索·恩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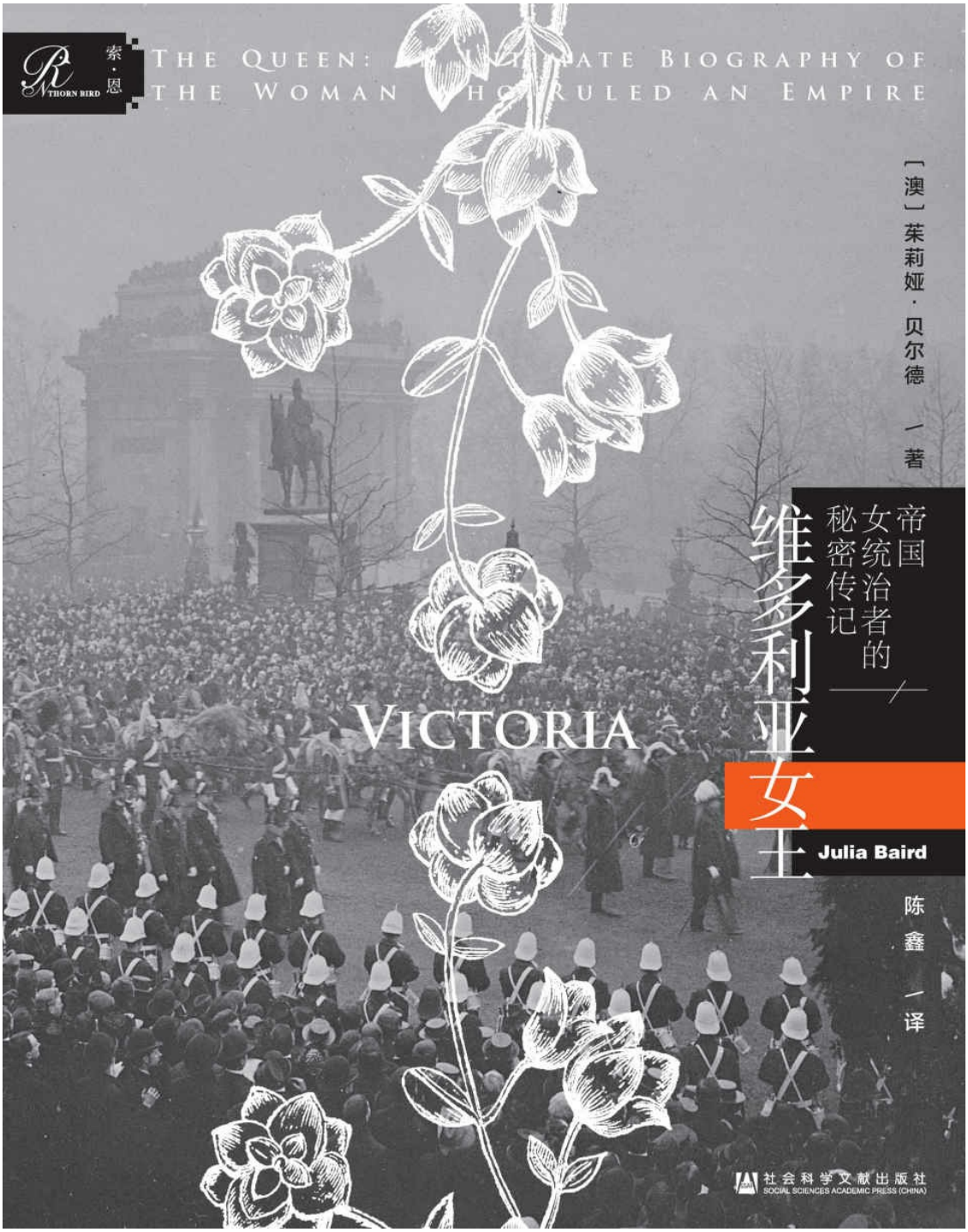
纵观一个多世纪
女性议题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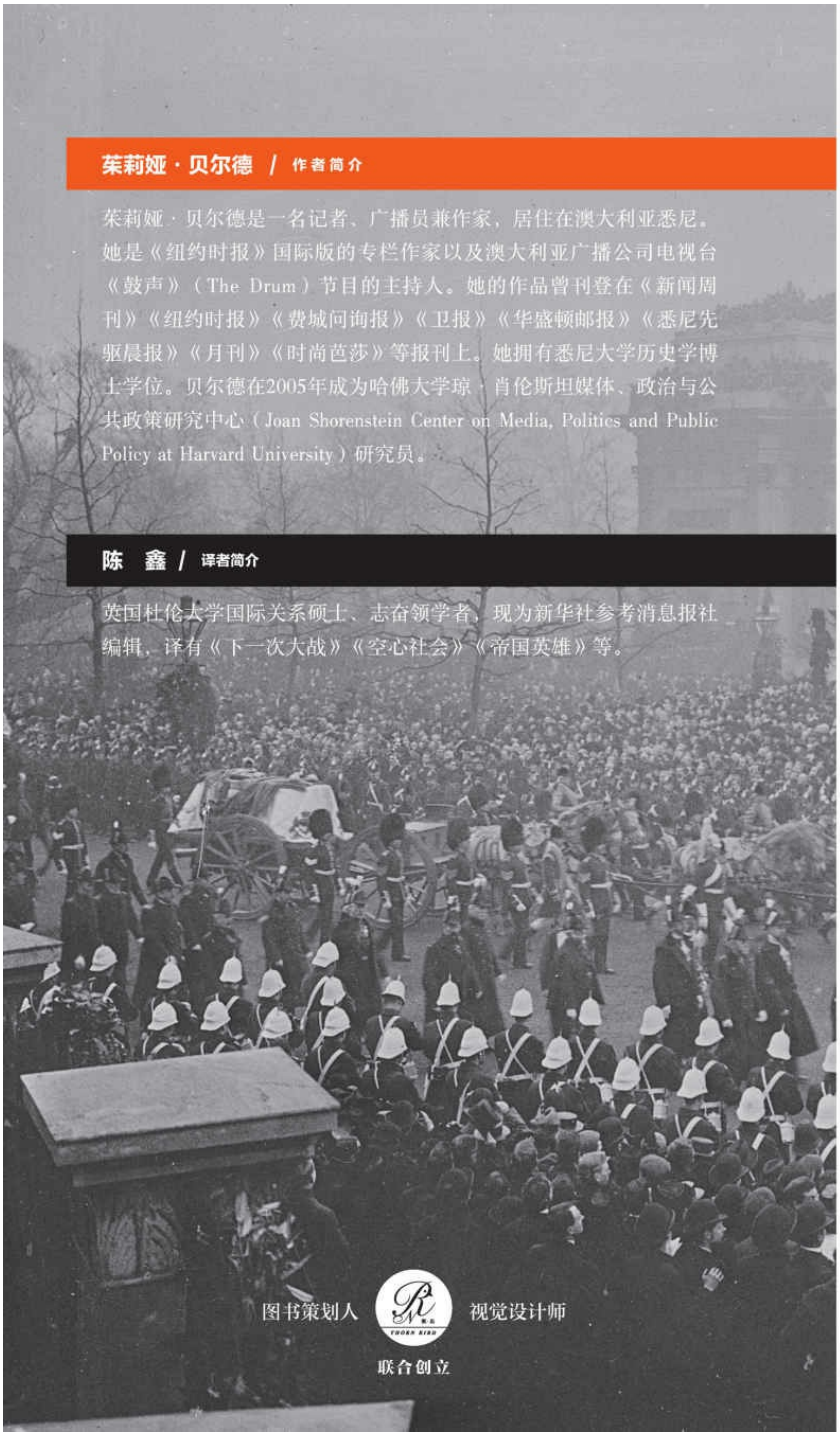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目录

- 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上、下）
- 天鹅之舞：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全2册）
-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全2册）


索·恩
THORN BIRD
THE QUEEN: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THE WOMAN WHO RULED AN EMPIRE
[澳]茱莉娅·贝尔德 著
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
维多利亚女王
VICTORIA
Julia Baird
陈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茱莉娅·贝尔德 / 作者简介

茱莉娅·贝尔德是一名记者、广播员兼作家，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她是《纽约时报》国际版的专栏作家以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鼓声》（The Drum）节目的主持人。她的作品曾刊登在《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费城问询报》《卫报》《华盛顿邮报》《悉尼先驱晨报》《月刊》《时尚芭莎》等报刊上。她拥有悉尼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贝尔德在2005年成为哈佛大学琼·肖伦斯坦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Joan 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t 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员。

陈　鑫 / 译者简介

英国杜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志奋领学者，现为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编辑，译有《下一次大战》《空心社会》《帝国英雄》等。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Victoria：The Queen：An Intimate Biography of the Woman Who Ruled an Empire

by Julia Baird

Copyright © 2016 by Julia Baird

THE QUEEN: AN INTIMATE BIOGRAPHY OF THE WOMAN WHO RULED AN EMPIRE

[澳]茱莉娅·贝尔德 著

维多利亚女王

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

VICTORIA

Julia Baird

陈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肯特公爵爱德华是一个骄傲又尚武的男人。他十分溺爱自己的女儿，并且夸耀说，尽管可能性很小，但有一天她终将成为女王。



◆维多利亚的母亲、德意志人维克图瓦在英格兰始终是一个外人，

但她渴望为自己赢得更大的权力。



◆身体强健的小维多利亚被形容成“穿着衬裙的国王”；年幼的公主十分喜爱玩偶，经常发脾气。



◆当18岁的维多利亚被告知国王已死时，她已经准备好成为女王了。但她的家庭女教师却徘徊在门后，手里拿着嗅盐。



◆到1851年，他们在婚礼上穿过的婚纱和礼服已经有些紧了——但即使在11年后，维多利亚也喜欢重现这一时刻，以提醒公众她仍然是她英俊新郎的新娘。



◆美国画家托马斯·萨利迫切地想要捕捉维多利亚在加冕年的“甜美嗓音”和“优雅举止”。她因为自己的仪态而备受称赞，在她身边的男人们笨手笨脚地排队并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时，她却一直保持着端庄的姿态。





◆被迷得神魂颠倒的维多利亚在日记里写道，阿尔伯特“超级英俊”。她还对阿尔伯特的“美髭”十分着迷，以至于她要求英国军队中的所有士兵都留同样的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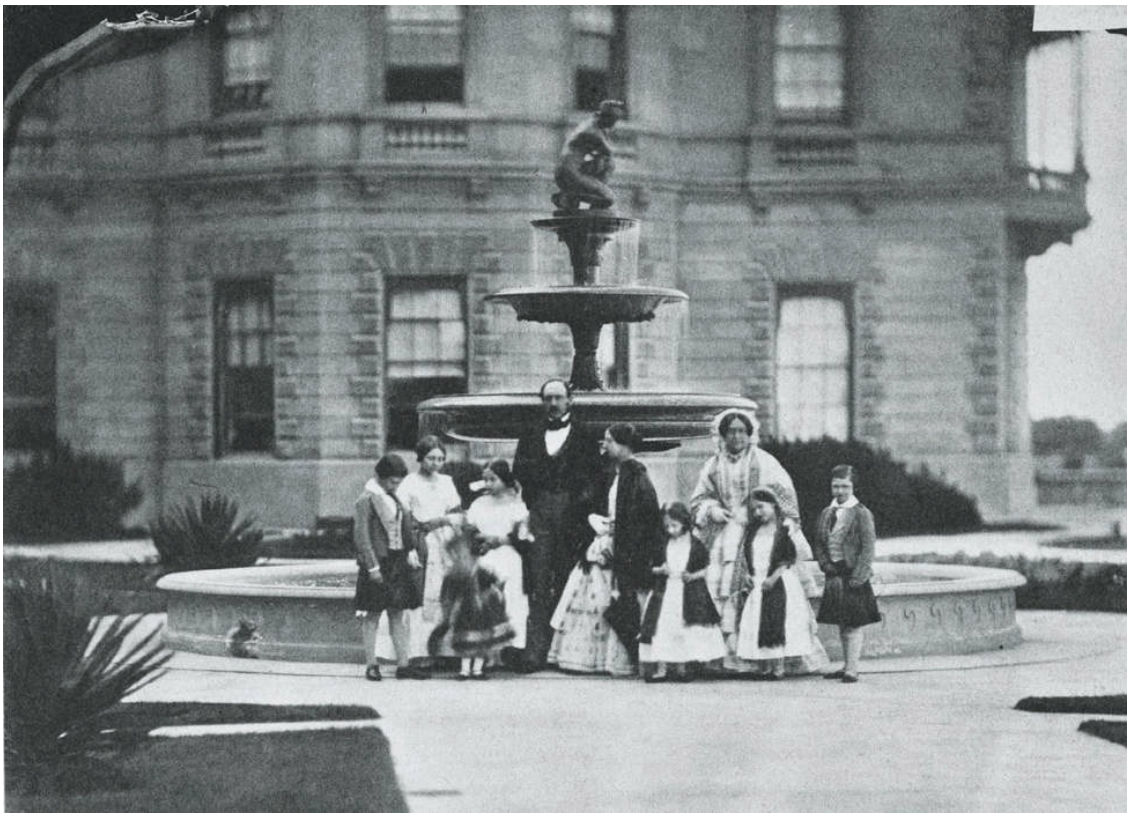
◆1859年，在年届四十之际，维多利亚到达了自己生命中的顶峰——拥有9个孩子，国家避免了革命，还有一个深受她喜爱的丈夫。她认为这幅由宫廷宠臣弗朗兹·克萨韦尔·温德尔哈尔特创作的肖像画非常出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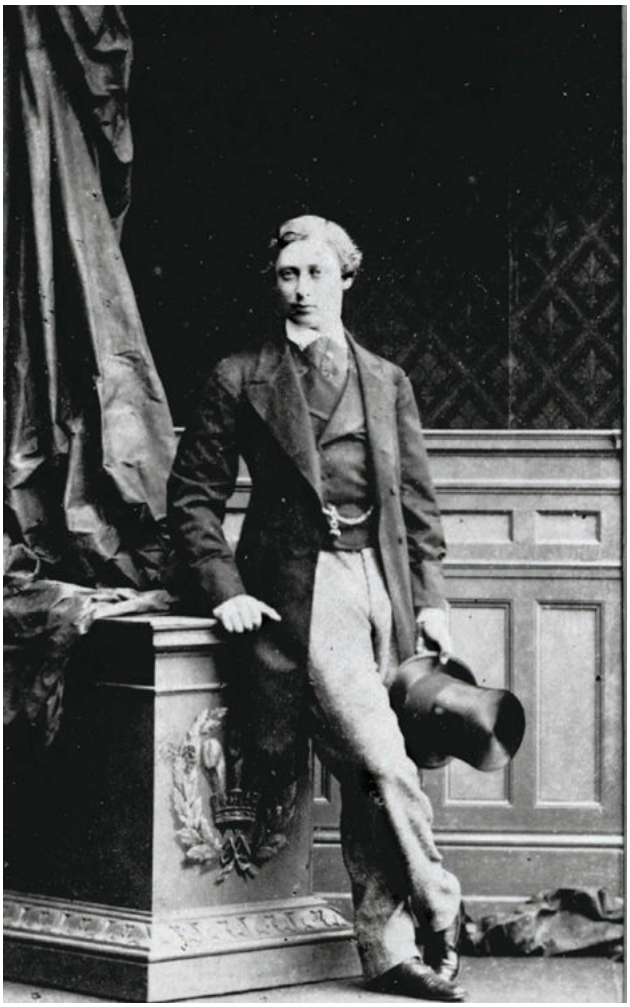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大女儿薇姬早熟又聪慧。她在还是一名少女时就嫁作人妇，并迁居普鲁士，但在那里，她一直与心怀敌意的公众和性格酷烈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做斗争。



◆维多利亚（照片中与伯蒂、薇姬、爱丽丝和阿尔弗雷德在一起）是一名坚定执行纪律的母亲，深度参与了孩子们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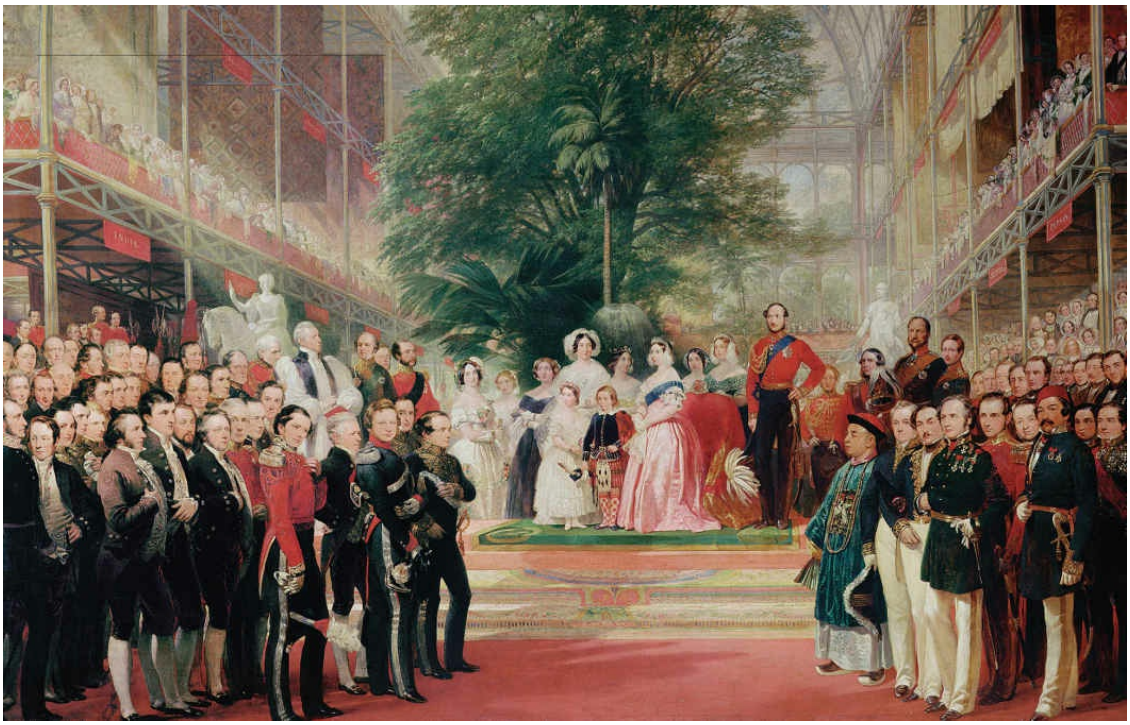
◆奥斯本宫位于苍翠而安静的怀特岛，是英国王室拥有的第一栋私人宅邸。一直渴望安静与清新空气的维多利亚感到非常激动：“全都是我们自己的。”



◆伯蒂是一名十分喜爱社交的男孩，他的魅力超越了他的智慧；他的父母曾经带他去检查颅骨，寻找是否有瑕疵。这位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很清楚父母对他的失望，因此颇具反叛精神，并纵情酒色之中。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十分溺爱他们最小的孩子比阿特丽斯（这是维多利亚画的素描画）。在阿尔伯特去世的当晚，维多利亚抱着她睡着了，并从此以后一直对她维持着强有力的掌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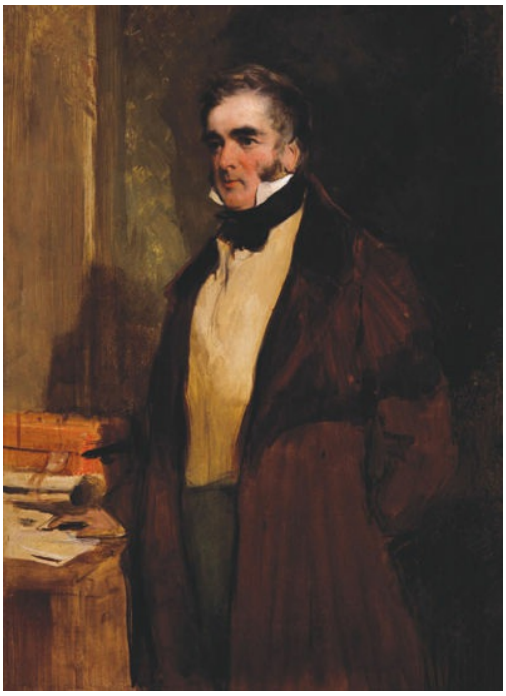
◆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最光辉的成就，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尔伯特。她写道：“我们几乎有能力做成任何事。”



◆维多利亚的家庭女教师莱岑女男爵一直致力于教会她的年轻学生成为一名强大而固执的女王。阿尔伯特后来认定她对自己的妻子产生了太大的影响力，并迫使她离开。



◆维多利亚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国王为这位失去父亲的公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指导和温柔的关怀。他还鼓励她嫁给自己的表弟阿尔伯特，并借此将一个科堡家族的人放在了英国权力的顶峰。



◆维多利亚对幽默的首相墨尔本勋爵变得十分迷恋，他也十分喜欢她。后来，维多利亚以及她信件的编辑都对她当时对一名年老男子溢于言表的喜爱感到十分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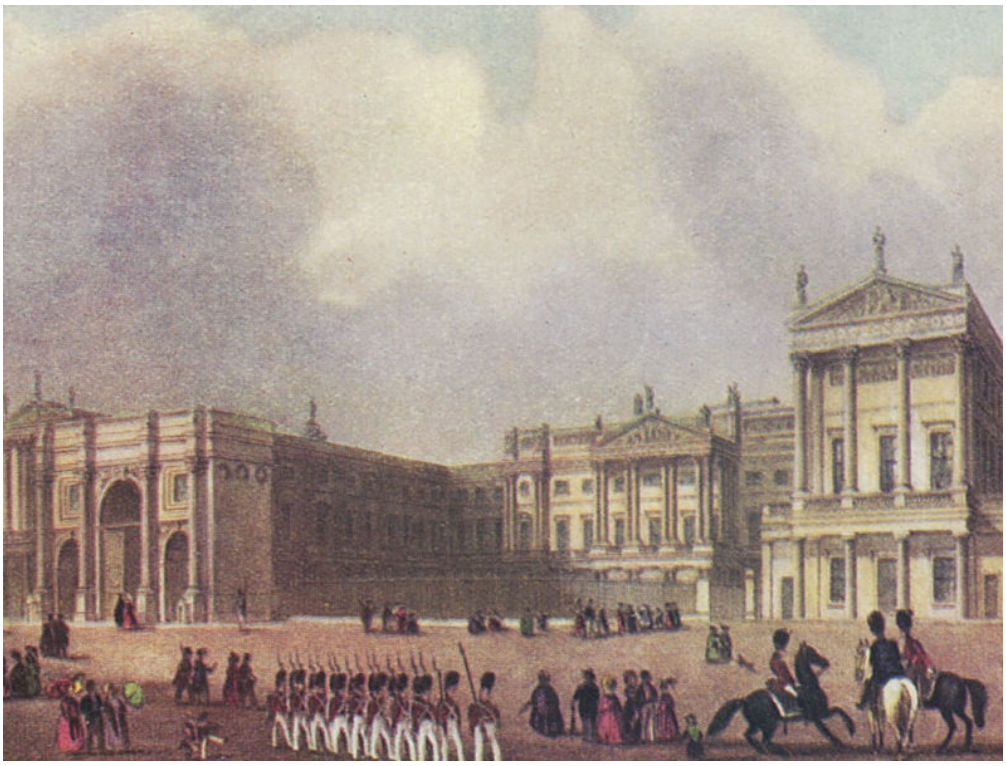
◆前陆军军官约翰·康罗伊迫切地想要控制王权，并试图欺负尚未成年的维多利亚，逼迫她将权力交给他和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十分鄙视他。



◆丁尼生勋爵的诗句为因丧偶而悲痛万分的维多利亚带来了安慰。他是少数认识到她在“那么可怕的高处”究竟有多么孤独的人之一。



◆维多利亚觉得罗伯特·皮尔既古板又保守；在登基成为女王后不久，她就曾一度阻挠他成为首相，好让墨尔本勋爵留在台上。但阿尔伯特很欣赏他，最终，她也喜欢上了他。



◆刚成为女王，维多利亚就想要住进宽敞明亮的白金汉宫。最终，白金汉宫糟糕的卫生设施和通风设施将让它变得十分压抑。



◆在宽敞的温莎城堡里，维多利亚从未产生过家的感觉，但在1861年阿尔伯特在温莎城堡去世后，她小心翼翼地将他的房间按照他在世时的样子保留了起来。



◆阿尔伯特曾与著名建筑师托马斯·丘比特合作，共同建造意大利风格的奥斯本宫，对他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避暑圣地。



◆这对王室夫妇在1848年首次看到巴尔莫勒尔城堡，就立刻被它迷住了。维多利亚写道，它“似乎呼吸着自由与祥和的空气，让我忘记了这个世界及其悲伤的动荡”。





◆苏格兰高地的与世隔绝让阿尔伯特兴奋不已，他告诉自己的继母：“我很少看到人的面孔；山顶被积雪覆盖，野鹿寂静无声地在房子周围走动。我作为一个淘气的家伙，也在悄无声息地跟踪这些无害的野鹿。”维多利亚会焦急地等待丈夫打猎收获的消息。



◆作为一名进步思想家、博学家和工作狂，阿尔伯特在现代君主制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无党派偏好、尊重宪法且受人尊敬，这些是现代君主制的特点。尽管只有30多岁，但阿尔伯特巨大的工作负担、忧郁的性格和糟糕的身体状况让他看起来似乎比实际年龄要更老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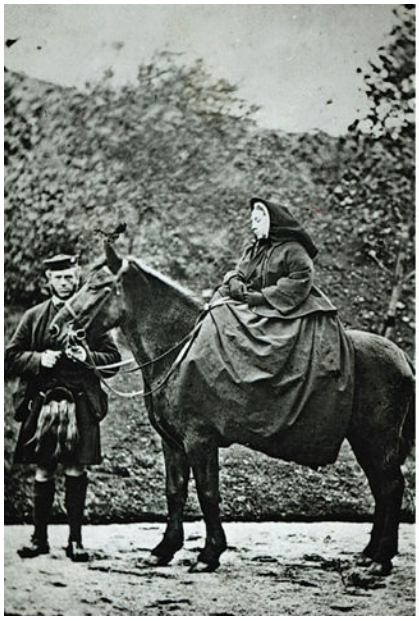
◆这幅阿尔伯特的纪念肖像画将他刻画成了一个年轻人，身穿基督教骑士的盔甲，结束了一生的战斗。维多利亚的题词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



◆1862年，在父亲去世仅仅几周后，杰出艺术家露易丝公主画了这幅维多利亚在梦中与阿尔伯特团聚的画。创作的日期是2月10日，也就是他们的纪念日。



◆在阿尔伯特去世后，维多利亚女王开始在拍摄照片时重现严肃的悼念场景，让她的女儿们围在他的半身像周围。一名侍女写道：“王宫有如庞贝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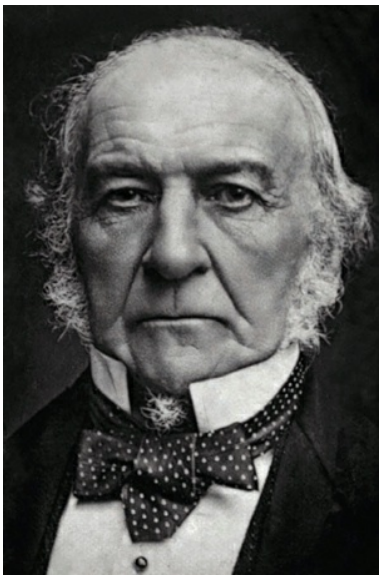




◆她的孩子们称他为“女王的种马”，但维多利亚却骄傲地称约翰·布朗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曾对他说：“没有人比我更爱你。”强壮、魁梧且无礼的布朗是唯一能够说服维多利亚去做一些她不愿做之事的人。



◆派头十足的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将恭维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经常取悦并奉承维多利亚，称她为他的“仙女王”。



◆理智的威廉·格莱斯顿四次出任首相。他深受英国公众的喜爱，却完全无法赢得维多利亚的青睐。他曾说：“光是女王自己就足以杀死任何人。”



◆维多利亚在外孙德皇威廉二世的怀中死去。仅仅14年后，他就将与英国开战。



◆在小女儿比阿特丽斯嫁给巴腾堡的亨利后，维多利亚有7个月的时间没有跟她说话。当帅气的亨利在非洲外海的一艘船上去世后，两个女人再次相依为命。



◆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伯蒂喜欢赌博、赛马和嫖妓。即使在年岁渐长之际，维多利亚仍然不愿将任何正式职权交给她的大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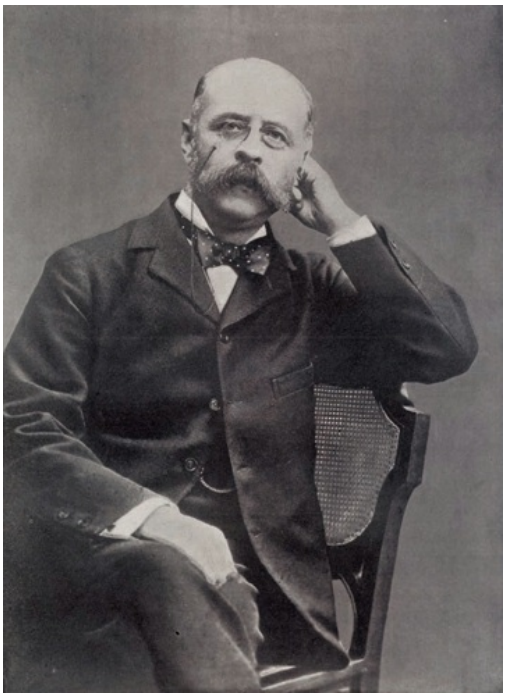
◆被称作“孟希”的阿卜杜勒·卡里姆通过诱骗的方式赢得了维多利亚的喜爱，先是担任她的仆人，后来又成为书记员。她的家人非常厌恶他，也不信任他。



◆即使在80岁的年纪，维多利亚依然主张她作为君主的全部权力。她仔细阅读了布尔战争的战报，这场战争爆发于1899年。



◆尽管维多利亚有着强烈的幽默感，但很少有照片捕捉到维多利亚的微笑。这张照片拍摄于1887年她的金禧庆典期间；她的女儿们认为，这对于一名君主而言是一张不太妥当的照片。



◆苏格兰医生詹姆斯·里德在维多利亚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在尽责地照看她。她将有关自己葬礼的指示托付给他，还将自己生命中最隐私的秘密一并交给了他。他保存完好的笔记为了解女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视角。



◆维多利亚女王在1901年去世时，街上挤满了人，而且寂静无声。作家亨利·詹姆斯写道：“我们都感觉失去了母亲。”

［维多利亚女王不］属于任何已知类型的君主或者女性，她与英国贵妇没有任何相似点，与富裕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也没有相似点，更不像来自德意志宫廷的典型公主……她的统治时间比另外三位女王加起来都要长。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来不可能被与其他任何人弄混，也不会与历史上的任何人弄混。所谓“人民喜爱维多利亚女王”或者“那种女人”的说法不可能用在她身上……在60多年时间里，她仅仅是“女王”，不带任何前缀或者后缀。[1]

——阿瑟·庞森比

我们都在观察女王生病的迹象；但……她性格中最为非凡的钢筋铁骨让她撑到了最后一刻，与任何人都不一样。[2]

——利特尔顿夫人

---

[1]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70.

[2] “We are all on the look-out”：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July 1844，348.

- 人物介绍
- 地图
- 家谱
- 序言
- 第一部分 维多利亚公主：“可怜的小维多利”
  - 1 “袖珍大力神”的诞生
  - 2 父亲之死
  - 3 孤独、淘气的公主
  - 4 难以置信的疯狂
  - 5 “家庭中的可怕事件”
- 第二部分 年少女王
  - 6 成为女王：“我还很年轻”
  - 7 加冕仪式：“一个源自《天方夜谭》的梦”
  - 8 学习统治之术
  - 9 宫廷丑闻
- 第三部分 阿尔伯特：或谓之为“王”的男人
  - 10 恋爱中的悍妇
  - 11 新妇叹良宵
  - 12 仅为夫君，而非主君
  - 13 宫廷闯入者
  - 14 实际上的国王：“就像一只冲向猎物的秃鹫”
  - 15 完美无瑕、令人敬畏的繁荣
  - 16 奇迹年：革命之年
  - 17 阿尔伯特的杰作：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
  - 18 克里米亚：“这场差强人意的战争”
  - 19 王室父母与“不满之龙”
- 第四部分 温莎寡妇
  - 20 “再也无人唤我维多利亚”
  - 21 “王宫有如庞贝一般”
  - 22 复苏温莎寡妇
  - 23 女王的种马
  - 24 仙女王觉醒
- 第五部分 女王，女皇
  - 25 足以杀死任何人
  - 26 “钢铁碰撞”：女王与格莱斯顿先生
  - 27 头戴软帽的君主

    - 28 “可怜的孟希”
    - 29 钻石帝国
    - 30 维多利亚时代落幕：“街道上呈现出奇特的景象”
- 致谢
- 注释
- 文献
- 索引

人物介绍

维多利亚的家人

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后来的肯特公爵（Duke of Kent，1767～1820）。乔治三世国王的第四子，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他身体强壮、为人正直，作为一名军官，他严守纪律，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温柔的丈夫和父亲。在经历了一段担任直布罗陀总督和英国陆军元帅的争议职业生涯后，爱德华开始致力于为王室生育继承人。在他的父亲乔治三世国王去世仅仅6天后，他就因肺炎而死，此事距离他女儿出生刚刚过去了不到一年，他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感到无比自豪。

玛丽·路易斯·维克图瓦（Marie Louisse Victoire），肯特公爵夫人（1786～1861）。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同时也是霍恩洛厄—朗根堡公主菲奥多拉的母亲。肯特公爵成功说服忍受丧夫之痛的维克图瓦嫁给他，并且从德意志迁居英格兰。她与维多利亚之间的母女关系有如暴风骤雨般，十分恶劣；两人在维多利亚少女时代就开始疏远，在后者继位为女王后逐渐被公众所知。但她们最终还是和解了，当母亲在1861年去世时，维多利亚伤心至极。

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从1760至1820年担任大不列颠国王（后来的联合王国国王），是维多利亚的祖父。尽管他是英国历史上（仅次于伊丽莎白二世和维多利亚的）在任时间最长的君主，还过着正直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但乔治三世最出名的还是他反复无常、无法

控制的疯狂行为，以及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去北美殖民地的过失。他的精神错乱——以及这种病症发生遗传的可能性——困扰了维多利亚好几十年（也给她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

乔治四世（George Ⅳ，1762～1830）。在乔治三世患病期间出任摄政王，后来乔治·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王子于1820年1月29日继位为国王。乔治四世是一个骄奢淫逸、大腹便便的男人，十分看不起自己的妻子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对她进行了迫害，并且一直与情妇住在一起。他的独生女夏洛特公主在分娩时去世。他与侄女维多利亚的关系有时十分紧张，但他后来送给她一头驴，并且在花园里为她举办了一场《潘趣与朱迪》表演，让她很开心。

威尔士公主夏洛特·奥古斯塔（Princess Charlotte Augusta of Wales，1796～1817）。乔治四世的独生女。她深受喜爱，也被期待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女王，但在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分娩后，她不幸离世，促使她臃肿的中年叔叔们为王位生育合法继承人竞争。她还留下了一个悲痛欲绝的鳏夫，也就是维多利亚那位英俊帅气、野心勃勃、温柔亲切的舅舅利奥波德。

威廉四世（William Ⅳ，1765～1837）。乔治三世的第三子，也是哥哥乔治四世的继任者。他在24岁的年纪从海军退役，并且在4年后加冕为国王。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与情妇生育了10个私生子。他后来迎娶了萨克森—迈宁根公国广受赞誉的阿德莱德公主，但他们生育的孩子全都死于襁褓之中，这意味着在他死后，王位直接就传给了他的侄女维多利亚。

恩斯特·奥古斯塔斯（Ernest Augustus，1771～1851）。乔治三世的第五子，因萨利克继承法禁止他的侄女维多利亚继承汉诺威王位，他继位为汉诺威国王。恩斯特是一名极端的保守党人——他也被人称作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他是人们恐惧以及八卦的对象，原

因是他脸上有着巨大的伤疤，还有一些未经证实的谣言声称他曾经与自己的姐妹同床共枕、性骚扰过修女，以及谋杀过一名贴身男仆。

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王子（Prince Augustus Frederick），后来的萨塞克斯公爵（Duke of Sussex，1773～1843）。乔治三世的第六子。他曾经两次迎娶没有得到父亲认可的女性，违反了《王室婚姻法》，因而失去了继承权。

阿道弗斯王子（Prince Adolphus），后来的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1774～1850）。乔治三世的第七子。他还是（乔治五世的妻子）玛丽王后的外祖父以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曾曾外祖父。

维多利亚的丈夫和孩子

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1819～1861）。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夫。出生在科堡附近的罗泽瑙城堡，比维多利亚小三个月。阿尔伯特的童年一直笼罩在父母婚姻破裂的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博学而自律的人，阿尔伯特渴望成就一番伟业并保持高尚的道德水准，维多利亚也十分崇拜他。尽管天赋昭彰，但他却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善良的阿尔伯特”，其他人却将他斥为“国王阿尔伯特”——一个外来闯入者。他因为在举办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过程中起到的杰出作用而广受赞誉。孜孜不倦的工作和糟糕的身体状况导致他在1861年12月就英年早逝，享年42岁。

维多利亚·阿德莱德·玛丽·露易丝公主（Princess Victoria Adelaide Mary Louise，1840～1901）。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第一个孩子，尽管她早熟又聪明，但在她的弟弟们出生后，她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机会。17岁时，她嫁给了未来的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她的婚姻很幸福，但她在德意志的生活却很痛苦；她感到被排斥、被误解，而且孤独无依。她的两个儿子不幸夭折，而大儿子威廉变得尤为残忍。薇姬（Vicky）与母

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书信往来，撰写了大量信件，并以这种方式相互倾诉，她们的去世时间也仅仅差了半年。

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威尔士亲王，后来的爱德华七世（1841～1910）。维多利亚的第二个孩子，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性格暴烈、喜欢热闹的“伯蒂”（Bertie）从来没有表现出姐姐那样的聪明特质，他的父母也因此对他苛责良多。维多利亚指责他和他不道德的越轨行为造成了父亲的早逝，并且拒绝让他在她还在世时承担任何重要职责。尽管父母对他持保留意见，但伯蒂后来在短暂的统治期间成为了一个施政得当、备受喜爱的国王。他的儿子乔治五世后来承继了他的王位。

爱丽丝·莫德·玛丽公主（Princess Alice Maud Mary，1843～1878）。维多利亚的二女儿和第三个孩子。爱丽丝生性叛逆，与哥哥伯蒂关系亲近，她的温柔在一心一意照顾奄奄一息的父亲和悲痛的母亲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在父亲去世6个月后与路易斯王子举行的婚礼是一场糟糕的婚礼，他们的婚姻也不幸福。尽管住在达姆施塔特，但她却不知疲倦地投身于护理事业，最著名的是她在普法战争期间的表现。在1878年12月14日因白喉去世时，她只有35岁，这时距离她父亲去世刚好过去了17年。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血友病基因，并且遗传给了好几个孩子，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后者最终选择雇佣拉斯普京来治疗她患有血友病的儿子。

阿尔弗雷德·欧内斯特·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fred Ernest Albert，1844～1900）。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第二个儿子，“阿菲”（Affie）后来成为德意志小小行省萨克森—科堡—哥达的统治者。作为一名能力优秀的海军军官（尽管他长期身处海上让女王感到沮丧），阿菲在成为科堡公爵后不得不放弃自己在海军的职业生涯。他是一名尽职尽责的统治者，但他不幸的婚姻和儿子的自杀让他陷入了酗酒的恶性循环。他于

1900年7月去世，比自己的母亲早了6个月。

海伦娜·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公主（Princess Helena Augusta Victoria，1846～1923）。维多利亚的三女儿和第五个孩子。小名“兰辰”（Lenchen）的她嫁给了相貌平平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松德堡—奥古斯腾堡的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王子，并且与他生育了4个孩子。海伦娜十分崇拜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后来于1889年成为英国皇家护士协会主席。她的住处离母亲不远，但基本上逃离了维多利亚的控制，在承担维多利亚秘书工作的同时，她还是多个慈善机构的赞助人。

露易丝·卡罗琳·阿尔伯塔公主（Princess Louise Caroline Alberta，1848～1939）。出生于革命之年的露易丝一直被人认为是个桀骜不驯、反复无常的女孩。她长大后成了一名天赋异禀的雕刻家，并且举止轻率，尤其与她的导师约瑟夫·埃德加·贝姆之间保持了一段亲密关系。美丽的露易丝后来嫁给了洛恩侯爵，但后来证明，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尽管遭到母亲的反对——维多利亚对于几个女儿的女学究倾向感到十分惊讶——但露易丝还是对全国妇女高等教育联盟的建立给予了鼓励，并出任该组织首任主席。她在二战爆发时去世，享年91岁。

阿瑟·威廉·帕特里克·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rthur William Patrick Albert，1850～1942）。维多利亚的三儿子和第七个孩子。在40年的军旅生涯中，阿瑟出任多支部队的总司令。或许可以说十分明智的是，他接受了母亲为他挑选的新娘，一名普鲁士公主，并且获得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至少以王室的标准来看是这样）。在哥哥阿菲去世后，阿瑟成为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继承人，但他打算在英国远程统治，这促使德国皇帝决定挑选另一名候选人。就这样，阿瑟差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自家人骨肉相残。

利奥波德·乔治·邓肯·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Leopold George Duncan Albert，1853～1884）。维多利亚的四儿子和第八个孩子，也是她在氯

仿的帮助下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利奥波德是一名有着强烈保守主义政治观点的知识分子，他的人生饱受血友病困扰。他的母亲和医生们对他进行了严密保护，防止他参与正常的活动。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牛津大学求学，作为奥尔巴尼公爵出任上议院议员，并且生育了一个女儿。在1884年他的31岁生日前夕，利奥波德不幸离世，这时他唯一的儿子尚未出生。

比阿特丽斯·玛丽·维多利亚·费奥多公主（Princess Beatrice Mary Victoria Feodore，1857～1944）。维多利亚的第九个，也就是最年幼的孩子，同时也是最受她喜爱的一个。在阿尔伯特死后，比阿特丽斯成为母亲身边最为固定的伴侣，尽管她在嫁给巴腾堡的亨利王子后曾经短暂地告别过这种经常令人感到窒息的角色。虽然维多利亚持保留意见，但“利科”（Liko）最终被证明一直到1895年去世都是一名模范女婿。作为维多利亚遗嘱的执行人，比阿特丽斯花费了许多年来改写和销毁女王的原始日志，并烧毁了她的许多信件，这是一种严重的审查行为。

维多利亚的孙辈

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德国皇帝，薇姬公主之子，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个孙辈。威廉以臀位出生，承受了巨大创伤；他的一只胳膊在出生时遭到扭伤，失去了作用，他的余生一直都在隐藏并补偿这一缺陷。他憎恨自己的母亲，并且对她十分粗暴。他表面上非常崇拜自己的外祖母，但他对自己国家的勃勃野心让英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具竞争性和敌对性。加冕为皇帝后，他将向自己的英国表弟乔治五世宣战。

乔治五世（George Ⅴ，1865～1936）。伯蒂的第二子，维多利亚的孙子。乔治五世在1910年至1936年间统治英国，而他的哥哥艾迪在1892年意外去世。（乔治还娶了哥哥的未婚妻特克的玛丽公主。）

王室成员

露易丝·莱岑女男爵（Baroness Louise Lehzen，1784～1870）。维多利亚的德意志女家庭教师和后来的宫廷女侍。在维多利亚的整个童年，莱岑都给予了她坚定的支持，训练她保持坚强并在面对批评和欺负她的人时捍卫自己。女王极度依赖莱岑的指导，这让阿尔伯特感到难以忍受。在经历一系列斗争后，阿尔伯特要求女男爵去德意志安静地过退休生活；她收拾好背包，在一个维多利亚仍在熟睡的早上离开了。

约翰·康罗伊爵士（Sir John Conroy，1786～1854）。最早是肯特公爵的侍从，后来成为其遗孀的顾问。康罗伊想方设法进入了维多利亚家庭的核心圈。康罗伊一心一意想要获得个人权力，并且试图强迫维多利亚同意在成为女王后任命他为私人秘书。维多利亚十分鄙视他，始终没有原谅他对她的严厉对待；她一当上女王就将他赶走了。

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Lady Flora Hastings，1806～1839）。宫廷女侍，后来成为肯特公爵夫人的侍女。当弗洛拉小姐出现腹部肿胀的症状时，她的宫廷中的对手们开始传出约翰·康罗伊爵士让她怀孕的流言蜚语。维多利亚愿意相信这种最糟糕的情况，在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的糟糕医术的助推下，维多利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流言蜚语。当弗洛拉小姐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疾病后去世时，年轻的女王公开喝倒彩，并遭到媒体的抨击。

詹姆斯·克拉克爵士（Sir James Clark，1788～1870）。在1837年至1860年间担任女王的私人医生。他在王室里漫长的职业生涯更多要归功于他的外交手腕，而不是高超的医术。他展露无遗的误诊能力，以及想要取悦女王的愿望，在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案例中将王室拖入了一场巨大丑闻之中。

冯·斯托克马男爵（Baron Von Stockmar，1787～1863）。他先是学

医，后来成为一名政治家，并作为利奥波德舅舅的秘书出任王室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是阿尔伯特亲王的亲密顾问以及莱岑女男爵的死对头。

利特尔顿夫人（Lady Lyttleton，1787～1870）。维多利亚的宫廷女侍之一，后来担任皇家保育院的院长。她是一名王室生活的敏锐观察家，曾经对维多利亚内在的“坚强性格”赞叹不已。

简·丘吉尔夫人（Lady Jane Churchill，1826～1900）。丘吉尔夫人从1854年到1900年去世一直担任宫廷女侍，她经常作为女王的传话人出现。如果有人违反了礼仪——例如参加宴会迟到或者在晚宴上笑得太大声——她会向当事人告知女王的不悦。她还负责为女王朗读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等人的小说。丘吉尔夫人忠诚地侍奉了维多利亚近半个世纪，在女王去世前仅仅一个月时去世。由于她没有留下任何日记或者回忆录，因此她的谨慎周到是完美无瑕的。

乔治·爱德华·安森（George Edward Anson，1812～1849）。阿尔伯特亲王的私人秘书，也是他最信赖的顾问之一。安森被证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经常担任这对时常闹别扭的王室夫妇的调停人。他突然早逝让阿尔伯特悲痛欲绝。

霍华德·埃尔芬斯通爵士（Sir Howard Elphinstone，1829～1890）。作为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老兵以及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埃尔芬斯通于1859年被任命为阿瑟王子的家庭教师，后来又担任利奥波德王子的家庭教师。

查尔斯·菲普斯爵士（Sir Charles Phipps，1801～1966）。女王的财务主管以及威尔士亲王的财务主管。他于1858年被封为骑士，在阿尔伯特临终前作为受他信赖的小圈子成员出现在他的床边。

查尔斯·格雷将军（General Charles Grey，1804～1870）。一名军官

和政客，以及女王在阿尔伯特去世后几年里的私人秘书。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为维多利亚未能出现在公众面前找借口。

亨利·庞森比爵士（Sir Henry Ponsonby，1825～1895）。女王忠诚、有洞见而且表情冷酷却十分幽默的私人秘书。他担任女王私人秘书长达38年之久，并在1879年荣获骑士勋位。

阿瑟·比格爵士（Sir Arthur Bigge，1849～1931）。他在1895年成为女王的私人秘书，并在同一年获封骑士。在维多利亚去世后，比格又先后为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服务，并在1911年成为上议院议员。

约翰·布朗（John Brown，1826～1883）。苏格兰高地人，被雇来担任阿尔伯特在巴尔默勒尔的室外男仆。在维多利亚因丈夫去世而悲痛不已之时，他被传召到英格兰来帮助她。她很快就对他形成了依赖，并发展出一段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关系将成为人们长期非议的主题。维多利亚的孩子们都很讨厌他，称他为“女王的种马”。

当维多利亚的遗体下葬时，布朗母亲的婚戒被戴在了她的手上。在维多利亚死后，爱德华七世烧掉了任何有可能败坏她名声的信件。

阿卜杜勒·卡里姆（Abdul Karim，1862或1863～1909）。女王的印度秘书及“孟希”（munshi），或者说书记员。卡里姆在王室里迅速从一名仆人崛起为备受信赖的顾问，这在王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感，尤其是在女王的子女之中，但维多利亚对他的虚伪和欺骗却视而不见。在女王去世后，爱德华七世国王命令烧毁了孟希的文件，因此对于他的真实影响力，我们只能进行猜测。

詹姆斯·里德爵士（Sir James Reid，1849～1923）。女王最喜爱的私人医生。他在1883年约翰·布朗病危期间诊治过他，并且接生了比阿特丽斯公主的所有四个孩子。里德的谨慎、医术和可靠使他成为女王身

边不可或缺的人物。女王还将自己对葬礼的最后请求托付给里德。她在他的怀中死去。

其他王室成员

费奥多拉（Feodora，1807～1872），霍恩洛厄—朗根堡公主。深受维多利亚女王喜爱的同母异父姐姐费奥多拉是肯特公爵夫人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女儿。当维多利亚仅有8岁时，迷人的费奥多拉成婚并迁居德意志。这对同母异父的姐妹坚持通信几十年；当费奥多拉在1872年去世时，维多利亚悲痛不已。

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Ⅰ，1790～1865），比利时国王。备受维多利亚尊敬的舅舅，也是夏洛特公主的鳏夫。利奥波德从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儿时起就一心一意想要撮合他们，对维多利亚而言，他就像父亲一般；他提出了源源不断的建议，并且悉心关怀她的教育、健康、心理发育以及婚姻。

利奥波德二世（LeoplodⅡ，1835～1909），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儿子。他在刚果的统治充满了无情和残暴的剥削以及大屠杀。

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在1848年革命后被迫退位，流亡大不列颠，并且居住在萨里郡的克莱尔蒙特。他的女儿露易丝-玛丽公主是维多利亚的舅舅利奥波德的第二任妻子。

维多利亚的同时代人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作为一名脾气暴躁但举世闻名的苏格兰作家兼历史学家，卡莱尔为维多利亚一生中发生的诸多大事件提供了第一手的记录。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狄更斯对于君主制没有什么敬畏之心；他认为自己比女王名气更大，因此一直试图避开她。维多利亚却非常崇拜他，并且津津有味地阅读他对伦敦下层社会的描写。两人一直到1870年才第一次见面，这时距离他去世仅有不到3个月时间。她将他描述为“非常和蔼可亲，有着令人愉悦的声音和举止”。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一位杰出的护士，为军队中的医疗体系带来了一场革命，尤其著名的是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表现。她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包括女王和她的几个女儿，爱丽丝、薇姬和海伦娜。尽管自己身体状况欠佳，但南丁格尔一直在倡议对医院和卫生管理体系进行结构和文化上的变革。她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颁大英帝国勋章的女性。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Lord Tennyson，1809～1892）。这位杰出的桂冠诗人就住在怀特岛上女王的别墅附近。在女王为丈夫去世而哀悼期间，他成为女王的密友，他的诗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安慰。他在1883年获封爵位。

首相们

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1779～1848）。年轻女王的第一个也是最受她信赖的首相。在经历了混乱而痛苦的个人生活后，墨尔本与这位18岁的年轻女王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当他的政府最终下台时，维多利亚感到心烦意乱。多年以后，她将为自己曾经对这位首相产生的强烈情感感到难堪。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1788～1850）。墨尔本勋爵政府下台后上任的首相。最初，维多利亚因为他把墨尔本赶下台而讨厌他，还对他在社交场合的缄默感到愤怒。但在看到他优秀的能力，以及愿意为捍卫自己信仰而不顾个人损失地斗争之后，她对他的敬意油然而

生。尽管皮尔是一名保守的保守党人，却锐意改革，并成功废除了不受欢迎、支持保护主义的《谷物法》，这也让他成为受到自己所在党派憎恨的人物。阿尔伯特将他当成一个父亲一般的人物。

拉塞尔勋爵（Lord Russell，1792～1878）。一名自由派改革家，两次出任首相。他是1832年改革法案的设计者，有人曾认为，这份改革法案标志着君主直接权力衰落的开始。他最大的失败是未能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爱尔兰饥荒期间为爱尔兰人提供帮助，这恶化了未来几十年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关系。

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1784～1865）。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巴麦尊最初很受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欢迎，但后来他们多次因他的自由派干预主义外交政策，以及在他们看来凡事不与他们商量的羞辱性做法而与他发生冲突。维多利亚曾反复要求将他解职。

德比勋爵（Lord Derby，1799～1869）。德比曾三次出任首相，尽管每次都是少数派政府，十分短命。后来他出任保守党领袖长达创纪录的22年。或许他最大的成就是在1867年确保第二改革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从而让选民规模扩大了一倍，并且给予了大量中产阶级投票权。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派头十足的小说家、保守派政客，并且两次出任首相。尽管他信仰英国国教，但他却是首位——也是唯一的——犹太裔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充满敬意的奉承、灵巧的语言天赋以及颇具趣味性的奇闻逸事深得维多利亚的喜爱。作为一名熟练的外交家，迪斯雷利还奉行进攻性外交政策，并且在议会中推动具有进步性的立法日程。

威廉·格莱斯顿爵士（Sir 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自由党领袖，四次出任首相，格莱斯顿以“英国政治的元老”之名而著称。他信仰虔诚，会回到自己的乡间别墅连续数月只做一件事——砍树，并且

对拯救“风尘女子”有着奇特的热衷。尽管格莱斯顿对治理国家态度严肃，但他却始终未能赢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敬意。她曾下大力气试图阻止他成为首相。

罗斯贝里伯爵（Earl of Rosebery，1847～1929）。不情不愿地在维多利亚的强迫下代替格莱斯顿出任自由党的首相。他的首相任期仅仅持续了一年左右。

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1830～1903）。维多利亚的最后一个首相，索尔兹伯里当了三任首相，并且与维多利亚一起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及其主要支持者格莱斯顿。维多利亚后来十分喜欢他文雅又充满敬意的处事方式。作为一名热忱的帝国主义者，索尔兹伯里主张“光荣孤立”政策，避免与其他大国结盟。

其他人物

阿方西娜-泰雷兹-贝尔纳迪娜-朱莉·德蒙热内·德圣-洛朗夫人（Madem Alphonsine-Thérèse-Bernabdine-Julie De Mont-Genêt De Saint-Laurent，1760～1830）。通常被称作“朱莉”，她是肯特公爵在迎娶维多利亚母亲之前的30年里的情人。

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Alexandra of Denmark），威尔士亲王夫人，后来的英国亚历山德拉王后（1844～1925）。作为伯蒂的妻子，“阿利克斯”（Alix）既优雅又善良，还十分宽容。尽管阿利克斯的丹麦血统曾经带来不便，主要是因为错综复杂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但维多利亚还是经常说，她喜欢这位儿媳胜过自己的女儿们。英国民众也很爱戴阿利克斯——与此同时，她丈夫狂欢作乐的性子却引得民众纷纷侧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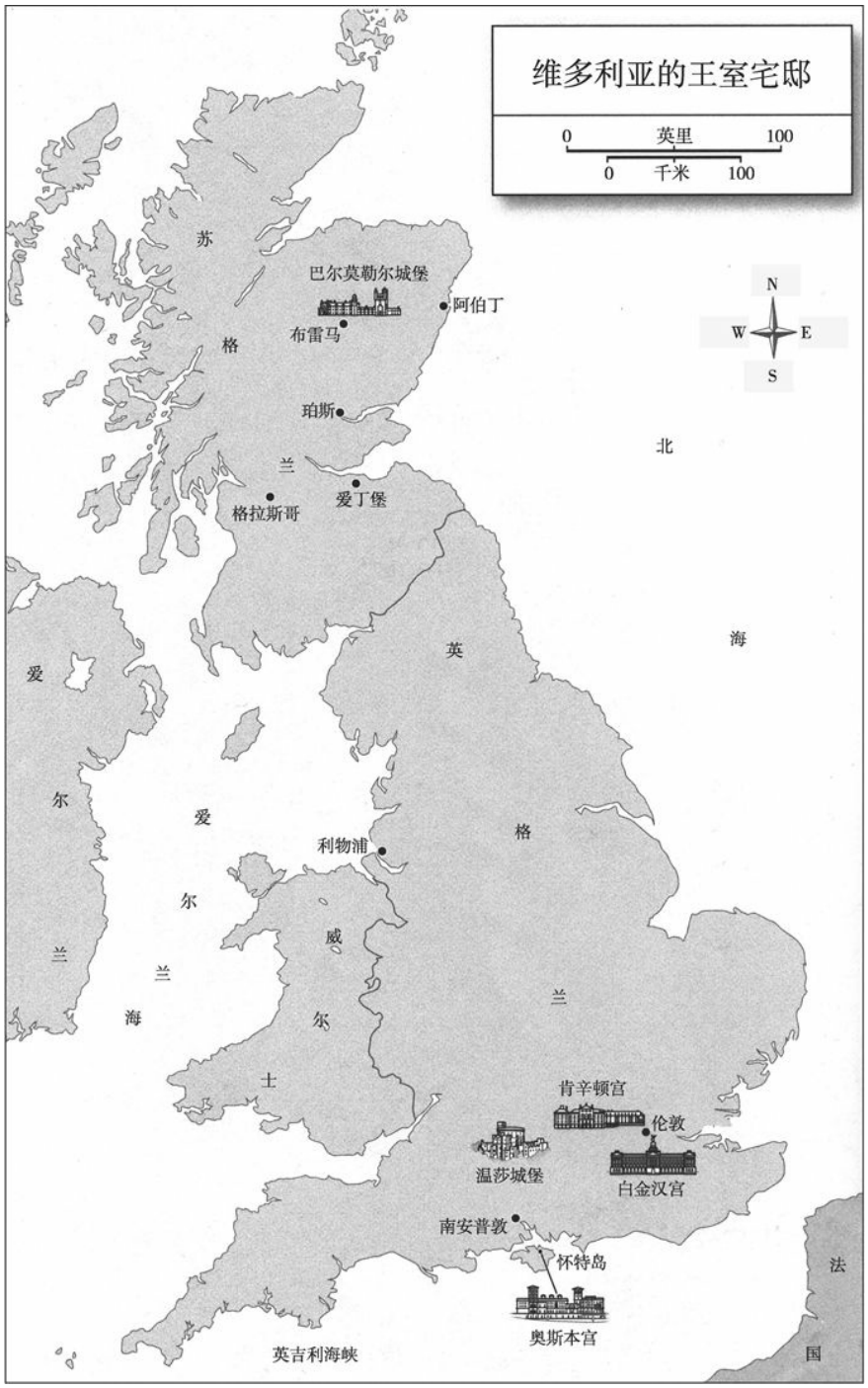
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Sir Joseph Paxton，1803～1864）。一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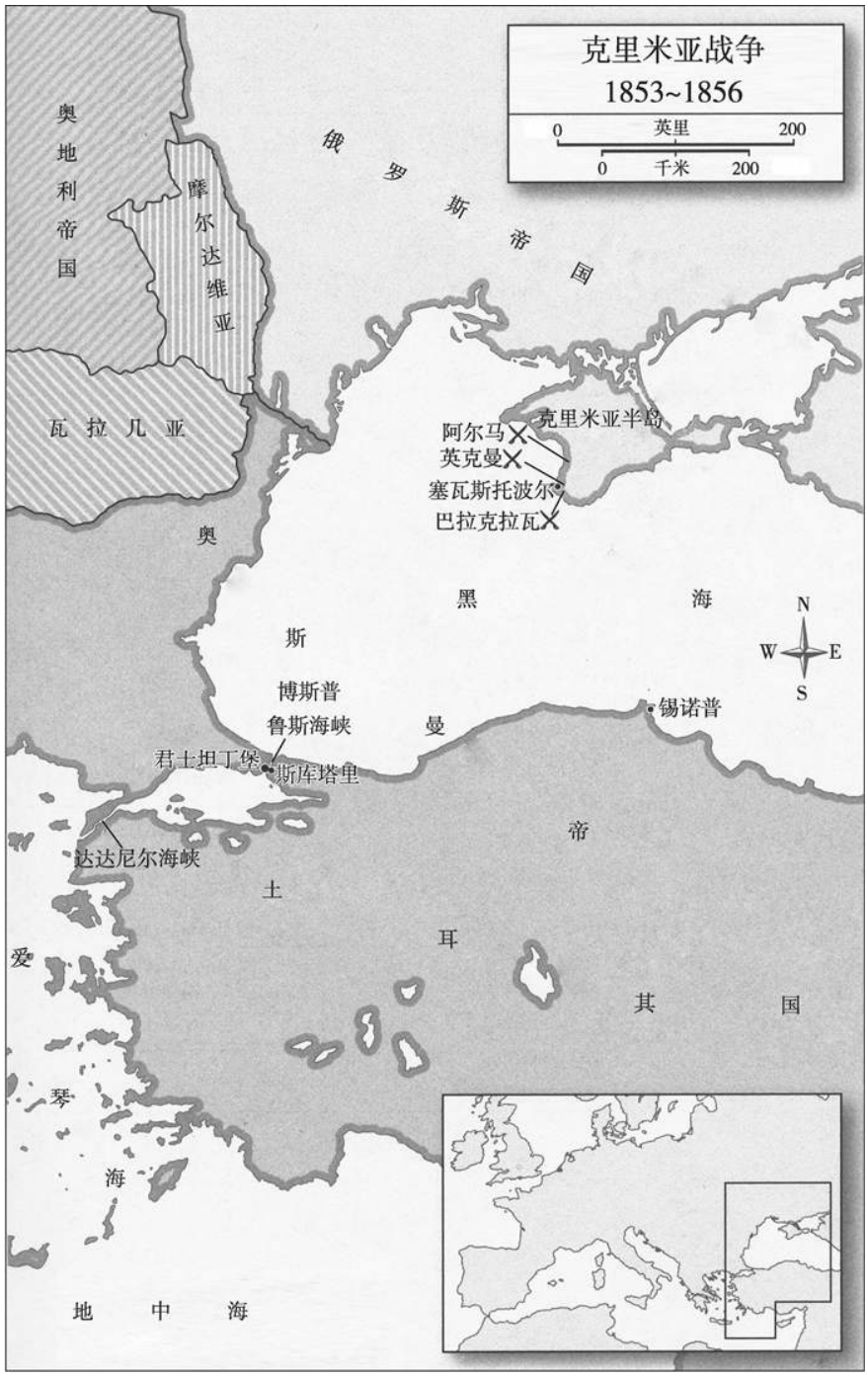
观园艺师和建筑师，为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设计了水晶宫。

约瑟夫·埃德加·贝姆爵士（Sir Joseph Edgar Boehm，1834～1890）。一名杰出的维也纳雕刻家，女王曾委托他制作了40多座王室雕像。贝姆与露易丝公主的关系十分亲密，后者曾经师从他学习雕刻艺术。当贝姆在工作室里突然去世时，露易丝公主也在场；有人猜测，他是在经过了剧烈的性活动后筋疲力尽而亡的，贝姆相关档案被摧毁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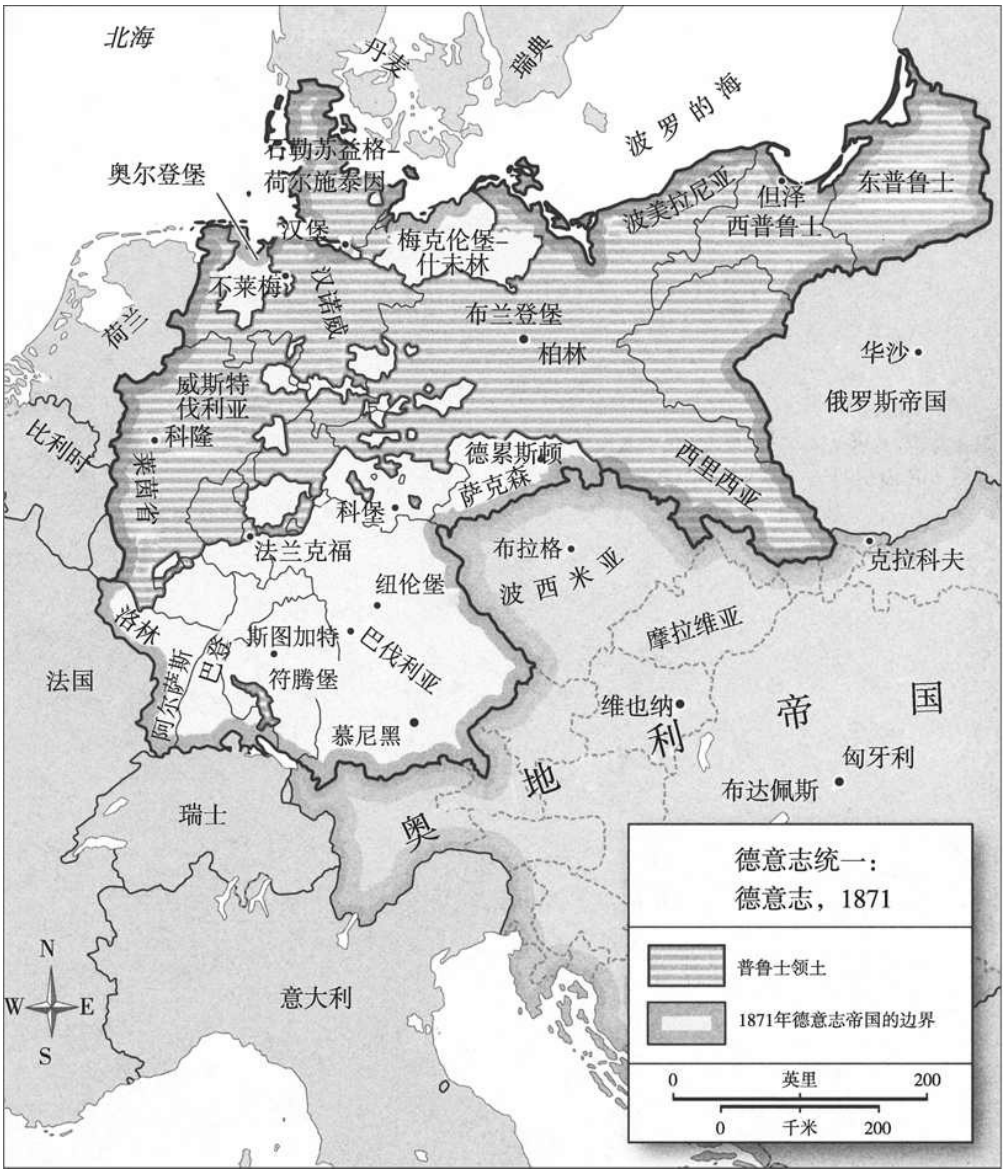
查尔斯·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 Gordon，1833～1885）。一名性格古怪的军事英雄，颇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崇拜。1883年，戈登在苏丹发生政变后受命前往撤离当地的英国和埃及军队。相反，戈登却掘壕固守，并开始遭遇围攻。格莱斯顿不愿派遣增援部队的态度激怒了维多利亚，也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后来戈登的被害被归咎于格莱斯顿的犹豫不决。正因如此，女王始终没有原谅格莱斯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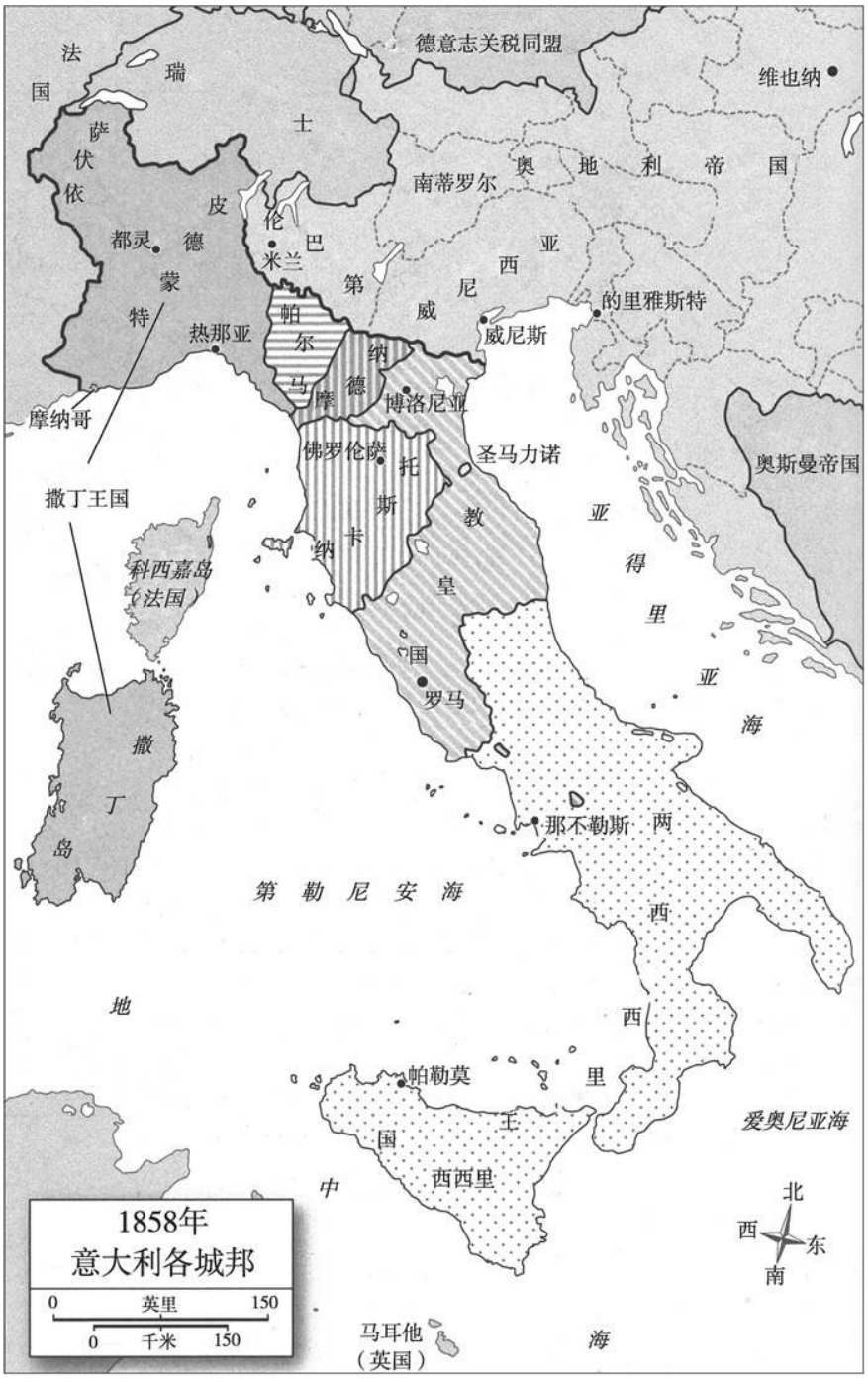
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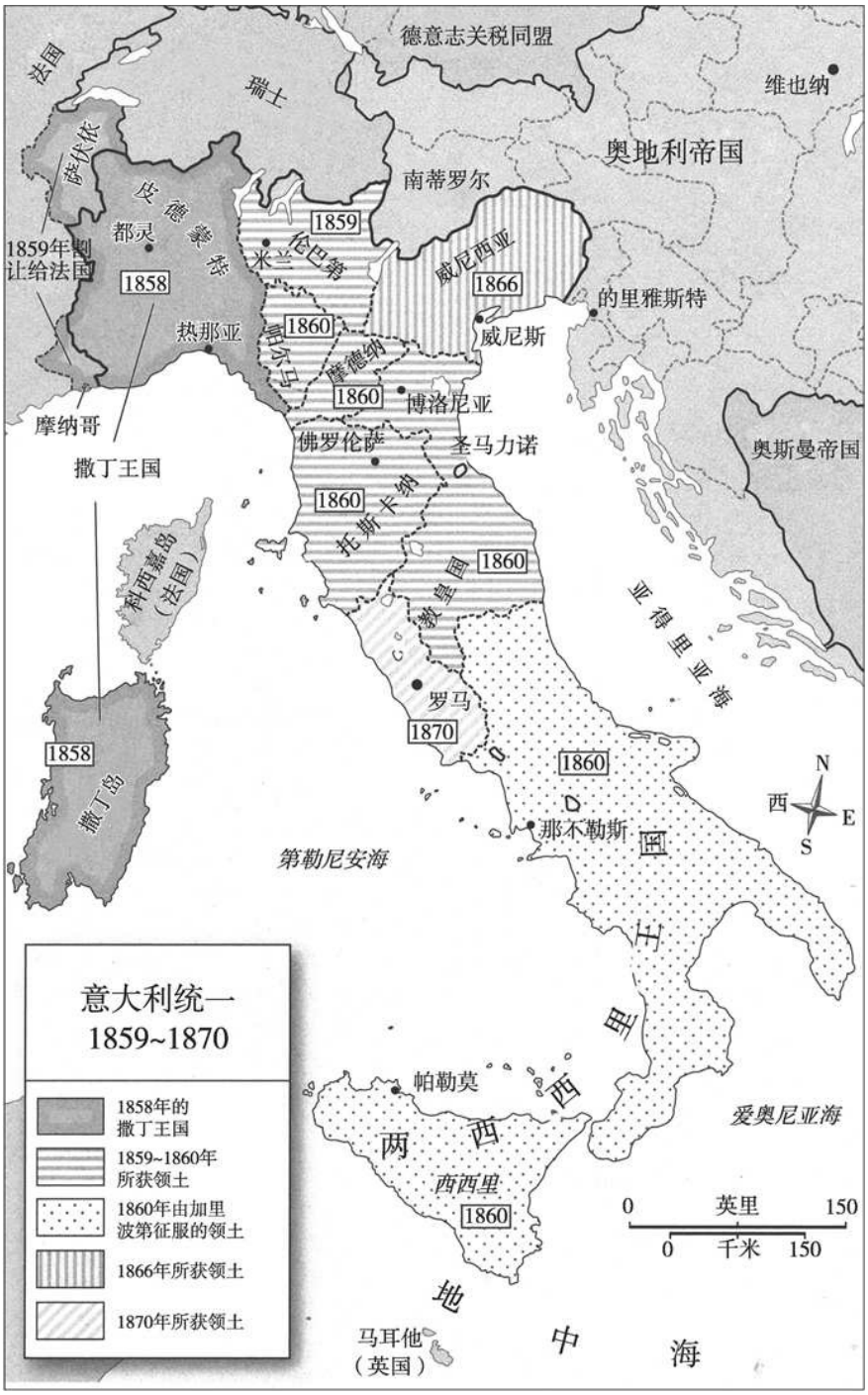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的王室宅邸
0 英里 100
0 千米 100
N
W E
S
苏
格
兰
巴尔莫勒尔城堡
阿伯丁
布雷马
珀斯
爱丁堡
格拉斯哥
北
海
英
格
兰
爱
尔
兰
海
爱
尔
威
尔
士
利物浦
肯辛顿宫
伦敦
温莎城堡
白金汉宫
南安普敦
怀特岛
奥斯本宫
英吉利海峡
法
国


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
0 英里 200
0 千米 200
奥地利帝国
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帝国
瓦拉几亚
克里米亚半岛
阿尔马
英克曼
塞瓦斯托波尔
巴拉克拉瓦
奥斯曼帝国
黑海
N
W E
S
博斯普鲁斯海峡
君士坦丁堡
斯库塔里
锡诺普
达达尼尔海峡
爱琴海
地中海
其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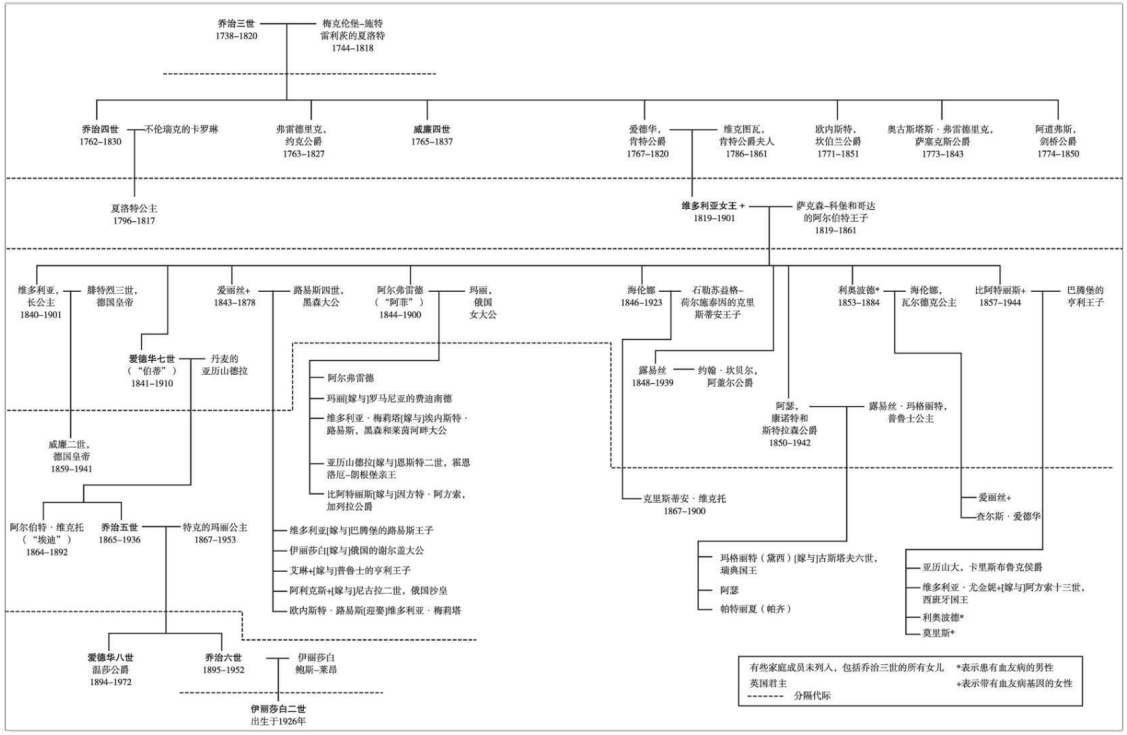

北海
丹麦
瑞典
波罗的海
石勒苏益格
奥尔登堡
荷尔施泰因
汉堡
梅克伦堡-什未林
波美拉尼亚
但泽
西普鲁士
东普鲁士
不莱梅
汉诺威
荷兰
布兰登堡
柏林
华沙
俄罗斯帝国
威斯特伐利亚
科隆
比利时
莱茵省
德累斯顿
萨克森
西里西亚
科堡
法兰克福
布拉格
波西米亚
克拉科夫
纽伦堡
巴伐利亚
摩拉维亚
法国
斯图加特
符腾堡
纳沙泰尔（普鲁士）
维也纳
慕尼黑
匈牙利
布达佩斯
瑞士
奥地利帝国
米兰
撒丁王国
威尼斯
北
西
东
南
托斯卡纳（奥地利）
德意志的统一：
德意志，1815
普鲁士领土
1815年德意志邦联的边界
0
英里
200
0
千米
200


北海
丹麦
瑞典
波罗的海
奥尔登堡
石勒苏益格-
荷尔施泰因
汉堡
梅克伦堡-
什未林
波美拉尼亚
但泽
西普鲁士
东普鲁士
不莱梅
汉诺威
布兰登堡
柏林
华沙
俄罗斯帝国
荷兰
威斯特
伐利亚
科隆
比利时
莱茵省
德累斯顿
萨克森
西里西亚
科堡
法兰克福
布拉格
波西米亚
克拉科夫
纽伦堡
洛林
斯图加特
巴伐利亚
摩拉维亚
法国
巴登
阿尔萨斯
符腾堡
维也纳
帝国
慕尼黑
匈牙利
布达佩斯
瑞士
奥地利
意大利
N
W
E
S
德意志统一：
德意志，1871
普鲁士领土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边界
0
英里
200
0
千米
200


法国
瑞士
德意志关税同盟
维也纳
萨伏依
皮德蒙特
都灵
伦巴第
米兰
南蒂罗尔
奥地利帝国
亚得里亚海
的里雅斯特
威尼斯
热那亚
帕尔马
摩德纳
博洛尼亚
摩纳哥
佛罗伦萨
托斯卡纳
圣马力诺
教皇国
罗马
奥斯曼帝国
撒丁王国
科西嘉岛（法国）
撒丁岛
第勒尼安海
那不勒斯两西西里王国
帕勒莫
爱奥尼亚海
地中海
马耳他（英国）
1858年
意大利各城邦
0 英里 150
0 千米 150
北
西
东
南


德意志关税同盟
法国
瑞士
维也纳
奥地利帝国
萨伏依
皮德蒙泰
南蒂罗尔
都灵
1859
米兰
伦巴第
威尼西亚
1859年割
让给法国
1858
1866
的里雅斯特
热那亚
1860
威尼斯
帕尔马
摩德纳
1860
博洛尼亚
摩纳哥
佛罗伦萨
圣马力诺
奥斯曼帝国
撒丁王国
1860
托斯卡纳
科西嘉岛
（法国）
教皇国
1860
亚得里亚海
罗马
1870
1858
撒丁岛
1860
N
西
E
S
那不勒斯
第勒尼安海
两西里
帕勒莫
爱奥尼亚海
西西里
1860
0 英里 150
0 千米 150
地中海
马耳他
（英国）
意大利统一
1859~1870
1858年的
撒丁王国
1859~1860年
所获领土
1860年由加里
波第征服的领土
1866年所获领土
1870年所获领土

家谱


乔治三世
1738–1820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夏洛特
1744–1818
乔治四世
1762–1830
不伦瑞克的卡罗琳
弗雷德里克，约克公爵
1763–1827
威廉四世
1765–1837
爱德华，肯特公爵
1767–1820
维克图瓦，肯特公爵夫人
1786–1861
欧内斯特，坎伯兰公爵
1771–1851
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萨塞克斯公爵
1773–1843
阿道弗斯，剑桥公爵
1774–1850
夏洛特公主
1796–1817
维多利亚女王 +
1819–1901
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的阿尔伯特王子
1819–1861
维多利亚，长公主
1840–1901
腓特烈三世，德国皇帝
爱丽丝+
1843–1878
路易斯四世，黑森大公
阿尔弗雷德（“阿菲”）
1844–1900
玛丽，俄国女大公
海伦娜
1846–1923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克里斯蒂安王子
利奥波德*
1853–1884
海伦娜，瓦尔德克公主
比阿特丽斯+
1857–1944
巴腾堡的亨利王子
爱德华七世（“伯蒂”）
1841–1910
丹麦的亚历山德拉
露易丝
1848–1939
约翰·坎贝尔，阿盖尔公爵
阿瑟，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
1850–1942
露易丝·玛格丽特，普鲁士公主
威廉二世，德国皇帝
1859–1941
阿尔弗雷德
玛丽[嫁与]罗马尼亚的费迪南德
维多利亚·梅莉塔[嫁与]欧内斯特·路易斯，黑森和莱茵河畔大公
亚历山德拉[嫁与]恩斯特二世，霍恩洛厄–朗根堡亲王
比阿特丽斯[嫁与]因方特·阿方索，加列拉公爵
克里斯蒂安·维克托
1867–1900
爱丽丝+
查尔斯·爱德华
阿尔伯特·维克托（“埃迪”）
1864–1892
乔治五世
1865–1936
特克的玛丽公主
1867–1953
维多利亚[嫁与]巴腾堡的路易斯王子
伊丽莎白[嫁与]俄国的谢尔盖大公
艾琳+[嫁与]普鲁士的亨利王子
阿利克斯+[嫁与]尼古拉二世，俄国沙皇
欧内斯特·路易斯[迎娶]维多利亚·梅莉塔
玛格丽特（黛西）[嫁与]古斯塔夫六世，瑞典国王
阿瑟
帕特丽夏（帕齐）
亚历山大，卡里斯布鲁克侯爵
维多利亚·尤金妮+[嫁与]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
利奥波德*
莫里斯+
爱德华八世
温莎公爵
1894–1972
乔治六世
1895–1952
伊丽莎白
鲍斯–莱昂
伊丽莎白二世
出生于1926年
有些家庭成员未列入，包括乔治三世的所有女儿
英国君主
分隔代际
*表示患有血友病的男性
+表示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性

序言

我觉得女王是一名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女性。

——埃米莉·丁尼生（Emily Tennyson）[1]

如此一名刁妇。[2]

——阿彻·克莱夫牧师（Rev. Archer Clive）

她已经准备就绪。

不过当维多利亚初次坐在王座上时，她的双脚甚至都够不着地面。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高耸的拱顶下，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在众人好奇的注视下如坐针毡，竭力控制着不去晃荡她的双腿。成千上万的人在日出前蜂拥至伦敦街头，希望能够占领有利位置，一瞥年仅18岁、身高不足5英尺的不列颠新女王。以前的国王要么肆意挥霍，要么风流薄情，要么嗜吸鸦片，要么疯疯癫癫；如今，整个国家都在为“体现了完美女性气质的美丽白玫瑰”[3]而着迷，他们的这位新君主，这位娇小少女正不安地坐在一间装饰着金色窗帘和异国地毯的巨大教堂内，承受着钻石满身的贵族人士的注视。

沉重的王冠让维多利亚的脑袋隐隐作痛，她的双手也在微微颤动——镶嵌着红宝石的加冕戒指被戴到了错误的手指上；后来用冰块才取下来，过程痛苦万分。她的周围站着几位较为年长的男性顾问，全都垂垂老矣。她的首相因吸食鸦片和饮用白兰地而恍恍惚惚，之所以需要鸦

片和白兰地，据说是为了缓解胃疼，而且他在整场仪式过程中眼前都是一片朦胧。她的大主教事先没有经过排练，念起稿子来磕磕绊绊。一名勋爵在靠近亲吻她的手时摔倒在了台阶上。不过，维多利亚的沉着冷静是无可挑剔的。她的声音既冷静又清脆，还沉稳。成为女王的想法曾一度让她感到恐惧，但随着她慢慢长大，她一直渴望参与工作，获得独立，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些控制。而她最为梦想的莫过于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睡觉，逃离母亲令人窒息的掌控。大多数青少年得到的都是零花钱，她却得到了一个王国。

几乎没有人会把赌注压在维多利亚加冕不列颠群岛女王这件事上。毕竟，她的父亲并非国王的长子，而是第四子。正如权力继承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仅仅是因为一系列悲剧的出现，亲人的去世，包括婴儿、一名产妇以及两个肥胖的伯父，以及幸运——她的军人父亲避免被哗变的士兵谋杀，并且不知怎地说服她的母亲嫁给了他这个人到中年、几乎破产的王子——才使得在1837年8月20日这天，一个国家的命运在滚滚车轮的带动下停在了一个身材娇小的18岁少女面前。她喜爱阅读查尔斯·狄更斯，操心吉卜赛人的福祉，喜欢动物，热爱唱歌剧，崇拜驯狮人，并且讨厌昆虫和甲鱼汤；她饱受亲近之人的欺负，一直到她的决心坚如磐石；她的心被情感和禁欲主义的绳索紧紧捆绑。

她的人生始终都不轻松。在满周岁之前，维多利亚就失去了父亲。在满18岁前，她已经与母亲渐渐疏远。有许多次，王位几乎从她手中滑落；其他人多年来一直试图将其从她手中夺走。她需要借助性格中与生俱来的钢筋铁骨，培养出一种倔强的力量。但是，这个幼年时喜欢跺脚、童年时喜欢猛摔钢琴盖、青少年时喜欢对折磨她的人怒目相向的少女如今已经成了女王。在加冕仪式结束后，她返回家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的小狗洗一个温暖的泡泡浴，小狗把肥皂泡泡抖到了她的脸上和衣服上，引得她欢笑不已。

我们如今已经忘记了维多利亚曾独自一人统治了多久。她或许在加冕几年后就嫁给了阿尔伯特，但在后者死后，她独自统治了长达39年时间。然而，我们对这段时期知之甚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悲伤太过巨大而持久，十分引人瞩目。如果你今天走在伦敦街头，会时刻留意到维多利亚曾经高调而持久的悲痛所留下的痕迹。对于当时和今日的任何人来说，很明显可以看出，她曾经尤为深沉地爱着她的德国丈夫：这是一场让她措手不及的意外之恋，却一直持续到她去世为止。在阿尔伯特死去20年后，她仍然在建造纪念碑——在海德公园，展现他强健身材的雕像高耸入云，贴金的腿部显得强劲有力，周围环绕着天使和德天使（Virtue），看起来好似神明一般。维多利亚始终未能从丧夫之痛中彻底恢复，当她后来在其他男人的陪伴下找到快乐时，她还曾内疚地向一名牧师忏悔。

然而，维多利亚的悲伤之深意味着一个迷思几乎立刻就出现了，而且许多人直到今天都仍然深信不疑：她在阿尔伯特死后就不再进行统治，而在她足智多谋的丈夫还在世时，她曾经把自己的几乎所有权威和权力都让渡给他。当她加冕时，人们惊讶于维多利亚能够思维清晰地思考和口齿伶俐地讲话；当她成婚时，他们相信她把所有的重大决定都交给了阿尔伯特来做出；当他去世时，她被苛责为一个冷淡、悲伤的寡妇。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维多利亚女王是一名坚决果断的统治者，既会抱怨工作的繁重，同时也会日复一日甚至每隔一小时地指挥她的首相。首相格莱斯顿曾说：“女王光是靠自己就足以杀死任何人了。”然而，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未能理解如此一名女性是如何能够如此巧妙而津津有味地行使权力的。部分原因是，通过挖掘海量的传奇故事和夸张表达来理解真正的维多利亚实在是太过困难了。

要想恰当地理解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回到二战仍在肆虐的1943年5月10日。在这一天，阿道夫·希特勒无限期地延长了他的独裁统治，美

国军队正准备将日本从阿拉斯加的岛屿逐出，而温斯顿·丘吉尔即将抵达华盛顿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举行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而第二天，轴心国就将在北非战场向同盟国投降。维多利亚的女儿、86岁的比阿特丽斯颤颤巍巍地坐在她位于英格兰萨塞克斯的家中。数十年前，她承担了一个繁重的任务，那就是整理女王汗牛充栋的日志。这项任务她干了10年，她亲手把日志誊抄在蓝色抄写本上，然后把原件烧毁，堪称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审查行为之一。如今，她是一名普通老妪，整日忙着翻译家族档案，以逃避战争带来的“焦虑”。在这一天，她拿出一张信纸，给她的侄孙乔治六世国王，即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父亲写一封恳请信——这封信此前从未公之于世。最近的一批档案让她感到惊骇不已。她在信中称呼国王为“伯蒂”[4]，写道：

> 我从图书馆馆长那里得到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封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信，信是用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书写的，但是内容十分私密，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个人争吵，我实在无法处理。里面还有些关于对我母亲的各种限制的摘记。这些文件没有任何历史或者传记价值，如果被人看到的话，只会平添误解，破坏她给人们留下的回忆。你可能不知道，我是我母亲的文献处理人，因此，我感到必须［向你］请求，允许我摧毁任何令人感到不快的信件。我是她最后尚在人世的孩子，感到保护她的回忆是我的神圣义务。这些信件究竟是如何……保留在档案之中的，我不太能理解。[5]

温莎城堡图书馆馆长欧文·莫斯黑德（Owen Morshead）就无意间寄送了“可燃材料”，向皇家档案管理员艾伦·拉塞尔斯爵士（Sir Alan Lascelles）致歉。（他实事求是地写道：“我知道亲王与女王在婚姻初期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没想过这些书里会有任何出人意料的内容。”[6]）这本书被退还给了比阿特丽斯，她很快就把它烧掉了。

比阿特丽斯于次年，也就是1944年去世。她不知道的是，在这些档案被送还给她之前，已经有人把它们拍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塞进了皇家档案馆的一叠档案里。它们如今仍然在那里，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用绳子捆着的白色小盒子里。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是不是那位图书馆

馆长违抗命令而且没有被抓住？还是说国王的命令是敷衍一下老太太，却将他曾祖母婚姻矛盾的证据保存下来？我们所知道的是，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在看着比阿特丽斯摧毁她母亲的私人文件并筛选剩余档案时曾感到十分沮丧。由于人们仍能从受维多利亚之托为阿尔伯特撰写传记的西奥多·马丁（Theodore Martin）的作品中一撇维多利亚的日记原文，因此，可以明显看出，比阿特丽斯在她的誊写中让她母亲显得更加温顺、情绪更为温和也更为通情达理。[7]

维多利亚信件的编辑们也以类似的方式歪曲了历史档案。正如伊冯娜·沃德（Yvonne Ward）巧妙展示的那样，负责筛选和编辑维多利亚书信的阿瑟·本森和伊舍勋爵（Lord Esher）展现的是一个遭到歪曲的女王形象。不仅仅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删减——例如删除了对法国人以及她的子女的尖锐批评，并且剔除了一些诸如“粗俗”这样的词语，以净化她的言语用词——还“淡化了女王拥有的知识和尤为尖锐或者草率的观点，好让她显得端庄而单纯。为了避免过于琐碎，她与女性之间的通信被忽略了。她与欧洲人士之间的通信被删减到最少程度，以减轻所谓她受到外部影响的印象”。[8]他们删掉了任何有可能让维多利亚看起来似乎“过度强势、不够端庄或者言语不逊”[9]，以及存在政治偏见的词语，更糟糕的是，在她的官方文集中，大部分信件都是由男性书写的[10]；只有四成信件出自女王之手。本森和伊舍还删掉了大部分写给其他女性的信件以及提到她子女的内容，因此，维多利亚的女性朋友被抹除干净，她作为母亲的自信也消失无踪。

给比阿特丽斯在二战期间摧毁的档案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将在本书中得到展示——是十分罕见的珍宝，让我们得以洞悉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段关系中，他把她称作“孩子”，并且告诉她如何才能举止端庄。不过，这封信件也说明了在女王的话语被篡改、删减、隐藏和摧毁的情况下，要想理解她的思想和心灵是多么困难。据保守估计，维多利亚在位期间平均每天要写下2500个单词，总计约有

6000万个单词。[11]然而，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都遭到了修饰或者掩盖，甚至彻底消失。她的家人焚烧了数不胜数的纸张，尤其是与她的苏格兰密友约翰·布朗、她的印度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以及她作为年轻女王时最为羞耻的一段插曲——对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欺侮——有关的任何信件。

维多利亚女王仍然被埋藏在堆积成山的迷思之下，而迷思的创造者既有旁观者、谄媚者、君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也有女王自己，并且自那时起，英国王室一直在支持这些迷思。这些迷思诸如当阿尔伯特去世时，她也死去了；她厌恶自己的孩子们；她是一个完美无瑕地尊重宪政、举止妥当的女王；她讨厌权力、缺少野心，一心只爱家庭事务；她是一个男人的简单造物，这个男人指导她、塑造她，就好像她是会走路、会说话的伽拉忒亚（Galatea）[12]一样。当然，还有她的仆人约翰·布朗仅仅是一个好朋友。然后是她自己创造的一些迷思：阿尔伯特完美无瑕，他们的婚姻也无可挑剔。他是真正的国王，而她只是他背后祈求的影子。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奥斯卡·王尔德认为，19世纪的三位伟人分别是拿破仑·波拿巴、维克多·雨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他把她形容为“黑玉上镶嵌的红宝石”——一个庄重甚于美丽的形象。她的确是一位伟人——但维多利亚同时也很刻薄而自私，经常目中无人，喜欢自怨自艾，并且固执倔强。在她的统治下，有数百万人因贫穷和饥饿而死，但她似乎对他们的苦难视而不见。对待她不喜欢的人，她要求苛刻、态度粗鲁。她蔑视精英；责备上议院议员整日打猎、喝酒、寻欢作乐；看不起社会上那些无所事事、纵欲过度的人；如果不喜欢某些人的话，经常会反对推行他们倡议的重要改革措施；并且经常因为贪恋在苏格兰平静、隐居的生活而逃避公共职责。

维多利亚对自己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认为自己的裙子不够雅

致，总是觉得自己不够瘦，身边之所以环绕着美丽的人与物，是因为她迫切地渴望补偿自己美的缺失。不过她同时也轰轰烈烈地爱过，既友善又真诚，拥有强烈的正义感，蔑视种族和宗教歧视，并且与她的仆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以至于许多人对这种关系纷纷侧目甚至表示怀疑。她还经历了8次刺杀并都死里逃生。到她统治末期，维多利亚女王的声望达到了非同凡响的程度。美国人宣称她是世界上最为睿智的女性。老妪们认为她的触摸能够治愈她们的疾病，老头们声称在接受她的来访后自己的眼睛看得更清楚了，还有一位76岁的非裔美国女性存了50年的积蓄，只为从美国“前往”英国，与她交谈几分钟。

女王出生在一段极端动荡的时期——环绕肯辛顿宫的平静小村在她晚年已经成了一座繁华都市，烟囱林立，烟雾遮天蔽日，坐落有序的排屋平均每间都塞进了5个家庭，河道里堵满污物，熙熙攘攘的轮船骄傲地航行全世界，将英国旗帜插在外国大陆上。起义暴动让教会、贵族和议会大受震动。在她的统治下，英国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位女王将统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一个时代将会以她命名，而她的坚定形象将永远与一个兼具增长、实力、剥削、贫穷和民主的吊诡时代联系在一起。

维多利亚是世界上最具权势的女王，也是知名度最高的职业母亲。当我们允许她——如同她自己长期以来在公众记忆里那样——沉浸在无比的哀思之中时，我们常常忘记，自少女时代起，维多利亚也曾为自己的独立和声誉以及王位的荣誉奋斗过，不仅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独自完成的。我们还会常常忘记她曾为了自己所深信的帝国和价值观努力奋斗，一直辛勤工作到双眼疲乏，她曾先后与10位首相进行商议和争论，她的儿孙遍布欧洲王室宫廷，并且在19世纪欧洲遭遇贵族动荡的时候保持了英国王室的稳定。我们常常忘记她再一次找到了所爱，她在儿孙绕膝玩耍时曾开怀大笑，她协助避免了一场与美国的战争，以及她曾经找准时机解雇或者任命了多位首相。我们常常忘记，大

英帝国的选举权扩大以及反贫穷、反奴隶等运动都能追溯到她堪称丰碑式的统治时期，同样如此的还有对家庭生活的重新思考，以及逐渐兴起的对宗教的怀疑。当维多利亚于1901年去世时，她已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2015年，才由她的玄孙女伊丽莎白打破。

维多利亚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一个世纪、一个帝国、九个子女、四十二个孙辈。如今，在温莎城堡外冰激凌商店和喧闹的纪念品商店的环绕下，道路中心矗立着一位端庄女性的雕像，神情冷峻地望向远方的地平线。温莎城堡由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11世纪建造，先后有包括查理二世（Charles Ⅱ）和乔治四世在内的多位国王对其进行过整修；维多利亚觉得这座城堡太过庞大和阴郁，“像是一座监狱”[13]，但她却是那个庇佑它直至今日的君主。作为一名母亲，她是这座城堡的看守者，保护着英国人民在动荡不安的世纪向民主迈出坚定步伐。作为一名母亲，她跟随自己的丈夫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断地争吵、哭泣；她竭尽全力让自己与生俱来的坚定决心与始终缺乏的自尊和谐共存。她是一个被推上至高地位的普通女性。

维多利亚需要应付当今女性也需面对的许多问题——处理不平等的关系，安抚心怀怨恨的配偶，试图养育出正派的子女，抵御反复出现的不安全感和抑郁感，花费数年时间从生育中恢复，怀念逝去的爱人，在我们想要逃避世界时被另一个爱人的魅力攻陷，渴望对自己的人生做出独立自主的决定，并且影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一个女性没有任何权力的时代，她渴求权力，并奋力争夺。维多利亚的故事是一个拥有无上尊荣和巨大特权之人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反抗与崩溃、干预与勇气、忠诚与巨大悲痛，以及强大韧性的故事，这个故事为我们诠释了这位身处帝国核心的娇小女性。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关权力的惊人故事。我们如今真正忘记的是，正是在维多利亚的支持下，现代世界方才得以形成。

朱莉娅·贝尔德

写于谢利海滩（Shelley Beach）

2015年10月

---

[1] Dyson and Tennyson，*Dear and Honoured Lady*，76.

[2] Rev. Archer Clive，引自Clive，*Mrs. Archer Clive*，87. 完整引文如下：“我跟着人群，发现自己面前是一幅阿尔伯特亲王的肖像画，画得很好。如果他的确如画上一样的话，那他一定和蔼而温厚，但也一定软弱而无能，肯定应付不了他即将迎娶的如此一名刁妇。”

[3] A Lady of the Court，*Victoria's Golden Reign*，2.

[4] 乔治六世的全名为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亚瑟·乔治，“伯蒂”是阿尔伯特的昵称。——译者注

[5] Beatrice to Bertie ［George Ⅵ］，May 10，1943，Braubridge ark，Sussex，皇家档案馆，AEC/GG/012/FF2/13.

[6] Morshead to Lascelles，May 14，1943，皇家档案馆，AEC/GG/012/FF2/14.

[7] 本森在日记中写道，伊舍曾对她说，比阿特丽丝“从事的是从女王的日记中摘抄她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部分的工作”——而本森认为，这意味着“最无聊的部分”。Benson Diary，July 25，1903，35：81-83；Ward，*Censoring Queen Victoria*，32.

[8] Ward，*Censoring Queen Victoria*，188.

[9] Ward，*Censoring Queen Victoria*，309.

[10] Ward，*Censoring Queen Victoria*，327. 他们对墨尔本勋爵有一种特别的偏好，本森和伊舍都非常“崇拜”墨尔本。在第一卷中，包含了35封维多利亚女王写给墨尔本勋爵的信件节选，以及139封墨尔本勋爵回信的节选。在1837年，有6封墨尔本的信件被发表，而同时只有4封维多利亚的信件对外发表。在1838年，只有3封女王的信件被发表，而墨尔本被发表的信件数量达到20封之多。Ward，*Censoring Queen Victoria*，191.

[11] 贾尔斯·圣奥宾写道：“如果她是一名小说家的话，她的全部作品总计能达到700卷，而且发表频率是每个月一卷！”（*Queen Victoria*，340.）但这仅仅是保守估计，没有包括与其他女性的书信往来。

[12] 典故出自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讲述的古希腊神话，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岛的国王，也是个著名的雕刻家，由于对女性的堕落和放荡不羁产生反感，决心终身不娶。一次他以象牙雕刻了一尊少女像，并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自己的作品，于是祈求爱神阿芙洛狄忒赐予雕像生命。爱神满足了他的愿望，将雕像变成名叫伽拉忒亚的美女，最后他们结成夫妻。——译者注

[13] 1858年10月21日，维多利亚给薇姬写信说：“我对温莎没有感情，我的确很喜欢它，也觉得它是一个宏伟、壮丽的地方，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爱上它，一个也没有，我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就好像它不属于我一样；这当然也削弱了我对生命的享受。”她在6天后再次写道：“你怎么能用‘亲爱的’来称呼温莎城堡呢，我实在无法理解。它就像是监狱一样，又大又让人抑郁——对我来说，非常沉闷，尤其跟巴尔莫勒尔相比，简直就是一个白天，一个黑夜——尽管它其实很不错！”Fulford，*Dearest Child*，140-41.

第一部分 维多利亚公主：“可怜的小维多利”



1 “袖珍大力神”的诞生

我的兄弟都不如我强壮……我会比他们所有人活得更久；王冠将加冕于我和我的子女头上。[1]

——爱德华，肯特公爵，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

在1819年5月24日晨曦初露的一小时前，凌晨4点15分，维多利亚女王呱呱坠地。在这最初的几秒钟里，她与任何一个新生儿都没有什么两样：一丝不挂、柔肤弱体、充满好奇，在母亲的怀抱里扭来扭去。她的天真无邪持续得十分短暂。片刻之后，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人们——包括牧师、法官、战士和政客们——都将蜂拥进屋，把他们红润的脸庞凑在这个尚未得名的女婴面前。20年后，那些亲自见证她的出生并仍然在世的人将向她鞠躬致敬，尊奉她为女王——但在她刚刚出生时，却很少有人会猜到这一结果，因为她仅仅是王位的第5顺位继承人。不过，这是一个身份尊贵的孩子——她将在未来统领军队、挑选大主教，并任命首相。从这一刻起，她就永远不再是孤身一人；她每走一步，都会有成年人形影相随，每一口食物都会有人提前品尝，而每一段对话也会被人在旁偷听。

天色渐亮，四柱床上的肯特公爵夫人躺回到了枕头上，筋疲力尽地闭上眼睛，呼吸着下方花园里丁香花和五月花的香气。在这个阴云密布的春日清晨，蒙蒙细雨让持续三周的酷热略有缓解。肯辛顿宫中女婴出生的那个房间有着纯白色的装饰，散发着奢华新地毯的味道。窗外，羊群在悠闲地吃草，松鸦在山毛榉树上愉快地歌唱。

按照王室的习俗，前一晚，枢密院（Privy Council）成员们从各自的舞会、剧院和床榻上应召前来。在公爵夫人因宫缩而痛苦不已、气喘吁吁之时，陛下的大臣们正在相邻的房间等待。[2]公爵此前有言在先，

不会花精力招待他们，因为他打算陪在妻子身边给予她鼓励。按照传统，这些上层人士在持续六小时的分娩过程中要听着公爵夫人的喊叫声，婴儿一出生就要蜂拥到房间里，以便为母子关系做见证。[3]［1688年时，詹姆斯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妻子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孩，而大部分公众——在对出现健康男性继承人十分不满的新教徒的煽动下——认为她实际上是流产了，但是事先将另一个健康男婴用长柄炭炉偷运进了房间里。这当然是捏造的，但恰恰成为导致革命爆发、将詹姆斯二世赶下王位的因素之一。[4]］

公爵夫人容忍了这些男人的存在，他们签署了一份出生证明，以及一份描述婴儿“完美健康外貌”的报告。他们口中嘟囔着贺词，然后疲惫地拖着步子回到了正在渐渐苏醒的城市中；马厩中的马夫开始取水，附近的蜡烛作坊飘来阵阵蜂蜡幽香。早餐摊贩们沿着大西路（Great Western Road）架起摊点，那是海德公园旁一条建于罗马时期的古老道路，是从西南部进入伦敦的主干道。工人们在邮件马车和市场火车之间穿过重重迷雾赶往工厂，身旁经过的是成千上万头被赶往屠宰场的牲畜。

肯辛顿宫内，肯特公爵正骄傲、兴奋地不能自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语无伦次地赞美了妻子在分娩过程中的“耐心和温柔”[5]，他还称赞了助产士西博尔德夫人（Frau Siebold）的“敏捷、热情和博学”。一个有趣的巧合能够显示出当时英国与德意志王室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么紧密，那就是仅仅3个月后，西博尔德夫人就将负责接生维多利亚未来的丈夫、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的母亲轻声说，他“美极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宝宝”。[6]从襁褓中起，阿尔伯特的美貌就备受称赞，正如维多利亚的力量备受称赞一样。

出生时，维多利亚在王位继承顺序上仅排第5位。不过，多年前，她的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也就是乔治三世国王的第四子——已经意

识到自己的兄弟没有子嗣，因而王位有可能在某一天传到他和他的后代手中，他的生命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的他已经有了一名伴侣，一位名叫朱莉·德·圣洛朗的温柔法国女子。据说爱德华在1790年，也就是他首次被任命为直布罗陀总督期间，曾雇她在一场宴会上与他的乐团一起歌唱，但她实际上却是被带到了他的住处，与他同床共枕。虽然两人关系的开端毫无浪漫可言，而且即使他们结婚，国王也不会承认他们的婚姻，但他们仍建立了一段相当成功的伴侣关系，在爱德华被派驻加拿大和直布罗陀期间，甚至是爱德华手下的军队发动可耻的叛乱期间，这段关系仍然在存续。[7]

不过，尽管爱德华与深爱着他的朱莉·德·圣洛朗共度了30年时光，但他最终还是决定需要一个合法的妻子，一个能够让他偿还巨额债务的妻子，因为王子在成婚时能够得到一大笔额外的津贴。在原定的王位继承人、他的侄女夏洛特因难产而死后，他还能够明显看到，如果他找到一个年轻妻子的话，那么她或许能够生下一个在未来统治英格兰的孩子。

* * *

在维多利亚出生几周前，肯特公爵焦急地催促自己的马车从德国一路西行，设法在时间上战胜最无法预测的竞争对手：生物规律。他想要让他即将临盆的德国妻子及时赶到英国分娩，好生出一个他希望能够在未来登上王位的孩子。让公爵深信不疑的是，无论未来的君主是谁，如果他或她在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是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完成的，那么将会得到更多的爱戴。他低头看着妻子苍白的面庞被温柔的春日阳光照亮，脸上露出喜色。他已经51岁并且身无分文：能够找到一个如此年轻貌美、温柔可人的妻子实属奇迹。32岁的维克图瓦公主[8]来自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Saxe-Coburg-Saalfeld），一个因拿破仑在德意志南部的土地掠夺而面积大为缩小的小邦国，她生性乐观、身材娇小而圆润，

有着一头棕色卷发和红红的脸颊。新近丧偶的维克图瓦有两个自己的孩子，在经过一番劝说后才同意嫁给肯特公爵。不过他们很快就形成了彼此爱慕的伴侣关系，维克图瓦也在不久后有了身孕。

在肯特公爵踏上从阿莫巴赫（Amorbach）前往英格兰的漫长旅途时，他不仅仅是在抓紧时间赶往大不列颠，他还希望自己是在奔向王位。仅仅在一年前，肯特公爵有可能生下王位继承人的想法还会令人觉得可笑。当时他在王位继承顺序上仅排在第5位，落后于他的兄长、摄政王乔治。排在乔治后面的是他备受宠爱的独生女夏洛特。接下来，排在肯特公爵前面的还有他的另外两个兄长，弗雷德里克和威廉。此时正渐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乔治三世国王与妻子夏洛特王后共育有15个子女，不过此时只有12个子女仍然在世。[9]7个仍然在世的儿子继承优先权要高于他们的6个姐妹——如果这些儿子有子嗣的话，王位也会传到他们的继承人，而不是他们的姊妹那里。（一直到2011年，英国王位继承都遵循长子继承制，即王位由男性子嗣按照出生顺序继承，如果没有男性子嗣，才会按出生顺序由女性子嗣继承。）

作为乔治三世国王长子——即后来成为乔治四世的摄政王——的独生女，夏洛特本应在父亲之后登上王位。夏洛特是一名活泼、迷人的年轻女子，与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利奥波德王子陷入爱河，两人于1866年结为连理。但夏洛特讨厌自己的体型——也讨厌总是被人提醒自己有多胖——因此变得闷闷不乐。她的医生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让她严格控制饮食，并且不断从她体内抽血。许多患者都因这种可疑的治疗方法而死，但那些神情沮丧的患者却十分青睐这种治疗措施，而对那些已经严重营养不良且身体十分虚弱的患者来说，这种方法尤为致命。

在经历了长达50个小时的分娩后，夏洛特的儿子最终流产。她筋疲力尽并出现大出血。医生们不断地喂她服用葡萄酒和白兰地，并且在她

身边堆满了热水瓶，却没能救下她的性命；[10]她于1817年11月6日死去。［她的男助产士理查德·克罗夫特（Richard Croft）感到极为沮丧，以至于3个月后，在参与另一次为时甚久的分娩时，他掏出了一把手枪对着头部自杀身亡］。对原本有望成为未来英格兰女王的夏洛特的哀思之情像阴影一样笼罩在伦敦上空数周之久。不久后，全国范围就出现了黑色布料的短缺。

突然间，出人意料地，王位继承之路被打开了；如今，王位将传给王储渐渐老去的兄弟们或其子女，而不再是夏洛特，一个刚刚走出青涩少女时代、年轻而受人爱戴的女性。人们心中的疑问是，谁将是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

乔治三世国王与夏洛特王后过着平静、体面的生活，与普通的英国中产阶级没什么不同。然而，他们的几个放荡不羁的儿子却不受人欢迎，既胖又懒。令人称奇的是，唯一既克制又正直还十分真诚的儿子恰恰是他们似乎最不喜欢的那个，即维多利亚的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

到1818年时，乔治国王已经失去了听觉和视觉，还有些精神错乱，饱受疾病困扰，有人认为，他当时患上了一种名叫卟啉症的罕见新陈代谢紊乱症，不过也很有可能他患上的是痴呆症或者躁郁症。[11]城堡中的常驻人员常能听到他在侧厅散步时发出的“令人不安的大笑”[12]，人们还经常发现他穿着紫色袍子漫不经心地弹奏一架大键琴。他饱受大难临头的幻觉的困扰，总是幻想自己在洪水中淹死，他还总是对看不见的朋友说话，并且把树木错当成外国贵宾而上前拥抱。1811年，73岁的他被正式宣布精神错乱。

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国王，既友善又睿智。但在年纪来到55岁左右时，他却陷入了悲惨的境地。他饱受痛风折磨，需要服用大量鸦片才能缓解腿部疼痛。他与妻子卡罗琳公主的关系水火不容。[13]这位摄政王在1821年禁止她出席自己的加冕仪式（在她身穿华丽服饰来

到威斯敏斯特教堂门前时，大门却在她的面前紧紧地关上）。三周后，卡罗琳王后就去世了。死因不明；有传言说，她是被国王毒死的。

在1817年摄政王的女儿去世时，乔治三世的7个儿子都已人届中年；最年轻的也有43岁了。因此，谁能生下继承人呢？坎伯兰公爵恩斯特是唯一既有正式婚姻，也没有与妻子关系疏远的王子。

在他们还很年轻时，乔治三世国王曾颁布命令，未经国王同意和议会批准，王室后代不得擅自成婚。由此形成的1772年《王室婚姻法》让王子们有了很好的借口可以避免给他们的情人许下任何承诺。正如墨尔本勋爵后来对维多利亚女王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像是“禽兽”一样。[14]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私生的孙辈——总数有56名之多，但他们之中无人有资格继承王位。夏洛特是唯一在受到官方认可的婚姻中出生的孙辈。当时真正重要的不仅仅在于这一代人，还在于掌控下一代。（身处继承顺序更远位置[15]的还有乔治三世国王的5个女儿，她们都已年届不惑之年，并且全都无儿无女。[16]）

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是否会绝后？现在看来，始于1714年乔治一世国王的汉诺威王朝有可能会在乔治三世国王的儿子们那里终结的想法似乎有些荒唐可笑。但是，鉴于他儿子们的行为，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当夏洛特去世时，围绕王室的未来出现了一阵骚动，议会坚持要求4名尚未成婚的王子必须结婚。

王子们立刻开始打理自己的发型，并将目光投向欧洲各国王室。由于与拿破仑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战争，法国无法得到他们的青睐。德意志很被看好，部分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路德教会的抚养方式能够带来端庄、顺从的妻子。4名王子中有3人很快就服从要求，在1818年年中成婚。最年轻的王子、剑桥公爵阿道弗斯向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的德意志公主发去婚约，后者欣然应允。[17]

维多利亚的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如今在王位继承顺序上排第4位，也是唯一遵循着其父母斯巴达式自律生活方式的儿子。他身高超过6英尺，既骄傲自负又强健有力，自称为“强者中的最强者”。尽管他私下里承认这么说有些放肆，但他还是经常夸口说，自己会比兄弟们活得更久。他经常说：“我过着规律的生活。我会比他们所有人活得更久；王冠将加冕于我和我的子女头上。”[18]据他女儿后来回忆，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复合体：既温和又冷酷；既富有同情心，又穷困潦倒；在遭到否定时脾气暴躁，在得到爱慕时温柔体贴。

与兄弟们不同，爱德华是一位聪明、生动、细致的书信家。他是一名支持大众教育、主张天主教解放和呼吁废除奴隶制的进步分子。尽管在军队中有着暴君式的名声，但他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他还非常奢侈浪费：他在心血来潮下做的事情包括带着一座拥有5000本书的图书馆跨越海洋，在衣柜里放置一眼喷泉，用天鹅绒装饰脚踏，在马路边安装五颜六色的灯光，等等。他的随从里一直有一位美发师，专门为他和他的仆人服务。

在这位公爵第一次向维克图瓦求婚时，没有人能够保证她会接受。她的两个孩子卡尔（Charles）[19]与费奥多拉此时分别仅有13岁和10岁，作为一名寡妇不受约束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比作为人妻的生活更令人满意。不过，在夏洛特去世几天后，她的鳏夫利奥波德给姐姐维克图瓦写了一封信，敦促她重新考虑肯特公爵的求婚。突然之间，爱德华的前景变得更为美好了：如今他与王位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许多。最终，维克图瓦接受了他的求婚。作为回应，爱德华温柔又浪漫地许诺要让他的年轻新娘幸福无比。[20]

爱德华与维克图瓦很幸运：他们内心深处都对彼此富有激情，并适应了家庭生活。1818年12月31日，爱德华给他的新婚妻子写了一封情书：“愿上帝保佑你。愿你爱我如同我爱你。”随着新年的到来，3位王

子的新娘都有了身孕。她们蜷着身子躺在丈夫身边，挺着大肚子，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接下来的一年时光。

到1819年，比赛正式开始了。3月26日，肯特公爵小弟阿道弗斯的妻子奥古斯塔生下了一名健康男婴。3月27日，爱德华兄长威廉的妻子阿德莱德早产生下了一名女婴，但只存活了几个小时。3月28日，肯特公爵爱德华踏上了从德意志的阿莫巴赫前往伦敦的旅途。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维克图瓦在颠簸不平的道路和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忍受了长达427英里的旅途。公爵曾担心，这趟旅途有可能让她提前分娩。但维克图瓦对她在英格兰的生活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期待”。她坐在丈夫身边乘坐嘎啦作响的马车一路前行，双手不停抚摸着腹部，手指触碰着皮肤上能够感知到胎动的地方。

4月18日，载着孩子、护士、助产士、牧师、医生和众多仆人、宠物狗以及鹦鹉的长长车队抵达了能够远眺英吉利海峡最窄处的法国海边小镇加来（Calais）。摄政王此前已经不情愿地同意让他的弟弟使用皇家游艇穿越海峡。他们在一周后穿越英吉利海峡。外面狂风大作，维克图瓦面色发青；在3小时的航程中，她呕吐了许多次。终于在多佛尔（Dover）靠岸后，他们径直前往肯辛顿宫。那里当时很像是一个乡下村落，而他们的巨大宫殿看起来似乎已荒废许久。墙壁上经常渗水，整个宫殿散发出干腐的臭味。作为一个不甘寂寞、极尽奢华的室内装潢家，这位公爵立即购买了窗帘、布料和家具：白色的装饰卧室，红色的装点餐厅。（他还在私下里焦急地给朋友写信，询问他的前伴侣朱莉近况如何。）在他与维克图瓦一起为他们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统治大英帝国大半个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出生做准备的同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这不过是另一个铺张浪费、大腹便便的王子与他怀孕的德意志妻子的故事。唯一给予他们关注的是那些会因为维多利亚的出生而蒙受最大损失的人：也就是英国王室。在她柔弱的肺部吸入第一口空气后不久，就已经有传言说，她邪恶的叔伯们正谋划要杀害她。

[1] Stockmar，*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1：77.

[2] 维多利亚出生时在场的官员包括曾在4年前的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一个在维多利亚十几岁时受到她鄙视的男人：当时担任她父亲的爱尔兰侍从、后来成为她母亲亲信的约翰·康罗伊上尉。

[3] 有些人曾认为，由于爱德华公爵没有血友病，而维多利亚有血友病基因，因此他不是她的父亲。但没有证据能够佐证这一点，而且有近三分之一的血友病病例是基因自然突变的结果。还应提到的是，维多利亚与她父亲所属的汉诺威家族的成员十分相像。参见 Stephen Pemberton，*The Bleeding Disease*：*Hemophili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Medical Progres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1），45.

[4] Worsley，*Courtiers*，190.

[5] Duke of Kent to Dowager Duchess of Coburg，May 24，1819，trans. cited by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30.

[6]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2.

[7] 在1802年的直布罗陀，爱德华差点在圣诞夜前夕命丧他自己手下士兵之手。他被派去这座位于西班牙最南端的英国偏远海军岗哨，负责恢复当地秩序；纪律散漫而且经常酩酊大醉的士兵们很快就讨厌起了他的严格和清醒。在他的手下士兵发动哗变后——这次哗变未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参与的士兵都醉得不轻——肯特公爵处死了3人，并将另外8人流放澳大利亚。（有几个人在抵达澳大利亚东南段的菲利普港后逃走了。其中一人在树林里消失无踪，并且与当地土著人一同生活了好几十年。）公爵后来应召回到英格兰，并开始为洗脱自己施暴的罪名而进行漫长的斗争。在不久后的1804年，一场黄热病席卷直布罗陀，杀死了大部分当地人。兵变让公爵免遭此难，也让他的女儿有机会在15年后出生。

[8] 维克图瓦是法语名，相当于英语的维多利亚（Victoria），因此维克图瓦公主有时也被译成维多利亚公主。——译者注

[9] 他们最年幼的两个孩子在接受了天花预防接种后先后死去，年仅4岁和不到2岁，他们最年幼的女儿阿梅莉亚在27岁时死于因麻疹而出现的皮肤感染。

[10] 埃尔德利·霍兰德爵士在《产科学与妇科学杂志》（*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aecology）1951年12月一期上撰文猜测：“夏洛特死于产后出血这一事实不太可能遭到质疑。”他嘲笑说，所谓她是因为在怀孕时没有勤于锻炼，或者在漫长的分娩过程中过于饥饿而死的说法非常可笑。如果说理查德·克罗夫特爵士犯了什么错的话，那应该是由于“错误的产科学体系”而没有使用产钳。引自 Longford，*Victoria R.I.*，151。

[11] Peters and Wilkinson，“King GeorgeIII and Porphyria，” 3-19. See also holeousia.wordpress.com/2013/03/07/ re-evaluating-the porphyria diagnosis of king george iiis madness/. 乔治三世国王在1788年突发严重的脑膜炎，在此期间，他一刻不停地说话，并短暂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他脸上的血管也出现凸起，以至于他的妻子将其描述为“黑色凝胶”（Hibbert，*George* Ⅲ：*A Personal History*，261）。但在第二年，国王出人意料地痊愈了，并且身体状况保持了很多年。最终，在他的小女儿阿梅莉亚1810年死于麻疹后，他病情复发。

[12] Fulford，*Royal Dukes*，38. 8.

[13] 她十分厌恶他放纵无度的生活，并且将他的住所描述为一座妓院。他也对她态度十分恶劣，在数十年里一直试图羞辱和摧毁她。他声称自己的妻子在结婚时不是处女，证据是她曾评论说，他的阴茎很大——这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说法，但标志着他开始纠结于妻子的性行为。他试图在法庭上证明妻子的不忠行为，以便能够离婚，却失败了。庭审程序太过羞辱和肮脏，以至于公众都站在卡罗琳这一边。这位摄政王甚至敦促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以剥夺卡罗琳·阿梅莉亚·伊丽莎白王后陛下的头衔、特权、权益、优待以及王后在王国内的豁免权，并且结束国王陛下与上述卡罗琳·阿梅莉亚·伊丽莎白的婚姻”。日记作家克里维写道，这项法案应该被称作“宣布王后是妓女的法案”（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27.）在法庭上面对他愤怒至极的妻子时，这位摄政王甚至贿赂民众来做出不利于妻子的证明，这也严重损害了君主的形象。

[1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3，1840. 8.

[15] 乔治三世国王的第六子、和蔼可亲的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对加冕为王没什么兴趣，而第七子剑桥公爵阿道弗斯是一个喋喋不休的男子，喜欢头戴一顶厚厚的金色假发，他在王位继承顺序上太过靠后，无法构成真正的威胁，尽管他是夏洛特死后第一个结婚的。

[16] 在这六位女儿中，没有一位生育了子女，也只有一位女儿结了婚。最年长的女儿夏洛特十分内向，在1797年嫁给了符腾堡王子。她只有过一个女儿，却是一

个死胎。女儿的死让她心碎：她将从英格兰带来的婴儿服装一直珍藏到去世为止。她的5个妹妹奥古斯塔、伊丽莎白、玛丽、索菲亚以及阿梅莉亚都被迫与母亲一起待在温莎城堡里，理由是她们有义务在父亲乔治三世国王发疯之后安抚她的情绪。她们整日里编织、弹奏音乐或者绘画，但因为无聊变得越来越疯狂。有两个人与仆人发生了风流韵事。她们甚至被禁止参加她们的大哥、威尔士亲王在成为摄政王时为自己举办的宴会，巨大的宴会桌中央特意设计了一条小溪，水中还有小鱼在游弋，岸边是绿色的苔藓和五颜六色的花朵。其中一个妹妹、伊丽莎白公主抱怨说：“我们还像过去20年一样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Fulford，*Royal Dukes*，38；Williams，*Becoming Queen*，47.

[17] 第三个儿子是一名水手，也是未来的国王威廉四世，他与一名演员生育了10名私生子，后来又在1811年凭借一纸书信将其抛弃。他向高贵而善良的阿梅莉·阿德莱德公主求婚并取得成功，但她经历了一系列造成巨大创伤的怀孕和分娩。她的第一个孩子是早产儿，并在出生几小时后夭折，她的第二个孩子流产，第三个孩子在出生4个月后死去。1822年，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却是死胎。

[18] Stockmar，*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1：77.

[19] 全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埃米希（Carl Friedrich Wilhelm Emich），是第三代莱宁根亲王。Charles是德语名Carl的变体。——译者注

[20] 他还希望她能够怀孕；一想到王位的下一顺位继承人——坎伯兰公爵欧内斯特——将得到王位，就让他无法忍受。欧内斯特脸上有一块疤痕，持有极端的托利党思想；一直有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称，他曾经性侵过一名修女、杀害过自己的男仆，还曾让自己的妹妹怀孕。他还娶了一名光彩照人但两次丧夫的德意志公主，后者被人怀疑杀害了至少一个丈夫。弗雷德丽卡确实怀了孕，但孩子却是个死胎。

2 父亲之死

肯特公爵夫人立刻就被她的宝贝女儿迷住了。她坚持用母乳喂养了半年时间，而当时的大部分贵族女性都雇有奶妈，通常是因为她们身上的束身内衣勒得太紧，影响了她们分泌母乳的能力。[1]尽管她的同龄人对此纷纷侧目，但公众却对公爵夫人坚持母乳喂养感到十分满意，尤其是那些自己也喜欢这么做的资产阶级们。她的这一决定比她自己所了解到的更为重要：因为母乳喂养是一种有效甚至是万无一失的避孕方式，这意味着公爵夫人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怀孕。如果她怀孕并给维多利亚生下一个弟弟的话，那么王位也许会被她的弟弟夺走。

对于出生的不是一个儿子，公爵的失望之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毕竟，按照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如果他的女儿没有兄弟的话，也是可以继承王位的。私下里，虽然承认她的机会很渺茫——他的几位兄长有可能会生出一名继承人来——但他仍然夸口说：“好好看看她吧，因为她将成为英格兰女王。”[2]维多利亚的父亲总是将他健壮、漂亮的宝宝称作奇迹。毕竟，在19世纪，光是出生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每1000名婴儿中就有150人在出生时死亡。即使在出生后，麻疹、百日咳、猩红热和霍乱的肆虐意味着婴儿活到5岁的概率仅为70%多一点。来自贫穷城市家庭、没有接受过母乳喂养或者断奶太早的孩子生存概率甚至更低。

当时还有一种通行做法，那就是给婴儿喂食鸦片，好让他们停止啼哭，而许多婴儿会因此失去食欲并挨饿。[3]可以预见的是，妈妈们会因为在工厂里工作时间过长、把孩子丢给陌生人照料而遭到指责。1850年，查尔斯·狄更斯担任编辑的杂志《家喻户晓》刊登了一篇文章，将这种做法归因于“无知的雇工奶妈”[4]，她们为了同时照顾八九个孩子就只能给他们下药。名为“舒缓糖浆”（Soothing Syrup）、“妈妈安

宁”（Mother’s Quietness）的调制品以及一种名叫“戈弗雷香酒”（Godfrey’s Cordial）的鸦片酊制剂使得“宁静的穷人家中散发出毒品的味道”。1867年，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写了“经过伪装的杀婴行为以及用鸦片制剂对儿童进行的麻醉”，并且补充说，他们的父母自己也染上了毒瘾。[5]婴儿的死亡如此普遍，以至于父母会为他们的新生儿买保险，如果孩子死去的话通常能得到5英镑的赔偿，而这种做法被认为鼓励了杀婴行为。到1900年，有80%的婴儿都被投了保险。

但维多利亚浑身充满了活力，以至于公爵夸口说，她“与其说是一个袖珍版的爱神维纳斯，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袖珍版的大力神”[6]。据她父亲说，她是个结实的孩子，是“力量与美相结合的典范”[7]，而她父亲亲自负责监督育婴计划和实际操作。她还有些胖乎乎的，两条腿尤其胖：公爵的律师斯托克马男爵称她为一个“漂亮的小公主，圆嘟嘟的像一只山鹑”。[8]维多利亚的伯父们很不高兴。[9]不久后成为乔治四世国王的摄政王一直深深地憎恨着自己的弟弟肯特公爵。

维多利亚出生在大英帝国的辉煌时刻。四年前的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中被击败，结束了长达17年的英法战争。英国对击败欧洲最强大的人和最强大的国家感到兴奋不已。如今，拿破仑被牢牢地关押在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上，而且，让英国人感到满意的是，他开始热衷于园艺事业。滑铁卢之战标志着“英国治下的和平”的开启——那是一段持续99年的和平，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一直稳步扩张，给亚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染上了帝国红色（也就是当时地图上显示的大英帝国的颜色）。这种扩张伴随着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和巨量的煤炭与铁矿石生产。大英帝国在19世纪快速而似乎无法阻挡的扩张使得英国王位成了众人眼红的奖赏。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和最强大的海洋大国。但伦敦却充斥着不满情绪。

1821年时，英国有半数的劳动力都不满20岁。在维多利亚出生的1819年，英国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工厂和纺织厂中童工的每日工作时长限制在12个小时之内；但这一法案却罕有实施。年龄低至5岁的儿童仍然在火柴厂、制钉厂、煤气厂、造船厂和建筑工地起早贪黑地工作。1833年通过的《工厂法》（Factory Act）规定9岁以下儿童不得工作，但该法案只适用于纺织厂。1834年，工厂被禁止招募任何10岁以下儿童担任学徒并从事清扫烟囱工作，也被禁止“虐待”任何10岁以上童工——但是，这一法案同样毫无效力，未能得到执行。清扫烟囱成为虐待儿童的重要标志，传说为了逼迫童工干活更快，会在他们脚下点起火，还有一些童工在蜿蜒曲折的灰暗裂缝中被卡住甚至死去的传闻。到1840年，伦敦仍然只有20%的儿童上过学。

工业革命正迅速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19世纪初，有20%的英国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到世纪末，这一比例增加到了75%。贫民窟在伦敦四处蔓延，而在曾经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有时一间屋子要住进30多个人。[10]对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大多数人而言，所谓的卫生措施指的仅仅是使用一个便桶，然后把污物倒进露天下水道中。在维多利亚出生时，食物是在露天火炉中烹饪的，信件还是用马匹传递的，半数的人口都不识字，少数有产阶级是唯一拥有政治权利的人。等到1901年她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人们已经开始乘坐地铁通勤，电报带着信息跨越海洋，教育成为一项义务，女性也有了一些基本权益。

在维多利亚出生时，放纵无度的摄政王与许多一无所有的英国平民遭遇的生存困境相距甚远。英国政府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Corn Laws），用关税来保护英国小麦，其结果是食品价格上涨，触怒了生活拮据的工人阶级。乡村劳工集体放牧的公共土地被围成了小块土地，以便收取更高的租金，却造成了巨大的生活困境。世界其他地区对英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同时下降的还有工资水平和就业率。在维多利亚出生前几天，围绕面包价格爆发了巨大骚乱；即使在肯辛顿宫周围较

为富裕的地区，贫穷的迹象也随处可见。

尽管维多利亚出生在英国，但她身边围绕的都是德意志人；甚至她的阵阵啼哭声都是用德语摇篮曲来安抚的（不过她一直到7岁才开始正式学习这门语言）。她几乎完全是德意志血统。她的母亲、母亲的女儿费奥多拉、舅舅利奥波德，以及家庭女教师都是德意志人。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德意志人，而距离她血缘最近的一位英国祖先来自17世纪。[11]从1714年到1901年，统治英格兰的所有汉诺威王朝君主都与德意志人联姻——维多利亚也不例外，她自己9个孩子中的6个也是如此。

德意志当时是一群小国家的集合，在1815年拿破仑被击败后，它们被捆绑在一个名叫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的联盟中。（一直到1871年，德国才以单一国家的形式存在。）其中部分国家在拿破仑战争中与法国结盟，但它们之中最大也是最强大的国家——普鲁士（Prussia）——却是英格兰的盟友。其中一个名叫汉诺威（Hanover）的小国家很奇特，接受英国国王在伦敦的统治，因为从血统上说，英国国王都是汉诺威人。这一持续一个世纪的安排由既是英国人也是德意志人的乔治一世国王在1714年开创，并在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女王后终结。因为只有男人可以统治汉诺威。

1819年6月24日，在肯辛顿宫顶层一间富丽堂皇、屋顶高耸的房间里，一小群人正站在屋内盯着婴儿维多利亚和她紧张不安的父母。他们围绕在一个当天从伦敦塔带来的金色洗礼盘周围。房间四周挂着红色天鹅绒窗帘，遮住了一排高挂在墙上、描绘了一些皇帝和法老骄傲外貌的半身画像，他们包括尼禄（Nero）、卡里古拉（Caligula）、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等。［按照礼仪，这些画像的面孔需要被遮住，以照顾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敏感。］

摄政王对受他轻视的弟弟生出了一名王位继承人感到愤怒不已，坚持要求孩子的洗礼仪式一切从简且不能对外公开，必须在下午进行。他

不想让这场仪式显得过于华丽，或者以任何方式暗示出它是为潜在的未来君主举行的。任何人都不准穿着礼服、制服或者金饰带。更糟糕的是，摄政王不允许肯特公爵和公爵夫人为他们自己的女儿取名。他们曾想给她取名为维克图瓦·乔治亚娜·亚历山德里娜·夏洛特·奥古斯塔（Victoire Georgiana Alexandrina Charlotte Augusta），但摄政王提前给他们写信说，不允许给孩子取名为乔治亚娜，因为他不希望他自己的名字“乔治”的变体被放在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名字变体的前面（亚历山大给了肯特公爵一笔钱操办婚礼，并且是他们孩子的教父）。摄政王说，他将在洗礼仪式上告诉他们还能使用其他什么名字。

在洗礼仪式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满怀期待地抱起胖乎乎的婴儿，向摄政王问道：“殿下愿冠此婴何名？”摄政王坚定地宣布：“亚历山德里娜”，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肯特公爵提出将夏洛特作为第二个名字，然后是奥古斯塔，但摄政王摇了摇头。他同样拒绝了伊丽莎白这个名字。他不希望这名婴儿，这个王位的竞争者，继承英国王室中任何具有传统和历史意义的名字。在公爵夫人忍不住失声痛哭后，摄政王终于说道：“那么，再给她冠以母亲之名吧，但是不能放在沙皇之名前。”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名字都来自外国；这个孩子在大约4岁之前一直以德里娜（Drina）之名为人所知。在那之后，她一直被称作维多利亚。1831年时，议会里有人试图将她的名字改成夏洛特或者伊丽莎白，因为他们认为亚历山德里娜和维多利亚这两个名字当时在英格兰没什么知名度，但维多利亚坚持自己的名字保持不变。

摄政王没有与自己的弟弟交谈就离开了洗礼仪式。但他的敌意却丝毫没有减退：当肯特公爵在小德里娜仅仅3个月大时把她带到豪恩斯洛荒野（Hounslow Heath）观看一场阅兵式时，摄政王大喊道：“那个婴儿来这儿做什么？”[12]维多利亚的叔伯们对她的母亲也没什么好感。肯特公爵夫人有着浓重的德意志口音，也没怎么努力学习英语——不过墨尔

本勋爵后来猜测，她其实对英文掌握得很熟练，只不过是假装说不好而已。她的演讲稿通常都会按照发音来拼写：“Ei hoeve to regret，biing aes yiett so little cônversent in thie Inglisch.（我很抱歉，英语说得还不太好。）”[13]王室成员们一直将希望寄托在肯特公爵的兄长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身上，希望他和妻子能够生出一名继承人，以取代不受待见的爱德华：小维多利亚是“他们真正的眼中钉、肉中刺”[14]。

不受欢迎的摄政王是一个悲惨的家伙。他在同一天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夏洛特和唯一的外孙，而且十分憎恨自己的妻子。[15]他身材肥胖，一直依赖鸦片酊来缓解腿部肿胀带来的疼痛。阿司匹林一直到1899年才成为专利药品，当时也没什么可以替代的止痛药。鸦片酊在维多利亚时代是合法药物。它是一种混合了草药、鸦片、蒸馏水和酒精的混合物，被普遍当成一般性药物使用，以起到帮助睡眠、缓解疼痛、停止腹泻（腹泻一般由霍乱或痢疾引起）、抑制痛经和胃胀气、舒缓分娩阵痛，以及缓和耳痛、牙痛和喉咙痛等作用。它还被用于治疗癔症和精神病，以及当时工人阶级中十分常见的“疲劳和抑郁”等症状。[16]它还是大多数专利药品的关键成分，效果极强，且极具成瘾性。[17]那些对鸦片酊的安眠、刺激功效上瘾的人中包括玛丽·托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18]、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9]、查尔斯·狄更斯，以及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20]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从克里米亚战争中返回英国后开始服用鸦片，声称这有助于缓解她的背部疼痛。她在1866年写道：“任何东西对我都没有用，只有新近流行、令人好奇的在皮下注射鸦片的做法能够让我舒服24小时——但它不会改善个人智力的活跃或者平静程度。”[21]丹蒂·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22]的夫人因鸦片酊服用过量而死。王室中的许多成员都对它产生了依赖，尤其是那些患有痛风等慢性疾病的人。

肯特公爵认为，海洋是一种比鸦片好得多的补药。大多数人喜欢夏

天去海边，而他却决定在1819年寒冬前往海边，好让患有风湿病的维克图瓦获得一些休息。

医生此前刚刚发现了海洋所谓的治疗功效——据说海洋能够治疗胸闷气短、中风，甚至是产后抑郁症，当时这种病症还被称作产后疲劳。哺乳期妈妈们被大力推荐进行盐水浴，因此公爵提前去德文郡海岸打前站，好找到一个让他们所有人落脚的地方。到那里之后，他去拜访了一名占卜者。占卜者对他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会有两名王室成员去世。他沉思着说："很有趣。我很好奇会是谁呢？"[23]其中一个将会是他精神失常的父亲，乔治三世国王；另一个人是谁他无论如何也猜不到。

几周后，他带着家人住进了距离海边不远的小峡谷中的一栋小别墅。［旅途中，他们还在公爵的旧时家庭教师菲舍尔主教（Bishop Fisher）那里短暂停留。小维多利亚把主教的假发拽了下来——这是她不尊重圣公会权威的早期迹象，而这种态度将贯穿她的一生。］他们在圣诞节那天冒着暴雪搬进了别墅。那年冬天特别冷，别墅四周狂风肆虐，但公爵却非常满足。他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的宝贝女儿有多么健壮："我怀疑，在我家族里的某些人看来，她有些过于健康了，因为他们把她看成一个障碍。"[24]维多利亚此时只有8个月大，但个头已经相当于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她的父亲相信，她已经继承了他灵魂中的钢铁意志。她最早的两颗牙"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牙龈；她几乎从不退缩。有一次，她正在别墅的保育室里熟睡，一名正在猎鸟的当地男孩不小心将一枚小子弹射穿了她的窗户。公爵说，她就像一个军人的女儿一样没有任何退缩。[25]

1月7日，肯特公爵与他的侍从约翰·康罗伊冒着大风沿着悬崖进行了一段漫长的散步。在他回到别墅前门时，他开始抱怨寒冷的天气让他的骨头疼痛不已。他在开始发烧后被转移到了一个较为暖和的房间里，并且接受了两次放血治疗，但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他们在如此紧急的情

况下能够找到的唯一医生威廉·梅顿（William Maton）不会说任何德语。梅顿医生再次实施了放血治疗，然后又用吸杯疗法和水蛭疗法治疗公爵。吸杯疗法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意即在皮肤上切一个小口子，然后在上面盖上一个加热过的杯子。随着杯子逐渐冷却，血液会流入真空中。在对公爵的治疗临近尾声时，他已经损失了约3升血液。公爵夫人既窘迫又愤怒，但她没有办法质疑医生的智慧。她写道：“他身上没有一处地方未被吸杯、水泡或者放血疗法触碰过……他疲惫不堪……都是被那些残忍的医生折腾的。”[26]那一晚，当公爵被告知医生想要再次实施放血疗法时，他流下了眼泪。

公爵夫人焦急地来回踱步，她的丈夫痛苦地躺在床上，不断咳嗽并发出嗝嗝声。她拒绝去休息。很快，亲友们开始陆续抵达别墅，其中包括公爵夫人的弟弟利奥波德王子，他还带来了日后将在宫廷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医生兼律师克里斯蒂安·斯托克马。斯托克马为公爵诊了脉，而公爵夫人就在一旁着急地等待。他转过身，轻声说：“人力已无力回天了。”[27]公爵夫人凝视着他，然后来到丈夫身边，握住他的手。她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更衣，也没有睡觉了。婴儿维多利亚——当时她被亲昵地称作“维克宝贝”（Vickelchen）——在婴儿床内熟睡，肯特公爵夫人的大女儿费奥多拉则跪地祈祷。破晓时分，公爵依然高烧不退、焦躁不安。他抓了抓妻子的手，将她拽到身前，气若游丝地说：“不要忘了我。”[28]

肯特公爵于1820年1月23日周日上午10时去世。由于他素日里身体十分健壮，因此他的死让人极为震惊。[29]俄国驻伦敦大使夫人利芬亲王夫人（Princess Lieven）写道：“那个人间的大力神不在了。”[30]可怜的维克图瓦如今又一次成了寡妇。她遭人厌恶、几乎身无分文，而且盟友甚少。她不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习俗和人民，而她怀中抱着的这个孩子却很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君主。王室曾对她略有好感，尤其是在女性之间[31]，但她在与那些有可能生出维多利亚竞争对手的女性王

室成员打交道时，表现出的缺乏技巧和争强好胜的态度，很快就将这种好感击得粉碎。

* * *

即使在死后，肯特公爵也同样非同一般。他的灵柩有一吨多重，长度有7英尺——抬棺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抬出门。他于2月12日夜间下葬于位于温莎的家族墓穴中，他的妻子则在房间里哭泣（女性不允许参加葬礼，据说是因为觉得她们会情绪失控）。他们的婚姻曾经幸福美满。[32]如今已成孤家寡人的她将保护、教导和控制维多利亚当成自己毕生最大的使命。但首先，她需要学会如何生存下去。

这丝毫不简单。公爵在去世前签署了一份遗嘱，将他的孩子托付给妻子抚养。他将一切都赠予了维克图瓦，尽管按照习俗，那个时代的男人通常会把财产留给他们的男性亲属（女性一般只能得到财产的利息）。但他的巨额债务迫使她不得不依靠弟弟利奥波德的资金援助和她大伯摄政王的善意。摄政王同意让他们继续留在肯辛顿宫居住。这悲伤的一家人在伦敦寒冷的冬天回到了肯辛顿宫，8个月大的维多利亚因马车的颠簸而不停哭泣。她站在马车里，时而迈着她强健的双腿哭泣，时而在她母亲的膝盖上哭泣，时而一边哭泣一边挥舞拳头砸在用黑布遮盖的关着的车窗上。在她父亲死后，这个日后成为女王的女孩生命中反复出现的双重压力首次显现：失去与忍耐。

在爱德华去世6天后，他的父亲乔治三世国王也在温莎城堡内去世，摄政王也就此加冕为乔治四世国王。这意味着到1820年1月29日时，维多利亚在王位继承顺序上已经从第5位上升到了第3位。随着可能性越来越大，她曾经十分温柔的母亲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痴迷权力。维多利亚将需要学习如何抵抗这个在她父亲去世时才刚刚给她断奶的女人。维多利亚的母亲曾说，即使是在婴儿时期，她就已经显露出“喜欢为所欲为的征兆”[33]。随着她慢慢长大，她需要借助这股子倔劲。因为

正是在学习如何反抗母亲的过程中，维多利亚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女王。

---

[1] 肯特公爵夫人说，尽管“每个人都非常吃惊”，但她“如果看到我亲爱的小宝贝趴在别人的胸前喝奶的话，会感到绝望的”。她的丈夫对妻子胸部的肿胀和收缩尤为感兴趣，称其为“母性营养”以及“一份最有趣的工作”。Stuart，*The Mother of Victoria*，76.

[2] Longford，*Queen Victoria*，24.

[3] 有些死亡还源于药物过量。英国注册总署的报告称，大多数因鸦片中毒而死亡的案例出现在年轻孩子身上，尤其是婴儿。在1863至1867年间，有235名一岁以下婴儿死亡，还有56名一岁至四岁幼儿死亡；5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的死亡人数为340人。Berridge，*Opium and the People*，100. 需要提到的是，如今，鸦片——或者说鸦片酊——被用于治疗母亲是毒瘾患者的婴儿身上出现的戒断症状。

[4] Protected Cradles，” 108.

[5] 当时一如现在，工人阶级对毒品的使用比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更令人担忧，而且它让人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34]：工人阶级所忍受的长时间劳动和繁重的工作条件，更别提缺少对女性的保护，例如育儿假或者产假等。女性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骡子；她们负责生孩子、照顾孩子、操持家庭，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工厂劳动中来，但她们的权利却少得可怜，而且无法得到认可。一直到19世纪末，她们仍然是自己丈夫的合法财产。——作者注

[6]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33.

[7] Plowden，*The Young Victoria*，35.

[8] 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1：78.

[9] 6月时，公爵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兄长摄政王没有对欧洲各国王室宣布维多利亚出生的消息，尽管维多利亚在王位继承顺序上排名很靠前：“他的计划很明显是想压制我。”在维多利亚出生三天后，坎伯兰公爵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名为乔治，就排在维多利亚的后面。他长大后虽然双眼失明，但还是成为汉诺威国王。

[10] Chesney，*The Anti-Society*，14.

[11] 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是乔治一世的母亲，也是维多利亚的曾曾曾曾祖母。维多利亚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德意志人。

[12] St. Aubyn，*Queen Victoria*，11.

[13]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46；Longford，*Victoria R.I.*，20.

[14] Van der Kiste，*George* Ⅲ*'s Children*，121.

[15] 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公主从小娇生惯养、待人粗鲁、生性叛逆。她十分厌恶摄政王的生活方式，并且表示她的丈夫及其奉承者们总是醉醺醺的；她经常能发现他们穿着靴子躺在沙发上不省人事，鼾声震天。民众的看法也与她一致。摄政王之所以与她结婚，是因为他的情妇敦促他找一个无法取代她，又能让他得以偿还部分债务的人。议会经常会在王室子嗣正式结婚后提高他们的年收入数额，这也造成了许多伤心的故事。

[16] Berridge，*Opium and the People*，31.

[17] 1868年的《药房法》将药物的售卖权局限于药剂师，而药剂师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真正出现。

[18]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夫人。——译者注

[19] 英国诗人、文评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20]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21] Berridge，*Opium and the People*，59.

[22] 英国画家、诗人、插图画家和翻译家，是前拉斐尔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23] 达夫写道，当公爵人在伍尔布鲁克时，一名算命师来到西德茅斯并对他说："今年会有两名王室成员死去。"（Duff，*Edward of Kent*，281.）其他人则声称这件事发生在豪恩斯洛希思的一次阅兵式上。例如：Stuart，*The Mother of Victoria*，87。

[24] Duff，*Edward of Kent*，279. 对所有事情的记述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14。

[25] Fulford，*Royal Dukes*，203.

[26]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43.

[27]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44.

[28] Longford，*Queen Victoria*，25.

[29] 坎伯兰公爵说："我一生中从未受到过这么大的打击。"他指的是自己兄长的死。（Duke of Cumberland to the Prince Regent，February 4，1820，Aspinall and Webster，*Letters of George* Ⅳ，vol. 2，letter 790.）王室也因这个曾被克罗克称作"强者中的最强者"的人突然死去而感到惊讶不已：他的一生中从未生过病，如今却在几乎半个国家的人即使患上感冒也会安然无恙之时被感冒夺去生命。这的确是非常不走运。让我想起了伊索寓言中橡树与芦苇的故事。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34.

[30] Creston，*Youthful Queen Victoria*，85.

[31] 1820年2月4日，奥古斯塔公主在温莎城堡致信哈考特夫人，谈及克拉伦斯公爵因爱德华的死而变得多么消沉，并且补充说："即使是我自己，也难过到一想起那个善良、杰出女性——肯特公爵夫人以及她所遭受的所有苦难就无法忍受；真的让人悲痛万分。她是言语能够描述的最为虔诚、善良和逆来顺受的人。"威廉让阿德莱德公主每天都去看她——并且说她能够给她带来巨大安慰——她们可以谈到一块去——"这让她们成为彼此真正的朋友和慰藉"。很不幸的是，公爵夫人无法回馈或者说维持这些友谊。很有可能因为她十分嫉妒：在1820年阿德莱德生下女儿伊丽莎白时，约翰·康罗伊写道："我们都变得不知所措。小夫人的鼻子都要气歪了。"（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40）伊丽莎白于三个月后不幸夭折。

[32] 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在母亲死后读到母亲在笔记本中所写的对父亲的爱时也感到很惊讶。她写道："她和我亲爱的父亲深爱着彼此。如此的爱情与依恋，我都不知道还能到这种程度。" 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560.

[33]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17.

[34] Berridge，*Opium and the People*，97.

3 孤独、淘气的公主

［维多利亚］被人严加看管，以至于女仆们忙到没人有闲暇悄悄告诉她“你是英格兰王位继承人”。我怀疑，如果我们能够解剖一下那颗小心脏的话，也许能发现某只鸽子或者小鸟已经把消息告诉她了。[1]

——沃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828年

维多利亚是个爱发脾气、不服管束的小姑娘。她讨厌正襟危坐，讨厌吃药，讨厌被人命令去做任何事。当她的钢琴教师塞尔先生（Mr. Sale）命令她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练习时，她用力把钢琴盖关上，大声喊道：“你看！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2]她生活中的诸多必须让她变得愈加叛逆。1830年，她的家庭女教师路易丝·莱岑女男爵[3]逼迫维多利亚在“品行簿”（Conduct Book）[4]上记录自己发脾气的次数。她有时一天要记录下3次发脾气，写道自己“对待莱岑态度恶劣、粗鲁无礼”。1832年8月21日，她“淘气得非常非常非常严重”（“非常”下面划了三道杠，而“淘气”下面划了四道杠）。在1832年9月24日下午，维多利亚写道，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极其淘气！！！！！”——整句话下面都划了四道杠——但在自己的日记里，她仅仅写道：“天气酷热难忍。”在她要为创造性写作编故事时，她编的通常都是些娇生惯养、不服管束的孩子需要进行忏悔或者被惩罚的故事。[5]

小公主写的故事还揭示出她是如何与守规矩的要求做斗争，以及她是如何幻想自己受人娇纵、不被纠正行为过失的。在她7岁时写的一个故事里，她描写了一个名叫安（An）“的淘气女孩”。她写道（文中还有些拼写错误）：

小安既漂亮又淘气，既贪心又调皮。没人喜欢接近她，因为她总是惹人不快。

> 有一天，她父亲举办了一场宴会，有许多大人物前来参加；小安获准进到房间里。只要有人跟她说话，她就转过身去不理不睬。由于她亲爱的父亲想要让她高兴，于是允许她与爸爸一起进餐；无论她要吃什么，她妈妈（也是她最喜爱的人）都会给她递来，还给了她好多糖果。安坐在D夫人和她妈妈之间；可怜的D夫人被安烦得受不了，对她妈妈说：“夫人，您女儿表现很糟糕，而且很烦人。”安的母亲G夫人气得脸颊通红。的确，夫人，请允许我和爱女小安一起离开。她带着安离开了房间，安的手上还拿了满满一盘糖果。[6]

写下这些文字的女孩很清楚被娇惯的好处和坏处。被维多利亚持续不断考验的不仅有莱岑，还有她的私人教师乔治·戴维斯牧师（Reverend George Davys）。母亲向4岁的维多利亚提出，如果她在戴维斯首次造访时表现良好的话，就能得到奖赏，而她却试图讨价还价，要求先得到奖赏。当戴维斯建议他们来学习字母o时，她却说她更喜欢h。

不过，虽然脾气不好，维多利亚却有着美好的心灵，而且为人诚实。有一天，公爵夫人对维多利亚的家庭教师说：“她今天早上表现很好，但昨天发了一次脾气。”维多利亚则尖声说：“发了两次脾气，一次在穿衣服时，还有一次在洗漱时。”[7]她的一些任性行为是被阿谀奉承的宫殿仆人以及定期造访的大人物给惯出来的。她开始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地位。一位名叫爱丽丝小姐（Lady Ellice）的年轻客人想要玩她的玩具，却听她说道：“你不许碰它们，它们是我的。而且，我可以叫你简（Jane），但你不能叫我维多利亚。”[8]就好像她受人怂恿故意表现得高人一等一样，而过多的阿谀奉承造成了她的傲慢自大。比她年长12岁的同母异父姐姐费奥多拉后来给她写信，谈到了她们母亲的侍女斯佩思男爵夫人（Baroness Späth）：“在你还小时，她曾经在你面前跪在地上走路，就像是一种偶像崇拜。”[9]主教们会匍匐在地毯上陪她玩耍，而贵族们则会列席旁听她的学校课程。她后来承认说，她知道自己是“屋子里的宠儿”，而且有时还会挑衅他人，认定他们不敢违抗她。有一次，有人对她说，如果她哭的话，同样居住在肯辛顿宫的她的叔叔萨塞克斯公爵会惩罚她，她却在每次他走过的时候开始撕心裂肺地大哭。

或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个衣食无忧、喜爱骑马、常去海边且备受身边人宠爱的女孩，在维多利亚自己的描述中，她的童年却相当悲惨。[10]她后来抱怨说，肯辛顿宫既脏又不舒服，到处都是甲虫。有一次，在被问及生日想要什么礼物时，她说道，想要有人擦洗一下窗户。不过，尽管有着各种玩具、漂亮衣服、宠物以及毛驴坐骑，但她真正缺少的却是朋友。她后来对自己的大女儿说："我在儿时的生活很不幸福；满腔的感情无处安放——身边没有兄弟和姐妹，也从未有过父亲——不幸的是，我和母亲的关系也不顺畅，或者说一点也不亲密或者知心……我也不知道幸福的家庭生活究竟是什么样！"[11]这不仅仅是事后无情——她的姐姐费奥多拉后来也描述了一个与之相类似的单调故事：

> 在我们压抑的生活中，失去一切交流、没有任何快乐情绪让人非常难受。我唯一的快乐时光是同你和莱岑一起外出散步或者乘车；只有在那时我才能随心所欲的说话和观察。我从多年的监禁中逃了出来，而你，我可怜的妹妹，在我成婚后不得不独自忍受。[12]

在1828年费奥多拉成婚并移居德意志时，维多利亚只有9岁；她伤心至极。从那时起，她的生活中就只剩下来自成年人的令人压抑的不断监视。她每晚都要睡在母亲的房间里，会有人看着她，直到她母亲上床睡觉为止。即使在她浇花时，也会有一个身穿红色制服的仆人跟在她身边。

维多利亚是在10岁时发现自己在王位继承顺序上排第3位的。那是在1830年3月11日，她正坐在自己的小桌前，试图全神贯注地读书。她镶着蕾丝边的天鹅绒裙子前面别着一根冬青树枝，好让她保持抬头挺胸。[13]在一场让泰晤士河部分冰冻的严寒结束后，大地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回暖，而她已经等不及想要骑上她的小马，侧坐在马鞍上在肯辛顿花园里驰骋了。骑马是她能够做的最接近独处的事情。她开始翻阅豪利特（Howlett）所著的《英格兰国王与女王传奇》（*Tables of the Kings*

and Queens of England），在翻到以前从未看过的一页时皱起了眉头：那是一张英国王室的家谱图，显示了通向王位的顺序。她的伯父，也就是身患疾病、避世隐居的乔治四世是现在的国王。接下来是她的伯父威廉。在那之后就是她的名字了。维多利亚突然哭了出来：“我比自己以为的更接近王位。”[14]

三十年后，最初受雇负责教导费奥多拉，但在维多利亚5岁时被任命为其家庭女教师的莱岑女男爵用赞美之词描述了这一瞬间。根据她的说法，维多利亚严肃地说：“看，许多孩子都会夸口炫耀，但他们不曾了解艰难险阻。这的确很光鲜，但更多的是责任。”[15]莱岑写道，紧接着，她伸出食指，宣称：“我必不凡！”这些得到广泛传颂的语句对一个10岁孩子来说显得太过正式和不自然，将一个令人气馁、烦恼的时刻变成了一段迷思。尽管许多母亲可能更愿意亲自将如此重要的消息告诉自己的女儿，但肯特公爵夫人却对于维多利亚无意间了解自身处境乐见其成。[16]（此前，两位前来评估维多利亚教育状况的主教都曾劝过她；他们说她必须对女儿如实相告。）当然，维多利亚在此之前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有过强烈的怀疑——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对一个小姑娘卑躬屈膝、毕恭毕敬呢？尤其是与此同时还对她同母异父的姐姐视而不见？不过，想法得到证实的那一刻却让人烦恼不已。数十年后，阿尔伯特亲王披露说，发现自己距离王位如此之近让维多利亚“非常不开心”。她曾经“因此大哭不已——甚至对自己有可能成为女王哀叹不已”[17]。三个月后，她的伯父乔治四世国王去世。

在1830年3月11日，也就是维多利亚发现自己可能命运的那一天，有几个后来成长为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人物的孩子也在埋头读书。比维多利亚年轻一岁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正与表亲一起在位于温切斯特的儿童游戏室内模拟建房子，她把石楠花铺在沙发上，并且试图给旧床铺除湿。（年轻的弗洛伦斯画了一张表格，表头分别是“蔬菜”和“水果”，她和表亲在表格里画上了圆锥、橡实等不同的图形，以代表模拟厨房里的

桃子、黄瓜、豌豆和土豆等食物，鲜明体现了她与生俱来的条理性。[18]）10岁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当时还叫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正在纳尼顿的寄宿学校创作完美无瑕的作文。[19]（埃文斯的成长过程十分与众不同：大多数母亲都会让女儿在家里或者学校接受有关顺从、缝纫、绘画和音乐的教育。）未来的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此时只有11岁，正在位于萨里（Surrey）的家中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查尔斯·狄更斯刚满18岁，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阅览室中用功，他当时正在学习速记法，好开始自己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比狄更斯略微年长一些，此时正在剑桥大学郁闷地读书中。他们所有人都将成为那个时代的巨人，但是与那个10岁时在肯辛顿宫中哭个不停的女性比起来，他们始终相形见绌。

维多利亚只信任一个人：她的家庭女教师。作为科堡一位路德宗牧师的女儿，莱岑女男爵是一名异乎寻常、专心致志且聪明绝顶的女子，终身致力于将维多利亚培养成一个坚强有力、聪慧明智的女王。女王后来成了一个多产的艺术家，还专门为她画了一幅充满深情的画像，画像上的她有着深色的头发、深邃的眼眸以及坚挺的鼻子和下巴，看起来既严肃又耐心，还很和善。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土豆，始终保持着咀嚼葛缕子的习惯，以改善自己的消化功能。莱岑经常受到那些厌恶她对女王巨大影响力的人抨击，但她是唯一全身心维护维多利亚利益的人。正因如此，她赢得了年轻女王的信任和喜爱，而且她也从未背叛过这份信任。在维多利亚患病时，莱岑会陪在她身边，安静地为布娃娃缝衣服，而维多利亚的母亲却一如既往地走亲访友。如果莱岑病倒了的话，维多利亚也会想念她。她后来写道：“公主是她唯一的挂念和羁绊[20]……在担任维多利亚公主家庭女教师的13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她。[21]”无论是作为公主还是后来身为女王，维多利亚都渴望这种一心一意的忠诚态度。

莱岑最关心的是确保维多利亚得到保护、受到良好教育，并被塑造成一个坚强的女王。她经常因维多利亚不服管束和独立自主的性格而遭到批评，但她事实上十分严厉；她仅仅是意识到了维多利亚与生俱来的勇气，并且对其悉心培养而已。她曾对维克图瓦说："我必须要确保公主能够养成——而不是被强加——一种品质，那就是对她认为是正确和好的事情，她会主动地尝试、思考，并且坚持己见。"[22]在当时，即使是暗示女孩的智力值得培养或者勇气是年轻女性的一个重要品质，也会引起巨大争议。维多利亚认为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虽然是一位优秀的君主，但同时也是一名严厉而傲慢的女性，不过莱岑却曾对康罗伊的一个亲人说，伊丽莎白是"完美的典范"[23]，以及她可以"原谅一个女王的邪恶，但不会原谅她的软弱"。[24]虽然维多利亚也有自己的缺陷，但她从来都不软弱。她是一个思维敏捷、才智过人的学生，喜爱炼金术，讨厌拉丁语和解剖学。但她最大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学究气，反而十分引人瞩目：跳舞、唱歌、绘画、戏剧、歌剧以及芭蕾。维多利亚是一个连说话和做梦都在用加粗斜体的姑娘。

人们经常说，维多利亚更像英国王室中的男性而不是女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有些不幸，因为汉诺威家族的男性经常会有着粗壮的体格和圆润的脸庞，下巴很小、鼻子很高、双眼突出。的确，她始终也没能拥有绝世美颜，而且始终在与自己的体重做斗争，但有些时候——尤其是在幼时，在热恋中，或者在欢笑时——她还是相当迷人的。画像上的她有着秀丽的脖颈、精致的颧骨、整齐的弯眉以及花苞般的嘴唇。她似乎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孩子：头发秀美、面容友善，还有一双无辜的蓝色大眼睛。据艾伯玛尔勋爵（Lord Albermarle）描述，7岁的她是一个"活泼的漂亮姑娘"[25]，喜欢戴着大草帽照看他窗下的花朵；她一边给花浇水，一边把水洒在自己小脚上的样子经常把他逗乐。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也变得越来越苗条，发色渐渐变深，表情也变得更加严肃、傲慢和羞涩。庄重的肖像画无法捕捉到她声音的轻盈或者行为举止的优雅和从容。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的密友哈丽雅特·阿巴思诺

特（Harriet Arbuthnot）说，9岁的维多利亚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26]：“一个健康、漂亮、端庄的小家伙，既顽皮又有些孩子气。”

在维多利亚所受教育中，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她暴躁的脾气从未遭到过打压——或者说早期所有压制这种脾气的努力全都失败了。当时的其他女孩都被教导要保持温顺而端庄。颇有影响力的作家汉娜·莫尔（Hannah More）在19世纪早期曾写道，男孩子应该因为有着“勇敢、独立、进取的精神”而受到赞扬，但女孩子却不应如此，而且任何这样的精神在被发现时就应遭到压制。莫尔写道：“女孩子们应当被及时教导要放弃自己的看法，而且不能过于顽固地纠缠于某个争端中，即使她们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也应如此[27]……对她们的未来幸福来说，最重要的是她们要养成一种温顺的脾气和宽容的精神。”[28]这与维多利亚相比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年轻的公主十分渴望获得她所谓的“欢笑”。她生性幽默，而且有着模仿和巧辩的天赋。她的祖母曾将她描绘成一个滑稽、老成的小丑。维多利亚还喜欢换穿各式服装。她喜欢的打扮包括头戴绿色穆斯林头巾、面戴白色胡子、身穿绿色斗篷的老派土耳其律师，修女，头戴头巾的淑女以及身披彩色围巾、带着金色项链的强盗夫人等。利奥波德经常提醒她，生活中有的不仅仅是消遣——例如，还有锻炼或者学习等——而对一个躁动不安的少女来说，消遣是仅有的慰藉。她顶嘴说：“消遣比一百次散步和骑马都更有用。”[29]她对他说，自己“强烈渴望做一些快乐的事”。

维多利亚在接待客人时是最快乐的，而在客人离开时却又最伤感。当1833年她的表亲、来自符腾堡王国（Württemberg）的亚历山大王子（Prince Alexander）与恩斯特王子造访肯辛顿宫时，她感到非常开心，写道：“他们都长得特别高，亚历山大很英俊，而恩斯特态度很友善。他们都让人感到非常亲切。”他们向她讲述了关于欧洲的奇妙故事，以

及各种军事战役，在他们离开时，她感到怅然若失：“我们会想念他们的，无论是在吃早餐、午餐还是晚餐，还是在骑马、乘船、开车以及散步时，不管身处何地都会想念他们。”[30]1833年夏天，迷人的费奥多拉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伊丽莎（Eliza）和查尔斯（Charles）来肯辛顿宫小住。在他们离开时，维多利亚画了一张伊丽莎身穿旅行长裙的肖像画，送给了她的这个小侄女[31]，她还在一篇长达14页纸的杂乱无章的日记中写道：

> 我非常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在房间里与最亲爱最可爱的姐姐陪伴在一起……我对她的爱简直无法言表……一想到一小时后我就再也看不到最亲爱的费奥多拉亲切和蔼的可爱脸庞以及蹦蹦跳跳的小美人伊丽莎和跑来跑去的单纯小家伙查尔斯了，我就感到难过不已。悲伤之情让我不能自已，以至于一想到要与他们分别，我就搂着她的（费奥多拉的）脖子，一起大哭了起来，温柔地拥抱着彼此……回到家后，我的悲伤之情如此之深，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一早上都在啜泣、哭泣不止……[32]

1836年9月21日，就在利奥波德结束为期6天的造访，离开她位于克莱尔蒙特庄园（Claremont）的住处[33]一个半小时后，维多利亚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我非常非常难过你离开了我们，我想再说一遍，我觉得你很清楚，我有多么爱你”。她写道，想到他正在离开，她可能一年内都见不到他，“我就哭泣不已……在这场人生中，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人，尤其是不开心的我，注定总是要与自己最爱的人分开”。她在签名处写的是他“最忠诚、最亲爱的外甥女和孩子”。

由于缺少朋友的陪伴，小公主与她的宠物们建立了深厚感情。除了肯辛顿宫鸟笼中一些十分不幸、遭到她折磨的金丝雀外，维多利亚对动物有着深刻的喜爱。她最喜欢的宠物狗是一只名叫达什（Dash）的骑士查理王猎犬，她会与它一起玩耍数小时，给它穿上红色夹克和蓝色裤子，并且在圣诞节时用姜饼和橡皮球来逗它玩。在她生病时，达什会睡在她身旁，在她乘游艇时，会跟在游艇后面游泳。年轻的公主还会花许多小时来玩她的洋娃娃。在她9岁时，维多利亚将她洋娃娃的成绩单寄

给了费奥多拉；有时，她们甚至还会相互通信。在其中一个最受喜爱的洋娃娃遭遇了不幸的事故、头部与身体相脱离后，费奥多拉写道：“我希望［娃娃］已经基本上康复了，这次严重伤情不会影响它的健康，它也不会因为短暂失去头部而失去你的喜爱。”不过维多利亚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洋娃娃，她写道：“莱岑把娃娃给修好了，我把她当作残次品放在了一边；不过，尽管如此，我又得到了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她的名字叫克拉拉（Clara）。”[34]

在她10岁时，维多利亚已经开始对她为数众多的洋娃娃感到厌烦了。到此时为止，她已经全神贯注地制作了一系列共132个精致的木偶娃娃。她和莱岑一起花费了成百上千个小时，认真仔细地为它们缝制衣服，假扮成宫廷中、芭蕾舞中或者戏剧中的角色。她们不厌其烦地为木偶娃娃上色、缝上它们的衣服，然后将它们的名字都写在一本册子里。维多利亚外出时有时也会带上它们，并且会在每一个新环境中把它们仔细摆放在经过精心布置的椅子上，它们会站成一排，用犹豫的小脸庞凝视着她。

由于维多利亚缺少父爱，也没有与叔伯们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因此利奥波德舅舅就成了她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备受敬重的人物。她童年最快乐的一些时光正是在他位于伦敦以南萨里郡的宅邸克莱尔蒙特庄园度过的。在海滨度假期间，利奥波德、维多利亚以及维多利亚的母亲会沿着海滩漫步，看着浅滩上孩子们泼水嬉戏，身穿齐踝泳衣的女士们嬉闹玩笑。当维多利亚不得不返回肯辛顿宫时，她会忍不住流泪不止。

利奥波德写给维多利亚的信展示出了这位未来比利时国王温馨的一面，而此时的他因为自己年轻妻子夏洛特的死而悲痛不已。他既时髦又英俊还举止优雅，但是有些人，例如他的岳父乔治四世国王，却觉得他既狡猾又无趣。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他经常炫耀

自己3英寸高的高跟鞋以及羽毛披肩，头戴假发以防止感冒，睡觉时还喜欢把金条放进嘴里以保持口腔张开，个中原因无人能够知晓。据说他还有着强烈的性欲，但他对待自己情人的态度却充满了鄙夷。在1829年至1830年，也就是维多利亚10岁时，他诱骗普鲁士美貌演员卡罗琳·鲍尔（Caroline Bauer）前来英格兰，谎称要与她结婚。他把她安顿在一座乡村庄园中，与她每日相会。对卡罗琳来说颇为不幸的是，他正沉迷于当时十分流行的“研末”活动中，即从肩饰上把金质和银质流苏取下塞进研磨机器里，出来的金属粉末可以再被熔为金属。利奥波德经常连续数小时忙于“研末”，让卡罗琳感到极为无聊，以至于她甚至声称，自己已经“几乎忘了该如何露出笑容了”。[35]在卡罗琳的兄长从德国赶来命令她回家之前的几个月里，利奥波德研磨的粉末已经足以制造出一口银质汤锅了。他后来把汤锅送给了维多利亚。

利奥波德对这个被他称作“亲爱的小鸡仔”[36]的外甥女的福祉十分关心。他经常会对她进行道德教育。第一，他始终要求她检查自身的过失并保持勤奋努力。在她13岁时，他说道：“善良的内心和真正高贵的品质”是她“未来的地位所需要的最不可或缺的条件。”[37]在她迎来14岁生日时，他劝诫她说，不要“沉醉于荣耀和成功”[38]，也不要“因为不幸而一蹶不振”。第二，他还教育她要保持公正，不过她终其一生都在违抗这条建言。第三，他指导她要坚决和果断——但是要等一等再做出最后决定。第四，要学习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以及第五，要时刻注意伪君子。他还强烈建议这位祖先普遍有发胖倾向的少女要勤加锻炼，克制自己吃东西过多、过快的习惯。在维多利亚15岁时，她催促利奥波德前来探望，哪怕仅仅是为了“见证我极为谨慎的饮食习惯也好，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39]。

乔治四世国王是一个不太受人欢迎的君主。惠灵顿公爵认为他是自己见过的最糟糕的男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作为一名反对改革的托利党支持者，这位国王一直在抵制正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最后在万般无

奈之下才在1829年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天主教徒竞选议员职位。威廉·梅克皮斯·撒克里（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不屑一顾地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件衣服、一顶假发以及假发下一张面带笑容的面具而已”[40]。骄奢淫逸的国王还成为英国富人铺张浪费的标志，在结束于1815年的对法战争给英国国力造成巨大损害的时候，他却榨干了公共资金。在他58岁加冕为国王时，他的体重有245磅，腰围有50英寸，而且吸鸦片成瘾。他的肚腩甚至垂到了膝盖的位置。［在维多利亚还是个小孩子时，她曾经胖到连走路都不稳，格兰维尔夫人（Lady Granville）因此称呼她为“穿着衬裙的乔治国王”[41]。］

不过，当维多利亚在1826年收到邀请，前去位于温莎的皇家小屋（Royal Lodge）拜访她的伯父国王陛下时，她还是感到很高兴的。当时国王正与他的情人一起住在那里。身材臃肿的国王脸上化了浓妆，头上戴着假发，庞大的身躯上人造珠宝闪闪发光。他赠送了维多利亚一幅自己的袖珍画像。目光尖锐的俄国大使夫人利芬亲王夫人说，尽管“国王对维多利亚毫不吝惜自己的拥抱和亲吻”，但她能看出来，“他并不喜欢把这个年仅7岁的未来希望抱在自己64岁的膝盖上”[42]。不过在维多利亚后来的描述中，她“身躯庞大、饱受痛风折磨”的伯父有着“令人惊叹的高贵气质和使人陶醉的行为举止”[43]。到1828年，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大部分时间都在温莎城堡的床上睡觉。传记作家罗杰·富尔福德（Roger Fulford）将乔治四世描绘成一个将生命中最后几年时光都用来“宠幸不受众人欢迎的情人、囤积自己穿过的所有服饰，［以及］在驾车外出前清空街道，防止有人看到岁月是如何破坏他的面容”[44]的男人。

随着国王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维多利亚核心圈子里的阴谋诡计开始变得越来越密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个后来遭到维多利亚憎恨的男人。喜欢操纵他人但也具有极大个人魅力的约翰·康罗伊上尉是一名爱尔兰裔前军人，曾经是她父亲的侍从，如今已经成为她母亲最亲密的

顾问。在维克图瓦的丈夫去世时，他曾承诺给予她保护，并且用诱骗的手段博得了她的好感。他偶尔会对维多利亚表现出友善的态度，但也会无情地戏弄她，有一次还曾经跟她说，她长得就像是丑陋的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这对一个小姑娘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嘲弄，而且这种嘲弄将伴随她数十年时间。维多利亚的主要玩伴是康罗伊的6个孩子之一维克图瓦，她们俩会连续数小时骑马、打扮，以及用纸牌搭屋子等。但维多利亚从未真正喜欢或者信任过她。主要原因是她深深地厌恶康罗伊，并且认为他肯定通过某种方式将她的母亲给催眠了。他“放肆、无礼的行为”，以及觉得自己可以对她指手画脚的傲慢态度都让维多利亚愤怒不已。他会监督她的每一个行动[45]，并且始终渴望能够得到正式的职位——例如女王的私人秘书——这将让他得以继续控制她。

康罗伊总是偏执地认为王室成员想要绑架或者腐化维多利亚，因此他和公爵夫人几乎将她与他们完全隔绝。他还开除了公爵夫人的侍女斯佩思男爵夫人——维多利亚对她甚为喜爱，而且从出生起就熟识——因为他认为她不仅宠坏了维多利亚，还在为国王担任间谍。王室对这一突然之举大为震惊——这位男爵夫人此前已经忠心耿耿地为公爵夫人效力了20多年。维多利亚变得极为担心，觉得接下来她将会失去莱岑——“我最挚爱、最忠诚、最亲密也是最无私的朋友”[46]。

对于康罗伊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王室开始感到既愤怒又困惑。1830年，维多利亚的伯母克拉伦斯公爵夫人（即后来的阿德莱德王后）来信表达了她的担忧，觉得维多利亚正变得越来越孤立。这位公爵夫人表达了王室的“普遍愿望”，那就是希望她不要让康罗伊对她产生“太大影响”。毕竟，康罗伊的家庭出身还不够高贵，不足以成为未来英格兰女王的唯一随从。但这封信恰恰助长了康罗伊和公爵夫人的偏执想法。他们几乎整日都在谈论国王的健康状况，肯辛顿宫内的空气弥漫着阴谋的味道。

1830年6月26日凌晨3点半，在经历一阵剧烈的咳嗽发作后，乔治四世突然大喊道：“上帝啊，这究竟是什么？”据说，他握住男仆的手，自问自答地说道：“孩子，这是死亡。”哀悼在沉默中进行。他最终被认定死于“心脏肥大”[47]，不过大量服用鸦片酊加速了他的身体衰弱。他的弟弟威廉感到激动不已。如今60多岁的他已经为加冕为国王准备了许多年，一直在坚持进行路途漫长、精力充沛的散步，并服用柠檬味大麦茶作为补药。他的一生除了生育10名私生子外建树平平，而如今的他正迫不及待地戴上王冠。

但是，11岁的维多利亚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却十分惊慌。第二天，她在自己无论去哪里都会带在身边的舒适的床上醒来，但时间距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焦虑的情绪让她感到胸闷不已。早餐时，她抱怨自己头很痛，问道能否外出骑马。她挥舞着自己的马鞭，紧握缰绳；她本可以在马上疾驰好几个小时——迎风策马、两眼刺痛，后背沐浴在阳光下。王位有可能很快为她所有，但她却一点也不想要。她知道母亲心中的勃勃野心，也知道自己心中的恐惧。正是在这时，作为一个仍然在玩洋娃娃的孩子，维多利亚开始了与母亲长达7年的斗争，这场斗争将给她带来深刻的伤痛。不过，在她意识到她母亲正试图在王冠落到她头顶前将其抢走后，她的祈祷内容将发生巨大变化。

---

[1] Scott，*Journal*，2：184，May 19，1828.

[2]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18.

[3] 莱岑最初是费奥多拉的家庭女教师，在1827年被乔治四世封为女男爵。

[4] 琳恩·瓦隆发现，这些书中有四本仍然被保存在皇家档案馆之中，书中记录了她日记里完全没有记载的发火记录。在第一本标记为1831年10月31日至1832年3月22日的书中，有数十个地方提到了“非常淘气、暴躁”，“在妈妈面前很淘气”，“非常过分的淘气”。她还“对莱岑态度恶劣、粗鲁无礼”，以及“淘气又粗俗”。Vallone，*Becoming Victoria*，24.

[5]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22.

[6]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22.

[7]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43.

[8] Longford，*Oxford Book of Royal Anecdotes*，358.

[9] 维多利亚自己说，她曾经“就像是庄园中的一尊偶像”，而且“每一个人都宠溺我，我看不起几乎任何人”。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19.

[10]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19.

[11] Fulford，*Dearest Child*，111-12.

[12] 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52.

[13] 这么做也许的确让人讨厌，但比其他女孩脖子上套的铁圈要好多了。《费尔柴尔德家族》（*The Fairchild Family*）一书的作者舍伍德夫人描写说，她曾经被迫套上一个铁圈，铁圈与一块黑板连在一起，黑板被捆在她的肩膀背后：“一直从六年级持续到十三年级。从一大早我就要套上去，一直到晚上，很少摘下来：我经常所有课程都是站着听的……在母亲在场时，我从未坐下过……早在我12岁之前，就被迫每天早上翻译50行维吉尔的诗歌，脖子上套着铁圈站在那里，铁圈一直压迫着我的喉咙。”Creston，*Youthful Queen Victoria*，148.

[14] 戴维斯牧师对维多利亚的发现有着不同的描述：这一描述将他自己放在了一个更加核心的位置。他说，他曾在前一天告诉她，“公主，明天我希望你能给我列出一张英格兰国王和女王的表格”。她在早上给他列了一张表格，他进行了仔细检查。他说：“干得很好，但还不够充分。你写了‘国王伯伯’是现任国王，也写了‘威廉伯伯’是王位的继承人，那谁是他的下一个呢？”维多利亚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不喜欢把自己写上去。”戴维斯说，他随后将此事告诉了公爵夫人，后者则给伦敦主教写信说，维多利亚如今已经了解自身的地位了。Tappan，*Days of Queen Victoria*，33.

[15]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13.

[16] Duchess of Kent to the Bishops of London and Lincoln，March 13，1830，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34.

[17]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45.

[18] Gill，*Nightingales*，90.

[19] 艾略特是一名杰出的学生，也是学校里最优秀的钢琴家。Hughes，*George Eliot*，24-25.

[20]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21.

[21]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208.

[22] Baroness Lehzen to the Duchess of Kent，June 13，1837，皇家档案馆 M7/48，翻译并引自 Hudson，*A Royal Conflict*，72。

[23] Hudson，*A Royal Conflict*，19. 维多利亚也不是安妮女王的崇拜者。她在14岁时对利奥波德舅舅给她寄来一篇有关安妮女王的文摘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写道："你给我寄来的东西显示出一个女王不应该成为的样子，我必须恳求你，应该给我寄来一些显示女王应有样子的东西。"利奥波德写道，她的信"非常聪明，观点尖锐"，并且在1834年12月2日的下一封信中回复说，会承担起这个任务。

[24] Hudson，*A Royal Conflict*，19.

[25] 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52.

[26] Bamford and Wellington，*The Journal of Mrs. Arburthnot*，2：186，引自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29。

[27] *Works of Hannah More*，2：376-67.

[28] *Works of Hannah More*，2：568.

[29] Princess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April 26，1836，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60.

[30] July 13，1833.（三年后的1836年，她的另两个表亲费迪南德和奥古斯塔斯也前来拜访，部分是为了庆祝费迪南德与葡萄牙女王的联姻。）

[31] 伊莉莎在20岁时因肺结核而死。

[32] 三年后，她的另外几个侄子，即费奥多拉的哥哥莱宁根的卡尔亲王的孩

子，前来英格兰小住，她再次变得热情洋溢——这与她对一天的课程进行的简明扼要的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仅仅是表露出一些情感，就让她感到激动不已：“爱德华有趣得不得了。他管我叫‘Lisettche’，以及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字。他对我没什么尊敬，我估计一点敬意也没有。”

[33] 克莱尔蒙特庄园是利奥波德与夏洛特公主的宅邸，但由于夏洛特公主已于1817年去世，因此，在1831年利奥波德加冕为比利时国王后，他就离开了克莱尔蒙特庄园，不再居住在这里。——译者注

[34] 引自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87。

[35] Bauer，*Caroline Bauer and the Coburgs*，296.

[36]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4.

[37] King Leopold to Princess Victoria，May 22，1832，引自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02。

[38] King Leopold to Princess Victoria，May 21，1833，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46.

[39] Princess Victoria to the King Leopold December 28，1834，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52.

[40] Thackeray，“George the Fourth，” 108.

[41] Williams，*Becoming Queen*，173.

[42] Creston，*Youthful Queen Victoria*，117.

[43] 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TK

[44] Fulford，*Royal Dukes*，100.

[45] 约翰·康罗伊还赢得了维多利亚的姑妈索菲亚的信任，但在他掌管索菲亚公主财政事务期间，很多年的档案都消失无踪。维多利亚后来相信，他将数千英镑的资金挪为己用（除此以外，索菲亚还在1826年花4000英镑给他在肯辛顿买了一栋别墅）。

[4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5，1835.

[47] Gardiner，*The Victorians*，4.

4 难以置信的疯狂

［十八岁的维多利亚］身上所有异乎寻常的品质中，最令人敬畏的是她的坚强性格……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心血来潮或者优柔寡断的人。一旦下定决心要做什么，她就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妥协不符合她的性格。[1]

——戴维·塞西尔

维多利亚躺在床上，感到怒不可遏。她病得很重，从来没有这么重过。她的脑袋嗡嗡作响，既头晕又恶心，已经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的她脸颊肿得非常厉害，以至于她甚至连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都快认不出来了。站在她身旁的是莱岑女男爵，正在不断咀嚼葛缕子籽。站在她对面的是紧张不已的肯特公爵夫人，她穿着浅色丝绸，沮丧地握着拳头。维多利亚的母亲一动不动地站在酒店窗前向外凝视，窗子能够俯瞰拉姆斯盖特（Ramsgate）的港口海滩，海滩上的遮阳伞和人们的面庞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康罗伊和公爵夫人想要做两件事。首先，使康罗伊在维多利亚加冕后被任命为她的私人秘书（在这之后还将被授予贵族地位——以及贵族院的一个席位——这是他最大的野心）。其次，如果国王在维多利亚年满18岁——或者21岁——前去世的话，让公爵夫人成为摄政王，代替维多利亚进行统治。公爵夫人说，维多利亚的年纪还太小，而他们又如此亲密地生活在一起。难道她不渴望、不需要康罗伊的明智建议吗？但是，康罗伊多年来一直在刺激和欺负维多利亚；她压根不想让他来主导自己未来的女王生涯，反而想将他从自己未来的王国中彻底赶走。维多利亚冷冷地盯着自己的母亲说：“不行。”

屋子里陷入了一阵寂静，外面孩童玩耍的欢笑声声声入耳。突然间，康罗伊冲入了房间，迸发出了一阵怒火。他冲着维多利亚大吼大

叫，骂她是一个愚蠢、自私、不可理喻的傻瓜。他说，她的脑子里塞满了垃圾，对洋娃娃和戏剧的热爱愚蠢至极，很明显她没有能力独自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她有欠于他。毕竟，要想一想他——以及她的母亲——为她做了多少事。

紧接着，康罗伊把一支笔和一张纸塞到维多利亚的手里，紧紧攥着她的手，催促她签署一份文件，任命他为私人秘书。维多利亚摇了摇头，露出痛苦的表情，紧紧地抱起了她亲爱的小狗达什。她看到自己的母亲是怎样凝视着康罗伊的，那是一种恳求、几乎有些献媚的眼神，这让她感到厌恶不已。

维多利亚从未将这一事件付诸笔端。她的日记罕见地出现了连续三周的空白，而在这一期间，她一直在与病魔做斗争，并且忍受康罗伊的欺凌。一直到后来，她才将这段伤痛透露给墨尔本勋爵："我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他们（母亲以及JC[2]）试图（在我仍然病重时）让我事先做出承诺，我尽管病得很重，但仍然进行了抵抗，他们冷漠而无情——我亲爱的莱岑一直在孤身一人给我提供支持。"[3]维多利亚的伤痛部分来自她母亲丝毫不关心她的病情给她带来的悲痛；关心她的只有莱岑。一连几天，公爵夫人和康罗伊都对维多利亚想要看医生的呼声置之不理。康罗伊不想让人知道维多利亚病了，担心人们可能认为她不适合做一个君主。（当地媒体得到的消息是有一名仆人病了，而维多利亚只是得了"小感冒"。）

在最终应召前来后，克拉克医生（Dr. Clark）说，她得的是"胆热"，但她患上扁桃体炎甚至伤寒的可能性更大。她的病情明显十分严重；她被迫卧床长达5周，在最终能够下地时，一次只能走几步路，而且她还在大把大把地脱发。等到她一瘸一拐、身体瘦削地从房间里出来时，她母亲的不闻不问让她感到怒火中烧。相比之下，她的家庭女教师得到了极大的赞誉："我最亲爱的莱岑一直都而且仍然在（我仍然需要

大量护理）持续不停、不知疲倦地照顾我。我仍然十分虚弱，而且身体变得非常瘦。”[4]她认真地遵照医生的建议，开窗通风，慢慢咀嚼食物，并且不断举起小棍子来锻炼肌肉。慢慢地，她的身体开始康复。

如果康罗伊的观察能够再敏锐些的话，那么维多利亚拒绝移交权力的态度就不会让他感到惊讶了。温暖和劝说也许会有用得多。正如利奥波德在给维多利亚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以为自己可以用某种方式来束缚你，但我就在你的身边，任你差遣，因此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难以置信的疯狂想法。”[5]维多利亚身上有一种无声无息的钢铁意志，经常会让那些低估她的人进退维谷。对于康罗伊不停欺凌她的那十年，她从未原谅过他。在1833年，也就是她14岁的那一年，她画了一幅题为《战争中的亚马孙战士》的画。画中留着柔顺长发的女性正骑马参加战斗，她们的战马正践踏着脚下的男子；其中一名亚马孙女战士向一名男性士兵的脸上直接射了一箭，将其射杀。

为了将一个轻浮少女改造成一位女王而炮制出的详尽、严苛的计划被称作“肯辛顿制度”（Kensington System）。从5岁起，维多利亚就被禁止独处，在下楼梯时必须扶着一名成年人的手，并且不能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与其他儿童玩耍。这一制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出自好意，目的是培养一位合格的女王。公爵夫人和康罗伊还想要把维多利亚培养成一位支持改革的女王，一个像康罗伊一样的辉格党人，而不是像王室其他成员那样的托利党人。（在19世纪前期，辉格党人支持废除奴隶制、为天主教徒争取平等权利、主张扩大选举权和自由贸易，以及建立君主立宪制，即国王或者女王作为国家元首，而制定法律的权力归于议会。）

但是，肯辛顿制度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维多利亚着想，甚至连其主要目的都不是如此。她的同母异父兄长卡尔·莱宁根将这一制度的目的定义为（1）通过将维多利亚与王庭的恶劣品行和政治相切割来为她赢

得民众的欢迎；（2）取得摄政王地位（理由是需要“确保肯特公爵夫人也能获得一个舒适、光荣的未来”）；以及（3）让康罗伊成为私人秘书。[6]他写道，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而采取的监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最微小、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不放过”。

造就这一制度的另一个更为阴险的幽灵是谋杀幻觉。公爵夫人和康罗伊声称，他们认为坎伯兰公爵恩斯特正计划杀害自己的侄女，好让自己成为国王；他是位列维多利亚之后的下一顺位王位继承人。康罗伊对公爵夫人说，恩斯特叔叔会在维多利亚的牛奶中下毒，然后在她虚弱时将她绑架，并任由她死去。[7]维多利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称其“全都是约翰爵士的捏造”[8]，但她母亲却真的惊恐不已。她做出安排，确保每天早上都有人先试吃一下维多利亚的早餐。

时年64岁的威廉四世是加冕时年龄最大的英格兰君主。在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将查理十世（Charles X）推翻后，威廉四世试图表现得比他骄奢淫逸的兄长更加节俭，并且积极参与政治，以抑制国内的共和主义浪潮。但他的保守思想和对改革的冷淡态度很快就让他与自己日渐不满的臣民渐行渐远。1830年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男性中，只有13%的人——也就是那些有产阶级——拥有投票权。一些小规模的“腐败选区”[9]仍然存在，当地的贵族地主可以有效地影响议员的选举，而许多制造业城市却完全没有任何议员名额。例如，居住在伯明翰（Birmingham）、利兹（Leeds）、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谢菲尔德（Sheffield）等城市的50万人在议会中就没有代表。

1830年，当支持改革的辉格党开始执掌权力后，改革的动力终于到来了。在1831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第二次未能得到通过后，整个国家爆发了。许多城堡被点燃，许多住宅被焚烧，德比（Derby）发生的起义中有数百人伤亡，大部分由军人造成。四名骚乱者被处绞刑。政客们对于因选举权未能得到扩大而引发革命的可能性变得极为紧

张。次年，《改革法案》在第三次表决中终于得到通过，使100万人获得了投票权。如今，18%的成年男性可以参与投票了。工业革命中蓬勃兴起的新兴城市获得了议员席位，而腐败选区中最为腐败的那些遭到了取消。[10]民选的下议院声望日隆，而上议院却日渐衰落。这个十年标志着辉格党效率的顶峰：在1833年，奴隶制终于在大英帝国全境被废除，比美国早了30年。[11]

在1830年11月，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为维多利亚的生活和教育提供额外的1万英镑资金，并且指定肯特公爵夫人在威廉四世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担任摄政王，这让公爵夫人喜极而泣。（另一个人选——坎伯兰公爵——更令人难以想象。）她说：“这是我失去肯特公爵以来第一个真正令人开心的日子。”[12]

从这时起，国王与公爵夫人两家人之间的强烈敌意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有一次，在公爵夫人拜访阿德莱德王后时，国王的一个私生子到了她们的房间里来，她愣了一下，然后立刻起身离开。[13]她还会抓住一切机会提醒国王她的女儿是下一顺位继承人，她故意刺激国王，通过升起王旗来表明维多利亚正在拉姆斯盖特，并且在维多利亚乘船出海时怂恿英军士兵向“公主殿下”敬军礼。[14]她和康罗伊招摇地带着维多利亚在全国巡游，目的是竭力进行正面的公共宣传，并且让公主未来的臣民们与她接触，这也成了维多利亚的首次王室巡游。维多利亚在1832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就描述了这样一趟前往威尔士的巡游。她对于伯明翰附近乡村的煤矿业所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不已：

> 男人、女人、孩子、田野和住宅都是黑的。乡村各处都很荒凉；煤炭四处可见，枯萎的草坪黑黢黢一片。我刚看到一栋正在着火的雄伟建筑。黑色在乡村蔓延，火车头呼啸而过，煤炭源源不断，到处都是正在冒烟和燃烧的煤堆，中间还混杂着破败的小屋和马车，以及衣衫褴褛的小孩子。

这个世界在维多利亚面前一闪而过，让她目瞪口呆。她标志性的直

率表达后来被从官方出版的日记选集中删除——例如丑陋的景色、拥挤且要求过多的人群、醉醺醺的市民以及一段不幸的插曲，她的马车压到了一名步行的男子。对于究竟是否需要踏上这些令人筋疲力尽的旅途，她与自己的母亲发生了激烈争执。不过，在她巡游全国的过程中，她巨大的受欢迎程度变得显而易见；康罗伊的肆无忌惮让国王愤怒不已。

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成了一出公开的肥皂剧。公爵夫人拒绝参加威廉四世的加冕仪式，她觉得威廉四世拒绝让维多利亚在行进队伍中站在他身后是在怠慢她。她给国王送去了一张字条，说维多利亚摔在地上把膝盖擦伤了，因此他们无法参加仪式。相反，他们去了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灰白海滩，对后来她的无礼遭到的广泛谴责完全视而不见。《泰晤士报》严厉抨击了公爵夫人的怠慢之举，认为这是在对国王想要做的任何事进行“彻底而坚决的反对”。1833年11月，日记作家托马斯·克里维（Thomas Creevey）将公爵夫人描述为“最多变、最锲而不舍也是最麻烦的家伙”[15]。

反过来，威廉四世也是一有机会就对康罗伊进行公开羞辱。在一次正式接见期间，他要求肯特公爵夫人的侍从——包括康罗伊——离开，理由是只有国王和女王的侍从才有资格待在现场。当1835年康罗伊被下令离开维多利亚的坚信礼现场时，维多利亚感到愤怒至极。她的坚信礼是“她生命中最严肃、最重要的事件”[16]，她一直“有着坚定的决心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让她倍感羞辱的是自己在这样的日子里受到伤害，而且还是替一个受她鄙视的男人受伤害，这让她的这个重要日子被彻底毁了。

在16岁生日之时，维多利亚已经开始发胖了。让她感到十分苦恼的是，她的身高仅有4英尺11英寸[17]，而且“不幸的是还非常胖”[18]。利奥波德写道，他听说“某位小公主……吃得有点太多，而且几乎总是有些太快了”。她的餐桌礼仪非常糟糕，喜欢狼吞虎咽、挑骨头，还会“对芦

笋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19]（可能是指用手指拿着吃）。不过，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的身材也开始变得更加苗条，人们对她细嫩的皮肤和水灵灵的蓝色大眼睛、浓密的长发和健康的身体羡慕不已。在这个年纪，对她的控制开始有所放松；她已经获准阅读一些小说，设计自己的发型，学习意大利语和歌唱课程，并且更多地参与母亲举办的宴会，她会在宴会上开心地注视着年轻的小伙子们，只要得到允许，就会与他们一起翩翩起舞。她喜欢音乐和戏剧；她少女时代的偶像都是芭蕾舞演员和歌唱家——其中之一是伟大的歌剧演唱家路易吉·拉布拉什（Luigi Lablache），他受雇负责指导维多利亚的歌唱课程。

达尔茜·阿什当（Dulcie Ashdown）写道，“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正是在这个年纪“跨过成为女人的门槛”[20]的，尽管万幸的是，维多利亚的“月经初潮从来没有被官方宣布过”。毫无疑问，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月事”（the monthlies）、“经期”（the turn）或者“身体微恙”（poorliness）的月经让她感到有些困惑。人们一般不会公开讨论月经，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女性会因为月经而丧失行为能力。医生们会建议女孩子不要在过热的房间里跳舞，避免受冻淋雨，并且努力不要胡思乱想。作家詹姆斯·麦格里戈·艾伦（James McGrigor Allan）在1869年的伦敦人类学协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会议上说：

> 在这种时候，女性不适合从事任何重要的脑力或者体力劳动。她们会因为疲倦和抑郁而无法思考或行动，这使得人们极端怀疑她们在危机持续期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负责任的个体……在脑力劳动方面，男性当前并且永远都会超越女性，其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自然不会周期性地干扰他的思考和行动。[21]

维多利亚身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除了想要变高、变瘦之外，她对于自己的相貌没有丝毫关心。她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美人，但也丝毫不在意。她还拿自己的相貌与同母异父的姐姐开过玩笑，写道她“非常高兴能够听说表现我丑陋脸庞的肖像画能够让你高兴”[22]。不

过，她却真心享受其他人的美丽外表——无论是男还是女。她的二表哥不伦瑞克公爵查尔斯深色的八字胡和骑马时穿着的毛边外套尤其让她喜欢。她非常喜欢他的发型，因为他的头发“飘逸地垂在面前”[23]。

维多利亚被普遍视为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许多男子都对她着迷不已，一些报纸上还对长长的潜在结婚对象名单进行了讨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写道，在维多利亚生病时，她“一心一意非埃尔芬斯通勋爵不嫁”[24]，那是一个比她年长两岁的时髦小伙。1836年2月，在她身体康复，终于被医生允许前往圣詹姆士宫（St. James’s Palace）后，埃尔芬斯通勋爵隔着众多宾客看着她，为她画了一幅素描肖像画。她穿着一件在巴黎买的漂亮灰外套自信地坐着，享受着他的注视。肯特公爵夫人却做出安排确保作为陆军军官和威廉四世侍从的埃尔芬斯通被派往印度。[25]有传言说，他和维多利亚已经陷入热恋之中，而光是这些流言蜚语，就足以让他被赶走了。[26]其他一些传言中的追求者包括奥兰治（Orange）兄弟、乔治·坎伯兰、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内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符腾堡家族的一员、希腊的奥托国王（King Otto），奇怪的是甚至还有利奥波德舅舅。

不过利奥波德已经给他的外甥女挑选了一个伴侣——她的表弟阿尔伯特——并且公开地试图策划他们的婚姻。1836年5月，阿尔伯特和他的哥哥埃内斯特首次拜访维多利亚，以庆祝她的17岁生日。[27]维多利亚非常喜欢她的两位表亲，“非常非常开心、快乐、幸福，就像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在她看来，体格健壮的阿尔伯特“极为英俊”。她写道：“他的眼睛又大又蓝，有着漂亮的鼻子和甜蜜的嘴唇、洁白的牙齿。”但阿尔伯特的身体同时也很虚弱，很容易晕倒，而且跟不上他表姐的步伐。在圣詹姆士宫举行的生日舞会上，阿尔伯特早早地就退场了；他“脸色苍白如灰，我们都害怕他有可能会晕倒；因此他回了家”[28]。翌日，他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没有吃任何东西，原因是“胆病发作”，在他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看起来“既苍白又虚弱”。维多利

亚略感沮丧地给利奥波德写信说：“我很抱歉地说，我们家里有一个病人，那就是阿尔伯特。”[29]

最终，维多利亚礼貌地感谢了利奥波德。“［阿尔伯特］非常聪明，非常善良，非常优秀也非常亲切，”[30]她补充说，“除此以外，他还有着你能见到的最令人喜爱的外形和相貌。”但维多利亚对于与他成婚一点兴趣也没有。她邀请了阿尔伯特的父亲参加她的加冕礼，但阿尔伯特和埃内斯特均未受邀。他们一直到三年后才再次见面。

在这一时期，康罗伊的行为让人感到极为费解。他这种理所应当的想法来自何处？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在王室中应有一席之地？维多利亚很好奇的是，他为什么要对她说，“他的女儿与我一样高贵”？[31]多年后，她仍然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他要惹怒我、欺凌我，我真的一直不能理解。”[32]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牛津郡的一间老旧小教堂里找到，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一直将康罗伊的档案保存在那里。在一本有些褪色、扣环损坏且书页侧边带有大理石花纹的褐红色日记本中，约翰·康罗伊的孙子在1868年12月写下了一段秘密信息。信息是用密码撰写的，这种密码似乎是借用了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字母表。[33]该信息的内容是：“康罗伊夫人据说是肯特公爵的女儿。”换句话说，约翰·康罗伊认为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菲舍尔（Elizabeth Fisher）是维多利亚父亲肯特公爵的私生女，是在他派驻加拿大期间孕育而生的，这也就意味着她是维多利亚同父异母的姐姐。[34]当然，这也就使得康罗伊成了维多利亚的姐夫——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人，而不是一个仆从。约翰·康罗伊的长子爱德华（Edward）在临死前也吐露了这一想法。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不可能、不真实的，纯粹是为了私利服务，但它能够解释康罗伊的放肆和控制欲。很明显，康罗伊想要的不是成为女王的顾问，而是与公爵夫人一起代替女王进行统治。

毫无疑问，康罗伊与守寡多年的公爵夫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情欲

的成分。维多利亚一直担心他们是情人关系。令人讨厌的坎伯兰公爵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曾当着她的面这么说过。[35]威灵顿公爵曾对格雷维尔（Greville）[36]说，维多利亚目睹了她母亲与约翰·康罗伊之间的一些“亲密举动”，并且告诉了斯佩思，随后斯佩思对公爵夫人进行了一番斥责。后来，维多利亚曾否认她母亲与康罗伊是情人关系，尽管她在童年时曾有过这种怀疑。很可能的情况是，这位寡居多年的公爵夫人对一个以迷惑女性的神奇能力著称的男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肯定能够解释他对她的控制力。利奥波德国王称康罗伊是“一个现实中的靡菲斯特[37]”[38]，并且对19岁的维多利亚说，他用“一种在古时候可能会被认为是巫术的力量”控制了公爵夫人。[39]即使是在年届暮年之后，令人敬畏的女王还是会一想到这个被她称作“怪物”的男人，就浑身发抖。[40]

康罗伊每隔一小时就会想出新的花样：不管是在梳理他渐渐稀疏的头发，还是在与议员们推杯换盏、阿谀奉承，抑或是在与公爵夫人进行无休止的惠斯特纸牌游戏时都是如此。他表现得越绝望，维多利亚坚持立场的态度就越坚定。她的伯父威廉四世国王最终将对这种蓄意而恶毒的阴谋爆发出惊天怒火。而他的怒火将会揭开一场丑闻的序幕。

---

[1] Cecil，*Young Melbourne*，385.

[2] 即约翰·康罗伊。——译者注

[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6，1838.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31 1835.

[5] King Leopold to Queen Victoria，March 9，1854，皇家档案馆 Y79/35.

[6] Longford，*Victoria R.I.*，55.

[7] 据说，坎伯兰已经散布了一些谎言，声称公主“脚上有疾”，而且不可能正常成长（维多利亚将这一流言蜚语归咎于康罗伊的女儿维克图瓦）。当格雷维尔的回忆录在1875年发表时，维多利亚说，所谓康罗伊试图保护她免受坎伯兰侵害的说法

是谎言。

[8] Hudson，*A Royal Conflict*，208.

[9] 指选民很少但仍在议会占有议席的选区。——译者注

[10] Mitchell，*Lord Melbourne*，182.

[11] 不过是有条件的——种植园主从政府债券中获得了2000万英镑——约占国家预算的40%——奴隶们也被迫在一段学徒期内无偿劳作。一直到5年后的1838年8月1日，他们才正式获得自由。

[12] Creston，*Youthful Queen Victoria*，147.

[13] Zeigler，*King William* Ⅳ，278.

[14] 国王愤怒至极。格雷维尔在1833年7月4日记载："国王（自然而然地）十分厌恶肯特公爵夫人带着女儿在王国内取得的进展，以及她在怀特岛做的其他一些小动作，还有不断出现的对公主殿下的敬礼等。"他们试图劝说公爵夫人停止这些做法，因为"敬礼是一件事关卫兵守则的事，无论是对陆军还是对海军而言"。她拒绝了，后来枢密院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只有当国王或者女王在船上时，才需要向王室旗帜敬礼。Reeve，*Greville Memoirs*，3：4.

[15] Thomas Creevey，November 2 1833，Gore，*Creevey*，345.

[16] 关于她的坚信礼，维多利亚写了一篇严肃的长篇日记，她在日记里说，对自己的原罪感到遗憾，希望作为一名焦虑女性的女儿，她能用顺从与风险来改善自己。她写道，她前去参加坚信礼时"内心有着坚定的决心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以尝试安抚我亲爱妈妈的悲伤、煎熬和焦虑，成为她顺从而深情的女儿。还要听亲爱的莱岑的话，她为我做了很多"。（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30，1835.）她的母亲用一如既往的焦虑语气给她写道："天意让你与众不同：对你提出比同年龄的其他年轻淑女更多的要求。在进行这些比较式，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更多对你的焦虑情绪，我亲爱的维多利亚。"（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47.）公爵夫人警告女儿说，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不会给她带来快乐，只有"善良、正直和教养"可以。

[17] 约为1.5米。——译者注

[18] Princess Victoria to Princess Feodora，October 30，1834，Vallone，*Becoming Victoria*，221.

[19] Longford，*Victoria R.I.*，30.

[20] Brumberg，*Body Project*，xviii. 琳恩·瓦隆还认为，月经是在15岁左右出现的。在一段对维多利亚早年经历的叙述中，瓦隆发现每个月的第三周，维多利亚都会闷闷不乐，并且变得有些悲伤。一篇后来在官方编纂的日志和信件集中被忽略的日记写道，在她环游英格兰之时，她时常抱怨树篱缺失、沟渠过多以及半醉之人太过密集的现象。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57. See also Ashdown，*Queen Victoria's Mother*.

[21] 引自 Showalter and Showalter，"Victorian Women and Menstruation，" 85。

[22] Williams，*Becoming Queen*，188.

[23] Longford，*Victoria R.I.*，55；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36.

[24] Browning to Mr. and Mrs. William Wentworth Story，June 21，1861，引自 Weintraub，*Victoria*，88。

[25] 《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对埃尔芬斯通的记载是这么写的："1837年，埃尔芬斯通被墨尔本勋爵任命为马德拉斯总督，从而离开皇家卫队。据说，当时这一任命的目的是驱散所谓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与他陷入爱河的流言蜚语。"有关教堂的片段被提及于Longford，*Victoria R.I.*，62："2月初，克拉克医生允许她穿着露易丝姨妈从巴黎寄来的灰色玫瑰镶边织锦外套造访圣詹姆士宫。她看起来如此迷人，以至于年轻的埃尔芬斯通勋爵在教堂里画了一幅她的素描画；在公爵夫人的坚持下，他被驱逐到了马德拉斯。"

[26] 这些传言最近被一位名为罗兰·佩里（Roland Perry）的澳大利亚作家重新提起。在一本名为《女王、她的情人以及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间谍》（*Queen，Her Lover and the Most Notorious Spy in History*）（Sydney：Allen & Unwin，2014）的书中，他声称，维多利亚在15岁时与27岁的埃尔芬斯通勋爵发生了私情。佩里没有提供任何档案来支撑这一说法，但在与本书作者的通信中，佩里说，他是"通过克格勃了解到这个故事的"，克格勃获得了维多利亚与大女儿之间未经删改的信件内容。他说，要想了解这件事，你"需要站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关键人员的面前"。没有任何可以让历史学家使用的实际证据。

[27] 威廉四世国王曾试图阻止他们，但未能成功。这位国王非常渴望能够把维多利亚嫁给信奉新教的奥兰治亲王的儿子，而不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科堡人，但维多利亚对他们始终冷若冰霜。

[28]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79.

[29] Princess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May 26，1836，Hibbert，*Queen Victoria in Her Letters*，18.

[30] Princess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June 7，1836，Hibbert，*Queen Victoria in Her Letters*，18.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1，1839.

[32] Hudson，*A Royal Conflict*，20.

[33] Conroy Family Collection，Balliol College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Conroy 2C，John Conroy 3rd Baronet，3D 9. See Hudson，*A Royal Conflict*，33.

[34] Hudson，*A Royal Conflict*，33，34. 康罗伊认为妻子伊丽莎白·菲舍尔是公爵私生女的想法在康罗伊孙子的一篇日志及其子爱德华的死前忏悔中有所披露："约翰爵士非常骄傲，认为让公爵夫人了解他妻子同维多利亚公主的关系不甚妥当。约翰爵士经常表示，这是一种对荣誉的羞辱，而且由于康罗伊夫人非常敬爱菲舍尔将军，她也不应被告知自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因此，这件事情应当永远保持沉默，尽管证据很充足。" Conroy Family Collection，Conroy 6F papers，Deathbed confession of Edward Conroy. 但证据丝毫不令人信服。

[35]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02. 1904年3月，本森从康罗伊的女儿那里获得了一本备忘录以及与维多利亚的通信。维多利亚在备忘录中划掉了所有内容。本森在日记中写道："J.C.爵士是一个真正邪恶、寡廉鲜耻、诡计多端的人。他对肯特公爵夫人建立了如此的优势地位，以至于人们都认为他是她的情人……女王对他产生了极端的恐惧。对他的恐惧（尽管这仍然很神秘）似乎出现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当时坎伯兰公爵用他标志性的残忍性格在她面前说，康罗伊是她妈妈的情人"。

[36] 英国日记作家查尔斯·格雷维尔（Charles Greville）。——译者注

[37] 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译者注

[38] Woodham. Smith，*Queen Victoria*，33.

[39] Hudson，*A Royal Conflict*，51.

[40] 肯辛顿制度的支持者们包括利奥波德、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索菲亚公主、卡尔·莱宁根亲王以及萨塞克斯公爵。康罗伊那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们很清楚他没有理财能力；成千上万的英镑在他的看管下消失无踪，而且挪用的证据十分充分（在她母亲和索菲亚姑妈的财务记录被公布后，维多利亚认定他是一个骗子）。

5 “家庭中的可怕事件”

他们每天、每时都在毒害她。[1]

——斯托克马男爵

威廉四世国王乘坐马车穿行在伦敦的街道上，凝视着窗外的景色。那是1836年8月的一个凉风习习的日子，他刚刚在议会发表完一场演讲，以标志议会议程的结束。

为了成为国王，他已经等待了很多年，但如今，他却没有任何享受的感觉。呼吁进行议会改革的无休止声音令人烦恼。最初，他支持改革，而且很高兴能够因此而受人爱戴。但随后，他们变得越来越贪婪。他原本不想批准《改革法案》，即使是下层阶级威胁要发动叛乱时他也不打算改变主意。他对首相说，他会死守伦敦，在威登（Weedon）的兵营升起王旗，奋战到底、至死方休。维多利亚也会站在他这一边的。但最终，他还是妥协了，批准了这一法案。即使是这个结果也无法让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持久满意。

随着金色的皇家马车缓慢驶过泰晤士河，国王想起，曾几何时，河中还可以捉到向上游游弋的鲑鱼，那时的泰晤士河还呈现出一派暗绿色，而不是被污物染得黑黢黢一片。不久后，这条河就将变得跟曼彻斯特那条经常会出现尸体的厄威尔河（River Irwell）一样黑。他习惯性地用食指背面擦了擦鼻子，然后凝视着街上的混乱景象：一名街头艺人正在制造噪音，一名男子身上挂着香皂广告牌，几个小男孩正在卖火柴，街头小贩正在兜售馅饼，一个因梅毒而鼻子毁容的印度乞丐正在敲鼓。马蹄在鹅卵石上发出噼啪声响，经过一堆一堆粪便，溅起的粪便落在女士的裙边上，并且弄脏了整片街道。

马车停在肯辛顿宫的车道上。虽然肯特公爵夫人、维多利亚、王弟萨塞克斯公爵以及王妹索菲亚公主（Princess Sophia）均在此居住，但肯辛顿宫实为国王所有。几个月前，公爵夫人曾要求搬到楼上去，距离地下排水沟的湿气远一些，据说排水沟里蘑菇都长到了内壁顶部，工人们在里面找到过瓶塞、猫咪、海豹尸体、假牙，甚至是死人。[2]当维多利亚在拉姆斯盖特患病后，医生建议她搬进空气流通性更好的房间里——但国王拒绝了这一请求。

他拾级而上，进入国王长廊，长廊上的巨大窗户能够俯瞰整个庭院。他在长廊上止住了脚步。长廊经过了整修，这直接违反了他的命令。他数了数：公爵夫人如今占据着17个房间。在去往温莎堡的3小时路途中，通常心情十分愉悦的威廉四世想起来公爵夫人对他和他家人的种种怠慢之举。他从未喜欢过自己的弟弟爱德华——而自己现在似乎是莫名其妙地亏欠了他那个忘恩负义的遗孀似的。

当晚10点，国王信步走进了温莎堡为庆祝他的生日而举办的宴会。他走到维多利亚身边，握起她的手对她说，他希望能够更频繁地见到她。紧接着，他声音洪亮地对肯特公爵夫人说，他知道她占据了肯辛顿宫的房间，“不仅没有经过他的允许，而且还直接违抗了他的命令”，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这种对他如此不敬的行为”[3]。他离开她的身边，誓言要阻挠她对权力的贪婪渴望。

第二天，也就是8月21日夜里，100名王室贵宾在桌前端坐一排，准备享用生日晚宴，在烛光照耀下人影绰绰。肯特公爵夫人坐在国王的右手边，国王的一个妹妹坐在他的左手边。威廉四世喝光了他酒杯里的酒，他的脸颊微微泛红，大肚子被束腰勒得紧紧的，紧接着，他起身发言：

> 我愿上帝能允许我再活9个月时间，届时，如若我死去，将不会有摄政王出现。我将能心满意足地将王室的权威交给那位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年轻

> 小姐个人施展，而不是交给我身旁的这个人手中，她的身边净是些心怀不轨的顾问，她自己也没有能力胜任摄政王的要求。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已经遭受到了这个人极大且持续的羞辱，但我已经决心不再忍受任何对我如此不敬的行为——在诸多让我感到不满的行为中，我尤为不满的是，那位年轻的小姐一直被迫与我的王庭保持距离；她一再被禁止进入我的会客室，而她本应一直待在那里……我是国王，我决心要让我的权威受到尊重，未来我将坚持要求并命令公主在一切场合出现在我的王庭中，这是她的职责。[4]

维多利亚的泪水夺眶而出。仆人们偷瞄着脸颊通红的肯特公爵夫人，她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反驳之词，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她们迅速离席，桌上的草莓果冻、海绵蛋糕和酒浸果酱布丁丝毫未动。公爵夫人第二天就逃去了克莱尔蒙特。

到1837年，随着矛盾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丑陋也越来越频繁，肯辛顿宫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痛苦万分的维多利亚抱怨自己头痛欲裂、身上莫名疼痛且疲惫不堪，公爵夫人则叫来她的儿子——也就是维多利亚同母异父的哥哥——卡尔·莱宁根居中斡旋。[5]卡尔对于康罗伊对莱岑的“刻骨仇恨”和粗暴对待感到震惊不已，但他一直对康罗伊深有好感，因此很快就站在了他这一边。他认定维多利亚荒谬无理，认为她对康罗伊的厌恶是在莱岑的怂恿下出现的“幼稚情绪”。他试图为双方达成和解而进行的斡旋最终失败了：他既无法说服康罗伊道歉，又无法说服维多利亚信任康罗伊，更无法说服利奥波德要求维多利亚将摄政王执政期限延长到她21岁为止。[6]维多利亚被压垮了：甚至连她的哥哥都背叛了她。

5月底时，人在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决定将深受他信赖的顾问斯托克马派往英格兰评估局势。精明的斯托克马认定，冲突的原因在于“公主的内在性格”和“约翰爵士对待公主本人的行为方式”。他说，约翰爵士的问题是他的粗鲁无礼、理所当然的态度，以及他自认为是“整个机器的管理者”的行为方式。

不过，手中握有王牌的是维多利亚。每过一天，她的自我意识就会增长一分，“而且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力量”[7]，但无休止的骚扰让她感到抑郁：斯托克马对利奥波德说，“他们每天、每时都在毒害她”。[8]维多利亚的母亲会公开批评她，提醒她她还很年轻，并且告诉她她的所有成功都归功于母亲的良好声誉。这个坚持用母乳喂养孩子，并且为维多利亚肥嘟嘟的小脸蛋而开心不已的女人变得对权力极为渴求，陷入了她自己构造的受害者叙述中，认为自己是一个长期受苦的母亲。她一再指出，自己放弃了在另一个国家的舒适生活，专心致志地要将一个女孩培养成一位女王。[9]但没过多久，维多利亚就再也不跟她说话了。

1837年5月，威廉四世国王决定进行干预。他在维多利亚年满18岁前几天给她写信，告诉她说，他会在她生日那天帮助她获得独立地位：他会请求议会每年拨款1万英镑供她使用，允许她任命自己的王室内库管理人，或者说财务官，只听命于她本人，他还会赋予她独立开设府邸的权力。国王指示他的信使张伯伦勋爵（Lord Chamberlain）确保将这封信交到维多利亚的手中。康罗伊和公爵夫人都曾试图抢夺这封信，但维多利亚拿到了它，并且在仔细阅读之后才把信交给母亲。公爵夫人感到怒不可遏，主要是因为她认为国王对于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所做的工作没有展示出丝毫的尊重。她知道自己成为摄政王的机会将在不到一周内成为过去。她决定以维多利亚的名义拒绝这一提议，但是不让她知道。

在听完了母亲的长篇大论后，维多利亚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她在日记中写道：“感觉非常难过和愤怒。没有下去吃晚餐。”[10]她很愿意接受国王的提议，但也知道她母亲不会允许，而她仍然需要生活在她的权威之下。维多利亚不知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只能顺从地抄写了她母亲在约翰·康罗伊爵士的建议下拟好的信件，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正式答复送出。[11]她提到了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并且说，她愿意留在母亲的保护之下，而她母亲应当保管她的所有资金。但国王也没那么好糊

弄：“这封信肯定不是维多利亚写的。”[12]

在1837年5月24日清晨，肯辛顿宫上空灰暗多云的天空上升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名字：维多利亚。[13]她终于年满18岁了。商店纷纷关门歇业，乐手和艺人们在肯辛顿洒满鲜花的街道上纷纷弹起乐器、跳起舞蹈。上午7点，一支由管乐器和竖琴组成的乐队开始在维多利亚窗子下方的阳台上进行表演：“举国同洒欢欣泪，泪洒最美五月花。”正在从窗口向下望去的维多利亚问道，他们是否还能再表演一遍。

她感到如释重负，并且在日记中写道：

> 今天是我的18岁生日！都这么大了！但是我距离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还相距甚远。从今天起，我要下定决心，用全新的刻苦精神学习，始终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目标上，并且努力每天少虚度一点光阴，让自己更有资格承担未来某一天即将担负的角色，如果上天允许的话。

与母亲的争吵和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使得年轻的公主对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兴奋，她渴望得到一个自己能够掌控，并且让她的母亲不得不听命于她的生活。

那天下午，当维多利亚与母亲和兄长一道乘车穿过庭院时，迎接她的是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迎声。街道两侧仰头张望的人群摩肩接踵，让她感动不已：“人们想要看到傻乎乎的我的急切心情令人动容，我必须说，我被它深深打动了，并且感到了一阵自豪，那是一种我对我的祖国和英吉利民族始终怀有的自豪之情。”但是，公众的欢呼仅仅凸显出她的家庭生活相比之下有多么悲惨，随着庆祝活动继续进行，维多利亚也变得越来越沮丧。甚至连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舞会，以及她那件装点着花朵的淡黄色长裙，都无法让她情绪好转。

1837年6月15日，晴朗的夏日万里无云，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从停在肯辛顿宫门口的马车上走了下来。他穿着一件灰色西服，戴着一顶礼帽——此时礼帽已经被认为是绅士的标志，尽管40年前首个在公开场合尝试戴礼帽的男人曾遭到逮捕，理由是它有着“闪亮的光泽，会让胆小的人感到惊慌”。（有4名女性在看到礼帽后晕了过去，路过的行人纷纷发出嘘声。[14]）利物浦勋爵就像王室里的几乎每一个人一样是一个保守党人，也是前首相同父异母的弟弟，他是仅有的几个既得到公爵夫人也得到她女儿信任的人之一。他的任务是打破僵局。

利物浦首先会晤了康罗伊，后者从男性的立场出发解释说，维多利亚和莱岑对他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厌恶态度。他说，首先，莱岑必须走人。其次，维多利亚“对他被任命为私人秘书或者私人政治顾问一事的坚决反对”十分滑稽可笑，因为她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根本没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她完全无法胜任对国家大事的思考，而且尽管她已经18岁了，但她的“心智比年龄要更加不成熟”。康罗伊解释说，公主本人十分轻浮，“很容易被时尚和外表所吸引”。利物浦勋爵能够让她看清道理吗？当然，康罗伊所考虑的完全是她的幸福。

利物浦勋爵断然拒绝了康罗伊提出的在女王身边担任正式职务的请求，对他说他非常不受欢迎。作为妥协，利物浦表示，他有可能被任命为王室内库管理人，负责掌管君主的财政事务，并且得到一笔养老金，但前提是他不能干预政治，并且“对任何人明确表达”他的看法。在“思忖再三”后，康罗伊同意了。两人握了握手。

接下来就是固执的公主了。维多利亚一直在孤独地等待利物浦勋爵，还细心地准备了一长串需要讨论的内容。她同意自己将不会任命私人秘书，而是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首相墨尔本勋爵来行使。不过，与康罗伊共事完全没门。她说，利物浦勋爵肯定也清楚“约翰爵士曾对她做出的诸多怠慢和无礼之举”，而除此以外，“她还知道他的另外一些事，这些事情使得她绝对不可能让他留在身边，担任任何机要职位”。她不

会允许康罗伊担任王室内库管理人一职。利物浦勋爵希望她能透露更多信息。她究竟知道些什么？维多利亚仅仅表示，她知道的有关约翰爵士的事情“让她完全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并且这件事是她自己得知的，没有其他人告诉她”。[15]维多利亚手上拿着一封由莱岑誊写下来的信件，在信件中，她拒绝许下任何承诺。最终，这位少女请求这位前首相[16]让她的施虐者睁开双眼，“看清楚他们给我造成的艰难处境”。

利物浦勋爵对公爵夫人说，他无法改变她女儿的主意。康罗伊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开始破口大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维多利亚一直待在房间里，只和莱岑交流。康罗伊决定，现在是时候执行他最后的绝望计划了：把维多利亚锁起来，逼迫她同意。他的盟友詹姆斯·阿伯克伦比（James Abercromby）是一名律师，当时担任下议院议长。阿伯克伦比对他说，既然维多利亚不通情理，那他就只能使用武力了。康罗伊去找到公爵夫人，声称“必须要逼迫她”。

在维多利亚怒视自己的亲属和欺凌者的同时，在议会中，议员们正在辩论女性是否应该获准在公共旁听席旁听议会辩论。在利物浦勋爵造访肯辛顿宫的那天，也就是6月15日，一位名叫格兰特利·伯克利（Grantley Berkeley）的绅士曾在下议院问道：“至于女士们的存在……如果她们在屋子里放一束花的话，难道不会觉得空气也变得更清新了吗？”显然，这些高贵的绅士们并不这么觉得，因此投票反对女性旁听。

当维多利亚在利奥波德在英格兰的宅邸克莱尔蒙特别墅附近的道路上看到一群正在扎营的吉卜赛人时，她被他们的热情所深深吸引。在1837年1月时，她去看望了他们几次，为他们画了素描画，给他们带来了汤汁，还试图安排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当其中一名吉卜赛姑娘即将分娩时，维多利亚还让人送来了食物和毯子。她暗下决心，如果他们请求她成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教母的话，她会给他起名为利奥波德。

热心的小维多利亚不想对这个私生子展示出一丝歧视。她对吉卜赛家庭中温馨的幸福十分羡慕和迷恋：

> 当我们在帐篷附近的路上散步时，一个自称名叫库珀（Cooper）的女子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她基本上算是这群人的发言人。我们转过身，停了下来，看到她带着一群孩子穿过街道来到我们这里，总共大约有6个孩子，我觉得。那是一幅十分单调却也十分漂亮、别致的画面。她本人头上没有戴任何东西，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搭在肩膀上，那群小孩子则围绕在她身边，他们都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穿着一身黑黢黢的裙子，都是些小东西，漂亮的孩子……吉卜赛人是一个奇妙、独特也十分吃苦耐劳的民族，非常与众不同！

当时，吉卜赛人被污蔑为一个懒惰、粗野、肮脏的异教徒民族，是在欧洲四处流浪的浪子，救济院的收容所里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17]但维多利亚觉得他们“被诬告、被错怪，并且遭到了严重的虐待”。她和莱岑一起阅读了克拉布先生（Mr. Crabbe）所写的《吉卜赛人拥护者》（*Gipsies Advocate*）一书，这本书让她们相信即使是穷人也会对善意做出回应。[18]但康罗伊却不这么认为。[19]

到1837年，威廉四世国王已经双耳失聪、腰痛难忍。维多利亚很少在日记中提到他，不过，在1837年5月他病重时，她在日记中为他感到伤心：“他一直对我很好。”[20]到6月中旬时，他明显已经奄奄一息了。维多利亚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且据6月16日拜访她的斯托克马说，她的母亲也变得对她极为严厉。他写道，如果宫外有人知道维多利亚是一个“遭到压迫的人”[21]的话，每个人“都会飞奔而来提供帮助”。但没有人前来帮忙。相反，用斯托克马的话说，维多利亚学会了“表面上顺从而温柔地与她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共处”[22]。

莱岑成了康罗伊阵营不满情绪的避雷针。她帮助维多利亚坚定自己的勇气，挫败了他们的计划。康罗伊及其盟友对她怒目而视、百般嘲讽、出言不逊。当维多利亚在拉姆斯盖特病倒后，她同母异父的姐姐费

奥多拉非常担心莱岑会被解雇，于是给维多利亚当时的家庭女教师诺森伯兰公爵夫人写了一封信，请求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提供帮助。[23]当康罗伊注意到诺森伯兰公爵夫人与莱岑走得很近后，她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作为家庭女教师，她再也没有见过独自一人的维多利亚，也无法对她深入了解，因此她在厌恶的心情中辞职了。维多利亚后来写到了她唯一的盟友莱岑不得不“忍受”的事情：有时，她甚至害怕自己的性命会在“家庭中的可怕事件”[24]中遭遇危险。

入夜时分，维多利亚躺在床上的鸭绒被里，聆听着父亲的老式玳瑁钟的滴答声，幻想着自己的复仇：她要让母亲为虐待过自己而感到痛苦；她要驱逐康罗伊；她要举行舞会，邀请自己认识的最英俊的小伙参加，彻夜跳舞、玩耍，遍尝美味。她态度坚决地给利奥波德舅舅写信说：“我非常期待似乎很可能在不久后发生的事情，既冷静又平静。我一点也不感到恐惧，不过也不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一切；但是我相信，凭借善意、诚实和勇气，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败。”这几个字将在日后成为她的座右铭：“我不会失败。”[25]

---

[1] Williams，*Becoming Queen*，281.

[2] Hollingshead，*Underground London*，71.

[3] Reeve，*The Greville Memoirs*，3：367.

[4] Reeve，*The Greville Memoirs*，367.

[5] 临行前，斯托克马对卡尔说，不要“把背叛、谎言和做假视为成功的武器”。斯托克马诚恳又谨慎地说，尽管他经常与康罗伊意见一致，但后者极为情绪多变和不知分寸，即使他们设法让他当上了私人秘书，“他也会用不了多久就凭借自己的愚蠢自讨苦吃”。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30.

[6] Albert，*Queen Victoria’s Sister*，86.

[7] Hudson，*A Royal Conflict*，102.

[8] Williams，*Becoming Queen*，281.

[9] 在维多利亚18岁生日那天，肯特公爵夫人发表了一番有关牺牲的公开讲话，说：“我放弃了我的家乡，我的家族和我的职责，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一项即将成为未来生活全部目标的工作中。”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urt of Common Council，no. 13，June 2，1837. Records Office，Corporation of London，引自Hudson，*A Royal Conflict*，127。

[1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9，1837.

[11] 一开始，她问母亲能否让切斯特教堂主持牧师担任她的皇家内库管理人。她母亲说不行。维多利亚又问，能否单独接见墨尔本勋爵——答案还是不行。她母亲甚至没有跟她说，墨尔本——当时他不太清楚维多利亚所受苦难之深——提出了一份妥协协议，即他们接受国王的条件，但公爵夫人会得到维多利亚津贴的三分之二。

[12] Williams，*Becoming Queen*，252. 6月6日那天，维多利亚给莱岑写了一份备忘录，概括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她写道：“我在5月19日那天（当时国王提出额外给她每年10万英镑）一如既往地反对允许约翰·康罗伊干预我的事务。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受到我母亲的命令，正如我之前以她的名义提出请求一样，我不对她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约翰·康罗伊爵士是她的私人秘书，既不是我的仆人，也不是我的顾问，从来不曾是。”

[13] *Morning Post*，May 25，1837.

[14] Paterson，*Voices from Dickens' London*，45.

[15] 利物浦备忘录被保存在皇家档案馆里。See Longford，*Victoria R.I.*，59.

[16] 原文如此。此处应为作者笔误，这位利物浦勋爵没有做过首相，他是前首相的弟弟，此时他的哥哥已经去世。——译者注

[17] Behlmer，“*The Gypsy Problem*，” 231.

[18] 在19世纪30年代，随着人口以及无家可归人数的激增，英国曾进行过一场有关贫穷的公开辩论。在1830年，首相墨尔本勋爵通过了穷人法，将此前杂乱无章的穷人救济制度整合成一套正式的济贫院制度。这项法律旨在抵消在经济萧条期照顾亟须帮助者的成本——土地所有者会根据所在地区需要帮助的人数而被征税——还以减少穷人数量为目标，但它却让济贫院里的条件变得极为恶劣，以至于没人能

在里面待很长时间。这些济贫院就像监狱一样，想要做的是治愈贫穷，而不是纠正犯罪行为。查尔斯·狄更斯就住在一家济贫院附近，他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因为欠债而被关押过。1839年，他在《雾都孤儿》中写道，济贫院的管理委员会“制定了规则，要求所有穷人都应拥有选择（为此这些委员会成员不会强迫任何人，至少他们不会），要么在济贫院中被慢慢饿死，要么完成一个快捷的手续离开济贫院……他们……热心地让已婚的穷人离婚……于是，男人不再像以前一样被迫养活自己的家人，因为他的家人都被夺走，他被迫变成了一个光棍”！参见 Richardson，*Dickens and the Workhouse*。
历史学家菲利普·齐格勒将穷人法描述为一种“本意良好的法律，但造成的人类不幸很可能超过了19世纪的其他任何单项措施。”（Ziegler，*Melbourne*，163.）一系列丑闻，包括非人对待和几乎饿死人的条件，导致该法律在10年后遭到修改。

[1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9，1837.

[2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9，1837.

[21] 斯托克马写道：“妈妈与女儿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她［公爵夫人］在康罗伊的敦促下将事情推至极端，用不近人情与严厉逼迫她的女儿执行她的意志。”如果真相得到揭晓的话，“公主必须表现出真实的自己，即一个遭到压迫的人，我敢肯定每一个人都会飞奔而来为她提供帮助”。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37.

[22] Williams，*Becoming Queen*，281.

[23] Princess Feodora to the Duchess of Northumberland，March 25，1835. 皇家档案馆，VIC Addl. Mss U/72/15；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60.

[24] Hudson，*A Royal Conflict*，219.

[25] Princess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June 1837，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95.

第二部分 年少女王



6 成为女王：“我还很年轻”

在18岁之前我从来没有快乐过。[1]

——维多利亚女王

能够为一个年少女王奋斗将打动每一个水手的心。他们会把她的脸庞文在自己的手臂上。[2]

——威廉四世

1837年6月20日凌晨2点，威廉四世国王在一声突如其来的惊叫后溘然长逝。不久后，他的管家科宁厄姆勋爵（Lord Conyngham）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匆忙爬上了一辆正在等候的马车，疾驰21英里赶往肯辛顿宫。在拂晓之际，他们飞速驶过手拿提桶的挤奶女工以及正在清扫马厩、冲刷马车、梳理马鬃的马夫。他们在交谈中谈到了对维多利亚的好奇，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任何人对她都知之甚少，因为她的母亲对她保护得太过严密。他们不到5点就到达了肯辛顿宫，却发现大门已经上锁，呼呼大睡的看门人对他们的叫门声充耳不闻。他们反复摁响门铃，一直到看门人被吵醒，并把他们带到楼下一间房间里，在此过程中，维多利亚一直在楼上安睡。他们很快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被人忘了。他们按了两次铃，但两次都被要求继续等待。肯特公爵夫人最终在6点时叫醒了维多利亚。

当维多利亚抬头看到母亲的面孔时，她的胃部感到一阵不适。她站起身，梳了梳她散乱的长发，穿上拖鞋，然后在她的白色睡袍上披了一件棉质晨衣。她的母亲紧紧握着她的手，第一次陪着她走下昏暗、狭窄的楼梯。跟在她们身后的是随身带着嗅盐的莱岑。在走进那两名男士正在等候的房间后，维多利亚将身后的房门关上——并且将她的母亲和家庭女教师关在了门外。大主教和勋爵跪了下来。科宁厄姆勋爵把她伯父

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亲吻了她的手，并且给她递上了国王的死亡证明。大主教对她说，上帝会与她同在。她允许他们平身，然后走出房间，把房门关上。随后，她把头靠在母亲的肩上哭了起来——既是因为自己不甚熟悉的伯父、国王陛下已经去世，也是因为连她自己几乎都没有意识到的解脱感而激动万分。

维多利亚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求独处一会儿。她下令将自己的床搬出母亲的房间，穿上了一件朴素的黑裙子，然后把头发编成冠状挽在头上。随后她与深受利奥波德信赖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斯托克马共进早餐，利奥波德将他作为礼物送给了即将成为女王的维多利亚。她坐在桌前，写了三封信：分别写给利奥波德、她同母异父的姐姐费奥多拉以及悲伤的阿德莱德王后，她还在信中坚持将阿德莱德王后称呼为王后陛下。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天将我置于这一境地，那我就将竭尽全力履行我对国家的义务；我还很年轻，也许不是所有，但可能在许多问题上都缺少经验，不过我敢肯定，很少有人拥有比我更加真实的善意和渴望，想要去做恰当和正确的事情。”

上午9点时，维多利亚接见了首相，“当然是一个人，我以后始终会单独接见所有大臣”。温文尔雅的墨尔本勋爵立刻就得到了她的青睐。在接见期间，他起草了她在枢密院的讲话稿。枢密院成员受到传召，几乎马上就要在上午11点举行会议。身在伦敦各处的100个人正火急火燎地穿上正式装束并赶往肯辛顿宫。当时的欧洲也有其他一些年轻女王：例如，葡萄牙女王（她被维多利亚称作“胖女王”）仅仅比维多利亚年长一个月，而西班牙女王只有6岁（她的母亲是摄政王）。但维多利亚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王，而且距离上一位女性君主安妮女王已经过去了123年。尽管由一群为君主提供建议的前议员或者现议员组成的枢密院通常会每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但很少有成员会定期参加。而在这一天，会议的出席率创下了新高。

墨尔本向她问道，她是否愿意在他的陪同下走进会议室，她回答说：“不用了，谢谢。我要一个人走。”她在两位叔叔坎伯兰公爵和萨塞克斯公爵的引导下坐上了王座。威廉四世的死让坎伯兰公爵成为汉诺威国王，也巧妙地使英格兰摆脱了一个广受憎恶的公爵。维多利亚为她的叔叔们宣誓就职，接着再为内阁大臣和枢密院大部分成员宣誓就职。（为了展示善意，她没有让“身体衰弱”的萨塞克斯公爵下跪——并且亲吻了他的脸颊，这样他就不必弯腰来亲吻她的手了。）随后，维多利亚宣读了墨尔本勋爵此前为她起草的宣言：

> 我亲爱的伯父、国王陛下的死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和痛苦的损失，也将管理帝国政府的职责移交给了我。这一巨大的责任如此突然地落在我身上，而且我还如此之年轻，如果不是寄希望于赋予我这一职责的神圣天意将给予我履行职责的勇气，以及我纯洁的目标和对公共福祉的热忱将得到通常属于一个更成熟、更有经验之君主的资源禀赋支持的话，我应该会被重担彻底压垮……我在英格兰接受教育，并且得到了挚爱母亲的温柔、开明的照顾，因此我从小时候起就学会了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宪法。我将不懈努力维持改革后宗教的国教地位，同时确保所有人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我将坚定不移地保护权利，并且竭尽所能改善我的臣民中所有阶级的幸福与福祉。[3]

这场公开表现取得了巨大胜利。济济一堂的绅士们对这位新女王目瞪口呆，他们许多人在听到她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如此沉着冷静地发表演讲后都深受触动。好几个人甚至热泪盈眶。他们似乎对于一个小姑娘竟然能够如此流畅地阅读感到惊讶不已。日记作家查尔斯·格雷维尔当时是枢密院的书记员，他写道：

> 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前所未有，对于她的仪态和举止的齐声赞颂和夸奖也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这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她的表现非同凡响，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期待。她的年轻和无经验，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无知，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4]

这种称赞似乎无人有任何异议。托利党人约翰·威尔逊·克罗克

（John Wilson Croker）说，她“就像我认识的所有年轻小姐一样有趣又端庄”[5]。明显深受触动的惠灵顿公爵声称：“她不仅仅身子在椅子里，她的气场还充满了整个房间。”[6]辉格党政治家兼日记作者托马斯·克里维滔滔不绝地说：“我们亲爱的小女王从每个方面来看都完美无瑕。”[7]据约翰·拉塞尔勋爵所说，对在场的男人来说，她是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幼年女王”。最简单质朴的表现引起了毫不吝惜的称赞。

* * *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对她的热恋。《旁观者》（*Spectator*）周刊将这种具有传染性的热潮称作“女王狂热”（Reginamania）。一幅题为《伦敦的费加罗》（*Figaro in London*）的漫画显示，如果小女王要求，约翰牛[8]甚至愿意把耳朵割下来。[9]她的个人品质得到了作家们的一致歌颂。托马斯·克里维写道，有一次，维多利亚在走廊里见到了正抱着一大摞图书馆书籍的新侍女查尔蒙特小姐，此前并不相识的两人迸发出一阵开怀大笑；他还提到，她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为一些不可思议的人支付津贴，例如她的私生表亲菲茨克拉伦斯（FitzClarence）一家人，她母亲一直不让她接触这家人，但维多利亚仍然对他们很关心。美国大使夫人萨莉·史蒂文森（Sallie Stevenson）在给她身在弗吉尼亚的姐妹们的信中写道，每个人都“疯狂地对年轻的女王表示效忠……在所有的社交圈子里，人们无一不在讨论她的美貌、智慧、亲切和沉着。有一千条趣闻轶事讲述了她的善良和那场出色的演讲，而她正是凭借那场演讲征服了所有人和一切”。[10]距离美国人成功发动起义反抗乔治三世国王才仅仅过去了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距离他们在1812年的战争中与英格兰再次交战也仅仅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如今，甚至连他们也被这位新晋女王给迷住了。

这位年轻女王让较为年长的男性着迷不已，这通常令他们也感到非常惊讶。霍兰德勋爵（Lord Holland）说，在结束觐见后，他“就像是一

个谄媚者，甚至有点像是个爱慕者”。他坦承：“尽管不是一个大美人，身材也不完美，但她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面庞，尤其是眼睛和肤色来看，都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孩，很有诱惑力。”[11]克里维写道，或许她确实会在吃饭时狼吞虎咽，或者在开怀大笑时毫不端庄地露出牙龈[12]，但他愿意忽视这些缺陷，因为“她每时每刻都会羞涩和欢笑，表现如此之自然，足以让任何人放下戒心。她的声音完美无瑕，在她想要说机灵话或者耍一下小机灵时，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如此”。负责为她画肖像画并在日后成为宫廷宠儿的艺术家乔治·海特（George Hayter）“相当迷恋她”[13]，并且“用最为科学的方式讲述了她眼睛的非凡特点”。不过，并非所有见证人的陈述都是可信的——毕竟，克里维曾表示，他从未见过比维多利亚对母亲的感情“更加美好、自然的挚爱之情”。

有些女性对于新女王的外表吸引力不太关心，反而为她感到忧心忡忡，怀疑这些夸耀、噪音和责任重担会对一个18岁女孩产生巨大影响。甚至连意志坚强的社会改革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都写道：“我们都对年轻女王有着一些浪漫的幻想，可怜的姑娘！她有多少机会在长大后还能保持纯真和善良呢？”[14]她觉得维多利亚“取得建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墨尔本一边擦拭着眼里的泪水，一边离开了维多利亚的首次枢密院会议，这时，斯托克马男爵来到他身边，在他手里塞了一封来自约翰·康罗伊的信，信中包含了一长串大胆的命令。[15]康罗伊写道：“对我过去功劳的奖赏，我认为应当是：贵族地位——红色绶带[16]——以及从王室内库中支付的每年3000镑养老金。”他要求的养老金甚至超过了内阁大臣的标准。墨尔本将信放下，哭喊道：“你听说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吗？”[17]在一个祭奠先王、庆祝新女王的日子里，康罗伊所想的却只有他自己。后来，在维多利亚列出的这个“魔鬼的”诸多要求旁，阿尔伯特写道：“国王在那天早上刚刚去世。”

几乎是一瞬间，维多利亚就把康罗伊从自己的家中赶走了，这一瞬间无论是她的预先计划还是真正实施都令人回味无穷。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墨尔本勋爵决定给予康罗伊一份养老金以及从男爵爵位，并且承诺，在他能够授予新的爱尔兰贵族爵位时，会将爵位授予康罗伊。他还补充说，女王已经同意了这一计划。这最终被证明是一项错误判断。通过向康罗伊许诺一个多年以后才能成真的贵族地位——康罗伊需要等到一个现有的爱尔兰贵族去世后才能获封——他给了康罗伊足够的空间，得以继续策划针对维多利亚的复仇。康罗伊原本打算一直在肯特公爵夫人的家中待到女王履行完所有承诺为止。（利物浦勋爵对斯托克马说，墨尔本“上当了”。）康罗伊始终未获封爱尔兰贵族，他家族中的怨恨情绪仍能从他们保留的剪贴簿中明显看出，剪贴簿中贴满了批评维多利亚的报纸文章。他们会在她犯错时狂喜不已，在她遭到攻击时幸灾乐祸。[18]

在自己成为女王的这一天，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唯一提到母亲的地方出现在最后，她写道：“下楼对妈妈说了晚安，等等。”公爵夫人感到很受伤。那天早些时候，她给维多利亚写了一封信，问到自己能否带着康罗伊一起参加她的登基仪式——像以往一样，她低估了女儿对他发自肺腑的憎恨。公爵夫人强调说，其他人会注意到［康罗伊不在现场］，而且“会说一些你在第一天肯定应该避免的话”。女王回答说，墨尔本勋爵“坚决认为”他不应该参加。公爵夫人写了一封更为居高临下的回信：“你不了解这个世界。S.J.［约翰爵士］有他的缺点，他或许犯下了一些错误，但他的意图始终是最好的……这件事太过遭人非议，变得非常不愉快。保重吧，维多利亚，你知道你自己的特权！小心点，墨尔本可不是国王。”

从这一天起，公爵夫人就被迫遵守起了王室礼仪，这意味着，她必须等待维多利亚的召见才能见到她。[19]维多利亚十分享受这种受她所控制的独处。她在那一天又见了两次“非常和善”的墨尔本。随后，她在

屋里独自一人吃了晚餐。在成为女王的第一天，她在日记里写了5次“独自”（alone）一词——“独自……当然是独自……独自……独自……独自”。她终于得偿所愿。

一个月后，维多利亚出席了议会闭幕式。这是她首次出现在议会，她神态庄严地穿着一件绣着金色装饰的白色丝绸长裙、一件边缘装饰着貂皮和金色花边的深红色天鹅绒长袍和拖裙，头上还戴着一顶头冠。她信步走进上议院，目光落在了正在国剑（Sword of State）前踱步的墨尔本勋爵身上。一份晚报滔滔不绝地写道：“她的表情在胸脯的快速起伏以及镶钻胸衣的闪耀光泽下清楚可见，胸衣在昏暗的王座里闪闪发光。”[20]这些大人物们公开流下了眼泪，这在后来几乎成了这位年轻女王早期出席议会会议的一种惯例。格雷勋爵（Lord Grey）“因聆听女王声音和讲话的愉悦”而哭泣，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声称“我从没听过有人比她朗诵得更出色”，而在她讲话结束时，萨塞克斯公爵已经在擦眼泪了。正坐在外交官旁听席上的美国人萨莉·史蒂文森说，她的声音“就像一只弗吉尼亚夜莺一样甜美”[21]。维多利亚的母亲情绪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穿着通常由男性穿着的厚重长袍终于坐在了王座上。议会大楼外，警察竭尽全力都无法阻止人们爬上树木，试图瞥一眼女王；他们像椰子一样冒着雨挂在树枝上长达好几个小时。

维多利亚在自己的新角色中立刻就建立起了一套日常规范。她早上8点起床，先阅读圣经，然后撰写加急公文，直到10点才和母亲一起吃早餐。她会在上午11点到下午1点30分之间接见政府大臣。在她之前进行统治的两任国王都不喜欢辛勤工作，因此她的勤勉得到了广泛的赞扬。她自豪地给表弟阿尔伯特写信，略带些炫耀意味地说：“我对于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高兴，这些事情无论是从性质还是数量上都不是微不足道的。”[22]如今已经成为比利时国王的利奥波德舅舅仍然在不断给她提供细致指导。他告诉她要保持审慎，形成自己的意见，在有人未经她的允许提起私人问题时立刻改变讨论话题。他还建议她遇事深

思熟虑，就像莱岑那样：“无论碰到什么重要的问题，你都不应该在它被提出的那一天做出决定。”[23]英格兰接下来的10任首相都会因这种策略而进退维谷。[24]

尽管如此，维多利亚还是在她的新工作中茁壮成长。在她的描述中，“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履行职责是最大的快乐，如果是为了国家的福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疲劳是无法承受的，无论有多么严重”。[25]她终于能够对她的国家有所帮助、必不可少了，而她也因此而干劲满满。当利奥波德说，她应当在他的宅邸克莱尔蒙特别墅待更多时间时，她顶嘴说：“我每天都要接见我的大臣。”维多利亚的休息时间很少。就像她的女仆每天都要竭尽全力梳理她的一头秀发一样，她也要竭尽全力批阅一大堆文件。她经常要工作到深夜。[26]

在维多利亚成为女王仅仅几周之后，就有人开始谈及她“略显专横的性格特点”以及她的“坚强意志”[27]。她对于自己的意见非常有自信。在她为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Montefiore）授予骑士爵位时——他是英国历史上首位犹太人骑士——她对于任何反对意见都置若罔闻，声称“我很高兴自己是第一个去做我认为正确之事的人，就应该是这样”。[28]她还对她眼中多余累赘的传统习俗发起了挑战。例如，她不喜欢传统上晚宴结束后的性别隔离，即男性会去另外一个房间饮酒。她不允许男性客人饮酒超过15分钟，而且除非他们全部回到会客室，否则她不愿就座。她的女性客人们也不得不站着。[29]

维多利亚女王日后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之子、政治家阿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在1933年写道：“从一开始，她就展现出了一种性格特点，那就是严格按照自身的标准行事，而不是委身符合别人期待的标准。”[30]她的自我依赖成了一种纵贯她一生的“永恒、突出的特点”。不过，他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特点在她婚后几乎彻底消失了。维多利亚在单身时对自己最为自信。

* * *

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首相墨尔本勋爵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柏拉图式浪漫之一。无论是年轻、没有父爱的女王，还是这位古怪地不甚关心政治的政治家，都从这段关系中获益良多——她得到了指导，而他得到了地位提升。两人都有些陷入恋爱的味道。维多利亚的痴情出现得很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非常喜欢他，和他交谈让我受益匪浅。"[31]她刚当上女王才3天就对利奥波德说："我可怜的母亲对墨尔本勋爵非常嫉妒。"（她信件的编辑人员后来对维多利亚写到墨尔本时使用的亲密、深情的方式感到很尴尬，因此将这些内容都删除了，担心后人会认定他们是情人。[32]）

已经失去了妻子和儿子的墨尔本将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了他的新职责中。他教导维多利亚政治之道，不过他给予她的最重要礼物是真挚的情感和认可。格雷维尔将这种感情描绘成一种父亲对女儿的"强烈喜爱"[33]，来自"一个有能力爱却失去了爱的对象的男人"[34]。1837年8月30日，格雷维尔写道：

> ［维多利亚］有着强烈的野兽精神，带着孩子似的兴趣和好奇踏上了她的新岗位。没有人比墨尔本更善于迎合她。他以无限的体谅和尊重对待她，顾及她的品位和意愿，用自己诚恳、自然的举止让她感到放松，同时还凭借风趣、离奇、讽刺的思维跳跃和在所有话题上的博学多识逗她开心。[35]

他们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例如饮食、狄更斯、清扫烟囱、她的邪恶伯父们、她的父母、牙齿、约翰逊医生、历史、哲学以及礼仪等。他们总是有很多话聊。在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后，政治动荡已经略为平息，但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才刚刚开始，该运动将持续数十年争取民主、反对腐败。如今已经成了世界一分子的维多利亚发现，这个世界带上了一层新的魅力。在她成为女王的这一年，查尔斯·狄更斯开始连载《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卡罗琳·诺顿（Caroline Norton）发表了

她的激进宣传册，强调母亲应当在离婚后获得年幼子女的部分抚养权；一场全国性的反蓄奴大会在美国召开，会议特别感谢了英国女性对他们的支持。发明家为电报申请了专利，首块用达盖尔银版照相法拍摄的银版成功曝光，而连通曼彻斯特与伯明翰的大枢纽铁路线（Grand Junction Railway）也建成通车。大变革的势头已经开始加速。

维多利亚想要立刻住进白金汉宫里。乔治三世在1761年买下了这座宫殿，而乔治四世对其进行了重建，但它此时还尚未成为正式的王宫，装修和修缮工作尚未完工。维多利亚发出书面指令，坚持要求所有修缮工作在7月13日前完工。为了满足她的这一愿望，施工方不得不额外招募了大量人手。美国大使夫人萨莉·史蒂文森写道："女王年纪轻轻，要求真不少。"[36]在7月14日这一天，整个宫殿都处于一团乱麻的状态，女仆们忙碌地擦洗地板，工匠们则在铺设地毯，但身处其中的维多利亚却安静祥和。她传召了号称地球上最伟大钢琴演奏家的西吉斯蒙德·塔尔贝格（Sigismund Thalberg），邀请他在7月底进行表演，并且要求施特劳斯（Strauss）为她的舞会创作舞曲。

在经历了阴暗的肯辛顿宫后，维多利亚对于新家的充足光线和宽敞空间兴奋不已；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屋外花园的美景，舞厅的吊灯也闪闪发光。她的房间与母亲的房间相距甚远。（与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一样，维多利亚对室内设计没什么兴趣；当她在晚年将一切都用格子呢覆盖其上后，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感官的侮辱。）假以时日，维多利亚会变得越来越讨厌白金汉宫，尤其是烟雾缭绕的烟囱、糟糕的通风系统，以及食物腐败的味道，她还会因为伦敦的潮湿空气和拥挤人口而感到压抑——落在她花园里的煤灰也会让她产生压抑感。但此时此刻的白金汉宫地理位置优越，刚刚粉刷完毕，而且空间足够大。她给费奥多拉写信说："每个人都说，我在登上王位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我看起来非常棒，感觉也很不错，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正是我喜欢的生活。"[37]

这是一个快乐的夏天。维多利亚整个夏天都待在伦敦城外的温莎城堡，经常举行宴会和舞会，基本上是在为所欲为。她在7月19日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她的手在会上被亲吻了3000次。她喜欢有人陪伴、受人关注、被人夸赞。她在温莎大公园（Windsor Great Park）举行的一场阅兵式上就像军官一样向士兵们敬礼，并在阅兵结束后兴奋不已："整场阅兵进行得非常漂亮；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男人，就好像我可以作为军队指挥亲自上战场一样。"[38]8月15日，维多利亚两年来首次骑上了一匹马；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骑马，因为她母亲始终坚持要求她在骑马时必须有康罗伊陪同。她喜欢聚集一大批骑手，然后策马疾驰长达数小时之久，她还始终认为自己骑在马上时看起来更有吸引力——个头也更高。

当维多利亚在11月乘坐马车外出，前去参加伦敦市长大人在市政厅举办的一场宴会时，迎接她的是一阵如潮水般的掌声。在连续数年被人称作自私、愚蠢、自负之人后，能够被这么多人喜欢让她感到了巨大的满足。维多利亚终于开始相信费奥多拉的话可能是对的，那就是："你手中握有让成千上万的人幸福的权力。"[39]不久后，这个数字有可能会变成成百上千万。

然而，有两个人明显非常不开心。公爵夫人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康罗伊感受到了女王的蔑视带来的阵阵寒风。有些场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维多利亚刚登上王位就立刻宣布，不会提升母亲的地位，也不会考虑让康罗伊担任私人秘书或者王室内库管理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未来对女王的影响力将微乎其微，甚至荡然无存。[40]身处王庭的许多人对此也一目了然。尽管公爵夫人曾乞求维多利亚不要将他们之间的摩擦告诉墨尔本，但他如今已经对此了如指掌，不过他没有采取任何努力来弥合双方的分歧。维多利亚已经开始有些可怜她心情沮丧的母亲了。

忠贞不渝的公爵夫人仍然继续为恢复康罗伊的职务而不断努力，但

始终徒劳无功。11月时，她向维多利亚请求允许他来参加市政厅举行的宴会。她说，如果维多利亚不喜欢他的话，那么请“至少原谅他，不要给他和他的家庭贴上标签然后拒之千里之外”。她接着说：“作为女王，你应该把那些让作为公主的你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请记住，我对约翰爵士有着极大的敬意，无法忘记他为我和你所做的一切，尽管他很不幸地触怒了你。”[41]在公爵夫人看来，女儿的忘恩负义让她十分不满。她有针对性地送给了维多利亚一本《李尔王》，作为19岁的生日礼物。

凭借着作为女王的额外收入，维多利亚开始偿还父亲的债务，并且在1839年10月为此得到了正式的感谢。然而，公爵夫人依然挥霍无度，而且还脾气暴躁地给维多利亚写信，要更多的钱，而此时她自己的津贴已经有所增加了。维多利亚在1838年1月写道：“从妈妈那里收到了如此气人的一封信，噢！噢！太气人了。”[42]她在收到又一封信后对墨尔本说，她的母亲正在“折磨”她。[43]（在维多利亚死后不久出版的女王信件官方选集中，维多利亚在1837年与母亲之间的通信都被“删除”了。[44]）

母女俩之间的严重不和如今已经成了伦敦的谈资，不过旁观者基本上对起因一无所知。格雷维尔猜测，或许维多利亚不仅曾在过去被他们二人“虐待”过[45]，而且还“私下里怀疑她母亲与康罗伊之间关系的性质”。公爵夫人曾对作为欧洲耳目的俄国大使夫人利芬亲王夫人吐露说，她对于“自己的无足轻重”感到伤心不已。[46]

康罗伊如今成了一个心烦意乱、充满仇恨的男人，到1841年初，他“因为对职务的渴望而快要活不下去了”[47]。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很快就发生了巨大转折。他来到乡村，开始凭借他一如既往的热情研究农业科学，成了新型农耕方式的主要倡导者。他在1852年赢得了英国皇家农学会颁发的“最优质肥猪饲养人兼参展人”奖章。维多利亚会继续履行自己对康罗伊一家的义务。即使在他死去近30年后，她仍然在向康罗伊的儿媳提供养老金。

维多利亚作为女王的成功有时可以说太过轻而易举，她得到的赞赏也太言过其实了。当她仅仅是在大声朗读其他人为她写好的讲稿就能让众多国之重臣放声痛哭时，很明显，他们对她的期待有些太低了，而这仅仅因为她很年轻，还是个女孩。当枢密院的成员们看到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少女在公开场合中竟然能保持沉着冷静时，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惊讶，还有深深的折服。正如（墨尔本勋爵的妹妹）考珀夫人（Lady Cowper）所写的那样："我从未听过有任何人对她说过一句批评之词，或者在她身上挑过一个错——这的确是一种罕见的幸福。"[48]然而，遗憾的是，这也是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目光犀利的伦敦男仆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就曾对维多利亚在1837年享有的受欢迎程度进行过一番冷嘲热讽："女王是一件新鲜事，让现在的人感到非常满意，但我担心这持续不了多久，因为人们的想法变幻无常，很难就因为任何一个人而感到满足，无论是国王、女王还是某个臣民都是如此。"[49]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

[1] Williams，*Becoming Queen*，288.

[2] Arthur Ponsonby，*Queen Victoria*，13.

[3] Tuer and Fagan，*First Year*，6-7.

[4] Greville，*The Great World*，113.

[5] Williams，*Becoming Queen*，265.

[6] Greville，*The Great World*，113；Arnstein，*Queen Victoria*，32.

[7]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53.

[8] 约翰牛是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于1727年由苏格兰作家约翰·阿布斯诺特所出版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主人公约翰牛是一个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绅士，为人愚笨而且粗暴冷酷、桀骜不驯、欺凌弱小。——译者注

[9] Williams，*Becoming Queen*，292.

[10] Williams，*Becoming Queen*，296；Sallie Stevenson to her sisters，July 12，1837；Boykin，*Victoria*，*Albert and Mrs. Stevenson*，74.

[11]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40.

[12] 克里维不是唯一曾对女王的牙齿发表过不友善言论的人。萨利·史蒂文森在称赞她的声音、“非常漂亮的”胸脯、双脚和大大的蓝眼睛的同时，也表示女王的嘴是“她最糟糕的容貌特征”。“总的来说有一点开；她的牙齿又小又短，一笑起来就露出牙龈，看起来很丑。” Boykin，*Victoria*，*Albert and Mrs. Stevenson*，107-8. 费奥多拉告诉维多利亚在坐下来被人画肖像画时，要闭上嘴，但肯特公爵夫人却说：“不，我亲爱的；自然而然的就行。” Weintraub，*Victoria*，111.

[13] Gore，*Creevey*，379 （September 25，1837）.

[14] Martineau，*The Collected Letters*，3.

[15] 维多利亚经常提到墨尔本的眼泪，似乎他很容易流眼泪。他在许多场合哭过，包括她的加冕礼，她第一次出现在议会，在讨论她的未来时，为增加肯特公爵夫人的年俸而举行议会投票时，在谈到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惠灵顿公爵的荣誉时，等等。

[16] “红色丝带”是一种俗称，指的是最尊贵的巴斯勋章骑士。St. Aubyn，*Queen Victoria*，68.

[17]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90.

[18] 这家人连续好几代人都对约翰·康罗伊受到的所谓错误对待怀恨在心，后来甚至公开表达出这种仇恨之情。在一本贴满了有关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事情以及对女王的广泛批评的家族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一段来自拜伦勋爵的话。这段话本身就能够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紧盯时光
没有任何人类力量
能够不被宽恕地承受
他耐心地搜索和长期的监视
因他对错误无比渴望。
Conroy Family Collection，Balliol College Archives，Conroy Papers，2C Residue C.

[19] Strickland，*Queen Victoria*，220-21.

[20] Ashton，*Gossip in the First Decade*，4.

[21] Weintraub，*Victoria*，111.

[22] Williams，*Becoming Queen*，291.

[23] King Leopold to Queen Victoria，June 27，1837，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104.

[24] 格雷维尔在1837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女王“极少或从不”当场给出答复，这应当归咎于墨尔本。但墨尔本认为这是她根深蒂固的习惯，他对格雷维尔说：“她在面对他时也是这种习惯，在他与她谈及某个话题，并征求她的意见时，她会对他说，她要考虑一番，并在第二天告诉他她的想法。” Strachey and Fulford，*The Greville Memoirs*，3：394；Greville，*The Great World*，133.

[25] Williams，*Becoming Queen*，291.

[26] 托马斯·克里维在1837年7月29日写道：“有一天，在晚宴时，乔治亚娜·格雷夫人坐在莱岑夫人身边，莱岑夫人一直是维多利亚的家庭女教师，据她说，从来没有过像维多利亚如此完美的一个人。她说，如今维多利亚从早到晚工作；甚至在女仆为她梳头之时，她也是被公文盒包围，在阅读正式文件的。”需要指出的是，他在这几句话之前还写道，尽管维多利亚被“偶像化”了，但萨瑟兰公爵夫人并没有被女王迷得神魂颠倒，因为女王有一次晚宴迟到了半小时，对她显得有所怠慢。Maxwell，*The Creevey Papers*，665.

[27] Greville，July 30，1837，Strachey and Fulford，*The Greville Memoirs*，3：390. 他接着说：“随着她信心日渐增加，以及她的性格逐渐开始形成，不可能不怀疑她会表明自己的强烈意志。在所有与王庭和王宫有关的琐事中，如果她对这些事一直很熟悉的话，她会扮演王后或者情妇的角色。”

[28] Weintraub，*Victoria*，110.

[29] 甚至连公众都注意到，这个被严密控制多年的姑娘如今很喜欢为所欲为。当她的母亲和墨尔本对她说乘坐马车去出席海德公园的阅兵式比较妥当时，她却决定骑着马去。她的这一决定启发了一首民谣：

我要一匹马，我决心已下，
想搞阅兵式吗？没有马就没戏啊，
我的墨尔本勋爵，就这样吧，

不管你和妈妈说些啥。[50]——作者注

[30] Arthur Ponsonby，*Queen Victoria*，10.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2，1837.

[32]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269-71.

[33] Healey，*The Queen’s House*，136.

[34]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44.

[35] Greville，*The Great World*，133.

[36] Boykin，*Victoria*，*Albert and Mrs. Stevenson*，76.

[37] Williams，*Becoming Queen*，292；Vallone，*Becoming Victoria*，199.

[3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8，1837.

[39] Williams，*Becoming Queen*，297.

[40] Baron Stockmar to King Leopold，June 24，1837，皇家档案馆 Add. A 11/26.

[41] Longford，*Queen Victoria*，72.

[4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5，1838.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6，1838.

[44] 据伊冯娜·沃德所说，当本森在1904年将手稿的第一部分送到约翰·莫里那里打印时，莫里承认自己忍不住连夜阅读了这部分选集。莫里写道：“许多信件都极为重要。女王写给母亲的一些信件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无论是在加冕前还是在加冕后，她的地位对肯特公爵夫人而言都十分敏感，这些信件显示出了坚定的性格和一种正义感。”（Murray to Benson，March 22，1904，John Murray Archives.）但是，沃德写道，“两个月后，本森要求伊舍归还这些部分，因为他刚刚收到伊舍的指示，‘特定内容’必须被删除”。（Benson to Murray，May 17，1904，John Murray Archives.）此后再也没有提到过维多利亚与肯特公爵夫人在1837年之后的任何信件往来，也没有信件被发表出来。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244.

[45] 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162（July 28）.

[46] Ashdown，*Queen Victoria's Mother*，112.

[47] Hudson，*A Royal Conflict*，170.

[48]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49.

[49] November 13，1837，Wise，*Diary of William Tayler*，57.

[50] Longford，*Queen Victoria*，76.

7 加冕仪式：“一个源自《天方夜谭》的梦”

我将永远把这一天作为我人生中最自豪的一天铭记在心。[1]

——维多利亚女王，1838年

可怜的小女王，她这个年纪的女孩连为自己挑选帽子都得不到信任；她却被赋予了一项连大天使都会退缩的职责。[2]

——托马斯·卡莱尔，1838年

1838年6月27日午夜——此时距离威廉四世去世刚刚过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整个伦敦城到处都能听到锯子、锤子和刨子的忙碌劳作声。这是一个微风习习的凉爽夜晚，让仍在辛苦工作的人感到颇为惬意。在海德公园里，劣质帆布帐篷中的侏儒、巨人、白化病人和肥胖男孩们正努力在一天的表演开始前先休息一会儿；摊贩们正在将旗帜和横幅钉在帐篷上；面包师们正往自己的大篮子里堆甜食；驴子们放肆地叫唤，猴子们则被链子拴在货车、马车和柱子上。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钟声一直响到凌晨1点，让本地居民烦恼不已。不久后，在一片漆黑的天空下，人们将开始成群结队地穿过蜿蜒曲折的街道，来到老旧、灰暗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试图占据最好的位置来观看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仪式，仪式将在几个小时后开始。

凌晨5点，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门向蜂拥而至的人群打开了。许多结束了加冕派对和舞会的欢庆者决定不睡觉了，半醉半醒地在街道上闲逛，一直到人群开始争夺有利的观看位置为止。一名记者写道：“对这些家伙来说，加冕日将会像一场梦一样度过。”[3]在伦敦的贫民区里，衣衫褴褛的淘气鬼们赤着脚在街道和广场上跳舞、欢笑，高唱《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直到天边亮起一抹晨曦。

此时的维多利亚躺在白金汉宫的床上，已经完全苏醒，她正在克制内心的一种感觉，那就是她当天将遭遇一件“非常可怕”的事。[4]在凌晨4点不到太阳升起时，外面响起了21响礼炮，而她却把脑袋埋在枕头里。[5]屋外的噪音使她不可能再度入睡。她已经当了一年女王——加冕仪式通常在前一任君主死去几个月后举行，好让哀悼期转变为欢庆期，并且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准备——但她仍然感到紧张万分。维多利亚以前从未参加过加冕仪式，完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非常害怕会犯错。墨尔本勋爵后来对她说，她自己的表现是“其他人无法给予指导的，必须由自己来发挥”。[6]维多利亚的母亲也无法给予任何帮助；她此时的主要考虑对象还是康罗伊，但除非维多利亚死了，否则他是不会在当天被邀请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

维多利亚始终无法鼓起勇气看看窗外，一直到上午7点，她才偷偷望向窗外格林公园（Green Park）中的“奇妙景象”：蜂拥而至的人群爬上山坡，达官贵人的马车纷纷驶向威斯敏斯特教堂，士兵们整齐划一地行走，人们则你推我搡地想要挤占一个能够看到女王的好位置。之前天上还下着大雨，那天早上终于雨过天晴后，人群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在行进路线的两侧，房屋都华丽地装饰上了旗帜和鲜花，观礼座席都铺上了地毯和帘布，更加耀眼的是身穿白色或夏日淡色服饰端坐在座席上的华贵女宾。

负责为《观察家报》（*Examiner*）报道这场仪式的查尔斯·狄更斯说，整个世界“到处都是等待着目睹女王的人”。[7]前一天晚上，大约有40万人在伦敦街头露宿。格雷维尔写道：

> 就好像人口突然间翻了5倍似的。不是说偶尔才能见到一个人，而是整个镇子到处都是人群，他们拥挤着、喧闹着，时而打着哈欠，时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或者空洞地发着呆；整个格林公园就是一个巨大的营地，帐篷顶上飘舞着横幅，道路上也都挤满了人，还有更多的人群乘坐火车不断蜂拥而至。[8]

维多利亚站在镜子前，看着她的化妆师为她调整脑袋上的钻石头饰，这时费奥多拉走进了她的房间。女王拥抱了她的姐姐，然后转过身去，再次盯着自己的倒影，显得既焦虑又自豪。她娇小婀娜的身躯被紧紧地套在了一件白色丝质衬裙和红色天鹅绒长裙里。她已经准备就绪。当她终于在上午10点踏上马车时，紧张的心情让她的腹部不断抽搐，阳光穿透云雾照在大地上，水手们则举着王室旗帜站在白金汉宫大门口的胜利之门[9]顶上。当第一声炮声响起，宣告她启程时，那些在几英里外她的目的地威斯敏斯特教堂等候的人们纷纷起立。剧院老板内尔森·李（Nelson Lee）在海德公园敲响了一面锣，紧接着，集市上的表演者们开始展示起他们五颜六色的服装，而摊贩们则拉起帆布门帘，开始兜售他们的商品。[10]好戏正渐渐拉开帷幕。

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路程有三英里长，沿着宪法丘路（Constitution Hill）走到海德公园角，路过皮卡迪利（Piccadilly）、圣詹姆士（St. James’s）以及蓓尔美尔街（Pall Mall），最终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和白厅（Whitehall），全程耗时一个半小时。

正在英格兰度假的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形容说，维多利亚的马车“金光闪闪，好似精灵一般，四周环绕着手拿三叉戟的海神护卫，英格兰王冠在车顶熠熠生辉”。维多利亚的臣民们有的挤在特别架设的长椅上，有的扶着烟囱站在楼顶上，有的趴在围墙上，有的站在树上，还有的骑在别人肩上，这一景象让维多利亚不禁动容。富丽堂皇的马车在8匹灰马的拉动下徐徐前行，车内的维多利亚则在一边微笑、一边挥手，东张西望地希望能够捕捉到尽可能多的眼神。她后来写道：

> 在我来到伦敦城时已经看到了许多人，但是与聚集在各处观看队列行进的数百万忠诚臣民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他们愉快的心情和极度的忠诚超越了一切，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女王究竟

有多么自豪。[11]

当女王的马车在白厅停下时，她看到有几个警察正在“以超出情势需要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警棍”[12]，于是明确表达了她的不满。她不得不进行多次干预，并且反复强调在为她清理道路时不能采用强制措施。[13]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警察会在那一天采取暴力行为。他看到有几个警察试图制服一个露着肩膀、披头散发的醉酒女子；每一次他们试图制止她，她就会大喊“加冕礼！”一名群众通过讲笑话、扇耳光的方式才让她冷静下来。门德尔松认定：“这里醉酒的女人比男人更多：她们能够喝下的威士忌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14]人群的喊声震耳欲聋。狄更斯写道：“他们的热情全都在呐喊之中。”[15]

新女王在将至正午之时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四周挥舞的手帕、致敬的枪支和吹奏的小号构成了一片巨大的海洋。

惊奇不已的门德尔松说：“我不得不掐了自己一下，以确认这不是一个源自《天方夜谭》的梦。”[16]记者们在描写维多利亚走进教堂时映入她眼帘的画面时穷尽了赞美之词，而她娇小的身躯在教堂哥特式的拱门下形成了鲜明对比。教堂里装饰着金色和红色挂毯，座位上整齐地坐着身穿天鹅绒的贵族男女，身穿长袍的主教站成长长的一排，高坛和圣坛四周围了一圈绣着金色花纹的紫色帷幕，地上还铺着精美的东方地毯。女宾身上精致的钻石珠宝在洁白的皮肤上闪闪发光。甚至连对宗教、教堂或者女王毫无兴趣的作家哈丽雅特·马蒂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写道：“我以前从未见过钻石的完美效果。光线的照射让每一个贵族女子都像彩虹一样光彩照人。这个场面光芒万丈、大气磅礴、如梦似幻，产生了一种让人筋疲力尽、昏昏欲睡的奇特效果。”[17]身处教堂上层的马蒂诺在等待期间吃了一份三明治，读了一本书，还靠着柱子休息了一会儿。

在维多利亚在更衣室内穿上一件红色貂皮镶边斗篷的同时，一支由

深红天鹅绒组成的长长队列进入了教堂，引起了一阵兴奋和惊奇的骚动，他们是来自各国的大使们。英国的老对手法国将领苏尔特元帅（Marshal Soult）引起了一阵特别的欢呼。跟在他身后的分别是肯特公爵夫人和萨塞克斯公爵，接下来是剑桥公爵、公爵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奥古斯塔公主。各国大使的队列尤为别致，效果颇佳，既是因为他们的马车十分奢华，有时还因为他们的服饰十分艳丽。俄国大使穿着白色皮衣。奥地利的埃施特哈齐亲王（Prince Esterházy）穿着一件完全由珍珠和钻石制成的大衣——甚至连他的靴子上都覆盖着一层钻石，在他走进教堂穿过一束阳光时，这些钻石发出闪闪亮光。他那闪亮的帽子“向四周放射出跳动的光线”[18]。狄更斯写道，当阳光照在他身上时，他“闪耀得就像天上的繁星”。

紧接着，维多利亚走进了教堂。众人起立，《我曾喜悦》（*I Was Glad*）歌声响起。她的身后跟着8位未婚少女为她拉起裙摆，少女们身穿银白相间的裙子，发间还插着粉色玫瑰。张伯伦勋爵负责为她拉起裙尾。她前方的首相墨尔本勋爵手上拿着国剑。在此之前，他已经服用了大量鸦片酊和白兰地，以缓解胃部不适带来的影响，但他也因此变得情绪激动，而且，用维多利亚的话说，“彻底崩溃了”[19]。他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对维多利亚说，她看起来就像飘在一朵银色云朵上一样。最近当选议员的保守党人、未来成为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说，墨尔本看起来“非常笨拙而不雅，他的巨大头冠歪到了鼻子上，长袍被他踩在脚下，还像一个屠夫一样举着国剑”。[20]

历时5小时的盛大仪式开始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维多利亚是“这片国度毋庸置疑的女王”[21]，与此同时，她先后转身面向北方、南方和西方。她承诺奉行基督教新教信仰，随后来到圣坛背后的圣爱德华祈祷室（St. Edward’s Chapel），脱下长袍，取下头冠，并按照惯例换上亚麻长裙和金色外衣。紧接着，她回到圣坛，坐在圣爱德华宝座（St. Edward’s Chair）上，在一顶由嘉德骑士举起的金色华盖下接受涂抹圣

油。由于缺少排练，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教长因病无法出席，因此并非一切都顺利进行。维多利亚轻声对约翰·锡恩勋爵（Lord John Thynne）说："请告诉我下面该做什么，因为他们［大臣们］都不知道。"[22]她不得不询问杜伦主教该如何处理沉重的主权之球。他对她说，把它和权杖一起拿着，肩膀上再披上貂皮镶边的金色长袍。不幸的是，为她的纤纤玉指特别制成的红宝石加冕戒指不得不费很大劲才戴到她的手指上，把她弄得生疼。

当光彩夺目的新王冠被放在维多利亚的头顶时，伦敦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声响：伦敦塔桥上的41门大炮依次响起，鼓声齐鸣、号声高亢。贵族男女纷纷戴上冠冕，主教们戴上帽子，而最高纹章官们则戴上他们的头冠。教堂内的人们发出肆意的叫喊，让高耸的拱顶都为之震颤。教堂外的民众也在高喊欢呼。维多利亚看了一眼墨尔本勋爵，发现他正在用一种"和蔼""慈父般"的眼神看着她。她还与端坐在贵宾席正上方的"亲爱的莱岑"四目相对，她们彼此会心一笑。[23]与此同时，伦敦城上空升起了两个热气球。在下方的海德公园内，演员们正在假扮女王和她的随从，以同步再现加冕礼现场实况，观众们则一边畅饮啤酒，一边高声鼓励。喜悦之情无处不在。

7岁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此时还被人称作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作为父亲的侍从，他在现场百无聊赖地观看了这个几十年后任命他担任首相的女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仪式。不过，当一个好心人把他扛在肩上，好看看戴着王冠的新女王时，他立刻就呆住了，后来，他描述说，那是一个"永恒不灭的景象，华丽灿烂的色彩和光线全都聚焦在一个纤弱、孤独的身躯上"。

维多利亚笔直地坐在金色布帘覆盖的王座上，仍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的母亲已经失声痛哭。马蒂诺说，维多利亚看起来"如此娇小，甚至显得有些孱弱"[24]。为她特别制成的帝国王冠价值112760英镑，约

合如今的1250万美元，王冠顶部还有一枚马耳他十字。[25]贵族们排成长队爬上王座前的台阶，挨个触摸王冠并亲吻她的手——尽管惯例是亲吻脸颊，但是显然对一个小姑娘来说，让600个老头子亲吻她的脸颊是一件“可怕的事情”[26]。当她身体虚弱的叔叔萨塞克斯公爵挣扎着想要爬上台阶时，年轻的维多利亚用双臂拥抱了他的脖子。身体臃肿的老年人罗尔勋爵（Lord Rolle）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还摔倒在了台阶底部，他被自己的长袍缠着躺在地上，引起了旁观者的一阵集体惊呼。他在旁人的帮助下站起身，又试了一次想要走上台阶来到正在等候的女王身边，旁边还响起了众人的鼓励声，但是维多利亚却站起身向他走来，亲切地、悄悄地对他说，她希望他没有受伤。维多利亚伸出手让他亲吻，也让所有目睹和听闻这一事件的人对她产生了更多的好感。

随后，维多利亚摘下王冠，接受圣礼。神奇的是，恰好在此时，一束阳光照射在了她的脸上。巴斯与韦尔斯主教（Bishop of Bath and Wells）略过了整整一页的仪式规程，提前结束了加冕礼。女王紧接着在忏悔者祈祷室（Confessor’s Chapel）短暂停留，祈祷室内的圣坛上放上了三明治，墨尔本也喝了满满一杯牧师的红酒。在此之后，唱诗班开始高唱“哈利路亚”，与此同时，维多利亚进行最后的正式退场。随后她回到更衣室，试图将戒指从疼痛不已的无名指上拽下来。维多利亚知道自己的手指很短，因此不得不将手浸泡在冰水里长达半个小时，才将戒指取下。

教堂外，约翰·罗宾逊警官（Constable John Robinson）正在与一名试图冲进教堂向维多利亚求婚的男子搏斗。这名男子名叫托马斯·弗劳尔（Thomas Flower），是第13轻骑兵团的一名上尉。当他后来被一名地方法官问及他的职业时，他回答道：“职业也好，生意也罢，都与问题毫不相干。我仅仅是女王陛下婚约的一个候选者。”[27]他此前已经两次因扰乱治安而遭起诉，先前还因为试图在意大利歌剧院（Italian Opera House）闯进维多利亚的包厢而“引起巨大骚乱”。他被宣称精神失

常，并被送往伦敦中部的托西尔·菲尔兹（Tothill Fields）教养所。［托马斯·弗劳尔并非第一个试图向维多利亚女王求婚的男人。此前已经有一个人因跟踪女王而被定罪，还有一人因试图闯入皇家礼拜堂（Chapel Royal）而被逮捕。］

维多利亚的表现堪称完美，她的镇静几乎掩盖了周围众人的失态。在返回白金汉宫的路上，她虽然疲惫不堪但同时也感到如释重负。人群仍在不断地欢呼，女士们在窗台、阳台和平台上挥舞着她们芳香的手帕。维多利亚感到饿极了，但刚回到白金汉宫，她就抱起小狗达什放进浴盆里进行清洗，温柔地把水泼在它的软毛上。[28]

在上午11点左右行进队伍过去后，成千上万的观众开始涌入海德公园逛集市。那是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50英亩的范围内散布着近1000个摊位。数不胜数的摊位、营帐和帐篷展示着五颜六色的横幅和来自各个国家的旗帜。牛肉、火腿、鸡肉、沙拉、啤酒和葡萄酒供应充足。人们在集市上随意闲逛，随处都能见到售卖坚果、玩具、姜饼、冰块或者橙子的摊位，乐队热闹演奏、锣声四起，杂技演员们则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人们时不时地驻足观看展现地标性景色和历史性时刻的全景图和西洋镜，包括“尼亚加拉瀑布”（不知怎的被容纳进了一个盒子里）、“纳尔逊之死”（the Death of Nelson），以及“拿破仑被擒”（the Capture of Napoleon）等。不过，大部分人都是为了饮酒而来，而那些展示小丑舞的展厅里“拥挤得让人窒息”[29]，里面装饰着幕布和英国国旗，人们在其中尽情抽烟、开怀畅饮、肆意调情。在集市开始仅仅几小时后，一位姜饼师傅的妻子在现场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婴儿被取名为海德·帕克（Hyde Park，即海德公园之意），并且其自身就成了一个拥有极大吸引力的明星——孩子父母的摊位一直开放到集市结束的几天后，有许多女性都给母子二人带来了礼物。[30]在加冕礼的那天夜晚，一个23岁的男子在舞蹈展厅上死去，死因疑似是癫痫病，或者用官方的说法，是“上帝造访”。

在一些最受欢迎的展厅和帐篷里，人们能够看到“畸形表演”，这是维多利亚时代一种十分奇特且通常十分残忍的娱乐活动。表演中有肥胖男女、斑点男孩、双头儿童，以及无头动物等，还会出现数十只猴子、一头骨瘦如柴的大象，以及几匹会算命的矮马；除此之外，还有一名舞蛇人；几个侏儒；“活体骷髅”；来自美国的女巨人双胞胎；双头小姐；以及备受喜爱的“猪脸小姐”史蒂文斯夫人，它实际上是一头棕熊，只是爪子和面部的毛被剃了个干净，还戴着白手套、软帽、围巾、头罩并套着一条长裙，它被牢牢地捆在一张椅子上，每当主人问它问题时，就会有一个藏起来的孩子用棍棒戳它一下。[31]

当查尔斯·狄更斯经过其中一场表演时，他摇了摇头，笑道：为什么巨人的帆布帐篷总是最小的？他是英格兰最负盛名的作家。此时的他刚刚离开度假之地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为的是赶来海德公园观看加冕礼庆祝活动。他想到，在工人阶级的娱乐活动方面，有许多人都是假内行：他们总是指责这些工人阶级进行各式各样充满罪恶和放纵的狂欢——但是看看吧，这有多棒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惬意的景象”[32]。据估计，有三分之二的伦敦人口参与了这场集市。正如格雷维尔所写的那样，加冕礼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取悦和吸引［民众］”[33]。这一点非同寻常，标志着君主与民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各地，各阶层的公民都参与到了加冕礼的庆祝活动中来，既喧嚣吵闹，又平稳有序：野炊、官方午餐会、教堂礼拜、街头派对、晚宴以及游园会等活动层出不穷。工厂和监狱中的人们得到了烤牛肉和煮牛肉，以及蔬菜、梅子布丁、啤酒、烟草、茶和糖等额外奖励。乞丐们得到了一笔加冕礼津贴。新门监狱的狱警们给犯人提供了牛肉、土豆、面包和一品脱烈性啤酒。那些被关在禁闭室的犯人还短暂获准与其他犯人进行接触。在乡下的集市上，50岁以上的男人们会为了一件做工精良的背心而进行赛跑，而50岁以上的女人们则会为了半磅重的鼻烟而进行激烈争夺。

加冕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女王在雨停后骑马经过了海德公园。墨尔本勋爵对维多利亚说，她的表现“非常漂亮——每一个部分都无可挑剔，举止得体”[34]，这让她兴奋不已。她站在阳台上观看了那天晚上的烟火表演。天空中的烟花绽放出成千上万的星星、光线、巨蛇、花朵和火箭，让人们看得眼花缭乱。但最为激动人心的是最后的奇观——烟花将身穿全套加冕礼长袍的维多利亚形象投射在天空上，闪闪发光。

加冕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墨尔本在服用了一剂大剂量的氯化亚汞后上床睡觉。此后的一周，他都没能回到内阁中来，但白金汉宫对他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女王在7月4日写道：“这件事相当令人生气、伤脑筋，让我感到愤怒不已；因为我已经习惯并且沉浸于每天看到这个亲切——而且我敢说甚至是亲爱——的朋友……当令我感到愉快的每日会面无法成行时，我会感到非常烦恼而不安……而且我今天要参加一场枢密院会议……就此看来，我只能在没有那个让我感到安全和舒服的人陪同的情况下出席了。”[35]（她还匆忙补充说，只有在莱岑不在她身边时，他才能感到舒心，显然是知道略有嫉妒心的莱岑会阅读她的日记。）

几个月后，加冕礼成为贝克街（Baker Street）上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新馆的核心主题。维多利亚此前已经允许为她的长袍制作完美复制品并放在这场雄心勃勃的展览上展出，展览内容还包括威斯敏斯特教堂内部的一份纸胶模型，模型捕捉到了一个在一个多世纪内都无法再现的瞬间：一名年轻女性接受涂抹圣油，加冕为数百万人的统治者。考珀夫人在给利芬亲王夫人的信中写道，英国人“从根本上说都是保皇主义者”，女王“只需要展示自己、接受崇拜就可以了”。[36]此时的一切都荣耀万分、金碧辉煌，笼罩着灿烂阳光；美貌的女王被赋予了一切美德。《冠军与先驱周刊》（*The Champion and Weekly Herald*）写道，鉴于维多利亚如此年轻可爱，“这样一个君主是不可能有敌人的”[37]。然而，这种状况将很快发生改变。她很快会发现，作为一个年轻女王，她缺少的并非自信或者勇敢。她缺少的是智慧。这将导

致她的运势如上升时一般迅速地坠落。

---

[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38.

[2] Longford，*Victoria R.I.*，83；St. Aubyn，*Queen Victoria*，63.

[3] *The Champion and Weekly Herald*，July 1，1838.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7，1838；Williams，*Becoming Queen*，274.

[5] 在加冕礼那天，在日出时、维多利亚女王离开白金汉宫时、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时，分别想起了二十一响礼炮，而在王冠被放在她头上时，响起了四十一响礼炮，在她离开教堂以及回到白金汉宫时，又分别响起了二十一响礼炮。

[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38.

[7] Dickens，“The Queen’s Coronation，” *Examiner*，July 1，1838，403.

[8] Strachey and Fulford，*The Greville Memoirs*，June 27，1838，4：69.

[9] 也被称作威灵顿拱门（Wellington Arch）。——译者注

[10] Frost，*The Old Showmen*，327-28.

[11] 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June 1838.

[12] Strickland，*Queen Victoria*，320.

[13] Strickland，*Queen Victoria*，320-21.

[14] Hensel，*The Mendelssohn Family*，2：41.“一名裸着肩膀、披头散发的醉酒女人试图跳起舞来，当警察尝试制止她时，她喊出了‘加冕礼’一词；但一名幽默的邻居成功地用笑话以及扇耳光的方式将她弄走了。据我观察，这里醉酒的女人比男人更多：她们能够喝下的威士忌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15] ［Dickens］，“The Queen’s Coro-nation，” *Examiner*，July 1，1838，403. Attributed to Dickens by the Pilgrim editors，*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1：408.

[16] Hensel，*The Mendelssohn Family*，2：42.

[17] Martineau，*Harriet Martineau's Autobiography*，421.

[18] Martineau，*Harriet Martineau's Autobiography*，421.

[1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38.

[20] Disraeli to Sarah Disraeli，June 28，1838，Weibe et al.，*Letters of Benjamin Disraeli 1860-1864*，7：466.

[21]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Illustrated London News & Sketch Limited，1887，90：704.

[22] Greville，*Journal of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1：？，June 28 1838.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38.

[24] Martineau，*Harriet Martineau's Autobiography*，125.

[25] 这顶王冠上镶嵌了一颗巨大的心形尖晶石，这颗尖晶石曾经由黑太子爱德华所佩戴，后来又被镶嵌在亨利五世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佩戴的头盔上。这顶王冠上还有一颗蓝宝石，这颗蓝宝石是在1163年忏悔者爱德华的墓被人撬开时在他遗体佩戴的戒指上发现的（这被人认为是王室所拥有的最古老的珠宝）。王冠上还有另外16颗蓝宝石、11颗绿宝石、4颗红宝石、1363颗明亮式钻石、1273颗玫瑰型钻石、147颗桌型钻石、4颗水滴形珍珠，以及273颗圆形珍珠。王冠重达近1公斤。

[26] Rusk，*Reign of Queen Victoria*，105.

[27] *The Times*，June 29，1838，8.

[28] Rappaport，*Queen Victoria*，36.

[29] *Morning Chronicle*，引自Ashton，*Gossip in the First Decade*，59。

[30] Frost，*The Old Showmen*，328.

[31] Sanger，*Seventy Years a Showman*，74.

[32] Charles Dickens，"The Queen's Coronation，" *Examiner*，July 1，1838，403.

[33] 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June 29，1838，174.

[3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38.

[3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4，1838.

[36] Weintraub，*Victoria*，114.

[37] *The Champion and Weekly Herald*，July 1，1838.

8 学习统治之术

作为一个年轻人，你的生活非常不合情理。这是男人才有的生活。[1]

——墨尔本勋爵

维多利亚立刻就对墨尔本勋爵产生了好感。她的首相孑然一身并且极富魅力：相貌英俊、迷人，一头黑发不拘一格，浑身散发出一种故意若无其事的气场。她会仔细聆听他说的每一个字，经常评论他出众的相貌，尤其喜欢在他穿上红蓝相间的温莎宫殿礼服或者他的头发被风吹乱时这么做，此外，她还会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他的风趣语录。她写道，她对他的爱“好似对父亲的爱。他知识如此渊博；记忆力超群；他认识每一个人，知道每一件事；不管他们是谁，或者做了什么……这对我大有裨益；与他之间的对话总是能让我有极大的进益”。[2]她是一个缺少父爱的年轻姑娘，一直受到母亲顾问的欺凌；他则是一个因妻子的公开出轨而备受伤害的鳏夫，而且他唯一的孩子也已经在一年前死去。他喜欢被需要、被崇拜并且身居高位的感觉；她则喜欢他的慈爱与专注。正如格雷维尔敏锐观察到的那样，维多利亚的感情或许“有性欲的成分，但她自己并不知道”。他们二人共处的时间非常之多，以至于引发了种种流言蜚语。[3]格雷伯爵夫人给托马斯·克里维写信说：“我希望你会觉得所谓墨尔本勋爵有可能迎娶女王的消息很有意思。”[4]

维多利亚对他拥有绝对信任——但他并不总是值得这份信任。墨尔本勋爵是一个不太合格的领导人，之所以在维多利亚成为女王的两年前第二次出任首相一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最不令人讨厌的候选人。他对政治缺乏热情，无法激发出足够的能量来关心社会痼疾，更不要提去对抗这些痼疾了。[5]有时，当改革派前来拜访他，向他陈述减少死刑或者推行义务教育等改革措施的理由时，他会一边听一边从枕头里拔羽毛出来，抛在空中，然后把羽毛吹到书桌的另一边。本名为威廉·兰姆

（William Lamb）的他是一个享有特权、聪明过人并毕业于伊顿公学的辉格党人，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避免冲突或者避免过于劳累。从他无忧无虑的生活中，你肯定猜不出他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令人痛苦的背叛和失败。他与年轻女王之间的关系既罕见又有趣，不可思议的是还非常感人。要想理解其中的缘由——以及他的需求是如何与她相契合的——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墨尔本在私生活中遭受的羞辱和痛苦是如何震惊伦敦贵族圈，并且让他的内心变得麻木不仁的。

1806年12月的一天，当时还被称作威廉·兰姆的墨尔本勋爵在下议院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讲，正是在那一天，公共旁听席上一个身材娇小、形似男孩的身影听得入了迷。那个身影正是他的妻子卡罗琳·兰姆（Caroline Lamb），她是个顽皮、古怪的家伙，当天正穿着她兄弟的衣服。另一位辉格党政客莫佩思勋爵（Lord Morpeth）的秘书偷偷将她带进了当时只准男性进入的旁听席。她的婆婆对此感到愤怒不已。

本名为卡罗琳·庞森比（Caroline Ponsonby）的她相貌并不出众，但她富有激情、活力充沛并且聪慧过人。墨尔本勋爵为她神魂颠倒，一得到机会（即在他哥哥去世，他继承了爱尔兰贵族爵位和大量财富后）就向她求婚了。他的家人对于她臭名昭著的坏脾气和反复无常的性格忧心忡忡，但墨尔本却对她情深意浓，于是他们在1805年结为连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如暴风骤雨一般，最为显著的是他对她极具破坏性的行为的容忍，这种容忍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他们二人育有一子，但是这个孩子患有癫痫病，或许还患有孤独症。卡罗琳无法再生育更多孩子的事实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也加剧了业已十分不稳定的情感裂痕。结婚仅仅几年后，威廉·兰姆就开始收到有关妻子通奸行为的匿名信。

卡罗琳最著名的情人是富有魅力的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在1812年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一书出版后，拜伦在伦敦受到了广泛赞誉。卡罗琳立刻就读完了这本

书，她坚持要求与拜伦见面，并且称他是个“疯狂、邪恶、危险的家伙”，这句评语从此流传了下来。事实上，他们俩都适用这句评语；他们之所以看上彼此，既是出于相互认可，也是出于情欲。对于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她写道：“那张美丽苍白的面庞是我的命运所在。”[6]这将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令人愤怒也最富传奇色彩的风流韵事之一；许多作家都曾用虚构角色来刻画卡罗琳与拜伦之间的劣迹。两人公开且不知羞耻的行为在那个夏天让整个伦敦为之震惊。拜伦因为能得到一名政客的聪明妻子的关注而感到受宠若惊。她则为他的美貌、名气以及最重要的是他的文采而兴奋异常，但这种兴奋将在未来给他们带来祸端。他们写了大量的情书——在其中一封如今被收录于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档案夹之中的情书上，卡罗琳还粘上了一根她自己沾着血的阴毛；除此之外，他们还曾试图私奔（有些人仍然认为他们已经秘密地结了婚）。

在经历4个月热恋后，拜伦抛弃了他的情人。卡罗琳心碎不已，以至于她在一场舞会上用碎玻璃割开了自己的手臂，在这起尤为引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后，她被赶到位于布罗克特（Brocket）的乡间别墅居住，并通过每天饮用一瓶雪莉酒的方法接受治疗。[7]她经常弄坏家具、砸碎陶器，用扫帚捅仆人，还会半裸地出现在公开场合。通常情况下，她都处在醉酒或者吸食鸦片后的神志恍惚状态。墨尔本为了她简直心力交瘁，仅仅36岁的年纪就头发灰白。他的政治生涯也屡遭坎坷，但他既没有离开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寻求离婚。

墨尔本勋爵之所以不离不弃，可能有三个原因：他对她持续不灭的爱，他的被动性格（在学生时代，他会逃避那些自己知道无法获胜的争斗），以及作为辉格党人毫不古板的道德观念。在墨尔本长大成人的18世纪末期，对婚姻的忠贞并不是一个受人称赞的美德。[8]婚姻被视为一种友好契约，契约中的夫妻俩拥有生育男性继承人的义务。正如墨尔本自己所说，他的母亲就是“一个杰出的女性、深情的母亲、优秀的妻子——但一点也不忠贞”。[9]她曾有过许多情人，并且与他们生育了多个

子女。众所周知，虽然墨尔本母亲的丈夫赋予了他家族姓氏，却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的父亲实际上是他母亲的情人之一：埃格雷蒙特勋爵（Lord Egremont）。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墨尔本却对自己不贞的妻子忠贞不贰。他的传记作者戴维·塞西尔（David Cecil）说，当时，如果一个已婚男人没有一个“活力充沛、前凸后翘的”情人的话，就会被认为十分古怪。至于已婚女性，“出轨太过稀松平常，甚至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品头论足”。[10]

但是，辉格党圈子外的大多数人却会对他们的性放纵进行严厉谴责。如果他们的风流韵事在媒体或者法庭上被公之于众的话，他们就会遭到嘲笑，对女性来说，则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卡罗琳的开放态度震惊了许多人，尤其是她还写了一本仅仅略作掩饰的书来讲述她的韵事。这本名叫《格莱纳翁》（*Glenarvon*）的小说出版于1816年5月，并立刻成了畅销书，但它却让她丈夫蒙受的羞辱久久无法消失。传记作家L.G.米切尔（L.G.Mitchell）写道，这本书“给整个辉格党圈子的脸上丢去了成桶的粪便”[11]。墨尔本不知所措，但一直到几年后，他的家人才成功说服他与妻子分居。当1828年1月卡罗琳因水肿病而奄奄一息时，墨尔本还专门从爱尔兰赶来陪伴在她身边。

在妻子死后，墨尔本有过两段引人关注的私通故事，但都以诉诸法庭收场。两次私通的对象都是聪明、幽默的已婚女性，她们的丈夫也都得到了墨尔本在政治上的青睐，直到他们决定向他提出起诉为止。这两起诉讼还详细描述了他喜欢鞭笞的个人癖好，而且都以他有意躲避所涉及女子告终，尽管他在两起诉讼中都被判无罪。第一名女子是他的爱尔兰好友布兰登夫人（Lady Branden），并且他终其一生都在为她提供养老金。[12]第二名女子是美女作家卡罗琳·诺顿，一个饱受丈夫虐待的高知女性。在她与墨尔本之间公开的亲密关系成为大众的谈资后，诺顿先生将此事告上了法庭。墨尔本终其一生都宣誓他和诺顿夫人从来都不是情人，但包括他兄弟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此半信半疑。这起案件在1836年

6月开庭审理，但9天后就以原告败诉告终。尽管被判无罪，但墨尔本勋爵还是郁郁寡欢了好几个月，难以睡眠和进食。他变得十分冷酷，要求卡罗琳·诺顿不要争夺三个儿子的抚养权，并建议她回到暴力的丈夫身边。诺顿夫人后来一直继续为母亲获得更多权益进行斗争，而在1837年，一项法律终于得到通过，允许女性争取7岁以下子女的抚养权。维多利亚对她的诉求表示同情，并且因为墨尔本没有出席该法案的投票而训斥了他。墨尔本说："我认为你不应该给予一名女性太多的权利……不应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权力……男人应该握有家庭中的权力。"[13]尽管他在自己的家庭中没有任何权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有这种看法）。

墨尔本勋爵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他的女性朋友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他甚至曾与维多利亚女王讨论过原则问题，尤其是打孩子屁股的问题。这似乎是源于他自己在伊顿公学的经历，当时，体罚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惩罚措施，不过，他在3年时间里只被鞭打过三次，这让他感到有些失望。[14]他对女王说，这些鞭打措施"总是会产生惊人的效果"[15]。他在余生中始终倡导将鞭打作为惩罚儿童或者女仆的手段。有证据显示，他沉溺于与自己的妻子和至少一个情人以及一个在他家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名叫苏珊·丘吉尔（Susan Churchill）的年轻孤女玩这种鞭笞游戏。[16]他的鞭笞对象似乎是自愿的，不过究竟是否真的能让一个孤女同意接受鞭笞实在令人感到怀疑。[17]L·G.米切尔认为，墨尔本是在为了那个背叛他的女人所犯下的罪过而惩罚所有女性。唯一毫无疑问对他寄予无上崇拜的女性就是女王本人。

格雷维尔写道："作为一名首相，他当然是一个古怪的家伙。"[18]他对于改革没有日程表，对于一个崭新、更美好的国家没有任何远见，也没有任何想要为之制定法律的政策。他的诡计多端经常被人低估，但停滞不前一直是墨尔本勋爵偏爱的立场。他最喜欢的政治格言是："为什么不能把它放一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个与世代脱节的人；他

身上所体现的是过去那个安全作为唯一核心议题的政府，也就是要避免战争、处理危机。[19]在一个风云诡谲、巨大变革的时代，英格兰的首相却最喜欢使用“拖延”和“推迟”这两个词。讽刺之处在于，墨尔本是一个辉格党人。此前的几位辉格党首相，尤其是在1830年至1834年间执政的格雷勋爵，推行了福利法案、结束了奴隶制并且扩大了选举权。但是墨尔本有一次甚至对惠特利大主教（Archbishop Whately）说，如果是他当政的话，他会对奴隶制“置之不理”[20]。因此，辉格党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失去前进势头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墨尔本领导的政府在1834年7月至11月以及后来的1835年4月至1841年8月他担任首相期间几乎毫无建树。他担任首相时期议会中进行的最重要辩论不是关于那些有可能给一个充斥不平等的国家带来改变的政策，而是“为了让不满的工人——或者说更多情况下是失业者——安守本分所需采取的镇压程度”。[21]

墨尔本对维多利亚产生的款款柔情让他感到既惊讶又高兴。在她成为女王前一年，他的独生子奥古斯塔斯不幸去世，英年19岁。医生说，他死去时心智只相当于一个8岁儿童。一切努力都没有成效：无论是定期放在他脑袋上的水蛭，还是饥饿疗法、头部磁化疗法，或是用腐蚀性酸液切割他的颅骨，都没有任何效果。在卡罗琳死后，他一直与墨尔本勋爵居住在一起，经常连续好几个小时凝望天空。墨尔本一直难以爱上这个孩子，但在失去独生子后，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以及他那个布满裂痕的小家庭的消失，还有他再次孑然一身的事实。

在维多利亚身上，墨尔本突然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那个孩子、伴侣和情感寄托。她对他知无不言。她在日记中写道，到7月时，他们已经开始讨论“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对我而言有些痛苦的事情”。[22]他对她直率地寻求安慰的要求给予了友善回应。她抱怨说，“除我以外每个人都在长大”。他却回答说：“我觉得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说，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者腼腆，只是有着“敏感而多情的性格”[23]。在了解到维多

利亚有多么讨厌她的母亲后，他还曾对肯特公爵夫人提出过严厉批评。维多利亚的一则日记详细记录了她和墨尔本是如何“长时间”讨论她的母亲的。[24]他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愚蠢的女人。”维多利亚补充说：“一点也没错；随后我们对于斯托克马称呼她‘如此无知的女人’开怀大笑，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25]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令人震惊。

维多利亚与墨尔本勋爵每天都要见面大约5个小时。他们在这段温馨的家庭式关系中不停地谈天说地、吃大餐、下象棋并且骑马穿越庄园等。精明的利芬亲王夫人写道，当墨尔本陪伴在她身边时，“看起来十分慈爱又满足，有些自鸣得意；既恭敬又不拘束……还很轻松快乐——所有情绪都混杂在一起”。[26]他们会亲密地相互打趣：维多利亚会取笑他的口音——他会把黄金念成“goold”，把罗马念成“Room”——以及他在重大场合打盹的习惯。

年轻的女王此时正处在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她会在日记中认真记录下墨尔本的警句妙语以及谚语格言。在她看来，他和他的傲慢态度十分有趣。在改革问题上，他说：“你最好不要尝试做什么好事，这样你就不会陷入争吵了。”在医生问题上：“英国医生会把你治死，法国医生会让你自生自灭。”在女性问题上：“女性之间友善相待的情况很罕见。”在园艺方面：“所有的花园都很枯燥，花园是一种很无聊的东西。”里士满公爵曾对他说，人们在出狱时比入狱时情况更糟，这令人感到非常震惊，对此，墨尔本的回应是：“我觉得，人们从很多地方出来时会比进去时变得更糟；比方说，当我从舞厅里出来时，就会比进去时累得多。”他的这番话让维多利亚“笑得上气不接下气”[27]。

最令人称道的是，墨尔本让她感到非常安全。但是，他却远远称不上她的理想伴侣。他有三件事没能做到：一是没能缓和她与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曾对她说，被外界视为一个孝顺女儿十分重要）；二是

没能让她确信她是整个国家的女王，而不仅仅是辉格党人的女王；三是没能激发她正在萌芽的社会责任感。他给她灌输的观点是，任何起义、抗议或者变革要求都是受到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个体所怂恿的。他向她隐瞒了工业革命期间爆炸性经济增长的真相，而在这段时期，有一大群人被迫成为城市贫民，肮脏拥挤的棚户区在大城市周围层出不穷，但这些贫民却没有任何逃离的机会，议会中也没有代表他们的声音。

从长期来看，最令人不安的失败是上面提到的第三点。墨尔本认为，儿童应当获准参与工作，而不是挨饿，而教育会让人们变得不幸福。他说，他“不喜欢任何穷人，而那些因为自身的过错而贫穷的人是他最厌恶的”[28]。维多利亚对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世界展现出的兴趣也遭到了他的讥讽。当维多利亚在1839年元旦对他讲述完《雾都孤儿》中有关“卑劣恶行”以及“工厂和学校中的饥饿”的故事后，墨尔本回答说：“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希望能避免它们。我不喜欢在现实中碰到这些东西，因此也不喜欢看到别人来表现它们。”维多利亚与他发生了争执，但徒劳无功。她终其余生都没能对消除贫困和改善基本条件的努力提供协调一致的支持。维多利亚的问题并不在于缺少对社会痼疾的关心，而是缺少对这些问题的接触。

但从短期来看，最大的失败在于上述第二点，即未能教育女王宪法赋予她的公正义务，而这是此前的利奥波德和未来的阿尔伯特一直在努力完成的事情。与父亲和朋友们一样，维多利亚也是个无所畏惧的辉格党人，而且她喜欢用“我们”这个词来指代她自己和墨尔本政府。[29]她没能意识到的是，墨尔本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保守派，之所以成为辉格党人，更多的是源于家族背景而不是自身信仰。[30]他偶尔还会试图劝说维多利亚，托利党人并不都是坏蛋，而且她未来还会需要与他们一起共事，不过她对他的这一说法不屑一顾，并且称呼反对党领袖罗伯特·皮尔是一个“肮脏的恶棍”[31]。当辉格党人以较大优势赢得她加冕后的首次大选时，托利党人、未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写道：“小女王鼓起了

掌，这是事实。”[32]托利党人眼睁睁地看着女王和首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感到恼怒不已。著名保守派人士查尔斯·阿巴斯诺特（Charles Arbuthnot）说：“年轻愚蠢的女王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这让我们希望渺茫。”[33]维多利亚仍然拒绝与除首相之外的任何人讨论政治。

到1838年底，也就是成为女王刚刚一年多时间后，维多利亚已经对自己光鲜亮丽的新生活感到厌烦了。工作永无止境，宴席和舞会让她厌倦，而陪在她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比她年长好几十岁。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如她最初以为的那么能干。到12月时，她开始变得易怒、抑郁又急躁：“我感觉我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格格不入。”[34]人们也开始怀疑墨尔本是如何忍受着一切的了，他需要夜复一夜地“陪肯特公爵夫人玩惠斯特纸牌游戏，以及每天六小时与女王的促膝谈心”，还需要“时刻小心不要说脏话或者信口开河”。对于一个本应管理整个国家的人来说，这种行为的确很古怪。墨尔本在自己作为导师、教师和父亲般的宫廷宠臣的生活是否让他无暇顾及国家大事的问题上，始终为自己做辩护。然而，在一个脆弱的时刻，当格雷维尔为他对维多利亚的照顾而向他致敬时，他哭着说：“上帝啊，我从早上到中午再到晚上一直都在忙这个！”[35]

维多利亚的身体也感觉疲惫不堪。墨尔本觉得她看起来“面色蜡黄”。由于无聊至极，她一有机会就暴饮暴食。墨尔本对她说，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散步，并且只在饥饿的时候才吃东西；她却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她会整天吃个不停。她说，散步让她感到恶心。墨尔本还要求她不再喝她钟爱的啤酒。到12月时，“暴躁、消沉”的维多利亚郁闷地发现她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25磅——“就我的个子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重”[36]。人们开始在私下里议论说，她的裙子开始做的越来越大，而且年仅18岁的她已经美貌不再了。墨尔本安慰维多利亚说，葡萄酒对她来说是个好东西，而且无论如何，对一个女人来说，最完美的身材就是“拥有丰满的胸脯”[37]。霍兰德勋爵不失礼貌地指出，她“丰满的体型或许已经超过了挑剔而紧张的健康评论家能够认可的程度”[38]。

维多利亚对自己的相貌越来越不满。在她看来，她不仅正变得越来越胖，而且头发还是深色的，眉毛也太细（她曾向墨尔本问道，如果把眉毛刮掉的话，会不会让它们变得更浓密些；他建议不要这么做）。当然，她的面庞仍然青春洋溢，皮肤细嫩，一双饱含深情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一般，还有着挺拔的鼻梁和一张粉色的樱桃小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她的外表。她开始变得懒惰；这个异常活力四射的女王把某些日子直截了当地形容为“游手好闲”。在4月底时，她写道：“今年我从玩乐中得不到那么多快乐了……与去年的我大相径庭。”维多利亚越来越深地陷入恐慌之中。她开始推迟沐浴和刷牙，并且编造各种糟糕的借口来避免锻炼身体。她的女仆们成为她坏脾气的宣泄口，尤其是她的更衣女仆，因为这名女仆的任务如今已经成了一件令她无比憎恨的事——那就是帮助她挤进越来越紧缚的衣服里。

维多利亚会因为任何微小的失礼而大发雷霆，而且她还会严厉斥责她的母亲，因为即使只是出现在她眼前，她母亲也会让她感到生气。有一次，她写道：“我告诉墨尔本勋爵说，我已经就妈妈未经询问就来我的房间的事情向她亮明了我的观点。她最初很生气。我不得不提醒她我的身份。”[39]墨尔本也没能逃过她偶尔的脾气爆发。夏天的一天晚上，她说，他的陪伴让她感到厌倦，因为他身体不适无法说话。她开始因他在布道中打鼾以及暴饮暴食而斥责他。当其他女性在晚宴上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以及当他在荷兰屋的流行沙龙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时，她会嫉妒吃醋。她甚至曾问他，他是否觉得霍兰德夫人比她更漂亮。她皱着眉头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人比自己更关心他。

帮助维多利亚与康罗伊进行了光辉斗争的顽强意志如今随着她对权力的任性使用变成了一种飞扬跋扈的做派。斯托克马拿她与她的汉诺威叔伯们做比较，形容她“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性情暴躁”。如果被人冒犯的话，她会“无一例外地乱扔身边的一切”。她开始感觉到，一个处在她这种地位的人不应该在如何做事或者如何思考方面受人说教——

而让斯托克马感到绝望的是，莱岑也在鼓励她的这种想法，“就像是保姆在孩子被绊倒后教训肇事的石头一样”。[40]

年轻的女王身边全都是溜须拍马之徒以及对她纵容溺爱的亲信。她的舅舅利奥波德始终建议她要不屈不挠，展现出一旦她做出决定，“没有任何超自然力量能让她改变主意”的态度。[41]一个已经十分顽固的年轻女性不需要过多的怂恿就会变得更加顽固，在这么多人不愿违背她的意愿时更是如此。这一点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的两起灾难性事件中暴露无遗，而她的两种强烈感情——对墨尔本勋爵的爱以及对康罗伊的恨——将导致她铸成惊天大错。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爱，也学会了如何去恨，但她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统治。不幸的是，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维多利亚还没有做好准备。

---

[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1838；Cecil，*Young Melbourne*，469.

[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4，1838.

[3] *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4：93. 当年9月，利芬亲王夫人致信格雷勋爵：“墨尔本勋爵陪伴女王太勤快了——一刻不停地跟她在一起——我都忍不住想象她肯定要嫁给他了。然而，这都是符合规定的，我认为，墨尔本勋爵应该绝对掌控局势，这既是应该的，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他将凭借极受王室推崇的地位站在新一届议会前；但这是否足以让他留在台上？”Le Strange，*Correspondence of Princess Lieven*，3：244.

[4] Countess Grey to Creevey，October 10，1837，Maxwell，*The Creevey Papers*，327，lordbyron.cath.lib.vt.edu/monograph.php?doc=ThCreev.1903&select=vol2.toc.

[5] 墨尔本认为，每年通过一项法案就足够了：1835年是英格兰市政法案，1837年是爱尔兰什一税法，以及爱尔兰穷人法。参见Mitchell，*Lord Melbourne*，162。

[6] Clarke，*Shelley and Byron*，51.

[7] 卡罗琳拒绝接受拜伦的抛弃，她经常会套上一件巨大无比的外套打扮成男仆

突然造访他的宅邸。她会偷偷潜入他的房间，试图将他和其他情人捉奸在床，或者仅仅是在一本他打开在桌上的书上潦草地写上“记住我”几个字。那本书是贝克福德所著的《瓦提克》（*Vathek*）。作为回应，他写道：

记住你！记住你！
直到忘川河水浇灭生命之息
忏悔与耻辱将与你相随
如噩梦般萦绕在你心里
记住你！莫怀疑
你的丈夫也会记住你
我俩谁都不会忘了你
你对他是虚妄，对我是魔鬼。

此时的拜伦十分厌恶她，认为她身上没有任何可贵的品质。他夸张地说，她是“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一只蝰蛇”。最后一幕戏剧性瞬间出现在1813年7月希思科特夫人举办的一场舞会上。由于嫉妒拜伦与另一位女性聊天，卡罗琳当众吵闹：在她亮出一把匕首后，发生了一起冲突，她在被人拖走前用碎玻璃割伤了自己。

[8] Ziegler，*Melbourne*，16.

[9] Mitchell，*Lord Melbourne*，5.

[10] Cecil，*The Young Melbourne*，9.

[11] Mitchell，*Lord Melbourne*，74.

[12] 在墨尔本死后，这笔款项被他的庄园接管。Mitchell，*Lord Melbourne*，217. 布兰登夫人的丈夫声称，墨尔本引诱了他的妻子，但他提供的证据没什么说服力，这一案件也被驳回；结果，墨尔本向布兰登勋爵提供了一大笔钱。随后，他对布兰登夫人的态度渐渐冷淡下来，后者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荣誉，还失去了她有权有势的情人，不得不致信墨尔本勋爵，恳求并抗议了一番，但墨尔本勋爵措辞严厉地对她说，他不会娶她的。在被指控犯有不道德和通奸行为后，男人还能一如既往地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女性却会深陷泥沼，经常会遭到驱逐，并被禁止再见到她们的孩子。

[1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19，1839.

[14] 墨尔本对维多利亚说：“我觉得他对我的鞭策还不够多。如果他鞭策我再多一些的话就更好了。” Esher，*Girlhood of Queen Victoria*，2：30.

[1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15，1838.

[16] 在一封写给婆婆的信中，他的妻子卡罗琳说，墨尔本称她假正经，她还暗示，他怪异的行为腐化了她的道德准则："［他］说我太刻板，乐于指挥我做一些我从未听说也毫不熟悉的事情，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闻所未闻的邪恶，最初的厌恶感很快就变成了普遍的原则崩坏，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直在一点一点地侵蚀我始终固守的美德。"（Lady Caroline to Lady Melbourne，April 1810，in Douglass，*The Whole Disgraceful Truth*，53.）在墨尔本写给布兰登夫人的40封信中，只有4封没有提到鞭笞。（Ziegler，*Melbourne*，106-7.）墨尔本对她说，她应该更多地鞭打她的孩子们，并且提议用这种方法来惩罚偷懒的女仆："在年轻姑娘裸露的皮肤上用桦条抽几鞭子，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作者注

[17] 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丘吉尔致信墨尔本勋爵，跟他开玩笑地说孩子都对她做了什么，如何逗得她哈哈大笑，并且询问他是否认为她10个月大的孩子太年幼了没法鞭打。她写道："一个有关孩子的提议，我没有忘了你在鞭打方面的实用课程，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很成功，至少在卡罗琳身上是这样，因为威廉还太小，你觉得对不对？他才10个月大。我记得，好像就在昨天似的，先是鞭打，随后被丢到了布罗克特别墅里一张供你使用的巨大沙发的一角，然后你离开了房间，我记得你有一天回来时说，'很自信嘛，还足够聪明吗？'听了这句话，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而不是哭泣不止。我想知道，女王也会鞭打王室里的王子们吗？" From the Panshanger MSS，引自 Mitchell，*Lord Melbourne*，214。

[18] Pearce，*The Diaries of Lord Greville*，131.

[19] Ziegler，*Melbourne*，203：墨尔本对维多利亚说，"政府要做的仅仅是防止和惩罚犯罪，并且保护合约。"齐格勒写道："所谓每届政府在上台时需要颁布一系列其承诺推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法律的概念是在19世纪逐渐形成的。18世纪的政府理念是，政府只需要关心国防、外交和国家治理等问题。新的法律只有在解决特定危机时才有必要。持有这种观点的墨尔本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政治领袖的看法，无论他们是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拉塞尔和皮尔是属于未来的人；而辉格党的墨尔本、霍兰德、兰斯多恩和巴麦尊以及托利党的惠灵顿、阿伯丁和林德赫斯特反映的是过去的传统智慧。"

[20] Cecil，*The Young Melbourne*，216.

[21] Ziegler，*Melbourne*，72.

[2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18，1837. 与之类似，在8月8日："讨论了许多

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我是说，事情匆匆而过，成为过去。墨尔本勋爵如此友善、善解人意，完全能理解我的感受。”7月17日，她曾写道，他是她的朋友：“我很清楚。”

[23] Longford，*Victoria R.I.*，66.

[2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6，1839.

[25] Cecil，*The Young Melbourne*，413.

[26] 引自Cecil，*The Young Melbourne*，394。

[2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3，1837.

[28] Lord Melbourne to John Russell，October 24，1837，from Mitchell，*Lord Melbourne*，282n.

[2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5，1838.

[30] 墨尔本的许多私下观点都很保守，他与托利党人的联系也很密切。换句话说，维多利亚虽然产生了对辉格党的强烈归属感，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辉格党人是什么样的。当时的正统辉格党人支持的是自由、低税率、圈地、民主和反专制等。参见Cecil，*The Young Melbourne*，7。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7，1840；Cecil，*The Young Melbourne*，336.

[32] Longford，*Victoria R.I.*，70.

[33] Mitchell，*Lord Melbourne*，240.

[3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5，1838.

[35] February 19，1840，Greville，*The Great World*，180.

[36]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63.

[37] Longford，*Queen Victoria*，88.

[38]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62.

[39] Cecil，*The Young Melbourne*，424.

[40]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64.

[41]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443.

9 宫廷丑闻

［墨尔本］手里掌控着一个年轻而没有经验的孩子，其整个行为举止和思维观点都必须完全服从于他的看法。公平地说，他对于自身处境是有一些感觉的……但从本质上来看，这种权力是绝对的，或者至少在宫廷中是这样。[1]

——阿伯丁勋爵对利芬亲王夫人如是说

他们当我是个孩子，但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是英格兰女王。[2]

——维多利亚女王

1839年5月30日，墨尔本勋爵和维多利亚女王在蔚蓝的天空下坐上敞篷马车，驶入时髦的阿斯科特赛马场。当他们出现时，观众席上的窃窃私语中传出了一阵嘘声。随后，当女王走下马车进入王室包厢时，传来了一声大喊："墨尔本夫人！"人群迸发出一阵窃笑之声，然后转过头来盯着此时微微露出羞赧之色的维多利亚。墨尔本勋爵一反常态地看起来很不安。嘘声来自两名托利党女性，分别是蒙特罗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Montrose）和萨拉·英格斯特里夫人（Lady Sarah Ingestre）。维多利亚愤怒不已。她说："这两个可怕的女人应该被鞭打一顿！"[3]不过她不知道，如果她下令的话，墨尔本可能会很乐于执行她的这一命令。她知道为什么她们会发出嘘声。这是在替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打抱不平，弗洛拉是她母亲和约翰·康罗伊的好友，最近几个月变得瘦削不堪。当弗洛拉小姐走进阿斯科特时，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热烈和持久的欢呼声。维多利亚对此感到怒火中烧。

32岁的弗洛拉小姐来自一个实力强大的托利党贵族家庭，已经在肯特公爵夫人身边做侍女长达5年时间。维多利亚认定她是一个"可恶的"间谍[4]，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与康罗伊联系紧密，墨尔本勋爵被告知要对她保持警惕。不过，一天晚上，在吃晚餐时，维多利亚和莱岑注

意到弗洛拉小姐的肚子鼓了起来。弗洛拉小姐此前在苏格兰与母亲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并在1839年1月与约翰·康罗伊一起乘坐驿递马车——一种封闭马车——回到伦敦，而且没有女伴陪同。刚回到伦敦，她就去找了詹姆斯·克拉克医生，抱怨说肚子里出现了奇怪的疼痛和酸楚感。他给她开了大黄丸以及涂抹腹部的乳液。这种治疗方法似乎有一些效果，不过尽管弗洛拉小姐的肚子不再变大了，却没有小下去。它圆鼓鼓的非常明显。

王庭的想象力，尤其是侍女们的想象力开始骚动。这是康罗伊的错吗？维多利亚在2月2日对墨尔本提起了这件“尴尬事”[5]。他要她保持沉默，并且说医生经常会犯错，而且他自己对英国医生的评价就不是很高。不过在她离开后，墨尔本立刻就传召了克拉克医生，后者表示，尽管他在没有进行严格检查的情况下无法得出肯定结论，但有理由表示怀疑。

维多利亚认定，这足以证实弗洛拉小姐和康罗伊之间是情人关系。墨尔本曾对她说，他认为弗洛拉小姐与康罗伊之间的亲密关系让维多利亚的母亲感到嫉妒。[6]这两个女人是情敌关系吗？维多利亚最后在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确信她——简单地说就是——有孩子了！！克拉克无法否认这种怀疑；这一切的可怕源头是那个怪物和魔鬼的化身，我不想提及他的名字，但他的名字就在这一页的第2行第1个单词。”

那个单词就是“J.C.”——也就是比弗洛拉小姐年长20岁的约翰·康罗伊。维多利亚感到恶心至极，很快就从评判一名女性变成了评判所有女性。她写道，这足以让我“厌恶我自己的性别；当女性道德败坏时，究竟是多么可耻、卑贱和下流啊！！对于男人们看不起女性，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7]

克拉克医生昏招迭出，使得情况变得日益错综复杂。首先，他暗中监视了弗洛拉小姐两周时间，偷偷观察她的肚子，从多个角度思考它的

形状。曾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担任海军外科医生的克拉克医生后来被称作“或许是历史上最不称职的皇家医生”[8]，他显然不了解其他有可能导致腹部肿胀的任何病症。[9]对于她还有能力继续工作和行走而且正常行动，他感到大惑不解，他对自己说，如果她病了的话，是没办法做这些事情的。他试图检查弗洛拉小姐胸衣下的身体部位，但遭到了她的拒绝（其他医生后来说，这种矜持加重了她的病情）。他随后问道，她是否已经秘密结婚了。她愤怒地予以坚决否认——她后来给她的叔父写信说，到这个时候，她的腹部肿胀已经减轻“许多”了。但这未能阻止“粗俗的”克拉克医生对她说，他认可“宫廷中女士们的观点，即我已经在私下里成婚了”。[10]弗洛拉小姐试图向他展示她的肚子已经变小了。他却坚持要求她坦白，以挽救她的人格，但她拒绝了。

> 这时他对我说，只有我接受医学检查才能让他满足，并且洗清我的污名。我发现，这一问题已经为女王所知，而且所有这些都已经被讨论过并安排好了，然后才对我说的，我自己的女主人［肯特公爵夫人］对此一个字也没听说，也没有得到哪怕丝毫的暗示，在他们向我提出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她的同意……我亲爱的女主人从未有哪怕一瞬间怀疑过我，她对我说，她非常了解我以及我的原则和我的家庭，以至于无法接受这种指控。然而，敕令已经下达了。

第二天，弗洛拉小姐同意接受耻辱以及“最严格的检查”[11]，负责进行检查的是另一名医生查尔斯·克拉克爵士以及被她称作“我的指控者”的詹姆斯·克拉克医生。波特曼夫人（Lady Portman）也在场。检查内容包括“完整的医学检查”，据弗洛拉小姐说，过程十分粗暴、冗长而痛苦。从本质上说，他们等于给她开具了一份处女证明，说明“没有理由认为当前或者曾经存在怀孕现象”[12]。

在一个处女女王的王庭内，人们竟然认为有必要进行如此粗鲁的检查以确认弗洛拉小姐仍然是处女，这本身就是对她尊严和荣誉的严重破坏。当弗洛拉小姐的弟弟黑斯廷斯侯爵听说此事后，他火急火燎地来到伦敦，想要确定谁是罪魁祸首，并且坚决要求得到赔偿，并且捍卫他们

家族的荣誉。他看到了墨尔本勋爵，并直截了当地对维多利亚说，她得到的都是恶劣的建议，并且需要找到谁是这些污蔑之词的始作俑者，好让他们接受惩罚。

这项强制性检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维多利亚给“激动至极”且病弱不堪的弗洛拉小姐送去了一封忏悔信，并且拜访了她。这是事情发生以来她们第一次见面。女王承诺，为了她的母亲，一切都会被抛诸脑后。弗洛拉接受了道歉，但是对女王说：“小姐，我必须心怀尊敬地说，我是第一个，相信也是最后一个得到君主如此对待的黑斯廷斯家族成员。我遭到的对待就好像是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宣布有罪一样。”[13]维多利亚祈祷一切都能够结束。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这场羞辱演变成了一场全面丑闻，吸引了全伦敦的关注长达数月之久：一是墨尔本拒绝平息谣言或者惩罚克拉克医生（毫无疑问，所谓弗洛拉小姐有可能仍然怀孕的谣言正是由他挥之不去的怀疑所引发的，而且得到了他本人的推动[14]）；二是媒体对这起事件的想象；三是维多利亚与母亲之间的恶语相向扭曲了所有的通信；四是托利党人想要破坏墨尔本政府的信誉；五是黑斯廷斯家族因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愤怒，他们一心一意要恢复弗洛拉小姐的名誉，并且找出是谁捏造了这一谣言。对弗洛拉小姐极为忠诚的公爵夫人解雇了克拉克医生。[15]但维多利亚却拒绝这么做。

这是一起极为难堪的事件，而且墨尔本也难辞其咎。他仍然在不负责任地继续煽动流言蜚语，迎合女王对任何与她母亲有关的人和事的厌恶。格雷维尔对此感到极为反感：“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墨尔本怎么可能允许这种可耻而有害的丑闻发生，这只会伤害王庭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即使是女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也无法让人原谅她对此事的参与。”[16]

他说的没错。这整件事都凸显出了维多利亚的不成熟。墨尔本曾一

度建议，应该将弗洛拉小姐尽快嫁人，以阻止流言传播。女王恶毒地写道：“这让我大笑不止，因为我说，F小姐既没有钱财又没有美貌，什么都没有！”[17]她写道，墨尔本也开怀大笑，因为他觉得弗洛拉小姐是他见过的最丑陋的女人。[18]从画像上来看，弗洛拉一点也不丑陋。她是个身材修长、外表聪慧的女子，有着聪明深沉的眼睛、小巧圆润的嘴唇以及深棕色的秀发。两人共有的偏见让他们显得既恶毒又讨厌。

弗洛拉小姐的母亲决定直接向女王陈情。3月7日，这位已故黑斯廷斯侯爵的遗孀给维多利亚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并通过肯特公爵夫人转交给她——以向她寻求帮助。她要求女王驳斥“诽谤之辞”，以显示其愤怒，信件结尾写道：“尤其对一名女性君主来说，英国各阶层的女性都会信心满满地对她寄予厚望，希望能得到保护以及同情（无论出身贵贱）。”[19]但维多利亚没有任何同情心；她认定这封信十分愚蠢，而且颇具挑衅意味，于是不发一言地将这封信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她的母亲。[20]这一误判将导致黑斯廷斯家族发动一场坚持不懈、尖酸刻薄的公开运动，以揭露王庭的错失并要求有人对此负责。这位身体欠佳且因为女儿的遭遇而倍感羞辱的侯爵遗孀随后致信墨尔本勋爵，要求将克拉克医生解雇。墨尔本回答说，她的要求“没有先例且容易引起反对”[21]，因此不能给予答复，只能屈尊证实收到了她的来信。

接下来，黑斯廷斯家族把事情捅给了媒体。3月24日，弗洛拉小姐的叔叔给《观察家报》寄去了一份基于他侄女来信写成的事件陈述；该陈述被完整地刊登在报纸上。弗洛拉小姐指责隶属辉格党的侍女以及“某位外国女士是始作俑者，后者对公爵夫人的仇恨人尽皆知”。弗洛拉给叔叔的信件日期为1839年3月8日，她在信中有针对性地对肯特公爵夫人进行了称赞：

> 我敢肯定，女王一定不知道他们把她引向了怎样的歧途。她已经尽力通过她的彬彬有礼向我展示她的悔意，她眼中的泪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公爵夫人完美无瑕。没有比她更加和蔼可亲的母亲了，而且她把对我

> 的羞辱看作是对她的羞辱，因为这种羞辱所针对的是一个为她服务、奉献于她的人。她立刻就解雇了詹姆斯·克拉克爵士，拒绝再见到波特曼夫人，并且一连几天都不愿出现在女王的餐桌前，也不许我这么做。

她最后说：“对于来信内容令人如此反感，我感到十分难为情，但我希望您能了解到真相，完整的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他——您也可以到处讲述这一真相。”[22]媒体沸腾了。这也是个政治问题：女王和她的首相都是辉格党人，而弗洛拉小姐是一名托利党人。托利党人的偏执心理被激发起来了，而许多辉格党人认为，这一丑闻被用作政治筹码，以中伤诽谤一名未婚女王和她的侍女，以及首相。与此同时，弗洛拉小姐日渐消瘦。

维多利亚本能地有着过度强烈的家族意识，以至于不愿向黑斯廷斯家族释放善意。当垂垂老矣的侯爵遗孀将她与墨尔本勋爵之间的来往信件全部交给《晨邮报》（*Morning Post*）时，维多利亚称她为一个“邪恶、愚蠢的老女人”[23]。她不再阅读报纸，并且表示报纸编辑们应该和黑斯廷斯家族一起被绞死。她不能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也不能理解她与墨尔本之间的亲密关系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拖累。在黑斯廷斯事件后，托利党人开始积攒实力，而墨尔本则渐渐失去对权力的掌控。

维多利亚摇了摇头。坐在她面前的是托利党议员罗伯特·皮尔，一个她一直觉得非常冷酷、讨厌的家伙。三天前的5月6日，墨尔本勋爵的政治生涯遭受致命打击；他所领导的政府在一项旨在为牙买加糖类贸易推行反奴隶制立法的法案中只以5票的优势赢得通过。（领先优势如此之弱足以葬送他的领导地位。）从那时起，就已经能够明显看出，皮尔将是下任首相的当然选择——还有就是他没能得到女王的充分支持。她对他说，不，她不愿仅仅因为他如今成了首相就把她闺房里的任何辉格党侍女赶走。

维多利亚对于失去墨尔本感到悲痛欲绝，一连好几天都无法控制地

哭个不停。“这件事让我感受到的痛苦、悲伤和绝望也许容易想象，但难以描述！我的一切快乐全部消失了！幸福平静的生活被毁了，亲爱友善的墨尔本勋爵再也不是我的大臣了……我哭了很久；只好穿上晨衣。”[24]5月7日，她站在蓝色会客厅外，竭尽全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而墨尔本正在蓝色会客厅内等着告诉她自己不得不辞职的消息：

> 过了好几分钟，我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当我真正走进去时，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心碎了；他就站在窗边；我握起他亲切熟悉的手，啜泣起来，然后我用双手抓住他的手，看着他，哭着说：“你不能抛弃我”……他给我投来和蔼、怜惜以及慈爱的目光，眼中噙着泪水让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用令人哀伤的声音说：“噢！不。”[25]

那天下午，墨尔本建议她拜访惠灵顿和皮尔，并且补充说，她应该信任他们，但同时也要保持谨慎。最重要的是，他在备忘录的最后写道：“陛下最好表达出您的希望，那就是陛下宫廷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被赶走，除了那些直接参与的人以外。我认为你可以向他提出这一要求。”维多利亚在拿到他的这份备忘录后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哭了起来。她长时间握着他的手，“我感觉这么做他就无法离开我了”。墨尔本很清楚维多利亚处境的艰难。那一天，他三次婉拒维多利亚的晚餐邀请，称在与他的政治对手进行如此微妙的谈判期间，他们俩见面不太合适。

维多利亚心碎不已。她绝望中的言辞揭示出一个与挚爱男子分别的少女遭受的痛苦创伤。在他离开后，她坐在桌前开始给他写信，眼泪朦胧了她的视线：

> 女王冒昧坚持提出一个她认为有可能办到的要求，即如果她明天下午乘坐马车出行，必须能够在庄园中瞥见墨尔本勋爵；如果他知道她的出行目的地，她将与他见面，以及与安格尔西勋爵（Lord Anglesey）和许多其他人见面——这将令人感到如此宽慰；肯定不会产生什么重大伤害；因为我可能会见到任何人；墨尔本勋爵可能觉得这种做法很幼稚，但女王真的很焦虑，因此也许的确很幼稚；如果她偶尔能见到一个朋友的面孔的话，将能够更好地渡过她的考验。[26]

那天晚上，她没有任何食欲，间歇性地哭泣到9点。维多利亚在8个月大时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如今19岁的她又失去了人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父亲角色，一个支持她对抗康罗伊和她母亲、让她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爱和魅力的男人。她的兄长和姐姐都远在欧洲，她身边也没有同龄人。这是一种令人感受到剧痛的失去。

当维多利亚醒来时，她又一次开始哭泣。墨尔本警告她不要显露出对托利党人的厌恶，尤其是对皮尔的厌恶，他虽然冷漠又腼腆，却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过，他们之间的会面进行得并不顺利。她抱怨说："女王不喜欢他的行为举止，相比——噢！与墨尔本勋爵坦率、开放、自然、友善和温和的举止比起来差别太大，太可怕了。"[27]当皮尔第一次提出要求她遣散部分与辉格党人有关联的侍女时，她说，她只会更换宫廷中的男性成员。紧接着，她关上房门，开始哭泣。莱岑来到她的身旁对她进行了一番安慰。

在5月9日第二次接见皮尔时，维多利亚态度更加强硬，而且绝不妥协。她让自己相信，皮尔的要求十分无礼，并且决定应该忠于自己的侍女们，就像她们在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事件中对待她的那样。维多利亚冷静地说：

> 我说了，不会放弃任何侍女，也从未想象过这样一件事。他问道，我的意思是不是要留下所有人。
>
> 我说："所有人。"
>
> "首席侍从女官（Mistress of the Robes）和内廷女官（Ladies of the Bedchamber）？"
>
> 我回答说："所有人。"[28]

维多利亚说，她从来不与侍女们谈论政治，而且，除此以外，她们也有很多隶属托利党的亲属。[29]她拒绝了皮尔提出的只更换高级侍女

的建议——首席侍从女官的地位比其他侍女要高——并且强调说，这种事情从未有过先例。她的家庭侍女仅仅因为政府的更迭就要被从她身边赶走，这真的是正确之举吗？她的侍女们根本不是政治家。（她反复强调，这种事情此前从未在王后身上发生过；皮尔坚称，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她是执政女王[30]。他说的没错——自从1714年以来，从未出现过女性君主——但在那之后，也没有女王被要求这么做过。）

在皮尔脸色苍白而沮丧地离开后，女王得意扬扬地给墨尔本勋爵写道：

> ［皮尔］表现得非常恶劣，坚持要求我放弃我的侍女，对此我回答说，我永远也不会同意的，我从没见过哪个男人像他那样可怕……我很冷静，但非常坚决，我认为你要是能看到我的沉着和坚决的话，也会很高兴的。英格兰女王不会屈服于这种诡计。请保持时刻准备的状态，因为你可能很快就会重获任用了。[31]

皮尔随后直言不讳地对维多利亚说，如果她不愿赶走部分嫁给了他政治死敌的侍女的话，那他将无法组成政府。维多利亚对墨尔本勋爵可能回归的前景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对皮尔说，她决心已下，将在几小时内或者翌日清晨向他致信，告知她的最后决定。她兴奋不已地草草写道，皮尔已经承认了自身的软弱，她恳求墨尔本立刻前来。

对于接下来该如何行事，墨尔本的内阁争论了好几个小时。说服他们回到政府任职以捍卫女王荣誉的正是来自维多利亚的信件。维多利亚写道：“不要担心，我现在既沉着又冷静。他们想要赶走我的侍女们，我猜想，接下来他们就会赶走我的更衣女仆和女佣；他们当我是个孩子，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是英格兰女王。”[32]尽管颇具骑士精神，但她的行为却十分不妥；一名反对党议员不应该建议女王如何才能最好地反抗新任首相。

皮尔于5月10日辞职。在一封言辞冷漠的信中，他对女王陛下郑重

表示，他对于女王曾考虑由他来担任首相一职感到受宠若惊。[33]民愤沸腾。维多利亚却欣喜若狂。那天晚上，她在为沙皇尼古拉一世（Czar Nicholas I）之子亚历山大皇储（Czarevitch Alexander）举办的正式舞会上跳舞跳到凌晨3点15分，还将亚历山大皇储描述成“一个讨人喜欢的亲爱的年轻人”。在他抱着她在舞池内翩翩起舞后，她表示：“我真的爱上了大公（Grand Duke）[34]。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玩得尽兴。”他在离开时紧紧握着她的手，然后“热情而深情地”亲吻了她的脸颊。她对墨尔本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必须时不时地与年轻人一起欢笑。”而身为托利党人的惠灵顿公爵和皮尔“非常沉闷”[35]。

在墨尔本重新执掌权力后，在维多利亚的世界里，一切终于再次恢复秩序。但王庭已经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而她无法摆脱心灰意懒的感觉。墨尔本本应帮助她理解，皮尔只想让那些嫁给托利党[36]议员的侍女走人。她不久后要求墨尔本帮她找一个身为托利党的侍女，好悄悄引荐到她身边。[37]在她剩余的统治时期，维多利亚只被要求过更换她的首席侍从女官，也就是她最高级别的侍女。不过，她的偏见仍然显而易见。她和父母一样都是辉格党人，始终希望由一名辉格党人来担任首相。当聚集在宫殿外的民众对墨尔本发出嘘声时，女王感到怒不可遏：“托利党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38]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维多利亚坦承，她在所谓的“寝宫危机”（Bedchamber Crisis）期间犯了错：“没错，我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我的侍女们也是，因为我在墨尔本勋爵的培养下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但我当时还很年轻，只有20岁，而且再也没有过那种表现——是的！那是一个错误。”[39]一想到女王实际上是赶走了一名首相，就令人感觉震惊不已。

到4月时，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已经奄奄一息了。黑斯廷斯家族发起的运动取得了成功；公众显然对弗洛拉小姐表示同情，后者不断出现

在公开场合，好避免人们认为她已经怀孕了。忧心忡忡的肯特公爵夫人确信弗洛拉小姐将不久于人世，但即使是到了6月份，维多利亚仍然将弗洛拉小姐的病情不屑一顾地称作是“胆病发作”[40]。维多利亚持续受到的抨击是她对弗洛拉小姐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态度，她说，她讨厌“不得不为这样一个女人承受如此责任”。墨尔本勋爵向她提供的建议仍然十分幼稚而不通情理。4月初时，维多利亚曾认定弗洛拉变得“相当无礼”[41]，墨尔本当时的建议是更加疏远她。翌日，他们分享了一则各自听到的传言：弗洛拉小姐已经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母亲黑斯廷斯夫人应当为没有发现肚子隆起，以及没有坚持要求她留在苏格兰而承担责任。维多利亚对墨尔本勋爵说，如果弗洛拉小姐要离开的话，最好就不要回来了。墨尔本勋爵建议说，这将有损女王的颜面。维多利亚在日记中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我怀疑的迹象，她在日记里写到了弗洛拉小姐的无礼和傲慢，以及仍然圆鼓鼓的身体。她的日记令人惊恐地揭示了她缺少对弗洛拉小姐的忏悔，以及对于这位身患重病的女性正在经历的痛苦没有任何理解。肯特公爵夫人曾反复试图让她的女儿与弗洛拉小姐交谈，或者至少给她写信，但维多利亚丝毫不肯改变主意。她坚持说，这是因为黑斯廷斯家族的无礼言行，以及他们将这一纠纷公之于众的决定给她带来的羞辱。墨尔本勋爵一如既往地对女王说，黑斯廷斯家族是错的那一方，并且鼓励她去提醒他们不要再有无礼行为。维多利亚既不能理解自己做了什么，也无法理解自己正在做着什么。弗洛拉小姐认为，她缺少的是同理心：“她从来不会为他人着想。”[42]

不过当维多利亚在6月底终于再次独自前去拜访弗洛拉小姐时，她感到羞愧难当：

> 我发现可怜的弗洛拉小姐躺在沙发上，看起来比任何一个活人都要瘦；几乎就是一具骷髅，但身子却肿胀得像是已经怀孕的人；她的眼睛里透着敏锐的目光，看起来像是一个将死之人；她的声音好似往常，双手也还有劲；她很友善，她说自己很舒服，很感激我为她做的一切；看到我一切安好她很高兴。我对她说，我希望等她身体好些时再来看她——这时她

紧握住我的手，就好像在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43]

维多利亚很快就离开了。她开始祈祷弗洛拉小姐能够突然康复，没过多久，这就成了她唯一能够思考和谈论的内容。[44]她开始在噩梦中梦见这个眼神迷离的贵族小姐。

弗洛拉·黑斯廷斯于1839年7月5日日出前去世。莱岑在维多利亚醒来后不久告诉了她这一消息。她死得很安详，“只是抬起了她的双手，发出了一声喘息”[45]。弗洛拉小姐在哭泣亲人的环绕下许下了她的遗愿：在她死后对她进行尸检，以最终彻底证明她的清白。宫廷中仍然流传着关于孩子流产的谣言。甚至在她去世的那个早上，一名抗议者还在标语牌上写道，弗洛拉是死于流产失败。[46]不过那份让维多利亚焦急等待了一整天的尸检报告显示，弗洛拉小姐的肝脏严重肿大，压迫了她的胃部。[47]报告还称，“子宫及其附器呈现出健康处女的正常表象”。[48]即使是在死后，她的贞洁也遭到了调查。

这一消息重新点燃了公众的怒火；维多利亚和墨尔本在公共场合遭遇嘘声，在女王的马车经过时，人们拒绝脱帽致敬，当有人在一片谋杀谣传中致皇家祝酒词时，无人发声以示响应。[49]维多利亚的母亲对她说，她不了解“自己的国家”[50]，而这一次，她说的没错。女王丝毫没有考虑到她的臣民们。她生平第一次成了某个派系的一分子，而且那是一个强大的派系；而丑闻、复仇和恶毒八卦带来的影响力太大。尤其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位女性的性能力，而这位女性因为与康罗伊的友谊而被她视为敌人。（这也是如今被我们称作“荡妇羞辱”现象的一个例证。）此外，她不仅对怂恿她这么做的人怀有好感，而且这个人还身居首相之位。维多利亚很容易沉醉其中，而且还太过年轻，无法理解其后果。这段篇章将长期被认为是一段耻辱：如今，在维多利亚的日记（也就是由她的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编撰的版本）中，已经没有任何提及弗洛拉小姐生病或者去世的内容，而且维多利亚所写的众多有关弗洛拉·黑斯廷

斯小姐的信件中，大部分也在后来依照其长子爱德华七世国王（King Edward Ⅶ）的命令被销毁了。[51]他和编辑都在发现维多利亚的“早熟知识”后感到惊诧不已。[52]

弗洛拉·黑斯廷斯的灵柩在一天深夜由马车运出宫外，希望能借此避开抗议者。这支神情阴郁的队伍缓慢驶向伦敦东区（East End），最终于黎明时分在布莱克沃尔（Blackwall）的不伦瑞克码头停下。遗体将被送上“皇家威廉”（Royal William）号蒸汽船，并被带往她祖先的土地苏格兰。人群聚集在码头上向这位被王庭愧对之女性的灵柩致敬。一名男子大喊道：“啊，受害者在这里，那凶手呢？”另一名男子则对女王的马车挥舞他的手杖，哭喊道：“［维多利亚］富丽堂皇的鬼话有什么用？她杀害了她！”[53]尽管从宫殿到码头的道路两旁站满了警察，人们还是向王室马车投来了好几枚石块。

在弗洛拉小姐去世的第二天，维多利亚穿行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在绿色草坪上一圈又一圈的翻滚，一直到她头晕到能够忘记自己的耻辱为止。[54]媒体报道中很少提到她的名字，但弗洛拉小姐的死经常会直接怪到她的头上。[55]有些记者还直言不讳地指责王庭犯有谋杀罪。[56]维多利亚经常坚称自己没有任何悔意，但她所扮演的角色却让她十分困扰：“我实在无法去思考那些萦绕在我心头的事情。”她发誓说，再也不会因为人们的相貌而得出结论。维多利亚知道，她的王冠已经蒙羞。

维多利亚得出的所谓弗洛拉小姐既阴险又狡猾的结论也是错的。弗洛拉小姐是一位有着强烈自尊心、信仰和敏感性的女性。在她漫长的病痛期间，她一直在纠结于如何原谅那些对她造成伤害的人。她不愿沉溺于仇恨。她说：“对我自己而言，我感觉这场考验是带着爱意来到我身上的，它让我与上帝走得更近，帮助我摆脱了一些世俗的情感，促进了我深层次的灵魂探寻。”[57]当她6月20日躺在床上参与最后一次圣餐仪式

时，伦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向她问道，她是否已经原谅了她的敌人。她说她已经原谅了他们，不再对他们怀有怨恨。正跪在她床边的肯特公爵夫人忍不住哭了出来。她走出房间，握起弗洛拉小姐的妹妹索菲亚（Sophia）的手，问道：“可以原谅我可怜的孩子吗？”[58]

有人说，弗洛拉小姐是死于伤心绝望。1839年7月20日，她的遗体被安葬在艾尔郡一所被苏格兰南部陡峭群山所环绕的古老教堂的地窖中。《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一名记者写道：“整场葬礼都十分庄严。”[59]有几千人前来参加了她的葬礼；她已经成了一名烈士，尤其对托利党人而言。《海盗报》（*The Corsair*）写道：“她的记忆因为一个高贵民族的同情和喜爱而被人铭记于心。”[60]报道还说，如果英格兰王庭不做出改变的话，“英格兰女王的性命、幸福和声誉将岌岌可危”。

对维多利亚来说，这是一个郁闷的夏天。她孤独无依、郁郁寡欢、烦躁不安，而且感觉自己肥胖无比。由于自己的决定遭到了如此公开的挑战，因此她对于自己权威受到的挑战变得极为敏感。如果她怀疑她的任何一位大臣在一件事情上没有征询她的意见的话，她就会写下措辞愤怒的便函，并且画上好多道下划线，要求得到解释。哈丽雅特·马蒂诺写道，每个人都能看出维多利亚的不开心。这位作家将责任归于墨尔本：

> 她登基时的相貌让我感到惊喜。她脸庞的上半部分尤为漂亮，有一种朴实、平静的气场，似乎充满了希望。在那一年年底时，她的变化可谓令人悲伤。她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如今已经变得放肆而不满。我们如今可以猜想，那是她人生中最不开心的一个阶段。被从年轻时有益的拘束中释放出来后，她得到了得意扬扬的辉格党人的奉承和纵容，还被他们据为己有，她被墨尔本勋爵误导，而且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属。她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女孩了。[61]

这起事件又拖延了好几个月才宣告结束，弗洛拉小姐的弟弟发表了足以定罪的书信，而克拉克医生则公布了对其侵入性检查的总结。不

过，对女王来说，这段黑暗时光在克拉克医生发表自己的辩护词几天后就突然而又引人注目地结束了。维多利亚心情沮丧、头疼眼酸地醒来，发现有人将石块投进了她的客厅里，将窗玻璃砸成了碎片。那是一个神秘但恰当的迹象，预示着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那天上午，就在她踮着脚尖绕过玻璃碎片之时，脾气暴躁的阿尔伯特王子走下了一艘船，踏上了英国的土地，开始了他的陆路旅途前来见她。从他在温莎城堡踏出马车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维多利亚将永远铭记1839年10月10日这一天。在这一天，她的心融化了。

---

[1] September 16，1838，Parry，*Correspondence of Lord Aberdeen*，1：113.

[2] May 10，1839，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181.

[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1，1839.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5，1838.

[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1839.

[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8，1839.

[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1839.

[8] Pearsall，*The Worm in the Bud*，5.

[9] 在1839年出版的《王室医生剖析》（*The Court Doctor Dissected*）一书中，医学博士约翰·菲舍尔·默里强烈谴责了詹姆斯·克拉克在医学洞察力方面的缺乏，他列举了十几种其他有可能导致类似怀孕症状的疾病，例如腹部肿瘤、肝病、消化系统疾病、脾脏疾病、腹部动脉的肠系膜动脉瘤疾病、水肿病或者脐疝等。

[10] 3月13日，弗洛拉小姐对母亲说，詹姆斯·克拉克已经被她的否认激怒了，而且变得“暴力又粗俗，甚至曾试图恫吓我”。*The Times*，September 16，1839，3.

[11] *The Times*，September 16，1839，3.

[12] *The Times*，September 16，1839，3.

[13] Martin，*Enter Rumour*，41.

[14] 维多利亚致信她的母亲：“C.克拉克爵士说，尽管她是一名处女，但还是有可能的，谁也说不好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她的子宫变得很大，就像是里面有一个孩子一样。” Longford，*Victoria R.I.*，99.

[15] Martin，*Enter Rumour*，48-49：索菲亚小姐给家人写信说，他的贵族病人中至少有一个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将他解雇了，而且“许多医学界人士都拒绝在讨论会上见到他，亨利·哈尔福德爵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说，他玷污了这个职业”。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8，1839中，维多利亚记载说，克拉克在整件事中受到了巨大伤害，失去了许多病人，“而且整个国家的报纸都在抨击他”。

[16]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67.

[1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8，1839.

[1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4，1839.

[19] Published in *The Times*，September 16，1839，3.

[20] 墨尔本没有回复这封信，而且表现得相当严厉。他批评了她信中的“语气和内容”，但是同时表示，女王应该竭尽所能“安抚”弗洛拉小姐及其家人的“心情”。

[21] Published in *The Times*，September 16，1839，3. 当年6月，黑斯廷斯侯爵致信墨尔本勋爵，要求这位首相为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所用的语气道歉。

[22] *The Times*，August 12，1839，5.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6，1839.

[2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7，1839.

[2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7，1839.

[26]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93.

[27]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00.

[28]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08.

[29] Martin，*Enter Rumour*，62. 哈丽雅特·克莱夫夫人是女王的侍女中唯一的托利党人。

[30] 王后和女王在英语里都用Queen来表示，因此有此一说。——译者注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9，1839.

[32]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174.

[33] Peel Papers，vol. 123，letter dated May 10，1839，British Library Archives，Add. 40，303，Extract：40303.

[34] 亚历山大皇储此前的爵位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译者注

[3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30，1839.

[36] 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因为前文已经提到，皮尔是对维多利亚与和辉格党有关联的侍女过从甚密感到不满。因此，此处应为辉格党。——译者注

[37] 当皮尔2年后成为首相时，阿尔伯特的私人秘书安森对他说，不仅有3名重要的辉格党女性原本就将离开王室，而且她们原本就打算在1840年离开。皮尔对此感到惊愕不已："如果女王早告诉我这三名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的侍女已经递交了辞呈的话，我会感到完全满意，并且在更换人选的问题上考虑女王的感受。"（Ziegler，*Melbourne*，298）骄傲、轻率和心碎使得这件事没有在当时得到解决。——作者注

[38] Ziegler，*Melbourne*，299.

[39] October 30，1897，Sir Arthur Bigge，in Longford，*Victoria R.I.*，114.

[4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9，1839.

[4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5，1839.

[42] 弗洛拉小姐从未指控过维多利亚怀有恶意，但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女王"偶尔能够产生善意，但她的自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得到了如此聚精会神的培养，以至于她不会想到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而且在当前形势下，无论是因为幼稚，还是因为缺少那种人们渴望看到的女性的荣誉感，我都不认为她能理解我会被最终证实有误的流言蜚语所伤害"。Martin，*Enter Rumour*，50.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7，1839. 在这次会议的一份记录中，弗洛拉小姐的姐姐索菲亚小姐给母亲写信说：“我开始认为［维多利亚］是一个蠢货和傻瓜——我认为她如今之所以关心起这件事来，是害怕伦敦城内仍然十分强烈的兴趣和义愤，担心如果缺少尊重和关心会产生什么后果。” Martin，*Enter Rumour*，67.

[4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6，1839：墨尔本勋爵一直到最后都十分刻薄。当他在6月29日被告知，一动不动的弗洛拉小姐正处在“最符合基督徒的思想状态”时，他反驳道：“说起来容易。我敢说，她肯定还想做坏事。”维多利亚补充说：“如果她康复的话，我担心她的确会这么做；但我对M勋爵说，我觉得人在最后必须忏悔。”维多利亚相信自己已经忏悔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将弗洛拉小姐的病看成一件麻烦事。（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1，1839.）正如她在晚餐时对M勋爵所说的那样，家里有一个将死之人实在令人感到尴尬，因为她没法外出，也没法邀请别人前来参加晚宴。（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3，1839.）

[4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5，1839.

[46] Martin，*Enter Rumour*，69.

[47] *The Champion and Weekly Herald*，July 14，1839.

[48] 《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尸检报告》被完整发表在1839年7月9日的《晨邮报》上。*Morning Post*，July 9，1839，5. 报告有五名医生的签名。内容如下：
整个人十分憔悴。
胸部：心脏和肺部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但覆盖右肺的胸膜出现大范围黏附的迹象，黏附在肋骨上——显然是源于长时间站立。
腹部：腹膜（或者说分布在腹腔并且覆盖在内脏外侧的薄膜）出现普遍的黏附现象，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器官的表面不与邻近器官黏附在一起。肝脏十分肿大，向下一直下垂到骨盆处，向上也有肿胀，严重挤占了右侧胸腔的空间。胆囊里含有少部分胆汁。肝脏颜色很浅，但其结构并未与健康状态有太大差别。胃部和肠道因气体而膨胀；它们的外层，尤其是肌肉部分，非常细长。脾脏和胰腺没有病变。部分肠系膜淋巴结出现肿大。还有少部分不明黄色物质，位于黏着物中。
子宫及其附属器官显示出健康处女的正常表现。
从黏着物的特点来看，可以明显看出，这些黏着物只能归因于久远以前的炎症。这些黏着物的影响一定是干扰了胃部和肠道内容物的通过，并且以很多方式干扰了这些器官的正常功能。

[49] 按照传统，在有人致皇家祝酒词时，必须在开场白中遵循固定范式，即

以“女士们，先生们，女王”开场，而在座嘉宾必须回答道：“女王”。——译者注

[5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0，1839.

[51] Hibbert，*Queen Victoria in Her Letters*，5.

[52] To M. V. Brett，March 13，1904，Brett，*Journals and Letters*，1：49.

[53] Martin，*Enter Rumour*，73.

[54] Longford，*Victoria R.I.*，124.

[55] 参见《旁观者》周刊封面。引自*Morning Post*，July 22，1839，3。《利明顿矿泉信使报》（*Leamington Spa Courier*）写道，J.克拉克爵士还在继续行医的事实让一则传言变得有些可信，即这起诽谤事件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女王陛下而非这名医生。Martin，*Enter Rumour*，57.

[56] 《时代报》（*The Era*）说，精神苦闷和遭到忽视杀死了她——而且这是谋杀，“谋杀”一词还用大写字母书写。1839年7月22日《晨邮报》上的一篇来信也称其为谋杀。*Morning Post*，July 22，1839，3.《晨邮报》针对女王及其王庭发起了一场漫长而猛烈的运动。《观察家报》报道称，弗洛拉小姐“在花样的年纪被王室走卒的诽谤和侮辱给摧毁了，这些人足够放荡和无耻，指望用这种死神的手段获得陛下的青睐，现在看起来他们又足够幸运，用这种残酷而致命的手段达成了目标！”（引自*Caledonian Mercury*，July 18，1839。）《观察家报》接着说：“下面用直白的语言来讲述这种邪恶的指控，那就是女王的青睐是通过将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置于死地来获得的，而且这种手段真的让人获得了陛下的青睐。”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指控。

[57] Martin，*Enter Rumour*，54-55.

[58] Martin，*Enter Rumour*，67-68.

[59] *The Times*，July 20，1839，6.

[60] *The Corsair*，August 31，1839，5

[61] Martineau，*Harriet Martineau’s Autobiography*，418.

第三部分 阿尔伯特：或谓之为“王”的男人



10 恋爱中的悍妇

我对阿尔伯特说，他就像一个光之天使一样前来拯救我……因为光是我自己无法完成自我救赎。我既年轻又任性。[1]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即使是在最不可救药地迷恋阿尔伯特王子之时，也总是以一种仿佛他是一个3岁小男孩，而她是他的家庭女教师的态度对他说话。[2]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维多利亚站在温莎城堡铺着红地毯的台阶顶端，向下凝视着表弟阿尔伯特。他正在与哥哥埃内斯特一起拾级而上，从一尊乔治四世的雕像以及几套盔甲前走过，前来握住年轻女王的手。此时正是1839年10月10日清晨，这两名英俊男子刚刚抵达英格兰，在此之前，他们冒着雨连夜乘船从欧洲大陆来到多佛港。维多利亚在闪烁的晨曦中凝视着阿尔伯特，愣住了：尽管面色苍白并且尚未从晕船症状中恢复，但他看起来仍然光彩照人。在他们上次相见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变得身材魁梧；他有着宽阔的胸膛，大腿肌肉线条分明，面部比例完美无瑕。突然感到有些害羞的女王伸出了她的手。

她感到神魂颠倒。那晚，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情地看着阿尔伯特——他美极了。”第二天，她进一步详细描写了他的外在特质：他“如此英俊潇洒”，有着“美丽的眼眸、精致的鼻子以及漂亮的嘴唇，一缕八字胡精细雅致，两鬓的腮须若隐若现；有着肩膀宽阔、腰肢纤细的完美身材”。这是一种让她无法抑制的强烈欲望。光是看着他，就足以让她心潮澎湃：“我必须牢牢把持住我的内心。”然而，仅仅四天后，她就完全敞开了心扉。

阿尔伯特在旅途中一直在下决心迎接一次艰难的对话。这位骄傲的德意志王子已经决心告诉“维多利亚表姐”，他不打算在她漫不经心地考虑是否要嫁给他的过程中连续数年原地踏步。他已经厌倦了惴惴不安的等待，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被人主宰。维多利亚曾希望他们两兄弟能够提前几天到，但阿尔伯特对哥哥埃内斯特说，让她等着。他很清楚她内心的保留意见。阿尔伯特的父亲曾对他说，她是个“悍妇女王”[3]——意志坚定且专横跋扈——而且宫廷里一团乱麻。阿尔伯特觉得她是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喜欢参加聚会和睡懒觉的女子。他们是有趣的一对——这个男孩喜欢徜徉在夏季住所罗西瑙城堡（the Rosenau）周围的树林里，寻找岩石、贝壳和树叶，好添加到他的自然科学藏品中；而这个女孩却抱怨说，她讨厌散步，因为她精致的靴子里会进石子，但她却愿意愉快地跳舞一直到鞋底被磨得像纸片一样薄。在乘船跨越英吉利海峡时，阿尔伯特一边听着滚滚海浪拍击船首的声音，一边还在排演让他感到恐惧的对话。你怎么才能对一位年轻女王说出口，告诉她你不打算等待她的垂青呢？

维多利亚对婚姻极为谨慎。在经历令人窒息的童年后，她如今终于自由了——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她不记得父母在一起的时光，也从未目睹过牢固、幸福的婚姻——她的舅舅利奥波德及其第二任妻子路易丝除外，后者对她而言就像姐姐一样。她知道，她的大部分叔伯都有过风流韵事，而且对待妻子态度恶劣；她为什么要匆忙冒这样的风险呢？大多数20岁的姑娘都已经结婚或者订婚了，但是，正如她在成为女王的第二年所写的那样，她想要“再享受两三年”她“现在年轻少女的生活”，然后再承担起“身为人妻的职责和顾虑”[4]。她还担心自己的工作量，“现在结婚的话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劳累”。除此以外，整个国家非常喜欢她现在的样子，一个独立自主的年轻女王。她宣称，这整个话题都“令人感到讨厌”。

至于阿尔伯特，他年纪轻轻但身体欠佳，英语说得不太流利，而且

未经世故。他们在1836年的访问让人丝毫提不起兴趣；埃内斯特在离开时还以为自己才是维多利亚喜欢的那个。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阿尔伯特曾给她写过一封信，祝贺她成为“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女王”。他在信中问道：“我祈祷你能够偶尔也同样想念一下你远在波恩的表亲们，并一如既往地善待他们。请放心，我们的思绪始终与你在一起。”[5]维多利亚还指示斯托克马陪同阿尔伯特一道前往意大利，以拓展他的教育内容。此行取得了巨大成功——头脑活跃的阿尔伯特对“无穷无尽的知识”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并不太喜欢当地的景色或者气候（从这一点上说，他的品位与维多利亚截然相反；比起游览博物馆，她更喜欢画风景素描）。

维多利亚还是个浪漫主义者，不喜欢自己的爱情被人计划好，或者充满算计；她希望爱情能够凭借无法抵抗的巨大力量从她心中喷涌而出。这怎可能发生在她那个脸色苍白、表情严肃的表弟身上呢？1839年7月，也就是在他们10月相会的几个月前，维多利亚曾试图阻止阿尔伯特前来造访。她请求利奥波德不要让她的表弟过度期待：“因为，除了我尚且年轻，且十分抵触改变现状之外，国家内部对于这种事也没有出现焦急情绪。”如果她匆忙步入婚姻殿堂的话，“可能会引起不满”。她的表弟在信里听起来似乎很不错，但她理智地指出，她“可能无法对他产生能够确保终身幸福的感情”[6]。她要求利奥波德取消此次访问，并且向阿尔伯特清楚无疑地表明“不存在订婚一说”。所有迹象都显示此次访问将是一次失望之旅。她甚至在写给日益沮丧的阿尔伯特的一封信中暗示，她对来自欧洲大陆的另一名绅士产生了好感：“我们已经接待俄国大公有一段时间了。我极喜欢他。”

维多利亚一直都不缺追求者。她位高权重、性格活泼且充满青春活力。美国的诸多报纸都报道了所谓丧偶的54岁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正认真考虑向她求婚”的传言。[7]《每日广告报》（*Daily Advertiser*）认为：“他没有理由不提出求婚，或者说，与欧洲性

格懦弱的王公贵族相比，他没有理由不是一个绝佳人选。”从新世界到旧世界，许多男子都被认为是“英格兰玫瑰”可能的夫君人选，但她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

而且，好似已经成为规律一样，维多利亚正受到一种特殊看法的强烈影响，即墨尔本勋爵的看法。他警告维多利亚不要嫁给阿尔伯特，原因有三：他是个德意志人，是她的表弟，还是一个科堡人。鉴于他的岳母同时也是他的姑母，阿尔伯特难道没有可能站在她那一边吗？（维多利亚对阿尔伯特的忠诚笃信无疑，“向他保证他无须在这一方面有所担心”。[8]）墨尔本最有力的论调在于，这场婚姻“没有必要”[9]。在这一点上，他们意见一致。墨尔本的论调背后有些自私的成分，因为他不希望他与维多利亚之间的亲密关系受人干扰。维多利亚也对墨尔本勋爵说，她希望他不要在其妹的敦促下再婚。[10]

最重要的是，任性的维多利亚担心，一旦成婚，就意味着她有可能再也无法管事；一旦成为人妻，她就无法如愿成为那种行事果决、掌控一切的女王。1839年4月，在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丑闻持续期间，她与墨尔本勋爵讨论了如何才能将维多利亚的母亲赶出她所居住的宫殿。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过婚姻，尽管维多利亚表示，就她现有的生活而言，这是一种“可怕的选择”。她说，她“已经习惯了为所欲为，我估计十有八九我不会跟任何人达成一致意见”。墨尔本有些不太明智地表示：“哦！但你仍然可以［为所欲为］。”[11]这是根植在维多利亚脑海中的婚姻模式：她的权力将完好无损；她未来的丈夫则将更像是传统上的“妻子”。她负责统治国家，而他负责亦步亦趋。

阿尔伯特对此感到厌倦。他的叔父利奥波德警告他维多利亚出现了犹豫，并且认为他的等待时间将从两年延长到四年。阿尔伯特将这种态度视为拒绝，准备告诉她说，他不会无所事事地等待下去。[12]反正她本来也没有让他感到着迷不已。他在年少时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后写

道：“维多利亚表姐总是对我们很友好。她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漂亮，但非常友善、活泼。”[13]在他的生命里，这位举世闻名的亲戚始终被描绘成他的命定伴侣，但如今，在他们双双迈过20岁门槛之际，他却担心自己很快就会看起来像个傻瓜：“如果在等待或许三年后，我发现女王对这桩婚姻没有任何意愿了的话，那么我就将身处一种滑稽的境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丧失未来的一切希望。”[14]他的未来取决于一名年轻女王的兴致。他恶心、疲惫地走入温莎城堡，抬头看到台阶上方一个娇小的身躯，那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

10月13日，维多利亚对墨尔本勋爵说，她对婚姻的看法已经变了。过去三天里，她一直处在躁动不安的状态，一边听着海顿（Haydn）创作的交响曲，一边在日记里潦草地书写，在阿尔伯特的灰狗从她叉子上叼走食物时，她还会偷偷地瞄他一眼。[15]她对墨尔本勋爵说，阿尔伯特“非常和蔼可亲、性情温和”，她承认自己脾气不好，并且坦白说，她如今已经认识到了“美貌的好处”。当她向首相透露自己的意愿时，墨尔本勋爵建议她考虑一周时间。但在第二天，她就告诉他，她决心已定。亲切的墨尔本也转变了态度，向她保证说婚姻会让她更加舒心，“因为一名女子任何时候都无法孤立于世，无论她处在什么地位”[16]。纵贯她的一生，这条讯息将向维多利亚反复提及：女性无法也不应该独自统治国家。维多利亚害羞地满脸通红，说道：“谢谢你犹如慈父一般。”

接下来就是最折磨人的部分了。按照传统，作为拥有统治权的女王，维多利亚必须是提出求婚的一方。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将她的决定通知于他，但对一个备受保护的年轻女性来说，尤其她既没有父亲的陪伴也不信任自己的母亲，这件事令她感到紧张不已。她与阿尔伯特之间从未讨论过任何类似爱情或者婚姻的事情；每次思虑至此，她的腹部就会出现一阵疼痛。让她感到开心的是，那天夜里，阿尔伯特在向她道晚安时攥住了她的手。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

最终，在10月15日周二中午12点30分，维多利亚在阿尔伯特外出狩猎时向他发出了传召令。他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看到墙边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半小时后，他前去见她。维多利亚请他坐下，然后试图闲聊一番。她的声音略微颤抖，语速也很快：

> 我对他说，我觉得他肯定清楚为什么我希望他前来，如果他能够答应我的愿望（也就是与我成婚），将令我感到极为高兴；我们彼此拥抱，一遍又一遍，他如此善良，如此深情；噢！想到我能够得到像阿尔伯特一样的天使的爱，我的激动之情简直难以形容！他是完美的化身；他的美貌、他的任何角度、任何方面都完美无瑕！

阿尔伯特立刻就接受了她的求婚。维多利亚对他说自己配不上他，拿起他“精致的手”，一遍遍地亲吻上去，随后传召了他的哥哥埃内斯特。紧接着，引人注意的是，阿尔伯特前去向莱岑致以敬意——也就是那个真正被维多利亚当成母亲的女性。维多利亚在那天以及随后几天的日记里洋溢着无法抑制的喜悦之情，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就好像她偶然发现了幸福的未来一样：好比一名双目失明的女子无意间发现了一尊大理石塑像，不停地抚摸它一样。维多利亚在那天晚些时候写信给舅舅利奥波德说：

> 他似乎完美无瑕，我觉得自己有着十分幸福的未来。我对他的爱无法言表，我会竭尽所能让这种牺牲降到最低（在我看来，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种牺牲）。他似乎有着优秀的鉴别力，这对他的地位而言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品质。过去几天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梦一般，我感到眼花缭乱，简直不知该如何下笔；但我的确感到非常幸福。[17]

维多利亚将这个秘密瞒了她母亲近一个月。在1840年出版的备受争议的女王传记中，阿格尼丝·斯特里克兰（Agnes Strickland）写道，这份婚约得到了肯特公爵夫人的“批准”。维多利亚态度坚决地在空白处写道：“从来没有。直到王子离开前几天女王亲自告知她之前，肯特公爵夫人都对此毫不知情。”[18]维多利亚不信任她的母亲，并让阿尔伯特相信她母亲会四处宣传这一消息，带来麻烦。公爵夫人显然怀疑有些什么

事情正在酝酿中；她曾两次未敲门就冲入维多利亚的房间，她知道维多利亚正与阿尔伯特待在一起，而她女儿认为她的这种行为十分无礼。最终，女王在11月9日将母亲传召到她的房间。肯特公爵夫人拥抱了维多利亚，并流下了眼泪；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没打算得到她的祝福，但她说，她还是会祝福他们。阿尔伯特随后进入房间，拥抱了维多利亚，并握起她的手。公爵夫人激动地说，他们如此年轻——维多利亚回答说，阿尔伯特如此沉着冷静——并发誓将永远不会干预他们的婚姻。她还不合时宜地提到了其他想要迎娶维多利亚的男人。

在公爵夫人返回自己的房间后，她的喜悦之情减弱了几分。了解到维多利亚等了如此之久才告诉她这一消息让她无法入睡。她焦虑地猜测着谁比她更早知情，思索这对情侣的成婚决定是否太过仓促。她担心自己未来将居于何处，并就自己住处的问题给维多利亚写了好几封信，而她女儿却把这些信件当作麻烦事不予理睬。她说，她的母亲就是个“大麻烦”[19]。

不过，在这对情侣的爱巢里，一切都如沐春光。阿尔伯特对女王的欣然求婚和缺少心计感到着迷不已。他在给自己祖母的信中写道：

> 几天前，维多利亚把我单独叫到她的房间，向我宣告了她发自肺腑的爱恋，我得到了她的全部真心，如果我能够做出牺牲，与她共度余生的话，将令她极为喜悦，她说她将这视为一种牺牲；唯一令她感到困扰的是，她认为自己配不上我。她在对我吐露真情时表现出的喜悦而开诚布公的态度令我着迷不已，我对此十分陶醉。她真的非常善良而亲切，我敢肯定上天没有让我落入魔掌，我们在一起将幸福美满。[20]

维多利亚的热情让这对恋人勇往直前，而阿尔伯特慢热但坚定的忠贞之情也将在不久后得以体现。他们表现得好像如痴如醉的恋人一般。他紧紧握住她的手，用自己的体温为之取暖，并赞叹这双手的小巧玲珑。在她工作时，他坐在她身边，随时应她的要求帮她蘸墨水。维多利亚会蹑手蹑脚地来到他身后，用双唇亲吻他的额头，并在他离开时追上

前去，献出最后的一个吻。阿尔伯特有着客观、务实的头脑，很难敌得过维多利亚的激情，他给出的回应是几句小声的抗议：“*Liebe Kleine，Ich habe dich so lieb，ich kann nicht sagen wie*（亲爱的小家伙，我如此爱你，简直无以言表）。”[21]她的爱之深，涌现得如此迅速，让他真正感到既欣喜又惊讶。在仅仅几周内，维多利亚就从一个喜欢独处和独自统治国家的女性转变成了一个完全被爱情所吞噬的女子。有时，维多利亚毫不掩饰的欲望甚至让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我对阿尔伯特说，我们应该非常非常亲密地在一起，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噢！能够与他非常非常亲密地在一起，我该多么幸福啊！”[22]

阿尔伯特感到为难，他对斯托克马说，他“经常感到不知所措，难以相信我所面对的这种强烈感情”。[23]不过，他的这种幸福也颇为坎坷；一想到要远离德意志，他就感到心烦意乱。甚至在女王——也就是他无与伦比的唯一——花费数小时为他描绘他们共同拥有的光辉未来时，他脑中所想的也一直是自己会失去些什么。他给自己的祖母写信说：“哦，未来！届时我岂不是得离开我亲爱的家以及您！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被深刻的悲痛情绪所占据。”[24]阿尔伯特知道，他不仅仅是走入一桩婚姻，还是接受了一份工作，而他的工作将“对许多人的福祉起到决定性影响”[25]。阿尔伯特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与权势人物成婚的可能性。仅仅几个月前，在他20岁生日那天，他还曾给哥哥写信说，他们应该努力推动通才教育，谋求实现“头脑的灵活性”，他认为这是“伟大人物借以统治其他人的权力源泉”。[26]阿尔伯特的目标是成就一番伟大事业。

由于生育了众多子女的维多利亚一直被塑造成一个她所在时代传统婚姻的典范，照片上的她也始终一脸爱意地看着丈夫，或者将双手放在正在读书的丈夫肩上，因此，人们很容易忘记她与阿尔伯特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非传统。她是英国最著名的女人，拥有多座宫殿和一支庞大的仆人队伍，身负重任。他却相对而言没什么名气，来自一个又小又穷

的德意志公国。[27]维多利亚的首相一直建议她寻找一个能够受她控制的配偶，一个顺从她的安排的配偶。阿尔伯特会看到他的未婚妻有多么固执和强势。他注意到，在他们上次见面之后的三年时间里，她的身高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却变得比以往坚决得多”[28]。从许多方面来看，维多利亚都承担了一个男性的角色：她是提出求婚的那一方，她先于阿尔伯特送给了他一枚戒指，并请求得到他的一绺头发。她没有义务改成他的姓氏，正如嫁给国王的女人们通常也会获准保留自己的姓氏一样。她用来形容他的深情话语通常都充满女性特质；他是她美丽“亲爱的天使”。

从最传统的意义上来说，维多利亚实际上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妻子”。墨尔本是她的精神伴侣，而阿尔伯特是她的欲望对象。在提出求婚后的几天里，她仍在持续记录自己与墨尔本之间的漫长对话，而“亲爱的”阿尔伯特仅仅作为一个美男子、一个优秀的舞伴以及一位晚宴伴侣被一带而过。他的话语和思想没有得到与墨尔本同等的重视，[29]她仅仅简略提及他对俄国人、法国人以及犹太人的厌恶之情，其中对犹太人的厌恶令人担忧。墨尔本对这种反犹主义思想嗤之以鼻，认为是典型的德国思维，而维多利亚不具有这种思想。维多利亚没有纠结于这一点。她曾两次向墨尔本勋爵坦白说，坠入爱河让她变得相当愚蠢。[30]然而，尽管年轻女王爱慕的可能是阿尔伯特健美的身体——尤其是在他穿着白色紧身裤“而且里面什么也没穿”[31]时——但真正让一代又一代人对这位喜欢早睡、一丝不苟的德意志王子产生巨大好感的是他永不停歇、博学多识的头脑。

从小，阿尔伯特就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在发出第一声啼哭后，他就“四处张望，像一只小松鼠一样”[32]。孩提时代，他对于自己的看法既自信又笃定；在少年时代，他见到了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ⅩⅥ），并用意大利语同他讨论起了艺术。他与哥哥一道创建了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喜欢写诗作曲，并为村里房屋被烧毁的穷人

家庭募集捐款。11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优秀而有用的人。”他出自本能地从很早就开始遵守一套荣誉准则：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喜欢跟伙伴们一起玩骑士的游戏，有一次，他所在的一方正在进攻一座对方藏匿其中的老旧废弃的高塔。一个朋友建议从后门偷偷溜进去，这意味着能够轻松取得胜利；但阿尔伯特却表示反对，声称这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极不符合一名萨克森骑士的身份”[33]。

阿尔伯特一方面诙谐幽默，有模仿天赋，另一方面身体也十分纤弱，一直到四岁都要被人背着上楼。这个天真可爱的金发男孩很容易疲劳，有时甚至会在饭桌上睡着，从椅子上滑下去。他的母亲露易丝公主（Princess Louise）很喜欢他，称他“杰出无比、英俊无双，有着蓝色的大眼睛……总是兴高采烈”。[34]阿尔伯特继承了母亲的快乐、理智和智慧，但他从未真正了解过她。他的父亲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埃内斯特公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对于将自己称作“主人”的性格活泼的妻子，他公开出轨。[35]最终，当她也开始有自己的调情对象，并且开始与一名小自己4岁的侍从长时间相处后，他对她提出出轨指控。埃内斯特公爵在愤怒中将她赶出家门，并保留了对孩子的全部抚养权。

当时只有23岁的路易丝十分孤苦凄凉。她的两个儿子分别只有5岁和6岁，在她离开的那一夜还感染着百日咳[36]；他们以为她是因为他们生病才哭泣的。她渴望见到自己的儿子，有一次甚至伪装成一名农妇，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当地一次收获节庆祝活动上，远远地看看他们。[37]尽管她曾反复询问，但埃内斯特公爵从未向她透露过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而且残忍地拦截了她寄来的所有信件。[38]

阿尔伯特与自己的母亲而非父亲和哥哥如此相像，这促使一些人暗示埃内斯特公爵并非他的父亲[39]——不过这种流言蜚语毫无根据。媒体偶尔会刊登一些反犹主义者的不实之词，称阿尔伯特真正的父亲是一名担任宫廷管家的犹太男爵。埃内斯特公爵自己的怀疑是，阿尔伯特的

父亲是他的儿时好友亚历山大·格拉夫·楚索尔姆斯（Alexander Graf zu Solms）。作为惩罚，他将路易丝赶回娘家居住了一段时间，流放了楚索尔姆斯，为掩人耳目，还进行了一项虚假的官方调查，持续数年。作为当时双重标准的明显例证，路易丝被指控犯有多项可耻、虚构的私通罪行，还被人称作“婊子”以及“无耻的罪人”[40]。传记作家赫克托·博莱索（Hector Bolitho）检查了萨克森—科堡公爵档案中的离婚文件，发现“一直到阿尔伯特王子出生至少4年后，文件中都没有哪怕只言片语暗示公爵夫人有过不忠行为，无论是与犹太人还是与基督徒；当阿尔伯特的母亲于1826年离婚时，他已经在上学了。7个月后，她嫁给了亚历山大·冯·汉施泰因，后者曾作为共同被告在法律诉讼中被提及”。[41]鉴于她丈夫自己的所作所为，路易丝遭受的对待可以说极为不公。被赶出家门的是女性，毫发未伤的是男性，但受苦最多的却是孩子。

1831年，阿尔伯特的母亲因子宫癌在巴黎去世，此时距离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的反君权骚乱仅有几个月时间。她享年只有30岁。她的遗愿是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安葬在一起，因为他才是那个不顾她的不贞名声仍然坚持爱她的男人。阿尔伯特和埃内斯特拒绝接受这一点；在1846年他们的父亲去世后，他们将她的灵柩从西德意志的圣文德尔地区挖出，将其重新安葬在科堡的公爵墓室中，就在他们父亲的身边。他们在1860年再次移动了二人的灵柩，这次是移到了他们在科堡专门为父母建造的一座宏伟陵墓中。尽管违背母亲遗愿的做法可能是错的，但这对兄弟俩试图完成的恰恰是他们在父母在世时未能实现的梦想——相处和睦的父母。阿尔伯特在余生中都对不忠行为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正是这种行为拆散了他的家庭，让他无法和母亲团聚。阿尔伯特总是“用一种温柔、悲伤的态度”谈及路易丝，一说起她痛苦的病症就备受折磨。[42]作为一种明显的温柔姿态，他最初送给维多利亚的礼物之一是一个小小的绿色星形别针，那是他母亲的遗物。他对于保持忠贞不渝有着无比坚定的决心，似乎对他而言这没有任何困难；这种决心创造出了一层能够始终让维多利亚感到安全的保护壳。他们都曾在幼年失去

过父亲或母亲，尽管阿尔伯特与自己的父亲之间不曾有过维多利亚与母亲之间的裂隙，但他们都渴望过上那种儿时梦想中的田园牧歌式的家庭生活。

1839年11月23日，维多利亚身穿一件简朴的晨裙端坐在枢密院的大臣面前。她的手腕上带着一根手链，手链上阿尔伯特的小小面庞正凝视着她。83名贵族在白金汉宫一层的一个房间里正襟危坐，满脸期待地看着她。维多利亚略感有恙。她低了一下头，努力稳住颤抖的双手，然后宣读了一份由墨尔本连夜写成的声明：

> 我现在传召诸位前来，为的是使诸位了解我在一个问题上的决定，这一问题将深刻影响我国臣民的福祉，以及我未来生活的幸福。我愿与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王子携手成婚。我深刻意识到即将缔结的婚约所具有的严肃性，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一决定，我也已拥有强烈信念，相信凭借万能之主的保佑，这一婚姻将既能确保我的家庭幸福，又能实现国家利益。我认为有必要尽快将这一决定告知诸位，以便诸位能够充分了解这件对我和我的王国而言至关重要之事，我相信这桩婚姻将能为所有亲爱的臣民接受。

随后，维多利亚按照礼仪尽可能快地离开了枢密院，身后留下了眼含热泪的墨尔本勋爵。一直到第二天，她的身体仍在不断颤抖。阿尔伯特已经在两周前返回了德意志，她在一封写给阿尔伯特的信中称，向陌生人宣布如此私密的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时刻”[43]。

在会议结束后，格洛斯特公爵夫人——也就是以前的玛丽公主——曾向维多利亚问道，她是否紧张得很。维多利亚回答说：“没错，但在那之前，我做了一件更让人紧张的事。”[44]

公爵夫人问道：“什么事？”

“我向阿尔伯特王子求婚了。”

这则消息引起了一阵无声的狂热。阿尔伯特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新郎人选。批评人士指出，他年轻、无经验，而且很穷，但其他人却对他的音乐和诗歌天赋夸赞有加。公众对女王的未婚夫有着许多问题。除了一些肤浅的好奇心外，大多数人还想知道他有可能掌握多少权力，能得到多少津贴，以及如何才能确保一个外国王子不会对女王施展过多影响。

《旁观者》周刊对他不屑一顾。该刊物写道，一名伟大英国女王的丈夫，无疑必须被阉割：

> 一个鎏金的傀儡，无法采取任何与其高贵出身和地位相匹配的行为；无法从事任何与一名战士或者政治家相匹配的事业；其全部重要性都来自他人；无法公开表露任何看法（或许服饰、家具或者马匹等问题除外），即使其妻子的命运和名誉危如累卵，也不能违反接纳他的这个国家的宪法。[45]

从历史上来说，女王的丈夫们始终未能在英格兰得到广泛爱戴。在让妻子受孕方面他们也不太成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与玛丽一世（Queen Mary Ⅰ）女王之间关系并不十分紧密，褐色头发的玛丽一世是亨利八世（Henry Ⅷ）的女儿，信奉罗马天主教，因处决了280多名新教徒而被人称作“血腥玛丽”（Bloody Mary）。那是一桩政治性的权宜婚姻，他们进行了共同统治，尽管菲利普如果没有妻子的同意无法做出任何决定，而且他的统治也随着她的去世而告终结。结婚时已有38岁的玛丽没有生育子嗣，并于42岁去世。当身为新教徒的玛丽二世（Mary Ⅱ）获悉自己必须嫁给荷兰表哥威廉时，她哭了整整两天。她后来渐渐喜欢上了威廉，但她也没有生育儿女。在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之后，他们要求共同摄政，这是基于务实的理由：玛丽的王位继承权更有力，但在光荣革命以及她身为罗马天主教徒的父亲詹姆斯二世（James Ⅱ）被推翻后，威廉的新教背景也提供了足够支持。他们在1689年至1694年间共同执政；当她在32岁的年纪英年早逝后，威廉继续

独自统治英格兰。玛丽二世的妹妹安妮在1702年至1714年担任大不列颠女王，她深爱自己的丈夫、丹麦的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 of Denmark），却在怀孕过程中备受折磨。肥胖且因痛风而行动不便的她有过17次怀孕，其中12次都因流产告终。在她剩下的孩子中，有4个未满两岁就夭折了，而她最后一个儿子在11岁时也宣告夭折。就维多利亚的案例而言，没有明显的理由需要实行双重君主制——她深受欢迎，而且年龄已经足以独自统治国家——尤其考虑到阿尔伯特还是一名外国王子。

有关阿尔伯特的流言蜚语所依赖的基础是某种隐形的歧视，即针对德意志人和针对表亲婚姻的歧视。表亲婚姻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十分普遍，贵族家庭经常鼓励这种做法，以维持家庭的亲密。[46]1874年，乔治·达尔文（George Darwin）给父亲查尔斯（Charles）写信说，户籍总署的数据显示，表亲婚姻“在我们阶层中的比例至少是下等阶层的3倍”！[47]这种做法在达尔文—韦奇伍德（Darwin-Wedgwood）这样的大家族中尤为普遍，约有10%的婚姻都是在一代或者二代表亲间完成的。[48]那些与表亲结婚的人中有许多著名人士，包括作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萨克莱（Thackeray）[49]的几个女儿、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50]、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51]、安东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52]的姨妈、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53]的父母以及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54]。在狄更斯、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55]、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56]、萨克莱以及特洛勒普的小说中，表亲婚姻十分常见。甚至连儿童读物中的角色也会与表亲坠入爱河：比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57]写道：“小兔班杰明长大后娶了弗洛普茜表妹（Cousin Flopsy）。他们儿女成群，既奢侈又快乐。”[58]

查尔斯·达尔文在1862年出版的著作《兰科植物的受精》（*Fertilisation of Orchids*）中对“永恒自体受精”提出批评，并且暗示

说，近亲结婚“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有着类似的害处”。[59]他在40多年里一直饱受多种神秘疾病的困扰，这些疾病让他头晕、恶心、浮肿、疲惫、焦虑、虚弱以及抑郁。他的这些症状有很多都传给了他的孩子，这让他对遗传烦恼不已；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近亲婚姻的结果？要知道，他自己的父母就是表亲婚姻，他娶的也是自己的表亲。[60]19世纪中叶，这一问题得到了日益热烈的讨论，在此之后，他的儿子乔治决定去确认近亲婚姻是否有害，并且开始借助父亲的帮助来搜集数据。（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她在1852年写道：“近亲结婚绝对违反自然规律，不利于种族的福祉；看看贵格会教徒、西班牙贵族、各国王室以及多山地区与世隔绝的山谷吧，那里的精神错乱、种族退化、身体畸形和智力缺陷正变得越来越严重。”[61]）

达尔文父子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支持所谓近亲结婚会导致失明或者耳聋的说法；只有很小比例的精神病院患者是表亲婚姻的后代（3%～4%）。唯一令人不安的发现是，表亲婚姻的后代中成为牛津或者剑桥赛艇队成员的比例较低。不过，乔治·达尔文得出的结论是，表亲婚姻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风险较小，但对穷人风险较高，这显然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偏见。但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尽管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之间的婚姻很成功，但大多数人都开始对表亲婚姻进行谴责。到此时，医学界已经开始众口一词地反对这种做法。[62]现代研究也已证实，父母是表亲的孩子有更高的风险出现认知缺陷、智力和发育障碍，以及流产。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或许应该是阿尔伯特的德意志血统。墨尔本勋爵对于维多利亚嫁给德意志人言辞十分尖刻——他说，德意志人从来不洗脸，而且嗜烟如命——远比他对表亲婚姻的意见要大得多。在19世纪中期，德意志被贬损为一个野蛮而落后的地区，尽管此时它已经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了。作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曾在1864年说道，德意志人是一个尚未开化，“食不果腹、阿谀奉承、狂妄自大”的民族[63]，始终处于“肮脏、懒散的令人作呕的生活状态”。德意志

当时由一群小国家组成，它们在拿破仑战争后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邦联，而这一邦联关系此时正承受着来自改革派的压力，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实施普选、拥有唯一皇帝的统一国家。在维多利亚时代，附庸风雅、久经世故的德意志知识分子、作曲家和诗人与肮脏的农民相去甚远，他们正逐渐渗透进英国的知识分子社交圈里。在19世纪00年代，英国对于拿破仑战争中的死对头法国仍然怀有挥之不去的敌意，但对德意志哲学、文学和思想的兴趣却实现了复兴[64]，这一风潮的引领者是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65]以及后来的一些著名作家，例如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及其子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狄更斯、歌德、卡莱尔、柯勒律治以及乔治·艾略特。反德情绪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德裔配偶被认为会对君主产生有害影响：从1714年到1901年，每一个英国君主的配偶都是德意志人。本身就有一半德意志血统的维多利亚心安理得地遵循了这一传统。

但是，维多利亚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阿尔伯特的祖国，而是他所信仰的主。英格兰女王可以嫁给任何人——但天主教徒除外。当亲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中被赶下王座，并被新教徒威廉三世（William Ⅲ）取代后，英格兰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英格兰君主成为天主教徒，或者与天主教徒成婚。这一法律至今仍然有效。阿尔伯特是一名严守教规的路德教徒，有着坚定的个人信仰，但他的家庭却是由天主教徒主导。维多利亚在枢密院发表的演讲中没有提到“新教徒”一词，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愚蠢的是，鉴于国内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以及维多利亚作为信仰捍卫者的重要地位，墨尔本在此之前建议将这个词删掉。）当惠灵顿公爵在议会中提及此事，托利党的报纸也发表讥讽之词后，这个词又被重新加进了正式版本中。当阿尔伯特返回德意志为婚礼做准备时，他还起草了一份详尽的家族史，以证明他无懈可击的宗教信仰。毕竟，马丁·路德正是在科堡创作圣咏的。

在维多利亚试图为她的情郎争取地位和金钱时，又遭遇了更多的阻碍。就阿尔伯特的年收入进行的投票颇具羞辱性。墨尔本一度提议阿尔伯特每年得到5万英镑，与以前的君主配偶相同。托利党断然投票反对，因而他的收入被设定在3万英镑。感到既难堪又恼怒的阿尔伯特对于维多利亚连一句同情的话都没有说责难不已："那些亲爱的托利党人将我的（预期）收入腰斩，让我的处境变得不太令人愉快。很难想象会有人像他们对待你我一样既卑鄙又可耻。这没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因为这件事让我不可能再对他们保持任何尊重了。"[66]维多利亚发誓说："只要我还活着，就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可憎的无赖，无耻之徒皮尔就是他们的头头。"[67]

接下来遇到的是先例的问题。维多利亚希望将阿尔伯特置于英国正式等级体系中仅次于她的位置，这意味着他将在正式仪仗队伍里紧跟在她的身后，但维多利亚的叔叔们以及托利党内的领导人均表示反对。维多利亚又一次被激怒了："可怜的阿尔伯特，他们对待这个亲爱的天使为何如此残忍！一群禽兽！你们这些托利党人应该被天打雷劈。复仇，复仇！"[68]她将一切归咎于惠灵顿公爵，因为他曾经在议会里责难过阿尔伯特的宗教信仰问题，而且不支持提高阿尔伯特收入的提案。墨尔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劝说才为惠灵顿公爵拿到了女王婚礼的邀请函，而且即使这样，维多利亚也只允许他参加婚礼仪式，而不是婚礼宴会。

阿尔伯特是个内向的人，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向维多利亚坦承："我通常（唉！）是一个很冷淡的人，需要有很强的感染力才能触动我。"[69]

不过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写了许多充满爱意的信件[70]，勇敢地回应了她的热情。[71]11月30日，他在科堡写了一封尤为冗长、絮叨的信：

> 最亲爱的维多利亚——我期盼与你交谈；分离于我而言痛苦不堪。你的可爱相片放置在我的桌前，我简直无法转移自己的视线……我的生命该

> 有多么幸福，如能有你与我一同品尝苦乐酸甜！对你的爱充盈了我的心田……愿你偶尔记起我对你的爱恋，我的心正为你真诚而光荣地跳动，我最大的心愿是你对我的爱能持续到永远……吻你一千遍。愿上帝保佑你！[72]

维多利亚的回信因反复无常的邮政系统而被耽搁了9天，令阿尔伯特焦急万分。他的爱是发自真心的。

但在甜蜜的情感后面，有时紧跟着的却是唐突的言辞。当谈及宫廷事务时，阿尔伯特试图坚持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在王室侍从组成名单方面。[73]阿尔伯特迫切地想要确保他们不完全是与未来妻子结盟的辉格党人，还要有一些真正有荣誉、有地位、有智慧的男子。他写道："如果我要真正置身于所有党派之外的话，那我的侍从就不能完全隶属于一边……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能够是教养良好、品格高尚的人。"阿尔伯特不愿接受由墨尔本勋爵的私人秘书担任他的财务主管的建议："我个人对于乔治·安森先生一无所知，除了有一次看过他跳方阵舞以外。"[74]阿尔伯特努力了好几周，一直敦促维多利亚至少允许他，一个即将远离故土的男人，挑选那些身边最亲近的人。[75]取悦阿尔伯特肯定比取悦安森先生更重要吧？[76]阿尔伯特有力地写道：

>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穷尽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奋笔疾书直到濒临失明，只为让你理解这对我而言有多么令人不快。这是我求助于你的爱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请求，我也不希望提出第二个请求；但我要冷静地宣布，眼下我不愿接受安森先生或者任何人。

不过维多利亚与墨尔本还是占了上风。安森先生得到了任命。唯一的妥协是，安森必须从墨尔本的幕僚队伍中辞职。不久后，他和阿尔伯特就会对这场纠纷一笑置之，因为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是少数——或者有可能是唯一——让阿尔伯特最终很高兴自己没有取胜的情况。但他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他坚持要求王位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想法也很明智。威廉四世是一名托利党人，维多利亚是一名公开的辉格党

人，但阿尔伯特坚定地引导她接受了不偏袒任何党派对于君主而言至关重要的看法。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帮助王位免受革命威胁。

阿尔伯特早期的信件揭示了他的自信以及希望能够得到倾听和尊重的决心。他会在意见被驳回或者被发号施令时冷静地表达不满，然后忘记一切给维多利亚送去飞吻。当他就由别人来处理他的财务事项的建议与未婚妻发生争吵时，他很清楚自己可能面临财政紧缩的前景。他在1840年1月初写道：“作为女王的丈夫，我将在家庭环境里处于从属地位，比任何其他丈夫都更要依赖妻子。我的私人财富只有那些供我支配的部分。因此，我有理由要求自我在近一年前成年以来所拥有的财富（就如同任何成年男子的所有物一样）交由我来支配。”他在这封强有力的信件末尾写道：“炽热地爱着你，我仍然是你忠实的阿尔伯特。”[77]他对维多利亚说，她不应该将公务与私事混为一谈，两人的分歧并不意味着“我对你的爱消失了，任何事都无法动摇我对你的爱”。

维多利亚最为肯定的一点是，阿尔伯特不能被人发现对她施加了任何过度的影响力，或者握有任何独立权力。尽管利奥波德曾经敦促阿尔伯特请求在贵族院中获得一个席位，但维多利亚拒绝了。她希望让丈夫得到的是王室职位：她曾问墨尔本，是否有可能让阿尔伯特成为国王。首相大人明确否认了这一可能性，并且表示她才是君主，他只是配偶，起到的是在艰难时刻提供“支持和援助”的作用。于是，维多利亚面临的问题将变成如何调和一个妻子的角色与一个强势女王的角色之间的矛盾。想要突破至少表面顺从的传统妻子角色，将既痛苦万分又史无前例。

婚礼举行前六周，即1839年12月29日，墨尔本在维多利亚的督促下给阿尔伯特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一些指导方针。首先，最重要的是，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需要在表面上就一切事务意见一致。其次，他不应亲自涉足政治：“殿下应当被认为是在赞同并支持女王的现行政府推行的

政策，这一点绝对必要。”再次，他应当选择那些大体上支持政府的人作为自己的侍从。阿尔伯特恼怒不已。他写信给维多利亚说：“我希望墨尔本勋爵没有认为我们想要过一种充斥着争吵和不和的生活，而不是充满爱意和团结的生活；一个人的看法不能由他人强加，因为看法是思考和信念的结果，一个直到你有了看法才形成自身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始终与你相同的丈夫不可能得到你的尊重。”[78]阿尔伯特不愿成为一个装饰性的丈夫。维多利亚始终爱慕着他，他们的婚姻也很幸福。但她始终没有谈到过他们婚姻之中的冲突和斗争，其所产生的代价，以及她采取了多少艰苦努力才让婚姻维持下去。一直到阿尔伯特去世后，她才对长女提及这些内容。斗争的核心在于，他们二人都热爱权力：维多利亚热爱的是权力给她带来的作为女性的自由，而在那个世纪，大多数女性都缺少这种权力；而阿尔伯特热爱的是权力赋予他的实施领导、影响和催生变化的许可。

维多利亚努力一动不动地站着，为她的白色蕾丝婚纱进行一系列试穿，与此同时，她的脑海里还在细数需要为婚礼完成的一系列琐事。就在女裁缝师将象牙褶皱缝在她如今已经十分纤细的腰身上时，她想到，不能忘了告诉阿尔伯特，他不应为婚礼而剃掉胡须。如果有什么事是她一定会坚持的话，那一定是要求他保留他们最初相见时的那一撮浅浅的八字胡。那一撮胡须给她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她对墨尔本勋爵说，所有骑士都应被要求留一个那样的胡子，而墨尔本“对此没有任何反对意见”[79]。她希望这种胡须成为正式制服的一部分。这是一幅十分有趣的画面：一排排穿着整齐制服的男子骑在马背上，所有人脸上都留着整齐划一的浅浅八字胡，而这仅仅是因为年轻女王的痴情。一想到阿尔伯特，就几乎足以平复维多利亚的紧张情绪；但一想到她在婚礼当天可能遭遇的所有小题大做、装腔作势和严格审视，她就感到身体不适。

在婚礼举行前的几天里，维多利亚一直忙于让议会——尤其是托利

党人——理解，阿尔伯特作为她的丈夫应当被认可为王国中一个地位超群的人——既要广受尊敬，也要获得丰厚酬劳。她在1840年元旦许下的愿望很简单：“亲爱的主，愿托利党人能满足我们的要求。”[80]维多利亚对托利党人的敌意也将招致阿尔伯特的反对。她的新郎决心削弱墨尔本的影响力：他将让这位首相因维多利亚继位初期犯下的愚蠢错误而受到惩罚。阿尔伯特不仅仅想要变得优秀，他还想要成为一个伟人。

---

[1] 引自 Hudson，*A Royal Conflict*，183。

[2] Shaw，November 21，1908，*Collected Letters*，2：817，cited in Weintraub，“Exasperated Admiration，” 128.

[3] Aronson，*Heart of a Queen*，53.

[4] 维多利亚后来会十分后悔这次拖延，她写道，她现在“一想到她曾经希望再让王子等待三四年，冒着毁掉他所有对生命的期待的风险，一直到她想要嫁人为止，她就无时无刻不在憎恨自己！……女王唯一能够给自己找的借口是，从肯辛顿的那种隐居生活突然间过渡到18岁后作为摄政女王所拥有的独立地位，让所有关于婚姻的想法都从她的脑海中消失了，这一点现在让她极为悔恨。”引自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43。

[5]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14.

[6] Benson and Esher，*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177-78.

[7] 《新罕布什尔文学与政治学杂志》（*New Hampshire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1837年8月5日一期记录了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纪事报》（*Salem Register*）上的一篇报道，内容是：
目前正在流传一则恶意传言，即所谓我们丧偶的总统正认真考虑向大英帝国年轻漂亮的女王求婚。我们最初认为，英国宪法和法律为这种想法制造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下面这段来自《波士顿每日广告报》（Boston Daily Advertiser）的文字显示，这位年轻的女王可以自由嫁给任何她选择的人，但天主教徒除外。尽管马丁“几乎每一件事都是轮到他的，而且都干不长”，但我们相信他从来都不是一名公开的天主教徒——因此，我们认为他没有理由不求婚，或者说，他没有理由没机会与欧洲的那些软弱王公们竞争一番。

[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8，1839.

[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4，1839.

[1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14，1839.

[1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8，1839.

[12]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32.

[13] Stewart，*Albert*：*A Life*，26.

[14]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7.

[15]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都很爱狗。维多利亚最喜欢的品种是傻傻又粘人的西班牙猎犬；阿尔伯特最喜欢的是冷酷又时髦的灵缇犬。他在1839年12月31日的一封信中对维多利亚说，他最喜欢的狗埃奥斯（Eos）“如果房间里有一块葡萄干蛋糕的话，会非常友好，跳杆子时会心情不好，非常喜欢打猎，每次打猎完都昏昏欲睡，非常骄傲，瞧不起其他狗”。（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47.）阿尔伯特把埃奥斯也带到了英格兰来，他还在英格兰为维多利亚挑选了一只黄褐色的灵缇犬。

[1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14，1839.

[17] 引自 Grey，*The Early Years*，188。她还给斯托克马、萨塞克斯公爵以及阿德莱德王后写了信。

[18] Stuart，*The Mother of Victoria*，246.

[1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17，1839.

[20]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110.

[21] Longford，*Victoria R.I.*，135.

[2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13，1939.

[23]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23.

[24] November 11，1839，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25.

[25]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24.

[26]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58.

[27] 仅比维多利亚小三个月的阿尔伯特来自科堡，一个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该国王室家族一直到19世纪初才在欧洲建立王朝。雅戈将埃内斯特公爵一世的弟弟利奥波德描述为科堡的“精神领袖”。

[28] Vallone，*Becoming Victoria*，31.

[2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6，1839.

[3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15，1839.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1，1839.

[32] Bolitho，*A Biographer’s Notebook*，114.

[33] Bolitho，*A Biographer’s Notebook*，19.

[34] Stewart，*Albert*：*A Life*，8.

[35]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20-21.

[36] 在1824年9月21日的一封信中，她写道：“离开我的孩子们是最糟糕的一件事。他们患有百日咳，而且会说：‘妈妈之所以哭，是因为她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得不离开。’” Sotnick，*The Coburg Conspiracy*，147.

[37] 这是德国文献学家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讲述的一个故事，引自Weintraub，*Victoria*，28。

[38] Sotnick，*The Coburg Conspiracy*，150.

[39] 对阿尔伯特可能是私生子的问题，分析参见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Bolitho，*A Biographer’s Notebook*，102-22。注：索特尼克（Sotnick）在《科堡阴谋》（*The Coburg Conspiracy*）一书中概括了反驳意见。简而言之，索特尼克认为他是私生子；罗兹·詹姆斯和博莱索认为他不是。最重要的观点认为，有关冯·梅仁男爵（Baron von Meyern）的流言蜚语一直到她与冯·汉施泰因上尉传出绯闻后才出现，她后来正是嫁给了冯·汉施泰因上尉。戴维·达夫（David Duff）也指出，阿尔伯特是在利奥波德1818年底访问科堡时孕育的。Duff，*Albert and Victoria*，28-

32，66. 不过，其证据仍然不够充分。

[40] Duff，*Albert and Victoria*，148.

[41] Bolitho，*A Biographer's Notebook*，103.

[42] 引自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4，attributed to Grey，*The Early Years*，8。

[43]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48.

[44] November 26，1839，Greville，*The Great World*，175-76.

[45] 引自 the *Caledonian Mercury*，November 28，1839。

[46] See Kuper，*Incest and Influence*，23.

[47] See Kuper，*Incest and Influence*，18.

[48] See Kuper，*Incest and Influence*，18.

[49] 英国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名利场》。——译者注

[50] 英国小说家，当时以哥特式的灵异小说闻名。——译者注

[51] 英国浪漫派诗人，湖畔派诗人之一。桂冠诗人指的是英国国王指派的终身宫廷诗人，为全国重大庆典活动作诗。——译者注

[52]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为出色的长篇小说家之一。——译者注

[53] 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与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54] 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译者注

[55] 英国作家与诗人，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世界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译者注

[56] 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卡斯特桥市长》等。——译者注

[57] 英国童话作家，代表作有《彼得兔》。——译者注

[58] See Kuper，*Incest and Influence*，23.

[59] Darwin，*Fertilisation of Orchids*，361.

[60] Kuper，*Incest and Influence*，94，达尔文对近亲繁殖的结果十分着迷。在1868年至1877年间，他发表了三篇有关动物与植物异体受精的专题论文。在第一篇论文《驯化后动植物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中，他提出："自然规律的存在几乎可以说已经得到证实，即关系不甚紧密的动物或植物进行的交配是极为有利或者说甚至是必要的，许多世代长期进行近亲繁殖极为有害。"达尔文认为，对人类而言或许也是如此，尽管他最初不愿陈述这一问题，"因为它被油然而生的偏见所包围"。无论如何，他都不得不去思考这对他自己家庭产生的影响。他的科学计划和个人担忧——他自己的婚姻、疾病，以及他孩子糟糕的健康状况——很难被割裂开。

[61] Nightingale，*Cassandra*：*An Essay*，47.

[62] 对19世纪的亲缘关系进行的优秀分析参见Anderson，"Cousin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 and Kuper，*Incest and Influence*。

[63] Evans，"The Victorians：Empire and Race."

[64] Ramsden，*Don't Mention the War*，32.

[65] 法国女小说家、随笔作者。祖籍瑞士法语区。——译者注

[66]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59.

[67] Cecil，*The Young Melbourne*，478.

[6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1840，from Longford，*Victoria R.I.*，137. 注：有关他的归化的法案是在没有特意提及的情况下通过的——但她后来得以通过王室特权宣布拥有优先权。

[69] Prince Albert to Queen Victoria，Gotha，December 28，1839.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45.

[70] 11月15日，仍然在因为渡海而头晕不止的他在加莱给女王写信，再次称她

为“亲爱的、深爱的维多利亚”。他写道，从他离开温莎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思念她，“你的面容填满了我的整个灵魂。甚至在梦中，我也从未想象过能够在人世间找到如此的爱情。当我与你亲密无间，握住你的手时，这一时刻永留我的心间！”（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26.）两天后，他写道：“吻你一千遍。”（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27.）

[71] From Wiesbaden on November 21，1839：“我只能想象你在14号那天孤独地待在你小小的起居室里；我们坐在那张小沙发上时多么快活啊。我非常想如魔法一般去到你那里，排遣你的孤独。这些天我一直被新的地方、新的情况、记忆、人、事情所分心，但它们全都无法抑制我内心因为分离而产生的痛苦。”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28.

[72]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85.

[73]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31-32.

[74] December 15，1839，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40.

[75]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42.

[76]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48.

[77] January 6，1840，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50.

[78] January 13，1840，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51.

[7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4，1840.

[8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1840.

11 新妇叹良宵

若余为女王，

将有何为？

愿立汝为王，

侍奉左右。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你忘了，亲爱的，我是君主，这项工作可不会为任何事停下来等待。[1]

——维多利亚女王

在1840年年初的几周里，随着婚礼日期临近，维多利亚变得越来越焦虑。天气阴沉不散——大风不息，空气寒冷而湿润。她变得苍白而瘦削，既吃不下又睡不着，焦躁不安，整个身体疼痛不已，还得了重感冒。即使是写信也让她疲惫不已。克拉克医生检查了她的身体，并且又一次误诊，告诉她说她得了麻疹。维多利亚躺在床上，看着雨水在肯辛顿宫她的窗子上留下道道污痕，竭力镇定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阵阵疑云爬上了她的心头。过去两年里，难道她没有因为比其他任何女性更为独立的人生而乐在其中吗？这种纯粹的自由很快将从她的指尖溜走。她闭上眼睛，想起城市各处正在忙碌进行的准备活动：烤制蛋糕、擦亮皮鞋、定做大衣、修建花园、清理马车等，还有许多大桶装苏格兰威士忌和堆满婚礼宴会所用食物的车辆正被人推着经过伦敦的街道。

在这个21岁姑娘的脑海里，总有些问题始终挥之不去：许下婚礼誓言后，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她对于生孩子感到很害怕。男女之间单独相处的方式似乎十分神秘。她配得上阿尔伯特吗？他的眼睛是否会像墨

尔本刻薄暗示的那样，在几年后开始盯上其他更清秀的姑娘？[2]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觉得阿尔伯特会干预政治？很明显她才是统治者，那个掌管着一切的人。他是否会试图控制她或者批评她？对他来说，这种牺牲是否太大？她有时会感觉自己配不上他：他如此英俊潇洒，而她却如此相貌平平。她有着与生俱来的骄傲和习惯成自然的权势，但爱情让她变得恭顺。在婚礼举行5天后发表的一首诗中，伊丽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即后来的伊丽莎白·勃朗宁）写道："若你说，天佑女王！噢，请细语轻言。她已为人妇，受宠万般！一切皆如圆满。"[3]维多利亚在仅仅几年内就学会了如何做女王，但她怎样学习如何身为人妇？

墨尔本勋爵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婚礼举行前的几天里振奋维多利亚的精神。他安慰她说，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事。当她提醒他以前自己决心保持单身时，他说，结婚很正常，她作为君主的工作才是"非常不近人情的"。这个有着痛苦而耻辱的婚姻经历的男人给出了一些颇为现实的建议："这是一场巨变——它有其不便之处：每个人都会尽力做到最好，有鉴于此，你已做得很好；这其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维多利亚认真记下了他的话，并补充说："你说得太对了。"她还有一种羞于启齿的需要，那就是希望自己变得光彩照人。她略带羞涩地向首相指出，她已经减了些体重，一定看起来压力非常大。他强调说，她看起来"棒极了"。他还说，他曾在一份苏格兰报纸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描述说，维多利亚有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热情渴望的鼻孔以及沉着坚强的嘴唇"。墨尔本勋爵反复念了这段溢美之词好几遍，脸上留下了两行热泪。他赞同地说，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描写，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外貌描写了"。尽管当今女性中很少有人会在听到人们说她们有热情渴望的鼻孔后感到受宠若惊，但女王却微笑着回答说："我敢肯定，你的朋友都不如我这么喜欢你。"[4]他回答说："没错。"他的温柔鼓励原本应该来自一个父亲。

维多利亚的麻疹最终被证明不过是紧张过度，而她一看到阿尔伯

特，紧张情绪就缓和了下来。当他抵达白金汉宫时，她已经等不及地站在大门前了：“再次看到他亲爱的脸庞，让我对一切都放心了。”[5]阿尔伯特还在因为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感到头晕不已，以至于他将自己比作一根蜡烛，尽管如此，他还是保持着平静和坚定的姿态。唯一不太和谐的音符是阿尔伯特在离开位于科堡的家时收到的来自维多利亚的一封正式信函。她写道，虽然他渴望能够有至少两周单独相处的时间，但她无法同意长达两周的蜜月假期。她有些居高临下地说，她太忙了：

> 亲爱的阿尔伯特，你完全没有理解这件事。你忘了，亲爱的，我是君主，这项工作可不会为任何事停下来等待。议会正在履职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事情发生，我可能会需要出席，几乎不可能离开伦敦；因此，离开两三天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如果我不能在现场目睹和听取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一刻都不会感到安心……这也是我本人的愿望。[6]

她对丈夫的爱深沉无比，但她也同时深爱着她的工作和责任感。人们在讲述维多利亚如痴如醉的恋情时经常忘了这一点：当她与阿尔伯特陷入爱河时，她从未打算放弃过自己撰写信件、阅读内阁文件以及与首相商议的职责。维多利亚觉得，有阿尔伯特在身边，她就能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作了。不过，她知道，她需要小心谨慎一些，不要让自己的丈夫显得过于软弱。要知道，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他迎娶的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女子。

当大主教问女王，她是否愿意在婚礼誓词中将“顺从”一词给去掉时，她坚持要把它留在誓词里。[7]对她来说，这并不是要求她对阿尔伯特低声下气，而是提醒她，她不能——或者说不愿——像对待王室其他成员、内阁以及成百上千万臣民那样支配她所嫁的那个人。在举行婚礼之时，她内心的矛盾和复杂情绪就像后来的整个人生里一样强烈：在公开场合，她誓言要顺从自己的夫君，但与此同时，她却在私下里否决了他的愿望。

维多利亚想要一个简单的婚礼：朴素的长裙、少数宾客以及低调的

仪式。当然，对一个女王而言，这种愿望很难得到满足。墨尔本设法说服她接受了更为复杂的庆祝活动，在他看来，这才配得上君主的身份。他建议她设法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受到他人目光注视时的羞涩和不安。他还说服她不仅仅邀请惠灵顿公爵，还邀请了利物浦勋爵，尽管她曾决心要让自己的婚礼上不出现任何托利党人。墨尔本还劝说她将婚礼放在圣詹姆士宫的皇家教堂举行，尽管她认为那个地方丑陋至极。维多利亚叹气说："对国王和女王来说，一切都总是如此不顺。"[8]

不过，在某些事情上，维多利亚始终坚持己见。阿尔伯特曾希望她只让那些在他看来符合道德准则的女性之女参加她的伴娘团，但墨尔本对她说，这种道德准则是只有底层阶级才会考虑的问题，此话充满了特权阶级的伪善。她决定无视阿尔伯特的愿望，依据等级挑选她的12个伴娘。她甚至大胆地将泽西夫人之女包括在伴娘团内，而臭名昭著的泽西夫人曾经是乔治四世的情妇。她还想要阿尔伯特在婚礼前的那一夜睡在她的屋檐下，并且将母亲和首相的反对斥为"愚蠢的鬼话"[9]。她知道，只要他在身边，她就能睡得更好。她还跟墨尔本勋爵开玩笑说："我笑着说，我要让人看看，我有时也是会有自己的意愿的，尽管我很少被允许这么做——这让M勋爵也笑了。"[10]首相与女王在一起开怀大笑，而阿尔伯特则在等候指示、静待时机。

1840年2月10日清晨，天空黑云压城。维多利亚睡得很沉，一直到上午8点45分才起来。她开心地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了。她看着窗外的黑云，坐在桌前给她的新郎写了一封信：

> 亲爱的，——你今天好吗，睡得香吗？我今天休息得很好，感觉很舒服。天气好糟啊！不过，我相信雨会停的。当你，我亲爱的新郎，一切准备好时，给我传句话。你忠实的维多利亚。[11]

维多利亚一动不动地站好，小心翼翼地扣上白色绸缎婚纱的扣子，婚纱绣着蕾丝花边，还有长达6码的拖裙，拖裙的边缘镶嵌着香橙花。

她的双手略带颤抖地在耳垂上戴上土耳其钻石耳坠，并在脖子上戴上钻石项链，随后在胸前别上阿尔伯特送给她的蓝宝石胸针。她伸出脚，让女仆帮她将精致的白色绸缎鞋的丝带系在脚踝上。她的低领婚纱显露出洁白光滑的胸脯，长发从中分开，在头部两侧扎成两个发髻。

维多利亚的衣着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为的是展现她的爱国主义姿态。婚纱的布料来自伦敦丝绸工业的传统中心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两百名来自德文郡的蕾丝制作工人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制作而成。制作完成后，设计图纸被销毁，以防止有人抄袭其设计样式。她的手套是在伦敦由英国儿童缝制而成的。为制作她的婚纱，维多利亚委托制作了大量手工制作的霍尼顿式蕾丝花边，为的是复苏风雨飘摇的蕾丝行业（机器制造的蕾丝花边复制品一直在损害这一传统行业）。她站在镜子前看着倒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头上戴着简朴的香橙花和长春花冠。在肖像画中，她看起来既年轻又苍白，既焦虑又出神。

女王曾要求，其他人不得穿白色衣服参加她的婚礼。有些人曾将她的颜色选择错误地解读为一种性纯洁的暗示——正如阿格尼丝·斯特里克兰（Agnes Strickland）[12]后来所说，她的选择不是打扮成“一个服饰华丽的女王，而是穿上无瑕的白色婚纱，就像一个纯洁的处女一样去见自己的新郎”。[13]维多利亚之所以选择穿上白色婚纱，主要是因为这种颜色能够完美地凸显精致的蕾丝花边——当时，白色还不是新娘的传统色彩。在掌握漂白技术前，白色是一种罕见而昂贵的颜色，更多的是财富而非纯洁的象征。维多利亚不是第一个穿白色婚纱的人，但她通过示范作用让白色流行了起来。英格兰各地的蕾丝花边制作工人都对自己的手艺突然极受欢迎感到兴奋不已。

随着维多利亚走向她的金色马车，人群变得喧闹起来。她一直没有抬头，“匆匆地环视一周以及头部的微微倾斜是她给出的唯一的谢意表

达”。[14]

如注的雨水和狂暴的大风让“为数众多”的祝福者们打消了出门的念头，但公众的参与热情却丝毫不减。[15]很少有事情能够像王室婚礼一样牵动英国人的心，而伦敦的兴奋情绪已经酝酿了好几周。《讽刺家报》（*The Satirist*）抱怨说：“我们都变得如痴如狂。人们的所听所想除了白鸽和丘比特、凯旋门和白色装饰，以及组合灯和全面照明外别无其他。”[16]专爱唱反调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一如以往涉及王室活动时一样，不耐烦地对于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大惊小怪而感到疑惑不解：“可怜的小家伙。”[17]（他说，即使身在远处，他也能准确地看出那名深受托利党人憎恨的女子有着“顽固而倔强的脾气”。）

尽管如此，在媒体长达一年的嘘声、骂声和抨击后，伦敦似乎再一次爱上了女王。有些人甚至痴情不已。维多利亚身后总有一群滑稽而执着的跟踪狂，有些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婚礼感到相当难过。有几个人的决心十分强烈。一名充满深情的男子经常站在肯辛顿宫的大门外，每天当她的马车经过时，他都会跟在后面。另一个名叫内德·海沃德（Ned Hayward）的男子持续不断地给内政部写信，寻求向维多利亚求婚。他最后试图拦下她的马，亲手给她递上了一封信，但旋即遭到逮捕。另一名绅士相信自己才是合法的国王，而维多利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主妇，因此爬上温莎城堡的大门，宣称：“我以英格兰国王的名义要求进入这座城堡。”[18]

王室婚礼引起的激动情绪无处不在，甚至连查尔斯·狄更斯都跟朋友开玩笑说，他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他在写给古怪诗人沃尔特·萨维奇·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的信中写道：“陛下的婚礼已经让这里的社会变得精神错乱，我要遗憾地说，我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女王。”[19]在婚礼结束三天后，狄更斯假装成维多利亚的追求者之一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

> 周二那天，我们一同外出远足，来到温莎附近，绕着城堡漫步了一番，看到了城堡的走廊和房间——甚至是那个特别的房间……房间里亮着红色的温馨光芒——显露出无比的喜悦和幸福——而我，你谦卑的仆人，在漫长的步行中躺在路边的泥土里，拒绝所有安慰。[20]

那个朋友打趣说，狄更斯回来时“口袋里装满了女王的肖像”，他“还偷偷抱着肖像流泪”。

* * *

人群在潮湿的天气中聚集起来，等待着能够一瞥新娘的模样，他们的身上骄傲地别着婚礼纪念章。从宫殿到教堂的泥泞道路两侧，警察紧紧地排成两排，努力地将吵吵闹闹的围观人群向后推。窃贼们此时开始在伦敦的街巷和后院里行偷鸡摸狗之事，因为警察们一整天都无暇顾及他们。与此同时，在从宫殿到教堂的道路沿线，许多树枝都因为无法承受趴在其上的人的重量而被折断。

抵达圣詹姆士宫红金相间的皇家教堂后，维多利亚径直来到了自己的牵纱者身边，她们全都穿着由她亲自设计的白色长裙，耐心地等待着。她给了她们每人一枚老鹰形状的绿宝石小胸针，作为勇气和力量的象征。阿尔伯特在圣坛前等待着，一身鲜红的修身制服上装点着英国最高骑士勋位嘉德勋位的项饰和星章，看起来帅气无比，他蓝色的眼睛凝视着一步步向他走来的娇小而严肃的新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大多数人一样，觉得阿尔伯特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帅气的青年”[21]，她说，在婚礼期间站在维多利亚不远处的勒费夫尔夫人（Mrs. Lefevre）提到说，她仪态端庄、口齿清楚，但她头上的每一朵香橙花都在颤抖，脸上看起来十分苍白，眼睛也泛着红，看起来就好像一夜没睡似的。但她签起名来就像一头狮子一般，而且很担心阿尔伯特王子会显得过于强势，每次他要犯错之时，她都会碰一下他的胳膊肘，告诉他在哪里签名，并在他把戒指戴错手指时纠正他。婚后她就放松了许多，看起来相当幸

福。[22]

翌日，维多利亚唯一想要纠正的是所谓她在婚礼上哭泣的报道：“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23]她曾长期接受训练，知道如何保持沉着、镇定，不打算被视为一名情绪不稳定的女王。

* * *

婚礼结束后，新婚夫妇抽空在维多利亚的房间里一同度过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回到婚礼宴会现场面对众人。维多利亚将一枚戒指戴在阿尔伯特的手指上，阿尔伯特则说，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任何秘密。（23年后，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从未有过任何秘密。”[24]）维多利亚随后换上了另一件天鹅绒边的白色长裙，戴上了一顶宽边软帽——一顶她可以藏在里面的帽子。

宴会是一个融合了颔首、屈膝、欢笑与握手的喧嚣场面。新婚夫妇最终在下午4点离开宴会，随着阳光开始穿透云层照射到地面，他们轻装简从地离开了宴会现场，陪同他们的除了三辆马车，还有许多沿着道路一边奔跑、一边欢呼的人。格里维尔抱怨说，他们坐着老旧马车“可怜而寒酸地离开”，但女王并不在意；太阳将天边的云朵烧得通红，随后坠入一片黑暗之中，一切就“只剩我和阿尔伯特独自待在一起，太令人高兴了”。[25]这将是她婚姻中反复奏响的一段副歌：她最想要的始终是与阿尔伯特独自相处。

在经历三小时的旅途后，这对筋疲力尽的新婚夫妇抵达了温莎城堡。维多利亚头很疼；她换了身衣服，躺在沙发上，脑海中闪现着这混乱一天的每一幅图景。在她休息时，阿尔伯特弹起了钢琴。这里比伦敦清净多了，真令人感到安慰。她回想起过去的几个小时：墨尔本竭力忍住眼中泪水时脸上的表情；阿尔伯特将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以及仪式完毕的幸福时刻；前往教堂的道路两边此起彼伏的脸庞；以及在宫殿中

浓浓的善意、震耳的掌声和阿尔伯特身着制服的优雅形象；他们驾车回到温莎城堡时伊顿公学的男孩们的疯狂欢呼；以及婚礼的庄重程度。她在日记中写道：“婚礼仪式十分壮观，既精美又简朴。我认为这应当能够给每一个在圣坛上立誓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他们决心永守自己的誓言。”[26]

不过，对于婚礼，她最喜欢的一点还是，当他们站在大主教面前时，大主教仅仅以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来称呼他们。她越来越开心地想到，在余生中，对她的阿尔伯特而言，她都仅仅是维多利亚而已。她不是什么女王或者统治者，仅仅是一个妻子和爱人。她翻过身，看着自己丈夫的手指在钢琴琴键上跳跃，弹奏着他自己创作的曲子。阿尔伯特抬起头看到了她，然后来到她身边，亲吻了她。晚上10点20分时，他们回到卧室，正如维多利亚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当然是上了同一张床。”[27]她躺在他的身边、他的臂弯、他的胸前，在黑暗中聆听着他的耳语，笑容爬上了她的脸庞。

在经历了几乎无眠的一夜后，维多利亚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她静静地躺着，在晨曦的光线照射下凝视着阿尔伯特的脸庞，对他和他洁白的脖颈感到惊讶不已，在此之前，她只简单地撇过几眼他的脖颈。他“有如天使般美貌”。这种让她难以想象的亲密感令她感到既满足又兴奋。对她而言幸运的是，宫廷中在王室夫妇首次爬上同一张床时进行围观的可怕传统已经在乔治三世时期过时了。她还感到幸运的是，阿尔伯特似乎是一个合格而温柔的爱人。维多利亚的新婚之夜是她记忆中最接近极乐的时刻。她的兴奋之情在日记中简直难以掩饰：

> 我从来、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夜晚！我最亲爱的阿尔伯特坐在我身边的脚凳上，他极度的爱恋和情感让我感受到了此前从未奢望过的天堂般的爱情和幸福。他将我拥入怀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亲吻彼此！他的美颜、他的甜蜜和温柔，——真的，能够有这样的夫君我感到庆幸至极！噢！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28]

这是一种充满欲望的魅力。吃早餐时，维多利亚凝望着他，再一次注意到他黑色天鹅绒外套下没有系领巾，“美得令我难以言表”。翌日，她又发出了超越世俗的惊叹：“已经是我们婚姻的第二天了；他的爱和温柔超越了一切，亲吻那可爱温柔的脸颊、将我的双唇放在他的双唇上，简直是天堂般的极乐。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纯粹、更加超越世俗的情感。噢！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她最喜爱的恰恰是微小而亲密的举动：当阿尔伯特为她穿丝袜时，或者当她看着他刮胡子时。他躺到床上她的身边，一遍遍亲吻她；他们相拥着入眠。当墨尔本勋爵对她说，她看起来“气色很好”时，她回答说，阿尔伯特的“善良和爱恋”“超越了一切”。在那些日子里，她日记中写到了阿尔伯特的触摸和他英俊的外表，同时还忠实地记录了她与M勋爵每一次谈话的主题和内容。

历史学家们一直都承认，维多利亚有着旺盛的性欲——有些人甚至暗示说，她是某种性爱狂魔，吞噬了一个宽容但筋疲力尽的丈夫。毫无疑问的是，她极富激情，这一事实经常与维多利亚让人产生的联想——阴沉的老妪和清教徒式的责难——产生激烈冲突。鉴于对当时女性而言性行为有多么令人苦恼——避孕和流产措施有限，也没有无痛分娩措施——维多利亚与丈夫之间恣意而大胆的肉体欢愉着实不同凡响。

在19世纪，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拥有强烈性欲的女性都是病态的：女性的欲望被认为十分危险，容易引起巨大争议，人们还认为女性的动物本能会压垮她们脆弱的意志，让她们失控。[29]那些梦想、考虑或者实施所谓过度性行为的女性被人称作“女性癔者”。有些女性被迫接受了阴蒂切除术，或者在会阴部被放置了医用水蛭。其他人则被告知要避免食用肉类以及饮用白兰地，要使用护颈枕、用硼砂来冲洗身体、接受冷水灌肠，或者严格遵守素食要求等。1886年时，一名医生在报告中说，最有可能成为“女性癔者”的人是处女、寡妇或者16至25岁的金发女性。[30]这种推断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学界十分盛行。

大多数女性疾病都被认为源自令人烦恼的盆腔内器官。女性器官方面知识的最重要来源被认为是男性妇科医生，而他们让女性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秘密，或许对他们自己来说尤其如此。［1858年的《医疗注册法案》（Medical Registration Act）明令禁止女性成为注册医师。[31]］对女孩实施性教育简直不可想象。英国医生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曾撰写了多本有关自慰的书籍，他甚至指出，有些已婚夫妇的知识贫乏到他们在婚姻中从未有过性行为。[32]［你不得不为阿克顿的妻子感到一丝同情，因为他曾在1857年宣称：“大多数女性（对她们来说再好不过）都不会受任何性情感困扰。”[33]］许多女性都试图避免进入性高潮，因为她们被告知这会导致怀孕。[34]罗伯特·泰特（Robert Tait）于1877年写道：

> 大部分女性在结婚时对于婚姻的功能仅有十分模糊的认识……在我们英国的生活方式中，对待这些课题总有一种虚伪的谦逊态度，其代价是女性要为此承受诸多痛苦。[35]

对许多已婚女性而言，性行为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无法令人享受其中。[36]鉴于当时对女性身体的无知，维多利亚对性快感的满足是真正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阿尔伯特没有记载过他对性行为的看法，但很明显，他能够让妻子感到满足。而且他显然非常爱慕她，因为他曾在给哥哥的信中赞许地写到她广受称赞的胸部。仅仅在婚礼举行前的几个月，他曾对埃内斯特辩解说，维多利亚“变得漂亮多了”，在前一晚的晚宴上看起来十分可爱：“她穿着一件低领长裙，丰满的胸部在胸前玫瑰的映衬下将长裙撑得凹凸有致。”[37]

尽管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的关系情真意切，明显享受着强烈的肉体欢愉，维多利亚也毫不怀疑自己是阿尔伯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性伴侣，但仍然有人猜测阿尔伯特是一名同性恋。与阿尔伯特同时代的人之所以对他感到怀疑，是因为阿尔伯特对于伦敦各式美女的魅力似乎完全免疫，他甚至经常忘了她们的名字；他从来不与其他人调情，也对美貌

不甚留意。斯托克马说，阿尔伯特只不过是在异性身边时“太过冷淡、太过拘谨了”，他还说，“他总是更容易与男性相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说的没错。[38]阿尔伯特很爱他的妻子，但无论是从社交还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他都更喜欢男性同伴。[39]这种偏好对作为政客夫人的克拉伦登夫人（Lady Clarendon）来说再明显不过了，她千方百计地想要在晚宴上与他对话，却注意到唯一能跟他对话的女性只有王室成员。[40]尽管他并不喜欢当时作为惯例的餐后品波尔图葡萄酒活动以及男性之间的玩笑——通常他会离开去独自下棋或者与维多利亚一起唱二重唱——但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是男性。在年满18岁时，阿尔伯特曾开玩笑地向斯托克马保证说，他会“给予姑娘们更多关注”[41]。

没有证据表明阿尔伯特曾与男性有过肉体关系，但许多人怀疑他有过。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曾说，阿尔伯特之所以没有步他父亲的后尘走上出轨之路，有两个可能的原因：要么是因为他“独特的成长方式”，要么是因为“一种更为根本的特质”，即“对异性的显著反感”[42]。其他人则指向他在波恩大学与许多男性结下的友谊[43]，以及他与克里斯托夫·弗洛舒茨（Christoph Florschütz）之间的亲密关系，后者是一名颇有天赋的学者，曾与阿尔伯特和埃内斯特共同住在阁楼的小房间里长达15年之久。阿尔伯特将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归功于弗洛舒茨，而不是他的父亲。由于母亲的缺位，他对这位家庭教师的强烈情感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44]有些人还指向19世纪许多男性学院内的同性恋文化，这些学院包括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学院以及像伊顿公学这样的公立学校，没有理由认为波恩大学会是个例外。一些在当今会被认为是同性恋的亲密行为——例如激情地宣誓爱意、同床共枕以及亲吻——当时不会被人贴上这样的标签。

对阿尔伯特性取向的讨论永远也不可能超越猜测的范畴。他和维多利亚有着亲密而美满的婚姻，维多利亚也是对阿尔伯特的记忆的首要捍卫者和创造者。在他还在世时，没有人真正对他有过流言蜚语，当时，

同性恋并不被人认为是一种身份认同，而是一种人们会偶尔涉猎的东西，通常是青少年以及刚成年的男男女女会去涉猎。据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将同性恋归类为一种身份认同的做法一直到1870年才出现。[45]

而且，最重要的是，阿尔伯特从未正眼看过或者爱慕过其他女性的事实正是他身上最令维多利亚喜爱的特质之一。这让她感到安全而保险。这也是对那些绕着王室团团转的万众瞩目、自命不凡的女人实施的卓越复仇。她曾开心地对墨尔本说，“阿尔伯特不太在意美女，而且十分讨厌那些备受宠爱的美女，总是想刁难一下她们”。[46]当墨尔本暗示说，那种对女人的兴趣会在未来某个合适的时候到来时，维多利亚爆发了一阵怒火。她怒气冲冲地说，说这种话很愚蠢，“我不会原谅你的”。[47]不过，第二天，她还是原谅了他。墨尔本向她道歉，表示他所指的仅仅是阿尔伯特的腼腆性格。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婚姻是近代史中最伟大的浪漫故事之一。它真挚、深情且成果丰硕。他们共同开启了一个君主制从直接权力转变为间接影响力的时代，以及君主制从作为贵族政治的结果变成作为中产阶级象征的时代。他们重塑并提升了君主制的声望，保护其免受革命的威胁，而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英国备受赞颂的时代，欧洲许多国家的贵族和王室都被革命所推翻。阿尔伯特的影响力将在日后短暂地超越他的妻子，但在寿命、活力和意志力方面，他都不如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将一鸣惊人，维多利亚则将颐养天年。

维多利亚在生育9个子女的过程中让阿尔伯特可以自由地在她身边一同工作，并很快发现聪明过人、思维活跃的阿尔伯特有着诸多好处。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她总共有大约80个月处于怀孕状态——总计超过6年，从分娩中恢复的时间甚至更长。在这段时间，她得以将工作完全交给一个杰出而深受信赖的助手。但她的丈夫不打算成为一个居于

从属地位的伴侣，而这也引发了他们婚姻中最激烈的争吵。早在孩提时代，阿尔伯特就已经表现出“对于受女性管制的强烈厌恶”[48]。而他迎娶的是掌管着一个帝国的女人。随着他和维多利亚踏上婚姻生活，双方都试图在这段关系中坚持自己的意愿，从传统上来说，这应该是最不平等的一段关系：丈夫与妻子、君主与配偶。在他们的情况中，配偶手中握有一张王牌：他永远也不必怀孕生子。

---

[1] January 31，1840，Buckingham Palace，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68-69.

[2] 在婚礼前的几周里，维多利亚至少有两次与墨尔本提起这一话题。第一次记载于1840年1月19日的女王日记中：他们“谈及阿尔伯特不喜欢贵妇们”，M勋爵说：“如果能够保持的话的确很好，但这种情况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下去。”维多利亚“责骂了他”。第二次是在1月23日：“我对M勋爵说，我跟斯托克马说了M勋爵在这里以及在温莎对我说的话，也就是有关A不容易保持的崇高原则的问题，斯托克马回应说，一般而言这种说法没错，但他认为A不是这样的人。”

[3] 来自诗歌《加冕与成婚》，发表于王室婚礼的5天后。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7，1840.

[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8，1840.

[6] January 31，1840，Buckingham Palace，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68-69.

[7] Warner，*Queen Victoria’s Sketchbook*，92.

[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5，1839.

[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7，1840.

[1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7，1840.

[11]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73

[12] 英国历史作家兼诗人。——译者注

[13] Strickland，*Queen Victoria*，209.

[14] *The Times*，February 10，1840，5.

[15] *The Observer*，February 10，1840，3.

[16] *The Satirist*，February 9，1840，引自 Plunkett，*Queen Victoria*：*First Media Monarch*，135。

[17] Thomas Carlyle to Margaret A. Carlyle，February 11，1840. doi：10.1215/lt-18400211- TC MAC 01；*CL* 12：40-42，carlyleletters. duke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12/1/lt-18400211- TC MAC 01.

[18] Williams，*Becoming Queen*，339.

[19] Forster，*Life of Charles Dickens*，1：145.

[20] House and Storey，*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2：25-27.

[21] February 14，1840，to Parthenope Nightingale，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411.

[22] McDonald，*Florence Nightingale's European Travels*，623.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40.

[24] Longford，*Queen Victoria*，143.

[2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40.

[2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40.

[2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40.

[2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40.

[29] 女性的性欲被认为是尤为危险的：当时观点认为，女性很容易被性冲动的力量所控制，因为她们更接近自然，因此也比男性更加不稳定、不理智。一名医生在1887年说："当她们受到感动并且变得兴奋时，尽管本意不是要犯罪，但她们还是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 Groneman，"Nymphomania，" 353.

[30] Groneman，“Nymphomania，”，340.

[31] 即使是自认为思想开放的女性也难以接受女医生的概念。男性在将自己塑造为道德和科学权威方面成效卓著，以至于任何寻求将自己置于该角色之中的女性都被认为是男性化或者是中性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作为护士被人称赞的，因此也被接受为一名养育者；但曾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治疗过许多病人的玛丽·沃克医生（Dr. Mary Walker）却被人嘲笑为怪胎。有一个例外是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她在美国取得了行医资格，因此得以在英国作为一名医生行医。

[32] “我见过的处女膜从未破损的案例远远称不上罕见。”“关于性交的无知和错误观念。”（1865）in Acton，*Functions and Disorders*，89.

[33] Tosh，*A Man's Place*，44.

[34] Mason，*The Making of Victorian Sexuality*，203. 梅森写道，19世纪的许多女性都害怕性欢愉，因为她们认为性高潮会导致怀孕。许多全科大夫都读过科普兰的著作，科普兰曾写道：“社会中各阶层的女性都普遍认识到，性交过程中的冷淡或者说对性高潮的抑制可以防止受孕，而且尽管她们在这方面会受到欺骗，但她们的这种推断大体上是正确的。” Copland，*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Medicine*，374.

[35] Tait，*Diseases of Women*，36，41，引自 Jalland and Hooper，*Women from Birth to Death*，222。

[36] 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写道：“大量证据显示，对过去的已婚女性而言，性是一种纵贯一生需要顺从而令人反感地负担的累赘，而不是快乐的源泉。” *A History of Women's Bodies*，13.

[37] August 22，1840，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24.

[38] Stockmar，*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2：7.

[39] 阿尔伯特在1838年给儿时好友勒文施泰因—韦特海姆—弗罗伊登贝格的威廉王子写信说，“我相信，我们［在大学里］一起度过的时光，一部分是从事有用的工作，一部分是进行愉快的交际，将永远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尽管我们之间有过无拘无束的亲密［*Ungenirheit*］也搞过许多恶作剧，但我们之间永远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和谐。我们的冬季音乐会——我们的小剧场——我们去费努斯贝格（Venusberg）的远足——游泳学校——击剑场——多么令人愉快啊！我都不敢去回

忆这些事情。” Grey，*The Early Years*，154.

[40] 来自克拉伦登夫人1841年7月21日的日志节选：“今天晚宴时，我坐在阿尔伯特亲王身边，但跟他相处不来。他温柔有礼貌，但不怎么说话。我相信他跟男人是说话的，但似乎从不和女人说话，除了王室成员外。他似乎与比利时王后相处甚欢，后者就坐在他的另一侧。”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1：221.

[41]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57.

[42] Strachey，*Queen Victoria*，136.

[43] 有些人曾指出，阿尔伯特有可能在19世纪30年代在波恩大学求学时就建立了依恋式的关系，尽管这仅仅是传言，没有证据。当时大学里普遍的同性恋关系得到了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在英格兰。罗纳德·皮尔索尔强调说，对许多高年级的人而言，“同性恋经历是一种惯例而不是特例”。（Pearsall，*The Worm in the Bud*，452.）到1895年，编辑威廉·斯特德也对此表示认可，他在奥斯卡·王尔德的案件结束后在他的《评论回顾》杂志里写道：“如果每一个犯下奥斯卡·王尔德之罪的人都要被投进监狱的话，那么从伊顿、哈罗、拉格比和温彻斯特到潘顿维尔和霍洛韦等监狱的移民数量将令人震惊。在那之前，男孩子们在公立学校里将可以自由选择性倾向和习惯，而他们将在未来因为这些习惯和倾向被判处苦役。”（Pearsall，*The Worm in the Bud*，456.）

[44] 参见吉莉恩·吉尔（Gillian Gill）在《我们俩》（*We Two*）一书中的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负责勘校维多利亚信件的爱德华·本森将阿尔伯特对弗洛舒茨先生的感情描述为“一种混乱而反常的幻想”。（*Queen Victoria*，190.）在40年后的1972年，戴维·达夫表示，阿尔伯特对他的家庭教师产生了“奇怪而反常的感情”，必须被“坚决抑制”。但是，对于这种说法，仍然没有什么证据。莫妮卡·夏洛特在1991年写道，阿尔伯特“毫无疑问迷住了”弗洛舒茨，如果达夫所言非虚的话，那么这件事“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反常之处，鉴于他母亲的离开以及弗洛舒茨监督两名男孩的学习长达15年之久的事实”。然而，夏洛特没有暗示这其中存在同性恋关系。（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154.）

[45] “同性恋”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是在查尔斯·吉尔伯特·查多克（Charles Gilbert Chaddock）1895年翻译的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著作《性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中，这是一本研究性行为的著作。“发明同性恋”的国家这一称号被授予德国，部分是因为那里的政客感觉有必要在19世纪00年代中期用“反鸡奸法”来压制同性之间的感情。Beachy，“The German

Invention of Homosexuality.”

[4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2，1839.

[4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4，1839.

[48] Grey，*The Early Years*，42.

12 仅为夫君，而非主君

［承认］一个重要事实［可以让婚姻成功］——那就是你的丈夫作为男性具有优越性。很可能你的天赋更高，学识更加渊博……但这与你作为女性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你的地位总是要比男性要低，而且必须如此。[1]

——萨拉·埃利斯，《英格兰妻子》（*The Wives of England*），1843年

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我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但要想给我的地位增加足够的尊严，难度在于我只是个丈夫，而不是家中的主人。[2]

——阿尔伯特亲王写给勒文斯泰因（Löwenstein）的威廉王子的信，1840年5月

手枪发出一声巨响。人们纷纷转过头来，而拉着马车的马匹在惊吓中停了下来。步道上站着一个矮小纤弱的少年，双手各拿着一把手枪，眼睛直直地盯着女王。这是1840年6月10日，一个多云、温和的周日下午。人们或是步行或是骑马在公园里闲逛，这时正好奇地注视着路过的王室马车，每逢周末的这个时候，王室马车总是会在这条从白金汉宫通往海德公园的道路上驶过。阿尔伯特注意到了一个“面相凶恶的矮小男子”，他先是在胸前抱臂，随后拔枪就射。阿尔伯特抓起妻子的手，喊道：“上帝啊！别害怕！”

维多利亚笑了笑。她以为是有人在公园中射鸟。“我安慰他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情况确实如此。在第一声枪响后，我从未想过，他也没想过，枪声是冲着我来的。”[3]但事实确实如此。持枪男子的名字叫作爱德华·奥克斯福德（Edward Oxford），来自伯明翰，是一个失业的酒吧招待，有着模糊的革命梦想。他一身体面地穿着棕色礼服大衣、浅色长裤和丝质马甲背心。他静静地站着，一双深邃有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对王室夫妇。

第二声枪响划破空气。维多利亚急忙躲避，这一次，子弹从她头顶划过，嵌进了对面的马车内壁上。阿尔伯特下令车夫继续前进，与此同时，围观者抓住了奥克斯福德，并将他扭送到了警察局。桀骜不驯的维多利亚继续乘车沿着宪法山路一路前行，中途还在她母亲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Belgrave Square）的住处停了下来，告诉她发生了什么。这对已经结婚四个月的年轻夫妇选择了一条较为舒适的道路穿越海德公园回到白金汉宫，好让维多利亚“呼吸一下空气”，并且“向公众展示，鉴于此前发生的事件，我们没有对他们失去信心”[4]，阿尔伯特后来是这么对他的祖母说的。第二天的报纸上对维多利亚的冷静一片赞颂之词。

等到女王与阿尔伯特乘坐敞篷马车返回白金汉宫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伦敦市民蜂拥而来，他们脱下帽子，高喊着支持女王的话语。此前在公园中骑马的绅士与淑女们自发地组成了一支队伍，围在女王的马车周围，护送她回家。她在日记中写道，那就像是一场“胜利游行”[5]。不过，当她终于返回卧室时，维多利亚面色苍白、全身颤抖地坐在床上，第一次展现出了她的脆弱。阿尔伯特拥抱并亲吻了她，称赞了她的勇敢。维多利亚知道，她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她写道：“我们死里逃生，真的是幸运。”后来，阿尔伯特向她展示了那两把“差点把我干掉”的手枪。她在当天日记的结尾写下了一段感谢祷告，然后蜷缩着身子紧紧地靠在阿尔伯特的身边，竭尽全力不去想原本可能发生的糟糕结局。上帝拯救了女王，民众日益汹涌的同情浪潮将前一年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丑闻和寝宫危机所留下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一扫而空。

在枪击未遂事件后，维多利亚在那年夏天仍然不断乘坐敞篷马车在公众场合出现，显露出毫不屈服的样子。她很快就意识到，通过现代领导人所谓正面“曝光”来公开证明自己的勇气能够在臣民中引起强大的反应。她开始理解应当如何表现——不仅仅作为一名女性和女王，还作为国家的象征——她应成为大英帝国的化身，知道如何统治国家，如何领导人民。利奥波德国王在听说这一事件后匆忙在拉肯宫（Laeken）给维

多利亚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说：“毫无疑问，你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将会给人留下非凡而良好的印象。”[6]如今，她知道了象征性力量的重要性。

在脏乱破旧的伦敦萨瑟克区，警方正在搜查爱德华·奥克斯福德的卧室，以寻找他的动机。他们找到了一把剑、一顶带有蝴蝶结的帽子、子弹、火药以及一些属于“新英格兰”俱乐部的文件。最关键的线索似乎是一份备忘录，暗示他是受“某些来自汉诺威的重要信件”的怂恿才采取行动的。[7]这引发了一些公众恐慌：维多利亚那位受人敬畏的叔叔——曾遭到恶意中伤且脸上留有疤痕的前坎伯兰公爵，即如今的汉诺威国王——是否正试图在女王诞下子嗣前将其杀害，好以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继承英国王位？奥克斯福德手中挥舞的银色手枪上刻着“ER”字样，有些人猜测这两个字母指的是埃内斯图斯·雷克斯（Ernestus Rex），即汉诺威国王现在的名字。[8]不过，所有文件似乎都是由奥克斯福德本人手写的；仅仅是一个诡计而已。[9]

在警察局中，那名被墨尔本勋爵称作“宵小之徒”的男子“正在充分享受自己受到的关注”。在被问话时，奥克斯福德表现得桀骜不驯、泰然自若、洋洋自得，时不时地还大笑两声。他迫切地想要知道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对他的袭击做何反应。在被告知他们两人丝毫没有受到惊吓时，他耸了耸肩，胡言乱语地说：“噢，我知道的恰恰相反；因为在我开第一枪时，阿尔伯特正打算从马车里跳出来，已经伸出脚了，但当他看到我掏出第二把手枪后，立刻就缩了回去。”[10]

利奥波德也对这起袭击感到惊讶不已；不仅仅是因为维多利亚一直是一个十分开明的君主，而且“我觉得你光是自己的女性身份就足以防止这类懦夫行为了”。[11]事实上，奥克斯福德表示，正是因为维多利亚是女性，才使得他想要刺杀她的。他对警官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自己认为一个像英格兰这样伟大的国家不应由女性来统治。[12]奥克斯福德被

控犯有叛国罪，并被押往新门监狱，后来被送往一家疯人院，他在那里待了27年后移民至澳大利亚。[13]

在1840至1882年间，先后有7个人试图刺杀维多利亚：他们之中有无业青年，有一个家具木匠，一名酒吧招待，一名农业劳动者以及一名前军官。他们所有人都曾短暂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随后消失无踪。他们所有人都很古怪，部分人精神错乱，也有部分完全清醒，大部分都被送往了澳大利亚，当时，那里是负责关押英格兰囚犯的偏远监狱。有人认为，之所以突然出现了一阵针对一名年轻而有权势的女性的袭击狂潮，其原因在于一种奇怪而具有传染性的“被爱妄想症”[14]，那些幻想自己是女王情人的男子“因不断地失望而变得嫉妒”。在1842年的第二次刺杀企图后，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于“这种公众对枪杀女王的奇异狂热情绪”的困惑。

> 我感到非常愤怒……谁刺杀过乔治四世？连我都没有过——麻雀说。可怜的维多利亚！别管冷静不冷静的了，现在正暗流涌动——她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女人！——而且，她很清楚，即使是在那些责难她最为严厉的人中，也没有人说过她不愿按照自己的理解造福自己的人民。结果，——那些在她统治下喜欢玩弄手枪的小男孩们把她当成了活靶子！这简直糟糕得不能再糟糕。我听说，现在有人会带着兴奋之情去看着可怜的女王乘车离开白金汉宫，想要看到她被人射击：每天大门口都有很多人！[15]

维多利亚对每一起袭击的反应都是一致的：她既桀骜不驯又勇敢无畏，但内心里却颤抖不已。为什么有这么多精神错乱的男人想要娶她、征服她或者枪击她？甚至连拥有至高权力和特权的女王也无法免受暴力的威胁。

在那个6月的下午，阿尔伯特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未出世孩子的安危。当爱德华·奥克斯福德枪击维多利亚时，她已经有近4个月身孕了，这让她的勇敢无畏显得更加令人惊讶。当时，人们对于母体影响有一种迷信——影响孕妇情绪或者精神的事件有可能伤害她们腹中

的孩子，让他们变得畸形或者精神错乱。［被人称作“象人”（the Elephant Man）的约瑟夫·梅里克（Joseph Merrick）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令人揪心的“怪胎”之一，他的传记就用了这一理论来解释他的畸形：他的母亲在怀他时受到了一头大象的惊吓和踩踏。他所患有的这种仍然十分神秘的遗传疾病——据信是多发性神经纤维瘤或者普罗透斯综合征——实际上与他母亲的子宫没有任何关系，但这种想法贯穿了象人悲惨的一生。维多利亚每年都会给他寄去一封手写的信件。[16]］

不过，维多利亚真正也是更为现实的担忧并不是母体影响，而是产妇本身的性命安危。据保守估计，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因分娩而死的女性比例约为千分之四至千分之五。[17]几个月前，她曾写道，怀孕并生下许多孩子是“我唯一害怕的事情”。产妇的死因主要是产褥热，尽管医生会开具大量鸦片酊和白兰地制剂，但这种病是没治的。当女性医学会（Female Medical Society）要求医生不要用在解剖间里被弄脏的手来接生婴儿时，《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对此嗤之以鼻。医生们声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污染，而在于那些死亡产妇的“心理情绪”过度了。[18]深受维多利亚喜爱的堂姐夏洛特的死也让她感到困扰不已，这位曾经的王位继承人正是在分娩时死去的。上层阶级的女性也无法幸免于分娩的危险。1839年时，维多利亚的表嫂、符腾堡的玛丽公主（Princess Marie of Württemberg）[19]在生下一名男孩后去世。

当维多利亚发现自己最大的担忧仅仅在婚礼几周后就成为现实时，她愤怒极了。她对自己的外祖母、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遗孀坦白说：“这正在毁了我的幸福；我一直讨厌这个主意，曾经夜以继日地向上帝祈祷，希望能让我拥有至少6个月的自由，但我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我真的感到非常不开心。我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希望做这件事，尤其是在婚姻刚开始的阶段。”她还说，如果她生下的是一个“讨厌的女孩”的话，会直接把她淹死。[20]

维多利亚热爱自己的婚姻，想要每时每刻陪在她的新郎身边。怀上孩子会打破她刚刚得到的平静。她后来给自己的长女写信说，如果没有怀孕的话，婚姻生活就是“无边的幸福——如果你有一个自己崇拜万分的夫君的话！那就像是提前到达了天堂一样”。[21]有一次，利特尔顿夫人在和维多利亚谈到另外某个人时说出了“像女王般幸福”这个词，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维多利亚说：“没必要纠正自己，女王确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22]这位女王曾穿着睡衣跑到利特尔顿夫人的房间，拽着她去看“最可爱的彩虹”。[23]这位女王曾专心致志地俯身查看郁金香树、天竺葵和蜂后，聆听阿尔伯特向她解释它们有趣的特点。维多利亚不久后就在日记里说，比起伦敦，如今她更喜欢乡村。[24]

维多利亚拒绝任由她圆鼓鼓的腹部造成她生活上的巨变，或者将她标示为一名弱者。在一次舞会上，她带着明显的孕相翩翩起舞，让旁观者震惊不已，霍兰德勋爵觉得，她跳舞的时长一定超过了“护士或者男性助产士”允许的程度。[25]在宴会上，她拒绝坐下，在糟糕天气下，她也拒绝留在室内。她曾对姐姐费奥多拉炫耀说，自己的身体健康得很：“我现在身体非常好。每天我都要长时间散步，有时候还要顶着大风，所以说我还很灵活，不过我必须遗憾地承认，自己的体型是不小了。”在距离分娩还有几周的时候，利特尔顿夫人形容说，她“非常灵活；今天早上10点前外出散步，似乎下定决心要打起精神，没有丝毫怨言”。[26]阿尔伯特在她躺在沙发上时曾给她念书或者唱歌，试图让她静下心来。

维多利亚对待怀孕的坦率态度令她的首席男助产士查尔斯·洛科克（Charles Locock）感到惊讶不已：“她没有丝毫保留，总是时刻准备着表达自己，谈论她的当前处境，而且总是用尽可能最直白的语言。”洛科克相当不喜欢女王的表现，表示她与他公开讨论自己的身体有失矜持。他有失妥当且满怀恶意地向他的女性朋友透露说，维多利亚身体的形状就像是水桶一样：“她将会变得非常丑、非常胖……她身上不穿胸

衣或者任何帮助她限制身材的东西……她看起来更像一个水桶。”一直到此前不久，所有孕妇都必须身穿紧身胸衣的想法才开始渐渐过时，但她们仍然要费力穿上衬裙、长袍以及无袖宽内衣等。[27]

阿尔伯特试图安抚妻子对即将到来的分娩的担忧。细心、体贴、聪慧：阿尔伯特的这些优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王室里的女性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蓝色眼眸、“朴素的品位和乐趣，以及快乐、活跃的脾气”[28]。他被称赞提高了宫廷里的谈话质量，以科学、艺术和园艺等内容代替了通常的闲言碎语。阿尔伯特是一个严肃的人，他鼓励维多利亚与他一起在夜里阅读宪法史，不过他也会逗得她哈哈大笑。他对妻子说，她应当在公开场合像一名舞蹈演员一样微笑，一边说，一边还跳到空中，像跳芭蕾舞一样转了一圈，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而，阿尔伯特并不像受他深爱的女王那样快乐。部分原因在于王室的窒息氛围。他想念自己的家人。王室里的日常对话让他感到枯燥不已，因而他喜欢独自一人下双重象棋（double chess）[29]。他经常在出席音乐会和晚宴时打瞌睡。这些时间对他而言就像是浪费了一般。阿尔伯特想要利用王室的荣耀来邀请并吸引伟大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女王却有些不愿意；这些人让她感到不安。她担心自己受教育水平不高，就像阿尔伯特曾对她说，以及墨尔本曾对安森所说的那样，“她的性格太过直白和坦诚，没法假装自己在这些话题上拥有的知识比真实情况多哪怕一分”。[30]她对于自己的夫君不愿在晚宴后与那些男人一起浪费时间感到很激动，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仅仅是感到十分无聊。

阿尔伯特长期以来一直陷入忧郁之中无法自拔，即使是他的妻子也无法让他摆脱。婚礼两周后，当阿尔伯特的父亲返回德意志时，维多利亚曾看到他在走廊里啜泣；他从她身边擦肩而过，不发一言。她忧心忡忡地悄悄来到他的房间。他转过头来，两眼通红地轻声对她说，她无法理解抛下优越生活与挚爱亲人是怎样的感受。他说的没错——维多利亚

在结婚时对于将她的母亲、康罗伊以及其他烦人的家伙抛在身后感到非常开心。维多利亚后来十分担忧地写道：“只有上帝知道我多么希望让这个亲爱的人儿变得既幸福又满足。”[31]

但是，阿尔伯特想要变得幸福面临的真正障碍是很大的。他有些不耐烦地想要尽快成为事实上的国王。他雄心勃勃、思维活跃，无法接受自己被视为一个装饰性的配偶，而他的妻子徜徉于权力的圣殿。他还想要帮助维多利亚避免再犯登基初期犯下的那种严重失误。他也想要与维多利亚一样站在君主专属的指挥台上。阿尔伯特身边的密友很快就看出了他心中的不平衡。他的哥哥埃内斯特曾说，维多利亚确保“他过上了一种恬静、幸福但缺少光彩和趣味的生活”[32]，与此同时，“她作为女王却走上另一个台阶”。

维多利亚对于这种安排感到非常满意。她知道阿尔伯特想要成为王室之主，也认同这是他应得的位置。她甚至曾在1845年2月——也就是他们的婚姻进入第5年之时——试图为他争取“配国王”（King Consort）的头衔，可惜未能成功。[33]但问题在于，身为王室之主意味着什么？当然，肯定不可能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十分在意保护自己曾为之奋斗的王位，并打算让自己的婚姻与工作保持距离，因而仍然独自会见墨尔本和其他大臣。但阿尔伯特拒绝被拒之门外，也拒绝被降格。在他看来，身为人夫就应该控制妻子的一切事务。他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男人该如何确立自己的自然权威？他在5月给自己的朋友、勒文斯泰因的威廉王子写信说：“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我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但要想给我的地位增加足够的尊严，难度在于我只是个丈夫，而不是家中的主人。”[34]

阿尔伯特最根本的信念是，女性不应成为统治者，至少不应独自成为统治者。他的家乡科堡奉行的是萨利克继承法，坚持要求君主必须是男性；这也是为什么汉诺威的王冠在维多利亚成为女王时落在了下一顺

位继承人坎伯兰公爵的头上（这也使她成为第一位仅作为英格兰君主的汉诺威人）。斯托克马男爵、利奥波德国王和埃内斯特都赞同阿尔伯特的观点。1850年时，阿尔伯特对惠灵顿公爵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填补女王作为女性在履行王室职责时自然而然会留下的一切空隙——持续而忧虑地关注公共事务的每一个方面，能够随时随地就她面对的多种多样的艰难问题提供建议和协助，无论是政治方面、社会方面还是个人方面的问题……将我的时间和力量任由她支配，因为我是她家庭中自然而然的主人、王室的监督者、她私人事务的管理者、她在政治事务上唯一的亲密顾问，以及她与政府官员、私人秘书和大臣之间进行联络的唯一助理。[35]

这是一种极为宽泛而全面的职责。但阿尔伯特的雄心壮志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在19世纪，只有极少数贵族女性拥有比丈夫更多的金钱和权力。大多数女性都是男性的财产，对自己的身体、金钱、财产或者儿女没有任何权利。许多层出不穷的哲学思想都试图为这种现象辩护：女性从本质上说隶属于家庭，她们可以通过生孩子以及不与其他男人睡觉的方式获得部分尊严或者地位。换句话说，也就是成为家中的道德守望者。

这意味着阿尔伯特的这些手腕拥有巨大的文化支持，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都认为女性天生低人一等。约翰·拉斯金在1864年指出，女性的自然状态是“作为妻子受丈夫支配”。他说，女性的力量不是用来统治或者作战的，“其智慧也不是用来发明或者创造，而是用来订购、安排并决定甜点的”。[36]查尔斯·达尔文也对此深表认同，他在1871年写道，自然选择意味着女性不如男性。他承认女性更加温柔，洞察力和理解力更强，也更为无私，但他又补充说：“这些能力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低等种族的特点，因此属于一个过时以及低等的文明状态。”[37]当妻子们承诺服从她们的丈夫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作家萨拉·斯蒂克尼·埃利斯在1843年写道，在结婚之前，女性必须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你的丈夫作

为男性具有优越性”。她将自己的畅销书《英格兰妻子》献给了女王。埃利斯接着说：“很可能你的天赋更高，学识更加渊博，也更受世人尊崇；但这与你作为女性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你的地位总是要比男性低，而且必须如此。”[38]这种毫无逻辑可言的处境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奋力抗争。

但维多利亚受到的教育却是要相信所有这些，而阿尔伯特也怂恿她产生了自己的教育水平和能力不如他的想法。他们婚姻的吊诡之处在于，随着她的爱意和满足感不断增加，她对自己的信心却不断萎缩。她的男性顾问们都说，最好还是让她用家庭生活来满足自己吧。[39]

在结婚3个月后，阿尔伯特终于在当年5月决定直接向妻子提出自己应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在维多利亚21岁生日——据她说，这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个生日——过后，阿尔伯特向她抱怨说，她从未与他一起讨论过政治，甚至连“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没有谈过。维多利亚向墨尔本勋爵坦承，尽管阿尔伯特对于“缺少信任”不太高兴，但她不想为此做出任何改变。墨尔本勋爵在与阿尔伯特的私人秘书安森先生的一次交谈中谈到了与维多利亚的这次对话：

> 她说，这完全是因为懒惰；她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但当她与亲王在一起时，更喜欢讨论其他话题。我的感觉是，女王陛下思维中的主要障碍是担心出现意见分歧，她觉得家庭和睦更有可能通过避免触及那些可能产生分歧的话题来实现。我自己的经验引导我认为，夫妻之间讨论的话题中虽然有可能出现分歧，但谈开了总比避之不谈要强，因为后一种情况肯定会引起相互之间的不信任。[40]

维多利亚生活中的所有男性都支持阿尔伯特寻求更多权力的努力。他们对女王说，要相信他、依赖他、信赖他，甚至连她亲爱的舅舅利奥波德也认为“你不应在任何事情上隐瞒他”。目光敏锐的斯托克马男爵是唯一建议阿尔伯特不要太过着急地追求权力之钥的人。他对安森说，尽管女王的确应该“渐渐向丈夫吐露一切”，但“他想要一步到位的想法存

在一定危险”。危险在于，阿尔伯特可能会因无心或者急于求成而犯错，促使女王不再寻求他的帮助。斯托克马还认为，年轻的维多利亚的问题更多在于知识不足而非懒惰，她仅仅是不太能理解大臣们提出的计划和法案而已。[41]

维多利亚忽略了这些忠恳，仍然我行我素地单独会见她的大臣们，尽管连这些大臣们都开始为她的丈夫感到遗憾了。阿尔伯特仍然未能获准阅览政务文件，或者在女王与墨尔本勋爵谈话时与他们共处一室。她十分讨厌他提出建议或者指导的努力。当满满一盒的政务文件送到她的跟前，盒子上还贴着一张纸条，直言不讳地指示她“立刻签字”时，阿尔伯特替她生起了气，并且让她等个一两天再回复这些文件，不然他们就会把她当成一个小小的官僚了。但是维多利亚却拿起笔，立刻签署了这些文件。[42]维多利亚用了自己的整个童年来挺起自己的脊梁骨，不可能轻易地服从他人的意志。即便如此，她儿时的盟友们如今也开始说起她的敌人们曾经说的那些话了，即她无法充分理解政治，她应该交出控制权。当这些话来自康罗伊时，她可以耸耸肩表示不屑一顾，但当这些话来自她的丈夫时，就令她忧虑得多了。

有一个人从不认为维多利亚应该屈服于阿尔伯特，那就是莱岑女男爵，一个十分善于抵抗的女人。莱岑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她认为阿尔伯特应该扮演与她自己一样的角色：施加影响但身居幕后，这对一个官方职务一直是家庭女教师的女性而言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身份。但在结婚后不久，阿尔伯特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赶走莱岑了。这位女男爵的势力范围得到了拓展：她如今负责管理维多利亚的财务，并担任她的秘书，控制着她的日记并负责处理付款票据。阿尔伯特认为，这位在维多利亚麻烦重重的少女时期坚定地站在她身边的女性，如今对她的控制已经超出了恰当的程度。有一天，利特尔顿夫人与女王一起在阳台上散步时注意到“莱岑夫人的苍白面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情，似乎她感觉到了正在发生什么），她站在城堡的一扇窗户背后，用她一如既往面带

焦虑的微笑、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女王”。[43]莱岑对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对维多利亚来说，这令人安心。但对阿尔伯特来说，这却不是什么好事。

阿尔伯特凭借直觉知道，他没办法通过强迫或者命令来赢得权力，只能通过温柔和关心来做到这一点。随着妻子的腰围在一次次的怀孕过程中先后扩大又缩小，他将鼓励她对自己产生依赖。阿尔伯特尝试了一种战略性的耐心——他将通过意志、智慧，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妻子的劝诱和关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她最终决定给予他他想要和需要的东西。这是一种甜蜜的屈服。

在爱德华·奥克斯福德向怀孕中的维多利亚开枪的9天前，阿尔伯特在他一直辛勤忙碌的反奴隶制协会（Anti-Slavery Society）发表了一番演讲。尽管演讲很短，只有165个单词，但五六千名现场听众发出了高声欢呼，“相对于我在发表演讲前不得不克服的恐惧和紧张情绪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充分的奖赏”。[44]阿尔伯特渴望得到尊重。他对待自己的职责十分认真——而且很快就博得了宫廷的好感。霍兰德勋爵在给格兰维尔勋爵的信中写道：“如今，称赞阿尔伯特亲王成了时尚。”[45]一名曾在晚宴上坐在他身旁的女性饶有趣味地写到他们“十分有趣的对话，对话内容是最重要的话题”[46]：“宗教原则及其对君主的影响和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还谈及祈祷方式、我们关于这些祈祷方式的看法……以及如何管教儿童；谈及战争与和平；以及监狱和惩罚。”作为王夫的阿尔伯特是一个天生的博学者。

阿尔伯特刻意实施的旨在统治英格兰的长期计划并不意味着他对维多利亚的爱有任何减少。作为英格兰女王丈夫的角色是他在孩提时就已经有人替他挑选好的人生道路，这意味着他的婚姻同时也是他的事业，而他对这一点始终保持着泰然自若的态度。他知道道阻且长、“布满荆棘”[47]，但他认定“为某个伟大而值得的目标克服困难总比为了某个微不

足道、毫无价值的目标要好”。在婚礼后的几周里，阿尔伯特的兄长埃内斯特向他们的叔叔利奥波德汇报了他兄弟的进展。在德国档案馆中保存的几封未发表信件中，埃内斯特“报告说，阿尔伯特做了正确的事，毫不犹豫地在一切事务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已经使得王室的所有命令都需通过他来下达，因而他已经成为‘女王表达意志的重要渠道’”。[48]他的孕妻越脆弱、越行动不便，阿尔伯特的官方地位就抬升得越高。

在未遂刺杀后的几个月里，维多利亚身边的男人们开始悄悄地为她死去的可能性做准备——无论是因为枪击、分娩，还是什么意料之外的原因死去。7月2日，也就是枪击事件发生三周后，墨尔本对维多利亚说，他想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的问题——或许维多利亚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其实她不知道。他说：“也就是有关通过一项摄政法案的问题。”1840年7月，当阿尔伯特获得在维多利亚死后执政的合法权利后，他得意扬扬地给哥哥埃内斯特写信说：“我要成为摄政王了——独自一个人——是摄政王，没有委员会的束缚。你会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的，它将让我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增加新的重要性。”[49]墨尔本对维多利亚说，议会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对阿尔伯特良好品格的认可，尽管这意味着一旦英国女王去世，一名德意志亲王就将执掌大权。

当年8月，阿尔伯特亲王在议会休会期间骄傲地就座于维多利亚身边的王座上，因为在此之前，墨尔本已经发现这么做是有先例可循的。当年9月，他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他也因此向斯托克马炫耀说，他的手上拿到了一系列“有趣的文件”。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对维多利亚感到“极为满意”，他略带谦逊地写道：“她只生过两次气……总的来说，她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50]当年11月，就在她产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之前，维多利亚要求将阿尔伯特的名字与她孩子的名字一起加进祈祷文中，并得偿所愿。

但女王并未放慢脚步——在三番五次的怀孕期间，她一直都在辛勤工作。她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当时所谓的“东方问题”上，即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所产生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建立于1299年，以土耳其为中心，在疆域最为辽阔之时，也就是16世纪和17世纪，它横跨南欧、中东、北非、非洲之角以及西亚的大片地区。但是，在经历了连续几十年糟糕的经济增长和无能的治理后，这个连接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庞大帝国已经变得羸弱不堪了：沙皇尼古拉将其称为“欧洲病夫”。英国和法国想要支持土耳其，将俄国拒于地中海之外。但当1839年奥斯曼苏丹去世，他未成年的儿子成为领导人后，埃及的土耳其总督试图将埃及从土耳其分裂出去。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支持土耳其，但法国支持埃及。战争差一点就难以避免，各方最终于1840年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维多利亚对利奥波德国王说，她“给予这些事务最认真的关注”，并且开玩笑说：“我觉得我的孩子除了其他名字外应该也有个与土耳其和埃及有关的名字，因为我们整天考虑的都是这些事……我希望自己做得还不错。”[51]

没过多久，在阿尔伯特的安排下，他和维多利亚各自笨重的木质写字台就被推到了一起，好并肩工作。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前不久，他给自己的兄长写信说：“我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看到一对彼此相爱、心神合一的夫妻。如今，维多利亚也已经准备好为了我放弃一些东西了，而我愿为了她放弃一切……不要觉得我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相反，在这里，虽然王夫的法定地位是这样没错，但我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种了不起的生活。”[52]

1840年11月21日下午，维多利亚的分娩提前三周到来了。她的宫缩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雨点不停地拍击着窗户，令她无法入睡。她叫醒了阿尔伯特，并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承受着剧痛的折磨。（与众不同的是，她后来声称，等到分娩过程开始时，她就一点也不紧张了。）就那个时代而言颇为不同寻常的是，阿尔伯特在她分娩的过程中始终与医

生和护士一起陪伴在身边。隔壁房间里坐着诸位国之重臣、一名大主教、一名主教，以及墨尔本勋爵，他们竖着耳朵仔细聆听着声音，而女王则在大声喘着气，并且竭力不喊出来。［王室总管大臣埃罗尔勋爵（Lord Erroll）后来炫耀说，当时女王的房门敞开着，因此他可以完整清楚地看见女王。］痛苦的分娩过程结束后，一名浑身通红、四肢乱动的女婴被从房间里带了出来，接受检查。她的身体十分健康，但她的父母却对她的性别感到十分失望（他们的许多臣民也是如此）。医生对女王说：“噢，夫人，那是一名公主。”[53]她回答说：“别在意，下一个肯定是王子。”

维多利亚靠着枕头躺在她带有华盖的红木床上，宣称自己已经感觉好多了，她自豪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任由他微笑着轻抚自己的手：“亲爱的阿尔伯特几乎从未离开过我，是我最大的安慰和支持。”[54]不过，没过多久，他就狼吞虎咽地匆匆吃完午饭，冲下楼梯以女王代表的身份出席枢密院会议。她感到如释重负；她活下来了，现在依然活着。外面响起了隆隆炮声。阿尔伯特欣喜若狂。他在同一天既当上了父亲，又当上了女王的代理人。

按照当时的习惯，生完孩子后，维多利亚在床上躺了两周。每天，她的宝宝会在她身处更衣室时被带到她身边两次，而每隔几周，她就要亲眼看一次宝宝接受沐浴。她一直把宝宝称作“孩子”，直到近三个月后，她的孩子才接受洗礼，并得名维多利亚·阿德莱德·玛丽·露易丝。多年后，维多利亚披露说，她一点也不觉得婴儿很可爱，尤其是新生儿，因为他们的四肢骨瘦如柴，而且很容易出现惊吓反射。（她曾经因为说婴儿“像青蛙似的”遭到批评——但这并不仅仅是一句污蔑；任何曾经照料过出生仅几天的婴儿、为他们洗过澡或者朝他们的小肚子吹过气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四肢会以一种名叫紧抱反射的方式伸展。这种样子看起来确实像是脚朝上躺着的青蛙。）正因如此，几乎所有主要的维多利亚传记里都出现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迷思，即女王缺少一切母性本能。

正如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伊冯娜·沃德所说，对维多利亚已发表的信件进行甄选的工作是由两个男人完成的，他们将她与其他女性之间有关婴儿、长牙以及怀孕等问题的信件来往排除在外，认为这些信件没有意义。[55]维多利亚对女儿薇姬所说的极为叛逆和反传统的言辞——即她在自己的9个孩子几乎都已长大成人后所写的有关分娩过程的磨砺和苦难的内容——被引以为据，以证明她厌恶自己的孩子。这些信件透露出一种对生育孩子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抵触——而且这种疼痛对维多利亚来说尤为难熬，因为她生育了为数众多的孩子。她在这些信件中并没有说生儿育女对她的身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她经常提到这一过程的痛苦；对于一个不足5英尺高的身材娇小的女性来说，其影响不会轻微。在这些年里，她的子宫很可能出现了下垂，给她带来极大的痛苦。但她在生育子女之时在日记中写下的话揭示出了她一直被人遗忘的温柔和乐观的一面。

从许多方面来说，维多利亚都是一个十分宠爱孩子的母亲。她的日记里处处洋溢着她对自己孩子的喜爱，显示出她是多么喜欢与他们一起玩耍。在薇姬出生三周后，维多利亚将她称作“我们亲爱的小孩子”，“每天都变得更漂亮”[56]，“她有着又大又亮的深蓝色眼睛以及娇小可爱的口鼻，肤色健康，脸颊处还带着一点色彩，对这么小的宝宝来说非常罕见”。在孩子出生四周后，她写道：“生孩子就像是一场梦一样。”[57]她在1841年初的日记随处可见她的满足之情：炫耀她漂亮的小姑娘，当阿尔伯特在旁边弹钢琴时与薇姬一起玩耍，或者看着阿尔伯特用雪橇推着薇姬在外面转悠。女儿每次试图坐起来或者在她膝盖上跳舞，都会引得她哈哈大笑。她不止一次写道，她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宝宝：“她真是个小可爱。”[58]她一边用一只手臂将她抱在腿上，任由她玩弄小饰物，一边写日记。

1840年圣诞节那天，维多利亚对自己的好运发出了由衷赞叹：“去年今天，我还是个未婚少女，而就在今年，我有了一个天使般的丈夫，

以及一个5周大的可爱女儿。”[59]当薇姬18个月大时，维多利亚写道，她已经“成了我们的小玩具以及一个很棒的宠物，在我们跟她玩耍时总是露出甜美的微笑”。[60]女王与被她昵称为“猫咪”（Pussy）的女儿一起度过的时间超出了他人的预期。利特尔顿夫人在1842年成为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她写道，维多利亚“始终”陪伴在孩子身边，为孩子的成长感到焦虑：“女王与所有年轻母亲一样要求十分严格，从来不认为宝宝取得了足够的进步或者已经足够好了。她始终陪伴在宝宝身边，一刻不停地想着她，并且对亲王的爱也越来越深沉。”[61]

晋升人母对维多利亚来说是一个意外。这个曾经羡慕吉卜赛人温馨的家庭生活的年轻女孩，如今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和睦家庭的核心。阿尔伯特一如既往地温柔、体贴、亲切。女王晚年时曾满怀诗情地回望这段时光，她以第三人称写道：

> 亲王的爱护和忠诚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喜欢在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坐在她［女王］身边，为她阅读，或者替她写字。除他之外没有人曾把她从床上抱起放在沙发上，他也总是会帮忙将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的她推到隔壁房间去。若是为了做这件事，他在宫殿里任何地方都会随叫随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而这件事总是给他带来极大不便；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甜蜜的微笑。简而言之，他对她的照顾就像是来自母亲的照顾一样，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比他更亲切、更聪明或者更明智的保姆了。[62]

从某种角度来说，在维多利亚恢复体力的过程中，阿尔伯特承担起了传统上的女性角色。他是一名温柔的照料者和关怀备至的父亲。他是“猫咪”喜欢跑向的那个人，是会将她举在空中并在房间里跳舞，逗得她咯咯笑的那个人。维多利亚一点也不嫉妒；她也深爱着阿尔伯特，而且当时，母性本能并未得到超过父性本能的赞美和讴歌。他仅仅是一个更具天赋的父亲而已。维多利亚对利奥波德说：“我们的年轻小姐正日益茁壮地成长着……我觉得你要是看到阿尔伯特将她抱在怀里跳舞的样子，一定会忍俊不禁；他是个优秀的照料者（我自愧不如，而且她对我

来说太重了，抱不起来），而且她来到他身边时似乎很高兴。”[63]维多利亚的全部愿望是让她的孩子们变得非常像他们的父亲。

孩子们十分爱戴充满好奇心并且智力超群的阿尔伯特。在“猫咪”两岁半时，阿尔伯特给自己的继母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对身为人夫的热爱：

> 对于看着小孩子的情感和能力不断发育，我有着极大的热情和深刻的兴趣，没有什么比观察小家伙的发展阶段更能增进我们对自身本性的了解了，而当我们自己在经历这些阶段时，似乎从未留意过。每天看着我们的孩子，我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她的性格与我们相当不同，展现出了许多可爱的特质。[64]

阿尔伯特委托深受宠爱的御用艺术家埃德温·亨利·兰西尔（Edwin Henry Landseer）在他23岁生日那天为他画一幅粉彩肖像画，并将画送给了维多利亚。他在画中细心地怀抱着小巧的公主，并满怀深情地看着她。阿尔伯特所给予的爱护是为了治愈儿时家庭的破碎所留下的创伤。他曾给兄长写信说：“婚姻生活是唯一能够弥补我们在幼年时所失去的那段情感的东西。”[65]

由于抚养孩子的大部分重担都由仆人们承担了，因此维多利亚一个月内就能起身行走了，并且计划了一趟前往温莎城堡的旅程。她在1841年初写给舅舅利奥波德的信已经开始从讨论婴儿转变为讨论外交政策：“你的小侄孙女正茁壮成长；每天她都变得更加健康有力，而且，我敢说，也变得更加漂亮；我觉得她会变得非常像她亲爱的父亲；她长得好快；我会很自豪地把她带到你面前。东方事务的结局非常不幸，是不是？”[66]当利奥波德在回信中欢快地祝福她儿女成群、幸福美满时，她回复说，不要抱有任何幻想。[67]她仍然将自己视为国家的领袖，这是最优先、最重要的，也是她的责任所在：

> 亲爱的舅舅，我认为你不能真的祝福我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妈妈”，因

> 为我觉得你能在我身上看到为什么大家庭对我们而言会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对国家而言，更不要提还有给我自己造成的苦难和不便；男人从来不去想，至少很少去想，对我们女人来说，经常经历这些是多么艰巨的任务。[68]

因此，当她在生完孩子仅仅三个月后再次发现自己怀孕时，维多利亚哭了，并且十分生气。她没有得到母乳喂养这种自然——但有些不完美——的避孕措施的任何帮助，因为她拒绝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喂养她的孩子，而人工避孕措施则被广泛认为是有罪的。有些女性曾试图在阴道涂上柏木油、铅、乳香精油或者橄榄油，以为这么做就能防止“种子”种下。[69]在1838年，许多贵族都会使用海绵，“海绵尽可能大到插进去不会不舒服的程度，外面还预先附加了一根木管或者一根窄窄的缎带，好把海绵拔出来”。[70]但没有证据表明维多利亚了解这种东西。当时的女性还被建议，如果想要避免怀孕的话，应该在排卵期前后从事性行为，但我们如今知道这恰恰是最容易受孕的时期。女王感到很痛苦，她后来在薇姬长大后对她说，结婚的前两年时光被怀孕“彻底破坏了”[71]。她不得不强迫自己远离丈夫的身边，后来她还抱怨说，当时她没有任何乐趣可言。然而，阿尔伯特却十分享受他的新生活。

到1840年底，红色机要信箱的铜钥匙已经落在了阿尔伯特的手中。信箱里的文件能够显示首相、内阁以及其他负责处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大事之人的想法。在第一次没有妻子注视的情况下将钥匙插进锁里时，阿尔伯特感到兴奋不已。他知道，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妻子正无助地躺着，需要人将她从沙发抬到床上，不过，他也是通过自身努力争取到这份成功的。他的秘书兼拥护者安森表示：

> 这是因为亲王在女王分娩期间聆听并记录了所有内阁事务，这一事实向女王清楚表明了他处理事务、协助寻找文件以及解释情况的能力……事实上，尽管还没有这样的名号，但［他如今实际上］已经成了女王陛下的私人秘书。[72]

女王分娩仅仅两天后，亲王就成功劝说妻子将这些箱子转送到他那里。11月24日，他向如今掌管着德意志一个小公国的兄长炫耀说：“我现在忙得很，因为我还要照管维多利亚的政治事务。”[73]

阿尔伯特通过强迫和诱惑等方式争取到了自己的新地位，成为王室之主和事实上的君主。[74]1841年7月，当薇姬8个月大时，安森记录下了阿尔伯特的满意之情：

> 亲王昨天回顾了他在抵达现有境遇的路上经历的诸多步骤——所有都是在婚礼结束后的18个月内完成的。那些曾经不想让他对女王产生帮助，担心他有可能雄心勃勃地触碰到女王特权之人遭到了彻底挫败……王室上下都正确认识到了王夫的地位。这个国家用一致通过《摄政法案》的方式表明了对他品格的信心。女王发现了拥有一名行事积极的助手和能人的好处，他会在需要之时给予支持和建议。内阁大臣们也以充分的尊重和敬意对待他。[75]

在1841年他们的首个结婚纪念日那天，阿尔伯特给妻子送了一枚摇篮状胸针，摇篮里还雕刻着一名婴儿。维多利亚写道：“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巧的东西，非常漂亮。”她说，这一年代表了“完美的幸福”[76]。阿尔伯特为她带来了这种幸福，但他自己的抱负远不止于育婴这么简单。他热爱音乐、艺术和科学，喜欢卫生和整齐，而且他想扩大自己在不列颠的影响力。一旦获准参与最有权势的政治讨论，阿尔伯特就将为这个仍将他视为外国人的国家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他的权力之路还存有两个重要障碍：墨尔本勋爵和莱岑女男爵，维多利亚最亲密的两个人。要想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需要让他们消失。

---

[1] 引自 Homans and Munich，*Remaking Queen Victoria*，3。

[2] Prince Albert to Prince William zu Löwensten-Wertheim-Freudenberg，May 1840，引自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69。

[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0，1840.

[4] Albert wrote to his grandmother from Buckingham Palace，June 11，1840，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70.

[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0，1840.

[6] King Leopold to Queen Victoria，Laeken，June 13，1840，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86.

[7] 这封写于1840年4月3日的信是寄到他的工作场所，一个名叫“栏中猪”的酒吧的，信上这样写道：“年轻的英格兰——先生——您被邀请今晚参加一场特殊的会议，这场会议的举行是源于几封来自汉诺威的重要来信。您必须参加；如果您的老板不给您外出许可的话，您必须违抗他的命令前来。A.W.史密斯，秘书。”Murphy，*Shooting Victoria*，40.

[8] Jerrold，*Married Life of Victoria*，84.

[9] Murphy，*Shooting Victoria*，38-40.

[10] *The Times*，June 12，1840，6.

[11] King Leopold to Queen Victoria，June 13，1840，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86.

[12] *The Times*，June 12，1840，6.

[13] 在墨尔本时，奥克斯福德作为一名成功的画家、英国国教执行专员、调查记者、作家、继父以及一名年轻寡妇的丈夫过上了受人尊敬的生活［改名为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当他所写的有关墨尔本市的著作发表时，他曾希望维多利亚也许能够读一读：“我希望某位著名女士能够知道，半个世纪前的那个愚蠢男孩如今已经是一个备受尊敬的社会成员。”他在维多利亚去世的前一年去世，他的故事从未在英国被公开发表过。Murphy，*Shooting Victoria*，510.

[14] Turner，“Erotomania and Queen Victoria，” 226.

[15] Miller，*Elizabeth Barrett to Miss Mitford*，121.

[16] Dekkers，*Dearest Pet*：*On Bestiality*，84.

[17] Loudon，*Death in Childbirth*. 第14页上的一张图表显示，这一数字在1851至

1890年间一直保持稳定，然后略有上升，并在1900年降至千分之四。

[18] Branca，*Silent Sisterhood*，86-88. 从1847至1876年，平均每千名产妇中有5人在分娩室死去，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因产褥热而死。医生会开具鸦片、香槟、白兰地和苏打水等药方。Flanders，*The Victorian House*，20.

[19] 玛丽公主是法国人，她嫁给了符腾堡的亚历山大公爵，后者的母亲与维多利亚的母亲是亲姐妹。——译者注

[20] 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192.

[21]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rch 24，1858，Ful-ford，*Dearest Child*，77.

[22]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06.

[23] September 23，1842，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30.

[24]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99-100.

[25]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11.

[26]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299.

[27] Flanders，*The Victorian House*，17.

[28] July 1841，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11.

[29] 国际象棋的一个变种。——译者注

[30] Memorandum from Mr. Anson on comments made by Lord Melbourne，Windsor Castle，January 15，184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22. 尽管维多利亚熟练掌握法语和德语，并且能够书写和听懂意大利语，但“她的其他教育都要归功于她天生的机灵和才思敏捷，这或许不是一个未来要戴上英格兰王冠的人应该接受的教育”。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8，1840.

[32] Unpublished letter from Yvonne Ward collection，Prince Ernest to King Leopold，February 1，1840，Co-burg Archives，567/WE22：66.

[33] 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171-72；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199；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256-57.

[34] Grey，*The Early Years*，256.

[35] Cited in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74.

[36] Ruskin，*Sesame and Lilies*，84，on the “Angel in the House.”

[37] Darwin，*Evolutionary Writings*，303.

[38] Ellis，*The Wives of England*，24-25.

[39] November 23，1841. 斯托克马给墨尔本勋爵写信说：“我［向皮尔］表达了我看到女王如此快乐之后的喜悦之情，并且表示希望她越来越多地在家庭关系中寻找并找到真正的快乐。” 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208.

[40] May 28，1840，“Minu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Lord Melbourne and Baron Stockmar，”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82-83.

[41] As recorded by Anson，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83.

[42] 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190.

[43] October 1838，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282-83.

[44]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69. 还要指出的是，女性被允许参加这些回忆，但不能发言，也不能成为正式成员。Tyrell，“Women’s Mission.”

[45]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11.

[46] February 1842，Fox，*Memories of Old Friends*，289.

[47]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42.

[48] Prince Ernest to King Leopold，February 17，1840，Coburg Archives，567/WE22：76. From Ward，“The Womanly Garb，” 281.

[49] Albert to Ernest，July 17，1840，引自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

51。

[50]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18.

[51]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October 16，1840，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242-43.

[52]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31.

[53] Longford，*Queen Victoria*，153.

[54] Longford，*Queen Victoria*，153.

[55]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5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1，1840.

[5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0，1840.

[5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1，1841.

[5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5，1840.

[6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4，1841.

[61] October 6，1841，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19-20.

[62] From a memo written by the queen，recorded by Grey，*The Early Years*，288-89.

[63] January 5，184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21.

[64]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83.

[65] August 22，1840.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25.

[66] To King Leopold，December 15，1840，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18.

[67] To King Leopold，December 15，1840，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18.

[68] January 5，184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21.

[69] Aristotle，*History of Animals*，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Smith and Ross，vol. 4，book 7，583a-b，引自 Jalland and Hooper，*Women from Birth to Death*，266。

[70] Richard Carlile，*Every Woman's Book*，25-5，31-32，38，42-43，引自 Jalland and Hooper，*Women from Birth to Death*，267。

[71] April 21，1858，Fulford，*Dearest Child*，94.

[72]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18.

[73] November 24，1840，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34；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197.

[74] 维多利亚信件的编辑本森给他的同事伊舍写信说，在伯蒂出生后的那一年，“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出现了。在提到1855年政府成立的文件中，有许多签名为‘维多利亚，R.’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中有时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有时又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但当出现单数时，‘我’所指代的始终是阿尔伯特亲王。这会造成巨大的困惑。” Esher Papers，11/5，Benson to Esher，March 4，1907，引自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17。

[75]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71.

[7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41.

13 宫廷闯入者

当女人陷入热恋时，她对公共权力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小。[1]

——赫克托·博莱索（Hector Bolitho）

1840年12月3日凌晨，一名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少年悄悄躺在了白金汉宫女王客厅的一张印花棉布沙发下。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是个失业的跑差，已经藏了好几个小时，希望能瞥一眼女王。他神志清醒地听着宫廷里的声音——小公主断断续续地哭泣；夜班奶妈在育婴室里来回踱步，温柔地唱着摇篮曲；一些古怪的脚步声以及夜班看守的鼾声。在三小时前，女王就坐在他如今藏身的沙发上；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暗自庆幸了一番。长公主（Princess Royal）就在隔壁熟睡呢！窗外的树木在风中摇曳，传来阵阵沙沙声，他心里思索着是否应该冒险去一趟厨房，赶在破晓前寻找更多补给品。食品柜里会不会有更多美味的土豆？或者奶酪？琼斯已经在宫殿里藏了好几天，他知道夜里的时间最好用来搜刮、探索并且寻找新的藏匿点。

在隔壁的接待室里，当月负责照顾公主的奶妈莉莉夫人（Mrs. Lilly）还没睡，正仔细地听着床边装饰华丽的摇篮里传出的轻柔的呼噜声。突然间，女王客厅的大门发出了巨大的嘎吱声。莉莉夫人喊了一声，但没人回应。门开得更大了，她坐起身，大声喊了出来：“谁在那？”大门突然关上了。

莉莉夫人从房里跑了出来，叫醒了莱岑，并派人去叫了当值侍从金奈尔德（Kinnaird）。金奈尔德搜索了一遍客厅，并特地查看了沙发底下，前一天晚上维多利亚正是躺在这张沙发上被推进卧室的。他突然间挺直了身子，然后慢慢地后退。莱岑瞪了他一眼，然后走向沙发，将它从墙边推开。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然后用手捂住了鼻子；藏在下

面的那名少年浑身覆满脏污、发出阵阵恶臭。他被人擒住并被带到楼下，随后表示自己没有任何恶意，只是来看女王的。当女人们手忙脚乱地摁住侵入者之时，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正在仅仅50码外的地方熟睡着。

这个消息引爆了整个伦敦城。与刺杀未遂的爱德华·奥克斯福德一样，这个宫廷闯入者很享受被当局审问的过程。他夸口说，自己“坐在了王座上”，并且“看到过女王，听见过公主的哭声”。他是通过攀爬花园外墙并钻了一扇窗户才进入宫殿内的，在宫殿里待了3天时间，一直藏在床下或者橱柜里。琼斯是那种很容易在弗里特街（Fleet Street）[2]取得成功的小伙；他曾梦想撰写一部有关王室夫妇丑闻的书籍，并坚称这是他闯入王宫的唯一原因——他想要“知道他们在宫殿里是如何生活的”[3]，尤其是想要听到女王及其丈夫之间的对话。琼斯的父亲声称他精神有问题，医生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宣称他脑袋的形状“极为古怪”[4]。但由于他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偷窃任何东西，因此枢密院仅仅判处他3个月强制苦役。[5]

在当时，宫殿的安全保卫松懈到了臭名昭著的程度。[6]宫殿的草坪上经常能发现不省人事的流浪汉和喝醉的士兵，他们是翻越了掩映在浓密、低垂的树枝下的矮墙进入宫殿庭院的。宫殿的许多看守都上了年纪，之所以能够被提拔为看守，是为了奖励他们的长期服役，而他们却经常在值班时睡觉。“少年琼斯”——伦敦的几家报纸都这么称呼他——在1838年12月时曾闯进宫殿过一次。在一场追逐过后，他在圣詹姆士大街被警察抓获，被抓时他身上穿着两条裤子和两件大衣。当鼓鼓囊囊的外裤被拽下来时，几件女士内衣掉了出来。他去过了女王的卧室和更衣室，偷了一封在那里找到的信件，外加一幅肖像画以及那些内衣。他的行为被描述为“年轻人的愚蠢”[7]，他后来被无罪释放。

在少年琼斯被莱岑发现的3个月后，他第三次闯入了宫殿。他于凌

晨1点半被人发现，当时他的手帕里还藏着从食品储藏室偷来的肉和土豆。三次闯入王宫的经历为他赢得了巨大名气。查尔斯·狄更斯在不久后给这名少年的父亲写信，要求见一见这个“宫廷受害者”，这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仰慕（他对于所谓少年琼斯十分聪明的普遍观点持怀疑态度，但遗憾的是，他从未写过任何有关这次会面的内容）。[8]美国小说家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即《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一书的作者，曾在访问伦敦时拜访过琼斯的父亲，并提议将他的儿子带到美国，他认为一个像他这么聪明的孩子能够在美国取得很好的发展。他们安排了一次见面，但库珀惊讶地发现自己见到的是“一个头脑迟钝、身材矮小的侏儒，极为沉默寡言、固执己见”。[9]

阿尔伯特亲王以少年琼斯一再闯入王宫为契机，整肃复杂、低效且浪费严重的宫廷管理。他决心把所有闯入者都赶出王宫，包括莱岑女男爵，后者在维多利亚分娩前后行动不便期间承担了更多责任，负责管理育婴室以及女王的财务事宜。时刻追求条理性的阿尔伯特亲王十分厌恶王宫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明显不称职行为。他决定为维多利亚制定新的秩序，从她的每日安排到财务事宜再到混乱不堪的宫殿，一切都要遵守规范。

首先，阿尔伯特为维多利亚制定了一份必须天天遵守的日程表。他们会在9点吃早餐，散一会儿步，然后一起写字、画画，下午2点吃午饭。维多利亚会在下午与墨尔本勋爵会面几小时，随后坐着敞篷马车外出巡游一番，有时是与阿尔伯特一起，有时是与她的母亲和侍女一起。晚餐在晚上8点。阿尔伯特亲自监督这份日程表尽可能完美地执行，并借此抑制了维多利亚对熬夜的渴望。

其次，亲王试图限制开销。他惊讶地发现，女王1839年全年光是在慈善和养老金方面就花费了3.4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约260万英

镑。[10]他还特别花时间审阅了康沃尔公国的财政记录，该公国在1840年是维多利亚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笔收入主要来自其锡矿——约有3.6万英镑，但其中有约三分之一被用于支付耗资巨大的行政工作。他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裁撤、重组和预算工作——并且在仅仅几年时间里就攒下了足够的钱，为他的家人在怀特岛上购买了一栋私人别墅。（他此前曾一再拒绝他位于科堡的家人提出的资金要求。）

再次，亲王将注意力放在了维多利亚住处的危险状况上，尤其是白金汉宫，他们每年都要在那里待上好几个月。白金汉宫高大宏伟、富丽堂皇，位于伦敦最优秀的地块，但通风条件十分糟糕，供暖系统年久失修，频繁发生的煤气泄漏曾导致厨房发生过奇怪的爆炸。仆人宿舍人满为患，托儿所已经不足以容纳他们日益庞大的下一代规模。王宫里散发着粪便的臭味：厨房的砖石地面恰好位于下水道上方，污水就在食品柜和烤炉的下方汩汩流过。女王更衣室正上方那一层的厕所经常堵塞，污水漫溢到窗外。1844年，温莎城堡的地板下方发现了数十个污水四溢的粪坑，在那之后，阿尔伯特将所有汉诺威时代的老式便桶都换成了现代的冲水马桶。

在维多利亚加冕后的第一年，森林与工程部（Department of Woods and Works）的一名特派员在接到有异味的投诉后检查了白金汉宫，并宣称下面几层肮脏不堪，不适合居住。他在厨房里发现了“许多蔬果残留物，以及其他一些极为肮脏污秽、令人作呕之物”[11]。屋顶出现渗漏，排水管上也出现漏洞，却没有人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三年后，阿尔伯特要求斯托克马帮助他进行另一次更为全面的检查。他们发现了一个历史悠久且极为低效的职责构成，王宫的维护职责由宫务大臣（Lord Chamberlain）与内务府大臣（Lord Steward）共同承担，还有部分工作由掌马官（Master of the Horse）和森林与工程部负责。白金汉宫的灯具由宫务府提供，由内务府负责清理，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由掌马官负责点亮。窗户总是显得很脏，因为内侧和外侧从未同时得到过清理：宫务

府负责宫廷内部的清洁，而森林与工程部负责外部清洁。内务府的工作人员负责准备和摆放柴火，而宫务府负责将其点燃。破碎的窗户和橱柜会连续几个月无人理睬，因为在修理之前，厨师长必须准备并签署一份申请书，该申请书还需由王室总管（Master of the Household）签字，由宫务府授权，并交给森林与工程部的工程监督。阿尔伯特任命了一名官员来代表所有三个部门，并长期居住在王宫内。

接下来是仆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近三分之二的王宫仆人丝毫不受监管，因此他们经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翘班就翘班。仆人的粗鲁众所周知。很少有人会带客人去他们的房间；许多人都会在迷宫似的走廊里迷路。阿尔伯特发现了一系列仆人们用了数十年的骗局和捞外快的手法：王宫外的人在预定马车时经常会伪造女王侍女的签名，以便把他们自己乘车的开销记在王室的账上；刚用过的蜡烛每天都会被掐灭，而男仆们会把前一天的蜡烛装在兜里带走，其中许多都是没有点过的；昂贵的员工餐连那些与王室仅有微弱关系的人都能享用。阿尔伯特削减了仆人工资，有时甚至幅度达到三分之二，原因是许多仆人每年仅有一半的时间在王宫里工作。

阿尔伯特待办事项中的最后一项是他所谓“王庭的道德尊严”[12]。赌桌从温莎城堡消失了。任何人都不准在女王——或者阿尔伯特——面前坐下。（后来担任首相的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夫人因刚刚分娩而获准在椅子上休息，“但是在女王的关照下，当亲王随后到场时，有一个非常胖的侍女站在了她身前”。[13]）大臣们在拜访女王时必须倒退着走出房间，因为向君主展示后背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宫廷礼服是必须穿着的。（如果一名女性不想穿着合适的服装，她需要取得医生开具的证明，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做会有损她的健康，然后再寻求宫务府的批准。[14]）“不诚实和性放荡的行为”会受到惩罚。一份严格的新行为准则被精心裱了起来，悬挂在侍女的卧室里。[15]维多利亚的名字长期以来一直与阿尔伯特在宫廷中所倡导的清教主义联系在一起，但真正在宣传

这些标准的是他而不是她。[16]墨尔本很快就意识到，尽管维多利亚“不太关心这些过度拘泥于细节的道德选择”，但阿尔伯特却“极为坚持道德观念”。[17]亲王坚持倡导“完美无瑕的品格”，而女王却对此“毫不在意”。[18]没人能够豁免于阿尔伯特的标准。甚至连他自己的兄弟也因为性行为放荡导致罹患性病而引起他的怒火。不过，维多利亚没有采取什么努力来压制丈夫的热情；至少在宫廷里，阿尔伯特时代已经开始了。

与此同时，英国政坛正兴奋地猜测墨尔本勋爵日益不受欢迎的辉格党政府将于何时被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托利党政府取代。早已为此做好准备的阿尔伯特此前已开始与皮尔进行秘密谈判，派遣他的秘书安森试图与皮尔达成协议，以避免类似寝宫危机那样的尴尬局面，在此前的那次危机中，维多利亚出于对墨尔本的喜爱对罗伯特·皮尔百般阻挠。阿尔伯特还设法与墨尔本进行了会谈，他对首相说，他不相信怀孕的维多利亚（这时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有能力一个人应付或者“经历艰难时刻”，他希望首相能够在就这一问题与女王进行任何交流时让他也加入对话中。[19]

1841年5月9日，安森与皮尔见面讨论维多利亚的侍女问题。安森代表阿尔伯特为3名高级侍女提出辞呈，她们的丈夫是著名辉格党人，也是即将卸任的墨尔本的盟友。她们分别是：萨瑟兰公爵夫人（Duchess of Sutherland）、贝德福德公爵夫人（Duchess of Bedford）以及诺曼比夫人（Lady Normanby）。皮尔在多次强调他的主要目标是要保护女王的尊严并顾及她的感受后，接受了这一条件。他还要求维多利亚正式通知他这三个职位的空缺。这一变化应当来自她，而不应被视为皮尔组阁的条件。[20]

在经历了此前的那次危机后，皮尔对于阿尔伯特的外交干预极为感激。在大英图书馆档案室保存的一份27页的备忘录里，可以明显看出皮尔的兴奋之情以及溢于言表的胜利、感激之情，同时显露的还有一种焦

虑情绪，他设法想要避免任何事被解读为对女王的不敬。[21]人们公开承认阿尔伯特的智慧远超女王，而安森援引亲王的话说，女王“对自己的宪政观有着天生的谦逊态度”，容易接受比她经验更丰富之人的主张。[22]这么说的确有着一些真实的成分——墨尔本曾建议自己的继任者给年轻女王写信时一定要充分详细，而且“要落到基本，因为女王陛下总是喜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拥有充分的认识”。[23]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为此时正处在第二次怀孕妊娠中期的维多利亚愉快地接受了她的丈夫在没有询问她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这种安排。但首相的变更——她的丈夫背着她推动了此事——对她来说是一段十分难熬的时期。在5月的第一周，她和墨尔本曾讨论过是否需要在她召见皮尔之前解决侍女问题。在他们仍在讨论之时，阿尔伯特就未经咨询她的意见擅自采取了行动，向皮尔提出了三名辉格党侍女的辞呈。维多利亚感到十分惊讶，她在5月9日写道：“我善良而杰出的墨尔本勋爵对我说，安森见了皮尔（我对此毫不知情，但阿尔伯特一定知道）。”这段插入语很重要——为什么她的丈夫没告诉她？她写道，在那天晚上，她“情绪十分低落”。那一晚，她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失去了墨尔本，醒来时感到筋疲力尽、心情沮丧，她写道：“唉！如果只是一场梦就好了！”[24]每一次想到将要再次失去她亲爱的墨尔本勋爵，维多利亚就忍不住想要哭泣。她对利奥波德说，这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痛苦”，但她下定决心要保持冷静，尤其是因为如今的她已经有了阿尔伯特。在认真阅读完1841年5月的安森—皮尔会谈纪要后，她在上面添加了一句警告：皮尔必须要理解，任命女王侍女的是女王本人，而不是他。她坚持要求将这一条作为“原则”，并在下面划了一道横线以示强调。[25]皮尔同意了。

维多利亚在政治权术与忠诚之间感到左右为难。几周后，她忧心忡忡地认为，自己向皮尔妥协得太容易了。阿尔伯特说，她的侍女们正在对她施加影响；维多利亚则请求再给她一些时间，并且承认不愿辞职的

贝德福德公爵夫人的家人给她送来了一封信。安森写道：“女王整天都情绪低落，并且说这件事整天萦绕在她的脑海，让她感到自己正在被亲王和墨尔本勋爵催促和伤害。”[26]她知道实际上自己如今已经没有选择，只能按照丈夫的建议行事了。

在维多利亚看来，这是在将自己的角色让渡给阿尔伯特，而这经常让她感到不安。墨尔本勋爵曾对她说，她的丈夫在一次活动中得到了盛大的接待，而她的回答是：“我不喜欢这样——首先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不在我身边，其次是因为我必须和他在政治中或者在国家的一般性事务中扮演我的角色。”[27]但阿尔伯特却有着娴熟的政治手段。他和安森一直在向现任和未来的首相示好，并背着维多利亚安排会见。5月15日，当墨尔本前来拜见维多利亚时，阿尔伯特就在屋里；这一次，他留了下来。

6月，当墨尔本所领导的内阁在一次有关外国糖类关税的辩论中失利后，皮尔强行进行了一次不信任投票，并迫使议会解散。维多利亚感到闷闷不乐，但日渐衰老的墨尔本却看得很开：“唉，没人喜欢离开，但我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太累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休息机会。”[28]维多利亚在大选期间过度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倾向性，造访了著名辉格党人，但无济于事。托利党在8月19日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女王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出席议会的开幕会议。

9天后，墨尔本终于被迫辞职。在温莎城堡阳台上的“星光下”，他和女王在他们的最后一次正式会面后说了再见。女王哭了。墨尔本温柔地对她说：“四年里，我每天都来见你，也每天都更加喜欢这种经历。”当他们4天后在克莱尔蒙特（Claremont）最后一次道别时，她流下了眼泪。维多利亚对待皮尔的态度比2年前和善多了，但她仍然对墨尔本说，自己对于与他分别感到“伤心透顶”[29]。她的日记中充斥着有关她感到如何“难受”的描述，以及有关她“心情沉重、神思郁结”的描述。[30]

她已经习惯了每天与他相见；在这之前，她与他之间未曾相见的最长时间是11天。1个月后，她仍然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与新首相之间相处的时间远比她与墨尔本勋爵相处的时间要少。女王与皮尔之间的通信也更加冷淡，更加一板一眼；她与首相的关系瞬时间失去了亲近感。[31]

阿尔伯特已经准备好大干一番了。他与皮尔有许多共同点：害羞，喜欢进行理性对话，热爱艺术和文学——尤其是德意志作家和荷兰画家的作品——并致力于社会改革（不过他们都不支持扩大选举权，皮尔曾反对1832年的改革法案）。阿尔伯特甚至设法劝说皮尔接受他以道德瑕疵为理由否决的一些正式任命，包括对博福特公爵（Duke of Beaufort）的任命。（当这位公爵的夫人去世时，他娶了夫人的同母异父妹妹为妻，而这一做法是被英格兰教会教法所禁止的。）有趣的是，皮尔同意了。

英格兰的这位新首相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Oxford）求学时以古典文学和数学见长，21岁就进入了议会，并在13年后被任命为内政大臣。掌管内政部期间，皮尔组建了伦敦警察署（Metropolitan Police Force），伦敦警察自那时起就因为他的缘故而被称作“鲍比”（bobbies）[32]。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保障劳工权益，并连续多年倡议废除旨在对进口小麦征税的《谷物法》，该法律保护了本地地主的利益，却推高了面包价格，给工人阶级和失业者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他是第一个认真应对人口膨胀、工业革命和经济衰退等紧迫挑战的首相。但他从未得到过特别的喜爱，部分原因是他十分高冷而笨拙。阿什利勋爵描述他是“一座只在表面上略有融雪的冰山”[33]。格雷维尔称他“十分粗俗”，“更像是个衣冠楚楚的店主，而非一国之首相”[34]，竟然会用餐刀来切果冻。维多利亚喜欢受人恭维，但皮尔却没有这种能力。他的微笑曾被人比作银色棺盖上反射的微光。[35]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无话可说，而她对他“像是一个正在给人上课的舞蹈教师”的举止感到恼怒不已。[36]格雷维尔说，“如果他的双腿能保持一动不动的

话”，也许她会更喜欢他一些。

此时正是炎炎盛夏，怀孕的维多利亚一直受到头疼的折磨。她失去了喜爱的首相，与丈夫发生争吵，还为宝贝女儿的健康而焦虑不已。经常感到抑郁的她对利奥波德说，她“如今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严峻的一次考验”，那就是失去了与墨尔本的每日联络，这让人感到“悲伤到心痛”[37]。8月底时，墨尔本给她写了封信，鼓励她“打起精神来”[38]。

阿尔伯特通常情况下比妻子更容易出现忧郁情绪，如今却心情愉快、神情振奋。一切都在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他对于墨尔本卸任的时机感到极为满意，这让他能够成为女王唯一的亲信。他让安森提醒墨尔本，“他的观点一直是，从这一刻起，［他］将承担起一个新的职责，而女王再也无法在需要时寻求墨尔本勋爵的帮助，因此必须从这一刻起征求他的意见”。阿尔伯特还精明地劝说维多利亚最信任的盟友为他说好话。他派安森去见墨尔本，要求他“敦促女王不要对给亲王分配工作有任何顾虑”。

墨尔本也认为阿尔伯特自然应该得到属于他自己的地位，但他警告说，阿尔伯特不能让维多利亚产生“亲王正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皮尔打交道”的想法，这会让她感到恐慌。[39]随后，墨尔本尽责地给维多利亚写了一封信，称赞了阿尔伯特一番，并提议由他——而非皮尔——担任自己真正的替代者，认为他有着出色的“判断力、脾气和辨别力”[40]。

随着墨尔本的影响力衰退以及阿尔伯特逐渐走到台前，维多利亚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安慰。如今她知道了爱是什么：那是一种安全、深沉且持久的爱。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她在回顾过去时对于自己在迷恋墨尔本勋爵时的表现感到十分难堪。她在1842年10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察看并更改了一篇旧日记，那篇日记如今会引起一些令人不快的情绪。我当时的人生太过虚伪而肤浅，而我却觉得自

己很快乐。感谢上帝！如今我终于知道真正的快乐是什么了！”[41]

这一认识伴随了她好几个月；在她在婚姻中逐渐成熟、变得容光焕发的过程中，“真正的快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维多利亚在1842年12月与阿尔伯特谈及她曾经“对墨尔本勋爵的无限喜爱和仰慕”。她说，她并不真的知道这种感情来自何处，“仅仅知道我依附着某个人，拥有了十分温暖的感觉”。阿尔伯特对她说，她“鼓起勇气却最终做了一件相当愚蠢的事”。[42]阿尔伯特或许十分理智，永远也不可能激励自己做任何愚蠢之事，但他同时也太过轻视妻子的感情。墨尔本在维多利亚初登王座的脆弱岁月里曾让她感到安全，而她对他的感情也是真实而相互的。对维多利亚而言，说再见是一件痛苦的事。

随着身体日渐衰弱，墨尔本勋爵变成了一个略显凄惨和孤独的人。每当经过白金汉宫，他都会满怀渴望地看着那座宫殿，在此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也一直在等待来自维多利亚的信件。他曾希望自己能在1846年应召重返议会，但女王对他说，她没有这么做，这是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在听说维多利亚患上产后忧郁症后，他给她写信说，自己也曾患过忧郁症：“我知道与之对抗有多么困难。”[43]他的传记作者戴维·塞西尔说，墨尔本十分渴望见到女王。[44]他与维多利亚相处的日子是他生命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她曾经十分仰慕和需要他。[45]每当有人提到她的名字，他的眼中就会噙满泪水。[46]

女王仍会给墨尔本寄去信件和礼物，并借钱给他，但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在1842年4月的一次舞会上，人们排起长队等待着向她道别，队伍如此之长，以至于墨尔本怀着沮丧的心情悄悄溜走，坐上了他的马车。他在第二天给她写信，告诉她说，在他驾车经过王宫时，能够看到她的房间，“甚至能分辨出房间里的画和桌子等，看到蜡烛已被点燃，窗帘也未拉上。陛下正要动身前去听歌剧”。[47]不久后，他就罹患中风，并于1848年去世。[48]

莱岑女男爵与阿尔伯特一再发生冲突，她试图捍卫自己的领地，而他则试图扩张他的势力范围。斯托克马对格兰维尔勋爵说，莱岑“愚蠢地”想要与阿尔伯特竞争影响力，没有认识到在维多利亚结婚后，她的地位已经不同往昔了。甚至连她曾经的朋友利奥波德也将她形容为阿尔伯特“未来的巨大威胁”[49]。

宫廷中的男人们开始苛责和围攻她。1840年12月，当安森结束一次为期10天的旅行返回王宫后，他气愤地说，莱岑“在我离开后只要有机会就会多管闲事给人找碴”[50]。尽管墨尔本曾向他保证，维多利亚对阿尔伯特的爱不会因为莱岑的干预而有所减少，但安森却不敢肯定：“她总是挡在女王的道上，指出并夸大亲王的每一处细小过失，始终在歪曲他，试图破坏女王对他的感情。”[51]很少有证据证明莱岑真的做了这些——她此前曾称赞阿尔伯特是“一个如此优秀而谦逊的人”[52]——但是，她无疑巩固了维多利亚维护自身特权的决心。约翰·康罗伊曾让莱岑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而她的本能是要保护女王。她说，重要的是，阿尔伯特应当认识到，“女王不会容忍任何人干扰她行使她最受人嫉妒的权力”。[53]这就是他们之间争端的核心：对女王权力的争夺。

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很快就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当阿尔伯特在1842年要求莱岑离开王宫后——莱岑反驳说，他没有权利提出这一要求——她就再也未曾与他说过一句话。莱岑十分厌恶阿尔伯特试图改变她与维多利亚已经达成一致的事情。阿尔伯特认为她粗鲁、无礼且渴望权力——而且地位已经超出了她所在的阶级。他非常生气地发现，莱岑作为一名平民和雇员竟然在育婴室里把“小猫咪”抱在腿上——而且还是坐着的。（即使是奶妈，也被要求站着给婴儿母乳喂养，以示对王室婴儿的尊敬。[54]）在女王的朝臣之一奇尔德斯海军上校爱上了女王后，莱岑没有将此事告知阿尔伯特，导致他指责她毫不称职。莱岑坚称，她之所以将此事告知了宫务大臣而不是阿尔伯特，仅仅是因为阿尔伯特对她的态度太过粗鲁，她无法与他交谈。

当一个像莱岑这样的女性威胁到阿尔伯特的权威时，他变得异常险恶。正如阿尔伯特的传记作者罗杰·富尔福德所说，她被公认为一个“爱找麻烦的老处女”[55]。阿尔伯特在写给兄长的信中称她为“老巫婆”（*die Blaste*）。她在那年圣诞节期间得了黄疸，也因此被他称呼为“黄脸婆”[56]。阿尔伯特将维多利亚的缺点归咎于莱岑：在他看来，维多利亚的缺点就是受教育水平不足——尽管莱岑本人的语言水平比他更高，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还会一点意大利语——以及害怕与比她年长得多的学者和政治家交谈。在莱岑离开前的几个月里，他对维多利亚的批评尤其激烈，但她一走，阿尔伯特就对自己的兄长说，维多利亚是“一个男人能够渴望的最完美的伴侣”。

莱岑对阿尔伯特很是嫉妒，但她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麻烦制造者。霍兰德勋爵曾称赞她有着“理性与智慧、良好的判断力以及更加优秀的意志力”[57]。即使是尖刻的格雷维尔，也将她描述为一个“聪明和蔼的女性”，“深受其他女性的爱戴，并受到所有宫廷常客的尊敬和喜爱”[58]。侍女乔治亚娜·布卢姆菲尔德（Georgiana Bloomfield）说，对于宫廷里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而言，她是个“和蔼而慈母式的”人物。[59]类似的，利特尔顿夫人也认为她既友善又热心助人，还十分乐于奉献。但阿尔伯特不会容忍任何人与他争夺维多利亚的情感，莱岑非但没有迎合他的雄心壮志，反而还处处与他作对，就像多年前她对抗维多利亚的母亲和康罗伊一样。她因为替女王仗义执言而受到了惩罚。

在维多利亚第二次怀孕期间，女王的侍女们曾对她强健的身体惊叹不已。但实际上，这位年轻母亲却感觉不太舒服，“神思郁结、情绪低落”[60]。她本来不想这么快就生另一个孩子，极为厌恶怀孕对她的生活构成的限制——就好像她的“翅膀被剪掉了一样”。她变得对工作兴趣锐减，经常大发雷霆。[61]

1841年11月9日，她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健康婴儿。维多利亚很高

兴那是个男孩，但在经历了痛苦的分娩过程后，她仍然感到情绪低落。[62]她在日记中写道：

> 我不想说太多，但我受的苦真的非常严重，如果不是有着亲爱的阿尔伯特的巨大安慰和支持，我本来以为自己都要死了……最终，在10点48分时，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噢，我感到如此幸福和感激，全能的上帝保佑了我，仁慈地保护我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日子和考验。尽管很累，但孩子一出生，我就感觉好多了。

阿尔伯特送给了她一枚宝石胸针，上面刻着他们儿子的纹章；随后，她进入了深深的睡眠，一直到第二天才醒来。她对自己又一次活了下来感到庆幸。她的孩子是个“健康、强壮的男孩”，但维多利亚在抱着他时却没有任何特别感受；没有爱，甚至连一丝情感都没有。她将在未来一年里受到产后忧郁症的折磨。在整个11月，阿尔伯特每天都将她从床上抱到椅子上。她感到身体虚弱、情绪低落、难以入睡。王室的其他成员紧张地关注着她，怀疑她祖父的疯狂终于在她身上出现并击溃了她。

过了好几个月，维多利亚才摆脱了这种悲伤情绪，她后来觉得，这种情绪难以得到解释，因为阿尔伯特让她感到如此幸福。她在1843年4月对利奥波德说，自己的精神被“弄垮了”，以至于“我为此受了整整一年的苦”[63]。后来，她对自己的大女儿说，问题在于两个孩子的出生间隔太短了：“伯蒂[64]和我都深受其苦，而他将因为在你出生后如此短时间就出生受很长时间的苦。”[65]作为长子，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后来的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生来就是为了成为国王，但他的长姐总是更聪明、更漂亮也更受宠爱的那一个。

1842年1月16日，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尽可能快地驾车从克莱尔蒙特赶回了温莎。他们此前短暂造访了利奥波德在英格兰的庄园，以治疗维多利亚的忧郁症，却提前被叫了回来，因为“小猫咪”的病情恶化了。阿尔伯特一直将育婴室里出现的问题归咎于莱岑，但当他的宝贝女儿生

病后，他变得既焦急又愤怒。“小猫咪”在仅仅几个月大时就开始变得虚弱而不安，无论是莱岑还是奶妈都无法安抚她，也无法让她胖起来。女王写道：“一直到8月底，她都是个漂亮、健康、胖乎乎的孩子，看到她现在这么消瘦、苍白，变化如此之大，让人太难过了。”[66]克拉克医生给她喂了驴奶和掺了奶油的鸡汤，但她一直难以下咽，还给她吃了掺了水银的甘汞，以及用来抑制食欲的鸦片酊。弟弟——也就是父母一直企盼的男孩——的出生让“小猫咪”的病情更加恶化。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天，维多利亚写道：“见了我的两个孩子，‘小猫咪’看起来惊恐万分，见到小弟弟后一点也不高兴。”

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在回程中几乎没怎么说话：当时，有许多孩子甚至还没有学会走路就不幸夭折了。[67]当马车驶入温莎城堡的方形庭院并停下后，他们匆忙跑上楼梯去往育婴室。他们在那里震惊地见到了骨瘦如柴、眼窝凹陷的“小猫咪”，而此时的“小猫咪”还在对他们咯咯地笑。阿尔伯特在愤怒中说了些什么，引起了保姆的激烈反应。他将目光转向维多利亚，并抱怨说：“这真的太恶劣了。”心烦意乱的维多利亚突然发起了火：难道他希望作为母亲的她滚出育婴室吗？[68]

两人都发起了脾气：阿尔伯特对维多利亚说，她对莱岑有着一种荒谬的迷恋，并且说她们两人忽视了他们的孩子——难道她们想害死她吗？维多利亚反过来指责他想要控制一切，包括育婴室；嫉妒她的地位和她与莱岑之间的珍贵友谊；以最坏的恶意揣度她；并且不允许她做出自己的决定。在阿尔伯特承担了她大部分仪式性角色后，她对于他如今还想掌控他们孩子的照料工作感到愤怒不已。几个月来潜藏在表面之下的紧张态势终于爆发了。维多利亚大声说，她感到很遗憾自己嫁给了他。

阿尔伯特对这种公开争吵感到愤怒至极、震惊不已。他喃喃地说“我必须要有耐心”，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一连几天拒绝与维多

利亚说话。斯托克马承担起了中间人的角色。维多利亚没过多久就深感懊悔，并在同一天给斯托克马写信说，这次争吵就像一次噩梦一样。她希望他能够告诉莱岑现在出现了“小小的误会”，并帮助阿尔伯特镇定下来，告诉他女王如今情绪十分低落，谁也不想见。尚未从几周前艰难分娩产下伯蒂的痛苦过程中恢复过来的她一直哭个不停。“我感到如此绝望，而且我的头好疼！我感觉就好像自己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我希望你能够安慰一下阿尔伯特。他似乎还是那么生气。我已经不生气了。”[69]

但他还在生气。阿尔伯特再也不打算缓和他的言辞了。他将强迫女王在丈夫和老师之间做出抉择。他给斯托克马写道：

> 莱岑是一个疯狂、粗野、愚蠢的阴谋家，痴迷于对权力的渴望，如今将自己视为一个半神，并且把任何拒绝承认她是半神之人视作罪犯……我则把维多利亚视为一个善良的人，仅仅是在许多方面被错误的养育方式给扭曲了……除非维多利亚认清莱岑的真面目，否则不会有任何改善，我希望这一刻能够到来。[70]

维多利亚的火气来得快走得也快，但阿尔伯特的怒火却深刻、冷酷且持久。他愿意给自己的妻子施加伤痛。他在几天后用冰冷的语气写信给她说：“克拉克医生对孩子处置不当，用甘汞毒害了她，而你让她挨饿。我再也不会管这件事了；把孩子带走，爱做什么做什么吧，如果她不幸夭折的话，你的良心要背负罪责。”维多利亚对阿尔伯特说，她能够原谅他“考虑不周的言辞”，并要求他告诉她是否在担心些什么。但阿尔伯特在写给斯托克马的一封信中大发雷霆地说：“维多利亚对我来说太草率也太暴躁了，我经常没办法对她谈及我的难处。她不会听我说完的，只会发一通火，责备我疑心重、想要获得信任、野心太大、嫉妒心强等。”

这两个男人取得了一致：女王必须妥协投降。斯托克马给维多利亚写了一封密信，威胁说如果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话，他就辞职。女王很快就回了信：“阿尔伯特必须告诉我他不喜欢什么，我会改的，但他也

必须承诺要聆听我、相信我；（相反）当我发脾气时，虽然我相信现在我不会经常发脾气了，但他不能去相信我说的那些蠢话，例如我对于婚姻感到痛苦什么的，这些都是我在身体不适时说的话。”[71]

维多利亚承认自己有缺陷。从儿时起，她就经常发脾气——阿尔伯特将她称作“易燃物”。但阿尔伯特似乎无法接受她偶尔也需要发泄一下的事实。相反，他时常指责她，并敦促她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这是徒劳的。

维多利亚仍在为莱岑辩护。她公道地指出，出于善意与忠诚，她想要照顾她的这位前家庭教师，并且把她留在王宫里，以奖励她一生的奉献。不过，她也承认，他们的地位“与其他已婚夫妇大为不同”，因为“阿尔伯特是在我的家里，而不是我在他的家里”，但最终，她还是要服从于他，因为她爱他。[72]她承诺将试图控制自己的脾气，并在1842年1月20日写道：

> 我经常容易发火，这（就像这场不幸开始的那个周日一样）会让我说一些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气话和令人讨厌的话，我担心会伤害阿尔伯特，但他不应该相信那些话，我会努力克服这个缺点，早在我结婚前，我就知道这会成为一个麻烦；因此，我本来不想结婚，在那两年半时间里，我完全就是那个样子，我的家庭教师让我变得难以控制自己，也难以屈服于其他人的意志，但我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它。[73]

三个月后，利特尔顿夫人被任命为家庭女教师。她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亲切、有能力、作风老派、举止有度。她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也让亲王和女王感到满意。对待亲王，她有着深深的爱戴之情，而对于女王，她几乎立刻就认识到了她身上的那股子“倔劲”[74]。人们一致认为，“小猫咪”的病情仅仅是因为她得到了过多的关心，而医生几乎一点积极作用也没起到。

* * *

7月25日，阿尔伯特在没有咨询妻子意见的情况下解雇了莱岑。他随后对维多利亚撒谎说，莱岑为了健康考虑想要回到德意志。她会在两个月内离开王宫。他还补充说，自己已经批准了这个决定。那天晚上，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我自然感到很沮丧，尽管我敢肯定这是我们和她的最好结果。”

一直在有意识地保护维多利亚的莱岑在看到焦虑不安的女王来到她的房间后，表现出愉快且令人欣慰的表情。她重复了一遍阿尔伯特的话，“表示为了她的健康着想，她觉得有必要离开，当然，也是因为我现在没那么需要她了，能够找到其他人来协助我”。维多利亚离开了她的房间，暂时感到松了口气。后来，当她坐在丈夫身边，与他一起演奏钢琴二重奏时，她一直在忍着没有哭出来。事情结束了。阿尔伯特得偿所愿。她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发生的事情感到相当不知所措、情绪低落，自然，一想到即将要与我亲爱的莱岑分别，我就感到非常悲伤，我如此地爱她。”[75]

1842年9月29日夜，维多利亚梦见了莱岑。这位女性在英格兰的沉重王冠落在维多利亚的头上时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她微笑，在约翰·康罗伊试图篡夺她的权力时给予了她力量，在她15岁差点因发烧而命丧黄泉时用冷毛巾放在她的额头帮她降温。这位女性比她的母亲跟她更亲近。她梦见莱岑来到她的房间对她说再见，以一贯的温柔来拥抱她。维多利亚醒来后充满了悲伤之情：“对我来说这太痛苦了……以前我曾听人提起过这种醒来后的奇怪感觉，但我从未体验过。这非常难受。”[76]

楼下，莱岑女男爵正在扣上她的外衣。她弯腰拎起最后一个箱子，走向等候在温莎城堡庭院里的一辆马车。天边正微微泛白；她匆忙走下楼梯。她不想吵醒维多利亚，因为她知道，她们两人如果见面的话都无法保持冷静。维多利亚在那天上午吃早餐时收到了她写的一封信，“她在信中以书面形式向我辞行，觉得这么做比当面见到我要好受多了。这

自然让我很沮丧，我很遗憾不能再一次拥抱她……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多年来，她就是我的一切。”[77]

女男爵带着无上的尊荣回到德意志与姐姐一同居住，而她的这位姐姐在几个月后就去世了。莱岑独自一人度过余生，每年都能从维多利亚那里得到丰厚的养老金。她对女王的热爱从未有丝毫减退。1858年时，她曾在比克堡（Bückeburg）火车站的月台上连续站了好几个小时，就为等待一列载有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火车，他们此时正赶去探望新近成婚的薇姬。[78]火车从车站隆隆驶过没有停留，莱岑则一直站在那里挥舞着手帕，想要看一眼维多利亚。

在维多利亚的脊梁骨还在成长时，莱岑是她的坚强支柱；她对维多利亚感到无比自豪。在阿尔伯特去世后的1866年，维多利亚前往赖恩哈茨布鲁恩（Reinhardtsbrunn）最后一次看望了她。她们相拥而泣；维多利亚知道，尽管莱岑如今已风烛残年，但她一定能够理解自己的悲伤。莱岑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一直在念叨着她的女王，此时的她已经神志恍惚，并且因髋骨骨折而卧床不起。她于1870年去世，享年85岁。维多利亚的统治还将持续30年。

到1842年底，阿尔伯特的对手都消失了。墨尔本已经辞职，莱岑流亡德意志。阿尔伯特拥有维多利亚密匣的钥匙，控制着她的财务（包括王室专款和私有庄园），并能接触到她的大臣们。迄今为止，他已经不仅仅是女王的代表，其风头俨然已经超越了女王。凭借自己作为女王私人秘书的角色——这一角色曾是约翰·康罗伊垂涎的对象——他负责起草信件、阅读国政文件，就一切事务给女王提出建议，并主导一切会议。凭借皮尔的帮助，他准备着手去完成一个国王的工作——并且是一个世所罕见的行事积极、行为自律、能力卓越的国王。他已经准备好，开始真正做一些“更崇高、更重要的事情”。

要做的事有很多。最让阿尔伯特牵挂的事情是军队改革、教育（尤

其是科学和地理学）、奴隶制、劳动条件以及外交关系等，尤其是与德意志和法国的关系。他对音乐、艺术、住宅建设和建筑学有着浓厚兴趣。他在许多团体中都担任着正式职务，包括皇家农学会（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伦敦音乐家协会（Philharmonic Society）、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改善劳动阶级条件协会（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ring Classes）、万国统计大会会议（Statistical Congress of All Nations Conference）、全国教育会议（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都柏林博览会（Dublin Exhibition）、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艺术学会（Society of the Arts）、消灭奴隶制协会以及皇家美术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for Fine Arts）（该组织与新议会大厦的建设有关）。他经常起早贪黑地工作，以便能有时间来推动他的特别计划。阿尔伯特是一个极有动力的人，而且对不列颠来说十分幸运的是，他的精力将在不久后被用于改革事业。

阿尔伯特还确保1841年的圣诞节是个愉快的节日。他从科堡购买了几株松树——并借此让圣诞树的传统流行开来[79]，尽管当时这些松树中有的被悬挂在屋顶上，有的像今天一样被放置在地上——他们还一起滑雪、堆雪人，并在松软的雪地上乘雪橇。维多利亚很难相信自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个1岁大的女儿以及一个2个月大的儿子，并拥有了温馨的家庭生活。在节礼日那天，安森在温莎城堡中满意地写道，女王“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小”，并且“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小公主身上”[80]。

另一方面，阿尔伯特则日益全神贯注地参与政治。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欧洲正酝酿着革命的狂热。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王室似乎暂时对断头台威胁保持免疫，但谁也说不好风向会发生多么迅速的变化。亲王为自己争取到了王室之主的地位，扫清了自己的障碍，将王宫清理干净，女王的密友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赶走。如今，他将注意力转移到

了英格兰的国家大事以及英国君主制的存续上。阿尔伯特决心开辟一个新时代：一个君主保持尊贵地位、不持党派偏见、公正无私的时代。他还决心不再重蹈妻子此前的覆辙。他将无所偏私地统治国家。他再也没有被嘲讽为一个温顺、听话的配偶；他对妻子的征服将得到认可和尊重。阿尔伯特时代已然开启。

---

[1] Bolitho，*Albert the Good*，86.

[2] 英国几家报馆办事处所在地，泛指伦敦新闻界。——译者注

[3] *The Times*，March 17，1841.《布莱克本标准报》（*The Blackburn Standard*）1840年12月9日援引他的话说："我想知道他们在王宫里是如何生活的，渴望了解这些人的习惯，我觉得对他们的描述在书里会很好看。"

[4] *The Times*，December 4，1840.

[5] *Jackson's Oxford Journal*，December 5，1840.

[6] 那年7月，看门人还在肖像画廊里发现了一名熟睡的男子，距离女王的卧室近在咫尺；她几分钟前刚刚从那里走过。那人名叫汤姆·弗劳尔（Tom Flower），曾在一个月前试图闯入加冕礼现场，这次来是再一次请求女王嫁给他。他被送到了托西尔菲尔兹监狱（Tothill Fields Prison）。

[7] *All the Year Round*，July 5，1884，234.

[8] Bondeson，*Queen Victoria's Stalker*，44. 希利援引狄更斯的话说，他"强烈怀疑所谓他思维敏锐的普遍观点"。*The Queen's House*，150.

[9] Bondeson，*Queen Victoria's Stalker*，25n；*Examiner*，March 28，1841. 邦德松补充说："后来有人曾怀疑帮助少年琼斯移居海外的是否真的是费尼莫尔·库珀，抑或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美国人。"

[10] Healey，*The Queen's House*，144.

[11]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08.

[12] To Baron von Stockmar，Windsor Castle，January 6，1846，引自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99.

[13] Healey，*The Queen's House*，152n.

[14] Wright，*History of Buckingham Palace*，176.

[15] Wright，*History of Buckingham Palace*，174.

[16] 这位年轻女王缺少清教徒主义的一个例子是她对艺术家乔治·海特的喜爱［当他画出巨幅画作《卡罗琳王后受审》（*The Trial of Queen Caroline*），画中出现了189个人物］。她对墨尔本勋爵说，她知道海特之所以没有入选皇家美术学会，是因为"他跟妻子吵了一架，然后分居了"。她后来还是在1842年向他授予爵位。Warner，*Queen Victoria's Sketchbook*，98.

[17] 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September 6，1841，203.

[18] 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September 6，1841，203.

[19] Memorandum dated May 5，184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39.

[20] A document described as "Secret. Memorandum of 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s with G. E. Anson，Private Sec. to Prince Albert，May 1841." Peel Papers，vols. 121-23，British Library papers：Add. 40，303. Extract：40301-3.

[21] Memorandum made by Peel，May 28，1841，Peel Papers，vols.

[22] "Memorandum of Mr. Anson's last secret interview with Sir R. Peel"（no. 4），May 23，184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58.

[23] Memorandum by Mr. Anson，August 30，184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83.

[2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0，1841.

[2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0，1841.

[26] Weintraub，*Uncrowned King*，120.

[27]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22.

[2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9，1841.

[29]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23.

[30] For example，May 5，May 6，May 7，1841.

[31] 她“亲爱、善良的朋友”墨尔本后来一直坚持给她写信，大部分是讨论个人事务，但偶尔也会不合时宜地给她提供政治事务上的建议——甚至就她是否应该支付新设立的收入税提出过建议。［在这些信件的第一卷（Viscount Melbourne to Queen Victoria，March 21，1842）中，墨尔本说，维多利亚支付收入税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他表示，她没有必要这么做。］这让阿尔伯特大为光火，阿尔伯特还让斯托克马写了一封抗议信。（身为改革家的皮尔希望对150英镑以上的所有收入征收7%的税，这在和平时期是一项十分激进的建议。）尽管斯托克马一再坚决要求他不这么做，但墨尔本还是不断给维多利亚写信。维多利亚后来将与另一位深受她喜爱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重复这一模式，那是19世纪80年代他下台之后的事情了。

[32] 皮尔全名是罗伯特·皮尔，鲍比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注

[33] Briggs，*The Age of Improvement*，326.

[34] February 21，1835，Greville，*The Great World*，99.

[35] Briggs，*The Age of Improvement*，326.

[36] September 17，1841，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204.

[37]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75-76.

[38] August 24，1841，September 2，1841，1：395-96.

[39] Memorandum by Mr. Anson，Au-gust 30，1841，引自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83。

[40]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85.

[4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1，1842. 在阅读自己的旧日志时，维多利亚在空白处潦草地写道：“再次读起，我忍不住要谈一谈当时自己的所谓幸福有多么虚伪，现在与亲爱的丈夫在一起又是一件多么真实的幸事和幸福，没有任何的政治和

世俗挫折能够改变；它无法持续长久，正如当时那样，尽管M勋爵既善良又优秀，对我也很和善，但只有社会才能让我获得欢乐，我只靠着这种肤浅的欢乐源泉，却把它当成是幸福！谢天谢地！对我和其他人来说，情况已经变了，我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样了。”

[4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7，1842.

[43]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460.

[44] Cecil，*The Young Melbourne*，524.

[45]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92.

[46] Cecil，*The Young Melbourne*，532.

[47] Lord Melbourne to Queen Victoria，April 20，1842，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494.

[48] 在1848年11月24日墨尔本去世那天的日志里，维多利亚没有提到他；维多利亚一直到第二天才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她把他当作一个“真正喜欢”她的人来哀悼，“尽管不是一个合格的大臣，却是一个高贵、仁慈和慷慨的人”。（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November 27，184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204.）不过，正如她给利奥波德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尽管她对他的记忆很好，但“好消息！我从未希望回到那段时光”。November 21，184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03.

[49]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16.

[50]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19.

[51]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19.

[52] Boykin，*Victoria*，*Albert*，*and Mrs. Stevenson*，251.

[53]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15.

[54] Gill，*We Two*，181.

[55] Fulford，*The Prince Consort*，74.

[56] Fulford，*The Prince Consort*，179. 贝内特（*King Without a Crown*，74）指出，一封写给埃内斯特的信被错误地解读为阿尔伯特对维多利亚的爱，而非对莱岑的厌恶，因为那段话之前的一句话被博莱索删了。*The Prince Consort*，34. 全文是这样的：“那个老太婆对你产生了深刻的仇恨，认为你是一切坏事的罪魁祸首。她昨天就是这么对安森说的。昨天在餐桌上，她看起来非常迷人，低颈露肩的，胸前别了一束玫瑰，看起来就像是快掉下来似的。”

[57] Healey，*The Queen's House*，121.

[58] October 5，1842，Greville，*The Great World*，205.

[59] Bloomfield，*Court and Diplomatic Life*，24.

[6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7，1841.

[61] 1840年时，她曾对墨尔本抱怨说，东方问题很无聊。（Longford，*Victoria R.I.*，149.）

[62] 值得称赞的是，阿尔伯特推迟了通知部分人维多利亚正在分娩，这意味着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的几位政要迟到了，错过了孩子的出生；当然，阿尔伯特此举是为了让妻子在经受钻心痛苦时不再承受内阁成员们无所事事地聆听的折磨。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November 11，1841，205.

[63] Jerrold，*Married Life of Victoria*，178.

[64] 维多利亚长子的昵称。——译者注

[65] Fulford，*Dearest Child*，147.

[66] See diary on September 4，1841，October 20，1841，November 2，1841，October 21，1842.

[67] 每1000名一岁以下的婴儿中有154名死亡。Jalland，*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120.

[68]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152.

[69]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96.

[70] January 16，1842，引自 Longford，*Victoria R.I.*，160。

[71] Longford，*Queen Victoria*，161.

[72] Source TK.

[73] Source TK.

[74] 1844年7月：“我们都在观察女王生病的迹象；但今天早上，在她上楼去教堂的路上，她的性格特点中最非凡的钢筋铁骨使她撑到了最后一刻，十分与众不同。”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48.

[7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5，1842.

[76]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31.

[7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30，1842.

[78] 薇姬于1858年1月25日在伦敦大婚；这是那年8月的一次探望。维多利亚在1858年8月12日的日志中写道：“我们路过车站时，莱岑就站在那里，挥舞着手绢。”

[79] 朗福德指出（*Victoria R.I.*，169），几十年前，夏洛特王后曾在温莎城堡装饰了一棵紫杉树，但这个想法要归功于阿尔伯特。这成了一种十分受欢迎的习俗。

[80] Memorandum by Mr. Anson，Windsor Castle，December 26，1841，引自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463。

14 实际上的国王：“就像一只冲向猎物的秃鹫”

他与她的身份认同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已经成了一个人，由于他热衷于工作而她厌恶工作，因而很明显，尽管她拥有头衔，但他才是真正发挥君主职能的人。他是实际上的国王。[1]

——查尔斯·格雷维尔，1845年12月16日

在19世纪中叶，对那些流落伦敦街头的人来说，1月通常是最难熬的。粪肥、烟草、烂鱼、久不沐浴的身体、制革厂、化工厂、燃煤以及房屋地下的粪坑在夏季发出的阵阵恶臭被严寒所取代。当太阳在苍白的天空上落下后，空气变得更为苦寒。瘦骨嶙峋的流浪猫四处翻找着食物，拾荒者们则在黑黢黢的下水道里四处搜寻铁钉、硬币或者小段的绳子，经常还要赶走硕大的老鼠。严寒让因为缺少墓地而被遗弃在排水沟和窄巷里的尸体四肢僵硬：他们有的是死于分娩的年轻女子，有的是在睡梦中被冻死的男人，有的是死于神秘疾病的骨瘦如柴的婴儿。寒风还透过破裂的窗户钻入狭小的房间里，一个个家庭在里面拥挤在一起用身体取暖。而在规模庞大又供暖糟糕的白金汉宫里，同样的寒冷迫使阿尔伯特亲王不得不穿着秋裤睡觉，还得戴着假发吃早饭。在伦敦，煤灰像雪片般落下，在帽子、屋顶和人们抬起的面庞上留下了漆黑的污秽。这位德意志亲王十分想念家乡的新鲜空气。

1846年1月27日下午，王室马车停在了威斯敏斯特宫门前，此时的太阳在成排烟囱的掩映下呈现出一片淡粉色的斑点。许多兴奋的民众聚集在议会大楼外，看着头戴礼帽、身着定制礼服的议员们一个接一个从眼前走过。他们时而喊出认识的议员的名字。有人在人群里出售牛肉和鳗鱼馅饼；还有个人在街角烤栗子。一个兜售香肠的女人爬上了排水沟里的一个垃圾堆顶端。一个约莫12岁的红衣男孩突然冲到马车后面，铲起马粪放进路边的篮子里；马粪将被卖给伦敦外围的农场和苗圃。一群

衣衫褴褛的孩子追着一只癞皮狗在街道上跑过。

阿尔伯特那一天特地来到议会支持他的朋友，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那将是皮尔职业生涯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辩论。皮尔是一名实业家的儿子，他认为，针对一系列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正在阻碍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并不公平地推高了普通英国公民的生活成本。地主阶层在大部分托利党的大力支持下强调说，废除这一关税，即《谷物法》，会毁了他们。皮尔不顾自身党派的意愿，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呼吁彻底废除这一关税。这既是一种政治上的勇气，也是在自毁前途。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十分赞赏皮尔的立场，在皮尔给阿尔伯特寄来一系列有关《谷物法》的备忘录后，他们决定支持他。勤奋的维多利亚与皮尔一样十分厌恶懒惰而享有特权的贵族，她在1846年的日记中写道：

> ［皮尔］补充说，看到“那些整天除了打猎什么也不做，每天晚上都要喝波尔多红葡萄酒，从来不研究这些问题或者阅读相关材料的老爷们跑去斥责和干预大臣们的工作”，让人感到非常不耐烦。这种局面让人感到的不仅是不耐烦，当我想到皮尔是如何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健康、舒适和时间，甚至他自己在党内的关系，换来的仅仅是他人的辱骂和可耻的忘恩负义，让人感觉相当怒火中烧。[2]

此时已临近下午4时30分，警察从1点起就列队站在道路两侧，将密密麻麻的人群挡在身后，这些人正吵嚷地呼喊着反对《谷物法》的议员名字。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皮尔信步走进下议院，优雅地向议长鞠了一躬，然后走向国务大臣席（Treasury Bench）的中心。他的仪态自信而优雅：作为一个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男子，他一头金发、眉清目秀，有着细长的鼻子和突出的脑门，以及深邃的眼睛。[3]观察家们经常将他的仪态形容为一个银行家或者“整洁的店主”才有的仪态。此时的他正承受着来自观众席的冰冷凝视，席上坐着总计400名贵族，他们的靴子上还沾着当天打猎留下的泥土。

当阿尔伯特亲王进入旁听席时，会议现场突然安静了下来。热爱赛

马的托利党议员乔治·本廷克勋爵（Lord George Bentinck）翻起了白眼：这位德意志亲王难道真的以为他可以用王室的青睐来影响这场辩论吗？起先是女王偏爱墨尔本，如今阿尔伯特又偏爱起了皮尔？这种来自君主的干预显得极为不同寻常，而且十分错误。迪斯雷利后来声称，即使是“温和派”，也对他的出现感到不安。

下午4时48分，皮尔站起身，抖了抖自己的袖口（维多利亚特别讨厌他的这个怪癖），在大厅里扫视了一眼，然后开始发表演讲。演讲持续了三个小时。结束后，阿尔伯特匆忙赶回王宫，对正打算前去吃晚餐的维多利亚说，皮尔的演讲“非常全面而出色”[4]。辩论进行了好几个晚上。2月底的一天，乔治·本廷克勋爵——他是枢密院职员兼日记作家查尔斯·格雷维尔的表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发表了一番惊人演讲，对亲王极尽嘲讽。（他的这番怒火为他赢得了下议院中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保守党的领导权。这个政党是在托利党因《谷物法》一分为二时组建的——支持自由贸易的皮尔派坚定追随首相，其他人重组为保守党。）乔治·本廷克勋爵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有着淡红色的胡须，身穿长礼服和天鹅绒马甲，脖子上还戴着一颗串在金项链上的绿松石。他说，皮尔已经抛弃了作为贵族的荣誉。而阿尔伯特的过错在于“听取了糟糕的建议”，他受到皮尔的“蛊惑”，“到议会这里来引领喝彩，而且可以说是按照女王的意愿对一项措施提供了某种来自陛下的个人支持，而这一措施无论是好意还是恶意，都会让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的至少大部分地主贵族深受其害，甚至会毁了他们”。[5]

出席这场辩论是亲王唯一一次过度涉入党派政治的行为，而且这是一个错误。托利党人自从维多利亚加冕后就一直对君主持怀疑态度，而既想拥有影响力又想保持中立的阿尔伯特曾誓言不表现出任何倾向性。在西奥多·马丁受维多利亚委托撰写的阿尔伯特传记中，女王为她的丈夫进行了一番辩护：“亲王之所以去，是像威尔士亲王以及女王的其他儿子会做的那样，去听一次优秀的辩论，这对所有的王子来说都大有裨

益。不过他理所当然地觉得再也不能这么做了。”[6]

等到3月议会就此事举行投票时，王室家庭正在风景优美的怀特岛度假。这天，维多利亚正打算离开海滩时，一名仆人满脸通红地跑了过来，手上拿着一个皮尔送来的匣子：下议院已经以绝对优势废除了《谷物法》。维多利亚看着这封信，大大松了一口气。阿尔伯特将皮尔视作一个志趣相投的人，甚至像是他的第二个父亲。他在写给斯托克马的信中说，这位托利党领袖“展示出了无穷的勇气而且兴致高涨；他的全部才能都被自己的意识所激发出来，即此时他正在国家的历史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之一”。[7]（应当指出的是，废除《谷物法》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成就。主要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反《谷物法》联盟”是一个表现完美、资金充裕且十分团结的政治组织。该组织的领袖都是些头脑灵活的演说家，他们将贵族们谴责为富裕的地主、尸位素餐的政客以及道德破产的领导人，从而有效地让他们居于守势。中产阶级的意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引领，而贵族们则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批判；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变。）

上任时接手了一团乱麻的罗伯特·皮尔与墨尔本勋爵截然不同，后者是乔治四世时代最后一任首相，信奉放任主义哲学，最著名的特点是对那个时代的暗流涌动视而不见。墨尔本对维多利亚统治初期困扰英国的诸多问题无动于衷：这些问题包括经济衰退、高失业率、高犯罪率以及贫穷。在墨尔本勋爵的懒政结束后，皮尔领导了一个所谓“真正在做事的政府”。他在两年内将财政赤字转变为财政盈余，这还是在1842年的首个预算中削减了一半多关税的情况下实现的。在1845年后，小麦成为仍然受到严密保护的唯一一种主要产品。他对年收入超过150英镑的人开征所得税，税率是每英镑征收7便士——相当于3%。（当皮尔宣布女王已经同意对自己的收入征税时，这一消息在下议院引发了一阵“巨大轰动”[8]。）他改革了银行体系，对企业进行监管，并着力解决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产生的诸多复杂问题。他很清楚一触即发的公众怒火带

来的紧迫性。经济和政治分析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说，皮尔“对遭遇革命的担心程度就像是个老妪担心患感冒一样”[9]。

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英格兰发生了有关两种作物的重要辩论，它们分别是土豆和小麦。1845年，爱尔兰土豆因夏季多雨和从美洲蔓延到欧洲的枯萎病而歉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也最终让有关《谷物法》的辩论获得了一些紧迫性。人为推高的物价导致谷物对爱尔兰穷人来说太过昂贵，而且大部分谷物都被出口到了英格兰，使粮食歉收的爱尔兰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替代食物来源。皮尔强调说，“取消对进口的阻碍是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10]。维多利亚变得越来越担心有关爱尔兰人“极端苦难”的报道，这些爱尔兰人甚至连死后也没有尊严可言，他们的尸体经常被丢弃在地上，既没有葬礼也没有棺材。[11]她决定将王宫里的面包配给限制在每人每天1磅的水平。

英国政府对发生在爱尔兰的悲剧做出的反应简直迟钝得令人发指。在饥荒的第一阶段，也就是1845和1846年，不列颠人组建了一个救济组织、投资建设市政工程，并为施粥场提供资金。他们向爱尔兰提供了700万英镑，而这仅仅是几年后他们为克里米亚战争所募集资金的十分之一。[12]但在1847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他们采取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爱尔兰人的苦难：《爱尔兰穷人法扩充条例》（Irish Poor Law Extension Act）引导穷人离开施粥场，进入拥挤的工厂，并在可怕的条件下辛苦工作。那些拥有超过四分之一英亩土地的人在申请救济时遭拒绝；许多人都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财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试图摒弃对土豆的依赖、改善农业状况，或者改革土地租赁制度。令人震惊的是，在饥荒的那几年，爱尔兰仍然在向英格兰出口食物。不幸的是，废除谷物税将无法为爱尔兰人提供多少帮助。

英格兰人对于放任主义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而持久的信仰。政府不愿对灾情进行干预，表面上的借口是那些受苦之人应当有能力在无需援助

的情况下自行摆脱苦难和贫穷。政府担心，恩惠会腐化他们。英格兰还对爱尔兰人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偏见。英国国教牧师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每当提到爱尔兰这个名字，英格兰人似乎就抛弃了起码的感情、审慎和常识，像残忍的暴君和昏庸的蠢货那样采取行动。”[13]即使是年轻的女王，也免不了产生这些情绪。她的情绪在对地主将小麦配给占为己有的愤怒与对爱尔兰人杀害这些地主的厌恶之间来回摇摆。[14]当听说一名男子在驾驶马车回家途中被人谋杀的事件后，她写道：“他们真是一群可怕的人，哪里都找不到这么野蛮的地方，太可怕了，那里到处都是这种可怕罪行！这始终让人感到焦虑和烦恼。”[15]她一直到1849年才第一次访问爱尔兰，那时距离她登上王位已经过去了12年。[16]

总体而言，在19世纪40年代，政治上的关注点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1842年5月英国议会发表的第一份有关童工的报告中，出现了6岁儿童被锁在运煤车上的惊人插图。报告称，最年幼的童工负责为矿井通风，保持活板门关闭，等到有运煤车需要通过时，他们负责正确开关活板门。这些被称作看门工的孩子年龄在4岁到10岁之间。《观察家报》报道称，这些孩子最讨厌的是地下的黑暗：他们常常恳求矿工给他们留几个蜡烛头。女性和年龄较大的儿童被安排沿着对成年男子来说太过狭窄的通道拖拽运煤车。他们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行，穿过一个个水坑和石碓。[17]女孩子们有时会像男孩一样半裸着上身工作，男人们在酷热之中也经常全身赤裸，而性侵在矿井里十分普遍。人们曾担心，那些在矿井中工作的女性会再也不适宜婚嫁。[18]

这些故事激发起了公众的想象，并为改变提供了动力，这种改变是在遭遇巨大阻力的情况下逐步出现的。[19]1842年的《煤矿法》禁止雇佣任何女性以及10岁以下的男孩，并确保督察员会强制执行这项法律。1844年的《工厂法》为纺织厂工人的每日工作时间设置了上限，8到13岁儿童是6个半小时，而女性是12个小时。1847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将每

天10小时工作制确立下来。到那个十年的末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到1851年时，只有2%的5～9岁儿童参加工作，而在10～14岁儿童中，这一比例也仅为四分之一。[20]在维多利亚的统治时期，她大多数臣民的生存条件都得到了显著改善；投票人数增加，也有更多的人在工作中得到了基本保护。国家的现代化真正开始了。

与此同时，在1842年的那个春天，白金汉宫正忙碌地为一场舞会做准备。5月12日，英格兰最时髦、最富有也装饰最为华丽的人物都聚集一堂，身穿用英国丝绸织成的服饰，以表达对斯皮塔佛德的贫困丝织工人的支持。这是阿尔伯特的主意，维多利亚也对此兴奋不已。斯皮塔佛德的女裁缝师们在几周时间里辛苦制作了他们的华服；维多利亚还用水彩在日记里画下了自己的礼服。

舞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伦敦全城的珠宝商都将自己的钻石倾囊而出。女王身穿白鼬皮衬里的惊艳礼服、绣着金色花纹的银色外套、敞口天鹅绒垂袖、毛边天鹅绒小裙摆，以及镶有珍贵宝石的臂环。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镶满宝石的金色王冠。阿尔伯特穿着一件貂皮衬里、边缘镶有1200颗珍珠和金色花边的红色天鹅绒披风。用来固定披风的胸针闪耀着钻石、绿宝石、红宝石、黄宝石以及其他珍贵宝石的光泽。披风下是一件金蓝相间的织锦礼服，斜里还挎着一件镶着钻石的宝蓝色天鹅绒缎带。他的剑柄上也镶着钻石。维多利亚的王冠一直往侧边滑，她的高跟鞋跳起舞来也不轻松，但她表示，那个夜晚完美无瑕：《伦敦新闻画报》（*The Ilustrated London News*）写道，英格兰从未像那个晚上一样如此决定性地展示其“在女性魅力上的至高地位”。女王一直跳舞跳到凌晨2时45分。

这场舞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珠光宝气的贵族们在大烛台下熠熠生辉，而那些孩子们却整天在黑暗中工作，只能祈求别人施舍给他们几个蜡烛头。在那个时代，王室的华贵被认为是臣民的骄傲，标志着英

格兰的实力与财富。然而，这场误会引发的反响揭示出了人们对富裕阶层日益增加的厌恶和反感。专职讽刺的工人阶级报纸《怪咖》（*Odd Fellow*）写道："一些仁慈的男女贵族们决心将自己伪装成忍饥挨饿的织工，好让女王陛下能够对眼下广泛存在的苦难有个模糊的印象。当这群人进来时，女王陛下将受到深刻震撼，第二天的报纸将报道说，女王留下了眼泪。"[21]

这种轻蔑态度显而易见。《北方星报》（*Northern Star*）将维多利亚比作在大火焚城时还在拉小提琴的尼禄。凭借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从穷人手里榨取的金钱，贵族们纷纷租借钻石、举办奢华盛宴，"幼稚地挥霍了成千上万英镑"[22]。维多利亚举办斯皮塔佛德舞会的初衷是好的，织工们也短暂地迎来了工作量的猛增，但这一切无法持久。这一行业的衰落是无法避免的。

在那个大多数工人阶级都生活在苦难之中的时代，维多利亚更容易被她遇到的个体而非改革运动激发出同情心。她会担心寡妇们是否有钱维持生计，以及为她表演的侏儒们是否受到了良好对待。她会担心孤儿、受伤老兵以及性侵受害者的福祉。当看到怀特岛上关押的少年犯"孤独地"在单人囚室里度过好几个月时，她为他们的悲惨生活感到难过。（时刻在意审美的她对于他们的相貌之丑陋感到十分困惑，认为他们看起来"真吓人"。）她曾要求让每一个牢房里"最有资格的男孩"得到赦免。[23]但是，当为穷苦工人的权益倡议了20年的贵族政客沙夫茨伯里勋爵提议修改法律，将每日工作时长减少到10个小时时，她表示了反对，她和皮尔都认为这会破坏经济生产效率。[24]在阿尔伯特费尽心力制订计划以消除贫困、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时，维多利亚需要的是更多视觉上的触动，以及直接和个体性的刺激。

尽管阿尔伯特显得风度翩翩，但他却仍然难以得到英格兰的充分接受。维多利亚对于王室家族对她丈夫不断展现出的敌意感到怒不可遏。

她的叔叔们经常争夺优先权，坚称他们的位次应当居于这位德意志亲王之前，这导致了许多荒唐场面，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不得不在正式活动中将他们挤到边上。在1843年7月举行的一场婚礼上，刚刚从流感中痊愈的阿尔伯特用力将汉诺威国王（即坎伯兰公爵）推下了圣坛的台阶，而维多利亚从圣坛的一侧小跑到另一侧，好在签署完结婚证书后将笔递给阿尔伯特。[25]

维多利亚害怕阿尔伯特的尊严会受损。在德意志时，她对普鲁士国王安排一名奥地利大公坐在维多利亚旁边以显示他的优先权并怠慢阿尔伯特的做法感到愤怒至极。（一直到多年后，她才同意再次接受来自普鲁士人的殷勤款待。）1842年6月，她对皮尔谈及“亲爱的阿尔伯特的尴尬而痛苦的地位，很奇怪女王配偶这个职位竟然没有任何财政拨款，我希望未来能够把阿尔伯特王夫的地位确定下来”。她写道，她担心“王夫这一职位对任何男人来说一定都很痛苦和耻辱”，甚至于“有时我几乎觉得，如果我没有嫁给他的话，对他来说或许更公平一些。但他如此温柔、善良，深深地爱着我本人”。[26]她曾试图使他被正式认可为配国王，但未能成功。最终，维多利亚在1857年利用自己的皇家特权通过皇家特许证将阿尔伯特封为王夫。

在1844年1月阿尔伯特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孤立变得日益明显。阿尔伯特偶尔会在私下里流泪，他对斯托克马抱怨说，“我们身边的众人都冷若冰霜”。[27]埃内斯特公爵一直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他抛弃了阿尔伯特的母亲，一直向他伸手要钱，曾试图勾引王庭内的侍女，并且曾经对阿尔伯特的长子没有取他的名字而十分恼怒。但阿尔伯特很爱他的父亲，因而父亲的死让他悲痛欲绝。维多利亚也对丈夫的悲伤感同身受，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那种人了。”阿尔伯特“既难过又凄凉，虽然他在我们彼此间的亲密爱情里得到了慰藉和幸福”。[28]每一次她凝视着自己的丈夫，她的眼中都满含着泪水。[29]

阿尔伯特将父亲的死视为一个征兆，预示着他如今必须全身心投入到第二段人生之中来，也就是他的妻子和人数日渐增加的家庭。如今，他的家已经变成了英格兰，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他再也没有一个能够回归的故土了。他在给兄长埃内斯特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我们为何哭泣，他们还问我们为什么要穿上黑色衣服；维多利亚与我一起哭泣，既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们所有人。让我们照顾好［我们的妻子］吧，让我们给予她们爱和保护，因为在她们身上，我们将能再次找到幸福。”[30]悲伤再一次拉近了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的关系。阿尔伯特写道：“维多利亚是我的全部存在赖以维系的珍宝。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别无所求。那是一种心灵与灵魂的结合，因此无比崇高，可怜的孩子们将在其中找到他们的摇篮，并借此在未来为他们自己找到相似的幸福。”

始终保持务实态度的阿尔伯特仅仅几周后就宣布自己已经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已经准备好“通过持续工作来强化自己”，并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家庭中。[31]亲王返回德意志安慰自己的兄长，并安排父亲的后事。这是他婚后第一次离开维多利亚，因而他写给自己“亲爱的妻子”的信中充满了甜蜜的安慰和爱意。

当阿尔伯特结束两周的分离返回时，维多利亚一听到他马车的声音就跑下了楼梯。她是如此兴奋，以至于那一晚大部分时间，她都睁着眼睛躺在他身边，静静地看着他睡觉，“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感激”。[32]

女王有许多需要感谢的东西。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她都与丈夫一起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她的孩子正茁壮成长，他们在苏格兰和怀特岛找到了喘息之机，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惬意也让她深感欣慰。她在日记中热情洋溢地写到了他们的孩子在地板上玩耍，而她和阿尔伯特就着台灯坐着读书的场景。他们时常长时间散步、玩九柱游戏，或者品尝樱草茶。1843年底时，她曾对于不得不离开白金汉宫前往另一处行宫表达过

遗憾，但她知道，自己没什么好抱怨的：“我在那里一直很幸福——不过就现在的我而言，在哪里不幸福呢？”[33]

维多利亚在1843年4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婴儿被取名为爱丽丝·莫德·玛丽公主，不过她的小名叫法蒂玛（Fatima），因为她是个胖乎乎的小婴儿。维多利亚对于又一次在分娩中幸存了下来感到松了口气。仅仅两天后，她就感觉枯燥无聊了：“躺在这不动什么也不做太无聊了，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34]她需要躺在床上被人推到起居室，然后坐在扶手椅中被人推着去吃晚餐。[35]她一边察看印度王公作为礼物送来的珠宝，一边等待阿尔伯特回到她的身边。阿尔伯特正忙着在自己的职责中添加新的内容，并代表女王主持官方接待活动。在她还挺着大肚子怀着爱丽丝时，维多利亚曾同意接见惠灵顿公爵，但在她感到疲倦后，阿尔伯特替她见了另外几位大臣。阿尔伯特会见了皮尔，两人一致决定维多利亚“相当古怪的”叔叔、在维多利亚生下他们第三个孩子的几天前刚刚去世的萨塞克斯所拥有的头衔如今应当转交给阿尔伯特，这些头衔分别是：巴斯总司令骑士勋章（Knight Great Master Order of the Bath）以及圆塔统治者（Governor of the Round Tower）。

不久后，维多利亚又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1844年8月6日，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为阿尔弗雷德·埃内斯特·阿尔伯特。他是个漂亮的男孩，有着浓密的深色长发、一双蓝眼睛和一只大鼻子。分娩过程疼痛难忍，维多利亚受的苦很“严重”，但她“健康的大胖小子”给她带来的喜悦洗刷了分娩的疼痛。阿尔伯特再一次全程陪在妻子身边。随着家庭规模不断扩大，阿尔伯特开始计划他们的未来。这个儿子后来被他们称作“阿菲”，在他的洗礼仪式上，阿尔伯特已经在谋划将4岁的薇姬嫁给普鲁士国王12岁的儿子了。阿尔伯特的计划是让伯蒂成为未来的国王，而阿菲成为科堡公爵——如果阿尔伯特的兄长没有生出继承人的话——而薇姬将作为普鲁士王后成为嵌在欧洲的一枚楔子。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不可能预见到未来一百年里欧洲发生的风云巨变，他们为后

代安排的一些联盟关系将在后来被证明对英格兰而言极为艰难，对他们的孩子而言则是充满了心碎。

维多利亚在婚后的前五年里生下了四个孩子，与此同时，阿尔伯特承担起了无比广泛的职责。皮尔将他任命为议会大楼重修工作的美术委员会主席——威斯敏斯特宫曾在1834年被烧毁——负责监督在经过翻新的议会大楼里安放艺术作品。他还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校长，并通过革新和拓展教学课程为该校做出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贡献。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他还花了许多时间来改造他在怀特岛上的家族宅邸以及白金汉宫。他为温莎城堡增加了一片农场、一排狗舍以及一个制酪厂，并亲自设计工作人员的宿舍。斯托克马将阿尔伯特在事业上不懈而迅速的发展归功于他的“实用型天赋，他凭借这种天赋能够在一瞬间抓住一件事情的关键，然后像盯上猎物的秃鹫一样伸出自己的爪子；然后带着猎物飞回巢穴”。[36]

阿尔伯特的好奇心十分旺盛。他像一个拼命学习应考的人一样研究他的新国家，仔细研究建筑计划、参访美术馆，并在他参观的工厂里把脖子伸到机器里去查看。他竭尽所能记录下一切，包括保存在温莎城堡的珍贵手稿，例如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手稿集。幸运的是，阿尔伯特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够推行自己的许多大胆想法；他通过游说成功地将决斗非法化，并且为军队设计了头盔、为育婴室设计了婴儿床，还为自己的孩子设计了示范农场。他养的猪甚至在农业展会上赢得了一等奖。[37]或许他最大的胜利是克服了对自己骑术的“一切无礼嘲笑”，向英国人展示他有能力“勇敢而稳当”地骑马。[38]维多利亚对于他最初竟然会因为这件事而被抨击感到非常生气。

阿尔伯特的勤奋、节俭、拘谨、虔诚以及想要驾驭19世纪时髦活动的渴望，从许多方面说比维多利亚本人更好地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他也因此受到我们如今所谓的“职业倦怠”的困扰。阿尔伯特动力十足，但

也体弱多病。这对夫妇在1843年第一次乘坐火车，从斯劳（Slough）前往距离不远的伦敦，而阿尔伯特却在旅途中深受晕车困扰，每小时45英里的速度就让他难受不已。维多利亚却对坐火车十分喜爱：“我觉得这种颠簸非常舒服，比马车要舒服多了，不能理解怎么有人会感到难受。”[39]阿尔伯特是一个被奢侈和舒适所包围的人，但他却放弃了休息，让无休止的工作毁掉了他的健康。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那个世纪可能会以“阿尔伯特时代”的名字更为人所知。

到1845年，阿尔伯特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国王了。那一年12月，兰斯多恩勋爵与约翰·拉塞尔勋爵造访了温莎城堡，并对他对王冠的牢牢掌控印象深刻：

> 以前，女王都是单独接见大臣的；他们会与她一个人交流，尽管阿尔伯特亲王肯定会了解一切；但如今，女王和亲王在一起，共同接见了兰斯多恩勋爵与约翰·拉塞尔，两人还言必称“我们”……很明显，尽管她拥有君主的头衔，但他才是真正履行君主职能的那个人。他是实际上的国王。[40]

维多利亚此时正怀着他们的第5个孩子。她将丈夫描述为一个比她自己更聪明的助手；她有时会对他的才能惊叹不已。维多利亚信件的编辑阿瑟·本森与伊舍勋爵证明了阿尔伯特工作有多么勤奋以及他给女王带来的帮助有多么明显。他负责整理女王的文件并加上评注，还撰写了“数不胜数”的备忘录。但维多利亚始终是女王。尽管女王的回复经常是由阿尔伯特草拟的，但她经常会修正和改写其中的部分内容，而且她会自己草拟大部分信件。本森和伊舍写道：

> 许多草拟都是由她自己写的，亲王会在行间进行修改和添加；这些草拟与亲王手写的草拟在文风上十分相似，很明显女王并不仅仅是接受了建议，还对重要事件有着她自己的强烈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有些人错误地以为阿尔伯特的努力和看法会抹杀维多利亚。例如，在宗教宽容度等问题上，维多利亚从小时候起就有着坚定的主见。当罗

伯特·皮尔想要改善天主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并为天主教的梅努斯神职人员培训学院提供更多资金时，尽管英格兰各地抗议四起，维多利亚还是向他提供了支持。她在宗教问题上有着十分突出的进步思想："我们所信奉的宗教形式让我感到脸红，它竟然如此缺乏一切恰当的情感，还如此渴求救济金。我们难道要把这70万目不识丁的罗马天主教徒赶到绝望的境地，让他们走上暴力之路吗？"[41]维多利亚对皮尔起身对抗"顽固浪潮以及盲目狂热"的行为表示称赞。[42]

皮尔的《谷物法》让他付出了整个职业生涯的代价。6月25日，这位首相在下议院的一次重要投票中失利，部分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团结在一起投他的反对票。他提出辞职并就此退休，而辉格党人再次执政。此时已经对皮尔颇有好感的女王对他说，她和亲王都认为他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朋友"[43]。皮尔请求获得一张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还有威尔士亲王的肖像——威尔士亲王是在皮尔成为首相后不久出生的——并希望他们在肖像中穿着"简朴的服饰"，就像他经常看到他们的那样。[44]皮尔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的国家做到最好，而他最大的缺点在于无法说服他的党派这就是最好的结果。[45]他迄今仍然以党派叛徒的身份被人铭记。

当了解到皮尔在政治上的失败时，维多利亚正在从第5个孩子的艰难分娩中恢复，那是一个胖乎乎的健康女婴，名为海伦娜·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公主，生于1846年5月。尽管她为皮尔感到难过，但满足的家庭生活让她变得更为冷静。这与5年前她在失去墨尔本时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说真的，当一个人像我一样在家庭生活中如此幸福和幸运时，政治只能退居第二位了（前提是我的国家安全无虞）。"[46]这些话经常被人引用，以强调所谓女王对政治的厌恶。但此时距离她生下第5个孩子仅仅过去了两周，看着恶毒的政治反对派粗暴地对待一个她日渐喜爱的优秀政治领袖，她仅仅是说出了许多政客在危急之时会想到的真相：那就是家庭事务比一切都重要。不过她在这里添加的插入语也很重

要：前提是她的国家安全无虞。

墨尔本已经走了，如今罗伯特·皮尔也走了。但这对王室夫妇已经不再需要这些精神导师了。到1849年他们两人都已年满30岁之时，维多利亚与她的亲王已经形成了一股令人生畏的合力。时任首相、著名辉格党人约翰·拉塞尔勋爵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安抚和帮助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爱尔兰人，还要管理好他目中无人的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这位勋爵让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越来越不喜欢。他们与他的斗争将影响下一个时代的英国外交政策，并证明女王和亲王在意见一致、并肩作战时的实力。

---

[1] Strachey and Fulford，*The Greville Memoirs*，5：257.

[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4，1846.

[3] For a portrait of Sir Robert Peel se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August 27，1842，243.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7，1846. 少女时代就对皮尔的演讲十分感兴趣的维多利亚在第二天读到了这篇演讲，并称其是“非常优美，但太长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8，1846.

[5]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HC Deb*）February 27，1846，vol. 84，cc249-349. 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之前，阿尔伯特的存在仅仅让皮尔的对手感到不满。媒体丝毫不感兴趣，有关本廷克（Bentinck）演讲的报道没有提到他对阿尔伯特的苛责。

[6]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322.

[7] February 16，1846，Martin，*The Prince Consort.*

[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6，1842.

[9] Charlot （*Victoria the Young Queen*，263）quotes Norman St. John-Stevas，*Walter Bagehot.*

[10] Parker，*Sir Robert Peel*，3：223.

[1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8，1846，引自 Longford，*Victoria R.I.*，190。

[12] Hoppen，*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570.

[13] 引自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411。

[1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5，1847.

[1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5，1847.

[16] 在此之后，维多利亚又访问了爱尔兰三次：分别在1853年、1861年和1900年。

[17] 所有都源自*Examiner*，May 14，1842。

[18] Heesom，“The Coal Mines Act of 1842，” 75.

[19] 1833年第一项有效的《工厂法》禁止纺织厂雇佣9岁以下儿童——但丝绸和蕾丝工厂除外——并且对13岁以下儿童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制，每天不得超过9小时，或者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13岁以下的儿童还被要求每天上学2小时。

[20] Lavalette，*A Thing of the Past*？，78. 需要指出的是，拉瓦莱特指出，在工业化之前，许多儿童的工作条件甚至更为恶劣，尤其是那些在小型工业和手工作坊里工作的儿童，例如织布工和编织工等。

[21] *Odd Fellow*，May 14，1842.

[22]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June 4，1842.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1845.

[24] 1844年，皮尔提出了《工厂法》，将纺织厂中童工的工作时长削减到6小时。阿什利勋爵想要对其进行修改，好让所有年轻人以及女性的工作时长削减到10小时。这一修正案得到通过，但皮尔对此表示反对，因而撤回了该法案。［需要指出的是，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在1851年才成为伯爵，在此之前他一直被称作阿什利勋爵。］

[25] 与这位备受争议的公爵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维多利亚珠宝的争夺——它们曾经属于夏洛特，理应由公爵继承，但维多利亚不愿放弃它们。

[2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9，1842.

[27] Prince Albert to Baron Stockmar，Windsor Castle，February 4，1844，引自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88。

[2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4，1844.

[29]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38-39.

[30] February 4，1844，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69.

[31] Prince Albert to Baron Stockmar，Windsor Castle，February 9，1844，引自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89。

[3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2，1844. 第二年，当她生平第一次前往德意志时，维多利亚造访了丈夫儿时在罗泽瑙的家，并且深受感动："如果我不是自己的话——这会是我的理想家园，但我会始终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 August 20，1845.

[3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3，1843.

[3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7，1843.

[3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6，1844.

[36] Stockmar，*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100.

[37] 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227.

[38]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December 12，1843，Hibbert，*Queen Victoria in Her Letters*，72.

[3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7，1843.

[40] December 16，1845，2：323.

[4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5，1845.

[4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5，1845.

[43] Queen Victoria，July 1，1846，引自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100。

[44] Peel to Victoria，July 24，1846，引自 Parker，*Sir Robert Peel*，3：452。

[45] Greville，*The Greville Memoirs*，2：325.

[4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0，1846.

15 完美无瑕、令人敬畏的繁荣

在许多年里，这对年轻人对自己孩子的痴迷程度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充满深情的年轻父母，尽管需要在公务上花费许多时间，但他们仍然会每天花大量时间来与他们的人肉玩具一起玩耍。[1]

——克莱尔·杰罗尔德（Clare Jerrold）

那里有平静、安逸、荒野、自由和孤寂。[2]

——维多利亚女王谈苏格兰

大拇指汤姆将军（General Tom Thumb）仅有25英寸高，体重仅有15磅，却在觐见女王的那天一点也不紧张。这个美国男孩年仅6岁，不过他的年纪通常被宣传为12岁或14岁。本名查尔斯·舍伍德·斯特拉顿（Charles Sherwood Stratton）的他从年仅7个月大时起就停止了生长，看起来像个袖珍小人。他有着一头金发、黑色眼眸和通红的脸蛋，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服装。[3]这个自信的美国艺人推开门走进女王的画廊，坚定地走在长长的地毯上，走向正在等待他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

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呼。他的经理、当时把他从父母手中“租借”来的P.T.巴纳姆（P. T. Barnum）后来写道，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能活动的蜡人”一样。大拇指汤姆从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些艺术品旁走过——包括鲁本斯（Rubens）、范戴克（Van Dyck）、伦勃朗（Rembrandt），以及弗美尔（Vermeer）等人的作品，大部分是由查理一世国王收藏的——停在了身材娇小的女王面前。生平第一次，她发现自己能够俯视某个人了。随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这种失礼之举引发了宫廷的一阵喧嚣：他没有称呼女王为“陛下”。女王牵起大拇指汤姆的手，带着他绕着画廊走了一圈，问了几个问题。他对她说，觉得她的画廊“十分一流”，引起诸位王室成员的开怀大笑。在接下

来的一个小时里，大拇指汤姆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模仿拿破仑，奉献了一场天衣无缝的表演。

巴纳姆被要求像所有宾客一样弯腰鞠躬、倒退着离开房间。画廊有着相当长的距离——大约50米长——而据巴纳姆所说，大拇指汤姆的短腿跟不上巴纳姆的步伐；落后时，他会转过身小跑几步，然后再转过来后退，然后再跑几步。他不断地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整个画廊都被笑声所笼罩。四处洋溢的兴奋之情让维多利亚的狮子狗也变得激动不已；它开始不停狂吠，而大拇指汤姆则被迫用拐杖将它挡开，却让人们笑得更厉害了。

维多利亚后来曾担心巴纳姆对大拇指汤姆不够温和，她将他描述成“我或者说任何人此前都未曾见过的最稀奇的奇人”：

> 这个小东西没有任何描述能够形容，他的真名叫作查尔斯·斯特拉顿……他是美国人，给我们他的名片，名片上写着“大拇指汤姆将军”的字样。他鞠躬时滑稽至极，会伸出他的手然后说：“不胜感激，女士。”我情不自禁地为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感到难过，希望他能够得到妥善照料，因为那些把他拿出来炫耀的人一定经常欺负他，我觉得。[4]

那一年是1844年，是大拇指汤姆为期3年的英国和欧洲巡演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三场成功表演的第一场。[5]维多利亚赏赐了汤姆金钱和礼物，但她给予的最重要礼物是她的关注，这让他获得了无上的荣耀和知名度。[6]大拇指汤姆将军成了时尚的宠儿；在他位于皮卡迪利广场的展览室外，一辆辆马车排起了长龙。汤姆乘坐一辆外形小巧但装饰华丽的红白蓝三色相间的马车在伦敦的街道上招摇过市，拉动马车的是几匹漂亮的矮马。[7]他很快就换上了宫廷礼服：一件刺绣精美的褐色天鹅绒外套和一条短裤；一件绘有彩色图案的白色绸缎背心；白色丝袜和鞋子；以及一顶假发、一顶三角帽、一柄假剑。他和他著名的老板巴纳姆非常清楚该如何取悦人群。巴纳姆声称，他的这个年轻门徒已经成了罗伯特·皮尔首相和惠灵顿公爵的“心爱宠物”。女王在1856年又一次邀请他进

行了表演。

维多利亚对这些当时所谓的“奇人异物”非常感兴趣：它们有的是奇珍异兽，有的是天赋异禀的男男女女，从马语者到侏儒再到宫廷小丑等不一而足。在与阿尔伯特结婚后不久，维多利亚就观看了“狮女”的表演，那是第一位以毫发无伤地进出关着狮子和老虎的大型兽笼而闻名的女性。她的表演在温莎城堡的庭院中进行，女王则是隔着一扇窗子进行观赏。表演结束后，维多利亚接见了这名女性，称赞了她的勇气。维多利亚说：“可怜的姑娘。我希望并祈祷你永远也不会受伤。愿上帝保佑你！”[8]

维多利亚对弱势人群展现出的善意以及她对奇人异事表现出的好奇心贯穿了她的一生。当一对号称世界上身高最高的夫妇宣布订婚时，她邀请他们造访了白金汉宫，并向新娘赠送了一件婚纱和一枚钻石戒指。[9]在年近80之际，女王还要求英俊而健壮的欧根·桑多（Eugen Sandow）定期为她表演。当一头曾为她进行过表演的名叫“查理”的大象杀死了一个欺负它的男人后，维多利亚给它的饲养员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她的遗憾。[10]

那是一段幸福的岁月。维多利亚艰难地应付着接连不断的怀孕和人数迅速增加的子嗣，并对欧洲的动荡忧心忡忡，但与此同时，她也在维护自己的权利，给予丈夫充分的自由来执行他的计划，并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心满意足。她与阿尔伯特喜欢在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为他们举行私人音乐会时一同引吭高歌；他们在家中建造了一个小剧场，以表演戏剧，并畅享美食与美酒。维多利亚有时会有些过于放纵：斯托克马曾在给她的信中严厉地写道：“女王不应一顿饭喝完一瓶葡萄酒。”[11]她真正渴望的是私密、独处，以及位于海边或者苏格兰高地的小家。[12]她最喜欢的两个词分别是“温馨”（cozy）与“舒适”（snug）——它们都可以用德语单词“*gemütlich*”来概括。

拥有苍翠牧场和灰白峭壁的怀特岛是第一个被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当作家的地方。整个岛屿弥漫着魔法般的空气；人行小径上到处都是长满鲜花的灌木丛和低垂的树枝；兔子在海岬上跳跃；夜莺在树林中歌唱。在他们明光透亮、微风吹拂的房子奥斯本宫里，每个房间都能看到优美的海景。维多利亚幼年时曾在这座岛上居住过，当皮尔通知他们岛上的一片地产可供购买后，阿尔伯特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谈了下来，并通过自己精明的预算支付了购置款。他十分珍惜这个不受政府干预，自行设计和改造一座房子的机会。他找来了著名建筑师兼绘图师托马斯·丘比特（Thomas Cubitt），并亲自参与一切：无论是意大利式地板设计和外观、艺术品和瓷器的摆放、花园、海滩、泥土、下水道，还是树木的种植，他都事必躬亲。阿尔伯特建了一座冰室、一片用于灭火的小湖泊、一栋为维多利亚而建的装点着马赛克瓷砖的海边小屋，以及一个专为孩子而建的海上漂浮游泳池。（维多利亚用的是一台木质游泳更衣车，她喜欢藏在里面悄悄滑到海里。）他还设计了婴儿床；吊在石质台球桌上方的吊灯，这些吊灯需要向外摆动才能进行清洁；在会客厅的推拉门上装了镜子，好在夜间反射水晶吊灯的灯光；并建造了瑞士小屋（Swiss Cottage），孩子们在里面种植植物、搜集岩石，并且用他们的玩具枪在模拟堡垒中玩耍。圣诞节时，他会创作赞美诗，好让全家人伴着吹奏乐器的伴奏一同演唱。

对维多利亚来说，这个家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小天堂”[13]。春天、羊群、夜莺和树叶都让她感到心情舒畅（“树木似乎被一层羽毛覆盖一样”[14]）。阿尔伯特也十分享受那里的生活。维多利亚在1845年写道：“看到亲爱的阿尔伯特享受这一切，对这块地方充满了喜爱，还打算实施如此之多的修缮计划，我感到非常欣慰。他在家里几乎一刻也停不住。”[15]她在3年后表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治疗方式。[16]阿尔伯特十分喜爱园艺；他尝试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变成肥料，并且在发现无法让他人效仿他的做法后，尤其考虑到伦敦污水横流的状况，他感到极为失望。他还获得了善待雇员的好名声。

身在奥斯本宫的维多利亚是一个热情、快乐的女子，还处在新婚燕尔的激动之中。她的写字台上摆放着家人的相框以及宝宝的小手和小脚模型：胖乎乎的爬满皱纹的小手、带着浅浅凹痕的手肘以及圆滑的脸蛋——作为父母，她和阿尔伯特捕捉到了一个个如果不去细心发现就会匆匆流逝的青春瞬间。造价昂贵的黄色会客室里悬挂的一幅画展示了当时这对夫妇不易被人察觉的机智与活泼。它刻画了3名女性坐在长满绿叶的树下沐浴着午后斑驳阳光的画面。其中一名带着神秘微笑的女子正靠在另一名女子身上。起初，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无伤大雅、如梦似幻的夏日野餐场面。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在那名脸上带有微笑、向后靠着的女子裙子下找到一个男子背部的轮廓，她的衬裙下还可以看到伸出了额外的一双脚。这幅由弗朗茨·克萨韦尔·温德尔哈尔特（Franz Xaver Winterhalter）创作的《短暂的休息》（*La Siesta*）被认为是女王购买的第一幅画作。一想到俏皮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一起看着这幅画开怀大笑，狡黠地向访客展示这幅画却不指出隐藏的男子，就让人忍俊不禁。[17]

在夏末或秋天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经常会前往北方人迹罕至的苏格兰山区。维多利亚第一次去是在1842年，那时她正饱受伯蒂出生后的产后忧郁症折磨。[18]她与阿尔伯特都被苏格兰高地原生态的寂静和美丽所折服。他们喜欢在荒无人烟的山丘上散步；在维多利亚专心绘画或者与侍从——他们都是些当地人，负责狩猎、钓鱼或者徒步探险时伴随左右——聊天，孩子们开心玩耍时，阿尔伯特喜欢进行狩猎或者跟踪小鹿。阿尔伯特喜欢当地“严峻而雄伟的山峰”和“纯净而清新”的空气，以及当地人“更为返璞归真的性格，他们身上带着远离城市的山地居民特有的真诚与热心”。[19]这让他回忆起了他童年时在德意志的家。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在1848年9月第一次前往位于巴尔莫勒尔（Balmoral）的“漂亮的小城堡”。他们在沉默中徒步爬了几英里山路，为的是一览越来越宏伟的景色。维多利亚写道：“这里看不到一个人，

除风声以及山鸡或松鸡的叫声外听不到一丝声音，简直太棒了。这让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崇敬与肃穆之情。”[20]颇为含蓄的阿尔伯特十分喜爱“山中彻底的孤寂感，在这里我很少能看到人类的面孔”。他最希望做的事是打猎：“我是个爱玩的人，一直在悄悄跟踪几头无辜的牡鹿，今天，我射杀了两头红鹿。”[21]他对待打猎的态度十分认真，而维多利亚也会焦急地等着听他讲述他搜集到了多少件兽皮：当他一无所获时，她几乎要难过地哭出来。他们喜欢把下午的时间用来工作，回复来自外界的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有的是关于爱尔兰，有的是关于欧洲动荡局势，有的是关于印度骚乱；但上午的时间通常十分寂静，无人打扰。

在巴尔莫勒尔，女王放弃了自己的拘谨，与当地人交起了朋友。她给她当地别墅的租户赠送了新的衬裙，与当地女性进行长达数小时的交谈，有时甚至与她们一同饮茶。[22]在她看来，她们单纯、直率，丝毫不做作，令人耳目一新：“她们一点也不粗俗，也一点不放肆，非常聪明、谦逊，也很有教养。”[23]这对王室夫妇沉浸在高地生活中无法自拔：他们经常穿着苏格兰格子呢，阿尔伯特学习了盖尔语，女王和孩子们则专门上了苏格兰舞蹈课。查尔斯·格雷维尔对于他们在那里的简单生活印象深刻：“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丝毫不焦虑；他们过得一点也不像是名门世家，反而像是非常小的贵族；别墅小，房间小，架子也小。”[24]

苏格兰将是维多利亚终其一生感到最幸福、最自在的地方。她可以坐在泥巴房里无休止地聊天。她可以与高地人一起跳舞，而不会有任何傲慢的贵族侧目，也可以与她的侍女们一边嬉笑，一边从最漂亮、最偏远的山丘上爬下。（在1849年11月11日的日记里，她写到了一名曾在一次旅居期间照顾过她的男子，这名男子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对她十分重要：即帅气的“J.布朗”。）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着迷于她的热情：在奥斯本宫举行的一次充满了漫长而尴尬的沉默的晚宴结束后，利特尔顿夫人看到男人们略带嫉妒地打起了台球，因为女王又开始谈起“她疯狂

而快乐的高地生活——那苏格兰的空气、人民、山丘、河流和树林，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更令人倾心”。利特尔顿夫人补充说：“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永远也不会看到、听到或者见证这些各式各样的迷人之物。”[25]但这正是他们苏格兰新家的魅力所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喜爱它。

* * *

在那些年里，维多利亚偶尔会担心，她的这种满足感也许无法持续很久。她渴望能将时间停住。在1847年的除夕夜，即将迎来1848年的时刻，她独自坐在房间里写道：

> 当一个人像我们一样快乐时，就会对岁月的飞速流逝感到悲伤，我总是希望时间能够停住一阵。今年有许多让我们感到感激的东西；孩子们都很好，两个年纪最大的提高很大。我思考了自己的缺陷——我必须避免些什么，必须纠正些什么，凭借上帝的帮助和我自己的毅力，我希望能战胜自己的缺陷。[26]

维多利亚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却从未停止自己的工作。[27]她誓言要为了丈夫提高自己。但她对待工作、孩子以及身为人母对她身体的影响所持的态度一直在反复变化。她身体健康，却也始终感到疲惫不堪；十分爱慕阿尔伯特，却也经常很厌恶他；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却也越来越对自己必须付出的牺牲感到委屈。维多利亚作为一名君主所获得的权力和成功都有赖于她作为一名母亲的平凡性和她作为一名妻子的满足感。她是一名居家女王，也因此而受到崇拜。但与此同时，诸多女性心中的不公平感也在她的心中开始扎根、发芽，而她一直到成为祖母才将这种情绪表达出来。

最糟糕的是肉体上的折磨。维多利亚身体上的疲惫在她私下里对生儿育女的肉体折磨越来越厌恶的态度上表露无遗；她从未在日记里写到过她身体上的痛苦、不适或者损伤，但她经常将怀孕比作像是一头

猪、“一头牛或者一只狗一样；我们的本性变得动物一般，兴致全无”。[28]

维多利亚对母乳喂养有着“完全无法克服的厌恶感”[29]。后来，当她的女儿爱丽丝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时，她感到很生气，甚至在不久后将巴尔莫勒尔牛奶场的一头小母牛命名为爱丽丝公主。[30]维多利亚将其视为一种粗俗的行为，对一名上层女性而言非常不妥。[31]她还认为，这种行为与履行公共职责是相矛盾的，在吸乳器发明前的岁月，这种观点或许很有说服力。[32]一直到商业性婴儿食物在19世纪60年代流行开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女性，甚至是贵族女性，都会将母乳与动物乳品或者糊状食物结合在一起喂养婴儿，一直到婴儿几个月大为止。奶妈的费用很昂贵，而且经常会被怀疑其可疑的道德水准腐化了她们照看的婴儿。[33]但维多利亚毫不怀疑地雇用了几个奶妈，她认为，如果让一个不那么有教养而且“更像个动物”的女性来给孩子喂奶的话，对孩子更好一些。[34]还在临产状态时，她就将她的第一个奶妈玛丽·安·布拉夫（Mary Ann Brough）从怀特岛传召前来，负责给威尔士王子喂奶。[35]

尽管拥有诸多特权，但女王与其他女性一样完全无法控制混乱且经常让人虚弱无力的生育过程。与维多利亚一样，当时有八成女性在婚礼结束一年内生育子女。当时的大部分英格兰女性用来生育或者母乳喂养孩子的时间平均长达12年：维多利亚则总计花了16年时间。[36]不过，维多利亚所生子女的数量几乎是英国平均水平5.5个孩子的两倍。[37]许多历史学家都无视这一伟大成就，忽视它所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影响，以及它所产生的无力感。她曾对自己的女儿说，生孩子“对于一个人的一切得体感都是一种彻底的侵犯（上帝知道，光是结婚就已经对得体感造成了足够的冲击）”。[38]

在那段生儿育女岁月的早期，维多利亚最大的安慰来自阿尔伯特。

她的丈夫在孩子生命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对妻子痛苦的关怀程度远超维多利亚时代的一般男性。[39]他在育婴室中没有丝毫不适。他还“监督着”子女抚养的“基本原则”，他曾在1846年写道，这些原则“在如此多的女性面前很难坚持”[40]。这位王夫在维多利亚分娩时一直陪在她身旁，在她行动不便时抱起她，并且很人性化地终结了在女王分娩时让十几名重要人物在隔壁房间等待的做法。他对孩子的态度也很温柔。利特尔顿夫人曾写道，一名保姆试了几次都没能将手套戴在威尔士王子的小手上——这个男孩当时只有2岁半大——最终沮丧地把手套扔在了一边。她写道：

> 我欣慰地看到［阿尔伯特］二话不说把孩子抱在膝盖上哄了哄，然后没有丝毫耽误地把手套给带上了，展现出了灵巧和温柔的举止；这位小王子明显对于得到帮助感到相当开心，抬起头温柔地看着父亲英俊的脸庞。这是一幅完美的育儿场景。我忍不住说道：“不是每个爸爸都有如此的耐心和温柔，”而且还得到了女王充满感激之情的注视！[41]

随着孩子日渐长大，阿尔伯特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兼具趣味、教导与关怀的人物：指挥育婴室工作，向宾客骄傲地展示孩子，组织洗礼仪式，规划他们的课程学习，建造小屋和堡垒，带他们去剧院、动物园以及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维多利亚曾描写他吵闹且热心地与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一起放风筝，与薇姬和伯蒂一起玩捉迷藏，以及向伯蒂展示如何在干草堆上翻跟斗。他让孩子骑在背上，以及将他们放在大篮子里在地板上拖拽的景象让她感到很开心。[42]她写道：“他对他们如此温柔，如此愉快地与他们玩耍，还能如此利落而沉稳地管理好他们。”[43]他喜欢一个膝盖上放一个孩子，一边轻轻晃动一边在管风琴上弹奏傻傻的歌曲。

1859年时，维多利亚对长女、18岁的薇姬说，阿尔伯特对待照顾家庭这件事非常认真：“爸爸说，那些将所有家务事以及对孩子的教育全交给妻子的人忘记了自己的首要职责。”[44]维多利亚将自己叔伯们的糟

糕生活归咎于父母教育的失败："似乎乔治三世对他的孩子很少关心。"[45]在许多年时间里，阿尔伯特都会每天亲自教育孩子一小时。在维多利亚经常遭到枪击的那段岁月里，他还细心关注着孩子们的安全，因为他收到了一些针对孩子们的"最为恐怖的"威胁信。他总是在口袋里放上一把孩子们房间的钥匙，并确保这些房间得到了严密保护，包括"复杂的轮班、结实的门锁、戒备森严的守卫室，以及各种严密的预防措施"。[46]

对维多利亚来说，平淡的日常生活是为人父母的重要组成部分。[47]她每天都会去育婴室看望她的孩子们[48]，并且骄傲地对别人炫耀[49]。甚至连她的侍女们都对她与孩子相处多长时间有过评论。[50]在1844年的一则有关教育问题的备忘录中，维多利亚表示，孩子应当"尽可能与父母待在一起，学会在一切事情上将自己最大的信任交给父母"。[51]她和儿女们一起阅读和祈祷，并用《圣经》来教导他们：她希望他们所学习的信仰是一种充满善意、宽容和爱的信仰，而不是充满"恐惧和颤抖"的信仰。[50]有关孩子的内容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维多利亚的日记里：例如在奥斯本宫附近的树林里采摘樱草、紫罗兰和银莲花，寻找复活节彩蛋，在农场里观看牧民清洁绵羊，在马戏团对着小丑哈哈大笑，在她更衣时在更衣室里玩耍，在动物园探望野生熊类，以及在花园中挖土豆等。在1852年的结婚纪念日那天，维多利亚充满感激地写道，尽管孩子们"经常是焦虑与麻烦的源头"，但他们也是"一种眷顾与快乐，给生活带来喜悦"。[52]

当他们的长子威尔士王子还是个孩子时，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就开始专注于他的教育问题，这对一个未来的国王而言是一项重要任务。他是个任性的孩子，像他的母亲在孩提时代一样有着暴风骤雨般的脾气——他经常发脾气发到筋疲力尽，以至于发完脾气后，他会躺在地上，就像是在睁着眼睛睡觉一样。[53]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对伯蒂感到十分失望，伯蒂厌恶学习，注定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学者，其学习进度与早

熟的姐姐薇姬比起来总是逊色很多。在他5岁时，女王曾将他描述成“一个很棒的孩子，在智力上没有丝毫欠缺”[54]。但仅仅一年后，她就说他与姐姐相比“更为落后”。（格雷维尔直言不讳地说，女王认为他很笨。[55]）在他8岁时，她的父母曾要求一名骨象学家检查他的颅骨。检查结果证实了他们的担忧：“不适宜进行脑力劳动，在特定时候甚至厌恶脑力劳动；以及……负责好斗、破坏和坚定等性格的器官都很大。智力器官只有适度发育。”[56]在寻求学术成就的过程中，伯蒂情感丰富、善于社交的本性很遗憾遭到了忽视。身为儿子，有一个像阿尔伯特这样的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19世纪40年代末，来到伦敦的外国人都对人们对维多利亚的疯狂热爱留下了深刻印象。在D.纽厄尔神父（Reverend D. Newell）站在人群里等待女王出席为一家律师公会所在地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公开献辞的仪式时，他看到一股“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想要看一眼女王。他说，他们不可能真的看到，但“这一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在英国人的这次气势庞大的人群聚集中，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见证并感受一个国家之心脏的强劲跳动”。[57]维多利亚将这一切归功于她的家庭。她在1844年10月给利奥波德写信说：“他们说，（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位君主像我一样受到如此爱戴，而这是因为我们的家庭，以及它所呈现出的优秀榜样。”[58]女王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象征性权力，并凭借一种精明的直觉理解了她的人民。[59]维多利亚代表了一种甜蜜、简单的家庭生活，而不是一种无所事事、挥霍无度的生活，这有助于英国君主制度免受未来许多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人民纷纷起身反抗荒淫无度的君主。

当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在奥斯本宫嬉戏玩闹以及在绿意盎然的苏格兰高地山丘上徒步旅行时，不满的阴云正在欧洲大陆上空集结。1848年，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房间里，两个分别名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男人正在创作《共产

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号召工人阶级“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在白金汉宫的规模得到扩大、装饰得到美化之时，欧洲王室却被接连赶下他们的宝座。在阿尔伯特愉快地测量自己安静的住所时，愤怒的人群冲入了巴黎、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地的宫殿。1848年5月，他自鸣得意地在白金汉宫给斯托克马写信说：“我们一切都好，王座从未像此时此刻一样在英格兰的地位如此崇高。”[60]

---

[1] Jerrold，*Married Life of Victoria*，94.

[2] Warner，*Queen Victoria's Sketchbook*，176.

[3] “General Tom Thumb Junior，at Home，” *Era*，March 3，1844.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23，1844.

[5] 他们在伦敦待了四个月。Richardson，*The Annals of London*，267；Barnum，*The Life of P. T. Barnum*，260；“Court and Aristocracy，” *Examiner*，April 6，1844. 在第二次造访期间（星期一晚上），大拇指使劲浑身解数把整个王室逗得哈哈大笑：

他对拿破仑皇帝的刻画引起哄堂大笑，后来他又表演了希腊雕塑，还跳了一段角笛舞，唱了几首他最喜欢的歌。女王陛下开心地给大拇指汤姆将军送了一个精美的纪念品，即一个镶嵌了黄金和宝石的珍珠蚌，外加一个漂亮的金色文具盒，文具盒上还写着“大拇指汤姆”名字的首字母，盒子上的绿宝石上还刻着他的盾徽。

在他第三次访问期间，大拇指唱了《扬基歌》，并且对女王的品位恭维了一番，尤其是赞赏了黄色会客厅的装饰风格。Barnum，*The Life of P. T. Barnum*，261.

《喀里多尼亚信使报》（*Caledonian Mercury*）1844年4月25日报道了大拇指汤姆第三次造访白金汉宫的过程：

女王要求他穿上为王太后表演时穿着的那件宫廷礼服。同时身处黄色会客厅的还有阿尔伯特、比利时国王和王后以及莱宁根的卡尔。“他受到女王陛下以及所有老朋友的接待。”身着戏服模仿了拿破仑，然后唱了两首歌，跳了角笛舞，从5：30待到7：00。欢笑声不断。

阿尔伯特问道，能否向他鞠上一躬，他获准并照做了，随后“与侏儒握了握手，后者向王室成员们鞠躬敬礼，随后对会客厅所呈现出的女王陛下的品位恭维了一番，这使得现场人群在他退场时爆发出一阵发自内心的欢笑”。

维多利亚觉得他“非常令人愉快，生动活泼，幽默有趣，跳舞唱歌都很好”。让她感

到好笑的是，大拇指汤姆的身高甚至都不到薇姬的肩膀，而薇姬当时才刚刚3岁半。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1844，and April 19，1844.

[6] “The Sights of London，” *Morning Post*，April 8，1844.

[7] Bogdan，*Freak Show*，150-51：“维多利亚女王见了这个神奇小子三次，还给他送了礼物，他在表演时总会招摇地展示一番。为了宣传自己的相貌，他会坐在一辆由小矮马拉动的装饰华丽的迷你马车里出行。这辆蓝、红、白相间的马车是巴纳姆的礼物，由女王的马车制造工匠亲手打造。”

[8] Sanger，*Seventy Years a Showman*，94.

[9] 在《怪奇秀》（*Freak Show*）（207）一书中，波格丹描写了“在世的身高最高的夫妇”，夫妇二人的身高加起来据说达到了15英尺11英寸（约合4.85米）。在1871年6月17日他们结婚之前，维多利亚将这对夫妇传召到白金汉宫，给新娘送上了礼物。

[10] 桑格很激动；他第一次是在维多利亚加冕礼那天在海德公园穿上演出服的。（碰巧他还是狮女的丈夫。）Sanger，*Seventy Years a Showman*，70.

[11]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31.

[12] 她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安静又清幽”。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40.

[13]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44.

[1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9，1849.

[1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2，1845.

[1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1，1848.

[17]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奥斯本宫博物馆馆长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表示，“这幅画的构图十分具有暗示性”，但他同时也表示，该画作过去曾被人修复过；如果能够查明——通过X光检查等手段——修复者究竟在画上做了多少涂抹，将会非常有趣。与作者的通信，2015年2月12日。——作者注

[1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9，1842.

[19] 阿尔伯特于1842年9月18日在温莎城堡给萨克森—哥达—阿尔腾堡的卡罗琳公爵夫人写信说：“苏格兰给我们两人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个地方风景优美，充满了冷峻和宏大的特点；对任何运动而言都非常合适，空气十分清新，比我们这里的空气要好得多。当地人更加自然，诚实与同情心是这些远离城镇的山区居民身上别具一格的特点。”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81.

[2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10，1848.

[21] 引自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104。

[22] 格雷维尔写道：“她整日在别墅内外跑来跑去，经常自己一个人。” September 15，1849，Strachey and Fulford，*The Greville Memoirs*，6：186；Greville，*The Great World*，269.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3，1850.

[24] September 15，1849，Greville，*The Great World*，269.

[25] Osborne House，October 5，1849，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92-93.

[2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31，1847.

[27] 在维多利亚刚结婚的前5年里，她有近4年时间都处在怀孕或者行动不便的状态（即60个月里的44个月）。

[28] Fulford，*Dearest Child*，115. 只有在写给薇姬的信中，维多利亚才会这么抱怨。上述文献中的一个例子（同样参见77-78页、94页）：
我认为我们在这种时候很像是一头牛或者一只狗；当我们的可怜本性变得如此兽性和冷淡时——但对你而言，我亲爱的，如果够理智、够理性，不会喜形于色，也不会成天与护士和奶妈待在一起的话——顺便说一句，这么做毁了许多优雅而聪明的年轻姑娘，尽管没有让她们作为母亲的本分增加分毫——那么孩子会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毕竟，亲爱的女儿，要记住不能丢掉一名年轻姑娘对待他人的谦逊（不过也不能过于拘谨）；虽然你结婚了，但你不要变成一个主妇，什么事都要听别人的，没有自己的主见——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这样的（现在的确有这样的感觉），经常会对其他已婚女性的自信感到惊讶。我害怕在国外，他们对这些事情会不太敏感。

[29] Fulford，*Dearest Child*，159.

[30] Van der Kiste，*Queen Victoria's Children*，58. 维多利亚写信给爱丽丝说，照顾孩子是一件"粗野"和粗俗的事："一个地位高贵、举止优雅、精神紧张的淑女永远也照顾不好孩子……奶妈的感情越简单、越像动物，对孩子就越好。"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70.

[31] 她给薇姬写信说："一个淑女如果做了那件事的话，就配不上她的丈夫，或者她自身的地位了，更别提一个公主。" Pakula，*Uncommon Woman*，114.

[32] Davidoff and Hall，*Family Fortunes*，27.

[33] 对中产阶级做法的概述，参见琳达·尼德（Lynda Nead）所著《性别迷思》（*Myths of Sexuality*）第27页：
人们对女性应当如何扮演母亲角色的看法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在十九世纪，这种态度的关键变化之一在于如何喂奶的问题。在十八世纪，雇佣奶妈曾经是上层家庭的通行做法；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霍乱爆发和政治危机期间，这一习惯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被聘为奶妈的劳动阶层女性的道德和身体健康遭到质疑，医生们也描述了道德/身体污染从奶妈（即劳动阶层）通过喂奶传染到孩子（即中产阶级）身上的可能性。中产阶级女性被强烈敦促自己给孩子喂奶；母乳喂养被重新定义为合格中产阶级母亲的自然和健康的做法，抚育子女也成为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腐蚀污染相隔离的地方。

[34] 维多利亚写信给爱丽丝说，照顾孩子是一件"粗野"和粗俗的事。（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70. 这些信件被援引于 Pakula，*Uncommon Woman*，215。）

[35] 13年后，布拉夫夫人将自己的六个孩子杀死在床上，她割破了他们的喉咙，随后试图割破自己的喉咙，但未能成功。她被认定已经疯了。记者们大肆宣扬她曾经是威尔士王子奶妈的事实；此时已经对伯蒂的心智能力和内向性格感到忧心忡忡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读到这些报道时感到紧张不已。（"The Murders at Esher Coroner's Inquest，Esher，Monday Night，" *The Times*，June 13，1854，12，column C.）——作者注

[36] Flanders，*The Victorian House*，14.

[37] Flanders，*The Victorian House*，14.

[38] Fulford，*Dearest Child*，77-78. 对于另一场讨论，参见Chapter 4，"Queen Victoria and the Shadow Side，" in Helsinger et al.，*The Woman Question*，1：63-77。

[39] 下面这段鲁德亚德·吉卜林所写的诗句援引Flanders，*The Victorian House*，15：“我们不问社交问题——我们不挖隐秘的耻辱——在小小陌生人驾到时，我们从不讨论产科学。” Rudyard Kipling，“The Three Decker，” in *Rudyard Kipling's Verse*，380.

[40] 引自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109。

[41] February 9，1844，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39-40.

[4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7，1843：“去了保育院，阿尔伯特开心地跟孩子们玩耍，把他们放在篮子里拖来拖去，先是一个接一个，然后是一起，这让他们非常开心。克莱尔蒙特的一切都令人感到愉快，保育院离我们的房间非常近，而在白金汉宫，距离几乎有一英里远，因此我们没办法随心所欲地进出。”

[43]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231.

[44] Fulford，*Dearest Child*，205，引自 Sanders，*Victorian Fatherhood*，30。

[4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0，1848.

[46] February 3，1842，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26. 阿尔伯特检查了孩子们住处的安保情况：“错综复杂的走廊、门锁和守卫室，以及各种严密的预防措施，显示出最为隐秘的危险——我担心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会让人心惊胆战！最重要的钥匙永远放在阿尔伯特自己身边保管，每念及此都会让他眉头紧锁。最恐怖的恐吓信（或许是疯子写的）直接指向了孩子们，我们经常收到这类信件。我不想让除了自家人以外的人知道这些。人们最好不要讨论这件事，因此，这件事只有我和我们这里的人知道。”

[47] 例如，正如澳大利亚学者伊冯娜·沃德展示的那样，维多利亚与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之间的通信就显示出她多么关注自己的孩子。两名女性工作起来都很勤奋，经历了危机、战争、刺杀和对外冲突。她们之间的信件被从维多利亚信件选集中忽略了，在这些信件中，她们讨论了对奶妈的使用、霍乱、伤寒、天花疫苗、断奶以及希望她们的丈夫不会因为她们的工作而被边缘化，而是被认可为她们的主人的愿望。
维多利亚在1842年6月2日给玛丽亚写信说：“我向你保证，我跟你的观点完全一致，丈夫永远排在第一位；我正在竭尽所能地做到这一点——而且对于他必须地位比我低，我总是感到很难过；我是女王，而他仅仅是亲王，这让我感到痛苦；但在我心中，以及在我的家中，他都是第一位的，是家中的主人和首脑。” Victoria to Maria，

June 2，1842，Lisbon Archives，Torre do Tombo，Caixa 7322/CR150-1，引自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51。

[4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6，1849：“这个夜晚十分令人愉悦，在外出返回后，跟孩子们待在室外，采草莓，一直到8点。我们独自吃晚餐，走在阳台上，看着月亮和大海。景色一片寂静，没有一丝树叶的声音，如此美妙。我们在这里多么幸福啊！我自己一个人时永远也体会不到跟亲爱的阿尔伯特在一起，追随他四处旅行的幸福和祥和。”

[4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6，1840：“宝宝被带了下来，我把她展示给所有侍女看。她醒了，非常甜蜜，我必须说，我为她感到骄傲。”

[50]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391. 安森还指出，女王“对政治兴趣越来越少……而且……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照顾年幼的长公主。”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88-89.

[51]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182.

[5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52.

[53] Jerrold，*Married Life of Victoria*，230.

[54] Jerrold，*Married Life of Victoria*，234.

[55] January 22，1848. 格雷维尔补充说，“我们的君主世代遗传且经久不衰的对明显继承人的反感似乎在女王身上很早就出现了，女王不太喜欢这个孩子。” Strachey and Fulford，*The Greville Memoirs*，6：9；Greville，*The Great World*，238.

[56]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238.

[57] Reverend D. Newell，引自 Homans and Munich，*Remaking Queen Victoria*，42。

[58]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October 29，1844，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32.

[59] 当维多利亚收到读者对她出版于1884年并献给约翰·布朗的书所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评论时，她说，她肯定自己“清楚地知道我的人民喜欢和欣赏什么，那就是‘家庭生活’以及简单质朴”。Fulford，*Beloved Mama*，160.

[60] Jagow，*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141

16 奇迹年：革命之年

> 随处可见的动荡，还有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毫无防备的我，促使我被伤感占据……我感觉自己老了20岁，就好像自己再也无法想起任何乐趣了。尽管我知道人民总体上很忠诚，但一想到我们可能面临的可能性，我就颤抖不已。[1]
>
> ——维多利亚女王，1848年4月3日

以“法国公民之王”之名闻名于世的那个男人正盯着镜子，缓缓地用刮胡刀划过自己的脸颊。他的妻子坐在他身后，几天来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而她丈夫的光滑脸庞则渐渐从留了多年的褐色胡须中显露出来；他突然露出了羞涩的表情，脸上看起来就像孩子一般毫无遮蔽。74岁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几天前刚刚被剥夺了王位。登上王位18年后，他在一场让巴黎的街道火光冲天的血腥革命中被迫退位，将王位让给了9岁的孙子。他和妻子玛丽—阿梅莉（Marie-Amelie）为了自身安全仓皇而逃。他们好几天都没有睡觉。路易·菲利普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第100次确认名为“威廉·史密斯夫妇”的伪造身份证件安然无恙。他们离开了位于巴黎的别墅，乘船来到海岸边的勒阿弗尔（Le Havre），并趁着夜色登上了一艘正在等待的轮船。他们这趟前往英国的旅途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旅行箱以及身上穿着的几件衣服。他们的逃脱十分惊险：在他们走后仅仅2小时，警察就来到了他们藏身的别墅，企图逮捕国王。[2]

在此前的几年里，法国国内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工人阶级在令人无法忍受的条件下辛苦工作，而生活成本却与日俱增。曾一度受人爱戴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当政府下令禁止一系列为募集资金支持反对派而举办的宴会后，数千人聚集在街头举行抗议示威。[3]在1848年2月22日，有52人在暴力骚乱中被杀害。随着愤怒的暴

民不断涌向他的王宫，身边顾问早已惊慌失措的国王决定退位。数十名王室成员三三两两地乘坐马车、火车、船只以及通过步行前往英格兰，随行的还有他们的保姆、女仆和朝臣；在法国国内，革命党人在宫殿里跳舞、饮酒，将王室的衣柜洗劫一空。[4]前往英格兰的国王子嗣中包括阿尔伯特的堂兄奥古斯塔斯（Augustus）及其妻子克莱芒坦（Clementine）（路易·菲利普的第三个成年女儿），以及维多利亚的表亲、萨克森—科堡—科哈里（Saxe-Coburg-Kohary）的维克图瓦，其丈夫是法兰西退位国王及其王后当时还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当身着船长大衣、戴着巨型护目镜的路易·菲利普从轮船走下来，踏上安全无虞的英国海岸时，他彻底松了一口气，几乎哭了出来。[5]

维多利亚接纳了她的王室好友，但她并不认同他们的投降行为。她认为这位国王应该留下来战斗到底。在她看来，放弃不仅仅是懦夫行为，而且毫无必要。28岁的维多利亚此时正大腹便便地怀着第6个孩子，但她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在日记里反复写道，她认为法国国王犯下了一个错误。

另一个痛点在于，路易·菲利普两年前刚刚出卖过维多利亚。法国国王与英国女王最初曾有过一段关系良好的蜜月期，部分原因是法国国王的长女路易丝嫁给了维多利亚的舅舅利奥波德，并且一直对年纪较小的英国女王非常友善。1843年，维多利亚成为300多年来首个拜访法国国王的英国君主。法国王室位于厄镇的城堡美得让她流连忘返，他们放松自在的举止也让她印象深刻。玛丽—阿梅莉王后对维多利亚说，她把她当成女儿一样看待。但两国王室在此次访问期间有一件事没有讨论，那就是有关西班牙的敏感问题。路易·菲利普一直梦想着让他的国家与西班牙结盟，于是悄悄安排自己的一个儿子迎娶西班牙女王的妹妹因凡塔·路易莎（Infanta Luisa），当时统治西班牙的是13岁的伊莎贝拉女王，她的母亲担任摄政。路易·菲利普设计了一个复杂的阴谋。他希望伊莎贝拉女王能够嫁给其表哥——被认为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无法生育

的加的斯公爵（Duke of Cadiz），并无法生育继承人，而因凡塔·路易莎能够嫁给他的儿子蒙庞西耶公爵（Duke of Montpensier），并与其生下一名继承人。

不过，维多利亚却希望伊莎贝拉女王能够嫁给一个来自科堡的表亲。经过长期谋划后，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1845年第二次访问厄镇期间，英法两国外长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即在西班牙女王生下子嗣前，它们两国都不会为因凡塔·路易莎介绍追求者。[6]这一协议在1846年烟消云散，因为巴麦尊勋爵愚蠢地向法国大使展示了一封信，信上说，维多利亚的一名表亲是伊莎贝拉女王的候选夫婿之一。这两名女孩随后立刻分别与加的斯公爵和蒙庞西耶公爵订了婚。“气愤至极”的维多利亚对玛丽—阿梅莉王后说，她的丈夫违反了承诺。两国王室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近两年时间，一直到巴黎的抗议活动爆发。

维多利亚很快就忘记了心中的怨气。她是真心对起义感到惊骇不已，尽管有过争执，但她仍然热爱她的法国亲戚。[7]她在3月7日，也就是她在白金汉宫迎接路易·菲利普与玛丽—阿梅莉的第二天[8]，写道：“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群谦卑的可怜人。”当时已近孕期末尾的维多利亚给这些前来避难的难民送去了衣物，并将她舅舅利奥波德的克莱尔蒙特庄园借给他们居住，只要需要，待多久都可以。奥古斯塔斯与克莱芒坦以及他们的孩子与她一起居住在白金汉宫。当时正怀着第四个孩子的克莱芒坦与维多利亚同岁，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与此同时，她们还试图去理解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听说路易·菲利普的儿媳，即继任国王的母亲埃莱娜（Helene）在一片混乱中被迫和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后，维多利亚感到心疼不已：“还有什么能更可怕！”[9]

宫殿上下都散发着焦虑与悲伤的气息。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可怜的克莱芒坦说，她睡不着觉，眼前总是出现那些恐怖的面庞，听到那些可怕的哭喊和尖叫。”[10]她一连几个月都对客人们感到忧

心忡忡。在客人变得过于瘦削时，她显得焦急不已，甚至称她的表妹维克图瓦看起来“像是一朵被压垮的玫瑰”[11]。

1848年的欧洲革命被称作“人民的春天”，1月发源于西西里，2月影响到法国，并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最暴力的起义出现在波兰、奥地利帝国、德意志、意大利以及法国。各地的革命原因不尽相同，而且基本没什么联系，但在许多国家，革命都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罕见地临时组成了同盟——在经历了数十年指数级变化后的一场大爆发。他们忍受了基本生活成本的增加、粮食歉收、城市拥挤、无所事事且无所作为的富人管理的议会以及专制的君主。随着他们开始辩论起民主的理想形态、社会主义、渐进自由主义以及共和主义，不满的声音日益强烈。

随着叛乱的蔓延，维多利亚的态度从担忧变成了恐慌。这种混乱对一名君主来说是一种诅咒。她在日记中将革命党人称作“一群嗜血的恶棍暴民”、“可怕的乌合之众”以及“行事令人作呕的人”[12]。女王不喜欢熙攘纷扰的人群，也不喜欢法国人。这一点在她的通信中也体现得很明显。当阿瑟·本森与伊舍勋爵在她去世后编辑她的信件时，他们删掉了她措辞最为严厉的反法观点，以避免让他的儿子爱德华七世国王在盟友面前尴尬。[13]保存在皇家档案馆中的原始信件揭示了她希望法国公民因发动叛乱而受到惩罚的秘密愿望。她在1848年4月写给利奥波德的一封信中说：“法国正发生着极为可怕的重大事件，为了维持道德准则，应该在巴黎出现一些重大灾难，因为那里是邪恶的温床，一切灾祸的发源地。”[14]尽管她私下里认为路易·菲利普不应退位，但她仍然写道：“有关路易十六的回忆以及法国暴民的邪恶与野蛮足以为他的一切做法提供充足的理由，任何人都会承认这一点。”[15]（字体加粗部分后来被本森和伊舍删除。）

英格兰大体上未受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狂潮波及。那年3月，就在

巴黎起义发生两周后，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一次受到大肆宣传的集会仅仅以阿尔伯特亲王的九柱戏场被毁以及集会的年轻领袖被捕并号啕大哭而告终。[16]维多利亚不耐烦地写道，“愚蠢的”抗议活动让她的法国亲戚受到了惊吓。[17]翌日，阿尔伯特对她说，部分“暴民”砸破了她母亲伦敦宅邸的窗户，还曾考虑过袭击白金汉宫，只不过一看到人数众多的守卫就被吓跑了。她在日记中写道，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但“在巴黎发生的可怕事件后，我忍不住变得更加焦虑了”。[18]

女王整日里都在仔细阅读来自欧洲的报告并安抚她的法国客人。阿尔伯特认为王室男性成员比任何政客都更有资格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建议，而他在听说自己心爱的德意志出现的动荡后感到极为震惊。[19]他理智地建议自己的兄长科堡与哥达公爵[20]不要使用或者扩大军事力量来镇压本地骚乱。[21]阿尔伯特还对英国宪章派日渐增加的信心感到担忧，后者近年来在许多领袖人物被从监狱释放后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爱尔兰人在经历了数个饥寒交迫的寒冬后也变得绝望至极，当地的金融投机行为引发了骚乱和恐慌。宪章派在听说法国成为共和国、将国王从王座上赶跑后彻夜在伦敦街头载歌载舞。

3月18日，在局势最动荡的时刻，维多利亚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女儿露易丝·卡罗琳·阿尔伯塔。[22]一直到临产的剧痛开始袭来之前，她几乎都忘了自己怀孕的事。在露易丝出生仅仅几天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就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危被迫离开伦敦。宪章派宣布4月10日将在伦敦举行一场大型集会，将有50万人参加，大多数人预计集会将变得十分难堪，甚至有可能煽动起骚乱。

此时仍在从艰难的分娩中恢复的维多利亚躺在床上啜泣着：

> 对德意志局势的悲痛——对各地的不幸和破坏的悲痛，再加上来自爱尔兰的坏消息以及人们心中对即将于10号在伦敦举行的大会的警惕正极大地考验着我可怜的阿尔伯特……是的，我感觉自己老了20岁，就好像自己

> 再也无法想起任何乐趣了。尽管我知道人民总体上很忠诚，但一想到我们可能面临的可能性，我就颤抖不已。我感觉非常平静，已经准备好迎接上帝让我们面对的结果，只要我们能有幸拥有彼此，共同承担一切。[23]

王室来到奥斯本的树林暂避风头，他们在那里略带恐惧地等待着来自伦敦的消息。维多利亚很快就恢复了她的镇静，在一封写给利奥波德的信中夸口说：“大事会让我安定而平静；只有那些琐事会让我神经紧张。”[24]阿尔伯特的侍从菲普斯上校（Colonel Phipps）留守伦敦并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随处探听人们的对话，试图评估人们对女王出走的反应。他写道：“她的个人勇气享有极高声誉，我从未听说有一个人认为她的离开是因为担心个人安危。”[25]

针对4月10日的集会，伦敦正进行着军队式的准备活动。众多志愿者涌向警察局，有多达8.5万人报名在集会那天担任特别巡警。[26]志愿者中包括未来的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王子（Prince Louis-Napoleon Bonaparte）。曾被当成英雄来崇拜、如今已上了年纪的惠灵顿公爵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任命为军队总指挥。政府控制了电报系统，以确保革命党人无法播送假消息，议会还匆忙通过了一项《驱赶外国人法案》，给予内政大臣将任何遭指控的外国公民驱逐出境的权力。[27]宪章派夸口说进行了一次拥有500万签名的请愿，请愿书如此庞大，以至于卷起来时就像一大捆干草，必须由4匹马才能拉动。他们希望发动一场革命，但至少，他们计划逼迫议会做出一些妥协。

4月10日，在蔚蓝的天空下，宪章派经过艰苦跋涉来到了伦敦的四处集会点，手上举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横幅。一个由4000名伦敦警察组成的方阵包围了此前被用于公开处决犯人以及举行板球比赛的肯宁顿公地（Kennington Common），还有8000名正规军士兵藏在伦敦的不同地点。[28]泰晤士河沿线的桥梁架起了4处炮台，河流的关键节点也停泊了武装船只。白金汉宫门前的林荫大道两侧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男子，以防止有人闯入白金汉宫。首相约翰·拉塞尔勋爵将窗户用议会文件贴

了起来，他怀孕的妻子与他一同前往安全的唐宁街，因为担心炮声会引起早产。[29]在空荡荡的政府大楼里，一盒盒的文件构成了路障，手拿枪支的人们藏在柱子和窗帘后面，每隔几分钟就要向外窥视一眼，看看骚乱是不是开始了。士兵们得到的命令是在必要的时候开火。[30]

戒备森严的消息让宪章派领袖、诺丁汉议员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震惊不已。他连续几天都无法入眠。集会前那个晚上，当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时，他决定，将以一种和解的精神处理此次抗议示威。他本可以下令宪章派发动攻击，希望军队和警察会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崩溃并叛变，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么做是徒劳的。在抗议那天，他的担心得到了证实：只有2.3万人出现在抗议现场，仅占期望数字的十分之一。

奥康纳站在肯宁顿公地搭建的讲台上，周围簇拥着上书“决不投降！”的旗帜，他要求支持者不要与警方发生冲突。大部分人遵守了他的要求，仅发生了零散的小规模冲突。领导人们同意将他们的请愿书用三辆双轮马车送到议会——后来，这些请愿书中发现了大量假名字，甚至包括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巴麦尊勋爵称其为“和平与秩序的滑铁卢”。维多利亚对于英国法治的胜利感到激动万分：

> 何其之幸！……所有阶层的忠心、军队和警方的卓越安排、特别巡警的高效，上上下下，从贵族到店铺老板——以及这种阻止行动的决心——必要的话甚至甘愿动用武力——毫无疑问是此次集会失败的原因。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而且我真诚相信，将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31]

阿尔伯特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他仍然会继续关注持续不断的怨言以及宪章派的集会——有些集会的参加人数甚至达到了5万人。他向斯托克马表达过对他们组织的严密性的惊叹，例如对秘密信号和信鸽的使用等。他还写信给拉塞尔首相，告诉他说，他通过个人研究发现伦敦存在数量多到令人惊慌的失业人口，大部分是因为政府削减了基建工程的

预算。他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创造就业岗位，并继续执行那些为失业者提供援助的项目。他还提醒首相说，政府有义务在危难时帮助工人阶级。[32]

这位王夫无法消除对1848年欧洲局势的忧虑情绪。外祖母最近去世让他感到悲痛不已，也因此让他变得十分抑郁。[33]工作没有丝毫停歇："我不记得曾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忙碌过。光是阅读英语、法语和德语文件就几乎占据了每天的所有空闲时间；然而，一个人不能遗漏任何信息，否则就会无法理解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得出错误的结论。"[34]1848年3月时，他曾乞求斯托克马来到他身边，分担他的一些重担："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每天都会损失体重和力量。欧洲大战就在眼前……我需要朋友。来吧，因为你是爱我的。"

维多利亚试图说服他不要对未来太过悲观，但阿尔伯特"被公务压垮了"，以至于患上了失眠症。每天早上他都醒得很早，无法再度入眠。维多利亚经常醒来时看见阿尔伯特正盯着床柱，脑袋里思考着问题。他每天7点起床，走到办公桌前，打开绿色台灯，而此时他的妻子还睡着。维多利亚略带内疚地写道："对于他在许多方面给我提供的帮助，我如何感激都不为过。"[35]

欧洲暴力活动之丑陋对女王产生了持久影响。她始终对虽然可能性较低但持续不断的袭击威胁感到恐惧。宪章派的诅咒似乎有如《圣经》中的故事一般：1848年6月，一场大雨侵袭了奥斯本，成千上万的蟾蜍聚集在草坪和山坡上，"就像一场瘟疫"[36]。3天后，又出现了一些虚假消息，称宪章派即将入侵这座王室的私人宅邸；为此，工人们拿起棍棒站在草坪上严阵以待。[37]仅仅4天后，维多利亚在晚上听完歌剧乘马车返回家中时真正受到了惊吓；她此前曾被警告说，宪章派会趁着夜色发动袭击。在他们的马车向着奥斯本宫缓缓行驶之时，一名男子跑到阿尔伯特一侧敞开的窗子边，反复嘟囔着"真正的凶手"几个字。[38]他很快遭

到了逮捕——并被发现是个疯子——但维多利亚恐惧得全身僵硬了好几个小时。

每天早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一醒来就能收到一堆来自欧洲的报告，他们会在并排放置的木质办公桌上相互之间来回传阅这些报告。他们的工作量非常大。在1848年全年，他们光是从外交部那里就收到了2.8万份报告，内容涉及各类问题，从宪章派，到欧洲革命，再到增加糖类关税对西印度群岛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当地还在艰难应对取消奴隶制造成的经济影响），以及撒丁岛野心勃勃的国王等，不一而足。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共同撰写报告、修改外交大臣和首相发来的草稿，将报告发给国内外的诸多政治人物，并且就各类事件准备备忘录。他们密切参与与其他国家的一切通信往来。他们帮助政府设计了一套微妙精巧的英国式回答，既支持合法政府，又尽可能地向盟友和亲属提供援助。对他们而言，利奥波德舅舅和他相对平静的比利时始终是欧洲和平的灯塔。

此时的外交大臣是巴麦尊勋爵，一个对自己的外交技巧有着坚定不移信念的人。他因为在单身时期颇受女性喜爱而被称作“丘比特勋爵”，而在1848年，他仍然是个英俊的54岁中年人，不过如今他已经娶了墨尔本勋爵的聪明妹妹埃米莉（Emily）为妻。女王在少女时期曾觉得他和蔼可亲，但如今，她和阿尔伯特都对他深表怀疑。183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被发现身处一名女王侍女的卧室里，据说是想要强暴她，而在侍女的尖叫声响彻整个走廊后，他逃离了房间。巴麦尊坚称自己仅仅是迷路了；事实上，他仅仅是任由自己走进了一个他以为是埃米莉·兰姆小姐（Lady Emily Lamb）所在的房间，而后者当时是他的未婚妻。[39]不过，阿尔伯特仍然表示怀疑，并在10年后用这个故事来反对巴麦尊。[40]

巴麦尊勋爵是一个奉行单边主义的自由干涉主义者，倾向于支持欧

洲的叛乱分子和独立运动。作为一个最初曾是托利党人的辉格党大臣，他的外交政策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大相径庭。王室夫妇有自己的偏见，希望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维持紧密的同盟关系，并支持奥地利对意大利领土的占领（巴麦尊希望意大利实现独立和统一，并曾秘密向意大利叛军输送过武器）。阿尔伯特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普鲁士领导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但这对王室夫妇在外交风格以及政策上经常与外交大臣发生冲突。他们十分厌恶巴麦尊不咨询或者听取他们意见的做法，以及他未经他们审阅就将报告发出的习惯。早在1841年，维多利亚就曾因他枉顾既定程序而斥责过他。巴麦尊写了一封圆滑的回信，向女王保证他会确保这种事不会再次发生，但他继续无忧无虑地在实际操作中无视她的存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都把他视为一个危险人物。

维多利亚认为，外交政策是君主的核心职责，因为它涵盖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她感到，维护不列颠的“尊严、权力和威望”是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巴麦尊既任性又冲动，但她认为自己超越了一切政治阴谋，能够更好地“与其他国家的君主及其政府随时维持坦诚而庄重的礼节性往来”[41]。在她看来，巴麦尊作为一名外交大臣，其职责是让她充分知悉所有情况，征求她的同意并接受她的意见，不去更改已经得到她认可的文件或者政策。

1848年8月20日，维多利亚给巴麦尊写了一封斥责信，因为她发现有一封寄给她的“私人信件”已经“在外交部被人打开了”。她在几天后又一次斥责了他，因为他没有向她告知奥地利与撒丁岛之间纠纷的最新情况。[42]巴麦尊向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发去的一系列傲慢而专横的报告——他的这些报告完全忽视了自己的上司首相大人的建议——也激怒了女王。巴麦尊还急切地想要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并让威尼斯成为一个共和国，而维多利亚十分厌恶这种想法：在自己还在与爱尔兰的叛乱分子纠缠之时，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外国叛乱分子呢？[43]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私下里把巴麦尊称作“皮尔格施泰因”（Pilgerstein，意为朝圣的石头），用德语的俏皮话捉弄他。（这个外号后来被从他们的官方通信中删除。[44]）维多利亚对首相约翰·拉塞尔勋爵说，她再也不想在社交场合见到巴麦尊，因为她无法带着敬意对待他。她与拉塞尔一起思考如何才能摆脱巴麦尊——或许将他派驻国外会很合适，例如派驻到爱尔兰。维多利亚认为，拉塞尔展示出了一种“悲哀的软弱”，因为他无法正面解决巴麦尊的问题，但实际上，首相是不愿影响到巴麦尊享有的来自激进派和自由派的支持。女王与外交大臣之间怒气满满的通信持续了很久，尤其是在1848年至1851年间。维多利亚几乎每天都会在日记里写下她有多么讨厌巴麦尊。[45]

不过，在宫廷外，巴麦尊却极受欢迎，他是唯一在公众中拥有大量拥趸的政府大臣。他被普遍视为民主英雄，喜欢摆出宏大而引人注目的姿态。1850年时，他又被卷入了一场纠纷之中，一个名为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的葡萄牙男子在雅典生活时住所遭到了抢劫。帕西菲科试图向希腊政府索取大量赔偿金，但未能成功。由于帕西菲科出生在直布罗陀，因此他以英国臣民的身份请求英国政府援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麦尊下令向比雷埃夫斯（Piraeus）派遣一支舰队，以显示政府对他的支持。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对此举感到很愤怒，上议院也谴责了他的行为，但在经过一场漫长而鼓舞人心的演讲后，巴麦尊的失策在下议院却被当成一种英雄行为而得到欢呼。他们称赞他所谓每个英国公民无论在哪里都应得到有力保护的想法。受到这一广泛支持的鼓舞，巴麦尊无视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提出的向英国驻希腊公使发去一份报告草稿的建议。女王表示，她无法同意“允许一名隶属于君主及其大臣的仆人违背她的命令，而且还故意向她隐瞒”。[46]这种模式持续了许多年——巴麦尊的单边主义、维多利亚的反对以及约翰·拉塞尔勋爵不情愿的干预，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巴麦尊的不真诚的道歉。当唐·帕西菲科过分夸张的声索多年后终于得到解决时，他只得到了自己最初要求的一小部分赔偿金。维多利亚觉得，就为了这么点微不足道的钱，英格兰差点

就发动了一场战争，激怒了希腊并疏远了法国。[47]

1850年8月，紧接着希腊危机，维多利亚致信首相拉塞尔，罗列了她对巴麦尊的不满，并概述了她的期待，即她的大臣应当充分、及时且充满敬意地向她告知一切。她说，否则，她将使用宪法权力将他解职。[48]巴麦尊眼中满含热泪地前来拜访阿尔伯特，坚称他认为自己与女王之间的分歧仅仅是政策上的分歧。他的悔悟很短暂，不久后，双方的冲突又再次开始了。

1850年，奥地利将军尤利乌斯·雅各布·冯·海瑙（Julius Jacob von Haynau）访问了英格兰，他是个独断专横、极度自恋的人，对待奥地利国内的叛乱分子十分残忍。一些工人将他认了出来，因而朝着他的脑袋投掷杂物，并抓着他长长的灰胡子在街道上拖拽。维多利亚对于一名外国政治家竟然在她的国家遭到如此袭击感到震惊不已；但奉行自由主义的巴麦尊认为“这名奥地利屠夫”罪有应得。相比之下，当匈牙利叛乱领袖科苏特·洛约什（Lajos Kossuth）造访英格兰，并在此期间多次发表痛斥奥地利皇帝和俄国沙皇的演讲时，巴麦尊却迫切地想要招待他。在内阁表示反对，维多利亚也威胁要将他解职后，他被迫取消了对科苏特的邀请。但仅仅10天后，巴麦尊就接待了一个曾将奥地利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作暴君和独裁者的激进派代表团。格雷维尔宣称，这一挑衅行为“前所未有、令人震怒”[49]。

巴麦尊最后也是代价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在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逮捕巴黎国民大会领袖并自立为终身皇帝时，宣布对这位法国国王的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保持中立，指示他们的大使不要支持任何一方。然而，巴麦尊却对法国大使表示祝贺，并对政变表示支持，这让英国政府感到十分难堪。约翰·拉塞尔勋爵最终将他解职，这让维多利亚感到非常高兴。

女王无法接受所谓革命是件好事的观点。她在1848年8月表示：“我

坚持认为革命对国家来说始终是一件坏事，是人民所遭受的可怕灾难的根源。遵守法律、服从君主就是在顺从更高力量，它是由神制定的，为的是人民而非君主的好处，而君主与人民拥有同样的职责和义务。”[50]对维多利亚来说，等级制度是神圣的：男人是一家之主，而君主是一国之主。她相信，她的婚姻和国家的平和都需要服从性——尽管她自己的服从很少显露出来。欧洲已经出现了支持自由派的巨大压力，但就当时而言，她的国家还很安全，没有什么变化。

在爱尔兰，1848年土豆再一次歉收，都柏林街道上的人们迫切需要食物。[51]英国议会对叛乱的可能性如此紧张，以至于他们暂时中止了《人身保护法》，以便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随意逮捕爱尔兰人。[52]这只会让潜藏在一贫如洗的爱尔兰表面之下的怒火进一步恶化。在1848年，对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感到紧张万分的维多利亚坚定认为，任何一个胆敢造反的爱尔兰人都应遭到镇压并得到教训。即使在那时，她的这种看法也被认为十分强硬。[53]

土豆大饥荒（Great Potato Famine）是19世纪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在爱尔兰播下了对英国人仇恨的种子，并引发了大规模对外移民。爱尔兰人口曾在19世纪初大幅增长，但在1846至1851年，其人口从800万减少到了约650万。大约有100万人被饿死，其他人则死于痢疾和霍乱。在剩下还活着的人中，有300万人要依靠政府救济才能生存。英格兰人未能防止大量爱尔兰人死亡的事实永久性地疏远了这两个国家。在1801至1841年间，英国曾出现了175个讨论爱尔兰局势的委员会——所有委员会都预测会发生灾难，但没有一个委员会采取措施让爱尔兰人摆脱该国逐渐滑入的贫困深渊。许多爱尔兰人只能靠水和土豆活着。

有些历史学家将100多万饥饿民众的死称作一场种族灭绝——但这主要是由固执和无知的疏忽造成的，而不是故意为之的大屠杀。许多英国政客都更愿意改革爱尔兰经济，推行他们的自由市场理念，而不是防

止民众饿死。这种不愿做任何事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爱尔兰的偏见以及认为爱尔兰人十分软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并喜欢依赖他人的看法造成的；许多人将饥荒视作上帝的不满以及爱尔兰人性格存在缺陷的证据。这种看法的出现被归咎于维多利亚，尽管这有些不太公平。她被称作“饥荒女王”，并被控犯有疏忽罪行，还缺少同情心。她曾捐赠了2000英镑（约合如今的20万英镑），这是爱尔兰救济行动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却被批评为远远不够；她公开发表了两封信件，敦促公众向爱尔兰捐款；定量配给王室面包；订购了大量爱尔兰毛葛；还同意下令进行斋戒，以支持爱尔兰穷人。她在1849年又捐赠了500英镑。

将饥荒的责任归咎于维多利亚有些牵强，不过她其实本可以为一个已经变得不太受欢迎的目标做出更多贡献，而且她的多个公开姿态是在首相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坚持下才做出的。她最初曾对专横跋扈的地主持批评态度，但在部分与她相识的地主遭到杀害后，她对佃户的同情心逐渐减退了。[54]

阿尔伯特对动乱的根源以及结果都感到非常担忧。他对工人阶级的同情要远超对贵族的同情，认为前者“承受了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苦难和最少的快乐”[55]。在1848年5月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协会的一场由他主持的会议上，他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廉租公寓、贷款基金和土地分配等示范措施很重要，但条件的任何改善“都必须是工人阶级自身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由资本家决定的。他为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制定了四大核心原则：为接受过行业实习培训的儿童提供教育、改善住房条件、为分配土地并建设房屋提供补助，以及建立专门用于吸纳储蓄的银行。[56]媒体报道对他盛赞不已。

极右翼政客十分厌恶阿尔伯特在政治上的积极态度。他在1849年5月对自己的兄长说，“极端保守党人”憎恨他“积极……反对他们的计划”的做法。他以自己对贵族政治的厌恶而闻名，而且他对于自己工作

的目的阐述得非常明确："财产的不公平分配，以及贫穷的危险及其所产生的嫉妒心态，是最主要的恶。必须找到办法，不是要（像共产主义者希望的那样）消灭富人，而是要帮助穷人。但这会产生摩擦。"[57]此番表态显示，阿尔伯特正在着手处理欧洲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并希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遏制国内的动荡。与寄希望于压制不满的妻子不同，他更希望防止不满的出现。这种观点在他所处的阶级中十分罕见。

阿尔伯特对手下的员工很好，他为了改善那些因不公制度而身处逆境之人的生活而采取的努力为他赢得了喝彩。例如，在他担任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会长之时，他发现，重物搬运工只能通过酒馆老板找到活干，而那些酒馆老板坚持要求他们在工作前先饮酒，这让他们始终处于糟糕的状态[58]，他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得到了"善良的阿尔伯特"（Albert the Good）的称号。在读到一篇有关济贫院的报道，并注意到有大量曾经从事佣人工作的人最终都流落到济贫院后，他为佣人设立了一个养老金项目。只要有一个老板给佣人写出一封负面推荐信，就会让他们陷入贫困。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0%的佣人——有近70万人——最终都流落到济贫院或者慈善机构。正是这些行动彰显出了阿尔伯特的卓越之处，以及他作为一名事实君主的视野和潜力。

最终，爱尔兰没有发生暴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太饿了。英国毫发无伤地躲开了1848年的动荡。辉格党贵族仍然统治着议会，维多利亚仍然头戴王冠，而英国也仍然在一步步走向全球，不断吞并土地并主宰海洋。在那一年年底，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为法国总统。普鲁士和奥地利境内接二连三发生冲突，但欧洲总体上恢复了稳定。1848年骚乱者所要求的民主改革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才会在大部分国家出现。正如历史学家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所写："无论是对当时人还是对后人来说，1848年都是一个英国的特殊性得到再次强调的年份。"[59]英国之所以能避免出现革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中产阶级忠诚地热爱他们的女王；政府在需要时会无情地使用武力；像皮尔

这样的狡猾政客制定了降低食品成本的法律。此外，通过将最极端的反对者送到澳大利亚这样的海外殖民地，政府得以将爱尔兰独立运动和宪章派的一些重要政治领袖调开。[60]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英格兰不是一片属于革命者的土地。维多利亚对此极为自豪。[61]

1850年6月29日，前首相罗伯特·皮尔的马将他摔了下来还踩在了他身上，造成他锁骨、肩胛骨和肋骨骨折，肺部被肋骨刺穿。群众聚集在他的伦敦住所外好几个小时，等待着警察阅读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病情公报，并且观察他进进出出的好友脸上的表情。3天后，皮尔去世了。维多利亚说，阿尔伯特非常悲痛，就好像“失去了第二个父亲”——那是曾在他通往权力的路上成为他盟友的人。[62]阿尔伯特在给肯特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承受了一个又一个打击……现在死神又把皮尔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他是最好的人，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王座最强有力的支柱，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皮尔死后变得极受欢迎。[63]近50万人向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每人捐赠了一便士，该基金会旨在为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购买书籍。

对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来说，那几年是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亲王在1850年7月写道：“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伤心事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他的多个亲密好友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每一个人的离世都是一次打击，让亲王变得更加孤独。1849年11月，阿尔伯特亲王的私人秘书兼密友乔治·安森在37岁的年纪去世。维多利亚写道，阿尔伯特把他当作兄弟一样进行哀悼。[64]威廉四世国王的遗孀兼维多利亚的伯母、高贵的阿德莱德王太后于1849年12月去世。1850年7月，维多利亚的叔叔剑桥公爵去世。紧接着，在1850年8月，法国前国王路易·菲利普在克莱尔蒙特流亡期间去世。10月，利奥波德舅舅失去了备受他宠爱的第二任妻子路易丝。[65]维多利亚感到伤心欲绝。

只有他们忠实的家庭顾问、如今居住在德意志的斯托克马仍在为亲

王提供建议；阿尔伯特经常给他写信，央求他前来英格兰。阿尔伯特每天比维多利亚早起一小时以回复信件，并一直工作到半夜。正如维多利亚所说，他开始看起来“苍白又疲惫”，体重有所增加，而且醒得很早，仍然饱受失眠困扰。

尽管神思郁结，但阿尔伯特的决心从未动摇。在1849年他即将迈入而立之年之际，他终于准备好独掌统治权了。英格兰平安祥和，维多利亚心满意足，阿尔伯特如今在妻子的允许下成为实际上的君主。如果说存在一个阿尔伯特时代的话，那么这个以审慎、宗教热忱、工业、活力和决心为特点的时代一定是在接下来的十年。过早开始衰老、备受困扰但天赋异禀的王夫将在19世纪50年代达到他权力的顶峰。

---

[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3，1848.

[2] Mr. Featherstonhaugh，British Consul at Havre，to Viscount Palmerston，March 3，184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188.

[3]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写道，巴黎当时既凶险又吓人：“那里有10万全副武装的工人组成了团体，他们没有工作，忍饥挨饿，但脑子里却充满了空虚的理论和荒唐的希望。” Tocqueville，*Recollections*，98.

[4] Ward，“1848：Queen Victoria，” 180.

[5] Mr. Featherstonhaugh，British Consul at Havre to Viscount Palmerston，March 3，184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187.

[6] Queen Louise to Queen Victoria，October 7，1844，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2-23.

[7] 维多利亚在1848年3月6日致信斯托克马男爵称，她一直希望改善与法国王室的关系，这预示着她已经原谅了他们在西班牙王室婚姻问题上的背叛：“你知道我对这家人的喜爱；你知道我渴望改善与他们的关系……我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见，以极为友好的方式再见到彼此。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一直在与我们争吵的蒙庞西耶公爵夫人（Duchess de Montpensier）竟然来这里逃难，穿的还是我送给她的衣

服，她还感谢我的善意，这真是任何小说家都想象不出的命运转折，人们永远都可以以此为戒。”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4.

[8]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March 7，184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163.

[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9，1848. 在写到退位的那一天时，最让维多利亚感到触动的是那位母亲在孩子被从手上抢走时的焦虑情绪：“可怜的埃莱娜，她的孩子们被人从她身边抢走了。还有什么更可怕！巴黎被推进了一条窄巷，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可怜的小罗贝尔失踪了整整三天！不过有一名绅士一直在照顾他，并且设法让埃莱娜了解了这个情况，埃莱娜一直以来表现得非常勇敢。”

[1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7，1848.

[1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6，1848.

[12] 在日志中，她称他们为一群“嗜血的无赖暴民”，“可怕尖叫的暴民”（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8，1848），“愤怒的武装暴民”，“恐怖的愤怒暴民”（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9，1848），以及“可恶的乌合之众”（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5，1848），并且表示，“人民正在采取一种令人作呕的方式”。（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1848）.

[13] 大部分删减是因为这些内容太过政治化了，或者揭示了在爱德华时代的人看来维多利亚太过强硬的一面。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309.

[14] 还要提到另一段被删除的内容：维多利亚说，她希望当法国的“疯狂局面结束时”，欧洲能够实现和平。“法国的”几个字被从这封写于1849年2月6日的信件的最终版本中删除。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241.

[15] March 11，1848，cited in Ward，*Censoring Queen Victoria*，163.

[16]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100. 维多利亚还在3月11日致信利奥波德称：“我们这里的小小叛乱无足轻重，这里给人的感觉很不错。”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8.

[1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6，1848.

[1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7，1848.

[19]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158.

[20] 他给自己心情沮丧的哥哥埃内斯特写信说：“人民的这种爆发总是十分可怕的”，他建议“选举法应该是自由和延展的。”维多利亚的姐姐1849年4月7日在斯图加特给她写信说：“我觉得你很难想象德意志现在处在什么状态。到处都缺乏对所谓法律的尊重，简直太可怕了……你不知道埃内斯特有时候有多么沮丧；看到这一幕，让我也很难过。我认为女性能够比男性更好地承受命运的打击……”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5.

[21]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101.

[22] 这个漂亮丰满的姑娘长大后成为一名颇有主见的雕刻家，对诸如普选权之类的社会运动有着比她母亲更强烈的同情。在她“这个好孩子”的一岁生日那天，维多利亚写道：“她出生在一个多事之秋，最终应该会成为一个独树一帜之人。”摘自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1848年3月18日，星期日。——作者注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3，1848.

[24]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April 4，184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166-67.

[25] Phipps to the Prince，April 9，1848，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88.

[26] Goodway，*London Chartism*，*1838-1848*，131.

[27] 该法案是在1848年通过的，但没有得到执行，并且在1850年被撤销。Bloom，*Victoria’s Madmen*，110.

[28] See Schama，*A History of Britain*.

[29] Belchem，“The Waterloo of Peace，” 255.

[3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6，1848.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0，1848.

[32]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224.

[33] 这位外祖母是他外祖父的第二任妻子，他的亲生外祖母在21岁生下他的母亲后就去世了。——译者注

[34] 引自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75。

[3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6，1848. 她写道：“阿尔伯特公务缠身，不得不起得特别早。对于他给我提供的诸多帮助，我无法给予足够的感谢……与阿尔伯特一起坐着马车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坐在小马椅里在花园里转了一圈，阿尔伯特和四个孩子一起玩耍。他对他们真好，开心地与他们嬉笑打闹，娴熟而坚定地管理他们。”

[3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0，1848.

[3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3，1848.

[3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7，1848.

[39] Chambers，*Palmerston*：*The People’s Darling*，178-79.

[40]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304-5：“温莎城堡的住宿格局发生过变化，巴麦尊勋爵进入的房间通常是由一名侍女居住的，该侍女并不反感他的注意，他也经常造访她。”此外，根据Feuchtwanger，*Albert and Victoria*，89记载，阿尔伯特对拉塞尔勋爵说，不能允许巴麦尊将意见强加给女王，这似乎不太真实，要么就是非同寻常得粗鲁和粗俗。

[41]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300-301.

[42] September 4，1848，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103.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4，1848. 维多利亚写道：“我们如果与这个不受承认的政府站在一起，成为第一个与他们合作的国家，帮助反叛的臣民丢掉他们的忠诚，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处理爱尔兰的叛乱，那么简直是给英格兰的名字带来耻辱。我态度强硬地向巴麦尊勋爵表达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44]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24.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对巴麦尊在1846至1851年间作为外交大臣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提出了质疑。伊舍在付印前删除了许多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和利奥波德批评巴麦尊的内容，“很可能是受了爱德华国王的指示”。他们删除了所有提到“皮尔格施泰因”这个名字的地方。

[45] 维多利亚对巴麦尊的鄙视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将欧洲的革命也归咎于他。在一段逻辑混乱的表述中，她还认为他应当为西班牙王室婚姻造成英法两国出现争端的后果负责：“毫无疑问，为了巴麦尊勋爵的野心和任性的政策，欧洲最重要的利

益都被牺牲了。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厌恶。”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7，1848.

[46] Queen Victoria to Viscount Palmerston，February 17，1850，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234.

[47]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77.

[48] 当第二年拉塞尔在议会里把它读出来时，议员们都震惊了，备感羞辱的巴麦尊宣布将再也不与拉塞尔共事。（1851年3月4日，女王致信拉塞尔勋爵，提醒他说他也“必须时刻向她告知当前的情况，以及议会内外政党的情绪”。）

[49] Greville，*The Great World*，289.

[5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6，1848.

[51]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295.

[5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1，1848.

[53] “更加肮脏”一词在她其中一封信件的公开发表版本中被删除了，这封信描述的是她在1849年访问都柏林时看到的爱尔兰人的景象：“我从未见过的愉快的人群，但是让人不敢相信地吵闹和兴奋，一直在说话、跳跃，没有欢呼，反而是在尖叫……你在这里看到的更加肮脏、更为衣衫褴褛和可怜的人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的都多。”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August 6，1849，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309.

[54] Murphy，*Abject Loyalty*，66：“然而，随着这一年的时间渐渐流逝，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注意力逐渐放在了爱尔兰内部对地主不断上涨的怒火上。1846年，爱尔兰发生了68起谋杀案。1847年，这一数字为98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无法理解大众的饥饿，却能够对地主的遭遇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经常与这些地主保持着私交。”

[55]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xi.

[56]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28.

[57] May 13，1849，引自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113.

[58]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xii.

[59] Taylor，“The 1848 Revolutions，” 146. 这类言论经常被编辑删除或者修改——尤其是伊舍，他对法国很热衷。

[60] Taylor，“The 1848 Revolutions，”，155.

[61] 在1848年9月5日议会闭幕式上，维多利亚发表演讲称：“我的人民很容易享受到秩序与平和所带来的的好处，因此不会允许掠夺与混乱的倡导者所推行的邪恶计划有任何机会成功。”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106.

[62] Queen Victoria to King of the Belgians，July 9，1850，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256.

[63] 正如维多利亚所写：“从上到下，人们都展现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伤感，这种情绪此前从未对他这个位置上的人展现过。所有的中产和下等阶级都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一个父亲以及一个朋友。”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3，1848.

[6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9，1849.

[6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21，1849.

17 阿尔伯特的杰作：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

我们有能力做成几乎任何事。

——维多利亚女王，1851年4月29日

伦敦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开，街道两旁呈现出人山人海的景象。他们有的坐在屋顶、梯子或者箱子上，有的拥挤地站在瑟彭泰恩河（Serpentine River）的岸边。在白金汉宫里，阿尔伯特亲王正在为他笔挺的陆军元帅制服扣好扣子。9岁的伯蒂正在穿一条苏格兰短裙。10岁的薇姬正耐心地等着别人将一顶粉色野蔷薇花冠固定在她的头发上。不过，外面的人群最想看到的是女王。维多利亚浑身闪耀着钻石的光芒：成百上千颗钻石被缝制在她的粉色丝质长裙上，环绕在她的脖子周围，还被小心地镶嵌在王冠上。她在胸前佩戴着一枚嘉德勋章，那是一颗嵌在蓝色缎带上的星星。她看了看镜中的自己，露出了微笑：1851年5月1日将成为她和她的国家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日子之一。

白金汉宫外，正在等待王室马车出现的人群看到一个意志坚定的男子迈着一条木腿略显尴尬地费力爬上了一棵大榆树。这件小男孩5分钟就能做到的事耗费了他50分钟；当他终于满头大汗地爬上一段无人占据的树枝时，他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人群中也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片刻之后，遥远的欢呼声预示着女王终于出现了。

当维多利亚的钢衬封闭马车在街道上迅速驶过时，太阳从云层中露了出来。警方估计，有70万人拥挤在街道上试图一瞥她娇小玲珑的身材。她的脸上泛起了一阵微红，对于阿尔伯特所创造的成就感到发自内心的自豪。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场梦；潮湿的地面在高温下产生了一阵雾气，让整个场景带有一丝不真实的味道。[1]她扫视着街道两侧拥挤的人群以及站在小船上上下跳动的人，心里想到，至少，她丈夫的卓越能力

终于可以得到英格兰的充分认可了。

薄雾逐渐散去，水晶宫（Crystal Palace）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微光，这座用100万片一英尺见方的玻璃建成的巨型建筑每一个角落都飘扬着旗帜。《晨邮报》将其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水晶绝壁，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2]。当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她的两个最年长的孩子以及王室成员一起走进规模宏大的水晶宫内时，外面响起了阵阵炮声和号声，管风琴也演奏起《天佑女王》的音乐。维多利亚走上她的临时王座——一张用鲜红色布匹遮罩的印度椅，周围环绕着雕塑和一座喷泉，脚下是颜色鲜艳的地毯。她在王座上挺直身子，双手紧握，用毫不掩饰的爱慕之情凝视着自己的丈夫。

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是她统治以来最杰出的时刻。在她周围，数以万计的民众涌入这座由2000名工人在仅仅7个月内就建起的宏伟建筑。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此刻正身着红黑相间的制服站在她身边的阿尔伯特。他略显疲惫，但看起来仍然光彩照人。那天早上醒来时，她看到他已经清醒地躺在床上，紧张又有些焦虑。那一天波澜不惊地过去了（除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名热情的中国官员在女王面前拜倒，导致其被错认为外交官，从而被安排在了官方行进队列里）。维多利亚将永远把这一天当成童话来铭记：

> 欢呼声震耳欲聋，每一个面孔都表达出喜悦，建筑高大而雄伟，装饰和展品华丽无比，管风琴奏响优美音乐（它拥有200个零件以及600个音阶，就像没什么了不起似的），我亲爱的丈夫是这场伟大的“和平节日”的缔造者，他邀请了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工业家和艺术家，这一切真的让人感动，实在是值得永远回味的一天。[3]

对维多利亚来说，阿尔伯特如今已经不仅仅是她的丈夫了；他是一名“缔造者”，有如神一般，是值得敬畏的对象。[4]那天下午，这对夫妇首次出现在白金汉宫的皇家阳台上。沉醉于自身受到的巨大关注之中的维多利亚难以找到恰当的方式来充分表达那一刻的喜悦、惊叹和激动。

她写道：“阿尔伯特将因为这个伟大的概念而名垂千古。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的脑海中除此以外别无其他。”[5]相比之下，阿尔伯特就要冷静得多，他清醒地将开幕式描述为“相当令人满意”[6]。这是几个月来辛勤工作的高潮时分。整个建筑都是进步的象征：一个科学、创造力与工业完美结合的绝美之地。或许最重要的是，它展示出了全球的团结、帝国的荣耀，以及不列颠的道德优越感。有一半的展览空间都给了外国，让展会获得了浓重的国际性色彩。这是许多英国公民首次认识这些遥远的国家，也是首次认识到大英帝国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展览上展出了数十个地球仪，上面刻画出各个大陆的形状以及天空中的天堂。[7]其中一个精巧的装置将地球刻画成一个蜷缩在壳里的动物，用心跳带动海洋的潮起潮落。[8]

* * *

看完整场展览需要花上至少整整20个工作日。展览分为四个区域：原材料、机械、制成品以及雕塑和艺术。展品可谓千奇百怪：抹香鲸牙齿、象牙、裸体雕像、煤气装置、为单身汉设计的无扣衬衫、三层蜂巢、巨大珠宝、家具、化肥、三百把刀组成的刀具、流淌着香水的喷泉、镶嵌着钻石的格子袜、一架可折叠钢琴、一架双人钢琴（维多利亚女王觉得，两个人同时弹奏钢琴的场面“有一种滑稽的效果”[9]）、用人的头发制成的花朵、大黄香槟、浸透啤酒的蛋糕、煤炭制成的花园长椅、可漂浮折叠式躺椅、风筝拉动的马车（名为“charvolant”）、一个有管子通到特殊座位上以便听障人士聆听讲话的讲台，以及一柄专为医生制作的中空拐杖，里面装有灌肠剂。最受欢迎的美国展品是收割机、柯尔特左轮手枪、活动靠背扶手椅、可以变成行李箱的床，以及一个用来保存尸体直到亲戚抵达的真空密封灵柩。[10]

几名自愿执行巡逻任务的警察被要求参与展示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据发明家说，那是一个可以设置成闹钟的装置，闹钟响起时，它可

以将床倾斜起来，让上面的沉睡者滚下床，甚至可以让他滚进冷水里。一种可以随意变换造型以展示服装的金属人体模特。那里还有做成女王形状的头发、锌块甚至肥皂，这使得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讽刺地说："用你自己来清洗你自己一定很有趣。"[11]

在为期5个半月的时间里，共有600万人参观了这场展览。许多伦敦名人都慕名前来。夏洛特·勃朗特形容它为"庞大、奇特、新颖、无法描述"。对她来说一切犹如魔法一般，摩肩接踵的人群似乎就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影响力征服了似的"。当她站在人数多达3万的人群中时，"听不到任何嘈杂的噪音，也看不到任何反常的动作；人潮安静地前进，带着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就像是从远方聆听到的海的声音"。[12]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妻子罗丝（Rose）在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可以折叠的织锦屏风；她很高兴能够在自己所在的类别里赢得铜奖。参观者来自各个阶层，他们三三两两地在柱子之间或者喷泉周围野餐。让人们感到欣喜的是，展览主办方第一次提供了某种类似冲水马桶的东西——名叫"顽童室"或者"休息室"——一次一便士。

举办此次展览的想法从阿尔伯特儿时参观起源于16世纪的法兰克福展览时就停留在他的脑海里了。[13]亨利·科尔（Henry Cole）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他是一名精力充沛的公务员，因制作首张圣诞贺卡以及协助创建便士邮政而闻名。[14]科尔在1849年参观完巴黎的一次展览回国后与阿尔伯特讨论了这一想法，当时他是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阿尔伯特当时是该学会主席[15]）。阿尔伯特建议将展览办成国际性的，于是一切就开始了。

对阿尔伯特来说，这次展览是一个能够打造重要道德和爱国基础的机会。[16]他在1847年9月给首相约翰·拉塞尔勋爵写信说："英格兰的使命、义务和利益在于将自己置身于文明传播和自由实现的先锋地位。"[17]他认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并将英格兰视为全世界的道

德灯塔。在1850年3月伦敦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举办的一次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番旨在争取公众支持的演讲，概述了他的愿景：

> 我们正处在一段最为奇妙的转型时期，很容易实现那个所有历史都最终指向的伟大目标——人类团结的实现……先生们——1851年博览会将给我们带来一场真正的考验，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人类在这一伟大任务中已经实现的发展阶段，以及所有国家都可以开始进一步征程的新起点。[18]

阿尔伯特被任命为负责监督展览筹备工作的皇家委员会主席。展览场馆的设计来自一名意料之外的设计者：一位名叫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的园艺师。他在参加一场铁路公司董事会议时信手涂鸦了一栋庞大的拱顶玻璃宫殿——其设计灵感来源于他在1837年受睡莲的部分启发为查茨沃斯庄园建造的一间温室。他于7月6日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这一手稿，并得到了高度赞许（尽管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称其为“两管烟囱之间的黄瓜架”[19]）。这一设计很快就被接受了：此时距离展览预计开幕时间只有10个月了。有些人对他雄心勃勃、别具一格的设计表示反对：是否有树木需要被砍伐？它是否会在风暴中被摧毁？或者在参观者的重压下坍塌？抑或是被鸟屎弄脏？有数百名男子被雇来在建筑的顶层来回踩踏；结果显示建筑物牢固又安全。在惠灵顿公爵的建议下，主办方请来了数只老鹰，好将有可能弄脏玻璃的麻雀从公园里赶走；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方法竟然奏效了。阿尔伯特宣称，最终的成果“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20]。

公众的反对却很激烈。批评者在拥挤的人群、犯罪、噪音、瘟疫、刺杀行动、骚乱以及革命等方面提出强烈反对意见。政客们表示，展览会吸引来社会主义者——他们会在公园里举行集会——以及窃贼、小偷、无赖、妓女，还有卫生状况糟糕、可能引发传染病的外国佬。一名极端的托利党议员甚至称其为“本国人民可能拥有的最糟糕的垃圾、最严重的欺骗，以及最不公平的负担”[21]。其他人则表示，食品供应会面临风险，展览周围的公园其他区域会被弄脏，而附近人家的银餐具会被

偷走。还有人担心罗马天主教徒会利用展览进行宣传，以及担心女性会因此忽略她们的家务活。[22]一名议员说，他希望“天堂能降下冰雹或者闪电”，让展览无法举行。[23]

阿尔伯特像是着了魔一样竭尽全力争取资金投入、政府支持以及公众对他的这一计划的认可，对抗任何在他看来缺少想象力和散布恐惧之人。他再次开始失眠，并受到风湿病困扰。在开幕日两周前，他给继母写信说：“眼下，我已经因为过度工作筋疲力尽了。展览的反对者竭尽全力想要让所有女性陷入恐慌，并且把我自己逼疯。”[24]但他坚持己见，并且从担保人那里得到了支持。在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展览馆就建成了。[25]皇家委员会副主席写道，如果没有阿尔伯特，“整件事将会分崩离析”[26]。

博览会的过道上回响着活塞的抽送声、汽笛的轰鸣声以及机械的喧嚣声。展览上展出了擦鞋机、棉纺机、折纸机、炼糖机、信封制作机、巧克力搅拌机、电报传输机、切石机、奖章、长钉以及蜡烛制造机、磨面机、亚麻籽榨油机、卷烟机、黄金称重机、苏打水制造机，甚至是抽血机（上面有一个机器做的水蛭）。那是一番宏大而奇妙的景象，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机械时代。在从这些发明创造中穿行而过、满脸不可思议地观赏它们的数百万人中，很少有人能理解这些机器将在未来几十年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27]

女王是最为热情的观众之一，她多次参观机器展区，每次都要与引导员待上几个小时，学习这些机器的工作原理。她写道，这一经历“相当有趣且有启发性，让人对人类才智的伟大充满了崇敬之情”。[28]她对清棉机尤其感兴趣。

7月9日，一名引导员向她展示了电报，被她称赞说“真的很了不起”。在她遇见阿尔伯特之前，这种科学原理的实际应用似乎还十分抽象，令人难以看到希望，但如今却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知识的

潜在用处，他在她的心中激起了崭新而真实的兴奋之情。阿尔伯特信心满满地将理论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理解不可思议的未来的能力，不断让她感到惊叹。在这些机器噪声的背后，能够听到数百枚钟表温柔而断断续续的敲击声和间歇性的报时声——它们有的是木质的，有的是防水的，还有的停下了——标志着一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以来时间的加速流失。英格兰已经进入了19世纪的下半叶，而万国工业博览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定义了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昌盛、蓬勃发展的工业、创造力和发明精神。维多利亚女王在5个半月时间里参观了展览40次。

并非一切都如此热情洋溢。当地手艺人和演员对于生意的流失怨声载道。查尔斯·狄更斯觉得展会就是一团乱麻。他曾短暂担任万国工业博览会工人阶级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for the Great Exhibition）的一名成员，该委员会旨在让展会接纳并适应工人阶级的需求，但在狄更斯的敦促下，该委员会在成立四个月后被解散了。他认为，他们的这一任务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于这一年被称作成就昭彰、普天同庆的一年感到越来越反感，因为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脏乱的环境中。1851年初，狄更斯在《家庭箴言》（*Household Words*）杂志上建议举办第二场展览，以展示“英格兰的罪行和疏失”[29]。当他最终踏足水晶宫时，他将其形容为“糟糕的骗人货”。他在1851年7月写道：

> 我发现自己已经被博览会耗尽了精力。我不好说“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么说也太过分了。我只去了两次。有很多东西都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对于景观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而如此多景观被融合在了一起，丝毫没有让这种恐惧感有所减轻。我不确定自己除了喷泉或许还有亚马孙女战士之外还看到了什么。不得不撒谎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有人问起“你看到了吗”？我只好说：“是的。”因为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会解释下去——我实在受不了。[30]

托马斯·卡莱尔也感到很郁闷。这位作家唯一赞美的只有建筑本身，他将其称为一座“巨型鸟笼”[31]、一个“巨型玻璃肥皂泡”[32]，以

及“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33]。余下的东西他都感到很厌恶，斥其为“发条产业博览会”[34]（Exhibition of Winddustry）。

尽管意愿很好，但阿尔伯特超然离群的态度、坚持不懈的工作精神以及志向高远的思想还是惹恼了许多贵族。利特尔顿夫人清楚地洞察到，博览会只不过是“加剧了所有名流对亲王的鄙视”。卢埃林·伍德沃德（Llewellyn Woodward）[35]称其为“一个有些尴尬而笨拙的自命不凡者”[36]。阿尔伯特的温暖和幽默并未展现在公众面前，会给人留下尴尬和笨拙的印象。正因如此，许多人见到他本人后会感到十分惊讶。当1854年卡莱尔在温莎城堡遇见阿尔伯特时，立刻就对他产生了深刻印象，称其为“一名英俊的年轻绅士，非常令人愉快……他就是彬彬有礼这个词的代言人，作风非常质朴：同时还是个通情达理之人”。他们就艺术、马丁·路德以及撒克逊人家谱进行了大量交谈。阿尔伯特在与卡莱尔这样的人相伴时感到最为惬意：他经常造访这些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工作室——有些贵族会嘟囔说，阿尔伯特也有些太惬意了。

这对仍处在而立之年初期的王室夫妇对于在1851年之前提升自身公众形象感到非常自信。[37]在博览会开幕的那一周，各大报纸对不列颠的优越性进行了大肆吹嘘，援引举止得体的人群、对君主的忠诚以及国家的发明创造作为证据。报道中充斥着浮夸之词：《布里斯托尔信使报》（*Bristol Mercury*）声称，博览会比金字塔还要伟大。阿尔伯特证明了自己“不是外国人”，而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土生土长、与生俱来”[38]。维多利亚敢肯定，博览会一定在伦敦上空施加了某种咒语，当阿伯丁勋爵对她说，由于博览会的举行，连议会的会议都平顺了许多时，她甚至有些自鸣得意。她将在余生中反复回味这一时刻。

当海德公园的玻璃庞然大物展现出世界之辽阔时，一位名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女性却在为她的世界之狭隘感到深深忧虑。与维多利亚不同，她仍然受缚于中产阶级对女性的期待，尽管才思敏捷，但仍然无

法从事她希望的工作。南丁格尔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护士，却与家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他们希望她留在家中。每次南丁格尔前往其他国家去造访女修道院和医院时，她的姐姐总是会歇斯底里地发作一番。她的母亲将她的梦想斥为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南丁格尔感到自己被传统和社会的迟钝所束缚，恳求家人允许她“追寻内心灵魂的意愿”[39]。她变得抑郁，整日躺在床上，拒绝进食，而且一度考虑自杀。她日日渴望一种能够施展自身才智的生活，夜夜希望迎来死亡：她写道，在家里待了一天后，上床睡觉就像是走进坟墓一样。

1852年，南丁格尔写了一篇相当具有预见性的文章，题为《卡珊德拉》（*Cassandra*），该文章最初是打算当作一篇小说来写的。文章的题目源自美丽的希腊红发女神卡珊德拉，她拥有预言能力，但在冷落了阿波罗的求爱后，遭到了后者的诅咒。这意味着，即便她透露了真相，也没有人会相信她的警告。文章中，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卡珊德拉渴望能够获准像男性一样将生命奉献给帮助他人的事业，并且施展自己的才智。当然，卡珊德拉就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本人。她写道：

> 为什么女性拥有热情、智慧和道德，却在社会上处于一个无法施展这些品质的地位？……如今，为什么男性织毛线和每天乘车外出就比女性这么做更加滑稽可笑？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群男人坐在起居室里无所事事时就会感到可笑，而如果是女性时就觉得没问题？男人的时间就比女人的更值钱吗？……女性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一现象，还曾经写书来支持它，甚至将自己训练成自认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对世界或者他人产生多少价值。[40]

这篇写于博览会期间的文章是一个严酷的提醒，让人意识到维多利亚的雄心壮志已经在其丈夫更为耀眼、更为崇高的理想背后消失无踪了。南丁格尔写道：“在他的命运背后，女性必须毁灭自己，只能成为他的补充。一名女性需要将自己献身于其丈夫的使命感……但如果她也有属于自己的命运或者使命感的话，那么她必须放弃它，十有八九是如此。”[41]她呼喊道：“醒来吧，女性，你们这些沉睡的人，醒来吧！”[42]

她的这番话很可能是直接针对维多利亚说的。但女王这份工作的本质意味着她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家庭事务的烦扰；她所渴望的并非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渴望的公共生活，而是她的私人生活。她的日记显示出政治是如何与她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及她是如何尽职尽责地工作、认真仔细地了解信息的。她极度关心自己的国家。她本身的统治野心渐渐被妻子职责和生育重担所埋葬，但她的热情从未消散。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热情是施展自己的才华去救死扶伤。维多利亚女王的热情是阿尔伯特。[43]

不过，嫁给阿尔伯特让她开始觉得治理国家的确是男人的工作；或许权力本身就是属于男性的。对维多利亚来说，若要持有这种看法，她就必须埋藏自己的本能。但她越是为阿尔伯特付出，就越是担心作为一个好妻子和作为一个优秀统治者之间存在根本上的矛盾。那个时代的“优秀女性”甚至连工作都不需要，更别提拥有巨大权力了。当她对工作渐生厌烦，或者当阿尔伯特展示出更强的天赋时，她就会将其归因于自己的性别——不然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她在1852年2月3日对利奥波德舅舅说，阿尔伯特“对政治和商业的兴趣日益浓厚，而且也非常适合从事这两项工作——他是如此聪明、如此有勇气——而我每天都变得愈加厌烦它们。”[44]不仅仅是她：“我们女性不适合治理国家——如果我们是好女人的话，就必须厌恶这些男性的工作；但有些时候，我不得不对它们产生兴趣，不管自己喜欢与否，当然，我非常喜欢。”一直到数十年后，维多利亚才会不再假装成为一名优秀女性需要远离权力。她并不愿意听从任何人，但只有在失去丈夫后，她才开始彻底心安理得地统治一个帝国。

1857年6月27日，维多利亚遭到了一名臣民的物理攻击。她正在外出拜访剑桥公爵时，一个名叫罗伯特·佩特（Robert Pate）的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男子从围绕在她马车周边的人群中冲了出来，令维多利亚感到自己“被一拳重重地打到了马车左侧”。他用一根镀铜手杖戳到了她的

脸上。她的软帽被压扁，手杖的金属头让她的额头出现瘀青，还留下了红肿的痕迹（许多年后才消失）。维多利亚恼怒至极：

> 这件事当然非常可怕，我作为一名女性——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轻女子，身边还坐着我的孩子们，竟然遭到了这种攻击，简直无法安静地乘车外出了。迄今为止这是最无耻、最懦弱的一种行为；对一个男人来说，袭击任何女性都是最残忍的行为，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认为这要比枪击更加恶劣，枪击行为虽然不道德，但至少更容易让人理解，而且需要更多勇气。孩子们受到了巨大惊吓，可怜的伯蒂当时脸都气红了。这已经是爱丽丝与阿菲第二次目睹这种事情了。[45]

这件事对她来说似乎就“像是一场噩梦”。佩特是一名前英军军官，他的律师以他失去理智为由替他辩护，他也因此被送到了塔斯马尼亚[46]，但维多利亚从未忘记这起事件。半个世纪后的1899年，当一家拍卖行试图出售那根著名的金属手杖时，奥斯本宫寄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致使那根手杖被从拍品中撤下。[47]

当维多利亚1853年4月又生下一个孩子，一个被她起名为利奥波德的瘦弱男孩时，她第一次在分娩过程中使用了氯仿麻醉剂。麻醉师辛普森医生（Dr. Simpson）特意从爱丁堡应召前来配制该麻醉剂。他将一块手帕浸在少量氯仿中，然后放进一个漏斗形容器里，好让女王通过它来呼吸。她在日记中写道：“其效果能够减轻痛苦、令人心安，并且令人无比愉快。”[48]维多利亚的亲身示范鼓励了整整一代女性尝试这种首次出现的分娩止痛剂。她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无视医生和牧师的反对，当时的医生们普遍认为，这种麻醉剂有可能激起女性的性欲，使她们在分娩过程中诱惑医生，而牧师们则坚持认为，试图逃避原罪的后果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女性试图重获自己身体控制权的漫长征途中，这仅仅是一小步。英格兰各地成千上万如释重负的母亲们效仿了女王的榜样。作为辛普森医生在1847年的第一个患者，女王感到激动万分：她的宝宝也被昵称为麻醉（Anesthesia）。

在1851年博览会闭幕前，展会共产生了近20万英镑的财政盈余，随后，博览会被从海德公园转移到锡德纳姆（Sydenham），并一直保留到1936年才毁于一场大火。[49]阿尔伯特计划将这笔钱投入到四个机构中，以便在水晶宫附近就地保存展会中的原材料、机械、制成品和艺术品。从这一愿景中，诞生了南肯辛顿地区的博物馆群，包括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Albert Hall）、自然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以及皇家音乐学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阿尔伯特在1851年底时产生了一种罕见的完成感以及十足的成就感，他在给兄长的信中写道：“过去这一年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万国工业博览会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和麻烦，但结束时却令人极为满意。”

王夫虽然心满意足，却因日夜操劳博览会以及与巴麦尊的争斗而筋疲力尽，照片上展示了一个颌部臃肿、腰围渐宽且表情沉闷的男子，已经与10年前迎娶维多利亚时那个热情而瘦削的年轻人相去甚远了。他从未停止过工作，他的家人也始终需要他花时间照料和操心。[50]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一直对长子伯蒂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试图执行一项严格的教育计划，以符合对一位未来国王的期待，但伯蒂却经常爆发出无法言表的怒火——正如阿尔伯特的图书管理员所说，就是“一阵狂怒”。维多利亚还对他们的婴儿利奥波德感到忧心忡忡，他身材瘦小，体弱多病。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了解到，他患有血友病（他患的是乙型血友病，一种由患病男性或者无症状女性遗传的疾病）。维多利亚的三个女儿都将这一基因继续传播下去，给欧洲王室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尤其是20世纪初的俄国。

十年过去，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婚姻也开始出现紧张。在两人出现分歧后，从阿尔伯特写的敦促维多利亚保持理性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到两人性格的不同。情绪不稳定的维多利亚开始厌恶生儿育女给她带

来的伤害——到1853年，她已经生育了8个孩子——以及阿尔伯特不用承受这一负担的事实。她会爆发出一阵怒火，要求得到倾听，如果他离开房间的话，还会跟着他出去。阿尔伯特劝诫她要控制自己，并且与上帝交流。在1853年5月，也就是利奥波德出生后不久，他开始撰写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备忘录以“亲爱的孩子”开头，敦促他的妻子“冷静思考事情的事实部分”。她曾因一个细枝末节的分歧暴怒，而他提醒她说，他并不是她痛苦的根源，仅仅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因为她一直在“轻率地积累易燃物”[51]。他没办法帮助她，因为如果他分析她的怨言的话，她会生气；如果他忽视她的怨言的话，她会感到被侮辱；如果他转身离开的话，她则会尾随在他身后。

作为一个善于分析的工作狂，阿尔伯特很难理解怀孕造成的荷尔蒙爆发，因此对于在他看来妻子的失去理智感到不知所措。（正如他曾对她说的：“一列长长的、紧密相连的理性列车就像是一段优美的音乐。”[52]）他无法理解的是，她的抑郁源自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维多利亚经常在日记中写到她十分感激阿尔伯特“坚持不懈的爱、温柔和关怀”[53]，但当她读到丈夫措辞严厉的备忘录时，有时也会失望地流下泪水。她的需要比他以为的要简单得多，而且她讨厌被人说教。

他们之间的交流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可以在他1855年2月写的一封信中找到一丝线索：“当我在忙于其他事时，除了最多也就是无法充分听你倾诉之外，我还能对你怎么办呢？”[54]维多利亚想要的只有被人倾听和拥抱。不过，整体而言，他们的婚姻仍然是幸福和互相帮助的。他们会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并且知无不言。在苏格兰逗留期间，当阿尔伯特外出猎鹿时，维多利亚会用粉笔或者颜料画画——她的日记里随处可见对快乐生活、美丽天空和壮丽高地景色的生动描写：包括山峰、树林还有日落。他们在这里是最快乐的。每次离开时，多愁善感的维多利亚都要模仿罗得（Lot）[55]的妻子，悲伤地回头望去。

[1] “The Opening，” *Preston Guardian*，May 3，1851.

[2] “Royal Inauguration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Morning Post*，May 2，1851，5.

[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1851.

[4]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50.

[5]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318. 维多利亚致信利奥波德：“我真希望你能目睹1851年5月1日这一天，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壮观、最感人的景象，也是我亲爱的阿尔伯特取得的巨大胜利。它真的令人目瞪口呆，有如童话一般……阿尔伯特的名字随着这一伟大概念而变得不朽，他向他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展示了自己的价值。这一胜利是伟大的。”

[6] Fulford，*The Prince Con-sort*，222.

[7] Leapman，*The World for a Shilling*，152.

[8] Leapman，*The World for a Shilling*，152.

[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9，1851.

[10] 对展品的更详细的描述，参见Leapman，*The World for a Shilling*，133。

[11] Cowen，*Relish*，221.

[12] Shorter，*Charlotte Brontλ and Her Circle*，425-26.

[13] 举办工业品展览的传统起源于16世纪的法兰克福展览。巴黎的展览开始于1798年，后来断断续续地举行。

[14] 科尔还曾为制定标准规矩而大声疾呼，曾管理南肯辛顿博物馆长达20年之久，还负责建立皇家音乐学院和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95.

[15] 科尔与阿尔伯特共同策划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皇家艺术学会展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群参观。1849年的一次展览吸引了1万名观众；大约有相同数量的观众每天去万国博览会参观。

[16] 当时，人们认为人类正开始获取更高层次的启蒙；正如丁尼生在《悼念集》（*In Memoriam*）中所写，人类必须“向上运动，从‘兽’中超脱/而让那猿性与虎性死灭”。

[17]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46.

[18]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48.

[19] Fulford，*The Prince Consort*，221.

[20]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99.

[21]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97. 同时，正如塞西尔·伍德姆—史密斯（Cecil Woodham-Smith）指出的那样，希卜瑟罗普上校（Colonel Sibthorp）也坚决反对公共图书馆法案，因为他不喜欢读书。*Queen Victoria*，310.

[22] 《抨击》周刊（Punch）上刊登的一幅漫画显示，一名男子一脸惊恐地站着，仆人解释说，他的妻子会在水晶宫待到下午茶时间再回来。漫画的标题为《给你妻子送一张季票的可怕后果》。（另一幅漫画则显示，“妈妈”失踪了——她与一名英俊男子一起偷偷跑到了一间偏僻的茶点室。）——作者注

[23]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358.

[24]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00. 也见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313n17。

[25] 原文如此。另有资料显示，由于建造水晶宫使用的都是预制材料，因此整栋建筑仅耗时22周就建造完成。整个工程于1850年8月开工。——译者注

[26]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44.

[27] Cowen，*Relish*，221.

[2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7，1851.

[29] Ackroyd，*Dickens*，632.

[30] To Lavinia Watson，July 11，1851，Hartley，*Selected Letters of Dickens*，234.

[31] Thomas Carlyle to John A. Carlyle，January 12，1851，The Carlyle Letters Online，doi：10.1215/lt-18510112-TC-JAC-01；*CL* 26：12-14. carlyleletters.dukejournals.org.

[32] Thomas Carlyle to Joseph Neuberg，July 25，1851，The Carlyle Letters Online，doi：10.1215/lt-18510725-TC-JN-01；*CL* 26：110-13. carlyleletters.dukejournals.org.

[33] Thomas Carlyle to Jean Carlyle Aitken，June 10，1851，The Carlyle Letters Online，doi：10.1215/lt-18510610 -TC-JCA-01；*CL* 26：85-86. carlyleletters.dukejournals.org.

[34] Thomas Carlyle to Jean Carlyle Aitken，August 4，1851，The Carlyle Letters Online，doi：10.1215/lt -18510804-TC-JCA-01；*CL* 26：118-19. 在与妻子简团聚后，他的态度有所软化，但仍然对这种炫耀与麻烦抱怨不已。January 29，1851，doi：10.1215/lt-18510129-TC -TSS-01；*CL* 26：29-31. carlyleletters.dukejournals.org.

[35] 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36] Woodward，*The Age of Reform*，106.

[3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0，1851.

[38] *Bristol Mercury*，May 3，1851.

[39] McDonald，*Florence Nightingale*：*An Introduction*，129.

[40] Nightingale，Florence，*Cassandra*，25-27. 她接下去说道：“我们在精神上斋戒，在道德上鞭策自己，在思想上惩罚自己，为的是压制永恒的白日梦，后者十分危险！我们决心‘从本月、今天起，我将从它解脱’；每天两次祈祷，并且每次沉湎其中时都要记下来，我们将奋力与之抗争。不成功便成仁。”

[41] Nightingale，Florence，*Cassandra*，40.

[42] Nightingale，*Cassandra*.

[43] 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而言，万国博览会的召开就像是“世界新时代的开启”。她对于在她看来蕴含在万国博览会之中的两个伟大概念而称赞阿尔伯特（她写道，大多数男人“只能做到半个”）：“工作的伟大，而非等级、财富或者血统的伟

大；另一个是人类的团结。这是第一次工人阶级与女王走在同一个队列里，而女王的丈夫看起来像是一个工人一般……第二个概念，人类的团结：我们再也不需要因为我们与其他人不一样而感谢上帝了。” 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187.

[44]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438.

[4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7，1850.

[46] 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方。——译者注

[47] 1899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短文报道称：“退役上尉罗伯特·佩特在1850年用来袭击女王，并且给女王陛下造成至今留存的伤疤的手杖，本周将被拍卖出售，但手杖所有者收到了一封来自怀特岛奥斯本的官方信函，导致他撤回了出售手杖的计划。佩特因袭击女王陛下而被判处流放7年，死于1895年。” “The Cane That Wounded Royalty，”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5，1899.

[4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2，1853.

[49]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110.

[50]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51.

[51] Albert to Queen Victoria，Osborne，May 9，1853，皇家档案馆 VIC/MAIN/Z/140 9 to 18.

[52]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14.

[5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2，1853.

[54]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329.

[55] 《圣经》中的人物，其妻子在逃跑时回头望去，然后变成了一根盐柱。——译者注

18 克里米亚：“这场差强人意的战争”

我们以及整个国家都完全沉浸在一个想法里，一个令人焦虑的想法——克里米亚……我对我亲爱而伟大的军队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说，士兵们正凭借勇气和幽默忍受着物资的缺乏和至今仍在困扰他们的可怕疾病。[1]

——维多利亚女王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因为缺少人照料而死的。我去过战场，伤员的呻吟声响彻我的心扉。[2]

——一名年轻海军军官，1854年

1854年2月28日清晨，维多利亚站在白金汉宫的会客室窗前，看着宫外的人群不断欢呼并挥舞系在棍子上的手帕。当时钟敲响7下时，早上一起来就匆忙换上一件深绿色羊毛长裙并搭配一件披巾和一顶软帽的维多利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推开门，乘着屋外人群的一阵喧嚣走上了白金汉宫的阳台。她用观剧望远镜自豪地注视着下方的军队——最后一个即将启程前往克里米亚的皇家近卫队营。她感到很惊讶：十分罕见的是，没有一个士兵看起来是醉醺醺的！

一个苏格兰步兵团——苏格兰火枪卫队——身着深红色外衣、黑色长裤，头戴熊皮帽笔直地站着，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取得结束了拿破仑战争的辉煌胜利后，英国士兵就变得信心满满、不可一世。维多利亚自己也想成为一名士兵。34岁的女王写道，在战争“这种情形下，身为女性真让我感到难过”。[3]

以身高和勇气著称的苏格兰火枪卫队摘下帽子，发出三声巨大的欢呼——维多利亚写道，欢呼声“直抵我的心中”。他们将帽子扔向阳台方向，大喊：“天佑女王！”而帽子在空中快速旋转的样子被她尽收眼底。

士兵们转过身去向前行进，在蓓尔美尔街上渐渐从视野中消失。他们沿着河岸街（Strand）前行，跨过滑铁卢大桥来到西南铁路公司（South Western Railway）的终点站。数十名女性走在部队身边，她们正陪着自己的丈夫走向战场。她们宁愿与丈夫一起迎接不确定的命运，也不愿留在后方整日担忧。[4]

在白金汉宫内，年轻的伯蒂和亚瑟王子正在玩一只发条狮子毛绒玩具，他们让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将玩具俄国士兵整个吞下。维多利亚先是外出散步，随后接待了访客，并观看了一场戏剧。在看着演员们朗诵台词时，她的思绪已经飞到了英军士兵那里。她后来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早上见到的美丽而令人感动的景象。”[5]

从许多方面来说，克里米亚战争都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维多利亚在第一次谈及战争的可能性时曾哭喊道：“上帝禁止！”[6]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英国应该仓促地帮助土耳其抵抗俄国——他们与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多少共同点，而且欧洲的和平自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已经持续了40年。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一个统治着拥有2200万农奴的落后国家的独裁者——如今将目光盯在了南方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在过去几十年里，奥斯曼——或者说土耳其——帝国发生了经济停滞，现代化进程进展缓慢，还经历了一系列软弱的政府，随时屈服于欧洲国家的要求。沙皇尼古拉一世称其为“欧洲病夫”，想要将其肢解并分配战利品。这是一片在地理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君士坦丁堡通过陆地和海洋将欧洲与亚洲连接在一起；也正是在那里，黑海与地中海相连。如果俄国向南进逼土耳其的话，有可能封锁重要的补给链条——尤其是英国穿越黑海通往印度的路线——并通过其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扩张其海上实力。1853年，随着俄国向着南方的多瑙河进军（进入如今的罗马尼亚），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正紧张地看向东方。

表面上看，战争是因为巴勒斯坦圣地的通行权争议而爆发的。但争议的真正核心在于谁应当担当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徒保护人的角色：是奉行天主教的法国还是奉行东正教的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鼎盛时期占据了非洲、欧洲和亚洲以及中东的大片土地，主要奉行伊斯兰教，但该国境内的3500万人中也包含着1300万东正教基督徒。[7]自从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国一直是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的领袖。沙皇尼古拉一世想要成为这些身处奥斯曼帝国境内、受穆斯林统治的基督徒的保护人，保护他们免受迫害。这一说法是他用以进一步插手这片不稳定地区的手段。当奥斯曼帝国领袖决定将保护人的名号授予法国时，俄国入侵了奥斯曼帝国领土，也就是如今的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848年当选法国总统，并在1852年自封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他热切地希望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并通过担任天主教徒捍卫者的角色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另一方面，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大国，需要保护穿越埃及和东地中海前往印度的商道，如果俄国控制黑海的话，这条商道会受到威胁。巴麦尊勋爵四处游走宣传战争的必要性，并团结了整个英国公众来支持他。在经历了数周笨拙而漫长的外交交锋以及一系列被视作俄国人怠慢态度的误会后，并且在好战媒体和政客的煽动下，整个国家渐渐滑向了战争。

维多利亚对于在战争舆论愈演愈烈的1853年夏末离开伦敦前往苏格兰感到忧心忡忡，但阿伯丁勋爵——他已于1852年被任命为首相——向她保证说，她不会被排除在重大决定之外。随后，她在10月份愤怒地发现巴麦尊勋爵已经说服首相在未征求她同意的情况下向黑海派遣军队，摆好了防御性的战争姿态。[8]阿尔伯特也对滑向冲突忧心忡忡。他希望四个中立大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能够协调行动避免战争。他还担心与法国结成排他性同盟有些鲁莽。[9]这对夫妇立刻离开巴尔莫勒尔并返回温莎城堡，要求阿伯丁勋爵做出解释。

维多利亚越来越担心英格兰正面临着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而英格兰竟然向土耳其提供支持却不以任何条件对其进行约束。[10]她愤怒地游说她的大臣，却无力阻止战争的势能。[11]10月23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11月30日，400名土耳其人在锡诺普（Sinope）遭到屠杀的事件激起了英国人对土耳其的支持。《泰晤士报》宣称，俄国不可能将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

1853年的冬天肃杀、阴暗又寒冷。太阳会连续消失好几天，一起消失的还有维多利亚对和平的希望。圣诞节的5天前，她写道：“事情令人焦虑。”[12]在新年的第一天，维多利亚尝试着不去思考即将到来的冲突，她坐在椅子上被人推着在温莎城堡的冰冻湖面上玩耍，湖边站着一排宫廷里的侍女。薇姬与爱丽丝如今分别已有13岁和10岁，正在学习滑冰；维多利亚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们，并且决定自己也尝试一把，一边扶着别人的胳膊，一边在冰面上摇摇晃晃地滑行。孩子们堆起了雪人，旁边还有小鹿信步走过。

1854年2月25日，内阁决定英格兰将向俄国发去照会，要求其撤离多瑙河。如果俄国拒绝或者未予答复的话，他们将采取行动。首相阿伯丁勋爵后来见到维多利亚时抱怨说，他“厌恶”一切形式的战争。维多利亚终于相信战争如今已不可避免，她挺直身子说道：“我告诉他这并非本意，这是为了避免更多流血以及避免一场更可怕的战争，这是必要的，应当现在就发生，因为临时性补救措施会非常危险。”[13]她妥协了。现在是时候保持冷静，并祈祷这是一场短暂并相对流血较少的战争了。[14]而且，英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经过一个冬天，法国和英国走得更近了，一对死敌如今言归于好，两个世纪以来首次并肩作战。

俄国拒绝撤退，英国则准备参战。这是一种奇怪而无法阻挡的趋势，分别由最后通牒、边缘政策以及认为自己遭到了远方野蛮人羞辱的大众组成，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奉行干预主义的政客和报纸的煽

动。如果能有更为巧妙的外交手段，英国和法国的参战本应可以轻易避免。但公共舆论被煽动到了狂热状态。诗人阿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在写给位于波士顿的美国作家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的信中说：“恩，我们正迈向战争，真的，人们在经历了漫长而枯燥的商业阶段后似乎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当然，感受到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是一件好事。”[15]托马斯·卡莱尔认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但他在1854年春天的日记中写道：“人群中从未见过如此的热情。”[16]阿伯丁勋爵等人进行过一些抵抗，但维多利亚的臣民们的情绪也已经在她身上体现出来。3月28日，战争开始了。

6个月后，土耳其斯库塔里（Scutari）港周围的海面上漂浮着无数猫狗的尸体，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丑陋不堪。几小时后，“科伦坡”（*Colombo*）号才会抵达该港，船上载着成堆的尸体和在9月20日的阿尔马河战役中受伤的士兵，伤员身上未能得到处理的伤口已经有蛆虫在爬。这是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尽管英法两国取得了胜利，但损失却十分惨重。船上的恶臭十分浓烈，以至于行程结束后，“科伦坡”号的船长又连着恶心了5天。早在船只的锚降到港口水面上的漂浮物位置之前，所有的毯子就都被从甲板上丢了下去。

军队的低效简直致命。伤员从战场转移到船只上花了4天时间，有好几个人在船只9月24日启程前就因霍乱而丧生。军队里连负责抬伤员的担架手都没有，一名军官曾这样谈到一名士兵抱着战友的样子：“强健的海神之子像一名仔细的护士怀抱婴儿一样抱着一名可怜的伤兵。”[17]俄国女性在上方的悬崖上瞪着受伤的敌人。一名年轻海军军官这样描写战斗结束后的场面：

> 你绝对想象不到他们承受的痛苦；遭到截肢的士兵被战友用肩膀扛了6英里……我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局面。军方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安排。我曾遇见几名军官，他们对我说，直到某位海军医生给他们喝了一口掺了水的白兰地之前，他们两天里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且他们曾在战场上待了36

> 个小时都没有见到一个军医。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因为缺少人照料而死的。我去过战场，伤员的呻吟声响彻我的心扉。[18]

在“科伦坡”号上搭载的27名受伤军官、422名受伤士兵以及104名俄国俘虏中，只有一半人在上船前接受过医学检查。船上只有4个医生，而且大部分人一直到战斗结束近一周后才接受了治疗。《泰晤士报》的记者形容说，上层甲板就是“众多腐烂的躯体”[19]。甲板上躺着如此众多一动不动的躯体，以至于水手们无法走到下方的六分仪进行导航，只能猜测去往斯库塔里的航线。这使得这艘船的航程又延长了12小时；有30人死在了路上。侥幸生还者被一些老年人慢慢拽到了山上，这些老年人是被征召作为救护队工作的，而据《泰晤士报》记者所写，这些人“毫无用处”[20]。

基本准备工作的缺乏令人震惊。英国军队在派兵上战场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前期的医疗救治规划。斯库塔里的医院里没有任何勤务兵或者护士。医院里甚至连用来制作包扎伤口的绷带的材料都没有。在历时两年半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共有2.3万名英国士兵阵亡，但其中只有4000名士兵是死在战场上的；其余都死于感染、疾病以及缺少救治[21]（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英国租借用来作为医院的土耳其兵营是建在污水管和漫溢的污水池上的，卫生状况很差）。不久后就能明显看出——尤其是对于那位后来成为克里米亚战争象征的女性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来说——许多死亡本来是可以轻松避免的。

在英国国内，《泰晤士报》开始倡议给予伤员更好的照料，并且刊登了与官方报道截然不同的叙述。这些叙述称，士兵们被当成野蛮人来对待。《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未来担任该报编辑的托马斯·切纳里（Thomas Chenery）大发雷霆地写道：

> 当人们知道甚至连为伤员制作绷带的绒布都没有的话，会说些什么？人们对于斯库塔里这些不幸病患的痛苦表现出了巨大的同情，每家每户都捐出了床单和旧衣物，以补充他们的所需。但是，为什么这种物资短缺的

情况没有被提前预见到？难道远征克里米亚不是过去四个月的讨论焦点吗？[22]

1854年10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论，呼吁英国公民捐钱为克里米亚战争提供基本物资。那年冬天，《泰晤士报》的资金账户中收到了2万多英镑的捐款。每一个曾受雇于万国工业博览会的人都捐出了一天的薪水，维多利亚剧院（Victoria Theatre）也捐出了一晚的门票收入。[23]此时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尽管仍身处他们家位于德比郡的夏季宅邸中，却一直在急切地阅读有关战争的报道。与维多利亚一样，弗洛伦斯也渴望参与眼下的这场战争——不过她是想要为因准备不足而造成的混乱带去秩序和效率。她讨厌战争，不过还是将其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她真正憎恨的是低效、无能和愚蠢。[24]在1854年10月10日星期二那天，弗洛伦斯前往伦敦。她在周四对时任内政大臣，同时也是南丁格尔家族好友的巴麦尊勋爵说，她想要带另外一名护士自费前往土耳其。周五那天，她收到了来自陆军医务部（Army Medical Department）安德鲁·史密斯医生（Dr. Andrew Smith）的授权与推荐信。她的行程也很快就安排好了。[25]10月21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启程前往斯库塔里，带着总共40位身着五颜六色服装、脸上带着焦急神情的护士。在短短一周内，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医疗护理史将被永久改变。

维多利亚决心成为一名亲自参与战争事务的君主，她对利奥波德舅舅说：“我的整个灵魂和心思都放在了克里米亚。”[26]她在等待战报时一直很焦虑。战争很快就受到传染病和伤病的严重困扰，夏天这些疾病在湿润的地中海很容易传播。有数千人甚至在拿起枪对准敌人之前就已经因痢疾、腹泻以及霍乱而丧生了。[27]《泰晤士报》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在斯库塔里港看到了许多漂浮在水面上的死尸。[28]

维多利亚被《泰晤士报》的报道激怒了——士兵们受到的待遇简直

骇人听闻，更令人难堪的是他们的无能被披露给了敌人和盟友。[29]为什么要让俄国人知道他们出现物资短缺？1855年5月，在战争开始一年后，一位名叫杰弗里斯的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effreys）告诉她说，“苦难、折磨，所有物资的缺乏，还有疾病等”，[30]这些没有丝毫夸大。维多利亚则对他说，报纸上的报道只会鼓舞俄国人的士气。她在日记中写道：

> 他承认这是一场巨大的不幸，但另一方面，他们感觉有些事情应该披露出来，否则就无法得到纠正，整个国家也必须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战壕里排水条件很差，积水深到人在里面时能没到腰部。甚至连军官们也境遇糟糕，他们总是被要求在夜间出动，几乎没有时间更换他们的靴子。可怜的士兵们得有多难熬？他们不得不穿着湿衣服躺下，经常连续一两个晚上都无法换衣服。他们冻得发抖，在拽下靴子时，有时甚至会带下脚上的肉！这位杰弗里斯中校曾经目睹过这些场面，因此有资格声称报纸没有任何夸大。

维多利亚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她就显而易见的组织混乱和玩忽职守大声训斥她的大臣，主张派遣更多军队，并倡议迅速制作军功章好颁发给归国的士兵，试图为残疾老兵找到就业岗位，慰问了医院里的伤兵，并且呼吁建设条件更好的军队医院。她对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Lord Panmure）说，她时刻牵挂着她“亲爱的”军队。[31]

维多利亚油然而生的同情心在她详细而认真地记述探望伤兵的过程中体现地最为明显。她在1854年的日记充斥着有关枪伤和毁容、冻伤造成的脚部畸形、坏血病造成的牙齿脱落，以及空荡荡的袖子和裤管的故事。她经常去医院慰问士兵，总是在看到这些“勇敢而高尚”的士兵后感到心情悲痛。她试图找到保持乐观的理由：他们的头皮虽然因为枪伤而被撕开，但他们的面庞看起来还很完整；他们能够幸存下去，有些人甚至还会返回战场。她真希望自己能够每天都来探望他们。

有几件事一直在鼓励着她：有关她给军队传去的信息给他们带来激

励的报道；英国军队在对阵俄国时取得的胜利；有关她的士兵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毫无怨言、保持高尚品质的公开报道等。这些大多数都是那些不希望让女王难过的将军们给她灌输的宣传材料。维多利亚的战时日记显示，她身边的人经常将最糟糕的消息编造成正面消息，将军们则急切地向她保证，他们的士兵并不在意为了祖国而受苦。作为卫生特派员被派去调查克里米亚医院的约翰·麦克尼尔爵士（Sir John McNeill）给维多利亚提供了“有关勇敢军队状况的最有趣、最令人满意和安心的记述”，对报纸的报道内容轻描淡写了一番。[32]他将军营描述成了一个伊甸园：“军营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快乐的地方；唱歌、跳舞和游戏持续不断，对危险的满不在乎也令人难以置信：‘士兵们再也不在乎枪击和子弹，相反更在乎苹果和梨’……‘这支军队中没有一个人不愿愉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以证明自己对女王陛下的忠心。’”[33]

维多利亚对这些安慰之词以及任何有关英雄事迹的记述紧抓不放。例如，在1854年10月9日那天，她得到了一份来自驻克里米亚英军指挥官拉格伦勋爵的“令人满意”的报告，内容是有关阿尔马河战役：“我们还饶有兴趣地阅读了长得令人有些难过的伤亡名单。这场战役打得非常出色、非常果敢，但也流了很多血。以前从未有过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军队以如此英勇而雄壮的姿态经受住防备如此森严、炮火如此之猛烈的炮台攻击的情况。”

那一夜，维多利亚与孩子们一起在巴尔莫勒尔跳起了里尔舞。

1854年9月20日发生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北的阿尔马河战役是联军取得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紧随其后于10月25日发生的巴拉克拉瓦战役打得混乱不堪，仅配备有长矛和佩剑的英国和法国轻骑兵对阵一排又一排配备了长枪的俄军士兵。光是英国轻骑兵的660人中就有240人被子弹打伤或者打死（这场战役共有737名联军士兵伤亡或失踪）。[34]在联军轻骑兵发起冲锋的仅仅几周后，丁尼生就发表了他的伤感副歌：“他们无

人应答/他们无人发问/有的只是去战去死/进入死亡之谷/骑兵六百名。”这些轻骑兵的冲锋被永久铭记为一个光荣牺牲的瞬间，目光短浅的将领们发动的毫无意义的杀戮通常都是如此。

维多利亚在听到拉格伦勋爵发回的有关巴拉克拉瓦战役糟糕结果的报告时颤抖不已；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眠。[35]第二天，她下楼吃早餐时收到了另一个更糟糕的消息。在晨间散步以及午餐和晚餐时，她一直在不住地颤抖。军方试图向她保证，虽然没有向前推进，但这场战斗是一次巨大胜利。一辈子都没有了解过战争的维多利亚被真正的战争惊呆了：“真是个可怕的时代！我从未想过自己会目睹和感受这一切！”她的心情在悲痛和骄傲之间来回摇摆：她的同情心和想象力让她感到难过。[36]对士兵及其遗孀的牵挂让她无暇他顾。她的睡眠也断断续续，日记中重复了几十次“焦虑”这个词。

战争终于在黑海沿岸俄国控制的小港口塞瓦斯托波尔迎来了转折点。这就是那个英国、法国、撒丁王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刚刚在克里米亚登陆就打算夺取的港口。但一直到1854年11月5日的因克尔曼战役（Battle of Inkerman）击溃了俄国人的决心后，对该港口的包围和围城才正式开始。围城战持续了1854年的整个冬天；港口的堡垒是在19世纪初由卓越的俄国工程师设计制造的，被证明几乎无法突破。女王和她的大臣们每天都在等待消息。到1854年圣诞节前，公众的情绪已经变得十分低落；人们急切地阅读拉塞尔每天对苦难、缺少给养以及无法占领这座俄国城堡的叙述。利特尔顿夫人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每个人的心灵都承受着可怕的忧郁和重担；我觉得以前的战争从未如此可怕过。”[37]

维多利亚是一个参与度很高的最高统帅，参与了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讨论，尽管她认为自己在军事问题上并不特别胜任。她在给纽卡斯尔公爵的信中写道：“女王认为关心军队的福祉和胜利是她最崇高的权力和

最珍贵的职责。”[38]阿尔伯特与她并肩努力，撰写备忘录总结了多项争议以及政治争论。当1855年1月一项旨在对战争的执行进行调查的动议以绝对优势得到通过后，首相阿伯丁勋爵提出辞职。巴麦尊勋爵被任命为首相，这让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感到颇为满意，因为他们觉得由他来当首相比当外交大臣要好得多。

然而与战争一同出现的还有某种奇怪的东西：突然爆发的对阿尔伯特的敌意。正如斯托克马指出的那样，对亲王的不信任源自他是个外来者的事实；他无论是穿衣、骑马还是握手都不是“真正正统英国人的方式”[39]。他的保守和“严守道德”在他拒绝骂人、赌博或者找情人的态度上能够明显看出。[40]贸易保护主义者厌恶他在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对外国工业的展示。接下来还有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那就是他是德意志人。

对外国影响的猜疑在英国根深蒂固。许多人讨厌亲王以任何方式给女王提供建议；有些人主张说，由他在国家大事上给君主提供建议、与大臣们进行讨论，或者甚至被告知这些具体事务，都是违反宪法的。在13年里，他与王座如影随形的事实几乎没人特别留意。如今，在他公开反对战争的处置失当并主张派遣更多部队之时，他却成了战时仇外主义的受害者。他被指责进行了过多干预，被认为对女王施加了近乎邪恶的影响，还曾在战争酝酿阶段渴望拥有个人权力。他被指责阻挠了巴麦尊推动对俄战争的努力，以及造成了巴麦尊曾因一项改革法案的争议短暂从内阁中消失的事实。[41]还有一些虚假的传言称，阿尔伯特已经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维多利亚称这些攻击“令人憎恶”“毫无根据”“极其讨厌”“臭名昭著而且如今几乎有些荒唐可笑”[42]。颇为受伤的阿尔伯特做出的回应是放下了自己管理的部分事务，一直到事态在议会得到解决为止。维多利亚不赞同他的退缩，认为这显得他拥有了负罪感，她还批评阿尔伯特“害怕

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43]。她向与她一同进餐的大臣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支持在议会对流言蜚语进行公开澄清。格莱斯顿向她保证说，这些批评者仅仅是对于“东方问题和他们对战争的渴望”过于兴奋而已。[44]阿伯丁勋爵将其斥为没有任何结果的反政府宣传。在1854年1月31日议会开会时，拉塞尔在下议院领导了一场辩论，对阿尔伯特作为关键顾问的角色进行了辩护。[45]这一措施压制住了批评者，维多利亚在三周后写道，众人的嘲弄也停止了。[46]

不过，许多传言其实都说得没错：阿尔伯特的确深度参与了女王的工作，并且以许多方式篡夺了她的角色。他如今经常与首相单独会晤，还得到了内阁和外国领导人的尊敬；曾在1854年9月见过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声称，“他从未见过知识如此丰富、渊博之人”。[47]维多利亚会在日记中随口提到这些会晤，但即使是在怀孕以及分娩期间，她仍然会热心地参与政治事务。阿尔伯特认为他们两人的婚姻符合圣经中的传统婚姻模式，即男人是女人的主宰。

伊舍勋爵在读完他们在这段时间的信件后表示，他们俩“才是真正的内阁大臣，甚至连巴麦尊也要时不时地靠边站”。[48]

但在阿尔伯特被怀疑拥有过多权力的同时，他也会因为权力太小而受到嘲讽。一名女性的工作职务比丈夫更有权势这种情形始终是那个年代漫画作者的素材，启发了许多杜撰的故事。在一则署名为画家E.M.沃德（E. M. Ward）的漫画中，阿尔伯特正在与皇家艺术学院理事会一同进餐，这时，一名皇家信使来到他身边，告诉他说女王紧急召见他。阿尔伯特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进餐。在又打发了两名信使后，他终于爬上了他的马车，不过他却对车夫说不要去王宫，直接去克莱尔蒙特宫，也就是属于利奥波德舅舅的乡间别墅。[49]

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讲述的一个故事或许是最广为流传的。阿尔伯特在房间里把门锁上；维多利

亚来到门前，在门上敲了一拳：

维多利亚：“开门！”

阿尔伯特：“谁在门外？”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

沉默。一阵敲门声。

维多利亚：“开门！”

阿尔伯特：“谁在门外？”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

沉默。又是一阵敲门声。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我是你的妻子。”

门立马就开了。[50]

但是，任何见过他们的人都能明显看出，阿尔伯特是拥有主导权的那个人；他们二人已经达成共识，认同阿尔伯特的天赋比维多利亚更高。他在婚后不久的1841年3月给兄长写的一封未公开的信可以让人看到他秉持的女性智力不如男性的观点。他写道：

> 听到你经常与优秀的艺术家交往我很高兴。不过，我不能认同你说的只在与优秀而聪明的侍女和女士交谈时才能有所收获的看法。你会因此而缺少男性气概以及对世界的清晰洞察；因为这些侍女们越优秀，她们对于一般概念和原则就会越困惑。我宁愿看到你与那些拥有丰富生活经验、小有所成，并且在自己与人类整体之间取得平衡的较为年长的男性密切来往。[51]

阿尔伯特对女性不太感兴趣，不管她们是不是聪明。与其他政客和贵族不同，他在成长过程中身边没有那种拥有理性思维的女性——例如改革家兼作家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或者墨尔本勋爵的

母亲伊丽莎白·拉姆（Elizabeth Lamb），她们经常举办沙龙，并且始终是19世纪英格兰复杂的文化生活的核心。阿尔伯特从幼时起就失去了母亲；他有一名男性家庭教师、一名男性律师，以及一个充斥着男性的家庭。他非但没有鼓励自己的妻子相信她自己的能力，反而告诉她她需要有所“提高”。

维多利亚如今把阿尔伯特称作她的“主人兼老师”[52]。在1854年他们结婚14周年时，她叹气说：“很少有女人能够受上天眷顾拥有这样一个丈夫。”[53]她在书桌上翻找了一番才找到他们的婚礼誓词：“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许下的誓言，要‘爱、珍惜、尊重、服侍并服从’我的丈夫。愿这句话永远刻在我的以及每个女性的脑海里。”她还会嘲笑那些喜欢支配自己丈夫的女性，尤其是首相约翰·拉塞尔的夫人。[54]当葡萄牙女王去世时，维多利亚为失去了“一位最为忠诚和钟情的妻子、一位堪称典范的母亲以及一位情真意切的真正朋友”而哀恸。[55]她没有提到这位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君主的事实。

维多利亚将阿尔伯特推得越高，对自己的看法就越低。女王日益显露出对自身能力缺少信心的迹象，与她在少女时代展现出的勇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当她的丈夫对她说，她的大女儿比她更聪明时，也就不足为奇了。[56]在她继位18年后，她写道：“我相信我已经试着去履行我的职责了，但我感觉我作为一名女性实在无法实现自己受到的期待。我经常会想，要是亲爱的阿尔伯特能取代我成为国王的话该有多好！”[57]维多利亚受过良好教育，思想上也时刻保持着好奇心；她经常与罗斯勋爵[58]一起讨论天文学，涉及话题包括恒星的重量以及木星这样的遥远行星等。但她也经常感到害怕，越来越没有信心。1854年10月，在连续数月收到来自克里米亚战争前线的报告后，她对于在日记中记录战争开始有了犹豫：“我太不精通军事事务，无法充分描写其中存在的难题，但我仍会试图写下几个字，写下我的想法。”[59]

那些促使女王为自己的王位奋起抗争的品质如今也是阿尔伯特所说正在摧毁她的性格和统治能力的品质：倔强、固执、勇气和自信。她一直渴望取悦于他。在1854年他35岁生日那天，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了粉白相间的棉布裙，在他打开礼物时仔细注视着他的表情，并思考着自己有多么配不上他。［她还将这种恐惧传给了薇姬，薇姬是一个异常聪明而早熟的孩子，在智力上与她后来的丈夫弗里茨（Fritz）旗鼓相当；在那个年代，与一个聪明且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结合是女性的命运。］她写道，肯定“没有一个妻子像我一样热爱和崇拜自己的丈夫”[60]。当每一个身着军装的男子都被要求像阿尔伯特一样保留上嘴唇的胡子时，维多利亚感到喜出望外。在1854年8月4日，她听说八字胡在皇家卫队中“非常流行”。[61]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更像阿尔伯特，希望她的士兵能够模仿阿尔伯特，希望她的大臣能够咨询阿尔伯特，并且希望她的臣民能够尊重阿尔伯特。

亲王的雄心壮志十分急切而宏大，而且他是真心想要辅佐自己的妻子。当惠灵顿公爵在1850年提议由他来担任最高统帅一职时，他拒绝了，因为维多利亚需要他的帮助：

> 女王作为一名女士无法随时履行自己的诸多职责；此外，她也不像此前的君主那样拥有一名为她效力的私人秘书。唯一能够帮助她、辅佐她完成君主应尽之复杂工作的人只有我自己。如果我所承担的任何职务会侵占我的时间和注意力哪怕一分，以至于会影响到我对女王的用处，那么我会感到非常遗憾。[62]

1850年4月6日，阿尔伯特坐在他位于温莎城堡的房间里，伏在他从德意志带来的绿色台灯前，就他对自己不同寻常的角色的理解撰写了一份备忘录：

>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和微妙的角色。它要求丈夫将自己的个人存在完全渗透在妻子的存在里——他不应企图为自己谋求任何权力——应当避免一切争论——不能在公众面前承担任何单独的职责，而要让自己的角色完全

> 成为她的一部分——填补她作为女性在履行王室职责时自然会留下的漏洞，一刻不停、提心吊胆地关注公共事务的每个方面，同时能够在任何时候为她提供咨询和辅佐，帮助她解决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难题。[63]

阿尔伯特在1857年终于获封“王夫”，令维多利亚得到巨大满足。[64]格雷维尔写道，到此时，女王已经在丈夫对政策细节的惊人掌握面前失去了存在感，“一切都依照他的想法行事”[65]。阿尔伯特在为自己取得控制权的同时并未巩固她的控制权。维多利亚不再依赖数量众多的顾问，而是完全依赖他；她的依赖十分彻底，而她的自信也已经受损。不过，阿尔伯特低估了她的智慧，以及她的活力和勇气。

随着战争在1855和1856年持续延烧，维多利亚开始嫉妒起“备受称赞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66]她细心阅读报纸上对“提灯女神”（Lady of the Lamp）的报道，并且在日记里长篇累牍地记载了士兵们是如何爱戴这位令人敬畏的护士的。她希望她也能去擦洗伤兵的额头。[67]维多利亚像母亲一样谈起她的士兵们；当她在1855年亲自向他们颁发克里米亚战争奖章时，她感到激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勇敢而可靠的士兵们的粗糙手掌”与女王娇小柔滑的手掌触碰该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她很高兴地听到许多士兵在那天都感动地哭了。[68]

女王在1856年1月20日向南丁格尔赠送了一枚胸针，胸针上镌刻着“仁慈之人受祝福”字样。那年晚些时候，她邀请这位如今大名鼎鼎的护士前往巴尔莫勒尔。维多利亚在1856年1月给她写信说：“当你最终回到故国海岸时，如果我能与为我们女性树立如此光辉榜样的你见面，将让我感到极大的满足。”[69]南丁格尔很快就同意了，她希望借此机会呼吁设立一个皇家委员会。[70]

当她们在巴尔莫勒尔相见时，维多利亚发现南丁格尔身材瘦削纤细，似乎十分疲惫——她在战争期间感染了所谓“克里米亚流感”（当时她以为是伤寒）。她以“史密斯夫人”的身份隐姓埋名与姨妈一起回到国

内，但患上了慢性普鲁氏菌病，这是一种严重的细菌感染，将伴随她的余生。维多利亚感到很惊讶：她以为会见到一个冷漠、严酷的女性，却发现她是一个“温柔、讨喜、动人的女性，非常有淑女风范，而且非常聪明，对一切的看法都十分清晰而全面”[71]。但女王最欣赏的还是南丁格尔的一心一意：

> 她的头脑完全而彻底地被一个目标占据，为了这个目标，她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并且像圣人一样奉献了自己。但她身上没有任何荒唐的狂热情绪……她的行动和观点体现出真正的质朴、安定和虔诚，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宗教热忱或者一丝一毫的虚假欺骗。而且，一同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种从不表现自己的真诚愿望——她隐姓埋名踏上旅途，为的是不为人所知，她还拒绝了一切公开亮相。[72]

南丁格尔主要谈到军队医疗体系缺少“制度和组织”的状况，这导致克里米亚的士兵们深受其苦，她还谈到改善这种状况的重要性。南丁格尔感谢维多利亚的“支持和同情，并表示，士兵们全都深刻感受到我的同情和关怀，并深表感谢”[73]，这让维多利亚激动不已。阿尔伯特与南丁格尔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自战争结束以来，问题变得更糟了。南丁格尔用词十分谨慎，渴望激起对方对她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她的成功变得广为人知；仅仅几年后，美国政府就将向她寻求建议，询问如何照顾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伤员。[74]）她接下来几个月一直待在巴尔莫勒尔附近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的家中，为了摆脱住院期间感染的虱子，她将头发全部剃光，把维多利亚吓了一跳。让她感到极大满足的是，在她逗留巴尔勒莫尔的末期，女王终于同意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军队中的卫生问题。

南丁格尔最初得出的结论是，维多利亚或许好奇心很重，却“很蠢——至少是她所认识的最依赖他人的人”；如果她发现自己在谈话中卡壳的话，就会立刻向阿尔伯特求助。但南丁格尔在与女王相处更久时间后，看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于阿尔伯特，她觉得他“似乎在自

身境遇中受到压制，充满了智慧，在每一个话题上都才思泉涌”，但也会出现重大错误。“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通过奖赏、展览和美好心愿来管理。”她颇为不吉利地总结说，他就“像是一个一心求死的人”。[75]她究竟是什么意思没人能够说清，而且这是她在1879年发表的事后之见。她有可能指的是他的疲惫或者糟糕的健康状况，不过对于一个擅长帮助他人求生的女性而言，这仍然是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洞见。

作为一名身处国家危机之时的女王，维多利亚身上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不协调性。克里米亚的暴力和流血仍在继续，维多利亚却在日记中记载着海边的月光、下雪、花开、蓝天，以及趁着晴朗天气在奥斯本宫待上一周带来的“奇特而抚慰心情的效果”。[76]在水手们向东方启程，并且因为没有帐篷或者御寒衣物而在山坡上瑟瑟发抖时，维多利亚却在与孩子们一起寻找复活节彩蛋、玩老鼠娃娃[77]，或者在阿尔伯特猎鹿时静悄悄藏在石楠树丛里[78]。

孩子们都在迅速成长，而他们的长女薇姬也在突然之间就长大成人了。[79]在战争期间的1855年，当王室还身处巴尔莫勒尔时，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William I）之子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向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请求迎娶他们多才多艺、智力过人的女儿，如今已近15岁的薇姬。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要求他——以及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重要人物——保证不要告诉薇姬这件事，直到她一年后在16岁的年纪完成坚信礼为止。维多利亚感到很兴奋，她对利奥波德说：“他是个亲切、优秀、英俊的年轻人，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将我们亲爱的孩子交给他。让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是，他真的很喜欢薇姬。”[80]她曾担心自己的女儿不够漂亮，配不上她的追求者。但她也感到很舍不得；不久后，她就要把亲爱的女儿交给普鲁士了。

维多利亚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如今成了一个宠爱孩子的外祖母，以及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之间的嫌隙早已被忘却。无论是母亲

还是女儿，在回忆起因康罗伊造成的冲突时都满怀遗憾。公爵夫人给维多利亚写信说，康罗伊在1854年的死让她感到很悲伤：“他给我带来了巨大帮助，但不幸的是，他也造成了巨大伤害。”[81]接下来，她请求自己的女儿不要沉溺往事，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些人的激烈交锋”引发了我们的不信任。日渐睿智的维多利亚安慰母亲说，那些日子早已过去了。

维多利亚始终担心自己有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所有幸福。在1853年她34岁生日那天，她写道：“我还有何种赐福没有享受过！我经常因自己竟然受到如此宠爱而感到惊讶，因巨大的幸福而颤抖，害怕我可能太过幸福了！”[82]夜莺、玫瑰和橙花环绕的奥斯本宫就是一个“天堂”。她是一个略显紧张但绝对心满意足的女人。

* * *

克里米亚战争是1815至1914年唯一有两个以上欧洲大国参加的战争。它标志着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长期和平的一次短暂中断。没过多久，英国就意识到，他们与盟友土耳其人之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土耳其人管理的是一个相当腐败而独裁的帝国；英国人不久后也抛弃了与法国人之间不自在的盟友关系。历时两年半的克里米亚战争将始终与官方的笨拙联系在一起，也暴露出了英国议会精英以及军方的无能。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任务十分艰巨：只有这位倡导使用饼状图的护士才能暴露出将军们的愚蠢。

1855年秋天，让人们翘首以盼的消息终于传来：在经历349天的围城后，塞瓦斯托波尔终于落入联军手中。[83]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晚饭后爬上克雷格高恩山（Craig Gowan），点燃了一堆篝火（篝火堆是一年前堆起来的，当时有假消息称该城堡已经陷落了）。苏格兰村庄里的绅士们身着睡衣、长靴和短上衣与仆人、护林人和工匠们一起赶来。女王看着人们绕着篝火翩翩起舞，有人向夜空中开枪，有人饮酒，有人

在演奏管乐，与此同时，她的思绪一如既往地来到了她的士兵们身边。许多人阵亡，许多人带着残缺的身体回国，战争结束时达成的协议也并没有为英国赢得任何重要的好处，但战斗如今还是结束了。在经历数月的谈判，达成了一项仅仅限制俄国数年的条约后，战争的重担终于从维多利亚的背上卸下了。阿尔伯特从篝火边回来对她说，那里的“狂热和兴奋超越了一切”[84]。

---

[1]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October 13，1854，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63.

[2] “The Battle of the Alma，” *The Times*，October 18，1854，8.

[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3，1854.

[4] Chesney，*Crimean War Reader*，29.

[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8，1854.

[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9，1854.

[7] Faroqhi et al.，*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2：778.

[8] 她在10月10日写道：“我们非常担心地发现，我们采取了十分危险的政策，阿伯丁勋爵自己都不喜欢这一政策，而采取这一政策前本应先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552.

[9] Stockmar，*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2：475.

[10] 她向克拉伦登勋爵指出，即使是君主也没有那样的权力。

[11] Queen Victoria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October 11，1853：“此外，在女王看来，我们与法国共同承担了欧洲大战的风险，却没有以任何条件来约束土耳其挑起这场战争。”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2：456.

[1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0，1853.

[1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5，1854.

[1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24，1854.

[15] Bostridge，*Florence Nightingale*，203.

[16] Chesney，*Crimean War Reader*，47.

[17] “Campaigning in the Crimea，” *The Times*，October 21，1854，9.

[18] “The Battle of the Alma，” *The Times*，October 18，1854，8.

[19] “Turkey：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Times*，October 13，1854，8.

[20] “Turkey：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Times*，October 13，1854，8.

[21] 一直到1855年年中，卫生委员会从英格兰乘船来到斯库塔里，对当地医院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带来巨大变化之后，死亡率才有所下降。共有约65万人在战争中死去。大部分是俄国人——47.5万人——法国死亡人数为9.5万人（其中7.5万人死于疾病）。英国的死亡人数中约有一半源于霍乱、腹泻和痢疾等疾病，还有5000多人死于斑疹伤寒、疟疾、伤寒、冻伤和坏血病等。Ponting，*The Crimean War*，334.

[22] “The Crimea：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Times*，October 12，1854，7.

[23] Grey，*The Noise of Drums and Trumpets*，104.《泰晤士报》的记者是爱尔兰人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他是现代报纸行业的首位战地记者，他真挚而让人揪心的记录改变了公众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24] 后来所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传奇的矛盾之处在于，她作为一名手持灯笼的温柔护士而声名鹊起，但她真正的天赋却是训练有素的分析能力以及组织能力。

[25] 在决定打算带三到四名护士一同前往后，在那个周六，南丁格尔向一名当时刚好出城的好友、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寻求建议。巧合的是，西德尼·赫伯特周日那天恰好给她写了一封信，询问她是否愿意带领一队护士，在政府的资助下前往斯库塔里的医院。See Bostridge，*Florence Nightingale*，205-6. This made it official.

[26] November 14，1854，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66.

[27] 拉帕波特写道，由于霍乱，有近1万名英军和法军士兵或死或无法战斗。*Queen Victoria*，106.

[28] “《泰晤士报》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报道说，看到有尸体从港口底部飘上来，在水上漂得到处都是，‘全都直挺挺地浮在水面上，在阳光下丑陋不堪’。” Bostridge，*Florence Nightingale*，203.

[29] 拉塞尔后来出名了——甚至连维多利亚都在日记里提到了他。在1855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她写道：“法国人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不过他们没有《泰晤士报》记者来四处宣扬，而我们有，这是我们永恒的耻辱。”

[3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8，1855.

[31] Queen Victoria to Lord Panmure，March 5，1855，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143-44.

[32] 约翰·麦克尼尔爵士说，甚至连所谓的缺乏准备也被极大夸大了——这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后来提供的证据相左——他违心地向女王保证说，她的“伤病士兵们得到的照顾超过了其他任何军队。”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4，1855.

[3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4，1855.

[34] Rappaport，*No Place for Ladies*，86.

[3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12，1854.

[3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8，1854，and November 9，1854.

[37]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414.

[38] 女王写给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的信（评论的是一封他此前写给驻克里米亚英军总司令拉格伦勋爵的信）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86.

[39] Stockmar，*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2：481.

[40] Stockmar，*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485.

[41] 女王在1856年写道：“阿尔伯特与我一致认为，在我们经历的历任首相中，巴麦尊勋爵是给我们带来麻烦最少的，也是最愿意讲道理并接受建议的一个。最大

的危险在于外交事务，不过如今负责外交事务的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智且公正无私的人［克拉伦登勋爵］，他［巴麦尊勋爵］只负责全局，一切都变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1，1856.

[4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9，1854；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4，1854；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0，1854，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8.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3，1854.

[4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5，1854.

[45] 阿伯丁勋爵与哈丁在上议院中领导了这件事。维多利亚在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约翰勋爵强硬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这对未来非常重要。在看完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发现阿伯丁勋爵在结束演讲时令人欣喜地为我亲爱的进行了辩护，而德比勋爵也在这一问题上发表了十分强硬的措辞……我把所有讲话都念给阿尔伯特听了，感觉既开心又骄傲。”不过，阿尔伯特的立场始终没有说明。

[4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0，1854.

[47]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110.

[48] Brett，*Journals and Letters*，2：97，Esher to Maurice Brett，August 9，1905；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88.

[49] Weintraub，*Victoria*，167

[50] Strachey，*Queen Victoria*，161.

[51] Albert to Ernest，unpublished，from Yvonne Ward’s files.

[5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3，1854.

[5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54.

[5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8，1854：“C.伍德爵士给了我一份有关约翰·拉塞尔夫人行为的记录，她竟然如此管教并毒害可怜的约翰勋爵，将她自己以及家人的看法强加给他！”

[5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20，1853.

[56] Queen Victoria to Vicky，December 18，1860，引自 Fulford，*Dearest Child*，293。

[5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0，1855.

[58] 爱尔兰裔英国天文学家。——译者注

[5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4，1854.

[6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lbert’s birthday，August 26，1854.

[6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30，1854.

[62]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256-57.

[63]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60.

[6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5，1857.

[65] October 8，1857，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329.

[66] 维多利亚没有提到过牙买加裔护士玛丽·西克尔（Mary Seacole），后者在克里米亚负责管理一个军队饰品店——备受喜爱的巴拉克拉瓦“不列颠酒店”，用漂流木建成——并且在战场上穿着颜色明亮的衣服照顾伤员。——作者注

[67] 她还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8，1854中写道：“我羡慕她能够做这么多好事，能够照看那些高贵而勇敢的英雄，后者的行为值得敬仰。尽管许多人都受了重伤，但他们从未有过怨言！”

[68] 她还心情愉悦地写道，一封由她写给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信被放在了每一个病房里。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Buckingham Palace，May 22，1855，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161.

[69] Queen Victoria to Florence Nightingale，［January］ 1856，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70.

[70] 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412. 维多利亚在1861年向弗洛伦斯提出安排给她一间肯辛顿宫中的公寓居住，但弗洛伦斯没有接受。

[7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1，1856.

[72] 阿尔伯特在日记中简单地写道：“她在我们面前提出了现有军队医院体制中的所有缺陷，以及需要进行的改革。我们对她感到很满意；她极为谦虚。”Martin，*The Prince Consort*，3：410.

[7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1，1856.

[74] 《大西洋月刊》在1861年12月报道称，这位英国护士的“辛勤工作、缄默性格以及非凡的管理能力”提高了对治疗伤兵的期待。他们写道，“主要是通过她……每一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研究了军营和医院卫生救护这一极为重要的课题。如今，美国女性需要担负起职责，我们相信，她们能够完善这一指导。”Grant，“New Light on the Lady.”

[75] 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415. 最早的引用信源是牛津大学教师兼神学家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1879年与南丁格尔谈话的笔记：“［维多利亚女王］尽管有些笨，却对重要话题充满兴趣——她是我所认识的最依赖他人的人。如果单独待10分钟，［她］会派人去把丈夫叫来，继续［开始］谈话——比周围的一切都要优越。他［阿尔伯特亲王］似乎遭到了压制，他充满智慧，在一切话题上都滔滔不绝，然而……如果他能随心所欲的话，那么意大利或者德意志的统一就没有希望了。他认为，世界应当用奖励、展览和善意来管理……他就像一个一心求死之人。他们曾经用一种十分笨拙的方式与孩子玩耍，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7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7，1854.

[77] Bloomfield，*Court and Diplomatic Life*，1：126.

[78] Bloomfield，*Court and Diplomatic Life*，125.

[7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3，1854.

[80] Queen Victoria to the King of Belgium，September 22，1855，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187.

[81] Longford，*Victoria R.I.*，146.

[8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4，1853.

[83] 半年前的1855年3月2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因肺出血去世，在此之前他感染了流感。

[8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10，1855.

19 王室父母与“不满之龙”

王座上的一家人，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将主权的骄傲拉下神坛，拉低到琐碎生活的层次。[1]

——沃尔特·白芝浩，1867年

我继续自己单调的工作，似乎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阿尔伯特亲王，1861年8月6日

几个世纪以来，翠绿色的泰晤士河一直从伦敦市中心流过，河上随处可见成群的天鹅，河里鱼群丰盈；驳船熙熙攘攘，数百万人的生活靠着这条河来维系。19世纪初泰晤士河河岸上逐渐堆积起来的恶臭污物也为那些能够忍受其气味的人提供了一份像样的工作。所谓的“清沟夫”的工作通常是由七八岁的孩子来从事，他们从河里拾取垃圾，在河岸和下水管出口附近游荡，胳膊上还挂着罐子和篮子，耐心寻找着煤块、木块、铜钉或者任何卖得掉的垃圾。男人们在下水道里爬行，搜寻一切有用的东西：铁钉、绳子、硬币、螺钉、刀叉、金属或者纽扣等。[2]亨利·梅休在19世纪中叶对伦敦穷人进行的权威描述记录了“许多神奇的故事”，讲述了人们在流淌着污水的下水道迷宫中迷路，或者“下水道猎人们被大量巨型老鼠围攻”的经历。[3]这本书的内容难登大雅之堂，却意外地畅销。[4]

一个世纪前，这条曾被恺撒命名为“塔梅西斯”（Tamesis）的河流曾经清澈见底。不过，当抽水马桶在19世纪中叶取代了粪坑，并将全城的污物通过粗大而阴暗的管道排入这条河流后[5]，河水仅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变成了黑色[6]。与此同时，首都的人口也在迅速扩张。1801年时，伦敦共有13.6万户居民。到185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30.6万[7]。河边的居民注意到河水中的酸度和浑浊度有了显著增加[8]。

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300万伦敦人每年要向泰晤士河中排放8000万加仑的粪便。这一问题看起来似乎难以解决。伦敦下水道委员会（Metropolitan Sewers Commission）首席工程师弗兰克·福斯特（Frank Forster）于1852年去世，他的死被归咎于“公务造成的折磨、疲劳和焦虑”[9]。第二年，伦敦发生了霍乱疫情，造成近1200人死亡。这一事件最终让科学家们相信，疾病并不是由空气污染，而是由水污染产生的。然而，充满惰性、缺少意愿和紧迫性的政府却没能采取行动。

王室虽然与世隔绝，但也无法幸免。白金汉宫经常发生粪便泄漏，而且爬满了老鼠。[10]维多利亚曾目睹她的宠物狗在温莎城堡的卧室里追逐老鼠，并且对其中一只宠物狗的“英勇”胜利表示称赞：“老鼠发出了一种难听的噪音，不过它很快就被干掉了。”[11]维多利亚还雇用了一个名叫杰克·布莱克（Jack Black）的私人捕鼠官，他身着鲜红色上衣、背心和长裤，扎着一根挂着铸铁老鼠模型的腰带，气势汹汹地在白金汉宫的走廊里巡逻。[12]当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乘坐游艇游览泰晤士河时，“可怕的气味”让他们恶心不已。[13]

到1858年6月，河水的气味变得如此难闻，以至于议会大楼边上的河水中被撒了柠檬，大楼内部的天花板上还挂着浸泡了消毒水的床单，好让议员们在发言时不必用手帕遮住口鼻。[14]夏初时分，一场漫长的干旱期减少了来自山区的清澈水流，也导致水温升到了创纪录的高度。[15]河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污物，绵延18英里。由此产生的危机后来以“大恶臭”（Great Stink）之名而为人所知。城市里的大部分商业活动都陷入停滞；各家法院匆忙处理手上的案件，以避免长时间暴露在臭气中。[16]查尔斯·狄更斯写道，“可怕的”泰晤士河有一种“令人思绪紊乱、恶心难忍的特质”[17]。有些伦敦市民在闻到臭气后不由自主地呕吐了起来。臭气也不会对不同阶级的人区别对待，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维多利亚统治的这个国家难以跟上19世纪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繁荣发展、贸易不断扩张，泰晤士河已经成为帝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但政

府却无法保证能够向她的臣民提供最基本的权利：干净的水和空气以及卫生条件。[18]

维多利亚操心更多的是她宫殿里的世界。她的第9个孩子、深受她喜爱的比阿特丽斯于1857年4月14日出生。阿尔伯特和医生又一次给维多利亚服用了氯仿麻醉剂，以缓解疼痛，这在她看来起到了“巨大的镇痛作用”。克拉克医生建议她说，鉴于她的身体经受了巨大损伤，以及她的岁数已经接近38岁，因此这应当成为她的最后一个孩子。维多利亚担心这有可能会影响她与阿尔伯特的亲密关系，因此向医生询问道：“我在床上还能获得乐趣吗？”[19]在第9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期间，她曾出现严重的咳嗽以及身体疲惫，同时还因为她同母异父的兄长卡尔的死而悲痛不已，卡尔是一名巴伐利亚军人兼政客。最终，阿尔伯特对他的兄长说，维多利亚“几乎无法完成别人对她的期待”[20]。但身体强健的女王在痛苦的分娩过程结束后不久就心情愉快地恢复了活力。在分娩两个月后，维多利亚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能够整晚跳舞的程度。她开心地写道：“这次我感觉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好、更强壮。[21]我还感谢上帝赋予我们一个如此可爱、漂亮的女孩，实现了我一直以来的愿望！”[22]她说，之所以给她起名为比阿特丽斯，是因为这个名字有“受祝福者”的含义。这个女孩将成为她母亲的巨大安慰。在看到比阿特丽斯在洗澡时嬉笑、玩耍后，维多利亚写道：“一个很棒的宝贝儿，你无法理解。她就像她爸爸的宠物一样，用她的两只小手轻抚他的脸庞。”[23]父母两人都迷上了这个孩子。阿尔伯特说，她是“我们有过的最讨喜的孩子”[24]。

比阿特丽斯很快就开始茁壮成长；她是个天赐之物，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维多利亚十分喜爱4个月大以上的孩子，尤其是胖乎乎的孩子。她在比阿特丽斯的周岁生日那天写道：“她如此迷人，我们非常喜欢亲吻、爱抚她。要是她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就好了。”[25]

就在比阿特丽斯出生不到一个月后，印度爆发了一场自发而残忍的叛乱。那是一场在政治层面——印度人反抗英国统治——以及宗教层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反抗基督教徒统治——上发生的独立战争。在叛乱爆发前，英国扩大了其在印度的影响力。从1848至1856年，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最具争议的是“无嗣失权”政策，即当印度土邦统治者“明显无能”或者死后无男性继承人时，其土地将遭到吞并，此举旨在将整个印度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他还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包括铁路、灌溉运河、电报线路、邮局、公路以及桥梁等——并使英属印度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囊括了北部庞大的旁遮普地区。他对公共服务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实施了集权化和西方化改革，并试图打击一些可怕的地方风俗，例如杀死女婴以及人体祭祀等。有些变化——例如在1856年将印度教寡妇重新婚配合法化的措施——执行得太过匆忙，被视为对印度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侵犯。印度人知道他们的士兵数量比英国人多得多；通常情况下，印度士兵与英国士兵的比例大约为20～30：1。[26]

叛乱的直接原因是1853年恩菲尔德步枪的启用。这种步枪使用的弹药外侧涂抹了猪油和牛油，设计用法是用牙来咬开弹药，而这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士兵来说都是一种侮辱（他们的宗教禁止或者不鼓励食用猪肉和牛肉）。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英国统治者强制皈依基督教。这些弹药最终被取代了，英国统治者还向他们保证会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且为那些用手指打开弹药的士兵提供补贴——尽管还是有传言说，那些猪油和牛油仍然存在。导火索出现在1857年5月9日，密拉特（Meerut）兵站有85名印度男子因拒绝为他们的步枪上膛而被判处10年监禁。第二天，三个印度步兵团做出回应，杀害了他们的英国军官及其妻子。随后，他们开始向南方的德里进军，并且杀害了尽可能多的欧洲人（最接近的估计是杀害了约50人）。

随着叛乱的扩大，维多利亚试图煽动内阁采取行动。[27]英国军队

此时正在前往亚洲的路上，即将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为英国贸易和外交在中国得到更大认可而战。相反，他们被调往印度，从而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推迟了一年。[28]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双方都犯下了可怕暴行。在坎普尔（Cawnpore），350名英国人被3000名印度叛军围困了三周。当地一名支持叛军的王公向英国人提出，如果他们放弃在坎普尔的防御工事的话，就为他们提供沿恒河而下的安全通道。英国人同意了，并且挤上了停泊在河边的划桨船。突然之间军号响起，印度划桨手跳入水中，而印度叛军则向英国人发射大炮，炸死了几乎所有人。手持佩剑的印度军队随后冲入水中，将任何在炮击中幸免于难的人砍死。幸存下来的125名妇孺被囚禁在一个附近的别墅里，并在一个月后遭到屠杀。英国人在屠杀发生的第二天抵达现场，经过了许多塞满了被肢解的尸体的水井。临时营房的墙上到处都是红色的小手印和小脚印，屋子里还有许多童鞋，有的鞋里还有脚的残肢。[29]英国人迅速发动了残酷的报复。在被英国人送上绞刑架前，叛变士兵在强迫下舔舐了地板上的血迹。

维多利亚对残酷的叛乱厌恶得无法入眠，脑海里始终牵挂着被困在别墅中的孩子们。这让她感到“毛骨悚然”。她要求自己的前侍女、如今是印度总督夫人的坎宁夫人，让那些“以如此可怕的方式失去自己挚爱亲人的人，知道我向他们表达的同情。一名女性，尤其是一名妻子和母亲，太能体会那些经历大屠杀的人所承受的痛苦了”。[30]

英国公众强烈要求进行报复。叛军被打残、处决、剥光衣服，或者被折磨取乐。一支英国部队一边喝酒、听乐队奏乐，一边观赏数百名叛军被绞死。[31]当具备进步思想的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对英军的这种行为进行惩罚时，媒体对他发出了嘘声，并吵嚷着发动更血腥的报复。[32]维多利亚对坎宁勋爵表示支持，称要求发动报复的呼声“十分可耻”。她对他说，尽管那些制造惨案的人应当遭到惩罚，但“对印度整体而言——对那些和平的居民，那些为我们提供援助的许多和善而友好的当地

人……我们应当展示出最大的善意。他们应当知道我们对棕色皮肤没有仇恨——没有任何仇恨，女王对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能看到他们幸福、满足、繁荣兴旺”。[33]

1858年7月，一份和平条约得以签署。英国议会解散了自1601年以来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直接承担起治理印度的责任。[34]维多利亚承诺对印度臣民的宗教信仰和崇拜给予法律保护，并且坚持要求所有人都应依据其教育程度和能力获得工作，而不是依据其种姓或者血统。[35]她的这些观点是在比较了从印度返回的英国官员撰写的报告后受到的启发，这些官员抱怨说，印度人的行为方式“就像是动物一样”[36]。

1858年1月，也就是印度叛乱的最后几个月里，薇姬嫁给了她的普鲁士王子弗里茨。阿尔伯特允准了他们的结合；弗里茨不仅来自一个他希望未来将领导实现德意志统一的国家，而且还拥有着自由主义信念，尽管他接受了严格的军国主义培养。薇姬与丈夫的观点十分契合，但他们将发现自己会与保守的普鲁士王室发生令人不安的争执。英国与普鲁士的联盟将被证明不如阿尔伯特希望的那么卓有成效。

维多利亚对长女婚礼的担心程度甚至超过了曾经对自己婚礼的担忧；她说，至少在当时，她知道自己会在阿尔伯特的陪伴下一同回家。在婚礼前一天的早上，她在寒冷中颤抖地如此剧烈，以至于她在与薇姬和阿尔伯特一起进行银版照相时影像都模糊了；照片中的另外两个人则保持了绝对静止。17岁的薇姬优雅地穿着白色波纹丝质裙，裙边镶嵌着蕾丝以及橙花和桃金娘。婚礼于1858年1月25日在圣詹姆士宫的皇家教堂举行——也就是18年前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举行婚礼的地方。（维多利亚曾在写给克拉伦登伯爵的信中否决了任何婚礼可能在柏林举行的建议：“不是每天都能有人迎娶英格兰女王的长女的。”[37]）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身着淡紫色天鹅绒长裙的维多利亚竭力忍着才没有哭出来：“我

几乎控制不住自己。”[38]她对女儿的端庄感到十分自豪，但在几天后向她道别时却泣不成声：“我的心碎了……多么令人难过的时刻，一想到我们最亲爱的孩子就这么走了，不知道多久以后才能再次见到她，就让我心痛。”[39]

2月2日，阿尔伯特在雪天里穿过聚集在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一千多名围观人群，护送女儿登上游艇，前往位于德意志的新生活。附近的小姑娘们已经在道路上撒满了花瓣。阿尔伯特一直害怕这一时刻到来：他非常喜欢这个聪明过人、才华横溢且与他如此相像的女儿——她也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与他志趣相投。一想到要分开，就让他感到“尤为痛苦”[40]。他们两人站在她的船舱里，薇姬将脸庞埋在阿尔伯特的胸前，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她感到自己对父亲的亏欠要超过其他任何人。[41]阿尔伯特抱着她，眼光凝视前方。他在第二天给她写的信中向她保证自己是爱她的，尽管表现得十分不自然：“我不是一个爱表现的性格，因此你不会知道我一直以来对你有多么珍惜，以及你的离开在我心中留下了多么大的空白。”[42]

在婚礼后的几天里，维多利亚一直担心得焦躁不已。她对利奥波德说：“她的自控力提高了许多，而且如此聪明（我可以说简直令人惊叹），如此明白事理，以至于我们能对她谈任何事——因此我们也会非常想念她。”[43]让她感到安慰的是，26岁的弗里茨，也就是普鲁士王子弗雷德里克·威廉是一个正派而善良的男子，而且明显深爱着薇姬。后来可以明显看到，距离让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那一年，维多利亚与薇姬开始了连续不断的通信，有时甚至每天一封信，在未来的四十年里，她们的通信数量总计近4000封。

不过，当1858年他们的女儿在普鲁士王宫的新家安顿下来时，最让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牵挂的还是欧洲的战争威胁。意大利当时还分裂成许多小国家，奥地利统治着意大利北部，吞并了伦巴第、威尼斯、托斯

卡纳（它们的首都分别是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而统一意大利的努力也渐渐获得了巨大推动力。[44]在1848至1866年，共发生了三场意大利独立战争，并最终以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告终。奥地利的统治在1848年战争结束时还未受影响；十年后，当法国被卷入进来并帮助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时，又一场战争爆发了（拿破仑三世希望意大利能够在一个撒丁国王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英国人对法国人的企图深表怀疑。维多利亚认为意大利仅仅是法国染指莱茵河的垫脚石，而且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还担心拿破仑三世——他们对这位亲密好友已经失去了信任——的野心会引发一场欧洲范围的全面战争。[45]

1859年3月，在拿破仑三世提供支持后，意大利北部的强大民主国家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国王立刻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奥地利在当年4月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王国解除武装。在遭到拒绝后，奥地利向该王国宣战。英格兰保持坚定中立，不过公众对撒丁王国表示支持。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发挥影响力，推动内阁坚持中立立场，并给好战的巴麦尊勋爵和约翰·拉塞尔勋爵写了大量信件。奉行干预主义的大臣们想要帮助法国，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通过一再努力控制住了他们。他们俩经常与巴麦尊发生争执，因为后者在担任首相期间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表现出了巨大的同情。他从1855年到1865年去世前一直担任首相一职（只在1858～1859年有过中断，由德比勋爵出任首相）。不过在1859年7月11日——也就是伦敦的大本钟首次敲响的同一天——法国与奥地利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一份初步和平协议（该协议在当年11月由一份三方签署的条约巩固下来，伦巴第最终被割让给撒丁王国）。一场全面战争得到了避免，而王室夫妇在防止英国出手干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6]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如今正处于权力的巅峰。[47]正如女王信件的编者之一伊舍勋爵后来所说，女王与皮尔、阿伯丁、巴麦尊和德比等首相之间的共事“拥有巨大的价值……［维多利亚］在多个至关重要的时

刻抑制住了大臣的行动，这些行动很可能引起巨大风险和危机，而大臣们在思考后却认为风险与危机不可能出现”。他写道，没有“女王的不屈不挠”，英国有可能就会卷入1859年的奥地利—意大利战争。

但阿尔伯特是否开始对政府事务进行了过多干预的问题仍然存在。到1859年，也就是他与英国女王成婚近20年后，他开始展示出日益强势的迹象。他经常与内阁大臣们发生争执，要求他们改变政策。伊舍勋爵在1905年审阅他的通信时写道，这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明显：

> 王夫对国家大权的掌握比以往更强，他与大臣们不断发生争执，他经常以女王的名义采取行动……他们之间存在摩擦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寿命更长一些的话，他的强势有可能演变成固执，而他与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上的政府——正如我们如今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紧张。[48]

当时，君主制度在阿尔伯特的领导之下发挥了更为强有力的影响，敦促政府在外交政策和民主化方面保持克制，倡导削弱贵族的权力，并通过覆盖全欧洲的王室血缘关系以及精心策划甚至有些微妙的秘密外交网络来发挥影响力。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是当时最为老练的外交官，他们经常与各国国王和王后举行会晤、致信其他一些国家的皇帝与皇后，并试图通过友谊或者讨论来影响他们的意见。阿尔伯特试图利用自己的孩子在欧洲王室传播英国王室的血脉。第一步是将薇姬送进普鲁士王庭，这是一次战略胜利，尽管她在那里的生活将会十分痛苦。

1859年1月27日，维多利亚成了一名外祖母。她兴奋地沿着城堡走廊奔跑，为的是告诉阿尔伯特薇姬的长子出生的消息，这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威廉·维克托·阿尔伯特（Frederick William Victor Albert）的男孩就是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Ⅱ）。维多利亚随后发出了一系列电报，温莎城堡下方的城镇上也响起了钟声，灯光都被点亮。她最初发现女儿这么快就怀孕时还感到很害怕；她将其称为“可怕的消息”[49]。

薇姬回复说，自己很荣幸能够创造出一个不朽的灵魂，这句话说得颇得她父亲的真传。维多利亚在听到所谓生育是某种精神苦旅的说法时翻起了白眼："我认为我们在这种时候更像是一头奶牛或是一只狗；这时我们的本性会变得如同动物一般，没有任何激情。"[50]孩子顺利生下后，维多利亚感到"放下了心里的重担"[51]，因为分娩仍然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不过，两天后，她听说这次分娩过程"非常惊险"[52]；胎儿处于臀位，几乎因此丧命。阿尔伯特建议多休息、用冷水洗澡并呼吸海风。薇姬给母亲寄去了一个盒式吊坠，里面放着她外孙的一缕头发。

维多利亚申斥了女儿一番，说她不应该"挑选"一个自己无法赶来陪她的日子分娩。作为代替，她给女儿送去了一瓶氯仿、詹姆斯·克拉克医生以及一个名字很有趣的助产士：因诺森特夫人（Mrs. Innocent）。[53]维多利亚仔细记录了薇姬身体恢复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她何时第一次躺在沙发上，何时能够在躺椅中坐直身子并站起身，何时能够行走等。一直到1859年5月薇姬回来探亲时，维多利亚才了解到，外孙的左臂在分娩时受了伤，只能软绵绵地耷拉着，无法动弹。[54]当维多利亚在1860年访问德意志并终于见到小威利（Willy）[55]时，她将他形容为一个"胖乎乎的健康孩子，有着漂亮而白嫩的皮肤"。[56]维多利亚是一个十分溺爱孩子的外祖母，她觉得自己孩子的子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孩子"[57]。

19世纪50年代末，在年届不惑之际，女王变得苗条又满足。[58]她终于摆脱了生育循环，愉快地享受着怀特岛的私密生活以及苏格兰的自由自在。她与阿尔伯特经常待在米克湖边用花岗岩和木头建造的小屋里，或者花上几小时乘船漂在湖面上钓鳟鱼，然后早早地上床睡觉，"在这座小屋里的生活如此平静和幸福，远离一切人类聚居地"。[59]巴尔莫勒尔城堡附近小屋里居住的穷苦劳动者对于女王的不宣而至感到十分惊奇。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时常去苏格兰高地的偏远角落进行长时间旅行，通常都是隐姓埋名出行，居住在小旅馆里。他们喜欢玩隐姓埋

名的游戏，回避好奇路人提出的问题，并在自己被认出来时试图猜测他们的伪装是如何被识破的。有一次，泄露秘密的是双轮马车上的王冠以及他们携带的床单上的图案，这些图案让当地人怀疑他们是来自巴尔莫勒尔的富豪访客，再加上维多利亚手上戴了那么多戒指，更是暴露了他们不凡的身份。一天早上，这支王室团队一醒来就听到了鼓声与笛声，看到年迈的房东太太穿上了一件漂亮的黑色绸缎礼服，礼服上还装饰着白色丝带和橙花，于是意识到他们被认出来了。[60]

在1859年的一次旅行中，他们爬上了英国第二高峰本麦克杜伊山（Ben Muich Dhui），阿尔伯特形容女王“尤其气色良好、心情愉悦、行动积极”[61]。她的旅行十分无忧无虑；他们嬉笑着从陡坡上沿着岩石滑下，并嘲笑那些东倒西歪的男仆们。维多利亚尤其喜欢她“价值连城的高地仆人”约翰·布朗，这名男子后来被她称作她最好的朋友，经常牵着她的马匹、搭着她的围巾，抱着她登上陡峭的岩石地形。她经常提到自己多么喜欢笑。当时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噢！要是时间过得不这么快就好了！”[62]阿尔伯特那一年的最后一篇日记是“我们在元旦跳舞”[63]。在这些平静的日子里，维多利亚总是在跳舞：既有华尔兹也有狐步舞，尤其是里尔舞。阿尔伯特在舞池里很难跟得上她的活力，但这并不重要。她在分娩仅仅几周后就能够翩翩起舞了，她知道，如果她能够跳舞的话，那么她也已经准备好再次面对世界了。

1859年6月1日，维多利亚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沿着泥泞的湖泊边缘散步，湖中淡粉色的火烈鸟正将喙伸进湖水中。她十分珍惜自己与长女之间新近发展出的亲密关系。她无所不谈：“我们完全理解彼此。她是一个亲切、聪明、优秀且充满爱意的孩子，我们就像姐妹一般。”[64]一长大，薇姬与母亲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平等了：她们都已步入婚姻殿堂并有了自己的孩子。[65]

不过，阿尔伯特仍然还是那个受人尊敬的导师，在道德上和思想上

培养着他的女儿。他对她说，只有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人心，他还鼓励她遵守时间，并且对变幻无常的公众情绪保持淡定。他给她安排了复杂的翻译任务，并且提议通过温习普鲁士预算的办法来帮助她更好地理解它。阿尔伯特还让她保证会“忠实地”向他告知“自己内心生活的进展”，这是一位严肃认真的父亲在对待一名严肃认真的女儿时，展现出的体贴得令人惊讶的姿态。反过来，他也承诺会给她的内心生活提供鼓励，并以此作为他的“神圣职责”[66]。

阿尔伯特亲王的思想所具有的抽象、哲学的本质在他写给薇姬的信中能够得到体现。例如，当她说自己想念家乡时，她母亲会温柔地安慰她说她也在被人思念。不过她的父亲却对思乡病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他安慰她说，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是“一种痛苦的渴望，完全有可能在感到满足和幸福的情况下同时出现”。他说，这是一种二元论，“新我”无法与“旧我”相割裂：“因此，我几乎可以断言，这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灵魂的痉挛。”[67]

维多利亚想要了解一切，并且要求对薇姬的新生活了解到无比细致的程度——她的宴会、她的住所、她的健康、她的衣着、她的房间、她的日常安排，等等等等。她对利奥波德说，她从未和大女儿长期分开过，因此“始终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焦急心切的状态，想要知道一切。这对一个曾经日复一日焦急关注孩子成长的母亲而言，看到孩子离开，只能依靠自己生活，实在是一个艰巨的考验！”[68]婚礼后不久，维多利亚就给薇姬写信，告诉她要把“对伟大事件的描述”留给其他人，“但要告诉我你的真正情感——以及你对人与事的真正印象，以及你内心的细节。第一：抵达那天你穿了什么裙子、戴了什么帽子？第二天戴了什么帽子？第二：你在科隆和马格德堡（Magdeburg）的房间是什么样的？第三：你是否和自己人在科隆一起用餐，在马格德堡是不是12点吃晚餐？第四：路上你会披哪件斗篷，有没有坚持画画？第五：你对德意志饮食喜欢吗——你可怜的女仆们能否应付这些手忙脚乱的事？”[69]

维多利亚经常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不仅表现出她的关心，还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热心肠和控制欲。[70]维多利亚喜欢给予薇姬各种指导，还写道：“你看，亲爱的，虽然相距甚远（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也无法安慰自己）——我仍然会像亲自在那里一样照顾着你。”[71]她还经常批评她。她曾因薇姬没有在白天吃饱饭、用大写字母写了太多单词、没有正确为纸张编码，以及记错了她继位的日子而申斥她。她还对她说不能笑太大声，不能在写字时驼背，要保持良好的牙齿卫生——“国外很少人能有一口好牙”[72]——要为了自己的丈夫而保持干净整洁，并且不要与王庭中除公婆外的其他任何人过度亲近。她写道：“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胖起来。不要吃那些软软的糊状物，也不要喝太多——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么容易让人发胖。”[73]她还警告自己的女儿不要因为对孩子的爱而忽视丈夫和自己的职责。她说：“如果对育儿工作过度热情，没有哪个淑女能胜任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地位，即使是王妃也是如此。”[74]维多利亚坚称自己每年仅会有四次看着最年幼的孩子沐浴并被放在床上。[75]

薇姬对母亲突然表现出的对她的过度喜爱感到有些惊讶，因为早些年母亲曾对她十分苛刻。[76]不过，这两名女性一致认为阿尔伯特是一个英雄人物。[77]维多利亚对薇姬吐露了她不幸的童年，以及她如何无处安放她“强烈的情感”[78]。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的一切都要归功于阿尔伯特：“除了是我的丈夫外，他还好似我的父亲、我的保护者、我在一切事务上的向导和顾问，以及（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我的母亲。我觉得没有人像我被你爸爸影响那样在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对我而言，你爸爸的地位就显得十分独特，当他不在身边时，我会感到失去了勇气。”[79]女王不知道这种彻底的依赖会在未来让她变得多么脆弱。

伯蒂是两人无法取得共识的一个话题。维多利亚经常斥责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而薇姬则几乎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1858年3月，维多利亚

对女儿说，她“讨厌极了”伯蒂，这时的伯蒂16岁，正在对着母亲念布道词，准备下个月的坚信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将前往罗马旅行，并开始在牛津的学习，但他始终表现出的懒惰让维多利亚感到绝望。她说他无知、无趣，而且相貌远远谈不上英俊，“脑袋又小又窄，五官巨大，完全没有下巴”[80]。她讨厌他低垂的“科堡鼻”——他的鼻子与维多利亚如出一辙——他的超重、大嘴以及新发型。[81]当时的流行是把头发剪短并且严格中分，而维多利亚却说，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没有脑袋只有一张脸似的”[82]。

维多利亚对孩子的描述与她对大多数人的描述完全一样：直言不讳而且经常十分严厉。例如，她在描写儿子利奥波德时写道：“他个头很高，但站姿差得前无古人，而且相貌非常普通，面色苍白，聪明但有些古怪——虽然很有趣，但并不是一个迷人的孩子。”[83]海伦娜的五官“又大又长，破坏了她的容貌”[84]。较为漂亮的阿瑟、爱丽丝和路易丝会得到她的赞美，并被作为相对照的例子。薇姬对维多利亚说，伯蒂在前往德意志探望她时显得很英俊，维多利亚却在回信中嘲笑说：“我觉得他很无趣；他的另外三个兄弟却都很有趣而且很健谈。”[85]薇姬的心沉了下去；帮伯蒂说话注定是徒劳无功的。[86]

维多利亚此时已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职业母亲。她作为一名女王兼母亲的形象让一个曾经显得似乎有些高高在上的她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沃尔特·白芝浩在1867年写道，王座上的一家人“将主权的骄傲拉下神坛，拉低到琐碎生活的层次”[87]。在统治英格兰的同时，维多利亚显得似乎心里在意的只有她的家庭生活。在当时的英格兰，参与工作的女性会受人怜悯，但185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有四分之一的妻子和三分之二的寡妇参与工作。[88]在19世纪下半叶，职业女性的数量迅速增加，变得受人尊敬起来。[89]不过，人们仍然认为，工作会让男性变强，让女性变弱。但女王在工作时没有丝毫内疚。

然而，也仅是在这个阶段，当维多利亚沉醉在身为人母的满足感中时，我们开始看到她对生儿育女给女性带来的伤害慢慢产生了愤怒。她称之为婚姻的阴暗面：除了生过孩子的女人外，很少有人会去谈论它，甚至都无法恰当理解它。当薇姬提出，一名已婚女性比未婚女性在社会中拥有更大自由时，女王回复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另一种意义上，也就是肉体意义上来说，并非如此：

> 你必须对抗的疼痛——以及痛苦、苦恼还有折磨——以及必须放弃的快乐——不得不时刻采取的防范措施，你会感受到作为已婚女性的束缚……我已经经历了九次，每次都要花上8个月时间来忍受上面提到的这些敌人，而且我承认它们让我筋疲力尽；我感觉受到了如此大的约束——就像是翅膀被剪掉了一样——事实上，即使是最好的时候……我感觉也只有半个自己存在——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这就是我说的“阴暗面”，与被迫同自己的家乡、父母和兄弟姐妹分别一样痛苦。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个性别是最不值得羡慕的性别。

19世纪妈妈们的隐秘世界——例如医学界的忽视以及镇痛药的缺乏——让维多利亚一想到自己的女儿们需要经历的一切，就不寒而栗。[90]当她在1860年见到爱丽丝公主的追求者时，维多利亚心情十分沮丧：“所有婚姻都是在碰运气——幸福永远是一种交换——尽管婚姻有可能很幸福——但可怜的女性仍然在身体上和心理上是她们丈夫的奴隶。这一点永远让我如鲠在喉。”[91]

甚至连有如天使一般的阿尔伯特也无法理解女性的命运。维多利亚在1859年愤怒地给薇姬写信说，阿尔伯特有时会对她和其他女性在身体上经受的考验“嗤之以鼻”。薇姬也一直在抱怨说，她丈夫的一个表亲看不起女性，并且认为她们仅仅是用来做装饰的。维多利亚回答说：

> 所有聪明男人本质上都有一些歧视我们这个可怜而卑微的性别的成分；甚至连你亲爱的老爸也不例外，尽管他不会承认——但他经常会嘲笑和讥讽许多女性，以及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些不便之处，不过他同时也厌恶那些不对女性展现关爱、给予注意并提供保护的男性，称那些将所有家庭

事务以及孩子的教育都交给妻子的男人实际上是忘记了他们的首要职责。[92]

王夫渐渐厌烦了维多利亚对怀孕造成的身体虚弱的抱怨。当1856年秋天她进入最后一次怀孕的妊娠中期时，阿尔伯特在一封信中指责她既要求苛刻又自私自利。他寄希望于通过给她写信来安抚她，但他同时也展现出了对她不断抱怨自己肉体拘束的不耐烦：

我与王宫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充分体谅你的境遇……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替你承担你身体上的痛苦——你必须独自与它们抗争——心理上的痛苦可能也是由它们引起的，但如果你少一点关注你自己和你的情绪，更多地注意外部世界的话，也许会发现这能带来巨大帮助。[93]

阿尔伯特鼓励妻子让上帝的眷顾带领她摆脱痛苦，以及她向他描述的那种“耻辱和愤怒”。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提到过，造成她对生儿育女产生矛盾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体上的代价。当她在死后第一次接受身体检查时，医生们发现，维多利亚出现了子宫下垂和腹疝的症状——这是她感到痛苦和不舒服的重要原因——两者都很可能是由艰难的分娩过程引发的，并且因她晚年的体重增加而不断恶化。

从许多方面来说，维多利亚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母亲。阿尔伯特对她说，她之所以不喜欢孩子，是因为她错误地认为母亲的工作是要训诫孩子：“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错误的理念，那就是母亲的工作永远是纠正、斥责和命令孩子并且安排他们的活动。你不可能跟一个刚刚被你斥责过的人还保持良好关系。”[94]当伯蒂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家庭教师——当时是克拉伦登勋爵——描述说，“女王对待孩子的严厉方式”“非常不明智”，尤其是对意志坚定、十分自律的伯蒂而言。[95]

1856年6月，薇姬在用蜡烛熔蜡密封一封信件时不小心引燃了自己的袖子，烧伤了胳膊。每一天处理伤口时，维多利亚都会陪在女儿的身边。

有时，维多利亚的孩子会让她感到厌烦，有时会让她感到愉快。她在日记里心情愉悦地写到她甜美、漂亮的“兰辰”，亲切、无私的爱丽丝，以及罹患血友病的利奥波德，后者虽然与疾病做斗争，却是一个“聪明、诚实、善良的男孩”[96]。她显然更喜欢比阿特丽斯、薇姬和阿菲，还曾把阿菲称作“宫里的阳光”，以及“非常像他亲爱的父亲”[97]。在提到阿瑟时，她说：“在这种时候，孩子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快乐无辜的本性令人耳目一新、心情愉悦。”[98]当阿尔伯特在1858年不让她带着年幼的子女一起去普鲁士探望薇姬时，她把他称作一个“铁石心肠的暴君”[99]。不久后，当阿菲受命外出数月，加入皇家海军“尤里亚勒斯”号护卫舰一起经直布罗陀前往地中海时，维多利亚对薇姬说：“你爸爸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残忍。我向你保证，没有孩子比有了孩子却要把他们放弃要好多了！这太让人难过了。”[100]她和其他孩子们会用望远镜观看月食和彗星，观赏动物园里丑陋的鲸头鹳，并且惊叹于美国“马语者”的精彩表演，后者能够几乎在一瞬间将桀骜不驯的马匹驯服得服服帖帖。[101]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保持着稳定；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家庭的支柱，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他们的孩子在关照和控制下逐渐长大，不过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联盟和叛逆，就像是爱丽丝与伯蒂一样，他们经常偷偷溜出去抽烟。

* * *

维多利亚喜欢频繁查询日历。她会将重要的日期和纪念日记在日记里——不仅仅是生日和婚礼日期，还有诸如阿尔伯特在订婚前抵达英格兰的日子、他们订婚的日子、阿尔伯特抵达英格兰参加婚礼的日子、弗里茨宣布打算迎娶薇姬的日子[102]、薇姬与弗里茨正式订婚的日子以及他们结婚的日子等。她会记下大小战役的纪念日、法国奥尔良家族倒台的日子、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的日子、薇姬烧伤手臂的日子，以及阿尔伯特在科堡跳出马车刮伤脸颊的日子。维多利亚企图紧紧抓住这些日子，就像是一个还未习惯知足常乐，害怕幸福有可能终结的女人一样。

她讨厌改变。

1860年以一个令人焦虑的注脚结束。维多利亚对战争感到担忧。她对薇姬说，她已经厌烦了“烦人”的政治以及整个欧洲大陆，有一天，她想与孩子们一起逃到澳大利亚去。[103]阿尔伯特亲吻了她的额头，对她说要相信上帝；他会像以往一样保护他们。[104]维多利亚还担心母亲的健康。当肯特公爵夫人在1859年从一阵突发疾病中康复后，维多利亚给利奥波德写信说，在四个小时时间里，她焦急地等待母亲是否能够活下来的消息，以前的她从未受过这种煎熬：“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么爱她，或者说我的整个存在似乎都与她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直到我看到远处那个不敢言说的可怕可能性距离越来越近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105]她对于自己在少女时代的固执感到十分内疚。她最害怕的是失去。

1861年3月16日，在经历几个月的健康欠佳、背部疼痛和感染后，肯特公爵夫人去世了。[106]维多利亚是坐在脚凳上握着母亲的手时意识到她已经停止了呼吸的。眼中满含热泪的阿尔伯特弯下身将维多利亚抱了起来，带到隔壁房间，后者被巨大的情感所淹没：“我的整个童年似乎都向我蜂拥而来。”[107]她给利奥波德舅舅写信说：“在这个我生命中最悲伤的日子里，你可怜而心碎的孩子写下了一个充满了爱的句子。她走了！”[108]

维多利亚躺在拉上了窗帘的房间里哭了好几周。她难以入睡、食欲不振，想着20年前她与母亲之间的隔阂是多么愚蠢，以及她有多么思念她。她收养了母亲的苏格兰猎犬，托人制作了一座半身像，梳理她的信件，并且开始处理她的财产。薇姬从德意志回国来陪伴她，而她的小女儿比阿特丽斯偶尔还会用“甜美而天真的咿呀咿呀声”振奋她的心情。[109]

不过这时正41岁的维多利亚已经陷入了抑郁，她将其形容为一种压迫式的、令人心力交瘁的阴云。她不能听到高声说话或者人群嘈

杂。[110]在母亲去世两周后，她的心中仍然有巨大的空虚感，一种“空白或者孤寂”，“既充满渴望，又感怀过去”。每天一次难以控制的哭泣是她唯一的解脱。她的头痛病十分严重而频繁；她很感激自己马车的橡胶轮胎不会发出噪音。即使是伯蒂说话的声音也会让她烦躁得大发雷霆。

不久后，有关女王发疯的谣言开始流传；这种流言蜚语从未走远，因为女王的祖父乔治三世国王也曾有过类似的命运。阿尔伯特对兄长说：“维多利亚状况很好，我无法理解这些有关她精神状况的可怕而恶毒的谣言是如何出现的。他们让我感到很厌烦，因为我知道会有什么后果。”[111]

不过，阿尔伯特也清楚维多利亚心怀渴望、感怀过去的特点，并且警告她说不要被悲痛压垮。他说，她在生活中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控制她的情绪”[112]。在1861年10月，也就是她母亲去世的几个月后，他给她写了一份备忘录：

> 我的建议是减少对自己和自身情感的关注，这真的是我能给予的最好的建议了，因为痛苦主要是通过纠结不放来感知的，也会因此被提升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如果你能增加对与个人情感无关的事物的兴趣，会发现处理这些情感的任务变得容易了许多，你自己也说，这些情感是你生活中巨大困境的根源。[113]

维多利亚天生就多愁善感，有时也是个很黏人的人，她变得十分依恋人与物；她讨厌离开奥斯本宫或者巴尔莫勒尔，每次阿尔伯特外出办事，她都会对他屏息以待。她在日记里认真地记录所有家庭成员的来来去去，并且会因为任何人的缺席而感到惋惜。她在巨大的悲痛面前尤其脆弱，而悼念过程中的一部分终于让女王感到满意，就好像她用力捂住了伤口一样。她在4月对薇姬表示，她不想被从悲痛情绪中“唤醒”。正是这一点阻碍了阿尔伯特防止她沉湎于悲痛的努力。

1861年，在维多利亚42岁生日那天，她要求不要在她窗外演奏音

乐。她只想珍惜阿尔伯特“温柔的爱和情感”，这个生日也变成了一个亲密异常的生日仪式。她鞭辟入里地写道，她亲爱的丈夫是她的“一切，我敢肯定上帝一定会在未来许多年里保佑他，不会让他先我而去！”[114]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开始紧张可能失去挚爱亲人的可能性。在费奥多拉50岁生日那天，刚刚失去同母异父哥哥卡尔的维多利亚写道：“愿上帝长久保佑这个亲爱的、我唯一的姐姐！如今我为所有至亲感到焦虑！”[115]

阿尔伯特的健康摇摇欲坠；他患有长期胃病，经常出现剧烈胃绞痛；他还容易感冒，经常出现头疼、发烧、牙疼以及黏膜炎。他在1859年5月对斯托克马说，过多的工作和刺激让他的“黏膜始终处在兴奋状态”[116]。有时，压力还会导致阵发性呕吐。维多利亚将其归咎于超时工作，总是急切地想让他痊愈。[117]她私下里认为他对此有些大惊小怪，就好像他得的是某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士流感”[118]一样。阿尔伯特经常批评妻子的情感脆弱，而她却批评他身体虚弱。（毕竟，这是一个经历了多次刺杀企图却毫不在意的女性。）她在1861年写给薇姬的一封信中抱怨说：

> 你亲爱的爸爸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好转，也不去试图克服身体的虚弱，却露出如此痛苦的面庞，人们总是认为他病情严重。我的情况总是恰恰相反；我可以在别人面前做任何事，而且不舒服的话从来不表现出来，所以人们从来不相信我病了或者受了苦。他的神经系统很容易兴奋以及受刺激，每件事都会让他完全难以忍受。[119]

她说，女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120]。

王夫极度疲累。1860年9月，在前往科堡的一趟旅途中，阿尔伯特由于马脱缰而从一辆行驶中的马车上跳了下来。他身上留下了瘀青和擦伤。斯托克马在查看了阿尔伯特的皮肉伤后悄悄对埃内斯特说：“上帝怜悯我们！如果他遇到什么严重的情况的话，会死的。”[121]埃内斯特还汇报说，感情脆弱的阿尔伯特出现了患病的迹象。埃内斯特说，当他们

在那年10月的科堡最后一次一同外出散步时，“阿尔伯特站住了脚步，突然间伸手进口袋去掏手帕……我走到他身边，看到他脸上流下两行热泪……他反复说，他很清楚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来到这里了”。[122]阿尔伯特心情很低落，“他的不满之龙”不断折磨着他。

这个九个孩子的父亲无法停止工作。在他的思维里，生活就是无止尽的单调工作。[123]他将自己视为某种签订了契约的驮畜，在写给兄长的信中，他说：“男人就是一头背负着重物的巨兽，只有在拖拽他的重物并且没有任何自由意志时才会快乐。我的经历每天都在教会我一点一点更好地理解这一真相。”[124]他无休止的独自猎鹿冒险似乎也无法缓解他的疲劳。维多利亚已经变得极度依赖于他，十分厌恶他的消失，甚至已经变得令他难以忍受。她对利奥波德说，当他独自前往阿伯丁待一晚以便发表一篇演讲时，“没有他我感到如此失落”。[125]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在她崇拜并依赖自己身体虚弱但动力十足的丈夫时，这一力量多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1861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伦敦发生了一场大火。身处白金汉宫花园里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看到天空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被点亮，于是爬上了宫殿的楼顶来观看火焰。

这一景象令人感到恐惧，天空一片血红，火焰冲天而上……点燃了整个城市，造成了可怕的破坏……整个景象都令人感觉不可思议、引人注目，威斯敏斯特的白塔在大火的右侧巍然耸立，月光美丽地闪耀，温暖而静止的夜晚被威斯敏斯特教堂塔顶的大本钟钟声以及军营的军乐表演打断。[126]

据信，图利街（Tooley Street）大火的起因是装满了黄麻、大麻、棉花和香料的仓库发生的自燃。大火很快就沿着泰晤士河南岸燃烧了四分之一英里，产生了一道100英尺高的火墙。旁观者们在河中划着船，河面则在火光中闪耀着金光。大火又继续烧了两天，一直到两周后才完

全扑灭；共有6人死亡，其中包括消防队的队长，一座仓库倒塌时压在了他的身上。

维多利亚站在宫殿楼顶观看了好几个小时，眼睛紧盯着烟雾和跳跃的红色火焰。在她最终不再观看大火，转过身去准备上床睡觉时，她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那一年年底之前，她自己的幸福生活就将被摧毁。

---

[1]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38.

[2] 在1840年，进入下水道成为违法行为，举报者还会得到奖励。这意味着当时人们通常只能在夜里提着提灯进去。

[3] Mayhew，*Mayhew's London*，326.

[4] 梅休的线人对他说，他们每天能挣6先令；相当于今天的每天50美元。梅休写道："按照这样的速度，伦敦下水道里每年找到的财物能达到不少于20000英镑［如今的330万美元］。" Mayhew，*Mayhew's London*，333.

[5] 普及程度的增加出现在1810年，并在1830年加速。在1848年，伦敦下水道委员会首次确保房屋排水和排污系统与下水道相连接。在1852年，城市里的16200栋房屋中，有11200栋与下水道相连接。

[6] 在19世纪初，伦敦大部分房屋的地下都累积了蜂巢状的粪池，里面塞满了污物，通常由守夜人徒手清理。亨利·梅休报道称，在穷人居住的房屋里，"许多人就在房间的角落里方便，或者在地板上挖一个洞，走廊、房间和楼梯上到处都是排泄物。这些房屋里的臭味对那些不习惯的人而言简直难以忍受"。引自Paterson，*Voices from Dickens' London*，23。

[7] Picard，*Victorian London*，50.

[8] 臭味在河水退潮时最为强烈：河岸边堆满了污物，并爬满了浅红色的虫子，这些虫子被男孩子们称作血虫。Picard，*Victorian London*，10.

[9] *Civil Engineer and Architect's Journal* 15 （1852），160.

[10] 用一名王室朝臣的话说："王室住所内的臭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强

烈。” St. Aubyn，*Queen Victoria*，328.

[1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22，1849.

[12] 布莱克还为诱捕老鼠比赛提供了老鼠，一群老鼠被放在坑里，观众会对小猎犬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将它们全部杀死下注。这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项十分流行的消遣活动。

[1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58. 清洁是阿尔伯特的无数热衷事务之一，他经常在自己的房子里实验各种粪便施肥计划，这是他研究如何改善劳动阶级生活条件的努力之一。

[14] 但是，《泰晤士报》写道：“那两周给伦敦公共卫生部门造成的后果相当于孟加拉兵变给印度当局造成的后果。” *The Times*，July 21，1858，9.

[15] Testimony from a civil engineer，*The Times*，July 14，1858，5.

[16] 在1858年6月23日的一个案子里，皇家财政法庭的一名法官说，由于恶臭太过强烈，他要快速结案。一名陪审员同意说，恶臭让他感到恶心，法官回应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关注河水的状况以及它对我身边一切的影响。我们不可能向自己隐瞒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正身处恶臭的环境中审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The Times*，June 24，1858，11.《泰晤士报》连续几个月呼吁政府清理河道。该报建议读者喝一杯加冰雪利酒，然后硬着头皮在低潮时分走到泰晤士河边：“然后你就能看到，在短短的半小时里以及两三英里的河道上，有上百个下水道口正在排放粪便，上百个烟囱正在排放烟雾，以及稀奇古怪、无法描述、令人作呕的蒸汽；上百英亩反常而泥泞的化学肥料，上百对浆轮正在搅拌泥土。水——虽然还是流动的——却一片漆黑。一丝不挂的淘气鬼们从黑黢黢的拱桥或者运煤驳船上跳下，在泥水里玩耍，就像是尼罗河里的小怪物似的……我们相信这是世界上最肮脏、最污秽的一条河流。” *The Times*，June 17，1858，8.

[17] 引自 Picard，*Victorian London*，51-52。这一段对泰晤士河影响的叙述十分值得读一读。

[18] 在伦敦工程委员会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扎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获准执行他的计划，沿着泰晤士河南岸和北岸建设两条超级拦截下水道，将污水输往城外的处理厂，从而避免污水流入泰晤士河之前，对于资金、责任和解决方案曾出现过长期的拖延和许多争议。（Paterson，*Voices from Dickens' London*，31.）1858年，议会批给了他300万英镑资金。随着泰晤士河沿岸开始建设路堤，他的计划也在渐渐

展开；在街道下方，165英里长的主要下水道与1100英里长的局部下水道相连接，从而将污水从市中心运走。这个下水道管网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挥全部功能。

[19] 达夫在《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Albert and Victoria*）一书的第225页称这是“私人信息”。他写道：“据传说，他［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对他的同行透露了女王对他提出的她不应再生孩子的建议给出了回应。回应是：‘噢，詹姆斯爵士，我在床榻之上还能有更多欢愉吗？’”

[20] Letter dated March 3，1857.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170. 在比阿特丽斯出生的一个月前，阿尔伯特给巴麦尊写信说，维多利亚的健康情况不好，需要前往温莎城堡：“女王感觉身体状况不足以支撑其经历内阁危机带来的焦虑。”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290.

[2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9，1857. 她写道：“后来在沙龙里举行了一场小型宴会，以及一场非常漂亮的小型舞会……对自己感到惊讶——自己竟然如此强壮，能够整晚跳舞，特别是之前经历了如此疲劳的接见，而且距离生下我第九个孩子仅仅过去了两个月！我真的心怀感激。”

[2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9，1857.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8，1857.

[24] Prince Albert to Baron Stockmar，April 2，1858，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177.

[2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4，1858. 后来在1859年1月23日，她试图画她最小的孩子：“画了小比阿特丽斯，她是最可爱的小家伙，圆滚滚的，如此生动活泼。”

[26] 1856年，印度当时有23.3万名印度士兵和4.5万名英国士兵。（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370）让印度士兵们感到愤怒的还有薪水被克扣，以及对孟加拉军队驻扎海外的要求，后者会让高种姓者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27] Queen Victoria to the Viscount Canning，December 2，185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389.

[28] 中国的战争是在1858年6月26日结束的。《天津条约》使中国进一步对英国的贸易和外交敞开了大门。

[29] 维多利亚被吓坏了，她在1857年9月18日的日志中写道：“在与简·C共进早餐后，在报纸上读到了坎普尔大屠杀的可怕细节。88名军官、70名贵妇和儿童、120名妇孺，以及400名居民被杀！院子里有两英寸厚的血，可怜的贵妇们留下了一缕一缕的头发和一件件的衣服，这些都被找到了！”后来，在女性遭受的折磨被公之于众后，她进一步为这些女性的尊严而难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4，1857.

[30] Queen Victoria to Lady Canning，September 8 1857，cited in Surtees，*Charlotte Canning*，238. 需要指出的是：维多利亚后来在1857年10月22日（p.243）的信中问道：“我想知道的是，是否有任何目击证人的可靠证词——能够证明诸如人们不得不吃自己孩子的肉等以及其他我无法付诸笔端的无法形容的可怕暴行？”

[31] St. Aubyn，*Queen Victoria*，306.

[32] 坎宁勋爵致信维多利亚：“前方最大的挑战之一——坎宁勋爵很难过不得不这么对陛下这么说——将是英国大部分公众对每一个种姓的每一个印度人的深仇大恨。海外已经出现了激烈而无差别的报复心理……似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认为将四万或五万叛变士兵以及其他叛乱者处以绞刑和枪决是不可行或者不正确的。”Viscount Canning to Queen Victoria，Calcutta，September 25，1857，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318-19.

[33] St. Aubyn，*Queen Victoria*，307. 女王还在这时——1857年11月1日——的日志中写道，她向巴麦尊勋爵“态度强硬地谈及”了“这里的许多人以及部分媒体表现出的十分糟糕的复仇情绪，向和平居民展示我们善意渴望的绝对必要性；还有死刑不应无差别地施加于所有叛变者，因为犯下谋杀和暴行的人或者与我们对抗的人，与那些仅仅是将毛瑟枪和背包丢下的人之间一定存在很大差别，而后者我担心也已经被绞死了”。

[34] 它是在1600年12月31日建立的。

[35] 她的声明如下：“有赖于基督教的真理，以及心怀感激地承认我们宗教的慰藉，我们否认有权利或者有意愿将我们的信仰强加给任何臣民。王室希望且愿意看到，没有人在任何情况下因他的观点而被迫害，或者因其宗教信仰或习俗而感到忧虑。”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335-36.

[3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6，1859.

[37] Queen Victoria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October 25，1857，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321.

[3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5，1858.

[3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1858.

[40]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132.

[41] Vicky to Prince Albert，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386.

[42]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146.

[43]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January 12，185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333.

[44] 在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签订的《维也纳条约》重新划定欧洲版图后，奥地利得到了伦巴第—威尼斯王国。

[45] 当法国人发现曾经阴谋刺杀该国皇帝的意大利阴谋者在英格兰寻求避难后，他们也愤怒不已。这些意大利阴谋者就是在英国制订革命计划并且制造手榴弹的。

[46] 这相当于是法国与奥地利之间就意大利各城邦邦联达成的一份协议，该协议完全忽视了意大利人的自治愿望，并且将尼斯和萨瓦并入了法国。

[47] August 28，1905，Brett，*Journals and Letters*，2：103-6. 参见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21。

[48] 伊舍后来在写给儿子的私人信件中说：“他与威尔士亲王之间也有一些问题萌发的迹象，当时王子还很小，或许他的早逝并不是很大的不幸。或许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工作也已经完成了，那就是他给女王带来的训练。他的生命足够长，足以种下种子，却无法看见稻穗成熟。或许这样也不差。”Maurice from Esher，August 18，1905，Brett，*Journals and Letters*. 引自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29。

[49]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y 26，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08.

[50]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une 15，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15.

[5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7，1859.

[5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9，1859.

[53] Prince Albert to Vicky，March 16，1859，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333.

[5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1，1859.

[55] 威廉的昵称。——译者注

[5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5，1860.

[57] 她写道，她现在理解了母亲曾经对孩子们感受到的“溢出的温柔”。VJ，August 16，1861.

[58] 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419.

[5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30，1849.

[6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9，1861.

[61] Prince Albert to Baron Stockmar，October 11，1859，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411.

[6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13，1857.

[63]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424.

[6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1859.

[65] 维多利亚致信薇姬：“女儿结婚后无论多么年轻都会立刻变得与母亲相同。”Queen Victoria to Vicky，April 21，1959，Fulford，*Dearest Child*，184.

[66] Prince Albert to Baron Stockmar，February 15，1858，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153.

[67] 阿尔伯特写道：“我来解释一下这种很难理解的心理现象。个人的身份被扰乱；一种双重性由于这种原因而涌现，那就是曾经的我，带着年轻人曾经拥有的印象、记忆、经验和感受，对某个特定的地点及其个人联系形成了依恋，在所谓的新我看来就像是迷失灵魂的外衣，但新我却无法与它相割裂，因为它的身份实际上是连续的。因此产生的痛苦挣扎，我想说，就像是灵魂的痉挛。” Prince Albert to

Vicky，March 10，1858，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178.

[68]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February 9，1858，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334.

[69] Queen Victoria to Vicky，February 6，1858，Fulford，*Dearest Child*，32-33. 维多利亚还经常批评女儿没有经常写信，或者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包括有关冷水海绵浴以及房间室温的细节等，尽管阿尔伯特曾经斥责她逼问太甚了。当薇姬在电报里没能提供有关她健康状况的足够信息时，维多利亚会在信中假装跺脚地说：“你没有说你的感冒好点了没，仅仅是说：‘我还不太好’以及——‘我很好’。你究竟发烧了没？……我已经习惯了了解你每个小时的情况，如今不知道你的真实情况真让我感到坐立不安。” Queen Victoria to Vicky，February 20，1858，Fulford，*Dearest Child*，54.

[70] 维多利亚还建议在信件开头写上标题，并且要求薇姬的侍女们提供一份女儿服装的清单，一份她所收到的公开和私下礼物的完整记录，以及一幅有关薇姬如何摆放家具的素描画。

[71] Queen Victoria to Vicky，December 11，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51.

[72] June 30，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20.

[73] Queen Victoria to Vicky，April 14 1858，Fulford，*Dearest Child*，90.

[74] 她警告她说，“如果你对于育儿工作太过热情，会浪费时间。如果一个贵妇这么做的话，那么她将配不上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地位，更别提一个王妃了。我知道，亲爱的，你会对此有些反感；但我只是希望提醒你、警告你，虽然你对小孩子们有着极大的热情（他们在最初的6个月就像是小植物一样），但是你有了孩子之后的喜悦很容易让你失去自制力。”（Queen Victoria to Vicky，November 17，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44.）维多利亚在3月16日的一封信中对薇姬说，她只喜欢3到4个月大的婴儿，“那时的他们真的非常可爱。”（Fulford，*Dearest Child*，167.）她在1859年5月2日再次写道，她不喜欢的只有新生儿，只有当他们变成“小人”之后她才会关心他们；“丑陋的婴儿是非常恶心的东西——即使是最漂亮的婴儿在赤身裸体时也显得很可怕；简而言之，只要他们仍然有着大身子和小四肢，以及那种可怕的青蛙式动作，就很可怕。但从4个月开始，他们就变得越来越漂亮。不过我要再说一遍——你的孩子无论多大都会让我感到喜悦。”（Fulford，*Dearest Child*，191.）

[75]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y 14，1859，Fulford，*Dearest Child*，193.

[76] 维多利亚在薇姬小时候对她管教十分严格，如今她认为正是她的这种教育方法才造就了一个拥有坚强性格的女人。她经常提醒女儿，她在小时候给她带来的艰巨考验："我认为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听话、脾气最糟糕的女孩子！……你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麻烦——的确非常大。相比而言，其他的孩子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你和伯蒂（以不同的方式）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非常好奇你是不是还会使出过去的那些老把戏？单腿站立、放声大笑——狼吞虎咽、走路蹒跚等。"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uly 28，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24-25.

[77] Vicky to Queen Victoria，February 15，1858，Fulford，*Dearest Child*，46.

[78]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une 9，1858，Fulford，*Dearest Child*，69.

[79]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une 9，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12.

[80] Queen Victoria to Vicky，November 27，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47.

[81] 七个月后，维多利亚埋怨说，他的口鼻还在不断长大，一只"科堡鼻"就像他的妈妈一样，下巴几乎看不见。Queen Victoria to Vicky，June 29，1859，Fulford，*Dearest Child*，198.

[8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September 2，1859，Fulford，*Dearest Child*，208. 维多利亚在1860年4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说："他一点也不好看；他的鼻子和嘴太大了，还喜欢把头发黏到头上，衣服穿得也很吓人——他真的是一点也不好看。在他的小脑袋和大脸庞的衬托下，他的发型真的太难看了。"

[83] Queen Victoria to Vicky，November 24，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46.

[84] Queen Victoria to Vicky，April 9，1859，Fulford，*Dearest Child*，175.

[85] Queen Victoria to Vicky，December 4，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49.

[86] 当一位母亲如此公开地表达对儿子的不喜欢时，总会有人有所反弹。薇姬敦促母亲原谅伯蒂，并且保持耐心，强调说他是能够变得善良而美好的，而且他渴望取悦母亲。（"他的内心是能够产生喜爱和温暖的，我敢肯定假以时日这种情绪一定会渐渐表现出来。他热爱自己的家，而且在这里感觉很幸福，这些感情必须得到呵护和培养，因为如果这些感情丧失的话，是不会轻易再次出现的。"Vicky to Queen Victoria，April 4. 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18.）她写道，如果关系疏远的话，会很糟糕。但维多利亚不愿改变态度。她坚持认为，责任在伯蒂身上，他要变得"更温柔、更体贴"，而且对父母感兴趣的事情更加感兴趣才行。（Queen

Victoria to Vicky，April 10，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20.）在读到这句话后，薇姬的心沉了下去。

[87]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38.

[88] 这次人口普查同时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独立劳动者。“‘女性在部分在家工作的行业里中能够提供重要服务；例如农民、小商铺店主、旅馆老板、制鞋匠、屠夫的妻子们’，还有那些列入这些类别的人。”Hall，*White，Male and Middle Class*，176. 这次人口普查还第一次列入了“英国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和主妇”这一职业。

[89] See Schama，*A History of Britain*，144.

[90] Queen Victoria to Vicky，April 20，1859，Fulford，*Dearest Child*，182.

[91]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y 16，1860，Fulford，*Dearest Child*，254.

[9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August 10，1859，Fulford，*Dearest Child*，205.

[93]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331.

[94] October 1，1856，引自 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244。

[95] September 17，1855，Strachey and Fulford，*The Greville Memoirs*，7：157；Pearce，*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317.

[9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7，1859.

[97] 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541；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1，1859.

[98]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y 2，1859，Fulford，*Dearest Child*，190.

[99]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uly 21，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24.

[100] Queen Victoria to Vicky，September 27 （then October 1），1858，Fulford，*Dearest Child*，134.

[101]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3，1858.

[102]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0，TK.

[103] . Queen Victoria to Vicky，undated，c. April 18，1859，Fulford，*Dearest Child*，180.

[104]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31，1860.

[105] .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May 25，1859，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334.

[106] . 维多利亚还曾与丹毒做过多年斗争，那是一种严重的皮肤感染。Victoire had also been struggling with erysipelas，an intense skin infection，for years.

[107]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6，1859.

[108] .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March 16，186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555.

[109]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7，1861.

[110] .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Windsor Castle，March 26，186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556.

[111] .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213.

[112] . 引自 Longford，*Victoria R.I.*，292。她提供的日期是1861年10月22日。

[113] . Richardson，*Victoria and Albert*，214.

[114]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4，1861.

[115]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7，1857.

[116] . Prince Albert to Baron Stockmar，May 28，1859，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449-50.

[117] . Fulford，*Dearest Child*，174.

[118] 暗指其故意夸大病情。——译者注

[119] . Queen Victoria to Vicky，February 16，1861，Fulford，*Dearest Child*，

308.

[120] . Queen Victoria to Vicky，February 21，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10. 至少有一名关系亲近的观察家认为女王太过希望他人的关注和爱，反而照顾不好她的丈夫。作为一名医生兼顾问的斯托克马变得十分紧张，将阿尔伯特的一次胃病归咎于温度的突然变化——以及“你每天都要经历的身体和思想上的担忧”。他一针见血地写道：“你那里缺少对睡眠、照顾和护理的体贴关怀，而这些对于病人和处在康复期的人来说十分必要。” Baron Stockmar to Prince Albert，November 8，1859，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414.

[121] . From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402，她提供的注释是*Memoirs of Ernest* Ⅱ，4：55。

[122] . *Memoirs of Ernest* Ⅱ，4：55.

[123] .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217.

[124] . Prince Albert to Ernest，November 14，1856，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166.

[125] .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September 15，1859，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409.

[126] .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2，1860.

第四部分 温莎寡妇



20 “再也无人唤我维多利亚”

我为女王担心。[1]

——查尔斯·格雷维尔，1861年12月14日

伯蒂从窗子里探出头来，扫视了一眼卡勒（Curragh）军营的操场。作息号声已经在几小时前的晚9点半宵禁开始时响起。他迅速走出了自己的指挥营房，路过两个小帐篷和他的卫兵，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趁着夜色找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营房，并且在门口探头进去张望。性感撩人的爱尔兰女演员内莉·克利夫登（Nellie Clifden）正在里面等待。他的朋友们将她偷偷带进了军营里，以款待这位19岁的威尔士亲王。

“放荡女”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变得日益普遍，那是一个被人忘却但朝着解放的方向迈出坚定步伐的十年。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开始叛逆：吸烟、公开调情、与未婚男性自由交往。[2]那个年代的书籍充斥着对年轻一代行事轻浮的抱怨。部分年轻女性甚至大胆拥抱“放荡”这个词，让上流社会惊讶不已。一名小说家写道：“噢，英国的少女们竟然对这一名号面不改色、不知羞耻甚至反以为荣！但1861年的事实就是这样。”[3]甚至1868年，在前往瑞士旅行时，维多利亚注意到，在聚集起来围观她的人群中，有一些“不受约束的年轻英格兰女子，她们是现在最令人讨厌的‘放荡淑女’的代表”。她还补充说：“有些人毫无疑问是美国人。”[4]

漂亮的内莉·克利夫登普遍被人描述成一个“本性放荡”的女人。伯蒂迷上了她的戏剧世界，这一世界与管束甚严的王庭有着天壤之别。违反禁忌与她相处的兴奋感以及在俱乐部里作为王位继承人无人能比的威望所带来的乐趣让他陶醉其中。他饮酒、吸烟、将威士忌倒在马屁精的

头上，并且与女性谈情说爱。他说的笑话引起哄堂大笑，他的欲望被人纵容，以及——最令他满意的是——他的父母不在现场。他一边大口地抽他的黑色烟斗，一边在约会日记里用密码记下了与内莉的见面。

9.6 卡勒——N.C. 第1次

9.9 卡勒——N.C. 第2次

9.10 卡勒——N.C. 第3次[5]

作为虔诚而优秀的阿尔伯特的长子，伯蒂每天都要被人提醒，自己让父母失望，永远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阿尔伯特的条顿式纪律、军团式作息以及刻意的道德指导未能改变他的儿子。尽管是一个讨喜又善良的年轻人，但维多利亚口中这位“可怜的伯蒂”的故事却总是令人失望。他在学校遵循的严格的7天日程安排没能给他培养出对学习的热爱。他的父亲说，他缺少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他的大脑“的用处连一把塞在箱子底的手枪都不如”——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没用。[6]

即使是1861年夏天伯蒂在卡勒军营的风流韵事也是在失败的阴霾下进行的。阿尔伯特命令伯蒂“接受为期10周的步兵训练，并且需要遵守都柏林附近的卡勒军营能够设计出的最严格的纪律”，好让他形成纪律意识以及坚定品格。[7]伯蒂的表现很糟糕，他的上级军官对他父母说，在训练结束时，他连指挥一个营的能力都无法具备。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视察了这座爱尔兰军营，并且观看他参与演习、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表现毫无亮点（不过维多利亚觉得他穿上制服看起来很帅）。在那次视察期间，阿尔伯特产生了一个令人心情沉重的感觉：他的儿子真的会有擅长的东西吗？他会成为怎样的国王？这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讽刺：伯蒂将拥有阿尔伯特始终渴望的那个头衔，却配不上它。他更像母亲而不是父亲，这让他的父母都感到很遗憾。女王叹着气说，伯蒂就是个“袖珍版”、男儿身的维多利亚，而且能力差得多。[8]维多利亚儿时对书籍和学习的兴趣或许要胜于伯蒂，但她和儿子之间的共性是性格活泼、脾

气暴躁并且喜爱玩乐。

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未能意识到的是，他们的儿子虽然无法通过智慧来代表王室，却可以通过他振奋人心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伯蒂在1860年对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是英国王室继承人进行的首次类似访问，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加拿大时，18岁的他为多座桥梁剪彩、精力旺盛地跳舞，甚至曾同意用手推车推着一名法国杂技演员横穿尼亚加拉瀑布，不过被他的保镖拦了下来。他在美国极受欢迎，经常在活动间隙乔装出行。在纽约时，他受到了起立鼓掌欢迎的礼遇，前来目睹他风采的民众数量之多甚至压塌了一间宴会厅的地板。美国的报纸还报道说，他喜欢与女士们露骨地调情，“窃窃私语地说一些甜言蜜语”[9]。女王曾短暂地赞同这种行为，并且认为伯蒂在回国时变得十分健谈。她将他在美国受到的热情接待归因于“主要是他们对鄙人的喜爱”[10]。英格兰的下一任国王注定要叛逆几十年。

阿尔伯特最初是从当时身处德国的斯托克马男爵那里听说儿子与内莉·克利夫登的风流韵事的，而斯托克马是碰巧在欧洲的报纸上读到这件事的。此时流言蜚语已经在伦敦的俱乐部里流传了好几周。阿尔伯特一直担心自己儿子暗地里拥有的汉诺威式性格特点如今已经进入了公众视野；维多利亚的叔伯们给君主制度带来的难堪似乎有可能会延续下去。阿尔伯特感觉浑身不舒服，内脏疼痛不已。性放纵是阿尔伯特在心理上的阿喀琉斯之踵：他自己的家庭就是被不忠所摧毁的，而他唯一的兄长也感染了梅毒。阿尔伯特没法把约会看作一件随性、必然或者毫无意义的事；对他来说，约会所包含的只有毁灭的种子。在19世纪，这种艳情不仅意味着丑闻，还有疾病、怀孕、诉讼以及经济损失。

11月16日，也就是他从斯托克马那里听说这些流言蜚语的4天后，阿尔伯特坐在桌前给儿子写了封信。那是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件，尤其要考虑到，当时贵族男性在婚前玩弄女性的现象并不罕见。信里这样

说：“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给你写信，探讨一个给我带来这一生最大痛苦的话题”，那就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作为一名王子已经“陷入了邪淫与堕落之中”[11]。他写道，伯蒂总是显得有些无知与懦弱，但“堕落”却是新的下限。他的父亲提醒他可能出现的噩梦：这位“娼妇”有可能会生下一个孩子——如果他拒绝相认的话，她有可能会将他告上法庭。她会提供“你不检点行为的令人作呕的细节”，而伯蒂自己也会遭到质询、围攻和羞辱。倍感羞愧和内疚的伯蒂恳求得到他的原谅。阿尔伯特对他说，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回归无辜。维多利亚也与丈夫一样感到厌恶至极：“噢！那个孩子——虽然我很可怜他，但我再也无法没有一丝颤抖地看待他了。”

决定已经做出：伯蒂必须成婚。薇姬已经在适龄的欧洲公主中物色了好几个月，试图为弟弟找到一个合适的新娘。她将目光锁定在了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身上，这位在1861年12月刚满17岁的公主兼具美貌、高贵而真挚的举止以及善良的性格。他们被安排在1861年德意志的一座大教堂内观光时偶遇。薇姬自己都已经有些爱上了亚历山德拉——她的昵称为阿利克斯——并且认为如果伯蒂没有迷上这名女子的话，那他也不会迷上任何人了。伯蒂很喜欢她，但他并不着急结婚。沮丧的维多利亚甚至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产生热情”[12]。唯一严重的挫折来自亚历克斯的祖国。19世纪60年代的一个重大政治纠纷发生在德意志——或者说普鲁士——与丹麦之间，双方围绕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尔施泰因（Holstein）两个公国产生了纠纷。德意志人希望获得这两个主要是丹麦人的公国的控制权，以便能够获得北海的入海口；荷尔施泰因是德意志的一部分，石勒苏益格的人口主要是丹麦人，却与荷尔施泰因结盟。因此，作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伯蒂很难与普鲁士的对手结盟；然而，阿尔伯特亲王却宣布说，伯蒂将会迎娶的是这位公主——而不是丹麦这个国家。他们的结合将不是“丹麦的胜利”[13]。时间紧迫，因为美丽的亚历山德拉还有其他追求者。

阿尔伯特身体不好、难以入睡，经常因担心儿子可能会有着放荡不羁的未来而烦恼。他决定在那年11月前往剑桥访问正在那里学习的伯蒂，并且与他在雨中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散步。伯蒂的忏悔是真诚的，最终，衣服浸透雨水的阿尔伯特原谅了他在内莉·克利夫登危机中的过失。维多利亚则在森林里散步时祈祷她身体疲惫的丈夫能够在那晚睡个好觉。

将阿尔伯特的失眠归咎于伯蒂其实不太公平。这位王夫此时42岁，但身体差得却像个老人。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而随着他日益深入地参与无休止的工作——各种委员会、约见以及国家大事等——他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对维多利亚发脾气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她曾对薇姬抱怨说，他“经常表现得非常令人厌烦——尤其是他急躁的性格和对工作的过分热爱”[14]。一如既往的是，她的工作令他振奋精神。维多利亚总是要比阿尔伯特快乐得多，但她也开始变得对他越来越失望。她无法穿透他身边的阴云。

最重要的是，王夫非常孤独。他感到自己在王庭里是孤家寡人，没有一个可以讲真心话的密友。他已经失去了安森和罗伯特·皮尔，而老年的斯托克马也已经搬去了德意志。在听说自己的表亲、年轻的葡萄牙国王佩德罗（King Pedro of Portugal）[15]在仅仅24岁的年纪就因伤寒症去世后，他感到极为悲痛。他把勤奋、优秀的佩德罗视作自己的儿子一般——也就是他曾希望伯蒂成为的那个样子。他在婚姻中也倍感孤独。正如他对斯托克马所说，他与维多利亚的关系 “遭遇了许多暴风骤雨”[16]。尽管曾努力尝试，但她却无法在消耗他最多精力的问题上与他具体深入地交谈。从精神上说，他们十分相配；但在智慧上，却并非如此。维多利亚深知这一点，后来她曾写道，她经常祈祷自己能“在社交中更配得上他”。斯托克马是他唯一能够与之毫无保留地交谈的人。[17]

阿尔伯特的身体一直很虚弱。据他过去的家庭教师弗洛舒茨

（Florschütz）说，在少年时代，他的身体就“从来都不是特别好”[18]。他的兄长埃内斯特曾说，他的“身体发育无法跟上智力的快速发育；他需要保护”。[19]他始终未能如人们希望的那样长成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的胃部也始终出现疼痛。他们所居住的宫殿也不太舒服。他经常会瑟瑟发抖，部分原因是维多利亚坚持要求保持一个凉爽的环境；她认为温暖的空气会导致感冒，并且破坏一个人的肤色。他们二人都相信，盆浴和冷水淋浴对免疫系统有好处。（阿尔伯特曾与薇姬开玩笑说，她母亲如果醒来时发现他在早上属于自己的时间里点燃炉火一边工作、写作，并一边取暖的话，一定会生气的。[20]）

不久后，阿尔伯特的抑郁就演变成了迟钝，并最终变成了一种宿命论。他开始出现死亡的闪念。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在1861年底时对维多利亚说，如果死亡来临的话，他不会进行反抗。如果罹患重大疾病，他会向疾病屈服：“我并不留恋生命。你也许有所留恋；但我却丝毫也不重视它。如果我知道自己所爱之人能够得到妥善照顾的话，即使是明天死我也已经准备就绪。”[21]

当他从剑桥返回温莎城堡时，阿尔伯特已经病了，背部和腿部出现了神经痛。维多利亚责怪了伯蒂一番，并且对薇姬暗示了“她巨大的悲痛和担心”，“我们两个都很心烦——他尤其如此——他简直被击垮了”。她从未见过他“情绪如此低落”[22]。阿尔伯特也向薇姬吐露说，他的心情“跌入低谷”。阿尔伯特在一个温暖的日子里前往伊顿公学观看那里的志愿兵进行演习，但他却在一件毛皮衬里的大衣内瑟瑟发抖；他感觉就好像被人沿着脊梁骨浇了一身冷水似的。[23]

1861年11月30日的那个周末，阿尔伯特起草了他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宣誓就任总统后不久，美国就爆发了南北战争。1861年4月19日，北方联邦开始实施海上封锁，以防止任何商品或者物资——尤其是武器——进出南方邦联。5月

13日，维多利亚女王发表中立宣言，禁止英国公民加入任何一方。随后，在11月8日那天——也就是阿尔伯特在桑德赫斯特准备冒雨外出之时——一艘名叫“特伦特”号（Trent）的英国邮轮在古巴附近的巴哈马海峡遭到美国海军“圣哈辛托”号（San Jacinto）军舰的拦截。船上的两名男子被逮捕并且从“特伦特”号上被带走，他们都是搭船前往欧洲的南方邦联外交官。

北方人对于英国船只“特伦特”号竟然搭载南方邦联成员感到愤怒至极，不过林肯不想因为这一事件而冒与英国开战的危险。英国公众也很愤怒，他们将这一事件视作对其中立立场和行动自由的羞辱。人们高呼“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挑衅行为一定要以战争作为回应。维多利亚草草地给薇姬写信说：“今天最大、最吸引人注意的事情是美国人的暴行！他们都是群恶棍！”[24]内阁决定，这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外交大臣起草了一份发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备忘录，里面包含了一系列措辞强硬的要求。该备忘录在11月29日被送到了温莎城堡。

11月30日清晨7点，身体虚弱的阿尔伯特在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后起床了，开始起草一份回应。他担心外交大臣的回应太过草率，有可能会激怒北方联邦，并使英国被迫与美国开战。维多利亚对此表示认同。[25]头上戴了一顶假发取暖并在身上裹了一件天鹅绒睡衣的阿尔伯特缓和了英方提出的要求，使用了更具外交艺术的语言，并且给了林肯政府一个台阶下，表示英方认为“圣哈辛托”号采取的行动一定没有得到北方邦联的知晓或者批准：

> 美国政府一定充分认识到英国政府不会允许它的旗帜遭到侮辱，也不会允许其通信安全遭到威胁，女王陛下的政府也不愿相信美国政府会故意对本国施加羞辱，或者强迫我们卷入一起纠纷并加剧他们业已十分令人烦恼的复杂局面，因此，我们愿意相信，在充分考虑当前形势后，并且有鉴于国际法遭到违反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他们会主动提出能够让本国感到满意的补偿，即送还那几位不幸的乘客并进行恰当的道歉。[26]

阿尔伯特疲倦地将它拿给维多利亚，并且说：“我几乎拿不住笔了。”这是他所写的最后一份备忘录。

在进行一些修改后，维多利亚将它交给了她的大臣们。这些改动得到一致认可，最终的版本十分接近阿尔伯特的建议。（巴麦尊勋爵此前已经在温莎城堡的走廊里徘徊了好几天，一边拄着拐杖一边强调阿尔伯特应该接受更好的治疗，而此时的他对这份回复感到尤为满意。）北方邦联也如释重负。尽管没有进行正式道歉，但林肯政府最终还是谴责了“圣哈辛托”号的行为。与美国的战争得以避免。

到12月2日星期一时，只有鸦片制剂能够给了无生气的阿尔伯特带来一丝安慰。维多利亚从未见他病得如此严重过，感到“极为紧张和难过”[27]。到12月4日，就在阿尔伯特在卧室与起居室之间来回散步寻求休息之时，公众第一次注意到了他的病情，他被描述为患上了“感冒发烧”。如果阿尔伯特能睡着一小时，便会让女王激动不已。有些人猜测，为王室考虑，詹姆斯·克拉克医生决定向他们隐瞒情况的严重性，不过他的能力也明显不足。他没能要求进行进一步医疗救助，而且他还有一种毫无助益的倾向，那就是经常声称阿尔伯特马上就能康复，但他的病情却出现了严重恶化。克拉伦登勋爵后来表示，这几个皇家医生“连病猫都治不好”[28]。

12月6日那天，维多利亚在凌晨3点醒来察看阿尔伯特一番，尽管在她靠近时，他既没有向她微笑也没有点头致意。后来，当她看着他饮茶并吃下两块脆饼干时，她产生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感觉，那就是他已经神游别处了：“有些时候，他的脸上会显露出十分陌生冷漠的表情。”[29]后来，他似乎有所恢复，能够坐起并且走路，虽然仍然虚弱，但脉搏已经强了一些。他甚至曾要求察看爱丽丝将与未婚夫一同居住的别墅的建筑规划，她的未婚夫就是未来的黑森大公（Grand Duke of Hesse）路易斯（Louis）。维多利亚变得如此焦虑，以至于她经常要求詹纳医生在检

查完阿尔伯特的身体后向她报告一声。18岁的爱丽丝会坐在父亲身边，连续好几个小时读书给他听，此时的她已经展现出了耐心和成熟的品质。

到12月7日，阿尔伯特变得经常语无伦次，总是重复类似“我好傻”这样的短语。[30]维多利亚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感觉就好像“我的心碎了一样”。她一直处在“焦虑不定的痛苦”中，一直到医生前来向她报告说，他们终于诊断出了病因：胃肠热病，这种疾病通常需要花上1个月的时间才能治愈。维多利亚一直关注的是自己的需求，总是在想如果丈夫被从自己身边夺走的话会是多么可怕。[31]爱丽丝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带她驾车外出。她提醒说，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月了。维多利亚坐在一言不发的阿尔伯特身边，眼泪簌簌地落在床单上。她感觉就好像“活在一场噩梦里”。她想，他必须停止那么辛苦地工作了。她甚至无法想象如何再过两周没有他的日子。

第二天，阿尔伯特要求将自己送到国王房间里——如今被称作蓝色房间——那里光线充足，令人心情愉悦。一架钢琴被推到隔壁的房间里，好让他聆听赞美诗。他静静地听着爱丽丝为他演奏，眼中噙满了泪水。[32]他每隔三小时喝一次茶，然后喝一小杯酒。维多利亚心情沮丧地来到教堂，却听不进一句布道。当她回到阿尔伯特身边，试图向医生解释些什么时，阿尔伯特拍了拍她的手。但他后来又笑了笑，轻抚她的脸庞——“亲爱的姑娘”（*liebes Frauchen*）——随后在她给他读书时睡了过去。医生们说，他们对他身体的恢复进展感到很满意，这是一种拍马屁式的胡说八道。王室里的人已经习惯于在情绪多变、敏感易怒的女王身边谨言慎行，但他们这种行为只会让她在面对最终的伤痛和打击时更加痛苦。

随着身体越来越虚弱，阿尔伯特的神志从清醒变得模糊，性情从暴躁变得温柔。12月11日那天，他靠在维多利亚的肩膀上吃了早餐。他和

蔼地说：“这样子很舒服，亲爱的孩子。”她却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好似被吓了一跳，说道：“让我们向全能的主祈祷吧！”维多利亚看着他微微泛红的面庞，安慰他说，他一直在祈祷，已经够多了。阿尔伯特回答说：“但是我们没有在一起祈祷。”随后他握起她的手，低下头开始祈祷。[33]阿尔伯特回到温莎城堡前在巴尔莫勒尔听的最后一次布道的内容是《阿摩司书》4：12：“以色列阿，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34]维多利亚刚一离开房间，他就对女儿爱丽丝说，自己快不行了。[35]

与此同时，医生们却对维多利亚说，她绝对没有理由担心，他们预计阿尔伯特一周内就会有所好转。但他短促而困难的呼吸却让她备受煎熬。她在12月13日凌晨4点醒来，要求得到情况汇报，却被告知阿尔伯特正在睡觉。他在那天早上8点维多利亚前去看望他时仍然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在他被人推着来到隔壁房间的过程中，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据他说一直在帮助他维持生命的庄严的拉斐尔圣母像（Raphael Madonna）。他躺在床上喘着气，眼睛盯着窗外的云彩，仔细聆听夜莺的叫声，那种声音让他回忆起罗泽瑙宫[36]。维多利亚始终待在他身边，只有外出散步或者驾车的时候才会短暂离开。在与阿尔伯特共处一室时，她竭力保持冷静，但一走到外面，就会失去控制，一边哭泣一边祈祷，“就像要疯了一样”！[37]

医生每隔半小时都要向阿尔伯特的嘴里喂一口白兰地，试图强化他的脉搏，但无济于事。他们仍然对女王说，他们此前看到过病情更加严重的病人康复的例子。维多利亚写道，那是“一段充满可怕焦虑的时间，但仍然充满了希望。那是一场危机，一场力量的对决”。她的最后一句话——同时也是她那段时间写的最后一篇日记——记下了医生的话，即“没有理由认为会有更糟糕的情况发生”。[38]她心情糟糕地在12月13日晚上床休息，并且要求每小时都被唤醒以听取情况汇报。她紧紧蜷缩着身子，娇小的身躯孤零零地躺在通常是她和阿尔伯特共享的大床上，心里想着就在不久前，阿尔伯特还在巴尔莫勒尔猎鹿的情景。她希

望他们仍然还在那里，而不是高大空旷的温莎城堡。一直到不久前，公众还可以在城堡外的公园里徜徉，而伊顿公学的男孩们也经常在草坪上东跑西窜或者在公园里狩猎。维多利亚从来都不喜欢庞大的温莎城堡，不久后，她会对它产生憎恨。

12月14日清晨6点传来了好消息。从维多利亚加冕时起就担任皇家医生的布朗先生前来对她说，“有理由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她能够听到外面狗舍里传来的微弱的狗叫声以及鸟舍里的鸟叫声。太阳正渐渐爬上蔚蓝的天空。她在一小时后前去探望阿尔伯特，穿着拖鞋轻轻走过走廊，长发披肩。然而，当她来到阿尔伯特的房间时，却大吃了一惊：“整个房间带有守夜人的悲惨气息，蜡烛在烛台里燃尽，医生也看起来焦虑万分。我走了进去，永远也无法忘记我英俊的爱人当时的样子，他躺在那里，初升的阳光照亮了他的脸庞，他的眼眸格外明亮而有神，就好像在凝视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完全没有注意到我。”[39]他看起来就像是圣人一般。

直到这时，伯蒂还不知道父亲的病情。维多利亚还生着他的气，不想让他回家，担心他可能会惹阿尔伯特生气。在过去几天阿尔伯特含糊不清的话中，有一个单词能够听得出来：“伯蒂”。一直很喜欢伯蒂，并且曾经是他叛逆活动的同伙的爱丽丝最终决定，她必须告诉他，爸爸“情况不好”，必须立刻前来。伯蒂收到电报是在12月13日夜里，当时他正在剑桥举行一场晚宴；两个小时后，他就搭上了一趟前往温莎的火车。他在凌晨3点抵达温莎，并且对父亲的糟糕状况感到震惊。阿尔伯特再也没有认出床边儿子的面庞。[40]

上午10点，医生们对维多利亚说，他们仍然“非常担心”，但阿尔伯特已经有所好转了。当她问到自己能否出去喘口气时，他们对她说要在15分钟内回来。她与爱丽丝一起在草坪上徘徊、发呆，并开始止不住地哭泣。爱丽丝抱住她，无声地凝视着远方，那里有一支军乐团正在演

奏。

维多利亚爆发了巨大的悲痛之情。那个20多年前为了她背井离乡的男人如今正面色苍白、浑身是汗地躺在床上，谁也无法引起他的注意。他的双手和脸上有一种“黯淡的色彩”。他双臂交叉于胸前，抬起手理了理头发：“好奇怪！感觉就好像他在准备又一场更伟大的旅程。”那天下午，阿尔伯特有两次称维多利亚为“姑娘”（Frauchen），并温柔地吻了她。最终，在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她走到前厅，倒在地上啜泣起来。当她的精神导师、温莎城堡教长对她说要坚强起来迎接一场伟大的考验时，她哭得更凶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一切？我的母亲？那又是什么？我以为那已经很让人悲痛了。但跟这次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41]

过了几分钟，克拉克医生叫爱丽丝去呼唤母亲前来。维多利亚擦了擦眼泪，很快就来到了蓝色房间。爱丽丝对她说，已经没有希望了，她“开始变得像一头被所有人追赶的母狮子，一下子跳到床边，恳求他说句话，并且再给她一个吻”。[42]阿尔伯特睁开了眼睛，但没有动弹；她把身子靠过来，亲吻了他一遍又一遍。随后，她跪在丈夫身边，握紧他的手。他的手已经冰凉，呼吸也很微弱。“噢，不，”维多利亚喃喃地说着，凝视着他的脸庞，“我见过这种场面。这就是死亡。”

爱丽丝双手紧握着站在床的另一侧，伯蒂与海伦娜站在床脚。[43]他们背后站着维多利亚的侄子埃内斯特·莱宁根亲王及其妻子玛丽（Marie）、四名皇家医生，以及阿尔伯特的贴身男仆和主要侍从。还有一群表情肃穆的王室成员挤在屋外的红毯走廊上。

阿尔伯特轻轻地深呼吸了三口气，然后一切就结束了。维多利亚站在床边亲吻了他的额头，将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她痛苦的哀号声让孩子们的心里也充满了寒意，并且回荡在城堡里的石质走廊间：“噢！我亲爱的爱人！”她跪在地上，麻木又悲痛欲绝，此时时钟敲响，时间定

格在晚10点45分；城堡已经被黑夜所包围。她的家人心情悲痛地站着，看着这个统治着数百万人民却失去了唯一所爱的女人。她的未来将会变成什么样？

在上床休息前，维多利亚去了一趟育婴室。她把身体温暖、睡意沉沉的比阿特丽斯从床上抱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在黑夜里轻轻地摇晃。她回到自己房间，将四岁大的比阿特丽斯放在她的床上，蜷着身子睡在自己身边。她已经从悲痛欲绝变得木然，在服下鸦片镇静剂后，她哭了一整夜。阿尔伯特的睡衣被放在她身边。爱丽丝躺在她床脚的一张小床上，此时也醒来与母亲一起哭泣。孩子们的温柔令人惊叹。小小的比阿特丽斯在醒后轻抚维多利亚的面庞，轻声说：“不要哭。爸爸去看外婆了。”[44]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们对于阿尔伯特亲王的死因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维多利亚不允许进行尸检。大部分人认为他是因为致命的伤寒症而死的，温莎城堡糟糕的排水系统很容易让他患上这种病，或者他也有可能死于肠穿孔。后来还有人猜测他死于肠癌、消化性溃疡或者胃泌素瘤。最近且最有说服力的理论由海伦·拉帕波特（Helen Rappaport）提出，她认为阿尔伯特死于克罗恩病，那是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会因为压力而病情恶化，其症状与阿尔伯特的症状相吻合。（这种疾病一直到1913年才得到医学界的认可。）拉帕波特强调，阿尔伯特的发烧症状有可能是慢性胃肠炎症恶化的结果，这也可以解释他的胃病和牙疼。[45]

第二天上午，英格兰各地敲响钟声。牧师们匆忙重写了有关死亡的布道词。在伦敦全城，人们的外套、长裙以及各式纹章、刀剑、皮带扣、扇子、旗帜以及房屋都被一层黑色所笼罩。自从近半世纪前的夏洛特公主去世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很久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过哀悼了。对这位外国亲王的怀疑烟消云散了，英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究竟失去了什

么。各家报纸开始赞颂这位德意志人的美德，阿尔伯特如今被称作“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男人”[46]。政客们对于他的死可能造成的影响紧张不已。长期以来一直赞赏阿尔伯特的“动力、睿智和老练”[47]的克拉伦登勋爵说，这是一场“国家灾难，比公众能够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48]。他和所有人一样也为维多利亚感到担心：

> 没有其他任何一名女性拥有同样的公共责任或者动机，需要受到她丈夫更卓越思想的绝对指导。这种习惯，或者说必要性，再加上她对他的深刻的爱，使她和他牢牢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失去他就像是与她自己的心脏和灵魂分离一样。[49]

的确如此。骄傲的女王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将永远受到失去挚爱亲人的影响。在她被抬出国王房间后，她静静地说道：“再也无人唤我维多利亚了。”她请求自己的家人不要离她而去。她知道臣民们对她十分同情，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有如雪片般飞来。她写道：“甚至连小村庄里不认识我的穷人也在为我而流泪，就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伤心事一样。”[50]她的臣民们为她感到心痛。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写道：“农民们在屋子里说的话就好像女王是他们中的一员似的。”[51]

孩子们对于失去父亲也感到心碎。怀孕并孤身一人身处欧洲的薇姬因为这种分离的痛苦而感到绝望。难过的伯蒂冲进维多利亚的怀抱，发誓要一辈子安抚她的心情。爱丽丝也备受打击，但仍然保持高度自制，她无私而温柔地关照自己的母亲，就像对待在弥留之际的父亲那样。阿尔弗雷德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仍然身处墨西哥附近的海上，一直到2月才回到家中。8岁的利奥波德王子身处遥远的法国，只能哭着说：“噢！我要妈妈！”[52]年幼的比阿特丽斯仍然在设法奇迹般地振奋母亲的情绪。这九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如今被王室中压抑沮丧的气氛所笼罩：身着黑色绉布，不允许大笑或者显露出任何对生活的热情。对自己都需要安慰的孩子们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维多利亚没有出席丈夫的葬礼。阿瑟与伯蒂小小的身材站在一众神情肃穆的老年人队列前方，表情悲伤的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啜泣。不过，维多利亚对葬礼仪式做出了一点改变。在阅读完葬礼宣言的草稿后——宣言中要求上帝“保佑并保护”女王的“长寿、健康、幸福”——她用黑笔将“幸福”一词给划掉了。她随后写上了“荣誉”一词以代替：如今，她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还会有幸福。[53]

1861年的圣诞节是一派严峻的景象。奥古斯塔·布鲁斯夫人[54]将其描述为一种极大的痛苦，就好像一片“无法穿透的阴云”笼罩在他们头上：“整个王宫似乎就像是庞贝一般。”[55]王室成员都收到了阿尔伯特的纪念品作为礼物。维多利亚静静地坐在她的会客室里，人们则在她周围轻声交谈。她会将手伸进口袋里，用手指摆弄阿尔伯特的红色手帕和金表，绝望地想到世事的不公，他的表仍然在走，但他已经不在了。她曾经为时光的匆匆流逝而哀叹；如今，每一个小时似乎就像是永远。她要求确保丈夫的钟表每天都要上发条，访客们也要继续在他的会客簿上签名，那本会客簿就放在她的会客簿旁边。人们必须理解：阿尔伯特或许已经死了，但他从未离开。

在安抚自身伤痛的同时，维多利亚开始讨厌受到公众的时刻关注：无论是剧院里偷偷窥探的望远镜，还是在人行道上或者挤在她马车旁伸着脖子看她的成排的政客或者平民。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眼睛在看着她。她再也无法忍受了。维多利亚渴望看到没有人的景色，渴望看到大海，渴望独处。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她自己的悲痛情绪：一种过分、放纵、吵闹、无所顾忌、要求苛刻且毫无羞耻的悲痛情绪。对一个既无法也不愿缝合她破碎、流血的心灵的女人来说，诗歌的慰藉暂时让政治黯然失色。在她哭喊失去丈夫就像是“从我的骨头上撕扯血肉”一样时，是否会有人理解她？她不再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女王，而是自称为“心碎的寡妇”。

[1] Strafford，*Diary of Henry Greville*，3：417.

[2] 对这个十年的精彩讨论，参见Mason，*The Making of Victorian Sexuality*，119-25。

[3] Grey，*Passages in the Life*，3：304.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8，1868.

[5] Ridley，*Bertie*，54.

[6] From King，*Twilight of Splendor*，135.

[7] Costello，*A Most Delightful Station*，98.

[8] Queen Victoria to Vicky，April 27，1859，Fulford，*Dearest Child*，187.

[9] *New York Herald*，September 19，1860；Charlot，*Victoria the Young Queen*，404.

[10] Queen Victoria to Vicky，Windsor Castle，November 10，1860，Fulford，*Dearest Child*，279.

[11] Woodham-Smith，*Queen Victoria*，416.

[1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October 1，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53.

[13]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215.

[14] Queen Victoria to Vicky，October 1，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54.

[15] 佩德罗国王是他们的远房侄子。——译者注

[16] 阿尔伯特在他们结婚21周年纪念日那天致信斯托克马男爵：“许多风暴肆虐而过，它却仍然翠绿如新、根系强健，感谢上帝，凭借这些，我可以确认，还将给世界带来很多好处。”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292.

[1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9，1863.

[1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9，1862.

[19] *Memoirs of Ernest* Ⅱ，18-19.

[20] Prince Albert to Vicky，September 1，1858，Martin，*The Prince Consort*，4：253. 需要提到的是：他对薇姬说，他在1860年12月突患的疾病是霍乱。维多利亚一如既往地没有获悉这一消息。

[21]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344. 他接着说：“我敢肯定，如果我病情严重的话，应该会立刻放弃，我不会为生命而斗争。我对生命没有执着。”

[2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November 27，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59-60.

[23]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353.（这是比维多利亚在日记里对那天的描述更加详细的版本。）

[24] Queen Victoria to Vicky，November 30，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70.

[25]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349.

[26] Queen Victoria to Earl Russell，December 1，1861，Benson and Esher，*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3：598.

[2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1861.

[28] Fulford，*The Prince Consort*，269.

[29]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356. “冷漠”一词被从维多利亚的日志中删除。

[30] 对阿尔伯特的死亡、葬礼和后来对他的哀悼活动的精彩描述，参见海伦·拉帕波特所著《无比迷恋》（*Magnificent Obsession*）。这段引语摘自第61页。

[3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7，1861.

[32] 比阿特丽斯从母亲的日志中删除了一些对阿尔伯特之死更为私密的描述。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西奥多·马丁（Theodore Martin）所著的官方版《王夫的一生》（*Life of the Prince Consort*）——这本书主要取材于维多利亚的原始日记——以及修改后的维多利亚日记来看到这一点。例如，比阿特丽斯删除了有关阿尔伯特的感觉，像是水从脖子上泼下来、他不断喘气、喝茶被呛、听到爱丽丝弹奏赞美诗时哭

出声的描述，以及有关他暴躁易怒，轻抚维多利亚脸庞，呼唤她亲爱的，维多利亚亲吻他的描述。她还删除了维多利亚对阿尔伯特说他是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病倒的话："你工作太累了，必须跟大臣们说说！"（维多利亚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出于自愿承担了许多项目，她说："不仅仅是这一件事；这是你自己在担心。" Longford，*Victoria R.I.*，296.）比阿特丽斯还删除了阿尔伯特对维多利亚说，当他躺在蓝色房间时，他听到了鸟叫声，回忆起了儿时在罗泽瑙的那些鸟叫声：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357.）例如，12月7日，维多利亚的原始日记是这样的："但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梦里。今天晚些时候，我的天使躺在床上，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眼泪簌簌地落下，我想起了我们即将面对的焦虑的日子，尽管不是令人惊慌的日子，还想起了我们计划的彻底失败。"比阿特丽斯将这些句子改成了："但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梦里。——阿尔伯特躺在卧室床上，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艰难地压制着泪水。"
维多利亚12月8日的日记是这样的："他看到我非常高兴——轻抚我的脸庞，面带微笑，称呼我为'亲爱的小妻子'（*liebe Frauchen*）……珍贵的爱人！他今晚的温柔——当他握住我的双手、轻抚我的脸庞、触摸我之时——让我如此感激。"（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359.）比阿特丽斯将它改成"前去看望亲爱的阿尔伯特，他看到我非常高兴，轻抚我的脸庞，面带微笑。"在12月9日的日记里，比阿特丽斯删除了"他如此和善，称呼我'善良的小妻子'，并且喜欢我握住他亲爱的手。"（Martin，*The Prince Consort*，359.）

[33] Longford，*Victoria R.I.*，298.

[34] Queen Victoria to Vicky，October 7，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56.

[35] 在阿尔伯特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死亡时，爱丽丝是他对之吐露实情的那个人，而不是维多利亚。当爱丽丝说，她告诉薇姬他"病得很重"时，他纠正她说："你应该告诉她我快死了，是的，我快不行了。"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esion*，69；Strafford，*Henry Greville*，3：420.

[36] 那是阿尔伯特出生的地方。——译者注

[37] Longford，*Victoria R.I.*，299.

[38] 维多利亚一直到1872年2月才振作起来记述了阿尔伯特的死，当时她根据此前留下的笔记撰写了一份记述。

[39]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5：363.

[40]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255. Sir G. C. Lewis to Lord Clarendon，December 19，1861：“格雷维尔告诉我，亲王没有认出威尔士亲王，所以他肯定是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度过最后一天的。”

[41]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81. 还可参见杰拉尔迪娜·萨默塞特夫人（Lady Geraldine Somerset）的记述，她的日记被保存在皇家档案馆中。

[42] 这个故事由温彻斯特夫人讲述，December 25，1861，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81。

[43] 11岁的阿瑟和15岁的露易丝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已经跟他道了别，并且被送去睡觉了。有四个孩子没有在场：薇姬怀着孕，留在柏林无法行动，阿菲正与海军一起身处墨西哥，而4岁的比阿特丽斯没有被允许进入这间病房。身体虚弱的利奥波德如今8岁，刚被确诊为血友病，此时正在法国南部接受治疗——在那之前，他刚刚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大出血。那天拥挤在房间里的还有罗伯特·布鲁斯将军（General Robert Bruce，伯蒂的家庭教师）；温莎教长杰拉德·韦尔斯利（Gerald Wellesley）；查尔斯·菲普斯爵士（Sir Charles Phipps，阿尔伯特的私人秘书）；以及查尔斯·格雷将军（General Charles Grey）。——作者注

[44]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83.

[45]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249-60. 与此前的许多人一样，拉帕波特指出，女王的产后忧郁症和对母亲的深切哀悼“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有其真实性；支持一个焦虑、忧郁和需要关怀的妻子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十分巨大。不过，有许多人都含蓄地，有时也直接地指责维多利亚与精神抑郁、母亲身份和悲伤情绪进行斗争的过程造成了丈夫的死，持这种观点的人数量如此之多，令人惊讶。

[46] *Daily Telegraph*，December 16，1861.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94.

[47]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250.

[48] Lord Clarendon to Sir George Lewis，December 14，1861，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51.

[49] Villiers，*A Vanished Victorian*，309.

[5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1，1862.

[51]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116，cites Wolffe，*Great Deaths*，195. 其他国家也源源不断地寄来信件，甚至连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也寄来了一封信，对她“真挚而强烈的丧亲之痛”表示同情，落款是“你的好朋友”。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135.

[52]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91.

[53] *The Times*，December 24，1861，6；Jerrold，*The Widowhood of Queen Victoria*，11.

[54] 奥古斯塔·布鲁斯夫人是伯蒂的家庭教师、尊敬的将军罗伯特·布鲁斯（General the Hon. Robert Bruce）的妹妹。奥古斯塔夫人后来嫁给了温彻斯特教长阿瑟·斯坦利牧师。

[55] Baillie and Bolitho，*Letters of Lady Augusta Stanley*，251.

21 “王宫有如庞贝一般”

自从他离开我之后，我就拥有了母狮一般的勇气。[1]

——维多利亚女王

当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听说英格兰女王想要私下接见他时，他有些闷闷不乐。他对好友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抱怨说：“我是一头害羞的野兽，喜欢待在巢穴里。”这位诗人问了两个问题：进屋时该如何与女王打招呼，以及他是否需要倒退走出房间。阿盖尔公爵是一名爱尔兰贵族，他的儿子将在未来迎娶露易丝公主，他建议丁尼生该如何表现：满怀敬意地鞠躬或者跪下，并且在感觉合适时向她伸出手，女王会在结束后走出房间。那是1862年，阿尔伯特刚刚去世4个月。公爵对丁尼生说：“与她谈话就像是对一名深受苦难的可怜女性交谈一样——这是她最喜欢的方式。”丁尼生被警告不要称王夫为“已故的”，而要记住一个“强有力的事实”，那就是女王“相信‘死者虽已逝，灵魂永不灭’”[2]。

这位时年53岁的诗人身着西服与黑色长筒袜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来到了奥斯本宫。他就住在附近，距离女王在怀特岛上的这座宅邸仅有几英里远。他被带进女王的会客厅，并且背对壁炉站着，等待女王的到来。当维多利亚进入房间时，她显得面色苍白，但泰然自若。她的眼神平静地聚焦在他身上：这个完美地捕捉到她的悲伤的诗人。丁尼生在一个亲密的男性好友去世后写下了《悼念集》（*In Memoriam*）一书，而维多利亚反复读了成百上千遍，时而写下她自己的笔记，并且用黑色墨水划出难忘的词句：

但我仍在，希望渺茫，

生命与梦想一文不名，

我徘徊于漆黑的土地，

周遭弥漫着他的气息。[3]

维多利亚觉得，看起来有些古怪，但她也觉得“他身上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之处”。丁尼生单膝跪地亲吻她的手。维多利亚坐了下来，告诉他说，他的诗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安慰，而他最近将《国王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献给阿尔伯特的举动也让她十分欣慰。丁尼生眼含热泪地对她说，阿尔伯特的死对国家而言是重大损失。[4]他认为维多利亚很漂亮，就像是一座亲切又悲伤的雕像。当维多利亚问及，他是否希望她为他做任何事时，他仅仅回答说，不知她是否能与他的两个儿子握个手。她在第二年的5月邀请他的两个儿子哈勒姆（Hallam）与莱昂内尔·丁尼生（Lionel Tennyson）同父母一起访问了奥斯本宫。

丁尼生一家——阿尔弗雷德及其妻子和孩子——都被女王迷住了，他们都觉得她“很美丽，与她的肖像画一点也不像”，而且毫不虚伪。甚至连10岁的哈勒姆都写道：“女王并不矮胖。陛下拥有宏大的思维和娇小的身躯。”[5]丁尼生的妻子埃米莉曾谈及女王的平易近人以及她们之间的亲近。埃米莉写道：“我感觉，女王是一个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女人。”[6]

丁尼生对不死灵魂的坚定信仰以及让她感觉自己得到理解的能力给女王带来了巨大安慰。女王在日记中写道：

> 与［丁尼生］进行了一些有趣的交谈，对他思想的伟大和宏大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外表看起来有些粗俗。在谈到灵魂的不朽以及所有科学发现都无法对此产生影响时，他说道，“如果不存在灵魂不朽的话，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存在上帝”，以及“你不可能去爱一个将你掐死的父亲”，等等。[7]

12年前的1850年，阿尔伯特曾坚持要求将丁尼生任命为“桂冠诗人”[8]。而在1862年，爱丽丝给这位诗人写了一封信，询问他是否能写

些什么来纪念她父亲的死。丁尼生为《国王叙事诗》写了一段赠言，并在其中称他为“善良的阿尔伯特”。他在赠言中鼓励维多利亚要忍耐，而她则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经常背诵这些诗句：

> 不要破碎，啊女人的心，而要忍受下去；
>
> 不要破碎，因汝乃王室，要继续忍受；
>
> 记住那颗星所有的美
>
> 它紧挨在你身旁闪耀
>
> 你们曾共同发出一束亮光，
>
> 但它已经落下，
>
> 仅留下王座孤独的光辉。

阿尔伯特离开后的最初几个月十分难熬。维多利亚很难睡得着，经常难过地醒来，脸上经常感到剧烈疼痛，并伴有经常性头疼。一切都感觉像是一场“噩梦”[9]。她总是十分怀念阿尔伯特给她的帮助：无论是整理文件、挑选艺术品、在墙上放置绘画、讨论政治或军队、与人会晤、在旅行相册里放置草图、监督灌木的修剪、咨询孩子的医生、安排访客的房间，还是藏复活节彩蛋，她以前都没有做过。

每一样东西都会引发对阿尔伯特的回忆。看到树木与植物会让她难过，因为他知道所有植物的名字。[10]鸟儿的歌唱也让她难过，尤其是夜莺的歌声。她找出他的物品，并浏览了一遍他的文件、他最喜欢的艺术品——尤其是拉斐尔的画作——以及他的手枪和步枪。最让她感到难过的是日历上对他缺席的日子的提醒：圣诞节、复活节、周年纪念以及生日等。在1863年她44岁生日的前一天，维多利亚躺在沙发上，因头疼而无法起身。第二天，即使是孩子们送给她的漂亮礼物也没让她高兴起来：“让我感到最难受的是，没有来自我的爱人的礼物。”[11]第二年时，

她的生日十分“空虚”，她感觉身体不舒服。她最终在房间里独自一人进餐。

有些人开始仔细观察维多利亚，寻找精神异常的迹象。王室里的人都知道维多利亚十分敏感，容易陷入抑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还普遍认为，女性缺少韧性，经常会陷入狂躁或歇斯底里，而且无法应付生活中的磨难。克拉伦登勋爵说，他们都觉得维多利亚在失去母亲时精神就“处在危急关头”。随着阿尔伯特去世，危险似乎显得更大了。他说，她如若“丧失理智”，会造成一场“国家灾难”[12]。

其他人则指出，维多利亚在悲痛的初期展示出了冷静与自持的品质。[13]在阿尔伯特去世四天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表示，她很惊讶地看到“这个紧张、焦虑、不安的女人表现得十分坚定，带有英雄的威严”[14]。克拉伦登勋爵认为她只是在顺从地遵守阿尔伯特的指示，不要被她的悲痛所击垮。[15]事实上，她当时正处在震惊的状态，这种状态后来才演变成悲痛。当她真正开始公开悼念时，她又受到了既仓促又不公正的评价。当她对普鲁士奥古斯塔王后说“渴望与憧憬会把我逼疯”[16]时，人们不禁皱起了眉头。而当克拉伦登在阿尔伯特去世几周后应召前往奥斯本宫时，他抱怨说：“女王流露出了令人尴尬的情感。”[17]

维多利亚下令整个王庭都要经历前所未有的长达两年的官方哀悼期。（在哀悼期结束后，她的侍女以及女儿可以脱下黑色，穿上半丧服，即灰色、白色或者浅紫色的服装。）她的许多臣民也决定与他们一起进行哀悼。她的侍女们佩戴的是黑色珠宝和绉纱，绉纱是一种用丝绸制成的黑色厚布料，会发出沙沙声，布料上的皱褶让它看起来非常单调。维多利亚在她的“天使”去世之前的那个十年里大部分时间都穿着黑色，为的是尊重先后去世的多位亲属与显贵。[18]严肃又严格的哀悼仪式一直很吸引她。[19]如今，维多利亚将在余生中一直穿着黑色长裙（或者说“寡妇丧服”）。谁会在乎她看起来美不美呢？她放弃了紧身胸

衣，穿上装点着黑色丝带的白色内衣，适应了心安理得的不惑之年。天堂中无需胸衣。

阿尔伯特的家什与房间被严格按照他在世时的样子保存下来。维多利亚将他的照片挂在他那一侧床榻的上方。每天，仆人们都会小心谨慎地将他的衬衫和长裤熨好放在蓝色房间里，并且放好用来刮胡子的干净毛巾和热水，随着他的钟表滴答作响，热水会渐渐变冷，而吸墨纸上不会有任何痕迹。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温莎城堡庭院里的一块墓地中，维多利亚委托雕刻家卡洛·马洛切蒂男爵（Baron Carlo Marochetti）制作了阿尔伯特和她自己的雕像，以放在他们的墓穴上，雕像上的他们处在同样的年纪。看起来就好像她也在42岁的年纪死去了似的。她每天都要去温莎城堡的墓园祈祷并凝视他的雕像，每天晚上都要来到蓝色房间待一会儿。

仆人们渐渐习惯了在女王身边蹑手蹑脚地走路并且在走廊里轻声交谈。尽管维多利亚可能显得很阴郁，但她仍然坚持要求让孩子们聚集在她身边，不要离开她。她想要以某种方式对他们失去父亲进行补偿，因而对阿瑟与利奥波德的家庭教师霍华德·埃尔芬斯通（Howard Elphinstone）说，“她很焦虑不想再在除非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与他们分别，因为如今上帝已经带走了他们备受尊敬的父亲，而他们的父亲身上拥有一切让他们恋家的因素……女王希望她的儿子们，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几个儿子们能够变得跟她亲近起来，并接受我们两个都欣赏的观点与习惯。”[20]她想让他们呼吸阿尔伯特喜欢呼吸的空气，尽管家中的气氛变得令人窒息。

整个王室都在以维多利亚敏感的精神状态为中心。那些短暂离开后又返回王宫的人，例如18岁的利奥波德，都接到警告说她无法忍受“噪音和兴奋等等”[21]。伯蒂被警告说不要过于轻佻、八卦和浅薄。[22]维多利亚拒绝让她的孩子们在悲伤之余有任何选择或者休息。她非但没有保

护他们免受痛苦，反而坚持要求他们在痛苦中挣扎。当孩子大笑或者高声说话时，她会对他们发火，认为这是他们对父亲的死无动于衷的表现。她会安排孩子三五成群穿上素衣，摆成向上凝望阿尔伯特白色半身像的姿势拍摄单调阴冷的照片，并且将这些照片分发给公众。她在其中一张照片的底部写道：“白昼变成黑夜。”[23]

女王希望公众看到阿尔伯特有多么卓越。她对他的赞颂超出了任何教宗对圣人的赞颂，她委托人将他的讲话编辑成书，为他撰写了一部传记，绘制了大量肖像画，并建造了许多公共纪念碑。照片里的他身穿金色盔甲，站在云端。善良的、英俊的、骑士般的以及神灵般的阿尔伯特头戴一顶“正义之冠”[24]。维多利亚想要巩固他的声誉，将他刻画成一个激发了人民心中善良的男人，一个让路易—拿破仑在与他分别时都感到“更有善心”的男人[25]。

维多利亚还苦苦思念丈夫的身体。她挑选了一张自己24岁时的迷人肖像放在灵柩里丈夫的手中。在肖像中，她的头靠在一张红色沙发上，蓝色的大眼睛向左肩望去。她身着袒胸衣装，露出洁白的皮肤，长发搭在脖子一侧。这是一个只有一个男人熟识的女人。即使在死后，他依然是维多利亚渴望的对象。她拥有他脸部和双手的大理石模型，而且喜欢把双手藏在床边。有时，她会把它们拽到身边来，假装冷冰冰的石头实际上是温暖的皮肤。她说，独自一人上床睡觉非常难熬：“与温柔爱人的爱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孤身一人！”[26]她闭上眼睛，不知不觉地陷进床单里，一只手抱着他的睡衣，并将他的大衣盖在自己身上。

女王曾公开表示希望悲伤能够终结自己的生命。她在写给阿尔伯特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师弗洛舒茨先生的信中说：“我唯一的愿望是尽快随他而去！没有他的生活真的算不上生活。”能够让她感到安慰的想法是他就在她身边，她会在他们“永恒、真正的家里”与他见面。她说，如果没有这一念想的话，她会“垮掉”[27]。她修改了自己的遗嘱，为下一代任

命了监护人，并且祈祷早日死去。

维多利亚设法在阿尔伯特去世几天后的1月6日举行了一场枢密院会议。她要求内阁成员在安排他们的事务时考虑到她的悲痛心情，并且表示她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勇气在这段混乱时期监督他们。她可怜兮兮地对克拉伦登勋爵说，“她的精神已经紧绷到了极限——她以前从来都不必思考，因为亲王曾经负责为她阅读并安排一切，省去了她的所有麻烦，并且为她解释那些她必须签署的文件，等等。”[28]她声称，政府更迭太过疯狂，会要了她的命——“当然她会十分感激这一结果”[29]。有一次，她曾激烈地敲打自己的额头，哭喊道：“我的理性呢，我的理性呢！”尽管她很清楚这种做法可能产生什么影响。[30]

她还请求反对党领袖德比勋爵保持冷静。在阿尔伯特去世半年后的1862年6月16日，女王要求克拉伦登勋爵对德比勋爵说，“如果反对党成功推翻现有内阁的话，就要冒着有损女王生命或者理智的风险”。她说，这只适用于将于8月任满到期的现任内阁。[31]有些人将这种表态解读为对现任首相、她的宿敌巴麦尊勋爵的支持，但实际上，她仅仅是渴望平静与稳定。在她的信息被传达给德比勋爵后，那届政府任期内反对党再也没有对政府发起过攻击，让维多利亚幸免于可能十分巨大的工作负担。

维多利亚身边的人都和阿尔伯特一样相信她无法独自统治国家。上了年纪的巴麦尊在听说阿尔伯特去世时曾晕倒好几次，他说：“如果是女王的话，对国家的损失还会小一点。”[32]本杰明·迪斯雷利也说：“我们埋葬了我们的君主。”[33]她自己也这么认为。这位身体强健的女王曾经将士兵送上战场，也曾经生育9个孩子，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整日哭泣的寡妇。到1864年，也就是阿尔伯特去世两年多后，人们已经在公开询问她是否会退位了。[34]但伯蒂没有赢得足够的尊重或者喜爱，许多人知道他曾经因父亲的死而受到指责。[35]伯蒂与母亲之间

的关系也处在危险的低谷。维多利亚拒绝让伯蒂承担她或者阿尔伯特的任何职责，甚至不允许他从事任何有薪水的工作，尽管她的这一态度面临着巨大压力。维多利亚光是看到他就很生气，甚至曾经抱怨说他的两条腿“很丑”。[36]她祈祷自己能够比他活得更久。[37]首相也越来越担心她对儿子“无法克服的厌恶”。[38]威尔士亲王正处在一种“被迫赋闲”的临界状态。[39]在1862年2月，也就是他父亲去世仅仅几周后，他被派往中东进行阿尔伯特计划好的一趟旅程。这让维多利亚大大松了一口气。

死后的阿尔伯特不仅聪明又突出，而且全知全能。维多利亚开始构建一个在阿尔伯特在世时难以置信的迷思：那就是她自己完全无助、无用、毫无价值。如果任何人暗示说她在抚育子女或者处理公务方面做了任何事的话，都会惹她生气：“他们应当知道，一切都是他的功劳，他是整个家庭的生命和灵魂，也是她在一切事务上的顾问。”[40]当她在解释为什么不愿参加1864年议会开幕会议时，她将自己描述成一个不幸地与世界政治相捆绑的小白兔，“孤苦伶仃、颤抖不已”[41]。编造这个故事给了她一个借口，好让她可以反复提及并夸大她的失落。贬低自己、夸大阿尔伯特变成了一种解释她的悲伤以及为什么她不愿重新返回世界的方式：如果说他曾经意味着一切的话，那么没有他的存在，她又能做什么呢？如果她所悼念的这个男人有如神明一般，那么所有人都应当进行哀悼，或者说至少尊重她的悲痛，因为他的死也是每一个人的损失。

维多利亚如今不得不承担两个人的工作量，而其中一个还曾是一个工作狂。她在信心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即使仅仅是向一小群人朗读伯蒂的婚礼宣言也“非常有挑战性”；她苍白的面庞让孩子们担忧不已。[42]在谈话中，她的决心会发生动摇，过去的不安全感又再次袭来。在1863年4月与一名贵族客人讨论意大利与波兰的动荡局势时，她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确信我的事实，好谈得更多”[43]。她再次拿出记载阿尔伯特意见的活页夹，并仔细研读。这一定是倡导阿尔伯特希望她推动的政策的最佳方式。[44]

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拜访位于巴尔莫勒尔的这对王室夫妇时，让她感到惊讶的是无聊又懒散的王室成员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差异如此巨大，因为这对王室夫妇都忙于思考战争、外交政策和“所有重要的事”。即使在阿尔伯特去世前，她也认为维多利亚十分尽职尽责，“却不相信自己，害怕没有尽自己全力，她的情绪也因此而消沉”。阿尔伯特走后，“如今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征求他意见的做法是对还是错”。南丁格尔认为这一点很感人，意味着“她没有被权力所腐蚀”。她喜欢上了维多利亚，这个羞涩地穿着“简朴的黑色丝质长裙的女人”。她可以看到她内心的深度，可以看出女王“如今无法忍受会客厅里无意义的表演”。[45]

维多利亚再也没有参加或者举行过任何一场公开舞会。1862年7月在奥斯本宫举行的爱丽丝的婚礼更像是一场葬礼。面无表情的维多利亚坐在椅子上，被她四个保护心切的儿子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她在整场婚礼期间都在努力克制自己的眼泪，不住地想到自己是如何与阿尔伯特一起策划这场婚礼的。她发现“人群的喧嚣”难以忍受，于是没有参加招待会，而是与爱丽丝和露易丝一起在另一个房间里进餐。维多利亚很喜欢她的新女婿、德意志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的路易斯王子，但她还是因爱丽丝没有在英格兰待上足够多的时间而警告了她一番。她又失去了一个孩子。维多利亚决定，她必须要求一个已婚的女儿与她一同居住，因此决心为海伦娜找一个“年轻而通情达理的王子”作为夫婿，并且住在她的一处宅邸里。[46]

她的孩子们先后结束了青春期，越长越高，不断探索其他地区，纷纷坠入爱河，有了自己的孩子，并试图让他们的生活摆脱因父亲的死以及母亲的悲痛情绪造成的巨大影响。1863年4月，爱丽丝在温莎城堡生下了一名女婴。18岁的阿尔弗雷德则在马耳他与女性胡闹嬉戏。在每一次标志着他们成长的事件中——无论是坚信礼、婚礼还是洗礼仪式——维多利亚都感到越来越绝望。她不仅仅怀念阿尔伯特的陪伴，她还讨厌

自己孤身一人。她藏在角落里，藏在孩子们身后，或者藏在教堂的密室里，试图归于乌有。

维多利亚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王宫里充满了饱含同情心的伴侣。她的抑郁情绪意味着，比起客人的到来所给予的鼓励，她更容易因为人们的离开而感到困扰。甚至当她感到孤独而绝望之时，她的生命里也从不缺少人的陪伴：她数量众多、宅心仁厚的孩子们，她的侍女们、亲朋好友、政客、牧师、诗人、仆人以及侍从等。她甚至在1862年造访德意志时见到了儿时的家庭女教师莱岑，她们都“大为感动”[47]。女王并不缺少人们的喜爱；她所缺少的是与她拥有同等地位的人。[48]她孤独地站在“可怕的高处”[49]，满怀期待地凝视天堂，而她身后站着一大群人，细致地观察着她。她不想要一群人，她想要的只有阿尔伯特。

当1863年3月10日伯蒂与美丽的丹麦公主阿利克斯举行婚礼时，维多利亚坐在温莎城堡圣乔治教堂圣坛上方的隔间里。（她走了一条秘密通道从教长办公室来到隔间，以避免被人看到。）当本杰明·迪斯雷利拿起镜片想要把她看得更清楚时，他得到的是冷酷的凝视，因而不敢再看。宾客们被允许穿着彩色服装，但侍女们与王室女儿们都穿着半丧服，主要是淡紫色与白色的衣服。维多利亚穿着一件配有绉纱的黑色丝质长袍，帽子上垂着面纱，表现得十分不安。当看到孩子们走进教堂时，维多利亚产生了想哭的冲动。[50]伯蒂在等待阿利克斯时向她鞠了一躬，而且一直表情不安地抬头看母亲。当小号声响起时，她想起了自己的婚礼，几乎晕了过去。

38个人涌入餐厅享受家庭午宴，而维多利亚却在隔壁与如今快6岁的比阿特丽斯一起静静地用餐。那天晚上，她在上床休息时心情十分沮丧。她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她。薇姬、爱丽丝，如今伯蒂也有了心之所属，而她却只能抱着阿尔伯特的睡衣：“我孤独凄凉地坐在这里，需要爱与温柔，而我们的两个女儿都有了她们深爱的丈夫，伯蒂也

把他可爱而纯洁甜美的新娘带到了奥斯本宫——他能获得如此珍宝实属有幸……噢！我在教堂里都经历了什么啊！”[51]

她知道不应该嫉妒自己的孩子们，却无法忍受。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伯蒂终于安定了下来，他似乎很满足，而阿利克斯是一块“珍宝”。第二天她醒来时得了重感冒，身体十分虚弱。

巴麦尊勋爵曾经讽刺说，只有三个人真正理解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冲突：如今已经过世的王夫；一名已经疯了的德意志教授；以及他自己，但现在却把它全忘了。对维多利亚而言，尽管政治很复杂，但她的忠诚却十分简单。丹麦已经统治了这两个公国几十年，但德意志人——由占据优势地位且十分好战的普鲁士领导——却仍然对它们虎视眈眈。在经历了克里米亚的灾难后，维多利亚支持英国保持中立，并且渴望避免一场全面战争，但她也支持普鲁士。当丹麦国王在1863年11月去世，并由亚历山德拉的父亲克里斯蒂安九世继承王位时，普鲁士人已经在奥地利的支持下准备好发动进攻了。

这场战争割裂了整个家庭。亚历克斯自然支持她的祖国丹麦。她在1864年1月早产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阿尔伯特·维克托（Albert Victor）。次月，普鲁士与奥地利入侵了石勒苏益格。当忠于妻子的伯蒂强调英国应当进行干预以支持丹麦时，维多利亚却要求克拉伦登叫他降低自己的调门。毕竟，他的姐夫、薇姬的丈夫弗里茨正在普鲁士陆军中作战。这件事成了家庭宴会上的一个禁忌话题。[52]

维多利亚在这个话题上情绪激动的通信与她在那些年里自我刻画的“被捕猎的可怜野兔”的形象大相径庭。她发出了诸多充满决心的信件和备忘录，敦促英国保持中立。她变得如此专心致志，以至于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工作。荷兰的索菲王后对她的一位侍女说：“她已经习惯了权力，这种习惯一旦拥有，就几乎不可能改掉。”[53]维多利亚仍然将自己视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指示巴麦尊要确保当她造访科堡

时，“外交上不能采取任何未经她事先批准的行动”。[54]她积极游说内阁的方式暗示出她不愿遭到反驳。当维多利亚在1863年给薇姬写信讲述欧洲的摩擦时，她哀叹自己失去了阿尔伯特的帮助，不过她同时也补充说，尽管心碎，但她仍然拥有许多“阿耳戈斯之眼”[55]：“自从他离开我之后，我一看见危险就拥有了母狮般的勇气，我再也不会介意向人民表达我下定决心的意见，而且不仅如此！是的，尽管这副疲劳的身躯是在苟延残喘，但我仍会毫无畏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56]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赞赏母狮的怒吼。1864年5月10日，“鲁莽的”巴麦尊对她说，人民开始认为她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上拥有过于强烈的“个人看法”。有些人觉得她对政府施加影响，使其不向丹麦施以援手，从而违反了公正无私的宪法职责。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在5月26日含沙射影地指出，维多利亚不像乔治三世等前任君主那么富有天赋。他说，“欧洲大陆存在一种强烈的印象，尤其是在德意志”，人们认为在与德意志有关的问题上，女王陛下的大臣们很难“执行一种纯粹英国式的政策”，这让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受到了损害。[57]维多利亚在日记里自怨自艾了一番：

> 多么残酷的指责，而且对象是一个可怜的无所依靠的寡妇，再也无法受到亲爱的丈夫的爱与智慧的庇佑，唯一能让我活下去的信念是要为国家利益而辛苦工作，看到这个国家自我削弱而且越来越陷入麻烦，我被焦虑、伤心和责任感撕成了碎片——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寻求保持公正无私！这种荒谬的中伤让我感到非常不快。噢！孤苦伶仃、没有任何人庇护我的日子太难过了！[58]

她对格兰维尔勋爵说，她“有责任对上帝和国家负责”，阻止他们参与欧洲的战争，尽管很多公众支持参战。格兰维尔圆滑地向她保证说，她挽救国家免于“采取诸多错误的举措”[59]。到6月时，丹麦战败。到10月，荷尔施泰因与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部分地区被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60]

这成了维多利亚新的行事模板：与女性一起哭泣，而对男性发号施令，同时还用引人注目的悲痛情绪来为自己做缓冲。不过，随着她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避世于遥远的宅邸和城堡中，公众对她的巨大同情开始变味。有人在白金汉宫的大门上栓了一块标志牌，上面写着：“这些威风凛凛的房屋正在出租或出售，原因是上一任主人的生意衰败。”该标志牌被扯了下来，警方也加大了警力保护，但仅仅几天后，标志牌又再次出现。[61]

1863年10月7日，苏格兰高地飘起小雪，维多利亚与爱丽丝和海伦娜一起骑了一天马，仅仅在回家前停下来喝了杯茶。天色已黑，向导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维多利亚的仆人约翰·布朗反复从马车上跳下来帮助他认路。20分钟后，马车开始倾斜——爱丽丝说，慢慢地，“我们开始翻车”——几个女人一起摔到了地上。这对维多利亚而言是一个关键瞬间。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她仅有一瞬间去思考“我们是否会死”，但她下定决心：“我还有事没有解决，还有心愿没有实现。”

> 我的脸重重摔在地上，但凭借着我从没想过自己拥有的力量，我设法立刻爬了起来，看到爱丽丝和兰辰躺在地上，旁边就是马车，两匹马也都躺在地上，布朗绝望地喊道：“万能的主啊，请怜悯我们！谁见过这种事情啊，我以为你们都死了！”[62]

接下来的几天，维多利亚一直躺在床上，乌黑的眼眶上放着生肉，她则不断按摩着酸痛的脖子和扭伤的大拇指，她的拇指将永远保持歪曲的状态。[63]维多利亚感叹道，她的“无助”非常令人难受，但她也展示出，自己因悲痛情绪而产生的想要去死的愿望已经被潜意识里更为强大的生存愿望所取代。[64]

渐渐地，随着维多利亚定期去浮若阁摩尔宫（Frogmore）墓园看望阿尔伯特的遗体，定期造访奥斯本宫，长时间地祈祷[65]，并且在巴尔莫勒尔周边远足，再加上孩子们表现出的善良，她变得越来越平

静。[66]在阿尔伯特去世三周年那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墓园希望一览阿尔伯特的坟墓，而她显得冷静许多了。她对同为寡妇的好友布卢彻伯爵夫人说：

> 尽管如今我的生活里充满了孤独与疲惫，但我意识到，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对孩子和国家而言，以及对执行亲爱的阿尔伯特的愿望和计划而言多么重要。为了以上这些，我必须努力再活一段时间！我的痛苦一如既往，但我已经顺从和屈服了，这在刚开始时对我来说曾经无比艰难。[67]

维多利亚不由自主地渐渐变得更加平静安详。爱丽丝鼓励她的母亲重新坐上马车、骑上骏马，回到公众视野。最初，在阿尔伯特死后，她甚至连路都走不了。她渐渐瘦削的样子让人们议论纷纷；但她希望自己脸上出现皱纹和岁月的痕迹，以展现悲伤与心碎的痕迹。她急切地检查自己是否长出了白发。但不久后，红嫩的脸颊和偶尔迸发的活力暴露出了她仍然强健的体魄。维多利亚还将继续活上37年。

---

[1] Queen Victoria to Vicky，29 April 1863，Fulford，*Dearest Mama*，205-6.

[2] 引自 Dyson and Tennyson，*Dear and Honoured Lady*，69. 维多利亚对未来重逢的信念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十分普遍。Wolffe，*Great Death*，205.

[3] Queen Victoria’s Album Consolativum 1862-1886，British Library Archives，Add. 62089-62090，30.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14，1862.

[5] May 9，1863，Dyson and Tennyson，*Dear and Honoured Lady*，78.

[6] Dyson and Tennyson，*Dear and Honoured Lady*，76. 完整引文如下：“女王的脸很漂亮，一点也不像她的肖像画，而是又小又像个孩子，充满了智慧和难以形容的甜美，还带着一丝悲伤。她思维的广度、自由和深度让A感到心情愉悦。我感觉任何虚伪在她面前都会无所遁形。我感觉我们讨论了天上与地下的一切。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能够与之如此轻松聊天，并且在见面几分钟后就不再有任何羞涩的夫

人。她对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发出了由衷的欢笑，但痛苦与悲伤的阴影有时还是会从这张满带笑意的脸上略过……我感觉女王是一个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女人。”

[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8，1863.

[8] 王夫对于丁尼生重新演绎的亚瑟王骑士的传说《国王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十分着迷。在收到提议由他担任这一职务的信件的前一天夜里，丁尼生梦到阿尔伯特亲吻了他的脸颊。6年后，阿尔伯特在丁尼生位于怀特岛的房子里摔倒了——这让他的妻子埃米莉恐慌不已，因为那所房子里凌乱不堪；他们正准备出售一批家具和画作。阿尔伯特与这位诗人愉快地交谈了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他的一名侍从在屋外采集樱草，准备在晚些时候用来为王室夫妇泡茶。

[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1862.

[1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27，1862.

[1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4，1863.

[12] Lord Clarendon to Sir George Lewis，December 14，1861，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251.

[13] 查尔斯·菲普致信巴麦尊：“女王尽管仍处在悲伤的痛苦中，但她完全镇定自若，展现出了非凡的自控能力。啊！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的损失，当她充分意识到时——我感到颤抖——但仅仅是为了她深刻的悲痛。究竟会发生什么——她在哪里才能找到这种支持和帮助，就像她之前在人生中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上所依靠的那些帮助？”引自Rhodes James，*Albert，Prince Consort*，273。

[14] 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418.

[15] 克拉伦登勋爵致曼彻斯特公爵夫人，1861年12月17日：“她似乎想起来他多么不赞同并且反对她的这种过度悲伤，正如她在母亲去世时所展现出的那样。如果她能以这种精神状态支撑自己，这也就是我们能够希望的一切了；当然，相信她的精神不会最终崩溃还为时尚早。”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253.

[16] 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229.

[17] From Lady Clarendon’s journal，February 3，1862，Bolitho，*Albert，Prince Consort*，258. 克拉伦登夫人还声称，维多利亚曾说，“她知道她会担心得发疯的”，以及“在巴尔莫勒尔时，她有三次都觉得自己正在发疯”。Bolitho，*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187.

[18] See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37. 维多利亚认真地哀悼了她的许多亲人，包括1850年的姑姑露易丝、1851年的汉诺威国王、1852年的惠灵顿公爵、1855年的沙皇尼古拉、1856年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莱宁根的卡尔亲王、1857年她的表亲内穆尔公爵夫人、1860年4月她的姐夫霍恩洛厄—朗根堡亲王，以及1861年1月阿尔伯特的继母、萨克森—科堡的玛丽王后以及普鲁士老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19] 她在1859年7月6日致信薇姬："你必须向我保证，如果我死了，你的孩子以及你身边的人会为我哀悼；这真的必须办到，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拥有强烈的情绪。" Fulford，*Dearest Child*，199-200. 她在1863年致信《泰晤士报》，谈及一则有关她有可能不再穿着寡妇丧服的传言："这种想法实在荒谬至极。" Rappaport，*Queen Victoria*，407.

[20] April 11，1862. McClintock，*The Queen Thanks Sir Howard*，50.

[21] McClintock，*The Queen Thanks Sir Howard*，49.

[22] 维多利亚对布鲁斯将军说，伯蒂应该"以妥当的精神面貌面对他可怜家庭无法治愈的悲伤。"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154；Sir George Aston，*The Duke of Connaught and Strathearn*，47-48.

[23] Bloomfield，*Court and Diplomatic Life*，2：150.

[2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19，1863.

[25]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161.

[26] Longford，*Victoria R.I.*，308.

[27] Bolitho，*The Prince Consort*，219-20.

[28]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61.

[29] Villiers，*A Vanished Victorian*，317.

[30] Villiers，*A Vanished Victorian*，318.

[31]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61-62.

[32]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76.

[33] Wiebe et al.，*Letters of Benjamin Disraeli*，165.

[34] 豪登勋爵致克拉伦登勋爵，1864年6月4日：“法国报纸谈起了维多利亚女王退位一事。我开始觉得，这种说法或许有点道理。我总是觉得，随着她刚开始守寡就出现了思维变化，她在儿子成年那天就选择退位应该对她自己的利益、幸福和声誉都会有好处。届时她将留下一个良好的名声和巨大的遗憾。”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292-93.

[35] Florence Nightingale，December 22，1861：“导致阿尔伯特患病的原因之一，以及他在神志昏迷之际一直在嘟囔的事情，正是威尔士亲王的缺点。” 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419.

[36] 需要提到的是，薇姬在谈到自己的孩子们时也同样十分坦率，她有一次在写到自己的儿子亨利时——当时他在10岁生日那天获得了一件制服作为礼物——说：“他可怜而丑陋的脸庞将看起来比以往还要难看，而且他看起来变得比去年更加泯然众人了。” Vicky to Queen Victoria，August 7，1872，Fulford，*Darling Child*，57.

[37] See Fulford，*Darling Child*，231.

[38] Villiers，*A Vanished Victorian*，313.

[39] 尊敬的埃米莉·伊登在1863年致信克拉伦登伯爵：“我理解露易丝公主所谓威尔士亲王的‘强制赋闲’是什么意思了，这有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如果是王夫的话，可能会给他布置一些工作——让他担任苏格兰摄政或者审计署职员或者家庭农场的长官等——一些受人尊重的职务，好让他免受伤害。”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284.

[40]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131.

[41] Letter to King Leopold，June 16，1863，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91.

[4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1，1862.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8，1863.

[44] 利奥波德曾鼓励这种想法，在给她的信中告诉她，认为“逝去的人继续对他们所留计划的执行情况感兴趣，以及看到他们精心计划的东西被摧毁或者忽视会给他们带来困扰和痛苦”是有道理的。King Leopold to Queen Victoria，January 16，1862，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11.

[45] 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419-20.

[46] 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Balmoral，May 18，1863，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85.

[4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8，1862.

[48] 利特尔顿夫人说，在阿尔伯特去世几天后，维多利亚“没有朋友可以倾诉”。Wyndham，*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422.

[4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7，1883.

[50] “一想到可怜的孩子们没有了他们急切需要的父亲，就让我心碎——他们的教育和地位如此艰难，我感觉完全无助。”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11，1862.

[5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0，1863.

[52] Ridley，*Bertie*，95-97.

[53] To Lady Mallet，December 30，1861，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120；S. Jackman and H. Haasse，*A Stranger in the Hague*，227.

[54] To Viscount Palmerston，August 11，1863，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102.

[55] 指时刻保持警惕。——译者注

[56] Fulford，*Dearest Mama*，205-6.

[57] Hansard，House of Lords Debates，May 26，1864，vol. 175，ccc 616-17. 他将其描述为一种“最大程度的困境，已经实质上影响到了本国对外国的影响力”。

[5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7，1864.

[5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6，1864；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

1864.

[60] 维多利亚在1864年5月28日致信普鲁士国王，敦促他减少要求，同意丹麦有可能接受的妥协。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203.

[61] 这件事在1864年3月30日的《特鲁曼埃克塞特空中邮报》（*Trewman's Exeter Flying Post*）或者《普利茅斯和科尼什广告报》（*Plymouth and Cornish Advertiser*）上有所报道。有些人认为这篇报道是杜撰的，但即便如此，正如蒂斯代尔（Tisdall）所说，它也能显示出"伦敦的风向"。Tisdall，*Queen Victoria's John Brown*，87.

[6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7，1863.

[6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6，1864.

[6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10，1863.

[65] 参见她写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信，1864年2月25日，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68。

[66] 例如，她在1863年10月23日的日志中写道："这一天风景的美丽无法形容，尽管我再也无法在任何事情中找到真正的快乐，但如此美丽的上帝杰作，如此的平静安宁，还是让我感觉很好。"

[6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4，1864.

22 复苏温莎寡妇

我的所有侍女都要穿丧服，我认为丧服与我们这群悲伤姐妹最为适合。[1]

——1864年9月维多利亚女王对沃特帕克夫人（Lady Waterpark）如是说

处在服丧期的英国女士是一种威严而令人敬畏的奇观。[2]

——乔治·萧伯纳

1862年1月16日，就在阿尔伯特去世1个月后，200多名男子与男孩被困在了新哈特利（New Hartley）煤矿的最底部。泵用发动机的铸铁横梁发生断裂，掉落进了唯一的电梯井中，将矿工们困在了井下。[3]当他们的尸体在6天后被发现时，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倒在地上睡着了一样。年纪最小的男孩只有10岁。维多利亚感到悲痛欲绝，宣称“她的心在为他们流血”[4]。11个月后，在她参加完一场为阿尔伯特的遗体祝圣的仪式并返回后，她得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圣经》，里面还附上了许多“忠诚的英国寡妇”的签名，其中包括在哈特利矿难中失去丈夫的80名女性。[5]维多利亚坐在桌前，给她“善良的寡妇姐妹们”写信说，失去丈夫后，让她感到安慰的是“他虽然没有现身但始终如一的存在感”，以及终有一天能与他团聚的信念。[6]

在她热情拥抱寡妇生活的过程中，女王将一个通常而言代表着迷失的身份变成了某种高贵而重要的身份认同。丧亲之痛可以跨越一切分歧。她写道：“如果这片土地上最贫穷的寡妇曾经真心爱过她的丈夫，并且对我表示同情的话，我愿意紧紧拥抱她，就像我对待一名王后或者任何身居高位的人一样。”[7]在丈夫去世后，她邀请伊丽莎·简·沃特帕克夫人来陪伴她，并表示“我觉得我们能够理解彼此，感觉除了责任感之

外，生活对我们而言已经结束了”。[8]这是一种阴郁的生活。女王承诺她只会要求沃特帕克夫人去做那些符合她心情的事情，并且说：“我的所有侍女都要穿丧服，我认为丧服与我们这群悲伤姐妹最为适合。”这群姐妹不断地为维多利亚提供情感沟通，与她一起谈话、哭泣。［剑桥公爵夫人的侍女杰拉尔迪娜·萨默塞特夫人（Lady Geraldine Somerset）叹气说：“一个人身边围绕着这么多黑色产生的痛苦影响可谓凄惨而糟糕，令人难以言表。”[9]］当亚伯拉罕·林肯在1865年被刺杀后，维多利亚给他的妻子玛丽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哀思。她写道，没人能够比她这位“完全心碎的”女王更好地理解她正在经历的事情。[10]玛丽·林肯回信说，她知道维多利亚会理解她的。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会比男性更加大声而持久地进行哀悼。鳏夫重新结婚并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要比寡妇高得多，通常在经过几周的隐居之后就会重返世界。在19世纪下半叶，55至64岁的妇女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寡妇，但在同年龄的男性中鳏夫比例仅有七分之一。[11]帕特丽夏·贾兰（Patricia Jalland）在她引人入胜的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家庭中的死亡》（*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中写道，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寡妇身份就是最终的归宿，这是一种非自愿的社会流放”[12]。然而，女王是有选择的；她的自我流放是自愿的，而且拥有着其他人无法享有的特权，有些人在私下里还会对她不够坚忍克己颇有微词。例如，苏格兰作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在1859年经历了丈夫的死亡，她有三个孩子也在幼年时夭折。她写了几十本书，用自己的智慧养活了剩下的几个孩子。当维多利亚在1868年，也就是奥利芬特失去最后一位女儿的四年后与这位作家见面时，她赞许地表示，奥利芬特是一名质朴的寡妇。但奥利芬特却不太赞赏女王。她在写给出版商的信中说：

> 如果我们普通人中有任何人像女王那样对待朋友、访客以及整个社会的话，我们会……失去这些访客和朋友。我怀疑我们这些不得不孤身一人与世界做斗争、没有得到多少同情的可怜女性能否真正体谅女王“前所未

有”的痛苦。一个女人如果在身边子女绕膝、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的情况下都无法鼓起勇气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论她喜欢与否——那么她肯定是个可怜人。[13]

但没有人可以强迫女王去做任何她不愿做的事。那种帮助少女时代的维多利亚夺取王冠的坚强品质如今驱使着成年的维多利亚去坚持她无悔的悲伤。

王宫大门内的维多利亚仍然在继续工作。她的日子如今分别在温莎、奥斯本和巴尔莫勒尔度过。她尽可能避开白金汉宫，因为那里太容易让她回忆起过去。她仍然会继续与大臣们进行措辞激烈的通信，参与授予荣誉和批准任命等活动，并且坚持主张她审查所有牧师人选的权利，经常会提出反对意见以及她自己的建议，尤其在涉及任命主教和大主教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她保留着自己的权力，但这些工作却不为公众所知。

要求维多利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声音愈演愈烈。这让她感到很愤怒。她会斥责任何胆敢向她施压的人，责难他们不理解她有多么脆弱。1863年时，维多利亚的秘书查尔斯·菲普斯对巴麦尊说，她的三名医生“非常确信”身着盛装孤身一人出现在公众场合对她的身体健康“十分不利”。[14]她的医生们不愿把这份意见写下来，担心它可能会引起误会。

1864年4月1日，《泰晤士报》对维多利亚的缺席正式提出抗议。那年12月，在阿尔伯特去世三周年那天，《泰晤士报》又抱怨了一遍。就在几天前，维多利亚曾对拉塞尔勋爵说，她无法出席议会的开幕仪式，因为这会给她带来“精神上的冲击”。当阿尔伯特陪伴在她身边时，她会感到安心，但如今他已经离去，“任何儿童心里的畏缩和紧张”都比不上她想到要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心里的感受。她给拉塞尔勋爵写信说：

她的精神已经极度脆弱，以至于任何情绪、任何讨论、任何劳累都会

> 给她的整个身体带来巨大的不适和痛苦。这种持续不断的焦虑情绪是与她艰难而不值得羡慕的地位分不开的，她既是女王，也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母亲，（更是王室的母亲），身边却没有一个丈夫来指导她、帮助她、安抚她、安慰她并且振奋她的情绪，她的焦虑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她的精神已经失去了自愈的能力，变得越来越脆弱。[15]

从身体上来说，维多利亚的健康程度比她愿意承认的要好得多。但从心理上来说，她却很脆弱。她的焦虑情绪导致头痛、晕厥以及面部的疼痛和腿部的风湿疼痛。1866年5月，维多利亚对拉塞尔勋爵说，她一直担心会出现“某种彻底的崩溃”[16]。她经常声称自己很可能在不久后死去。[17]一想到有数千双眼睛会将目光聚焦在她身上，她就会陷入严重心烦意乱的状态。[18]在身处公共场合时，她会出现全身颤抖，经常无法让自己保持平静。她曾经受人枪击、被人用棍棒击中头部、遭受过虐待，还沦为寡妇；如今，她想要的是感到安全，是想要某个人来保护她。她想要的庇护很快就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身上实现了。

* * *

备受信赖的苏格兰侍从约翰·布朗在1864年冬天应召来到奥斯本宫为维多利亚牵马。她的医生曾命令维多利亚坚持骑马，而在苏格兰高地时，她渐渐习惯了布朗为她牵马：“陌生人会让我紧张……唉！我现在又虚弱、又紧张，非常依赖那些我已经习惯并且信赖的人。”[19]高大、帅气且很会保护人的布朗凭借他强壮的体魄和沉稳的力量振奋了维多利亚的情绪。他是在12月赶到奥斯本宫的；次年2月，她就赐给他“女王高地仆人”的永久性职位。到11月时，他被任命为约翰·布朗绅士。布朗开始在王室里拥有不同寻常的崇高地位，经常陪伴她一起从伦敦前往苏格兰，甚至前往欧洲。维多利亚陶醉于他的忠诚：“他对我如此忠心耿耿——如此朴实、如此聪明，又如此不像一个平凡的仆人，非常开朗而专注。”[20]他恰恰是孤独绝望的女王所需要的那剂补药。

维多利亚终于在1866年2月出席了议会开幕仪式，这是阿尔伯特去

世以来的头一遭。她确保让首相拉塞尔勋爵了解到，这对她而言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21]。当这一天来临时，她感到心烦意乱、没有食欲。她身穿素色晚礼服，头戴寡妇帽，帽子上还戴着一顶镶嵌有钻石和蓝宝石的头冠。她安静地坐在敞篷马车里从好奇的人群面前驶过，微风吹拂着她的面纱，人群中的许多人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她了。她换了个入口进入议会大楼，以避开走廊上人群的凝视，但在拥挤的议会大楼里，维多利亚还是感觉快要晕倒。第二天，她对首相说，这次考验带来的“强烈的精神冲击让她颤抖不已、筋疲力尽且身体不适”[22]。她戏剧性地说，仅仅是为了孩子和国家着想，她才有了活下去的渴望。

不过，她渐渐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例如在白金汉宫接受朝拜、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检阅部队、参加表亲的婚礼、为自来水厂剪彩，以及为雕像揭幕等。当她的女儿海伦娜在1866年6月12日成婚时，维多利亚甚至亲自将她交到了新郎手上（尽管大主教对她说，由女性来这么做很“罕见”[23]）。1867年，她再次出席议会开幕仪式，不过她坚持自己第二年不再被要求这么做。在她统治的后39年里，维多利亚只出席了7次议会开幕仪式，而且一次都没有宣读她自己的讲话，全都是由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代劳的。

维多利亚在19世纪60年代始终无法摆脱悲痛的心情，与此同时，一场推动民主的协力合作引发了一连串的骚乱、游行和抗议。致力于寻求扩大选举权的组织改革联盟（Reform League）的激进领袖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在英国各地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上发表演讲。1867年，议会通过了《第二改革法令》（Second Reform Bill），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资格投票的男性数量从100万增加到了200万。[24]维多利亚对民主化很警惕，但在有迹象显示该法案在下议院享有大多数人支持后，她对该法案表示强烈支持。她将自己视为穷人的女王，经常为“上层阶级的轻浮以及他们对下层人的无动于衷”而叹息。[25]但她对这项关键法案产生的影响其实很小。

不过，在政治上，维多利亚没有失去一丝锐气。首相们渐渐习惯了被强势女王打击，女王却宣称自己体弱多病。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因为发出了没有得到维多利亚批准的文件而遭到训斥，就像多年前的巴麦尊那样。[26]她回绝了大部分正式请求，甚至是那些她最终照办的请求。她经常不愿招待外国贵宾，就算勉强愿意接见，也一定要让英国政府为之买单。[27]例如，在1867年，取代巴麦尊勋爵担任首相的辉格党人德比勋爵曾乞求女王将前往奥斯本宫的行程推迟三天，以便能够在白金汉宫与土耳其苏丹会晤10分钟。她的回答十分讽刺："厌恶这个词不太适用于这个话题；更靠谱的说法是，这对女王的健康而言极为不便和不利。"[28]不过，她还是同意推迟行程两天，并要求苏丹提前一天抵达，她还派她的医生前去德比勋爵那里，以便转告她精神脆弱的消息，并再次强调她所承受的巨大负担。她再次威胁自己会"彻底崩溃"，并表示她拒绝被人霸凌或者指手画脚。这是维多利亚独特而有效的谈判策略：在斗争中示弱，并且在反复展示力量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弱小。她的大臣们无力应对一个难相处、倔脾气的女王。只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位孤独的女王想要的是受人欢迎、奉承和崇拜。

本杰明·迪斯雷利很了解魅力的力量。他在1868年上台执政，并对女王说，"他能够给予的只有自己的忠心"[29]。尽管他是一名保守党人，但当他成为首相时，维多利亚仍然将其宣传成工人阶级的胜利。他此前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也没有任何财富，作为一名犹太人的儿子，他在政坛几乎籍籍无名。在皮尔首相执政时期，迪斯雷利曾谋求政府职务但遭到拒绝，而在托利党因《谷物法》发生分裂时，他在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保守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被视为一个尽管天赋异禀但有些古怪的局外人，擅长撰写通俗小说。在成为首相时，迪斯雷利自豪地宣称，他"爬到了滑竿的顶端"[30]。

迪斯雷利绝非常人。他曾连续数十年身穿褶边衬衫、彩色长筒袜并头顶染色卷发，像个花花公子一般，还喜欢模仿曾在1812年勾引墨尔本

勋爵妻子的布里恩勋爵。12岁时，由于他的父亲与所在的犹太教堂出现分歧，因此他从犹太教改宗为英国国教；这让他得以考虑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当时犹太人被禁止担任公职。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妻子玛丽·安·刘易斯（Mary Anne Lewis），一位迷人、聪明、富有的寡妇，比他要年长12岁。

迪斯雷利还是一名成功的通俗小说家，非常喜欢描写花哨的情感。他优秀的文字天赋在他与女王的相处中派上了大用场。他写道，他希望：

> 在重要的国家大事中，陛下不会对他有所保留，让他无法享受陛下的指导带来的恩惠。
>
> 陛下的生命是在与伟大人物的不断交流以及对重大事务的确认与处理中度过的。如今所有人都承认陛下天生拥有这些伟大的能力，但即便不是如此，这些难得而非凡的经历一定也给予陛下突出的优势，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匹敌，更别提在世的王公贵族们了。

维多利亚在下一次看到迪斯雷利时，她“容光焕发”地和他打了招呼。[31]

迪斯雷利不仅仅把奉承变成了一种艺术。在他给女王写的信件中，他还让政治变成了一件对她而言饶有兴趣的事，这是继墨尔本勋爵卸任以来的第一次。他会清楚地解释政治事件和辩论，既有细节也有格调。维多利亚对一个朋友说，她以前从未读过这样的信件。[32]迪斯雷利明智地遵从她在人事任命方面的意愿，尤其是涉及教会任命方面，并且表示他很乐于遵从她的命令。他还向她致以极大的敬意。在1868年维多利亚出版《我们高地生活的日记节选》（*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Our Life in the Highlands*）后，这本书首印的2万本很快就一售而空。迪斯雷利后来在对话中看似随意地说起了“咱们作家”这几个词。他没法说服她相信一切，却成功地控制住了她，甚至最终将这位曾经立场坚定的辉格

党女王转变成了保守党保守主义事业的支持者。

不过迪斯雷利作为首相的第一个任期仅仅持续了10个月。[33]他在那年12月的大选中被最大的政敌、自由党的威廉·格莱斯顿击败。格莱斯顿是一个仪表堂堂且十分理智的人，有着老鹰般的眼睛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这一点深得阿尔伯特的认可；他们两家人的大儿子曾经一同出游。格莱斯顿经常被人称作“人民的威廉”，是一个颇受欢迎且行事节俭的财政大臣，一直致力于改革。他所缺少的是与暴躁易怒的君主打交道所需要的圆滑技巧——那种墨尔本和迪斯雷利这样的人所拥有的技巧。他的妻子曾对他说要“宠着点女王”，但他不理解怎么才能做到。[34]他也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方法来解释政策。他经常让维多利亚感到困惑，而后者讨厌感到自己很蠢或者低人一等。韦尔斯利教长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你不能对她展现过多的尊重和礼貌，我觉得甚至连过多的温柔都不行。”[35]

格莱斯顿已经证明了自己既目光远大，又拥有巨大的政治勇气。他说，他的一项伟大使命是“安抚爱尔兰”[36]。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即1868年12月至1874年初，格莱斯顿主要忙于废除爱尔兰圣公会——这是它当时的名字，尽管它是一个与英国国教有联系的少数派教会——而维多利亚是该教会的领袖。这意味着在法律上进行政教分离，并且免除爱尔兰人向圣公会支付什一税的义务——他们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维多利亚并不支持这一法案——她强调说，土地权应当具有优先权，而极端民族主义者会被该法案激怒。毫无疑问，一个更大的个人担忧在于苏格兰也许会效仿——甚至连英格兰也有可能——并取消她作为当地教会领袖的身份。不过下议院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支持率——格莱斯顿称其为“国家的有力裁决”[37]——迫使她认识到，这一决定不应由她来做出，议会上下院之间的冲突将“十分危险，甚至是灾难性的”[38]。她最初曾计划对该法案表示反对，但随后还是向格莱斯顿提供了帮助，作为一名协调者协助他与上议院达成妥协。她甚至——不情愿地——推迟了前往奥

斯本宫的行程，以确保该法案得到通过（尽管她还是措辞强硬地提醒格莱斯顿说，这种调解非常不同寻常，不能被视为先例）。《爱尔兰教会法案》（Irish Church Act）在1869年得到通过。

阿尔伯特的工作是在公众的充分注视下进行的；他让君主制显得既富有成效又值得尊敬。没了他之后，维多利亚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而公众对耗资巨大且人口迅速增加的王室的不满不断扩散。王室的每一次婚姻和每一个新生儿都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开支，伯蒂的行为也恣意挥霍。在1871至1874年间，英国成立了85个共和派俱乐部（Republican Club），对“君主制的耗资巨大和毫无用处”以及伯蒂的“不道德典范”等进行抗议。[39]格莱斯顿在1870年给格雷维尔写信说：“女王消失无踪，威尔士亲王也不受尊重。”[40]经济疲软，王室收入过高，而法国已经在1870年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英国不应该效仿呢？[41]

公共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1858年在美国成立的“芬尼亚兄弟会”（Fenian Brotherhood），该组织的目标是推翻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并建立一个属于爱尔兰人的共和国。1866年，该兄弟会曾试图从美国入侵加拿大，但未能成功。1867年，他们在英国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炸毁了一座监狱的外墙并杀害了一名警察。作为报复，该组织的三名成员被处决并成为殉道者。由此引发的过度恐慌引起了维多利亚的不快，她建议她的大臣们对任何暴力威胁简单地以中止人身保护令作为回应，这将意味着人民会无端遭到逮捕或者拘留，不过大臣们认为此举不妥。1867年12月20日，她被告知有80名芬尼亚兄弟会成员乘坐两艘轮船从纽约出发，准备对英国政府发动袭击。100名苏格兰火枪兵在奥斯本宫的马厩里驻扎下来，还有好几艘船只在奥斯本宫下方的海岸线上巡逻。维多利亚感到陷入了绝境，但当这些威胁无一成为现实时，她变得更加怒不可遏。[42]

3个月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一名芬尼亚兄弟会成员在悉尼开

枪打伤了维多利亚23岁的儿子阿尔弗雷德王子。他在前往甘蓝树海滩（Cabbage Tree Beach）“拜访当地土著，观看他们的体育运动表演”途中被人开枪击中背部，并四肢着地跌倒在地。子弹留在了他的腹部。他后来对母亲说，他在后面三天时间里都难以呼吸。[43]这名爱尔兰凶手大约35岁，皮肤白皙、衣着得体，后来遭到处决。

《悉尼先驱晨报》称此次枪击案是一场“巨大灾难，影响了所有阶层的人”[44]。与其他英国本土革命运动一样，芬尼亚兄弟会在此之后遭遇挫败，并消失了许多年。

阿尔伯特希望德意志统一而强大。他将自己的大女儿薇姬安插在普鲁士王庭，希望将他的自由派理念带到这个他希望未来能够领导德意志的国家。19世纪60年代，精明又投机的普鲁士外交家奥托·冯·俾斯麦决心将所有德意志邦国统一在普鲁士的统治之下。到1871年，他已经基本上成功了。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打破了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联盟关系的稳定，留下了一个真空，而俾斯麦凭借他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利用了这一真空。他在1862年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无法用演讲和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只能用铁与血来解决。”[45]1866年，他在意大利的支持下入侵了奥地利，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作“七周战争”[46]（Seven Weeks’ War）。普鲁士决定性地击败了奥地利，战后签署的条约导致有22个邦国统一在北德意志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中，而俾斯麦是该邦联的总理和领袖。[47]但是，自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一直领导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的奥地利却被排除在外。

在新的联邦中，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汉诺威成了德意志的州。维多利亚同意阿尔伯特的看法，并对斯坦利勋爵说：“一个强大、统一、自由的德意志将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友。”[48]但她不信赖俾斯麦，并且认为他的侵略行为“骇人听闻”[49]。她的女婿，也就是薇姬的丈

夫弗里茨——他的伯父当时是普鲁士国王——也不赞同俾斯麦通过暴力来强迫统一的做法。弗里茨曾认为与奥地利开战形同“兄弟相残”，但在普鲁士胜利后，他被证明是错误的。维多利亚敦促普鲁士国王做出可以接受的妥协，以实现和平并防止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餐桌旁，战争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薇姬嫁给了一个为普鲁士人作战的鸽派普鲁士王子，爱丽丝嫁给了一个为奥地利人作战的德意志王子，伯蒂娶了一名丹麦公主，海伦娜嫁给了一个出生在丹麦的德意志王子。当维多利亚在1869年底开始规划露易丝的未来时，她放弃了阿尔伯特始终坚持的地缘政治姻缘。她在给伯蒂的信中写道：“时代已经变了；强大的外国同盟关系看起来成了麻烦与焦虑的来源，没什么好处。有什么能比我们的家人在与丹麦的战争以及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期间所处的境地更加痛苦呢？”相反，美丽的露易丝嫁给了一名英国臣民——一名热爱诗歌的自由党政客，名为约翰·乔治·爱德华·亨利·道格拉斯·萨瑟兰·坎贝尔（John George Edward Henry Douglas Sutherland Campbell），即洛恩勋爵（Lord Lorne）。（这对夫妇一直分居两地，没有子嗣；坊间一直在流传有关洛恩性取向的流言蜚语。[50]作为一名天赋卓越的雕刻家，露易丝有自己的秘密；据说她与雕刻家约瑟夫·埃德加·贝姆有私情，后者据信是在与她做爱时死去的。最近有一名传记作家称，她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并悄悄送给他人抚养。[51]）但海伦娜不顾母亲在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执意嫁给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克里斯蒂安王子（Prince Christian）。

王室血脉还在不断繁衍。伯蒂与母亲的关系在他娶了阿利克斯后有所改善，尽管维多利亚仍然拒绝让他承担任何官方职责。爱丽丝十分崇拜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并且与之相交甚好，她在1866年的奥地利—普鲁士战争中担任过护士，并且婚姻十分幸福，尽管她后来与母亲有所疏远，原因是她建议母亲更多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使母亲有些生气。薇姬的一个孩子西吉斯蒙德在年仅21个月大时就因脑膜炎夭折，而让维多利

亚感到绝望的是，她无法赶到薇姬身边去安慰她。她仍在为罹患血友病的利奥波德忧心忡忡，在1868年他出现了一次大出血后，维多利亚决定他将成为她“生命中的主要目标”[52]。她虔诚地每晚与他吻安。[53]即使在他身体良好之时，维多利亚也“始终为他感到焦虑”[54]。她对于孩子们的生活始终有一个烦恼挥之不去，那就是担心失去父亲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她试图为他的缺席做出补偿，但感觉自己无法胜任这一空缺。因此，她始终在控制、斥责、命令及疼爱她的孩子们，情绪复杂多变。在日记里，她再也没有描写温馨的家庭场景，而在阿尔伯特在世时，她的日记里曾充斥着这些内容。从这时起，她在夜深人静之时记录的主要是遥远的苏格兰山区。

在阿尔伯特去世4年后的1865年12月10日，维多利亚深爱的利奥波德舅舅去世了。这位代理父亲的死让她“目瞪口呆”。[55]对46岁的她而言，作为君主，作为9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以及作为一个经常因欧洲国家的战争而陷入分裂的大家族的女家长，她的肩上担子很重。她仍然认为自己始终忠于阿尔伯特的遗产，但她发现树立雕像比推行他的理念要简单得多。有一件事曾经吸引了她丈夫很大的注意力，那就是德意志的未来，而在当时，德意志正分裂成数十个小邦国。

维多利亚的悲痛既冗长又聒噪。公众感到奇怪：为什么她无法出现在议会并履行她作为君主的职责？为什么她无法短暂放下自己的痛苦，从事她由此获得收入的工作？不过，至少有两件事能够缓和人们对这位多年来未能妥善履行职责的女性的轻蔑。首先，维多利亚并非不愿工作，她只是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在阿尔伯特去世后经历的严重焦虑很像是某种社交恐惧症，她对此心知肚明，却无法控制。其次，一直到近些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56]，心理学家才开始认真研究长期悲痛——一种复杂、创伤性或者持续很久的悲痛情绪——的本质，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的悲痛情绪比其他人更严重。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许多人都不愿将可以理解的悲痛情绪认定为疾病，但如今，

它已经被列入了第5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的附录中，名为“持久性复杂丧亲障碍”［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PCBD）］。

据估计，这种疾病影响着10%的丧亲人士，对这种疾病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维多利亚尤其容易出现深刻而强烈的哀痛情绪。[57]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经历长期悲痛，如果她们在童年失去过父亲或母亲，曾经遭受过霸凌或者控制欲很强的父母，失去了一个她们高度依赖且能够给予巨大帮助的配偶，抑或是配偶的去世既突然又出乎意料的话，她们尤其容易出现这种病症。[58]其他致病因素包括情绪紊乱史以及缺少安全感的依恋性格。维多利亚具备了长期悲痛的基本因素。[59]尽管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长期哀痛十分包容，但维多利亚的避世之举超出了人们心中对寡居女王的合理期待。[60]人们最初的同情心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阿尔伯特去世仅仅几年后就已经消失无踪了。

如今的医生有可能会实施心理治疗、为她开具抗抑郁药物，并建议进行定期锻炼、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但是相反，这位统治着整个帝国却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女王，却把其他悲伤的女性聚集在自己身边，沉迷在痛苦之中。她讨厌被人告知自己还会再次快乐起来。[61]暗示情况会有所改善似乎就意味着对阿尔伯特的记忆的严重背叛。找一个替代者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这让她的失落感变得更加明显。一名高级宗教人士对维多利亚说，她从现在起必须将自己当成基督的新娘，而她的回答是：“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62]

时间逐渐减轻了她的痛苦。但在痛苦渐渐消失时，维多利亚却仍然想念那种痛苦的感觉，她给沃特帕克夫人写信说：“强烈的悲痛已经过去——我为此感到难过，因为即使在悲痛之中也有甜蜜，但持久的黑暗和阴云却始终不散。”不过，她说，她已经准备好“愉快地奋斗下去”。

她花了近3年时间不断地说自己想要去死，而如今，她说，她想要为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继续活下去。[63]随着她变得日益坚强而愉快，她再次在自然中找到了快乐。渐渐地，她重新开始在日记中描写美丽的风景。在18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阿菲让维多利亚的女仆把母亲叫起来，告诉她说天上出现了许多流星。她不情愿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裹了一件便袍。她站在窗前，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景象，星星又大又亮，流星像烟花一般从天空划过。她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并且派她的仆人叫醒了尽可能多的人。她不希望任何人错过这个场面。

---

[1] Queen Victoria to Lady Waterpark，September 21，1864，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s，Add. 60750，Extract 60750，Lady Waterpark，vol. 1.

[2] Shaw，*Collected Letters，1898-1910*，817.

[3] 在这场灾难发生后不久，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确保任何矿井都不能只有一个电梯通道；需要有双通道进出。

[4] January 23，1862，Lady Cavendish's Diary，ladylucycavendish.blogspot.com/2006/11/23jan1862-200-hartley colliers-found.html.

[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8，1862.

[6] Walter Walsh，*The Religious Life of Queen Victoria*，116.

[7] e.g.，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9，1865.

[8] 在此之前，她已经接受检查，显示她健康状况良好，能够行走与骑马，并且已经准备好在社交场合表现出女王库存的样子。Queen Victoria to Fanny Howard，September 14，1863，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s，Add. 60750，Extract 60750，Lady Waterpark，vol. 1.

[9] Rappaport，*Magnificent Obsession*，151.

[10] Queen Victoria to Mrs. Lincoln，April 29，1865，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266.

[11] Jalland，*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230. 据估计，19世纪60年代的婚姻中约有19%以夫妻一方死去而结束，并且约有47%的婚姻会在25年内结束。

[12] Jalland，*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231.

[13] 引自 Houston，*Royalties*，148. Also Jay，“Mrs. Brown，” 194。

[14] Sir James Clark，Dr. Jenner，and Dr. Watson.

[15] Queen Victoria to Earl Russell，December 8，1864，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244-45. 她向利奥波德坦承，她的精神状况在1865年8月恶化，只有完全的安静才会让她感觉好些。（Queen Victoria to King Leopold，August 31，1865，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274.）需要提到的是：有些人曾说，女王在阿尔伯特去世前就展现出了焦虑的迹象。露西·卡文迪许夫人在1864年2月5日写道：“我们不能责怪女王今年又一次没有做这件事：即使是亲王在他身边时，她的紧张也曾经近乎让她抵抗。” ladylucycavendish.blogspot.com/2009/01/05feb1864-parliament opens without. html.

[16] Queen Victoria to Earl Russell，May 25，1866，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329.

[17] Letter to King Leopold，June 16，1863，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91.

[18] 即使是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场合，例如亚历克斯与伯蒂的第一个孩子阿尔伯特·维克托的洗礼仪式，维多利亚依然写道：“感觉每一只眼睛都盯着我，太糟糕了。”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0，1864.

[1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6，1864.

[20] Letter to King Leopold，February 24，1865，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255.

[21] Sir Charles Phipps to Earl Russell，Osborne，December 20，1865，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289. 维多利亚之所以需要去，部分原因是为她的孩子争取资金支持——海伦娜即将嫁给一个家境不好的王子，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克里斯蒂安王子，而阿尔弗雷德也快18岁了。

[22] Queen Victoria to Earl Russell，February 7，1866，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299.

[2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1，1866.

[24] 1867年改革法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05.7万名选民规模的基础上增加了93.8万名新选民。Woodward，*The Age of Reform*，187.

[2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4，1867.

[26] Queen Victoria to Lord Stanley，December 11，1867，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472. 还可参见日期为1867年12月16日的信件，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476。

[27] 例如，在1869年，当被要求招待埃及总督时，维多利亚强调说，她工作太多，没有丈夫，身体不适，没办法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招待他人。Letter to Gladstone，May 31，1869，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601.

[28] Queen Victoria to the Earl of Derby，July 4，1867，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443.

[29] Disraeli to Queen Victoria，February 26，1868，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505. June 10，1846

[30] Monypenny and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4：600.

[31] Bradford，*Disraeli*，278.

[32] Maxwell，*Life and Letters of Clarendon*，2：346.

[33] 在这几个月里，他通过了重要的反腐败法律，并且将公开处刑定为非法。

[34] 格莱斯顿夫人在1867年对丈夫说：“宠着点女王，至少有一次相信自己能做到，你个亲爱的老家伙。” Magnus，*Gladstone*：*A Biography*，160.

[35] Longford，*Victoria R.I.*，362.

[36] 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2：252.

[37] 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572.

[38] 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603.

[39] Williams，*The Contentious Crown*，39.

[40] Shannon，*Gladstone*：*Heroic Minister*，92.

[41] 海伦娜在1866年成婚时得到了一份嫁妆，露易丝在1871年得到了一份嫁妆，阿瑟在1871年7月年满21岁时获得了一份津贴，而阿尔弗雷德王子在年满21岁时获得了一份年金，并在1873年成婚时又获得一份年金。——作者注

[4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0，1867.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6，1868.

[44]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March 13，1868，5.（Victoria did not find out until April 25.）

[45] Steinberg，*Bismarck*：*A Life*，181

[46] 这场战争也被称作意大利的第三次独立战争。维多利亚曾请求普鲁士国王避免这场战争，但没有成功。

[47] 俾斯麦不希望法国和俄国干预，因此推动威廉一世国王与奥地利迅速媾和。《布拉格和约》于1866年8月23日签署，导致了北德意志邦联的诞生。

[48] Queen Victoria to Lord Stanley，August 7，1866. 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1：364.

[4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4，1866.

[50] Sandwell，“Dreaming of the Princess，” 47.

[51] Hawksley，*The Mystery of Princess Louise*.

[5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4，1868.

[5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0，1868.

[5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7，1860.

[5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0，1865.

[56] Maercker and Lalor，“Diagnostic and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57] 考虑一下“持久性复杂丧亲障碍”的标准：长期渴望、强烈的悲痛与情感创伤，并且执着于死者与死亡的情境。这些进一步症状必须历经超过一年：对失去亲人的事实不愿相信或者情感麻木，难以积极回忆死者，对自己与死者或者死亡的关系产生苦涩、愤怒以及难以适应的评估（例如，内疚感），以及过分逃避对失去亲人事实的提醒。其他症状包括渴望死亡以便与死者团聚，自从亲人去世后难以相信他人，感觉没有死者了以后生活失去意义或者变得空虚，相信没有死者自己就无法正常工作，对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感到困惑，自身认同感降低（例如，感觉自己的一部分随着死者一起死去了），在失去亲人后难以或者不愿在未来追逐原有的兴趣。身体上的困扰包括疼痛与疲劳等。*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th ed.，Appendix，Conditions for Further Study，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7-8.

[58] Jalland，*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321.

[59] Shear et al.，“Complicated Grief，” 105. See also Prigerson et al.，“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e1000121.

[60] 正如帕特丽夏·贾兰发现的那样：“长期与偏执性的悲痛情绪在十九世纪的家庭中十分罕见，或许比如今更加罕见……维多利亚女王作为永恒的温莎寡妇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她有时会被视作一种典型，而不是相反。” Jalland，*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318.

[61] 在阿尔伯特去世近两年后，维多利亚对埃尔芬斯通少校说，别人的同情让她感到安慰，她在自己的孩子那里找到了一些同情。“埃尔芬斯通少校希望精神抑郁有所减轻，但她感觉这永远也不可能；相反，随着时间流逝，其他人的抑郁减轻，她感觉到深切的忧郁——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无助和孤独感。这种斗争每天都变得越来越糟，失去感每个小时都变得更加强烈，她摇摇欲坠的身体状况和破碎的精神状况越来越难以承受各种考验、工作和悲伤，以及——最重要的——孤独。” McClintock，*The Queen Thanks Sir Howard*，51.

[62] Bell，*Randall Davidson*，1：83.

[63] Queen Victoria to Lady Waterpark，Osborne，February 10，1867，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s，Add. 60750，Extract 60750，Lady Waterpark，1：271.

23 女王的种马

布朗是个粗野的家伙……但他却对女王有着无限的影响力，而且对女王毫无尊重……王室上下都在说他是“女王的种马”。从肉体上来说他是不错的，就是有些粗俗。[1]

——威尔弗雷德·斯考恩·布伦特（Wilfred Scawen Blunt）

天知道我多么想要被人照顾。[2]

——维多利亚女王，1865年

首先而言，约翰·布朗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当这位男仆与维多利亚待在一起时，他会为她划船，在舞池里与她翩翩起舞，并且引导她攀爬陡峭的高地小径。他会抱着她骑上马鞍，替她制伏攻击者，在她走不动时背起她，并且高坐在她的马车上。在维多利亚的女儿比阿特丽斯编辑的日记中几乎看不到布朗的痕迹；他总是突然出现，就像是从阴影中走出一般，在需要他的时候，在河水太深、马匹太倔、铁道太颠、道路太过湿滑的时候，他总是应召前来。[3]但是，从这些零散的记录中，读者可能无法看出布朗几乎总是在维多利亚的身边。女王每到一处他都会相伴左右：仅仅几年时间后，她就将毫不羞耻地称他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流言蜚语称，他可不仅于此；甚至连维多利亚的孩子们都把这个魁梧的苏格兰人称作“女王的种马”。否则该如何看待君主与仆人之间这段非比寻常的关系？作为一名统治者，维多利亚坚定地遵守着礼仪。但作为一个女人，她遵从的却是自己的本能。八卦传播者可以去死了。约翰·布朗让她感到快乐。

维多利亚总是被直接、不做作和真挚的人所吸引，因此立刻就对这个在巴尔莫勒尔工作的年轻男仆留下了深刻印象。1850年，在她31岁时，她将他描述为“一个帅气、高挑的23岁小伙，头发卷曲，为人幽

默，乐于助人”。[4]10多年后，在阿尔伯特去世后，当他被要求前来照顾女王时，他欣然应允。他将成为她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比莱岑、墨尔本或者其他任何过客都要亲密。维多利亚在约翰·布朗的陪伴下度过了18年时间，几乎与她和亲爱的阿尔伯特一同度过的时间一样长。

在19世纪60年代末，维多利亚仍然过着某种隐居生活。当她1868年出现在白金汉宫的一场游园会上时，熙熙攘攘的人群让她感到不知所措。她已经隐居了近7年时间。在那些年里，她的日记内容始终平淡、枯燥又重复，缺少了她常见的热情与好奇（偶尔也有例外，例如她所描写的两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连体女孩的访问，她们为她唱了一首二重唱[5]）。悲伤的沉淀压缩了她的世界；甚至连引人注目的外事活动也是按照她的心情好坏来描写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她的日子仍然被接二连三的死亡所笼罩。光是在1870年这一年，她就失去了布吕歇尔伯爵夫人（Countess Blücher）、格雷将军（General Gray）、她的医生詹姆斯·克拉克以及她过去忠心耿耿的家庭女教师莱岑。[6]在1872年，她的姐姐费奥多拉的离世是“无可挽回”的损失。[7]悲伤但坚强的维多利亚活得比生命中如此众多的重要人物都要久。随着她过去的亲朋密友不断离世，女王开始暴饮暴食，她放松了裙围，并且患上了风湿病、牙痛和头痛。

但是，在她的臣民们等待女王出现的同时，有关一个男人得到她的喜爱并垄断了她的注意力的流言蜚语开始传播。这个高个子苏格兰人是不是把她拐跑了？当被指责在苏格兰期间忽视女王职责时，她没有感到丝毫内疚[8]：她将自己视为决定所谓职责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唯一仲裁人。她拒绝推迟前往巴尔莫勒尔的旅程，甚至连需要参加议会开幕式或者处理内阁危机时依然如此。[9]王室私库管理人（Keeper of the Privy Purse）托马斯·比达尔夫爵士（Sir Thomas Biddulph）说：“女王会以琼斯夫人的身份与人交谈，而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10]国之重臣们抓耳挠腮地看着女王的马车在街道上颠簸驶过，车上站着一个令人熟悉的6英尺4英寸高的人：身穿苏格兰短裙的布朗，他正警惕地盯着任何有可

能靠近女王的人。

令人最震惊的是布朗的随便。难以想象一个人会像他那样跟女王说话。财政大臣、保守党人凯恩斯勋爵在巴尔莫勒尔举行的一场男仆舞会——王公贵族与仆人们一起跳舞的场合——看到他时简直目瞪口呆："我从来没想到有人会像他那样粗鲁地对待女王。"[11]一名律师曾见到布朗试图给女王别一条格子花呢围巾，维多利亚动了一下，别针刮到了她的下巴。布朗随后喊道："诶，女人，你能脑袋保持不动嘛！"[12]俄国皇后曾写道，布朗对待维多利亚的态度"就像是在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13]。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粗鲁无礼的举动对维多利亚而言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毫无保留。这种率真正是她在失去阿尔伯特后一直渴求的那种亲密。在与维多利亚以及她的其他侍女们一起走在高地陡峭的山坡上时，简·丘吉尔的脚被裙子边缘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布朗把她扶了起来，直言不讳地说："你不如女王陛下重。"维多利亚对此笑道："我说，'你觉得我体重增加了吗？'他直白地回答说：'嗯，我觉得是的。'"[14]

许多人觉得女王对礼仪和绯闻的不管不顾令人难堪。愤愤不平的德比勋爵在日记中列举了女王令人"产生怀疑"的所有行为：

> 在公园偏僻部分乘车途中漫长的独处；经常在她房间陪侍左右；私人信息由他来转交给上层人物；当他为她牵马或者驾驶马车时刻意避开他人视线；一切都显示出她挑选了这个男人来结交友谊，而这是相当荒唐的，与他的地位毫不相称。公主们会拿这件事开玩笑——这么做或许不太明智——并且称他为"妈妈的情人"。

维多利亚甚至允许并纵容布朗酗酒。一天下午，当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地上醉晕过去，无法为她驾驶马车时，亨利·庞森比[15]二话不说跳上了马车。（维多利亚容忍手下仆人的饮酒问题：当她收到一份报告称，一名男仆喝醉酒并且把一盏台灯摔在了台阶上时，她仅仅在报告边缘写

上了“可怜的家伙”几个字。[16]）布朗越来越表现得像是个中间人，让那些上层人物恼怒不已。他们无法如愿见到女王，反而却见到一个直言不讳的大胡子苏格兰人，此人从来没有时间拘泥于细节。当朴次茅斯市长前来觐见女王，并询问她能否前往该市参加一场阅兵式时，布朗仅仅是把脑袋伸进房间，然后说：“女王说了，当然不行。”[17]市长悻悻地退下了，显然受到了刺激。德比担心，没有人愿意告诉女王其他人是如何看待布朗以及她与布朗的关系的。

维多利亚没有意识到的是布朗对她的孩子产生的影响，他们都看不起他，而且愿意投入相当大的精力来摧毁有关他们的母亲与一个男仆之间亲密关系的任何记载。他的酗酒、咒骂和霸道态度对王宫内的年轻人没有多少吸引力。伯蒂、阿尔弗雷德、露易丝和利奥波德变得尤其厌恶布朗。[18]他们觉得他既粗俗又做作，而且对母亲对他的喜爱感到恼怒不已。当露易丝订婚并开始规划她的家庭时，她对庞森比说：“我不会让一个穿着苏格兰短裙的荒唐男人随时随地跟着我。”[19]

维多利亚是一个相信她的亡夫仍然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女人，她被布朗表面上的第六感所吸引，而这种第六感对高地人来说其实是习以为常的。当王室在1861年离开巴尔莫勒尔时，布朗对她说，他希望她能身体健康，而且“最重要的是，愿你的家庭里不再有死亡”。那一年有3个人死去，包括阿尔伯特在内。布朗的话反复在维多利亚脑海中萦绕，“就好像它们是某种奇怪的预感”[20]。这让她对他的神秘力量深信不疑。许多人仍然相信，她把他当作降神会上的灵媒，试图通过他来接触阿尔伯特；鉴于她对唯灵论[21]的兴趣，这种说法是有可能的，但从未得到过证实。一名作家曾经将布朗称作“穿着苏格兰短裙的拉斯普京（Rasputin）”。[22] [后来被真正的拉斯普京迷惑的沙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Alexandra Feodorovna）在与母亲爱丽丝一起拜访外祖母维多利亚时曾见过约翰·布朗。[23]]

维多利亚将布朗的薪水加倍，给了他一栋房子以供他退休后在巴尔莫勒尔生活，并且把他擢升为“女王的高地仆人”，还给他颁发了奖章。她命令巴尔莫勒尔的资产管理人去查询布朗的家谱，并且惊喜地发现他与苏格兰最负盛名的家族有血缘关系。她早就知道布朗血统纯正。

在阿尔伯特去世后的5年时间里，女王一直避开公众的视线。而在1867年，数千人涌入了一年一度的皇家美术学会春季展。展出的画作中有一幅巨大的帆布画，由埃德温·兰西尔爵士（Sir Edwin Landseer）创作，名为《女王陛下在奥斯本宫，1866年》。在画作中，女王横坐在一匹光滑的深色马上，穿着一贯的黑色。她在阅读一封从地上的公文箱里拿出的信件，她的宠物狗就躺在公文箱旁。她的对面站着一个身着黑色苏格兰短裙和外套的高个子，神情严肃地拽着缰绳。在阿尔伯特死后的岁月里，这就是女王消磨时间的方式吗？

这幅画引发了一场丑闻。《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的美术评论员写道：“如果任何人站在这幅画前观赏一刻钟，并且听取观众的评论的话，他就会发现画面中出现了多么轻率的行为。”[24]没过多久，流言蜚语就变得十分下流：女王和布朗先生是情人关系吗？她是不是怀上了他的孩子？他们有没有秘密结婚？一名美国访客在1868年说，令他目瞪口呆的是，他经常能听到人们将女王称作“布朗太太”的粗俗玩笑。他写道：“我听说，女王疯了，而约翰·布朗是她的看护人；女王是个唯灵论者，而约翰·布朗是她的灵媒。”[25]

维多利亚很喜欢这幅画，并且订购了一幅版画。她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当她在1867年听人小心翼翼地暗示说她不能带着布朗一起参加海德公园举行的一场阅兵式，原因是他们预计人群会嘲讽他时，她愤怒至极。她用自己一贯的自怨自艾与固执己见粉碎了这个主意，声称这会让她既紧张又沮丧，而布朗对她而言是一个安慰。在就她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漫长讨论后，内阁终于决定不再向她施加压力。她的内科医

生詹纳医生对他们说，任何“强烈的兴奋感都会让她剧烈呕吐（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兴奋）”。而且，如果她无法得到这种源于“本性”的安慰的话，“对她心理状态的影响有可能会很危险”。[26]大臣们在内阁会议桌前面面相觑：如果他们要求女王将布朗留在家中的话，女王会呕吐？如果她呕吐不出来的话，她有可能发疯？最终阅兵式被推迟了。

在寂静无声的时刻，当凝望迷雾缭绕的高地或者温莎城堡的绿色草坪时，维多利亚会感到一阵萦绕不去的内疚感。她的悲伤有所缓解的事实是否意味着她背叛了阿尔伯特？在他人的陪伴中寻求安慰是对还是错？她对韦尔斯利教长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后者安慰她说，“悲伤情绪渐渐消失”是完全正常的，而且是一种比当初盲目的悲伤更加持久的爱的证明。他进一步对她说，她应当将这种安慰看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27]

很少有哪个话题像维多利亚女王与约翰·布朗的关系那样遭到如此无端的猜测和粗略的记载。大多数流言蜚语都毫无根据。例如，有一个故事说，维多利亚从马车里跳出来，消失在了一间小房子里，并且生下了约翰·布朗的孩子，然后容光焕发地拿着香槟酒出现在人们眼前，任何曾经生过孩子或者见过生孩子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故事荒唐可笑。[28]大多数流言都源自随着时间流逝而神秘失踪的文件档案所引发的诱人故事。作家E.P.蒂斯德尔（E. P. Tisdall）声称自己拿到了一份据说是维多利亚亲笔书写的信件，她在信中对约翰·布朗说她喜欢他，这封信据说是被布朗撕碎丢在垃圾桶里后，被人在垃圾桶里发现并拼凑起来的。不过，这封信已经丢失了，它的真实性以及传说中与维多利亚笔记的相似度从未得到过考证。

一则经常被人提及的趣闻来自伯蒂的一个声名狼藉的情人，名叫凯瑟琳·沃特斯（Catherine Walters）。当伯蒂委托雕刻家约瑟夫·埃德加·贝姆来捕捉她美丽的容颜时，贝姆对沃特斯说，他在巴尔莫勒尔应女王

的要求雕刻一尊布朗塑像的三个月里见到了许多可疑的举动。沃特斯随后向一个朋友吐露说：

> 布朗是一个粗鲁无礼的家伙……他对女王有着无限的影响力，而且对女王毫无尊重，竭尽所能地利用他与女王的关系。王室上下都在说他是“女王的种马”。从肉体上来说他是不错的，就是有些粗俗，他有着漂亮的眼睛（据说与已故的王夫很像），而深爱着丈夫的女王不知怎么地开始相信亲王的灵魂进入了布朗体内，在经历了4年非常不幸福的寡妇生活后，她给了他各种特权……她曾经与他一起去山区的一栋小房子里，号称是为了保护并“照看她的宠物狗”，而他的卧室就在她的卧室边上，侍女们的卧室却在房子的另一端……贝姆看够了他与她之间的亲密关系，毫不怀疑他获得了“一切婚姻中的特权”。[29]

有关女王秘密结婚的流言蜚语不止见诸报端，还出现在一些大人物的日记里。[30]曾经担任维多利亚的牧师的诺曼·麦克劳德在1872年临死前坦白说，他主持了女王与约翰·布朗的婚礼——这一故事被人记了下来，但是删掉了部分关键点。鉴于维多利亚坚定认为寡妇不应再婚，以及布朗在1870年差一点与另外一名女子结婚的事实，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但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是某种形式的承诺或者交换或者仪式，即布朗将他母亲的婚戒交给女王；而他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的婚姻，以便侍奉并爱戴她一人。

不过，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王室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摧毁任何有关维多利亚与布朗关系的证据，这种做法在维多利亚生前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她死后。伯蒂对他母亲这位高地仆人的痛恨延续到他继位成为爱德华七世之后，整个王室家族也都对于他们的女族长和君主竟然痴迷于一个喜欢酗酒和骂人的平民而感到极为难堪。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最不显眼的信息也能发出最响亮声音的原因。

在苏格兰低地最南部顶端附近距离特威德河畔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镇，曾经当过20年维多利亚医生的詹

姆斯·里德爵士（Sir James Reid）的档案被保存在一栋石质宅邸中。里德医生是一个稳重可靠、备受尊敬的人，从1881年到维多利亚生命的最后，一直得到她的信任和仰赖；她就是在他的臂弯中去世的。她曾下达严格指令，要求只有詹姆斯爵士一个人可以在她死后抬起并移动她的遗体，因为他以行为得体而谨慎闻名。他用自己小巧而灵敏的手坚持记录着完美无瑕的日记，记载了他每天的行动和医疗预约。在1883年的一天，他记载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景象。当他打开温莎城堡里维多利亚的房门时，他看到她正在与约翰·布朗眉来眼去地调情，并且“走了两步”。

布朗撩起自己的苏格兰短裙，对她说：“噢？我还以为它在这里。”

她笑着撩起自己的短裙，回答说：“不，它在这里。”[31]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清楚这个“它”指的究竟是什么。[32]不过可以明显看出的是，詹姆斯爵士对这段对话产生了足够的兴趣，并且认为它足够重要，需要记在他的黑色小日记本里。对话揭示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程度。我们无法了解这种亲密的确切性质是什么，但这个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趣闻片段显示出维多利亚与布朗之间存在一种过分的亲密关系，不仅超出了女王与仆人之间的正常范畴，甚至也超出了任何异性朋友之间的正常范畴。第一个有权接触维多利亚所有日记的伊丽莎白·朗福德（Elizabeth Longford）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洞见深刻的维多利亚传记，她一直坚持认为维多利亚与布朗之间只存在柏拉图式的关系。她最近写道，如果布朗曾经是维多利亚的情人的话，那么“她的众多朝臣、侍从、侍女、更衣女仆、‘按摩师’、朗读者或者其他人会在某个时候碰巧看到某些东西的”。[33]朗福德所不知道的是，詹姆斯爵士的确看到了。

或许令人产生最长时间思考的一件事是，伯蒂被别人用一叠维多利亚与亚历山大·普罗菲特（Alexander Profeit）之间的信件敲诈勒索的报告。普罗菲特是巴尔莫勒尔的管理人，非常讨厌布朗，而这件事是在翻

阅保存在皇家档案馆之外的医生笔记本时才被发现的。维多利亚与普罗菲特之间总计有约300封信件往来，在维多利亚去世后的那几年，普罗菲特的儿子很清楚他的这一发现有多么重要，而且有可能带来多么大的好处。詹姆斯·里德爵士被派来代表伯蒂从普罗菲特的儿子手里拿走这些信件，他在经历了为期半年的谈判后，最终于1905年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不知道为了换取这些信件或者说他们的内容，伯蒂究竟花了多少钱。这些信件立刻就被烧毁了。里德在一本绿色的笔记本上就这些信件留下了寥寥几笔的记载，但笔记本在他死后也被销毁了。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仅有他在日记中对这些笔记的描述。他写道，这些信件“非常败坏名声”[34]。

尽管如此，研究者们始终没有得出维多利亚与约翰·布朗相爱的结论。如果这么做，就是在暗示维多利亚与约翰·布朗之间有一段炽热、强烈和持久的性关系。维多利亚从未隐瞒她和布朗的关系——他们如果真的是情人关系的话，她肯定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35]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暧昧、热情与亲密。他们会在荒野里独处好几个小时，豪饮威士忌——或者约翰·布朗所谓的“烈酒”（*sperruts*）——而在偏远地区住宿时，他们彼此之间的房间离得很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激情又孤独的女性会对一个粗犷的苏格兰人的吸引力完全免疫。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否曾握住她的手，或者怀抱着她在巴尔莫勒尔附近远离人们视线几英里远的山区里坐着。在情人与朋友之间，亲密关系存在着一千种可能。他们有可能彼此有过拥抱、亲吻和爱抚。有那么一两次，维多利亚可能背对他蜷起身子，以提醒自己感受身边人的温度是怎样的感觉；她比布朗要矮上整整一英尺。对那些认为偶尔的温柔时刻不会与一名君主的道德和举止相矛盾的人来说，他们肉体上的关系采取何种表现形式实在无关紧要。

可以肯定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很爱约翰·布朗。事实上，这是一场真实存在的丑闻。这种爱不是她所熟知的与阿尔伯特之间的爱，她在那

段爱情中是一个倾情付出的弱者角色，始终在一个被她视为神明而非平等对象的男人的指导下努力“提高自己”。她从未体验过父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不信任自己所获得的母爱，而墨尔本勋爵更像是一个导师而非快乐的伙伴。她对约翰·布朗的爱是独一无二的。他比维多利亚小7岁，两人之间还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社会鸿沟。即便如此，他仍然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非女王来对待。在维多利亚看来，婚姻应当存在于一个“主人”与一个怀有崇敬之心、表现恭顺的妻子之间。婚姻有可能存在于一个统治世界的女人与一个为她照管马匹的男人之间的想法对她来说一定荒唐可笑，也会违反她对于婚姻关系的基本概念。但她的确爱他，就像一个女人去爱一个保护和喜欢她的男人一样。

由于这段关系如此不可能，因此维多利亚可以允许自己将它当成一段热情似火的友谊。很明显，从里德对他们私密世界的一瞥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会令整个社会感到震惊。他们肉体上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或者是什么性质，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维多利亚与布朗的关系就像第二次婚姻一样，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动力——而且尽管她百般否认，但这种动力的确非常符合女王的心意。渐渐地，她的生活重新迎来了色彩。当露易丝成婚时，她的母亲同时佩戴上了红宝石与钻石首饰。[36]

在欧洲大陆上，奥托·冯·俾斯麦正在梦想统一的德国能够崛起为欧陆的超级大国。俾斯麦的胃口受到了1866年普奥战争（Austro-Prussian war）的刺激，在那场战争后，有22个北德意志邦国组成了一个邦联，由普鲁士领导。如今，他想要利用一切奇迹将这些邦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个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并且囊括南德意志那些仍然独立的邦国，包括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他相信，有一个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是刺激法国使其宣战，以迫使德意志南部的邦国与军事实力强大的北部邦国组成联盟对抗它们共同的敌人。俾斯麦昭然若揭的野心令法国倍感威胁，当一名普鲁士王子被认为是西班牙国王的可能人选时，

法国咆哮着发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名普鲁士王子的名字后来最终被撤回，但随后发生的外交怠慢（善于操纵局势的俾斯麦对此夸大其词，并重新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最终说服法国必须发动进攻[37]：该国于1870年7月向德意志宣战。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结成联盟后，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军队拥有了相当于法国两倍数量的士兵。

在经历16年前克里米亚战争的难堪战况后，维多利亚迫切地想要维持英国的中立。她仔细阅读报纸上的伤亡记录，并反复敦促格莱斯顿增加英军士兵的数量，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38]。她要求了解战备程度、陆军与海军的士兵数量，以及造船厂的状况。

维多利亚觉得这场冲突毫无意义，而且对于自己的女婿们相继参战感到十分痛苦。她坚持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不去管这些事，并且让人们平静下来。对我而言，去做任何事，而不是宣布中立和谨慎，都是无济于事的”。[39]不过，她的心还是站在德意志一边。[40]（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她同意英国向法国出售武器和马匹，此举触怒了普鲁士。）她只祈祷战争能尽快结束，并且不断安慰薇姬和身怀六甲的爱丽丝；她的这两个女儿都在一边等待自己军人丈夫的消息，一边在医院里照料伤员。身处苏格兰高地的维多利亚在巴尔莫勒尔的商店门前停了下来，购买了一些棉布来制作绷带。

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在1870年9月的色当战役（Battle of Sedan）之后，法国领导人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并且与手下的10.4万名士兵一起被俘。[41]普鲁士的胜利是决定性的。他们的人数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征兵制度的使用以及他们的铁路系统、对克虏伯钢制大炮的使用以及协调有序的动员。这标志着欧洲均势的结束，而英国与法国此前已经主宰了欧洲半个世纪。如今，德意志帝国正在崛起。德国占领了阿尔萨斯（Alsace）和半个洛林（Lorraine）地区，而法国将试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其赢回来。德意志如今在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国

王统治下正式统一；它在1871年1月成为一个单一国家。与此同时，意大利占领并兼并了教宗辖地（Papal States），这片领地自从8世纪起就处在教宗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此时已经失去了拿破仑三世的保护。欧洲的大国格局每年都在发生变化。

在战争过程中，革命派巴黎公社在1870年9月4日发动政变，使得法国成了一个共和国。[42]法国皇后欧仁妮（Eugénie）前来英格兰避难。心怀同情的维多利亚前去接见她，并且详细地记载了她的逃离过程和心中的恐惧——从那位认出戴着帽子和斗篷的她并大喊“上断头台！”的流浪儿，到挤在马车里行驶在颠簸的道路上、如地狱般难以忍受的旅途等，不一而足。[43]不列颠群岛再次躲过了革命；他们敦实的女王没有面临任何危险。

随着年龄的增加，维多利亚渐渐变得更加倾向于保守主义。年轻时，她曾经对查尔斯·狄更斯所描述的穷人的生活产生过强烈的兴趣，但并没有对造成贫穷的原因产生过兴趣，还经常指责那些对造成贫穷的原因进行抗议的人。她在1870年对第一项《爱尔兰土地法案》表示支持，该法案规定佃户的产权如果发生任何变化将得到补偿，但她又匆忙向首相指出，“明显缺少对地主的同情”[44]。她写道，将问题的“全部责任”归于地主很不公平，佃户们不应就此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女王承认这些问题是由僵化的阶级差异造成的，但她并未就解决方案提出过建议或者思考，而换作阿尔伯特的话是会这么做的。）

这并不意味着女王不愿看到穷人的境遇有所改善。[45]当她在1870年会见查尔斯·狄更斯时，她将他描述为“非常和蔼可亲，声音和举止令人愉悦”。当3个月后狄更斯在58岁的年纪去世时，维多利亚写道：“他有着广博而充满爱心的思想，对穷苦人民有着强烈的同情。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各阶层之间将实现更亲密的氛围和更团结的联合。我真诚地祈祷它能实现。”[46]然而，女王并没有就有可能消除贫困的措施提

出任何建议或者思考，而她的丈夫在世时是会这么做的。

维多利亚更喜欢逃避而非探索。她撰写了一些大受欢迎的书籍，描述她在苏格兰度过的时光——例如1868年出版的《我们高地生活的日记节选》以及1884年出版的《更多节选》（*More Leaves*）——主要讲述的是家庭生活，并且温馨地聚焦于她的家人，这些书籍还助长了认为她无所事事的看法。不过，正如阿瑟·庞森比指出的那样，维多利亚仍然一如既往地固执己见：

> 不需要进行多少研究就能找到这样一个日子，她在那天的日记中记录了某起毫无趣味、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在她那天的信件中，你还能找到一封写给首相或者私人秘书的信件，用她最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她想要干预某件国家大事的愿望。不过这些全都被排除在了她的信件集之外，公众——包括激进派，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包括共和派——也感到很满意，因为一个整天傻傻地沉湎于苏格兰休憩生活的君主不会产生多少危害。[47]

作为单亲妈妈，她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孩子福祉的重要性。她与深受她喜爱的薇姬之间仍保持通信。在伯蒂与温柔、优雅的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成婚后，她和伯蒂的关系也回暖了，不过，她在赞赏他受人欢迎的同时，也警告他要注意自己急躁、鲁莽的行为。居住在诺福克（Norfolk）桑德灵厄姆府（Sandringham House）的伯蒂还是过着喝酒、赌博、追求女性的日子，而他的妻子则经历了一系列疾病和怀孕。女王试图对伯蒂采取的控制以及亚历山德拉的社交生活成为许多人闲聊的话题。[48]

1869年，伯蒂一位绯闻情人——哈丽雅特·莫当特（Harriet Mordaunt）——的丈夫揭露了他的不端行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丑闻。伯蒂坐在桌前给母亲写信时心里出现了一阵毛骨悚然的感受，他想起了父亲临死前对内莉·克利夫登事件是多么失望。1870年2月10日，他给女王写信说：“我痛苦地感到有责任通知您（我之所以称‘痛苦’，是因为您在知道您的长子被迫在法庭上出庭作证后一定是这样的感受），我已接

到C.莫当特爵士之律师的传唤，将于下周六在彭赞斯勋爵（Lord Penzance）的法庭上出庭作证。”[49]女王对自己的儿子给予支持，并且相信他是无辜的。W.E.格莱斯顿首相也有样学样。在伯蒂出庭发表了信心满满的证词后，法官宣布哈丽雅特是疯子。伯蒂接下来继续无忧无虑地狂欢作乐、追求女色。他丝毫不担心针对他的污蔑中伤，但他还是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放荡者。

维多利亚如今关心的是她年纪居中的几个孩子。26岁的阿菲常年酗酒，而且纵情于一名他在马耳他驻扎期间认识的年轻女子。他的母亲不相信他表现出的冷淡态度，并且觉得他“敏感、暧昧又任性”[50]。不过，她和27岁的爱丽丝实现了某种形式的重修旧好。维多利亚批评海伦娜生出的孩子“过于普通”[51]，批评她总是生病、身材矮胖，而且看起来比她24岁的年纪要老。[52]露易丝的婚姻令人担忧且毫不幸福。聪明的利奥波德竭力忍耐着他被困家中的生活，顽强抵抗着反复出现的大出血和腿伤。他的兄弟姐妹们认为母亲对他们这个病体缠身、行动受限的兄弟保护过度，并且提出了抗议；维多利亚却坚定地认为，他们不应该纠结于利奥波德错过的事情，而应该去想想他仍然能够做些什么。她觉得，她的孩子们毫无感恩之心，而且非常愚蠢地不愿接受她的建议。[53]同时身为一家之长和一国之主对一个人来说几乎难以承受。伯蒂还如此令人失望，简直太糟糕了。

最小的孩子们仍然温柔可爱。阿瑟即使到了20岁仍然跟父亲长得很像，只有在把头发弄成中分时才会让母亲感到烦恼。[54]13岁的比阿特丽斯是最受宠爱的，也是维多利亚最想留在家里陪自己的孩子。维多利亚试图推迟她的成年，阻止她夜间外出，并且尽可能地延后了她进入社交界的舞会。维多利亚哀伤地写道：“她是我身边仅存的孩子，没了她我活不下去。”[55]孙辈们嬉笑着在她的宫殿里跑来跑去，维多利亚十分宠爱他们——尤其是那些长得漂亮的孩子——同时也抱怨说他们怎么那么多。在她的孙辈身上，她体验到了收益递减效应：她只对其中两三个

孩子感兴趣，但是“当他们每年都要多出三个来时”，她对身为母亲略带歉意的薇姬说：“生孩子这件事成了我的孩子的焦虑来源，没有什么兴趣了。”[56]

在阿尔伯特去世后的10年里，维多利亚变得越来越自私。她无法抑制的悲痛和抑郁导致她通过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事情——甚至连外交事务最初也是依照对她思想状态的影响来评估的。那些最适应她需求的人，例如约翰·布朗和比阿特丽斯，会受到称赞，而那些不适应的人，例如格莱斯顿，会被拒之门外。[57]她怪自己的孩子们不理解她的重担。当女儿露易丝订婚时，维多利亚一点也不为她感到高兴；一想到又失去了一个女儿，她就难过。[58]当阿菲在圣彼得堡举行婚礼时，她拒绝前往。她写信给薇姬说，孩子们结婚时只会让她感到抑郁。这是她错过的第一场自己孩子的婚礼，但她向薇姬承认说：“我现在非常讨厌出席婚礼，觉得婚礼既悲伤又痛苦，尤其是女儿的婚礼。”[59]她还错过了外孙威利在普鲁士的坚信礼。当威利的母亲薇姬表示抗议时，维多利亚回答说：“我很累。”[60]

女王的坦率还用在了前来她宫廷做客的贵宾们身上。例如，当她接见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时，她将他描述为“一个长相奇特、行为古怪的苏格兰老头，声音有气无力得令人感到忧郁，还带着显著的苏格兰口音，喜欢滔滔不绝地讲述苏格兰以及一切堕落的事情”。[61]（他反过来对她“和蔼的微笑”和她“相当迷人”的外表进行了一番夸张的赞扬。他对自己的姐姐说，不可能“想象一个比她更有礼貌的娇小女子了”。[62]）

到1870年，人们开始用一种近似恐慌的态度来看待维多利亚。他们如何才能让她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她的孩子和大臣们都持有同样悲观的看法：她的避世隐居正在伤害君主制度。[63]她远离人们视线的时间越久，她的臣民们对她的喜爱就越少。庞森比感到很沮丧：“如果她既不是行政首脑也不是荣耀源泉，更不是展示焦点的话，那王室的尊严将

荡然无存。”[64]甚至连迪斯雷利也很郁闷。他担心君主制度会面临危险，这种危险并非来自任何共和运动或者战争，而是来自“威信的逐渐流失”：女王已经让人民认为即使没有她，他们也能过得很好。[65]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对君主的喜爱是不会自动恢复的，反而有可能因为她的缺席而被耗尽。

1871年底，维多利亚身体抱恙——这是她自从少女时期罹患伤寒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生病。她仍在康复时，伯蒂突然发起了高烧，症状与10年前阿尔伯特的病情诡异地相似。整个王室都陷入了恐慌。维多利亚三次赶往伯蒂与阿利克斯一同居住的桑德灵厄姆府，希望能亲吻到他退烧的额头。她忧心忡忡地站在他房间里的一扇屏风后面，仔细聆听着他的呼吸。她从未像那段日子那样爱过他，她甚至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失去他。[66]成千上万的信件和电报纷至沓来；公众的悲伤情绪也很强烈。人群拥挤在报馆周围，等待着最新消息。[67]牧师们在礼拜日布道中向上帝祈祷，祈祷伯蒂能够活下来。在失去重要亲人的悬崖边摇摇欲坠的王室赢得了整个国家的好感。正如英国人一直到阿尔伯特死后才认识到他的天赋一样，一份报纸沉思地说，或许伯蒂也是如此。他拥有另一种天赋，虽然不够聪明，但更有亲和力：在履行仪式性职责时表现出的亲切感，“对体育运动的英国式热爱”，以及一种对王室而言非常有用的性格特点：“显然他很愿意应邀参加任何人举办的奠基仪式或者市集开业典礼。”[68]

伯蒂能够活下来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心怀感激的维多利亚写道：“我们都感觉，如果上帝饶恕了他的性命的话，那一定是为了让他开启一段新生活。”[69]格莱斯顿抓住机会利用了人们对君主制度再次燃起的喜爱之情，建议于1872年2月27日在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举行一场激动人心的感恩仪式。维多利亚在教堂里感觉很无趣，而且觉得圣保罗大教堂“又冷、又沉闷，还很昏暗”[70]，但顶着寒风在阴沉的天空下站在教堂外的数百万民众发出的呐喊声让她产生了得意

扬扬的感觉，她拽起伯蒂的手激动地挥舞。《泰晤士报》郑重地宣称，那一天对伦敦人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天”[71]。他们希望向女王展示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受到爱戴。他们由于看到她本人而产生的喜悦与伯蒂的康复一样都是值得庆祝的理由。

这一时刻揭示了一个伯蒂迅速领会到的道理，而他的母亲从未领会过：英国公众需要仪式和盛典，需要有机会能够一瞥身着盛装的君主。她的臣民们热切盼望的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时常现身的女王。正如哈利法克斯勋爵所说，人民希望他们的女王看起来像一个女王的样子，头戴王冠、手拿权杖：“他们希望自己花的钱能够物有所值。”[72]女王觉得这样令人烦恼，但她的儿子却本能地理解了这种表演的重要性。他站起身向整个国家挥手、鞠躬，而他的母亲则希望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一如既往地爱戴她。

仅仅两天后，维多利亚就在乘车进入白金汉宫时再次遭到枪击。凶手很快就被布朗抓住喉咙并被迫松开了手枪，她则将一切归功于布朗的“精神集中和行动敏捷”——“只有布朗一个人看到他在周围晃悠并对他产生了怀疑”。[73]为此，她创立了一个新的奖赏类别——“维多利亚忠诚服务勋章”，以奖励“向君主忠诚献身的非凡行为”，勋章由黄金制成，一面上还刻着她的头像。（布朗似乎是这一勋章的唯一获得者。[74]）她还心满意得地在他宽阔的胸前别上了一枚银色勋章，以表彰他“长期忠诚的服务”。[75]布朗不仅仅复苏了她对生活的热情，还救了她的命，当他们在苏格兰高地策马扬鞭之时，这种想法一次次在她的脑海中浮现。[76]

* * *

维多利亚仍然十分渴望回到她空间越来越小的家中。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变得越来越内向，对噪音的讨厌也几乎能够比得上她对炎热的讨厌了。孩子们大喊大叫的声音让她感到烦躁，她也已经相信，她的神经

在因为工作、焦虑和叛逆的孩子而变得十分紧张后，已经永远也无法复原了。[77]她给薇姬写信说：

>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难——你的处境一点也不容易，但我的处境也充满了考验和困境，以及令人不堪重负的工作——需要的是我永远也无法获得的休息。这个庞大的家庭有着越来越多的人数和利益，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我必须给自己增加的负担。由于缺少一个丈夫兼父亲的角色，因此让所有人满意（完全不可能做到），保持公正公平以及和蔼可亲，以及还要经常保持沉默的工作对我而言要求太过苛刻，十分令人恐惧。[78]

唯一能够让她获得彻底休息的地方是被称作“格拉斯奥尔特希尔”（Glassalt Shiel）的小别墅，它位于苏格兰高地墨黑色的米克湖旁，隐藏在湖边雪山的冷杉林中。[79]

渐渐地，她的力量恢复了。她再次开始跳舞、旅行。她甚至再次鼓起勇气看起了活页乐谱，而她的双人二重奏钢琴谱经常让她回想起阿尔伯特。最终，回忆给她带来的快乐超过了痛苦：“过去似乎以一种奇特又美妙的方式向我袭来。”[80]

维多利亚很少梦见阿尔伯特。相反，她经常梦见自己的母亲。她写道：“已婚生活已经完全结束了。我觉得这是我又一次产生自己与她一同居住的感觉的原因。”[81]在1871年她52岁生日那天，维多利亚写道：“孤单一人，一如既往。”[82]她没有丈夫，作为统治者和母亲也没有正式的伴侣。但她却拥有布朗，一个与她的关系超越了任何分类的男人：最好的朋友、参谋、亲信、伴侣、知己。维多利亚经常对布朗说：“没有人比我更爱你。”[83]

他会严肃地回答说：“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他比她的孩子跟她更亲密，据亨利·庞森比所说，他也是唯一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并且说服女王去做不愿做之事”的人。[84]当她生病时，她连儿子和女儿都不叫，却会把布朗叫来。维多利亚的财务经理（王室私库管理人）托马斯·比达

尔夫抱怨说，如果她的家人前来的话，“会让她立刻死掉的”。[85]正如她向薇姬解释的那样：

> 当一个人挚爱的丈夫去世、孩子成婚后——就会感觉一个朋友，一个能够将自己的忠诚献身给你的朋友，是你继续走下去所需要的唯一的东西——他会完全支持你。并不是说你对孩子的爱会有所减少——但你会感觉，随着他们渐渐长大成人、各自组建家庭，你对他们的用处就不多了，他们对你的用处也不多了（尤其是在上层阶级）。[86]

1877年1月1日，维多利亚给布朗寄去了一张贺卡，卡片的正面是一位家庭女仆的画像。她在贺卡正面写道：“致我最好的朋友JB/来自他最好的朋友V.R.I.”[87]贺卡里这样写道：

> 我派我的女仆
>
> 带来新年贺信，
>
> 信中话语将证明
>
> 我的信念与挚爱
>
> 你是我心里最珍贵的宝藏，
>
> 对她微笑一如对我微笑
>
> 让你的答案充满爱
>
> 并且给我带来快乐。

布朗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

[1] Wilfrid Scawen Blunt’s diary，引自 Lambert，*Unquiet Souls*，41。

[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April 5 1865，Fulford，*Your Dear Letter*，21.

[3] “我亲爱的小马驹走起路来很优雅，就像猫一样，布朗抱着我骑上去，沿着石板路一直走的方式也很值得称赞。”（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4，1860.）

她称他是“如此思虑周全、充满干劲，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向导和仆人”，（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8，1860.）还有“布朗用他强有力的臂膀一路上很好地帮助了我”。（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0，1859.）第二天，在爬山时，“石楠花长到了膝盖那么高，路上坑坑洼洼，滑得很，石头有两三英尺高，需要爬过去。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没有布朗的帮助也爬不上去……下山是一件好玩且有趣的事，孩子们什么也没做，不断地滑行、翻滚，每走一步都欢声笑语。下山的路既陡又滑，布朗用尽全身力气支撑着我。”然后“下山要轻松多了，但有些地方路很不好走，我不得不依靠布朗强劲的胳膊来支撑我”。（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8，1874.）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3，1850.

[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4，1871.

[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12，1870.

[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3，1872. See also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31，1872.

[8] Kuhn，*Henry and Mary Ponsonby*，97.

[9] 1866年，当拉塞尔勋爵即将辞职时，维多利亚正在苏格兰。弗雷德里克·卡文迪许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女王一直待在巴尔莫勒尔，难辞其咎。”因为她在那里什么事也决定不了。（June 22，1866.）三天后，她说，维多利亚留在苏格兰这一“糟糕的错误”“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以及下流的传言。”（June 25，1866.）Cavendish，*The Diary of Lady Frederick Cavendish*，10.

[10]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71.

[11]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126.

[12] Cullen，*The Empress Brown*，10. 他使用的引文是Tisdall，*Queen Victoria’s John Brown*。这本书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书名为*Queen Victoria’s Mr. Brown*。需要提到的是，维多利亚在1861年致信利奥波德称，布朗“把我照顾得很好，结合了马夫、侍从、助理与女仆的工作，我可以说，他在斗篷和披肩方面用处很大”。Cullen，*The Empress Brown*，49.

[13] Cullen，*The Empress Brown*，12.

[14] Queen Victoria to Vicky，September 26，1859，Fulford，*Dearest Child*，211.

[15] 老练的庞森比曾是阿尔伯特的侍从，在1870年被任命为女王的私人秘书。作为一名自由党人，他将与妻子一起在王室内发挥巨大的民主影响。她的妻子玛丽·布尔蒂尔（Mary Bulteel）倡导女权主义，聪明得让女王觉得有点吓人。不过，女王对庞森比渐生依赖，并且赞赏他对布朗的宽容——他曾将布朗称作“自然之子”。——作者注

[16] Cullen，*The Empress Brown*，170，citing Bolitho，*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17]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126. “在传递信息时，他的礼仪从来没有过任何减弱。当朴次茅斯市长前来请求女王参加一场志愿者检阅式时，女王的私人秘书向她转达了这一请求，并且希望得到私下答复，以便以礼貌的方式传达给那位市长。在他们一同坐在侍从室等待时，布朗探了个脑袋进来说，‘女王说了，当然不行’。于是事情就这么结束了，那位市长垂头丧气地走了。”

[18] 有一次，布朗打了利奥波德并对他大喊大叫，残忍地惩罚了他，孤立他，并且把他的狗牵走了。Ridley，*Bertie*，135；Downer，*Queen’s Knight*，178-84.

[19] Cullen，*The Empress Brown*，123.

[20] Queen Victoria to Vicky，November 13，1861，Fulford，*Dearest Child*，365-66.

[21] 认为死者的灵魂可以和生者交流。——译者注

[22] Cullen，*Empress Brown*，12，26.

[23] Cullen，*Empress Brown*，12.

[24] Cullen，*Empress Brown*，91.

[25] Williams，*The Contentious Crown*，34.

[26] July 6，1867，Vincent，*Disraeli*，*Derb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313.

[27] Longford，*Victoria R.I.*，326.

[28] 最早提到婚姻以及可能的儿子一事是在1866年的《洛桑公报》（*Lausanne Gazette*）以及1867年的《廷斯利报》（*Tinsley*）和《战斧报》（*Tomahawk*）上。

[29] Lambert，*Unquiet Souls*，41. 兰伯特还在42页提到，布伦特还曾写到一个名叫罗顿勋爵（Lord Rowton）的人，他曾以蒙塔古·科里（Montagu Corry）的身份担任迪斯雷利的私人秘书多年，并且经常造访王室居所："他谈了很多女王的事情，让我惊讶的是，他认为她对约翰·布朗的喜爱中有重要的性成分。关于这种关系，他提到了女王委托贝姆为布朗制作的雕像，这恰恰是XX［布伦特通常以此来指代凯瑟琳·沃特斯（Catherine Walters）］对我说的，贝姆亲自指认与她有关的东西。因此，我猜测这肯定是真的。"（Wilfrid Scawen Blunt diaries，January 28，1902，cited in Lambert，*Unquiet Souls*，42.）兰伯特补充了一个脚注："就其本质而言，这种猜测很难找到证据来证明。我能获得的唯一的其他证据来自一名大学教授，他在温莎城堡档案馆工作时无意间找到了一堆维多利亚女王与男仆之间的通信。从这些信件中，他推断两人的关系绝对不是柏拉图式的。"

[30] 刘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写道："庞森比夫人几天前对H.S.［内政大臣］说，麦克劳德小姐（Miss Mcleod）宣称，她的哥哥诺曼·麦克劳德（Norman Mcleod）在临死前向她坦承，他主持了女王与约翰·布朗的婚礼，并且补充说，他一直对此深表忏悔。麦克劳德小姐没有理由编造这种故事，因此我几乎愿意相信它，尽管它听起来不太可能且十分可耻。" Lord Harcourt diaries，February 17，1885，Bodleian Special Collections，MS Harcourt dep. 365.

[31] Sir James Reid's personal diary，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32] 里德夫人认为"它"是维多利亚在跌倒时出现的瘀青。Correspondence with Michaela Reid，April 3，2016.

[33] Longford，*Queen Victoria*，62.

[34] Sir James Reid，notebooks，vol. 25 （1904-5），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诺利勋爵（Lord Knolly）在1905年5月9日给詹姆斯爵士写了一封信，用的是一张带有白金汉宫浮雕图案抬头的白色信纸，这封信被贴在了一本剪贴簿中。信上是这么写的：
我亲爱的里德。
我把你昨天的信交给了国王。
他对于你在获得这些信件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技巧、判断力和外交手段十分赞赏，他很高兴能在下周四6时30分见到你和这些信件。
詹姆斯爵士还用蓝色墨水写了一张便笺，贴在这封信旁边：
5月11日——6：30前往白金汉宫拜会国王并交给他一个金属盒子，里面装了300多封

先女王与普罗菲特医生（Dr Profeit）的信件（关于J.B.），这是我在经历了半年的谈判后从乔治·普罗菲特（George Profeit）手里拿到的——许多信件都非常败坏名声——国王对我表示感谢——还见了诺利勋爵。

[35] 需要提到的是，亨利·庞森比认为布朗仅仅是一个仆人。

[36] Cullen，*The Empress Brown*，123.

[37] 在1866年普法战争结束，战利品被夺走后，法国的不满在整个欧洲回荡。

[38] July 16，1870，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37.

[39] Fulford，*Your Dear Letter*，322.

[40] 维多利亚与薇姬一致认为，德国人不仅仅在身体上更加优越，在“道德上”也是如此。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6，1871.

[41]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223.

[42] 维多利亚抗议说，法国人“没有感恩之心”，一次也没有为这位“不幸的皇帝”大声疾呼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5，1870.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3，1870.

[44] 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2：1926，7.

[45] 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9.

[4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11，1870.

[47]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124.

[48] Vincent，*Disraeli，Derb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198.

[49] Ridley，*Bertie*，129.

[50] Hibbert，210.

[51] Letter to Vicki，December 1，1872，Fulford，*Darling Child*，70.

[52] Fulford，*Darling Child*，44.

[53] 她对薇姬说，“对父母的感激以及对年龄和权威的尊重如今已经变了味！”Fulford，*Darling Child*，47.

[54] Fulford，*Darling Child*，25.

[55] April 16，1873，Fulford，*Darling Child*，86.

[56] May 8，1872，Fulford，*Darling Child*，40.

[57] See Fulford，*Darling Child*，39.

[5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16，1870.

[59] September 14，1873，Fulford，*Darling Child*，108. 在露易丝订婚时，维多利亚脑子里还在想着维持家庭血统纯正的想法，她写道：“当王室的规模如此庞大，我们的孩子又有了（唉！）这么多孩子时，让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与本国的一些伟大家族联姻——是对君主力量的巨大加强，也是王室与国家之间的强大纽带……除此以外，输入一些新鲜血液也是绝对必要的——否则这个家庭将在身体上不断退化。”Fulford，*Your Dear Letter*，306.

[60] July 3，1873，Fulford，*Darling Child*，99.

[6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4，1869.

[62] Fawcett，*Life of Queen Victoria*，225.

[63]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71.

[64]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21.

[65] March 15，1869，Vincent，*Disraeli*，*Derb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340.

[66] 在他被认为奄奄一息之时，《雷诺新闻报》提前发表了一份讣告，并且抨击伯蒂的一生是“连续不停地无聊取乐”。*Reynolds Newspaper*，December 10，1871，4-5. Cited in Williams，*The Contentious Crown*，74.

[67] *The Times*，December 9，1871，9.

[68] *Graphic*，December 9，1871.

[69] Queen Victoria to Vicky，December 20，1871，Fulford，*Darling Child*，20.

[7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27，1872.

[71] *The Times*，February 28，1872，5.

[72]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72.

[73]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rch 4，1872，Fulford，*Darling Child*，33.

[74] Cullen，*The Empress Brown*，158.

[75]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rch 13，1872，Fulford，*Darling Child*，34.

[76] “听说女王要出门，又看到约翰·布朗拿着一个篮子，女王的一个未婚侍女问道，他拿的是不是茶叶。他回答说：‘不是，她不太喜欢茶。我们带了饼干和烈酒。’”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126.

[77] Queen Victoria to Vicky，November 3，1874，Fulford，*Darling Child*，160.

[78] Fulford，*Darling Child*，209.

[79] 她在米克湖畔的别墅躲了起来，例如，1877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干扰的消息让它成为世界上唯一我可以彻底休息的地方。”Fulford，*Darling Child*，269.

[8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9，1876.

[81] September 3，1873，Fulford，*Darling Child*，106-7.

[8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4，1871.

[83] Cullen，*The Empress Brown*，216. 在布朗死后，维多利亚从1866年的一篇日记或者日志中摘抄了一份节选出来，这份节选后来在休·布朗的遗物中找到。“我亲爱的约翰·布朗经常说：‘你没有比布朗更忠诚的仆人了’——噢！我也是这样的感受！经常我会对他说，没有人比我更爱他，他也没有比我更好的朋友，他回答说‘你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84]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128.

[85] Cullen，*The Empress Brown*，131.

[86] Longford，*Victoria R.I.*，354.

[87] Cited in Longford，*Victoria R.I.*，456.

24 仙女王觉醒

女王说：“我不明白你所说的你的路是什么意思，这里周围的所有道路都属于我。”[1]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多么大的勇气！多么强的力量！多么旺盛的精力！[2]

——本杰明·迪斯雷利谈维多利亚女王，1879年11月26日

1875年6月的一个上午，维多利亚在弗罗格莫尔庄园（Frogmore Cottage）吃早餐时注意到了温莎城堡地面上蜂拥而来的“众多小青蛙”。[3]它们有数千只之多，“在草坪和道路上跳跃、爬行，看起来数量还在增加……让草坪看起来就像是活的一样！”深感恐惧的她命令仆人们清理道路长达几个小时，直到道路上完全没有这些“恶心”生物的痕迹为止。这些小青蛙会让她的皮肤产生刺痛感。一名自然学家对她说，这些青蛙们远道而来是为了在温莎城堡的池塘里繁育后代，很快就会消失，就像蝗灾一样。维多利亚虽然后来曾不遗余力地拯救一只老乌龟的生命，并且一想到狗狗们遭遇疼痛就流眼泪，却仍然觉得这些青蛙看起来“非常令人不快”[4]。

一年之后，青蛙消失了。温莎城堡的道路被清理干净，草坪和树篱也被修剪整齐。女王的生活既秩序井然又温馨舒适；她让自然和世界都屈服于她的喜好。但是，她周围的政治版图却在迅速发生变化：土耳其帝国正在衰退，奥地利对欧洲的掌控渐渐减弱，统一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影响力不断增加。土耳其雇佣兵对发动叛乱的保加利亚人（他们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犯下的残暴的血腥罪行让整个欧洲都感到令人作呕。1876年7月，俄国诗人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在一趟前往

圣彼得堡的列车上写下了一首诗，题为《温莎城堡的槌球游戏》，他在诗中将维多利亚喜欢击打的槌球比喻成在土耳其民兵脚下滚来滚去的保加利亚妇孺的头颅。[5]她的裙边浸泡在血水中。俄国出版社拒绝发表这首诗，担心会冒犯维多利亚；但这首诗的手抄版却广为传播。[6]

土耳其人的暴行令人毛骨悚然。保加利亚人的头颅被插在杆子上或者堆在推车上，孕妇们被开膛破肚，一排排的胎儿被插在刺刀上炫耀，孩子们被卖作奴隶或者小妾，妇女们遭到残忍强奸，许多人被锁在教堂里活活烧死。[7]一名记者写道："基督教徒的头颅就像球一样在市场里的土耳其人之间翻滚。"[8]然而，英国很少有人对这起维多利亚时代最严重的暴行产生愤怒情绪。迪斯雷利觉得它不过是"咖啡厅中的胡言乱语"[9]。女王很肯定这些故事都被故意夸大了。毕竟，土耳其人是他们的盟友。英国人已经花费了多年时间保护土耳其人的边境免受俄国蛮子的威胁。

议会在调查土耳其人行动方面动作慢得令人难以原谅。即使在暴行的残忍程度已经昭然若揭之后，迪斯雷利仍然对它们的性质进行了轻描淡写，极大地低估了公众的情绪。他计划继续向日渐衰落的土耳其提供支持，以抵抗来自俄国的入侵，主要目的是保护英国前往印度的贸易通道。他的直觉是错误的。最终是新闻媒体迫使政客们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的调查[10]——尤其是《每日新闻》在6月23日发表了一篇报道，认为死难基督教徒的数量在1.8万到3万之间。

自从500年前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周边的保加利亚后——保加利亚就位于奥斯曼土耳其北部边界的西侧——保加利亚人一直对他们的统治（主要是军事统治）愤怒不已。当他们在1876年发动叛乱时，土耳其人的报复来得非常迅速。大多数针对基督教徒的报复行为都是由"巴什波祖克"（*bashi-bazouks*）发动的，他们是一群野蛮的雇佣兵，就连他们自己都偶尔要受到其所效忠的土耳其军队的管教约束。维多利亚将他们描

述为“可怕而残暴的破坏者……脸型瘦长、胡须挺立，身上不穿制服……匕首就插在腰带上”。她很信任固执己见的迪斯雷利，但她也开始意识到这些传言之中存在一定真相。

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20多年后，欧洲病夫土耳其再次面临崩溃的威胁。东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今有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让英国十分关心：一个是他们的盟友土耳其的稳定，另一个就是土耳其领土上基督教徒的命运。[11]煽动者们强调说，欧洲其他国家应当进行干预，以保护这些基督教徒。另一方则担心这么做会让俄国有借口代表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基督徒向土耳其开战，因为他们正寻求俄国的保护。俄国仍然决心肢解土耳其，并且通过君士坦丁堡获得进入地中海的入口，而英国则决心维持土耳其的完整，以保持自身在该地区的权威和前往印度的通道。

当格莱斯顿在报纸上读到土耳其人的暴行后，如今66岁、已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并处在半退休状态的他感到怒不可遏。[12]他认为，这不仅是文明对抗暴政的斗争，而且是黑暗对抗信仰的斗争。作为一名辞职后一直从事撰写神学著作工作的基督徒，他对于其他基督徒受到的宗教迫害感到尤为愤怒。他在自己的床榻上撰写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小册子，要求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他最著名的作品《保加利亚恐怖与东方问题》（*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出版于1876年9月6日，并立刻成为畅销书。该书在出版的第一个月就卖出了20万本。但更青睐现实政治而非高尚品格和干涉主义的维多利亚称他仅仅是在“火上浇油”[13]。

格莱斯顿比迪斯雷利更懂得如何阅读民众的情绪；这一点如今十分明了。他身材匀称、智慧过人，喜欢戴领结，脸上习惯性地保持着严肃的表情。他已经在众议院任职44年，担任过多个职位。随着有关土耳其问题的辩论愈演愈烈，他迅速成为反对派中最具权威的人物。他还非常讨厌迪斯雷利：他们相互之间的鄙视和竞争成为那个世纪最激烈的政治

对抗。

到1876年，整个国家都被煽动了起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共舆论站在格莱斯顿一边，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保护保加利亚人。托马斯·卡莱尔——与约翰·拉斯金一道（他曾将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称作“两支老风笛”[14]）——领导了部分旨在反对土耳其人并抗议其在保加利亚驻军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总数多达数百场。查尔斯·达尔文向一个救济基金捐了50英镑。[15]维克托·雨果对迪斯雷利等人不屑一顾地认为这些恐怖事件仅仅是夸大其词的倾向进行了一番讽刺：“被长矛尖抛来抛去的孩子实际上只是被刺刀给刺死的。”[16]当时22岁的奥斯卡·王尔德正在牛津大学研究经典著作，并且作为一个长发飘飘、神形颓废且喜欢手拿向日葵的唯美主义者而名声在外，他给格莱斯顿寄去了一份自己写的诗，题为《有关保加利亚基督徒大屠杀的十四行诗》（*Sonnet on the Massacre of the Christians in Bulgaria*）。[17]

不过，维多利亚很生气。她进行了一番令人不可思议的思维杂技，目的是以某种方式将土耳其的暴行归咎于俄国，并且将煽动反土情绪归咎于格莱斯顿。格莱斯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麻烦制造者和叛乱煽动者”[18]。日益保守的女王斥责女儿薇姬不应对自由派事业展示同情。维多利亚的理念是，英国应当向俄国阐明，如果俄国人入侵君士坦丁堡的话，他们会保护土耳其的利益，这样大英帝国的声望就能得到维护。她的内阁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但迪斯雷利同意她的看法；他们一起在1877年8月就此与俄国人进行了秘密沟通，这一举动尤为非同寻常，因为连外交大臣都被蒙在鼓里。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20年里，对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有过很多研究，而议会内外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英国对于保护土耳其表现得更加强硬的话，俄国一开始就不会入侵了。维多利亚与迪斯雷利的核心关注点是保护英国的权力。

迪斯雷利的错误之处在于拒绝毫不含糊地在公开场合对暴行进行谴

责。他担心改善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命运有可能在国内引发问题；这会让爱尔兰人自治看起来更加符合逻辑。但是除了拆散令英国感到侮辱的三皇同盟之外，他的目标并不明朗——三皇同盟是俾斯麦在1873年组建的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该同盟的目标是控制东欧——“在迪斯雷利看来，这是对英国声望的侮辱”[19]。对格莱斯顿来说，外交政策中道德因素很重要。而对迪斯雷利来说，权力因素很重要。

本杰明·迪斯雷利是一个不太可靠的首相。他喜欢穿华丽而庸俗的天鹅绒外套，像是个花花公子一般，戒指戴在手套外面，额头正中还有一撮卷发。他喜欢留山羊胡子、在脸颊上搽胭脂，并保持着略带疲惫、引人发笑的表情。迪斯雷利利用自己的魅力进入了英国社会的核心，但他却是一个局外人（迄今为止，他仍然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犹太裔首相）。在两次出任首相的间隙，他写了一部畅销小说，题为《洛泰尔》（*Lothair*），那是他的第16部小说。在19世纪中晚期，撰写流行小说的天赋被认为是一件有些可疑的事：他没有像其他绅士们那样从事“经典、历史或者宪法研究”，反而写了一部“花哨的浪漫故事”，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故事“再次唤醒了过去的怀疑，那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外表突破传统的犹太裔知识分子，是否是带领保守党取得胜利的合适人选”。[20]

不过在1874年，迪斯雷利让他的批评者大跌眼镜。他的保守党自从1841年以来首次赢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兴高采烈的维多利亚狡黠地给薇姬写信说：“你看过有哪个首相像格莱斯顿这样遭遇过如此全体一致且势不可挡的议会解散结果吗？它显示出他有多么不受信任，不受欢迎！”[21]阿尔伯特曾经很喜欢格莱斯顿，认为他智慧严谨、信仰坚定。但维多利亚却对他表示怀疑，并且得出结论，认为他是“一场巨大灾难”。她觉得他天资聪慧，却是个糟糕的政治家，仅仅为了原则就以巨大的政治代价推动立法。薇姬认同父亲的自由主义理念，自然更加接受格莱斯顿，但即使是她也感到他有些自相矛盾且“难以理解”——一个糟

糕的政客。维多利亚真的对他的巨大声望感到疑惑不解，而在这种声望消失时，她感到欢呼雀跃："格莱斯顿先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大臣——而且非常不讨人喜欢，这很棒。"[22]

格莱斯顿还是一个孤傲而缺乏魅力的家伙。更糟糕的是，他十分无趣；从来不会说下流话或者参与八卦讨论。[23]诗人兼小说家埃米莉·伊登（Emily Eden）说，格莱斯顿不会交谈，只会说教："即使把他泡在沸水里冲洗，然后拧成一股绳，我也不觉得能挤出一滴乐趣之水来。"他的简报通常都非常复杂而无聊。维多利亚抱怨说，他对她说话的方式就仿佛她是一场公开会议似的。自鸣得意的迪斯雷利说："格莱斯顿把女王当作一个公共部门来对待；我把她当作一个女人。"[24]格莱斯顿雄辩的口才没有得到女王的注意，她也变得越来越讨厌他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他完全缺乏墨尔本、布朗和迪斯雷利表现出的温暖和亲密感。用罗斯伯里夫人的话说："格莱斯顿先生有可能是一个博学奇才，但他永远也无法理解男人，更别提女人了。"[25]

迪斯雷利理解女性。一名曾坐在格莱斯顿身边的女性声称："我认为他是英国最聪明的男人。但当我坐在迪斯雷利身边时，我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女人。"[26]这正是魅力的最重要本质：一种非凡而讨人欢喜的专注力。甚至当维多利亚与迪斯雷利产生分歧时，她仍然觉得他很有魅力，她曾对罗斯伯里勋爵说："当我们出现分歧时，他总有办法……用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说'亲爱的女士'，然后把脑袋歪在一边。"[27]对一名首相而言，维多利亚的青睐仍然足够重要；它将成为迪斯雷利所获支持的来源和格莱斯顿痛苦的根源。

在那些喜欢取悦于她、对她讲真心话并且寻求她认可的男人身边，维多利亚会犹如花朵一样绽放。阿尔伯特曾经会让人感到自己很愚蠢——格莱斯顿也是如此。但迪斯雷利却让维多利亚重拾自信。当造访奥斯本宫时，他甚至觉得她有可能拥抱他："她满脸笑意，像一只小鸟一

般在房间里四处穿行，与人闲聊。”[28]女王惦记着他的痛风，甚至请他坐下来——这是继墨尔本勋爵之后第二位获得这一待遇的首相。与墨尔本一样，迪斯雷利也在悼念自己妻子的死，他与妻子玛丽·安一同度过了33年时光。他对维多利亚产生了真挚而深沉的喜爱。[29]他在妻子死后对埃莉夫人说：“我热爱女王，或许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剩下的唯一还爱的人。”[30]

从许多方面来说，迪斯雷利都是阿尔伯特的反面。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布雷克描述他为“骄傲、派头十足、思维活跃、慷慨大方、情绪丰富、喜好争论、生活奢侈、夸张做作、钟爱阴谋论、喜欢密谋”。[31]与阿尔伯特不同，他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32]迪斯雷利在写到自己的男秘书蒙塔古·科里（Montagu Corry）时说：“我对他的喜爱超过其他任何男性，但是通常来说，除了涉及工作之外，男性社会不太符合我的口味。”[33]甚至连他的小说也主要是为女性而写的。对他来说，女性无法投票或许是一件不幸的是；毫不意外的是，他支持女性投票权这一想法。

迪斯雷利浮夸的穿着、爱炫耀的性格、对土耳其洗浴的喜爱、与男性友人之间亲密的友谊，以及对老年女性的热爱导致一些历史学家暗示他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是双性恋。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而且他的确拥有一段持久而幸福的婚姻。威廉·库恩（William Kuhn）对迪斯雷利的著作进行了语法分析，以寻找同性恋和娘娘腔的迹象，他主张，这些故事在一个同性恋需要被保密的时代实际上是一种自传体小说：一直到1861年，鸡奸行为还会被判处死刑。[34]库恩得出的结论是，迪斯雷利“拥抱了某种双重性，某种有意识的暧昧，无论是在性别上还是在情感上，他都既爱男性也爱女性”，另外，他与蒙塔古·科里之间“不仅仅是朋友关系”。在他看来，迪斯雷利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35]他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布雷克仅仅暗示，他有点像派头十足的奥斯卡·王尔德，后者在有妻室的情况下还曾与男性保持过性关系

——这种比较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

1877年春天，俄国终于入侵了土耳其，目的是向保加利亚人提供支持并团结东正教基督徒。维多利亚将其视为对她个人的羞辱。战争每过一个月，她的决心就强大一分，对俄国人的仇恨也在爱国主义的外表下日益强烈。她说：“俄国人的每一次失败都让我感到高兴。”[36]庞森比指责迪斯雷利将这场争端简化成女王与沙皇之间的一场棋局。迪斯雷利行事很聪明，他用内阁的分歧来制约女王，同时又用女王的固执来刺激内阁。[37]维多利亚将那些与她意见不一的人轻蔑地称作傻瓜或者叛徒。在她看来，她和迪斯雷利代表了“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格莱斯顿只不过是一个“情绪化的”圣战者。她开始在自己的信件中提及“不列颠之狮”，威胁说“如今雄狮已经苏醒，是会咬人的”[38]。俄国必须知道，英国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情况下参战。

在危急时刻，维多利亚的长处与短处同时显现：她忠诚、爱国，充满责任感，但与此同时，她缺少理解对手立场的能力，固执己见，并且喜欢将事情理解为善与恶之间非黑即白的史诗级斗争。她认为犹豫不决的人十分软弱、缺少决心，并对迪斯雷利说，她打算亲自去鞭打俄国人。[39]当维多利亚无法让议会屈服于她的意愿时，她感到非常痛苦。在1877年4月至1878年2月间，她曾经5次威胁退位，声称自己宁愿退位也不愿见证自己的国家“亲吻野蛮人的双足”[40]。她谴责议员们缺少爱国精神和正派作风：“身为一名立宪君主制中的女王，无法去做正确的事令人感到非常痛苦。我宁愿愉快地抛弃一切，过上宁静的退休生活。”[41]

公文如同成群的蝙蝠一般从维多利亚的城堡和别墅中飞出。迪斯雷利对他的朋友布拉德福德夫人说，“仙女（他后来喜欢这么称呼女王）每天都要写信，每个小时都要发电报”[42]。迪斯雷利和女王如今已经成了工作上的伙伴，维多利亚经常将两人并称为“我们”。当迪斯雷利获得

所在党派的支持以紧急召回议员开会、扩大英军规模并且参与直接仲裁时，她给他的奖励是公开表示支持。继她在1841年前往布罗克特（Brocket）拜访墨尔本勋爵后，她首次前往位于休恩登庄园（Hughenden Manor）的首相家中共进午餐。

在1878年夏天，维多利亚在身处巴尔莫勒尔的4周时间里共收到了1.1万封电报——大多数与东方问题有关。在那年的3月，俄国人秘密强迫土耳其接受了《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该条约创建了一个幅员辽阔得令人警惕的独立保加利亚。但6月13日举行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废除了这项条约；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迪斯雷利与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帮助下，与俄国和土耳其谈妥了新的条款，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圣斯特凡诺条约》。保加利亚实现独立，但面积更小了，威胁性不仅对周边国家更小，对英国也更小了。迪斯雷利还设法为英国夺得了塞浦路斯——虽然没有明显的合法性。他每天都要通过信件向女王汇报。虽然已有73岁高龄但仍然顽强而活力充沛的迪斯雷利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来游说、斡旋、社交，并且与喜欢喝香槟酒、身材臃肿的俾斯麦一起抽雪茄，直到协议最终达成为止，把他累得筋疲力尽。这一协议一直维持到1918年；俄国向地中海的扩张得到了遏制；欧洲暂时得到了保护。俾斯麦对他的英国新朋友称赞道：“那个犹太老家伙就是关键人物（*Der alte Jude，das ist der Mann*）。”[43]

迪斯雷利于7月16日回国，迎接他的是欢呼的人群和满堂的喝彩：这将是他担任首相期间最重要的时刻。战争得以避免，英国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维多利亚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和一束花。花朵一直是他们之间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经常会从奥斯本宫给他寄去樱草花和雪花莲，他将其称作一份“仙女的礼物”。正如在墨尔本勋爵时代坚定地站在辉格党人一边一样，维多利亚如今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支持者。在柏林会议的谈判取得胜利后，她发誓要对自由党人发动报复：“他们对国家造成

的伤害是无法恢复的，我永远也无法忘记。”[44]她年纪渐长，但力量日益增强，活力也得到恢复，而且她无意识地遵循了阿尔伯特的建议，沉浸在某种外在的事务中，以忘掉痛苦。在迪斯雷利担任首相期间，她曾三次出席议会开幕仪式。[45]而且她从来没有真正原谅格莱斯顿。

女王。教会。帝国。迪斯雷利正是这样来定义保守党的理念的，也是这样来影响未来一个世纪的保守党论述的。[46]维多利亚有如被他施了魔法的君主，他给她带来许多头衔和大量的土地，仅仅为了取悦于她。帝国的战利品是足以令人满意的奖赏。迪斯雷利设法夺取的第一样东西是苏伊士运河近一半的股份，这是1875年以400万英镑的价格从破产的土耳其驻埃及总督那里购买而来的。剩余的股份归法国所有，由于驶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中有四分之三都是英国船只（大部分是前往印度的），因此迪斯雷利抓住了这一机会，防止法国获得全部股份。第二天，维多利亚赞赏地给阿尔伯特的传记作者西奥多·马丁写道，迪斯雷利“对于英国应当具有的地位拥有非常宏大的思想和非常崇高的理想。他的思想如此伟大和恢宏，他对大小事务的理解如此迅速，比格莱斯顿要强多了”。[47]

本杰明·迪斯雷利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保守党的现代化改造。在他看来，政治必须聚焦于社会正义、改革和英国人的福祉。他的政府是一个具有社会进步性的政府，从一个属于贵族和上层阶级的保守党转变成了一个属于民主和大众的新政党。他凭借高超的策略在1867年的改革法案上击败了格莱斯顿，将选举权扩大到了所有家庭——并且给予富有男性不止一张选票——然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略微更加进步的法案。当这项法案失败后，他将其简化为家庭选举权；而当修改后的法案通过后，他因为整个改革而受到赞誉。这种大师般的政治策略巩固了他作为未来政党领袖的地位，激怒了格莱斯顿，并促成了对保守主义的重新定义。一名评论家曾说，迪斯雷利在工人阶级中看到了新一代的保守党选民，就像是雕刻家在“宝石中看到天使一样”[48]。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自

此成为英国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涌现出了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温斯顿·丘吉尔（Winton Churchill）、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和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以及近些年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等人物。但迪斯雷利既很务实，也有原则。在《第二改革法案》通过后不久，他就努力确保保守党在农村地区的席位不会受到新近获得选举权的工人阶级的威胁，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把保守党赶下台。[49]

在迪斯雷利的领导下，贫民窟被推倒，替换成了新式住宅，新的措施被制定出来，以鼓励储蓄。在1875年，他通过了一系列进步法案以保护劳工权益，强调劳工权益与财产权一样重要。[50]其中两项法律确保工人在合同条款被违反时与雇主拥有同样的追索权，并且将不诉诸武力的罢工纠察队合法化，保护工会免受谋反罪指控。《农牧地租借条例》（Agricultural Holdings Act）意味着佃农可以因对土地的改良而获得补偿。《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将铺设人行道和道路照明变成强制规定，建立了地方检疫部门，并且强制要求新建大楼安装自来水和排水系统。1878年的《工厂法案》禁止10岁以下儿童工作，而10岁至14岁儿童按规定只能每天工作半天，女性工作时间每周不超过56个小时。其他一些新的法律为城市建设工人阶级住房提供了贷款资金。[51]渐渐地，在维多利亚的注视下，英国变成了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现代的国家。

还有一些法律，迪斯雷利仅仅是为了取悦女王而大力推动的。第一项便是1874年的《公开崇拜管理法》（Public Worship Regulation Act），旨在清除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格莱斯顿对此表示反对。）第二项是1876年通过的《禁止虐待动物法》（Cruelty to Animals Act），该法强制要求研究人员证明任何对动物造成痛苦的实验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确保这些动物接受麻醉。最后，迪斯雷利强制通过了一项法案，赋予维多利亚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的头衔，尽管该法

案遭到了强烈反对，还有人指责说，这仅仅是为了确保女王在面对自己的儿媳玛丽亚女大公（Grand Duchess Marie）（她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玛丽亚坚持要求自己被称呼为“皇室殿下”（Her Imperial Highness），而非“王室殿下”（Her Royal Highness）——以及女儿薇姬时享有优先地位，她的女儿薇姬在弗里茨继承普鲁士王位后晋升为德国皇后。其他人则暗示，此举是为了让她的孩子在德国皇室中拥有更高的地位，维多利亚则称，这种说法“绝对错误”[52]。自从英国在1858年接管印度后，她就认为这一头衔已经是她的了，只是没有正式宣布而已，对这一头衔的反对让她感到困惑。毕竟，伯蒂刚刚完成了一次对印度的成功出访，他在那里虚张声势地进行了一番猎虎和猎象活动，让东道主对他着迷不已。1876年5月1日那一天，她被正式宣布成为印度女皇。这是她最为自豪的时刻之一。她用羽毛笔轻蘸墨水，仔细地签下了“维多利亚女王&女皇”（Victoria R&I）的名字。

但是，悲剧仍然在维多利亚的生命里挥之不去。她的年龄渐渐增大，如今已进入知天命之年，每过一年，丧亲之痛都会增加一分。1873年5月的一个上午，爱丽丝的两个儿子埃内斯特与弗里德里克·威廉（Ernest and Frederick William，后者也被称作弗里茨或者“弗里蒂”）正在玩捉迷藏。爱丽丝离开了他们一小会儿，把头探出门去，叫保姆过来照看孩子们。突然间，还在蹒跚学步的弗里茨走到了床边，爬上窗台，然后翻了下去，摔在下方的阳台上。他母亲的尖叫声穿透了墙壁；下方街道上的旁观者纷纷转过头来。这个身患血友病的小男孩已经不省人事。他没有摔断任何骨头，但出现脑出血，并因此夭折。

几乎就在3年后，也就是1876年，海伦娜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也出现了一系列抽搐并夭折。身处苏格兰的维多利亚心如刀绞，一直在眼前看到那个孩子的幻象，她原以为这个孩子能够痊愈的。王室埋葬了又一个小型灵柩，这次是安放在温莎城堡圣乔治教堂的地下室里。维多利亚在脖子上挂了一个装有孩子头发的盒式吊坠：为什么悲痛情绪如此绵延不

绝？她如是想道。可怜的海伦娜。还有可怜的爱丽丝。当爱丽丝的丈夫、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路易斯在1877年去世时，爱丽丝的工作量翻了三倍。维多利亚想到，自己必须为这个可怜的姑娘安排一个假期。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有孕在身的爱丽丝也仍然坚持在医院里工作，负责给士兵包扎并清洗伤口。在1878年夏天，维多利亚掏钱让整整一家人在英格兰南部海岸边的度假圣地伊斯特本度了一次假。

病魔似乎从未远离王室血脉。1878年末，位于黑森—达姆施塔特的爱丽丝一家感染上了白喉。爱丽丝仔细照看着她的5个孩子，红肿的眼睛里写满了担心。11月16日那天，她3岁的女儿梅（May）不幸逝世。不久后，爱丽丝也病倒了。当女王听说爱丽丝病倒后，她泣不成声，赶忙派遣她的医生前往黑森，并焦急地等待着报告。她向伯蒂和利奥波德征询意见，并且迷信地在蓝色房间里祈祷，那里正是爱丽丝在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照料她父亲的地方。12月14日，也就是阿尔伯特去世的日子，爱丽丝也撒手人寰：刚好是在11年后。她年仅35岁。

约翰·布朗给维多利亚带来了电报，在她不住哭泣时一直站在她身边：

> 这个贴心、多才、杰出、温柔、高尚而亲切的孩子在她亲爱的父亲生病期间以及之后以各种方式支持我、帮助我，表现得非常令人钦佩——在父亲去世纪念日这天，她竟然被召唤到父亲身边，简直令人不可思议，难以理解！[53]

悲伤拉近了家人的距离。[54]伯蒂在失去这位深受他喜爱的童年淘气玩伴后悲痛地一病不起，他口齿不清地对维多利亚说：“好人总是被带走，坏人总是留下来。”[55]仅仅三个月后，薇姬的小儿子瓦尔德马（Waldemar）就因白喉去世。薇姬再一次深受打击。当造访英国的行程结束时，她哭了起来；她希望更加频繁地前来探访，但维多利亚却不总是允准。薇姬严谨、冷静的头脑——这是阿尔伯特悉心培养的结果——

在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新角色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她心怀渴望地告诉维多利亚：“总体而言，可以说不聪明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如果经历尽可能平顺的一生真的意味着幸福的话。”[56]她的大儿子、未来的德国皇帝威廉的手臂残疾让她很烦恼，威廉也渐渐成长为一个粗鲁、可憎和无礼的年轻人。[57]

从这时起，维多利亚将开始对爱丽丝的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展示出特别的关心。她不知道的是，其中一个孩子将被指责为引发一场革命的罪魁祸首。爱丽丝的女儿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嫁给了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olas Ⅱ），并将血友病基因传给了儿子阿列克谢（Alexis）。她将受到自称圣人的拉斯普京蛊惑，因为他拥有安抚这个男孩甚至为他止血的神秘能力。

1879年，女王迈入花甲之年。她的头上终于长出了白发。她感觉自己老了，爱丽丝的死让她“失去了活力”[58]。她如今变得十分肥胖，身高似乎也变矮了。[59]卡文迪许夫人在1879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尽管身穿一身黑白礼服的女王在一场婚礼上举止优雅，但“我觉得女王陛下变矮了，是一个比以往更矮小的女子”。维多利亚坚持要求画师给她画上符合君主身份的严肃表情，但在私下里，她却非常嫌弃自己“又老又丑的脸”[60]。不过，在外孙女索菲（Sophie）的眼中，她就像是一个小洋娃娃：“我亲爱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娇小——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女孩。”[61]在她的两个男人——布朗和迪斯雷利——的热烈感情影响下，她变得更加强大。令人几乎难以想象的是，仅仅4年后，她生命中的这两大支柱将彻底消失。

---

[1] Carroll，*Through the Looking-Glass*，16.

[2] Monypenny and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6：503.

[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75.

[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75，then July 2，1875.

[5] Brown，“Henry James and Ivan Turgenev，” 112.

[6] Whitehead，“The Bulgarian Horrors，” 232. 还可参见Tedford，“The Attitudes of Henry James and Ivan Turgenev”。需要提到的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1876年10月将它从法语版的《国家》一书中翻译了过来，尽管他并不“赞同俄国人对战争的渴望”。Goldsworthy，*Inventing Ruritania*，29.

[7] 例如，参见 *Daily News*，July 13，1876。

[8] *Daily News*，July 1，1876.

[9] Hansard，House of Commons，August 11，1876，vol. 2341，col. 203.

[10] *Daily News*，June 23，1876.

[11]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266.

[1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3，1873.

[1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8，1876.

[14]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325.

[15] Patton，*Science*，*Politics and Business*，127.

[16] *Spectator*，July 23，1876，10.

[17] Varty，*Collected Poems of Oscar Wilde*，xvii.

[18] September 26，1876，Leonard，*The Great Rivalry*，169.

[19]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234.

[20] Monypenny and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5：169-70，172.

[21] February 14，1874，Fulford，*Darling Child*，129.

[22] February 17，1872，Fulford，*Dearest Child*，29.

[23] 玛丽·庞森比很喜欢格莱斯顿的政治手段，但更喜欢迪斯雷利的陪伴。

[24] Longford，*Victoria R.I.*，402.

[25] Rhodes James，*Rosebery*，112.

[26] 引自 Leonard，*The Great Rivalry*，203。还可参见Cornwallis-West，*Lady Randolph Churchill*，97。

[27] Rhodes James，*Rosebery*，64.

[28] Longford，*Victoria R.I.*，400.

[29]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3，1873.

[30] St. Aubyn，*Queen Victoria*，427.

[31] Blake，*Disraeli*，50.

[32] 迪斯雷利对马修·阿诺德说：“每个人都喜欢被人奉承，但在忠诚方面，你应该像用泥铲子一样将它垒起来。” St. Aubyn，*Queen Victoria*，427.

[33] October 1874 to Lady Bradford，Buckle，*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5：348.

[34] Kuhn，“Sexual Ambiguity，” 16.

[35] Kuhn，*The Politics of Pleasure*，11.

[36] Fulford，*Darling Child*，253.

[37] Longford，*Victoria R.I.*，411.

[38] February 20，1878，Fulford，*Darling Child*，283.

[39] 在混乱的中心是王室的新成员玛丽，令人尴尬的是，她是一个俄国人。这位俄国沙皇的女儿在1874年1月23日嫁给了坏小子阿菲。维多利亚很快就变得十分喜欢玛丽，称赞她平和的脾气和幽默的性格，尽管连她自己都没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真心喜爱她冷淡且有时还十分粗鲁的儿子。维多利亚喜欢那些能让她开怀大笑的人。她在那些年里对自己的儿媳十分同情，在女王与首相抱怨她的祖国时，这位儿

媳在英国处境艰难。但玛丽坚忍不拔且令人钦佩，因此她的出身没有人在意。

[40] Chapter 8 of Strachey，*Queen Victoria*.

[41] February 15，1878，Fulford，*Darling Child*，282.

[42] 迪斯雷利似乎是在第一次出任首相后开始使用“仙女王”这个词的。Monypenny and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6：150.

[43] Monypenny and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6：311.

[44] Longford，*Victoria R.I.*，415.

[45] St. Aubyn，*Queen Victoria*，430. 那几个年份分别是1876、1877和1880年。

[46] 参见Matthew，*Gladstone*：*1809-1898*，267。

[47] November 26，1875，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62 and 1878*，2：428.

[48] Leonard，*The Great Rivalry*，151.

[49] Leonard，*The Great Rivalry*，151.

[50] Hibbert，*Disraeli*，296.

[51] 这项颇具进步意义的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查德·克罗斯推动并启发的，他在1874至1880年担任具有改革精神的内政大臣。迪斯雷利很高兴将这些改革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5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1876.

[5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4，1878.

[54] 阿瑟被薇姬描述为“广受尊敬和喜爱”，并且是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模范王子”，他在1878年与普鲁士公主露易丝订婚，后者是弗里茨·卡尔（Fritz Carl）的小女儿。维多利亚在听说这份婚约后有些闷闷不乐——事情发生的速度比她希望的要快，她不喜欢普鲁士王室，而且她以为露易丝会更漂亮一些：她的口鼻据说很丑，牙齿也不好。March 12，1878，Fulford，*Darling Child*，284.（在回顾维多利亚于与危机之间对潜在联姻对象的讨论时，两名女性在讨论时使用的措辞之直白、近乎是

商业的态度令人惊讶——就好像他们像良种马一样被人检查齿龈——他们的身体特点被详细剖析。）但在参加婚礼时，维多利亚戴上了长长的白色面纱和“光之山”钻石，并且在阿尔伯特去世后首次穿上了宫廷裙裾。

[5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4，1878.

[56] January 3，1877，Fulford，*Darling Child*，236.

[57] Fulford，*Darling Child*，26.

[5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24，1879.

[59] 格莱斯顿对妻子说，维多利亚体重为11石8盎司，“就她的身高来说是挺重的”。St. Aubyn，*Queen Victoria*，335. See also Bassett，*Gladstone to His Wife*.

[60] August 4，1875，Fulford，*Darling Child*，187.

[61] Fulford，*Darling Child*，144.

第五部分 女王，女皇



25 足以杀死任何人

光是女王就足以杀死任何人。[1]

——威廉·格莱斯顿

至于不满何时会固化成憎恶，很难确定一个精确的时间。但对维多利亚来说，1880年起码是一个她对格莱斯顿的不满转变成毫不掩饰的敌意的年份。在1880年4月，一份电报带着迪斯雷利在议会大选中失利的消息，抵达了她正在度假的德国巴登—巴登（Baden-Baden）。迪斯雷利没有准备好迎接这样的结果，也没有提前给他的仙女王打好预防针。她对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说："这是一份糟糕的电报。"庞森比对于她的用词也感到大吃一惊。[2]迪斯雷利写道，他备受打击："他与陛下您的关系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快乐和兴趣所在。在他孤独无依时，它们会不断涌现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启发他、支撑着他。"维多利亚心情沉重地回复说，她希望他们之间能够继续相互通信，"探讨许多私人话题，不要震惊或者冒犯任何人，更好的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她以前也跟墨尔本这样做过。严格来说，这么做是不合法的，破坏了君主不与反对党成员通信的传统，因为这种做法会被视为对政府的危害。）

比失去迪斯雷利更糟糕的是格莱斯顿有可能取代他的想法。维多利亚在那个月晚些时候心事满满地回到英国：她如何才能阻止"人民的威廉"成为人民的首相？她对迪斯雷利说，她不可能召见格莱斯顿并要求他组阁，"因为我只能说，我无法信任他，也无法给予他我的信心"。[3]（严格来说，她也没有义务这么做，因为他在此之前已经辞去了自由党领袖职务。）亨利·庞森比反复对她说，她必须召见格莱斯顿，但维多利亚花了好几天时间与其他自由党人磋商，试图避免这么做。4月4日那天，她写道："她宁愿退位也不愿召见或者与那个即将毁掉一切、成为

独裁者的疯狂煽动者有任何交流。除了她自己以外，其他人也许会屈服于他的民主统治，但女王坚决不会。”[4]又一个自艾自怜的回合开始了：一个“再也不年轻”的寡妇真的必须接纳一个曾经是政府敌人的人吗？[5]

但是与另外两个共同承担如今已执政的自由党领导职务的候选人相比，格莱斯顿年纪更大、更有魅力也更有权威。两人都拥有拒绝权：他们分别是下议院自由党领袖“放荡哈蒂”（“Harty-Tarty”）哈廷顿勋爵与上议院自由党领袖“没种的”（“Pussy”）格兰维尔。迪斯雷利在4月21日辞职后花了两天时间与维多利亚商量他的继任者问题，并且建议她召见哈廷顿。在哈廷顿表示自己无法在不让格莱斯顿担任内阁大臣的情况下组阁后，维多利亚要求他去询问格莱斯顿是否愿意在哈廷顿麾下任职。格莱斯顿很“震惊”竟然被问到这个问题：很明显，他在大选中非凡的演说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应当成为首相。维多利亚不情愿地求助于格莱斯顿的密友格兰维尔（因为他曾经反对那项让她成为印度女皇的法律）。格兰维尔对她说，格莱斯顿得到了英国公众的支持，并且向她保证，这个德高望重的元老不太可能领导政府超过一年时间。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维多利亚最终在4月23日没好气地传召格莱斯顿前来温莎城堡。[6]他后来中肯地表示，她用“一种毫无差错的完美礼节”迎接了他。[7]格莱斯顿对她说，他想要身兼首相与财政大臣两个职务，她虽然感觉这有点过分，但并未表示反对。维多利亚随后对他在苏格兰竞选运动中使用的抨击迪斯雷利的一些“尖锐措辞”进行了一番斥责，并且试图将哈廷顿任命为陆军大臣，但未能成功。85天后，她的私人秘书庞森比对她说，格莱斯顿想要任命激进派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共和派的查尔斯·迪尔克爵士为内阁大臣。维多利亚态度坚决地对庞森比说，她必须“对两人的观点感到放心”，才会同意让他们成为内阁大臣。[8]她已经给了庞森比一份特别清单，上面列出了给格莱斯顿的命令——他不能改变外交政策，也不能改变英国对印

度的统治，或者削减预算开支、增加“民主倾向”[9]。不过，格莱斯顿在与女王进行了尴尬的会面后，还是写道：“总而言之，我感到很高兴。”[10]

在他们温莎会晤的那个寒冷夜晚，天上的星星显得格外明亮。风吹过她窗外的树木，发出沙沙的声响。维多利亚盯着格莱斯顿粗犷的面庞，思索着他会占据首相职务多久。他已经70岁了，比维多利亚年长10岁，但仍然充满了精神和活力——这与当时75岁的迪斯雷利截然不同，迪斯雷利在任职首相期间一直健康状况不佳。不过，她仍然安抚迪斯雷利说，格莱斯顿看起来“病得很重，年纪很大，形容枯槁，声音也虚弱无力”，他还跟她说了两次，他不会任职首相太久[11]——但这个承诺他却没有实现。

迪斯雷利难以阻止自己的失败。整个国家的情绪已经发生了转变，他在《柏林条约》中取得的胜利已经被人遗忘了。英国赢得了最近在阿富汗和南非发生的战斗，以维持和扩大他们庞大的帝国，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斗中出现了许多重大伤亡。更重要的是，在经历30年不间断增长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在1877年，失业率为4.7%；到1879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1.4%。[12]农民们艰难度日，但迪斯雷利却拒绝采取维多利亚统治初期被取消，并且已经在邻国纷纷恢复的那些保护性措施。迪斯雷利给利顿勋爵写信说：“这个国家的苦难是我所领导的政府倒台的原因，而且是唯一原因。”[13]在公开场合，他表现得很乐观，但在私下里，他却十分泄气和疲惫。

格莱斯顿还采取了一种令人震惊、前所未有的竞选策略。他开创性地在苏格兰进行了美国式的竞选活动，在一系列大型公开集会中直接向成千上万的民众发表演讲，这次竞选后来被称作“中洛锡安竞选”。他发表了鼓舞人心、强有力的演讲，抨击迪斯雷利，尤其聚焦于他“有害的”外交政策，格莱斯顿认为，这种外交政策践踏了小国的权利，擅自

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格莱斯顿大声说道，在非洲，有1万名祖鲁人被杀害，“他们的过错仅仅是试图用他们赤裸的身体来抵挡你们的大炮，保卫自己的壁炉和家园、妻子和家人”。[14]他还谈及“阿富汗山村里的纯净生活”。格莱斯顿主张外交政策中的美德——意味着减少干预——并成功利用了选民对现行外交政策的反感情绪。[15]

格莱斯顿主张更加温和的殖民主义，支持地方自主权和自治原则——这同样也是他在爱尔兰问题上所青睐的立场。格莱斯顿甚至承诺允许南非德兰士瓦（South African Transvaal）独立，该地区是在1877年被英国吞并的。[16]他对于英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进一步扩张持谨慎态度，并且将那些通过残暴手段获得的新领土称作“虚假的光荣幻象”。维多利亚愤怒不已：她认为战争是保护她的帝国的必要手段。[17]她不屑地将格莱斯顿斥为“美国政治演说者”[18]，并且因为他对外交政策的抨击而感觉受到了人身侮辱，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政策是她与迪斯雷利共同制定的。但是，人们成群结队地赶来聆听格莱斯顿的演讲——爱丁堡的一次集会就有2万人之众——而且有关他的演讲的报道很快就能传播开。他的侄女忍俊不禁地看到他在回家路上一反常态地“有些得意扬扬的样子”[19]。迪斯雷利则拒绝阅读他的这位政治对手的演讲。他在1876年获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并跻身上议院。

于是，英国的“老头子”[20]再次成为国家领袖。他写道：“比肯斯菲尔德主义的垮台就像是意大利浪漫小说里某些辉煌城堡的消失一样。”[21]他击败了自己的死对头。不过，格莱斯顿所缺乏的是一份详细的计划。他一心一意地想要逆转迪斯雷利的政策，以至于忽视了制定一份属于他自己的详细的立法日程。

大选失利让业已疲惫不堪的迪斯雷利大伤元气。在1881年春天，他又一次患上了支气管炎。当他裹着红色睡衣病恹恹地躺在伦敦家中，接受顺势疗法治疗时，维多利亚派去了医生帮忙诊治，还每天都给他送去

他最爱的樱草花束。当他被问及，女王是否应该前来探望时，迪斯雷利拒绝了：“不，最好不要。她只会让我给阿尔伯特捎一个口信。”[22]

本杰明·迪斯雷利在破晓前的一个小时平静地死去。那是4月19日，距离他在大选中失利刚刚过去了一年。约翰·布朗告诉了女王这个消息，他自己也感到尤为遗憾，因为迪斯雷利一直对他充满尊重。维多利亚召见了备受迪斯雷利喜爱的私人秘书蒙塔古·科里，并且问了他好几个小时她“最真挚、最亲切的朋友”的最后时刻是如何度过的。[23]甚至连格莱斯顿也说，英国、甚至是欧洲最“杰出的人”去世了。[24]

这位光彩夺目的政治家不希望举办国葬；他仅仅请求被悄悄葬在妻子玛丽·安身边，就在他位于休恩登的家中。在格莱斯顿看来，这又是一次令人讨厌的装模作样，他说：“他死后跟生前一个样。全都是做作，没有一丝真实和诚恳。”[25]但维多利亚却表示理解。甜美可爱的樱草花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志，象征着她眼中他们对过度奢侈的共同厌恶。他们都居住在插满了鲜艳花朵的家中，但两人却都对不起眼的樱草花赞赏有加。她给他的葬礼送去了许多樱草花束，还附送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最喜欢的花朵，来自奥斯本宫。”[26]格莱斯顿翻了翻白眼。（他坚持认为迪斯雷利更喜欢百合花，之所以说喜欢樱草花，只是在迁就女王。）

他们俩的名字将始终作为英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对手成双成对出现：格莱斯顿与迪斯雷利，狮子与独角兽。迪斯雷利一直到最后都对格莱斯顿充满仇恨，而且一有机会就对他发动抨击。在迪斯雷利死后，当格莱斯顿坐在桌前为他在议会中的这位对手撰写颂词时，他突然感染了痢疾。他后来对一个朋友说，发表那篇演讲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之一。格莱斯顿的问题在于，他有着说真话的强烈倾向：他真正想要说的是，不诚实的迪斯雷利利用了维多利亚臣民的“软弱一面”。不过，维多利亚还是短暂地软化了对他的态度，原因是他说了她朋友的好

话。

成为女王40年后，60岁的维多利亚终于对自己有了自信。如今，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党人，她对于在她眼中格莱斯顿政府的软弱和无能百般奚落。她对自己说，改变的不是她，而是政党：自由党已经渐渐转向社会主义，而保守党成了真正的自由派和帝国的真正捍卫者。迪斯雷利在自己一年时间的退休生涯中仍然在持续与她通信，共写了22封信。大多数信函都是私人性质的，但也有一次，他不小心涉足了违背宪法的领域。在1881年1月，维多利亚对《君主演说》——由格莱斯顿的办公室递交给她的需要由她大声朗读的文本——中的部分措辞表示反对，这些措辞声称英国士兵应当离开坎大哈。她不愿发表包含这些措辞的演讲；而她的大臣们则拒绝删掉这些措辞。在奥斯本宫举行的一场激烈的内阁会议后，部分内阁大臣威胁提交辞呈。愤怒的维多利亚说，在担当女王的这些年里，她从未受到过如此“缺少尊重”的对待。她面容冷峻地盯着内阁成员，记住了他们是如何“几乎跌跌撞撞地退出去的”[27]。

这起争议的主题很重要——女王在参加议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时是在为谁说话？当内政大臣威廉·哈考特对她说，这篇演讲实际上是“内阁大臣的演讲”时，她感到怒火中烧。迪斯雷利反驳了哈考特的说法，并且——错误地——向她保证说，他的这种说法是“一条未见于英国宪法（British Constitution）的原则”，“仅仅是议会中流传的一句流言蜚语”[28]。喜欢干预政治的利奥波德是维多利亚眼中最聪明的孩子，他同样对母亲表示支持，强调这很明显是君主的演讲。[29]维多利亚终于同意按照原样发表演讲，与此同时还在一封写给格莱斯顿的信中谴责了有关阿富汗的段落。这是又一个她强调自身权威，但未能得偿所愿的例子。

哄骗一心一意隐居的君主结束肃穆的隐居生活可谓非凡壮举。维多利亚之所以能再次成为一名积极参与政治的君主，要归功于迪斯雷利，

这最终可以说是他对格莱斯顿发起的最大报复。她重新充满活力，并且相信自己有权利干预政治，再也不说她的工作是一项巨大负担了。她甚至威胁大臣们要采取超出宪法允许范围的干预行动。她在1881年6月对格兰维尔说：“如果事情还像过去几年那样发展的话，那么立宪君主将有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0]

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下议院影响力的增强，君主在英国政治中的作用渐渐弱化成了宪法顾问的角色，但维多利亚仍然主张自己的行动空间。她在迎接一个观点基本与她相左的新首相之前竟然受到鼓励要尊重自己的判断，这一事实就为斗争创造了完美的条件。毫不意外，英国政坛的老头子认为迪斯雷利“教给学生的有点多了”。当女王坚持要求了解内阁会议的私密细节，就像迪斯雷利过去那样时，格莱斯顿却认为这种要求“无法容忍”。

就在女王争夺权力，并要求自己的意见得到倾听之时，英国女性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开始要求获得支配自己收入、与男性拥有同等离婚条件、受到保护免遭暴力，以及分享子女抚养权的权利。（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在与妻子离婚或分居后都拥有子女的全部抚养权。）维多利亚几乎无法理解这种痛苦，因为她不需要——而且也对此没有兴趣或者同情。光是操心她自己以及孩子们的个人奋斗就已经让她筋疲力尽了。[31]

消除女性是丈夫财产的思想需要耗时几十年。一直到1870年，女性挣得的所有收入都还属于她们的丈夫，而且一直到1882年，她们的财产也是如此，甚至在离婚或分居后依然如此。根据一项拥有几世纪历史的保护原则，英国法律并不将妻子视作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受庇护的女性”（femme covert），受到“丈夫或领主的保护或影响”。换句话说，妻子的地位相当于一个仆人。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第二法案》（Second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将女性确立为独立实体

——“独身女性”（femme sole）——有权利拥有、继承和租借财产，并且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渐渐地，女性赢得了更多在离婚后照顾孩子的权利；从1886年起，法官在决定女性是否可以拥有子女的部分（有限）抚养权时，将把孩子的福祉也考虑在内。

有关女性选举权的首个法案于1870年在议会进行了一番辩论。该法案遭到彻底失败，但这其中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胜利——拥有财产的女性获准可以参加校董竞选。［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ett Anderson）在1865年成为英国首位拥有医师资格的女性，她在5年后参加了所在地校董的竞选，并成功当选。］女性活动家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与从事律师工作的丈夫理查德一起在1889年组建了女性选举权联盟（Women’s Franchise League），主要目标是为女性争取地方选举的选举权。［潘克赫斯特夫妇拥有一段世所罕见的平等婚姻，他们的三个女儿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西尔维娅（Sylvia）和阿黛拉（Adela）后来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女性参政论者。］

维多利亚对女性参政论者没什么好感。她给阿尔伯特的传记作者、苏格兰诗人西奥多·马丁写信说：“女王非常焦急地想要征募任何能够发声或者写作的人一起来遏制这种疯狂又邪恶的‘女权’荒唐事，她这个可怜而脆弱的性别正执意要参与这种荒唐事伴随而来的一切可怕行径，忘了一切淑女的感受和礼仪。”她在谈到曾经参加过女性参政权集会的安伯利夫人时说，她“应该被好好鞭打一顿”。她轻蔑道：“让女性成为上帝希望的样子吧，也就是男性的帮手——但拥有完全不同的义务和天职。”[32]

女王这份工作具有欺骗性的一点在于，尽管它与国王是一样的，但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女性的工作，因此显得很合适。维多利亚支持女性“得到合乎情理的教育”以及“在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得到雇佣”，但不

支持她们从事严肃工作或者参与投票。[33]终其一生，维多利亚都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在一个奉行女性居家论的文化中，她却是一个女性权威的模范。而且，较为显著的是，在女王的5个女儿中，有4个都成了女性权益的倡议者。

维多利亚恰如其分地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特例”[34]。她反对女性掌握权力，与此同时却越来越警惕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当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对她说，一群女性强调，她们应当获得投票权，因为“很少有男人适合这份工作”时，她咯咯地笑了起来。[35]达弗林勋爵很可能也是在谈论她对伯蒂的态度——维多利亚认为自己从事领导和政治工作的能力比长子要强得多，一想到要把王位让给他，就让她感到生气。

想到年轻姑娘们要身处解剖室，面对“不可名状的”人体器官，就让女王感到反胃。她和格莱斯顿终于在一件事情上产生了共识：训练女性成为医生的想法“令人作呕”。[36]（不过，她却支持女性接受训练成为产科医生，或者治疗印度的穷苦女性患者，因为后者的宗教信仰使她们不愿接受男性的医疗救助。）

女王对那些“轻浮”女性尤为苛责，尤其是那些参与传统上属于男性的活动——例如狩猎——的人。当查尔斯·科尔夫人（Lady Charles Kerr）在骑马时遭遇事故造成头骨骨裂时，维多利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她在1872年给薇姬写信说：

> 希望这件事能够警告那些轻浮、疯狂的年轻女性，她们真的已经失去了性别特征。而且那些丈夫、父亲和兄弟们也要吸取教训，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姐妹们以如此不淑女的方式展示自己。在其他方面，这个可怜的小家伙非常安静，也不强壮——但想象一下，她竟然独自一人出去打猎，而她的丈夫还在伦敦散步！[37]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许多事情都归咎于“轻浮”女性：例如道德准则的松弛、淑女的男性化，以及导致克里米亚、印度和英国等地英

国防御力量崩坏的性病的蔓延。[38]到1864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英军士兵都因梅毒和淋病入院治疗。[39]由于遭到指责的并非士兵，而是与他们睡觉的女性，因此解决方案也很简单：陆军和海军需要干净的妓女。在1864年，第一项《传染病防治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为军队引入了官办妓院制度。

该法律还包含对在公共场合走路的女性进行监视的特别条款：警方可以逮捕任何怀疑是妓女的女性，无须证据。[40]女性有可能要经受侮辱性的性病检查，要么是在医院，要么是当场进行，并且在当地警局注册，接受定期检查（或者拘禁）。如果提出抗议的话，她们会被套上紧身束缚衣，双腿被用夹具掰开。如果一名女子被发现患有性病的话，她会被关在医院3个月。[41]在罗纳德·皮尔索尔（Ronald Pearsall）所谓“捕猎妓女的特定氛围”中，性工作者——而非她们的客户——承受了来自教会和议会的抨击。[42]这或许是维多利亚时代双重标准的最有力、最公开的例子，女性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因为性行为而受到惩罚，男性却能逃脱审查与谴责。[43]

不过，许多男人仍然将妓女视作社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托尔斯泰无法想象伦敦如果没有了“从良的妓女”会是什么样子。他在1870年写道：“家庭会变成什么样？有多少妻子或女儿会保持纯洁无瑕？人们如此愿意遵守的道德准则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这种职业的女性对于现有复杂生活中的家庭是必不可少的。”[44]离婚还很罕见，男人如果经济实力不够的话，应该推迟婚期。失业造就了大量光棍。

在当时的英国，妓女行业是诸多猜测的对象，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严谨研究。在19世纪中叶的伦敦，女性性工作者的数量预计在8万至12万之间，而伦敦的总人口约为230万。[45]很多人都染上了性病，最常见的是梅毒，他们生的孩子也感染上了这种疾病。[46]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他们使用的治疗方法都没什么效果；水银在药片、洗浴和面霜中的

大规模使用仅仅是导致牙齿掉落、肾脏衰竭、中毒以及口疮等问题。[47]（预防性手段——例如油、醋和酒精——也没什么用。）当时几乎不可能存在安全性行为——虽然在19世纪中期已经出现了避孕套，但仍然很贵——而对女性来说，控制生育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19世纪下半叶，一位名叫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的女性发起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且颇有成效的运动，反对对女性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试图揭露她眼中的伪善，即所谓道德耻辱只属于女性，而不属于追求她们的男性的说法。[48]例如，1871年的传染病防治法皇家委员会就宣称，妓女与她们的客户毫无可比性："对于一方来说，过错在于收益，而对另一方而言，过错只不过是自然冲动的不定期释放。"[49]然而，正如一名性工作者在被判入狱后所说的那样："女士，这听起来的确很不可思议，但席上这位判决我入狱的法官一两天前曾经在街上付给我几先令，让我陪他回家。"[50]

布雷斯布里奇·海明（Bracebridge Hemyng）宣称，性工作者正在"毒害国家的血液"[51]。这个国家的"社会大恶"吸引了那个时代最精力充沛、最热情洋溢的改革者的注意：致力于传播福音的基督徒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劝说妓女从良并帮助她们重获新生。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威廉·格莱斯顿，他形成了一种近乎有害的执念，想要"拯救"英国最美丽的妓女们。他是政坛中最著名的妓女之友。而且他相信，这正是女王恨他的原因。[52]

格莱斯顿是一个古怪而正直的人。高挑而瘦削的他曾经连续4个月在一座乡间别墅里砍树，同时思考脑海中的问题。他一直在自我责难，专注于打磨自己的性格，履行天赋使命，从事基督在人世间的工作。他的每一天都以祈祷收尾。他每天都会去教堂，每周都会对仆人们布道。索尔兹伯里勋爵对维多利亚说，很难想象格莱斯顿会耐心聆听布道而不"起身辩论"[53]。甚至连就餐时间也是宣传美德的良机：他主张咀嚼嘴

中食物32次——平均每颗牙齿一次——然后再吞咽。他将活到89岁，这在维多利亚时代可是个不小的成就。

至于格莱斯顿对“堕落女性”的迷恋是何时开始的，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清楚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1850年前后，那时他已经进入议会达18年之久。他从1848年开始为一家名叫“堕落女性矫正宗教教养所协会”（Church Penitentiary Association for the Reclamation of Fallen Women）的慈善组织工作，后来亲自参与矫正工作。他会连续数小时与他在街上见到的性工作者交谈，试图说服她们选择另一种人生。他会为她们阅读丁尼生和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的作品，安排画师为她们画肖像画，渐渐形成了对她们的深刻喜爱。

这位身材高挑、面容忧郁的政客尤为喜欢长得漂亮的妓女，这件事很难逃脱他人的评头论足。他在1852年将自己最感兴趣的一名妓女描述为“一半是秀美的雕像，美得不可方物”[54]。他的同僚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ere）说：“格莱斯顿将自己传教士般的干预行为与对美妙面孔的热忱欣赏结合在了一起。”[55]忧心忡忡的同僚们试图警告格莱斯顿，要他注意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但他拒绝做出改变。性工作者们称呼他为“老不正经”（Old Glad-eye）[56]。在1859年之后的5年时间里，他曾试图拯救八九十名妓女，但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他承认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抛弃了自己的悲惨生活，我可以公平地说，那是源于我的影响。”[57]

大多数传记作者都认为这些邂逅是纯洁的，驱动力源于性刺激，但不是为了完成性行为。1853年，一个苏格兰人在看到格莱斯顿与一名妓女交谈后，她曾试图勒索他，格莱斯顿向警方报案，并且毫无悔恨之意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与一名有罪之人的通常做法大相径庭。但当他的日记在1968年发表时，他又给人留下了一个更加模糊的印象。他的内心充满羞耻感，有时会在与妓女见面后鞭打自己，甚至在自己的日

记里画了一个小小的皮鞭符号（最后一次出现在1859年）。他的传记作者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说，他的“宗教—性情感危机”十分“特别，更多的是由于这种危机所产生的内疚感十分强烈，而非其诱惑性的强烈”。[58]尽管他不太可能与这些女性保持全方位的性关系，但格莱斯顿自己还是内疚地承认了这些努力的“肉欲”本质，即她们对他而言是一种性诱惑，引诱他进入了危险的领域。她们是他最大的“灵魂负担”。他写道，如果这种关系的本质不是肉欲的话，“它是不会在我心中留下如此大的空虚的。”［格莱斯顿在自己的神秘日记里描写了他与犹如塑像般美貌的伊丽莎白·柯林斯（Elizabeth Collins）相处的两个小时，称这两个小时“既奇特又可疑，还不止于此”[59]，紧接着他画了一个皮鞭的符号。他对名妓玛丽昂·萨默海斯（Marion Summerhayes）的想念“需要受到限制和消除”[60]。］

格莱斯顿在晚年时对自己的儿子说，他相信那些有关他的故事“无论真假”，一定传进了维多利亚的耳朵里，导致了她的冷酷态度。[61]他承认自己与女王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谜，我不太能够理解，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62]（他后来向自己的儿子、身为牧师的斯蒂芬保证说，他从未有过“有悖婚姻忠贞的行为”。）[63]维多利亚的敌意不太可能源于她所听说的有关格莱斯顿与性工作者的故事；她经常说，他是一个好人，却是一个软弱的政治家和一个“疯子”。

她对他的厌恶并非源于道德层面，而是发自肺腑的；她曾连续数年试图推翻威廉·格莱斯顿的政府。这与他究竟迷恋什么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与女王相处。

1886年，《传染病防治法》终于遭到废除。这部法律产生的效果差得令人觉得荒唐可笑：英军中性病患病率与1865年相比完全相同，在该法律实施的20年里没有任何变化。女性如今也不再被指责为疾病的唯一携带者，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男性。甚至有人表示，女性遭到了剥

削。有些人，例如乔治·萧伯纳，甚至勇敢地表示，是时候对这件事进行认真调查了。1893年，萧伯纳在自己所写的有关性工作者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的前言中写道：妓女行业不是由“女性的堕落”或者“男性的放荡”造成的，而是由女性“薪水过低、不受重视、超时工作”的现象造成的。[64]妓女们后来仍然是轻蔑、怜悯和欲望的对象，但针对双重标准的斗争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女性，对她们而言，维多利亚是一个不明真相、暴躁易怒的女神。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漫漫征程已经开始了。

对于这趟征程，维多利亚将起到激励的作用，但她本人却并不支持它；她像一个脾气暴躁的缪斯女神，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她的时光都用来控制男人。

男人们还在不断向她射击。1882年3月2日，当维多利亚从抵达温莎的火车上下来时，又有一个疯子向她开了几枪，当时布朗就陪在女王身边。这是她遭遇的第七次刺杀；一名列车售票员阻止了那名男子——他名叫弗雷德里克·麦克利恩（Frederick McLean）——两名当地的伊顿公学学生也开始用雨伞揍他。全英国都愤怒了。女王像以往一样欣然接受了这次袭击所引起的同情浪潮。维多利亚心满意足地说道：“看到我这么受人爱戴，即使是被人开枪击中也值得了。”[65]

弗洛伦斯·迪克西（Florence Dixie）是一名突破传统的女性。作为作家、旅行家、女权主义者和战争记者，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曾经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狩猎，纠正过查尔斯·达尔文的几个事实性错误，并且在创设英国女性足球运动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66]1880年，她在第一次布尔战争期间作为《晨邮报》驻外记者前往南非，而在此之前的1877年，也就是迪斯雷利担任首相期间，英国吞并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持有某些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即国王或者女王的长女应当有权继承王位，男孩和女孩应当一同接受教育，女

性应当被允许穿着裤装，以及婚姻应当是平等的，等等。[67]后来，她还有如宿命一般地搬到了温莎城堡附近的一栋房屋内（她被迫将自己的宠物美洲虎安置在了一家动物园里，因为它不断地猎杀了城堡周围公园里的所有鹿）。

在1883年3月的一个下午，时年26岁的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在外出散步时遇到了两名身穿长袍、头戴面罩的男子，他们将她推倒在地，试图用刀刺杀她。最终，她的圣伯纳犬休伯特（Hubert）把他们吓跑了。起初，这起袭击被归咎于主张爱尔兰共和的芬尼亚组织成员，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对爱尔兰地方自治的支持激怒了他们，不过她的一番说辞的准确性遭到了质疑。[68]

这起在距离城堡仅仅2.5英里远的地方发生的袭击案令女王感到非常不安，她给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寄去了一封安慰信，试图查清究竟发生了什么。约翰·布朗在寒冷的空气中连续数小时搜索那片区域，代替维多利亚寻找答案。他后来又花了整整一周时间负责抱着膝盖因扭伤而严重肿胀的女王四处走动。与此同时，布朗还在与重感冒做斗争。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布朗患上了丹毒，那是一种痛苦的综合症状，会导致包括耳朵和眼睑的整张脸肿胀。在温莎城堡的18年半时间里，他没有休息过一天，而维多利亚对于他无法前来陪伴她感到“十分生气”。

两天后，他就去世了。

维多利亚感到心烦意乱。她给布朗的弟媳杰茜·麦克哈迪·布朗（Jessie McHardy Brown）的信中写道：“他拥有最好、最真诚的内心。”她说，她的悲痛之情“无法控制、糟糕透顶，我不知道如何承受它，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69]在布朗去世10天前，也就是1883年3月17日，她从楼梯上摔下，并且从此无法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行走。让她感到难堪的是，从这时起，她就将不得不扶着椅背在房间里走动，或者拄着两根拐杖。她需要被人抱上楼梯，并且坐在一把特制椅子中被人从马

车抬到火车上。她的一些臣民曾经提出过不同的治疗方案——包括一位名叫卡什夫人（Mrs.Cash）的女士，她认为女王如果骑三轮车的话也许能够改善腿的病情。总是能一眼看出荒唐可笑之事的庞森比给妻子写信说：“想象一下女王骑三轮车的样子。”[70]

此时与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时的相似性十分明显。她的内心再次被人击碎，老伤口渗出新的悲哀。女王在3月30日对克兰布鲁克伯爵（Earl of Cranbrook）说，她不仅仅失去了自己“最真诚、最亲密”的伙伴，还失去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友谊。她以第三人称这样描写自己：“女王感到生命第二次变得极具挑战，对于自己如此需要的一切被剥夺感到悲伤不已。”[71]在布朗去世几天后，她对庞森比说：

> 女王正努力试图让自己忙起来，但她已经完全被击垮了，她的生命再一次遭受了类似1861年的冲击，一切联系都出现动摇和撕裂，每时每刻，这个强劲臂膀和明智顾问的离去都令人不胜唏嘘，他热心肠，喜欢使用原汁原味的欢快话语，而且在任何大大小小的场合都会表现出同情心。

人们经常以为，丁尼生是在阿尔伯特去世后对维多利亚说，她“孤独地站在可怕的高处”的；事实上，他是在约翰·布朗去世后说出这番话的。正是在这时，她终于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当丁尼生就布朗之死给她寄来安慰信时，维多利亚大受感动，甚至邀请他前来探望她。尽管他此时已经双腿打战，双眼处于半失明状态，但他对她说，他还是可以看出她有多么孤独，他发誓将利用自己仅剩的一点时间来尽可能安慰她。[72]这位垂垂老矣的诗人后来对自己的儿子说，他在与女王离别时哭了，因为“她如此充满女性气息，又如此孤独”。[73]

维多利亚致信丁尼生，对他的善意表示感谢，并这样提到布朗：

> 他的心中只有我，我的福祉、我的舒适、我的安全、我的快乐。勇敢、无私、公正廉洁、极为谨慎，敢于说出事实并向我表达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他心中“公平正确之事”，从来不说拍马屁的话，也不说那些虽然让人听起来高兴，但他觉得不正确的话……我日常生活的舒适已经一去不复返

——留下的空虚太过巨大——损失无法弥补！

宫廷公报中有25行字与布朗有关，还提到了女王受到的“巨大震动”——在迪斯雷利去世时，只有5行字与他有关。[74]钟声反复响起，风笛手被禁止在城堡附近演奏，维多利亚还下令将她和布朗在苏格兰高地远足途中得到的格子花呢，用作他灵柩的棺罩。她致力于确保布朗能够不仅仅作为一名普通仆人——也不像格莱斯顿在给她的信中笨拙地写的那样作为一名“佣人”——被人铭记。格莱斯顿没有能够意识到女王对这个男人产生的明显而巨大的好感。格莱斯顿曾希望她能够挑选一名“优秀而高效的继任者”来接替布朗的职务。但维多利亚不想要，也无法想象一个继任者的存在；对她来说，人是无法被取代的。阿尔伯特无法被取代，约翰·布朗也是如此。她的内心也许已经伤痕累累，但她不会试图去填补伤痕。

相反，维多利亚委托制作了有关布朗的领带夹、半身像、纪念碑和雕像，委托雕刻家将丁尼生的语句刻在他的墓碑上，并且修建了石冢和长椅来纪念他。紧接着，由于最近她的高地日记出版后取得成功，备受鼓舞的她宣布将为约翰·布朗撰写一部回忆录，并且表示会秘密出版。在这件事上，她的顾问们采取了一种罕见的强硬立场。亨利·庞森比紧张地给她写了一封信，请求女王陛下的原谅，“因为他对这种有关陛下内心最神圣情感的记录是否应该对外界公开深表怀疑”。他担心陌生人会误解她的话，引发不合适的关注，这将令“女王感到痛苦”[75]。维多利亚回复道，“我当然无法同意这一点”，并且对他说，她必须纠正布朗仅仅是一个仆人的印象，因为他“远远不止于此”。这就是她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的事情。[76]

一份回忆录草稿随后被送到了温莎城堡年轻的新任教长兰德尔·戴维森手上，他是温莎城堡圣乔治教堂的精神领袖，很快就赢得了维多利亚的尊敬。在布朗去世后，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据他说，那次对话“十分感人、严肃、有趣，但也十分艰难”。在发现维多利亚已经写了

一本有关布朗的回忆录，并在其中大量引用布朗日记中的内容后，戴维森慌了。维多利亚已经在《更多节选》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写布朗，引起家人的反感。那本书充斥着有关高地平淡生活的多愁善感的故事。[77]［1884年出现的讽刺版《节选》与《更多节选》对维多利亚与布朗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讽刺："我们俩非常重视在每天早上都共进早餐……布朗会（用手推车）推我爬上山坡，然后再推着我冲下来。他这么干了好几次，我非常乐在其中……接着他会扶着我坐上小船，在湖上摇晃大约半个小时。这么做令人觉得非常愉快。"[78]］

教长对维多利亚说，她不应发表有关布朗的回忆录。他罕见地指出，有些"下等阶级""配不上如此的信赖"[79]。当维多利亚坚持要求出版时，他提出辞职。她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拒绝与他见面，后来还是恢复了关系。这本书从来没有出版。庞森比非常享受能够烧毁布朗日记的机会，这丝毫不足为奇，尽管这些日记——以及维多利亚所写的《布朗的一生》（*Life of Brown*）——的消失非常令人遗憾。伯蒂在继承王位后进一步摧毁了布朗的其他残留痕迹，甚至将布朗在温莎城堡的房间——维多利亚在他死后将房间封锁了起来——改造成了一间台球室。

但维多利亚确保布朗不会被遗忘。她允许自己对他的喜爱之情被公之于众，因为对她而言，一名强势女性与一名仆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婚姻，甚至不可能是一段严肃的恋情。她永远也不可能称呼他"主人"；她才是他的女主人。然而，他们的话语中有一种特别的爱意。作家汤姆·卡伦（Tom Cullen）声称在女王的日记中找到了一份摘录，那是女王在约翰·布朗去世后誊抄并交给约翰的哥哥休·布朗（Hugh Brown）的。她披露说，布朗曾经发誓要照顾她直到他死去为止，她还说："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比布朗还要更忠心耿耿的仆人了。"维多利亚继续说道："后来，我经常对他说，没有人比我更爱他，他也没有比我更好的朋友了：他回答说，'你也没有比我更好的朋友。没有人比我更爱你。'"[80]

在1884年，也就是布朗去世一年后，维多利亚仍然闷闷不乐，印度、埃及和爱尔兰的动荡让她焦躁不安，她相信生活“真的变得越来越悲惨、越来越艰难”。[81]接着，她被告知自己身患血友病的儿子利奥波德在戛纳摔了一跤，摔伤了膝盖。不久之后，他就出现剧烈抽搐，并因脑出血而死。他的妻子此时即将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唯一能够平复维多利亚悲痛情绪的是，她知道利奥波德曾经多么不快乐，他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和折磨”[82]，“这种坐立不安地期盼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的感觉”让他痛苦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痛苦也日益加剧。作为一名认真而不安的知识分子，利奥波德十分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却因为母亲的过度保护而备受压抑，令他沮丧的是，他的病情始终是她焦虑的原因。他的生活充满痛苦——很容易出现瘀血，受到王庭中某些人的轻视，甚至曾经遭受约翰·布朗及其兄弟的无情欺负。他那位时刻对他的病情保持警觉的母亲认为他“非常丑陋”，笨手笨脚。他去世时距离自己的30岁生日仅剩10天。

在19世纪，尽管血友病已经成为大规模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德国，但人们对它的理解还很少。很少有血友病患者能够活到成年；平均预期寿命仅为7岁。死亡有可能源于从马上或者椅子上摔下，或者源于拔牙。也有可能源于最轻微的伤痛：一名理发师因为用剪刀刮伤了鼻子而死，而在1860年，还有一名婴儿因为被雪茄烟烟嘴划破嘴唇而死。儿童间的游戏有可能致命[83]；孩子们经常会因为瘀血和划伤而死。在面对无效的医治手段时，血友病患者的父母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生活中充满了内疚与担心。维多利亚写道：“没有人了解我始终对他的担心。”她确保自己时刻待在儿子身边。[84]

1868年，当15岁的利奥波德在又一次大出血后正在恢复身体时，《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评，主张利奥波德不应再参加剧烈运动。[85]据信，他拥有“脆弱的血管”或者某种男性月经；一直到1891年，研究人员才发现，血友病患者的血液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凝固。[86]维多

利亚遵循了顶尖专家的建议，包括食用健康食品、注意卫生、避免剧烈的男孩游戏，以及休息，等等。[87]因此，利奥波德阅读了大量书籍，赢得了“学者王子”的称号。[88]他在政治上有着强有力的保守观点；维多利亚将对此感到怀念。

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利奥波德迫切地想要宣示自己的独立。在1878年，他25岁之际，他拒绝与母亲一起前往北方的巴尔莫勒尔，而是前往欧洲旅行。对格莱斯顿而言，看起来似乎他想要“要么活着，要么就壮烈地死去”[89]。他想要娶妻，并且像正常男人一样生活。对血友病人而言，婚姻是一个禁忌，而且在当时极为罕见——人们对于后代的健康状况以及病人的寿命和赚钱能力表示担忧。[90]利奥波德的医生坚持认为，不应满足他结婚的要求，因为他有可能把“如此可怕的疾病”给遗传下去。[91]

维多利亚知道，要让她身体脆弱的儿子结婚，是一场“巨大的风险和尝试”，但她还是允准了。[92]1882年4月，他迎娶了令人敬畏、勇气可嘉的德国瓦尔德克（Waldeck）公主海伦娜（Princess Helen）。婚礼前一天，他踩在橙子皮上滑了一跤，出现严重流血。而在婚礼当天，他的母亲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他“在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里”“仍然在一瘸一拐、不住颤抖”[93]。42年来第一次，维多利亚在自己黑色长袍的外面套上了一件白色婚礼面纱。而如今，在仅仅不到2年时间后，利奥波德就撒手人寰，她再一次只穿黑色服饰。

---

[1] Hardie，*Political Influence*，73.

[2] Aronson，*Victoria and Disraeli*，183.

[3] Memorandum by Queen Victoria，April 18，1880. 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4/65.

[4]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184.

[5] Aldous，*The Lion and the Unicorn*，307.

[6] 一旦女王委任了格莱斯顿，他亲吻了她的手，他就被认可为自由党的议会领袖以及首相。

[7] Jenkins，*Gladstone*，438.

[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pril 27，1880.

[9] Letter to Henry Ponsonby，April 8，1880，引自 St. Aubyn，*Queen Victoria*，445。

[10] Aldous，*The Lion and the Unicorn*，310.

[11] Monypenny and Buckle，*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539.

[12] These are trade union statistics，cited in Blake，*Disraeli*，697.

[13] 引自 Blake，*Disraeli*，721。

[14] Aldous，*The Lion and the Unicorn*，296.

[15] 参见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268。

[16] 这对维多利亚来说尤其难以接受，因为德兰士瓦布尔人已经在1881年的马朱巴山战役中消灭了一支英国军队。（Longford，*Victoria R.I.*，440.）她不想看到非洲土著人受到布尔人的控制："一个极为无情而残暴的邻居，事实上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中的南方奴隶主一样是压迫者。"（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30，1881.）

[17] 她在1879年致信迪斯雷利："如果我们要维持作为一流大国的地位的话，我们必须凭借我们的印度帝国和其他殖民地，持续不断地为某个地方的进攻和战争做好准备。" July 28，1879，Queen Victoria to Lord Beaconsfield，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79 and 1885*，3：37-38.

[1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2，1879.

[19] Aldous，*The Lion and the Unicorn*，299.

[20] 指格莱斯顿——译者注

[21] Aronson，*Victoria and Disraeli*，184.

[22] Blake，*Disraeli*，474.

[23] 迪斯雷利曾在一年前拒绝过维多利亚授予的男爵爵位，却设法为科里争取到了男爵爵位，后者对他而言就像儿子一般。格莱斯顿将这件事比作卡利古拉把自己的爱马任命为执政官。从那以后就有人暗示科里是迪斯雷利的情人，就像他的妻子一样。Kuhn，“Sexual Ambiguity，”16.

[24] Aldous，*The Lion and the Unicorn*，319.

[25] Shannon，*Gladstone*：*Heroic Minister*，275.

[26] Blake，*Disraeli*，752.

[2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anuary 5，1881.

[28] 哈迪（Hardie）写道，这是迪斯雷利的一次“重大过失”：“早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斯威夫特就观察到，众所周知，‘在这些场合发表的演讲融合了核心心腹的建议，因此，它们代表了女王陛下的大臣们的观点，以及他自己的观点。’”Hardie，*Political Influence*，76-77.

[29] Hardie，*Political Influence*，76，192-93.

[30] Queen Victoria to Lord Granville，June 5，1880，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79 and 1885*，3：108.

[31] 薇姬的儿子瓦尔德玛（Waldemar）在1879年死于白喉，当时年仅11岁。俾斯麦在葬礼那天晚上又考虑不周地举办了一场社交聚会，进一步加剧了薇姬的伤痕。维多利亚悲伤地致信她的女儿：“我的心为你流血和伤痛。”她写道：“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经历像这样可怕的考验和冲击，而生命没有立刻停止的。”

[32] Rappaport，*Queen Victoria*，428.

[33]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une 26，1872，Fulford，*Dearest Child*，51. 她对薇姬说，女人应该得到“合理的教育”——并且“在合适的时机工作”，但不能“失去性别特征，并且担任医生（除了一个类别外）、律师、选民等。一旦做这些，你就立刻失去了男性保护的价值。”

[34] Fulford，*Dearest Child*，67.

[35] Longford，*Victoria R.I.*，395.

[36] 当她发现女儿露易丝与医生伊丽莎白·加雷特——她是英国第一位获得行医资格的女性——安排了一场秘密会见并讨论她的研究后，维多利亚愤怒不已。然而，露易丝却说："发现她如此热衷于自己的工作让我很高兴……她能够证明，女性如果全心全意的话可以学到多少东西。" Hawksley，*The Mystery of Princess Louise*，114.

[37] Queen Victoria to Vicky，February 24，1872，Fulford，*Dearest Child*，30.

[38] Levine，"Venereal Disease." 在见证克里米亚的破坏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1862年组织了一个卫生委员会来调查性病问题。

[39] Walkowitz，*City of Dreadful Delight*，49.

[40] 朱迪丝·沃科维茨（Judith Walkowitz）称，梅毒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极为普遍"，"在中上层阶级和穷人劳工群体中几乎普遍存在"。Walkowitz，*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50. 玛丽·卡彭特估计，患病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0%。*Health*，*Medicine*，*and Society*，72.

[41] Walkowitz，*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73.

[42] Pearsall，*The Worm in the Bud*，278.

[43] 对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之一约瑟芬·巴特勒而言，这种双重标准极为明显，她意识到："人们口中女性得到的原罪比男性要严重得多。"［正如J·米勒（J. Miller）在1859年所指出的，"女性只要跌倒一次，整个社会就会在知晓过失的时刻站到她的对立面。男性习惯性地跌倒许多次，也会去忏悔；社会对他的支持只会发生一点点改变，甚至一点也没有。" J. Miller，*Prostitutio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ts Cause and Cure*（Edinburgh：Sutherland and Knox，1859），26.］巴特勒遍访英格兰和欧洲的妓院，呼吁进行改革，并且与性工作者交朋友，经常把她们带到自己家里照顾。

[44] Wilson，*Eminent Victorians*，108.

[45] Pearsall，*The Worm in the Bud*，250. "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稍微可靠一点的专家之一阿克顿医生（Dr. Acton）表示，成年未婚女性中有十三分之一到十四分之一

是不道德的，不过这种说法与其他数据相矛盾。” Pearsall，*The Worm in the Bud*，276. 警方报告中的数字要低得多。

[46] 在1846年上半年，伦敦共有56人因梅毒而死。其中有30人是不到一岁的婴儿。Walkowitz，*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49.

[47] Frith，“Syphilis—Its Early History.”

[48] 一旦女性“堕入”妓女行业，人们经常断言她们不可避免地会早死。一名专家估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旦女性决定“下海”（turn a trick），她们平均就只剩4年时间可活了。爱丁堡性病医院（Lock Hospital in Edinburgh）的入院登记簿显示，有十分之九的妓女“在30岁前就消失了”。对许多年轻女子来说，这仅仅是结婚前的一份临时工作而已。——作者注

[49] Davidson and Hall，*Sex，Sin and Suffering*，121.

[50] Wilson，*Eminent Victorians*，188.

[51] 他说，尽管许多人最终都过上了值得尊敬的生活，但靠出卖自己身体挣钱的女人“比赏金女杀手好不到哪去，犯下的是不受惩罚的罪行。”海明写道，性工作者“毒害了国家的血液”。Bracebridge Hemyng，“Prostitution in London，” in Mayhew，*London Labour*，4：235.

[52] 马格努斯（Magnus）在*Gladstone*：*A Biography*，425-26中写道，格莱斯顿曾在1897年对儿子们说，如果她真的认为有关他与性工作者之间关系的故事属实的话，那么她人真的很好，但他又接着说：“我不会信口雌黄，我相信我离开的情形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有着严肃的原因，但这些原因不足以解释这种情形。无论真假，这些说法都一定进入了她的耳朵，在她看来需要（而不仅仅是可以）采取那些已经采取的措施。”马格努斯强调说，尽管女王应该听过部分“虚假的故事”，但“很少有负责任的人能够给出可信的证据，即使是格莱斯顿的死对头也不例外”。当斯坦莫尔勋爵（Lord Stanmore）对格莱斯顿说，女王有可能对他的企图表示怀疑时，他回答说：“如果女王对我这么想的话，那么她如此对待我就是正确的。” St. Aubyn，*Queen Victoria*，446.

[53] April 19，1875，Longford，*Victoria R.I.*，528.

[54] Marlow，*The Oak and the Ivy*，68.

[55] Isba，*Gladstone and Women*，115.

[56] Glad eye有抛媚眼之意，同时Glad-也与格莱斯顿的名字开头相同。——译者注

[57] Isba，*Gladstone and Women*，119.

[58] Jenkins，*Gladstone*，100.

[59] Jenkins，*Gladstone*，100.

[60] Jenkins，*Gladstone*，100.

[61]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425-26.

[62] Gladstone Memorandum，March 10 and 11，1894，Guedalla，*The Queen and Mr. Gladstone*，1：76.

[63] 这件事发生在1898年格莱斯顿去世前不久。正如传记作家H.C.G.马修（H.C.G. Matthew）总结的那样，这是一份“明确且明显有所保留的宣言”，而他的儿子赫伯特后来在1927年的法庭上为自己父亲的名誉辩护时没有使用这份宣言。彼得·E.赖特上尉（Captain Peter E. Wright）在1827年诽谤说，格莱斯顿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品格高尚、恪守原则的话”，私下里却在“追求和迷恋各种类型的女士”[94]。赫伯特的律师认为，格莱斯顿那句宣言中所隐含的保留意见有可能向陪审团暗示，他与数十名与他交好的性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完全纯洁无瑕。法庭最终确认了格莱斯顿的道德品质。——作者注

[64] Shaw，*Mrs. Warren's Profession*，181.

[65] March 6，1882，Longford，446.

[66] 需要提到的是：她的哥哥之一、第九代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称奥斯卡·王尔德是一个“鸡奸者（somdomite）”［众所周知，他拼不对“鸡奸者（sodomite）”这个词］认为他和自己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有某种关系。王尔德以诽谤罪起诉他，随后发生的法庭审讯——真相就是最好的辩护——导致他破产和名声尽毁。他因为与男性保持关系而被判犯有“有伤风化罪”。出狱后，王尔德去了法国，死于巴黎的阿尔萨斯酒店。

[67] Dixie，*Gloriana*，129-30.

[68] *Pall Mall Gazette*，March 19，1883. 还可参见 *Aberdeen Weekly Journal*，

March 19，1883.

[69] Cullen，*The Empress Brown*，201.

[70] Cullen，*The Empress Brown*，204.

[71] Queen Victoria to Viscount （later Earl of）Cranbrook，Windsor，March 30，1883. Grosvenor，“Dear John.” 维多利亚对这件事写得很详细：“或许，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君主与仆人之间存在过如此强烈和真挚的依恋、如此温暖和充满爱的友谊，［上文中“君主与仆人之间”这个词据信是后来加上去的］，而这存在于她和亲爱而忠诚的布朗之间。性格的强大以及身躯的力量——最无畏的正直、善良、正义感、诚实、独立和无私，加上温暖温柔的内心，以及始终保留的来自生命早期的平凡的淳朴，让他成为我所认识的最非凡的男人之一——而且女王感觉，在被剥夺了自己如此需要的一切后，她的第二次生命正变得极具考验和悲伤。”

[7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7，1883.

[73] Lord Hallam Tennyson to Victoria，Isle of Wight，October 22，1892. 皇家档案馆，VIC/MAIN/R/44/ 14. 女王给丁尼生勋爵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父亲的死，丁尼生的儿子在回信中说：“我冒昧补充一句，在访谈结束时，他对我说：‘在我与女王分别时，我的眼中噙满热泪，因为她如此温柔，又如此孤独（lonely）。’”［这里也有可能是“可爱”（lovely）；这个单词很难看清，但原文中的“n”与丁尼生勋爵字迹中的其他“n”很接近。］

[74] Cullen，*The Empress Brown*，204.

[75] Henry Ponsonby to Queen Victoria，February 28，1884. 皇家档案馆，VIC/ADDA12/902.

[76] Queen Victoria to Henry Ponsonby，February 23，1884，皇家档案馆，Add. A/12/899. See also Kuhn，*Henry and Mary Ponsonby*，220-21.

[77] 这些书还有其政治目的，有效地让那些指责她在政治上干预太多或者持有偏见的人闭了嘴：她只不过是一个在苏格兰的山丘之中闲逛的王室妇女而已。

[78] “Kenward Philip，” *John Brown’s Legs or Leaves from a Journal in the Lowlands*，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those extraordinary Legs，poor bruised and scratched darlings.” From Longford，*Victoria R.I.*，460.

[79] Bell，*Randall Davidson*，94.

[80] Cullen，*The Empress Brown*，216.

[81]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anuary 2，1884，Fulford，*Beloved Mama*，155.

[8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March 26，1884，Fulford，*Beloved Mama*，162.

[83] Kerr，“The Fortunes of Haemophiliacs，”359-60.

[84] Bennett，*Queen Victoria’s Children*，124.

[85] Footnote 66 in Kerr，“The Fortunes of Haemophiliacs，”cites “Editorial Prince Leopold，”*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1868）：148.

[86] Potts and Potts，*Queen Victoria’s Gene*，51.

[87] Walker，“On Haemophilia，”605-7.

[88] 利奥波德的病情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被描述为“血管脆弱”，并且引发了一场有关血友病病因和治疗方法的更广泛的重要探讨。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王室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血脉正在遭到质疑，而维多利亚却始终坚称自己没有继承任何不良遗传。自发性突变——或者说新病例——还完全是一团迷雾。［Stephen Pemberton，*The Bleeding Disease*：*Hemophili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Medical Progres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1），35.］约翰·威克姆·莱格（John Wickham Legg）在187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称，唯一有证据佐证的假设是近亲结婚。没有记载显示有人与维多利亚探讨过这件事，而且鉴于基因学一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为人所知，因此，这种探讨不太可能发生。——作者注

[89] Rushton，“Leopold：The ‘Bleeder Prince，’”487.

[90] Kerr，“The Fortunes of Haemophiliacs，”367.

[91] Legg，*A Treatise on Haemophilia*.

[92] Rushton，“Leopold：The ‘Bleeder Prince，’”486.

[93] Potts and Potts，*Queen Victoria’s Gene*，48.

[94]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630.

26 “钢铁碰撞”：女王与格莱斯顿先生

我的天哪！那是个女人！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女人！[1]

——奥托·冯·俾斯麦

有时，最古怪的人也会成为最伟大的英雄。身材瘦削、衣着朴素的查尔斯·乔治·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 George Gordon）被普遍视为一个傲慢而容易受蒙骗的人。少年时，他就喜欢通过捉弄同学来取乐，而且幻想着成为一名阉人。作为军校学员，他经常欺负后辈，喜欢用梳子或者扫帚殴打他们。等到他成为英军中尉之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虔诚的基督徒，回避物质享受，坚持只拿低薪，而且渴望死亡。他说，他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一心求死。与拿破仑三世一样，戈登有着摄人心魄的蓝灰色眼睛，这双眼睛被认为是他能够对许多人进行神秘控制的秘诀，他尤其善于控制中国和非洲境内彼此敌对的部族势力。当没有身处战场时，戈登会去照顾肯特工厂里的病人和穷人，拯救街头的淘气鬼。他还有一种难以解释、或许有些可疑的癖好，那就是喜欢男孩的陪伴。

这种怪癖丝毫无碍于戈登的名声。在19世纪中期，就在维多利亚还在为东方问题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焦急万分之时，戈登在镇压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那是一场残酷的内战，从1850年持续到1864年，造成至少2000万人死亡。此人率领由中国士兵组成的“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Army）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被称作“中国的戈登”（Chinese Gordon），他的名字也成为帝国传奇。

1882年，尽管格莱斯顿不情不愿，但英国还是占领了当时名义上是土耳其一个行省的埃及。英国的政策有些混乱，他们最初是打算帮助埃及王室抵挡一场军事叛乱、防止经济崩溃，并且保护苏伊士运河以及

1869年埃及开放后英国在该国的投资。不久后，在邻国苏丹出现了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神秘主义者，并且宣布发动一场旨在摆脱土耳其—埃及统治的神圣独立战争。这位神秘主义者自称穆罕默德·马赫迪（Muhammad al-Mahdi）——与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同名。1883年，苏丹政府试图镇压他，但失败了。当地的埃及军队不足以镇压叛军，而且不久后，局势就已变得明朗，身处苏丹的埃及人以及所有英国公民都需要撤出。格莱斯顿内阁对于是否进行干预闪烁其词。但女王却态度坚决。她想要将马赫迪踩在脚下，但其他人，尤其是像格莱斯顿这样的自由派，却希望撤出所有军队。

戈登将军似乎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人选。如今51岁的他名气已经不如往昔，而且他已经准备动身前往刚果，他觉得——或者说希望——自己会在那里死去。曾经公开对他表示敬仰的政客们如今在私下里说他有些精神错乱。格莱斯顿的秘书E.W.汉密尔顿（E. W. Hamilton）称他为一个“精神有些失常的宿命论者”。英国驻华领事官员罗伯特·哈特爵士（Sir Robert Hart）认定他“不总是十分正常”。不过戈登接受了臭名昭著的出版商W.T.斯特德（W.T.Stead）的采访，谈及他将用自己在中国的方法来处理苏丹危机——以及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不能被放弃，而应该得到加固——随后，奉行鹰派路线的伦敦媒体就发出了“让戈登来处理苏丹问题”的呼声。

最初，格莱斯顿曾试图抵制这种压力，拒绝派戈登去执行一个目的不明的任务。他不想与埃及扯上关系，更希望彻底放弃苏丹，而且不想浪费时间或者资源来占领更多土地。为什么要派一个激进的冒险家去处理一场撤退呢？不过，认为这次任务很快就能完成的他最终还是妥协了，条件是戈登可以就战略问题提出建议，但不能亲自执行。[2]这是一种徒劳的希望：戈登是一个藐视权威的特立独行者。他认为英国内阁充斥着江湖骗子，相信自己只对来自上天的一个更高权威负责。他对自己的姐姐说，事情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就像钢琴一样”。[3]

就这样，好戏开始了。戈登向喀土穆总督发去了一份特点鲜明的直白电报：“不要当懦夫。你们是男人，不是女人，我来了。告诉居民们。”[4]在马赫迪叛军包围城市并将他困在城内之前，他成功疏散了2500名妇孺和伤员。他掘壕固守准备作战。英国政府在1884年的整个夏天都在思考是否要派遣军队去拯救他；他得到的命令是离开苏丹，而不是占领苏丹。戈登很清楚自己处于抗命状态，他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承认没有遵守女王陛下的政府及其官员的命令，但这就是我的本性，没办法。”[5]他的傲慢无礼却让公众更加青睐于他。曾经对派遣戈登以及救援戈登都表示过支持的激进派内阁成员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早在那年3月收到十几份“特别”电报后就警告说：“我们很明显正在对付一个受到中非气候影响的野蛮人，这种气候即使对最理智的人来说也像是烈酒一般。”[6]

政府讨论了几个月是否要派遣军队，以及如果派遣军队的话，应该派遣何种类型和规模的军队，走哪条路线。怒气冲冲的维多利亚敦促格莱斯顿向戈登提供支持，她认为戈登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7]。她开始对他的安全感到极为焦虑，并且决定直接与她的军队将领们接触。当她遭到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的批评时，她反驳说：“女王始终拥有与军队将领的直接电报联系，而且始终会这么做……女王不会接受他人的命令。她不是一台机器。”她随后直接不顾首相的建议，要求被派往喀土穆的沃尔斯利将军确保士兵们留在苏丹。[8]她向薇姬抱怨说，自己作为帝国首脑的地位没有丝毫乐趣可言，因为“不管我怎样警告、书写、计算和表态……除非拿把手枪指着他们的胸膛，否则他们什么也不干”。[9]她在1884年2月9日对首相说，她为戈登的安危而“颤抖”，此时戈登正在从开罗前往喀土穆的路上：“如果他遭遇任何事的话，结果将非常可怕。”[10]

对喀土穆的围攻开始于1884年3月13日。英国军队一直到那一年的11月才开始进军解救他。

在围攻持续300多天后，戈登被马赫迪派杀害了；他们残忍地将他的头颅砍下，插在了营地里的一棵树上。他于1885年1月26日被害。仅仅两天后，英国救援远征队就抵达了喀土穆。10天后，戈登的死讯传到伦敦。维多利亚怒发冲冠。这对她而言是一次严重的个人羞辱。[11]她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她在给薇姬的信中写道：“他们的头上沾着戈登以及数千人的鲜血。”她自己的良心是洁白无瑕的：“我不停地警告、敦促，一切都徒劳无功。［但］格莱斯顿先生……将永远洗刷不掉英雄戈登的鲜血。”[12]

女王决定，是时候采取极不寻常的一步了。她发了一份明文电报——这样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因为它没有加密——收件人是格莱斯顿、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以及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在首相从北兰开夏（North Lancashire）——他此前正与德文郡公爵一起待在那里——赶往伦敦的途中，康福斯枢纽（Carnforth Junction）火车站站长将电报交到了他手上，而戈登的死讯此时已经传来。格莱斯顿打开电报，阅读了女王的严厉措辞：“来自喀土穆的消息非常可怕，想到这一切本应可以避免，许多珍贵的生命如果早做行动就能挽回，就令人太过恐惧。”怒火中烧的格莱斯顿发誓自己再也不会踏上温莎城堡的鹅卵石路一次，他还考虑要辞职。

那天夜晚，一份精心准备、态度坚决的答复被送到了女王手上。格莱斯顿写道，尽管他“无意评价女王陛下的判断”，但据他掌握的信息和回忆，他“无法完全理解女王陛下宣布的结论”。换句话说，她错了。他写道，沃尔斯利勋爵领导下的英军也许能够及时赶到喀土穆救援戈登，但他们却因为沿着河流走了一条迂回道路而被耽搁了，“而这是在戈登将军的明确要求下做出的决定”[13]。严格地说，他说的没错，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维多利亚早在10个月前就敦促采取行动，这根本不是短短几天的事。

格莱斯顿再次患上肠道疾病，手上长起了疹子。[14]他在1885年2月19日那天去看了一场戏剧，也是在同一天，戈登的死讯传到了伦敦，而他在议会却几乎没有提到戈登——维多利亚知道，如果是迪斯雷利当首相的话，他一定会进行一番深切哀悼。从战略上说格莱斯顿是对的，喀土穆对大英帝国而言意义不大，但他犯下的灾难性错误在于，他错估了失去一位戈登这样地位的将领对他的党派的影响。保守党人很高兴地看到，自己毫不费力地就得到了这个把柄，它显示出自由党明显缺少帝国野心。格莱斯顿的外号也从“GOM”（Grand Old Man，老头子）换成了“MOG”——戈登的凶手（Murderer of Gordon）。

截至此时，格莱斯顿已经很难掩饰他对意志坚定的女王的蔑视了。他在主持内阁会议时，一开始会宣读维多利亚的声明，然后将她的信件塞回口袋里，不屑地说：“好了，先生们，该干正事了。”[15]1885年4月时，他曾说，维多利亚的看法“相当没有价值”[16]。他未能理解的是，无论是好是坏，维多利亚都有一种神奇的本领，能够表达出许多臣民的想法。她已经形成了比她的许多大臣都更加敏锐的政治直觉。而且有些时候，维多利亚的确进行了成功的干预。例如，在1884年，议会因《第三改革法案》（Third Reform Bill）陷入僵局，该法案旨在将投票权赋予农民。总体而言，维多利亚赞同选举改革，但她却不喜欢这种改革带来的破坏。她对这项法案非常乐观，但部分自由党人发出的解散上议院的呼声却让她惊骇不已。她要求格莱斯顿约束一下“他的一些狂热同僚和追随者”，并且强调，如果没有权力平衡，君主的地位将“难以维持”。

维多利亚曾坚持要求自由党人与保守党人举行会谈，保守党人强硬地表示，除非同时通过一项选区重新分配法案，否则他们不会让改革法案获得通过。这次会谈的结果是，上议院同意通过改革法案，同时在下议院执行一项刚刚谈判达成的选区重新分配法案。格兰维尔勋爵对女王的“巨大影响力”表示称赞，而亨利·庞森比也将“不停敲打双方，要双方保持克制，并坚持要求他们举行会谈”的功劳归于她。[17]当格莱斯顿对

她表示感谢时，她颇为夸张地回答说：“能有点用是我现在唯一的追求了。”[18]如今的她已是花甲之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成功推动谈判达成这次妥协让维多利亚相信了两件事：未来创立一支位属第三方的中间派政党的可能性，以及她自身影响力的效用。

不过，在格莱斯顿任期内，外交政策是一个维多利亚的影响力暂时熄火的领域。格莱斯顿本能地反对武力外交政策以及为了扩张而扩张的政策，但他的国家仍然奉行帝国主义。他不情愿地被裹挟进了南非、北非以及中亚地区的殖民战争。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伊·詹金斯所写，格莱斯顿“在两个世界都遭遇失败……从一开始，一个凭借反帝国主义的施政纲领竞选上台的政府就发现自己不自在地陷入了太多帝国主义困境中。”[19]其结果是一种不合逻辑的外交政策——在1881年英国军队从德兰士瓦撤军的同时，他们又在1882年占领了埃及；在内阁派遣戈登前去营救位于苏丹的英国公民的同时，他们却在他被包围后拒绝营救他。在温莎城堡内，一尊戈登将军的大理石半身像陈列在走廊里，冷冰冰地提醒着他的死亡。

在1884年令人极度痛苦的7个月时间里，王室的饭桌上笼罩着一层冰冷的沉默。从5月至11月，比阿特丽斯和她的母亲拒绝同彼此说话，而是在饭桌上通过交换纸条的方式交谈，同时还用刀叉在瓷器上敲击出清脆的声响。维多利亚经常放在餐桌上用来冷却夏日空气的冰块几乎没有必要存在。气氛相当尴尬，尤其是因为她们一般都十分亲密。维多利亚的这个最年幼的孩子此前展现出的只有顺从。但如今，她与英俊的巴腾堡王子亨利（Prince Henry of Battenberg）坠入了爱河，就在维多利亚的眼皮底下。[20]当时27岁且顺从而羞涩的比阿特丽斯坦承说亨利王子已经占领了她的心房时，维多利亚不出意料地表现得十分自私而夸张：“快乐已经永远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21]

维多利亚一直都害怕这一时刻的到来。她曾试图阻止人们在比阿特

丽斯的面前说出“婚礼”一词。她曾试图防止自己的女儿与男人共处一室，或者与除了自家兄长以外的任何人共舞。她推迟了她的坚信礼。她想要保护自己最亲爱的小女儿，不让她接触那个她自己深表怀疑的习俗；毕竟，维多利亚如今声称自己讨厌婚姻。当然，她曾经十分喜爱自己的婚姻，但她认为连续不停的怀孕伤害极大且痛苦不堪，孩子的离世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而且大多数婚姻都苦不堪言。她自己的家庭就佐证了这一点。薇姬在普鲁士就苦不堪言，饱受对她不满且控制欲极强的公婆的欺负；露易丝嫁了一个怀疑是同性恋的男子，并且有了多个情人；爱丽丝在遥远的土地上离世；只有内向的海伦娜心满意足地与丈夫居住在附近。维多利亚郁闷地说：“我活得越久，就越觉得婚姻很难带来真正的幸福。大多数都是为了方便而已——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幸福——当然，当婚姻真正带来幸福时，它会受到极大的珍视，却很难长久。”[22]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维多利亚对比阿特丽斯的控制似乎有些令人窒息以及自私无比，从许多方面来说，的确如此。但在19世纪，家庭里年纪最小的女儿终身侍候父母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为了这个目标，一切都可以被牺牲。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们都对身为大龄未婚女性所要受到的限制恼怒不已；值得一提的是，恭顺的比阿特丽斯却毫无怨言。[23]不过，如今她有了一个实现幸福的机会，就是与“利科”（Liko）在一起。比阿特丽斯也会变得很固执，用自己倔强的沉默来对抗母亲倔强的沉默。利科十分引人注目：时髦、温柔、帅气。这种沉默最终被三名男性保护人打破——伯蒂、爱丽丝的鳏夫黑森大公路易斯，以及他的兄长、巴腾堡的路易斯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代表比阿特丽斯向女王提出恳求。维多利亚提出了获得她批准必须满足的条件：结婚后必须始终与她一同居住，不能有自己的住所。身心俱疲的比阿特丽斯——以及反正也没有什么财产的利科——很快就同意了。

1885年7月23日，一个艳阳高照的炎热日子里，婚礼在奥斯本宫附

近的一座教堂内举行。只有一小群人见证了婚礼；尤其是，维多利亚拒绝邀请格莱斯顿参加。比阿特丽斯身披白色蕾丝和橙色花朵，就像母亲当年的模样，她还借来了母亲当年的头纱。激动万分的维多利亚说，她看起来“十分甜美、纯洁与平静”[24]。前一天夜里，女王与比阿特丽斯一起从热闹的宴会上溜了出去，陪她走到她的房间，并且紧紧地拥抱了她，泪流不止。[25]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了40多年母亲后，她终于放开了最后这个孩子的手。她两眼通红地离开了女儿身边，躺在床上盯着窗外庄园与花园周围的灯光，祈祷比阿特丽斯能够永远幸福，并且永远也不要离开她。在婚礼结束后，维多利亚感到“十分难受”，不过没过多久，她那位精神饱满、对她百依百顺的女婿就赢得了她的认可（她甚至令人有些震惊地允许他在晚餐后与伙伴一起抽烟）。能够从情绪多变、控制欲极强的母亲手中获得某些自主权让比阿特丽斯松了一口气。

比阿特丽斯很快就怀上了未来四个孩子中的第一个。不久后，人们就会发现，她是可怕的血友病的携带者。她的一个儿子遗传了这种疾病，而且这个孩子也被起名为利奥波德。比阿特丽斯唯一的女儿维多利亚·尤金妮（Victoria Eugenie）后来嫁给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King Alfonso ⅩⅢ），把这种疾病带到了西班牙王室中，并因此变得极度不受欢迎。

1885年，在戈登去世四个月后的一天，格莱斯顿的政府倒台了，维多利亚欢呼雀跃得“像一个放了学的小姑娘”[26]。政府是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被击败的——一份旨在提高啤酒关税的提案——不过在戈登将军去世后，英国政府始终在与合法性的问题做斗争。政府还在爱尔兰独立的热点问题上陷入深刻分歧。议会同时也被解散，保守党人索尔兹伯里勋爵成为首相——他将三次出任这一职务。在第一次任职期间，他从1885年6月起领导的少数派政府仅仅持续了7个月时间。

索尔兹伯里身材高挑、头发渐渐稀疏，还留着一脸浓密的络腮胡，

他是一名保守党人，曾在1867年因迪斯雷利的改革法案获得通过而宣布辞职。他对变革的怀疑与维多利亚十分契合。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维多利亚对风度翩翩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变得极为喜爱。他彬彬有礼、聪明睿智、谈吐幽默，而且与女王一样都对地方自治持反对意见。

索尔兹伯里还是第一位比维多利亚更为年轻的首相，也是最后一位身为上议院成员领导英国政府的贵族政客。这个被其传记作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称作“维多利亚时代之巨人”的男人将在1895年和1900年为保守党赢得绝对多数胜利，并奠定了长期的保守党统治。

维多利亚十分珍惜与索尔兹伯里一起度过的时光，曾经对她的一名主教说道，他享有“她的大臣之中——甚至包括迪斯雷利在内——最崇高的地位”[27]。他的女儿维奥莉特（Violet）一次在法国听到他们的对话后曾说：“我从未见过哪两个人关系处得如此融洽，他们优雅的举止以及对彼此的敬意和尊重令人感觉赏心悦目。”[28]

这种尊重是相互的。索尔兹伯里认为，女王有一种神秘的能力，能够体现公众的观点：他感觉，当他了解了维多利亚的看法时，他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知道她的臣民们会拥有何种看法，尤其是臣民中的中产阶级”。[29]索尔兹伯里与女王还对穷人的生活条件持有共同的担忧。他曾在188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改善穷人住房条件不仅能给穷人带来健康，还能鼓舞穷人的士气。这种关联性也激起了维多利亚的兴趣。安德鲁·默恩斯牧师（Reverend Andrew Mearns）在1883年10月发表的报告《伦敦弃儿的苦涩呼喊》（*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中对附近贫民窟的描述让维多利亚感到震惊不已。[30]报告中描述了惊人的拥挤状况，还包含关于乱伦的叙述，得到了自封为反对伦敦的肮脏、邪恶与剥削之伟大侠客的出版商W.T.斯特德的大力推广。[31]此时的维多利亚仍然在因为几个月前布朗的死而哀痛，她给格莱斯顿写信说，有关“我们的伟大城镇中穷人的凄惨住房条件”的故事让她感到难过，她询

问是否应该启动一项公共工程项目，以及是否需要就此展开调研。[32]面对格莱斯顿的不情愿，她开始游说其他更具同情心的政客和神职人员。1884年2月，一个皇家委员会得以成立，主要负责处理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索尔兹伯里与伯蒂都曾在委员会中任职。

1885年，在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期间，他在上议院引入了一项法案，要求房东对不卫生的住房条件负责，并且赋予地方政府委员会封停不卫生住所的权力。这些法律虽然只是渐进式的，但十分重要；它们促使公众开始思考，在改善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方面可以做些什么，紧接着出现了更多的调研以及住房信托基金的设立。

1886年1月，索尔兹伯里在一项土地法案的投票中被击败，并宣布辞职。议会中的86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召集了大量议员反对他，希望如今支持地方自治的格莱斯顿能够重新掌权。维多利亚发动了一场步调一致且坚定有力的运动，以确保格莱斯顿不会再次成为首相。首先，她拒绝接受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辞呈。其次，她试图在温和派辉格党人与保守党人之间建立联盟，以便将自由党人挡在门外。她对态度温和的自由党统一派成员乔治·戈申（George Goschen）说，政府改组将是一场“灾难”，并且“我为国家感到担心”[33]。她敦促他与保守党中间派建立联盟，并且不要支持格莱斯顿，因为他“一有机会就会毁灭这个国家”。她对索尔兹伯里说，如果格莱斯顿上台的话，她将拒绝接见任何“让她有一丝不满的人”。她在一则备忘录的最后自怨自艾地写道：“失去像索尔兹伯里勋爵这样的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全世界——以及我自己而言简直糟透了！”[34]

维多利亚穷尽了一切方法以防止格莱斯顿再次出任首相。她甚至曾要求丁尼生勋爵——他刚刚陪伴好友格莱斯顿完成了一趟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游轮之旅——试图劝说格莱斯顿不要参加即将举行的大选。[35]丁尼生抗议说，他对格莱斯顿的影响力微乎其微。[36]

维多利亚的干预非同寻常：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格莱斯顿的厌恶，试图将他赶下台，并且让他上不了台，她积极寻求帮助其他人建立执政联盟并组建政府，并且期望在内阁成员的挑选上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这其中连一丝行事中立的样子都没有。维多利亚的大臣和秘书曾反复警告她说，如果公众了解到这些阴谋诡计的话，她会遭受批评，甚至丑闻缠身。温和的自由党人戈申直接拒绝拜见她，担心这么做有可能“影响”局势（对此，她狠狠地斥责了他[37]）。他建议维多利亚召见格莱斯顿，强调说自由党人仍然在格莱斯顿的掌控之下。

由于担心媒体有可能发现维多利亚不愿召见格莱斯顿的情况，庞森比采取行动，询问她是否可以立即召见格莱斯顿，以“结束这种令人紧张又激动的形势”[38]。被动攻击是维多利亚的最后手段。当庞森比匆忙在深夜找到格莱斯顿时，后者正准备换上睡袍。庞森比问他是否愿意组建政府，并且对他说：“女王陛下从他反复表示的想要退出公共生活的意愿中了解到他不愿接受组阁任命，因此传来这一信息，即她给予他选择接受与否的自由。”[39]这可不是一个温馨的拥抱。

这位老头子如今已经习惯了女王的反对，接受了组阁任命并再次出任首相。庞森比简要介绍了女王对内阁人选的意见：她不会接受查尔斯·迪尔克，此人曾卷入一起令人震惊的离婚丑闻，并且是一名口无遮拦的共和主义者。格莱斯顿嘟囔了几句，但同意了。女王还反对他的好友格兰维尔勋爵加入内阁，对此格莱斯顿也勉强同意了。后来，他还同意不认命休·奇尔德斯担任陆军大臣，尽管他认为这是一项“重大损失”[40]。（此人被任命为内政大臣。）维多利亚提醒他说，她的反对意见并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41]。她最期望弄清楚的是格莱斯顿在地方自治的问题上究竟是何意图：他是会仅仅如他所说调研一下爱尔兰人要求自制的呼声，还是这只是一个老练的谋略，目的是为执行地方自治铺平道路？[42]这是那个时代英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反抗不息的爱尔兰人是否应当获准进行地方自治。格莱斯顿坚定认为这一

问题至少应当得到认真思考，但这一态度却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将是他最伟大、最富远见，但也是最具自我毁灭性的一项使命。[43]

到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问题已经成为英国议会的主导议题。爱尔兰正在遭受长期农业减产、频繁饥荒以及无休止暴力的折磨。对倡导爱尔兰共和的芬尼亚组织的支持正在不断增加。甚至早在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土豆饥荒发生前，格莱斯顿就曾将爱尔兰视为一场“即将降临的暴风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见证了乌云的汇聚。当他在1868年获悉即将成为首相时，他停下了在庄园里砍树的工作，宣称“我的使命是安抚爱尔兰”。

他的确做出了尝试。首先，他在1869年解散了爱尔兰教会，并同时免除了天主教农民向教会支付什一税的义务。[44]紧接着，他试图处理地主土地所有制文化（地主几乎从不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并为爱尔兰佃户提供保护。他在1870年通过了一些法律，确保遭到驱逐的佃户能够为他们在租用土地期间对土地做出的改善得到补偿。在1881年，他提出《爱尔兰第二土地法案》（Second Irish Land Act），该法案带来了真正的安全保障，允许佃户申请公平的租金、固定的租期，或者出售租赁权的自由。（大部分爱尔兰农民没有他们土地的所有权，主要从地主那里租赁土地，而大部分地主居住在英格兰。在1870年时，只有3%的农业地产是由所有者真正居住的。[45]）

不过，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地方自治。大部分上议院成员、格莱斯顿的许多自由党同僚以及女王本人都对这一想法十分厌恶。岌岌可危的爱尔兰经济、饥荒和长期减产造成的余波，以及绵延不绝的共和派暴力活动和农业动荡，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麻烦的来源地的尴尬。大英帝国正试图赞颂自由，时而还会在世界层面认可原住民的权益，但在家门口遭遇的伪善指控却太过明显。格莱斯顿相信，这种愤怒循环是英国患上的一种已经发生了转移的癌症。

女王不相信爱尔兰配得上或者说需要进行自治。她认为格莱斯顿“总是给爱尔兰人找借口”[46]，并且经常提醒他，自己反对他的“可怕”法案。[47]事实上，爱尔兰的暴力活动不知怎的就成了他的责任。维多利亚说，他一直煽动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因此引发了骚乱，将爱尔兰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恐怖国家”。女王主张实施宵禁，并试图加强自己对议会的掌控。[48]她不分党派地鼓励所有反对地方自治的人团结起来保护大英帝国，并击败地方自治法案。[49]她一再驳斥疲惫不堪的格莱斯顿，要求他就自己的明确意图撰写一份备忘录。[50]格莱斯顿在信中表示，他仅仅希望“调研”自治政府的问题，但这封信却无法令她感到满意，尽管促使他下定这一决心的部分原因是他认识到了爱尔兰人的意志。[51]维多利亚对他说，他不能把她的沉默当成是对这一问题的认可，她在他的做法之中“看到的只有对帝国的威胁”，“在帝国的统一面临解体以及严重动荡的危险时”，她无法给他的支持。[52]格莱斯顿直言不讳地提醒她应当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他写道，他“极为谦逊地意识到”她愿意“对那些有幸成为陛下顾问的人给予恒久不变的宪法支持”[53]。他很清楚，女王的支持变化无常，但从法律上讲，她有义务给予支持。但是，正如戈登将军一样，维多利亚认为自己是在对一个更加崇高的力量负责。

当格莱斯顿在1886年4月就地方自治问题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他的演讲极为振奋人心。议员们面前的这项法案将在都柏林建立独立的议会和政府，该议会和政府将负责除外交、国防和贸易之外的所有爱尔兰事务。（该法案还将所有爱尔兰议员从威斯敏斯特除名，许多自由党议员都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此举将使他们丧失自己经常倚赖的许多选票。）格莱斯顿用一种有力而轻快的声音说道：“依照我的理解，这是我们历史上的黄金契机之一，眼下这种契机也许会时不时地出现和消失，但通常而言不会重来。”[54]

然而，这一契机还是被错过了。6月8日那天，该法案以341票反

对、311票赞成的结果遭到否决。自由党人分歧严重，有93人投票反对该法案。自由党统一派退出了自由党，并且与保守党结盟，共同反对地方自治一直到1914年。格莱斯顿的远见比他的政治技巧更为伟大，他无法争取到足够多同僚的支持。

对维多利亚而言，这是一项胜利。1886年6月20日，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格莱斯顿的电报，电报上说他的政府将递交辞呈。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庆幸。"[55]格莱斯顿尽心尽力采取的这些措施对维多利亚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她觉得他已经变得"有些狂热地""相信他正在为爱尔兰牺牲自己"[56]。她一如既往拥有识别政治风向的敏锐嗅觉——并且善于在适当的时候推波助澜。她曾积极地鼓励重要政客反对该法案，并且不断敦促温和派自由党人与温和派保守党人找到共同立场。

在1886年投票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和秋天，有数十人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教派骚乱中丧生，数百人被捕。即使是在辞职后，格莱斯顿也没有放弃。18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声祈祷就能代表一切祈祷：爱尔兰、爱尔兰、爱尔兰。"[57]他在1892年选举中再次为地方自治进行抗争，并且设法在1893年推动通过了一项缩水版的法案，但该法案很快就被上议院彻底否决。格莱斯顿对爱尔兰自治的执着令人印象深刻：原则鲜明，却不具备政治可能性。上议院不可能支持他。他非但没有给英伦列岛带来团结，反而让他所在的政党发生分裂，自己也成为自由党在未来2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无法上台执政的罪魁祸首。但如果英国在1886年通过格莱斯顿的法案的话，他们原本可以避免长达35年的动荡和流血。[58]格莱斯顿说的没错——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们却错过了。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年里，维多利亚正处在政治上的巅峰。她证明了自己比身边的大多数男人都更加擅长政治手腕。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无法理解一个女人是如何施展此种权力的。阿瑟·庞森比写

道，他的父亲在1870年成为女王的私人秘书，如果他父亲的工作内容仅仅是“对一个对时事知之甚少也毫不关心的执拗的中年女人献殷勤的话”，会无法忍受的。不过庞森比很快就对“她的能力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始终对她的勤勉惊叹不已”。他认为她是一个“清晰、理智、诚实的思想家，在某些事情上，她是一个优秀的商业女性”[59]。但是从这些男人的描述中，我们很难弄清楚她到底有多么高效。他们的态度似乎经常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女性布道的看法相类似：光是有女性这么做，就已经十分令人惊讶了。[60]

如今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发现维多利亚曾经是一个如此强势、喜欢进行干预的统治者。她经常拓展自身角色的界限。她竭尽全力地确保她和外交大臣能够共同决定外交政策，无须征求内阁的意见。她经常绕过首相向军队将领发布她自己的命令。她试图阻止格莱斯顿获取并维持权力。埃德蒙·戈斯爵士（Sir Edmund Gosse）在1901年写道：“女王比通常印象中更加不愿意向内阁的命令屈服。”[61]然而，维多利亚精心树立了一个顺从、避世且热衷家庭生活的女王形象，以至于她去世后出版的书籍因为暗示她拥有自己的意志而被认为太过极端。她对政治的干预程度——以及她的大胆程度——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才为人所知，她统治末期的信件到此时才得以发表。甚至连维多利亚统治时期担任过三次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都写道：“我可以有信心地说，在她漫长的统治时期，没有哪位大臣会在忽视她的建议或者在要求她收回建议后不产生某种自己有可能承担危险责任的感受……她很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62]正如她的信件编辑伊舍勋爵所指出的那样，女王总是向内阁的统一意见妥协，但“从不会立马向单个大臣的意见屈服”[63]。

那么，女王的宪法角色究竟是什么呢？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所谓宪法是由众多文件集合而成的，包括议会法令、法院判例、权威文献、国际条约和宪政惯例等。1867年，在女王避世哀悼期间，沃尔特·白芝浩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宪法》中指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于君主宪法

角色的明确表述。然而，他强调，由于缺少对女王角色的理解，她的威望得到了增强：“如果专门为了女王而成立一个委员会，那么王室的魅力就会荡然无存。它的神秘性正是它的生命所在。我们不能让神秘的事物暴露在阳光下。我们不能让女王亲自参与政治角逐，否则她将不再受到所有政治参与者的尊敬；她将成为众多政治参与者的一员。”[64]

白芝浩认为，君主拥有三项权利：“意见得到征询的权利；鼓励的权利；以及警告的权利。”[65]他写道，尽管君主是民主的“脸面”，但他或者她的角色却主要是仪式性和象征性的。但一直到伯蒂继承王位之后，这种仪式性、象征性的君主才成为常态。[66]维多利亚所实施的许多权利已经超出了白芝浩所说的内容：例如申斥大臣、取消支持、影响内阁任命、颠覆首相以及指挥军官等权利。

白芝浩写道，王室的首要职能是“通过及时举办光鲜亮丽的活动”来缓和政治。[67]他们的第二职能是激发未受教育者或者思维简单者的忠诚感：“即成为那些仍未受到充分教育之人的可见的团结象征，他们对此有强烈需求。”[68]第三职能是迎接外国政要。第四职能是提供一个道德楷模（他同时表示，维多利亚的许多先祖都未能满足这一要求）。最后一项职能是在过渡时期保障稳定，为政府更迭提供某种“伪装”。

君主的权力展示在政府的倒台和建立时达到最大化。白芝浩写道，当政党陷入分裂，无法选出领导人时，君主有可能“从陷入分裂之政党的高级成员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者”，当然前提是君主应保持公正无私。[69]但谁来判断君主的洞察力正确与否呢？[70]白芝浩认为，由于世袭王朝先天虚弱，很少有君主能够真正完成这样的任务：“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宪政君主的最大智慧是用思虑周全的无为而治来展现自己。”[71]然而，很明显，权力就在那里，而维多利亚一有机会就会夺取它，即使在党派没有分裂时依然如此。原则上说，只有在下议院中能够号令多数政客的人数超过1人时才会出现分裂。这种情况在维多利亚时

代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1894年。然而，她还在1852年挑选了阿伯丁勋爵，并在1894年挑选了罗斯贝里勋爵担任领导人——这些人都是合法的王室选择。在1886年因爱尔兰地方自治发生分裂期间，维多利亚曾试图推动阿盖尔公爵成立一个新的温和派政党，以“拯救国家和宪法”。她还曾鼓励那些反对地方自治的自由党人成立一个独立的自由党统一派组织。[72]

很明显，维多利亚还认为自己有权力将首相解职，并解散内阁，尽管这一权力从未被行使过。当希腊国王以“导致国家破产”的理由在1892年将整个内阁解职时，维多利亚认为他完全有权力这么做：“但行使这一权力是否明智要取决于具体情况。”[73]她会反对特定的人被任命为内阁大臣，但一旦内阁任命已经完成，她不认为自己可以再将他们解职。她的抗议通常至少在表面上是缘于道德因素——例如在亨利·拉布谢尔的案例中，他在结婚前就与自己的演员妻子同居了——以及个人原因（拉布谢尔还曾批评过君主制度）。正如在迪尔克事件中的做法一样，格莱斯顿提出了抗议，但接受了女王的否决权，将这两个人全部排除在外。

尽管身为行政部门首脑，但国王与女王却应该接受大臣们提供的建议。不过，只能在递送给她的政策文件上盖章的想法对维多利亚而言是一种侮辱：她可不仅仅是一台“机器”。毕竟，斯托克马曾对她说，君主是“永恒的首相”[74]，而首相仅仅是“临时的内阁首脑”。迪斯雷利也曾鼓励她提高自己的存在感，称她为“女独裁者”和“女仲裁人”。亨利·庞森比则向另一个方向采取行动，花费了许多年焦急地试图确保维多利亚仰赖大臣们的建议，而不仅仅是依赖她自己的想法。[75]不过，尽管她曾采取行动击败过内阁的提案，但从未否决过任何一项提案。例如，当格莱斯顿推动一项旨在解散爱尔兰教会的法案时，维多利亚既表示出对该法案的反对意见，同时又对该法案的通过提供了帮助。

到维多利亚统治末期，英国距离成为民主国家已经越来越近——有三分之二的男性如今拥有投票权（尽管女性仍然无法投票），君主的权力也大大削弱。作为女王，维多利亚所从事的工作职能接受了不断的重新定义。她殚精竭虑地工作，以维持自己的权力，但这些工作主要是在私下进行的。她还是一个聪明而强势的政治权谋家，但她却狡猾地在自己的臣民面前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喜欢在苏格兰慢跑的平凡母亲。这证明她拥有敏锐的政治直觉；她知道，当她表现得像是国民一员时，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喜爱，但在面对大臣们时，她却固执地牢牢把控着自己的宪法权力。她曾经见证俾斯麦一步步侵蚀薇姬的公公、德国皇帝的影响力，而她不打算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她曾试图忽视格莱斯顿是所在政党的领袖，并且拥有民众支持的事实，但在她的阴谋诡计最终徒劳无功后，她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她一直所坚持的东西——如果她不能得偿所愿的话，她甚至威胁过要退位——实际上是她自己的影响力。

到19世纪80年代，格莱斯顿已经开始认为女王“有些无理取闹”了。[76]她对他施加的压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任首相——而他也用几乎同等的力量进行反抗，称她提出的获悉有关内阁争吵情况的要求“令人无法忍受”以及“无法接受”。他希望她能够退位，好让伯蒂继位，并且承认自己对君主制的信心已经出现了动摇。渐渐地，他对于她对他的看法越来越不关心。到1886年，她对他的厌恶已经变得如此显而易见、顽固不化，以至于几个月后当他的政府因爱尔兰问题出现分裂并倒台时，她甚至感到十分高兴。

他在1881年叙述了一次拜会女王的经历：“受到了十分礼貌的接待，进行了漫长的拜会，但我总是被拦在一道铁圈之外；即使我有力量，也没有任何意愿想要突破进去。”[77]他在写给查尔斯·迪尔克的信中说：“我相信，有一百个迹象可以证明，她十分期待我退休的那一天，就算不能令她欢呼雀跃，也至少会让她感到如释重负。”[78]他说的没错，然而他们两人却针锋相对地一同活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龄。维多

利亚始终低估了格莱斯顿的长寿。每一次她看到他，都觉得他看起来处于重病和身体衰退的状态。她也年纪渐长，走路需要拄着拐杖，每天还要接受按摩才能缓和坐骨神经痛以及风湿病。

格莱斯顿的秘书爱德华·汉密尔顿认为，维多利亚很可能十分嫉妒格莱斯顿，尤其是嫉妒他对英国臣民的非凡掌控。她经常警告他不要像在中洛锡安时那样进行竞选运动。她要求他注意自己的言辞，并且把他当作一个需要监督的青少年一样来对待，尽管他实际上比她还年长10岁。在他即将发表重要讲话前，她会给他寄去便条：在1881年时，她对他说要“非常谨慎”[79]，而在1883年，她要求他“警惕自己的言辞”[80]。汉密尔顿在1883年9月写道：

> 如他［格莱斯顿］所说，她在见到他这个老人受到的过分尊重时感到愤愤不平，这个老人经常提醒公众他的存在，而且经常加班加点地为公众工作，而女王陛下却由于自身生活方式的原因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她无法忍受报纸专栏文章中“格莱斯顿先生的近期活动”用大号字体展示，而宫廷公报却在下方用小号字体展示……她发现自己身边的这个首相所拥有的地位在英国独一无二，与此前她所经历的首相大为不同，甚至连在她之前的任何君主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首相。[81]

在所有曾经与维多利亚共事的政治家中，格莱斯顿是最具远见的一位。他与伤痕累累却爱说俏皮话的墨尔本勋爵截然不同，后者更喜欢无为而治而非采取行动。格莱斯顿与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斗争，誓言即使孤身一人也要勇往直前。他没有耐心进行民意调查或者使用焦点小组的研究方法——更喜欢采取劝说和领导的方式。他引入了第一项全国性教育法律，即1870年教育法案，凭借1872年选举法冲击了爱尔兰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解散了爱尔兰的英国国教教会，试图通过《腐败行为法》来消灭购买选票的做法，开始为招聘公务员举行考试，并且结束了男性公民需要付钱才能获得军中正式职务的做法。

或许，维多利亚跨越宪法界限的做法之所以没有引发更多争议，是

因为她的这些做法很少成功；如果她成功将格莱斯顿赶下台，或者设法劝说某位中间派议员接受组阁任命的话，人们会大受震动，而她也会受到谴责。在她臣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在苏格兰散步，而不是将一名民选上台的首相赶下宝座。维多利亚与格莱斯顿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意志与个性的重大冲突。[82]庞森比后来厌烦了在维多利亚与格莱斯顿之间来回传递言辞礼貌的愤怒信函，以至于在1884年一次漫长的争执期间，他要求首相直接写信给女王。庞森比对妻子玛丽说，他可不想把“手指放在相互碰撞的两艘铁甲舰之间”[83]。

---

[1] Vovk，*Imperial Requiem*，61.

[2] Jenkins，*Gladstone*，511.

[3] Longford，*Victoria R.I.*，467.

[4] Zetland，*Lord Cromer*，110.

[5] Gordon，*The Journals*，59.

[6] 到9月时，他已经称他“相当疯狂”了。Jenkins，*Gladstone*，212.

[7] Queen Victoria to Vicky，Windsor Castle，February 20，1884，Fulford，*Beloved Mama*，159.

[8] 她还指示他烧掉她“非常私密”的信件。她还给他的妻子沃尔斯利夫人下达了类似的命令。“威胁如果他没有得到强劲支持就辞职。我给你的暗示永远不能公之于众，沃尔斯利勋爵也永远不能对外透露。但我真的觉得他们必须被吓一吓。” May 28，1885，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79 and 1885*，3：619.

[9] Queen Victoria to Vicky，February 27，1884，Fulford，*Beloved Mama*，160.

[10] Cited in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371.

[11] 维多利亚在听说戈登被抓后，于1885年2月7日致信薇姬，称格莱斯顿是一个“老罪人”，并哭喊：“我们一如既往的太晚了，而我作为国家元首要去承受耻辱。” Fulford，*Beloved Mama*，182.

[1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Osborne，February 11，1885，Fulford，*Beloved Mama*，182.

[13] Jenkins，*Gladstone*，514.

[14]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400.

[15] Seaman，*Victorian England*，447.

[16] Jenkins，*Gladstone*，501.

[17] Kuhn，*Henry and Mary Ponsonby*，205.

[18] Longford，*Victoria R.I.*，372.

[19] 在南部和北部非洲以及中亚地区。Jenkins，*Gladstone*，501.

[20] 这件事发生在爱丽丝的大女儿维多利亚与亨利的哥哥路易斯的婚礼上。维多利亚有些分心，因为她发现爱丽丝的鳏夫、黑森公爵路易斯娶了自己的情人，一个来自俄国的离异女子。她立刻就做出安排，取消了这桩婚姻，并且派伯蒂将消息告诉了那个倒霉的女人。（这名女子后来生下了公爵的孩子，却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伯蒂说：“在我们都意见一致时，我们是一个紧密的家庭。”也是一个有些残忍的家庭。——作者注

[21] June 20，1884，Fulford，*Beloved Mama*，168.

[22] Queen Victoria to Vicky，January 15，1879，Fulford，*Beloved Mama*，34.

[23] Dyhouse，*Feminism and the Family*，27.

[2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3，1885. 她说，她在这次婚礼上受到的感动比另外八个孩子的婚礼都要多，“但是充满自信”。

[2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3，1885. 她说，她在这次婚礼上受到的感动比另外八个孩子的婚礼都要多，“但是充满自信”。

[26] Lady Geraldine Somerset，引自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373。

[27] Roberts，*Salisbury*，795.

[28] Roberts，*Salisbury*，793.

[29] Longford，*Victoria R.I.*，567.

[30] Longford，*Victoria R.I.*，461.

[31] 作为《蓓尔美尔报》（*Pall Mall Gazette*）编辑，斯特德将在1885年引人注目地揭露伦敦的儿童性交易状况——《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The Maiden Tribute of Modern Babylon*）系列文章——并得到了女权主义改革家约瑟芬·巴特勒的帮助。对于如此可怕的故事得到出版并供大众审阅，维多利亚感到十分恐惧，而当斯特德因淫秽罪被捕时，她也拒绝进行干预。格莱斯顿令人惊讶地对这些故事没有展现出兴趣，却匆忙在议会推动改革，因为他知道，斯特德可能拥有某些涉事议员的姓名。（格莱斯顿说，她对于“大量可怕故事的搜集方式，以及这些故事在街头的广泛分布所产生的道德后果都十分不满”。）不过，女性可以合法性交的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惩罚措施也得到了加强。斯特德后来登上了泰坦尼克号，并随着那艘船沉没在了冰冷的北大西洋中，但他却实现了流芳百世。——作者注

[32] October 30，1883，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79 and 1885*，3：451-52.

[33] Queen Victoria to Mr. Goschen，January 27，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158.

[34] Memorandum by Queen Victoria，January 28，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163.

[35] Queen Victoria to Lord Tennyson，Osborne，July 12，1885，Hope and Tennyson，*Dear and Honoured Lady*，120.

[36] Lord Tennyson to Queen Victoria，Freshwater，Isle of Wight，July 20，1885，Hope and Tennyson，*Dear and Honoured Lady*，121.

[37] Queen Victoria to Mr. Goschen，Osborne，January 31，1886，皇家档案馆 3/204.

[38] Memorandum by General Sir Henry Ponsonby to Queen Victoria，Osborne，January 29，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176.

[39] Memorandum by Henry Ponsonby，St. James Palace，London，January 30，

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199.

[40] Sir Henry Ponsonby to Queen Victoria，St. James，February 3，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228.

[41] Telegram from Queen Victoria to Henry Ponsonby，March 2，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239b.

[42] Memorandum from Lord Goschen to Queen Victoria，January 29，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192.

[43] 早在1845年，他就致信妻子："爱尔兰，爱尔兰！那朵西方的阴云，即将来临的暴雨。" Jenkins，*Gladstone*，276.

[44] 至关重要的是，他还在爱尔兰引入了秘密投票。

[45] Samuel Clark，*Social Origins of the Irish Land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120.

[46] Longford，*Victoria R.I.*，446.

[4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9，1880.

[48] 她写道，暴力行为如此严重，尤其是针对地主的暴力行为，以至于甚至可能"有必要实施宵禁"。（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1，1880.）她还鼓励爱尔兰首席大臣（Chief Secretary to Ireland）福斯特（Forster）在没有得到充足资源以遏制"非法行为和恐怖主义"的情况下以辞职相威胁。（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16，1880.）四个月后，格莱斯顿引入了《高压统治法》（Coercion Act），该法律暂时中止了人身保护权，于是那些涉嫌犯罪活动的人可以未经审判就遭到逮捕。在扩大警察权力的同时，格莱斯顿还引入法律，帮助贫穷农民摆脱了逾期债款的烦恼。

[49] Kuhn，*Henry and Mary Ponsonby*，208-9.

[50] Queen Victoria to William Gladstone，Osborne，February 4，1886，皇家档案馆 VIC/MAIN/C/37/240.

[5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3，1886.

[5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6，1886.

[53] Letter from Gladstone，May 8，1886，excerpted in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y 8，1886.

[54]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508.

[5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20，1886.

[5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February 1，1886.

[57]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558.

[58] 英国议会上院和下院一直到1914年才通过地方自治法案，随后又因为战争爆发而遭到推迟。一直到1921年，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动的游击战争结束后签署协议时，爱尔兰才获得了独立地位。南爱尔兰在第二年分裂出去——并被称作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而北爱尔兰则一直留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作者注

[59]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80-81.

[60] 塞缪尔·约翰逊听一个朋友说，在一场贵格会教徒的聚会上听到了一名女性在讲道。他说："先生，一个女性来讲道就像是一条狗用后腿走路一样。这样做是做不好的；不过光是能做到，就会让你感到惊讶了。" July 31，1768，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405.

[61] Gosse，"The Character of Queen Victoria，" 333. 他接下去写道："她自认为在职业上是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中心。这种意识，这种或许甚至有些荒诞不经的对自身不可或缺性的信念，极大地帮助她每天保持了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而且渐渐地，她让公众的想象力为她着迷。" Gosse，"The Character of Queen Victoria，"，337.

[62] Creston，*The Youthful Queen Victoria*，5.

[63] Brett，*Journals and Letters*，1：74："女王在会议期间有好几次向大臣们表示异议，而且我必须承认，每一次我都觉得她的干预是有道理的。她总是在内阁的权威面前屈服，但她并不总是对单个大臣的意见妥协。格莱斯顿对待她十分无理，断言说，如果看到她像她的伯伯们那样把政府关门的话，他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

[64]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48.

[65]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60.

[66] 还可以说，白芝浩的构想是在乔治五世国王统治期间巩固下来的。参见Heffer，*Power and Place*，463。

[67]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37.

[68]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41.

[69]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54.

[70]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65.

[71]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57.

[72] Hardie，*Political Influence*，91-92.

[73] Longford，*Victoria R.I.*，516.

[74] Martin，*The Prince Consort*，2：445.

[75] Aronson，*Victoria and Disraeli*，192.

[76] Aronson，*Victoria and Disraeli*，565.

[77] Jenkins，*Gladstone*，468-69.

[78] Jenkins，*Dilke*：*A Victorian Tragedy*，TK.

[79] 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the Years 1879 and 1885*，3：241.

[80] 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the Years 1879 and 1885*，395.

[81] Bahlmann，*The Diary of Hamilton*，486-87.

[82] 讽刺的是，维多利亚与格莱斯顿之间意见取得一致的一件事就是，给予女性投票权或者说任何政治权力都是没有意义的。老头子断言，这有可能导致女性破坏她们权力的源泉：“即其自身本性的敏感、纯洁、精致和高贵。”[84]维多利亚对此

表示同意，尽管与此同时，她还是向首相寄去了一轮又一轮的信件和电报，要求他屈服。——作者注

[83] Gladstone to Samuel Smith，April 11，1892，引自 Bell and Offen，*Women，the Family，and Freedom*，2：224.

[84] Kuhn，*Henry and Mary Ponsonby*，202.

27 头戴软帽的君主

将这个庞大帝国团结在一起的象征是一顶王冠，而不是软帽。[1]

——罗斯贝里勋爵

他们想让她带上一顶王冠。毕竟，过去的君主都是这么做的。在金禧庆典上，女王当然应该戴上一顶闪亮的王冠，以彰显她长达50年的统治，那将是她崇高地位、指挥角色、巨大财富以及非凡成就的象征。但维多利亚却不屑理睬其首相与家人的请求。在1887年她的金禧庆典上，她头戴软帽，身穿朴素的黑色长裙。她拒绝穿着传统的紫色天鹅绒长袍以及仪式王冠，也不愿带上半个世纪前她在登基大典上小心携带的权杖与宝球。在场的有各国国王与王后、公主与王子、欧洲各国的伟大男性与女性，他们全都珠光宝气、光彩照人；但维多利亚却一身黑衣地坐在马车里，紧跟着他们徐徐入场。这既是她的特质也是她的本能，而且完全是前无古人：她是一个头戴软帽而不是王冠的女王。[2]她身居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巅，却呈现出最为温顺的名誉元首的形象。

1887年6月2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威斯敏斯特教堂即将举办一场感恩礼拜，维多利亚坐在马车里，用阳伞遮住了自己的面庞。50年前，她曾经是一个兴奋而秀丽的少女：“英格兰玫瑰”。如今，她是一名白发苍苍的寡妇，生育了9个孩子，失去了丈夫、2个孩子、5个孙辈，以及她最忠实的朋友与伙伴。她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骑在马背上在公园中疾驰，而是经常坐在小马椅上被人推来推去，看起来行动十分不便，而且时常露出疲态。她四顾望去，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欢呼声，以及面带微笑、眯起双眼抬头仰望的面庞所构成的海洋让她感到难以承受。她的侍女剑桥公爵夫人形容说，“蜂拥在街道上的数百万人”看起来“就像是蚁丘一般”[3]。

一群工人跟着维多利亚的马车一同奔跑，时而欢呼，时而大喊：“你做到了，老婆婆！你做得好！你做得好！”[4]她向他们点头致意，开心地笑了起来，红红的眼眶噙满泪水。她的面前站着一排排的王室成员：她的三个儿子、五个女婿以及九个孙子或外孙。印度骑兵的佩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淡黄色马匹拉着的马车上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王室成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行进队列中，有43人是维多利亚的家人，包括她孩子和孙辈的配偶。进入教堂后，她坐在了覆盖在加冕王座上的红色貂皮长袍上——但是显然“绝对没有穿在身上”[5]。她向坐在下方的下议院议员们望去。她扫视着他们的面庞，没有看到格莱斯顿的身影，尽管他就在那里。

参加仪式的女性大多数都穿着浅色服装，或白色或灰色，这些朴素的丧服正是维多利亚所规定的。

争奇斗艳的反而是男人：他们穿着红色制服、绣花西服以及长至拖地的紫色天鹅绒主教长袍等。最光鲜亮丽的参与者是那些来自遥远殖民地的家伙，“东方的总督们”炫耀着自己鹅卵石般大小的钻石和绿宝石，有的挂在胸前，有的则绣在了头巾上。

女王还是做出了一点妥协：她20年来第一次在软帽的边缘绣上了白色蕾丝，并且镶嵌上了钻石。仅仅几天后，伦敦的时髦女士们就带上了类似的镶钻软帽。一名记者在7月，也就是金禧庆典结束后的一个月白金汉宫举行的一场王室花园宴会上略带不满地记录了这一趋势：“教堂里的女王陛下和公主们之所以头戴镶边软帽，是为了代替头冠。但是女士们在花园宴会上也头戴镶嵌珠宝的软帽就不像话了。”[6]

在好几天时间里，英国各地举办了各类市集、野餐、赛艇会、体育锦标赛，以及为孩子、穷人和老人举办的晚宴等。对孩子们来说，这些活动仿佛具有魔力一般。12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学校里给母亲写信说：“除了50周年庆祝活动，我的脑海里什么都没有。”为期两天的庆祝

活动以一场在海德公园中举办的派对告终，参加派对的是3万名学童。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下了肉馅饼、圆面包、橙子以及牛奶、柠檬汁和姜汁啤酒等。在娱乐方面，现场有6支军乐队，20场《潘趣与朱迪》演出，100个摸彩桶，8个牵线木偶小剧场，9支进行犬类、马驹以及猴子表演的小剧团，1000根带有“50周年庆祝手柄”的跳绳，1万个小气球，以及4.2万个其他玩具等。[7]巨人与侏儒一同进行巡回演出。

从苏格兰北部到英格兰最南端，“大多数的山丘上都燃起烽火，火堆一直燃烧到破晓时分”。光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2个郡，就点燃了1000多处烽火[8]，而在远居北方的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当地人甚至很难看清烽火的样子，因为那里的天空一直到午夜时分还会被夏日的太阳所照亮。[9]不列颠群岛的处处山峰都点亮了帝国的荣耀。

这场庆祝活动可谓史无前例：1785年时，为庆祝乔治三世国王登基25周年，也曾试图举行过庆祝活动，但很少有人前来参加。

如今，伦敦就像是一座快乐之城，煤气灯、煤油灯、灰光灯、电灯、大烛台和彩灯交相辉映。如此多的灯光将整座城市照得透亮，甚至有些地方，灯光比白天还要亮一些。邦德街（Bond Street）上的布雷登巴赫先生（Mr. Breidenbach）用喷嘴将紫罗兰香味的香水喷到50英尺的空中，然后用电灯将其点亮。

在这整个过程中，阿尔伯特都是一个由维多利亚坚持不懈的哀悼变幻出来的幽灵形象。当6月20日清晨的阳光破晓时，维多利亚一如既往地敏锐察觉到自己的孤独。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到来了，而我依然孤身一人。”距离她的丈夫去世，已经过去了25年。有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一无所知，但她仍然固执地身披黑衣站在那里，试图向他表示敬意，她很确定，人们的欢呼声表明他们知道她在失去了他之后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在金禧庆典结束后，维多利亚写了一封信，感谢她的臣民们在她往返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路上对她表示出的热情：“可以看

出，这漫长的50年，我的辛勤劳动和殚精竭虑受到了我的人民的认可，其中的22年，我是在无比的幸福中度过的，拥有我亲爱的丈夫的陪伴和支持，还有同等长度的年份充满了悲伤与苦难，没有了他庇佑的臂膀和睿智的帮助。”[10]

当她的300万臣民向“女性金禧公募基金”（Women’s Jubilee Offering Fund）捐款，并募集7.5万英镑资金时，维多利亚决定委托建造阿尔伯特的又一尊雕像（不过她用这笔钱中的大部分成立了女王金禧护理学院[11]）。多亏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仍然留在人们的心中（不过她还是改变了他的一些严格规定：她允许那些被认为是离婚案中无辜一方的女性参加金禧庆典；她甚至考虑将这一特权赋予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这类女性，但索尔兹伯里勋爵建议她放弃这个念头，“因为此举有可能会招来那些轻浮的美国女子”[12]）。这是一个展现仁慈的好时候——在帝国各地，囚犯们纷纷获释出狱，不过那些曾残忍对待动物的囚犯却是例外，他们的罪孽无法得到维多利亚的原谅。

一如既往的是，维多利亚在众多亲属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孤寂。她渴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公开表现对她的爱。在阅读孩子们为金禧庆典准备的演讲稿时，维多利亚给庞森比写信说：“女王对这些答复表示满意，但始终希望其中加入‘我亲爱的母亲’这几个词。不仅仅是在这个场合，而且是要永远如此……女王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回忆起她时永远不要遗漏这个词。”

女王还有7名儿女尚在人世，分散在全球各地。如今他们团聚在伦敦，以庆祝母亲的长久统治。42岁的阿菲与家人一起驻扎在马耳他，担任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37岁的阿瑟是驻孟买英军的总司令，与妻子幸福地生活在印度——而且很快将迎来三个孩子。46岁的薇姬生活在普鲁士，内心痛苦且不受欢迎，受到心怀疑虑的媒体、反对英国的俾斯麦首相以及她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大儿子威廉的迫害。

其他的几个孩子还留在英格兰：刚刚年满30岁的比阿特丽斯如今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并且快乐地与自己的新婚丈夫利科生活在一起。当几个月后她在巴尔莫勒尔生下名叫埃娜（Ena）的女婴时，利科将埃娜称呼为“金禧小外孙女”。露易丝还没有到不惑之年，正处在一段与罗恩侯爵（Marquess of Lorne）的不幸婚姻之中。海伦娜已有41岁，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慈善事业之中；在金禧年里，她成为新近成立的英国护士协会（British Nurses’ Association）的主席。

伯蒂近年来日益受到维多利亚的喜爱，他如今已有45岁，身材肥胖，有5个孩子，但似乎与20年前相比距离继承王位并没有更进一步。W.T.斯特德在《蓓尔美尔报》上拿他开玩笑说：“‘身着红装的肥胖小秃头’威尔士亲王在他那位一身白衣、光鲜亮丽的德国姐夫身边看起来如此不起眼，他还会成为我们的统治者吗？”[13]

有时，维多利亚给人感觉就像是英国版图上永恒不变的风景似的。

在金禧庆典结束一周后，薇姬的丈夫弗里茨因咽喉增生接受了一次手术。增生被宣布是良性的，因而薇姬又燃起了丈夫有可能痊愈的希望。他喉部的小肿块最早是在5月被发现的，大夫曾经采取过几次笨拙而痛苦的尝试，试图用烧红的电线将其去掉，但每次被割掉后，它又会再次出现。有6名德国医生做出了喉癌的诊断，并且建议进行一项危险的手术，手术结果会导致弗里茨失去说话能力，甚至有可能丧命。英国专家莫雷尔·麦肯齐医生（Dr. Morell Mackenzie）在薇姬的请求下匆忙赶到德国去为他进行诊断。麦肯齐医生从他的喉部移除了一个据他说是良性的肿块。德国医生们坚持认为出了错；麦肯齐从他的喉部取出了又一个肿块，并且表示这也不是肿瘤。薇姬迫切地想要相信麦肯齐医生，但她对一名英国大夫的信赖激怒了当地人以及她的大儿子威廉，后者开始密谋将父亲从皇位继承顺序中驱逐出去。

威廉是一个自大、有时有些残忍且没什么才华的人，对自己的母亲

有一种特别的仇恨。薇姬在生育威廉时忍受的痛苦的臀位分娩意味着威廉必须被拽出她的子宫，导致他的左臂由于神经损伤出现了部分瘫痪（如今这种症状被人称作厄尔布氏麻痹）。这使得他的左臂比右臂短了15厘米，多年来，他一直通过将左臂放在佩剑或者其他支撑物上来掩饰这一事实。当时的医疗条件不足以治疗这种被认为十分羞耻的残疾。为了让他的左臂康复而采取的治疗方法简直耸人听闻。其中一种治疗方法最早在他仅仅几个月大时就进行了，名为“动物浴”。会有一只野兔被杀死并开膛破肚，每周两次；威廉的残疾臂膀要伸进仍然温暖的尸体中，希望野兔的生命能量能够神奇地转移到他的身上。威廉还曾接受过电击，并被绑在一个金属装置上，以强迫他保持抬头。他将自己的耻辱以及多年来所接受的痛苦而失败的治疗归咎于自己的母亲：他永远也无法原谅她。[14]

作为一个支持国家统治的军国主义保守派，威廉相信自己是家庭中真正的爱国者。薇姬对母亲说，他“幻想自己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自己比奉行进步主义的父亲弗里茨更具普鲁士精神，并且是俾斯麦以及与“专制主义和警察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的崇拜者。维多利亚对他这个28岁外孙的傲慢自大感到十分恼怒，以至于她甚至不愿邀请他参加自己的金禧庆典。薇姬不得不替他求情，特别谈到英国与德国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迹象，都会加剧她作为一个身处保守主义德国的自由主义英国女性所面临的难题。威廉曾希望将自己患病的父亲留在普鲁士，自行前往伦敦。身处英国的维多利亚对于他的这番诡计愤怒不已。甚至连俾斯麦都认识到威廉还太不成熟，无法担当统治国家的重任。俾斯麦认为，威廉冲动鲁莽，“喜欢受人奉承，有可能在出乎意料或者无意的情况下将德国拖入战争”[15]。不过，最终人们发现，威廉的问题根本在于他的性格，而非成熟与否，多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恰恰表明，威廉对战争的渴望远远超出了他指挥战争的能力。

1887年11月，弗里茨终于被确诊得了癌症；麦肯齐医生最终对此表

示认可。威廉很快就开始了赤裸裸地夺权行动，成功说服普鲁士皇帝——也就是他的祖父，弗里茨的父亲——授权由他来代表弗里茨签署文件。1888年2月，弗里茨接受了气管切开术。到3月23日，威廉已经成了副皇帝，在德国外交部工作，并且成为议会中众多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自己准备演讲稿，并且在桌上详细地写下了自己的继位计划。弗里茨知道自己已经被当成一个死人了；后来，威廉的妹妹夏洛特与弟弟亨利转变立场开始支持兄长，更加加重了对弗里茨的伤害。[16]薇姬对维多利亚抱怨说："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是即将消失的阴影，很快就会被现实所取代，而现实就是威廉！"对薇姬来说，自己丈夫在准备继承皇位时竟然病入膏肓，简直太过不公：皇帝如今已是90岁高龄，肯定命不久矣。她很确定自己的丈夫将会是一个伟大而仁慈的普鲁士领导人，也会是议会民主制的有力支持者。

1888年3月，身体日渐虚弱的弗里茨终于在父亲死后加冕为德国皇帝腓特烈。维多利亚很高兴女儿终于成为皇后："这让人觉得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梦。"[17]如今已经有半个世纪统治经验的维多利亚指导他们既要保持坚定，也要取得尊重，尽管弗里茨仍然病得很重。

弗里茨是一个无声的皇帝。他在纸上写下指令，并且只能通过插管来呼吸，而与此同时，他的大儿子却在不耐烦地等他死去。薇姬的神经十分脆弱，她的神经痛有时让她连床都下不了。她每天几乎都坐在丈夫身边织东西，他则将一袋冰块压在喉咙上，有时她会徘徊在他房门外，聆听他的呼吸，或者在他咳嗽发作时陪着他乘车出行。薇姬既孤独又被人误解；她的英国血统让她变得极为不受欢迎。她的私人信件经常被泄露给媒体，并且全文刊出。她的三个孩子全都抨击她，指责她造成了他们父亲的疾病，或者导致他只能接受糟糕的治疗。甚至连薇姬微笑时，都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她麻木不仁的证据。

统治精英们交头接耳地传播有关薇姬的流言蜚语。俾斯麦的儿子赫

伯特认为弗里茨即将到来的死亡是“好运气”；他很高兴能够摆脱一个娶了一名带有“彻底英国观念”的女人的男人，因为这种情况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外交政策。[18]贵族们和俾斯麦首相都担心弗里茨有可能试图将薇姬任命为摄政王。甚至连薇姬代替弗里茨签署文件的想法都遭到了俾斯麦以及她自己的儿子亨利的反对，亨利说：“霍亨索伦家族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不能由女人来领导。”[19]悲伤的皇后如今四面楚歌。

是时候由她的母亲进行干预了。维多利亚决定将在1888年4月结束在意大利度假的返程途中去普鲁士一趟，看望一下弗里茨并且展示支持。当她来到普鲁士时，她将会与老政治家俾斯麦直接面对面。当时还有另外一次微妙的外交行动至关重要。薇姬的女儿——也就是维多利亚的外孙女——维多利亚公主想要嫁给巴腾堡的亚历山大王子（Prince Alexander of Battenburg）——绰号“桑德罗”，亚历山大王子此前已经在1886年辞去了保加利亚国王的头衔，结束了连续七年的统治。弗里茨已经给予女儿他的批准。俾斯麦的儿子也对这位美貌的公主垂涎不已，因此俾斯麦强烈反对这桩婚事，理由是这有可能激怒俄国，尤其是新近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者是桑德罗的表亲。桑德罗既高大又帅气，很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喜爱，不过她还是劝薇姬等到得到完全批准再说。（她还获悉，桑德罗爱上了一个尤为漂亮的歌剧演唱家。）

当维多利亚走进弗里茨的房间时，后者给她递了一束花；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随后，她在夏洛腾堡宫她自己的房间里接见了俾斯麦。（索尔兹伯里勋爵敦促她带上一个大臣，但她拒绝了。）在他们独处的45分钟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但俾斯麦在走出房间时拿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不久后，他说：“我的天哪！那是个女人！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女人！”[20]作为一个将女性权威视作诅咒的男人，俾斯麦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言论，以显得更为讨好：“老奶奶在夏洛腾堡宫表现得非常理性。”[21]可怜的薇姬一边哭泣一边与母亲道别。但维多利亚的这次访问是成功的，她让德国人记起了这位皇后的母亲所拥有的巨大权力。

心怀嫉妒的威廉嗤之以鼻地说：“老太太是时候去死了。”[22]

弗里茨在皇位上只待了99天：他死于1888年6月15日。此时的他已经是“形容枯槁”[23]。在去世前一天，他曾经给妻子写了一张便条：“我会发生什么？”[24]薇姬在他的床边坐了好几个小时，拿着一块浸满白葡萄酒的海绵让他来吮吸。在他呼出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后，薇姬将他的佩剑放在他手上，然后亲吻了他的手和脚。威廉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的部队——数十名身穿红色制服的轻骑兵——很快就包围了整栋房子。他们仔细搜查了一番弗里茨的书房，寻找自由派阴谋的证据，而威廉则封锁了电报房。

新皇帝来到母亲的房间，彻底查抄了一番，并且指控她藏匿了一些他认为会被送往英国的秘密文件。薇姬站在一边看着他，哭泣不止。（她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薇姬已经在金禧庆典期间偷偷将弗里茨的私人文件带到英国去了，藏在白金汉宫的一个铁质保险箱里。后来，弗里茨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安排一名医生将他的战争日记偷偷带给英国驻柏林大使，他迫切希望保留一份对自己在普法战争和奥普战争以及德国统一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准确记录。[25]）后来，当薇姬试图走到阳台上，好剪下几朵玫瑰放在弗里茨的遗体上时，一名守卫粗暴地抓住了她的臂膀，将她赶了回来。

不知所措的薇姬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给母亲写信，因为母亲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她：“我已经是一个寡妇，不再是他的妻子。我该如何支撑下去？你做到了，我也会做到。”[26]维多利亚深表同情：“我不曾体验过看到另一个人填补我天使般丈夫之空缺的痛苦，我始终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忍受这一点！”弗里茨的空缺被他的儿子所填补，后者不仅对薇姬拥有统治权，而且还十分鄙视她。甚至连威廉的朋友赫伯特·俾斯麦都将他描述为“冷若冰霜。他从一开始就相信人民存在的目的就是受利用的……利用完之后，就可以弃之不顾了。”[27]威廉迅速埋葬了自己的

父亲，并且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查阅父亲对自己葬礼所做的指示。

这位奉行民族主义的新皇帝对英国极为敌视，这标志着英德关系出现了重要转变。他在拜访他所喜爱的外祖母时会穿上英军制服，还十分热衷于在怀特岛周围进行快艇竞速。但他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深层次的竞争关系，专注于建设普鲁士海军，寻求与英国海军展开竞争。他最终走上了与母亲的家族开战的道路，导致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王室的姓氏从“萨克森—科堡—哥达”改成了“温莎”，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与德国交战。威廉极为冷落伯蒂，在继承皇位后不久就曾拒绝在维也纳与他见面，理由是伯蒂在弗里茨的葬礼上出言不逊。维多利亚深感震惊，认为他既令人讨厌又自命不凡，而他的妻子则“令人作呕”。她仅有一次不情愿地允许他前往奥斯本宫来拜访她，那是在1889年，当时他表现出的讨好和对于能够身穿英国海军上将制服的兴奋之情让她放松了警惕。威廉夸张地说：“这是与圣文森特（St.Vincent）[28]和纳尔逊（Nelson）[29]一样的制服；足以让人感到眼花缭乱。”[30]

如果弗里茨的喉癌没有让他过早撒手人寰会怎样？德国有可能迎来一位奉行自由派理念、富有同情心的皇帝，这位皇帝想要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尤为厌恶反犹运动。薇姬曾写道：“作为一名现代文明人，作为一名基督徒和一名绅士，他认为这一运动令人憎恶。”他曾竭尽所能地抵制这一运动。[31]他的儿子威廉却恰恰相反，不断地煽动并领导反犹运动。威廉在1927年流亡荷兰期间曾写道：“媒体、犹太人和蚊子……是人类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掉的麻烦事。我相信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毒气？”作为父亲，弗里茨一定会与儿子煽动起来的这项运动进行斗争。[32]

维多利亚说，如果民主只能让威廉·格莱斯顿这样的人重新竞选上台的话，那么民主没有意义。格莱斯顿在1892年再次出任首相，这是十年来的第三次。维多利亚写道：“我们举世闻名的宪法有一个缺陷，那

就是像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这样备受尊敬的政府不得不下台，原因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选票不够多而已。”[33]维多利亚在宫廷公报中挑衅式地“遗憾地”宣布了索尔兹伯里的辞职。对她来说，不得不召见一个“82岁半的又老又野蛮的不可理喻之人”的确是无法承受之重。[34]比女王年长10岁的格莱斯顿年岁渐长，但仍然让女王感到恼怒。她将他描述为“垂垂老矣……脸庞萎缩、面色惨白，眼睛里带着一丝诡异的神色，嘴角还带着虚弱的表情，声音也变了”。[35]她指出，他身形佝偻，走路必须拄着拐杖。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

年纪越老，格莱斯顿就得坐得离维多利亚越近，因为他的耳聋越来越严重。他们都讨厌见到彼此，很难找到什么共同语言；女王说，会面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让她感到厌恶的是，格莱斯顿在1893年再次试图推动爱尔兰人的“渐进自治”，导致下议院出现了斗殴事件。上议院以419比41的投票结果明确否决了这一提案。格莱斯顿在有生之年里将始终无法看到爱尔兰实现自治。

1894年2月28日，在再次出任首相18个月后，年老体弱的格莱斯顿缓缓走上了温莎城堡的台阶。对于女王对他提出辞呈的反应，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最近，由于在支持海军建设方面缺少其他人的支持，他在政治上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与此同时，德国正在不断增强其海上实力。但格莱斯顿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身体上的衰退；他已经再也无法看得清或者听得清了。这位老大爷和他那位毫无同情心的女王共同度过了尴尬的半个小时，试图进行一些东拉西扯的闲聊，但最终不得不去讨论大雾与雨天，以及维多利亚即将到来的意大利之旅。维多利亚很明显感到如释重负。格莱斯顿写道：“我从未见过她气色这么好。她的兴奋之情正处于顶点。她的举止也始终很亲切。”相比之下，他的一些阁僚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泣不成声。格莱斯顿将他们称作“又哭又闹的内阁”。他的政治生涯横跨了60年；他担任首相的时间总计达到12年，还

担任了33年的枢密院成员（为君主提供建议的政治家）。

女王对格莱斯顿辞职信做出的反应既简短又粗鲁。她承认，在“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承担重任”之后，他“希望在这个岁数卸下如此艰巨的重担情有可原，她相信［他］能够享受和平与安宁，与他非凡而忠诚的妻子一起健康又幸福地生活，愿他的视力能够有所恢复。”她突然又说：“女王很愿意向格莱斯顿先生授予爵位，但她也知道他不会接受的。”[36]格莱斯顿感觉这就像一记耳光一样。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一点温情都没有吗？她至少可以表示一点点赞赏，甚至仅仅是一点点认可吧？难道他的离去没有令她感到一丝伤感吗？他将他们的道别比作1831年底他在西西里岛度假的末尾。当时他一直骑在一头骡子上。格莱斯顿回忆说，尽管他“在那头骡子的背上坐了好多个小时”，它从来没有对他做过坏事，还给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服务”，但“我实在无法对这头畜生产生一丝一毫的情感。我既无法爱上，也无法喜欢上它”。[37]

在下议院发表完他最后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讲后，格莱斯顿于翌日与妻子凯瑟琳一起前往温莎城堡，与女王共进晚餐，并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清晨，凯瑟琳前去觐见维多利亚，并且在会面期间一直哭个不停。她想要弥补他们之间的关系，想要让她尤为脆弱的丈夫确信他与女王之间的怨恨不会恶化，也不会广为人知。她两次请求维多利亚理解，她的丈夫是全心全意为她效力的，“无论他犯过什么错误”。维多利亚写道，后来，凯瑟琳“祈求我允许她向他告知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允准了；因为我相信情况的确如此，尽管有些时候他的行为让人觉得难以相信这一点”。凯瑟琳很聪明；她分享了许多有关阿尔伯特的记忆，以及他们之间相识有多么久。维多利亚写道：“在她离开时，我亲吻了她。”[38]

在历经几十年的冲突之后，女王在他辞职时对他表现出的粗鲁仍然让格莱斯顿感到困扰。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会像在“给店主结账”一样“简单地”就把他赶走了。[39]1894年3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他

与女王的关系中有“某种谜团，我一直无法理解，或许永远也理解不了”[40]。他希望家人将他晚年与女王之间的糟糕关系“隐匿于世”。至少现在，他再也没有义务去和她交谈了。

维多利亚都没有想要劳烦去问一下格莱斯顿，他的继任者应该是谁。她选择了罗斯贝里勋爵，一个温和的自由党人，既腼腆又焦虑，还支持帝国主义路线。最令她满意的是，他曾经向维多利亚保证说，自己不会主张地方自治。在经历了最初因他希望通过旨在解散威尔士和苏格兰英国国教教会的法案而产生的纠纷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融洽。女王的清晰明了和勇敢果决让这位新首相惊讶不已。46岁的他比女王年轻许多，扭转了此前许多年的态势。他所领导的政府基本无所作为，内阁内部分歧严重，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也很快就被上议院否决。这届政府只延续到来年的6月。看到他下台，维多利亚很难过。她一反常态地甚至更喜欢罗斯贝里，而不是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要知道，在政治上，她通常与后者更为意见一致。而在1895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人取得了巨大胜利。维多利亚所青睐的政党再次执掌大权。

在女王的世界里，核心是她的儿女和孙辈，她也一直在操心着他们的生活。她喜欢那些在她腿边爬来爬去、笑起来带有酒窝的年幼的孙辈们；阿瑟·庞森比写道，她对小孩子的爱如今显得“包罗万象”。她已经被人称作“欧洲的祖母”：她的子孙云集于欧洲大陆各国的宫廷，还会在德国、俄国、西班牙、希腊、罗马尼亚、葡萄牙和挪威等国的王室中继续繁衍下去。[41]爱丽丝的女儿、美丽的黑森公主阿利克斯同意嫁给俄国皇太子尼古拉。1894年，在婚礼的三周前，她被猝不及防地拉进了公众的视野中，因为她丈夫的父亲，也就是俄国沙皇，去世了。她与如今成为新沙皇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孩子后来在俄国大革命中悉数遇难。[42]

对维多利亚来说，埋葬一个孙辈，尤其是一个继承人，总是显得命运不公。但在1892年1月14日，伯蒂失去了他的大儿子，被称作艾迪

（Eddy）的阿尔伯特·维克托王子因肺炎不治身亡。艾迪只有27岁，原本即将在数周后迎娶自己的表妹、特克的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 of Teck）（他原本想娶另一位表妹，黑森的阿利克斯，但后者拒绝了他）。艾迪的弟弟乔治在玛丽悲痛之际与她关系日渐亲近，并在6月娶了她。（他后来在1910年成为乔治五世国王。）阿利克斯和伯蒂因为他们这个英俊而和善的儿子不幸离世而悲痛不已；阿利克斯在余生中一直保留着一个用来纪念他的神龛。这已经是她埋葬的第二个孩子了，因为他们最年幼的孩子在出生仅仅24小时后就宣告夭折。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艾迪之死一直是各种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的热衷话题。在他生前，他曾被传言是一家同性恋妓院的常客，是一名私生子的父亲，甚至还有人诽谤他是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有100多个人被认为与1888年伦敦穷人区白教堂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残忍的妓女谋杀案有关，但凶手始终未被发现。所谓艾迪就是凶手的指控最终被推翻。）

在1887年金禧庆典期间，随着维多利亚的马车缓缓驶出宫殿大门，一名高大瘦削的印度男子聚精会神地在窗边注视着。阿卜杜勒·卡里姆在她继位50周年时受邀前来服侍这位如今已有68岁的女王；他很快就将有力地运用自己的魅力赢得她的好感。时年仅有24岁的卡里姆对维多利亚而言代表了帝国的精华所在；他时常对她谈起“王冠上的明珠”印度的悠久传统，描绘他的祖国所拥有的稀奇文化与历史。他还教她说自己的语言，并且为她烹饪美味的咖喱。

她认定这是一个纪念金禧年的绝佳方式：在住处雇佣一些印度仆人。毕竟，她已经当了十几年印度女皇了，而且她还需要人的协助，来对付一群即将赶来参加金禧庆典的印度王公。卡里姆是一名来自阿格拉（Agra）的监狱职员，对于收到邀请，他感到兴奋不已，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来学习宫廷礼仪。他在金禧庆典开始前三天抵达温莎城堡，随行的还有敦实而讨人喜欢的穆罕默德·巴克什（Mohammed Buksh），两人身上整齐地穿着五颜六色的丝质束腰外衣。这两个神情紧张的家伙见到维

多利亚后亲吻了她的双脚。在她的描述中，卡里姆比巴克什“白得多”，“身材高大，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她还补充说，他的父亲是“阿格拉当地的一名医生”[43]。

这些举止优雅、备受尊敬的男子完美匹配了维多利亚对身旁助手的期待：谨慎、忠诚、讨喜。他们进步神速。他们抵达仅仅几天后，维多利亚就写道：“这几个印度人如今总是等在一旁，做这做那，干得很出色也很安静。”[44]卡里姆与她进行了漫长的对话，谈论他颇具异国情调的家乡。他的魅力让她陶醉，因而他的职责也渐渐增加。他对她说，他来到这里从来都不打算仅仅成为一个小小的仆人。他野心勃勃，想要获得更多东西。维多利亚在他的百般劝说下准备提拔他，她在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让他大老远过来仅仅在桌边侍候是一个错误，这件事他以前从未做过，他以前在自己的国家是一个职员，或者说是一个孟希[45]，处于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阶级。”[46]从那个月起，卡里姆开始教她印度斯坦语。她写道，这“让我感觉很感兴趣，很好玩”[47]。到12月时，她已经开始尝试在接见到访的印度王公时说上几句了。（亨利·庞森比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顽皮地写道：“她给了我一本印度词汇表来学习。”）当卡里姆回到印度休假时，她会想念他。她写道，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顺手，用处很大”[48]。

骄傲的卡里姆在宫廷等级上连跳数级，于1888年被任命为女王的官方孟希，或者说官方书记员。所有有关他服侍女王用餐的照片都被销毁。这时距离布朗去世仅仅过去了5年，卡里姆的快速升迁激怒了整个王室。他缺少布朗的政治品行和长期的服役历史，而且更善于在操纵女王的同时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好处。维多利亚给了他位于阿格拉的一大块土地，以及温莎城堡一间装饰一新的平房，还有位于奥斯本和巴尔莫勒尔的小别墅。卡里姆还为自己身处印度的父亲和兄弟谋得了升迁机会以及参加重要宴会的邀请函。他被授予三等印度帝国勋章殊荣，一般而言，获得这一殊荣的人从事的都是对国家而言拥有至关重要贡献的工

作。因自己的成功而日渐膨胀的卡里姆提出了越来越离谱的请求。[49]例如，他要求得到“大量”麻醉药品，包括吗啡和鸦片酊等，好寄给他的父亲。据维多利亚的医生詹姆斯·里德爵士估计，这一数量的药品足以杀死1.5万名成年人。[50]里德专门派去了一名信使以解释他为什么拒绝孟希的要求。

或许是由于卡里姆远离故土的原因，维多利亚对他的关怀细致入微。她竟然如此迅速地与他产生了如此信赖的关系，这一事实凸显出一个母亲的孤独感，要知道，她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成家，而她最亲近的男性伴侣们——阿尔伯特、布朗以及迪斯雷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里德不情愿地负担起了照顾这位印度仆人的任务，而维多利亚则向他寄去了许多冗长的信件，内容是有关他们的衣着、活动和健康等。她担心寒冷的气候可能是卡里姆罹患疥疮和疖子的原因。当卡里姆病恹恹地躺在房间里时，维多利亚经常在白天前来探望他，坐在床边轻抚他的手。疑心越来越重的里德——他是这段关系最为细致也最具偏见的记录人——记载了维多利亚在他房间里度过的许多个小时，“学习印度斯坦语课程、签署文件、检查他的脖子、平整他的枕头，等等。”[51]

女王迅速而单方面地将此前不为人知的穆斯林职员推到了君主制等级体系中的上层。阿卜杜勒·卡里姆的例子凸显出她的忠诚、她对种族主义的厌恶、她的友善，以及她容易受到吸引的特质和对亲密关系的盲目需求。作为从低等阶级擢升为女王第二位亲密伴侣的人，卡里姆很快就被视为约翰·布朗的继承者。但维多利亚比卡里姆年长了44岁，对他也更加具有母性关怀。她还十分信任他，即使在他的话应该遭到质疑时，她也深信不疑。不久之后，她的神志就将再次遭到质疑。

---

[1]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79.

[2]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79.

[3] Williams，*Becoming Queen*，343.

[4] Housman，*The Unexpected Years*，220.

[5] *Illustrated London News*，June 25，1887.

[6] *Illustrated London News*，July 9，1887，38.

[7] Pearce et al.，“Queen Victoria’s Golden Jubilee，” 597.

[8] Rusk，*Reign of Queen Victoria*，304.

[9] *Illustrated London News*，July 2，1887.

[10] *Illustrated London News*，July 2，1887.

[11] 参见 qni.org.uk/about_qni/our_history。

[12] December 11，1887，引自 Longford，*Victoria R.I.*，497。

[13] 引自 Ridley，*Bertie*，248。

[14] 萨塞克斯大学荣誉历史教授约翰·勒尔也认为威廉在少年时代曾对母亲有过性幻想，表现在他的性梦中，当她没有对他的渴望或者不恰当的言辞给出回应时，这种性梦就让他对母亲产生仇恨。参见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kaiser-wilhelm-iis-unnatural-love-for-his-mother-led-to-a-hatred-of-britain-8943556.html。

[15] Corti，*The English Empress*，259.

[16] Pakula，*An Uncommon Woman*，471.

[17] Fulford，*Beloved and Darling Child*，64.

[18] Corti，*The English Empress*，266.

[19] Pakula，*An Uncommon Woman*，470.

[20] Vovk，*Imperial Requiem*，61.

[21] 维多利亚在1888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请求俾斯麦亲王支持可怜的薇姬，他向我保证说他会的，还说她的命运很艰难。”

[22] Pakula，*An Uncommon Woman*，483.

[23] Corti，*The English Empress*，280.

[24] Corti，*The English Empress*，301.

[25] Pakula，*An Uncommon Woman*，439.

[26] Hibbert，*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388.

[27] Pakula，*An Uncommon Woman*，441.

[28] 第一代圣文森特伯爵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1st Earl of St Vincent，1735年1月9日～1823年3月14日），英国皇家海军元帅和英国国会议员。——译者注

[29] 第一代纳尔逊子爵霍雷肖·纳尔逊（Vice Admiral Horatio Nelson，1st Viscount Nelson，1758年9月29日～1805年10月21日），英国皇家海军中将，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译者注

[30] Emperor William Ⅱ to Sir Edward Malet，June 14，1889，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79 and 1885*，3：504.

[31] Statement of the Empress Frederick，1888，in Corti，*The English Empress*，293.

[32] Pakula，*An Uncommon Woman*，457.

[33] Kronberg Letters，July 6，1892. Cited in Longford，*Victoria R.I.*，518.

[34] Jackson，*Harcourt and Son*，213.

[35]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15，1892.

[36] Windsor Castle，March 3，1894，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86 and 1901*，2：372-73.

[37] Magnus，*Gladstone*：*A Biography*，425-26.

[3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3，1894.

[39] March 10，1894.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610.

[40] March 10，1894. Matthew，*Gladstone*：*1809-1898*，610.

[41] 当约克公爵与夫人生下了一名婴儿，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随后成为温莎公爵）时，维多利亚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有三个直系继承人，君主还活着。”其他的欧洲王室联姻包括：普鲁士的索菲公主（薇姬的女儿）嫁给了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毛德公主（伯蒂的女儿）嫁给了丹麦的卡尔王子；玛丽公主（阿尔弗雷德的女儿）嫁给了罗马尼亚的费迪南德；康诺特的玛格丽特公主（阿瑟的女儿）嫁给了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子；以及维多利亚·尤金妮公主（比阿特丽斯的女儿）嫁给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

[42] 她和丈夫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遭到囚禁，后来在监狱的地下室里被处决。亚历克斯对拉斯普京的诡异依赖激怒了饥饿的俄国农民，拉斯普京是一个负责照顾她患有血友病的儿子的隐士。她背对枪口，临死前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希腊东正教会在2000年将她封为圣徒。

[43]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3，1887.

[44]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ne 28，1887.

[45] 孟希一词出自波斯语，是那些熟练掌握语言之人所拥有的尊称，后被用于英属印度，意指当时印度政府所雇用的管理人员。——译者注

[46]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11，1888.

[4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30，1887.

[48]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November 2，1888.

[49] 当维多利亚设立印度之星勋章和大英帝国勋章时，她坚持要求勋章上不能带有任何基督教的符号，好让她的印度教和穆斯林臣民也能接受这些勋章。

[50] Reid，*Ask Sir James*，137.

[51] Reid，*Ask Sir James*，133.

28 “可怜的孟希”

女王似乎有些精神错乱。[1]

——詹姆斯·里德爵士

情况已经到了惊动警方的地步……但这也没用，因为女王说，这是“种族歧视”，我们都嫉妒那个可怜的孟希。[2]

——弗里茨·庞森比

维多利亚胳膊故意一甩，就把桌上所有的装饰品、照片、墨水瓶和纸张等物件一并扫到了地毯上。她挺直身子，大声地呼了口气。她想要的仅仅是带她的孟希一起去法国南部——毕竟，他之前曾陪她一起去过意大利——而如今，她的王室成员们却发动了一场叛乱。他们对她说，要么孟希走人，要么他们就走人。他们拒绝与他一同进餐。那是在1897年，距离卡里姆在维多利亚的金禧庆典前夕来到王廷已经过去了10年；在这10年里，维多利亚与这位印度助手关系越来越近，但紧张态势也在酝酿。里德医生甚至与威尔士亲王结成了同盟，他曾对伯蒂谈及“女王对孟希的态度以及与他的关系所带来的危机”。[3]维多利亚特有的固执的忠诚感是她从儿时就拥有的特质。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她不可能听人摆布。她似乎没有意识到，王室成员并没有欺负她，卡里姆才是那个欺负她的人。她始终焦虑的是他开心与否，以及他不能离开她身边。索尔兹伯里勋爵将这种依赖归因于维多利亚对某种兴奋感的渴求，因为这种感觉在老年女王的生活中太罕见了。[4]她最终取得了胜利，卡里姆在春季假期陪她一起去了法国。

到19世纪90年代初，卡里姆已经成为宫廷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1893年，他回到印度休假6个月，随后把妻子也带到了英格兰。另外两个被卡里姆称作“姨妈”的“妻子”也跟随前来，同行的还有其他亲属。

（里德医生写道，每次他去照顾生病的“阿卜杜勒·卡里姆夫人”，听到的口音都不太一样。）卡里姆在性事方面的混乱导致他反复染上性病，而里德医生似乎很喜欢将这些汇报给女王。他至少有两次严肃地对女王陛下说，卡里姆得了淋病，他还记下了维多利亚的惊讶之情。如果是阿尔伯特的话，可能已经吓得发抖了，但维多利亚却容忍了下来。

孟希在宫廷里不太受欢迎。维多利亚觉得他既脆弱又骄傲；她身边的人却觉得他既做作又虚伪。庞森比认为他是一个胖傻子。伯蒂也很讨厌他，但不敢跟母亲对着干，于是只好跟里德医生协商。里德医生一点也不信任孟希，觉得他是在利用女王的善意。1894年，在陪同女王前往欧洲度假途中，里德医生坐在他在意大利的房间里，罗列了一长串卡里姆身上让他感到最讨厌的事情，卡里姆也在随行队伍之中。这一长串的事情中包括卡里姆对于他的列车车厢位置的抱怨，他与王室男性成员一同骑马的渴望（这一渴望受到了女王的支持），他罗马之行的巨额开销，他霸占了女王侍女盥洗室的事实，以及他对于意大利报纸“毫不在意他”的抱怨，而在女王的督促下，这一抱怨被传达给了意大利报纸的编辑们，好让他们增加对他的报道量。[5]

卡里姆一直在为了自己被认可为一名王室成员，并被接纳为上流人士一员而斗争，但这让维多利亚的随从们感到极端厌恶。约翰·布朗曾经对地位问题毫不在意，更倾向于是一个平等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自吹自擂者，但卡里姆却渴望在等级体系中向上攀升。1889年，他发现自己在桑德灵厄姆的一场节日演出中被安排与仆人坐在一起时，于是站起身，径直走了出去。女王——她习惯于在他不开心时对他进行安抚——向他保证说，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当维多利亚的儿子阿瑟看到卡里姆正在布雷马运动会上与上流人士相谈甚欢时，他对庞森比抱怨了起来。1894年，卡里姆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维多利亚两名孙辈在科堡的婚礼现场，原因是他注意到自己被安排站在几名男仆的身边。卡里姆立刻给女王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让维多利亚伤心地泪流不止。她向他的要求

屈服，从那时起，这个来自阿格拉的年轻书记员就开始乘坐王室马车在阿尔伯特亲王的家乡游览，一名侍从则高坐在车厢上。他还被邀请参加所有的国家音乐会，但正如里德医生所写的那样，“每个人都躲着他”[6]。鉴于维多利亚对陪伴的渴求，王室成员们开始真正担心起善于操纵的卡里姆对女王的控制，以及她有可能做出的妥协。

尽管宫廷内部关系紧张，备受她喜爱的新对象也遭到诸多质疑，但这些年对于年逾古稀的维多利亚而言却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感。她在结束旅行回国时总是在兴致勃勃地聊天。侍女们说的每一个奇闻逸事都会让她大笑，她也因此越来越频繁地与她们单独进餐（她反而减少了与整个王室成员，以及政客和贵宾一同进餐的频率）。与阿尔伯特去世后悲痛哀悼的那几年不同的是，身边的美景总是能让她心情愉悦：“优美的光线照射在紫色的山丘和金色的桦树上，中间点缀着仍然绿意盎然的树木。”[7]她会对为了让她开心而表演的活人画（*tableau vivant*）兴奋不已，王室成员们会穿上历史或戏剧人物的服装，静悄悄地摆好姿势，等到大幕拉开，就会展示出一个细致入微的静态场景。这一场面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的，经过了许多个小时的排练以及为了拍照而摆的造型。维多利亚深表喜爱，因此他们排演了数十个活人画，模仿了伊丽莎白女王与雷利（Queen Elizabeth and Raleigh）、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卡门》（*Carmen*）以及《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等著名形象。[8]卡里姆与穆罕默德喜欢十分积极地参与这些精心安排的表演，装扮一番与维多利亚的子孙和伙伴一起摆造型。

孟希的人格伪装出现的第一道裂痕是在1894年，当时，他夸大自身地位的事实被揭露了出来。卡里姆曾经声称自己的父亲是驻印度英军的军医处处长，但里德医生却发现，他父亲仅仅是一个未获行医资格的医院助手，因此决心揭发他。1894年，在经过漫长的调查后，包括里德医生在内的四名男性王室成员撰写了一份报告，称卡里姆出身低贱、欺诈成性。作为回应，维多利亚对于在她看来的所谓阶级势利眼发起抨

击：“证明可怜的好孟希出身十分低贱的行为真的非常可恶，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也非常不合适……她知道有两名大主教都分别是屠夫和杂货店老板的儿子。”[9]她写道，她“为可怜孟希的敏感情绪而感到难过”。里德医生被命令停止调查，而且有关孟希的父亲仅仅是一名药剂师的进一步证据也被驳回并不予理会。

维多利亚有很好的理由去怀疑，人们之所以用恐惧和猜疑来看待卡里姆是源于种族歧视。（例如，里德医生在报告中反复提及的一项抱怨是针对孟希的妻子和岳母的：“比英国地位最低下的劳工更加不堪和肮脏；地毯上到处都是她们吐的痰。在起居室里宴请客人，等等。”[10]）女王认为，消除歧视至关重要，她自己就不存在任何歧视。她禁止其他人使用“黑人”一词；甚至连索尔兹伯里勋爵都因为这个词而陷入过麻烦。牧师们曾经向她保证说，穆斯林尽管不是基督徒，但也有可能拥有基督的灵魂，于是她也这样教导自己身边的人。[11]尽管维多利亚对女性权益态度十分保守，她却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十分进步。但卡里姆自己却表现出了她所憎恨的许多偏见，而在她看来，卡里姆才是这些偏见的受害者。在1894年访问意大利的行程中，他表现出比自己的同胞高人一等的态度，拒绝“允许其他印度人与他待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12]。

对孟希的抨击只是让女王更加拉近了与他的距离。机敏的亨利·庞森比绝望地看着他获得了女王越来越多的恩宠，写道：“黑色劲旅［卡里姆］的地位提升是一件着实让人烦恼的事。我害怕对此提出反对反而会加强她进一步提升他地位的愿望。越反对越要干。”[13]卡里姆得到了约翰·布朗的旧房间，他的肖像画被画成了金色的背景。1889年10月，维多利亚甚至带着他一起去了巴尔莫勒尔的偏远别墅，尽管她曾经在布朗去世后发誓再也不在那里度过一个夜晚。

1889年6月，维多利亚的一个珠宝胸针消失不见了，于是她指责自己的更衣女仆没有把它扣在围巾上。女仆坚称已经扣过了，但无论怎么

找都找不到。几周后，另一个受雇于金禧庆典时期的印度仆人穆罕默德揭发说，胸针实际上是被卡里姆的内弟胡尔麦·阿里（Hourmet Ali）偷走并卖给了温莎当地的一名珠宝商。当女王见到她的其中一名更衣女仆塔克夫人向她展示的证据时，她变得怒不可遏。但她并不是对阿里感到生气——而是对塔克夫人和珠宝商生气，大喊道："这就是你们英国人所说的正义！"卡里姆对她说，阿里只是遵循印度的习惯，将丢失物品捡起并装入口袋，但什么也没说，于是，维多利亚要求所有相关人员对此事保持沉默，并坚称她相信阿里的诚实。里德医生叹着气写道："于是，这起偷窃尽管得到确凿证明，仍然被忽略了，甚至变成了一件毫无疑问对卡里姆有利的事，女王似乎有些精神错乱。"[14]

女王尽可能久地忽略所有不利于孟希的证据。亨利·庞森比在1897年4月写道：

> 最近我们在孟希的问题上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也始终无法让女王认识到她让这个男人查阅每一份与印度有关的机密文件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女王坚持要将孟希推到前台，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抗议的话，不知道她何时才会停手。幸运的是，他碰巧是一个愚蠢至极且没受过教育的人，他的理想生活似乎是什么也不做，想吃多少吃多少。

卡里姆在社交上的大部分动作都是无伤大雅的。让王室男性成员感到更加担心的是，孟希渐渐通过诱骗手段取得了处理——以及越来越多地影响——女王与印度有关的信件的权利。卡里姆一心一意地想要说服女王解决印度国内穆斯林少数族裔面临的困境，包括他们在当地议会的代表权问题。维多利亚无意识地开始将印度提出的任何在她看来只需礼貌拒绝的请求，交由卡里姆来处理，允许他来答复。[15]

庞森比继续写道，真正的问题是，尽管卡里姆本人是个傻瓜，但他却有个聪明的朋友拉菲丁·艾哈迈德（Rafiuddin Ahmed），后者加入了伦敦的穆斯林爱国者联盟（Muslim Patriotic League）。卡里姆此前曾敦促维多利亚为艾哈迈德的律师生涯提供一臂之力，她也尽责地做到了。

女王甚至曾一度建议将他派到英国驻君士坦丁堡使馆任职，以确保有一名穆斯林外交官存在。这一请求遭到了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拒绝，后者对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其他人心存偏见的话，他是愿意接受这个机会的。很多人怀疑艾哈迈德曾经将国家机密泄露给英国在阿富汗的敌人——阿富汗当时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并且从孟希那里得到了关键情报，此时的孟希已经负责阅读“总督的信件，以及任何来自印度的重要信件”[16]。当孟希不顾王室的反对在1898年夏天陪同维多利亚一起游览欧洲时，他愚蠢地邀请艾哈迈德也一同前往。艾哈迈德很快就被阿瑟·比格赶走了，比格是在1895年亨利·庞森比爵士去世后取代他成为女王的私人秘书的。也就是在这时，在王室住进法国尼斯的蕾佳娜皇宫酒店，观赏波光粼粼的地中海之时，紧张局势终于爆发了。

维多利亚的医生坚定了自己的意志，准备好与女王进行一场漫长而不快的对抗。他感觉自己别无选择；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印度男人既讨人厌又控制欲极强，而且他还是对英国安全的潜在威胁。里德大胆地对一脸严肃的维多利亚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君主的声誉。伦敦警察局长已经向里德医生告知，孟希卷入了穆斯林爱国者联盟的活动之中。在合理不满和势利谣言的共同驱使下，里德医生确保让女王了解到，他已经因“她的精神清醒与否接受了质询”[17]。维多利亚泣不成声。她知道人们都说了她什么，也向里德医生承认“自己同意他反复提出的升职要求十分愚蠢，但还是在试图护佑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维多利亚在忏悔与愤怒之间来回摇摆。

终于到了与“卑鄙无耻的”卡里姆对峙的时候了。在王室其他成员还在下方的海滩上散步时，里德医生来到他面前，对他说，自己知道他是一个来自下等阶级的“冒牌货”，他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担任秘书的经验，还“是个两面派，一面展示给女王，另一面在离开女王房间后出现”。他还指责卡里姆骗女王的钱。卡里姆曾声称，印度的任何开销都不需要收据，因此在英国，也不应要求他提供收据[18]；随着他的开销

日渐增加，人们的疑心也越来越重。等到这群人几周后离开法国时，卡里姆已经遭到了制伏。精疲力竭的维多利亚要求她的绅士们不要再谈论这个“痛苦的话题了”[19]。她仍然继续为她“可怜的M”辩护，并反复表示，印度人之所以不喜欢他，是因为他们是印度教徒，而他是穆斯林。维多利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仍然在进行着反抗，试图为孟希以及他的朋友艾哈迈德洗清罪名。

维多利亚之所以对她的印度仆人如此依恋，部分是源于她自己对悉心照料的需求。此时的她已经进入古稀之年，怀孕、生产和体重增加带来的并发症导致她走起路来就疼痛难忍，也不可能站太长时间。正如她在从分娩中恢复时阿尔伯特曾做的那样，她希望能够被小心而温柔地从床上抱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被抱到马车上。她写道，印度人“十分聪明”，每次抱她时，都“不会把她弄疼”[20]。她的王室成员其实已经见到了这个安静而专注的男子给年纪衰老的女王带来的帮助，却拒绝承认这一点。

1895年时，悲痛再次降临王室。比阿特丽斯的丈夫、深受喜爱的利科请求被派往非洲的阿散蒂（Ashanti）地区任职，英国将在后来获得这片富含黄金的土地的控制权，这片土地后来被称作加纳。利科与比阿特丽斯的关系已经冷淡了下来，他与她漂亮的姐姐露易丝关系越来越近。颇具艺术气息且聪明伶俐的露易丝是一名才华横溢的雕刻家，但她的丈夫却几乎肯定是一名同性恋；她有过许多婚外情，并且与自己的导师、雕刻家约瑟夫·埃德加·贝姆保持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关系。利科与比阿特丽斯怀疑露易丝正在与女王的新秘书阿瑟·比格搞外遇，露易丝则指责他们是在诽谤。随着王室之中的纠纷变得激化，洛恩勋爵不得不前来为她辩护。利科在维多利亚的勉强同意下逃了出去，参加战争去了。

几周后，利科感染了疟疾，并且于1896年1月20日死于一艘前往加纳的运输船上，此时的他甚至还没有亲眼见到一场战斗。维多利亚悲痛

不已。她最喜欢的孩子如今也变得伤心欲绝，这两个身着黑衣的女人都饱尝了生活的不幸。伤心的露易丝对她说，自己曾是“利科的红颜知己，而比阿特丽斯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就像是简单耸耸肩一样丝毫不被在意”。这番话让比阿特丽斯更加痛苦。传记作家露辛达·霍克斯利（Lucinda Hawksley）得出的结论是，“利科认为露易丝是一个比比阿特丽斯更有共鸣的红颜知己（也的确真的只是红颜知己）的可能性非常高”。[21]比阿特丽斯常被人称作“害羞的公主”，余生都将像生命之初那样生活：全身心奉献给自己的母亲，以及对母亲言论的保护——和清理。她一生的工作将变成重新撰写和编辑她母亲的日记，这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审查行为。

里德医生没有放弃让卡里姆失去信誉的任务，而在1897年，他终于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也就是2月时，里德医生曾经与女王谈及“孟希的性病复发”。当被告知卡里姆在12月再次染上淋病时，女王“吃了一惊”[22]。不过，最终让女王有所踌躇的是卡里姆自私自利且不合时宜的宣传要求。1897年10月16日《每日画报》上刊登了一张照片，上面展示的是圆润的女王身披白色围巾、头戴黑色羽饰宽帽，正在签署文件，而身材魁梧的卡里姆站在她身边用一种自鸣得意、目中无人的神情看着相机。图片的说明是“女王在高地的生活，陛下正在聆听孟希、印度帝国三等勋章获得者哈菲兹·阿卜杜勒·卡里姆讲解的印度斯坦语课程”。摄影师对里德医生说，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对王室规定的一次令人难堪的违反——是在卡里姆的坚持要求下刊登的。在里德医生对女王告知了这一切后，她给他写了一封14页的长信，责备自己允许卡里姆这么做：

> 我非常烦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一直很难过，我的绅士们想要监视和干预我的一个身边人，对于他，我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证据感到怀疑，对于发生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难过。

她请求里德医生了结这件事，避免出现丑闻：“我内心的平静正在

遭受极大困扰。我害怕自己在这件事上犯下了巨大的错误……我实在读不下去，请求你将它烧掉，还有我今天早上的信件也一起烧掉。”[23]但卡里姆依然岿然不动。

当伯蒂后来在1901年成为国王时，他想要清除一切有关母亲与一位印度书记员之间友谊的痕迹，于是下令将孟希的所有文件都丢进火堆中烧掉。维多利亚曾下令在她的葬礼行进队伍中给卡里姆安排一个位置，但在葬礼结束后不久，伯蒂就下令孟希及其妻子立刻离开英国回到印度。他还派侦探前往印度监视卡里姆，以防止他将机密文件私自带出英国。孟希回到了阿格拉，在这片女王为他购置的土地上变得越来越胖，并且在1909年去世，终年仅有46岁。卡里姆从未说过王室的坏话。他的名字也将永远与宠爱他、轻信他的女王联系在一起。

1896年的一个上午，格莱斯顿一醒来就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感觉。他梦见自己与维多利亚共进早餐。他们似乎有了一次性接触，其中包含了一些有关“如何进入以及从哪里进入”的困扰。[24]这个梦让他惊愕不已——他与女王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当然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在第二年，将会出现一次勉强的和解时刻。1897年，多亏了维多利亚的女儿露易丝，格莱斯顿与妻子凯瑟琳在戛纳的一座酒店里见到了维多利亚。都已经近乎失明、老态龙钟、腿脚不便的维多利亚和格莱斯顿第一次握了握手。女王说，他们都“很老了”。这两个曾经固执无比的人交谈了几分钟，格莱斯顿后来表示，“女王在谈话方面的奇特能力和习惯已经消失了”。他已经87岁了，正在饱受面部神经痛、颊癌和黏膜炎的折磨，这促使他退出了一切政治活动。他在1896年9月24日发表了最后一篇演讲——主题是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最新犯下的暴行。在准备1897年钻禧庆典时，维多利亚没有要求格莱斯顿参与其中。

1898年5月19日清晨，在辞职4年后，格莱斯顿终于去世了。他的死因被记录为“老年性昏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甚至连他的死亡的庄

重性也没有阻止女王的无礼。她不愿给凯瑟琳·格莱斯顿写信，因为她就是不喜欢格莱斯顿：“如果我一点也不遗憾的话，怎么能说自己遗憾呢？”她在一封写给薇姬的信中对自己持久的无礼进行了一番解释：“我不能说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英国人’。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才华横溢，但他从未试图维持大不列颠的荣耀和威望。他放弃了德兰士瓦，放弃了戈登，摧毁了爱尔兰教会，试图将英格兰同爱尔兰分裂，挑起阶级对立。他所造成的破坏无法轻易抹除……但他的确是一个很好也很虔诚的人。”很奇怪的是，格莱斯顿的死没有被记载在宫廷公报里。维多利亚后来对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这“完全是一次疏忽”。

在5月28日格莱斯顿的葬礼举行前，有25万人前来威斯敏斯特教堂瞻仰格莱斯顿的遗体。一直与格莱斯顿保持着友谊的伯蒂在葬礼上担任抬棺人，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五世国王也担任了同样的角色。当维多利亚听说伯蒂打算为自己的前敌人抬棺时，她给他发去了一封电报询问原因：这是谁的主意，是否有先例？威尔士亲王直言不讳地答复说，他不清楚有没有先例，也没有人给他提建议。在后来发给凯瑟琳·格莱斯顿的电报中，维多利亚对如今被视作维多利亚时代支柱的格莱斯顿致以最高褒奖，称他不只是“我统治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女王不会委托在英国的大小城镇为这位老大爷树立雕像。在维多利亚的身边，首相、孩子、朋友和亲属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她却始终屹立不倒：一些臣民已经开始觉得她是永生不死的了。

---

[1] Reid，*Ask Sir James*，132.

[2] 弗里茨·庞森比——亨利的儿子，当时是王室里的下级侍从——关于卡里姆·阿卜杜勒，April 27，1897，Longford，539.

[3] Reid，*Ask Sir James*，143.

[4] Reid，*Ask Sir James*，154.

[5] Reid，*Ask Sir James*，139.

[6] Reid，*Ask Sir James*，140.

[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October 23，1891.

[8] January 6，1888，Balliol College，Marie Mallet Archives Lady in Waiting，Mallet V 1-11. Envelope marked “Mallet V i. First Waiting as Maid of Honor，1887，Letters to her Mother.”

[9] Arthur Ponsonby，*Henry Ponsonby*，131.

[10] Reid，*Ask Sir James*，139.

[11] Longford，*Victoria R.I.*，509.

[12] Reid，*Ask Sir James*，139.

[13] Reid，*Ask Sir James*，138.

[14] Reid，*Ask Sir James*，132.

[15] Longford，*Victoria R.I.*，508.

[16] Letter from Fritz Ponsonby about Karim Abdul，April 27，1897.

[17] Reid，*Ask Sir James*，144.

[18] Reid，*Ask Sir James*，146.

[19] Reid，*Ask Sir James*，146.

[20] King，*Twilight of Splendor*，201.

[21] Hawksley，*The Mystery of Princess Louise*，269.

[22] Reid，*Ask Sir James*，153.

[23] Reid，*Ask Sir James*，152.

[24] 马修（*Gladstone*：*1809-1898*，610）在1896年强调说，这个梦“也许有性的

成分，因为他记载了有过‘有关如何以及在哪里进入的小小不安’。他曾在1839年用过‘待进入’（reserved for access）一词来描述自己在婚姻方面的童贞（参见14 June 39）”。在1896年年底，他还发表了一份私下声明——《宣言》（*Declaration*）——谈及“我相信曾经一度流传的流言蜚语”，而当时他没有办法出面为自己辩护。他在上帝面前宣称“我在生命中任何时候都没有犯下对婚姻不忠的行为”。这份发表于1896年12月7日的宣言全文如下：

关于我相信曾经一度流传的流言蜚语，尽管我不知道曾经流传到何种程度：而且鉴于当时我无法出面为自己辩护；我希望在此记录我在上帝以及他的审判席面前的严正声明和保证，那就是我在生命中任何时候都没有犯下对婚姻不忠的行为。我坚决否认这一点，我还与我亲爱的儿子斯蒂芬分享了这一观点，他既是我现在年纪最大的儿子，也是我的牧师。他将有权决定如何保存或者使用这一声明，除非必要——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否则应当私下保存：而且无论如何，应当让他的弟弟们知晓。

29 钻石帝国

我相信，从来也没有人见过我所受到的这种喝彩……欢呼声震耳欲聋，每一副面庞似乎都洋溢着快乐。

——维多利亚女王，1897年6月22日

这个房子里没有人抑郁；我们对失败的可能性不感兴趣；它们根本不存在。[1]

——维多利亚女王，1900年

奥斯卡·王尔德说，对于时间横跨60年的统治，应该泰然自若地进行庆祝。[2]为庆祝维多利亚继位60周年，这位剧作家决定为法国滨海贝内瓦尔（Berneval-sur-Mer）村的儿童举办一场盛大的晚会，当时他正在那里游历。在此之前，他曾因有伤风化罪在英国监狱中服刑。他身穿一件颜色鲜亮的蓝绿色衬衫，免费赠送“草莓与奶油、杏子、巧克力、蛋糕和红石榴糖浆……一个巨大的冰冻蛋糕上面用粉色的糖写着‘维多利亚女王继位60周年’字样，周围装裱着绿色花纹以及一圈红色玫瑰”。他将乐器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并且试图将他们组成一支乐队，演奏英国国歌。在王尔德的指挥下，号声与手风琴声此起彼伏。[3]

在维多利亚钻禧庆典的这一年，即1897年，英国进口的香槟数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年。[4]这是一场展现帝国实力的庆祝活动，但同时也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矛盾：巨大变革和扩张，搭配了一个似乎永远不变的君主。维多利亚被赞颂为帝国的支点，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地球的轴心。这位一身素服的78岁妇人如今已经达到了接近神话的地位。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偏远部落崇拜她，她表情肃穆的雕像装点着全球各地的城市，人们甚至声称在美国的群山之中看到了她的轮廓。在W.T.斯特德的杂志《评论回顾》中，她的照片被摆在了亚

伯拉罕·林肯的边上：该杂志声称“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高水准成功”可以在“美国伟人亚伯拉罕·林肯和英国伟大女性维多利亚女王的诞生中”得到完美展现。[5]

当她的轮椅在钻禧庆典那一天被推到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时，嘈杂的声音中出现了一声呼喊：“加油，老婆婆！”[6]78岁的维多利亚腿脚不便，无法走下马车；于是，在圣保罗教堂的门外举行了一场露天的仪式，好让她不必下车。维多利亚相信，60年来的辛勤工作已经让自己有权利要求不离开马车，也不为庆祝活动花自己的钱，她还提出不必举办华而不实的国家庆典。她不希望在10年内第二次招待各国王室成员，既耗资巨大，也会带来不便，于是她下令不允许邀请在位的国王或者女王。这也包括自己的大外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后者对此感到异常愤怒。这场钻禧庆典的焦点不再是到访的君主和贵族，而变成了帝国本身——一个如今占据全球四分之一面积的大帝国。

许多臣民们相信，他们的女王如今拥有了某种控制天空的神秘力量：在钻禧庆典那天，当她的马车在街道上徐徐前进时，阳光显得无比灿烂。当一个写着“维多利亚”字样的巨型气球在树林中腾空而起时，一个小姑娘停下脚步仔细凝望：“看那！维多利亚女王正在去天堂！”[7]维多利亚坐在黑色花边阳伞下，情绪激动、啜泣不止。伯蒂的妻子阿利克斯温柔地拍了拍她的手。作家艾德蒙·戈斯解释说，人群中之所以爆发狮吼，是因为“女王与她的人民之间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吸引力，穿越了官方口译员的头顶。就好像女王是在与臣民们面对面说话一样，她的存在让他们如痴如迷”。[8]马车前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迸发的声浪始终让她情不自禁。维多利亚与臣民们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强大。在那些年里，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6岁，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英国人年龄超过65岁。人群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只经历过维多利亚这一个君主。

女王的同龄人也在慢慢变老。丁尼生早在钻禧庆典的5年前就已去

世，享年83岁。查尔斯·狄更斯于1870年死于中风，享年58岁。查尔斯·达尔文在1882年遭遇心脏衰竭去世，享年73岁。乔治·艾略特——或者说玛丽·安·埃文斯——在1880年去世，享年61岁，去世的8年前，她发表了《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一书。汤姆·萨姆将军去世时只有45岁。但令人敬畏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如今已有77岁，已经卧床三十年之久，很可能是因为她在克里米亚期间感染的慢性布鲁氏菌病，但她仍然倚靠在床上的枕头上，从事着卫生、饥荒和医院规划等方面的非凡工作。南丁格尔让人在她位于伦敦的家中阳台上挂了几盏彩灯，以庆祝钻禧庆典：红色的棉布上闪烁着VR两个字母形状的灯光。[9]

维多利亚如今已垂垂老矣，眼神也越来越不好。不过，她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优雅。许多见过她的人都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她夸张的时间感、优雅的举止、微笑以及银铃般的声音。当作家阿瑟·本森在她去世的两年前见到她时，她的声音让他为之一震：“声音既慢又甜——体现出了某种非凡的简洁性——比我想象中声调高得多，也没有一点嘶哑、傲慢或者……颤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年轻而平和的女性。”[10]现存的照片中，女王面带笑容的照片很少，这很不幸：只有那些面容严肃的照片被保存了下来。部分原因是，在很多年里，拍照片时需要进行长时间曝光。正如薇姬曾在给母亲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亲爱的妈妈的面庞有一种魅力……任何照片都无法复原出来。”[11]不过，维多利亚还是公布了一张“非常喜欢”的她在钻禧庆典上笑容满面的照片，你可以看到笑容让她的脸都变了形。她这么做遭到了女儿海伦娜和比阿特丽斯的反对，她们认为女王笑得这么明显不太妥当。[12]

马克·吐温坐在河岸街临时搭建的木质看台上观看了钻禧庆典的行进队列。来自澳大利亚、印度、非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西印度群岛的军队在伦敦绕行一周，从白金汉宫一直绕到圣保罗教堂。当时正居住在欧洲的吐温接受委托，为《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撰写有关钻禧庆典的报道，他在现场感到眼花缭乱。他写

道：“英国历史有2000年之久，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世界在女王出生之后所取得的进步比这两千年的剩余部分加起来还要多……她所见到的新发明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要多。”自从维多利亚1837年继位以来，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已经因火车、轮船、电报、电话、播种机、电灯、打字机、照相机等新发明的诞生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维多利亚的统治比此前的任何一位英国君主都要久，她也是历史上最庞大帝国的首脑。吐温写道，他们所欢呼的是“英国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威力”，为的是“六十年来在道德、物质和政治上所取得的进步和积累”。从1558年到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着一片拥有10万平方英里和不到500万人口的土地，但是到了19世纪末，维多利亚却统治着全世界可居住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些土地上生活着4亿人口。在她一生中，地球上的人口总数增加了5倍。维多利亚见证了选举权的扩大、廉价报纸的诞生以及知识产权、麻醉药物和现代卫生设施的发展。法典中取消了200项此前要被判处死刑的罪名。[13]公民们赢得了组建工会的权利，并且见证了每日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少到8小时。平等也得到了极大推动。在担任女王的这些年里，维多利亚见证了“女性从许多沉重而不公平的法律的压迫中解脱；许多女子大学也得以建立”，吐温如是写道，“在许多地方，女性获得的权利让她们几乎实现了与男性的政治平等，而如今的一百多个女性工作岗位此前是完全不存在的——其中包括医疗、法律和专业护理等”。

在维多利亚出生时，女性被迫扮演着“屋中天使”的角色：她们被视为道德的守护者，这也基本上将她们限制在家中。到19世纪末，已经有整整一代人试图打破旧有习俗。如今有许多女性都独自居住，或者与其他女性室友一同居住，这一转变被称作“女儿的反抗”。已婚女性也渐渐在收入、子女和身体等方面赢得了部分权益。在1891年的一个关键案例“女王诉杰克逊”（Regina v. Jackson）一案中，一名丈夫——杰克逊先

生——绑架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将她扣留在自己的房子里，还用门卫来看守。他将她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婚姻权利”，但未获胜诉。法官坚持认为，他没有这样的权利。这被赞颂为一个重大决定，结束了丈夫控制妻子身体的权利。［仅仅2年前，“女王诉克拉伦斯”（Regina v. Clarence）一案中的法官还曾坚称，男性有权利强奸妻子，即使他感染了淋病也依然如此。英格兰和威尔士一直到1991年才有了“婚内强奸”的概念。］“女王诉杰克逊”案建立在1870年和1882年通过的两项《已婚女性财产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的基础之上，这两项法案宣称，妻子有权控制自己的收入和资产（以及妻子是有别于丈夫的独立法律实体），1886年的《未成年人抚养法》也对此案有所贡献，该法案引入了一个概念，即授予抚养权时，必须考虑到儿童的福祉。

渐渐地，女性在公共生活中也有了立足点。1894年新通过的《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意味着所有拥有房产的女性都可以在地方选举中投票、成为济贫管理人（负责管理当地失业者、老人和弱势人群的福祉），并且参与学校董事会等。1897年，在英国准备钻禧庆典，以及军队在非洲集结之时，全国妇女选举权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成立了，这一组织在令人敬畏的米莉森特·加雷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的领导下联合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团体。一项旨在赋予女性投票权的法案首次通过了下议院的二读。每一英寸的胜利都十分艰难，需要付出艰苦斗争，但等到钻禧庆典时，女性所取得的小小进步却被赞颂为大英帝国的胜利。

无论对于英国还是外国的男女老幼而言，整个钻禧庆典都算得上一场帝国的加冕礼；各大报纸炫耀着英国的成就，而一切成就的化身就是一位身穿黑色素服的矮小、敦实又严肃的人物。英国人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以及在印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阿散蒂、缅甸、加拿大、新西兰和埃及发生的战争。进步的象征被反复传诵：粮食关税被取消，济贫法得到修订，食物变得更便宜，住房条件更好，工资也更高了。议员

们再也不穿着老式的丝袜和裤子（那样子就像是“参加一场游园会似的”），也没有人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再吸鼻烟了。[14]（美国国会的议员们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抛弃他们公用的鼻烟盒。）

不过，帝国的代价也十分高昂。在1839至1842年和1856至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1850年至1864年期间戈登将军协助镇压的太平天国叛乱中，有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死亡。在维多利亚的治下，加拿大、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诸岛的原住民大量死亡。原住民作为奇观和战利品在她面前被驱赶着慢跑。维多利亚对他们的奇异特点惊叹不已，但与大部分人一样，并没有考虑过英国对他们土地的占领对这些人意味着什么。英国的许多人都认为，殖民仅仅意味着进步，而不是镇压。印度发生了可怕的饥荒，阿富汗发生了血腥的战争，非洲则见证了对财富的掠夺，当地人的权益遭到了残酷践踏。帝国的战利品在维多利亚的脖子和手腕上闪闪发光，同时也挂在她的墙上，还给她的宫廷厨房带来香气。不过，最残酷的战争尚未到来，这场野蛮的战争将标志着维多利亚所拥护的帝国扩张开始衰退。

印度仆人们如今负责将身体虚弱的女王兼女皇从一个房间抱到另一个房间。到处都是阿谀奉承、缺少质疑的生活意味着她的每一个愿望都能得到纵容，但她却仍然渴望自己无法掌握的东西：爱与陪伴。在她费力地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十年之时，大多数的日子都被用来怀念已经过去的日子了。然而，她还是渴望长寿；每一个新年，她都会祈祷能够再活一年，她的身体技能能够完整无缺，尤其是自己所剩无几的视力，好让她能够继续领导她的国家。

在欧洲，下一代的领导人正在崛起，民族主义的暗流再次汹涌澎湃，冲击着各国的边界。那些阅读了有关伟大女王钻禧庆典内容的男孩们会产生对他们自己伟大国家的幻想。阿道夫·希特勒那年8岁，正在不太认真地考虑成为一名牧师。贝尼托·墨索里尼13岁，正在反抗负责教

育他的僧侣，欺负其他同学，以及通过用砖头反复殴打自己唯一的朋友来取乐。[15]约瑟夫·斯大林18岁，正在接受成为俄国东正教牧师的训练——而且与威廉一样，他的左臂也有畸形，他会试图在肖像画中加以掩饰。这些自大狂妄的未来领导人在英国和美国的对手们也在接受政治和战争的训练。在维多利亚举行钻禧庆典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15岁，是一家圣公会寄宿学校的好学生，正准备前往哈佛大学求学。温斯顿·丘吉尔22岁，正在参加战争和报道战争之间来回摇摆。28岁的内维尔·张伯伦是一名成功的船舶制造商。在美国，进步改革家泰迪·罗斯福已经38岁，刚刚被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在几年后的1901年，这位牛仔出身的士兵将成为美国副总统。不过，有一个人是他们都认识的，而且她的影响力、土地和财富受到了他们的一致嫉妒，那就是英国女王。

很难想象维多利亚会对19世纪末期对非洲的大掠夺所产生的丑陋和残酷的结果一无所知。在那些年里，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德国、英国和法国全都贪婪地占领了非洲的大片土地，以追求矿产财富。欧洲人最早在1488年抵达了非洲最南端，当时葡萄牙探险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驾船驶过了好望角。但一直到1652年，荷兰人、德国人和法国胡格诺教徒开拓者才在南非建立了永久性定居点——他们也是布尔人，或者说南非白人的祖先。从1795年起，英国人开始陆续抵达。与英国的第一次大决裂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初，当时英国废除了奴隶制，而布尔人则认为奴隶制对他们的经济而言至关重要，也是维持种族优越感的重要工具。许多布尔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迁徙”（the Great Trek）中向北迁徙，以逃脱英国的统治，在经历了一系列与原住民祖鲁人的血腥战斗后，他们最终在德兰士瓦［也被称作南非共和国（South African Republic）］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定居下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南非当时由四个实体构成：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两者都是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以及两个英国殖民地，分别是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和纳塔尔（Natal）。

宝石与黄金会将脆弱的和平撕得粉碎。当北开普地区的小镇金伯利在1869年发现钻石时，英国人丢掉了对布尔人控制非洲富饶地区的模糊接受。英国开始推动建立一个南非联邦政府，而他们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在这一地区定居的英国公民占多数。移民们纷纷来到这块大陆的最南端淘金，新的城市也在荒芜的平原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当1873年德兰士瓦境内发现了大规模金矿时，托马斯·弗朗索瓦·比格尔斯（Thomas François Burgers）总统还曾鼓励外国人——外侨（Uitlanders）——来他这个几近破产的国家定居，甚至在当地议会中给他们分配了两个席位。但在1877年，英国人在迪斯雷利的支持下吞并了德兰士瓦（尽管英国曾在1852年承认过该国的独立地位）。英国人此前刚刚吞并了全球范围内的大量土地，包括斐济、马来亚和西非黄金海岸等，他们说，之所以不得不这么做，是因为原有的政府执政不力。不过，德兰士瓦是布尔人的最后避难所。三年后的1880年，他们揭竿而起，取得了一些成功。战败的英国人同意在保留宗主权的情况下维持该共和国的独立，这意味着英国可以拥有部分控制权，但德兰士瓦将在内政上保持独立自主。维多利亚将这一决定视为一次耻辱的妥协，并且指责格莱斯顿不小心丢掉了这块有利可图的土地。[16]

从1870年到1914年，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控制权从10%增加到了90%。在这几十年的掠夺和殖民过程中，数百万非洲人命丧黄泉；最臭名昭著和暴力的凶手之一是维多利亚的表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是她舅舅利奥波德的长子，制造了19世纪最严重的一部分人权侵害事件。他于阿尔伯特去世四年后的1865年继位，并且将刚果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加以控制。他开发了当地的象牙和橡胶贸易，迫使当地人为他工作。如果无法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他们将被殴打致残或者被杀害。据比利时政府估计，在刚果的2000万人口中，有一半人死在他的统治之下，后来，他们迫使利奥波德二世将这片土地的控制权交给了比利时政府。

利奥波德二世长相丑陋，令人毛骨悚然，鼻子特别大。1885年，他在一次法庭庭审中被提及，据说他每月支付800英镑，让人从英国定期给比利时送处女来供他消遣；他尤其喜欢10～15岁的女孩（伯蒂据说也是与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有关系的那家英国妓院的常客）。他的表姐维多利亚女王还是继续欢迎他——或许是出于对他父亲的尊敬。维多利亚的宫廷侍女之一玛丽·马利特（Marie Mallet）觉得他令人恶心。1897年时，她回忆了一次利奥波德二世造访巴尔莫勒尔的情形："他只能用两根手指来握手，因为他的指甲太长了，不敢让它们有所损伤。他还是个油腔滑调的老怪物，我觉得他非常邪恶。我们都觉得，他认为拜访一趟女王就能让他获得一件崭新的伪装，否则他为什么要从500英里外赶来，只是吃一顿午餐呢。"在拜访维多利亚时，他对比利时议会向实现普选方向采取的措施抱怨不已，对此，维多利亚也认为"不应予以赞同"。他还对她谈到了刚果的事，不过她没有说清楚具体谈了什么。[17]

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大发横财。他对当地人的税赋十分治重，以至于许多人被饿死；当地的食人族雇佣兵将没有交税的人屠杀殆尽。这些令人震惊的人权侵害事件在1904年被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爵士（Sir Roger Casement）曝光，后来还受到了马克·吐温的讽刺。[18]

在维多利亚的金禧庆典期间，她的女婿弗里茨的喉部患上了癌症。如今，在她的钻禧庆典结束后，维多利亚将发现，弗里茨的遗孀、她亲爱的女儿薇姬胸部或许也有癌症正在扩散。薇姬罹患一系列怪异的疼痛已经数十年：包括神经痛、关节炎、疝痛、背痛、皮疹、发烧以及眼部肿胀，等等。（至今仍然有人猜测，她和母亲均患有无确定症状的卟啉病，乔治三世国王正是死于这种病。当时的人们对这种病了解很有限，其症状从偏头痛到神经错乱等各有不同。对于这种疾病的认识如此模糊，以至于它已经成了针对任何人的万能诊断结果，尤其是那些拥有王室或者汉诺威家族血统的人，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但在1898年，薇姬收到了一份糟糕得多的诊断书：乳腺癌。她最后只比母

亲晚去世5个月。

维多利亚仍然在世的7个子女全都出席了庆祝她继位60周年的庆典，同时出席的还有爱丽丝的鳏夫与利奥波德的遗孀（黑森的路易斯王子以及瓦尔德克与皮尔蒙特的海伦娜公主）。自从金禧庆典以来，有许多人相继离去。年届55岁、头发日渐花白的伯蒂仍然在为长子艾迪的去世而悲痛，又在1891年遭遇另一桩丑闻，他被传唤出庭，原因是他的一个朋友在玩牌时作弊了。[19]如今52岁且身体欠佳的阿菲在科堡过着无聊的生活，试图用借酒浇愁的方式来忘记金钱和婚姻上的烦恼。海伦娜是一个既没得到维多利亚多少青睐，也不如其他人让她操心的女儿，如今已有41岁，拥有4个孩子（她失去过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胎死腹中，另一个出生几天后就死去），并且深深沉浸在慈善事业中。她的丈夫、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松德堡—奥古斯腾堡的克里斯蒂安王子不幸地失去了一只眼睛，他的小舅子阿瑟在外出打猎时不小心开枪打伤了他。阿瑟则有一段幸福的婚姻和三个孩子。比阿特丽斯如今40岁，寡居一人，有4个孩子。家中的美人露易丝如今已经习惯于与丈夫洛恩勋爵保持朋友式的感情，她于钻禧庆典的当晚在德文郡府（Devonshire House）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客人们受邀穿上了1820年的古老服饰（维多利亚就出生在1819年）。伯蒂打扮成了耶路撒冷圣约翰勋章大师（Grand Prior of the Order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的模样，而亚历克斯则打扮成了漂亮又有诗意的法国王后瓦卢瓦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Valois）。[20]

在1899年2月，即钻禧庆典结束的不到2年后，阿尔弗雷德的独子、与父亲同名的小阿尔弗雷德去世了，死因被宣布为肺结核。（小阿尔弗雷德因为想要迎娶一名平民而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执，一怒之下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庆祝活动上开枪自杀，仅仅2周后便撒手人寰。）让维多利亚感到有些恼怒的是，他的葬礼被定在了2月10日，也就是她自己最神圣的结婚纪念日那一天。（她始终没有放弃对纪念日的执着，不管是

好事还是坏事。）老阿尔弗雷德——当时的萨克森—科堡公爵“阿菲”在第二年因喉癌去世，仅差几天没有度过自己的56岁生日；他是维多利亚第三个在她在世时去世的子女。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她哭了出来：“我的第三个成年子女，还有3个亲爱的女婿。81岁好难！”[21]她知道，失去爱子的痛苦让他变得虚弱。那一年感觉起来就好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悲伤与凄惨似的”。

在维多利亚坐在小马车上绕着公园来回转悠之时，对英俊而聪明的小阿菲的回忆生动而痛苦地浮现在她眼前。他与阿尔伯特如此相像，也让阿尔伯特非常满意，但在成年后搬到父亲的家乡去之后，他却变得痛苦而又无爱。时间的皱褶让维多利亚仿佛回到了那段黄金岁月，阿菲与兄弟姊妹坐在父亲背上，像骑马一样骑在他身上，掉下来时又咯咯地笑，奥斯本宫与巴尔莫勒尔承载了那么多快乐的日子。如今一切皆成虚妄。[22]阿菲的葬礼于1900年举行，在他葬礼的第二天，布尔人造成了又一列火车脱轨，并抓住了一些英国囚犯。仅仅几周后，维多利亚的一名孙辈将在非洲战死。

1899年10月11日，第二次英国—布尔战争爆发了。很少有事情能够像军事冲突一样集中维多利亚的思绪。她亲自向许多士兵道别，并且在日记中用一种可以明显感知的焦虑情绪记载了战斗的细节。她如今已有80岁高龄，却仍然对她的军队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呼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尽管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帝国主义者——例如，在写到中国时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能在任何地方得到任何东西，而我们却可以”[23]——她最终接受了在非洲发动战争的理由。

她相信英国应该保护其臣民与领土。她的警告是，穷人不能承担超出比例的战争税赋，以及派去战场的战马应当被良好地对待。

战争的理由非常直白。公众被告知，他们需要保护德兰士瓦境内遭到压迫的外侨，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公民，并使他们免受暴君保罗·克留

格尔总统及其南非白人政府的迫害。但有好几个国家也在寻求控制1886年在德兰士瓦韦特瓦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发现的大规模黄金矿藏。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缔造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曾作为一名志愿医生前往南非，他说，这场战争仅仅是对“世界上最大的宝箱之一”的争夺。

1899年3月，四面楚歌的外侨向维多利亚递交了一份有2.1万人签名的请愿书，直言不讳地请求获得保护，并警告她说，布尔人正在准备发动战争。他们抱怨说当地没有自由媒体，英国公民遭到总统的随意驱逐，还被课以重税；他们权利很少，连相互见面都不允许。亨利·庞森比的继任者阿瑟·比格解释说，警察“几乎完全由布尔人组成，行为方式极为专横和不公，还造成了一名英国公民被害”。[24]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向维多利亚建议说：“无论是在眼下还是在未来使用武力，但如果没有武力威胁，肯定不会有人去做任何事。”[25]1899年10月10日，南非的两个共和国发出了一份48小时最后通牒，坚持要求英国人从纳塔尔和开普撤出军队。在英国人拒绝让步后，布尔人入侵了英国殖民地，并包围了马弗京（Mafeking）、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Ladysmith）等重镇。

在1899年的整个秋天，维多利亚都在认真阅读前方传来的报告，报告中的细节让她感到烦恼不已。最初的失败是压倒性的。她记录下所有讨论的来龙去脉，仔细分析她从前线指挥官那里收到的频繁电报，看望伤员，仔细观察士兵妻子的面孔寻找担忧的痕迹，并且亲自归还了一名14岁男孩的军号，这名男孩在战场上被击中身亡。如同她在所有受她支持的军事冲突中一样，她积极地奔走呼喊，要求派遣更多军队。1899年11月至1900年2月间发生的莱迪史密斯之围让她操心了好几个月。不过她对自己所获消息的记载表明，维多利亚收到的战争消息许多都是粉饰和谎言，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想要提振她的情绪，以及吸引她关注她的指挥官们坚忍克己的精神。她经常被告知，士兵们虽然战死沙场，但已

经竭尽全力；她还被告知，他们不在乎战争的苦难，很高兴能够去那里参战。

即使已经80岁高龄，但维多利亚仍然要求行使自己作为君主的全部权利。当内阁决定用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来更换总司令沃尔斯利勋爵（Lord Wolsley）时，她明确表示自己“很生气”这件事没有事先告诉她，也没有征求她的意见。[26]罗伯茨后来经常给女王寄来感情横溢的信件，不过她还是经常就战争进展斥责他。她经常就战争的执行表明自己的看法。她也会进行编织：包括围巾、羊毛围巾和帽子等，这些会直接寄给她“亲爱而勇敢的士兵们”[27]。当这些大受欢迎的物什被军官们一抢而空时，她又在元旦那天给士兵们寄去了10万罐巧克力，罐子上还装饰着她的肖像画。其中一个装在帆布背包中的巧克力罐挡住了一颗子弹，拯救了一名士兵的性命。维多利亚曾试图搜集每一名战死沙场的将士的照片，好让她能够将它们放在一本相册中；她给阵亡将士的母亲和遗孀写去了一封封信件。她还探望伤员：尽管她不得不从马车上被抱到椅子上，但她还是决心去医院看望伤员并检阅部队，因为她知道她的出现对这些士兵意味着什么。

士气是女王的首要担忧。当1899年12月临时外交大臣阿瑟·鲍尔弗前往温莎城堡拜见她，并带来战事失利的糟糕消息时，她坦率地说：“请理解，这个房子里没有人抑郁；我们对失败的可能性不感兴趣；它们根本不存在。”[28]士气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贯穿战争始终，维多利亚都坚持拒绝有人不断提出的对布尔战争的指挥进行调查的提议。她正确地预见到，这样的调查会降低士气，但推迟调查又会产生更加糟糕的副作用，那就是隐瞒英国在南非战场上出现的错误和弊端，并且任由其继续下去。她写道：

> 女王必须强烈敦促鲍尔弗先生，有必要抵制这些对我们的将领和战争指挥方式的不爱国也不公平的批评。如果政府既坚决又勇敢，国家会支持他们的……你们必须展示出一道坚定的战线，不要有任何时候让人以为我

> 们有所犹豫。战争结束之后，可以再进行调查，但不是现在。毫无疑问，陆军部犯了很大的错，但需要改变的是整个体制，而这一点现在还办不到。[29]

维多利亚担心，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被汇报给布尔人和其他人，从而对英国的声誉造成破坏，而此时他们需要的是团结和坚强的信念。她对参战的爱尔兰突击队员满怀感激之情，以至于她取消了前往欧洲大陆的假期，前往爱尔兰进行访问，这是她39年来首次访问爱尔兰。她还十分敏锐地意识到英军内部的民族关系。印度士兵作为“后备军”主要在其他部队的身后工作，这一事实让她感到既困惑又愤怒。1900年2月，她向索尔兹伯里请求说：“为什么你不要求所有军队全部出击？这是可以办到的……布尔人不仅入侵了祖鲁兰，还招募原住民与我们对抗。当然这可以成为我们使用印度人的理由。”[30]

她每天都在仔细阅读电报。基奇纳勋爵发来了令人沮丧的电报，谈到英军在南非遭遇的抵抗，并强调，英军在作战初期遭遇的失败极大地增加了布尔人的征兵数量。在他们焦急地等待数月，希望看到遭遇围城之苦的莱迪史密斯最终胜利的过程中，维多利亚还在敦促索尔兹伯里派去更多士兵，并且强调说，尽管她再三催促，但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增加军队的数量。她对报告中“可怕的”伤亡数字感到震惊，并且坚持要求如果不增兵，就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她问道：“是否有可能警告那些年轻军官们，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暴露自己？”[31]她当时不知道的是，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死亡都源于“友军误伤”；如果知道的话，她会被击垮的。维多利亚在1900年的最后一篇有关战争的日记写于12月31日，文字之中透露出郁闷的情绪：“来自南非的消息不太好。我们的一个驻军点遭到敌人突袭，一门大炮被抢走。不过，我们重新占领了该据点。”[32]

对于这场战争，英国国内的不安情绪日益滋长。欧洲和爱尔兰对于所谓英国的不必要干预也越来越愤怒。1900年时，一名15岁的意大利抗

议者试图在布鲁塞尔的一列火车上刺杀伯蒂与阿利克斯。（他们毫发未伤。）后来，最受维多利亚喜爱的一个孙辈、热爱板球运动的克里斯蒂安·维克托王子，也就是海伦娜的长子，在这场战争中因伤寒而死。他当时33岁，已经作为军官在非洲参加了好几场战役。已经因战败的消息而悲痛万分的维多利亚，此时更是被击垮了。按照他的遗愿，克里斯蒂安被安葬在比勒陀利亚，就在他的战友们身边。而在苏格兰，他的外祖母女王陛下既没有食欲，也无法入眠，变得越来越无精打采。当里德医生1900年10月29日前来看她时，她几乎一直在哭，而且“情绪十分沮丧”[33]。她的日志里凌乱地记载着亲属与朋友的死亡以及这场可怕战争的悲剧；一切已经变得无法忍受。

她变得越来越虚弱。多年以来，维多利亚都被告知要少吃，她的腰围已经证明了她拥有旺盛的食欲，以及偶尔她连走路锻炼都办不到。不过，到1900年11月10日时，她已经变得“十分瘦削”，也失去了对食物的兴趣。如今受到维多利亚严重依赖的里德医生曾试图用由鸦片制成的杜佛氏散来帮助她睡眠。里德医生给伯蒂写信，告诉他他的母亲身体正在日渐衰弱，他不建议女王外出旅行。不过，维多利亚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她病情的严重性，伯蒂也不例外。这个即将继承王位的男人提醒医生说：“女王有着非凡的活力和勇气。”[34]但到12月时，女王在奥斯本宫就只能整日待在屋里，而且也只能小口地喝肉汤和牛奶了。

在维多利亚病恹恹地躺在床上之时，改革家埃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正在仔细打包一箱箱的食物和药品，以便运给被关押在南非集中营中的妇女和儿童。在1900年，为了打击布尔人的游击战策略，英国开始系统性地烧毁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住宅，这后来被称作“焦土政策”。集中营的数量也开始不断增加，白人与黑人还被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里。被基奇纳称作“那个可恶的女人”的霍布豪斯是一名倡导福利的活动人士，她决心给那些被关押的人送去医疗物资。46岁的霍布豪斯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引人注目，她在1901

年1月乘船前往南非。帐篷营地中的死亡和悲惨景象让她震惊，她将这些营地形容成“活生生的坟墓”。营地里缺医少药、食品短缺，卫生状况也很差，到处都是伤寒和黑尿热患者。到1902年时，已经有2.8万名白人和1.4万名非洲黑人在这些可怕的集中营中死去，几乎是在战斗中阵亡的英国士兵数量的两倍。

女王对于这些集中营中英国人犯下的暴行毫不知情；其细节一直到她死后才出现在世人面前，引起极大争议。她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羞愧难当的。[35]（即使是她下达的有关马匹的命令也被证明毫无作用；有数十万匹马被宰杀。）她不同意“歇斯底里”的女性“在没有必要理由的情况下”乘船前往南非，并且觉得她们对当地的官兵而言是个麻烦事。[36]（为了让女王高兴，罗伯特勋爵禁止所有女性进入奥兰治自由邦境内，除非她们有儿子或者丈夫在里面受了伤。[37]）历史学家詹妮·德吕克（Jenny de Rueck）表示，残暴的南非集中营“可以说为折磨平民树立了一个榜样，后来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欧洲的犹太人、斯大林治下的俄国人、波尔布特治下的柬埔寨人以及前些年卢旺达和南斯拉夫的平民都遭受了这样的折磨”。格莱斯顿死于战争爆发前一年；他如果发现了这种侵害行为，一定也会愤怒不已。

柯南·道尔这类人会赞颂战争的荣耀，以及与“来自萨瑟兰鹿林的男仆、来自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林居人、来自安大略的粗汉、来自印度和锡兰的花哨运动员，以及来自新西兰的马夫”并肩作战的荣耀。他自鸣得意地说，“在南非的平原上，帝国的鲜血兄弟情得以铸就”[38]。但战争的丑陋一面也得到了报道，记者们的报道每天都会撕去一块政府宣传的伪装。出版商W.T.斯特德情绪激动地指控英国士兵强奸女性。一支声名显赫的队伍参与了在南非的战斗和报道：圣雄甘地（Mahatma Ghandi）——他同情布尔人，但同时支持大英帝国——组建了印度救护兵团。巴登—鲍威尔勋爵（Lord Baden-Powell）在为期217天的马弗京围城期间负责指挥卫戍部队。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未

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澳大利亚作家班乔·帕特森（Banjo Paterson）都在这场战争中当过战地记者。（帕特森形容丘吉尔是“能力与吹牛”的最有趣结合，并且尖锐地指出：“只有拥有严重自卑感的人才有可能坐直身子认真听他说话。”）这是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人与欧洲人——或者说欧洲人的后裔——打的第一场战争。

这也是最后一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战，而此时的大英帝国已经因为要镇压拒绝其统治的土地而陷入兵力告急的状况。英军士兵的残暴行为给南非人留下了好几代人的伤疤。最重要的是，战争与荣耀之间的纽带，以及帝国与阅兵式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或许对政客来说更令人烦恼的是，英国所提出的大英帝国代表了最优秀民主的主张被揭露为一派虚伪之词——布尔战争已经证明，为了经济利益，当地人的权益可以遭到践踏，集中营里的妇女和儿童也会因为疏忽和残暴对待而丧生。

到1900年底，这场战争的道德与否已经遭到严厉质疑。正如《道德世界》（*Ethical World*）杂志编辑斯坦顿·科伊特（Stanton Coit）所写：“在英国所有阶层的这一代人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深刻地自我反省和自我怀疑。”[39]在战争结束前，维多利亚的世界就已经开始萎缩和颤抖，这位身体结实的吉祥物也变得越来越瘦削而虚弱。随着19世纪过去，20世纪到来，帝国的光辉变得灰暗，伟大的女王亦是如此。

维多利亚已经病了有些日子了。她变得越来越心不在焉、情绪低落。白内障让她的视力变得模糊。她很难睡着，但同时又变得异常平静，即使是碰到那些曾经会惹她生气的事情，她也会镇定自若。1900年12月初时，她的脑海中“充满了病态的疼痛幻觉”。里德医生决定用麻醉剂来解决她的问题。12月7日，他形容说，她“紧张兮兮、怨言繁多，而且十分孩子气”。她前往奥斯本过圣诞节，并且喝了蛋奶酒，但基本上没有吃过正餐，早早地就去休息了。在圣诞节那天，已经在维多利亚的宫廷内服侍了半个世纪的丘吉尔夫人在奥斯本宫的床上去世了。露易丝

公主认为，根据她对她的了解，“一定是看到女王如此不像自己原来的样子而产生的震惊”让丘吉尔夫人死去的。

1901年元旦那天，也就是澳大利亚正式宣布建立联邦的日子，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又一年开始了，我感觉非常虚弱，不舒服，这一天过得很糟。”里德医生征求了他人的意见，这些意见证实，“大脑功能退化”已经持续了很多周。1月16日，在服务了二十年后，里德首次见到了躺在床上的维多利亚。她昏昏欲睡、骨瘦如柴，蜷缩着朝右侧躺着。他“十分惊讶于她看起来如此之瘦小”。非同寻常的是，没有什么能让她感到生气。第二天，她就被搬到了较小一些的床上，床的周围围了一圈屏风，好阻挡别人的视线。当公主们前来看望她，神情肃穆地从她床前走过时，她连一个也认不出来了。第二天夜里，亚历克斯与伯蒂整夜都坐在她床边，对她温柔细语。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时，维多利亚曾担心伯蒂可能会试图推翻自己的命令，因此，在1月18日那天，她对里德说，不想见到伯蒂。[40]但在弥留之际，她显得十分温柔，要长子“亲吻她的脸颊”[41]。她的医生看着她变得越来越像个孩子，担忧不已。

过去的20年对维多利亚来说是一场身体上的折磨。皇家档案馆仍然不希望公布她死亡的细节——有一份医学报告曾透露，她患上了子宫下垂和腹疝。或许披露女王的病情有些不合时宜，对某些人来说，这些信息太过私密了。但这些病情的确可以解释维多利亚的一些长期疼痛和行动上的困难。从1883年起，她就很难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走路了，在此之前，她摔了一跤，还经历了约翰·布朗之死。[42]其他的一些疼痛被她隐瞒并独自承受了下来。这种脆弱让维多利亚尤为感激那些能够在身体上为她提供支撑的人——例如约翰·布朗和后来她的印度仆人们。她还对于自己死后谁有可能触碰她的遗体极为敏感——她下令只有里德医生和侍女可以触碰她。[43]

她的医生悄悄地控制了局面。由于知道“公主们不会同意”，因此里

德秘密地给德皇威廉二世发了一封电报，后者曾要求他及时告知女王的身体状况。电报是这样写的：“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症状，造成极大焦虑。这很私密。里德。”[44]公主们——尤其是海伦娜——也不希望伯蒂前来，于是给他发去了错误的好消息。[45]在里德医生的坚持下，海伦娜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于1月19日召唤伯蒂前来。那天下午，官方发出了第一则公开消息：“女王正在遭受严重身体衰竭的折磨，并伴有令人焦虑的症状。”阿瑟开始启程从柏林赶往英格兰，同行的还有德皇威廉二世。比阿特丽斯和海伦娜有些惊慌，发誓要竭尽所能阻止他们备受争议的侄子踏上英国的土地，并且赶紧给阿瑟发了一封电报。里德医生对待威廉的善意很有意思，最好的解释是，他本能地看到了这个有些无情和傲慢的人身上的一丝柔情。好斗又好战的威廉不仅虐待自己的母亲，还曾随心所欲地欺骗自己令人敬畏的外祖母，甚至在最近，他还公开表示对布尔人的支持，把维多利亚气得不轻。但他同时也对维多利亚有着深深的敬意和爱意，爱她要胜过爱自己的母亲。[46]

1月21日晚6点，维多利亚醒了过来，并且询问里德自己是否好些了。随后她紧紧盯着他，担心他有可能会劳累过度，需要帮助。她紧接着表示，“今天南非有了一些好消息”。她病恹恹、身体虚弱地躺在床上，要求里德站到她身边来，并且直直地盯着他的双眼。她口气坚决地对他说，她还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我还想活久一些，还有一些事情要解决。我已经安排好了大部分事情，但仍然还剩下一些，我想要再活久一些。”她的生存渴望很强烈，与40年前她丈夫的被动接受大相径庭。里德后来报告说：“她用这种可怜的方式向我提出请求，赋予我极大的信任，就好像她觉得我可以让她活下去似的。”[47]

在奥斯本宫的楼下，伯蒂、海伦娜与比阿特丽斯仍然希望能够延缓威廉的到访。伯蒂决定前去伦敦，告诉威廉现在不能来看望女王，而且连他自己都没有见到女王，这确实是真的。楼上，里德和女仆们将维多利亚抱到了一个小一些的床上。她在1875年下达的命令是，“除了约翰·

布朗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在她临死前与侍女一起照顾她。由于布朗已经不在，这一重任落到了里德的肩上。

在她曾经与阿尔伯特一同住过的绿色小房间里，维多利亚已经视力差到看不清身边站的都是谁了。可怜的薇姬如今已有60岁，被监禁在她普鲁士的公寓内，癌症正在她全身的器官蔓延。她可怜地给母亲写信说，有时，楼下街上的人们都能听到她痛苦的哭声。她吃不下也睡不着；疼痛就像是“好多块刀片在我背上刮一样”[48]。不过，维多利亚的三个女儿在那里站了一整夜——她们是海伦娜、露易丝和比阿特丽斯——同时还有伯蒂、阿利克斯、威廉、里德医生以及护士和女仆。里德医生很同情威廉，因此允许他单独见维多利亚五分钟。一名主教以及一名当地教区牧师站在她的床尾，不断地背诵《圣经》诗句并祈祷。维多利亚还在牢牢地坚持着对生命的执着。里德给妻子写信说：“我情不自禁地钦佩她在可以放弃之时始终坚持抗争的精神。”[49]祈祷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他们的声音变得嘶哑。等到维多利亚已经明显濒临死亡之时，他们被要求停止了祈祷。她面无表情地躺在床上，顽强地呼吸着。

1901年1月22日下午4点，奥斯本宫发布了一条直白的消息：“女王正在渐渐死去。”[50]里德医生站在她身边，威廉站在对面，就像两个悲伤的哨兵一样，其他人则在房间里来来去去。5点时分，两人在床的两侧跪了下来，每人将一只胳膊伸到她背后，将她扶起来，保持一个半坐起的姿势。伯蒂在床尾静静地坐着。露易丝跪在里德医生旁边。维多利亚安静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死在了医生和外孙的怀里。仅仅14年后就将与英国开战的威廉悄悄地握紧了里德的手，满怀谢意与感激。但最终是伯蒂合上了母亲的双眼。[51]

---

[1] Cecil，*Life of Robert，Marquis of Salisbury*，3：191.

[2] 1896年11月23日，维多利亚在日志中写道：“今天是我的统治时间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英格兰君主的日子。”

[3] Moyle，*Constance*，302.

[4] Morris，*Heaven's Command*，534.

[5] Homans and Munich，*Remaking Queen Victoria*，49.

[6] Longford，*Victoria R.I.*，548.

[7] Arnstein，"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594.

[8] Gosse，"The Character of Queen Victoria，" 310. 需要提到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被迷住了。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为了避开人群逃到了瑞士。（Tomalin，*Thomas Hardy*，269.）甚至有报道称出现了丑陋的下流言辞。在卡姆登，一个爱说笑的人在教区会议上表示，"仁慈的女王陛下多年来对国家十分有用，为了缅怀她，我们应该要一样能够继续在这里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在卡姆登，我们现在最想要的是一个公用尿壶。"随后爆发出了哄堂大笑，直到教区牧师要求提出下一个建议才停下来。（Housman，*The Unexpected Years*，219.）

[9] McDonald，*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5：427.

[10] 这段内容来自1899年5月24日一篇引自 Arnstein，"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20的文章他将这段引文的来源归于乐卓博大学的伊冯娜·M.沃德。阿恩斯坦认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感觉到德国口音——不过其他人有不同意见。

[11] Fulford，*Your Dear Letter*，315

[12] Ward，"*Editing Queen Victoria*，" 266-7. 埃德蒙·戈斯爵士在1901年这样描写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个人特质中，微笑是最为值得注意的。它在她的权力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她将自己引人注目的本能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没有任何人的微笑与它有一丝相像，而在她公开出来的肖像中，也没有任何肖像在她去世后捕捉到了这种微笑的影子。尤其是在照相机的邪恶诅咒下，这种微笑完全消失了，那些从未看过它的人完全想象不到它能以何种令人惊异的方式点亮和提振年老女王的面部线条。"Gosse，"The Character of Queen Victoria，" 315.

[13] Arnstein，"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199.

[14] *Illustrated London News*，June 21，1897.

[15] Neville，*Mussolini*，19.

[16] Lee，*Queen Victoria*，523. 维多利亚还接见了钻石大亨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却显然一点也没有理解后者的生意内容究竟是什么。在他讲述钻石矿井以及钻石的处理过程时，她仔细聆听，全神贯注地几乎入了迷，另一方面，他也对她如此了解南非感到十分吃惊。

[17]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18，1891.

[18] 利奥波德二世的行为从未发生过改变。67岁时，他让一名仅有十几岁的妓女怀了孕，于是将她安置在一间别墅里，给了她一个头衔。他在自己1909年去世的几天前与她结了婚。比利时人在他的葬礼上发出了嘘声。——作者注

[19] 当伯蒂1891年在一栋乡间别墅里与朋友玩纸牌赌博时，其中一个人威廉·卡明爵士（Sir William Cumming）被发现出老千。在后来的法庭审讯中，伯蒂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为威尔士亲王，竟然卷入这种败坏名声的事情中，被认为是可耻的，但维多利亚仍然对他十分支持。

[20] 清晨穿越格林公园回家途中，年轻的马尔堡公爵夫人、美国人孔苏埃洛（Consuelo）失望地发现“人类的渣滓”正躺在草坪上。“那些人太过沮丧、意志消沉，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施舍，只能浑身湿透、精神恍惚地躺在地上。”From Ridley，*Bertie*，326.

[21]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July 31，1900.

[2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August 2，1900.

[23] March 27，1898，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86 and 1901*，3：TK.

[24] Sir Arthur Bigge to Queen Victoria，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86 and 1901*，3：362.

[25] 鲍尔弗在索尔兹伯里勋爵患病期间负责掌管外交部。他的官方头衔是首席财政大臣。

[26] Pakenham，*The Boer War*，245.

[27] Jerrold，*The Widowhood of Queen Victoria*，439.

[28] Cecil，*Life of Robert，Marquis of Salisbury*，3：191.

[29] Queen Victoria to Mr. Balfour，February 4，1900；Parkhouse，*Memorializing the Anglo-Boer War*，555.

[30] Queen Victoria to the Marquis of Salisbury，February 11，1900，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86 and 1901*，3：485.

[31] Queen Victoria to the Marquis of Lansdowne，January 30，1900；Parkhouse，*Memorializing the Anglo-Boer War*，555.

[3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December 31，1900.

[33] Reid，*Ask Sir James*，197.

[34] Reid，*Ask Sir James*，198.

[35] 维多利亚曾经对英国人对待俘虏的文明方式引以为豪。然而，当她听说有成百上千的囚犯遭到虐待时，她写道："对待囚犯的方式十分可耻而不人道。"她在1900年6月13日指示兰斯多恩勋爵向罗伯茨勋爵提出抗议，并指出英国人以前是如何优待战俘的。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86 and 1901*，3：562.

[36] Mr. Chamberlain to Sir Alfred Milner，April 3，1900，Buckle，*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Between 1886 and 1901*，3：520.

[37] Lord Roberts to Queen Victoria，April 15，1900，ibid，3：528.

[38] Doyle，*The Great Boer War*，259-60. See gutenberg.org/files/3069/3069-h/3069-h.htm.

[39] Van Wyk Smith，"The Boers and the Anglo-Boer War，" 429-46.

[40] Reid，*Ask Sir James*，203. 里德医生十分担心，以至于在维多利亚最终病情危重之际，他一度决定不告诉她伯蒂就在那里。未被公布的还有维多利亚给里德的另外一些指示，她在指示中说，只希望里德——还有她提出的其他几名医生，再加上比阿特丽斯或者"我的其他年轻女儿之一或者康诺特公爵"——来照顾她。她说，"不管是我的大儿子，还是我的任何大臣，都不能下达任何违反这些指示的命令"。Sir James Reid，notebooks，vol. 20（1897-98），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41] Sir James Reid："Pencil notes of what occurred during the last days of Queen

Victoria’s life and at her death.” January 21，1901，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42] Weintraub，*Victoria*，632.

[43] 她在给伯蒂和比阿特丽斯的指示中写了她对自己葬礼的希望：
我希望我的遗体除了自己的女性侍女外任何人都不能触碰，除她们之外任何人都不行——要在那些在我生命中一直并密切陪伴我的人（或者私人侍从）的协助下。我希望我的遗体得到我忠实侍从的看守，他们只能帮助将我放进灵柩内。我希望这些私人侍从中包括我的印度侍从，只要他们不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阻止履行这些职责。他们的温柔以及对我的照顾令人称赞不已，而我现在行动不便，需要这么多帮助。
October 25，1897. 皇家档案馆，VIC/MAIN/F/23/1-9a.

[44] Reid，*Ask Sir James*，203.

[45] Reid，*Ask Sir James*，204.

[46] Reid，*Ask Sir James*，196.

[47] Reid，*Ask Sir James*，206.

[48] Packard，*Victoria’s Daughters*，309.

[49] Reid，*Ask Sir James*，211.

[50] January 22，1901，4 p.m. 签署人：詹姆斯·里德，医师；道格拉斯·鲍威尔，医师；诺曼·巴洛，医师。皇家档案馆 VIC/MAIN/F/23/25.

[51] 当时明显掌控着一切的里德是告诉伯蒂应该这么做的人。据他说，所有王室成员都在床边与他握了手，随后，伯蒂感谢他为女王所做的一切。需要提到的是，里德在帮助护士处理她的遗体时，发现了她患有腹疝和子宫下垂。Reid，*Ask Sir James*，212.

30 维多利亚时代落幕：“街道上呈现出奇特的景象”

英国女王去世了！这句话听起来就像“太阳再也不会升起”一样沉重。[1]

——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

一想到英国没有了女王，感觉就像是房子没有了屋顶一样。[2]

——阿瑟·本森

1901年2月1日，伦敦笼罩着一种压抑而可怕的沉默。街道和街角上挤满了人，窗前、房顶上也都站着人，想要一瞥那一具经过抛光的橡木灵柩。载有维多利亚女王灵柩的炮架咔嗒咔嗒地从街上驶过，打破了悲伤的沉默。小说家莫里斯·巴林说：“伦敦就像一座死城……我走在街上，感觉就好像自己在玩牌时出老千了一样。”[3]随着载有维多利亚灵柩的蒸汽火车沿着铁轨从朴次茅斯一路向北来到伦敦，成千上万的人在潮湿的地上低下头静静地跪着。巴特西公园里的列车轨道旁也站满了人群，人们静静地举起帽子，叹息声连连。[4]除了这个统治了不列颠63年7个月零8天的81岁妇人之外，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其他的君主。

笼罩着白布的灵柩被放在了一台炮架上，先是从维多利亚车站驶向帕丁顿，随后前往温莎。人行道上挤满了身着黑色素服的人群，他们红着眼睛站在2月的寒风中。卖花姑娘们身穿绉布织成的破衣烂衫在人们的胳膊间挤来挤去。[5]女性权益倡导者约瑟芬·巴特勒感觉就好像失去了一位“挚友”：“每个人都在哭泣，人们的窗帘都拉了下来。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同身受的悲痛情绪。”[6]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透过窗户看着白金汉宫的大门，对“难以置信、数不胜数”的人群惊叹不已：“最开始我们都感觉像是失去了母亲。”[7]日记作家蒙克斯韦尔夫人（Lady Monkswell）在附近的一家店铺里观看现场的情况，在看到灵柩

时泣不成声、颤抖不已。她说：“街道上呈现出奇特的景象，挤满了体面、得体的中年人，每个人都在悼念……我静静地向她道了别。人们都脱帽肃立。”

在英国人看来，维多利亚之死令人感到一阵奇怪的不安——就好像一栋大楼的基础动摇了，他们都走在倾斜的新地面上一样。悲伤情绪之中还夹杂着惊慌。有些人在寒风中安静地站着，渴望看一眼经过的灵柩，嘴里还在默念：“上帝请帮助我们。”阿瑟·本森对于这种罕见的人人感同身受的悲痛情绪感到困惑：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哭泣不止，就连曾经想要结束君主制的共和派也受到了感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让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完整的悼念仪式，这么做是想要做一些事情，“以表现有人在乎”[8]。一名前往海德公园观看葬礼行进队伍的女性写道：“密密麻麻的人群，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一片安静。”[9]相比之下，此前一任君主威廉四世的去世就很少被人提及：没有人在他的葬礼上哭泣。

奥斯本宫外，最初出现了一阵骚动，媒体记者们一边沿着道路奔跑一边大喊：“女王已死！”但随后，英国很快就被一阵肃静所笼罩。[10]亨利·詹姆斯形容说，紧接着出现的情绪“既奇怪又难以名状”：人们说话都用低声细语，就好像在害怕什么东西似的。他对这种反应感到惊讶，因为女王之死不是什么突然发生或者不同寻常的事：就像是“老旧的手表停止走动了一样”，一个曾经“全身心投入到普罗大众福祉事业中”的老寡妇死去了。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位出生在美国的作家意外地产生了沮丧的感觉。他与许多人一样，哀悼“这位可靠而有如母亲一般的老年中产阶级女王，她将整个国家都温暖地抱在她又大又丑的苏格兰鸽子花呢围巾褶皱里”。维多利亚已经成了一种礼仪与稳定的象征，一面对抗令人不安的动荡局势的盾牌。如今，她的神化过程已经完成。《泰晤士报》写道，他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母亲，还失去了一个近乎受到他们崇拜的“女恩人”。《纽约邮报》形容说，她的权力是一种“神话般

的荣耀”。

维多利亚曾想要一个“充满敬意，但形式朴素的”葬礼。[11]在观看过利奥波德王子和比阿特丽斯的丈夫利科的军事葬礼后，她决定也要给自己办一个类似的葬礼。不需要任何排场，只要身着制服的军官和穿着苏格兰短裙的高地风笛手，还有贝多芬，就可以。她坚持要求自己的灵柩“始终由士兵或者我的仆人来扶着，不要让殡仪员来扶棺”。[12]她还要求用东西蒙住炮架，防止它发出往常那么大的噪音。在齐鸣的大炮、飘扬的羽毛以及一支护送船队之中，躺着女王的遗体。她要求将自己最私密的秘密小心翼翼地放在身边，用一层层的薄纱和花朵藏起来，外面是一层木炭内衬，以及经过抛光的木质灵柩。只有4个人知道里面是什么：包括她的医生和3名侍女。这一秘密将与她一起埋葬一个世纪。

1897年12月9日，也就是她去世的3年前，维多利亚为自己的葬礼秘密颁布了十分私密的指示，她说，这些指示必须始终由与她同行的最高级别人士随身携带，而且在她死后才能打开。[13]这些指示被收录进了里德医生的档案之中，由其家人保管在特伦顿（Trenton）。在这些指示中，她专门列了一长串她希望放在灵柩中的物品清单：子女的回忆录、孙辈的照片等。在她手上，她希望戴上5枚来自阿尔伯特的戒指以及来自菲奥多拉、她母亲维克图瓦、露易丝以及比阿特丽斯的戒指。她还想戴上一枚“朴素的金色婚戒”，这枚戒指原属于约翰·布朗的母亲，而她对布朗的描述堪称感情洋溢。她说，布朗曾经短暂地戴过这枚戒指，但维多利亚在他死后“一直”戴着它，希望在下葬时也能戴在手上。至于戴在哪只手指，维多利亚没有写明。

女王还要求将装有阿尔伯特以及她所有子女和孙辈照片的相框放在她的灵柩内。她还详细地解释说，想要一张她“忠实的朋友”约翰·布朗的侧面彩色照片，与他的几缕头发一起放在一个皮质盒子里，外加他的其他相片（她经常小心翼翼地带在口袋里）一起放在她手上。她还要求

把一个阿尔伯特的手模放在灵柩中，“始终放在她身边”。此外，她还想要在身边放一块阿尔伯特的手帕以及他的一件披风，一件爱丽丝织成的羊毛围巾，以及一块“我忠实的朋友布朗的”手帕，“这个朋友对我的忠诚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王室不久后就将开始摧毁一切有关这位肩膀宽阔的苏格兰人的记录，这时他们没有看到这份指示。里德医生受命将布朗的头发放在她手中，然后用薄纱将她的手包了起来，再将花朵小心翼翼地放在薄纱上。[14]即使在死后，布朗也与他的女王以及阿尔伯特和她的孩子在一起：他母亲的婚戒戴在她的手指上，他的照片和头发在她手中，他的手帕则覆盖在她身上。

温柔而细致的里德医生小心翼翼地与侍女们一起摆放女王灵柩中的物品。[15]她的遗体被测量和整理了一番，然后套上了一件丝质长裙，胸前还带有嘉德勋章的花纹。她的头发被剪掉，脸部周围的面纱底部还绣上了白色花朵。里德医生的妻子苏珊说，她看起来漂亮极了，“就像是一尊大理石雕像”[16]。在1月22日那天，伯蒂、德皇、里德医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将她的遗体抬进了灵柩里，随后包上木炭衬里，再将棺盖拧紧。紧接着，前往温莎的漫长路程就开始了。

女王去世的消息让全世界震动。成千上万的电报飞往奥斯本宫。在伦敦，演员们在演戏演到一半时走下舞台。交通陷入停滞。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关闭了整整一天。[17]在新几内亚，部落民缅怀那位曾经笼罩在他们心头的神圣母亲。在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以及大英帝国的偏远角落里，人们纷纷停下脚步，开始祈祷。维多利亚已经变成了某种原始的母性神灵，穿越了文化与宗教的界限。伦敦的穆斯林“为世界上真正信徒数量最多之国家的君主”祈祷。[18]印度总督柯曾勋爵（Lord Curzon）说，印度人认为她几乎是一个圣人。[19]孟加拉贵族、巴哈杜尔王公贾庭德拉·莫汉·泰戈尔（Maharaja Bahadur Sir Jotindra

Mohun Tagore）说，她就像是“全人类伟大的母亲，像我们［印度教］神话中的力量女神一样受人崇拜”[20]。在波斯，她是“拯救我们免遭毁灭的善良天使”[21]。

维多利亚以一种自己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改变了女性的一切。她唤醒了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某种渴望，或者说激发了某种勇气；她是世人眼前的女性典型，既热爱自己的家庭，又拥有充分的权利和独立的收入。H.G.韦尔斯认为，当王冠戴在她头上时，一种“解放的感觉”就产生了。他的母亲一直在以一种“强烈的忠诚度”关注维多利亚的生活——每一句话、每一次快乐或者每一次伤痛：

> 女王也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事实上可以说是我母亲的互补人格，在她想象中能够安抚她因自己的性别、娇小身材、身为人母以及生活中的无尽难题而承受的局限和磨难。亲爱的女王可以指挥自己的丈夫就像指挥一个臣民一样，并且可以让伟大的格莱斯顿先生心怀敬畏。如果身处那个位置的话会是怎样的感受？可能会说这件事，可能又会做那件事。对于我母亲心中的幻想，我毫不怀疑。她晚年时喜欢头戴黑色软毛、身穿黑色丝质长裙，变得与那位至高无上的寡妇相当神似。[22]

卓越的活动人士约瑟芬·巴特勒说，好的女王能够让男人也变得柔软：“她能够融化他们的粗鲁，以及对女性的轻蔑。”[23]甚至连被女王嗤之以鼻的妇女参政论者也赞颂她的榜样和影响力。后来于1913年的德比郡在国王的马蹄下受伤致死、成为妇女参政运动首个牺牲者的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强调说，维多利亚证明了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女性的工作”这种说法：维多利亚阅读了每一份文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花瓶”。虽然从来没有阅读过女王的日记，也没有研究过她的信件，但戴维森说的没错。

她对女性的影响还遍及全球。一家日本杂志的女性编辑赞颂她“甚至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都唤醒了战胜自己、成为女皇的野心”。[24]当美国

民权运动领袖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1899年在温莎的一场招待会上见到维多利亚女王时，她说自己“在看到她愉快的面孔时……感到一阵激动”。阿梅莉亚·布卢默（Amelia Bloomer）声称：“如果维多利亚可以坐上英格兰的王座，那么美国女性也可以坐上华盛顿的总统宝座。”[25]维多利亚的有利地位让聪颖的女性嫉妒万分。美国作家莎拉·简·利平科特（Sara Jane Lippincott）——她也以“格蕾丝·格林伍德”（Grace Greenwood）的名字为人所知——在1883年写道：“我在想，不知道女王陛下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拥有了神佑的特权才能与‘这个时代的一流男性’自由交谈；或者公开承认自己对政治的兴趣……而不必担心被人看作是‘爱管闲事的有主见的女人’。”[26]但维多利亚一直在忙于让自己显得渺小，好让阿尔伯特产生伟大的感觉，因此她从未意识到自己必须争取的东西有多么少。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维多利亚的工作让女性参政运动获得了稳定而又少有人提及的动力。在她去世时，《雷诺新闻报》（*Reynold’s News*）写道，她的一生“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正在心甘情愿地浪费这个国家的妇女资源……王国里有成千上万个潜在的维多利亚。我们再也不能主张……女性不适合承担公共职责了”[27]。她是女性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但或许她的突出地位正是让她在一个持续不平等的时代显得更容易令人接受的原因。她是拥有统治地位的女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她不是一个更多人会去效仿的符号。她的权力是通过继承而来；她不必为此斗争，或者从男性手中夺取权力。权力就像一个神圣的重担一样，被轻轻地放在了她的肩上。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维多利亚所捍卫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和西方人。当她听说一名女性在英格兰的火车上被人猥亵，或者某个像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Lady Florence Dixie）这样的人在温莎附近遭到袭击时，她会怒不可遏。但在她统治期间，印度、阿富汗和非洲有数不胜数的女性遭到了强奸、杀害，或者在大英帝国扩张版图的一系列“小型战

争”中失去了丈夫。数百万人忍饥挨饿。[28]帝国的不平衡让她烦恼——她最大的动力在于维持不列颠的伟大，但她在听说为了实现这种伟大而付出的代价后又忧心忡忡。这个世纪最严重的暴行出现在南非的英国集中营中，而那时的维多利亚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 * *

1901年2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遗体在浮若阁摩尔宫的墓园下葬，就葬在阿尔伯特身边。在她的家人关上大理石墓穴的大门时，室外的雨夹雪变成了大雪，产生了宁静、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维多利亚一直梦想的白色婚礼。她的灵柩盖着白布，拉着灵柩的马匹是白色的，坟墓的大理石也是白色的。各处的布帘也得是金色与白色相间的，她还下令任何地方都不能看到黑色。[29]维多利亚固执地认为，死亡不应与黑暗，而应与光明联系在一起。丁尼生给了她这个想法，他曾对她说，死亡本身已经足够可怕了，为什么还要“给它披上一层令它显得更糟的色彩呢”？[30]

她不打算成为一个披红戴绿或者玫瑰色傍身的女王：她早就已经褪掉了身上的羽毛，不再假装自己的美貌，转而去寻求身边美人相伴。她朴素而不加修饰的举止惹得一个小牧童问道：“她为什么不穿上容易让人认出来的衣服？”[31]维多利亚是一个喜欢黑白两色的女王，始终随心所欲地维持着有力统治。死后，这位寡妇再次成为新娘。她要求下葬时身穿白色丝绸和羊绒制品，肩上披着披肩，脸上还戴着面纱。维多利亚的寿命几乎是丈夫的两倍，独自统治国家的时间也是他们共同统治的两倍之久。

在谈到自己最大的渴望时，维多利亚一辈子重复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简单”。她想要一种简单的生活。她不喜欢穿紧身胸衣，主要是觉得不舒服。（她曾经在1867年对“新款超紧睡衣”翻过白眼。）女王在与世隔绝的苏格兰小别墅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那里位于苏格兰高地“狂野

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乡间”[32]，远离高楼与城堡，远离人们的视线与繁杂的事务。正如G.K.切斯特顿（Chesterton）在她去世后不久所写的那样，她“目中无人的谦逊态度”是帝国的核心所在：“没有人能够否认，她代表了最谦卑、最矮小也是最坚不可摧的人类福音，当所有的麻烦和麻烦贩子都没话可说之后，我们的工作能够一直干到日落，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直活到死亡。”[33]这话没错。不过，尽管她的谦逊是目中无人的，但她的目中无人却一点也不谦逊。

维多利亚不想死。或许她性格中最大的矛盾在于，她以为自己渴望死亡；实际上，她却对生命依依不舍。每当遇到危险，她都会本能地后退；当她的马车在苏格兰翻车，或者当日渐增长的年纪给她带来巨大影响时，她大声呼喊想要获得更多时间。就在去世的3年前，她还在日记中写道：“行动不便让我感觉到年龄带来的影响。78岁是一个好岁数，但我祈祷能再活几年，为了我的国家和亲人们。”[34]

她从未停止过工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维多利亚还抱怨说，尽管她喜欢在午饭后睡个午觉，以解决夜间的失眠问题，但这么做“很浪费时间”。在她去世的三天前，尽管关节处已经充满了积水，说话也很困难，但她仍然与里德医生讨论了南非局势，并且对战争表达了忧虑之情。这个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祈祷能够在天堂与她的阿尔伯特相会的女人，如今却仍然在祈求她的医生帮助她在世上再活更多时间。还有更多的事情要解决，更多的灾难要预防，更多的战争要打，更多的士兵要保护。

更多的事情始终存在。维多利亚认为，她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阿尔伯特吩咐的不断完善自己——还没有完成。她在写给伯蒂和比阿特丽斯的葬礼指示中写道：“我死得很平静，很清楚我的许多过失。”[35]围绕在她床边的这些人很清楚她的过失所在：反复无常、脾气暴躁、对子女专横跋扈、相信自己永远正确等。当然，他们也了解她的善良、忠

诚、幽默、敬业、信仰、不做作、没有偏见，以及她的坚韧不拔。正如劳伦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所写的那样：“维多利亚女王身上最具戏剧性的一件事是她的长寿：在这个以她名字命名的快速变革的时代，她却始终稳如泰山。”[36]这也是为什么，在她的一生中，她从一名少女变成了帝国的图腾。

维多利亚的强劲心跳一直持续到她的最后一口呼吸，里德医生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值得记载”[37]。这也是理解这个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女人的最佳线索，也是用以消除她生性被动、依赖男人、厌恶权力等迷思的关键线索。她也许的确会经常抱怨，但她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她悲伤了好几十年，但正如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所见证的那样，她同样也在毫不退缩地抗争。她顽强不屈、坚定不移的存在影响了一整个世纪，在其他女性没有任何权力时，她紧握权力不放。如果今天从伦敦上空飞过，还能看到她威严的大理石雕像矗立在街头，令人不禁赞叹一个隐居守寡的9个孩子的母亲是如何取得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的。答案很简单：维多利亚坚持了下来。

---

[1] Corelli，*The Passing of a Great Queen*，3.

[2] January 19，1901. Benson Diary，Magdalene College Library，Cambridge，vol. 5，1900-1901，130.

[3] Baring，*The Puppet Show of Memory*，215-16.

[4] Housman，*The Unexpected Years*，221.

[5] 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发表的评论，援引Wolffe，*Great Deaths*，242。

[6] “我敢肯定我们的内心今天都心系一件事，想念着我们亲爱的女王母亲，人民的母亲，尽职尽责、一片虔诚、勇气可嘉的女王。我感觉就好像失去了一个亲爱的朋友。每个人都在哭泣，每个人的百叶窗都拉了下来。这是真正的、令人感同身受的悲伤。我敢肯定，欧洲大陆上的人无法理解我们所感受到的悲痛，但这种蔓延

在她整个帝国的爱与悲伤的电流多么美好啊。” Jordan，*Josephine Butler*，285.

[7] Edel，*Henry James*：*Selected Letters*，328-29.

[8] Bostridge，*Florence Nightingale*，518.

[9] Nicholson，*A Victorian Household*，184.

[10] Corelli，*The Passing of a Great Queen*，46-48.

[11] January 26，1897，Instructions for Burial，皇家档案馆，VIC/MAIN/F/23/1-9a，12-16，18-37.

[12] January 26，1897，Memorandum by Queen Victoria. 皇家档案馆，VIC/MAIN/F/23/1-9a，12-16，18-37.

[13] Sir James Reid，notebooks，vol. 2 （1881-83），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14] 这些指示被一直保存在她女仆的口袋里，如今保存在詹姆斯·里德爵士的档案中，这位医生一直陪伴维多利亚到她去世。皇家档案馆曾试图获得这份文件，好让它与维多利亚的其他档案一起被私密地保管起来，但没能获得成功。

[15] 里德仔细地记载了她死亡的细节。里德夫人说，维多利亚对他说的最后几个字是：“我会做你喜欢的任何事。” Susan Reid to Mary，i.e.，Mrs. John F. Reid，January 26，1901，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16] Susan Reid to Mrs. Reid，January 25，1901，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17] 皇家档案馆，VIC/MAIN/F/23/32：一则来自1901年2月2日《泰晤士报》的剪报：“今天，纽约的金融和商业交易所关门歇业，以表示尊敬和同情……纽约的繁忙生活出现了停顿。”

[18] Wolffe，*Great Deaths*，229.

[19] Wolffe，*Great Deaths*，229.

[20] Wolffe，*Great Deaths*，230.

[21] Wolffe，*Great Deaths*，231.

[22] Wells，*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27.

[23] Jordan，*Josephine But-ler*，285.

[24] 引自 Longford，*Victoria R.I.*，504。

[25] 引自 Rappaport，*Queen Victoria*，426。

[26] Greenwood，*Queen Victoria*，390-91.

[27] *Reynolds Newspaper*，January 27，1901. Cited in Rappaport，*Queen Victoria*，430；Williams，*The Contentious Crown*，145.

[28] 瘫痪在床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正在忙于印度事务，有近2900万印度人在英国统治下因一轮又一轮的饥荒而被饿死。南丁格尔花了很多年时间试图迫使英国政府消除当地的贫困，并呼吁改善灌溉设施，改革土地所有制。（Bostridge，*Florence Nightingale*，473.）让她深感失望的是，即使在1877年发生饥荒，导致光是孟买和马德拉斯就有400万人死亡后，她所支持的计划依然没有得到采纳。——原文注释

[29] October 25，1897. 皇家档案馆，VIC/MAIN/ F/23/1-9a.

[30]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March 6，1873.

[31] Craig，“The Crowned Republic？，” 173.

[32] 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September 26，1848.

[33] G. K. Chesterton，“Queen Victoria，” 234.

[34] May 24，1897，Duff，*Queen Victoria’s Highland Journals*，223.

[35] October 25，1897，皇家档案馆，VIC/MAIN/F/23/1-9a.

[36] Housman，*The Unexpected Years*，370.

[37] 里德医生指出，在女王奄奄一息之时，“心脏的活动仍然稳定，一直维持到了最后一刻”，尽管她身体很虚弱，而且“大脑疲惫”。他说，尽管有过古怪的走神，但她的神志并没有昏迷，证据是她一直到去世的几分钟前仍然认得几位家人。Sir

James Reid，Medical Report，January 23，1901，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

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横跨了多个大洲和许多年，我心中的感激之情堪比这些年飞过的里程数。首先，我非常感谢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她慷慨地允许我不受限制地研究英国皇家档案馆中的文献，并引用受到版权保护的材料。资深档案管理员帕米拉·克拉克（Pamela Clark）小姐的帮助尤其大，她分享了她关于这些档案的大量知识。我还要提到，在2015年9月9日这一天，就在我对这本书进行最后修订的时候，女王陛下终于超过了自己的高祖母维多利亚的纪录，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在研究维多利亚的一生时，我曾经造访过数十家图书馆——以及附近的咖啡店——它们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纽约社会图书馆（New York Society Library）、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Penn University Library）、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米切尔图书馆（Mitchell Library）、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苏格兰国立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伦敦图书馆（London Library）以及曼利图书馆（Manly Library）。我必须尤为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的帕特里克·弗莱彻（Patrick Fletcher）；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Oxford）文件与手稿档案馆朗斯代尔馆长安娜·桑德（Anna Sander）；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Oxford）助理客户经理本·阿诺德博士（Dr. Ben Arnold）；以及奥斯本宫馆长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

正如她为许多女性所做的那样，澳大利亚前总督昆廷·布赖斯（Quentin Bryce）在任期间为我提供了非凡的帮助。如果没有布赖斯女士的秘书斯蒂芬·布雷迪（Stephen Brady）的支持，我不可能获得在皇家档案馆进行研究的许可。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苏格兰兰顿塔的迈克拉夫人（Lady Michaela）和亚历山大·里德勋爵（Lord Alexander Reid）慷慨地允许我不受拘束地阅读詹姆斯·里德医生的日记和工作日志，以及他们的家族剪贴簿，这些内容十分引人入胜。

我的研究助理凯瑟琳·波普（Catherine Pope）对维多利亚漫长的一生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她的勤劳、智慧以及敏锐的眼光至关重要。其他有价值的帮助来自乔·塞托（Jo Seto）、利比·艾芬妮（Libby Effeney）、萨姆·雷吉斯特（Sam Register）、露西·基皮斯特（Lucy Kippist）以及玛德琳·劳斯（Madeline Laws）。那些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重要意见的人包括约翰·巴灵顿·保罗（John Barrington Paul）、埃弗里·罗姆（Avery Rome）以及麦考里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肖恩·布劳利教授（Professor Sean Brawley）。埃文·卡姆菲尔德（Evan Camfield）提出了许多卓有帮助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乐卓博大学的伊冯娜·沃德将她在德国和温莎获得的文件慷慨地借给了我。

我还要感谢那些杰出的朋友们，他们都在许多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特别是玛莎·希尔（Martha Sear）、吉尔·戴维森（Jill Davison）、安娜贝尔·克拉布（Annabel Crabb）、达明·德鲁（Damien Drew）、卡西·福斯特（Cathie Forster）、乔西·格雷奇（Josie Grech）、詹姆斯·胡克（James Hooke）、克里·安布勒（Kerri Ambler）、乔·奇切斯特（Jo Chichester）、莎拉·麦克唐纳（Sarah Macdonald）、阿里·本顿（Ali Benton）、伊恩·卢赫斯（Ian Leuchars）、约翰·哈伍德（John Harwood）、布里奥妮·斯科特（Briony Scott）、利·萨尔斯（Leigh Sales）、米娅·弗里德曼（Mia Freedman）、莉莎·惠特比（Lisa Whitby）、朱迪丝·惠兰（Judith Whelan）、艾玛·阿尔贝里西（Emma

Alberici）、理查德·斯克鲁比（Richard Scruby）、摩根·梅里什（Morgan Mellish）、埃莉·韦恩赖特（Ellie Wainwright）与伯纳德·祖埃尔（Bernard Zuel）。当然，还有我在纽约市的团队成员：凯蒂·麦克伦南（Katie Maclennan）、克里·金博尔（Kerri Kimball）、玛丽·摩根（Mary Morgan）、劳拉·温鲍姆（Laura Weinbaum）以及邦妮·西格勒（Bonnie Siegler）。

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同事对于我的写作冲动深表理解并给予了巨大支持，尤其是托尼·希尔（Tony Hill）、史蒂夫·坎南（Steve Cannane）、加文·莫里斯（Gaven Morris）以及马克·斯科特（Mark Scott）。许多人都曾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帮助过我：帕特·欧文（Pat Irving）、安娜贝尔·安德鲁斯（Annabel Andrews）、伊恩·麦克吉尔（Ian Macgill）、罗伯特·纽林兹（Robert Newlinds）、诺曼·斯旺（Norman Swan）、沃特·夏皮罗（Walter Shapiro）、梅丽尔·戈登（Meryl Gordon）、达伦·桑德斯（Darren Saunders）、纳马·卡林（Naama Carlin）。我的高中老师凯尔·瓦基尼（Care Vacchini）曾经教育我，历史不仅仅是日期和一本正经的肖像画，还囊括了战壕与传单、宣传与文学以及灯火管制和丝袜等。人类的双手在带来残忍破坏的同时，也能创造精致的美好。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有一个像她这样的老师。

有些人我必须致以特别的谢意：感谢忠实的蒂姆·迪克（Tim Dick）阅读我的草稿，他和亲切的凯丝·基南（Cath Keenan）一直带着我同亲爱的饮茶小团体一起纵情欢笑；感谢瓦妮萨·惠特克（Vanessa Whittaker）对我展示出的友情，以及她无限的幽默洞见；感谢詹姆斯·伍德福德（James Woodford）的理解、善意以及去芜存菁的神秘能力；感谢凯特琳·麦吉（Caitlin McGee），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善良、最温柔的人；感谢彼得·菲茨西蒙斯（Peter Fitzsimons），我的荣誉兄弟，也是我在人生的龟兔赛跑中始终追赶的对象，只可惜他从来不会打盹休息，

而是不断激励我前进；感谢莫琳·多德（Maureen Dowd）与我保持的非同寻常的友谊，以及带领我在纽约进行的一千次冒险；感谢乔纳森·斯旺（Jonathan Swan）给予我的矢志不渝的爱和鼓励；感谢乔·福克斯（Jo Fox）在诺丁山的家中无微不至地招待了我好几个月，并且在我写作之余带我参加了音乐节和远足等活动；感谢我交情最久、感情最深的朋友杰姬·琼斯（Jacqui Jones），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冷静而坚定地站在我身边，过去几十年里，她与我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谈话，内容涵盖一切，包括维多利亚。

有5个人对这本书的构思和撰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在《新闻周刊》的杰出前编辑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几乎是我决定撰写维多利亚生平的唯一原因。他敏锐的眼光和鼓励在我的写作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是最早引诱我来到纽约工作的人，他对我的影响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认知。我无可比拟的经纪人宾基·厄本（Binky Urban）从我提到维多利亚这个名字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给予我毫不动摇的支持。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安娜·皮托尼亚克（Anna Pitoniak）和凯特·梅迪纳（Kate Medina）担任我的编辑，我感到极为荣幸。安娜凭借其稳重而冷静的眼光为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凯特始终保持敏锐、体贴和热情，而且出自本能地立马就理解这本书的写作意图。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是为了告诉我所认识的那些姑娘们——尤其是安娜（Anna）、弗朗西丝（Frances）、索菲（Sophie）、玛丽（Mary）、格蕾丝（Grace）、阿丽尔（Ariel）、罗丝（Rose）、茜比拉（Sybilla）以及我的女儿波比（Poppy）——一个18岁的女人是如何管理一个帝国的。你们都可以改变并统治这个世界。

最后，我亲爱的父母朱迪（Judy）与布鲁斯（Bruce）始终教导我要热爱我所从事的行业。他们的支持毫无保留，而且无法估量。我幽默

的兄弟迈克（Mike）和史蒂夫（Steve）也在一直坚定地支持着我；还有我的嫂子和弟媳，克琳（Kerryn）和安玛莉（Annemaree）；以及我备受喜爱的侄子侄女们：劳拉（Laura）、凯特（Cate）、卢克（Luke）、伊莱贾（Elijah）和奥斯卡（Oscar）。我的孩子波比和萨姆（Sam）是我的两颗北极星。你们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也让我生命中充满欢笑。这本书是献给你们的。

注释

缩写

QVJ：维多利亚女王的日志

RA：皇家档案馆

文献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参考了许多材料，包括手稿集、档案等，并造访了英格兰、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图书馆。在位于英格兰伯克郡温莎城堡的皇家档案馆里，我阅读了维多利亚与她的丈夫、子女、首相、秘书、大臣、朋友以及王室成员之间的通信。我多次穿行于怀特岛奥斯本宫以及温莎城堡、白金汉宫和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里她曾经居住的房间。奥斯本宫自从维多利亚去世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仍然摆满了纪念品，以及婴儿四肢的雕塑、儿童的毛发，还有一对富有的年轻夫妇委托画家创作的画作。

维多利亚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字。对研究者而言值得欣喜的是，她的日记如今已经能够在网络上访问到了。一个世纪前，编辑她的信件的艰巨工作是由阿瑟·克里斯托弗·本森以及伊舍子爵完成的，乔治·厄尔·巴克尔（George Earle Buckle）后来接过了他们的工作。她写给长女的信被保存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霍夫（Friedrichshof），由黑森家族的家族基金会负责保管。罗杰·富尔福德（Roger Fulford）在1964至1981年一直在编辑这些信件；阿加莎·拉姆（Agatha Ramm）在1991年出版了最后一卷。

其他材料源自以下收藏：

Aberdeen Papers，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s Collection，St.Pancras，London

Althorp Papers，Correspondence with Sir Henry Ponsonby，Private Secretary to Queen Victoria，many on behalf of the Queen，British Library

Ayrton papers，British Library

Arthur Benson Diary，Magdalene College Library，Cambridge England.

British Library Newspaper Collections，Colindale Avenue，London，England

Diaries of Lady Katherine Clarendon，Clarendon Papers，MSS Eng.E.2122-5，Bodleia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Conroy Family Collection Papers，Balliol College，Oxford

Lord Cross papers，British Library

Benjamin Disraeli correspondence with Queen Victoria，Western Manuscripts，MSS Disraeli，NRA 842 Disraeli，Bodleia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Empress Frederick Letters，Kurhessische Hausstiftung，Schloss Fasanerie，Eichenzell，Germany

Ernest Ⅱ，Duke of Saxe-Coburg，Staatsarchiv Coburg，Germany

Gladstone Papers，including correspondence with Queen Victoria and her private secretaries 1845-94，British Library

Sir William Harcourt，Correspondence with Queen Victoria 1880-81，MS Harcourt dep.365；and 1882-83，MS Harcourt dep.2 Bodleia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Archives of Princess Dorothea von Lieven，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 Collections

Princess Dorothea von Lieven letters to Marie Mallet Repository，Balliol College，Oxford

Marie Mallet Archives，Lady in Waiting，Balliol College，Oxford

Morier Family Papers，K1/4/4，1866-72，Queen Victoria’s letters to General Peel，Balliol College，Oxford

Nightingale Papers Vol Ⅻ，Add. MSS 45750，British Library

Peel Papers，British Library

Queen Victoria Collection，Kensington Palace，London，England

Queen Victoria’s “Album Consolativum，” British Library

James Reid Papers，Reid Family Archives，Lanton Tower，Lanton，Scotland

Yvonne Ward，PhD dissertation，“Editing Queen Victoria：How Men of Letters Constructed the Young Queen，” Borchardt Library at La Trobe University in Bundoora，Australia

Lady Waterpark’s diary as Lady in Waiting to Queen Victoria，1865-1891，British Library

Women’s Suffrage file，Add.74952，Jubilee appeal：1897，British

Library

期刊文章

Anderson，Nancy Fix. “Cousin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1，no.2（September 1986）：285-301.

Arnstein，Walter L. “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The American Scholar* 66，no.4（Autumn 1997）：591-97.

Baker，Kenneth. “George Ⅳ：A Sketch.” *History Today* 55（2005）.historytoday.com/kenneth-baker/george-iv-sketch.

Beachy，Robert. “The German Invention of Homosexualit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2，no.4，Sci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ulture（December 2010）：801-38.

Behlmer，George K. “The Gypsy Problem in Victorian England.” *Victorian Studies* 28，no.2（1985）：231-53.

Berridge，Virginia. “Queen Victoria’s Cannabis Use：Or，How History Does and Does Not Get Used in Drug Policy Making.” *Addic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1（2003）：213-15.

Brown，Catherine. “Henry James and Ivan Turgenev：Cosmopolitanism and Croquet.” *Literary Imagination* 15，no.1（2013）：109-23.doi：10.1093/litimag/imt014.

Brumberg，Joan Jacobs. “Chlorotic Girls，1870-1920：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Female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53（1982）：1468-77.doi：10.2307/1130073.

Craig，David M. “The Crowned Republic？Monarchy and Anti-Monarchy in Britain，1760-1901.”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6，no.1（March 2003）：167-85.doi：10.1017/S0018246X02002893.

DeLuca，Geraldine. “Lives and Half-Lives：Biographies of Women for Young Adult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17，no.4（1986）：241-52.

Demos，John，and Virginia Demos. “Adolesc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1（1969）：632-38.doi：10.2307/349302.

Evans，Richard J. “The Victorians：Empire and Race.” Lecture delivered at Gresham College. April 11，2011.gresham.ac.uk/lectures-and-events/thevictorians-empire-and-race.

Frith，John. “Syphilis—Its Early History and Treatment Until Penicillin and the Debate on Its Origins.”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Medical Health* 20，no.4（December 2012）：49-58.search.informit.com.au/clocumentSummary；dn=395151977487523；res=IELHEA.

Gosse，Edmund. “The Character of Queen Victoria.” *Quarterly Review* 193（January-April 1901）：301-37.

Grant，Susan-Mary. “New Light on the Lady with the Lamp.” *History Today* 52，no.9（September 2002）：11-17.

Groneman，Carol. “Nymphomania：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exuality.” *Signs* 19，no.2（1994）：337-67.

Grosvenor，Bendor. “Dear John.” *History Today* 55，no.1（January 2005）.

Heesom，Alan. “The Coal Mines Act of 1842，Social Reform，and Social Control.”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4，no.1（March 1981）：69-88.doi：http：//dx.doi.org/10.1017/S0018246X00008037.

Jay，Elisabeth. “‘Mrs. Brown’by Windsor’s Other Widow.” *Women’s Writing* 6，no.2（1999）：191-200.doi：10.1080/09699089900200066.

Kerr，C.B. “The Fortunes of Haemophilia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al History* 7，no.4（October 1963）：359-70.doi：10.1017/S0025727300028829.

King，Kathryn R.，and William W.Morgan. “Hardy and the Boer War：The Public Poet in Spite of Himself.” *Victorian Poetry* 17，nos.1 and 2（Spring-Summer 1979）：66-83.

Kuhn，William. “Sexual Ambiguity in the Life of Disraeli.” *Gay and Lesbian Review Worldwide* 13，no.4（2006）：16-18.

Larsson，S. Anders. “Life Expectancy of Swedish Haemophiliacs.” *Journal of Haematology* 59（1985）：593-602.doi：10.1111/j.1365-2141.1985.tb07353.x.

Levine，Philippa. “Venereal Disease，Prostitution，and the Politics of Empire：The Case of British Ind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4，no.4（1994）：579-602.

Linton，E.Lynn. “The Judicial Shock to Marriag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9（May 1891）：691-700.

Maercker，Andreas，and John Lalor. “Diagnostic and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in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4，no.2（June 2012）：167-76.

Morton，Tom. “Jewel in the Crown.” *Frieze* no.66（April 2002）.

“Notes of the Month.” *Civil Engineer and Architect’s Journal* 15（1852）：159-60.

Pearce，Brian Louis，et al. “Queen Victoria’s Golden Jubilee 1887.”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135（July 1987）：573-97.

Peters，Timothy J.，and D.Wilkinson. “King George Ⅲ and Porphyria：A Clinical Re-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History of Psychiatry* 21，no.1（2010）：3-19.

Plunkett，John. “Of Hype and Type：The Media Making of Queen Victoria 1837-1845.” *Critical Survey* 13，no.2（Summer 2001）：7-25.

Prigerson，Holly G.，et al.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Criteria Proposed for DSM-V and ICD-11.” *PLoS Medicine* 6，no.8（August 2009）：el000121.doi：10.1371/journal.pmed.1000121.

“Protected Cradles.” *Household Words*，2：31（October 26，1850）：108-12.

Raven，Thomas F. “The Hæmorrhagic Diathesi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November 8，1884）：686.archive.org/details/britishmedicaljo11884brit.

Reid，Michaela. “Sir James Reid，Bt：Royal Apothecary.”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4，no.4（April 2001），194-95.

Rushton，Alan R. “Leopold：The‘Bleeder Prince’and Public Knowledge About Hemophilia in Victorian Brita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7，no.3（July 2012）：457-90.doi：10.1093/jhmas/jrr029.

Shaw，George Bernard. “The Ugliest Statue in London.” *Arts Gazette*（May 31，1919）.

Shear，M.Katherine，et al. “Complicated Grief and Related Bereavement Issues for DSM-5.”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8，no.2（February 2011）：103-17.doi：10.1002/da.20780.

Showalter，Elaine，and English Showalter. “Victorian Women and Menstruation.” *Victorian Studies* 14，no.1（September 1970）：83-89.

St.John，Ian. “Queen Victoria as a Politician.” *The Historian* 80（December 1，2003）.

Tait，Robert Lawson. “Note on the Influence of Removal of the Uterus and Its Appendages on the Sexual Appetite.” *The British Gynæcological Journal* 4（1888）：310-17.

Taylor，Miles. “The 1848 Revolution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166，no.1（2000）：146-180. doi：10.1093/past/166.1.146.

Tedford，Barbara Wilkie，“The Attitudes of Henry James and Ivan Turgenev Toward the Russo-Turkish War.” *Henry James Review* 1，no.3（Spring 1980）：257-61. doi：10.1353/hjr.2010.0139.

Turner，Trevor. “Erotomania and Queen Victoria：Or Love Among the Assassins？” *BJPsych Bulletin* 14（1990）：224-27.doi：10.1192/pb.14.4.224.

Tyrell，Alex. “Women’s Mission and Pressure Group Politics in Britain 1825-60.”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63，no.1（Autumn 1980）：194-230.

Van Wyk Smith，Malvern. “The Boers and the Anglo-Boer War（1899-1902）in the Twentieth-Century Moral Imaginary.”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1，no.2（September 2003）：429-46. doi：10.17/S1060150303000226.

Walker，John West. “On Haemophili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1872）：605-60.

Ward，Yvonne M. “The Womanly Garb of Queen Victoria’s Early Motherhood，1840-42.” *Women’s History Review* 8，no.2（1999）：277-94.doi：10.1080/09612029900200211.

Weintraub，Stanley. “Exasperated Admiration：Bernard Shaw on Queen Victoria.” *Victorian Poetry* 25，nos.3-4（Autumn-Winter 1987）：115-32.

图书资料

Ackroyd，Peter. *Dickens.* London：Sinclair-Stevenson，1990.

Acton，William. *The Functions and Disorders of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in Childhood，Youth，Adult Age，and Advanced Life：Considered in Their Physiological，Social，and Moral Relations.* London：Churchill，

1857.

Albert，Harold A. *Queen Victoria's Sister*：*The Life and Letters of Princess Feodora.* London：Robert Hale，1967.

Albert，Prince Consort. *The Principal Speeches and Addresses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Consort.* London：John Murray，1862.

Aldous，Richard.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Gladstone vs Disraeli.* London：Pimlico，2007.

Altick，Richard D.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 New York：W.W.Norton，1973.

Anderson，William James. *The Life of F.M.，H.R.H.Edward，Duke of Kent*：*Illustrated by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De Salaberry Family，Never Before Published，Extending from 1791 to 1814.* Ottawa，Ont.：Hunter，Rose，1870.

Arnstein，Walter L. *Queen Victoria.* New York：Macmillan，2003.

Aronson，Theo. *Heart of a Queen*：*Queen Victoria's Romantic Attachments.* London：Thistle，2014.

——. *Victoria and Disraeli*：*The Making of a Romantic Partnership.* New York：Macmillan，1977.

Ashdown，Dulcie. *Queen Victoria's Mother.* London：Hale，1974.

Ashton，John. *Gossip in the First Decade of Victoria's Reign.*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903.

Aspinall，A［rthur］.，ed.，*The Letters of King George Ⅳ，1812-1830.* 3 vol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8.

Aston，George，Sir. *His Royal Highness，the Duke of Connaught and Strathearn：A Life and Intimate Study.* London：G.G.Harrap，1929.

Bagehot，Walter.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London：Kegan Paul，Trench，1888.

Bahlman，Dudley W.R.，ed. *The Diary of Sir Edward Walter Hamilton 1880-1885.* 2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

Baillie，Albert Victor，and Hector Bolitho，eds. *Letters of Lady Augusta Stanley，a Young Lady at Court，1849-1863.* London：G.Howe，1927.

Bamford，Francis，and the Duke of Wellington，eds. *The Journal of Mrs Arbuthnot.* 2 vols. London：Macmillan，1950.

Baring，Maurice. *The Puppet Show of Memory.* Boston：Little，Brown，1922.

Barnum，P.T. *The Life of P.T.Barnum：Written by Himself.* London：Sampson Low，1855.

Bartley，Paula. *Prostitution：Prevention and Reform in England，1860-1914.* London：Routledge，2000.

Bassett，A.Tilney，ed. *Gladstone to His Wife.* London：Methuen，1936.

Basu，Shrabani. *Victoria and Abdul：The True Story of the Queens*

Closest Confidant. Stroud，U.K.：History Press，2011.

Bauer，Karoline. *Caroline Bauer and the Cobur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Nisbet.London：Vizetelly，1887.

Belchem，John. “The Waterloo of Peace and Order：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In *Europe in 1848：Revolution and Reform*，edited by Dieter Dowe et al.，translated by David Higgins，242-57.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1.

Bell，G.K.A. *Randall Davidso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

Bell，Susan Groag，and Karen M.Offen，eds. *Women，the Family，and Freedom：The Debate in Documents.* Vol.2，1880-195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Bennett，Daphne. *King Without a Crown：Albert，Prince Consort of England，1819-61.*London：Pimlico，1983.

——. *Queen Victoria’s Children.* London：Victor Gollancz，1980.

Benson，Arthur Christopher，and Viscount Esher，eds.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John Murray，1907.

Benson，Edward F. *Queen Victoria.* London：Longmans，Green，1935.

Benson，Elaine. *Unmentionables：A Brief History of Underwear.*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

Berridge，Virginia. *Opium and the People*：*Opiate Use and Drug Control Polic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 Rev.ed. 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9.

Best，Geoffrey. *Mid-Victorian Britain 1851-75.* London：Fontana，1985.

Blake，Robert. “Constitutional Monarch：The Prerogative Powers.” In *The Law，Politics，and the Constitution*：*Essays in Honour of Geoffrey Marshall*，edited by David Butler，Robert Summers，and Vernon Bogdano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 *Disraeli.* London：Methuen，1966.

Bloom，Clive. *Victoria’s Madmen*：*Revolution and Alienation.* Basingstoke，U.K.：Macmillan，2013.

Bloomfield，Georgiana. *Reminiscences of Court and Diplomatic Life.* London：Kegan Paul，Trench，1883.

Blyth，John. *Caro*：*The Fatal Passion，the Life of Lady Caroline Lamb.* London：Rupert Hart-Davis，1972.

Bogdan，Robert. *Freak Show*：*Presenting Human Oddities for Amusement and Profi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Bolitho，Hector. *Albert the Good and the Victorian Reign.* New York：D.Appleton，1932.

——. *Albert*：*Prince Consort.* Rev.ed. London：David Bruce and Watson，1970.

——. *A Biographer's Notebook.* London：Longmans，Green，1950.

——，ed. *Further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Prussia.* Translated by Mrs.J.Pudney and Lord Sudley. 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8.

——，ed. *The Prince Consort and His Brother*：*Two Hundred New Letters.* London：Cobden-Sanderson，1933；New York：Appleton-Century，1934.

Bolitho，Hector.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Collins，1949.

Bondeson，Jan. *Queen Victoria's Stalker*：*The Strange Story of the Boy Jones.* Stroud，U.K.：Amberley，2010.

Bostridge，Mark. *Florence Nightingale*：*The Making of an Icon.*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8.

Boswell，James.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ondon：G.Cowie，1824.

Boykin，Edward，ed. *Victoria，Albert，and Mrs. Stevenson.*London：Rinehart，1957.

Bradford，Sarah. *Disraeli.* London：Phoenix，1982.

Branca，Patricia. *Silent Sisterhood*：*Middle-Class Women in the Victorian Home.* London：Routledge，1975.

Brett，Maurice V.，ed.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Reginald Viscount Esher.* 4 vols.London：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1934-1938.

Briggs，Asa. *The Age of Improvement，1763-1867*. London：Longman，1993.

——. *Victorian People*：*A Reassessment of Persons and Themes 1851-1867*.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3.

Brumberg，Joan Jacobs. *The Body Project*：*An Intimate History of American Girls*. New York：Random House，1997.

Bryson，Bill. *At Home*：*A Short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London：Black Swan，2011.

Buckle，George Earle，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and Journal Between the Years 1862 and 1878*. 2nd ser.2 vols.London：John Murray，1926-28［1862-78］.

——，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and Journal Between the Years 1862 and 1885*. 2nd ser. London：John Murray，1928［1879-85］.

——，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and Journal Between the Years 1886 and 1901*. 3rd ser. 3 vols. London：John Murray，1930-32.

Caine，Barbara. *Victorian Feminis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Carlyle，Thomas.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and Jane Welsh Carlyle*. Edited by Brent E.Kinser.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0-2016. http：//carlyleletters.dukeupress.edu.

Carpenter，Mary Wilson. *Health，Medicine，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 Victorian Life and Times. Santa Barbara，Calif.：Praeger，2009.

Carroll，Lewis.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Cavendish，Lady Lucy Caroline Lyttelton. *The Diary of Lady Frederick Cavendish.* Edited by John Bailey. Vol.2.New York：Frederick A.Stokes，1927.

Cecil，David. *The Young Melbourne and Lord M.*London：Phoenix Press，2001.

Cecil，Lady Gwendolen. *Life of Robert，Marquis of Salisbury.* 4 vols.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21.

Chambers，James. *Palmerston：The People's Darling.* London：John Murray，2005.

Chariot，Monica. *Victoria the Young Quee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Chesney，Kellow. *The Anti-Society：An Account of the Victorian Underworld.* Boston：Gambit，1970.

——. *Crimean War Reader.* London：Frederick Muller，1960.

Chesterton，G.K. "Queen Victoria." In *Varied Types*，225-34. New York：Dodd，Mead，1903. Reprint，Rockville，Md.：Wildside Press：2005.［chapter in a book］

——.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New York：Dodd，Mead，1910.

Clarke，Isabel C. *Shelley and Byron*：*A Tragic Friendship*. London：Hutchinson，［1934］.

Clarke，J.F. *Autobiographical Recollection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London：J. and A.Churchill，1876.

Clive，Mary，ed. *Caroline Clive*：*From the Diary and Family Papers of Mrs. Archer Clive，1801-1873*. London：Bodley Head，1949.

Colley，Linda. *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ondon：Vintage，1996.

Connell，Brian. *Regina vs. Palmerston*：*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Queen Victoria and Her Foreign and Prime Minister，1837-1865.* New York：Doubleday，1961.

Copland，James. *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Medicine.*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45.

Corelli，Marie. *The Passing of a Great Queen*：*A Tribute to the Noble Life of Victoria Regina.* New York：Dodd，Mead，1901.

Cornwallis-West，Mrs. George. *The Reminiscences of Lady Randolph Churchill.* London：Edward Arnold，1908.

Corti，Egon Caesar. *The English Empress*：*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Queen Victoria and Her Eldest Daughter，Empress Frederick of Germany.* Translated by E.M.Hodgson. London：Cassell，1957.

Costello，Con. *A Most Delightful Station*：*The British Army on the Curragh of Kildare，Ireland，1855-1922.* Cork，Ire.：Collins Press，

1996.

Cowen，Ruth. *Relish*：*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Alexis Soyer*，*Victorian Celebrity Chef*.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6.

Creston，Dormer. *The Youthful Queen Victoria*：*A Discursive Narrative*. London：Macmillan，1952.

Cullen，Tom A. *The Empress Brown*：*The Story of a Royal Friendship*. London：Bodley Head，1969.

Darby，Elisabeth，and Nicola Smith. *The Cult of the Prince Consort*.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Darwin，Charles R. *Evolutionary Writings*. Edited by James A.Secor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 *Fertilisation of Orchids*. London：John Murray，1862.

Davenport-Hines，Richard. *Sex*，*Death*，*and Punishment*：*Attitudes to Sex and Sexuality in Britain Since the Renaissance*. London：Collins，1990.

Davidoff，Leonore，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1780-1850*. Rev.ed. London：Routledge，2002.

Davidson，Roger，and Lesley A. Hall，eds. *Sex*，*Sin and Suffering*：*Venereal Disease and European Society Since 1870*. London：Routledge，2001.

Dekkers，Midas. *Dearest Pet*：*On Bestiality*. London：Verso，2000.

Dennison，Matthew. *The Last Princess*：*The Devoted Life of Queen Victoria's Youngest Daughter*. London：Phoenix，2007.

Diamond，Michael. *Victorian Sensation.* London：Anthem Press，2003.

Disraeli，Benjamin.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1860-1864.* Edited by M.G.Wiebe et al.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9.

Dixie，Lady Florence. *Gloriana*；*Or*，*The Revolution of 1900.* London：Henry and Company，1890.

Douglass，Paul. *Lady Caroline Lamb*：*A Biography*. New York：Macmillan，2004.

Downer，Martyn. *The Queen's Knight*：*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Queen Victoria's Most Trusted Confidant.* London：Corgi，2008.

Doyle，Arthur Conan. *The Great Boer War.* London：Smith，Elder，1900.gutenberg.org/files/3069/3069-h/3069-h.htm.

Duff，David. *Albert and Victoria.* London：Frederick Muller，1972.

——. *Edward of Kent*：*The Life Story of Queen Victoria's Father.* London：Frederick Muller，1973.

——. *The Shy Princess*：*The Life of 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Beatrice*，*the Youngest Daughter and Constant Companion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Evans Brothers，1958.

Duff，David，and Victoria，Queen of Great Britain. *Queen Victoria's Highland Journals.* Rev.ed. Exeter，U.K.：Webb and Bower，1980.

Duff，Ethel M. *The Life Story of H.R.H. the Duke of Cambridge.* London：Stanley Paul，1938.

Dyhouse，Carol. *Feminism 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1880-1939.*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9.

Dyson，Hope，and Charles Tennyson，eds. *Dear and Honoured Lady：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Queen Victoria and Alfred Tennyson.* London：Macmillan，1969.

Ellis，Sarah Stickney. *The Wives of England：Their Relative Duties，Domestic Influence，and Social Obligations.* New York：D.Appleton，1843.

Erickson，Carolly. *Her Little Majesty：The Life of Queen Victoria.*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7.

Ernest Ⅱ. *Memoirs of Ernest Ⅱ，Duke of Saxe-Coburg-Gotha.* 4 vols.London：Remington，1888.

Erskine，Mrs.Steuart，ed. *Twenty Years at Court：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Hon. Eleanor Stanley，Maid of Honour to Her Late Majesty Queen Victoria，1842-1862.* London：Nisbet，1916.

Esher，Reginald Baliol Brett，Viscount，ed. *The Girlhood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Diaries Between the Years 1832 and 1840.* 2 vols. London：John Murray，1912.

Faroqhi，Suraiya et al.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1300-1914，*vol.2，*160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Farwell，Byron. *Queen Victoria's Little Wars.* New York：Harper，1972.

Fawcett，Millicent Garrett. *Life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Boston：Roberts Brothers，［1895］.

Feuchtwanger，E.J. *Albert and Victoria*：*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Saxe-Coburg-Gotha.* London：Hambledon Continuum，2006.

Fildes，Valerie. *Wet Nursing*：*A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

Fisher，Trevor. *Prostitution and the Victorians.* New York：St. Martin's，1997.

Flanders，Judith. *The Victorian House*：*Domestic Life from Childbirth to Deathbed.* London：Harper，2004.

Forster，John. *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2 vols.（London：Chapman and Hall，1904.

Fox，Caroline. *Memories of Old Friends*：*Being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Letters.* Edited by Horace N.Pym.London：Smith，Elder，1882.

Frost，Thomas. *The Old Showmen，and the Old London Fairs.* London：Tinsley Brothers，1874.

Fulford，Roger. *George the Fourth.* Rev. and enl. ed. London：Gerald Duckworth，1949.

——. *The Prince Consort.* London：Macmillan，1949.

——. *Royal Dukes*：*The Father and Uncles of Queen Victoria.* New and rev. ed. London：Fontana，1973.

——，ed. *Dearest Child*：*Letters Between Queen Victoria and the Princess Royal 1858-61*. London：Evans Brothers，1964.

——，ed. *Dearest Mama*：*Letters Between Queen Victoria and the Crown Princess of Prussia 1861-1864*. London：Evans Brothers，1968.

——，ed. *Your Dear Letter*：*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Queen Victoria and the Crown Princess of Prussia 1865-1871*. New York：Scribner，1971.

——，ed. *Darling Child*：*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Queen Victoria and the Crown Princess of Prussia，1871-1878*. London：Evans Brothers，1976.

——，ed. *Beloved Mama*：*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Queen Victoria and the German Crown Princess，1878-85*. London：Evans Brothers，1981.

Gardiner，John. *The Victorians*：*An Age in Retrospect.* London：Hambledon and London，2002.

Gardiner，Juliet. *Queen Victoria.* London：Collins and Brown，1997.

Gill，Gillian. *Nightingales*：*Florence and Her Family.* London：Sceptre，2004.

——. *We Two*：*Victoria and Albert*：*Rulers，Partners，Rivals.* New York：Ballantine，2010.

Gillen，Mollie. *The Prince and His Lady*：*The Love Story of the Duke of Kent and Madame de St. Laurent.* 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1970.

Goldsworthy，Vesna. *Inventing Ruritania*：*The Imperialism of the Imagination.*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Goodway，David. *London Chartism，1838-184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Gordon，Charles George. *The Journals of Major-Gen.C.G.Gordon，C.B.，at Khartoum.* London：K.Paul，Trench，1885.

Gore，John，ed. *Creevey.* Rev.ed. London：John Murray，1948.

——，ed. *Creevey's Life and Times*：*A Further Selectio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omas Creevey，Born 1768-Died 1838.* London：John Murray，1934.

Gorham，Deborah. *The Victorian Girl and the Feminine Ideal.* Canberra：Croom Helm，1982.

Greenwood，Grace［Sara Jane Lippincott］. *Queen Victoria*：*Her Girlhood and Womanhood.* New York：John R.Anderson and Henry S.Allen，1883.

Greville，Charles. *The Great World*：*Portraits and Scenes from Greville's Memoirs，1814-1860.* Edited by Louis Kronenberger.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3.

——. *The Greville Memoirs.* Rev.ed. Edited by Roger Fulford. London：Batsford，1963.

——. *The Greville Memoirs.*（second part）：*A Journal of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from 1837 to 1852.* Edited by Henry Reeve.3 vols. London：Longmans，Green，1885.

——. *The Greville Memoirs*：*A Journal of the Reigns of King George Ⅳ and King William Ⅳ*. Edited by Henry Reeve.2 vols. New York：D.Appleton，1896. Reprint，London：Forgotten Books，2013.

——. *The Greville Memoirs*：*A Journal of the Reigns of King George Ⅳ and King William Ⅳ and Queen Victoria.* Edited by Henry Reeve.8 vols. London：Longmans，Green，1888.

Grey，Charles. *The Early Years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Consort.*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67. Reprint，London：Forgotten Books，2013.

Grey，Elizabeth. *Caroline*：*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Fast Young Lady.* 3 vols.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62.

——. *The Noise of Drums and Trumpets*：*W.H.Russell Reports from the Crimea.* London：Longman，1971.

Guedalla，Philip，ed. *The Queen and Mr.Gladstone.* 2 vols.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33.

Hall，Catherine. *White，Male and Middle-Class*：*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2.

Halliday，Stephen. *The Great Stink of London*：*Sir Joseph Bazalgette and the Cleansing of the Victorian Capital.* Stroud，U.K.：Sutton，1999.

Handford，Thomas. *Queen Victoria*：*Her Glorious Life and Illustrious Reign.* Atlanta：Franklin，1901.

Hardie，Frank.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Queen Victoria.* 2nd ed. London：Routledge，1963.

Hardyment，Christina. *Dream Babies*：*Child Care from Locke to Spock.* London：Jonathan Cape，1983.

Harrison，J.F.C. *Early Victorian Britain，1832-51.* London：Fontana，1988.

Hartley，Jenny，e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Hastings，Flora，*Poems by the Lady Flora Hastings.*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842.

Hawksley，Lucinda. *The Mystery of Princess Louise*：*Queen Victoria's Rebellious Daughter.* 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13.

Healey，Edna. *The Queen's House*：*A Social History of Buckingham Palace.* London：Michael Joseph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oyal Collection，1997.

Heffer，Simon. *Power and Plac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King Edward* Ⅶ.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8.

Helsinger，Elizabeth K.，Robin Lauterbach Sheets，and William Veeder，eds. *The Woman Question*：*Defining Voices，1837-1883.* Vol.1，*The Woman Question*：*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37-1883. New York：Garland，1983.

Hensel，Sebastian. *The Mendelssohn Family（1729-1847）from Letters and Journals.* 2nd rev.ed. Translated by Carl Klingemann and an American collaborator.2 vols. London：Sampson Low，1882.

Hewitt，Margaret. *Wives and Mothers in Victorian Industry.*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5.

Hibbert，Christopher. *Disraeli：A Personal History.* London：Harper Perennial，2005.

——. *George* Ⅲ：*A Personal History.* London：Viking，1998.

——. *George* Ⅳ：*Regent and King，1811-1830.* London：Allen Lane，1973.

——. *Queen Victoria：A Personal History.* London：HarperCollins，2000.

——. *Queen Victoria in Her Letters and Journals：A Selection.* Stroud，U.K.：Sutton，1986.

Hilton，*Boyd. A Mad，Bad，and Dangerous People？England，1783-1846.*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Hobhouse，Hermione. *Prince Albert：His Life and Work.* London：Hamish Hamilton，1983.

Hochschild，Adam. *King Leopold's Ghost：A Story of Greed，Terror，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London：Pan，2002.

Holcombe，Lee. *Victorian Ladies at Work*：*Middle-Class Wording Women in England and Wales*，*1850-1914.* Newton Abbot，U.K.：David and Charles，1973.

Hollingshead，John. *Underground London.* London：Groombridge and Sons，1862.

Holmes，Richard. *Queen Victoria.* New York：Boussod，Valadon，1897.

Homans，Margaret. *Royal Representations*：*Queen Victoria and British Culture*，*1837-1876.*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Homans，Margaret，and Adrienne Munich，eds. *Remaking Queen Victor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Hoppen，K.Theodore.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1846-1886.* 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Clarendon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Horn，Pamela. *The Victorian Town Child.* Stroud，U.K.：Sutton，1997.

Hough，Richard，ed. *Advice to a Grand-daughter*：*Letters from Queen Victoria to Princess Victoria of Hesse.* London：Heinemann，1975.

Houghton，Walter E.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House，Madeline，and Graham Storey，eds.，*The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Pilgrim Edition.12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2002.

Housman，Laurence. *The Unexpected Years.* London：Jonathan Cape，1937.

Houston，Gail Turley. *Royalties*：*The Queen and Victorian Writers.*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9.

Howard，Michael. *The Franco-Prussian War*：*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1870-1871.* London：Routledge，2001.

Howell，Philip. *Geographies of Regulation*：*Policing Prostit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the Emp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Hudson，Katherine. *A Royal Conflict*：*Sir John Conroy and the Young Victoria.*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94.

Hughes，Kathryn. *George Eliot*：*The Last Victorian.* London：Fourth Estate，1998.

Hunt，Leigh. *The Old Court Suburb*：*Or，Memorials of Kensington，Regal，Critical and Anecdotical.*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55.

Isba，Anne. *Gladstone and Women.* London：Hambledon Continuum，2006.

Jackman，Sophie，and Hella S.Haasse，eds. *A Stranger in the Hague*：*The Letters of Queen Sophie of the Netherlands to Lady Malet，1842-1877.*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

Jackson，Patrick. *Harcourt and Son*：*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Sir*

William Harcourt，1827-1904. Madison，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4.

Jagow，Kurt，ed. *Letters of the Prince Consort，1831-1861.* Translated by E.T.S.Dugdale. London：John Murray，1938.

Jalland，Patricia. *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Jalland，Patricia，and John Hooper，eds. *Women from Birth to Death：The Female Life Cycle in Britain 1830-1914.* Brighton，U.K.：Harvester，1986.

James，Henry. *Henry James：Selected Letters.* Edited by Leon Edel.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Jenkins，Elizabeth. *Lady Caroline Lamb.* London：Sphere Books Limited，1972.

Jenkins，Roy. *Gladstone.* London：Pan，2002.

——. *Sir Charles Dilke：A Victorian Tragedy.* Rev.ed. London：Collins，1965.

Jerrold，Clare. *The Married Life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G.Bell and Sons，1913.

——. *The Widowhood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Eveleigh Nash，1916.

Jordan，Jane. *Josephine Butler.* London：John Murray，2001.

Juste，Théodore，ed. *Memoirs of Leopold Ⅰ，King of the Belgians.* Translated by Robert Black.2 vols. London：Sampson Low，Son，and Marston，1868.

King，Greg. *The Last Empress：The Life and Times of Alexandra Feodorovna，Tsarina of Russia.* New York：Carol，1994.

——. *Twilight of Splendor：The Court of Queen Victoria During Her Diamond Jubilee Year.* Hoboken，N.J.：John Wiley and Sons，2007.

Kipling，Rudyard. *Rudyard Kipling's Verse：Inclusive Edition，1885-1919.* 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1919. archive.org/stream/rudyard kiplings00compgoog#page/n390/mode/2up.

Kuhn，William M. *Democratic Royalism：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Monarchy，1861-1914.* 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St Martins，1996.

——. *Henry and Mary Ponsonby：Life at the Court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Duckworth，2002.

——.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A Portrait of Benjamin Disraeli.* London：Free Press，2006.

Kuper，Adam. *Incest and Influence：The Private Life of Bourgeois Englan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Lady of the Court，A. *Victoria's Golden Reign：A Record of Sixty Years as Maid，Mother，and Ruler.* London：Richard Edward King，1899.

Lamb，Lady Caroline. *Glenarvon.* London：J.M.Dent，1995.

Lambert，Angela. *Unquiet Souls*：*The Indian Summer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1880-1918.* London：Macmillan，1984.

Lamont-Brown，Raymond. *John Brown*：*Queen Victoria's Highland Servant.* Stroud，U.K.：Sutton，2000.

Langland，Elizabeth. *Nobody's Angels*：*Middle-Class Women and Domestic Ide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Lavalette，Michael，ed. *A Thing of the Past*？：*Child Labour in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9.

Leapman，Michael. *The World for a Shilling*：*How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Shaped a Nation.* London：Review，2002.

Lee，Sidney. *Queen Victoria*：*A Biography.* New York：Macmillan，1903.

Lee，Stephen. *Aspects of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15-1914.* London：Routledge，1994.

Legg，J.Wickham. *A Treatise on Haemophilia，Sometimes Called the Hereditary Haemorrhagic Diathesis.* London：H.K.Lewis，1872.

Leonard，Richard L. *The Great Rivalry*：*Disraeli and Gladstone.* London：I.B.Tauris，2013.

Levine，Philippa. *Prostitution，Race，and Politics*：*Policing*

Venereal Disea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Routledge，2003.

Lieven，Dorothea，Princess. *Correspondence of Princess Lieven and Earl Gre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uy Le Strange.3 vols. London：R.Bentley，1890.

Loeb，Lori Anne. *Consuming Angels*：*Advertising and Victorian Wome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Longford，Elizabeth，ed. *Louisa，Lady in Waiting*：*The Personal Diaries and Albums of Louisa，Lady in Waiting to Queen Victoria and Queen Alexandra.* London：Jonathan Cape，1979.

——. *The Oxford Book of Royal Anecdot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 *Queen Victoria*：*Born to Succeed.* Stroud，U.K.：History Press，2009.

——. *Victoria R.I.*London：Pan Books，1966.

Loudon，Irvine. *Death in Childbirth*：*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Maternal Care and Maternal Mortality，1800-195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Lutyens，Mary，ed. *Lady Lytton's Court Diary 1895-1899.* 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1.

Lyttelton，Sarah Spencer. *Correspondence of Sarah Spencer，Lady Lyttelton，1787-1870.* Edited by the Hon. Mrs.Hugh Wyndham. London：John Murray，1912.

Magnus，Philip. *Gladstone*：*A Biography*. London：John Murray，1954.

——. *King Edward the Seventh.* London：John Murray，1964.

Mallet，Victor，ed. *Life with Queen Victoria*：*Marie Mallet's Letters from Court 1887-1901*. London：John Murray，1868.

Marcus，Steven. *The Other Victorians*：*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

Marlow，Joyce. *The Oak and the Ivy*：*An Intimate Biography of William and Catherine Gladstone.* New York：Doubleday，1977.

Marples，Morris. *Wicked Uncles in Love.* London：Michael Joseph，1972.

Martin，Robert Bernard. *Enter Rumour*：*Four Early Victorian Scandals.* London：Faber and Faber，1962.

Martin，Theodore.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Consort.* 5 vols. London：Smith，Elder，1875-80.

Martineau，Harriet.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Harriet Martineau.* Edited by Deborah Anna Logan.5 vols. 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2007.

——. *Harriet Martineau's Autobiography.* Edited by Maria Weston Chapman. Boston：James R.Osgood，1877.

——. *A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Peace，A.D.1816-1846.* 4 vols. 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77.

Mason，Michael.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Sexua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Matson，John. *Dear Osborne*：*Queen Victoria's Family Life in the Isle of Wight.* London：Hamish Hamilton，1978.

Matthew，H.C.G. *Gladstone*：*1809-189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Matthew，H.C.G.，and K.D.Reynolds. "Victoria（1819-1901）."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online ed.，May 2012.doi：10.1093/ref：odnb/36652.

Maxwell，Herbert. *The Creevey Papers*：*A Selectio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2 vols. London：John Murray，1905.

——.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Fourth Earl of Clarendon，K.G.，G.C.B.* 2 vols. London：Edward Arnold，1913.

Mayhew，Henry.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Selected by Victor Neuburg. London：Penguin，1985.

——. *Mayhew's London，Being Selections from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by Henry Matthew.* Edited by Peter Quennell. London：Pilot Press，［1949］.

McClintock，Mary Howard. *The Queen Thanks Sir Howard*：*The Life of Major-General Sir Howard Elphinstone，V.C.，K.C.B.，C.M.G.，by His Daughter，Mary Howard McClintock* London：John Murray，1945.

McDonald，Lynn，ed. *Florence Nightingale*：*An Introduction to Her*

Life and Family. Vol.1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Waterloo，Ont.：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1. Baltimore：Project MUSE，2012，2013.

——，ed. *Florence Nightingale on Society and Politics，Philosophy，Science，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Vol.5 of *The Collected World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Waterloo，Ont.：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3.

——，ed. *Florence Nightingales European Travels.* Vol.7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Waterloo，Ont.：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4.

McHugh，Paul.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al Reform.* London：Groom Helm，1980.

Miller，Betty. *Elizabeth Barrett to Miss Mitford：The Unpublished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to Mary Russell Mitford.* London：John Murray，1954.

Miller，J. *Prostitutio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ts Cause and Cure.* Edinburgh：Sutherland and Knox，1859.

Mitchell，Leslie George. *Lord Melbourne，1779-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Mitchell，Sally. *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6.

Monypenny，William F.，and George Earle 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 6 vols. London：J.Murray，1910-

20.

More，Hannah，*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2 vols.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40.

Morley，John.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3 vols. New York：Macmillan，1904.

Morris，Jan. *Farewell the Trumpets*：*An Imperial Retreat.* New York：Penguin，1978.

——. *Heaven's Command*：*An Imperial Progress.* London：Faber and Faber，2003.

——. *Pax Britannica*：*The Climax of an Empire.* New York：Penguin，1968.

Morris，R.J.，and Richard Rodger，eds. *The Victorian City*：*A Reader in British Urban History，1820-1914.* London：Longman，1993.

Moyle，Franny. *Constance*：*The Tragic and Scandalous Life of Mrs.Oscar Wilde.* London：John Murray，2012.

Murphy，James H. *Abject Loyalty*：*Nationalism and Monarchy in Ire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1.

Murphy，Paul Thomas. *Shooting Victoria*：*Madness，Mayhem，and the Rebirth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London：Head of Zeus，2013.

Murray，John Fisher. *The Court Doctor Dissected.* London：William Edward Painter，1839.

Nead，Lynda. *Myths of Sexuality*：*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Victorian Britai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

Neale，Erskine. *Life of H.R.H.Edward，Duke of Kent*：*Father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Richard Bentley，1850.

Nelson，Michael. *Queen Victoria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Riviera.* London：I.B.Tauris，2001.

Neville，Peter. *Mussolini.* 2nd ed. London：Routledge，2014.

Nicholson，Shirley. *A Victorian Household.* London：Barrie and Jenkins，1988.

Nightingale，Florence. *Cassandra*：*An Essay.* Introduction by Myra Stark. Old Westbury，N.Y.：Feminist Press，1979.

Normington，Susan. *Lady Caroline Lamb*：*This Infernal Woman.* London：House of Stratus，2002.

Packard，Jerrold M. *Victoria's Daughters.* New York：St. Martin's，1998.

Pakenham，Thomas. *The Boer War.*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9.

Pakula，Hannah. *An Uncommon Woman*：*The Empress Frederick Daughter of Queen Victoria，Wife of the Crown Prince of Prussia，Mother of Kaiser Wilhelm.* London：Phoenix，2006.

Parker，Charles Stuart，ed. *Sir Robert Peel*：*From His Private Papers.* 3 vols. London：John Murray，1899.

Parkhouse，Valerie B. *Memorializing the Anglo-Boer War of 1899-1902.* Kibworth Beauchamp，U.K.：Troubador，2015.

Parry，E.J.，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Lord Aberdeen and Princess Lieven.* 2 vols. Lond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38.

Paterson，Michael. *Voices from Dickens' London.* Cincinnati：David and Charles，2006.

Patton，Mark. *Science，Politics and Business in the Work of Sir John Lubbock：A Man of Universal Mind.* Farnham，U.K.：Ashgate，2007.

Paxman，Jeremy. *The Victorians：Britain Through the Paintings of the Age.* London：BBC Books，2009.

Pearce，Edward，and Deanna Pearce，eds. *The Diaries of Charles Greville.* London：Pimlico，2011.

Pearsall，Ronald. *The Worm in the Bud：The World of Victorian Sexuality.* Stroud，U.K.：Sutton，2003.

Perkin，Haro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2nd ed. London：Routledge，2002.

Picard，Liza. *Victorian London：The Life of a City 1840-1870.*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5.

Pilbeam，Pamela. *Madame Tussaud and the History of Waxworks.* London：Hambledon and London，2003.

Plowden，Alison. *The Young Victoria.* Stroud，U.K.：History Press，1981.

Plunkett，John. *Queen Victoria：First Media Monarc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onsonby，Arthur. *Henry Ponsonby，Queen Victoria's Private Secretary，His Life from His Letters.* London：Macmillan，1943.

——. *Queen Victoria.* Great Lives. London：Duckworth，1933.

Ponsonby，D.A. *The Lost Duchess：The Story of the Prince Consort's Mother.* London：Chapman and Hall，1958.

Ponsonby，Frederick，ed. *Letters of the Empress Frederick.* London：Macmillan，1928.

——. *Sidelights on Queen Victoria.* New York：Sears Publishing，1930.

Ponting，Clive. *The Crimean War.* 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04.

Pope-Hennessy，Una.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London：The Reprint Society，1947.

Porter，Roy. *London：A Social History.* London：Penguin，2000.

Potts，D.M.，and W.T.W.Potts. *Queen Victoria's Gene.* Stroud，U.K.：Sutton，1995.

Pudney，John. *The Smallest Room：A Discreet Survey Through the Ages.* London：Michael Joseph，1954.

Quennell，Peter，ed. *The Private Letters of Princess Lieven to Prince*

Metternich，1820-1826. New York：E.P.Dutton，1938.

Ramm，Agatha，ed. *Beloved and Darling Child：Last Letters Between Queen Victoria and Her Eldest Daughter，1886-1901.* Stroud，U.K.：Sutton，1998.

Ramsden，John. *Don't Mention the War：The British and the Germans Since 1890.* London：Abacus，2007.

Rappaport，Helen. *Magnificent Obsession：Victoria，Albert and the Death That Changed the Monarchy.* London：Windmill Books，2012.

——. *No Place for Ladies：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Arum，2007.

——. *Queen Victoria：A Biographical Companion.* Santa Barbara，Calif.：ABC-CLIO，2003.

Reid，Michaela. *Ask Sir James：The Life of Sir James Reid，Personal Physician to Queen Victoria and Physician-in-Ordinary to Three Monarchs.*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87.

Reynolds，Helen. *A Fashionable History of Underwear.* Oxford：Heinemann Library，2003.

Rhodes James，Robert. *Albert，Prince Consort：A Biography.* London：Hamish Hamilton，1983.

——. *Rosebery.* London：Phoenix，1995.

Richardson，Joanna. *Victoria and Albert：A Study of a Marriage.* London：J.M.Dent and Sons，1977.

Richardson，John. *The Annals of London*：*A Year-by-Year Record of a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London：Cassell，2001.

Richardson，Ruth. *Dickens and the Workhouse*：*Oliver Twist and the London Poo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Ridley，Jane. *Bertie*：*A Life of Edward Ⅶ*. 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12.

Roberts，Andrew. *Salisbury*：*Victorian Titan*. London：Phoenix，2006.

Robinson，Lionel G. *Letters of Dorothea，Princess Lieven，During Her Residence in London，1812-1834*. London：Longmans，Green，1902.

Rowbotham，Judith. *Good Girls Make Good Wives*：*Guidance for Girls in Victorian Fiction*. Oxford：Blackwell，1989.

Rowse，A.L. *Windsor Cast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4.

Rusk，John. *The Beautiful Life and Illustrious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Boston：James H.Earle，1901.

Ruskin，John. *Sesame and Lilies*：*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Manchester in 1864*. London：Smith，Elder，1865.

Sanders，Valerie. *The Tragi-Comedy of Victorian Fatherho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Sandwell，Ruth.W. “Dreaming of the Princess：Love，Subversion，and the Rituals of Empire in British Columbia，1882.” In *Majesty in*

Canada：*Essays on the Role of Royalty*，edited by Colin Coates，44-67. Toronto：Dundurn Group，2006.

Sanger，George. *Seventy Years a Showman.* 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6.

Schama，Simon. *A History of Britain*：*The Fate of Empire*，*1776-2000.* London：Hyperion，2002.

Schlicke，Paul. *Dicken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London：Unwin Hyman，1988.

Scott，Sir Walter. *Journal.* 2 vols. Edinburgh：David Douglas，1828.

Seaman，L.C.B. *Victorian England*：*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1837-1901.* London：Routledge，2002.

Shannon，Richard. *Gladstone*：*Heroic Minister*，*1865-1898.* Vol.2 of *Gladstone.* London：Allen Lane，1999.

Shaw，George Bernard. *Collected Letters.* Edited by Dan H.Laurence. Vol.2，*1898-1910.* London：Reinhardt，1972. capitadiscovery.co.uk/sussex-ac/items/85550.

——. *Mrs.Warren's Profession.* Rockville，Md.：Wildside Press，2009.

Shoemaker，Robert. *Gender in English Society*，*1650-1850*：*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Spheres*？London：Longman，1998.

Shorter，Clement K. *Charlotte Brontë and Her Circle.* New York：Dodd，Mead，1896.

Shorter，Edward. *A History of Women's Bodies.* New York：Basic Books，1982.

Showalter，Elaine. *The Female Malady*：*Women*，*Madness*，*and English Culture*，*1830-1980.* London：Virago，1987.

Siegel，Dina. *The Mazzel Ritual Culture*，*Customs and Crime in the Diamond Trade.* New York：Springer，2009.

Smith，Victoria Ruth. "Constructing Victoria：The Representation of Queen Victoria in England，India，and Canada，1897-1914." Ph.D.diss.，Rutgers University，1998. DAI 1998 59（1）：286-A.DA9823210.Fulltext：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Sotnick，Richard. *The Coburg Conspiracy*：*Royal Plots and Manoeuvres.* London：Ephesus，2008.

Spongberg，Mary. *Feminizing Venereal Disease*：*The Body of the Prostitute in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Discourse.* London：Macmillan，1997.

St.Aubyn，Giles. *Queen Victoria*：*A Portrait.* London：Sceptre，1991.

Steinberg，Jonathan. *Bismark*：*A Lif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Stewart，Jules. *Albert*：*A Life*，London：I.B.Tauris，2012.

Stockmar，Christian Friedrich von. *Memoirs of Baron Stockmar.*［Compiled from His Papers］ by His Son Baron E.Stockmar. Edited by

F.Max Muller. Translated by G［eorgiana］ A［delaide］ M［üller］.2 vols. London：Longmans，Green，1873.

Stoughton，John. *Windsor*：*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astle and the Town.* London：Ward and Co.，1862.

Strachey，Lytton. *Queen Victoria.* New York：Harcourt，Brace，1921.

Strachey，Lytton，and Roger Fulford，eds. *The Greville Memoirs，1814-1860.* 8 vols. London：Macmillan，1938.

Strafford，Alice Byng，ed. *Leaves from the Diary of Henry Greville.* 4 vols. London：Smith，Elder，1883-1904.

Strickland，Agnes. *Queen Victoria from Her Birth to Her Bridal.* 2 vols. London：Henry Colburn，1840.

Stuart，Dorothy Margaret. *Dearest Bess*：*The Life and Times of Lady Elizabeth Foster.* London：Methuen，1955.

——. *The Mother of Victoria*：*A Period Piece.* London：Macmillan，1941.

Sudley，Lord，ed. and trans. *The Lieven-Palmerston Correspondence，1828-1856.* London：John Murray，1943.

Surtees，Virginia. *Charlotte Canning*：*Lady-in-Waiting to Queen Victoria and Wife of the First Viceroy of India 1817-1861.* London：John Murray，1975.

Sweet，Matthew. *Inventing the Victorians.* London：Faber and

Faber，2001.

Tait，Lawson. *Diseases of Women.* 2nd ed. New York：W.Wood，1879.

Tappan，Eva March. *In the Days of Queen Victoria.* Boston：Lee and Shepard，1903.

Taylor，A.J.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Clarendon Press，1954.

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 “George the Fourth.” In *The Four Georges.* Vol.27 of *The Work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98.

Thompson，Dorothy. *Queen Victoria：The Woman，the Monarchy，and the People.* New York：Pantheon，1990.

Thompson，E.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Vintage，1966.

Thompson，F.M.L.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1830-1900.* London：Fontana，1988.

Tisdall，E.E.P. *Queen Victoria’s John Brown：The Life Story of the Most Remarkable Royal Servant in British History.* London：Stanley Paul，1938.

Tisdall，E.E.P. *Queen Victoria’s Private Life，1837-1901.* London：Jarrolds，1961.

Tocqueville，Alexis de. *Recollections：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Edited by J.P.Mayer and A.P.Kerr. Translated by George Lawrence. New York：Doubleday，1970.

Tomalin，Claire. *Charles Dickens*：*A Life.* London：Viking，2011.

——. *Thomas Hardy*：*The Time-Torn Man.* London：Viking，2006.

Tosh，John. *A Man's Place*：*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Tuer，Andrew White，and Charles E.Fagan. *The First Year of a Silken Reign.*London：Field and Tuer，1887.

Uglow，Jennifer S. *Elizabeth Gaskell*：*A Habit of Stories.* London：Faber and Faber，1994.

Ulrich，Melanie Renee. "Victoria's Feminist Legacy：How Nineteenth-Century Women Imagined the Queen." Ph.D.diss.，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2005. hdl.handle.net/2152/1745. DAI 2006 66（8）：2942-A. DA3184538. Fulltext：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Vallone，Lynne. *Becoming Victoria.*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 *Disciplines of Virtue*：*Girls'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Vanden Bossche，Chris R. "Moving Out：Adolescence." In *A Companion to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dited by Herbert F.Tucker. Oxford：Blackwell，1999.

Van der Kiste，John. *Queen Victoria's Children.* Stroud，U.K.：

History Press，2013.

——. *Sons，Servants & Statesmen：The Men in Queen Victoria's Life.* Stroud，U.K.：Sutton，2006.

Villiers，George. *A Vanished Victorian，Being the Life of George Villiers，Fourth Earl of Clarendon，1800-1870.*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938.

Vincent，John，ed. *Disraeli，Derb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Journals and Memoirs of Edward Henry，Lord Stanley［Derby］，1849-1969.* Brighton，U.K.：Harvester Press，1978.

Vovk，Justin C. *Imperial Requiem：Four Royal Women and the Fall of the Age of Empires.* Bloomington，Ind.：iUniverse Star，2014.

Wake，Jehanne. *Princess Louise：Queen Victoria's Unconventional Daughter.* London：Collins，1988.

Walkowitz，Judith R.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Walkowitz，Judith.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Women，Class，and the Stat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Walsh，Walter. *The Religious Life and Influence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Swann Sonnenschein，1902.

Ward，Yvonne M. *Censoring Queen Victoria：How Two Gentlemen Edited a Queen and Created an Icon.* London：Oneworld，2014.

——. “Editing Queen Victoria：How Men of Letters Constructed the Young Queen.” Ph.D.diss.，La Trobe University，2004. arrow.latrobe.edu.au：8080/vital/access/manager/Repository/latrobe：35628？exact=creator%3A%22Ward%2C+Yvonne.%22.

——. “1848：Queen Victoria and the Cabinet D’Horreurs.” In *1848：The Year the World Turned*？Edited by Kay Boardman and Christine Kinealy，173-88. Newcastle upon Tyne，U.K.：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7.

Warner，Marina. *Queen Victoria’s Sketchbook.* London：Macmillan，1979.

Weinreb，Ben，and Christopher Hibbert，eds. *The London Encyclopaedia.* Rev.ed. London：PaperMac，1993.

Weintraub，Stanley. *Disraeli：A Biography.* New York：Dutton，1993.

——. *Uncrowned King：The Life of Prince Albert.* New York：Free Press，1997.

——. *Victoria.* London：John Murray，1996.

Wells，H.G.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Discoveries and Conclusions of a Very Ordinary Brain（Since 1866）*. London：V.Gollancz，1934.

White，Jerry. *Lond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uman Awful Wonder of God.”* London：Jonathan Cape，2007.

Whitehead，Cameron，“The Bulgarian Horrors：Cultu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Great Eastern Crisis，1876-1878.” PhD dis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4. doi：10.14288/1.0167317.

Wilde，Oscar. *Collected Poems of Oscar Wilde.* Edited by Anne Varty Ware. Hertfordshire，U.K.：Wordsworth Editions，2000.

Williams，Kate. *Becoming Queen.* London：Arrow，2009.

Williams，Richard. *The Contentious Crown*：*Public Discussion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in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Aldershot，U.K.：Ashgate，1997.

Wilson，A.N. *Eminent Victorians.* London：BBC Books，1989.

——. *The Victorians.* New York：W.W.Norton，2002.

Wise，Dorothy，ed. *Diary of William Tayler，Footman，1837.* London：The St.Marylebone Society，1987.

Wise，Sarah. *The Blackest Streets*：*The Life and Death of a Victorian Slum.* London：Bodley Head，2008.

Wohl，Anthony. *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J.M.Dent，1983.

——，ed. *The Victorian Family*：*Structure and Stresses.* London：Croom Helm，1978.

Wolffe，John. *Great Deaths*：*Grieving，Religion，and Nationhood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Britai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rism.talis.com/sussex-ac/items/671687.

Woodham-Smith，Cecil. *The Great Hunger*：*Ireland 1845-1849.* London：Hamish Hamilton，1962.

——. *Queen Victoria*：*Her Life and Times.* London：Cardinal，1975.

Woods，Robert. *The Demography of Victorian England and Wal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Woodward，Ernest. *The Age of Reform*，*1815-1870.* 2nd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

Worsley，Lucy. *Courtier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Court.* London：Faber and Faber，2010.

Wright，Marcus Joseph. *Sketch of Edward Augustus*，*Duke of Kent.* Richmond，Va.：William E.Jones，printer，1889. hdl.loc.gov/loc.gdc/scd0001.00206909626.

Wright，Patricia. *The Strange History of Buckingham Palace*：*Patterns of People.*Stroud，U.K.：Wrens Park，1999.

Zeepvat，Charlotte. *Prince Leopold*：*The Untold Story of Queen Victoria's Youngest Son.* Stroud，U.K.：Sutton，1999.

Zetland，Lawrence John Lumley Dundas，Marquis of. *Lord Cromer*：*Being the Authorized Life of Evelyn Baring*，*First Earl of Cromer.*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32.

Ziegler，Philip. *King William* Ⅳ. London：Collins，1971.

——. *Melbourne*：*A Biography of William Lamb*，*2nd Viscount Melbourne.* London：Collins，1976.

索引

Abercromby，James，53

Aberdeen，Lord

Crimean War and，261，262，269

on Melbourne and Victoria，96

as prime minister，261，262，269，287，428

Victoria and，252，261，262，270，287，428

Acton，William，148

Adelaide of Saxe-Meiningen，Queen Consort（aunt），10，18，34，40，60，242

Afghanistan，392，395，456，467，468，490

Africa，14，465. *See also* Anglo-Boer War；South Africa

Ashanti mission，458

British arrive in，469

civilian suffering，the Herero and，478-79
colonization of，468，469-71
Diamond Jubilee and，467
European control of（1870 to 1914），470
Gladstone and expansion into，393，416
gold in，458，469，470，474
Gordon in，412，413
Africa（*cont'd*）：
Leopold Ⅱ and human rights abuses，470-71
Ottoman Empire in，165-66，260
Sudan crisis and，412-14
women harmed，"little wars" and，490
Zulu massacre，392
Agricultural Holdings Act，381
Ahmed，Rafiuddin，456，457
Albemarle，Lord，28
Albert Edward（Bertie），Prince of Wales. *See* Edward Ⅶ，King

Albert Hall，255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Prince Consort， xliii， xliv
achievements，208-9，243-52，255

as acting monarch，171-73，179，180-83，186，193-96，207-10，241，242，253-54，270，273

aging of，255-56

anger of，189，190

Anson（private secretary）and，106n，133-34，172，180，182，186，242

anti-Semitism of，124

appearance of，5，44，115，116，135，138，144，146，245，273

assassination attempts and，152-54

ball of 1842，203

at Balmoral Castle，257

Bill for a regency in event of Victoria’s death，165

biographer for， xliii，199，380，397

birth，5

birth of first daughter，166-67

British politics and，133，135，197-201

burial place（Frogmore），325，334

canonizing of，by Victoria，326

cause of death as Crohn’s disease，318

as champion of puritanism，179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116，122，124，132，134，158，179，182-83，185-87，208，209，251，291，306

childhood，124-25

Christmas 1841，194-95

correspondence with Victoria，66，141，132-34，206

Crimean War and，261，269-71

daughter Beatrice and，282

daughter Victoria and，285-86，290-91

death，309-17，317n

deaths of friends，late 1840s，242

depression of，233，242，300，310-11

desire to remove Lehzen and Melbourne，163，173，176-77，184，185-87

difficulties of being Victoria’s husband，158-59，274

as dismissive of Victoria’s feelings，185，295

engagement to Victoria，120-24

equerries，231，354n

fatalism of，310-11

fatherhood and，169-70，220-22

father’s death，205-6

faults of，117，128

feeling of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to Victoria，180，187

fidelity of，150，308

first meeting with Victoria，43-44

first wedding anniversary，173

foreign policy，235（*see also specific issues*）

German heritage of，130-31

German unification and，346，348

gifts to Victoria，170，173，188

Gladstone and，343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and，243-45，247-52

health，44，117，209，249，256，299-301

hostility toward，205，269-71

ideas and opinions，124，126，160-61，164

influence and power，92，134-35，136，140，150-51，152，158-66

issues of concern to，193-94，204-5

Italy tour，117

lecturing Victoria on motherhood，295-96

Lehzen and，163

Lehzen’s removal by，189-92

letters to contemporaries，152，160，166，170，172，199-200，242，255

loneliness of，310

love for Victoria，206

loyalty of，118

made Prince Consort，274

marble cast of face and hands，327，487

marital intimacy，146，148，149

marital strife，xliii，135，189-91，256-57

marriage *of*，145，150-51，158-59，164，169，170，205，206，256-57，270-74，310

marriage of，as unconventional，123-24，205

matter of precedence，132，136，205

Melbourne and，132，133，136，165，173，184

Melbourne’s guidelines for，135

memorials to，xli，436

memo to Victoria giving advice on grief，298-99

mother of，125-26

museum complex created by，255 myths about，xlv

Nightingale’s view of，276

objects buried with Victoria and，487

official roles，165，193，194，205，208

Osborne House and，215-16

palace administration and，176-79

Palmerston and，234-36，256

Peel and，179-83，184，193，197-200，207，208，210，241-42

plans for his children，207-8，288

popularity of，164

portrait commissioned，170

preference for male company，148-50，272

press and widely told stories about，270-71

Prince Consort，named，205

as Privy Counsellor，165

protocol established by，179，186

quest for power，159-65，167，171-73，180-83，271-74，287-88

religion of，as issue，131-32

reservations about marriage，123

role as private secretary，193

role of the monarchy and，288

routine instituted by，177

rumors about paternity of，125-26

senior ladies-in-waiting replaced by，180

social reforms advocated by，233，240-41

social unrest of 1848 and，229，232-33

son Bertie and，305-9

status and income，132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Prince Consort（*cont'd*）：

Stockmar and，117，123，224，232，233，242，300，308，310

strengths of，158

summer residence，the Rosenau，116，315

titles given to，159，207，274

Trent affair and final memo，311-13

trip to Britain（1939），111，115-20

trip to Coburg（1860），300

veto of official appointments on moral grounds，183

Victoria and，as joint force，211

Victoria's dependence on，300-301

Victoria's desire to reach after death，355，393

on Victoria's learning of line of succession，26

Victoria’s passion for，116，253-54

Victoria’s pregnancies and，165

Victoria’s preservation of his possessions，325

as Victoria’s sole confidant，184，187

wedding of，144

women（and Victoria）as intellectually inferior，180，187，271，377

women，views on，294-95

working class sympathies，239-40

workload and effects of stress on，209，233，234，242，249，255-56，279，299-300，309-10

Albert Victor（Eddy），Prince（grandson），447

Alexander Ⅱ of Russia，105，382

Alexander of Württemberg，Prince（cousin），29

Alexandra（Alix）of Denmark，Princess（daughter-in-law），309，330-31，347，364，464，480，482

death of son Eddy，447

Schleswig-Holstein conflict and，331-32

son born，332

Alexandra Feodorovna（Alix）of Hesse，Empress of Russia（granddaughter）

death in Russian Revolution，447

hemophilia passed to son，384

marriage to Czar Nicholas，446-47

Rasputin and，355，384

Alfonso ⅩⅢ of Spain，King，419

Alfred（Affie），Prince（son），207，208，349，437，472

Albert’s death and，317n，319

alcohol and scandal，365

assassination attempt，345-46

childhood，473

costs of monarchy and，345n

death of，473

death of son Alfred，472-73

favored status of，296

loathing of John Brown，355

Victoria skips his wedding，366

Ali，Hourmet，455

Alice，Princess（daughter），207，293，296，472

accident in Scotland（1863），333-34

Albert’s death and，313，314，316，318，319

alliance with Bertie，296，316

birth of a daughter，330

breastfeeding by，219-20

Christmas 1853，261-62

daughter’s marriage to Czar Nicholas，446

daughter’s wedding to Louis of Battenberg，417n

death of son Fritz，383

diphtheria and death，383，418

Franco-Prussian War and，362

marriage to Louis of Hesse-Darmstadt，313，329-30，347，383

as nurse in the Austro-Prussian war of 1866，347

relationship with Victoria，335，347，365

request of Tennyson，323

suitors，294

wedding of，329-30

workload of，383

Allen，James McGrigor，42-43

Amberley，Lady，397

American Civil War，311-13

Anderson，Elizabeth Garrett，396-97

Anglo-Boer War（Second，1899），473-77

British atrocities，478，490

casualties，477

civilian suffering in，478-79

concentration camps，478，480，490

death of Prince Christian Victor，477

press coverage of，479

siege of Ladysmith，475，476

Victoria’s activism and，475-77

Anne，Queen，61，129

Anson，George，106n，133-34，162，172，180，182，186，194，242，310

Peel-Anson memo on ladies in Victoria’s household and Albert’s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180

Anthony，Susan B.，489

Anti-Corn Law League，200

Anti-Slavery Society，164

Antoine，Duke of Montpensier，227

Arbuthnot，Charles，92

Arbuthnot，Harriet，28

Argyll，Duke of，320，428

aristocracy

Albert’s dislike of，240，288

contempt for Albert，251

Corn Laws and，199

criticism of，204

hemophilia and，256

life of working class vs.，203-4

sexual indulgence and，87

Tory Party and，381

Arnold，Matthew，131

Arnold，Thomas，131

Arthur，Prince（son），259，437，472

costs of monarchy and，345n

death of his father and，317n，319-20

the Munshi and，453

relationship with Victoria，293，296，325，365

Victoria’s death and，481

Ashdown，Dulcie，42

Ashley，Lord，183

Augusta of Prussia，Queen，324

Augusta of Reuss-Ebersdorf（maternal grandmother），29

Augustus of Saxe-Coburg and Gotha（cousin），226，228

Australia，14，297，467，479

declared a federation，480

Diamond Jubilee and，465

as penal colony，155，241

shooting of Prince Alfred in，345

Victoria’s death and，488

Austria

Austro-Italian war of 1859，286-87

feud with Sardinia，235

Haynau’s brutality in，237

Italy and，235，236

loss of power，372

Seven Weeks’War，346

unrest of 1848，241

Austro-Italian war of 1859，286-87

Baden-Powell，Lord Robert Stephenson Smyth，479

Bagehot，Walter，200，246，279，293，427-28

Baldwin，Stanley，381

Balfour，Arthur，474，475

Ballot Act of 1872，431

Balmoral Castle，Scotland，217-18，261，267，277，338，353

Albert and Victoria，anonymity and，289-90

Brown and，290，353（*see also* Brown，John）

expedition to Ben Muich Dhui，290

halcyon days at，290

manager，Alexander Profeit，359-60

Nightingale visits，275

Victoria’s happiness at，257，289

Baring，Maurice，484

Barnum，P.T.，212-14

Bath，Bishop of，79，42

Battle of Waterloo，14

Bauer，Caroline，31-32

Beatrice，Princess（daughter），351，465，472

Alberts death and，317n，319

birth of，281

as carrier of hemophilia，419

children of，419，437

as comfort for Victoria，317-18，331

death of， xliii

death of husband，458-59

dispute over her marriage，417-18

favored status of，296，298，365

marriage to Henry of Battenberg（Liko），417-19，437，458-59

naming of，281-82

relationship with Victoria，365-66

Victoria’s death and，481，482

Victoria’s diaries and letters destroyed by， xlii-xliii，109，459

as Victoria’s executor， xlii-xliii

wedding of，418-19

Beaufort，Duke of，183

Bedchamber Crisis，102-6，106n，180

Bedford，Duchess of，180

Belgium，234，469，471. *See also* Leopold of Saxe-Coburg-Saalfeld，Prince

Benson，Arthur， xliii，209-10，229，464-65，484，485

Bentinck，Lord George，198-99

Berkeley，Grantley，53

Bertie. See Edward Ⅶ，King

Biddulph，Sir Thomas，353，370

Bigge，Arthur（Victoria’s secretary），457，458，474

Bismarck，Herbert von，442

Bismarck，Otto von，346，361-62，379-80，430，437，438，440

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375

on Victoria，411

Victoria and，441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The（Mearns），420

Black，Jack，280

Blake，Robert，377，378

Bloomer，Amelia，489

Bloomfield，Georgiana，187

Blücher，Countess，334，352

Blunt，Wilfred Scawen，351

Boehm，Joseph Edgar，347，357，458

Bolitho，Hector，126

Bonn University，149

Bradford，Lady，379

Branden，Lady，88，89n

Bristol Mercury，251

Britain. *See also* aristocracy；child labor；women；working class；*specific topics*

anti-Catholic sentiment in，131-32

anti-French sentiment in，131

anti-German sentiment in，130-31，205，269

anti-Irish bias，201-2，239

bread riots，15

brothels for the military，398

changes in，Victoria’s reign and，15，293，466（*see also specific*

laws）

child labor，14-15，91-92，202-3，381-82

Christmas tree tradition，194

coal mining，impact of，40-41

coronation festivities，81-82

death of John Brown and Victoria’s grief，response to，406

as democracy，429

Diamond Jubilee and，462-65，467，468

drug addiction in，13，13n

education in，15，26-27，210，431

events of 1837，69

expense of the monarchy and republicanism，344-45

fairs and freak shows，81

Glorious Revolution，129，131

Golden Jubilee，433-37

greatness of，Victorian Age，xlvi

homoeroticism in，149

homosexuality in，378

hostility toward Albert，205

as industrialized economy，14

Irish potato famine and，200-201，238-39

lace and silk industry，141-42，203

laissez-faire and，201-2

as leading naval power，14

life expectancy in，464

mourning for Albert，318-19，325

Peel’s reforms and innovations，200

population shift to cities，15，91

poverty in，xlvi，13，15，91，92，204-5，363-64，381（*see also* poverty）

problems plaguing the country，200，204

Reform Bills，39-40，46-47，68，341

reign of William and Mary，128-29

revolution avoided in，241

“rotten boroughs，”39，40

slavery and， xlvi，9，38，40，69，89，90，102

social unrest of 1848，225-41

soldiers of，259

suffrage movement，396-97

top hats，51

Tory vs. Whig，38-39

Turkish atrocities and outcry，373-74

unrest and rioting，40，341

Victoria and modernizing of，203

Victoria’s death and，484-86，488

Victoria s eighteenth birthday，50-51

Victoria’s wedding，141-44

Britain（*cont’d*）：

voting rights，39，40，341，381，416，429，466，467

widows in Victorian England，337-38

British Association，194

British Empire， xlvi.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in Africa，458

coal and iron production，14

cost of，467-68

cost of，in lives，392，490

death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467-68

Diamond Jubilee and，465

Disraeli and，380

Egypt and，412

expansion of，14，392，467-68

Gladstone and imperialism，392，416-17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and，245

India and，282

manufacturing，14

on maps，in red，14

Pax Britannica，14

slavery abolished，40

Suez Canal，380，412

Victoria’s near-mythic status in，463-64

Victoria’s death and，488

Zulu massacre，392

British Library，Peel-Anson memo at，180

British Medical Journal，409

British monarchy， xlvi

the British as royalist，83

constitutional role of the queen，427-29，431-32

coronations，timing of，74

costs and taxpayer resentment，344-45

death of George Ⅲ，19，21

death of George Ⅳ，35

death of Princess Charlotte and，5，8，9

government in power and，135

Hanoverian dynasty，8-9，16，160

hemophilia and，256，409n

household attendants and party in power，104

husbands of queens，public reaction to，128

illegitimate children and，8，35，40，63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issues，198，199

line of succession，Victoria and，xl，3，5，8-9，10，13，21，25，35，40

male preference primogeniture，6

name change from Saxe-Coburg-Gotha to Windsor，443

porphyria and，472

Privy Council and，61

proof of royal birth，4

public’s need for ceremony and pageantry and，368

role in British politics，395-96

role of，under Albert，288

Royal Marriages Act of 1772，8

Settlement Act of 1701，13

ties to German royals，5，9，16，131

unpopularity of King George III’s sons，7，18，32-33

Victoria and Albert and new image for，150

Victoria as longest reigning monarch，465

Victoria as youngest monarch，61

Victoria’s coronation，73-83

Victoria’s image and protection from revolutions，223-24

Victoria’s seclusion and damage to，367

William Ⅳ as oldest person crowned，39

British Nurses’Association，437

British Parliament， xlvi，39，40，46-47，53. *See also specific parties*；*specific prime ministers*

Aberdeen as prime minister，261，262，269，287，428

Agricultural Holdings Act，381

Albert’s role as key adviser and，270

Albert’s support for Peels Corn Laws repeal，197-98

Ballot Act of 1872，431

basic rights issues of，281

building new Houses of Parliament，194，208

changes during Victoria’s lifetime，467

Coal Mines Act of 1842，202

constitutional role of the queen and，427-29，431-32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398，403

Corn Laws，15，183，197-201

Corrupt Practices Act，431

Cruelty to Animals Act，382

Derby as prime minister，287，341

Disraeli as prime minister，342-43，376，389

Education Act of 1870，431

Factory Acts，15，202-3，381-82

First Irish Land Act，363

Gladstone as prime minister，343-44，376，389-92，422-26，443-44

Gladstone’s last speech，444

Grey as prime minister，89-90

Home Rule issue and，423-26，426n，428，446

House of Commons，growth of influence，395

Infant Custody Act，466-67

Irish Church Act，344

Irish Poor Law Extension Act，201

Irish Question，423，444

Local Government Act，467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 of 1870 and 1882，466

Melbourne as prime minister，52-53，61-62，64-66，85，89-90，92，102，105-6，134，136，138，139，171，180

Palmerston as prime minister，269，287，327

Peel as prime minister，102-6，179-83，197-201

Public Health Act，381

Public Worship Regulation Act，382

Reform Bills，39-40，46-47，68，183，341，381，416

Removal of Aliens Act，231

Rosebery as prime minister，428，446

Russell as prime minister，211，231，236，339，340

Salisbury as prime minister，419-21，427，443，456

Second Irish Land Act，423

Second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of 1882，396

British Parliament（*cont’d*）：

sewage and smell，Houses of Parliament，280-81
Strangers’Gallery，198
suspension of habeas corpus in Ireland by，238
Turkish atrocities and，372-75
Victoria opens，339，340-41，380，394-95
Victoria’s first appearance，65-66
Victoria’s influence，416
Victoria’s role，395-96
women prohibited in the gallery，63，85
women’s suffrage debated，396
Brontë，Charlotte，246-47
Brontë，Emily，129
Brough，Mary Ann，220，220n
Brown，Dr.（royal doctor），315
Brown，Jessie McHardy，404
Brown，John，xli，xliv，290，383，393，453
alcoholism of，354

appearance，352

assassination attempt and saving Victoria’s life，368

death of，404

diaries of，burned，407

edited out of Victoria’s diaries，351，358，487

first mention in Victoria’s diary，218

gossip about，353，356，357-58

in Landseer portrait，355-56

love for Victoria，370，405-6，408

loyalty of，340，370，404

mother’s wedding ring and Victoria，358，487

objects buried with Victoria and，487

as “the Queen’s Stallion，” 352，357

Reid’s account of flirting，359

relationship with Victoria，351-61

sixth sense of，355

Victoria Devoted Service Medal，368

Victoria’s card to（January 1，1877），370

Victoria’s carriage accident（1863），333-34

Victoria’s children’s dislike of，354-55

Victoria’s gifts and grants to，355

Victoria’s love for，360-61，369-70，407-8

Victoria’s memoir of，406-7

Victoria’s mourning and memorials for，404-8

Victoria’s recovery from grief and，361

Victoria’s seeking advice about relationship，356-57

Browning，Elizabeth Barrett，18，138，155-56

Browning，Robert，43

Bruce，Lady Augusta，320

Bruce，General Robert，317n

Brunswick，Charles，Duke of，43

Buckingham Palace，69，177，243，245，435，465

Albert and remodeling，208，224

Albert’s administration of，176-79

archaic and inefficient structure，178

ball of 1842，203

disrepair of，178

health hazards in，280

palace intruder（Boy Jones），174-76

Queen’s Picture Gallery，212-13

rats in，280

servants and scams，178-79

Tom Thumb and other curiosities at，212-14

Victoria at，69-70，74，80，139，207，301

Victoria avoids after Albert’s death，338

Victoria returns to（1866），340

winter at，lack of heat，197

Buksh，Mohammed，448，454

Bulgaria

independence of，379

rebellion in（1876），373

Russian support，378

Treaty of Berlin and，379

Turkish atrocities and，372-75，461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Gladstone），374

Bulteel，Mary，354n

Butler，Josephine，399，420n，489

Byron，George Gordon，Lord，86-87，342

Cadiz，Duke of，227

Cairns，Lord，353

Cambridge，Prince Adolphus，Duke of（uncle），9，10，77，242

Cambridge，Augusta，Duchess of（aunt），10，77

Cambridge，Duchess of，337，434

Cambridge University，27，130，149

Albert as chancellor，208

Bertie at，309，311，316

Canning，Lord，284

Canterbury，Archbishop of christening of Victoria，16，17

coronation of Victoria， xl，78

notifying Victoria of King George Ⅳ's death，59，60

Carlyle，Thomas，73，131，142-43，251，262，366，374

Albert and，251

Caroline of Brunswick，Princess，8

Carroll，Lewis，129，371

Casement，Sir Roger，471

Cassandra（Nightingale），252-53

Cavendish，Lady，384-85

Cecil，David，36，185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for the Great Exhibition，250

Chamberlain，Joseph，391

Chamberlain，Neville，469

Champion and Weekly Herald，The，83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The"（Tennyson），267-68

Charlemont，Lady，63

Charles（Carl），3rd Prince of Leiningen（half-brother），6，9，

24，39，49，51，281

Charles Ⅱ，King， xlvii

Charles Ⅹ of France，King，39

Charlotte，Princess（aunt），5，6-7，8，9，10，31，157，318

Charlotte，Queen，6，7

Chartist movement，68-69，229-34

Chenery，Thomas，264

Chesterton，G.K.，491

Childers，Hugh，422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Byron），86

child labor，14-15，91-92，202-3

chimney sweeping and child abuse，15

Coal Mines Act of 1842，202

Factory Act，381-82

Factory Act of 1844，202-3

trappers，202

China

"Chinese Gordon，" 412

Opium Wars，467

Second Opium War，283

Taiping Rebellion，412，467

Christian Ⅸ of Denmark，King，331

Christian of Schleswig-Holstein，Prince（son-in-law），347，472

Christian Victor，Prince（grandson），477

Churchill，Lady Jane，353，480

Churchill，Susan，89

Churchill，Winston，xlii，381，435，468-69，479

Church of England，xlvi

Public Worship Regulation Act，382

Victoria as head，344

Victoria's irreverence for，19

Church of Ireland，423，429，431

Church Penitentiary Association for the Reclamation of Fallen Women，401

Clarendon，Lady，149

Claremont house，Surrey，30，31，49，53，66，182，188，271
as residence for exiled French king，228，242
Clarendon，Earl of，285，296，313，318，324，325，327，332
Clark，Sir Charles，99
Clark，Dr.James（royal doctor），189，190，276，289
Albert’s death and，313，317
death of，352
as incompetent，98，137
scandal of Lady Flora and，97-100，101，111
treatment of infant Vicky，189
Victoria’s childhood fever and，38
Victoria’s pregnancies and，281
Clementine of Orleans，Princess，226，228
Clifden，Nellie，305-6，308，309，364-65
Clive，Archer，ｘｘｘix
Clough，Arthur Hugh，262
Coal Mines Act of 1842，202

coal mining

child labor and，202

Hartley mining disaster，336-37

impact of，40-41

Coburg，Germany，27，126，132，139，160，177，453

Albert visits（1860），300

Prince Alfred in，472

Coit，Stanton，480

Cole，Henry，247

Coleridge，Samuel Taylor，18，131

Collins，Elizabeth，402

Colombo（ship），262-64

Communist Manifesto，The（Marx and Engels），223

Conroy，Edward，44-45

Conroy，John，19，28，33-34

ambitions of，36-38，39，40，41，45，50，64，193

archives at Balliol College，44

death of，277
demands made on Victoria as new queen，64
Duchess of Kent and，33-34，40，41，45，49，64，70-71
farming and，71-72
revenge schemes by，64-65
scandal of Lady Flora Hastings and，97-102
sense of entitlement，44-45，49
Victoria and，36-37，50，51-53，70-72，74，95
Victoria dismisses，64
William Ⅳ and，41-42，50
Conroy，Victoire，33-34
Conservative Party，198，342，343，376，381，419，425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398，403
Conyngham，Lord，59，60
Cooper，James Fenimore，176
Corelli，Marie，484
Corn Laws，15，183，197-201

Corrupt Practices Act，431

Corry，Montagu，377，378，393

Corsair，The，110

cousins，marrying，129-30

Cowper，Lady，72，83

Creevey，Thomas，41，62，63，64，85

Crimean War，18，201，258-78，411，479

allied armies，268

Battle of Alma，262-63，267

Battle of Balaclava，267-68

Battle of Inkerman，268

British commander for，267

“British Hotel，” 274n

British naval base at Sevastopol，260

British nurses and，265，274n

casualties，262-64，265，267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267-68

ending of，278

Florence Nightingale and，264，265，274-76，278

lack of basic preparation for，262-64

motivation for，259-61

Scots Fusilier Guards，259

Sebastopol，268，278

starting date，262

Victoria’s involvement and，258-59，261-62，265-67，268-69，274-75

wives accompanying husbands to，259

Croft，Richard，7

Croker，John Wilson，62

“Croquet at Windsor”（Turgenev），372

Cruelty to Animals Act，382

Cubitt，Thomas，215

Cumberland，Prince Ernest，Duke of（uncle），8，39，40，45，61，154，205

becomes king of Hanover，61，160

Curzon，Lord，488

Daily Advertiser，118

Daily News，373

Dalhousie，Lord，282

Darwin，Charles，129-30，161，374，464

Darwin，George，129，130

Darwin-Wedgwood family，129

Das Kapital（Marx），13

Davidson，Randall，407

Davison，Emily，489

Davys，George（tutor），23-24

Death in the Victorian Family（Jalland），337

Denmark

  Princess Alix and Bertie，309

  Schleswig-Holstein conflict，309，331-33

Derby，Lord，287，327，341，353

de Rueck，Jenny，478-79

de Staël，Madame，131

Diamond Jubilee，460，462-65，467，468

Princess Louise’s fancy dress ball at Devonshire House，472

Twain writing about，465，466

Dias，Bartolomeu，469

Dickens，Charles，xl，13，18，27，69，81，92，129，131，176，363-64

criticism of the Great Exhibition，250-51

death of，464

on the Great Stink，281

on Victoria’s coronation，75，76，77，81-82

Victoria’s wedding and，143

Dilke，Sir Charles，391，413，422，429，430

Disraeli，Benjamin，78，92，198，327，330，375-76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342，377-78

charm of，376-77

conversion to Anglicanism，342

death of，393-94

fiction of，375，377

foreign policy and，375

Gladstone and，374，381，394

Gladstone replaces，343，389，393

Gladstone’s Midlothian campaign and，392

Judaism of，375-76，380

laws passed under，381-82

lunch with Victoria at Hughenden Manor，379

Martin on，380

party philosophy of，380-81

as prime minister，342-43，376，389

Russian invasion or Turkey（1877）and，378-79

Suez Canal purchase，380

Transvaal and，470

Treaty of Berlin and，379-80，392

Turkish atrocities and，372-75

on Victoria，1979，371

Victoria and，342-43，367，373，377，379，380，381，389-90，393

Victoria elevates to Earl of Beaconsfield，393

Victoria’s power and，429

women as intellectual equals，377

Dixie，Lady Florence，403-4，489

Doyle，Sir Arthur Conan，474，479

Dublin Exhibition，194

Duchy of Cornwall，177

Durham，Bishop of，78

Eastern Question，165-66，170，270，373，374，379，412. *See also* Ottoman Empire

East India Company，284

Eden，Emily，376

Education Act of 1870，431

Edward Ⅶ “Bertie，” King（son），109，220，220n，221，243，417n

affair with Nellie Clifden，305-6，308，309，364-65

Albert’s death and，316，319-20

Albert’s plan for，207-8

alliance with sister Alice，296，316

assassination attempts，477

birth of，187-88

blackmail rumors，Victoria’s letters and，359-60

at Cambridge，309，311，316

Canada and America trip（1860），307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222，，307

death of son Eddy，447，472

as disappointment to his parents，305-7，308-9

dismissal of Munshi and，460

education of，222-23，256，306-7

father’s visit at Cambridge and resulting illness，309

Gladstone’s funeral and，461

India trip，382

loathing of John Brown，355，358，407

marriage arranged for，309

marriage to Alexandra of Denmark，330-31，347

Middle East trip（1862），328

military camp of Curragh，305，307

Mordaunt scandal，364-65

Munshi and，452

near-fatal illness（1871）and Victoria’s reaction，367-68

popularity of，307，367

profligate behavior，344-45，364，365，471

public’s need for ceremony and pageantry and，368

rebellious behavior of，305-6，308

Sandringham House residence，364

scandal about cheating，472

Schleswig-Holstein conflict and，332

son born，332

Stead’s comments on，437

support for Beatrice’s marriage to Henry of Battenberg，418

Victoria blames for Albert’s illness and death，311，327

Victoria’s aversion to，292-93，296，298，328

Victoria’s burial and，488

Victoria’s death and，480-83

Victoria’s declining health and，477-78

Victoria’s letters edited to avoid embarrassing，229

Victoria’s opinion of fitness to rule，397

Victoria’s relationship with after his marriage，347，364，437

wedding of，330-31

worries about，256

Egremont，Lord，87

Egypt，166，260，408，467

British occupation of，412，417

Sudan and，412，413

Suez Canal and，380，412

Eliot，George（Mary Ann Evans），26-27，131，464

Elizabeth Ⅰ，Queen，28，465

Elizabeth Ⅱ，Queen， xliii， xlvi

Ellis，Sarah，152，161

Elphinstone，Sir Howard，43，325

Ely，Dowager Lady，377

England. *See* Britain

Engels，Friedrich，223

English Constitution，The（Bagehot），427-28

Ernes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Albert’s brother），43，115，116，117，123，170，172

Albert’s correspondence with，148，206，255，281

Albert’s health and，300，310

Albert’s marriage，views on，159，160

Albert’s quest for power and，164，165，166

burial of his mother and，126

Florschütz and，149

social unrest of 1848 and，229

Erns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Duke（father-in-law），125-26，149，205-6

Ernst of Württemberg，Prince（cousin），29

Erroll，Lord，166

Esher，Lord， xliii，209-10，229，270，287，427

Esterhazy，Prince of Austria，77

Ethical World，480

Eton School，85，88-89，145，149

Eugénie of France，Empress，363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225-41

Albert’s views on，240

Victoria’s views on，238，240

Examiner，101，202

Factory Act of 1844，15，202-3

Factory Act of 1878，381-82

Female Medical Society，156

Fenian Brotherhood，345-46，404，423

Feodora，Princess（half-sister），6，9，16，20，24，26，29-30，31-32，157-58，299

children，Eliza and Charles，29

death of，352

marriage，25

Victoria becomes queen and，60

on Victoria’s childhood，25

Victoria’s coronation and，75

Fertilisation of Orchids（Darwin），129-30

Fisher，Bishop，19

Fisher，Elizabeth，44

FitzClarence family，63

Florschütz，Christoph（Albert’s tutor），149，310，327

Flowers，Thomas，89

Forster，Frank，280

Foucault，Michel，150

France. *See also specific people*

Austro-Italian war of 1859，286

British diplomacy and，237

British hostility toward，131

coup d’état and Louis-Napoleon，237-38

Crimean War and，260，262，268

Franco-Prussian War（1870），361-62

Louis-Napoleon Bonaparte as president，241

Napoleonic Wars，ending of（1815），14

Napoleonic Wars，German allies，16

Paris Commune coup，363

Revolution of 1830，39

Revolution of 1848，225-26

riots of 1831，126

Victoria’s anti-French sentiment，228-29

Victoria visits king at Eu（1843 and 1845），227

Franco-Prussian War（1870），361-62

Battle of Sedan，362

Frederick William（Fritz）Ⅲ，Emperor of Germany（son-in-law），273，277，284-85，332，346，382，438-40，471

Fulford，Roger，33，186

Gandhi，Mahatma，479

Gaskell，Elizabeth，129

George Ⅰ，King，8，16

George Ⅲ，King（paternal grandfather），5，6，7，63，69，222
death of，19，21

madness of，7-8，19，298，471-72

Silver Jubilee，436

George Ⅳ，King（Prince Regent，uncle），xlvii，6，7，8，10，25，31，69，140

accession of，21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18

christening of Victoria and，16-17

coronation，8

death of，26，34

Duchess of Kent and，21

extravagant spending by，32-33

final years，33

gout and laudanum dosing，8，18，33，34

hatred of Duke of Kent，14，16，17

marriage of，8

naming of Victoria and，17

obesity，33，34

as reactionary Tory，32

unpopularity of，18，32-33

Victoria and，33

George of Denmark，King，129

George Ⅴ，King（grandson），xliii，447，461

George Ⅵ，King（great-grandson），xlii

Germany. *See also* Prussia

anti-Semitism in，124，125，443

birth of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5

British views on，130-31

descendents of Victoria and royalty of，446

Emperor Frederick William（Fritz）Ⅲ and，284-85

Franco-Prussian War，361-62

as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16

Hanover as ruled by England，16

under Kaiser Wilhelm，443

Lutheranism of，9

marriage of Edward of Kent and Princess Victoire，6，10

navy increased in，444

Prussia as English ally，16

rise of，as major power，362

royals of，tied to British monarchy，5，9，16，131

social unrest of 1848，229

unification of，346，361-62

Ghana，458

Gipsies Advocate（Crabbe），54

Gladstone，Catherine，445，460，461

Gladstone，William Ewart，xli，270，343，376，382，479

aging of，444，460

Albert and，343

appearance，391

Ballot Act of 1872，431

Bulgarian crisis and，373-74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343，374，376，377，400，431

Corrupt Practices Act，431

death of，461

death of John Brown and，406

Disraeli and，374，381，382，392，394

Disraeli replaces，376

Education Act of 1870，431

expense of the monarchy and republicanism，344-45

fetish for “fallen women，” 400，401-2，402n

foreign policy and，416-17

foreign policy as about morality，375

as GOM（Grand Old Man），391，393，396，415，422，444，461

government falls（1885）and Victoria’s response，419

Gladstone，William Ewart（*cont’d*）：

Irish Church Act and，429

Irish Question and，344，423-26，444

last speech of，461

laws passed under，431

longevity of，401

Midlothian campaign，392-93，431

Mordaunt scandal and，365

opposes women as doctors，398

pamphlet on Turkish atrocities，373-74

as “the People’s William，” 343，390

popularity of，343，391

as prime minister，343-44，376，389-92，422-23，443-44

on Prince Leopold，409

Stead and，420n

Sudan crisis and，412，413-15

thanksgiving service for Bertie’s survival and，368

Victoria，difficulty relating to，343-44，366，376，377，402，445

Victoria and，389-92，414-17，421，430-32，432n，434，443-

Victoria and Cabinet selection，391，422-23，429，430

Victoria opposes return to power（1886），421-22

Victoria’s dislike for，376，378，380，389，390-91，402，444

Victoria’s telegram *en clair* to，414-15

wife Catherine and Victoria，445，460

on women’s rights，432n

Glassalt Shiel cottage，Scotland，369，455，491

Glenarvon（Lamb），87

Gloucester，Duke of，33

Gloucester，Princess Mary，Duchess of，127-28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31

Golden Jubilee，433-37，447-48

divorced women allowed at，436-37

mourning dress，433，434，436

prisoner release，437

Victoria’s bonnet，435

“Women’s Jubilee Offering Fund，” 436
Gordon，General Charles George，411-14，417，467
Gosse，Sir Edmund，427，464
Granville，Lord “Pussy，” 164，185，333，390，395，422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194，243-55
Albert’s creation of museum complex with profits from，255
Albert’s securing of funding，249
Albert’s vision and，247-48
closing of，255
critics of，250-51
Crystal Palace，244，248
exhibits，246
foreign industry in，269
machine section，249-50
number of visitors，246
praise for，251-52
profit made by，255

public opposition to building，248-49，248n

size of，246

toilets for the public at，247

Victoria’s visits to，249-50

Greece

descendents of Victoria and royalty of，446

Don Pacifico affair，236-37

King Otto of，43

king sacks the Cabinet（1892），429

Greville，Charles，45，62，68，71，85，197-98

on Albert as de facto king，196

on Albert dwarfing Victoria，274

on Baroness Lehzen，187

Bentinck as cousin，198

on life at Balmoral，218

on Melbourne，89，93，100

on Peel，183

on Victoria after Albert’s death，305

on Victoria’s coronation，75，81-82

on Victoria’s wedding，145

Grey，General Charles，317n，352

Grey，Countess，85

Grey，Lord，66，89-90

Gypsies，53-54，169

Halifax，Lord，368

Hamilton，Edward W.，412，430-31

Harcourt，Sir William，395

Hardy，Thomas，129

Hart，Sir Robert，412-13

Hartington，Lord “Harty-Tarty，” 390-91

Hastings，Dowager Marchioness of，100，101，102

Hastings，Lady Flora，xliv，96-102，106-10，111

Hastings，Marchioness of，99，111

Hawksley，Lucinda，458-59

Haynau，Julius Jacob von，237

Hayter，George，63

Hayward，Ned，143

Heath，Edward，381

Helena，Princess（daughter），211，293，296，330，465，472

accident in Scotland（1863），333-34

costs of monarchy and，345n

death of son Harald，383

death of son Christian Victor，477

marriage to Prince Christian of Schleswig-Holstein，347，418

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Nurses’Association，437

relationship with Victoria，365

Victoria’s death and，481，482

wedding of，340

Helena of Waldeck，Princess（daughter-in-law），410，472

Helene of Orleans，Princess，228

Henry of Battenberg（Liko），Prince（son-in-law），417-19，437，458

Henry Ⅷ，King，128

Her Majesty at Osborne，1866（painting by Landseer），355-56

Hitler，Adolf，468

Hobhouse，Emily，478

Holland，Lady，94

Holland，Lord，83，93，157，164，187

Home Rule（for Ireland），404，419，421，423-24，423-26，426n，428，446. *See also Ireland*

Household Words journal，13，250

Housman，Laurence，492

Hugo，Victor，126，374

Hunter，Michael，217n

Idylls of the King（Tennyson），322，323

Illustrated London News，The，203，248

Imperial College，255

Imperial State Crown，value of，79

India

Arthur stationed in，437

Bertie’s trip to，382

British reprisals，284

British rule，282，382

India（*cont’d*）：

“doctrine of lapse，” 282

Enfield rifled musket cartridges，problem of，282-83

famines，468

massacre at Cawnpore，283

peace treaty of 1858，284

racism and Indians，454-55

rebellion in（1857），282-83

soldiers in British military，476

starvation under British rule，490n

veneration of Victoria，488

Victoria as Empress of，382，391，448

Victoria’s Indian staff，448（*see also* Karim，Hafiz Abdul）

women harmed，“little wars” and，490

Indian Ambulance Corps，479

Industrial Revolution，15，40，91，183

Infanta Luisa of Spain，227

Infant Custody Act，466-67

Ingestre，Lady Sarah，96

In Memoriam（Tennyson），322

Ireland

absentee landlordism in，202，239，363，423，431

British prejudice against the Irish，201-2，239

British response to，201，211

British worries of rebellion in，238，241

Fenian Brotherhood，345-46，423

Gladstone and，344，423

Great Potato Famine，200-201，238-39

hatred of the British，238

Home Rule，404，419，421，423-24，423-26，426n，428，446

Irish Land Acts，363，423

mass emigration，238

social unrest of 1848 and，229-30，238

social unrest of 1886，425

Victoria as “the Famine Queen，” 239

Victoria’s prejudice against and first visit，202

Irish Church Act，344，429

Irish Land Acts，363，423

Irish Poor Law Extension Act，201

Irish Question，421，423-26，428，444，446. *See also* Home Rule

Isabella of Spain，Queen，227

Isle of Wight，41，199，208，215，222

Bertie honeymooning on，331

child prisoners on，204

Osborne House，royal family and，177，208，215-17，217n，230-31，233-34，277，289，322，338，377，443，480

Tennyson on，322

Victoria’s death at，480-83

Italy，329，469

Albert tours，117

annexation of Papal States，363

Austria’s control in，235，236，286，372

Austro-Italian war of 1859，286-87

independence movement，235

Napoleon Ⅲ and，286

Palmerston’s support of independence，235，236

unification of，372

unrest of 1848 and，228

Victoria visits，440，444，451，452，455

wars of independence，286

Jalland，Patricia，337

James，Henry，485-86

James Ⅱ，King，4，129，131

Jeffreys，Lieutenant Colonel，265-66

Jenkins，Roy，401-2，416-17

Jenner，Dr.，313，356

Jerrold，Clare，212

Jersey，Lady，140

Jews

Albert’s anti-Semitism，124

Disraeli’s Judaism，375-76，380

Germany’s anti-Semitism，443

Victoria’s knighting of first Jew，67

Johnson，Samuel，426

Jones，Edward（Boy），174-76

Karim，Hafiz Abdul（Munshi），xliv，447-58，459-60

Bertie burns papers of，460

Kensington Palace，xlv-xlvi，4，5

baptism of Victoria，16-17

birth of Victoria，3-4

environs of，15

Kents in residence，10-11

royals living at，46

Victoire and Victoria in residence，21，24，47-48，49，59-60

Victoria at，137，143

Victoria learns she has become queen，59-60

Victoria’s eighteenth birthday and，50

Kensington System，38-39

Kent，Edward，Duke of（father），xl

appearance，9

belief in Victoria’s future as queen，13

birth of Victoria，3，4，5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9

coffin for，and burial，21

finances and estate，21

fortune-teller’s prediction，19

illegitimate daughter（rumor），44，45

lifestyle，9

line of succession and，5-6，9，10

lover，Julie de Saint-Laurent，5，11

marriage to Princess Victoire of Saxe-Coburg-Saalfield，6，9-10

overseeing of Victoria’s nursery，14

political positions，9

race for the throne and，6，7，9，10

seaside visit and death of，18-20

Kent，Victoire of Saxe-Coburg-Saalfeld，Duchess of（mother）

as ambitious，21，35，39，47，49，64，65，70-71，74

birth of Victoria，4，5

breastfeeding of Victoria，12

children，Charles and Feodora，6，9，16，20，24（*see also* Charles of Leiningen；Feodora，Princess）

John Conroy and，33-34

death of，297

death of husband，20

dedication to Victoria，21

dislike of，by royals，17-18，20

finances and，40，71

home in Belgrave Square，153

marriage to the Duke of Kent，6，9-10

nickname，20

pregnancy with Victoria and journey to England，6，10

reconciliation with Victoria，277

as regent，40，48

rheumatism of，19

rift with William Ⅳ，41-42，47-48

royal tours，40-41

Kent，Victoire of Saxe-Coburg-Saalfeld，Duchess of（mother）（*cont'd*）

scandal of Lady Flora Hastings and，1-6-7，97，98，100，101，110

seaside holidays with Victoria，31

struggles after Edward's death，21

Victoria and，early years，xl，21，23-27，37，41，49，65，70，90，153，297

Victoria as queen and，65，66，67n，69，70-72，93，94

Victoria's coronation and，74，77，79

Victoria’s engagement to Albert and，121-22

William Ⅳ’s dislike of，41-42，45，47-48，49

Kerr，Lady Charles，398

King Lear（Shakespeare），71

Kinnaird（page），175

Kipling，Rudyard，479

Kitchener，Sir Herbert，476，478

Kossuth，Lajos，237

Kruger，Paul，474

Kuhn，William，378

Lablache，Luigi，42

Labouchere，Henry，401，429

Lamb，Caroline Ponsonby，85-88，89，89n

Lamb，Elizabeth，272

Lamb，Lady Emily，234-35

Lancet，The，156

Landor，Walter Savage，143

Landseer，Edwin Henry，170，355

Lansdowne，Lord，209

Lascelles，Sir Alan， xliii

La Siesta（painting by Winterhalter），216-17，217n

Last of the Mohicans，The（Cooper），176

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375

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Our Life in the Highlands（Queen Victoria），343，364

Lehzen，Baroness Louise（governess），22，23，25，26，27-28，34，49，52，54-55，60，82，108

Albert blames for problems in the nursery，188-89

Alberts removal of，189-92

conflict with Albert，163，173，176-77，185-87

contemporary opinions about，186-87

death of，193，352

final years in Germany，193

last meeting with Victoria，193

palace intruder（Boy Jones）and，175

Victoria’s character and，54，66，94，193

Victoria visits in 1862，330

Leopold，Prince（son），255，293，296，325，472

Albert’s death and，317n，319

death of，408

hemophilia of，256，317n，347，365，408-10，409n

loathing of John Brown，355

marriage of，409-10

Victoria’s overprotection of，365，408

Leopold Ⅱ of Belgium，King（cousin），470-71，471n

Leopold of Saxe-Coburg-Saalfeld，Prince（uncle）（later King Leopold Ⅰ of Belgium），7，10，16，20，21，29，30，31-32

advice to the young queen，66，92

Albert’s position in Britain and，134，164

on Albert’s quest for power，160，162

as Belgian king，66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31-32

chooses Albert for Victoria，43-44，117-18，119，121

Claremont house，Surrey，31，188

on Conroy，45

death of，348

“drizzling，” 32

on Lehzen，185

letters to Victoria，170-71

moral lessons taught to Victoria，32

second wife，Louise of Orleans，116-17，227，242

social unrest of 1848 and，234

Victoria and，29，30，31-32，42，49，60，68，170-71，181，300

Victoria becomes queen and，60

on Victoria’s fortitude，154

Victoria’s letters to，183-84，223，229，258，265，286

Les Misérables（Hugo），126

Lewis，Mary Anne，342，377，394

Liberal Party，390，394，412，422，425，428. *See also* Gladstone，William Ewart

Third Reform Bill and，416

Liberal Unionists，425，428

Lieven，Princess，20，33，71，83，91

Life of Brown（unpublished memoir by Queen Victoria），407

Lilly，Mrs.（children’s nurse），175

Lincoln，Abraham，311，312，337，463

Lincoln，Mary Todd，18，337

Lippincott，Sara Jane（Grace Greenwood），489

Liverpool，Lord，140

Local Government Act，467

Locock，Charles，158

London

Big Ben’s first striking，287

birth of Victoria and，4-5

Chartist meeting of April 10，1848，230，231-32

child sex trade，420n

cholera epidemic of mid-1850s，280

coronation of Victoria and，73-83

dirtiness and oppression of，69-70

discontent in，14

education in，15

fair and freak show，Hyde Park，81-82

Great Stink，281

growth and change，xlv-xlvi，15

hardships of mid-winter，196-97

Jack the Ripper，447

Lincoln’s Inn，223

living conditions，15

Metropolitan Police Force，183，231

Metropolitan Sewers Commission，280

mourning of Princess Charlotte，7

population growth，280

prostitution and，399

slums of，15，420，421

soot of，197

Spitalfields silk production，141，203，204

Thames River，279-80

Tooley Street fire of 1861，300-301

Trafalgar Square meeting of 1848，229

Victoria and，69-70，71

Victoria’s death and，484-86，488

Longford，Elizabeth，359

Lorne，Henry Douglas Sutherland Campbell，Lord（son-in-law），320，347，361，365，418，437，458，472

Lothair（Disraeli），375

Louise，Princess（Albert’s mother），125-26

Louise，Princess（daughter），230，230n，293，317n，458

brother-in-law，Liko，and，458-59

costs of monarchy and，345n

Diamond Jubilee and，472

loathing of John Brown，355

marriage to Lord Lorne，320，347，361，365，418，437，458，

relationship with Victoria，366

secrets of，347，458

Victoria’s death and，482，483

Louise of Orleans（aunt），116-17，227，242

Louis-Napoleon Bonaparte，Prince（Napoleon Ⅲ），231，237-38，241，260，270，286，326，411

Franco-Prussian War and，362

Louis of Battenberg，Prince，418

Louis of Hesse-Darmstadt，Prince（son-in-law），313，329-30，347，383，417n，418，472

Louis Philippe of France，King，225-27

alliances by marriage and，227

death of，242

Luther，Martin，132

Lyttelton，Lady，vii，157，158，163，169，187，191，218，221，251，268

Lytton，Lord，392

Mackenzie，Dr.Morell，438，439

Macleod，Reverend Norman，358

Macmillan，Harold，381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82-83，221

al-Mahdi，Muhammad，412，413

Maiden Tribute of Modern Babylon，The（Stead），420n

Major，John，381

Mallet，Marie，471

Malory，Thomas，401

Marie，Grand Duchess（daughter-in-law），382

Marie-Amelie of Naples and Sicily，Queen，225-26，227，228

Marochetti，Baron Carlo，325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 of 1870 and 1882，466

Martin，Theodore，xliii，199，380，397

Martineau，Harriet，63，77，79，110

Marx，Karl，13，223

Mary Ⅰ，Queen（Bloody Mary），128

Mary Ⅱ，Queen，128-29

Mary of Modena，Queen，4

Mary（May）of Teck，Princess（later Queen Mary），xliii，447

Maton，William，19-20

Matthew，H.C.G.，402n

Mayhew，Henry，279-80

McNeill，Sir John，267

Mearns，Andrew，420

medicine and health issues

belief in the healing powers of the sea，19

bleeding or leeching，7，19

bracing baths and cold showers，310

brucellosis，464

cupping，19-20

diphtheria and death，383，384

diseases of infants，13

Dover’s Powder（opium-based），477

Erb’s palsy，438

erysipelas，404

hemophilia，408-9，409n

ignorance about childbirth，294

infant mortality，13-14

the infant Princess Victoria’s treatment by Dr.Clark，189，190，191

laudanum（tincture of opium）as general remedy，18，189

menstruation，beliefs about，42-43

narcotics and drug addiction，13，13n

opium，xl

opium for infants，13，189

opium taken by George Ⅳ for gout，8，18

patent medicines，18

porphyria，471-72

pregnancy and death of Princess Charlotte and，7

puerperal fever and unclean hands，156-57

saltwater baths for nursing mothers，19

venereal disease，398-99，403

Victoria（Princess Royal）and，471-72

Melbourne，William Lamb，Lord，8，17，37，72，84-92，89n，431

advises against Victoria marrying Albert，118

affairs of，88

Albert’s desire to remove，173

Albert’s guidelines and，135

Albert’s private secretary and，133-34

Albert’s quest for power and，165

Alberts status and income and，132

Conroy and，64，65，70

death of son，90

death of wife，88

discipline（whipping）obsession with，88-89，89n

final years and death，185

on Germans，130

marriage advice，138

marriage to Caroline Ponsonby，85-88，138

Mendelssohn，Felix，76，77

mother of，87

Peel replaces，179-83

political ideas，85，200

as prime minister，52-53，61-62，64-66，85，89-90，92，102，105-6，134，136，138，139，171，180

resigns as prime minister，182

scandal of Lady Flora Hastings and，96-102，107

three failings of，91-92

Victoria and，52，60-61，67n，74，82，88，89，96，100，102，104-5，135-36，138，139，163，180，181，182，184-85，377

Victoria and final farewell，182

Victoria and platonic romance，68-69，84-85，90-92，93，95，96

Victoria’s betrothal and，118，124，127，131，138-39

Victoria’s coronation，intoxication during，77-78，80，82

on Victoria’s domestic harmony，162

Victoria’s first child born and，166

Victoria’s first statement to the Privy Council and，61-62，64

Victoria’s marriage and，150

Victoria’s mother and，71，90，93，94

Victoria’s wedding and，140，141，145

Melbourne，William Lamb，Lord（*cont’d*）：

wedding advice，140

wit of，91

“women should not rule alone” mantra，119-20

Merrick，Joseph（Elephant Man），156

Middlemarch（Eliot），464

Milnes，Richard Monckton，319

Mitchell，L.G.，87，89

monarchy. *See* British monarchy

Monkswell，Lady，485

Montagu，Elizabeth，272

Montefiore，Moses，67

Montrose，Duchess of，96

Mordaunt，Harriet，364-65

More，Hannah，29

More Leaves from the Journal of a Life in the Highlands（Queen Victoria），364

dedication to John Brown，407

Morning Post，102，244

Morpeth，Lord，86

Morshead，Owen， xliii

Mrs. Warren's Profession（Shaw），403

Munshi. *See* Karim，Hafiz Abdu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255

Muslim Patriotic League，456，457

Mussolini，Benito，468

Napoleon Bonaparte，14，16，81

Napoleonic Wars，14，16，131，259

Napoleon III. *See* Louis-Napoleon Bonaparte，Princ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194

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467

Newcastle，Duke of，268-69

Newell，Rev.D.，223

New York Post，486

Nicholas Ⅰ，Czar，105，166，259-60，447

Nicholas Ⅱ，Czar，384，447

Nightingale，Florence，18，26，130，144，252-53，347

on Albert，276

Crimean War and，264，265，274-76，278

Diamond Jubilee and，464

mourning for Victoria，485

starvation in India under British rule and，490n

Victoria and，274-76，329

Normanby，Lady，180

Northern Star，204

Norton，Caroline，69，88

Norton，Charles Eliot，262

Norway，446

O’Connor，Feargus，232

Oliphant，Margaret，129，338

Oliver Twist（Dickens），69，92

Order of the Garter，144，243，487

Ottoman Empire，165-66，259-60，268，412

atrocities against the Bulgarians，372-75

Oxford，Edward，153，154-55，156，164，175

Pacifico，Don，236，237

Palace of Westminster，208

Pall Mall Gazette，437

Palmerston，Lord，211，227，232，234，256，261，265，312

dismissal of，238

Italian nationalism and，287

and liberal interventionist foreign policy，235，237

marriage to Emily Lamb，234-35

as “Pilgerstein，” 236

as prime minister，269，287，327

public popularity of，236-37

replaced by Derby，341

Victoria and，327，332，339

Victoria and Albert and，234-37

Pankhurst，Emmeline，397

Pankhurst，Richard，397

Panmure，Lord，266

Papua，New Guinea，463

Parliament. *See* British Parliament

Pate，Robert，254-55

Paterson，Banjo，479

Paxton，Joseph，248

Pearsall，Ronald，399

Pedro of Portugal，King，310

Peel，Robert，92，104-6，106n，132，179-83

Albert and，179-83，184，193，197-200，207，210，241-42，310

appearance，198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career，183，197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183，198

Corn Laws repeal and，197-201

death of，241

Disraeli and，342

establishes Metropolitan Police Force，called “bobbies” after him，183

Isle of Wight and，215

opposition to Shaftebury labor bill，204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s，200，211

political ideas，183

popularity，242

as prime minister，102-3，182-83，197-201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and，197-201，210

revolution avoided in Britain and，241

unpopularity of，183

Victoria and，180-83，197-98，205，210

Victoria’s support of education for Catholics，210

voted out of office，210-11

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PCBD），348-49

Peter Rabbit（Potter），129

Philharmonic Society，194

Philip Ⅱ of Spain，King，128

Phipps，Colonel，231

Phipps，Sir Charles，317n，339

Ponsonby，Arthur，vii，67，364，426，446

Ponsonby，Fritz，451

Ponsonby，Henry（Victoria’s private secretary），67，354，354n，355，405，426

Bigge replaces，457

Brown and，354，355，370

Brown’s death and Victoria’s grief，405，406

burning of John Browns diaries，407

death of，457

Disraeli and，378，389

Gladstone and，390，391，416，422，432

Golden Jubilee and，437

Indian staff and，448

Munshi and，448，452，453，455，456

opinion of Victoria，426

speeches for the Jubilee and，437

Victoria’s political power and，426，429

Victoria’s seclusion and，367

Portman，Lady，99，101

Portugal，235，446，469

Albert and King Pedro，310

queen of，61，272

Potter，Beatrix，129

poverty，xlvi，13，15，91

Albert vs. Victoria and，204-5

Disraeli’s reforms and，381

Salisbury on living conditions，420

Thames River and，279-80

Victoria and inaction，92，363-64

workhouses，240

prison and prisoners

Australia as penal colony，155

children and，204

Tasmania as penal colony，254

Privy Council，61，62，64，72，127，198

Albert meets as Victoria’s proxy，167

palace intruder（Boy Jones）and，176

Victoria announces her engagement to Albert，127-28，131

Victoria’s birth and，4

Victoria’s statement to，61-82

Profeit，Alexander，359-60

prostitution，398-400，400n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398，403

Gladstone’s fetish for “fallen women，” 401-2，402n

Jack the Ripper and，447

Shaw’s play and，403

Protestant Church of Ireland，344

Prussia，31，166，205，235，241. *See* also Bismarck，Otto von；Wilhelm Ⅱ，Kaiser

as ally of England，16

Emperor’s throat cancer and power play by Wilhelm Ⅱ，438-42

Schleswig-Holstein conflict，309，331-33

Seven Weeks’War（with France），346，361，362

unification of Germany and，346，361

Princess Victoria and，207-8，285，288

Victoria’s visit（1888），440-41

Public Health Act，381

Public Worship Regulation Act，382

Punch cartoon，248n

Queen’s Jubilee Nursing Institute，436

Raglan，Lord，267，268

railways，69，248，465

first royal family trip，209

of India，282
Prussia’s，362
troop transport and，259
Ramsgate（Albion Hotel），36，40，47
Rappaport，Helen，318
Rasputin，355，384
Reform Bill of 1832，39-40，46-47，68，183
Reform Bill of 1867（Second Reform Bill），341，381
Reform Bill of 1884（Third Reform Bill），416
Reginamania，63
Reid，Sir James（Victoria’s doctor），358-59，477
death of Victoria，480-83
incident between Victoria and John Brown recorded by，359
instructions for Victoria’s burial and，486-88
Munshi and，449，451-52，453，454，455，457，459-60
on Profeit’s letters，359-60
Victoria’s death and，358

Reid，Susan，487-88

Removal of Aliens Act，231

Republican Clubs，344-45

Review of Reviews，463

Reynold's News，489

Richmond，Duke of，91

Roberts，Andrew，420

Roberts，Field Marshal Lord，475，478

Robinson，John，80

Rolle，Lord，79

Romania，446

Roosevelt，Frankin D.，468

Roosevelt，Theodore，469

Rosebery，Lady，376

Rosebery，Lord，377，428，433，446

Rossetti，Christina，137

Rossetti，Dante Gabriel，18

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194

Royal College of Music，255

Royal Commission for Fine Arts，194，208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400

Royal Society of Arts，247

Ruskin，John，27，129，161，248，374

Russell，Lady John，272

Russell，Lord John，62，179，209，236-38，287

Albert and，233，247，270

Crimean War and，268

dismissal of Palmerston，238

Irish crisis and，239

as prime minister，211，231，233，236，237，239，247

support for Louis-Napoleon，237-38

Victoria and，236，237，339，340

Russell，William Howard，265

Russia

Alexandra Feodorovna（Alix），as Empress，446-47
Crimean War and，259-78
descendents of Victoria and royalty of，446
George Ⅳ and，17
Princess Lieven as wife of ambassador，20，33，71
Orthodox Catholics of，260
Ottoman Empire and，166，259，260
social unrest of 1848 and，237，241
Treaty of San Stefano，379
Turkish atrocities and，374-75
Turkish invasion（1877），378-79
Victoria and，77，118
Victoria’s daughters，hemophilia，and ruling family，256
St.James Palace，43，44，75
Chapel Royal，wedding of Albert and Victoria，140，144
wedding of Princess Vicky，285
Saint-Laurent，Julie de，5

St.Margaret’s Church，London，73

St.Paul’s Cathedral，368，463，465

Sale，Mr.（piano teacher），22

Salisbury，Lord（Robert Gascoyne-Cecil），79，400-401，419-20，436-37，441，476

concern for the poor，420-21

as prime minister，419-21，427，443-46，456

Victoria and，420，446，461

Salisbury，Lord（Robert Gascoyne-Cecil）（*cont’d*）：

as the Victorian Titan，420

on Victoria’s influence，427

Sandow，Eugen，214

Sandringham House，364，367，453

Sardinia，234，235，268，286-87

Satirist，*The*，142

Saturday Review，356

Schleswig-Holstein conflict，309，331-33

Scotland. *See also* Balmoral Castle，Scotland

Albert and，217

Glassalt Shiel cottage，369，455，491

sixth sense of Highlanders，355

Victoria as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344

Victoria on，212，217

Victoria’s books about，343，364

Victoria’s carriage accident（1863），333-34

Victoria’s love of，218，348

Scott，Sir Walter，22

Seacole，Mary，274n

Second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of 1882，396

Second Opium War，283

Seven Weeks’War，346，361

Shaftesbury，Lord，204

Shaw，George Bernard，115，336，403

Siebold，Frau，5

Simpson，Dr.，255

slavery

abolished in the British Empire，40，102，234，469

Albert’s position for abolition，164，193

in America，69

antislavery movement，xlvi，69，164，194

Duke of Kent’s position for abolition，9

Turks and，372

Whigs and abolition，38，89，90，102

Smith，Dr.Andrew，265

Smith，Sidney，201-2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ring Classes，194，239-40

Society for the Extinction of Slavery，194

Society of the Arts，194

Somerset，Lady Geraldine，337

“Sonnet on the Massacre of the Christians in Bulgaria”（Wilde），374

Sophia，Princess（aunt），47

Sophie of the Netherlands，Queen，332

Soult，Marshal，77

South Africa，392，393，469

Anglo-Boer War（Second，1899），473-77

Boers in，469，470

Britain’s federation in，469

Transvaal（South African Republic），469-70，474

Southey，Robert，129

Spain

Africa and，469

Bloody Mary and，128

French king and alliance with，227

Palmerston and，235

Prussia and alliance with，361

six-year-old queen of，61

Victoria’s descendents and royal house of，446

Späth，Baroness，24，34，45

Spectator，63，128

Spring Exhibition of the Royal Academy，355

Stalin，Josef，468，479

Stanley，Lord，346

Statistical Congress of All Nations Conference，194

Stead，W.T.，413，420，420n，437，463，479

Stevenson，Sallie，63，66，69

Stockmar，Baron Christian，14，20，49，54，64，90，160，185，199，215，224，300，308

Albert and，123，149，162，189，190，205，208，232，233，242，310

as Victoria’s adviser，60，117，429

Strachey，Lytton，149，271

Strauss，Richard，69

Strickland，Agnes，121，142

Sudan，412

Gordon and siege of Khartoum，413-14

Suez Canal，380，412

suffrage movement，xlvi，396-97，403，432n，467，489-90

Summerhayes，Marion，402

Sumner，Charles，66

Sussex，Duke of（uncle），24，47，61，66，77

coronation and，79

death of，and titles passed to Albert，207

Sutherland，Duchess of，180

Tables of the Kings and Queens of England（Howlett），25

Tagore，Maharaja Bahadur Sir Jotindra Mohun，488

Tait，Robert，148

Tayler，William，72

Taylor，Miles，241

Tennyson，Alfred，Lord，27，267-68，401，405，421-22

Albert appoints poet laureate，323

audience with Victoria，321-23

death of，464

dedication to Albert，322，323

lines for John Brown’s tombstone，406

Victoria’s choice of white burial clothes and，491

Tennyson，Emily，ｘｘｘｉｘ，322-23

Tennyson，Hallam and Lionel，322

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32，129

Thalberg，Sigismund，69

Thatcher，Margaret，381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Carroll），371

Thumb，Gen. Tom（Charles Sherwood Stratton），212-14，464

Thynne，Lord John，78

Times of London，41，110

campaign for better care of wounded，Crimean War，264-65

criticism of Victoria’s absence from public view（1864），339

letter by Emily Davison，489

on Victoria’s death，486

Tisdall，E.P.，357

Titanic，420n

Tolstoy，Leo，399

Tory Party，38，51，62，78，92，99，101，143，446. *See also* Disraeli，Benjamin；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Albert and Peel，179-83，197-200

Albert’s status and，132，136

Tory Party（*cont’d*）：

Bedchamber Crisis，102-6，106n

Disraeli and modernizing of，380-81

Lady Flora Hastings as martyr，110

Salisbury as prime minister，419-21

split，Conservative Party formed，198

Third Reform Bill and，416

Victoria and，380，394

Victoria’s wedding and，140

Trent affair，311-13

Trollope，Anthony，129，247

Trollope，Rose，247

Turgenev，Ivan，372

Turkey

atrocities against the Bulgarians，372-75，461

Crimean War and，259-60，261，262-63

Russia invasion（1877），378-79

Sevastopol，268

Treaty of San Stefano，379

Twain，Mark，465，466，471

Van Buren，Martin，118

Victoire of Saxe-Coburg-Kohary（cousin），226，228

Victoria（Vicky），Princess Royal（daughter），24，172，174，183，186，194，243

Albert’s death and，317n，319

Bertie and，292，293

betrothal to Frederick William（Fritz）of Prussia，277

birth of，167

breast cancer of，471-72，482

Christmas 1853，261-62

death of son Waldemar，384

as empress，382

favored status of，296

first child born（Kaiser William Ⅱ），288-89

Franco-Prussian War and，362

hiding of private papers from son Wilhelm，442

husband’s throat cancer and，438-40，471

illness of，188-89

as intellectual equal to husband，273，384

life in Prussia，as miserable，288，418，437，438-40

loss of son Sigismund，347

marriage，207-8，284-85，332，346，347，418

as more loved than Bertie，188

political views，376

as precocious，222，273

relationship with her father，169-70，290-91

relationship with her mother，168-69，221-22，290，291-92，296，298，364，366，369

Victoria’s letter on “fast” women to，398

Victoria’s visit（1888），440-41

Victoria，Queen

adoration of， xlv，63，64，83，223，322-23，434，463-64，488

as archetype，488

belief in hierarchy，238

belief in spirits，355

diaries and letters destroyed or selected to omit material， xlii-xliv，41，109，167-68，229，236，351

legacy of， xlvi

life of a royal，3-4

line of succession and， xl，3，5，12-13，21，25，40，48

memorials to， xlvi-xlvii

myths about， xli， xlii， xliv-xlv，26，167

naming of，17

photographs of，smiling，465

prestige/fame，vii， xlv， xlvii，123

progress，modernity，and， xlv-xlvi，466-69

reign，length of， xlvi，465

royal prerogative，205

size of kingdom，465-66

twin themes in life of，loss and endurance，21

as Whig，91，92

Wilde’s description of， xlv

writings by，amount daily， xliv

—character and major characteristics

artistic ability，27

beer drinking，93

breastfeeding seen as vulgar，219-20

bullying by， xl， xliv

calendars and dates，obsession with，296-97，473

candor of，41，366

childbirth，hormones，and emotional outbursts，256-57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xl，24，53-54，63，79，214，449，492

composure and control， xl，45，72，105，144，192，231

courage of，153，154，156

decision-making，32，66，94，110，261，489

dislikes， xl，93，116，297，369

fear of loss，297，299

feelings about childbearing and newborns，167-68，171，294

grace of，28，464

guilt and， xli，293，297，353，356-57

impartiality，failure of，32，91，92，332-33

imperiousness，24，28，94

independence of，27，67，116-17，118，137-38，163

introversion and aging of，369

iron will，vii， xl， xli，37-38，45，67，140，191，338，493

irreverence for Episcopal authority，19

Lehzen and shaping of，27-28，54，66，94，193

libido of，147，148

love of animals， xl，371-72，382，437

love of nature，217，349-50

mantra，55

music and，69，119，369

overview，xl，xli，xlv

passion for the dramatic arts，28

personal habits，42，63，116

pets of，xli，30，37，80

plumpness，32，33，42，93，384-85

preference for a chilly environment，310

resilience of，xlvii，324，492

romanticism of，117-18

self-absorption，298-99，366

as self-critical，xlv，93，272-73，492

sense of duty，139-40

sense of humor，29，492

sensitivity，90，314，324，326，481

sentimentality，xl，257，299，407

simplicity and “defiant humility，” 218，491-92

stoicism，xl，324，337

Victoria，Queen—character and major characteristics（*cont'd*）：

strength of，5，27-28，36，49，273，274

stubbornness and defiance，21，22，24，27，94，273，341-42，452

temper of，22-23，24，190，191

tolerance for religion and race，67，124，210，449，451，454-55

times of crisis and，378-79

uncertainty，intimidation by Albert and，159，161，271-74

as "virago queen，" 116

voice，xl，28，62，63，66，464-65

wielding of power，xli，xlii，xlvii，55，110，118-19，135，137，261，426-32，489

—1819-1837（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3-55

admirers and romance，43-44

appearance，14，28

bilious fever of，38，43

birth，3-4

christening，16-17

confirmation，41-42

Conroy and，33-34，37-38，39，45，49，51-53

descriptions of，by contemporaries，28，29

discovery of line of succession（March 11，1830），25-26

dog，Dash，30

dolls of，30-31

dressing up in costume，29

education of，25，27-29

eighteenth birthday，50-51，59

father’s death，20，21

firing of Baroness Späth by Conroy，34

German ancestry and influences，16

governess Lehzen，22，23，26，27-28，31，34，37-38，49，52

Gypsies and，53-54

harassment of，49

intrigue around，John Conroy and，33-34

at Kensington Palace，24

“Kensington System，” 38-39

Liverpool’s attempted intervention with，51-53

as melancholy，lonely child，24-25

moral lessons taught by Leopold，32

mother and seven-year battle，35

as naughty child，22-23

oppressive homelife，54

passage to womanhood，42

playmate，Victoire Conroy，33-34

plots against，by her uncles，11，39

as precocious，19

riding and，25，35

royal tours，40-41

seaside holidays，31

singing lessons，42

sixteenth birthday，42

stories made up by，23

surveillance by adults，25，34

treated as the “idol of the house，” 24，26

tutor Davys，23-24

as “Vickelchen，” 20

vigorous health and，14，19

visitors，29

visit to George Ⅳ at Windsor，33

—1837-39（teenage queen），57-111

accounts from contemporaries，62-64

Albert arrives in Britain，111

appearance，63，65-66，75，79，93，110-11

ballad about exercise of her will，67n

Bedchamber Crisis，102，104-6，106n，180

boredom and，92-93

Buckingham Palace as new residence，69-70

changes in lifestyle，65

changes in social conventions by，67

coronation，xxxix-xl，44，73-83

death of William and reaction to becoming queen，59-60

depression and unhappiness，93-94，110，111

estrangement from mother and Conroy，70-72

first actions as queen，60

immaturity，100，106，108-9

income，71

initial happiness of，70，91

knighting of first Jew，67

lack of support，103

learning to rule，84-95

Leopold’s advice，66

marriage proposals，80

Melbourne and，60-61，67n，68，71，74，78，82，84-85，88，89，90-93，100，102-5，110-11

Melbourne and coronation，intoxication during，77-78，80，82

Melbourne and platonic romance，68-69，84-85，90-92，93，95，96

overeating and，93

Parliament and，65-66

pensions paid by，63，72

popularity，72，83

press and criticism of，101，102，109，110

Privy Council and，61-62，64，72

proclamation，65

public disapproval of，108，109，111

riding and，70

routine，66-67

scandal of Flora Hastings，96-102，104，106-10，111

temper and，94

wisdom lacking，83

workload of，66-67，93-94

—1839-1861（the Albert years），115-320

abdication of role to Albert，180-83，186，193-95，207，209-10，242，253-54，271-74

Aberdeen as prime minister and，252，261，262，270，287，428

admirers of，186

Albert，arrives in England（1839）and Victoria smitten，115-20

Albert，correspondence with，132-34，141，206

Albert，dependency on，300-301，314

Albert，opinion of，115，116，121，123，292

Albert，passion for，116，253-54

Albert，treatment of，115

Albert and，as joint force，211，242，269

Albert and hostility of public and family，205，269-71

Albert and precedence issue，132，136，205

Albert and proposal，engagement，120-24，127-28

Albert as figure of awe，245

Albert as “Lord & Master” and Victoria’s submission，191，272

Albert as sole confidant，184，187

Victoria，Queen—1839-1861（the Albert years）（*cont’d*）：

Albert presented as intellectually superior，180，187，253-54，271-72

Albert replaces senior ladies-inwaiting，180，181

Albert’s death and，311-17

Albert’s desire to remove Lehzen and Melbourne，163，173，176-77，184，185-87

Albert’s love for，206

Albert’s manipulation of，163-64，172-73，180，181-82，184，192

Albert’s quest for power and，134-35，140，158-66，171-73，287-88

Albert’s undermining of her confidence，159，161，271-74

Albert’s writing table side by side with Victoria’s，166，234

anti-French sentiment，228-29

anti-Irish bias，202

appearance，119，135，138-39，158，243-44，273，289

assassination attempts，152-56，164，165，403

assault on（1850），254-55

Austro-Italian war of 1859 and，286-87

ball of 1842，203

Balmoral Castle and Scotland，217-18，257，261，267，277，289-90

best-loved words and *gemütlich*，215

birthday ritual，299

birth of daughter Alice，207

birth of daughter Beatrice，281

birth of daughter Helena，211

birth of daughter Louise，230

birth of daughter Victoria，167

birth of son Albert（Bertie），188

birth of son Alfred，207

birth of son Leopold，255

as Britannia，154

children’s governess，Lady Lyttelton，169，191

chloroform during childbirth and，255，281

Christmas 1861，320

Corn Laws and，199

correspondence，183-84，209-10，223，229，258，265，268-69

Crimean War and，258-78

daughter Beatrice and，296，298

daughter Vicky and，168-69，221-22，290，291-92，296，298

daughter Vicky’s marriage，285 depression of，183-84，185，188，189-90，298

domestic life and children，168，194-95，206-7，211，215-24，241，253，277，279-301

Eastern Question and，165-66，170，270

expenditures of，177

fear of revolution，228-29，232，233-34

first train trip，209

first wedding anniversary，173

food and drink，215

foreign policy，235，311

as grandmother，288-89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and，243-45

grief and mourning for Albert，317-30

honeymoon，139

income for，177

Indian mutiny and，284

Irish Question，201，202，239

issues of concern to，204

at Kensington Palace，137

Lehzen and，163，185-87，191-93

Lehzen removed by Albert，189-92

Leopold and，170-71，181，183-84，223，229，258，265，286，300

Louis Philippe of France and，226-28

marital bliss，146-47，148，149

marital discord，256-57，310

marital strife，struggle for power and，135，159，161-63，189-91

marriage，separation from the crown，160

marriage，Victoria’s views of，116-19

marriage doubts，137-38

marriage of，145，150-51，152，157，159-60，169，184，189，205，206-7，256-57，270-74

Melbourne and，118，119，131，132，134，135-36，138，

145，150，163，180，181，182，184-85，377

Melbourne，and Victoria’s betrothal，118，124，127，131，138-39

Melbourne，and Victoria’s first child，166

Melbourne，and Victoria’s wedding，140，141，145

Melbourne on Victoria’s marriage，150，162

Melbourne’s final farewell，182

modernizing of Britain and，203

motherhood and，168-69，171，291-92，293-94，296

Nightingale and，274-76

at Osborne，Isle of Wight，199，215-17，222，230-31，233-34，277，289

palace intruder（Boy Jones），174-76

Palmerston and，234-37

Peel and，180-83，197-98，199，205，210

popularity，153，154，223

prayer on New Year’s Day，1840，136

pregnancies，physical toll of，188，189，207，219，256，295

pregnancies and children's births，150-51，156-58，165-67，171，180-81，183，187-88，207，209，211，226，228，230，230n，255，281

pregnancy fears，156-57

press and criticism of，128，129，130，131，204，265-66

Privy Council and，127-28，131

problems plaguing Britain and，200，204

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American Civil War，311

public sympathy for her loss，319

relationship with her mother，121-22，153，277，297-98

rumors about mental state of，298

Russell and，236，237，239

social unrest and revolution，1848，225-41

son Bertie and，292-93，296，298，305-9，311

son Leopold and，293，296

state business and，162-63，170-71

suitors，118

Tom Thumb and other curiosities as entertainment，212-14

Tories and，131，132
Victoria，Queen—1839-1861（the Albert years）（*cont'd*）：
visits to French King（1843 and 1845），227
wedding，135-46
wedding dress，141-42
wet nurses employed by，220，220n
Whigs and，133
workload of，117，139-40，165-66，219，234，253，293
—1862-1879（widowhood and recovery），321-85
accident in Scotland（1863），333-34
appearance，322，335，384-85
assassination attempt（1872），Brown's heroism and，368
Balmoral Castle，Scotland and，353
Bertie's near-fatal illness（1871）and，367-68
Bismarck，German unification，and，346
Brown and，340，351-61，366，369-70，383，385
Carlyle and，366

correspondence after Albert’s death，332，364

criticism of，338，339，348，349，356

daughter Alice and，335，347，365

daughter Alice’s wedding，329-30

daughter Helena’s wedding，340

daughter Vicky and，364，366，369

death of Alice，383-84

deaths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352，382-83

deaths of grandchildren，383，384

depression of，324，330

Disraeli and，342-43，367，373，377，379，380，382，385

Disraeli’s reforms and，381-82

dreams of her mother，369

as Empress of India，382，391

expenses and taxpayer resentments，344-45

foreign policy，331-33，372-75，378-79

Franco-Prussian War，362

frogs at Frogmore and，371-72

Gladstone and，343-44，366，376，380

Glassalt Shiel cottage，369

as grandmother，366

grief of，as pathological，348-49，352

Hartley mining disaster and，336-37

health，339，341-42，352

identity as widow，336-38

illness（1871），367

Irish Question，363

Lehzen and，330

Prince Leopold’s death，348

letters to Alexander Profeit，359-60

loneliness of，331，342

Mordaunt scandal and，365

motherhood and relationship with her children，after Albert’s death，325-26，347-48，364-66

mourning dress，325，329，336

myth of her inability to rule without Albert，327，328-29

new template for ruling following Albert’s death，333

opening of Parliament by，340-41

at Osborne，Isle of Wight，322，340，377

as partisan Tory，380

political positions，364

public sympathy for her loss，333，349

residences，338

return to public life，335，340-41

return to rule，338

riding and，340

Russell and，339，340

Russian invasion of Turkey（1877），378-79

Schleswig-Holstein conflict，331-33

seclusion from public view，338-39，344，345，348-49，352，355，367

social issues and conservative politics，363-64

social unrest and Second Reform Bill，341

son Bertie’s wedding，330-31

state duties and，341-42，348，353

tactic used by，342，356

Tennyson and，321-23

thanksgiving service for Bertie’s survival and，368

Turkish atrocities and，372-75

will to live，334

workload of，332，338

worries about signs of madness，324-25，327

—1880-1901（Regina Imperatrix），389-493

aging and health，430，434，444，458，464，468，477-78，481

Albert’s memory and，436

Anglo-Boer War（Second，1899），473-77

Beatrice’s marriage and，417-19

bejeweled bonnets and，435

Brown’s death and Victoria’s grief，404-8

Brown’s devotion and，405-6，407-8

contentment in her seventies，453-54

daughter Vicky and，440-41

daughters of，supporting women’s rights，397

deaths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404-8，434，447，461，464，472-73，477

depression of，477

Diamond Jubilee，460，462-65，467，468

dislike of grandson Kaiser Wilhelm，439，443

Disraeli and，389-90，393，395

domestic life and children，437-38，446-47

Eastern Question and，412

and “fast” women，398

final days and death，480-83

foreign policy，412，414-17，426

funeral and burial，486-87，491

funeral train，484-85

Gladstone and，389-92，394-96，402，414-17，419，421，430-32，432n，443-46，460-61（*see also* Gladstone，William Ewart）

Gladstone opposed by（1886），421-22

Golden Jubilee，433-37

Gordon’s death and，414-15，417

as “the Grandmother of Europe，” 446

grave of，491

Indian politics and，456

Irish Question，421，423-26，428，446

knee sprain，404

Victoria，Queen—1880-1901（Regina Imperatrix）（*cont’d*）：

London slums，concern about，421

loneliness of，405，437，449

longevity of，468，492

mourning dress，410，433，434，436

Munshi and，447-60

opposes women’s rights，397-98

at Osborne，Isle of Wight，443，480-83

political positions，394-96，416，421-32

political prime of，426-32，446，475

Prussian visit（1888），440-41

public image，429，432，433-35

racism and Indian servants，454-55

resurgence as a politically active monarch，395

rise of European nationalism and，468-69

Rosebery and，446

Salisbury and，420，446，456，461

scorn for “fast” women，398

secrets buried with her，486

son Bertie and，397

Speech from the Throne dispute，394-95

Sudan crisis and，412-14

tableaux for entertainment，453-54

Tennyson and，405，421-22

Third Reform Bill and，416

Tory Party and，394

women’s rights opposed by，397-98，432n

workload of，492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255

Victoria Eugenie，Princess（granddaughter），419

Victoria of Hesse-Darmstadt，Princess（granddaughter），417n

von Hanstein，Alexander，126

Walters，Catherine，357

Ward，E.M.，270

Ward，Yvonne，xliii，167

War of 1812，63

Waterpark，Lady Eliza Jane，336，337，349

Wellesley，Gerald，317n，343，356-57

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28，32，45，62，103，106，207

Albert and，131，132，160，273

Chartist meeting of April 10，1848，and，231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and，248

Victoria’s wedding and，140

Wells，H.G.，488-89

Westminster Abbey

coronation of King George Ⅳ，8

coronation of Victoria，xxxix-xl，73，75，78-80

Gladstone lying in state at，461

Golden Jubilee，434，436

Whately，Archbishop，90

Whig Party，38-40，62，85，87，89. *See also* Melbourne，William Lamb，Lord

back in power（1845），210-11

ousting of（1841），179-80，182

Palmerston and，235，236-38

in power（1848），241

Victoria and，92，101，110，133，182

Wilde，Oscar，xlv，374，378，462-63

Wilhelm Ⅱ，Kaiser（grandson），288-89，384，437，438-39，468

grab for power，438-42

as head of state，442-43

nationalism of，442-43

Victoria’s burial and，488

Victoria’s death and，481-82，483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and，463

Victoria’s dislike of，439

Victoria skips his confirmation，366

wasted arm of（Erb’s palsy），384，438，468

William Ⅲ，King，128-29，131

William Ⅳ，King（Duke of Clarence，uncle），10，18，25，39，46-48，242

ascendancy，34-35

coronation，41

dying and death，54，59，485

grants Victoria independence and Privy Purse，50

rift with Victoria’s family，41-42，45，47-48，49

unpopularity of，39

Victoria and，41-42，45，47，48，54，59

William of Lowenstein，Prince，152，160

William the Conqueror， xlvii

Windsor Castle， xlvi-xlvii，143，209，214

Albert and changes at，208

Albert arrives in England（1839），119

Albert’s changes at，179

Boxing Day 1841，194-95

bust of Gordon，417

death of George III at，21

family vault at，21

frogs at Frogmore and，371-72

modern toilets installed in，177-78

Royal Archives， xliii，229，481

Royal Burial Ground，Frogmore mausoleum and Albert’s tomb，325，334，491

Royal Lodge，33

St. George’s Chapel，383，407

Victoria at，70，115，338

Victoria at，ice skating，261-62

Victoria at，with John Brown，359

Victoria’s dislike of，315

Victoria’s honeymoon at，145

visit of child Victoria with King George Ⅳ，33

Winterhalter，Franz Xaver，216

Wives of England，The（Ellis），152，161

Wolseley，Lord Garnet，417，475

women，13n，15，466-67

activists，69，88（*see also specific women*）

Albert’s views on，271-72，294-95

as “angels of the house，” 466

birth control and，171

breastfeeding and，219-20

chloroform during childbirth and，255，289

in coal mines，202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 and，398-99，403

conventions changed by Victoria，67

demeanor taught to girls，29

divorce and，436-37

as doctors，396-98

double standard and，398-400

education of，26-27

Factory Acts and，203，381-82

“fast” women，305-6，398

female illnesses，147-48

first child after marriage，220

first lioner tamer，214

women（*cont’d*）：

forbidden at funerals，21

forbidden to watch parliamentary debates，53，85

Gladstone opposing rights for，432n

Gypsy，53-54

Infant Custody Act，466-67

Local Government Act，467

marriage and，152

marriage and man as master，270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s of 1870 and 1882，396，466

maternal mortality，156-57

Melbourne’s position on，88

menstruation and，42-43

middle-class expectations for，252，253

as moral guardians of the hearth，161

pregnancy and behavior，158

pregnancy myths，156

principle of coverture，396

prohibited from becoming doctors，148

as property of their husbands，396

prostitution and，398-400，400n

in public life，467

radical change and，69

Regina v. Clarence，466

Regina v. Jackson，466

“the revolt of the daughters，” 466

rights demanded by，1870s，396

rights of，13n，15，88，397-98，432n

sex，desire，and，147-48

sexual misinformation and，148

social reforms under Victoria，466

spinster existence of youngest daughters，418

suffrage movement，396-97，403，432n，467，489-90

as unfit to rule，160-61

in Victorian world，13n

Victoria opposing rights for，397-98，432n

Victoria’s impact on，488-89

Victoria’s sisterhood of widows，336-38

viewed as innately inferior，161

widows in Victorian England，337-38

working women，293

Women’s Franchise League，397

Woodward，Llewellyn，251

working class，13，13n，14-15，68-69，81. *See also* child labor

Albert’s reforms and，233，239-40

Coal Mines Act of 1842，202

Factory Act，381-82

Factory Act of 1844，202-3

fatigue and depression among，18

life of aristocracy vs.，203-4

political attention to，202-3

Shaftesbury’s bill defeated，204

social unrest of 1848，228-33

Toryism of，381

World War Ⅰ，14

Franco-Prussian War and，362

Wright，Peter E.，402n

Zulus/Zululand

Boers and，469，476

massacre，392

zu Solms，Alexander Graf，1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上下/（澳）茱莉娅·贝尔德（Julia Baird）著；陈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

书名原文：Victoria：The Queen：An Intimate Biography of the Woman Who Ruled an Empire

ISBN 978-7-5201-5069-9

Ⅰ.①维… Ⅱ.①茱…②陈… Ⅲ.①维多利亚女王（Victria 1819-1901）-传记 Ⅳ.①K835.61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2781号

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上、下）

著者/〔澳〕茱莉娅·贝尔德（Julia Baird）

译者/陈鑫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9.25 插页：2 字数：576千字

版次/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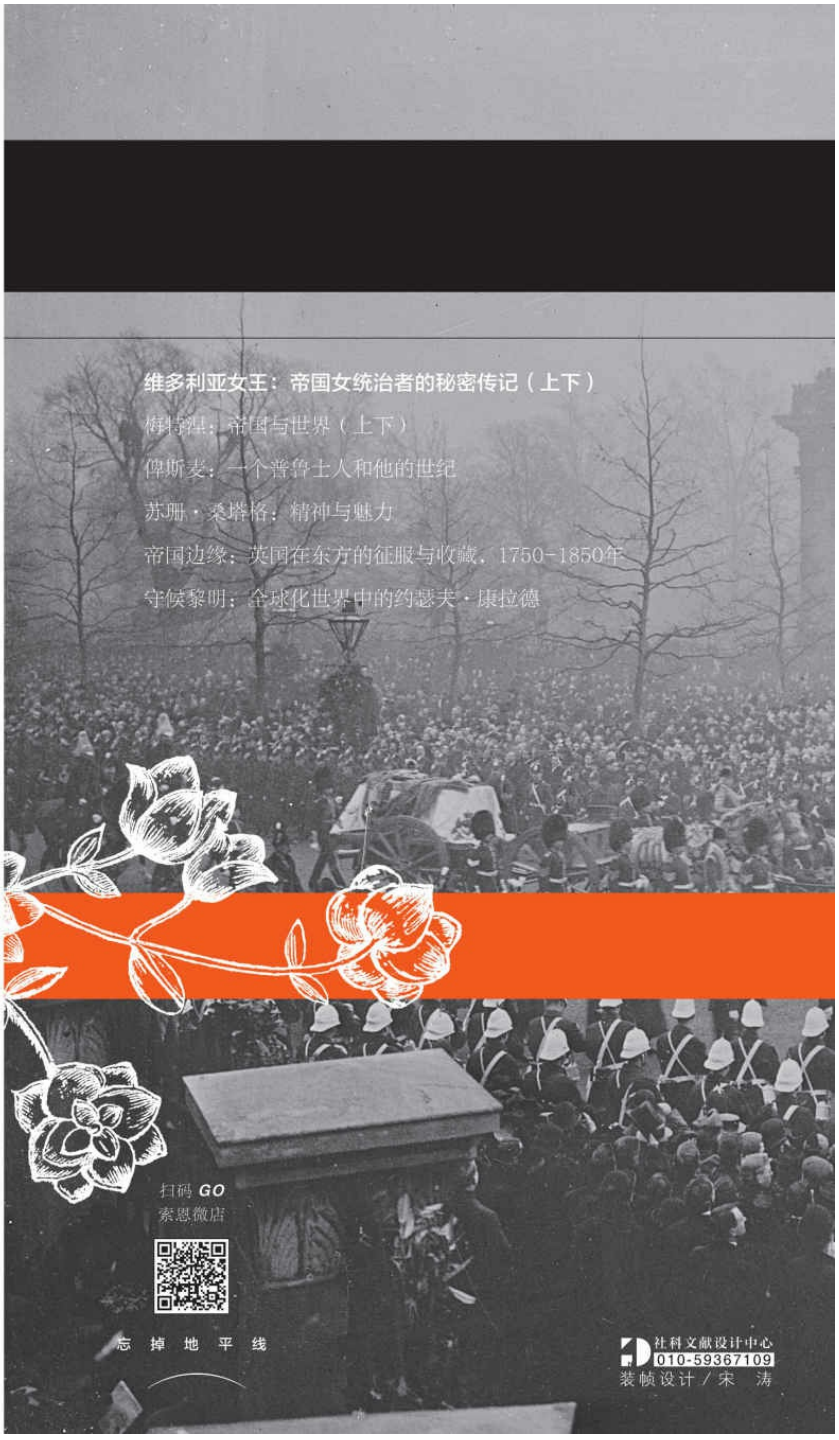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201-5069-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1365号

定价/118.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上下）
科学组：帝国与世界（上下）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
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扫码 GO
索恩微店
忘 掉 地 平 线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 她发动中英鸦片战争，加冕印度女皇

— 她是威廉二世痛恨的外祖母，也将血友病基因传到了罗曼诺夫皇朝

— 她每日写作 2500 字，死后却遭受了最大规模的出版审查

— 她一生生育 9 个儿女，长期与焦虑抑郁抗争，寻找认同、探寻意义

— 一个有关爱情与心碎、忠贞与悲伤、力量与坚韧的故事，一部颠覆传统认知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

被《纽约时报》、《时尚先生》杂志、芝加哥公共图书馆评为年度图书

《维多利亚女王》是朱莉娅·贝尔德经过精巧构思和严谨调查撰写的一本人物传记，为这位卓越不凡的君主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推荐）

这本新鲜出炉的大作是贝尔德对维多利亚进行的一次权威刻画。她展现了剥夜印象，对女王的描写细致入微，重塑了她的形象……贝尔德笔下的维多利亚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女性。她笔下的女王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的女性，但她多变、感情外露、热爱性爱并且动力十足……她的故事写于今天，她构建了一个强力的强大的君主人物形象，她后一刻地剥落伸出了一个丰满的人物，[illegible]，并且[illegible]。

——《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推荐）

[illegible]

——玛丽·克莱尔

与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一样，贝尔德以小说家的方式写作，她的书中充满了令人无法抗拒的细节和描写。

——《西雅图时报》



索·恩
THORN BIRD
忘 掉 地 平 线

索 恩官方微信

索 恩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5069-9

定价：118.00 元（上、下）



天鹅之舞

普利策奖入围作品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一个充满文化、魅力与特权的世界
一首唱给世纪末巴黎的挽歌

Proust's Duchess
How Three Celebrated Women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Fin-de-Siecle Paris

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

[上]

〔美〕卡罗琳·韦伯 /著
马睿 /译

CAROLINE WEB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献给格洛丽亚·范德比尔特·库珀，

以崇拜，以热爱

让我的血液流入你的思想。

让我的血脉涌进你的梦境，

为它们填满美丽的猫眼石。

你的爱，由我的梦筑成。

——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与你有关》（*Tua Res Agitur*）

（1887年前后）

如此说来，那世间最美的梦之花

叶脉中流淌着我们的血，又以我们的心灵为根。

——马塞尔·普鲁斯特，《路易·冈德拉先生的〈小鞋子〉》

（1892年）

- 天鹅之舞：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上册）
  - 序曲 宛如天鹅
  - 第一部分
    - 第1章 稀世珍禽（1885年6月2日）
    - 主题旋律 美丽的鸟儿
      - 第2章 我的唐璜，我的浮士德
      - 第3章 阴影王国
    - 哈巴涅拉舞曲 自由的鸟儿
      - 第4章 波希米亚的孩子
      - 第5章 衰亡与兴替
      - 第6章 余桃偷香，红杏出墙
    - 即兴曲 鸟鸣和鸟羽
      - 第7章 被看见的艺术
    - 短曲 鸟之歌
      - 第8章 白马王子
      - 第9章 巴黎，无论高低贵贱
      - 第10章 当代阿拉米斯
- 天鹅之舞：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下册）
  - 第一部分
    - 众赞歌 相思鸟
      - 第11章 疯子、情种和诗人
      - 第12章 跛脚鸭
  - 第二部分
    - 变奏曲 笼中鸟
      - 第13章 未曾送出的吻
      - 第14章 十四行诗的素材
      - 第15章 天堂鸟
      - 第16章 比才夫人的画像
    - 华彩段 画家、作家、鹦鹉、先知
      - 第17章 优雅入门
      - 第18章 我们的心
    - 帕凡舞曲 配对
      - 第19章 普鲁斯特的幻灭
    - 挽歌 悲情鸟
      - 第20章 人已逝，爱未央
      - 第21章 后备情郎

        - 第22章 女神与恶魔
        - 第23章 只要姿态优美
        - 第24章 须臾之物的王（1894年5月30日）
    - 回旋曲 真正的禽鸟之王，或幼王万岁
- 尾声 天鹅绝唱
- 致谢
- 附录一 作者附言
- 附录二 法国政权更迭年表，1792—1870年
- 附录三 社交专栏作家普鲁斯特
- 插图权利说明
- 参考文献
- 索引

索·恩
THORN BIRD

天鹅之舞



普利策奖入围作品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一个充满文化、魅力与特权的世界
一首唱给世纪末巴黎的挽歌

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夕年

Proust's Duchess
How Three Celebrated Women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Fin-de-Siecle Paris

[上]

〔美〕卡罗琳·韦伯 / 著
马睿 / 译

巴黎

CAROLINE WEB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卡罗琳·韦伯（Caroline Weber）/ 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已出版的著作包括《罪与美：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2006）和《恐怖与其牢骚：可疑字眼与法国革命》（2003）。她目前住在曼哈顿。

图书策划人 视觉传达匠
联合创立

天鹅之舞

Proust's Duchess

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

How Three Celebrated Women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Fin-de-Siecle Pari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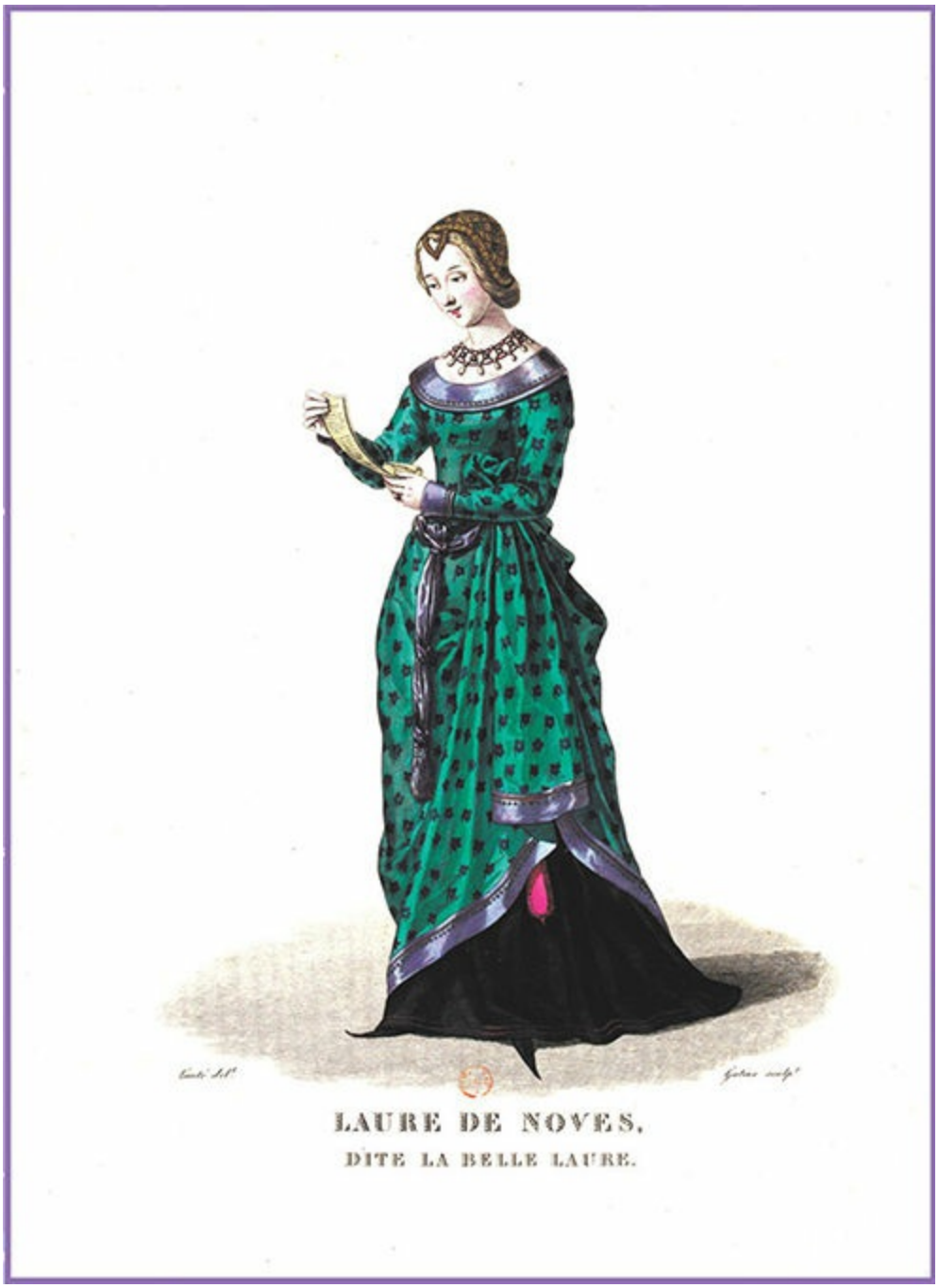
27岁的格雷弗耶子爵夫人（后升为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德·里凯·德·卡拉曼-希迈（约**1887**年），波托-里什开始在玛德莱娜教堂她的祷告长椅上留下匿名情书的那段时期。纳达尔摄



26岁的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夫人洛尔·德·萨德（**1885**年）。普鲁斯特喜欢她那双眼皮耷拉的碧眸、淡红金色的头发和精致的鹰钩鼻。纳达尔摄



埃米尔·斯特劳斯夫人（**1887**年），**38**岁的热纳维耶芙，也就是**16**岁的普鲁斯特首次在高中学校里与她的儿子雅克·比才建立友谊的那一年。纳达尔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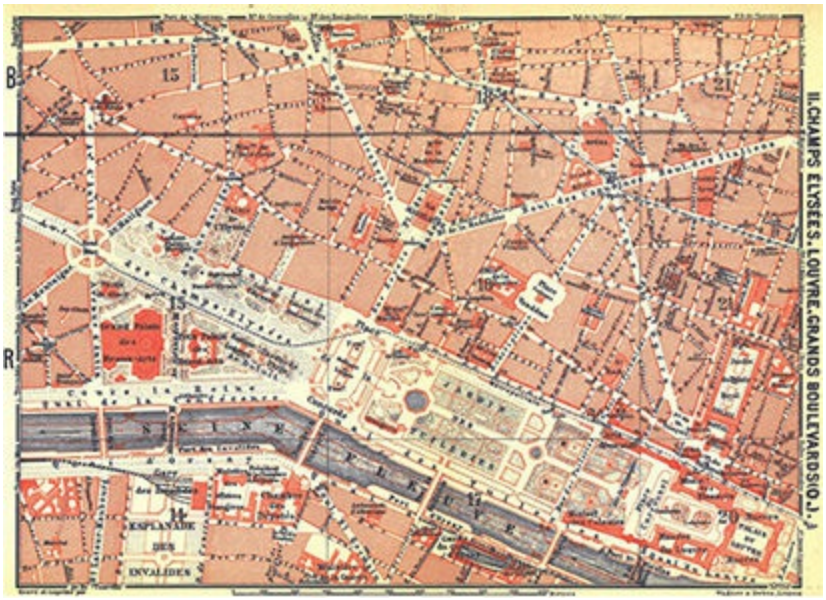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彼特拉克为洛尔的女性祖先洛尔·德·诺韦斯创作了大量抒情诗，**1327**年，他在阿维尼翁远远地爱上了这位女士。洛尔身为这位著名缪斯的后代，成为她人格面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面向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奥丽阿娜的着迷始于他童年时期观看讲述她的一位中世纪祖先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故事的幻灯片。洛尔声称自己是她的后代



巴黎最时髦的街道之一，香榭丽舍大道，成为本书中许多重要事件的场景，从维克多·雨果**1885**年**6**月的葬礼到伊丽莎白·格雷弗耶**1887**年**5**月在短程加速赛上露面，再到马塞尔·普罗斯特**1892**年春天跟踪洛尔·德·舍维涅



19世纪末的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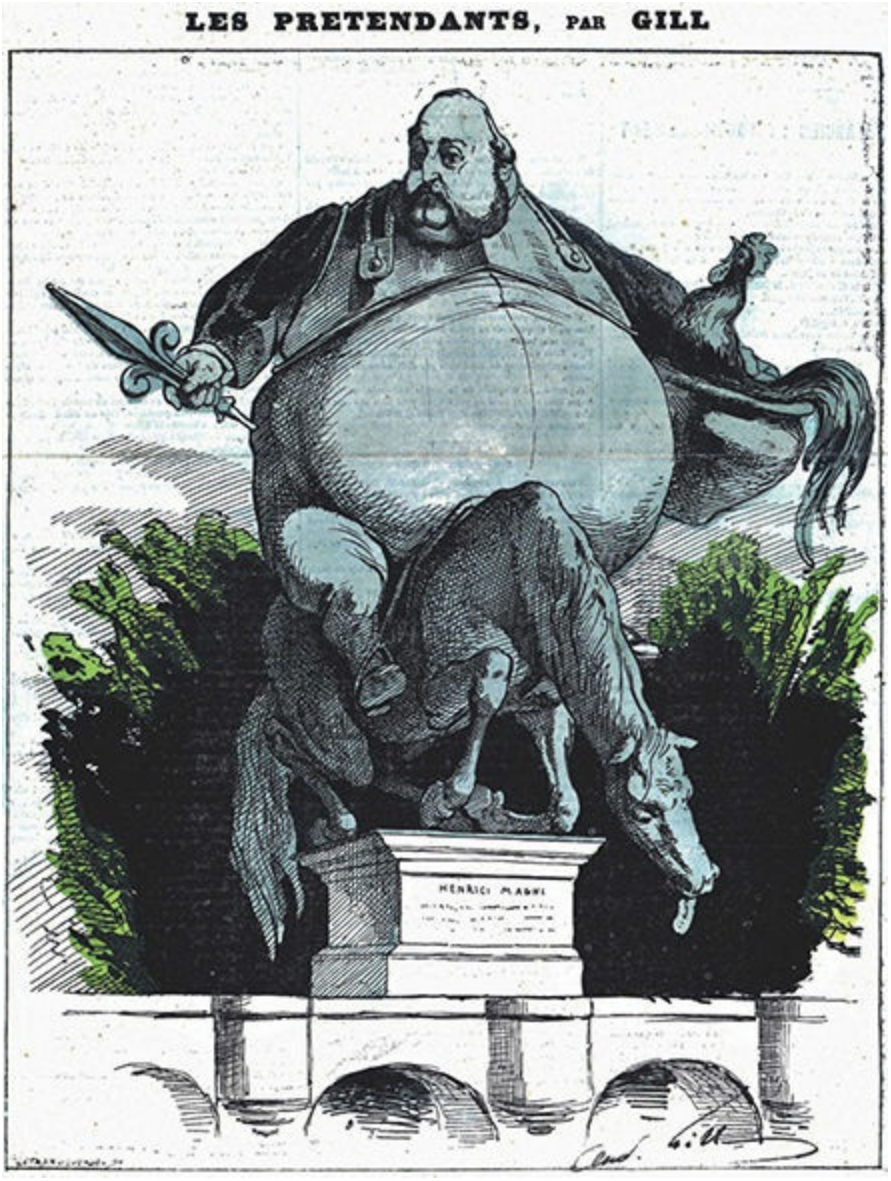
1885年萨冈舞会上的蜜蜂芭蕾舞源于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流浪的犹太人》中的一个舞蹈片段。在德·萨冈亲王夫人的版本中，舞者是来自巴黎贵族最高阶层的**24**位“蜜蜂”



古老的德·希迈城堡，有护城河环绕，位于比利时埃诺省，这是伊丽莎白父亲家族的祖宅。孩童时期，她和兄弟姐妹与亲戚家的孩子们一起在城堡的私人剧院里上演戏剧，那是效仿法国王室的枫丹白露宫剧院建造的



居斯塔夫·莫罗的《花园里的莎乐美》。伊丽莎白和母亲一起在**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看到这幅水彩画，母亲米米后来买下了这幅画送给她。伊丽莎白对这位有着致命诱惑力的圣经公主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这幅法国波旁王朝最后一位王位觊觎者、流亡的德·尚博尔伯爵的漫画刻画了他骑在自己的爱马“群众的要求”上的形象。他在**1873**年复辟的失败，揭穿了他关于法国人盼望他回来登基的谎言



埃德加·德加的《卢多维克·阿莱维与阿尔贝·布朗热-卡韦在歌剧院后台》（**1878**～**1879**）。热纳维耶芙的堂兄卢多维克（左）是一位备受赞誉的剧本作者、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许多艺术家朋友，包括德加，都成为她沙龙里的常客



弗洛蒙塔尔·阿莱维是**19**世纪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作为他的女儿，热纳维耶芙自幼在音乐家、作家和艺术家中间长大。她的第一位丈夫乔治·比才曾在巴黎音乐学院跟随弗洛蒙塔尔学习



让·贝罗的《一场晚会》（**1877**年）。这个聚会场景精准描绘了世纪末巴黎社交界那种优雅的氛围，晚会要求女性必须穿有紧身衣的曳地长裙，男性必须穿着正式晚礼服，男女都必须戴手套



欧仁·拉米《德·萨冈亲王夫人举办的一场化装舞会》（**1883**年）的试画。亨利·格雷弗耶委托他创作了这幅作品，亨利（正中）装扮成扑克牌中的国王参加了**1883**年的萨冈舞会。伊丽莎白（左）装扮成**“**夜后**”**。她身后那位红头发、络腮胡、戴着白色轮状皱领的男人就是无处不在的夏尔·阿斯



出现在伊丽莎白和热纳维耶芙两人沙龙中的博物馆级法国古董——有博韦绣帷的**18**世纪长靠椅，绣帷上再现了画家让-巴蒂斯特·乌德里为《拉封丹寓言》（**1694**年）所绘的插图



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的《蝙蝠猎人》（**1885**年）。伊丽莎白**“**按布列塔尼人的规矩称之为舅舅**”**的孟德斯鸠在这幅自画像中时年**30**岁，他是个浮夸的同性恋美学家和诗人，鼓励她形成了一种极尽奢华的个人风格。蝙蝠是他的图腾

序曲 宛如天鹅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来不是个早起的人，但1892年春天有一阵子，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了。[1]

他的作息习惯始终如一。普鲁斯特家的公寓楼位于玛德莱娜广场附近，是短短几十年前与巴黎的城市大道一起拔地而起的奢华住宅楼之一。每天匆匆梳洗穿戴完毕后，他出门一路向西，走去右岸最著名的街区——圣奥诺雷区（Faubourg Saint-Honoré）。

19世纪下半叶，这里到处是闲游者，但时年20岁的法学生普鲁斯特可不是个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去追寻优雅，虽然他并不认识她（没错，优雅的化身是一位女士），但知道她住在哪里。他每天早上不顾惜自己虚弱的身体，正是要赶向那里。正如他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向她坦白的那样，“当年，每次见到你，我的心脏病都会发作”[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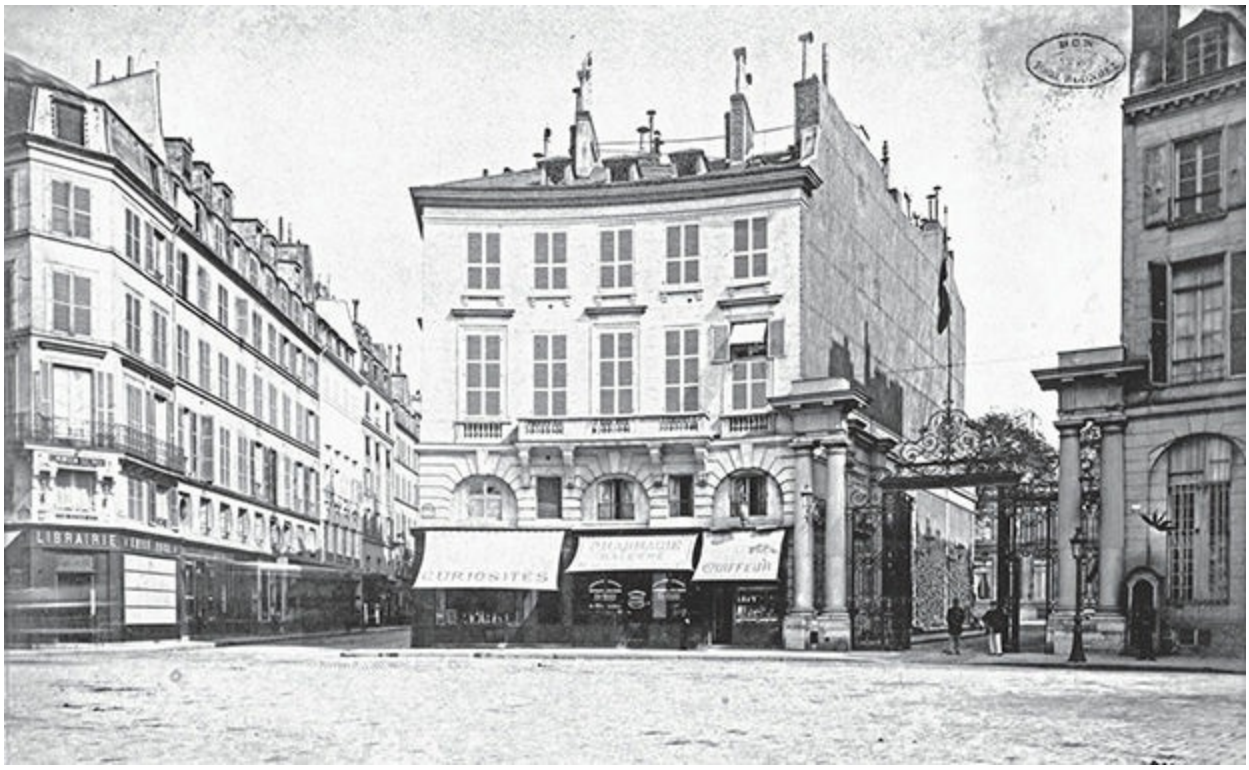
他每天踏上的危险旅程是同一条路，还特意为它取名为“我的希望路线”[3]。它的起始点是普鲁斯特家的公寓楼，那座七层的石灰岩楔形建筑就像迎头穿过激流的船首一样，把马勒塞尔布大道（boulevard Malesherbes）上繁忙的交通一切两半。出门向右急转弯，立刻就来到了阴森静默的德·拉维勒-勒维克街（rue de la Ville-l’Évêque），那条短短的小巷沿街有一排单门独户的府邸，或称私宅。快到内政部时，普鲁斯特会突然左转，沿着仅有一个街区那么长的柳林街（rue des Saussaies）走进博瓦乌广场（place Beauvau），在那里稍停片刻，时间刚够他记下埃米尔-保罗书店橱窗里展示的那些书名。然后他再次右转，进入宁静的街区。再快步走五分钟就到目的地了：米罗梅尼尔街（rue de

Miromesnil）34号，一座狭窄的四层住宅楼。

这座建筑的外立面是廉价的灰泥外墙，装着老虎窗的屋顶呈炭黑色，看上去并无出奇之处。它建于一个世纪之前，里面没有普鲁斯特与家人在家中享受的那些现代设施：电梯、高效的通风装置和有自来水的浴室。然而这座建筑物的破败一隅就是他眼中的“应许之地”，神圣的原因是有一位女神住在那里，他此刻站立在大楼前门对面的人行道上，焦急地等待着女神的出现。

大多数早晨，他无须等太久便能看到她款款而出。这位娇小的金发伯爵夫人年纪在三十出头，尽管米罗梅尼尔街既不繁忙也不宽阔，但很难不注意到他，她也不会显露出自己看到了街对面呆望着她的那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年轻人。她像往常一样左转进入博瓦乌广场，普鲁斯特会让她先行几步，然后一路小跑跟在她身后。他还算幸运，她这时出门散步往往不会带一位身穿制服的贴身男仆，那是她那个阶层的大多数女性必不可少的陪护，为的正是震慑普鲁斯特的这种行为。

他的夫人迈着矫健轻快的步伐在整个街区漫步（她身材苗条，也希望保持曼妙身材），他紧随其后。她走进富丽堂皇的府邸留下自己的名片时，他就流连在门外；她购物时，他等在精品店外；她每天两次造访协和广场旁边的公爵府（那是她繁忙的社交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他也在府外徜徉。他沿着她最喜欢的香榭丽舍大道一路慢跑，尾随在她的身后，左右躲避着马车和行人，生怕自己跟丢了。他与她保持着一段谨慎的距离，时而够着瞥一眼她挺拔的身形和她“那双清澈澄蓝的眼睛，那是法国天空的颜色”[4]——也是她帽子上矢车菊的颜色。他把她的面孔和服饰的每一个细节记在心里，惊叹着她竟有如此神秘的力量“把普普通通的晨间散步……变成一首优雅的诗作、最精美的饰品和全天下最珍奇的花朵”[5]。



1892年春，普鲁斯特每天早晨都会途径博瓦乌广场的埃米尔-保罗书店（最左），去见德·舍维涅夫人

很显然，一个如此令人心驰神往的尤物不可能只是个普通人，她也的确不是。让普鲁斯特魂牵梦萦的是一位名流（社交场的名女人）[6]：王室之友、艺术家的缪斯、贵族圈的焦点、社会专栏的宠儿、陌生人的奇想，以及，他写道，最为“至高无上的荣耀”[7]之精华——除了她，只有“白孔雀、黑天鹅……皇宫禁苑里的女王”才会拥有这一切。然而这些特质也让她在这位年轻的崇拜者眼中那样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因为他和他的名媛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区，但他们的社交圈子却有着天壤之别——她来自上层贵族，而他来自上层资产阶级。

尽管如此，普鲁斯特仍然怀揣希望，渴盼着有一天她能够把他收入她的羽翼之下，带他去那纯洁而妙不可言的美丽仙境。因此他每天早晨都紧跟在她身后，像一条尾随着天鹅的流浪狗。

正如传记作家乔治·佩因特（George Painter）所说，这是“一种荒谬的求偶方式”[8]——普鲁斯特本人中年时也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那时他感伤地说到自己少年时企图“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树荫下抓住一只天堂之鸟”[9]。在当时，那场徒劳的追求确实给他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他的跟踪行动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后，一个春天的早晨，伯爵夫人猛然转过头来对着他，发出尖利的斥责之声：“菲特亚穆在等着我呢！”[10]

她对普鲁斯特说的这第一句话就让他彻底泄气了，原因有二。罗贝尔-詹姆斯伯爵[11]与普鲁斯特可谓天上地下：他是勇敢的海军前军官和波旁王朝的廷臣，家人和朋友的名字出现在《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中，那是王室和上层贵族阶级的社交名人录。（伯爵家的一家之主，阿尔瓦、贝里克和菲茨-詹姆斯公爵[12]据说是全欧洲头衔最多的男人，衣服上的纹章比英女王的还要多。）只有贵族们知道菲茨-詹姆斯这个姓氏的法语发音是“菲特亚穆”，他是出色的骑手和射手，是巴黎最崇尚动感、筛选最严格的男子俱乐部“骑师俱乐部”（Jockey）的中流砥柱，该俱乐部拒不接受平民和犹太人早已尽人皆知。论起让他的少妇心有所钟的情敌，年轻的普鲁斯特不可能想到比罗贝尔·德·菲特亚穆更令他望而却步的对手了。[13]

更令普鲁斯特心灰意冷的是，女神的声音一点儿也不符合他在头脑中为她构造的绝美形象。她总算开口跟他说话了，他本该听到天籁之音，但事实上听到的却是一只坏脾气鹦鹉的嘶哑叫声。他的稀世珍禽就这样消失了。“或许关于她的美，最为真实的东西存在于我的欲望中，”第二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她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或许只有我曾在梦中与她相遇。”[14]

这个结论只对了一半。的确，普鲁斯特在现实世界见到了自己梦里的珍禽。然而在他出现之前，有无数人也曾梦到过她，将她想象成为一首诗、一个女王、一朵奇花，抑或一只仙界的天鹅。或许他并没有意识

到，他们的梦曾经渲染和影响了他自己的梦境。

夫人自己的梦也是一样。她的确过着自己的生活，但她有现实和虚构两种生活，而且和梦到过她的无数人一样，她也强烈偏爱虚构的领域。不仅他们的梦如此，她也会在梦中看到自己重生为一首诗、一个女王、一朵奇花和一只仙界的天鹅。事实上她不仅在他们的眼中，也在自己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人物。早在她与一个名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无名小子遭遇之前，这样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

本书讲述了真实人物如何在一个阶级的语境中变成虚构的故事，19世纪末，法国贵族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已是强弩之末，却重生为一个神话。那个象征性重生的核心，就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三个资深社交名媛把自己——同时也被她们身边的人——转变为传奇：集高贵、优雅和时尚于一身的完美典范。她们的名字是热纳维耶芙·阿莱维·比才·斯特劳斯（Geneviève Halévy Bizet Straus，1849-1926）、阿代奥姆·德·舍维涅（Adhéaume de Chevigné）伯爵夫人洛尔·德·萨德（Laure de Sade，1859-1936），以及格雷弗耶子爵夫人（Vicomtesse Greffulhe，后升为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德·里凯·德·卡拉曼-希迈（Élisabeth de Riquet de Caraman-Chimay，1860-1952）。

《天鹅之舞》是这三个女人的传记。本书追踪了她们走上社交巅峰所选择的纵横交错的路径，研究了她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富有创意的策略。本书讨论了她们如何征服了一个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确立形象是归属其中的前提和必须付出的代价。本书揭示了她们的得失，当自我变成人物、生活变成故事，她们隐藏了什么，又将什么公之于世。本书论述了她们最耀眼的成功，也揭开了她们最幽暗的秘密。本书跟着她们一起走进众星捧月的炫目光耀之地，也随她们再度遁入强光近旁的孤独暗影。本书既展示了她们希望在世人眼中留下的形象，也剖析了她们在观众退去之后现出的孤形单影。

本书的三位女主人公均受困于不幸的婚姻和既有的性别规范，通过把自己重塑为偶像，寻求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满足。她们把自己重塑为一个传奇的巴黎封邑的原型人物，那块封邑是由来访的各国王公和当地贵族组成的，有人称之为“社交界”（上流社交界的简称），有人称之为“上层”，也有人称之为“城区”（贵族城区的简称）。[15]

这个社会简直是时代倒错，它所依靠的世袭特权和宫廷雅趣传统是不复存在的旧制度的残留。这些传统与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大革命（1789—1799）的领袖们推翻君主制、铲除贵族阶层所高举的平等主义旗帜背道而驰，第三共和国（1870—1940）政府仍旧在宣扬那些原则，毫不顾及贵族的利益。[16]

然而悖论是，整个世纪末，城区始终保持着绝对的社会和文化权威；法国的确已经民主，但贵族头衔仍是终极的地位象征。在这一点上，没有谁比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资产阶级政治家阿道夫·梯也尔[17]的态度更加坦诚了。1871年，当法国头衔最高的贵族德·于扎伊公爵（Duc d’Uzès）祝贺他当选总统时，梯也尔脱口而出：“哦，但梯也尔夫人觉得还是当公爵夫人更光彩些！”[18]

如此垂涎贵族荣耀的绝非总统夫人一人。正如1898年小说家儒勒·列那尔[19]所写的，

> 自革命以来，我们的共和国丝毫没有朝着（平等）或自由迈出一步。在这个共和国，人人都渴望受邀去格雷弗耶（夫人）的家中做客。[20]

还有一位评论家称之为“公爵夫人们的胜利”[21]，如此口是心非的矛盾状况和上流社会本身一样持续着，直到颠倒乾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作为这座英灵殿中的女神，德·舍维涅夫人、格雷弗耶夫人和斯特劳斯夫人对她们那个特权圈子内外的同胞都充满了无限魅力，然而三人中无一是公爵夫人，斯特劳斯夫人甚至根本没有贵族头衔。这突出了她们非凡而出奇的成就。在社交界，公爵夫人本来就比伯爵夫人（更不用说平民）优越，这一贯毋庸置疑。如果说这三个女人的光芒渐渐盖过了圈子里的公爵夫人们，她们并非通过拒斥世袭和头衔这类久经考验的价值观，而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重塑了那些价值观。在大众传媒兴起的历史时刻，民意在法国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有着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能量，这三个女人不但清楚阶级特权对势利之人的吸引力，还为它注入了一套全然现代的公关传播和自我宣传的技巧。

作为连接历史和现代的桥梁人物，格雷弗耶夫人、斯特劳斯夫人和德·舍维涅夫人要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观众：一种是上层精英，另一种是一般公众。为了在贵族阶级内部树立和维持自己的声望，她们采纳了那个圈子中久负盛名的优雅和排外信条，完善了其追求奢华的贵族风格方面的天赋，结交出身全欧洲最宏伟奢侈的庄园的朋友。与此同时，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公众，她们培养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编辑、画家、雕塑家、作曲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服装设计师和摄影师。她们作为先驱预言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在这个世界里，声名本身便足以彰显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她们把自己“作为有血有肉的素材”献祭给了“十四行诗和小说”[22]，许多作家都曾在作品中写到过她们，说此话的人就是其中之一。

同样，斯特劳斯夫人、德·舍维涅夫人和格雷弗耶夫人也没有单纯依靠他人来构建自己的公共形象。她们摆出的姿态和编织的故事为塑造自己令人难忘的人格起到了积极乃至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她们在创造力和社交声望之间进行了复杂精妙的权衡。发挥想象力除了创造审美价值外，还为这三个女人发挥了多种不同的功能，它是逃生出路，又是自我营销的高招；是应对机制，又是诱惑技巧；是对历史的修

正，又是对自我的肯定。它诱惑她们每个人，时而是逃离现实的手段，时而是精神失落的解毒剂，时而是爱的替代品。即便素日维护贵族荣耀的政治秩序正在她们身边分崩离析，狭义和广义的艺术创作仍使她们得以演出一部彰显贵族荣耀的奇幻人生。

本书记录了这三位女性如何一步步登上不久便会彻底消失的社交界的顶峰，揭示了普鲁斯特即将在他的七卷本半自传体小说《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中讲述的那个半真实故事的真实前史：贵族理想的式微和终结。

天鹅死去之前，必先高歌一曲。

马塞尔·普鲁斯特对真人转化为虚构之事略知一二。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段，第一人称叙述者（后来被称为“马塞尔”）忆起孩童时期在床上读书的场景。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之时，成年马塞尔回忆那个年轻的自己，“我总觉得书里说的事儿……全都同我直接有关”[23][24]。全书充斥着这样的沉迷幻想，整部小说记录了叙述者逐渐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追忆似水年华》的主人公出身的家庭就是以文学和艺术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他至关重要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母亲为他大声朗读乔治·桑的《弃儿弗朗沙》（*François le champi*，1848）。即便她跳过了桑的小说中那些更有性暗示意味的段落——书名中的那位弃儿与抚养他长大的老年女性之间的爱情，其核心的类乱伦式爱情也呼应了她与马塞尔之间极为亲密的情感。[25]

文字同样在叙述者的母亲与外祖母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两位女人互相使用的那种温柔的私密语言起源于塞维涅夫人[26]的母女通信，那些信件记录了路易十四时代的社会规范。另一位为长期执政的国王路易十四时代作传的作家圣西蒙公爵[27]，他的那些轻慢的讽刺语句可见于

马塞尔的祖父和他们家的老朋友——一位名叫夏尔·斯万的人物之间的彼此揶揄。当祖父怀疑孙子的一位同学可能是犹太人时，他狡猾地哼起了弗洛蒙塔尔·阿莱维[28]的歌剧《犹太女》（*La Juive*，1835）。多年后，当一家妓院的鸨母给叙述者本人介绍一位与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同名的充满“异国风情”的犹太妓女时，他也忆起那部歌剧中的咏叹调——“拉谢尔，当从天主！”[29]

对马塞尔而言，剧作家让·拉辛[30]的悲剧是他自始至终的参照物，不管是在父母逼迫他穿着夸张行头照相而大哭的时候，还是在注意到两位隐瞒性取向的同性恋贵族青年对聚会上的一群外国年轻外交官产生了性欲之时，他都会想到那些悲剧。绘画则为他提供了另一套丰富的类比。当他震惊地听说一位尊贵的侯爵夫人认识他的父亲时——父亲是一位中产阶级公务员，与夫人的社交圈并无明显交集，马塞尔把她比作居斯塔夫·莫罗[31]的《朱庇特与塞墨勒》（*Jupiter and Semele*，1895）中那位超大号的众神之王，把自己的父亲想象成聚集在朱庇特王座下面的那一群蚂蚁大小的人物中的一员。戴着白色领结的男爵会让他想起惠斯勒[32]的《黑白协奏曲》。在诺曼底的一个海滨度假村，海鸥布满淡蓝色的天空，恰如“莫奈……一幅油画中的睡莲”。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习惯了戴着艺术的透镜来观察生活，因而在他看来，爱情也同样首先是发挥想象力的练习。他最早倾注情感的对象是他家的一位邻居，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Oriane de Guermantes）。这位贵妇人的年纪更接近于他的母亲，而他也从未见过她。叙述者的痴迷起源于他着迷地研究德·盖尔芒特夫人祖先的画像，他们是法国最古老、最伟大的贵族王朝的后裔。[33][34]稚气的他痴念着那些描绘着中世纪女城堡主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35]的传说的幻灯片，据说公爵夫人就是那位女城堡主的后裔，他还会细细欣赏家附近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和挂毯，在那里寻找其他封建时代的盖尔芒特家人的影子。

基于这些描述，马塞尔逐渐把公爵夫人想象成法国那个浪漫的、骑士的、以贵族为主的过去的象征。“过去一想到德·盖尔芒特夫人，”他解释说，“我总是在心中用挂毯或彩色玻璃窗的色调描绘她的形象，把她想象成另一个世纪的模样，举止气派与普通人完全不同。”就连“盖尔芒特这个姓氏”也会让他想起“童话故事，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画着国王查理八世的挂毯”，或者正如学者多米尼克·于连（Dominique Jullien）所说，让人想起中世纪怪物大全中的“加拉曼特[36]神鸟”[37]。

成年后，叙述者对公爵夫人的兴趣从中世纪转到了现代，但仍然保留着幻想的特质。从她的朋友斯万那里听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是“巴黎最高贵的人，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菁华”[38][39]，马塞尔现在把她看成魔法王国的守护人和女王，他担心自己低微的出身会永远将他隔绝在那座王国之外，那是历史和神话继续存在的疆土，还顶着当代最时髦的光环。他在报纸的社会版面读到她在德·莱昂亲王夫人（Princesse de Léon，那是世纪末上层社会真正的行家里手）举办的化装舞会上轰动一时的穿着，并一丝不苟地记下那些细节。在歌剧院，叙述者坐在远处凝视着公爵夫人和她的一位表亲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把“这两位富有诗意的女性”[40]比作古典神话中的女神——“美丽超凡的迪安娜[41]”[42]与“（手持）饰有流苏、闪闪发光神盾的米涅瓦[43]”[44]。公爵夫人那件素雅而时髦的服饰在他看来就像“鸟的羽毛，不仅是美的装饰品，而且是身躯的外延部分”[45][46]。

有几个月，他甚至在德·盖尔芒特夫人每天沿右岸散步时跟踪过她。在那些出行中，马塞尔想象自己正尾随着“一个变成月桂树或天鹅的天神”，每想到这里，便更是激动不已。然而有一天，他看到公爵夫人心烦意乱地扯拽自己的面纱和大衣，“像个普通女人那样”对自己的外表吹毛求疵。这个小插曲中的平凡性让普鲁斯特感到恐惧，但讽刺的是，他再度启用自己的神话奇想，把她比作“像天神变成的天鹅，做着它那一类动物的种种动作……忽然向前抓住门把或雨伞，完全是天鹅的

动作，忘记了自己是天神”[47]。

德·盖尔芒特夫人突然丧失神性给叙述者带来的惊恐，暴露出他用虚构改写事实的习惯。对他来说，未加粉饰的真实看起来永远不如经过一番华丽装饰来得美好；现实总是令他失望。在公爵夫人的例子中，马塞尔只在她的宅邸参加了一次晚宴，就发现他梦想中的女郎事实上竟然是一个噩梦。她任性、冷漠、做作而浅薄，只关心哪些琐碎的细节能改善她的绝妙形象：她买来画作和书籍不为欣赏和阅读，而是为了炫耀自我标榜的知性；她与知名艺术家的“友谊”也同样为了装饰，虽然她浮夸地宣称“在她看来，天才胜过一切”，事实证明，她对他们的画作要么嗤之以鼻，要么一无所知；她骄傲地提及自己的家族关系，却对他们没有丝毫真诚的情谊；表面上对仆人“充满仁慈”，私下里却总是虐待他们。就连她为社交界友人们一致称道的机敏诙谐，“也大多是些空洞的笑话、羞辱的言辞、令人不知所措和幼稚自大的双关语”。她那些贵族头衔的朋友们也同样令人失望——他们和女主人一样浅薄，甚至连她那点虚有其表的教养和魅力也没有。[48]

在近距离观察公爵夫人及其同类之后，叙述者意识到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由于残留的宫廷礼仪规范被彻底颠倒……肤浅的表面（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且意义深远”[49]。虽然之后数年他仍常常光顾盖尔芒特家的聚会——好不容易奇迹般地（简直如幻似梦）受到了那个圈子的欢迎，他可不准备放弃这个特权——马塞尔却不再把他们看作尊贵的“一群天神”下凡了。



这是普鲁斯特的一个从未出版的手稿笔记本，他在里面画了一幅素描，从中可见他心目中的理想贵妇形象介于女神和天鹅之间

在他那部寻找意义的4000页巨著中，还有很多其他幻灭的场景，这次祛魅只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盖尔芒特家那边”与他的期待相去甚远，那么叙述者接二连三为追寻意义所做的其他一切也是一样：家庭、友谊、情爱、性爱、主教堂、演奏会、侦查、怠惰、旅行、新闻报道、印象派、窥阴癖、头戴花朵的少女、身穿制服的少年，等等。一直到《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Le Temps retrouvé*，1927），马塞尔才终于在一个顿悟的时刻解开了自己的谜题，生动地呼应了他孩童时期那个与睡前故事难解难分的梦境。[50]

那个场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地点是德·盖尔芒特亲王和亲王夫人的巴黎府邸。叙述者人到中年又疾病缠身，战争的最后几年都是城外的疗养院度过的，不久前刚刚从那里回来。一到招待会，他就发现在自己离开巴黎的这些年，年轻时的那些显要人物已经衰老得快要

认不出了。他们的样貌衰变得如此剧烈，以至于有那么一刻，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漏掉了这场聚会的某个变态的着装要求：带着你自己的死亡面具。这个被他挖苦地称为死亡面具舞会[51]的场合再度表明，这些上层的“美丽的人儿”并不值得他当年那般尊崇，他们已经不复美丽。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年老色衰，随着她从天鹅女神变成了“一条年岁久远的神圣的鱼”，有些容颜已经淹没在似水年华和蹉跎岁月（法语的“Temps perdu”既有“似水年华”之意，又有“蹉跎岁月”之意）的原始泥沼中。即便战争已经摧毁了她那个浮夸和特权的世界，她早已是明日黄花，年龄仍然不依不饶地侵蚀了她的容貌。

与公爵夫人无关紧要地寒暄几句之后，马塞尔退到主人的书房，她那特有的沙哑刺耳的声音仍然萦绕在耳际，“就好比宣布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但他在那里最终顿悟了：“唯一值得过的生活”是“在书中被照亮和……实现的生活”。[52]他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本《弃儿弗朗沙》，突然意识到只要把那一切——转瞬即逝的快乐、空洞虚假的希望，还有其间的一切——平移到文学中，他便可以找回他担心流逝或蹉跎的所有旧时光。通过为了艺术真实而挖掘自己的经历，他完全可以为那些经历注入它们初次发生时看似缺乏的意义。这一解决方案将艺术和生活编织成一个牢固的戈耳狄俄斯之结[53]，把读者手握的《追忆似水年华》变成了书中的叙述者正要加速书写，以便为自己的故事画上句号的书。是结束，同时也是开始。[54]

普鲁斯特的叙事充满各式各样的人物，背景设置为世纪末巴黎的娇纵阶级，书中的人物与当时当地（那碰巧还是他自己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知名人物极其相似，因而进一步模糊了写作与现实之间的界限。[55]虽然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与他生活中的熟人之间往往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他却始终坚称自己的代表作不是一部影射小说——为容易辨认的当代人物戴上徒有其表的虚构面具的小说。塞莱斯特·阿尔巴雷（Céleste Albaret）曾经在普鲁斯特写作《追忆似水年华》时作为管家服

侍过他。普鲁斯特曾对她抱怨说，一个朋友“问我要开启我这本书的‘钥匙’……这我可给不了。不是因为我害怕或者想把钥匙藏起来，而是因为每个人物都有太多的钥匙”。[56]

然而，普鲁斯特又给了他的叙述者马塞尔许多他自己的识别特征：他的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他那位公务员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流行病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他对母亲的过度依赖，母亲是拉辛、塞维涅和乔治·桑的热心读者；他自己不切实际的学究气质；他的慢性病；他不喜欢为谋生而工作；他在爱情方面的坏运气；以及他对上流社会的强烈兴趣，所有这一切又都引诱人们猜疑他写的就是真实的生活。（普鲁斯特本人还有两个所谓的缺点，他倒没有将之赋予笔下的叙述者：母亲是犹太裔，以及他对男性更感兴趣。他还把他的第二自我写成了独子，因而抹去了他弟弟罗贝尔的存在。）普鲁斯特声称，他的主人公和自己的这些共同点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怠惰：“我给了主人公我本人拥有的特质，就省去了创造他的麻烦。”[57]怠惰是他与虚构的马塞尔另一个共有特质。

为了给全巴黎最显贵的巨人们画像，普鲁斯特随意借鉴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人物。夏尔·斯万这位儒雅而时髦的人物虽然出身中产阶级，又是德国犹太人后裔，却仍然受到社交界的欢迎，普鲁斯特创造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一位名叫夏尔·阿斯（Charles Haas，1833-1902）的人，他交友广泛，颇受欢迎。[58]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伯爵[59]（1855—1921）无意间也把自己的贵族出身、同性恋取向、博学多闻、刻薄气质以及他那件值得惠斯勒为之作画的晚礼服，和他极其好斗的傲慢不逊等特质借给了马塞尔未来的导师德·夏吕斯（男爵）。[60]孟德斯鸠的外甥女婿格雷弗耶伯爵亨利（Henry，Comte Greffulhe，1848-1932）则是夏吕斯那位富有、冷漠、自命不凡的兄弟——德·盖尔芒特公爵巴赞的模板，他难以控制的拈花惹草让他的妻子奥丽阿娜成为“全巴黎最美丽但受骗最深的女人”，他暴烈的脾气则为他赢得了一个绰号，它同样属于

爱发脾气的格雷弗耶——“电闪雷鸣的朱庇特”（Jupiter Tonnant）。[61]

最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个人物是普鲁斯特以三位贵妇人为原型复合而成的，她们共同构成了他关于贵族阶层的优雅和风度的梦想。[62]他在写给这三个女人的信件和关于她们的信件以及其他许多记录详尽的通信中，确认了这三重联系。他的朋友费尔南·格雷格[63]的总结最为言简意赅：“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就是斯特劳斯夫人加上德·舍维涅夫人……还有一点格雷弗耶夫人的影子。”

这三个女人在她们所处的时代家喻户晓，就连陌生人也看一眼便知她们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原型。她们既得到了自己贵族同类的崇拜，也是普罗大众的偶像，在当时所引发的惊叹、迷恋和幼稚的渴望，与21世纪美国社会对公众人物、体育明星和亿万富翁的着迷并无二致。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一生中收到过无数的仰慕信，以至于她的档案中有个很大的卷宗，标记就是“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敬辞和赏识”。（这个卷宗里的文件夹上有诸如“单相思的陌生人的诗歌”和“匿名者的爱慕——1888年”[64]等撩人的标签。）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和洛尔·德·舍维涅都没有那么仔细地保留个人记录，但她们也同样诱发过无数爱慕之情，无论匿名与否。她们也曾令一个时代浮想联翩。

历史的悖论之一，就是这三个在自己的时代名满天下的人，如今只会因为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质借给了一个虚构人物而被世人铭记，哪怕这个虚构人物来自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不过说起来，写过这几个女人的几位传记作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让她们沦为小说家艺术素材的同谋。最早的这类研究，比贝斯科亲王夫人[65]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德·舍维涅伯爵夫人洛尔·德》（*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Laure de Sade，Comtesse de Chevigné*，1950）就把虚构的公爵夫人直接等同于真实的伯爵夫人；最近的一部著作，洛尔·伊勒兰（Laure Hillerin）的《格雷弗耶伯爵夫人：盖尔芒特一家的影子》（*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2015）则逐点分析了她的传主无意间为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个人物贡献了多少素材，大到她的高贵出身，小到她的奥布松扶手椅。[66]

将虚构和真实人物等同起来的做法，逆转了在1913年《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存在于小说家和他的缪斯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因而歪曲了真实的历史。在过去的这一百年间，世人只因为普鲁斯特才会去关注德·舍维涅夫人、斯特劳斯夫人和格雷弗耶夫人。然而他之所以对她们感兴趣，是因为整个社会对她们感兴趣，而整个社会为何会对她们感兴趣，还是迄今尚未有人讲述的故事，无论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还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都没有讲述过。

碰巧，普鲁斯特对这几位"摆好姿势"（他自己的用词）让他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绘制文学肖像的女人们所知甚少。他在1890年代初开始朝巴黎社交界的顶端缓慢而艰难地攀爬之时，其公爵夫人的三位原型早已稳稳地站在巅峰了。她们大他11岁到22岁，都在过去的十年中升到了社交界的荣耀之巅，而他那时还是个读书的少年。普鲁斯特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她们之时，三位夫人主持的沙龙都像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沙龙一样，吸引了"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菁华"：王公贵族、其他显贵，还有精挑细选的各类著名艺术家。正如格雷弗耶夫人的一位宾客对她所说的，"您请王公贵族来给天才们传授礼仪，又请天才们来给王宫贵族们助兴"。或者正如普鲁斯特本人后来提到他笔下的公爵夫人的娱乐哲学时所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恰如其分地认为，高品质的'沙龙'是建立在牺牲"[67]——也就是严格筛选的原则之上的。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名不见经传，还有一半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青年的社交前景实在算不得光明，但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唯一一份进入社交界的介绍信：他高中时代与斯特劳斯夫人的儿子雅克·比才的友谊。凭借这层关系，普鲁斯特于1889年开始参加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那时他

18岁，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即便如此，他足足花了十年时间才与女主人建立了真正的友谊，而即便在那以后，他们的关系仍始终保留着初见时的那一丝拘谨。1910年代，塞莱斯特·阿尔巴雷有些惊讶地注意到，每次斯特劳斯夫人来拜访普鲁斯特（通常都是在她看过牙医之后，因为牙医诊所就在同一座楼里），“她总会按门铃，问我普鲁斯特先生身体如何。她从不越过门厅，普鲁斯特先生从未邀请她进屋，她也从没有提出想要进屋”。

在他成为斯特劳斯夫人客厅里常客的第一个十年里，普鲁斯特不得不委屈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68]在极其偶然的场合，她会邀请他参加午宴或晚宴（那是比她每周的招待会规模小一些、筛选更严格的活动），其间她总是把“小马塞尔”安排在位次最末的座位上。还有一次，她在其他更尊贵的客人（那是她精心配置的一群贵族、富豪和艺术家）面前羞辱他，说她之所以邀请普鲁斯特来，无非是想让他的父亲帮助雅克进入医学院。（普鲁斯特医生照做了。）

通过一场同样长久而执拗的魅力攻势，普鲁斯特终于在1890年代中期与德·舍维涅夫人培养了真挚的友谊，也就是他1892年每天跟踪沿右岸附近散步的那位轻灵的金发女郎。然而她对他也同样势利。和斯特劳斯夫人一样，她也在巴黎举办严选宾客的高级沙龙，但她的沙龙只对像（并包括）“菲特亚穆”那样出身高贵的社交家开放。德·舍维涅夫人招待会的常客正是普鲁斯特最想要结交的那些人——他本人根本没机会进入骑师俱乐部［事实上，就连相对“波希米亚风”的艺术家联盟俱乐部（Cercle de l’Union Artistique）都拒绝接受他］，他从社交界新闻上获知，他们的声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德·舍维涅夫人固执地拒绝把普鲁斯特引荐给他们。1909年，他说在他和伯爵夫人相识的25年里，她从未邀请他来参加自己的沙龙——要知道自1880年代初以来，她几乎每天都会举办沙龙。[69]只有当她推定自己交际的人是普鲁斯特的同类——中产阶级和/或犹太裔的艺术家时，才会对他发出邀请。他曾抱怨说，“德·

舍维涅夫人总是试图把我和波托-里什[70]划为一类”，意指大他22岁的著名犹太作家。“她不明白：我就是波托-里什！”[71]说此话时，普鲁斯特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事实正是如此。波托-里什和德·舍维涅夫人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友，他们之间的通信至少比洛尔一生中跟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频繁和真诚。然而波托-里什也一样，到死也没有受邀参加过一次她的招待会。

至于格雷弗耶夫人，普鲁斯特与她的关系就更脆弱了。他为设法见她所花费的时间最长，她无疑是他未来人物的三位原型中最高高在上的一位。她的表舅和密友罗贝尔·德·孟德斯鸠（1893年，普鲁斯特请求他作为中间人介绍他们认识）喜欢这么问普鲁斯特：“你难道不知道，你出现在她的沙龙中，恰恰破坏了你希望它具备的高贵感吗？”[72]1894年，普鲁斯特终于说服了孟德斯鸠为他引见。但格雷弗耶夫人在其后多年仍然无视普鲁斯特的存在，直到她的女儿1904年嫁给他的朋友吉什公爵阿尔芒[73]之后，才有所缓和。从那以后，她偶尔会屈尊让他来剧院她的包厢里填补空位，或者在她的晚宴上扮演“牙签”——茶余饭后为更重要的宾客取乐的人。但她从未喜欢过他；老年的她对孙辈回忆起普鲁斯特时，说他是个“令人不快的小个子男人，总是躲在门廊那里鬼鬼祟祟的”。[74]有一位美国作家问及他时，格雷弗耶夫人说，“我不喜欢他……他很烦人”。[75]

有这段历史作为背景，难怪普鲁斯特终其一生对这三位女性的看法始终保留着最初的那种“迷弟崇拜”。[76]他小说中那位公爵夫人身上的梦幻气质，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为之神往的三位名媛的特质。在他着手创作《追忆似水年华》前数十年，小说叙述者赞美德·盖尔芒特夫人所用的那些仙界和鸟类的比喻就已经大量出现在普鲁斯特关于这三大社交宠儿的作品（多半是非虚构作品）中了。斯特劳斯夫人是“销魂夺魄的天使”[77]。舍维涅夫人“是个特殊的物种，介于女神和鸟儿之间。她是……一只长着雪白双翅的孔雀，一只拥有宝石双眸的文雀”。格雷弗耶夫人

是一只即将展翅高飞的“巨大的金鸟”[78][79]，她的光芒就“像来自高空的恩宠，像满天星辰那神秘而透明的芬芳”（这最后两句摘自普鲁斯特写于1902年的一篇关于格雷弗耶夫人沙龙的文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篇文章遗失了，本书末尾附有该篇的英译文）。[80]这些修辞手法也以各种变换的形式出现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用于描述超脱尘俗的人，她们所在的天堂是普鲁斯特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无法企及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摆出一副世故的姿态，奥托·韦格纳（**Otto Wegener**）摄于**1900**年前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普鲁斯特对他的几位夫人的理想化认知开始变得无望，但同样充满异想，同样不属凡间，进一步预言了叙述者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态度。1896年，普鲁斯特开始撰写一部杂乱无章的自传体小说《让·桑特伊》（*Jean Santeuil*），但几年后就放弃了，他在其中刻

薄地写道：“S夫人从未去过卢浮宫，因为她根本不喜欢绘画。但因为她有钱，她收藏了华托[81]的画作和居斯塔夫·莫罗的早期作品。”[82]这位不知廉耻的浅薄贵妇看重这些画作，仅仅是为了炫耀她的优雅品位。在《让·桑特伊》的其他地方，普鲁斯特讥讽地把斯特劳斯夫人写成“马梅特夫人”，一个虚伪的中产阶级攀爬者，她的名字“马梅特”在法语中意为“土拨鼠”，把她比作一个拼命朝社交食物链顶端攀爬的讨厌生物。

虽说普鲁斯特总算没有把格雷弗耶夫人比作啮齿类动物，但他写她的刻薄话也不少。1907年，他嘲笑她被大肆吹捧的“对有趣的事物（文学和艺术）充满热爱”会让“那些有趣的事物感到讨厌”，因为那只是表演，“不能提升这个女人本身，只能提升她的名气”。[83]他还说，“就像胭脂一样”，她在文化方面的装腔作势让她“远远望去超凡脱俗”，却根本无法使她成为“天才之人真正的朋友”。

不久，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夫人也丧失了普鲁斯特在想象中赋予她的万丈光芒。虽然这个过程在她第一次斥责他、提到菲特亚穆时就开始了，但其后数年，随着普鲁斯特对她的了解日渐加深，她的缺点越来越尖锐地突显，他对她也越来越失望。他写过的最恶毒的信件之一，就是在生命最后几年写给她的；那封信开头写道：“当一个人曾经热爱的东西变得非常愚蠢……”[84]大约同时，他向塞莱斯特·阿尔巴雷抱怨说伯爵夫人“过去那么美……而今却不过是个长着鹰钩鼻、声音沙哑刺耳的老女人”。[85]他还曾对另一个密友轻蔑地说她是“一只粗鲁的老鸟，很久以前我竟然误以为她是一只天堂之鸟”。[86]他承认自己把德·舍维涅夫人作为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原型，还说：“我把她变成了一只可怕的秃鹫，这么做至少能阻止他人误以为她是一只卑劣的老母鸡。”[87]

与普鲁斯特“仙界的天鹅”的赞词相比，这些诨名符合法国评论家罗兰·巴特发现的贯穿《追忆似水年华》全书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原则：本体倒错。[88]马塞尔从头到尾都惊奇地发现，人们跟他们的外貌表象如

此不同：他一次次地看到一个已知的自我（*x*）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未知的、相反的自我（非*x*）。“倒错”也是普鲁斯特喜欢用来表示同性恋的词语，他的叙述者的发现往往会暴露出，那些被看作异性恋的同性恋人物过着双重性爱生活。无论少女还是鳏夫，外交官还是伪名媛，佩戴勋章的战争英雄还是极端正统的天主教亲王——无论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可能“倒错”，事实上异性恋身份（*x*）的背后始终掩藏着一个同性恋身份（非*x*）。

然而倒错的动态在卧室之外也一样存在——特别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是《追忆似水年华》中少数几位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同性恋癖性（或其他任何性秘密）的主要人物之一。[89][90]对公爵夫人而言，倒错的是一种抽象的、审美的理想，与关于贵族光环、高高在上和“阶级”的想象密切相关。在该书结尾，被马塞尔一度美化为神鸟的女人、那个为天堂而重生的存在，沦落为来自深海的丑陋生灵。[91]她显赫的同类们也遭遇了差不多的命运，从天神荟萃沦为僵尸鸠集。

普鲁斯特虽然一贯否认他和他的叙述者是同一个人，但两位马塞尔无疑在一点上是重合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社交女郎、一个贵族精英阶层的化身，要么是一位女神，要么是一个魔鬼。她要么太神圣、要么太卑劣，无法占据普通人生命中那块灰色的中间地带，大多数人惯常以混沌的姿态在那里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无论被理想化还是被轻慢贬损，德·盖尔芒特夫人始终缺乏人性，这使她很方便地变成了马塞尔投射自己思想的一块屏幕——关于法国封建历史和世袭贵族的传奇，关于现代巴黎社会和他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关于梦想的确会成真的一个朦胧仙境。[92]

马塞尔在《重现的时光》中最后一次与公爵夫人谈话时，她顺便说了一句：“人们以为他们了解我，其实不然。”[93]我喜欢把这句话解读为普鲁斯特微妙地承认了他自己和他的叙述者都无法从三个层面来看待他

们的名媛典范。无论好坏，这些女人自始至终都是符号，从来不是真实的人。[94]

我希望《天鹅之舞》能够补全这一人物架构，因为太长时间以来，过于简化的虚构一直被当作事实。毫无疑问，和她们的虚构自我一样，德·舍维涅夫人、斯特劳斯夫人和格雷弗耶夫人全都秉持着一个观念，即肤浅的表面不可或缺且意义深远。然而我在长达六年详尽无遗的档案调查中发现，她们追求表面的雍容典雅同样揭示了极为复杂的人性。事实上，我发现她们的故事如此丰富有趣，根本无法以一本书的篇幅全部讲完。虽然这三个女人都活到了20世纪以后，至死都在高调经营着自身的辉煌，但我选择在本书中重点讨论1870年代末至1890年代初这段相对短暂的时期。虽然自德雷福斯事件[95]于1897年秋成为全国性政治丑闻开始，她们的生活又有了很多值得关注的转变，但事实上她们的生平大事最密集的时段却是在这较早的时期，因为正是在那时，她们成为巴黎社交界最亮的明星。

从路易十四时代以后，法国贵族一直保持着偏爱外表和形式（*x*）胜过真实和内容（非*x*）的传统。这种外表崇拜成为世纪末城区的过时观念，而斯特劳斯夫人、格雷弗耶夫人和德·舍维涅夫人虽然在广义上恪守这一观念，却以很多非正统的方式修正了它的细节，影响颇为深远。她们采纳了优雅外观这个来自宫廷的古老模式，把它与一种新兴的媒体文化融合，将自己呈现为崭新的、更好的贵族风范的化身。如今我们早已熟悉了个人变成一个形象或“品牌”，公众的谄媚和吹捧成为终极奖赏，而她们则是这方面的先驱人物。

对这一发展至关重要的，是三个女人启迪了她们那一代大大小小的天才们大量创作作品。这些艺术家中如今仍举世皆知的只有少数几位——乔治·比才、居伊·德·莫泊桑、埃德加·德加[96]、居斯塔夫·莫罗。然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名人，他们的耀目星光让他们的缪斯

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反之亦然）。和给他们灵感的女人们一样，这些艺术家也大多比普鲁斯特大十岁到二十岁，许多人早已是扬名立万的天才，而他本人直到去世前几年才刚刚获得天才的封号（他于1922年去世，享年51岁）。在普鲁斯特的成年时代，这些人为他的偶像们创作的画像弥漫在整个文化空间，为他那位温室名媛、那株“太阳底下最名贵的花朵”最终生根发芽的土壤供足了养分。

本书的三位女主人公全都要面对来自现实世界的巨大挑战，那是再多的光环、名声和幻想也无法消弭的。她们深爱的人往往毫无征兆地英年早逝。她们要对付难缠的亲戚和不忠的朋友。她们对自己的孩子疏于照管。她们的丈夫总是背叛妻子。她们担心名声，担心财富，担心人老珠黄。不安全感和丑闻令她们心力交瘁，心理疾病和药物上瘾让她们疲惫不堪。她们也有单相思的暗恋和不快乐的苦恋。她们要直面“倒错”的问题。她们都有一颗破碎的心，其中一人还有一副破碎的鼻骨。

这些女人不但在爱情上连连押错赌注，在其他领域也一样，从艺术到政治再到真正的赛马（斯特劳斯夫人和德·舍维涅夫人都热爱这项娱乐，两人都是狂热的赌徒）。作为艺术收藏家，斯特劳斯夫人偏爱朱尔-埃利·德洛奈[97]胜过埃德加·德加，偏爱亚历山大·法尔吉埃[98]胜过奥古斯特·罗丹[99]。同样，德·舍维涅夫人和格雷弗耶夫人也资助了一群时髦的社交界肖像画家如费代里科·德·马德拉索[100]和保罗·塞萨尔·埃勒[101]，却无视约翰·辛格·萨金特[102]和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103]等超群拔类的天才。德·舍维涅夫人曾经与一位流亡的王位觊觎者为伍，但后者从未登上王座，她还支持过一次未曾出师的保王派军事政变。格雷弗耶夫人曾经胸怀抱负，认为丈夫在政治上必将大展宏图，事实上她丈夫的政治事业在一个丑闻缠身的开局之后就折戟沉沙了。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邀请了来自各个意识形态阵线的宾客，包括好几位恶毒的反犹主义者。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他们的偏执却成了她要面对的难题，看到她支持被无端迫害的犹太裔陆军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他们

把她看作一个制造麻烦的犹太人，从此离她而去，避之不及。

三人中只有格雷弗耶夫人曾梦想过成为作家，虽然从未公开，但那是她一生孜孜追求的目标。她写过数百篇文学作品，大多是自传体，但只发表过其中几篇，而且都是匿名发表的。因此，普鲁斯特无从得知他借以构建自己的文学人物的女人也习惯把自己构建成一个文学人物。他从未识破在她扮演耀眼明星角色的无数文字中，有几篇竟然是以当代上层为背景的影射小说习作。不过这样的倒错一定会让他喜出望外：贵族（*x*）的面具背后竟然是艺术家（非*x*）。

如果普鲁斯特真的了解她们，他一定会看到，和所有人一样，他的三位缪斯也至少戴着上百副面具。他会看到，她们和所有人一样，也有无数夹缠不清的秘密与渴望、伤痛和恐惧。最重要的是，他会看到，如果不是和所有人一样，她们至少和他本人一样，也希望现实是别样的，并以自己的超越梦想来对抗眼前的现实。无论它是否空洞虚假、误入歧途或注定失败，正是那个梦想驱使着她们高高在上、引吭歌唱，驱使着她们面对羽翼受伤、声带颤抖，面对暗云涌动、末日在前，仍继续高高在上、引吭歌唱。如果有知音，定会听到她们以优美的旋律唱道：我如天鹅般死去，但请记住，旧日的我曾是女神。

注释

本书未删节的完整注释共有逾800页。为了缩减篇幅，给读者减少负担，我尽可能地精简了引用，附上了完整的参考书目。除特别说明外，非英文原文的引文都是由我自己翻译的。

缩略语

经常引用的一手资料作者

为简单起见，我对本书三位主要的女性人物使用了同样的缩略语，

而不是用不同的缩略语来反映她们的闺名，就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而言，我也没有反映她第一次婚姻的夫家姓氏。

CA：塞莱斯特·阿尔巴雷

CCB：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娘家姓卡斯泰尔巴雅克

FB：费迪南·巴克（费迪南-西吉斯蒙迪·巴克的艺名）

GB：乔治·比才

GBB：乔万尼·巴蒂斯塔·博尔盖塞

HB：亨利·德·布勒特伊

JB：雅克·比才

JEB：雅克-埃米尔（雅克）·布朗什

MB：玛尔特·比贝斯科，娘家姓拉霍瓦里（Lahovary）

RB：罗贝尔·德·比伊

AC：阿代奥姆·德·舍维涅

GCC：吉莱纳·德·卡拉曼-希迈

LC：洛尔·德·舍维涅，娘家姓德·萨德

MACC：玛丽-艾丽斯·德·卡拉曼-希迈

MCC：玛丽（米米）·德·卡拉曼-希迈，娘家姓孟德斯鸠-费赞萨克

ED：埃杜瓦尔·德吕蒙

LD：莱昂·都德

RD：罗贝尔·德雷福斯

AF：阿尔贝·弗拉芒

AdF：安德烈·德·富基埃

RF：罗贝尔

AG：安德烈·热尔曼

AGG：吉什公爵（后来的德·格拉蒙公爵）阿尔芒·德·格拉蒙

EG：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娘家姓里凯·德·卡拉曼-希迈

EdG：埃德蒙·德·龚古尔

FG：费尔南·格雷格

HG：亨利·格雷弗耶

LG：德·克莱蒙-托内尔公爵夫人伊丽莎白（莉莉）德·格拉蒙

DH：达尼埃尔·阿莱维

LH：卢多维克·阿莱维

NH：亚历山德里娜（纳尼内）·阿莱维，娘家姓勒巴斯（Le Bas）

BL：芭芭拉·利斯特（威尔森夫人）

GL：乔治·德·洛里

LL：利顿勋爵罗伯特·布尔沃-利顿

AM：穆尼埃神父

GM：居伊·德·莫泊桑

OM：欧文·梅雷迪斯（LL的笔名）

PM：保罗·莫朗

RM：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

GLP：加布里埃尔-路易·普兰盖

MP：马塞尔·普鲁斯特

GPR：乔治·德·波托-里什

HR：亨利·德·雷尼埃

ES：埃米尔·斯特劳斯

GS：热纳维耶芙·比才·斯特劳斯，娘家姓阿莱维

PV：保罗·瓦西里（朱丽叶·亚当的笔名）

马塞尔·普鲁斯特成书的作品

以下除特别说明外，这些文本所有详细的参考书目信息都列在了“参考书目”中。

RTP：《追忆似水年华》

AD：《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女逃亡者》

CCS：《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

CG：《追忆似水年华》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

CSB：《驳圣伯夫》（*Contre Sainte-Beuve*）

JS：《让·桑特伊》

LP：《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女囚》

OJFF：《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

MPG：《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的下午聚会》（*Matinée chez la Princesse de Guermantes*）

PJ：《欢乐与时日》

SG：《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

TR：《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重现的时光》

---

[1] Maurice Duplay，*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Paris：Gallimard，1972），23.

[2] MP致LC，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9（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12；又见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63；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0；and Henri Raczy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Paris：Parigramme，2005），134。众所周知，MP惯于不为信件署期，RD在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Paris：Plon，1939），15中一个幽默的段落中提到了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Kolb的广泛研究再加上关于当代报刊和其他人的信件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确定MP写信的日期，无论是大致日期还是具体日期。只要获得这类信息，我就会在文本中提供该信息。为避免啰唆，在引用MP的信件时，如果收信人在这些段落的故事中无关紧要，我不

会提到她/他的名字。

[3] MP，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382。关于MP的“希望路线”，又见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62-63。

[4] Helene Iswolsky，*No Time to Grieve*：*An Autobiographical Journey*（Philadelphia：Winchell，1985），91.

[5] MP，CG，358. MP曾招募RB与他一起“跟踪”LC；关于这一经历的一手记述，见RB，*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Paris：Portiques，1930），79-80。MP在他的文章“La Comtesse”中记录了同样的经历，见CSB，86-93，90。

[6] 读者在本书后文中还会看到这个词的一个同义词，即“名媛”（grande mondaine）；这个词既可作为名词又可用作形容词，它的阳性和中性形式为“名流”（mondain）。为简洁起见，在使用名词时，我更喜欢用这两个词而不是稍显优雅且（在我描述的情境中）更广泛使用的“上流贵妇”（femme du monde）、“上流名士”（homme du monde）和“社交界人士”（gens du monde）。与这些词语最接近的英语单词“socialite”（风流人物）带有一些贪婪的轻微贬义或轻蔑的内涵，不适合世纪末巴黎的语境，在那里，mondains一词至少在正式场合还是表示尊重的。——作者注（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为作者注，其余均为译者注）

[7] MP，“Portrait de Mme ***”，见MP，PJ，225。本书第22章详细讨论了这篇文章，它最初在《酒筵》上发表的标题是“A Sketch Based on Mme de ***”，那是MP在1892年与一群朋友一起创建的文学杂志。MP对杂志的共同创办者们说“Mme de ***”就是LC；见RD，*Souvenirs sur Marcel Proust*（Paris：Grasset，1926），71。

[8]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0.

[9] MP致AGG，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20（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349。这封信也被引用在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540并全文摘录于MB，*Le Voyageur voilé*（Geneva：La Palatine，1947），106-11。

[10] 引自MP致AGG，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20（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349；and in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2。

[11] 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Comte Robert de Fitz-James，1835-1900），19世纪的法国贵族。法国政治家博尼·德·卡斯特兰对他的评价是“脾气暴躁的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是那种贵族交际家，前水手，有着多种天赋；他画画非常拿手，尽管他对品位并不特别关注。他珍爱所有的女人，特别是某种类型的，对和自己一样行事的人却非常严厉。他的天性被我们的饮食所改变。如果他以自己的出身和天赋在不那么民主的时代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的话，他将会是一个伟人”。

[12] 阿尔瓦、贝里克和菲茨-詹姆斯公爵（Duke of Alba，Berwick，and Fitz-James），阿尔瓦公爵的全称是阿尔瓦-德托梅斯公爵（Duke of Alba de Tormes），是西班牙的元勋贵族头衔；贝里克公爵是英国为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设立的英格兰贵族头衔；而菲茨-詹姆斯公爵则是法国为他设立的贵族头衔。

[13] 如果读者想更多地了解本书对贵族称呼以及王室和贵族头衔的处理规则，请参考附录一中的“关于命名和大小写的说明”。——作者注

[14] MP，“Reliques”，见PJ，176。同样，MP在“La Comtesse”中写道：“我如今想起伯爵夫人，意识到她……是那种拥有一盏小小的神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发光的那种人。一旦认识他们，与他们交谈，变得和他们一样，就看不到他们神秘的光芒、魅力和色彩了。他们也就丧失了所有的诗意。”MP，CSB，87-88.

[15] 严格来说，贵族城区就是指圣日耳曼城区（Faubourg Saint-Germain），也就是气势不凡的左岸街区，那是旧制度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贵族阶层在法国首都的据点。然而在19世纪，这个词的范围已经扩大，也包括圣奥诺雷区，它位于塞纳河对岸，是个不那么宁静、更加豪奢的富人区。民间流传着“圣日耳曼区是贵族区，圣奥诺雷区是富人区”的说法。——作者注

[16] 与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一样，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只适用于男性。法国女性直到1945年才获得了选举权。——作者注

[17] 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路易-菲利普一世时期的首相。他在第二帝国灭亡后再度掌权，因镇压巴黎公社而知名。

[18] 引自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41。

[19] 儒勒·列那尔（Jules Renard，1864-191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著有《乡村的犯罪》（1888），《胡萝卜须》（1894）等。

[20] Jules Renard，*Journal inédit*（Paris：Bernouard，1927），entry of January 3，1898；引自Richard Langham Smith and Caroline Potter，eds.，*French Music Since Berlioz*（London：Ashgate，2006），111，n. 1。

[21] 引自Suzanne Fiette，*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s Lumières à la Belle Époque*（Paris：Perrin，2015），206。关于上层及其消亡，又见GLP，“Gratin（Le），” in *Dictionnaire du snobisme*，ed. Philippe Jullian（Paris：Plon，1958），87；以及Alice Bernard，“Le grand monde parisien à l’épreuve de la guerre”，见 *Vingtième siècle* 99（July-September 2008）：13-32。

[22] GPR，*Théâtre d’amour*（Paris：Paul Ollendorff，1921），344.

[23] MP，CCS，3.

[24]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5] 关于RTP中母子亲密关系的简要讨论，见Judith Thurman，“I Never Took My Eyes off My Mother，” 发表于*The Proust Project*，ed. André Aciman（New York：FSG/Books & Co./Helen Marx Books，2004），6-7。

[26] 塞维涅夫人（Mme de Sévigné，1626-1696），法国书信作家。其尺牍生动、风趣，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社会风貌，被奉为法国文学的瑰宝。她幼失怙恃，在外祖父母家成长，受过良好的教育。18岁出嫁，育有一子一女，26岁丧偶，后未再嫁。她把女儿奉为掌上明珠，现存书信的大部分都是写给女儿的。

[27] 圣西蒙公爵路易·德·鲁弗鲁瓦（Louis de Rouvroy，Duke de Saint-Simon，1675-1755），法国政治人物。父亲是路易十三的宠臣，他早年从军，1702年进入凡尔赛宫，侍奉路易十四。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他在路易十五的摄政委员会任职，晚年在自己的庄园著书立说。

[28] 弗洛蒙塔尔·阿莱维（Fromental Halévy，1799-1862），犹太血统的法国作曲家。大歌剧《犹太女》是他的代表作。阿莱维是法国大歌剧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歌剧内容多表现宏大场面和尖锐冲突，常带有民族解放的内涵。

[29] 关于RTP中对艺术-历史资料的处理，见Eric Karpeles，*Proust and Painting*：

A Visual Companion to “In Search of Lost Time”（London：Thames & Hudson，2008）。Karpeles在110-111页摘录并解释了关于莫罗的《朱庇特与塞墨勒》的段落；他分别在198页和211页引用了“惠斯勒的《黑白协奏曲》”和“莫奈……一幅油画中的睡莲”。

[30] 让·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为法国17世纪最伟大的三位剧作家。代表作有《昂朵马格》（又译作《安德洛玛刻》）和《费德尔》等。

[31] 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法国象征主义画家，他的绘画主要从基督教传说和神话故事中取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罗的绘画作品中往往包含着文学要素，因此莫罗往往被同时代的象征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尊为先驱。

[32] 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著名印象派画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21岁时怀着成为艺术家的雄心前往巴黎。他在伦敦建立起事业，从此再未返回美国，多年后成为19世纪美术史上最前卫的画家之一。

[33] MP，CCS，op. cit.，9-10 and 59-60；Samuel Beckett，*Proust*（London：Chatto & Windus，1931），45；Howard Moss，*The Magic Lantern of Marcel Proust*：*A Critical Study of* “Th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Philadelphia：Paul Dry Books，2012 [1962]），62-63.

[34] 真正的“盖尔芒特”并非持剑贵族（*noblesse d’épée*）中最重要的家族之一，而是属于一种没那么古老和尊贵的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该贵族阶级是通过在国王的政府中担任重要的司法或管理职位而获得贵族头衔的。不过普鲁斯特在写作《追忆似水年华》时，希望用一个业已消失的姓氏创造一个贵族王朝，“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的发音让他浮想联翩，当下又无人用这个姓氏，他就决定把它用在自己的小说中。——作者注

[35] 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Geneviève de Brabant），中世纪传奇故事的女主人公。她的故事是广泛流传的忠贞妻子凭被她拒绝之人的一面之词而遭到陷害和遗弃的典型例子。相传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是巴拉丁领主特雷夫的西格弗里德之妻，受到管家戈洛的诬告被判死刑，却被刽子手放逃，她在牝鹿的喂养下，与儿子在阿登的一个山洞里生活了六年。在此期间，西格弗里德发现了戈洛的诡计，他在追猎鹞鹿时找到了她的藏身之所，为她恢复了名誉。故事的原型据说是巴伐利亚公爵、莱茵王权伯爵路德维希二世的妻子——布拉邦的玛丽。名字从玛丽变成了热纳维耶

芙，或许可以追溯到对巴黎的主保圣人热纳维耶芙的崇拜。

[36] 加拉曼特（Garamantes），希罗多德提到过的一个文明和部落。人们认为他们对应于古利比亚西南部铁器时代的柏柏尔部落。

[37] Dominique Jullien，*Proust et ses modèles*（Paris：José Corti，1989），134.

[38] MP，CG，356.

[39]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页。

[40] MP，CG，356.

[41] 迪安娜（Diana），又译作“狄阿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众神之王朱庇特和温柔的暗夜女神拉托娜的女儿，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妹妹。迪安娜也是司管贞洁的女神，形象通常为一个持弓的圣洁少女。

[42] MP，CG，357.

[43] 米涅瓦（Minerva），又译作“弥涅耳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战神和艺术家与手工艺人的保护神。猫头鹰是她的标志物，象征着理性和智慧。

[44] MP，CG，357.

[45] MP，CG，357.

[46]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84～585页。

[47] MP，CG，329.

[48] 关于“德·盖尔芒特的心灵”的局限性，见James Litvak，“Strange Gourmet：Taste，Waste，Proust，” in *Studies in the Novel*，28，no. 3（Fall 1996）：338-56，348。

[49] MP，CG，719.

[50] 关于MP对社交界的幻灭，见Léon Pierre-Quint，*Marcel Proust*：*Sa vie*，*son œuvre*（Paris：Simon Kra，1925），176-77；关于祛魅是RTP的一个基本特征，见

Walter Benjamin，*Sur Proust*（Caen：Nous，2010），22-23。

[51] 这个双关语也讽刺了德·萨冈亲王夫人1885年的“野兽舞会”，详见第1章。“死亡面具舞会”是MP描述RTP的最后一个聚会场景的原始题目，在他去世后发表，题目是*Une matinée chez la Princesse de Guermantes*，见MP，MPG，15。关于普鲁斯特的“死亡面具舞会”与《圣西蒙公爵回忆录》的关系的精辟分析，见Marc Hersant and Muriel Ades，“D’un bal de têtes à l’autre，” in “Le Temps retrouvé” *80 ans après*：*Essais critiques*，ed. Adam Andrew Watt（New York：Peter Lang，2009），10-21。

[52] MP，TR，337；又见MP，CG，357.，899，其中MP写道，艺术作品是“能够重现失去的时光的唯一途径”。

[53] 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 knot），传说在很久以前，弗里吉亚的国王戈耳狄俄斯编织了一个绳结，绳结之外没有绳头，因而看似不可解。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弗里吉亚见到这个绳结之后，拿出剑将其劈为两半，解开了这个结。

[54] 关于RTP的环状结构，见Antoine Compagnon’s preface to the French Folio edition of MP，CCS，ed. Antoine Compagnon（Paris：Gallimard/Folio，1988），xxv。

[55] Howard Moss，*The Magic Lantern of Marcel Proust*：*A Critical Study of* “Th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Philadelphia：Paul Dry Books，2012 [1962]），22：“（《追忆似水年华》）是一座镜宫，其中有真实的人、自然的物体和机构出现，为了通往真实而诉诸扭曲。”

[56] 引自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41；关于MP的“钥匙”问题，又见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153-57，243-45，and 248；A. Adam，“Le Roman de Proust et le problème des clefs，” *La 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65（1952）；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Paris：Plon，1939），“Les Clefs de Proust，” 37-44；Jacques de Lacretelle，“Les Clefs de l’œuvre de Proust，” in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112（January 1923）；André Maurois，*Quest for Proust*，trans. Gerald Hopkins（New York：Penguin，1962 [1950]）；Henri 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Paris：Gallimard，1989），51-63；and Roland Barthes，*The Preparation of*

the Novel，trans. Kate Brigg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313-15。

[57] MP，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9（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

[58] 首先见RB，*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Paris：Portiques，1930），65；RD，*Souvenirs sur Marcel Proust*，190-92；DH，*Pays parisiens*（Paris：Grasset，1932），81-83；以及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51-64。在她与MP的通信中，GS提到了MP最初在她的沙龙里认识的阿斯为“斯万-阿斯”（被引用在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51）。（据RB说，MP至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对他说过阿斯就是斯万的原型。）Edmund de Waal在他出色的家族传记中讨论了另一把“钥匙”Charles Ephrussi与夏尔·阿斯的关系：*The Hare with Amber Eyes*：*A Hidden Inheritance*（New York：Picador，2010），104-7；Ephrussi最终成为EG和HG两个人的好朋友，但由于那段友谊发生的时间在我考察的时间之后，同时也因为Ephrussi与GS和LC都不够亲近，他没有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在本研究中。

[59] 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伯爵（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Fezensac），即马里·约瑟夫·罗贝尔·阿纳托莱（Marie Joseph Robert Anatole，1855-1921），也即后文中的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伯爵，法国审美家、象征主义诗人、艺术品收藏家和花花公子。他因为是法国颓废派作家约里斯·卡尔·于斯曼的小说《逆流》中的人物让·德埃森特，以及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夏吕斯男爵的人物原型而闻名。

[60] 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55-65；William C. Carter，*Marcel Proust*：*A Lif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126，147，176，243-44，442-43，and 756-57；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185-97；FG，*Mon amitié avec Marcel Proust*（Paris：Grasset，1958），33-34；LG，*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Paris：Flammarion，1925）；Philippe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prince de 1900*（Paris：Perrin，1965）；Ursula Link-Heer，“Mode，Möbel，façons et manières：Robert de Montesquiou und Marcel Proust，” in *Marcel Proust und die Belle Époque*，ed. Thomas Hunkeler（Frankfurt：Insel，2002），84-120；and Edgar Munhall，ed.，*Whistler and Montesquiou*：*The Butterfly and the Bat*（New York and Paris：The Frick Collection & Flammarion，1995），28 and 53.

[61]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48. 关于HG是德·盖尔芒特公爵的一个原型，见Philippe Michel-Thiriet，*Le Livre de Proust*（London：Chatto & Windus，1989），186。

[62] FG，*Mon amitié*，45. CA声称据MP说："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个人物的部分原型是格雷弗耶伯爵夫人，还参照了斯特劳斯夫人和德·舍维涅伯爵夫人。"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41，153-57 and 243-48. 而其他提到LC，EG和/或GS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原型的资料太多，无法一一全文引用，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资料来源包括：Anne-Marie Bernard，ed.，*The World of Proust as Seen by Paul Nadar*，trans. Susan Wise（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2002），69，72，and 97；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Laure de Sade*，*Comtesse de Chevigné*（Paris：Plon，1950），i-xii，35，133-35，and 138-42；MB，Le Voyageur voilé，op cit.，49-118；RB，*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Paris：Portiques，1930），79-80；Carter，*Marcel Proust*，129-30，144，and 673；RD，"Madame Straus et Marcel Proust，" in *La Revue de Paris* 42（October 15，1936）：803-14；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17-25 and 34；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1：*Les Quartiers de l'Étoile*（Paris：Pierre Horay，1953），105 and 138-39；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1：*Le Faubourg Saint-Honoré*（Paris：Pierre Horay，1956），88；FG，*L'Âge d'or*（Paris：Grasset，1947），158；AG，*Les Clés de Proust*，*suivies de Portraits*，"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Paris：Sun，1953），29-45；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Oriane，" 155-98；André Maurois，*Quest for Proust*，trans. Gerald Hopkins（New York：Penguin，1962 [1950]），160-79；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50；and 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trans. Euan Cameron（New York：Viking，2000），117。MP以这三个女人为原型创造了德·盖尔芒特夫人，甚至在一些全面的作品中也有所提及，诸如William Amos，*The Originals*：*Who's Really Who in Literature*（London：Cardinal，1990），221。

[63] 费尔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1873-1960），法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1953年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64] EG，in AP（II）/101/1. EG档案文件中绝大多数没有标题和署期，但只要可能，我都会补全那一信息。

[65] 玛尔特·比贝斯科亲王夫人（Marthe，Princesse Bibesco，1886-1973），著名

的罗马尼亚-法国作家、社会名流、时尚偶像和政治沙龙女主人。

[66] 在她关于LC的传记中，MB甚至曾称她是“洛尔-奥丽阿娜”；见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56。至于EG与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逐点比对分析，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16-17，423-47，and 539-43。

[67] MP，CG，744.

[68] MP，*Lettres à Madame et Monsieur Émile Straus*，ed. Robert Proust（Paris：Plon，1936），11.

[69] Jean-Baptiste Proyart，“Marcel Proust et la Comtesse de Chevigné：envoi autographe sur *Le Côté de Guermantes* I et correspondance”（June 2008）：4. MP在一封并非写给LC而是写给AC的信中抱怨从未受邀去过LC的沙龙，后者可怜MP，最终邀请了他。关于MP具体的希望见到却未能见到的上层交际家们，见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543，n. 80。

[70] 乔治·德·波托-里什（Georges de Porto-Riche，1849-1930），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71] LG，*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Paris：Flammarion，1925），19；Maurois，*Quest for Proust*，67.

[72] Bernard Briais，*Au temps des Frou-Frou*：*Femmes célèbres de la Belle Époque*（Paris：Imprimerie de Frou-Frou，1902），267；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110.

[73] 吉什公爵阿尔芒（Armand，Duc de Guiche），即阿尔芒·德·格拉蒙（Armand de Gramont，1879-1962），法国贵族、科学家和企业家，第12代格拉蒙公爵。在1925年继承其父的正式贵族头衔之前，以其礼称“吉什公爵”而闻名。

[74] Joseph Confavreux and Nathalie Battus，*Guermantes en héritage*，a documentary aired by France-Culture on February 19，2007.

[75] Mina Curtiss，*Other People’s Letters*（New York：Helen Marx Books，2005），168.

[76] James Litvak，“Strange Gourmet：Taste，Waste，Proust，” in *Studies in the Novel*，28，no. 3（Fall 1996）：338-56，348；and Wayne Koestenbaum，“I Went by a Devious Route，” in André Aciman（New York：FSG/Books & Co./Helen Marx Books，2004），57-58. Litvak把德·盖尔芒特夫人令MP的叙述者浮想联翩描写为“对得不到的事物的着迷”，夫人本人则是马塞尔那个得不到的终极事物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版本：“母亲”。“他从未有一刻怀疑过自己对她（公爵夫人）的强烈的爱，”Litvak写道，“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把它比作某个同性恋男子对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爱。”（James Litvak，“Strange Gourmet：Taste，Waste，Proust，” in *Studies in the Novel*，28，no. 3（Fall 1996）：338-56，347）。在MP（而非马塞尔）的生活中，同样理想化的“同性恋男子之‘爱’”也影响着他对LC、GS和EG的态度。在评论这一现象时，MP的同时代人用“虔诚”替代了“同性恋”。诸如，“他对社交界的贵妇人们的崇拜近乎虔诚；（RM）和（EG）尤其令他敬畏”。见AdF，*Cinquante ans de panache*（Paris：Pierre Horay，1951），71。值得注意的是，AdF把EG和RM两人都称为“贵妇人”。

[77] 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 avec Mme Straus*，preface by Susy Mante-Proust（Paris：Plon，1936），15-16。

[78] 这个典故来自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José-Maria de Heredia）的十四行诗《塔索斯河》（“Le Cydnus”，1893），其中把克利奥帕特拉想象成为“一只巨大的金鸟从高处接近猎物”。普鲁斯特至少在两篇文章里用这一比喻来形容格雷弗耶夫人。——作者注

[79] Dominique（MP的笔名），“Le Salon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在本书附录三中首次被翻译成英文发表。

[80] 见附录三，其中还翻译了《高卢人报》1893年的一篇文章，将斯特劳斯夫人和格雷弗耶夫人列为全城首屈一指的沙龙女主人。这篇文章署名为“全体巴黎人”，此前人们认为它并非普鲁斯特所写，但我列举了详细的证据，证明他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作者注

[81] 让-安托万·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国洛可可时代的代表画家。

[82] MP，JS，435.

[83] MP，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7（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77。MP进一步评价说EG不是“雷加米埃夫人”——提

到了一位传奇沙龙女主人，正如我在本书第20章所述，EG事实上试图在精神上认同这位夫人。

[84]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68.

[85] 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43-44.

[86] MP致AGG，in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20（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349。

[87] MP致AGG，in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20（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349。

[88] 巴特首次论述倒错是RTP的“基本原则”是在1977年在瑟里西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后来扩充后的内容见Roland Barthes，*The Rustle of Language*，trans. Richard Howar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272-80。关于RTP中的“倒错”的典型范例，又见Pierre Zoberman，“L’Inversion comme prisme universel，”in *Le Magazine Littéraire*：*Marcel Proust*（2013）：81-86；Laure Murat，“Les Souliers rouges de la duchesse，ou la vulgarité de l’aristocratie française，”in Forest and Audeguy，eds.，op. cit.，97（“The *Search* [is] the great book of inversion”）；以及Peter Brooks尚未出版的演讲，发表于2013年在Columbia University Maison Française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Brooks 在讨论《追忆似水年华》中人物的隐秘的同性恋时，指出：“普鲁斯特笔下的‘性欲倒错者’的生活恰恰颠倒了我们对现实的观感和观点。”（Brooks还在他的“Persons and Optics”一文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见*Arcade* [March 16，2015]：n.p。）Nicolas Grimaldi就这一（*x*）变成（非*x*）的现象也做出了精辟的概要分析，“一个人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在整部《追忆似水年华》中，没有什么比这一定理得到过更多、更持久的验证……没有一种人际关系不是建立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的”。Nicolas Grimaldi，*Proust，les horreurs de l’amour*（Paris：PUF，2008），87.

[89] MP，TR，328.

[90] 与她反复出轨的丈夫相反，《追忆似水年华》自始至终把德·盖尔芒特夫人描写为一个忠于婚姻的典范——她没有什么秘密的情爱生活。在《重现的时光》中，叙述者有过跟这个看法矛盾的简短回忆。他记得她的表兄夏吕斯曾对他说：“公爵夫人纯洁无瑕的说法实际上是由巧妙掩盖起来的无数次风流韵事拼凑成的。”然而夏吕斯的断言并没有促使叙述者深究下去。“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他

想，“她在大家心目中是无可指摘的。”如果普鲁斯特听说过（或关心过）我在本书后文中记述的无数次风流韵事，他大概有足够的素材让他那位无可指摘的公爵夫人的形象变得复杂得多。——作者注

[91] RTP，tome IV，600.

[92] 关于年轻的MP对法国古老家族的“神秘”敬畏，见Jean Recanti，*Profils juifs de Marcel Proust*（Paris：Buchet/Chastel，1979），18；以及RB，*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Paris：Portiques，1930），86。

[93] 关于年轻的MP对法国古老家族的“神秘”敬畏，见Jean Recanti，*Profils juifs de Marcel Proust*（Paris：Buchet/Chastel，1979），18；以及RB，*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Paris：Portiques，1930），86。

[94] 早期委托他人为自己作画时，EG考虑过萨金特，但最终否决了他，选择了如今已被人遗忘的社交界肖像画家卡罗勒斯-杜兰；见James S. Harding，“Art Notes from Paris，” *Art Amateur* 17，no. 2（July 1887）：31。这一决定表明了EG在绘画方面的品位。Madrazo为LC所绘的肖像复制品见本书后半部。据A. Adam说，op. cit.，Madrazo是RTP中的雕塑家茨基的原型。

[95] 德雷福斯事件（法语：Affaire Dreyfus），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冤情终于在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

[96] 埃德加·伊莱尔·热耳曼·德加（Edgar Hilaire Germain de Gas，1834-1917），生于巴黎的印象派画家、雕塑家。德加富于创新的构图、细致的描绘和对动作的透彻表达使他成为19世纪末的现代艺术大师之一。他最著名的绘画题材包括芭蕾舞演员和其他女性，以及赛马。他通常被认为属于印象派，但他的有些作品更具古典、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画派的风格。

[97] 朱尔-埃利·德洛奈（Jules-Élie Delaunay，1828-1891），法国学院派画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作为肖像画家而大受欢迎。

[98] 亚历山大·法尔吉埃（Alexandre Falguière，1831-1900），法国雕塑家和画家。1882年荣任法兰西艺术院院士。

[99] 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罗丹善于用丰富多样的绘画性手法塑造出神态生动富有力量的艺术形象。除雕塑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插图、铜版画和素描，他还写过几部著作，主要著作有《艺术论》，主要雕塑作品有《沉思者》《维克多·雨果像》《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像》等。

[100] 费代里科·德·马德拉索（Federico de Madrazo，1815-1894），西班牙画家。马德拉索家族人才辈出，被誉为19世纪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绘画世家之一。1846年，他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853年成为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后又担任普拉多博物馆馆长和皇家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院长。

[101] 保罗·塞萨尔·埃勒（Paul César Helleu，1859-1927），法国油画家、粉彩艺术家、铜版雕刻家、设计师。以其为“美好时代”的交际花所画的大量肖像画而闻名。

[102]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美国艺术家，因为描绘了爱德华时代的奢华而成为“当时的领军肖像画家”。他的父母皆为美国人，但他本人在迁居伦敦之前，都在巴黎接受训练。他一生中创作了900幅油画，逾2000幅水彩画，以及无数素描画、炭笔画，描绘了他游历世界各地时的所见见闻。

[103] 亨利·玛丽·雷蒙·德·图卢兹-洛特雷克-蒙法（Henri 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Monfa，1864-1901），简称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为称作“蒙马特尔之魂”。洛特雷克承袭印象派画家奥斯卡-克劳德·莫奈、卡米耶·毕沙罗等人画风，受日本浮世绘之影响，开拓出新的绘画写实技巧。他擅长人物画，对象多为巴黎蒙马特尔一带的舞者、女伶、妓女等中下阶层人物。其写实、深刻的绘画不但深具针砭现实的意味，也影响日后巴勃罗·毕加索等画家的人物画风格。

第一部分

第1章 稀世珍禽（1885年6月2日）

事后报道德·萨冈亲王夫人[1]那场年度化装舞会的社会新闻把它比作挪亚方舟、《一千零一夜》和一场幻梦，不过论其宏大的奇妙场景本身，它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年，女主人以动物王国为主题，要求她的一千七百多位宾客以布封伯爵的插图版著作为服饰参考[2]，这位启蒙时代的博物学家曾研究环境对植被的“变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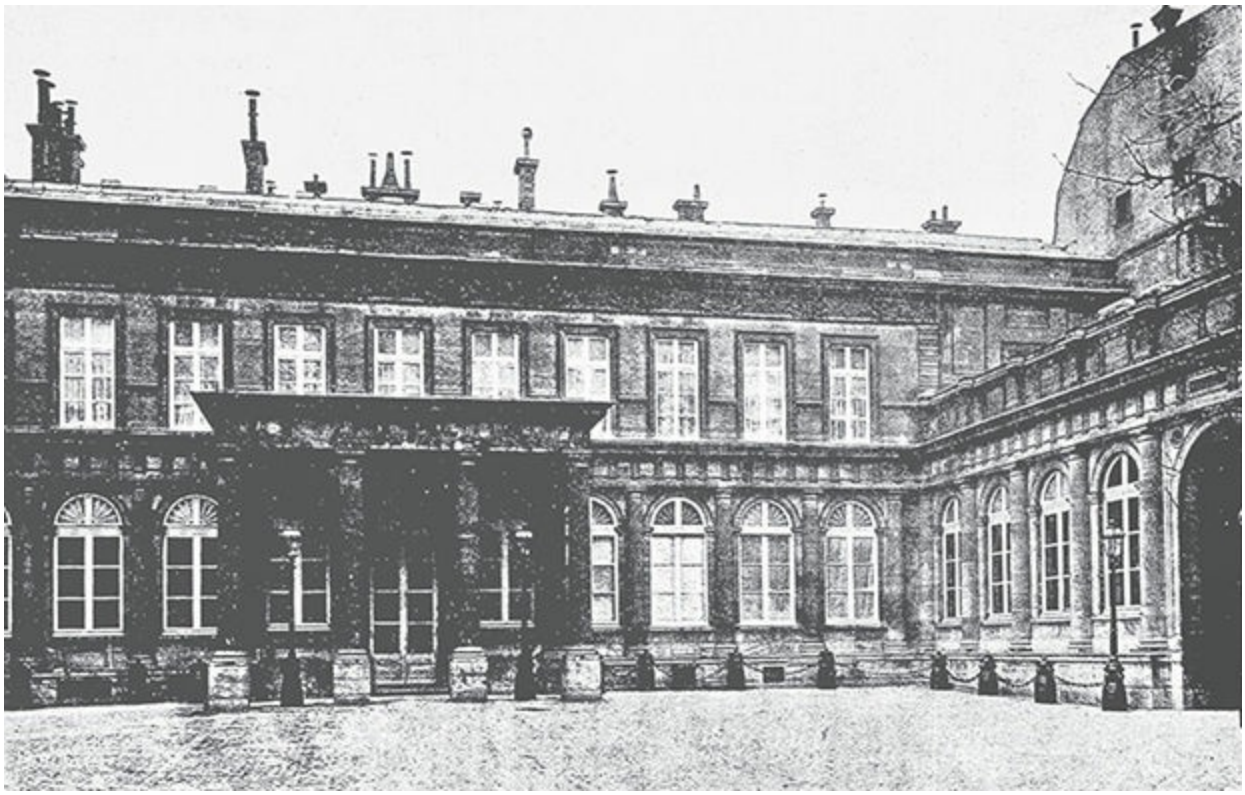
一座巨大的庆典庭院把德·萨冈夫人位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私人宅邸与不远处的市井喧杂隔绝开来。庭院里，五十位头戴白色假发、身穿红金色制服的男仆忙着招呼相继到来的宾客，把他们从饰有家徽的马车上搀扶下来，引他们走进一座淡紫色电灯光照亮的大客厅。[3]（这座宅邸的女主人认为“斯万-爱迪生电灯”[4]——当时灯泡在巴黎还十分罕见——要比蜡烛或煤气灯光更喜庆。）在一位瑞士护卫宣布他们的姓名和头衔之后，受邀的宾客走上一段白色大理石楼梯，楼梯两侧列着另外五十位身穿制服的男仆和同样数目的红斑岩花瓶。楼梯上铺着古色古香的奥布松地毯。

在那段楼梯的尽头，宾客们来到了一排豪华的正式接待厅，它们的装饰风格依次是路易十六、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四时期的，仿佛带着来宾穿越时光回到过去。其中一间客厅里悬挂着古董级哥白林壁饰挂毯，它们极为昂贵，萨冈夫人每十年才把它们挂出来展示一次。另一间客厅里，手工雕刻的墙板上镀有50磅纯金，而第三间客厅的墙面都是顶天立地的镜子，仿照凡尔赛宫镜厅的风格。虽然这座宅邸的前主人是“希望钻石”[5]的所有人、挥金如土的亨利·托马斯·霍普，但自从新主人迁入以

来，它的装饰变得更加奢华了。46岁的德·萨冈亲王夫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有着贵族的高颧骨和光滑细腻的白皮肤，她常常觉得自己的长相酷似玛丽·安托瓦内特。[6]

萨冈府邸的豪华装饰光耀夺目，但跟当晚聚集于此的一群动物相比，它们还是黯然失色了：那各色各样的珍禽异兽显然是在公然违抗自然——和文化——的法则。作为上流社会的成员，那些狂欢者是巴黎公认的出身优越和品位良好的典范。今晚，他们逆规则而行，装扮成野蛮的兽类，把传说中的彬彬有礼当作儿戏。

和社交界的所有活动一样，在这场所谓的野兽舞会上，宾客们的穿戴都极尽时髦风范，只不过这一天，他们的优雅精致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古怪样貌。这些头戴定制的高顶丝质礼帽、身穿裁剪完美的西装的交际家们（他们都是“骑师俱乐部”和“联盟俱乐部”等巴黎男性尊贵社交俱乐部的成员），今晚却戴着用硬纸雕成的夸张头饰，装作昆虫或害虫、甲壳虫或大猎物。女士们则在清一色的晚礼服和珠宝首饰之外，加戴了毛皮、面具和奇异艳丽的羽毛。美如雕塑的德·萨冈夫人身穿“鸟王后”的服饰，包括一个覆盖着羽毛和宝石的巨大机械尾，它可以随意伸缩。她甚至还把一个制成动物标本的孔雀头戴在自己的头上，那双镶钻的孔雀眼睛在电灯下闪着诡异的光。



德·萨冈府邸的外立面和庭院，**1885**年**6**月，贵族们聚集在那里，举办了一场奢华的化装舞会

时年26岁、傲视群芳的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夫人也动了同样可怕的心思，把一只死雪鸮的头掖在了自己的头巾帽里。[7]伯爵夫人精通古典神话，自称“智慧女神米涅瓦的朋友”，但她头戴米涅瓦的鸟类标志物这一举动却与sagesse（智慧）一词的另一个意思——“端庄”或“得体”——截然相反。说起来，德·舍维涅夫人雪白色的薄纱晚礼服和羽毛倒还算矜持不苟，但她头顶那只鸮头的眼窝里闪烁的那对巨型血红色宝石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们是一头怪物、一个恶魔、一具猫头鹰腐尸的眸子。

这样的对比研究刻意强调了闺名为洛尔·德·萨德的伯爵夫人广为人知的矛盾特质。她看起来像一位公主。眼皮松弛的蓝色双眸、光滑柔顺的金色卷发和轮廓清晰的苗条身材，让她像极了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8]笔下的她的同名女性祖先，于格·德·萨德伯爵夫人洛尔·德·诺韦斯。然

而她说起话来却像个乡下人，拖长的语调过时而野蛮，还像个码头搬运工一样满口脏话，一口污秽的土语像极了她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先辈德·萨德侯爵[9]。[10]除了喜欢射箭、骑马和定制男装外，她说话语气强硬，一位朋友给她取名“彼特拉克下士”[11]。这一诨名突出了德·舍维涅夫人为自己设计的对立人设：集阴柔与阳刚、圣洁与亵圣于一体。

她的粗鲁作风和挑逗的“男士派头”[12]（她另一位朋友的话）引得上流社会的许多人大献殷勤，据传其中有好几个人曾与德·舍维涅夫人有过床笫之欢。在萨冈舞会上，她就和其中一位仰慕者约瑟夫·德·贡托伯爵（Comte Joseph de Gontaut）调情，全然不顾两人的配偶都在场（也不顾贡托的装束愚蠢至极：他装扮的是一只长颈鹿的臀部和后腿，他的两位男亲戚分别装扮成长颈鹿的躯干和头部）。一般来说，这样不顾廉耻的出格行为在上流社会是不被容忍的，婚外恋只能秘密进行。然而奇怪的是，德·舍维涅夫人那些叛逆的危险举动倒让她受到了圈子里很多最显赫的大人物的青睐：王公贵胄们已经厌倦了他们圈子里无趣的拘谨礼仪。对那些达官贵人来说，这位年轻女贵族挑战优雅礼节的做派就像降神会或电话一样，是新奇刺激的调剂品。[13]

有了带金佩紫的朋友们的喜爱，德·舍维涅夫人对她自视为最丢脸的特质——不够有钱——也能一笑置之，宣称自己“收入不高，但殿下不少”[14]。当社交太太团纷纷猜测她那只猫头鹰头上镶嵌的红宝石是一位罗曼诺夫大公的礼物时，她不置可否。然而在另一次功力极深的炫耀中，她却对那位传说中的恩主的好品位颇有微词。她讲述了与罗曼诺夫大公的另一件礼物有关的故事——一条塞满绿松石的鲟鱼——她耸耸肩说那东西黏兮兮的，并总结说：“不管怎么说吧，我去过沙皇村[15]，那里一点儿都不时髦！”[16]这些话都是德·舍维涅夫人棋高一着的妙举：收到一位殿下奉上的特别礼物就足够引人注目了，对那些礼物嗤之以鼻简直就是盛气凌人。

伯爵夫人与长颈鹿臀部的调情后来被一只双翼星钻点点的蜂鸟[17]打断了，蜂鸟把她拉到一旁，耳语了几句。这一打断，贡托自去找他的长颈鹿头和躯干了，他们合在一起，成了当天舞会上最大的野兽。他们曾听说另一位宾客打算扮成大象来参加舞会，这时欣慰地发现女主人在最后一刻否决了该计划，说那有可能会破坏她府邸天花板上由绘画大师创作的壁画。



一份刊登在报纸上的野兽舞会的素描画，贵族们装扮成昆虫和鸟兽。最上排右四就是德·舍维涅夫人，她装扮成一只雪鸮

亲王夫人还宣布不准装扮成鱼，理由是如此扮相的宾客必然想要游泳，而她不能保证府里（据说很大）的水族馆的温度合适。这一警告并没有制止一位悍妇扮成一条鲑鱼，那曲线毕露的艳粉色鱼尾装饰是专为吸引眼球而设计的。很遗憾，这个女人的服饰之所以招来了更多的注意，却是因为另一位妖媚妇人，圈子里的太太们称她为“金发碧眼的克

利奥帕特拉”。那人碰巧穿了一件近乎同一色调的紧身衣，装扮成一只鹦。两位粉红色妖怪在府邸后面那座有公园那么大的花园里小心地观察着彼此，那里有好几千只斯万-爱迪生灯泡，把古老的栗树下照得皎如日星。

室内，一位发福的公爵夫人和一位苗条的子爵夫人之间的较量正在升温，两位都选择了穿豹纹[18]现身。虽然论头衔，25岁的格雷弗耶子爵夫人不如对手尊贵，但她的优势显然无可争议。她体态端盈、身姿柔曼、脖颈优美，那双深色的大眼睛犹如三色堇碎花。伊丽莎白·格雷弗耶闺名里凯·德·卡拉曼-希迈，是巴黎社交场上最著名的美女之一。她的同代人通常把她比作爱神维纳斯和贞洁超凡的月神和狩猎女神迪安娜。人老珠黄的德·比萨克公爵夫人（Duchesse de Bisaccia）则不会令人联想起任何此类神祇。旁观者们开玩笑说，这只瘦豹子和胖豹子的鲜明对比还不算最有趣的，看看比萨克夫人那一脸的不高兴，再想想她家徽上的座右铭——“是我的荣幸”（C’est mon plaisir）[19]，那才令人捧腹。



众所周知，伊丽莎白·格雷弗耶的装扮参考了著名的艺术作品，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施洗者圣约翰》（***John the Baptist*，1513-1515**）

荣幸当属格雷弗耶夫人。然而她并没有显出享受胜利的样子，只是全程带着唇上那一抹冷冷的蒙娜丽莎式微笑，那是她经典的表情。正如她的一位亲戚所说，“她无时无地不美丽。但她的生活绝不是一顿漫不经心的野餐，做巴黎最美丽的女人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乐子”。[20]子爵夫人自己也承认，她在每一个场合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打造“无出其右的尊贵形象”[21]。为实现这一效果，她偏爱能够引发轰动和惊叹的服饰，今晚也不例外。她往往在一种冰雪女王的审美基调上寻求各种变化，正与她无可挑剔的贞洁美名相配。［她的家族座右铭是“虔诚与我同在”[22]（Juvat pietas），真让许多迷恋她的俱乐部成员绝望。］然而在野兽舞会上，她却变形为一头凶猛的野兽。她避开了其他野兽装束中的晚礼服，只用一件沙沙作响的女士内衣把自己包裹起来，外面披一张真正的豹皮。一头柔软光亮的栗色卷发上戴着些闪闪发光的黑玉发饰，松松地散开搭在肩膀上。

更令格雷弗耶夫人的服饰魅力四射的，是她没有像其他客人那样参考布封的插图形象，而是参考了一件被卢浮宫永久收藏的珍品：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施洗者圣约翰》。除了美丽之外，她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热爱艺术，她还有个坏名声就是常常以此凌驾于同侪之上。她的《施洗者圣约翰》服饰典型地表现了其阳春白雪的装腔作势，她自以为那能使她在上层鹤立鸡群。整套服饰非常讲究，表明她对列奥纳多的画作有过仔细研究，从巧妙地披挂豹皮到垂下的深色卷曲头发，更不用说那抹冷冷的蒙娜丽莎式微笑了。

另外，她这身行头也提出了关于她为什么会选择那幅作品作为装扮原型的问题；因为列奥纳多的约翰是个标致的阴阳人，他的容貌被认为参考了画家那位年轻的男性情人。[23]就算对洛尔·德·舍维涅那样的假小子来说，这样性别扭转的服饰也算大胆了——易装要到几十年后才会成

为社交圈化装舞会的主流——但至少还符合她的“阳刚气质”。而伊丽莎白·格雷弗耶装扮成这样就更不合情理了。不管那引发了她的贵族伙伴们何种猜测，这套装扮背后的逻辑一直是她撩人遐想的小秘密。

与此同时，两位豹子之间的视觉差异也吸引了一位局外人小青蛙的注意，此人黑眼睛、橄榄色皮肤，是社交圈的新人。这位青蛙一贯风趣幽默，便对两位豹子的装束借题发挥，跟同伴们讲起了令人捧腹的笑话：说三位罗斯柴尔德的女继承人分别装扮成一头金钱豹、一只蝙蝠，还有一只亮橙色热带鸟。然后青蛙就开始嘲笑公爵夫人那头豹子的庞大体形了，那后来成为她最著名的风趣笑话之一，但经过不断被人引用和修正，可怕的丛林捕食者变成了一头无趣的圈养食草动物。整整一个世代之后，这个笑话的最终版本仍在巴黎城区流传着：“她可不是一头母牛哦，她是一群母牛！”

如果说这类羞辱因为风趣幽默而在巴黎社交圈流传的话，它们也揭示了那个贵族世界的光鲜外表下涌动的恶意，使得那个阶层本身变成了一个古怪杂居的物种：齿如瓠犀，却长着一双血淋淋的利爪。在野兽舞会上，当一声猎号突然吹响，人类装扮的一群猎鹿犬冲进府邸时，这样的两重性暴露得一览无余。那些“动物”戴着狗的面具、身穿粉色猎装，在光滑的大理石镶木地板上咆哮着横冲直撞，追得人扮的一头雄鹿四处逃窜。

这场追逐的结果如何，后世不得而知，但这个场面却揭露了参与者的某种本质特征。和它所模仿的游戏一样，这一仿制的猎鹿场面是一种暴力仪式，是用刻意的程式来疏导法国廷臣阶级昔日对国王潜伏的敌意。在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把一间简陋的王室狩猎小屋变成全欧洲最富丽堂皇的宫廷[24]之前，他成年时正逢贵族不满君主专制主义的自大，贵族发起了针对王权的内战，几乎将其一举颠覆，这一切绝非巧合。为了制止更多煽动叛乱的言行，年轻的君主独创出一个天才的做

法，把封臣们的暴力欲望引入一个只有他才能界定和控制的领域：宫廷庆典。

这一标题项下的某些活动，如王室狩猎和宫廷舞会，已经足够费力，完全可以为廷臣们的攻击性提供一个倾泻体力的出口。然而“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某些早期宫廷古装庆典中扮演太阳的角色，给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格）还有一个更加抽象的方式来消灭这一威胁，那就是为他的凡尔赛宫的随从们规定一套极为复杂精细的礼节，几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每个人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的地位。宫廷成员每天聚集在一起侍奉国王用膳时，哪些人有权在国王面前落座？而这样一群小精英团体中，谁会有幸得到一张脚凳，谁能得到一把端椅？当一位法国公爵走进房间，他应该走在一位合法的私生龙子（路易十四有很多这样的私生子）前面还是后面？谁有特权开启或结束谈话？谁有特权在服侍国王上床入睡时为他擎着烛台？国王在王室的马镫上经历了漫长而疲惫的一天之后，谁有特权为国王脱下马靴？太阳王的天才在于，他说服宫廷的成员们将这些琐碎的问题视为（象征性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以这种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贵族成员嫉妒彼此而不是嫉妒他，如此一来，如果打猎和跳舞还未能耗光他们的充沛精力，他们也至少不会再对着王位虎视眈眈了。[25]

至世纪末，在整整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政治暴动[26]废黜了路易十四的王室后裔、波旁王朝（以及他们的劲敌表亲奥尔良王朝和白手起家的皇帝波拿巴）之后，法国贵族仍然保留了对铺张和排场的返祖式热爱。然而贵族积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如今它最强大的对手不再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国王，而是资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成就斐然，且在这样一个工业化时代变得越来越富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分人口已经在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显示出自己的实力：政治、金融、工业、技术、科学、传媒和艺术。到萨冈舞会举办之时，资产阶级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已经把法国带入了一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一

个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工业、科学和文化活力的时期，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才告终结，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追溯性地称之为“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27]

资产阶级虽然对整个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显而易见且势不可挡的成功却伤害了世袭精英们的傲气，那个阶层的成员自出生其接受的规训，就是视平民为天生的劣等人。贵族作家和美学家爱德蒙·德·龚古尔[28]曾以其特有的傲慢说：“资产阶级就是一群乌合之众。”[29]有时候法国贵族稍许不那么无礼，会把那些据信较为劣等的同胞称为“无生”[30]之人，仿佛生来不是贵族后裔的人根本不存在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低阶公民的成就公然挑衅了巴黎贵族的天生尊贵感，最近刚刚去世的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死后还给了贵族们重重一击。雨果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他在距离野兽舞会不到两周时刚刚去世，享年83岁，雨果之死在整个法国民众中引发了极大震动，以至于德·萨冈夫人确实考虑过取消自己的舞会，以免被雨果的葬礼抢了风头。

她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几十年来，法国民众视雨果为偶像，他不但在诗歌、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才华出众，还大无畏地致力于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31]雨果以他迅速崛起的事业轨迹和直率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早已成为法国民众的心目中共和理想的英雄化身，并因此成为世袭特权的对立面。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的许多上层同胞对他深恶痛绝。政府决定为雨果举办大型国葬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恨意。



路易十四，即所谓的“太阳王”，在宫廷舞会上扮成阿波罗。凡尔赛宫的宫廷舞会被他确定为制度化的宫廷盛典

最后，亲王夫人的朋友们说服了她，不要让民粹们对雨果葬礼的大惊小怪打扰他们享受好时光。尽管如此，全然无视这场葬礼是根本不可能的。6月1日，也就是萨冈舞会的前一天，200万名悼念者涌入巴黎的街道，目送那位伟人的灵车从凯旋门（当天为悼念他而垂挂黑纱）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穿过塞纳河缓缓行至先贤祠。在那里，他将被安葬在同为文学巨匠的伏尔泰和卢梭的近旁。[32]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雨果的葬礼将作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盛况之一”[33]而被载入史册。上流社会的绅士们在宅邸和俱乐部的阳台上观看着送葬队伍，在看到他的灵柩时拒不脱帽，表达对死者的鄙视。整个场面深深地激怒了这些贵族，这只是他们无效的小抗议而已。天违人愿，那位大作家被正式封圣，这再次提醒他们，在志在必得的下层阶级面前，他们已然落败了。

“有生”阶层的相对低效性，是靠一种基于土地所有权的世袭财富的长久传统得以维系的，这培养了他们对雨果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检验标准的厌恶：自我提升和勤奋努力。世纪末的贵族还不能接受一个事实，即只有接受这些价值观，他们才有望真正接近对手的成就，更遑论超越对手。相反，用历史学家戴维·希格斯[34]的话说，“他们发现自己还掌握着优雅行为的标准，那是他们社会权力的最后一座堡垒”。[35]和他们凡尔赛宫的祖先一样，他们也用这些首先是象征性的观点来看待竞争，把他们屡受挫败的野心和一触即发的敌意升华为一场争夺社交威望的永无止境的战斗。

然而没有了宫廷，贵族男女们就丧失了争夺这一奖项的正式角斗场，正如没有了国王，他们就再也无法向某一个确定的权威人物索要奖赏了。这样的困境源于法国1870年9月再度成为共和国。这是自法国大革命（1789—1799）以来，这个国家第三次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下确立新政体。援引同样的三大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三共和国也消灭了贵族阶层这个合法实体，但还允许这个阶层的子弟继续使用他们的世袭头衔。

为抵御这样的蚕食，城区的上等人们汲取了先辈的智慧，调整了凡尔赛宫那种制度化的故作姿态，使之适应更为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他们展示奢华的新背景是巴黎本身，这座城市经过拿破仑三世手下那位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师乔治-欧仁·奥斯曼[36]的改造，已经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令人惊叹地焕然一新了。[37]奥斯曼为巴黎打造了巨大的公共空间，包括宽阔的街道、公园和表演大厅。在那些地方，巴黎上流社会成员们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他们那些被关在距离市中心12英里的王室宫廷里的先辈。



1885年**6**月**1**日，维克多·雨果的葬礼：**200**万民众涌入巴黎的街道，向这位最受法国人爱戴的作家致敬

在这一背景下，上层不间断的浮夸消遣让公众不仅深刻地意识到它仍然拥有十足的特权，也让他们看到它决心将平民拒之门外，以此来保留那一特权。法裔罗马尼亚小说家和社交行家玛尔特·比贝斯科亲王夫人在《平等》（É*galité*，1935）中回忆：

> 贵族得意于尊贵的仪式感，它被他们带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不是炫耀，而是奢侈，大方自然的庄严姿态。这是一座要塞和城防坚固的城堡，（外人）永远无法进入，也根本不该试图进入……经过了那么多革命，经过了法国大革命本身，这种诱人的魅惑氛围仍然存在；在巴黎市中心，它构成了一个远

离市井平民的世界，就像高高在上的月亮之于地球，就像一个不受时间支配的外星世界。[38]

一个社会其他阶层无法接近的、曲高和寡的平行宇宙的存在，对被它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题，令他们恼火。世袭贵族蔑视那段所谓破坏了它自身的历史，大肆展现出身所赋予的特权力量。

然而，社交界既然把那种仪式感带到“巴黎城中央”，就要接受几位巧妙选择的外人，这群人被一位交际家称为“资产阶级顺势疗法的一剂良药”。经过过去那一个世纪的政治动乱，许多贵族家庭的财务境况已经与他们传统的尊贵身份极不相称，把他们残存的荣耀——城区的私家大宅和乡间的庄园——变成了无以为继的财务负担。为了避免亲自“经商”的羞辱，囊中羞涩的贵族们开始靠婚姻圈钱。[39]这一策略被俗称为“为家徽重新镀金”（redorer son blason）或“为家族的土地施肥”（fumer ses terres），实施者基本上都是贵族男性，根据长子继承权的传统，除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往往也要继承家族的财务压力。这也是出席野兽舞会的好几位最显赫的贵族成员采取的策略，包括女主人自己的丈夫，德·萨冈亲王博松-佩里戈尔（Boson de Talleyrand-périgord，1832-1910）。

萨冈夫妇的婚姻成为重新镀金现象的典型范例，也揭示了它的种种缺陷。53岁的德·萨冈亲王的优雅服饰自是完美无瑕，他有一头与众不同的浓密白发，扣眼上别着一朵古朴雅致的白色康乃馨，过去30年来，他一直是巴黎无可争议的“时尚之王”[40]。萨冈以此荣誉为傲，喜欢戏仿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格言“朕即国家”，宣称“我就是社交界”[41]，没有哪一位自尊自爱的贵族梦想过在这一点上挑战他的地位。正如一位同代人所说，“德·萨冈亲王的单片眼镜就是照亮社交界的太阳”。和太阳王的政治权威一样，萨冈也拥有绝对的社交权威。

然而正如另一位同侪所说，亲王“素来就热爱两样东西，优雅和女

人……两样都很昂贵”，与路易十四不同，如果没有可观的财务支持，他哪一样也玩不起。据同一位评论家所说，萨冈幼稚地认为“他应该拥有一位听话的魔法师，一位童话中的人物，能应需要把石头变成红宝石和珍珠”。[42]

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有，出于权宜考虑，亲王于1858年娶了富可敌国的银行家和军火商的女儿让娜·塞埃（1839—1905）。萨冈鄙视她的卑贱出身，既不爱他的新娘，也毫无尊重可言。然而既然屈尊给了她高贵的姓氏，他希望她的家族能以让他全权处理他们的财产作为回报。（正如他对她的父亲所说，“想要购买王冠的人当然要做好解囊的准备”[43]。）相反，亲王震惊地发现，他的妻子不愿意支付他昂贵的裁缝账单和赌债，还给他确定了一笔年金，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她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德·加利费侯爵夫人乔治娜倒是十分慷慨，又是给钱，又是送昂贵的礼物，这更加深了萨冈对妻子的恨意。作为报复，他对朋友们蔑称她为“下等丫头”。

萨冈对已故的岳父阿希尔·塞埃（Achille Seillière）也一样鄙夷不屑。塞埃曾在普法战争（1870—1871）中给法国士兵配备纸鞋底的靴子，敛集了巨额财富，事情曝光后，他于1873年自杀了。[44]该丑闻一经曝光，亲王立即愤怒地搬出了“用不义之财购买的”萨冈府邸，搬到他位于皇家路（rue Royale）俱乐部楼上的一间简陋的两室套房里（还把他最值钱的古董都寄放在一位朋友家里，以防妻子或债主拿走）。萨冈彻底疏远了伴侣，甚至拒绝在她举办的聚会上与她并肩接待宾客，而是让她臭名昭著的疯子弟弟雷蒙·塞埃（Raymond Seillière）代替他站在接待席上。（塞埃对自己和姐姐的出身戒心十足，总喜欢狂暴地宣称他们“是朱庇特和朱诺、孔子、所罗门王、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45]）亲王通常会拒绝出现在妻子的聚会上，不过今晚他倒是不再抵制，为的是能跟格雷弗耶夫人来一出送暖偷寒。

至于亲王夫人，她硬着头皮面对这一切，希望以比谁都慷慨铺张的方式来娱乐城中显贵，她付出那么昂贵的代价买来头衔，当然要苦心维系来之不易的地位。虽然包括她丈夫在内的一小撮贵族或许会嘲笑她那股子暴发户的粗俗气，但社交界的其他人似乎很欣赏她投入不可估量的巨额财富来取悦他们。既然他们为贵族们富丽堂皇的消遣倾向提供了资金，像萨冈夫人这样有钱的暴发户自然在城区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城区的人们哪怕不情不愿，也须忍受这样的事实。

除此之外，对那些有着出色的个人魅力和才情的外人，上层也表示欢迎，用一位作家后来的说法，这些人会大大增加聚会的“智慧系数”[46]。像德·萨冈亲王那样的庄严贵族无疑是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交界聚会的一分子，但就连他的崇拜者们也承认，他这人“资质平庸、非常肤浅、非常无知”[47]，以至于如果谈论的中心话题不是打猎、骑马、穿衣和俱乐部，他就完全插不上话。更糟的是，他还会脱口说出一些他自以为富有诗意的不当推论，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有一次，他把夜晚的星空比作“长了一脸天花的黑鬼”[48]。这类严重错误让他的对话者哑口无言，迫使女主人们吸取教训，不能指望他来做谈笑间的鸿儒。

社交界的女前辈们对等级森严的巴黎社交界的巅峰人物，也就是王室的陛下和殿下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也同样有理有据。除瑞士外，法国是世纪末欧洲唯一的非君主制政权，自1870年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欧洲各君主制大国迟迟不愿与它建立外交关系。[49]而如此对它爱答不理却并没有减弱外国君主们来巴黎享乐的热情（通常认为，欧洲其他各国的首都加起来，也没有巴黎那样的醉人盛景）。当这些显赫的男女来到巴黎时，上层以近乎宗教的敬慕欢迎他们，举办最奢华的宴会向他们致敬。但与其说仰慕那些王室宾客，不如说敬畏他们的地位，因为出身王宫，他们所背负的压力往往会限制他们个性的发展。欧洲统治王朝的子弟生来便受训要在对他们肃然起敬的民众面前摆出高贵姿态，但他们往往更擅于伪装，而非真正地施展魅力。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样貌

倾城但头脑愚钝的亚历山德拉亲王夫人[50]（亚丽克丝），论身份尊贵，她和丈夫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51]（伯蒂）在社交圈的聚会宾客名单中高居榜首。一位法国外交官曾写信给亚丽克丝的父亲、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52]，描述了她和兄弟姐妹们装聪明的特殊技能：

> 为了给公众留下他们正在热烈交谈的印象，王子和公主们养成了从1数到100，再从头开始数数的习惯。“1，2，3，4，5，6”，罗亚尔王子说。
>
> “7，8，9，10，11”，罗亚尔公主答道。
>
> “12，13，14”，英厄堡公主一脸坚定地插嘴。
>
> “15，16，17，18，19，20，21，22”，赛拉公主答道，她可是个话匣子。
>
> 公众会高兴地想，“王子和公主们度过了多么愉快的一晚啊”！

这样的伎俩暴露了王室里连正常的聊天都没有，这对整个社交圈的交谈打趣更是泼了一盆冷水。

于是，希望自己的聚会优雅与趣味并存的女主人们只好到社交界以外寻找元气十足的人来弥补这些笨蛋。正如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国王的堂妹、著名的沙龙女主人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53]（1820—1904）解释她为何向著名小说家大仲马发出友好邀请时所说，

> 我不会因为他出身高贵而邀请他，他只是个有一半黑人血统的私生子；我不会因为他位高权重而邀请他，他什么都不是。那么就是他的才智，只是因为他的才智，让我选中了他。我希望他那……永远澎湃的激情让我的招待会充满生气。[54]

她毫不掩饰对一位艺术家高高在上的态度，但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艺术家们还是对玛蒂尔德公主的沙龙趋之若鹜，她因此而被昵称为“艺术圣母”[55]。

尽管如此，公主的“艺术”小圈子仍然是城区的反常现象，社交界往往认为搞艺术创作的人是一群迷人但声名狼藉的异类。他们更频繁也公认为更安全的选择是夏尔·阿斯，这位52岁的交际家和蔼可亲又风趣幽默，威尔士亲王和德·萨冈亲王都把他纳入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圈。阿斯的父亲出生在德国，曾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证券经纪人，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从资产阶级的犹太人背景脱颖而出，成为深受上层喜爱的一员，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风趣的揶揄是他的招牌，例如当素有多嘴饶舌之名的德·波尔塔莱伯爵夫人梅拉妮[56]邀请他陪她去听歌剧时，他回嘴道：“我很荣幸——我还没在《浮士德》里听到过您的声音呢！”[57]

阿斯不但用他那不失亲切的刻薄天赋揶揄他人，也常常用它来自嘲。[58]常开玩笑说他那些王室和贵族同伴们喜欢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他们遇到过的唯一一位穷鬼以色列人（社交圈对犹太人的称呼）[59]。“穷鬼”用在阿斯的身上只是个相对的说法。他虽然算不上暴富，却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足够的遗产，维持他自己选择的有闲阶层的生活方式不成问题。然而他的自我贬低却让“有生”阶层的成员安心，虽然他们名义上收留了他，但阿斯总算没有丧失一个他那种出身的人在他们跟前应有的谦和。

在他社交生涯的早期，阿斯曾经连续四年申请加入骑师俱乐部，表现出了同样令人愉快的克己态度：他创下了该俱乐部历史上被拒次数最多的纪录。在他第五次尝试申请时，骑师俱乐部的头目们为了奖励他的谦卑，最终把他收编。即便考虑到他此前经历的一切难堪，他们的决定仍然是第一等的社交奇迹，因为俱乐部明确表示过，入会要看血统和头

衔。根据社交界一个众所周知的传闻，脾气暴躁的德·杜多维尔公爵[60]担任俱乐部主席期间，曾否决了“无生”阶级小说家保罗·布尔热[61]的入会请求，宣称“我认为整个巴黎终归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不计个人成就的”。[62]阿斯所能凭借的也只有个人成就，但他还是设法入选了。

考虑到俱乐部严格禁止接受犹太人，阿斯入选骑师俱乐部更是奇事一桩。除阿斯之外，俱乐部只对三位法裔罗斯柴尔德男爵打破过这一禁令，他们巨大的财富和工业帝国让他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和德·萨冈夫人一样，阿方斯、居斯塔夫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三位男爵能够有条件地进入社交界，得益于他们挥金如土的慷慨大度。和德·萨冈府邸一样，他们的宅邸也因富丽堂皇而位居能够接待王室宾客的少数巴黎私人宅邸之列。许多贵族私下里不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惊人财富，包括德·萨冈亲王在内的少数人甚至公开鄙视他们。（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巴黎歌剧院举办的一次社交界筹款聚会上，萨冈安排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全都坐在立柱后面，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他们。[63]）这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自内心的厌恶解释了巴黎贵族们为什么会尖刻地“忘记了”他们的骑师俱乐部会员身份，称阿斯是“骑师中唯一的以色列人”和“骑师俱乐部的犹太人”。[64]

一如他的社交才能，阿斯对自己的品位和艺术鉴赏力也不事张扬。他在第二帝国期间担任过拿破仑三世的名胜古迹鉴定人，后来又担任艺术画作鉴定人。[65]天生慧眼再加上他凭借这些职位获得的社会关系和专业技能，阿斯成为巴黎首屈一指的鉴赏家。第二帝国衰落后，阿斯失业了，不得不靠给社交界朋友们提供关于艺术品收藏的建议来获得满足。这一业余爱好或许无法让他才尽其用，但在上层社会，这可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服务。巴黎贵族们虽然非常精通那些无关紧要的优雅艺术，在画作方面可并非总是那么博学多闻。而因为艺术品是地位的必要象征，他们又希望了解自己购买、继承或出售的东西。但他们常常又羞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每到这时，阿斯那种无害而谦和的咨询风格就让他们

备感放松。阿斯总是巧妙地让他们相信，他的建议正是他们一直以来心中所想，就连社交界最自信的审美家也很受用。正如格雷弗耶夫人所写的那样，“我喜欢和阿斯一起参加巴黎沙龙”——一年一度的法国学院派艺术展——“他能帮我厘清自己的观点”。[66]



詹姆斯·蒂索（**James Tissot**），法国优雅交际家的画像《皇家路上的小圈子》（***Cercle de la rue Royale*，1868**）。夏尔·阿斯，普鲁斯特未来作品中夏尔·斯万的原型，就站在最右边

从不缺席任何欢乐聚会的阿斯也参加了野兽舞会，一如往常，那天他最大的问题是抽空对每个跟他高声聊天的人说上一两句俏皮话。他选择了什么装束不得而知，但他大概加入了一群扮成复活节白尾兔的交际家行列，一位新闻记者提到了他们，只是没有一一辨认兔子们的身份。（阿斯选择这样的装扮也显示了他特有的机智幽默，他的姓“Haas”很像“Hase”，也就是德语的“兔子”。）骑师俱乐部的犹太人不停地开着玩笑，恭维这个，闲聊那个，像素日一样靠自己的机智获取他人的好感。

如此一来，他也为当晚在场的另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人树立了榜样——他的朋友，36岁的热纳维耶芙（贝贝）·阿莱维·比才［Geneviève（Bébé）Halévy Bizet］。她打扮成一只漂亮时髦的青蛙，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夫人们（上文提到的银行家男爵们的妻子）装扮的鹅群待在一起。比才夫人能受邀参加舞会，也是因为她无法抵挡的个人魅力，在这一点上她很像阿斯。但他那种谈笑风生的自谦风格倒不怎么适合她。她在自己的世界已然是一颗闪亮的明星了，并把那种自信带入了城区。谁也不会觉得贝贝是等闲之辈。

奇怪的是，比才夫人的自信与她那些社交界新相识们的自信相得益彰，这是因为她也是基于出身而自信。她算是犹太人群体中的贵族，因为她已故的母亲娘家姓格拉迪斯（Gradis），是古老而极为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67]的一支。格拉迪斯一族最早来自巴勒斯坦，于公元2世纪迁居葡萄牙，在那里，族中的一位女性嫁入了布拉甘萨王朝[68]的公爵府。15世纪末犹太人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之后，格拉迪斯又迁居波尔多，在那里重新起家成为航运业大亨。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全面控制了法国与其加勒比殖民地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以至于法王路易十六主动提出给他们加封贵族。但他们的无上光荣——他们高贵身份的最佳证明——就在于他们拒绝了国王的好意，因为要接受那样的提议，他们就必须以《圣约·新约》的名义起誓[69]。在这方面，格拉迪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一个世代之后便欣然接受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为他们加封的贵族头衔，皇帝以此举换取他们资助他和盟友们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中对法开战。

祖辈们对获封爵位不感兴趣让比才夫人感到高兴，不是因为她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心怀敌意——她宣称他们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是因为她承诺忠于犹太教，她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承诺可言。（有一次，当有人问她是否考虑皈依天主教时，她避重就轻地说：“我没有多少宗教可改。”[70]）格拉迪斯拒绝封爵只是符合了比才夫人从她的父系长辈们那

里继承的一个信念，即真正的荣耀不是王室赠予的礼物，而是靠天赋赢得的奖杯。

她已故的父亲就是这一原则的最佳典范。阿什肯纳兹[71]德国移民的儿子弗洛蒙塔尔·阿莱维（1799—1862）是一位音乐奇才和作曲家，他的代表作《犹太女》（*La Juive*，1835）一度成为全欧洲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72]随着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阿莱维的同胞也给予了他无上的荣誉和盛赞。他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哀悼者涌入街道，目送他的灵车从左岸的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徐徐驶向右岸最北端的蒙马特尔公墓，而全城的剧院和音乐厅也关闭灯光，向他致敬。[73]虽然送葬队伍的规模比不上最近的雨果，但公众集体悼念阿莱维之死也同样确定无疑地让他获得了国宝的神圣地位。

在她自己这一代人里，比才夫人的堂兄卢多维克·阿莱维（Ludovic Halévy，1834-1908），即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弟弟莱昂·阿莱维的儿子，也同样声名远扬，他是一位小说家和轻歌剧的剧本作者，还是滑稽不恭的大道派[74]编剧。卢多维克长期与亨利·梅亚克[75]合作，两人共同开创了一种俏皮浮夸的喜剧类型，被公认为体现了现代巴黎精神的精华，俗称为“梅亚克-阿莱维式才思”。1884年12月，卢多维克获得了法国文人的最高荣誉：入选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这个有着250年历史、由40位成员组成的学术机构负责保护和提升法兰西语言的瑰宝。（直至今日，法兰西学术院仍然是法国官方文化等级制度中的最高梯级；它的成员被称为“不朽者”，这个称号毫无讥讽之意。）被选为新的“不朽者”一贯被视为巴黎城中的重大事件，但卢多维克入选尤其事关重大：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犹太人。[76]

卢多维克还曾与梅亚克一起为比才夫人已故的丈夫乔治的作品《卡门》（1875）创作了歌词。比才在该剧首演后数月便英年早逝，但这部歌剧在他死后继续在世界各地大获成功，让他与已故的岳父一样垂世不

朽。到野兽舞会举办之时，比才和阿莱维这两个姓氏已经成为法国音乐天才的同义词了。

正如一位新闻记者所说，这两个“光荣的名字，（为比才夫人）罩上了无与伦比的耀目光环”。[77]她也没有辜负自己的神秘光环，身边总是围绕着巴黎顶尖的艺术人才，他们成群出现在她每周在蒙马特尔举办的沙龙中。她的信徒来自各个领域，从埃德加·德加到居伊·德·莫泊桑，前者将他无出其右的眼光和精湛技艺瞄准乌烟瘴气的舞蹈家、苦艾酒鬼和妓女的世界，后者沉迷于性爱、毒品和麻烦，贪婪的程度怕只有他惊世的文学才华能够匹敌。比才夫人能吸引这样一群精彩绝伦、成就斐然的追随者，本身就激发了社交界对她的好奇心，特别是在第二帝国崩溃、玛蒂尔德公主星光黯淡之后。其他贵族女主人们也会开门欢迎一两个附庸风雅的宾客——尤其是涉猎纯文学的贵族，但比才夫人交往的可都是天之骄子，而且与“艺术圣母”不同，她娘家和夫家的姓氏都让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更妙的是，那些光顾比才夫人的沙龙的才子们盛赞她就是“梅亚克-阿莱维式才思”的化身。这样的名声表明，她那粗鲁的、反讽的诙谐气质会让人想起她的堂兄卢多维克创作的深受青睐的喜剧，当然在社交界听来，还有些夏尔·阿斯的简练机妙的调子。因此，她的幽默感让她在上层的受欢迎程度加倍，使她的名字出现在许多贵客名单中。[78]

然而贵族的雅量是有限的。要进入他们优雅尊贵的小圈子，像比才夫人和夏尔·阿斯这样的平民不仅要给众人取乐，还要大度地忍受社交界礼仪中配备的蓄意羞辱。比方说，在萨冈舞会这样的正式场合，资产阶级宾客每从一个会客厅走向另一个会客厅，就不得不接受自己地位低人一等的事实。在贵族府邸，总有高高的双扇门（portes à deux battants）把这些会客厅隔开，每每来到这样的双扇门前，礼仪要求“无生”阶层的人必须停下来，让有爵位之人从右侧走到他们前面。这一做

法名为“让风头”[79]，英文是“giving the hand”（法语是“donner la main”），hand的用法同“占上风”（“upper hand”），这一礼仪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日臻完善，目的是在王室和贵族之间实施严格的等级制度。虽然内在机制相当微妙，但它的意义一目了然，是“无生”阶层必须接受的从属姿势。绅士们固然时兴众所周知的“女士优先”，哪怕是对资产阶级女性，但他们的女性同类可不需要这么做。在这样一个象征意义上，贝贝有可能而且的确被视为等闲之辈。

同样的偏见也出现在晚宴的座次安排中，德·萨冈夫人召集包括阿斯在内的仅仅40位优待宾客在当晚典礼之前参加的晚宴就是如此。在受邀的所有其他宾客翩翩而来之前两个小时，亲王夫人招待她那个亲密的小圈子享受了孔代亲王鳟鱼、法式慕斯鹅肝和维也纳会议利口酒。就算身着动物服装，上层也遵守着严格的等级阶序：爵位越高，座位离主座越近；地位越低，座位就越靠近桌脚或下席（英语称之为“盐罐的下首”）。当聚会中有中产阶级庶民在场时，这样的羞辱一定会针对他们，不管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有多高。一位社交新手曾经询问萨冈亲王的侄子，即被公认为其“时尚王国”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的博尼费斯（博尼）·德·卡斯特兰伯爵[80]，假设有两位晚宴宾客，一位是八旬老人维克多·雨果，另一位是个少年公爵，他会把谁安排在上座。卡斯特兰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当然是公爵。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81]

就算所有的宾客都是贵族，座位的安排也能反映出基于爵位和家室的复杂算计，最终的排座有时会引起不快。德·萨冈夫人的舞会前宴会上还有一位客人，就是傲慢的艾默里·德·拉罗什富科（Aimery de La Rochefoucauld）伯爵，此人有一次看到自己被安排在下席（这全拜他那位中产阶级母亲所赐，每当不得不勉强承认有这样一位母亲时，他都会耸耸肩，说自己跟她“不常走动”[82]），于是恼羞成怒，高声质问女主人：“请赐教，亲王夫人，我们这些坐在下面的人吃到的菜品和你们坐在上面的人是一样的吗？”[83]伯爵的暴怒违反了一个更微妙的处世法

则，那就是面对任何煎熬和痛苦都要保持风度。同桌之人对他的失态幸灾乐祸，给他取了一个他再也甩不掉的绰号：“座次”·德·拉罗什富科。

要在每一次交际中如此紧张焦虑地确认身份地位，社交界也不外乎是丛林，在这样一个达尔文世界，居民们淹没在没完没了的社会生存竞争中，耗尽体力。在野兽舞会上，这些不仅体现在动物装扮上，或门厅或座次安排的礼节规矩上，或模仿猎鹿赛局（该赛局也颇合规矩，一位平民扮演鹿，贵族们扮演猎犬）上，或许也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被德·萨冈夫人安排为当晚压轴戏的特别表演中。当府邸各处敲响午夜钟声之时，她招呼宾客们进入舞厅，那里太过空旷，她不得不请了两个互不相干的乐队同时演奏，各占舞池的一端。

一阵鼓声过后，亲王夫人收起她的孔雀尾巴，走上舞厅中央的舞台，拉开大幕，幕布后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蜂箱。随着两个乐队奏响旋律，11对“蜜蜂”男和“黄蜂”女涌出蜂箱，跳起了夸张的交欢舞。这段舞曲由俄裔法国编舞师约瑟夫·吕西安·珀蒂帕［Joseph Lucien Petipa，他与著名的《睡美人》的编舞莫里斯·珀蒂帕（Marius Petipa）是兄弟］专为这次舞会编排，是根据比才夫人已故父亲的歌剧《流浪的犹太人》（*Le Juif-Errant*，1852）中一个著名的舞蹈片段改编的。[84]那场歌剧轰动的首演后不久，“蜜蜂芭蕾舞”就在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中作为宫廷舞剧重演，备受关注；拿破仑三世希望通过复兴旧制度中凡尔赛宫的盛典来使自己（通过政变攫取）的政权合法化。如今在自称酷似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主人的安排下，同样的场面再度重演，而重演所在的场景也配得上太阳王本人。



1863年在拿破仑的宫廷中表演的蜜蜂芭蕾舞，**22**年后在萨冈舞会上复活了

在德·萨冈夫人委托编排的舞剧中，跳舞的蜜蜂全都从贵族的最高阶层中选出，姓氏都是德·卡斯特、加利费、拉罗什富科。他们身穿金色条纹的锦缎短袍，头戴小小的金头盔，装饰着金银细丝的触须。在这些装束下，他们的身份很容易辨认。[85]舞伴们跳着加伏特舞绕金色蜂箱旋转时，蜂群聚集、分散，又重新聚集在弗朗索瓦·德·贡托-比龙伯爵夫人（Comtesse François de Gontaut-Biron，她是和德·舍维涅夫人调情的那位长颈鹿屁股的女亲戚）的周围。在一场刻意安排的顺从表演中，其他扮演黄蜂的女芭蕾演员拥戴德·贡托-比龙夫人为蜂后，而她称德·博蒙伯爵（Comte de Beaumont）为她的王。然后，这一对开始跳起了胜利的双人舞，其他人则一对一对悄无声息地滑回了蜂箱。到音乐结束时，只有“王室”夫妇还留在舞台上，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征服了这片领

地。这段舞蹈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即便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有些动物也要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一些。

果真如此吗？按照另一位“无生”阶层的晚会宾客、左倾作家朱丽叶·亚当[86]的说法，蜜蜂芭蕾舞成为当晚庆典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不是什么好的转折点。在以“保罗·瓦西里伯爵”为笔名发表的报道中，亚当写道，人们为蜜蜂们鼓掌的掌声刚刚落下，一种明显的不适感便“弥漫在整个人群中，疑虑像火药味一样散布（在我们中间）”。[87]这场表演之前，宾客们“以最为欢愉的语词”向彼此致意，此刻却纷纷厌恶地看着彼此。他们不再赞美朋友的戏服，开始了苛责的批评。谈话变成了抱怨、咆哮和低俗的动物双关语（“嘿，你这只丑小鸭！”“你不也一样么，老山羊！”[88]）。

虽然晚会节目单——模仿小报的样式，取名为《鸭鸣报》（*Le Canard*，法语“鸭子”用在报纸上的意思就是“小报”）——承诺清晨四时三十分还会有一顿冷餐，但留下来参加冷餐会的人寥寥无几。“午夜刚过不久，”亚当写道，“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准备早退了，我们也确实早退了，走时还带着对彼此和对自己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满。”年轻的名媛德·布勒特伊侯爵夫人（Marquise de Breteuil）觉得规定的动物装束可能“很不方便，而且样子多半极蠢”[89]而决定不参加当晚的舞会，后来深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得意，因为朋友们纷纷传说“舞会不怎么愉快……很严肃，一点儿都没意思”。

由此说来，野兽舞会并未大获成功，反而掀起了小小波澜。导致狂欢者们不满的是什么？珀蒂帕以王室为原型的芭蕾舞为何未能让现场的气氛更加欢快？舞会的评论者们无一给出解释。然而除了“聚会疲劳”（社交界本季的聚会从复活节刚过就开始了，这样漫长的社交马拉松着实让人疲惫不堪，萨冈舞会是本季的压轴大戏）这样笼统的猜想之外，还有几个可能的解释。其一，蜜蜂芭蕾舞大概让数位来宾觉得等级

体系不够严谨：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弗朗索瓦·德·贡托-比龙伯爵夫人绝不是跳舞的“黄蜂”中头衔最高的——德·格拉蒙公爵夫人（Duchesse de Gramont）才是。因此，德·贡托-比龙夫人被尊为蜂后非但没有肯定，反而违背了贵族的等级次序。

另一方面，虽然德·格拉蒙公爵夫人的丈夫来自“血统纯正”（pure souche）的法国天主教王朝，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她本人却是犹太人出身——的确，她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最有效地为格拉蒙的家徽重新镀金的姓氏，但依然是犹太人。近年来，对某些贵族来说，犹太人身份有着令人不快的含义，让人想起都市化、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该经济体制下，信仰不同宗教的暴发户在争夺钱财的竞争中全面击败了乡绅阶层。此外，法国的反犹分子把犹太人和一种外国血统，具体而言是日耳曼血统联系起来。法国最近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已经把这种概念变成了仇外的集结号，城区内外都是如此。更何况德·格拉蒙夫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支系，说法语还带着些德语口音。有些宾客大概不会觉得她被群舞演员加冕封后是她应得的荣誉，而会认为她名不副实。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场表演之所以让在场者感到不安，是因为它对头衔和等级的混淆暴露了社交界阶级划分本身的不稳定性。无论上层的男男女女如何坚决地捍卫他们象征性的高贵传统，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和国，而且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地带之一。与贵族的祖传地产所在的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外省农业采邑全然不同，法国的资本正在迅速打破这个国家的经济平衡，日渐偏离乡绅农业而倾向于国际商业、工业和金融。因此，即便是只有部分时间住在巴黎的贵族们，也感到自己像布封专题研究中的某些物种一样，被迫适应陌生环境中的种种压力。于是，面对资产阶级“乌合之众”的排山倒海之势，他们不得不做出令他们的祖辈痛心疾首的让步：大到德·萨冈亲王和德·格拉蒙公爵为了金钱利益而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小到像阿斯和比才夫人这等资产阶级不速

之客也受邀参加舞会。

虽然只是权宜之计，但这些外来者侵入社交界有一个尤其不受欢迎的副作用：他们有时候会获得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即便那些声称比他们高贵的人也未必会得到。阿斯入选骑师俱乐部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就连“有生”的候选人也频繁地被该俱乐部拒之门外，他受邀参加德·萨冈夫人舞会前的40人晚餐也是一例。这类意外的成功不仅证明了阿斯在社交场上的巨大魅力，也表明上流社会与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之间的边界是极不稳定的。

如此看来，蜜蜂芭蕾舞不单是社会等级制度遭到破坏的一桩孤例，还证明了一种远为普遍和致命的社会现象：上层的解体。正如关于萨冈舞会的媒体评论在其后几周乃至数月所证实的，在法国，对此趋势不满的可不止巴黎的贵族这一群人。

舞会嘉宾的抱怨并没有出现在社交界新闻中，也就是把城区的新闻报道给巴黎大众的那一大批蒸蒸日上的巴黎日报、周报和月报。这些出版物对野兽舞会的报道充满情怀，也有着明显的偏见。亲王夫人再次展示出不少保守贵族认为过分包容的社交本能，邀请了几位社交新闻记者参加聚会。为答谢她的好意，他们纷纷在自己的专栏中不吝笔墨，对这场聚会大加赞扬。[90]《高卢人报》（*Le Gaulois*）的一位记者用了六段文字赞美蜜蜂芭蕾舞这个“非凡”的节目，也用同样冗长的文字记述了当晚的服装、餐饮、音乐和装饰多么令人着迷。《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八卦专栏记者“星火”［Étincelle，勤奋进取的德·佩罗妮子爵夫人（Vicomtesse de Peyronny）的笔名］[91]也不甘示弱，将德·萨冈夫人的社交娱乐天赋与她的假想孪生姐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相提并论。“星火”还说，就连午夜过后宾客们开始互称的那些虚弱无力的动物双关，事实上也是一种“如此奇幻的野兽交际方式”。

亲王夫人或许会觉得这类褒扬之声让她的花费物有所值，至少它们

赞美她是长袖善舞的典范。但这些报道见诸法国外省时，便引发了一种强烈的抵制，那里的人们对颓废、挥霍且有可能来自“外国”的都市人的敌意日渐加深。政治派别的两端——拥护共和制的世俗左派和拥护君主制的天主教右派——都有报纸谴责城区放任地堕落为浮夸和妄自菲薄。“继续吧，”自由派报纸《卢瓦尔河与上卢瓦尔河共和报》（*Républicain de la Loire et de la Haute Loire*）的一位记者提到萨冈的动物展览时说：“继续欢腾、呼哨、喵喵叫吧，继续沉迷在你们自己的达尔文世界里，你们终有一天会后悔的，到那时一切都太迟了！”这些文字的背后隐隐透着一种威胁：另一场反对贵族的灾难性起义一触即发。言外之意是，正如贵族们在1789年未曾预料到它的爆发那般，如今他们显然也没有注意到它的潜伏。[92]

天主教大报《朝圣者报》（*Le Pèlerin*）的一位专栏记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反感。他假定自己的读者熟悉《但以理书》[93]，把社交界比作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94]，后者因骄傲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被迫以动物之身活了七年（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像禽鸟的爪子”[95]）：

> 在如今这样一个亵渎神灵的时代，这场兽化（甚至不能单单称之为化装）舞会破坏了那些本来应该为社会其他阶层做出表率之人的公信力。不知这能否给他们以教训，就像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他的“舞会”之后用了整整七年时间学到的教训那样——提醒他们不管在哪里，哪怕是自己的沙龙，也不能如此藐视上帝，让基督教世界蒙羞。[96]

另一份保守出版物《宇宙报》（*L’Univers*）的一位记者未必这么想，他的文字里透着一股末日临头的意味：

> 关于一位贵族夫人近日为朋友们举办的怪异娱乐的报道不光是丑闻——它们引发了一种真正的恐怖感，那是一种掺杂着

> 理所当然的愤怒的恐怖感。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类令人难过的狂欢如何令那些为它们唱赞歌的人欢欣鼓舞，我们又如何不恐怖？那些人欢欣鼓舞地看到，昔日法国的残余就要陷入愚妄并彻底消失了。[97]

在这些评论家看来，野兽舞会意味着法国阶级体系的根本危机。如果说除去所有炫耀的装腔作势之外，贵族还有什么更深的政治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意味着王权和宗教。它意味着秩序（天主教君主制）的力量会战胜混乱（无神论共和制）的力量。它意味着荣誉、传统，以及“存在即合理”。从这一视角看来，这样一群人出席像野兽舞会这么一个愚蠢至极、放浪形骸的聚会不仅仅是自我毁灭，也是对法国这个光荣的王国的毁灭——虽然那个王国早在近百年前就已经消失在断头台上了，很多保守派人士仍然梦想着复兴它的旧日荣光。

很多，但并非全部。至少有一位学者认为复兴事业败局已定，它的丧钟就在德·萨冈夫人那个人造的动物王国里敲响。舞会刚刚过去的那些天，埃杜瓦尔·德吕蒙[98]的名字并没有从第四阶级[99]狂喷的刻薄报道中凸显出来。然而一年后，这位来自里尔、一直默默无闻的评论家却在法国政界引爆了一枚炸弹：《法国犹太人》（*La France juive*，1886），这本长达1200页、疯狂攻击犹太人的宣传册指责法国各地的犹太人正在密谋从内部瓦解这个国家。德吕蒙将野兽舞会上的“犹太化”社会混乱视为该阴谋存在及其胜利的实证。他甚至点名提到夏尔·阿斯和洛尔·德·舍维涅及其他社交名流，让两人预先体验了一把出名的滋味，一个世代之后，还会有另一位作家（虽然出于全然不同的动机，结果也大相径庭）让他们声名远扬。[100]

《法国犹太人》在首版后的十年内发行了140版，足见其畅销，它突然释放出一种仇外的种族主义偏执，成为法国政治中一股强大潮流。该书没有对勇敢的封建贵族抒发什么怀旧之情，而是想象出了一个梦魇

般的当代地狱，在那里，“一切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而“真正历史悠久的法国贵族”却成为惨遭犹太人毁灭的众多牺牲者之一。[101]三年后，正好赶上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德吕蒙重新推出了这一套侮辱性论断——再次援引野兽舞会，证明“如今的贵族如何沦为”邪恶的犹太人玩弄阴谋的牺牲品——写了一本续集，书的标题说明了一切：《世界的末日》（*La Fin d’un monde*，1889）。

然而，一定还有另一个时刻，有另一种想象的结局。在德吕蒙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为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之前；在社会专栏作家们关于野兽舞会的报道见诸报端（他们更不知道那些会成为丑闻）之前；在恐惧和（自我）咒骂的火药味弥漫于德·萨冈府邸，促使宾客们早退之前；一定有一个时刻，另一种比这一切远为动人的结果在诱惑着众人。在那样一个时刻，舞者们为他们“错误的”王后封圣，无意间偏离了传统的社交脚本，在那间灯火通明的舞厅里发射了一颗小小的照明弹。在那个时刻，三位年轻的女性宾客——一只妙语连珠的青蛙、一头女扮男装的豹子和一只猫头鹰的腐尸——在德·贡托-比龙夫人被加冕的那一刻瞥见了自己的进阶、升华和荣耀。夏尔·阿斯作为这三位尤物的慈父般的朋友，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结果。然而正如蜜蜂芭蕾舞所显示的那样，上流社会对名望的追求也是一场女人的游戏。当时，三位女性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没有理由不为胜利而战。

很久以后，她们会看到理由。很久以后，她们会质疑、反思甚至后悔当初的选择。还是在很久以后，她们会看到她们宣誓效忠的那个世界——那个显贵的世界——在一位（半）犹太人巧妙而毫无怜悯的笔下全然崩溃，但此人可没有参与德吕蒙想象的那种阴谋，因为他在表演他一个人的蜜蜂芭蕾舞，从贵族的花园里采集花粉，把它们转化成他小说的“黑蜜糖”。[102]但此时，在这一刻，这三位年轻的女人并非濒危物种——她们是稀世珍禽。此时，在这一刻，世界还没有结束。它才刚刚开始。

[1] 让娜·塞埃（Jeanne Seillière，1839-1905），19世纪巴黎的艺术收藏家和社交名媛，德·萨冈亲王博松·德·塔勒兰德-佩里戈尔之妻。

[2]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封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启蒙时代著名作家。布封的思想影响了之后两代的博物学家，包括达尔文和拉马克，他被誉为“18世纪后半叶的博物学之父”。

[3] 在塞埃/萨冈家族购买之前，圣多米尼克路57号的宅邸被称为德·摩纳哥府，取自它18世纪的主人，即被一位摩纳哥亲王疏远的妻子。对德·萨冈府邸和野兽舞会的描写多取自当代的资料来源，包括*L’Art et la mode*（June 16，1885）：6-7；Jules Claretie，*La Vie à Paris*：*1880-1885*，vols. 1-6（Paris：Victor Havard，1880-1885），vol. 1，175；Étincelle（pseud. Vtesse Peyronny），*Carnet d’un mondain*（Paris：Édouard Rouveyre，1881），47-60；*Le Figaro*（May 28，1885）：1；*Le Figaro*（June 3，1885）：1；*Le Figaro*（June 5，1885）：1-2；*Le Gaulois*（May 26，1880）：1；*Le Gaulois*（May 10，1885）：2；*Le Gaulois*（May 29，1885）：1；*Le Gaulois*（June 3，1885）：1-2；*La Lanterne*（June 1885）：2；Parisis（pseud. Émile Blavet），“Le bal Sagan，” in *La Vie parisienne*：*la ville et le théâtre*，preface by Aurélien Scholl（Paris：Paul Ollendorff，1886），116-23；Abbé Sadinet，“Le Bal des bêtes，” in *La Vie moderne*（June 15，1885）：392-93；*Truth*：*A Weekly Journal* 7，no. 174（June 3，1880）：713-15；and *Le Voleur illustré*（June 11，1885）：382-83。关于萨冈府邸和萨冈婚姻的其他记述，见An American（pseud.），“To Blow Up a Princess：Dynamite Bombs Explode in the Doorway of the Princesse de Sagan，” *Baltimore American*（March 1，1892）：1；J. Sillery，*Monographie de l’hôtel de Sagan*（Paris：Frazier，1909）；“Historic Residences of Paris Now Occupied by Antiquaries，” *New York Herald*（January 2，1910）：11；A Veteran Diplomat（pseud.），“The Passing of Talleyrand，le roi du chic：A Chapter in the Fall of Past Grandeur，”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1910）：n.p.；AdF，“Une saison de printemps commence，” *La Semaine à Paris*（May 8，1936）：4；and Pierre Guiral，“Les Écrivains français et la notion de la décadence，” *Romantisme* 13，no. 32（1983）：9-22。

[4] 约瑟夫·斯万（Joseph Wilson Swan，1828-1914），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发明家，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在1878年获得第一个白炽灯专利。他的居所是世界第一个用电灯照明的私人住所。1860年，约瑟夫·斯万发明了白炽灯的原型——半真空碳丝电灯，由于当时真空技术的限制，电灯寿命不够长。1875年，斯万改进了他的发

明。1878年，斯万早于爱迪生一年获得白炽灯专利权。由于专利方面的争议，1883年，约瑟夫·斯万与托马斯·爱迪生一起成立了电灯公司。1894年，约瑟夫·斯万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5] “希望钻石”（Hope Diamond），世上现存最大的一颗蓝色钻石，重45.52克拉。目前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院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传说这是一颗受诅咒的宝石，会为拥有者带来厄运。1824年，著名收藏家亨利·菲利普·霍普（Henry Philip Hope，1774-1839）买下了该钻石，并用自己的姓氏为其命名。由于hope意即希望，故此钻石得名“希望钻石”。

[6] *Truth*：*A Weekly Journal* 7，no. 176（May 13，1880）：682；and de V...（pseud.），“Nos Grandes Mondaines：la Princesse de Sagan，” *La Revue mondaine illustrée*（February 10，1893），n.p.

[7] 关于“美丽的洛尔”的样貌，见Stéphanie-Félicité du Crest de Saint-Aubin，Comtesse de Genlis，*Pétrarque et Laure*（Paris：E. Ladvocat，1819），174。

[8] 弗兰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和早期的人文主义者。1327年，一位名为洛尔的女士在阿维尼翁的教堂里演出，她的身影激发了彼特拉克旷日持久的创作冲动。后来那些沿袭其风格的文艺复兴诗人们把这三百多首诗的合集称为《歌本》（*Canzoniere*）。洛尔本人可能是于格·德·萨德（Hugues de Sade，萨德侯爵的祖先）的妻子洛尔·德·诺韦斯（Laure de Noves），也可能只是被诗人理想化或假想的人物。

[9] 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1740-1814），简称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法国贵族出身的哲学家、作家和政治人物，写过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以色情描写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丑闻而出名。萨德在波旁王朝、共和国、执政府和帝国时期均曾身陷囹圄，他64年的人生有29年都在监狱和疯人院中度过。以其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Sadism）”成为西方语言对性虐恋的通称。

[10]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89；and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5. 23 “Corporal Petrarch”：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7.

[11]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7.

[12]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4.

[13] 关于上层对（谨慎的）通奸的容忍，见GLP，“Gratin（Le），”in *Dictionnaire du snobisme*，ed. Jullian，89。

[14] AG，*Les Clés de Proust*，30.

[15] 沙皇村（Tsarskoe Selo），俄罗斯圣彼得堡郊外的村庄，是俄罗斯帝国时期俄罗斯皇族罗曼诺夫家族成员的居住地之一。

[16] AF，*Le Bal du Pré-Catelan*（Paris：Arthème Fayard，1946），312-13.

[17] Abbé Sadinet，“Le Bal des bêtes，”in *La Vie moderne*（June 15，1885），392.

[18] 关于EG在RM的豹纹装束的全面描写，见RM，*Têtes couronnées*（Paris：Sansot，1916），253-54；and in RM’s preface to the *Catalogue des tableaux par Gustave Jacquet*（Paris：Galerie Georges Petit，1909），10。

[19] Comte O. de Bessas de la Mégie，ed.，*Légendair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devises，cris de guerre，dictons，etc.*（Paris：Librairie Centrale，1865），119.

[20] LG，*Mémoires*，vol. 2，*Les Marronniers en fleurs*（Paris：Grasset，1929），22.

[21] EG，见AP（II）/101/150；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53.

[22] Louis de la Roque，ed.，*Bulletin héraldique de France，ou revue historique de la noblesse*，vol. 9（Paris：Administration du Bulletin Héraldique de France，1890），49.

[23] Inti Landauro，“Louvre to Restore da Vinci’s *John the Baptist*，”*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3 2016）；James M. Saslow，*Ganymede in the Renaissance：Homosexuality in Art and Societ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89-90.

[24] 指位于巴黎西南郊外伊夫林省省会凡尔赛镇的凡尔赛宫，它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片森林和沼泽荒地，162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以1万里弗尔的价格买下了117法亩荒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二层的红砖楼房，用作狩猎行宫。

[25] 关于凡尔赛宫的王室礼拜堂的规矩，见Alexandre Maral，*La Chapelle royale de Versailles sous Louis XIV*（Wavre：Mardaga，2010），109-22。

[26] 关于1792年第一共和国建立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期间的一系列政权更迭——波旁王朝、波拿巴帝国、奥尔良王朝和共和国政府，见附录二。——作者注

[27] 关于路易十四宫廷的礼仪，见Pierre Dominique，“Sous le règne de l’étiquette，” *Le Crapouillot*：*Les Bonnes Manières* 19（1952）：19-25；Norbert Elias，*La Société de cour*（Paris：Calmann-Lévy，1974），79-93；Lucy Norton，ed.，*Saint-Simon at Versailles*（London：Hamish Hamilton，1980），223-35；and Louis de Rouvroy，*Duc de Saint-Simon*，*Mémoires*，ed. M. Chéruel，preface by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vol. 12（Paris：Hachette，1858），ch. 19。Elias指出，在路易十四的廷臣中，争名夺利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一个人职位的提升必定会引发另一个人遭到贬谪”（79）。

[28] 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法国小说家。曾与福楼拜、都德、左拉等结下友谊，小说多用心理学和病理学观点分析人物的精神状态。他是一年一度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创始人。

[29] EdG，日志，op. cit.，1867年9月5日的日记。

[30] Georges Renard，“Les Femmes du monde et leur rôle politique，” in *La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tome XXXVII，no. 3（September 1903），601-16，605.

[31] 关于法国民众对维克多·雨果的“普遍盛赞”，以及关于后者的“中产积极自由主义”，见Robert Harborough Sherard，*Twenty Years in Paris*：*Being Some Recollections of a Literary Life*（London：Hutchinson，1905），6，11。

[32]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39-41；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49-52；and Graham Robb，*Victor Hugo*：*A Biography*（New York：W. W. Norton，1999），525-32. 关于德·萨冈夫人因雨果的葬礼而取消舞会的一闪而过的念头，见*Le Gaulois*（May 29，1885）：1。

[33] Frederick Brown，*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0），126.

[34] 戴维·希格斯（David Higgs，1939-2014），加拿大历史学家，多伦多大学历

史系教授，著有《19世纪的法国贵族：不平等主义的实践》（*Nobles in 19th-Century France*：*The Practice of Inegalitarianism*，1987）等。

[35] David Higgs，*Noble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The Prac tice of Inegalitarian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229. Suzanne Fiette也有过同样的论述，写道："在世纪末，贵族通过占据优雅生活的绝对顶峰来报复他们丧失的政治权力。"见*La Noblesse française*，206。关于世纪末贵族一心维护社会地位的其他资料包括Jean-pierre Chaline，"La Sociabilité mondaine au XIXe siècle，" in *Élites et sociabilité en France*：*Actes du colloque de Paris*，*23 janvier 2003*，ed. Marc Fumaroli，Gabriel de Broglie，and Jean-Pierre Chaline（Paris：Perrin，2003），25；Christophe Charle，"Noblesses et élite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in *Les Noblesses européennes au XIXe siècle*：*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et l'Université de Milan*，*Milan-Rome*，*21-23 novembre 1985*（Milan：EFR，1988），427；Anne Martin-Fugier，*Les Salons de la IIIe République*（Paris：Perrin，2003）；and Guillaume Pinson，*Fiction du monde*：*analyse littéraire et médiatique de la Mondanité*，Ph.D. dissertation（Montreal：McGill University，2005），19-28。

[36] 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因获拿破仑三世重用，因主持1852年至1870年的巴黎城市规划而闻名。当今巴黎的辐射状街道网络即是其代表作。

[37] Marie-Claire Bancquart，*Paris "Fin-de-Siècle"*（Paris：SNELA，2009），372-83.

[38] MB，*Égalité*（Paris：Grasset，1935），167.

[39] Suzanne Fiette，*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s Lumières à la Belle Époque*（Paris：Perrin，2015），211；and Vicomte André de Royer-Saint-Micaud，"Avons-nous une noblesse française？" *La Revue des revues*（October 1898）：1-20，12.

[40] Gaston Jollivet，*Souvenirs de la vie de plaisir sous le Second Empire*（Paris：Tallandier，1927），97；A Veteran A Veteran Diplomat（pseud.），"The Passing of Talleyrand，le roi du chic：A Chapter in the Fall of Past Grandeur，"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1910）：n.p. 关于德·萨冈亲王的品位、财务状况和婚姻，又见AdF，*Cinquante ans de panache*，（Paris：Pierre Horay，1951），48-50；and Martin-Fugier，*Les Salons de la III^{e}République*，23-24。

[41] Marcel Fouquier，*Jours heureux d'autrefois*：*Une société et son époque*，*1885-1935*（Paris：Albin Michel，1941），53.

[42]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215.

[43] An American（pseud.），"To Blow Up a Princess：Dynamite Bombs Explode in the Doorway of the Princesse de Sagan，" *Baltimore American*（March 1，1892）：，1.

[44] Léon Techener，*Bulletin du bibliophile et du bibliothécaire*（Paris：L. Techener，1873），193；A Veteran Diplomat（pseud.），"The Passing of Talleyrand，le roi du chic：A Chapter in the Fall of Past Grandeur，"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1910）：n.p.；and AdF，*Cinquante ans de panache*，49.

[45] "Société Medico-psychologique—le cas du Baron Seillière，" *La Petite République française*，June 30，1887；reproduced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Year 1887*（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8），336.

[46] MP，CG，744.

[47]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214.

[48] A Veteran Diplomat（pseud.），"The Passing of Talleyrand，le roi du chic：A Chapter in the Fall of Past Grandeur，"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1910）：n.p.

[49] 作为被"一个家族的多位头戴王冠的表亲"统治的欧洲大陆上仅有的两个共和国之一，法国的外交孤立见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38-39。

[50] 亚历山德拉亲王夫人（Princess Alexandra），即丹麦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of Denmark，1844-1925），婚前是丹麦的公主，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长女，16岁时嫁给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成为威尔士亲王夫人。1901年，随着威尔士亲王登基，她也成为英国王后和印度皇后。

[51] 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1841-1910），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第二个孩子及长子，出生当年即被封为威尔士亲王。他在60岁时登基成为英

国国王和印度皇帝，称爱德华七世。

[52] 克里斯蒂安九世（King Christian IX，1818-1906），丹麦国王（1863—1906年在位）。格吕斯克堡公爵腓特烈·威廉第四子。1863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无嗣而崩。克里斯蒂安王子受议会拥立，入继丹麦王位，成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开始了丹麦的格吕克斯堡王朝。

[53] 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Princesse Mathilde Bonaparte），拿破仑的幼弟、法国元帅及威斯特法伦王国国王热罗姆·波拿巴与续弦的妻子、符腾堡王国的国王腓特烈一世之女符腾堡的卡塔里娜的女儿。

[54] Horace de Viel-Castel，*Mémoires sur le règne de Napoléon III*，vol. 2（Paris：Guy Le Prat，1979），95.

[55] Raczy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137.

[56] 德·波尔塔莱伯爵夫人梅拉妮（Mélanie，Comtesse de Pourtalès），即梅拉妮·德·波尔塔莱（Mélanie de Pourtalès，1836-1914），法国宫廷女侍官，沙龙女主人。她是阿尔弗雷德·勒努阿尔·德·比西埃男爵之女，1857年嫁给银行家埃德蒙·德·波尔塔莱伯爵。她的沙龙被认为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最负盛名的沙龙之一，而她也被认为是巴黎上流社会和帝国宫廷生活中的领袖人物。

[57]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77.

[58] 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17；关于阿斯创下了骑师俱乐部历史上被拒次数最多的纪录，见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16。

[59] Luc Sante解释说“希伯来人”是历史悠久的法国犹太人（通常是像GS的母亲那样的塞法迪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新近的移民（按照刻板印象，都是像GS的父亲那样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Luc Sante，*The Other Paris*（New York：Farrar，Straus，& Giroux，2015），82.

[60] 德·杜多维尔公爵（Duc de Doudeauville），即索斯特内二世·马里·夏尔·加布里埃尔·德·拉罗什富科（Sosthène Ⅱ Marie Charles Gabriel de La Rochefoucauld，1825-1908），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1887年继承其兄的杜多维尔公爵头衔。

[61]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著有

《门徒》（*Le Disciple*，1889）等，曾五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62] Guillaume Hanoteau，*Paris*：*Anecdotes et portraits*（Paris：Fayard，1974），90. 关于家族传统和家世对入选骑师俱乐部的重要作用，又见Robert Burnand，*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de 1870 à 1900*（Paris：Hachette，1948），147。

[63]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135.

[64] 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17.

[65] X.（pseud.），“Choses et autres，” *La Vie parisienne*（February 5，1870）：113；and Raoul Chéron，“Nécrologie：M. Charles Haas，” *Le Gaulois*（July 6，1902）：2.

[66] EG，undated note in AP（II）/101/149.

[67] 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15世纪被驱逐祖籍伊比利亚半岛，遵守西班牙裔犹太人生活习惯的犹太人，是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占犹太人总数约20%。由于长期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生活习惯与其他分支颇为不同，他们说拉迪诺语。“塞法迪”一词意为“西班牙的”，是犹太人称呼伊比利亚半岛的名字。

[68] 布拉甘萨王朝（Braganza），1640年葡萄牙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后，第八代布拉甘萨公爵约翰四世继承葡萄牙王位而成立的王朝，该王朝统治葡萄牙直至1910年，是统治葡萄牙王国最后的王朝。

[69] 犹太教的圣经在基督教中称为《圣经·旧约》，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承认的经书。

[70] 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31，n. 1.

[71]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其中很多人从10世纪至19世纪期间向东欧迁移。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他们普遍采用意第绪语或斯拉夫语言作为通用语。其文化和宗教习俗受到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

[72] 标准说法是，这是自首演后25～30年中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Mathias Énard的表述稍有不同，他说这是“1930年代前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最为频繁的歌剧”。

见Mathias Énard，*Boussole*（Paris：Actes Sud，2015），262。感谢Julie Elsky提醒我注意这份资料。

[73] Ruth Jordan，*Fromental Halévy*：*His Life and Music*（New York：Limelight，1996），197-99 and 208.

[74] 大道派戏剧（Boulevard theater）是起源于巴黎旧城街道的一种戏剧美学。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通俗戏剧和资产阶级戏剧开始在巴黎的圣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上演，由于其中有许多通俗剧和谋杀故事，当时圣殿大道又被称为“犯罪大道”（boulevard du Crime）。

[75] 亨利·梅亚克（Henri Meilhac，1830-1897），法国剧作家、歌剧歌词作者。以其与卢多维克·阿莱维在比才的《卡门》、雅克·奥芬巴赫的多部作品，以及儒勒·马斯内的《玛农》等剧目上的合作而闻名。

[76] 关于LH的“特殊气质，他独一无二的反讽风格，他独特而无法模仿的风度”的详细讨论，见Claretie，*La Vie à Paris*：*1880*，vol. 1，225-32。

[77] AF，*Le Bal du Pré-Catelan*，158.

[78] 关于社交界对艺术家的矛盾心态，见Martin-Fugier，*Les Salons de la III*e *République*，12-15。

[79] 关于这一礼仪的起源和意义，见Daria Galateria，*L’Étiquette à la cour de Versailles*，trans. Françoise Antoine（Paris：Flammarion，2017），115-17。

[80] 博尼费斯（博尼）·德·卡斯特兰伯爵［Boniface（Boni）de Castellane，1867-1932］，法国贵族、政治家。他是“美好时代”首屈一指的时髦风尚带头人，也是美国铁路大亨的女继承人安娜·古尔德的首任丈夫。

[81] Misia Sert，*Misia and the Muses*：*The Memoirs of Misia Sert*（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53），126-27.

[82]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30.

[83]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Paris：Revue Adam，1948），45. 关于艾默里·德·拉罗什富科是“一位寻常圣西蒙”，见PW，*Society in Paris*：*Letters to a Young French Diplomat*，*trans. Raphael Ledos de Beaufort*（London：Chatto & Windus，1890），134。GLP认出了PV就是朱丽叶·亚当（PW，*Society in Paris*：

Letters to a Young French Diplomat，trans. Raphael Ledos de Beaufort（London：Chatto & Windus，1890），29）。

[84] 关于阿莱维歌剧中的蜜蜂芭蕾舞，见Paul Smith，“Théâtre du Grand Opéra：*Le Juif-Errant*，”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17（April 25，1852）：137-40，139。关于蜜蜂芭蕾舞在第二帝国时期盛行一时，见Damien Colas，“Halévy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Orchestra，” in Niels Martin Jensen and Franco Piperno，*The Impact of Composers and Works on the Orchestra*：*Case Studies*（Berlin：Berliner Wissenschafts Verlag，2007），143-84 and 177-78。

[85] 关于萨冈舞会中的舞者名单，见ED，*La France juive*：*Essai d'histoire contemporaine*，vol. 2，43rd ed.（Paris：Marpon & Flammarion，1886），180-81。

[86] 朱丽叶·亚当（Juliette Adam，1836-1936），法国作家、女性主义者。1870年代，莱昂·甘必大和反对保王党的其他共和派领袖经常参加她举办的沙龙。出于同样的兴趣，她在1879年创办了《新评论》（*Nouvelle Revue*），出版了保罗·布尔热、皮埃尔·洛蒂、居伊·德·莫泊桑，以及奥克塔夫·米尔博等人的著作。她还参加了让娜·施马尔在1893年创办的先驱联盟，呼吁女性有权为公共和私人行为作证。

[87] PV，*Le Grand Monde*（Paris：La Nouvelle Revue，1887），306. 又见PV，*Society in Paris*，202。

[88] 丑小鸭（odd duck）有格格不入之意，而老山羊（old goat）有老色鬼的意思。

[89]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203）.

[90] 通常，社交界新闻是通过以下两种不体面的方式获得关于各类社交事件的细节的：（一）他们乔装打扮后偷偷潜入聚会；（二）他们付钱贿赂用人、服务提供商（马车夫、女装裁缝、花匠）和/或赌债缠身的贵族宾客。十年后，普鲁斯特本人也将动用第二种策略，贿赂格雷弗耶夫人的仆人，获知关于她在巴黎的府邸中的一切。——作者注

[91] 关于《费加罗报》的这位主要八卦专栏作家的真实身份就是德·佩罗妮子爵夫人，见“Le mariage d'Étincelle，” *La Revue des grands procès contemporains* 14（1896）：266-348。她的同代人把她在事业上的成功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当她写作时，“我们可以听到一位真正的名媛在说她的母语；可以分辨出她的话不是某一

位专业人士的虚假作品”——“专业人士”意即“无生”的“新闻记者”。（引文见 “Le Mariage d’Étincelle，” “Le mariage d’Étincelle，” *La Revue des grands procès contemporains* 14（1896），266。）关于巴黎时尚和社交报刊上匿名作者使用的少女一般的绰号，见Lisa Tiersten，*Marianne in the Market*：*Envisioning Consumer Society in Fin-de-Siècle Fr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137。

[92] 关于世纪末法国反犹主义的仇外性，见Jérôme Hélie，“L’Arche sainte fracturée，” in Général André Bach，*L’Année Dreyfus*：*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rmée française de Charles X à “l’Affaire”*（Paris：Tallandier，2004）。Hélie写道，在世纪末的众多法国保守主义者看来，“犹太人是‘新’人群崛起的强烈标记，也就是没有血统正统性、在这个国家没有根基的一群人，很容易与‘可恨的德国’混为一谈的人”。（231）

[93] 《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圣经·旧约》中的大先知书之一。历来犹太教与基督教会都同意但以理（Daniel）是该书的作者，该书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该书部分或全部是公元前2世纪写作的。

[94]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约公元前634—前562），位于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605—前562年。他因在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而为人赞颂，同时也因毁掉了所罗门圣殿而为人熟知。他曾征服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并流放犹太人，《圣经》上对此也有所记载，主要记录在《但以理书》中，《圣经》的其他章节也提到了他。

[95] Daniel 4：33.

[96] *Le Pèlerin*（July 1885）. 关于右翼对野兽舞会的其他报道，见*Annales catholiques*（June 27，1885 and July 16，1885）；*La Croix*（June 18，1885，February 16，1889，and February 13，1894）；and *La Légitimité*（August 1，1896）：165-66。

[97] *L’Univers*，June 7，1885.

[98] 埃杜瓦尔·德吕蒙（Edouard Drumont，1844-1917），法国新闻记者、作家。1889年，他发起了法国反犹联盟，还是《自由言论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99] 第四阶级（Fourth Estate），又被称作第四权，大众广泛认知的“第四权”是指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的力量，但事实上“第四权”的真正的意涵是指封建时代社会三阶级（贵族、僧侣、平民）以外的“第四阶级”，即媒

体、公众视听。第四阶级的观点认为，新闻界在宪法里担负着一个非官方却是中心的角色。

[100] ED，*La France juive*，vol. 2，94-97 and 177-82；and *La Fin d'un monde*（Paris：Savine，1889），386-89. ED还批评了世纪末城区那些不容置疑的习俗，尚博尔伯爵（以下简称"爵爷"）及其正统王朝拥趸在抵制法国的"犹太化"共和制潮流方面效率太差，见*La France juive*，vol. 1，436-44；他在ED，Testament d'un antisémite（Paris：E. Dentu，1891），4-10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101] ED，*La France juive*，vol. 1，174. 又可见ED，*Testament d'un antisémite*，"是犹太人。一切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115）

[102] MP把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描写为一只制造蜜糖的蜜蜂的文字引文见Maurice Duplay，*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Paris：Gallimard，1972），72；以及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145。关于MP从上层的几位夫人那里收集花粉制造"黑蜜糖"，见William Fifield，"Interview with Jean Cocteau，" *Paris Review* 32（Summer-Fall 1964）。

主题旋律 美丽的鸟儿

歌儿啊，我本不是那片金色云朵

在一场珍贵的细雨中降落

以稍稍平息朱庇特的万丈怒火；

但我必曾是被爱的一瞥点燃的烈焰

我必是空中飞得最高的那只禽鸟

用我的赞美把她带离尘嚣。

——彼特拉克，《歌集》（*Rime Sparse*，约1327—1374）

我们未必容易理解飞翔在一片旷野上空的鸟儿、离开河水飞往高空的天鹅……无时无刻不令一位伟大的天才神往……并获得后世的崇拜。

——马塞尔·普鲁斯特，《记居斯塔夫·莫罗的神秘世界》（“Notes on the Mysterious World of Gustave Moreau”，1898）

第2章 我的唐璜，我的浮士德

约瑟夫亲王和玛丽（米米）·德·卡拉曼-希迈亲王夫人喜欢为他们的六个孩子布置短小的作文。1874年，就在二人开始为14岁的长女伊丽莎白寻找结婚对象时，他们要求她和16岁的哥哥约瑟夫写一篇两只笼中鸟的对话。按照父母的规定，其中一只是笼养鸟，另一只是野生鸟。

伊丽莎白的文章重点写了后一只金丝雀的悲惨生活，少时的自由令它魂牵梦萦：

> 每每忆起童年，想到此生再也无缘一见的巢居，它就痛心切骨——它在那鸟巢里长大，也在那里学会了飞翔！每每忆起曾在山楂树间和森林深处与同伴们齐声欢歌，它就心如刀割！现在被困在一间铁屋里，只有一两处栖木可供歇息，它终将在这里郁郁而死。

它的同伴不懂它的绝望，问它为何伤悲，这只鸟儿哭叫道：

> 你难道不知道，那天地间的万物，那广袤而美丽的大自然的一切，曾经全都属于我吗？你难道不知道我长大的鸟巢四周铺就着五彩的羽毛，坐落在高高的山楂树上？……失去了这等幸福时光，让我如何快乐起来？我再不能像你一样歌唱了，你习惯了在这囚笼中生活……而我，我知道自由的滋味（也）舔尝过它的甘美……如今却被囚入笼中，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唯有一死，才能让我获得解脱。

婚后的伊丽莎白回首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时，一定悲从中来，没想到她竟然一语成谶，预言了自己作为格雷弗耶子爵夫人的未来。

1878年夏，18岁的法国-比利时女伯爵伊丽莎白·德·卡拉曼-希迈与全法国最抢手的未婚男子之一、29岁的格雷弗耶子爵亨利订婚了。[1]按照当时贵族通婚的规矩，这对夫妇的婚约也是双方家族本着互利原则进行的一桩交易，现实利益大于爱情。伊丽莎白家世显赫，父亲是比利时亲王，即将成为第18代希迈亲王的约瑟夫·德·里凯·德·卡拉曼-希迈，母亲米米·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来自法国贵族阶层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和卡拉曼-希迈家族的所有女性一样，伊丽莎白一出生就是女伯爵[2]；她的家徽上有一顶箍冠（*couronne fermée*），标志着家族血统高贵。她的祖先包括公元7世纪统治法国的墨洛温王朝[3]的国王克洛泰尔二世[4]；督政府时期巴黎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塔利安夫人[5]；一位名叫达达尼昂（d’Artagnan）的17世纪骑士，据说是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Three Musketeers*，1844）中人物的原型；以及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伊丽莎白的祖母埃米莉·德·佩拉普拉（Émilie de Pellapra）声称是这位皇帝的私生女。这样的家底在世纪末的社交界意义重大，它所代表的声望和权威是金钱买不到的。



伊丽莎白·德·卡拉曼-希迈女伯爵与格雷弗耶子爵亨利的订婚照，摄于**1878**年；亨利照相时总是让伊丽莎白坐着，以显得他本人高大一些

然而亲王们吃穿用度也需要钱，说起来，伊丽莎白的娘家也阔气过。两个世纪前，她父亲的祖辈里凯一族曾带头开拓那个时代野心最大的公共工程——连接加龙河与地中海的米迪运河[6]，积聚了大笔财富。[7]然而自那以后，整个家族的财产日益缩水，很大一部分花费都用于维护他们在各处持有的富丽堂皇的房地产了。该家族位于比利时埃诺省（Hainaut）的“希迈城堡”筑有堡垒和角楼，很多建筑元素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还有以法国王室的枫丹白露宫剧院为原型建造的私人剧院。家族在巴黎的住处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名为“希迈府邸”，气派一点儿也不输“希迈城堡”。1884年，《纽约时报》称之为“法国最著名的豪宅之一”，该地产占地54000平方英尺，位于圣日耳曼区，在马拉凯码头上

俯瞰塞纳河。这里的一切都会让人想起旧制度的光辉岁月，确切地说是路易十六时期的风光。希迈府邸的建筑设计师是弗朗索瓦·芒萨尔[8]，室内壁画是夏尔·勒布朗[9]的作品，景观设计师是安德烈·勒诺特尔[10]，整个工程启用的恰是太阳王为美化凡尔赛宫而聘请的同一个设计团队。

仿佛如此巨额花销还嫌不够，约瑟夫亲王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1]担任外交使节，前往欧洲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伯恩、巴黎、罗马，也耗费了自己的大量财产，任职协议规定他必须自掏腰包设宴款待宾客。（由于它迫使从业人员花钱而非挣钱，外交被认为是适合出身高贵之人的少数职业之一；伊丽莎白的祖父也体面地担任过外交官。）少女时代的伊丽莎白就开心地跟随父亲前往各个外国驻地，如饥似渴地学习每一个新环境的语言。然而这些工作耗尽了约瑟夫亲王的积蓄，以至于当利奥波德二世1870年请他担任埃诺省督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命。从那以后，他和米米就在那里和巴黎两地抚养他们的六个孩子。

生活安排的改变多少有助于减轻这对夫妇的开销，让儿女全都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决定也一样。作为最年长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约瑟夫一起上课。从伊丽莎白四岁、约瑟夫六岁起，家庭教师每周二、周四和周六登门给他们上课。每周的其他几天，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和父母监督他们学习。到伊丽莎白十几岁时，这类学习就几乎只关注文学了。她那些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关于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和法语作家们的作品的详细评论，所涉及的体裁和历史时期广得惊人。[12]伊丽莎白沉迷于这类阅读，16岁时，她甚至劝说父母让她去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她和父母都没有认真考虑过选择那样一条职业道路，但她还是单纯地热爱自己的课业。后来弟弟妹妹们在学习上需要帮助时，她受过的培训也派上了用场。

一家人住在一起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培

养了一种重要的亲近感。当时（如今也一样）的欧洲贵族都喜欢给孩子取模仿儿语的昵称，伊丽莎白叫贝贝斯、约瑟夫叫约、两个妹妹吉莱纳和热纳维耶芙分别叫吉吉和米奈。两个弟弟皮埃尔和亚历山大被称为托托和莫斯。孩子们常常像一般的兄弟姐妹一样为小事争吵，也对彼此玩些淘气的恶作剧。（贝贝斯最恶意的一次是让吉吉吃掉了一条鼻涕虫。[13]）尽管如此，他们仍是一群亲密的兄弟姐妹，在父母温暖而周到的关怀下快乐成长。

父亲的省钱措施并没有让家庭的财务状况恢复足够的元气，以满足他的掌上明珠贝贝斯那些门当户对的追求者们通常提出的嫁妆标准。他和米米一直希望把她许给她的表哥，德·利涅亲王路易（Louis，Prince de Ligne）。路易与伊丽莎白在埃诺青梅竹马，过去几年，他处处显示出对这个表妹的痴迷。然而他有自己金钱上的麻烦。祖父在1880年去世后，路易继承了家族那座有护城河环绕的14世纪城堡，苦心经营，艰难维系。年轻的路易即便爱恋着伊丽莎白，也支撑不起为爱结婚的奢侈。

伊丽莎白也很喜欢表哥，但她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没有机会成为路易的新娘而遗憾。她自幼便知自己早晚要成为别人的妻子。除去当修女（自法国革命前夕，贵族女孩们就不再走这条路了）或入宫做女侍官（她的妹妹吉吉成年后就选择了这个职业）之外，她这个阶层的姑娘们很少有其他选择。她虽然有资格从事教师职业，但亲王的女儿从事该职业终究不体面。私下里考虑自己的未来时，伊丽莎白有过一些模糊的空想，希望将来能嫁给母亲的堂弟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伯爵。在法语中，隔代堂表亲“按布列塔尼人[14]的规矩”被称为舅舅或姨妈，按照该称呼，伊丽莎白认为罗贝尔·德·孟德斯鸠是自己的舅舅，她也是这么叫他的，但他只比她年长五岁。孩提时，他们常到他和米米的祖父母在法国的城堡去玩，那一直是很开心的时光。特别是罗贝尔舅舅喜欢和伊丽莎白一起玩乔装打扮的游戏，把她蓬乱的卷发梳理得像侯爵夫人的发型（coiffure marquise）那般典雅，还为她的娃娃们设计新衣服。[15]因

此，她觉得罗贝尔舅舅会成为“最理想的丈夫”。

和那一代许多同性恋贵族男性不同，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不打算用假结婚来隐瞒把自己的性取向；他终生未娶。既然他不想结婚，伊丽莎白也开始怀疑自己大概最好也保持单身。她在日记中吐露说，最理想的世界是，她会和自己最爱的两个人共度余生：父亲和母亲。她把儿时的家称为“天堂”，如果能一生住在“天堂”里，即便要做一个教师，毫无体面地为那点微薄的薪水打拼，也是值得的。

父母二人都有特别的理由得到长女的爱。约瑟夫亲王一直让伊丽莎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仿佛即便她是个女孩子，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近年来，他常常在撰写和演练总督发言稿时请她帮忙，严肃地对待她的意见，以至于伊丽莎白觉得终稿是她和父亲共同完成的。约瑟夫亲王还喜欢带她出国，他有时仍然会遵从比利时国王的命令进行一些外交旅行。在那些旅行中，伊丽莎白就是父亲的非官方秘书，继续从事他的演讲稿撰写人和公共演讲辅导的工作。她还是他的正式同伴，和他一起参加使馆活动，其间流利地操持各国语言与使馆随员和各国元首谈笑风生。

从现实层面上来讲，约瑟夫让伊丽莎白陪他旅行，就能让他的外交伴侣米米在家里陪伴其他孩子了。但这些旅行却让伊丽莎白得以一瞥外面的世界，那是她这个背景的女孩子很少有机会冒险为之的。正如小说家埃米尔·左拉1878年在一篇关于“当今女性”的报纸文章上所写的，

> 家世良好的少女被加以极为严格的监督，没有年长女伴的陪同绝对不得出门……她所受的全部教育，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结婚前长期处于被监视和与世隔绝的状态。[16]

若以此为标准，伊丽莎白随同父亲旅行是极不寻常的。她对此十分清楚，因而更加对父亲充满敬重和热爱。

米米也是她的至亲之人，或许更得她心。伊丽莎白喜欢母亲甜美的性情、明智的忠告，喜欢她一条粗粗的大辫子盘在头顶，喜欢她那张写满关切的漂亮脸蛋。[17]她敬重米米温柔但坚定地要求伊丽莎白和兄弟姐妹们“谦虚、亲和、诚实、自然”，同时要“培养对杰出观点的敏感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18]，首先就是艺术。米米年轻时接受过音乐会钢琴演奏家的培训，师从克拉拉·舒曼[19]，甚至还曾为弗朗茨·李斯特演奏过，这在她那一代贵族女性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丈夫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在他的支持下，米米注意为儿子和女儿们提供同样严格的音乐教育。作为该教育的一部分，她创办了一个小型家庭乐队，每个孩子演奏一种不同的乐器。伊丽莎白被分配弹钢琴，她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母亲在键盘上演奏四手联弹，其他孩子各自吹弹着铜管、木管和弦乐器加入进来——约瑟夫亲王也拉着心爱的斯特拉迪瓦里琴[20]为他们伴奏。

有时，当伊丽莎白按照女家庭教师坚持要三姊妹学习的要求，不情不愿地在“女红”课上绣花或编织时，米米会鼓励她把针线活放下，尝试点儿更充实的活动：读诗、画画、写故事。

米米还鼓励伊丽莎白和妹妹们与约瑟夫亲王的弟弟欧仁·德·里凯·德·卡拉曼-希迈亲王的四个女儿共处，欧仁亲王和家人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比利时，另外半年住在法国的乡村别墅。伊丽莎白、吉吉和米奈把自己和几位堂姐妹统称为“七姐妹”[21]，彼此充满了喜爱。每当她们去希迈城堡探望祖父时，七个女孩儿会从阁楼里翻出祖辈的奇装异服穿在身上当作戏服，一起在私人剧院上演即兴剧。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堂妹是文静内向的玛丽-艾丽斯，她比伊丽莎白小八岁，对这个堂姐很是崇拜。[22]

正是这些简单的快乐，让伊丽莎白对这个家依依不舍，多待一日都心怀感激。但离家的日子近在眼前。她在家中享受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时，父母继续为她寻找合适的丈夫，1878年夏初，他们终于定下了格雷

弗耶子爵亨利。子爵在巴黎社交圈外号“金牛犊”[23]，取自夏尔·古诺[24]的《浮士德》（1859）中一段很受欢迎的咏叹调，因为他能从父亲格雷弗耶伯爵夏尔和无子嗣的叔叔亨利·格雷弗耶两人那里继承一笔巨额遗产。格雷弗耶家族的银行家先辈最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精明的金融交易获得第一桶金，如今则拥有由地产、铁路、运河及其他位于法国和英格兰的工业组成的庞大资产组合。在巴黎的圣奥诺雷区，亨利和他的家人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建筑群，相邻的私人豪宅配有硕大的私家花园和就地马厩（那里养着30匹马，在城市中心养这么多马是前所未闻的）。[25]此外，格雷弗耶家族还在塞纳-马恩地区（Seine-et-Marne）拥有好几处地产，那里距离巴黎很近，是上流社会乡村度假的胜地。[26]该家族最喜欢的打猎场布德朗森林（Bois-Boudran）就在巴黎西南，距离城市还不到50英里。

家徽上镀了如此厚厚的一层黄金，这样的追求者可遇而不可求。[27]据米米和约瑟夫所知，子爵唯一潜在的缺陷，就是他的格雷弗耶祖先们曾经“经商”，他们的贵族爵位只有短短70年历史。（因为在拿破仑一世去世之后慷慨地出资支持波旁王朝复辟，亨利的祖父于1818年受封世袭贵族爵位。）尽管如此，这个家族依然在社交界声望极高，据说这时他们的名望甚至超过了卡拉曼-希迈家族，因为格雷弗耶家族的财富能让他们过上象箸玉杯的生活。[28]



伊丽莎白的亲戚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称亨利为“大榆木脑袋”，因为他的头骨看起来像个长方形

亨利·格雷弗耶与父亲和叔叔亨利都是巴黎两个最尊贵的男性俱乐部——联盟俱乐部和骑师俱乐部——的成员，那是法国贵族和欧洲各国君主的安乐窝。亨利的母亲费利西泰还属于拉罗什富科家族的德·埃斯蒂萨克一支，拉罗什富科是法国最尊贵的公爵家族之一；他的两个妹妹让娜和路易丝都嫁入了同样显赫的豪门，分别成为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夫人（Princesse Auguste d’Arenberg）和德·拉艾格勒伯爵夫人（Comtesse de L’Aigle，后升为侯爵夫人）。这些王公贵族都没有回避与格雷弗耶建立姻亲关系，这打消了约瑟夫和米米的疑虑，觉得如果他们与该家族联姻，贵族们也不会认为这桩婚姻不光彩。此外，亲王和夫人还没有蠢到垂涎欲滴地盯着金牛犊（和他那个养着30匹马的城市马

厩）的程度。和路易·德·利涅不同，亨利·格雷弗耶财大气粗，完全不在乎新娘的嫁妆多少。单从这些来看，他们的贝贝斯就算是有幸觅得佳婿了。

在亨利一方，这桩婚姻也是一番精明算计。7月，在他与伊丽莎白（按规矩有年长女伴陪同）及其父母几次短暂的会面（先是在巴黎，后来又在多维尔[29]，两个家庭那年夏天都在海边租住度假村）之后，子爵向她求婚了。准确地说，根据贵族求婚礼仪，是他的父亲向约瑟夫亲王提亲了。替亨利向亲王求婚时，格雷弗耶伯爵再次申明，他的儿子会宽容地接纳伊丽莎白那点卑微的、只有5000法郎年金的嫁妆，跟亨利自己的400000法郎年金相比，那简直是九牛一毛，这还不算他一结婚就能得到的800万法郎。（他有权在父亲和叔叔亨利去世时继承6000万法郎的遗产。[30][31]）然而格雷弗耶的求婚并非慈善之举。正如亨利的一位密友布勒特伊侯爵亨利·勒托内利耶（Henri Le Tonnelier，Marquis de Breteuil）推论的那样，“格雷弗耶决定娶（伊丽莎白）只有一个原因：她是一位亲王的漂亮女儿，身世显赫”。[32]

布勒特伊分析得颇有道理。亨利很清楚，与卡拉曼-希迈家族联姻将进一步提升他已经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还会大大改善他未来的政治生涯。婚后，亨利打算谋求进入法国国家立法机构——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他的叔叔亨利和已故的祖父都曾在该机构任职。年轻人认为最好能继续发扬这一家族传统，并为法国君主复辟尽一份力。

1870年代末，第三共和国的未来尚在未定之天。不光领导层内部总是被琐碎的内讧争吵和经常发生的丑闻所困扰，两个被驱逐的法国王室的对立支系——波旁主系的族长尚博尔伯爵（Comte de Chambord）和奥尔良旁支的族长巴黎伯爵（Comte de Paris）——也都蓄势待发，伺机东山再起。格雷弗耶家族把赌注压在了奥尔良派，它看起来要比极端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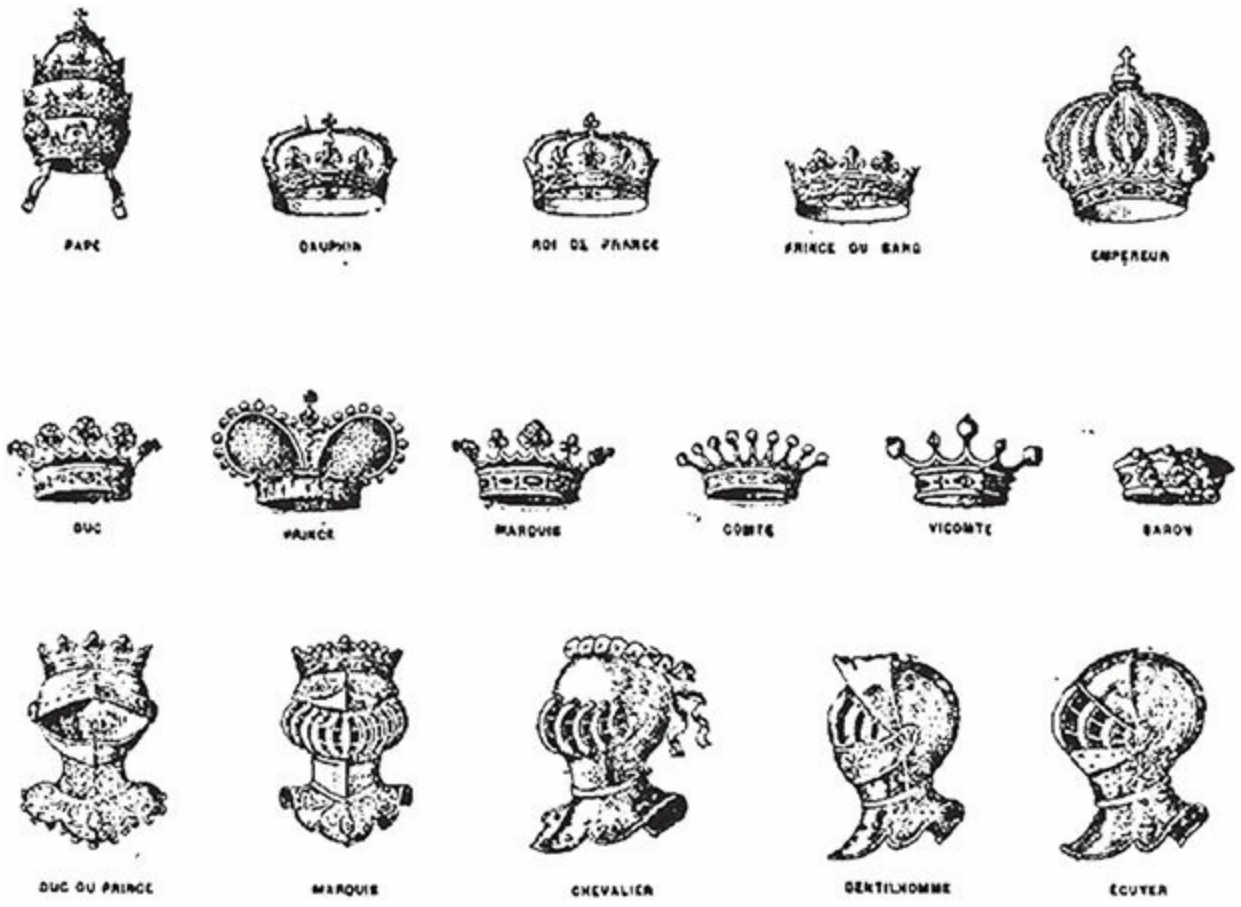
守的波旁派更加善待较为近代的财富。（法国至此唯一一位奥尔良国王路易-菲利普[33]于1830年他的波旁表亲查理十世[34]被迫退位后登基，直到1848年被推翻，他曾支持过一个两字政治纲领：“致富！”）格雷弗耶已故的祖父、父亲和叔叔都是奥尔良派复辟的长期拥护者，他也通过他们与巴黎伯爵建立了密切关系，希望能帮助后者重登王位。

由于这一努力需要国际支持，布勒特伊——维多利亚女王曾亲自命令他在女王的长子和继承人威尔士亲王伯蒂频繁前往巴黎寻欢作乐期间照顾他——也在努力说服未来的英格兰国王支持奥尔良派再次登上王位。子爵避开了更为实质性的政治讨论，但因为对打猎的共同热爱，他与威尔士亲王也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他和伯蒂曾经在女王名下一个庄园的鸟类保护区玩射击游戏，被女王知道后，亲自斥责了他们一顿；这一事件可能让女王对格雷弗耶子爵产生了反感，却成了伯蒂和他两人最愉快的回忆。[35]）在格雷弗耶看来，这样的人际关系足以助他跻身政界高层；他对自己身为政界推手和领导人物的未来满怀期待。如此强大的人脉再加上他的真命天女，他必定前途无量。

子爵对婚姻既有如此功利的考虑，自然不会看重他与未婚妻是否相爱的问题。布勒特伊认为他的朋友“从未”像他“爱慕”有过床笫之欢（那是“他至今唯一的职业”[36]）的几十个女人那样“爱过伊丽莎白”。不过格雷弗耶并非为了爱情而娶伊丽莎白，他看重的是资质，而她的资质完美得无可指摘。她有高贵的姓氏，还有一顶箍冠。（格雷弗耶家族的盾徽上只有一个次等的箍环。）她有三个兄弟，父母正在培养他们进入欧洲外交界的最高梯队。她的父亲受到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至高无上的敬重，据说国王认为他是比利时下一届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子爵进入公共生活后，这样的裙带关系无疑会让他如虎添翼。

更让他心神荡漾的，是得知伊丽莎白在随同约瑟夫亲王旅行期间还遇到了很多欧洲王室贵胄，并与他们建立了友谊。例如，在陪同父亲出

使俄国期间，她得到了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37]和他魅力非凡的妻子玛丽亚·帕夫洛夫娜[38]的赞赏，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在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也是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大公夫人的父系与奥尔良旁系是亲戚，因此在格雷弗耶这样的奥尔良派看来，她和大公是尤为宝贵的人脉。）伊丽莎白本人对子爵说过，她不难想象他就是未来的法国驻俄国大使。[39]这样的职位能把他带入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统治者的宫廷，这极大地满足了格雷弗耶妄自尊大的膨胀感。而如果未来的妻子可以想象他担任如此受人尊敬的职位令他很开心的话，那么她能帮他获得这一职位就更让他心花怒放了。



冠和头盔

图中显示的就是与不同的爵位和头衔相配的各种冠冕。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亲王，可以佩戴箍冠（中间行，左二），而她

的未婚夫只是子爵，只有资格佩戴箍环（中间行，右二）

这些因素抵消了格雷弗耶看到的未婚妻身上的不足，从她每每谈到娘家就变得眼泪汪汪，到她公开反感他最喜欢的打猎运动。最让他厌烦的还是她的艺术天分，虽然他对自己那点儿肤浅的教养极为自豪。（正如他和伊丽莎白的女儿很多年后写的奉承他的话："爸爸……讨厌一切不够诗意、没有乐感和无关文学的东西。"[40]）和他那个阶层的许多保守派一样，子爵也坚信一个女人修身养性——当个"才女"[41]——难免会丧失女人味。正如另一位贵族所说，"才女……一点儿都不勾魂摄魄。她会是个蹩脚的花瓶"。这就是格雷弗耶的世界观，他准备按照自己的观念彻底改造妻子。

他一直对金发碧眼情有独钟，而伊丽莎白的黑头发和黑眼睛是他无力改变的。不过至少她的容貌还有一些补偿的价值，虽然子爵本人对她的样子不以为然，但除他之外，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她美如璞玉。布勒特伊那时已经跟格雷弗耶轻盈优雅的金发表妹康斯坦丝·德·卡斯泰尔巴雅克（Constance de Castelbajac）订下婚约，当他对布勒特伊抱怨说伊丽莎白"根本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时，他的朋友机敏地回答说，未来的格雷弗耶夫人有自己独特的夺人心魄的美，"就像来自东方的海妖，或童话里的公主"。布勒特伊赞美：

> 她那纤细的腰身，优雅的姿态，她的侧影，都是无与伦比的；人们看到她走过必会惊异地回头，以为她是在云中漫步。[42]

布勒特伊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早就着迷于伊丽莎白的样貌的人。在她婚前几个月，小说家和学术院院士奥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曾在希迈府邸的晚宴上坐在她旁边，也觉得她令人迷醉：

> 我扎着白色领结步行至马拉凯码头。晚宴上，我坐在年轻

> 的（女伯爵）身旁，她睁着一双黑眼睛凝视着世界，那双眼睛大得有些出奇，双唇饱满鲜嫩，宛如清晨的花朵。那一头浓密的黑发啊，压得她的头颅几乎都有些无力承受了。她美得像透明的琥珀，充满智慧，那双又深又亮的眼睛像个仙女或精灵，像个小小的牧羊女那样笑着，这姑娘……本人就是奇珍异宝。[43]

子爵觉得女人的智慧毫无用处——诚然，他之所以不喜欢伊丽莎白的“才女”气质，大概至少部分归因于他怀疑她比自己聪明，这样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虽然他的学习成绩记录很难找到，但他在中学毕业会考中曾八次落榜，而且显然在那以后就放弃了学业。[44]）但艺术品位就是另一回事了。除了沉迷女色、骑马和打猎之外，他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购买艺术品和珍本书，扩充他父亲和叔叔的收藏。格雷弗耶对待这一嗜好的态度和其他三个嗜好一样，定要与人争个高低，因此他只会去追逐市面上最受人垂涎的物品。虽说——还是布勒特伊所说——“他只会对另一种样貌的美人有所反应”（金发碧眼的女郎），子爵的结论似乎是，既然别的男人都觉得伊丽莎白美若天仙，她应当可以算他的又一件极品收藏。

在他们四个月的恋爱期，伊丽莎白并不知道自己在他眼中是这样的。当父母第一次跟她提起子爵时，她想到要见他就脸色发白了，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居然敢把她从至爱的身边带走，这令她愤愤不平。第一次见面时，双方的母亲都在场，她只是用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盯着子爵，说话全是米米的事。然而，和她那个阶层的大多数未婚少女一样，伊丽莎白从未与非亲非故的男子有过任何长时间的接触。[45]这让她对格雷弗耶的魅力攻势毫无抵抗力，格雷弗耶可是情场老手，简直没费什么力气就赢取了她的芳心，他大谈艺术、书籍和政治，那种夸夸其谈被她误以为是男性的阳刚之气——他的高声大嗓让社交圈的人给他取了另一个绰号，“电闪雷鸣的朱庇特”——他的奉承话全是有备而来，她却误

以为是对她情有独钟。

布勒特伊写道，虽然他的朋友倾向于“说一堆蠢话，讲些只有他自己（觉得）好笑的笑话”[46]，但格雷弗耶的自恋——由“大袋大袋的现金”和拉罗什富科家族的出身支撑的自恋——还是很有感染力。伊丽莎白的反应就验证了这个说法。她没有注意到子爵的缺点，反而和他一样笃信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洞察和魅力。初次见面仅仅几周，她就又羞怯又激动地对父母说，如果有谁能战胜她对婚姻的抵制，毫无疑问是魅力不可挡的格雷弗耶子爵。



婚后两年、**20**岁的伊丽莎白，已经是公认的美人了

她还喜欢他“北欧式的”英俊，热情地狂赞他“匀称的五官、漂亮的蓝眼睛和浓密的金色大胡子”。[47]这些也是她从这个男人那里获得的暗示，正如布勒特伊幽默地说过的，这个男人“觉得自己算是天底下最最英俊的人了”。（伊丽莎白后来还认定布勒特伊忌妒她丈夫健壮的体

格，因为他虽然五官漂亮，但有些驼背。[48]）也不是人人都觉得子爵英俊；他的胡子和头都呈现一种古怪的长方形，大家都觉得他长得像扑克牌中的国王。[49]但在伊丽莎白看来，这恰恰突出了他血管流着王室的血液这一令人欣慰的事实：格雷弗耶的曾祖父夏尔·德·温迪米勒·迪卢克（Charles de Vintimille du Luc）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还曾因跟那位国王神似而得了“半路易”的诨名。

要是新娘再挑剔一些，可能会觉得格雷弗耶的身高是个减分项。伊丽莎白在当时算是高挑的——她的身份证件上标注的身高是1.68米（5英尺6英寸），但子爵很矮，至少比她还矮几英寸。[50]更糟的是，他对此差异很敏感，在两人拍订婚照时，强烈要求她坐下来而他保持站姿，否则就拒绝拍照。但作为一个既有钱又有品位的男人，他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他的萨维尔街[51]西装的裁剪大大突出了他宽阔的双肩和胸膛，很好地遮掩了他矮胖的身材。

格雷弗耶是献殷勤的行家里手，事实证明，这是伊丽莎白那样天真烂漫的姑娘无法抗拒的。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在希迈府邸她的卧室窗户下面唱起了小夜曲。他穿着合身的深红色骑手上衣，头戴黑色天鹅绒软帽，手拿一支红玫瑰，让伊丽莎白想起了一部歌剧中的男主角，他那清晰有力的男高音更加深了这一印象。其后几周，他每次来拜访，她都会说服他跟她一起为她的父母唱一曲二重唱。她最喜欢的选段来自古诺的《浮士德》和莫扎特的《唐璜》，由此灵感，她总是温柔地把他想象为“我的唐璜”和“我的浮士德”。那时她还没有想过，她的爱人竟会变得像前者一样没有心肝，像后者一样没有灵魂。

伊丽莎白的确注意到，子爵在几个重要话题上和她意见不一致，而他也不乐意包容异议。他们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5月，他陪她和米米一起去参观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这场博览会由巴黎政府组织，意在向全世界表明，这个国家已经从七年前与普鲁士战败的厄运中

恢复了元气。参观博览会的现代法国艺术展时，伊丽莎白迷上了《花园里的莎乐美》（*Salome in the Garden*，1878），这幅神秘的水彩画是由她母亲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象征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创作的。[52]米米附议女儿的赞美，说她和约瑟夫亲王或许可以设法买下这幅画，送给女儿女婿作为结婚礼物。令母女俩大吃一惊的是，格雷弗耶打断了她们的谈话，高声怒斥莫罗的画作一点儿也不美，古怪至极，但凡有一点品位或判断，都不会觉得它美。看看夏尔·沙普兰[53]吧，那才是艺术家！子爵骄傲地说他收藏有沙普兰的好几幅作品（他专攻媚人的学院派裸体画和古板的社交肖像画），而莫罗——开什么玩笑！[54]

目瞪口呆的母女俩赶忙把他从那幅引发不满的作品前引开，虽然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他的爆发还是让伊丽莎白困扰了一阵子。“她的浮士德”似乎脾气很大啊，而且这么轻易就把脾气发泄在她身上——更不要说对她喜欢的画家和至爱之人。她觉得恐惧。米米倒没有那么容易被吓住，她还是买下了《花园里的莎乐美》，但只是送给了伊丽莎白一人作礼物，而不是送给她和子爵两人。

几周后，他再次发作了，这一次事关他们婚后共同的生活。伊丽莎白盼望着在巴黎参加所有聚会和舞会。她对他说，困在乏味的埃诺乡下期间，她一直关注城区贵族朋友们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生活的报道，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身体验了。听到这里，格雷弗耶爆发了。他用“电闪雷鸣的朱庇特”的大嗓门喊道，上层的高调聚会都是愚蠢的宣传崇拜的症状，那种崇拜正在毁掉他们所在的阶级。他的夫人不该期待，甚至想都别想去参加这种讨厌的瓦解阶级的放荡狂欢。

这一次，伊丽莎白的惊异一定表现在了脸上，因为他在长篇大论的中途，突然换了一副腔调。“好啦，你不会那么喜欢社交圈的，对吧，贝贝斯？”他用一种温柔的、诱哄的语气说。

你这么聪明的女人，不会喜欢上流社会的——去舞会根本

> 就是宝宝们干的蠢事（*bête*）！还华尔兹，多白痴的娱乐！不，唯一值得过的生活是私生活，隐秘的生活。[55]

带着屈尊的傲慢提起她童年的昵称［突出“贝贝斯”和“*bébête*”（意为“愚蠢”“幼稚”）的发音相近］之后，子爵宣布话题结束，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争论。

伊丽莎白内心并没有改变立场，继续幻想着社交圈的欢乐场景。不过她决定不再就此话题跟他争论了。8月30日，她婚礼日的前几周，她开始在一个新日记本上写日记——婚姻日志。她在第一页上安慰自己，觉得她的柔韧性情一定能确保她和这个人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此刻，作为他不久后的新娘，她提到他时已经开始用教名了：

> 我深爱着亨利，完全被他迷住了。当然，他有自己的习惯和信念，但是我……我必须一心只关注那些让我更亲近他的东西。[56]

这段文字表明，伊丽莎白并不像她那个阶层的许多姑娘那样命运悲惨——因为家境一贫如洗而嫁给她们根本不可能爱上的人。然而尽管如此，想到要和亨利厮守终生，她天真的爱意中仍带有一丝困扰的矛盾心理。在婚姻日志的第一篇，她重忆起自己曾经幻想永远生活在父母身边。想起因为意外地爱上了亨利，她只能放弃这个梦想了，她不无焦虑地意识到自己还不清楚他是否一样爱她。“他会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我一些吗？”她想。答案必须是肯定的——即便亨利本人没有说过，米米已经向她保证了这一点。但若果真如此，伊丽莎白想，那“为什么我在快乐之余，会感到如此悲伤呢”？[57]

她把自己的忧郁心情归咎于一个事实，那就是结婚，即便是和亨利结婚，也会最终结束“我曾经的那个年轻女孩的王国”：

永别了，我深爱的一切——永别了，我少女时代的梦想和诗意——啊，我这样爱你们！那个少女时代的我不久就会死去了——我要结婚了——我，那个总觉得自己不适合婚姻状态、对结婚的后果只有反感，因而总是发誓永远不会结婚的我。但爱情以如此迷人的方式降临了，我的心被它从未有过的一丝痛楚击中，我终于不得不直面那个可怕的词语——婚姻。我将给自己的生命带上锁链，永远——永远！——我的命运将不再掌握在我自己手中；结婚，就必须接受它的后果……勇敢地跟我现在的生活说再见，不再回头，免得泪流满面。再见了，永别了，我珍爱的一切。

喜读诗书的伊丽莎白不止一次读到过“甜蜜而忧伤的爱”这种彼特拉克式的修辞，因而她自己对爱人的渴望也不乏抒情。事实上，她的外祖父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伯爵就是彼特拉克诗歌的著名译者。即便如此，她仍然害怕即将托付一生的“后果”。[58]

她写下的“后果”一词可能至少意味着以下二者之一。首先，伊丽莎白的父母注重培养她的心智、发掘她的艺术天赋，他们心目中的女儿不是——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服从的奴隶。然而尽管如此，在世纪末的社交界，这却是为人妻子的本分。那个时代最好的传记作家之一，克莱蒙-托内尔公爵夫人伊丽莎白（莉莉）·德·格拉蒙［Élisabeth（Lily）de Gramont，Duchesse de Clermont-tonnerre，她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尔芒后来娶了伊丽莎白和亨利的女儿埃莱娜］曾经评价这一失衡状态：

在那个时代，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其程度简直令今人难以置信；她们无权拥有自己的观点，无权随心所欲地花自己的时间或金钱。我曾经认识一位贵妇人低声下气地请丈夫给她一些邮票，他答道：“昨天不是给过你了吗。”我父母邀请我的格拉蒙·德·阿斯特尔（Gramont d’Aster）家的表姐去歌剧院时，即

便她年事已高，头发全白了，她还是转头问丈夫：“你会同意我去吗，安托万？”[59]

如果说婚姻制度本身妨碍了女人独立的话，那么嫁给亨利这个对最微弱的反对意见也绝不宽容的人，简直就令人窒息。从她亲身经历的两次爆发来看，伊丽莎白或许已经直觉地感受到，她得益于父母宽容而获得的那种思想或表达自由，在他这里绝无可能。和她与哥哥曾在对话作文中写到的那只笼中金丝雀一样，她也常常回想起那种自由，伤心地哀叹自己彻底失去了它。

她对婚姻的保留态度还有另一个解释，但两者绝不矛盾，那就是格雷弗耶家族传说，伊丽莎白极端厌恶性爱和怀孕。在一个全靠不断繁衍继承人和备用继承人才能维持存续的阶层，这是婚姻的必然结果，毫无商量余地。她的后代就证明了这一恐惧症，她只“给”亨利生了一个孩子，1882年3月出生的埃莱娜，因为身为女孩，她既无法继承父亲的贵族头衔，也无法延续他的姓氏（因此这个姓氏就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了）。因为伊丽莎白和亨利似乎没有再努力一次，没有不停地努力来孕育一个至关重要的儿子，所以公然违反了贵族社会对儿孙满堂的喜好——像伊丽莎白自己的娘家那样，连她自己的女儿出嫁后也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60]就此而言，伊丽莎白的生育能力受到了同时代人的非议，其不同寻常的程度足够表明她宣称的对婚姻的“厌恶”，尤其是对性爱的反感。她的一位重孙辈曾用直接取自世纪末的委婉语说：“我们家里人提起她时都说：‘她对“那一类事情”充满恐惧。’”[61]

伊丽莎白的恐惧或许跟她完全没有任何性意识有关。父母抚养她的方式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先进，但他们没有给她灌输过女孩应有的对生育“那一类事情”的认识。我们很难确切地了解一个姑娘成长过程中的这一方面，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她不知道的东西，但伊丽莎白档案中有好几个文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线索。在她订婚前的日记中，她曾写道

她很难分清楚自己遇到的那些男人有何差别，除了她喜爱的舅舅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之外，男人在她眼里都是“从一个黄不拉叽的恶心模子里造出来的”。[62]她在临终前接受的一个未经发表的访谈中，透露自己还是个少女时，父母明确禁止她参与任何形式的“男人不得不用双臂抱住我”的舞蹈。[63]（就连华尔兹舞也在被禁之列。）她对访问者说，在埃诺的一个舞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军官试图出其不意地吻她一下，“我着实吓坏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人吻我一下，我就会怀孕生子”！

虽说贵族的处女新娘一般都是这样，但伊丽莎白似乎在完全了解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后很久，还是条件反射地惧怕和任何男人有最轻微的身体接触。或许这也不是偶然，她的妹妹们似乎也是一样。她的小妹妹米奈直到24岁的高龄（在社交界看来的确如此），才嫁给了据说对女人不感兴趣的职业军官查尔斯（查利）·波谢·勒巴尔比耶·德·蒂南［Charles（Charley）Pochet Le Barbier de Tinan］。他们婚后没有子嗣。而伊丽莎白一生都与之保持着亲密关系的妹妹吉吉选择根本不结婚，成了比利时的玛丽-亨丽埃特王后的宫廷女侍官。“我发自内心地害怕‘那一类事情’，”吉吉这样解释自己逃避婚姻状态，“一想起‘那个’我就浑身发抖。”[64]

伊丽莎白对性爱的保留态度本身，大概就足以使她与亨利龃龉不合了。就算在男人调戏女人像呼吸一样正常和随意的城区，他的性欲也被认为高得惊人。社交界谣传，他在整个巴黎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后宫”[65]，只要他在城里，就每天接连不断地与她们每一个人颠鸾倒凤。事实上，亨利若干年如一日地遵循着自己的性爱日程，以至于拉着他那辆时髦的两轮双门马车——车身上绘着格雷弗耶家徽（蓝色球体、黑色秃鹫、金色王冠，还有条状银色背景上的金色星星）——的马儿们根本无需驾车人的命令，会自动在他每日行程的每一个地址停下来。

如果说伊丽莎白在他们订婚期间对亨利的后宫一无所知，在他们婚礼当天，从圣日耳曼德佩区教堂驱车前往希迈府邸拐角处的接待厅时，却无意中得到了一点关于后宫的暗示——圣日耳曼德佩区教堂建于公元6世纪，她的祖先，法国古老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即埋骨于此，她和新郎那场盛大壮观的婚礼也在那里举行，宾客多达1500位，包括奥尔良亲王的整支船队。亨利穿着深蓝色晨礼服，看起来光彩照人，伊丽莎白那条象牙白色的锦缎长裙后面拖着16英尺的裙裾，更是光芒四射。她父母提携的作曲家埃利塞奥·吕卡（Eliseo Lucat）专为他们的婚礼创作了一首名为《要幸福》（“Soyez heureuse”）的马祖卡曲，题献给伊丽莎白。婚礼结束，她和亨利两人走出教堂时，它那欢庆的旋律与组钟敲出的庆典钟声融为一体，却被另一种喜悦的噪音淹没：4000个陌生人聚集在教堂门外，痴痴地看着这对迷人的新婚夫妇，看到他们出来，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66]

伊丽莎白在婚姻日志中写道，这是她最快乐的一刻，不仅因为她已经与至爱终成眷属，更因为那些争先恐后看她一眼的祝福者们如见天人：

> 我们在婚礼祝祷之后出现在教堂门口时，听到这些人高喊：“他们多漂亮啊！”我必须承认，那座教堂，那座我小时候只要在巴黎，每周日都会去的教堂本身，似乎已经换了天地，正如我本人已今非昔比，我心中尽是喜悦。他们喊道：“她好美！”“多么迷人的少妇！”“他真是个幸运的男人！”——听起来很蠢，但我心花怒放，又得意扬扬。

伊丽莎白在这里暴露了后来逐渐成为她成年后的主要特质：单纯地为自己的美而昂然自得，并因身边其他人对她的赞赏而神怡心醉。

这一次，她和亨利一坐上他的马车，伊丽莎白的喜悦就黯淡下来了，马车一直等在教堂的鹅卵石广场对面的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

上。他们乘车前往希迈府邸，她后来写道：

> 亨利似乎一心想着的马；事实上这让我很生气，因为我本期待着我们终于独自坐上了马车时，他会对我百般温存，但他的眼睛盯着他的马——整条波拿巴路上夹道欢迎的人们朝我们掷来花束，亨利却只是盯着外面，不停地说“亲爱的，你可得规矩点儿啊，人们都看着我们呢”。但爸爸曾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把（马车窗户上的）小窗帘拉上，有点儿隐私！我最后发现，亨利甚至在我们路过的那些商店的橱窗里观察马的动静。我气坏了，但我们很快就到了马拉凯码头，除了可爱的老姨妈夏洛特等在那里，别人都还没到呢，夏洛特姨妈像个小小的巫婆（她的确是呢）一样前后晃着头，对亨利说：“漂亮的太太，漂亮的马，让我们走着瞧，走着瞧吧”——这是令人害怕的预言，从自己的姨妈嘴里说出来尤其令人心惊。[67]

伊丽莎白后来才得知，亨利之所以目不转睛地盯着马，是因为他担心它们会停在某一位情妇的门口，泄露了他那个后宫的秘密。

这个秘密在夫妇俩在塞纳-马恩地区度蜜月期间败露了，但不是立刻败露的。他们先是在拉里维埃（La Rivière）城堡暂住了两周，那是亨利父母名下的地产，位于历史名城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郊外。一个美丽的秋日午后，她和亨利去枫丹白露那树影斑驳的森林里骑马。伊丽莎白觉得风景太浪漫了，当即宣布那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为了纪念那个时刻，她跳下马，采了一小簇石楠花。“我要把它保存一生！”她喊道，一边在丈夫的眼前摇着那束花，如弗耶所说，像个小小的牧羊女那样笑着。[68]和亨利一起回到拉里维埃后，她把那些石楠花枝夹在一本书里，待它们干了，又夹在她的婚姻日志里保存。它们至今仍然夹在那里。

在拉里维埃，伊丽莎白开始试穿婚后女人的服装。她有生以来第一

次拥有了自己的贴身女仆阿孙塔，后者用浓重的西班牙口音叫她“子爵啊夫人啊”，负责为她穿衣梳头。（阿孙塔忙着那些束腹撑和发卡时，“子爵啊夫人啊”还在勉为其难地写东西：日记、待办事项、创作篇章，还有写不完的家信。）伊丽莎白喜欢自己那些优雅的成年服装——米米在婚礼前为她买了几套新衣服——喜欢妆奁内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精美首饰。[69]虽然父母财务拮据，但还是为她准备了体面的嫁妆：48条睡裙、24件绣花内衬衣、2件紧身衣、1件羊毛浴袍、34条衬裙、10件晨衣。96双袜子、96块毛巾、96条手帕，（除了毛巾和浴袍外）全都装饰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蕾丝花边。“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贵妇人”，她写信给米米说。

表面看来，伊丽莎白和亨利是一对神仙眷侣。“你们看上去就像两个君主”，她新晋的小姑子路易丝·德·拉艾格勒说。[70]伊丽莎白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当成一句恭维话。但不久就发现路易丝这句话暗含讽刺，她便认定亨利的妹妹只是忌妒。伊丽莎白在日记中写道：“丑陋的女人都对美怀有深深的恨意。”在另一篇文字中，她沉思道：“没有什么比另一个漂亮女人的照片更让女人反感了。”[71]伊丽莎白把她和亨利的订婚照放在拉里维埃客厅的壁炉架上。

然而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在她和自己英俊的新郎之间，麻烦正暗自酝酿着。关于新婚之夜，通常十分啰唆的伊丽莎白在自己的婚姻日志中未置一词，只是说亨利首次进入她的卧室时，她的心“跳得更快了”。但米米寄到拉里维埃的一封信却表明，伊丽莎白完全没有准备好身为人妇。米米意识到女儿缺乏经验，试图给她打气：

> 我知道你烦躁不安，但请立即平静下来吧。你爱亨利，那么就要信任他——毫无畏惧地把自己献给他。你说你准备穿着浴袍睡在贵妃椅（而非床）上。千万别那么做……如果我在，可以在夜晚替你的女仆当班，我会用一个吻把你哄到床上，让

> 你像个乖孩子一样，安静地待在那里。你必须那么做，上床去吧。把心交给上帝，交给（亨利）。不要胡闹，不要闩上门……不要刚开始一起生活就伤害他——那伤害之深，可能远超你的想象。[72]

这封信的结尾或许表明，米米多少对亨利拈花惹草的癖性有了一些耳闻，因而更加急切地恳求伊丽莎白不要“伤害他”。然而伊丽莎白仍然畏缩不前，以近乎滑稽的轻描淡写拒绝此事：“但是妈妈，有很多事情你从没对我说过啊！”[73]这次交流之后，她和母亲再也没有讨论过性事。

但伊丽莎白以一位“德·蒙泰伊昂公爵夫人玛丽-爱丽丝”的日记之名，对她的新婚之夜有过委婉的描述。这位公爵夫人的名字取自她甜美可爱的堂妹玛丽-艾丽斯·德·卡拉曼-希迈（Marie-Alys de Caraman-Chimay），年方二九、新婚宴尔，出身高贵、样貌出众、冰雪聪明。她的娘家温馨有爱，但陷入贫困，就把她嫁给了一位富可敌国的法国公爵[74]，而玛丽-爱丽丝对这桩婚姻很满意……直到她的新婚之夜。出于礼节，她没有详细记录那晚的对峙，只是在第二天早晨把它描写成她有生之年最伤痛的经历。玛丽-爱丽丝哀叹道，她少女时代那些“关于身着绿衣的白马王子，关于月光骑士”的梦想，让她荒诞地全然没有准备好面对婚床上那个“玷污（她的）无瑕之美的丈夫”[75]：

> 当人们最初对我提到婚姻一词时，我以为那是献身和约束的同义词……我以为它是个社交行为，我的家人热切地希望我执行的社交行为。我没有料到——哦，我完全没有料到！——婚姻行为所意味的一切……的确，意味着献身和约束。但那未知的兽性啊，那包裹在美好语词中的玷污！哦，可怕啊！哦，蹂躏啊！在签订这样一纸合同之时，双方中只有一方了解它真正的含义，真的公平吗？……我该向谁抗议？我该责怪什么？

风俗？法律？他，公爵？他只是在“履行丈夫的职责”……至少他是那么说的。[76]

这一段被录入伊丽莎白档案中的一份未装订的单页校样，是她其后20年断断续续地写的一本自传体小说的一部分。亨利根本不知道这部小说的存在。她是否以另一种方式让他觉出自己对“那种事”的恐惧，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拉里维埃待了两周后，新婚夫妇乘坐马车来了一趟短途旅行，穿过枫丹白露森林向东北驶去，前往壁垒森严的中世纪小城默伦（Melun）。路上，他们在大庄园（La Grande Commune）停下来，那是格雷弗耶家族在该地区拥有的好几处猎场中的第一处，伊丽莎白和亨利没在那里久留，时间刚够他对当地人发表一篇演说，接受他们对他结婚的祝贺——这些都是封建时代遗留的传统。

从大庄园出发，夫妇俩启程前往布德朗森林，每年秋冬，从打猎季开始一直到新年，格雷弗耶大家族的人都要聚集在这座占地7500英亩的庄园里，这对新人也将在那里度完他们的蜜月。这座城堡的形状是难看的L形，历史比格雷弗耶的贵族爵位久不了多少，完全没有孟德斯鸠和希迈家族建筑物的那种光泽感和历史感。它的样子让伊丽莎白想起了兵营。[77]除了城堡入口处两旁过道上高大的铁杉，以及建筑物后面草地上那个周围长着荆棘丛的小池塘外，这里的景观也差强人意，一排看上去毫无人性的大温室代替花园，伊丽莎白觉得整个外观“别提多乏味了”。[78]

这类美学缺陷丝毫没有困扰她的丈夫和姻亲们，他们来布德朗森林不是为欣赏美景，而是为运动的。亨利的祖父在1814年买下这个地方，之所以选择这里，就是因为它的森林和草地是全法国最好的射击场。从那以后，格雷弗耶家族不断买入邻近的一块又一块土地，买断了许多佃农的耕地，迫使更多人背井离乡，创造了至此时为止最大的私家围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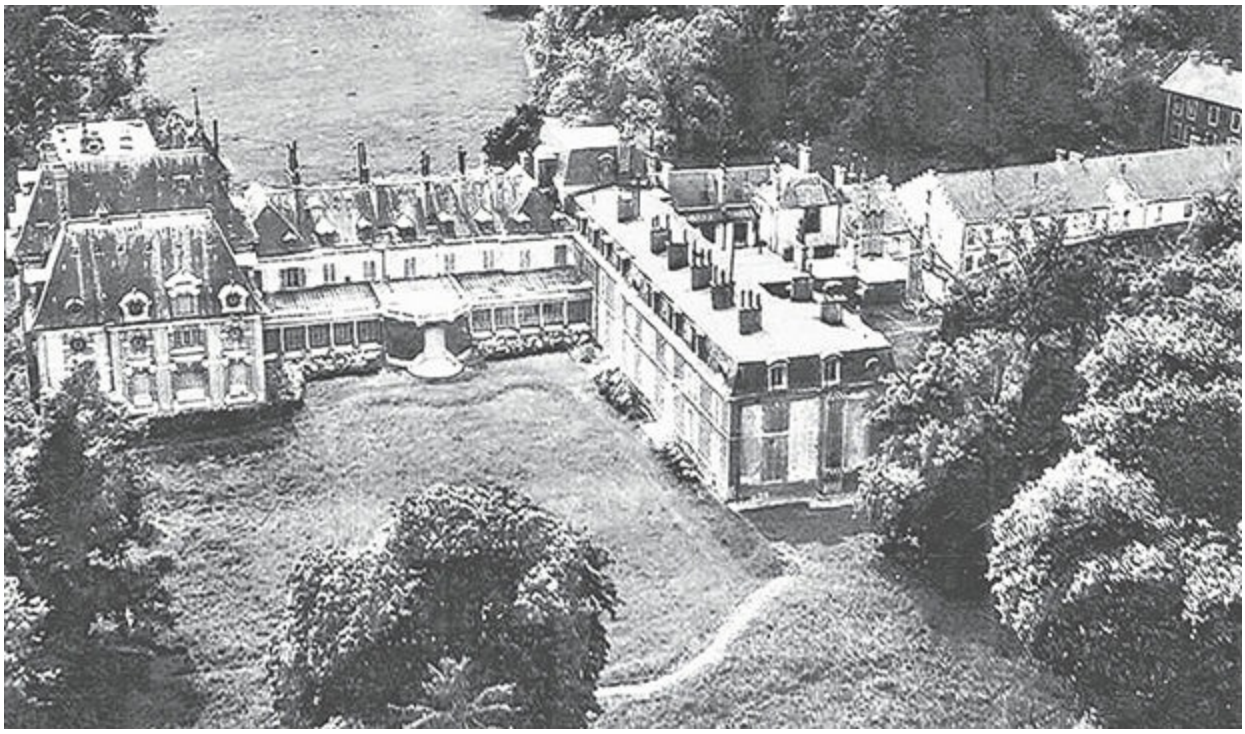
在一篇关于“大首都为本地带来的祸患”的揭露文章中，当地报纸《大伯瑞犬》（*Le Briard*）的出版人报道说，格雷弗耶家族为享乐而吞并大片土地，迫使整个社区的农民和小农场主背井离乡，要知道那些人已经在该地区居住和耕作了几个世纪。这些贫苦之人不仅被迁往格雷弗耶庄园的最外围，连世代都是公共交通路线的道路、马道和人行道也严禁他们使用。《大伯瑞犬》的出版人以笔名撰写这篇文章，猜想“格雷弗耶的个人梦想一定是要把整个塞纳-马恩地区变成只属于他自己和其他几位像他一样的大地主的庞大围场……在他的心目中，（该地区的）小农户的命还没有一窝山鹑值钱”。[79]

为了保护那些山鹑和地产上所有其他猎物，格雷弗耶家族雇用了一支场地管理员和护卫的常备军，领头的是一位好勇斗狠的彪形大汉，名叫“大胡子”。[80]这些全副武装的人负责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该家族“神圣不可侵犯的猎物”，对入侵者和偷猎者实施残酷的惩罚。“大胡子”觉得每一个当地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是潜在的罪犯。“我们是金属工具，你们不过是陶土罐，”他曾对一群嫌疑人说，“我们会把你们砸得粉碎。”[81]结果，《大伯瑞犬》报道说：“‘大胡子’比格雷弗耶家的人更可恨，更可怕。”[82]但说到底，“大胡子”的确只是工具——是他的老板公然无视平民的明证。手下人以他们的名义实施威吓手段表明在第三共和国，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仍隔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但对有产者——至少对那些热爱打猎的人而言，布德朗森林可谓人间天堂，可与有数世纪历史的法国王室的打猎场、传奇的尚蒂伊庄园（domaine de Chantilly）一类的围场媲美。[83]尚蒂伊庄园如今属于德·欧马勒公爵（Duc d’Aumale），他是已故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幼子，也是（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外）活着的法国人里少有的几位比格雷弗耶家族富有的人之一。就连德·欧马勒公爵也希望收到布德朗森林的邀请，他和他的奥尔良亲戚们偶尔会位列格雷弗耶家族的贵宾席。经常在那里和亨利一起打猎的人被称为“发起人”。除了亨利的妹夫们、父亲和叔叔

亨利之外，这个小圈子还包括亨利·德·布勒特伊、德·拉福斯公爵（Duc de La Force）、迪洛·德·阿勒曼侯爵（Marquis du Lau d’Allemans）、科斯塔·德·博勒加尔侯爵（Marquis Costa de Beauregard）、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以及奥廷格兄弟鲁道夫和弗朗索瓦，这最后两位是和格雷弗耶家族一样的新教银行家家族的子弟。作为布德朗森林围场的常客，发起人都有一种特殊的纽扣，上面饰有庄园名称和一个野猪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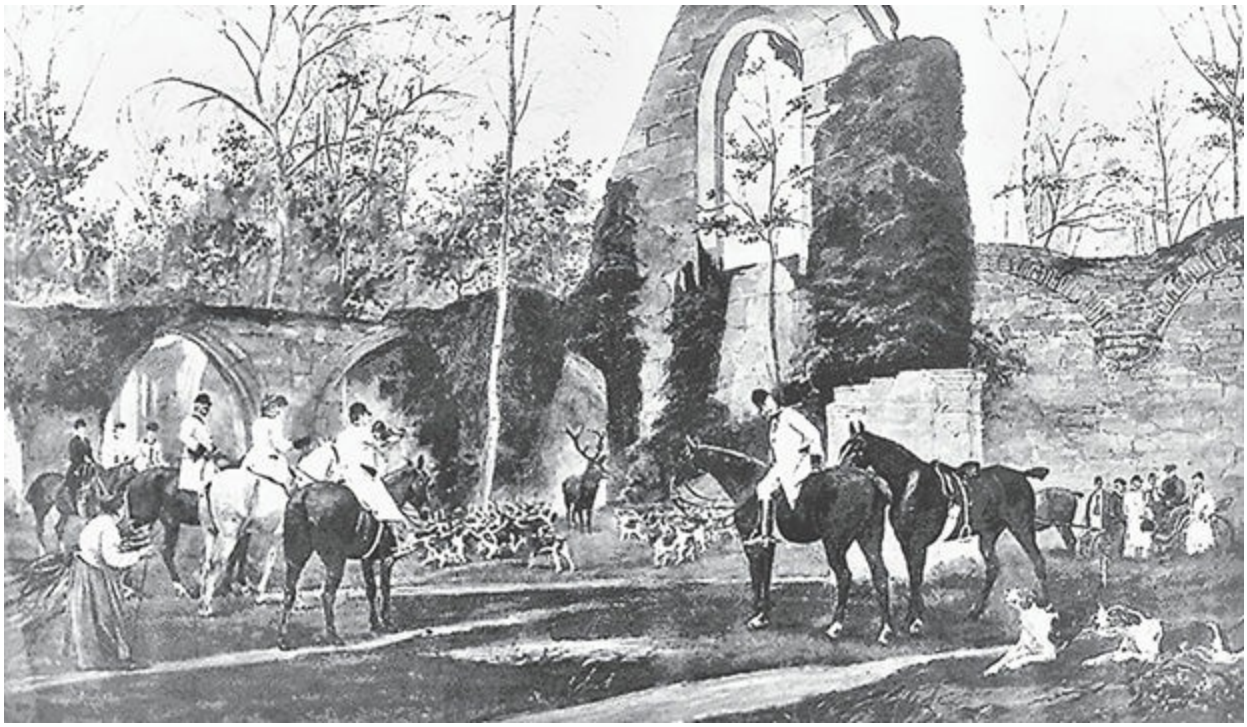
野猪是布德朗森林的特产猎物，格雷弗耶家族在那里豢养和训练了40条野猪猎犬（un vautrait）专门用于这一目的，此外还有几十条普通猎犬（une meute）用于狩猎其他野兽，包括狐狸、狼和雄鹿。但尽管动物品种不一，狩猎的仪式却大致相同。布德朗森林的枪手们身穿蓝金色制服，策马狂追猎物，有几百年历史的狩猎自有一套大阵仗：狩猎专家、猎人、狩猎号和一群猎犬。一大群人横穿森林和草地狂奔几个小时，猎物为活命而奔逃。直到最后，猎物半是累死半是吓死，在狂暴的犬牙和武器（霰弹枪、来复枪、左轮手枪乃至匕首）之下悲惨地送命。猎犬及其主人杀得正酣时，胜利的号角高声吹响，却不能完全盖住牺牲品们绝望的哀号。



布德朗森林是格雷弗耶家族最喜欢的围场，位于塞纳-马恩地区，他们每年秋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



这张明信片上显示的是在布德朗森林一天所获的猎物



格雷弗耶家族和他们的亲戚都是贪婪的猎人，包括创作这幅水彩画的鲍勃·德·拉艾格勒（**Bob de L'Aigle**）在内

虽说每一位发起人都热爱狩猎，但它并非布德朗森林唯一的纵欲方式。格雷弗耶家人和宾客们还享受那种最奢华的射猎方式：驱射（battue），即一大群驱猎者把野禽和野猪赶出它们的躲藏地，驱赶它们走向大批的枪支。[84]一位驱射老手写道，在布德朗森林这样规模的庄园上，这种游戏可以引发一场对动物的"真正的大屠杀"。每个打猎季，除了那里自然野生的数万只鸟类外，格雷弗耶家族在庄园里储备的野禽也数量惊人——30000只野鸡、7000只山鹑，等等。[85]按照德·拉福斯公爵的说法，在布德朗森林里驱射一天，一个神枪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1500"件"战利品。有一年，巴黎伯爵那位风流潇洒的弟弟德·沙特尔公爵罗贝尔·德·奥尔良（Robert d'Orléans，Duc de Chartres）表现出众，仅用两天时间就猎杀了3400只鹌鹑。

对打猎爱好者来说，打猎的传统（和放纵）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它被称为"帝王的游戏"。亨利对这一联想甚是自豪，认为和他与伊

丽莎白结婚一样，布德朗森林也能给王室和国家首脑留下良好印象。（城堡虽然名义上属于他的叔叔亨利，但作为格雷弗耶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亨利继承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第一次带领贝贝斯参观庄园时，就带着骄傲的神情对她说，共和国的现任总统、贵族出身的元帅德·麦克马洪[86]将在12月初来这里，和众发起人一起进行几天的射猎活动。

这个消息让伊丽莎白大吃一惊。她们希迈家族跟麦克马洪有亲戚关系——用上层的术语来说，她和元帅算是“沾亲带故”——他的妻子闺名伊丽莎白·德·拉克鲁瓦·德·卡斯特（Élisabeth de La Croix de Castries），则是伊丽莎白的教母，也是米米最好的朋友。然而伊丽莎白没料到，她那位痛恨共和派、宣称他们全都“臭气熏天”的丈夫竟然还愿意与麦克马洪结交。不过亨利坚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上，元帅都是“我们的人”，应该结交。“此外，”他还说，“虽说在政治上洁身自好并非不可能，但有时还是得做一些奇怪的事情。”[87]伊丽莎白当时不可能了解这句话概括了亨利全部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在个人利益面前，原则不值一提。

说到打猎，亨利就远没有那么灵活了。正如他对贝贝斯解释的，布德朗森林的日常活动不容许任何例外：按家族规矩，无论天气有多恶劣，无论她有多不情愿，她每天必须和其他女人，包括她的婆婆格雷弗耶伯爵夫人费利西泰，她的大姑子拉艾格勒伯爵夫人路易丝和让娜·德·阿伦贝格亲王夫人，还有每一位男性客人的夫人，一起跟着打猎队伍。伊丽莎白沮丧极了。她试图让亨利知道，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打猎：不喜欢那阴冷潮湿；不喜欢在猎犬追逐猎物、男人们端枪射击时无尽的等待；不喜欢在马鞍上和敞篷单门篷车里待好几个小时；不喜欢本地农民和村民们一听到号角就从整个乡野蜂拥而至，唯恐晚了便看不见猎物；不喜欢那些咆哮声、尖叫声，以及整场活动结束后凝结成块的血迹。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她碰巧骑术很好，在马背上姿势优雅倒还算是一点安

慰，但并不足以让她放弃立场，喜欢上这么糟糕的追捕游戏。

话虽如此，但她太害怕丈夫发脾气，根本不敢公开跟他作对。因此她敦促他考虑一下他的表妹康斯坦丝娇弱的身体，她与亨利·德·布勒特伊的婚礼只先于亨利和伊丽莎白的婚礼一个星期。用那个时代的惯用语来说，年轻的布勒特伊侯爵夫人有痨病（饱受肺部和胸部虚弱之苦）。因此，伊丽莎白推论道，康斯坦丝最好待在有火炉的室内，而她既然是格雷弗耶家的客人，就不该被独自一人留在那里。



虽然伊丽莎白颇擅骑术，但她丝毫没有丈夫对这种帝王游戏的热爱

这是个聪明的说法，迎合了亨利对标准“贵族式”拘泥于形式的专注。（按照一位社会讽刺作家的说法，上流社会对“要有礼貌”的重视程度比对整个《十诫》加起来还要多。[88]）不过亨利很快就识破了伊丽

莎白的诡计，对她说此事要由他的父亲和亨利叔叔来决定，让他异常震惊的是，他们居然支持伊丽莎白的计划。亨利的父亲夏尔急不可待地想要孙辈来传宗接代。因此他觉得不让负责生育格雷弗耶家下一代的女人受累去打猎不但合理，而且明智。（事实上，伊丽莎白好笑地记录说，如果让她的公公说了算，他根本不会让她动弹一下："为了我的健康考虑，我觉得他会希望看到我困在轮椅上！他总是给我送来各种吃的喝的，还拉过来椅子让我坐。"[89]）至于亨利叔叔，他已经病入膏肓（第二年春天就因病去世了），深知发起人的打猎生活习惯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惩罚。他也同意夏尔的看法：其他人在野外打猎时，两位少妇应该获准留在家里。

然而如果说亨利的父亲和叔叔倾向于把两位新娘排除在帝王游戏之外的话，他的母亲可不这么看。费利西泰争辩说，无论是康斯坦丝的肺还是伊丽莎白未出世的孩子都与此事无关；在布德朗森林，每个人都要参与打猎，不由分说。这次轮到伊丽莎白震惊了——夏尔和亨利·格雷弗耶立即屈服了，请求她按费利西泰说的做。

这次交流让伊丽莎白首次了解到格雷弗耶家族的另一个传统：要绝对地、心存畏惧地服从婆婆。费利西泰绝非美女，但她有着埃斯蒂萨克那一支拉罗什富科家族每个人都有的锐利的蓝眼睛和鹰钩鼻。年轻时，这些特征至少让她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不过自那以后，她早已头童齿豁，如今显然戴着假牙和假发。（她的假发黑得像鞋油，看上去特别假。）这些饰物给了她一种可怕的气势，让她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军事教官或近卫军掷弹兵，她那股子唐突专横的派头更是雪上加霜。她的丈夫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都十分和蔼自信，在她面前却畏缩得像个小学生，亨利叔叔也是如此。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抱怨说，格雷弗耶家族"把握权柄"的是费利西泰，其次就是路易丝·德·拉艾格勒，这另一位"身穿制服的掷弹兵"显然很乐意帮助母亲驳倒贝贝斯对其权威的挑战。[90]

伊丽莎白别无选择，只好每天陪着一起打猎，跟她做伴的还有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她几年后死于肺炎）。不过她的屈服并没有让她和夫家女眷间的关系归于和平。高大而阴郁的路易丝态度和做派都和她母亲一样令人不安，她冷若冰霜，总是沉默地表示不满，而费利西泰公开咆哮地指责伊丽莎白不是个合格的打猎爱好者。在她所有的夫家女眷中，只有让娜·德·阿伦贝格这位娇小玲珑的金发女子偶尔会对她示好。但和夏尔及亨利叔叔一样，让娜也太胆小，不敢公然与费利西泰作对。伊丽莎白身陷敌营，孤立无援。

她的婚姻日志现在变成了无尽的失望和伤悲的记录。伊丽莎白在描述典型的野外打猎日时写道：

> 今天我在婆婆的单门篷车里，追着打猎队伍在户外待了五个小时，我真的喊出了声：太冷了！她一刻不停地实况解说：“猎人们到那边去了，不，他们到这边来了，我们得看看有什么东西窜出来了……”突然，16只野猪跃入眼帘。但我只看到了6只，我婆婆很生气，因为我说看不清最后一只是不是母猪。显然，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91]

婆婆找碴就已经够令人不快了，但发现了这一切的起因后，伊丽莎白愈加烦恼，那就是费利西泰坚信，哪个女人也配不上她唯一的儿子。就连让娜乃至路易丝私下里也承认，他们的母亲养育亨利的方式让亨利本人也坚信这一点，家里的其他人也都忍受不了他的跋扈。[92]在她的日记和家信中，伊丽莎白给费利西泰取了一个代号：“地狱犬”（Cerberus），原型是古典神话里那只长着三个头的邪恶看门狗。“地狱犬一刻不停地盯着我，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态度冷淡极了，”她写道，“她的个性处处跟我相反。”[93]

一天，当猎犬们袭击了一位老农妇而不是它们屠杀的猎物时，费利西泰的冷淡中露出了邪恶的一面。伊丽莎白亲眼见到她婆婆听说狗群把

那位老迈的受害者的嘴唇“咬下来一大块”时，居然“变得很兴奋”，这真是让她目瞪口呆。自始至终，费利西泰对被狗群狂屠的女人没有一点关心，而是不停地高声尖叫着：“它们咬了那个老东西！好棒的狗！”[94]如果说伊丽莎白曾经怀疑过“地狱犬”这个绰号是否欠妥的话，经过这一事件，她一点儿疑虑也没有了。的确，她现在亲眼看到了她的新家庭为什么如此不受当地人欢迎，为什么当地的报纸如此不遗余力地谴责“（格雷弗耶家族）在这片可悲可怜的角落上实施压迫，在这里，主人的意志高于法律”。[95]

伊丽莎白把婆婆划归魔鬼之列并非难事，但让她接受亨利同样恶劣就要难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对她也一样恶劣。他以母亲为榜样，利用贝贝斯不喜欢打猎这件事作为借口，对她随意责骂。10月19日，他在一大群猎人面前对伊丽莎白大发雷霆，原因是按照他的说法，她“看到他对鸭子开枪时，那样子就像奥菲丽娅[96]”。[97]这个比喻与其说证明了伊丽莎白的所谓不当行为，倒不如说显示出亨利不学无术，因为她惹他生气的事情——缩在羊毛毯子下面，牙齿打战——与发疯的奥菲丽娅溺水而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亨利似乎无论如何就是要对伊丽莎白吹毛求疵。几天后，他正端枪准备射击时，她听到康斯坦丝的一句蠢话而笑起来，这又让他爆发了。他再次当着所有人的面对贝贝斯大肆咆哮。她在日记中写道，那天他说尽刻薄话之后才停止咆哮，并断然得出结论说：“嗯，看来你这辈子从来没打过猎！”[98]那句致命的侮辱过后，他才扭转马头，骑马走了。

打猎结束、吃饭锣敲响时，伊丽莎白在布德朗森林的折磨并没有跟着结束。和在城里一样，在乡下，人人也要穿戴整齐地出来吃晚餐。然而在这一层表面的优雅之下，餐间谈话仍围绕着枪支猎物，这让伊丽莎白觉得乏味得难以忍受。正如她在一封家信中抱怨的那样，布德朗森林饭桌上的谈话“主要是把白天打猎的那些细节重复一遍”——仿佛那些细节多么激动人心，值得重复和进一步分析似的。她后来发现，这样的做

法倒不是布德朗森林独有的。德·拉艾格勒家族也有自己巨大的围场庄园弗朗克波特（Francport），那块13000英亩的森林庄园就在孔皮埃涅（Compiègne）森林旁边，发起人也喜欢在那里聚会。[99]在那里，正餐时间的习俗是在吃饭开始时朗读当天的打猎记录，然后对涉及的每一枪和未打中或屠杀的每一“件”战利品细细回味一番。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晚餐会后，伊丽莎白简直要庆幸自己没有在弗朗克波特度蜜月了。不过要是没有在布德朗森林度蜜月，她也会一样庆幸。

发起人在餐桌上还喜欢谈论另一个话题，但那个话题是农场经营。和大多数乡绅贵族一样，格雷弗耶家族及其朋友们也把农业和畜牧业看成乡绅的神圣职责。因为天性偏好智识和艺术，又自幼游历四方，伊丽莎白对此没有任何兴趣，十分困惑夫家人何以对“小鸡、火鸡，甚至猪”如此着迷。她对米米承认说，当饭桌上进行这类讨论时，她只能像“萨拉·伯恩哈特[100]在（维克多·雨果的）《爱尔那尼》[101]中问她的情人是否还活着时一样，装出动情的样子”。[102]一天傍晚，伊丽莎白在全桌人热切地讨论最好用什么饲料喂养野鸡时，逼迫自己参与了讨论。她努力装出萨拉·伯恩哈特那种动情的样子争论说小虫子比蚂蚁卵更好，总算赢来了亨利难得的赞许的微笑。

然而伊丽莎白发自内心地不喜欢“这里无比乏味的晚间聚会”。她在日记中试图提醒自己，尊重亨利的品位和愿望是身为人妻的职责所在：

> 我必须记住，我现在过这种生活是为了让我丈夫高兴。尽管实在很难逼自己去喜欢完全没有兴趣的东西，但或许我对这一切的感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103]

想到亨利不遗余力地毁谤她自己的兴趣，例如读书，这样合理化的自我安慰就更难接受了。虽然他也收藏书，但不怎么喜欢阅读；和他花同样多的时间收购的艺术作品一样，在他看来，他买来的那些珍本只是身份的象征，除此再无他用。伊丽莎白对父母抱怨说，这就是为什

么“这里的图书室总是锁着。亨利无法想象居然还真有人想进去找点东西读”。更糟的是，她渐渐明白，他把她爱书看作一种性格缺陷，他有责任改正这种缺陷。有一次他从她的手中夺过一本诗集，高叫道：“爱我比爱任何小说都强！”

当伊丽莎白试图让他了解，她的生命中不能没有小说（或诗歌）时，亨利提出了一个假装妥协的方案。他提出为她订阅《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就是他母亲偶尔细读的一份保王党报纸。但伊丽莎白的灵魂需要的是文学，她拒绝放弃。[104]亨利看到她蜷缩在那里阅读维克多·雨果的一本书，大发脾气，尖叫着说她“品位太差”。他的发作让伊丽莎白也火了。“每当有人攻击我热爱的东西，”她后来写道，“我会被激怒，也会失态。”[105]

正因为在布德朗森林的生活如此烦闷，伊丽莎白起初很盼望她和亨利那年秋天的另一项主要娱乐：作为夫妻，义不容辞地首次拜访该地区的亲朋好友。她对有机会离开庄园和夫家人心怀感激。然而正是在一次这样的出行中，她第一次瞥见了丈夫秘密的婚外恋，她在婚姻日志中布满泪痕的三页纸上记录了这一发现。“那块遮眼布从我的眼前扯下了，”署期为1878年10月23日的日记第一页写道：“整个天地一下子明光锃亮，刺眼的光芒带来的是无穷无尽、无以言说的痛楚。”第二页只写着一个名字——“德·奥松维尔子爵夫人德·阿尔古小姐（波利娜）”[106]，第三页是她对整个事件的叙述。那天傍晚德·奥松维尔子爵和子爵夫人（后来的伯爵和伯爵夫人）在他们位于附近的古尔西（Gurcy）城堡为伊丽莎白和丈夫举办晚宴，其间她发现庄园的女主人与亨利眉来眼去，“对他投来无数小小的爱意和渴望”，暴露出二人的关系毫无疑问异常亲密。

突然间，亨利频繁地离开布德朗森林——包括有一次短期前往巴黎去参加一个婚礼，伊丽莎白也接到了邀请，但他禁止她参加——被赋予

了一个可怕的全新意义。［根据社交界的传言，亨利蜜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波利娜·德·奥松维尔幽会，不仅在巴黎，也在布德朗庄园距离古尔西很近的一座建筑——桦木屋（Les Bouleaux）。］

亨利与波利娜的婚外情也解释了他最近为什么几乎随意对伊丽莎白发脾气，哪怕争论的焦点根本不是她是否算个女猎手。那晚在古尔西的宴会上，她意识到如果说亨利“如今对我既不温存也不体贴”了，那不仅仅是因为他脾气不好、性情冷漠——虽然这些的确是他的特质。不，她的丈夫之所以对她劈头盖脸，是因为她不是波利娜，还因为天真烂漫的伊丽莎白希望他无论如何都是爱她的。

这是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德·奥松维尔子爵夫人波利娜娘家姓德·阿尔古，在很多方面，她与亨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伊丽莎白望尘莫及。波利娜是一位完美的贵妇，对自己有着近一千年历史的贵族血统深感自豪，甚至可以花好几个小时冥想自己和丈夫的家世有多伟大，她的丈夫奥特南也有一位姓德·阿尔古的祖母，这更令她志得意满。（这对夫妇的父系祖父曾在路易十六的王宫里担任高阶廷臣，既是好友又是姻亲，两人的儿子又安排自己的孩子联姻，更是亲上加亲。）波利娜对祖先的崇拜让她与亨利气味相投，亨利喜欢吹嘘她母亲家族的制服是紫色的，那是王室服丧的颜色，历史可以追溯至12世纪，一位耶路撒冷的拉罗什富科国王穿上它，“悼念耶稣基督之死”。[107]这个传说会让波利娜重提德·阿尔古家族在“圣地”的功绩，他们曾在“狮心王”理查一世[108]的旗帜下，向圣地发起过十字军东征。

除了背家谱之外，波利娜的主要信条就是上流人士的“单纯”品质。在理想的贵族用法中，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值得赞美的低调谦和，一种务实的亲切优雅，表示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贵，都不会误以为自己事实上高人一等。但在世纪末的城区，这样的品质已经相当稀有了，或许是因为贵族已经丧失了太多特权，没有定力再对自己所剩不多的一项特权

——表面上与生俱来的高贵——淡然处之。和她的贵族同伴们一样，波利娜的“单纯”也只是一种骗术。她假装对自己事实上最为骄傲的价值——出身和头衔——不以为然，如此恰能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表明她真正出身高贵。正如评论家亨利·拉齐莫[109]所说，“赞美一个人‘单纯’，意思就是她有足够的理由不单纯”。[110]

就这个意义而言，上层人士中没有谁比亨利那位自大的表兄艾默里·“座次”·德·拉罗什富科更不单纯了。[111]于是波利娜就常常通过嘲弄他来展示自己的“单纯”，通过嘲笑艾默里对出身的得意来淡化自己对此事的虚荣。一位参加过她在巴黎举办的招待会的社交界绅士（*hommes du monde*）曾说：

> 德·奥松维尔夫人真是骨子里的单纯，她常常说起“她亲爱的艾默里·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如果艾默里不随身带一本家谱，就是个魅力无限的绅士了。”她会揶揄（他）有一次和一群（拉罗什富科）亲戚一起去日内瓦湖上划船。突然，湖上刮起了一阵大风，看样子船马上就要沉了，伯爵对赶来帮助他们的救援者们大喊：“先救家族中更高贵的那一支！”

除了装出一副姿态，表明自己不会如此野蛮可笑地狂妄自大之外，波利娜的故事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支撑起了她的情人那点脆弱的虚荣心。他也一样对自己的拉罗什富科血统沾沾自喜，但亨利痛苦地意识到，“格雷弗耶”这个姓氏有着中产阶级新教徒的意味，缺乏一个贵族小品词（“德”）[112]，而且它的贵族头衔的历史还不到一个世纪，所有这些当然无法让艾默里这样的血统纯正论者景仰，为了弥补母亲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坏影响，艾默里常常“指出那些备受吹捧的血统中的弱点，就连一百多年前结成的那些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也要嘲笑一番”。[113]表兄的这个习惯带出了亨利最邪恶的一面，他自视过高，根本容不得对他的血统有任何中伤。波利娜迫使艾默里采取守势，抚慰了他的心灵。

然而，她在这方面的玩笑绝没有让她的态度变得平易近人。正如她的朋友加布里埃尔-路易·普兰盖[114]所说，波利娜认为自己仿佛“远远高人一等……头上戴着一顶隐形的王冠：谁见了她，都想要向她俯首鞠躬呢”。同样，莉莉·德·格拉蒙也说她：

> 温柔可亲，但近乎固执地陈腐，仿佛她是一位女王，屈尊俯就地跟低她一等的人寒暄似的。她称呼他人也用昵称，对他们嘘寒问暖，但她那双冷漠的大眼睛可丝毫不参与言辞和手势传递的温情……她的姿态非常高傲。[115]

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的评价更刻薄：“德·奥松维尔夫人的人品很差。”[116]但波利娜的高傲让她与亨利非常亲近，亨利的母亲从小就教育他，傲慢是“出众和出身的标志”。他还很看重波利娜与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巴黎伯爵和伯爵夫人的亲密友谊。只要那些君主能够东山再起（亨利希望如此，也为此做了充分的打算），他们无疑会征召波利娜和她的丈夫担任高位，那样以来，德·奥松维尔家族就能够接近王位，就连与比利时王室关系密切的卡拉曼-希迈家族也无法与之媲美了。[117]

然而，如果说波利娜出众的社交和政治资质本身就已足够吸引亨利，那么她的美貌也同样令他着迷——上层称她为“美女波利娜”并非空口无凭。波利娜虽比伊丽莎白大14岁，但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承认，亨利的情妇仍然是个

> 美丽的妇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美如雕塑。她的皮肤或许因为玫瑰痤疮而显得太红了，但她的鼻子挺拔而漂亮，还有路易十五那样一双眼皮松弛的眼睛。

这最后一个特质或许说明亨利被波利娜吸引有一种自恋的成分：她很像他自己所谓的王室祖先，或许更重要的是，她很像他自己。正如布勒特伊所说，“格雷弗耶的情妇们都是金发女郎——她们的头发全都是

同一种草莓金色调，这让她们看起来像一家人”。[118]这也让她们和她们那位草莓金色头发的情夫看起来像一家人。

至于奥特南·德·奥松维尔，如果他对妻子与亨利的私情略知一二的话，他似乎并不为此而苦恼——原因或许是他自己据说也跟配偶以外的其他人有染。德·奥松维尔的同代人注意到他对波利娜“无可挑剔、近乎吓人的殷勤”[119]，但社交界都知道他是乔治·比才夫人的忠实拥趸，就是父亲和亡夫都是伟大作曲家的那位比才夫人。只要在巴黎，他从未缺席过比才夫人的周日招待会，他的妻子从不跟他一起参加这类活动。比才夫人这种放荡不羁的资产阶级犹太人，正是傲慢的波利娜希望躲开的那一类人。不过老实说，她倒也不必担心会跟这人狭路相逢；比才夫人劝她的男性朋友来拜访她时最好都别带家属。

伊丽莎白完全理解戴眼镜的严肃绅士奥特南·德·奥松维尔何以被比才夫人所吸引，她在蒙马特尔举办的沙龙让一大群成就斐然的名人趋之若鹜。毕竟，他本人就是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既是“有生”阶层，也是有头脑的。他的母亲是一位传记作家，传主既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玛格丽特·德·那瓦尔[120]，也包括现代文学评论家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121]，而她的祖母热尔梅娜·德·斯戴尔[122]则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小说家之一。他的父亲，目前的德·奥松维尔伯爵，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法兰西学术院院士。奥特南本人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有志于将来接替父亲进入学术院，据说认识不少“不朽者”的比才夫人正在帮助他实现这一抱负。

格雷弗耶夫妇拜访古尔西前不久，奥特南刚刚完成了一部关于缺乏教育和无家可归对城市贫民孩子的负面影响的专著。他现在正奋笔疾书，撰写一部他的高祖母苏珊·内克尔[123]的传记。不仅她的女儿德·斯戴尔夫人是个名人，内克尔夫人也是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124]的妻子，1789年7月11日他被国王解职，加速了三天后对巴士底狱

的狂攻。在法国革命的前十年，她在巴黎的沙龙吸引了法国启蒙时代的领袖人物，包括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125]，以及博物学家德·布封伯爵乔治。

奥特南对内克尔夫人的研究让伊丽莎白很感兴趣，她自己的曾祖母塔利安夫人也曾在革命后那十年主持过相当重要的沙龙。（事实上，塔利安夫人就是通过德·斯戴尔夫人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伊丽莎白的曾祖父德·希迈亲王的。）同样让伊丽莎白感动的，还有他显然为高祖母的成就感到骄傲；除了她那些希迈家和孟德斯鸠家的亲戚外，伊丽莎白很少遇到贵族成员重视祖先的智识或艺术造诣，而不是贵族头衔的悠久历史。［米米资助的作家阿贝尔·埃尔芒[126]曾在他1899年的风尚喜剧《城区》（*Le Faubourg*）中，入木三分地讽刺了这一态度。剧中，守旧的老处女瞧不起一个贵族家庭，说他们“在12世纪中期的时候还是无名小卒呢！”[127]］伊丽莎白有墨洛温王朝的王室血脉，按说她比谁都有资格睥睨众生。但她一贯觉得塔利安夫人才是她最喜欢的先辈，因而看到奥特南也同样为内克尔夫人感到骄傲，她深有感触。

波利娜对这些可没什么热情。和亨利一样，她也对艺术气质嗤之以鼻，认为它有损优雅。她自己感兴趣的是慈善，那是她那个阶层的夫人们的标准副业。[128]她是城区最著名的慈善组织“慈善协会”的积极会员，该机构成立于18世纪末，为穷人提供食物和关照。亨利的母亲和妹妹们在巴黎时，也把大量时间花费在该机构。事实上，格雷弗耶家族的女人们已经向伊丽莎白施加压力，敦促她加入该协会了。她目前尚在犹豫，私下里觉得那是一群叽叽喳喳、既吝啬又好胜的老太婆，她们不关心自己做了什么善事，只关心自己在年度慈善义卖会上是否赢了众人。就此而言，伊丽莎白的观点和行为与亨利的契合度也不如波利娜。两个女人之间的差异让他越来越反感妻子遗世独立的才女做派。

伊丽莎白得知亨利的不忠时极为震惊，这是令人痛苦的证据，证明

了他事实上并没有“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我一些”。仿佛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可怕的发现，在古尔西那场让她开眼的晚宴后不久，布德朗森林的发起人之一、精力充沛的法国-爱尔兰外交官阿瑟·奥康纳还送了她一个恶作剧的礼物：《亨利四世之爱》（*Les Amours d’Henri IV*）的一册珍本，里面是对那位国王放浪形骸的滥情生活的历史记述。[129]亨利对奥康纳发火，说他纯属吃饱撑的，花450法郎——“这么一大笔钱！”——开这么一个愚蠢的玩笑（当时书的平均价格是3法郎）。就在“电闪雷鸣的朱庇特”对朋友发作之时，伊丽莎白转身上楼奔向了自己的卧室，泪流满面。

虽然伊丽莎白没有费利西泰或波利娜那么冷若冰霜，但她也不喜欢像这样公开表达情感；她看重自己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的尊严，绝不喜怒形于色。正如她几十年后对亨利坦白的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和磨难，我竭尽全力不让人们看出来在心如刀绞的同时还要满面笑容，这对我来说有多难”。[130]在拜访德·奥松维尔庄园后的那几周，她把那个策略付诸实践，努力在布德朗森林摆出一副平静和开心的样子。她没有让《亨利四世之爱》折磨自己，而是拿起了亨利叔叔送给她的一本上流社会格言集，从中搜索有用的窍门。从这本小书中——因为是她的叔叔给的，亨利只好容忍她阅读——她推论出“美丽的女人和丑陋的女人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性别”，以及她本人必须在美丽的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方能好过一些。这显然是对付“美女波利娜”的一计良策。[131]

对伊丽莎白来说，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位魅力四射的女人，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她直面挑战，对自己又有了新的使命感而心怀感激。她开始每天花很长时间与阿孙塔商量，试验各种盘发和佩戴首饰的新式样。她最喜欢的创新之一，是把一个很长的珍珠项饰在后颈上部的一个发髻上缠一圈，让剩下的“珍珠河”松松地挂在脖颈后面两个肩胛骨之间；在更随意的穿戴中，她会把珍珠换成一条拖尾丝巾。她派人从巴黎请来女裁缝，当场完成她自己设计的各种华丽装束，那些设计的灵

感都是从她新家的艺术和书籍收藏中获得的。

伊丽莎白这类风格的第一个实验，模仿的是一件娴静端庄的白色宫廷礼服。这件礼服来自一件古董雕刻作品，穿在一位与她同名的王室公主身上，它一下子就吸引了她的注意。伊丽莎白女士是路易十六的一个虔诚的妹妹，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与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起被禁闭，又在他们之后不久被送上了断头台。伊丽莎白女士以坚定的勇气和从容面对死亡，在拥护君主制的圈子里几乎被尊为圣人。她从未结婚，这更让她有着天使般的贞洁美名，保王派为她而作的画像一般都会描绘身穿白衣的她，以便突出这一点。这是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完全认同的人物。

这件灵感来自她的王室同名者的衣服用富有光泽感的白色锦缎制成：格雷弗耶家族其他女性的衣橱中不大使用这种布料。（正如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所写，费利西泰鼓励路易丝和让娜“选择礼服时从两种色调中选择：毛毡和尘土”[132]，让娜干脆什么颜色也不用，只穿黑色。[133]）有膨胀的裙撑和华美的长拖裾，伊丽莎白·格雷弗耶模仿的这件礼服显然唤起了人们对旧制度的记忆；它与当时巴黎流行的那种细腰宽袖的时髦女服完全不同。穿上这件礼服，伊丽莎白写道，她几乎能够听到一个声音“在（她）耳边耳语，说（她是那么）鹤立鸡群”。[134]

和未来的很多时候一样，伊丽莎白的时尚宣言是一种真正的主张，她所采纳的风格不仅仅是宣示身份，更是在彰显理想。在这一例中，她的装束明明白白地将自己比作贞洁的伊丽莎白女士。让她的丈夫像亨利四世那样与情妇们投怀送抱去吧；伊丽莎白可以寻找一个高贵得多的典范，圣洁的、在迫害面前绝不低下高贵头颅的殉难公主。伊丽莎白似乎在说，她或许不得不容忍亨利的背叛，但她不准备让他高她一筹。在王室姿态方面，他还得从自己这位“小小的女王”妻子身上学到一二。

虽然这件新衣服有着王室的弦外之音，但伊丽莎白没有穿着它去参

加帝王的游戏；它是为舞会，不是为猎鸭掩体而制的。此外，只要打猎和农事仍然占据着每晚的餐桌谈话，她那些典雅出众的服饰就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效果。为了创造一种更适合展示时尚的环境，伊丽莎白鼓起勇气，决心“为这个家定下一些违背旧例的新规”。

12月初，这样一个机会意外地出现了，亨利叔叔患流感病倒在床。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时急剧恶化，他和亨利的父母不得不离开布德朗森林，前往阳光充裕的里维埃拉，那里的气候更有益健康。他们缺席期间，伊丽莎白接过管家之职，确立了庄园新一代女主人的地位。她虽然无力阻止发起人白天打猎，却成功地把晚间的主要活动改成了更复杂多样的娱乐项目，既有庄严的（例如她在德·麦克马洪元帅来访期间举办的化装舞会），也有荒诞的（例如一种室内游戏，最后一本正经的来访外交官同意用皮带拴着“一只谷场里最漂亮的鹅”绕客厅一周）。圣诞节到来时，这类娱乐活动已经成了布德朗森林的新规范。“现在我们这里变得很优雅，很有社交范儿了。”伊丽莎白在写给米米的一封信中喜形于色。[135]“我们又笑又唱……谈论的是打猎之外的话题！布德朗森林变样了！在我看来，就像发生了奇迹。”[136]

就在那前后，她身穿自己大受欢迎的新礼服出现在圣诞节（也是亨利的30岁生日）晚宴上时，经历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顿悟时刻。看到其他客人在她入场的那一刻“惊叹地陷入深深的沉默”，伊丽莎白狂喜地意识到，“人们觉得我很美！就连我的婆婆也惊呆地看着我，像从未见过我一样”。[137]（这时费利西泰和夏尔已经回到了布德朗森林，亨利叔叔留在尼斯，奄奄一息。）正如人群在她的婚礼那天对她欢呼一样，伊丽莎白对于自己身为美人的力量充满陶醉。

这种力量当然有局限，尤其在亨利那里，他会继续毫无节制、毫无内疚，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调戏女人，直到他于1932年去世。在那以前很久，伊丽莎白将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

世上没有任何一件礼服能够让他对自己忠心。不过从他们的蜜月一开始，她就注意到他“总想看看我给其他每个人留下了什么印象”[138]，并不停地敦促她“保持高贵的姿态”[139]——令人想起波利娜·德·奥松维尔——让“人们看到你就想说：‘那个亨利真是个幸运的小子！他娶了全法国最美的女人！’”伊丽莎白记得他们的这类对白，开始享受并积极策划各种场合，让“亨利的朋友们觉得我惊鸿一瞥——让他兴奋起来”。[140]即便这些无法激发他的性欲，但至少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更准确地说，这刺激了她自己的虚荣心乃至性冲动——后者对她来说，至多是次要的事情。伊丽莎白讨厌婚姻的性“后果”，显然更偏爱自我的抽象快感而非本我的世俗乐趣——她后来与其他男人打交道也在不断证实这一偏好。面对首次发现亨利的不忠，面对他对她越来越狠心的态度，伊丽莎白选择到自己的婚姻之外去寻找信心。正如她对米米倾诉的，

> 既然嫁了一个弃我于不顾的丈夫，我就试图充分利用这一点，尽可能制造一点我自己的成功，而不是沉浸在自怜自伤中，因为……我对他越是关心、投入和爱，他就越享受离开我，越……（似乎）和另一个女人厮混在一起。我能做的只是装作一切正常，追求我自己的生活和快乐……这倒是很方便，因为（亨利）本人也希望我光芒四射；否则，别人会说他娶了一个笨蛋。[141]

不过，“我自己的生活和快乐”当然（还）不是指同样的浪漫史。她把大部分精力和希望都放在了从众人的崇拜而不是从一个男人的爱中获得快乐：

>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快乐堪比一个女人成为所有的目光凝视的对象，并从众人那里汲取养分和愉悦时的狂喜。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欢喜、骄傲、陶醉、慷慨和统治的感觉，是被给

> 予一顶王冠又对它不屑一顾（的感觉）。只有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船长和伟大的演说家才会懂得这种感觉，当他们以自己的精湛技艺和天赋让公众陷入疯狂的欢呼呐喊时，就是那样的感觉。[142]

虽然忍受了种种羞辱，并且还将继续忍受下去，但伊丽莎白在婚姻中对自己的魅力培养了果敢的信心。她会依仗自己不可思议的美，成为自己的诗人、船长和演说家。

然而正如诗人需要读者、船长需要舰船、演说家需要听众，如果伊丽莎白那精巧的魔力只在家人和朋友中间施展，就不会有什么建树。她在布德朗森林确立下来的定期狂欢是她在正确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她利用那些机会享受男性宾客的低语和凝视——偶尔还会有久久不放的吻手礼或悄悄传递的情书。她尤其高兴的是收到了奥特南·德·奥松维尔本人的一首十四行诗，把她比作贞洁的狩猎和月亮女神迪安娜。[143]他在敬辞的最后宣称，伊丽莎白的“高贵姿态和迷人风度（已经）征服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这首十四行诗似乎为伊丽莎白终其一生将自己比作迪安娜开了个头，在她的公众形象中，迪安娜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这种认同还促使她购买了一座由让-安东尼·乌敦[144]雕刻的巨大的迪安娜半身像，那也是她最珍视的收藏。（她对妹妹吉吉描述那座半身像时写道：“她的神情令人难忘，她的美就是我的传奇。”[145]）事实上，她初次与德·奥松维尔家族交流时就获得了应得的奖赏。波利娜或许迫使伊丽莎白面对亨利不忠于婚姻的事实，但奥特南帮她找到了想象中的自我：那个自我飘飘欲仙、遥不可及、超凡脱俗。

然而如此令人惊叹的人格需要更大的观众群，而不仅仅是亨利的家人和朋友，还好，伊丽莎白知道到哪里去寻找。1879年元旦，她和亨利离开布德朗森林前往巴黎。她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旅行，承认自己虽然

不想让他看出重返首都令她多么激动，却难以抑制地暗中微笑起来，那是期待胜利的微微笑意。[146]“你不怎么喜欢社交界，对吧，贝贝斯？”亨利用甜言蜜语哄骗她说。事实上，她正准备沉醉其中，乐而忘返。

---

[1] 关于EG的祖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44-45；AG，*Les Clefs de Proust*，34-37；以及AP（II）/101/3中的各种家谱文件。

[2] 很多年后，伊丽莎白和她的妹妹们都长大成人了，比利时王室授权里凯·德·卡拉曼-希迈家族未来的女儿们自出生起全部自称公主（而非女伯爵）。之所以被赋予该家族这一荣誉，是为了奖励吉莱纳（吉吉）·德·卡拉曼-希迈在王宫里尽心尽力地服侍比利时王后玛丽-亨丽特。——作者注

[3] 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希尔德里克一世是王朝的创立者，在公元457年第一次被文献提及，之后他的儿子克洛维一世在481年降服了高卢北部和中部并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在此之后一直统治着法兰克王国，直到公元751年3月希尔德里克三世被矮子丕平废黜。由于墨洛温王朝的扩张，法兰克王国获得了除塞普提马尼亚以外的所有高卢地区。

[4] 克洛泰尔二世（Clotaire II，584-629），墨洛温王朝的国王。

[5] 塔利安夫人（Mme Tallien），即泰雷扎·卡巴吕·德·丰特奈·塔利安（Thérésa Cabarrus de Fontenay Tallien，1773-1835），出生于西班牙的法国贵族，大革命时期的沙龙女主人和社交名人。后成为希迈亲王夫人。

[6] 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法国南部的一条连接加龙河（Garonne River）与地中海的运河，是沟通地中海和大西洋比斯开湾间内陆水路系统的主要连接线。运河东起地中海港口城市、埃罗省的塞特港，西至上加龙省首府图卢兹附近与加龙河相接。建于1667年至1694年之间，是17世纪法国的重要工程。运河设计师皮埃尔-保罗·德·里凯（Pierre-Paul de Riquet，1609-1680）在设计上匠心独运，使运河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7] 关于里凯家族建造这条运河［又称朗格多克运河（Canal de Languedoc）］的事，见A. Borel d’Hauterive，ed.，*Annuaire de la pairie et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et des maisons souveraines de l’Europe*，no. 3（Paris：Bureau de la Revue Pittoresque，

1845），245。

[8] 弗朗索瓦·芒萨尔（François Mansart，1598-1666），法国建筑师，据称是将古典主义风格融入法国巴洛克式建筑的第一人。《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是17世纪法国最有成就的建筑师，他的作品“因其高度的精致、绝妙和优雅而远近闻名”。

[9] 夏尔·勒布朗（Charles Le Brun，1619-1690），法国画家、艺术理论家、室内装潢师和当时好几个艺术学校的董事。他曾是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画师，被后者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他是17世纪法国艺术界的重要人物。

[10] 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1613-1700），法国景观设计师，法王路易十六的首席园艺师。他最著名的功绩是设计了凡尔赛宫的花园。他的作品代表了法国规整式园林的最高成就。

[11] 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835-1909），比利时国王，1865年继承了父亲利奥波德一世的王位。他是刚果自由邦的创立人和拥有者。他在1865年之前曾任职中将，并游历过印度、中国、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各地。

[12] AP（II）/101/1-2.

[13] AG，*Les Clés de Proust*，39.

[14] 布列塔尼人（Breton），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民族。使用布列塔尼语，属于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不列颠语支。

[15]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41.

[16] Émile Zola，“Types de femmes en France，” *Le Messager de l’Europe*，June 1878，n.p.

[17]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44.

[18] EG致MCC署期1880年9月20日的信件，见AP（II）/101/40。

[19] 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1819-1896），著名德国钢琴家与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之妻，也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钢琴师之一。

[20] 斯特拉迪瓦里琴（Stradivarius），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尤其是乐器制

造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所制作的弦乐器。斯特拉迪瓦里琴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好的弦乐器之一。

[21] MACC致EG署期1900年12月30日的信件，见AP（II）/101/53。

[22] EG的私人档案中有一个大文件，内容为MACC致EG及其姊妹的信件；见AP（II）/101/53。

[23] RM写过一篇关于HG的讽刺诗，每一句都和“Veau d’Or”（金牛犊）押韵，引文见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84；又见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03。

[24] 夏尔·古诺（Charles Gounod，1818-1893），法国作曲家，歌剧《浮士德》是他的代表作。他于1859年根据歌德作品改编而成的歌剧《浮士德》取得极大的成功，因为曲调通俗，色彩丰富，抒情柔美，开创了一代新风，奠定了他世界性的地位。

[25] Béatrice de Andia，ed.，*Autour de la Madeleine*（Paris：Action Artist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2005），83.

[26] 关于塞纳-马恩地区，见Tom（pseud.），“La Grande Villégiature，” *L’Illustration* 92（July 21，1888）：39。

[27] 关于HG的财富，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8-21。

[28] 关于HG的父系祖先，见Guy Antonetti，*Une maison de banque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Greffulhe Montz et Cie*（Paris：Cujas，1963）；Jean-Baptiste de Courcelles，ed.，*Histoire généalogique et héraldique des pairs de France，des grands dignitaires de la couronne，des principales familles nobles du royaume*，vol. 7（Paris：Arthus，1826），93；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and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Paris：Flammarion，1949）：“格雷弗耶家族的祖先并没有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202）。

[29] 多维尔（Deauville），濒临大西洋英吉利海峡的法国诺曼底大区卡尔瓦多斯省一城市，是享誉法国的一个靠海休闲的度假小城。

[30] Éric Legay，*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Master's thesis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1986-1987），55，note 1.

[31] 要把历史货币转换为当今货币的购买力在方法论上实非易事，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不过布勒特伊的朋友阿尔贝·德·曼伯爵（Comte Albert de Mun）在贵族圈里算是一个富人了，他的年金是70000法郎。——作者注

[32]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0.

[33] 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年在位）。又称"路易腓力"。1830年，查理十世试图推行镇压法令，触发了七月革命。立法议会选举他为王国摄政。两天后查理退位，路易-菲利普加冕为法国国王。他在右翼极端君主派和社会党人及其他共和党人之间采取中间路线，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34] 查理十世（Charles X，1757-1836），本名查理-菲利普，是法国波旁复辟后的第二个法兰西及纳瓦尔国王（1824—1830年在位）。他是路易十五之孙、路易十六及路易十八之弟，历经其兄路易十八的十年复辟之后，67岁时才继承王位。由于他对天主教的强烈热情和对贵族政治的厌恶，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并引发1830年的七月革命，查理被迫逊位，流亡英国。

[35] LG，*Mémoires*，vol. 2，20. LG还说，当两个年轻人在非法打猎期间看到维多利亚女王走向他们时，他们"像两个少年一样藏进了灌木丛中"。

[36]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39.

[37] 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Duc Wladimir，1847-1909），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也是后来俄国皇室的家族领袖及俄国沙皇的假定继承人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的父亲。

[38]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Maria Pawlowna，1854-1920），德国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弗里德里希·弗朗茨二世之女，1874年与弗拉基米尔大公成婚。她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和聚会，因此被视为莫斯科最有名的社交名媛。

[39]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66-67.

[40] Élaine Greffulhe，“Papa，” in AP（II）/101/33.

[41] Astolphe-Louis-Léonor，Marquis de Custine，“Bas-bleu，” in *Dictionnaire du snobisme*，ed. Jullian，35.

[42] Astolphe-Louis-Léonor，Marquis de Custine，“Bas-bleu，” in *Dictionnaire du snobisme*，ed. Jullian，40.

[43] Octave Feuillet，in “Hommages et appréciations，” AP（II）/101/1.

[44] Éric Legay，*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Master’s thesis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1986-1987），49-50. Legay对法国国家档案馆内保存的19世纪中学毕业会考成绩的研究表明，起初的八次努力之后，HG后来也从未通过该考试。Legay的研究进一步表明HG设法逃过了服兵役，兵役对当时的法国男性公民来说是强制性的，但据Legay说，HG可能付钱请其他人来顶替他服了兵役。鉴于HG常常宣称他身为持剑贵族，很珍视荣誉，人们大概不难以为他亲自履行了这项公民义务。见Éric Legay，*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Master’s thesis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1986-1987），50。

[45] EG少女时代的日记，标注为*Mes premières amours*，见AP（II）/101/1，n.p。

[46]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0。

[47] 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4，90.

[48]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51. Painter指出，这一缺陷后来引起了MP的注意，后者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他是“加西莫多·德·布勒特伊”。

[49]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Paris：Flammarion，1949），203；关于HG的祖先曾流着“一半国王路易的血”，见Pauline de Broglie，*Comtesse de Pange*，*Comment j’ai vu 1900*（Paris：Grasset，1962），49；以及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4，90。

[50] EG的身份证存档于AP（II）/101/1。在同一份身份证上，她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了8岁，说自己是1868年出生的。

[51] 萨维尔街（Savile Row），伦敦市中心梅费尔（Mayfair）的购物街区，因为传统的定制男士服装行业而闻名。萨维尔街从17世纪便声名鹊起，当时这里是欧洲皇家贵胄信赖与炫耀个人财富品位的地方。

[52] 关于EG得到的这幅画，见Jean Laran，ed.，*L'Art de notre temps*：*Gustave Moreau*（Paris：Librairie Centrale des Beaux-Arts，1914），73；RM，*Les Pas effacés*，vol. 2（Paris：Émile-Paul，1923），233-34；and RM，*Altesses sérénissimes*（Paris：Félix Juven，1907），11，44。

[53] 夏尔·约书亚·沙普兰（Charles Joshua Chaplin，1825-1891），法国画家和版画家，主要画风景画和肖像画。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掌握不同的技巧，如粉彩、平版印刷、水彩、粉笔、油画和蚀刻。以画年轻女性的优雅肖像而闻名。

[54] 关于MCC和EG对莫罗的喜爱，见RM's preface to *Exposition Gustave Moreau*（Paris：Galerie Georges Petit，1906），11-12；关于HG对莫罗的长篇大论的抨击（以及他对夏尔·沙普兰的偏爱），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5 and 34-35。

[55] EG在她的婚姻日志（1878—1879）中引用HG的话，n.p.，in AP（II）/101/1。

[56] EG在她的婚姻日志（1878—1879）中引用HG的话，n.p.，in AP（II）/101/1，1878年10月19日的日记。

[57] EG在她的婚姻日志（1878—1879）中引用HG的话，n.p.，in AP（II）/101/1，1878年9月26日的日记。

[58] 例如，16世纪的彼特拉克风格的诗人Pernette du Guillet就曾在她的*Rymes*的第三首诗中提到"爱的痛楚"之"甜蜜而忧伤"。*Rymes*，ed. Victor E. Graham（Geneva：Droz，1968），41. 关于EG对彼特拉克诗歌，特别是对彼特拉克笔下的洛尔的着迷，见EG的上课笔记，AP（II）/101/1；以及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5。Hillerin没有提到EG的外祖父将彼特拉克的诗歌译成法文。

[59] LG，*Souvenirs du monde*：*1890 à 1940*（Paris：Grasset，1966），87-88.

[60] 对格雷弗耶家族来说，上流社会的看法"远远不够"，见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4。

[61] 对Armand-Ghislain，Comte de Maigret的访问，Paris，March 14，2012。

[62] EG，*Mes premières amours*，op. cit.，entry of February 3，1877.

[63] EG在一次未经发表、没有署期的访问中对一个没有标明身份的访问者说的话，见AP（II）/101/1。

[64]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31.

[65] LG，*Souvenirs du monde*，131.

[66] *Le Petit Parisien*，September 27，1887，1.

[67] EG，婚姻日志，1878年9月25日的日记。

[68]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25.

[69] 关于EG的嫁妆，完整记录保存在AP（II）/101/1。Jean-philippe Bouilloud，ed.，*Un univers d'artistes*（Paris：L'Harmattan，2004），31。

[70]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27.

[71] EG，见AP（II）/101/150。

[72] MCC致EG，见AP（II）/101/41。

[73] EG致MCC，见AP（II）/101/40。

[74] 注意：伊丽莎白虚构的第二自我的爵位比伊丽莎白的真实情况高得多。普鲁斯特笔下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是一位公爵夫人，而这个人物的三个原型中有两个是伯爵夫人，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也同样提升了她们的身份。在普鲁斯特为《追忆似水年华》记录的最早的笔记中，德·盖尔芒特夫人"只"是一位伯爵夫人。——作者注

[75] 一份未装订的单页校样，构成了未具名的"玛丽-爱丽丝日记"。这里引用的摘自标题为"蒙泰伊昂城堡，新婚第二天"的一页。见AP（II）/101/149［副本见AP（II）/101/152］。EG未曾为该文本加标题，但我在下文中提到时都会称之为她的"玛丽-爱丽丝"项目。

[76] 一份未装订的单页校样，构成了未具名的"玛丽-爱丽丝日记"。这里引用的

摘自标题为“蒙泰伊昂城堡，新婚第二天”的一页。见AP（II）/101/149［副本见AP（II）/101/152］。EG未曾为该文本加标题，但我在下文中提到时都会称之为她的“玛丽-爱丽丝”项目。数十年后，EG似乎把她的“玛丽-爱丽丝”部分传给了当时与之交好的小说家Adolphe Aderer看，因为后者的*Une Grande Dame aima*（Paris：Calmann-Lévy，1906）中包含一段新婚之夜的描写与EG写的异常相似，女主人公也神似玛丽-爱丽丝·德·蒙泰伊昂。在动笔写*Une Grande Dame aima*几年前，Aderer曾把另一部小说，*L'Impossible Amour*（Paris：Calmann-Lévy，1903）题献给了伊丽莎白。我正在对两人的关系，以及EG自1890年代中期以后的其他秘密文学合作进行深入研究。

[77] EG，婚姻日志，1878年10月6日的日记；关于铁杉小道，见Agnes Herrick and George Herrick，*Paris Embassy Diary*（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7），20-21。

[78]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203.

[79] Le Père Gérôme（pseud. A. Vernant），“Notes sur la Grande Propriété：Chez M. le Comte Greffulhe，” *Le Briard*（October 22，1892）：我从一个法国珍本商人那里买到了这一期《大伯瑞犬》。不过这里引用的文章于1892年10月21至10月25日以同一标题分三期连载在该报纸上。这三期报纸都保存在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Seine-et-Marne，微型胶卷PZ 34/44Mi306。

[80] Le Père Gérôme（pseud. A. Vernant），“Notes sur la Grande Propriété：Chez M. le Comte Greffulhe，” *Le Briard*（October 22，1892）：我从一个法国珍本商人那里买到了这一期《大伯瑞犬》。不过这里引用的文章于1892年10月21至10月25日以同一标题分三期连载在该报纸上。这三期报纸都保存在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Seine-et-Marne，微型胶卷PZ 34/44Mi306。

[81] Le Père Gérôme（pseud. A. Vernant），“Notes sur la Grande Propriété：Chez M. le Comte Greffulhe，” *Le Briard*（October 22，1892）：我从一个法国珍本商人那里买到了这一期《大伯瑞犬》。不过这里引用的文章于1892年10月21至10月25日以同一标题分三期连载在该报纸上。这三期报纸都保存在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Seine-et-Marne，微型胶卷PZ 34/44Mi306。

[82] Le Père Gérôme（pseud. A. Vernant），“Notes sur la Grande Propriété：Chez M. le Comte Greffulhe，” *Le Briard*（October 22，1892）：我从一个法国珍本商人那里买到了这一期《大伯瑞犬》。不过这里引用的文章于1892年10月21至10月25日以

同一标题分三期连载在该报纸上。这三期报纸都保存在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Seine-et-Marne，微型胶卷PZ 34/44Mi306。

[83] 关于布德朗森林和尚蒂伊猎场的出色品质，见Georges de Wailly，“La Vénérie moderne，” in *La Nouvelle Revue*，vol. 80（January-February 1893）：167-77，168-69；and Éric Legay，*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Master’s thesis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1986-1987），111-112。

[84] 关于驱射和一般的射击狩猎的详情，见Gaston，Marquis de Castelbajac，“La Chasse à tir，” in *Le Protocole mondain*，ed. AdF（Paris：Levallois-Perret，n.d.），359-64；Crafty [pseud.]，*La Chasse à tir*：*Notes et croquis*（Paris：Plon，1887）；and “Les Battues，” in *La Chasse moderne. Encylopédie du chasseur*，ed. M. H. Adelon，G. Benoist，et al.（Paris：Larousse，1912），291-314。

[85] Le Père Gérôme（pseud. Vernant），“Notes sur la Grande Propriété：Chez M. le Comte Greffulhe，” *Le Briard*（October 21，1892）：1；关于1500“件”战利品的数字，见La Force，Auguste de Caumont，duc de. *La Fin de la douceur de vivre*：*souvenirs，1878-1914*. Paris：Plon，1961，77；关于沙特尔公爵两天射杀了3400只鹌鹑，见Olivier Coutau-Bégarie，ed.，*Souvenirs historiques*：*Archives et collections de la princesse Marie d’Orléans*（Paris：Drouot，2014），52。

[86] 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法国军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1873—1879年在位）。他在克里米亚战争及意大利马真塔战役（1859）中扬名，后晋升为法国元帅，并受封为德·马真塔公爵（duc de Magenta）。

[87] HG，引文见EG in AP（II）/101/150。

[88] Léon Pierre-Quint，*Marcel Proust*：*Sa vie，son œuvre*（Paris：Simon Kra，1925），180.

[89] EG，婚姻日志，1878年11月20日的日记。

[90] 关于费利西泰的相貌，见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43；以及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9。关于费利西泰对她丈夫和亨利叔叔的威吓，见PW，*Les Soirées de Paris*（Paris：La Nouvelle Revue，

1887）；以及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30。

[91] EG，婚姻日志，1878年11月20日的日记。

[92] 关于路易丝·德·拉艾格勒承认费利西泰对HG的偏袒是整个家族的灾难，见AP（II）/101/54。

[93] EG，婚姻日志，1878年10月11日的日记。

[94] EG，婚姻日志，1878年11月10日的日记。

[95] Le Père Gérôme（pseud. Vernant），"Notes sur la Grande Propriété：Chez M. le Comte Greffulhe，" *Le Briard*（October 21，1892）：1.

[96] 奥菲丽娅（Ophelia），《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她深受哈姆雷特喜爱，这段感情却受到其父御前大臣的万般阻拦；御前大臣后被哈姆莱特刺死，奥菲丽娅得知后，面对亲人和爱人的矛盾彻底崩溃，整天唱着古怪的歌到处游荡，不幸落水淹死。

[97] EG，婚姻日志，1878年10月9日的日记。

[98] EG，婚姻日志，1878年11月5日的日记。

[99] 见"Society，" *Lady's Realm* 14（May-October 1903）：675-78，676。

[100] 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约1844-1923），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舞台剧和电影女演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圣女贞德之后最有名的法国女人。在1870年代——"美好年代"的初期，伯恩哈特就以她在法国的舞台剧表演而出名，其后闻名于欧洲和美洲。

[101] 《爱尔那尼》（*Hernani*），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戏剧作品，标题来自西班牙南巴斯克县的一个小镇，该剧于1830年2月25日在巴黎首演。

[102] 引文见cossé-Brissac，op. cit，49。

[103] EG，婚姻日志，1878年11月20日的日记。

[104] 关于HG赞同《法国公报》以及EG对它毫无兴趣，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31。

[105] EG in AP（II）/101/5. 在她的婚姻日志中，EG写道：“亨利对我觉得美好的一切无端发作。”1878年11月13日的日记。

[106] 波利娜·德·阿尔古（Pauline d’Harcourt，1846-1922），出身于古老的法国贵族家族的女性活动家。她曾在1907—1923年任伤兵救济协会（SSBM）女士委员会主席，该组织是法国红十字会（1940）的前身。

[107]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45.

[108] 理查一世（Richard Ⅰ，1157-1199），中世纪英格兰王国的国王，因勇猛善战而得到了“狮心王”（Richard the Lionheart）的称号。理查一世身为天主教徒，曾加入教廷发起的十字军东征。他是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将领，于阿苏夫会战中击败穆斯林军队。

[109] 亨利·拉齐莫（Henri Raczymow，1948-），法国作家。他自1970年代起，在巴黎担任文学教授。著有《占领》（*La saisie*，1973），《我们亲爱的马塞尔在这一夜过世》（*Notre cher Marcel est mort ce soir*，2014）等。

[110] 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90.

[111] 关于艾默里·德·拉罗什富科的血统“纯正论”，见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4，87。

[112] 虽说小品词“德”既不是证明贵族血统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但这个词的确出现在绝大多数法国贵族的姓氏中。亨利·格雷弗耶很介意自己的姓氏中没有这个词。据安德烈·德·富基埃说，他坚称格雷弗耶这个姓氏本身“比任何小品词都要高贵”。——作者注

[113] PV，Les Soirées de Paris，135.

[114] 加布里埃尔-路易·普兰盖（Gabriel-Louis Pringué，1885-1965），法国作家和专栏作者，著有《城中30年晚餐记》（*30 ans de dîners en ville*，1948）、《画像与幽灵》（*Portraits et Fantômes*，1951），以及《盛装归来》（*Revenants en habits de gala*，1955）等。

[115] LG，Mémoires，vol. 1，110.

[116]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122. MP后来写了一篇阿谀奉承的文章《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的沙龙》，

以Horatio为笔名发表在《费加罗报》（1904年1月4日）上。这篇文章的副本见MP，*Le Salon de Mme de...*（Paris：L'Herne，2009），64-75。在这篇文章中，MP将波利娜和奥特南称为"智识、道德和容貌高贵"的两位典范（66）。但除了浮皮潦草地用了两行文字赞美波利娜（72）外，整篇文章都在谈论奥特南的成就和人品，MP是通过GS认识他的。

[117] Paul-Gabriel Othenin，Comte d'Haussonville，*Le Comte de Paris*：*souvenirs personnels*（Paris：Calmann-Lévy，1895）；and MB，*La Duchesse de Guer mantes*，104.

[118]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0.

[119]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Paris：Revue Adam，1948），105.

[120] 玛格丽特·德·那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1549），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贵族之一，是著名作家与文人的保护人。她醉心于文化沙龙事业，也为艺术家与作家大力提供赞助。在当时的法国和欧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

[121] 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作家、文艺批评家。圣伯夫出生于布洛涅的一个旧贵族家庭，1823年进入医学院学习，1857至1861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他作为批评家的名声在第二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122] 热尔梅娜·德·斯戴尔（Germaine de Staël，1766-1817），法国女小说家、随笔作者。她将那些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德语作家的浪漫主义作品推广开来，并以此而闻名，也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

[123] 苏珊·内克尔（Suzanne Necker，1737-1794），法国-瑞士沙龙女主人和作家。她主持了旧制度时期最著名的沙龙之一，还领导了法国临终关怀医院的建设。

[124]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法王路易十六的财务总监和银行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其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125] 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一生涉猎很多领域，在数学、力学、天文学、哲学、音乐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有很多建树。著有八卷本巨著《数学手册》、力学专著《动力学》、二十三卷本《文集》，还为《百科全书》撰写了序言。

[126] 阿贝尔·埃尔芒（Abel Hermant，1862-1950），法国小说家、编剧、散文家和作家，也是法国学术院的成员。他的第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拉博森先生》（*Monsieur Rabosson*，1884）便奠定了他作为讽刺性社会观察者的声誉。

[127] Abel Hermant，*Le Faubourg*（Paris：Paul Ollendorff，1900 [1899]），32. 据PM说，MP记录艾默里·德·拉罗什富科伯爵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他们在公元1000年时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PM，*Journal d'un attaché d'ambassade*（Paris：Gallimard/NRF，1963），194. Painter以稍有不同的方式引用了这句话，但也同样把它归功于"座次"："他们在公元1000年时还是无名之辈。"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53.

[128] Boniface de Castellane，*Vingt ans de Paris*（Paris：Fayard，1925），105；and Marie-Thérèse Guichard，*Les Égéries de la IIIe République*（Paris：Payot，1991），114-15. 在EG的文学作品全集存档的数百份没有装订的样张中，她以消极反抗的姿态讽刺了两位贵族女人，贬损了她们在即将到来的慈善晚宴上的捐助；见EG，in AP（II）/101/150。

[129] 署期为1881年1月8日的EG致MCC的信件，见AP（II）/101/40；以及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52。

[130] 1912年10月14日EG致HG的信，见AP（I）/101/22。

[131] EG，婚姻日志，1878年11月10日的日记；关于EG为美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见LG，*Mémoires*，vol. 2，22。

[132] EG，in AP（II）/101/150.

[133] Louise d'Arenberg，marquise de Vogüé，*Logis d'autrefois*（Paris：n.p.），n.p. 注：这份打字手稿中的某些部分有编号，其他部分则没有，因此我从中引用的文字中偶尔会缺失页码。

[134] EG，AP（II）/101/151.

[135] EG，婚姻日志，1878年12月12日的日记。

[136] EG，婚姻日志，1878年12月15日的日记。

[137] EG，婚姻日志，1878年11月16日的日记。

[138] EG，婚姻日志，1878年10月7日的日记。

[139] EG，婚姻日志，1878年10月26日的日记。

[140] EG，婚姻日志，1878年10月26日的日记。。

[141] 1882年11月18日EG致MCC的信件，见AP（II）/101/40。

[142] 引文见RM，*La Divine Comtesse*（Paris：Manzi，Joyant，1913），205。

[143] 德·奥松维尔的无题十四行诗，后来由EG的一位秘书重新打字，以“Hommages et appréciations”为标签存入了AP（II）/101/1。

[144] 让-安东尼·乌敦（Jean-Antoine Houdon，1741-1828），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雕塑家。1771年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院士，1778年被任命为教授。由于路易十六的赞赏，他和宫廷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但侥幸逃过牢狱之灾，后来在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又重新走红。

[145] EG致GCC，见AP（II）/101/50。关于EG收购这座半身像的过程，见EdG，日志，1891年7月7日的日记；以及本书附录三全文摘录的，Dominique（MP的笔名）：《格雷弗耶伯爵夫人的沙龙》。

[146] 关于EG重返巴黎，见EG，婚姻日志，1878年12月25日的日记。

第3章 阴影王国

格雷弗耶夫妇回到巴黎之后一个月，另一对错配的贵族夫妻也走向了婚姻殿堂：19岁的洛尔·德·萨德和31岁的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和比她小一岁的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一样，洛尔·德·舍维涅也没有感受到多少婚姻的乐趣，不久以后，她也会在社交界寻找慰藉和意义。同样和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一样，洛尔·德·舍维涅也是间隔了一段过渡期之后，才从少女新娘变成名媛的。伊丽莎白是在布德朗森林度过了一个季节之后才开始征服城区，而洛尔则先是在一个被她称为“阴影王国”[1]的地方久久迂回，之后才迎来了自己的胜利。

洛尔·德·萨德是奥古斯特·德·萨德伯爵两个孩子中的次女，1859年出生于巴黎西郊外一个宁谧的河边小镇帕西（Passy）。遵循家族中长达500年的传统，她也是以祖先于格·德·萨德伯爵夫人洛尔·德·诺韦斯（1310—1348）的名字命名的。在死于黑死病前，洛尔·德·诺韦斯以“美丽的洛尔”［意大利语写作“Laura”（劳拉）］之名得到了永恒：彼特拉克在1327年耶稣受难日那天在阿维尼翁的教堂里瞥见了她的身影，一见倾心，那以后，彼特拉克便献身于诗歌写作，在诗篇中倾诉对这位已婚伯爵夫人的禁忌之爱。

他的十四行组诗，特别是《歌集》，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抒情诗奠定了基础，这一成就使得给他以灵感的女人在文学史上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五百多年后，“美丽的洛尔”的后代仍然为她无意间获得的盛名而自豪，每一代至少有一个女孩子要以她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当奥古斯特·德·萨德为他们的女儿取名洛尔时，他们根本无法预料到，有一天她也会无意间成为天才的缪斯，获得永恒的声名。

洛尔的父亲就是在她那位同名祖先的影子里长大的，他的家族府邸

孔戴城堡里处处装饰着彼特拉克和洛尔·德·诺韦斯的肖像挂饰。这座筑有塔楼的庄园是德·萨德家族财富的主要部分，奥古斯特1819年在那里出生时，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年，他那样的贵族家族的财富和特权已被大大削弱。然而长子继承权的传统仍然维持着，因此作为家里五个孩子中的幼子，奥古斯特没有资格继承家族的城堡。他何时乃至为何选择安家帕西不得而知，或许是出于某种健康原因，那个村庄里的温泉很吸引健康状况不佳之人，他们认为温泉疗养能够治愈他们的疾病。

奥古斯特·德·萨德伯爵没有什么正式的职业，这在他那个时代的贵族中不算罕见。他出身持剑贵族（自封建时代以来，这个古老的世袭贵族阶层一直是法国军队的主力），本来应该成为旧制度下的一名军官。[2]德·萨德的祖先源于普罗旺斯地区的阿维尼翁城，起初是商人，该家族的第一位于格·德·萨德（后来还有许多同名者）在1249年跟随路易九世（后来人称“圣路易”）向埃及发动圣战后，获封了贵族头衔。虽然这场远征以法国军队的失败和法王被监禁而结束，但德·萨德的参与仍使他们的家徽（红色背景上的一颗八角黄星，正中是双头黑鹰）出现在了凡尔赛宫的十字军东征大厅（这个圣殿由五间房屋组成，用于纪念法国古老的武士阶层）和阿维尼翁著名的桥梁上。[3]

自那以后，德·萨德家族的每一代人都会坚守为王室征战的传统，充满自豪地把男孩们变成军官，把女儿们变成洛尔。然而奥古斯特遵循这条职业道路的机会却被1830年所谓的七月革命[4]阻断了，极端保守的波旁王朝君主查理十世被推翻，他较为开明的奥尔良表亲，自称“资产阶级国王”的路易-菲利普取而代之。某些贵族家庭集结在这位新君主的周围，但也有许多贵族不屑于此，其中就包括德·萨德家族。

总的来说，被推翻的波旁王朝的那群支持者比奥尔良派更传统，自称“正统王朝拥护派”。他们傲慢地拒绝为自己不认可其权威的统治者服务，同样的态度也延伸到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2）和第二帝国

（1852—1870）政府。这一系列“非正统”政权在时间上横跨奥古斯特·德·萨德的整个成年时代；对他来说，回避法国武装部队是关乎政治原则的大事。

不过，他的政治观点并不妨碍他在1844年娶热尔梅娜·德·莫雄（Germaine de Maussion）为妻，虽然她的父亲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刚刚从拿破仑一世那里受封准男爵的爵位。（历史更悠久的持剑贵族的后代往往看不起帝国贵族，也就是拿破仑一世分封的阶层。到19世纪中后期，这种偏见越来越弱。）这对夫妇在婚后第三年，也就是1847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瓦伦丁。12年后，洛尔才出生，那时父母都已经40多岁了，她大概是父母偶然得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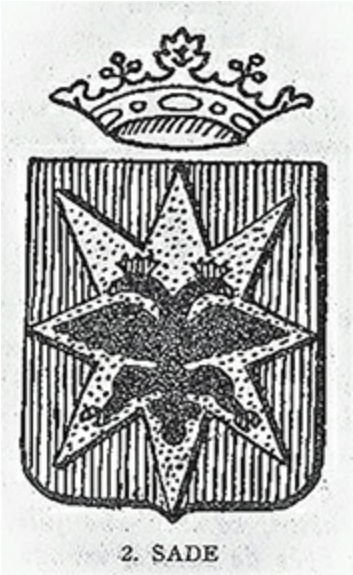
她成长期间，家人一直住在帕西的马罗尼埃街（rue des Marronniers）9号那座平凡无奇的红砖公寓楼里，如今那里已经成了一个口腔医学院。成年后，洛尔回忆起那条街，说那是个“冬天下午四点后，你就会想割喉的地方”。[5]然而就此而言（许多其他事情也一样），她所说的倒是符合事实：马罗尼埃街是条安静的郊区小街。不过与巴黎那些繁华的街道相比，它确实有一种荒凉感，特别是在冬天，太阳落山很早，这条街得名的那些板栗树（marronniers是“板栗”之意）也都光秃秃的。



德·萨德家族的府邸孔戴城堡，洛尔后来成为孤儿后，有时会在那里住一阵子

孩童时期的洛尔就对光之城[6]充满了向往。父母在她四岁时第一次带她去那里，参加17岁的姐姐瓦伦丁与年轻的海军上尉彼埃尔·洛朗斯·德·瓦鲁（Pierre Laurens de Waru）男爵的婚礼。[7]婚礼在右岸的第九区举行，那是年轻夫妇准备定居的一个中产阶级街区。从古板的帕西来到这里，第九区的热闹让洛尔大开眼界——从奥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两旁那些平板玻璃门的百货商店，到铺着鹅卵石的殉道者路（rue des Martyrs）上的农产品摊位，从里薛路（rue Richer）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女神游乐厅（Folies-Bergère），到皮加勒广场（place Pigalle）上那些下流的舞厅和妓院。

虽不如圣日耳曼区和圣奥诺雷区那么富丽堂皇，瓦伦丁定居的新街区还是让年幼的妹妹对其他名流鄙视的那一带城区心驰神往。洛尔也喜欢贵族城区。她央求父母只要有空就让她去拜访瓦鲁夫妇，整日幻想着住在那里。据她的好友莉莉·德·格拉蒙说，洛尔“对她心爱的巴黎太着迷了，根本没想过要离家前往更远的远方”。[8]



洛尔喜欢提醒同代人，她的家徽装饰着德·萨德祖先所在地、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那座著名的桥梁

然而当家庭悲剧发生时，她却不得不去向远方。1868年5月，离洛尔九岁生日还有三周，父亲去世了。母亲在八年后也撒手人寰。热尔梅娜去世时，洛尔太小，无法独自住在马罗尼埃街，但是要搬去和瓦伦丁与皮埃尔一起住在巴黎，她的年纪又太大了，那对夫妇自己也养育着几个年幼的孩子。

照顾洛尔的责任落在了一个由姨妈姑妈、叔叔舅舅和成年表亲组成的松散网络身上，他们在自己的外省庄园里轮流照顾她。德·萨德家族这边，有布里（Brie）的孔戴城堡，普罗旺斯的马赞庄园；在莫雄家族那边，有巴黎以西大约60英里的亚姆维尔城堡。（洛尔最亲近的亲戚、她母亲的姐姐玛罗切蒂男爵夫人卡米耶，与她意大利裔的丈夫居住在伦敦，由于距离太远而无法承担监护人的责任。[9]）不管洛尔此前接受过什么教育（无论是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的授课，还是前往当地修道院上学），她被亲戚们从一个城堡带到另一个城堡，课业也就半途而废了。

洛尔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安排并非永久性的；监护人们的打算是只要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就把她嫁出去。（因为当时的法国民法认为女人终身都是未成年状态，应该直接从父亲手中转交给丈夫控制，因此实质上，洛尔的亲戚们一直在为她寻找一个新的监护人。）然而说成一桩亲事着实不易，虽然她漂亮活泼，出身良好，对她那个阶层的男性来说，洛尔却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很有吸引力的结婚对象。

问题之一就是洛尔的嫁妆。虽然她的嫁妆不像伊丽莎白·德·卡拉曼-希迈那样可怜，却因无法变现而令人踟蹰不前，主要包括阿尔勒（Arles）附近的一个名为卡巴纳酒庄（domaine de Cabannes）的农场，那里的主要住所是个粗糙破旧的石头农舍，按洛尔的说法，那里简直四面透风。那座庄园原本是个葡萄园，因为几个世代疏于照管，已经没什么收成了。作为洛尔嫁妆的主要部分，卡巴纳酒庄实在没什么吸引力。[10]

瓦伦丁在进入婚姻市场时，除了姓氏之外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资产，但彼埃尔·德·瓦鲁足够富有，完全能养活两人。他的父亲德·瓦鲁男爵阿道夫·洛朗斯（Adolphe Laurens）是法兰西银行的一位顶级银行家，利用自己在法兰西银行的人脉，为彼埃尔在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和国家保险公司董事会谋得了有利可图的职位。[11]因此，彼埃尔无须为钱娶妻。鉴于贵族们对“经商”之人的偏见，像他那样的单身汉倒是法国社会中的异数。也是出于同样的偏见，洛尔的亲戚们给她参谋的结婚对象多半也需要找到有钱的配偶。随着贵族阶层越来越穷，洛尔寻找丈夫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

她的姓氏更是雪上加霜。家族人脉对法国贵族来说至关重要，从通告（faire-part）等习俗就可见一斑。家族中如有成员结婚或死亡，就会以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孙辈、重孙辈、侄子外甥、侄女外甥女、侄孙甥孙、侄孙女甥孙女、姑妈姨妈、姑婆姨婆、叔伯舅舅、叔祖舅爷和表亲等全体成员的名义，发放一个铜版印刷的通告，只要他们与结婚或死亡之人有一点关系，不管是血亲还是姻亲。这类做法使德·萨德小姐和她的丈夫永远也摆脱不了她的娘家姓氏。虽然“彼特拉克的缪斯”给这个姓氏蒙上了光环，但它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内涵，全要拜洛尔的另一位家喻户晓的祖先所赐，那就是她的父系曾祖父，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侯爵（1740—1814）。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生”者并非什么道德典范；亨利·格雷弗耶与德·奥松维尔夫人的情事就表明，奸淫苟且在那个阶层十分泛滥。然而尽管如此，法国贵族男女一直并且仍然很讲究装门面——这正是唐纳蒂安·德·萨德至死藐视的东西。他用一个又一个丑闻让家族蒙羞，还犯下了一系列罪行，他骄傲地称之为“爱之罪”。这些包括绑架并折磨一个乞丐；鞭打几个妓女并给她们下毒；劫持他妻子的妹妹，一位与世隔绝的修女，然后玷污了她并和她一起私奔到意大利；在自己位于普罗旺斯的城堡狂欢痛饮；将耶稣受难像、圣餐饼和其他宗教用品用作性玩具；

撰写了大量充满可怕暴力和野蛮反教权的色情小说。

唐纳蒂安认为，他藐视权威的行为与他家徽上的口号——在萨德看来（Opinione de Sado）[12]——是一致的。虽然该座右铭所传递的权利意识很难说与唐纳蒂安的贵族同侪格格不入，但拒绝为自己的出格违法行为裹上哪怕最轻薄的得体的外衣却构成了冒犯。不管他的亲戚和同侪如何指责他让家族和所在的阶级蒙羞，他还是认为自己宁愿“用地狱的色彩包裹（他的）罪行”[13]，也不愿顺从他们空洞虚伪的体面和规矩的观念。“是的，我放荡，”他写道，

> 傲慢、残忍、喜欢诉诸极端的想象，因为有着无与伦比的颠倒的是非之心……一言以蔽之，我就是这样；还有，要么杀了我，要么接受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14]

让整个家族震惊的是，这样的态度屡次让唐纳蒂安作奸犯科，也让他一生总共有28年的时间身陷囹圄。至今，他仍然是法国历史上一项纪录的保持者，那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服刑历经了最多的政权，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到第一共和国、督政府[15]、执政府[16]，直到拿破仑一世的帝国。他于1814年死于沙朗东（Charenton），一座监禁疯子罪犯的疯人院。

自那以后，关于这位无法无天的侯爵的传说[17]便渗透到法国文化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后来数代文学叛逆者对他的崇拜，在19世纪的巴黎作家中，他最主要的拥护者包括夏尔·波德莱尔[18]和居伊·德·莫泊桑[19]。20世纪初，德·萨德对色情残忍的关注又让他成为评判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20]的试金石，后者讽刺地称他为“神圣侯爵”。[21]与此同时，世纪末新兴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等学科发明了“施虐狂”一词，将唐纳蒂安的癖性载入语言、科学和哲学经典。[22]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他曾孙女的姓氏成为“变态”的同义词，把未来的新郎们吓得不敢近前。

最后，洛尔有两年时间都在等待亲戚们找人来接管她。在那段居无定所的时期，她频繁往来于孔戴、马赞和亚姆维尔，基本上被三个地方疏于看管，知道如果没有丈夫，她将注定余生都是家族慈善的对象：那时她将不再只是暂时待字闺中（jeune fille à marier），缺衣少食，而会变成一个永远寄人篱下的老处女（*vieille fille*）。然而她的一位朋友记述，那段时间洛尔始终是“武士灵魂的化身”[23]，拥有太多“勇气、头脑和精力”[24]，绝不顾影自怜，独自垂泪。

为了对抗那种相对的孤立状态，洛尔跟着莫雄家那些喜好运动的表亲们学会了像男人一样出色地骑马和射击，与那些为她打猎提供方便的猎场看守人、猎人、驯兽师和马倌等劳动者建立了深厚感情。从这些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外省人身上，她学会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村话和乡音，使她说话时有种不合时宜的乡野风情。[25]她还学会了下层阶级不加区别对谁都称“你”的称呼习惯——不管对方的年纪和社会地位如何——喜欢用最短的词，特别是用“ça”而不是“cela”来表示“那个”。[26]她最喜欢的一个谈话招数是说出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或做出一个古怪的断语，然后耸耸肩说：“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嘛（Tout le monde connaît ça；tout le monde sait ça）。”[27]这句结束语的最后一个字在世纪末的人们听来，有种用“否也”来代替“不是”的俚语腔调，突出了前面谈话的惊奇或震惊效果。作为语言上跨越雷池的必然结果，洛尔也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常常躲在谷仓后面和她的大老粗伙计们吞云吐雾。

洛尔的头脑和四肢一样发达，不过她注意不过多地谈论自己的读书兴趣；她意识到在她所处的那个阶层，才女没有多少吸引力。[28]在她家族各个城堡的图书室里，她每周都能速读完好几本书，至死都保持着这个习惯。在孔戴的收藏中浏览一番之后，她发现自己的叔公路易-马里·德·萨德（Louis-Marie de Sade）关于历史和神话的著述颇丰——却没有他父亲“神圣侯爵”那么尽人皆知。[29]他的著作很吸引她，因为他把这两个主题合而为一了。在他的《法兰西民族的历史：第一种族》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tion*：*The First Race*，1805）中，路易-马里将这样的神话断言为事实：在如今被称为法国的这片领土被罗马人（他们称它为高卢）占领之前，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是冥府和死亡之神普鲁托[30]，后者繁殖了优越的人种。[31]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对洛尔关于法国君主制，以及后来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关于整个法兰西“种族”的观念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位亲戚舍瓦利耶·路易·德·萨德（Chevalier Louis de Sade）的政治专著也影响了她的观点。在法国革命期间，这位勇士[32]移民英格兰，在那里发表了大量关于革命意识形态和共和政府之危害的宣传册。他于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回到法国，对波旁王朝统治的拥护一直持续到它于15年后被推翻。在他的《政治辞典》（*Political Lexicon*，1831）中，这位勇士煽动性地呼吁法国“真正的保王派，那些珍视和尊敬君主制和正统领袖，（并深深）依赖王室的权力和君主制度稳定的人”团结起来。[33]虽说这一呐喊并没有给被废黜的波旁王朝带来多少帮助，却很好地总结了洛尔本人的政治观点。

她继续沉浸在家族故事中，自学了德·萨德祖先所在地的方言普罗旺斯语，还阅读了大量彼特拉克所著和关于他的著作。她得知自己从“美丽的洛尔”那里继承的教名成为彼特拉克的灵感，启迪后者写了好几个以“金色”（*l’oro*）和“月桂”（*l’alloro*）等同韵字为主题的重复段落。她从这一发现中获得启发，养成了另一个持续一生的习惯，用一片月桂叶作为信件结尾的签名。

出于对自己的同名祖辈的好奇，她阅读了一部关于彼特拉克及其缪斯的双人传记，作者是她的高祖辈德·萨德神父，该书写于1764年。虽然位居神职，但这位神父几乎和他最喜欢的侄子唐纳蒂安一样放荡不羁，他关于彼特拉克和洛尔的研究充斥着污言秽语，揭穿了诗人对洛尔的所谓柏拉图之恋的谎言。例如，“彼特拉克把玩（洛尔）就像药店里

的老鼠把玩那里的药丸，伸舌头去舔那些装着药丸的瓶子”。[34]倘若洛尔的监护人们知道她居然在读这类东西，想必会阻止她，因为在那个阶层，就算已婚妇女阅读这类有伤风化的文字也属出格。但他们对洛尔不闻不问，因而助长了她对这种禁忌话题的兴趣，在马倌同伴的指导下，她甚至敢于直呼那个禁忌的名词：肏*。

关于这个话题，她的曾祖父唐纳蒂安可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洛尔在阅读他的小说时，陶醉于其中的淫秽低俗和残暴的黑色幽默。德·萨德的作品共有数千页，为虐待、强奸、鸡奸、娈童、乱伦、兽奸、食粪癖、食人和杀人的乐趣大呼过瘾。它称卖淫是女人最崇高的使命，女德则是有违人性的罪行。它贬斥上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野蛮人”，圣母玛利亚是个“犹太娼妓”，耶稣基督则是“无知、羸弱而愚蠢的江湖骗子”“就该被当作最下流的无赖之王”。在这个虚构的宇宙中，恶贯满盈的人总能飞黄腾达，而德行兼备者总是遭到殴打（或被暴揍一顿，或被殴打致死）。修道院是疯狂肛交的温床，而护城河环绕的宫殿则是屠杀人类的屠宰场，没人能听到被杀者的尖叫。

阅读这样的文字大概为洛尔对恶行的定义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阈值，也让她变得大胆，敢于公开发表惊人的观点。在她漫长的社交生涯中，只要洛尔听到有人中伤她的曾祖父，她就会耸耸肩，说他的作品既不淫荡也不污秽，只是“无趣”而已。“再说，”她还会不动声色地说，“他确实是个很不错的丈夫。”洛尔非常清楚，唐纳蒂安对待他那位虔诚而坚忍的妻子的方式绝对无法证实这样的结论。他在欢场和妓院里挥霍了她的嫁妆，和她的妹妹（修道院的修女）私奔了，他无尽的刑期更是把她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就连在监狱里他也没有忘记折磨她，强迫她定期花钱购买定制的假阳具，补充他巨大的收藏。若想知道这场婚姻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只需看看革命的法国刚刚宣布离婚合法化，她就不顾宗教禁忌，利用新法律与丈夫断绝关系。洛尔只是因为刚愎自用，才在这个话题上反驳传统观念。毕竟，“在萨德看来”也是她的家族座右铭，而在

洛尔看来，她有权按照自己的观点重新定义道德，或者重写历史。

和她那位曾祖父一样，对洛尔而言，重新定义的一部分就是对限制级语言的喜好。唐纳蒂安几乎在每一页文学作品中都毫不掩饰这一喜好，还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编造了这一段格言，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喜爱：

> 说些淫词秽语，（而且）毫不吝于使用这类词汇；目的就是尽可能造出最大的丑闻，因为丑闻缠身的感觉太美妙了。[35]

同样，鉴于洛尔的阶级、年龄和性别，如此为丑闻正名简直不可思议。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在她所处的那个社会，“有些词语是体面的女人到死都不能说出口的”。这套词汇的范围很全面，从下流的诨号到最平实的人类解剖学和生物学术语。但洛尔对它们甘之如饴。在她看来，哪怕最无聊的乡间夜晚，也能因为晚餐谈话中插进一两句下流话而变得生动起来。

洛尔利用自己在乡下的日子提高了好几个特殊技能——轻松的运动气质、模仿粗人的土话、反叛精神——正是这些，让她后来在巴黎受到众人的倾慕。甚至可以说彼时的她正在为这一角色做准备呢。用她的好友比贝斯科亲王夫人玛尔特的话说，洛尔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巴黎很有趣，其他地方都很乏味。但你必须明白如何忍受无聊，因为没有炼狱的天堂是无法想象的……除非你是圣人。”[36]洛尔和亲戚们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没有为超凡入圣做分毫修炼，反而越来越狂野放肆。他们真恨不得马上就把她打发走。

1878年，他们总算成功了。她的堂姐德·兰古男爵夫人洛尔（Laure，Baronne de Raincourt，娘家姓也是德·萨德）向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提到了她。当时，这位30岁的单身汉和兰古夫妇一起，担任法

国王室家族嫡系的最后一个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亨利·德·阿图瓦（Henri d’Artois）的侍从。自从1830年政变终结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尚博尔和他手下那群坚定的正统王朝拥护者就把根据地设在了奥地利的弗罗斯多夫（Frohsdorf）城堡。这个微型宫廷的主要人物就是尚博尔，被称为“爵爷”，也被追随者们拥戴为“国王亨利五世”；他的王后玛丽-泰蕾兹·德·莫德内（Marie-thérèse de Modène）被称为“夫人”，是个年老耳聋、爱发牢骚的哈布斯堡王朝公主；宫廷里还有十几个杂役，每天的工作包括给爵爷系鞋带和领带（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学会自己做这两件事）以及为他口述的通信做笔录。最后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阿代奥姆·德·舍维涅肩上，他是国王的两个私人秘书之一。[37]

弗罗斯多夫是个庄重而极其保守的地方，它守卫着一些古老的法国价值观，诸如君权神授和天主教信仰神圣不可侵犯。王室夫妇虔诚地信仰天主教——认为禁欲后的婚姻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神圣境界——让他们那些未婚侍从们也承受很大的结婚压力。作为尚博尔夫妇小圈子的一员，舍维涅需要的新娘当来自一个同情正统王室又长期拥护君主主义的贵族家庭。德·萨德家族500年忠于王室的历史是洛尔的优势所在，与之相比，“神圣侯爵”的那些小过失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作为持剑贵族的象征，深受正统王朝拥护者重视的为王室服务的传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王室的武装部队服役，二是在宫廷和国王的外交使团中服务。舍维涅来弗罗斯多夫城堡之前参加过普法战争，也就是说他一人完成了这两项使命。他的父系和母系两边的祖辈都曾在军队和宫廷中建功立业，从1220年代路易九世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38]摄政时期，到六个世纪后的路易十八统治时代。舍维涅的哥哥奥利维耶曾先于他在弗罗斯多夫城堡担任爵爷的侍从，如今则在巴黎领导着一群顽固的正统王朝拥护者，每年亨利五世的生日宴会和路易十六被处决纪念日的宴会都由他组织。

德·萨德家族则是典型的封建军阀，严守在自己坚固的外省城堡中，在君主需要时为王室出征。但18世纪中期，唐纳蒂安·德·萨德的父亲让-巴蒂斯特（约1701—1767）却离开出生地普罗旺斯前往凡尔赛，希望能用自己英俊的相貌、风趣的才思和权谋手段在路易十五（1710—1774）的宫廷里谋得高位。让-巴蒂斯特凭借着这些特质和与双性伴侣奸淫放荡的口味，很快就得到了整日沉迷于酒色声乐的国王的宠爱。据说让-巴蒂斯特成了国王陛下的皮条客，大概也是他的情人之一。路易十五为表示对此人的赞赏，提名让-巴蒂斯特担任一系列大使的美差。

1733年，路易十五恩准让-巴蒂斯特娶了德·孔戴亲王夫人的一个女侍官。（让-巴蒂斯特和亲王夫人本人也有过一段如胶似漆的情事，他的婚姻方便地掩护了这段婚外情。）这一结合将使德·萨德家族的声望达到顶峰：与君主本人的亲戚结成了姻亲。

让-巴蒂斯特及其家族在巴黎那座富丽堂皇的孔戴府邸得到了一处住所，他们的长子唐纳蒂安就出生在那里，和孔戴家的长子一起长大，无人注意时，唐纳蒂安还喜欢把孔戴家的那位长子痛打一顿。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时，唐纳蒂安参军服役，算是为自己好战的天性找到了一个发泄口，但就连战争也无法满足他对暴力的渴望。[39]战后不久，他就因绑架和折磨一个女乞丐而被捕了，后者对当局说，他蒙住她的眼睛，用一把小刀毁伤她的肉体，在伤口上泼洒灼热的烛蜡，并强迫她亵渎十字架。路易十五私下里帮了让-巴蒂斯特一把，出面让当局释放了这个年轻人。但唐纳蒂安继续无耻地违法犯罪，不久就被同一个国王下令关回了监狱。

法国革命为唐纳蒂安的人生开启了一个新篇章。因为天生叛逆，他标榜自己认同和支持平民为自由而战。在1789年7月14日一伙暴民攻占巴士底狱之前几天，他碰巧又入狱了。后来他声称是自己透过监狱墙上的一道缝隙对群众高喊，煽动他们发起了暴动。起初，这个故事让他在

平民伙伴中赢得了好感。但在君主制1792年被推翻、次年1月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后，政治环境对贵族日益危险。新的共和国剥夺了他们的头衔和特权，在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在全国范围内清洗国家公敌嫌疑人的恐怖统治时期，他们更是遭到了围捕。

1794年3月，唐纳蒂安以反革命罪名被捕，又一次遭到监禁，等待着革命法庭的审判。这类审判本身就是对公正的蔑视，几乎每一位被审判者都会走向断头台。但罗伯斯庇尔及其党羽逮捕的人数过多，法庭跟不上他们的速度。唐纳蒂安后来总是说，他在等待审判日期间所在的皮克毕（Picpus）监狱是他见过的最恐怖的人间地狱；从那里可以看到断头台罹难者的集体坟冢，据他说，他和狱友们被迫“在35天里埋葬了1800具（无头尸体），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从我们这个倒霉的监狱里拉出去被处决的”。[40]他本人能逃过死劫，完全是因为罗伯斯庇尔政权在唐纳蒂安原定的审判日之前几周被推翻了。

正是在皮克毕监狱里受苦的经历挽救了德·萨德侯爵在舍维涅这类人心目中的形象。对很多世纪末贵族来说，祖先在恐怖统治时期受到过迫害变成了一枚荣誉勋章，再次证明他们与“无生”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信念引发了一个话题：攀比自己有多少祖先死于断头台。在小说《平等》中，比贝斯科亲王夫人讽刺了这种革命受害者情结，指出在皮克毕掩埋的无头尸体中，贵族出身的还不到一半。

在舍维涅所在的那种君主主义圈子里，提及“殉难的”祖辈突出了一种隐含的对君主的政治效忠，一俟将亨利五世推上王位的政变启动，就会再次需要这样的忠诚。舍维涅在评估是否应娶洛尔为妻时，大概把她曾祖父在恐怖统治时期所受的煎熬看成一项不错的家族荣誉了。事实上，舍维涅自己的一位祖先也曾被关入皮克毕监狱，也多亏了罗伯斯庇尔倒台才没有被送上断头台。

德·萨德家族宣誓效忠王室一定也让舍维涅忽视了洛尔家谱中其他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也就是贵族与较低阶层的通婚。洛尔尽量不提此事，但她母亲一方的出身是新教徒商人特勒森家族，他们在17世纪末期为躲避宗教迫害而逃离法国，在日内瓦创立了一家银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洛尔的母系高祖乔治-托比·特勒森（Georges-Tobie Thellusson）又把自己那一支族亲迁回法国，在那里购买了一座宅子，还附带准男爵爵位。通过慷慨地为王室金库捐款，他获得了国王的许可，使用贵族小品词“德”，并在巴黎的玛莱区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来庆祝自己社会地位的提升，那座宅邸前还有一个30英尺高的凯旋拱门。

如此说来，特勒森家族和格雷弗耶家族采取了相同的策略，都是新教徒银行家通过与历史更悠久但需要为家徽重新镀金的持剑贵族通婚而获得了贵族地位。然而革命之后，特勒森家族财运渐衰，但格雷弗耶家族却风兴云蒸，这种分化也反映在他们的婚姻上。亨利·格雷弗耶的父亲娶了拥有公爵爵位的拉罗什富科姓氏的女子，而洛尔的母亲却不得不嫁给一个外省乡绅的不名一文的儿子，还拖带着一个颇有争议的姓氏，洛尔的姨妈卡米耶则只好嫁给一位意大利雕塑家玛罗切蒂男爵，他获得爵位的历史短得可怜。



特勒森家族出身新教徒商人，在**18**世纪末买了一个准男爵爵位，建造了这座庄严宏伟的巴黎宅邸，后来他们的财富日渐缩水

权衡这些利弊之后，舍维涅在1878—1879年冬天的某个日子向洛尔求婚了。他大概是派代表上门提亲的，因为似乎没有记录表明他曾在婚礼前离开奥地利前往法国。舍维涅的求婚有利有弊。舍维涅是布列塔尼古老的贵族姓氏之一，洛尔能嫁给这样的姓氏自然是脸上有光，婚后就能获得伯爵夫人的头衔。出身卡拉曼-希迈等外国亲王家族的女孩子一出生就能获得爵位，与之相反，法国贵族的女儿们一般只有在结婚后才能获得这类敬称。而洛尔坚信奥托·冯·俾斯麦的格言“生命始于男爵”，当然希望自己至少像母亲和那么多女性先辈一样获得爵位。她的一位孙女后来说过，洛尔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嫁给了一位伯爵而不是公爵。

只有舍维涅家族的男性才有的阿代奥姆这个怪异的名字，会令人愉快地回想起封建时代：它从“*heaume*”这个词派生而来，意为骑士帽盔上的凹槽。[41]既然洛尔以出身持剑贵族为荣，舍维涅的贵族社会地位算是个好消息。他受雇于弗罗斯多夫城堡也一样，据洛尔的兰古表亲们说，他是亨利五世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一旦有正统君主主义政变发生，舍维涅一定会位列王国中最有权力的人。（事实上，近年来另一个波旁王朝复辟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了，至于原因，洛尔不久就会明白。）

舍维涅的地位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他和国王的其他侍从一样，工作都是不拿薪水的。他有几个同事靠变卖在国内继承的局部土地权来养活自己。其中一位，亨利·格雷弗耶的一个很远的亲戚，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位于塞纳-马恩地区的一处地产，即盖尔芒特城堡。[42]

舍维涅本人没有资产可以变现。19世纪初，他的伯祖、当时阿代奥姆这一支的族长德·舍维涅侯爵阿瑟，因为一项不明智的地产交易而破产了。阿瑟的弟弟路易——也就是阿代奥姆的祖父——克服重重困难才总算保住了家族的老宅，即位于法国西海岸的大西洋卢瓦尔省的圣托马斯城堡。他去世时，城堡由他的长子、另一位路易·德·舍维涅伯爵继承，也就是阿代奥姆的父亲。但庄园的农业无法产出足够的收入养活这位路易的满堂儿孙：1854年路易去世时，留下了四个儿子，阿代奥姆排行最末，三个哥哥都已经结婚了，一共生了九个孩子。此外，圣托马斯属于路易的长孙奥古斯丁，后者在他的父亲、阿代奥姆的大哥阿瑟1869年去世后继承了庄园。因此，当时家族的财富已经没有多少了，阿代奥姆分得的财产更是少之又少，他用那点收入勉强维持着王室的工作。

这样的经济窘况带来了一个社交困境。在巴黎，舍维涅家族的富有和高贵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些富人跟阿代奥姆的关系可没那么亲近。大约60年前，来自该家族另一支系的一位路易·德·舍维涅曾经娶了（“无生”阶层的）凯歌香槟[43]女继承人。这次婚姻带来了巨额的现金财富，

这对夫妇的子嗣因而与法国贵族最古老、最显赫的氏族联姻：莫特马尔家族和德·于扎伊家族。作为这些舍维涅族人的远亲，阿代奥姆称自己是他们的亲戚自是合法合理，但他在他们眼中却只是个不值一提的穷亲戚。由此可推论，他的妻子在他们眼中也没什么地位——除非她能想办法改变这一切。

考虑到这一切，大多数有适婚女儿的贵族家庭都不会欣然接受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的求婚，但洛尔的监护人们可没心思挑三拣四。他们急于敲定这门亲事，让洛尔以为他或许是她能接受的最好的求婚对象，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最终为她确定这桩亲事的条件是，舍维涅在圣奥诺雷城区的柯里塞街（rue du Colisée）1号租下了一个很小的住处，供夫妇俩离开尚博尔的宫廷休假之用。[44]

1879年2月6日，19岁的洛尔·德·萨德小姐和31岁的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在巴黎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婚礼弥撒上宣誓对彼此永远忠诚。据朋友们回忆，那天跪在圣坛前的少妇是个娇小玲珑的金发女郎，“髋部苗条、双肩宽阔、脖颈纤细”。她那双低垂的蓝色大眼睛冷若冰霜，但时不时会闪出狡黠的光芒。跪在她身旁的男人身材瘦长，一双棕色眼睛的瞳距很小，唇上有浓密的棕色胡须，渐秃的头顶边缘还竖立着两簇深棕色的头发。舍维涅那张瘦骨嶙峋的“短斧脸”[45]（套用一位熟人的话）总是涨红着，仿佛永远为自己难看的高个子感到抱歉，又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不管他们最初对彼此的印象如何，新娘和新郎明知与对方缔结了终身的婚约，还是会心怀芥蒂。在1879年的法国，离婚还是非法的。



洛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她的淡黄色头发、眼皮松弛的蓝眼睛和高高的鹰钩鼻给了她一种优雅高贵的气质

阿代奥姆·德·舍维涅夫妇在巴黎城区还没有足够高的地位，因而最杰出的名人新闻日报《高卢人报》只用一行字报道了他们的婚礼，要知道这家日报往往会用几段甚至几页篇幅来报道更有名的姓氏之间的通婚。（该报用三篇头版文章来报道格雷弗耶/卡拉曼-希迈的婚礼。）但有一家开办不久也不大有名的社交界小报，《特里布莱报》（*Le Triboulet*），却刊登了一篇较长篇幅的公告，可想而知，它突出了新郎在弗罗斯多夫的地位，并列出了参加婚礼的其他尚博尔拥护者的名字，进而强调他们拥护正统王朝的立场。[46]其他文字更为笼统地讲述了新婚夫妇的家世，例如舍维涅曾在普法战争中服役，以及婚礼的地点鲁莱圣斐理伯教堂（église Saint-philippe du Roule），是右岸最世俗化的教堂之一。

不过，《特里布莱报》上的文章有一个古怪之处，那就是它把新娘的姓氏写成了“巴德”（“巴登”的法语拼法，就是德国温泉小镇巴登-巴登所在的那个地区）而不是“萨德”。这个错误把她和巴登的大公们联系了起来，那是一群极其富有的条顿[47]显贵，或许是因为新郎在奥地利工

作，他们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又或许它反映出人们对新娘那个不体面的姓氏持有偏见。[48]“在（德·舍维涅夫人）生活的那个世界，”后来与洛尔结成好友的银行家继承人安德烈·热尔曼（André Germain）写道，“生于德·萨德之家可不是件令人欣喜若狂的事儿。”[49]

如此意外地被提升了头衔可能会令人感到荣幸，但洛尔却不允许它存在。接下来那一周，《特里布莱报》刊登了一则详细的更正启事：

> 本报上一期有一处印刷错误，即阿代奥姆·德·舍维涅先生娶了德·巴德小姐，该姓氏应该写成“德·萨德”。德·萨德小姐的祖上正是彼特拉克诗中所赞美的那位“美丽的洛尔”·德·诺韦斯。阿代奥姆·德·舍维涅先生则来自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有幸得到了尚博尔伯爵爵爷（原文如此）的特别重用。[50]

这则补遗只可能来自洛尔本人。因为参加她婚礼的大部分宾客都来自外省或外国，他们不大可能看到像《特里布莱报》这样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巴黎报纸。鉴于她和丈夫在社交圈尚且没有什么名气，在她最亲近的圈子之外，也不可能有谁会注意到这个错误。舍维涅或许有可能请他们更正，但他厌恶公开宣传，不会关注关于自己婚礼的公告。此外，他也绝不会像《特里布莱报》的更正启事那样，称自己的雇主为“尚博尔伯爵爵爷”。按照礼仪，波旁王朝觊觎者要么被称为“尚博尔伯爵先生”，要么被称为“爵爷”，干脆利落[51]（《特里布莱报》的作者第一次倒是没有弄错这个细节）。错误叫法表明，刊登这则启事的人并不熟悉王公贵族称谓的细节——比如洛尔这样的人。

比她的失礼更有趣的，是她提请编辑注意三个要点：她的祖上是彼特拉克的缪斯“美丽的洛尔”，她丈夫的古老血统，以及尚博尔对他的“特别重用”。这些都是她其后50年在巴黎社交圈不断重复的细节，因为她总是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强调，连那些不认识她的人也会用这套话来介绍她了。[52]正如比贝斯科亲王夫人所说，洛尔特别能够“把关于

自己的诗意看法强加在周围人的头脑中，让他们把她重新想象为一个全新的、绝妙的人物，继而把那个人物——可以说是她的替身——投射在公众想象的镜子里”。[53]《特里布莱报》上的更正启事表明，洛尔在婚姻生活之初就开始施展自己的这一天赋了。婚礼后还不到两周，她就已经向世界交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化新版本。

洛尔从未提起或写到过这种重塑自身的努力，更不要说她这么做的动机了。但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一个19岁的孤儿急于把自己近些年的孤独、流离和不安全感抛诸脑后。母亲去世后有两年多，无父无母、无家可归、不名一文的状态把她变成了一个局外人——她的确生活在城堡中，却活得像个需要怜悯的女孩，像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这种凄凉的人设却跟她生活在亲戚家时为自己构想的人格面貌格格不入：文学的后裔洛尔、英勇无畏的女猎人洛尔、风趣幽默的古怪精灵洛尔、世故老练的巴黎人洛尔。婚后，她终于有机会把这些第二自我焊合成一个更加美妙的形象——一个深受诗人、交际家和国王们钟爱的贵妇人，永远摆脱了孤儿的身份。不管身为孤儿遭受了多少屈辱和委屈，她都会被她投射在公众想象之镜里的迷人的第二自我所救赎，起码这一新形象会让人们忘记那一切。

虽然严格来说，洛尔的丈夫是她的老爷和主人，但他对于塑造她的新形象却没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那些后来慢慢了解她的人一致认为，给了她一个新的姓氏、新的头衔、一个宫廷职位和一个巴黎的地址之后，“她可怜的阿代奥姆对她就不再有什么大用了”。[54]这不是说舍维涅没有讨她喜欢的优点。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紧张的特质和病态的外表”下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使得他和新婚妻子之间培养了一定的好感。舍维涅和洛尔一样热爱阅读，只不过他最喜欢的题材（地理学、歌剧和农学）她不感兴趣。他是个天赋异禀的音乐家，但现存的资料没有说明他演奏的是哪种乐器。他的举止风度无可挑剔。就算在最高道德准则是“要有礼貌”的贵族圈子里，舍维涅也是绅士风度的典范，他曾救助过

三个陌生人，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他们的马车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里撞毁了。他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之后，用自己的双马四轮马车把几位伤者送回了家。[55]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内敛的智慧”[56]，让冰雪聪明的洛尔难抑喜爱和欣赏。她喜欢带着社交界人士吹牛时特有的那种低调说，“阿代奥姆可不是个傻子”。[57]

然而，虽然舍维涅有很多优点，但他在一个关键方面却很令人失望：他缺乏在社交界变成举足轻重的人物所必需的野心和才干。到他和洛尔举办婚礼之时，他只加入了一个俱乐部：地理学会。那是个高尚体面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学会，但它不是巴黎社交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在洛尔的积极鼓励下，舍维涅很快就设法入选了骑师俱乐部，这是个更加了不起的功绩，因为他是舍维涅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入选该俱乐部的人。[58]然而让洛尔失望的是，他没有兴趣利用自己的俱乐部会员身份在城区有所建树。

舍维涅置身于上流社交圈之外的部分原因，是他还没有把巴黎当作自己的家，他也无法如此，毕竟在弗罗斯多夫城堡任职，使他每年有八个月的时间不在法国。[59]当然，他之所以远离上层，另一部分原因是那里没完没了的奢侈化装舞会、赛马和慈善晚宴要花大笔金钱，而他不得不精打细算——这是让他年轻的新娘感到不快的另一件事。不过舍维涅在社交界保持低调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喜欢独处，追求宁静平和的生活。相反，洛尔觉得在帕西和外省的那些年获得的平和宁静足够她一生回味了。她决心发现巴黎并让巴黎发现她——不管“她可怜的阿代奥姆”是否在她身边。

洛尔愿意在没有丈夫帮助的情况下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或许还与他们的性生活有关，或者至少与他的性生活有关。在两人举办婚礼之时，舍维涅的亲戚朋友们都知道在定期离开弗罗斯多夫城堡来巴黎期间，他一直跟一位名叫埃米莉·威廉斯（Émilie Williams）的英国中年妓

女有来往，她有个著名的绰号叫“海豹”。[60]更有甚者，他向那些了解内情的人透露，他没打算在婚后与威廉斯断绝关系。这样一桩风流韵事本来不会让巴黎社交界的人大惊小怪，在那里，交际花和已婚或未婚贵族男性有染的事数不胜数。但舍维涅对“海豹”如此投入却让他的同伙们不解，因为她相貌平平，对她那个职业的女性来说，这是最非同小可的缺陷了。她那双温和而茫然的棕色眼睛和微隆的白色腹部，难免让人想起她那个绰号的动物，“‘海豹’一点儿也不美，甚至连好看都谈不上”，一位八卦专栏记者如是说。

就算在她青春年少的时期，那是舍维涅婚前整整15年，威廉斯最响亮的名声也是其他漂亮交际花的陪衬。一个著名的场景是，一位有恶毒趣味的交际家让人按照那个时代最抢手的妓女科拉·珀尔胸部的样子做了一只黑玛瑙大酒杯，后来又把它送给了“海豹”，以此来证明珀尔的魅力更胜一筹。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是，威廉斯因一位同事抢走了自己的情人而在公开场合跟她大打出手，把情敌的一簇簇头发都拽了出来。媒体戏称这一事件为“发髻战争”。[61]

然而虽说威廉斯的样貌平平是显而易见的，她却用自己“是个极为善解人意的女人，比周围任何人都要开明贤惠”的名声弥补了这一缺陷。[62]所谓开明延伸到了一种特殊的性行为，她的绰号对此也有所指，她还把它刻印在自己的信纸上：“海豹说妈妈，海豹说爸爸。”[63]正如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同时代人对此也一本正经地讳莫如深，世纪末的巴黎人对这种色情专长的具体含义也不会明言。在威廉斯与恩客的嬉戏中还有其他的女人出场？抑或她迎合的那些男人更偏爱“爸爸”而非“妈妈”，招呼她来，用洛尔自己的曾祖父德·萨德的话说，“玩鸡奸”？现存的记录对此不置一词。[64]

但法国文化传说中有两点似乎能确认威廉斯的绰号与那些不合常规的性别或性规范有关。首先是德·布封伯爵认为海豹既不是鱼类也不是

禽类，“这种奇怪的物种”似乎既不属于陆地生物也不属于海洋生物。这种两栖性质的“奇异之处”[65]使得海豹成为模棱两可的性行为的独特隐喻，例如作家让·洛兰[66]曾在一部1901年的小说《德·福卡斯先生》（*Monsieur de Phocas*）中塑造了脸谱化的人物、娘娘腔的审美家德·福卡斯先生（海豹先生），以此来影射同为同性恋的仇敌罗贝尔·德·孟德斯鸠。[67]第二个线索更平实一些，那就是法语中有一个俚语是“gay as a seal”，意思是“像海豹一样基情四溢”，相当于英语中的“基情一只鹅”（gay as a goose）。

海豹和她的“妈妈/爸爸”口号成了巴黎大道派戏院和男士俱乐部中流传的艳俗笑话，但它也引出了舍维涅的性偏好的问题，以至于他和洛尔结婚十多年后，一个每年更新的贵族圈指南仍然称他单身无子嗣[68]：这是上流社会对（像海豹一样）“同性恋”的含糊说法。[69]这一细节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背景知识，解释洛尔最不名誉的萨德式宣言：“丈夫可教不了你怎么肏。”[70]

婚礼之后，洛尔与舍维涅在巴黎度过短暂的蜜月，便启程前往弗罗斯多夫，他的职责要求他尽快把新娘介绍给国王和王后。乘火车前往奥地利要30个小时，让洛尔有了足够的时间幻想自己此行抵达的王室。她听说“弗罗斯多夫”在德语中是“快乐的村庄”的意思，虽说那显然不是巴黎，但她希望那里比她少女时期住过的那些乏味的住处强一些。

然而，当她终于抵达小小的弗罗斯多夫火车站时，她发现那个喜气洋洋的地名掩盖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据她同时代的人说，描绘那个小镇的最佳形容词是



在与洛尔结婚之前，阿代奥姆跟一位绰号为“海豹”的情妇交往已久。她有一句隐晦却显然与性有关的座右铭：“海豹说妈妈，海豹说爸爸”

单调和平庸。当地人生活在一种无动于衷和与世无争的氛围中，那是法国城市和城镇中看不到的。整个地区充斥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无聊气氛，连美丽如画的阿尔卑斯山景也无法驱散那种气氛。你会觉得十分愕然，不禁奇怪尚博尔伯爵怎么……受得了住在这么个地方。

至于城堡本身，那座乏善可陈的芥黄色庄园实在太过沉闷荒凉，任谁住在那里都忍不住会感到沮丧。洛尔夫家的远亲德·于扎伊公爵夫人曾用“阴郁”一词来形容典型的上流社会游人对这里的看法。舍维涅的另一位亲戚，同为王室侍从的勒内·德·蒙蒂·德·雷泽（René de Monti de Rezé），曾经试图看到这一缺陷的积极一面，声称“这座城堡无可否认的简朴外观，正好符合王室流亡海外的忧郁心境”。那座精心修剪的法式花园大概本意是为了让人想起凡尔赛宫，但环绕着城堡的护城河已经干涸，破坏了花园的壮观，反而凸显出波旁王朝已经沦落到这般境地。（我们很难想象凡尔赛宫会被用作国家邮政的办公楼，但自1955年以来，弗罗斯多夫的确变成了一座国家邮政大楼。）

关于城堡，最可称道的要数它的场地，号称一流的打猎和射击场：有一个猎鹿场、一个打靶场，还有数百英亩茂密的森林和草地。城堡北边外墙附近有一大片犬舍和马厩，证明在这样一个君主因为丧失了王国而无事可做的宫廷里，帝王的游戏何等重要。[71]爵爷声称自己愿意放弃大多数奢侈享受，却拒绝在马身上吝啬。他拥有一百对完美配种的纯种马，马身全是毫无瑕疵的白色，就像他家徽上的象征：百合花。

城堡的内部装饰介于狩猎小屋和陵墓之间。波旁王朝的其他宫廷里都装饰着大量的镀金、大理石、壁画、镜子和护壁板，而这座建筑的内墙只用朴素的白色粉刷，挂着各种鹿角、马蹄和动物头骨；一间房子里摆满了玻璃柜，展示着各种鸟类的剥制标本。其他房间则摆满了让人想起波旁家族伤心过往的纪念品：从1654年路易十六加冕时穿着的钻石搭扣的鞋子，到维热·勒布伦[72]为爵爷的伯祖母玛丽·安托瓦内特所绘的画像，画像上仍带着刀刺的破损，那是一伙革命暴徒在1789年10月冲入凡尔赛宫，叫嚣着要割下王后的头时留下的。爵爷已故的姑妈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Duchesse d’Angoulême）——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长女，也是他们的直系亲属中唯一在大革命中活下来的成员——正是在那间卧室中去世的，那间卧室也被保留为祠堂来纪念她。[73]



尚博尔伯爵流亡期间的小型王宫所在地弗罗斯多夫城堡，它简陋的建筑和乏味的内饰实在令游人提不起兴趣

在城堡内所有的遗物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属一个水晶的遗骨匣，上面有一支金色的百合花，刻着“L. ⅩⅤⅡ”的字样。匣子里装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之子的小心脏，君主主义者们在他的父亲1793年被处决时尊奉他为路易十七，但他还未来得及与共和派一争高下并确立自己的权威，就被狱卒们杀死了。（被杀时，他还不到十岁。）亨利五世的一位追随者写道，对他来说，小男孩的心脏“几乎带着一种宗教意义”，正如在它旁边展示的两件物事：玛丽·安托瓦内特走上断头台时戴着的那顶破碎的白色帽子和染有血迹的白色三角巾。和宗教遗物一样，这些物品意在赞美它们原本所属的罹难者，同时也提醒活着的人，王室成员有过怎样惨痛的经历。

除了这些恐怖的纪念品之外，弗罗斯多夫城堡的内饰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乏味枯燥。私人住处都是些光线阴暗、设备不足的狭窄房间，至于那些设备简陋的接待室，除了墙上排列的家族肖像和有着百合花图案的地毯外，根本看不出什么王室气派。就连位于红色沙龙正中央的“王座”，就是爵爷和夫人接受朝拜的地方，也不过是把普通的扶手椅，椅身上有一些镀金，椅背顶上有木刻的纹章，坐垫上缝着法国国徽（由一顶箍冠和三支百合花装饰的纹章盾）而已。[74]但这些装饰也许是故意弄得平淡无奇的。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长的君主流亡生涯——已经49年，并且还在继续——尚博尔伯爵不想让人以为他已经把奥地利当作祖国了。“人只有在祖国才能安家，”他声称，“在国外只是露营，只有等待。”[75]

尽管如此，弗罗斯多夫城堡却保留了其主人名分的一个宝贵特点：200年前，他的太祖父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庄严确定下来的繁复的宫廷礼节。亨利五世和太阳王一样严格保留那一套礼仪，要求廷臣们每次经过王座时都要（根据性别不同）鞠躬或行屈膝礼，哪怕它是空置的状态；在请求从王室成员面前退下时要倒退着走出房间；只有在被问到时才能对爵爷和夫人说话，且只能用第三人称（“既蒙爵爷垂问，臣有幸向爵爷进言……”）；每天早上六点半做弥撒，中午11时用午餐，晚上六时用晚餐，还有其间的每次打猎出行、马车出行、炉边闲聊和打扑克，都要陪伴在君主左右；如此等等，用空洞的繁文缛节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跟舍维涅夫妇直接相关的，是规定每个新到城堡的人都必须立即被引荐给王室夫妇，不得耽搁。为遵守这一规定，洛尔和丈夫到达自己的简朴住处之后，一刻也不得休息或安顿。相反，她要立即换上规定的宫廷服饰：一身过时的黑色装扮，一个笨重的有箍衬裙外面罩一条长拖裾，恰是男孩子气的洛尔最不喜欢的那种装扮。随后她和阿代奥姆便立刻前往红色沙龙，爵爷和夫人已经端坐在王座上，两边站立着这座微型宫廷的十几位成员。[76]

按照阿代奥姆事先跟她描述过的礼仪，洛尔在接见厅的门口停下来，行了一个很低的屈膝礼——整套礼仪需要行三个屈膝礼，这是第一个。然后她慢慢地走向王室夫妇，映入眼帘的是男仆（他们都遵循旧制度下的凡尔赛宫风格，带着扑粉假发，身穿蓝色制服），墙角处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画的肖像（其上的刺刀扎孔非常明显）、夫人脖子上那一圈核桃大小的珍珠（事实上，那正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维热的画像中所戴的那一串珍珠项链）。洛尔在王后和国王面前又行了两个屈膝礼，她深躬下身，前额都擦着镶木地板了。随后她保持着平伏在地的姿势，脱下右手的手套，握住尚博尔伯爵夫人裙子的下摆，亲吻它。

在象征意义上，这些动作不但证明了洛尔对君主的忠诚，也让人想起她的祖先为君主效忠的悠久历史。对她来说，一生中首次见到王室成员，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成人礼。眼前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她奉行这一套做法，规规矩矩地俯伏在地，她却对他所知甚少。当他心情不错时，亨利五世会把这套仪式看成私下作乐的机会：他喜欢在跟男性侍从们开玩笑时称女性廷臣的这套“出场体操”为“开阴*礼”。[77]

尚博尔对下流话的喜好是他比较迷人的特质之一。除此之外，他身上实在没有多少荣耀的波旁家族男儿的气质。59岁的爵爷有点儿对眼，体态肥胖，因为很久以前的一次骑马事故而跛足，跟他的先辈太阳王没什么可比之处，正如他的红色沙龙一点儿也不像镜厅。[78]他没有穿镶嵌珠宝的宫廷服饰，而是套着一件邋遢的羊驼毛开衫，脚上穿着白袜子和黑色居家拖鞋。“那套装束，”一位评论家曾写道，“就像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巴黎人早晨去公园散步的穿着。”[79]他的肩膀、胡子和硕大的双下巴都以一种再也无法重整旗鼓的姿势下垂着——自从他五年半以前放弃重新执政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姿态了。



尚博尔伯爵，这张照片是在洛尔初次见他之前**18**年拍下的；那时他已经因为一次骑马意外而跛足了

洛尔还太年轻，没有读过爵爷试图发动政变的媒体报道。但舍维涅作为那次事件的亲历者，向她描述了当年的情况。1873年秋，在羽翼未丰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中占绝大多数的保王党的鼓励下，当时53岁的尚博尔违反了让他离国四十多年的流亡法，乔装化名从弗罗斯多夫回到了法国。他先是在凡尔赛宫短暂停留，希望共和国总统德·麦克马洪元帅欢迎他回来并带他凯旋巴黎，确保人民赞同他重登王位。尚博尔甚至带回了一匹高大的白色纯种马，名叫“群众的要求”（Vœu Populaire），准备在那荣耀的一天骑马进城。

然而他在法国国旗上的倔强立场证明了他的无力。爵爷狂热地希望恢复波旁王朝的白色旗帜，以纪念波旁王朝的百合花。然而，最初由1789年的革命者们打出的蓝、白、红三色旗已经成为法国人民倍加珍视

的政治象征，他们绝不舍得放弃。不少头脑清楚的人劝他屈服——这恰恰是屈服于“群众的要求”——但尚博尔态度坚决。他在声明中坚称“亨利五世绝不能放弃亨利四世的旗帜”，就连骨子里是个保王党的麦克马洪也不同意他的立场，甚至拒绝见他。这次挫折迫使爵爷在屈辱中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据舍维涅说，他在返回奥地利的途中哭了一路。[80]

爵爷未能重获王权，这加重了他几十年来一直与之抗争的压抑的悲苦和无力的愤怒。他每天都会痛苦地想到家人被迫经受的考验：伯祖父路易十六被第一共和国的创建者们监禁、推翻和处决（弑君的决定性一票居然是由国王的表亲奥尔良公爵投出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伊丽莎白女士和路易十七被同一伙人监禁和杀害；父亲德·贝里公爵（Duc de Berry）在1820年被暗杀，那时爵爷尚未出生；他的祖父查理十世1830年被迫退位，紧接着另一位奥尔良表亲路易-菲利普就篡夺了王位；1832年，母亲德·贝里公爵夫人密谋对这位表亲发动政变而失败；波旁家族被祖国流放；最近，他和妻子生育继承人的努力也失败了。经历过这一切屈辱，他等待已久的重整河山的机会还是挫败了，这几乎令尚博尔无法承受。

他的追随者们也一样沮丧，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萎靡的他振作起来。在弗罗斯多夫城堡，他们让波旁王朝加冕礼所需的装饰始终处于备用状态：爵爷和夫人的紫色纯白边斗篷；他们自己的专用制服；一辆华美的加冕马车；那匹名为“群众的要求”的马。[81]在每天早晨必行的弥撒上，他们继续为领袖再度登上王位而祈祷，他们在巴黎有不少拥护正统王朝的密友，其中有些人还在谋划着正统王朝的复辟。

然而败局像裹尸布一样紧紧地缠着他们的英雄。乐观的时候，尚博尔会引用圣保罗的句子“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82]作为自己的座右铭。[83]现在他更喜欢这类威吓的箴言，如“没有原则的话”——所谓原则就是他作为波旁王朝所剩的唯一一位正统的王位索要者，应该统

治法国——“我不过是个跛脚的肥胖男人”以及“唯一能毁灭一位亲王的法律就是流亡法”。[84]洛尔后来在巴黎对她的告解神父说，她到达弗罗斯多夫时，亨利五世经年累月的伤怀早已消磨了他最后一丝统治的意志。不管廷臣多么英勇无畏地劝说他（以及他们自己）情况并非如此，但在这位初见尚博尔的少妇看来，波旁王朝的统治显然绝不会在他的任期内复兴。1879年2月，它在弗罗斯多夫已经奄奄一息了；洛尔给这里取了个别号，叫“阴影王国”。[85]

城堡里垂死挣扎的氛围或许很容易让洛尔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沮丧，她的婚姻让她摆脱了阴郁孤立的不安定状态，却陷入了另一种同样的状态——距离她向往的欣欣向荣的大都市反而更远了。但她知道光之城正等待着她，而且时间并不需要太久，这总算有所安慰：阿代奥姆已经向她保证，他们这回来弗罗斯多夫只会待几个月就重返法国。他在首都有些政治事务要处理，其间洛尔可以开始布置他们在圣奥诺雷区的家，然后他们还会去圣-托马斯城堡短住，拜访他守寡的母亲。那以后，她可以独自一人留在巴黎，想待多久都可以，而她的丈夫将在奥地利继续婚前的工作日程。[86]（按规定，尚博尔伯爵鼓励他新婚的侍从把每年八个月的服务期限减半，以便在宫廷外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但舍维涅恭敬地谢绝了这个好意。）

他唯一的请求是，洛尔将来每年至少在奥地利生活两个月，以防有人猜测他们是假结婚，也就是没有行婚姻之实。在洛尔看来，这个条件不但合理，简直就是超出她想象的姑息纵容。她那个阶层的女人很少有机会单独待在家里，更遑论独自跨越国界。按照风俗，她们无论到哪里，至少都有一位身穿制服的男仆陪同，一般还需要一位（或几位）家庭成员提供额外的、象征性的保护。舍维涅提议的安排史无前例地偏离了女性礼仪的要求，将在洛尔梦想的城市里给她史无前例的自由。如此自由的未来让一切都变得可以忍受了，哪怕一年中有部分时间要困在阴影王国里。

洛尔在弗罗斯多夫的第一天是在混沌中度过的。身穿束腰的紧身衣经历了三天火车旅行，而后又在红色沙龙按规定行了一整套屈膝礼，她一定累坏了，迫不及待想上床睡觉。然而在首次觐见时发生了一件事，让她久久难以释怀。敬礼和亲吻裙摆全部完毕之后，她在君王夫妇的脚下保持着半仰卧位，阿代奥姆提醒过她，只有当爵爷说几句通常都是套话的欢迎词之后，她才能站起身。但国王没有说话——没有立刻开口说话。他不慌不忙地注视着脚下蹲伏的苗条身影。洛尔目光低垂，或许在想她是不是做错了哪一个屈膝礼，或许在心中暗自诅咒着她那条难看的裙子的裁剪。她的丈夫一定像往常一样涨红了脸。肥硕的、61岁的尚博尔伯爵夫人一定也像平常一样一脸迷惑；她完全聋了，总觉得自己大概没听到什么重要的事，这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吃力。廷臣们站着一动不动。身穿制服的男仆——其中有两位名叫夏马尔涅——凝神屏息。[87]墙角那口老古董时钟嘀嗒作响，最后爵爷毫无征兆地打破了沉默。“你得当心啊，阿代奥姆！”他高声说道，“你一不小心，就会有人带着她跑掉呢！”[88]

这不是传统的问候——诸如“欢迎你，我的孩子”那一类——却是亨利五世典型的做派。他的一位廷臣曾经写道，在大多数交际中，爵爷会戴上“一副像神父一般忧郁的面具”。但有时他的沮丧会占上风，这时他要么盛怒，要么开个不得体的玩笑。[89]这句关于舍维涅新娘的俏皮话就是后一种情况的典型表现，那些侍从像往常一样尴尬地微笑起来；他们很了解自己的主人，不会把此话当真。拙劣归拙劣，他这是在试图献殷勤呢，佯装提出王室的初夜权来对初来乍到者道出赞美之词。

如果这句俏皮话出自某一位更强健的法国君主之口，它大概会预示着真正的性威胁：比方说，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都会毫不迟疑地霸占某个侍从的妻子，爵爷那位16世纪的同名祖辈亨利四世也一样，后者是波旁王朝王室血统的创立者，也是出了名地喜欢在女人中间厮混。的确，早先那位亨利曾骄傲地昭告天下，他那只巨大的鼻子和总别在帽子上的

巨大羽饰（panache），都是他的生殖器官强大过人的标志。自从他统治以来，国王的臣民就认为他的性能力与他的政治权力相关，性能力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政治权力。[90]然而这种联系在爵爷的伯祖父路易十六即位之后就瓦解了，后者在近七年的时间里拒绝与玛丽·安托瓦内特同房，他死于断头台更是适得其所，以至于某些恶意批评者称他的政权为“阉人”统治。

自那以后，尚博尔伯爵的追随者们都很清楚，波旁王朝性基因的失能性突变一直持续着，对王室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之一，路易十八，死后没有子嗣，据说他从未跟妻子同过床；他另一个弟弟的儿子、爵爷已故的叔叔德·安古莱姆公爵（Duc d’Angoulême）也一样。（事实上，德·安古莱姆公爵夫人在遗嘱中有言，禁止验尸官查看她的尸体；她的侍从中有人传言说她不想让世人知道她到死都是个处女。）

等待爵爷本人的也是同样的结局，他对自己与夫人的结合从未有过明显的激情，也没有什么已知的证据表明他在婚姻之外展示过性爱的活力。他的封臣们对他的这一行为倍感担忧，以至于在他结婚多年后的某夜，他们曾安排一位出名“放荡”的贵族美女在弗罗斯多夫的亲王卧室里等他。他们原计划让她帮助他摆脱童子状态，以防尚博尔伯爵夫人在这方面失败，如此便能燃起他继续跟妻子做爱的兴趣了。但让美女和他们本人大为诧异的是，爵爷发现她在自己的床上后，立刻冲出了房间，脸色像他珍视的法国旗一样苍白无色。安排了这次幽会的人劝诱那位行事未遂的王室狐狸精发誓对发生的一切保密。然而在他自己的小圈子里，国王的反应证实了他的性冷淡，这是追随者们最担心的，就连他那两百匹马的颜色后来似乎都证明了他们的担心。一个知情人说到尚博尔全白色的马队时，曾狡黠地说：“毫无疑问，他特别喜欢那种贞洁的色调。”[91]

诚然，亨利五世对性爱缺乏激情也可能与他的婚姻没有子嗣毫无关系。但在廷臣们的心目中，这两件事是彼此关联的，在他们看来，他没有子嗣就意味着他们珍视的一切必将终结，因为“拥护正统王朝”就意味着王位从一个正统（波旁家族的男性）继承人传给下一个。如果他死后没有继承人，此时看来这是确定无疑的了，拥护正统王朝的事业也将随着他的离世而彻底失败。[92]

然而，亲王在饭桌上却显示出旺盛的食欲，洛尔几乎在觐见之后立刻发现了这一点。她刚行完礼站起身，又在夫人脚下行了三个礼之后，墙角的时钟就敲了六下，一听到这个信号，王室夫妇立刻从王座上弹起来，快步走出了红色沙龙，廷臣们一路快走跟着他们。这是弗罗斯多夫的晚餐时间。阿代奥姆在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冲向餐厅时对她说，爵爷喜欢吃饭不但要及时，还要迅速，繁复的礼节越少越好。洛尔在宫廷的第一个晚上，被指定坐在国王左边的上座。（他的妻子作为在场地位最高的女人，总是坐在他的右边。）但她可不能指望爵爷会在吃饭时跟她说话。同样，和所有君主一样，礼节禁止她先开口对他说话。

洛尔根本没有太多时间考虑违背这一礼节，因为和爵爷一起用餐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虽然丈夫事先提醒过她，但晚餐的招待和食用如此粗野还是令她吃惊，的确，弗罗斯多夫的大多数新来者都对此深感震惊。德·于扎伊公爵夫人曾抱怨晚餐招待的“速度快得让人害怕”。[93]另一位来访者沃特福德侯爵夫人（Marchioness of Waterford）也说起过类似的经历，说她和朋友们“得到警告说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东西，要不就没有晚餐可吃了”，因为那一小队身穿制服的男仆服侍晚餐时，任何一道菜都不会重复端上来。[94]的确，侯爵夫人说，“汤端上来时”，她的同伴“一直在聊天，而我一直在听，汤就被端走了，其他每一样食物几乎也都是如此”。那天晚上她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是城堡来客最典型的抱怨。

不过洛尔反正一直吃得很少——她很严格地控制饮食，靠连续抽烟来抑制胃口——因此弗罗斯多夫的这个程序倒没有让她觉得太难过。然而晚餐之后的礼仪成了更大的难题。每晚用过甜点和咖啡后，国王会退到吸烟室和其他男人一起抽雪茄，而女人们和夫人一起聚在会客厅绣花、玩牌、“聊天”。这一习惯成为洛尔每晚的磨难，因为她虽然为自己生动风趣的应答而自豪，但在王后钟爱的那些话题上，包括耶稣基督、天气，以及奥尔良家族的背信弃义，她却根本没有用武之地。[95]（这老三样中的第三个甚至成为尚博尔伯爵夫人版本的主祷文中的重要主题，她不但祈祷自己摆脱邪恶，也祈祷自己能“摆脱整个奥尔良家族”。[96]）夫人个性阴郁，又如她的一位天性善良的追随者所说，“资质平庸”，拒绝偏离这三个话题，她还对同伴们假装对她的独白感兴趣信以为真，总是用更大的音量一遍遍重提。

夫人拒绝引入其他话题或许跟她掌握的法语太初级有关（与波旁王朝的假定国王结婚三十多年后，她的法语仍然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或许也跟她的听力不好有关。遗憾的是，爵爷总是嘲笑她这两个缺陷，这让她更加局促不安——他对她说不好他的法国名字尤其不留情面，每当她试图发出听起来像发牢骚的“恩里科？”时，他总是高声大嗓地奚落她。

刚到弗罗斯多夫时，洛尔还不知道王后为何总是握住这些老旧的脚本不放，便决定改变现状，把谈话引向她自己的固定话题：巴黎。尝试失败了，原因是夫人有个古怪的癖性，洛尔刚来弗罗斯多夫，不知道要把这个考虑在内。尚博尔伯爵夫人生来就面部畸形，用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她本人也不是什么选美皇后）的话说，伯爵夫人“长得太丑了，仿佛‘丑’这个词就是专门为她发明的”。[97]夫人对自己丑陋非常敏感，而且尽管她和丈夫是无性婚姻，她却对丈夫有着极大的占有欲，因而她惧怕法国首都，在她的心目中，那里就是个放荡淫乱的疯人院，里面充斥着要把他引入歧途的贱货。“我对统治没多大兴趣，”她高声抱怨

说，“巴黎到处都是美女。”[98]洛尔居然能冲破女主人隔阂的迷雾谈起巴黎，让在场的其他女人深感钦佩，但新来的廷臣洛尔吸取了教训：还是聊王后熟悉的魔鬼（那些奥尔良叛徒们），把其他的一切抛诸脑后吧。

起初，夫人的听力损伤让洛尔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以为可以当着这位老太太的面口无禁忌。在红色沙龙首次觐见之后不久，洛尔受到召唤，她要和王后一起乘马车在城堡的庭院里转转。按照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的说法，这一邀约是个好兆头，表示洛尔将在城堡里一帆风顺，因为这表明她给王室夫妇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菲茨-詹姆斯伯爵是弗罗斯多夫的老资格了，他大献殷勤，将给洛尔指导宫廷里不成文的规矩视为己任。虽然菲茨-詹姆斯的判断让她为之一振，但洛尔还是很讨厌这乏味无聊的出行。因此当她前去报到，爬上马车坐在王后身边时，洛尔像年少时那样寻求声援。“上帝啊，约瑟夫，”她用粗哑的烟嗓冲着马车夫喊道，“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无聊过。”[99]

让洛尔后悔的是，回答她的不是男仆而是王后，后者一反常态地低声说，“可怜的孩子，我很抱歉”。然后，夫人解释说，有时候马车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颠簸会让她短暂地恢复听力。洛尔支支吾吾地道歉，除了波旁家族的奥尔良支系之外，夫人对每个人都怀有基督徒的宽宏慈悲，不但原谅了她，还因为她在那短暂的一刻表达了自己的沮丧而更喜欢她了。从那天起，尚博尔和德·舍维涅两位伯爵夫人每天下午都乘马车一起出行。

洛尔要想讨好亨利五世就更容易了，首先是因为两人都喜欢骑马、打猎和射击。这些运动让洛尔尽显优势，突出了另一位打猎爱好者所谓的“她身上那种森女气质和骑士风度，以及亚马孙族女战士一般妙不可言的特性”。[100]她穿马裤而不是长裙，横跨在马身上而非侧身坐在上面，无不凸显她的“英武之气”。碰巧，爵爷打猎时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走路虽然跛脚，但骑马的姿态却极其优雅，也是个绝佳的猎手。

在弗罗斯多夫周围的田野和树林里引领众人狩猎，让老僭越王忘记了自己的忧虑，让他“超越了时空”，拥有了一种极乐的幻觉（尽管转瞬即逝），仿佛他正“过着法国国王的生活，自希尔德贝尔特一世[101]以来，法国国王顾名思义就是狩猎之王”。[102]

在洛尔来弗罗斯多夫之前，女人并非王室狩猎的固定参与者。夫人本人不骑马，男人们带着武器、号角和猎犬在乡间飞驰时，她的女侍官们安分守己地陪她待在城堡里。因此，看到洛尔对这项运动如此热爱，爵爷既吃惊又高兴。他特别欣赏她对猎杀的热爱：一闻到火药味，她的鼻孔都张开了，就像一个嗅觉猎犬闻到了鲜血的味道。如此奇异的场景让尚博尔发自内心地狂笑，夸她是个“好枪手”。此话从这位现代希尔德贝尔特嘴里说出来，是至高无上的赞美。

同样不和谐但同样让国王开心的，是洛尔的粗口。爵爷本人也喜欢说脏话，但他从未遇到过洛尔这样血统和头衔的女人有此癖好。同样有趣的是她故意学来的土话鼻音，她会轻蔑地嘲笑他的老对头麦克马洪元帅：“麦克马洪？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只呆头鹅昂（原文如此），他明摆着就是嘛！”或者她会贬低自己显然超群的智商，慢吞吞地拉长语调说：“我就是杠小傻瓜，一杠小乡巴佬。”[103]

尚博尔对这个胆量过人的贵族少妇的亲切感变成了一种充满温情的依赖感，以至于他希望，甚至要求，每次射击时她都要在场。他素来不喜欢给随从起绰号，却昵称洛尔为老丫头（la vieille）——她还年轻呢，所以这个称呼颇有些讽刺——证明他们之间的友好情谊。[104]她以自己充满阳刚之气的骑马装束、勇敢无畏的运动天赋和放荡下流的幽默感而成为国王实际上的亲信之一。

洛尔不久就发现，君主对她的喜爱使她能够以其他侍从根本不敢尝试的方式，挑战他的权威。例如，她注意到他以“在（每一次）谈话中都像暴君一样占得上风”来弥补自己缺乏真正的政治权威，不管对话者

是谁，也不管他们企图告诉他的内容。正如他的另一位追随者所说，除了那些支持自己的意见之外，“他从来不听人说话，从来不想听懂任何事情”。[105]洛尔有一种天生的（也许是遗传的）出格做派，爵爷“浮夸的冥顽不化”实实在在地激起了她的反叛，因而她养成了故意激怒他的习惯。其他侍从向来对他俯首垂立，但她却摆出沉着的姿态从容应对爵爷的疯话，笃定地知道他不久就会自己大喊大叫累了，那时他就会怯懦地请求她原谅自己的失态。每到这时，洛尔不会像一般仆从那样立即安慰他，而是乘胜追击，用那双蓝眼睛冷冷地盯着他，用刺耳的声音说：“爵爷跟我道歉，我还能说什么？爵爷为什么不能先克制一下自己的愤怒呢？”[106]

对于一个虽然经历了无数“不可思议的挫折”，但从小就坚信上帝派他到人间来统治自己同胞的人来说，洛尔的傲慢无礼着实令人震惊，但也令他病态地感到惊喜。当她像数落淘气的孩子那样责备他时，洛尔不但如另一个贵族所说“完全没有一丝恐惧”，还展示出她让自己的所谓上司无地自容的撩人冲动。考虑到尚博尔夫妇虔诚的宗教信仰，她没有在他们面前提到她的萨德祖先。不过说起来，她身为那位恶棍侯爵的后代之事，或许会让国王更加痴迷于她的大胆无畏。

然而就算对洛尔，尚博尔的和蔼敦厚也是有限度的。尽管他喜欢有人偶尔貌似挑战一下他的权威，但他只会允许这类贬低按照他的规则、符合他当时的情绪，而他的情绪向来善变。这一秒钟让他开怀的事，可能马上就会令他勃然大怒：弗罗斯多夫的前辈们至今仍然颤抖不止地记得一个令人不快的往事——一个可怜虫被爵爷的欢乐误导，伸出手去拍了拍君王的肚子。[107]为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他的侍从们必须懂得何时停止玩笑，开始卑躬屈膝。他们还必须遵守一套固定的俯首帖耳的礼节，天衣无缝地执行君王希望周围每个人遵从的一套形式化的自我贬低的仪式，哪怕像亨利五世本人这样的君王也觉得那套仪式太过繁琐。

因此，洛尔单指望用自己的傲慢便在宫廷里获得成功并不明智。她还必须掌握错综复杂的王室礼节，在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的指导下——他陪伴她的时间明显超过了她丈夫——她学会了自己该学的东西。菲茨-詹姆斯训练她在和君主夫妇说话时用第三人称而非第二人称；在打猎时把一个特别（或容易）出风头的机会让给国王，或出身王室的其他任何打猎同伴；在与君主和殿下们打牌时输给他们，又不输得太明显；在房间里头衔最高的亲王坐下之前，要始终保持站立。（这位亲王往往根本不坐下，众所周知，君王们总是故意让身边的每个人站很长时间，没别的原因，就是他们有权这么做。别看爵爷的腿残疾了，他也是玩这一套的行家里手。）对君王们来说，这些礼节每天都在让他们安心地觉得，比起其他人，他们有着天赋的优越性。

洛尔对礼节规矩的研究也让她对其他同伴的相对社会地位有了敏锐的认识。她会在“标记距离”时表现出这一敏感性，所谓“标记距离”，就是对正规礼节做出详细的标定。[108]在向某人致意时，洛尔的屈膝礼的深度与那人的头衔高低直接相关。去用餐时，她在队列中的位置在某些贵妇人的前面，但要“敬让”另一些头衔高于她的人。她学会了不对宫廷里每天必行的一个主要仪式大惊小怪，即男仆们站在整个城堡的每一个双门入口两边，为王室夫妇执双门，但只为其他人执单门。洛尔后来很感激菲茨-詹姆斯帮助她掌握了新环境的这一套繁复的仪式。这样一来，他便为她作为廷臣的长期事业做好了成功的准备——不光对亨利五世及其王后而言，对她后来在巴黎社交圈结交的许多其他君王也是如此。

洛尔与爵爷的关系特别融洽，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她与宫廷里的其他人关系和睦。多年顾全大局的奉承谄媚和叩首称臣，既要为他系鞋带又要咬紧牙关忍着他的无名怒火，爵爷的许多廷臣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自己就被这个来自帕西、满嘴脏话的19岁新秀占了上风。但他们的怨恨并没有让洛尔慌成一团，因为正如菲茨-詹姆斯解释的，那只能证

明她在争夺尚博尔的喜爱这场无声无息的竞争中一举夺魁了。同样，菲茨-詹姆斯也提醒她，那些心怀妒忌又无事可做的同事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在国王的面前败坏她的名声。她得到了这样的警告，便设法挫败了他们诋毁她的计划。

洛尔的对手们或许把君王的赞许看成终极的荣耀，但她玩这场游戏却是为了一个全然不同（但也并非无关）的奖杯：在社交界的声望。她屈指数着和丈夫一起回巴黎的日子，决心跻身社交圈领导潮流的人物，她和尚博尔的友谊会让她如虎添翼。洛尔坚信她未来前往首都后，将把自己——而不是“可怜的阿代奥姆”——描述成亨利五世最宠爱的廷臣。就像中世纪画作中的圣徒挥舞着自己的殉道工具一样，洛尔挥舞着君主给予她的“特别重用”出现在上层。正如圣巴斯弟盎的乱箭[109]和圣加大肋纳[110]的磔轮成就了他们升入天堂，王室恩主对她的喜爱也将助她登上贵族城区的巅峰。

与此同时，洛尔预见到，要利用她和爵爷的关系促成这一桩奇迹，那他们的关系就必须引人遐想，因此就需要表现得有一种比小圈子的欢乐友情更令人心驰神荡的情感基础。在为生动再现她的弗罗斯多夫叙事找寻细节时，她想起了自己在红色沙龙首次亮相时尚博尔的那句俏皮话：“你一不小心，就会有人带着她跑掉呢！”

这句话将成为洛尔征服社交界的一把钥匙。它与她的“阴影王国”奇想和能够不在丈夫的陪伴下跨国旅行的自由一起，成为她的得力工具，为她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重新书写她熟记在心的彼特拉克《爱之胜利》的经典爱情故事：“想想普鲁托吧，他和普洛塞庇娜[111]的故事：爱追随着这位神祇一直到地狱深处。”[112]在社交界提到她在弗罗斯多夫的生活时，洛尔会把自己描述成普洛塞庇娜——被罗马神话中的冥府之神和君王普鲁托劫持，并监禁在遗忘河[113]岸那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王国中（虽然每年只有部分时间）的美丽少女。[114] [那条流经弗罗斯多

夫城的河流碰巧叫莱塔河（Leitha），与遗忘河（Lethe）发音相似。]在这个戏剧化的故事中，尚博尔会出演她的普鲁托：不是亲切和蔼的打猎同伴，而是忧伤且痴迷于她的王室劫持者。



洛尔把弗罗斯多夫称为**“**阴影王国**”**，把自己描述为普洛塞庇娜，那位被冥府之神普鲁托劫持的迷人少女。左图是贝尼尼[115]根据这一主题创作的雕塑，收藏于罗马的贝佳斯画廊博物馆（**Borghese Gallery**）

洛尔明智地认识到，这个对事实大加渲染的版本只能说给没有亲眼见过弗罗斯多夫或国王本人的人听。毋庸置疑，亨利五世并没有把她监禁在自己的城堡：她来去自由，丈夫也是自愿生活在那里的。同样，那位爱发脾气、爱耍性子的“跛脚胖男人”显然也不是凶猛的地狱之王，抓住他迷人的金发女人质不放。

洛尔不需要自己的王室浪漫故事有多大的真实性，她只需要让它在上层子弟们听起来像真的就行了。她还预见到，在大多数上流社交圈子里，没有人会质疑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虽然巴黎贵族全都听说过尚博尔伯爵，但认识他的人少之又少。自1830年革命将他和法国波旁家族的其他人驱逐流放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弗罗斯多夫距离太遥远、处境太凄凉，不会吸引太多的城区贵族前去朝拜。

以普洛塞庇娜的神话为原型建构自己的叙事有三个优势。第一，这样就把“她可怜的阿代奥姆”贬为她生活故事的边缘人物，这正是洛尔希望给他的位置。第二，如此就编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不管是先天禀赋（她的文学祖先）还是后天培养（她良好的阅读习惯），洛尔很有讲故事的天赋。因此，她知道比起一个生活乏味的外省新娘与一个没有王位的倒霉蛋国王的故事，普洛塞庇娜及其劫持者的戏剧性情节的叙事张力要大得多。第三，洛尔把自己描述成为爵爷（对）眼中的尤物，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极其荣幸的人群中的一员。纵观历史，法国国王的迷恋给了他们的情妇们无与伦比的声望：阿涅丝·索雷尔[116]、迪亚娜·德·普瓦捷[117]、加布丽埃勒·德·埃斯特雷[118]、蒙特斯庞夫人[119]和曼特农夫人[120]、蓬帕杜尔夫人[121]和杜巴利伯爵夫人[122]，就算在死后，这些情妇们也沐浴着圣恩的永恒光辉，耀眼的光芒令子孙后代与有荣焉。

这就是为什么亨利·格雷弗耶宁愿顶着私生子的耻辱，也要吹嘘他的祖先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之一。这就是为什么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如此自豪地宣称，他的祖先是国王詹姆斯二世[123]的一位被承认为嫡出的私生子（“菲茨”在中世纪的诺曼底语言中就是“儿子”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莫特马尔家族的人虽然是极其古老正统的贵族血统，却仍然因为他们与阿泰纳伊斯·德·蒙特斯庞的亲戚关系而受邀赴宴，后者充满活力的智慧风趣曾让伟大的路易十四神魂颠倒。这就是为什么格拉蒙公爵们一直有给女儿取名科丽桑德的传统，以纪念她们的女性先辈科丽桑德·德·吉什[124]，亨利四世和他的阳刚羽饰的宠儿。

洛尔预见到，在这些家族统治的世界里，她只有想方设法在他们贩卖地位的游戏中击败他们，才能获得成功。格雷弗耶家族、莫特马尔家族、菲茨-詹姆斯家族和格拉蒙家族强调他们与昔日的王室情妇们的血亲关系，而在她发明的虚构叙事中，她自己扮演了现任王室中这一令人艳羡的角色。

洛尔自我夸大的天赋很像她未来的邻居和朋友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后者最近把自己装扮成路易十六那位贞洁的殉难者妹妹，就展示了同样的天分。和伊丽莎白一样，洛尔的神秘姿态也需要一个更大、更好的观众群，绝非她婚姻之初的那一小群人能满足的。弗罗斯多夫就是洛尔的布德朗森林：一个她将在巴黎日臻成熟的戏剧搬上舞台的试验场。

婚礼之后还不到四个月，洛尔就回到了圣奥诺雷区，开始出门交友，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谈论她刚刚从弗罗斯多夫回来，就像一个起死回生的人：有些晕眩，却因重获新生而狂喜。[125]

---

[1] Marcel Schneider，*Innocence et vérité*，vol. 2，*L'Éternité fragile*（Paris，Grasset：1991），295. MB提到，LC也把弗罗斯多夫称为"死亡帝国"（"the empire of the dead"）；见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29。

[2] 持剑贵族家中的幼子传统上都会成为神职人员，但由于天主教神父有禁欲的要求，已婚的贵族成员无法从事这一职业。——作者注

[3] A. Borel d'Hauterive，"Musée de Versailles：notice sur les cinq salles des Croisades，" *Annuaire historique pour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9（1845）：127-95，180.

[4] 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是1830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的序曲，因为波旁王室的专制统治令经历过大革命的法国人民难以忍受，于是他们群起反抗法王查理十世的统治。

[5] 引文见LG，*Souvenirs du monde*，153. 又见LG，*Mémoires*，vol. 2，30。LG把LC长大的那条街名写对了，却错误地把它的所在地写成了奥特伊而非帕西。在奥

斯曼重新设计的巴黎，这两个历史上相连的镇子在1860年，也就是LC出生前一年，被并入了首都的第十六区。

[6] 光之城（City of Light）是巴黎的别称。

[7] 关于瓦伦丁与彼埃尔·德·瓦鲁的婚姻，见《高卢人报》（1868年7月15日）第一版；以及*L'Indicateur des mariages*（August 21-28，1864）：3。关于瓦鲁生平的详情，见《高卢人报》（1914年4月29日）第二版刊登的他的讣告以及（1914年5月2日）关于他的葬礼的报道。

[8] LG，*Souvenirs du monde*，153.

[9] Silvia Silvestri，"Marochetti，Carlo，" in *Diziona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vol. 70（Rome：Treccani，2008），n.p.

[10] 现存的资料极少（又称莱卡巴纳、马斯-德-卡巴纳或拉卡巴纳）。该地产显然最初是在"第11位得到该姓氏的让·德·萨德"于1590年代成为"拉卡巴纳的共同主人"时被传给德·萨德家族的。François-alexandre Aubert de La Chesnaye-Desbois，ed.，*Dictionnaire de la noblesse*，vol. 18（Paris：Schlesinger Frères，1873），32. 舍维涅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它出售给了法国政府。

[11] 关于阿道夫·德·瓦鲁受雇于法兰西银行，以及瓦鲁家族的整体情况，见Alain Plessis，*Régents et gouverneur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Geneva：Droz，1985），48-51。

[12] Comte de Burey，ed.，*Annuaire général héraldique*（Paris：Jules Wigniolle，1902），986.

[13] 引文见Lawrence W. Lynch，*The Marquis de Sade*（Boston：Twayne，1984），ii。

[14] 引文见Lawrence W. Lynch，*The Marquis de Sade*（Boston：Twayne，1984），13-14。

[15] 督政府（Directoire exécutif，1795-179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掌握法国最高政权的政府，前承国民公会，后启执政府。1795年8月，热月党控制的国民公会颁布了新的共和三年宪法，规定新立法机构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元老院，由250人组成，下院称五百人院，由500人组成。

[16] 执政府（Le Consulat，1799-1804），1799年，拿破仑从埃及返国，并连同富歇和塔勒兰德密谋政变。同年11月9日，拿破仑军队控制督政府，迫使督政辞职，解散法国议会和元老院，夺取议会大权，并宣布执政府成立，督政府正式灭亡。执政府成立后，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掌握了最高权力，并开始实行一连串改革措施。拿破仑1802年8月修改共和八年宪法，改为终身执政，更在1804年策动公民投票，加冕自己为"法兰西人的皇帝"，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执政府正式灭亡。

[17] 这个传说被写入Jules Janin很有影响力的传记作品*Le Marquis de Sade*（Paris：Chez les marchands de nouveautés，1834），流传开来。

[18] 关于德·萨德对波德莱尔的影响，见Damian Catani，"Notions of Evil in Baudelaire，" *Modern Language Review*，vol. 102，no. 4，996-98。

[19] 关于GM对德·萨德的兴趣，见Marie-Claire Bancquart，*Paris "Fin-de-Siècle"*（Paris：SNELA，2009），234。关于MP（通过阅读波德莱尔）对德·萨德的兴趣，除其他外，见Simone Kadi，*Proust et Baudelaire*（Paris：La Pensée Universelle，1975），93-96。

[20]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法国诗人、剧作家、艺术评论家，其诗歌和戏剧在表达形式上多有创新，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

[21] Guillaume Apollinaire，"Le Divin Marquis"（1909），in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ed. Michel Décaudin，vol. 3（Paris：Gallimard，1993），785.侯爵的作品也对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艺术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见Paul Éluard，"L'Intelligence révolutionnaire du Marquis de Sade，" *Clarté*（February 1927）；以及Claude Mauriac，"Sade déifié，" in *Hommes et idées d'aujourd'hui*（Paris：Albin Michel，1953），117-30。

[22] 世纪末关于波德莱尔作品中的"施虐狂"的评论包括Paul Bourget，*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vol. 1（Paris：Plon，1920 [1883]），5-9；以及Max Nordau，*Degeneration*（London：D. Appleton & Co.，1895），286-87 and 317。从19世纪末以来，关于施虐狂的临床讨论包括Max Nordau，*Degeneration*（London：D. Appleton & Co.，1895），450-51；F. C. Forberg，*Manuel d'érotologie classique*（Paris：Isidore Liseux，1883）；Dr. Jacobus X.（pseud.），*Le Marquis de Sade et son œuvre devant la science médicale et la littérature moderne*（Paris：Charles Carrington，1901），19-28；and Dr. Marciat，"Le Marquis de Sade et le sadisme，" in

Vacher l'éventreur et les crimes sadiques，ed. A. Lacassagne（Paris：Masson，1899），185-237。在1972年的一个电视采访中，德·萨德侯爵格扎维埃发起了"在法语中禁止""施虐狂"一词及其变体的运动，理由是这个术语"对整个家族造成了伤害"。可访问以下网址观看采访：http：//www.ina.fr/video/CAF97037725.

[23]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74.

[24]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 MB补充说，每一次面对亲人离世，LC都"高昂起头，拒绝抱怨"（90）。

[25] 关于LC做作的村话被写在了德·盖尔芒特夫人身上，尤其见MP，CSB，234："伯爵夫人说话时有种美妙的'泥土'味儿。她会说：'她是阿斯托尔夫的堂妹，笨得像头呆鹅。'"又见MP，*Carnets*，Florence Callu and Antoine Compagnon，eds.（Paris：Gallimard/NRF，2002），397："这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好友。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资本就是用舍维涅如野兽般的声音表现斯特劳斯的精神。"还有RTP的这句脚注："我是一头野兽，说话像个农民。"（n. 220）注：我把"eun"翻译成了"uhh"。

[26]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3.

[27] 引文见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104；on LC's use of "*ça*，" 又见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04；and AF，"Le Salon de l'Europe，" *La Revue de Paris* 7，no. 44（November 15，1936）：457-76，464，and 469。

[28]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69.

[29] 路易-马里·德·萨德文学成就的简述见Ernest Desplaces and Louis Gabriel Michaud，eds.，*Biographie universelle，ancienne et moderne*，vol. 37（Paris：Chez Mme Desplaces，1843），224。

[30] 普鲁托（Pluto），古典神话中冥府的统治者。

[31] Louis-Marie de Sade，*Histoir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première race*（Paris：Delaunay，1805），v-vi.

[32] 舍瓦利耶（Chevalier）之名有"勇士"之意。

[33] Chevalier Louis de Sade，*Extraits du "Lexicon politique"*（Paris：A. Barbier，1831），1.

[34] Abbé de Sade，*Mémoires pour la vie de François Pétrarque*，vol. 2（Amsterdam：Arskée & Mercus，1764），478.

[35] D.A.F.，Marquis de Sade，*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ou les instituteurs immoraux*（Quebec：Bibliothèque Électronique de Québec，n.d. [1795]），134.

[36]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80.

[37] 关于廷臣们每天在弗罗斯多夫的工作，见Monti de Rézé，*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Paris：Émile-Paul，1930），41。关于AC在军队服役，见Fidus（pseud. Arthur Meyer），“Le Jour de l’An à Goritz，” *Le Gaulois*（January 2，1881）：1；and *Le Vétéran*，10（May 20，1910）：20。

[38] 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Blanche de Castille，1188-1252），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和妻子埃莉诺的女儿，1223—1226年为法国国王路易八世的王后。在儿子路易九世未成年时，出任摄政（1226—1236），统治国家。法国人尊称她为“仁慈的布兰卡太后”，也称她为“贤母布兰卡”。刚摄政时，她冷静果断地平息了贵族叛乱、控制了王国大权，并在十年摄政期间让法国蒸蒸日上。她签署了阿尔比十字军的《巴黎条约》（1229），使图卢兹伯爵的大部分领土落入卡佩王朝手中，并迫使英王将普瓦图让给法国。1236年她归政给已成年的路易九世，但实际上仍在幕后操纵国政，直到1252年去世。她与其子“圣路易”创造了中世纪法国的黄金时代。

[39] Maurice Lever，*Sade：A Biography，trans. Arthur Goldhammer*（New York：Farrar Straus & Giroux，1993），77-78，83.

[40] Lawrence W. Lynch，*The Marquis de Sade*（Boston：Twayne，1984），18. 关于19世纪贵族的“殉难”，见Suzanne Fiette，*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s Lumières à la Belle Époque*（Paris：Perrin，2015），125；贵族关于皮克毕监狱里无头尸体的夸张说法，见MB，*Égalité*，166；关于AC的祖先也曾被关在皮克毕监狱，见René Pocard de Cosquer de Kerviler，Sir Humphrey Davy，and Louis-Marie Chauffier，eds.，*Répertoire général de bio-bibliographie bretonne*，book 1，vol. 9（Rennes：Plihon & Hervé，1897），201。

[41] 关于“阿代奥姆”这个名字的衍生，见Kerviler，Davy，and Louis-Marie Chauffier，eds.，*Répertoire général de bio-bibliographie bretonne*，book 1，vol. 9（Rennes：Plihon & Hervé，1897），200。

[42] 关于爵爷的廷臣们在财务上的牺牲，见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211。

[43] 凯歌香槟（Veuve Clicquot Champagne），法国兰斯的一家香槟酒厂，专门生产优质的香槟。凯歌香槟由菲利普·克利科（Philippe Clicquot）于1772年创建，是世界最大的香槟酒厂之一。

[44] 关于柯里塞街上的公寓，见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60；以及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64。1884年，这对夫妇已经搬到了几个街区远的珀西尔大街1号。*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Nationale de France* 1，no. 4（May 3，1884）：xxiii.

[45]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76；关于AC外形容貌的其他信息见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29；Françoise Benaïm，*Marie-laure de Noailles，vicomtesse du bizarre*（Paris：Grasset，2002），37；Bernard Xau，"Derniers échos de Göritz，"《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9月9日），1-2；and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1。现存被收入公开资料的唯一一张AC的照片出现在一部回忆录中，作者是他的一位同属弗罗斯多夫廷臣的表兄。Monti de Rézé，*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Paris：Émile-Paul，1930），175.

[46] 《高卢人报》（1879年2月2日）：第4版；关于HG/EG婚礼的头版报道，见《高卢人报》（1878年7月27日）：第1版；《高卢人报》（1878年8月23日）：第1版；以及《高卢人报》（1878年9月27日）：第1版。关于AC/LC婚礼的篇幅较长的报道，见《特里布莱报》（1879年2月9日）：第12版。

[47] 条顿人（Teutonic），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公元前四世纪时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步和日耳曼其他部落融合。后世常以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或是直接以此称呼德国人。

[48] 关于爵爷在弗罗斯多夫的侍臣和宫廷，见《高卢人报》（1885年8月23日）：第2版；《高卢人报》（1883年9月8日）：第37版；以及Théodore Anne，*M. le Comte de Chambord*：*souvenirs d'août 1850*（Paris：E. Dentu，1850），199-216。

[49] AG，*Les Clés de Proust*，31.

[50] 《特里布莱报》（1879年2月16日）：第12版。

[51] 当时，"伯爵爵爷"是巴黎伯爵专用的叫法，表明他的法国王位继承者地位

是排在尚博尔伯爵之后的。——作者注

[52] PV，*Les Soirées de Paris*，403。

[53]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34.

[54] AG，*Les Clés de Proust*，30.

[55] 引文见Léon Pierre-Quint，*Marcel Proust*：*Sa vie*，*son œuvre*（Paris：Simon Kra，1925），180；AC对马车出事伤者的侠义救助报道见《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7月13日）：1。

[56] L. Massenet de Marancour，*Les Échos du Vatican*（Paris：n.p.，1864），113-14.

[57]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05.

[58] *Le Diable Boiteux*（pseud. Baron de Vaux），“Nouvelles et échos，”《吉尔·布拉斯报》（1880年1月31日）。

[59] AF，“Le Salon de l’Europe，” *La Revue de Paris* 7，no. 44（November 15，1936）：457-76，467.

[60] Bénaïm，op. cit.，37；关于海豹的其他传说见Arsène Houssaye，*Les Mille et une nuits parisiennes*，vol. 4（Paris：E. Dentu，1878），n.p.；Cora Pearl（pseud. Emma Crouch），*Mémoires de Cora Pearl*（Paris：J. Lévy，1886），245；Richard O’Monroy，*La Soirée parisienne*（Paris：Arnould，1891），128-29；Virginia Rounding，*Grandes Horizontales*：*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Four Nineteenth-Century Courtesans*（New York：Bloomsbury USA，2003）；and Zed（pseud. Comte Albert de Maugny），*Le Demi-monde sous le Second Empire*：*souvenirs d’un sybarite*（Paris：E. Kolb，1892），105。Arsène Houssaye还说“海豹”是1860年代统治妓女圈的一群“毁灭妃子”中的一个次要人物。

[61] Gabrielle Houbre，ed.，*Le Livre des courtisanes*：*Archives secrètes de la police des mœurs 1861-1876*（Paris：Tallandier，2006），197-98.

[62] Gabrielle Houbre，ed.，*Le Livre des courtisanes*：*Archives secrètes de la police des mœurs 1861-1876*（Paris：Tallandier，2006），198；and Zed（pseud. Comte Albert de Maugny），*Le Demi-monde sous le Second Empire*：*souvenirs d’un*

sybarite（Paris：E. Kolb，1892），106.

[63] Étincelle（pseud. Vicomtesse de Peyronny），*Carnet d'un mondain*；“La Journée parisienne，”*Le Gaulois*（January 21，1880）；Maxime Gaucher，“Causerie littéraire，”in *La Revue bleue*（July 4，1885）：663-67，666.

[64] 世纪末许多关于德·萨德侯爵的讨论都明确把他称为“性欲倒错者”。例如D.A.F.，Marquis de Sade，*Idée sur les romans*，preface by Octave Uzanne（Paris：Rouveyre，1878），7；and Dr. Jacobus X.（pseud.），*Le Marquis de Sade et son œuvre devant la science médicale et la littérature moderne*（Paris：Charles Carrington，1901），19-28。

[65] Buffon，*Œuvres complètes*，vol. 6，384.

[66] 让·洛兰（Jean Lorrain，1855-1906），法国象征派诗人和小说家，同性恋者。

[67] “海豹”的法文phoque来源于拉丁文phoca；这两个词基本上是同音词。关于洛兰对RM的戏仿，除其他外，见Jean Lorrain（pseud. Paul Duval），*Monsieur de Phocas*：*Astarté*（Paris：Paul Ollendorff，1901），1-12。

[68] René Pocard de Cosquer de Kerviler，Sir Humphrey Davy，and Louis-Marie Chauffier，eds.，*Répertoire général de la biographie bretonne*（Rennes：1898），207.

[69] GS的表兄维利·布斯纳什写过一部喜剧，名为《白腹海豹》（*Le Phoque à ventre blanc*，1883），其中一个人物引用“海豹说妈妈，海豹说爸爸”作为交际家们喜欢的有伤风化的幽默例子。

[70] PM，*L'Allure de Chanel*（Paris：Hermann，1996），107-8 and 196；and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5. Descriptions of Frohsdorf are taken from（in order cited）：Fidus（pseud. Meyer），“Le Château de Frohsdorf，”*Le Gaulois*（July 5，1883）：1；Bernard Xau，“Derniers échos de Göritz，”《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9月9日），1-2；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18；Monti de Rézé，*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Paris：Émile-Paul，1930），10-12；Gyp（pseud. Comtesse de Mirabeau-Martel），*La Joyeuse Enfance de la III*e *République*（Paris：Calmann-Lévy，1931），131；and Jules Cornély，*Le Czar et le roi*（Paris：Clairon，1884），252-54.

[71] Comte de Pimodan，*Simples Souvenirs，1859-1907*（Paris：Plon，1908），162.

[72]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Elizabeth Vigee Lebrun，1755-1842），法国女画家，因给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画肖像而出名，法国大革命后离开法国到欧洲各地作画，一生创作有六百多幅肖像画和两百多幅风景画。

[73] Luigi Bader，*Album*：*le Comte de Chambord et les siens en exil*（Paris：Diffusion Université-Culture，1983），66-67；关于装有路易十七心脏的遗骨匣，以及它"几乎带着一种宗教意义"，见Jan Bondeson，*The Great Pretenders*（New York：W. W. Norton，2005），69-70。

[74] 关于红色沙龙及弗罗斯多夫内部装饰的描写参考了Jules Cornély，*Le Czar et le roi*（Paris：Clairon，1884），255 and 262；and Homme d'État（pseud.），*Histoire du Comte de Chambord*（Paris：Bray & Retaux，1880），249-50。

[75] Fidus（pseud. Meyer），"Le Jour de l'An à Göritz，" *Le Gaulois*（January 2，1880）：1.

[76]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99-100；and Monti de Rézé，*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Paris：Émile-Paul，1930），21-31；关于弗罗斯多夫的制服，见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99。

[77] Monti de Rézé，*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Paris：Émile-Paul，1930），33.

[78] Homme d'État（pseud.），*Histoire du Comte de Chambord*（Paris：Bray & Retaux，1880），250.

[79] Jules Cornély，*Le Czar et le roi*（Paris：Clairon，1884），255.

[80] 爵爷在1873年10月发表的《萨尔茨堡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关于法国国旗的立场，转录在Henri d'Artois，Comte de Chambord，*Lettres d'Henri V depuis 1841 jusqu'à présent*，ed. Adrien Peladan（Nîmes：P. Lafare，1873），234-36；又见Comte [Albert] de Maugny，*Cinquante ans de souvenirs，1859-1909*，ed. René Doumic（Paris：Plon，1914），195-96；and La Force，Auguste de Caumont，duc de. *La Fin de la douceur de vivre*：*souvenirs，1878-1914*. Paris：Plon，1961，107-10。关于爵爷的国旗立场的政治影响，见Alan Grubb，*The Politics of Pessimism*：*Albert de*

Broglie and Conservative Politics in the Early Third Republic（Wilmington：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96），50。关于AC对爵爷在回弗罗斯多夫的路程中哭了一路的叙述，见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304-5。

[81] Luigi Bader，*Album*：*le Comte de Chambord et les siens en exil*（Paris：Diffusion Université-Culture，1983），88. 关于包括AC在内的廷臣们为君主这次失败的重登王位努力所做的制服，见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343。据AM说，LC像保留遗物一样保留着那套制服。

[82] *Spes contra spem*，引自《圣经·新约》，《罗马书》4：18。

[83] 《罗马书》4：18。

[84] 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344.

[85] Schneider，*L'Éternité fragile*，295；AF，"Le Salon de l'Europe，" 457-76；and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81 and 105-6.

[86] 关于AC在弗罗斯多夫的任期，见《费加罗报》（1884年9月24日）：第1版；关于AC给予LC可以单独回巴黎的自由，见Schneider，*L'Éternité fragile*，295-96。

[87] 这两个男仆是一对父子。父亲服侍了爵爷五十多年，直到临终前的最后一刻；见Jules Cornély，*Le Czar et le roi*（Paris：Clairon，1884），277 and 362。

[88] LG，*Mémoires*，vol. 2，29-30.

[89] Monti de Rézé，*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Paris：Émile-Paul，1930），33. 关于爵爷"逗趣的示好"，见Dubosc de Pesquidoux，*Le Comte de Chambord d'après lui-même*（Paris：Victor Palmé，1887），68-70。

[90] 在弗洛茨多夫展示王室纪念品中就包括这件羽饰，仿佛每天都在责备亨利五世未能永远延续他的同名祖先开创的王朝。——作者注

[91] LG，*Mémoires*，vol. 2，28.

[92] René de La Croix，Duc de Castries，*Le Testament de la Monarchie*，vol. 5（Paris：Fayard，1970），33.

[93] 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19.

[94] Augustus Hare，*The Story of Two Noble Lives*：*Memoirs of Louisa，Marchioness of Waterford*，vol. 3（London：George Allen，1893），265.

[95] 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19；and LG，*Mémoires*，vol. 2，28.

[96] Luz，*Henri V*，130. 关于夫人对奥尔良派的憎恶，见Guillelmine Lucie Marie de La Ferronays，*Mémoires de Mme de La Ferronays*（Paris：Ollendorf，1900），261-62；and Otto Friedrichs，"Desinit in Piscem，" *La Légitimité* 19（May 16，1886）：289-93，290。LC后来对AM和MB说爵爷也恨奥尔良派，如果皇子拿破仑四世没有在非洲被杀，他本打算收养他并立他（而不是巴黎伯爵）为继承人的。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08.

[97] 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18.

[98] LG，*Mémoires*，vol. 2，29. 关于夫人不想看到丈夫登上王位和她对漂亮的巴黎女人的恐惧之间的联系，见La Force，Auguste de Caumont，duc de. *La Fin de la douceur de vivre*：*souvenirs，1878-1914*. Paris：Plon，1961，110。

[99] Huas，*Les Femmes de Proust*，164-65；and in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01. 关于LC这次失礼之后每天下午和夫人一起乘车出行，见AF，"Le Salon de l'Europe，" 461-62。

[100]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70；关于爵爷骑马打猎的嗜好，见LG，*Mémoires*，vol. 2，28；and Jules Cornély，*Le Czar et le roi*（Paris：Clairon，1884），263。

[101] 希尔德贝尔特一世（Childebert，496-558），法兰克人之王和巴黎国王。他是克洛维一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兰斯。公元511年克洛维去世后，其领地被分给了他和三个兄弟。长兄提乌德里克一世在梅斯，次兄克洛多米尔在奥尔良，幼弟克洛泰尔一世在苏瓦松，而希尔德贝尔特一世则在巴黎。

[102]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70.

[103]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0.

[104] 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343.

[105] PV，*Les Soirées de Paris*，33.

[106] 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344.

[107] LH，*Carnets*：*1878-1883*（Paris：Calmann-Lévy，1935），838. LH是从AC在弗罗斯多夫的一位廷臣德·布拉卡伯爵（Comte de Blacas）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

[108]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49. 另一位“标记距离”的行家里手是波利娜·德·奥松维尔；见MP，“Le Salon de la Comtesse d’Haussonville，”72。

[109] 圣巴斯弟盎（Saint Sebastian，约256-288），基督教早期的圣人和殉难者，传说他受到罗马皇帝迫害，被绑在树桩上用乱箭射死。

[110] 圣加大肋纳（Saint Catherine，约282-约305），基督教早期的圣人和殉难者。据说她多次拜访罗马皇帝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并试图劝说他相信，迫害基督徒是个道德错误。她成功地劝说皇后皈依了基督教，皇帝派来与她论辩的许多异教徒哲学家也纷纷皈依。皇帝把她关进监狱，后来以磔轮（breaking wheel）这一酷刑将她处死。传说她一触到轮子，轮子就坏了，最后被斩首而死。

[111] 普洛塞庇娜（Proserpina），罗马神话中冥王普鲁托的妻子，神话传说她被普鲁托劫持之后，被迫吃下了六颗石榴籽，因此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必须待在阴间，另外六个月则回到阳间跟母亲一起生活。

[112] Francesco Petrarcah，“Le Triomphe de l’Amour，”in *Pétrarque*：*Épîtres*，*éclogues*，*triomphes*，trans.（into French）by Comte Anatole de Montesquiou-Fezensac（Paris：Aymont，1843），97.

[113] 遗忘河（Lethe River），神话中的河流，为冥界的五条河之一，亡者到了冥界会被要求喝下遗忘河的河水，以忘却尘世间的事。

[114]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29；and MB on LC in NAF 28220，carton 57.

[115] 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Gianlorenzo Bernini，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画家。早期杰出的巴洛克艺术家，17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大师。贝尼尼主要的成就在雕塑和建筑设计，另外，他也是画家、绘图师、舞台设计师、烟花制造者和葬礼设计师。

[116] 阿涅丝·索雷尔（Agnès Sorel，1422-1450），号称法国历史上最美的女人，查理七世的情妇。传言查理七世对她一见钟情，相见第一晚便辗转难眠。后世更认为是她给予查理七世无比的勇气与自信，从英国人手中夺回诺曼底省。

[117] 迪亚娜·德·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1500-1566），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其子亨利二世在位期间的一位重要的宫廷贵族女性，后来成为亨利二世的“首席情妇”，更曾公开和亨利一起行使政治权力，权倾朝野。

[118] 加布丽埃勒·德·埃斯特雷（Gabrielle d’Estrées，1573-1599），法王亨利四世的情妇、红颜知己和顾问。她说服亨利在1593年放弃新教，支持天主教，后来又敦促法国天主教徒接受南特敕令，该法令授予新教徒某些权利。

[119] 蒙特斯庞夫人（Mme de Montespan，1640-1707），即弗朗索瓦丝-阿泰纳伊斯·德·罗什舒阿尔（Françoise-Athénaïs de Rochechouart），法王路易十四最著名的情妇。她出身法国历史悠久的贵族罗什舒阿尔家族，与路易十四生了七个私生子女。由于她与路易十四的浪漫关系，她的影响力在法国宫廷无处不在，有时被称为“法国真正的王后”。

[120] 曼特农夫人（Mme de Maintenon，1635-1719），即曼特农侯爵夫人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Françoise d’Aubigné），法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任妻子。她与国王的婚姻既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得到承认，因此她并不被认可为法国王后，但她在宫廷里的影响力极大，也是国王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121] 蓬帕杜尔夫人（Mme de Pompadour，1721-1764），即蓬帕杜尔侯爵夫人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法王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交际花，王室秘密后宫“鹿苑”的总管。

[122] 杜巴利伯爵夫人（Mme du Barry，1743-1793），即让娜·贝库（Jeanne Bécu），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也是恐怖统治时期中最知名的受害者之一。

[123] 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33-1701），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1685—1688年在位），也是最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英国国王。他的宗教政策和专权都遭到臣民反对，最终在光荣革命中被剥夺王位。他逃亡法国，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保护。

[124] 科丽桑德·德·吉什（Corisande de Guiche），即德·吉什伯爵夫人迪亚娜·德·安杜恩（Diane d’Andoins，1554-1621），被称作“美丽的科丽桑德”，1582—1591年是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未来的法王亨利四世）的情妇。

[125] Schneider，*L’Éternité fragile*，296；and “Échos du High-Life，” *Le Triboulet*（June 29，1879）：12.

哈巴涅拉舞曲 自由的鸟儿

爱情像一只自由鸟，谁也无法将它驯服。

——《哈巴涅拉舞曲》，选自乔治·比才，《卡门》；亨利·梅亚克和卢多维克·阿莱维作词

我跟着清风，我跟着姑娘，

我跟着心随着希望一起跳动的诗人……

不要对我诚实——就让我吻你的黑色双眸吧，

它们浓密的睫毛像蜂鸟的翅膀一样颤振。

—乔治·德·波托-里什，《夏娃的苹果》（*Pommes d'Ève*）中的《信札》（*Letters*，1874）

第4章 波希米亚的孩子

“难道说乔治背叛了我，正在跟我那位狐狸精朋友洛尔眉来眼去？快告诉我！”[1]1880年7月，31岁的热纳维耶芙（贝贝）·比才从瑞士的一个温泉疗养地写信给莉泽洛特（莉佐特）·德·波托-里什［Liselote（Lizote）de Porto-Riche］。这里所说的乔治是莉泽洛特的丈夫，25岁的诗人和剧作家乔治·德·波托-里什。多年来，放荡子波托-里什一直试图哄骗他的表姐兼密友贝贝跟他上床，自她的丈夫五年前去世，他越发不知廉耻地得寸进尺了。最近，他送给贝贝一首充满性暗示的诗歌，露骨至此，贝贝只好请求莉佐特管管他的“无礼”。不过事实上，贝贝很享受表亲的迷恋。甚至可以说，她就指望着这份爱恋呢。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有情敌要把他夺走，她就坐立不安。

事实上，波托-里什能认识洛尔，正是通过贝贝本人介绍；他们在贝贝和另一位爱恋她的堂兄卢多维克（卢多）·阿莱维每周四在蒙马特尔的杜艾街（rue de Douai）22号共同主持的沙龙上相识。（私下里，沙龙是贝贝主持的，但由于单身女人不该在家里接待男宾，她就在卢多维克家举办聚会，他们住在同一座公寓楼里，卢多维克就住在她的楼下。[2]）[3]当时，贝贝曾注意到洛尔和波托-里什之间擦出了明显的火花，但直到此刻出国度夏，她才明白应该有所警惕了。贝贝的确不想与波托-里什有什么风流韵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希望他跟自己的某一位朋友交往，尤其是狐媚的德·舍维涅伯爵夫人。

贝贝此时回想起来，她的表弟与洛尔初遇时就已经过于亲热，实在令她不快。洛尔漫不经心地无视礼貌谈话的规矩，从一开始就把波托-里什当成老友，直呼其名“波托”（按照礼节，她本应称他“先生”），还欢快地讲出一连串只有她的曾祖父德·萨德才说得出口的下流话。在城区的客厅和舞厅里，如此渎圣是不可想象的，在贝贝的沙龙里也一样耸

人听闻。虽然贝贝在自己家里招待艺术家，但她来自特权阶级，言谈举止和受人敬重的贵妇人一样得体。就连她圈子里的那些暴民煽动者在贝贝面前都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洛尔对此毫不在意。



热纳维耶芙·阿莱维·比才的英俊表弟乔治·德·波托-里什追求过她和其他许多女人。他发明了一种戏剧体裁，名为“情爱剧”

波托-里什显然被洛尔的大胆弄得心痒难熬，尤其她还是一位伯爵夫人，贝贝知道，这个头衔也让他着迷。波托-里什有着极端左翼的政治观。1871年，他曾因在巴黎公社加入了激进叛乱者的战斗队伍，险些被行刑。然而他还不大习惯贵族的声望。和贝贝一样，他也出身犹太人上层资产阶级的富裕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巴黎的社会精英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波托-里什因为追求文学事业而与父母疏远之后，一直都捉襟见肘，变卖了不少传家宝来支持自己的艺术。但有一项最宝贵

的财产是他绝不舍得丢掉的：一把珍贵的古董剑。朋友们猜测他之所以留着那件宝物，是因为他一厢情愿地“自认是……持剑贵族”。[4]作为一个到此时仍寂寂无名的作家——还是个犹太作家——波托-里什很少有机会与那个阶层的人交际，更不用说那些美丽的女主人们。整个巴黎贵妇阶层看起来都那么遥不可及，令这位屡教不改的色迷焦躁又心烦。因此，有人介绍他认识一位轻浮放浪的贵妇人简直是天降好运。他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见到“波托”也同样令洛尔兴奋，滔滔不绝地跟他讲起了自己的文学祖先，还说她天生对作家充满好感。这些特质至少在社交圈的女人中十分罕见——的确，洛尔出现在贝贝的沙龙本身，就显示了她不同于典型社交老手的冒险倾向。同样不同凡响的，是她毫不掩饰自己对男人的喜欢。这对波托-里什是个好消息，因为他的同行们一致认为他是“最性感的男人”。由于“凌乱的黑发（和）阴郁浪漫的苍白面色”，他让肖像画家雅克·布朗什[5]想起“一位来自巴格达的诗人”[6]，让剧院经理安德烈·安托万[7]想起“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上流社会编年史家安德烈·德·富基埃[8]后来通过洛尔认识波托-里什，也用类似的语词描写他：

> 他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精致面孔，浓密的头发看起来总像是刚刚被一股浪漫主义风暴吹乱，那双黑色的眼睛爱抚而忧郁地望着你，波托-里什是个天生的情种。[9]

正如波托的世界里缺少贵妇人，如此一目了然的性感在洛尔的世界里也一样稀有。这么比较的确不公平，但他闷骚的英俊面孔和潇洒风度确实让性能力低下的尚博尔伯爵和德·舍维涅伯爵都自愧不如。洛尔即刻就用那双眼睛挑逗起诗人，请他评价一下她本人像不像彼特拉克的缪斯。首次见面为她和波托持续一生的友谊开了个好头。

这两位的友谊和他们的婚外情一样令贝贝难以接受。波托-里什是贝贝沙龙里的常客，她把那群男人称为忠实门徒（*fidèles*），跟他们有

一个心照不宣的协定：他们有幸来陪伴她，作为回报，他们必须把她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这并不是说她希望他们抛弃妻子或情人——很多忠实门徒，如波托-里什，往往既有妻子又有情人。贝贝提出这个条件也不是因为她希望追随者们成为她的情人，她固执地不跟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上床。她希望从忠实门徒们那里得到的爱，事实上恰恰就是彼特拉克对洛尔的同名祖辈所怀有的那种爱：绝对尊重，没有一点点性爱的企图。因此，当贝贝问波托-里什是否“背叛”了她时，她知道他的过错首先是一种精神出轨——比身体出轨严重多了。

贝贝对此坚信不疑，以至于她毫不迟疑地问了莉佐特一连串关于洛尔有无可能成为情敌的问题，那个胆小心善的女人总是因为丈夫的淫乱而苦恼不已。而贝贝对于禁止莉佐特和其他大多数人的妻子（情人更是明令禁止）来参加自己的沙龙，也一点儿没有内疚感。

除了罕见的几例之外，贝贝极少允许女性宾客进入自己的圈子，这是她慎重考虑后的决定，为的是让自己在追随者眼中更加光芒四射。洛尔能够完美地实现这一目的。作为一个很受欢迎且很有魅力的贵妇人——传说的流亡国君亨利五世的宠儿——她是贝贝用来炫耀的宾客，可以向忠实门徒们展示自己了不起的社会关系。正如卢多维克·阿莱维的儿子达尼埃尔后来回忆的那样，德·舍维涅夫人沿着他们家公寓楼梯欢快地拾级而上，本身就向贝贝沙龙里的常客表明，他们那位永远出色的女主人做了一件不可能之事：引诱“有生”阶层的一员进入了波希米亚人的圈子。[10]

1880年6月底7月初，贝贝离开自己位于蒙马特尔的家前往瑞士的古尔尼格尔（Gurnigel），同行的有她八岁的儿子雅克，以及另一对母子：资质平庸的学院派历史画家的妻子本杰明·（厄拉利·）于尔曼夫人［Mme Benjamin（Eulalie）Ulmann］和她的女儿、比雅克小六个月的玛塞勒。贝贝这次旅行既是度假也是温泉疗养，以便缓解她一生大部分

时间都深受其苦的神经疾病。

贝贝的父母双方都有遗传的精神问题，在她身上体现为神经衰弱，巴黎首屈一指的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医生认为，这一疾病最常出现在女人和犹太人身上。[11]贝贝的症状表现为紧张不安的焦虑和萎靡不振的绝望交替发作，其他症状包括疲惫、食欲不振、呕吐、背部痉挛以及面部抽搐的加重，九年前她与母亲莱奥妮·阿莱维（Léonie Halévy）发生了一场极不愉快的冲突，首次出现了最后这种症状。[12][13]从那以后，贝贝一直尽量避免与莱奥妮见面。但那年夏初，她鼓起勇气和母亲见了一面，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症状复发了。这次挫败迫使贝贝意识到她的精神有多脆弱。因此如果医生命令她在瑞士-德国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区休养几周——“想看到最近的文明世界的迹象，要走六个小时的路程”，她在一封信中对卢多维克的母亲亚历山德里娜·（纳尼内·）阿莱维抱怨说——那么贝贝知道不管愿不愿意，她都应该遵医嘱。[14]

此刻，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待在这里。新鲜的山区空气和田园风光本该让她安心，但远离家中那些令人鼓舞的娱乐活动，让她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糟。如果她还在巴黎，就能在杜艾街上卢多维克的客厅里接待崇拜者，穿一件她喜欢在会客时穿的不雅的睡衣斜靠在躺椅上，八卦、调情，时不时给自己黑色的宝贝贵宾犬薇薇特［这个名字取自她亡夫的歌剧《阿莱城姑娘》（*The Girl from Arles*）中的一个人物］喂点儿羊角面包屑。[15]她会在玩牌时让梅亚克赢——不然他就会像个学步的幼儿那样闷闷不乐。[16]她会让德加陪她去女帽商那里。[17]他之所以同意陪她做这差事，往往是因为他喜欢研究女店员们长满老茧的红色手指，不过这些出行中至少有一次被他当成了为贝贝本人画素描的机会。她会在朋友亚历山大·仲马（小仲马）的新剧首演时为之鼓掌欢呼，或是在她亡夫或亡父的某个剧作重演时坐在前排的重要位置。她会摆好姿势让某一位画家朋友为自己画像，她喜欢这位朋友的肖像画胜过德加的

——埃利·德洛奈，他在自己的寓言人物画中借用了她的脸，也创作了她最喜欢的自己的肖像画；或者奥古斯特·图尔穆什[18]，他以她为原型，创作了颇受欢迎（且身份不明的）“现代美女图”。[19]她会骑着自己的马“尼普顿”在布洛涅森林里漫步，享受路人投来的凝视——尤其是那些头戴高礼帽、身穿长礼服的交际家们，她在社交专栏中读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或许也知道她的芳名。

作为一个神经衰弱的人，贝贝不得不长年外出旅行：“温泉疗养”之行是她精神健康疗法的一个定期处方。然而她讨厌离开巴黎——向来如此。就算如今，在近20年后，她仍然能记起1861—1862年冬天，自己只有11岁，父母带她和姐姐埃斯特前往尼斯时，她有多义愤填膺——实际上，那是医生为她们的父亲开的温泉疗养的处方。比她大六岁的埃斯特在全家出行时充当了她的家庭教师。在尼斯短暂停留期间，埃斯特让贝贝写一篇作文，题目自选。作为土生土长的巴黎人，贝贝认为自己来自大城市，实在受不了里维埃拉慢节奏的乡下生活，因而写了一篇文章来赞美自己家乡的优越性。她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一再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城市适宜生活，那就是巴黎。”[20]

贝贝接着写道，对任何有点自尊的城市居民来说，就算短期离开首都，“也会无聊至死”，因为“美丽的大自然、新鲜的奶油、野草莓，还有装着绿色百叶窗的农舍”根本不足以取代家中“轰轰烈烈的聚会和娱乐”。在文章结尾，贝贝重申了开头的论点，还幻想出了一个由她作为君主统治的世界：

> 如果有朝一日我当上皇帝，或至少当上皇后，我会对每一个抱怨城市拥挤和噪音的人玩这么一个小伎俩：我会强迫他们住在首都之外不准回来，直到他们自己也坚信人只能生活在巴黎，除此之外不管在哪里，都只会有乏味无聊的生活！[21]

从贝贝写下这些句子后，将近20年过去了——法国皇帝退位也过去

了十年——但她关于巴黎的看法却始终未变。她对自己身为“青蛙”极为自豪，那是旧制度下凡尔赛宫的廷臣对巴黎人的昵称。[22]让洛尔·德·舍维涅之流的贵族朋友们去吹嘘他们纯种乡绅的古老历史吧。作为“青蛙”和犹太人，贝贝是彻头彻尾的世界主义者；她常说这两个属性把她变成了“双料巴黎人”。[23]



埃德加·德加，《在女帽商店里》（***At the Milliner***，**1882-1885**）：德加是热纳维耶芙一家的老朋友。他有时会陪她一起去买衣服和帽子，还喜欢看她梳头发

古尔尼格尔是她去过的最不像巴黎的地方，远比尼斯无聊；贝贝决定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虽然遵从了阿尔卑斯山疗养的程式——泡温泉、漱喉、催眠按摩、为恢复健康而在大自然中散步——但她焦虑地思考着她的缺席会给家中的追随者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处距离巴黎山长水远，她无法那么笃定他们的忠诚了。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写完给莉佐特的短信后，贝贝很快另写了一封信给波托-里什。这是个顽皮的奇袭，万一他已经忘了她，这封信算是提醒她的存在：

> 我亲爱的朋友，我在这世界的尽头，真让人沮丧，沮丧极了！不过我很自私地想，要是你在这里陪着我就好了……请给我一些你的消息吧——我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位朋友的近况，因

> 为我此刻所在的乡下简直跟德国一样沉闷……我在这里没有丝毫乐趣，我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31岁），生活中的乐趣会越来越少。此刻我正要出去骑马，重拾一点生趣。要是没用，我就别无选择了，只好弄弄室内装饰——或者与人偷情！来这里看看我吧，看你还有没有别的坏主意！[24]

她简直就像是与波托-里什直接交谈，这些文字传递的风趣轻佻的调调一点儿也不亚于和忠实信徒们直接交谈。尽管贝贝公然和每一位男性同伴调情，但她严格恪守“只是朋友”的原则，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推向了绝望边缘。每当她看似要把其中的某一位永久逐出自己的圈子时，她会让那人想想或许，只是或许，她可以被说服，只为喜欢他而对他网开一面，如此再把他拉回到自己的股掌之上。她是亡夫的《卡门》（1875）中那个红颜祸水的标题人物的灵感来源，并非事出无因；据她的表兄、同为忠实信徒的路易·冈德拉[25]说，比才本人曾说过，她就是那个人物的原型。贝贝根据经验知道，一点点性承诺的暗示可以管用很长时间。如果她让波托-里什觉得她最终还是可以跟他缠绵缱绻的，那么理想情况下，他就不会再想洛尔·德·舍维涅，又要对她想入非非了。

贝贝需要波托-里什保证对自己的爱意未改或许不能正式列入她的神经衰弱症状，但不需要太专业的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识就能看出，正因如此（用她一位朋友的话说）“病态地惧怕孤独”，才刺激了她的人际关系。[26]的确，贝贝的整个人生规划都围绕着一种远离孤独的渴望。一个有安全感的女人会觉得有这么一大群忠实的朋友已经足够证明自己被爱了，但贝贝打心底里觉得，只要她没有足够用心地经营那些友谊，她必会孑然一身，孤独终老。

每次向忠实信徒们道出这一担忧时，她往往会用一种轻快的口气，就像开玩笑地请求波托-里什给她出点儿“坏主意”。曾有一次，两人都在巴黎，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杜艾街，她寄给他一张卡，也用了

同样开玩笑的口气：“我不耐烦地等了五分钟，然后开始在家具下面找你——但没看见波托-里什！快回到我跟前来吧，你这胆小鬼逃兵。”[27]另一次，她把自己的一幅肖像的带框复制品寄给他，“这样你似乎就能在模拟像里跟我神交”，就“不会丢了爱我的习惯啦”！

有时，她的恐惧会以一种更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另一封未署期的致波托-里什的长信中，她写道：

> 我希望不久以后就能见到你，因为当你厌倦了让那些事实上只有一点点爱你的人给你很多爱……一定会留五分钟时间给最亲密的老朋友。

如这一段落所示，贝贝也不过是一般性地动用些手段，让自己的忠仆们心驰神往。她暗示波托-里什的新同伴们不像她那样喜欢他，就发出了一个不怎么含蓄的讯息：他应该放弃她们，转而投向她这个“最亲密的老朋友”。但她的狡黠出卖了那种灼烧内心的焦虑，那就是在每一位忠实信徒的心底，都藏着一个潜在的逃兵。这个词常常出现在贝贝的通信里，不光是与波托-里什的通信，与沙龙很多常客的通信都是如此，马塞尔·普鲁斯特最终也包括在内。1922年，在他死前几个月，也就是她自己过世前几年，她写信给他，问自己是否已经“在（他的）心目中‘破碎成灰’”，然后又先声夺人地感谢他“没有抛弃我，让我孤身一人死去”。[28]

贝贝一方面担心被生命中的男人们抛弃，另一方面又因为无法控制身边的几位女人而烦躁不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她的婶婶纳尼内·阿莱维，后者跟她一样有种滑稽不恭的幽默感（纳尼内的临终遗言是“哦，孩子们，我多么热爱……语法啊！”[29]）。贝贝视纳尼内为同道中人，跟她频繁通信，时不时吓唬对方她们对彼此的感情可能会慢慢消失。“不要太习惯于没有我的生活，我亲爱的小婶娘，”贝贝在1878年写信给她说，“因为我即将回家，收复我的宠儿的地位。”[30]

贝贝大概不愿意承认，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从母亲身上继承了那种强迫症般独占一切的社交倾向，莱奥妮娘家姓罗德里格斯-昂里凯斯（Rodrigues-Henriques），在贝贝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莱奥妮总是不停地交际娱乐。作为闻名于世的作曲家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个雄心勃勃的雕塑家，莱奥妮喜欢召集一群艺术家在身边，他们位于巴黎第九区的公寓一周七天大宴宾客。莱奥妮在波尔多的富裕犹太人社区长大，母亲来自格拉迪斯家族，因而也继承了一部分家族王朝从海运业中获得的巨额财富。这样的财富使得莱奥妮摆脱了其他巴黎艺术家妻子的家务负担，可以把全部精力投注在朋友们身上。她比弗洛蒙塔尔小21岁，主持着一个巨大而热闹的沙龙。

根据阿莱维家的一位常客、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31]的说法，在全盛时期，这对夫妇的客厅就像“一间真正的苏格拉底的小屋”，充斥着“天才人物”和他们的作品。[32]（莱奥妮从她的波尔多家族那里继承了不少珍贵的艺术品，也花费巨资来扩充自己的收藏。）但即便有一群男仆和女佣来伺候她和朋友们，家里还是过于拥挤，近乎混乱。弗洛蒙塔尔在一个巨大的钢琴柜上作曲，钢琴柜正中间的抽屉拉出来是一个全尺寸的钢琴键盘。这是弗洛蒙塔尔自己发明的家具，家里除了妻子举办招待会的客厅外，哪儿也放不下这个庞然大物。因为这一限制，他不得不培养出巴黎歌剧院经理爱德华·莫奈斯[33]所谓的“一种全然不为外界所动的专注”。莫奈斯怀疑，如果没有那样的专注，弗洛蒙塔尔根本不可能“作曲……因为家里从早到晚都人声鼎沸”。[34]

德拉克洛瓦与莫奈斯一样担心这种生活方式会对其朋友的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吵闹声中完成任何严肃的作品呢？”德拉克洛瓦在自己的日记中问道。贝贝儿时的一个夏天，他说服阿莱维一家离开城市到科尔贝（Corbeil）休息一阵子，他在那个河边的小村落里有一座避暑别墅。弗洛蒙塔尔很喜欢这个建议，以至于他不仅在科尔贝租下一处宅子，还买了一个别墅。然而在那里住了仅仅几天后，莱奥妮

就崩溃了，认为那里的宁静和安逸“令人窒息”，要求全家人立刻赶回巴黎。“我只见了F. 阿莱维夫妇两次，他们就已经要走了，”德拉克洛瓦抱怨说，“他们这些社交名士啊，一周中每晚都得请朋友们来打扑克，要不就活不下去。”多年后，德加对他们的小女儿重复了这句对“F. 阿莱维夫妇”的指责，他不满地提到贝贝“被她的社交生活吞噬了”。[35]

贝贝疯狂地沉迷于社交生活，与其说是对莱奥妮的自觉模仿，或许倒不如说是对父母在她成长过程中极少培养她“全然不为外界所动的专注”的延迟反应。1849年2月26日，贝贝出生时，父亲已经49岁了，正处在一个艺术创作复兴期。三个月前，他的新歌剧《安道尔山谷》（*Le Val d’Andorre*，1848）开演，好评如潮。这是他自《犹太女》以来最大的成功，在评论界和普通观众中广受好评。《犹太女》是一部大歌剧，写的是犹太女人拉谢尔和基督教王子利奥波德之间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这部世界闻名的歌剧被理查德·瓦格纳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剧之一”，它收获的巨大声誉令弗洛蒙塔尔在它首演后的那些年一度担心自己此生还能否超越它。《安道尔山谷》的成功让他重拾艺术自信，开启了一段疯狂的创作期。贝贝是他和莱奥妮的次女，她降生时，他正完全沉浸在下一部喜歌剧《玫瑰仙女》（*La Fée aux roses*，1849）的创作中。他还忙着在巴黎音乐学院教导年轻的作曲家。那是他的母校，也是法国最好的音乐学府。他全身心地投入专业，而莱奥妮又沉迷于社交，阿莱维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他们的新生儿——也没多少时间去管他们早熟的大女儿、时年六岁的埃斯特。

贝贝还在襁褓中时，全家曾短期旅居伦敦，以便弗洛蒙塔尔监督他根据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改编、与《犹太女》的剧本作者欧仁·斯克里布共同创作的音乐剧的排练，同时也是为了参加《犹太女》和《安道尔山谷》在英国的公演。[36]阿莱维一家到达后不久，就应邀觐见了1848年被推翻后一直流亡英格兰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王室的召见确认了弗洛蒙塔尔跻身法国当世最伟大艺术家的地位，也开启了阿莱维

一家在伦敦的昂贵的社交生活。

一年后，全家回到巴黎，弗洛蒙塔尔继续通宵达旦地创作，一举创作了另外两部喜歌剧《黑桃皇后》（*La Dame de pique*，1850）和《流浪的犹太人》（*Le Juif-Errant*，1852），还在音乐学院承担了更多的教学任务。他主动应征国民自卫军[37]——有一批像他本人这样的中年法国艺术家年轻时曾因获得了荣耀的罗马大奖[38]而被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因而十分重视这项公民义务。所有这些职责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了，而在1854年，他又担起了另一项职责：法兰西艺术院的终身秘书。这个德高望重的闲职是拿破仑三世政府赋予他的，他担任该职位后，还获得了位于左岸的法兰西学会大楼里的荣誉住处，那里是包括法兰西学术院在内的法国全部（五个）学术学会的所在地。阿莱维一家位于孔蒂码头那座金色穹顶大楼里的公寓，这里成为莱奥妮昼夜不停地举行招待会的新基地。



爱德华·迪比夫[39]：《孩童时期的比才-斯特劳斯夫人》（***Mme Bizet Straus as a Child***，约**1850**年代）：热纳维耶芙生在物质生活奢侈的家庭，但父母没有给过她

多少关爱

就算在金碧辉煌、将塞纳河美景尽收眼底的新公寓里，贝贝的母亲也焦躁不安。她除了每天的沙龙外，还有大量的通信。这些信件的本意是为了密切关注自己的朋友，很像贝贝后来在自己整个成年生活中写信的口吻——文风中既有责备，也有挑逗。“说说你的近况吧，”莱奥妮对一位偶尔来孔蒂码头做客的人说，

> 一旦有谁成了我的朋友，我就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或许我不该问你在做什么！此时此刻我都能想象出你的嘴唇嘟起来、眉头皱起来的样子。唷！我收回——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告诉你，我有多喜欢和欣赏你。[40]

正如她后来对贝贝解释的那样，“关爱是唯一能给我帮助的东西”。[41]

莱奥妮的确需要临床意义上的帮助。她和弗洛蒙塔尔都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如今应可算作临床抑郁症。莱奥妮患的很可能是躁狂症，表现方式先是狂乱的精力充沛和怪异的沾沾自喜，紧接着就陷入抑郁。她疯狂时，过度活跃的目光掠过自己的沙龙和雕塑，二者都让她自以为是地夸耀起“我但凡是个男人”，她的艺术天分本该让她举世闻名。

在这种过于兴奋的状态中，莱奥妮也会开启惊人的购物狂欢，一车一车地拉回各种装饰品，塞进他们位于孔蒂码头的公寓里。[42]虽然见多识广，但她在狂欢中收集的那些“艺术品”却多半是垃圾：坏了的小型取暖器、破碎的陶瓷、有裂缝的锅碗瓢盆。莱奥妮花费巨资买来这些丑陋无用的东西，德拉克洛瓦甚至担心她总有一天会把整个家庭“拖进救济站”。作家和美学家爱德蒙·德·龚古尔把阿莱维家日益凌乱的住处比作“小型沙朗东”（也就是1814年德·萨德侯爵去世的那家疯人院）。

自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贝贝也经历了同样难以忍受的吵闹和孤

单。如果说这些对她的影响大于对她姐姐的影响，那或许是因为埃斯特当时已经跟她们喜爱和敬重的堂哥卢多维克·阿莱维订婚，可以指望即将到来的婚姻让她逃离家中的一切。人人都说埃斯特是个聪明有爱的少女，她总是尽可能地对妹妹尽到母亲的责任。但她无法弥补父母彻底无视贝贝的需求。贝贝八岁时写给父母的一封信就明白无误地展现了那种无视，令人揪心，那时他们离开她，把她无限期地留给祖母照看：

> 我亲爱的爸妈，我很难过你们今天又没来，请求你们明天一定要来。跟你们讲讲我昨天是怎么过的吧。我醒来后洗了个澡，然后去散步，再然后就上楼学习了。后来我下喽（原文如此），在奶奶身边安静地读书。然后我们上楼干活到四点。有的时候不得不整理线头到五点，让我心烦意乱。然后我吓（原文如此）楼到前门去看你们有没有来，因为我们不能去找你们……门口站着一个你们派来的人，替你们对我们说你们不会来了，这让我们非常不安……那就是我的一天，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全心全意地吻你们。贝贝。[43]

和洛尔·德·萨德一样，贝贝·阿莱维也培养出迷人的个性，来应对成长过程中的压力。成年后，她用一个难忘的说法来描述自己的少女时代：“我孩提时就被父母抛弃了，像大拇指汤姆[44]那样——只不过我是被留在法兰西学会的楼顶上自生自灭！”[45]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强调了她作为知名艺术家之女（后来又成为知名艺术家之妻）高不可攀的地位。鉴于法国人对文化和学术成就的极大敬畏，法兰西学会大楼是全国最负盛名的建筑物之一。从塞纳河望去，它那金光闪闪的宏伟穹顶是左岸天际线的主要景观，在穹顶周围的楼顶上玩耍的故事在法国人听起来魅力无限，就像英语世界的人听到有人在白金汉宫或白宫的楼顶度过了整个童年。

不过在另一个层面上，她被父母抛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

每当莱奥妮因为疯狂症状加重而再度进入精神病院，此事就会噩梦成真。[46]1854年贝贝五岁，莱奥妮那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埃米尔·布朗什[47]医生位于帕西的疗养院里度过的，布朗什的病患多是巴黎最有钱也最有名的人，其中很多都是闻名遐迩的艺术家。（贝贝在写给堂姐瓦伦丁的一封信中回忆起小时候去那里探病的情况："我很害怕那些疯子。但布朗什夫人安慰我说，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人！"[48]）布朗什的疗养院所在地距离洛尔·德·萨德长大的那条街不远，是一座18世纪的庄园，曾经是法国正统王妃德·朗巴勒亲王夫人[49]名下的财产。精心修建的草坪占地12英亩，上面点缀着不少凉亭，病人可以在那里进行整套治疗，大部分疗法都要利用帕西著名的温泉：洗肠、漱喉、冷水澡，以及持续几个小时乃至几天的泡澡。



作为法兰西艺术院的终身秘书，热纳维耶芙的父亲在俯瞰塞纳河的法兰西学会大楼里得到了一间公寓

布朗什医生虽然自称专家，却无法治愈莱奥妮。1864年春天，贝贝15岁生日后不久，母亲再度住进了他的诊所，一住就是四年。这一次，弗洛蒙塔尔的两个未婚的姐姐弗洛尔和梅拉妮·阿莱维也和她一起入院，这两位此前一直都和埃斯特（以及一位英国女家庭教师）一起承担照顾贝贝的责任。让她们的小侄女难过的是，她们余生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布朗什医生诊断她们患上了“彻底的痴呆症”。[50]

到母亲和姑妈们开始在帕西长住之时，贝贝已经失去了父亲，1862年3月他去世时，已经有一个星期处于疯癫失常的状态。他的弟弟莱昂·阿莱维（也是布朗什诊所的病友）写道，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的上午，弗洛蒙塔尔让埃斯特和贝贝“按照音阶*do*，*re*，*mi*，*fa*，*so*，*la*，*ti*，*do*的顺序（把他平放在沙发上），最后再把他的头放在靠垫上”。女儿们刚刚把他放好，他就去世了。



热纳维耶芙的许多亲戚都曾在布朗什医生位于帕西的著名精神病院里寻求治疗。她的姐姐在那里离奇死亡

弗洛蒙塔尔被安葬在许多著名法国艺术家的长眠之处蒙马特尔公墓，贝贝和埃斯特不得不在没有母亲陪伴的情况下走在送葬队伍中；莱奥妮再次入院和父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她们变成了真正无父无母的孤儿。从孔蒂码头横穿巴黎到蒙马特尔高地那段路程，两旁有无数乐迷列队送葬，那一定是两个女孩一生中很恐怖的经历，也对贝贝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一位弗洛蒙塔尔的抬棺者后来说："母亲完全是个癫狂的疯子，小女儿也越来越像母亲了。"[51]

两年后，贝贝遭受了另一记重大打击，埃斯特——"唯一一个让我有可能经受住苦难的人"[52]——在布朗什医生的诊所离奇死亡。1864年4月初，22岁的埃斯特去诊所陪伴莱奥妮，或许她自己也在那里接受某种治疗（但她母亲后来坚称，埃斯特来时身体十分健康）。贝贝和家庭女教师一起留在巴黎。到诊所两周后，据称埃斯特患上了支气管炎。三天后的4月19日，贝贝的奶妈带着她赶到帕西，只来得及见姐姐最后一面，埃斯特死在了妹妹的怀里。

几十年后，卢多维克的儿子达尼埃尔·阿莱维曾写道，贝贝的一位表兄——路易·冈德拉的弟弟艾蒂安曾向他透露过埃斯特之死的真相。一天晚上，莱奥妮试图在疗养院的一个池塘里自杀，大女儿跳入水中救了她，但自己随后患上了致命的高烧。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可信，但并不符合布朗什医生的儿子、画家雅克-埃米尔（雅克）·布朗什的说法：诊所所在地根本没有池塘，这是老布朗什当年刻意做出的景观设计，"以免诱惑自杀之人"。[53]

埃斯特死后好几个月，布朗什医生一直瞒着莱奥妮。当他最终透露这个消息时，莱奥妮爆发出一阵偏执狂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叫嚷说是贝贝杀死了埃斯特。莱奥妮不愿意动摇这个想法，禁止贝贝出现在她的

面前，让贝贝发布法律声明，宣布自己是一个亲戚——巴黎银行、铁路和房地产大亨埃米尔·佩雷尔（Émile Pereire）——的被监护人。[54]就这样，贝贝被踢出了父母在孔蒂码头的公寓，搬到了佩雷尔位于蒙索平原（*la plaine Monceau*）的庄园里，蒙索平原是佩雷尔和弟弟伊萨克参与开发的右岸富人住宅区。

贝贝如今失去了全部最亲近的家人，还被母亲指控犯下了莫可名状的罪行，她陷入抑郁，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她的监护人无法为她重建安全感；事实上反而无意间增加了她的精神压力。1852年，埃米尔和伊萨克·佩雷尔创立了一家银行，动产信贷（Crédit Mobilier）银行，它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但贝贝成为埃米尔的被监护人之后不久，银行经营状况就直线下滑，归咎于投机性的投资决策、可疑的业务和山雨欲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佩雷尔兄弟的对手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毫不手软。[55]到1866年，动产信贷银行已经损失了近9500万法国法郎。一年后，银行倒闭。186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买下了佩雷尔位于蒙索平原的宅邸，出价比兄弟俩十年前购买的价格低40%。

监护人的财富地位急剧下降加重了贝贝的痛苦，她的堂兄卢多维克痛心地注意到这一点。“这么多年，有太多的灾难降临在那个可怜的孩子身上！”他写道。“这么多痛苦，失去了这么多亲人！”[56]深爱着埃斯特的卢多维克也经历着爱人离世的巨大痛苦。他的母亲纳尼内·阿莱维担心卢多维克会因悲伤而移情明显受到精神困扰的贝贝。于是在1868年，纳尼内催促他与路易丝·布勒盖（Louise Breguet）结婚，她是一个瑞士钟表世家的新教徒女继承人。婚礼之后，卢多维克精神失常了几周时间，一度变得对路易丝充满“攻击性”[57]，以至于双方的父母都担心她的安全，在布朗什医生干预之下，把他带离了她的身边。几个月后，卢多维克恢复了理智，和路易丝团聚。路易丝曾私下里担心“或许卢多维克（对他们的婚姻）缺乏热情”是因为他觉得她“或许是（某种）恶魔”[58]，现在这样的担心也消除了。不过传记作家曾指出，卢多维克从

来没有真正从埃斯特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一生对她都充满痴迷，还把爱意延伸到了贝贝身上。

卢多维克结婚时，贝贝仍旧在丧亲之痛中拼命挣扎。在日记中，她请求上帝为她抚平伤痛：

> 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那些残酷时光的可怕记忆：让我和我爱的一切天人永隔。它们（岁月）既无法抹去，也无法治愈我的伤痛。哦，埃斯特，我亲爱的姐姐，有你在身边，我可以承担一切，上帝在这尘世把我们分开了，愿他赐我力量，有朝一日能有幸在你身边获得一席之地。哦，主啊，您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拿走了，您把我那么深爱的、让我的心灵和生活充满欢乐的姐姐带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体会父亲带给我的欢乐，就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而您甚至没有留下母亲的爱来安慰我——我也不可以试图用我的关爱抚平她的创伤和不快！您让我在这世上孑然一身，哦，主啊！……一切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永远结束了，您难道不能赐予我一些怜悯吗？如果我不够好，请想想看，至少我也非常不幸，我请求您的原谅，还有您的帮助啊……请不要弃我而去……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一些慈悲吧，帮助我，让我值得被您垂怜，让我配得上我悼念的那些人的爱。[59]

用传记作家尚塔尔·比朔夫（Chantal Bischoff）的话说，这篇日记是典型的幸存者负罪感案例：

> 热纳维耶芙充满了无可挽救的负罪感——她因为父亲和姐姐都死了而她还活着而内疚，因为没有给父亲足够的爱而内疚，因为没有在拥有爱的时候充分享受快乐而内疚，因为没能安慰母亲而内疚……如果上帝让她所爱的每一个人都离开了她，那是因为她配不上他们！[60]

比朔夫进而指出，虽然贝贝这篇充满罪恶和原谅语词的祈祷文听起来“更像个基督徒而非犹太人”[61]，它事实上呼应了《犹太女》的同名女主人公拉谢尔剧中的那句“配得上父亲和她的亲人”。贝贝恳求上帝，也证明她后来自称“我没有多少宗教可改”不是实话，且表明如果说她在成年后没有宗教信仰，或许并非因为她从未有过，而是因为她在自己黑暗而动荡的青年时代失去了信仰。

自责和绝望永远留在了贝贝的心里，每当更多丧失亲人的痛楚逼近，它就会变本加厉地浮出水面——伴以关于溺水的逼真幻觉和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温柔的心永远不会忘记。”19岁的她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对它们来说，”她又写道，“过去不死——只是缺席。”[62]如今读来，很像威廉·福克纳那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63]

1869年春，20岁的贝贝与30岁的乔治·比才订婚时，那片乌云才暂时散去了，身材魁梧、满脸胡须的比才曾在音乐学院跟随贝贝的父亲学作曲。比才的热情奔放与贝贝的忧郁矜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外省长大的孩子喜欢穿海军条纹休闲上衣，戴针织围巾和草帽：她那些头戴高顶礼帽的巴黎亲戚们很少会穿戴成这样。然而这位貌不惊人的乡下淳朴小伙子有着惊人的天赋，贝贝已故的父亲很赏识这一点。从音乐学院毕业后，比才像弗洛蒙塔尔一样，获得了声望极高的罗马大奖。

贝贝之所以决定嫁给比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弗洛蒙塔尔的关系。她在接受他的求婚之前，曾私下里与一位名叫亨利·勒尼奥（Henri Regnault）的学院派艺术家订了婚，后者也是罗马大奖获得者。[64]然而父亲的死似乎让贝贝倾向于他的得意门生，鉴于在生命最后数年里，弗洛蒙塔尔与学生在一起的时间远远多于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变化似乎也是合理的。从象征意义上，与比才的关系对贝贝而言就像是获得了重新与父亲建立联系的机会，早在父亲死前多年，工作就已经把他从女儿的身边带走了。

很久以后，贝贝甚至会编出一个故事，说弗洛蒙塔尔曾“有一天走进她的房间，说‘我的学生比才想要娶你为妻。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不过你瞧，我跟你说过了。’”而她回答：“我愿意。”[65]然而如果她对小说家朱利安·本达[66]描述的这一场景属实，那就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她至多12岁时就向她传达了比才的求婚意愿，因为弗洛蒙塔尔去世时，贝贝刚满13岁。此外，虽然她青年时代或许很可能曾在各种演出中碰到过比才，他却并没有在通信中提到过她。直到她17岁那年，比才对自己的一位音乐学生埃德蒙·加拉贝尔（Edmond Galabert）透露：“我遇到了一个深得我爱的天真女孩！两年后，我一定要娶她为妻！”[67]比才不得不等到贝贝年满19岁才能嫁给他的说法，显然与她对本达讲述的事件版本相矛盾。不过她把弗洛蒙塔尔作为自己婚姻的中间人表明，当她决定嫁给比才时，父亲的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或许是母亲对这桩婚姻的强烈反对，让贝贝把父亲的祝福当成了一剂解药。作为显赫的犹太人格拉迪斯氏族的后代，莱奥妮觉得不名一文的小资产阶级、非犹太人比才——一个做了钢琴教师的外省理发师的儿子——作为她仅剩的女儿的结婚对象，是不可接受的人选。到此时，莱奥妮已经在巴黎郊外的另一所疗养院住下了，她在布朗什医生位于帕西的诊所住了四年之后，后者把她送到了那里。虽然她怒不可遏地反对贝贝订婚都是通过信件表达的，但她的不快还是让比才很受伤。他对卢多维克抱怨说：“阿莱维夫人只尊重那些有社会地位（和）钱的人！！！！！”[68]

比才的家人同样不支持这桩婚姻。他鳏居的父亲阿道夫·比才（Adolphe Bizet）逐渐接受了来自巴黎的犹太人儿媳妇，但其他亲戚却和莱奥妮一样强烈反对——他们是一群极端保守的低中产阶级天主教乡下人。（在他们的观念里，“娶个犹太女人是世上最大的灾难”。[69]）但这对夫妇顶住了压力。1869年6月3日，他们在第九区举办了一场世俗婚礼，婚礼只有几位家人参加，包括新郎的父亲和新娘善良的舅舅、莱奥

妮的弟弟伊波利特（伊波）·罗德里格斯［Hippolyte（Hippo）Rodrigues］。伊波是来自波尔多的成功银行家，他挺身而出，给了这对新婚夫妇精神和财务上的支持。[70]

结婚头几年，比才对朋友说他和他的“宝贝”（这是他对她的昵称）“在一起很快乐”[71]，“非常快乐”[72]。贝贝在婚礼后就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但她丈夫这段时期写下的文字表明他们的关系充满关爱与和谐。和每一桩婚姻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特别是关于钱的问题。为了维持生计，比才不得不教授钢琴课，而当从小过惯了奢侈生活的贝贝知道他们只雇得起一个侍女时，大吃一惊。在丈夫的请求下，她雇了一位名叫玛丽·赖特尔的年轻女人，后者曾在外省伺候过比才的父母。那时，贝贝相信了丈夫其他的家庭成员认定的事：玛丽·赖特尔的小儿子让是阿道夫·比才的私生子，因而是乔治同父异母的兄弟。

在赖特尔一家的陪伴下，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巴黎北部郊外的蒙马特尔镇。镇子坐落在一个425英尺的高地上，顶上居然有三架风车，对于那片浓雾弥漫的天际线，这可是出乎意料的点缀。从整个巴黎都能仰望到那一带充满田园牧歌风情的轮廓，但那片街区却是有名的滋生暴动和渎职的温床。蒙马特尔在1871年爆发了最残酷的平民大屠杀，在部分意义上解释了它何以恶名远扬，在全部意义上解释了它最高处那座搭着脚手架、蒜头一样的白色轮廓：圣心堂，政府当时正在建造那座教堂，为巴黎公社的血腥流血事件和普法战争的国耻赎罪。然而蒙马特尔那种反主流文化的神秘性也源自在那里安家的艺术家们，亨利·穆杰[73]在浪漫故事集《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情景》（1851）中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波希米亚人”涌入这一区域不仅仅为了那里活泼自由的氛围，也因为那是全城租金最便宜的地区之一。地势越低，距离巴黎市中心越近，房价就越高。不过蒙马特尔地势较低的部分也有一种艺术家云集的感觉，为巴黎创作阶层中较为富裕的成员所青睐。



乔治·比才是热纳维耶芙的父亲在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和信徒。她为了嫁给他，解除了与画家亨利·勒尼奥的婚约

贝贝和丈夫就在这片街区中相对奢侈的地段安了家，位于杜艾街22号那座简朴的石灰岩四层大楼中。他们是通过卢多维克·阿莱维找到此地的，卢多维克与妻子及两个幼子一起住在二层的整层公寓中，比才夫妇选择了楼上的单元住宅。它最好的特点是有个全景露天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穆杰描述的如画场景：烟囱顶上冒着炊烟，铺着石板瓦、瓦片甚至稻草的屋顶，三架风车，还有旧海关大楼的遗址，让人想起城市周围由堡垒和卫兵关卡环绕的历史。在高地半山坡，还有牛羊在参差不齐的一行行草地上吃草。

杜艾街这座楼里的阿莱维和比才两家成为这一带艺术家们喜爱的聚会地点，它那深蓝色的前门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卢多维克的老朋友埃德加·德加在隔壁的一个工作室里居住和工作，此人自诩不食人间烟

火，却几乎每天都要来坐一会儿，有时是一个人来，有时带上他迷人的情妇奥尔唐斯·豪兰（Hortense Howland），她本是法国人，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美国侨民；有时他还带着阿莱维家的另一位老友阿尔贝·布朗热-卡韦（Albert Boulanger-Cavé），他是个活泼的社交家，也是艺术鉴赏家。（德加画了一幅两人一起在歌剧院的肖像画送给了卢多维克，这幅画被挂在阿莱维家客厅墙上的显眼位置。）其他邻居也以不同的频率来访，包括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作曲家埃克托·柏辽兹、儒勒·马斯内[74]和夏尔·古诺；画家居斯塔夫·多雷[75]、爱德华·德太耶[76]和居斯塔夫·莫罗。皮埃尔·皮维·德·沙瓦纳[77]也在附近有个工作室，但较少来访，或许是被同事们给他取的绰号“马耻骨”[78]给耽搁了。

在婚姻的这一阶段，比才夫妇给周围人的印象是一对非常般配的夫妻，虽有差异，但关系融洽。贝贝的冷幽默正好搭配丈夫活泼的乡村男孩风貌，而他豪爽的个性也抵消了她那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焦虑倾向。那种倾向让比才很震惊。他在追求贝贝时对她还不是十分了解，不知道她的心理问题有多严重，她家里也没有任何人在事后对他讲过她与莱奥妮充满困扰的过去。不过他很乐意承担起让自己的新娘幸福的责任。婚礼几个月后，比才给伊波舅舅写信说：

> 我对于提前防范，确保我亲爱的贝贝的健康已经很有经验了（哈！热纳维耶芙自带操作手册呢！）。她的总体情况很好：睡眠、胃口，一切都一如所愿——来自我这边的好消息！[79]

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让这对夫妇的好日子戛然而止。贝贝家中又一重悲剧的消息传来，卢多维克40岁的异母兄长吕西安-阿纳托尔（阿纳托尔）·普雷沃-帕拉多尔［Lucien-Anatole（Anatole）Prévost-paradol］被逼自杀了。[80]阿纳托尔是莱昂·阿莱维与歌剧演员吕桑德·帕拉多尔（Lucinde Paradol）婚外情所生，是

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外交官，他从小和父亲的婚生子女一起长大，那些孩子把他看成亲哥哥，贝贝也一样。她和卢多维克还未从亲人离世中缓过神来，普法战争就震惊了全国。9月，普鲁士人在色当会战[81]中击败了法国，拿破仑三世投降后被监禁。在巴黎，他的政府瓦解了，让位给第三共和国。倒台皇帝的配偶欧亨妮乘坐马车和她的美国牙医一起逃跑了。两周后，德国皇帝的军队逼近巴黎，对这座城市的封锁持续了整个秋冬。

封锁期间，比才试图帮助贝贝保持乐观，但他自己也在通信中哀鸣眼前的世界末日。“真令人心碎，”他对一个朋友写道，“我们失去了（和平和友爱），代之以血泪、堆积成山的尸体，还有不计其数、没有止境的犯罪！”[82]或许因为希望自己敏感而抑郁的新娘得到更多支持，他鼓励她写信给母亲，莱奥妮已经不顾全家人对她能否在精神病院外正常生活的合理担心，离开郊外的诊所，回到了出生地波尔多。为了逃离普鲁士人的屠杀，大量巴黎妇孺也和新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一起迁往那里。

然而贝贝却选择留在蒙马特尔，那时比才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役，这位罗马大奖获得者也是为了补上年轻时未服的兵役。夫妇俩决定留在原地，这让原本已经问题重重的莱奥妮有了歇斯底里的借口，尤其是有报道说巴黎面临大规模的饥荒和燃料短缺。11月下旬，贝贝给莱奥妮写了一封口吻愉快乐观的信，坚称虽然普军兵临城下，但她和乔治过得还不错：

> 妈妈，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还没有饿死，而且我必须说，到此时为止我还没有吃过猫、狗、耗子，嗯，听人说完美社会的人都吃这些。今天我第一次尝了尝驴肉的味道……虽然我们本应胃口全无，但自从这可怕的封锁开始以来，我们反而比以往吃得更多了呢！[83]

在贝贝轻松的语调背后，我们看到在战争的那一阶段，她和乔治仍然享受着非同一般的特权。普鲁士军队包围了三个月，许多巴黎人的确已经沦落到吃猫吃老鼠的境地了，更多的人忍饥挨饿。然而因为贝贝的佩雷尔亲戚的资助，她和比才还能获得较富足的新鲜供给。在农产品逐渐从城中消失的时候，埃米尔和伊萨克·佩雷尔还能差人从他们位于塞纳-马恩地区的庄园运来新鲜水果和蔬菜。在巴黎的家中，佩雷尔兄弟还保有一个上千瓶红酒的酒窖，并继续享用他们在和平年代保存的陈年好酒，直到一伙暴民冲进来抢劫一空。

随着封锁继续，就连佩雷尔兄弟的生活水准都下降了，也开始品尝其他巴黎人早已太过熟悉的艰难况味。到圣诞节前后，比才写信给他的朋友埃内斯特·吉罗[84]，“我们已经吃不上饭了。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晚餐就只能吃几块马肉骨头；热纳维耶芙每晚都会梦到鸡肉和龙虾”。[85]

贝贝的精神开始低落，她信中那种妙趣横生的幽默感也逐渐消失了。在一封写给堂姐、卢多维克的妹妹瓦伦丁·阿莱维的短信中，她抱怨比才要服兵役，总是不在家：“想想看吧，乔治去守卫城防时，我有26个小时都独自一人待在家里，是的，独自一人……乔治觉得没问题，但我觉得等待的时间很长。”[86]他执行任务期间回到公寓时往往已是深夜，贝贝已经睡了。再度悄悄出门之前，他会在贝贝的床头柜上留下情书，让她一醒来就能看到。但这些语词温柔的信件却无法消除她对于还要失去一个深爱之人的恐惧。（“如果每天收不到他的短信，”她对瓦伦丁说，“我根本活不下去。”）

不久，贝贝不吃、不笑，拒绝离开卧室，甚至根本不下床。她的状况极度恶化，比才慌了，于是在1871年新年后几周决定带她离开巴黎。“热纳维耶芙会没事的！热纳维耶芙就是我的命！”他安慰伊波舅舅说，后者请求他们来波尔多与他和莱奥妮住在一起。1月28日，巴黎被普军占领。几天后，比才夫妇逃离这座城市，投奔贝贝的舅舅和母亲去

了。她真正的麻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和姐姐的死一样，贝贝在波尔多精神崩溃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其细节只能从比才、卢多维克和伊波舅舅后来慌忙通信的字里行间捕捉一些。据比才说，贝贝重新见到母亲的那一刻，就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抽泣——不是欣慰，而是因为彻底的、完全无法控制的绝望而抽泣。“前所未有的剧烈”痉挛扭曲了贝贝的脸，折磨着她的身体，剧烈得她根本无法说话或走路。比才在惊恐中把她打发去了他们的旅店房间，承诺说，只要睡一晚好觉，贝贝就会恢复平静了。但第二天早晨，比才写道：

> 贝贝听到旅店走廊里有人声——你简直想象不出她的脸色变得多苍白！她扑到我的怀里，哭喊道：“那是她！要是再见她一次，我就要死了！”她的脸看上去吓人极了！

贝贝恳求比才立即带她离开母亲，他一心想要平息她的情绪，就答应了。他们定了下一趟去巴黎的火车票，比才提前发电报给卢多维克，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 热纳维耶芙过去几个月日渐消瘦；从阿莱维夫人再度出现在她生活中的那一刻起，热纳维耶芙整个人就充满恐惧……绝对病态的恐惧……我陷入了可怕的窘境……我该怎么做……只能说在我们到达后还不到22个小时，热纳维耶芙就彻底发狂了，她精神失常，不停地对我说：“带我离开这里，快！快！要不我就要像埃斯特那样被她杀死了！”

他们一回到巴黎，贝贝就部分恢复了平静，只是她的脸还在继续战栗和抽动，伴之以“明显过于紧张激动的样子，你根本想象不出有多严重。至于阿莱维夫人”，比才最后说，“她一定不知道，单是她在场，就能要了她女儿的命”。[87]

无论当时还是过后，贝贝从未解释过她为什么突然如此坚信是她母亲，此前指控她杀死了埃斯特的母亲，犯下了那一罪行，也没有提到过为什么她会觉得莱奥妮也想杀死她。从波尔图回来后，贝贝每晚都噩梦连连，她说自己甚至羞于与丈夫谈起那些噩梦。她的神经性抽搐仍在继续，只有极少数相对平静的时候才有所缓解。

莱奥妮极端自私，以至于她甚至没怎么注意到女儿匆匆离开她回到了巴黎。但她继续用信件操控贝贝，写信给她和比才说："感谢上帝，你们没有理由对我冷眼相对或无动于衷，我要求你们爱我胜过一切。"然后，莱奥妮认为贝贝仍然因为埃斯特的死而内疚，便打出了自己的王牌："你们两人现在得给我四个人的爱。"[88]比才口头答应了这一要求，接过了跟莱奥妮通信的任务，以便让贝贝脱身。他越了解岳母，就越厌恶她，对卢多维克说她是个"肤浅至极的女人……自称爱每一个人，事实上她只爱自己……简直自恋得令人难以置信"！[89]

这一观点让比才更加坚信"她和热纳维耶芙水火不容（但她们都是病人）"。他妻子的医生们同意这一做法："我咨询的所有专家都说，（贝贝）一次也不能再看见她母亲了。"[90]这些专家或许也给了贝贝一些镇定药，帮助她从波尔多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不过她在信中没有提到过任何具体药物，直到七年后，她哀叹说医生为了治疗神经性抽搐给她开的药太苦了。总有一天，她会喜欢用药物来保护自己不再回到那段并未真正死亡的过去。但此刻，她还指望着丈夫帮她驱走那些纠缠不休的幽灵呢。

外部状况再次让比才无法如她所愿留在身边照顾她。回到被占领的城市后，他重新加入了国民自卫军，贝贝强烈反对他这个决定。3月1日，普军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举行胜利游行，那里距离比才的公寓还不到两英里。[91]对巴黎人来说，看着侵略者趾高气扬地从凯旋门行军至协和广场，挥着刺刀耀武扬威，真是莫大的耻辱。然而贝贝只担心比才一

人。她在游行那天写给瓦伦丁的信中只字未提普鲁士人，而是抱怨说：“我们这些不快乐的可怜妻子不得不在丈夫出门后独守在家中，天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几周后，她又对瓦伦丁报告说：“乔治已经三天……没回家了——你能想象我有多讨厌这种生活！我头昏眼花，恍恍惚惚。”

这种恍惚状态让贝贝对威胁着自己的城市和故乡的动荡更加无感，但动荡随即找上门来。5月10日，普鲁士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签署了和平条约，对后者施加了极其苛刻的条件。法国同意割让大片土地（两国边境的省份阿尔萨斯和大部分洛林地区）给普鲁士，并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这些屈辱让步引发了法国首都的大规模骚动，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聚集在巴黎公社的红旗下。这一暴力的社会主义机构被卡尔·马克思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92]的典范，它拒绝停战协议的条款，不承认第三共和国的权威。它的发源地正是蒙马特尔。

比才夫妇所在的街区成为随后的国内冲突的爆发点。[93]他们的公寓楼距离克里希广场（place de Clichy）只有几个街区，该广场在5月21—28日所谓“血腥一周”（Semaine Sanglante）中成为主要战场，政府军进入巴黎，剿灭了公社。冲突造成了约20000名巴黎人死亡，结束的方式也极其恐怖。贵族出身的将军德·加利费侯爵[94]下令将几百个公社战俘就地处决，兑现了自己臭名昭著的公告：“你们蒙马特尔人大概会觉得我无情，但我比你们想象的更加残暴。”[95]

作为特权阶级的子弟（以及国民自卫军士兵的妻子），贝贝不支持公社起义。但她的很多艺术家朋友支持，包括波托-里什，他被加利费的军队俘虏后，侥幸逃脱了处决。幸运的是，杜艾街上的那座大楼也没有受损。然而，“血腥一周”的恐怖让贝贝的精神陷入危机。6月，她听说莱奥妮不久就要从波尔多回巴黎了，再度精神崩溃，而由于比才担起了与她母亲通信的责任，贝贝对他也有了一种“奇怪的恐惧”。[96]他们的

婚姻陷入了一个令人悲哀的悖论，比才介入她和莱奥妮之间本是出于善意，但贝贝偏执地疑心他向着母亲，怀疑他们二人合起伙来害她。

10月，贝贝拾起了久已不写的日记，时间刚够她用潦草的字迹重复早先祈求神灵的那段话语：

> 主啊，我痛苦，哭泣，恳求您……即便您觉得我不配拥有自己曾经梦想的快乐，难道就不能至少不要再让一切如此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吗？给我一丝希望，指引我吧。不要只让绝望来指引我所有的行动。[97]

接下来那个夏天，的确有一线希望闪现在眼前，比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降生了。雅克-弗洛蒙塔尔·比才生于1872年7月10日，以他已故的外祖父命名。然而，雅克的降生增加了初为人父的比才赚钱谋生的压力，他更没有时间陪伴贝贝了。比才接受了巴黎最卓越的经理人之一莱昂·卡瓦略（Léon Carvalho）的委托，为《阿莱城姑娘》谱曲，这部情节夸张的“乡村悲剧”预计于那年秋天在巴黎轻喜剧院（Théâtre du Vaudeville）开演。

鉴于卡瓦略和阿方斯·都德——这位备受尊敬的作家不久将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把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改编成了这部剧作（小说本身则是由普罗旺斯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98]讲述的一个故事改编的）——的显赫声名，《阿莱城姑娘》本该是乔治至此时为止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他在这个项目上投注了全部精力。卡瓦略为这部歌剧指定了非常规的26件乐器的乐队，比才仅用几个月时间就为它创作出了二十五六首音乐曲目，其中大多才华横溢。古怪的配器包括两支长笛、两支法国号、七把小提琴、五把大提琴、两把低音大提琴、两支巴松管、一支双簧管、一个铃鼓、一架钢琴、一个定音鼓和一台幕后簧风琴。

《阿莱城姑娘》于10月1日首演，比原计划提前了；事出紧急，卡

瓦略不得不用它替换了另一部未能按计划开演的作品。观众被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激怒了，把怒气发泄到《阿莱城姑娘》上。虽然比才的音乐非常美妙，但演出在开演当晚得到的反应却相当冷淡，最终仅演了21场就结束了。[99]

比才对这一挫折的回应是，他从原来的音乐中选出了四首曲子，把它们重新编排成了大乐队演奏的曲目。这样形成的组曲在一个月后首演，获得了极其热烈的反响，成为比才在专业上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不久以后，声誉极高、在巴黎音乐演出场所中仅次于巴黎歌剧院的喜歌剧院（Opéra-Comique）委托他写一部自选主题的歌剧。在为《阿莱城姑娘》谱曲时，比才开始对地中海一带的民间传说感兴趣，因此他提议改编普罗斯佩·梅里美[100]著名的中篇小说《卡门》（*Carmen*，1845）。得到了喜歌剧院的许可后，他雇用卢多维克·阿莱维和亨利·梅亚克——很久以来，他们在歌剧和喜剧领域一直有非常成功的合作，成为法国戏剧史上最著名的创作搭档——来为歌剧作词，他立即着手为它谱曲。

如果说这些发展预示着比才在音乐道路上的前途不可限量，它们对贝贝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随着他投身于音乐创作，她被抛弃的感觉日益强烈。迫切需要照顾新生儿雅克更加重了她的孤立感。身为人母或许曾经是贝贝担心上帝不会给她的“快乐”之一，但婴儿那永无餍足的需求让她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需要，而这不单是因为照顾新生儿本身就是一个消耗体力的工作。更糟的是，贝贝觉得每当丈夫好不容易从工作中抬起头来，他对孩子倒是比对她更感兴趣，称孩子是自己“伟大的、美丽的宝贝”（雅克甚至偷走了她的昵称）。

在比才的感情序列中明显降级让贝贝十分恼怒，于是她对待自己的孩子很像小时候父母对待她的方式——疏于照管。卢多维克的幼子达尼埃尔后来（按布列塔尼人的规矩）批评他的姑姑对雅克的幸福全然无动于衷：

她如魔鬼一般任性，又如玩偶一般轻率，坚信自己已经为孩子做了该做的一切，事实上她只不过在自己醒着时差人把他送来卧室，让他和她的狗一起在她那安逸的、喷洒了太多香水的床上坐一会儿。[101]

达尼埃尔写道，“热纳维耶芙姑姑每天……爱抚雅克的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小时。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她跨入他那间又大又脏的卧室的门”，她“从早到晚把他扔在那里”。如果这些对贝贝育儿方式的总结属实，那就表明她与那位一心只顾自己的母亲有着惊人的相似，着实令人不安。

很多年后，贝贝和卢多维克烧掉了她婚姻这一阶段的所有信件，以及比才的大部分信件。[102]因此，关于这对夫妇关系的最详细的描述就来自达尼埃尔·阿莱维，或许这些是他从父母和其他成年亲戚那里听到的。（比才和卢多维克一起创作《卡门》时，达尼埃尔还和雅克一样，是个襁褓中的孩子。）据达尼埃尔说，当比才“从早到晚工作，创作最美妙的音乐而开始为世人所知时”，贝贝“缺乏认真生活的心态”，因而不认为这种生活是充实的。相反，“她想社交，而丈夫因为太爱她而没有反对”。[103]

贝贝重走母亲的老路，成为一大群波希米亚人的女主人，对他们敞开公寓的大门，鼓励他们随时想来就来。和莱奥妮一样，她也对八卦和牌戏有着无法抑制的渴求，最重要的是他人的陪伴，并且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放弃这些娱乐。蒙马特尔是很多著名夜总会的所在地，如红磨坊（Moulin Rouge）、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和黑猫（Chat-noir）夜总会，那里喧闹的夜生活每天持续到深夜，贝贝也一样。从一开始，她位于杜艾街的客厅就吸引了一群她从小一起长大，以及通过比才认识的那一类创作天才。

关于贝贝这一时期的沙龙，最生动的描写出自画家雅克·布朗什。

多年来，贝贝的许多亲戚都曾在他父亲那里治疗，布朗什和他的父母把阿莱维一家当成自己的家人——“比我们自己的叔父和表亲们更亲近”。[104]年轻的布朗什比雅克·比才大11岁，他一生都记得杜艾街上的那间公寓，记得在那里接见宾客的那个女人：

> 我还能清晰地忆起那个房间，贴着花朵壁纸，那种凌乱不堪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艺术”，或者更准确地说，很“波希米亚”。漂亮的热纳维耶芙身穿睡衣躺在沙发上；我还能记起她那双兴奋的双眼皮的黑眼睛，看上去像仁慈的友弟德[105]，一头黑发下面的脸苍白如山茶花，厚厚的嘴唇总是轻轻抖动着。[106]

这段对贝贝的描述中强调的好几个特点，也被她后来的崇拜者们着重指出：她慵懒的姿态；她暴露的、更适合睡房而非客厅的裙子；她神经质的颤抖和“兴奋”的状态。还有最重要的，她是个厚嘴唇的黑发美女，这里提到友弟德，就突出了犹太人的特征。埃利·德洛奈也曾赞美她的容貌透着异国情调，称她是“有一双天鹅绒眸子的大宫女”，并写道：“至少从眼睛看，你真的是充满东方风情！”[107]

除了布朗什、德洛奈和德加之外，贝贝早期的常客还包括她童年时代的钢琴教师夏尔·古诺及其作曲家同伴儒勒·马斯内、埃内斯特·吉罗和加布里埃尔·福莱[108]，著名剧作家小仲马、亨利·梅亚克和维克托里安·萨尔杜[109]，象征主义诗人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110]和亨利·德·雷尼埃[111]，以及一群前途光明的作家，他们被誉为“未来评论界的王子们”[112]：剧作家兼剧评人朱尔·勒迈特[113]、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保罗·布尔热，以及小说家兼剧作家保罗·艾尔维厄[114]。还有她的许多艺术家表亲——写过滑稽大道闹剧的维利·布斯纳什（Willie Busnach），如《白腹海豹》（*Le Phoque à ventre blanc*，1883年，该剧用了埃米莉·威廉斯那句晦涩难懂的口号作为结束语）；很有影响力的编辑和评论家路

易和艾蒂安·冈德拉；当然还有波托-里什和卢多维克。波托-里什早先就认定，贝贝有如此惊人的社会关系，是推动他文学事业的不二人选。“你将把我变成名人”，他对她说，把希望认作事实。“你将主持那些仪式。”[115]

在她社交事业的这一阶段，贝贝喜欢推动朋友们的事业。这里毕竟是蒙马特尔，艺术是凝聚这个社区的黏合剂。她用自己的高妙手段和奕奕神采为作者和编辑、画家和收藏家、演员和剧院经理、剧作家和评论家充当中间人。她为小说、诗歌和报纸专栏提供反馈。她主持新剧彩排和新音乐表演。正如她的一位作家朋友后来回忆时所说，

> 她欢迎……艺术和文学世界中最优秀的一切来到她的沙龙……天然地营造出一种风趣、高雅、友爱和动人的安乐氛围。[116]

由于贝贝神情怠惰、身穿薄款睡衣，保罗·布尔热戏称她为“最慵懒的缪斯”。[117]但刚开始做沙龙女主人的这几年，贝贝对朋友们的事还是很上心的。

对忠实信徒的依恋或许是贝贝的灵丹妙药，却让比才很苦恼，他虽然忙，但也注意到自己的位置被取代了。达尼埃尔·阿莱维说：“发现热纳维耶芙姑姑的心越来越不属于他，比才很痛苦！她对他仍然有爱，但另一种爱已经超越了它：那就是对社交圈的迷恋。”比才在1873年写给吉罗的一封信中暗示自己对事情有所警觉，他讲了最近做的一个梦：

> 我们去了那不勒斯，住在一个漂亮的庄园里；那里的统治者是一个纯粹的艺术政府。元老院成员有贝多芬、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乔尔乔内[118]等人。国民自卫军被一支巨大的乐队取代……贝贝与歌德的关系有点过于友好，不过除了这一点不便之外，从这样的梦中醒来还是非常残酷的事。[119]

有趣的是，在比才的梦里，贝贝与其“关系有点过于友好”的人恰是她（和她母亲）最喜欢的那种类型：天才之人。虽然忠实信徒中没有著名的德国作家——自从战争以来，贝贝对普鲁士人产生了强烈的恨意——但她那位经历了同一场战争的丈夫怀疑她窝藏敌军却也没错：就是那些随时准备包围他的新娘的艺术家朋友们。

无法言说的怨恨和无法调和的需求伤害了两人的感情，比才夫妇的婚姻不久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1874年初，因为可能在她和卢多维克后来烧毁的信中提到的原因，贝贝搬出杜艾街，住进了卢多维克·阿莱维位于巴黎以西的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的乡下别墅。[120]她把雅克留给仍住在蒙马特尔的丈夫和她母亲共同照顾，虽然此前她一直试图不让母亲见自己的儿子。只有少数几封信逃脱了贝贝和卢多维克的火刑，在其中一封信中，比才温柔地询问她“小脑袋”的状况如何，并就他和莱奥妮关于雅克所做的安排询问她的建议，还一再说他爱她。[121]那是2月的事。到那年6月，他与贝贝和好了。

贝贝一定觉得自己对丈夫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同意不立即恢复社交生活，因为比才如今要在父亲过去的那一架钢琴上工作，却又没有弗洛蒙塔尔·阿莱维那“全然不为外界所动的专注”。比才必须赶在那年秋天之前完成长达1200页的谱曲，那时《卡门》就要在喜歌剧院彩排了，为了他的工作便利，贝贝同意和他一起搬到他在布吉瓦尔（Bougival）租下的一座刷成黄色的砖体别墅里度夏，布吉瓦尔是塞纳河边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巴黎以西十英里处，离圣日耳曼昂莱很近。[122]

起初，她抱怨偏僻的乡村生活太无聊了，正如在贝贝小时候，弗洛蒙塔尔试图举家搬到科尔贝时莱奥妮的牢骚一样。比才开始定期回巴黎与评论家和演员见面时，贝贝对自己被流放在布吉瓦尔更是深恶痛绝。他不在期间，她独自留在别墅，只有雅克和赖特尔一家与她做伴：这在贝贝看来可不是个愉快的安排。虽然雅克可以和小男孩让·赖特尔愉快

地玩耍，但贝贝可不想和那个小男孩的妈妈有什么交集。玛丽·赖特尔在比才家里工作时或许跟他们亲如一家，但贝贝不觉得和她交朋友是什么体面的事。

而贝贝自己找的玩伴大概更成问题。和德拉克洛瓦的科尔贝一样，布吉瓦尔也成为希望逃离首都的疯狂喧嚣、寻找新鲜空气和阳光艺术家们的避风港。贝贝的朋友小仲马和伊万·屠格涅夫就是这座小村庄最著名的文学人物。常住在这里的画家包括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阿尔弗雷德·西斯莱[123]、克洛德·莫奈和贝尔特·莫里索[124]，音乐界的代表人物则是埃内斯特·吉罗和伊雷姆（埃利）·德拉博尔德［Eraïm（Élie）Delaborde］。比才与最后这两人很亲近，请他们在自己离开期间帮忙照看妻儿，没过多久，他们也成了贝贝的好友。不过，比才学者们猜测她与德拉博尔德的关系逐渐超出了单纯的友谊，后来的事件似乎也能证实这一说法，不过现存的资料无法证实两人究竟是何时开始这段婚外情的。

德拉博尔德与乔治·比才有很多相像之处。和著名作曲家一样，他也比贝贝大得多，1874年夏，他35岁，贝贝25岁。也和比才一样，德拉博尔德有着结实的体格和与之相匹配的超常魅力；同时代人称他是有足够天赋挥霍的超群之人。据说德拉博尔德是作曲家夏尔-瓦朗坦·阿尔康[125]与一位贵族音乐学生的私生子，五岁起就展现出钢琴演奏家的惊人天赋。其后20年的学习和表演让他34岁时便在巴黎音乐学院获得了一份荣誉教职，就连他才华横溢的父亲都从未获得过这一殊荣。在音乐学院，比才是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学生，而德拉博尔德却是阿莱维的同事。

用音乐学院另一位教职人员安托万·马蒙泰尔（Antoine Marmontel）的话说，钢琴家德拉博尔德不但能用“技艺纯熟的音乐家的权威和极致……以伟大的表现力和无与伦比的魅力”驾驭最难的曲子，

还能背谱演奏。[126]他利用这一技巧谋得了一份乐队钢琴家的赚钱副业，在欧洲各地的音乐厅里吸引了大量观众。德拉博尔德在自己的出生地巴黎极受欢迎，1870—1871年冬天，他的乐迷们在整个封锁期间（仍克服困难）出门去看他的演出。



在他的朋友比才为《卡门》作曲而“忽略”了热纳维耶芙时，钢琴家埃利·德拉博尔德一直在她的身边陪伴她。比才死后，她和德拉博尔德曾秘密订婚

另一个与贝贝丈夫的相似之处是，德拉博尔德也喜欢与其他艺术家结交，他多方面的天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爱德华·马奈，他称赞德拉博尔德“拥有真正的绘画才能”，这一称赞很可能是真诚的。[127]德拉博尔德在画作上签名用的是自己的中名“米利亚姆”（Miriam），他的有些画作在一年一度的巴黎沙龙上展出，对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业余画家来说，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德拉博尔德也和比才一样喜欢多姿多彩的装饰，不过他的装饰是动物而非服装。1871年春，他到伦敦旅行时，随身带着至少121只凤头鹦鹉和其他鹦鹉。[128]（在其他旅行中，他的移动动物园里还有两只宠物猴。）此外，德拉博尔德运动天赋极佳，在巴黎时每天都会去击剑。在布吉瓦尔，他在凉爽宜人的塞纳河水中长距离游泳，有时候比才也会和他一起游。

然而虽然两个男人有这么多共同点，但他们的几个不同之处或许让贝贝更倾向于德拉博尔德。首先，他是犹太人。贝贝的家庭把犹太人身份看成一项天赋的文化权利，而不一定是一种宗教信仰。在阿莱维一方，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她的祖父创建的法国犹太人群体的第一份报纸。她的父亲也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关注犹太人主题［从《犹太女》到《流浪的犹太人》，再到未完成的《诺阿》（*Noé*，1862）］，叔叔莱昂·阿莱维除剧作家的正职之外，还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两卷本权威著作。在贝贝这一代，堂兄约瑟夫·阿莱维是研究闪米特人文化的考古学家，1880年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些成员一起，成立了一个在法国推动犹太人学术研究的组织。[129]巧合的是，该组织的另一位创始成员正是贝贝未来的第二任丈夫埃米尔·斯特劳斯（Émile Straus）。

在贝贝的母亲这一边，投身犹太教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同样强烈。莱奥妮的弟弟伊波·罗德里格斯虽然是一位股票经纪人，却创建了犹太人科学和文学学会（Société scientifique-littéraire israélite），还写下了关于犹太人历史的巨著。贝贝已故的姨妈欧亨尼·福阿[130]也一样了不起，她是第一位靠写作维持生活的法国犹太女人；福阿也喜欢在小说中写与犹太人有关的题材。[131]

德拉博尔德的犹太人身份来自他的父亲阿尔康，这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犹太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贝贝的父亲曾有一次试图招募

阿尔康在巴黎首屈一指的犹太会堂里担任风琴手。和贝贝的叔叔莱昂和舅舅伊波一样，德拉博尔德的父亲在业余时间里也是一位学者，纯粹出于兴趣而把整部《旧约全书》从希伯来语翻译成了法语。[132]他也在自己谱写的音乐中用到了自己的学识，音乐学家戴维·康韦[133]认为那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专门运用犹太人主题和观念的音乐艺术作品”。[134]除了包括《创世纪》和《所罗门之歌》中的希伯来语引文之外，阿尔康的许多作品都基于犹太礼拜音乐的曲式。德拉博尔德本人因为编撰了父亲的作品合辑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表演曲目，所以对这类材料也非常熟悉。

德拉博尔德还自称“埃利”（伊莱贾），进一步渲染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是像贝贝这样的犹太人家庭中最常见的名字：她的阿莱维祖父和卢多维克的长子都叫“埃利”。如此一来，她和德拉博尔德共有一套从家族继承的信仰准则，这对两人都是慰藉。她的丈夫虽然才华过人，但他那小资产阶级的天主教祖先却没有给他，当然也给不了他这样的教育。

至少在贝贝看来同样不可抗拒的，是德拉博尔德也与一位有着严重精神问题的家长维持着艰难的关系。德拉博尔德是由养母（他跟这位养母姓）抚养长大的，但他长大后听说自己与阿尔康的血缘关系，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赢得父亲的赞许乃至父爱。这一努力非常艰难，因为阿尔康是个出名的怪人，致病因是恐惧人类。[135]他曾有一次拒绝了在一个很有声望的沙龙里演奏的邀请，对女主人说与人类接触一个半小时会让他“倒在医院里”。他的社交恐惧症非常严重，以至于1838年，他年仅24岁就举办了最后一场音乐会，随后便与世隔绝35年。1862年，阿尔康在写给他仅存的几位好友之一的信中这样描述他强加给自己的孤独：

> 和往常一样，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不是读了一些书的话，我活得多少像一棵卷心菜或一只蘑菇、一簇真菌，只不过是能听懂音乐的真菌。[136]

随着年岁的增长，阿尔康越来越隐秘，到了妄想症的地步，坚信有人密谋偷走他一生的积蓄。音乐学家斯蒂芬妮·麦卡勒姆（Stephanie McCallum）曾指出，这些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阿尔康的怪癖使他不可能与儿子或其他任何人保持亲密关系。德拉博尔德试图跟着他学音乐，并通过编辑和表演他的曲目来消除隔阂。阿尔康如何看待儿子这些表达孝心的方式不得而知。不过就德拉博尔德与贝贝的亲密关系而言，超越父母精神失常障碍的历史，或许让两人拥有了极其丰富的共同经历。

最后，由于音乐会巡演的成功，德拉博尔德相对较为富裕，而贝贝在这方面绝对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天生热爱奢侈的生活，结婚后拮据的财务状况完全压抑了这一热情。（她花费巨资购买时髦的服装，囤积大量她根本吃不完的昂贵巧克力和没时间戴的手套。[137]）由于她嫁给比才后就不再写日记，后来还烧掉了那些可能有损他们的理想爱情故事的信件，我们无从知道贝贝对嫁给比才导致自己的经济状况下滑究竟做何感想。但前后变化可能很明显；嫁给比才之后，贝贝从一个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女儿和骄纵的女继承人，变成了一个靠教授钢琴课赚钱谋生的无名作曲家的妻子。

由于她是在比才根本没有名气时选择嫁给他的，我们不能假设贝贝和她母亲一样，“只尊重那些有社会地位（和）钱的人！！！！！”即便如此，她和莱奥妮一样，把这两样看得极为重要。弗洛蒙塔尔·阿莱维地位最高的恩主之一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后来有一次语带讥讽地说：“真是难以置信，每次只要有一位罗斯柴尔德出现在视线中，热纳维耶芙必定会趋之若鹜！”[138]公平地说，她之所以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所吸引，或许不仅仅是仰慕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少女时期的她曾目睹母亲的佩雷尔表兄弟的衰落，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一度可以媲美罗斯柴尔德家族，事实上他们的铁路公司最初还是与詹姆斯男爵[139]合伙

创建的。在贝贝的心目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许是她那个麻烦重重的原生家庭的假想替代物。佩雷尔兄弟垮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兴旺，不仅买下了手下败将在巴黎的宅邸，还在1880年买下了他们的乡村庄园。[140]当然，贝贝的祖先曾婉拒了封爵的提议，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有了世袭男爵之位。贝贝了解这些差别，或许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作她那种出身的犹太人财阀的更佳版本。

除了传说他的生母出身贵族之外，德拉博尔德与上层毫无关系，他当然也没有像坊间传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富可敌神”。但贝贝初遇他时，他比比才富裕多了。此外，德拉博尔德穿得也像个有钱人。他从伦敦定制的西装与她丈夫那身粗糙土气的古怪行头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在迁居布吉瓦尔之后，比才仿佛觉得自己不够土气似的，还整日叼着一支玉米芯烟斗。作为一个巴黎人，贝贝对自己见多识广的时尚品位颇感自豪，她对最新时尚投注的宗教热情远大于对犹太人仪式或假日的关注，当然会对两个男人的个人风格差异极为敏感。

最后但绝对同样重要的是，德拉博尔德之所以吸引贝贝，是因为他真的有时间陪她，这是比才做不到的。在布吉瓦尔期间，德拉博尔德正处于教学和巡演的间歇期，没有什么迫切的原因会像贝贝的丈夫那样常常把她一个人丢下。比才把全部心思都倾注于《卡门》（据传言，扮演女主角的演员加利-玛丽[141]或许也分了一杯羹）之时，德拉博尔德走进了贝贝的生活。即便德拉博尔德没有其他弥补缺憾的品质，他的关注本身也对贝贝意义重大；由于过去的经历，她对孤独充满病态的恐惧，那恐惧从未完全消失过。

德拉博尔德在布吉瓦尔兢兢业业地守护着比才的妻子，此事并非没有引起朋友和邻居们的注意。按照某些传记作者的看法，比才本人也很清楚两人的友谊日渐加深。[142]米纳·柯蒂斯[143]在比才去世一个世纪后发现了一叠他隐藏的私人文件，甚至指出作曲家不但知道，而且默许了

贝贝与德拉博尔德的风流韵事，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卸下了妻子永远需要关注的负担”，能够专心为《卡门》谱曲了。另一位传记作家的看法完全相反，认为贝贝与德拉博尔德的婚外情让比才妒火中烧，一直折磨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如何，贝贝的不忠对比才或许的确有些艺术价值，如果正如他对路易·冈德拉所说，他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个充满异国风情、拒绝对任何男人伏低做小的伊比利亚吉卜赛女郎。（不管出自何方，对一个与丈夫的朋友有婚外情的女人来说，“如果我爱上你，你可要当心”无疑都是个恰如其分的口号。）如果比才的确怀疑贝贝和德拉博尔德有染，那么他不仅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反而继续请德拉博尔德陪伴她。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比才都一直指望这位朋友担起这份责任。

任谁都没有料到，那一天过早地来到了。1875年3月3日，《卡门》在喜歌剧院首演。比才夫妇那时已搬回巴黎，但贝贝没有参加首演，显然是染上了睑腺炎，不得不留在蒙马特尔家里。但比才的其他朋友悉数到场支持他，这部歌剧的第一幕开始时，观众似乎先入为主地认为他的歌剧一定错不了。然而没过多久，新奇的音乐和出格的女主人公就得罪了观众。第二天，卢多维克·阿莱维概括了首演的灾难：



比才对热纳维耶芙的表兄说，《卡门》中那位极其独立、充满异国风情的女主人公的原型是他那位（伊比利亚塞法迪犹太裔）新娘。
但有人怀疑他与**1875**年演绎了那位标题人物的歌唱家加利-玛丽有染

第一幕很受好评。（卡门的）第一首歌得到了喝彩，米凯拉和堂·何塞的二重唱也一样。第一幕结尾不错——掌声，叫幕声……大家涌到比才身边祝贺他。第二幕就没那么好运了。开头很棒。《斗牛士之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就冷场了。从那以后……观众越来越震惊、不安、困惑。幕间曲时来到比才身边的人少了，祝贺之词也没那么真诚了——（他的朋友们）很尴尬，很不自然。第三幕的冷场更明显……观众对第四幕的反应从头到尾都冷若冰霜，除了比才的三四个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什么人（留下）。他们嘴上说着安慰的话，眼睛里却满是悲哀。《卡门》失败了。[144]

到最后的大幕落下之时，比才整个人陷入了混乱状态。他向自始至终都在他身边的吉罗坦白说，他没法在失败后回家面对贝贝——现在不行。于是两个朋友漫步深夜的巴黎，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了好几个小时，其间比才一直都在“倾诉他内心的苦楚”。[145]然而他一到杜艾街就因扁桃体炎而倒下了。其后几周，扁桃体炎又犯了很多次，还伴以疼得无法走路的关节风湿肿痛，左耳还长了一个很大的脓肿。仿佛为了应和贝贝那位以*do-re-mi*音阶躺下等死的父亲，比才也用音乐术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想象一下一个降A调/降E调双踏板在你的头脑中轰然响起，从左耳到右耳响个不停，”他写信给吉罗说，“我不堪其扰。”[146]

5月下旬，比才以城里的空气毒害健康为由，说服贝贝和他一起再度逃往布吉瓦尔，等身体恢复了再搬回来住。但这次迁居似乎让他更衰弱了。5月27日到29日之间的某个时候——历史学家们对具体的日期莫衷一是——比才和德拉博尔德一起去游泳，事后看来，这个决定似乎证实了他的朋友古诺的理论：《卡门》的失败让作曲家产生了自杀倾向。[147]无论成心与否，跳入塞纳河让比才受了寒，很快就转为发烧和更严重的风湿性炎症。6月1日，他心脏病发作，第二天又发作了一次。

那以后他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病榻上，比才叫来了贝贝、雅克和赖特尔一家。他此刻才吐露，让·赖特尔不是他父亲的私生子，而是他自己的。[148]比才让贝贝答应承担起把让抚养成人的责任，并继续留玛丽·赖特尔在她身边服侍。忧心如焚的贝贝含泪答应了，她也的确践行了诺言。后来她让自己的儿子相信他和让·赖特尔是乳奶兄弟——婴儿时代吸吮着同一个女人的母乳的兄弟——余生也一直留着玛丽·赖特尔做她的管家。她对保留这些关系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她从未在通信里提过两位赖特尔中的任何一位。

在不眠不休地在病床前照顾丈夫时，贝贝一度觉得自己听见他气喘吁吁地说：“德拉博尔德！快去把德拉博尔德找来！”[149]德拉博尔德来

到他们家里时，比才已经昏过去了，不知是贝贝还是赶来帮忙的卢多维克跑去叫来了医生。医生一到，当场就宣布比才去世。那是1875年6月3日凌晨3时：三个月前的这一天，《卡门》在喜歌剧院首演，六年前的这一天，他和贝贝举行了婚礼。

和母亲当年的状况一样，26岁的贝贝也陷入了癫狂，无法出席丈夫的葬礼[150]，但有四千多位悼念者涌入蒙马特尔公墓致哀。[151]在比才的墓前，古诺在朗读贝贝的悼词时泣不成声[152]："她愿意和他一起重温他们婚姻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153]

那以后数月乃至数年，贝贝全力扮演着比才的悲伤寡妇的角色。按照习俗，她须在丈夫死后一年服全丧，但一年过后，她决定继续身着寡妇丧服。两年后她请朋友埃利·德洛奈给她画肖像画时，仍是一袭黑衣。德洛奈得到她的允许后，在1878年的巴黎沙龙上展出了那幅画：头戴黑纱、身穿黑衣的贝贝用一双悲伤的黑眼睛凝视前方，眼神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德洛奈将这幅肖像画送展的时机也刚刚好。《卡门》首演失利后的那些年，公众渐渐改变了对那部歌剧及其作曲家的看法，认为该歌剧是一项重大成就，作曲家是个天才。要求上演比才作品的信件从欧洲各地飞来，贝贝在卢多维克的帮助下处理那些信件。这些重演不但带来了版税——贝贝突然间有了很多钱——也带来了欧洲各国最高君主的关注。维多利亚女王要求上演《卡门》专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是如此，贝贝骄傲地把沙皇就此事的来信透露给了媒体。[154]



热纳维耶芙在丈夫死后为他服丧五年，成为著名的“比才的寡妇”

艺术家和作家们也加入了身后盛赞的行列。俄国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称《卡门》是“真正意义上的杰作……是注定反映整个时代最强大的音乐抱负的罕见作品”[155]。弗里德里希·尼采则在听那部歌剧时宣称，“这部作品本身就是‘杰作’”[156]。（这位德国哲学家尤其感兴趣的，是《卡门》“残酷而悲观地”把爱情描述称为“一个悲壮的玩笑”[157]。）

这些喝彩声再加上德洛奈那幅令人心动的《乔治·比才夫人的画像》（1878）引发了公众对作曲家那位充满异国风情的年轻寡妇的兴趣。作为娱乐业的产儿，贝贝拥有读懂观众的第六感，给了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用传记作家安妮·博雷尔（Anne Borrel）的话说：

德洛奈那幅忧郁的《乔治·比才夫人的画像》……在世人面前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在这幅作品中，美丽的被画者得到

重生，成为她创作的关于自己的小说中活生生的女主人公——预感到她还会继续启迪很多其他小说的写作。[158]

为了维系德洛奈的画作赋予她的那种令人难忘的公共形象，贝贝在1878年的沙龙之后又服了整整两年的全丧。

直到1880年，她才最终脱下丧服，换成了半丧服（demi-deuil），一种以淡紫色、灰色和白色为主色调的衣着风格，以免突兀地从全黑过渡到无拘无束的彩色。不过贝贝的这一改变，与其说是为自己那个“比才的寡妇”的人格画上了句号，不如说是改进了那个人格。她永久性地穿着半丧服，永远提醒所有见到她的人，她曾经深爱并失去了那位天才。（她还特意定制了大量信纸，色调也是浅灰、淡紫和粉色，如她在一封信中所写，“堇色的哀思近于黑”。[159]）在她最亲近的人当中，这一时尚宣言为她赢得了“紫衣缪斯”的绰号。

对普通巴黎公众来说，贝贝的寡妇服饰表明，她乐意满足人们对比才的好奇。乐迷们纷纷到她位于杜艾街上的公寓朝圣，她非但没有赶走陌生人，反而邀请他们进去，非正式地带他们参观自己的家。一位来访者记得她领着一群人穿过作曲家的办公室和卧室，指着那台钢琴柜和布雷顿水手服，泪眼蒙眬地说：“这是他创作的地方，那些是他的衣服。”[160]人们结束参观时，被比才夫人深深打动，她显然一刻也没有忘记已故的丈夫。

但她悲悼的公共形象掩盖了一个没那么体面的现实。比才死后还不到十个月，贝贝就秘密地通知最亲近的人，她和埃利·德拉博尔德订婚了。[161]四个月之后的1876年8月，她和德拉博尔德在她母亲的公证员面前签署了一份结婚契约。说到姑母时永远都充满刻薄的达尼埃尔·阿莱维说，贝贝虽然失去了丈夫，但“她可连一天孤独的寡妇都没当过”。[162]

只不过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度假村里，她基本上都是孤身一人，只拖着厄拉利·于尔曼这个累赘——在贝贝的信中，此人不过是个方便的帮手：占据着她不得不离开的那些更有趣的人的位置。就连她的儿子雅克也不在身边，雅克一见她就兴高采烈，还算给了贝贝一点指望。他们刚到古尔尼格尔后不久，小玛塞勒就开始有咳嗽的症状，因此医生命令她和雅克分别隔离在两处。于是此时雅克回到法国和他的比才爷爷住在一起，总是用拼写错误的长信对母亲狂轰滥炸，里面多半都是责备（“你为什么从不写信给我？都是我写给你！我睡觉时还把你的信放在胸口！”[163]）而很少有什么消息。贝贝渴望的是消息，关于巴黎和她的忠实信徒们的消息。

纳尼内婶婶往往是个可靠的八卦来源，“因为我们俩都有股子轻浮劲儿”[164]，她对婶婶说古尔尼格尔“糟糕得难以言说”，与其说是因为它本身地处偏远（虽然那也没让它好多少），不如说是因为

> 这里看不到一个法国人，只有说德语的瑞士人，和根本不说话的德国人！……最可怕的，比与世隔绝或冰天雪地还要可怕的……是根本听不到一个法语词……连狗都用德语叫唤——而且它们还极少叫唤。我试图跟其中一只大狗交个朋友，但他根本听不懂我的话，轻蔑地走开了，冲着一个来自法兰克福的老头跑了过去。[165]



热纳维耶芙的儿子雅克·比才六岁时的肖像，由她的朋友埃利·德洛奈所画，他对母亲有强烈的依赖，母亲对他却无动于衷

关于狗只用德语叫唤那句话，是贝贝逗自己的忠实信徒们开心时使用的典型的新奇荒诞的句式。然而它也表达了她在瑞士有多孤单，又是多么归心似箭。

除了那一纸婚姻契约外，贝贝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让后世探知她与德拉博尔德的情事。但她与古尔尼格尔当地动物们的交流或许提醒了她，她是乐意取消婚约的。贝贝喜欢狗，但她不喜欢凤头鹦鹉、其他鹦鹉和猴子，带着一百多只这类动物旅行——更别说还要跟它们住在一起——那无数粗俗不雅的麻烦，轻易就抵消了萨维尔街定制西装和一位犹太人疯子父亲赋予他的吸引力。在与德拉博尔德订婚两年之后，她恳求卢多维克代表她与他断绝了关系。她无法解释自己的理由，只是说“她的朋友，她的自由——她无法去考虑任何别的东西”。[166]

从那个角度来看，贝贝被困在德国人和他们毫无反应的宠物中间，

这的确令她心灰意冷。在写给吉罗（自比才死后，她一直和吉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的一封信中，她抱怨说虽然她和于尔曼夫人在那么多条顿人中间找到了两个看样子有些魅力的候选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意大利人——但两人不知为何似乎对她的魅力无动于衷。（贝贝没有提到于尔曼夫人的魅力，想必跟她自己没有什么可比性。）7月11日，吉罗用挑逗的口气回信说：

> 自从你离开之后，巴黎简直乏味得无法忍受。……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还有我喜欢你，但你对此和我一样心知肚明，如果我顺着这个写下去，一定会把你烦死。所以如果你愿意，我们来谈谈你碰到的那两个男人吧——你的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此刻，我打赌你已经把两人都列入你著名的被害人名单了——那名单就要变得和唐璜的（一千零三个）一样长了！我只请求你一件事，不要让他们占了我的位子。[167]

贝贝在与仰慕者们的通信中收到了很多性暗示，这封信是其中比较直言不讳的；遗憾的是，她的回信没有留下来。尽管如此，吉罗的信表明，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似乎在其他语境下也都很享受这种半开玩笑的调情。贝贝总是讲述吉罗漫不经心的品行来逗忠实信徒们开心，有一次她问他的私生女像不像母亲，吉罗得意地笑着说：“我哪知道。我见到她时，她总是戴着帽子。”[168]这一对话暴露出两人明显违反了两性间的礼节，但也突出了贝贝天生就是个会讲故事的人。

至于吉罗断言贝贝征服的人在人数上已经可与唐璜媲美，这句话暗示了在守寡期间，比才的寡妇还真是个快乐寡妇。关于自己最近在古尔尼格尔遇到的绅士，贝贝本人在向纳尼内婶婶描述宏大计划时，也透露了这一点。她先前在旅馆餐厅里就注意到他了，他正在读《费加罗报》，“说一口没有口音的法语。……他竟然是个巴黎人！这里唯一的

一个！他看上去很有钱，很出众；我已经在培养他走入卢多维克家了”。[169]出于同样的原因，她假装哀叹道：“我担心他最终不过是个旅行中的推销员。”贝贝还说，在排除那一可能性之前，她将不得不请婶婶先不要告诉家里的其他任何人“我这位新的未婚夫。我还不知道他的净值有多少；我可不想无缘无故地提高（大家的）期望值”。[170]

到夏天结束时，“新的未婚夫”［后来我们得知他的名字叫居斯塔夫·马克斯（Gustave Marx）］已经被遗忘了，于尔曼夫人和她生病的幼女也一样。一回到巴黎，这些小角色就不再有资格进入“卢多维克家”了，在那里，明星女主人对自己的配角有更高的标准，可选的演员也更出色。例如，波托-里什和洛尔·德·舍维涅仍在贝贝的沙龙里受到欢迎，虽然她无法阻止他们刚刚萌芽的友谊。（洛尔那年秋天会住在阿代奥姆家族的城堡里，等待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0月降生，贝贝得知此事，或许会很开心。）

不过她的干预确实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在就那位狐狸精朋友洛尔的行踪而纠缠波托-里什夫妇时，她搜集到了一点有用的情报。贝贝在出发去古尔吉格尔之前不久遇到的一位极为合意的犹太律师——令人钦佩的迈特尔·埃米尔·斯特劳斯，据信是已故的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私生子——曾在她离开期间向波托-里什打听过她。[171]听说“可怜的比才夫人”被困在阿尔卑斯山区，她的幼子还被隔离了，斯特劳斯恳求波托-里什随时向他通报他们最新的情况。[172]换句话说，斯特劳斯对贝贝感兴趣。与居斯塔夫·马克斯不同，斯特劳斯毫无疑问是个大人物：见多识广、人脉深广、腰缠万贯。斯特劳斯一定会从贝贝著名的被害人名单中脱颖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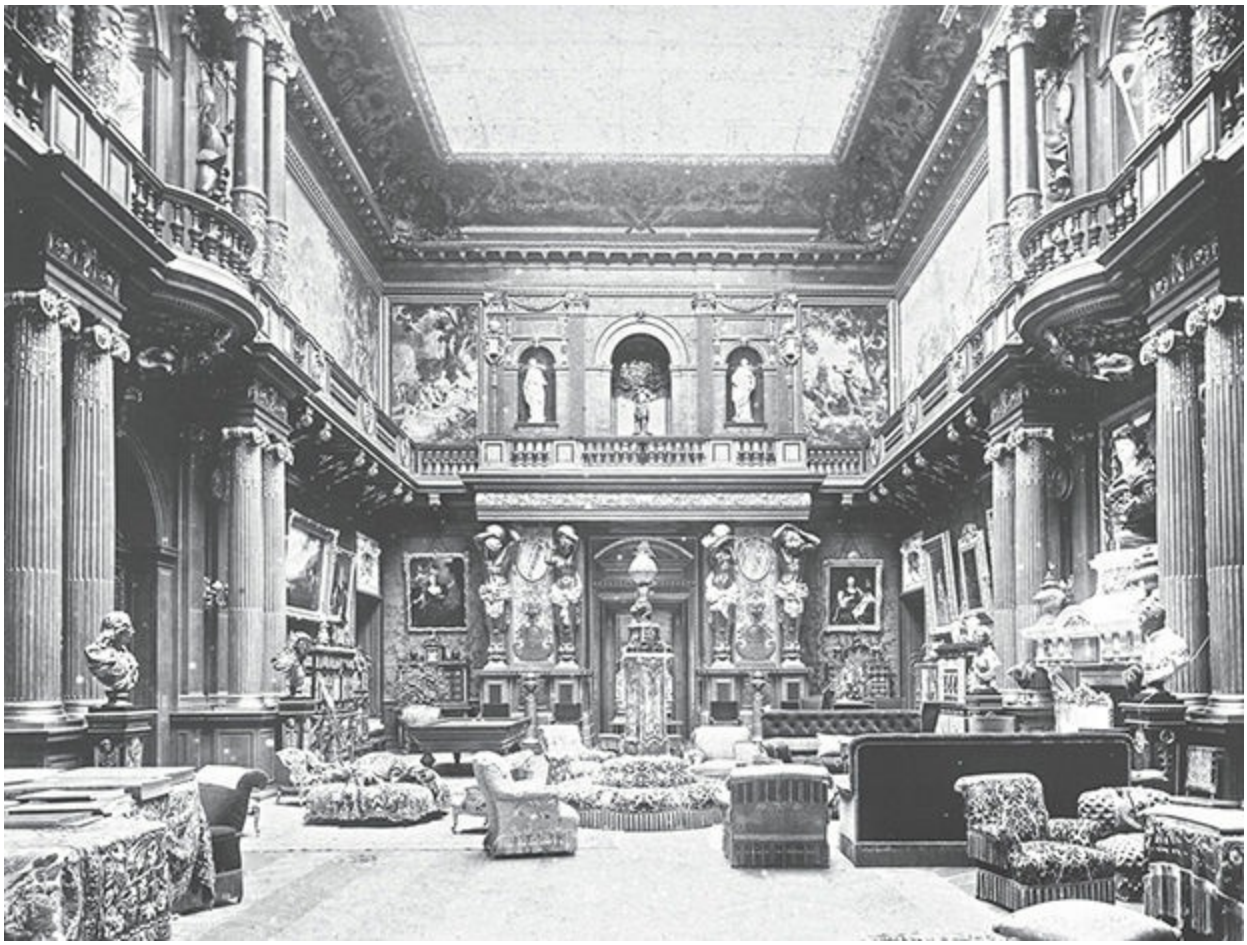
从瑞士回来之后短短数月，贝贝和斯特劳斯就开始出双入对；或者更确切地说，热纳维耶芙和斯特劳斯开始出双入对。他不喜欢她儿时的昵称，说服她放弃了那个名字——这看上去只是个小小的改变，却预示

着她的人生轨迹将发生重大变化。快乐寡妇此时即将步入第二段婚姻，也即将进入社交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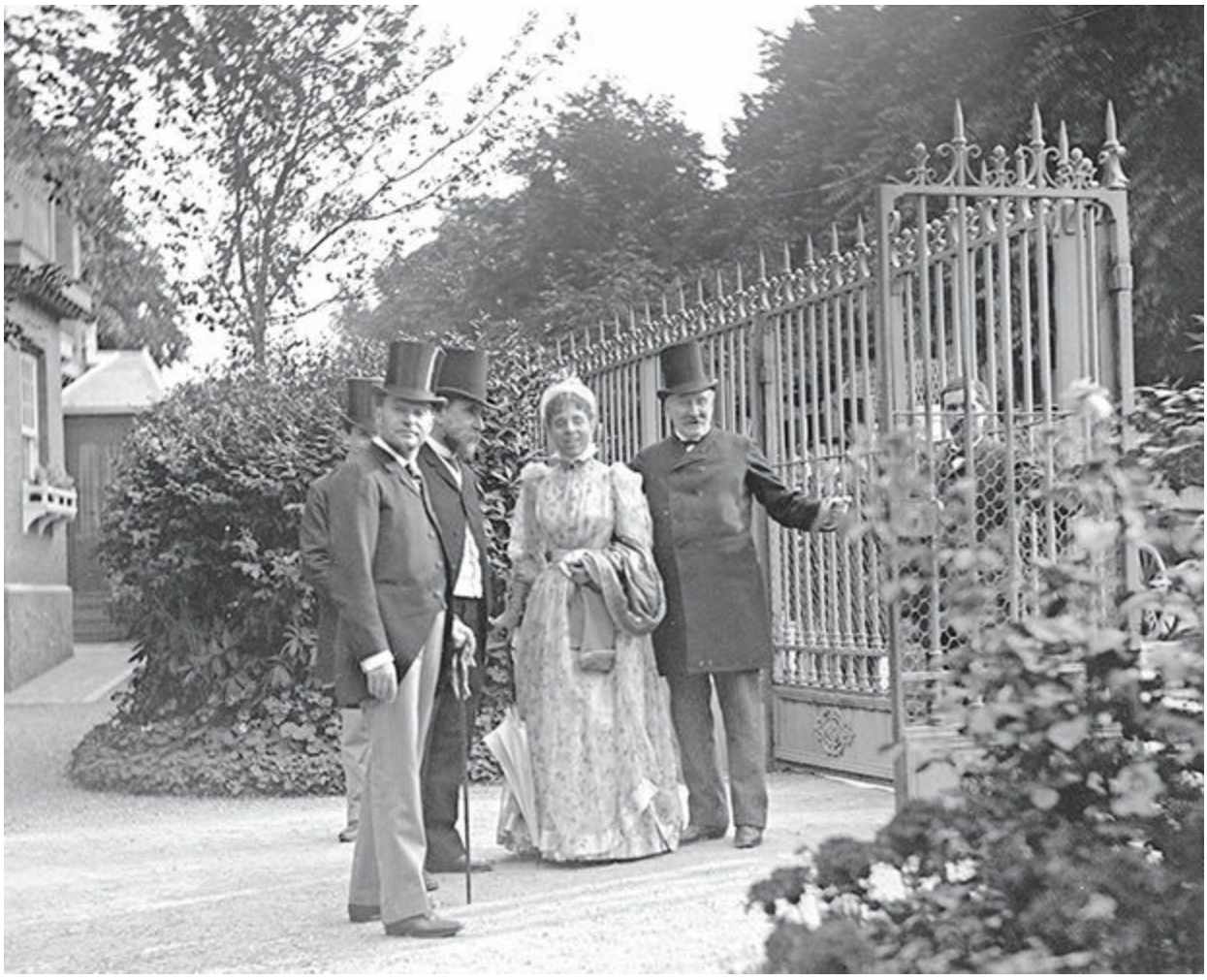
她和斯特劳斯第一次有记录的共同出行是在1881年3月。在卢多维克和另一位朋友的陪伴下，他们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塞纳-马恩地区的那座有名的城堡，费里埃（Ferrières）。[173]这座法国最大的城堡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1850年代建成，是一座庞大的正方形新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四角各有一座显眼的圆顶塔。单是大厅就有“微型博物馆”的盛名：墙上挂满了昂贵的艺术作品，并镶嵌着杂青金石、大理石和青铜；60英尺高的天花板上装着水晶屋顶。城堡图书室有8000多册藏书，共有80间客用套房——按照各个套房中墙上悬挂的古董挂毯的主题被命名为“花香卧室”“雉鸡卧室”，等等，每一间都配有闻所未闻的顶级奢侈品：一个私密的洗手间。（每个套房的洗手间墙上还挂有更多同样主题的挂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家中的犹太会堂，这是主人们坚定地奉行犹太教的标志（在他们看来，他们受封的异教徒爵位与这一点并无矛盾）。1836年，德裔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把詹姆斯男爵位于巴黎的豪宅称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的“财阀专制国家的凡尔赛宫”。海涅的说法同样适用于费里埃。在巴黎上层犹太人看来，它完全等同于王室宫殿，达到了犹太人权力和地位的顶峰。

如此夸张的奢侈让“有生”阶层的许多人嗤之以鼻。[174]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把费里埃比作“掀翻的五斗橱”，而自称法国人品位守护者的爱德蒙·德·龚古尔则称之为“愚蠢而荒谬的奢侈品，是穷尽想象的种种风格的大杂烩”。[175]尽管如此，内部装潢（设计师是欧仁·拉米[176]）的王宫气派和巨大的打猎场地（占地18平方英里的上好森林、河流和草地）还是为它吸引了许多来自欧洲统治精英阶层的拥趸，包括瑞典和英格兰未来的国王。1862年，拿破仑三世看到费里埃的奢华后“陷入了狂喜”。八年后，德国皇帝威廉一世[177]征用费里埃作为他个人在普法战争期间的作战基地。这位皇帝反对首相的负面意见，宣称“多么非同寻常

的宫殿啊！国王可没办法偷偷拥有这样的东西——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才有这样的特权”。战争结束后，他把城堡归还给了主人，内中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红酒收藏均完好无损。[178]



普法战争（**1870—1871**）期间，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征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著名城堡费里埃作为他私人的作战基地



这是热纳维耶芙和未来的丈夫埃米尔·斯特劳斯（左一）现存最早的合照。她被他的财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关系所吸引

在热纳维耶芙看来，受邀前往费里埃是美梦成真，不仅有机会在富可敌国的氛围里住上几天，也有机会促成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她自家亲戚之间的非正式和解。这必将是一份身后的停战协议，因为热纳维耶芙的亲戚和前监护人埃米尔·佩雷尔已经在1875年去世了，五年后他的弟弟伊萨克也与世长辞。伊萨克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买下佩雷尔兄弟乡下的地产，由于其位置正好距离费里埃很近，两处地产就合二为一了。尽管如此，和解对热纳维耶芙来说仍大有深意。她渴望把家族的仇恨抛在脑后，开启新的人生，让自己和这个时代的赢家结盟。她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宏大、更美好的生活，就像来拜访费里埃，以及其中所暗含的社交

关系的大大提升。一边手挽着斯特劳斯，一边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相谈甚欢，热纳维耶芙迈向了未来。

---

[1] 引文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00；GPR为GS而作的色情诗题为《一位卡门》（"A Carmen"），见GPR，*Tout n'est pas rose*（Paris：Calmann-Lévy，1877），169-70；GS向莉佐特抱怨这首诗"无礼"的文字，见NAF 24981，folio 240。GPR早期创作的另一首献给GS的诗题为《一位B夫人》（"A Mme B"，1870），见GPR，*Pommes d'Ève*e（Paris：1874），84-85。关于GS与GPR的关系，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46-50。

[2] 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60.

[3] 杜艾街（rue de Douai）22号那座四层楼的住户几乎全都是阿莱维一家和他们的亲戚。热纳维耶芙住在三层的公寓里（她与比才的整个婚姻期间以及后来守寡的11年都是如此），她的堂兄卢多维克·阿莱维一家——妻子路易丝和两个儿子埃利和达尼埃尔——住在二层。卢多维克的父母、贝贝的叔叔莱昂和婶婶纳尼内·阿莱维（Nanine Halévy），与他们的未婚女儿瓦伦丁同住在一层。1873年到1875年期间，乔治·比才的父亲阿道夫也住在这座楼的底层公寓里。（注：和英语不同，"底层"和"一层"在法语中不是同义词，法语的"一层"翻译成英文是"二层"，以此类推。）——作者注

[4] Henri Lavedan，"Un raffiné：Georges de Porto-Riche，" *Le Journal*（May 16，1894）：1. 关于评论家们对GPR的看法，见*Un Monsieur de l'Orchestre*（pseud. of Émile Blavet），"La Soirée théâtrale：*L'Infidèle*，" *Le Figaro*（April 26，1891）：2；and Hendrik Brugmans，*Georges de Porto-Riche*：*sa vie*，*son œuvre*（Geneva：Slatkine，1976），121. 关于GPR的古董剑，见HR，*Nos rencontres*（Paris：Mercure de France，1931），124-25。

[5] 雅克·布朗什（Jacques Blanche，1861-1942），法国艺术家。尽管他曾经接受过画家亨利·热尔韦的指导，但基本上靠自学成才，在伦敦和巴黎成为一名成功的肖像画家，画风接近托马斯·庚斯伯罗等18世纪英国画家，以及爱德华·马奈、约翰·辛格·萨金特等人。

[6] JEB，*Mes modèles*：*souvenirs littéraires*（Paris：Stock，1984 [1928]），114.

[7] 安德烈·安托万（André Antoine，1858-1943），法国演员、剧院经理、电影导演、作家、批评家，被认为是法国现代场面调度之父。

[8] 安德烈·德·富基埃（André de Fouquières，1874-1959），法国演讲家、文人和“名流”。他致力于“公共事务”和政治，是莫莱-托克维尔辩论协会的成员。在政治选举中两度受挫后，他放弃了政治，但继续与旧制度的名人来往并出入于欧洲各个宫廷。他与多人合作，写过几部戏剧，并撰写过多部回忆录。

[9] 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4，143. 关于GPR的男性魅力，又见FG，“Hommage à Porto-Riche，”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September 13，1930）：46-47。

[10]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抄录于*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 avec Daniel Halévy*，ed.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173-180，177。

[11] Georges Guinon，ed.，*Clinique des maladies du système nerveux*：*M. le Professeur Charcot，Hospice de la Salpêtrière*，vol. 2（Paris：Progrès Médical，1893），319. George Miller Beard，*A Practical Treatise on Nervous Exhaustion*（*Neurasthenia*）（New York：Treat，1880），53；and Michael R. Finn，*Proust，the Body，and Literary Form*（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0-12 and 38-41. 至于GS的具体症状，她在所有通信中都曾提到，她的家人和朋友也一样。仅举一例，GPR写过GS“焦虑和抑郁交替发作”。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249.

[12] FG，*L’Âge d’or*，168；and AF，*Le Bal du Pré-Catelan*，158；正是AF引用另一个朋友关于GS抽搐的话说它“就像夏日天空的闪电”。朱塞佩（热热）·普里莫利伯爵稍带恶意地说GS的面部痉挛让她“像个疯女人，……所以出于礼貌，我总是避免看她”；见Primoli，*Notes intimes*，n.p.，引文见Emily D. Bilsky and Emily Braun，eds.，*Jewish Women and Their Salons*：*The Power of Conversation*（New York：Jewish Museum，2005），230，n. 103。关于GS的抽搐的讨论，又见Bilsky and Braun，eds.，72；and in George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91。

[13] 贝贝的抽搐包括眼睛突然不自觉地睁大然后眨眼，伴以下唇突然突出，头朝左肩部下沉。这些抽搐动作往往会让首次见她的人吓一跳。不过据费尔南·格雷

说，只要认识了她，“就会习惯这些破坏了她那美丽的吉卜赛（原文如此）面容的抽搐了”。——作者注

[14] 1880年7月6日GS致莱昂·（纳尼内·）阿莱维夫人，抄录于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34。从GS的通信中引用原文时，我尝试尽可能提供出版源信息而非档案源信息，以便感兴趣的读者追溯原文。关于GB，LH，GPR，ES和GS档案的详情，见“参考文献”部分。

[15] 关于GS穿睡衣待客的习惯，见GS致GPR未署期的信件，存于NAF 24944，folio 442/443。

[16] HR，*Les Cahiers inédits*，ed. David J. Niederauer and François Broche（Paris：Pygmalion/Gérard Watelet，2002），322.

[17] 关于GS与德加和其他艺术家朋友一起进行的活动，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31-47；LG，*Souvenirs du monde*，op. cit.，289；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60。

[18] 奥古斯特·图尔穆什（Auguste Toulmouche，1829-1890），法国画家，以其笔下精美的巴黎妇女肖像画而闻名。

[19] 1881年9月20日GS致NH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38。在这封信中，GS说德洛奈把自己化成了秋神、夜神和一位护士等多种形象。GS没说图尔穆什的哪一幅画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她只是说他请她来让他画画时穿上时尚的现代裙装。图尔穆什看似借用GS的容貌创作的画作包括*Awaiting the Visitor*（*Attendant le visiteur*，1878）；*Exotic Beauty*（*Beauté exotique*，c. 1880s）；and *The Love Letter*（*Le Billet-doux*，1883），见本书彩页的复制版。他还在1886年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但那幅作品已经丢失。

[20] GS，日记，署期为1862年1月；抄录于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34。

[21] GS，日记，署期为1862年1月；抄录于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34-35。

[22] Louis-Sébastien Mercier，*Tableau de Paris*，vol. 1（Paris：Virchaux，1781），44.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GS出席德·萨冈夫人的野兽舞会时装扮成了青蛙。

[23] LG，*Mémoires*，vol. 2，op. cit.，199；LG，“L’entresol，” *Le Figaro*：*supplément littéraire*（March 3，1926）：3；and FG，*L’Âge d’or*，164.

[24]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99.

[25] 路易·冈德拉（Louis Ganderax，1855-1940），法国记者、戏剧批评家。他是《巴黎评论》（*Revue de Paris*）的文学编辑，也是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

[26] Lucien Corpechot，*Souvenirs d’un journaliste*（Paris：Plon，1936），119；and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4 and 132.

[27]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48-49. GS称GPR为“逃兵”（*lâcheur*）的其他信件的例子，见NAF 24971，folio 270/271，folio 290/291，and folio 276/277；and NAF 24944，folio 295，folio 329，and folio 337。

[28] GS致MP，署期为“5月27日，周六”的信，见耶鲁大学的普鲁斯特档案文件，GEN MSS 601，box 49，folder 1022。

[29]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Paris：Flammarion，1949），108，n. 1.

[30] 1878年8月6日GS致NH，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33。

[31]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他的画作对后期崛起的印象派画家和凡·高的画风有很大的影响，他1830年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影响了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

[32]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8-23；以及Eugène Delacroix，*Journal*（Paris：Plon，1932），422-25及各处。

[33] 爱德华·莫奈斯（Édouard Monnais，1798-1868），法国报人、剧院经理、编

剧和歌词作者。他曾任《巴黎杂志音乐公报》主编，后出任法国内政部歌剧专员、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院长，以及巴黎歌剧院联席院长。

[34] 爱德华·莫奈斯，*Souvenir d'un ami pour joindre à ceux d'un frère*（Paris：Imprimerie Centrale，n.d.），12。又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3。

[35]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41.

[36] Ruth Jordan，*Fromental Halévy*：*His Life and Music*（New York：Limelight，1996），139；关于弗洛蒙塔尔·阿莱维在巴黎工作的繁忙日程，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05-12。

[37] 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城市效仿巴黎而组建的民兵组织。这是一支区别于正规军的独立军事力量，对革命有一定影响，但后来被拿破仑解除武装。在君主被流放后，国民自卫军重建并继续在19世纪的每一次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38] 罗马大奖（Prix de Rome），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主要为艺术生设立的奖学金。起初由法国王室绘画和雕塑学院在其学员中经过严格选拔而出，共有四个名额，获奖者可以前往罗马，在著名的美第奇别墅居住三年，并接受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的指导。获奖者在罗马期间的所有支出由法国国王负担。

[39] 爱德华·迪比夫（Édouard Dubufé，1819-1883），法国肖像画家。他作为肖像画家的生涯正式始于1853年为皇帝拿破仑三世和皇后欧珍妮所画的肖像。

[40]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2.

[41] *Mina Curtiss*，*Bizet and His World*（New York：Alfred A. Knopf，1958），266.

[42]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9-23；Ruth Jordan，*Fromental Halévy*：*His Life and Music*（New York：Limelight，1996），110 and 168-69，and Laure Murat，*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Paris：Hachette/Lattès，2001），139-43 and 199-202.

[43] 这封信全文抄录于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9。

[44] 大拇指汤姆（Tom Thumb），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汤姆生下来只有父亲的大拇指一样高，故而得名。

[45] 引文抄录于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9；以及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11。又见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88。

[46]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2 and 23；Delacroix，*Journal*，499；and Murat，*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199-201.

[47] 埃米尔·布朗什（Émile Blanche，1820-1893），法国精神病学家。他是画家雅克·布朗什的父亲。

[48] 1863年GS致瓦伦丁·阿莱维的一封没有署期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52。

[49] 德·朗巴勒亲王夫人（Princess de Lamballe），即玛丽-路易丝-泰蕾兹·萨瓦-卡里尼昂（Marie-Thérèse-Louise de Savoie-Carignan，1749-1792），意大利萨伏依王朝分支的成员，17岁时嫁给了波旁王朝的正统继承人德·朗巴勒亲王路易·亚历山大·波旁。她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50] Murat，*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180-81.

[51] Andrée Jacob，*Il y a un siècle… quand les dames tenaient salon*（Paris：Arnaud Seydoux，1991），141.

[52]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49.

[53]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30；Murat，*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200.

[54] 见埃米尔·佩雷尔签署的一份经公证的文件，署期为1864年10月18日，犹太

教艺术与历史博物馆（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du Judaïsme）数字档案，编号inv. 2000.24.038。奇怪的是，这份文件还指出埃斯特·阿莱维并非死于帕西，而是死于巴黎第九区的19 bis，rue de la Chaussée d’Antin。我无法找到其他证据来证实这一古怪说法，阿莱维家族的其他学者或传记作家也从未提到过。根据巴黎的一家英文书店Galignani 发布的一份当代指南，19 bis，rue de la Chaussée d’Antin是一家巴黎新教徒“较富裕阶层”的年轻太太学校的地址。*Gaglignani’s New Paris Guide*（London：Simpkin，Marshall & Co.，1863），116.

[55] 关于佩雷尔兄弟的破产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见Romaric Godin，“Les Frères Pereire，le salut par le crédit，” *La Tribune*（December 26，2011）；and 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158-59。

[56]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61.

[57]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EdG，他是从阿莱维的朋友Sichel夫人那里听说的，而后者又是从布朗什医生那里听说的。J.-P. Halévy，“Ludovic Halévy par l ui-même，” 143-44.

[58]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EdG，他是从阿莱维的朋友Sichel夫人那里听说的，而后者又是从布朗什医生那里听说的。J.-P. Halévy，“Ludovic Halévy par l ui-même，” 143-44.。

[59]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39.

[60]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40。

[61]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40。

[62]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68。

[63] 威廉·福克纳那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尚未过去”，见威廉·福克纳，*Requiem for a Nun*（New York：Knopf Doubleday，2011 [1951]），

69。

[64] AG，*Les Clefs de Proust*，29.

[65]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54.

[66] 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1867-1956），法国哲学家、小说家、评论家。曾经获得四次诺贝尔文学奖与一次龚古尔文学奖的提名。他善于写作论理性文章，代表作有《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1927）等。

[67]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53。

[68]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53。

[69]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54。

[70] 关于这些前往阿莱维/比才家做客的宾客的家庭住址，见Jetta Sophia Wolff，*Historic Paris*（Paris：John Lane，1923），227-28；*Tout-paris*：*Annuaire de la société parisienne*（Paris：A. La Fare，1893），69，80，155，237，and 400。感谢Alain Bertaud告诉我"Pubis de Cheval"的意思，起这个讽刺绰号的是美术学院的一位不敬尊长的学生。

[71] GB致伊波·罗德里格斯，见NAF 14345，folio 267。

[72]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62.

[73] 亨利·穆杰（Henri Murger，1822-1861），法国小说家和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情景》（*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1851），其内容为根据自己经历写成，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巴黎阁楼的极度贫穷的作家的故事。

[74] 儒勒·马斯内（Jules Massenet，1842-1912），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尤以其歌剧而闻名。他上演最频繁的歌剧作品是《玛农》（*Manon*，1884）和《韦尔泰》（*Werther*，1892）。

[75] 居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1832-1883），法国艺术家、版画家、漫画家、插画家和木雕雕刻家。他的作品多是黑白两色。作品充实饱满、层次分明、质感强烈。

[76] 爱德华·德太耶（Édouard Detaille，1848-1912），法国学院派画家、军事题材艺术家，以其精准和现实主义的细节而著称。他被认为是“法国军队半官方的艺术家”。

[77] 皮埃尔·皮维·德·沙瓦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法国画家，尤以其壁画而闻名。他是法国国家美术协会的共同创办人和主席，其作品对其他许多艺术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78] “马耻骨”（Pubis de Cheval）是他的名字Puvis de Chavannes的谐音。

[79]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64。

[80] Jean-Pierre Halévy，“La Famille Halévy，” in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ed. Henri Loyrette*（Paris：Fayard，1996），18-37.

[81] 色当会战（Battle of Sedan），普法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发生于1870年9月1日，结果为法军惨败，德军大获全胜，大量法军被俘，连法皇拿破仑三世本人亦沦为阶下囚。虽然德军仍需要与即时重组的法国政府作战，但此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的胜利。

[82] Hugh MacDonald，Bize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166.

[83]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67.

[84] 埃内斯特·吉罗（Ernest Guiraud，1837-1892），法国作曲家和音乐教师。他以创作了比才歌剧《卡门》，以及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的传统管弦乐宣叙调而闻名。

[85] Borrel，“Geneviève Straus，” 106-27，116.

[86]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67.

[87]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87；and in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71-72.

[88] Rémy Stricker，*Georges Bizet*（Paris：Gallimard，1999），153.

[89] Borrel，"Geneviève Straus，" 117.

[90]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72 and 74-75.

[91] Peter Brooks，*Flaubert in the Ruins of Paris*：*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a Novel，and a Terrible Year*（New York：Basic Books，2017），37.

[92] Jacques Rougerie，*Paris libre*：*1871*（Paris：Seuil，2004），265-70.

[93] 关于巴黎公社期间的GS和GB，Jacques Rougerie，*Paris libre*：*1871*（Paris：Seuil，2004），76-81。关于巴黎公社的基本资料，Jacques Rougerie，*Paris libre*：*1871*（Paris：Seuil，2004）。Alistair Horne，*The Fall of Paris*：*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71*（London：Reprint Society，1965），245-433；and John Merriman，*Massacre*：*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New York：Basic Books，2014）.

[94] 将军加利费侯爵（Marquis-Général de Galliffet），即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ston Alexandre Auguste，1830-1909），法国将军，以参与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而闻名。

[95] Alistair Horne，*The Fall of Paris*：*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71*（London：Reprint Society，1965），406.

[96]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91.

[97]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03.

[98]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1830-1914），法国诗人、语言学家，曾带领19世纪的奥克语（普罗旺斯语）文学复兴。他在1904年与西班牙剧作家何塞·埃切加赖共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99] 关于评论界对《阿莱城姑娘》的反应，见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03；以及Konrad von Abel指挥的比才《阿莱城姑娘》的节目单，Jürgen Höflich Musikproduktion（Munich，2005）：未出版。

[100]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中短篇小说大师、剧作家、历史学家。梅里美终身衣食无忧，学识渊博，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中鲜有的学者型作家。

[101]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18；and Hervé Lacombe，*Georges Bizet*：*Naissance d'une identité créatrice*（Paris：Fayard，2000），744.

[102] Borrel，"Geneviève Straus，" 119.

[103]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06.

[104]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107.

[105] 友弟德（Judith），《伪经》及天主教核定英译本《圣经》中《友弟德书》（Book of Judith）中的人物，又译为"朱迪斯"。她是以色列女英雄，在亚述大军围攻其家乡伯图里亚时，与她的女仆潜入亚述军营，获得了亚述统帅赫罗弗尼斯的信任与爱慕，后来在赫罗佛尼斯醉酒之后将其刺杀，斩下敌帅首级之后与女仆返回伯图里亚。亚述军队因主帅遇刺而溃败。

[106]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107；引文又见Andrée Jacob，*Il y a un siècle… quand les dames tenaient salon*（Paris：Arnaud Seydoux，1991），150。

[107] 1884年9月和1890年5月18日埃利·德洛奈致GS的信，分别见NAF 24384 folio 66/67 and folio 82/83。

[108] 加布里埃尔·福莱（Gabriel Fauré，1845-1924），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钢琴家以及音乐教育家。福莱前承圣桑，后继者则有拉威尔与德彪西。早期与圣桑一同为法国国民乐派奠基，后期在巴黎音乐学院任内力行改革，提拔后进，对于法国近代音乐发展起了轴承的作用。福莱的音乐作品以声乐与室内乐闻名，在和声与旋律的语法上也影响了他的后辈。

[109] 维克托里安·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1831-1908），法国剧作家。他最初的成功源于为女演员维尔日妮·德雅泽创作的作品，一生共写有几十部剧本，师承欧仁·斯克里布的佳构剧传统。知名作品包括《潦草的小字》《费朵拉》《托斯卡》等。此外，他还写过大量轻松喜剧。187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110] 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José-Maria de Heredia，1842-1905），出生于古巴圣地亚哥的法国诗人，高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杰出的十四行诗而知名。1894年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111] 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1864-193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被认为是法国20世纪初期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112] Georges François Renard，*Les Princes de la jeune critique*（Paris：La Nouvelle Revue，1890）.

[113] 朱尔·勒迈特（Jules Lemaître，1853-1914），法国批评家和剧作家。1884年，他辞去教授的职位，先后成为《辩论杂志》和《两大陆评论》的戏剧评论家。1896年入选法兰西学术院。

[114] 保罗·艾尔维厄（Paul Hervieu，1857-1915），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小狗迪奥热纳》（*Diogène le Chien*，1882），《调情》（*Flirt*，1890）。1900年入选法兰西学术院。

[115]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34. 在为入选法兰西学术院而寻求GS的帮助时，约瑟夫·雷纳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你如此广结良友，有你引荐，我会结交很多既优雅又有影响力的人。" 雷纳克致GS，未署期，标注为 "Porter's Lodge [Pavillon du Concierge]，Montjoye，Rambouillet，Friday，" in NAF 14383，folio 106/107。

[116] RF，"Mort de Mme Émile Straus，" *Le Figaro*（December 23，1926）：2.

[117] 1887年12月28日保罗·布尔热致GS；引文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61。

[118] 乔尔乔内（Giorgione，1478-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威尼斯画派画家。

[119]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86；以及Curtiss，*Bizet and His World*，266-67.

[120] Curtiss，*Bizet and His World*，366. Curtiss引用了GB致GS的一封署期为1874年2月的信，其中说莱奥尼“想长期带孩子，要么就不带。我们决定不让她带。让我听听你的说法，是留下雅克还是把他送往别处”（366）；GS做了哪一种选择不得而知。关于GS不让莱奥尼接触JB的努力，见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01。

[121] Curtiss，*Bizet and His World*，366.

[122] LH在日记中记录，《卡门》于1874年9月1日彩排。但因为迄今未知的原因，彩排“混乱”而“争吵激烈”，充满了难以解释的打断和延迟。Curtiss，*Bizet and His World*，373-74；and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05。

[123]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Alfred Sisley，1839-1899），法国印象派艺术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英国人家庭，之后恢复英国国籍，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法国度过。西斯莱主要创作风景画，风格受到印象派同道和柯罗的影响，主要作品有《枫丹白露河边》《鲁弗申的雪》《马尔利港的洪水》《洪水泛滥中的小舟》等。

[124] 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1841-1895），法国女画家，也是巴黎印象派团体的一员。法国评论家葛斯塔夫·杰夫华将她与另外两位女画家玛丽·布哈可蒙、玛丽·卡萨特并列为印象派三姝。1864年，也就是莫里索23岁那年，她首次在声誉卓著的学院派巴黎沙龙里展出作品，被选中的作品是两幅风景画。

[125] 夏尔-瓦朗坦·阿尔康（Charles-Valentin Alkan，1813-1888），犹太血统的法国作曲家、钢琴家。阿尔康是19世纪重要的钢琴作曲家，他的音乐极大地开拓了钢琴音乐发展的道路，拓宽了钢琴音乐的范围，提高了钢琴的表现力，其历史意义越来越得到重视。

[126] Jean-Yves Bras，“Qui était Éraïm Miriam Delabord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lkan* 4（March 1987）：3-6.

[127] Curtiss，*Bizet and His World*，369.

[128]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16；Curtiss，*Bizet and His World*，368；and Ruth Harris，*Dreyfus*：*Politics*，*Emotion*，*and the Scandal of the Century*（Macmillan：New York，2010），284.

[129] 该组织名为“犹太研究学会”，至今仍在运作。关于创建成员名单，见该学会杂志第一卷中的使命宣言：《呼吁成立犹太研究学会》，*La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vol. 1（1880）：160-61。关于ES参与该学会的活动，又见“Procès-verbaux des Assemblées Générales et du Conseil（1879-1880），” in *La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vol. 1（1880），152-59。

[130] 欧亨尼·福阿（Eugénie Foa，1796-1852），法国作家。她是塞法迪犹太人的后裔，母亲出自格拉迪斯家族。在结束与丈夫约瑟夫·福阿的短暂婚姻后，她便以写作来维持生活。著有《吉都什》（*Le kidouschim*，1830）和《老巴黎》（*Le vieux Paris*，1840）等。

[131] 关于阿莱维和罗德里格斯-昂里凯斯/格拉迪斯/福阿等家族对法国犹太人文化的贡献，见Michèle Bo Bramsen，*Portrait d’Élie Halévy*（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68），1-5；*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ed. Henri Loyrette*（Paris：Fayard，1996）；以及Maurice Samuels的开拓性研究，*Inventing the Israelite*：*Jewish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Palo Alto，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39-46。

[132] 关于阿尔康的犹太文化活动，见Jean-Yves Bras，“Qui était Éraïm Miriam Delabord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lkan* 4（March 1987），5；and David Conway，*Jewry in Music*：*Entry to the Profess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Richard Wagner*（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31；and Ruth Jordan，*Fromental Halévy*：*His Life and Music*（New York：Limelight，1996），179。

[133] 戴维·康韦（David Conway，1950-），英国音乐历史学家，著有《音乐圈里的犹太人》（*Jewry in Music*：*Entry to the Profess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Richard Wagner*，2012）等。

[134] David Conway，*Jewry in Music*：*Entry to the Profess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Richard Wagner*（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35；关于爱尔康根据犹太礼拜音乐曲式改编的音乐，David Conway，*Jewry in Music*：*Entry to the Profess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Richard Wagner*（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222-37。

[135] 关于阿尔康的精神疾病的讨论，主要来源是Stephanie McCallum，“Alkan：Enigma or Schizophrenia？” *Alkan Society Bulletin* 75（April

2007）：2-10。

[136] Stephanie McCallum，“Alkan：Enigma or Schizophrenia？” *Alkan Society Bulletin* 75（April 2007），8。

[137] 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28-29；and *Maurice Sachs*，*Le Sabbat*：*souvenirs d’une jeunesse orageuse*（Paris：Gallimard，1960），16.

[138] EdG，1887年12月28日的日记。据EdG说，玛蒂尔德公主说此话时GS也在场，而且声音大得她一定能听到。

[139] 詹姆斯男爵（Baron James），即詹姆斯·马耶尔·德·罗斯柴尔德（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1792-1868），德-法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创始人。1822年获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封为男爵。

[140] 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158.

[141] 塞莱斯蒂纳·加利-玛丽（Célestine Galli-Marié，1837-1905），法国女中音歌唱家，以其在歌剧《卡门》中扮演同名女主角而闻名。

[142] Hervé Lacombe，*Georges Bizet*：*Naissance d’une identité créatrice*（Paris：Fayard，2000），744；and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11.

[143] 米纳·柯蒂斯（Mina Curtiss，1896-1985），美国作家、编辑、翻译家和教师，曾任史密斯学院副教授。她翻译并编辑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信件》等一系列书籍，并著有传记《比才和他的世界》（*Bizet and His World*，1958）等。1960年，她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44]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14-15.

[145]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16.

[146]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16.

[147] Hervé Lacombe，*Georges Bizet*：*Naissance d'une identité créatrice*（Paris：Fayard，2000），736.

[148] GB、GS和赖特尔一家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以前由GB保有的让和玛丽的少量照片如今保存在Mina Curtiss Collection in the Music Divisio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JPB 93-95，series 7，box 4，folios 193-99。

[149] Hugues Imbert，*Médaillons contemporains*（Paris：Fischbacher，1902），51.

[150] Borrel，"Geneviève Straus，" 120.

[151]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94. GB虽然被葬在蒙马特尔公墓，但他的遗体后来被迁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Lachaise Cemetery）。

[152] Jacques-Gabriel Prod'homme and Arthur Dandelot，*Gounod*：*sa vie et ses œuvres*，*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Paris：Charles Delagrave，1919），182，n. 4.

[153] Winton Dean，*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London：J. M. Dent & Sons，1965），128. Dean认为是 Gounod写的这份声明，而不是GS。

[154] 他要求上演《卡门》的信件节选见《高卢人报》（1877年7月24日），第二版。

[155] Susan McClary，*Georges Bizet*：*Carmen*（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17.

[156] 引文Susan McClary，*Georges Bizet*：*Carmen*（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18.

[157] 引文Susan McClary，*Georges Bizet*：*Carmen*（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18.

[158] Borrel，"Geneviève Straus，" 120.

[159] Borrell，"Geneviève Straus，" 210；又见雷纳克致GS未署期的信件，存于NAF 14826，folio 100/101。

[160]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16.

[161] Leslie A. Wright，*Bizet Before Carmen*（New York：1985），14. 关于GS与德拉博尔德订婚和打算嫁给他的媒体报道，见*Musical Standard*（October 14，1876）：247。

[162] Borrel，“Geneviève Straus，”121.

[163] JB致GS，NAF 14383，folio 9/10。JB童年时写给GS的其他未出版信件见卷宗5-28。

[164] 1878年7月24日GS致NH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32-33。

[165] 1880年7月6日GS致NH的信，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34。

[166]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176.

[167]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97-98.

[168] Carter，Marcel Proust，207.

[169] 1880年7月6日GS致NH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34。

[170] 1880年7月6日GS致NH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34。

[171] 关于ES传说中的罗斯柴尔德父亲，本书第10章有更长篇幅的讨论，见Borrel，“Geneviève Straus，”106；EdG，1883年11月23日和1885年6月6日的日记；Andrée Jacob，*Il y a un siècle… quand les dames tenaient salon*（Paris：Arnaud Seydoux，1991），165；and Herbert Lottman，*The Return of the Rothschilds*：*The*

Great Banking Dynasty Through Two Turbulent Centuries（London：I. B. Tauris，1995），88。

[172]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98-99；and GPR to GS，in NAF 24971，folio 240/241.

[173] Fredric Bedoire，*The Jewish Contribution to Modern Architecture*：*1830-1930*，trans. Roger Tanner（Stockholm：Ktav，2004），18 and 85-92；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45-48 and 108-10；and Guy de Rothschild，*Contre bonne fortune…*（Paris：Pierre Belfond，1983），11-42.

[174] 关于德雷福斯事件之前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无限权力引发的反犹言论，见Anka Muhlstein，*Baron James*：*The Rise of the French Rothschilds*（New York and Paris：The Vendome Press，1983），114；Jacques de Biez，*Rothschild et le péril juif*（Paris：Chez l'Auteur，1891）；and Un Banquier（pseud.），*Que nous veut-on avec ce Rothschild I*er，*roi des Juifs et dieu de la finance*？（Brussels：Chez les Principaux Libraires de la Belgique，1846），7："The royalty of Rothschild Ist，" the pseudonymous "Banker" states，"is an officially recognized fact，as indisputable as that of a Bourbon，a d'Orléans or a Cobourg."

[175] Fredric Bedoire，*The Jewish Contribution to Modern Architecture*：*1830-1930*，trans. Roger Tanner（Stockholm：Ktav，2004），88.

[176] 欧仁·拉米（Eugène Lami，1800-1890），法国画家、水彩画家、平版画家、插画家和设计师。他在七月王朝和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是时尚巴黎的画家，也曾为《吉尔·布拉斯》和《曼侬·莱斯戈》等书绘制插图。

[177] 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全名威廉·腓特烈·路德维希（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71年1月18日就任德意志帝国第一任皇帝。他死后，因为德意志统一而被其孙威廉二世尊为大帝，号称"威廉大帝"。

[178] Guy de Rothschild，*Contre bonne fortune…*（Paris：Pierre Belfond，1983），18. Niall Ferguson引用的这最后一句话稍有出入："我们这些人无法敛聚如此巨大的财富，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成就。"见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199。关于普鲁士人占据费里埃，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

198-201；and Guy de Rothschild，*Contre bonne fortune.*…（Paris：Pierre Belfond，1983），19。

第5章 衰亡与兴替

1883年8月24日，忍受了两个月的腹痛折磨之后，尚博尔伯爵在弗罗斯多夫城堡去世了。[1]他几乎活到了自己63岁生日的那一天，已经超出自己家族男性寿命十多年了。尽管如此，对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复辟的保王派来说，他的死仍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正如一位编年史家谈及弗罗斯多夫城堡那年夏天的紧张气氛时所写的，爵爷那个小圈子的成员：

> 不敢相信法国国王居然真的死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不解："如果不是为了登基统治，他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在他们看来，他就是法国君主制的化身。如果他消失了，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

一场重大的地质灾难加重了笼罩在焦虑的王室上空的烟霾。那年5月底到8月底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岛经历了一连串火山爆发，引发了一场高达百英尺的海啸，吞噬了36000人的性命。另有60000人死于席卷全球的强烈气流引发的火灾、尘灰、砂砾和大气扰动，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好望角，到处都天昏地暗、翻江倒海。这是自1755年里斯本地震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里斯本地震也造成了同样的死亡人数，而波旁王朝殉难的守护圣人、尚博尔伯爵的伯祖母玛丽·安托瓦内特碰巧是那年出生的。在迷信的廷臣们看来，这一巧合预示着塌天大祸。

洛尔·德·舍维涅在她的君主病痛开始前几周逃回了巴黎，因而在君主最后的日子里并没有陪伴在侧。（他的死因究竟是胃癌、溃疡、心脏病还是中毒，医生团队始终没有达成一致，他们最初的诊断是胃炎，因为他在6月食用了过熟的草莓。）但8月4日上午，尚博尔在病榻上曾试图传唤洛尔。舍维涅提醒他洛尔出国度夏去了，国王突然想起来，他在

她离开的前夜曾为她画过一幅素描。在那幅小小的肖像画中，洛尔的周围到处是扁衣箱、行李员，还有无数的鹦鹉。



Le Gaulois

HENRI V EST MORT, VIVE PHILIPPE VII

尚博尔伯爵死于**1883**年**8**月**24**日，粉碎了追随者们复辟正统王朝的希望

爵爷让人把那幅画取来，把它送给舍维涅作为他尊贵身份的象征。他继而解释说他死后，夫人会解散弗罗斯多夫城堡的宫廷，搬到亚得里

亚海滨小镇格里茨（Göritz），这对王室夫妇在那里有一个冬季住所，他会和很多客死他乡的波旁家族人士一起葬在那里，其中包括他的祖父、1836年在那里死于霍乱的查理十世。将死之人提议道，在永远离开城堡之前，舍维涅可以随意取几件纪念品。“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他咧嘴笑着并用刺耳的声音说道，“要是老丫头在，她能塞满两个旅行箱！”[2]根据洛尔的转述，这是亨利五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其他目击证人则宣称，他死前吐出的最后一个词是“法国”。[3]）

十天后，欧洲各国的君主来到温暖的格里茨，吊唁法国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位觊觎者。亨利五世去世时没有子嗣，因而任命他45岁的表弟巴黎伯爵菲利普·德·奥尔良为继承人，全然不顾他们分别代表的王室家族的两个分支已经敌对了一个世纪之久。[4]这一和解举动虽意在弥合法国保王派内部的分歧，却激怒了舍维涅这类一生都在斥责奥尔良派企图篡位的纯粹正统王朝拥护者。舍维涅和同事们在公开场合当然宣称支持君主任命的继承人。但私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腓力七世[5]统治王朝的前景并不看好。[6]

尚博尔的葬礼本就令这些保王派愁肠百结，又因为各种节省开支的措施而变得愁云惨雾，负责组织葬礼的舍维涅不得不用硬纸板制成的法国王室纹章来装点格里茨天主教堂。看到那些粗制滥造的廉价装饰品，正统王朝拥护者们对法国波旁王朝黯然落幕更是伤心不已。保王派政治家阿尔贝·德·曼伯爵[7]专程从巴黎赶来参加葬礼，据他说，这些忠实信徒“不仅在哀悼国王，也是在哀悼君主制本身，哀悼（他们）曾热爱并如此慷慨和虔诚地为之献身的事业”。[8]在另一位旁观者看来，他们显然难过地“意识到自己浪费了生命；他们把青春年华、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希望”。[9]弗罗斯多夫的有些成员伏在爵爷的尸体上痛哭，他的尸体裹着祖先的白色旗帜，平放在雕刻着百合花的白色大理石棺椁中。

也有廷臣窃笑夫人决定让她丈夫的西班牙波旁亲戚和他的外甥们［由他唯一的姐姐、已故的德·帕默公爵夫人（Duchesse de Parme）所生］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这一举动象征性地否定了巴黎伯爵刚刚得到的假定法国国王的地位。[10][11]（因此他本该走在其他所有哀悼者的前面。）菲利普·德·奥尔良深感上当，除了抵制葬礼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的仆人们恳求他只需在教堂里把自己的祷告椅相对于其他人前移十米即可。为表示对这位受到轻视亲王的尊重，许多欧洲王室和贵族的子弟也没来参加葬礼。但去世国王的寡妇大概会咆哮着引用一句她最喜欢的赞美诗来为自己辩解：她对奥尔良派的憎恨猛如死亡[12]。



丈夫死后，尚博尔伯爵夫人请人在隐居庄园的花园里仿照著名的卢尔德圣母朝圣地建造了一个圣祠

这是尚博尔伯爵遗孀最后一次徒劳地宣示波旁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后她不但与心爱的“恩里科”永别，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活，毕竟在过去的37年里，她还是和他一起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的。葬礼之后，她关闭了弗罗斯多夫城堡，解散了廷臣和员工，随后迁居至位于格里茨的那座16世纪庄园，她差人在庄园的花园里仿照卢尔德[13]的圣母朝圣地（Virgin’s Grotto）建造了一座专门敬奉圣母的圣祠。一俟完工，这位很可能仍是处女的夫人余生每天都会在那里祈祷好几次。她再也没有回弗罗斯多夫，那里的其他常客也是如此。亨利五世的宫廷和它的主人一样销声匿迹了。[14]

没有了国王、地位乃至整个生存的意义，舍维涅要么因为事情太多，要么是客气，否则就是太悲痛了，根本没心情在最后一次离开弗罗斯多夫之前收集王室的收藏品。除了他和洛尔要在之后六个月（和黑色的丧服一起）佩戴的正统王室悼念胸针外，他带回法国的唯一一件纪念品就是他为十年前那次失败的正统王朝政变特制的制服，以及君主在遗嘱中留给他的一件没有特别说明的赠品。还有爵爷在病榻上送给他的那幅洛尔的肖像。

那套制服被收在了舍维涅夫妇位于圣奥诺雷区那间新公寓的壁橱里。［夫妇俩如今在珀西尔大街（avenue Percier）1号租了一套公寓，距离他们此前那间位于柯里塞街的备用公寓不远，几家之遥就是格雷弗耶家族租来用作奥尔良派总部的住宅。[15]］但洛尔把第二件弗罗斯多夫的纪念品放在了客厅的显著位置，把它和一幅德·萨德侯爵的18世纪水彩肖像画并排悬挂在一起。如此一来，这幅王室素描画就被供奉起来，始终提醒着人们关于洛尔其人的传说：她曾经像“可怜的阿代奥姆”一样，不辞辛劳地为爵爷的君主复辟而努力，与丈夫的使命不同，她的事业在爵爷死后很长时间仍然风生水起。

自从洛尔作为新娘第一次前往弗罗斯多夫以来，五年过去了，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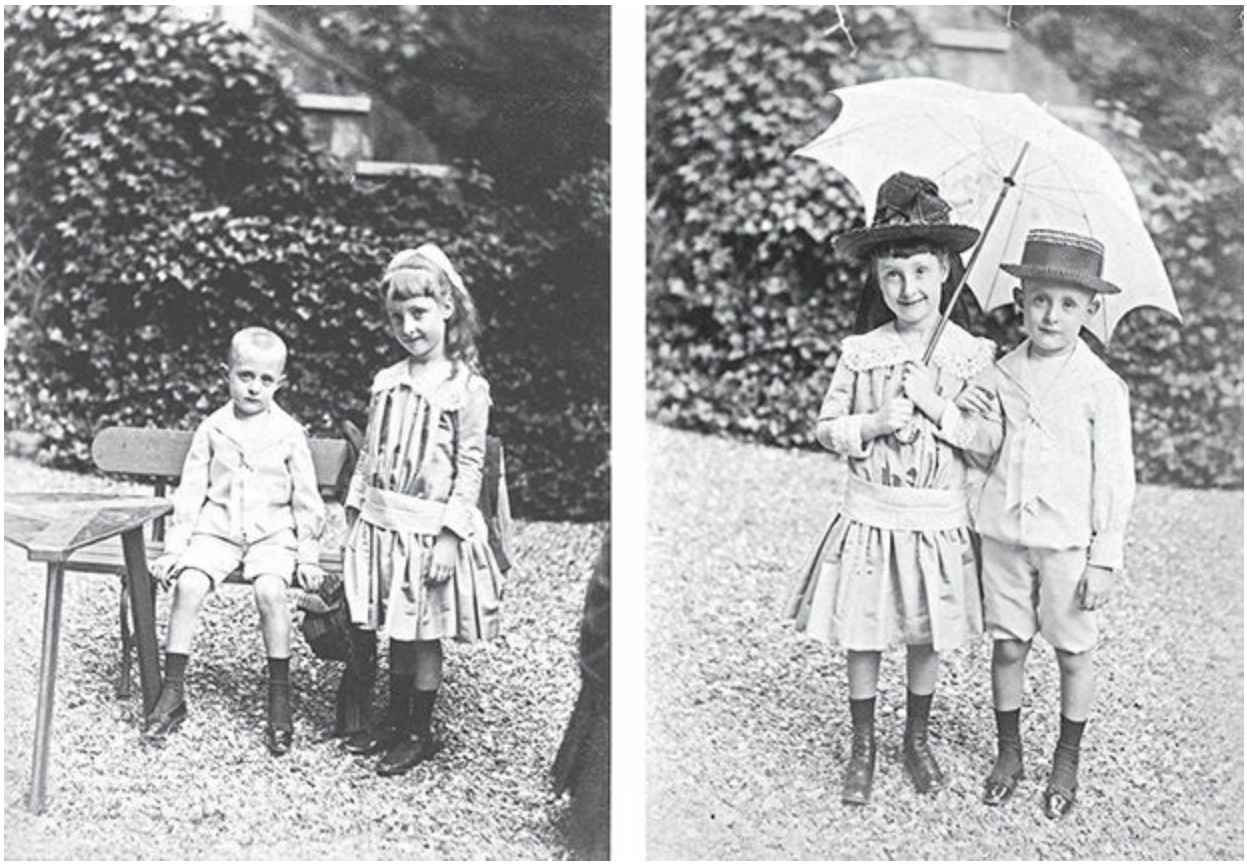
洛尔已经24岁。婚后，她听从丈夫的要求，每年至少有两个月和他一起待在弗罗斯多夫城堡。她还完成了身为妻子的另一个任务，没有耽搁就生下了两个孩子：1880年10月出生的玛丽-泰蕾兹（以她的王室教母尚博尔伯爵夫人命名），以及两年后降生的弗朗索瓦这个必不可少的男性继承人。履行了这些身为人妻的义务之后，洛尔便充分利用舍维涅作为交换而给她的刺激，在没有他陪伴的情况下回到巴黎，她回来得越来越频繁，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根据礼节，洛尔每次离开宫廷之前，都必须请求君主夫妇批准。为迎合他们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她每次请求这一恩赐时大概都会提出自己初为人母的义务。[16]由于礼仪禁止廷臣的孩子住在国王的住所，玛丽-泰蕾兹和弗朗索瓦·德·舍维涅不能与父母一起住在弗罗斯多夫，洛尔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把他们送到圣托马斯城堡自己的婆婆那里，但孀居的德·舍维涅伯爵夫人坚称，超过几个月，她就付不起孩子们的食宿了。（洛尔偶尔在舍维涅家族的城堡里短居，亲眼见到婆婆的生活有多悭吝：为削减燃料开支，阿代奥姆的母亲命令整个城堡晚上十点后宵禁，还在深夜亲自沿着黑暗的过道巡察，透过卧室门下面的缝隙窥视哪间屋子里有火光或灯光。[17]）因此在一年中剩下的时间，玛丽-泰蕾兹和弗朗索瓦就不得不待在巴黎——说起来是跟母亲住在一起。

不过事实上，洛尔在巴黎期间也很少和孩子们见面。相反，她把他们委托给一位住家的女家庭教师照顾（这位发福的、终日抱怨的爱尔兰女人名叫弗朗西斯），然后专注于自己的社交生活。起初回巴黎时，洛尔依靠当地的亲戚（她的舍维涅姐夫瓦鲁兄弟，以及两边家族各色各样的堂表兄弟姐妹）和正统王朝拥护者（弗罗斯多夫廷臣的亲戚）把她引荐给社交界。但没过多久，她就在那个圈子里培养了自己的人脉，成为各类活动的中心人物。

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洛尔在社交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

自封的亨利五世宠儿的地位。在城区社交时，她选择的立足点便是给新认识的人们讲述“阴影王国”的逸闻趣事。她的贵族同伴们好像永远听不腻那些故事：她首次出现在红色沙龙时，尚博尔伯爵如何开玩笑说要跟她私奔。宫廷里所有的女人中只有她一人每天跟他一起打猎——“因为打猎也给我带来安慰”。只有她敢于在爵爷发君主的脾气时责备他。只有她敢于说些渎圣的话与他打趣，那些话就连猎人们听了都要脸红。只有她有一幅由法国波旁王朝最后一位王位觊觎者所画的素描，就挂在她巴黎的家里。在一遍遍讲述这些故事时，洛尔精湛地展示了自己的“天真”，强调国王的崇高地位根本没有让她惊慌失措。同时，也同样重要的是，她鼓励听众对这些片段所暗示的惊人的亲密关系浮想联翩。



洛尔的孩子玛丽-泰蕾兹和弗朗索瓦·德·舍维涅，**1888—1889**年前后

洛尔有时甚至会暗示，爵爷才是她两个孩子的生父。她欲盖弥彰地

请求听众不要这么想。她会高喊：“我的两个孩子都是阿代奥姆的——我发誓！”自己驳斥自己的含沙射影。“没有私生子——那是底线！”[18]由于“有生”阶层的成员向来青睐王室的私生子，洛尔显然认定，对孩子的生父做出这般“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在孩子们将来进入社交界时会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另外，她还精明地算出作为一位假定国王的假定情妇，很少甚至没有哪一位贵族的大门会对她关闭，这一赌果然赢了。五年之内，她把自己从一个寂寂无名的乡下新娘，转变为巴黎社交界最受欢迎的少妇之一。

这一变化带来了社交界接二连三的邀请，一位观察家写道：

> 永无止境的狂欢，包括盛大的宴会和亲密的晚餐会，公开的音乐会和私人的戏剧表演，游园会和茶会，白衣舞会（bals blancs：为初进社交界的少女举办）、玫瑰舞会（bals roses：为年轻的已婚夫妇举办）、沙龙舞会、集会、慈善晚宴和晚会，中间还穿插着晚会演出、画展开幕式、冷餐会、订婚宴、变装舞会、大使馆舞会和其他数不尽的灯红酒绿的活动。

洛尔在巴黎期间，这些活动排在她优先事项的前列，就算在爵爷去世、她和丈夫迁居圣奥诺雷区长住之后，也是如此。1883年秋，“可怜的阿代奥姆”永别弗罗斯多夫。如今他回来了却发现在他离开期间，洛尔已经建立了繁忙且完全自洽的日常生活，而且不愿意把他纳入自己的生活中。至于舍维涅抛下洛尔又在首都有着怎样的业余消遣，后文会有详述。但从她的视角来看，阿代奥姆的永久迁回巴黎，并不需要她对自己的社交习惯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孩子们在她的生活中也始终处于次要地位，这总是引发保姆滔滔不绝地抱怨。一位拜访舍维涅夫妇公寓的访客曾在无意中听到弗朗西斯痛

斥洛尔——她那怪腔怪调的法语夹杂着蒂珀雷里[19]土腔，吵闹得厉害——“打扮成一朵铃兰（muguet）的样子去参加某个化装舞会了”，根本不顾五岁的玛丽-泰蕾兹“正在出麻疹，烧到了102℉[20]！”[21]但洛尔可不是好欺负的，就算体格大她一倍的爱尔兰怒妇也别想欺负她。她自己成长期间就没有受到多少父母的照顾，因而也不觉得不陪伴孩子有什么错。

她也绝不是唯一一位把社交生活排在母亲身份之前的人，巴黎贵族有许多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对包括洛尔在内的许多这类女人来说，社交活动“永无止境的狂欢”是一种职业而非消遣，是她们维系家族和阶层荣耀、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哪怕是很小的作用）的机会。除此之外，她们在第三共和国鲜有这种机缘。[22]和那个制度下所有的法国女人一样，贵族女人的法律地位也相当于未成年人。她们无权投票选举或担当政治职位。她们不得进入那个国家的精英大学、军校或职业学校学习。她们不得参加武装军队或外交使团，不得入选公司董事会或法兰西学术院之类的学术机构。与此相反，贵族阶级的男性理所当然地拥有上述全部特权，以及在排他性的社交俱乐部集会的权利，那些俱乐部也不接受女性会员。

后来的1917年，洛尔会反抗最后一项不公，参与建立了巴黎第一个男女社交俱乐部：行际盟友联盟（Union Interalliée）。但在她年轻时，她对社交界的态度是全然接受的，认为那是她进入比家庭更大，因而也可能更刺激，且无疑更有名望的领域的最佳机会，她珍视这个机会。

在这一点上，洛尔同样是她所处环境的产物。由于上文提到的那些不公，法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最初萌芽在1890年前后初现端倪。但贵族女性显然不愿意与之为伍，就算在较下层的女性中间，它也最多是个少数人的事业。[23]（伊丽莎白·格雷弗耶虽然反传统地写到过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但她也很谨慎，只是私下里有这些想法而已。）在考察这一时期

贵妇们的无动于衷时，女性主义领袖卡罗琳·考夫曼（Caroline Kaufmann）写道：

> 她们是凤凰、珍禽、无价之宝，并希望继续保持这样的身份。她们根本不关心女性解放，理由也很充分——争取女性解放对她们没有什么好处。[24]

当然，把自己当作“珍禽、无价之宝”本身也是一种政治举动，只不过这一举动与女性的姐妹情谊无关。洛尔全身心地投入上流社会那些在本质上属于修饰性、象征性的活动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性别、对自己的阶层效忠。如果说她有政治兴趣的话，那么她的政治兴趣更倾向于旧制度，而非“第二性”。[25]

洛尔投身的聚会狂欢可不是为意志薄弱之人准备的；它的日程安排耗时耗力，每年、每月、每周、每天，无休无止。最广义地讲，社交界的年历分为三部分：巴黎的社交季（1—6月）；海边、山区或出国度夏旅行（7—8月）；乡间的秋/冬打猎季（9—12月）。夏天、秋天和冬天暂时离开巴黎，也就是所谓出城度假的那段时间，贵妇们会待在自己、家族或朋友名下的别墅、乡间庄园或城堡里。[26]

这些节庆和假日只是贵妇们社交义务的一部分。洛尔圈子里的女人没完没了地出访和接受拜访。按照历史学家安妮·马丁-菲吉耶（Anne Martin-Fugier）的说法，每年，这套仪式始于

> 新年走访：每年第一周是留给近亲属的，第二周拜访朋友，（1月的）最后两周留给亲戚。然后是“消食”走访。在受邀参加某个晚宴或舞会（无论是否出席）之后一周内，必须去拜访邀请者。之后就是（对订婚、结婚和获奖）表示祝贺的走访或上门慰唁。“顺便”的走动，就是每年要对希望保持良好关系但无须过多交往的人有三四次登门拜访。还有在旅行之前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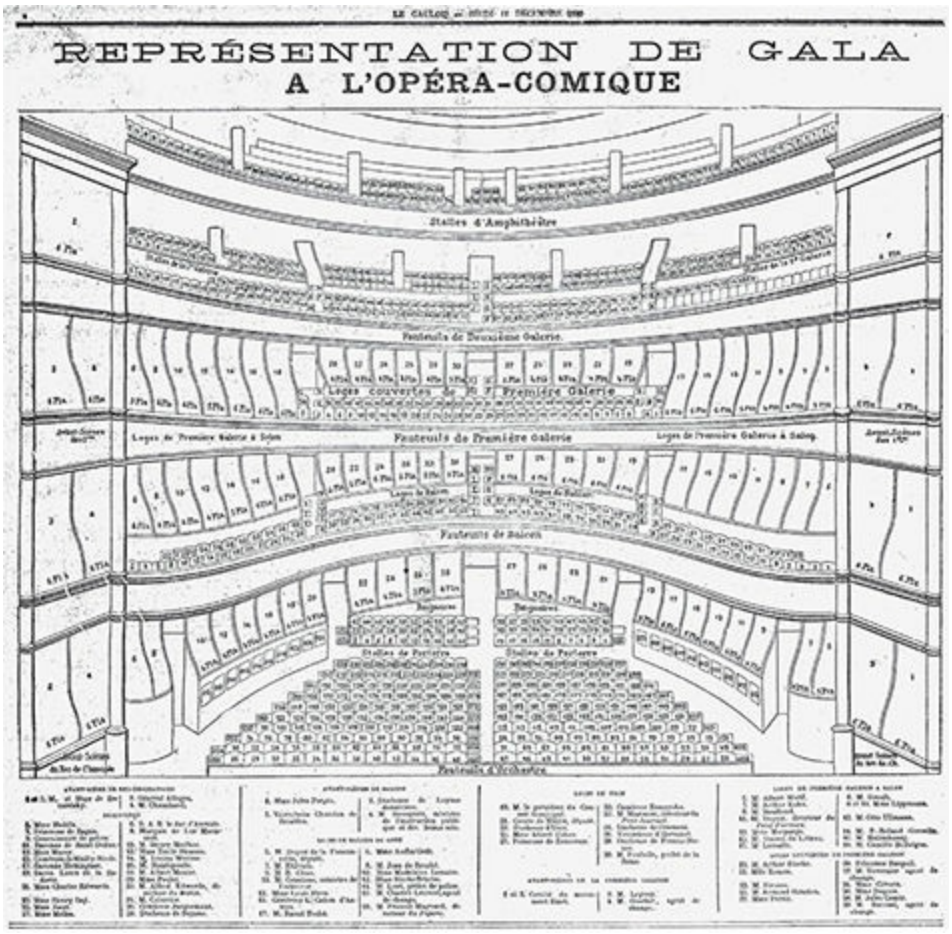
之后上门问候或道别的拜访。[27]

并非所有这些拜访都须见面。如果登门时主人不在家，只需留下名刺（carte de visite）或拜帖即可，在右上角或沿右边折叠一下，表示本人曾亲自登门拜访。在这种情况下，收到名帖的人必须回访。另一种方式是派男仆代表本人向朋友或熟人“发名帖”（poser les cartes）。如果名帖是以这种方式分发的，右侧没有折叠，就无须回访了。名帖的左下角或左侧折叠表示主人已结束旅行回到城里，这也无须回访。在住宅入口处，女主人会放置银质托盘，请人们把名帖留在那里。伊丽莎白·格雷弗耶的一位亲戚估计，他们那个阶层的女性每年要收发1000-1500张名帖。

洛尔在巴黎时，通常会把每天的拜访分成两轮，一轮是在上午早餐后，另一轮是在晚餐前，也就是一天的活动即将结束时。其间，如果天气允许，她会在下午三时左右和贵族同伴们一起在布洛涅森林里漫步、骑马或乘坐马车，布洛涅森林以前是王室狩猎地，后来在1850年代由乔治-欧仁·奥斯曼改成了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公园。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每天在布洛涅森林的中心地带沿湖边散步成为巴黎贵族们的专场演出，是他们向彼此和公众炫耀自己的精英朋友圈和漂亮时装的机会。帝国垮台后，上流社会恢复了这项活动，但把散步的地点从湖边改成了横穿森林的主道之一金合欢路（allée des Acacias）。这条枝繁叶茂的宽阔林荫道俗称“花蹊”[28]，每天下午四时左右，这里到处都是来露脸和会面的社会名流。对于洛尔这样一位上层新秀来说，出现在花蹊是吸引社交圈老手关注的重要机会——当然，最好还能得到他们的喜爱。



金合欢路俗称“花蹊”，是横穿布洛涅森林的一条主道，伊丽莎白、洛尔和热纳维耶芙与其他巴黎人一样，在那里会见他人、展示自己



像这样的示意图标注出了坐在巴黎顶尖表演场所的人士，突出了观众本身也是一场重要表演

日落之后还有其他必行的仪式，例如城区人士在巴黎三个顶尖表演场所的“预约”之夜。[29]出于不得而知的原因，上层社会固定的传统是每周一去歌剧院、周二去法兰西喜剧院、周六去喜歌剧院。在这些夜晚，巴黎贵族占据了剧场最好的座位：他们通过预约租下了整整一季的包厢和大厅包厢（baignoires：通常位于一层的超大型包厢）。他们身着晚间的盛装出席——绅士们穿正式晚礼服；女士们穿着晚礼服或皮草，佩戴传家珠宝——预约者们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谁穿戴了些什么，谁和谁坐在一起：比起舞台上发生的故事，这些戏剧场面才更吸引看戏的上流人士。[30]坐在“天堂”（最上层的便宜座位被称为“天堂”）的观者也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在巴黎的这三个顶尖表演场所，观众如此热衷于窥探，以至于报纸会在每一季之初刊印这些场所的示意图，精准地标出贵族预约者包厢的位置。为了进一步迎合观者的好奇心，巴黎剧场和戏院的经理们会遵循每场演出从头到尾都开着观众席座灯的习俗。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在1899年赞助重演理查德·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31]时曾试图废除这一做法，理由是这位作曲家的作品需要观众全神贯注地倾听。但她的贵族同伴们强烈反对该禁令；他们更在意自己的优雅表现，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兴趣关注舞台上的表演。

洛尔享受预约之夜的原因和她喜欢在花蹊骑马一样：它们提升了她在城区的形象，为社交界报纸报道这类活动的记者们也渐渐对她津津乐道。最佳包厢的季票价格超出了她和阿代奥姆的支付能力，但由于不管什么包厢或大厅包厢，王室的宠儿都会为之增色，所以洛尔很少会缺少邀请。如果她时不时抱怨法兰西喜剧院或歌剧院“满是预约者的臭气”，那只是为了不显得对邀请人的施舍过于感激不尽。洛尔虽然“收入不高”，但自尊还是有的。

每周四和周日，她会和上层其他人一起出现在布洛涅森林的隆尚（Longchamp）赛马场或她的出生地帕西附近的奥特伊（Auteuil）赛马场。[32]洛尔无须担心那些出游的票价，因为支付了骑师俱乐部会员费的交际家和他们邀请的客人可以坐在视野极佳的座位观看赛马。夫人们聚集在她们自己的女性看台，即所谓的“夫人看台”（Tribune des Dames），她们的丈夫却在附近一个男女共用的看台上与交际花们打情骂俏。[33]为了报复那些交际花，贵妇们观看赛马时总是在着装打扮上极尽能事。据一位赛马场的常客说，正是这些

> 贵妇人……使得时尚品位到达了顶峰！她们簌簌轻裙，曳曳繁花，传家珠宝璀璨生辉，是专为今天这个场合从匣子里取出来佩戴上身的。夫人看台像一座法式花园……无檐和有檐帽

上绽放着鲜花，小帽子上栖息着蜂鸟和天堂鸟，注定会让某些旁观者妒忌得发狂！[34]

洛尔不久就会开始关注时尚了，但她在赛马场上最挂怀的还是赌博。[35]她自信出色的骑马技术给了她相当独到的选马眼光，内行地在马厩和围场附近奔忙着，一一审视那些纯种马，询问它们的骑师和驯马师。正如她的一位贵族同伴所说，她显然“热爱（赛马）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使得许多著名的赛马主人都对她青眼有加，特别是埃德蒙·德·波尔塔莱[36]伯爵及夫人，以及若阿基姆·缪拉[37]亲王及夫人，她与他们建立了维系一生的友谊。然而一到比赛开始，洛尔就振奋精神，飞身回到“夫人看台”，透过长柄眼镜观看自己的马在赛道上飞驰：从起跑门到第一个转弯，5～20弗隆[38]，速度达到顶峰，最后冲刺，冲向终点。

洛尔赌的数额很小，最多也就50法郎，但细心的同伴们注意到，每次她输了，脸上就变得毫无血色。不过就算在赌运不佳的日子里，从马术表演场回到巴黎的那段路也会让她恢复精神。这段旅程本身就是社交界的盛况。安坐在马车上或骑马的贵族夫人老爷们再度攀比起来。同样对他们的荣华富贵评头品足的，还有挤在道路两旁的寻常百姓，他们瞪着壮观的马车队伍和他们所谓“上等人”[39]阶级的华贵服饰。上层对这些无所事事的懒汉们也有专属称谓，“穷光蛋俱乐部”，强调他们被巴黎所有像样的俱乐部拒之门外。[40]在洛尔及其同伴们看来，这些下等的非俱乐部成员们发出的欢呼声和口哨声，像白噪声一样讨人欢喜，是他们理应享受的赞美的背景音效。

正如她的一位社交界友人安德烈·德·富基埃指出的那样，“穷光蛋们”还扮演着另一个角色。在参观了从隆尚或奥特伊回巴黎的“壮观游行”后，他们会再次回到首都的茫茫人海中，让自己看到的“这位小巧的男爵夫人的行头或那位侯爵的快马”在那里口口相传。就像预约夜晚之后从“天堂”传出去的八卦消息一样，这些喋喋不休的话语也会充斥社交

界报纸的版面，强化了人们对上等人优雅生活方式的好奇心。[41]洛尔能够参与到赛马后的游行中，表明她不仅在自己的贵族阶层中地位高，也令难以计数的“穷光蛋”仰之弥高，他们通过谈论和阅读她所在的世界，“渐渐地形成一种幻觉，仿佛他们并没有被拒之门外”。



骑师俱乐部成员的妻子们坐在隆尚赛马场特殊的“夫人看台”上。这张照片是由城区备受欢迎的意大利贵族热热·普里莫利[42]伯爵拍摄的

另一个培养这种幻觉的事件就是慈善晚宴，巴黎上流社会的成员们在那里兜售自己（及其仆人）所做的定价过高的手工艺品货样，以此来为各种慈善事业筹款。[43]从针绣坐垫和蕾丝小帽，到手绘扇子和装饰花哨的赞美诗书封，五花八门。有些胆大之人会献出手卷雪茄来卖，也有人会说服欧仁·拉米和夏尔·沙普兰等时髦画家捐出自己创作的小型艺术品。夫人们会暂时克服自己对辛苦“经商”的阶级偏见，亲自驾临售卖摊，比谁能卖出更多的商品。如果有王室成员浏览她们的商品，竞争就会更加激烈；像聚会一样，每当有陛下或殿下屈尊客串出场时，售货摊就会声名大噪。不过，慈善晚宴不仅仅是迎合精英阶层。普通巴黎人只需支付一笔小额入场费即可与上等人亲密接触几个小时之久，想来真是诱人。如果他们花钱买东西，还能与显赫的卖主当面交易，例如德·于

扎伊公爵夫人和她活泼可爱的年轻表亲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夫人。

洛尔像个典型的名媛一样投身社交，但她的社交方式却带着一丝非正统的做派，这让她声望更盛了。尤其是像比贝斯科亲王夫人所说的那样，洛尔无视上层严格禁止“年轻太太们在丈夫无法陪同的情况下接受邀请进入上流社会”的规矩，在“可怜的阿代奥姆”不在时社交，让同伴们大为震惊。[44]

洛尔起初独自出入社交界时，她强烈地意识到那里迎接她的不满的目光和愤怒的私语。为了缓和反对者的情绪，她开始渲染自己的“乡巴佬”形象，睁大眼睛，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拉长语调说自己“像一只呆头鹅昂”“就是杠小傻瓜”——就是她在奥地利时用得得心应手的那套口头语。然后她会对现场最明显的质疑者发表一通热切的小演讲——那通常是某个指手画脚、牢骚不断的老太婆，曾有一个爱开玩笑之人的诙谐地说这老太婆“简直比一袋缝衣针还要烦人”。[45]洛尔对可能诋毁她的人摆出最甜美的微笑，说没有亲爱的阿代奥姆给自己引路，这社交场合真让人望而生畏，但是——这里有一个戏剧性的停顿——他没法一边陪伴她来“我们的表亲德·于扎伊的慈善晚宴，一边在弗罗斯多夫城堡侍奉爵爷啊”。[46]

洛尔一说出这些有魔力的话语，就拔去了礼仪规矩之龙卫的毒牙，迫使他们认可她自封的特权，可以不必恪守其他人必守的规矩。几十年后，马塞尔·普鲁斯特会提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如何在自己的圈子里特立独行，藐视礼仪法则，巧妙地把“我不必”这个词变成了自己的体面，把无论多任性地“行使自己的‘社交自由意志’”变成一种艺术。这正是洛尔独一无二的立场。就算在她生命即将结束时，在她本人也变成了“一袋缝衣针”一样讨人嫌的老太婆时，社交界的人们还会称她为“全巴黎为数极少的几个无须丈夫陪伴出行的女人之一”。[47]

比贝斯科亲王夫人在谈到友人外出没有监护人陪伴时，使用的历史

隐喻十分引人遐想：“在巴黎，德·舍维涅夫人过着一种18世纪廷臣的生活，从凡尔赛宫逃离出来，身穿便服在城市的街巷里冒险”。[48]洛尔比谁都清楚，弗罗斯多夫城堡根本无法跟凡尔赛宫相提并论，但她欢迎人们把她比作那座更古老、更华丽的宫廷的侍臣。在旧制度下，众所周知，凡尔赛宫过度的排场和盛典往往会逼迫国王的侍从们偶尔摆脱束缚，来巴黎赴一场狂欢。洛尔把自己套入这一先例，不仅能为自己违背礼仪的行为辩解，也再次强调了她与波旁王朝的特殊联系。

为突出这一联系，她还打破了第二个重要的礼仪规矩：她讨好新闻界。在洛尔进入社交界的前十年，那个世界的常客们一直在试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慈善拍卖、赛马场和预约之夜中（半）公开社交意味着他们要冒被社交界报纸曝光的风险，媒体无疑会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事件。自从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一巴黎新闻界的亚产业蓬勃发展；一反人们的直觉，在废除了阶级制度之后，普罗大众对贵族的好奇心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上层的夫人和绅士们已经习惯了在社交专栏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往往还附带着对其衣着、马车、马和帽子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有些交际家甚或很欣赏这些肯定他们高人一等的文字。然而他们只是私下里快乐，上流社会的官方说法是新闻界低俗不堪，是污秽民众的喉舌，而民众的意见不会也不可能对他们这群杰出人士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这一信念，追求媒体的关注就相当于严重贬低了自己的高贵身份。何况如此自贬身份的还是一位女性成员，简直罪不可赦。在洛尔以前的那一代人中，萨冈亲王夫人是少数几个敢于无视这一准则的女人之一，她的名声因而一落千丈。社交界传统派的标准说法是，这位“下等丫头”与第四等级的杂役们打得火热，无疑暴露了自己低俗的真实出身。

洛尔做出同样的出格行为时，有着萨冈夫人没有的两个优势：一是

她的“社交自由意志”，二是据传可以证实的显赫血统。当然，家徽悬挂在凡尔赛宫的十字军东征大厅的女人，不可能被贬低为下等人：“此事众所周知。”作为见识一流的自我推销者，洛尔讨好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行业的大亨们。在“有生”阶层，洛尔凭借卓越的超前意识了解到，这种势力可能会对自己多么有用。正因为触角远远地伸到贵族的封闭小世界以外，它必将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影响观念，提振声望。《高卢人报》的经理、洛尔最强大的媒体同盟阿蒂尔·梅耶尔[49]曾称自己的行业为“新闻界陛下”，这并非没有缘故。[50]

在大革命之后的那一个世纪，法国新闻界在一个重要意义上取代了国王陛下以前扮演的角色：制造和破坏名声，赋予和收回威望。在旧制度下，波旁宫廷构成了法国社会精英的神经中枢和顶峰，其成员知道，一切福祉仅来自君主。与此同时，王室审查法令严格禁止凡尔赛宫乃至整个王国的言论自由，这进一步支撑起君主无可辩驳的最高权力。[51]

君主制度瓦解之后，一切都变了。异军突起的日报和周报出版物促成了民意的兴起，取代了国王的判断和宠幸。保守贵族抱怨说，法国缺乏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头畸形体”。事实上这个身体并非无头，只是他们不喜欢它的样子：现代性和大众统治、媒体宣传和民粹主义。如果在世纪末的法国有谁戴着王冠的话，那必是“新闻界陛下”。[52]



作为巴黎顶尖的社交日报《高卢人报》的经理，阿蒂尔·梅耶尔热切结交“有生”阶层，通过宣传把他们变成名人

梅耶尔是对洛尔极有帮助的支持者，他毫无保留地尊重她自封的显赫身份，即便或者说恰恰是因为他自己出身低微。这位阿尔萨斯犹太人拾荒者之子是靠为第二帝国最著名的交际花布兰奇·德安蒂尼（Blanche d’Antigny）担任私人秘书起家的，据说这位交际花就是埃米尔·左拉的小说《娜娜》（*Nana*，1880）标题人物的原型。[53]与德安蒂尼那些高层情人的接触让梅耶尔对上层社会充满渴望，也成为他一生的执念。“他居然对社会等级的每一个细节烂熟于心，”一位贵族女人对此惊奇不已，“他知道有些公爵的地位高于亲王殿下，也知道有些尊称听起来无足轻重，却凌驾于听起来尊贵百倍的姓氏之上。”为了把这些神秘莫测的知识派上用场，梅耶尔后来成为社交新闻记者，先是为《巴黎新刊》（*La Nouvelle Revue de Paris*），后来又为《高卢人报》撰写社交界报道。

自1879年当上《高卢人报》的经理以来，梅耶尔便一直努力讨好自己的贵族订阅者，却总是因为自己犹太人的低微出身而遭到嘲笑。（他的对头们开玩笑说他的家徽座右铭是“旧衣服旧绶带有售”[54]；还有人说他“在王室成员面前会像个小姑娘一样脸红”[55]。）洛尔·德·舍维涅祖上赫赫有名，又在弗罗斯多夫城堡受宠，简直是梅耶尔梦想的盟友，而她又主动培养他，在社交活动上找到他，向他吐露自己对爵爷宫廷生活的内行看法。

她的友好姿态迎合了梅耶尔的自尊心和他的政治观点，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梅耶尔起初是个拿破仑信徒（在白手起家的法国人中，拥戴拿破仑者不算罕见），但他重新把自己塑造成为激昂的正统王朝拥护者，利用《高卢人报》作为头号讲坛，呼吁极端天主教、极端保守的亨利五世复辟，甚至还皈依了天主教以表忠心。他的宗教皈依在上层看来是不知羞耻的无赖和“势利小人”[56]行径——“势利小人”是巴黎方言中新增的骂人话，这句来自英格兰的外来语起源于拉丁语的sine nobilitate（意为“没有贵族头衔”）。

能与“弗罗斯多夫的尤物”为友，让梅耶尔受宠若惊，作为回报，他总是在《高卢人报》中奉承洛尔，称她和阿代奥姆两人都是古老血统和热情拥护正统王朝的典范。后来他渐渐只提洛尔一人（这几乎肯定让她那位不愿意抛头露面的丈夫大松了一口气），同时注意突出她的祖上是那位“彼特拉克的洛尔”和德·萨德侯爵。

梅耶尔虽然总是遭到城区人士的嘲笑，但他的报纸却是那里的非官方权威。[57]因此，梅耶尔对洛尔的赞美极大地提升了她在上流社会的声望，也让她在穷光蛋俱乐部名声大噪。她标志性的鹤立鸡群被其他媒体渠道争相报道，变成了巴黎的社交渴望者每天的精神食粮。梅耶尔的朋友朱丽叶·亚当写道：

德·舍维涅伯爵夫人身姿优美、碧眸如水、婀娜多姿，是

> 当今巴黎社交圈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的祖辈是彼特拉克纯洁的情人，她也用自己清澈的目光启迪了诗人的灵感。她不可抗拒的美丽为她赢得了每一张选票。[58]

亚当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洛尔频频出现在媒体上背后的悖论。作为保王派和贵族，她极力反对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的社会制度。但作为一个以保王派和贵族身份寻求声名远播的人，她又要迎合民意。如此一来，她就变成了那种社会制度的共谋，其中“无生”的普罗大众发挥着重要的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最初来到巴黎之日，洛尔还利用一种更显精英派头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名望：她开办了一个沙龙。这种上层阶级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旧制度，贵族女性把她们位于巴黎的客厅变成热烈交谈的场所，不受宫廷中各种严格规矩的限制。[59]由于它的贵族起源和贵族色彩，沙龙在革命和恐怖统治时期衰落了，却在19世纪重新兴起，成为贵族社交的支柱，在君主制复辟和帝国统治时期盛极一时。随着第二帝国在1870年崩溃，沙龙再度陨落，却又在1880年代报复性地浮现，一连串以前革命时代的沙龙女主人为主题的怀旧新书重振起它的声望。最初出版且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就是奥特南·德·奥松维尔的《内克尔夫人的沙龙》（*Mme Necker’s Salon*，1882）。

同旧制度时代一样，沙龙是在夫人的客厅里举行的，通常每周一次，由她选定“日子”。沙龙的常客们在社交界——据说在新闻界也一样——被称为女主人的小圈子。当那个圈子非常小而且非常排外时，它就会被称为“封闭”沙龙：那是社交声誉和威望的黄金标准。

作为巴黎的新秀，洛尔请她旧日在弗罗斯多夫的导师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帮她召集一个令人艳羡的封闭式沙龙。和洛尔一样，菲茨-詹姆斯也曾频繁往返于奥地利和巴黎之间，往往会将旅行的时间调得与洛尔一致，而在爵爷死后，他也迁回了法国首都，长住下来。和在

宫廷里一样，菲茨-詹姆斯在巴黎也积极关注他那位年轻的被保护人的社交轨迹，而作为社交界的中流砥柱，他召集了一群同样显赫尊贵的男人和他一起去她家里拜访。他们都是“骑师俱乐部”或“联盟俱乐部”的会员，或两者兼是；与洛尔的丈夫（他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怎么友好）不同，他们都是交际家圈子中的一线明星，被公认为巴黎社交圈的领军人物。

其他许多沙龙女主人都争相邀请这些人，但他们顾及菲茨-詹姆斯的面子，听他说他们一定得会会洛尔，也就顺了他的意，但甫一见面，他们就被她那玩世不恭、元气满满的气质迷住了。这群温文尔雅的陌生人大多和菲茨-詹姆斯年纪差不多，比她大20岁左右，洛尔在这群着迷的听众面前谈笑风生。《高卢人报》最大的竞争对手《吉尔·布拉斯报》（*Gil Blas*）的一位专栏作家解释说：

> 德·舍维涅伯爵夫人粗鲁、机敏，还有一些野性，随时会拿那些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开个玩笑奚落一番，她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古板的老派社交界。她为这个最保守的社交圈带来了一股喧闹活泼的生气；她的话锋时而跃起时而弹回，时而奔跑时而飞翔，永远不知疲倦，永远酬应如流，从不会砰然落地。她的才思会瞬间升入天堂，下一刻又跟魔鬼本人打情骂俏。她蛮横的笑话、意象、比喻，还有无人可比的大笑，让听众目瞪口呆。[60]

按照最好的沙龙女主人传统，她为那种往往会被礼仪、规矩束缚而全然缺乏想象力的环境注入了一丝轻佻，一种出其不意的乐趣。洛尔的拜访者们被彻底迷住了，以至于他们坚持一而再地登门拜访，不再是给菲茨-詹姆斯帮忙，而是为了自己享受。洛尔嘲笑他们的年纪大，称他们是“我的老头子们（vieux）”[61]；他们成了她那声誉极高的封闭沙龙的常客。



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是洛尔在弗罗斯多夫和巴黎的导师，也是她多年的情人

不久，老头子们开始觉得每周只见这位活泼热情的年轻朋友一次着实不够。他们放弃了其他所有的沙龙（激起了被他们抛弃的女主人们无穷无尽的怨恨），养成了每天在骑师俱乐部吃完午饭就来拜访洛尔的习惯，跟她在客厅里聊上至少两个小时才肯离开。必须要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物质享受而来的。洛尔的客厅又小又挤，窗帘永远拉下来遮挡着阳光，以免那些已经褪色的破旧地毯和室内饰面继续被日照损伤，要说此举着实多余。一位客人曾说，她的家具“看上去仿佛是长在房子里的，不大可能是挑选、购买并搬到房子里来的，简直毫无特色”。[62]椅子是出了名的不舒服，摇摇晃晃的，不可能让已过中年的访客们的关节和脊椎觉得舒服。老头子们一定觉得很渴，因为房间里烟雾缭绕；洛尔用那把长柄的琥珀烟斗一根接一根抽着卡波尔牌香烟。据一位忠实信徒说，信徒们“不怎么抽烟，但（他们）偶尔会自己从伯爵夫人桌子上的糖果盒子里取出一颗土灰色的止咳糖……恢复体力”。除此

之外，拜访者们最好的零食就是一两杯橙汁了，很可能还是微温的。

然而乏味装饰的珀西尔大街1号还是有几样刺激的东西，直指洛尔的个人魅力。爵爷为她画的素描是其中一件，不过那幅画直到1883年才出现在她的沙龙里，那时老头子们已经是常客了。另一个标志着她与王室友谊的东西是一套法贝热[63]珠宝盒和彩色硬石镶嵌的小玩意儿，摆放在她身旁的桌子上，是“（她的）大公们送的礼物”。这些小玩意儿证实了洛尔那句自我描述：她“收入不高”，但“殿下不少”。

另一件惹人遐思的玩意儿是一座很大的皮埃尔·康布罗纳将军[64]的半身像，这位拿破仑军队里的军官最臭名昭著的事迹是他在滑铁卢投降时说了一句脏话：“妈的！”（“Merde！”）自那以后，“康布罗纳的话”就成为法语中秽语脏话的同义词，虽然洛尔只要能用粗俗的话，就从不费事说什么委婉语，但这座将军半身像立在她的壁炉架上，无疑是在故意提醒人们，她自己有多喜欢说脏话。[65]当然在更具体的意义上，它也提醒着人们她的一个更丢脸的成名原因：她是第一个被人听到在公开场合说出康布罗纳的脏话的贵妇人。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要多大胆无礼才能说出这句话，但在当时是非常极端的。当然也很迷人——她的大胆让她的侍从们不间断地光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最终，数十年如一日。

洛尔的曾祖父德·萨德的肖像表明，她的叛逆有种返祖的性质，这也为她的叛逆蒙上了更加诱人的光环。她与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堕落者有亲戚关系或许在寻找丈夫时会把很多追求者吓跑，但如今她已经结婚了——而且奇迹般地摆脱了配偶的监督——它就成了刺激男性展开遐想的元素。虽然他们和她有着巨大的年龄差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头子们对洛尔的迷恋绝非慈爱的长者风范，起码绝非仅此而已。在解释自己为何很少允许新客人参与每天的封闭沙龙时，她开玩笑说：“我的老头子们闻到新鲜肉体的味道就会咆哮。”[66]一次，一位刚到巴黎的英国

贵族女子有幸被她赋予了这一特权，成为少数进入沙龙的外来者之一，她证明了那些交际家们的热忱带着一股捕食气息，把他们比作对着一只鸟流哈喇子的“公猫”。[67]

莉莉·德·格拉蒙跟老头子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她也惊异地发现他们显然为洛尔销魂荡魄：

> 德·舍维涅伯爵夫人坐在烟雾中，傲视着她那群交际家们。他们驼着背坐在扶手椅中，对她大献殷勤，仿佛感谢她容貌如此娇美，谈吐如此风趣……用她那因为抽太多烟、熬太多夜而稍显沙哑的女声谈天说地，打牙犯嘴。[68]

洛尔的娇美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娇小的身材皮包骨头，面部五官太有棱角：尖而高的颧骨，突出的下巴，鹰钩鼻的弧度总让人禁不住想起各种鸟类（老鹰、天鹅、隼、秃鹫和“海岛之鸟”）。[69]她把草莓金色的头发梳到脑后紧紧向上盘起，一绺蜷曲的卷发留在前额周围，试图给自己加一些柔弱的女人味，却无济于事。心情不好时，她看上去像普尔奇内拉[70]——来自意大利即兴喜剧[71]和大木偶剧院的鹰钩鼻女人。心情很好时，她像一个天使，那碧蓝色的眸子和金黄色的头发似乎不属凡间。而通常情况下，她的样子符合自己的绰号“彼特拉克下士”，那股“阳刚气质”不仅来自凸起的鼻子和下巴，也来自她锐利而低哑的声音（在同时代人听起来，仿佛“因为数百年发号施令而变得粗哑了”）。[72]

在她的朋友、著名巴黎银行家之子安德烈·热尔曼看来，洛尔有“一种神秘气息，仿佛这副美丽的骨骼是从她曾祖父（德·萨德）一百年前凋萎的那些监狱里逃出来的”[73]。比贝斯科亲王夫人则认为，她代表了“法国女人的形象，经过千年历史的浓缩，如法国玫瑰一般完美，像法国红酒一样曼妙”[74]。热尔曼和比贝斯科的比喻提到了让交际家们迷恋洛尔以及让她离不开他们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与她“骨感的传令官”样貌一样，她也和他们一样深深怀念着贵族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

地位的美好旧时光。[75]绝非偶然，这正是洛尔的老头子们出身的阶层。他们毫无例外地公开谴责自由和平等的力量摧毁了旧制度，在第三共和国更是达到了新高度。洛尔的沙龙常客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与她本人的“弗罗斯多夫的尤物”形象有着完美的契合。

对老头子们中的两个人——阿尔贝·德·曼伯爵和布勒特伊侯爵亨利·勒托内利耶——来说，持此反动立场意味着他们在共和国政府内部积极地扮演反对派角色。德·曼在出身（很久以前，他的外祖父也是为流亡国外的亨利五世光荣服务的人员之一）和信仰（德·曼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不遗余力地批评共和左派的世俗化）上都是正统王朝拥护者，已经成为国民议会中的极右派代言人。他以激情四溢的演说而闻名，在演说中发自内心地呼吁“革命乃国之大敌”以及“混乱无序、社会堕落和道德败坏，那就是共和制的意义”。[76]



洛尔开玩笑说自己像意大利即兴喜剧中那位长着鹰钩鼻的小丑普尔奇内拉，有时还在化装舞会中扮演这个角色。这幅素描是由拿破仑一世的侄孙费迪南·巴克（**Ferdinand Bac**）所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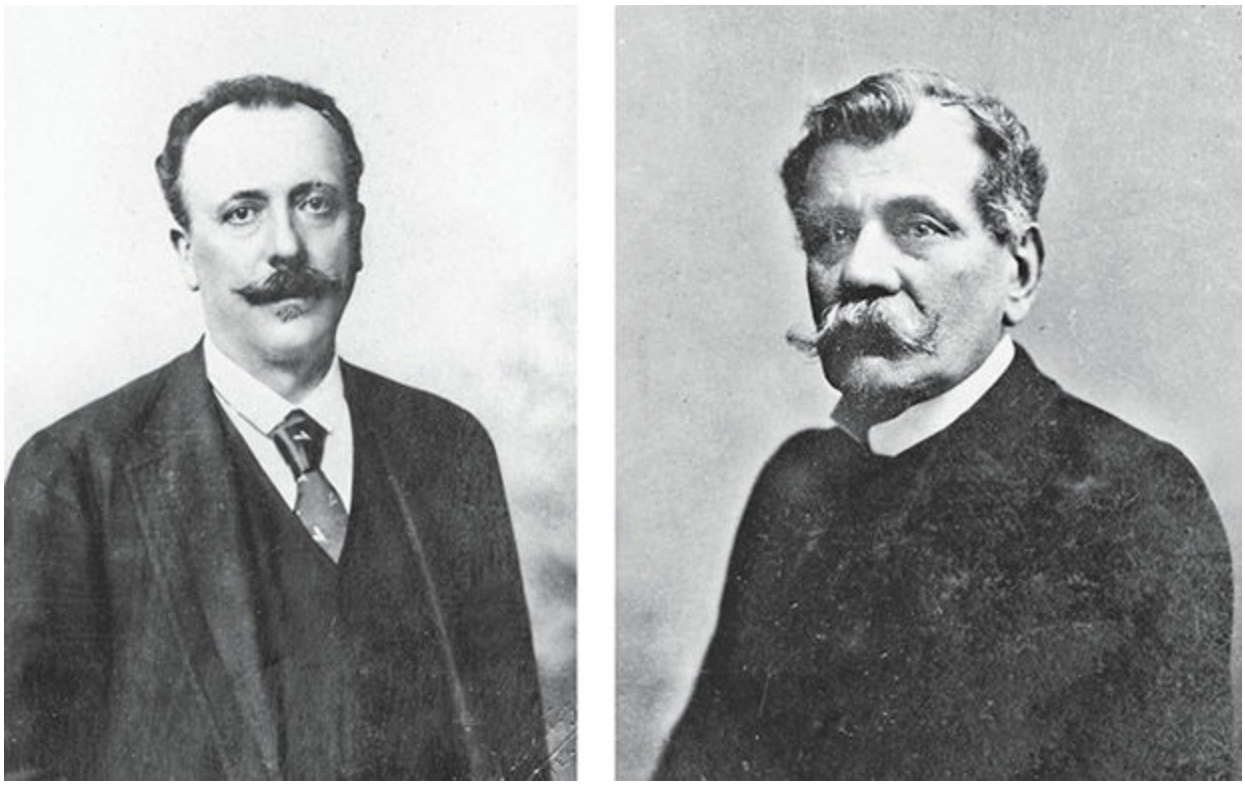
除了雄辩的口才之外，德·曼与梵蒂冈的独特联系也赋予他很大的

权威。他能对教宗利奥十三世[77]施加影响，这一点在法国无人可比，以至于他的同胞们把他看作本国的教廷大使，是教宗派驻到他们中间的非正式代表。因此当德·曼批判共和国时，人们会认为他不仅代表了自己政党的观点，也是为教宗代言。目前的形势也的确如此，共和派意识形态中的反教权主义没有在圣伯多禄大教堂[78]赢得什么朋友。

能收服德·曼成为自己的信徒让洛尔很自豪，虽然他的虔诚信仰会让她觉得不够殷勤。她总是跟每一位老头子打情骂俏，每每和德·曼调情时，他会抗议说："我很抱歉夫人，但是你看，我绝不会对妻子不忠。"[79]德·曼拒绝合作会激怒洛尔，但他间接地为她的沙龙蒙上了教宗的神秘光环，大大弥补了这一缺憾。毕竟教宗本人也是一位君主，因此德·曼出现在洛尔的招待会上就增加了她积累的王室声望，那会进一步让她声名远播，她对此十分珍视。

亨利·德·布勒特伊是议会中另一位致力于抵抗民主在法国扩张的君主主义领袖。布勒特伊的父系一方出了很多卓越的廷臣和政治家，还有一位18世纪最出色的沙龙女主人之一，埃米莉·迪沙特莱[80]，她是牛顿的首位法语译者，也是伏尔泰的长期情人。和洛尔对待自己的中产阶级商人祖先一样，布勒特伊也很少提及自己母亲一方那些"无生"阶层的亲戚。他们是富尔德家族，一个非常有钱的犹太人银行家族。布勒特伊凭借他们的财富，过上了大地主的生活，又对拥有大地主的姓氏备感自豪。

和好友亨利·格雷弗耶一样，他也倾向于奥尔良派君主而不是波旁王朝复辟。过去十多年，他一直是巴黎伯爵在国民议会下议院——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的官方发言人，在那里发表和德·曼一样的反共和主张。1889年夏，政府准备庆祝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时，布勒特伊在议会公开宣称，革命是这个国家彻头彻尾的灾难。



保王主义政治家阿尔贝·德·曼（左）和君主主义历史学家科斯塔·德·博勒加尔（右），都是洛尔封闭沙龙的成员

洛尔那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则退出了公共生活，公然投身贵族的闲适享乐，以此来表明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菲茨-詹姆斯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弗罗斯多夫城堡的事业一经结束，就开始纵容自己的怠惰，觉得那是他的出身赋予他的权利；而他与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犹太女继承人，闺名叫罗莎莉·冯·古特曼（Rosalie von Gutmann）的女人的无爱婚姻，又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资本。（虽然菲茨-詹姆斯和布勒特伊偶尔都会出于本能反对犹太人，但说起用犹太人的金子为自己的家徽重新镀金，他们还是十分乐意的。）

约瑟夫·德·贡托伯爵是老头子们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比洛尔大八岁，也是贵族出身。他的家族有着拥护正统王朝的古老历史。1830年，他的好几位祖辈曾陪伴法国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十世流亡海外。然而他的父亲埃利·德·贡托-比龙（Élie de Gontaut-Biron）却在1871

年接受了第三共和国驻普鲁士大使一职；但六年后，他的保王主义朋友们在国内夺权失败，他被从任上召回。该事件导致贡托-比龙被迫辞职。[81]不久，他的儿子约瑟夫这位法国顶尖军事学院圣西尔军校（Saint-Cyr）的毕业生和普法战争的荣誉老兵也辞去了军官之职，终结了这个家族长达300年的卓越服役传统。（在旧制度下，约瑟夫·德·贡托至少有四位父系祖先担任过这个国家最高的军事职位，即法兰西元帅。）约瑟夫有21个兄弟姐妹，因而本人也“收入不高”。但他娶了一位郡主埃玛·德·波利尼亚克（Emma de Polignac），她的嫁妆帮他维系着奢华的生活方式。据说贡托是巴黎最好的骑手，是越野障碍赛马全国冠军，也一直在法国积极推广这项英国传统的运动项目。他还是比利牛斯山脉的度假小镇帕乌（Pau）的猎犬专家，那里是上等猎狐犬的故乡。[82]

迪洛·德·阿勒曼侯爵阿尔弗雷德的父亲曾经是查理十世的一位低级侍从，他也是主动怠惰的典范。迪洛虽然曾在议会中短期担任过奥尔良派代言人，但他后来以“他的家族传统和过去百年来的动荡，让（他）有义务与任何及一切‘革命’政府断绝关系”为由，退出了政界。[83]迪洛有着典型的上流社会的诙谐，喜欢说他之所以退出公共生活，是为了全天候为一年一度在布洛涅森林中举办的鸽形土靶射击比赛做准备，他总是在该比赛中获得最高荣誉。他还是个狂热的业余摄影家。但他的密友们知道，把政治换成鸽形土靶和照相机让迪洛很难接受。[84]其中一位写道，“他装出的闲散是一副面具，他只是用风度掩盖了自己的失落感（*son activité perdue*）”；承认自己国家的政府中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是“他最有勇气的行为之一”[85]。

科斯塔·德·博勒加尔侯爵夏尔-阿尔贝（洛尔称呼他“科斯塔”）一度也曾是君主主义代言人，他在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观点永远不可能与当权的共和派达成一致时，同样退出了政界。辞职后，他着手撰写一部四卷本的巨著——那部关于萨伏依王朝的著作最初是由他的曾祖父于1816年

开始写作的，自17世纪起，科斯塔·德·博勒加尔家族就是该王朝颇受重视的顾问、廷臣和军官。[86]和他未来的法兰西学术院同事奥特南·德·奥松维尔一样，科斯塔寻找慰藉的方式也是在写作中复兴那个他和同类人曾经当道的昨日世界。正如他在为已故的曾祖父所写的致辞中所说，“您把我们和往昔勇敢的一代联系起来”[87]，正是为了他们，

> 我努力重现旧日时光，重新发现他们的记忆，那些从我的心间取下的真正的枯萎的花朵就像扯下的书页。也正是为了那些先辈，为了让他们的后代热爱受他们本人那般敬重的王公们，（我从您手中）接过此任，写完了这些关于萨伏依王朝的回忆录。[88]

科斯塔作品中的怀旧色彩呼应了德·奥松维尔在关于内克尔夫人的著作中流露的一种情绪：“（在这些）书页中重燃起昔日的灰烬……或许能创造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东西，但只要还能看得见海市蜃楼，它所带来的幻觉本身就令人心醉神往。”[89]

同样的幻觉也笼罩着洛尔的沙龙。德·曼写道，在外面的世界，他和他的贵族同伴们受到了“未来之人”的十面埋伏。但对他们自己圈子里的“过去之人”而言，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用旧制度特权的海市蜃楼对抗现代民主社会的残酷现实。凭借着她的贵族身份和货真价实的正统王朝拥护者立场，洛尔是这群人完美的精神领袖。正如来访的英国朋友所见，老头子们把她那间昏暗发霉的起居室当成了“君主的接见厅”[90]，把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当成了他们的女王：她是世俗世界的神圣权威，是有幸见证了政权崩溃的人。[91]

如果洛尔晚一个世纪出生，她几乎肯定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品牌。她以超前的意识抓住了后来成为很多名人公关策略的关键，那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应该足够统一，以便在仰慕者中间获得辨识度，但同时又要足够多变，才能赢得他们持续的关注。作为其核心，她的“普鲁托的新

娘”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鸣，就是因为它让人们想起了关于世袭特权及其悲剧收场的更为宏大的叙事。

洛尔深知这一点，便扩充了保留曲目，加入了另一个基于同一主题的变调：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德·萨德侯爵唐纳蒂安经历的灾难。在沙龙的墙壁上，她把曾祖父的肖像与爵爷画的她和鹦鹉的素描并排挂在一起，使之成为谈话中一个方便的提示符。如果她觉得朋友们对她那套“阴影王国”的老生常谈有些厌烦了，她会轻快地把香烟嘴弹到唐纳蒂安这一侧，顺畅转接到自己大家族历史的另一个章节。从孔戴亲王的玩伴到巴士底狱的囚徒，从皮克毕的掘墓者到沙朗东的病人，德·萨德的下滑趋势与亨利五世一样夸张，他的道德败坏让故事变得更加刺激。洛尔在弗罗斯多夫的乏味与“神圣侯爵”的地牢间转换话题，满足了同伴们对于一种文明黑暗而性感的魅力的渴望，那是他们的祖先曾一度大权在握并最终火尽灰冷的文明。

鉴于神秘的封建时代的普洛塞庇娜是洛尔在社交圈为自己构建的核心形象，人们大概会以为1883年8月爵爷的去世会导致她的声望下滑。但事实上，她的名声却大大提升了。除了她与媒体的接触和封闭沙龙外，她能继续声名显赫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如果洛尔的贵族同伴怀疑过她夸张了爵爷对她的喜爱的话，那么传说中他在临终前关于“老丫头”的那句俏皮话（她迫不及待地把它透露给了梅耶尔）似乎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她的说法，老头子们亲眼看到了爵爷亲手画的那幅漫画。其次，她利用了贵族阶层对王室殉难者的特殊敬意。作为革命中最著名的王室受害者，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及其幼子路易十七在整个19世纪成为王室殉难的化身。在一生不幸遭遇之后还客死他乡，他们的亲戚亨利五世也有资格荣登传说中的殉难者之列。[92]



洛尔从未见过奥匈帝国大公鲁道夫[93]，却在他**1889**年**1**月自杀之后为他服丧。她抓住每个机会展示自己对君主主义的忠诚

在整个贵族城区，就连在尚博尔生前没有集结在他周围的人，也在他死后视他为富贵安逸却岌岌可危的逝去的时光[94]的象征。[95]这一反应的典型事例就是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决定以“尚博尔伯爵的花束”作为自己新的标志性香水味道。[96]在政治上，玛蒂尔德公主是个波拿巴主义者，这也符合她的姓氏和出身。但由于她的波拿巴亲戚们也一样丧失了皇位，所以她对尚博尔的苦难充满同情，对那个君主统治这片国土的时代充满怀念。同样的情感也启迪了德·萨冈亲王夫人，这位坚定的奥尔良派在波旁王位觊觎者死后不久，以“尚博尔的鲤鱼”作为她招待一位奥尔良派殿下的晚宴上的第一道菜。[97]

这类举动给予逝者荣光，这并非因为他具体的政治观点（他最主要的政治观点就是拒绝法国三色旗，至少可以说是搞错了方向）或政治成就（他根本没有成就），而是因为他，用一个奥尔良派内行的话来说，

是“昔日的威严和荣耀……君主的特权，生来就拥有14个世纪的荣誉、忠诚和不屈不挠的刚毅的……光荣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洛尔的弗罗斯多夫叙事就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效力。它让上层安心地觉得，如果说爵爷和他代表的王权理想在事实上消失了，那么它们的精神仍然闪现在他这位明艳动人、百折不挠的宠儿身上。

经过君主主义念旧情怀的渲染，洛尔的名望为她带来了大量新的邀请，去参加城区最尊贵的狂欢。在巴黎的前四年，她一直没能进入德·萨冈亲王夫人年度化装舞会的宾客名单。然而在爵爷的葬礼举办九个月后，德·萨冈夫人不但指定洛尔参加舞会，还邀请她前来参加舞会前仅有100人参加的晚宴。不止这些：亲王夫人还从1000多名受邀请人中选择洛尔在专业编排的舞蹈表演中扮演令人垂涎的20个角色之一，那是舞会的传统压轴表演。

德·萨冈夫人大肆渲染自己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喜爱，指示宾客们要身着农民装束，因为她准备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半木结构的乡间村落里招待他们，那个村落是模仿凡尔赛的王后农庄建造的（亲王夫人在自己宅邸的后花园里斥巨资重现了该场景）。[98]“有生”阶层的成员都知道，那个农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逃离凡尔赛宫繁复礼仪的避风港；她和朋友们在那里装扮成朴素的农民，在王后拙朴典雅的大理石牛奶场里饮用新鲜牛奶，与一群群特别喷洒了香水的羊群嬉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正式的宫廷芭蕾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德·萨冈夫人为舞者们安排了一段适合乡村场景的插曲：一段喧闹的踢踏布列舞曲。

这是女主人做出的一个大胆选择，如今冗长的宫廷庆典对贵族们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奢望，这样的选择不一定合他们的口味。就连一贯奉承谄媚的《高卢人报》也表示反对，称布列舞是“舞蹈中的卷心菜汤”。然而洛尔一定对这个选择暗自高兴，对于她的乡下姑娘人设和天生的运动天赋来说，这再合适不过了。亲王夫人请舞者们穿的木屐绊倒了好几个

动作不够灵活的舞队成员。但洛尔的布列舞充满活力，令观众眼前一亮。

布列舞之后的表演又给了她另一重提升：一位专业女歌唱家表演雅克·奥芬巴赫[99]的《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Geneviève de Brabant*，1859）中的一段咏叹调。得益于这一选择，洛尔能够把一位传说祖先的名字挂在嘴边，与洛尔·德·诺韦斯或德·萨德侯爵相比，她不经常提起这位祖先，但一样为之自豪。那就是布拉邦的玛丽（Marie de Brabant），这位中世纪的贵族女人被冤枉在丈夫参加十字军东征时对丈夫不忠。故事讲道，她丈夫离家期间，另一个男人来找玛丽，遭到拒绝之后，作为报复，他指控她通奸。她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处死，但死后却沉冤得雪，她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传说中以巴黎的主保圣人之名为她重新命名为热纳维耶芙。[100]第二帝国时期，雅克·奥芬巴赫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一部喜歌剧，反响热烈。但洛尔那时还是个孩子，那以后，由于喜歌剧这个类型日趋衰落，《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也风光不再了。因此洛尔没有多少机会不经意地提起自己家谱中的这一分支。这样一个机会居然出现在她参加的第一个萨冈舞会上，这的确是一个愉快的巧合，她抓紧机会给那群对家世十分敏感的同伴们普及了自己跟布拉邦的联系。

那晚，洛尔简朴动人的装束为她赢得了更多赞美：一顶小小的头巾式女帽和褶边围裙搭配着一件条纹土布连衣裙。她对支持者们说，自己当晚的身份是“路易十六的烘焙女”[101]。这个称谓并没有听上去那么感觉良好，因为它暗含的典故是路易十六及其家人“殉难”故事的一个较早章节。1789年10月5日晚，一群饥饿的巴黎暴徒行至凡尔赛宫，他们（错误地）怀疑国王和王后在那里囤积了大量面粉。劫掠者们冲入宫门，杀死了门卫。然后他们在王宫里疯跑，叫嚣要宰了那个“烘焙女”——玛丽·安托瓦内特，还要喝掉她的血。最后，入侵者抓住了王室一家，把他们强行带回了巴黎。这个插曲标志着法国君主制终结进程的

开始，和所有持剑贵族一样，洛尔也十分明白这一点。她自称“路易十六的烘焙女”，就加入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列，或者更具体地说，加入了革命的受害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列。通过这种方式，洛尔再度把自己塑造成法国殉难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



在德·萨冈亲王夫人**1884**年举办的农民舞会上，身着放肆的**“**烘焙女**”**装束的洛尔与她的朋友科斯塔

除了其他舞会参与者的关注之外，洛尔的装束还为她赢得了最后一项特殊声望：《艺术与时尚》（*L’Art et la mode*）这家由她的好友热纳维耶芙·比才的堂兄卢多维克·阿莱维参与创办的短命时尚杂志将她的肖像用作了插图。这家杂志的化名记者并没有忘记她那身装束的政治暗示，用凝练的“梅亚克与阿莱维式幽默”写道：“看着漂亮的德·舍**夫人，我们几乎忍不住想要原谅那些总是抢劫面包房和闹革命的群众了！”

虽然自称喜爱玛丽·安托瓦内特，但德·萨冈亲王夫人似乎不反对洛尔的烘焙女花招。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女主人，她一眼就知道谁是晚会宾客中的耀眼明星，洛尔显然大获成功。从那以后，亲王夫人每年的萨冈舞会和舞会前的晚宴就再也没有落下过她。

她还邀请洛尔参加她和自己那群老头子们的聚会，规模更小，宾客的选择也更挑剔：奥尔良派亲王们，如今他们作为法国王位的新继承人，变成了洛尔极有价值的关系网。在她所处的阶层，说到底最重要的不是谁戴上了王冠，而是谁站得与王位最近，得到它赋予的荣耀最多。洛尔本能地了解这一概念，毫无歉意地接受它。她好不容易离开了帕西、外省和阴影王国，当然不甘心让自己再度归于沉寂。普鲁托已死。普洛塞庇娜万岁。

---

[1] 关于爵爷的疾病和死亡，见Joseph du Bourg，*Les Entrevues des princes à Frohsdorf：la vérité et la légende*（Paris：Perrin，1910），and Monti de Rézé，*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Paris：Émile-Paul，1930），202-30；Pierre de Luz（pseud. Pierre Henry de La Blanchetai），*Henri V*（Paris：n.p.，1931），reprinted as vol. 58 of *Les Amis du Comte de Chambord*（Paris：Plon，2007），459-60；Jules Cornély，*Le Czar et le roi*（Paris：Clairon，1884），284-352。

[2] 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343. AM还描写了爵爷为洛尔和她的鹦鹉所画的素描。

[3] Hyacinthe de Paule de La Motte Ango，*Marquis de Flers*，*Le Comte de Paris*，trans. Constance Majendie（London：Allen & Co.，1889），204.

[4] Dubosc de Pesquidoux，*Le Comte de Chambord d'après lui-même*（Paris：Victor Palmé，1887），448-89 and 465-66.

[5] 腓力七世（Philippe Ⅶ），即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普·阿尔贝（Louis Philippe Albert，1838-1894），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菲利普·德·奥尔良（Philippe d'Orléans），王号路易-菲利普二世。他是法国奥尔良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长孙，早逝王储

费迪南·菲利普的长子。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被迫逊位的法王路易-菲利普一世曾希望长孙以路易-菲利普二世的名号继位延续王朝，但民众普遍不支持，最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王朝结束。

[6] Un Domino（pseud. Meyer），“Les Fidèles，” *Le Gaulois*（August 24，1883）：2.

[7] 阿尔贝·德·曼伯爵（Comte Albert de Mun，1841-1914），法国政治人物，社会改革家。

[8] 阿尔贝·德·曼伯爵，“Les Dernières Heures du drapeau blanc，” *La Revue hebdomadaire* 46（November 13，1909）：141-63，141。

[9] PV，*Society in Paris*，27.

[10] 关于葬礼上先后顺序的混乱，以及让巴黎伯爵把自己的祷告椅相对于其他人前移的建议，见Hyacinthe de Paule de La Motte Ango，*Marquis de Flers*，*Le Comte de Paris*，trans. Constance Majendie（London：Allen & Co.，1889），206；Cornély，op.cit.，365。

[11] 根据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1713），路易十四之孙费利佩五世（Felipe V）要想继承西班牙王位，就必须放弃他和他的后裔们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亨利五世死后，正统王朝拥护者中有一个很小的分裂派倾向于由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族长担任统治者，恢复法国的君主制。但这一派别在第三共和国的政界没有形成气候。——作者注

[12] 出自《圣经·雅歌》8：6，原句是“for love is strong as death”。

[13] 卢尔德（Lourdes），位于法国西南部上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市镇，也是全法国最大的天主教朝圣地。

[14] 关于夫人打算迁居，以及爵爷计划被葬在格里茨，见Jules Cornély，*Le Czar et le roi*（Paris：Clairon，1884），357-58；and Joseph du Bourg，*Les Entrevues des princes à Frohsdorf：la vérité et la légende*（Paris：Perrin，1910），303。

[15] 在1885年的地理学会成员名单中，AC和LC的住址是珀西尔大街1号。1880年代后期，1886年后1889年前，他们搬到了米罗梅尼尔街34号，也就是上文所述年轻的MP的“希望路线”的终点。关于格雷弗耶家族资助的珀西尔大街上的奥尔良派总部，见“Ça manque de pigeons！” *La Lanterne*（August 3，1878）：1。

[16] 关于爵爷的天主教家庭价值观，见Chambord，Henri d’Artois，Comte de. *Lettres d’Henri Ⅴ depuis 1841 jusqu’à nos jours.* Edited by Adrien Peladan. Nîmes：P. Lafare，1873，227。

[17]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78.

[18] PM，*L’Allure de Chanel*，106.

[19] 蒂珀雷里（Tipperary），爱尔兰的一个郡，位于爱尔兰岛南部。

[20] 此为华氏度，约合38.9℃。

[21]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80. 这个小插曲发生的时间可能是1885年春，那时LC有一次穿了一套铃兰装束。见Vicomtesse de Renneville，“Chronique de l’élégance，” *La Nouvelle Revue* 34（May-June 1885）：444。

[22] Laurence Klejman and Florence Rochefort，*L’Égalité en marche*：*Le Féminism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Paris：PFNSP/des femmes，1989）.

[23] Diana Holmes and Carrie Tarr，eds.，*A Belle Époque*？*Women in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1890-1914*（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2007），12.

[24] Marie-Thérèse Guichard，*Les Égéries de la IIIe République*（Paris：Payot，1991），17. 关于世纪末法国女性主义的兴起和掣肘，又见Diana Holmes and Carrie Tarr，eds.，*A Belle Époque*？*Women in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1890-1914*（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2007），12。

[25] 这里参考的自然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女性主义的奠基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1949）。在本传记的所有主要人物中，只有EG一人活到了波伏娃的著作出版之时。

[26] 关于“上层阶级社交的金三角：海滨别墅、巴黎府邸和打猎城堡”，见Suzanne Fiette，*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s Lumières à la Belle Époque*（Paris：Perrin，2015），217。

[27] Martin-Fugier，*Les Salons de la IIIe République*，100. 每年1000-1500张名帖的数字也得自同一来源。

[28]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47-48；Jean Lorrain（pseud. Paul Duval），*La Ville empoisonnée*：*Pall-Mall parisien*（Paris：Jean Crès，1936），210；《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5月29日）：1；and Sally Britton Spottiswood Mackin，*A Society Woman on Two Continents*（New York and London：Transatlantic，1896），172-73。

[29] Robert Burnand，*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de 1870 à 1900*（Paris：Hachette，1948），226；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232-33；Aurélien Scholl，“Abomination！” in *Le Fruit défendu*（Paris：Librairie Universelle，1888），n.p.；and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82. GLP指出，周五是上层资产阶级预约的，周六则专门留给贵族歌剧预约者。

[30] 关于预约者们对舞台上的故事不感兴趣，见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82 and 121；and AGG，*Souvenirs*（n.p.，n.d.），29。

[31]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理查德·瓦格纳的一部歌剧，他自己称之为三幕剧，于1865年6月10日在慕尼黑皇家宫廷与国家剧院首演。这部歌剧是瓦格纳和马蒂尔德·维森东克的恋情写照，被视为古典-浪漫音乐的终结、新音乐的开山之作。

[32] LG，*Mémoires*，vol. 2，168；and AGG，*Souvenirs*（n.p.，n.d.），31-33.

[33] Marie-Alice Hennessy，“Courses，” in *Dictionnaire du snobisme*，ed. Jullian，53-54.

[34] Lysiane Sarah-Bernhardt（pseud.），“Les Courses，” in *Le Protocole mondain*，ed. AdF，340-41.

[35]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81.

[36] 埃德蒙·德·波尔塔莱（Edmond de Pourtalès，1828-1895），瑞士裔银行家、军人，法国政治家。

[37] 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1834-1901），第四代缪拉亲王，曾任法国陆军少将。他是波拿巴-缪拉家族的成员。

[38] 弗隆（furlong），英国、前英国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的长度单位，一单位长度等于660英尺或220码或10链，约等于公制的201.168米。

[39] 在世纪末的平民看来，“上等人”（“la haute”）通常会取代贵族社交界用来指代自己的那些名词。贵族们对这一称谓耿耿于怀，就像如今的人们不喜欢被形容为“有档次”（英语中的classy，法语中的classieux）一样。——作者注

[40] 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1，231. “穷光蛋俱乐部”出现在OJFF中，MP写道：“在‘穷光蛋’的眼睛和想象中”，“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似乎把他们和乘车驶过的优雅夫人们分成了两个世界。见MP，OJFF，627。

[41] 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1，231. 关于“上等人”这句无产阶级称呼上层阶级的俚语，见Aristide Bruant，ed.，*Dictionnaire français*：*argot*（Paris：Flammarion，1905），28。

[42] 热热·普里莫利（Gégé Primoli），即朱塞佩·纳波莱奥内·普里莫利（Giuseppe Napoleone Primoli，1851-1927）伯爵，意大利贵族、收藏家和摄影家，“热热”为其绰号。他的外公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第二代卡尼诺和穆西格纳诺亲王夏尔·吕西安·波拿巴。在19世纪后期，他拍摄了逾万幅照片。

[43] 关于LC在德·于扎伊夫人的邀请下参加的一次慈善晚宴的记述，见Louis Prudent（pseud.），*“A la rue de Sèze*：*fête de charité*，*” Le Gaulois*，May 1，1885，2。

[44]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80.

[45] Comte Léonce de Larmandie，*Du Faubourg Saint-Germain en l’an de grâce 1889*（Paris：E. Dentu，1889），122.

[46] *Le Gaulois*（May 1，1885）：1. 又见AF，“Le Salon de l’Europe”：“当德·舍维涅夫人说到‘阿代奥姆’时，她是在诉诸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op. cit.，466），即便AC（通常）不知道LC在用他的名义达到那一目的。

[47]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6.

[48]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80.

[49] 阿蒂尔·梅耶尔（Arthur Meyer，1844-1924），法国新闻业巨头，著名的法国保守派日报《高卢人报》的经理人。梅耶尔是保王派。

[50] Arthur Meyer，*Ce que mes yeux ont vu*（Paris：Plon-Nourrit，1912），359.

[51] 关于大革命之前和之后法国新闻界的简史，见Henri Avenel，*Histoir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depuis 1789 jusqu'à nos jours*（Paris：Flammarion，1900），18-20 and 35-63；关于1789年后发行量的大幅增加，见Rolf Reichardt，"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a European Media Event，" *EGO*：*European History Online*（August 27，2012）：5。

[52] 据历史学家Rolf Reichardt说，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之前，全法国出版的大幅报纸的数目"可以用一只手数得过来"，而八年后，"单是巴黎的报纸的日发行量就达到了15万份"。其后100年，那个数字继续呈指数级增长。

[53] Odette Carasso，*Arthur Meyer，directeur du Gaulois*：*Un patron de presse juif，royaliste et antidreyfusard*（Paris：Imago，2003），19-35.

[54] ED，*La France juive*，vol. 2，183.

[55] Lucien Corpechot，*Souvenirs d'un journaliste*（Paris：Plon，1936），104.

[56] 关于"势利"这个词条进入了世纪末的法国社交界话语，见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47-60；Meyer，*Ce que mes yeux ont vu*，409-10；and Zed（pseud. Maugny），*Parisiens et Parisiennes en déshabille*（Paris：Ernest Kolb，1889），3-12。

[57] 关于城区对《高卢人报》的喜爱，见de Pange，他将其描述为"社交界的官方报纸"（op. cit.，272）。

[58] PV，*La Vie à Paris*，103.

[59] 关于法国的沙龙传统，尤见Benedetta Craveri，*The Age of Conversation*，trans. Teresa Waugh（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6）；and Antoine Lilti，*Le monde des salons*：*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Paris：Fayard，2005）。

[60] Larillière（pseud.），"La Société de Paris：La Comtesse de Chevigné，"《吉尔·布拉斯报》（1903年8月17日）：1。

[61]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1-12.

[62]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75. 见AF，“Le Salon de l’Europe，” 463-65；and in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65。

[63] 法贝热（Fnbergé），成立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珠宝品牌，由居斯塔夫·法贝热（Gustav Fnbergé）于1842年创立，后交由其子彼得·卡尔·法贝热（Peter Carl Fnbergé）经营。法贝热主要加工金、银、孔雀石、玉石、青金石等贵金属和宝石材料，许多作品都具有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艺术风格，早年为俄罗斯沙皇创作了一系列缀满珠宝的复活节彩蛋，并因此闻名。

[64] 皮埃尔·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1770-1842），法兰西帝国的将军，曾参加过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后在滑铁卢战役中受伤。

[65] LC的一位孙女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讲述LC对这句脏话和使之出名的将军的半身像的喜爱。见Marie-Laure de Noailles，“Clefs（les mots），” in Jullian（ed.），*Dictionnaire du snobisme*，ed. Jullian，51-52。

[66]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78.

[67]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78；引文又见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32。

[68] LG，*Mémoires*，vol. 2，30-31.

[69] 对洛尔容貌的不同评价，见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5-76；Pierre Grenaud and Gatien Marcailhou，*Boni de Castellane et le Palais Rose*（Paris：Les Auteurs Associés，1983），158；PM，*L’Allure de Chanel*，168-71；LG，Mémoires，vol. 2，31；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33；and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78。

[70] 普尔奇内拉（Pulcinella），一个经典角色，最初出现在17世纪的意大利即兴喜剧中，成为那不勒斯木偶剧的固定角色。这个角色是意大利南部的明星，被称为“人民的代言人，因为像那不勒斯人那样生动鲜活的民族必然是直言不讳的”。在不同的剧目中普尔奇内拉这个人物的地位和态度也不同，让世界各地的观众为之着迷。

[71] 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一种戏剧，是以喜剧小品为基础的即兴剧场，其特点是角色佩戴面具。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一个

特色是插科打诨，另一个特色是其中的滑稽演员会以哑剧的方式呈现。剧中有许多定型角色，如愚笨的老人、狡猾的仆人、看似勇敢的军官等。

[72]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5-76. 由于如第8章所述，同样一句话被EdG用于描述德·欧马勒公爵的声音，LC的粗哑嗓音可能就是Arnaud会说她“充满阳刚之气”的原因；见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5。

[73] AG，*Les Clés de Proust*，31.

[74]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46-47.

[75] Gilbert Guilleminault，*Prélude à la Belle Époque*（Paris：Denoël，1957），212.

[76] Jacques Piou，*Le Comte Albert de Mun*：*sa vie publique*（Paris：Spes，1925），8；对德·曼力图“把自己变成（法国）某个天主教政党的领袖”的评价，见“Count Albert de Mun，” *Public Opinion* 48（November 13，1885）：615。

[77] 利奥十三世（Pope Leo ⅩⅢ，1810-1903），1878年起任天主教会的领袖。他以其知性和试图确定天主教在现代思想方面的立场而闻名于世，并因其关于《玫瑰经》的十一道教宗通谕而赢得了“玫瑰经教宗”之名。

[78] 圣伯多禄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 Church），又称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大殿。由米开朗琪罗设计，是位于梵蒂冈的一座天主教宗座圣殿，建于1506—1626年，为天主教会重要的象征之一。

[79] LG，*Souvenirs du monde*，39.

[80] 埃米莉·迪沙特莱（Émilie du Châtelet，1706-1749），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749年，她完成了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法文翻译和评注。

[81] 关于导致贡托的父亲被从柏林召回巴黎的国内政治危机，见Albert，Duc de Broglie，*Ambassador of the Vanquished*：*The Viscount Élie de Gontaut-Biron’s Mission to Berlin*（London：William Heinemann，1896），267-98。

[82] 关于贡托的家庭和休闲活动，见Robert R. Locke，*French Legitim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 Order in the Early Third Republic*（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56-57；and *La Revue des Basses-pyrénées et des Landes* 1（1884）：334。

[83] DH，*Pays parisiens*，84.

[84] 关于迪洛的休闲活动，见de Vaux，*Le Sport en France*，199-202；*La Revue des Basses-pyrénées et des Landes*，334。此外，本书中复制的许多照片要归功于两位摄影者，迪洛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摄影搭档是埃德加·德加的长期情妇奥尔唐斯·豪兰，他们拍摄的照片保存在阿莱维的家族相册中，如今由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85] DH，*Pays parisiens*，83-84.

[86] 法国王室与萨伏依王朝通婚的传统可以追溯至15世纪路易十一与萨伏依的夏洛特以及奥尔良王朝的查理一世与萨伏依的路易丝之间的结合，后一对夫妇就是弗朗索瓦一世的父母。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旧制度结束之时，最后的高潮是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未来的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分别娶了萨伏依的两个女儿。因此，亨利五世的祖母是萨伏依人。1861年，萨伏依公爵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位国王；他的儿子分别是意大利的翁贝托一世（Umberto Ⅰ）和德·奥斯塔公爵（Duke d’Aosta），即1870—1873年统治西班牙的阿玛迪奥一世（Amadeo Ⅰ）。——作者注

[87] charles-Albert，Marquis Costa de Beauregard，*Un homme d’autrefois*：*Souvenirs recueillis par son arrière petit-fils*（Paris：Plon，1878），vi.

[88] charles-Albert，Marquis Costa de Beauregard，*Un homme d’autrefois*：*Souvenirs recueillis par son arrière petit-fils*（Paris：Plon，1878），468.

[89] Paul-Gabriel Othenin de Cléron，Vicomte（later Comte）d’Haussonville，*Le Salon de Mme Necker*（Paris：Calmann-Lévy，1882），3.

[90] 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78.

[91]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07，and 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81.

[92] 扼要重述一下亨利五世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废黜、监禁和斩首。其子路易十七被卫兵监禁、虐待和谋杀。女儿德·安古莱姆公爵夫人在革命期间受到精神创伤，一生无子，客死他乡。爵爷的祖父查理十世被废

黜、流放、死于他国。他的父亲德·贝里公爵在他（亨利）出生之前就被暗杀了。他的母亲德·贝里公爵夫人因计划让他代替路易-菲利普登基而被监禁、流放，客死他国。他的婚姻无子嗣。他的继承人是仇恨的奥尔良派。他的旗帜被废弃。他丧失了自己的王国。他的马名叫“群众的要求”。如果他还有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历史，包括他自己那次流产的政变——那对他是致命一击——以及他自己终究身死异国。——作者注

[93] 鲁道夫（Rudolf，1858-1889），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独子。与父亲的保守主义立场相反，鲁道夫个人偏好自由主义，譬如父亲总是穿着军装并要求他效仿，这让他备感痛苦；受父亲的压力，他在1881年娶了比利时的公主史蒂芬妮。被迫的婚姻及不幸遭遇让他在婚后精神沮丧，随后精神崩溃，在1889年与女友一同殉情自杀。

[94] 非正统王朝拥护者在爵爷死后对他的赞赏，见Georges de Nouvion and Émile Landrodie，*Le Comte de Chambord*：*1820-1883*（Paris：Jouvet，1884），396；Eugène Veuillot，“La Mort du Comte de Chambord，” *L’Univers*（August 25，1883）：1；and Dubosc de Pesquidoux，*Le Comte de Chambord d’après lui-même*（Paris：Victor Palmé，1887），492-93。

[95] 世纪末法国贵族阶层对其光荣往昔的“自给自足的正统王朝梦”，以及与之相伴的“拒绝接纳现代世界”，概述见Suzanne Fiette，*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s Lumières à la Belle Époque*（Paris：Perrin，2015），216。

[96] Robert Burnand，*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de 1870 à 1900*（Paris：Hachette，1948），84. 正如Burnand指出的，对于一种香型来说，这个名字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波旁王朝的象征“百合”“没有香味”。

[97] Un Domino（pseud. Meyer），“Échos de Paris，” *Le Gaulois*（April 29，1888）：1.

[98] 关于德·萨冈夫人的农民舞会和LC当晚的装扮，见“Bloc-notes parisien：au village，” *Le Gaulois*（June 11，1884）：1-2；Diable Boiteux（pseud.），“Nouvelles et échos，”《吉尔·布拉斯报》（1884年6月11日）：1-2，（1884年6月12日）：1，以及（1884年65月13日）：1；另见Hy de Hem（pseud.），“La Fête villageoise de la Princesse de Sagan，*L’Art et la mode* 30（June 21，1884）：8-9。关于LC的服装的引文来自Hy de Hem的文章。

[99] 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出生于德国的法国作曲

家，浪漫主义时期的大提琴家和剧院经理。他以1850年代到1870年代的近百部轻歌剧而闻名，代表作是歌剧《霍夫曼的故事》（*Les Contes d'Hoffmann*，1881年上演）。

[100] 关于LC的祖先是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玛丽）和洛尔·德·诺韦斯，见Henri Raczymow，*Le Paris littéraire et intime de Proust*（Paris：Parigramme，1997），26；and Henri Raczy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196。我自己对洛尔及其丈夫的家谱的研究未能证实她和布拉邦一族有任何亲属关系。

[101]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Mémoires d'outre-tombe*，tome I（Paris：Garnier Frères，1899），281.

第6章 余桃偷香，红杏出墙

“普洛塞庇娜的丈夫”（这是上层为阿代奥姆·德·舍维涅取的绰号）也和她一起出席了1884年的萨冈舞会，这对他来说是件稀罕事。他在这类大型的浮夸场合往往会很不适应，虽然他举止得体，但还是带着明显的无措神情。一位贵族曾写道，每当洛尔的丈夫碰巧出现在某个大型社交场合，他看上去就像一只被暴风雨弄得晕头转向的海鸟，正栖息在一只轮船的桅杆上歇息，以便攒足力气飞回到暴风雨中。[1]舍维涅显然不曾在弗罗斯多夫城堡忍受过这么密集的社交活动。刚搬回巴黎那段日子，他很难推脱，不过还是勉力应付过去了。他虽不像妻子那样鄙视不可避免的礼仪要求，但哪些是为表示效忠家族或（已故）国王而必须公开露面——例如婚礼、葬礼和纪念波旁王朝的各类生日和忌日的活动，哪些是出席更严格意义上的社交活动，他分得很清楚。他尽可能避免后者，让洛尔在没有他陪伴的情况下无拘无束地享受社交生活。

舍维涅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弗罗斯多夫城堡的那些年让他习惯了非常规律的生活方式，因此回巴黎后，也建立了一套刻板机械的日程。每天早饭后，他会步行至书记员路（rue Scribe）的骑师俱乐部，那里距离他和洛尔位于珀西尔大街的公寓不远。他会坐在战利品室（此名是因为墙上挂着很多剥制成标本的动物头）的扶手椅上阅读晨间报纸，直到下午一时。然后是午餐时间，这始终是骑师俱乐部的美味时刻，因为该俱乐部的厨师被美食界夸赞为当时唯一能在厨艺上与德国皇帝的私厨比高下的人。[2]午餐和晚餐期间，俱乐部大厅没什么人，会员们都去参加各自的女士朋友的沙龙（也包括他妻子的沙龙）了，然后还会去花蹊，但舍维涅一直待在那里，在战利品室继续阅读到晚餐时间。在会员餐厅用过晚餐后，他要么在吸烟室抽一支雪茄或玩一把纸牌，要么去参加自己的某个晚间活动。在巴黎的交际家中，舍维涅是个非典型的喜欢孤独的

人。

他晚间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歌剧院、喜歌剧院和法兰西喜剧院，去哪里则取决于是周几的晚上。他很少漏掉这些场所中的新剧演出——骑师俱乐部在三个表演场所都有会员包厢——但他总是避开洛尔和她的社交伙伴们扎堆儿的预约之夜。阿尔贝·弗拉芒（Albert Flament）是一位和善的同性恋作家，与舍维涅和洛尔两人都是好友，他觉得舍维涅看上去更“像个严肃的老兵或隐士”而非见多识广的文化人。不过伯爵很认真地对待表演艺术，喜欢不受干扰地欣赏它们。他对洛尔和她的朋友们趋之若鹜的作秀和八卦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舍维涅来戏院看的是真正的戏剧。

有些下午和晚上，如果巴黎另一处他最爱光临的场所——地理学会——举办他热心参加的活动的话，他会对日程稍做改变。骑师俱乐部（它成立于1833年，宗旨是在法国推广驯马和赛马业）迎合的是有运动天赋的贵族的品位，而地理学会吸引的是一群更好学、更知性的会员。该学会常常在位于圣日耳曼大道的总部举办知名探险家和学者的讲座，每隔几年，活动委员会还会围绕一个国际性的主题组织一次大会。[3]



骑师俱乐部是舍维涅在巴黎的另一个家。每天午餐后，俱乐部的其他会员们都成群结队地去拜访他的妻子了，他仍然待在那里

1879年5月，在和洛尔首次从弗罗斯多夫回巴黎期间，舍维涅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讲座。那次活动的主讲人德·莱塞普子爵费迪南[4]让他大为赞赏。莱塞普因在非洲开发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竣工）而闻名于世，他现在又向地理学会的会员们推出一个新计划：在中美洲的巴拿马建一条类似的运河。他的演讲一如既往地激动人心。（“莱塞普对自己计划的成功信心十足……”他的一位崇拜者说“他能让上帝本人相信A等于B”。[5]）舍维涅认为莱塞普给了他很大的启迪，遂决定把他和洛尔的部分积蓄投资在该项目上，巴拿马运河公司当天就正式成立了。这是舍维涅后来很后悔的一个投资决定。

从弗罗斯多夫退休后，舍维涅没有继续和埃米莉·“海豹”·威廉斯联系，后者本人也退出江湖了。[6]巴黎一度有传言说威廉斯之所以洗手不干，是为了写一部揭秘性的自传。但她离开这一行真正的动机没有那么猥琐：和许多迟暮之年的妓女一样，她也皈依基督教，弃绝了自己罪孽

深重的行为。一位白发苍苍的交际家在威廉斯回归基督教之前就认识她，后来在圣奥古斯丁大教堂的弥撒礼上见过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 要是你最近参加过每天上午11点在圣奥古斯丁举行的礼拜，你会注意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保养得很好，穿着极为朴素，手里拿着一本祈祷书，目光低垂，态度谦卑地跪在正厅最右侧的长凳上，与礼拜的其他教众明显隔着一段距离。这位可敬的资产阶级显然急于躲开窥探的目光和熟悉的面孔，她就是，或者曾经是，近年来暗娼业的幕后操纵者埃米莉·威廉斯。如今她从良了，只想在清静中老去。

除了一位旧相识在这里提到她之外，威廉斯似乎确实如愿地过上了清静的生活。她的名字从暗娼阶层的年鉴里消失了，她的座右铭“海豹说妈妈，海豹说爸爸”也不再流传。（不过，先锋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一个世代之后再次提起这句话，他有一首诗，题目就贴切地叫作《海豹》。）没有原始记录表明舍维涅从弗罗斯多夫回到巴黎之后曾试图跟威廉斯重新联系，而且他似乎也没有另找一位妓女来代替她。

但他大概找了一个更有争议的替代人选：一位聪明的、戴眼镜的贵族男子，小他14岁的德·塞纳瓦斯男爵布鲁诺·马里·泰拉松（Bruno 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7]舍维涅初次见他是在1886年，地点可能就在地理学会，24岁的塞纳瓦斯那时仍是单身，虽然他守寡的母亲一直催他成家，但他却想方设法保持单身。他真正热爱的是旅行。1882年夏，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奖励了自己一趟去比利时和荷兰的短途旅行。一年半以后，他又来了一次行程更长、野心更大的旅行，和一群大学好友一起去了斯堪的纳维亚、俄国、中东和北非。塞纳瓦斯原计划无限期地留在国外，但1885年一直资助他冒险的祖母去世了。他回到法国参加她的葬礼，从那以后就和母亲一起生活在巴黎。

为了避开母亲的逼婚，塞纳瓦斯躲到了地理学会的图书馆，他在那

里找到了学会收藏的旅行资料，规划他下一次长途旅行的路线：到美国和东南亚。舍维涅此时已经不再定期前往奥地利，或许正渴望来一场旅行呢，便加入了他的研究。两个男人一起在地理学会那间安静的木板装饰的图书馆里消磨了许多个愉快的下午，向往着远方，规划着激动人心的旅行。

1887年春，他们实施了计划，开启了一趟环球旅行。[8]3月19日，他们在勒阿弗尔[9]登上了“布列塔尼号”（*Bretagne*）邮轮，九天后在曼哈顿登陆。《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个人信息”栏写道，舍维涅和塞纳瓦斯在麦迪逊广场上的奢侈酒店霍夫曼酒店（Hoffman House）入住。6月，他们来到了旧金山，两人的到达再度引起了当地报纸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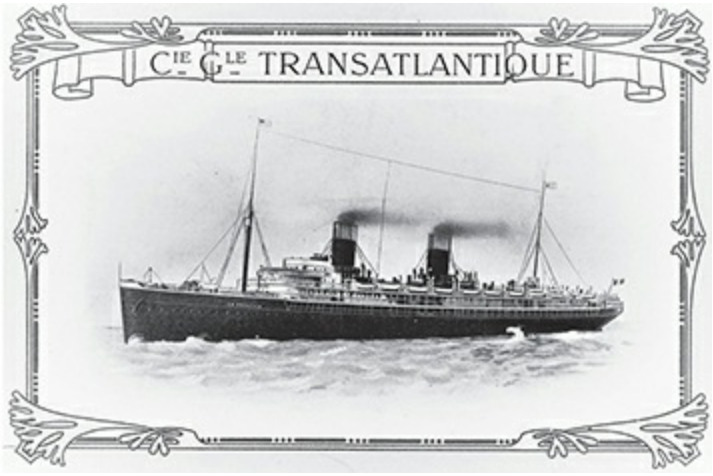
> A. 德·舍维涅伯爵和德·塞纳瓦斯男爵都来自巴黎，入住了（旧金山的）王宫（酒店）。他们此次环球旅行的目的纯粹是娱乐，将乘坐下一艘汽船前往日本。

除了“布列塔尼号”的旅客舱单和《纽约先驱报》上的公告外，《上加利福尼亚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的这篇报道，是提到两人这次旅行的唯一一份资料。如果舍维涅或塞纳瓦斯给自己国内的亲人写信提到过旅行的话，那些信件也都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塞纳瓦斯的母亲在自传中写道，他的确通知她说自己和好友将绕道暹罗。他还捎信给她说他“很累”，正考虑在亚洲长住下来。[10]但他和舍维涅都在1888年春回到了巴黎。

他们的环球旅行或回国的消息都没有出现在巴黎的报纸上——这个疏漏乍看上去很令人不解，因为他们的冒险毫无疑问会让社交界的报纸很感兴趣。《高卢人报》有一个关于上层人士赴远（外国和外国宫廷）近（诺曼底的庄园、塞纳-马恩地区的城堡）各地旅行的每周专栏。阿蒂尔·梅耶尔没有在该专栏中报道塞纳瓦斯/舍维涅的旅行，大概是出于

对洛尔的善意，因为报道中即便对其友谊的性质不做任何影射，单是公布两个男人一起外出一年之事，就足够制造一桩丑闻了。不管她对丈夫的名声受损有何感想，洛尔为了保护自己的形象，谅必希望这桩事件不要成为新闻。请求梅耶尔帮忙是洛尔的首选之举，而鉴于她一贯对他友善，答应帮忙也是他的必尽之责。不过这一事件似乎证实了梅耶尔的个人信条："在社交界，五个男人里有三个是鸡奸者。"[11]

塞纳瓦斯的母亲、孀居的德·塞纳瓦斯男爵夫人也决心制止丑闻，单独采取了行动。在儿子前往纽约旅行前，她曾固执地想让他娶一位贵族出身的小姐。但他回国后，孀居的男爵夫人显然认定她的布鲁诺即便娶一位中产阶级新娘，也总好过继续做一个性倾向可疑的单身汉。因此她降低了要求，安排他和一位中产阶级商人之女、22岁的玛丽-埃莉斯·卡米耶（Marie-Élise Carmier）结了婚。在回忆录中，男爵遗孀会（也的确）用好几页篇幅写自己在某个慈善晚宴上见到了德·比萨克公爵夫人，或在某个聚会上见到了巴黎伯爵夫人。然而对儿子的不当行为逼迫她安排的联姻却充满矛盾，只用短短一句话提到了他的订婚和婚礼，既没有说明卡米耶家人的身份，也没有提新婚儿媳的名字。[12]在他自己的数卷本回忆录中，塞纳瓦斯或许也出于同一目的省略了这一段。他长篇大论地写了自己此前的数次出国旅行，却根本没提他与舍维涅长达一年的旅行。塞纳瓦斯那年12月结婚之后，两位朋友似乎彻底断了联系。[13]



1887年**3**月，舍维涅和年轻的德·塞纳瓦斯男爵乘坐这艘船从勒阿弗尔驶向纽约，开启了持续一年多的环球旅行



这张图片展示的就是霍夫曼酒店的大厅，舍维涅和塞纳瓦斯在纽约期间曾入住这家酒店

洛尔也从未谈及丈夫的旅行，不过只要她的圈子里有人风闻此事，就一定会让她难堪。同样，她本人也不是什么模范妻子——恰恰相反。[14]正如她几十年后对可可·香奈儿所说，出于“对‘那个’（ça）——

也就是床事——的真正喜爱”，并已经认定丈夫不会给她那方面的任何指导，洛尔决定自己“从情人那里学习‘那个’”。此外，她的不忠似乎至少早于舍维涅的不忠几年时间，也就是说不是因为看到丈夫与塞纳瓦斯有染而蓄意报复。说起来，她的通奸行为倒使得舍维涅此举名正言顺了，而不是相反。

洛尔或许能用她解释其他一切叛逆行为的逻辑为自己的调情辩解：标准的礼仪规则对她并不适用。但她尊重社交界的一个规矩，在婚外性行为中尽可能小心谨慎。她保守秘密的方式是极少对自己的私生活进行书面记录，咧嘴笑着说一切信件要么是控告罪状，要么就太乏味无趣，最好的策略是根本不写信。

洛尔寻求性教育的男人们也跟她一样圆滑，与她谈情说爱的地点都在他们的单身套房：就是城市远郊区的单身汉公寓，圈子里的人不可能看到他们的地方。为了赴这些幽会，洛尔会戴上一顶覆着精致小巧面纱的帽子——在这些出行中，看到她的脸的人越少越好——先躲到博物馆、百货商店或是某个无伤大雅的公共场所里。她的情人会用一架出租小马车（就是马车版的出租车）到那里接上她，带到自己的隐身处，享受一下午的男欢女爱。

洛尔的第一个情夫显然是菲茨-詹姆斯本人。不管偷情男女有多谨慎，在城区这么一个到处都是八卦闲人的小世界，秘密的激情很少能够保守秘密。因此，当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在1886年的一篇没有署期的日记里附带地提了一句洛尔与菲茨-詹姆斯有染时，她已经把它当作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不过作为洛尔另一位老头子的妻子，康斯坦丝或许了解这对男女私通的内情。）康斯坦丝与洛尔同岁，比菲茨-詹姆斯小24岁，她说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色狼，早已风光不再了：

> 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这位迟暮英雄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里了，要说他年轻时，或许比那一代的其他任何男人征服的女

人都多！他年轻时出奇地英俊潇洒、教养良好（*plein de race*）、多才多艺，那股子亦正亦邪的魅力会让女人疯狂，让她们像任人践踏的草芥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15]

康斯坦丝只是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对这位迟暮英雄的魅力不屑一顾，却没想到一只脚踏进坟墓的竟然是她自己。写下这篇日记之后几个月，她就在1886年夏死于肺结核，时年27岁。菲茨-詹姆斯活到65岁，直到1900年才去世。

当时，他仍有足够邪恶的魅力激起洛尔强烈的爱意。在奥地利，他曾以万无一失的宫廷礼仪指导赢得了她的信任。在巴黎，除了帮她开办沙龙外，他还就应该接受和婉拒哪些邀请、应该培养或冷落哪些熟人给她建议。和在弗罗斯多夫时一样，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绝非无足轻重；洛尔处理这些小事的方式可能会大大提升或贬损自己的社交形象。

洛尔从菲茨-詹姆斯那里了解到，上层的社会等级观念与王宫里稍有不同，他们会考虑出身和为王室服务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美若天仙的德·埃尔韦·德·圣德尼侯爵夫人路易丝（Louise，Marquise d’Hervey de Saint-Denys），人称“金发克利奥帕特拉”，据说是尚博尔伯爵的外甥德·帕默公爵（Duc de Parme）的一个马倌的女儿；她的姐姐是个马戏团演员，母亲是个维也纳犹太人。[16]然而凭借着自己的美貌和头衔——她通过嫁给年龄是自己两倍的知名汉学家而得到的头衔——路易丝把自己重塑为一位贵妇人。同样，夏尔·阿斯虽然是犹太人，但他高贵的言谈举止和极佳的文化品位却使他成为一个合适乃至理想的同伴。

洛尔听从了菲茨-詹姆斯的建议，与这两位社交界人物成为朋友，不过后来她却与金发克利奥帕特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德·埃尔韦侯爵死后，路易丝居然不知廉耻地嫁给了洛尔姐姐的长子雅克·德·瓦鲁。（与马倌的女儿社交是一回事，接受她成为家人则是另一回事。）虽然

有这么一段遗憾的插曲，但洛尔一生都认为，关于上流社会，她需要知道的一切都是菲茨-詹姆斯教给她的。

他们的情爱关系在1886年有过短暂的中断，大概是因为他瞒着洛尔决定娶罗莎莉·冯·古特曼为妻。他没完没了地为穷困所迫，视这桩婚姻为纯粹的生意：罗莎莉这位来自维也纳的犹太女继承人（据说与金发克利奥帕特拉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能得到他的贵族头衔，而菲茨-詹姆斯将得到她的金钱。但洛尔对此持不同看法。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在日记中写道，菲茨-詹姆斯突然结婚“令巴黎处处泪流成河。对他的情妇、娇小的德·舍维涅夫人也是一记重击，以至于她三天前卧床不起，佯装染上了流感”。[17]很久以后，洛尔自己也承认，菲茨-詹姆斯的背叛让她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过她还说，她很清楚自己的出身，这总算让她没有当众出丑：

> 菲（茨-詹姆斯）爱我，至少我觉得如此。一天，我出行回来后，去参加城里的一场大型晚餐会。在门厅里我碰巧瞥了一眼留言簿，看到上面写着“罗（伯特）·德·菲（茨-詹姆斯）伯爵和伯爵夫人”。那个混蛋居然没告诉我就跑去结婚了！我觉得我当时快要崩溃了，但我立即振作起来，对自己说：你是洛尔·德·舍维涅，娘家姓德·萨德。[18]

洛尔的沉着显然奏效了。菲茨-詹姆斯的婚书墨迹还未干，就有传言说他和德·舍维涅夫人“已经旧情复燃”了。[19]社交圈里有爱开玩笑的人用画家罗莎·博纳尔（Rosa Bonheur，直译为“罗莎·幸福”）之名的双关语给他的新娘取了罗莎·玛纳尔（直译为“不幸”）的绰号。新任德·菲茨-詹姆斯伯爵夫人接受现实的办法是编了一句自我贬低的风趣咒语：“我很丑，我很笨，那正是我别具一格之处。”[20]她还开始制作一个与“以色列人”结婚的法国贵族家族名单。[21]罗莎很清楚社交界的反犹情绪，她说列出这样一份名单是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保护自己，洛尔也开始着手将“情人资产”多样化。18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某个时段，她同时与另一位老头子开始了一段婚外情：约瑟夫·德·贡托。他和菲茨-詹姆斯“有点表亲关系”，事实上两人还有很多共同点。和菲茨-詹姆斯一样，贡托也来自古老的贵族世家：他的祖先包括查理大帝、征服者威廉和法兰克人的首位国王于格·卡佩[22]。近些年，得益于父亲担任驻普鲁士大使的职位，贡托也“殿下不少”；和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一样，他也利用父亲在国外工作的便利，与欧洲各国的王公贵胄培养了友谊。

贡托交际甚广又温文儒雅，浑身透着一股妙不可言的气质，城区称之为“贡托家族的魅力”。[23]他被称为“全巴黎最受欢迎的男人之一”，在女性中尤其炙手可热，在上流社会和暗娼阶层都颇有名气。[24]由于相对贫困，他也出于权宜之计娶了富有、温顺而可爱的埃玛·德·波利尼亚克郡主。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觉得郡主对他的爱近乎“疯狂的英雄崇拜”。[25]贡托没有对埃玛付出同样的爱，但这并不妨碍他大手大脚地花她的嫁妆。



洛尔·德·舍维涅与好友及分分合合的情人约瑟夫·德·贡托一起在巴黎漫步。摄影：热热·普里莫利

据说，洛尔也疯狂地迷上了贡托。但事实证明，他的情感和菲茨-詹姆斯的一样靠不住。和洛尔幽会几年后的一天，贡托和一位名叫温思罗普夫人的美国女人私奔了，温思罗普夫人的丈夫是侨居海外的波士顿要人和猎狐爱好者，两人一直住在帕乌。贡托瞒着妻子和洛尔，与温思罗普夫人在帕乌私通缠绵已近三年。他写信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埃玛——还是通过菲茨-詹姆斯这个渠道，压根没有对洛尔透露过半个字。贡托向全世界宣布，温思罗普夫人才是他一生至爱的女人。

这件事令洛尔愤怒，但她再一次保持了冷静。在贡托变心几年后，洛尔在巴黎的一个舞会上遇到了温思罗普夫人，带着冷冷的微笑对后者说：“万分感谢你，省去了我面对老态龙钟的约瑟夫。”[26]不过最终洛尔也没能躲过老态龙钟的约瑟夫。当他和他的美国甜心终于意识到没有配偶的财富就根本活不下去时，他们不得不分手了。温思罗普夫人的丈夫没有接纳她——他移情于她的妹妹，还说自己暗地里一直更喜欢妹妹——但埃玛和洛尔却都张开双臂欢迎贡托。其后20年，他与洛尔分分合合，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

贡托虽然薄情寡义，但他拥有一项在洛尔看来可以说比始终不渝的爱情更加重要的东西：一群出身极其高贵、地位极其显赫的朋友。[27]洛尔后来几位关系较好的社交界大人物最初都是通过他介绍认识的。贡托为她介绍的最重要的人物是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和大公夫人，密友们昵称他们为“GDWs”（“弗拉大公夫妇”）。[28]在城区，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尊贵，作为亚历山大三世（萨沙）的四个（嫡出）弟弟中最大的一个，弗拉基米尔大公在自己国家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仅次于可怕的“全俄国的独裁者”沙皇本人。他的官方职位是帝国卫军（Imperial Guard）指挥和圣彼得堡总督，他和妻子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闺名玛丽（米涵）·冯·梅克伦堡-什未林女公爵，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有一处宏伟的宫殿。弗拉基米尔宫殿是模仿15世纪的佛罗伦萨宫殿建造的，也是这对夫妇举行自己的盛大宫廷聚会的地点，其规模仅次于沙皇的宫廷。弗拉大公夫妇被怀疑觊觎王位——后来又为他们的儿子谋求王位——并非毫无根据。（1888年10月，沙皇一家在火车失事中险些丧命，事故导致23人丧生，萨沙后来开玩笑说：“想想看，弗拉基米尔听说我们还活着，该多失望啊！”[29]）

然而在城区，大公刻意宣扬的名声是沙皇最喜爱的弟弟，众人对此铭记在心。弗拉大公夫妇都是狂热的亲法分子，每年至少两次往返戛纳享受昼夜不停的奢华狂欢，可以说在喷气式飞机问世前三四代，他们就

已经开了环球旅行的先例，在往返戛纳的路上，他们会在巴黎短暂停留。在巴黎，媒体记录了“美食家大公”（弗拉基米尔是个饕餮之徒，每顿饭都要有经过注释的菜单）对食物的毫无节制和大公夫人豪奢的购物习惯，据说她是卡迪亚独一无二的最佳顾客。（她拥有堪称世界上最精美的珠宝收藏。[30]）

贡托在父亲早年间在米涵的祖国德国任大使期间就认识她了，那时他二十多岁，她还不满二十岁。她结婚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酷爱运动的大公也立刻就喜欢上了贡托。弗拉大公夫妇两人一见到好朋友那位漂亮的年轻情妇，立刻就喜欢上了她。洛尔对打猎和骑马的热爱与大公一拍即合，她喜欢爆粗口，他也一样。和已故的亨利五世（他的妻子与亨利五世还“有点表亲关系”）一样，大公也非常看重礼仪，但喜欢在各种礼仪场合来几句粗野的玩笑和幼稚的逗趣。大公夫人表面上看起来要比丈夫更得体一些，但也不是个谦逊怕羞之人。她强硬、聪明又极为独立，在圣彼得堡，传说她能够“把丈夫控于股掌之中”。她是罗曼诺夫皇朝历史上第一位拒绝在婚后皈依俄国东正教的新娘。米涵做出那一决定时的冷静和勇敢，正是她惊喜地在洛尔身上发现的品质。




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和大公夫人，即弗拉大公夫妇，常常来巴黎狂欢，洛尔是他们来巴黎期间最喜欢的同伴和向导

贡托为洛尔介绍的另一位大人物是大她近20岁的法国贵妇人，德·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夫人（Duchesse de La Trémoïlle）。和洛尔的大部分老头子一样，亨利·德·布勒特伊也是公爵夫人的好朋友。他在日记中坦诚地说：

> 虽然我很喜欢她，但我必须说她长得很丑，非常丑，头太大、头发过密、五官粗糙，嘴里仿佛只有一颗牙齿，还……长着一双小眼睛，虽然那双眼睛和善而睿智。她的腰身……太粗，脸色也太红润。不过在这副粗野的外表之下，她有一颗最美好、最高贵、最慷慨的心……以及最聪明、最风趣的头脑。[31]

洛尔和公爵夫人很快成了好友，养成了每天午前在拉特雷穆瓦耶位于协和广场的宅邸促膝谈心的习惯，那里距舍维涅家很近，步行就能到达。随后她们会分头进行各自的社交活动，洛尔回家开办她的沙龙。下午五时，她会回到拉特雷穆瓦耶府上，与公爵夫人玩一轮惠斯特纸牌游戏，其间互相汇报一天的见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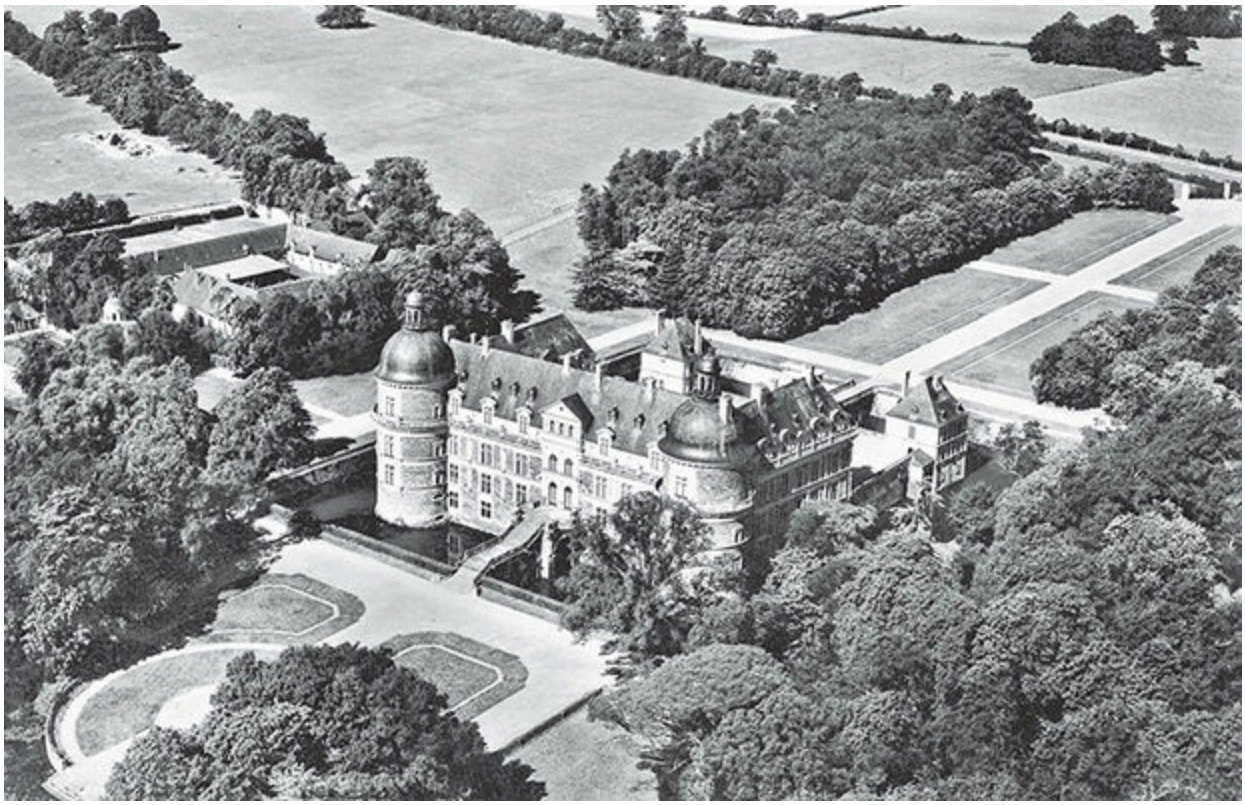
这样的生活安排使得洛尔常常能在谈话中提到这位尊贵朋友的名字，却又不显得是在吹牛。不过与公爵夫人结交的确值得夸耀，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爵位。玛格丽特-让娜·德·拉特雷穆瓦耶是路易-菲利普一位很有势力的大臣之女，也是奥尔良家族的长期密友，因此当巴黎公爵成为法国王位的觊觎者之后，她在上流社会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正如奥尔良家族的地位提升让公爵夫人脸上有光，她的地位提升也让洛尔跟着沾了不少光。

德·拉特雷穆瓦耶夫人碰巧还是个疯狂热衷运动的女人。她和丈夫每年秋季都在他们位于卢瓦尔的雄伟城堡塞朗（Serrant）举办狩猎聚会，那是上流社会狩猎季的高潮，洛尔从不会缺席。[32]其他客人可能受邀在那里打几天猎，但洛尔往往至少待几个月，这是她深得女主人重视的另一个标志。在到访期间，洛尔也赢得了公爵的好感，只不过公爵更偏爱钻研祖先的资料（他是个狂热的家谱学者和家族历史学家），而不是在祖传的庄园里打猎。

公爵勤奋用功、偏爱独处的个性和对贵族昔日荣耀的着迷与洛尔的丈夫非常相似。不过舍维涅很少和妻子一起去塞朗，而是更喜欢在他和洛尔位于米迪地区的庄园卡巴纳酒庄里消磨闲暇时光，他在那里试验葡萄园的灌溉方法。这一安排使得贡托可以担当洛尔在塞朗的护花使者（把妻子埃玛留在家里）。只要他们在其他受邀的客人面前维持必要的外表上的体面，女主人并不反对年轻朋友们的风流韵事。不过上流社会还是开始风言风语，说洛尔在塞朗淫荡放肆；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写到

过德·舍维涅夫人在某个城堡做客期间，被人看到在深更半夜悄悄出入“一间不属于她自己的卧室”。

如果说洛尔知道这一传言，她显然不觉得那是在提示自己应该收敛了。她在巴黎也花很多时间和贡托在一起，后者对运动的热爱和她自己十分吻合。他们下午常常一起在人来人往的花蹊骑马，在那里，与贡托比肩而行的洛尔总是很早就被注意到了。由于她自己的骑术高超，又总是出现在骑马和猎犬圈子里的传奇人物身旁，因此她很快就成了花蹊的耀眼明星，《吉尔·布拉斯报》的一篇文章就证实了这一点。1884年6月，该报纸在头版列了一个名单，要为巴黎城里的每一位名媛取一个花朵绰号。取植物作为绰号有助于把这些小姐与同样在花蹊游走的时髦交际花们区分开来，后者通常都有以动物名取的外号（譬如“海豹”）。花朵绰号没有被众人接受，不过洛尔的绰号叫“金合欢”，就取自那条大道的正式名称：金合欢路。



德·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和公爵夫人在他们位于卢瓦尔的塞朗城堡招待洛尔，每年的狩猎季，洛尔都要在那里度过一个月的时光

作为城中精英阶层的聚会地点，花蹊还是新的时尚趋势的走秀台。洛尔在这方面也得益于与贡托的关系，后者表面看来是个体格强健的运动直男，事实上却有着完美的时尚感觉。他的朋友博尼·德·卡斯特兰常常讲一个故事，说的是共和国政治家保罗·德夏内尔[33]在入选高层后派人向他——博尼——发出紧急请求，请他提供一些穿衣建议（这一要求表明，“无生”阶层在品位问题上永远缺乏自信）。作为德·萨冈亲王的外甥，博尼本人也很讲究穿戴，本可以提几条建议。但他对德夏内尔说：“在这方面，有一个人可以提供比我更好的建议，那就是约瑟夫·德·贡托伯爵。”[34]贡托是否同意给德夏内尔提供建议不得而知，不过那位政治家最后的选择无可指责：旺多姆广场上有名的裁缝店沙尔韦（Charvet）。

然而贡托在时尚方面真正的专长，还要数改造漂亮名媛的衣橱。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是博尼的嫂子让（多莉）·德·卡斯特兰伯爵夫人，后者之所以成为社交界的美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贡托的明智建议。[35]伯爵夫人多莉闺名叫多萝泰·德·塔勒兰德-佩里戈尔（Dorothée de Talleyrand-périgord），是萨冈亲王夫人同父异母的姐姐，也是在德国长大的，还在那里嫁给了第一任丈夫、普鲁士人查理·埃贡·冯·翁·楚·菲尔斯滕贝格亲王（Prince Charles Egon von und zu Fürstenberg），被赞美为“德国皇帝的宫廷里最美的装饰品”。[36]但菲尔斯滕贝格死后，多莉改嫁一位法国表亲，来到了巴黎，她的新同胞们却嘲笑起她那奢侈的“德国”服饰。贡托就在这时出手帮助了她。他鼓励多莉强化而不是弱化条顿人的时尚直觉，同时教了她一些更精致的裁剪要点，把她的“瓦尔基丽[37]之魅”变成了时尚的菁华。据安德烈·热尔曼说，那些曾经嘲笑她的巴黎人不久就开始模仿她的“瓦格纳式（与沃思[38]风格相反）”的大胆，并哀叹自己没能力驾驭这种风格（通常是因为他们相对矮小的身材）。

当热尔曼说“多莉·德·卡斯特兰始终像个来自沃坦[39]王国的女子”时，他是在真诚地夸奖她。[40]

贡托对洛尔似乎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鼓励她尽可能突出自己在穿搭上的怪癖。在她假小子的少女时代，她养成了一套实用主义的、显然一点儿也不阴柔的穿衣风格。在情人的教导下，这种癖好成了她魅力的关键所在。洛尔有好几位同时代人都赞美她是“社交界第一个穿克里德[41]西装的女人”：修长得体、实用、裁剪精致的羊毛西装，和她那位衣着讲究的情人穿的一样，只不过用一条朴素的曳地长裙代替了长裤。[42]（她也有骑马时穿的长裤。）1885年6月，《高卢人报》在一篇关于上层流行“着装阳刚化的新时尚”的文章中提到了她的名字。[43]这一说法也表明，她在时尚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了。

除了在户外具有优势之外，洛尔的男式裁剪服装还为当时主流女裙中过多的荷叶边和巨大累赘的内衣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在一篇批评世纪末女装中随处可见的裙撑这个“怪物”[44]的日记中，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写道：

> 巴黎人很有品位，这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当前被热追的时尚完全破坏了他们对女性形体的感觉……我真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穿裙撑不可。在身后再拖一个没身子没头的人实在不方便。仿佛那样的折磨还不够似的，为了保持整个撑架的适当位置，还得穿其他很多东西，那些一定全都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发明。首先不得不在紧身内衣周围戴一个马尾衬垫……然后还有那个撑起中间隆起部分的小棉垫，腰身四周还有更多的蕾丝花边，然后还有两三个巨大的铁环，那些铁环扎进大腿里，每次坐下都疼痛难忍。

除了不舒服之外，这些内衣还给那些碰巧要在情人而非丈夫面前脱掉它们的女人们造成了很大的难题。穿上那些内衣需要侍女帮忙，大多

数堕落妻子们都不愿在外出与情人幽会时带上这么一个帮手。真的，那些在马车而不是单身套房里跟情人偷情的太太们，幽会时往往不得不把紧身内衣扔出马车窗外。这使得在每天五点到七点钟（cinq à sept）的通奸窗口期关闭，已婚妇女们衣冠不整地赶回家见丈夫之后，女士内衣在布洛涅森林里随处可见。

洛尔的“阳刚化”外表摈除了这些笨拙不雅的衣物，自然也解决了与之相关的问题。它加强了舒适度和实用性，而且它更漂亮、更自然的裁剪，在超时尚的巴黎人中获得了热切的拥护。不过这种风格要穿在瘦削健美的人身上才好看，而那时，丰腴、矮小、软胖的身材仍是女性魅力的典范。洛尔天生热爱运动，又注意保持身材瘦削，她引领了一种新的女性理想潮流，比玛德琳·薇欧奈[45]、普瓦·波烈[46]以及她未来的朋友可可·香奈儿等设计师提前十多年预演了修长而无内衣累赘的现代时尚。[47]

洛尔对自己的服装品位有了新的自信，便开始对服装问题发表意见了。[48]洛尔说起英国好友德·格雷夫人（Lady de Grey）最新的高级定制服装——这位六英尺高的漂亮女贵族总是穿着奢华的沃思或雅克·杜塞[49]时装——会惊呼：“哦，那位格拉迪斯！那位格拉迪斯！多时髦啊！在我们法国，还有哪个女人能穿成那样？”[50]同样，在审视奢华女帽设计师卡罗琳·瑞邦[51]的作品时，洛尔也会用权威的口气说：“一流啊，我亲爱的！……那才叫优雅！（Ça，c’est élégant！）”[52]

在这些例子中，洛尔的口头语缩写词“ça”加重了赞美的口气。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她也用那个词传递了令人难堪的轻蔑。那次事件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被洛尔批评穿衣风格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夫人。这位王妃在珠宝方面的一流品位不知为何没有延伸到穿衣选择上，她往往像许多（过去和现在的）王室女性一样，穿着过时的保守服装。洛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她改头换面。一天，她去欧陆酒店

（Hôtel Continental，弗拉大公夫妇在巴黎最喜欢的酒店）接大公夫人，并和她一同去附近参加罗斯柴尔德家族举办的游园会时，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洛尔看到大公夫人和以往一样穿着邋遢的裙子，立刻板起面孔。“你就穿那个（Ça）？！”她喊道，大声引用自己的口头语来突出厌恶之情。“在圣彼得堡可以！在海牙可以，在哥本哈根或许也可以！但在巴黎不可以！夫人到底是在哪儿做的‘那个’？”随后她恢复了廷臣的谦卑姿态，平静地说：“如果夫人允许，我现在就可以带夫人去沃思。对，就现在，居斯塔夫？”（居斯塔夫是舍维涅家的男仆，受命陪同洛尔出席特殊场合。）“现在就把大公夫人殿下的马车掉转方向！”[53]

和洛尔的每一个高光时刻一样，这一事件也变成了社交界的传说，表明她真如传言那样，与王室人物关系密切，而且还在他们面前表现出闻所未闻的随便态度。这个故事也彰显了她众所周知的巨大成就。洛尔不揣冒昧地就品位问题质疑一位罗曼诺夫大公夫人之后，便拥有了在巴黎这样一个时尚之都与王室成员的魅力一争高下的权威——这是“新闻界陛下”总是明确关注的权威。用热尔曼充满崇拜的赞词来说，时尚王国的权杖已经传到了洛尔手中。

---

[1]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30；将AC比作暴风雨中的海鸟的文字见同一页，又见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76。

[2] Scrutator（pseud.），“Dinners *à la Russe*，” *Truth*（July 31，1879）：138-40，139.

[3] 骑师俱乐部和联盟俱乐部两家俱乐部的内部装饰，以及会员的习惯的详细描写，见Charles Yriarte，*Les Cercles de Paris*：*1862-1867*（Paris：Dupray de la Mahérie，1864）。虽然Yriarte写这些俱乐部的时间先于本书讨论的时期，到世纪末，两家俱乐部的文化没有多少变化。

[4] 德·莱塞普子爵费迪南（Ferdinand，Vicomte de Lesseps），即斐迪南·马里（Ferdinand Marie，1805-1894），法国外交官、实业家。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即由他

主持开凿。1879年的地理学会聚会上，包括他在内的135位学会成员以开凿巴拿马运河为目标，年逾古稀的德·莱塞普子爵被任命为巴拿马运河公司总经理。但公司经营不善，最终破产。

[5]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49.

[6] 关于“海豹”的详情，见Zed（pseud. Maugny），*Le Demi-monde sous le Second Empire*：*souvenirs d’un sybarite*（Paris：E. Kolb，1892），105-7；and *Guillaume Apollinaire*，*Selected Writings*，*trans. Roger Shattuck*（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1），198：“I’ve the eyes of a sea-going calf.../I’m merely a seal by profession./A seal-lion proud of its past/Papa Mama/Pipe and spittoon and a café concert/Heigh ho.”

[7] 关于塞纳瓦斯的生平及旅行，见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2，304-10，and vol. 3，242-44。

[8] 报纸上提到AC与塞纳瓦斯一起旅行的文字出现在《纽约论坛报》的“个人信息”栏目（1887年3月28日）：第三版；以及《上加利福尼亚日报》的“个人”栏目（1887年6月13日）：n.p。

[9] 勒阿弗尔（Le Havre），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第二大城市，位于塞纳河河口，濒临英吉利海峡。

[10] 塞纳瓦斯将母亲的自传作为自己的多卷本回忆录和家族史的一部分出版了；见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3。

[11] HR，*Les Cahiers*，635.

[12] 关于孀居的男爵夫人提到自己与德·比萨克公爵夫人和巴黎伯爵夫人的结交，见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3，243-44。关于她只用一句话提了一下布鲁诺的婚礼，见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3，245。孀居的男爵夫人还有些焦虑地述及布鲁诺“按布列塔尼人的规矩称之为舅舅的”Auguste Grandin de L’Eprevier拒绝担任证婚人，几年前他在她女儿Marthe的婚礼上就是证婚人。L’Eprevier声称他

身体不好，无法参加婚礼，但男爵夫人担心他事实上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抵制婚礼（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3，245）。她没有说自己认为可能是什么原因，但根据她本人的偏见，她猜想与新娘不名誉的出身有关。

[13] 塞纳瓦斯对自己其他旅行的详细记录，以及他奇怪地对与AC一起长达一年的旅行只字未提，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3，243-44。关于她只用一句话提了一下布鲁诺的婚礼，见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3，245。孀居的男爵夫人还有些焦虑地述及布鲁诺“按布列塔尼人的规矩称之为舅舅的”Auguste Grandin de L’Eprevier拒绝担任证婚人，几年前他在她女儿Marthe的婚礼上就是证婚人。L’Eprevier声称他身体不好，无法参加婚礼，但男爵夫人担心他事实上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抵制婚礼（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2，304-10。

[14] 关于LC的婚外情和情人的单身套房，见PM，*L’Allure de Chanel*，106；and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43。

[15]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194.

[16] Anonymous，“A Leader of French Fashion，” *The Searchlight*（January 21，1905）：27；关于LC与她争吵之事，见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104-5；and AG，*Les Clefs de Proust*，31-32。

[17]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194.

[18] PM，*L’Allure de Chanel*，107.

[19] AG，*La Bourgeoisie qui brûle*：*propos d’un témoin*，*1890-1940*（Paris：Sun，1951），74.

[20] AG，*Les Clés de Proust*，139.

[21] AG，*La Bourgeoisie qui brûle*，185-86.

[22] 于格·卡佩（Hugues Capet，941-996），法兰西国王。巴黎伯爵“伟大于格”（Hugues le Grand）之子，祖父为西法兰克国王罗贝尔一世，956年继承父亲成为法兰西公爵。987年被贵族正式选举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的卡佩王朝。

[23] A. de Gramont，op. cit.，256.

[24] PV，*France from Behind the Veil*，349.

[25]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192-93.

[26]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73. Painter把这句挖苦话错引成了“谢谢你省去了我看着亨利老去的麻烦”，将它置于洛尔后来与HB的婚外情的背景，后者也离开她跟一个美国女人结婚了。LC或许在遇到HB在1891年3月所娶的新欢时复制了这句侮辱，但若果真如此，Painter却没有提供确定的来源。见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2。

[27] A. de Gramont，op. cit.，454.

[28]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194-95 and 204-5；and Galina Korneva and Tatiana Cheboksarova，*Grand Duchess Maria Pavlovna*（East Richmond Heights，CA：Eurohistory，2015），22-52.

[29] Simon Sebag Montefiore，*The Romanovs*：*1613-1918*（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6），470.

[30] Galina Korneva and Tatiana Cheboksarova，*Grand Duchess Maria Pavlovna*（East Richmond Heights，CA：Eurohistory，2015），ch. 6，“Passion for Perfection and Jewels，” 169-79.

[31]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56.

[32] 关于LC每年前往塞朗，见BL，*The House of Memorie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82-83；关于AC’s 在卡巴纳的葡萄栽培试验，见*Le Journal de l’agriculture，de la ferme et des maisons de campagne* 3（1892）：502-3；*Le Progrès agricole et viticole* 22（1894）：392；*Le Bulletin du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16（1897）：821；*La Géologie agricole* 3（1897）：249-50；*Les Annales de la science agronomique française et étrangère* 1（1898）：348；and *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griculteurs de France* 59（January-June 1906）：265。AC和LC至少曾在1894年在卡巴纳主持过一次打猎聚会；见Gant de Saxe（pseud.），“Mondanités：réceptions，” *Le Gaulois*（January 20，1894）：2。

[33] 保罗·德夏内尔（Paul Deschanel，1855-1922），法国政治家，1920年2月18日至9月21日曾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

[34] Pierre Grenaud and Gatien Marcailhou，*Boni de Castellane et le Palais Rose*（Paris：Les Auteurs Associés，1983），72；on Deschanel choosing Charvet，see PM，*1900*（Paris：Marianne，1931），13.

[35] PV，*France from Behind the Veil*，350. 博尼·德·卡斯特兰写过多莉（他的嫂子）有一种“大公夫人”的“国际风范”，而不是巴黎社交女子的“骨子里很法国”的样貌，见Castellane，*Vingt ans de Paris*，107。

[36] AG，*Les Clés de Proust*，127.

[37] 瓦尔基丽（Walkyrie），北欧神话中战神奥丁（Odin）的婢女之一。

[38] 沃思（Worth），指后文中提到的第一位在欧洲出售设计图给服装厂商的设计师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思（Charles Frederick Worth）创造的服装风格。沃思是“公主线”时装的发明者，也是西式套装的创始人。他使用的布料奢华铺张，偏爱昂贵精细的面料和奢华的装饰，喜欢在衣身装饰精致的褶边、蝴蝶结、花边，在肩上垂挂皇家金饰，使用可折叠的钢架裙襟。

[39] 沃坦（Wotan），前基督教时期德国日耳曼部落宗教中的神，相当于北欧神话中的战神奥丁。

[40] AG，*La Bourgeoisie qui brûle*，189.

[41] 克里德（Creed），最初是英格兰的一家裁缝铺，由英裔法国时装经理人查尔斯·克里德（Charles Creed）创办于1760年，1980年代成为世界知名的香水品牌，总部位于巴黎。

[42]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2；按照MB的说法，LC因而“促成了女性时装的革命”（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2）。

[43] “Bloc-notes parisien，” *Le Gaulois*（June 11，1885）：2.

[44] 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223.

[45] 玛德琳·薇欧奈（Madeleine Vionnet，1876-1975），法国时装设计师、企业家，被誉为“斜裁大师”，和可可·香奈尔、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齐名，是风靡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三大时装设计师之一。

[46] 普瓦·波烈（Paul Poiret，1879-1944），法国20世纪前20年的大师级服装设计师，同名高级定制时装屋的创始人。他在自己领域中所做的贡献被认为堪比毕加索为20世纪艺术留下的遗产。

[47] 关于由男士剪裁的女式西装时尚促成的理想女性身材类型的变化，见Eugen Weber，*France Fin de Siècl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99-100。

[48]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169.

[49] 雅克·杜塞（Jacques Doucet，1853-1929），法国时装设计师和艺术品收藏家。他以轻薄半透明材料叠加柔和色彩的优雅服装而闻名。

[50] AF，“Le Salon de l’Europe，” 469.

[51] 卡罗琳·瑞邦（Caroline Reboux，1837-1927），巴黎著名的女帽设计师和时装设计师。她把高级时装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法国重新流行，取代了19世纪中期的旧式女帽。

[52] AF，“Le Salon de l’Europe，”，464。瑞邦相对小巧、低调和不成型的草帽和毡帽相当于世纪末那些帽型巨大而装饰繁复的帽子，就像洛尔简洁的西装相对于那个时代带有裙撑又到处是荷叶边的时髦女服，是现代时装的代表。虽说瑞邦发明的钟形帽要到很晚才问世，早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她就已经开始试验尽量简洁的帽形了。具体实例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收藏的一顶小巧的蓝色帽子：Caroline Reboux，*Hat*（1870-1880）；编录号：CI.38.47.5。

[53] AF，“Le Salon de l’Europe，”，49。

即兴曲 鸟鸣和鸟羽

一只鸟儿之所以被关在鸟舍或鸟笼里，要么是因为它的羽毛，要么是因为它的啁啾，它要么羽毛多彩瑰丽，要么歌喉婉转动听。可以说，概观之下，女人的燕语莺声和搔首弄姿也是一样。她利用一切时尚的手段，把自己变成一只蜂鸟、一只文雀、一只天堂鸟……

女人用自己独一无二但无可比拟（原文如此）的歌声让人着迷，让人欢喜，让人沉醉。她是一只唧哩着钻入云霄的云雀，一只在林中喧闹的黄莺，一只用天籁之音迎接黎明的夜莺。毫不夸张地说，当她的羽毛与歌声一样甜美，她就是一只真正的凤凰……

被关在鸟舍或鸟笼里的女人会为了寻欢、为了权力……优雅、品位等目的而修饰自己的羽毛或声线……当她从一根树枝跳上另一根树枝时……或者当她透过鸟笼的栏杆望向外面的世界时，自会燕语莺声、搔首弄姿。

——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女作家》（“La Femme de lettres”，1884—1887年前后）

第7章 被看见的艺术[1]

洛尔·德·舍维涅并非独自掌握着时尚王国的权杖。与洛尔极简主义的男式裁剪相反，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引领着一种装饰华丽、天马行空的风格，这使她也成为上层的焦点。[2]虽然像其他方面的传统一样，那个阶层的着装一般需要严格符合规矩，但伊丽莎白喜欢打破所有规矩的服饰。如《高卢人报》1882年报道的，她绚丽夺目的非主流让她成为贵族圈中的神秘人物。一篇刊登在头版的“美丽的格雷弗耶子爵夫人”传略中一方面赞美她是“甜美如梦的纯正贵族女性典范”，另一方面也称她为着装上的叛逆者：

> 格雷弗耶（夫人）最痛恨的就是平庸。她在一切领域中别出心裁，这让她的外表稍显怪异……她的服装是她本人专为自己设计的。她穿着的一切都必须独一无二——她宁可看上去古怪，也不愿意跟任何人雷同……然而不管她有多任性善变，不管她的服饰多么异想天开，她却永远保持着一种极为出众的风度。人们一眼就能认出她是一位贵妇人。[3]

这段描写基于一个悖论：伊丽莎白在着装上的“任性”非但没有破坏，反而提升了她“极为出众的风度”。和洛尔一样，她也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发展了一套自觉的自我宣传策略，成为贵族阶层高贵的典范。她发誓要在巴黎重现自己蜜月期间用那件“伊丽莎白女士”的裙子获得的成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头等重要的目标：“在他人面前，永远要对自己说：我要让此人在我们相遇之后记住一个无与伦比的高贵形象。”[4]在她信任的一位导师的帮助下，伊丽莎白完善了这一形象，成为耀眼的明星。渐渐地，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亲王贵胄还是平民百姓，都会用“无与伦比的高贵”来形容她。

和那时及现在的大多数名人一样，伊丽莎白能够一战成名，也要依靠雄心、魅力、禀赋和时机。她创造并推出自己无与伦比的光环之时，恰逢法国君主制彻底丧失扮演该角色的能力。如果说尚博尔伯爵悲惨的事业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君主制在法国复辟的希望，那么他的继承人巴黎伯爵菲利普·德·奥尔良则给出了致命一击。巴黎伯爵天性腼腆胆怯，虽有很强的责任感，却没有真正的领导冲动或天赋，也没有展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贵形象”的意愿。威尔士亲王一向希望他的王室成员们多一些夸张的演技，他曾傲慢地评价菲利普·德·奥尔良“太像个资产阶级，当不了国王”。[5]

巴黎伯爵的个性与这一判断相当吻合，他谨慎地避免公开展示王室的排场，只有一个重要场合例外，但那次例外是致命的。1886年5月，他和妻子在他们位于巴黎的宅邸加列拉宫（Galliera Palace）举办了一场奢华的盛宴，庆祝他们的长女阿梅莉·德·奥尔良（Amélie d’Orléans）与未来的葡萄牙国王订婚。欧洲各国的君主纷纷来到首都，保王派报纸狂热地报道这次盛宴，引发了共和派对于君主主义政变的恐惧。一个月后，政府投票决定流放巴黎伯爵和所有其他排队等待法国王位的亲王们。

菲利普悄悄地离开了法国，再也没有回来，但他的离去并没有明显降低社交界的魅力值。在他在巴黎作为假定国王的三年任期内，巴黎伯爵和他的妻子，一位瘦削脸、高大粗笨、永远叼着雪茄烟的女人，非常乐意将众人的关注留给像伊丽莎白·格雷弗耶这类真正享受它的人，后者也的确抓住了这个机会而没有放弃。听到德·玛萨侯爵[6]说“在（她）身旁，巴黎伯爵夫人就像个打扫房间的女仆”，伊丽莎白壮起胆子，想出了一句毫不掩饰的自夸标签来形容自己：“要做女王的女人”。[7]



伊丽莎白很高兴听到一位朋友说，在她身旁，奥尔良派法国王位觊觎者的妻子巴黎伯爵夫人就像个打扫房间的女仆

伊丽莎白首次获得众人关注的亮相是在德·萨冈亲王夫人1880年5月在圣日耳曼区举办的化装舞会上。那晚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德·萨冈夫人举办的第一个化装舞会；上层自普法战争后享受的第一次盛大狂欢；自格雷弗耶夫妇的婚礼以来，伊丽莎白第一次出现在上千位观者面前。

由于亲王夫人没有为那年的舞会公布任何着装原则，宾客们可自由安排自己的装束，而伊丽莎白为自己设计着装更是没有一丝马虎。她致敬丈夫所热心的帝王运动（或许也向她自己在性爱方面的含蓄致敬），装扮成了贞洁的狩猎女神迪安娜，头戴一个新月形状的钻石发饰，穿着一条用闪闪发光的镶钻锦缎制成的芭蕾舞短裙式裙装。[8]裙装的下摆本身就是个大胆的设计，它短得足以露出伊丽莎白纤细的脚踝，却又用很

多裙撑撑得很大，以至于德·萨冈宅邸那巨大的礼仪楼梯只容得下伊丽莎白一人。当然，萨利姆除外，这位六岁的非洲侍者是伊丽莎白的舅舅罗贝尔·德·孟德斯鸠最近赴丹吉尔[9]短途旅行时带回来的。虽然在标准的古典图像中，迪安娜是自己拿着箭筒，但伊丽莎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萨利姆，她声称后者疯狂地爱着她。



在**1880**年首次举行的萨冈化装舞会上，站在最右边的伊丽莎白装扮的是迪安娜，手持弓和箭。非洲来的男侍者萨利姆（**Salem**）帮她拿着箭筒。一位不具名的艺术家在《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上重新想象了当时的场景

这显然不是打算泯然于众人的女人的装备。但不管它多华丽，都没能遮住穿戴者的美艳。“这位迪安娜，”加布里埃尔-路易·普兰盖写道，“完全可能出自普拉克西特列斯[10]或乌敦的雕塑；她精巧的头颅完美地安放在与她宽阔的双肩相连的天鹅般优美的脖颈之上。”[11]普兰盖惊叹伊丽莎白的“长裙拉长了她那曼妙婀娜的风韵和曲线……她迷住了上流社会，惊呆了他们，征服了他们，让他们五体投地”。[12]《世界画

报》的一位专栏记者也持同一观点，看到她“路易十四风格的迪安娜”装扮后惊呼：“多么漂亮的点漆之目！多么娇美的面庞！多么浓密的黑发！那优美的姿态就像漫步云端的女神！”[13]

《费加罗报》无处不在的社交专栏记者“星火”也呼应了同事的结论。她写道，德·萨冈夫人的舞会不但在战后十年的节衣缩食后恢复了城区的华丽盛典场面；还把

> 一颗炫目的新星捧上了社交界的地平线：20岁的美人格雷弗耶子爵夫人娘家姓希迈（原文如此），她那双黑色眸子闪烁的光芒要比她戴在浓密头发上的那颗钻石新月耀眼千倍……她（就是）女神迪安娜，却是从凡尔赛宫的宫廷芭蕾舞中走出的迪安娜。太阳王本人也要向这个帝王之夜鞠躬行礼。[14]

这里把子爵夫人描写成一个有能力征服路易十四本人的“王室”人物，把她与王室成员相提并论，这是有着巨大象征意义的胜利。

女王的比喻和启迪这一比喻的服饰，始终在巴黎人的想象中牵萦缠绕。1881年4月，“星火”在《费加罗报》的一位同事宣布格雷弗耶夫人“在德·萨冈夫人去年的舞会上一举夺冠”，当然，舞会并没有设立名次。1882年4月，笔名为“维奥莱塔”（Violetta）的记者在《高卢人报》上赞美她是“贵族的完美化身，‘高贵苍白的美人，财富之女、天国之后、爱神之母’”。这里引用的是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5]的句子，但维奥莱塔说，如果真想了解格雷弗耶夫人的“绝对优势”，只需记得

> 她穿着去赴德·萨冈亲王夫人的舞会的服装是活生生的女神迪安娜的形象，带着路易十四时代的高贵庄严和古代奥林匹斯山的神圣尊贵，像一个从太阳王的宫殿里走出的人物，她的形象映现在庆典大厅四面环绕的镜子里，层层叠叠，无穷无

尽……[16]

这里再度把子爵夫人比作从路易十四的宫廷里穿越而来的人，是王宫乃至天神之尊贵的“活生生的形象”。“她在每个人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所引发的倾慕，那主要是一种敬畏之情，”维奥莱塔接着说，“那是一切女王应得的情感。”[17]

那正是伊丽莎白力图用自己后续的聚会服饰再现的情感。接下来的那一场萨冈舞会是为了向女主人的密友和传说中的前情人威尔士亲王伯蒂致敬而举办的，在那场舞会上，伊丽莎白穿一条血红色的天鹅绒宫廷服，披一件毛丝鼠斗篷，头戴一顶红宝石王冠，这套着装的灵感或许来自汉普顿宫悬挂的一幅年轻的伊丽莎白一世的肖像。[18]（伊丽莎白非常喜欢她这位圣洁的王室同名者，在她的档案中保留着一张印有这幅肖像的明信片。）伊丽莎白此前曾受到威尔士亲王的接见，当时是在她婚后的那个夏天苏格兰的一次松鸡狩猎聚会上。但她没机会给亲王留下深刻印象，那天下着冷雨，整个聚会每个人都裹着粗花呢外套。所以她急于让他见到自己身上的华服，那套既向他的王室祖先致敬，又能展示她自己的尊贵风范的服饰。

为了确保能在舞会上吸引他的注意，伊丽莎白看准时机，与亲王同时到达德·萨冈府邸。亲王殿下总是最后一个到，因此她设法和亨利一同很晚才到舞会现场，这个计划效验如神。格雷弗耶夫妇刚刚踏入府邸的门厅，德·萨冈夫人的瑞士守卫就宣布威尔士亲王到。按照礼仪，本应由亲王夫人先招呼自己的王室贵宾，但伊丽莎白抢先了一步，在亲王脚下行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屈膝礼，以至于等到德·萨冈夫人行礼时，亲王几乎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洛尔·德·舍维涅事后说：“伊丽莎白·格雷弗耶，那才是个知道怎么行屈膝礼的女人呢！”）



伊丽莎白穿着威尔士亲王伯蒂的祖先、女王伊莎丽白一世的服装，彻底迷住了亲王

威尔士亲王阅过无数漂亮的巴黎女人，但他显然很高兴看到眼前这位屈身行礼的“伊丽莎白女王”。他糊涂了几秒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到过她（因为她主动行礼表明他见过她）。直到他注意到自己的老朋友格雷弗耶站在她旁边，才想起来这位迷人的都铎王朝美人就是松鸡狩猎会上那位害羞的年轻新娘。明确了这一联系之后，亲王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赞美伊丽莎白，门厅里所有的客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们还听到他终于接受了亨利向他发出多年未果的邀请：同意那年秋天来布德朗森林打猎了。

从那天起，社交界的常客们经常说，伊丽莎白·格雷弗耶“能对威尔士亲王呼风唤雨”。[19]在前一年的舞会上，旁观者们还只是猜测她有能力令王室殿下肃然起敬；这一年，他们目睹了她的成功。普兰盖写道，

握有“美貌……财富以及无可比拟的尊贵的权杖”，伊丽莎白再次成为当夜的女王。

在之后那场萨冈狂欢上，她决定装扮成莫扎特的《魔笛》[20]中的夜后，穿一件多褶边的黑色波兰舞曲长袍，背后戴一对巨大的薄纱蝠翼。亨利身穿红白色提花制服上衣、红色长袜和白色褶裥领（这套“红方片国王”的装扮非常适合他那长方形的头），陪她出席舞会。他这身装备一定为他赢得了不少恭维，因为后来他委托社交界的水彩画家欧仁·拉米创作一幅画来描绘他和贝贝斯出现在那场舞会的人群中的场面。[21]最终的画作是一个纪念，那是亨利像妻子一样热衷于服装改变形象的魔力的少数实例之一。

在1884年的萨冈舞会上，伊丽莎白全然无视预先规定的“农民”主题，炮制了另一个版本的女王形象。亲王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穿着土布服装，配以方头巾和木屐，伊丽莎白却装扮成了路易十四那位美丽的孙媳妇勃艮第公爵夫人（Duchesse de Bourgogne）。路易十四老年时居然爱上了这位孙媳妇，举世愕然。（据说她26岁香消玉殒时，老国王的心都碎了。）这位年轻的公爵夫人有着传奇的美貌，就连素来挑剔的圣西蒙公爵也在他关于路易十四宫廷的多卷本回忆录中不吝恭维之词，这样的赞美在整部回忆录中屈指可数：

> 她大胆、高贵而优雅地昂着头；风度那般尊贵，笑容那般生动，身材苗条而比例完美，婀娜的姿态像女神走在云端：这一切令她的样貌赏心悦目。走起路来顾盼生辉……她是每个人眼中的尤物。[22]

伊丽莎白的贵族同伴们大概都很熟悉圣西蒙的文字，因为他毫不掩饰地对他们的祖先说三道四，他的回忆录也成为他们那个阶层的必读书。就连贵族中最没有文学细胞的人，也会津津有味地阅读公爵记录他们的祖先在凡尔赛宫耍弄权谋的花边新闻。

说到勃艮第公爵夫人，圣西蒙书中最刺激的花絮之一就是她和德·阿尔古亲王夫人的宿仇，后者年轻时曾是个美人，但人老珠黄，廷臣同伴们都称她为“金发怒神”。[23]圣西蒙写道，德·阿尔古夫人说谎成性、水性杨花、阴险邪恶，早已成为太阳王的随从中最“可怕、可憎、可鄙”的女人之一。[24]勃艮第公爵夫人比谁都恨她，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总是对亲王夫人开各种侮辱性的玩笑，比如在她的椅子下面点燃炮仗啦，对她投掷像石头一样硬的冰雪球啦，还在半夜三更让20名瑞士护卫敲锣打鼓地进入她的卧室，“用吵闹声把她惊醒”。[25]

伊丽莎白大概很高兴唤起人们对这些趣闻的回忆，因为亨利的情妇“美女波利娜”就是德·阿尔古亲王夫人的后代。至少在17世纪，说谎成性、水性杨花的德·阿尔古金发女郎得到了报应，而且国王对此听之任之。正如圣西蒙所说，国王觉得“公爵夫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因此她能肆无忌惮地折磨亲王夫人。伊丽莎白从亨利那里得不到这样的支持，他永远不会支持她与他生活中的其他女人为敌。不过正是出于那个原因，伊丽莎白装扮成勃艮第公爵夫人时，一定沾沾自喜地幻想自己无所不能。

为了成功演绎这个典故，她那天正是按照凡尔赛宫中那幅公爵夫人著名肖像上的服饰穿戴装扮的，那幅肖像是让-巴蒂斯特·桑戴尔[26]在1708年创作的。[27]裙子是一件非常正式的蓝灰色锦缎宫廷服，多彩的宝石和金色饰边装饰着三角胸衣，还有一条极长的拖裙，不得不请孟德斯鸠那位可信赖的非洲侍者萨利姆再度客串。这一次，萨利姆还带着一把像棕榈树一样巨大的遮阳伞。

然而无论在桑戴尔的肖像中，还是在伊丽莎白的复制品中，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袭华丽的深紫色天鹅绒斗篷。这件斗篷有一道纯白色饰边，上面缝着波旁王朝的百合花，彰显穿戴者的王室身份，与淳朴的“农民”嬉闹格格不入。这正是伊丽莎白选择它的原因。

她的女王装扮又一次在同代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整整五年后的1889年夏，社交界报纸的记者们还在恳求读者们“记住（格雷弗耶夫人）在德·萨冈亲王夫人的化装舞会上那套勃艮第公爵夫人的装束。她就像从太阳王的宫殿里走出的幽灵”。[28]

这最后一声喝彩的时机值得注意，因为那恰恰是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政府在巴黎举办盛大的新一届世界博览会，以表纪念。世博会轰动的序曲是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那座1000英尺高的铁塔于1889年3月31日落成，那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29]作为进步、科技和勇往直前的共和国精神的标志，埃菲尔铁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就连它也无法，也的确没有让伊丽莎白的创新失色：一个从太阳王的宫殿里走出的时尚女王在现代巴黎的报纸上重获新生。

1889年世界博览会前十年，当伊丽莎白首次随亨利迁居巴黎时，她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她未来会变成时尚的偶像。这对新婚夫妇在布德朗森林度完蜜月后，就在格雷弗耶家族位于圣奥诺雷区的大院里住下了。那座大院由一群相邻的私人住宅和民用及商用建筑组成，所有这些都用通风廊、庭院和花园组成的网络相连，在安适静谧的德·阿斯托格街（rue d’Astorg）和德·拉维勒-勒维克街交叉的地段占据了大半个城市街区。这座大院有三四十英尺高的石墙和高大的铁艺大门，看上去极为壮观，邻居们称之为“梵蒂冈”。除了能圈养30匹马的马厩外，它还有35间仆人卧室：这纯属非必需的奢侈，因为管理这么大的宅院需要的人力之巨令人咋舌。



在**1884**年的萨冈化装舞会上，伊丽莎白复制了**1709**年让-巴蒂斯特·桑戴尔所绘的勃艮第公爵夫人肖像中的王室服饰。其他众人都身着农民装束

亨利叔叔那年四月去世后，伊丽莎白和亨利继承了他位于德·阿斯托格街8号的私人宅邸，那是一栋18世纪的大宅，后来在1956年，和整座大院的其他大部分建筑一样被彻底摧毁了。让-路易·普瓦雷（Jean-Louis Poirey）这位格雷弗耶家族的住家保安之子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在他没有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详细描述了整个宅院的情况。普瓦雷回忆那里的花园是“一座巨大的私家公园，规模仅次于爱丽舍宫的花园”（即共和国总统居住的地方）。[30]那里有茂密的悬铃木和栗树、精心修剪的树篱、井然有序的花圃，是首都市中心的一片闹中取静的绿洲。仅仅两个街区之外，马勒塞尔布大道上车水马龙，终日的喧嚣声即便门窗紧闭也不绝于耳。然而在格雷弗耶家的花园，最主要的背景音是鸟儿的欢唱和喷泉的叮咚声，间或能听到银铃般的笑声，那是从德·阿伦贝格家后院为孩子们建造的木偶戏院里传来的。

院墙外的街道上没有多少马车和行人声。格雷弗耶家族在那里买下的很多商业地产都被用来在他们自己和闹市之间增加一道缓冲，但亨利的父亲的确把他在德·阿斯托格街30号那座大楼的底层零售空间租给了很受欢迎的巧克力大亨费利克斯·波坦（Félix Potin）。这个品牌之所以获得了一批忠诚的客户，与其说是甜品的质量上乘，不如说聪明的营销技巧让它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每一盒、每一条波坦巧克力中都含有一张名人集换卡：把某一位家喻户晓的当代作家、艺术家、政治家或君主的照片印在一张廉价硬纸片上，被许多爱好者竞相收藏。[31]除了费利克斯·波坦公司的人来人往之外，德·阿斯托格街上的嘈杂声主要是不协调的乡野腔调，比如山羊倌或牧羊人挨家挨户地叫卖新鲜羊奶时，一路走来的笛声或铃声。[32]偶尔从街上吹送来的声音还有某一位售卖廉价小物的商人的叫声，他不时会游逛到这里，和着他的巴巴里风琴的刺耳音调高声叫喊着："幻灯，幻灯，出售天下奇物啦！"[33]

德·阿斯托格街8号的大宅室内一层有八个洞穴般的接待厅，占地约17 250平方英尺。[34]作为这座宅邸的女主人，伊丽莎白有权从中选一间开办自己的沙龙。她选择的那一间较小——虽然空间还是太大而不够温馨，但由于对着屋后的花园和房前的入口庭院两边都有窗户，所以这里的光线充足。（前后都有风景表明这座宅邸符合贵族住宅建筑的首要要求：位于"庭院和花园之间"。）她那间沙龙的方格天花板被涂成了天蓝色，上面点画着羊毛状的白云。墙壁镶嵌着手工雕刻的路易十五时代护壁板，有白色大理石的路易十六时代壁炉台干净的新古典主义线条衬托，它们旋转的卷须和贝壳也不显得杂乱无序。房间内的家具是一套昂贵的沙发和椅子，也都是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的手工雕刻品，座位上铺盖的博韦[35]绣帷上是让-巴蒂斯特·乌德里[36]为让·德·拉封丹[37]的寓言故事书绘制的插图。除了一个曾属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装饰性铜钟是格雷弗耶家族收藏的贵重物品外，这间客厅里的装饰物显示出伊莎丽白更为现代的品位。她把莫罗的那幅《花园里的莎乐美》悬挂在这里的墙壁上，把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照片也摆了出来。这些物品创造了一种温暖随

意的氛围，让它全然不同于这座宅子里的其他沙龙，那里无一不散发着装腔作势的特权、富贵和沉默的气息。[38]

在伊丽莎白看来，这座新宅邸另外两个最让人喜欢的地方，要属底层的冬季花园（*jardin d'hiver*）和楼上她的更衣室了。更衣室就在她的卧室旁边，卧室有一个可以俯瞰花园的室外大阳台。亨利就寝的地方跟她不在一处，他的卧室和办公室在大厅的另一侧。

亨利在家时，往往也是通过仆人们传送纸条与她交流。如果他本人来到伊丽莎白跟前，多半都是因为他心情很差，要跟她吵架了。（“每当亨利贪婪地需要发脾气时，”她写道，“他本可以把怒气发在马车夫或厨子身上，但我总是他最喜欢的发泄对象。”）每到这时，他会冲她大声喊叫，弄得仿佛整个房子都在跟着震动。除此之外，这座宅子整日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地下室除外，那里的厨房、储藏室、酒窖、洗衣房和锅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不过这些空间自有繁忙的工作人员打理，不是伊莎丽白的地盘。她虽然负责计划自己和亨利每天的菜单，但都是厨子和管家到楼上向她汇报，按照她的指令行事即可。

在这安静而孤立的王国中，与伊丽莎白交往最频繁的是她的婆家人。亨利的父母夏尔和费利西泰住在隔壁的德·阿斯托格街10号，他的妹妹路易丝和妹夫德·拉艾格勒伯爵罗贝尔（鲍勃）·德阿克雷[39]一家住在12号。另一个妹妹让娜和丈夫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40]住在德·拉维勒-勒维克街20号，那座宅邸与德·阿斯托格街上的几座宅邸共享一片后花园。德·阿伦贝格家的房子是整座大院中唯一没有用有篷过道与其他房子相连的住宅，因此在下雪或下雨时就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他们的女儿路易丝·（里凯特·）德·阿伦贝格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起，每到恶劣天气，就要由一位仆人拉着一架两轮车送她一家人去附近外祖父的房子。[41]

这些安排使得四家人几乎天天见面，何况费利西泰还有每天早间弥

撒后去看看每个孩子及其家人的习惯。此外，费利西泰要求整个家族每周至少四天晚上一起吃饭，最好在10号，那个餐厅本来就又大又暗，还悬挂着从天花板到地面的黑色佛兰德挂毯。她还希望整个家族每周日下午在她的沙龙里聚会，她的沙龙通常只有很少的一群亲戚和世交好友前去敷衍一下。[42]

费利西泰的招待会着实乏味。她那间昏暗的墨绿色客厅装饰得阴郁而单调，主题就是“死去的家人”：挂满了各种装在框子里的临终前肖像，玻璃下面压着一绺绺落满灰尘的头发。就连房间里仅有的那一点假装的生气和色彩——摆在中间圆桌上的巨大的“鲜花金字塔”（那是每天从布德朗森林的温室里采摘运来的）——也带着一股忧郁而压抑的气息，就像是新掘的坟墓上摆放的葬礼花环。谈话也一样无趣，因为费利西泰不但对宾客人选要求很严（大多都是像她一样守旧的老古董），对聊天的内容也有要求（同样守旧）。伊莎丽白在日记中称10号进行的交谈简直如教科书一般诠释了“在社交界不得不说的单调乏味的现成语言：大家全都为了礼仪说出冷漠的套话，将真正的感情隐藏起来”。另一位出席这些周日聚会的客人说它们“没有一点点吸引力（和）活泼的生气”，还说“那一家人没一个擅于社交的……格雷弗耶家人开办沙龙点起长蜡烛仿佛根本不是为了开心，而是为了完成任务”。

不过亨利动辄提醒伊丽莎白，所谓的良好教养莫过于履行义务和含蓄矜持。以他和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的关系为例，两个男人对彼此不屑一顾，以至于在私下谈话里，德·阿伦贝格曾不止一次威胁要在他和亨利的房子之间的公园中线上建一堵墙，这样两人就永远不必见面了。[43][44]如果说德·阿伦贝格没有实施这一威胁，那是因为和亨利一样，他知道维持一个联合家族阵线的表象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义务。在当前的共和制度下，消灭阶级的威胁如同一把利剑悬在贵族头上，在德·阿斯托格街，大家心知肚明的道理就是，要想保护自己免于被消灭的危险，就必须与同类结成一体，还要假装喜欢这么做。伊丽莎白既然是格

雷弗耶家族的一员，也应遵循同样的规矩。亨利对她说的“唯一值得过的生活是私生活，隐秘的生活”，确是他的真心话。

不过亨利自己的私生活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家外度过的，主要是为了躲避跟他结婚的那个女人。他虽然要求伊丽莎白参加每周若干次的家族晚宴和母亲的每一场招待会，却很少和她一起出席这些活动。他有俱乐部要去，有马要骑，有购买艺术品的狂欢，有含糊暧昧的政治野心，最重要的是还有婚外情，亨利在外面的娱乐太多了，不会愿意和贝贝斯一起围炉取暖。

她后来知道“美女波利娜”不是唯一一个跟她争夺亨利之爱的女人时，原本就很糟糕的一切变得更难以忍受了。迁入德·阿斯托格街后不久，伊丽莎白得知，家里有一位男仆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把从布德朗森林的温室里采摘的好几十束兰花分别送给居住在全城各处的女人：亨利臭名昭著的后宫。[45]这些女人来自各个阶层，有贵妇人、女演员、交际花、舞女、用人、马戏团演员和女教师，每个人都必须签署一份正式的“永恒的爱情盟约”，上面写着：“我，，发誓一生钟情于亨利·格雷弗耶，至死不渝。”（亨利死后，伊丽莎白发现全巴黎有三百多个女人在同一份文件的副本上签过字。）亨利喜欢像单身未婚时一样，定期和每一位情妇幽会。但如今他结婚了，便稍稍改了一下规则，选择在不同的单身套房而非在那些女人的家里会面了。最后他还租下了巴加特尔（Bagatelle），那是位于布德朗森林正中央岛上的一座很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城堡。这处地产的前主人包括两位国王，一位波旁王位觊觎者和伊丽莎白的一位希迈祖先。亨利把它变成他自己的私人爱巢，与情妇们一起躲在这里，往往一待就是好几天。

亨利长期不住在德·阿斯托格街并不意味着伊丽莎白在他离家期间可以无拘无束。他援引礼仪之规，禁止她在无人陪伴时出巴黎城，洛尔·德·舍维涅那种廉价的自由活动可不适合他的妻子。亨利继而提醒她，

如果她违背他的命令，他的母亲或姐姐或仆人们会向他告密（他们的忠诚最终只对他一人，这个付给他们工资的人），还说他会让她为违抗命令而后悔的。这一双重标准几乎和他的不忠一样令伊丽莎白愤愤不平，这也是她后来关注女性权利的起因。[46]伊莎丽白思考着自己的困境，写道："女人被视为战利品、漂亮的个人财产……微笑、文静而迷人。永远待在鸟舍里，不得离巢。"只有男人，她接着写道："才有飞翔的自由。"[47]

婚后的前几年，伊丽莎白在镀金鸟笼里享受着仅有的一点自由。至少在巴黎，她不需要跟着去打猎，也就能安静地追求自己的室内爱好了。她在沙龙里那一架巨大的钢琴跟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还自学吉他，想让自己的音乐曲目变得更多样一些。她怀念米米的家庭音乐会，在德·阿斯托格街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家族传统：每周日晚上费利西泰的招待会后，她会在自己的沙龙里举办私人演奏会。虽然大部分音乐都是雇用专业音乐家演奏的，但伊丽莎白也鼓励有能力的客人参与演奏。她惊喜地发现，就连路易丝·德·拉艾格勒这样个性最拘谨、最没有艺术天分的客人，也会急切地抓住表演的机会。（亨利已经不再兴致勃勃地与伊丽莎白一起表演二重唱了，但如果他在家，有时也会来一段独唱。）



与伊丽莎白结婚后，亨利租下了布德朗森林一个岛上的小城堡巴加特尔，用作自己的爱巢，也就是奢华版的风流交际家单身套房

为了打发这些小型音乐会中间空闲的时光，伊丽莎白开始钻研亨利藏书中的珍本：她婚后那几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德·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乔治·桑的《弃儿弗朗索瓦》（*The Country Waif*）以及普罗斯佩·梅里美的《卡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48]埋头于文学和音乐让伊丽莎白重新找到了母亲在她少女时代灌输给她的“对美好事物的热爱”[49]，以及她在父母的照应下品尝过的幸福。

但就算远离了布德朗森林，她那些阳春白雪的爱好还是遭到了费利西泰的坚决反对，后者重申伊丽莎白对艺术毫无节制的爱好不符合格雷弗耶子爵夫人的身份。婆婆指控说，贝贝斯沉迷于书籍不但不得体，简直就是装腔作势。费利西泰学识太浅还咄咄逼人，本人又过分关注形式，根本不能想象世上会有人以读书为消遣：那一定是在装。“所以我

在假装读书？”伊丽莎白沮丧地写道，“‘友好的’地狱犬又一次指控我故作姿态。”

地狱犬的儿子同样不友好。有一次亨利碰到伊丽莎白正在跟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热烈地讨论音乐——她越来越喜欢阿伦贝格和他的妻子让娜，觉得他们是她婆家人里面最有教养的——就冷言冷语地说：“我好像娶了米洛的维纳斯呢！”[50]这是一语双关的讽刺，抨击伊丽莎白的美貌和她对音乐的热爱。亨利很喜欢自己的这个文字游戏，后来常常会这么说，全然不顾妻子泪眼婆娑地抗议“嘲讽会将爱情腐蚀殆尽”。[51]

鉴于他们明确表示要维护家庭和谐，亨利和费利西泰不得不忍受伊丽莎白的一个消遣：给远在比利时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表亲们写信。和蜜月时一样，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和妹妹们写信，虽然她总是强颜欢笑，但来自巴黎的长信还是让他们担心。“在她这个年纪，”吉吉苦恼地说，“没有消遣，不能离家，听到的都是令人不安的事，这太难过了。”[52]玛丽-艾丽斯·德·卡拉曼-希迈就好哄多了，至少在伊丽莎白婚后一两年是这样。她那时还是个孩子，仍然对美丽的成年堂姐充满敬畏，无法从她的信中读出弦外之音，尤其是随信件一起寄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来自巴黎的礼物：一枚猫眼石戒指啦，一瓶紫罗兰香水啦。这些礼物让玛丽-艾丽斯更崇拜堂姐了，也就更不会关注伊丽莎白语气中的压抑。小姑娘根本不会想到偶像（玛丽-艾丽斯真的把伊丽莎白比作圣餐礼[53]）的生活竟然如此不幸。

在卧室和更衣室这些绝对私密的地方，伊丽莎白写下了大量文字，更加直率地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她知道如果亨利、费利西泰或路易丝看到她全神贯注地写字，又要抨击她“故作姿态”了。）她继续每天写日记，也会在阿孙塔和一群侍女每天为她穿衣、戴帽和脱衣时在笔记本或随手取来的纸片上涂写。当时上流社会的巴黎女性每天在不同的时间（早上、下午、晚间）要为各种活动（散步、骑马、跳舞）和场合（看

戏之夜、赛马之日）换七八套衣服。[54]每次换装都要由手巧的侍女精心摆弄一番，胸衣、裙撑、衬裙、罩裙、长袜、饰带、别针，还有一排排极小的纽扣，小姐夫人们根本不可能自己穿戴。就算是伊丽莎白这样的服装爱好者也会觉得这些过程无聊透顶。仆人们为她的衣着忙活时，她便用潦草的斜体写满一页页纸，宣泄婚姻生活带给她的伤痛和困惑。

“难过和哭泣有什么用呢？”她在一张便笺上自问自答：

> 会改变人心吗？你难道不知道受苦是你的命？听听多少个世纪以来的声音吧——你听到了吗，那些被辜负的爱人的叹息，那些幻灭的心灵发出的呻吟和哀叹，在他们的苦难解脱很久之后仍不绝于耳？那就是生活——真心注定会受伤。[55]

伊丽莎白重拾起她在蜜月期间开始的创意写作作品，关于18岁的德·蒙泰朗公爵夫人玛丽-爱丽丝极不愉快的新婚之夜的那本据称虚构的日记。她也写杂文，包括一个关于各类女性的“社会生理学研究”系列。社会生理学这种民间伪科学是由小说家莱昂斯·德·拉芒迪（Léonce de Larmandie）发明的，把贵族城区当作异族部落那样研究他们的风俗习惯。伊丽莎白采纳这一方法主要是为了写赞美自己的人物素描（《要做女王的女人》《引领时尚的女人》）以及不点名地损害她婆家那些女人的形象的文章（《丑女人》《凶残的女人们》）。

伊莎丽白少女时代担任父亲的秘书时，曾经学过杜普雷速记，她的有些作品就是用杜普雷速记的秘密代码写的。婚后，她不想让亨利知道自己的某些想法或心情时，常常会诉诸她半生不熟的速记法里那些晦涩难懂的圆圈和直线，亨利虽然不愿意在身边陪她，却不知为什么总是近乎偏执地关注他离家期间妻子做了些什么。他偶尔从后宫回家的那些夜晚，并非不会翻看贝贝斯的纸张，一旦对看到的东西有异议，就会冲她大喊大叫。因此，吉吉和米奈也学会了用速记符号给她写信，用代号来代替她们闲聊起的人名。他们给亨利的化名是“la Jal”，这是“the Jealous

Woman”（“忌妒的女人”）的缩写：缩写和性别变化都是为防备他窥探。

不过伊丽莎白的大部分信件、日记和文学作品都是用直白的法语写成的，因此如果亨利愿意，他很容易就能辨认出这典型的悲伤段落：

> 我爱的人目光游离地瞥了我一眼，就找他的情人们去了。我孤身一人留在这里，拒绝他们给我的一切，呼唤那个离我而去的人……我跪下来细看消失的一切，我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这颗看不见的心上。

这段哀叹把伊丽莎白的婚姻危机表达为一种可见度危机，把她的痛苦归咎于亨利在事实和隐喻两个层面拒绝看她。让伊丽莎白卑微地跪下细看的“消失的一切”，既有丈夫离开她“找他的情人们去了”，也有她自己存在意义上的崩溃感，因为她挣扎着想要留住却未能留住他游离的目光。

然而按照她婆婆的说法，隐形正是一个教养良好的妻子应该期待的生活状态。在费利西泰以及被她耳濡目染而观念一致的孩子们看来，德·阿斯托格街上那些必须参加的聚会已经给了这个家族的女性足够的社交机会。除了这些适度的聚会外，格雷弗耶家的夫人小姐们必须过一种难以察觉的隐居生活，因而除了“梵蒂冈”这一比喻，邻居们最喜欢拿他们的宅子打趣的话就是“德·阿斯托格街的每个人都在沉睡”。

费利西泰和她的女儿们即便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保持着极低的姿态——据说让娜·德·阿伦贝格太自谦了，“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56]一般说来，她们在巴黎外出仅限于参加婚礼、葬礼和她们极其乏味的亲戚们举办的极其私密的封闭沙龙。（这些沙龙与洛尔·德·舍维涅的沙龙一样排外，却全然没有舍维涅沙龙的欢乐和刺激。）格雷弗耶家的女人们还会参加慈善协会的会议，以及各种为她们支持的其他事业筹款的盛典

和慈善晚宴。奥尔塞·路易丝·德·拉艾格勒偶尔还会外出前往花蹊和隆尚的夫人看台。伊丽莎白得到亨利的许可后，有时也会在这类外出时跟着一起去；她一点儿也不喜欢陪小姑子，但能走出家门透口气还是让她心存感激。

每年有几次，整个格雷弗耶家族会出席城区那些更大、更“混乱”的聚会，但只有在他们认为有利可图时才会这么做。例如，虽然格雷弗耶一家看不起德·萨冈亲王夫人，觉得她是个粗俗的中产阶级暴发户，但他们认为她值得结交，因为威尔士亲王和巴黎伯爵那位英俊的金发碧眼的弟弟德·沙特尔公爵罗贝尔，都是她的好朋友（据说还是她的前情人）。亨利及其家人急于巴结这些王室子弟，认为有必要参加一年一度的萨冈舞会，哪怕这些舞会总是被报纸过多曝光。

除了这些精心策划的外出，亨利的母亲还支持他的观点，那就是尤其对贵族女性来说，“隐秘的生活”才是最值得过的。费利西泰总是不厌其烦地说，那些在全城抛头露面的名媛们可能会“让人说三道四”：在她嘴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社会罪行了。

她觉得一个血统高贵的女人同样不贤惠的行为，就是对丈夫的出轨表现出哪怕一点点恼火的迹象。比方说，人人都知道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常常不参加费利西泰的封闭沙龙，而是拜访那位名人寡妇热纳维耶芙·比才去了。与费利西泰的招待会相反，比才夫人的周日招待会是出了名的有趣。但里凯特·德·阿伦贝格后来回忆说，虽然家里有些人“责备（奥古斯特）与犹太人交好”，但让娜·德·阿伦贝格从不抱怨丈夫出轨。[57]相反，她引用费利西泰（和亨利）最喜欢说的另一句话，“忍受着婚姻的镣铐”。[58]让娜的婚姻把她变成了一个庄静的殿下，她有义务让自己的行为配得上这一头衔。

按照费利西泰的看法，对德·阿斯托格街上的夫人们来说，穿着朴素乃至邋遢过时也是一项义务，理由是只有像德·萨冈亲王夫人这样的

女投机分子，才会因衣着而“被人说三道四”。费利西泰宣称，真正的贵妇人不需要这类卑鄙的伎俩；只要有良好的眼光，定会看出衣着拘谨本身就透着出身的高贵。

在婆婆所有关于优雅礼仪的说教中，这是最让伊丽莎白厌烦的。在她的婚礼之日以及后来在布德朗森林扮成“伊丽莎白女士”出场之时，她已经找到了在一群艳羡的观众面前“因感受到自己的美而获得的快乐”。[59]她曾希望能在巴黎重新燃起那一腔热情，如今她就住在这座城市，刻薄的老费利西泰却晃着那口发黄的假牙和难看的假发，要求她放弃这种快乐。伊丽莎白写信向吉吉倾诉自己的沮丧，说她觉得“必须要把（我）自己变丑才能在这个家里取得谅解”。[60]在那叠越堆越高的社会生理学研究中，她又写了一篇刻薄的文章，题为《友好的地狱犬，或主动请缨的免费陪媪》：

> 什么事情她都要说长道短；地狱犬还真难安抚。为了让她闭嘴，必须遵守她所有的准则：戴最不合适的帽子，穿最平庸的裙子——新奇的剪裁式样被绝对禁止。一点儿个性也不能有。绝对不能突出自己。[61]

刚结婚时，伊丽莎白尽力安抚地狱犬。她与亨利的关系自蜜月之后就开始紧张了，她知道如果再与他的母亲争吵，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不过也正是为了遵守费利西泰与家人社交的规则，伊丽莎白突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自由通道。给远在比利时的家人写了那么多信件之后，她还是渴望有人陪伴。然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和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一样，米米也患上了结核病，身体每况愈下）而且父亲财力不支，他们没法时常来巴黎看她。事实上，约瑟夫亲王甚至在考虑卖掉马拉凯码头的家族宅邸。在寻找买主的过程中，他为了躲避债主，已经把楼上的房间租给了各色租客，包括精神病学家让-马丁·沙尔科医生和一位犹太银行家的女继承人弗洛尔·拉蒂斯博纳·桑热（Flore Ratisbonne Singer）。[62] [63]

她所爱的家人无法从比利时来到身边，伊丽莎白就转而寻找她最喜欢的本地亲戚来陪她。那就是在孩童时期与她玩过家家和洋娃娃，她按照布列塔尼人的方式称其为舅舅的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如今仍被她称为罗贝尔舅舅的孟德斯鸠23岁，住在他鳏居的父亲位于河对岸的圣日耳曼区私人宅邸中。他居然很愿意恢复两人童年时期的联系。他的友好态度绝非定局，因为他是个敏感而好斗的人，常常挑起血仇闹着玩——费迪南·巴克把他比作“匕首飓风”[64]——还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夏尔·波德莱尔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贵族就是以令人不快为乐的。”[65]不过后来，让伊丽莎白的新家族不快真的成了孟德斯鸠的一大乐事，他认为他们就是没有教养的小市民。他当面称她的丈夫为“大榆木疙瘩”，一举两得地讽刺了亨利的方片国王脑袋和他（在孟德斯鸠看来）极其愚笨的头脑。反感是双方面的；亨利也恨他到了极点。

不过作为伊丽莎白的亲戚，孟德斯鸠绝对有权到家里来拜访她，因此他成了她在德·阿斯托格街上的第一位忠实访客。在此过程中，他也成为她反叛上流社会的导师和同谋，鼓励她不要把贵族身份等同于服从和自我贬低，而要把它等同于良好的艺术品位和华丽的自我展示。孟德斯鸠的教导与费利西泰关于贵族尊严的准则截然相反，却在心有灵犀的姑娘那里得到了共鸣。在她努力适应巴黎生活的那段时日，他给这位孤独的外甥女教授了一门被看见的艺术。

孟德斯鸠虽然贬低自己出身的阶层是“垂死的圣日耳曼区”[66]，但他却和费利西泰·格雷弗耶、波利娜·德·奥松维尔或艾默里·“座次”·德·拉罗什富科（这最后一位碰巧与亨利和孟德斯鸠都是表兄弟）一样，对自己的祖先充满自豪。（虽然他们都有着公爵的姓氏，但艾默里和孟德斯鸠的母亲是来自同一“无生”家庭的两姐妹，但两人都宁愿不提此事，这就是前者那句俏皮话“彼此不常走动的母亲”的来源。[67]）孟德斯鸠酷爱历数他那些显赫的（父系）祖先：墨洛温王朝的国王、阿基坦[68]和费赞萨克的公爵，特别是火枪手达达尼昂——这位17世纪的传奇英雄在1840

年代因历史小说家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的小说而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浪漫传说。孟德斯鸠向世人宣告他是这位传奇人物的后代时，有意不提火枪手原型没有社会地位，只是个新封爵不久的商人之子。相反，他强调达达尼昂的母系（孟德斯鸠）血统纯正，以及他为路易十四服役时的浪漫英勇行为。孟德斯鸠斥巨资修复加斯科涅[69]那座摇摇欲坠的达达尼昂城堡，在那里举办奢华的聚会，只允许少数尊贵的人参加（意大利作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70]就是这些尊贵的客人之一[71]）并用卖弄自己伟大祖先的故事款待宾客。

孟德斯鸠还喜欢提及装饰家谱其他分支的图形字谜一般的家徽和昔日贵族姓氏："我梦见了我的一群女性祖先！"[72]他尖叫着。"皮克塔瓦涅、克劳德、奥里安、阿尔派！布朗什弗洛尔、盖勒加、米罗蒙、奥德！……长长的一列头戴神圣桂冠的美人！"[73]他认为这一谱系也赋予他神性。有一次在被问及为什么一位熟人打招呼而他没有回应时，孟德斯鸠尖声说："人们在十字架前面经过时会对它鞠躬！但十字架可从来不回应！"[74]

有时他的确会对某个地位较低的人致意，但他有一套古怪的礼仪。孟德斯鸠不是点头、鞠躬或伸出手（这是典型的上流社会致意的三要素），而是头往后仰，离他致意的那个人更远了。这一动作夸大了他脊椎已经十分严重的凹度，使他的形体从侧面看像个很长的右括号，而背部凹陷姿势的加重会让他的胸部更向前挺，脸更朝上扬。然后他才会一边眼睛朝天，一边对下面的小卒轻轻点一点下巴。甚至在平时，他也把那只骄傲的高鼻子向上倾斜着，一脸嘲讽。作家儒勒·雷纳尔称他是"一只以良好的自我感觉为食的猛禽"。[75]

不过与表兄艾默里不同的是，孟德斯鸠自视清高的并不仅仅是他的贵族出身。他骄傲的资本还包括他自称艺术家和艺术恩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美学教堂里的大祭司"。为了证明这一信念，他委托当代艺

术家和工匠创作了大量作品，从安东尼奥·德·拉冈拉[76]到埃米尔·加莱[77]，还写了一卷又一卷的诗歌，并声称那是他一生的至爱。他高声说：“我为费赞萨克家族的公爵冠冕上又加了一顶诗人的桂冠！”[78]



伊丽莎白在奥托·韦格纳面前做出害羞的样子

不过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孟德斯鸠的诗歌只是兴奋地把扭曲的句法、造作的新词和华而不实的专有名词杂乱地堆积在一起，让一位评论家联想到“一本被飓风吹得歪七扭八的字典”。[79]另一位评论家则称之为“浮夸菌的培养皿”。[80]下面这首四行诗就是例子：“我是神父佩特罗尼乌斯和弥赛亚梅塞纳斯，/是一只易变的词语挥发器（原文如此）/头戴宝石的法官啊，那才是华彩中，/我守望的美。”[81]他的诗作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品位……很少有读者能欣赏那种品位。批评者们背地里给他取名“拿起你的竖琴”·德·孟德斯鸠，这句话源于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一

行诗。[82]

然而周围人的不理解对孟德斯鸠几乎没有影响。他坚称为美服务是人类最崇高的工作，由于这些活动需要创造力和胆识，艺术家及其恩主有权为所欲为。“在我看来，”他喊道，“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德行，就应该免受常人礼法的束缚！”

他把这一道德观应用到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许多世纪末作家一样，孟德斯鸠也把自己和周遭看作可以用大胆创新的风格任意挥洒的画布。他的口头语就是“热爱那一生只能得见一次的事物吧”，多亏从自己那位中产阶级母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他有钱把最为稀奇古怪的梦想付诸实践。[83]他为自己的猫举行了奢华的洗礼仪式。他在夏天最热的一天在屋子里燃起旺火，“为了向火证明，我爱它本身，爱它的美，而不像其他人那样，愚蠢地只为取暖”。[84]他把宠物龟送到法贝热去给龟壳镀金并镶嵌宝石，这个做法杀死了那只乌龟，却被用在约里斯-卡尔·于斯曼[85]的《逆流》（*A Rebours*，1884）中，成为小说中唯美主义的反正统主角德埃桑特公爵（Duc Des Esseintes）典型的优雅姿态，那个人物无疑会让人想起孟德斯鸠。[86]



这些漫画刻画了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后仰的姿态、时髦的穿衣风格和瘦削的侧影

于斯曼在描写主人公古怪的室内装修品位时，借用了孟德斯鸠在他的巴黎住宅中的做法：用作门铃的教堂大钟，立在一整张北极熊皮上的俄国雪橇，用宝蓝色丝绸镶边并装饰有飞翔的六翼天使的拱形天花板。孟德斯鸠还有些宝贝物件没有被于斯曼写入小说，包括杀死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那颗子弹、惨遭巴黎公社叛军破坏的欧珍妮皇后[87]半身像、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88]的金丝雀曾经栖息的鸟笼，以及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之后用过的床上便盆。“风格必须亲眼看见才能信其有，”孟德斯鸠在写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里如是说，“就算亲眼看见，人们还是不信……有谁会对《蒙娜丽莎》信以为真？！”[89]他就该主题写过无数信件，每一封都用紫色墨水以他特有的华丽字体写就。

他的外甥女面临的更紧迫问题或许是，有谁会相信孟德斯鸠的着装选择？这位帮伊丽莎白打磨时装品位之人，自己的衣橱就充满惊喜。日式和服与墨西哥宽边帽、神父的无袖长袍与猎鹰者的手套、金线锦缎袍与碎花软绸领巾——没有什么古怪出格的事物为他所不容。莉莉·德·格拉蒙回忆说孟德斯鸠的服装样式简直令人咋舌：

> 他的淡天蓝色西装；他著名的淡绿色装束配一条白色的天鹅绒背心；还有其他更加古怪的装束，色彩狂野但裁剪完美……他根据自己的心情选择着装，而他的心情又像他那丝质夹克的彩虹色衬里一样多变……他曾经穿一件淡紫色夹克，淡紫色长裤和淡紫色衬衫出席（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专场音乐会，还在领口戴了一束粉白色紫罗兰取代领带。“因为，”他解释说，“听韦伯的音乐时只应穿淡紫色！”他戴领带时，领带别针往往是充满异国风情的珠宝艺术品，要么是一只翡翠蝴蝶，要么是一只黑玛瑙骷髅。他光滑细长的食指上戴一只巨大的图章戒指，上面镶嵌的水晶被挖空，装入了一滴眼泪——他从未透露过那是谁的眼泪。[90]

这些装束彰显了孟德斯鸠对绅士衣着“常人礼法”[91]的藐视，传统的持重色调就是灰色、黑色和白色。[92]［仅有的例外是粉色骑马装、正式的红色西装（habits rouges）、打猎制服、化装舞会的装束，还有夏尔·阿斯那顶灰色丝质高顶礼帽的翠绿色里衬。］然而与此相悖的是，孟德斯鸠的大胆因为他高贵的非同凡响而受到了贵族同伴们的景仰，恰如他的好友洛尔·德·舍维涅，他不久就会把这位朋友介绍给伊丽莎白。他的同代人或许会窃笑他的品位，却敬佩他的热情活力。其中一人承认，“即便（孟德斯鸠）从头到脚穿一身卷心菜叶子……他仍是最完美的时髦人物”。事实上，他也的确冒险尝试过至少半植被的装束：一身贴身的黄绿色西装，就连他的朋友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穿上那身衣服看起来像一个豆角。[93]

孟德斯鸠在着装上的跃进也暗示了他明确拒绝异性恋中的阳刚身份。他由极端保守的鳏居父亲抚养长大，又在基督教神父那里接受教育，既害怕又向往同性爱情的“邪恶”。他内化了很多父辈对同性恋的极端厌恶，以至于他对性爱行为也怀着矛盾心理，近乎厌恶（这是他与伊丽莎白的许多共性之一）。为此，好几位传记作者都猜测孟德斯鸠的同性恋大概只停留在理论上，至少在他1880年代中期遇到自己的秘书兼同伴加布里埃尔·德·伊图里（Gabriel de Yturri）之前是这样。[94]不过在那以前很久，他就开始无视自己所在阶级关于性的规矩礼法，培养了一种“娘娘腔”作为他的美学乃至道德立场。正如他在一篇诗作（这首诗说理中肯，很不像他的风格）中所写，“娘娘腔打架，娘娘腔复仇；/娘娘腔征服了……乏味而结实的男人。……/它本身就有不止一个物种，不止一个性别，/因而百折不回”。[95]

他忠于这一信条，采取了一个性别扭转的人格设定；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孟德斯鸠似乎在夸耀自己的与众不同，就像孔雀夸耀自己的尾巴”。事实上，孔雀羽毛的确是孟德斯鸠在装束中爱用的关键物件，

还有高跟、脸彩、色彩绚丽的珠宝，珠宝往往还做成奇异的形状。就服装本身而言，孟德斯鸠喜欢奢华的“阴柔材质”，如天鹅绒、双面横绫缎、金线棉和皮草。他是巴黎第一个把上流社会的白色晚礼服换成英裔美国人的无尾晚礼服的人，并把衣料改良成绿玉色、紫色天鹅绒和绣着黑色绣球花的金色日本丝绸。当他不得不穿普通的白色晚礼服时，他会用从伊丽莎白那里借的毛丝鼠披肩作为装饰。他沉思着自言自语道，“这近乎仙气的皮草”，让他联想到“鸟羽……那般轻盈，仿佛一片雪花或一滴雨滴就能把它吹皱，很难称之为正经的皮草”。[96]

孟德斯鸠正是把外甥女的毛丝鼠挂在双臂上，请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为他画了一幅全身肖像《黑色与金色的交响》（*Arrangement in Black and Gold*，1891-1892）。这是伊丽莎白在通过舅舅认识艺术家之后，委托后者创作的，孟德斯鸠摆了一百多次姿势才完成。（据孟德斯鸠说，这些会面实在累人，他靠一种特殊的鸡尾酒才算没有半途而废：在葡萄酒里掺可卡因。）惠斯勒是“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他发明的口号）的主要倡导者，希望在画作中重现抽象的阴影和音乐中的和谐关系。这一观点让这对热爱音乐的舅舅和外甥女大为赞赏[97]，二人都视他为才华横溢的“好朋友”[98]。

同样令孟德斯鸠着迷的还有惠斯勒的好斗人格，典型代表就是他写作了一部清算敌我的巨著——《树敌的优雅艺术》（*The Gentle Art of Making Enemies*，1890），还有他丰美的装饰性壁画，代表作是他著名的“孔雀室”（1876—1877）。这个房间就是孟德斯鸠喜爱孔雀羽毛的源头；他常常吹嘘是“好朋友惠斯勒”教他欣赏“这些色彩斑斓的羽毛的……它们的上百个孔眼全都是‘知识’”！

为互表尊敬，惠斯勒给孟德斯鸠取了个绰号叫“蝙蝠”[99]，与他自己的化名“蝴蝶”相呼应。表面看来，“蝙蝠”暗指伯爵的黑头发黑眼睛，或许还暗指他通过化妆添加的苍白的、吸血鬼一般的气质。（“好朋友”在

给孟德斯鸠所画的肖像中突出了这种鬼魅般的特质——并非全然出于友善。）然而蝙蝠这种可怕的鸟兽组合也让人联想起诗人与“不止一个物种、不止一个性别”的象征性关系。（如第三章所述，海豹的混杂性也会引发类似联想，让·洛兰在1901年那部写孟德斯鸠的滑稽模仿作品中，就用海豹代替了蝙蝠。）伯爵把蝙蝠这种生物变成了他毫不难为情的“娘娘腔”的图腾。他在一部题为《蝙蝠：明暗对比法》（*Les Chauves-Souris*，1892）的诗集中向它致敬，还将惠斯勒和玛德琳·勒梅尔[100]的画作用作该诗集的插图，用绣有标题动物的灰绿色丝绸装帧，出版了该诗集的奢华限量版。孟德斯鸠的第二自我远近闻名，以至于漫画家塞姆（Sem）的一个漫画系列画的就是他在夏维[101]订购滑稽的蝙蝠主题的长裤。

另一位激起孟德斯鸠的创造性想象的，是当时法国舞台上顶尖的女歌唱家和享誉世界的名人之一莎拉·伯恩哈特。[102][103]他喜欢声称伯恩哈特是他曾与之做爱的唯一女人，在他们纵欲狂欢之后，他连续呕吐了整整一周。虽然如此，这位悲剧女演员还是说她爱孟德斯鸠“甜美和无限的温柔”，或许因为他是全巴黎屈指可数的几位风格之怪诞奇异可与她媲美的男人之一。“超凡入圣的萨拉”（她的歌迷们如此称呼她）总是穿着男装，她的情人有男有女［从夏尔·阿斯到印象派女画家路易丝·阿贝玛（Louise Abbéma）］，他们在热气球中做爱，在棺材里睡觉。她把一只中国鳄蜥戴在胸前，用一根细金链拴在紧身胸衣上；她的家里有一个动物园，养着一只鹦鹉、一头美洲狮、一条猎狼犬、两条柯利牧羊犬、一条巨蚺、一只名叫“达尔文”的猴子、一只名叫“亚力克西斯”（这是送给她这只鹰的那位俄国亲王的名字）的老鹰、一只安第斯野猫和一条喝香槟的鳄鱼。



这里画的是孟德斯鸠在夏维订购印有他的图腾生物蝙蝠的长裤

孟德斯鸠对伯恩哈特的女扮男装尤其感兴趣，她在许多著名的女声男角中炫耀了那些男装。首先就是她在弗朗索瓦·戈贝[104]的歌剧《过客》（*Le Passant*，1869）中扮演流浪的吟游诗人扎内托的突破性表演；后来她又扮演了哈姆雷特、加略人犹大、小丑皮埃罗[105]、洛伦佐·德·美第奇[106]、罗密欧以及拿破仑一世那位不幸的独子“雏鹰”[107]。在西方文学中的分身[108]［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1886）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1）］阴魂不散之时，孟德斯鸠在雌雄同体的萨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神秘映像。1874年，19岁的他曾聘请摄影师纳达尔为身穿配套的扎内托剧服的他和伯恩哈特两人拍了一些照片。在成品照片中，两个朋友的褶边衬衫、天鹅绒披肩、硕大的大脚短裤和活泼的土耳其帽模糊了他们的性别差异。十年后，在米米和伊丽莎白带他去拜访居斯塔夫·莫罗的画室之后，孟德斯鸠聘用了一群奢侈品供应商来把萨拉装扮成画家作品中的一位人物，“一个被无数珠宝压得抬不起头的美人”。[109]这一装扮恰与伯恩哈特在维克托里安·萨尔杜的《狄奥多拉》（*Théodora*，1884）中扮演的标题人物拜占庭皇后狄奥多拉[110]不谋而合。她在那个角色中所穿的夸张戏服的很多灵感都来自莫罗——和孟德斯鸠——的疯狂想象。



《过客》中的萨拉·伯恩哈特：这是一长串男装人物中的第一个，也是她和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在纳达尔的照片中穿着的戏服的灵感来源

孟德斯鸠觉得伊丽莎白也是同道中人，同样喜欢冒险尝试衣着方面的荒唐想法，且（不同于伯恩哈特）基本上不受各种相互冲突的时间制约。[111]从一开始，他对艺术的热爱就与外甥女产生了共鸣，伊丽莎白总是被婆家人攻击“装模作样”，因而觉得他的艺术追求简直就是一剂解毒良方。她向他透露自己秘密的文学创作，渴望接受他的编辑建议。他集贵族血统和审美品位于一身，支持她，认为她也在这两方面出类拔萃。和舅舅罗贝尔一样，伊丽莎白也觉得与出身较低的人相比，显赫的血统赋予了她隐含但无可否认的优越感。她在作品中无数次提到自己的“出身自豪感”。

与他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刻意压抑这种自豪感。她曾赞美时尚设计

师普瓦·波烈说：“我知道你能让巴黎的小人物改头换面，但我还不知道你也有能力为贵妇人设计服装！”[112]（波烈听了这话后指示自己的销售团队，以后格雷弗耶夫人来买的所有衣服都要大大提高报价，要让“她也根本买不起”。[113]）她对贵族圈子里的人也同样霸道，提到艺术天赋时尤其不留情面。“我亲爱的T.，”她对一位在音乐、文学和绘画方面都有涉猎的交际家说，“你简直就是每个领域的陪跑者之王！”不过她对自己在同样这几个领域的业余尝试可是十分满意。她命令秘书抄写那篇题为《友好的地狱犬》的文章，写道：“我觉得，我，伊丽莎白·C-C.格雷弗耶，把这个人物刻画得精妙之极。抄九份。”[114]

和孟德斯鸠一样，伊丽莎白也会自命不凡地谈起自己对艺术和美的热爱。“我一生中唯一真正的至爱就是和谐”，她在一次家族晚宴上宣称，或许是为了补偿她与亨利之间缺乏真正的至爱（以及和谐）的事实。她还在另一个场合宣称：“为了生活，我必须超越存在……我需要去那高墙之外……进入无限王国，哪怕只是在想象中。”她喜欢对众人宣称，柏拉图曾说过，“美是善的荣光所在”。

无论是否有意为之，这些话使得亨利、费利西泰和路易丝更频繁地指责她装腔作势了。（温柔的让娜私下里是一位水彩画爱好者，谨慎地支持贝贝斯。）在榜样舅舅的鼓励下，伊丽莎白发誓要从容应对他们的嘲笑：“我喜欢被迫害，被迫害让我在鄙视中变得高贵，也让我得以衡量我自己和那些激怒我之人的距离。”她在《凶残的女人们》一文中推论到，之所以会有那一距离，是因为对手们的平庸：“光明、美好和才华让她们愤怒，让她们窒息……她们无法忍受其他人拥有她们（没有）的天赋。”

但与既不爱她也不懂她的人生活在一起，还是给她带来了伤害。每当丈夫或婆家人令她沮丧时，伊丽莎白都会向孟德斯鸠倾诉自己的苦闷：

> 我陷入了一种超乎想象的抑郁状态……我沉默地忍受着，却在心中愤怒地反抗某些死板僵化的人……然而我能做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不能做。啊！我们属于那种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无数雄心抱负中的伟大鸟类，总是振翅飞向蓝天！有时我真羡慕那些不因渴望成就而备受煎熬的人，他们心如止水。

她的舅舅深有同感。在孟德斯鸠傲慢自大的外表之下，他也和伊丽莎白一样被巨大的孤独感折磨着。他的孤立并非源于某个蠢笨的家族，而是源于整个蠢笨的社会，它辱骂像他这样“娘娘腔”的人，他则假装先发制人去嘲笑他们。伊丽莎白把自己的不快乐倾诉给他，也附和了他自认为被拒绝和误解的天才之感，使他获得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亲密且长久的友谊。终其一生，孟德斯鸠都会开玩笑说外甥女是社交圈中唯一一个他“从不与之争吵”的人。[115]

他喜欢被她归为隐喻的“伟大鸟类，总是振翅飞向蓝天”，尽量鼓励她振作起来。“只有仓鸮才惧怕光明，而高贵灵魂的激情属于雄鹰，”他忠告她，“所以让你的灵魂像雄鹰一样飞翔吧，摆脱那些令人苦恼的忧思……让我来做那能让你汲取到渴望之光明的帐幔、让你宽心的明灯和指路灯塔。”[116]

虽然这里的隐喻十分混乱，但伊丽莎白很感激舅舅主动做她的灯塔。她更加感激他所用的雄鹰的比喻，因为那“伟大鸟类，总是振翅飞向蓝天”曾是她推定的祖先拿破仑一世的家徽，那是她为之欣慰的“出身自豪感”的众多来源之一。孟德斯鸠写给她的信中充满了这类恭维话，她总是让秘书把它们抄下来存档。如果说她对其他家人的信件并没有这么重视，那或许是因为只有舅舅的长信把她刻画成了自己希望的模样：一个因为王室血统和文化教养而变得高贵的美人。为了感谢孟德斯鸠的这一功劳，她对他说：“只有你和太阳了解我。”[117]他在数年乃至数十年后常常引用这句话来显示他对她的爱，往往还要骄傲地加上一

句：“我很高兴在我和太阳中，她把我放在了前面。”

孟德斯鸠鼓励伊丽莎白培养自己奢华的服装品位。他把城里最顶尖的女装裁缝带到德·阿斯托格街来见她，帮助她用“大榆木疙瘩”的钱装满了华美的衣柜。和历史上所有不忠的丈夫一样，亨利也愿意为妻子的疯狂购物买单，默认那是为了换取对他出轨的许可。虽然他拒绝给她哪怕一点点零花钱，但他每年给她的服装津贴高达30万法郎。[118]要想为历史货币确定在当代的价值，我们只能得到可疑的结果：不过只要想想在1880年，在巴黎顶级的裁缝那里定制一身三件套男士西装的价格大概是160法郎[119]，或者在同一年，侍奉伊丽莎白的侍女的月薪为140法郎左右[120]，对这一数额之巨就会有更清楚的概念了。

既然在服装支出上基本没有限制，伊丽莎白便任由自己的想象力驰骋。在进行她舅舅所谓的“诗意购物”时，她总是以避开最新的时尚为宗旨。相反，她选择的东西，用她自己的话说，要能够表达她最为重要的“‘与众不同’、创造新事物的渴望（和）决心”。[121]在与设计师会面时，伊丽莎白会翻阅他们当季的全部产品；然后霸气地挥挥手，命令他们“给我做些跟那些不一样的东西”！[122]就连为世界各地的后妃和女王们追捧的巴黎高级定制服装和斯文加利[123]风格的创始人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思，也会听到同样的要求。伊丽莎白已经把孟德斯鸠的格言牢记心间了——她只想要“那些一生只能得见一次的事物”。[124]

她在另一篇题为《开创新风尚的女人》的社会生理学研究中提出了这一理念。这篇文章简述了伊丽莎白希望扮演的品位缔造者和时尚创立者的角色，以下是全文：

> 她对时尚的热爱并非在于追随，而在于确立它的走向；是她在颁布新形式，并扭转新奇的织物，赋予它新的功能。她随心所欲地委托创作新风格并将其公之于世，在任性的异想天开中呈现自己的美。她是一株名花，令人惊喜，令人讶异——无

数充满爱和恨的目光和心意朝她涌来，这个独一无二的女人，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没有人敢模仿她，只有在她厌倦了某一个变革性的样貌之后，她留在他人头脑中的那个形象才会被他们的模仿抵消；随后“其他每个人”都竞相模仿她，机械地拿起她满不在乎地抛弃的东西——她此前曾经爱过的东西。[125]

孟德斯鸠在一篇赞美伊丽莎白的荣耀的文章中，也用同样的语词描述了她对时尚的敏感性，强调：

独创性，有时就是她宏大的奇思妙想和超凡品位。我曾见她穿过一件覆满珍珠的礼服，那华美的气度连卡利古拉[126]的妻子，连她那位伟大的同名女庇护人……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也望尘莫及……我曾见她穿过一件破晓颜色的天鹅绒裙子，披一件装饰了十万根天鹅羽毛的斗篷，她看起来像一个落入凡间的仙人掌精灵。我见过她戴一个全用冠蓝鸦羽毛做成的毛茸茸的青绿色暖手筒，（搭配）一件波纹绸女装，蓝紫色中透着翡翠绿色，让她看上去像罗蕾莱[127]一般不容置疑。[128]

除了上述装束之外，伊丽莎白早期在“诗意购物”方面的大手笔还包括：一件将白色和金色棕榈叶织入锦缎的淡紫色公主裙，搭配一顶薄纱无边帽和一条黑色的狐狸毛披肩，那条披肩极长，一直拖在她身后的地上；一件轻薄的白色塔夫绸礼服，用很多珍珠圈固定在肩上，配一顶微型的珍珠王冠；一条色彩斑斓的“黄褐色”丝绸高腰款长袍，褶饰卷边上点缀着丝质的银莲花；一条白色的缎面连衣裙，系一条淡蓝色缎子腰带，戴一个满是细平布玫瑰花的胸饰，每朵玫瑰花的花瓣上都坠着一颗真正的珍珠；还有一条钟形的粉色和蓝色织锦礼服，上面绣着明黄色的金合欢花。（和她舅舅的朋友洛尔·德·舍维涅一样，她也很享受金合欢路上向她投来的目光；媒体为伊丽莎白取的花朵绰号是“水仙”，至于原因，不久就满城皆知了。）[129]

伊丽莎白对待配饰和对待服装一样，纵容自己每一个“任性的异想天开”的点子。她早期最喜欢的配饰包括一件装饰着真正的蝴蝶的羽毛头饰；一顶覆盖着几百朵丝质紫罗兰的马尼拉阔边帽；一只填充的天堂鸟，它摇摆的尾羽正好与她面颊的弧度吻合；一对黑色的塔夫绸蝠翼（就是她在“夜后”装束中为了向舅舅致敬而戴的那一对）；以及一件繁复精美的鸟笼头饰。这最后一件女帽饰没有照片留下，也没有人详细描述过。但联想到她关于女人被监禁在“鸟笼中”的思考，它表明伊丽莎白的服饰和她的创作型写作一样，都是她深层次自我表达的方式：这件头饰就是她对自己被监禁在德·阿斯托格街所做的注解。

相反，孟德斯鸠写到的那件天鹅绒毛斗篷，伊丽莎白为它搭配了一双覆盖着更多天鹅羽毛的白色缎面无跟拖鞋，或许表明她对那种优雅超凡的飞禽的认同。她的舅舅极力支持乃至启迪了这种类比。他把她收入了自己和惠斯勒的有翼团体——显然忘记了他关于雄鹰与仓鸮的比喻——将“天鹅”之名施洗于她。为赞美她的脖颈和双肩的优雅线条，他发明了一个夸张的名词，“天鹅制服”（cygniform），并对她说，如果她将来要发表那些文学创作的任何一篇，不妨使用“天鹅”作为笔名。［孟德斯鸠本人后来正是用这个笔名摘录了一些伊丽莎白的文章选段，收入自己的散文集《思考的芦苇》（*Les Roseaux pensants*，1897年）中。[130]］舅舅和外甥女也都知道，天鹅在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中有着重大的标志性意义。和欧洲最著名的瓦格纳崇拜者、浮夸地自称“天鹅王”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31]一样，伊丽莎白和孟德斯鸠也热爱歌剧《罗恩格林》[132]（1850），在那部歌剧中，天鹅扮演了爱的神秘承载者的角色。[133]

孟德斯鸠还把伊丽莎白描述为“莉达之鸟的纯贞样本”，这个典故取自古典神话，朱庇特化身天鹅，爱上了一位名叫莉达的美人。对孟德斯鸠而言，把外甥女等同于男性的神而非凡间的女人，表现出一种有趣的性别扭转，把天鹅（和伊丽莎白）变成了一种性别模糊的象征——和蝙

蝠（及他本人）一样。孟德斯鸠在下面的诗句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 童贞的青年，仙界的天鹅，
>
> 美丽的仙女……
>
> 易变的王子，苍白的、引颈向上的鸟儿，
>
> 超凡入圣的双性人！[134]

由于她自己对性的矛盾心态，伊丽莎白或许很喜欢她的天鹅人格。它显然也很适合她的迪安娜这个人设。

和那位纯贞的狩猎女神一样，在同代人颂赞她的优美文字中，天鹅也随处可见。安德烈·热尔曼写她“如天鹅一般滑翔”[135]，而加布里埃尔-路易·普兰盖则称赞她的脖颈和头颅的优雅姿态像极了天鹅。[136]与孟德斯鸠有过短暂友谊的画家雅克·布朗什写道，无论伊丽莎白出现“在歌剧院还是乡间，真的，她永远都是她舅舅的《莉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137]这样的类比支撑起伊丽莎白的自我形象：她是一只稀世珍禽，停留在粗糙的下等生物之间，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像她的婆家人那样的生物，她在自己的一篇社会生理学文章中写道，他们的灵魂“如果变成人形，双手都会长满老茧”。

因为舅舅鼓励她夸示自己的美，她养成了请人创作肖像和照相的习惯，后来就拥有了极大一批肖像画和照片。孟德斯鸠也有同样的行动，力图打破怪人德·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138]创下的“不少于189次”摆拍照相的记录。[139]他得意扬扬地无视亨利和费利西泰的愤怒，带着一个又一个艺术家来德·阿斯托格街介绍给伊丽莎白，并鼓励她委托每个人为她画一幅肖像。

伊丽莎白的父母也资助了许多艺术家，她也很高兴和舅舅提携的艺

术家们见面。让他们照着她的样子绘画、素描、拍照和雕塑就更令她开心了，但她对他们的作品并非全都满意。她在多个场合抱怨说：“有些日子我们状态不佳，但那偏偏都是要坐下来请人画肖像的日子。”[140]她委托亚历山大·法尔吉埃雕塑的半身像让她非常失望，命人砍去了头部，只留下肩膀部分。[141]孟德斯鸠留下了下巴部分。

不过，伊丽莎白很少会对那些表现她像天鹅的作品感到不满。保罗·塞萨尔·埃勒是她舅舅罗贝尔1886年通过惠斯勒认识的一位年轻画家，他曾让她坐在一张“天鹅式样”的小桌子旁，利用这样的并置来突出被画之人和支撑物之间相得益彰的曼妙姿态。埃勒的另一件作品是一幅高大的全身肖像，如今仍然由她的后代保存着，那幅肖像也有类似的效果，上面的伊丽莎白身穿合身的珠光白缎曳地长裙，一只手停在一把巨大的天鹅绒毛扇的皱褶中。[142]这幅肖像很符合被画者本人的心意。孟德斯鸠也欢呼雀跃，表扬埃勒为“漂亮的模特……加上了白天鹅的标志”。[143]

伊丽莎白在一张由保罗·纳达尔1887年拍摄的照片中为自己加上了同样的标志，后者继承了父亲纳达尔［本名加斯帕尔-费利克斯·图尔纳雄（Gaspard-Félix Tournachon）］的事业，成为法国声望最高的肖像摄影师。她仍然穿着一件白色长袍，这是沃思的蓬松无肩带裙子，手里挥着另一把巨大的天鹅绒扇子；当她把扇子举到脑后时，它的羽毛仿佛是从她的肩部生出的翅膀。几年后，她又在纳达尔的一位竞争者奥托·韦格纳的镜头前摆了另一副鸟的姿势，她魅惑地望着镜头，双手高高地举着一件毛茸茸的白色斗篷，仿佛即将展翅高飞。[144]

另一次与韦格纳的会面产生了一幅两个伊丽莎白的复合像，鬼魅气氛令人难忘，一个身穿白色薄绸和蕾丝，另一个身穿黑色塔夫绸，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877）中关于白天鹅奥杰塔/黑天鹅奥吉丽娅的重复段。

她最喜欢的照片中还有一幅是纳达尔在1883年拍摄的，伊丽莎白穿着她的曾祖母塔利安夫人（1773—1835）的衣服，那件婀娜多姿的拷花丝绒紧身连衣裙和白色的新古典主义头巾是她有一次在希迈城堡中拜访家人时翻出来的。在革命后的督政府时代，泰雷扎·卡巴吕·德·丰特奈·塔利安（后来的希迈亲王夫人）主持过全城最有名的沙龙之一。塔利安夫人复兴了遭到共和派恐怖统治严重破坏的艺术场景，作为高雅文化的资助人发挥了极大的影响。纳达尔的照片清楚地表明，伊丽莎白急于在这一点上向她看齐。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虽然塔利安夫人热爱艺术，但她也是督政府时期巴黎的时尚引领者，凭借一己之力恢复了前革命时代服装的精美繁复之风。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塔利安夫人每个手指上戴一枚蓝宝石戒指，每个脚趾上套一枚宝石趾环，两踝均戴着金罗口，两条胳膊上各戴九只手镯，头上还戴着一顶红宝石王冠头饰，漫步穿过杜伊勒里宫[145]——往昔都是序曲——还有一位身穿制服的非洲侍者为她拖着长裙。这就是伊丽莎白所谓的“T. T.装束”的起源，她把自己象征性地变成了曾祖母的风尚遗产的继承人。



伊丽莎白的这些照片呈现出她的“天鹅”人格的不同样貌，左图这张由纳达尔拍摄，右图由奥托·韦格纳拍摄



伊丽莎白喜欢这张由奥托·韦格纳拍摄的她自己的双重肖像，让人想起《天鹅湖》中的奥杰塔/奥吉丽娅



在这张纳达尔于**1883**年拍摄的照片中，伊丽莎白身上的裙子属于她最喜欢的祖先塔利安夫人，一位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和时尚潮人

事实上，伊丽莎白请女帽商为她制作样式可以追溯到督政府时期的帽子，还请人把头发照着塔利安的样子绾成一个督政府时期风格的松松的发髻，饰以金色发带，以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她是那位女祖先的转世。常常有人赞美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每当这时，伊丽莎白会说：“我们家人称之为塔利安的眸子。”[146]

她常常提起自己的“T. T.”血统[147]，就连弗拉基米尔大公也对此印象深刻，还送了她一本塔利安夫人的传记作为礼物。[148]这看似毫无新意的一举绝非无关紧要，因为与大多数王室成员一样，沙皇的这位弟弟对非王室的家世很少或根本没有兴趣。［正如另一位王室子弟曾经讥讽

的那样，“从我所在的高度看，一切（爵位）都很低微”。］他一直记得这位年轻朋友的曾祖母的身份，并在很久之后送了她一本关于该主题的书，这足以证明伊丽莎白有着独一无二的血统家世，也证明了她成功地给身边的人留下了这一印象。无论他们的祖先作为廷臣或士兵有过多大的贡献，很少有持剑贵族能炫耀自己的祖先像塔利安夫人那样光彩夺目或声名远扬。和孟德斯鸠的火枪手达达尼昂及洛尔·德·舍维涅的“彼特拉克的洛尔”（及德·萨德侯爵）一样，伊丽莎白也通过强调与一个欧洲文化偶像的亲缘关系，来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正如她在萨冈舞会上的各种着装所体现的，伊丽莎白和塔利安夫人一样偏爱戏剧化服饰，灵感多来自绘画（列奥纳多）、文学（圣西蒙）和音乐（莫扎特）。这些不只是她晚会服饰的灵感来源。对日常穿戴，伊丽莎白也会依赖艺术品中的图案、色彩和质地。亨利的珍宝收藏始终是时装创意的来源，像弗朗索瓦·布歇[149]所绘的那套珍贵挂毯、镶嵌一颗柠檬大小的黄水晶的古董银质镀金遮阳伞柄，或是荷兰黄金时代画家梅尔希奥·德·洪德库特尔[150]所绘的细节精密的彩虹色画作《鸟类音乐会》（*The Concert of the Birds*，1670）。[151]

因渴望证明艺术与时尚密切相关，伊丽莎白聘请了年逾八旬的水彩画家欧仁·拉米教她素描和水彩，就是受亨利委托画了两人在1883年萨冈舞会的场面的那位画家。[152]（多亏让娜·德·阿伦贝格为这一大胆举动开了先河，请玛德琳·勒梅尔为她教授私人艺术课程；勒梅尔的花卉静物画吸引了一批狂热的上流社会拥趸。）伊丽莎白跟随拉米学习绘画，提升了自己绘制服装设计草图的能力。

伊丽莎白还学了摄影，有一段时间，她在纳达尔位于嘉布遣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的工作室里给他当学徒，那里位于玛德琳画室以东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153]没有信息记录她在那里具体做些什么，但很难想象她会乐意帮忙做些枯燥的琐事。倒是有更详细的文件记

录她在家里跟随世交好友和热心的摄影爱好者德·圣-普里斯特伯爵（Comte de Saint-Priest）学习摄影的过程。他教给伊丽莎白如何在德·阿斯托格街的冬季花园里进行专业摄影。她在这里的模特包括罗贝尔舅舅、亨利和吉吉。

伊丽莎白聘请一位名叫德洛热的画家为她衣橱里的每一件单品画一幅水彩画：晨衣、日装裙、茶会服、舞会服、猎装、游泳装以及她为赴舞会穿戴的王室风范的华服美饰。[154]由于只有她、德洛热和孟德斯鸠了解该过程，所以必是他们中间的一人将此事透露给了《吉尔·布拉斯报》的某个人。该报纸报道说最终的画册必将成为后世的珍贵艺术品，这是一本附有说明的分类目录，其中的服饰“因为穿戴它们的女人的花容月貌而更加精美”。[155]同样的报道还出现在德·沃男爵（Baron de Vaux）188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巴黎最优雅女人的专著中；事实上，德·沃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伊丽莎白的时装“都是从艺术角度精心选择的”。[156]这些文字表明，她成功地把自己和服装作为值得纪念和展览的艺术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孟德斯鸠也附和了这一观念，盛赞她是个“名垂青史的美人”，可与卢瓦河谷的城堡或光之城的博物馆媲美：

> 20年后，来巴黎的游人将在导游手册上看到她的名字；他们会要求见到她——或许那是他们来此地的唯一目的——看到她之后……他们就死而无憾了。[157]

孟德斯鸠建议真正的唯美主义者把他们的座右铭从“一见威尼斯，虽死而无悔”改成“一见伊丽莎白，虽死而无憾”。他继而指出，为了那些终身没有机会目睹其芳华的可怜人考虑，她“作为美人，有（神圣的）义务让自己的魅力……在无数忠实的肖像画中得到永生，她的魅力不但令当代人沉醉，也将在博物馆中让子孙后代见之忘俗”。

炫耀自己的美丽的确引发了某些实际存在的难题，其中大多是亨利造成的。为防她“被人说三道四”，他禁止伊丽莎白的任何肖像出现在公共场所。[158]她在日记中愤怒地抱怨自己无法“展出埃勒的‘天鹅’”，孟德斯鸠曾对龚古尔说，“大榆木疙瘩”毁掉了埃勒给伊丽莎白画的很多素描，以防任何人看到它们。[159]居斯塔夫·莫罗所画的伊丽莎白的肖像画大概也同样遭到了不测。那幅油画的创作始于1887年，花了好几年才完成，但伊丽莎白1906年在乔治-珀蒂画廊（Galerie Georges-petit）组织的莫罗画展中却不知为何没有展出这幅画。她把自己收藏的莫罗的全部画作都借去展览了，却独独没有他为她画的那一幅，后来那幅画也没有出现过。



伊丽莎白经常为自己设计的裙子和帽子绘制草图

为了限制她继续公开曝光，亨利对伊丽莎白实施了严格的晚上11时半宵禁，据说如果她回来晚了，他还会动手打她。[160]支持这一谣言的证据见于她的档案中一个名为“亨利写来的讨厌信件”的卷宗：那些信件的主题包括他因为当着晚餐客人的面用手杖打她或当面啐她而道歉。[161]其中也充满了家暴丈夫的陈词滥调：什么如果不是她激怒了他，他不会痛打她；什么他打她“完全不是有意的”；什么他永远不会再犯，等等。[162]不过从伊丽莎白写给他的信来看，他还是再犯了——一而再，再而三。1909年，她将近50岁而他已年过花甲，她仍然在恳求亨利不要再让她陷入“那些暴力场面”，她认为那些暴力最终一定会杀死她。她解释说：

> 我不怕速死但我害怕被毁……那种恐惧已经发展成病态，（以至于单是听到）门突然打开（就能引发巨大的恐惧）……我讨厌因恐惧而发抖，讨厌在梦魇中度过（余生）……你会发现你的受害者得了脑动脉瘤，那时一切都太晚了。[163]

她的其他一些文字也暗示有家庭暴力存在，只不过写作的手法更加隐晦一些。她从188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的日记中，好几次提到让整个巴黎社会为之愤怒的一桩婚内杀人案。1847年，在圣日耳曼区的家中，德·普拉兰公爵（Duc de Praslin）用匕首多次捅入23岁的妻子的身体，最终用一个钝器打碎她的头盖骨，杀死了她。案件发生前很长时间，上流社会一直怀疑普拉兰殴打妻子。若干年前，他曾试图把他和妻子的九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变成孩子们真正的母亲；只要妻子求他让她见见孩子们，他就暴打她，此事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在因杀妻而等待审判期间，他在监狱里服毒自杀了。

伊丽莎白屡次深思这一事件表明，她同情德·普拉兰公爵夫人，后者写给丈夫的信件曾在她死后发表在一家报纸上，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深爱着丈夫，是他的残酷无情毁了她。伊丽莎白在日记中引用了公爵

夫人在信中无心写下但事后看来充满反讽的片段（如“生命如此短暂，我亲爱的特奥巴尔德”）。伊丽莎白关于这桩谋杀案的笔记也透露出，她曾经就下毒杀人之事详细询问过一位不具名的医生：

> 下毒——有了现代科学，再没有比这更简单、更（杀人于）无形的办法了。把几滴细菌放在某人的手帕上，就能让他患上霍乱、斑疹伤寒，等等，随你所愿。那当是未来的德·普拉兰公爵们可期的结局。——医生，1892年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很难解读。伊丽莎白或许在想象自己和亨利重演普拉兰灾祸，而他，“未来的普拉兰公爵”，将杀死她，然后自杀。当然，她也有可能幻想过在亨利有机会害死她之前，先下手毒死他。

很难确切地说伊丽莎白曾经由丈夫联想到那位通奸、易怒、杀人的公爵，不过公爵的杀妻案是伊丽莎白在私人写作中提到过的唯一一桩此类丑闻。何况普拉兰谋杀案就发生在她自己的街区，更不用说还在她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确，她的希迈家族与普拉兰家族甚至还“有点表亲关系”呢。

不管她是害怕谋杀还是策划谋杀，伊丽莎白确实严格遵守了亨利的宵禁。在上流社会的夜间活动中，她往往是第一个离开或唯一在午夜之前离开的客人。（相反，洛尔·德·舍维涅始终都是可以玩到晚会结束的几位客人之一——接着还要带一群人狂歌痛饮到黎明。）在像上层这样社交毫无节制的地方，如果是资质平庸的女人，早走可能会降低声望。但伊丽莎白想办法把这样的限制变成了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她精心研究了一系列技巧，充分利用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一点有限的时间。

这些战术中最大胆的，是她在活动中现身的时间比其他人都晚得多，如此一来，她的出现就无法不吸引每个人的目光，她在威尔士亲王出席的那次萨冈舞会上就动用了这一技巧。城区的人称此为格雷弗耶夫

人“优美的姗姗来迟”，在弗拉大公夫妇赴巴黎玩乐期间孟德斯鸠为二人组织的一场音乐会上，伊丽莎白的表现更是口口相传。[164]整个巴黎上流社会都知道，按照礼节，如果有王室成员出席活动，其他客人都应在王室成员之前到达会场。但伊丽莎白足足晚了一小时才大摇大摆地走入舅舅的音乐会，还在入口处停留了片刻，让每个人的目光都从舞台转到她身上。然后她快步穿过大厅，优雅地坐进了弗拉基米尔大公身旁的上座。她坐下时对他粲然一笑，脸上没有一丝尴尬或自责。

大公虽然很喜欢伊丽莎白，但仍对她如此公然违反礼仪大感震惊。事后有人听到他把自己的疑问大声说了出来，“她是故意的？还是因为没有钟表？”[165]若干年后，埃克托·柏辽兹的《浮士德的天谴》（*La Damnation de Faust*，1846）在巴黎重演时，她又在葡萄牙的阿梅莉亚王后[166]面前故技重施。

与“优美的姗姗来迟”相媲美的，是伊丽莎白要求自己不但在其他人之前离场，而且往往刚到几分钟就先行告退了。这一伎俩也产生了极好的效果，让同去的狂欢者们看到她转瞬即逝的神秘风采，意犹未尽，回味无穷。其他目的相同的习惯包括她明确拒绝连续两晚外出，也拒绝出席任何晚餐会，英国大使馆举办的除外。（和英语世界里鼓吹法式风情一样，巴黎人也把英式派头看作上等的域外情调——这就是为什么上层总是把威尔士亲王夫妇奉为上宾，也是为什么伊丽莎白丈夫的名字要用英语拼法。）

伊丽莎白还有两个极为精彩的花招，专门用于上流社会的预约之夜。第一个只能在歌剧院使用，幕间休息时，她会站在从歌剧院大厅到包厢和大厅包厢的那两段楼梯的顶部。大厅是交际家们幕间休息时聚集的地方。他们把妻子们留在包厢里说长道短，在幕间这段时间出来抽根烟，或者看看有无可能跟女演员们欢会一时——很多女演员都是他们的情妇。伊丽莎白独自站在楼梯顶端，确保幕间曲结束、绅士们成群上楼

入座时，每个人的目光都会被吸引到她身上。她愿意相信他们只要看她一眼——“立刻就有人说这位夫人：与众不同！”[167]——就会把他们几分钟之前还眉目传情的一众艳俗小歌星、小舞女忘得一干二净。

伊丽莎白的第二个预约之夜招数能在巴黎的三大表演场使用，因为所需的背景无非就是她自己的大厅包厢。巧妙编排之下，她会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躲在自己那个大厅包厢的阴暗凹处，深知其他观众的长柄眼镜和单片眼镜会一直转向她这个方向，看看她在不在里面。然后，在一个精心选择的时刻，她会像布谷鸟自鸣钟里弹出的机械鸟一样，突然出现在剧院的强光下。她在接下来的几秒钟保持好姿势，享受着观众惊叹的低语和注视，随后再次陷入黑暗。[168]从夏尔·阿斯这样的交际家到德·沃男爵这样的社交专栏作家，再到乔治·德·波托-里什这样的文人，对这些微型演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伊丽莎白·格雷弗耶是一个“幽灵”，在所有见过她之人的心头萦绕不去。[169]

伊丽莎白白天出现在隆尚也会实现同样惊艳的效果，在那里，她会用好几层半透明的白色绢网遮住自己的脸，“像用纱布包裹的”（她写道）“一枚珍果”。[170]表面上，这么做是为了防晒——由于被晒成褐色意味着生活艰难及室外劳作，19世纪末的贵妇人们都力求保持肌肤纯白无瑕。但伊丽莎白使用那些绢网的真正目的，却是保持神秘，激发起人们对那张半遮的面部更强烈的好奇心。



伊丽莎白在巴黎歌剧院的大楼梯顶部上演小型戏剧，把自己精彩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亨利及其母亲大概不敢承认，伊丽莎白用这些技巧，把格雷弗耶家族关于“隐秘的生活”优越性的信念完美地融入了让自己在社交场合出类拔萃的设计。她没有把自己隔离在卫道士的封闭沙龙里，而是通过在世人面前惊鸿一现便倏尔闪退来提升自己的高贵声望。如此刻意安排，她的美与受邀参加费利西泰的招待会一样昭昭在目。那种高不可攀正是它的威望所在。如安德烈·热尔曼所说，它保证了当伊丽莎白出现在社交场合时：

> 就仿佛她来自奥林匹斯山的王座，用自己的荣耀和光芒照亮那些虽然奢侈但略显乏味的聚会，因为她的神秘光环，它们顿时变得其华灼灼，其乐陶陶。[171]

同样，伊丽莎白也知道，如果她在奥林匹斯山上隐匿得太久，她的荣耀和光芒就会淡出人们的记忆。她从洛尔·德·舍维涅那里取经，开始

栽培新闻媒体，与《高卢人报》的阿蒂尔·梅耶尔培养了友好（但相对疏远）的关系，对梅耶尔《费加罗报》的同行加斯东·卡尔梅特[172]也和蔼友善。通过这些人及其下属，伊丽莎白让她的奢华服装的细节得以传播。在第一次萨冈舞会前，她向梅耶尔透露说“20位女装裁缝正在夜以继日地赶制（她准备在舞会上穿的）那套美妙非凡的经典‘迪安娜’装束”，“包括一个镶钻的新月形头饰，一定会成为当晚的谈论焦点”，当然还有“一个可爱的非洲小侍者”拖着的长裙。[173]另一次，她在婆婆的客厅里穿着一件绣有合欢花的粉色和蓝色礼服首次亮相，那里显然不欢迎记者，但不知为何，这条裙子在第二天的《高卢人报》上获得了盛情赞美。

为防止有人模仿，伊丽莎白严令自己的服饰供应商不得为任何人复制她的装束。他们服从这一命令，让人们广泛猜测她根本没有惠顾巴黎任何一家高级服装定制商。一位《艺术与时尚》（*L’Art et la mode*）的记者猜测说，“这位贵妇人”没有“让女装设计师们争相打扮她”，而是“自己设计所有服饰，在自己住宅中的一间私人工作室里完成成品”。[174]这样的谣言听起来诱人，却毫无根据。虽然德·阿斯托格街上的宅院够大，完全能容纳这么一间工作室，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而且伊丽莎白几乎与所有顶级的高级服装定制商合作，她最喜欢的品牌一直是沃思，只不过为了谨慎起见，试衣都在她自己家里进行。

她更乐于泄露关于个人风格的其他秘密：她的祖先是塔利安夫人、她的文化品位阳春白雪，还有她总是避开“最新的时尚”。[175]根据这些明智地与媒体分享的信息碎片，公众在想象中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一幅优美的、自成一格的画面。《费加罗报》赞美她“修正了帝国服饰”（这是对她那件督政府时期的“T. T.”装束的误称）并“开启了将头发高高盘上的疯狂时尚，社交界称之为‘小格雷弗耶发型’”。[176]（对开启了这一风尚的女人而言，“小格雷弗耶发型”最好地突出了她天鹅般优雅的脖颈。）《吉尔·布拉斯报》声称是她让满是荷叶边的18世纪“无赖

裙”（*robe à la polisson*）重新流行起来，但警告说她是少数能成功演绎该时尚的女人之一：

> 如果哪一位贵妇人能把这条裙子穿得出彩（那的确很难），它就会产生一种愉悦的效果；但她的腰身必须很窄、很细、对称且优雅——如果她的身材较为丰腴，看起来就会像个马戏团的小丑……因此对如今大多数女人来说，避开这一时尚，只去欣赏能够胜任的少数美人，当属聪明和明智的做法。第一个穿这条裙子的德（原文如此）·格雷弗耶子爵夫人就是这样的美人。[177]

类似的媒体曝光帮助伊丽莎白同时表达了两个她最爱的社会生理学类型：“要做女王的女人”和“引领时尚的女人”。1884年，《费加罗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特写，将她与旧制度下的几位最著名的“时尚先锋”相提并论：蓬帕杜尔夫人、德·朗巴勒亲王夫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178]所有这些女人都让自己的衣着成为王室风范，这当然不是巧合。因此这一类比突出了伊丽莎白的新潮中女王气质的一面。

然而伊丽莎白在集中演绎这些历史范例的同时，还超越了她们，为一个名声才是终极权力手段的美丽新世界修正了那些时尚。与蓬帕杜尔、朗巴勒或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同，伊丽莎白不是通过与王室成员建立关系（她只是偶尔使用王室作为道具）来获得“时尚引领者”的权威的，她的耀目光彩仅仅来自她本人：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力，她全身心地重塑自我和展示自我。她从崇拜者那里收获的无数激昂赞歌中有一篇称她为有着“上千种美丽”的女人。[179]这是伊丽莎白认可的评价。她的美有很多，但它们的来源相同，那就是她散发出“无出其右的尊贵形象”的能力。

每一次更换服饰，每一次公开露面，每一次媒体曝光，伊丽莎白都在自己的完美形象中重新打造贵族的优雅高贵。她不仅为城区，也

为“庞大而无名的”巴黎公众施行了一个无法抗拒的魔咒。《费加罗报》1891年报道了她在巴黎的家中举办的小聚会，其中写道：

> 格雷弗耶子爵夫人的品位绝对是新奇的，是“平凡庸常”的反面。因此她让客人拥有了为幻灯机喝彩的乐趣，那样的东西还前所未见。[180]

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话很值得注意，因为马塞尔也正是通过这里提到的同一介质，首次发现了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神秘光环。然而在伊丽莎白不断变化的媒体形象的语境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这一次没有提到她穿戴的服饰。在她首次在萨冈舞会上华丽亮相九年后，这里描述的她演绎了一种虽有联系却全然不同的视觉效果：一连串光彩夺目而转瞬即逝的形象，那是她“绝对新奇”的品位才能想出来，并通过她自己选择的一个屏幕投射出来的——得到了众人的喝彩。记者没有更详细地描写她在这次表演中使用的幻灯机。或许德·阿斯托格街上的新奇小物商贩终于成功地卖出了一样东西。但道具不是重点。

伊丽莎白就是魔灯。伊丽莎白就是幻影。

---

[1] 本章标题参考的是博物馆长Philippe Thiébaut的展览目录，*Robert de Montesquiou，ou l’art de paraître*（Paris：Éditions de la RMN，1999），可贴切地译为“罗贝尔·德·孟德斯鸠，或者形象的艺术”。

[2] 2016年，Olivier Saillard和Dr. Valerie Steele组织了一次博物馆展览，展示EG的服饰，先后在巴黎的Palais Galliera和纽约的时装技术学院举行。在新闻媒体上，这次展览引发了好几篇关于EG的先驱性衣着风格和她“时尚偶像”的重要地位的文章。实例见Madison Mainwaring，“Fashion Regained：Looking for Proust’s Muse in Paris，” *Paris Review*（March 16，2016）；and Isabelle Cerboneschi，“La Comtesse Greffulhe，icône de mode，” *Le Temps*，December 23，2015（online editions）。但关于这一主题，最优秀、最富有学术气质的文章是Valerie Steele，“L’Aristocrate comme œuvre d’art，” trans. Delphine N ègre-Bouvet，in Saillard，ed.，op. cit.，60-65。另一

篇同一类型的好文章是Alexandra Bosc，“Elle n’a pas suivi les modes，elle était faite pour les créer”（76-80）。

[3] Violetta（pseud. of Laincel），“Sous le masque，” *Le Gaulois*（April 5，1882）：1.

[4] EG，in AP（II）/101/150；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53。Hillerin贴切地提到了EG的“出名策略”和“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央的艺术”；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11-14。

[5]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355.

[6] 德·玛萨侯爵（Marquis de Massa），即德·玛萨侯爵亚历山大-菲利普·雷尼耶（Alexandre-Philippe Régnier，1831-1910），即后文中的菲利普·德·玛萨，法国骑兵军官、戏剧作者。

[7] EG把玛萨的赞美抄写在“Hommages et appréciations”中，见AP/101/1。

[8] 关于EG装扮成迪安娜以及这次舞会的大致情况的准确描写，见Vicomte Georges Letorière（pseud.），“Le Bal costumé de la Princesse de Sagan，” *Le monde Illustré*（June 19，1880）：382-83。

[9] 丹吉尔（Tangiers），北非国家摩洛哥北部的滨海城市，在直布罗陀海峡西面的入口，位处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交界。

[10] 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395—前330年），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和留西波斯、斯科帕斯一同被誉为古希腊最杰出的三大雕刻家。他是第一个塑造裸体女性的雕刻家。

[11] GLP，“La Souveraine de la Belle Époque，” *Crapouillot*：*Les Bonnes manières* 19（1949）：26-27，26.

[12] *Le Crapouillot*：*Le Savoir-vivre à travers les âges，l’étiquette des cours*（1952）：25.

[13] Letorière，“Le Bal costumé…，” 393.

[14] Étincelle（pseud. of Peyronny），*Carnet d'un mondain*，n.p.

[15]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贵族、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小说作家。

[16] Violetta（pseud. Laincel），"Sous le masque，" *Le Gaulois*（April 5，1882）：1；扩充版见Alice，Comtesse de Laincel，*Les Grandes Dames d'aujourd'hui*（Paris：Société d'Imprimerie，1885），267-72。Violetta引用的缪塞的那句诗选自《法国绅士拉斐尔的秘密想法》"Les Pensées secrètes de Rafaël，gentilhomme français"；见Alfred de Musset，*Poésies complètes*（Paris：Charpentier，1840），151。

[17] Violetta（pseud. Laincel），"Sous le masque，" *Le Gaulois*（April 5，1882）：1；扩充版见Alice，Comtesse de Laincel，*Les Grandes Dames d'aujourd'hui*（Paris：Société d'Imprimerie，1885），267-72。Violetta引用的缪塞的那句诗选自《法国绅士拉斐尔的秘密想法》"Les Pensées secrètes de Rafaël，gentilhomme français"；见Alfred de Musset，*Poésies complètes*（Paris：Charpentier，1840），151。

[18] 关于EG在她参加的第二场萨冈舞会上穿的红色天鹅绒宫廷服，以及她恰好与威尔士亲王同时到场的描写，见GLP，"La Souveraine de la Belle Époque，" 27。EG这件服装的原型或许是年轻的伊丽莎白一世的一幅肖像，灵感来自她档案中的一张图片明信片，上面显示的就是这样一条裙子，EG手写标记："伊丽莎白女王的照片——汉普顿宫。"1879年到1881年期间，她和亨利一起多次前往大不列颠，其间她可能去过汉普顿宫；那些旅行大多是为了在苏格兰打猎松鸡，但也做出了游览伦敦和该国各大庄园的行程安排。

[19] 这是一个成语，有点像英语中说某人备受尊崇时会说此人是"宇宙的中心"（"the sun rises and sets on"）。

[20] 《魔笛》（*Magic Flute*）是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编号K.620。《魔笛》于1791年9月30日在维也纳维登剧院首演，由莫扎特亲自指挥。作者于同年去世。这部歌剧取材自诗人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童话集《金尼斯坦》（*Dschinnistan*）中一篇名为《璐璐的魔笛》（"Lulu，or the Magic Flute"）的童话，1780年后由伊曼纽尔·席卡内德改编成德语歌剧脚本。

[21] *LG*，*Marcel Proust*（Paris：Flammarion，1948），60.

[22] James Eugene Farmer，*Versailles and the Court Under Louis XIV*（Philadelphia：Century，1905），290-91.

[23] Louis de Rouvroy，*Duc de Saint-Simon*，*Mémoires*，ed. M. Chéruel，preface by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vol. 4（Paris：Hachette，1858），53.

[24] Louis de Rouvroy，*Duc de Saint-Simon*，*Mémoires*，ed. M. Chéruel，preface by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vol. 4（Paris：Hachette，1858），56.

[25] Louis de Rouvroy，*Duc de Saint-Simon*，*Mémoires*，ed. M. Chéruel，preface by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vol. 4（Paris：Hachette，1858），56.

[26] 让-巴蒂斯特·桑戴尔（Jean-Baptiste Santerre，1651-1717），法国画家，通常与法国洛可可时代最后一位重要代表画家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相联系，但他本身也是个值得注意的画家。

[27] 关于EG的勃艮第公爵夫人造型，有两篇优秀的叙述来自她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见Le Diable Boiteux（pseud. de Vaux），“Nouvelles et échos，”《吉尔·布拉斯报》（1884年9月2日）：1；以及the Baron de Vaux，*Les Femmes de sport*（Paris：Marpon & Flammarion，1885），148-49。

[28] Le Diable Boiteux（pseud.），“Nouvelles et échos，” *Le Gaulois*（June 13，1889）：1.

[29] Jill Jonnes，*Eiffel’s Tower*：*The Thrilling Story Behind Paris’s Beloved Monument and the Extraordinary World’s Fair That Introduced It to the World*（New York：Penguin，2009）. Jill Jonnes指出：“（埃菲尔铁塔的）尖顶最终达到了300米或984英尺的高度。加上旗杆，塔高达到了1000英尺。”

[30] “Ma comtesse：souvenirs d’un enfant，8-10 rue d’Astorg，1944-1956”（Gy：n.p.，2015）. 非常感谢普瓦雷先生与我分享这份没有出版的文件。

[31] 巴黎的另一个巧克力供应商介朗-布特龙（Guérin-Boutron）改进了波坦的创意，提供明星的彩色照片集换卡。两个品牌的集换卡见书中彩页。——作者注

[32] L. de Vogüé，*Logis d’autrefois*，（Paris：Plon，1878），8.

[33] HG，*Quantum mutatus ab illo*（n.p.，1913-1921），in AP（I）/101/32；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47。

[34] 格雷弗耶家位于德·阿斯托格街的房屋的建筑面积和布局，见Poirey，Jean-Louis. “Ma Comtesse：Souvenirs d’un enfant，8-10，rue d’Astorg，1944-1956.” Gy：n. p.，2015，5。

[35] 博韦（Beauvais），位于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和瓦兹省的首府，下辖博韦区。博韦挂毯原是为富有的资产阶级和法国贵族生产的装饰品，同时也供出口，19世纪后质量开始下降，产量也减少了。

[36] 让-巴蒂斯特·乌德里（Jean-Baptiste Oudry，1686-1755），法国洛可可派画家、雕刻家和挂毯设计师。他尤以自然主义的动物画以及描写猎物的狩猎作品而闻名。

[37]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诗人，以《拉封丹寓言》留名后世。拉封丹生于法国中部埃纳省的蒂埃利堡，父亲为政府官员。曾习法律、神学，但最后决心成为作家。

[38] 关于EG的沙龙的家具和装饰，见Gerald Reitling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Objets d’Art Market Since* 1750（New York：Holt，Reinhart & Winston，1965），436；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63；and Curtiss，*Other People’s Letters*，165。Curtiss提到，César Ritz后来借用将天花板刷成天空颜色的方法，设计了他位于巴黎和伦敦的同名酒店的餐厅。1880年代末，EG沙龙里的护壁板被搬到了布德朗庄园；它们如今悬挂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Colombe d’Or酒店。见John Harris，*Moving Rooms：The Trade in Architectural Salvag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208。1999年，EG沙龙里的一把不属于博韦系列的椅子，一把由Jacob签名并曾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所有的镀金木椅——在巴黎的拍卖中卖出了250万法郎，大约相当于50万美元。Judith Benhamou-Huet，“Pourquoi les meubles flambent，” Les Échos.fr，December 5，2000. 关于Oudry根据拉封丹画作设计的博韦绣帷的长沙发和椅子，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135。Hillerin声称这件家具给了MP灵感，RTP中盖尔芒特家的某些家具就是根据这一灵感写成的，但事实上GS也有一个套房里面装满了18世纪家具，绣帷上的图案也来自拉封丹画作，而由于MP在GS的公寓里度过的时光远远多于在EG的住宅的时光，这里的灵感来源更有可能是GS的家具。到1891年，Oudry装饰已经被移到了餐厅；见EdG，日志，1891年4月25日。

[39] 德·拉艾格勒伯爵罗贝尔（鲍勃）·德阿克雷（Robert [Bob] des Acres，Comte de L’Aigle，1843-1931），法国政治家，1885—1893年任众议院议员。

[40] 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Prince Auguste d'Arenberg），即奥古斯特·路易·阿尔贝里克（Auguste Louis Albéric，1837-1924），法国贵族、君主主义政治家。他以庞大的财富和遍布法国的地产而闻名。

[41] 关于EG的沙龙的家具和装饰，见Gerald Reitling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Objets d'Art Market Since* 1750（New York：Holt，Reinhart & Winston，1965），436；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63；and Curtiss，*Other People's Letters*，165。Curtiss提到，César Ritz后来借用将天花板刷成天空颜色的方法，设计了他位于巴黎和伦敦的同名酒店的餐厅。1880年代末，EG沙龙里的护壁板被搬到了布德朗庄园；它们如今悬挂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Colombe d'Or酒店。见John Harris，*Moving Rooms*：*The Trade in Architectural Salvag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208。1999年，EG沙龙里的一把不属于博韦系列的椅子，一把由Jacob签名并曾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所有的镀金木椅——在巴黎的拍卖中卖出了250万法郎，大约相当于50万美元。Judith Benhamou-Huet，"Pourquoi les meubles flambent，" Les Échos.fr，December 5，2000. 关于Oudry根据拉封丹画作设计的博韦绣帷的长沙发和椅子，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135。Hillerin声称这件家具给了MP灵感，RTP中盖尔芒特家的某些家具就是根据这一灵感写成的，但事实上GS也有一个套房里面装满了18世纪家具，绣帷上的图案也来自拉封丹画作，而由于MP在GS的公寓里度过的时光远远多于在EG的住宅的时光，这里的灵感来源更有可能是GS的家具。到1891年，Oudry装饰已经被移到了餐厅；见EdG，日志，1891年4月25日。

[42] 关于德·阿斯托格街上的居住安排和每周活动安排，见L. de Vogüé，*Logis d'autrefois*，（Paris：Plon，1878），n.p.；and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54。

[43] 贵族家人之间的感情往往是浮皮潦草的，最贴切地表现这一特点的，莫过于亨利的表兄艾默里·德·拉罗什富科在野兽舞会当晚说的那句让他臭名远扬的话。在准备舞会时，拉·罗什富科得到消息，说他的一位亲戚已在弥留之际了。拉罗什富科对送信人喊道："你太夸张了吧！"然后就打发他走了。如果拉罗什富科承认那位亲戚已经奄奄一息，按照礼节，他就不得不错过舞会（服丧期间不得参加聚会），而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蜜蜂芭蕾舞中扮演令人艳羡的角色了。事实上当那位亲戚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已经戴上小小的金色触须和漂亮的条纹蜜蜂短袍，全副武装准备滑入舞池了。——作者注

[44] A. de Gramont，*L'Ami du Prince*，op. cit.，326.

[45]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79.

[46] 关于EG对女性权利的关注，Hillerin认为其主要表达是她写于1904年但未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关于应当赋予女性的权利的研究》（"My Study on the Rights to Be Granted to Women"）。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473-74；原文见AP（II）/101/150。但事实上，EG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开始写关于性别平等和性别角色的文章了，那一系列文章的标题为《女人：一个社会生理学研究》（*Les Femmes：une physiologie sociale*），存档于 AP（II）/101/151。

[47] EG，*Les Femmes*；引文又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80。

[48] 关于EG的阅读习惯和喜好，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64；关于HG的藏书，见*Collection des livres anciens et modernes，provenant de la famille Greffulhe*（Monte-Carlo：Sotheby Parke Bernet Monaco，February 1982）：27 and 102。

[49] 1880年9月20日EG致Mimi的信，见AP（II）/101/40。1887年11月13日，EG在婚姻日志中就已经悲哀地得出结论："显然，［除了］几乎总是和我观点一致的德·阿伦贝格亲王之外，这一家人没有一点艺术品位。"

[50] 引文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86；又见Jean Cocteau，*Le Passé défini*（Paris：NRF/Gallimard，1983），301。

[51] EG，in AP（II）/101/150.

[52] AP（II）/101/45；引文又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79。

[53] 1893年4月7日MACC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53.

[54] Eugen Weber，*France Fin de Siècl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97.

[55] EG，untitled note marked "La Rivière '89，" in AP（II）/101/150.

[56] PV，*Society in Paris*，95. L. de Vogüé，*Logis d'autrefois*，（Paris：Plon，1878），12-13.

[57] Louise d'Arenberg，marquise de Vogüé，*Logis d'autrefois*（Paris：n.p.）.

[58] HG致EG没有署期的信，存档于AP（II）/101/14。

[59] EG，in AP（II）/101/150.

[60]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48.

[61] EG，《主动请缨的免费陪媪》，未发表作品中的一篇，存档于AP（II）/101/152。

[62] 伊丽莎白总说亨利不给她零花钱，只授权她在娱乐和购买衣物上大笔开支。她无法帮助父母留住希迈宅邸，说明了她无法获得丈夫的财富的事实。格雷弗耶家族是全巴黎少有的几个能买得起该宅邸的富裕家族之一。但他们没有干预，因此，1884年，约瑟夫亲王把它亏本卖给了法国政府，后者把它并入了隔壁的高等美术学院。——作者注

[63] 关于EG的家人无法保留希迈府邸，见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201。关于该住宅于1884年出售的情况，见Parisis（pseud. Émile Blavet），"L'Hôtel de Chimay，" *Le Figaro*（June 14，1884）：1；以及The Paris Galignani's Messenger（pseud.），"The Fate of the Hôtel de Chimay，" *New York Times*（July 4，1884）：n.p。关于拉蒂斯博纳·桑热夫人在希迈府邸开办的"犹太人……政治和艺术沙龙"，见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97。

[64] 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180.

[65] RM，*Notes et réflexions inédites*，存档于NAF 15108，folio 46；又见RM，*Les Pas effacés*，vol. 2（Paris：Émile Paul，1923），53.

[66] RM，"Aristos，" in NAF 15183，folio 46/47.

[67]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54.

[68] 阿基坦（Aquitaine），法国西南部一个大区的名称。在罗马帝国时代，阿

基坦高卢行省最初的范围是从比利牛斯山至加龙河，之后屋大维将加龙河至卢瓦尔河间的土地并入该行省。经历了近千年的分分合合，在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爱德华三世于1361年建立了阿基坦公国，但法国在1453年重新夺回该地。之后，阿基坦就成为法国历史的一部分。

[69] 加斯科涅（Gascony），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今阿基坦大区及南部-比利牛斯大区。

[70]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者。1889—1910年，他在意大利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作品有《玫瑰三部曲》。1914年至1924年期间，在政治领域非常活跃。邓南遮常常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先驱，在政治上颇受争议。

[71] 《达达尼昂的城堡以350英镑出售》（"D'Artagnan's Château Sold for £350"），见*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vol. 182（1933）：42。

[72]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vol. 182（1933），36。

[73] HR，*Les Cahiers inédits*，368，432，and 433；and LG，*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22-23.

[74]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70.

[75]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75.

[76] 安东尼奥·德·拉冈达拉（Antonio de La Gandara，1861-1917），法国画家、粉笔画家和制图师。

[77] 埃米尔·加莱（Émile Gallé，1846-1904），法国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之一，出生于法国南希的一个手工艺者家庭。高中毕业后赴德国攻读了哲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并学会了玻璃和木材的加工方法。1874年他继承了父亲的手工作坊，1883年将其扩大为生产瓷器、玻璃制品和木制品的车间。

[78]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05.

[79] 同时代人对RM"糟糕的"诗作的一篇评论，见Lorrain（pseud.），*La Ville empoisonnée*，97 and 103-4。关于RM的"美学宗教"，详见第24章。RM被写成他自己的美学宗教里的"大祭司"，见*La Revue mondiale*（January 1，1899）：97。

[80] 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114.

[81]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85.

[82] *Robert de Montesquiou，ou l'art de paraître.* Edited by Philippe Thiébaut. Paris：Éditions de la RMN，1999，8.

[83] RM，*Les Pas effacés*，vol. 3，121.

[84] 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176.

[85] 约里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颓废派作家、艺术评论家，早期作品受到当时自然主义的影响。《逆流》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描写了一个无聊贵族的颓废经历。

[86] 关于RM与德埃桑特公爵的相似之处（包括导致乌龟死亡的浮夸装扮），见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484-86；Chaleyssin，"Des Esseintes，" in op. cit.，27-36；and Marc Fumaroli's excellent preface to Joris-Karl Huysmans，*A Rebours*（Paris：Gallimard，1977 [1884]）。AM作为许多世纪末艺术家和交际家的朋友和告解神父，声称于斯曼本人曾对他说："德埃桑特一半是孟德斯鸠，一半是我本人。"虽然RM很享受人们从德埃桑特联想到他本人带来的名声，但后来也难免觉得厌烦；见RM，*Les Roseaux pensants*（Paris：Eugène Fasquelle，1897）；以及EdG，日志，1892年5月18日的日记。

[87] 欧珍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1826-1920），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也是法国的最后一位皇后。

[88]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文艺复兴"一词就是他在1855年出版的《法国史》中提出的。

[89] RM致EG，存档于AP（II）/101/150。

[90] Cornelia Otis Skinner，*Elegant Wits and Grand Horizontals*：*Paris—La Belle Époque*（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62），45-46.

[91] 关于男式晚礼服和RM对它所做的变化，见Robert Burnand，*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de 1870 à 1900（Paris：Hachette，1948），91；and *Robert de Montesquiou，ou l'art de paraître.* Edited by Philippe Thiébaut. Paris：Éditions de la RMN，1999，9。

[92] 关于上流社会的男士着装要求，见GLP，"La Haute Société de la Belle Époque，" *Le Crapouillot*：*La Belle Époque* 29（1949）：2-7，5。关于RM的高跟鞋，见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70。

[93] 关于RM的优雅，见Raoul Ponchon，"Gazette rimée：le mot 'chic，'" *Le Journal*（April 16，1902）：2。就连继承了舅舅的"时尚之王"称号、极有眼力的博尼·德·卡斯特兰也极力称赞RM的风格。Boni de Castellane，*Comment j'ai découvert l'Amérique*（Paris：G. Crès，1925），90-91. RM的紧身黄绿色西装或许是让·洛兰（以保罗·杜瓦尔为笔名）出版的《德·福卡斯先生》中标题人物穿着的灵感来源，*Monsieur Phocas*（Paris：Paul Ollendorff，1901），1-3。

[94] 关于RM对性的矛盾心理，见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55-58。关于他与加布里埃尔·德·伊图里的关系，尤其见Rubén Gallo，"An Argentinian in Paris，" ch. 2 in *Proust's Latin American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4），90-133。

[95]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54.

[96] Magali（pseud.），"Le monde et la mode，" *La Vie élégante* 2（July 15，1882）：261-272，271. 该文本特别提到了EG对毛丝鼠的喜爱。EG后来指控伊图里偷了她的毛丝鼠，因为他和RM在惠斯勒的肖像画完成之后没有将其归还给她。关于RM把红酒和可卡因兑在一起喝才熬过了那么多次做模特的煎熬，见EdG，日志，1891年7月7日的日记。

[97] 关于RM与惠斯勒的"友谊"，见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143；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30-36；Edgar Munhall，ed.，*Whistler and Montesquiou*：*The Butterfly and the Bat*（New York and Paris：The Frick Collection & Flammarion，1995）；以及惠斯勒与RM的通信，可在互联网上查阅，网址：http：//www.whistler.arts.gla.ac.uk/correspondence/people/result/?nameid=Montesquiou_Rde&year1=1829&year2=1903&sr=0&firstname=&surname=Mont

[98] 关于惠斯勒是EG和RM的"好朋友"，见EG致RM的多封信件，存档于

AP（II）/101/150；1891年3月16日EG致惠斯勒的信，存档于AP（II）101/26；以及EG致惠斯勒的多封信件，存档于AP（II）/101/116。

[99] 关于RM以蝙蝠为图腾，见Edgar Munhall，ed.，*Whistler and Montesquiou*：*The Butterfly and the Bat*（New York and Paris：The Frick Collection & Flammarion，1995）；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56；and RM，*Les Chauves-Souris*：*clairs-obscurs*（Paris：Georges Richard，1892）。关于《蝙蝠》珍藏版的奢华装订，见LG，*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38。

[100] 玛德琳·勒梅尔（Madeleine Lemaire，1845-1928），法国女画家、诗人、知名沙龙女主人。她将普鲁斯特引介到上流社会，据说是普鲁斯特笔下维兰德夫人的原型。座上客包括威尔士亲王、各国大使、无数的公爵伯爵夫人等。她以画人物、风俗和花卉闻名，有清甜的沙龙气，格调不高。

[101] 夏维（Charvet），法国高端衬衫制造商和裁缝，创建于1838年，位于巴黎旺多姆广场28号。它为巴黎商店和国际奢侈品零售商设计、生产和销售定制的与成品的衬衫、领带、睡衣和西装。

[102] 在剧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Dame aux camélias*，1852）中，伯恩哈特献上了她最著名的表演之一，但小仲马曾对这位女演员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弥留之际用最后一口气说："真高兴我要死了，再也不用听萨拉·伯恩哈特唱歌了。"萨拉的宠物美洲狮吃掉了小仲马的硬草帽，算是为她报了仇。——作者注

[103] 关于RM与莎拉·伯恩哈特的友谊，见Cornelia Otis Skinner，*Madame Sarah*（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7），101；关于伯恩哈特家的动物园和其他的怪癖，Cornelia Otis Skinner，*Madame Sarah*（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7），93-94 and 238；莎拉·伯恩哈特（伪冒），*My Double Life*（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7），316-18；以及Robert Gottlieb，*Sarah*：*The Life of Sarah Bernhard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小仲马那位奄奄一息的朋友的故事，见Lysiane Sarah-Bernhardt（pseud.），"Les Courses，" in *Le Protocole mondain*，ed. AdF，256。

[104] 弗朗索瓦·戈贝（François Coppée，1842-1908），法国诗人、小说家。戈贝是颇有名望的高蹈派诗人，因为其诗歌描写平凡人朴素的情感，被称作"平凡人的作家"。他在188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888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05] 皮埃罗（Pierrot），哑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固定小丑角色。

[106]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意大利政治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被同时代的佛罗伦斯人称为“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他是外交家、政治家，也是学者、艺术家和诗人的赞助者。

[107] 指拿破仑唯一的婚生子拿破仑·弗朗索瓦·夏尔·约瑟夫·波拿巴（Napoléon François Charles Joseph Bonaparte，1811-1832），1814年4月4日，拿破仑宣布让位给儿子，称“拿破仑二世”，但这个男孩仅仅“统治”了两天，拿破仑便于6日同意其本人及后代放弃法兰西帝位。1815年，卷土重来的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之败后也曾让位给他的儿子。虽然富歇主持的临时政府和议会两院并不承认“拿破仑二世”，但他持续十几天（1815年6月22日至7月7日）的“统治”还是被载入史书。1832年7月22日他在维也纳的美泉宫去世，年仅21岁。1900年，作家爱德蒙·罗斯坦（Edmond Rostand）向拿破仑二世致敬的戏剧《雏鹰》（*L’Aiglon*）上演，“雏鹰”这一绰号由此流传开来。

[108] 分身（Doppelgänger），本意指某个生者在两地同时出现，由第三者目睹另一个自己的现象。该存在与本人长得一模一样，但不限定为善或恶。总体而言，分身大抵上被视为神秘学现象。

[109]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29. Jullian认为莫罗与惠斯勒的影响力不可相提并论，他写道：“惠斯勒在他面前举起了花花公子的抛光金属镜子，而莫罗找到了魔法师的水晶球。”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65. 关于RM把萨拉·伯恩哈特变成了莫罗画作中的人物，需要注意的是，RM既迷恋又厌恶的奥斯卡·王尔德在自己的法语剧作《莎乐美》中专为这位女演员创作了标题人物，也设想她变成了从莫罗画作中走出的人物。关于王尔德的《莎乐美》（直到他入狱之后才被公演）的“颓废”审美的极佳论述，见Rhonda Garelick，*Rising Star*：*Dandyism*，*Gender*，*and Performance in the Fin de Sièc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149。

[110] 狄奥多拉（Théodora，500-548），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王朝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皇后。和丈夫查士丁尼大帝一样，她也被东正教会封为圣人，纪念日为11月14日。

[111] 关于EG对RM的“极端品位和与众不同”（如她对MCC所说）的崇拜，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41-42；and Valerie Steele，“L’Aristocrate comme œuvre d’art，” trans. Delphine N ègre-Bouvet，in Saillard，ed.，op. cit.，61。

[112] Paul Poiret，*Vestendo la Belle Époque*，*trans. Simona Broglie*（Milan：Excelsior，2009 [1930]），163.

[113] Paul Poiret，*Vestendo la Belle Époque*，*trans. Simona Broglie*（Milan：Excelsior，2009 [1930]），163.

[114] AP（II）/101/50；强调为EG自己所加。

[115] AG，*Les Clés de Proust*，129. RM，*Les Pas effacés*，vol. 2，53.

[116] RM致EG，存档于AP（II）/101/150。

[117]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22.

[118]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80.

[119] 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Senevas，*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X*e *siècles*（Paris：J. Moulin，1939），vol. 2，302.

[120] “Relevé des recettes et des dépenses faites pour Madame la Vicomtesse Greffulhe（1880），” in AP（I）/101/16.

[121] EG，《风格》（“La Mode”），手稿署期1887年，存档于AP（II）/101/150。

[122] RM，*La Divine Comtesse*，203. Valerie Steele，“L’Aristocrate comme œuvre d’art，” trans. Delphine N ègre-Bouvet，in Saillard，ed.，op. cit.，64；and Alexandra Bosc，“Elle n’a pas suivi les modes，elle était faite pour les créer”（76-80），78.

[123] 斯文加利（Svengali），法裔英国漫画家和作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1834-1896）的小说《特里尔比》（*Trilby*，1894）中的人物。斯文加利是个邪恶的催眠术师，他催眠并操纵小说主人公特里尔比成为著名的歌唱家。这部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斯文加利也成为邪恶操纵者的化身。

[124] EG，in AP（II）/101/151.

[125] EG，《引领时尚的女人》，EG，in AP（II）/101/151；引文又见Alexandra Bosc，“Elle n’a pas suivi les modes，elle était faite pour les créer”（76-

80），77。

[126] 指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公元12-41），后世史学家常称其为卡利古拉（Caligula）。卡利古拉是他自童年时的外号，意为“小军靴”，源于他婴儿时代随父亲屯驻日耳曼前线时，士兵为他穿上的儿童款军靴。卡利古拉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典型暴君。他建立恐怖统治，神化王权，行事荒唐。

[127] 罗蕾莱（Lorelei），莱茵河中游东岸的一块高132米的礁石，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境内。罗蕾莱礁石处的莱茵河深25米，却只有113米宽，是莱茵河最深和最窄的河段，险峻的山岩和湍急的河流曾使得很多船只在这里发生事故遇难，因而传说罗蕾莱山顶上有位美若天仙的女妖罗蕾莱，用动人的美妙歌声诱惑行经的船只，使之遇难。

[128] RM，*La Divine Comtesse*，203-4.

[129] 非其他归属的服饰的描述见Étincelle（pseud.），“Carnet d’un *mondain*，” *Le Figaro*（June 25，1883）：1；*La Grande Revue*（May 1889）：322；*Le Gaulois*（April 29，1887）；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20-25；*La Nouvelle Revue*（June 1884）：446；Valerie Steele，“L’Aristocrate comme œuvre d’art，” trans. Delphine N ègre-Bouvet，in Saillard，ed.，op. cit.，64；Violetta（pseud. Laincel），“Sous le masque，” *Le Gaulois*（May 27，1882）：1；and Valérie Laforge，*Talons et tentations*（Quebec：Fides，2001），68。

[130] RM在《思考的芦苇》中摘录伊丽莎白的创意写作选段的那一章，标题为“面具四重奏”（“Le Quatuor des masques”），署名“天鹅”（Le Cygne），还抄录了其他三位未署名的“业余作者”的作品。其他作者中的一位是Élaine Greffulhe，RM为她的散文诗署名“天鹅之女……夜莺”。RM，*Les Roseaux pensants*，292-313.

[131] 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1845-1886），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巴伐利亚国王。在巴伐利亚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最狂热的城堡修建者，特别是由于他对新天鹅堡的修建，民间称他为“童话国王”。

[132] 《罗恩格林》（*Lohengrin*），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浪漫歌剧，脚本由作曲家本人编写。虽然剧中有历史成分，但其性质属于童话歌剧。歌剧灵感来源于中世纪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诗篇《提特雷尔》和《帕西法尔》。瓦格纳在其遗作《帕西法尔》中再次采用了这两个诗篇中的故事。

[133] 不出所料，RM也很崇拜喜欢天鹅和瓦格纳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至少写过两首关于他的诗，“Armenta”和“Passionspiel”，收录于*Les Chauves-Souris*，305-8。

[134] RM，Poem LXXXIV，in *Les Paons*（Paris：Georges Richard，1908 [1901]），144.

[135] AG，*La Bourgeoisie qui brûle*，190.

[136]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109.

[137]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204.

[138] 德·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Comtesse de Castiglione），本名维尔吉尼娅·奥多伊尼（Virginia Oldoïni，1837-1899），19世纪的意大利贵族，是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情妇。她也是早期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她不惜举债，花了40年时间拍摄了700幅照片。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对她痴迷不已。他耗时13年为她撰写了传记《非凡的伯爵夫人》（*La Divine Comtesse*），于1913年出版。

[139] *Robert de Montesquiou，ou l’art de paraître.* Edited by Philippe Thiébaut. Paris：Éditions de la RMN，1999，35. 关于EG的许多肖像画家，一个不错的总结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506-7，n. 7。

[140]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81.

[141] LG，*Mémoires*，vol. 2，（Paris：Flammarion，1948），25.

[142] EG的两把奢华的羽毛扇的近照，见Saillard，ed.，op. cit.，66-67。这两把扇子都不是埃勒的肖像画或纳达尔的照片中出现的那一把，一把太小，另一把太大，而且它们都是用鸵鸟毛做成的。

[143] JEB的引文见*Propos de peintre*，ed. Frédéric Mitterrand（Paris：Séguier，2013），384-85。

[144] Mary Bergstein称韦格纳为EG拍摄的“复合像”源于世纪末时尚圈兴起的对“摄影招魂说”的兴趣，很有说服力。Mary Bergstein，*Looking Back One Learns to See：Marcel Proust and Photography*（Amsterdam and New York：Ropoli，2014），156.

[145] 杜伊勒里宫（Palais des Tuileries），曾是法国的王宫，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于1871年被焚毁。

[146] 对Armand-Ghislain，Comte de Maigret的采访，巴黎，2012年3月14日。

[147] MB，*Le Voyageur voilé*，33.

[148] EG在一封未署期的信件中感谢他送自己塔利安的传记，存档于AP（II）/101/24；这封信的摘录引文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174。

[149] 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18世纪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的代表人物。他曾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担任首席画师，是蓬帕杜尔夫人最为赏识的画家。布歇的作品种类广泛，数量惊人，将洛可可时期的精致、细腻、优雅与浮华表现到极致。他绘画的题材多为神话和田园诗，尤擅装饰画，以明快的色调表现女性胴体，给人以感官刺激。

[150] 梅尔希奥·德·洪德库特尔（Melchior d'Hondecoeter，1636-1695），荷兰动物画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他几乎只画鸟类，通常是公园般的风景中有异国情调的鸟儿或猎禽。

[151] 关于德·阿斯托格街那所宅邸的艺术和家具，见*La Collection Greffulhe：vente le lundi 6 mars 2000*（Paris：Drouot，2000）；*Catalogue on a Selected Portion of the Renowned Collection of Pictures and Drawings Formed by the Comte Greffulhe*（London：Sotheby's，June 22，1937）；and Charles Gueullette，*Les Cabinets d'amateurs à Paris，la collection du comte Henri de [*sic*] Greffulhe*（Paris：Detaille，1887），5-6。

[152] 1882年8月13日EG致MCC的信，存档于AP（II）/101/40；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59；and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66-77。关于让娜·德·阿伦贝格跟勒梅尔夫人学习，见Horatio（pseud. MP），"Le Salon de Mme Madeleine Lemaire，" in MP，*Le Salon de Mme de…*，39。

[153]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63-64. EG在她的冬季花园拍摄的某些照片如今可在奥赛博物馆的网站上查阅数字版，在"Fonds autour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1860-1890）"栏目。这些照片的编号为PHO 2010 5 19和PHO 2010 5 20（HG）；PHO 2010 5 16（Guigui）；and PHO 2010 5

17（德·萨冈亲王，在奥赛的网站上被误称为“德·卡拉曼-希迈伯爵？？（原文如此）”。

[154] Le Diable Boiteux（pseud. de Vaux），“Nouvelles et échos，”《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11月3日）：1。

[155] Le Diable Boiteux（pseud. de Vaux），“Nouvelles et échos，”《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11月3日）：1。

[156] de Vaux，*Les Femmes de sport*，148.

[157] RM，*La Divine Comtesse*，199.

[158] HG致EG未署期的信件，存档于AP（II）/101/32。

[159] RM详细描写了埃勒的“天鹅”肖像画，见*La Divine Comtesse*，200-201。

[160]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48；and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33.

[161] HG致EG，存档于AP（II）/101/32。

[162] HG典型的精神分裂型“道歉”是他在1902年寄给EG的一封蓝纸头（petit bleu，指快信——译者注），他在其中交替使用第一和第三人称：“当他让她痛苦时，他的心在流泪，他也一样痛苦。我当时拿着手杖，碰巧没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很后悔。像那些（令人看不起的）行为让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痛苦……他的心碎了。他请求她的原谅。他再也不会那样了。他喜欢他——她的亨利。”HG致EG，petit bleu，指快信——译者注。

[163] 1909年1月4日EG致HG的信件，存档于AP（I）/101/22。

[164] 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183-84. EG在一篇题为《论未揭秘之事的影响》的未发表文章中阐释了优美的姗姗来迟背后的理论。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声望的来源是神秘感”。EG，“De l’influence du non-dévoilé，” in AP（II）/101/150. 她还就同一主题写了另一篇文章，“Aperçu sur le prestige”，EG，“De l’influence du non-dévoilé，” in AP（II）/101/150，论证了“声望是‘被想象出来的现实’”。两篇文章的更多引文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

2014），213。

[165] 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184；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15. 关于EG在葡萄牙王妃面前优美地姗姗来迟，见A. de Gramont，*L'Ami du Prince*，op. cit.，275。

[166] 阿梅莉亚王后（Queen Amelia），即奥尔良的阿梅莉（Amélie of Orléans，1865-1951），她被丈夫的臣民称为"玛丽亚·阿梅莉亚·德·奥尔良"，是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妻子，葡萄牙最后一任王后。作为巴黎伯爵菲利普亲王和妻子玛丽·伊莎贝拉·德·奥尔良的长女，她的出身是"奥尔良郡主"。

[167] EG，in AP（II）/101/151.

[168] 关于EG藏在里面并从她的大厅包厢的阴影中突然短暂出现的伎俩，见MB，*Le Voyageur voilé*，49。

[169] Haas，引文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9；Le Diable Boiteux（pseud. de Vaux），"Nouvelles et échos，" *Le Gaulois*（June 13，1889）：1；1925年1月GPR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107；以及EdG，日志，1891年4月25日。

[170] EG，in AP（II）/101/149.

[171] AG，*Les Clés de Proust*，33.

[172] 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1858-1914），法国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1914年，卡尔梅特发起了反对财政部长约瑟夫·卡约的运动，因为后者开始实行累进税制，并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奉行对德国的和平主义立场。卡约夫人因为担心报纸会揭露其隐私而亲手枪杀了卡尔梅特。

[173] 《高卢人报》（1880年5月26日）：第1版。

[174]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23.

[175] 在他关于EG每次出现都如"女神"的论述中，AF也强调她是塔利安夫人的后代，见*Le Bal du Pré-Catelan*，258-59。

[176] Étincelle（pseud.），“Carnet d’un mondain，”《费加罗报》（1891年6月5日）：第1版；引文又见Alexandra Bosc，“Elle n’a pas suivi les modes，elle était faite pour les créer”（76-80），77。

[177] Santillane（pseud.），“Courrier de Paris”，《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11月24日）：1。

[178] Étincelle（pseud.），“Les Maréchales de la mode，”《费加罗报》（1884年9月1日）：第1-2版。

[179]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03.

[180] Étincelle（pseud. of Peyronny），“Mondains et *mondaines*，”《世界画报》（1891年1月10日）：第1版。

短曲 鸟之歌

诗人，拿起你的竖琴；正是我，你那永生的

女神，我看见你今夜沉默有悲哀，

我好像是一只鸟，听见幼雏的呼唤，

为了和你一同哭泣，我从天空飞来。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五月之夜》[1]

---

[1] 引自陈潋莱、冯钟璞译，《缪塞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74页。

第8章 白马王子

伊丽莎白说公众的爱慕就像“无名之人大手的抚摸”，平息了她的焦虑。[1]在另一篇以她在蜜月中虚构的那个不快乐的新娘玛丽-爱丽丝·德·蒙泰伊昂之名所写的日记中，她写道：

> 年轻、美丽而迷人，感受自己支配他人的权力，真让人开心啊……我几乎想要为拥有这一天赋而感谢某个不知名的神祇了。而对自己来说，这又是多么令人愉悦的天赋啊！……无论我有任何焦虑和伤痛，我的镜子都会来安慰我。我看着自己的映像，看着自己的眼睛——我深知如何用它们蛊惑人心——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总能找回良好的感觉。事实上，唯一让我心情糟糕无法自拔的，是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不够迷人的时候。[2]

她的罗贝尔舅舅认为萨拉·伯恩哈特是他的理想化分身，而伊丽莎白选择的分身却是她自己“迷人的”映像，通过公众、媒体、肖像画家和她的镜子反馈给她的形象。

不出伊丽莎白所料，费利西泰果然极力反对她的新晋名人身份，这位年长女人觉得这么做恶毒地冒犯了礼仪规矩。她提醒伊丽莎白，贵族女人的名字从她宣布婚讯之后就不该再出现在报纸上，直到她的讣告登出。

为了劝阻伊丽莎白在服装上的“夸张表现”，费利西泰利用了她从贵族同伴们那里听到的一切负面评价。为满足费利西泰的目的，最有用的负面评价之一来自埃莱娜·斯坦迪什（Hélène Standish），伊丽莎白的这位表姐大她13岁，娘家姓德卡尔。埃莱娜一直被认为是城区最优雅的女

人之一。有一个星期天，她来到费利西泰的沙龙，恰逢伊丽莎白在沙龙上展示一套新装束。[3]伊丽莎白很不高兴看到她（埃莱娜有个讨厌的习惯，总想抢她的风头），于是为了留住大家的注意力，便滔滔不绝地讲起那天上午往返教堂的路上有多少人向她投来赞赏的目光。说完，伊丽莎白假装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如果有一天街上的那些小人物不再驻足看我了，我就该知道自己的美丽一去不返了。""亲爱的，"埃莱娜从容应对，"要是你继续穿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永远都会驻足看你的。"[4]

费利西泰是个没有多少幽默感的人，但她觉得埃莱娜的挖苦是她听过的最好笑的东西之一。她不顾自己制定的要维护家庭团结形象的规矩，忙不迭地把这句羞辱的话传得上流社会人尽皆知——她成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马塞尔·普鲁斯特还在《追忆似水年华》的一版草稿中引用了它。

亨利看到妻子出名后，心情更加复杂一些。在某些信件中，他责骂她那些吸引眼球的时装，说它们损害了他的名誉：

> 我总是好奇，却始终不明白，一个智商和相貌都在中等之上的人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穿那些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衣服，把自己弄得愚蠢而荒唐……我见不得自己的好名姓被这些古怪的戏服和丑陋的破布玷污。[5]

还有时他会指责孟德斯鸠诱惑她背离作为格雷弗耶子爵夫人本该追求的"平静的生活、隐秘的生活"："你宁愿跟你（舅舅）一起满城招摇，他只是想利用你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不可抑制的想出名的渴望——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但亨利也并非一味地责备。有时他也在抱怨中掺杂一些恭维："你的帽子不合时宜，衣服也一样——我想看到你的眼睛闪亮，像碧（看不

清）空中的两颗星——你根本不需要炫耀纤细的腰身。”[6]有时则是毫不含糊的赞美。“我的思绪受到你的吸引，（渴望）在你的天空中驰骋，”他在一封没有署期的短信中写道，“（我）像一只被俘的爱情鸟，咕咕地向他的鸽子表达爱意，那只鸽子没有他的陪伴也能自由飞翔！”

亨利的喜怒无常起初让伊丽莎白很困惑。不过后来，她渐渐找到了他的刺激源：费利西泰一个严厉的眼神，某位姘头的一句挖苦[7]，多疑地想象贵族同伴们都在讥笑他“让”妻子抛头露面。反过来，其他人对她的评价偶尔也会激起亨利的爱意。从一开始，他就曾告诉她，他希望朋友们一看到她就说——“那个亨利真是个幸运的小子！他娶了全法国最美的女人！”[8]多亏她设计巧妙的公开露面，如今外面流传的正是这句话。

伊丽莎白早期最直白的崇拜者包括布勒特伊，他仍然在责备亨利低估了她独一无二的魅力；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在她首次出现在歌剧院舞会时就公然求欢（她赶走了他）；德·玛萨侯爵，这位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和上流社会的盛典大师专门组织了一场烟花表演向“迪安娜-伊丽莎白”·格雷弗耶致敬，还就此主题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把她与那位守护女神相提并论。[9]另一位向她表达忠诚的交际家是将军德·加利费侯爵加斯东，这位功勋卓著的战争英雄因为在战场上受伤，肚子上还留着一块银板，令女人们着迷不已。虽然他曾因无情地镇压巴黎公社而得到了“克里希[10]的刽子手”的恶名，但在这可怕的名声背后，加利费有着顽童般的幽默感。[11]他还是个嘻嘻哈哈的无耻好色之徒，常常公然挑逗伊丽莎白来激怒亨利。（亨利回击，称加利费是“老酒鬼克里希杀手”。[12]）弗朗索瓦·奥廷格（François Hottinguer）就没那么过分，这位沙黄色头发的瘦削交际家是布德朗森林发起人中唯一的单身汉。他是自己家族银行的高级合伙人，和伊丽莎白一样喜欢文学，因而与她展开了暧昧的通信，亨利似乎一直蒙在鼓里。[13]不过奥廷格一见伊丽莎白就盯着她发呆，他对她的爱意已经是圈里公开的秘密了。最后，伊丽莎白

最荒谬的社交圈情郎当属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这位性情古怪的作曲家和美学家自称是自己所在阶级中的败家子。他对伊丽莎白的着迷源于他们共同的音乐爱好，上层之人还从未见他有过那么狂热的激情；众所周知，他的性爱品位与女人无关。

除波利尼亚克之外，这些男人都是（探究）女性魅力的行家里手，因此亨利虽然讨厌加利费，却也很重视他的意见。和他收集的善本书籍和珍贵艺术品一样，妻子的魅力也因其显然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令他高兴。他喜欢人们说他拥有最好的一切。

在极少数情况下，另一个男人对伊丽莎白的赞美不但会让亨利充满自豪，还会激起他的情欲（或者说因自豪而起了贪念）。格雷弗耶夫妇婚后两年半，社交圈传言，亨利自新婚之夜后从未进过伊丽莎白的卧室——或者说她从未给他开过卧室的门。这样的猜测似乎与夫妻俩一直没有孩子有关，要知道他们急需给格雷弗耶家族的头衔和财富生一个继承人。不过与人们假定的二人禁行婚姻义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禁令解除的时机。1882年3月19日，伊丽莎白和亨利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埃莱娜降生了，时间恰逢伊丽莎白公开诱惑威尔士亲王的那场舞会之后九个月。这表明看到妻子居然令伯蒂魂不守舍，亨利也对她另眼相待，伯蒂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高调（也是头衔最高）的风流情种了。洛尔·德·舍维涅大概会说，没有什么比设想某位亲王的迷恋更让一个贵族的心狂跳不已了。

然而亨利的心并没有狂跳太久。发现贝贝斯怀孕之后，他好久没有回德·阿斯托格街；她抱怨说仿佛“他（在）躲一个传染病人”。[14]他消失了好久，以至于伊丽莎白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在离家期间跟别人结婚了。（几十年后，她会发现自己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亨利最恶毒的时候往往会说伊丽莎白不是“真正的格雷弗耶夫人”——他的某一位（或多位）情妇才是。

当时，他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羞辱是专为她预备的。伊丽莎白在妊娠中期对米米说，她刚刚收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一封匿名信，在接下来的50年，她从亨利的情妇们（有时是亨利本人，那是他特别想激怒她的时候）那里收到了数十封这样的短信。[15]那封未署名的信上写满了错别字、威胁和下流的俚语，说亨利根本不爱她，他鄙视她的家族，觉得她瘦得让人讨厌［“你的（原文如此）就是一麻袋骨头，对吧大姐”］，还说她的床上功夫满足不了他。

结婚近三年后，看到亨利在外通奸的证据并没有让伊丽莎白吃惊，令她吃惊的是除了对她不忠之外，他居然还在她的情敌们面前侮辱她。他素来嚷着要装门面、做样子，却在背后毫不犹豫地诽谤伊丽莎白。她又一次陷入了沮丧。“我曾经感觉到的爱情已先我而死”，她在一封没有编号的日记中写道，纸页上沾满了泪痕。“它被杀死了，躺在我面前的坟墓里。”

他们的爱已死，但伊丽莎白却动弹不得；虽然法国1884年就已经宣布离婚合法化了，但在她那个阶层，离婚仍是个抹不掉的污点。如果她离开亨利，就会给自己和孩子带来不尽的羞辱。何况如果没有他，伊丽莎白就不名一文，他从没有停止过提醒她这一点。“是我的好名姓在养活你”，他会愤怒地说，他说的“养活”的确是字面意思。一天，伊丽莎白和吉吉回德·阿斯托格街吃晚饭时晚了几分钟，亨利就对厨房的人说：“不要给那两个骚货任何吃的！让她们饿死吧！”伊丽莎白写道：“这样不间断的吵闹让我因羞愧而脸红。假如我不必担心丑闻，会有勇气离开这里吗？”[16]答案永远是否定的。

怀孕很艰难；伊丽莎白觉得肚子里有“一群大老鼠小老鼠”在啃噬她。[17]她唯一的安慰就是毫无道理地坚信自己一定能生个男孩。她幻想着一旦“给”丈夫和婆家一个男性继承人，他们就会感激她留住了这个好名姓，如此就能对她好一些了——亨利是格雷弗耶家族的独苗。“如

果是个女孩，我连看都不想看她一眼，你可以直接把她带走，”她对承诺她生产时来巴黎陪她的米米说，“我的荣辱全在此一举了——必须是个男孩。”[18]

她生下的却是个女孩。仿佛那还不够糟，小埃莱娜长得像极了亨利，那双突出的蓝眼睛和过大的鼻子更像费利西泰。虽然米米暖心地安慰她说婴儿大一点儿就会好看了，但伊丽莎白还是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六个月过去了，仍不见女儿的相貌有什么改善，她简短地写道：“我看不出埃莱娜在变好看。”[19]



伊丽莎白唯一的孩子埃莱娜长得很像亨利家的人

伊丽莎白本人则进入了全盛时期，坐完月子，人人都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迷人了。米米在巴黎住了很长时间，对伊丽莎白的“抑郁状态”产生了奇效，让她浑身上下散发出新的魅力光彩，她决定要好好利用一番。从现在起，她准备走进有人欣赏自己的地方——社交圈了。“我承认，”她写信给米米说，

我要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既然有了美女和才女的名声，我

要让男人对我献点儿殷勤了。与其永远吹毛求疵，怪（亨利没有）回报我的投入、我的努力乃至我的爱，怪他为何宁愿躲开我，跟那些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的女人们厮混……（我已经决定）过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光芒四射。[20]

埃莱娜出生后，伊丽莎白养成了引诱其他男人爱上她的习惯，她余生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正如她的传记作家洛尔·伊勒兰（Laure Hillerin）指出的，亨利早已“暴露出他自己与（伊丽莎白）渴望的一切，与她那颗渴望爱、热爱美的灵魂所冀望的一切截然相反”。[21]为了获得补偿，她打算赢得男人们的心——甚至走出了最早那批求爱者的圈子，全然不顾他们是不是和她一样头衔尊贵、精神崇高了。

她追求这一目标的方式往往会暴露她的短处：她过分守礼、过分自信、唯我独尊，而且天真得近乎孩子气。伊丽莎白只想激发男人对她的美丽的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感，以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回报。她希望他们都是她梦想中的豪侠人物：月光骑士和穿绿衣的白马王子。在她的想象中，自己的生命将因他们的崇拜而变得神圣，会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是她丈夫（“我的唐璜”“我的浮士德”）明确拒绝参与的童话般的浪漫传奇。

伊丽莎白为这一角色试探的第一个候选者是60岁的德·欧马勒公爵亨利·德·奥尔良（Henri d’Orléans），他是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巴黎伯爵的叔叔。在所有的奥尔良亲王中，德·欧马勒是法国公众觉得最有魅力的一个，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同情共和派，因此，他还算是个民族英雄。伊丽莎白初次见他是四年前在她的婚礼上，他的出席表明法国王室的那一支对格雷弗耶家族非常重视。她好奇地听说公爵还是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他能入选是因为拥有大量珍贵的艺术品收藏和三万册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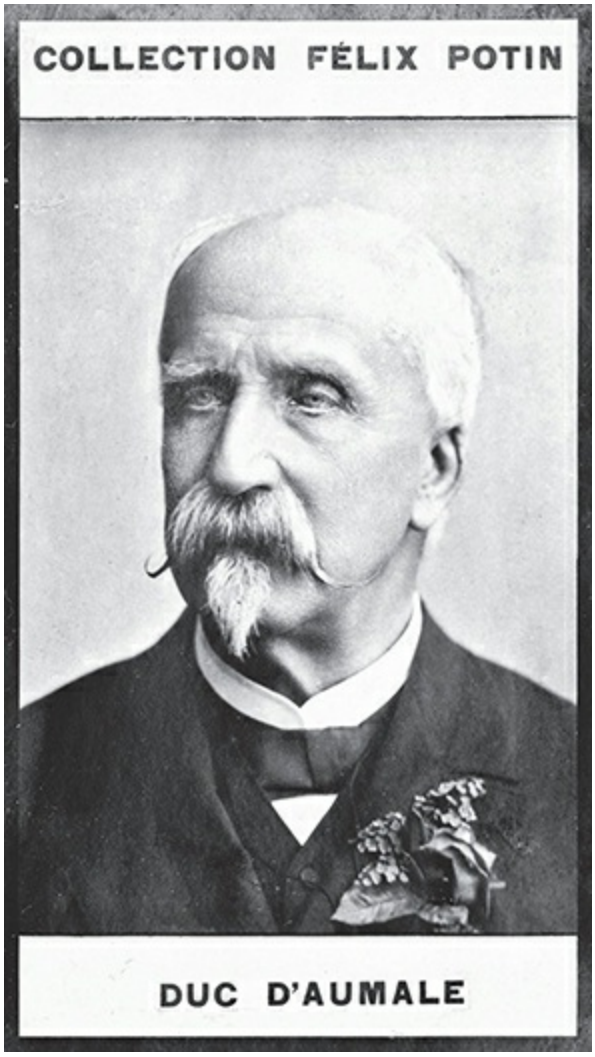
自那以后，伊丽莎白和德·欧马勒在许多社交场合有过交集。但她

似乎直到1884年秋，才第一次把寻找情郎的目光落在他身上，那年他邀请她和亨利到自己位于布德朗森林附近的尚蒂伊庄园参加打猎聚会。理论上，德·欧马勒似乎恰是那种能满足伊丽莎白绝望地“需要成就感”的男人。他既有王室血脉的荣耀、战士的英勇（他的确曾在阿尔及利亚英勇作战，后来还当过那个国家的总督），又有个人悲剧的传奇气质（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全都先他而死），还是个很有文化权威的“不朽者”。

然而近看之下，公爵并没有这些光环。[22]伊丽莎白和亨利到达尚蒂伊打猎时，主人看上去比60岁还要老。几绺稀疏的白发从他黑色的天鹅绒骑手帽下面伸出来，那一撮纤细的白色山羊胡子还是更适合长在真正的山羊而非一位有王室血统的亲王脸上。德·欧马勒那张瘦削的脸被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晒得像动物皮革一样粗糙，脸上沟沟壑壑，因为他不停地抽烟，所以身上有浓重的烟草味道。他的声音沙哑而刺耳，据同代人说，那是因为“多年下达命令”才“变得粗糙”的。[23]和他的表兄尚博尔伯爵一样，他走路也跛着一只脚。公爵关于自己跛脚的玩笑——“我年轻时有柔软的四肢和挺直的身体，现在只有僵硬的四肢和瘫软的身体啦！”[24]——大概会让亨利五世（和洛尔·德·舍维涅）乐不可支，却让伊丽莎白不知所措她期待的理想人物可不是这样的。

这个愚蠢的笑话暴露了德·欧马勒的智识水平有限。他收藏的油画和素描在全法国位列第二，仅次于卢浮宫；藏品包括拉斐尔的《美惠三女神》、乔托[25]的《圣母之死》以及列奥纳多《蒙娜丽莎》的一份裸体预备草稿。然而在领着客人们参观画廊时，他的愚钝再度体现出来：他现场评论的总是前一幅画作。举例来说，他跛行到一幅画着明媚阳光下的绿色橡树的画作跟前，缓慢庄重地说：“看那白茫茫的雪地，如死神一般毫无血色。”[26]他以为自己正在解说挂在橡树画旁边的杰洛姆[27]所绘的雪地决斗场景呢，但公爵毫无察觉。他的解说脚本是提前背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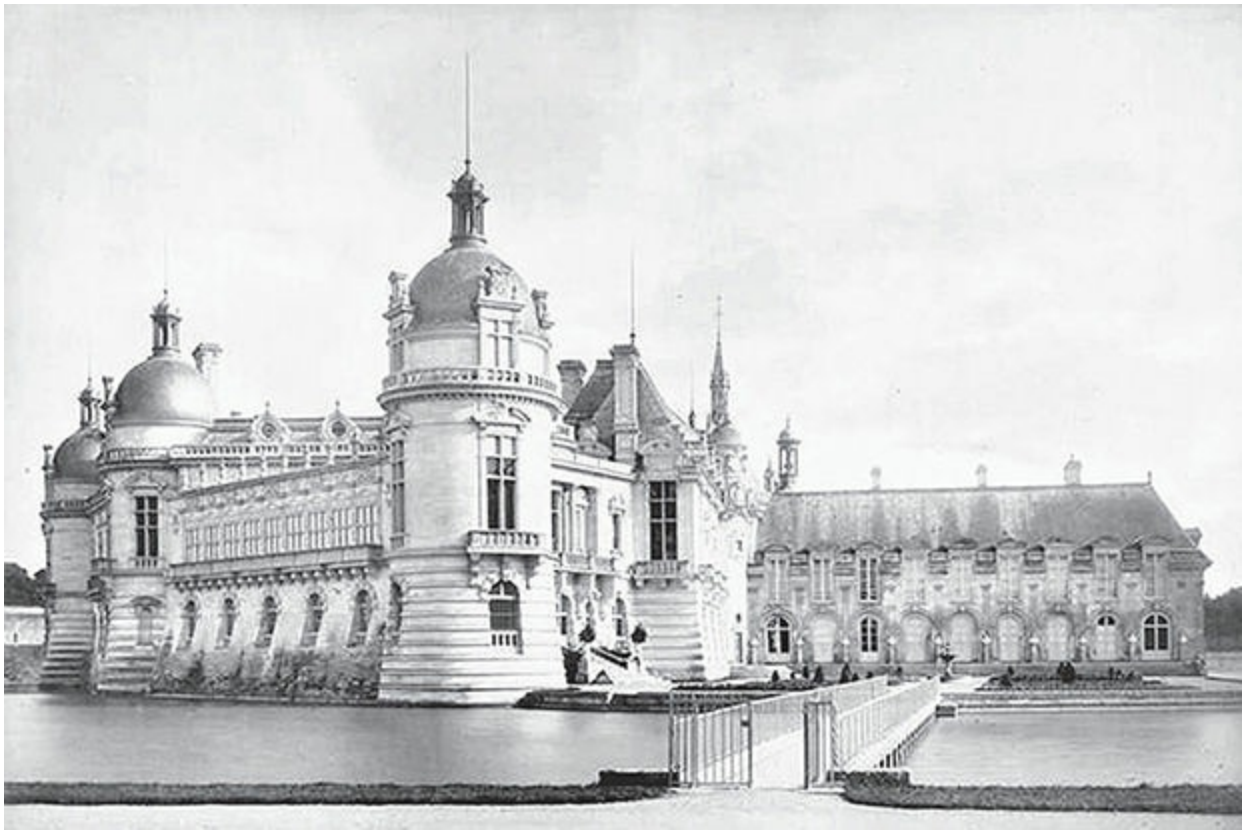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不满是双方面的。她在尚蒂伊的第一晚，晚餐时还像平常一样得体，穿一件合身的白色晚礼服，在颈背处戴一朵硕大的白色百合花——这是向主人的百合花家徽致敬。德·欧马勒虽然开玩笑说自己不举，却素有讨女人喜欢的名声；他还有个长期的情妇，两人相处甚欢。他对伊丽莎白没有不良企图，却如条件反射一般，殷勤赞美她戴着那朵白色的家徽："夫人，您戴上这个就像个仙女。"但她会错了意。这恰是她希望听到的回应。她还没来得及鼓励公爵继续恭维，亨利就快速走过来抓住她的肘部，狠狠地捏了一下。"怎么了贝贝斯，你在搞什么鬼？"



德·欧马勒公爵，奥尔良派国王路易-菲利普之子，吸引了伊丽莎白的兴趣，将他看

作一个有潜力的追求者

亨利的干预让伊丽莎白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跟王室成员调情，哪怕只是为了鄙视他虚伪的占有欲。他们在尚蒂伊剩下的时间里，她动用了所有手段企图征服公爵，却没能成功。德·欧马勒一定后悔说她像“仙女”，因为他接下来的三天都在佯装无视她的扭捏作态，避开她的暗送秋波。拜访结束时，德·欧马勒看到她离开，大松一口气。“格雷弗耶夫人是一朵很容易变成爬藤的百合花。”他对自己的朋友、巴黎著名银行家埃德蒙·茹贝尔（Edmond Joubert）说。[28]上流社会可是个名副其实的流言工厂，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伊丽莎白的耳朵里——古怪的是，居然是洛尔·德·舍维涅说给她的，洛尔的夫家跟茹贝尔有点亲戚关系。不过如果洛尔希望这句引言刺痛伊丽莎白，她可要失望了。伊丽莎白觉得这是一句恭维话，骄傲地命令秘书把它抄下来，归入了一个名为“敬辞和赞美”的卷宗。



德·欧马勒公爵位于布德朗森林附近的尚蒂伊城堡是法国顶尖的猎场之一

尚蒂伊之后，伊丽莎白与另一位著名的法国亲王开启了一段更成功的风流韵事。这段关系的催化剂是1883年春，埃莱娜刚出生那段时间，她突然收到的一封电报：

> 昨天上午在皇家路上，一个酷似女王的美丽身影穿着那种不可思议的督政府时期的斗篷，让一个男人因为崇拜和欣赏而呆住了。每个人都在说着同一个词：非凡。这个男人后来对朋友们说的也是这个词，意思是优美、荣耀以及众人的敬畏。朋友们答道："笨蛋！你昨天才发现啊？"我想知道这位王室美人的名字，请帮帮我。——萨冈[29]

在那以前的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德·萨冈亲王博松·德·塔勒兰德-佩里戈尔一直是城区的时尚之王。能够吸引他的目光令伊丽莎白喜出望外，尤其是她还知道亨利厌恶此人。她在档案中的一张纸条上详细记录了亨利单方面与萨冈不共戴天的原因。在他与伊丽莎白结婚前几年，亨利曾与体态丰满的金发女演员布兰奇·皮尔逊（Blanche Pierson）有过一段私情，在她身上花了很多钱。[30]他自以为他的慷慨足以换得布兰奇的忠贞。因此有一天他到（自己买给）她的公寓，居然见到她正在温柔地给萨冈洗脚，大为惊愕。亨利当场泪流满面，一生誓不原谅亲王在这场背叛中所扮演的角色。近十年后，每当亨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会泪眼蒙眬："太可怕了！"他会抽泣着说："他可是来我家赴过晚宴的人！"[31]

伊丽莎白知道萨冈是妹夫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的好友——事实上两位亲王还是表亲——便设法让德·阿伦贝格夫妇在他们的沙龙里把他介绍给自己，亨利素来厌恶妹夫，千方百计不去参加他们的沙龙。（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也一样讨厌这位内兄，自然十分愿意导演这场邂逅。）23岁的子爵夫人与51岁的亲王在德·拉维勒-勒维克街一见如故。

萨冈立即给伊丽莎白提供了一些他著名的时尚建议，把她带到克里德那里去对她的全套骑手服饰来了一番改头换面。[32]《吉尔·布拉斯报》谄媚地说起了这次改造：

> 格雷弗耶子爵夫人新做的狩猎服必将成为每个人追逐的典范：用墨绿色起绒粗呢做成的百褶窄裙长不过脚踝，里面是白色的丝质灯笼裤，柔软的小牛皮靴子。上身是一件蕾丝镶边的香桃木色双排扣外套，上面有许多口袋；一件绒面革马甲；一件麻纱领；还有一顶圆边毡帽，帽檐上装饰着一束真正的石楠花。[33]



著名的时尚之王德·萨冈亲王成了伊丽莎白的时尚导师和专一的崇拜者

伊丽莎白愉快地欢迎萨冈进入她那个小小的亲信圈，激起了那个圈子中另外一位主要成员罗贝尔舅舅的强烈反对。孟德斯鸠在写给她的信中提到这位新对手时，引用维克多·雨果在拿破仑三世1851年政变之后那句浮夸的威胁说："如果我们中间还剩下一个人，那一定是我。"[34][35]事情根本没到那一步，但他自那以后始终拒绝与萨冈同处一室。在伊丽莎白与亲王结交很多年后，孟德斯鸠在一个为了向他致敬而举办的午餐会上看到萨冈在座，仍愤然起身，拂袖而去。

孟德斯鸠的忌妒源于一个误解，他以为萨冈想取代他，成为伊丽莎白最信任的朋友和导师。其实，亲王是想做她的情人。萨冈在一连串炽烈的信件、电报和电话（1883年德·阿斯托格街上首次安装电话）中表达的激情给她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伊丽莎白对他虽然没有爱意，却喜欢有他陪伴在侧。让亨利怒不可遏的是，她已经开始与亲王一起出入社交场所了（作为她妹夫的表亲，萨冈在理论上是她的亲戚，因此可以扮演合适的监护人角色），也享受与他同行所带来的声望。她兴奋地在每周四奥特伊赛马场的比赛开幕式上与萨冈和威尔士亲王一同站在王室的有篷看台上；萨冈凭一己之力在那里举办赛马，作为对上流社会每周日的隆尚赛马会的义务性补充。她兴奋地在喜歌剧院里坐在他身旁的上座，他（同样凭一己之力）让每周二的预约之夜成为上层的礼仪。她兴奋地在社交专栏里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他的名字旁边，向全世界宣布她与时尚之王的友谊。

萨冈虽然对艺术一窍不通，但他的好朋友夏尔·阿斯精通此道，他把阿斯介绍给伊丽莎白，三人一起去参观最新的画廊开幕式和博物馆展览。两个男人亲切而充满鼓励地赞美她对艺术的喜好，甚至在她自己的创作尝试中充当模特，不像亨利那样无情地不屑一顾。萨冈站在德·阿斯托格街的冬季花园里请她拍摄了一张照片，而阿斯则请她画了一张钢笔肖像画作为她美术课的作业。不过阿斯虽然英俊潇洒，却行踪不定，社交日程排得很满，伊丽莎白从来不清楚下次会在什么时候再见到他，

萨冈则始终随叫随到。不管伊丽莎白想去哪里，总能请到他来陪伴，他曾说过她就是一位女王，总以侍奉女王之礼待她。

最重要的是，萨冈喜欢跟她讨论时尚，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就细节提供自己的见解，诸如哪一种帽型适合她的漂亮脸型，或者裙子如何裁剪才更能突出她的优美身段。讨论她的“美的实验”似乎从来不会让他厌倦。（或许他很欣慰不必就与服装无关的话题搜肠刮肚。）偶尔，亲王会稍稍越过边界，惊呼她的美貌“把他逼疯了”。但就连这温和的越界在伊丽莎白看来也是洒脱迷人的。萨冈从不会太过分，而她永远欢迎有人提醒自己魅力十足。



伊丽莎白学习了素描、绘画和摄影，朋友和家人常常被她用作模特，包括左图中的夏尔·阿斯

在所有这些方面，亲王都是伊丽莎白理想的追求者。“无论何时，我们都能对彼此心领神会，还不乏热情！”她在一篇题为《错误的邂逅》（“False Encounters”）的文章中写道。“你对我说的话就像一连串充满爱意的赞美。我们是一体的，因为你相信我的梦，而那也是你的梦。”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共同的梦是两人共同痴迷于她一个人的美

——并非彼此吸引。与德·欧马勒公爵不同，萨冈才刚过五十，仍然活力十足，对爱倾心。但伊丽莎白虽然觉得他健美的身材和精心裁剪的衣装、十足贵族范儿的五官和那头浓密的白发让他鹤立鸡群，却对他没有肉体上的爱欲。在《错误的邂逅》中，她哀叹自己面临的难题不公平，反问道：“哦，为什么你所在的身体无法吸引我，为什么我无法爱上你的身体？”[36]

伊丽莎白对萨冈的爱只是精神上的，为此她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希望对他们两人都好。她对吉吉说，她决定用文字的方式与他调情，“让亲王因期待而激动不已”。[37]不光是给他写信，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写了一份正式的敬辞，分期寄给他。她在那份文本中用理智而无性的方式回报了新朋友的爱。

伊丽莎白请布德朗森林附近一个镇上的印刷商把她写完的小册子印在精美奢华的卡纸上[38]，她在其中赞美了笔下之人传奇的时尚风度：

> 见之忘俗（impressionner）是那些超群绝伦之人所拥有的妙不可言的气质的明显特征，那种气质让普通人说：“他”或“她”“与众不同”。
>
> 他是巴黎城里最优雅的男人，总是穿一袭黑衣，绕颈缠着一条黑色的波纹丝带（一头固定着他的单片眼镜），沉稳中不失雅致，古朴里蕴含情调……
>
> 德·X亲王的单片眼镜是一个晴雨表，标注的是他所审视的女人的美丽级别。如果他把它紧贴着自己那只内行的眼睛，就表明他对（她）姣美的容貌十分满意。如果他干脆冷冷地放下它，你就能看出他对眼前这女人的容貌毫无兴趣。他的单片眼镜是个立法者，道出令人胆寒的最终判决。

表面上，这篇颂文只是在重复同时代每一篇描写萨冈的文字中都会提到的陈词滥调：他的优雅形象，以及他作为时尚领军人物的至上权威。伊丽莎白这篇颂词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她对自己亦不吝赞美。从小册子的第二页开始，她赞颂的就不光是“他”，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她”，用的恰是她在《引领时尚的女人》中对自己所用的句式。她提到亲王标志性的单片眼镜（那是他本人引入时尚的男性饰品，他觉得戴眼镜太像资产阶级了）时，称它是用来欣赏女性“容貌”的。[39]在她看来，萨冈最出众的标志既不是他著名的单片眼镜，也不是他同样著名的白发，而是他对女性魅力的鉴赏力。

在这部小册子的第二部分，伊丽莎白改变了重点。她援引祖父翻译的彼特拉克的诗，将萨冈写成一位殷勤的情人，为一位高不可攀的理想女性而深深着迷：

> 他总是跟在她的身后，关注她的内心，服从，而从不发号施令。如果担心自己会超越爱的界限（outre-amour），他甚至会保护她不受自己的侵犯！因为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角色，是一位豪侠仗义的绅士……他为这个美丽女人的美而对她心怀感激，一如对待艺术一样愉悦欢喜而毫无自私自利，只有真正的情人才会那么做。他崇拜高贵，尊重珍品。[40]

这些句子里透着明显的自鸣得意。如果说亲王是可敬的，那是因为他欣赏“她的”美，对“她”视若“珍宝”，甚至会“保护她”不受自己低级本能的侵犯，完全出于感激“她的”美好而放弃肉体的愉悦，他认为美好本身就是回报——“只有真正的情人才会那么做”。

如此一来，亲王这位“情人”就与虚构的德·蒙泰伊昂公爵和现实的格雷弗耶子爵截然相反了。伊丽莎白虚构的和现实中的丈夫都在婚床上罪恶地亵渎了妻子的贞洁，而萨冈却把他的情人当作偶像一样崇拜，那才是她应有的位置。正如伊丽莎白在自己的小册子中写到的，他是她的

骑士理想，是她的白马王子，只不过没有身穿绿衣，而是在一套黑色的萨维尔街西装外穿一件白色的凸纹背心。

遗憾的是，伊丽莎白的档案中没有提到萨冈对这篇文章做何反应，但其后很多年，他一直忠实地、看似在精神上爱恋着她。她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曾对一位采访者说："德·萨冈亲王一直到死都崇拜着我。"这倒不一定是真的：萨冈1897年中风了，余生都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说话。但在这一悲剧发生之前，他似乎接受了伊丽莎白的小册子为他们的友谊开列的条件。他安于以"不乏热情的心领神会"爱着她：一种突出风格而欠缺性欲的感情。超出此界的一切都会让伊丽莎白觉得受到"玷污"而离开他。正如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写的，"资产阶级的肉欲"为她所不齿。

或者起码她是这么想的，直到另一位亲王的出现，彻底改写了她两情相悦的无性之爱的脚本。

伊丽莎白1884年夏天初遇他时，被法国人称为让·博尔盖塞亲王的堂·乔万尼·巴蒂斯塔·博尔盖塞（Don Giovanni Battista Borghese）28岁，只比她大四岁。他皮肤黝黑、长相英俊，有个很相称的绰号叫"罗马社交界的白马王子"[41]，虽然个子不高，仪态却像猫一样轻盈优雅，因而伊丽莎白和吉吉在通信中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黑豹"。[42]乔万尼长着线条硬朗的下颌、贵族式的瘦长体形、精心修剪的黑色络腮胡子，还有一双拉罗什富科家族典型的锐利的蓝眼睛，这双眼睛长在她婆母和孩子的脸上或许让伊丽莎白厌恶，长在他的脸上却异常迷人。他是费利西泰那位闺名泰蕾兹·德·拉罗什富科的妹妹的儿子，是亨利的嫡亲表弟。

乔万尼不仅母亲是贵族，他的父亲是第九代苏尔莫纳[43]亲王马尔坎托尼奥五世（Marcantonio V），因此他属于意大利和法国贵族阶层的最高梯队。马尔坎托尼奥五世的母亲也来自拉罗什富科家族，闺名阿代拉伊德（Adélaïde）；在罗马，有人说她毒死了儿子的第一任妻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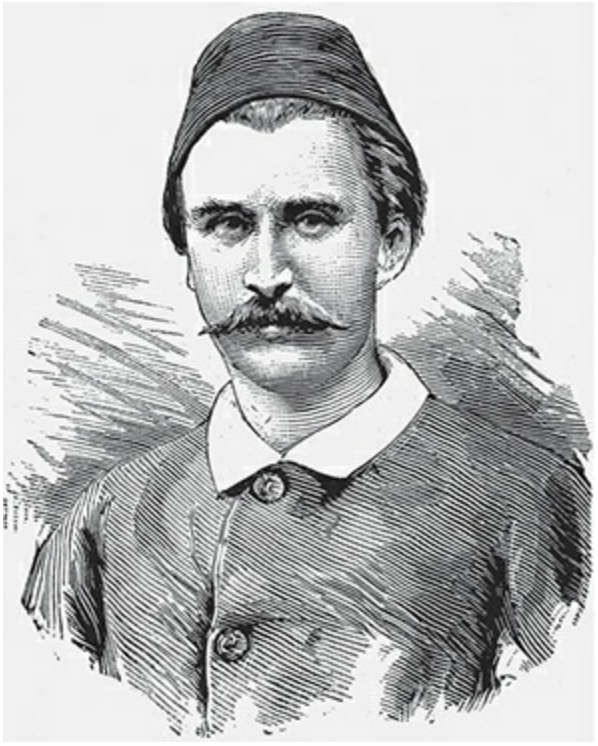
便为他和自己拉罗什富科家族的侄女泰蕾兹的婚姻铺平道路。[44]（这个家族就是有好战的家族精神，并非“座次”·德·拉罗什富科所独有。）如果这的确是阿代拉伊德的计划，那么她成功了：马尔坎托尼奥真的娶了泰蕾兹，两人生了九个孩子。乔万尼在七个儿子中排行倒数第二，与母亲极为亲近。据他的一位密友说：“在所有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中，他最爱的就是母亲。”[45]

博尔盖塞是一个双文化和双语家族，虽然在法国有很深的渊源，他们大多数时间却住在罗马，有时住在台伯河畔的博尔盖塞宫（Palazzo Borghese），有时住在博尔盖塞庄园，那是西班牙阶梯[46]以北的一处占地148英亩的庭院，里面保存着他们传说中的艺术藏品。虽然传说他们极为富裕，但博尔盖塞家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土地和艺术之类不可变现的资产。为了保持偿付能力，马尔坎托尼奥和他的长子及继承人保罗开始涉足罗马的投机性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到十年后，这些计划将以丑闻告终，整个家族被推向财务破产的边缘。[47]

乔万尼还年轻，不急着成家立业，他也不必着急，因为已经有四个哥哥给父母生下了继承人。但因为英俊迷人，家世良好，他自然成了罗马的媒人们争抢的目标，在巴黎也一样，只不过（因为他不常来巴黎）没有那么热烈罢了。为了躲开这些爱管闲事的人，他决定周游世界，起点就是1883年作为罗马教廷代表团的一员赴莫斯科参加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加冕礼。理论上只有高级教士才有资格享受这一殊荣，但自从他们的祖先保禄五世[48]出任教宗以来，博尔盖塞家族在梵蒂冈一直有着很大的势力，乔万尼入选代表团就是证明。根据教宗的命令，乔万尼被授予马耳他骑士团的荣誉爵士之位，马耳他骑士团是一个主权宗教骑士团，人称“教宗侍卫队”。[49][50]带着这一头衔，乔万尼加入了教宗的莫斯科远征队。



不久将成为保加利亚摄政王（和后来的沙皇）的费迪南亲王是个喜欢卖弄的怪人，
是乔万尼·博尔盖塞的好朋友



堂·乔万尼·博尔盖塞是个狂热的探险家，资助并参与了**1880**年的一次穿越中非的探险

鉴于“全俄国的沙皇和独裁者”当时掌握的权力无出其右，乔万尼参加这次帝王加冕典礼也间接让国内的众人高看他一分；无论在罗马还是巴黎，鲜见哪位贵族受邀参加这次加冕礼。他也因为在莫斯科期间结交的王室友人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费迪南（福克西）·德·萨克森-科堡亲王［Prince Ferdinand（Foxy）de Saxe-Cobourg］。[51]费迪南1861年生于维也纳，属于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的军官那一支系，与全欧洲的大多数王室都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甚至与少数拉丁美洲王室成员也有关系。他的母亲克莱芒蒂娜·德·奥尔良王妃（Princesse Clémentine d’Orléans）是路易-菲利普所有的孩子中最坚定、最有抱负，据说也是最聪明的。传说从费迪南的孩提时代起，母亲就谋划让他登上王位（不管哪国的王位）了。

年轻亲王的德·奥尔良血统和庞大的王室表亲网络让他成为巴黎社

交圈无尽幻想的对象。然而由于他住在维也纳，上层关于他的大多数消息都是谣言，乔万尼的巴黎朋友们指望他来证实那些谣言——如果能添油加醋，就更好了。乔万尼言行谨慎，很少说长道短，更不会为了逗同伴一乐而编故事。不过他确实驳斥了某些对好友的恶意毁谤，诸如有人说费迪南崇拜撒旦，还有人说他整日盯着卡布里岛上的年轻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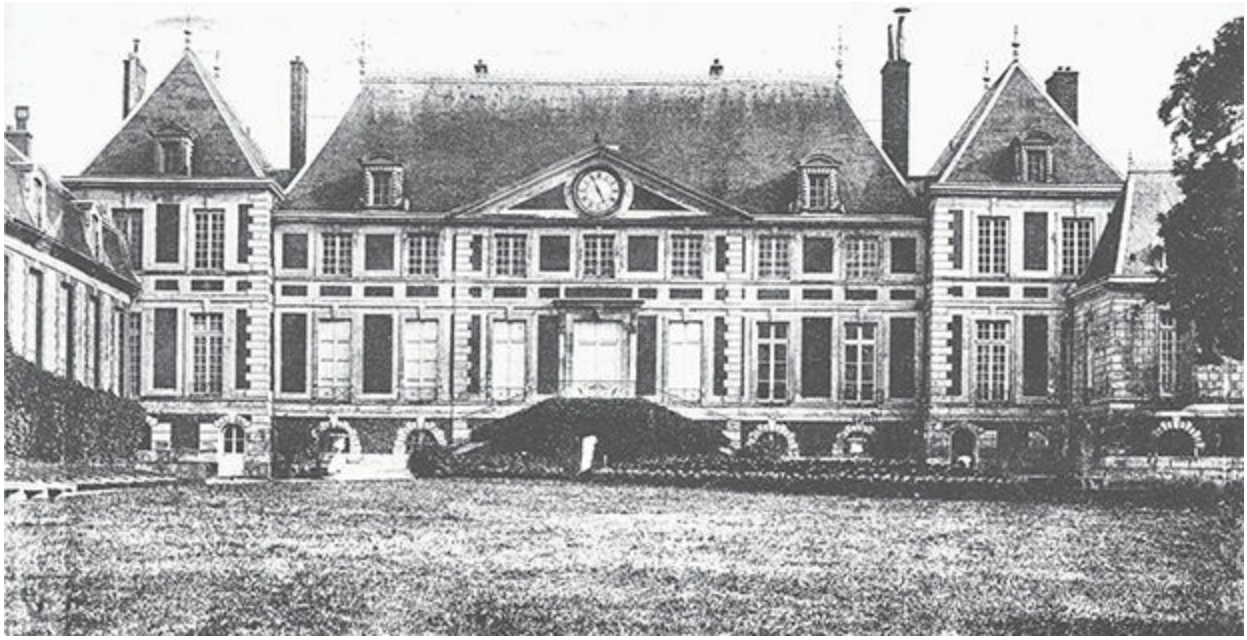
还有些得到乔万尼证实的传言不那么下流，诸如费迪南没有来由地怕马（虽然他在奥匈帝国骑兵队的职衔很高），还有他“女里女气的”着装风格。[52]被维也纳同胞称为“女人费迪南”的他涂抹化妆品，穿女士胸衣，戴名贵珠宝；有一次参加英国王室葬礼时，还戴了一顶他自己设计的桃红缎子头巾帽。此外，他到哪儿都带着一条哼哧哼哧的浮夸巴哥犬“布比”，得意地说那是他的表姐维多利亚女王送给他的礼物。费迪南不知道的是，女王根本受不了他，把布比送给他也绝非出于善意。

关于费迪南，最精彩的故事跟他痴迷王室徽章有关，那和宝石、蝴蝶和异鸟并列为他的几大收藏。[53]在莫斯科参加加冕礼期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予外国贵宾荣誉勋章。费迪南收到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54]后，把他（特别显眼的）鼻子翘得老高，说他想要象征着更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55]。全俄国的独裁者被他的无礼激怒了，高声答道：“那个小王子连圣亚历山大勋章都不配戴！”[56]费迪南带着他那个次一等的勋章溜走了，但沙皇从没有原谅过他的粗鲁无礼。

虽然有很多古怪的癖好，但喜欢费迪南的人都会欣赏他聪明、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且极有修养。他是个勇敢无畏的探险家，走遍了欧洲、非洲和美洲。1879年，他曾与哥哥卢德维格·奥古斯特（Ludwig August）一起环球航行，两人在巴西海岸有一些著名的植物学发现。[57]乔万尼和费迪南一样喜欢出国旅行。沙皇加冕礼三年前，他加入了第一批从东到西穿越非洲的欧洲探险家队伍，用自己的积蓄资助这次旅行（因此地理学文献中将这次探险命名为“博尔盖塞远征”）。[58]正如乔万

尼后来对伊丽莎白解释的那样，就连久经考验的探险家也曾警告他们，万万不可从西到东穿越非洲。

乔万尼和他的两个意大利旅伴佩莱格里诺·马泰乌奇博士（Dr. Pellegrino Matteucci）和阿方索·德·马萨里队长（Commandante Alfonso M. Massari）决心证明既有观念是谬误，于1880年2月从红海港口萨瓦金[59]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大西洋沿岸的几内亚湾。在其后13个月里，他们步行或骑骆驼向西南横穿苏丹。行至达尔富尔时，整个旅行只走完了五分之一，乔万尼收到了母亲的一封电报。她称自己得了重病，恳求他立即回罗马。[60]（罗马的传言后来推测说，泰蕾兹王妃命令儿子回国时身体很健康，只是想让作为天主教亲王的儿子远离疯狂的伊斯兰世界的威胁。[61]）他的两个同伴在他离开后完成了远征。马泰乌奇在那不久以后死于黄热病。



1884年，伊丽莎白和乔万尼初次见面是在德·盖尔芒特城堡参加两人共同的一位亲戚的葬礼上

乔万尼离开非洲之前，努佩[62]苏丹送了他一个特别的纪念品：一

张大猎物的兽皮。各类第三方叙述对这张兽皮的解释不一，有人说是金钱豹皮，有人说是黑豹皮。[63]这个令人难忘的纪念品大概和乔万尼如猫一样优美轻盈的姿态一样，是伊丽莎白和吉吉为他取那个代号的灵感来源——特别是他可能曾把这张毛皮作为礼物送给她，她在野兽舞会上的装束或许能证实这一点。想想她在那场舞会上的装束模仿的是列奥纳多的《施洗者圣约翰》肖像，“施洗者圣约翰”的意大利语正是“乔万尼·巴蒂斯塔”，她在那次舞会上穿戴的金钱豹皮很可能就是乔万尼的。那次的豹皮装束明显不同于她以前的女王装束，大概就是以隐秘的方式向她最近的白马王子致敬吧。

那场迷恋始于1884年7月，她和乔万尼是在他和亨利的一位母系远房亲戚、两度丧偶的八旬老人皮科·德·当皮埃尔伯爵夫人（Comtesse Picot de Dampierre）的葬礼上认识的，伯爵夫人闺名欧内斯廷·普朗德里·德·盖尔芒特（Émilie-ernestine Prondre de Guermantes）。[64]在巴黎开了一场追悼会后，葬礼在盖尔芒特城堡的家族教堂地窖里举行，那座路易十三时期的城堡位于塞纳-马恩地区，砖石外立面，双重斜坡屋顶。

已故的欧内斯廷在该地区是出了名的放荡不羁、尖酸刻薄。如果她觉得神父讲道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在专属于盖尔芒特家族的教堂长椅上尖叫：“够了，神父！闭嘴吧，神父！”[65]一次她去参观罗斯柴尔德家族1850年代建起的奢华城堡费里埃时，对主人们脱口喊道：“这地方就是个精品店嘛，我家那个才是城堡！”[66]参观附近的另一个庄园时，因为主人是个富有的可可商，她就称呼主人为“可可男爵”，还不停地叫唤：“可可！可可！”[67]

在欧内斯廷的拉罗什富科亲戚看来，这些粗鲁话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她的地位尊贵；他们认为，她作为一个位高年长的贵妇人，有权鄙视比她地位低下的人。她在盖尔芒特城堡的教堂下安葬之后（她是世上最后一个拥有该姓氏的人），整个家族深情回忆欧内斯廷，对她的离世充

满惋惜之情。不过伊丽莎白和乔万尼都不认识她，两人对家人的追思都没有多大贡献。他们变成了谈话的边缘人物，就自然而然地彼此吸引了。

另一个共性大概就是已故的欧内斯廷曾经充满优越感地与费里埃相提并论的城堡居然如此邋遢，让两人都觉得好笑。[68]乔万尼作为拥有全世界最大私人艺术收藏的家族的子弟，和伊丽莎白一样热爱和欣赏美丽的东西（“对他来说，美才是真正的宗教”，她赞许地写道），盖尔芒特家毫无美感，到了近乎滑稽的地步。老鼠已经繁衍了若干代，一直在啃食接待厅里悬挂的那些油画，那间31米长的画室天花板上的壁画不过是20年前画上去的，却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污垢。仆人们用的扫帚直接用楔子挂在17世纪的护壁板上，吝啬的欧内斯廷在餐厅的墙上铺的是仿科尔多瓦革的廉价墙纸。

乔万尼种种智识上的兴趣也很吸引伊丽莎白。他是个运动健将，却跟她认识的大多数人相反，更喜欢读书而非打猎。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小说、诗歌、历史、宗教和哲学作品，对这些领域的话题都能侃侃而谈且很有见地。（马塞尔·普鲁斯特是1890年代中期与乔万尼交好的，他曾说后者是非常健谈的人。）乔万尼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文学，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作家。他对伊丽莎白说，他希望有一天至少能迁居巴黎，加入艺术家联盟组织，顾名思义，那是男士俱乐部中最有艺术气质的。[69]

在这些方面，乔万尼的感受力也跟伊丽莎白十分投契，没过多久，她就断定两人是灵魂伴侣，被一种看不见但不可否认的电流击中了。他们在盖尔芒特城堡的那段时间，每天只要想到即将见到他，她的期待就强烈得近乎疼痛。在亨利、费利西泰和其他家庭成员面前，伊丽莎白小心地掩饰着自己的激动。谈到乔万尼时，她彬彬有礼，装出冷静、庄重的中立态度。她想：“社交圈创造了一套现成的语言，来自该阶层的人

必须使用那套语言……它掩盖了所有的情感，不管是最冷漠的无动于衷，还是最真诚的温情爱意。”[70]然而在与乔万尼交谈时，她觉得那种束缚竟也能制造出它自己的刺激：

> 当你用冷冷的得体语言去掩盖一种强烈的情感，它一听就是假的、完全相反的，由此而可爱又慌乱地支支吾吾竟然比最热烈的语词更令人喜悦。

伊丽莎白相信他能读懂每当他在场时她总是出错，慌乱地期期艾艾；她相信他懂得在他们两人之间，闲聊绝非无聊之举。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每次随意聊到那些平庸的事物和我们热爱的事物时，”她写道，“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像是跟我们作对。”[71]）整个家族在盖尔芒特庄园的团聚结束后，乔万尼和母亲一起回到意大利，而伊丽莎白与亨利和埃莱娜一起去诺曼底的海滨度假胜地迪耶普度假。格雷弗耶一家入住豪华的皇家酒店（Hôtel Royal），该酒店在宣传中称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酒店，整个八月，他们一直住在那里。[72]

德·萨冈亲王和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都住不起这家酒店，但两人都急于重新进入伊丽莎白的生活圈，不久也分别在那里下榻了。亨利和往常一样找到了其他的乐子，她就和两位亲王一起沿木板路散步（这里就是上层夏季期间的金合欢路），带埃莱娜到酒店的私人沙滩上去看海鸥。

这期间，她一直想念着乔万尼。整个夏天，以及随之而来的秋冬，她给他写了很多语气亲密、倾诉衷肠的信，讲述她不幸的婚姻和“她沉重的个人负担”。她对他说自己多么渴望逃离；多么羡慕玛丽·德·迈利-内勒（Marie de Mailly-nesle），这位年轻优雅的名媛离开了不负责任的丈夫，与一位温雅自信的波兰歌剧演员私奔了——伊丽莎白写道，从那

以后，她看上去“容光焕发”。

乔万尼回信的态度摇摆不定。在某些信中，他听起来和伊丽莎白一样备受煎熬，用抒情的语气写他们的通信让他多么开心、多么陶醉。他有一次对她说起一个孤独的冬夜，他的“心绪变得和天空一样阴郁冰冷”[73]时，一个来自布德朗森林的信封到了，散发出“我永生难忘的愉悦香气”，他的忧郁在“耀眼的光辉中”一消而散。[74]但有时他给她的印象是被她的过于强势吓着了。看到她热情地讲述玛丽·德·迈利-内勒的丑闻时，乔万尼似乎担心伊丽莎白想把这事作为他们两人效仿的范例。他在回信中敦促她忘了自己：

> 我亲爱的朋友，不要为了我而折磨自己——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成为你的心病，想到你的负担本已过重，我于心不忍……我请求你，不要再想我了——抱怨生活是没用的，虽然我的生活中也有难处，我也有过机会，其他人知道如何将它们变得对自己有利，而我却并没有从中获益……那位“容光焕发”的M（玛丽·德·迈利-内勒），她【比我】坚强、勇敢，知道在面对牺牲时如何充分利用机会……对她的勇气担当，生活理应回报她以快乐。不要担心我，我不配；我从不知道如何从“我的语言引发的行动”中获益。[75]

乔万尼祈求两人保持距离，但没有得到他期待的结果。伊丽莎白从小习惯了被人追求，她对自己说，他的退缩只是在表达过于浓烈的爱意。正如她与德·欧马勒公爵那场失败的调情所表现的一样，百合花变得比爬藤还缠人。她继续接二连三地给乔万尼写信，诉说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和对爱情的渴望。她给他寄去了自己的几张照片（包括纳达尔拍摄的那张她身穿“T.T.”服饰的肖像），也得到了他的一张照片作为回报。



玛丽·德·迈利-内勒与歌剧演员雷什克私奔，成为上层的一桩丑闻

看到乔万尼继续写来心乱如麻的信，伊丽莎白对他的感情更加强烈了，无意中还有了些色情蕴含。她在亨利的图书室里看到了夏尔·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Tales of Mother Goose*，1697）的1864年版本，用红色的摩洛哥革装订而成，插图用的是画家居斯塔夫·多雷[76]所画的诡异似幻的版画。其中一幅版画一下子吸引住了她：一个身穿舞会长袍的女孩在夜里沿着一段楼梯走出城堡。这幅插图让伊丽莎白有了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性幻想，她把那种幻想变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故事，主人公是她新虚构的第二自我埃莱奥诺尔（Éléonore），这位勇敢美丽的少妇爱上了一位英俊的王子：

> 埃莱奥诺尔一到楼梯下面就能看到王子，王子将陪着她走进舞厅，透过魔法宫殿那些金光闪闪的窗户，便可以看到那里。

她到达舞厅时，音乐停下，所有的目光都转过来，看见她穿着那件缀满宝石的华服翩翩而过，人群窃窃私语，赞叹这位美丽而神秘的女人。

王子会看着他！一种甜蜜的激动击穿了她；她感觉到他在身旁，仿佛他们一起升入虚空。

然后，他们一起出去，走进了魔法花园。她的目光变得恍惚缥缈，耳中传来他甜蜜的耳语，与远处传来的旋律混在一起，然后……[77]

画面在这里中断了，但是根据手稿中一个注解的说法，在此之前，埃莱奥诺尔的“想象产生了一种肉体需求，（她的）身体盲目却又狂热地渴望那种肉体需求”。

伊丽莎白狂热而盲目的饥渴让她变得勇敢起来。她把埃莱奥诺尔文本的一个副本寄给了乔万尼，仿佛是为了挑战他有没有胆量承认这样的通信多么有伤风化，而激发她写出这些信件的渴望有多强烈。但他只是重申自己无法兑现“我的语言引发的行动”的警告，简略地说了句，“我们正在走入险境”。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仍怀有希望，认为乔万尼本可以轻易中断两人的通信，但他没有。更有甚者，他利用她的埃莱奥诺尔故事梗概提了一个建议，使两人不但可以而且必须继续定期保持密切联系。乔万尼以她当年应付德·萨冈亲王的方式对待伊丽莎白，不能不说是因果报应：他试图把二人的友谊从“险境”过渡到看似安全的、无性的写作领域。

在一封署期为1884年12月1日的长信中，乔万尼简述了他的计划：他希望伊丽莎白和他一起写一部小说。他对小说的情节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但这个做法本身就让人激动。这将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内容是

他和伊丽莎白（一）以小说的两位主人公、注定无法终成眷属的埃莱奥诺尔和热拉尔的名义；及/或（二）以他们自己的名义——但假装埃莱奥诺尔和热拉尔是他们认识的真实人物，是两个姻亲表兄妹可以无伤大雅地闲聊的人——写成的信件。[78]不知道伊丽莎白是否警告过乔万尼说亨利喜欢随意翻阅她的私人文件。如果她警告过他，那么以第三人称写写他们的第二自我，对她和乔万尼两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安全措施。

不过他随即指出，以埃莱奥诺尔和热拉尔的名义写作，以及写作这两个人的故事这“两重巧计”不光是为保护隐私，也是出于文学艺术技巧的考虑。在书稿中“注入一点神性的、活生生的现实”可以让他和伊丽莎白重塑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他们的这一努力或许能对小说这种体裁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伊丽莎白的埃莱奥诺尔片段启发了两人朝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现在乔万尼鼓励她继续走下去，让他也参与到这一文学旅程中。

> 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要是能像龚（古尔）氏兄弟那样一起写点什么，该多惬意啊！他们常常并肩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在同一张纸上写作！……他们的合作模式至今无人模仿。……即便我们最终的作品有瑕疵，写作的过程也会很有趣，不是吗？还有，我们远隔千里，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变成有趣的文字给对方看，对不对？……这难道不是奇迹，不是命中注定……让我们隐身于众目睽睽之下，继续保持联系？……在书店橱窗里看到（我们的书）——一本人人传诵的神秘的书，该多奇妙啊！……或许写作这本书要花很长时间；不过你看树上的鸟儿一根一根地衔来树枝，却仍然能在爱的季节里飞速地筑起爱巢！[79]

这一提议打动伊丽莎白有若干原因。首先，她喜欢两人组成创作搭档的想法。她一直笔耕不辍地进行秘密的文学尝试，只有罗贝尔舅舅一

个读者已经让她觉得不够了。他起初曾积极鼓励她的文学创作，最近却对她的作品失去了热情。不久以前，她总算鼓起勇气把玛丽-爱丽丝的手稿拿给他看，却被他用一句刻薄话怼了回来："一个早熟的小女孩含混不清的叙事。"更糟的是，孟德斯鸠还建议她彻底放弃小说，试试保守谨慎一些的目标，比如说翻译他们的朋友惠斯勒的文章。在她拒绝了舅舅的建议之后，他又说一个作家必须掌握基本的技巧才能开始真正的艺术实践，"就像总得先练习弹音阶才能弹赋格曲吧"！这些话动摇了伊丽莎白对自己的文学天赋的信心；乔万尼的建议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重新激发起她的自信和创作渴望。

一想到她和乔万尼可能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对埃德蒙和朱尔·德·龚古尔的呼应，伊丽莎白更是备感荣幸。1870年朱尔去世之前，龚古尔兄弟共同写作了无数小说、历史和艺术评论作品，"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在同一张纸上"写作，据说两人分开的时间从未超过一天。（埃德蒙和朱尔都不曾结婚，埃德蒙有"同性恋"嫌疑，而朱尔染上了梅毒。）时至今日，埃德蒙·德·龚古尔仍然是文学世界的幕后推手；事实上他也是孟德斯鸠毫无保留地表示尊敬的少数几位在世的作家之一。[80]伊丽莎白能以龚古尔兄弟而非其他作家作为自己的榜样，将迫使舅舅承认她的天赋。即便她和乔万尼从未对外人说起过他们合作的小说，她确信待时机成熟，她一定会把它泄露给罗贝尔舅舅。那时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低估了她的艺术才能。

同样甚至更让她激动的，是乔万尼似乎给了她一个加深两人情感联系的机会。他提出把他们的生活写入作品，让她想起了像龚古尔兄弟一样有名，却是基于浪漫爱情而非手足之爱而展开合作的文学搭档：乔治·桑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两位作家的书信为他们的爱情留下了激动人心的记录：这段婚外恋与两人的小说和诗歌一样令伊丽莎白着迷。似乎可以肯定地猜测，乔万尼也很熟悉这两位作家传说中的这个方面，毕竟他都能背诵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了。几个月前，伊丽莎白曾写信讲述了她

关于“和谐”的超凡力量的沉思。让她高兴的是，他在回信中引用了两句缪塞的诗：“痛苦的女儿呵，和谐！和谐！/为歌唱爱情，天才创造了这个语言！”[81][82]

这里引用的诗歌再次让伊丽莎白看到了乔万尼的感受力与她多么一致。但这次引用对她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这是她较早甚或最早一次看到他提及爱情。这背离了上流社会语言冷静得体的规范，即便不算出格，也似乎证实了她那么渴望相信的东西：他们深深地被彼此吸引着，两人共有的对艺术的痴迷只是那种内在情感的延伸而已。以同样的逻辑推断，乔万尼设想的文学项目也将认可和加深这一双向的情感纽带。

他的两只鸟儿“在爱的季节”共筑爱巢的比喻，更为伊丽莎白的这一理论添加了底气。他用这样的类比，除了表示他把两人的合作看成求爱之外，还能有什么意思呢？他还建议他们把“一点神性的、活生生的现实”注入埃莱奥诺尔和热拉尔的故事，这不也是明示两人有可能开启浪漫关系吗？在伊丽莎白看来，这一模式将允许乃至鼓励虚构人物之间的爱情溢出到创作者的生活中。就此而言，这一项目也将有助于爱情的发展。

伊丽莎白有这么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同意这一计划，当然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她当天就给他写了回信，说：“我说不出有多愿意把我们的两团火焰变成一团，我们藏在彼此的眼中，但或许注定有朝一日会打动他人的心灵。”

说到底，两人写作小说的过程绝不会像两团火焰的融合一样简单，也不会像共筑鸟巢一样迅速。整个过程前后持续了十多年，其中发生了许多令人心烦的曲折，直到两人的合作关系最终瓦解，伊丽莎白对它怀抱的希望也最终破灭。另外在他们最终分手之前，把他们“神性的、活生生的现实”变成虚构的尝试将让她和乔万尼陷入一个哈哈镜的迷宫里——在那里，想象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难以梳理了。

不过对一个爱上自己的影像的女人而言，哪怕是哈哈镜，也有某种令人眩晕的吸引力。当时，伊丽莎白全身心地欢迎这个折射、修改和放大自己的迷人影像的新机会。她将和堂·乔万尼·博尔盖塞一起隐身于众目睽睽之下，开创一种新的被看见的艺术。

---

[1] AP（II）/101/151；引文又见RM，*Les Roseaux pensants*，307。

[2] EG，in AP（II）/101/152.

[3]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40.

[4]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80；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52. Huas和Painter两人都提到，MP在SG的第二卷一个被放弃的段落中用到了这句妙语。有趣的是，MP认为EG从雷加米埃夫人那里借用了这句关于“小人物”的话；见Jeanne Maurice Pouquet，*The Last Salon*，trans. Lewis Galantière（New York：Harcourt，Brace，1927），325. 关于EG对雷加米埃夫人的认同，见本书第20章。

[5]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23.

[6] HG写给EG的这封信是写在他的伯爵信纸上的，因此写作日期必定是在1888年9月以后；AP（II）/101/32。这里引用的HG对EG说的其他的话也摘自同一档案编号下的信件中。

[7] 伊丽莎白设置了一个名为“亨利写来的讨厌信件”的卷宗，她为其中许多信件加了注解，诸如“他的情妇最近又肥了，所以忌妒我”。——作者注

[8] EG，婚姻日志，1878年10月26日的日记。

[9] 在烟花表演的最后压轴戏中，玛萨侯爵那场为EG组织的烟花在天空中组成了首字母D-E（“迪安娜-伊丽莎白”）；他为EG写的十四行诗题目也是《迪安娜-伊丽莎白》，时间为1886年。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1909年，Judith Gautier会把EG比作迪安娜和维纳斯两人，她写了一首无题十四行诗，头一句是“迪安娜邀请维纳斯来到森林”。EG把这两首诗和玛萨（及其他崇拜者）写给她的其他许多文字都保留在了“Hommages et appréciations”中，AP（II）/101/1。

[10] 克里希（Clichy），指巴黎市区西北部的克里希广场。

[11] 关于加利费在巴黎公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见Alistair Horne，*The Fall of Paris*：*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71*（London：Reprint Society，1965），406-7。

[12] HG致EG，存档于AP（II）/101/32。

[13] 奥廷格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89。其中最激情洋溢的信大约持续了十年，从1884年到1894年。

[14]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52.

[15] 1881年10月13日EG致MCC的信，存档于AP（II）/101/32。还有若干写给EG的其他匿名信——包括一封EG手写标注为“亨利写的匿名信”——都存档在同一卷宗。

[16] Cocteau，*Le Passé défini*，301.

[17] 1881年10月2日EG致MCC的信，AP（II）/101/40。

[18] 1881年10月12日EG致MCC的信，AP（II）/101/40。

[19] 1882年12月8日EG致MCC的信，AP（II）/101/40。

[20] 1882年11月18日EG致MCC的信，AP（II）/101/40。

[21]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90-91.

[22] 关于德·欧马勒公爵的相貌和风度，见X.（pseud.），“Choses et autres，” *La Vie parisienne*（June 7，1890）：319；Robert Burnand，*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de 1870 à 1900*（Paris：Hachette，1948），150；and Raymond de Monbel to EG，undated letter in AP（II）/101/99。

[23] EdG，日志，1874年12月14日的日记；以及EG，存档于AP（II）/101/59 and AP（II）/101/150。

[24] LG，*Mémoires*，vol. 2，169.

[25]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约1267-1337），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西方绘画之父”。在英文中对他的称呼和中文一样，只称他为乔托。

[26] LG，*Mémoires*，vol. 2，168。世纪末德·欧马勒收藏的完整目录，见*Chantilly*：*Visite de l’Institut de France—26 octobre 1895*（Paris：Plon，1896）。*Dormition of the Virgin*展示在一个名为“乔托展室”的特别画廊中，后来被证明是由乔托的一位追随者所画。

[27] 让-里奥·杰洛姆（Jean-LéonGérôme，1824-1904），法国历史画画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印象主义风行法国甚至全世界之时，法国也存在着另一股逆流，即坚守学院派的古典主义，让-里奥·杰洛姆就是其中之一。

[28] EG，标记为“cited by Monsieur Joubert”的短信，存档于AP（II）/101/150。关于LC的外甥女Yvonne de Chevigné与Jean Joubert的婚姻，以及德·欧马勒公爵与新郎父亲的友谊，见Marquise de Dangeau（pseud.），“Chronique mondaine，” *La Mode de style*（February 11，1891）：51-54，52。

[29] 德·萨冈亲王致EG的一封电报，见AP/101/（II）/112；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62。

[30] 关于HG与布兰奇·皮尔逊的婚外情，见Gabrielle Houbre，ed.，*Le Livre des courtisanes*：*Archives secrètes de la police des mœurs 1861-1876*（Paris：Tallandier，2006），153 and 188；and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0。

[31] LG，*Mémoires*，vol. 2，26.

[32]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63.

[33] Le Diable Boiteux（pseud.），“Nouvelles et échos，”《吉尔·布拉斯报》，1885年8月12日，第1版。

[34] “Et s’il n’en reste qu’un，je serai celui-là”：《追忆似水年华》中最可笑的一个段落就是，普鲁斯特也用这句名言表达了一位古板土气的外省贵族女人在看到“G***伯爵夫人”时的忌恨。——作者注

[35] RM致EG的信，未署期，存档于AP（II）/101/150。这句英雄体出自维克多·雨果的“Ultima Verba”，见*Punishments*（*Les Châtiments*）（1853）。关于MP借用了

这句引语，见CG，735。

[36] EG，“Fausses rencontres，”存档于AP（II）/101/152。

[37] EG致GCC，存档于AP（II）/101/151。

[38] EG最终为这本小册子取的题目是*Portrait du Prince de X*；见AP（II）/101/152。这本小册子经过了排版印刷，但没有页码。当代人关于萨冈的优雅风度的三个典型记录，见AdF，*Cinquante ans de panache*，48-50；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31；and Scrutator（pseud.），“Notes from Paris：Intermarriage and Degeneracy，”*Truth*（August 14，1902），386。

[39] EG，*Portrait du Prince de X*.

[40] EG，*Portrait du Prince de X*.

[41] LG，*Mémoires*，vol. 2，37.

[42] 1891年2月24日EG致GCC的信，存档于AP（II）/101/45.

[43] 苏尔莫纳（Sulmona），意大利阿奎拉省的一个市镇。

[44] Augustus Hare，*Story of My Life*，vol. 1（Library of Alexandria：n.d.）. 堂·马尔坎托尼奥与他闺名Lady Gwendoline（Guendalina）Talbot的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四个孩子也都早夭，但Hare没有说他们也是被阿代拉伊德·德·拉罗什富科毒死的。据他的朋友Conte Edoardo Soderini说，堂·马尔坎托尼奥同意再婚的唯一条件是“他发现泰蕾兹［德·拉罗什富科］长得和他的Guendalina一模一样”。Conte Edoardo Soderini，*Il Principe Don Marco Antonio Borghese*（Rome：Bafani，1886），12.

[45] Commandante Alfonso M. Massari，*Don Giovanni Borghese*：*Cenni necrologici*（Rome：Presse della Real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1918），6.

[46] 西班牙阶梯（Spanish Steps），位于意大利罗马的一座户外阶梯，与西班牙广场相连接，山上天主圣三教堂就位于西班牙阶梯的顶端。西班牙阶梯无疑是全欧洲最长与最宽的阶梯，总共有135阶，是法国的波旁王朝用法国外交官的遗产资助梵蒂冈在1723—1725年建造完成的。

[47] 关于博尔盖塞家族在世纪末的财务困境，见Frances Elliot，*Roman Gossip*（London：John Murray，1894）；Ian Chilvers，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n.d.），90；and René Guimard，“Les Borghèse，”《吉尔·布拉斯报》（1891年8月30日）：1-2；GBB及其家族的履历资料主要摘自*Almanach de Gotha*，vol. 144（1904）：281-83；以及Elliot，op. cit。

[48] 保禄五世（Paolo V，1550-1621），原名卡米洛·博尔盖塞，为博尔盖塞家族成员之一，于1605年到1621年出任教宗。

[49] 该骑士团最恶名昭彰的团友就是德·萨德侯爵，他加入骑士团不是想为教宗服务，而是因为传说在那里可以方便地跟其他成员鸡奸。——作者注

[50] Enea Balmas，*Studi di letteratura francese* 18（Florence：Olschki，1990），170. 关于马耳他骑士团中的同性恋，又见Carlo Carasi，*L’Ordre de Malte dévoilé，ou voyage de Malte*（Cologne：n.p.，1790），184-186；and Edward Prime-stevenson，*Du similisexualisme dans les armées et de la prostitution homosexuelle à la Belle Époque*，trans. Jean-Claude Féray（Paris：Quinte-Feuilles，2000），23。

[51] 关于费迪南·德·萨克森-科堡亲王的详细情况，摘自Henry Fischer，ed.，*Secret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Royal Saxony*（1891-1922）：*The Story of Louise，Crown Princess*（Bensonhurst，NY：Fischer’s Foreign Letters，1912），36；Stephen Constant（pseud.），*Foxy Ferdinand，Tsar of Bulgaria*（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79），37-46；and John MacDonald，*Czar Ferdinand and His People*（New York：F. A. Stokes，1945），94。

[52] Stephen Constant（pseud.），*Foxy Ferdinand，Tsar of Bulgaria*（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79），37 and 44；Anonymous（pseud.），“Ferdinand the Feminine，” in *Ferdinand of Bulgaria：The Amazing Career of a Shoddy Czar*（London：A. Melrose，1916），125-34；Duncan M. Perry，*Stefan Stambolov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Bulgar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216-17；and A. Nekludoff，“Auprès de Ferdinand de Bulgari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54（November-December 1919）：546-76，551。

[53] Stephen Constant（pseud.），*Foxy Ferdinand，Tsar of Bulgaria*（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79），44；and the Baron Beyens，“L’Avenir des petits états：la Bulgari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44（April 1818）：874-94，875. 关于他的鸟舍，见Anonymous，*Ferdinand of Bulgaria*，128。

[54] 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Order of Saint Alexander Nevsky），得名自古代罗斯的统帅和政治家，最早由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在1725年颁授，用以

表扬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主要是政治或军事功勋的俄国市民。

[55] 圣安德烈勋章（Order of Saint Andrew），第一受召使徒圣安德烈勋章是俄罗斯联邦及俄罗斯帝国最高等级的勋章。此勋章由沙皇彼得大帝于1698年设立，致敬圣安德烈，即耶稣的第一个使徒和俄罗斯的主保圣人。勋章只有一个等级，仅用于奖励最突出的民事或军事贡献。在被苏联废除后，俄罗斯于1998年重新设立其为最高级勋章。

[56] S. Stephen Constant（pseud.），*Foxy Ferdinand，Tsar of Bulgaria*（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79），37；and in J. V. Köingslöw，*Ferdinand von Bulgarien*（Munich，1970），34。

[57] Heinrich Wawra de Fernsee，*Les Broméliacées découvertes pendant les voyages des princes Auguste et Ferdinand de Saxe-Cobourg*（Liège：C. A noot-Braeckman，1880）。

[58] 关于博尔盖塞远征的一手详细资料，见佩莱格里诺·马泰乌奇博士的证词，节选见Pietro Amat di San Filippo，*Gli illustri viaggiatori italiani con una antologia dei loro scritti*（Rome：1885），498-507；and Commandante Alfonso M. Massari，*Don Giovanni Borghese*：*Cenni necrologici*（Rome：Presse della Real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1918），6。该远征的二手资料，见Sir Harry Hamilton Johnston，*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213-14；*Le Tour du monde*：*nouveau journal des voyages*，vol. 40-41（Paris：n.p.，1881），437；and *L'Exploration* 17（1884）：228-29。

[59] 萨瓦金（Suakin），苏丹东北部港口城市，位于苏丹港南部红海海岸。始建于12世纪，13世纪初一度成为非洲红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并成为渡海前往麦加朝圣的重要口岸。16世纪被土耳其人占领后逐渐衰落。1821年被埃及占领。

[60] Commandante Alfonso M. Massari，*Don Giovanni Borghese*：*Cenni necrologici*（Rome：Presse della Real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1918），6；and "La Traversée de l'Afriqu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e Géographie*（1885）：861.

[61]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e Géographie*（1881）：457；GBB离开非洲后两位同伴的命运，见*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e Géographie*（1883）：861；and *Le Tour du Monde*：*Nouveau Journal des Voyages 40-41*（1881）：437。

[62] 努佩（Nupe），西非尼日利亚民族。主要分布在卡杜纳河两岸，从尼日尔河的布萨滩到贝努埃河与尼日尔河汇合处。努佩人早在16世纪就已建立王国。18世纪曾受奥约人的约鲁巴王国统治，19世纪中叶又遭北部富拉尼人的索科托王国侵袭，并传入伊斯兰教。

[63] Sonia Bompiani，*Italian Explorers in Africa*（London：Religious Tract Society：1891），53；*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e Géographie*（1882）：117；and Commandante Alfonso M. Massari，*Don Giovanni Borghese*：*Cenni necrologici*（Rome：Presse della Real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1918），6.

[64] HG母亲的外婆Anne Picot de Dampierre有四个兄弟，其中一位娶了艾米莉·欧内斯廷·普朗德里·德·盖尔芒特（Émilie Ernestine Prondre de Guermantes），就是最后一位德·盖尔芒特伯爵（Emmanuel Paulin Prondre）的女儿（网上有好几份家谱错误地把“Prondre”写成了“Pondre”，意为“孵蛋”的“孵”）。Ernestine Picot de Dampierre于是就成了HG的曾祖舅妈。盖尔芒特家族的家谱见A. Borel d’Hauterive and Vicomte Albert Révérend，eds.，*Annuaire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vol 54（Paris：Bureau de la Publication，1896）：369。关于欧内斯廷死后盖尔芒特城堡的后续主人，见Suzanne Verne，*Guermantes de Louis XIII à nos jours*（Paris：Ferenczi，1961），182-86。关于欧内斯廷在巴黎和盖尔芒特城堡的葬礼，见“Hommes et choses，” *Le Matin*（July 10，1884）：3。

[65] Suzanne Verne，*Guermantes de Louis XIII à nos jours*（Paris：Ferenczi，1961），175.

[66] Suzanne Verne，*Guermantes de Louis XIII à nos jours*（Paris：Ferenczi，1961），175.

[67] A. de Gramont，*L’Ami du Prince*，op. cit.，159.

[68] 关于盖尔芒特城堡1880年代的装饰，见Suzanne Verne，*Guermantes de Louis XIII à nos jours*（Paris：Ferenczi，1961），177-82。

[69] 关于GBB的优雅谈吐，见Luca Bartolotti，*Roma fuori le mura*（Rome：La Terza，1988），78；and *Countess Maria Tarnowska*，*The Future Will Tell*：*A Memoir*（Victoria，BC：Friesen，2016），31。关于GBB的文学兴趣，见Commandante Alfonso M. Massari，*Don Giovanni Borghese*：*Cenni necrologici*（Rome：Presse della Real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1918），5。

[70] EG，一篇标注为“4e volume：Le Revoir”的文本，用EG混杂的速记法署期（翻译为：1885年2月10日），第1页（页码仅仅是为EG一个笔记本的这一部分手编的），存档于AP（II）/101/151。从日记判断，参考她如何在近半年后再度见他的文本，EG似乎从盖尔芒特之后，就这么写到自己与GBB的初次相遇了。但我之所以再次引用，是因为它有益而精练地概括了她关于“用社交圈的语言”与他通信的大部分感受。

[71] EG，一篇标注为“4e volume：Le Revoir”的文本，用EG混杂的速记法署期（翻译为：1885年2月10日），3。

[72] JEB，*Dieppe*（Paris：Berthout 1992 [1926]），21.

[73] 1887年12月28日GBB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53。

[74] 1887年12月28日GBB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53。

[75] 1884年12月1日GBB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151。

[76] 居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1832-1883），19世纪法国著名版画家、雕刻家和插图作家。

[77] EG，未编页码的手稿，存档于AP（II）/101/151。这一页的第一行是 “*Ce soir-là，vibrante de plénitude elle chantait. …*”

[78] GBB为自己的第二自我命名为热拉尔，或许是为了向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非洲探险家“雄狮杀手”朱尔·热拉尔（Jules Gérard，1817-1864）致敬；毕竟，有人认为GBB本人曾在非洲远征期间杀死了一头狮子或黑豹。一个奇怪的巧合是，1887年，斯特凡·马拉梅曾给DH和JB布置作业，让他们在康多塞的英语课的翻译练习中写一篇《雄狮杀手热拉尔》。DH，*Pays parisiens*，113.

[79] GBB致EG的日期标注为“1884年12月1日”的信，存档于AP（II）/101/151。EG对这封信的回信、GBB的后续通信和许多埃莱奥诺尔和热拉尔文本也都存档于同一卷宗。

[80] RM致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日期标注为“（1883年）4月”的信，见Heredia，*Correspondance*，ms. 5689，vol. 12。

[81] 引自陈澈莱、冯钟璞译，《缪塞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85页。

[82] 摘自缪塞的诗《绿西》（“Lucie”），这一句也被用作GBB唯一出版的书籍中关于音乐那一章的铭文。GBB [Prince Jean Borghèse]，*L’Italie moderne*（Paris：Flammarion，1913），257.

第9章 巴黎，无论高低贵贱

理论上，洛尔·德·舍维涅和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看似迥然不同。洛尔是外省乡绅出身，祖上是高贵的十字军骑士；热纳维耶芙是波希米亚资产阶级，“双料巴黎人”。骨感美人洛尔是王室“弗罗斯多夫的尤物”，热纳维耶芙则是神经衰弱的蒙马特尔女王。热爱赛马的洛尔身着娇小的粗花呢西装，是“武士精神的化身”；萎靡倦怠的热纳维耶芙穿着她丝质的淡紫色晨衣，是“最慵懒的缪斯”。洛尔是金发的天主教徒，热纳维耶芙是黑发的以色列人。在童话里，她们可能是互为陪衬的白雪和红玫，也可能是彼此为敌的白天鹅与黑天鹅。但在现实中，她们是密友。[1]她们在重要的方面改变了彼此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巴黎社会的风貌。

在表面的迥异之下，洛尔和热纳维耶芙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风趣、迷人，像大头钉一样尖利（一旦被激怒，也会像大黄蜂一样恶毒）。她们都喜欢男人超过女人——她们自己和彼此除外。[2]两人都是不知疲倦的社交高手和毫无廉耻的风骚女人，两人都是自恋的自我鼓吹者和杰出的谎言大师。最后，两人都热爱巴黎，无论高低贵贱，贵族圈还是艺术圈。名媛洛尔为蒙马特尔着迷，波希米亚人热纳维耶芙被城区所吸引。两人都不打算彻底背离自己本来的特质。恰恰相反，两人都很清楚“她的”巴黎对外人的吸引力，并以此来支撑她自己的形象。更不寻常的是，两个女人都意识到彼此生活圈子的魅力所在，也都从那个圈子中借一点魔力给自己。

洛尔为上层注入了一股压抑不住的顽皮劲头。[3]她总是第一个主动要求给一头活驴身上涂颜料，把它涂得像一匹斑马（这是歌剧院筹款抽奖中的头奖），或在“滑稽交响曲”中打响板（晚会宾客卖力装出噪音制造者的样子，真正的乐队在幕布后表演）；暴风雨袭击赛马场时，她总是最后一个去躲雨；气温降至零下时，她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溜冰聚会。

在她的“德·于扎伊表亲”和布德朗森林亨利·格雷弗耶共同举办的一次特别的火炬猎狐会上，她策马飞奔在最前列。

预约之夜可能会非常乏味无趣，仅有的一点乐趣是举着长柄眼镜查看贵族同伴，而完全忽略台上的表演。为了挽救这些聚会，洛尔会在演出结束后拖着一群朋友去最新的时髦餐厅或偏僻的舞厅（这些可不是家世良好的夫人该去的地方）。社交圈的大多数女人很早就睡下了，莉莉·德·格拉蒙写道，然而洛尔“会在外面玩到凌晨二时，12个小时后又出来了，精神焕发、笑逐颜开，可爱如常”。[4]

在外玩到凌晨二时意味着到贵族城区以外去冒险，在这个意义上，洛尔也充满创意。当比贝斯科亲王夫人把她比作18世纪凡尔赛宫的廷臣，“冒险”在首都乱闯时，她不单是指洛尔没有丈夫陪伴在社交圈语笑喧阗，还指她更为莽撞地冲入那些她从儿时起就为之着迷的真实而另类的巴黎街区，包括活力四射、资产阶级聚集的第九大区——她的姐姐瓦伦丁已经不在那里生活了，但洛尔发现了一些好玩的吃饭喝酒的地方——还有城北景色优美的高地蒙马特尔，罪犯和艺术家们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游逛。

去蒙马特尔郊游期间，洛尔交了很多朋友，很少有名媛愿意或敢于与那些人交朋友，哪怕是自称对艺术感兴趣的名媛。玛尔特·比贝斯科写道：

> 百伶百俐又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德·舍维涅夫人不会觉得走出自己所在的阶层去探索社会边缘有任何不妥。她结交艺术家、波希米亚人、音乐家、记者，以及任何让她觉得开心和有趣的人……任何有天赋或才思的人，两者都有当然更好。[5]

事实上，洛尔和她所在阶层的任何人一样重视家世和头衔，但她与反正统文化群体社交，反而为贵族式“单纯”主题创造出一种新的变调，

假装相信“什么都没有天分重要”，相信她那些艺术家伙伴们的内心世界优于“最显赫的贵族……乃至某些王室成员”，而其他贵族女性只满足于对他们敬而远之。[6]洛尔以这种方式维系着每个“单纯”贵妇人那种核心的悖论式假象：她天然“有生”，不必对出身大惊小怪。

说起来不大可信，洛尔能进入社会边缘人的群体，还要感谢她在上层最初结交的一位朋友：德·迈利-内勒伯爵夫人，闺名玛丽·德·古莱纳（Marie de Goulaine）。[7]奇怪的是，她和洛尔长得很像，陌生人往往会误以为她们是姐妹。玛丽也和洛尔一样崇拜艺术天分——她本人就是个很有抱负的歌唱家——也一样对礼仪规矩的束缚很不耐烦。更有甚者，玛丽还与社交圈彻底决裂，她离开了蛮横的贵族丈夫，与让·德·雷什克（Jean de Reszké）私奔了，这位身材高大、魅力十足的波兰男高音不久将会成为他那一代最伟大的歌剧明星之一。（据说玛丽和雷什克私奔前曾是她丈夫的表亲亨利·格雷弗耶的情妇，这或许能解释伊丽莎白为何对她的私奔那么感兴趣。）玛丽的大多数贵族同伴在她失节后都躲着她，洛尔却坚定地维持着两人的友谊，常常到她和雷什克位于蒙马特尔的工作室去拜访二人。洛尔正是在那里初次结识这对夫妇那位迷人的好朋友热纳维耶芙·比才（那时她还叫“贝贝”），并开始到附近的杜艾街去出席她的沙龙。

作为蒙马特尔地位最高的女人，玛丽和热纳维耶芙为她们充满趣味和创意的邻居们举办沙龙，洛尔也正是通过这两位，才把一群作家和艺术家吸引到了自己的社交圈。除了乔治·德·波托-里什外，洛尔在这个世界里最喜欢的人是三位著名的女艺人。第一位是当红歌女伊薇特·吉贝尔（Yvette Guilbert），皈依蒙马特尔的贵族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8]，他用自己的画作让她名垂千古，骨瘦如柴的她戴着黑手套，尽显荣耀。第二位是世界著名女高音奥尔唐斯·施奈德（Hortense Schneider），因在雅克·奥芬巴赫作曲、梅亚克和阿莱维作词、流行一时的谐歌剧《热罗尔坦公爵夫人》（*La Grande-Duchesse de Gérolstein*，

1867）中成功扮演标题人物而名扬四海。第三位是雷雅纳［Réjane，闺名加布丽埃勒·雷雅纳（Gabrielle Réjane）］，她也是出演梅亚克和阿莱维合作歌剧的老资格了，被誉为自“超凡入圣的”萨拉·伯恩哈特以来最出众的法国女演员。



著名波兰男高音歌唱家让·德·雷什克是洛尔结交的首批波希米亚友人之一

洛尔喜欢对城区的贵族同伴们吹嘘她结交的这些朋友，后者往往觉得这样的关系很不得体。就连伊丽莎白·格雷弗耶这样自称热爱艺术的人也有这样的偏见，往往把受她提携的艺术家们当作她雇用的帮手。［她老年时曾雇用艾莎道拉·邓肯（Isadora Duncan）来德·阿斯托格街为她私人表演，却在表演后拒绝让这位舞蹈家与宾客同席。］洛尔则不同，她总是随意而熟稔地提起那些名人朋友的名字，在谈话中用诸

如“波多跟我说雷雅纳……”之类的话来增加谈资。[9]如果有社交圈同侪碰巧提到了某一位她还不认识的前途无量的艺术家，洛尔就会一边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一边惊呼：“什么？有一位新出世的天才，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她？”[10]她用王室使用的“我们”一词来突出她自诩比谁都了解波希米亚生活。



夜总会歌手伊薇特·吉贝尔帮助洛尔进入了蒙马特尔的夜生活

有当地的朋友做向导，洛尔成了蒙马特尔夜生活的发烧友。她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是“黑猫”，那个有名的酒馆就在热纳维耶芙家公寓的附近。“黑猫”创办于1881年，所在地是一个三层楼的废弃邮局，外观是破旧的半木式结构，它是世界上第一家夜总会，顾客们可以在那里喝酒到深夜，同时观赏喧闹的现场表演。一头红发的浮夸经营者鲁道夫·萨利斯（Rodolphe Salis）主要为创意人士服务，他们在“黑猫”的内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写作和艺术作品，在它的舞台上表演音乐和朗诵，还在墙上挂满自己的油画、素描和海报。（图卢兹-洛特雷克和泰奥菲勒·斯坦伦

[11]都是那里的常客。）“黑猫”鼓吹一种“怪异的疯狂”美学。[12]萨利斯对高雅艺术嗤之以鼻，让他的服务员穿上繁复的绿色和金色丝绸制服，戴上法兰西学术院的“不朽者”戴的那种双角帽。他让艺术家卡朗·德·阿谢（Caran d’Ache）在三楼安装了一个皮影戏台，剪影木偶（ombres chinoises，即中国皮影）以一个发光的幕布为背景欢跳着，对历史事件和圣经故事进行喧闹的滑稽演绎。[13]

作为主持人，萨利斯极端喜欢出风头，他挑出新顾客，特别是富有的顾客，像演戏一般用滔滔不绝的脏话对其展开攻击。下流话也是阿里斯蒂德·布吕昂[14]歌曲中的重头戏，布吕昂自称城市社会底层的英雄，是从约翰尼·卡什[15]到性手枪乐队[16]再到“声名狼藉先生”[17]等乐坛叛逆者的代表人物。[18]布吕昂穿着火枪手的靴子和火红色围巾在舞台上大步行走，歌里唱的都是些卑微的人和恶棍，以及坚决不向律法强权屈服的社会弃儿。由于该街区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中臭名昭著的影响，他那些蛊惑人心的颂歌在蒙马特尔引发了特殊的共鸣。正如历史学家杰罗尔德·塞盖尔（Jerrold Seigel）指出的，布吕昂在现实生活中也建立起自己的反叛形象，让仆人们称他“人民歌唱家”而不是正式的“先生”。[19]（“人民歌唱家，来吃晚饭了，烤肉都要熟过头了。”）洛尔作为君主主义者，并不同情歌唱家的左翼政治立场，但他的粗口和艺术叛逆却让她觉得极其有趣。



“黑猫”成为蒙马特尔声名狼藉、远近皆知的夜间娱乐场所

很多波希米亚艺术家对社交圈的认识也仅限于在八卦专栏里读到的内容，洛尔的乡下土语、令人咋舌的脏话连篇和她挑战贵族礼仪[20]的粗鲁无礼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她的祖先是“彼特拉克的缪斯”也让他们心生敬畏。波托-里什这类对《歌集》倒背如流的作家[21]，甚至能从金发女郎洛尔的鹰钩鼻相貌中看出被彼特拉克称为“这只金羽凤凰”的那个女人的面部线条。[22]这层关系让洛尔的艺术家朋友们神魂颠倒，有人干

脆称她为“德·舍维涅伯爵夫人洛尔·德·诺韦斯”。[23]还有人觉得她有如此绝妙的文学遗产，一定也和17世纪的作家德·塞维涅夫人有关，遂将错就错地以那个名字来称呼她。

就连她的娘家姓也被这群人正面解读——她的“有生”阶层同伴们多半会一本正经地略过那个姓氏不提。[24]波兰裔年轻钢琴家米夏·纳坦松（Misia Natanson，后来嫁给了艺术家何塞-马里亚·塞特[25]）的沙龙吸引了马拉梅[26]、德彪西、图卢兹-洛特雷克、莫奈和雷诺阿等人，米夏说正因为“她的祖先是德·萨德侯爵，（德·舍维涅夫人）才能够自由地说出其他任何人难以启齿的话”。[27]米夏与洛尔关系亲密，她叹道：“德·萨德！多美的姓氏啊。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得这个姓氏！”[28]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也对此十分景仰，洛尔是1880年代初通过波托-里什认识莫泊桑的。文学圈公认莫泊桑是19世纪最挑剔的散文体作家之一、已故的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的得意门生，是个天赋惊人的作家。（龚古尔称莫泊桑是福楼拜的私生子，但这个说法从未经证实。）他是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在这一体裁上极为多产。但莫泊桑还是个肌肉发达、热爱刺激的拳击手、击剑手、水手、猎手和多才多艺的须眉男子，他的十足神气就连布吕昂也自叹不如：在莫泊桑看来，精神生活远没有肉体的愉悦来得重要。传说他睡过的女人和写的短篇小说一样多，约有300位，包括从站街女到大资产阶级贵妇等各色各样的女人。[29]莫泊桑二十多岁就染上了梅毒，但公开宣称他很“骄傲自己患上了弗朗索瓦一世的疾病”，并坚称此病对他惊人的性欲没有丝毫影响。小说家约里斯-卡尔·于斯曼曾与他和福楼拜一起在城里玩了一夜，证实了此话并非信口开河：

> 莫泊桑吹牛说他能用做爱把女人累垮。（我们）移步一家妓院，莫泊桑接受考验当众解衣，与他选择的同伴来了五次。福楼拜高兴地叫道：“啊，真让人神清气爽！”[30]

莫泊桑自称“神圣侯爵”的狂热仰慕者，这与他的人格面貌完全一致。他声称每当他想拉一个新情妇下水时，总会给她一本德·萨德的书作为入门读物。[31]他还加入过一个只接收男性成员的秘密组织，和德·萨德小说中的许多同类组织一样，它也专门致力于各种淫乱、通奸和“残暴下流”的行为。[32]莫泊桑为该组织撰写了疯狂的细则，它的活动后来还包括拉皮条和极端暴力，但后来因一个矢志参加的会员在入会期间被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打伤致死，就解散了。它名叫“施虐狂克里普人协会”（Société Sadique des Crépitiens），“克里普人”是福楼拜杜撰的一个词，意义不明，“施虐狂”则无须解释。

洛尔致莫泊桑的信无一留存下来——鉴于她一贯吝于留下文字记录，她大概也没有给他写过很多信。不过他写给她的几封信最近在巴黎的一场拍卖会上出售了，表明他们的友谊深厚而持久。其中一封没有署期的长信是他从诺曼底写给她的，甚至暗示莫泊桑可能与洛尔关系暧昧，或至少试图说服她和自己卿卿我我。他邀请她来他的海滨别墅拜访，说她可以住在自己的客房，当然就连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他们住在一起，她“余生都会被流言纠缠”。[33]他说，如果她想避开丑闻，可以在附近找个住处，“只要扮成男人到我这里来”就能阻止八卦满天飞了。[34]至于如此纵容她享受自己的女扮男装癖好到底有没有说服洛尔成行，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莫泊桑不惮于把女性友人写进自己的小说，或许还在《漂亮朋友》（*Bel-Ami*，1885）中给了洛尔一个配角，那部小说让他名声大噪，家喻户晓。小说的主人公是敢于冒险的贵妇人德·马雷尔夫人（Mme de Marelle），因为政治家丈夫不在身边，她总能自行其是，自由自在地潜入蒙马特尔的夜总会里去玩。一次，她装扮成打工女去那里时，带上了小说的标题人物漂亮朋友：一个英俊的万人迷作家。在克里希大道（“黑猫”所在地）上的一家吵闹的夜总会里，她越过喧哗声对他说出了心里话：

> 我一直不敢向你要求那个（ça），可是你怎么也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喜欢逃到所有那些妇女们不去的地方消磨时间……我呀，我就喜欢那个（Moi，j’adore ça）！我是下等人的口味！[35][36]

无论从风格还是内容上，这段自白一看就是洛尔的话，吹嘘“逃离”带来的禁忌之乐，又喜欢用她的标志俚语词，“那个”（ça）。莫泊桑那么崇拜她的曾祖父德·萨德，把她作为尝试出格行为和“下等人的口味”的榜样倒也恰如其分。

洛尔的波希米亚式冒险惹得城区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一本正经的交际家，也就是“老头子们”的对立面，担心她给他们的妻女树下了坏榜样。亨利·格雷弗耶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明确反对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任何人的不端行为。他在家里命令贝贝斯“当心德·舍维涅夫人——她是个失足女人”！[37]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在社交圈里与她交谈，不要邀请她到家里来，甚至想都别想模仿她。[38]（伊丽莎白对这一禁令的虚伪性明察秋毫，她在日记中抱怨：“他倒是什么麻烦都不怕招惹！”[39]）但洛尔对这些指责一笑而过。她非但没有觉得背离原来的圈子有何不妥，反而宣称她“享受”上流社会的舞厅和蒙马特尔的酒吧之间的“反差”。在萨德看来：洛尔无怨无悔。

她满不在乎的态度并没有阻止她设法打败自己的批评者。为了抗衡格雷弗耶之流的男人的责备，她把威严的弗拉大公夫妇也变成了蒙马特尔的热烈支持者。有一次他们来巴黎寻欢作乐期间，她把他们径直带入了“黑猫”，在鲁道夫·萨利斯用最低俗下流的语词申斥大公夫妇时，她和众人一起捧腹大笑。在俄国，侮辱罗曼诺夫王朝的王公可能会冒被流放西伯利亚甚至处死的风险，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弗拉大公夫妇很开心。在萨利斯辱骂的间歇，大公开心地喊了一句话，大概也全拜洛尔自己的宣传，这句话后来变成了上层的王室成员语录：“真棒，老丫

头！”[40]这句赞美让洛尔十分自豪，因为它让人想起亨利五世对她的昵称，同时也让她想起自己旧日的王室友谊，突出了眼前这位新朋友的地位。后来，每当弗拉大公夫妇回到巴黎，都会要求洛尔带他们重返蒙马特尔，去寻找更多“危险的刺激”。

在另一个大胆实验中，洛尔决定在她位于圣奥诺雷区的公寓里为弗拉大公夫妇举办一个小小的午餐会。除了通常的贵宾德·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夫人、约瑟夫·德·贡托、亨利·德·布勒特伊，以及其他受到罗曼诺夫夫妇青睐的上流社会人士之外，洛尔还请来了一位出人意料的客人——除了她之外，没有谁有胆量请她与王室成员一起用餐：她的朋友、当红歌唱家奥尔唐斯·施奈德。[41]洛尔一定知道，早在1867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曾专程来巴黎观看奥尔唐斯在奥芬巴赫的《热罗尔坦公爵夫人》中的精彩演出，也知道自那以后，他一直渴望见到这位女演员。（奥尔唐斯素有吸引王室情人的名声，同时代的人打趣地称她为“亲王通道”。[42]）歌手和女演员或许能秘密地跟王室成员上床，但绝对不能在“体面的”女人在场时与王室成员交谈，更不要说还有“体面的”王室夫人在场。如今国家元首与演艺界人士同框或许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在19世纪末的社交界，那却是不可想象的，洛尔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歌剧女演员奥尔唐斯·施耐德和许多来访巴黎的外国王室成员关系亲密，因此她有个绰号叫“亲王通道”

当天午餐会的高潮是在奥尔唐斯的简短表演之后，洛尔问在座的其他人：“现在我问你们，谁才是真正的女大公？”[43]她装作对头衔全然无动于衷，却对天分极为重视，再度震惊了在场的同伴们。正如她的朋友阿贝尔·埃尔芒所说，洛尔的大胆构成了一种独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出其不意，令明星女高音和皇室成员的光芒加起来也黯然失色。在所有听说过这次聚会（洛尔自会让它传得满城皆知）的人看来，这证明她“完成了全巴黎再没有第二个人敢于一试的壮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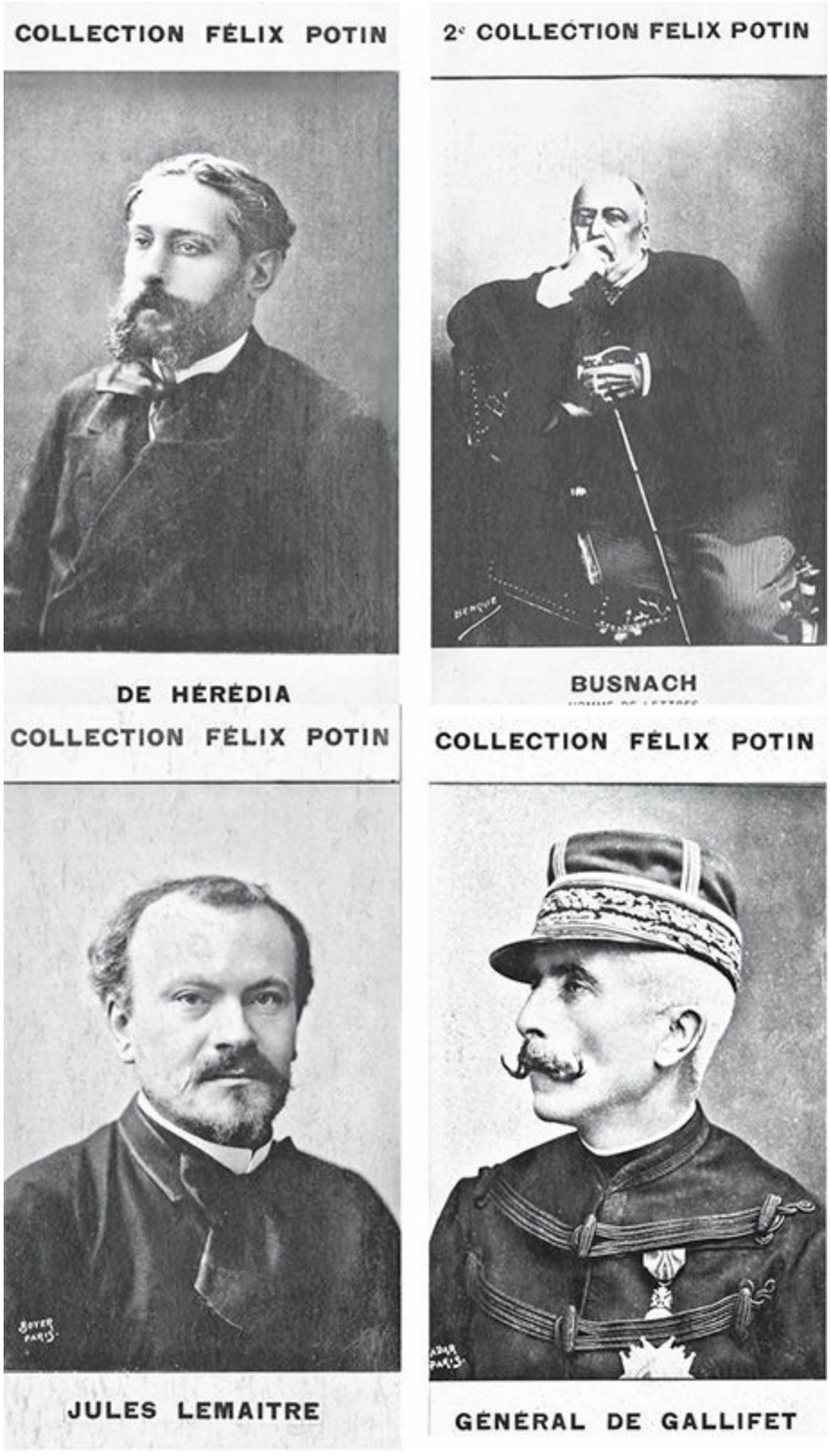
热纳维耶芙·比才弥合贵族与艺术家之间分歧的策略没有洛尔那么高调，但她同样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把这两个世界的人融合在一起。她的童年虽然很不快乐，但年纪轻轻就习惯了大富大贵的奢华：家里有大批用人，贵重的艺术品和古董（中间夹杂着莱奥妮的破铜烂瓦），精美的服饰，上乘的餐具、食物和红酒。因此，贵族的富有不会令热纳维耶

芙慌乱，她和那个阶层的成员一样淡定。能够从容面对特权阶层的身外之物，让她成为连接贵族城区和波希米亚生活的中间人的不二人选。

另一个让她适合这一角色的因素是她引人注目的三重身份：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女儿、卢多维克·阿莱维的堂妹以及乔治·比才的寡妇。洛尔的女大公午餐会清楚地表明，就连王室成员也会被著名艺术家的光芒所吸引，而热纳维耶芙一生都被那种光芒环绕着。她还不会走路时，父母就在伦敦与被废黜的国王路易-菲利普觥筹交错了。她在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长大，亲眼看到父亲和堂兄被那个政权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奉承，从皇帝同母异父的兄弟德·莫尔尼公爵（Duc de Morny）到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前者是影响力极大的政治特工，却只渴望编写舞台剧本（卢多维克热心地与他合作完成了一部轻歌剧），后者招募卢多维克和弗洛蒙塔尔出席她的沙龙。“艺术圣母”（波拿巴公主）的偏好开创了许多艺术和社交事业，比才后来也吸引了她的兴趣，不过他太专注于自己的创作，没有利用她的提携为自己在专业领域或上流社会谋利。但在他去世并被奉为天才之后，他的寡妇把他很多出身高贵的崇拜者变成了自己邀请的人选。用卢多维克的儿子达尼埃尔（按布列塔尼人的规矩，他是热纳维耶芙的侄子）的话说，“比才的名字是她头上的耀眼光环”，她灰色、白色和淡紫色的半丧服饰也一样大放光彩。[45]

热纳维耶芙以比才寡妇的身份获得了重生，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她把每周一次的招待会从自己杜艾街的公寓移到了楼下卢多维克的住处，收获了一群新随从，他们改变了她的沙龙的主旨和构成。在整个家族中，卢多维克利用自己的名声在这个城市结交了为数最多的社会精英。[46]通过他的波拿巴恩主，他结交了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其中包括玛蒂尔德公主的法意混血外甥、贫嘴的朱塞佩·（热热·）普里莫利伯爵，还在巴黎公社将将军德·加利费侯爵变成“克里希的刽子手”之前若干年与他结交。卢多维克还加入了非常私密的比克肖晚餐会（Bixio Dinner），这个受邀参加的活动每周一次，成员包括加利费、

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和德·欧马勒公爵。卢多维克起初是法兰西学术院的候选人，后来又成为学术院院士，自然要奉承那些有头衔的“不朽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德·奥松维尔伯爵约瑟夫·奥特南·德·克莱龙（Joseph Othenin de Cléron）和欧仁-梅尔希奥（梅尔希奥）·德·沃居埃子爵［Vicomte Eugène-Melchior（Melchior）de Vogüé］，后者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驻俄国宫廷外交随从之后，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除了德·欧马勒公爵外，这些人都成了热纳维耶芙每周四举办的沙龙的常客，前来的还有德·奥松维尔的儿子奥特南（“美女波利娜”的丈夫），以及无处不在的夏尔·阿斯。



这些巧克力卡上的人物（从左上开始，顺时针）分别是诗人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

亚、剧作家维利·布斯纳什、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朱尔·勒迈特、将军加斯东·德·加利费侯爵

据卢多维克说，这些绅士每周都会去蒙马特尔向他的堂妹献殷勤，那种越界出格的兴奋感与洛尔·德·舍维涅和弗拉大公夫妇去附近夜总会的兴奋劲儿是一样的："圣日耳曼区（前往）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仿佛去逛'黑猫'。"[47]他还说她那个圈子里的波希米亚人对于能与"有生"阶层融合也一样激动："'黑猫'（前往）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仿佛那是圣日耳曼区。"两个圈子的相遇并非没有可能发生冲突：比方说，1871年，波托-里什不但在路障的另一端与加利费作战，还看到自己的很多朋友在将军及其部队的枪声中倒下（他本人也险些遭遇那样的结局）。然而年轻诗人和老兵在热纳维耶芙的沙龙里坦率交流，简直就是两个阵营和谐相处的榜样。艺术家和贵族们都努力对彼此保持礼貌，每个人都急于保住参加如此别具一格的多样化沙龙的特权。当时也有其他资产阶级沙龙女主人试图招募同样庞杂的一群宾客，但很少有人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即便如此，热纳维耶芙仍然密切关注着几位竞争对手，偶尔也会出席她们的沙龙，并邀请她们来自己的沙龙做客。）

热纳维耶芙与埃米尔·斯特劳斯的爱情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小圈子，他从自己的阶层中招募了几位巴黎高层人士；他们与她圈子里的人不同，但彼此互补。作为公司法的顶级专家，斯特劳斯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的顾问律师。在这一职位上，他结识了全城所有一流犹太人银行家族的成员，以及苏黎世运河的行家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和新教徒实业家族子弟居斯塔夫·施伦贝格尔（Gustave Schlumberger）。斯特劳斯还结识了像约瑟夫·雷纳克（Joseph Reinach，1856-1921）这样的共和派领导人。埃德蒙·德·龚古尔虽然讨厌他，但也曾忌妒地说，这位政治家"毫无疑问将在今后的20年里成为掌控法国命运的几人之一"。[48]由于他们"无生"的出身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这些人不会受到最有贵族风范的沙龙的欢迎，又因为他们的权势和财富，

也不会成为波希米亚人的天然盟友（虽然许多银行家都收藏当代法国艺术作品）。在热纳维耶芙的沙龙里，金融大亨和政治领袖为这群人增加了另一层新意，提供了对手沙龙中没有的另一重刺激。

在斯特劳斯带入圈内的客人中，威望最高的无疑是阿方斯、居斯塔夫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三位男爵，即已故的詹姆斯［原名雅各布·马耶尔（Jakob Mayer）］·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三个成年儿子。詹姆斯男爵不到20岁就从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贫民窟移民到法国，在这里创建了其家族跨国金融帝国的巴黎分支“罗斯柴尔德兄弟”（Rothschild Frères），掌握的权力可与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媲美。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在1837年写道：“这位犹太人银行家”拥有“万贯家财，那是社会的权柄”，因而“能够支配教宗和基督教。他付钱给王室，买下了一个个国家”。[49]





阿莱维相册里的两张照片。左起，德加、热纳维耶芙、阿尔贝·布朗热-卡韦、路易·冈德拉。右图，坐者左起，梅尔希奥·德·沃居埃、卢多维克·阿莱维、德·布鲁瓦西亚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roissia**）、路易丝·阿莱维，站立者从左到右，达尼埃尔·阿莱维、夏尔·阿斯。该相册中的所有照片都是由洛尔和奥尔唐斯·豪兰两人的交际家朋友迪洛侯爵（**Marquis de Lau**）所摄，奥尔唐斯也长期是德加的情妇

詹姆斯男爵1868年去世时，几个儿子继承了他的财富和政治势力。长子阿方斯成为“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新主管，他和两个弟弟请埃米尔·斯特劳斯进公司担任法律顾问。这一决定更为流传甚广的传言增加了可信度，即斯特劳斯是其父的私生子。三位男爵也的确待斯特劳斯如兄弟，这让流言变得更加刺激。但这个兄弟很招人烦。他们出现在杜艾街就是因为被斯特劳斯纠缠了几个月：“你一定要见见热纳维耶芙！”[50]他们最终前往蒙马特尔完全是为了安抚他，但一到那里就见识了热纳维耶芙的魅力，并开心地加入了她日益扩大的忠实信徒圈子。

对热纳维耶芙而言，罗斯柴尔德兄弟来到她的沙龙是不可小觑的巨大成功。她仍然崇拜他们，认为他们是自己不光彩的佩雷尔亲戚的“更佳”版本，为他们这种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所吸引。她还知道在巴黎的犹太人中，没有谁拥有他们那么高的名望。每当有王室成员来到城里，罗斯柴尔德兄弟都会为他们举办聚会，就连反犹的上流社会人士也会渴望受到邀请。甚至连反犹的艺术家们也渴望结交他们，得到他们慷慨的恩顾。保罗·艾尔维厄虽然低声咕哝着“肮脏的犹太人”，私下里却也对亨利·德·雷尼埃说：“我才不会与（热纳维耶芙）和斯特劳斯翻脸呢，是他们把我介绍给罗斯柴尔德兄弟的。”[51]

如果热纳维耶芙足够诚实，大概也会以同样的口气描述自己与斯特劳斯的关系。自从1881年初次与他一起拜访费里埃，她便如玛蒂尔德公主所说，抓住一切机会对罗斯柴尔德家的人“趋之若鹜”。这让热纳维耶芙的亲友们怀疑她之所以接受斯特劳斯成为追求者，他与罗斯柴尔德家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的乃至决定性的因素。他们的共识是，虽然斯特劳

斯“疯狂地爱（着）我们的女神热纳维耶芙”，她却没有用爱来回报他。达尼埃尔·阿莱维再度呼应父母的意见，写道自己的姑母之所以“容忍”斯特劳斯进入到自己的生命中，是“因为他来了，喜欢她……而他并没有得到爱”。[52]

斯特劳斯比热纳维耶芙大四岁，是个矮小纤瘦的男人，姿态萎靡，乱蓬蓬的红色毛发渐稀，眉毛上还有一道很大的马蹄形皱纹。他脸上最好看的部位是那尖削硬朗的下巴，上有一道强有力的凹痕。不过当时的文化认为胡子代表着阳刚，他的下巴上却只有一小撮稀稀拉拉的络腮胡子，多少还是被看作有缺陷。他26岁时曾主动要求在巴黎被围时参战，一枚炸弹在他的脸附近爆炸了。从那以后，他的一双蓝眼睛就皱成了永久的半眯样子，微笑时只有一边的嘴角能够上翘。当然，热纳维耶芙也不必因为追求者的局部面瘫而嫌弃他，鉴于她自己也患有面部抽搐，这一缺陷或许还能引发她的共鸣。有时候爱人的怪癖甚至能激起人的欲望。不过尽管如此，与她最亲近的人仍一致认为，她“可没（觉得斯特劳斯）是个阿多尼斯[53]”[54]——这是社交圈的经典反语，意在强调她一点儿也不觉得他英俊。

当然，他们坚称，他们的热纳维耶芙也并非为斯特劳斯的个性所倾倒。施伦贝格尔虽然名义上是他的朋友，却为许多忠实信徒代言，贬低斯特劳斯“资质平庸，教养很差，任性粗鲁，还有律师职业病，话太多”。（“施伦”作为研究十字军东征和拜占庭的学者，也同样是话痨，那也是学者的职业病。）龚古尔也觉得斯特劳斯那股“律师习气的啰唆”很讨人嫌，让·福兰（Jean Forain）画过一幅漫画，画中热纳维耶芙的情郎正在法庭中慷慨陈词，嘴巴张得极大，十分怪异。埃利·德洛奈通常对谁都不出恶言，却也批评斯特劳斯是个“讨厌鬼”。热纳维耶芙难得有几位闺蜜，其中的一位，亨利·（洛尔·）贝涅尔［Henri（Laure）Baignères］夫人，说斯特劳斯又傲慢又没自信，“气人有，笑人无”。[55]

艾尔维厄、布尔热和波托-里什都讨厌斯特劳斯的“可怕的坏脾气”，他每次发作都大声咆哮，作家们因此为他取了“老虎斯特劳斯”“斯特劳斯虎”“可怕的斯特劳斯”等绰号。[56]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每次犯脾气时，斯特劳斯会破坏热纳维耶芙的沙龙，“阴沉着脸，像个陀螺似的满屋乱转，不是踩了这位女士的裙子，就是踏了那位男士的脚”，而且绝不会停下来为自己“不小心侵犯到别人”而道歉。[57]

在卢多维克和路易丝·阿莱维看来，热纳维耶芙与斯特劳斯的爱情源于她的两个最可悲的天性，同时也放大了这两个天性——“邪恶的虚荣和社交算计”。她与比才结婚的那几年搁置了那些冲动，但它们却在这段新的关系中变本加厉地重新出现了。热纳维耶芙日渐符合比才对她母亲的描述，和斯特劳斯一起并通过斯特劳斯与罗斯柴尔德兄弟同流合污，为的正是“社会地位（和）钱”！

因为急于讨好罗斯柴尔德家的男人们，热纳维耶芙对他们的妻子和女性亲友也一并发出邀请。这一招使她结交了阿方斯、居斯塔夫和埃德蒙男爵夫人们、她们的小姑莫里斯·埃弗吕西［Maurice Ephrussi，闺名贝亚特丽斯·德·罗斯柴尔德（Béatrice de Rothschild）］夫人，以及嫁入天主教贵族家庭的两位女性亲戚——（玛格丽特·）德·格拉蒙公爵夫人和（贝尔特·）德·瓦格朗亲王夫人［Princesse（Berthe）de Wagram］，这两姐妹都来自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热纳维耶芙还敞开沙龙大门欢迎另外两个很有魅力且家世很好的姐妹——卢利娅·卡昂·德·安韦斯（Lulia Cahen d’Anvers）和玛丽·卡恩（Marie Kann），她们都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亲善的著名犹太银行家的妻子。雅克·布朗什给这一小群新的忠实信徒取名“犹大的伯爵夫人们”。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通过她们的关系，他的姑母热纳维耶芙“受邀进入了最棒的圈子”，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58]

然而她的吸引力还扩展到了这份独特的宾客名单大杂烩之外。热纳

维耶芙在法兰西学术院的巨大影响力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那些文艺志向高远的客人们。算上卢多维克及其写作搭档亨利·梅亚克（1888年入选）、梅尔希奥·德·沃居埃以及小仲马（他是阿莱维家族的多年好友），在40位“不朽者”中，热纳维耶芙能够施加影响的人就有4位，而且她毫不避讳为朋友的利益动用这些关系。在她的一生中，至少还有9位沙龙常客会被提名入选学术院：历史学家奥特南·德·奥松维尔，小说家保罗·布尔热、保罗·艾尔维厄和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诗人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亨利·德·雷尼埃和费尔南·格雷格，戏剧评论家（也曾是个剧作家）朱尔·勒迈特，还有她亲爱的表哥波托-里什。

据说热纳维耶芙为德·奥松维尔的入选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父亲生前曾在学术院拥有一席反而对他不利，因为老德·奥松维尔“以贵族对下等人的鄙视”对待小仲马，得罪了后者。不过热纳维耶芙与卢多维克一起，确保小德·奥松维尔赢得了必需的选票。（至于这对堂兄妹有没有帮助他与小仲马和解，就不得而知了。）热纳维耶芙婉拒了另外两位忠实信徒获得入选资格的请求：施伦贝格尔和雷纳克。她坦率地写信给后者说他根本没机会入选，她也帮不了他（两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都支持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这种有争议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入选学术院）。雷纳克欣然同意热纳维耶芙的判断，他的顺从本身就证实了她在“不朽者”中间的影响力。

热纳维耶芙与上层社会成员相处的时间越长，她招待宾客的方式就改变得越明显，波希米亚风格越来越淡，转向传统的上流社会风格。在她开设沙龙的初期，她总是为客人举办特别的私人演奏会，或者请艺术家朋友们表演自己的新作品。她鼓励他们当中的作家把手稿带来，让她和其他客人提提意见。她有时甚至会亲自朗诵几首诗或唱一两首歌，由古诺或马斯内为她钢琴伴奏。这些娱乐项目使她的招待会全然不同于城区的其他沙龙，那些沙龙往往是就着橙汁、法式小点心，（对男士们和洛尔·德·舍维涅而言）抽着烟闲聊几个小时。但后来，热纳维耶芙降低

了文化在沙龙中所占的比重，因为她从贵族朋友们那里得知，热切地谈论阳春白雪的话题违反了社交圈关于得体谈话（应始终轻松愉快）和妇德（应避免书卷气）的基本要求。聪明世故如她，热纳维耶芙审慎地遵行这些标准，据莉莉·德·格拉蒙说，至少“她的朋友们对她不卖弄学问而心存感激”。[59]



美学家、作家和日记作者埃德蒙·德·龚古尔虽然痛恨犹太人，却是热纳维耶芙沙龙的常客；他通常会陪同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出现在沙龙中，他那些未经过滤且挑剔、势利的日记一直是个宝贵的八卦来源，记录着他和热纳维耶芙那个圈子里的流言蜚语

埃德蒙·德·龚古尔常常陪同玛蒂尔德公主光临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他对那里犹太人宾客占多数的格局嗤之以鼻，却喜欢热纳维耶芙营造的谈话氛围——“有趣而轻浮，就像在一个18世纪的沙龙里，充满了匠心独妙的恶意双关语，尖刻的挖苦如鄙夷一笑”。[60]诚如龚古尔的类比所

示，这样的戏谑可以追溯到旧制度下的巴黎沙龙，为在宫廷上争权夺利而耗尽心力的贵族在离开凡尔赛宫度假期间，也要在沙龙上争取象征性的霸主地位。在这些客厅小冲突中，词语就是武器，胜者就是用最出色的才智和匠心击败同侪的人。普鲁斯特为《高卢人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伟大的法国沙龙的综述，他在其中写道：“他们彼此之间总是话中带刺。”[61]

夏尔·阿斯是公认的熟谙这一战术的大师，像他对饶舌妇梅拉妮·德·波尔塔莱的突袭——“我还没在《浮士德》里听到过您的声音呢！”——就在圈里流传了几十年，他也会不断尝试新的素材。[62]他尤其喜欢抢朋友的风头——这倒是他皈依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特征——例如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两人在普法战争之前就是密友了。[63]阿斯综合了社交圈幽默的两个专长：拟人和双关，模仿孟德斯鸠的慷慨陈词，故意糟践后者的自命不凡——“我为费赞萨克家族的公爵冠冕上又加了一顶诗人的桂冠（couronne）！”他改动了“couronne”这个词的几个字母，把诗人的桂冠变成了心脏病。

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也擅长这轻巧却一击致命的招数，不过他更喜欢引用他人的巧妙应答而不是自己想出一计回应。他重复那句挖苦博尼·德·卡斯特兰的未婚妻、美国铁路大亨的女继承人安娜·古尔德（Anna Gould）腰缠万贯却长相一般的格言：“从背影看，她足够漂亮了！”[64] [法语中“背影”（dos）和“嫁妆”（dot）是同源词，这句格言就利用了这一点，暗示如果考虑到安娜·古尔德的财富，她很有吸引力。] 这些淘气又刻薄的侮辱都可入选城区的格言警句——在热纳维耶芙越来越像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也是一样。

刚有自己的沙龙时，洛尔·德·舍维涅没有多少时间出席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但她有时也会来，向忠实信徒们展示“她的刻薄才思”何以成为“巴黎社交圈的欢乐和恐怖之源”。[65]有一次她腋下夹着自己的小博美

犬吉斯（Kiss）来到这里，当脸上的妆比女神游乐厅的艳舞女郎还要浓重的小说家让·洛兰出声地在小狗的头上吻了一下时，洛尔做出恐怖的表情，说：“小心！你脸上的粉弄得它满身都是！”[66]（和阿斯一样，洛尔也惯于再利用自己的俏皮话：多年后她又把这句话说给了让·谷克多[67]听。）

还有一次，洛尔当面攻击了热纳维耶芙性情古怪的朋友波托茨卡伯爵夫人艾玛纽尔（Emmanuela，Comtesse Potocka），后者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样子都很恐怖，黑漆漆的头发、黑色眼影粉，身材像她养的几十条灵缇一样消瘦——证实了她性生活放荡的传言。洛尔本人固然不是什么女德模范，却假装对波托茨卡夫人为人不检点心生愤懑。有一天，当后者在一位据信为情郎之人的陪伴下起身向热纳维耶芙告辞时，洛尔抓住了机会。“她就像太阳”，她故意提高音量，好让离开的那一对听到。“在一个地方升起（*se lève*），在另一个地方落下（*se couche*）。”[68][69]

热纳维耶芙圈子里的好几位艺术家也一样擅长这类辩论。德加出身贵族，却主动选择波希米亚生活方式，颇有“用不了三句话就能击败对手”的天赋。[70]他最喜欢攻击的目标是热纳维耶芙沙龙里的其他画家。他曾讥讽居斯塔夫·莫罗，说“他让我们相信众神都戴着表链”！[71]（达尼埃尔·阿莱维在日记中解释道，这是讽刺莫罗画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神话人物。）他嘲笑因画战争场面而闻名的学院派画家爱德华·德太耶是个“武器贩子”[72]，说埃利·德洛奈是个“猫猫狗狗的水彩画家”[73]。这些羞辱贬损没有为德加赢得任何艺术家同行朋友，却让圈子里的其他人觉得很可乐。

德加嘲笑胖子的笑话也很出名，表达了他对尺码过大的女人的极端厌恶。达尼埃尔·阿莱维记得他讲了一个趣事，在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

一天在歌剧院，两位女士把大粗胳膊架在包厢前的天鹅绒横档上休息。突然，从顶层楼座上传来一声大叫：“快把那块火腿拿走！”大家都懵了。顶层楼座上又传来哀怨的声音：“快把那块火腿拿走！”观众们开始耳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们看到了粗胳膊，哄堂大笑。两位女士只好躲进了包厢。[74]

热纳维耶芙和洛尔一样执着于保持身材苗条，也和德加一样对胖人持有偏见，以她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是“她不是一头母牛”（或黑豹），“她是整个牛群”。这类俏皮话会让身材丰满的玛蒂尔德公主不舒服，但她在这里是少数。

德加还沉迷于反犹笑话，显然不顾这会激怒他的犹太女主人和同伴们。他最喜欢讲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两只宠物猴在费里埃的一个聚会上逃跑了。这里的梗是宠物猴们为参加聚会穿上了西装领带，如此便很难与被认定像猿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们区分开来。为了找到逃跑的动物，一位客人决定把所有的客人聚在一起，问他们谁可以给他一枚两路易金币[75]。猴子们跳出来说它们有，暴露了身份——这正中设计者的圈套：只有猴子才舍得掏出钱来。

德加对阿斯也毫不留情地发起反犹攻击，这再次表明上流社交圈一旦开始插科打诨，残酷的性情必会战胜友谊的纽带。画家本人选择了远离自己出身阶层的那种无聊浮夸，因而很不赞同阿斯对那个阶层巴结奉承，认为他不知疲倦的社交活动显示了暴发户过于渴望融入的心情。德加嘲笑好友不停地赶去参加一个又一个聚会，给他取名“贫穷的犹太流浪汉”。[76]

洛尔·德·舍维涅也像德加一样喜欢侮辱犹太人，挖苦起来也丝毫不顾及所谓朋友的利益。阿蒂尔·梅耶尔很少出现在杜艾街（他和热纳维耶芙向来不和，两人都不赞同对方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的野心）。有一

次他出席那里的沙龙之后，洛尔对在场的其他人说：“我的犹太佬头都秃了，但他的身子骨还算硬朗。”[77]她对阿斯更是恶意满满，背地里说他使用了一点卑鄙的犹太人手段才入选了骑师俱乐部。据洛尔说，阿斯等到可能投反对票的人都在巴黎围城期间去跟普鲁士人打仗了，才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候选人身份争取入会。

这样的怪谈虽然只为博社交人士一乐，却也利用了一个极其严肃的对立，即英勇的持剑贵族与据称精明、懦弱、卖国而效忠“德国”的犹太人之间的对立。1890年代德雷福斯事件爆发时，自称法国爱国者的人会援引同样的刻板印象来证明，把一位无辜的犹太人军官当作普鲁士间谍处置是合情合理的。

很难确切地说出热纳维耶芙的犹太客人们对这类幽默做何感想。有些人会虚与委蛇，比如卢多维克·阿莱维也会自嘲，说自己符合刻板印象中“犹太人”的贪婪。他讲到他曾经拒绝两万法郎的出价为《高卢人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我必须掐自己一下。真的是我在说话吗？”[78]至于在热纳维耶芙的圈子里反对这类反犹笑话的声音，有记录的实例似乎只有一次。一位未具姓名的犹太人朋友有一次不得不打断让·福兰（他是曾跟随德加学习的漫画家，以尖刻的幽默感成为热纳维耶芙最喜欢的一位客人）的种族主义攻击，插嘴说：“但你们的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啊！”福兰和他的老师一样才思敏捷，反驳说：“对，那是因为他谦虚。”这类反击或许阻止了犹太忠实信徒们更频繁的抗议。普鲁斯特后来在一个未发表的手稿片段中猜测，“或许一个犹太人”一生中“总（有）一个时刻要经历几乎不可避免的羞辱”，因此他已经“不怕被鄙视了”。[79]

至于热纳维耶芙，她那句“我没有多少宗教可改”或许能够表明她试图超脱“有生”阶层的朋友们打趣的种族主义侮辱。[80]另一方面，她自己成了沙龙中最幽默诙谐的人，更有力地制止了他们的偏见。

热纳维耶芙的尖刻绝不逊于宾客中的任何人，但她很少那么卑劣小气。费尔南·格雷格说她的幽默感鲜活地混合了

> 常识和意外惊喜，这让她能够以根本不真诚的方式说出最古怪的话。她和堂兄卢多维克·阿莱维一样有一副异想天开的头脑；说出的嘲弄有股子天然的温柔劲儿，逻辑则完全出人意料。[81]

热纳维耶芙那种尖刻打趣的俏皮话的确让人想起卢多维克和梅亚克合作的舞台剧中那种善意的讽刺。一位戏剧评论家曾赞扬“梅亚克和阿莱维”的才智“辛辣而节制；辛辣却从不落井下石，既粗鲁又可爱，他们也讨厌人性的弱点，却更觉得可笑”[82]，他们享有极高的文化威望。识别出他们的幽默与热纳维耶芙的幽默之间有着家人的一脉相承，无异于把她纳入了最有喜剧天赋之人的行列。

让热纳维耶芙不同于这对名人组合，并显然让同伴们觉得比后者更加有趣的，是她在说俏皮话时带着一脸和善的无辜。（龚古尔称之为她“犹太人的满不在乎”[83]。）正因为热纳维耶芙说话时面无表情，那些听起来很难令人捧腹的俏皮话才让听众忍俊不禁。她最著名的一句俏皮话来自在马斯内的歌剧《埃罗底亚德》（*Hérodiade*，1881）首演时与古诺的对话。幕间，古诺转向她，以说教的口气称：“我觉得这音乐像八音盒。”热纳维耶芙立刻喊道：“我正想说呢！”[84]她睁着一双大眼睛，一点儿没有被逗乐的样子。她还有个常被引用的警句，即每当有不熟悉她的背景的人问她喜不喜欢音乐时，她总会答道：“在我第一个家里，他们整天鼓捣那玩意儿。”[85]热纳维耶芙对自己与19世纪最伟大的两位作曲家的关系如此轻描淡写，可见她对上流社会那套假装的“单纯”轻车熟路。

光临她的沙龙的常客们惊叹她聪明诙谐，总是记下她的挖苦讽刺，“热纳维耶芙最新”语录便不断扩充更新。在两个周日之间为打发时

间而重复她的俏皮话，简直成了他们集体自我抚慰的仪式。他们还会对各自圈里——贵族、财阀或艺术家——的门外汉们引用她的格言，并总是用这个问题抛砖引玉："你听到热纳维耶芙的最新语录了吗？"[86]就像在风平浪静的湖中扔进了一块石子，这样的一咏三叹会在巴黎社交圈里激起涟漪，那些同心圆不断扩大，乃至覆盖整个湖面，没有哪个角落能保持平静。正如"美元公主"新娘的丈夫博尼·德·卡斯特兰带着巨大的惋惜所说，"昔日的公爵夫人们正在被风趣机智的女人所取代"。[87]

岁月流逝，热纳维耶芙还会找到其他加强神秘感的方式。不过她的"梅亚克和阿莱维式"诙谐的传说会通过三个各自独立但同样声望很高的朋友圈传遍全城，进而为她打下绝佳的基础。与洛尔深夜在"黑猫"疯玩的传说一样，这个传说不仅提升了女主人公的荣耀，还代表了蒙马特尔与上流社会之间一种象征性的融合。任何收集费利克斯·波坦集换卡的人都能证明，在19世纪末的巴黎，旧的藩篱正在倒塌，全新的社会秩序在它的残骸上建起。在特权的堡垒和天才的贫民窟之间出现了一个热闹的大市场，家世与天分、高贵与低贱一起出现在那里，以一种共同的货币进行交易：出名。作为这种和谐关系的促进者，热纳维耶芙和洛尔脱颖而出，成为两个最著名的典范。虽然她们姓氏的光芒都源于其他男人的成就（彼特拉克、德·萨德、比才和阿莱维家族），但这两个女人用她们非正统的社交能力和自我推销手段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热纳维耶芙和洛尔预见到了大多数同代人还没有感知的未来世界，她们因为出名而闻名遐迩。[88]

---

[1]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86；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177；and 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430.

[2] 在热纳维耶芙1926年手写的遗嘱原稿中，洛尔是接受馈赠的极少数女人之一。其他女性受益人几乎全都是亲戚或仆人。——作者注

[3] LC社交恶作剧的这一简短样本来自Eugène Hubert，“La Fête de l’Opéra，”《吉尔·布拉斯报》（1883年4月8日）：第3-4版；“La Journée，”《高卢人报》（1885年4月29日）：第2版；以及 “Bloc-notes parisien，”《高卢人报》（1889年3月17日）：第1版。

[4] LG，*Mémoires*，vol. 2，31.

[5] LG，*Mémoires*，vol. 2，79-80。

[6] 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4，118. 关于LC性格的这一方面，又见AF，*Le Bal du Pré-Catelan*，156-57。

[7]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80；and AF，“Le Salon de l’Europe，”467-70. 关于雷什克的情爱丑闻，见Garry O’Connor，*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Philadelphia：Atheneum，1979），49。玛丽·德·迈利-内勒由于不能离婚，不得不等到丈夫死后才嫁给雷什克；等那一天终于来到时，她和男高音已经一起生活十多年了。关于传说HG曾与玛丽·德·迈利-内勒有过婚外情，见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0。

[8] 亨利·玛丽·雷蒙·德·图卢兹-洛特雷克-蒙法（Henri 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Monfa，1864-1901），简称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人称“蒙马特尔之魂”。洛特雷克承袭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等人的画风，吸收了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开拓出新的绘画写实技巧。

[9] AF，“La Salon de l’Europe，”463.

[10] AF，“La Salon de l’Europe，”，450。

[11] 泰奥菲勒·斯坦伦（Théophile Steinlen，1859-1923），出生于瑞士的法国新艺术运动油画家和版画家。

[12] Harold B. Segal，*Turn-of-the-Century Cabaret：Paris，Barcelona，Berlin，Munich，Vien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20. 除特别注明之外，关于“黑猫”的详情均为Segal的描述（19-37）；摘自Theodore Child，“Characteristic Parisian Cafés，”*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77（April 1889）：687-703 and 700-703；以及Jerrold Seigel，*Bohemian Pari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1830-1930*（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223-24 and 231-36。关于布吕昂在巴黎上层社会广受欢迎，见Jerrold Seigel，*Bohemian Pari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1830-1930*（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238-39；以及Alcanter et Saint-Jean（pseud. Marcel Bernhardt），“Les Vendredis d’Aristide，” *Le Nouvel Echo* 3（February 1892）：78-80。

[13] “黑猫”的皮影戏模仿的历史和《圣经》人物包括拿破仑一世、圣安东尼和示巴女王；见Harold B. Segal，*Turn-of-the-Century Cabaret*：*Paris*，*Barcelona*，*Berlin*，*Munich*，*Vien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31。还有一部特别大胆的皮影戏讽刺了耶稣的一生；见the *Chap-Book*（August 1，1894）：201-2。

[14] 阿里斯蒂德·布吕昂（Aristide Bruant，1851-1925），法国夜总会歌手、喜剧演员和夜总会业主。他最著名的形象是身穿黑斗篷、戴着红围巾，出现在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的某些著名的海报中。他还被认为是写实歌曲这种音乐体裁的首创者。

[15] 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1932-2003），美国音乐家、乡村音乐创作歌手、电视音乐节目主持人，创作和弹奏演唱歌曲包括乡村、摇滚、蓝调、福音、民间、说唱，多样曲风令人赞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

[16] 性手枪（Sex Pistols），英国朋克摇滚乐队，于1975年在伦敦组建。性手枪乐队只存在了两年半时间，仅发行了四首单曲和一张录音室专辑《别理那些小痞子，这里是性手枪》（*Never Mind the Bollocks*，*Here’s the Sex Pistols*），却被视为流行乐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乐队之一，引发了英国的朋克运动，启发了许多后来的朋克和另类摇滚音乐人。他们的公开露面常常以暴乱结束。乐队1977年的单曲《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攻击了社会成规和对王室的服从。他们时常越轨的歌词涉及的主题还有音乐产业、消费主义、堕胎和纳粹大屠杀。

[17] “声名狼藉先生”（The Notorious B.I.G.，1972-1997），美国饶舌歌手，本名克里斯托弗·乔治·拉托·华莱士（Christopher George Latore Wallace）。他在2015年被“公告牌”（Billboard）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位饶舌歌手”第一名。

[18] 关于布吕昂蛊惑人心的人格面貌和音乐曲目，见Jerrold Seigel，*Bohemian Pari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1830-1930*（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235-39。

[19] Jerrold Seigel，*Bohemian Pari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1830-1930*（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239。在法文中，尊贵的布吕昂让仆人们使用的称呼是“*Chansonnier populaire*”，直译是“大受欢迎的歌唱家”。但在法文中，“*populaire*”不光有受欢迎之意，还有“人民”“群众”的内涵，布吕昂声称自己是百姓的代言人，因而尤其注重这一细节。

[20] “*épater la noblesse*”这个短语来自“épater la bourgeoisie”，意为挑战中产阶级的礼仪规矩和权威，这里“*épater la noblesse*”的意思是挑战贵族的礼仪规矩。

[21] 本书第14章也讨论了GPR对彼特拉克的兴趣，这方面的内容见NAF 24951，folio 156；and Walter Müller，*Georges de Porto-Riche*，*1849-1930*：*l’homme*，*le poète*，*le dramaturge*（Paris：J. Vrin，1934），51。

[22] Francesco Petrarca，“CLXII. *Questa fenice dell’aurata piuma*，” in *Il Canzoniere*，vol. 1，ed. Lorenzo Mascetta（Lanciano：Rocco Carabba，1895）. 在这句诗中，和彼特拉克的许多文字游戏一样，“dell’aurata”（金色的）也暗含着他的夫人的名字：洛尔。

[23] Gratin（pseud.），“Femmes et fleurs，” *Le Gaulois*（August 30，1885）：1；关于有人把LC误称为“德·塞维涅夫人”，见AF，“Le Salon de l’Europe，” 460。

[24] AG，*Les Clés de Proust*，31；and Jean-pascal Hesse，*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Paris：Assouline，2014），418-19. 在接受Hesse采访时，Xavier de Sade说他的祖先唐纳蒂安1814年去世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只能在家里提一提侯爵的名字”（418）。1930年代的年轻人Xavier还说，他被一位叔叔警告说，“你要是在敢外面提一句你的曾祖父，就会完蛋的”（419）。

[25] 何塞-马里亚·塞特（José-Mariía Sert，1874-1945），加泰罗尼亚壁画家，出身于富有的纺织实业家庭，是萨尔瓦多·达利的好友。他以浮雕式的灰色画法而闻名，喜欢用金色和黑色。

[26] 斯特凡·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原名艾提安·马拉梅（Étienne Mallarmé），19世纪法国诗人，文学评论家。他与阿蒂尔·兰波、保尔·魏尔伦同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希罗狄亚德》（1875）、《牧神的午后》（1876）、《骰子一掷》（1897）等。

[27] Misia Sert，*Misia and the Muses*：*The Memoirs of Misia Sert*（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1953），87.

[28] PM，*L'Allure de Chanel*，107.

[29] 关于GM传说中的300个情妇，见Armand Lanoux，*Maupassant le Bel-Ami*（Paris：Fayard，1967），p. 241；and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October-December 1970）：84。

[30] Louis Auchincloss，*The Man Behind the Book*（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6），99.

[31] LD，*Devant la douleur*，119.

[32] René Maizeroy，"Guy de Maupassant à Sartrouville，" in *Le Gaulois*（July 3，1912），1. Maizeroy在文中称自己是GM最好的朋友。我引用的大量关于GM的秘密社团的信息都是他透露的。关于"克里普人"的详情，见Marie-Claire Bancquart，*Paris "Fin-de-Siècle"*（Paris：SNELA，2009），131；以及编辑们致GM的短简，*Contes et nouvelles*，ed. Dominique Frémy，Brigitte Monglon，and Bernard Fremech（Paris：Robert Laffont，1988），209。

[33] GM，致一位女性朋友的信，未署期，拍卖编号为#272，被转录于*Autographes et manuscrits*（Paris：Ader，June 23，2013）。这份拍卖品并未被认定为致LC的信，然而它是和一叠其他信件一起拍卖的，那些信件被确认为GM和LC的其他艺术家朋友（伊薇特·吉贝尔、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费迪南·巴克）写给LC的。这些信件据说都出自同一处家族地产。

[34] GM，致一位女性朋友的信，未署期，拍卖编号为#272，被转录于*Autographes et manuscrits*（Paris：Ader，June 23，2013）。这份拍卖品并未被认定为致LC的信，然而它是和一叠其他信件一起拍卖的，那些信件被确认为GM和LC的其他艺术家朋友（伊薇特·吉贝尔、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费迪南·巴克）写给LC的。这些信件据说都出自同一处家族地产。

[35] 译文引自莫泊桑，《漂亮朋友》，王振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138-139页。

[36] GM，*Bel-Ami*（Paris：L. Conard，1910 [1885]），146.

[37]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38.

[38] 亨利·格雷弗耶警告妻子远离洛尔有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草莓金色头发、眸子碧绿的洛尔正是他喜欢的类型。再说她一贯自称喜欢“肏*”，对亨利这样欲壑难填的男人而言，绝不会不感兴趣的。不过即便两人的确有过私情，他们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作者注

[39] EG，见AP（II）/101/8。

[40] 在RTP中，MP正确地指出这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话，在SG的开头，盖尔芒特家的一次聚会上，他以配角身份出场。不过，大公之所以那么高兴，原因是一位名媛被主人家花园的喷泉淋得浑身湿透，又羞又臊。

[41] AF，“Le Salon de l’Europe，” 464-66.

[42] F. W. J. Hemmings，*Culture and Society in France，1848-1898：Dissidents and Philistines*（London：Batsford，1971），136. 关于鼎盛时期人称“巴黎女王”的施耐德对真正王室的魅力，见Jacques Heugel，“Hortense Schneider，” *Le Ménestrel*（May 14，1920）：208。

[43] AF在“Le Salon de l’Europe，” 464中对这一插曲的叙述稍有出入。

[44] AF在“Le Salon de l’Europe，” 465。

[45]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177.

[46] 关于LH的名士风范，见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92；and J.-P. Halévy，“Ludovic Halévy par lui-même，” 141。他参加“比克肖晚餐会”一节，见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43。

[47] FG，*Mon amitié*，42-43；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86；关于GS的“混合”沙龙的独特性和声望，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62-63；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175；and Andrée Jacob，*Il y a un siècle… quand les dames tenaient salon*（Paris：Arnaud Seydoux，1991），168-70。关于她文学圈的朋友一直请她在事业上帮助他们，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34-36。

[48] EdG，日志，1893年2月17日的日记。

[49] Muhlstein，*Baron James*，105.

[50]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1. 关于雷纳克嘲笑ES一刻不停地谈论GS，见LG，*Mémoires*，200。

[51] HR，*Les Cahiers*，447.

[52]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177.

[53] 阿多尼斯（Adonis），希腊神话中掌管植物每年死而复生的神，非常俊美。他本是黎巴嫩地区的神，后来被纳入希腊神话，但始终保持着中东闪族的来源。

[54] Andrée Jacob，*Il y a un siècle… quand les dames tenaient salon*（Paris：Arnaud Seydoux，1991），165.

[55] HR，*Les Cahiers*，278.

[56] 除特别说明外，一切GS的忠实信徒们对EG的抱怨和对其性格的评价的引文全都摘自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3-16。Bischoff很奇怪地坚持认为关于ES的暴脾气和狂暴的占有欲的评价“不该被当真”（115）。不过在所有忠实信徒中，似乎只有保罗·艾尔维厄一人曾对ES发脾气的倾向轻描淡写。见PH致GS的信，未标明日期，存档于NAF 13026，folio 37。

[57]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178.

[58]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175。

[59] LG，“L'entresol，” 3. 同样，关于GS“毫无书卷气、毫不贪恋文学也毫无学术气质的性格”，见RD，“Madame Straus et Marcel Proust，” 806。

[60] EdG，日志，1895年2月18日的日记。JEB以同样的口气提到了GS沙龙里的打趣；见*Mes modèles*，114。

[61] “全体巴黎人”（MP的笔名），《巴黎的伟大沙龙》，《高卢人报》（1893年9月1日）：第1-2版；译文见本书附录三。

[62] 关于阿斯和德·阿伦贝格的诙谐，见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28；and FG，*Mon amitié*，43。

[63]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223.

[64] Paul Grelière，*Les Talleyrand-Périgord dans l'histoire*（Paris：Éditions Clairvivre，1962），181.

[65] AdF，*Cinquante ans de panache*，52.

[66]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6；AG，*Les Clefs de Proust*，15.

[67] 让·谷克多（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设计师、编剧、艺术家和导演。

[68] 这句俏皮话是上流社会文字游戏的另一个范例。因为在法语中动词"升起"和"落下"也有"醒来"和"上床睡觉"的意思，洛尔的玩笑暗指波托茨卡夫人如传言所说，到处跟人上床。——作者注

[69]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66.

[70] FG，*Mon amitié*，43. 这里，FG事实上是指德加的学生和朋友、漫画家让-路易·福兰的刻薄嘲讽。但它同样适用于德加，福兰承认德加在艺术和头脑上都是他的老师。关于福兰是GS"最喜欢的"风趣之人，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38，n. 1。

[71] DH，*My Friend Degas*，trans. Mina Curtiss（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64），47，n. 5.

[72] DH，*My Friend Degas*，trans. Mina Curtiss（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64），47，n. 5.

[73] EdG，日志，1885年6月6日的日记。GS虽然不是特别喜欢战争场面的油画，但她对德太耶的画特别偏爱，因为他画过《卡门》最初的舞台布景。

[74] DH，*My Friend Degas*，47.

[75] 两路易金币（two-louis coin），法国金币名，铸于1641—1795年，币上铸有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等人的头像。

[76] 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92.

[77] André Magué，*La France bourgeoise actuelle*（Paris：Février，1891），229. LC声称掌握阿斯入选骑师俱乐部的秘密的引文见PM，*L'Allure de Chanel*，106；以及DH，*Pays parisiens*，82。关于参加普法战争的骑师俱乐部成员，见 "Le Jockey-Club à l'armée，" *Le Figaro*（October 25，1870）：2。

[78] LH，*Carnets*，590.

[79] AGG，*Souvenirs*，144.

[80] 这一片段被抄录在Pléïade版本的RTP的学术注释中。MP，RTP，vol. 1，902.

[81] FG，"Sur Marcel Proust" *Le Journal des débats*（February 7，1937）：3；and FG，*L'Âge d'or*，168. 同样，关于她的"巧妙应答，其中她非常巧妙地注入了自己善意的讽刺"，见RF，"Mort de Mme Émile Straus，" 2。关于GS的"梅亚克和阿莱维式"才智，又见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21 and 29。关于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梅亚克和阿莱维式"才智，见MP，TR，785。

[82] Jean-Claude Yon，"Le théâtre de Meilhac et Halévy：satire et indulgence，" in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ed. Henri Loyrette*（Paris：Fayard，1996），162-77，168.

[83] EdG，日志，1887年3月28日的日记。

[84] LG，*Mémoires*，vol. 2，201；FG，L'Âge d'or，168.（是FG指出GS和古诺当时正在看《埃罗底亚德》。）许多年后，MP在他模仿圣西蒙的回忆录中引用了这句话，说它是GS所说，但改变了她说此话的背景。MP，*Pastiches et mélanges*（Paris：Gallimard，1947 [1919]），84.

[85] LG，*Mémoires*，vol. 2，201. GS其他最常被传颂的俏皮话，LG，*Mémoires*，vol. 2，200-201；以及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 avec Mme Straus*，99-100。

[86] 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18.

[87] Castellane，*Vingt ans de Paris*，106. 在同一段，Castellane还指出“（巴黎贵族的）旧宅子里的聚会越来越少，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新型社会”（Castellane，*Vingt ans de Paris*，106）。那种新型社会不仅包括“聪明风趣的女人”，还有非贵族且往往是外国出生的女继承人，如Castellane本人的妻子安娜·古尔德。关于世纪末巴黎旧的社会樊篱的坍塌，更多内容见Suzanne Fiette，*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s Lumières à la Belle Époque*（Paris：Perrin，2015），205-7；以及CCB在1886年的一篇日记：“无论我们望向何处，那个旧世界，旧社会，似乎都正在瓦解。”CCB，*Journal*：*1885-1886*，ed. Éric Mension-Rigau（Paris：Perrin，2003），196.

[88] 这里的一个重要例外是阿蒂尔·梅耶尔，他加入（并帮助）LC和EG成为她们那个时代的名人偶像；据JEB说，梅耶尔的指导“原则”是“名声比天分重要”。JEB，“Mes modèles”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artistiques et scientifiques*（July 14，1928）：2.

第10章 当代阿拉米斯

在她们各自的家中，洛尔和热纳维耶芙并不是唯一直面争议和无视传统的人。她们的丈夫也在颠覆着各自阶层不成文的规矩。阿代奥姆·德·舍维涅的反叛方式是与年轻的德·塞纳瓦斯男爵交往并与他一同旅行。埃米尔·斯特劳斯的反叛方式是拒绝安于自己出身的阶层——巴黎的移民工人阶级。关于阿代奥姆的出格行为，似乎没有更多的资料留存下来，因而也没有多少可说。而斯特劳斯反常的社交资历却有不少证据保存至今，足够对其人有更为清晰的了解。那些证据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有头脑、有野心、和他娶的女人一样复杂的男人；这位精力充沛的“无生”阶级奋斗者在一出大规模社会剧中扮演了他自己的配角，那是热纳维耶芙、洛尔和伊丽莎白共同主演的剧目：上层的阶级重构。

斯特劳斯毫不掩饰自己提升社会地位的欲望，这种做法常常令同代人错愕。他虽然只是个资产阶级犹太人，却以执拗的坚定和精明的策略成为一名律师，也以同样的坚定和精明巴结贵族乃至王室成员。按照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的说法，斯特劳斯急于挤入上层的渴望直接源于他对自己的家世背景的不自信。正如达尼埃尔·阿莱维所说，“和许多白手起家的人一样，斯特劳斯出身低微，却极端势利”。[1]同样和许多白手起家的人一样，他从不谈论自己是从多深的底层爬上来的。斯特劳斯的名字在19世纪末的报纸杂志和回忆录中出现了数百次，但这些资料中无一处提到他的出身，或者他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上升之前那些年的情况。斯特劳斯本人活到了八十多岁，却从未谈起或写过自己的出身。在他和热纳维耶芙结交的那些圈子里，人们往往会自负地谈起自己的家世背景，因此他把那些从自己的公开人格中彻底抹去的做法就显得更不寻常了。

我们很难断定斯特劳斯是否也对热纳维耶芙彻底隐瞒了自己的出

身。不过在热纳维耶芙的通信中，没有第二任丈夫任何亲戚的来信或去信，这表明要么他选择不对她提起斯特劳斯家的其他人，要么她也愿意无视他们的存在。她对待第一任丈夫的家人可不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也是无名之辈。比才死后，热纳维耶芙仍然与他鳏居的父亲、退休理发师和钢琴教师阿道夫联系密切，常常请他帮忙照顾雅克。在她的鼓励（可能也是在她的资助）下，阿道夫·比才甚至搬到了杜艾街22号她楼下的一间小公寓里，一直住到他1886年去世。

热纳维耶芙和斯特劳斯那年10月7日结婚时，两人或许都希望开启一段新生活。婚礼在巴黎大犹太会堂（Grand Synagogue of Paris）举行，那是一座庄严宏伟的现代会堂，外观是装饰繁复的新罗马风格，能容纳1800人。[2]这座会堂位于第九大区，与新娘第一次举办婚礼的地方同处一个街区，但二者的相似之处仅此一项。热纳维耶芙和比才是在当地的市政厅里结婚的，举办了一个朴素的世俗仪式，只有几个最亲近的家人参加（还受到新娘母亲的抵制）。她和斯特劳斯的婚礼极尽排场，是由巴黎的首席拉比主持的宗教仪式——在高耸的大理石圣坛脚下，新婚夫妇在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婚礼彩棚下面交换了誓言。一群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也是这座会堂的首要恩主）成员见证了他们的结合，其到场对新婚夫妇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到这时，热纳维耶芙和埃米尔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夫妇俩仿佛在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后就是他们的家人了。

仿佛还要让这假托的家世门第惠及他已故的母亲菲利皮内和父亲亚伯拉罕·斯特劳斯一样，新郎在结婚证书上把二人列为食利者：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人。[3][4]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件中提到自己的法定父母。这也是谎言，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计划如何与热纳维耶芙一起开始新生活。斯特劳斯擅长自我重塑，在这方面与热纳维耶芙不分高下，他将重新书写过往的历史，冲破特权的要塞，定义全新的自己。

亚伯拉罕·泽利希曼（Abraham Seligmann，1803-1881）出生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上莫舍尔（Obermoschel），那是莱茵河谷的普鲁士领土，与法国的阿尔萨斯省接壤。大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口居住在该地区，他的家族就在其中；亚伯拉罕有三个兄弟姐妹，他是次子。根据民事记录，他的父亲萨穆埃尔（1774—？）是法兰克福犹太巷的拾荒者，那是欧洲最古老的犹太人贫民窟之一。他迁居阿尔萨斯可能是为了加入一个家族造假币团伙，因为在1806年，萨穆埃尔有两个生活在该地区的泽利希曼家族亲戚因伪造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货币而被捕。[5]这两位泽利希曼被审判和定罪后，萨穆埃尔把自己和最亲近的家人的姓氏改成了“施特劳斯”（Strauss），表明他们与这桩丑事无关。[6]但没过多久，萨穆埃尔又回到了法兰克福贫民窟，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阿尔萨斯，后来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也曾做过一模一样的事。

1820年代末，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在上莫舍尔娶了同样是阿尔萨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菲利皮内·弗兰克（Philippine Frank，约1812—1884），1830年，两人在那里生下了长子利奥波德。不久后他们移居巴黎。在迁居过程中，亚伯拉罕第二次更改姓氏，去掉了最后一个“s”。从那以后，他的姓氏就改成了法语发音的“斯特劳斯”（strôss）[7]，而不是条顿人的“施特劳斯”（schtrauss）。这一发音变化对两人的幼子埃米尔十分重要，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和自己不体面的莱茵传承之间有了清晰可辨的距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美国犹太人移民社区，德裔犹太人位处社会等级的顶端，碰巧都属于泽利希曼和斯特劳斯（就目前所知，与亚伯拉罕和萨穆埃尔等人没有任何关系）等有钱有势的家族。[8]相反在法国，说德语的阿什肯纳兹人一般都被看成粗鲁的贫民，不可与格拉迪斯、罗德里格斯和佩雷尔等祖产丰厚、数代以前就来到法国的伊比利亚塞法迪犹太人相提并论。德裔犹太人是“贫民窟贱民”的刻板印象在普法战争后变得更加偏激。[9]那时，年轻的律师埃米尔刚刚在巴黎开始自己的事业，他总是强调自己姓氏的法语发音，以表达自己的学识、教养和爱国情怀。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那些想羞辱他的人干脆就叫

他“施特劳斯”。



埃米尔·斯特劳斯的父母就是在莱茵河下游河谷的这座犹太人占多数的城镇里结婚的

一到巴黎，亚伯拉罕·斯特劳斯夫妇就在第二大区的一个蓝领社区住下来，菲利皮内在那里又生下了四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埃米尔出生于1844年，是最小的儿子，比斯特劳斯家的次子达尼埃尔小11岁。孩子们在家里说德语和意第绪语，这或许说明父母掌握的法语有限。和许多时代和文化中的移民后代一样，斯特劳斯兄弟姐妹大概都是在外面跟母语使用者学习的本地语言：玩伴、邻居、老师（如果孩子们上过学的话）。数十年后，埃米尔会重拾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德语，将海

因里希·海涅的一些诗歌翻译给维利·德·罗斯柴尔德女男爵（Baronne Willy de Rothschild）。

第二大区当时是，现在仍然是巴黎大堂[10]的所在地，那是市中心的很大一片集市，被恰当地称为“巴黎之腹”。亚伯拉罕在那里找到了流动楼层小贩的工作，后来升级为面粉商人，在市场最西边的谷物交易厅有固定摊位。在埃米尔·左拉反映现实的小说《巴黎之腹》（*Le Ventre de Paris*，1873）中，他笔下的谷物交易厅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石笼”[11]，满是粉尘的大面袋子垒得很高，上面覆盖着拱形圆顶。1885年，它将变成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新大厅，该交易所此前位于隔壁的柱廊式新古典风格建筑中。巴黎大堂附近的整片区域每天从日出之前忙碌到日落之后。清晨天不亮，外省来的农民、渔民和猎人们就赶着车进城把货物从马车上卸下来；夜间，穷人和老鼠一样，到垃圾箱和污水沟里寻找吃食。

少年时代，利奥波德和达尼埃尔·斯特劳斯在最小的弟弟还未出生时，也和父亲一起在谷物交易厅从事面粉生意。（按理说他们应该没有读过高中。）菲利皮内或许也和他们一样劳动，当时有很多女人都在巴黎大堂干活。[12]除了最重的搬运活之外，市场里的女性劳动者从事和男人一样的工作，从管理库存到与买方交易。如果菲利皮内确实在市场里帮忙，那么白天她大概会把两个牙牙学语的女儿留给某个邻居照看。无论如何，她仍然承担着做家务的主要责任，包括把洗澡、清洁和做饭用的水搬过狭窄的楼梯；买食品杂货，天热时它们很快就会坏掉；给鱼去鳞、给禽类去毛、给肉类去皮，在烟熏火燎的煤炉或燃气炉上烹制食物；把大卷的脏床单、脏衣服和尿布拖到河边洗净。巴黎上层阶级能够优哉游哉地享受，把所有沉重家务都分给仆人去做，像斯特劳斯家这样的家庭可负担不起那样的奢侈。



这张照片上表现的就是典型的**19**世纪工人在巴黎大堂搬运谷物的形象。斯特劳斯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也曾干过这活



在“巴黎之腹”，女人也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奢侈是有一个年长的监护人，要么是男仆，要么是某个成年亲戚，在菲利皮内抛头露面时帮她守护名节。好也罢，坏也罢，没有这样的保护倒是为她的一段关系铺平了道路，那是她这样的女人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有希望碰到的巧遇。在184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菲利皮内与历史上最富有的男人之一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1792—1868）男爵有了一段婚外情。[13]

这段风流韵事的源起无从得知，不过谷物交易厅与证券交易所毗邻可能促成了他们最初和后来的邂逅，詹姆斯男爵每天都要去证券交易所。他们也有可能是通过面粉交易认识的。1840年代中期，整个法国小麦歉收，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大饥荒危险在即，詹姆斯男爵便采取行动预先制止了危机。他把巴黎的谷物商贩集中到一起，对他们说，只要他

们同意不再涨价，他本人会出钱弥补亏空（他利用与俄国沙皇的衍生品互惠信贷筹资）。如果菲利皮内确实曾与亚伯拉罕和儿子们一起在生意场上帮忙，而且如果斯特劳斯一家确实作为商贩被男爵召集到这次会议上，那么她就有可能是在那里引起了他的注意。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据说是埃米尔·斯特劳斯的生父，他是个富可敌国的金融家、慈善家，也是路易-菲利普的顾问

什么让她和男爵走到了一起则是另一个难解之谜。菲利皮内没有个人作品——她大概都不会写字，因为在阿尔萨斯犹太人社区，只有男孩子才去上学——詹姆斯男爵的档案中似乎也没有任何关于这段婚外情的线索。但他毕竟是全欧洲最有钱有势的男人之一，这一公共形象与菲利皮内的籍籍无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一切关于他们彼此吸引之基础的讨论都注定会朝当时和现在已知的关于他的资料倾斜。至于菲利皮内为何对男爵感兴趣，最没有新意却也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给了她一

些在她和亚伯拉罕的生活中不敢想象的物质享受。众所周知，詹姆斯男爵对精美物品的胃口极大，常常斥巨资购买和享用。正如他的一位玄孙女安卡·米尔施泰因（Anka Muhlstein）在关于他的传记中所述：

> 这位罗斯柴尔德喜欢肆意炫耀和过度挥霍，表明一种强烈的……决心，他要超过任何人，让自己鹤立鸡群，决意要在贵族自己的游戏中打败贵族，那就是奢侈、品位和精致的游戏。[14]

除此之外，男爵对穷人也是出了名的慷慨。如果他在与菲利皮内交往中显示出这两个倾向中的一个或全部，那么他有可能以自己的慷慨赢得了她的喜欢。[15]

詹姆斯男爵并不以英俊著称，他长着滚圆的肚子、多肉的双下巴，还有一双浮肿垂睑的蓝眼睛，整个人像一只穿着银行家服饰的牛蛙。[16]随着年岁增长，他越来越像牛蛙，腰腹部越发滚圆，到最后，他站着和躺着几乎一样高。爱开玩笑的社交人士打趣说，他为了弥补自己的丑陋而娶了一位美女——他19岁的侄女，闺名贝蒂·冯·罗斯柴尔德（Betty von Rothschild，1805-1886）。[17]贝蒂是个性感丰腴的杏眼褐发美女，被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称为“无翼的天使”[18]。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9]在1842年到1848年间为她创作的一幅巨幅肖像凸显了她一头浓密黑发的光泽、完美的鹅蛋脸型，以及肩部细腻优雅的线条，一条奢华的玫瑰色塔夫绸礼服将她的曼妙完全衬托出来。娶一位漂亮妻子当然不会妨碍他对婚姻不忠，但詹姆斯男爵在每一段婚外情中都很留意他在上流社会的名声，那是他非常在意的。［据当时的奥地利大使说，“大公们都在（取）笑他，但（还是）醉心于”出席他为了讨好他们而举办的聚会。[20]］为避免丑闻，男爵喜欢从低阶妇女中挑选情妇。[21]因此从社会阶层上来说，商贩的妻子恰是能吸引他色眯眯的目光的那种女人。

菲利皮内没有留下照片；和仆人们一样，斯特劳斯家人根本请不起人拍照或画像。假设她也像幼子一样有着瘦削的身材、浅色眼睛、白皙的皮肤和红色头发，那么她与男爵20岁妻子的样貌大相径庭。更有意思的可能是菲利皮内贫困的背景吸引了男爵，不仅因为这使她生活在他的社交圈之外，还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令人始料未及，也再次与贝蒂形成了鲜明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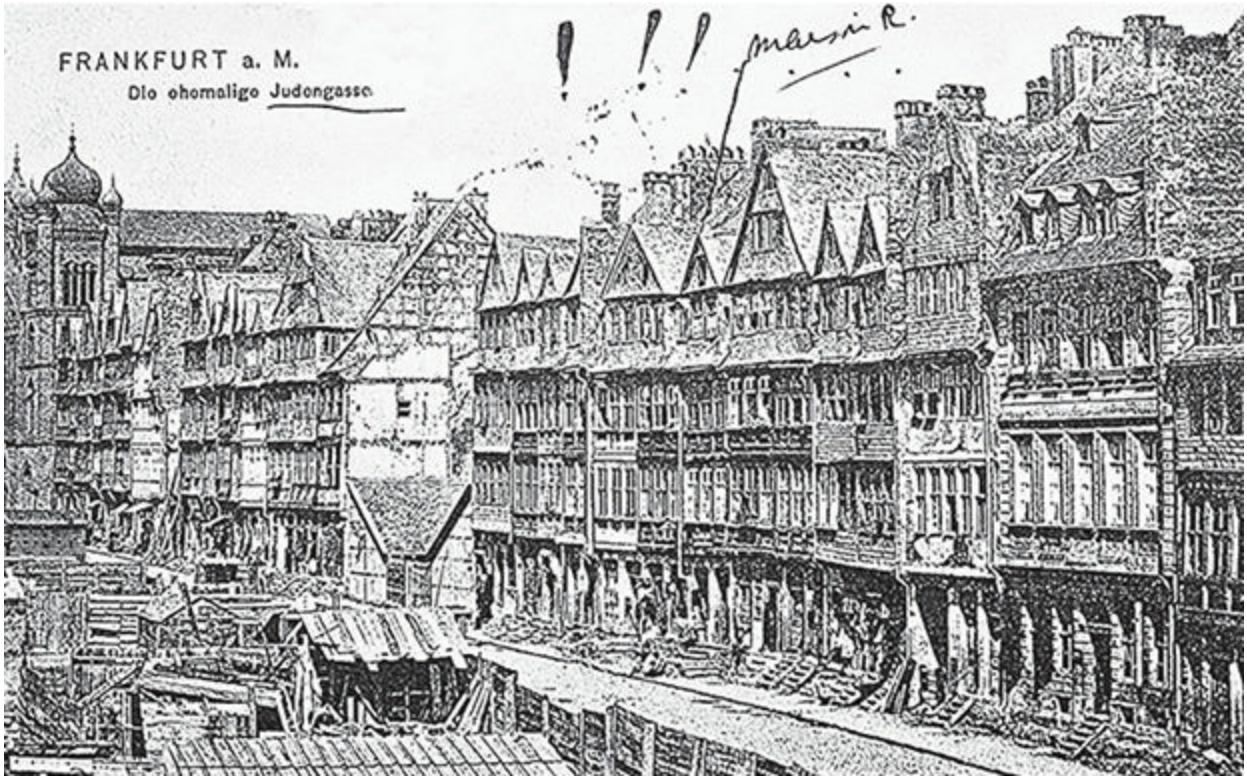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出生于法兰克福犹太巷的一个阿什肯纳兹家庭，那里也是菲利皮内的公公的出生地。他在家中五个儿子里排行最末，19岁便受父亲的委派移居巴黎，创建家族银行生意的法国分部。父亲迈尔·阿姆谢尔（Mayer Amschel）以货币兑换商起家，那时已经是个银行家了。（詹姆斯的哥哥们被派驻全欧洲各个城市完成同样的使命，因而整个家族建起了一个跨国集团。）拿破仑战争（1803—1815）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发了一大笔横财，为他们赢得了奥地利的贵族爵位；在巴黎，詹姆斯发财的途径是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赌拿破仑一世一定会失败。不过他真正白手起家成为一个大亨，还是在七月王朝[22]（1830—1848）期间。凭借自己在金融方面的非凡才能，詹姆斯起初与佩雷尔兄弟合作，扩大生意规模，进入了必将成为那个世纪最重要、增长最大的行业——铁路。他以自己的精明能干赢得了国王路易-菲利普的信任，管理国王的私人投资，他和贝蒂也凭借国王的喜爱进入了社交圈。

然而夫妇俩社会地位的提升进一步突出了二人之间的深刻差异。贝蒂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代，一出生便享尽荣华富贵，正如她的一位同代人所写的那样，她“带着那种贵族式的无动于衷，将最昂贵的奢侈品视为家常”[23]。詹姆斯男爵没有妻子那种天然的从容不迫；他出生的世界——犹太巷——是她全然陌生的，不管他获得了多少财富和权势，也永远不可能把那一切抛诸脑后。如果这样的差异加重了男爵在社交场上的不自信，或者让他和贝蒂在家里生出其他争执，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身份较低微的女人所吸引，就是像菲利皮内·斯特劳斯那样的女人。



詹姆斯男爵的妻子贝蒂也是他的侄女。她被认为是大美女，这幅肖像由安格尔创作

除了外表上天差地别之外，詹姆斯男爵和妻子的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她“说纯正的法语”，而他带着浓重的德裔犹太人口音——“*P*on*ch*our，Ma*t*ame”（“你好，夫人”），这使他每次一张口就暴露了自己的贫民窟出身。[24]小说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1829-1847）中写到无所不能的德裔犹太人纽沁根男爵时，就给他赋予了詹姆斯男爵那种粗鲁的音调变化，让它们的发音跃然纸面。[25]即便巴尔扎克很小心，除了“那胖犹太人”外没有详细描述此人，至今也仍有人认为罗斯柴尔德是纽沁根的原型。在没有其他任何突出特点的情况下，这位虚构银行家的犹太巷土语就成了这个人物的核心特征。



这张法兰克福犹太人贫民窟的明信片中用一个箭头标注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长大的地方

菲利皮内的法语大概也有同样浓重的口音。贝蒂“非常纯正”的法语显示出她和自己的叔叔之间巨大的经验差异，而菲利皮内那一口移民的法语或许让他听到了熟悉亲切的乡音。那大概表明她有可能理解男爵在往往不怎么友好的异国他乡白手起家、不知疲倦地工作所经历的种种艰辛。虽然身份低微，但菲利皮内和家人每天仍面临着那样的艰辛。

埃米尔1844年出生时，菲利皮内在出生证上填写的父母是她自己和亚伯拉罕·斯特劳斯。然而孩子诞生后几个月，亚伯拉罕就搬去英国了，再也没有回来，这可不像一位宠爱新生孩子的父亲所为。亚伯拉罕突然永久出走标志着他与菲利皮内的婚姻事实上的终结。埃米尔的父母分开的时机似乎能够证实他并非亚伯拉罕所生，而是詹姆斯男爵之子的传言，他后来进入的社交圈对这个传言笃信不疑。

他获得的独一无二的教育优势进一步增加了传言的可信度。在斯特劳斯家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埃米尔一人被送去私立学校，少年时代寄宿在右岸的一个高级膳宿公寓布斯凯-巴思（Bousquet-Basse），那里的学生们都在附近很有名的私立日校——康多塞中学（Lycée Condorcet）读书。布斯凯-巴思和康多塞中学的校友名单就是这座城市大资产阶级和犹太精英的名人录。斯特劳斯能在那里入学，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由詹姆斯男爵安排和出资的，男爵已经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詹姆斯·纳塔涅尔·德·罗斯柴尔德（James Nathaniel de Rothschild）送到了那里。詹姆斯·纳塔涅尔与埃米尔·斯特劳斯在布斯凯-巴思寄宿的时间有所重叠（前者比埃米尔大两岁，因此在学校里比埃米尔高两届），这表明大金融家没有刻意让自己的私生子远离那些得到承认的子孙。的确，高中毕业之后，斯特劳斯继续沿着詹姆斯·纳塔涅尔的成长轨迹，在他之后两年进入了巴黎的法学院。[26]斯特劳斯1867年毕业，成为亚伯拉罕和菲利皮内的家族中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

斯特劳斯毕业后又创造了另一个家族第一。他成了一位作者，在巴黎一家小众出版社茹奥（Jouaust）发表了自己关于财产法的毕业论文，该出版社书单上除此之外仅有的一部法律专著就是詹姆斯·纳塔涅尔·德·罗斯柴尔德的法学院毕业论文。茹奥更有名的出版物是赞美詹姆斯男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其他成员的系列宣传册。这家出版社的高级编辑之一是历史学家欧仁·阿尔方（Eugène Halphen），他（当时尚未诞生的）孙女诺埃米·阿尔方（Noémie Halphen）长大后嫁给了詹姆斯男爵的另一个孙子莫里斯·德·罗斯柴尔德（Maurice de Rothschild）。（诺埃米的外祖父碰巧是热纳维耶芙的前监护人欧仁·佩雷尔。[27]）鉴于茹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关系，它出版一位名叫埃米尔·斯特劳斯的无名学生的法学院毕业论文的决定，似乎再次证明了此人是罗斯柴尔德之子的传言。

这些年里，斯特劳斯断断续续地记了一本日记。他在首页称：“我

只会说真话，只写给我自己。”[28]作为他个人思绪的资料库，这本日记包括几个潜在的生平线索，虽然大多数是简略的。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线索，是他在日记中画了大量素描，写了不少短篇故事。这些涂鸦表明，斯特劳斯自称“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热爱一切艺术——绘画、音乐和诗歌”并非妄言，即便后来他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种热爱也始终是他最为认同的特征。[29]对于一个没有受过艺术培训（学习的是如何成为一名律师）的年轻人而言，他的钢笔画显示出极大的天赋。其中最好的一幅肖像画是一个穿着随便的黑发女人背对着观者，在燃烧的蜡烛火苗上焚烧一叠信件。巧合的是，这幅画让人想起他未来的妻子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毁掉了与乔治·比才的全部通信。

另一个相关的线索是他晦涩地记述了自己与一位捐助人的会面，那显然还是在法学院的时候，这位捐助人只是被称作“陌生男人”（l’Inconnu）。[30]听说了斯特劳斯的艺术倾向，而他本人又是一位世界级的艺术鉴赏家和收藏者，陌生男人请斯特劳斯拿出画作来给他看看。斯特劳斯把日记本递过去，紧张地等待着，陌生男人则沉默地翻看那些画。最后男人说话了，语气生硬粗鲁，拐弯抹角地表扬了他：这些真的是斯特劳斯画的吗？画工很好，看上去不像是他画的。这样的反应听起来可能有点像侮辱，斯特劳斯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陌生男人认可自己的画表示“欣慰”。他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位陌生人。如果詹姆斯男爵曾在年轻人的日记中扮演过一个小配角，那应该就是这一次了——上了年纪的威严财阀顺道过访，时间刚够他以模棱两可的父亲态度过问一下斯特劳斯的艺术创作，继而再次消失在陌生的未知世界。

如果说斯特劳斯日记中的这个线索表明有人短暂地出场，下一个线索就说明有人刺眼地缺席。他日记中没有一处提到亚伯拉罕、菲利皮内或四个兄弟姐妹中的任何一个。富裕家庭的男孩子们把寄宿学校和大学看成稀疏平常的成长过程而非人生中前所未有的机会，作为在他们中间长大的外人，斯特劳斯大概会为自己乏善可陈的家庭感到尴尬。如果真

是这样，那么他或许在同学中缄口不提自己的家庭以防被嘲笑；无论出于未经省察的习惯，还是出于有意为之的动机，这样的沉默也延伸到了日记中。无论动机如何，他在日记中一字不提家人的做法成为他一生遵循的行为模版：彻底疏远他们，仿佛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哪怕他真如自己所说，“只写真实的东西”，仿佛他的家人根本不曾存在。



年轻的斯特劳斯写自己“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热爱一切艺术”，在日记本中画了很多素描

斯特劳斯还在布斯凯-巴思时，有理由担心自己会遭到霸凌。该校的另一位校友曾瑟瑟发抖地忆起“（同学们）的残酷无情——他们私下里对待彼此就像野蛮人”[31]，以至于较为敏感的孩子会终日处于“恐惧和殉难感”中，恨自己为什么来到世上。[32]对斯特劳斯而言，他出身的阶层比同学们的低，受折磨的风险就够大了，更何况最初他的行为举止和

标准跟他们的完全不同。不过斯特劳斯14岁时，他的两个哥哥卷入了一个屈辱的金融丑闻中。[33]他们在报纸上臭名远扬，或许让斯特劳斯获得了另一个有力的理由，对同学（或许也对自己）假装那些社会弃儿斯特劳斯小贩们跟他毫无关系。

父亲移居英格兰后，利奥波德和达尼埃尔继续在谷物交易厅做生意。将近20岁时，他们把家里的生意重组为“斯特劳斯兄弟面粉商”（Straus Brothers Flour Merchants），为增加销量采取了激进冒险的做法。1850年代初，利奥波德越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城开了一家分公司，而达尼埃尔留在原地监管巴黎大堂的国内生意。然而两个兄弟终究应付不来海外扩张。1858年，“斯特劳斯兄弟面粉商”宣布破产。巴黎和伦敦的报纸都刊登了公司倒闭的消息，以及该公司的两位所有人在两个国家面临的法律诉讼。

为了避免被投入债权人的私牢，利奥波德和达尼埃尔从各自的城市逃走了。达尼埃尔回到了祖先的故土阿尔萨斯，做些经营物件的小本生意。利奥波德起初在波尔多进口南美的红酒和烈性酒，后来又去了亚拉巴马，在那里被一对名为马克斯兄弟的干货商人以诈骗罪起诉到州最高法院。[34]他最终到了旧金山，虽然他又在自己的姓氏最后加上了那个“s”，却仍无法声称自己与那里的李维·施特劳斯牛仔裤大亨有关。利奥波德或达尼埃尔后来是否还见过彼此、其他兄弟姐妹或母亲，历史记录中没有明显的线索证明这类团聚。他们的出逃和自我放逐，不但让斯特劳斯家族蒙羞，也毁了那一家人所剩无几的亲情。

斯特劳斯在日记中只字未提，但家庭蒙受的屈辱和内部破裂为解密他所写的短篇故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背景，那些故事合起来构成了另一条简略的生平线索。这些短文没有题目、没有署期，也未完成，多是些关于当代巴黎人做派的微型喜剧，从中看不出斯特劳斯画作中显示的那些天分，没有什么社会学见解或心理学深度。但它们仍然值得关注，一

个重要原因是其中几乎每一位主人公都出身持剑贵族。法国天主教武士阶层的子弟作为一个社会类型，其形象正好与圈钱的犹太人移民相反，前者英勇神武神气活现，后者则是一群怯懦的恶棍，敲诈债权人，又在骗局曝光后弃国逃跑。斯特劳斯的虚构文字中那些温文尔雅的贵族军官，可以被视为他对自己从未认同的那个可耻而支离破碎的家庭的彻底重写。

斯特劳斯对持剑贵族的天真的理想化，不但出现在他的创意写作中，或许也影响了他毕业后职业道路的选择。他于1867年就获得了法学学位，但直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没有记录表明他开始在巴黎执业。斯特劳斯在那段间歇期参了军。他或许是巴黎被围后才应征入伍的，那时身体健康的法国男人全都应召参军了。当然他也有可能此前就参军了，因为没有记录表明他在那些年里从事过其他专业活动，而过上绅士阶层的闲适生活那时还不是他的一个选项。因此他或许从法学院一毕业就去服强制兵役了，后来又延长了兵役期，希望继续在军队里担任全职军官。詹姆斯男爵在斯特劳斯获得法学学位的一年后就去世了，因此即便男爵有意干预斯特劳斯的事业轨迹，他也未曾以“陌生男人”的身份再度造访，批评年轻人浪费了极其正统的法学教育。

斯特劳斯在这段间歇期所写的日记提供了一些更为隐秘的见解。在篇幅最长的短篇故事中，他给自己指定了一个第二自我，阿拉米斯，取名自大仲马1844年的历史小说中三个火枪手中的一个。大仲马笔下的阿拉米斯在三人中最有野心和才智，甚至不惜暗算他人，但他也和同伴一样“温雅而出众”，那些正是斯特劳斯为自己这个版本的人物赋予的特性。[35]他还为自己这位“当代阿拉米斯”[36]赋予了明显与自己相似的特征，包括强烈地“热爱一切艺术”，以及“瘦削的身材、金黄色的头发、鹰钩鼻（和）尖下巴”。[37]斯特劳斯把自己重新想象为持剑贵族，英勇无畏地渴望为法国而战，这无疑显示出他毫不掩饰的社交欲望。在他进入社交圈之后，这样的欲望被其同代人解读为势利：

> 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更光荣的事业了，秉持自由的选择，逼迫与正义为敌之人就范！还有什么比高贵的心灵更美丽、更神圣的吗？[38]

在斯特劳斯的日记和生活中，这种骑士幻想很快就结束了。在他写下最后一篇阿拉米斯故事时，战争爆发了，它毫无意义的“绝望和蹂躏”让我们这位英雄目瞪口呆。阿拉米斯消逝在黑暗中，代之以斯特劳斯对自己参加普法战争经历的不连贯记述。

1871年1月，双方已经宣布停战了，斯特劳斯却与一颗爆炸的炮弹不期而遇。

1871年3月停战之后，斯特劳斯在巴黎过上了平民生活。他在第九大区租了一间公寓，距离他未来的妻子位于杜艾街的那座楼不远。靠近蒙马特尔或许是他强调自己“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热爱一切艺术”的方式，即便他正在着手开展自己的律师业务，在一个全无波希米亚风格的行业中打造一番天地。

斯特劳斯早期的一些案子枯燥无聊得近乎可笑。其中一个是代表一个女人起诉一位药剂师为她的狗配错了支气管炎药物，导致狗因摄入过量药物而死亡。[39]另一个案子是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直到婚后才发现，自己那位自称塞加拉侯爵的年轻英俊的丈夫欺骗了她，他的头衔（假冒的；事实上他是西班牙宪兵之子）、家徽（也是伪造的），乃至年龄（35岁，但他对她说自己只有33岁）全都是假的。斯特劳斯代表被告出庭，在结案陈词中把被告比作“《热罗尔坦公爵夫人》中的弗里茨”，就因为年长的公爵夫人迷恋他，这位英俊的年轻士兵得到了一连串不劳而获的提升。[40]如此恰当但出人意料的典故后来成为斯特劳斯在法庭上的鲜明特色之一，他似乎总能用恰当的文学典故和引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的聪明并没有为假冒的男爵赢得此案，但那是斯特劳斯罕见的一次败诉。塞加拉案和小狗支气管炎案据说是他仅有的两个败诉的案子。

其后十年，埃米尔·斯特劳斯大状——他很高兴自己也通过工作获得了一个专门的尊称——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他对每一个案子都巨细靡遗地纠缠细节，以工匠般的骄傲完善自己的诉讼摘要。他把曾投入到绘画中的精益求精和全神贯注投注于法律事业，并得到了快速发展。1879年他35岁时，已经是同代人里公认最优秀的律师之一，成了“巴黎律师界的领军人物”。[41]

正是在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找上门来，把斯特劳斯从一位引人注目的律师变成了不可战胜的律师。让他担任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法律顾问（担任这个职位的同时，他仍然可以代理其他案件，只要没有利益冲突即可）似乎是詹姆斯男爵的长子阿方斯男爵（1827—1905）的主意，这位说话温和、眼神忧郁的男人长着上细下圆、擦到衣领的络腮胡子。由于已故的父亲指定他作为下一代家族领袖和公司领导，阿方斯或许也获知了斯特劳斯身世的秘密，以此为由找到了他。两人虽然差了17岁，但阿方斯和斯特劳斯关系友好融洽，因为两人都曾投身公共服务（阿方斯也曾在巴黎被围期间英勇作战；此外，他还给法国政府贷款数百万法郎，用于在和平时期支付普鲁士的战争赔款）；都热爱艺术（和詹姆斯男爵一样，阿方斯也是个眼光敏锐、知识丰富的艺术收藏家）；也都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正是这最后一个价值观让这对据称为同父异母的兄弟走到了一起。阿方斯常常被看作他父亲的（婚生）孩子中最聪明、最勤奋的一个，他欣赏斯特劳斯的机敏才智和孜孜不倦的职业道德。[42]斯特劳斯也欣赏阿方斯不摆架子的风度和对家族事业废寝忘食的投入。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至少在两个方面彻底改变了斯特劳斯的生活。首先是财力方面。他在罗斯柴尔德兄弟得到的报酬应该相当优厚，不过位于伦敦的大家族档案中没有留下这类记录，因而没有关于他薪水的资料保存下来。但在为公司工作期间，斯特劳斯也在一个领域收获了专业才能，那就是如今所谓的公司法。（1899年，《高卢人报》称他为

巴黎首屈一指的“财务问题专家”。[43]）随着法国工业化进程加速，经济越来越现代化和复杂，该专业使斯特劳斯变成了富人。

新增的财富使他能够接受与罗斯柴尔德同侪一样的品位和消费习惯了，只是没那么奢侈而已。或许是在阿方斯或埃德蒙（埃德蒙是罗斯柴尔德兄弟中与斯特劳斯年龄最接近的，他自己也有精美的艺术收藏）的怂恿下，他开始购买艺术品了。[44]他主要收藏绘画大师的作品、18世纪法国艺术品和现代艺术。与阿方斯和埃德蒙一样，斯特劳斯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收藏。（阿斯给交际家朋友们的那套关于艺术收藏的简要提示，他们是不需要的。）或许跟他自己的绘画天赋有关，斯特劳斯目光独到，尤其是在当代收藏这一类别，这给了他足够的信心选择名气不大的艺术家的作品。他早期最棒的发现是克劳德·莫奈，他从后者那里购买了几幅色彩鲜艳的画作。

财富还让斯特劳斯有闲暇把律师事业拓展到不那么挣钱，纯粹因为兴趣而涉足的领域。他为一个文化促进组织，即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Society for Dramatic Authors and Composers），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致力于保护艺术家们为舞台写作和作曲的知识产权。得益于参与该组织的工作，斯特劳斯能够把知识产权法纳入自己的客户服务范围中，没过多久，他代表的当事人就包括了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著名艺术家，像雷雅纳、居伊·德·莫泊桑、乔治·德·波托-里什和居斯塔夫·莫罗（斯特劳斯也收藏了他的作品），等等。作为公司法领域的领袖，斯特劳斯把自己“像波希米亚人一样热爱艺术”变成了一项核心的律师业务，这无疑非同寻常。

另一方面，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也大大改变了他的社交地位和前景。与詹姆斯男爵关系的传言自始至终伴随着斯特劳斯，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关注，那远不是一位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当然更少）犹太人律师所能得到的。关于他的父亲是谁的八卦无处不在，至少部分当归因于

罗斯柴尔德家族臭名昭著的偏狭。他们有族内通婚的传统，詹姆斯男爵和贝蒂的结合只是很多实例中的一个而已，该传统的本意是防止外人进入家族，分得财产——虽然古怪，但它完全等同于在旧制度下法国贵族的氏族内通婚做法。19世纪末的“有生”阶层仍然渴望能延续这一王朝模式，但他们的家徽需要镀金，就不得不屈尊妥协，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没有这样的压力。1859年，詹姆斯男爵和贝蒂的次子居斯塔夫男爵（1829—1911）娶的妻子不是亲戚，让整个家族为之大怒。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贝蒂仍然不能接受这桩婚姻。她也未曾原谅自己的两位法兰克福侄女贝尔特和玛格丽特·冯·罗斯柴尔德嫁给天主教贵族。[45]在此背景下，埃米尔·斯特劳斯能够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接纳，令人震惊，此事前所未有，看起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他是詹姆斯男爵的私生子。



阿方斯男爵接替父亲詹姆斯男爵担任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雇用斯特劳斯做法律顾问

斯特劳斯对贵族的崇拜和他对艺术的热爱一样，从少年时代持续到成年以后，不过他作为社交名流，可远不像艺术律师和收藏家那样游刃有余。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外出社交时，他温顺地紧随其后，忙着巴结一生中头回见到的真正的贵族。然而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身边的人而言，那种明显急于讨好的样子与他平日工作里养成的好斗傲慢的态度，以及对自己的出身迟迟不消的戒备心看起来都极不协调。斯特劳斯不久以后从热纳维耶芙的朋友们那里获得的批评——说此人招人讨厌、咄咄逼人、愤愤不平——只是把上层对他没风度没教养的抱怨换一套说法说了出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何以招惹这么一个粗野讨厌的人，这只会让他们是亲戚的猜测更加可信。要不然，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容忍他呢？

斯特劳斯似乎读不懂社交圈熟人们躲开和冷落他的暗示。他顽固地追求社交人脉，运气最好的时候，他想要结交的大人物正好需要一位律师。他攀附保利娜·冯·梅特涅（Pauline von Metternich）的过程就是如此，这位尖嘴猴腮的奥匈帝国亲王夫人的社会地位在第二帝国时期，她丈夫以奥地利大使的身份入驻拿破仑三世的宫廷时达到了顶峰。第二帝国崩溃后，梅特涅夫妇回到了祖国，但亲王夫人疯狂地热爱音乐又追求时尚，偶尔会回巴黎听音乐会，定制高级时装。碰巧，斯特劳斯遇到她时，她有一位侍女的丈夫刚刚在奥地利因谋杀罪被捕（被捕时手里还握着血淋淋的刀）。斯特劳斯虽然对奥地利法律一无所知，但仍立即主动提出帮忙，他利用对杀人犯的漫长乏味的审判与保利娜保持通信。[46] 她没有保留他写来的信，但从她写给他的那些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女人客气地忍受着一个男人的殷勤，尽管欠了他人情，但还是希望他别来烦自己。斯特劳斯把她所有的信件都归入一个特殊的文件夹（这对他来说实属罕见，因为他没有几封其他通信被保留下来），至死都保留着它们。

斯特劳斯的社交事业原本很可能在这里戛然而止了，没有什么进

步，所剩的只是一捆来自一位亲王夫人的敷衍潦草的信件，错把琐事当作奇迹。然而在此过程中他遇到了热纳维耶芙·比才，获得了冲破上流社会堡垒的第二次机会，他知道她就是那个能送他上青云的人。正如她的艺术家朋友们指望她帮他们出名，贵族朋友们指望她把他们变得有趣，斯特劳斯也指望她把自己改造成交际家。他没有料到对热纳维耶芙来说，这次尝试也和他的杀狗案和伪造家徽案一样，是她的特殊魔力失灵的罕见个例。

斯特劳斯走向未来新娘那条路的起点可能是很多地方，可能是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她的很多朋友和亲戚都是那里的会员；也可能是某个社交场合，人人对有趣的比才寡妇趋之若鹜，对斯特劳斯则避之不及。他或许曾在自己住的街区、剧院或花蹊注意过她。两人的生活有很多交叉点，又有很多共同的熟人，以至于到他们在1880年8月到1881年3月期间的某个时候走到一起时，他们的关系想必会给人一种宿命感。

至少斯特劳斯有这种感觉。他很早就把自己的暗恋透露给了约瑟夫·雷纳克，此人后来在热纳维耶芙面前无情地嘲笑他，说斯特劳斯自从初次遇到她，就丧失了一切谈论其他事或其他人的能力。在他用那句“你一定要见见热纳维耶芙”的咒语纠缠罗斯柴尔德兄弟、雷纳克和施伦贝尔格陪他去拜访她的沙龙之前，那首先是他每天对自己念的咒语，关键词是“一定”。热纳维耶芙是他必要的需求，是一个像自由、公正或骑士荣誉一样绝对而不可妥协的原则。迷恋她将复活他心中的阿拉米斯，爱她会让他变得高贵。

这里的关键词——“高贵”——是个充满矛盾的词，斯特劳斯的阿拉米斯复活的利弊都被它召唤出来。一方面，他对热纳维耶芙的爱绝对是真诚不渝的，按照她的好友们的说法，那的确把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就连卢多维克的妻子、一向讨厌斯特劳斯的路易丝，也承认他变好了。“斯特劳斯这人浑身上下没有一点高贵之处。”[47]她对儿子达尼埃尔

抱怨说，但她又说：“唯一让他高贵的就是他对你姑母的爱。”在这句话中，路易丝为高贵所赋予的意义与斯特劳斯在他的阿拉米斯故事中所指的意义相同：人格正直，道德高尚。斯特劳斯对热纳维耶芙的爱让他显露出自己最令人赞赏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变得高贵了。

问题在于“高贵”的另一层意义是斯特劳斯渴望归属的那个阶级。就此而言，它激发了伴随欲望而生并对其产生影响的一切势利小人自命不凡的冲动，让他显露出最招人鄙视的品质。

这是上层的阶级重构在人性方面的代价，热纳维耶芙和斯特劳斯两人结成搭档在上流社会攀升时，都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与她最亲近的人们很沮丧地发现她与斯特劳斯结为夫妻后，表现出了比以往更多“邪恶的虚荣”和社交“算计”，她的沙龙开始变得无趣了。[48]

虽然令人遗憾，但变得无趣也是她所做选择的必然结果。热纳维耶芙承担起让斯特劳斯变成交际家的职责，就意味着要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阶级”（或“俱乐部”）这个蛮横武断、排除异己的概念本身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就意味着以一种不管不顾的方式接受下面这句格言的逻辑：

> 在我看来，“骑师俱乐部”的意思就是不管我在这里结交了什么人，让我最开心的始终是除我之外，外人没有这样的机会。[49]

秉持这一准则（热纳维耶芙的确渐渐接受了这一准则），就是认定结交谁与他们是什么人无关，而只与他们不是什么人有关。

根据这一逻辑，忠实信徒们觉得热纳维耶芙“不爱斯特劳斯”也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她自己也挑明了这一点，从她1886年秋对他们讲起准备嫁给他的决定时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斯特劳斯，你丈夫？！那太

可怕了！”他们抗议道。“我还能怎么办？”她叹口气说，“这是我唯一能甩掉他的办法了。”[50]

恰如所料，这个玩笑被收入了热纳维耶芙最新语录，这再次证明了她的生动有趣。然而这句玩笑话中的厌世情绪却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纳维耶芙在做出这个决定时的某种伤感。嫁给斯特劳斯就是委屈自己过上一种没有爱的生活，虽然她算出这样的牺牲带来的收益（她已故的母亲痴迷的东西——“社会地位（和）钱！”）高于损失，但她可不觉得那是件容易的事儿——她既没有那么坚强，也没有那么天真。

斯特劳斯恐怕更难应对这些。在他和热纳维耶芙结婚之前，他就开始在一对矛盾的欲望之间挣扎了，一方面是对世故的企图（热纳维耶芙是他的战利品和社交帮手），另一方面是对爱情的希冀（热纳维耶芙是他一生的至爱）。罗贝尔·德雷福斯[51]说起他时用了一个比喻，大概会让这位从前自称阿拉米斯的律师会意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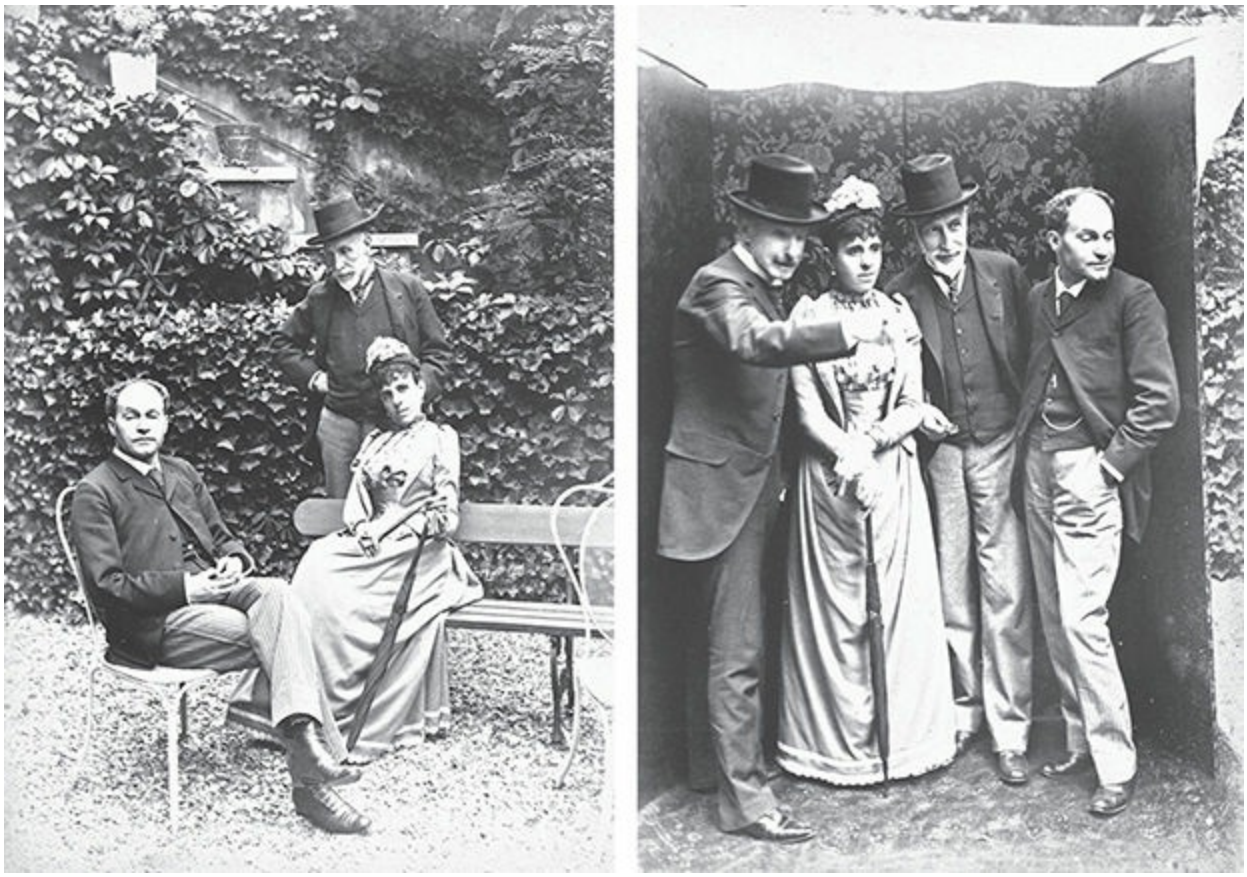
> 斯特劳斯让我想起一个古老的骑士传说中的骑士，为了征服超凡脱俗的公主，他必须放弃自己出于忌妒而把她锁在一座只有他才有钥匙的塔里的诱惑——因为他急于或者至少觉得自己必须，向（其他）值得尊敬的追求者打开城堡的大门。[52]

在他与热纳维耶芙的关系中，斯特劳斯面对的是一个经典的魔鬼交易：他要衡量一下自己独自享有的需求（他毫不掩饰这个需求，以至于加利费开玩笑地称他是热纳维耶芙的“业主”[53]）与收藏家炫耀珍品的渴望，看二者孰轻孰重。

最后，收藏家打败了配偶。急于讨好贵族人士的斯特劳斯积极鼓励热纳维耶芙投身于社交生活和沙龙，他知道除此之外，那些贵族人士根本不会理他。但在朝着这个方向敦促她时，他放弃了对“超凡脱俗的公主”的所有权。现存的热纳维耶芙和斯特劳斯的照片全都是和一位或多

位她的忠实信徒一起照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恰如其分地图解了一桩被世故所腐蚀的婚姻。

虽然斯特劳斯和热纳维耶芙一样，是主动选择这桩交易的，但随着她的知名度日升，与交易相伴的情感负担日益沉重。斯特劳斯虽说“对妻子的沙龙充满自豪感，仿佛那是他自己的沙龙”[54]，但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他对社交圈的爱却始终与他的恐惧激烈冲突”，他总是要跟人争夺热纳维耶芙的关注。后来，这种内在冲突让他变得更加粗野，也更不掩饰自己的易怒和好战。



阿莱维家庭相册中的另外几张照片：（左）斯特劳斯与热纳维耶芙坐在前面，布朗热-卡韦站在后面；（右）阿斯、热纳维耶芙、布朗热-卡韦和斯特劳斯

他总是向忠实信徒们证实自己是个“残忍”而“可怕”的人。[55]有一次，普鲁斯特加入了小圈子，他注意到就连在其他客人离开之后留在沙

龙里和斯特劳斯夫人一起围坐在炉火边这么一个无辜的举动，也会让斯特劳斯因为忌妒而慌乱不安。“你真应该看看他那副样子，”普鲁斯特对塞莱斯特·阿尔巴雷回忆道：

> 他受不了妻子叫我“亲爱的小马塞尔”……他会在椅子上辗转不安、起身、四处走动，再坐下、拿起火钳捅火苗，然后把火钳丁零当啷地扔在地上。斯特劳斯夫人会说：“埃米尔，求你了！”他会咕哝一句：“我亲爱的热纳维耶芙，你说话太多，已经很累了……”但她会说：“我亲爱的小马塞尔，请别在意。埃米尔，别烦我们！”斯特劳斯先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把火钳弄得叮当乱响。[56]

另一位忠实信徒更笼统地记述了这一互动：“斯特劳斯对（热纳维耶芙）的占有欲让他吃了很多苦头。他总是心怀不满，想必很渴望有机会能专横地对待她。”[57]

如果埃德蒙·德·龚古尔的话可信，那么斯特劳斯确实专横地对待过她。龚古尔经过对他和热纳维耶芙夫妇俩的一番审视，得出的结论是，在他们的关系中，“女人像个男人，不想被束缚”——带着热纳维耶芙的歌剧分身卡门的影子——“而男人的行为像个女人，总想永远独占爱人的一切”。此外，热纳维耶芙的飘忽不定也越来越让斯特劳斯无法忍受，以至于“有一天，他（在盛怒中）把她推倒在地”，从那以后她“总是害怕他会对她实施更多的暴力”。[58]最后，据龚古尔说，热纳维耶芙之所以接受了斯特劳斯的求婚，就是“因为她害怕（如果她坚持拒绝）她的追求者要么杀了她，要么自杀”。

1886年圣诞节，斯特劳斯婚礼之后还不到三个月，龚古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热纳维耶芙“后悔嫁给了这位追求者”。如今已经与她终成眷属的追求者也会有自己的悔恨，令他心中那个秘密的阿拉米斯大失所望。[59]

[1]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399.

[2] 由于法国法律不承认宗教婚姻有法律效力，ES和GS也不得不在第九大区的市政厅登记民事婚姻；见“Faits divers，” *Le Temps*（October 9，1886）：3。

[3] 必须在民事文件上填写“职业”一栏时，财富自给自足之人就会使用食利者一词。比方说，马塞尔·普鲁斯特1922年的死亡证书上就准确地认定他为食利者。——作者注

[4] *Staats-und Adress-Handbuch der Freien Stadt Frankfurt*，vol. 114（Frankfurt：Krugs Verlag，1852），308.

[5] 关于泽利希曼亲戚们卷入造币团伙，见*Journal politique de Mannheim* 107（April 18，1886）：4；and Maurice Mejan，*Recueil des causes célèbres et des arrêts qui les ont décidés*，vol. 1（Paris：Plisson，1807），193-234。

[6] MP和FG两人后来都曾提到，斯特劳斯夫妇的长期“好友”德·奥松维尔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他们立场相对，便开始故意念错他们的姓氏来侮辱他们。FG，*L’Âge d’or*，169；and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225. MP在RTP中描写过一个类似的互动，斯万变成了德雷福斯的支持者，触怒了很多社交圈的朋友；这以后，社交圈的某些人（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女儿，他死后被她母亲出身贵族的第二任丈夫收养）开始把他的姓氏念成“斯旺”，“把这个源于英国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德国姓氏”。关于这一变化的讨论，见Raczymow，*Le Cygne de Proust*，28。

[7] 元音与英语的“dose”或“gross”相同。——作者注

[8] 关于德裔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见Stephen Birmingham，*Our C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New York：Harper & Row，1967）；关于塞法迪犹太人在法国的声望，见Philippe Erlanger，“Israélites français devant le snobisme，” in Jullian，ed.，95-96。

[9] 关于这种有害刻板印象的起源和含义，尤其见Hannah Arendt，*The Jew as Pariah*（New York：Grove，1978）and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Part I*：*Anti-Semit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anovich，1951），54-88。

[10] 巴黎大堂（Les Halles），法国巴黎的一个区域，位于时尚的蒙特吉尔街的南端。它的前身是已于1971年拆掉的中央批发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地下购物区——大堂广场。其露天中心区低于街道，像一个坑，有雕塑、喷泉和马赛克，以及格雷万蜡像馆。

[11] Émile Zola，*Le Ventre de Paris*，3rd ed.（Paris：Charpentier，1874），213.

[12] 关于巴黎大堂的男女混合劳动，见Luc Sante，*The Other Paris*（New York：Farrar，Straus，& Giroux，2015），104。

[13] Ignotus（pseud.），“Les Roth schild，” *Le Figaro*（January 30，1878）：1；关于他每天前往证券交易所，见Muhlstein，*Baron James*，86；关于他对粮食危机的干预和他与沙皇的交易，见Guy de Rothschild，*Contre bonne fortune…*（Paris：Pierre Belfond，1983），73-74。

[14] Muhlstein，*Baron James*，78.

[15] Ignotus（pseud.），“Les Roth schild，” *Le Figaro*（January 30，1878）：1；Septfontaines（pseud.），*L’Année mondaine 1889*（Paris：Firmin-Didot，1890），329；and 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19-20. 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的博爱精神，见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6-48；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19-20，233，and 273-80；以及RM，“Saints d’Israël，” *Têtes couronnées*，98-106。

[16] 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111.

[17] Muhlstein，*Baron James*，76-78.

[18] Heinrich Heine，“Die Engel，” *Neue Gedichte*（Hamburg：Hoffmann & Campe，1852），219. 关于贝蒂写这首诗的灵感来源，见Virginia Cowles，*The Rothschilds：A Family of Fortune*（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3），72。关于安格尔为贝蒂所画的肖像，见*Portraits by Ingres：Images of an Epoch.* Edited by Gary Tinterow and Philip Conisbee. 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Harry N. Abrams，1999，414-25。

[19]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画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和浪漫主义画派的杰出代表欧仁·德拉克洛瓦之间的著名争论震动了整个法国画坛。安格尔的画风线条工整、轮廓确切、色彩明晰、构图严谨，对后来许多画家如德加、雷诺阿乃至毕加索都有影响。

[20] *Portraits by Ingres*：*Images of an Epoch.* Edited by Gary Tinterow and Philip Conisbee. 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Harry N. Abrams，1999，414. 关于詹姆斯男爵的野心，又见Nicault，Catherine. “Comment‘en être’？Les Juifs et la haute société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ⅩⅨe siècle.” *Archives juives*：*revue d’histoire des Juifs de France* 42（2009）：，9；and Muhlstein，*Baron James*，81。Muhlstein提到詹姆斯男爵在巴黎时，每周开四场聚会。

[21] 1860年代中期，詹姆斯男爵年逾七旬时，开始与拿破仑三世一位部长的美丽妻子（也是MP的一位未来指挥官的母亲）Walewska伯爵夫人眉来眼去。但到那时，他避免与出身好的巴黎女人纠缠不休的名声已经众所周知了。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109.

[22] 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1830年7月27日，法国爆发七月革命，革命持续了三天，波旁王朝复辟期结束，8月9日，七月王朝宣布成立。奥尔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获得王位，成为新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

[23] Muhlstein，*Baron James*，78.

[24] Nicault，Catherine. “Comment‘en être’？Les Juifs et la haute société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ⅩⅨe siècle.” *Archives juives*：*revue d’histoire des Juifs de France* 42（2009）：，000；and 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58. 关于詹姆斯男爵的“纽沁根式”发音，见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91。

[25] 很难为英语世界的读者说清楚，这种“犹太人”法语在母语为法语的人听起来和（书面）看起来是什么效果。在他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著作中，尼尔·弗格森写了一个例子，詹姆斯男爵在谈到佩雷尔兄弟时说：“Vat do you mean？… I haf the greatest confidence in the chenius of Messrs. Pereire，… such clefer men.”（“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两位佩雷尔先生的天分有最大的信心……他们真是精明。”）在

《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中，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刻板印象化的古怪犹太人迈尔·沃尔夫山姆吹嘘自己的“business goneggtions”（商业人脉），也有同样的效果。——作者注

[26] ES的法学院毕业论文写的是《拿破仑法典》中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异。ES，*La Distinction des biens*（Paris：Jouaust，1867）. 詹姆斯·纳塔涅尔·德·罗斯柴尔德的作品也是由ES发表毕业论文的那家出版社出版的，题目是*Des conventions qui modifient la composition de la communauté*（Paris：Jouaust，1865）。

[27] 此处原文似有误，前文提到热纳维耶芙的前监护人为埃米尔·佩雷尔。——译者注

[28] ES，日志，5，存档于NAF 14386。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大多数档案不同，这份手稿没有为每一页编写档案号，因此我使用了页码。

[29] ES，日志，19。

[30] ES，日志，19。“陌生男人”对少年ES居高临下的态度与詹姆斯伯爵在他的孩子、亲戚和下属面前一贯是个“专制的父亲”的描述一致；见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228-29。

[31] Constant Coquelin，*Un Poète philosophe*：*Sully Prudhomme*（Paris：Paul Ollendorff，1882），9.

[32] Sully Prudomme，“Première solitude，” cited in Constant Coquelin，*Un Poète philosophe*：*Sully Prudhomme*（Paris：Paul Ollendorff，1882），10-11.

[33] Baudouin，“Tribunal de commerce：Faillites，” *Gazette des tribunaux*：*journal de jurisprudence et de débats judiciaires*（January 24，1857）：38；“Bankrupts，” *Solicitor’s Journal & Reporter*（March 14，1857）：281；and “Meetings for Proof of Debts，” *Solicitor’s Journal & Reporter*（December 25，1858）：139. 关于利奥波德·斯特劳斯在逃离巴黎后的活动，见*Revue des vins et liqueurs et des produits alimentaires pour l’exportation* 12，no. 12（1888）：24。

[34] “Marx et al. v. Strauss [*sic*] et al.，” *Southern Reporter* 9（April 1891）：818-20.

[35] ES，日志，op. cit.，24。

[36] ES，日志，op. cit.，19。

[37] ES，日志，op. cit.，19。

[38] ES，日志，op. cit.，22.

[39] *Le monde Illustré*（March 20，1880）：186；关于斯特劳斯在法庭上打赢官司的记录，见 “Maître Émile Straus，” *Le Gaulois*（June 22，1889）：3。

[40] Albert Bataille，“Gazette des tribunaux，”《费加罗报》，1884年3月13日，第3版。这类夸张的文学类比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ES代理一个不知名的诗人Louis Ratisbonne起诉一家文学杂志以Ratisbonne的名义发表了另一个人的糟糕诗作之时。在结案陈词中，ES引用了缪塞一首关于抄袭的诗中有趣的一句：“我的杯子或许不大，/但我才是那个用它饮水的人。”（“*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这两句诗的前一句——ES假设在场观众能够听出来源，就没有引用——是“我像痛恨死亡一样痛恨抄袭”（“*Je hais comme la mort l’état de plagiaire*”）。报道这个案子的那条新闻没有标题，见*Le Livre* 4（1883）：140。

[41] Paul Hervieu引自Alphonse France，“Courrier des théâtres，” *Le Figaro*（May 26，1905）：5。

[42] 关于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出色的职业精神，见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6-47；and Niall Ferguson，*House of Rothschild*，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New York：Penguin，2000），228。

[43] “Maître Émile Straus，” *Le Gaulois*（June 22，1889），3.

[44] 关于ES的艺术收藏，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是*Collection Émile Straus*：*tableaux modernes*，*aquarelles*，*pastels*，*dessins*，*sculptures*，*tableaux anciens*，*terre cuites*，*meubles et sièges anciens*，*tapisseries Aubusson*（Paris：Galerie Georges Petit，June 1-2，1929）；关于ES与艺术家协会的关系，见Alphonse France，“Courrier des théâtres，” *Le Figaro*（May 26，1905），5；and Malcolm Daniel，*Edgar Degas*，*Photographer*（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8），62。

[45]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46.

[46] 保利娜·冯·梅特涅致ES的信存档于NAF 14383，folio 118/119 through folio

134/135。

[47]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抄录于*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 avec Daniel Halévy*，ed.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177.

[48] *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 avec Daniel Halévy*，ed.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177。FG注意到一个类似的变化，说GS不再只因为自己喜欢其人而邀请人们来自己的沙龙了，她开始邀请“‘时髦’之人”，只因为他们“时髦”而邀请他们。FG，*Mon amitié*，42.

[49] Racyz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23. 这句话的一个类似版本见Louis de Beauchamp，*Marcel Proust et le Jockey-Club*（Paris：n.p.，1973），17。

[50]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179；FG，*L’Âge d’or*，169. FG还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被斯特劳斯及：（对她）鲁莽的崇拜激怒了。”

[51] 罗贝尔·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1873-1939），法国记者、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童年时的友人。

[52] 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117.

[53]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6.

[54] DH，“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175.

[55]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5-16.

[56] 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154-55.

[57] GL，*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Paris：Amiot Dumont，1948），156.

[58] EdG，日志，1886年12月25日的日记。

[59] ES还会写一系列虚构短文，都是在间接表达他对GS及其社交圈朋友的幻

灭。这些故事被统一命名为《不幸的故事》（“Contes chagrins，” 1892），见本书“参考文献”。

马睿/ 文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拥有20多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在翻译技术和术语标准化国际合作中担任重要协调角色，出版过多部中英文译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

视觉传达 社科文献·宋 涛
Telephone 010-5936[illegible]

Telephone 010-59367109

比普鲁斯特还精彩。

——塞西尔·戴维－魏尔（Cécile David-Weill），《君子好逑》（*The Suitors and Crush*）作者

19 世纪末的巴黎，贵妇人组织的沙龙堪称当时时尚、艺术、高雅礼仪的代名词，吸引了无数艺术家，甚至王公贵族、政界权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卡罗琳·韦伯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线索，还原法国三位名媛的社交世界和命运起落，重现世纪末巴黎的社会面貌和政治思潮。



一部迷人的三人传记……韦伯集中书写了普鲁斯特为之着迷的三位魅力无限的女人，精准详实地描绘了受到社会和政治深刻变革威胁的法国贵族阶层……细致入微地记述了她们的离合悲欢、恩怨情仇……她生动再现了她们的府邸城堡乃至王室成员、艺术家和作家们光临的聚会和沙龙的奢华氛围、装束和装饰，这一切让胸怀抱负而又敏感多情的青年普鲁斯特深深陶醉。对这三位非凡的女人和她们那个风起云涌、脆弱易逝的世界做了洞悉幽微的迷人刻画。

——《柯克斯书评》（精选星级书评）

索·恩

THORN BIRD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8176-1

9 787520 181761 >

定价：239.00 元（上、下）

索·恩
THORN BIRD

天鹅之舞



普利策奖入围作品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一个充满文化、魅力与特权的世界
一首唱给世纪末巴黎的挽歌

Proust's
Duchess
How Three Celebrated Women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Fin-de-Siecle Paris

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夕生

[下]

〔美〕卡罗琳·韦伯 / 著
马睿 / 译

巴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AROLINE WEBER

卡罗琳·韦伯（Caroline Weber）/ 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已出版的著作包括《罪与美：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2006）和《恐怖与其牢骚：可疑字眼与法国革命》（2003）。她目前住在曼哈顿。

图书策划人 视觉传达匠
联合创立

天鹅之舞

Proust's Duchess

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

How Three Celebrated Women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Fin-de-Siecle Pari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保罗·塞萨尔·赫勒鲁所绘的《格雷弗耶伯爵夫人》（**1891**年前后）。在为她画肖像的许多画家中，伊丽莎白喜欢赫勒鲁突出她宛如天鹅的轮廓的方式。**1891**年，她邀请他在乡下共同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一百多幅水彩画和素描，但亨利觉得那些画作的视角过于亲密，把大多数作品都销毁了



朱尔-埃利·德洛奈的《乔治·比才夫人的画像》（**1878**年）。这幅为服丧的**29**岁热纳维耶芙所画的肖像在**1878**年的巴黎沙龙上引发轰动，巩固了她比才遗孀的公共形象。它也是莫泊桑的《如死之坚强》中那幅**“**阳光和伤逝的画作**”**的灵感来源



詹姆斯·**A.M.**惠斯勒的《黑色与金色的交响：罗贝尔·德·孟德斯鸠-费赞萨克伯爵》（**1891**～**1892**年）。伊丽莎白和孟德斯鸠都极其崇拜这位他们称之为**“**好朋友**”**的画家。在这幅由伊丽莎白委托创作的肖像中，孟德斯鸠的造型是把她的毛丝鼠斗篷搭在胳膊上



行为乖僻的费迪南·德·萨克森-科堡亲王是乔万尼最亲密的好友之一。**1887**年夏，乔万尼取消了前往迪耶普拜访伊丽莎白的计划，以便去索非亚参加费迪南成为保加利亚摄政王的登基大典



伊丽莎白与亨利的法意混血表亲堂·乔万尼·巴蒂斯塔·博尔盖塞有过很长时间的秘密通信。她和乔万尼合作近十年写一部书信体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他们难成眷属的第二自我埃莱奥诺尔和热拉尔的故事



38岁的居伊·德·莫泊桑（**1888**年）是那个时代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他最后两篇小说《如死之坚强》（**1889**年）和《我们的心》（**1890**年）都基于他与热纳维耶芙的秘密恋情。纳达尔摄



伊丽莎白与无数王室成员缔结了友谊，包括俄国皇族成员。沙皇**1896**年送了她一件俄式礼拜袍作礼物，她请沃思把它改成了一件夸张的晚礼服斗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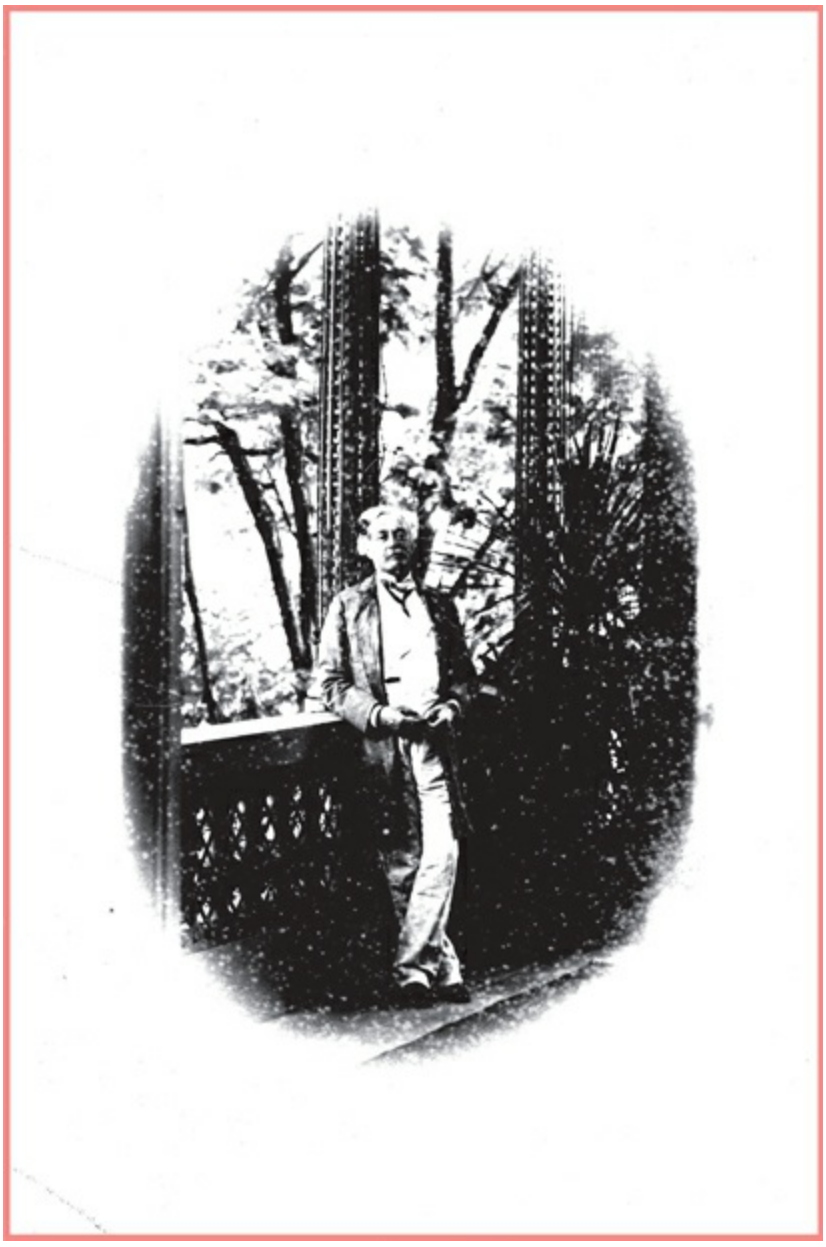
在他的诗歌中，彼特拉克把他对洛尔·德·诺韦斯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想象成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他还曾把洛尔本人比作这种神鸟，把她金黄色的头发写成“金羽”。利顿勋爵在写给伊丽莎白的十四行诗组诗《玛拉》（**1892**年）中借用了凤凰的比喻



阿里斯蒂德·布吕昂是蒙马特尔的民间歌手，他在那里的传奇夜店黑猫夜总会（后来在他自己的夜店）里表演。他以不合礼法的虚张声势和关于贫民与罪犯阶层的充满俚语的小曲而闻名



普鲁斯特对贵族阶层的服饰，包括贵族男仆们那些有着繁复装饰的制服，十分着迷。巴黎最有名的制服裁缝铺之一萨顿裁缝铺的店面就在斯特劳斯家公寓楼的一层，位于奥斯曼大道**134**号



伊丽莎白跟随社交界的摄影爱好者纳达尔学习摄影，在她位于德·阿斯托格街的冬季花园里自己布景拍照，请家人和朋友担当模特。这是她为德·萨冈亲王，即“时尚之王”拍摄的一幅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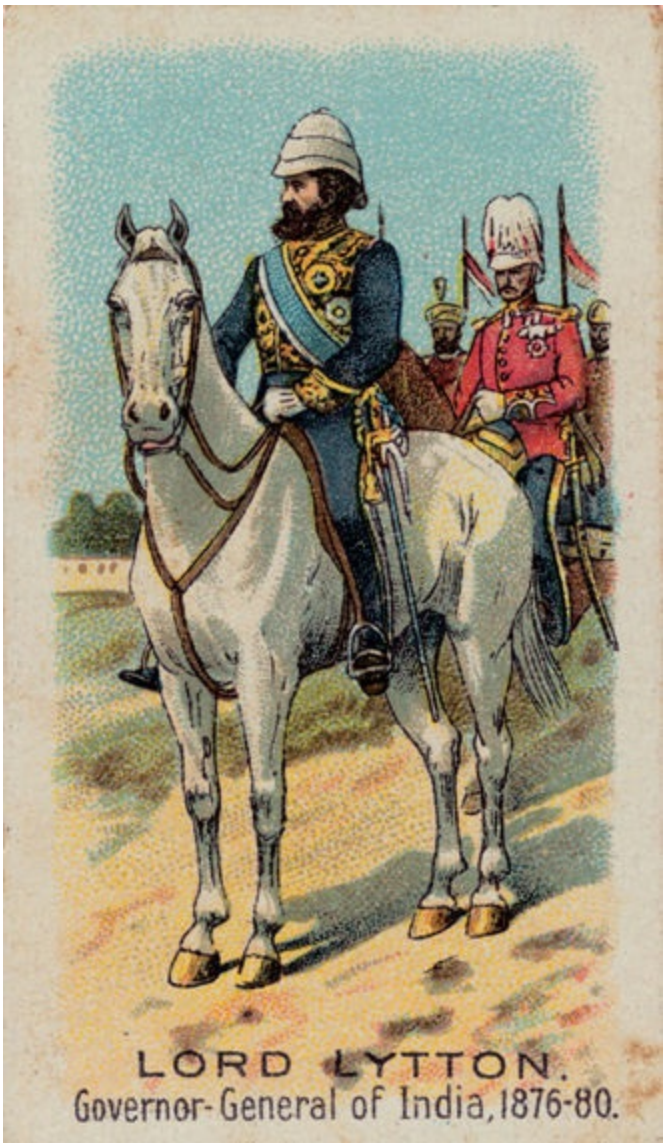
上左：卢多维克·阿莱维
上右：德·奥松维尔伯爵
下左：梅尔希奥·德·沃居埃
下右：保罗·布尔热

热纳维耶芙的沙龙吸引了一群艺术家和贵族，他们构成独一无二的宾客组合。声名卓著是她的信徒们的共同点，其中许多人都成了世纪末巧克力公司制作的名人集换

卡上的人物



乔治·布朗热将军，被画成红心国王是因为他长相英俊，又颇受民众喜欢，因叫嚣与普鲁士再战而成为全国推崇的民粹主义英雄。洛尔加入了共谋支持他发动军事政变的君主主义组织，但因他在**1889**年**4**月**1**日逃离法国，计划失败了



作为英国大使来到巴黎之前，利顿勋爵曾担任印度总督，他在那里奢华的享乐做派为他赢得了“尊贵傀儡”的绰号



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歌剧《流浪的犹太人》（**1852**年）是许多社交界人士的一个参照，从戏称阿斯为**“**流浪的犹太人**”**的埃德加·德加到各自在创意写作中改编了这个故事的利顿勋爵和伊丽莎白



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为伊丽莎白所取的“天鹅”绰号可能来自理查德·瓦格纳的《罗恩格林》（**1850**年）。乔治·德·波托-里什把自己和伊丽莎白想象成这部歌剧里的一对爱人：天鹅骑士罗恩格林和比利时贵妇布拉邦的艾尔莎



雅克·埃米尔·布朗什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画像》（**1892**年）。这幅画像中的普鲁斯特**21**岁，刚刚开始他所谓的**“**山茶花时期**”**，也就是他青年时代进入社交界的那段日子。据布朗什说，这枚花朵胸饰是利顿勋爵送给他的礼物



在斯特劳斯家位于特鲁维尔的庄园里拍下的照片（**1893**年前后），从左到右（站立者）：费尔南·格雷格、乔治·德·波托-里什、路易·德·拉萨莱；以及（坐者）普鲁斯特、路易·冈德拉和热纳维耶芙

第一部分

众赞歌 相思鸟

我觉得整个天空变成了一轮光环，

用湛蓝和光明环绕着你，守护着你。

鸟儿栖息在一朵花上，振动双翼，

花自飘香，鸟自唏嘘，

你呼吸的空气充满了魔力。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牧羊人之屋》（“La Maison du berger”，1844）

毫无疑问，忒修斯的妻子遭遇了最无法避免的激情之一，它让人心智迷狂，意志消沉。……但费德尔也有一个无比温柔和脆弱的灵魂，也备受折磨。……她面色苍白、神情憔悴，无法入睡，像个修女在自己的修道院里为某种神秘却无法治愈的欲望所扰，她的罪恶虽如熊熊烈焰，但事实上她像希波吕托斯一样忠于爱情。

——朱尔·勒迈特，在奥德翁国家剧院对拉辛的《费德尔》（*Phaedra*）的剧评（1886）

第11章 疯子、情种和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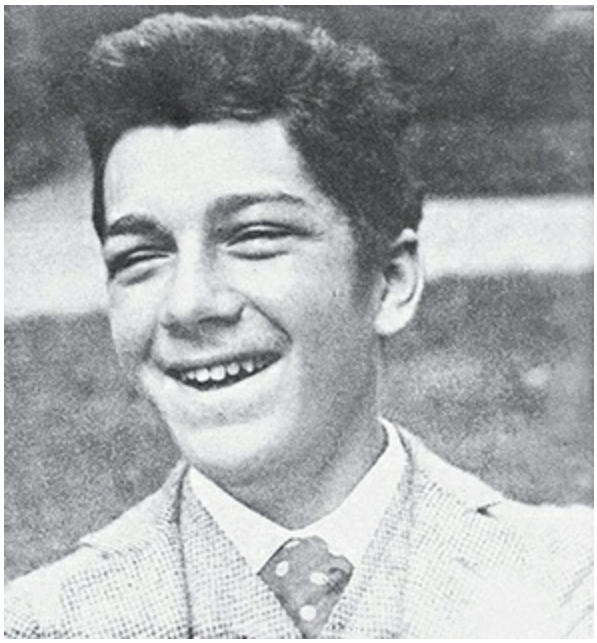
马塞尔·普鲁斯特最早的文学创作灵感来自两位高中同学：雅克·比才和达尼埃尔·阿莱维。他们以热纳维耶芙的儿子和（按布列塔尼人的规矩）侄子的身份引领他来到她的沙龙，促成普鲁斯特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然而这两个男孩的行为首先为普鲁斯特的整个创作生涯提供了一个样板：他们让他着迷，继而令他失望，迫使他开始了写作。

1887年10月，雅克和达尼埃尔都年满15岁，进入了巴黎的康多塞学校，16岁的普鲁斯特比他们高一年级。两位表兄弟自孩提时就是最好的朋友，在位于杜艾街的同一栋公寓楼里长大。两家人和谐共住的时光在1886年10月就结束了，热纳维耶芙守寡11年后嫁给了埃米尔·斯特劳斯。婚礼之后，新娘和新郎就带雅克一起搬到了风景优美的第八大区的一间新公寓，那里距离蒙马特尔不远，但社交和精神气质却有天壤之别。这次搬家迫使雅克离开了他从自出生起就居住的公寓，以及与他手足情深的表弟。他经历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不过第二年秋，他和达尼埃尔就在康多塞团聚了。

康多塞学校创立于拿破仑一世时期，因而原名为波拿巴学校，是巴黎历史最悠久、声望最高的学校之一。[1]它虽然建在一座前嘉布遣兄弟会[2]修道院的旧址上，却是右岸的犹太人大资产阶级（这对表兄弟从阿莱维家继承的遗产足以把他们归于这一类，虽然雅克的父亲是个天主教徒，达尼埃尔的母亲是个新教徒，而且两个孩子都受洗过）的首选高中。[3]雅克的新继父就是康多塞校友，达尼埃尔的哥哥埃利也是，还有卢多维克·阿莱维已故的异母兄长阿纳托尔·普雷沃-帕拉多尔，以及雅克的舅公伊波·罗德里格斯。孩子们父母的那些很有影响力的朋友也都曾在那里接受教育，从共和派政治家约瑟夫·雷纳克到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布朗什医生，从作家小仲马和埃德蒙·德·龚古尔再到好几位罗斯柴尔德

男爵。这样的人脉在康多塞学生的家族中非常典型，只不过由于两人的父亲都是名人，所以雅克和达尼埃尔或许是各自班级中最显眼的学生。

两位表兄弟到学校后不久，就与普鲁斯特建立了虽反复无常但影响深远的友谊，和他们一样，普鲁斯特也来自备受尊敬的半犹太富人家庭（也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他和父母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夫妇，以及弟弟罗贝尔一起住在第八大区，就在玛德莱娜广场旁边。阿德里安出身低微，是伊利耶尔乡下村庄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杂货商，但他的医学事业蒸蒸日上，先是成为一名卓越的病理学家，后来又成为新兴的流行病学领域的顶级权威。长子进高中时，他已经是第三共和国顶尖的公共卫生专家，在霍乱和疟疾暴发时帮政府制定应对政策，在全世界各地开展关于传染病病因和治疗的讲座。



16岁的达尼埃尔·阿莱维相貌英俊，在康多塞很受欢迎，普鲁斯特在那里和他成为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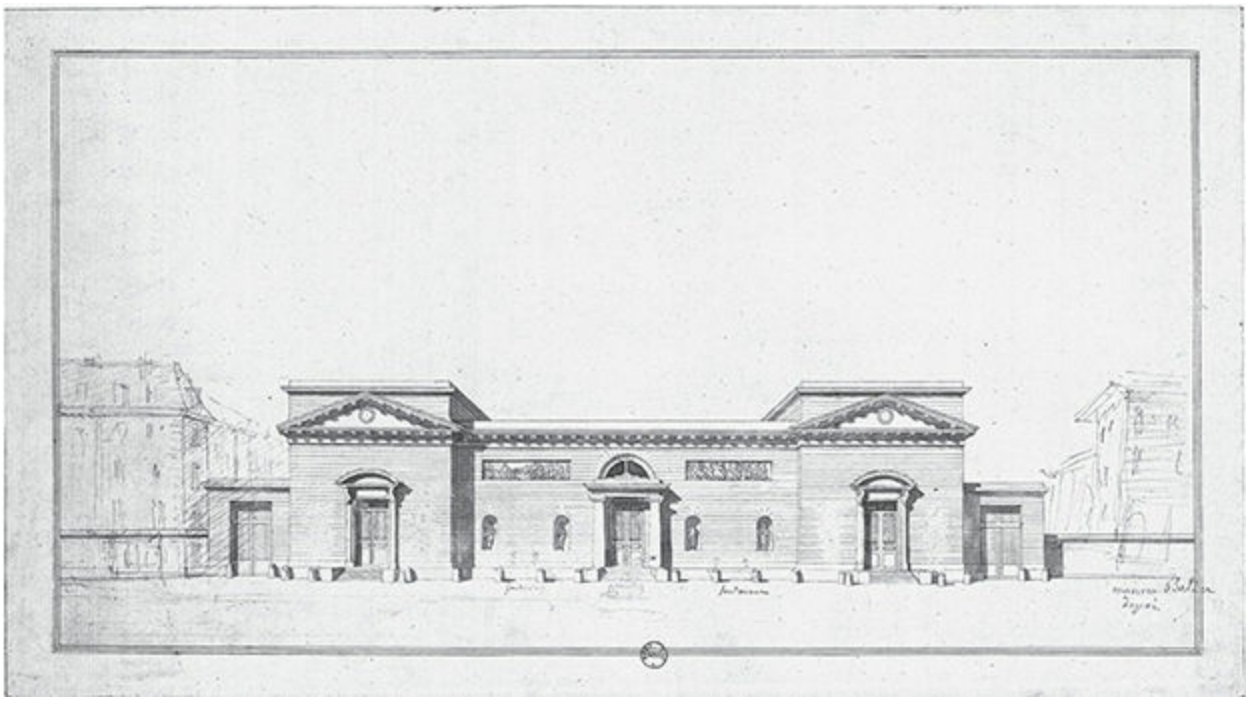
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夫人闺名让娜·魏尔（Jeanne Weil），是既聪明又有教养的巴黎人，她的家族是来自阿尔萨斯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靠

制造业和金融业发了财。她是已故的阿道夫·克雷米厄[4]的侄外孙女，这位共和派政治家和活动家曾通过1870年的《克雷米厄法》（Crémieux Decree）将公民权赋予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犹太人。这一成就让他遭到了新兴反犹运动的怨恨；该运动的头目埃杜瓦尔·德吕蒙说，克雷米厄因支持犹太人而“成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的）敌人”。[5]但在开明人士的圈子里，克雷米厄获得了极大的尊敬。少女时期，让娜跟随父母去拜访他时，见到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乔治·桑和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等名人。[6]阿道夫·克雷米厄也是康多塞的毕业生。哲学家亨利·柏格森[7]也是，他后来成了让娜另一位亲戚的丈夫。

在中上层阶级特权的外表下，让娜·魏尔与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背景差异竟然与雅克·比才的父母在他父亲生前所面临的差异有着惊人的相似。[8]正如传记作家埃弗利娜·布洛赫-达诺（Evelyne Bloch-Dano）指出的，阿德里安·普鲁斯特那位缺乏教养的、坚定的天主教母亲在儿子娶魏尔小姐之前大概“一辈子都不屑于看犹太人一眼”。但魏尔小姐的教养、魅力和丰厚的嫁妆与阿德里安的远大抱负和成功一起，大大增加了这对夫妇的社会财富。这桩婚姻“为他们进入（巴黎）大资产阶级阶层敞开了大门，白手起家的男人和犹太女继承人本来都没有机会进入那个阶层的”。作为两人婚姻的结晶，马塞尔是典型的康多塞生源，只不过在雅克和达尼埃尔出现之前，他在那里一直独来独往。

在康多塞校园，普鲁斯特最初在学校修道院时期留下的有柱回廊里见到雅克和达尼埃尔时，他们并不算是纯粹的陌生人。三个年轻人小时候曾在帕普-卡尔庞捷（Pape-Carpentier）上学，那所小学是康多塞的固定生源地；普鲁斯特还充满深情地记得雅克那位漂亮的母亲在放学后接儿子和侄子回家的场景。[9]从那以后，他就再没见过这对表兄弟，两人在此期间都长成了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他们都爱运动、性格开朗，有那种受欢迎的学生的大大咧咧的神气，他们也的确很快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学生。相反，普鲁斯特身材矮小，就算在完全成年以后，身高也只有

1.67米。



康多塞学校位于右岸的一座前嘉布遣兄弟会修道院的旧址上

普鲁斯特的身体状况也很差。他那时已经患上了过敏、哮喘、消化道疾病，还有将折磨他一生的失眠，整个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床上度过，因而身材瘦削，面色呈现出病人的苍白。达尼埃尔·阿莱维回忆说，青春期的普鲁斯特长着“一双东方人的大眼睛”和几乎不属于这个尘世的病态，看起来像个“受到惊扰又令人不安的大天使”——这显然不是年长的男孩愿意给新同学留下的印象。[10]

普鲁斯特的行为举止有些古怪，既源于他的外表，也源于他的成长环境，长期生病卧床让他和母亲形成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因为生病长期旷课在家，让娜请家庭教师来帮他赶上课业，但她本人承担了在家教育儿子的主要责任。她接受过严格的教育，精通多个学科门类和好几种外语，在那个时代的女人中实属罕见，何况据大家所说，她非但博学，还很有头脑。鉴于普鲁斯特很小就表现出智识上的早熟，让娜非常

适合做他的老师，也热切地把自己对文学、音乐、历史和艺术史的挚爱灌输给他。她在个人辅导期间展示出超凡的敏锐、无限的温情和才思，得到了“她的小狼”（她对儿子的称呼）的热切呼应，这也构成了二人强烈共生关系的基础。[11]



在学校里，普鲁斯特思想早熟，但社交能力非常笨拙



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夫人闺名让娜·魏尔，是长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普鲁斯特少年时代的玩伴莫里斯·迪普莱（Maurice Duplay）惊异地发现，让娜和马塞尔只要有彼此陪伴就会喜形于色。他注意到他们喜欢在文学历史典故与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间进行“巴洛克式的荒谬”比喻，互相逗趣。这个游戏的起源是让娜为了让敏感的儿子不那么害怕“灌肠剂或牙医来访这类不愉快的事情”而想出的策略。[12]迪普莱记得：

> 每当普鲁斯特夫人不得不让马塞尔做好心理准备迎接这些痛苦时，她会用这样的句子开头——“列奥尼达一世[13]知道如何在最大的挑战面前保持镇静”或者“雷古鲁斯[14]平静面对灾祸，世人皆振奋”。

这种有趣的并置后来成为普鲁斯特文学风格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他和让娜在通信和谈话中引经据典的习惯也是一样。（17世纪的剧作家让

·拉辛是两人最喜欢引用的作者。[15]）

普鲁斯特称母亲为“漂亮的小妈妈”，是她教他把两人彼此喜爱和理解的乐趣等同于从文学和艺术中获得的乐趣。他后来总是试图从其他关系中寻找同样的乐趣组合，却再也无法在钟爱的其他任何对象身上重建与母亲的那种完美的心灵相通。一直到她1905年去世，母亲始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早在1886年，他第一次回答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问卷时，普鲁斯特写道，他最无法想象的悲伤就是“离开妈妈”。[16]六年后，他对同样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从不认识我母亲”。[17]

普鲁斯特与让娜这种古怪又晦涩的交流给他带来了那么多快乐，但这种逗趣方式却让他成为同学中的另类。雅克和达尼埃尔的同学罗贝尔·德雷福斯写道，普鲁斯特对各种文化典故博闻强记、信手拈来，让他成为成年人的宠儿，却激发了“我们这些不成熟的少年（对他无情）的嘲笑”。[18]更糟的是，德雷福斯说，普鲁斯特总是急于讨好大家，毫不为此害臊。他习惯了让娜无条件的爱，根本看不出同学们不喜欢他。他同样在“普鲁斯特问卷”中写下，他最大的心愿是“被爱”。他无法掩饰那样的渴望，这进一步加深了同学们对他的偏见。

达尼埃尔·阿莱维总是带头欺负普鲁斯特。他受到雅克·比才和罗贝尔·德雷福斯的教唆，会在课间追着普鲁斯特沿回廊满校园乱跑，毫不留情地奚落嘲笑他。[19]男孩子们发现，把这位受害者的姓氏中的“s”去掉，就是“屁”（prout）。这个幼稚的侮辱虽然让普鲁斯特不安，却也产生了一个积极的结果。普鲁斯特一生都对名字塑造个性和影响命运的魔力很感兴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

达尼埃尔自己承认他在那个年纪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在回忆录中，他以第三人称说高中时代的自己“暴力而残忍：同学们仰视他、服从他，却绝非真正喜欢他——他们只是不敢激怒他”。[21]他回忆自己和同学一起欺负普鲁斯特时写道：

他身上有种东西让我们很不舒服，于是我们残忍地对待他；甚至想过要揍他一顿。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做——揍普鲁斯特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想揍他，就足以让他坐立不安了。他在我们眼里显然不像个男孩子。我们觉得他的友善、体贴的表达和温柔的讨好都太做作了；觉得他是个装腔作势的骗子，并当面这么称呼他——他那大大的东方人的眼睛会变得极其忧伤，但那也无法阻止他继续友善地对待我们。[22]

普鲁斯特忍受同学们的嘲笑有他自己的原因，那碰巧与名字的魔力有关。两位表兄弟有着他们的传奇父亲的姓氏，于是他们在他的眼中就有了无与伦比的魅力。[23]雅克·比才灿烂动人的笑容和一脸早熟的毛茸茸的胡子像极了他已故的父亲。随着作曲家的名声越来越响亮，这种相像更让他受人景仰。雅克高中一年级时，他父亲的最后一部歌剧《卡门》单在巴黎喜歌剧院就上演了330场，在世界各地上演，观众都起立鼓掌。达尼埃尔的父亲卢多维克·阿莱维作为第一位犹太人“不朽者”的地位让普鲁斯特大为震撼，他自己的父亲喜欢开玩笑说，将来马塞尔也会入选法兰西学术院。

在学校里，这对表兄弟的父亲的名声保护了他们，男同学们没完没了的恶作剧不会落在他们身上。有人曾听到一位恼怒的自习课督导高喊：“你们很清楚，单凭自己的姓氏，你们也永远不会被开除！”[24]对普鲁斯特而言，那些姓氏有一种特殊的、近乎神奇的魅力，那是他自己的姓氏永远无法拥有的。虽然父亲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成就为家族的姓氏争了光，但普鲁斯特对那些不感兴趣。他彻头彻尾是母亲的儿子，崇拜的是艺术。普鲁斯特昵称雅克为“《卡门》之子”，只要有机会就当着达尼埃尔的面赞美卢多维克·阿莱维的著作，他坚持不懈地努力赢得他们的好感。

那对表兄弟很快就找到了容忍（还不算十分欢迎）他的友善的理

由。两个男孩虽然因叛逆而行事荒诞，却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会被同样有着罗贝尔·德雷福斯所谓的“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的人所吸引。他们和德雷福斯以及班上另外两个学生费尔南·格雷格和罗贝尔·德·弗莱尔（Robert de Flers）一起组建了一个小团体，称为“文学小团伙”[25]，带着年轻人不自知的沾沾自喜筹划着要一举震惊巴黎文学界。11月，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周一》（*Le Lundi*）的文艺评论期刊，刊名取自另一位康多塞校友、已故评论家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26]的《周一的讨论》（*Causeries du lundi*，1851-1862）。这本期刊的公开使命是发表“一切值得一读的东西，无论内容和体裁”，并捍卫“大获全胜的美学折中主义”——这是引用象征主义诗人保尔·魏尔伦的话。[27]阿莱维任命自己为主编，卢多维克知道后吹嘘说：“达尼埃尔离不开文学，那是他的宿命。”[28]

可能是在为《周一》招募新人的过程中，达尼埃尔主动与普鲁斯特和解了，后者在前一学年结束时荣获康多塞备受垂涎的最佳法文作文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普鲁斯特拿到的是一个典型的高中生作文题目[29]——在皮埃尔·高乃依[30]和让·拉辛的新古典主义悲剧中，情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写了自己关于拉辛作品中“残酷的现实主义”和“极端的恐怖”的思考。[31]他的论点全然不同于一般的中学生解读，传统上一直把拉辛对自私和不顾一切的欲望的描写与高乃依为英雄主义、胸怀大众的自我牺牲辩护对立起来。达尼埃尔为学长的大胆折服了，邀请他为文学小团伙新办的杂志供稿。“普鲁斯特比谁都有天赋”，他在日记中写道，还很有先见之明地加了一句，“或许他长大后，会发出最最耀眼的天才之光”。[32]

普鲁斯特抓住这个向达尼埃尔证明自己的机会，飞速地为《周一》12月那一期写了一篇讽刺剧评：完美讽刺了朱尔·勒迈特。勒迈特是当代人对圣伯夫的回应，后者的评论风格总是充满趣闻逸事，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充分发挥了评论家的主观性，勒迈特不仅喜欢写自己对某一

部作品的主观“印象”，还喜欢预见那些印象将如何被驳斥，以此来削弱驳斥的力量。[33]普鲁斯特写了一篇评论皮埃尔·高乃依的悲剧《贺拉斯》（1640）的文章，戏仿了这种方法，《贺拉斯》是康多塞课程中的必读书。普鲁斯特提出了一连串不言而喻得根本不值一提的见解（例如，《贺拉斯》的背景在罗马，因而人物都是罗马人），接着又用“又或者我错了”这个句式的多个变体，弱化每一个见解的气势。读者如果不熟悉勒迈特那种过度模棱两可的文风，很难读懂这篇讽刺文章的高超技艺，但达尼埃尔在姑母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上见过勒迈特，在普鲁斯特文章中的每个句子里都看到了评论家的影子。不管普鲁斯特有多少怪癖，他都是《周一》不可多得的人才。

新供稿人在第二年春提交的另一篇稿件更令达尼埃尔震惊。这是以夏尔·波德莱尔那种阴郁而紧张的风格写就的无题诗，波德莱尔是达尼埃尔和普鲁斯特两人最喜欢的诗人。达尼埃尔那年注册了一门由斯特凡·马拉梅教授的英文课，马拉梅是那个世纪最重要的法国诗人之一，在他的指导下，达尼埃尔迷上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马拉梅称之为诗歌体裁的杰作。普鲁斯特没上马拉梅的课，却同样欣赏波德莱尔，但他看待波德莱尔的视角不同，或者说独树一帜：认为他是拉辛在19世纪的继承人。[34]

和拉辛的戏剧一样，波德莱尔的诗歌让普鲁斯特感兴趣的，是它关注欲望扭曲的、暴力的、自我毁灭的方面。[35]在《恶之花》中，这一关注包括对同性恋和施虐受虐狂主题的考察，普鲁斯特对此最为着迷，他一生都认为“波德莱尔非常看重这些（主题），以至于本来想给整部诗集命名为《女同性恋者》（*The Lesbians*）而非《恶之花》”。这些主题也是普鲁斯特本人非常看重的，与对母亲的依恋相伴相生，他总是怀着一种深深的羞耻感为男人所吸引。（父亲曾把他送到一个妓女那里，试图“治愈”这一缺陷，却让他更讨厌自己了：此事以闹剧收场，普鲁斯特还没有完全解开大衣的纽扣，就打碎了一件陶器，仓皇逃离了现

场。[36]）在普鲁斯特看来，爱意味着温柔和思想交流，性却只能带来堕落和痛苦，而后一种看法正是《恶之花》的核心主题。普鲁斯特之前模仿勒迈特是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这次则借用波德莱尔来非常认真地描述爱的蛮荒海岸。

他为《周一》所写的无题诗讲述了一个“恐怖的梦境”，一群“漂亮的年轻人”被一个“残忍的国王，年轻的杀人者”“用邪恶的刺穿身而过”。他严厉地抨击这位加害者（很像波德莱尔在《恶之花》那篇好战的开场白中高声向“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的述说），普鲁斯特的诗歌叙述者也宣布与受到国王迫害的其他受害者同心同德：

哦国王！……我被这个噩梦惊呆了，被钉在

你的宫殿（ton palais；也可理解为“你的上颚”）里动弹不得，

我每天都想放你的血……

我以那些苍白的梦游人的名义诅咒你，他们

被他们不安的英雄梦想欺骗了，

也在诅咒你，哦残忍的、暴虐的白国王。[37]

和《恶之花》一样，这里的诡谲意象和充满威胁的口气也与波德莱尔（以及拉辛）喜欢的语调高昂的古典英雄体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不过，普鲁斯特的诗歌不仅仅是用模仿向前辈致敬。这里充满了虐待者和失眠者、非人的折磨和无法实现的理想，可以看到他后期成熟作品中的许多标志性特点。

关于普鲁斯特与达尼埃尔的关系，这首诗还有个更巧妙的功能：它

是对康多塞操场上那个“残忍的、暴虐的……王”的一记漂亮的回击。普鲁斯特本人就患有失眠症，身体虚弱，完全可以被称为“苍白的梦游人”，他太熟悉达尼埃尔在校园里嘲笑他时使用的“邪恶的刺”。然而普鲁斯特用自己的诗歌表明，他完全有能力反击，即使做不到以牙还牙，也能用写作针锋相对。

这部作品有一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诗歌叙述者既痛恨又迷醉于国王的残忍，两次给仇敌以响亮的诅咒——这是从拉辛的悲剧《费德尔》中借用的修辞手法，普鲁斯特和母亲一样对《费德尔》倒背如流，这部剧中包含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诅咒情节。当戏剧的同名女主人公坦白她对继子希波吕托斯的禁忌之爱时，他惊恐地退缩了。她为了报复，便让丈夫国王忒修斯相信希波吕托斯想诱奸她。暴怒的忒修斯诅咒自己的儿子，叫来海神尼普顿除掉他。希波吕托斯勇敢地与接踵而至的海怪作战，直到他的马受惊后把他拖死，结局悲壮。

《费德尔》以忒修斯谴责的警告为基点，突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诅咒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们是言语行为，完全靠词语进行。通过在诗中使用这种修辞手法，普鲁斯特再次重申手中的笔可被用作武器，与剑旗鼓相当。他表明，自己的力量在于掌握了波德莱尔和拉辛的文学语言：那恰是这首诗的首位读者达尼埃尔渴望拥有的语言。（他后来成为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首位法语译者和传记作者，但在这一时期，达尼埃尔希望长大以后能够成为诗人。[38]）普鲁斯特生怕这些有针对性的攻击逃过了“残忍的国王”的眼睛，在现实生活中，他对这位“残忍的国王”又崇拜又厌恶，还给这首诗写上了“献给达尼埃尔·阿莱维，写于放学后留堂的前15分钟，那期间我一直盯着他看”。[39]

达尼埃尔又恼怒又钦佩，把这几句话和诗歌一起抄写到日记中，从此养成了一个习惯：抄写普鲁斯特写给他和雅克的全部信件，留给后世观看。在页面空白处，达尼埃尔写道：“普鲁斯特（马塞尔），1888年5

月13日放学后留堂——这是他的第一首诗，他是这么说的——这小子真令人难以忍受！”[40]这句话流露出他羡慕那个大男孩显而易见的天赋。据信是为文学而生的达尼埃尔将继续惊叹普鲁斯特的才华，正如几个月后，他这样评论雅克收到的一封普鲁斯特的长信，

> 普鲁斯特……全篇没有一处涂抹的痕迹，没改一个字。这个疯子确实天赋惊人，我没有见过任何……写得比这更精彩的文字。[41]

至于普鲁斯特模仿波德莱尔的诗，让达尼埃尔感到不安的不仅是它的文学技巧，还有其中暗示的作者的性倾向。从“残忍的国王”和受害者（被君主的“刺”“穿透”之后，这些人被钉在他的宫殿里动弹不得，这里用了法语的双关语，“宫殿”也可作“上颚”解）之间施虐和受虐的关系，到献词中赤裸裸的欲望（“献给达尼埃尔·阿莱维，写于……一直在盯着他看”），它的同性恋倾向确定无疑。

至少这是达尼埃尔的解读。在后来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普鲁斯特虽然“比谁都有天赋”，但他“年轻而柔弱，（而且）他性交-合（原文如此），他手淫，甚至还有可能鸡奸（原文如此）”！文学小团伙中的其他人从一开始就觉得普鲁斯特“不像个男孩子”，自然一致同意这种看法。用德雷福斯的话说，

> 我们佩服普鲁斯特，也感觉他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但他的性倾向让我们害怕，就是16岁孩子的那种害怕。……那甚至成为我们嘲笑和虐待他、（试图）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疏远他的主要原因。[42]

不消说，普鲁斯特的性倾向也是他被达尼埃尔和雅克吸引的原因，他给这对表兄弟写了一连串信件，表达了对他们的向往。普鲁斯特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性魅力解释了他为什么坚持不懈地努力赢得他们的好

感。追求这对表兄弟让他备受羞辱和单相思的煎熬。但普鲁斯特从康多塞毕业时，这些情感会让位给一种更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立场：他用自己的笔描述了这些男孩子的禁恋魅力，以及他如何挣扎，不再将他们作为爱恋的对象。

普鲁斯特最先关注的是比才，觉得他比达尼埃尔随和也更有同情心。[43]这种看法大概与雅克对母亲的爱有关，他的母亲与普鲁斯特“漂亮的小妈妈”同年出生。两位母亲都有种漫不经心的冷幽默，透出她们的冰雪聪明，也都有股子不落俗套的美。她们的黑头发、黑眼睛和“漂亮的犹太人的五官”（普鲁斯特对让娜的描写），总是让儿子的朋友们想起《旧约全书》里的女主角们。

然而除此之外，两个女人一点儿也不像。[44]热纳维耶芙是个长袖善舞的名媛，她高调的社交生活和名人朋友在巴黎人尽皆知。让娜则是个恋家的女人，当丈夫不得不和自己专业领域的政治掮客们周旋时，她宁愿让他一个人去应付。热纳维耶芙虚荣，和好友洛尔·德·舍维涅一样，欣然接受现代女性身材极其苗条的时尚，把自己饿得很瘦。丰满的让娜对减肥或追求时尚完全没兴趣。然而或许她们最大的区别还在于两人的育儿方式完全不同。让娜总是在儿子身边宠爱他，热纳维耶芙却总是事后才想到儿子，或者干脆当他不存在。

雅克热切地渴望母亲的爱，根本无法忍受“离开妈妈”的普鲁斯特对此心有戚戚焉。整个童年时期，每当热纳维耶芙因温泉疗养或社交任务而长期离家时，雅克总是写一封又一封的信求她回来，或者求她至少给他写一封回信。她就算在家，也从未踏入儿子的卧室半步。据达尼埃尔说，由于她的疏忽大意，雅克甚至私藏了很多刀片——这是他自毁冲动的早期征兆，这种冲动导致他在成年后酗酒、吸毒，乃至最终自杀。

普鲁斯特在1887—1888年冬天的某个时候首次向“《卡门》之子”示好，雅克的母亲在刚刚过去的秋天再婚，他正处于叛逆期，行为鲁莽轻

率，经常在放学后被老师留堂。雅克在家里也总是麻烦不断。一天清晨，斯特劳斯发现他从公寓的一扇窗户爬回家，显然是未经允许在城里玩得彻夜不归。热纳维耶芙对此一笑而过，但斯特劳斯认为他们应当考虑动用更严格的措施规训孩子了，比方说送他去寄宿学校。几年后他们真的送他去了那里。（卢多维克暗示是热纳维耶芙“总是从一个城堡匆匆赶往另一个城堡”的习惯迫使她必须送走儿子。）

雅克与家长的冲突给了普鲁斯特一个突破口。他写信给雅克说他自己在家里也有麻烦，说他们应该相互支持：

> 我亲爱的小雅克，我的家人对我很不好。他们想把我送到外省的寄宿学校去。我非常悲伤，唯一的安慰就是爱与被爱。真的，是你回应了那样的需求，是你在这个冬天有那么多自己的麻烦要面对时，前几天还给我写了一封漂亮的信。吻你，全心全意地爱你。[45]

由于达尼埃尔没有抄写他和雅克写给普鲁斯特的信，只抄了普鲁斯特写给他们的信，雅克那封“漂亮的信”的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普鲁斯特为它使用的形容词很值得玩味，那也是他常常用来形容自己深爱的妈妈的词。

这里提到寄宿学校也同样值得玩味。这显然是编造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普鲁斯特曾有可能被流放到“外省”的某个学校。他与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通信堆积如山，其中没有一处哪怕一句提到这种可能，那本来也不可能。和他一样，让娜也根本无法想象离开她的“小狼”。因此，看来普鲁斯特编造了寄宿学校的威胁，还声称父母对他不好，目的就是希望赢得雅克的信任。至于他说谎的动机不只是共情那么简单，从关于“爱与被爱”和“全心全意地”爱比才这些句子中就能看出来。就连“吻你”这句法语中常用的告别语，也有着充满爱意的弦外之音。它最贴近的英文翻译是“love and kisses”（“爱并吻你”）——这可不是异性恋少年

们常用的说再见的方式。

那年春天的晚些时候，普鲁斯特向雅克的求欢更直接了。他的求爱信没有留下来，但他后续的一封信表明，雅克拒绝了他：

> 我亲爱的雅克，我很难过，但仍然尊重你的正直。你（拒绝）的理由很棒，我钦佩你在此问题上的周全考虑。然而……心灵——或者身体（le cœur—ou le corps）有着理智全然不懂的理由。因此我以对你的极大钦佩接受……你为我套上的残忍枷锁，但也带着巨大的悲哀。或许你是对的。但在我们能够采摘那朵娇艳欲滴的花时不去采摘，仍然让我伤感，因为如果（成年后）再去采摘，那时它就会结成——禁果。诚然，你觉得那果子有毒，那我们就别再想也别再提此事了。[46]

和这里暗示的雅克的拒绝一样值得关注的，是普鲁斯特拒不接受他的拒绝。即便他保证尊重雅克的愿望，两人却保留了柏拉图式的友谊，普鲁斯特对17世纪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的名言用了一个双关语，重申了自己的爱欲："心灵（le cœur）有着理智全然不懂的理由"，在cœur（心）后面附上了它的同音字*corps*（身体）。普鲁斯特这么做，是在求助于最初把他引入雅克和达尼埃尔的圈子的"对文学的一往情深"。为了进一步强调那种一往情深，他赞美了雅克的周全和正直。普鲁斯特或许因为被拒绝的"残酷枷锁"而烦恼，但他暗示他的爱既是肉体之爱，也是精神之爱。

如此巧妙的推理并没有改变雅克的想法，他仍然拒不采摘那俗语中的花朵，但也没有因普鲁斯特的诱惑而生气。据达尼埃尔和罗贝尔·德雷福斯说，他坚信自己是个异性恋者，因此"对普鲁斯特迸发的激情只是耸耸肩膀一笑了之，他很清楚自己一点儿那方面的嫌疑都没有"。[47]

普鲁斯特承认自己失败了，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雅

克的无动于衷被他用作初次对达尼埃尔示好的借口，他在那年五月写信给达尼埃尔，表达了他渴望“永远凝视着雅克，吻（他），坐在（他的）膝上，用肉体爱（他），有血有肉的爱……全心全意地叫他‘我的小可爱’和‘我的天使’，哪怕全世界反对，也绝不会觉得这些行为是所谓的‘鸡奸’”。[48]他那封信的结尾带着戒备的语气，仿佛提前想到了达尼埃尔的嘲笑：“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样的冲动就比普通的爱情更脏。”

这套辩词表面上是在倾诉他对雅克的爱，事实上却是冲着达尼埃尔来的。普鲁斯特利用后者理性分析的头脑，在第二封信中提醒他，西方经典中有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爱男人的：

> （至少）有两位智慧的大师在他们的一生中采摘了那朵花：苏格拉底和蒙田。……他们认为年轻男子的友谊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可比跟愚蠢、堕落的女人纠缠好多了。[49]

“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关系显然是普鲁斯特在这里追求的——他现在透露，是达尼埃尔让他有了这样的冲动：

> 我要对你这个漂亮男孩解释一下我这句推理，这是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即便我们通常不怎么愿意谈起它。……你以为我疲惫而虚弱，你错了。如果你能吸引我，如果你有一对漂亮清澈的眸子，它们又如此清晰透彻地反映出你那颗高贵的头脑，让我觉得我不亲吻你的双眼便无法全心全意地爱你的头脑，如果你的身体和眼睛像你的思想一样优雅机敏，让我觉得如果坐在你的膝上我便能进入你的思想，最后，如果你的你，你那有着活泼头脑（在我看来，那与你轻盈的身体无法分离）的你，能够改进和增加我“爱的甜美欢愉”，那么这一切哪有一丝一毫意味着我当受到你的嘲笑。……我知道很多极其聪明和正直的男人年轻时与其他男孩一起厮混。后来他们回头去找女

人了。……所以不要把我看成鸡奸者——那会让我伤痛难过。[50]

普鲁斯特在这封向达尼埃尔求爱的信中使用的很多策略在致雅克的信中都用过：赞美朋友的聪明才智，幻想坐在他的膝上，假设同性尝试是可以接受的少年行为，坚称这样的尝试不构成实际上的“鸡奸”。（这是普鲁斯特年轻时常常用于形容同性恋的名词，很久以后他又换成了“变态”。）这封信和以前那些信唯一的重大区别，是普鲁斯特请求宽容。他抗议说自己既不“疲惫”也不“虚弱”，恳求达尼埃尔不要唾弃他是个追求刺激的行为不轨之人。他，普鲁斯特所希冀的，不过是另一个男孩的“爱的甜美欢愉”。

普鲁斯特的恳求仍然没有结果。它甚至还破坏了他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似乎导致他和那对表兄弟关系破裂了。收到他的信后不久，达尼埃尔不再写信给普鲁斯特，也彻底不跟他说话了，雅克也这样对待他。到那年春季学期结束时，以及整个暑假，两个男孩都当普鲁斯特不存在。他们越是固执地无视他，他就越绝望。在一篇夸张的笔记中，他声称母亲发现了他和雅克之间“过分的肉欲之爱”，禁止他们再见面。这大概又是他的编造，是临时想出来以制造紧迫感的——仿佛导致他与雅克分开的是让娜的禁止，而不是那对表兄弟的冷漠。无论如何，普鲁斯特宣称，他已经准备好如有必要就“在家以外的地方爱你”。“我的小可爱，我们可以把一所咖啡馆变成我们两人的温馨小家。”

普鲁斯特以夸张的方式把这封信标记为“我一生中写过的最艰难的信”。[51]然而雅克和达尼埃尔不为所动。达尼埃尔把它誊抄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那个可怜的普鲁斯特彻底疯了。这封信就是证据。”[52]

随着新学年到来，那对表兄弟的“封口令”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这让普鲁斯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8月，他请求罗贝尔·德雷福斯（后者错就错在联系他，问了几个关于即将到来的新学期课程的问题）帮他解释

情况何以如此。他恳求德雷福斯告诉他，为什么雅克“过去对我那么好，现在却彻底抛弃了我”，为什么“他的表弟更彻底地抛弃了我”。[53] 谁也不知道德雷福斯是怎么回答他的。那年9月，普鲁斯特仍然在问他那对表兄弟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想捉弄我，想甩掉我，还是别的？”），渴望与他们和解。

在写给德雷福斯的信中，普鲁斯特甚至把自己比作拉辛笔下的费德尔，那是注定失败的性出轨的典范。费德尔对继子希波吕托斯的痴爱是通奸、乱伦和犯罪（因为她对国王丈夫不忠），是三重禁忌。同样，它的痛苦一定让17岁的普鲁斯特感同身受，他对德雷福斯说起自己最近见到达尼埃尔和雅克的情景时，这一点便明白无误：“我简直要像费德尔那样说，重见阳光使我目眩神晕，/我双膝在颤抖，禁不住要往下沉。”[54][55]

大致就在写这封信的那段时间，普鲁斯特第一次回答了他那份后来很著名的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最喜欢的文学人物是谁。普鲁斯特的回答是“费德尔”（但他后来划掉了，代之以拉辛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贝雷尼丝，后者成功地克服了自己问题重重的欲望[56]）。正如他对德雷福斯解释的那样，他能理解费德尔对希波吕托斯的痴念——“他既年轻，又可爱，受到大家的仰慕。”[57][58]

康多塞10月重新开学时，普鲁斯特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年开始了，他失望消沉到了极点。然而不久他就有了顿悟，发现能够帮自己不再沮丧的灵丹妙药，恰是达尼埃尔和雅克此前愿意与他相遇的那个领域。在那个领域，假设的欲望和假想的言论不仅可以被容忍，简直就是被鼓励的，那就是文学。

10月初，普鲁斯特写了两首诗，给两个表兄弟一人一首。他写给达尼埃尔的新诗就是以《鸡奸》为题目，表明他执着的想法仍然没变。但这首诗用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形式，在有着达尼埃尔那样的文学品位的读

者看来，这种形式更容易接受——从五百年前的彼特拉克开始，那一直是遭拒的爱人占据的领地。最近，波德莱尔和马拉梅刚刚给了这种形式一种令人眩目的全新表达，现在普鲁斯特也用它来为自己的主题服务。《鸡奸》是一首十四行诗。

普鲁斯特的十四行诗遵循这一体裁的法语传统，开头是两段四节诗行，使用了波德莱尔、马拉梅和拉辛那种清晰的六音步抑扬格：

如果我有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银锭、金子和青铜，

如果我有一点勇气，有充满力量的腰部、双唇和双手，

我会离开城市生活——离开这里的书籍、马匹和权术——

逃离那里，现在，今天，明天，

到一片结满覆盆子的草地上——泛着翡翠绿或胭脂红！

——

那里没有乡间的麻烦，没有马蜂、露水和霜冻，

我会想永远待在那里，与他共眠、同住和爱恋

一个身体温热的男孩，他的名字叫雅克、皮埃尔或菲尔明。[59]

普鲁斯特只用条件动词来描写自己的同性恋乌托邦，强调了它与诗歌叙述者生活的世纪情况全然不同。《鸡奸》用一连串“如果”和“我会”在当前（现实）和可能（文学）之间划了一道安全的界线，不再是“真正的”普鲁斯特试图与朋友们一起探索那种可怕或可厌的可能性。相反，它成了最为常见的诗歌修辞，就像《费德尔》中那种近似于乱伦的爱，抑或《恶之花》中那位“虚伪的读者”。同样，一旦“雅克”与虚构

的“皮埃尔”和“菲尔明”并列，他就丧失了与雅克·比才的明显联系。他变成了被塑造出来的众多人物之一，所在的世界无论与作者的现实多么相像，仍与之截然不同。

把自己被禁的性伴侣和性冲动变为修辞手法之后，普鲁斯特放弃了起初描写它们的条件时态。在这首十四行诗的最后一段三行诗节中，他用现在时态重新表述了自己被禁的欲望：

> 让伪善之人怯懦的嘲笑见鬼去吧！
>
> 纷纷落下吧，鸽子！年轻的榆树，歌唱吧！苹果们，结果吧！
>
> 我想[je veux]呼吸他的芬芳直到死亡
>
> 在红色夕阳的金光下，在白色月亮的莹润光辉里，我想
>
> [je veux]——心醉神迷，以为自己已经死去
>
> 远离讨厌的美德敲响的丧钟！

叙述者两次高呼“我想”，强调了自己的愿望的紧迫性，而不是条件性——这种强调重点的转换即所谓的转折（*volta*），一般是由十四行诗结尾的两个三行诗节开启的。在《鸡奸》中，转折把性与死并置，因为叙述者渴望的肉体的欢愉——呼吸爱人的芬芳，死在他的怀里——暗示了那种类似性高潮的“极乐”（petites morts）。

这首诗的两个三行诗节也尝试了拉辛式的言语行为，那句激励性的“让伪善之人怯懦的嘲笑见鬼去吧！”将恐同症驱逐出了叙述者的性爱乐园。通过这句诗，普鲁斯特沿袭了拉辛，召唤出一种新的语言现实——一种源于自己所处的世界，又与之截然不同的现实。[60]这里提到

的拘谨而嘲笑的人可被解读为有针对性地指代普鲁斯特近期在达尼埃尔和雅克那里的遭遇，但叙述者呼吁把“伪善的”恐同者逐出自己的乐园，就在文学和生活之间画上了清晰的分界线。（没有“马蜂、露水和霜冻”也是一样，这些都是自然界不可避免的元素。）普鲁斯特表达出一种不被容许的渴望，对谴责它的人嗤之以鼻，在诗中想象了一个魔法仙境，那里的风俗习惯不同于现实，也优于现实。他的十四行诗正是它呼唤的乐园，是一个“远离讨厌的美德敲响的丧钟”的世界，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鸡奸”（用达尼埃尔的说法）的世界。

即便在这个诗化的世外桃源之外，《鸡奸》似乎也改善了普鲁斯特与那对表兄弟的关系，达尼埃尔总算在接受这首诗时打破了沉默，在诗旁边标注了编辑意见。达尼埃尔的反馈思维严谨、头脑清醒，关注作品的形式属性，表达了他已经改变立场，再度将普鲁斯特看成引人注目的作家而非需要躲避的变态。因为这首诗的文学价值，达尼埃尔对这位大男孩天赋的信心再度成为他们关系的焦点。

达尼埃尔对《鸡奸》的第二反应是送给了普鲁斯特一首他自己的诗，那首题为《爱情》（“Amour”）的诗冗长离题，共有14个诗节。[61] 该文本的灵感也源于波德莱尔，但读起来像蹩脚的模仿或无意的谐拟。单在开头第一个诗节中就包括了波德莱尔的三个最哗众取宠的比喻——一个吸血鬼、一具腐烂的尸体和一堆寄生虫，其后的诗节愈发糟糕。如果普鲁斯特高中时代的诗歌中包含他成熟作品中闪烁的“天才的光芒”的话，达尼埃尔在这方面的尝试就证明了他最终选择哲学和历史而非文学的决定有多么明智。

《爱情》写得一塌糊涂，却成了普鲁斯特的一次成功机遇，他抓住这个机会用自己高超的文学技巧击败了达尼埃尔。“全诗非常糟糕，”他写道，“没有任何天分可言，真让我绝望，而且完全不该是你写的东西。”他在纸张的边缘写上了自己的评语，诸如“幼稚糟糕的诗”“无法理

解的迂回说法、烦人的陈词滥调”“在思想、语言和格律层面非常愚蠢”。普鲁斯特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是敦促达尼埃尔重读经典——“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拉封丹、拉辛……拉布鲁耶[62]、福楼拜、圣伯夫……还有最重要的，卢多维克·阿莱维”——来纠正他粗鲁笨拙的文风。[63]

对普鲁斯特和达尼埃尔两人来说，这次交流十分重要，因为它使得两人再次变成了有远大抱负的作家同伴。那年秋天，文学小团伙决定再度出版杂志，更名为《丁香评论》（*La Revue lilas*，取自它使用的淡紫色印刷纸张），达尼埃尔不仅像开办该杂志前身时那样请求普鲁斯特供稿，还同意后者作为秘书长入选理事会。[64]矛盾的是，让达尼埃尔坚信普鲁斯特的天赋比他的性倾向更重要的，居然是一篇关于鸡奸的十四行诗——或者至少让他觉得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达尼埃尔将友人的《鸡奸》比作波德莱尔臭名昭著的大麻上瘾，猜想“如果（普鲁斯特）没有了他卑劣的一面，大概也会丧失他伟大的根基”。[65]

普鲁斯特为新杂志贡献的第一篇稿件是一首无题散文诗——这虽然是由波德莱尔开拓的体裁，但普鲁斯特再度为它加上了自己的独特印记。这首题献给“我亲爱的朋友雅克·比才”并充满同性恋渴望的诗歌描写了巴黎一间公寓里的一个不眠之夜。全诗共有两段诗行，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 15岁。傍晚七时。十月。
>
> 天空是深紫色，点缀着灯光。一片黑暗。哦，我可爱的小朋友，为什么哦为什么此时的我不是坐在你的膝上，我的脸紧贴着你的脖子？为什么哦为什么你不爱我？这是灯，是对平凡之物的恐惧。它们压迫着我。……这是对平凡之物的恐惧，是夜幕降临时毫无睡意，楼上有人在跳华尔兹，还能听见另一间屋里碗碟碰撞的噪音。哦，我可爱的小朋友……[66]

和《鸡奸》一样，这段文字也巧妙地用文学表达了作者本人清晰可辨的特征，从普鲁斯特夜间孤独的悲伤到他关于蜷缩在一位男性朋友膝上的幻想。

然后普鲁斯特引入了一个转折，突出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引入不但与叙述者的色情幻想有关，也与叙述者过去只觉得“恐惧”的一整套具体的“平凡之物”有关，它在第二节也是最后一节诗中一一列举了它们：

17岁。夜间11时。十月。

灯光微弱地照在我房间的黑暗角落，在我突然变成琥珀色的手上、我的书，和我的书桌上投射出一片很大很亮的光圈。……在这间宽敞而沉默的公寓里，大家都睡着了。……我打开窗，最后看一眼友善的月亮那张甜美的圆脸。……我关上窗。上了床。我的灯在我身旁的床头柜上，在一堆杂乱的玻璃杯、盛放冰冷液体的烧瓶、精装的小书、来自朋友的信、情书中间，在我的书房深处照射出一缕微弱的光。神圣的时段！平凡之物，和自然一样——我无法征服它们，只好把它们变成神圣之物。我用自己的灵魂，用亲密而灿烂的形象遮盖住它们。我住在圣殿，住在奇观里。……灿烂的景象在我眼前舞蹈。床很软，我睡着了。[67]

这一段与普鲁斯特写给这对表兄弟和为他们而写的其他文字截然相反，甚至与上一段文字相反，整段没有一处提到同性的爱欲。虽然“上了床”和“床很软”这些句子里有暗含的性欲，但叙述者不再沉迷于他的不可能之爱的痛苦，而是突出了创造力补偿给自己的快乐。“平凡之物，和自然一样——我无法征服它们，只好把它们变成神圣之物。”过去那种对自然的恐惧，对无法改变的、不愿意或不能够容纳叙述者的禁忌之爱的现状的恐惧——在他召唤的灿烂形象面前消失了。诗人的艺术

就是圣殿，其余的一切都是奇观。

除了改善自己与雅克的关系之外，这部作品还让这位年纪更小的男孩开始刻意地对他友善了。得知普鲁斯特有收集他崇拜之人的照片的癖好（这个习惯让很多人很困惑，因为当时人们只会把照片送给家人和密友）之后，雅克送了普鲁斯特一张自己的照片，并签上了一句中听的恭维话："给马塞尔·普鲁斯特，（你和阿莱维是）我最亲爱的朋友，1889年2月。"

雅克也开始邀请普鲁斯特放学后到他家的公寓来。普鲁斯特像传说中的一样讨大人喜欢，用他的顺从讨雅克的父母开心，他的博学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特劳斯夫妇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以至于事实上暂时搁置了送雅克去寄宿学校的计划。"问问斯特劳斯先生我对雅克的影响有多好吧，"1888年11月，普鲁斯特对达尼埃尔沾沾自喜地说，"判断一个人的德行，最好的标准就是他（对他人）的影响。"普鲁斯特接着说，至于他的"鸡奸"，雅克和达尼埃尔两人都无须再为此烦恼了，因为"我正努力保持纯洁，哪怕只是为了体面"。[68]

普鲁斯特或许在这一时期发现的一首诗中找到了保持纯洁的动力，即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牧羊人之屋》。这部作品歌颂了诗歌、"纯洁的精神"和"宁谧有爱的梦幻曲"，强调文学与性爱不同，它不受"心灵烦乱"的干扰，伟大艺术"那面纯洁的、如钻石般耀眼的镜子"是世上唯一"永恒的爱"。[69]另一方面，维尼的诗也承认追求这样的爱可能是一件孤独无助的事情，因为最"卑微的灵魂"在面对真正的天才时，"既无法（承受）它的激情，也无法（承担）它的重量"。1889年春，这一要旨或许对普鲁斯特有着特殊意义，让他从中感受到安慰，因为达尼埃尔和雅克拒绝了他投发在《丁香评论》的作品——一部短篇故事，讲的是一位古希腊的年轻英雄学会了将男性之间的柏拉图式友谊看得重于同性之间的爱欲。这对表兄弟曾以拒绝他的求爱伤害过普鲁斯特的感情，拒绝

他的作品无疑是对他更大的伤害，这或许能解释他为什么会转向维尼那种孤独而崇高的世界观。他对自己说，他的天赋超出了这对表兄弟这样的凡人的眼界，如此便能对他们的忽视不屑一顾，提醒自己还有更高的艺术境界去追求。

普鲁斯特这一思维方式的变化缓和了他对达尼埃尔和雅克的感情，他觉得以前看到他们的姓氏便以为他们是创作天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那年5月写给达尼埃尔的一封信中，普鲁斯特指出两位表兄弟缺乏他以为他们拥有的过人智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 昨天傍晚……我说自己不再像以往那样爱雅克，我觉得大概表达得还不够清楚。我绝不是说我觉得他愚蠢——只是他过去在我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形象有些模糊了，就像不再爱的那种感觉。……不过我仍然觉得他有不少（优）点——你本人或许不会欣赏那些优点，因为它们与感情有关，而感情并不能全然诉诸文学；对那些敏感的个性和细腻的情感，他远比你懂得更多。不过仔细想想，那些正是艺术的内容；是它们让伟大的书籍拥有了持久的魅力。……所以你看，我仍然非常喜欢比才，因为跟你相比，我更喜欢他。[70]

普鲁斯特以这种转弯抹角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自尊，明确表示他盲目崇拜这对男孩的日子结束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这对表兄弟仍然拥有他的喜爱，那只是因为他们教给了他“艺术的内容”。普鲁斯特不再用爱情或色情标准来判断这对男孩，而是启用了美学标准。他们如今对他的意义仅仅在于那是他本人创作活动的起点，就像玻璃被熔化，变成了如钻石般闪耀的镜子，映照着他的艺术。

然而当普鲁斯特说他不再想念雅克时，他倒没有完全放弃爱情。只不过他把理想化的目光投向了一位更精巧、更有潜质的缪斯：一个已经启迪过无数巴黎艺术家并举办着全城最棒的沙龙之一的女人；一个和她

的朋友夏尔·阿斯一样超越了犹太人身份，成为“有生”阶层的荣誉成员的女人。[71]一个与雅克和达尼埃尔有关，但她的性别和年龄——还有她耀眼的社会地位和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使她方便地逃脱了普鲁斯特“不纯洁的”同性恋渴望，让他得以自由地关注她的审美社交魅力的女人。一个达尼埃尔称之为“姑母”，雅克称之为“妈妈”，而社交专栏——那是普鲁斯特在人生的康多塞那一章结束时的固定阅读材料——用许多大写加粗的名字称呼的女人：热纳维耶芙·阿莱维·比才·斯特劳斯。

---

[1] 关于康多塞的前身是波拿巴学校（在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改为“波旁学校”），Charles Lefeuve，*Histoire du Lycée Bonaparte*（*Collège Bourbon*）（Paris：Bureau des Anciennes Maisons de Paris sous Napoléon III，1862）。关于康多塞学校的大批犹太人校友，见DH，*Pays parisiens*，102。

[2] 嘉布遣兄弟会（Capuchin），天主教男修会，是方济各会的一个分支。

[3] 康多塞虽然严格意义上是走读学校，但它也对寄宿在巴黎各大高级宿膳公寓的学生开放。如第10章所述，可以在那里上学，在布斯凯-巴思公寓住宿。关于波拿巴学校/康多塞截至1862年的大量（但仍不完整）知名校友名录，见Charles Lefeuve，*Histoire du Lycée Bonaparte*（*Collège Bourbon*）（Paris：Bureau des Anciennes Maisons de Paris sous Napoléon III，1862），107-270. See also 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9。

[4] 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曾在第二共和国和国防政府期间担任司法部长，是法国犹太人权利的坚定捍卫者。

[5] ED，*Testament d’un antisémite*，86，n. 1.

[6] Carter，*Marcel Proust*，6；and 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 关于《克雷米厄法》的重要意义（和局限），见Maurice Samuels，*The Right to Difference*：*French Universalism and the Jews*（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74。

[7]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优美的文笔和极具魅力的思想著称。

[8] Évelyne Bloch-Dano，*Madame Proust*：*A Biography*，trans. Alice Kaplan（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and Jean-Yves Tadié，*Marcel Proust*，*trans. Euan Cameron*（New York：Viking，2000），13-36；and Maurice Duplay，*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Paris：Gallimard，1972），13.

[9] Tadié，*Marcel Proust*，55 and 68；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9；and Racyz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50.

[10] DH，*Pays parisiens*，123；翻译稍有不同的引文又见Edmund White，*Marcel Proust*：*A Life*（New York：Penguin，1999），28。

[11] 关于普鲁斯特夫人非同寻常的文化素养和教育背景，详情见Bloch-Dano，*Madame Proust*，trans. Alice Kaplan（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41-42 and 101-3。关于青年MP在“非同寻常的骚动期”，“永无餍足的阅读期”的“多病岁月”，见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11-12。

[12] Maurice Duplay，*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Paris：Gallimard，1972），23.

[13] 列奥尼达一世（Leonidas，公元前540—前480），也有译作李奥尼达一世。古代斯巴达国王，出自亚基亚德世系，阵亡于第二次波希战争中的温泉关之役。他率领的300名斯巴达士兵的英勇表现使他成为古希腊英雄人物。

[14] 马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约前248），古罗马军事活动家，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的统帅。

[15] 关于母子二人彼此引用拉辛打趣，最早的有记录的例子见MP，*Correspondance avec sa mère*：*1887-1905*，ed. Philip Kolb（Paris：Plon，1953），23，让娜·普鲁斯特在一封致MP的信的最后引用了拉辛的《爱斯苔尔》中的一句话：“时间太久，我心急如焚！”显然，在MP年纪很小，和一群邻居孩子在爱丽舍宫游玩时，就能“聊起他心爱的拉辛”了；见Carter，*Marcel Proust*，817，n. 36。在本章后文中我还会谈起MP与拉辛的关系，并就此话题引用多部重要的学术资料。

[16] 关于MP何时首次填写这一问卷，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但算得上为重建普鲁斯特的生平大事年表做过最详尽研究的学者Philip Kolb认为那是在1886年。关于普

鲁斯特问卷的详情，见Carter，*Marcel Proust*，55，and（crossing my desk just before this book went to press）Évelyne Bloch-Dano，*Une jeunesse de Marcel Proust*：*une enquête sur le questionnaire*（Paris：Stock，2017）。MP对第一份问卷的回答，见Maurois，*Quest for Proust*，52-54。MP后来完成于1892年的问卷版本的副本见Mireille Naturel，*Marcel Proust in Pictures and Documents*，ed. Suzy Mante-Proust and trans. Josephine Bacon（Zurich：Edition Olms，2012），118。关于普鲁斯特就母亲问题给出的问卷答案有一个风趣的讨论，见Elisabeth Ladenson，“Someone like Ma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0，no. 9（May 8，2008）：19-20。

[17] 正如最优秀的普鲁斯特传记作者William Carter所说，“少年时代的普鲁斯特……是最典型的可怜而没有安全感的妈妈的乖宝宝”。Carter，*Marcel Proust*，75.

[18] RD，Souvenirs，43. 关于MP在同学中间不受欢迎，又见JEB，*Mes modèles*，103。关于同学们的父母都很喜欢他，同样见RD，“真正喜欢马塞尔的人是年龄（比他的小同学）更大的一群人：他们一致惊叹他的礼貌、风度、温柔和良善”（25）。同样，吕西安·都德也回忆过他的成年家人多么喜欢MP。“我祖母宣称‘她从未见过像小普鲁斯特先生那么亲和、有教养的年轻人。’”吕西安的母亲称MP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读书极多，性格极好”。Lucien Daudet，*Autour de soixante lettres de Marcel Proust*（Paris：Gallimard，1929），11-13.

[19] 关于男孩子们在校园里嘲笑MP，见RD，*Souvenirs*，31。

[20] Roland Barthes，*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Paris：Seuil，1972），133；and Benjamin，*Sur Proust*，9-11.

[21] DH，“Autoportrait inédit，” in *Cahier* 2（January 1889）；reproduced in MP，*Écrits de jeunesse 1887-1895*，ed. Anne Borrel（Paris：Institut Marcel Proust International，1991），30.

[22] DH，*Pays parisiens*，122-23.

[23] MP并非唯一被这对表兄弟著名的家族姓氏吸引的人。后来与JB有姻亲关系的Maurice Sachs也曾写过类似的反应，见Sachs，*Le Sabbat*，45。

[24] FG，*L’Âge d’or*，136.

[25] RD，*Souvenirs*，56.

[26] 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

作家、文艺批评家。圣伯夫生于布洛涅一个旧贵族家庭，1823年进入医学院学习，1857年至1861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他作为评论家的名声在第二帝国时期达到顶峰。

[27] MP，*Écrits de jeunesse*，94.

[28] RD，*Souvenirs*，54. 关于《周一》的创办和使命，见MP，*Écrits de jeunesse*，91-94。关于MP所获的法语作文奖，见RD，*Souvenirs*，22。

[29] MP关于拉辛与高乃依对比的文章见André Maurois，*A la recherche de Marcel Proust*（Paris：Hachette，1949），33-49。传记作家Biographer Jean-Yves Tadié写道，这篇文章是“（MP）喜爱拉辛的第一条线索，他把后者看作兄弟，跟自己惺惺相惜的人”；在完成于康多塞的另一篇文章中，MP“提到‘拉辛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原文如此）肯定了爱情的力量”。Tadié，*Marcel Proust*，65. MP还讨论过波德莱尔与拉辛的深刻联系，见CSB，329-32 and 432-34。在一篇关于MP与拉辛的关系的重要研究中，Antoine Compagnon指出，MP对拉辛式激情的“崇高的恐怖感”的喜爱并非原创；在世纪末，比MP年长一代的一群著名评论家提出过类似的解读——最著名的是Ferdinand Brunetière，他赞美拉辛是整个“关于爱的激情的文学的”先驱。Antoine Compagnon，*Proust entre deux siècles*（Paris：Seuil，1989），95-102；Ferdinand Brunetière，“La tragédie de Racin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62（1884）：213-24. Compagnon正确地指出，“普鲁斯特关于拉辛的观点的原创性在于，他始终把后者与波德莱尔联系在一起”（101）。我在本章后文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一并置，进一步参考了Compagnon就这个主题的研究。关于MP“极为熟悉拉辛的文本”，又见Anka Muhlstein，*Monsieur Proust’s Library*（New York：Other Press，2012），94。

[30] 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17世纪上半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与莫里哀、拉辛并称法国古典戏剧三杰。主要作品有《熙德》《西拿》《波利耶克特》《贺拉斯》等。他的剧作题材丰富，内容深刻，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31] Antoine Compagnon，“Racine and the Moderns，” *Theatrum Mundi*：*Studies in Honor of Ronald W. Tobin*，ed. Claire Carlin，Ronald W. Tobin，and Kathleen Wine（Charlottesville，VA：Rookwood Press，2003），241-49，242.

[32] DH，Carnet 1，1886-1888，转载于MP，*Écrits de jeunesse*，53。

[33] Theodore Child，“Literary Paris，”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35（August 1892）：337-39；MP后来对勒迈特的评价，见MP，“Pendant le

Carême，”最初刊印于*Le Mensuel* 5（February 1891）：4-5 并转载于MP，*Écrits de jeunesse*，174-75。MP为《周一》所作的模仿勒迈特的作品转载于MP，*Écrits de jeunesse*，101-2。

[34] 关于马拉梅对DH的巨大影响，见DH，*Pays parisiens*，105-17；以及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53-56。关于马拉梅是第一个让DH对迷上波德莱尔的人，见DH，*Pays parisiens*，117。

[35] Compagnon，*Proust entre les deux siècles*，101-7. MP，“A propos de Baudelaire，” in MP，CSB，632. 关于波德莱尔和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也是为MP的SG提供灵感来源的诗歌的作者）两人对MP在文学中书写同性性欲的重要影响，见Elisabeth Ladenson，*Proust's Lesbian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18-22。

[36] William C. Carter，*Proust in Lov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14；and Carter，*Marcel Proust*，70.

[37] MP，无名诗歌，署期为1888年5月13日；以“Premiers vers de Marcel Proust”为题抄录于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35-36。

[38] 关于DH的尼采研究，特别见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75-82，and 201-21。日记作者DH的活动，见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51-52。

[39]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35. 我不同意Carter的判断，即认为与MP这一时期的其他文本不同，这首诗中“没有任何同性恋的渴望”。Carter，*Marcel Proust*，66.

[40]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36.

[41] MP，*Écrits de jeunesse*，52.

[42] Borrel and J.-P. Halévy，eds.，37-38.

[43] Borrel and J.-P. Halévy，eds.，66.

[44]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89. JB致GS的信，同样见JB致GS，存档于NAF 14383，folios 20-48。JB在这些信件中充满渴望的语气，以及GS对它们（以及对他）的无动于衷，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03。

[45] MP，*Écrits de jeunesse*，41.

[46] MP致JB，见Kolb，ed.，*Correspondance*，vol. 1，101-2。

[47] MP，*Écrits de jeunesse*，120.

[48]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40-41.

[49]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51。

[50] MP致DH，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121-22。关于这封信如何预示了MP后来在文学中书写同性恋的讨论，见Carter，*Proust in Love*，15-16。

[51]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43.

[52]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关于MP或许"编造了"寄宿学校的威胁，见Tadié，*Marcel Proust*，69；关于MP与那对表兄弟关系的破裂，Tadié，*Marcel Proust*，69-71。干预让娜·普鲁斯特担心MP对JB的"肉欲之爱"，见Carter，*Marcel Proust*，69。

[53] MP致RD，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105-6；相关讨论又见Tadié，*Marcel Proust*，71。

[54] 译文引自拉辛：《拉辛戏剧选》，齐放、张廷爵、华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98页。

[55] Landes-Ferrali，Sylvaine. *Proust et le Grand Siècle*：*formes et significations de la référence*. Preface by Antoine Compagnon. Tübingen：Gunter Narr，2004，200. 正如Landes-Ferrali所说，至少从1886年起，这两句诗一直让普鲁斯特念念不忘，他在一

封写给外祖母的信中描写自己正在写一篇学校布置的论文遇到的困难时，开玩笑地把第二句改成了“（我需要的）语词受到了惊吓，禁不住地往下沉”（200）。1892年第二次回答普鲁斯特问卷时，MP仍然把费德尔列为“最喜欢的虚构人物”。Mireille Naturel，*Marcel Proust in Pictures and Documents*，ed. Suzy Mante-Proust and trans. Josephine Bacon（Zurich：Edition Olms，2012），118.

[56] Bloch-Dano，*Une jeunesse de Marcel Proust*，trans. Alice Kaplan（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203.

[57] 译文引自拉辛：《拉辛戏剧选》，齐放、张廷爵、华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23页。

[58] 拉辛，《费德尔》（*Phèdre*，第二幕，第五场）；MP引用这句话时，却把前两个形容词的位置换成了“年轻，可爱”，见MP，*Chroniques*（Paris：Gallimard，1927），32。正如Antoine Compagnon和Anka Muhlstein等人指出的，RTP的叙述者在CCS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把自己比作了费德尔；见Compagnon，*Proust entre les deux siècles*，84；and Muhlstein，*Monsieur Proust’s Library*，94-95。

[59] MP，《鸡奸》，收录于*The Collected Poems of Marcel Proust，ed. Harold Augenbraum*，New York：Penguin，2013，4-5。该诗集中包含有法语诗歌及其英文译文的极佳版本，以对开页形式排版。不过我这里使用的是我自己的译文，因为MP在本诗中列出了一连串叙述者未来情人的名字，而企鹅版的《鸡奸》译文莫名其妙地删去了“雅克”这个名字。

[60] 后来，MP明确指出《费德尔》中那个表述性的供认（承认禁恋行为）是该剧中最“无法模仿的生动”手法。见MP为PM，*Tendres stocks*（Paris：NRF，1923）所写的无标题前言，第31-32页。

[61] DH的诗被抄录于MP，*Écrits de jeunesse*，157；关于它所体现的波德莱尔的影响，见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56-57。关于MP对这首诗的批评，包括这里引用的评论，见MP，*Écrits de jeunesse*，160；DH，*Pays parisiens*，118-20。

[62] 让·德·拉布鲁耶（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哲学家、作家。他以描写17世纪法国宫廷人士、深刻洞察人生的著作《品格论》而闻名。

[63]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60-61.

[64] RD（和MP、DH、JB一样）是这本杂志及其后续杂志*The Green Review*（*La Revue verte*）和*The Banquet*（*Le Banquet*）的创刊编辑，他说《丁香评论》创办于1888年11月；见RD，*Souvenirs*，44。

[65]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44.

[66] MP，*Écrits de jeunesse*，123.

[67] MP，*Écrits de jeunesse*，123.

[68] MP致DH，见Kolb，ed.，vol. 1，122。

[69]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牧羊人之屋》，vol. 1（Paris：A. Lemerre，1883）。这首诗在之后很多年里一直是普鲁斯特的试金石；例如MP，署期为1898年10月第一周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3（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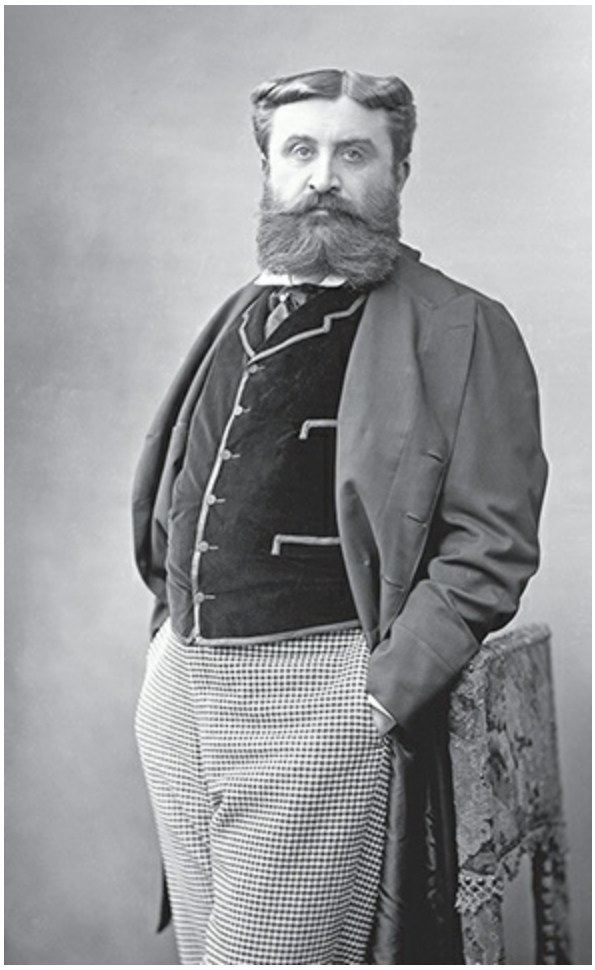
[70]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hereaf ter Borrel & J.-P. Halévy，eds.）（Paris：Fallos，1992），65-66.

[71] 关于MP把对JB和DH的喜爱转到了GS身上，见Tadié，*Marcel Proust*，73-76。在本书后文中，我详细讨论了MP与GS的关系。但所有传记中关于二人关系的最精练的讨论，见Edmund White，*Marcel Proust*：*A Life*（New York：Penguin，1999），30-31。

第12章 跛脚鸭

1889年11月11日，40岁的亨利·格雷弗耶伯爵发布了一个声明，令他的亲人们大吃一惊。他于那年9月22日在下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在布德朗森林所在的默伦选区竞选时，亨利说自己“保守、独立、开明”，“不完全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只是对奥尔良派亲王们的事业持有同情，毕竟格雷弗耶家族世代为其效力。他还宣传自己是共和派左翼分子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谴责他们是“一群土匪和盗贼，剥削他人，道德沦丧”。[1]认识亨利的人都知道，他绝无自己标榜的“开明”观点，他尖刻的反共和情绪是发自内心的。他一生傲慢地驳斥“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常喜欢发表诸如“共和派都是臭气熏天的讨厌鬼！”这样的言论。[2]这就是为什么在入职六周后，他居然声称自己改变了立场，让家人和朋友大吃一惊。他现在变成共和派人士了。[3]

亨利在政治上皈依共和派的消息尤其令29岁的伊丽莎白感到不快和震惊。过去两年，因为她不打算与他分享，所以一直独自黯然神伤，亨利大部分时间并不干预。但两人偶尔交谈时，他们谈论的多是政治局势，自奥尔良家族被流放后，这已经成为德·阿斯托格街晚餐上的一个主要话题。在这些交谈中，伊丽莎白和亨利惊喜地发现，两人虽然在婚姻的其他方面毫无共同语言，但在思索法国君主制的未来和亨利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时，意见却惊人的一致。伊丽莎白甚至曾自鸣得意，认为有了他的财富和奥尔良派的关系，加上她在新闻界的能力和神秘感，他们将组成一对不可战胜的政治搭档。他没有事先与她商量就变节加入共和派阵营，让伊丽莎白的这一希望破灭了。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如果没有她，亨利根本不可能当选。起码她起初是这么想的。当然，后来真相大白，结果只会令她更加难过。



1888年，亨利·格雷弗耶成为格雷弗耶伯爵，这张照片由纳达尔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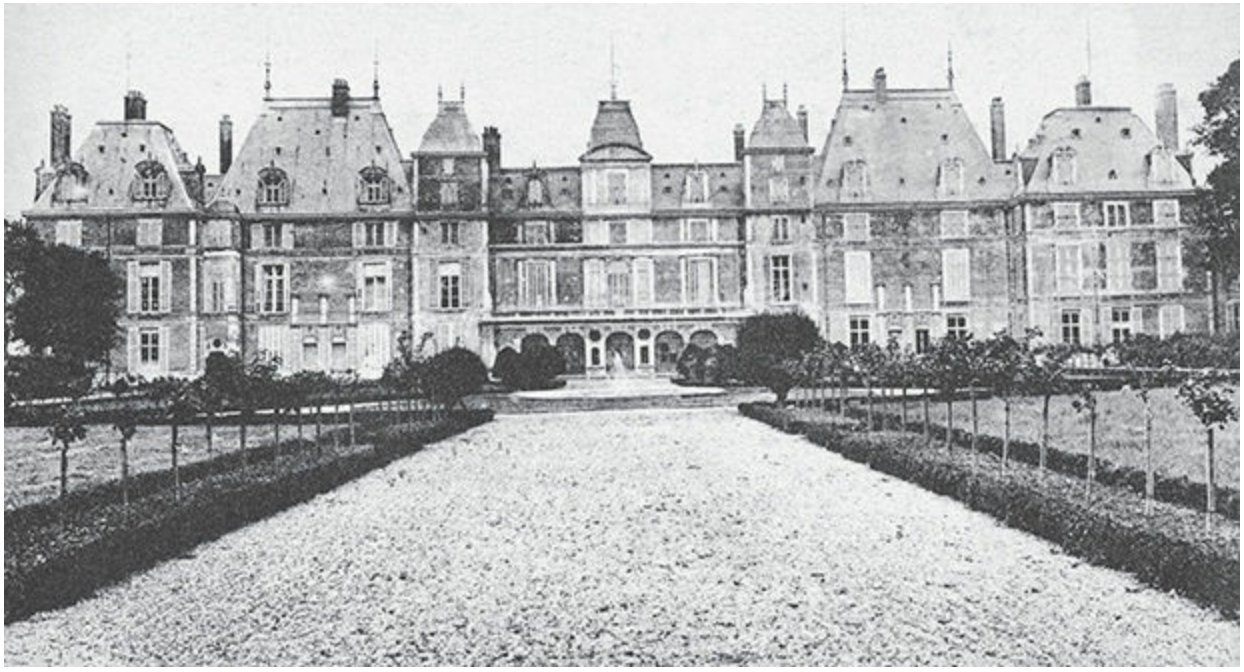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认为，亨利的政治生涯正式开始于1886年夏，也就是她决定插手此事之时。在这以前她年复一年焦虑地等待着，想看看他是否准备实现自己宣称的进入公共生活的远大抱负。但他拖了一年又一年。伊丽莎白恋爱时曾幻想他成为驻俄国大使或出使圣詹姆士宫[4]，眼看也将成为泡影。因为害怕亨利发脾气，所以她也不愿敦促他别再如此怠惰。但1886年6月22日，一切发生了变化，政府通过了流放法，将法国王位的觊觎者全部驱逐出境。这一态势让伊丽莎白有了动力，也为她劝说丈夫实现自己的政治天命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她在这样一个时刻将此事提上日程是违反常理的，因为亨利一生都支持的亲王们正被一一赶出法国。但奥尔良家族6月24日出发前往英格

兰之前，在他们位于诺曼底的祖宅德·厄城堡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告别仪式，那座城堡是在他们的君主先辈路易-菲利普时代建造的，也遵循了那一时期的建筑风格。除了全欧洲各国的王室亲戚，奥尔良家族还召集了城区君主主义小圈子的成员：格雷弗耶夫妇、拉特雷穆瓦耶夫妇、德·奥松维尔夫妇、德·曼夫妇、布勒特伊夫妇、斯坦迪什夫妇、萨冈夫妇和加利费夫妇（最后这两对是两位妻子一起来的，没有丈夫陪同）。正是在这些奥尔良派的核心保王派成员中，伊丽莎白对丈夫的政治未来有了顿悟，决心帮助他更积极地参与到奥尔良派统治事业中，成为中流砥柱。

伊丽莎白所获得的启示与其说源于政治意识，不如说源于个人直觉，她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王室成员聚在一起；看着他们，她渐渐明白了。有些来厄镇送别奥尔良亲王们的王室成员是她见过的，例如比利时王室家族的成员，而其他人伊丽莎白还是第一次见，例如克莱芒蒂娜·德·萨克森-科堡王妃（Princesse Clémentine de Saxe-Cobourg）和她的爱子，即乔万尼的朋友保加利亚的费迪南亲王。晚上，在城堡的哥特复兴式[5]宴会厅里，由欧仁·维奥莱-勒-迪克[6]设计的护壁板上悬挂着绘有打猎场景的古董佛兰德挂毯，几十位陛下和殿下在烛光下共进晚餐的场景令伊丽莎白肃然起敬。单个看来，这些显贵人物中很少有人能满足伊丽莎白对魅力的极高标准。她觉得巴黎伯爵夫人仍然更像个洗衣妇，德·欧马勒公爵像一头老山羊，而克莱芒蒂娜老王妃那如山的体重直令她瞠目。但从整个群体来看，男人们戴着闪闪发光的勋章和缎带，勋章的名字听起来充满诗意（圣灵勋章、星十字勋章、金羊毛勋章、金刺勋章、嘉德勋章、圣母勋章、大象勋章），女人们戴着王冠，王冠上镶嵌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她被他们的夺目光彩震慑了。在这样的场景中，伊丽莎白突然意识到，她和她的贵族同伴们已经太久没有见到端坐在王位上的君主了：王室宫殿的魔力是无法超越的。正是这一领悟让她下定决心，亨利应该在奥尔良派的最高指挥部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因为如果他能发挥作用帮助亲王们复辟，他和伊丽莎白就会在新的王宫中任职：以他们

无与伦比的美貌、财富和宠幸，王宫才是最适合他们的地方。



奥尔良家族的亲王们于**1886**年夏被流放前，在家族祖宅德·厄城堡举办了一次告别聚会。伊丽莎白和洛尔都是那次聚会的座上宾



表兄尚博尔伯爵**1883**年去世后，巴黎伯爵成为法国王位的假定继承人

和亨利一样，伊丽莎白也是在奉行君主主义的家庭长大的，不过就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她的父母效忠的是波旁王朝而非德·奥尔良派。同样与亨利一样，伊丽莎白也不赞成共和派左翼的平等理想。正如她在1887年的一篇只有一页篇幅的杂文《平等》（“Equality”）中所述，

> 平等一词很危险，对公益有害。……想想蜂群吧，其中必有工蜂，有蜂王。如果个个都是蜂王，一切就会陷入停滞。不平等乃社会之福。[7]

此次前往厄镇，伊丽莎白前所未有地意识到，王室子弟作为一个独特的、绝对不平等的人群，享有的权力和荣耀是何等惊人。其他传记作家和学者们曾试图把她写成一个政治开明人士，但在这一最基本的意义

上，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者。伊丽莎白真诚地相信，某些男人和女人的出身和地位使他们有权统治，那是绝对自然和必要的。（她的开明之处仅限于把女人包括在这一类别中。）她虽然开明地接受新闻媒体之类的民主权利方式，却不认为自己在大众中的名气能够替代一种更排他的社会权威，即因接近君主制权力而获得的权威。是时候让“要做女王的女人”走出晚会服饰的小格局，涉足更宏大的事业了。

伊丽莎白在厄镇开始这一努力时，意外地与洛尔·德·舍维涅结成了同盟，后者独自一人来参加奥尔良家族的送别会，似乎很高兴看到格雷弗耶夫妇也来了。谁都知道洛尔与亨利五世关系密切，因而伊丽莎白对她出现在城堡感到很困惑，后来她注意到两件事。首先，洛尔与德·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夫人、德·萨冈亲王夫人、阿尔贝·德·曼和亨利·德·布勒特伊等奥尔良派死忠的关系非常要好。洛尔高调标榜自己在正统王朝派中的人脉，但她显然是通过这些朋友才进入亲王们的小圈子的。其次，洛尔在厄镇非常严格的正式王宫环境中如鱼得水、千娇百媚，那里的一切和弗罗斯多夫城堡没什么不同。在第三共和国时代成年的贵族们会对如此严苛繁复的宫廷礼节望而却步，尤其是德·欧马勒公爵在尚蒂伊并不实行这一套规矩，在所有的奥尔良亲王宅邸中，尚蒂伊距离巴黎最近，也是上流社会人士最常拜访的。（最近在那里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德·欧马勒请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坐在上座，把他的王室亲戚弗拉基米尔大公夫人安排在次座上，着实令王室家族蒙羞。）在这一背景下，洛尔轻松应付着主人的各种习俗，举止风度鹤立鸡群。看到她如此顺畅地重拾起在弗罗斯多夫城堡所受的训练，就能理解为什么奥尔良家族的人都喜欢请她陪伴左右了。除了所有讨人喜欢的特质之外，她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了然于胸，那一代法国女人很少能望其项背。

在厄镇期间，洛尔为伊丽莎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伊丽莎白虽然像女王那样仪态万方，却对王室习俗没有多少经验。少女时代陪同父亲前往外国宫廷时，伊丽莎白因未婚，没资格出席正式场合。新婚不

久，她和亨利曾在布鲁塞尔受到过比利时君主的接见。然而自那以后，她与王室的接触大多限于在巴黎的社交活动和布德朗森林及其他猎场的打猎聚会，那里的主流是上流社会而非王室的礼节。伊丽莎白因不得不承认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而闷闷不悦，或许还忌恨洛尔在厄镇的风头盖过了她。但看着那个周末来奥尔良家族城堡的一众人等，她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能干的导师。康斯坦丝·德·布勒特伊病得很重（她不到一周之后就去世了），她的丈夫显然既要照顾她，又要与王室主人周旋，忙得不可开交。德·萨冈和德·加利费两位夫人只对彼此感兴趣；德·加利费将军和斯坦迪什夫人也一样，他们的风流韵事已经是圈里公开的秘密了。德·拉特雷穆瓦耶夫人太丑了，德·曼夫人又太自以为是，无法激起伊丽莎白的自信心，显然“美女波利娜”·德·奥松维尔是她最不愿意请求帮助的人。如果是其他场合，伊丽莎白大概会去询问萨冈的意见。但亨利在场，伊丽莎白可不想对他的仇敌过于友好。经过排除法，她只好让洛尔做自己的向导了。

伊丽莎白后来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满意，不但因为洛尔对王室事务应付裕如对她帮助极大，还因为洛尔其人实在有趣。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女人（那年夏天，洛尔27岁，伊丽莎白26岁）一起说笑八卦是伊丽莎白几乎从未有过的体验。除了母亲、妹妹和表妹玛丽-艾丽斯之外，她很少信任其他女人，因为她坚信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使她们很难有什么友谊，漂亮女人更是如此。不过洛尔的外表、时尚感和个性与她截然不同，伊丽莎白不觉得她们会有什么竞争关系。更重要的是，她喜欢洛尔那种邪恶的幽默感和它引发的那种合谋打趣的感觉，仿佛洛尔每时每刻都在默默地怂恿她在一切庄重和排场的外表下看出荒谬感。费迪南亲王有一次在晚餐上把啤酒洒在身上，脱了上衣，两位少妇看到他露出的一条胳臂从手腕到肩部挂满了金光闪闪的镯子，她们对视了一眼，以无声的兴奋睁大眼睛看着彼此，庆幸自己不是唯一看到那个场景的人。[8]

在厄镇，伊丽莎白还着手在可能领导奥尔良派政变的人中为亨利寻

找同盟。因为如果这些人成功地把巴黎伯爵扶上王位，他们就会拥有在新政权中分配高位的权力，伊丽莎白希望他们支持亨利，幸运的是，其中三位已经这么做了，他们是布勒特伊、德·曼和德·奥松维尔。伊丽莎白还想拉一个人皈依自己的阵营，于是把目光投到了51岁的埃马纽埃尔·伯谢（Émmanuel Bocher）身上，她以前不太认识此人。伯谢的父亲是巴黎伯爵的私人银行家，他因此成为亲王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也是奥尔良派的头目之一。在厄镇初遇时，伊丽莎白从伯谢关注的目光中看出他被自己迷住了，于是清醒地决定诱引他为亨利的事业成功加一把力。

和以往一样，伊丽莎白对她的新情郎没多大兴趣，但伯谢一边大献殷勤，一边高谈阔论，倒是让调情变得很轻松。他虽在政界身担要职，却自命为学者而非政治家。除收藏珍本书籍外，伯谢还热衷于考古学和18世纪法国铜版画，他收藏这类铜版画已有几十年，为这些藏品保留了附有说明的两卷本分类目录。[9]他对伊丽莎白谈起他的收藏品，透露他把最喜欢的铜版画都收藏在蒙马特尔的一间画室里，连他23岁的妻子也不知道此事；他非常希望伊丽莎白能抽空到那里拜访他。这一披露让她警觉到伯谢对她的企图一点儿也不纯洁。但伊丽莎白相信只要能骗过他，就能确保他支持亨利。她在一篇题为《要做女王的女人》的杂文中写道：“要做女王的女人要作伪证，要出卖肉体，是一个用于献祭的处女。”[10]伯谢将成为她在厄镇的重大征服，但她“出卖肉体”始终停留在言语上，没有付诸行动。

6月24日上午，奥尔良家族的聚会即将结束。在与他们深爱的人们饱含深情地告别之后，亲王们走出城堡，看到草坪上站满了来自整个诺曼底和更远地区的送别者。布勒特伊那天暂别病情日益加重的妻子，来到了现场：

> 身穿罩衣的农民和来自海滨的水手与前（奥尔良派）大臣、公爵、银行业大亨和其他各界名人并肩而立。来自田间的

> 农妇和来自勒特雷波尔的水手的妻子们就站在法国最高贵的夫人们身旁。几乎每个人都眼含热泪，当天在场亲眼见到这一情景的人，想必永远不会忘记这伟大、庄严而沉默的效忠游行。估计有12000人当天来到（厄镇）向亲王们致敬。[11]

奥尔良家族将乘坐私人火车前往海滨，在那里乘坐轮船前往英格兰，他们启程后，贵族宾客也都散了。包括布勒特伊在内的几位贵族乘坐火车陪同亲王们前往勒特雷波尔，那里的码头涌来了另外25000名效忠者。布勒特伊写道，轮船启航后，巴黎伯爵站在甲板上，对人群最后一次“哀伤而高贵地挥手致意。只脱口发出了一句呼喊：‘法国万岁！’成千上万人随声附和。‘国王万岁’的喊声相对较少，因为亲王已经告知众人，希望大家避免公开彰显”明显的君主主义情绪。直到最后，自封的菲利普七世都希望维持迫使他去国离乡的祖国的法律和秩序。

伊丽莎白和亨利从厄镇回到巴黎后，一直沉浸在一种复燃的君主主义热情中。正是从这时起，他们的政治合作关系进入关键时期，起码她当时是这么想的。过去，每当伊丽莎白责备亨利长期不着家时，他总是反驳说他不回家是为了避开她因为他还有其他女人而嫉妒地大发脾气。亨利觉得，伊丽莎白最近开始对他的事业感兴趣真是个讨人喜欢的改变，总好过像过去那样耍性子，而在伊丽莎白看来，他愿意与她讨论自己的政治轨迹也给了她一些安慰，至少她可以做一个他的情妇们无法替代的红颜知己。这次和解并没有让亨利的滥情有所收敛，也没有缓和伊丽莎白因此而感受到的痛苦。但在和解期间，夫妇俩共同的政治使命感确实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一点点和谐的氛围，那是这场婚姻几乎从一开始就从未有过的。

伊丽莎白离开厄镇后便开始与埃马纽埃尔·伯谢秘密通信，她没怎么对他谈起与丈夫和解之事，反而强调了自己的伤心和孤单。这些或许并非假话，但她暗示伯谢是那个能减轻她的痛苦之人，就是假话了。

1887年春，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上，她向他倾诉说，“（她的）双唇从未曾吐露过一个词”——爱。[12]这样的招认使伯谢燃起了强烈的决心，一定要让她对自己说出那个词，而伊丽莎白故作扭捏，好让他充满期待。那年秋天，伯谢和父亲帮忙安排亨利入选了默伦的镇议会，这是迈向政治高位的一小步，却是十分必要的第一步。

伯谢大概觉得如此为伊丽莎白的丈夫服务，就能以赢得她的爱作为回报。他如果真是这么想，那么就被无情地欺骗了，从他在亨利当选后寄给她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1888年5月31日，伯谢写道，

> 您从未轻启双唇，真诚地告诉我是或否。您那双纤纤素手拒绝写下您希望说出的话。您不觉得吗？在某些感情上，我们需要勇气，而您没有，我们也需要一种超越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的能力。我觉得您很可怜，仅此而已。



妻子**1886**年去世后，亨利·德·布勒特伊与伊丽莎白结下了亲密友谊，同时开始了与洛尔的婚外情

然而事实上并非仅此而已。最后，伯谢宣称“无论我多么痛苦……我的心将始终对您怀有深情不渝的爱”。[13]伊丽莎白不为所动，甚至感到厌烦。她在他的另一封信件的背面潦草地写了句：“蠢货！没有一句实话。我永远不会爱上他，我只是需要他。让他像其他人一样卑躬屈膝吧，又不是我的错。”[14]如果伯谢继续爱她，那是他的问题——她可不打算可怜他。她将继续利用他，他将继续卑躬屈膝。

到这时，伊丽莎白大概觉得她已经用不着顾及伯谢的感情了，因为看起来亨利提升政治地位的下一步要依靠另一位奥尔良派领袖，而那人已经十分忠诚可靠了。自从妻子在奥尔良家族离开法国后去世，亨利·德·布勒特伊与伊丽莎白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在丧妻的伤痛中把她变成了知己，经常与她和亨利共进晚餐，以免回到没有康斯坦丝的家里郁郁寡欢。布勒特伊还重新燃起了支持奥尔良派复辟事业的热情，试图以此来忘记伤痛，他绞尽脑汁希望找到一条路径，让巴黎伯爵回法国重登王位。

布勒特伊不久就在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将军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或者说他希望如此，前国防部长布朗热充满领袖魅力，在奥尔良家族刚刚被驱逐的那段日子里很快变成了享誉全国的民粹主义英雄。布朗热本人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主张，他曾经参与镇压巴黎公社——和他的主要对手加利费一起枪杀激进分子，也曾成为德·欧马勒公爵的门徒，后来又加入了乔治·克列孟梭[15]领导的极左翼阵营，那是流放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16]将军甚至跟与奥尔良派争夺王位的对手波拿巴派眉来眼去，自称拿破仑式的军事独裁者。近年来，整个社会政治谱系中失去公民权的各类公民，从痛恨腐败官员和贪婪资本家老板的工人到同样仇恨那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卫道士的保守贵族，都怀有深深的阶级仇恨和民族主义焦虑，布朗热适时地利用这些，为自己进行政治投机。

将军越来越广泛的民众基础就包括仇外的埃杜瓦尔·德吕蒙最近刚刚在《犹太人的法国》（*Jewish France*，1886）一书中煽动的不满之人，他说犹太人正从内部颠覆法国，力图把他们变成外国威胁的替罪羊。布朗热也有类似的动作，他指责普鲁士人，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弊端归咎于在普法战争中的屈辱战败，呼吁再来一次全方位的军事对决。布朗热以叫嚣武力的极端沙文主义和骑在他标志性的黑马上的潇洒表象，挑动民众疯狂地推翻现任政府，并疯狂地崇拜他，指望他救万民于水火。

听从了德·于扎伊公爵夫人的建议，本人也是极端君主主义者的布勒特伊决定利用布朗热的民众基础来为奥尔良派的复辟开拓局面。让布勒特伊打定主意的景象发生在1888年4月19日，那天逾十万市民涌入巴黎的大街小巷欢迎将军，将军乘坐一辆艳俗的红绿色敞篷四轮马车，由几匹毛色光亮的黑马拉着，马笼头上别着将军的纹章红色康乃馨，马鬃上还饰有红绿色的丝球。布勒特伊在日记中写道，那是“彻头彻尾的骗子的装备”，但这个骗子让我们再明白不过地看到，尽管民众“高呼‘共和国万岁！’，但他们真正热爱的还是一个人，他们真正渴盼的是一位主人”。[17]布勒特伊曾亲眼看到巴黎伯爵在法国的最后一天引发了多么强烈的民众热情，他相信那位亲王正是这样一位主人，只要军队和民众愿意集结在他的旗帜下。

基于这一直觉，布勒特伊和德·于扎伊公爵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开始接近布朗热。他们提出在政治和财力上支持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第三共和国，把巴黎伯爵接回来作为菲利普七世登基。将军看到他们对自己的伟大力量竟有如此信心，何况未来的国王本人还给他写了一封亲切的感谢信，极尽恭维之词，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有了巴黎伯爵的祝福，布勒特伊和公爵夫人劝说城区的朋友们加入这次煽动叛乱的行动。最终结成的联盟是德·奥尔良派、波拿巴派、洛尔和阿代奥姆·德·舍维涅、瓦伦丁和皮埃尔·德·瓦鲁以及阿蒂尔·梅耶尔这类前正统王朝拥护

者组成的大杂烩。不管他们曾因派系之争有过多大的分裂，这些贵族人士在一点上是团结的：都希望看到自己痛恨的共和国倒台。[18]

在布勒特伊的请求下，亨利·格雷弗耶也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新成立的“布朗热委员会”的名单上。但他听从了伊丽莎白的建议，在计划看起来有把握成功之前，拒不进一步参与行动。伊丽莎白虽然很想看到亨利成为对亲王不可或缺的人，但她对布朗热能领导奥尔良派走向胜利怀有疑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她讨厌将军曾仇外地试图禁止她最喜欢的歌剧之一——瓦格纳的《罗恩格林》（1850）——在全法国演出。（20年前，萨冈亲王也曾以爱国为由试图促使同样的禁令通过。但自那以后，他就慢慢地接受了伊丽莎白的立场。）此外作为一个“引领时尚的女人”，她觉得布朗热的马匹上的那些丝球太难看了，她女儿在成年以后仍然这么认为。但就算抛开这些吹毛求疵，伊丽莎白也担心将军根本是个信不过的人。她在军队中位居高位的朋友们，如加利费，都说他是个不道德的利己主义骗子。就连布勒特伊也开玩笑地蔑称他为“漂亮朋友将军”，用典就是莫泊桑小说中那个漂亮英俊但不择手段的主人公。[19]在伊丽莎白听来，布雷特伊的玩笑暴露了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么一个可疑人物身上所承担的风险。她一点儿也不确定亨利是否应该跟风仿效。

一度，伊丽莎白发现自己居然和费利西泰不谋而合，后者写信对她发牢骚：

> 我一直觉得德·于扎伊公爵夫人疯了，但没想到她竟疯狂到如此地步，我总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必须谨慎，现在看起来，亨利可能迟早也会陷入荒谬可笑的境地，那还算好的，但如果他能听从我们的建议，就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20]

当亨利最终承认他在名义上已经加入了德·于扎伊/布雷特伊的委员会时，费利西泰大发雷霆。“只有野心勃勃的傻瓜才会转向布朗热的阵

营。”她怒容满面。伊丽莎白表示同意，但她鼓励亨利小心行事，要巧妙地使布朗热阵营的人相信他会投身他们的事业。[21]或许想起了自己与伯谢的周旋，她提议采取战术性欺骗：

> 只要比其他人稍微聪明一点儿，要参与其中，以误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同时又不牺牲自己真正的信仰。[22]

伊丽莎白认为，如果亨利和布朗热团伙的人稍稍保持一点距离，就能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政变成功，他就能以从头到尾的支持者身份出人头地；如果政变失败，他也可以和布勒特伊及其他共谋者划清界限，强调自己的君主主义立场比他们的更节制，不主张分裂。伊丽莎白写信给他说，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最好是个独立派，与每个人搞好关系，但不要随波逐流”。[23]

事实上，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当前政治环境中激烈的党争现状，亨利作为独立派可能要比成为奥尔良派的正式成员对他的亲王更加有用。当前，政府中的共和派和君主派陷入了焦灼的对立状态。如果亨利以独立派身份在貌似中立的外表下支持巴黎伯爵复辟，或许议会的共和派会给他一点表达观点的机会，而如果一个公开的奥尔良派提出同样的观点，他们必然会反对。伊丽莎白觉得亨利以这种聪明的方式为亲王服务会更得后者的赏识，一旦新的君主制政府成立，他也一定会因此而得到重用。

不久，伊丽莎白和亨利得到了另一种提升。1888年9月27日，夏尔·格雷弗耶在久病之后去世了，终年74岁。亨利和伊丽莎白成了新的格雷弗耶伯爵和伯爵夫人，而费利西泰则被降级为伯爵太夫人。除了给他们留下难以计数的财富之外，老人的去世还让整个家族有了六个月（他的寡妇有两年）的强制服丧期，其间须停止一切社交和娱乐活动。德·阿斯托格街和布德朗森林的客厅都挂上黑纱，整个家族的很多马车窗户上也是一样，马车用的马应该是全黑色，马笼头上戴着黑色花环，鬃毛里

编入黑色丝带。马车夫和仆人把蓝金色的格雷弗耶家族制服换成黑色的丧服，质地比主人的庄严丧服要粗糙一些。整个家族在那年剩下的时间里取消了一切打猎活动，并提前自请回避来年春天巴黎的社交季。

这次不得不退出社交界的时机对伊丽莎白和亨利两人都是机缘凑巧。关于伊丽莎白为何会欢迎它，下文再详细说明。对亨利来说，父亲去世正好给了他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借口，不再参与布朗热派委员会的工作，随着将军在民众中的支持率继续以骇人的速度增加，该委员会的活动在整个秋冬日益频繁。

格雷弗耶夫妇服丧期间，布勒特伊及其同伙经历了一段准备推翻现政府的欢乐旧时光。他们正在密谋叛变之事，这为他们的聚会带来了一种秘密的兴奋感，包括用作诱饵的马车、秘密的出入口，还有幼稚的化妆，男人们都戴着假胡子。[24]他们在日常服饰中加入了红色康乃馨，得意地在胸衣和大衣翻领上体现自己是异见人士。布勒特伊和洛尔·德·舍维涅被整个事件这种醉人的乐观主义和偷偷摸摸的兴奋感冲昏了头脑，竟然还开始了一段婚外情。阿蒂尔·梅耶尔也陶醉在结识声名显赫的新“朋友”的兴奋中，在《高卢人报》上无缘无故地赞美他们。他甚至说服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在他皈依天主教后作他的教母。[25] [在说服她的过程中，梅耶尔表达了一个矛盾的愿望，希望由这个国家头衔最高的女贵族为自己施洗，“（为他）洗去渴望提升社会地位的焦虑”，据他所说，每个犹太人自一出生就受到这种焦虑的折磨。] [26]

布勒特伊及其同伙也努力专注眼下最重要的事。在年久失修的英国大使馆，他们与大使利顿勋爵[27]和威尔士亲王讨论了英法关系将来在菲利普七世治下的光明前景。在一点儿也不破旧的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府（用她那些“无生”阶层的祖先，也就是凯歌香槟公司的创始人留下的财富装饰一新），同谋们客气地询问布朗热本人有何进攻计划。他绝口不谈啰唆的细节让大多数人觉得这是教养良好的表现，一个烘焙师的后

代居然有这样的修养，令他们又吃惊又高兴。（事实上将军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但在“有生”阶层看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姓氏意为“烘焙师”，这就足够这些人了解他的出身了。）布朗热没有谈论战略或政策等问题，而是用含混却很有煽动性的语言对这群人讲述了他有独一无二的能力令法国人听从他的指挥。“我会不遗余力地煽动民意，”他对他们说，“我还有不少其他妙计呢。”[28]

他的锦囊妙计很快就用完了。到1888年底，据布勒特伊估计，布朗热已经“赢得了一百多万法国人的支持”，自称布朗热派的人士在全国各地参加竞选，他们虽然没有合法政党地位，却在许多选区赢得了胜利。1889年1月，将军本人代表巴黎竞选下议院的一个席位，票数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政府以他与军方的连属关系为由，宣布他的获胜无效，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阻止布勒特伊这伙人结成军政府。这一挫败激怒了巴黎内外布朗热的支持者。民众骚乱此起彼伏，共和国摇摇欲坠，发动军事政变的时机似乎成熟了。

然而，将军本人缺乏追随者们期待的凌厉霸气和坚定的使命感，根本无法担此大任。恰恰相反，他开始精神错乱，突然间名声大噪让他不知所措，妄想自己面临监禁或暗杀的风险越来越大。他从情妇那里寻求安慰和指导，后者大概除了提供糟糕建议外，还给了他不少有害的药物。4月1日，就在政府以爱国主义为名大张旗鼓地为新建成的埃菲尔铁塔揭幕几个小时后，布朗热害怕自己以谋反和叛国罪而被捕，逃到了比利时。[29]他随身带着情妇和上流社会支持者的钱（单是德·于扎伊公爵夫人一人就给了他300万法郎），再也没有回来。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认为，“埃菲尔铁塔就像是在他逃跑的消息后面画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向每个人掷地有声地表明，共和国的根基仍然无比坚固。

看到自己的门生居然可耻地逃跑了，德·于扎伊公爵夫人言简意赅

地写道："如此一来，将军的星光不是渐褪，而是彻底熄灭了。"[30]他的消失让许多心怀不满的法国人失去了一个为他们不成熟的愤怒、偏见和恐惧代言的人。德吕蒙抓紧时机，粗制滥造出一系列新的反犹宣传文字，如《世界末日》（*The End of a World*，1889）、《最后的战斗》（*The Last Battle*，1890）、《一个反犹主义者的证词》（*An Anti-Semite's Testament*，1891），还创办了一份反犹报纸《自由言论》（*La Libre parole*，1892-1924）。在这些出版物中，他反复重申"犹太人"贪婪和危害国家的论调，如今，他还在犹太人反法的嫌疑罪行中加入了一条：埃菲尔铁塔亵渎了巴黎的天际线（哪怕埃菲尔本人是个基督徒）。

他呼吁每一位法国爱国者同心协力反对"外国人"的论调不久就得到了其他国家主义理论家的附和，包括前布朗热团伙成员、年轻作家和政治家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此人最近刚刚开始光临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的沙龙。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煽动者们在工人阶级中赢得了支持，为资本主义的罪恶开出了激进的解决方案。左派和右派都呈现出极端主义抬头的趋势，第三共和国似乎正朝着一触即发的世纪末走去。事后想来，布朗热派危机似乎是这个政权陷入重大麻烦的开始，而非结束。

布朗热逃跑的另一个中短期后果，是它不但击垮了布勒特伊和他的朋友们发动政变的计划，还摧毁了法国君主主义者们最后一丝残存的正统论信仰，亲王们被流放已逾三年，他们仍然试图以此作为政治信条。随着新一轮大选在秋季开始，奥尔良派政治家们争相说服选民相信他们的政纲仍切实可行。同胞们在9月22日选举时，布勒特伊、德·曼和德·奥松维尔全都保留了各自在议会的席位。但在整个国家，他们的政党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在梅耶尔《高卢人报》的办公室里听取了糟糕的选举结果后，布勒特伊反思了同人的失败：

我们没有选择——要么获胜，要么死亡，要么赢得多数，

> 要么成为一个无能的少数派！这两种境地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 我们没有其他的指望。避而不言是没有用的——我们失败了，
> 无论接下来事态如何，当前，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31]

然而布朗热派计划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亨利·格雷弗耶的处境，并且让形势对他有利了。将军的盛衰起伏引发了极大的混乱，亨利趁此机会开始了首次在全国范围的竞选，作为默伦地区的代表竞选下议院议员。他没有参与布勒特伊流产的政变也没有遭受牵连，因而他自我宣传的形象是既不同于君主主义者，又有别于共和派的一个有益的中间人。他虽然不吝于批评当前政权，却承诺他将让众人满意，拥护“保守、独立且开明”的政治利益。这种前后矛盾的主张让对手们给亨利取了一个绰号叫“蝙蝠候选人”（*le candidat chauve-souris*），大概是抨击他的意识形态是诡异的杂交体。鉴于他那么厌恶罗贝尔·“蝙蝠”·德·孟德斯鸠，亨利不可能喜欢这个比喻。



亨利因为混杂的政治立场，被滑稽地刻画为“蝙蝠候选人”

不过辱骂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推进自己一把抓的政治进程。他滔滔不绝地空谈他能带领同胞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听起来与逃跑的布朗热如出一辙。他发誓将调和“昨天的法国（与）明天的法国”[32]，并反复对媒体申明他将建立自己的政党，“一个像萨宾女人那样站在敌对的派别之间，保护各个派别免受对手打击的政党”。“萨宾女人”出自雅克-路易·达维德[33]的一幅著名的历史画作。[34]每当被追问自己政治纲领的具体细节时，他会回答说自己“刚刚进入政坛，还不属于任何党派，因而不打算被称作或归于”任何派别。[35]

至此，亨利似乎不折不扣地遵行了伊丽莎白的建议，独立于任何具体派别。或许可以想见，他愚笨的竞选过程一定会激怒布勒特伊，后者预言亨利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当选默伦地区的代表，无论发生什么，不惜一切代价”。[36]（后面这个条件从句是亨利自己的口头语，一般都是用在责备贝贝斯违反了礼仪规矩之时。）然而奥尔良派需要争取一切代表的支持，考虑到亨利过去曾对他们的党派效忠，他们决定支持他作为他们在默伦地区的候选人。虽然布朗热失败了，但奥尔良派的核心在这个一直很保守的地区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事实上它的支持对亨利大有帮助。9月22日，亨利以60.5%的压倒性优势当选。[37]

就算把当地奥尔良派金主们的支持考虑在内，亨利获得如此决定性的胜利也令人吃惊。不光是因为他在竞选时似乎毫无建树，而且在默伦地区和周边，从来没有人喜欢过他。自从他十年前从叔叔那里继承了布德朗森林后，亨利保留了“大胡子”作为他在该地区的执行人，恐吓嫌疑偷猎者和侵入者，引发了当地媒体不遗余力地批评。通过代理人来残酷地对待邻居让亨利获得了懦夫的名声，因此当地人流传着连他的漂亮妻子也“比格雷弗耶伯爵更像个男人”的说法。[38]（不仅如此，他对伊丽莎白抱怨说：“我的对手们居然说我打老婆！”[39]）亨利知道自己在该选区有多不受欢迎，在竞选期间一直避免公开露面，而是在一个选民不到8000人的地区，依靠花钱雇来的四五百名支持者代他劝说民众归

附。[40]他的对手则恰恰相反，他们举办了一次又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召开了一连串广受欢迎的城镇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亨利总算屈尊露面了，当他那一群武装护卫开始推搡人群时，活动便沦为一场惨烈的斗殴。然而尽管如此，不知为何，他还是在该选区获得了不可否认的胜利。



亨利喜欢把自己想象成达维德的《萨宾女人的调停》中阻止两方敌军互相残杀的萨宾女人

伊丽莎白觉得，丈夫的胜利似乎证明了她自己敏锐的战略直觉。由于听从了她的建议保持中立，亨利在如今由共和派占绝对多数的议会赢得了一席，这一胜利甚至惊动了巴黎伯爵，后者亲自给他发来了贺信：“你赢得的多数派是我得到的最满意的惊喜。”[41]获得王室的首肯令伊丽莎白充满乐观期待，相信亨利一定能成为亲王背后的男人，届时她

自己就是男人背后的女人。

然而就在那时，亨利变节了。入选后还不到两个月，他就公开宣布放弃独立，投靠了议会的共和派。伊丽莎白事先并不知晓他的决定，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慨。亨利突然改变方向可能会让她为两人筹谋的一切成为泡影。她单刀直入地指责了他：

> 真是遗憾啊，遗憾，格雷弗耶伯爵先生居然是“明天的共和派”——一点也不显不贵了！不管你的初衷如何，这么做实在有失体面。而且你做出的让步越多，声名就越狼藉。你会与他们（共和派）同流合污，被朋友们抛弃，被所有人鄙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该出卖自己。相信我，我并不是因为恼怒地发现自己居然嫁给了一个共和派才说这些的。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思考自己正在怎样一步步滑向堕落。我更希望看到你是一个独立派，与每个人搞好关系，尤其不要随波逐流。……低贱的共和派这一角色不适合你。[42]

抛开这么做一定会引发奥尔良派阵营的愤怒不提，亨利变节共和派之所以让伊丽莎白惊骇，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么做无异于抛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作为一位贵族老爷，她的丈夫本该“凌驾于（其他）每个人之上”，不仅在政界如此，他生来就该睥睨众生。这是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始终坚持的道德观。如今和过去一样，显贵和威望是他们身份的核心，是他们判定自己在贵族同侪和芸芸众生中的相对位置的依据，每当亨利本人斥责她败坏家族名誉时，提醒她的也正是这一点。然而他如今却在败坏家族名誉，犯下的恰是此罪。“出卖自己”给共和派就是在迎合最低层次的需求，就是支持上层的阶级重构。

伊丽莎白被他的无耻行为震惊了，此时她最关心的就是它将在贵族同侪中引发怎样的敌意，更不要说巴黎伯爵了。在来自英格兰的另一封信中，亲王以尖刻的低调含蓄对亨利写道，“我亲爱的格雷弗耶，我知

道你能指望我的，和我能指望你的一样多”——换言之，全无指望。

最糟的还在后面。亨利变节后才几天的工夫，就有消息传出他竞选期间不择手段，贿赂某些选民，阻止另一些选民去投票。亨利发表声明断然否认：如果被指控的欺骗行径是真的，那也是他的竞选代理人背着他做的。丑闻让人们怀疑他所获得的60.5%多数票的真实性，也暴露了他刚刚采取的共和派立场的真实目的：这是懦夫先发制人的一招，以防遭到议会多数党的迫害。至少就此目的而言，亨利失败了。应激进议员卡米耶·佩尔唐（Camille Pelletan）的要求，立法者们开始对亨利在默伦的竞选展开正式调查。[43]

调查一直持续到那年年底。议员们研读了一份厚厚的卷宗，评估了针对格雷弗耶竞选活动的几项指控：（一）付钱给公民买选票，通常支付5～10法郎的金额；（二）阻止其他公民投票；（三）利用免费酒水换取另一些公民的支持；（四）与各个市政集团及其领导进行暗中交易——“吉涅斯社区需要一个水泵？格雷弗耶先生会给他们买一个水泵。香浦的消防员想办一个宴会？格雷弗耶先生会出钱让他们办宴会”。卡米耶·佩尔唐数次抱怨说，卷宗中的许多关键文件都不翼而飞了，其他资料看上去像是被篡改过的。如果这些属实，那么亨利和他的团队负责编写卷宗之事大概能解释这些异常情况。

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议员们最终确定亨利在默伦只得到了52%的选票，他仍然获得了微弱多数，但显然比原始计数少了很多。[44]此外，他们还发现亨利在楠日（Nangis）区持有地产，后者也曾考虑在那里参选。但就算他在那里捐赠了一所医院和一所学校，他仍然在预备性投票中位列最后，因而只好放弃了楠日。这一点证据似乎符合佩尔唐试图为亨利建立的形象：他是个有钱的骗子，想花钱贿选进入政界。议员们在议会讨论调查结果时，亨利·德·布勒特伊和他的奥尔良派同僚们坐在一起，避免就此发表评论，但他一直在说：他的老朋友亨利·格雷弗

耶“会不遗余力地当选默伦地区的代表，无论发生什么，不惜一切代价”。

1889年12月23日，亨利的41岁生日前两天，议员们结束了调查，开始就此事投票。在对同僚发表的结辩陈词中，佩尔唐敦促他们宣布格雷弗耶伯爵的入选无效。他提醒左翼同人说，在变节皈依他们的阵营之前，伯爵曾屡次指控他们偷盗和腐败——如今证明，这正是他自己的竞选活动的两个基本特征。佩尔唐说，格雷弗耶参选的道德腐败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在财务上舞弊，还以“无限的，呃哼，可塑性”“提议……调和右派和左派的激烈冲突，将自己比作达维德所画的‘萨宾女人’”！佩尔唐把这一装腔作势的比喻作为笑料，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 但他太谦虚了！“萨宾女人”是被劫持的，但没有人劫持（格雷弗耶）——他劫持了自己，他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鼓励，就自发地加入我们伟大的共和派阵营！[45]

听到这些话，议员们爆发出呼喊声、口哨声和哄堂大笑。佩尔唐停顿了足够的时间让他的观众们尽情欢乐，然后他又严肃起来，历数格雷弗耶的恶行。但那句话令每个人都难以忘怀，第二天还在全国各地报道这次会议的报纸上刊印出来，成为佩尔唐的致命一击——“他劫持了自己”。[46]

这句话所含的轻率而恶毒的讽刺意味很像梅亚克、阿莱维和热纳维耶芙·比才·斯特劳斯的风格。但这些话曾让那些人赢得诙谐风趣的好名声，却毁了亨利的声誉。最后，他倒是没有被踢出议会：有192名议员投票支持宣布他的入选无效，261名议员投票反对。[47]尽管如此，他在议会的名声已经被佩尔唐的取笑彻底破坏了。

不久，哪怕有重要的投票，他也不再去议会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他对伊丽莎白说，“我不会再去了，因为我从不知道怎样投票才能

不让左派和右派都扭过头来针对我。”[48]他们的女儿埃莱娜那年七岁，她写了一首题为《选举：一首道德诗》的原创作品来让父亲开心。在列举了参加“摧毁对手的战斗”的诸多挑战之后，诗的结尾写道：

选来选去又是为了什么？

不过是要赢得一席

而在那个席位上，发表一个观点

会招来一千个仇敌。

教训：

快乐的生活是隐秘的生活；

那些可怜的议员应该得到怜悯。[49]

亨利自怨自艾，起身前往布德朗森林，一直在那里待到打猎季结束。[50]或许看到自己唯一的孩子同意他说隐秘的生活才是最优越的，他有了一点点安慰。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妻子从未达成一致。

伊丽莎白倒也没有因为再次预言成真而对亨利作威作福。她的沮丧令她无法沾沾自喜，这点胜利的代价太高，无法消除她的愁绪。她曾短暂地梦想能在宫廷有一个灿烂的未来，沐浴在丈夫（和国王）的荣耀中度过一生；就在她的另一个无限宝贵的梦想破灭之时，这个抚慰人心的梦想在她暗无天日的生活中闪出了一道亮光。然而现在，随着亨利政治生涯的终结，那个让她获得安慰的幻想也落空了。

她从这场灾难中得到的教训是，显贵和威望的确是他们的一切。

她没有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仰仗他人得来的荣耀一文不值。

[1] th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débats parlementaires*，*Chambre des Députés*，session of December 23，1889，520.

[2]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3.

[3] 关于亨利自称皈依共和派，见Éric Legay，*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Master's thesis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1986-1987），77-81。MP在JS的一个段落中提到这种皈依。德·盖尔芒特公爵的前身德·雷韦永公爵像HG一样怒斥"讨厌鬼"，却"和共和派一起"选举，还说："我希望他们全都被杀死！"MP，JS，403.

[4] 圣詹姆士宫（Court of Saint James），伦敦历史最悠久的宫殿之一。虽然英国君主已经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没有在这里居住了，但它至今仍然是英国君主的正式王宫，且在英国各王宫中居于首位。基于这个原因，英国朝廷即以圣詹姆士宫为名，正式名称为"圣詹姆士朝廷"。

[5] 哥特复兴式（Gothic Revival）建筑风格始于1740年代的英格兰。19世纪初，当时的主流是新古典式建筑，但崇尚哥特式建筑风格的人试图复兴中世纪的建筑形式。哥特复兴运动对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甚至对澳洲和美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哥特式的复兴与中世纪精神的兴起有关。

[6] 欧仁·维奥莱-勒-迪克（Eugène Viollet-le-Duc，1814-1879），法国建筑师与理论家，最有名的成就是修复中世纪建筑。他是法国哥特复兴式建筑的中心人物，并启发了现代建筑。

[7] EG，"*Égalité*，" in AP（II）/101/149. EG用她含混的速记法在这篇文章最后签名"艾尔莎"（Elsa），即本书第14章提到的第二自我。

[8] 关于严格的宫廷礼仪，见X. Brahma（pseud. EG），*Âmes sociales*（Paris：G. Richard，1897），68-69。关于LC与EG的友好，见存档于AP（II）/101/77的各类文件。关于看见费迪南亲王的手臂上满是手镯，见PM，*Journal d'un attaché d'ambassade*，438。

[9] Emmanuel Bocher，*Les Gravures françaises du XIX*e *siècle*：*Catalogue raisonné des estampes*，*pièces en couleur*，*au bistre et au lavis*，*de 1700 à 1800*，2 vols.（Paris：D. Morgant，1872-1880）. 关于他在蒙马特尔的秘密画室，见伯谢致EG，没有署期的信（写于1887—1888年前后），存档于AP（II）/101/1。我这里应该多说

一句，Anne de Cossé-Brissac认为这封信的作者是埃马纽埃尔78岁的父亲埃杜瓦尔·伯谢（Édouard Bocher）。但在蒙马特尔拥有画室、收集版画并与EG秘密通信好几年的人是埃马纽埃尔。

[10] EG，“La Femme-reine，”见AP（II）/101/151。

[11]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16.

[12] 伯谢在一封没有署期的信中对EG回引了这句话，见AP（II）/101/1。

[13] 埃马纽埃尔·伯谢致EG的（未签名）信件，署期1888年5月31日，存档于AP（II）/101/1。

[14] 埃马纽埃尔·伯谢致EG的（未签名）信件，署期1888年5月31日，存档于AP（II）/101/1；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1-22。

[15]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人称“法兰西之虎”或“胜利之父”。法国政治家，曾于1906—1909年和1917—1920年两次出任法国总理。

[16] 关于布朗热追随克列孟梭，以及后者对“那种不公正的流放法”的支持，见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54。关于布朗热与德·欧马勒公爵的奇怪关系，见Frederick Brown，*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New York：Anchor Books，2010），93-94。关于公众对骑在光鲜亮丽的黑马上的布朗热的崇拜，见Frederick Brown，*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New York：Anchor Books，2010），95-103。关于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决定支持他，见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55-56。

[17]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252. 布朗热在民众中的号召力启发了HBd 政敌们同样的看法，如共和派议员Jules Ferry。历史学家Frederick Brown写道：“在麻烦重重的时期，Ferry所谓的‘民众的想象力’需要把激情和幻想集中在一个人身上。”Frederick Brown，*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New York：Anchor Books，2010），103.

[18] 关于“民粹主义者”布朗热和法国贵族精英阶层本来不大可能的聚合，一个学术讨论见William D. Irvine，“French Royalists and Boulangis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5，no. 3（Spring 1988）：395-406。

[19]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281.

[20] 费利西泰·格雷弗耶致EG，1890年9月（无日期）寄自拉里维埃的信，存档于AP（II）/101/7。

[21] 1888年12月20日费利西泰·格雷弗耶致HG，存档于AP（II）/101/7；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0。感谢Cossé-Brissac关于EG和HG对布朗热派事件的看法以及后者后续行动的精彩概述。

[22] 1888年7月EG致HG的信，存档于AP（I）/101/22；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1。

[23] 1889年11月EG致HG的信，存档于AP（I）/101/22。

[24]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299.

[25] Lucien Corpechot，*Souvenirs d’un journaliste*（Paris：Plon，1936），97.

[26] Lucien Corpechot，*Souvenirs d’un journaliste*（Paris：Plon，1936），98。

[27] 爱德华·罗伯特·布尔沃-利顿（Edward Robert Bulwer-Lytton，1831-1891），第一代利顿伯爵，英格兰保守派政治家、诗人。1876—1880年曾任印度总督，1887—1891年出任英国驻法国大使。

[28]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245.

[29] Frederick Brown，*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New York：Anchor Books，2010），124 and 146.

[30] 德·于扎伊，op. cit.，60.

[31]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386.

[32]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2.

[33] 雅克-路易·达维德（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在1780年代绘成的一系列历史画标志着当代艺术由洛可可风格向古典主义的转变。除去在艺术领域的建树之外，他还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雅各宾派的一员，在法国大革命中十分活跃。这里提到的画作名为《萨宾女人的调停》（*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1796-1799）。故事背景是在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国初期，第一任国王是年仅18岁的罗慕路斯。罗马人是拉丁移民，国民中多是年轻的单身男性。于是罗慕路斯设计以举行祭典并邀请临近的萨宾国民前来参加，因为祭祀日不能打仗，所以萨宾人没有防备，活动中罗马男人在罗慕路斯的带领下突然将萨宾的女人抢走。猝不及防的萨宾人只有仓皇逃走。这些被劫持的萨宾女人都成了罗马男人的妻子，并生下了孩子。后来的几年，萨宾人不断前来攻击罗马想讨回他们的姐妹，但这时他们的姐妹都已成为罗马人的妻子和母亲，这些女人带着孩子出来调停争斗，因为无论谁胜谁负，她们都将失去丈夫或父兄。于是罗马和萨宾化干戈为玉帛，合并为一个国家，享受罗马公民的待遇。

[34] *Le Nouvelliste de Lyon*（October 16，1889）：1.

[35]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op. cit.，session of December 23，1889，521.

[36]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327-28.

[37] Éric Legay，*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Master's thesis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1986-1987），61.

[38] Le Père Gérôme，*Le Briard*（November 14，1891）：1.

[39] 1888年8月5日HG致EG，存档于AP（II）/101/32。

[40] Éric Legay，*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Master's thesis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1986-1987），70-71.

[41]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0.

[42] 1889年11月EG致HG的信，存档于AP（I）/101/22；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

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4。

[43] “Fin de session” and “Le Parlement：vérification des pouvoirs，” *Le Petit Journal*（December 25，1889）：1 and 3.

[44] 关于HG以52%而非60.5%的优势获胜，见*L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session of December* 14，1889，403；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20，n. 3。

[45]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débats parlementaires* 29（November 12-December 23，1889）：653.

[46] “Bulletin du jour：Chambre des Députés，” *Le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December 24，1889）：1；Pas Perdus（pseud.），“La Chambre，” *Le Figaro*（December 24，1889）：1-2，2；“Chambre des Députés：La Séance，” op. cit.；“L’Election Greffulhe：Discours de M. Camille Pelletan，” *La Justice*（December 25，1889）：1-3，2；and “Le Parlement：Vérification des pouvoirs，” *Le Petit Journal*（December 25，1889）《高卢人报》是唯一拒绝报道HG的丑闻的报纸；阿蒂尔·梅耶尔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向EG表达善意，正如他为了向LC表达善意而只字未提AC的环游旅行。

[47] 关于HG入选议会无效的投票结果的报道见 “Chambre des Députés：La Séance，” *Le Temps*（December 25，1889）：3。虽然HG胜利了，但他仍备受批评，例如被称为“显然能向任何和所有买家免费提供商品的新共和派”；见“Opportuno-réactionnaires，” *La Lanterne*（December 28，1889）：1。

[48]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180.

[49] 埃莱娜·格雷弗耶，“Les Élections：poésie morale，” in AP（II）/101/35。

[50] 见1889年11月15日HG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32。

第二部分

变奏曲 笼中鸟

我心中的每一份爱意都挣扎着冲出樊笼，就像数千只鸟儿振动翅膀，把鸟笼的笼条震得簌簌直响。

——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与你有关》（*Tua Res Agitur*，约1887年）

莎乐美：请让我亲吻您的嘴唇吧。

约翰：想都别想，巴比伦之女！索多玛之女！想都别想！

莎乐美：我要亲吻您的嘴唇，约翰。我要亲吻您的嘴唇。

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公主殿下，公主殿下，您就像园中之香，您就像万鸽之王，别再看这个人，别再看他！不要对他说这种话。我不能容忍您说那种话。

——奥斯卡·王尔德，《莎乐美》（*Salome*，1893）

我的诗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悲伤小鸟，

它被提到户外，放在一棵开花的树下，

那些自由的飞鸟听到它回荡的哀鸣而来

困惑地看着它，解不开眼前的谜题。

——埃莱娜·格雷弗耶《伤心玫瑰》（*Les Roses tristes*，1906）

第13章 未曾送出的吻

1887年春，短程加速赛（*les drags*）刚刚举办了四个年头，却早已成为巴黎社交季的一大焦点了。[1]这项由国家障碍赛协会（National Steeplechase Society）赞助、由德·萨冈亲王主持的赛事，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英式短程加速赛。七位由萨冈亲自挑选的交际家驾驶着四马驿站马车，以惊人的速度从协和广场飞驰到奥特伊赛马场，赛后还将在那里享受一顿野外香槟餐。

在19世纪末，那些特别定制的喷漆马车就相当于如今的职业赛用车，喷漆使用的是骑手们家徽的颜色，车顶和车内有足够的座位容纳十几位亲友。为了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骑马比武致敬——那时在马上比赛枪术的贵族男子会勇敢地亮出自己爱人的徽章——短程加速赛的规矩是七个参赛者每人的妻子都要坐在骑手旁的驾驶位上。该做法维护了规矩礼仪的一个重要假说，那就是贵族老爷的妻子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即便是最无可救药的色狼，也想在公开场合维持这样的体面，只有一个刺眼的例外：亨利·格雷弗耶。

结婚近十年后，伊丽莎白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期，亨利的后宫总有一个当朝的王后，他称之为“主理人”（La Principale）。波利娜·德·奥松维尔占据这一霸主地位长达十多年，但最近，一位报复心切的丰满的轻佻女子德·努瓦尔蒙男爵夫人（Baronne de Noirmont）迫使她退位了。伊丽莎白怀疑那位相貌平平的矮个男爵夫人之所以要跟亨利风流，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抢他名声在外的美貌妻子风头这么个不值一提的愿望。但伊丽莎白的这一推想没有具体的证据，一直到这年4月的一天傍晚，亨利冲进她位于德·阿斯托格街府邸的卧室，宣布了一个骇人的决定：他参加这一年的短程加速赛时，德·努瓦尔蒙夫人要位居上座，坐在他和贝贝斯中间。伊丽莎白极力反对，用她丈夫经常讲的维持体面的话好言

相劝。但亨利咆哮着让她闭嘴，用一贯的残暴无情提醒她，除了服从命令，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几周，伊丽莎白一直企图忘记即将到来的短程加速赛。她埋头于各种文化活动，去听音乐会、看画展，写自己私密的文学作品和通信。但5月10日赛马日当天，巴黎上空万里无云，整个城区的人都聚集在协和广场，衣冠楚楚的绅士们穿着晚礼服，扣眼上别着抱子甘蓝大小的康乃馨，喜气洋洋的夫人们身着夏季的印花裙，头戴镶着花环的遮阳帽。伊丽莎白用一幅不透明的白色面纱遮住脸颊，还举着一把镶褶边的白色遮阳伞。平时，她的这些饰品都是道具，为的是挑逗巴黎民众，维持神秘感。但今天，她用这些是为了保护自己。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在绝望的羞辱中满脸通红。被身穿蓝金色格雷弗耶制服的男仆扶上亨利的蓝金色马车后，她一眼就看到了得意扬扬的德·努瓦尔蒙夫人。伊丽莎白在座位上坐好，把那条褶饰的白裙往近前拉了拉，以免碰到情敌的裙子，亨利透过她的面纱满脸堆笑地看着她，仿佛在挑衅，看她敢不敢反对他变态的骑士风度。



短程加速赛的第一段，交际家们驾驶着自己的马车从协和广场走上香榭丽舍大道

所有的选手和乘客都就位后，鼓声齐鸣。德·萨冈亲王出现在奏乐台上，白发在黑色丝质高顶礼帽下闪闪发光，他透过单片眼镜巡视观众一周。接着他举起右手，像他身后那座3000年历史的方尖碑一样挺拔直立，冲着天空扣响了发令枪。听到枪声，7条长鞭一齐甩在28匹马的马背上，28个马车轮子一起转动，旋即加速。5.5公里的赛程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开启，绕过凯旋门，经过布洛涅森林到达奥特伊。从头到尾，观众都站在道路两旁，为上流社会的壮观场面欢呼。对伊丽莎白而言，整个行程那颠簸喧闹的每一秒钟都是难熬的，有成千上万的巴黎人看着她蒙羞从眼前经过，不得不和丈夫的“主理人”共享她的上座。

第二天，伊丽莎白逃到了伦敦。此行的借口是卡罗勒斯-杜兰[2]为她画的最新肖像将于5月14日在皇家艺术研究院揭幕，但真相是她没脸留在巴黎。[3]崇拜者们无论怎么谈论她无与伦比的美丽，都无法安慰她当众出丑的难过心情。有一位可能的情郎的安慰或许对她无比重要，但他没有来城里参观短程加速赛，也没有在信中提及此事。或许这也无妨——伊丽莎白不想要他怜悯。她想要他的爱。

她在短程加速赛上受辱之事居然还带来了一个正面的后果。伊丽莎白的公公夏尔也为儿子如此虐待她感到震惊，在她从英格兰回国后，送她了一份她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奢侈的礼物：位于迪耶普的一处地产。迪耶普位于诺曼底海滨，是她最喜欢的度假小镇。那处地产名为拉卡斯庄园（Villa La Case），在交给她钥匙时，夏尔强调那是她名下的地产，只属于她一个人。

亨利当然对这份礼物心怀不满，不仅是因为它暗含着对他卑鄙行径的责备。[4]他喜欢像鲁瓦亚温泉小镇（Royat-les-Bains）那样安静的温泉小镇胜过诺曼底海滨，他不喜欢那里炫富的上流社交圈，为首的都是像德·萨冈亲王夫人这类讨厌的人。但伊丽莎白欣喜若狂。她立刻为那

所房子想出了合适的用场：把它变成自己的奢华艺术家之村，一个她和罗贝尔舅舅以及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绘画和弹奏音乐的安静场所。[5]当亨利在鲁瓦亚、巴黎或不知名的什么地方与他的“主理人”打情骂俏时，伊丽莎白可以藏身拉卡斯，在懂她爱她之人的陪伴下实施自己的创意计划。

罗贝尔舅舅觉得这个计划好极了，同意帮她举办庄园的开幕式，8月他将和伊丽莎白在那里举办一个乡村府邸聚会。他们一起拟定了一个很短但完美的宾客名单：两位作曲家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和加布里埃尔·福莱，福莱是伊丽莎白新提携的作曲家（最近刚刚开始创作一段题献给她的美妙的帕凡舞曲）；画家保罗·塞萨尔·埃勒；还有年轻有为的作家堂·乔万尼·博尔盖塞。罗贝尔舅舅不知道，事实上伊丽莎白在决定举办聚会时，心里想着的人正是乔万尼。她希望在沮丧之时，给她安慰的人是乔万尼。同样是乔万尼，她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不是怜悯，而是爱。

自从伊丽莎白在盖尔芒特庄园当皮埃尔的葬礼上初遇亨利那位英俊的半意大利血统表亲以来，三年过去了，亲王仍然令她魂牵梦萦。“不想他的每分每秒都苦不堪言。”她写道。[6]其实，想着他的每分每秒也一样苦不堪言，只不过那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带着些甜蜜的相思之苦。乔万尼偶尔与母亲一道或独自来巴黎，在此期间已经成为上层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的温雅举止和有趣谈吐而备受欢迎。更不要说他那充满异国情调的英俊外表，那双拉罗什富科家族典型的蓝色眼眸在博尔盖塞家族深色面孔的映衬之下，像一对蓝宝石般明亮。莉莉·德·格拉蒙说他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7]，这让伊丽莎白想起了彼特拉克，在她的少女时代，是彼特拉克让她初次品味到苦乐参半的相思之苦。自乔万尼出现后，伊丽莎白真算是尝尽了相思的滋味。

这几年，她与他的友谊时断时续，时而被家庭悲剧（她的母亲和他

的父亲分别在1884年和1886年去世）打断，仍然主要通过信件维持。乔万尼仍然和母亲一起住在罗马，但他继续谈论着以后会迁居巴黎。每当他来到巴黎，总是住在德·阿斯托格街费利西泰姨妈的宅邸。在这些来访期间，格雷弗耶家族的社交模式让伊丽莎白每天都能见到他。她见他的次数越多，就越深信他才是她这些年来一直渴望的灵魂伴侣。

伊丽莎白曾希望乔万尼在罗马期间，他们的文学合作能拉近两人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两人以“埃莱奥诺尔”和“热拉尔”的名义（乔万尼在手稿中对热拉尔也会用“G.B.”和“王子”等代称）已经互写了几十封信件和日记。写小说的预设给了伊丽莎白勇气，让她对乔万尼倾诉了很多心里话，她原本全然不敢想象自己会对他说这些。“多好啊，”她以埃莱奥诺尔的口吻写道，“知道你会看穿这道透明的面纱，了解我的真意。”[8]她对热拉尔说，她只有在一个男人看着她时，或者最好是一群人看着她时，才会觉得心中充满活力。（“我觉得那种无名之人的凝视会给我某种兴奋感，就像我们听到和声时获得的那种震颤；凝视是美的音乐！”[9]）她承认虽然自己的德行名声毫无瑕疵，但事实上“我拒绝追求者不需要什么德行”，因为他们几乎——事实上只有一人除外——都让她厌恶。她甚至承认一想到那位独具魅力的男性朋友，“我就得到了保护和抚慰，仿佛正躺在他的怀里，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如此袒露心扉严重背离了伊丽莎白在上层听到的整齐划一、苍白无力的谈话：“在社交圈总是不得不说那种单调乏味的现成语言——人们完全是为了礼仪说出冷漠的套话，将真情隐藏起来。”[10]透过那层透明的虚构的面纱，她对乔万尼道出了真情。

一幅透明的面纱或者一面魔镜，就能够让她真实生活中的悲伤消失殆尽，把它们变成她渴望又缺乏的一切：爱情、亲密、自由、欢乐。不久前，伊丽莎白重读了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牧羊人之屋》，其中将

诗歌形容为“如钻石般耀眼的镜子”，这让她想到了自己和乔万尼正在写的小说的使命。至少在她看来，两人正在为“永恒的爱”（维尼语）建造一座圣殿，这是他们生活在其中却又无法相聚厮守的那个限制重重又呆板乏味的环境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她早期致乔万尼的一封信引用了诗中两句：“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可爱？这样的社交圈有什么可爱？/只有你的眼睛说它们美丽，我才会说它们美丽！”[11]



伊丽莎白的私人档案中保存着乔万尼的照片

伊丽莎白知道维尼所说的“社交圈”指的是广义的世界，但她就是想用这个狭义的社交圈的意义，因为她已经开始视社交圈为真正的敌人了。[12]她一度被那里的优雅和热闹折服，如今却对那里令人窒息的礼节、恶名昭彰的虚伪、对真实情感毫不宽容而愤懑不已。她用一封又一封寄往罗马的信告诉他，这是她想要为乔万尼放弃的世界。

然而乔万尼丝毫没有迁就迎合她的意思。他和伊丽莎白本该合写一部爱情小说，但他寄来的稿子却总是回避爱情这个话题。到目前为止，他的稿件主要是些虚构的日记，讲述一次穿越非洲的旅行，故事的原型似乎是博尔盖塞远征。伊丽莎白让秘书把他寄来的片段抄写在一个血红色皮革封面的笔记本上，这些片段主要是些下面这样的段落：

> 18__年10月1日，上午7时。我被紧急信件召回欧洲，离开了塔马苏丹位于瓦达伊边境的宅邸达尔盖里。……我的两位同伴将在我走后继续远征，向乍得行进。

每当伊丽莎白急切地撕开他新近从罗马寄来的包裹，这些乏味的流水账都会让她想尖叫或哭喊。乔万尼用非洲旅行的后勤组织工作来回复她的真心告白，实在不怎么合适。

她站在文学的角度接受了这一点，乔万尼发展这一次要情节，一定有他的理由。他的想法大概是非洲之行是这部小说的框架叙事，小说的故事以热拉尔被截断的穿越撒哈拉旅行开头，那次旅行是在他和埃莱奥诺尔的爱情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至于这对情侣感情如何或为何破裂，还须乔万尼详细解释——伊丽莎白根本不忍去想。）出发前夕，热拉尔会把一捆他和埃莱奥诺尔过去的情书送给一位同行者替他保管。这位次要人物“P.M.”（大概是乔万尼那次博尔盖塞远征中的同伴佩莱格里诺·马泰乌奇的缩写），会成为小说中虚构的“编辑”，“在两位情侣最终都死去之后匿名”出版两人的通信。小说开头是P.M.写的一篇前言，揭示了那些信件为何会在他手里；随后是信件本身，把读者带回到这对情侣那段难成眷属的爱情故事的开端。

看到这样一个拟议结构，伊丽莎白承认非洲日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叙事手段。但作为乔万尼对她的感情的线索，这几乎全然没有用处。她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他时，试着暧昧地奚落他：“我已经开始忌妒那些外国的土地了，那里如此彻底地拥有了你！”[13]乔万尼没有上当，拒不

回应。

他的稿件中有屈指可数的几处，小说人物的确提到了女人和爱情，但他也没怎么鼓励她发挥联想。例如，P.M.有一次说道，虽然他与“G.B.的关系比普通的友谊亲密得多”，但他从未听热拉尔“带着哪怕一丝兴趣提到过任何女人的名字”。[14]与人物的这一特征相符，现存的信件中除了一封之外，热拉尔总是极力绕开感情这个领域。在一篇关于瓦格纳（乔万尼和伊丽莎白一样，对瓦格纳的音乐痴迷不已）的很长一段题外话的结尾，热拉尔发表了唯一一段关于爱情的讨论：

> 有距离感的现实总会显得更加美好，很少有什么能经得起仔细审视。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但有一次我透过放大镜看她那“美丽的面孔”时，我必须承认……她脸上的毛孔吓了我一跳。[15]

伊丽莎白绝不相信自己的毛孔会吓人一跳——如果说有任何人的面孔经得起仔细审视，那就是她的了。尽管如此，乔万尼的态度还是让她百思不解。除了亨利之外，伊丽莎白认识的男人中没有一个看到她会无动于衷。就连她的发型师也声称爱上了她——她有一沓充满激情的信件为证。[16]

伊丽莎白并不是唯一一个为乔万尼的躲躲闪闪为难，或者试图用小说来解释这一切的人。就在那年春天，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马里恩·克劳福德（Francis Marion Crawford）、生于意大利、父母都是美国人的作家发表了一部名为《萨拉西内斯卡》（*Saracinesca*，1887）的影射小说，小说主人公堂·乔万尼·萨拉西内斯卡与堂·乔万尼·博尔盖塞之间惊人的相似令罗马社交界议论纷纷。[17]除了亲王头衔，他“非罗马人的”[18]血统［这一“独特特征（归因于）他有一位外国母亲”[19]］，他的家族与教宗的联系，以及他的相貌（“在那一头短短的黑发和山羊胡须的衬托下，他的五官格外英俊”），虚构的乔万尼与真实乔万尼的一个

最为明显的共同特征，是他总是用“充沛的精力”去寻找冒险，对浪漫爱情则避而远之。作为整个罗马最炙手可热的贵族男子之一，他执拗地坚持单身，令那个阶层的女士们大惑不解：

> 堂·乔万尼未婚，但罗马城里没有几位适婚女人不愿意欢天喜地地嫁与他为妻。然而他一直在犹豫——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一直毫不犹豫地坚持单身。他拒绝结婚的行为已经引发了很多批评。……他充满野性的名声源于他喜欢追求危险的刺激，而非许多同代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些可耻行径。但他对一切婚姻提议的回答都是他……还有的是时间，还没有见到一个他愿意与之结婚的女人，打算先自己消遣。[20]

在克劳福德的叙事中，乔万尼对异性缺乏兴趣的真正原因是他对科罗娜·德尔卡尔米内（Corona del Carmine）未曾启齿的爱，那位“异常美丽的”公爵夫人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那“（仿佛是她）手中了不起的武器”。[21]科罗娜出身破落贵族，被迫为财富而嫁给了公爵。那是一场不幸的婚姻，因为公爵这位“放荡人类的可怜废物”对她不忠，与无数的女人通奸鬼混。然而科罗娜的高尚品行不允许自己通奸（“关于公爵夫人从来没有过一句传言”），乔万尼·萨拉西内斯卡的高尚品行也不允许自己诱惑她。

伊丽莎白在乔万尼的敦促下阅读了《萨拉西内斯卡》，希望相信她的王子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才与自己保持距离。事实上，他亲口对她承认，他就是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又警告她说“书中（把我）写得太好了”。[22]伊丽莎白却觉得，书中的描写精准地抓住了他的特点，而且不光是肤浅的细节，还有他可敬的道德品行。和乔万尼·萨拉西内斯卡一样，乔万尼·博尔盖塞也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对自己的祖先与梵蒂冈的联系充满自豪。在非洲时，他曾在喀土穆的集市上花钱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17岁奴隶男孩玛拉吉安。[23]除了让玛拉吉安受洗之外，乔万尼还

把他带回罗马生活，并安排他在那里接受一流的天主教教育。这样高贵的品行是伊丽莎白看重乔万尼的众多特性之一，哪怕似乎正是这一品行阻止他向她表明心意。毕竟在天主教会看来，他们的私通不仅是通奸，还是乱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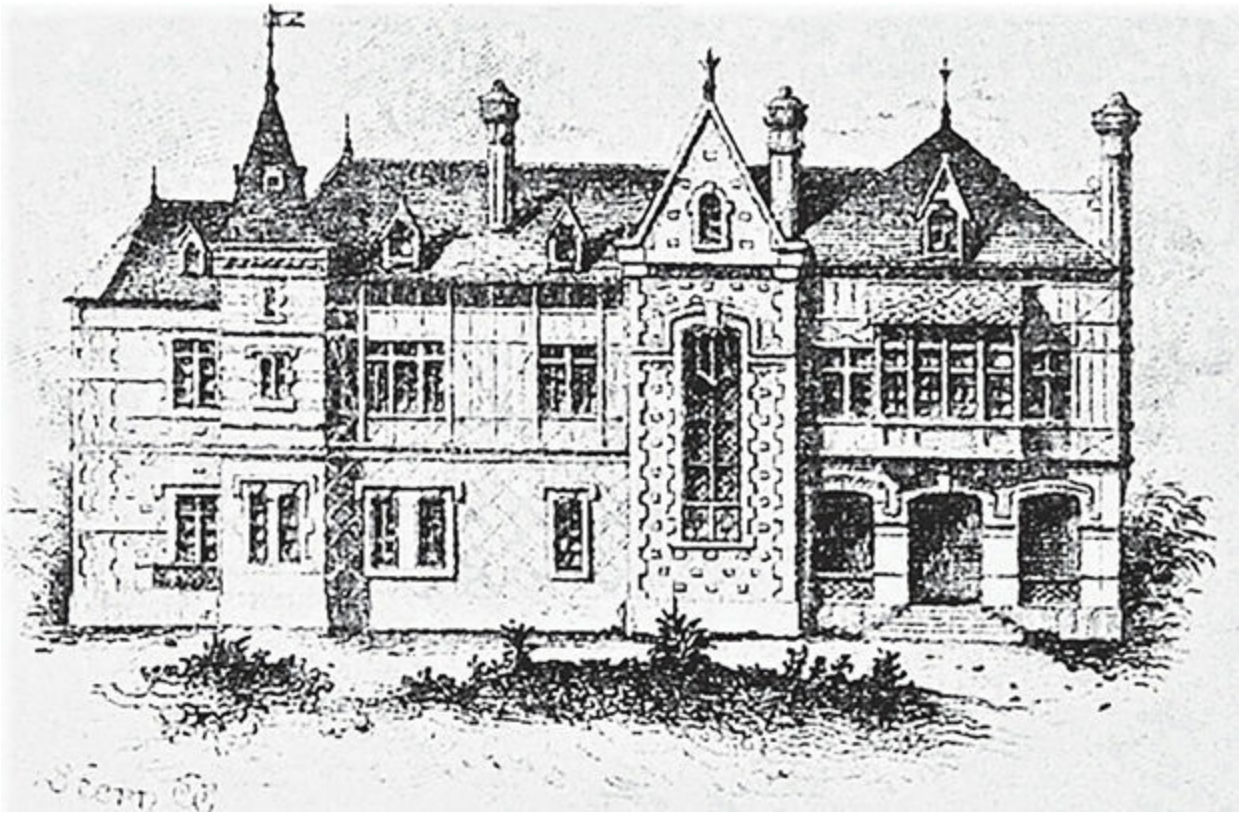
然而不管乔万尼有多含蓄，她对他的亲密情感远超他的想象，足以让她在任何时候想起他时都会用“你”这个代词，虽然无论当面还是在她（甚至埃莱奥诺尔）的信中，她都绝不敢以这种亲密的方式称呼他。除了对女儿、兄弟姐妹和堂妹表妹外，按照礼节，伊丽莎白使用的代词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的“您”。鉴于她甚至对亨利和罗贝尔舅舅都使用“您”这个代词，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对成年姨表姻亲的适当称呼。伊丽莎白在日记中想象她对乔万尼坦白了她想起他时使用的随便称谓：

> 与你在一起时，我会冷冷地叫一声先生，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是我的情人，既有柏拉图式爱情的温柔体贴，也有一切肉欲的疯狂。[24]

然而她还是想让他知道这一切。当他接受她的邀请，8月来迪耶普参加暖房聚会时，她对自己做出了承诺：她将在那时对他表明心迹。

在拉卡斯度过的第一个8月，伊丽莎白正在为迎接乔万尼、罗贝尔舅舅和其他两位客人做最后的准备。一群家佣在沉默地清扫整个庄园，把靠垫拍圆，给地板上光，而她则到屋外的花园去巡视一圈。庄园坐落在一个很高很陡峭的悬崖上，所在的岬角孤独地伸出英吉利海峡，但草坪却出奇地青翠繁茂。数十万天竺葵花开满花坛，在刷成白色的半木式房屋外立面周围形成了一股馥郁芬芳的红色浪潮。格雷弗耶家族的旗帜飘扬在一座仿中世纪的城堡主楼上。敞开的窗户上的铅条玻璃刚刚擦过，还散发着柠檬香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除了海鸥从天空俯冲入海的声音外，伊丽莎白只能听到悬崖脚下海浪撞击的声音，还有她自己快速而稳定的心跳声。

整个夏天她最深切的希望，是乔万尼像她一样为拉卡斯着迷。她甚至幻想他们两人可以远离各自的家庭和社交圈，在那里享受爱情生活。在罗贝尔舅舅的帮助下，她请人在花园里建起了一个装饰性建筑——一座极小的日本塔——想吸引自己的白马王子。与罗贝尔舅舅和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一样，乔万尼也成了日本风的铁杆拥护者。[25]所谓日本风，是由埃德蒙·德·龚古尔和夏尔·埃弗吕西（Charles Ephrussi，犹太人艺术鉴赏家，比夏尔·阿斯博学，但没他世故[26]）发起的对日本装饰艺术的狂热。[27]一贯挑衅的亨利认为，日本风不过是娘娘腔的代名词，证据不光是孟德斯鸠和波利尼亚克的性倾向，还有龚古尔、埃弗吕西，以及乔万尼永远单身的事实。但在伊丽莎白看来，乔万尼喜爱日本风却能证明他的精致品位，并因而证明他与她心灵契合。此外，他对日本艺术（和对瓦格纳）的着迷意外地促成了他、罗贝尔舅舅和埃德蒙三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后两位是同性恋，但他们对伊丽莎白都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她的大多数男性信徒公开表示敌意。他们两人都喜欢乔万尼，她认为这对两人的未来是个好兆头。



位于迪耶普，俯瞰英吉利海峡的拉卡斯庄园是伊丽莎白的公公送给她的礼物

这座塔并非伊丽莎白为迎接乔万尼的到来而准备的唯一惊喜。过去很多个月，她写了一套组诗和一些散文诗，希望能让他彻底明白自己的心意。在题献页，她抄上了日记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是我的情人”那段文字，把它献“给你，那个不真实的你”，还写道，“你的心是我一直藏匿其中的清凉绿洲，而你并不知情”。[28]为了向乔万尼的罗马血统致敬，她给整套诗集取名《与你有关》（*Tua Res Agitur*），取自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如果邻人的墙着火了，此事与你有关。”[29]乔万尼一定知道这个典故的出处，果真如此，他就会了解她的欲望如熊熊烈火，不可抑制。届时他们之间再没有千推万阻，再没有诈哑佯聋。

楠日的一家出版商曾经为伊丽莎白印刷她献给德·萨冈亲王的敬辞，如今也用同样的规格为她印制了一份《与你有关》——用厚厚的、拜帖大小的漂亮浮雕纸装订而成的小册子。在乔万尼到来之前，她要做

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想出一个策略来测试他对自己这些文字的反应如何，她打算把这本小册子放在他的房间里，他到达的当晚就能看到。几天前，她原本觉得要在其他客人不在场、他们两人独处时，询问他的看法。但她现在突然想到，可以让埃莱奥诺尔写一张纸条给热拉尔，问他对《与你有关》有何看法；既然两位小说人物经常讨论艺术，这当是他们通信中的一个毫不突兀的问题。伊丽莎白喜欢把自己写给乔万尼的诗歌变成两人小说原型的“神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是的，她将用这个办法请他就自己的诗作发表看法。她最后巡视了一眼花园，回屋睡觉去了。上床之前，她在钢琴上弹奏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牧歌》（*Siegfried Idyll*）。那是最令她心旷神怡的音乐。

第二天清晨，伊丽莎白感到多年未曾有过的希望和兴奋。她的乡村府邸聚会一定十分完美。《与你有关》一定十分完美。乔万尼一定十分完美。罗贝尔舅舅将于次日到达，其他人几天后到达。她简直望眼欲穿了。

在床上用早餐时，伊丽莎白翻看了整齐地堆在一个专门的银质托盘上的信件。一封来自罗马的电报放在信件的最上方；她抓起它，撕开，读完了。然后她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乔万尼遗憾地表示，他还是无法来拉卡斯；另一件紧急的事迫使他前往国外，目前不知归期。

伊丽莎白的心崩溃了。

她的墙烧毁了。

这本该与她的邻人有关，此刻邻人却不见踪影。

乔万尼在电报之后还差人送来了一大捧日本百合，是又一个道歉的表示。花香让伊丽莎白恶心，但她还是把它们摆在床头，那是她的逃跑

王子留下的纪念。

她想都没想就拿起了《高卢人报》。在首页上读到：“让·博尔盖塞亲王刚刚离开罗马前往保加利亚，并将在费迪南·德·萨克森-科堡亲王府上住一段日子，两人的关系极其亲密。”[30]

伊丽莎白模模糊糊地记起来了。上个月，乔万尼的老朋友费迪南·德·萨克森-科堡亲王刚刚被任命为保加利亚的统治亲王；报纸上报道了他将于那年夏末在索非亚上台执政的消息。她记得当威尔士亲王跟他们说起他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愤怒反应时，她跟亨利·德·布勒特伊还大笑了一通：“科堡的费迪南亲王（原文如此）根本不合适——那个孱弱、古怪的娘娘腔……应该立即阻止才是！”[31]（维多利亚女王也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样讨厌他。）她的朋友亨利也道出了类似的结论：



走在最右边的费迪南·德·萨克森-科堡亲王于**1887**年登上了保加利亚王位。他身后，左三，那个头戴大礼帽、满脸胡须的矮小身影就是乔万尼。他从索非亚启程去参加登基仪式

> 如果（保加利亚人）真的沦落到把空着的王位拱手让给费迪南·德·萨克森-科堡-哥达（原文如此）亲王，那么此事至少有其可笑的一面。我想不出比那个大鼻子、鼻音浓重——那是他从德·奥尔良家族继承的两个特征——的年轻王子浑身佩戴珠宝，身上浸满香水更滑稽的了。……他的法国亲戚全都无情地嘲笑他，（但）他母亲，出类拔萃的克莱芒蒂娜王妃，把他宠坏了。[32]

读罢《高卢人报》上的消息，伊丽莎白想不起来保加利亚在地缘政治中有何重要地位，大概与俄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之间的权力平衡有关吧。与她有关的事实只有一个：乔万尼前往索非亚，与好友共同庆祝胜利去了。他那位古怪的、娘娘腔的、亲密的好友。当然如此。

她应该猜到的，应该看到那些蛛丝马迹，如果不是在乔万尼本人身上——她仍然觉得他充满阳刚气概——那么也应该在费迪南亲王身上看出端倪。他去年夏天在厄镇脱掉外套时，露出的胳膊上戴满了手镯：单单那一个场景就该让她明白些什么了。

伊丽莎白应该注意到了这些事情，她应该意识到了。正如巴斯德[33]医生在她最近去参观他的巴黎实验室时所说，“最严重的精神错乱是只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来看待事物”。[34]另一件她应该注意却没有注意的事情是：那位当世最伟大的科学家认为，退居想象世界是愚蠢透顶的行为。根据巴斯德的标准，该如何形容埃莱奥诺尔/热拉尔的手稿？或《与你有关》？说它们是如钻石般耀眼的镜子吗？不——他一定会说它们全都是精神错乱。[35]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伊丽莎白再次拿起《与你有关》，重写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文字。在修订后的题献页中，她的笔调哀婉：“我把这些短命的篇章献给你，那个不真实的你，它们就像快乐时光一样转瞬即逝。”[36]

新的结尾也弥漫着同样的情绪，其中提到乔万尼致歉的花束：

最美的日本百合散发出残忍的芬芳！

强烈的爱情突然刺痛了我的灵魂……

我们对彼此道出至高无上的快乐誓言

那是我们梦想的快乐，却把它隐藏在死板的面具背后。

那未曾送出的吻，让我们想象的双唇贴在一起。

拉卡斯，这座她寄托了那么多希望的房子，此刻却变得让她难以忍受。无论她看向哪里，都会感受到情人的缺席，都会渴望他从未曾送出的吻。她给罗贝尔舅舅和其他受邀客人发电报说，要把暖房聚会推迟到9月初。根据礼节，她不能彻底取消聚会。在没有真心的社交圈，伤心不是背弃诺言的理由。伊丽莎白将在几周后回来为朋友们扮好女主人的角色。但此时此刻，她必须逃离。“像一头动物藏起来死去，”她写道，“我也需要藏起来忍受痛苦。”

仿佛是为了惩罚自己未能看到最爱之人的真相，她去和自己最不爱的人，她的婆婆，共处了一段时间。费利西泰那年夏末在拉里维埃城堡度过，也就是伊丽莎白和亨利九年前度过蜜月前几周的地方。那段日子，亨利和父亲在布德朗森林为即将到来的打猎季做准备，因而城堡里只有费利西泰一个人。她尖刻、无聊的个性与乔万尼诱人的聪明有趣相差何止千里，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伊丽莎白觉得在婆婆身边能迫使她重新适应那冷酷的无爱的现实，她竟如此愚蠢，还幻想着可以摆脱这样的现实。

伊丽莎白还需要一些个人空间来舔舐伤口——“我的头脑，”她在8月22日写道，“像一间恶意加工厂，那里的每一个轮子和嵌齿都在制造

苦痛。”还好，费利西泰似乎愿意让她一个人待着。她没有强迫伊丽莎白住在城堡里面，而是答应了她的请求，让她住在城堡的一个附属建筑物：庞蒂耶夫馆（Penthièvre Pavilion）。大革命之前，庞蒂耶夫公爵曾是这里的主人，他不是格雷弗耶家族的祖先，格雷弗耶的一位祖先在革命后买下这处庄园，传给了后代。尽管如此，费利西泰对于自己的地产曾经属于路易十四的一位孙辈和路易十六的表亲之事还是过于自负。伊丽莎白怀疑婆婆之所以愿意让她住在庞蒂耶夫馆，无非是因为单是说出公爵的名字，就能让费利西泰获得巨大的满足。

庞蒂耶夫馆是个路易十六风格的装饰性建筑，面积不大但很迷人，但费利西泰很少听到有人主动要求住在那里，因为传说那里闹鬼，说是原主人阴魂不散。[37]庞蒂耶夫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曾把这个地方当成一间小作坊，在那里摆弄自己收藏的几百只钟表。自他1793年去世后，这些东西都留在原位没有人动过——分散在桌面上，摆满了整个馆内的玻璃柜，从没有人上过发条，但它们仍然准确报时。当地人迷信说它们之所以如此精准，是因为老公爵每天午夜都会来访。据说他的灵魂化作一团诡异的、无定形的光，回来照看自己的那些钟表。周围始终充满钟鸣激荡之声，伊丽莎白觉得自己在时间中凝固了，她的希望和未来全都被那封来自罗马的电报终结了。“其他每个人都在往前走，”她感伤地写道，“我却像一座停摆的钟。”[38]她几乎有些遗憾，庞蒂耶夫为什么不在她住在他那些宝贝中间时出现在她面前。公爵心爱的妻子难产死去，七个孩子中有五个夭折了，唯一成年的儿子兼继承人生活放荡，却还是年纪轻轻便死了，公爵最后在年迈老朽之时，又目睹自己美丽无辜的儿媳德·朗巴勒亲王夫人玛丽-泰蕾兹·德·卡里尼昂（1749—1792）死于一伙革命暴徒的愤怒谋杀，他一生尝尽了失去至爱的痛苦滋味。

事实上，如果说伊丽莎白在馆内居住期间有谁曾阴魂不散的话，就是那位命运多舛的亲王夫人，亲王夫人的生平突然看起来与伊丽莎白本

人的故事如此诡异得相似。德·朗巴勒亲王夫人曾是一位美丽的贵族处女，在国外的家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17岁就被送往巴黎，嫁给了贵族中最合适的子弟之一。她的丈夫就是上文所说的庞蒂耶夫的继承人，他无耻地轻慢和鄙视她，与几十位情妇私通，挥霍自己的财产，他苦恼的父亲只好将地产当作礼物送给儿媳作为安慰（帕西的朗巴勒府邸，也就是布朗什医生的精神病诊所所在地，也是其中之一）。亲王夫人为了缓解不幸婚姻带来的痛苦，与玛丽·安托瓦内特建立了亲密而热情的友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她无条件地忠诚——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792年9月巴黎的一连串骚乱中，一伙暴徒把亲王夫人拖到街上，要求她公开放弃对王后效忠，还指责她与王后是情人关系。亲王夫人拒绝后，暴徒们就把她劈成了碎块，用长矛挑着她的头颅、胸部，还有（据某些报道称）外阴部，带着这些惨不忍睹的战利品路过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监狱窗前，叫嚣着让王室囚徒“亲吻她情人的双唇”。

与玛丽·安托瓦内特、伊丽莎白女士和王室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德·朗巴勒亲王夫人在贵族圈成员的记忆中也是为君主制献身的殉难者。（伊丽莎白的罗贝尔舅舅甚至就这一主题写过一些诗歌。[39]）然而伊丽莎白此刻觉得，亲王夫人不是为政治殉难，而是为爱殉难。说到底，她的死因是没有什么能够诱惑她放弃自己最珍视的友谊。伊丽莎白自言自语地说：“一颗真诚的心注定要破碎。”[40]她自己所受的痛苦虽然没有德·朗巴勒亲王夫人那样耸人听闻，却也同样让人痛不欲生。

起初住进拉里维埃城堡的那几天，她忽然想到在未来的某个舞会上可以穿上德·朗巴勒亲王夫人的装扮；和她那些精致的服饰一样，它将代表着忠诚和纯洁。但她住在那里期间，伊丽莎白想起来，由于众所周知德·萨冈亲王夫人总是把自己比作玛丽·安托瓦内特，上层就把她最好的朋友加利费侯爵夫人乔治娜称为“德·朗巴勒亲王夫人”。伊丽莎白还想起来，这个绰号带着不少丑闻的气息；因为和她们18世纪的同名者一样，大家认为这两个女人也是情人关系。被丈夫（长期不忠的德·加利

费将军）疏远的加利费夫人住在德·萨冈夫人在圣日耳曼区府邸后面的花园为她建造的一所漂亮房子里。两个女人在社交圈出双入对，有时还穿着情侣装，她们在多维尔的度夏庄园也互相紧邻；多维尔也在诺曼底海滨，位于迪耶普西南，相隔几个镇子。她们甚至安排德·萨冈夫人的一个弟弟娶了德·加利费夫人的女儿安托瓦内特。据说两位母亲安排这一结合就是为了掩饰她们过分的亲密关系，按照上流社会八卦人士的说法，她们的关系综合了“朋友间最忠诚的友谊”与“姐妹间最温柔的亲情”。[41]

伊丽莎白从罗贝尔舅舅那里知道，这些话很少像表面听起来那么无辜。和圈里流传的与德·萨冈和加利费两位夫人有关的其他措辞，什么“亲密无间的友谊”“非常密切的联系”“最甜美的亲情”等一样，它们都是同性恋的委婉语。每当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与（打个比方吧）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或者他的住家私人秘书加布里埃尔·德·伊图里的关系时，罗贝尔舅舅就会生闷气，但他却很享受用这些话来说别人的乐趣。

碰巧，乔万尼也是这样。几年前他在巴黎时，曾在信中对伊丽莎白讲述了一段（在他看来）十分下流的故事，那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歌剧院之夜。乔万尼在与自己圈子里的一位“德·C.夫人”八卦时，注意到他们的另一位同伴“H.夫人”看到一对男女在街对面的浴室里亲热，越来越坐立不安。他和德·C.夫人一起得出结论，说H.夫人不是忌妒那一对男女中的女人，而是忌妒那个男人。乔万尼在信中对伊丽莎白说，H.夫人的神情低落证实了“（他）六个月前就开始对她有所怀疑”。[42][43]

当时，伊丽莎白没多想这个故事，只是好奇：严格说来，女性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在她们的加密信件中，她和吉吉想象了两个女人互相又咬又撕对方的衣服、捏对方的乳头、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向浴缸的场景。但事后想来，她意识到乔万尼的故事或许还有关于他自

己的倾向的另一层重要信息。但伊丽莎白忽略了那条线索，最终害了自己。

伊丽莎白已经受不了再看一眼埃莱奥诺尔/热拉尔手稿了，但写作仍然是她的解脱方式，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写作。她又回到了自己写的德·蒙泰伊昂公爵夫人玛丽-爱丽丝的故事，增加了两个人物，创造了一段三角恋。布兰切·德·沃居庸这位天真的年轻新娘疯狂地爱着自己的新婚丈夫、英俊的环球旅行者艾马尔·德·韦尔特伊，在发现他与自己的亲戚玛丽-爱丽丝有一段地下情之后，她精神崩溃了。布兰切得知这段地下情时，艾马尔正在非洲和欧洲旅行，她在一连串日记和写给他的信中哀叹他的不忠。标准的布兰切式悲叹如下：

> 当你注定要欺骗我时，又为什么要让我相信你，我知道你是个骗子，但我仍然渴望相信你。……我为你神奇的力量所折服，竟全然无视自己的意志。我愤怒地把油泼洒在镜子上，这样我就看不到镜子里照出的真相了。哦，不要看。不要看。[44]

通过引入这一次要情节，伊丽莎白既表达了绝望，又探索了自己性格中相互冲突的不同侧面：既是让别人伤心的女人（她现在把玛丽-爱丽丝形容为“用自己极大的魅力征服了所有看到她的人：男人、动物……甚至女人”的“刽子手”[45]），也是伤心的女人。

至于艾马尔·德·韦尔特伊，他环球旅行的习惯一看便知与乔万尼有关，伊丽莎白为他选择的名字也一样：韦尔特伊是拉罗什富科家族名下一座有800年历史的坚固城堡[46]；它一位12世纪的主人名叫艾马尔二世·德·拉罗什富科。在该家族近代的历史中，一位拥护正统王朝的政治家德·当皮埃尔侯爵也有同样的教名。如此一来，虚构的韦尔特伊之名的现代拼法“Aymard”就含蓄地暗指欧内斯廷·皮科·德·当皮埃尔，伊丽莎白和乔万尼初次邂逅正是在她的葬礼上。

有了这些人物和线索，伊丽莎白的玛丽-爱丽丝手稿本身就像一面泼了油的镜子，在映照的同时也掩盖了她伤心的秘密。她在以布兰切的名义记录的日记中新写了一篇：

> 现在我懂了，哦，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终于懂了，那个曾经让我发笑的鸟儿的故事——那只鸟儿把头埋进沙堆，为的是看不到自己处于危险，而它的身体裸露在外。多希望我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埋好自己的头和心，和骗子一道欺骗自己，为的是不要看，不要看。[47]

伊丽莎白和布兰切一样，都感到坟墓在召唤着她们，死亡比爱情仁慈："我已经进入到死亡的苦行，我们中间那些遭受如此苦痛的人根本就不该放开死神的手。"

事情过去一年后，1888年9月27日，死神郑重地来到了德·阿斯托格街。它带走的是伊丽莎白的公公，她和亨利成了新的格雷弗耶伯爵夫人和伯爵。头衔提升和财富增加并没有让伊丽莎白精神振奋，她还和在拉里维埃城堡时一样低落。她沮丧得甚至没有注意到全黑的丧服让她的眼中闪出了"不可思议的光芒"（她的话），她以为这只是外部现象，与她无关，因而当罗贝尔舅舅即兴念了一句诗来赞美她——"美丽的百合花，黑色的雌蕊是她的眼睛"时，伊丽莎白转向来巴黎参加葬礼的妹妹，用就事论事的口气说："的确如此，你不觉得吗，吉莱娜？"在悄无声息、所有窗户和镜子都罩着黑纱的格雷弗耶府，吉吉听到贝贝斯如此自大，竟然笑出了声。

吉吉不知道，或者说任何人都不知道，伊丽莎白已经不再因为自己的美而开心了。她就是想不明白，一个人有着任谁都为之凝神屏息的美貌，又何至于如此悲伤——当然，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吸引的那个人除外。她很好奇，"为什么非得是其他人在惊叹我闪烁的大眼睛"？既然"那个我不想叫出名字的'某人'"丝毫不为之所动，她要那盈盈秋水又

有何用。[48]

至少她的忧郁还没有惹怒亨利。通常，伊丽莎白只要露出一点点悲伤的迹象，就会激怒他，引来他恶狠狠的责骂。（“不要跟个仆人似的哭哭啼啼！”[49]）不过到目前为止，由于父亲的去世在形式上需要表现悲痛，亨利欣然容忍她的低落。

有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凄凉心境让伊丽莎白心怀感激，尤其是她无法跟任何人讨论自己心情糟糕的真正原因。正如她最近的一位崇拜者，英国大使利顿勋爵敏锐地写给她的话，“最大的不幸并非那些让我们身穿丧服、接受吊唁的伤痛”。[50]

过去几个月，利顿勋爵一直试图向伊丽莎白倾诉他不为人所知的忧愁，暗示她本人就是那忧愁的源头。尽管如此，他还是准确地描述了她的精神状态。她难过不是因为公公去世了——虽然她很喜欢夏尔，但完全能够接受年迈多病的他离世的事实——而是因为她自己还活着。她有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是写给一位男性的，名字只用了一个“G.”，在信中她说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无法言说、无法解释的混沌伤痛”，“无数的刀片”把她的心划成了碎片。她一如既往地渴望以死来解脱：“从现在起，我沉浸在黑暗中的心只会渴求消灭思想的永恒沉寂。”[51]

自杀既诱人，又骇人。她以布兰切的名义写作时，沉思道：

> 如果我有机会结束这一切，不用想也不用体验生的一切，我会举起自己的手吗？让我害怕的是让我仍然留恋生的一切；否则无论什么来对我说“我就是虚无”“神秘的……死神”，我都会满怀喜悦地投入它的怀抱。[52]

伊丽莎白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遗嘱，她死后将莫罗的《花园里的莎乐美》送给罗贝尔舅舅，她的私人文件留给吉吉，她沙龙里的那座古董

钟留给乔万尼——那曾经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财产。留给亨利的只是一道指示，说她死后停棺时希望穿戴什么：一件白色礼服和一条白色面纱，“就像结婚当天的新娘”。但她不愿意戴结婚戒指，想戴上两枚特殊的戒指，那是丈夫之外的某人送给她的礼物。一枚戒指上面雕着一把剑，另一枚雕着一只天鹅。她没有说它们是谁送的礼物。

罗贝尔舅舅在一切与审美有关的事情上都是她的顾问，也是唯一与她讨论过葬礼装束的人。他写了一首诗回答她，题为《死去的女人最后的停留》（“Le Coucher de la morte”）。诗中，一位美丽的少妇虽有大批潜在的追求者，却仍然决定去死，她的死亡构成了一幅古雅的画面。她选择了黑檀灵床，上面高高地堆满靠垫，靠垫里的填充物不是羽绒，而是无数渴望得到她却被她拒绝的男人写的信。伊丽莎白读到这首诗时泪流满面。那是她舅舅写得最好的作品。与利顿勋爵的格言一样，它精准地描述了她的悲哀。

亨利一如既往地与她不搭调，这段时间他的情绪异常高涨。伊丽莎白觉得他还在为父亲服丧，如此喜形于色实在不合理，但她本人也是他心情大好的部分原因。毕竟，是她敦促亨利更积极地参与奥尔良派的复辟事业和即将到来的布朗热派政变，他有理由对自己的政治前景充满乐观。她只希望一旦政变成功，他能够重新致力于拥护君主制，希望巴黎伯爵能给他相应的酬报。在此期间，她希望亨利约束一下自己的轻浮。那只会让她显得更加低落。

光明的政治前景并非亨利神采飞扬的唯一原因。他也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如何花费遗产，因为继承了这笔遗产，他如今变成了法国最富有的男人之一。他计划大肆扩建布德朗森林，包括一个舞厅、几间豪华的新卧室套房，和一个能与希迈城堡的剧院媲美的私人剧院。[53]最重要的工程是一个两层高的正式宴会厅，里面摆着一张能容纳百人用餐的餐桌，平时它隐藏在镶木地板下面的巨大底层空间里，用时轻按开关，它

就升上来。

除此之外，亨利的建筑改造还将为布德朗森林装备奢华的现代设施，像电话、电灯和在餐厅与厨房之间运行的地下火车。（这最后一项创新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首先在费里埃启用的，这个设计既可以确保客人远离厨房的声响和气味，也可以保证菜品在从厨房送到餐厅的过程中不会变凉。）按照礼节，他在父亲去世后六个月内不得社交，但这并没有阻止亨利幻想他在服丧期结束后举办的聚会——“不光让社交圈，也让全欧洲的贵族眼花缭乱”的聚会。[54]他甚至短暂地宠爱了一下妻子，在自己的世外桃源给伊丽莎白安排了一个位置。“宾客、剧院、音乐，”他在写给她的信中按捺不住喜悦，“我已经能想象你在那里像个仙女一样翩然来去的样子了。”

伊丽莎白拼命眨眼忍住眼泪，不置一词。

不算太久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她曾多么欢迎丈夫把布德朗森林变得更加喜庆的地方。这些年，她逐渐在德·阿斯托格街办起了自己的沙龙，在婆婆每周日晚间的家族聚会之后，她的沙龙算是尾曲。伊丽莎白的家庭招待会起初只是她为朋友和家人举办的小规模的表演活动，招待会的成功使她壮着胆子尝试了一些更耗时费力的活动。在罗贝尔舅舅的帮助下，她在全巴黎寻找有前途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主动提携和资助他们。她提携的人包括加布里埃尔·福莱，她在前一年9月还欢迎他来拉卡斯做客（除乔万尼之外，几位最初受邀的客人也都一起来了），还有路易·巴斯德，她出资帮助这位前途光明的微生物学家建起了新的研究机构。为了报答她的慷慨，这些人同意偶尔专程光顾她的沙龙，在那里与她和宾客们分享最新的音乐作品和科学发现。即便抛开内容，这些活动的新奇感也让伊丽莎白的朋友们很开心，特别是那些刚刚从她婆婆死气沉沉的客厅里来到她家的客人。费利西泰对此当然怀恨在心。

亨利起初也一样不高兴。他愿意出资给伊丽莎白让她去提携“天才

之人”，完全是出于贵族有提携天才的光荣传统。但他与这些下等人划清界限，坚决不跟他们友善交往。他在一封愤怒的信中指责她说：“一位淑女绝不应当让丈夫的房子遭到劫掠，无耻地公开露面，向野蛮人打开自家大门。”[55]在另一封信中，他解释说贝贝斯邀请这些人进入她沙龙的习惯违背了他的等级秩序：

> 我是个有逻辑的人——我觉得开门请进那些小人物、陌生人和寄生虫不会有任何好处，所有这些邪恶的自私自利的苦力只能……突出证明人最好还是物以类聚，并证明我对野蛮人的厌弃是多么正确。[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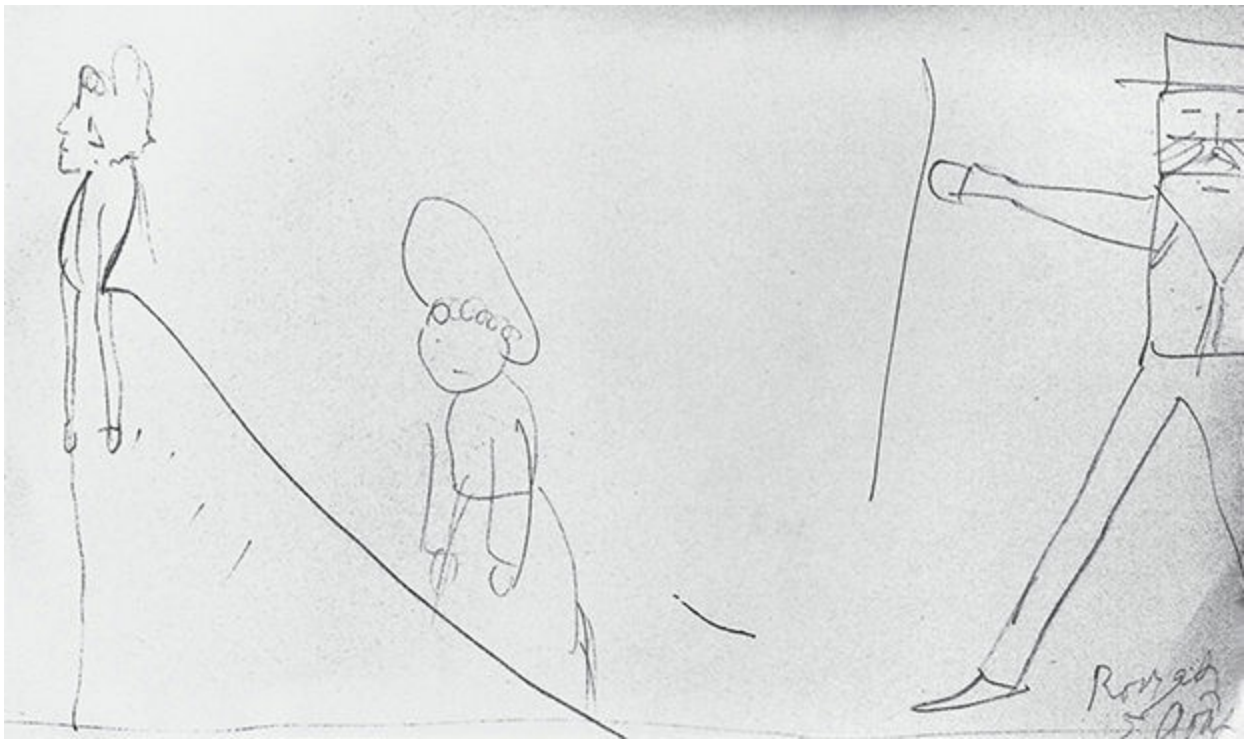
最终救了伊丽莎白的，是亨利自己的很多密友——从布勒特伊到迪洛，再到奥廷格兄弟和德·曼——全都迷恋她的文化活动。和上层其他女主人沙龙里的活动比起来，这些活动是那么与众不同。与他们惊叹她的美丽一样，亨利的同侪对她独创的、有些波希米亚风格的沙龙的赞美也让他改变主意，开始支持她了。不过一旦有任何小人物、陌生人或寄生虫让他不高兴，亨利仍然保留当众斥责他们的权利。（亨利对犹太人尤其充满敌意，他抱怨伊丽莎白的一次聚会说：“几英里外都能闻到犹太佬的臭味！”[57]）但他总算更支持她的艺术聚会了。的确，他准备在布德朗森林里加盖的私人剧院使她也能在乡下以更大规模复制那些聚会，毕竟她很怀念在希迈的私人剧院里与表姐妹们创作的那些作品，常常希望能有那么一间剧院举办沙龙。

不出伊丽莎白所料，亨利的母亲强烈反对他建造私人剧院的计划，觉得那会把整个家族拖入不可逆转的阶级重构。费利西泰警告他说，如果他和伊丽莎白要“邀请半个城的人”来和他们一起住在乡下，那她本人将“宣布与布德朗森林决裂”。费利西泰一向讨好儿子各种放荡的生活习惯，现在总算意识到问题了。“毫无疑问，”她冷言冷语地说，“一夜暴富会让人变蠢，最终还会把他变得卑鄙下流。”[58]

费利西泰不知道儿媳多年来一直抱怨亨利的正是这一点——只不过是私下里，在日记里——也不知道伊丽莎白认为婆婆应该对亨利的道德堕落负责。伊丽莎白在日记中写到婆婆曾对他说：“给你5000万法郎。去吧，全巴黎最漂亮的情妇随你挑！”[59]

如果米米还活着，伊丽莎白知道她会给自己怎样的建议：全心全意地做一个慈母，把埃莱娜抚养成人。但米米在1884年圣诞节当天去世了，年仅50岁，伊丽莎白悲痛欲绝，连自己都无法照顾，更不要提当时还在蹒跚学步的埃莱娜了。那以后一年多的时间，伊丽莎白把抚养埃莱娜的任务交给了费利西泰。在一位名叫安妮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和一队保姆、用人的帮助下，老太太不失时机地向孙女灌输了格雷弗耶家族的三宝：家谱、打猎和规矩礼仪。

如此熏陶，再加上相貌平常（埃莱娜继承了格雷弗耶家族的大方脸和拉罗什富科家族的大鼻子），如今已经六岁的埃莱娜让伊丽莎白觉得“太像他们了”：德·阿斯托格街上的仓鸮。[60]伊丽莎白禁不住会想，假如孩子长得像她一些，她的母爱大概也会多一点。



伊丽莎白和亨利的女儿埃莱娜画了这幅画，揭示了自己和他们在一起时的场景，反映了两人婚姻的紧张状态

事实上，埃莱娜曾经画过一幅她自己、伊丽莎白和亨利一家人在鲁瓦亚度假期间的图画，尖刻而精准地描述了一家人的状态。那幅画中，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在母亲的身后摔倒了，踩着了母亲礼服后面的长拖裙。伊丽莎白的眼睛直视着前方，仿佛准备从页面的左侧走出这幅画，根本不理身后的女儿。亨利占据着页面的最右端，与妻子保持着这张纸所能容纳的最远距离。他面对着观者，也全然无视女儿的存在。埃莱娜虽然在父母的中间，却仍是独自一人。



伊丽莎白和四岁的埃莱娜一起，请纳达尔为他们拍照。伊丽莎白觉得女儿的相貌平常，令人失望

小姑娘有着超乎年龄的早熟，显然直觉地感受到自己的样貌令母亲失望，她视母亲为偶像，渴望自己长得像她。“我忘不了自己的出身，”她郑重地对伊丽莎白说，“我不希望本该像你的东西（原文如此）让你从天堂跌落到人间！”[61]还有一次，埃莱娜注意到自己的五官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高兴地大叫起来：“我长得不再像爸爸了！我的眼睛几乎变成了黑色！”[62]让母亲和女儿都感到遗憾的是，埃莱娜眼睛的颜色从拉罗什富科家族的蓝色变成了塔利安夫人的棕色之事，并没有改变伊丽莎白认为她从根本上是个异类的看法。几年后，埃莱娜高兴地向

她报告说伊丽莎白强迫她穿的铁丝内衣真的让她的脊背“挺拔多了”。[63]那个奇妙装置大概减轻了伊丽莎白的担忧，孩子长大后不会身体畸形了，但并没有让她相信埃莱娜会变成像她一样天鹅般优雅高贵的美人。

伊丽莎白看出来女儿身上至少有一点很像她，那就是她的艺术倾向。埃莱娜喜欢画画、阅读和写作，希望长大后成为她的教父罗贝尔舅舅那样的诗人。母亲鼓励她通过写作散文诗来锤炼文学技巧，主题是她们两人最爱的：伊丽莎白的美貌。埃莱娜自觉地把自己的第一篇文学创作命名为《关于妈妈的一切》（“All About Maman”）：

> 1887年12月。妈妈很美，她有一双美丽的小耳朵，我告诉你，绝不像驴耳朵那么长。她那双漂亮的可爱眼睛很大。她的腰很细，牙齿雪白；她的下巴美得像两朵玫瑰花。她从楼上下来用晚餐时，那优雅的姿态，哇！她微微颔首，大家都凝视着她的美貌。她的头发上戴着钻石，穿一件男式的漂亮小马甲。你要是看到她，一定会因喜悦而拜倒在她脚下。我觉得她迷死人了。[64]

罗贝尔舅舅觉得，《关于妈妈的一切》显示出了真正的文学天分，证明了不管他这位教女的长相多不像孟德斯鸠和希迈家族，她的血管里还是流着一些他们的血液。（他忍不住加了一句，虽然有这样的天赋，埃莱娜“无疑会长成一个高大结实的女猎手”——酷似父亲。他也不喜欢她那格雷弗耶家族的长相。）

孟德斯鸠关于埃莱娜有文学天赋的结论虽然让伊丽莎白多少有些欣慰，却没有驱散她生活中的黯淡阴郁。对她而言，只有一种光源能够驱散黑暗。“让太阳发光的你！”她抽泣地写道。

过去，每当伊丽莎白的情绪低落时，众人的崇拜会让她重新振奋起来。然而如今这方灵丹妙药是多么乏味无用啊。在《没有回音的呼喊》

中，她分析了自己的烦恼：

> 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觉得整个巴黎都是她的王国；她喜欢自己，炫耀自己，以随意展示自己的美献身社交圈，谁都可以看她，任他是谁。
>
> 或许我会听到一曲圣歌！
>
> 她急切地倾听着，听到的却总是那乏味的叠句，让她恶心！那些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是人们对年轻漂亮的女人惯用的套话，她哀叹道：哦！我不过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
> 对着不知如何去爱的心灵，响亮悦耳的七弦琴奏出再悲切的音乐，又有何用呢？[65]

这篇文章从那喀索斯（Narcissus）的神话讲起，这位把自己的名字给了水仙花的少年，因为被自己的水中倒影迷住了，没有注意到厄科[66]正在用借来的语词恳求他的爱——水仙正是新闻界为伊丽莎白取的花朵绰号。[67]和她那位不幸的同名者一样，伊丽莎白也陷入了僵局。在社交界的同伴中，她的美貌只会引发毫无意义的乏味赞美，判定她“不过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美貌令她如此势单力孤。



热热·普里莫利拍下了这张在布德朗森林的花园里摆出水仙花姿势的照片

（除了自杀之外）伊丽莎白能够想出的唯一一种摆脱这种命运的方法，就是一首圣歌，为她的美丽灵魂而非漂亮脸蛋而唱的圣歌。这样一首歌将宣告她的灵魂知己即将到来，那人有着和她一样罕见的内在天赋。那将驱散她的孤独，引出她曾经梦想着与乔万尼共同拥有的故事结局：两个知道如何去爱的心灵沐浴在无限的幸福中。

然而伊丽莎白在当前的生活环境中看不到如何才能找到另一位灵魂知己。城区是漂亮脸蛋的王国，不是美丽灵魂的疆土。

和家人的去世一样，伊丽莎白对社交界的幻灭也为她的悲伤提供了

方便的借口。她与最亲密的朋友们谈话时，一次次地说起自己的幻灭感，但他们总是没法把这些与她联系起来。作为“时尚之王”，萨冈喜欢漂亮脸蛋的王国，想不出为什么王国中最漂亮的女人伊丽莎白会觉得它荒芜。布勒特伊也是彻头彻尾的社交名流，虽然他往往自称希望少花点时间参加聚会，多去逛逛博物馆。（伊丽莎白知道这只是骗术：每次布勒特伊对她夸口说去逛了哪个文化胜迹，像圣心教堂或卢浮宫，事实上都是跟他的情妇洛尔·德·舍维涅幽会去了。[68]）

至于罗贝尔舅舅，每当伊丽莎白对他抱怨贵族同伴缺乏精神和情感深度时，他都会生气地说，她早该看出这些缺陷了。他提醒她说，“有生阶层”本来就是一群没有感情的无知之人，还毫无根据地目中无人。因此，他们只配被取笑，“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自认为伟大、事实上却很渺小，（或者）自己以为可以像雄鹰一般展翅高飞，事实上最多只有一对小鸡的翅膀更可笑的事了”。[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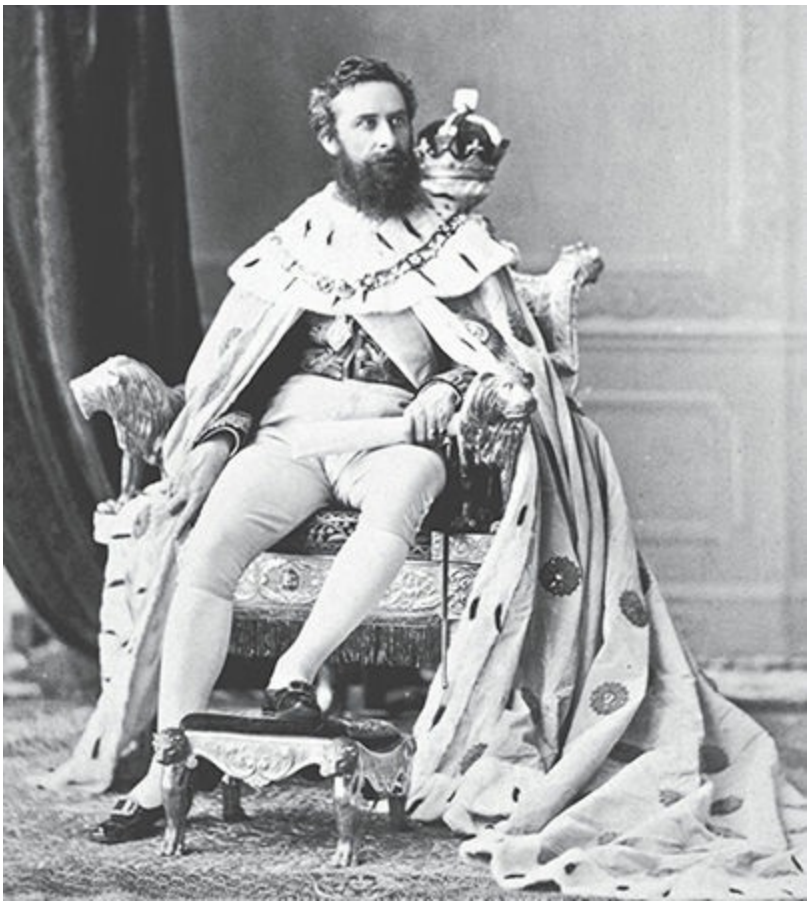
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也对她的哀叹不屑一顾。这位作曲家和“性欲倒错者”自称讨厌骑师俱乐部中那些沉迷女色的笨蛋，却仍然每天去那里吃午餐——和布勒特伊一样，他关于社交界的保留意见也是一种姿态，是反向体现上流社会“单纯”的方式。[70]持这一立场的埃德蒙对伊丽莎白说，她的焦虑只能怪她自己。“所有的午餐、晚餐，这些没完没了的社交聚会，不停地公开露面，这一切令我筋疲力尽。”他抱怨说。埃德蒙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伊丽莎白的社交生活让他都筋疲力尽，对她的影响只会更大。

伊丽莎白虽然希望得到罗贝尔舅舅和埃德蒙的支持，但没把他们关于她社交生活的焦躁评论放在心上。她觉得这两个人显然对她有很强的占有欲，因而他们与其说不赞成她的社交生活，不如说不赞成她特别欣赏一位社交名流：利顿勋爵。前一年12月，利顿勋爵作为大不列颠驻法国的新任大使来到巴黎。这位57岁的英国人此前担任过外交随从，在巴

黎已经很有名气了，如今更是受到上层的老朋友们英雄般的欢迎。他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又能熟练地使用双语，成为社交界最新的宠儿，并很快将伊丽莎白作为自己最爱的女性。

由于利顿勋爵拥有半王室地位，与他交往令伊丽莎白与有荣焉，巴黎其他贵族也是一样。他声称与欧文·都铎[71]是远亲，后者的孙子亨利六世创建了都铎王朝，妻子瓦卢瓦的凯瑟琳则是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此外，利顿勋爵本人曾在1876年到1880年担任印度总督，也相当于君王的地位。这些资历使他成为受到所有最尊贵的聚会和沙龙（包括伊丽莎白的沙龙）垂涎的宾客。

私下里与伊丽莎白交谈时，利顿勋爵表示她的同胞居然如此热衷于他的总督职位，让他大吃一惊，要知道他的印度臣民和本国同胞几乎全都认为那是他的失败和耻辱。他就任总督时，恰好碰上一场导致逾6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让他这次的职业经历一开始就乌云笼罩。利顿勋爵不但没有为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穷人提供救济，反而认为让他们挨饿可以遏制人口过剩，那才是当时亟须采取的行动。被这一政策激怒的公众发现他在其他方面挥霍无度，更是怒发冲冠。担任总督期间，利顿勋爵花费巨资与阿富汗打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他还试图扩大印度的鸦片生产，累积了500000英镑的赤字。[72]（他本人吸食大量鸦片。）在他的批评者们看来最糟糕的是，他举办了不少史无前例的奢华聚会，例如一场为期一周的宴会，据说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晚餐会，让68000位达官贵人享受山珍海味，痛饮“黄金深釜里欢腾起伏的香槟”；与此同时，单是迈索尔和马德拉斯，就有100000人饿死。[73]这许多争议源头解释了他在1879年幸运地躲过一次暗杀，以及印度人和英国人给他取了贬义的绰号：“印度的尼禄”和“大排场”。[74]



身穿总督服饰的利顿勋爵，他担任过印度总督，是伊丽莎白的狂热崇拜者

然而在巴黎社交界看来，与他曾经登上印度王位的荣光相比，利顿勋爵在印度的糟糕政绩就不算什么了。此外，巴黎贵族认为他热爱奢华盛典是优点而不是缺点。王室收藏品爱好者交换的烟草卡上画着这位英俊潇洒的伯爵头戴木髓遮阳帽——烟草卡是一些廉价的名人肖像画，相当于费利克斯·波坦的巧克力集换卡，只不过是附在烟草包装里的。社交行家们痴迷于他穿戴加冕服饰的照片，下身穿白色紧身裤，身体的细节暴露无遗。

城区如此重视利顿勋爵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因为曾在驻西班牙、葡萄牙和奥地利的英国大使馆任职）与许多欧洲国家的君主建立了友好关系，与他本国的君主的友谊尤其亲密。维多利亚女王对自己的后代（尤其是对伯蒂）是出了名的严厉冷酷，对利顿勋爵却爱如己出。她赐

予他荣耀，把他从准男爵（他父亲的头衔）升为伯爵，还让他的妻子伊迪丝·维利尔斯（Edith Villiers）担任她的宫廷女侍，并任命他进入自己的枢密院。女王甚至坚持要做他和伊迪丝的一个孩子的教母——那个孩子取名维克多，为的是向女王致敬——并授权利顿勋爵以第二人称而非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这本是王室家庭成员独享的特权。除了奢华享乐的本领外，利顿勋爵受到维多利亚女王宠爱的特殊地位，使得受邀到英国大使馆参加他举办的宴会成为巴黎最受追捧的礼遇之一。

潇洒的伯爵尤其受到上层女主人们的追逐，他那些精彩的印度故事和花哨殷勤的举止迷得她们神魂颠倒。侨居海外的巴黎人传言，英国外交使团中还从没有过一个比利顿勋爵更优秀的舞者和更活泼的聚会宾客：这是夫人们喜欢他的另外两个原因。

在伊丽莎白看来，他是最有趣的同伴，总是带她去城中各处新鲜有趣的地方，仿佛比她更熟悉这个城市。他带她去参观一位外科医生解剖死人尸体，去听灵媒与灵界对话，去看全木偶演出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他带她和亨利·德·布勒特伊（两人通过威尔士亲王认识，是老朋友了）去拜访让-马丁·沙尔科医生的精神病诊所，这位精神病学家曾租过希迈府邸的一个厢房。[75]如今沙尔科医生在沙普提厄医院（Salpêtrière Hospital）工作，是治疗癔症的专家，据说这种神经衰弱症状在女性中特别普遍。为了向伊丽莎白及其同伴展示自己如何治疗这种疾病，沙尔科在他们面前为一位病人催眠——那是个漂亮但衣冠不整的姑娘，穿着一件不像样的白色睡袍——并请他们给她“提议”一个狂想。利顿勋爵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伊丽莎白，对那位病人说她“面前正有一场火灾”。这些话让姑娘陷入了绝望，哽咽、尖叫并疯狂地企图扑灭一场只有她才能看见的大火。

伊丽莎白非常喜欢和利顿勋爵在一起，以至于她婉拒了几乎所有的晚餐聚会邀请（涉及座位安排和食物供应等问题时，“优美的姗姗来

迟”就没有那么容易成功了），却定期在英国大使馆与他共进晚餐。得益于他在社交圈的威望，伊丽莎白只对他一人例外，也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神秘性，“她外出晚餐的地点仅限于英国大使馆”这句话，也和洛尔·德·舍维涅的那句“收入不高，但殿下不少”一样，成为她公共形象的关键句。[76]不过伊丽莎白与利顿勋爵共进晚餐也有她私密而感伤的理由。英国大使馆位于距德·阿斯托格街不远的圣奥诺雷城区大街上，馆址是一座漂亮的18世纪宅邸，即博尔盖塞府。[77]此名源于它最著名的前主人、拿破仑一世的妹妹波利娜·博尔盖塞（Pauline Borghese）亲王夫人，也就是乔万尼·博尔盖塞的伯祖母。伊丽莎白仍然因乔万尼去了索非亚而沮丧不已，但她内心仍有一个角落固执地希望他迟早能意识到，她才是他的一生至爱。看到他的家徽出现在大使馆各处在她看来是个吉兆，提醒她要坚守信念。

伊丽莎白在博尔盖塞府参加的某些晚餐是国事活动，在场的宾客有上百甚至上千人。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温馨的非正式晚餐，除她之外只有男主人和布勒特伊在场。利顿勋爵不会邀请伊丽莎白的丈夫或他25岁的妻子来参加这些更亲密的聚会。亨利之所以容忍这种怠慢，完全是因为他坚信贝贝斯与利顿勋爵保持良好关系能加强他在威尔士亲王那里的影响力。（他也信任布勒特伊是个称职的陪护人。）利顿伯爵夫人伊迪丝则决心对此一笑置之。据她的密友说，丈夫迷上了格雷弗耶夫人让她私下里也很烦恼，但她“明智地装作把它看成一个笑话”。[78]这位金发女人美若雕塑，身高比利顿勋爵整整高出一头，她自己也天天在社交界周旋忙碌，还喜欢在巴黎定制服装，这些都是她的精神寄托。虽然管理大使馆的费用已经令她和丈夫的家庭不堪重负，但她仍是沃思最大的客户之一。伊迪丝和丈夫一样亲法，她遵循“有生阶层”巴黎人的黄金法则：无论财务状况多么糟糕，婚姻关系多么冷淡，永远都要保持姿态完美。

利顿勋爵虽然在社交界大受欢迎，但当伊丽莎白向他倾诉那个圈子里的人如何肤浅轻薄、墨守成规时，从他那里得到的共鸣却远远多于其

他社交好友。伊丽莎白用自己虽有些生硬但足够交流的英语对他抱怨说，他们的上流社会同道们“往往”会“遵循我们所谓‘规矩’的惯例”，从不会独立思考，也不会渴望深邃。利顿勋爵深表同意，在一次关于该话题的对话中对她说：

> 仿佛社交生活中根本不允许有高洁、真诚和深刻的东西存在；相反，社交界总是欢迎一切下流、虚假和琐碎的东西。调情是可以的，而爱情，真正的爱情，却被轻视和贬低，说它麻烦、不妥、累人。

这段话让伊丽莎白想起了罗贝尔舅舅提到的仓鸮和雄鹰的区别。她想：“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想跟没有精神世界的人交往了。”[79]而利顿勋爵，伊丽莎白觉得他和她一样醉心于精神世界。[80]

上层依然故我，英国伯爵也不乏批评者，那些像“一袋缝衣针”一样尖刻讨厌的人质疑他“新奇”，这是社交界表示“怪异”的黑话。这些人窃笑利顿和他的母亲、爱尔兰美女罗西娜·惠勒·布尔沃-利顿都曾在精神病院住过，还说他已故的父亲“频繁地暴发抑郁和沮丧……接着就急切地寻找刺激”。[81]众所周知，利顿勋爵的情绪也常常同样剧烈波动，他自己承认，他的情绪总是在无法控制的激动和一种他所谓的“忧郁的恶魔”[82]或“几乎无法忍受的歇斯底里的抑郁”[83]的状态之间摆动。约瑟夫·雷纳克忌妒利顿勋爵越来越受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英国人也是她沙龙里的常客）的喜爱，在报纸上诋毁他“整个人有四分之三都是疯的”。[84]

不管他是不是疯子，虽然利顿勋爵早年在东方就开始大量吸食鸦片，但那对他的精神状态并没有什么帮助。[85]澳大利亚女歌唱家内莉·梅尔巴（Nellie Melba）有时候会陪伴着某一位亲王情人出现在社交界，她喜欢讲一个好笑的故事，说英国伯爵“非常频繁地”吸食一种物质，还企图让人以为那是鼻烟：

（利顿勋爵）会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金色鼻烟盒，盒盖上画有珐琅画的那种，仔细地用手指蘸一点，抬眼看着天花板，然而很慢、很小心地把它吸进鼻子，露出无限享受的样子。那还没完。从鼻烟中获得了极度的快乐之后，他会弹一弹手指，从胸袋里掏出一块巨大的红手帕，无比仔细地擦自己的鼻子。然后他会说“啊”，双手在背后紧握，带着快乐的微笑走到窗前。整个过程让我觉得他那个牌子的鼻烟一定好得不得了。

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经常在斯特劳斯夫人的招待会上碰到利顿勋爵，他说后者假装那是“鼻烟”根本骗不了那里的常客们——骗不了“总是浑身乙醚味儿”[86]的让·洛兰，骗不了精神药物的发烧友居伊·德·莫泊桑，也骗不了毫不掩饰地依赖吗啡的热纳维耶芙本人。在这个心照不宣的环境里，利顿勋爵疯狂痛快地吸鼻子，证明他也是毒品使用者。有一年夏天，雅克·布朗什和勋爵两人在诺曼底度假时，经伊丽莎白介绍认识了英国伯爵[87]，他说后者是个“在后宫里沉迷酒色的帕夏，愉悦地吸食鸦片的老色狼”。[88]

社交界提到利顿勋爵的父母那场丢脸的婚姻时，语调也一样充满恶意，传说他母亲狂怒地指责他父亲道德堕落，直到婚姻结束。[89]在一部耸人听闻的影射小说中，罗西娜·布尔沃-利顿滑稽地模仿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说他是个堕落冷酷的自大狂，一笑就露出“血盆大口”，那副邪恶的样子，“鹰钩鼻、厚嘴唇（和）干硬世故的线条（都表明他）邪恶的激情”。“如果有哪位艺术家要为《浮士德》绘制插图，需要找个魔鬼梅菲斯特的模特”，那他定是不二人选。

罗西娜说，同性恋是她丈夫“邪恶的激情”中最糟的一项，她公开指责他与犹太人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有染。如今两人都死了，但当年这些指控大概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两人都曾模仿他

们共同的偶像、诗人拜伦勋爵的样子穿女士的裙子，拜伦也是个恶名远扬的浪子和“鸡奸者”。与他们的英雄一样，迪斯雷利和爱德华·布尔沃-利顿也留飘逸的长发，戴耀眼的珠宝，穿五颜六色的蕾丝衣服。当关于布尔沃-利顿的“鸡奸”传说开始在社交界流传时，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也随声附和，添油加醋地加以谴责。他说他年轻时曾在地中海地区旅行，为了逃避那位英国老男人的欺负，从船上落水，差点儿淹死。在一封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他的这段回忆没那么言之凿凿，但挖苦的口气还是一样的。[90]

让罗贝尔舅舅遗憾（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并没有让伊丽莎白对利顿勋爵产生偏见，她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喜欢的是女人。不过她的确不得不承认，他的时尚品位给了她另一种印象，也给了他的敌人们另一个诽谤他的理由。大使（和她舅舅一样）避免贵族们使用的冷色调和低调裁剪，偏爱巧克力棕色的西装、紧身裤和巨大的翻领，配上花色鲜艳的方巾，两只手的好几根手指上都佩戴着镶嵌多彩宝石的戒指——包括一颗很大的绿宝石，几乎与伊丽莎白从米米那里继承的传家宝戒指一样大。他还喷浓重的古龙水，举止绵软轻柔，令有些人觉得阴气十足。除了吸食鸦片的习惯和曾担任总督的经历之外，利顿勋爵的阳刚气质有些含混，伦敦的同胞们因而为他取了另一个贬义的绰号：“副女王”。[91]

由于罗贝尔舅舅曾坚定地赞美“娘娘腔”，伊丽莎白以为他和有趣的英国伯爵两人会意气相投。谁知两个男人互相嗤之以鼻。在她那些年写好后让舅舅编辑的所有文字中，他最喜欢的一篇的主题是“没有什么比看到另一位美女的照片更让美女烦恼的事情了”。[92]或许他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讨厌利顿勋爵；他们太像了，很难不把对方看成对手。她曾经错误地对罗贝尔舅舅说她的英国朋友说他“太像女人”，在她舅舅听起来（同样，虽然他赞美娘娘腔），这样的描述等同于公开宣战。自那以后，伊丽莎白不得不接受现实，她生命中的两个罗贝尔[93]永远不可能

成为朋友。

她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利顿勋爵最吸引她的特质正是让她与罗贝尔舅舅最亲密的特质：文学天赋。然而这一共性或许也引发了她舅舅求胜的怨恨，因为利顿勋爵已经出版了六七本诗集。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生前是非常成功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很多经久不衰的陈词滥调都出自他的笔下，诸如“笔诛胜于剑伐”“群氓”“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等等。利顿勋爵少时对父亲天赋的仰慕不亚于埃莱娜崇拜伊丽莎白的美貌。从14岁起，他就知道他也想成为一名作家，但父亲对他说文学世界太小，容不下“两位著名的布尔沃-利顿”。年轻的布尔沃-利顿只好妥协了，同意从事外交事业，将文学作为爱好而非职业。他还承诺用“欧文·梅雷迪斯”（Owen Meredith，“欧文”是他传说中的都铎祖先的名字）的笔名出版所有作品，也的确用那个笔名粗制滥造了大量华而不实的诗作。[94]梅雷迪斯的诗在评论家中评价不高，但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喜欢它们胜过其他任何英国诗人的诗作，不管是在世的还是已经去世的。

那年夏天，利顿勋爵送了伊丽莎白一部他的《格兰纳威利尔》（*Glenaveril*，1885）的译本，这部六章的史诗刚刚出版了法语版。她还没有开始读——她更喜欢阅读英文原版——却喜欢与作者探讨创作过程。当时，利顿勋爵正在写作自己的代表作《罂粟王》（*King Poppy*，1892），这部韵体讽刺狂想曲探讨了想象的力量（以及吸食鸦片的快乐）。或许是为了向好友洛尔·德·舍维涅致敬，他说作品标题中的罂粟是被普洛塞庇娜偷偷带到冥府的唯一一种花朵。

或许是为了向好友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致敬，利顿勋爵还为一首关于“流浪的犹太人”的长篇喜剧诗做了注释，弗洛蒙塔尔·阿莱维的一部歌剧就以流浪的犹太人为主题。[95]利顿勋爵研读了大量关于这位民间传说人物的资料，为了替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们背叛耶稣的行为赎罪，他注定要永远在地球上流浪。英国伯爵把自己的研究发现讲给了伊丽莎

白，后来她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借用了它们，在一首散文作品的开头写下了这句引言：“流浪的犹太人说‘必须继续前行’。”

利顿勋爵很得意，自己居然影响了这位“才女，漂亮的上等女人”[96]，他在回国后写给她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她，揶揄地使用了这个下层阶级用于描述社交界的词儿，他们两人对社交界的归属感都充满矛盾。伊丽莎白没有告诉他，她自己关于流浪的犹太人的概念与他全然不同。利顿勋爵构想的人物是英国第一位犹太人首相迪斯雷利的神话版本，此人被政敌诋毁，被“群氓”斥责。伊丽莎白的视角不同。像在真实生活中一样，她在艺术中也试图理解男人为什么会出走，去别的国家，去找别的情人。就这一点，她标示过大仲马的一段引文：

> 没有什么比旅行癖更容易征服人类了；一旦我们为旅行而狂热，它就会催促我们前行，永远前行：流浪的犹太人只是一个象征。[97]

在伊丽莎白的文学想象中，流浪的犹太人就是艾马尔·德·韦尔特伊，他在全世界漂泊，却无法摆脱自己罪恶的重担，他没有背叛耶稣，却背叛了自己可爱的妻子布兰切。他背负的作为惩罚的磨石是他始终清楚地意识到布兰切爱他，连他的背叛也没有摧毁她的那份爱：

> 啊讽刺啊，讽刺（原文如此），他走得越远，身上的铁链越重，链条不断展开伸长（直到他）焦躁不安地喊出来：上帝啊，让我摆脱这个负担吧！但无论他去哪儿，都拖着那负重，谴责他，高声羞辱他，束缚他；这是一颗已死的心，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会被献给另一个人。[98]

伊丽莎白也会给利顿勋爵看她的其他作品，却没有给他看这一篇，因为她知道这会为他打开一个缺口，大肆谈论他自己的难以克制的爱——对她的爱。近来在使馆的晚餐中，她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他斜视着自

己，目光从起初的郁积心头到几近疯狂，他那双突出的、明亮的绿色双眸闪烁着新的令人不安的欲火。夏天快结束时，有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出现在迪耶普的门口。伊丽莎白问他为什么没带家眷来，他抓住她的手，用那双明亮的碧眼狂热地看着她，沙哑地耳语道："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99]

要是她也怀着同样的爱意就好了。但穿戴着俗丽的围巾、戒指和紧身天鹅绒长裤的利顿勋爵实在不是伊丽莎白喜欢的男人类型。何况他的年龄比她大一倍，已经无法让她折服。即便如此，与年纪相仿的德·萨冈亲王不同，利顿勋爵没有顺从地接受伊丽莎白希望她的追求者们扮演的无性角色。她在一篇题为《真正的朋友》（"The True Friend"）的文章中勾勒过这一角色：

> 真正的朋友会给你母亲一般无私的情感。……这种依恋建立在尊重、信任和爱的基础上，但这种爱里没有任何与尊重矛盾的东西。……真正的朋友一点一点地赢得你的信任，只在你允许的范围内进入你的生活；他绝不会试图偷走任何没有给予他的东西。……真正的朋友就像彼此的守护天使。……当他们在一起时，那感觉仿佛两人都被白色的双翼笼罩，而不是身处群狼咆哮的密林。[100]

利顿勋爵没有被这样的论调说服，他反驳伊丽莎白说，自己对她的感情毫无严父风范，更无慈母之恩。他进而对她说，那一套"我们只是朋友"的甜言蜜语无法永远约束那些情感。除了眼睛里泛着不安而贪婪的微光之外，她最近还注意到他对她说话的方式也带上了明显的攻击性，仿佛两人都知道她一定会拒绝他，而他已经准备好为此而憎恨她了。她想，如果有朝一日英国伯爵想要吻她，他多半会扑上来咬她。

《我恨而且爱》（*Odi et amo*），这是卡图卢斯[101]写的一首拉丁诗歌，她少女时代曾经读过："我恨，而且爱。"[102]这些年，其他标榜爱

她的男人也曾表现出同样的两重性——一旦遭到回绝，就会由喜爱转为愤怒。

伊丽莎白较为冷静达观的时候，会把这样的互动看成洞察男性心理的机会。她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玛丽-爱丽丝·德·蒙泰伊昂，“一位崇拜者不计其数的女神”，进行了类似的分析：

> 她一直希望了解那个词（爱）意味着什么，在送追求者们离开之前，仔细审视他们的面容。他们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快乐、天堂、梦想，谈论这些时，他们的眼睛会古怪地大睁着，脸色通红；然后当她让他们知道“她并没有这种感觉”时，他们会毫无过渡地说起地狱、痛苦、折磨等词。那一刻，她的审视就结束了。[103]

然而尽管伊丽莎白对这样的态度激化已经很有经验了，她仍然无法面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利顿勋爵身上。她不愿屡屡想起他离开她就活不下去，而乔万尼显然可以。两个男人态度如此天差地别实在令人气馁，简直就是羞辱。“多么屈辱啊，”她写道，“让一个男人如此狂热地爱着，却让另一个男人这般嫌恶。”[104]

在为亨利的父亲服丧那六个月里，格雷弗耶一家人蛰居在德·阿斯托格街。（亨利很恼怒的是，根据礼节，那个打猎季他也不能在布德朗森林打猎了。）与世隔绝正好符合伊丽莎白低落的心境，但经冬入春，她能看出亨利渐渐不耐烦了。他提醒她说一年多前他曾支付一大笔钱给居斯塔夫·莫罗，请他为她画一幅肖像，并责备她为什么不跟画家约时间，去当必要的模特。

伊丽莎白是故意不跟莫罗联系的；她仍然闷闷不乐，不想以这副样子入画。但为了安抚丈夫，她联系了艺术家，定在4月的某个日子去他的工作室当模特。她过去一直很喜欢去莫罗的画室，也试图告诉自己拜

访画家会有好处。她总能跟他聊到一起——或许是因为他很少说话。

莫罗的工作室藏在第九大区一座小宅邸的石砖外墙后面，距离德·阿斯托格街不算远，乘马车几分钟就到了。但在伊丽莎白看来，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半是魔幻灯，半是珍品阁。[105]墙上挂着各种珍品，是大师用画笔创造出来的世界。鹰爪、王冠和匕首上闪烁着鬼魅的宝石；头发和光环带着那种耀眼的暖金色。到处是神兽：喀迈拉[106]和海德拉[107]、塞壬和西牟鸟[108]、独角兽和斯芬克斯。一只孔雀在纠缠朱诺。丽达爱上了天鹅。俄耳甫斯[109]弹奏着七弦琴，瞥了一眼身后注定劫数难逃的欧律狄刻[110]；女祭司把他大卸八块。狄多和萨福在峭壁上摇晃着；她们跳起时，会带着心痛一起奔向死亡。《施洗者圣约翰》的头颅在半空中漂浮，莎乐美诱惑着希律王[111]。伊丽莎白一层层脱去面纱，仿佛打开层层包装，把自己当作礼物呈现在画家眼前。

这最后一幅画，《幽灵》（*The Apparition*，1876），与米米在亨利1878年世界博览会上发作之后为伊丽莎白买下的那幅莎乐美水彩画全然不同。在伊丽莎白的《花园里的莎乐美》中，希律王的继女还没有表演她臭名昭著的脱衣舞。相反，她安静地站在那里，披着一件褶边的靛蓝色天鹅绒斗篷。她伸出胳膊握着被害者的头，审视着它，仿佛那是一份死亡警告，提醒她一切都将归于尘土。她的脸上带着忧伤的表情，蓝色的长袍把驱使希律王谋杀的身体的每一条曲线都遮住了。在这幅肖像中，犹太荡妇几乎变成了一位修女或圣人，变成了抹大拉的马利亚[112]，声明抛弃尘世的一切浮华虚荣。

结婚前夕，伊丽莎白被《花园里的莎乐美》中那位庄严、圣洁的女主人公吸引了。而此刻眼前这幅《幽灵》吸引她的，是年轻女人那无耻的色情欲望。伊丽莎白已经在于斯曼的小说《逆流》中读到过这幅画；在小说中，这幅画是她的罗贝尔舅舅的虚构分身德埃桑特的重要艺术藏品。德埃桑特认为，这幅莎乐美是：

不灭欲火的神祇，是有着受到诅咒之美的不死的歇斯底里女神……她无动于衷、不负责任、冷酷无情，就像古代的（特洛伊的）海伦，毒害每一位走近前来的人、每一位凝视过她的人、每一位她碰触过的人。[113]



伊丽莎白在莫罗的画室请他画肖像时，爱上了他这幅《幽灵》

莫罗本人曾经说《幽灵》中的莎乐美是“永恒的女性，像飞鸟般自由，却致命而可怕，仿佛终其一生手握一朵花，寻找她虚幻的理想，把一切踩在自己的脚下践踏”。[114]伊丽莎白在这两个原型中认出了自己。她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男人曾经这样描述过她了。

画像开始时，她和莫罗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客套话，莫罗是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留着不修边幅的白胡须，一双警觉的黑眼睛，银发乱蓬

蓬地顶在头上。他问候了罗贝尔舅舅，说自己很欣赏他，还带着礼貌和戒备的神情听伊丽莎白谈起她最近雇用美国画家詹姆斯·A. M. 惠斯勒为他画一幅全身肖像画。她热情地赞美她和舅舅这位好朋友的天分，说为了让惠斯勒得到应有的重视，她正在与一些政治家朋友努力让他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她请英国大使帮忙向法国政府举荐惠斯勒，虽然他还没取得成功，但伊丽莎白相信，即便职业外交家办不到的事，她也能办到。她已经决定亲手为惠斯勒绣他的玫瑰形饰物，也就是获得荣誉勋章的标记。

莫罗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个消息。惠斯勒有多自我标榜和盛气凌人，莫罗就有多寡言少语和与世无争，他对其他画家争夺名利之事不感兴趣——伊丽莎白突然担忧地意识到，他对她这些妄自尊大的唠叨也不感兴趣。她有个糟糕的习惯——弟妹们总是笑话她这一点——只要她焦虑或生气或难过，就会自吹自擂。这段日子，这三种情绪总是萦绕在她心头。

那大概就是为什么她又在自吹自擂，向莫罗吹嘘自己了不起的成就。当时，整个巴黎正在准备那年5月开幕的1889年世界博览会，那场庞大的艺术、技术和文化展览会必将吸引数十万游客从世界各地涌来。由于第三共和国准备以这次盛会来庆祝大革命100周年，伊丽莎白在城区的贵族朋友们大多打算抵制它；他们对1789年的煽动者的标准评价是：“他们砍掉了我祖母的头。我不想听到此事。”[115]然而她自己却不自觉地对莫罗吹嘘起博览会史无前例的盛大宣传乃是不可多得的机遇。她已经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做公益，在特罗卡德罗[116]组织一场特别的筹款演出，上演乔治·亨德尔的《弥赛亚》（1742），一切收益将归慈善协会所有。[117]

演出日期定于6月10日，标志着两个第一：这是法国观众第一次听到完整的亨德尔杰作，也是巴黎慈善晚宴第一次以大型乐队表演的方式

进行。通过菲利普·德·玛萨和夏尔·埃弗吕西两人的努力，喜剧小品和画展开幕已经成为巴黎社会公益活动的主流，但大型音乐表演还从未有过。她不顾婆婆的反对（她那位婆婆反对一切形式的创新），成功地说服慈善协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她在新闻界的联系人也已经预言该活动定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莫罗还是不置可否，短暂沉默后，他说自己决定不在今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任何画作。他在11年前参加了上一届博览会，不打算重复这一经历；媒体的吹捧和公众的关注都会让他分心。他解释说："暴烈的观感会减损梦境的纯度。"[118]说到这里，他的寒暄用词明显穷尽了，于是便重拾起画笔和调色盘，开始工作。

整个工作室安静下来，除了偶尔从莫罗的画架后面传来一句简短的评价。这期间，他似乎进入了入定状态。他的目光呆滞，对伊丽莎白说的话像是传授禅机，诸如"痛苦是必须的，那是一种净化"[119]以及"必须隐避尘世，才能拥有新的视野"。[120]

伊丽莎白后来把这些话抄到日记本上，思考它们对自己的意义。她自己的痛苦绝不像净化，而像是一句诅咒。她避世的尝试也没有给她什么有益的新视野去理解痛苦。相反，它们让她在尘世中一味地沉溺和失落。她觉得自己消失了。

伊丽莎白知道，那些觉得她冷酷无情的男人们一定会把她看成莎乐美那样的人物，用她"受到诅咒之美"把他们一一打倒。[121]他们不知道她也那么像莎乐美的受害者施洗者圣约翰，被"不灭的欲火"燃烧殆尽。"哦，我能感觉到心底里永恒的欲望的种子蠢蠢欲动，剧烈的、可怕的痛苦，"她写道，"我觉得自己像一团火焰，上下跳动。……我的痛苦幻化成一切模样在身后追逐着我。"[122]

它像野兽一样追逐着她，一时一刻都不放手——即使在莫罗的画室

里也是如此。前去当模特时，她第一次注意到列奥纳多那幅《施洗者圣约翰》的一幅小型复制品挂在前厅：《乔万尼·巴蒂斯塔》，那个披挂豹皮的阴阳人。那曾是伊丽莎白在野兽舞会上的装束，曾是她如此珍视的记忆，如今却像是她无意间跟自己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嘲笑她怀着怎样温情脉脉的希望，才选择那样一身装束。

沿德·阿斯托格街回家的路上，她开始考虑自杀。“我在咆哮，我的血在沸腾，我心中充满仇恨，我想死。我觉得我即将犯罪、即将疯狂，哦疯狂！”[123]她开始想要不计后果，毁灭一切。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她不是特别虔诚的人，却祈祷着获得解脱。“赐予我力量吧，上帝，让我把痛苦埋在心底。我恳求您，如果我不再有力量忍受这一切，就让我摆脱这残酷而不幸的生活。”[124]她期待着上帝听到她的呼喊。沿着塞纳河边孤独地漫步，她注意到埃菲尔铁塔在世界博览会前终于完工了。她觉得那细长的金属轮廓看起来像“两条垂挂蕾丝的长臂，到顶上双手合十，对着上天祈祷”。[125]

4月21日，周日，伊丽莎白独自一人到玛德莱娜教堂去参加复活节祷告，玛德莱娜教堂是右岸的一座古典风格的教堂。弥撒结束时，她垂着头，跪在祷告椅上没有动，身后教堂的中门开了，阳光洒入中殿。听到排钟的钟声，其他教众们一齐站起来，欢呼耶稣的复活和世界的重生。伊丽莎白没有感受到那份喜悦。

但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小小的私密的奇迹发生了，让她记起自己毕竟不是无可救药的孤独一人。4月22日，她写道：“昨天在玛德莱娜教堂，我在哭，没有祷告，我觉得有一双不安的眼睛正在看着我，焦虑地试图猜想我眼泪的意义。”[126]

[1] 关于这次短程加速赛的最佳报道出现在《费加罗报》（1887年5月1日），第1版；就连这篇文章也写到了德·努瓦尔蒙男爵夫人与EG一起坐在HG的马车里。关于短程加速赛，也称邮政车赛，见Élisabeth Hausser，*Paris au jour le jour*：*1900-1919*，*les évenenements vus par la presse*（Paris：Minuit，1968），455；and GLP，*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76-77。

[2] 卡罗勒斯-杜兰（Carolus-Duran，1837-1917），法国肖像画家、艺术导师，曾获荣誉军团勋章，法兰西艺术院成员。

[3] 卡罗勒斯-杜兰为EG画的那幅肖像遗失了，但评论界认为那是那次展览上最出彩的作品之一。William Sharp，“The Royal Academy and the Salon，” *The National and English Review* 9（March-August 1887）：513-24，514 and 518.

[4] 见EG致HG，一封写在维也纳Sacher酒店信纸上的未署期的信，存档于AP（I）/101/22。

[5] Sylvia Kahan，*In Search of New Scales*：*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Octatonic Explorer*（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9），59；and AGG，*Souvenirs*（n.p.，n.d.），139.

[6] EG，in AP（II）/101/150.

[7] LG，*Mémoires*，vol. 2，37.

[8] 埃莱奥诺尔（EG）致热拉尔（GBB），“1888年1月4日8时”的信件，存档于AP（II）/101/151。

[9] EG，in AP（II）/101/152.

[10] EG，“4e volume：Le Revoir，” op. cit.

[11] 维尼，《牧羊人之屋》，EG在一封标记为“84年12月3日”的信件中引用，存档于AP（II）/101/151。

[12] 关于EG越来越不喜欢上流社会社交圈，见存档于AP（II）/101/150的一个片段；开头一行写道：“我不再喜欢社交界了……”

[13] 埃莱奥诺尔（EG）致热拉尔（GBB），存档于AP（II）/101/150。在这部小说的排版页面上，EG划去了“热拉尔”，在上面写上了“加斯东”。不过她似乎没有

在手稿的其他地方做这一姓名的改动。

[14] 一本没有标记的红色笔记本上的一篇，是GBB的笔记，存档于AP（II）/101/150（以下简称“热拉尔的日志”）。

[15] 一本没有标记的红色笔记本上的一篇，是GBB的笔记，存档于AP（II）/101/150（以下简称“热拉尔的日志”）。

[16] EG把这些信件保留在一个名为“敬辞和赏识”的文件夹中，存档于AP（II）/101/1。

[17] Jane Hanna Pease，*Romance Novels*，*Romantic Novelist*：*Francis Marion Crawford*（Bloomington，IN：AuthorHouse，2011），72.《萨拉西内斯卡》的一个法文版于1890年春在*Le Temps*上连载（首次出现在3月12日），一年后全书出版；见*La Nouvelle Revue*（June 1891）：893。

[18] F. Marion Crawford，*Saracinesca*（New York：Macmillan，1893 [1887]），8.

[19] F. Marion Crawford，*Saracinesca*（New York：Macmillan，1893 [1887]），11。

[20] F. Marion Crawford，*Saracinesca*（New York：Macmillan，1893 [1887]），17。

[21] F. Marion Crawford，*Saracinesca*（New York：Macmillan，1893 [1887]），18。

[22] 1887年12月28日GBB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53。

[23]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November 5，1880）：529；以及EG，见AP（II）/101/53。GBB热衷天主教义似乎主要出于家族荣誉感而非信仰。一位跟他关系亲近的神职人员回忆道，他有一句“格言——我什么也不信，但死前还是会差人找一位神父来；这是我与生俱来的习惯”。Albert Houtin，*The Life of a Priest*：*My Own Experience*（London：Watts & Co.，1927），227.

[24] EG，1887年11月24日的日记，存档于AP（II）/101/150。

[25] 关于世纪末巴黎的日本风，见Robert Burnand，*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de 1870 à 1900（Paris：Hachette，1948），142；and Junji Suzuki，“Le Jardinier japonais de Robert de Montesquiou，” *Cahiers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18（2011），103-4。RM写过自己（和龚古尔）对日本风的着迷，见RM，“Japonais d’Europe，” *Le Gaulois*（March 9，1897）：1。

[26] 埃弗吕西说话带着浓重的意第绪语口音，和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一样，这种口音也使他很难融入社交圈。的确，埃弗吕西在社交圈的外号是“玛塔姆”——这是“Madame”（夫人）一词的“贫民窟”发音。——作者注

[27] 关于波利尼亚克对EG的世故的失望，见Sylvia Kahan，*In Search of New Scales*：*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Octatonic Explorer*（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9），55。

[28] EG，《与你有关》，存档于AP（II）/101/150。下文中从《与你有关》中引用的句子均来自同一来源；这部作品的编辑版本和与它的创作有关的文本文件也都存档于同一处。

[29] 拉丁语原文是“*Nam Tua Res Agitur，paries cum proximus ardet*”，出现于贺拉斯，《书信集》，I，xiii（l.84）。

[30] “Échos de l’étranger，” *Le Gaulois*（August 29，1887）：1. 这篇新闻报道也出现在“Petites annonces，” *La Croix*（August 30，1887）：4。

[31] Constant Coquelin，*Un Poète philosophe*：*Sully Prudhomme*（Paris：Paul Ollendorff，1882），36.

[32]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83. 关于“保加利亚问题”详细的当代评论，见Sir Edward Hertslet and Edward Cecil Hertslet，eds.，*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1886-1887*，vol. 78（London：William Ridgway，1894）：908-18；关于EG对这个话题的思考，见AP（II）/101/197。

[33]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常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

[34] EG，in AP（II）/101/149.

[35] 几年后，EG再度想到她那些浪漫幻想是一种疯狂，给一个不具名的男性写信时说：“我（关于你）的这些幻想充斥在我的生活中——哦，就让我在怀中轻摇这

些幻想吧，仿佛一个疯女人晃动着怀中的玩偶，坚信那就是她失去的孩子——谁敢对她喊出那玩偶是木头做的？”EG写在布德朗森林的信纸上的笔记，署期为1892年3月6日，存档于AP（II）/101/150；这封信的开头一句是：“哦，请告诉我自己……”

[36] EG，《与你有关》。很多年后，EG把《与你有关》这次改动后的一份副本寄给了EdG，问他是否觉得她应该出版这部作品（除了她私下里在楠日印制的“三到五”份现成副本外），如果应该，他是否愿意写一篇序言。见EdG，日志，1894年7月5日的日记。关于他试图劝阻她发表这部作品，见EdG，日志，1894年8月8日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担心我的回答会让渴望出名的伯爵夫人不满。”

[37] L. de Vogüé，*Souvenirs*，（Paris：n.p.）.

[38] EG，没有署期的短笺，存档于AP（II）/101/149。

[39] RM，*Les Perles rouges*；*les paroles diaprées*（Paris：G. Richard，1910），xx，82-83.

[40] EG，存档于AP（II）/101/152。

[41] Brusquet（pseud.），“Le Régime du sabre，” *Le Triboulet*（May 23，1880）：5；and A. de Gramont，*L’Ami du prince*，399，n. 2. 顺便说一句，Alexandre Seillière不是德·萨冈夫人那位精神不正常的兄弟；那是Raymond Seillière，德·加利费夫人显然曾试图让德·萨冈亲王夫人把后者送到精神病院。关于这一丑闻，见“Franc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8），303-55。

[42] “德·C.夫人”很可能指代德·舍维涅夫人，她通过自己的表亲、夏尔·马罗凯蒂（Charles Marochetti）与乔万尼·博尔盖赛相熟，马罗凯蒂是意大利驻俄国大使，因此也是弗拉大公夫妇圈子里定期出现的人物。“H.夫人”似乎是指“无生阶层”的沙龙女主人奥雄夫人，后者经营一家医院，专门收治贫困家庭患结核病的女童。——作者注

[43] 1884年4月GBB致EG一封没有签名的短笺，红色笔记本第21页（书写页码），存档于AP（II）/101/151。关于奥雄夫人为患有结核病的女童开办的医院，见Maxime Du Camp，*La Charité privée à Paris*（Paris：Hachette，1892），257。

[44] EG，另一张标注为“德·布兰切日志”的排版页，存档于AP（II）/101/152。这篇日记开头写道：“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写。”

[45] EG，未编号稿纸，存档于AP（II）/101/152。

[46] Marquis de Amodio，“Le Château de Verteuil，”可上网查看电子导游书andre.j.balout.free.fr/Charente（16）_pdf/verteuil_chateau003.pdf. 关于艾马尔·德·拉罗什富科（在某些早期历史记录中，他的名字被写作“艾马尔·德·拉罗什”），见*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l’Angoumois*（Angoulême：n.p.，1864）：255；and *Bulletins et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la Charente*，vol. 6（Angoulême：L. Coquemard，1897）：123。

[47] EG，《德·布兰切日志》，存档于AP（II）/101/152。

[48] EG，AP（II）/101/[152].

[49] HG致EG，未署期信件，存档于AP（II）/101/32。

[50] LL致EG，重新打字的信件片段，署期为1884年1月9日，存档于AP（II）/101/151。

[51] EG，存档于AP（II）/101/152。

[52] EG，一张排版页面，被裁成了一个约1英寸×3英寸的长方形，存档于AP（II）/101/152。她在另一张纸上列出了自己打算在下葬时穿白裙戴白纱的计划，见AP（II）/101/152；这张纸开头写道：“已经准备好穿一件最美的白裙和白色披肩死去……”几年后的1892年，EG改变了计划，决定穿黑裙子下葬。关于RM的《死去的女人最后的停留》，见EG致EdG未署期的信件，存档于AP（II）/101/151。

[53]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53-54；and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204.

[54]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53.

[55] HG致EG，未署期的明信片，存档于AP（II）/101/32。

[56] HG致EG，未署期的信件，存档于AP（II）/101/32。

[57] 1897年7月3日HG致EG的信件，存档于AP（II）/101/32。

[58]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

Flammarion，2014），254.

[59] EG，未署期的笔记，存档于AP（II）/101/149。

[60] EG，未署期的笔记，存档于AP（II）/101/149，296。

[61] 埃莱娜·格雷弗耶从鲁瓦亚温泉小镇写给EG的信，存档于AP（II）/101/37。

[62] 埃莱娜·格雷弗耶致EG，没有署期的信，存档于AP（II）/101/34。

[63] 1896年7月21日埃莱娜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37。在同一封信中，埃莱娜提到也用电疗法改善了身体姿态。

[64] 这篇文章出现在埃莱娜·格雷弗耶，*Le Livre d'ambre par Élaine Greffulhe de 5 à 7 ans*，罗贝尔·孟德斯鸠作序（Nangis；L. Ratel，1892 [1887-1889]），n.p。RM在同一本著作中，在他为德·吉什公爵夫人埃莱娜·格雷弗耶的作品*Les Roses tristes*（Paris：Presses de l'Imprimerie Nationale，1923 [1906]），vii-viii所写的序言中，以及1890年11月写给EG的一封信（"无疑会长成一个高大结实的女猎手"），存档于AP（II）/101/150中，都表达了对埃莱娜的文学天赋的看法。

[65] EG，《没有回音的呼喊》，被收入一本名为"Essais d'esquisse sur vingt motifs"的手写散文集，第12页，存档于AP（II）/101/152。EG在她的组诗《与你有关》中发展了这一有些前后矛盾的"圣歌"概念，本章后文中有所讨论："*Il faudrait douce et tendre la passion d'une main à la hauteur de la mienne—tandis qu'allongée sans voir—Presque sans penser—sans parler—une mélodie divine traduirait cette extase*"；"*J'entendis de si douces choses en écoutant mon cœur que je me taisais.*"见EG，《与你有关》，存档于AP（II）/101/150。

[66] 厄科（Echo），字面意思为"回声"，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掌管赫利孔山的山岳神女。

[67] 关于EG自比那喀索斯，见Comte Léonce de Larmandie，*Du Faubourg Saint-Germain en l'an de grâce 1889*（Paris：E. Dentu，1889），218。

[68] EG，AP（II）/101/1；and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384.

[69] RM，*Les Quarante Bergères*：*portraits satiriques en vers inédits*（Paris：Librairie de France，1925），54. 这部文集是RM死后出版的，但RM好几十年前就已

经开始发表其中很多讽刺小品文了。

[70] Sylvia Kahan，*In Search of New Scales*：*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Octatonic Explorer*（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9），56.

[71] 欧文·都铎（Owen Totur，1400-1461），威尔士的朝臣，英国国王亨利五世的遗孀瓦卢瓦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Valois）的第二任丈夫，都铎王朝创始人亨利六世的祖父。

[72] *The Spectator*（12 August 1876）：2-3.

[73] Mike Davis，*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New York：Verso，2001），chapter 1，n.p. 这一章的数字版节选可见www.nytimes.com/books/first/d/davis-victorian.html。

[74] "G. A berigh-Mackay's 21 Days in India，" in Sujit Bose，ed.，*Essays on A nglo-Indian Literature*（New Delhi：Northern Book Center，2004）：41-49；and Edward Hower，*Shadows and Elephants*（Wellfleet：Leapfrog Press，2002），91.

[75] 关于参观沙尔科的诊所以及与被催眠患者的互动，外加LL的引文（"面前正有一场火灾"），见 "T.P. in His Anecdotage，" *T.P.'s Weekly*（December 7，1906）：723。

[76] LG，*Souvenirs*，（Paris：n.p.），148.

[77] 英国大使馆所在建筑位于圣奥诺雷郊区街39号，最初是德·沙罗斯特府，得名于1720年代建造该府邸的法国公爵。1803年，波利娜·波拿巴应兄长拿破仑的要求，嫁给堂·卡米洛·博尔盖塞（GBB的伯祖父）后，这里变成了她在巴黎的住所。1814年，拿破仑倒台后，波利娜把这座建筑卖给了惠灵顿公爵，后者把它捐赠给了英国王室。关于博尔盖塞府的简史，见Anne Martin-Fugier，*La Vie élégante，ou la formation de Tout-paris*（Paris：Fayard，1993），149-50。Jean-Dominique Ronfort and Jean-Mérée Ronfort，*A l'ombre de Pauline*：*La Residence de l'ambassadeur de Grande-Bretagne à Paris*（Paris：Éditions de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78] Mary Lutyens，*The Lyttons in India*：*An Account of Lord Lytton's Viceroyalty 1876-1880*（London：John Murray，1979），10. 关于利顿夫人对沃思高级定制服装的喜爱，见Diana de Marly，*Worth*：*Father of Haute Couture*（London：Elm Tree Books，1980），162-63。

[79] EG，AP（II）/101/149.

[80] 关于EG对LL“精神世界”的赏识，见JEB致EG，没有署期的信件，存档于AP（II）/101/67。

[81] John Ferguson Nisbet，*The Insanity of Genius*（New York：Scribner’s，1912 [1891]），129. Nisbet还讨论了LL家其他成员的精神疾病的例子（128）。

[82] LL in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

[83] Mary Lutyens，*The Lyttons in India*：*An Account of Lord Lytton’s Viceroyalty 1876-1880*（London：John Murray，1979），5.

[84]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330.

[85] “The Late Lord Lytton an Opium-smoker，” *Friend of China* 16，no. 4（October 1896）：109；“Owen Meredith，” *Illustrated American*（December 12，1891）：165. 这两篇文章发表时都没有署名，本章引用的这个段落见Nellie Melba（pseud.），*Melodies and Memories*（New York 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925]），90。

[86]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31.

[87] 1885年12月25日JEB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67。

[88] JEB，*Mes modèles*，114.

[89] Rosina Bulwer-lytton，Baroness Lytton，*A Blighted Life*（London：Bloomsbury，1994），219-29. 关于传闻中迪斯雷利与爱德华·乔治·布尔沃-利顿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和“拜伦式”爱情的详细讨论，见Andrew Elfenbein，*Byron and the Victori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206-29；Andrew Elfenbein，“The Shady Side of the Sword：Bulwer-Lytton，Disraeli，and Byron’s Homosexuality，” in *Byron*，ed. Jane Stabl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110-22。关于迪斯雷利“模棱两可的性取向”，见William Kuhn，*The Politics of Pleasure*：*A Portait of Benjamin Disraeli*（London：Free Press，2006），5，12，

and 125。Adam Gopnik关于Kuhn的书籍的评论文章“The Life of the Party，” *New Yorker*（July 3，2006）中有一句令人难忘的对“迪西的浮夸形象”的描述：“他无须再在赫勒海游泳或为希腊而战，就能变成所谓的拜伦式英雄：他成了一个娘娘腔，（穿成）塞西尔·比顿和‘村民’摇滚乐团成员之间四不像的样子；一次在马耳他度假期间，他穿着全套海盗服饰，还佩戴着手枪和匕首。后来……据一位关爱他的观察家说，他还穿了‘一条猩红色的马甲，带着很长的蕾丝荷叶边，……白手套，外面套着好几个金光闪闪的戒指’。他屡次戴着出门的金链子是个珍品，他的喷漆卷发是个奇观。”

[90] RM致EG，邮戳在迪耶普所盖，署期为1890年9月（？）的信，存档于AP（II）/101/150。

[91] Sir Salar Jung，“An Indian Mayor of the Palace，” *Today* 1（July 1883）：342-52，351；and Jehu Junior（pseud. Thomas Gibson Bowles），“Statesman：Lord Lytton，” *Vanity Fair* 219（March 18，1876）：223.

[92] EG，“La Preuve，” in AP（II）/101/150. 这篇文章被RM手写的一个词标注为“好”。

[93] 利顿勋爵的原名为爱德华·罗伯特·布尔沃-利顿（Edward Robert Bulwer-Lytton），其中的“罗伯特”与罗贝尔舅舅（本名Robert de Montesquiou）中法语发音的“罗贝尔”拼写相同。

[94] 关于LL的文学事业，见Louise Dalq，“Lord Lytton：philosophe et poète，” *Le Figaro*：*supplément littéraire*（November 12，1887）：1-2；关于他父亲力劝他放弃该事业，见Leslie George Mitchell，*Bulwer-lytton*：*The Rise and Fall of a Victorian Man of Letters*（London：Bloomsbury/A&C Black，2003），83-84。关于“欧文·梅雷迪斯”源于“欧文·都铎”，见Harlan，Aurelia Brooks. *Owen Meredith*：*A Critical Biography of Robert*，*First Earl of Lytt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6，67。“梅雷迪斯”这个姓氏也出自同一来源，是布尔沃-利顿家谱中一个不算坚挺的支系：Harlan写道，这个家族的“传统”就是重申“安·梅雷迪斯是嫁到布尔沃-利顿家族的，不是欧文·都铎的姐妹或侄女”（67）。关于《格兰纳威利尔》法文版的出版，见*Le monde Illustré*（June 2，1888）：1。

[95]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364. 关于LL对阿莱维的《犹太女》的英文改编，标题就改成了《剧》

（1887），见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265-66。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LL的曾祖父Richard Warburton Lytton是一位古代语言学者，曾用希伯来语写了一部戏剧。这部作品从未上演——据作者说，这是因为他“找不到足够精通希伯来语的演员来表演”。John Ferguson Nisbet，*The Insanity of Genius*（New York：Scribner’s，1912 [1891]），128.

[96]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387.

[97] Alexandre Dumas père，*Quinze jours au Sinaï*（Paris：Charles Gosselin，1841），289.

[98] EG，《德·布兰切日志》，存档于AP（II）/101/152；该段落出现在一张裁下来的校样中，那一页开头写道：“*Quel mépris angoisseux s’empare de celui qui ne voit pas aimé…*”这段引文的开头就是 “*Hélas ironie ironie…*”

[99] Lord Lytton致EG，存档于AP（II）/101/95；关于EG觉得如果LL想吻她，多半会狠狠地咬出血来，见她写于1889年10月27日的日记，存档于AP（II）/101/150。

[100] EG，“L’Ami vrai，” in AP（II）/101/150. Hillerin敏锐地观察到《真正的朋友》“是亨利的反面肖像”（235）。

[101] 卡图卢斯（Catullus，公元前84—前54年），古罗马诗人。他继承了萨福的抒情诗传统，对后世诗人如彼特拉克、莎士比亚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2] 关于EG的希腊和罗马文学教育，包括卡图卢斯，见她的课堂笔记本，存档于AP（II）/101/1。

[103] EG，没有编号的校样，标注为“德·玛丽-爱丽丝日志”，存档于AP（II）/101/152。

[104] EG，AP（II）/101/150；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93.

[105] EG拜访莫罗画室的记录，见 “Visite chez Gustave Moreau”，以及好几页没有标题的零星笔记，存档于AP/101/151 and 152。关于莫罗画室和家的装饰，又见Geneviève Lacambre，“De la maison au musée” and “Des œuvres pour le musée，” in *La*

Maison-musée de Gustave Moreau ed. Marie-Cécile Forest（Paris：Somogy，2014），25-68。

[106] 喀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

[107] 海德拉（hydra），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传说它有九颗头，其中一颗头要是被斩断，立刻又会生出两颗头来。

[108] 西牟鸟（simurgh），伊朗神话和文学中的一只仁慈的神话鸟。

[109] 俄耳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一位音乐家。传说他是色雷斯人，故乡是奥德里西亚王国的比萨尔提亚，参加过阿耳戈英雄远征。他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俄耳甫斯进入冥府试图将她带回，但以失败告终。

[110] 欧律狄刻（Eurydice），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精灵，俄耳甫斯之妻。

[111] 希律王（King Herod，即希律一世，公元前73—前4年），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从属王。根据记载，希律是个残酷的国王，为了权位，曾下令杀害自己的家人和多位拉比。但他也是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建设者，他扩建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修建了恺撒利亚的港口，以及马萨达与希律宫的城墙。

[112] 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在《圣经·新约》中被描写为耶稣的女追随者。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公会都把她奉为圣人。

[113] Joris-Karl Huysmans，*A Rebours*（Paris：Gallimard，1977 [1884]），145.

[114] Gustave Moreau，*L'Assembleur de rêves*：*Écrits complets de Gustave Moreau*，*ed. Pierre-louis Matthieu*（Paris：Fata Morgana，1984），78. 和福楼拜和王尔德一样，莫罗和于斯曼也极大激发了世纪末文化对莎乐美的兴趣。Toni Bentley，*Sisters of Salom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22-25.

[115] MB，Égalité，48.

[116] 特罗卡德罗（Trocadéro），夏乐宫（Palais de Chaillot）所在地区，位于法国巴黎第十六区，隔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相对。此名来自西班牙最南端加的斯湾的一个小岛。1823年8月31日，法军出兵西班牙，支持受到叛乱威胁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特罗卡德罗战役中，未来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之子德·昂古莱姆公爵率军击败了西班牙叛军，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绝对统治。

[117] Sylvia Kahan，*In Search of New Scales*：*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Octatonic Explorer*（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9），67.

[118] EG，标注为“拜访居斯塔夫·莫罗”（“Visite chez Gustave Moreau”）的单页笔记，存档于AP（II）/101/151。

[119] EG，AP（II）/101/152中的无标题笔记。

[120] EG，AP（II）/101/152中的无标题笔记。

[121] 例如，OM就曾在“Saturnalia”中把EG比作莎乐美：“此刻她的手中握着的。那是/一个死去男人的头颅。现在她那灼灼双眼中/有制造恐怖的窃喜！她那红红的嘴唇如何能亲吻/那些白色的唇！/是的，那就是她。我认出了/埃罗底亚德”——埃罗底亚德是莎乐美母亲的名字，有时也用于指代女儿。“Saturnalia”被收录在《玛拉》（1892）的一卷中，LL死后，EG听说那是为她而写的；我在第20章较为详细地讨论了那本书。OM，“Saturnalia，”*Marah*（London：Longmans，Green，1892），150.

[122] EG，AP（II）/101/152. 关于莫罗画室前厅挂的列奥纳多的《施洗者圣约翰》的复制品，见RM’s preface to *Exposition Gustave Moreau*，13。

[123] EG，《德·布兰切日志》，存档于AP（II）/101/152。

[124] EG，《德·布兰切日志》，存档于AP（II）/101/152。

[125] EG，in AP（II）/101/152.

[126] EG，1889年4月22日的日记，存档于AP（II）/101/150。

第14章 十四行诗的素材

巴黎。1887—1888年冬。乔治·德·波托-里什遇见了一个新缪斯。她美丽、已婚、富有，是“有生”者——换句话说，跟他完全不是一路人。尽管如此，他预言格雷弗耶子爵夫人将成为他一生的挚爱。“她让男人对自己过去的那些女人充满厌弃。”他写道。[1]而波托-里什阅女无数。[2]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几个月以前，她像个身穿黑衣的白色仙女，看到她的那一刻融化了他胸中的块垒，导致作家十多年无所事事的阻碍一下子消失了。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波尔多军火商。他年轻时，父亲想让他从事银行业或律师，但他顶住了极大压力，成了一名作家。他20岁出头就发表了好几首广受好评的诗歌和几部独幕剧，那些作品获得的正面评价似乎证明了他职业选择的正确性。他的文学前景看似一片光明；波托-里什对自己反抗父亲、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生活深感自豪。就在那时，一切土崩瓦解了。

26岁时，波托-里什对天赋的自信达到顶峰，尝试了他到此时为止最有野心的作品——《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戏剧性事件》（*Drame sous Philippe II*，1875）。这部戏剧背离了他早期作品的浪漫和抒情主题，围绕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16世纪比利时布拉邦公国的一次起义。在表妹热纳维耶芙（那时她还叫贝贝）的帮助下，波托-里什甚至说服了儒勒·马斯内为这部戏剧创作一套原创曲目。但这部作品彻底失败了，评论家们嗤之以鼻，说它简直是个被宠坏的半吊子的虚荣副业。在他们看来，他最大的错误显然是出身食利阶层，而且姓氏里居然还很不幸地带有一个“里什”[3]，它再度突出了他的出身，虽然他试图让人知道他放弃遗产追求艺术，但反对者对这样的牺牲并不买账。一位评论家甚至指责他不但付钱给剧院上演他的作品，“还出价给某些评论家收买

好评”。[4]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戏剧性事件》获得的糟糕评价让波托-里什发自内心地恐惧，以至于这部剧尘埃落定之后，他决心再也不提笔写作了。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他的确恪守誓言。直到他遇到了格雷弗耶夫人。在那以前，他唯一一次违背誓言的严肃尝试是在1886年夏，那年他重读彼特拉克，再度想起文学表达居然可以如此强烈、如此崇高。[5]但那时，波托-里什还缺一位缪斯。现在他终于找到了她，不知不觉，她再度点燃了他的创作火花。正如他对一位最近刚刚表示有兴趣跟他合作的剧院经理所说，“当年初试牛刀后，我太幼稚，居然放弃了写作事业，十年来几乎一事无成。但现在，我再次充满了急切的写作欲望”。37岁的波托-里什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轻时代，灵感迸发、志向远大：他将把诗歌像花朵一样撒在她的脚下。他的戏剧将让她为认识他而傲视众生。[6]

只不过她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波托-里什尽全力改变这一现状。幸运的是，格雷弗耶夫人就住在他的公寓附近，他与妻子莉佐特、他们七岁的儿子马塞尔和一条恰如其分地取名为米塞利（Misère，意为“穷”）的狗一起住在那里，位于爱丽舍宫对面的圣奥诺雷郊区街。得益于住所紧邻，他整个秋冬都在多方打听关于这位美丽的子爵夫人的一切。他在她位于德·阿斯托格街的宅邸的高墙外等待，跟踪她来来往往。他跟着她走过整个街区，步行尾随她那辆漂亮的马车，直到马车扬长而去。她带女儿和狗出门散步时，他也会跟在后面，格雷弗耶夫人有一条小型西班牙猎犬和一条大灵缇，出门溜米塞利时，波托-里什会像童话故事里的顽童那样特意在口袋里放一些面包屑，万一与他心爱的女人走近时，好给她的宠物们一点儿好处。（有一位身穿制服的高大男仆时时处处陪伴着她，波托-里什没有机会靠近，但仍然满怀希望。）



乔治·德·波托-里什远远地爱上了伊丽莎白，为她写了一连串诗歌，后来这些诗歌结集出版，书名为《错过的幸福》（***Happiness Manqué***）

他记下了她在家附近最喜欢逛的书店是阿喀琉斯书店[7]，最喜欢的画廊是乔治-珀蒂画廊。他在一群在花蹊炫耀新衣服的漂亮女人中寻找她的身影。他仔细查找社交报纸上的公告，看她打算去哪些音乐会、戏剧和歌剧，然后每一场都买票去看。他坐在“天堂”的顶层座位上，用观剧望远镜对着她，仔细端详子爵夫人。至少在她为每次演出停留的那段时间里端详她；通常，她停留的时间不会很长。

他在社交界的朋友屈指可数，洛尔·德·舍维涅就是其中之一，于是他总是向她打听格雷弗耶夫人的私生活。[8]她读些什么书？拜访哪些朋友？当她离开巴黎去度假时，会去哪里？当她穿上某件华丽而老派的长裙时，希望取悦谁？她的丈夫对她冷酷无情、不忠于她的传言是真的吗？她对他忠诚吗？她会不会也在找机会出轨？她对表亲孟德斯鸠的喜爱会不会延伸到其他作家身上？

正如洛尔已经多次对波托-里什说过的那样，她本人也偏爱作家——作为彼特拉克笔下的洛尔的后裔，她怎么会不喜欢作家呢？因此她尽可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只不过其中不无夸张编造的成分。洛尔滔滔不绝地讲起亨利和“贝贝斯”两人婚礼当天的盛况，闭口不提她并没有受邀参加他们的婚礼。她描述了他们在巴黎的宅院奢华得令人咋舌，但她也只进去过一次，那是去年春天去参加子爵夫人在那里举办的演奏会。（亨利·格雷弗耶仍然觉得洛尔会对他的妻子产生坏影响，但她与公爵和大公们的友谊，多少还是让他高看她一眼。）

洛尔用沙哑的声音娓娓道出一个她想象的世界，那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是亲王，每一所住处都是城堡。她谈起两年前的夏天，巴黎伯爵被流放前夕，自己和格雷弗耶夫妇作为“特别精选”的小圈子成员，受邀前往德·奥尔良家族在诺曼底的宅邸厄镇城堡去送别伯爵——“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嘛。”她说俄国第二号人物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未拒绝到格雷弗耶家族位于塞纳-马恩地区的地产打猎的邀请，哪怕最近一次打猎出现了一点礼节上的疏忽，令他十分错愕。在追猎中，有一张记录着每一位王公的全名和头衔的卡片，上面标记着他在追猎队伍中的位置或隐蔽处。（相反，非王室成员的隐蔽处只用数字标记：按照洛尔的说法，那个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嘛。）在为大公准备这一特殊标记物时，布德朗森林里的一位猎人搞砸了，漏掉了“殿下”，还把大公的全名简称为“大弗拉”。

洛尔抖这个包袱时，波托-里什没有跟着她一起大笑：他不关心什么追猎，什么隐蔽处，什么大弗拉。他只关心格雷弗耶夫人，关心的程度或许都让他的好友有些厌烦了。不过洛尔还是很耐心地对他。她看似满嘴脏话，其实心肠很软。[9]波托的窘境感动了她，她在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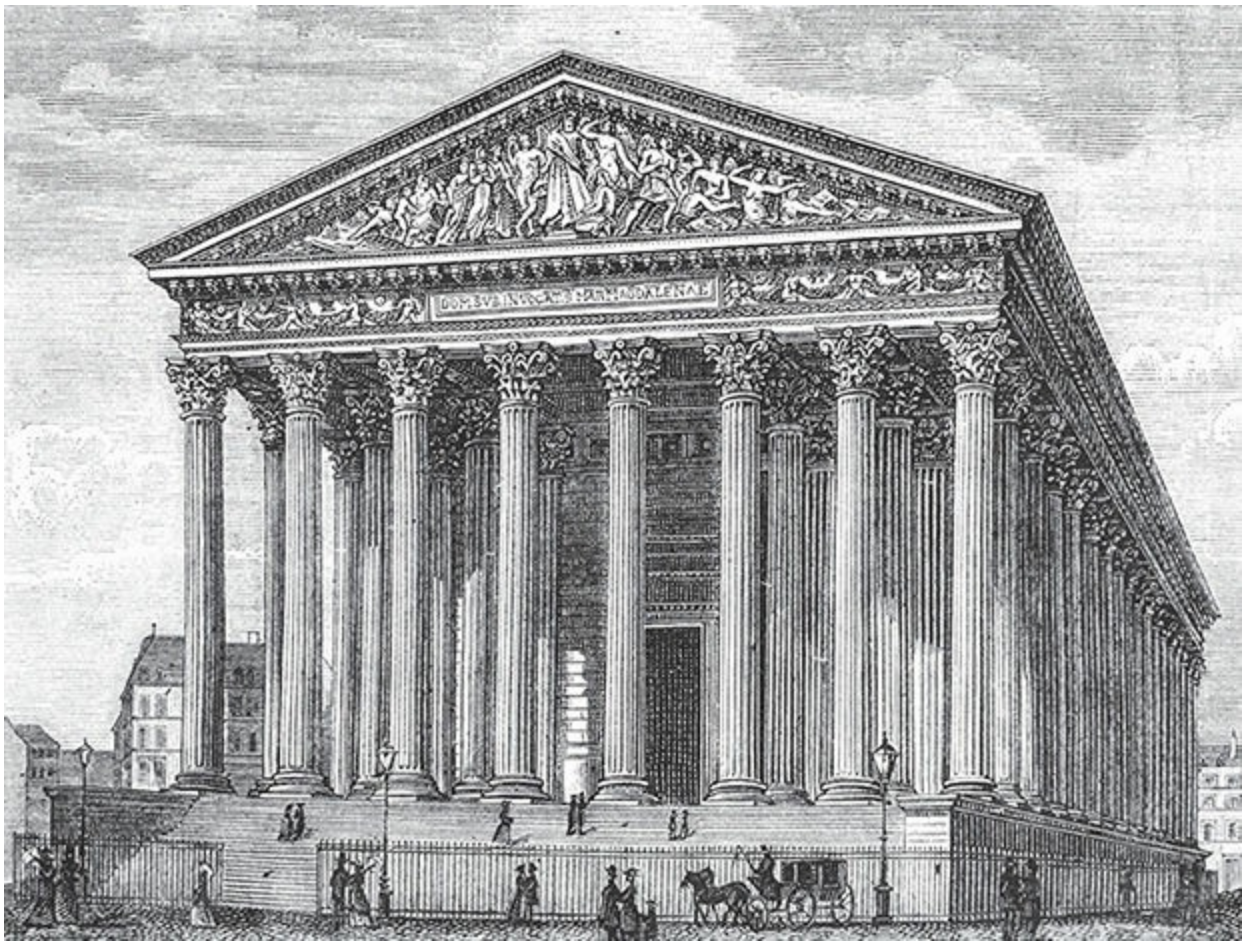
他还没有对他生活中的另一位名媛、他的表妹热纳维耶芙讲述自己的暗恋，虽然他认为如果她愿意帮忙，应该能从她的朋友、格雷弗耶夫人的妹夫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那里搜集一些有用的情报。问题在于，

热纳维耶芙一定不愿意。她经常跟波托-里什倾诉自己跟别人打情骂俏，但每次他谈起自己的风流韵事，都会让她十分恼怒。紫衣缪斯讨厌情敌。

波托-里什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子爵夫人只要在巴黎，大多数星期天都会去玛德莱娜教堂，通常是与丈夫的两个妹妹（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另一个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和婆婆（假发难看，说话刻薄）一起。由于她总是坐在家族祷告长椅的尽头，与其他几位女人保持着一段距离，波托-里什觉得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一封信给她。想想吧，和耶稣受难日祷告时在阿维尼翁的教堂里注视着洛尔·德·萨德的彼特拉克一样，他也把教堂当成了一个只为爱情祈祷的场所。在拿破仑一世（据说“贝贝斯”也是他的后裔）时期，玛德莱娜教堂被称为荣耀的殿堂，是纪念法国士兵的丰碑。[10]波托-里什成功实现自己的计划后，那里将成为世人心目中的爱的殿堂。

他是犹太人，没有亵渎神灵的担忧。“你们那位金色胡须的耶稣……为世人而死。”他写道，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缪斯讲道理了：“但是……我要为你而死。”你：伊丽莎白。他无法面对面地与她交谈，就试图在纸上与她对话，亲密的口气仿佛她已经是他的爱人了。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天，她都会在玛德莱娜教堂自己的祷告椅上发现一封他留下的没有署名的情诗。

波托-里什打算暂不对她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希望在她打听自己的身份之前，有机会用情诗对她展开攻势。他不希望她听到的关于他的第一句话是，“人们曾经读过他写的东西”。在下结论之前，让她读一读他的新作品吧，那是她所启迪的作品。如果她喜欢他写的东西，一定会欣然同意见他。波托-里什自信，她一见他就会爱上他的。女人都是那样。[11]



波托-里什最初追求伊丽莎白的方式是在她位于玛德莱娜教堂的祷告椅上留下没有署名的情诗



为了对伊丽莎白掩盖自己的身份，波托-里什把那些情书交给了保罗·艾尔维厄，见左图，请他用自己的笔迹抄写一遍

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匿名，他还请自己的作家朋友，30岁的保罗·艾尔维厄替他把那些情诗抄写一遍。由于艾尔维厄紧凑的向右倾斜的笔迹与波托-里什垂直的螺纹书法全然不同，这样的伪装堪称完美。艾尔维厄的个性也很谨慎；在热纳维耶芙的八卦沙龙里，他一直以守口如瓶著称。诚然，有些忠实信徒也觉得他是个伪君子。比方说年轻的作家莱昂·都德（Léon Daudet，乔治·比才曾根据其父阿方斯的中篇小说创作了《阿莱城姑娘》）就觉得艾尔维厄：

> 是个保守拘谨、野心勃勃的人，对一切都有冷静的算计。他精明、暧昧、巴结、谨慎，是个完美的狗腿子。[12]

亨利·德·雷尼埃也持同样看法，开门见山地说，“艾尔维厄对人客

气，是因为他精明地算计了那人有何价值”[13]，以及“恐怕就连他备受称赞的正直也不过是实现野心的诡计。……他是个出纳员，是个算计者；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算计”。[14]但至少在热纳维耶芙的朋友圈里，都德和雷尼埃还是少数。大多数忠实信徒看到女主人喜欢艾尔维厄，也就依样说他是最为“言行审慎”之人[15]；小马塞尔·普鲁斯特更是把他夸上了天，甚至说他是“友谊雕塑”的完美模特——看一眼艾尔维厄就知道他绝不会背叛好友。[16]波托-里什假定普鲁斯特是对的，对此深信不疑。

至于他的情人，波托-里什希望他的身份谜团能激发起她的兴趣。前一年5月，他在巴黎重新上演理查德·瓦格纳的《罗恩格林》（1850）时从远处对她眉目传情，剧中的标题人物向布拉邦公爵夫人艾尔莎宣示忠诚时有一个条件：她绝不能知道自己的名字。[17]鉴于伊丽莎白是个著名的音乐爱好者，把自己和他想成瓦格纳歌剧里的人物或许能勾起她的兴趣。

（在这一点上他还真猜对了。这段时间前后，伊丽莎白开始在以她特殊的编码速记法写成的某些日记中用“艾尔莎”作笔名。她也有自己的秘密，但那些秘密与波托-里什无关。）

波托-里什在圣诞节前不久留了第一封情书给她。全诗抄录如下：

从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开始写诗，

但她只对自己的丈夫忠实。

我回家的路上，她经过我的街道；

安坐在马车里，目不斜视。

她的脸颊没有因爱抚而焕发容光；

身上的裙裾还是去岁的款式。

你们这些王后啊，都是忌妒的国王的囚徒，

我见到她，就想起了你们。

如果他曾在教堂里逗留，想看她发现纸条后有何反应的话，他没有把这些写在日记里。不过她确实把这首诗带回了家，放入了一个标记为“来自素不相识之人的敬辞和赏识”的卷宗里。

波托-里什决定继续实验。接下来的六个月，那些诗耗尽了他的才思。他每隔一两周给她写一首新诗，全都没有标题，全都只有几行。他写她的眼睛，写它们如何萦绕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她的“黑眼睛”“摩尔人的大眼睛”“温柔甜美的眼睛”“如此傲慢的眼睛”“太美而令人难忘的眼睛”“（她的）眼睛就是他的应许之地”。

他写她的婚姻，洛尔跟他说过她的婚姻麻烦重重：“她很少出门；是个诚实的贤妻。/他们说她不快乐。/他们说她读诗歌/而她终日等待着自己严厉的主人回家。”

他写自己为了追求她而想出的“每一次努力，每一个计谋”：“我从12月起就站在你的屋外等你”；“我到处寻找你，/在剧院（和）森林/……我在报纸上遍寻你的名字”；“我跪在你那满墙壁画的教堂”。关于教堂，他暗示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我亵渎了神圣，不为众人，只为你，我美丽的基督徒”）并吹嘘上帝之子也比不上他：“我比耶稣更有勇气”；“比你们基督徒的物神更勇敢，/我会带给你永恒的爱。”他的确带着一种恋物癖的热情描述她的衣服，仿佛它们能替代他渴望拥抱的那具身体。“在剧院的人群里，我蹭了蹭你那件中世纪的裙衣。”“我跪在你身后，碰触你裙子的褶边；/那件裙子你穿上那么合身。/你身上的衣裙，仿佛已经是我的情人。”在这些，乃至他为她所写的所有诗行里，

她都是“你”，与他身心合一。他对她的爱超越了一切礼仪规矩。

一天，伊丽莎白把扇子落在了教堂里。波托-里什带着扇子逃走了，把自己的下一首诗涂写在它丝质的皱褶中：“终有一天，这把扇子会在她的嘴边扑动，/人们会看到她脸红，会好奇那是为何。/那是因为她在自己不可信赖的唇边/感受到我送出的看不见的吻。”

按顺序读下来，他的诗描摹出一个不稳定的情感弧。在最初那些诗中，他卑躬屈膝。“我是一介平民，爱上了女王，/但女王不爱我。”[18]“你生命中一个可怜的魔鬼……/但愿你知道，美丽的陌生人，他多么热烈地爱着你啊！”“我忠实的心属于你；/如果你一定要羞辱它，随你。”恳求者的立场对波托-里什并不容易，他一向自认为是个登徒子，是萨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19]（1747）中那位冷血的瘾君子。波托-里什习惯了轻而易举地俘获女人心，继而不假思索地让她们心碎。

1月底，与伊丽莎白裙衣的亲密接触让他恢复了一些登徒子式的自负：“你一定会遇到那位追踪你的足迹的情人……/你可知道等待你的是怎样热烈的激吻？”但他的乐观心态不久就逐渐消失了，被单相思之苦一点点侵蚀：“人们问我是不是病了；/心痛让我的白发和皱纹越来越多，/我觉得37岁的我，真的老了。”在另一张纸条上，他威胁要从她的生命中彻底消失：“我以为为你写下这些悲伤的诗句/可以给我黑暗的日子带来些光明。/但我已不堪忍受了。……/我总是歌咏自己的伤悲/这份苦太重太深。”

留诗给她的做法也失去了新鲜感。他渴望与她面对面交谈，写信请求她让他去招待会拜访她。但她不为所动。“我一步也迈不进你生活的世界。”他抱怨道。他知道她邀请了其他艺术家去她的沙龙，为什么他就不行呢？

2月，他再次遭受打击。波托-里什跟着伊丽莎白和她的一伙朋友进了阿喀琉斯书店，藏在一个书架后面偷听。他听到的话瞬间击溃了他的自信心。他简短地记述了那次事件，标记为“188_年2月。阿喀琉斯书店”。“我全都听到了。你的朋友们对你说我是/一个无可夸耀的诗人和没有家世的男人。/的确如此，我不值一提；但尽管我出身卑微，/我也有感觉，也会痛苦，和最伟大的男人没有差别。”

他再次提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重复了《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悲叹（当时这部喜剧正在奥德翁国家剧院排练——他和伊丽莎白都出席了首演之夜，两人都是独自去的[20]）。“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和）血气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负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21]

我们会的，波托-里什坚定地想。第一次，一丝复仇的火苗悄悄爬进了他的诗句。他伤心地想象自己未来在文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会永远打败那些势利眼：

> 明天还有谁会记得你的朋友？
>
> 他们死后会变成无名的头骨和丑陋的灰烬，
>
> 而我，今天看似籍籍无名，
>
> 将对后世有无限价值。
>
> 一旦结束这些耻辱和怨怒的日子，
>
> 我的名字将在爱神的年鉴里长存。

这次爆发是情感宣泄，却只给了他一时的安慰。向伊丽莎白的朋友

透露他正是她的同伴们在书店里诋毁的“无可夸耀的诗人”之后，波托-里什不再像以往那么确信她对自己的追求不做回应并非对他的个人偏见了。她现在知道了他是谁，却仍视他为无物。

波托-里什担心艾尔维厄出卖了自己，就不再让他做中间人了。[22] 他开始用自己的笔迹给她写诗，把它们寄到她的巴黎住所。整个春天，他一再恳求她同意见面详谈。他说他的社交资质比她预想的要好：“我的好些朋友都受邀去你家了……/拜托你，也对我打开你的门吧……/虽然我来自波希米亚，/但我对沙龙礼仪一清二楚！”为假装上流社会的风流潇洒，他像德·萨冈亲王那样留长了头发，也是同样艺术家风格的桀骜不驯的样式，看上去就像他的头顶有一座火山即将爆发。波托-里什浓密的头发基本上还是黑色的；一旦它们变白，就和时尚之王的样子没有什么区别了。

伊丽莎白对波托-里什的新发型无动于衷（她大概根本没有看到——她看剧的那些夜晚，观剧眼镜从来不会朝上看向“天堂”的方向）。他改变了方针，开始谈论自己的性技巧：“我梦想过要给你生命中最棒的五分钟。”只有五分钟？他调整了语调：

一旦我把你长久地拥入怀中，

你就不再会介怀我低微的出身。

你会如饥似渴地盼望享受过的狂喜，

我会用数不清的激吻唤醒你沉睡的双唇。……

我是情爱天才，令所有的男人眼红。

还是石沉大海，他开始诉诸她对艺术的热爱，那是社交界报纸的读者们共知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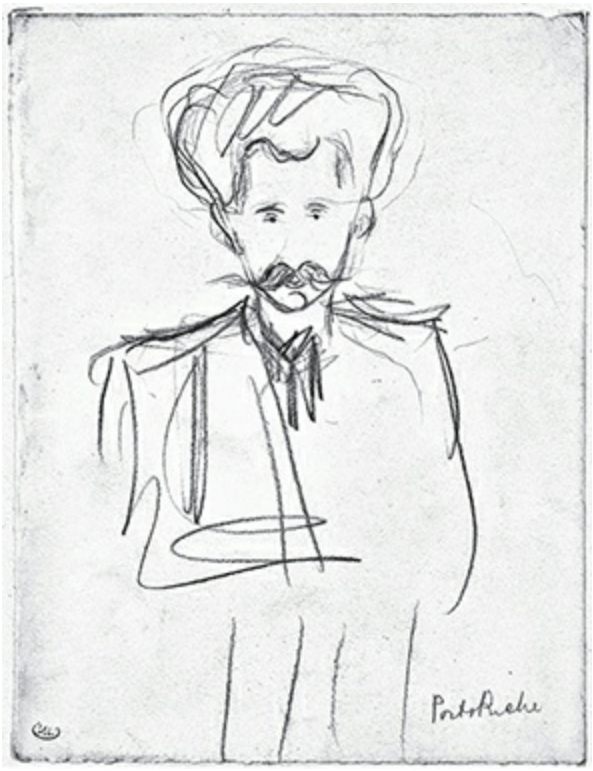
啊！你不光是个贵妇人，还是个艺术家……

用你启迪灵感的目光和你隐秘的爱意。

看在所有打动过你的传奇的份上，

看在所有珍爱过你的天才的份上，

请对一个无名的可怜虫仁慈一些吧，他所祈求的只是仰慕你。



波托-里什模仿德·萨冈亲王留了一头马鬃一样浓密的长发。法国-意大利海报设计者莱奥内托·卡皮耶洛（**Leonetto Cappiello**）画下了他的这个新形象

她毫不仁慈。她的态度没有一丝缓和，迫使他再次幻想待他功成名就的那一天，那些躲避他的人必会后悔。“你会买我的小说，为我的戏剧鼓掌。……/终有一天，我成名成家，/或许那时，你会但愿自己认识

我，/你会后悔这一段虚度的似水年华。”

但虚度年华的是波托-里什，“在怨怒和羞辱中度日如年。”[23]到那年6月，他已经束手无策了。他愤怒地回击，警告伊丽莎白一旦她失去容颜，一定会后悔曾经轻视过他：

未来是公平的，会给我复仇的机会。

十年后，我会嘲笑你的奚落……

会比你快乐得多。……

那时没有人再跟踪你，而我，一个恢复了平静的诗人

也不会再送情诗给你。

那时你会后悔曾经的冷漠：

你会又丑又老，又从未曾爱过。

说她韶华易逝显然无法赢得他渴望的美人心。因此波托-里什祭出了自己的撒手锏。7月，他开始与另一个女人寻欢作乐，还在写给伊丽莎白的诗中得意地炫耀：“我的情人和你一样美；/和你一样柔弱易碎。……/当我们的贪欢结束，/我们会一起散步，路过你住的房子。”[24]那段时间，他不再写信给她了。让她好奇去吧。让她烦恼去吧。

巴黎。1888—1889年冬。波托-里什恨自己不争气，但他不得不宣告失败。他已经近六个月不与伊丽莎白——自从她的公公那年9月去世，她如今已经是格雷弗耶伯爵夫人了——联系了，然而这一成就并非源于他自己的克制，而是她从社交圈消失了。（他从报纸上得知她出城旅行去了，还得知她公公去世和随之而来的服丧期。）12月，他在城里再次见到她的那一刻，“（她）像第一次俘获我心时那样身穿一袭黑

衣”，所有的意志力都土崩瓦解了。距离他第一次在玛德莱娜教堂给她留情书，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他崩溃了，给她写了一首新诗。从这时起，他会像“所有珍爱过你的天才”彼特拉克、龙萨[25]和莎士比亚那样为自己的颂诗编号。他用这些诗再次开启了追求她的脚步：

啊，她来了，她又回来了，像上一季一样高高在上。……

六个月那么长，她小小的心灵那么坚硬，竟从未

想起来问问我如何挺过了没有她的时光，从未曾问问

我做了些什么，甚或爱她是否仍是我生命中的大事。……

她的马车从我身边过去了，马儿一路小跑；她的灵魂，玩偶的灵魂，

似乎牵挂着他人的爱慕，他人的亲吻。

我本想要跟随她的，冷酷的女人——

但她小小的心灵从未把我过问。

伊丽莎白一如既往地无视他，对他奚落她“玩偶的灵魂”也处之坦然，他本希望这么说可以刺激她开口说话的。他推测她大概还在为他不忠的消息而难过。于是又写了一首诗，通知她说自己争强好胜的一时欢乐已经结束了：“我冷漠地赶走了/我短暂的情人。/她哭了，身穿平庸的蕾丝裙的她/并非不妩媚温存。”他现在是伊丽莎白的人了，只要她愿意。

她毫不动摇的沉默迫使他更严肃地考虑他所说的她的“隐秘的爱意”到底是什么。要是伊丽莎白的心真的属意于他人的爱慕、他人的亲吻呢？一年前，波托-里什曾把她描述成“一个诚实的妻子”“只对自己的

丈夫忠实”，但她的贞洁会不会只是表象？会不会她愿意违背结婚誓言——只不过不是为了他？

波托-里什为了寻找线索，在2月的一场音乐会上用观剧眼镜审视着她。在黑色的丧服映衬下，她的脸像大理石一样苍白肃穆，她的目光如未点燃的炭一样毫无生气。但就在那时，音乐出现了变化，她也一样。当弦乐队奏出波澜起伏的和声“引出了爱的忧伤”时，她的眼中重新跳动起炫目的火焰。这一变化让他确认了自己最深的恐惧：“有人把她从我这里带走了。”

不久，他的焦虑就变成了愤怒。波托-里什为了赢取她的芳心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一想到她在为另一个男人而憔悴，他简直怒不可遏——毫无疑问，那一定是个贵族男人。他在日记中咆哮：“那么，她只挂念那些出身高贵的情人了——我藐视他们每一个人！”[26]他让伊丽莎白知道自己的愤怒，尖刻地（在给她的信中）以第三人称如此写她：“她无疑会对头衔高贵的轻浮情事点头应允。”波托-里什是一介平民，爱上了一位女王，但女王不爱他。“经过了整整一年漫长的挣扎，我甚至连她的手都未曾碰过。”

不过他还可以做些别的：查出她的秘密。他把这一点透露给她：“我对她的了解胜过她自己，/整整一年，我跟着她，/身心投入，亦步亦趋；/我看到了一切，我洞察一切。……/我会是第一个猜出她的所爱的名字的人。”

当他询问洛尔·德·舍维涅，伊丽莎白是否可能有婚外情时，洛尔当面嘲笑了他。“你疯了，你疯了，你真的疯了！”她大声叫道，那是她因吃惊而不知所措时的标准抗议。然后她对他分析了原因。首先，亨利·格雷弗耶绝不会对这样的背叛坐视不管；据说妻子哪怕有一点违背他的意愿，他都会动手，通奸断无可能。此外，人人都知道伊丽莎白对“那个”没兴趣——她永远都用童贞女王和童贞女神的装束提醒人们这一

点。更何况亨利·德·布勒特伊曾对洛尔讲起最近一次拜访迪耶普时，他发现伊丽莎白“瘦削而紧张，焦虑不安，没有胃口”——看似已经被某种不知名的疾病折磨了至少一年。根据洛尔的内行观点，这听上去不像是个恋爱中的女人。

作为男人，一个朋友们都把他的暗恋误会成疾病的男人，波托-里什用恳求的语气说出了不同意见。“如果贝贝斯憔悴了，”他叹道，“那就是贝贝斯恋爱了。”洛尔假装被他的双关语逗笑了，但波托并没有笑。[27]

他强迫自己专注于工作。1月，他在《插图评论》（*La Revue illustrée*）上发表了一个独幕喜剧，名为《弗朗索瓦丝的运气》（*La Chance de Françoise*，1889），那时他的好友莫泊桑也以一段失败的爱情为灵感，刚刚开始在同一本文学评论杂志上连载自己的最新小说《如死之坚强》（*Fort comme la mort*）。在《弗朗索瓦丝的运气》中，标题人物死心塌地爱着自己的丈夫马塞尔，马塞尔自诩登徒子，能够忍受她的崇拜，却还是后悔娶了她。整部剧中，弗朗索瓦丝面对马塞尔对婚姻充满疑虑和不忠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仍毫无根据地坚信终有一天她的运气会转变——“弗朗索瓦丝的运气！”——那时，丈夫会认识到他爱的还是她，只有她。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构成了整部剧的讽刺架构，产生了始料不及的感染力。

出乎波托-里什的意料，《弗朗索瓦丝的运气》竟然大获成功，因苦涩尖刻而毫无感伤地刻画了两性关系而备受赞誉。评论家们欢呼他是个天才，是这种从根本上充满现代性的戏剧体裁——情爱剧（*le théâtre d’amour*）——的发明者。[28]几乎一夜之间，他又从一个毫无指望的半吊子变成了巴黎戏剧舞台上的焦点。

在那些很了解他的人看来，波托-里什这部突围的剧作描述的婚姻很像他自己的婚姻。（正如他的朋友朱尔·勒迈特在一篇头版评论中赞

颂的那样：“这是一位取材于真实生活的丈夫！源于生活！”[29]）起初他的家人和莉佐特——她是波托-里什的嫡亲姨表妹——的家人都试图阻止两人结婚，但这些障碍反而激发了他的热情。但莉佐特刚成为他的妻子，他就对她丧失了兴趣，与一个又一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还辩解说这是在为作品收集素材：“这不是不忠，是调研！”而被儿子拴在家里的莉佐特痛苦地意识到波托-里什在外面的风流韵事之后，却仍然爱着他，并坚信他最终一定会转变。当弗朗索瓦丝贬低自己“只是个一生只会爱一个男人的小傻瓜”[30]时，洛尔·德·舍维涅或许觉得那是可笑地向她本人致敬，但波托-里什的其他朋友则听到了可怜的、被亏待的莉佐特的声音。

这些朋友不知道他心碎的秘密，因而不可能知道，波托-里什刻画的弗朗索瓦丝其实有他自己的影子。在下流的人格面具下，他是个像她一样毫无希望的多情之人，得不到所爱之人一点鼓励，却仍然坚持爱着那人，哪怕还有可能会遭到背叛。“如果我有权悲哀，一切就容易多了。”[31]当马塞尔谴责弗朗索瓦丝为自己玩弄女人日益不安时，弗朗索瓦丝叹道。波托-里什也没有权利悲哀。他得不到伊丽莎白的心。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新近的声名大噪显然彻底改变了她的看法。《弗朗索瓦丝的运气》开演后不久，伊丽莎白打破沉默，对波托-里什发出了他等待已久的邀请，请他来参加自己的家庭招待会。震惊之余，他把她的指令写成了诗歌：

我会在她丈夫出城时把名帖留在她的屋前；

她会遵守新的原则，为我打开她的房门。

后来，如果她的丈夫问起，她会微笑地对他说

一天夜里在歌剧院的前座有人介绍诗人给她认识。

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们见到过我的悲伤，

会对我们伸出帮助的手。

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为“乔治的运气”而欣喜若狂。

塞利斯贝格。1889年7月。波托-里什与妻儿一起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度假。他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我逃离了她令人不安的目光。……/我并没有她想的那么好/最好还是逃跑。”他最好还是逃跑，因为说到底，与她上床并不会让他快乐。反思过后，波托-里什觉得自己在两人关系中的一切快乐皆在于想象，在于追逐：“我一直在渴望和追逐/最真切的欲望，最纯粹的梦境；/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陌生人/渴望她为我创造幸福的未来。”正是因为她高高在上，才激起了他的欲望。一旦他看起来能够真正拥有她了，他对她的欲望就消失了，就那么简单。

或许也没那么简单。

诚然，波托-里什的爱火并非一夜之间熄灭的。在伊丽莎白打破沉默之后那一个半月，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想念她，对她如此惊人的诱惑天赋充满怨愤。在吩咐他把名帖留给德·阿斯托格街的门房后，她巧妙地没有提出他们见面的具体日期。相反，她给他布置了一连串更难以完成的指令：在赛马会上，我那一束花中一朵康乃馨的花瓣里藏着一封信，找到它；把你的回信留在阿喀琉斯书店一本海因里希·海涅的诗集里；幕间休息时，在喜歌剧院的大厅里塞给我一张纸条。这些不无幼稚的小花招提高了波托-里什的期待，让他幻想自己和伊丽莎白走入了一部托尔斯泰小说或莎士比亚悲剧的书页里，爱情危险而不可抗拒，值得为它冒险，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只要她坚持这样的策略，她会一直拥有他。

然而到了4月，她开始显得过于急切，几乎带着一种绝望，敦促波

托-里什快些跟她幽会。他试图警告她，她正在破坏爱情的乐趣：

啊！不要那么快就离不开我了！还是轻蔑吧，善变吧；

你不知道，亲爱的放纵的姑娘，我还能忍受许多苦痛。……

让我们等待吧，等我因为你的拒绝，对你的感情更加炽烈……

请不要让你那条太过大胆的裙子露出太多乳沟。

你会在八月屈服于我——到那时，我将彻底赢得你的心。[32]

然而伊丽莎白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仍催促他与她约会，她的急切引起了他的怀疑。她到底为什么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对她那样一个女人，一部独幕剧的成功真的会引发爱意吗？即便如此，她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要结束这场追逐游戏，那可是她带头玩的，而他显然乐在其中？

波托-里什思考着这些问题，再度怀疑她大概有另一位爱慕的对象。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她突然如此急切地想要见他很可能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挑起他的情敌的忌妒。

波托-里什再度通过远距离观察伊丽莎白来寻找答案。复活节周日，他跟着她来到了玛德莱娜教堂，在弥撒期间窥视着她。虽然一条淡紫色的面纱遮挡着她的脸，但她的手不停地伸入面纱下面，紧攥着一块潮湿的手帕。波托-里什顿时明白了一切。他本人（尚且）不是她哭泣的理由，所以她一定在为另一个人哭泣。他气愤地想，那必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情人”了，“我的心无关紧要”。

夏洛克还会找机会报复的：波托-里什知道他将如何让她付出代价。他会同意幽会，一见面就争取跟她上床。不管她是否屈服，他都会在事情结束后把她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世。“我会毁掉她的名声/来补偿我的失败。/我会用我仇恨的指控，/败坏她珍贵的名誉，/没有人会怀疑我，/瞧，我已经有过那么多次成功。”[33]如果伊丽莎白要嘲笑他是个粗鄙之人，他完全可以做出粗鄙的样子给她看。

但事到临头，波托-里什却还是做不出那么卑鄙的事。在定下幽会的日子之后，他用这篇冷漠的诗歌取消了他们的约定：

我不知为什么在她所给的爱面前退缩了；

或许我还在算计虚度的年华，经历的苦痛。

希望与渴念的兴奋感从我的胸中消失了；

我重新找回了过去那位邪恶的登徒子……

我会背叛她，那是一定的；一旦我的快乐消失，

我会从毫无悔意中获得意外的喜悦。

波托-里什还是用他的笔发出了最后一击。他把写给她的整组诗发表在了《插图评论》中，取名《错过的幸福：一个恋爱中的男人的日记》（*Bonheur manqué*：*carnet d’un amoureux*，1889）。他希望通过发表诗歌，让伊丽莎白明白整个过程都是他在利用她而非相反，促使他追求她的是艺术的野心而非爱情。他编了一句格言，讲述像她那样的女人为何不该低估他这样的男人：“就算在床上，作家们也在想/不是想他们的情妇，而是考虑名声。/亲爱的美人，你不过是，/十四行诗的素材，小说中的人物。”[34]让她觉得自己被利用、被暴露，那就是复仇。那就是他要的公正。

然而波托-里什还是宽厚地并未一击致命，他没有公开她就是诗人在《错过的幸福》中对话的那个女人。[35]鉴于她众所周知的高不可攀和名望，透露这段秘密的文学纠葛给波托-里什带来的宣传效果，可能是他写一辈子成功的戏剧也达不到的。尽管如此，在把诗歌交给《插图评论》之前，他还是把诗中那个女人从深褐色头发的女人改成了金发女郎，并改动了所有可能让人联想到伊丽莎白的地点和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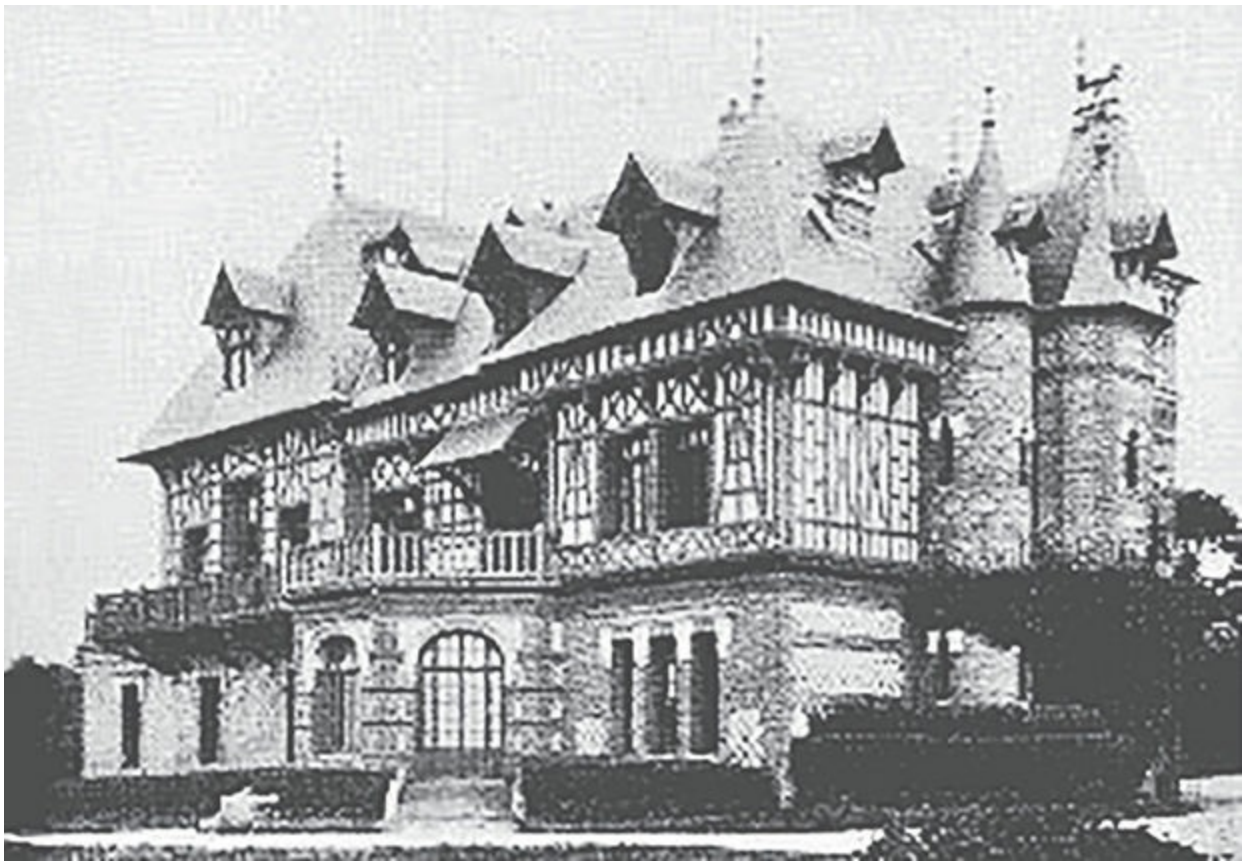
剩下的唯一一个指向她身份的线索，出现在他为这套组诗选择的引言中。在他收到的她最后几封信中，她曾对波托-里什说她对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和乔治·桑之间的强烈情感着迷不已。当时，波托-里什把这当成了对他的鼓励。作为他和伊丽莎白这段浪漫感情的范例，缪塞和桑的关系与他原本想象的模板一样诱人：罗恩格林和艾尔莎·德·布拉邦。因此，他最后一个浪漫感伤的姿态，就是在《错过的幸福》引言中使用了一段缪塞的引文，听起来像是罗恩格林说的话。那是要对情人的名字永远保密，以此来保护一段神圣爱情的誓言："如果你觉得我会告诉你/我大胆爱上的是谁/即便你给我一座王国，/我也不会说出她的名字。"[36]只有伊丽莎白会知道这些句子是写给她的——那是一位奴仆对他的女王虔敬的道别。

完成杰作之后，他带上莉佐特、马塞尔和米塞勒一起出发，前往瑞士度夏。波托-里什声称他想躲开混乱喧闹的巴黎世博会，但那是谎言。他只对伊丽莎白承认了真相："我要去一个远离法国的地方，一个不是所有的鸟儿都会用你的声音歌唱的地方。"[37]

迪耶普。1889年8月。最终，波托-里什还是无法逃避。他把莉佐特和马塞尔留在瑞士，独自一人赶回了巴黎，又从那里去了迪耶普，伊丽莎白正在那里度夏。他无视热纳维耶芙一连串打听他近况的信件，热纳维耶芙太了解他了，已经感觉到他会惹是生非。[38]她像洛尔·德·舍维涅一样，想知道波托-里什到底是不是疯了。

他没疯。他的热恋让他一时冲动来到了诺曼底，但让他留在那里的却是他的艺术。事情是这样的：他一到塞利斯贝格，就收到了伊丽莎白的信，是经由巴黎转到这里来的。在信中她敦促他“大胆地踏入你觉得环绕着（她的住所）的‘恐怖区域’”[39]，来海滨拜访她。几天的忙乱之后，他来到迪耶普，住进了位于阿瓜多街（rue Aguado）的一家旅馆。他的房间正对通往大海的木板人行道，从那里可以看见远处格雷弗耶家族的地产，虽然远，却是城西海岸线上的一个清晰的黑点。那座房子坐落在风中一个孤立的悬崖上，与世隔绝，遗世独立。当波托-里什步行上岬角到那里拜访她时，他心中再次充满了那种熟悉的不自信感，用他在日记中引用的维克多·雨果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是一条蚯蚓，爱上了天上的星。”[40]

波托-里什准备好了接受伊丽莎白的鄙视，所以到达庄园后，看到她像老朋友那样欢迎他，或至少把他当人看待，他大吃一惊。她亲自为他开门，仆人们在她的身后忙碌着，其中一位用水晶杯给她送来了橙汁，另一位送来了一方小小的蕾丝手帕——放在一个光洁锃亮的银托盘里。除了仆人之外，伊丽莎白似乎独自一人住在这座高高在上的豪华城堡里，他第一次觉得她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甚至还有些孤独。



1889年夏，波托-里什在伊丽莎白的召唤下，中断了与家人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旅行，她邀请他到拉卡斯庄园拜访她

后来，波托-里什只用一连串零星的笔记记录了他们那次见面的细节。但那些笔记表明，伊丽莎白希望谈论的是她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他的：

> 于是她就那样，谈兴甚浓地告诉我，做一个漂亮女人、一个被崇拜者缠绕的美人是怎样的感觉，有着怎样的欢愉。她从未体验过比那更美妙的感觉。她只尝过被男人效忠的甜美。[41]

伊丽莎白也清楚地表明，让她备尝甜美的效忠来自比波托-里什身份高贵得多的追求者，这促使他再度对那些“出身高贵的情人”燃起了怒火，在她的心目中，他们终究比他高出一筹。他在日记中重复道：“我

藐视他们每一个人！”[42]

唯一的可取之处是：伊丽莎白的坦白让他获得了一部新作品的灵感，他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波托-里什随手记下了核心构思：

“中篇小说”

一个在其他男人看来仍然美丽优雅的贵夫人独自一人，被丈夫忽视和抛弃，她也不爱丈夫。

她打算和一位身份非常高贵、行踪非常不定的（划掉了）男爵开启一段婚外恋。他们打算（看不清）艺术。他们的婚外情将以通信的方式进行。[43]

在另一篇涂鸦中，他写道：“热拉尔忌妒了吗？”[44]

波托-里什告诫自己，这些句子为他指出了一条解脱之路；它们会帮助他弥补自己的错误。是的，他中断假期、风尘仆仆地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赶往英吉利海峡，却只听到伊丽莎白再度确认他不是她所爱之人，的确愚蠢。但这一次，作为对他忠诚的回报，她给他的礼物远比她的芳心更加珍贵。不管无心还是有意，她把自己的故事送给了他。

---

[1] GPR，*Bonheur manqué*，首次发表于*La Revue illustrée* 81（May 15，1889）：313-23。除非特别说明，引用的均是这一版本的《错过的幸福》，因为它们最贴近EG从GPR那里收到的手写原文；起初在教堂写下，后来又用邮件寄给了她。她把大部分原诗和信件都存档保留下来，见AP（II）/101/1。这些诗歌的时间顺序——有些作者以邮件发送的可以邮戳为证——后来在《错过的幸福》的成书版中被打乱了。

[2] 本章关于GPR的生平信息（从他征服的女人到他早期的文学成就再到他十年的写作障碍）的出版资料包括Edmond Sée，*Porto-Riche*（Paris：Firmin-Didot，1932）；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le Faubourg Saint-Honoré*；*A. Antoine*，

Mes souvenirs sur le Théâtre-libre（Paris：Fayard，1921）；Hendrik Brugmans，*Georges de Porto-Riche*：*sa vie*，*son œuvre*（Geneva：Slatkine，1976）；Lavedan，“Un raffiné：Georges de Porto-Riche”；Charles Monselet，“Théâtres，”in *Le monde Illustré*（July 5，1873）：11；HR，*Nos rencontres*。

[3] *riche*，意为“富有”——译者注

[4] 除特别标注的之外，本章的档案资料包括（请注意GPR档案的卷宗编号混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原始资料的编号混乱）：GPR和艾尔维厄致EG的未签名信件，存档为“Lettres d’un soupirant inconnu，”见AP（II）/101/1；GPR致EG的其他信件，存档于AP（II）/101/107；GPR，NAF 24951，folios 16，30，76，80，and 88；GPR，《错过的幸福》的片段和草稿，存档于NAF 24951，folios 40-70；GS 致GPR，存档于NAF 24944，folios 260/261，262/263，and 494/495；LC致GPR，NAF 24954-24955 and NAF 24980；EG致GPR，存档于NAF 24971，folios 185-91，以及GS致GPR，存档于NAF 24971，folios 262/263 and 358/359。

[5] GPR，NAF 24951，folio 156.

[6] 关于GPR重燃起创作天才作品的决心，见GPR，存档于NAF 24951，folios 5 and 79。

[7] 这间书店是世纪末人们很爱去的地方。Jules Claretie写道，阿喀琉斯书店的顾客们常常能在那里遇到著名政治家和知名作家（如他本人）。Claretie有一次偶尔听到一位优雅的老妇人请阿喀琉斯的店员指给她“最新的严肃书籍”——原来她是被废黜的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寡妇欧珍妮皇后。Jules Claretie，*La Vie à Paris*：*1898*（Paris：Charpentier，1899），9.

[8] GPR，NAF 24951，folio 24；以及GPR致LC，见NAF 24980，folio 17/18。AF确认了LC关于的婚礼所说的话都是谎言，见AF，“Le Salon de l’Europe，”476。

[9] LC致GPR，NAF 24955，folio 228；以及GPR致LC，NAF 24974，folio 31。

[10] *Le Guide pittoresque de l’étranger dans Paris et ses environs*（Paris：Jules Renouard，1843），92；*Description du fronton de l’église de la Madeleine*（Paris：Gauthier，1834），6；and Lebrun（pseud.），*Manuel complet du voyageur dans Paris*（Paris：Roret，1843），294。

[11] GPR，见NAF 24951，folio 44。

[12] LD，*La Melancholia*（Paris：Grasset，1928），205.

[13] HR，*Les Cahiers*，468.

[14] HR，*Les Cahiers*，492。

[15] *Les Hommes du jour*：*annales politiques*，*sociales*，*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1911）：n.p. 参见以如下内容开篇的无标题戏剧评论，“*Des gens*，*sans doute bien intentionnés*，*ne cessent de nous proposer*，*depuis dix ans*，*pour modèle parfait*，*le théâtre de M. Paul Hervieu*”。

[16] MP，*Letters to a Friend*，preface by GL，trans. Alexander and Elizabeth Henderson（London：Falcon Press，1949），22.

[17] Albert Gier，“Marcel Proust und Richard Wagner：Zeittypisches und Einmaliges in einer Beziehung zwischen Literatur und Musik，” in Thomas Hunkeler（Frankfurt：Insel，2002），142；and Prod’homme and Arthur Dandelot，*Gounod*：*sa vie et ses œuvres*，*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Paris：Charles Delagrave，1919），213. Prod’homme 和Dandelot写道，这次制作出演的《罗恩格林》打败了《浮士德》，成为巴黎社交界最喜欢的歌剧。

[18] 原文是：*Je suis comme Ruy-Blas*，*amoureux de la reine*，*/Mais la reine ne m’aime pas*. Ruy-Blas是维克多·雨果1838年的一部戏剧中的同名主人公，这位契约平民痴迷西班牙女王，后者冲破禁忌回报他同样的爱。或许GPR知道雨果是EG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或许不知道。不论如何，这段典故太长了，不大适合纳入我对这两句诗的译文。

[19] 《克拉丽莎》（*Clarissa*），英国作家萨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于1747—1748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克拉丽莎·哈洛的悲惨故事，她对美德的追求总是被家庭挫败。哈洛家是暴发户，一心只想提升社会地位，他们总是不肯放过对女儿克拉丽莎的控制，克拉丽莎最终因此而死。

[20] 一部由Edmond Haraucourt根据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编、由加布里埃尔·福莱作曲的法文三幕剧于1889年12月在奥德翁国家剧院开演。Edmond Haraucourt，*Shylock ou le marchand de Venise*（Paris：n.p.，1889）；and *Le monde Illustré*（December 28，1889）：402. 事实上，GPR不知道的是，福莱曾于1889年10月写信给EG，说就是因为参观了她“美丽的花园”，才让她获得了灵感，创作了一部特别“精巧的乐句——一部威尼斯的月光曲——献给夏洛克”。经RM介绍，EG对福

莱的提携始于一年前。这封关于夏洛克的月光曲的信件引文见Jean-Michel Nectoux，*Gabriel Fauré*：*A Musical Life*，trans. Roger Nichols（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45。

[21] 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

[22] 见GPR关于在“格（雷菲勒）夫人和乔（治）及保（罗）”一事上他的朋友“P”的“出卖行径”的笔记，存档于NAF 24979，folio 17；又见GPR所说的关于“失去的友谊，决裂”的话，存档于NAF 24951，folio 70。GPR还对HR抱怨过艾尔维厄的“恶意算计”；见HR，*Nos rencontres*，124。GPR的怀疑都是有根据的；如第21章所述，艾尔维厄1888年春就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给EG写信了；见AP（II）/101/1。

[23] GPR，NAF 24951，folio 66.

[24] 这是GPR把《错过的幸福》手稿交给《插图评论》时从中删去的若干诗歌中的一首。但这首诗出现在了成书中；见GPR，*Bonheur manqué*（Paris：Ollendorff，1908 [1889]），26。

[25] 比埃尔·德·龙萨（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诗人。19岁时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这位本来一心侍奉神的少年情窦初开时，出于对美丽的卡桑德拉的爱慕，龙萨开始了爱情诗的创作。他在1552年为自己的女神写下著名的十四行诗《爱情》。因为作品大获成功，龙萨从此便被承认了作家的身份，并被公认为卓越的爱情诗人。

[26] GPR，NAF 24951，folio 16.

[27] 波托-里什的哀叹，“如果贝贝斯病了，那就是贝贝斯恋爱了”取自让·拉辛的悲剧《贝雷尼丝》（1670）中的一句著名台词：“如果蒂图斯妒忌了，那就是蒂图斯恋爱了。”继发明了所谓的“情爱剧”之后，波托-里什后来又被称为“犹太拉辛”。——作者注

[28] RF，“Théâtre d’amour：Georges de Porto-Riche，” *La Presse*（July 13，1898）：4.

[29] Jules Lemaître，“*La Chance de Françoise* de Georges de Porto-Riche，” *La Revue illustrée*（January 1，1889）：1.

[30] GPR，*La Chance de Françoise*（1888），in *Théâtre d’amour*，15.

[31] GPR，*La Chance de Françoise*（1888），in *Théâtre d'amour*，41。关于GPR自己的"运气"，见NAF 24974，folio 88。

[32] GPR，见NAF 24951，folio 56。

[33] GPR在一篇名为"Poème"的未发表文本中也探讨了这个观点，见NAF 24951，folio 91："He loves her，and wants to behave like an honest man；but when he sees that he is looked down upon，he becomes rabble（*canaille*）once again. And how better to show that he is rabble than by calumny？He will say that this woman became his mistress，and people will believe him… because he is a libertine whom women find irresistible."

[34] GPR，*Théâtre de l'amour*，344.

[35] 在《错过的幸福》的未出版注释中，GPR解释了自己决定不公开EG就是这本书所题献的人；见NAF 24951，folio 60。关于GPR的缪斯身份的神秘性，又见Marc Gérard，"Bonheur manqué，" in *Le Gaulois*（July 14，1889）：2。

[36] GPR在那些诗歌作为成书再版时，去掉了这段引言。

[37] GPR，NAF 24951，folio 56.

[38] 1889年7月17日GS致GPR的信，NAF 24516，folio 47；1889年8月18日GS致GPR的信，NAF 24944，folio 262/263；以及1889年8月2（？）日GS致GPR的明信片，NAF 24944，folio 494/495。

[39] EG致GPR，存档于NAF 24971，folio 185。

[40] 这里的用典是雨果的韵体悲剧《吕布拉斯》（*Ruy Blas*），如前所述，其中一位平民爱上了一位女王。除了在手稿注释中引用这部剧外，GPR还在《错过的幸福》中的一首诗中明确地把自己比作《吕布拉斯》的主人公。

[41] GPR，NAF 24951，folio 30.

[42] GPR，标注为"（1889年）8月9日星期五"的日记，存档于NAF 24951，folio 70。

[43] GPR，"中篇小说"（笔记），存档于NAF 24951，folio 26。

[44] GPR，“Trop honnête”（笔记），存档于NAF 24951，未编号卷宗。

第15章 天堂鸟

年轻的普鲁斯特曾梦想过要去遥远的魔幻大陆来一场探索之旅。从地理方位上来看，这一未知领域距离他位于马勒塞尔布大道的住所一点儿也不远。然而从社会阶层上来说，他为了到达那里而必须跨越的距离似乎遥不可及且危险重重。正如他的朋友费尔南·格雷格后来回忆的那样：

> 1890年前后，普鲁斯特的出身成为他进入城区的障碍，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普鲁斯特初入社会时，觉得城区是一块禁地；那就是他对那里魂牵梦萦的原因，就像一个收集明信片或邮票的孩子向往大溪地或锡兰一样。与早期非洲的制图大师们一样，在普鲁斯特的想象中，这片未知领域到处是怒吼的雄狮和天堂鸟。他想象中的雄狮代表着男人，也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贵族男人们……鸟儿则代表着女人。

普鲁斯特向来不擅运动。但从1890年代初开始，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探险家，英勇无畏地踏入了一片雄狮和珍禽的领地。

遗憾的是，普鲁斯特的家庭背景对他进入这个世界并无帮助。正如他后来对塞莱斯特·阿尔巴雷所说的，

> 我父母认识的人是一回事。凭我父亲（所处）的地位，他们的圈子是由一位杰出的医生和他杰出的同事们组成的，再加上一些有名的患者。但我希望认识的是社交人士，是所谓“圣日耳曼区”的精华。……母亲无力介绍我认识那些人。

母亲无能为力，但他的朋友雅克·比才的母亲有办法，也的确这么做了。1880年代末，普鲁斯特开始光临雅克家的公寓时，热纳维耶芙的

社交声望已接近巅峰。和她的老朋友阿斯一道（普鲁斯特在她的客厅里首次见到了阿斯）——斯特劳斯夫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表明资产阶级犹太人出身丝毫不会阻碍他们在社交界塑造辉煌。因此，普鲁斯特指望她帮助自己探索那个世界，并把自己变成了她沙龙里的常客，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当时，普鲁斯特的同窗好友们担心他对“社交界的极度痴迷”（罗贝尔·德雷福斯语）会阻碍他的艺术潜力的发展。[1]他们许多人后来都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们错把他对社交界的好奇当成了庸俗的趋炎附势。“那段时间，”德雷福斯回忆道，“普鲁斯特似乎决意要受邀前往某些贵族宅邸，投入文学创作的时间和精力反而少得多，这让我们一头雾水。”费尔南·格雷格警告普鲁斯特，如果把这么多时间都花在社交界，他很可能变成一个“无可匹敌的半吊子”。[2]雅克·布朗什也随声附和，劝好友不要变成“可怕的知识分子上层‘学徒’中的一员”。[3]

然而普鲁斯特显然心中有数。他从一开始就领悟到斯特劳斯夫人能够且的确引领他进入的领地有多丰富灿烂。她那个精英圈子里的陌生人和风俗习惯将为他提供一生受用的文学素材，它最终的轮廓就呈现在虚构的《盖尔芒特家那边》中。

当然，与斯特劳斯夫人和她的朋友们共度美好时光并非年轻的普鲁斯特生活的全部内容。1889年夏从康多塞毕业后，他还须花很多时间完成一系列其他义务、成年仪式和消遣。1889年11月，18岁的他到驻奥尔良的一个步兵团去报到，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兵役，奥尔良位于巴黎西南70英里的卢瓦尔河畔。[4]大大出乎他所料的是，他虽然不是个称职的士兵，却很喜欢那段军旅生活。（在所在营队的64位新兵中，他排名第63；当他主动提出将值勤期延长一年时，上级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指挥官们知道普鲁斯特身体不好，因而对他很宽容——他因为哮喘而咳嗽不止，实在不可能注意不到。他躲过了最严酷的军训，周日都回巴黎

过，还雇了个勤杂工来照管他的军服和装备。他不住营房，住在奥尔良一间舒适的公寓里；新兵伙伴们怀疑普鲁斯特在那间安逸的特殊宿舍里，连吃早餐都不下床。

虽然军训生活很松弛，但普鲁斯特的确学会了如何开枪和持剑，这些不仅是军队的必要技能，在社交界也很有用。为了解决事关荣誉的争执，贵族的决斗传统那时仍很受人们偏爱。（1897年2月，普鲁斯特本人就进行了一场决斗，他的沉着和勇气给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从马上摔下来受伤之后，他放弃了第三项同样不可或缺的绅士运动——骑马。

军队让普鲁斯特接触到了自己在骑师俱乐部的两个熟人：两位都是他的指挥官，夏尔·瓦莱夫斯基伯爵（Charles，Comte Walewski）和阿尔芒-彼埃尔·德·肖莱伯爵（Armand-Pierre，Comte de Cholet）。学者们认为，这两位伯爵是《追忆似水年华》和《让·桑特伊》中两个出身尊贵的军队人物的粗线条原型。但除此之外，瓦莱夫斯基和肖莱也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在普鲁斯特与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两位原型人物之间建立联系的人。夏尔·瓦莱夫斯基是拿破仑一世与一位波兰贵族女人所生的私生子的儿子，那位波兰贵族据说就是伊丽莎白·格雷弗耶的祖先。瓦莱夫斯基对普鲁斯特很和善，有一次还夸奖他的粉色信纸很好看。至于德·肖莱伯爵，他与洛尔·德·舍维涅“有点表亲关系”。（德·萨德这一系的一位伯母，她的堂姐洛尔·德·兰古的母亲，娘家姓肖莱）。和瓦莱夫斯基一样，肖莱也对普鲁斯特很好，甚至还应年轻人的要求送了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给他。肖莱在照片上用萨德式的夸张语气写道：“送给临时兵马塞尔·普鲁斯特，来自一个折磨过他的人。”[5]

1890年11月，兵役结束时，普鲁斯特搬回了巴黎的公寓。他听从父母的吩咐，注册了索邦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和外交，父母希望他从这两个领域中选择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职业。（他的弟弟罗贝尔已

经打算继承父业行医了，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但普鲁斯特提醒父亲说，他觉得自己学习法律和外交完全是虚度年华[6]；他唯一感兴趣的是文学。

普鲁斯特荒废学业，遵循自己制定的一套繁忙的教育课程。他去看戏、听歌剧；去看博物馆的展览和夜总会的表演。他贪婪地阅读且涉猎广泛，既包括以前就喜欢的作家（拉辛、圣西蒙、维尼、波德莱尔），也包括当代作家（居伊·德·莫泊桑、保罗·布尔热、保罗·艾尔维厄、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英语文学大师（爱默生、莎士比亚、雪莱、乔治·艾略特）[7]。他阅读的是法语译文，而母亲阅读的则是他们的英文原著。从康多塞毕业时，他获得了最后一次法语作文奖；奖品是让·德·拉布鲁耶的《品格论》（*Characters*，1688），那是对路易十四宫廷生活的简洁优雅的描写，成为普鲁斯特的又一部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文本。在他开始考察上流社会之后，《品格论》派上了大用场。

普鲁斯特自学的那些东西到考试时都毫无用处；他不止一科不及格。但几年后他还是完成了两个大学的课程。1893年获得法学学位时，由于父母仍在敦促他从事一份正当的职业。为安抚他们，他接受了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工作。实习律师普鲁斯特只坚持了两周，之后整个成年生活就再也没有正式就业。

长子看似缺乏目标的人生令普鲁斯特的父母很失望，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人生目标就是在某一个收入不菲的职业中获得成功。不过正如传记作家威廉·卡特（William Carter）所指出的，让娜和阿德里安·普鲁斯特没有意识到“马塞尔看似闲情逸致，事实上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学徒生涯”[8]，是一个作家在寻找自己的主题和表达方式。另外，普鲁斯特的父母也没有以中断财务支持来惩罚他。他们的财富足够养活他一辈子，尽可以让他悠闲地寻找和实践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

在充沛的自由时间里，普鲁斯特继续与文学小团伙保持联系，该组

织在1890年代初有了好几个新成员：乔治·德·洛里（Georges de Lauris）、路易·德·拉萨莱（Louis de La Salle）、罗贝尔·德·比伊（Robert de Billy）和雅克·贝涅尔（Jacques Baignères，斯特劳斯夫人的朋友亨利·贝涅尔夫人之子）。该组织还迎来了雅克·布朗什的加入，他也是康多塞校友，只不过年龄稍大一些，还是普鲁斯特以及比才/阿莱维家的世交好友，后来成了文学小团伙的标志性画家。这群人目标明确、冲劲十足，其中很多人已经在自己选择的领域有了些名声：达尼埃尔在哲学领域，格雷格在诗歌创作，布朗什在画像方面。雅克·比才已经决定学医，但他名义上仍然认同该组织的学术和艺术倾向。

同伴们如此雄心勃勃让普鲁斯特觉得自卑，也深受启发，他断断续续地锤炼自己的写作技艺。还在服兵役时，他就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包括保尔·魏尔伦和康多塞英文教师斯特凡·马拉梅等象征主义诗人们偏爱的前卫文学期刊《白色评论》（*La Revue blanche*）。普鲁斯特还曾为另一份出版物写过一篇评论，不吝赞美德·肖莱伯爵的一本关于土耳其的著作；肖莱送他签名照片，大概也是为了感谢他写作这篇书评。

1892年1月，普鲁斯特帮达尼埃尔、格雷格等人共同创办了他们的最后一份文学杂志《酒筵》（*Le Banquet*），这似乎是一份月刊，出刊一直持续到1893年3月，之后与《白色评论》合刊。[9]出版《酒筵》是一桩家务事，是由雅克·比才同父异母的哥哥让·赖特尔在自己做排字工的那份报纸的印刷厂里印制的。年轻人们把杂志的订阅权卖给了斯特劳斯夫人沙龙里的忠实信徒们。

这一群胸怀抱负的年轻作家在这个圈子里打下的读者基础是令人振奋的，包括斯特劳斯夫人的常驻“不朽者”（德·奥松维尔、沃居埃、小仲马、梅亚克和阿莱维），她那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朋友（朱尔·勒迈特、冈德拉兄弟），诗人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和亨利·德·雷尼埃，

还有小说家居伊·德·莫泊桑和让·洛兰。这群人里，就连在热纳维耶芙起初与之结交时尚未出名的那些作家，此刻也都功成名就了。保罗·艾尔维厄的第一部关于上层的小说《眉来眼去》（*Flirt*，1890）大获成功，该小说的续篇《他们的自白》（*Peints par eux-mêmes*，1893）更是轰动一时。保罗·布尔热关于社交界的小说也广受好评；1893年，《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他是“巴黎的文学大家之一”。[10]波托-里什也好运连连。虽然《错过的幸福》（1889）并没有得到多少好评，但《弗朗索瓦丝的运气》（1889）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情爱剧”的极大热情，而波托-里什为该体裁创作的后续作品《不忠的爱》（*L’Infidèle*，1891）也巩固了他的明星地位，该剧由雷雅纳担任女主角。他成功的终极标志？洛尔·德·舍维涅兴高采烈地宣称，弗拉大公夫妇觉得他“十分迷人”。[11]

有这样一群名人订阅《酒筵》，普鲁斯特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同样吸引他们光临斯特劳斯夫人沙龙的现象，他有自己相当敏锐的见解：世故。普鲁斯特为杂志写的第一篇稿件，就是为路易·冈德拉的短篇小说《小鞋子：一个圣诞故事》（“The Little Shoes：A Christmas Story”，1892）所写的评论，那是一个故作多情的故事，讲一位巴黎贵族想离开妻儿和一位交际花私奔，却在看到孩子的小鞋子后心碎和动摇，决定留在他们的身边。冈德拉的故事矫揉造作，自然很快就无人问津了，但普鲁斯特的评论以该故事为基础，探索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首先，普鲁斯特认为由于城区普遍存在着对婚姻不忠的现象，冈德拉之所以写《小鞋子》，一定是为了给真实世界中丈夫不忠的社交名媛们带去些许安慰。在这里，普鲁斯特就许多描写世纪末上层的文学作品（包括他自己未来的杰作）得出了一个推论：它们是以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为原型的。

后来谈到《追忆似水年华》时，普鲁斯特否定了这一论点；他也会更笼统地假定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里展开的。[12]然而在整个1890年代，普鲁斯特反复明确提到，他的文学作品

是想象力和他周围的世界共生关系的成果，而他所谓的“周围的世界”往往是指上流社会。的确，当普鲁斯特把这些年的作品收入《欢乐与时日》（*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1896）时，热纳维耶芙的朋友让·洛兰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该书的内容“都是些关于优雅的乏味琐事”。洛兰的这句话毫无疑问是贬义，他的评论相当恶毒，还提到了关于普鲁斯特的性倾向的刺耳之语，因而导致上文提到的那场决斗。然而就其缩略的格式和主题焦点来看，“关于优雅的乏味琐事”简直精准地概括了普鲁斯特从二十多岁发表关于《小鞋子》的评论起的所有文学作品的特征。[13]这篇文章为他后来投稿于《酒筵》的稿件确定了基调，它们几乎全都采用了报告文学或短篇影射小说的形式，内容几乎都与当代巴黎社会有关。

在为《小鞋子》写的评论中，普鲁斯特还重复了他在康多塞的最后一年获得的见解：当现实令人失望时，艺术会给人以安慰和救赎。[14]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普鲁斯特猜想故事中那位不快乐的已婚贵妇人的真实原型“很可能正在徒劳地期待冈德拉先生用看似讲述故事的方式向她承诺的奇迹”。然而，普鲁斯特接着说：

> 那没关系——她不会觉得太幻灭，因为通过（这么说吧）把她的痛苦平移到小说世界中，冈德拉先生已经摒弃了它自私的一面，提供了独具创意的慰藉。他的谎言是唯一的现实；即便我们真的热爱生活中那些令我们神魂颠倒的“真实的”东西，它们也已经开始一点点褪色，直至消失。那些事物所拥有的让我们快乐或悲伤的力量都会减弱，这反而使得它们在我们的灵魂中生根，我们在灵魂中把它们的颜色转化为美感。那才是真正的快乐所在，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段话证明了普鲁斯特敏锐的洞察力，就算是像《小鞋子》这样老套的作品也能启迪他对文学艺术之惊人转化力的深刻思考。然而他才刚刚开始，他还没有准备好摒弃那些令他“神魂颠倒的东西”——诸如社交

圈的珍禽异兽。在摒弃那些东西之前，他首先要邂逅它们，考察它们，他必须先去好友母亲的沙龙里来一番探险。

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每周日下午都会在位于奥斯曼大道134号的夹层公寓里招待忠实信徒，从那里可以俯瞰一座刚刚竖起的威廉·莎士比亚的雕像。她所在的街道以第二帝国时期那位城市规划师的名字命名，他在这一带开拓出郁郁葱葱的宽阔林荫道，使得圣奥诺雷区和蒙索公园之间的那一狭窄地带成为最新的理想住宅地段。达尼埃尔·阿莱维抱怨奥斯曼摧毁了旧巴黎杂乱无章的建筑和扭曲的巷道，把右岸的这一带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枯燥乏味如澳大利亚”。[15]然而即便如此，这一街区的便利和现代设施仍吸引了不少娇生惯养又有眼光的居民。让热纳维耶芙满意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好几位亲戚都住在附近。

让普鲁斯特满意的是，他也住在附近，距离斯特劳斯家大约半英里。与他不久以后到德·舍维涅夫人位于米罗梅尼尔街的住处所走的“希望路线”一样，他每周日从马勒塞尔布大道9号步行到奥斯曼大道134号的路程也很短，风景也不怎么优美。但那里有两个地标为他的文学想象打下了基础，让他准备好面对自己将在夹层公寓里发现的世界，并影响了他对那个世界的文字记录。

普鲁斯特周日朝圣路过的两个地标中的第一个位于马勒塞尔布大道46号，大致就在他家和斯特劳斯家公寓的正中间。这座地标，即圣奥古斯丁大教堂，是奥斯曼时期的另一件作品：是巴黎第一批主要用钢铁建成的教堂之一。[16]就连它那260英尺高的穹顶也被包上了铁护套，站在凯旋门上，远远望一眼就能认出它来。除了穹顶大得不成比例，以及整个教堂的建筑风格是哥特式、拜占庭式和罗马式建筑的大杂烩外，圣奥古斯丁大教堂常因外观丑陋而遭人诟病。不过，普鲁斯特喜欢把它想象成他家后院里的一座微型罗马城。它的拱形圆顶和金属的轮廓，加上钟楼常常映出巴黎天空反复无常的色彩变化，在他看来仿佛出自皮拉奈

奇[17]笔下的永恒之城[18]。



马勒塞尔布大道是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城市规划师乔治-欧仁·奥斯曼**1853—1870**年间在右岸开拓的一条宽阔的新林荫道。普鲁斯特家于**1873**年搬到了那里

在普鲁斯特的幻想中，这种昔日的伟大光环与当前圣奥古斯丁教堂会众的荣耀融为一体。与玛德莱娜教堂一样，这座位于马勒塞尔布大道南端、有悬饰的礼拜堂也吸引了一群杰出的天主教会众。第二帝国期间，拿破仑三世和他那位时髦的配偶欧仁妮皇后就在那里礼拜，皇帝夫妇倒台后，教堂的声望丝毫没有减损。第三共和国期间，社交界媒体报道说，圣奥古斯丁仍然是“全巴黎最高贵的教区”，是普鲁斯特的天堂鸟们最喜欢的一块栖木。[19]

如果前往夹层公寓的时机正好，他还可以在这些多彩的物种刚刚做完弥撒走出教堂时，停下来欣赏她们。她们斜撑着遮阳伞，摇着手里的扇子，叽叽喳喳地闲聊几分钟，等待自己的马车到达，停在教堂前庭。

这些人中间至少有一位从良的名妓，即埃米莉·“海豹”·威廉斯，但普鲁斯特只会关注贵族女人，他可以从她们的男仆的制服颜色和马车门上刷漆或镀金的家徽来猜出她们的头衔和姓氏。



圣奥古斯丁教堂位于普鲁斯特的公寓和斯特劳斯家公寓之间的中点。他喜欢在前庭停留一会儿，瞥一眼刚刚做完周日弥撒的高贵的教徒们

他喜欢思索这些珍禽栖息在怎样令人眩晕的高处。这种脑力练习产生了不少作品，其中之一是一篇只有一段长的文章，题为《致一位（女性）势利眼》（“A une snob”，1893）。这篇文章开头对城区的精神鸟巢进行了仿英雄体的描写：“家族树（家谱）的根基深植于最古老的法国土地下面。”[20]然后提出（并得出结论）这种“社交界令人炫目的象征观念”——贵族社会是“家族树组成的一片森林”——的核心在于

（一个）把现在和过去结合在一起的梦境。十字军的灵魂让当代（贵族）们平庸的脸也变得生动起来。从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中，你能否感受到昔日奢华的法国正在活跃地、几乎乐声悠扬地复苏，就像一个死去的女人从她刻有家徽的墓碑下面坐了起来？

关于贵族女人死而复生的隐喻让人想起了洛尔·德·舍维涅装扮的普洛塞庇娜，其中心思想也基本一致：那个有着古老的持剑十字军阶级的“昔日奢华的法国”既没有灰飞烟灭，也没有被人遗忘。或者用普鲁斯特正要去拜访的那个女人的话说，“过去不死”。

在这些年的其他作品中，普鲁斯特把过去的重生特别归功于贵族名姓的悠扬魔力。他推理道，资产阶级的名字之所以缺乏这种魔力，是因为“那个无法走入的长夜遮住了他们古老的渊源”。相反，法国最高贵家族的名字可以追溯到数世纪以前，甚至更久。如此锚定在“古老的渊源”之上，它们就把当代拥有那些名字的人与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联系了起来。“这些名字呈现出幻灯片一般稚拙明快的颜色，通过那些颜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长着（一脸）蓝胡子的勇武贵族或立在塔中的（一个被囚禁的姑娘）……或者看到一位武士骑着马穿过13世纪的巷道”。[21]这种浪漫联想不仅起源于乡绅贵族的姓氏（那些姓氏因为十字军东征的英雄或国王的廷臣而举世皆知），还源于它古雅的往往只属于某些氏族的教名，由当代子弟把它们带入了当世：

奥东、吉兰、尼弗隆……杜克杜瓦勒、阿代奥姆或雷努尔：这些风雅的教名来自如此深远的过去，似乎神秘地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就像我们教堂的彩色玻璃上镌刻的那些先知或圣人的名字。[22]

《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们会发现，原来普鲁斯特早在这一时期就

表达了他在“盖尔芒特”之类高贵的姓名中寻求的“充满诗意的快乐”，他赋予它们以彩色玻璃、幻灯片和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的幽灵才有的那种鬼魅般的光辉。[23]

普鲁斯特步行至斯特劳斯家的两个关键景点中的第二个位于此行的终点：萨顿（Sutton’s）裁缝铺，位于夹层公寓正下方的底层零售空间。这类商业设施在巴黎的现代化街区并不罕见；普鲁斯特家的公寓楼（也是奥斯曼时代的建筑）底层就有两个裁缝精品店，埃普勒（Eppler’s）和桑特-拉博德（Sandt & Laborde）。然而这些店铺都没有萨顿那么吸引他。埃普勒和桑特-拉博德都是面向大众的裁缝铺，而萨顿却专门为贵族家庭缝制制服：这是“昔日奢华的法国”让年轻的普鲁斯特浮想联翩的另一个古雅的遗俗。[24]

萨顿缝制的制服可分为两类：猎服和家仆制服。普鲁斯特从未受邀参加过打猎聚会，因而对打猎的仪式和盛况并不熟悉，似乎也不曾对那些盛会的衣装感兴趣。但他每天看到男仆们护送社交界的夫人们前往巴黎各处，对他们惹人注目的服饰很感兴趣。这些家仆们统一穿着法式制服的传统可追溯到旧制度，那时王室和贵族家庭的男仆们头戴白色假发，身穿齐膝短裤，脚套丝质长袜，还穿着他们服务的家族颜色的正装礼服，扣子上饰有该家族的纹章。大革命过去了一百年，这种古色古香的穿着仍然是城区男仆们必要的礼节。在不需要陪伴女眷出行时，这些男仆在主人家里白天或晚上有客来访时扮演着双重角色。[25]男仆们口头通知主人每一位客人的到来，并在视觉上让每一位来访者注意到其雇主的高贵身份——里凯特·德·阿伦贝格别出心裁地称这一任务为“脑力劳动”。[26]巴黎最高贵的宅邸中都有大批这样的卫兵，站在每一间接待厅的入口和每一段楼梯的底部。

法式制服的布料和配饰昂贵，裁剪正式而合身，再加上白色丝袜很容易弄脏或弄破，显然不适合穿着它们做家务琐事，不过当男仆的第三

个工作就是侍奉晚餐会，不得不偶尔端个盘子或托盘。他们显然被免除了更繁重的家务，这一点突出了他们作为地位象征的重要性。正如普鲁斯特在拉布鲁耶的作品中读到的，“贵族家庭中……身穿制服的男仆”的首要任务是让人“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自惭形秽；因为谁都要受到贵族乃至他们一切所属之物的傲视”。[27]



这张明信片上印的就是**1888**年这座莎士比亚铜质雕像竖起之后，斯特劳斯家所在的公寓楼。他们的夹层公寓就位于主层以下，制服裁缝萨顿的店面顶上

普鲁斯特的家族没有纹章颜色装备自己的家仆，在他看来，贵族为自己的奴仆规定的特别服饰显然与那个阶层的“单纯”相矛盾——它总是装作淳朴自然。他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手稿片段中详细讨论了这个想法，这个片段最终变成了《在斯万家那边》，但普鲁斯特把它从小说的最终版中删去了，这篇关于上流社会的伪装的思考以两位虚构的夫人为例：

德·博韦亲王夫人上门拜访她的嫂嫂德·艾诺子爵夫人时，

> 接待室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一位男仆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虽然姑嫂二人都不觉得头衔有什么重要，这股力量却命令男仆必须身穿艾诺家族颜色的制服。……子爵夫人家里遵行的是上流社会的法则，她选择着装（以及）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进出，每一个（行动）也都遵行着同样的法则，就像芭蕾舞步一样严格。……子爵夫人本不关心贵族身份或奢侈生活……是上流社会的法则为她的男仆们穿上了艾诺家族颜色的制服，让他们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28]

这些句子直指那些贵族的虚伪，他们即便在积极努力维持“头衔的重要性”时，嘴里还在否认它的重要性。如果像普鲁斯特虚构的德·博韦和艾诺夫人这样的人诚实的话，她们一定会承认，自己是特意通过诸如法式制服这样浮夸炫耀的标记来彰显身份地位的。相反，她们把自己的选择归因于“上流社会的法则”，这一法则是像重力一样不可动摇和不偏不倚的“无形的力量”，使她们无须采取任何行动。[29]

和这种“无形的力量”一样让普鲁斯特觉得有趣的，是它还有一个卑鄙的阴暗面，即债务，因为虽然昔日的巴黎贵族们能将身穿制服的家仆看成天赋权利，当前的许多贵族却早已无力支付它的高昂费用。普鲁斯特听说，“半个城区的人”都欠萨顿的钱，金额高达六位数。因此，偶尔偷窥一眼制服裁缝铺，就能看到某一位大老爷或贵妇人正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窘况：生动地展示了历史感与现代性的冲突。

偷窥到这一场面的乐趣也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不过他把它们变成了揭露变态而非穷困的场景，那是上流社会最下流的秘密。在他的短中篇小说《无动于衷的人》（*L’Indifférent*，1893，发表于1896年）中，一位名叫莱普雷的交际家有着“一张漂亮而高贵的路易十三的脸”[30]，无意中赢得了玛德莱娜·德·古韦斯的芳心。玛德莱娜是个精力充沛的黑发寡妇，许多声名显赫的绅士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都被

她拒绝了。莱普雷之所以吸引玛德莱娜，是因为只有他对她的魅力无动于衷。玛德莱娜“陷入了一种疯狂地需要”让莱普雷爱上她的情绪[31]，符合“那句著名的台词‘如果你不爱我，我就爱你’（Si tu ne m’aimes pas，je t’aime）中包含的关于调情的至理名言”（普鲁斯特很难克制住向活泼的黑发比才寡妇致意的冲动）。[32]但她每次尝试诱惑他都以失败告终。她最后惊恐地得知，莱普雷每晚在巴黎的贫民窟游逛，寻找“阴沟里的卑劣女人”。他高贵的风度掩盖了一个无耻的恶行：“他只爱满身泥污的女人，他疯狂地爱着她们。”[33]

这样的倾向不光使得玛德莱娜无法得到莱普雷的爱，还使他作为已故父亲的独子无法延续家族的血脉。他的一位朋友向玛德莱娜解释说，他不愿意与同阶级的女人做爱，“莱普雷太爱惜羽毛，根本不考虑结婚。……他的儿子也不会像他，因为他根本不会有儿子”。[34]莱普雷的性喜好让他在性交之后绝不可能生育一位合法继承人，因而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反转了普鲁斯特的姓名重生模式。一个像“阿代奥姆”这样的名字固然能够重现一段古代的祖先历史，但莱普雷这样一个变态却注定会使一个姓氏和血统彻底消失。

《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e et Gomorrhe*，1921-1922）中有一个情节更直接地移植了在萨顿裁缝铺里发生的粗俗一幕。叙述者偷窥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一位表亲、蛮横的德·夏吕斯男爵进了位于盖尔芒特家右岸住所底层的制服裁缝铺。马塞尔预感到夏吕斯此行必有故事，便潜入裁缝铺隔壁没人的出租铺子，他在那里隔着薄薄一堵墙听到的声音“仿佛魔杖一般迅猛和彻底”地“完全改变了”他的观念，让他获得了重新看待一切的视角：“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不明白，也未曾目睹过。”[35]马塞尔看到的，更确切地说，他听到的，是一个裁缝与夏吕斯之间吵闹的性接触。夏吕斯是一个鳏夫，素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后来，从自己的藏身处偷看外面的庭院时，普鲁斯特看到男爵要为这次幽会向那位性伴侣付钱。夏吕斯的故事与莱普雷的故事一样，都是性偏离的污点取代了

财务困境的耻辱——并最终预示了一个贵族家族血统的终结，单单贫困是不大可能使家族走向终结的。

此外，这些场景还使普鲁斯特有机会探索肤浅与深度、相似与真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把现在和过去结合在一起”的姓名一样，犯有隐秘罪行的贵族也横跨两个本该相互矛盾的世界：高贵与低贱。无论多么荒谬，他的高贵出身和贵族特权始终与它们本该排斥的堕落并存。

普鲁斯特每周日在前往奥斯曼大道134号的行程中瞥见的表面上的高贵和背后隐藏的堕落并存，成为他笔下的社交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会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对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并做出更加深刻的解释。经过莎士比亚雕像（虽然普鲁斯特喜欢这位吟游诗人，但这座纪念碑却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任何痕迹）后右行，就到了斯特劳斯家的住址，他会推开萨顿裁缝铺门面右边的那扇厚重的木质前门。一进大厅，他会登上一小截楼梯，戴着手套的手掠过新艺术风格的楼梯扶手那段铁艺曲线。如果哮喘发作，他会略过楼梯，乘坐小小的电梯上楼，电梯的样子十分有趣，像一把路易十五时代的围手椅。正如他的朋友乔治·德·洛里后来所说，在整个行程的这最后也是最短的一段，普鲁斯特的兴奋感会达到峰值，理由也很充分。一旦越过门口，跨进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他真正的发现之旅就要开始了。[36]

---

[1] RD，*Souvenirs*，57.

[2] FG，引文见RD，RD，*Souvenirs*，57.

[3] JEB，*Mes modèles*，108.

[4] 关于MP服兵役的资料包括Carter，*Marcel Proust*，103-5；AG，*Les Clés de Proust*，115；Tadié，*Marcel Proust*，58；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19-23；and Marie Miguet，“Le Séjour à Doncières dans *Le Côté de Guermantes*：Textes et avant-textes，” in Vers une sémiotique différentielle，ed. *Anne Chovin and François*

Migeot（Besanç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c-comtoises，1999），27-50。感谢Philippe d'Ornano体贴地与我分享他关于波拿巴家族与其瓦莱夫斯基祖先的知识。

[5] Vers une sémiotique différentielle，ed. *Anne Chovin and François Migeot*（Besanç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c-comtoises，1999），30.

[6] 1893年9月28（？）日MP致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信，见Kolb，ed.，vol. 1，236。

[7] 关于MP这一时期对英语文学的兴趣，见Daniel Karlin，*Proust's Englis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7。

[8] Carter，*Marcel Proust*，160.

[9] RD，*Souvenirs*，79-133；FG，L'*Â*ge d'or，148-52；Carter，*Marcel Proust*，131-32；and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4-15. 关于让·赖特尔在他工作的报纸（Le Temps）印刷厂里制作《酒筵》，见FG，*Mon amitié*，59-60；and Raczy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137。关于文学小团伙把《酒筵》的订阅权卖给了GS沙龙的客人，见RD，"Madame Straus et Marcel Proust，" 16。

[10] "Paul Bourget in New York，" *Pittsburgh Press*，August 21，1893，2；关于GPR取得的成功，见HR，*Nos rencontres*，122；关于保罗·艾尔维厄的成功，见Octave Mirbeau，*Combats littéraires*（Paris：L'*Â*ge d'homme，2006），82。

[11] 关于LC报告说GDW最近开始欣赏GPR了，见NAF 24955，folios 208，211，245，and 264。

[12] 关于年轻MP坚持作家的生活与他的艺术密不可分（而不是在他继《驳圣伯夫》以后宣称的绝对不可比），尤其见JS，它在开篇就发表了免责声明："这本书能否被称为小说？它不如小说，又或者大大高于小说：它是我生活的底色，没有多少装饰……这本书不是写作而成的，它是我采摘的。"MP，JS，183. MP在整个JS中不断重提这一概念，例如他还写道，"我们的生活无法彻底与我们的作品分开。我向您叙述的所有场景都是我在生活中经历过的"（490），或者在把作家的生活"情景，无论快乐的还是可怕的"作为艺术"素材"之后，MP得出结论——"无论我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永远是我们学习阅读（并学习写作我们周围的世界）的字母表"（477）。读者或许能够注意到这种艺术生活共生的概念和GBB试图与EG共同探讨的那种观念之间的相似性，后者也力图把"一点神性的、活生生的现实"注入他们

共同的文学创作中。

[13] Jean Lorrain（pseud. Duval），无标题评论转载于PJ，294-296，295。FG提到同样的问题时写道，虽然PJ中包含“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但它还是有“太多的亲王夫人、太多忧郁的美人、太多优雅”；见FG，*Mon amitié*，65。FG在MP对冈德拉的《小鞋子》的书评中看出了同样的特质，FG说它“语气上很像社交界——当时，世故是他可爱的小罪过，也一直是他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FG，*Mon amitié*，53。

[14] 该文本的引文摘自MP，“‘Les Petits Souliers，’ par M. Louis Ganderax，” *Le Banquet* 1（March 1892）。冈德拉的小说本身，“Les Petits Souliers：conte de Noël，” 发表于*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09（January 1，1892）。

[15] DH，*Pays parisiens*，148.

[16] David Jordan，*Transforming Paris*：*The Life and Labors of the Baron Haussman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194-95.

[17] 乔凡尼·巴提斯塔·皮拉奈奇（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画家、建筑师、雕刻家。

[18] 永恒之城（Eternal City），指罗马。

[19] X.（pseud.），“Choses et autres，” *La Vie parisienne*（November 13，1875）：642.

[20] MP，“A une snob，” in PJ，89. 该文本最早发表在*La Revue blanche* 26（December 1893）：392-93。

[21] MP，*Days of Reading*，trans. by John Sturrock（London and New York：Penguin Books/Great Ideas，2008），104.

[22] MP，*Days of Reading*，trans. by John Sturrock（London and New York：Penguin Books/Great Ideas，2008），103.

[23] MP，CG，825. 这最后一行出现在关于贵族姓名的响亮魔力的长篇讨论中，其中MP指出：“与我自己的审美愉悦相比，我对历史并没有那么好奇。”又见MP，CSB，248：“在我看来，盖尔芒特是他们的名字。……盖尔芒特这个名字融合了（诸如）布拉邦的热纳维耶芙的珍奇，仿佛（一幅）画有查理八世的挂毯，一扇印着恶棍查理的彩色玻璃窗。……我受邀把这些传奇人物，这些幻灯片上的人物、

彩色玻璃窗上的人物、（来自）九世纪的挂毯上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时，盖尔芒特这个光荣的名字仿佛获得了重生，能够认出我，开口呼唤我。”

[24] “Le Livre d’or du *Figaro*，” *Le Figaro*（December 26，1877）：2.

[25] Pauline de Broglie，*Comtesse de Pange*，*Comment j’ai vu 1900*（Paris：Grasset，1962），23.

[26] L. de Vogüé，*Logis d’autrefois*，（Paris：Plon，1878），n.p.

[27] La Bruyère，op. cit.，132.

[28] MP，*Manuscrits autographes*：*Soixante-deux cahiers de brouillons*，*etc.*，NAF 16652，cahier 12，folios 124-29.

[29] 在RTP中，MP把同样的“法则”或“力量”称为“盖尔芒特的天才”（*le génie des Guermantes*），*génie*既有“天才”也有“精灵”之意，这个短语含有人类发明和超自然神力的神秘融合之意。MP在JS中讨论过同一现象的类似情况，关于有些贵族“在言谈举止以及艺术……品位中谦和地贬低自己的贵族身份”，同时又以微妙的方式，例如“用小小的贵族王冠装饰的信纸，一群看似漫不经心地称他们为‘公爵老爷’‘公爵夫人太太’的仆人，祖先的画像，带有他们的名字的城堡，以及刻有家徽的银器”来强调自己头衔的题外话。MP，JS，448.

[30] MP，*L’Indifférent*，PJ，263. MP在1893年夏就写出了这部作品，却一直到1896年才发表；MP，*L’Indifférent*，PJ，348；and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133。

[31] MP，*L’Indifférent*，264.

[32] MP，*L’Indifférent*，257。MP对玛德莱娜的寡居的叙述读来也像是暗指GS：“在她四年的寡居生涯中，（社交界）最出色的男子每天都会来府上拜访好几次。”“他们的一致意见让她知道自己是巴黎最有魅力的女人，她聪明（和）风趣的名声……更为她的美貌增色不少。”（261）

[33] MP，*L’Indifférent*，266。

[34] MP，*L’Indifférent*，266。

[35] MP，SG，11.

[36] GL，*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Paris：Amiot Dumont，1948），145.

第16章 比才夫人的画像

普鲁斯特的同窗好友们虽然抱怨他出于对“社交圈的极度痴迷”而每周光临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但文学小团伙中有好几个人——雅克·布朗什、费尔南·格雷格、罗贝尔·德雷福斯、罗贝尔·德·比伊和乔治·德·洛里——也都是那儿的常客。他们坚称自己不像好友普鲁斯特那样热衷于上流社会；不管这是否属实，布朗什后来回忆道，他们继续“哀叹普鲁斯特对社交界的关注”。他们事后才意识到，普鲁斯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为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他需要仔细考察那个曲高和寡的世界。要写作关于上层的出色作品，他必须靠自学去了解那里的居民，到此时为止，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他们。[1]正如格雷格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普鲁斯特关于社交圈的一切，都是在斯特劳斯夫人家里学到的”。

为此目的，普鲁斯特前往斯特劳斯夫人的夹层公寓时，认定他可以从常客们的每一句措辞、每一个手势和每一次伪装中旁收博采。布朗什惊异地看到普鲁斯特强大的观察力，把它比作“蜜蜂的触角和有着上千个小眼面的昆虫复眼”。这一比喻与普鲁斯特后来说他进入社交界是为自己艺术的“黑蜜”收集花粉的话异曲同工。与他心目中的另一位文学英雄、小说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一样，普鲁斯特也将得益于自己包罗万象的观察，一丝不走地创作人物和场景。无论年轻时代的初试牛刀还是在后来的成熟作品，上层的习惯和怪癖都将是他的素材来源。

普鲁斯特在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里学到的东西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他最初拜访沙龙的那几年，她的好几位长期忠实信徒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爱上高不可攀的社交名媛，也发表了有感而发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泊桑的《如死之坚强》，这部小说与他的朋友波托-里什的《错过的幸福》同时连载发表。《如死之坚强》和莫泊

森随后的小说《我们的心》（*Notre cœur*，1890）都被公认为受他与斯特劳斯夫人之间的情事启发。也就是说，就在年轻的普鲁斯特刚刚开始从事写作、成为巴黎上流社会的吟游诗人之时，莫泊桑也和波托-里什一样，在普鲁斯特未来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几位原型人物之中，找到了一位缪斯。

《如死之坚强》的作者为普鲁斯特树立了一个尤其重要的榜样，因为与波托-里什不同，莫泊桑送出了自己的吻，也讲述了他的故事，而波托-里什至死都没有说出他那本《错过的幸福》是题献给伊丽莎白·格雷弗耶的。[2]更确切地说，莫泊桑在小说中穿插了不少一看便知与斯特劳斯夫人和他自己有关的细节，引导读者产生了令人信服的印象：他讲的是亲身经历的情爱秘密。在此过程中，他所树立的先例对普鲁斯特有两重意义。首先，他强调自己的生活与作品之间公认的交会点，将现实的元素重新编排进作品，使之带上艺术真实的印记。虽说普鲁斯特在高中时代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尝试这种美学了，但比他大20岁的著名小说家莫泊桑却更加纯熟地表达了这一美学观念。

其次，莫泊桑使用艺术碰撞现实的手法来批判斯特劳斯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为之倾心的优雅文化。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莫泊桑本人在生活中决心成为上流社交界的一员。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同样决心抨击他们。他在创作上的诚实正直不允许他在作品中对那么一个阶级进行理想化的描述，无论他作为一个男人多么渴望进入那个阶级，作为艺术家的他很清楚，那个阶级是空洞的、堕落的。“社交人士应该意识到，”莫泊桑在别处写道，“他们对小说家敞开大门的危险，不亚于一位谷物商在自己的仓库里养老鼠。”[3]这一比喻大概并非不含恶意；如果他和热纳维耶芙真像朋友们怀疑的那样亲密，那么她很有可能曾对莫泊桑透露过丈夫不体面的家庭背景。（果真如此的话，那要算是她少有的重大供述，因为忠实信徒中其他人的公开和私人作品加起来足有几千页了，却没有一人提到过斯特劳斯的谷物商亲戚。）

然而对普鲁斯特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莫泊桑亲身展示了不加粉饰地描写社交界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在《如死之坚强》中，莫泊森指出上层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它的优雅本身，而在于这样的优雅既促成又掩盖的那种错位的雄心、幻灭的渴望和大量的欺诈。虽然年轻的普鲁斯特并未完全理解这一理论，但假以时日，它将对他关于上层的最精准敏锐的描述产生影响。

30年后，在《盖尔芒特家那边》中，普鲁斯特会写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同我谈圣日耳曼区时，就像在同我谈文学，并且，只有在她同我谈文学时，我才觉得她比任何时候更愚蠢，更带有圣日耳曼区的特征”。[4][5]结合上下文，这几句话提到的现象与《如死之坚强》中讨论的现象稍有不同。普鲁斯特的叙述者赞美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文学”特质时，他讨论的是她的血统令人浮想联翩的象征：十字军祖先、家族纹章，以及古老而充满诗意的姓名。叙述者认为，比起公爵夫人试图显摆教养的那些枯燥无味的寒暄闲聊，这些贵族标识才是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素材。

然而，这句关于城区的文学性的话也在更笼统的意义上适用于普鲁斯特和莫泊桑在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的沙龙里亲眼所见的动态。那里上演的交际互动是一出出皮影戏，在真实戏码的表面之下还上演着一出双簧，正如歌剧院舞台上的表演之于预约之夜的社交界。进入社交界就意味着戴上面具，向世人展示一副优雅的外表，将一切私密的、“不雅的”、真实的痕迹藏匿起来。在这个重要的意义上，贵族社会很可能是世纪末巴黎最富有文学性的背景，因为它要求成员必须以虚构的方式存在。《如死之坚强》中的一个人物曾说：“在社交界，一切都是假象。”[6]这是最为深刻的真理。



在《如死之坚强》（**1889**）中，居伊·德·莫泊桑抨击了他在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中见到的世故的文化

嫁给斯特劳斯并搬到第八大区后，热纳维耶芙离开了充满艺术气息、混乱无序的蒙马特尔。但为了保持一点使她杜艾街的沙龙大受欢迎的波希米亚风，她迫使丈夫做出了妥协。在他们新搬入的街区，贵族家庭一般要么住在庄严古老的府邸，要么住在某一座住宅楼主要楼层的豪华公寓里，这一带有许多奢华的第二帝国时代的住宅楼。斯特劳斯家迁入的奥斯曼大道134号大楼也同样奢华，也有主层公寓，配有两层高的天花板、正式的双开门和这类住宅中常见的巨大的铁艺阳台。但在热纳维耶芙的劝说下，斯特劳斯夫妇放弃了这一选项，而住进了这座住宅楼的夹层，那是位于主层以下、底商萨顿裁缝铺高高拱起的窗户上面的一个低矮空间。在其他这类住宅楼中，像萨顿这样的商人要么把夹层用作仓库，要么用作自己“店铺楼上”的住处。斯特劳斯夫妇既有钱又有地位，做出这么一个房产决定十分古怪。然而在热纳维耶芙和她的忠实信

徒看来，夹层与她以前那间蒙马特尔的公寓一样，是个诱人而别出心裁的另类，背离了上流社会古板无趣的庄严奢华。的确，在少女时代与继母德·格拉蒙公爵夫人（娘家姓罗斯柴尔德）一起拜访过那里的莉莉·德·格拉蒙回忆说，那是个迷人的地方，几乎带有某种魔力。由于公寓的窗户正对着奥斯曼大道两旁的树梢，它给了访客们一种登上树屋的愉快感觉，那里低矮的天花板也有助于营造一种温馨的气氛。据格拉蒙回忆，夹层公寓那种“无可名状的诱人而亲密的魔力”也延伸到了它那位孤独的女住户身上：“在低矮的沙龙里，阳光透过窗外栗子树的叶子斜照进来，埃米尔·斯特劳斯夫人散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迷人气息。”[7]

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位于大楼圆形建筑的那间漂亮的椭圆形房间，她如今作为斯特劳斯的妻子享受的富有生活也在那里（不管是不是夹层）绽放出最为耀眼的光彩。她的一位忠实信徒曾写道，斯特劳斯把她视为“他的杰作”[8]，把她安置在一个精美绝伦的环境里，周围摆满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价值连城的古董。[9]访客们就坐的手工雕刻的椅子和长沙发上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家具师乔治·雅各布[10]的签名。家具上的奥布松饰面上绘有农人赌博或花环图案，还有拉封丹《寓言》的插图，与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客厅套房里的博韦挂毯一样。奥布松挂毯悬挂在洛可可风格的护壁板上，上面所绘的田园场景与斯特劳斯收藏的画作交相辉映：那些画作不拘一格，但都是一流的18世纪法国大师（华托、纳蒂埃[11]、格勒兹[12]、弗拉戈纳尔[13]、布歇）以及当代画家（莫奈、毕沙罗[14]、雷诺阿、维亚尔[15]、秀拉[16]，以及福兰、德洛奈、莫罗、德太耶等知交故友）所绘。在所有的19世纪法国艺术家中，斯特劳斯最热衷收藏的是欧仁·布丹[17]，此人最痴迷于描画海滩、港口、栈桥、船只、低潮和强浪。热纳维耶芙有时会叹息道：“我看布丹看得够够的。”[18]她不喜欢水景，或许因为自己的姐姐是溺水而死的。

有些艺术藏品被按照主题归置在一起。福尔图尼[19]所绘的农村姑娘水彩画与米勒[20]同一主题的蜡笔画相邻；格勒兹和福兰所画的半裸

姑娘构成了另一对诱人的组合。还有些组合显示出女主人著名的任性的幽默感。在两幅油画中，朱庇特以两种不同的面具侵犯了两个不同的女人。米勒所画的维纳斯和丘比特的铅笔素描夹在拉米的《奥赛罗与伊阿古》（*Othello and Iago*）和巴瑞[21]的《两只孟加拉虎相争》（*Two Bengal Tigers Fighting*）之间。这组三联画有何寓意？爱会伤人，嫁给“老虎斯特劳斯”后尤其如此。附近还悬着杜米埃[22]的一幅漫画，画着一位秃顶的律师在法庭上大放厥词，更是再明白不过地凸显了这一寓意。

壁炉旁边的架子上立着一群学术派动物雕像：石膏雕塑的一头狮子和一条灵缇；青铜雕塑的一只矮脚猎狗和一头单峰骆驼。这些奇异的组合也表明它们出自热纳维耶芙之手，她在情绪低落时曾说过，婚姻状态就像一个悲剧的错配，把两头注定无法同步而行的野兽束缚在一起。[23]有些组合就显得比较欢快，例如一群纤巧而精美的18世纪陶土小雕像组成的方阵，排列在壁炉台上。

墙角的一个玻璃柜里展示着一套由皇家哥本哈根瓷器厂制作的昂贵而花里胡哨的小动物塑像。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场时，热纳维耶芙会对那些“可怕的哥本哈根”[24]翻翻白眼，解释说她没法扔掉它们，因为那是阿代勒·德·罗斯柴尔德多年前送给雅克的生日礼物。热纳维耶芙用这么一句装腔作势的抱怨摆出大胆不敬的样子，恰如洛尔·德·舍维涅嘲笑那些罗曼诺夫朋友们的坏品位。（“我去过沙皇村，那里一点儿都不时髦！”）考虑到就连那些忌妒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上流名士们也承认他们艺术收藏的品位无人可比，这真是一记险招。热纳维耶芙对“可怕的哥本哈根”的蔑视表明她对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无动于衷，对于她自己的名望所依赖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不屑一顾。的确，热纳维耶芙声称雅克之所以接受了阿代勒送他的这套小动物塑像生日礼物，是因为阿代勒和她已故的丈夫萨洛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Salomon de Rothschild）是他的教母和教父。事实上萨洛蒙男爵

在雅克1872年出生前八年就去世了，雅克婴孩时期的受洗证书上，教父母一栏也没有显示他或妻子的名字。

另一个陈列柜里的那个白色陶瓷的绽放鲜花的花园就没什么争议了。堆放的第三套物品是热纳维耶芙的母亲雕塑的好几个半身像，她早在1884年就去世了。那些小雕像包括除了热纳维耶芙本人之外的每一位家人，莱奥妮直言不讳地拒绝为她塑像。这个玻璃柜上方悬挂着康坦·德·拉图尔[25]为伏尔泰所绘的著名肖像。哲学家带着稀疏的假发，面露凶相的笑容，让雅克·布朗什觉得简直就是热纳维耶芙疯癫的老姑妈梅拉妮“逼真的模拟像”。

再婚并搬到夹层公寓后，热纳维耶芙丢弃了父亲和前夫曾在上面作曲的那架钢琴，在两个巨大的花盆架之间安放了一架新的大钢琴，两个花盆架上都开满了新鲜的玫瑰花。花也是斯特劳斯痴迷的东西：据说按顺序排下来，他最爱的三样东西分别是他的妻子、他的艺术藏品和他的玫瑰花。

屋子里四处散落的摆设桌上堆放着书和杂志，上面写着献给热纳维耶芙的谄媚献词。她并不会一一阅读或承认自己读了那些作品，却很喜欢炫耀它们。时间在古董时钟的滴答声中流逝，时钟又重重叠叠地映现在古董镜子里。

房间正中央，在壁炉对面的墙上，悬挂着那幅得意之作：身穿丧服的比才夫人画像，眸似轻烟，面如晶玉。

德洛奈的肖像画是沙龙里的点睛之笔，就挂在热纳维耶芙斜靠着招待宾客的路易十五时代的长沙发上方。忠实信徒们一致认为相形之下，那幅肖像使得“世上所有的毕沙罗、拉图尔、秀拉和莫奈都顿时显得乏味起来”。普鲁斯特更甚，他曾对着不止一位初来沙龙的访客问道：“您看，先生，它比《蒙娜丽莎》还美，不是吗？”[26]自1878年在巴黎沙龙

面世以来，这幅油画收获了无数好评[27]，例如下面这一则：

> 比才夫人的唇上挂着憔悴的微笑，摇摆不定的火焰在她那对炽热的眸子里灼烧。她的美像个萦绕在心头的愁绪，一定很难描画。德洛奈先生却把它表现到了极致：他创作了一幅杰作。

另一种典型评论突出了被画者“令人不安的魅力”，称整幅画作是“黑色和金色的绝响”，这一说法先于惠斯勒为罗贝尔·德·孟德斯鸠所绘肖像的题目，《黑色与金色的交响》（1890—1891）。事实上，孟德斯鸠是斯特劳斯的一位当事人，也成了热纳维耶芙的好友。他为那幅传说中的肖像写过一篇颂歌：“德洛奈为你的灵魂画了一幅肖像，/画中你的双眼燃烧着一团火焰/公然藐视流逝的时间。”

热纳维耶芙的朋友中只有德加一人拒绝赞美德洛奈的肖像画是天才之作。他说那幅肖像戏剧化地突出她的黑色丧服，是为传递悲伤而设计的讨巧的捷径。德加或许不无道理，因为热纳维耶芙请德洛奈画像之时，她与德拉博尔德已经秘密订婚好几年了。但德加的牢骚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其他人对这幅画作的赞赏。据莫泊桑说，他们把它视为一种宗教遗物，一到沙龙就赞美它，“很像人们一进教堂就在胸前划十字架”。[28]

热纳维耶芙享受这些致敬，哪怕它们违反了她在沙龙中不得讨论艺术的禁令。乔治·德·洛里猜测她之所以破例，是因为“她沙龙里的一切都是献给她的”。除此之外，她仍然劝阻忠实信徒们讨论阳春白雪的话题。洛里转述她的话说，她为自己的原则辩解时，指出“她的朋友们的任何书籍或（画作）自然只能是好的。为什么要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喋喋不休呢”？[29]

鉴于她沙龙里的天才异常集中，热纳维耶芙关于高雅话题的禁令让普鲁斯特大吃一惊。他习惯了与他“漂亮的小妈妈”和高中时代的好友们

谈论书籍和艺术，如今见到了这么多著名作家，却不能挑起文学的话题，让他十分失望。他曾在交给《周一》的第一份稿件中戏仿朱尔·勒迈特，如今却不能当面问他关于高乃依和拉辛的问题；他曾在1893年夏的一段时期试图模仿上流社会书信体小说《他们的自白》，却无法与保罗·艾尔维厄讨论此书；也不能就《错过的幸福》询问波托-里什的创作灵感（普鲁斯特私下里认为那部“书中收录的诗都很糟糕”[30]，但据《高卢人报》称，该书在巴黎“女人中很受欢迎，人手一册”[31]）。雅克·布朗什写道，普鲁斯特尤其难过的是，无法与利顿勋爵一起讨论英国文学。

中年以后，普鲁斯特会把这一困局写入《盖尔芒特家那边》。首次出席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上的晚餐会时，叙述者恼火地发现“当她和诗人或音乐家在一起时，她只同他们谈论天气，并使这种极其平常的谈话具有一种优雅的韵味”[32]，而不谈论他们的作品。叙述者说“这种克制，会使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第三者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神秘莫测”[33]，如果来访者是一位他“渴望能一饱耳福的著名诗人”[34]，尤其如此。但热纳维耶芙拒绝讨论她那些著名朋友们的成就，是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表演出来的贵族式“单纯”。与贵族人士假装对血统无动于衷一样，她对天才的不屑一顾也凸显出她天生就有权对其习以为常。

即便在这段较早的时期，热纳维耶芙的反才女态度也常常令普鲁斯特觉得不太适应。“如果斯特劳斯夫人对我们喜欢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他问洛里，“而X夫人那么了解文学和艺术，我们又怎么会更喜欢斯特劳斯夫人而不是X夫人的沙龙呢？”[35]洛里猜测她作为女主人的吸引力“与她天生的诱惑力有关”[36]，起初，普鲁斯特同意这种说法。但没过多久他就明白，她的诱惑力绝不是天生的。

嫁给斯特劳斯后，热纳维耶芙对她可爱的人格做了些微调。除了风趣（那也发生了变化）之外，她打动忠实信徒的主要是三个特征。首先

是她独树一帜的美，由于岁月流逝、神经衰弱和药物滥用的蹂躏，她本人的美比德洛奈的肖像画凸显出更大的“麻烦”。她躺椅旁边桌子上的药水瓶和注射器说明了她有多么依赖佛罗拿[37]和吗啡。[38]自称“能读懂人心的心理学家”保罗·布尔热注意到她对鸦片的依赖越来越重，曾屡次恳求她减量，但她充耳不闻。

热纳维耶芙声称用药是为了治病，但它们几乎没怎么缓解她的面部抽搐，她的脸仍然周期性地震动一下，“就像夏日天空的闪电”。然而正如这个比喻所示，她羸弱的体格也是她的魅力所在，她对此心知肚明。热纳维耶芙扮演了性感的多病之身，重演了一代人之前由她的好友小仲马那部出奇轰动的小说改编的通俗剧《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所张扬的憔悴病态的女性美。与住在蒙马特尔时一样，她穿着有伤风化的家居服接待来访者：婀娜多姿的便服和缀满蕾丝的晨衣，颜色是她标志性的灰色、淡紫色和白色。她大量喷洒自己最喜欢的香水“西班牙皮革”（Peau d’Espagne），以至于埃利·德洛奈恳求她“不要用那么多‘西班牙皮革’了，你本来的味道就不难闻”！[39]但和布尔热关于药物的说教一样，德洛奈的恳求也被当成了耳边风。据她的侄子达尼埃尔说，热纳维耶芙从早到晚都在身上“喷洒过量的香水”。[40]

热纳维耶芙懒洋洋地躺在铺着缎面坐垫的舒服睡榻上，家里的客厅终年燃烧着旺火，但她还是常常抱怨体冷。她会迷人地颤抖一下，抓过一件昂贵的皮草披肩或羊毛围巾包住脖子和胸部，同时把睡衣的下半部分敞开一些，露出脚踝和双脚，那是那个年代的“体面”女人绝不该暴露的身体部位。为了进一步增加刺激，她还穿着肉色的丝质长袜，双腿看起来像是裸露的。这一假象让龚古尔感到震惊，他在日记中抱怨斯特劳斯夫人“不是个上流社会的夫人，倒像个冒牌交际花”！[41]玛蒂尔德公主也有同感，她哀叹从她自己作沙龙女主人（以及后来的红颜祸水）的黄金时代以来，社交界世风日下。但热纳维耶芙的其他访客——至少圈子里的异性恋男子们——都被迷住了。约瑟夫·雷纳克开玩笑说：“应该立

法禁止那一类挑逗。”[42]

然而雷纳克和热纳维耶芙两人都很清楚，那一类挑逗是她的魅力必不可少的部分，她正是用那种微妙但清晰的性欲暗示来诱惑忠实信徒的。对绝大多数拥趸而言，那一暗示只是假象。热纳维耶芙知道自己卖弄的风情会吸引他们的兴趣，但她也知道须适可而止，才能保护名声不受损害。上流社会的性别双标就是，如果她展露的性暗示过于明显，就违反了社交名媛应该遵守的礼仪。洛尔·德·舍维涅固然可以对这样的束缚嗤之以鼻，但热纳维耶芙的资产阶级犹太人出身却没有赋予她这样的自由。作为上层的一名荣誉成员，她必须奉行女性安分守己的信条。她也的确正己守道，手法之娴熟，不明所以的陌生人有时候还以为她是在修道院里长大的呢。[43]

因此，为了恪守妇道，热纳维耶芙把一本正经的保守姿态融入了风情，构成了她的第二个魅力标志。当忠实信徒们激情燃烧时，她保持冷静，暗示自己的冷淡源于对丈夫始终不渝的忠诚——她的第一任丈夫。虽然斯特劳斯有着“可怕的坏脾气”，但热纳维耶芙凭直觉就知道，在追随她的人看来，斯特劳斯远没有他的前任那种不可动摇的力量。因此她让忠实信徒们明白，她将永远为已故的伟大的乔治·比才守丧。她把最喜欢的长椅放在德洛奈为她创作的身穿丧服的寡妇画像下面，就是在鼓励人们持这种看法，还有就是，她只穿色彩黯淡柔和的半丧服。

这些巧计给热纳维耶芙的侍从们留下了长久的印象，保罗·艾尔维厄称她为“身穿淡紫色睡袍的美丽芬芳的夫人”[44]，保罗·布尔热借用她的某些特征塑造了他关于上流社会的小说《妇人之心》（*Un cœur de femme*，1890）中那位诱人的寡妇女主角。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为她操纵异性恋友人的纯熟技巧所折服，写了一首诗，把她比作在奥德赛多年流浪期间仍对丈夫忠贞不渝的佩妮洛普，全然无视一群追求者正在争夺她的芳心：“她是著名作曲家的遗孀……/仍受到亡夫曲调一咏三叹的蛊

惑……/她是佩妮洛普，永远不让追求者们近身/绝不接受其中任何一人——/但这位佩妮洛普敢于再婚。”[45]这是孟德斯鸠最深刻的诗作之一。两人都擅长装腔作势，但他欣赏热纳维耶芙聪明的招数。再婚的佩妮洛普本来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语词，但那正是让她如此迷人的特质。

斯特劳斯虽然忌惮孟德斯鸠的门第，却无法欣然接受他把热纳维耶芙描写为另一个男人的佩妮洛普。但就连斯特劳斯也知道，在某种程度上，热纳维耶芙仍然或者说装作仍然活在对比才的记忆中。普鲁斯特发现，斯特劳斯“每当妻子提起乔治·比才时都变得焦虑不安，她一直深深地爱着前夫”[46]，龚古尔也看到过斯特劳斯类似的反应，说热纳维耶芙每次“偶尔”哼起《阿莱城姑娘》或《卡门》中的某个曲调时，眼神会不知不觉变得恍惚起来，没有什么比那种眼神更让斯特劳斯怒不可遏的了。[47]

但同样，她故作比才寡妇的姿态绝非偶然：她有时在家里组织的比才音乐演奏会不是偶然（那又是故意违反自己的反艺术政策）；她用他歌剧中的人物为自己小型贵宾犬取名不是偶然；每一次他的作品重演她都出席不是偶然；她奔走努力，让他的纪念碑在喜歌剧院竖起也不是偶然，那里已经有一座她已故父亲的半身像了。热纳维耶芙促成了比才纪念碑落成之事简直让斯特劳斯嫉妒得发疯，龚古尔都怀疑是不是律师的某一位仇敌向她提议了这个计划。

不管斯特劳斯多么焦虑，热纳维耶芙仍然维持着比才寡妇的形象，她很清楚在继续哄骗忠实信徒和把他们从身边推开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线，而维持这个形象绝对有助于她安全通过那个界线。与比才以她为原型在《卡门》中创造的那个吉卜赛荡妇一样，热纳维耶芙拒绝归属于任何一个男人，或者说，至少她想让大家相信这个说法。

按照莉莉·德·格拉蒙的记述，热纳维耶芙最迷人的特质之三就在于她：

有讨人喜欢的罕见直觉，她能用女性的敏锐触角了解到你最私密的想法和最深层的欲望。她知道你想要什么，正在渴望什么，焦虑什么；她讨好你，抚慰你。[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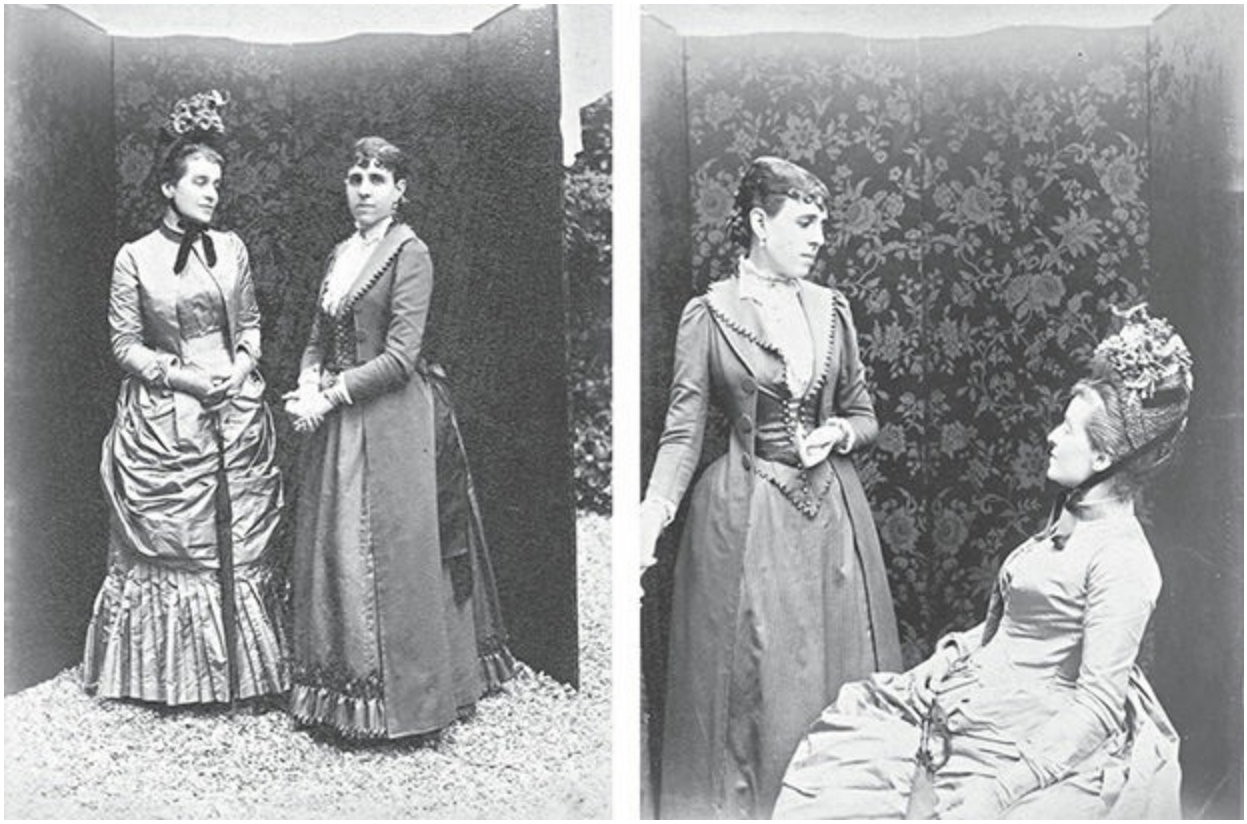
格拉蒙尤其崇拜热纳维耶芙优雅地抚慰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她的丈夫阿方斯据说是斯特劳斯同父异母的哥哥，如今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因而也是该家族在巴黎这一支系中最富有、权势最大的成员。阿方斯的妻子在社交界人称劳丽男爵夫人（Baronne Laurie），是他来自英国那一支的同族侄女。她生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惊人的财富仿佛一层绝缘保护膜，使她面对外部世界常常晕头转向。（有一次在参观一位好友位于英格兰的庄园时，她带着真诚的好奇问道："你们找来这么多干枯的树叶干吗啊？"）她的公公詹姆斯男爵1868年去世之后，劳丽男爵夫人和阿方斯继承了三亿法郎的财产，就变得更加与世隔绝了。[49]当年，那笔财富相当于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年薪的15000倍。[50]

一走出家族的保护膜就心慌意乱的劳丽男爵夫人还有着隐匿的女同性恋倾向，这更令她茫然无措。在第二帝国时代，巴黎秘密警察曾经监视到她与德·萨冈亲王夫人的好友乔治娜·德·加利费之间有一段谨慎的情爱史。后来帝国崩溃，该警察部队也被解散了，自那以后，劳丽男爵夫人的性倾向一直是严防死守的秘密。但那个秘密在热纳维耶芙的沙龙里很有暴露的危险，少有的几位公开宣称同性恋的忠实信徒之一、小说家和记者让·洛兰最热衷于八卦巴黎上流社会秘密的同性恋。当然，洛兰深知他的女主人格外重视罗斯柴尔德家族，因而闭口不提劳丽男爵夫人的女同性恋倾向，热纳维耶芙则格外小心地安抚她：

如果劳丽男爵夫人带着一脸惊恐焦虑的神情走进门，斯特劳斯夫人会立即站起身给她递上一杯加奶的热茶和一些巧克力，不断提醒她这些高级巧克力是侯爵送来的。然后她会喃喃

低语：“费里埃……你的沃思礼服好漂亮……大鸟笼里的那些鸟儿怎么样了？”[51]

这种毫无痕迹的安慰就像给劳丽男爵夫人吃了一颗定心丸。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族长片刻之后就安下心来，证明热纳维耶芙的悉心关怀极其有效。



39岁的热纳维耶芙与她最重视的宾客之一，**50**岁的**“**劳丽（·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一起摆拍的照片

不知情的人会觉得热纳维耶芙的关怀只是出于善意，例如，普鲁斯特就很赞赏（或者标榜赞赏）她的“善良”“慈悲”“教养之下的道德魅力”。但更了解她的人（如莉莉·德·格拉蒙）知道，热纳维耶芙“热切地关怀（朋友）的艺术”首先是“让他们离不开自己的艺术”。[52]如果洛里觉得她“是个柔情入骨的女人”，那是因为“她知道如何讨好你，让你反

过来讨好她”。[53]莫泊桑觉得她之所以展现出“难以想象的周到体贴、精细入微（和）无尽的好心”，根源就在于她全身心地需要“让她的俘虏们靠近她，臣服于她”。

虽然热纳维耶芙的风趣一直是忠实信徒们被她吸引的一个官方理由，但和她的美貌一样，她敏捷的才思也开始衰退了。她最受欢迎的一些俏皮话如今已经传了十年之久，诸如“我正想说呢！”（回应古诺说马斯内的音乐像“八音盒”时的话）以及“这是我唯一能甩掉他的办法了”（虚假地解释为什么嫁给斯特劳斯的话）。但她仍然常常把它们拿出来说，对听众的冲击力与日俱减。即便像洛里这样年轻的访客还没怎么听过这些重复段，也评价它们是（温暾无味的）“炒冷饭”[54]，而不属于她的忠实信徒小圈子的阿蒂尔·梅耶尔居然斗胆说：

> 很遗憾，她才思敏捷，却不知该如何大方、低调一些。……真正的女主人应该知道如何开启谈话并让它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不急着占上风。……她应该把网球拍递给客人们，而不是亲自下场打球。[55]

用这些标准来看，热纳维耶芙不是沙龙女主人的典范。但她真正的信徒们拒绝承认这类异端邪说。他们假装她一如既往地令人捧腹，每次听到她的俏皮话，总是装出一片欢腾气氛，莫泊桑（可能还有其他人）觉得那伪装的欢腾才是上流社会的本质：

> 在上流社会，笑从来就不是真诚的。出于礼貌，人们表现出愉快的气氛并佯装大笑。他们交出了一份通情达理的笑的摹本，却从未曾真正地一展欢颜。[56]

或许忠实信徒们放大了热纳维耶芙的诙谐风趣的魔力，以此来增强留在她身边的满足感，安慰自己说从社交角度来看，他们为之倾心的是全巴黎最棒的女主人。［“您的谈话，”普鲁斯特滔滔不绝地对她说（无

论真诚与否），“真是一件艺术品！”］或许当她沙龙里的幽默伤害了他们本人时，他们得用伪装的大笑来缓和刺痛，就像阿斯忍受德加的反犹笑话那样。普鲁斯特忍受洛兰叫他“马塞尔·屁”也是一样，洛兰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他高中时代的这个屈辱绰号。

这种防御奚落的办法大概对一个人尤其有用——作为对自己的短小俏皮话的补充，热纳维耶芙最喜欢讲述长故事来逗弄此人——那就是卢多维克的写作搭档亨利·梅亚克，他真的是打热纳维耶芙一出生就看着她长大的，骄傲地自称是她最狂热的拥趸。毫无疑问，他也的确有着最大的块头：这位渐秃的红脸单身汉长着一圈浓密灰白的海象胡子，因为肥胖而从来蹲不下身去系鞋带，他走路总是拖着鞋带在后面。热纳维耶芙和朋友们戏称他为“肉疙瘩”[57]——艾尔维厄又把它改为“法兰西学术院的肉疙瘩”[58]，谅必是出于嫉妒，因为梅亚克1888年入选了这一最高学术机构。

鉴于他在歌剧和戏剧界的成功，梅亚克可以随意挑选歌唱家和女演员跟他上床，他不在夹层公寓时就是这样消遣的。但热纳维耶芙在场时，他会热诚地宣称她是他唯一钟爱的女人，并竭尽全力证明自己的忠诚。每当她离开巴黎去做温泉疗养（一年有很多次），他总是坚定地尾随，跟她一起旅行。但如此一来，他就把自己变成了她回家后讲述的“有趣”故事的冤大头。梅亚克生长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中，对城市之外的生活一无所知，他那倒霉相简直就是热纳维耶芙取之不尽的笑话大金矿。她讲述他为了取悦她，在瑞士的一个湖边温泉变成了游艇驾驶员——“梅亚克租了一艘小摩托艇，开始讨论在自己的法兰绒裤子上绣满船锚”[59]——还有一次去比利牛斯山脉的旅行中，梅亚克试图“做个徒步者和远足者，头戴贝雷帽挥舞着一根（牧羊人的曲柄杖）四处炫耀。那真是一幅很美的画面”[60]，这些故事让忠实信徒们十分欢乐。



亨利·梅亚克是卢多维克·阿莱维长期的写作搭档，也是热纳维耶芙最为盲从的忠实信徒。她和保罗·艾尔维厄戏称他为“法兰西学术院的肉疙瘩”

这些趣闻逸事变成了热纳维耶芙施展幽默的主体，以至于在她的沙龙里，当常客们像普鲁斯特后来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写的那样，说起她的“梅亚克和阿莱维式”诙谐时，他们所指的可能不仅仅是她与阿莱维共有的反讽能力，还有她对梅亚克的嘲弄奚落。它们或许也凸显出她把表兄的合作者控于掌心的卡门式风格（“如果我爱上你，你可要当心”），她越是拿他开心，他就越发卑微地爱她。在一封她拿出来向朋友们显摆的信中，梅亚克奴颜婢膝地对她信誓旦旦，说：“勒迈特所说的我的一切‘天才’都起于你，源于你。……我所写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

是因你而起。”[61]他可是这个国家的40位“不朽者”之一，这样的颂词非同小可。

热纳维耶芙的故事并非都以笨手笨脚的“肉疙瘩”为主角。不过大多数故事都围绕着她离开巴黎的旅行——或许想到能够获取一些新谈资，就会让这些离开城市的时光变得稍微不那么令人沮丧。她有一个故事就来自在暴雨中搭乘轮渡横穿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的旅行，那次梅亚克不在身边：

> 我上了轮渡，在意大利美丽的天空下——那是我见过的最恶劣的天空。……还有暴雨！大家都到船舱里去躲雨，我要是告诉你们有一支意大利军乐队先到了船舱，你们就知道那里有多挤了。……黑压压一片，根本不能动，船上下颠簸着。伞都撑开了，行李要么湿透了，要么找不到了，还有电闪雷鸣，就在那时，哈，意大利人真是天性喜乐，乐队指挥给了个手势，然后砰、砰——表演开始了！我整个人动弹不得，左边是个扁衣箱，右边是支伸缩号。[62]

另一个精彩片段的高潮是，她在鲁瓦亚的一处温泉看到了一个“古怪的东西”，把祷告椅和坐浴盆合二为一：“我还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它的发明者一定是个大忙人！”[63]

在热纳维耶芙“难忘的、几乎不可描述的四个小时”[64]的故事中，梅亚克再次出现，她同他和斯特劳斯一起去参观卢尔德的圣母朝圣地（孀居的尚博尔伯爵夫人在位于格里茨的花园里竖起的就是那个朝圣地的微型复制品）。但这个故事中的点睛之笔居然不是梅亚克，这可是绝无仅有的：

> 想想吧，满城都是精神失常的疯子跪在街道中央，女人们手拿蜡烛四处走动，神父们唱着圣歌列队前行，害痨病的、半

身不遂的、癫痫症患者和疯女人们被人用小车推进洞穴，人群在泥地里挤来挤去，尖叫着对圣母祈求，声音大得不像是祈祷，倒像是骂人。……那天的卢尔德大概有10000个朝圣者……上帝在那个城里只扮演一个小角色，那种感觉很古怪……一切都是献给圣母的：雕塑、祈祷、横幅，等等等等。人们嘴里只会谈论圣母，上帝给我的印象就像个“不堪大用的丈夫”，大家只是出于礼貌才跟他打个招呼。

思维敏捷的听者马上就知道，“不堪大用的丈夫”恰是斯特劳斯在热纳维耶芙的沙龙里的角色。自从他娶了他们的朋友，那些他对其地位垂涎三尺的大人物都明确地对他说，他们到夹层公寓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与他的妻子交往。更令人恼火的是，她自己如今也开始鄙视斯特劳斯了，龚古尔也注意到此事，记下了这样一则对话：“丈夫说漏了嘴，说‘昨晚上我做了个最最愚蠢的梦’。S夫人答道：‘亲爱的，你确信你当时没醒？’”[65]为了避免这类打击，斯特劳斯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她的沙龙，而据达尼埃尔·阿莱维说，没有一个人想念他。

最不想念他的当属热纳维耶芙和莫泊桑，两人的秘密交往始于1885年末或1886年初。最初可能是波托-里什、洛尔·德·舍维涅或玛蒂尔德公主介绍他们认识的，后者声称莫泊桑受她提携，因为她与他已故的导师居斯塔夫·福楼拜交情甚笃。初遇莫泊桑时，热纳维耶芙还在为她是否应“最终答应”嫁给斯特劳斯而举棋不定，而比她小一岁半的莫泊桑风头正劲，刚刚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漂亮朋友》（1885），出版短短四个月就重印了36次。[66]《漂亮朋友》讲述了一位沉迷女色的粗鲁记者靠与女人上床一路攀爬到巴黎社会顶端的故事，不但让它的作者声名大噪，还给他带来了足够的财富有能力购买一栋海滨别墅、一艘游艇和埃米尔·斯特劳斯提供的法律服务。小说家同行保罗·莫朗[67]估计，莫泊桑的轰动大作为他创造了90000法郎的年收入，对虚构文学作品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巨款。

《漂亮朋友》的巨大成功使人们关心的焦点转向了莫泊桑本人丑闻连连的名声。他鼓励人们八卦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质，信件签名都用“漂亮朋友”，还吹嘘说“漂亮朋友就是我自己”（这是在模仿福楼拜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68]和他的小说主人公一样，莫泊桑也曾是个记者，因傲慢粗野的举止、结实健壮的体格和浓密的胡须（他在作品中把这当作性能力的关键象征），以及对女人的致命吸引力而声名远扬——传说有300个女人委身于他。只要他还在公众的视线内，莫泊桑的性能力就始终是他标志性的特征之一。人们认定小说的主人公很像他，进一步巩固了关于他的传奇的那个方面。

和大多数传奇一样，这个传奇也有它的黑暗面：梅毒。到1889年，莫泊桑的疾病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视力问题，更让他身边的人心烦的是，他经常会做出癫狂行为。一个朋友说，有一次他和莫泊桑在乡间散步，莫泊桑突然抓起一根掉在地上的树枝，使劲儿插进地里，咆哮着说一年以后，它就会生出“千百个小莫泊桑”。[69]

1887年，莫泊桑与另外300位法国艺术家联名抵制埃菲尔铁塔，当时铁塔在建，准备迎接1889年世博会开幕。后来他经常在塔里的餐厅吃饭，“因为这是全巴黎唯一一个（他）无须看到”铁塔的地方。他还有一句不那么诙谐的俏皮话，声称：“上帝在埃菲尔铁塔塔尖宣布：‘德·莫泊桑先生是上帝之子，是耶稣基督。’”[70]脱离语境来听，这类自大狂的宣言或许是名声带来的自恋症状：是大量财富和阿谀奉承几乎必然带来的自我膨胀。只有更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正摇摇晃晃地走在彻底疯狂的边缘。[71]

对热纳维耶芙来说，在嫁给一位古板拘谨的律师之前，这位坏小子小说家实在是个诱人的冒险。说到底，她对精神失衡并不陌生，虽然她本人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世故，但她仍然一如既往地钟情于波希米亚风。（如格雷格所说，就算在嫁给斯特劳斯之后，她也“从未停止

过对反叛艺术家的喜爱”。[72]）何况莫泊桑还有名声和财富这两大诱惑，简直就是热纳维耶芙心目中理想的男子汉。他渲染自己淘气的名声，在把自己的畅销书送给她时，题字是“漂亮朋友本人敬赠”。[73]

不过漂亮朋友本人对比才寡妇倒不是一见钟情，她的头发是黑色的，五官还有强烈的“闪族”特征，而他更喜欢金发女郎，讨厌犹太人。（在另一部小说中，莫泊桑揣度当代犹太人“正在用金钱的力量报复他们长期以来受到的其他种族的压迫”。[74]）但热纳维耶芙是个名人，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她的人脉尤其加分。莫泊桑的姓氏中虽然有贵族小品词，但他不是贵族；他的父亲在1846年才在他们的姓氏中加了那个“德”，母亲则出身体面的诺曼底资产阶级。然而莫泊桑急于征服城区，他也意识到热纳维耶芙能帮助他实现那一成就。在龚古尔看来，莫泊桑的社交野心是他精神健康日益恶化的症状之一；这位年长的作家曾鄙夷不屑地说“（莫泊桑）家里收藏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哥达（年鉴）》”。[75]

莱昂·都德也发现莫泊桑渴望提升社会地位，证据如下：

>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听说他给自己买了三打玫瑰色内裤，两打漆皮鞋，各种颜色的西装，还与最时髦的衬衣裁缝进行了正式会谈，他觉得他们非常聪明。他还开始急切地寻找有头衔的人，积极加入交际俱乐部、沙龙……并请求他们帮助自己改变（以前很粗鲁的）吃相、衣品、步态和骑术。当老朋友们嘲笑他突然变得势利时，他回击道：“我不想再做贱民了——我要向上爬——如果我有个孩子，我希望他是个社交名士，我宁愿做一个血统高贵的二流子，也不想做一个出身低贱的天才！”[76]

都德还写道，他和他的朋友们忍不住嘲笑莫泊桑的势利眼，但“我们也为他感到悲哀”。[77]他们想不通为何一位如此伟大的天才也“落入了

上流社会的陷阱”，在这些琐事上分心，去巴结谄媚那些下流无耻、不识抬举的笨蛋。

考虑到他的社交野心，莫泊桑最初走近热纳维耶芙与其说为追求色欲，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发迹的渴望。可以肯定的是，在她1886年10月嫁给斯特劳斯之前，莫泊桑至少向她发出了两个下流的提议。[78]5月，他邀请她和波托-里什夫妇一起来他家里共进晚餐——波托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也可以带上斯特劳斯”。“我知道一位夫人来单身汉家里赴宴不怎么‘规矩’，”小说家承认道，“但我觉得如果这位夫人还有另一些她认识的女人作陪，就不那么糟糕了。”（所谓的“另一些女人”事实上就是莉佐特·德·波托-里什一人。）热纳维耶芙写给莫泊桑的信件无一留存下来——看起来他似乎在某个时间段把它们全都毁掉了——原始记录中也没有其他资料点明他家里的那场晚宴到底有没有发生。不过没过多久他再次写信给她，显然是在回复她邀请他光临沙龙：

> 我下面的话未免有失鲁莽。我有没有可能在社交交际标准时间之外的某个时候和你见面？如果你觉得这个要求粗鲁不敬，直说无妨。（不过）想多见见自己感兴趣的女人，单独见她们，以便品味她们的魅力和风度——以便为她们着迷，这些难道不是正常的想法吗？
>
> 家庭招待会让我不堪忍受。……我更想在你只招待我一个人的时候前去拜访，只见我一个人，只听我一个人说话，只让我一个人见识你的美丽和妩媚——我不会待太久，我保证。

莫泊桑在这封信中给热纳维耶芙留下了直接回绝他的余地，但她没有那么做。他的第二封信写于1886年夏，表明她在回复他希望得到特殊对待的请求时，承认自己最近开始脱发，对当时（乃至任何时候）社交界的女人来说，向一个刚刚认识的人透露这么私密的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热纳维耶芙刚刚与斯特劳斯一起启程去瑞士度长假，为了避开斯

特劳斯，莫泊桑的回信是通过两人的一位旅伴转交的，即德·黎塞留公爵的未亡人（Dowager Duchesse de Richelieu），闺名艾丽斯·埃纳（Alice Heine，1858-1925）。这位金发女郎美如雕塑，长着一双凄婉的棕色眼眸，一口精致的小龅牙。她生在新奥尔良，是一位波尔多富裕犹太银行家的女儿。她在美国内战期间搬回了法国，通过两人共同的波尔多犹太人精英亲戚认识了贝贝。1875年，艾丽斯嫁给了一位一贫如洗的法国公爵——这又是一例在现代为家徽镀金的例子，但五年后就孀居守寡了。自那以后，她和热纳维耶芙就成了一对不可分割的同伴，两人都寡居，都与音乐界联系密切（艾丽斯是个狂热的歌剧爱好者和赞助人），都热衷于社交。她们到死都为彼此保守着秘密，两人应该有过这方面的约定，可能就是从艾丽斯收到莫泊桑写给热纳维耶芙的信开始的。

那年夏天，两位女性朋友和斯特劳斯一起的旅行是他和热纳维耶芙订婚前的最后一次。但热纳维耶芙还是对莫泊桑很感兴趣，才会不嫌麻烦地请艾丽斯做中间人，在旅行中与他保持联系。这点骗术还是必要的，鉴于斯特劳斯毫无疑问会被莫泊桑的信激怒：不光是写信之事本身，还有他们讨论的亲密话题和语气。由于脱发是他的梅毒症状之一，莫泊桑给热纳维耶芙提供了一个偏方，附上详细说明：在热水中加入氨水、甘油和一种“起泡的焦油化合物，好点儿的药店都有卖”，混合调制即可。她居然指望他提出建议，这表明他已经向她透露了自己的病情，除非她是通过《漂亮朋友》中主人公翘起的小胡子推断出莫泊桑知道如何处理毛发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的推断没错：关于头发的色情化描写，在法国文学经典中只有波德莱尔能与莫泊桑媲美。）无论如何，在信件结尾，他请求她送他一样能满足恋物癖的小东西作为回报：“如果我的办法如我所愿成功了，那么我请求您（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让我保留几根您的头发，作为为您效劳的奖赏。”



艾丽斯·埃纳出身富有的犹太银行家庭，**1879**年嫁给德·黎塞留公爵时皈依了天主教。她和热纳维耶芙一样年轻守寡，后来又于**1889**年**10**月嫁给了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一世。这次婚姻并不幸福，两人最终于**1902**年合法分居

热纳维耶芙那年秋天与斯特劳斯结婚后，和莫泊桑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大概仍然是背着律师进行的。[79]莫泊桑四处漫游和诱惑女人的积习难改，因此每当旅行或性征服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他与热纳维耶芙的书信传情就会变得稀少。（事实上热纳维耶芙可能不知道，他至少与她的两位女性忠实信徒玛丽·卡恩和波托茨卡伯爵夫人有过私情，或许还曾和玛丽的妹妹卢利娅有染。）不过1888年，他们的友谊发生了关键的变化，莫泊桑写给热纳维耶芙的信明显又增加了。为了写自己的下一部

小说，他前往阿尔及利亚旅行了一个月，其间寄了不少情感丰沛的长信给她，描述周围的美景：“溪谷中全是原始森林”；屋顶的吊床“上的天空中布满了巨大、火热、神奇的非洲恒星”；到处是跳蚤的清真寺是“石头盖成的宁静避风港，我常去那里，像个守规矩的穆斯林”。这些句子听起来更像是出自一个单相思的侠客而非性欲旺盛的漂亮朋友，给热纳维耶芙的印象是他一个人待在那里，孤独地想念着他远离的“人们”：

> 晚上，我会在沙漠的干燥空气里独自饮酒，品味着这份孤寂。这很不错，也很悲哀。有些傍晚，我到达一家朴素的非洲客栈，在四面白墙的单间里充分感受到我与深爱之人竟相隔千里，因为我的确深爱着他们。

在最后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他寄了一件充满暗示意味的礼物给她：在阿尔及尔的露天市场里买的一对“奴隶少女”耳环。他说起深爱之人用的虽然是“他们”而不是“她”，但莫泊桑一生中从未给其他任何女人买过这样的礼物或写过这样的信。热纳维耶芙的光芒压过了她们所有人。

她和莫泊桑两人都在巴黎时，会安排常常见面，一般都是请两人共同的朋友作陪，或者作为他们见面的借口。一个夏日的午后，热纳维耶芙与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和玛德琳·勒梅尔一起出现在战神广场（Champ-de-Mars），观看莫泊桑乘热气球飞越巴黎，他以自己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奥尔拉》为气球命名。另一次，她与热热·普里莫利、梅亚克和小仲马的女儿科莉特·仲马·李普曼（Colette Dumas Lippmann）一起到塞纳河畔特列勒（Triel-sur-Seine）去拜访莫泊桑，他在那个河边的小村庄租下了一处农庄，以便安静地写作。普里莫利拍的照片里显示莫泊桑划着一条标有“MADAME”（“夫人”）的小船，带着两个女人泛舟河上，另一张照片上，莫泊桑殷勤地献花给热纳维耶芙。



1889年夏，热热·普里莫利为泛舟塞纳河上的热纳维耶芙（左）、科莉特·仲马·李普曼和居伊·德·莫泊桑拍下了这张照片



39岁的莫泊桑与**40**岁的热纳维耶芙在塞纳河畔特列勒的花园里调情。热热·普里莫利摄

热纳维耶芙与莫泊桑可能还曾设法幽会。1888年6月，他写信给她，确认两人将在巴黎城外相聚：“我明天一早起床就会去普瓦西（Poissy）。要是没接到你乘下午两点的火车过来，我就先去圣日耳曼（昂莱）那条路上的树林里等你。”卢多维克在那附近有一所房子，热纳维耶芙大概安排了与他和路易丝聚会，以此作为与莫泊桑幽会的挡箭牌。热纳维耶芙后来向雷纳克抱怨，说路易丝拒绝在她去阿莱维夫妇的乡间别墅做客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她没具体说是针对什么。[80]

7月，莫泊桑到斯特劳斯夫妇在滨海特鲁维尔（Trouville-sur-Mer）租下的庄园去拜访他们，那是位于诺曼底海滨的一个时髦的度假城，这

对夫妇后来在此地买下了自己的大庄园。［莫泊桑就生长在该地区，在特鲁维尔东北35英里外的埃特勒塔（Étretat）有一处房产。］阿莱维家庭相册中有一张热纳维耶芙和莫泊桑与好几位社交名人一起在阶地摆拍的照片，包括梅尔希奥·德·沃居埃、他的俄国岳父安年科夫将军（General Annenkoff）和妩媚动人的（只不过就热纳维耶芙的目的来看，她十分平庸，毫无威胁）资深社交名媛德·布鲁瓦西亚伯爵夫人。那年秋天，热纳维耶芙安排莫泊桑参加了在费里埃举办的打猎聚会。他接受了邀请，但对那里装腔作势的体育精神嗤之以鼻，对龚古尔抱怨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没有让宾客去追逐一头活的野兽，而是让他们的猎人把一头死鹿拖到森林里，再往那个方向放猎犬。不过由于许多王公贵族都去费里埃打猎，此次经历后来还是给了莫泊桑很有价值的吹牛资本，这再次证明热纳维耶芙的提携还是很重要的。

除了向莫泊桑敞开社交界的大门以外，热纳维耶芙似乎还为他提供了写作素材。1889年2月，正好在她40岁生日之前，莫泊桑在阿尔及利亚写作的那部小说开始在《插图评论》上连载：《如死之坚强》。[81]那年5月，这部作品以成书形式出版，令评论界和书迷都吃了一惊，因为它写的是上流社会，是作者以前的作品中几乎从未提到的场景。（在《漂亮朋友》中，主人公一直到小说结尾才爬到那个顶峰。）而且在知情的读者看来，《如死之坚强》反映了作为作家乃至作为男人的莫泊桑生活重点的重大变化。[82]具体说来，它促使人们猜测小说原型是他和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之间的风流韵事。按照《高卢人报》的说法，这种看法反过来又促成了这部小说“在公众中的轰动效应”。



热纳维耶芙（中）把莫泊桑（最左）介绍给了她的许多贵族朋友，包括（从左到右）布鲁瓦西亚伯爵夫人、欧仁-梅尔希奥·德·沃居埃子爵和沃居埃的俄国岳父安年科夫将军

《如死之坚强》的女主人公，40岁的安娜（安妮）·德·吉勒鲁瓦［Anne（Any）de Guilleroy］是个风情万种的社交沙龙女主人，虽出身资产阶级，但已经融入了上层。[83]她穿着紧身性感的衣服，肉色的袜子，嫁给了一个毫无风度、社交野心很大的财阀，她从未爱过他，他则把她当成自己艺术收藏中的“杰作”。吉勒鲁瓦夫妇完全买得起一座宅邸，却选择住在马勒塞尔布大道上的一间古怪拥挤的公寓里。（在小说的一篇早期草稿中，吉勒鲁瓦夫妇住在奥斯曼大道上。）两人唯一的孩子自幼便被送到外省的一户人家，以便让母亲腾出时间应付繁忙的社交

日程。该日程既慰藉了安妮无爱的婚姻，也掩盖了她与另一位社交界名誉成员之间长期的婚外情。

安妮用她活泼的才思、“麻烦的”美貌和敏锐的社交直觉征服了上层：“她能读懂……人心，知道他们想听什么，让他们很安心。”她的沙龙是“艺术家和交际家的神秘融合”，有一群忠实常客。[84]她把常客们称为忠实信徒，其中包括一位肥胖而蛮横的孀居贵妇，整日自豪地宣称自己提携了艺术家，但对被提携者的作品一无所知；一位聪明的退休艺术审查员，把自己的博学都浪费在了迟钝的社交名士身上；还有安妮的秘密情人，相貌英俊但性情粗鲁的奥利维耶·贝尔坦（Olivier Bertin），此人由著名画家变成了交际家，城区也接受了他的加入。就是贝尔坦创作了她的忠实信徒们每次来沙龙都要膜拜一番的画作：“一个（穿戴着）金色和黑色的漂亮女人，整个画面由阳光和伤逝构成”，画中的她正在为一位死去很久的亲戚服丧。[85]

这些元素一看就让人想起热纳维耶芙，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似乎向朋友们证实了他们猜测的她和小说家之间的秘密情事。贝涅尔夫人对龚古尔八卦说，热纳维耶芙曾亲口对她说过：“有朝一日，如果莫泊桑请她跟他私奔，她会不顾一切地跟他走。”把这个消息传给了热热·普里莫利的波托-里什说，莫泊桑曾亲口对他承认他与热纳维耶芙有染，但后来又补充说他们只上过一次床，是在《如死之坚强》问世之后。由于热纳维耶芙本人没有留下她对这部小说有何感想的记录，我们不可能知道她怎么想。但小说对女主人公的描写可算不上恭维。

在《如死之坚强》所有的人物生平细节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奥利维耶·贝尔坦在与安妮·德·吉勒鲁瓦相恋之初所画的那幅由阳光和伤逝构成的肖像画。小说的故事在1887年春开始时，两人已经出双入对12年了。他们都是上流社会的名誉成员而不是“天生”在此，因而谨慎但快乐地在社交名人朋友们的眼皮底下交往着。但随着他们步入中年，贝尔坦

为他的情妇所画的她年轻时的那幅肖像开始不断提醒他们，两人很快就会失去他们在彼此或在自己身上唯一真正热爱的东西：外表的魅力。这对情人为这一至高无上的崇高价值奉献了一生，在小说叙述的那几个月，他们惊恐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和一开始让他们爱上彼此的那幅画作一样脆弱易逝，一样缺乏深度。

两人的失败是由安妮十来岁的女儿安奈特不经意间促成的，在小说开头，安奈特已经结束了在外省的童年，回到了巴黎。父母当初把她送走是为了专注于社交生活，如今把她带回来则是为了把她嫁给一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侯爵。安奈特初次在社交界露面时，父母的朋友们看到她简直与贝尔坦所绘的安妮肖像一模一样，都惊呆了。他们赞美姑娘摄人魂魄的美固然表明安奈特在看重外表的社交界前途一片光明，但安妮觉得，那也意味着自己作为社交女王的时日无多了。她仪态万方地魅惑了忠实信徒那么多年，容颜日衰让她惊恐万分，以致患上了神经强迫症：每隔几分钟就要照镜子，看看是不是有新的皱纹长出来。她的不安变得越来越病态和强烈，最终再也无法公开露面了。她黯然神伤，滥用吗啡，独自一人关在她曾经如女神般艳压群芳的典雅客厅里，那幅曾经是沙龙焦点和荣耀的肖像只是在不断提醒着她死期将近。

和安妮一样，贝尔坦也出身资产阶级，只是因为年轻时容貌英俊和一度因此而拥有的人格魅力，才暂时在上层有了一席之地。同样和安妮一样，他也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魅力日减而经历了一场中年危机——那次顿悟同样是由安奈特和那幅肖像促成的。由于姑娘太像他为她母亲画的像，贝尔坦绝望地爱上了她，安奈特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暗恋。他在她眼里只是个无足挂齿的老人，相貌和声望都比不上她出身高贵的未婚夫。她还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贝尔坦的艺术作品也过时了。贝尔坦知道，至少这最后一个缺陷是他自己的过错；画过安妮之后，他就放弃了宏大的艺术抱负，一心追求她和上流社会的世故去了。然而他对安奈特强烈的爱颠覆了他长期以来的信念：他一直坚信自己为了一生难求的爱

情而牺牲了天赋。正如书名引用的诗篇[86]中所写，爱情“如死之坚强”，然而贝尔坦被迫看到了他对安妮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肤浅的；让他着迷的是那幅画，而不是那个女人。[87]虽然他拼命地否定这一想法，但每当他凝视着安妮的画像，“如今我眼前浮现的都是安奈特的样子。母亲已经消失了”。[88]

贝尔坦一直坚信自己的中产阶级出身和艺术追求让他摆脱了“有生阶层”的浅陋，如今看到自己的浅薄更令他痛心切骨。他发疯地妒忌安奈特有贵族头衔的未婚夫，甚至自以为是地给安奈特说教了一番贵族阶层如何乏味，跟她说：

> 上流社会（的男人和女人）的智慧不值一提，毫无内容亦毫无价值；他们的信念没有支撑，他们的品位轻浮可疑……他们没有任何深刻的想法、由衷的体味或真诚的情感；他们的教养是虚无的，他们的世故只是虚伪的；简言之，他们是创造出假象并按照精英人群的规定动作行事的假人，他们不是什么精英。[89]

这部小说的高潮出现在一次《浮士德》的特别演出中[90]，贝尔坦看到安奈特一脸崇拜地盯着“显然是虚构的假人”主演，内心卷起了狂怒的波澜。[91]她能对这位外表英俊但音乐才能平庸的男高音如此喜爱，表明她也是贝尔坦警告过她的那种轻浮之人。画家惊恐地发现，他也深受同样扭曲的观点之害；与古诺歌剧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也把灵魂出卖给了那些虚幻的最终招致毁灭的享乐：“仿佛他本人正在变成浮士德。”[92]那天深夜，他因为自责而发疯，撞上了一辆飞驰的公共马车。

虽身受重伤，但他对外表的狂热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当安妮赶到他的临终卧床前时，贝尔坦表达了两个遗愿。第一，他希望能看着她女儿的脸死去。第二，他恳求安妮毁掉两人的信件，如果不慎落入他人之手，它们可能会毁了她品行端正的伪装。把她和贝尔坦的情书付

之一炬，眼看着它们灰飞烟灭，她觉得“他们的爱本身也变成了灰”[93]，信封上液化的封蜡就像从伤口奔涌而出的血。接着，蜡变成血的比喻在小说的最后一段倒转过来。贝尔坦死了，留下安妮惊恐地看着他的尸体变成一尊苍白冰冷的蜡像。他死后才变成了完美无瑕的上流人士：一个“被动的、无情的”假人。[94]

这是对这对情人的真实原型的警示？也许吧。没什么用就是了。

---

[1] MP的同代人提供的关于他在GS的沙龙里充当社交界学徒的情况和引文摘自JEB，*Mes modèles and La Pêche aux Souvenirs*；RD，*Mon amitié* and “Madame Straus & Marcel Proust”；AGG，*Souvenirs*（n.p.，n.d.）；FG，*L’Âge d’or*；and GL，op. cit。

[2] 关于GM对MP之影响的敏锐思考，见Patrick Mimouni，“La Vocation talmudique de Marcel Proust：I. Les Lois causales，” in *La Règle du jeu* 35（September 2007）：82-114，83-85。Tadié也简短地提到过GM对MP早期作品的影响，见Tadié，*Marcel Proust*，57。

[3] 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144.

[4]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43页。

[5] MP，CG，786. 有趣的是，短短几页之前，叙述者刚刚说起德·盖尔芒特夫人“同梅里美、梅亚克和阿莱维的性格相近”（MP，CG，285）。这些都让人想起GS，不但提到了梅亚克（还通过他间接提到了他的写作搭档LH），还提到了梅里美，梅亚克和LH正是在他的中篇小说的基础上为GB的《卡门》创作了剧本。本章之初，德·盖尔芒特夫人还滔滔不绝地讲起了GB的《阿莱城姑娘》；见MP，CG，776。

[6] GM，*Fort comme la mort*，in *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Louis Forestier*（Paris：Gallimard/Pléïade，1987），877.

[7] LG，*Mémoires*，vol. 1，198.

[8]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

1992，123.

[9] GS沙龙里的家具、艺术品和摆设摘自拍卖目录*Collection Émile Straus*. 本章描写的所有物件都在那次拍卖中出售，只有一个例外：德洛奈的热纳维耶芙·阿莱维·比才的画像。斯特劳斯夫妇的继承人把那幅画作捐给了卢浮宫；它如今被收藏在奥赛博物馆。

[10] 乔治·雅各布（Georges Jacob，1739-1814），巴黎最著名的两位大师级木匠之一，曾为法国王室城堡制作座椅家具及家装，主要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让人联想起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具。

[11] 让-马克·纳蒂埃（Jean-Mark Nattier，1685-1766）法国画家，以为国王路易十五宫廷里穿着古代神话服饰的女人画肖像而闻名。

[12] 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18世纪法国画家，与同时代描绘宫廷和神话为主的画家不同，格勒兹关注市民生活，善长风俗画和肖像画。

[13]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法国洛可可时代最后一位重要代表画家。他的前期画作以宗教、古典故事为主题，后期基本以奢侈、享乐、情欲为主题。

[14] 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丹麦裔法国的印象派、新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喜好写生，画了相当多的风景画，他的后期作品是印象派中点彩画派的佳作。

[15] 爱德华·维亚尔（Édouard Vuillard，1868-1940），法国画家、纳比派成员。其作品多为肖像画、室内画和装饰性壁屏，常以周围常见的食物为题材。维亚尔实现了拉斯金、莫里斯等人提出的“艺术平等”口号。

[16] 乔治-皮埃尔·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1859-1891），点彩画派的代表画家，后印象派的重要人物。他的画风与众不同，充满了细腻缤纷的小点，每一个点都充满着理性的笔触。秀拉擅长画都市中的风景画，也擅长将色彩理论套用到画作当中。

[17] 欧仁·布丹（Eugène Boudin，1824-1898），法国风景画家。早年跟随米勒和特罗容学画。布丹出身水手世家，其父为导航员。布丹一生受其影响，热爱法国西部海岸的景致。他的第一次作品展是在1857年，被称为“印象派之父”，也是莫奈

的启蒙恩师。

[18]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8.

[19] 马里亚·福尔图尼·马尔萨尔（Marià Fortuny i Marsal，1838-1874），19世纪加泰罗尼亚画家。他是欧洲最早的一批现代主义艺术家之一，也是当时在巴黎和罗马知名的加泰罗尼亚籍画家。

[20] 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法国巴比松派画家，以乡村风俗画中感人的人性而闻名法国画坛。他的画作以写实的风格描绘农村生活，是法国最伟大的田园画家。

[21] 安东尼·路易斯·巴瑞（Antonie Louis Barye，1796-1875），走兽雕塑家，是杰出雕塑家波西奥和画家格罗的学生。1831年的沙龙中展出了安东尼·路易斯·巴瑞的雕塑《猛虎吞噬鳄鱼》，使他获享盛名。

[22] 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法国著名画家、讽刺漫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杜米埃是当时最多产的艺术家。

[23] 关于GS把爱情描述为两头注定无法同步而行的野兽，见EdG，日志，1887年3月28日的日记。

[24]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9；and Racyz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50.

[25] 莫里斯·康坦·德·拉图尔（MauriceQuentin de La Tour，1704-1788），法国洛可可派肖像画画家。他著名的肖像画人物包括伏尔泰、路易十五、蓬帕杜尔夫人等。

[26] JEB，*Mes modèles*，113.

[27] 这里引用的同时代人对德洛奈的GS画像的评论有A. Surmay，"Exposition de peinture：Salon de 1878，" *Musée des familles*：*lectures du soir* 45（September 1878）：258；and "Le Salon des Beaux-Arts de 1878，" *Gazette des beaux-arts*（July 1878）：58。RM关于那幅画作的诗见RM，"Dédicace à Mme Émile Straus，" in *Les Paroles diaprées*（Paris：Sansot，1910）。关于德加不喜欢德洛奈的画像，见DH，*My Friend Degas*，37。其他忠实信徒对它大加赞赏的引文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

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16-17。

[28] GM，*Fort comme la mort*，878.

[29] GL，*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Paris：Amiot Dumont，1948），154.

[30] MP，in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3（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44.

[31] M. Gérard，"Bonheur manqué，" 2.

[32] MP，CG，505.在这一段，MP把公爵夫人只愿意与艺术家谈论"菜肴或即将开始的纸牌游戏"归咎于无关的"梅亚克和阿莱维式诙谐，那也是她的机智"。MP，CG，506.

[33]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73页。

[34]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74页。

[35] GL，*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Paris：Amiot Dumont，1948），155.

[36] GL，*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Paris：Amiot Dumont，1948），155.

[37] 佛罗拿（Veronal），巴比妥的商用名。

[38] EdG，日志，1894年6月18日的日记；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32；Florence Callu，"Madame Straus，" in Tadié，ed.，*Le Cercle de Marcel Proust*，203 and 207；and Sachs，Le Sabbat，16。关于GS的面部抽搐"像夏日天空的闪电"等，见AF，*Le Bal du Pré-Catelan*，158。

[39] 1890年德洛奈致GS的信，存档于NAF 14383，folio 82/83。

[40] DH，Carnet 3，May 30，1890；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n. 118.

[41] EdG，日志，1899年4月15日的日记。关于GS的肉色丝袜，EdG，日志，1891年2月22日和1886年4月16日的日记。

[42]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41.

[43] 热纳维耶芙或许从家族中两个在修道院里长大的女性成员那里学会了一些小窍门，她们就是卢多维克已故的同母异父哥哥阿纳托尔·普雷沃-帕拉多尔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泰蕾兹甚至担任了神职，后来还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作者注

[44]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61.

[45] RM，"Ginevra，" *Les Quarante Bergères*，n.p.

[46]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22.

[47] EdG，日志，1886年12月25日的日记。

[48] LG，*Mémoires*，vol. 2，201.

[49] 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120；中层银行家年薪的数字用的是1880年的法国法郎，PM在提到GM的出色财力时给出的。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Paris：Pygmalion/Gérard Watelet，1998 [1942]），120-21.

[50] 1880年在巴黎，一位夫人的侍女的平均年薪大约是360法郎，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一位中层雇员的平均年薪为2000法郎。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117.

[51] LG，*Mémoires*，vol. 2，201.

[52] LG，*Mémoires*，vol. 2，202。

[53] GL，*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Paris：Amiot Dumont，1948），154.

[54] GL，*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Paris：Amiot Dumont，1948）；JEB，*Mes modèles*，114；and HR，*Les Cahiers*，382.

[55] 梅耶尔，*Ce que je peux dire*，op. cit.，89-90。

[56] GM，*Fort comme la mort*，877.

[57]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40. GS为梅亚克取的绰号的法语原文是"la Tourte"，字面意思是"圆圆的一条很结实的面包"，习语意为"懒汉"或"肉疙瘩"。

[58] 1892年9月11日保罗·艾尔维厄致GS，引文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41。关于梅亚克因为太胖而无法蹲下身系鞋带，见LG，*Mémoires*，vol. 2，201。

[59]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91.

[60]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81。关于梅亚克受虐狂似的献身于GS，最佳叙述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Meilhac：La 'Tourte' Amoureuse"：240-45。

[61] 1890年6月30日梅亚克致GS的信，信头标注为"维特尔赌场"（Casino de Vittel），引文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42。

[62]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55.

[63]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75。

[64]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82。

[65] EdG，日志，1895年2月18日的日记。

[66] 关于《漂亮朋友》的畅销、批评以及巨大收益的情况参考了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120-21。

[67] 保罗·莫朗（Paul Morand，1888-1976），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术院院

士、外交官，被誉为现代文体的开创者之一。跟法兰西学术院文学大奖并列的保罗·莫朗文学奖就是以他来命名的。

[68] 引文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121；又见GPR，*Sous mes yeux*（Abbeville：F. Payart，1927），46。

[69] Dr. Zacharie Lacassagne，*La Folie de Maupassant*（Toulouse：Gimet-Pisseau，1907），46. 关于GM与埃菲尔铁塔，见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139-41；and Jacob T. Harskamp，*The Anatomy of Despondency*（Leiden：Brill，2011），282。

[70] *A lain-Claude Gicquel*，*Maupassant*：*tel un météore*（Paris：Castor Astral，1993），242.

[71] Robert Harborough Sherard，*Twenty Years in Paris*：*Being Some Recollections of a Literary Life*（London：Hutchinson，1905），55.

[72] FG，*L'Âge d'or*，125.

[73] 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121.

[74] 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138。

[75] EdG，日志，1892年1月1日的日记。Édouard Maynial，*Guy de Maupassant*：*la vie et l'œuvre*（Paris：Société du Mercure de France，1906），200.

[76] LD，*Devant la douleur*（Paris：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1915），116-17.

[77] LD，*Devant la douleur*（Paris：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1915），116-17.

[78] EdG声称GM"试图在她（GS）嫁给斯特劳斯之前占有她，（并）在那以后继续追求她"。EdG，日志，1890年7月5日的日记。

[79] GM致GS的信的所有引文都可见于方便查询的莫泊桑通信数字版：网址是www.maupassant.free.fr（以下简称"GM，*Correspondance*"）。这些信件是按照时间顺序编号的；本章引用和提到的信件有417，418，514-20，526，529，531，535，536，588，614和615。如本章所述，GS致GM的信件无一留下。或许并非偶然，

《如死之坚强》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据信以GS为原型的女主人公烧掉了她与据信以GM为原型的主人公的全部信件，以防丈夫或其他任何人发现他们的婚外情。我们知道GS和LH毁掉了她与GB的大部分通信，但不知道是谁毁掉了她与GM的通信。不过GM本人也可能是个自愿的参与者；1890年他与GS处于热恋期时，他在一封写给某位没有标注姓名的女性通信人的信中写道，他害怕想到“后代对我的私生活充满好奇……一想到人们会谈论她和我，男人们评头论足，女人们说三道四，想到记者们会对我们大书特书，我对她充满尊敬的温柔会被扒光底裤（请原谅这个可怕的表达，但话糙理不糙）……我就会感到剧烈的愤怒和深刻的悲哀”（信件645）。

[80] 雷纳克致GS，存档于NAF 14383，folio 148/149。

[81] 关于评论界对《如死之坚强》的反应，见Louis Forestier’s “Notice” to GM，*Fort comme la mort*，1560-61。关于人们认为这部小说是关于GM和GS真实的风流韵事，见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173；EdG，日志，1895年1月28日的日记。

[82] Robert Harborough Sherard，*Twenty Years in Paris*：*Being Some Recollections of a Literary Life*（London：Hutchinson，1905），59-63.

[83] 为了缩短这本书的整体篇幅，我大大精简了GM的书的内容概要和分析，但我打算在网络上或者以书的形式提供一个未精简的内容概要版本。在此期间，推荐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如死之坚强》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摘要：Anka Mulhstein，*The Pen and the Brush*：*How Passion for Art Shaped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Novels*，trans. Adriana Hunter（New York：Other Press，2017），146-51。

[84] GM，*Fort comme la mort*，869.

[85] GM，*Fort comme la mort*，848。

[86] 《圣经·旧约·雅歌》8：6，第1072页。

[87] 《所罗门之歌》8：6。

[88] 《所罗门之歌》，987-88。

[89] 《所罗门之歌》，875-76。

[90] 《所罗门之歌》，1000。这一场景让我们想起了1887年秋天为纪念《浮士德》在喜歌剧院演出500场，在那里举行的一场真实的筹款演出，GS和LC的朋友让·

德·雷什克扮演标题人物。这位男高音吸引安奈特的好几个细节似乎都指向雷什克，尤其是他充满丑闻的爱情生活。

[91]《所罗门之歌》，1003。

[92]《所罗门之歌》，1001。读者或许注意到这里呼应了MP的那句话："我总觉得书里说的事儿……全都同我直接有关。"的确，关于《如死之坚强》对RTP的影响，还有很多话要说。正如我准备在其他地方说明的那样，两本书的联系不在于对世故的批评，而在于建立了一种感官经验，能够在情感上（有效地）唤起过去生活中的某个被遗忘的时刻的"无意识记忆"的模式。当然，在RTP中，叙述者是被"小玛德莱娜"点心放入茶水中泡软后的滋味带回到同年。在《如死之坚强》中，贝尔坦与安奈特在蒙索公园散步时也有类似的体验。听到女孩的声音，他突然听到了数年前她母亲安妮与贝尔坦初坠爱河时安妮的声音，"那种神秘复活的人声"（900）把"他旧日的生活活生生地带回到眼前"（899），让他陷入了"（他以为已经）消失、陷入虚无的回忆。……仿佛有一只手搅动起沉淀的记忆"（899）。

[93]《所罗门之歌》，1027。

[94]《所罗门之歌》，1028。

华彩段 画家、作家、鹦鹉、先知

文士墨客艳羡画师，也想去画画速写，搞搞写生，他如果这样做了，那就会一败涂地。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笔下人物的动作、癖好、口音，无不是他的记忆授意于他的灵感的。在一个虚构人物的名字下，没有不能放上六十个他见到过的人物的名字，他们有的做出一副怪相，有的献出一只单片眼镜，某人是怒气冲冲的模样，某人又只剩下自命不凡的手势，等等。此时，作家发觉，他那当画师的梦想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如愿以偿的，但是，这个夙愿却已经实现了，作家在不知不觉中也完成了他的速写本。因为，在他自身具有的本能的推动下，作家，远在他自信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在有规律地疏漏那么多为别人所注意的东西，致使别人责备他心不在焉，而他也以为自己既不善于听，又不善于观察，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授意自己的眼睛、耳朵永远地抓住那些在别人看来实属无谓的琐碎小事，某时某人讲某句话时所用的语调、脸上的神色以及耸肩动作，此人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可能一无所知，如此行事已有多年，而这是因为种种语调他早已听到过了，或者预感到他还会再听到，觉得这是一种可更新的、能持久的东西。因为他只是在其他那些人那么愚蠢或者那么疯癫地鹦鹉学舌、重复与他们品性相似的人的话语，从而甚至使自己成为先知鸟、成为一条心理法则的代言人的时候，他才听取他们说的话。他只记住一般的东西。

——马塞尔·普鲁斯特，《重现的时光》（*Le Temps retrouvé*，1927）[1]

---

[1]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

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725—1726页。

第17章 优雅入门

莫泊桑在《如死之坚强》中对外表超越实质、形式战胜情感的上流社会发出了强有力的抨击。假以时日，普鲁斯特也将越来越无情地批判这一现象，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谴责“出于宫廷生活的遗风”，由表及里，“表面的反而变成重要的和深刻的了”。[1]然而在他还是个社交新手时，他再度以斯特劳斯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为榜样，渴望早日适应那里做作的浅薄规则。

普鲁斯特在这一初级阶段学习适应时，上流社会的肤浅教条支配着他的两类主要行为。第一个与他的性道德有关。早在高中时代与雅克·比才和达尼埃尔·阿莱维交往时，普鲁斯特就已经得出结论：他应该尽量压制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哪怕只是为了优雅”。在定期拜访夹层公寓的前五年，他的言行也遵循着这个想法。普鲁斯特之所以能装成“异性恋”，得益于在他拜访的沙龙里，每一位（男性）宾客都被默认为暗恋女主人，同时又被坚决规劝不要受欲望的摆布。正如莫泊桑在下一部影射小说中表现的那样，这样的双重规则让某些忠实信徒很难适应，对普鲁斯特却是个完美的安排。他效仿斯特劳斯夫人的其他随从，把她奉若神明，当成遥不可及的“无情的妖女”[2]。他接二连三地送她赞美和鲜花；给她写激情澎湃的信件，其中充斥着“和一切其他方面一样，您拥有独一无二的超凡技艺，总能使人心驰荡漾直至心碎成伤”这类语句。[3]如果她允许（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普鲁斯特真的会把一张搁脚凳或箱式凳放在她最喜欢的睡榻下面，坐在她的脚下。他的这一姿态让好友雅克·布朗什想起了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1786）中那个毫无希望地迷恋教母的温柔小杂役凯鲁比诺。[4]

布朗什的比喻很贴切，不仅因为凯鲁比诺是女声男角，歌唱家的女性特质（和女高音的音域）突出了这个人物的特性，还因为普鲁斯特的

激情本来就是表演，并没有肉体的欲望与之对应。普鲁斯特本人在最初写给斯特劳斯夫人的一封信中也含蓄地透露了这一点：

> 您并不是十分信服我们必须仰赖柏拉图式爱情的真相（我觉得您不信服任何真相！）。……既然我愿意遵循您禁止失礼举动的动听教训，我就不再说什么了。但请您，我请求您，仁慈地恩顾一下让（我）对您如此依恋的热切的柏拉图式爱情。[5]

这几句话中暗含的防卫语气表明，普鲁斯特的爱可能过于纯真了，不合热纳维耶芙的口味，因为虽然她声称不会对信徒们的爱欲给予任何回应，却毫不掩饰激起那种爱欲带给她的快感。而对普鲁斯特来说，柏拉图式爱人的角色是个轻松乃至（根据他的朋友们的说法）惬意的默认立场。文学小团伙的成员们一致认为，“谁都没有普鲁斯特更享受那种伪装”。

与他的殷勤姿态一样，普鲁斯特觉得，斯特劳斯夫人第一次写信给他是在1890年的耶稣受难日，也有着特殊意义。（他已经给她写了一年多的信，她总算施恩回了他一封信。）他想象这一巧合在他对斯特劳斯夫人的无性爱恋与彼特拉克对洛尔·德·萨德未成眷属的爱情之间建立了一种象征性的联系，那位意大利诗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爱人，就是在五百多年前的耶稣受难日。这样的联想又反映出普鲁斯特的爱充满了理智和文学性质，从他最初写给斯特劳斯夫人的另一封信中也可见一斑：“在这里献上我虚构的温柔的吻，我怕真实的吻会让您感到麻烦。”[6]

除了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之外，普鲁斯特热恋斯特劳斯夫人的假象也是他勤勉出席她的家庭招待会的借口。此举同样是“为了优雅”，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趋附者急于闯入上流社会更不优雅的事了，虽然普鲁斯特每周孜孜不倦地出席她的沙龙也是出于同样的急切，但他知道，公

开承认这一点相当于阻断自己在社交界的前途。正如他几年后在《让·桑特伊》中戏说的，对于有远大抱负的社交人士来说，“罗恩格林对艾尔莎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出身时所说的话之危险性和破坏力”相当于说“我一见你就醉了，我们可以一起用晚餐吗？”[7]他推论说，这些话“不可挽回地破坏了”说者的名声，因为它们暴露了他过于急切的讨好心态；“人只会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友好”。[8]这很可能也是普鲁斯特从斯特劳斯夫人那里听到的“禁止失礼举动的动听教训”之一，他在1892年夏天对她抗议说：“您要是以为我渴望成为社交名士，就大错特错了。”[9]

在斯特劳斯夫人所有的忠实信徒中，最夸张地诠释了一心想发迹的危险的，恐怕就属莫泊桑了。正如他艳俗的时尚翻新和手头那本翻旧了的《哥达年鉴》所示，莫泊桑丝毫不觉得渴望进入上流社会有何难为情，为此头等大罪，热纳维耶芙的两位“犹太伯爵夫人”无情地惩罚了他。据莱昂·都德说，玛丽·卡恩和她的妹妹卢利娅·卡昂·德·安韦斯设计了一连串恶作剧来恶搞小说家：

> 有一次，她们让莫泊桑穿一套红色西装去赴晚宴，当他穿着那一身衣服，像一只长尾鹦鹉一样站在一群身着晚礼服的绅士们中间时，她们因为羞辱了他而乐不可支。另一次，【不知玛丽还是卢利娅】请他来幽会，他到了她家里，发现每一件家具下面都躲着她的朋友，一个个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还有一次，她们寄了一沓由侍女签名的充满激情的情书给他。[10]

这些恶作剧把莫泊桑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傻瓜。这些故事在夹层公寓讲述时总会引发全场哄笑，突出了上层对一心讨好之人发自内心的鄙夷。

在热纳维耶芙的随从大军中，另一位深受此看法之害的人是费尔南·旺德莱姆［Fernand Vandérem，本名旺德雷姆（Vanderheym）］。他是个精明的小说家，经莫泊桑介绍来到她的沙龙。性情沉稳、举止文雅的

保罗·艾尔维厄虽然也出身大资产阶级，却与这群人中的交际家们一样看不起旺德莱姆，说他是个卑劣的犹太人暴发户，对龚古尔痛斥“一切都是被这些人玷污和败坏的”。[11]旺德莱姆的确有很大的社交野心——正如他的一位同代人所说，他“不仅想要争得一席之地，还想得到首席”[12]——但他也担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会阻碍他向上爬。[13]艾尔维厄深知这一心理，开始在圈里传播恶意的谣言，说热纳维耶芙头衔最高的宾客之一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私下里很讨厌旺德莱姆。旺德莱姆得到艾尔维厄的提示，立即上当了，每当亲王在场，他就慌作一团，不知所措。德·阿伦贝格不在场时，他会祈求别的忠实信徒解释一下，他这么一个身份低微的职业写手究竟怎么得罪尊贵的殿下了。旺德莱姆的痛苦成了夹层公寓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再次向喜欢他的普鲁斯特表明，隐藏自己的社交雄心有多重要，并再度促使后者明确表达了对斯特劳斯夫人“伪装的爱情”。[14]

渴望从内部观察社交界不仅影响了普鲁斯特的性人格，也影响了他整个行为举止。在观察斯特劳斯夫人那些上流社会的朋友时，他并不满足于评说他们过度关注形式。[15]他观察到，他们在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和姿态有着成千上万的微妙差别。作为外人，普鲁斯特很快就明白，对这类细微差别的无知可能会让他在那个世界里名誉扫地。如果斯特劳斯夫人和她的小圈子觉得他是个不值一提的俗物，那么就连他在那里岌岌可危的地位也会不保。他可不想事情发展成那样，或许正因为如此，普鲁斯特才决心自学上流社会优雅的礼仪和奥妙。

首先，他注意到在上层，“优雅”这个词本身就要遵守一个必不可少、心照不宣的法则。这个词当时（现在仍然）是巴黎人世故的陈词滥调，它的意思不仅包括礼貌和教养，还包括毫不费力地掌握相关规则，自然从容却又万无一失地过上富贵安逸的生活。法国社交界没有一个词与意大利语中的“sprezzatura”（意为“若无其事”）对应，因此（如今还是如此）就拿“优雅”这个万金油来将就。普鲁斯特发现，社交新手的危

险在于，这个至关重要的词有很多看似差不多的同义词——事实上却事与愿违，这些变体暴露了一个人从根本上缺乏优雅。“华丽”是用来形容乡巴佬的，“漂亮”是形容粗人的，或许最糟糕的当属“时髦”，那是用在太小心、太努力讨好之人身上，是形容“势利眼”的。[16]

普鲁斯特在1892年5月那一期《酒筵》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势利眼》的文章，饶有兴味地强调了这一偏见。除了模仿拉布鲁耶不动声色、心照不宣的语气之外，这篇文章还采纳了拉布鲁耶对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那些卑劣的、一心渴望身份地位的廷臣们的尖刻批判视角。《势利眼》开头描写了一位普通的当代贵妇人事实上极其在意也极其努力，却自欺欺人、迷人眼目：

> 一个女人毫不掩饰自己热爱舞会、赛马乃至赌博的事实。她对此直言不讳，大方承认，甚至张扬其事。但要让她承认自己热爱“时髦”，她就要蛾眉倒蹙、凤眼圆睁了。……深通世故的女人害怕被人指责喜欢时髦，以至于她们绝不会直接用这个词；有时迫于压力，她们会诉诸一个委婉语，以免道出那个可能有损她们名声的情人的名字。她们会执着于“优雅”一词，这……至少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主导她们生活的是审美而非虚荣。[17]

秉持着拉布鲁耶的精神，普鲁斯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学结论：“优雅”是社交界为不敢声张的爱或自恋——势利、虚荣——发明的暗语。

更让普鲁斯特惊异的是，斯特劳斯家那些“优雅”的玩笑话居然如此寡淡无味。他发现，由于那里禁止高雅话题而鼓励浮夸，人们被迫表现出“自我肤浅的一面”，与他们最为珍视的“品位、信念（以及）观点”决裂。[18]他写道，由于社交界的打趣仅限于最新的轰动新闻[19]或“（某个夫人的）公寓里的琐碎物品”[20]这类琐事，它们最多也就是“讨人喜欢的

蠢话，我们在内心深处深知它们不可理喻、自欺欺人，简直就像一个人对着家具说话，因为妄想家具是活物”。[21]

普鲁斯特虽然急于讨好斯特劳斯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但在跟她们聊天时，却觉得他得不断压低自己的智力水平才行。但他也为陷入“迂腐”付出了代价，二十多年后，他回忆道：

> 年轻人如果反应比较迟钝，在（社交界）成功的概率会比聪明人更大一些。……我当时太年轻。起初我只说幼稚愚蠢的话。有一回我话锋伶俐了一些，就被屏蔽（在小圈子之外）长达六个月，只能参加（较大的）聚会。[22]

这段回忆录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中立口气表明普鲁斯特当时备感屈辱。《让·桑特伊》中有一个片段更有启发性，写作的时间也更贴近，以斯特劳斯夫人为原型的马尔梅夫人是来自“无生”阶层、渴望在社交界出名的沙龙女主人，她在朋友们面前羞辱了年轻的男主人公。让·桑特伊崇拜马尔梅夫人的“话锋犀利（和）才思敏捷”，但他每次兴奋地在谈话中偶露锋芒，却只能得到她的鄙视。[23]当他在她的沙龙里提起那些话题时，她“嘲讽地回应他的观点”，对其他客人喊道，“他怎么每次开口都像个装腔作势的蠢货啊”！[24]让·桑特伊“糊里糊涂地觉得自己大概因为太天真而犯了错，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因而）羞耻得无地自容”。[25]这次挫折还唤醒了让·桑特伊高中时代最糟糕的回忆，一群因“看似聪明而让他有些喜欢的男孩……在他开口说话时嘲笑他，满校园追赶他”，全然无视他“（那些）最真诚和优美的信”，这使他备感痛苦。[26]把马尔梅夫人比作让·桑特伊的前校友进一步暗示了文学小团伙与斯特劳斯夫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嘲笑年轻人太书呆子气，却又急于表现得世故圆滑。

普鲁斯特对伊丽莎白·格雷弗耶所谓的上流社会礼节的“单调乏味的现成”性也颇有微词。[27]在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里，贵族们依靠现成的

浮文套语为谈话定下基调，处处透着客气，却既不包含也不会引发任何真正的同理共情。一个例子是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一世，他在1889年娶了艾丽斯·德·黎塞留之后就成了一位荣誉忠实信徒。每次在斯特劳斯夫人府上遇到一位新的艺术家，阿尔贝亲王都会带着迷人的微笑说：“您在摩纳哥家喻户晓。”[28]一般来说，他本人从未听说过自己恭维之人。不过他道出此话时的大家风范会让不谙世事的听者误以为他是真诚的，饱经世故者便会更明白事体一些。他们知道阿尔贝亲王所说的不过是套话，客气得就像“他在颁发文凭或让对方吃一盒法式小点心”。[29]“发现这类可亲话语的虚构特性就是他们所谓的成熟”，普鲁斯特写道，而“对这样的友好举动信以为真”则是粗鲁无礼的明显标志。[30]

普鲁斯特还谴责了社交界对陈词滥调的喜爱。斯特劳斯夫人的贵族宾客们原则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实际上则不一定），因而更偏爱陈腐无趣的圣经格言。奥特南·德·奥松维尔在考察法国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不可估量的经济差异时，就引用了福音书：“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31][32]德·奥松维尔可是研究城市贫困的专家，本该道出一些更有深度的见解。与他同为“不朽者”的院士梅尔希奥·德·沃居埃用拉丁语引用圣经格言，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激情和活力：我怜悯这众人（Misereor super turbam）[33]。[34]在普鲁斯特听来，这类陈词滥调唯一有趣之处，就是它们表现了说者毫不自知的自以为是。德·奥松维尔和沃居埃生来就拥有巨大的财富和特权，他们喜欢援引古老的基督教真理来证明当前的世界秩序是正确的：除他们之外，到处都是需要怜悯的穷人。[35]

更让普鲁斯特怒不可遏的是，这些操持着油滑乏味语言的绅士都是享有盛誉的作家，而正如他对斯特劳斯夫人所说，最优秀的作家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更有甚者，这种陈腐的自我表达之风也传染给了“无生”阶级的作者，只不过他们的流行语往往都是世俗的，与《圣经》无关。举例而言，旺德莱姆就沉迷于讨论社会阶级。但不知是出于神经质的自我贬低还是单纯出于无知，他喜欢用一套毫无教养的惯用语

来表达观点，令社交名士们深觉尴尬。旺德莱姆喜欢用的词有“出风头”“高大上”。[36]他用“上层的精华（cream）”来表示“上层”，或者另一个更糟糕的词，“上等人”。他谈到贵族时用的词是“有品之人”。这一套词汇在上层阶级的人听来极其刺耳，很可能也让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深恶痛绝，干脆趁势认可了传说中他对旺德莱姆的积怨。甚至也有可能，艾尔维厄正是注意到了德·阿伦贝格听到旺德莱姆粗俗聒噪时的一脸嫌恶，才开始传递那个谣言的。

斯特劳斯夫人的表兄路易·冈德拉虽然编辑了全法国最有名的文学期刊《巴黎评论》（*La Revue de Paris*），但此人偏爱另一种陈词滥调：三流雇佣文人的语言。在为《酒筵》撰写的关于冈德拉的《小鞋子》的书评中，普鲁斯特称赏不置——他太渴望有朝一日能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作品，赞美编辑大人可能也是怀此目的。但他私下里怒斥冈德拉的弱点恰在于他“声词雅美”，然而灾梨祸枣，那些语词早已变得粗陋不堪。直到近二十年后，普鲁斯特才对斯特劳斯夫人承认了他有多厌恶她表兄那种陈旧过时的文风，1908年，他总算对她宣泄了一番：

> （冈德拉先生）的文字怎么充满了陈腐之气？为什么他在提到“1871年”[37]时，一定要加一句“那最可憎的一年”？为什么他会不自觉地把巴黎定性为“大城市”，（还）说德洛奈是“大师级画家”？为什么……态度友好就一定要“面带微笑”，而丧亲之痛就一定是“天地不仁”？[38]



路易·冈德拉和他的弟弟艾蒂安是表妹热纳维耶芙终生的好友。路易作为一本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是兄弟二人中更有成就的一位

普鲁斯特学者们往往引用这几句话作为一种负面的“诗艺”（ars poetica）论，是一位艺术家谴责懒惰而陈腐的文风，而这两个形容词很少（至少在他成熟的作品中）能用在他身上。然而阿兰·德·波顿[39]对这段批判文字的注释更有深度，他指出普鲁斯特的文学思想和他在社交界的经历之间有一个重要联系：

> 陈词滥调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的观点有错，而在于它们肤浅地表达了很好的观点。……陈词滥调之害就在于，它们只是

蜻蜓点水的肤受之言，却让人误以为是对某种情境的深虑远议。

犹太人笑话是斯特劳斯夫人沙龙里广为流传的第三类老生常谈。毫不走心的成见中充斥着反犹主义，忠实信徒们的逗乐打趣也一样，哪怕那会伤害她和她丈夫的感情，事实也经常如此。让·洛兰附和德加对莫罗的华丽美学的讥笑，打趣说后者的画作之所以吸引犹太收藏家，是“因为画里全是金银财宝”，全然不顾斯特劳斯家的沙龙里就挂着好几幅莫罗的油画。龚古尔宣称斯特劳斯“完美地诠释了卖长柄眼镜的邪恶商人的模样”。[40]这里重复了一个老掉牙的说辞，居斯塔夫·福楼拜在他的《庸见词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中嘲讽了这个说法：“犹太人：以色列的儿子。犹太人全是卖长柄眼镜的。”[41]福楼拜重弹这些旧调是为了证明它们有多陈腐和愚蠢。普鲁斯特对此心服首肯，但他惊异地发现，像龚古尔和洛兰这样功成名就的作家显然并非同道。

夹层公寓里的语言课并非全都这般扫兴。正是从斯特劳斯夫人的贵族朋友们那里，普鲁斯特习惯了他尤其钟爱的一套词汇的奇妙发音方式：姓氏。他惊喜地发现，许多古老贵族姓氏的发音与它们的拼写方式不同。这种不成文的贵族语言规则把“比萨恰”念作“比萨克”，“布罗格利”念作“布罗伊”，“卡斯特拉内”念作“卡斯特兰”，“卡斯特里”念作“卡斯特”，“格雷菲勒”念作“格雷弗耶”，“罗昂”念作“鲁昂”，“塔列朗”念作“塔勒兰德”，“德·于泽斯”念作“德·于扎伊”，如此等等。有些精英地名也使用如此神秘的发音系统。比方说，已故的尚博尔伯爵的王国就读作“弗罗施多夫”，第一个音节的韵脚不同于（法语和德语语音所规定的）“罗斯”，而同于“罗氏”或“道氏”。[42]

这些细微的差别让普鲁斯特意识到了他从未曾察觉的复杂丰富的层次。就美感而言，诸如“布罗伊”和“德·于扎伊”这样诡谲怪诞的发音中包含着一种诗意元素，普鲁斯特在许多贵族姓氏中都发现了这种元素，它

源于古老法国的历史沉淀，那种熹微的光泽会让人想起岩块剥落的炮塔和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他写道：

> 她的那种发音方式，如果其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没有任何创造一套语汇的意图，真称得上是一座用谈话作展品的法兰西历史博物馆。“我的叔祖菲特-雅姆”不会使人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知道菲茨-詹姆斯家族是会很愿意申明他们作为法兰西的名门望族，不想听到人家用英国腔来念他们的名字。不过有些人，他们原先一直以为得尽力按照语法拼读规则来念某些名字，后来却突然听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是这么念的，于是又尽力照这种他们闻所未闻的念法来念那些名字，这些人驯顺到如此可怜的地步，倒是实在令人吃惊。比如说，公爵夫人有一位曾祖父当过尚博尔伯爵的侍从，为了跟后来当了奥尔良党人的丈夫开个玩笑，她总喜欢说“我们这些弗罗施多夫的旧族”。那些原先一直以为该念“弗罗斯多夫”的客人当即改换门庭，满嘴“弗罗施多夫”的说个不停。[43][44]

普鲁斯特在一篇未发表的手稿片段中讨论了这些细节的社会功能，那篇手稿写一位笨拙的犹太趋炎附势者像旺德莱姆一样，“尽说些社交界的人从不会说的话”。[45]叙述者带着淘气的、拉布鲁耶式的人情练达反问道：“单是发出‘卡斯特里’中的‘里’音，就能证明此人对上流社会一无所知吗？”[46]然而这句评语的讽刺意味也延伸到了评论者本人，即普鲁斯特身上。毕竟，他也和旺德莱姆及其他任何资产阶级人士一样，从不知道‘卡斯特里’中的‘里’不发音。成年后的普鲁斯特自觉地调整了发音，和那位一听到公爵夫人的发音方式便立即改口说“弗罗施多夫”的笨蛋一样，“驯顺到如此可怜”。[47]

普鲁斯特还学会了注意穿衣细节，那更能区分谁是交际家、谁是大

老粗。斯特劳斯夫人有伤风化的女主人行头经她一番筹划，大胆打破了其他沙龙（更不用说她自己的宾客）所遵行的着装规则。女性访客通常会戴着帽子、手套，穿着典雅的曳地日装裙，臀部周围用衬裙和裙撑撑起，由于身着日装紧身衣，所以腰部急剧变窄（这件衣物穿着要比僵硬的夜装紧身衣舒服一些，但洛尔·德·舍维涅通常什么紧身衣都不穿）。男性访客穿着深色长礼服，坎肩及长裤、阔领带、别在扣眼上的花、手套和高顶礼帽的颜色与礼服要么色调统一，要么构成巧妙的对比色。他们一进客厅就会脱下高顶礼帽，把它顶部朝上放在门道旁边或自己座椅旁边的地板上。夏尔·阿斯在行脱帽礼仪时，会露出一圈活泼的绿色丝绸衬里。不过阿斯这样的创新属于新手勿试，对新手而言，任何背离规则的变化只能表明他的无知而非出色天分。

无知就意味着粗俗，它会引发“有生”阶层的怒斥。莱昂斯·德·拉芒迪伯爵，就是关于城区的社会生理学研究带给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启发的那一位，讲过一个小资产阶级巴黎人的故事。因为曾经救过一位大老爷的性命，他受邀前往后者的府邸晚餐，但他系了一条黑色而非白色领结赴宴，显得方枘圆凿，格格不入。[48]拉芒迪发表这个故事的年份是1889年，但普鲁斯特对它念念不忘，整整15年后，他仍难免弄巧成拙，系着白色领结去参加他的朋友吉什公爵阿尔芒在乡间别墅举办的午宴，不想到场的其他人都穿着打猎和骑马的服装。那以后一个多月，仿佛是为了弥补这次失礼行为，普鲁斯特又摇摆到了另一个时尚极端，戴一顶随意的圆顶礼帽去参加吉什在巴黎举办的婚礼。但这一选择也大错特错了：参加上流社会的婚礼必须戴高顶礼帽。在最近发现的一段电影胶片中可以看到一位脸颊瘦削、满脸胡子的人物，历史学家们认为那就是普鲁斯特，他正尾随着婚礼队伍（新娘是埃莱娜·格雷弗耶）匆匆走出玛德莱娜教堂，头上那顶不合时宜的圆顶毡帽在高顶礼帽丛中格外显眼。[49]

自他的社交事业之初，着装疏漏就一直困扰着普鲁斯特。最初，他

还在奥尔良的军团服兵役，趁周日休假赶来出席斯特劳斯夫人的招待会，那身统一分发的步兵制服简直让他如坐针毡，在那个场合，它看上去格外寒碜。他有一次写信给她，为自己“骇人的”制服上衣道歉，并向她保证在找到更得体的衣服之前，他不会再出席她的沙龙了。雅克·布朗什在关于夹层公寓的回忆文字中提到了身穿难看军装的普鲁斯特：

> 我至今还能记起马塞尔身穿士兵制服、敞披斗篷、头戴硬军帽的样子。他可不是为了好玩儿才穿那身军装的，它与他黑色的胡须和标准的椭圆脸型构成了古怪的反差，让他看上去像个年轻的亚述人。……马塞尔坐在一张箱式凳上，对两天没刮的胡子毫不以为然，想帮忙倒茶反而撞翻了陶瓷杯，那一情景历历在目，恍然如昨。[50]

画家还写到普鲁斯特的帽子永远“像个（满身绒毛倒竖的）斯凯猬或刺猬”。[51]

然而布朗什接着说，兵役一结束，普鲁斯特就告别了军服和两天没刮的胡子，改头换面、破茧成蝶了。那个邋遢的军校学员不见了，更别说康多塞中学那个郁郁寡欢的少年。此时的他挺拔而立（或坐在箱式凳上），是一位温雅自信的“学徒交际家”，“系着一条随意扎结的绿色阔领带，下着紧身长裤”，长礼服的翻领上别着一朵山茶花。[52]1892年布朗什为他创作肖像画时，普鲁斯特就是这副样子，布朗什只是改变了被画者领带的颜色（改成了白色）和他领上别着的那朵花（改成了一朵兰花）。虽有后一种改动，但普鲁斯特后来回忆起自己二十多岁初涉社交圈的那段日子，总会把生命中的这一阶段称为他的“山茶花时期”。[53]据费尔南·格雷格说，普鲁斯特对自己扣眼上别着充满异域风情的花朵颇为自豪，它替代保险的白色康乃馨而成为精雅别致的选择，因为它是利顿勋爵送给他的礼物。



21岁的普鲁斯特还在服兵役时，利用每周一天的休假去拜访热纳维耶芙

除了提高穿衣品位，普鲁斯特还培养了独到的眼光，看出社交界哪怕最乏味无趣的交际也有微妙的权术在起作用。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即“艺术圣母”，给他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素材。他在夹层公寓初遇她时，公主已年过六旬，早已失去了年轻时苗条的腰身——身材曾最好地补偿了她的凸眼泡和阔大苍白的脸颊。相反，此时的她结实圆胖，看上去与波拿巴家族的祖籍科西嘉岛上的农妇别无二致。[54]虽说穿戴的都是公主的行头——穿着制作精良的绸缎女装，通常都带有拖裙，并点缀着鸡蛋大小的大溪地珍珠——但她硕大的体格实在像个整日围着脏衣服团团转的洗衣妇。乍看之下，她的行为举止也是一样。公主对自己提携天才年轻人的声名甚为自豪，总喜欢安慰他们说她这人不拘礼节。因

此，无论是对热纳维耶芙沙龙里的常客，还是对那些仍在每周二光临自己的招待会的人们，这位年长的妇人都会夸张地表现自己的“单纯”，温柔地提醒那些波希米亚人，她的波拿巴家族也是新贵出身：“要是没有法国大革命，我还在阿雅克肖[55]的街上买橘子呢！”[56]

然而仔细观察公主就会发现，她的谦逊只是伪装的表象，无论是她对大仲马的意评（“我可没法因为他血统高贵而邀请他，他是个杂种，有一半黑人血统”），还是她蛮横地依赖头衔带来的特权，都将这一点暴露无遗。“玛蒂尔德公主鼓励（我们其他人）对她特别卑躬屈膝，”亨利·德·雷尼埃写道，“为表示尊敬，说话必须压低声音，动词必须变成第三人称，（我们还必须）欣然服从。”[57]此外，当雷尼埃和他的艺术家兄弟们按照礼节行吻手礼（baisemain）向她致意时，公主会把手尽量贴近地面，以至于他们鞠躬时，前额几乎碰到了地板。她通过强制人们实施这类恭敬的礼仪，在自己标榜尊重的那些艺术家中间端起了公主架子。

玛蒂尔德公主的“单纯”本质上充满矛盾，暴露了上流社会那一经典的装模作样毫无诚意。务实的贵妇人的虚伪将成为普鲁斯特在写到城区时最青睐的主题之一，例如《盖尔芒特家那边》中有一个场景，叙述者尖刻地写道：“当膳食总管称呼（这个只信精神不信爵位的）女人为‘公爵夫人’时，这种意外的现象并没有使她感到不舒服。”[58][59]这句话的讽刺意味就在于，马塞尔描述的情况根本不是意外。公爵夫人虽然常常宣称自己“只信精神”（根本不信爵位），但正是她本人坚决要求仆人们使用头衔。然而她从来没有质疑过——如普鲁斯特早年写到虚构的德·艾诺子爵夫人及其身穿法式制服的仆人时所用的词——她必须利用自己的地位背后的那种“无形的力量”：“她从来没想要求管家只喊她‘夫人’……每每有事要叫丈夫办理，她总对膳食总管说：‘您提醒公爵先生……’。”[60]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单纯”只是虚构，粉饰了她极其重视公爵头衔的真相。



身穿黑衣的热纳维耶芙，左起第四，与一群人一起参加了**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同去的人包括斯特劳斯（右边紧挨着热纳维耶芙）、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最左），卢多维克（右起第三位头戴高顶礼帽者）和梅亚克（最右）。摄影：热热·普里莫利

假以时日，普鲁斯特会发现，这种虚伪也是斯特劳斯夫人（后来的德·舍维涅夫人也是一样）身上最令人不快的特质之一。但同样的特征出现在波拿巴公主身上却并没有让他那么厌恶。这大概是因为她是他见过的第一位王室成员，和任何社交人士一样，普鲁斯特也很容易被王室成员头顶上公认的光芒所打动。在上层的年资越深，接触到的王室成员越多。但就算在生命尽头，他说起玛蒂尔德公主时，也始终带着一股迷离的怀旧感，称她为“我的第一位殿下”。[61]

事实上，他不仅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了这一别称（在一个嘲讽“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并不摆出一位殿下的派头”的段落中），

还在1922年与詹姆斯·乔伊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中屡屡提到“殿下”二字，令爱尔兰人甚是反感。后来乔伊斯抱怨同为天才的普鲁斯特“只谈到了公爵夫人”，而普鲁斯特若是听到此言，大概会忙不迭地指出玛蒂尔德公主不是公爵夫人而是一位皇殿下。[62]他初次在夹层公寓见到她时，就知道了此二者的区别。即便发现她的“单纯”并没怎么掩饰她的傲慢，他仍为结识了一位王侯的后代而深感自豪。

公主从斯特劳斯夫人的访客那里获得的第三人称表达方式让普鲁斯特更笼统地了解了王室和贵族称谓的复杂细节。[63]在《布瓦尔与佩居榭的世故》（“*Mondanité* of Bouvard and Pécuchet”，1893）中，他深入挖掘了这些神秘的古老细节中的荒诞主义喜剧效果。[64]他在文中再度发挥模仿天分，想象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榭》（*Bouvard and Pécuchet*，1881）中的两位标题人物，那对天资愚钝的小资产阶级博学者，下决心进入社交界。在福楼拜的讽刺小说中，两人试图自学庞杂的学问，从医学到育儿和景观建筑，再到玄学。但他们的“知识”是各种靠不住的资讯、半生不熟的观点和庸俗成见的大杂烩，每次他们试图付诸实践，都会滑稽地一败涂地。在普鲁斯特的模仿作品中，布瓦尔与佩居榭考察了贵族阶层的方式和路径，同样遭遇了不可救药的坏运气。

两位朋友为未来的社交归附迈出的第一步，是试图解决应该如何对社交界的大人物鞠躬致意的问题：“是整个身体都向前弯曲呢，还是颔首即可？动作应该快还是慢，向前一步还是留在原地？……双手应该保持在身体两侧，握住帽子，戴着手套吗？”[65]然后他们排练了其他“彬彬有礼”的仪态，效果是不自知的荒唐可笑：“布瓦尔靠在壁炉架上，小心把玩着他专为此目的带来的一双浅色手套（以免弄脏），为使效果逼真，称呼佩居榭为‘夫人’或‘将军’。”[66]在面对引荐的问题时，两人更迷茫了：“应该先说谁的名字？应该用手指着被点名之人，还是冲其人点头，还是保持静止，不动声色？”

当布瓦尔和佩居榭说到“以合适的头衔称呼每一个人”的话题时，他们的迷惑达到了闹剧高潮，这个话题令人望而生畏，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得不认输了：

> 应该称男爵、子爵和伯爵为“先生”，但“您好，侯爵先生”在他们听起来毫不热情，而“您好，侯爵”又太傲慢。他们只好说“亲王”或“公爵先生”，但就连他们也觉得后一种用法有点恶心。殿下们更让人头疼；布瓦尔一想到自己那些王室熟人就觉得脸上有光，想出了一千句以各种方式突出这一称谓的话；他赧然一笑、轻轻垂首，双腿跳来跳去地说出了这个词。但佩居榭宣称他会忘记，或者稀里糊涂，或者干脆当着亲王的面笑场。简言之，为免去麻烦，他们决定干脆还是别进圣日耳曼区了。[67]

虽然表面看来荒诞不经，但布瓦尔和佩居榭“干脆还是别进圣日耳曼区”的决定，恰恰突出了那个世界的优雅守则显然着意发挥的排外功能。那些守则的目的就是吓退和羞辱外人；它们的本意就是要炫耀德·阿伦贝格们与旺德莱姆们之间、骑师俱乐部和穷光蛋俱乐部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普鲁斯特的模仿文章的最后一段，布瓦尔和佩居榭突然充满鄙夷地话锋一转，针对起就连他们这样的土包子也自以为完全有资格嘲笑的那个社会群体：

> 说到犹太人，布瓦尔和佩居榭承认他们讨厌待在犹太人身边。他们（犹太人）年轻时都是在德国卖长柄眼镜的。他们都长着鹰钩鼻、想法离奇，邪恶的灵魂一心一意钻钱眼儿。何况他们还组成了某种庞大的秘密社会，把自己取之不尽的财富任由不知名的敌人挥霍，目的可怕而神秘。[68]

在一篇滑稽模仿上流社会优雅守则的文章的结尾来这么一段枯燥冗长的反犹俗套，乍看上去似乎不合逻辑，细想则不然。虽说普鲁斯特也和前辈福楼拜一样对这类噱头反感透顶，但斯特劳斯夫人的其他朋友们却总是乐此不疲。在夹层公寓，人们听到侮辱性的反犹言论时总会报以大笑，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原因很简单，反犹是“优雅的”，犹太人身份代表着粗俗。

如果你是普鲁斯特，你的愉悦就没那么旗帜鲜明了。你的笑可能是出于尴尬、自我厌恶，或者装作蛮不在乎（“单纯”）。你笑是为了讨人喜欢，或者像个非犹太人（无论如何，普鲁斯特已经受洗，如果血统上不完全是非犹太人，他的宗教信仰已经与犹太人无关了）；或者是为了忍住不哭。不过也有可能，你的笑声中暗含着某种骇人的秘密，希望终有一日，你可以利用自己毫不留情的天分，把那些上等人统统打入他们自己的穷光蛋俱乐部。一想到彼时他们的优雅也救不了他们，你笑了。

---

[1]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02页。

[2] 《无情的妖女》（“Belle Dame sans Merci”）是约翰·济慈所作的一首诗。诗歌题目为法文，原是法国普罗旺斯一支歌曲的名字。

[3] 邮戳为1892年11月13日MP致GS的信，见MP，*Lettres à Madame et Monsieur Émile Straus*，6。

[4] JEB，*Mes modèles*，113. 居斯塔夫·施伦贝格尔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把年轻人坐在脚凳上的情景描述为“怪诞”。Gustave Schlumberger，*Mes souvenirs*：*1844-1928*，vol. 1（Paris：Plon，1934），304.

[5] “1892”年MP致GS的信，见MP，*Lettres à Madame et Monsieur Émile Straus*，11；MP在第四页提到了他与GS的“耶稣受难日”纪念日。

[6] MP致GS未署期的信，MP，*Lettres à Madame et Monsieur Émile Straus*，5。

[7] MP，JS，667.

[8] MP，JS，667.

[9] 1892年夏MP致GS的信，见R. Proust，ed.，op. cit.，7。

[10] LD，*Devant la douleur*，118. LD在叙述时并没有点明卢利娅和玛丽就是这些恶作剧的设计者；该信息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31。

[11] EdG，日志，1889年12月11日的日记。

[12] Paul Allain，"En passant：La Place à table，" *Le Radical*（November 9，1922）：1.

[13] LD，*Fantômes et vivants*（Paris：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1914），293.

[14] 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26. 正如Taylor一针见血地指出的，MP"一生中从未垂涎过女人。他只是希望垂涎她们"（27）。

[15] 不过，MP的确认为这样的关注是世故的基石，他在二十多岁时就写道："社交界的人们通常会用外表来判断一切。"MP，JS，628.

[16] Aristide Bruant，ed.，*Dictionnaire français*：*argot*（Paris：Flammarion，1905），180-82.

[17] MP，"Études I. Snobs，" *Le Banquet* 3（May 1892）；以"Snobs"为题转载于MP，PJ，86-88。

[18] MP，JS，677.

[19] HR提到在1891年春，GS和她的忠实信徒们就非常痴迷于谈论一位通奸的法国少妇在北非毒死了丈夫然后自杀的新闻。关于这一丑闻的报道，见Amédée Blondeau，"L'Empoisonneuse d'Aïn-Fezza：Mme Weiss，" *Le Rappel*（May 30，1890）：1；Émile Massard，"Jeanne Weiss，" *La Presse*（May 30，1891）：1；Notre Envoyé Special（pseud.），"L'Empoisonneuse d'Aïn-Fezza"（May 31，1891）：1-2；and "Le Suicide de Mme Weiss，" *L'Avenir de Bel-Abbès*（June 3，1891）：1-2。

[20] MP，JS，678.

[21] Alain de Botton，*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New York：Pantheon，1997），108.

[22] MP，in Kolb，ed.，vol. 3，247.

[23] MP，JS，677-78.

[24] MP，JS，677-78.

[25] MP，JS，679。

[26] MP，JS，258；1068，注释3。这条注释中包括一个从JS的手稿中删除的短小段落，其中MP明确将马尔梅夫人比作了高中时代折磨他的让的“小团伙”，认为他们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残忍地对待他，还在于他错以为他们聪明。

[27] EG，“Le Revoir，” op. cit.，几年后在JS中，MP会同样抱怨世故的现成语言束缚了情感、心理和创作自由：“所谓‘良好教养’的那些不假思索的回答破坏了一切天性、一切独立思考和一切诗意的可能。”见MP，JS，525。

[28]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27. 关于MP对毫无意义的“社交友好”的分析进一步的讨论，见Gilles Deleuze，*Proust et les signes*（Paris：PUF，1964），10-11。

[29] MP，CG，833.

[30] MP，SG，62. MP在其他地方曾称之为友好谈话的“荣誉功能”（CG，834），不仅限于世纪末的贵族阶层。如今大多数说英语的人早晚会意识到“你好吗？”和阿尔贝亲王对陌生人的万金油赞美一样，纯属套话。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很少能听到真诚的回答，希望得到真诚回答的就更少了。

[31]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2：8，第187页。

[32] 《马太福音》26：11。德·奥松维尔还在他的至少一部书中引用了这句话。Paul-Gabriel Othenin de Cléron，Comte d’Haussonville，*Socialisme et charité*（Paris：Calmann-Lévy，1895），381.

[33]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8：2，第31页。

[34] 这是圣莫代福塞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Maur-des-Fosses）12世纪唱和歌

集里的一句歌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手稿部，siglum F-Pnm lat.12044。Vicomte 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Le Roman russe*（Paris：Nourrit-Plon，1888），xxiii.

[35] MP关于这一现象最风趣幽默的描写，是一位虚构的君主从小就相信“神圣天意要你生来就高人一等、堆金叠玉……仁慈的天主希望你拥有苏伊士运河几乎全部的股份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皇家荷兰石油公司股份的三倍”。MP，CG，720.

[36] Lucien Descaves，“Opinions et souvenirs：Fernand Vandérem，” *Le Journal*（February 6，1938）：3；Robert de Traz，“Chroniques，” *La Revue hebdomadaire*，2，no. 7（February 12，1938）；229-35.

[37] 正是在1871年，第三共和国向普鲁士割让了阿尔萨斯省和大部分洛林地区，20000人在巴黎公社运动中丧生。普鲁斯特也是那一年出生的，因此在他看来，那一年必定没有冈德拉感觉的那么“可憎”。——作者注

[38] 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 avec Mme Straus*，109。在同一封信的后文中，MP解释说套话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是因为“只有那些带有我们的品位、我们的疑虑、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弱点的东西才是美的”（112）。的确，在表达和描述现实时，“陈词滥调的问题”在于它们只是“蜻蜓点水的肤受之言”。Alain de Botton，*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New York：Pantheon，1997），88.

[39]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1969-）出生于瑞士、居住在英国的作家、电视节目主持及制作人。他的著作及制作的电视节目惯以哲学角度，诠释与探讨各种日常生活中的际遇。他出版的小说《爱情笔记》售出了两百万册；《拥抱似水年华》《身份的焦虑》《幸福建筑》都创出了最畅销书籍的佳绩。

[40] EdG，日志，1885年6月6日的日记。

[41] 居斯塔夫·福楼拜，*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suivi des “Mémoires d’un fou”*（Paris：Nouvel Office d’Édition，1964），84。多加一句，EG也不总是靠开玩笑来缓和自己的反犹主义观点；他直率地自称“理论上是整个犹太种族的敌人”；见EdG，日志，1891年6月24日的日记。

[42] 关于那些发音与拼写不符的法国贵族姓氏，又见Cécile David-Weill，*The Suitors*，trans. Linda Coverdale（New York：Other Press，2012），101。在这部21世纪关于世故的精彩作品中，作者之所以要追记姓氏的发音，是因为女主人公Laure Ettinguer的姓读作“埃廷格齐”，正如EG和HG的朋友们奥廷格一家把自己的姓氏念作“奥廷格齐”。

[43]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225页。

[44] MP，LP，543.

[45] MP，存档于NAF 18324，folio 83/84。

[46] MP，存档于NAF 18324，folio 86。在同一本笔记中，MP讨论了其他错误的“措辞”和“名词形式”暴露了自称的交际家事实上是个冒牌货；例如，“把德·杜多维尔……公爵称为‘德·拉罗什富科·杜多维尔公爵’”以及“不省略喀斯特兰和塔勒朗中的‘e’和‘ey’的发音，等等”。：MP，存档于NAF 18324，folio 84。在SG中，他又回到了德·于扎伊的发音问题，指出对一个加入贵族的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婚姻的主要乐趣之一就在于她有权说起“我的德·于扎伊姨妈”，按照起初“曾令她十分惊讶的方式”来发音。MP，SG，213.

[47]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225页。

[48] Comte Léonce de Larmandie，*Du Faubourg Saint-Germain en l’an de grâce 1889*（Paris：E. Dentu，1889），91.

[49] 有些学者认为这段胶片捕捉到了MP在新娘派对刚刚结束后离开教堂的情景；可在以下网址观看http：//www.france24.com/en/20170215-france-literature-marcel-proust-footage-wedding-clip.婚礼发生于1904年11月，即MP拜访AGG的城堡后一个月左右。

[50] JEB，*Mes modèles*，112-13。

[51] JEB，*Mes modèles*，111。

[52] JEB，*Mes modèles*，113。关于MP新近对社交界风格细节的关注，又见Sisley Huddleston，Paris Salons，Cafés，Studios（New York：Blue Ribbon Press，1928），277。“他说，他有必要知道一位亲王（原文如此），优雅的评判者，如何戴自己的单片眼镜”，他说LC收藏的帽子是“一座活生生的行走的博物馆”。

[53] 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145.

[54] 匿名作者，*Biographie de Mme Demidoff：la Princesse Mathilde*（London and

Brussels，1870），31。匿名作者这里把“滚圆肩膀”的玛蒂尔德公主比作了“博斯平原的一位肥硕的农妇”。

[55] 阿雅克肖（Ajaccio），科西嘉岛最大的都市，位于法国科西嘉岛西岸，是科西嘉岛的首府，也是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的出生地。

[56] MP，“Un Salon historique：le Salon de S.A.I. Princesse Mathilde，” in *Le Salon de Mme de…*（Paris：L’Herne，2009），15-35，16.

[57] HR，*Les Cahiers*，278. GPR在其他文字中也曾抱怨玛蒂尔德公主的高傲，见NAF 24951，folio 44。

[58]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11页。

[59] MP，CG，732-33.

[60]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11页。

[61] 在OJFF中，叙述者提到虚构的德·卢森堡亲王夫人（据信原型为德·萨冈亲王夫人）时说，她是“我的第一位殿下”，然后又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限定语：“我说她是我的第一位，因为玛蒂尔德公主”——叙述者先遇到的——“从仪态上说完全不是一位殿下”。这里的笑话是，德·卢森堡亲王夫人和玛蒂尔德公主都认为自己对地位低下的人很“单纯”——不装腔作势，十分务实，但事实上她们的举止极其高傲。写明德·卢森堡亲王夫人无意间对叙述者及其祖母的可憎行为的场景是RTP最有趣的段落之一。Walter Benjamin引用乔伊斯引述MP曾经对他说“她是我的第一位殿下”。Walter Benjamin，“Pariser Köpfe，” in *Walter Benjamin Passagen*：*Schriften zur französische Literatur*，*ed. Gérard Raulet*（Frankfurt：Suhrkamp，2007），174-81.

[62] Carter，*Marcel Proust*，778.

[63] 关于法国王室和贵族称谓的规则，详见本书附录一。——作者注

[64] 故事梗概见Brooks，*Flaubert in the Ruins of Paris*，161-63。

[65] MP，“*Mondanité* et *mélomanie* de Bouvard et Pécuchet，” in *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收录于MP，JS，57-65，59。

[66] MP，“*Mondanité* et *mélomanie* de Bouvard et Pécuchet，” in *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收录于MP，JS，57。

[67] MP，“*Mondanité* et *mélomanie* de Bouvard et Pécuchet，” in *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收录于MP，JS，59-60。

[68] MP，“*Mondanité* et *mélomanie* de Bouvard et Pécuchet，” in *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收录于MP，JS，62。关于这一段落的简略但精辟的评论，见Carter，*Marcel Proust*，152。关于MP面对上流社会反犹主义盛行的矛盾的愉悦感，见JEB，*Mes modèles*，121。

第18章 我们的心

2月的巴黎流感肆虐，所以利顿勋爵谨遵医嘱，去尼斯住了几周，就住在西米埃兹（Cimiez）区的异乡人酒店（Hôtel des Étrangers），位于俯瞰城市的半山。海边的空气和阳光有助于他身体复原；前一年5月他做了一个手术，从鼻腔里取出了一个肿瘤，自那以后健康便每况愈下。[1]（这位英国人“吸鼻涕”的习惯也更严重了。）但不管里维埃拉的日光浴对身体的疗效如何，都未能让利顿勋爵的心情恢复平静。近来他愁肠百转，忧心忡忡。

1890年2月16日，他在给妻子的妹妹特里萨·厄尔（Theresa Earle）的信中写到了自己的焦躁不安：

> 我觉得我像风一样飘摇不定，我确定无疑地意识到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真的，我是一个自己也难解的谜。我只知道我体内至少有六七个不同的人格，他们彼此间全然不同——他们朝不同的方向撕扯着，争相阻隔彼此——而且我也不觉得世上有谁比我自己更了解他们一些。[2]

由于他没有详细说明那些冲突的自我的身份，特里萨·厄尔大概只能猜测姐夫说的是他的两个职业人格：一边是大使阁下，一边是欧文·梅雷迪斯。同时应付外交和文学工作的确让他力不从心，而且他还必须这么做：利顿勋爵指望靠卖书的（微薄）收入来支付管理大使馆（高得离谱）的费用呢。前一周，他对妻妹说，他刚刚“改写和重写了《罂粟王》的大部分文字”，希望能尽快出版。他坦言在修订这部代表作的过程中，他尽量不过于担忧“它出版后的商业反响，哪怕它看似有可能一败涂地”。[3]

然而事实上，对他而言，诗作的商业反响事关重大。他少年在哈罗公学求学时，同学们便称他为“穷鬼利顿”，那个绰号至今仍然适用。他尽量不张扬自己的财务压力——甚至给一条最喜欢的宠物狗（最近刚刚死去）取名“预算”——但他再也不想当朋友圈里最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人了。

特里萨·厄尔大概还会猜测姐夫的抑郁症又犯了。这段时间，他一直觉得“（他）和（自己的）理想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让他痛苦不堪”，还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外交和社交地位的局限。他在写给另一位最亲密的知己、已婚的女儿贝蒂·鲍尔弗夫人的信中说：

> 我就像一只被困在养禽场的野鸟，如果说被绑的双翅偶尔还能在笼子下面扑腾，它们感觉压抑的另一个原因是知道自己身为病人，这样坐立不安不甚体面。[4]

鸦片有助于平复那些坐立不安的情绪，但效果从不长久。

利顿没有告诉贝蒂或特里萨·厄尔的是，他一直在谨慎地追求巴黎的两位已婚女人，而且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了。虽然这两个女人——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和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并非好友，但她们的社交圈有很大的交集，他脚踩两只船的真相迟早会为人所知。这更加重了利顿勋爵的心病，但他还不至于蠢到跟女儿或妻妹提及此事——两人都会替他的妻子愤愤不平的。

利顿勋爵的尼斯之行或许让他的感情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了。他2月7日入住异乡人酒店。两天后，热纳维耶芙单独出现在城里，也住进了同一家酒店。她的官方说辞是要在蒙特卡罗的亲王宫殿与老朋友艾丽斯·德·黎塞留共度几个月时光，后者如今已经是摩纳哥的艾丽斯王妃了，正在准备自己当上王妃后的第一次舞会，请热纳维耶芙务必在蒙特卡罗多住些时日，“帮她处理那些烦琐的差事”，此外也请她出席《卡门》的

巡回演出，这次堂·何塞将由让·德·雷什克出演。（艾丽斯要在这两个重大活动中面对公众，需要热纳维耶芙全力给她道义上的支持，因为阿尔贝亲王选择独自一人驾驶新游艇“艾丽斯王妃号”过一个超长蜜月。[5]）然而私下里，热纳维耶芙的摩纳哥之行使她总算有机会在没有丈夫监督的情况下在当地游历一番了。斯特劳斯陪她来到蒙特卡罗，却在他和热纳维耶芙到达宫殿短短几天后被一个案子召回了巴黎。他不在场，热纳维耶芙独自一人去了尼斯，中途还在戛纳停留了一天。

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从6月中旬开始一直驾驶着游艇“漂亮朋友号”环游地中海的居伊·德·莫泊桑也在热纳维耶芙到达两个城市期间出现在戛纳和尼斯。她在西米埃兹时，莫泊桑也寄宿异乡人酒店——要知道他来尼斯时通常都和母亲住在一起，她在附近有一所房子。[6]

热纳维耶芙在里维埃拉海滨期间的通信显然缺失了，这使我们很难确定她在那里做了什么，什么时候，与谁在一起。2月，她从蒙特卡罗写信给婶婶纳尼内·阿莱维，讲述在亲王宫殿的遭遇，假装抱怨那里的种种缺陷：什么它“有自己的镜厅，这名字倒是合适，因为那里冷得跟冰窖似的”[7][8]，什么她住在一间“可怖的卧室，那是某一位约克公爵咽气的地方”，什么“这里的大理石或斑岩地板太滑，走路时摇摇晃晃、手舞足蹈的”。那个月晚些时候，她从尼斯给波托-里什寄了一封神秘的短信：“运气好的话，事情会圆满解决的。”至于是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运气才能“圆满解决”，她一个字也没有解释。[9]

然后她的通信就中断了六个月。

不过，埃利·德洛奈在3月寄来的欢迎热纳维耶芙回巴黎的信表明，她曾向他倾诉自己在旅行期间见到了英国伯爵。她或许是在转达利顿勋爵对德洛奈为她所画肖像的赞美时透露此事的，因为画家写道：“我那忧郁的、目光如丝绒般柔软的东方侍婢啊……很荣幸利顿勋爵喜欢我（给你画）的肖像，不过我觉得他更爱本人是绝对正确的！”[10]她忧郁

的原因是另一个谜，但她丈夫大概与此有关，因为保罗·布尔热在3月18日写给她的信中问道：“斯特劳斯控制住他可怕的坏脾气了吗？”[11]不管他是否知晓她在法国南部的幽会，布尔热显然担心热纳维耶芙此时在家里面对的头疼事儿。

关于两人在尼斯期间发生了什么，利顿勋爵的通信所能提供的线索就更少了。他指名写给热纳维耶芙的信件存世很少，其中一封是几个月前写的，利顿勋爵称她是“最聪明迷人的女人，作曲家阿莱维之女、经久不衰的歌剧《卡门》的作曲家比才的遗孀”。[12]两人的通信也在里维埃拉之行后中断了大约六个月之久，另一个原因或许是事后为顾全大局进行的审查。（在他去世后为他编辑信件出版时，贝蒂·鲍尔弗夫人扣下了父亲可能不愿公开的所有文件；利顿勋爵也曾为自己已故的父亲尽过同样的义务，隐瞒了英国伯爵生前许多轻率之举。[13]）

不过从利顿勋爵这段时期其他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到热纳维耶芙的影子。例如，他虽然生前没来得及把《流浪的犹太人》改编成讽刺剧，却完成了对她已故父亲的另一部歌剧《犹太女》的英语改编。（利顿勋爵版本的标题就叫《剧》（*The Play*），从未上演。）他还以谄媚的口气写到在她的沙龙里遇到的那些文学泰斗，表达了自己更偏爱“害羞、沉默，显得笨拙，却极为风趣的”梅亚克，把梅亚克比作“一头粗壮的大象，却有一条出奇灵巧敏捷的象鼻子”。[14]

利顿勋爵重视这类人脉，他知道在巴黎，要想拥有这些人脉，热纳维耶芙是最好的帮手。他在英格兰也有很多作家朋友，包括查尔斯·狄更斯、罗伯特·勃朗宁和奥斯卡·王尔德；结交这些人让利顿勋爵安心了一些，虽然他出身贵族又从事外交，但作家同行们还是严肃地对待他的艺术天分。（他如此戒备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总有人公开诋毁他的写作天分，包括他的父亲至死都瞧不起欧文·梅雷迪斯，说他是个抄袭者和雇佣文人；说到儿子与狄更斯是好友，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的不屑之

词名声在外：“猫还要瞅国王一眼呢。”[15]）利顿勋爵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总希望赢得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家们的尊重。他总往夹层公寓跑，就是觉得那是和他们相遇的理想场所。

热纳维耶芙大概也给了他一些创作灵感。他以欧文·梅雷迪斯为笔名创作了一首甜蜜而心酸的爱情诗——《在夹层公寓》（“A l’entresol”），写给一位有着“深邃而潮湿的黑色眸子”，紧张得“脸颊颤抖”的“忧郁”迷人的巴黎女子。这首诗用英文写成，但它的法文标题暗示了它的场景：右岸一个夹层公寓的优雅客厅，诗中的叙述者和他的女主人在那里独自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沙龙的摆设让人想起热纳维耶芙沙龙中的东西，不管是“一面清澈的大镜子”中映出的“伟人伏尔泰的眉峰”，还是“格勒兹笔下娇小的法国美人”，以及“丽达那白天鹅的后背/被她充满爱之重的吻压弯了”，抑或是新鲜采摘的大量玫瑰，为了抵御外面的严冬而“花冠紧闭”。

在与房屋的女主人相顾无言时，叙述者站在沙龙的窗前，凝视着下面“起伏的大道熙熙攘攘”。与此同时，在他身后的壁炉架上，“时钟的指针飞快地行走”，表示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提醒他时光飞逝，更令叙述者悲喜交集。起初，它使他急于与目光忧郁的女主人及时行乐：“哦是啊，/时光如流沙/还是不要问，不要说/……让我们用热吻把魔咒打破！”然而就在他准备拥抱她时，他退缩了，在火光映衬下，她那双黑色眸子的光芒突然让他想起了另一间沙龙，另一位沙龙女主人。《在夹层公寓》的结尾，叙述者不再对同伴说话，而是对自己的心发出了祈求，那里住着另一个女人，那是她的王国：“哦我的心啊，她看上去跟她那么像，简直可怕！/让我躲开自己的绝望吧，/躲开我梦中的那个幽灵！”[16]

这些诗句大概勾勒出了紫衣缪斯的影响在何处终结，一位对手缪斯出现了，因为利顿勋爵梦中的幽灵不是热纳维耶芙，而是伊丽莎白。前

往尼斯之前的六个月，他终于厌倦了伊丽莎白混沌不明的暧昧态度，断然终止了两人的关系。然而，他摆脱她的努力并没有平息他对她说起过的“从我初见你的那一刻起就把我彻底笼罩的不可思议的情感”。[17]他说他想终结友谊之后很长时间，伊丽莎白一直是利顿勋爵魂牵梦萦的人。

从已出版的通信来看，除了一句（“才女，漂亮的上等小女子”）之外，他的女儿贝蒂在他死后删除了提到格雷弗耶夫人的所有语句。然而伊丽莎白档案中保留的信件表明，利顿勋爵是在1889年8月底9月初与她断绝联系的，那之前他们刚刚在迪耶普度过了一个假期，两人的配偶和子女均不在场。[18]她并未邀请他与她同住在拉卡斯，他只好寄宿在城里的皇家酒店（这是他消受不起的奢华）。然而利顿勋爵还是发誓对她矢志不渝，是她的反对引起了两人关系的破裂。他写了封短信，离开了她：

> 鉴于您亲口道出也亲身展示了您对我的感情只是纯粹的精神性质，我必须说我高估了自己在那种条件下维系我们之间关系的能力。[19]

利顿勋爵随后启程去了滨海特鲁维尔，那是热纳维耶芙在诺曼底海滨最喜欢逗留的地方，专栏作家们看到他与她和梅亚克一起出现在赛马场和赌场中。

伊丽莎白早已预感到终有一天，她的英国朋友会下此最后通牒的。然而他决定彻底终结两人的关系还是令她十分震惊。1889年10月，她把他们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重写成了一则精练的道德寓言：“他爱她。她恪守贞操。他就不再爱她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爱彼此（Aimez-vous les uns les autres）。”[20]她在这篇文字中再次审视了利顿勋爵的殷勤背后郁积的愤怒，也记得在自己因为乔万尼而陷入绝望的低谷时，英国伯爵是“第一个注意到我的面容开始憔悴的人；他也许会愿意陪我变得又老又丑、招人讨厌。这样的特质让他的爱与芸芸众生的截然不

同”。[21]

自迪耶普那决定命运的一别之后，利顿勋爵一直坚守着不再见伊丽莎白的决心——除了在大型社交聚会中，那时他们避开彼此不会引起过多关注。即便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写信给她，在那年冬天的一封信中向她坦白，只需“一句、一词、一念，就能重新唤起我对你的一往情深”。[22]“重新唤起”这个词用得不当，他对她的渴望从来没有休眠过。至多有过几次短期的退潮。每当爱的潮水轰然而涨，他唯一可以平息胸中澎湃的方法，就是把思念付诸纸上。

这类文本中有一篇独出心裁的对伊丽莎白的人物素描，她在利顿勋爵去世之后才收到这封信。原文以法文写成，开头和结尾都断言她的幽灵总是纠缠着他，以下是精简片段：

> 今晚的伦敦，一切显得那么阴郁悲伤，写这封信是为了给你讲述一个幻象，它一直顽固地盘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连它最微小的细节也仿佛离我那么近，那么逼真，跟它相比，伦敦的肮脏街道倒是一片模糊了。
>
> 那是个年轻女人的影子。……她是十足的贵妇，简直就是女王，但她仍然是一个女人。然而她与其他女人绝无半点相似，就像童话中的公主和庸常俗气的公主们，天差地别。
>
> 她今晚的装束是一件精美的粉色晨衣……透明的皱褶翩然起落，为她苗条优雅的身段勾勒出美妙的轮廓，她浑身散发出仙境的光芒，就像悬浮在落日的玫瑰色余晖上的一朵云霞。
> ……
>
> 偶尔会有一只穿着粉红丝质拖鞋、裹着粉红色丝袜的可爱小脚从起伏的云朵下面露出来，……忽而消失，忽而重现，就

像一只鸽子眷恋着一位隐形的女神，迟迟不肯离去！

这只小脚的主人似乎陷入了沉思……棕色大眼睛——深邃、狂野、谜一样的眼睛——的神情就像一只牝鹿突然在森林里停下来，惊魂未定地倾听着远处只有她能辨出的一缕回声。牝鹿只有回到了森林才会心安，被魔杖轻点而变成公主之后，只有到了公主的世界才会无忧。……这个女人周身充满诗意；她就是一首关于自己的诗篇。……她把文字变成了诗，把诗变成了歌声。

她那美丽的嘴角上有时会住着一位嘲讽的小恶魔，这一次，请它祈求她不要取笑这篇匆匆写下的未完成的幻象素描，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皇家利顿伯爵R.，伦敦，1890年8月4日，星期日晚[23]

这份文件的日期很能说明问题：利顿勋爵写信之时，距离二人宣布分手已经过去了近一年。但他仍然想念着伊丽莎白，满脑子都是她的影子。

利顿勋爵内心深处一定暗自希望：迟早有一天，他对她本人避而不见却仍以书信传情的策略会引诱她再度请求见他，甚至终有一日会被他的爱降服。不过一旦她听说他同时与热纳维耶芙眉来眼去，这样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利顿勋爵曾不止一次向伊丽莎白保证对她的感情忠贞不贰，“绝不可能与其他任何女人有染，甚至不可能对任何女人有所企图”。[24]根据他从她和布勒特伊那里听说的关于亨利·格雷弗耶的后宫的事，利顿勋爵知道伊丽莎白断然不接受爱情的出轨。要是她发现利顿勋爵一面声称非她不爱，一面去追求比才遗孀，她永远不会原谅他。

然而他追求热纳维耶芙之事属实。社交新闻报道表明，两人从尼斯

返回巴黎后那几个月，她和利顿勋爵的联系更紧密了。在那以前，热纳维耶芙只收到过英国大使馆最大型聚会的邀请（最多可能会有2000人参加），现在却常常与大使先生和少数几位宾客一起享受私密的午餐。利顿勋爵亲自从热纳维耶芙的忠实信徒中挑选其他受邀者参与聚会，都是他个人最喜欢的几个圈中人：梅亚克、阿莱维、小仲马、艾尔维厄、布尔热，这些日间聚会的私密程度相当于他先前与伊丽莎白和布勒特伊共进晚餐。然而热纳维耶芙自己最喜欢的同伴却是莫泊桑，英国人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人。（利顿勋爵骨子里是个浪漫主义者，曾公开批评莫泊桑对男女关系的描述太过残忍尖刻。[25]）热纳维耶芙招募莫泊桑陪同她一起赴博尔盖塞府午餐之举，把利顿勋爵卷入了又一场短命的爱情三角中——她本轻浮，而他还不得不与小说家争宠。

莫泊桑这段时期的活动证明了这一态势。1890年3月从法国南部回到巴黎后，他开始撰写第二部关于上层的小说《我们的心》；该书在当年6月20日由奥兰多夫（Ollendorff）出版社出版发行。莫泊桑写作《我们的心》的三个月，恰好是他常常挽着热纳维耶芙一起出入英国大使馆的日子。他初次在那里与她和利顿勋爵共进午餐是3月12日，最后一次是三个月后。那年4月，莫泊桑秘密地到鲁昂短住过几天，在那里写信给好友罗贝尔·潘雄（Robert Pinchon）说他“不是一个人，但请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这次旅行。此事必须保密，因为和我一起来这儿的女人的丈夫妒忌心极重”。无论在写给潘雄的信还是其他通信件中，他都没有点明这个女人的身份。但莫泊桑那年春末写给热纳维耶芙的信中提到了“鲁昂之行”，仿佛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秘密。[26]

此外，根据他对波托-里什透露的消息，莫泊桑与热纳维耶芙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性交，时间似乎是他对《我们的心》的手稿进行了最后一轮修改之后。按照热热·普里莫利转述波托-里什的说法，热纳维耶芙“对莫泊桑（在床上）的兽行反感”至极，对他说自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27]波托-里什对普里莫利说，莫泊桑把这一事件写入了他的新

小说：“她只干吊别人胃口的事”。[28]热纳维耶芙给了他写《我们的心》的灵感。莫泊桑一写完那部小说，与她的联系就陡然减少了。[29]

和《如死之坚强》一样，《我们的心》也讲述了一位显然很像斯特劳斯夫人的虚荣愚蠢的贵妇人的秘密爱情故事。这第二个写照比第一个更为致命。虽然安妮·德·吉勒鲁瓦也是与人偷情的奸妇，也因个性轻浮浅薄而几乎丧失了真爱的能力，但她只爱一个男人：奥利维耶·贝尔坦，至少她在这一点上还是真诚正直的。相反，《我们的心》的女主人公米歇尔·德·比尔纳（Michèle de Burne）却把许多追求者玩弄于股掌之上，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她是个“成熟得恰到好处”的寡妇[30]，年轻时“十分不幸……（嫁给了）一个家庭暴君，在他面前任何人都得俯首屈膝……她得忍受种种苛求、冷酷、妒忌以至那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主子的各式暴行”。[31]和斯特劳斯一样，已故的比尔纳先生除了欺负妻子外，还为满足自己的社交野心而“把她变成了一个漂亮、有礼、训练有素的哑巴女奴”。[32]当他在婚后第五年死于动脉瘤破裂后，米歇尔·德·比尔纳发誓再也不让另一个男人来控制她了。

孀居的米歇尔培养了一群由艺术家、交际家和银行家组成的忠实信徒。[33]她凭借万种风情和“变幻莫测、精彩活泼的机智”[34]成为这“一帮崇拜者”的“偶像，……迷恋……人间的女神”[35]；他们的爱慕“升华和神化了她，像是遍体馨香”。

在《我们的心》开头，主人公安德烈·马里奥首次由朋友马西瓦陪伴，拜访了米歇尔的夹层公寓，马西瓦是著名的作曲家，也是那里的常客。[36]马里奥相貌英俊、爱好运动，既有钱又不乏艺术天赋，在这位37岁的单身汉的眼里，异性早已勾不起什么好奇。遇到这位不顾一切地保持独立的女人倒让他心潮澎湃。听马西瓦警告说她所有的忠实信徒都试过勾引她，但谁也没有成功，她因难以征服而拥有了无法抗拒的性魅力。其后几个月，他尺素传情，并最终让她屈服于他。

然而她是个冷酷的情妇，在两人首次交媾之后便回避与马里奥进一步的肉体接触。[37]她来单身套房与他见面时，表现得像常规的社交拜访。她拒绝他的求爱，宁愿谈些琐事：她最新潮的时尚装束啦、最近的社交大胜啦、忠实信徒的怪癖啦，如此等等。[38]这些不愉快的约会让马里奥觉得情妇只是在“假意温柔”，而米歇尔本人只是个女人的拟像。

然而有悖常理的是，她越回避他的抚摸，马里奥对她的“贪馋欲望”就越不可抗御。当她开始与罗多尔夫·德·伯恩豪斯伯爵（Comte Rodolphe de Bernhaus）眉来眼去时，他内心的煎熬越发深重，伯爵是个“有魅力、健淡、出类拔萃”的奥地利外交官。[39]虽刚来巴黎不久，却已是城区的新宠，一夜之间“变得与莎拉·伯恩哈特齐名”。米歇尔和她已故的丈夫一样在意自己在上流社交界的地位，急于把伯爵变成她沙龙里的“明珠”。马里奥从其他忠实信徒那里得知，她和伯恩豪斯大概已经暗通款曲了。这样的消息让马里奥陷入绝境，驱使他逃到乡下，在该书收尾部分，他在一位可爱的乡下姑娘的怀里寻求慰藉。但即便到那时，他仍然忍不住想起自己那位忸怩作态的情妇。到小说结尾，马里奥与乡下姑娘做爱，却骗自己说她就是那个冷酷无情的女人米歇尔·德·比尔纳。

认识或听说过热纳维耶芙的读者一看就知道，莫泊桑小说中的女妖就是她本人的写照，作者对此几乎不加掩饰。[40]和许多巴黎文人学士一样，龚古尔也在《我们的心》一问世就迫不及待地把它读完了，正如他在7月5日所写，

> 莫泊桑在《我们的心》中描画了现代巴黎贵妇德·比尔纳的肖像，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施特劳斯夫人（原文如此）。……是的，热纳维耶芙就是德·比尔纳夫人：没有良心、没有人性、没有底线的男人杀手；在她那个小小的朋友圈里，她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想想她是怎么对待梅亚克的吧！[41]

事实上，莫泊桑的确想到了她是怎么对待梅亚克的——并在书中影射了两人的关系。在米歇尔所有的家臣中，最可怜的就要数衣冠不整的“胖子弗莱斯耐”了，此人“矮胖、气喘、讨厌、没有胡子，是个夸夸其谈的老家伙。对那位少妇说来他肯定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比别人、比谁都千百倍地盲目爱她，这让别人都讨厌，可在她眼中至关重要”。在《我们的心》中，这位梅亚克的翻版亦步亦趋地跟着米歇尔，每时每刻都渴望得到她的爱。他处处低声下气、俯首帖耳，令其他的崇拜者们厌烦透了，给他取了个“海豹”的诨名（似乎是在影射他身材肥胖，与阿代奥姆·德·舍维涅的前任情妇那种令人费解的性能力无关）。当忠实信徒批评她对马屁精的“这种该受批评的口味，这种不顾旁人的庸俗爱好”时，“比尔纳夫人微笑着回答说：‘我就爱他像个忠心的老伯’”。这正是朋友们对她抱怨梅亚克时，热纳维耶芙标准的辩解之词。

没有现存证据表明梅亚克读过《我们的心》，或者表明如果他读过，他在“海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出了热纳维耶芙就是米歇尔·德·比尔纳的原型。不过她的其他几位密友都得出了与龚古尔一样的结论。在一个家庭相册中，达尼埃尔·阿莱维在他姑妈的一张照片下面写下了一行说明文字：“这就是斯特劳斯夫人，居伊·德·莫泊桑的《我们的心》的女主人公。”[42]达尼埃尔一反常态地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重申对这位亲戚的人格有多鄙视：“如魔鬼一般任性，又如玩偶一般轻率。”[43]或许他觉得把热纳维耶芙等同于米歇尔·德·比尔纳就足够表明她有多讨厌了。达尼埃尔的母亲路易丝更明确地表达了反感。同样据龚古尔说，她在城中四处散布“如果我是热纳维耶芙，我会反抗，会去怒斥莫泊桑”！[44]另一位好友也指责热纳维耶芙的第二自我如此无情地对待马里奥。热纳维耶芙反驳道：“对男人就该那样！”这样的反应进一步证明了德·比尔纳夫人就是她的分身。



热纳维耶芙顽皮地为梅亚克整理领花

利顿勋爵也参与了关于《我们的心》的讨论，但他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据说斯特劳斯夫人就是莫泊桑那部我非常讨厌的小说《我们的心》的女主人公”，他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说。[45]但他只字不提伯恩豪斯，那位与萨拉·伯恩哈特齐名的“有魅力、健谈、出类拔萃”的外交官[46]，与他本人也有无数相似之处，利顿勋爵宣称热纳维耶芙“一点儿也不”像比尔纳夫人。[47]

至于斯特劳斯，他或许不像利顿勋爵那样善意地认为热纳维耶芙是无辜的，不过同样，我们不大清楚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在《我们的心》出版一周后，莫泊桑、热纳维耶芙和利顿勋爵最后一次在英国大使馆共进午餐。那次聚会之后，三个人都离开巴黎度夏去了，而斯特劳斯则留在城里，处理莫泊桑的委托，对一个未经他同意

便复制其肖像的出版商提起诉讼。（正如莫泊桑在那年6月对斯特劳斯申斥的那样，他无法忍受在书店橱窗里看到自己的脸；他觉得自己的每张照片都“令人讨厌”。[48]）热纳维耶芙7月去了诺曼底，和洛尔·德·舍维涅一起在多维尔观看了赛马，还在附近的滨海特鲁维尔物色了几处待售地产。后来，她在梅亚克和德洛奈的陪同下前往巴涅尔德吕雄[49]温泉疗养，那是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处风景秀丽的水潭。整个8月，以及9月的前三周，她都住在吕雄的顶级酒店萨卡隆（Sacaron）。据说热纳维耶芙在那里治疗她的偏头痛，她原本就一身病痛，最近又添了这一症状。

这段时期，莫泊桑似乎尽量在旅行中避开热纳维耶芙。她前往北部的特鲁维尔时，他去了南部的尼斯和艾克斯[50]（在那里，他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见到了在那里出差的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这个消息让马塞尔极为兴奋）。当热纳维耶芙前往南部的吕雄时，莫泊桑又到了北部埃特勒塔的海滨别墅。与此同时，利顿勋爵回英格兰住了几个月，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夏天都在内布沃思（Knebworth）的小木屋度假，那是布尔沃·利顿家位于赫特福德郡的祖产。（为了抵消庄园的置业开支，利顿勋爵把主屋租给了几个租户。）

然而在8月4日，他本人就去了伦敦——他正是在这一天写下了前文引用的伊丽莎白的人物素描——到接下来那一周的周末，他在迪耶普逗留三天之后，也住进了巴涅尔德吕雄的萨卡隆酒店，同样没有家人陪伴。[51]和热纳维耶芙一样，他也在吕雄一直住到9月底。

有梅亚克、德洛奈和利顿勋爵陪伴，我们不清楚热纳维耶芙是否还在等丈夫来吕雄跟她会合。但不管她期待与否，斯特劳斯在8月5日～27日之间的某一天出现在了萨卡隆。而也是在这期间，热纳维耶芙的鼻梁骨折了。

热纳维耶芙的通信时断时续，这一次的中断在她在吕雄小住期间恢

复了，她给婶婶纳尼内·阿莱维写了四封信。其中最长的一封署期8月27日，热纳维耶芙在信中解释说，她试图独自驾驶一辆轻便马车，从驾驶座上摔下来，脸朝下摔到地上。她后来一如既往地把这次事故说成了玩笑，说或许她现在有资格加入马戏团做“一枚女‘人体炮弹’”了。

比较反常的是热纳维耶芙在那封信的结尾有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埃米尔没对你隐瞒什么，我发誓！你会看到我的鼻子还完整无缺地留在原处！”[52]这句话表明，纳尼内曾对斯特劳斯关于妻子受伤的说法表示过怀疑。鉴于他名声在外的野蛮脾气，纳尼内可能怀疑他打伤了热纳维耶芙，然后编出这么一场事故作为借口。



热纳维耶芙和利顿勋爵都以疗养为名住在巴涅尔德吕雄，那里的温泉疗养远近闻名

如果斯特劳斯的确要为热纳维耶芙的鼻梁骨折负责，那么问题就变成这次大打出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心》本身不大可能是激怒

他的直接原因；因为作为莫泊桑的律师，斯特劳斯在8月底到达吕雄之前很久，就已经非常熟悉这部小说，以及它的女主人公与自己妻子的相似之处了。（斯特劳斯与莫泊桑的通信表明，他十分重视阅读自己当事人的书。）不过，或许发现利顿勋爵与热纳维耶芙住在同一家酒店，让斯特劳斯看到了米歇尔·德·比尔纳与德·伯恩豪斯伯爵的风流韵事竟然可能是有事实基础的。果真如此，那么这一怀疑就有可能引起他的暴怒，而如若他的怒气转为暴力，事后就有可能对纳尼内隐瞒热纳维耶芙骨折的真实原因。

不管斯特劳斯夫妇之间在吕雄发生了什么，家暴是优雅的上流社会最不愿承认的失礼事件之一；一位贵妇人即便鼻梁骨折了，也会对此类不愉快的事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美丽面孔。因此，热纳维耶芙回到巴黎后对大家宣称自己“非常满意被写入莫泊桑的书里”或许就是做戏。据龚古尔说，“施特劳斯夫人（原文如此）费尽口舌，四处申辩说（《我们的心》）是莫泊桑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龚古尔冷冷地说“S夫人的随从觉得她没理由为（莫泊桑）笔下的她而自豪”，然而在热纳维耶芙看来，莫泊桑把她作为小说女主人公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她满心欢喜了。

“S夫人的随从”的确怒不可遏。一位忠实信徒再度非议起热纳维耶芙的人品，抱怨说“只有交际花才会对……莫泊桑这样的……平民……感兴趣，犹太女人一心只想与名人上床，为的是通过结交名人提升地位”。[53]波托-里什在这段时间跟热纳维耶芙闹翻了，他也表达了不满，冷言冷语地说：“她一点也不在乎那个人物有没有德行；她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位女主人公是好是坏；她在乎的只是那位女主人公名气很大，还被人当作是她！”[54]波托-里什虽然没有点名，却显然是在责备表亲贪慕虚荣。

这类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但热纳维耶芙的朋友们或许误解了她声称

喜欢《我们的心》的原因。正是因为她非常在意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所以她或许觉得不得不对这本书喜爱若狂。即使米歇尔·德·比尔纳这个人物的塑造令她不安，但把自己的窘迫表现出来只会给她造成更大的伤害。她要维护自己的名声，不论是贞洁的妻子（和寡妇），还是一位时尚典范、花心女人和无与伦比的缪斯。她表露出任何对《我们的心》的不安都相当于承认自己的尴尬和痛苦。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建立起来的自我形象，承认这一点必会前功尽弃。



1890年夏，热纳维耶芙和利顿勋爵同时住进了这家酒店，两人的配偶都留在家里

评论家和学者们往往觉得《我们的心》是莫泊桑最糟糕的作品之一。[55]情节不足为道，结局虎头蛇尾，人物扁平而老套：忌妒的情人、残忍的戏弄、有着金子般真心的乡村少女。几位评论家觉得这些缺陷要归咎于在写《我们的心》那段时期，莫泊桑的梅毒症状大大加重

了。[56]1890年3月，他对父亲抱怨说仅仅读或写几行字就会“引发我难以忍受的眼痛”。偏头痛也让他虚弱无力。如今这两个症状也开始困扰热纳维耶芙了。

这一时期，莫泊桑的精神状况也开始恶化。他对保罗·布尔热坦承：

> 我每次走进自己的房子，总有一半的概率会迎头遇上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一打开门，就看见自己已经坐在扶手椅上了。[57]

或许这种幻觉也能解释莫泊桑何以那么厌恶自己的肖像，指示斯特劳斯禁止一切未经允许的肖像出现在公共场合。然而他还有其他幻觉。他声称一位医生给他开的药丸“用它们的小小声音跟他说话，给他建议，遣词造句好过他写的任何东西”。[58]他严厉斥责忠心侍奉他近十年的男仆弗朗索瓦·塔萨尔（François Tassart）“给上帝写信，指责我强奸了一只鸡、一头山羊，如此等等”。[59]他指责另一位家仆从他的个人积蓄中偷了“70000法郎，后来又偷了400万，然后又偷了600万”[60]，他咆哮说必须得挖个洞把自己那“数百万、数十亿、数万亿的钱”藏起来。[61]他再度可怜地装成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命令家中所有的仆从称他为“伯爵先生”。

然而莫泊桑精神状况恶化最令人心碎的证词，当属他在1890年6月写下的一封断断续续的信，收信人是一位不具名的女人，或许是热纳维耶芙，或许不是：

> 我所有的感觉都在我的体内膨胀，就像胆汁泄漏，让我苦不堪言。不过要是我把它们吐出来，或许它们就会消失，而我也会变得一身轻松、心情愉快，谁知道呢？当一个人的头脑只是一个裂开的伤口，思考就变成了难以忍受的折磨。我的头脑

> 中有那么多伤口，以至于只要我动一动心思，就疼得想高声尖叫。为什么？为什么？仲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我胃不好。但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一颗可怜的、骄傲的、可耻的心，一颗人心，那种人人都会嘲笑却有感情也会受伤害的人心，我的头脑也会受到伤害，我有一个破旧的、拉丁人的灵魂。有些时候我不这么想，却也一样痛苦，因为我来自一个被鞭挞的家族。但我不说，我不拿它示人，我觉得我甚至把它掩盖得很好。毫无疑问，我给人的印象是最满不在乎的那种人。我是个怀疑论者，但那不是一回事，我是个怀疑论者是因为我的眼睛洞察万物。我的眼睛对我的心说：“藏起来吧，你这古雅的老灵魂。”于是它就藏了起来。[62]

在这样的状况下写作《我们的心》，莫泊桑或许注定达不到他此前的作品所确立的高标准。只有热纳维耶芙试图声称他再度获得了成功。

小说出版后，莫泊桑的身体症状更加严重了，这迫使他不得不彻底停止写作：《我们的心》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在那年余下时间和第二年一整年中，莫泊桑都在进行随意的治疗和游览航行，但他的精神分裂日趋加重。1891年12月31日，他写信给一位医生，声称他自拟的鼻腔灌洗疗程在他的脑子里灌满了盐水，以至于他能：

> 感觉到我黏稠的脑浆从鼻子和嘴巴里滴漏出来。死神就要来到，而我疯了！我的大脑正在紧锣密鼓地催我撤退。永别了，朋友，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63]

第二天夜里，1892年1月1日，莫泊桑试图对自己的头开枪。他一扣动扳机，就发现弗朗索瓦·塔萨尔早已有所防备，把子弹从枪里取出来了。于是莫泊桑抓过一把开信刀，从自己的下巴下面划过，血从伤口喷涌而出时，他高喊着：“看看我干了什么，弗朗索瓦，我割了喉：这显然是疯狂的症状！”[64]

塔萨尔叫来了医生，医生正好来得及为莫泊桑缝合伤口，使他免于失血而死。医生给小说家服用了镇静剂，然后在“漂亮朋友号”船员中一位魁梧水手的帮助下，给他套上了约束服。为了阻止他进一步伤害自己，莫泊桑被马车送到了布朗什医生位于帕西的诊所。

热热·普里莫利后来讲述了好友精神崩溃的一个悲惨故事：

> 他们来领莫泊桑离开家去布朗什医生的诊所时，可怜的人被五花大绑，眼睛里噙着泪水，恳求看护者把他带到海边，让他最后看一眼“他那般心爱的船”（“漂亮朋友号”）。不要……这些对梦中知己的感人告别让人想起了罗恩格林准备离开理想国度、与残酷的现实搏斗时，对自己的天鹅所说的话。[65]

然而莫泊桑再也无法与现实搏斗了。接下来的一年半，作为布朗什位于德·朗巴勒府邸的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他只能与在自己想象中虚构出来的事物搏斗：昆虫“从远处”蜇了他一针吗啡；他的胃里有“一团霍乱病毒”在腐烂；一群暴徒决心杀死他，“因为我烧掉了自己的房子”！他在府邸内的病房——“装饰成佛罗伦萨风格的”15号病房——俯瞰塞纳河美景，却也无济于事。从那时一直到他去世，莫泊桑每天都不得不盯着耸立在对岸的宿敌：埃菲尔铁塔。

莫泊桑住院期间，热纳维耶芙曾多次去帕西看他，但每次都被布朗什医生诊所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说这是患者母亲的要求。一听说儿子疯了，洛尔·德·莫泊桑的第一反应就是试图用头发勒死自己——这一行为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居伊在小说中对头发的色情化描写有无病理学基础？有其母必有其子：洛尔·德·莫泊桑自杀未遂——一位医生把她绕颈锁喉的大粗辫子剪断了，救了她。[66]她一恢复理智（至少又能说话了），就通知布朗什医生，无论如何，绝对禁止任何女性访客探望她儿子。在她看来，女人是他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她甚至可能把自己也归于祸水一类了。莫泊桑在德·朗巴勒府邸住了18个月，母亲从没有去

探望过他。

洛尔·德·莫泊桑不知道，热热·普里莫利和乔治·德·波托-里什也就她儿子的精神崩溃有过同样的猜测，不过他们针对的只是一个女人。他们猜想“《我们的心》中的那位漂亮的女主人公……大概（用她销魂蚀骨的花言巧语）加速了致命危机的到来”，最终击倒了小说家。[67]假如波托-里什和普里莫利对弗朗索瓦·塔萨尔说起自己的猜测，他们或许还会在后者独自收集的关于主人之死的证据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理由。塔萨尔说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是一位残忍无情的荡妇，他只称她为“身着灰衣的夫人”。



莫泊桑讨厌埃菲尔铁塔，称之为“丑陋无比的大铁块”和“花里胡哨的烟囱”

自塔萨尔的回忆录出版之后，一代又一代学者就这个女人的身份展

开辩论，认为（并挑选出）最大的可能性当是卢利娅·卡昂·德·安韦斯或玛丽·卡恩，就是那两位常以羞辱莫泊桑为乐的“犹太人伯爵夫人”。[68]但这些评论家全都忽视了一点，只要仔细研读塔萨尔的回忆录就会强烈地感受到，热纳维耶芙才是那位身着灰衣的夫人。

塔萨尔在回忆录中描写这位神秘的女人是一位“极其时髦的资产阶级女人”，总是穿着深紫灰或珍珠灰色的衣服，总是“喷洒大量香水，却不是交际花”。（这一描写让人想起了德洛奈曾抱怨热纳维耶芙用了太多“西班牙皮革”香水，达尼埃尔·阿莱维指出她一出场总是“喷洒过量香水”，龚古尔说她像个“冒牌交际花”。）在塔萨尔的叙述中，这个女人的其他典型特征包括她“非常优雅的举止”（“仿佛曾在修道院接受教育”），她“惊人的智慧”和眼睛里散发的独特的光芒，很可能是吸食吗啡的结果。

塔萨尔写道，身着灰衣的夫人于1890年5月18日首次出现在莫泊桑位于博卡多尔路的公寓里，大概就是作家当年4月在鲁昂的幽会到6月出版《我们的心》这段时间的正中间。从一开始，塔萨尔就觉得身着灰衣的夫人拜访自己雇主的“‘官方’住宅”而非莫泊桑通常云朝雨暮的单身套房，真是咄咄怪事。5月和6月还有许多次，这个女人屡次避开莫泊桑的爱巢，来到他位于博卡多尔路的公寓，这位男仆猜测，这一行为所暗示的性保留态度或许能解释她给他的雇主带来的“巨大伤害”。在莫泊桑6月前往艾克斯前夕，小说家对塔萨尔说，他想“不计一切代价摆脱‘身着灰衣的夫人’”。

之后就是一段间歇期，与莫泊桑和热纳维耶芙那年夏天和初秋毫无交集的旅行吻合。但身着灰衣的夫人于1891年2月开始再度拜访博卡多尔路，那恰是莫泊桑和热纳维耶芙恢复联系的时候。小说家于2月15日在夹层公寓与她单独共进晚餐，并计划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与她和洛尔·德·舍维涅一起去“黑猫”夜总会。那以后线索就中断了，直到那年8月，

莫泊桑和热纳维耶芙两人都去了日内瓦湖温泉疗养。她在埃维昂莱班[69]租了一处庄园，而他入住了迪沃讷莱班[70]的一处温泉，据说那里为严重眼疾患者提供专门的水疗。

热纳维耶芙9月初在依云写给婶婶纳尼内的信中提到莫泊桑最近“让她去迪沃讷两日游”。[71]这一细节与塔萨尔关于身着灰衣的夫人到那里拜访了主人的记录吻合。根据莫泊桑的通信记录，他至少在9月4日去依云看望过热纳维耶芙一次。几天后，他回到依云，陪她一起到布兰科旺公主（Princesse Brancovan）位于湖边的宅邸巴萨拉巴庄园（Villa Bassaraba）参加聚会，热纳维耶芙在聚会上拨雨撩云，处处留情。一位社交界记者说她“穿得像个交际花……裙子上点缀着丁香花”，说“伟大的阿莱维之女”就像“从（欧仁·）斯克里布的剧本中走出的风流女主”（斯克里布是她父亲生前的合作者，他们共同创作了《犹太女》《暴风雨》《流浪的犹太人》）。[72]

他们离开瑞士前不久，塔萨尔写道，莫泊桑“在烈日下驱车几个小时从迪沃讷前往日内瓦城，去普雷尼（Pregny）拜访R.男爵夫人”，那段时间的治疗效果也就一笔勾销了。（德·普雷尼城堡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是热纳维耶芙离家前往日内瓦湖畔期间的住处。）莫泊桑到达城堡时，男爵夫人和她的朋友们出去了，没有留下口信，他也不知该去哪儿找他们。塔萨尔认为这次徒劳的远行对他的雇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身心创伤。男仆再度怀疑穿灰衣的女妖罪不可恕，说她的心一定是“大理石做的”，才会如此残忍地玩弄莫泊桑。

塔萨尔有种不祥的预感，预言说这个女人的游戏将是对他雇主的最后一击，此预言十分准确，莫泊桑在四个月后自杀未遂。据男仆说，是那位身着灰衣的夫人“从东方”寄来的一封电报触发了莫泊桑疯狂的自残行为。的确，当那封致命的电报到达戛纳时，卢利娅·卡昂·德·安韦斯和玛丽·卡恩都在法国，不在东方。但热纳维耶芙和卢多维克一起去了亚

历山大，在那里拜访他已故的同母异父的兄弟阿纳托尔的女儿泰蕾兹·普雷沃-帕拉多尔。泰蕾兹在父亲1870年自杀后进了一座天主教修道院，最近刚刚升任了院长。

1893年7月6日，莫泊桑在布朗什医生的诊所去世，死时距离自己的43岁生日还差一个月。医生对龚古尔说莫泊桑临终时已经“兽化（原文如此）”，“不可救药地疯了”。他的遗言是：“人影！有人影！”[73]

在热纳维耶芙那个充满轻浮氛围的沙龙，莱昂·都德曾拿莫泊桑的姓氏谐音开玩笑，叫他“抹脖杀”（maupassa）。[74]

两天后，他被葬在巴黎。热纳维耶芙参加了葬礼，斯特劳斯却没有。在埃米尔·左拉的倡议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捐资在距离夹层公寓不远的蒙索公园为莫泊桑竖起了一块纪念碑。[75]在这座由拉乌尔·韦尔内（Raoul Vernet）雕塑的塑像中，小说家与一位世纪末荡妇做伴，显然让人想起了热纳维耶芙。博学的马克斯·诺尔道[76]医生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堕落》（*Degeneration*，1892）中考察了道德沦丧与天才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段对这座石雕双人肖像的洞隐烛微的描写：

> 一个女人慵懒地斜靠在贵妃榻上……一堆靠垫散乱地放在她的身旁脑后，十分撩人。她身上的每一个特征都带着纯正的巴黎式优雅的烙印。……她的双脚俏皮地从裙子下面伸出来，穿着绣花丝袜，高跟拖鞋。她身穿居家便服，有大量蕾丝花边。……韦尔内先生费了很大工夫勾画这些“内衣”，因为它们似乎恰是他希望赋予这个女人乃至整座纪念碑的象征意义（原文如此）。这位身穿挑逗“内衣”、足蹬机智（原文如此）鞋子的巴黎女人手里十分随意地拿着一本书……那是莫泊桑的想象力的成果。在她的身后竖立着（作家）本人的半身像，他逼真得骇人……低矮的额头、短粗的鼻子、蓬乱的胡须、粗野而肉感的嘴。……莫泊桑凝神盯着女人——不是她手里的他的小

说，也不是她的手，而是看向更低处，她那很有表现力的双足，特别是那些看似带给人无限遐想的内衣。韦尔内先生的作品……讲述了一个色情催眠的故事，说明了女性的诱惑力多么强大。[77]



莫泊桑纪念碑上有一个不具名的女人，显然很像热纳维耶芙

诺尔道这段话虽然准确地描述了纪念碑的奇妙之处，却有一个不显眼的小错误。他写道，韦尔内雕塑的莫泊桑凝神盯着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手拿小说的那位穿着丝袜的荡妇。这句话默认了书和女人不同。但对《我们的心》的作者来说，在他犯下的致命错误中，它们或许根本就是同一回事。

[1] *Archives diplomatiques*：*mensuel international*（April-June 1889）：352；and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384-85.

[2]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395.

[3]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395.

[4]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24。

[5] AdF，*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vol. 4，23；Baron de Vaux，ed.，*Le Sport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Paris：J. Rothschild，1899），84.

[6] 在一封署期为1890年2月16日的电报中，GM写道："于尼斯的异乡人酒店。"在那以前，GM最后一份留存下来的通信署期为1890年1月26日，那时他在戛纳的玛丽-路易旅馆（Pension Marie-louise）。和他在尼斯期间不住在母亲家里的决策一样，他选择玛丽-路易旅馆也很反常，因为他的"漂亮朋友号"就停泊在戛纳，通常他一到那个港口，会选择睡在船上。GM，letters 596 and 595. 关于GM母亲的住处离西米埃兹很近，见Jacques-louis Douchin，*Vie érotique de Guy de Maupassant*（Paris：Suger/Pauvert，1986），150。

[7] "镜厅"在法语中写作"Galerie des Glaces"；"glace"既有"镜子"之意，也有"冰"的意思。——作者注

[8] 1890年2月GS致NH的一封邮戳为"摩纳哥王宫"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84-85。

[9] 1890年2月GS致GPR的信，寄自尼斯，存档于NAF 24971，folio 276。

[10] 1890年3月18日埃利·德洛奈致GS的信，存档于NAF 14383，folio 82/83。

[11] 1890年3月18日保罗·布尔热致GS的信，引文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116。

[12]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02.

[13] 关于LL在父亲死后对其信件的审查，见Louisa Devey，*Life of Rosina，Lady Lytton*（London：S. Sonnenschein，Lowrey，& Co.，1887），vi-x。关于GS和LL现存信件中的缺失：GS的通信于1890年8月27日恢复，LL的通信于9月8日恢复。在后一个日期，LL用萨卡隆酒店的信纸写了一封信，GS在署期为前一个日期的信中给他的回信地址正是萨卡隆酒店。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87.

[14]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02.

[15] Leslie George Mitchell，*Bulwer-lytton：The Rise and Fall of a Victorian Man of Letters*（London：Bloomsbury/A&C Black，2003），83.

[16] OM（pseud. LL），"A l'entresol，"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Owen Meredith*（New York：New York Publishing Company，1895），213.

[17] 1889年7月17日LL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95。

[18] 从1889年8月开始，LL与Lady Dorothy Nevill的通信都写于迪耶普的皇家酒店（Hôtel Royal）。Lady Dorothy Nevill，*Under Five Reigns*（London：Methuen，1910），245.

[19] LL致EG，存档于AP（II）/101/95。

[20] EG，1890年的日记，存档于AP（II）/101/150。

[21] EG，没有标题的笔记，署期1889年10月12日，存档于AP（II）/101/150。

[22] LL致EG，存档于AP（II）/101/95。

[23] 1890年8月4日LL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95；引文又见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45-46。

[24] 1890年9月20日LL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95；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93。

[25]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05.

[26] 本章参考的GM致GS的信件均摘自GM，*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3（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are：669，672，673，700，706，707，771，772，and 773。

[27] Joanna Richardson，*Portrait of a Bonaparte*：*The Life and Times of Joseph-Napoléon Bonaparte*（London：Quartet，1987），195.

[28] 热纳维耶芙与莫泊桑的首次性交也是最后一次，这或许让她没有染上梅毒，不过在二人传说中的幽会后不久，她确实有了两个症状，都是莫泊森的梅毒症状：偏头痛和眼部极度疼痛。热纳维耶芙的精神症状也在随后那些年明显加重了；这种情况加上她新增的对被关在布朗什医生诊所的恐惧，最终导致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杀未遂。不过由于她长期神经衰弱，很难言之凿凿地把她的精神状况恶化归咎于梅毒。——作者注

[29] 在某种程度上，GM与GS像这样减少联系是可以量化的。1888年，GM开始写《如死之坚强》时，他写的信中有20%都是写给GS的（60封中的12封）。189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4%（那年72封信中的1封）。

[30] 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1032。

[31] 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1034。

[32] 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1035。

[33] 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

1042。

[34] 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1058。

[35] 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1115。

[36] 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1033。

[37] 米歇尔·德·比尔纳极不情愿与情人再次上床，这个决定很容易让人想起GPR/GM/普里莫利关于GS拒绝与GM“有第二次”的传言，这比我这里的情节梗概更有趣。虽然米歇尔难以抑制处处留情，但她最亲近的人认为她“无性”，GM在文中有几处暗示她与德·马尔唐郡主有同性恋关系（GM，《我们的心》，见*Romans de Guy de Maupassant*，ed. Forestier，1120及1128-29），这个人物的原型似乎是GS和LC的朋友（格拉迪斯·）德·格雷夫人。一位著名评论家和编辑也很诧异米歇尔这个人物居然还有同性恋的弦外之音，以至于在写给GM的信中，他称她为“一位萨福”；见GM，*Correspondance*，letter 617。

[38] 书中另一个很有暗示意味的细节会让人联想起与GS、EG和LC有关的鸟类意向，GM写道，德·比尔纳夫人为情人展示了她的一套新装束，一件缀满羽毛的斗篷，让她的“样子很古怪，像只野鸟”；见GM，《我们的心》，1128。这件斗篷诡异地很像第7章中RM描述的那一件EG的斗篷，也让人想起了彼特拉克曾把洛尔写成一只有着美丽羽毛的珍禽，见本书的彩页插图。在GM小说的上下文中，作者暗示的米歇尔的同性恋倾向和她的鸟类装束都表明，他笔下的贵妇人是“变态”或“怪异”的，关于这一看法的一般性讨论，见Marie-Claire Bancquart，*Paris “Fin-de-Siècle”*（Paris：SNELA，2009），213-14。

[39] GM，《我们的心》，1100-01 and 1103。

[40] 关于“在莫泊桑的心目中，她（GS）就是德·比尔纳夫人”，见Borrel，“Geneviève Straus，”124。

[41] EdG，日志，1890年7月5日的日记。

[42] DH，Carnet 3，189；DH剪贴簿的这一页再现于*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ed. Henri Loyrette*（Paris：Fayard，1996），117。

[43] 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18；Hervé Lacombe，*Georges Bizet*：*Naissance d'une identité créatrice*（Paris：Fayard，2000），744.

[44] Jacob T. Harskamp，*The Anatomy of Despondency*（Leiden：Brill，2011），175.

[45]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1（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02；1890年9月8日的信件。

[46] 利顿曾入读波恩大学，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早年曾在英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任职。此外由于英语中的"earl"（伯爵）相当于法语中的"comte"头衔，社交界报刊有时会称他为"le Comte de Lytton"（德·利顿伯爵）。——作者注

[47]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1（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02；1890年9月8日的信件。

[48] 1890年6月20日GM致ES的信，letter 628，见*Correspondance*。

[49] 巴涅尔德吕雄（Bagnères-de-Luchon），法国上加龙省的一个市镇，位于该省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属于圣戈当斯区（Arrondissement de Saint-Gaudens）。

[50] 艾克斯（Aix），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罗讷河口省的一座城市。

[51] EG在1890年9月3日的一封致"X"的信中提到了这次来访，还说LL从迪耶普去了吕雄，存档于AP（II）/101/26。

[52] 1890年8月27日GS致NH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67。

[53]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31.

[54] GPR，*Sous mes yeux*，47-48. 同样，EdG也批评她热爱出名，说GS把"娱乐

业”的风气带入了社交界，见EdG，日志，1892年5月17日的日记。

[55] 对《我们的心》的负面评价包括Douchin，*La Vie érotique de Guy de Maupassant*；*René Doumic*，*Les Écrivains d’aujourd’hui*：*Bourget—Maupassant—Loti—Lemaître*（Paris：Perrin，1895），91；Remy de Gourmont，*Promenades littéraires*，vol. 4（Paris：Mercure de France，1927），145-48。Sherard猜想这部小说“一定是完全为商业目的而写的”。Sherard，62.

[56] Louis Forestier’s “Notice” to GM，*Notre cœur*，1621-22.

[57] Sven Kellner，*Maupassant，un météore dans le ciel littéraire de l’époque*（Paris：Publibook，2012），58.

[58] EdG，日志，1893年10月1日的日记。据EdG说，GM在戛纳自杀未遂的前一天晚上曾大声抱怨那些药丸和“小小声音”。

[59] Georges Normandy，*La Fin de Maupassant*（Paris：Albin Michel，754），194.

[60] Murat，*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336.

[61] Robert Harborough Sherard，*Twenty Years in Paris*：*Being Some Recollections of a Literary Life*（London：Hutchinson，1905），65.

[62] GM致一位不具名的女性通信人的信，未署期，letter 646，见GM，*Correspondance*。

[63] 1891年12月底GM致Dr. Henri Cazalis的信，letter 751，见GM，*Correspondance*。

[64] PM，*Vie de Guy de Maupassant*，250.

[65] Joanna Richardson，*Portrait of a Bonaparte*：*The Life and Times of Joseph-Napoléon Bonaparte*（London：Quartet，1987），132；and Bruno Haliou，“Comment la syphilis emporta Maupassant，” *La Revue du practicien* 53（2003）：1386-89.

[66] Marie-Claire Bancquart，*Paris “Fin-de-Siècle”*（Paris：SNELA，2009），194；and Murat，*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338. Murat还就GM在布朗什诊所临死前那段时期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记录，“Fou？Maupassant et le docteur trois-

étoiles，” Murat，*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328-48。

[67] Joanna Richardson，*Portrait of a Bonaparte*：*The Life and Times of Joseph-Napoléon Bonaparte*（London：Quartet，1987），195.

[68] 关于玛丽·卡恩、卢利娅·卡昂·德·安韦斯和GM的“身着灰衣的夫人”的争论，一个很好的概览见Douchin，*La Vie érotique de Guy de Maupassant*。所有弗朗索瓦·塔萨尔的引文均摘自他的*Souvenirs sur Guy de Maupassant par François，son valet de chambre，1883-1893*（Paris：Plon，1911）。关于塔萨尔所说的那封促成了GM自杀未遂的“来自东方”的电报的细节肯定地排除了玛丽·卡恩和卢利娅·卡昂·德·安韦斯是“身着灰衣的夫人”的可能性，因为GM接到那封电报时她们两人都在法国，而GS和LH一起去了亚历山大。关于拉姆拉修道院，见Liévain de Hamme，*Guide-indicateur des sanctuaires et lieux historiques de la Terre Sainte*（Paris：Imprimerie des Pères Franciscains，1897），138。关于泰蕾兹·普雷沃-帕拉多尔在那里担任神职，见*The Nation* 59（September 24，1894）：215。关于泰蕾兹·普雷沃-帕拉多尔和她的两个兄弟姐妹露西和亚尔马，见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92-103；and Pierre Guiral，“Anatole Prévost-Paradol，” in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ed. Henri Loyrette*（Paris：Fayard，1996），128-35，133-34。

[69] 埃维昂莱班（Évian-les-Bains），简称“伊云”，法国的一个市镇，位于上萨瓦省北部的日内瓦湖畔，瑞士洛桑的对面。

[70] 迪沃纳莱班（Divonne-les-Bains），法国东部安省的一个市镇。

[71] GS致NH，标记为“1891年9月初”的信，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92。

[72] Étincelle（pseud.），“Les Parisiennes au Léman，” reprinted in *La Grande Dame* 1，no. 1（1893）：5-7. GS说起过她拜访了德·布兰科旺公主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日内瓦湖畔的庄园，见Françoise Balard，ed.，*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Paris：CNRS Éditions，2002），191-92。

[73] EdG，日志，1893年1月30日。

[74] LD，*Souvenirs littéraires*（Paris：Grasset，1968），100.

[75] 关于GM纪念碑的落成，见*La Gazette anecdotique* 21（November 15，1897）：258-59。

[76] 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49-1923），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医生、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77] Douchin，*La Vie érotique de Guy de Maupassant*，10-11.

帕凡舞曲 配对

我们要制止她们的赞叹！我们很快就会变成她们的奴隶！

一如既往！始终一贯！

我们彼此热爱！彼此憎恨！

我们诅咒所爱之人！

——加布里埃尔·福莱，献给伊丽莎白·格雷弗耶的《帕凡舞曲》，作品50号（1887），作词：罗贝尔·德·孟德斯鸠

凤凰这种珍奇而孤独的禽类……食香料，住在至纯至净之域，在由太阳点燃的芳香木的葬火中终结自己美丽的一生。然而毫无疑问，他曾不止一次妒忌过白鸽的命运，因为她有一个情投意合的伴侣！我没有过度赞美您，您对自己的形象明察秋毫，您在自己喷洒的香水和脚下燃烧的熏香中陶醉。您在许多方面是天使，但终究还是个女人。

——皮埃尔-西蒙·巴兰切[1]致朱丽叶·雷加米埃[2]（约1805年）

---

[1] 皮埃尔-西蒙·巴兰切（Pierre-Simon Ballanche，1776-1847），法国作家和反革命哲学家，他阐述了一种进步神学，在19世纪初的法国文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2] 珍妮·弗朗索瓦丝·朱丽叶·阿德莱德·雷加米埃（Jeanne-Françoise Julie Adélaïde Récamier，1777-1849），又称“雷加米埃夫人”，法国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托克维尔曾是她沙龙里的座上宾。她的一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目睹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兴起和覆灭，又亲历了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的建立，最后她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的次年去世。

第19章 普鲁斯特的幻灭

到莫泊桑去世时，斯特劳斯夫人在普鲁斯特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了。他对她与小说家的蜂缠蝶恋知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普鲁斯特长达22卷的通信中最长的一次中断，碰巧就是在热纳维耶芙/莫泊桑的私通以不幸终结的那段时间，这一巧合着实令人抓狂。1890年一整年，普鲁斯特似乎只有两封信留存下来，其中一封是写给父亲的短笺，里面羞涩地自夸说著名的居伊·德·莫泊桑“一定或多或少知道我是谁”，另一封写给斯特劳斯夫人的信更短，是一束菊花的附言。让娜于1891年写给他的一封信表明，普鲁斯特和母亲交换过对《我们的心》的看法，但从她的文字中无法推断出他的意见。1891年和1892年，似乎总共只有四封信留存下来，其中三封都是写给斯特劳斯夫人的，这本身或许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这些信件中无一处提到莫泊桑、利顿勋爵甚或埃米尔·斯特劳斯，但从中可以看到，普鲁斯特对紫衣缪斯的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或许可以说是淡化。

第一封信的署期是1891年复活节前后，普鲁斯特含蓄地自比彼特拉克，将斯特劳斯夫人比作洛尔·德·诺韦斯，说他把耶稣受难日当成二人关系的纪念日，因为斯特劳斯夫人正是在那一天首次写信给他（但那份文件也缺失了），用她“腾跃洒脱”的字迹迷住了他。他把自己与彼特拉克、斯特劳斯夫人与“美丽的洛尔”进行类比，弦外之意是他曾寄予厚望，想让好友的母亲成为自己的灵感之源。

一年后，那些希望破灭了。1892年春季某日，普鲁斯特给斯特劳斯夫人写了一封信，以恭敬有加的颂词开头，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场个人攻击：

夫人：

我钟情于神秘的女人，因为那就是您的模样，我常常在《酒筵》中这么写，也常希望您能在其中辨认出自己的影子。但我再也不能全心全意地爱您了，以下是原因。……我总是看见您被二十几个人团团围住，或者更确切地说，总要越过二十几个脑袋才能看到您，因为（您）与之保持最远距离的，始终是那个年轻人。但假设经过多次努力，我终于能单独见您了，您也只有五分钟时间与我谈话，而就在那五分钟里，您仍在想着别的事。更糟的是，跟您谈论书籍，您说我是书呆子；跟您谈论人，您说我轻率八卦；跟您谈论您，您又觉得可笑。[1]

不管是在聚会中与他“距离最远”，还是在他终于有机会单独见她时显得心不在焉，斯特劳斯夫人显然伤了他的自尊。但普鲁斯特也厌倦了她“禁止失礼举动的动听教训”，它们使谈话变得如此乏味而空洞。此时的他思维敏锐，求知若渴，早已无法满足于讪牙闲嗑，特别是他深信本可与对之论今说古、无所不谈的人。

在这一系列的第三封信中，普鲁斯特写及收信人，来了一段诡秘而模棱两可的人物素描：

关于斯特劳斯夫人的真相

起初，我以为您只爱美好的事物，以为您非常了解它们——然后我发现，您根本不在乎它们。后来我以为您只爱人，（直到）我看出您对他们也漠不关心。如今我觉得您只爱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最引以为傲的不是智慧而是机灵，不是机灵而是风度，不是风度而是衣装。（您是）一个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胜过一切其他人事的人——（然而您）仍然风姿绰约。正因为您风姿绰约，您千万不要窃喜，以为我如今少爱您半分。为了证明事实正好相反（因为您知道行胜于言——而您素来有言无行），我会寄给您最美的鲜花——这大概

会让您厌烦，因为您不肯屈尊关心一下我作为您这位尊贵的冷漠女王最恭敬的仆从，痛彻心扉的情感。

马塞尔·普鲁斯特[2]

如果热纳维耶芙读过达尼埃尔·阿莱维的日记，她大概会惊异地发现，这篇假装赞美的颂词与普鲁斯特在高中时代寄给她侄子和儿子的诀别信多么相似，他在那封信中也坚称，虽然那对表兄弟并不像他一度希望的那么聪明，但他仍然喜欢他们。在这篇《关于斯特劳斯夫人的真相》中，只是批评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给她的标签不是愚蠢，而是莫泊桑为《如死之坚强》和《我们的心》的女主人公们赋予的性格弱点：虚荣的心性、虚假的妩媚、虚伪的承诺（“有言无行”）。普鲁斯特的感情始终在狂喜与自贬的刀尖徘徊，发现自己曾在一个虚假的偶像面前五体投地令他“痛彻心扉”。这不是因为女王没穿衣服，而是她空洞得只剩下衣服。

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热纳维耶芙与莫泊桑之间糟糕的私情触发了他的顿悟，哪怕只是因为整个闹剧上演期间，普鲁斯特有那么多时间都是在沙龙里度过的。毕竟，《我们的心》引发的混乱至少让另一位忠实信徒，乔治·德·波托-里什，坚定地视热纳维耶芙为不可救药的浅薄之辈——而普鲁斯特后来所说：“我就是波托-里什！”但即便普鲁斯特对热纳维耶芙的风流情史一无所知，单凭整日流连于夹层公寓而日益熟稔，就足以令他越来越不屑了。正如莫泊桑在他的最后两部小说中强调的——但普鲁斯特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一切关于优雅的课程都贬损了教授者的形象。彼特拉克从没有走近洛尔而为她的缺陷大感失望，无论洛尔有何缺陷。普鲁斯特的女神一旦近观，就失去了圣洁的光环。

所幸，普鲁斯特已经从热纳维耶芙的儿子和侄子那里知道，梦想破碎也可以成为另一种富有营养的创作源泉。1892年某日，他写了一个关于祛魅的童话故事，尝试了这一观念。[3]故事梗概如下（引文都是普鲁

斯特的原文）：“很久以前，有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名叫珀西。他出身卑微，与此相称，他独自住在一个不起眼的住所。在童话社会——也就是王公贵族的社会中——珀西毫无出众之处，虽然他与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同名，那是他的创造者最近喜欢上的作家之一。”

然而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名字始终预示着命运。因此，珀西充满诗意的名字也就预示着一种充满诗意的命运。一天，“美丽”和“名声”两位仙女决定特别青睐他一番。于是她们挥舞着魔杖，在珀西的头脑中注入了“关于名声和美丽的最美好的想象”——他在那些想象中扶摇而上，摆脱了卑微出身带来的平庸生活。正如她们希望的那样，两位仙女的门生为自己的想象力而陷入了狂喜。他急于征服一位美丽的殿下（童话仙境中的终极奖赏），把克利奥帕特拉本人召唤到他卑微的桌前，她为能与他共进晚餐而欣喜不已。更有甚者，她常常来与他共度美好时光。“女王被她的魔术师的美妙头脑所吸引，常常接受他的邀请。”在仙女们带他进入的精神世界中，珀西生活中其他的一切也变得崇高伟大起来。他简朴的住所也变成了“一座宫殿，那一两样不值钱的小装饰也变成了无价之宝”。

珀西从未因梦想与生活现实相去甚远而苦恼，直到他20岁出头的一天，

> 他的虚荣心要跟他谈一谈。在这场对话中，（珀西的虚荣心）对他说：“仙女们骗了你，我的朋友。她们让你尝到了名声和美丽的滋味，给了你关于名声和美的梦，却没有给过你美丽和名声。”

他的虚荣心举例说明珀西为自己理想的女人赋予了“她大概根本从未有过的风姿”，说年轻人太专注于幻想，对现实视而不见：别说是女王，哪怕最普通的女人也对他鄙夷不屑。“就连一点儿都不高贵的X夫人，她有不少情人还远不如你呢，你要是敢对她谈起爱情，她也会对你

不理不睬。”

珀西被这些话刺痛了，叫来了名声和美丽两位仙女。他用甜言蜜语恳求她们让他美妙的梦境成真，“就像把巨大的珍珠砸在她们发光的肉体上”。他具体提出，想要一个女王做情妇——一位真实的女王来替代克利奥帕特拉——以此来报复势利的X夫人。两位仙女神色悲伤地解释说，她们可以满足他的愿望，但代价是一旦她们这么做了，她们就会永远从他的生命里消失。一心要对X夫人炫耀一番的珀西同意了这些条件，美丽和名声两位仙女便伤感地与他告别：“再见了，亲爱的孩子，魔咒破除了，但我们必须满足你。”

她们真的满足了他。第二天，珀西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还有一座城堡。他还遇到了一位光彩夺目的女王对他一见钟情——“毫无逻辑地求欢于他”。珀西的愿望实现了，X夫人忌妒得发狂。

然而正如仙女们警告的那样，我们的主人公愿望一旦实现，起初让那些愿望充满诱惑的魔力就烟消云散了。珀西没有从此与自己的女王幸福地生活在城堡中，而是

> 惊异地发现，他不再渴望那些美丽公主（原文如此）了，过去她们只存在于他的梦里时，曾令他多么心醉神怡。现在他觉得她们那么平庸；他越了解她们，她们的魅力就越弱。她们的魔力早已不再精妙、醉人和神秘了。

这以后，普鲁斯特的叙事断裂了，发展成为诸如“他花费了那么多心思去采摘，却亲手毁了那朵花”的混乱的片段，以及像“S特劳斯/S坦迪什”之类的记号，或许有些暗示意味，但作者未加解释。

普鲁斯特再也没有写完珀西的故事，也未曾发表过。然而他从未忘记过它的基本假设。他会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不断撰写和重写这一主题的

各种变调：高高在上的缪斯一旦走近，她的魅力就风流云散了。花儿被采摘的那一刻，就被毁了。天鹅总是摔落在大地上的。

眼下，普鲁斯特要去猎获一只新的稀世珍禽。

---

[1] 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 avec Mme Straus，21-22。

[2] 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163-64。

[3] 复录于MP，*Écrits de jeunesse*，207-10。

挽歌 悲情鸟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公主，被囚禁

在海滨一座中了魔法的塔里：

每当公主从塔内远眺，

看到头顶和脚下只有

海浪、云朵和飞鸟。……

她觉得自己大概

也是一只飞鸟。有一天她对鸟儿们，

叹道，“哦姐妹们，把我带到远方”

“离开这里吧！”“你得戴上翅膀啊，”它们说。

她张开双臂让它们落在上面，答道，

“我不能！哦，要有翅膀才能飞离！

为什么独我没有翅膀？

为什么只有我是异类

要孤独地从生到死？”

“公主，”一只鸟儿对她说，“您不是”

“孤独的异类。在很远很远

的地方，在海对面的一个遥远

的地带，也有像您这样

的鸟儿。那些鸟儿没有显形的翅膀

但我听到他们多次宣称

只要对他们说一个词

就能把他们带入天堂。”

“那是什么词？哦快告诉我！”她说。

“我可以告诉您，”那只小鸟答道，

“但即便我告诉了您，对您也没什么用处……”

“快告诉我！”“是我爱你。”那以后

公主就陷入了忧伤。但她喃喃

自语着那句我爱你，一遍又一遍

每次她对自己发出

那个声音，都会伴随着一声叹息：奇怪的是，每当

她叹息一声，她小巧的胸脯都会起伏和颤抖。

“我对谁都说不出那句可爱的话，”

“也没有谁会用那美妙的句子作答。”

——欧文·梅雷迪斯（利顿伯爵爱德华·罗伯特·布尔沃-利顿的笔名），《格兰纳威利尔》或称《变形记》（1885年）

海鸟们很难过，

他们哭着说：

我们再也不会喝

海里的水了，

那原是我们的眼泪。

——埃莱娜·格雷弗耶，《琥珀之书》（*Le Livre d’ambre*，1887-1889）

第20章 人已逝，爱未央

关于斯特劳斯夫人与利顿勋爵的风流韵事，真相扑朔迷离；同样，现存资料的缺失缩小了可知范围。在比利牛斯山脉共度良辰后，两位朋友的通信出现了另一个巨大缺口，仿佛他们商量好了似的（还仿佛与年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商量好了，当然那是不大可能的）。热纳维耶芙信件的缺口从1890年9月持续到1891年8月，利顿勋爵的则从1890年12月持续到1891年5月。只有一个线索留存下来，但它很有价值：一封写给热纳维耶芙的未署期、未发表的短信。由于信尾签名只有一个“L.”，所以学者们此前未能确定它的归属。事实上这封信一看便知是利顿勋爵的笔迹，信纸上还印着他的家徽。他写道，“那位夫人在吕雄”的“不幸消息……让我难过极了”（未具体说明是什么消息），并提议他们“在我庄静的邻人家里”讨论一下此事，“时间由您来定”。[1]（这里提到的邻居十之八九是庄重的殿下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亲王，后者的宅邸位于德·拉维勒-勒维克街，从博尔盖塞府步行五分钟即可到达。）利顿勋爵在结尾处强调，无论夫人在吕雄遇此不幸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永远是她“非常、非常、非常忠诚的”崇拜者。

然而两人度夏归来后，那种忠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很多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媒体报道都表明，从1890年秋开始，利顿勋爵和热纳维耶芙两人中断了在英国大使馆的私密午餐，也不再在社交场合出双入对了。（比利牛斯山脉之行前，人们经常看到两人在社交界同进同出。）萨卡隆酒店插曲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这些变化，或许能证明斯特劳斯发现利顿勋爵也住在该酒店，进而打断了热纳维耶芙的鼻梁的猜想。这样一场变故很可能会导致这对（婚外情）伴侣就此分手，历史记录似乎也能证明，事实的确如此。

然而他们的关系并未彻底终结。回到巴黎后，利顿勋爵仍然会偶尔

拜访夹层公寓。表面上看，这似乎不符合他和热纳维耶芙必须分手才能平息斯特劳斯之怒的猜想。但这两位都是精通社交界表面文章的老手了，他们知道利顿勋爵突然从她的沙龙里消失就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正式破裂，势必会让人说长道短。那些看出《我们的心》中的罗尔多夫·德·伯恩豪斯伯爵就是罗伯特·利顿伯爵的读者，想来尤其擅长推理。这么做的结果将是丑闻曝光，热纳维耶芙可能会遭到“老虎斯特劳斯”变本加厉的报复。因此就目前来看，利顿勋爵在忠实信徒中维持正常的假象，似乎是更安全的做法。

这出双簧使得利顿勋爵、热纳维耶芙和斯特劳斯三人都能继续从他们的关系中各取所需。斯特劳斯醋海翻波，自然不愿看到情敌出现在热纳维耶芙的客厅里，但他一心攀附权贵，又不忍从妻子的宾客名单中划去这么一个尊贵的名字。热纳维耶芙一贯对侍从们的忠诚没有信心，得知英国伯爵没有彻底抛弃她自是心满意足，而利顿勋爵对自己的作家名声也一样毫无把握，仍渴望在她德高望重的文学信徒中享有一席之地。

因此至少在表面上，这一爱情三角愉快地相安无事——堪比《奥赛罗》的金屋闹剧。就像米歇尔·德·比尔纳对马里奥“假意温柔”一样，斯特劳斯夫妇与利顿勋爵也维持着虚假的友谊，甚至在1891年4月来了一场异地重逢，三人都来到蒙特卡罗，成为亲王宫殿的座上宾。艾丽斯王妃一定提前警告了热纳维耶芙——她们是无话不谈的闺蜜，王妃不可能对利顿勋爵的闹剧一无所知——或许两个男人也事先想到了会在那里碰面。即便在此次做客期间出现了任何紧张事态，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留存下来。唯一的间接证据是摩纳哥亲王夫妇与斯特劳斯夫妇的一张合照，利顿勋爵拒绝出镜。但这次回避多半与他自己的婚姻有关，而不是为了照顾热纳维耶芙的夫妻感情；他从宫殿写信给妻子，想让她以为他是摩纳哥亲王夫妇唯一的贵宾。或许伊迪丝也需要丈夫跟她保证自己的婚外风流已经结束了。

1891年秋，利顿勋爵最后一次拜访奥斯曼大道134号，那时他的好友奥斯卡·王尔德为自己的法语剧目《莎乐美》（1893）上映之事已来巴黎数月，请他引荐并登门拜访声名远扬的紫衣缪斯。那次拜访并不顺利，但并非利顿勋爵的过错。王尔德从一开始就称女主人为“斯特劳斯太太”，激怒了热纳维耶芙，那是当面称呼社会地位较低之人的方式。[2]一位名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漂亮纨绔子弟对他的到来表现得过于热情（“您看，先生，它比《蒙娜丽莎》还美，不是吗？”[3]），王尔德会错了意，以为小伙子向他求爱；直到后来发生了一场令两人都十分尴尬的事件，他才意识到自己自作多情了。[4]他高高在上地赞美德加说：“您不知道您在伦敦的名声有多响。”画家干脆回敬道：“还好没您那么响。”[5]德加和约瑟夫·雷纳克毫不掩饰对王尔德的厌恶，用利顿勋爵本人的话说，他的言谈举止“十分娘娘腔”。

后来，雷纳克还奚落热纳维耶芙怎能容忍同性恋毁了自己的沙龙。她反驳道，“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寻找的猎物和我们又不一样。”[6]这位“性欲倒错者”虽然没能取悦热纳维耶芙，但他日益响亮的名声却让她喜欢表现出被他取悦的样子。之后几年，随着王尔德越来越臭名昭著——轰动一时的高潮是他于1895年因公开猥亵罪而被审判、获罪和入狱——他当年在夹层公寓中的那次出场也就变成了斯特劳斯夫人神话中越来越关键的情节。在这一语境下，她与英国当世最有争议的作家之间的“友谊”成为她深远影响力的又一个标志。热纳维耶芙甚至喜欢暗示，德洛奈为她所画的肖像是《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的灵感源泉，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王尔德首次拜访她的沙龙时，那本书已经问世六个月了。

如果热纳维耶芙读过《道林·格雷的画像》，她大概就会掂量一下还要不要宣称书中那位非正统主角的画像与自己的画像有关了。在王尔德的小说中，标题中的画像表现了那位看似漂亮的被画者内心的丑陋，呈现了道林·格雷道德败坏的堕落灵魂。再顺便说一句，不过此事与热

纳维耶芙密切相关：道林的一位朋友警告她远离“那些服饰充满感伤色彩（向她们爱着的男人致敬）的女人”，指出，“永远不要相信穿紫衣的女人”。[7]鉴于热纳维耶芙以淡紫色为主和明显感伤主义的穿衣风格，这句格言大概不会让她十分开心。

然而同样，王尔德小说的这些方面大概还不足以阻止热纳维耶芙宣称自己为其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态度很可能跟对《我们的心》的态度一样，促使波托-里什讥讽她：“她一点儿也不在乎那位女主人公是好是坏；她在乎的只是那位女主人公名气很大，还被人以为是她！”[8]

无疑，从吕雄回到巴黎之后，热纳维耶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孜孜不倦地追逐焦点。1890年秋冬，她成为社交场上无处不在的核心人物。（如果德加乐意用他形容夏尔·阿斯的话来嘲笑她，大概也会称她为“流浪的犹太人”。）此外，热纳维耶芙还加倍努力地代表父亲和已故丈夫遗产的公共形象。10月，她坐在前排重要位置出席了新制作的《犹太女》首演，正是那次隆重的首演让年轻的普鲁斯特开始了对那部歌剧持续一生的痴迷。不久，在喜歌剧院大厅里竖起一座比才雕像的宣传活动声势高涨，以《阿莱城的姑娘》和《卡门》分别在11月和12月的特别纪念演出达到高潮。热纳维耶芙没有参与策划这些演出，但她的名字出现在两次演出的前期宣传广告的重要位置。有了她象征性的祝福，两次活动都人满为患，最后只剩下站位了。

这些演出成为热纳维耶芙提升公共形象的新高峰。在首演中，她和舞台上下的所有名人一样，吸引了大量关注的目光。这在《卡门》的演出中尤为难得，要知道两位享誉国际的男女主角，让·德·雷什克和澳大利亚女歌唱家内莉·梅尔巴（Nellie Melba）在音乐世界的地位至高无上；而在观众席中，忠实的摩纳哥艾丽斯王妃势位至尊。（普鲁斯特极为激动地出席了这场星光灿烂的特别演出，但他被安排的位置是低等

的“男人席”，站在斯特劳斯夫人前排包厢的最后面。）坐在包厢席位的其他尊贵人士还有德·欧马勒公爵、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德·萨冈亲王、罗贝尔·德·菲茨-詹姆斯伯爵、阿尔贝·德·曼伯爵、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他没带洛尔出席，而带来了新结交的美国朋友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这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老板住在巴黎，惯于高调炫富］，以及意料之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群人。不过当晚毫无争议的女王是热纳维耶芙——或者更确切地说：比才遗孀。在《卡门》和《阿莱城的姑娘》两部剧的首演之夜，她把平日以灰、白和淡紫色为主的半丧服换成了全黑的丧服，让人想起她在德洛奈肖像画中的一身墨缎。[9]

自热纳维耶芙为那幅肖像楚楚作态后，十多年过去了，近看之下，她的面容继续显出岁月的痕迹，依赖鸦片也对她的容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0]但从远处看，她仿佛刚从德洛奈的画布中款款下来，艺术逼真地还原了真实。就连因讨厌斯特劳斯而殃及热纳维耶芙的埃杜瓦尔·德吕蒙，也不情不愿地承认她在《卡门》首演上风头极盛——说“身穿黑色蕾丝，戴着黑色面纱”的她简直是“完美的比才遗孀”。[11]比才纪念碑本身进一步将热纳维耶芙的形象塑造成了比才薪火的传承者。那座雕塑是亚历山大·法尔吉埃的作品，后者的创作构想很像韦尔内创作的莫泊桑纪念碑，选择不把主题人物表现为孤独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被女人束缚的男人形象。除了作曲家本人相对较小的半身像外，法尔吉埃还为比才那位天意选定的缪斯雕了一个全身塑像。乍一看去，这个人物似乎是卡门，穿着有伤风化的“吉卜赛”服饰。但她的脸一看就是热纳维耶芙的脸。就这样，她与一位天才的情爱故事再度被庄严铭刻，在艺术中获得了永生。

比才纪念碑最终完成时，《我们的心》已经出版了好几年。但法尔吉埃的作品会帮助细心的读者理解那本书中一个原本无法解读的细节。书中有一位名叫普雷多莱的次要人物，由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有史

以来最伟大的雕塑家而受邀来到米歇尔·德·比尔纳的沙龙，他很喜欢她壁炉架上的一套“很有现代感的群雕”。当普雷多莱问她群雕的创作者是谁时，她说是法尔吉埃，继而毫无来由地笑了。莫泊桑的同时代人看到普雷多莱都会想到奥古斯特·罗丹，他才华横溢，却因总是拙劣地企图把女主人带入他热切的艺术讨论而在巴黎社交界臭名远扬。[12]（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罗丹与热纳维耶芙向来话不投机，以及为什么他与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一见如故。）《我们的心》的作者为罗丹安排了一个虚构的名字，而法尔吉埃却以真名出现在书中，显然更高调地突出了后一位艺术家。米歇尔提到他时的神秘一笑也是一样。由于法尔吉埃的姓名或艺术本身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她笑的似乎是她和她所对应的真实人物都知道的一个圈子里著名的笑话——她对应的真实人物当然也喜欢收藏那位雕塑家的作品。



热纳维耶芙参与了在喜歌剧院大厅竖起一座比才纪念碑的发起活动，宣传了自己比才遗孀的形象

与她的高调截然相反，与热纳维耶芙分开后，利顿勋爵在社交界一直保持低调。他在9月20日写道：“如今的巴黎是一座孤寂的城。”孤寂是他自己选择的，只偶尔有极少的公开露面。10月，他去看了好友萨拉·伯恩哈特演唱的《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1890年，由维克托里安·萨尔杜创作的过于紧张的商业剧），并于第二天上门拜访了她，说自己有多喜欢那部剧（事实上他并不怎么喜欢）。[13]利顿勋爵还在布里斯多酒店（Hotel Bristol）为威尔士亲王举办了一场“非正式”午餐——地点是伯蒂选的，他喜欢这里舒适的最新现代化设施，不喜欢博尔盖塞府那种老旧的奢华——还与亨利·德·布勒特伊的女友洛尔·德·舍维涅一

起参加了一场降神会。[14]那天的预言家未能知会洛尔她即将在五年内第三次把情人拱手让给一位外国女人：1891年3月3日，43岁的亨利·德·布勒特伊将迎娶23岁的玛尔塞利塔·加尔内（Marcellita Garner）——父母双亡、纽约州沃平杰斯福尔斯市（Wappingers Falls）一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漂白粉”实业的女继承人。[15]即便洛尔或利顿勋爵在降神会上得知了其他玄妙天机，两人也没有把它们付诸笔端。

除了这些外出，利顿勋爵一直待在大使馆中，“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待在家里，抽很少的烟”，“预算”的后继者、一条名叫“小妖怪”的壮硕的大比利牛斯山犬，在他的脚下打着呼噜。[16]他的女儿贝蒂惊慌地说他“身体几乎病痛不断……身体不好，（加上）精神抑郁”。1890年11月8日是利顿勋爵的59岁生日，他会活到60岁，但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从利顿勋爵的视角来看，身体虚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使馆的大部分日常工作转交给妻子伊迪丝，腾出时间专注写作，伊迪丝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他仍在修改《罂粟王》，社交界报刊始终不改口地称之为《软饭王》（*King Pappy*），这让他很生气。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耗费他最多心血的却是一部题为《玛拉》（*Marah*，1892）的抒情组诗。这部诗集充满了晦涩的文学典故和没有翻译的拉丁语原文片段，缺乏畅销书的特质。但正如他对特里萨·厄尔所说，“一个在写作时一心想要成名或迎合当前品位的人，是不可能写出伟大诗作的。诗人必须取悦自己”。

《玛拉》写了一桩“注定难成眷属的爱情”，这个主题不算愉悦，却令诗人深陷其中。1890年圣诞节，利顿勋爵对特里萨·厄尔抱怨说“（除了丁尼生和勃朗宁……）我们当代的英国诗歌奇怪地缺乏激情或柔情”。然而在他看来，那是全无道理的，抒情诗尤其不该没有感情。利顿勋爵对妻妹说，自彼特拉克以降，该体裁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抒发“强烈的情感”，那种情感是“烙在（诗人）最深层的意识中的，（他

需要）自己从（内心）最幽微的角落把它挖掘出来，一切代价自己承担”。

他在写给女儿贝蒂的信中重复了同样的论调：“在我看来，某种个人情感元素是一切真正的爱情诗所不可或缺的。”不管他试图在《玛拉》中表达的爱情多么不幸，那是利顿勋爵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自从与热纳维耶芙半分手以来，那种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了。他觉得仿佛有一双手紧紧卡住他的咽喉，挤出他气管里残存的空气，然后，用欧文·梅雷迪斯的话说，把他猛抛向“令人窒息的蓝色锥体，融入无边的暗夜”。利顿勋爵对伊丽莎白始终不渝的爱是火也是冰，灼伤他的皮肤、凝固他的血液。那是他的福祉和祸根，是他的美德与罪行，如果他不能在作品中表现那样的爱情，那么或许父亲说得没错：他根本不该自称诗人。[17]

书写《玛拉》是利顿勋爵给自己定下的一个艰巨任务。随着他“越来越专注于创作”，贝蒂·鲍尔弗写道：“他极其痛苦地感觉到……他本人与周围的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利顿勋爵的确常常抱怨那种“对立”让他永远矛盾重重，但这一次他对贝蒂诉说的却与其他情形不同，不是他的公开与私人身份的冲突，而是他对艺术的远大抱负与他实现那些抱负的能力不匹配。他担心自己缺少天分，无法表现出内心爱情的复杂层次。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他没有说那份爱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对立，正是它内在的矛盾使它如此难以表现。

在《玛拉》组诗较早的一篇《偶像崇拜》（“Idolatry”）中，叙述者宣称“爱就是要在这里，在苍穹之下/创造一位人间的神”。然而由于“人间的种种缺憾，……/被创造出来的人间的神/只能是神圣与邪恶的合体；/令人又爱又恨的神”。爱中带恨的传统主题再度出现在《孪生子》（“Twins”）中。这段从《玛拉》的最终版本中删去的文字表现了叙述者的两难选择：“一个我恨的女人，……/她的一切亲密关系绝无瑕疵，/

她的一切行为谨慎得体——/一位社交场上的圣人”和“一个我爱的女人……，/不是圣人也不是罪人，/而是不齿于真相的狂野之人。”在这首诗的结尾，他揭示出这两个女人是一体的。的确是Odi et amo（我又恨又爱）：伊丽莎白的理解没有错，利顿勋爵对她的爱正是那样，因为《玛拉》的叙述者诉说的隐秘对象就是她。

利顿勋爵对贝蒂说，组诗的题目选自约翰·班扬的基督教寓言《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该诗把“苦水”玛拉与“乐土”伯拉（Beulah）对立，标题中的基督徒从与死亡和罪恶世界相关的苦水走向乐土，那里“远离死荫谷，也不在绝望巨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他解释说，《玛拉》将逆转这一轨迹。在整部诗集的四个诗章里，诗歌叙述者会越来越远离救赎，走向悲苦——在班扬的文本中，精神之旅是由上帝启迪的，而在利顿的文本中，它是由叙述者的“异教徒偶像”，也就是他一边崇拜一边斥责的那位夫人启迪的。叙述者在挚爱之人身上寻找天堂，却不可避免地堕入地狱。

然而这些对立的逻辑是易变的，与之相应，利顿勋爵刚开始创作《玛拉》，他对伊丽莎白的恨意就转向了反面。那年年终的某个时候，两位朋友和解了。“哦亲爱的，亲爱的！”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那些看不见你、听不到你的消息、不知道你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不知道你感觉如何的日子，我多么难过啊！”[18]伊丽莎白的玄孙女、传记作家安·德·科塞-布里萨克（Anne de cossé-Brissac）认为，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890年秋。信中的话表明，此时伊丽莎白和利顿勋爵不但恢复了通信，而且恢复了经常见面。这一转变何时发生或由何事促成不得而知，但英国伯爵在《玛拉》第一章中增加了一首诗，题为《心灵感应》（“Telepathy”），讲述了叙述者越过一个拥挤的房间与前爱人对望，一瞬间就重新系上了二人情感的纽带：“而后越过喧哗的人群/你的目光与我相遇；/心对心所倾诉的一切/尽在那无声的一瞥之中。”

那个社交季，利顿勋爵与伊丽莎白唯一一次有记载的相遇发生在12月，那是在布洛涅森林举办的一场滑冰聚会，他与妻子伊迪丝和青春年少的女儿康斯坦丝同去，伊丽莎白则是独自一人。不过两人也有可能早在10月利顿勋爵与洛尔·德·舍维涅一起参加降神会时就恢复联系了；伊丽莎白这段时间的记事本上提到了好几次这样的聚会，它们当时很受圈子里思想开放（或轻信）的成员欢迎。伊丽莎白从米米死后便一直对玄学津津乐道，利顿勋爵声称他的英格兰租屋内布沃思“常有一个名为‘黄孩儿’的幽灵出没”，与她颇有共同语言。如果他与伊丽莎白的和解的确发生在某个降神会上，那么“心灵感应”这个题目大概是个私下的玩笑，暗指两人和解的背景。

威尔士亲王在布里斯托酒店的午餐会也发生在10月，那是伊丽莎白和利顿勋爵重新建立联系的又一个机会。作为能在巴黎对伯蒂“呼风唤雨”的女人，伊丽莎白当是显而易见的贵宾人选（利顿勋爵应亲王要求没有对媒体公开宾客名单）。而且她也会欣然接受邀请，原因不只是她从不拒绝王室的召唤。那年秋天，乔万尼·博尔盖塞为避开罗马城里疯传的他的家族即将破产的谣言而回到了巴黎，伊丽莎白决心炫耀一下自己那些位高权重的崇拜者，诱惑他离开自己的密友费迪南。换句话说，哪怕只是因为伯蒂的地位高于保加利亚的摄政亲王，她也会迫不及待地参加为威尔士亲王举办的午餐会。

那年冬天，伊丽莎白还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位王室成员：伯蒂亲爱的姐姐维多利亚长公主之子、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9]30岁的伊丽莎白还没有机会见到他，但那年31岁的皇帝从两年前登基以来就开始让她着迷了。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谨慎收集他的照片，从照片中看到这位德国统治者相貌极其英俊，认为他可以为自己现有的崇拜者群体锦上添花。（半个世纪后，她还对贝尼托·墨索里尼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她根本不认识其人。[20]）在她与乔万尼对弈的情感棋局上，德国皇帝是一枚极有价值的棋子。或者准确地说，一个“王”。

“如你所知”，她在新年那天写信给吉吉说，“我一直想找机会让威廉二世认识我”，多亏威尔士亲王，她终于等到了机会。伊丽莎白从伯蒂和布勒特伊那里听说维多利亚——她的普鲁士臣民称她为“腓特烈太后”——打算在2月来访问巴黎，但她将微服出访，因为她儿子德国皇帝的政府还没有正式承认第三共和国。伊丽莎白明白即便是微服出访，腓特烈太后此行也需要得到上流社会一定规格的接待，便主动提出在德·阿斯托格街为她举办一个绝密的下午茶会。

那正是伊丽莎白梦寐以求的机会。她激动地对吉吉说：“我为皇帝陛下帮的这个忙，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外交任务呢……定会让他永远也忘不了我！”[21]更棒的是，她接着说：“我已经问了乔万尼——‘我的嫡亲表兄’——能否跟我一起接待。”亨利已经出于政治原因拒绝了接待。（他如今被报界讽刺为“萨宾女人党的创始人”，不能再冒被人看到与德国王室成员私相授受的风险，给自己再惹争议了。[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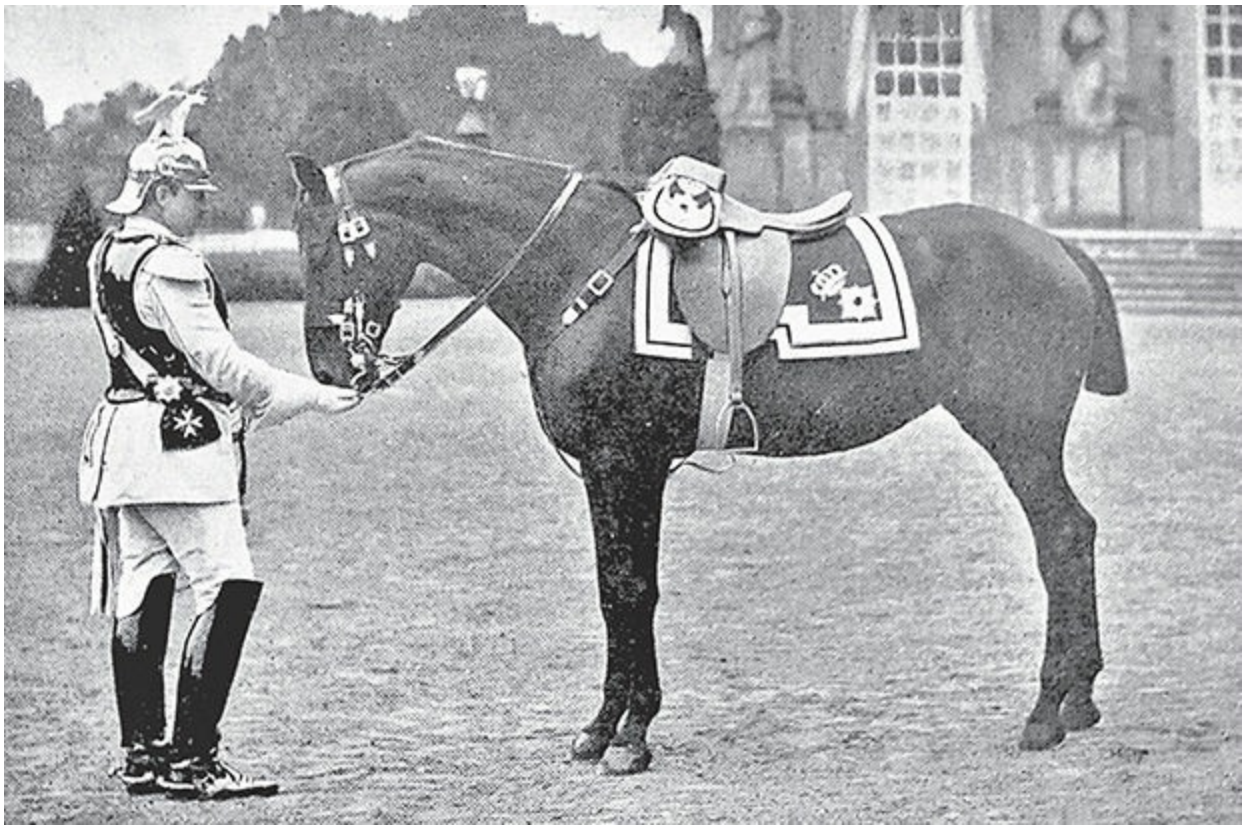
为了让自己的下午茶会圆满成功，伊丽莎白不得不与贵宾的母国英格兰的大使馆秘密协调。从这一背景来看，她与利顿勋爵和解的时机或许不是巧合。无论她与他和解有无其他动机，为了顺利实施欢迎皇太后——并顺带迷住德国皇帝，让乔万尼妒忌——的计划，大使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

利顿勋爵对伊丽莎白的隐秘意图一无所知，在那头晕目眩的几个月，与伊丽莎白恢复友谊令他飘飘欲仙。他对贝蒂说，他如今打算给《玛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把开头那个“注定难成眷属的爱情”变成“平静而幸福的爱恋”。他甚至把整部诗集的题目改成了《玛拉和伯拉》（*Marah and Beulah*），表明诗化叙述者就像班扬的基督徒一样，将从悲伤走向极乐。

在第一章结尾的《缺席》（“Absence”）中，叙述者重申了他对情人完全的依赖：“没有你来点亮，我就没有光，/就像一盏无人执掌的微

弱烛灯！/就像地球没有了天空，/天空没有了太阳。/回来吧！/回来吧！”诸如此类。利顿勋爵把《缺席》与《她的肖像》和其他几首诗与几封信（包括那篇早先写的牝鹿变成公主的人物素描）单独抄写出来，请人在他去世后寄给伊丽莎白。这些文本将提醒她，他从未停止爱她，还写了一部《玛拉和伯拉》来证明对她的爱。

鉴于他已经在伊丽莎白那里尝尽苦头，利顿勋爵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一次他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凶兆和预言》（“Omens and Oracles”）中，叙述者意识到自己需要小心了：“所有那些未来的魅影，过去的幽灵，/在这个不眠之夜来到我身边，叹息着，高喊着，‘小心啊，傻瓜！/反省一下你偷来的感情吧！’”[23]然而，利顿勋爵仍然无视内心的忠告，自信这一次他与挚爱的关系将与往日不同。



伊丽莎白收集了不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明信片，她在见到他之前就希望能用自己的美貌和在上流社会的声望打动他



然而美梦破碎得太快，他不久就发现，伊丽莎白对他入骨伤害的旧习未改。德国皇帝的母亲于2月24日莅临德·阿斯托格街（伊丽莎白向吉吉报告说，多亏乔万尼，下午茶会极为成功：“太后与‘黑豹’聊了很久，堪称完美；他表现得机智而得体”）。随后几个月的某个时候，利顿勋爵和伊丽莎白又吵了一架，这一次，他担心他们终究要分道扬镳了。[24]他沮丧地叹息伊丽莎白“可怕的信中那些残忍的话”，表明这一次提出分手的是她。[25]这封信后来也不见了，也没有人知道伊丽莎白这样做的原因。不过可能的解释是，她利用利顿勋爵完成取悦德国皇帝的“外交任务”之后，就再也不需要他了。她关于埃马纽埃尔·伯谢的那句冷酷的话——“蠢货！我永远不会爱上他，我只是需要他”——暴露了她常常对喜欢自己的人采取功利态度。或许她也把利顿勋爵当成了“蠢货”。

从她那年秋天写的一封信来看，事实显然如此，她向收信人（此人的名字被划去了，代之以“X”）倾诉道：

> 利顿勋爵给我写了70页的信，我甚至提不起精神给他回复两个字：可怕。世事如此：你那么渴望从他那里收到这么多页纸的人，却很少写信或根本不写。[26]

这几句话表明，即便在利顿勋爵以为他们神秘的爱情重获新生时，伊丽莎白也觉得他很讨厌。从那一点来看，她再度抛弃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一段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她用对利顿勋爵如此勤于笔耕的抱怨让收信人明白，“你那么渴望从他那里收到”这些爱情印记的人一如既往（令人烦恼）地未能满足她的愿望。在她写给和关于乔万尼·博尔盖塞的所有哀叹中，这是最常重复的一条。这可以总结为：“世上其他人全都爱我——为什么你不爱我？”的确，在她的档案中，这封写给“X”的信被归入了“博尔盖塞”文档，表明她之所以甩了利顿勋爵，或许是因为到那时，乔万尼已经让她魂牵梦绕，完全没有心思理会英国伯爵和他“可怕”的70页长信了。

此外，她从未给利顿勋爵看过她的埃莱奥诺尔/热拉尔小说，1891年春，那部小说的写作再度占去了她的大部分精力，即便她的共同作者的速度仍然慢于她的期待。她记得乔万尼最初关于像龚古尔兄弟那样合作的建议，便提议龚古尔兄弟中健在的埃德蒙那年4月来德·阿斯托格街小聚。龚古尔后来写道，她请他来居然不是为了社交，而是为了讨论“写一部关于社交界女人、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一个无论是莫泊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从未准确描述过的人物的小说”，这令他十分震惊。[27]龚古尔从这一切推断出，格雷弗耶夫人打算劝他写一部关于她的小说，但事实上，她是在为有朝一日请他评价她自己（和乔万尼）的手稿做准备。当时，她只是“碰巧”给这位长者看了几首埃莱娜写的散文诗。

伊丽莎白主动接触龚古尔之举大概是想让乔万尼对自己的文学资本

心服口服。但她更渴望让他明白，她是个多么理想的女人。从那年春天他们的往来信件看，伊丽莎白（或埃莱奥诺尔）一直在吹嘘有多少男人为她神魂颠倒，想以此来挑衅乔万尼（或热拉尔）。乔万尼应答的“虚构”信件则有一种他们自己的爱憎并存的特质。在有些信件中，热拉尔责备埃莱奥诺尔“病态地需要用（她的）身体取悦每一双眼睛，满足每一个卑劣的愿望”[28]，指责她对她“最近征服的某一位要人”或最近“大获成功的王室接见”的在意胜过了对他的关心。[29]另一些信件则表达了他希望“我曾经因她而起的那些圣洁的梦想”（不管那是什么梦想）仍有可能实现。

伊丽莎白看到这些信件中的一往情深，应该会暗自得意，在她的鼓动下，写作搭档总算不那么冷漠了。她甚至还说服他那年7月与她、吉吉、孟德斯鸠和热热·普里莫利一起去德国拜罗伊特（Bayreuth）旅行。那里举办的夏季戏剧节近年来成为备受理查德·瓦格纳拥趸青睐的时髦胜地，她的舅舅罗贝尔已经去过一次，坚称伊丽莎白一定要跟上潮流。（“我可不是在建议你，我是在命令你。”）同为瓦格纳崇拜者的乔万尼自然应该成为这次冒险的同行者。但伊丽莎白邀请他的理由当然不纯粹出于文化上的志同道合。或许乔万尼的理由也一样；他答应同去，但想中途在哥达逗留几天，那是费迪南亲王家族公国的两个首府之一。

乔万尼还以自己的名义寄给伊丽莎白一封令她既受鼓舞又感挫败的短信，令后者十分抓狂。他在信中为自己对她“或许过于冷漠”而道歉，解释说在遇到她以前，他“从未见过一个爱好、品位和头脑与我如此投契的女人”。[30]尽管如此，他仍然恳求她“彻底忘掉我那副古旧的皮囊”——这是他对自己身体的老派说法——爱“我最好的东西，我的精神，我从未曾把它献给别的任何人”。

即便有选择地只读其中令人鼓舞的句子，这些信也算不上伊丽莎白长久以来翘首以盼的爱情宣言。她自认为德国之行一定会促使他道出真

情，因而急切地盼望着出发的日子。至于她与利顿勋爵的关系，拜罗伊特的短途旅行大概成了她与他分手的另一个迫切理由，这位追求者太难伺候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是时候“积聚（自己的）力量”集中诱捕她的逃跑王子了。[31]



1891年夏，**31**岁的伊丽莎白（最左）与孟德斯鸠（伊丽莎白右边）、乔万尼（最右）和拍摄这张照片的热热·普里莫利一起去拜罗伊特旅行

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可能是，她之所以与利顿勋爵断绝关系，是因为听说了他与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迎风待月。他收到伊丽莎白那封“可怕”的诀别信后，回复了一首诗，痛骂“卑劣的告发者”把他变成了“你最大的仇敌，/你最该害怕的男人，/……你年轻的一生中最险恶/最致命的危险”。[32]在伊丽莎白的小圈子里，有两个人最有可能诋毁利顿勋爵。

首先是她的舅舅罗贝尔，后者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中屡次责备她与一个讨厌的男人恢复了毫无价值的友谊。那个男人倒不一定是利顿勋爵——孟德斯鸠妒忌外甥女的每一位男性朋友，他也没有在那些书信体的侃侃说教中指名道姓——但英国人挖苦伊丽莎白这位亲友“太像女人”大概会让他位列后者的仇人长名单之首。如果孟德斯鸠听到关于利顿勋爵与热纳维耶芙的不伦爱恋的风言风语，一定会趁机在外甥女耳边煽风点火。

利顿勋爵的另一位可能的“告发者”奥古斯特·德·阿伦贝格也一样。过去这一年，德·阿伦贝格和伊丽莎白几乎每天都见面，拟定她最新的文化项目——法国伟大音乐试演协会（Société des Grandes Auditions Musicales de France）——的相关细节。[33]该协会创建于1890年春，是个资助音乐表演的慈善组织，赞助的都是不知名或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法国作曲家创作的音乐。这是伊丽莎白的发明，也是全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此类型组织。但出于礼仪考虑，她请妹夫作为该组织名义上的牵头人。经过与她密切合作，德·阿伦贝格对伊丽莎白与一群男人眉来眼去的友谊有了十分不安的新看法。

数年前，正是德·阿伦贝格本人唆使她与德·萨冈亲王初会的。然而他没想到嫂嫂居然习惯了这类见面。德·阿伦贝格向来注重家庭荣誉，讨厌看到伊丽莎白置名声于不顾。在他看来，她位于迪耶普的庄园简直是导致名誉蒙羞的危险催化剂；他对费利西泰说，没有亨利陪伴的伊丽莎白在那里招待男性客人着实不妥。而所有在拉卡斯簇拥在她身边的人中，佩戴珠宝首饰、写诗、抑郁又吸毒的利顿勋爵让德·阿伦贝格尤其担心。

如果德·阿伦贝格希望毁掉嫂嫂和英国伯爵的友谊，他凭借自己与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的亲密关系很容易找到必要的武器。作为她长期忠实信徒中的一位，德·阿伦贝格大概和波托-里什或德洛奈等人一样，是她倾诉的对象。利顿勋爵提到过“庄静的殿下”府邸，表明他甚至撮合

了英国人与热纳维耶芙的秘密情事。如果德·阿伦贝格的确以这种方式帮助过两人的话，那么他毫无疑问对他们的纠缠了然于胸。他曾一本正经地就拉卡斯发牢骚，这证明他愿意干预嫂子的婚外情，那他自然也会毫不犹豫地挑拨他与那位可疑的英国朋友反目。

不管是谁告密，也不管原因是什么，与伊丽莎白失和彻底击垮了利顿勋爵。他故技重施，避免参加任何可能和她相遇的聚会，但社交圈很小，他做不到无限期地躲开她。德·莱昂亲王夫人5月26日的化装舞会就引发了一次痛苦的相遇。德·莱昂亲王夫人38岁，出身贵族，以前的名声大多源于她显赫的婚姻（嫁给了德·鲁昂公爵的长子和继承人）、收集大量洋娃娃和喜欢玄学诗。最近这位亲王夫人决定挑战一下德·萨冈亲王夫人在化装舞会领域的垄断地位。“有生”贵族德·莱昂夫人准备入侵“下等丫头”统治长达十多年的地盘，令社交界十分激动，焦急地等待大戏开场。当年轻的亲王夫人透露她的舞会主宾是西班牙王后时，上流社会的期待更加强烈了。这一消息意味着利顿勋爵作为英格兰女王的大使必须出席舞会，哪怕要遇上伊丽莎白。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在人群中看到她，鉴于德·莱昂亲王夫人的宾客名单那么长（1700人），而伊丽莎白通常在社交场合只是露个脸就走，这样的希望看起来也不无道理。

事与愿违。为了让自己的舞会有别于萨冈舞会，德·莱昂夫人发布的着装规定完全不同于对手极力夸张的异想天开：唯一的着装要求是宾客不得穿任何彩色服装。（杜鲁门·卡波特[34]大概不知道，这才是最早的黑白舞会。）极少数客人无视这一规定，包括洛尔·德·舍维涅，那天她扮了一身黄蓝格子的小丑造型，吸引了不少眼球。但大多数狂欢者都遵守规定，利顿勋爵的妻子和女儿身穿沃思制作的白色丝质蓬蓬裙出场，伊丽莎白·格雷弗耶也没穿戴彩色服饰。一看到她，利顿勋爵就恨自己不该来。就算在一片黑白色的海洋里，她还是孤雁出群，穿一件样式简单的白色长袍，头发上戴着一条金色的饰带。她的目光越过舞厅勾

住了利顿勋爵的心。他的悲愤在偌大的空间里盘旋。他看向别处，待回转目光——她已经翩然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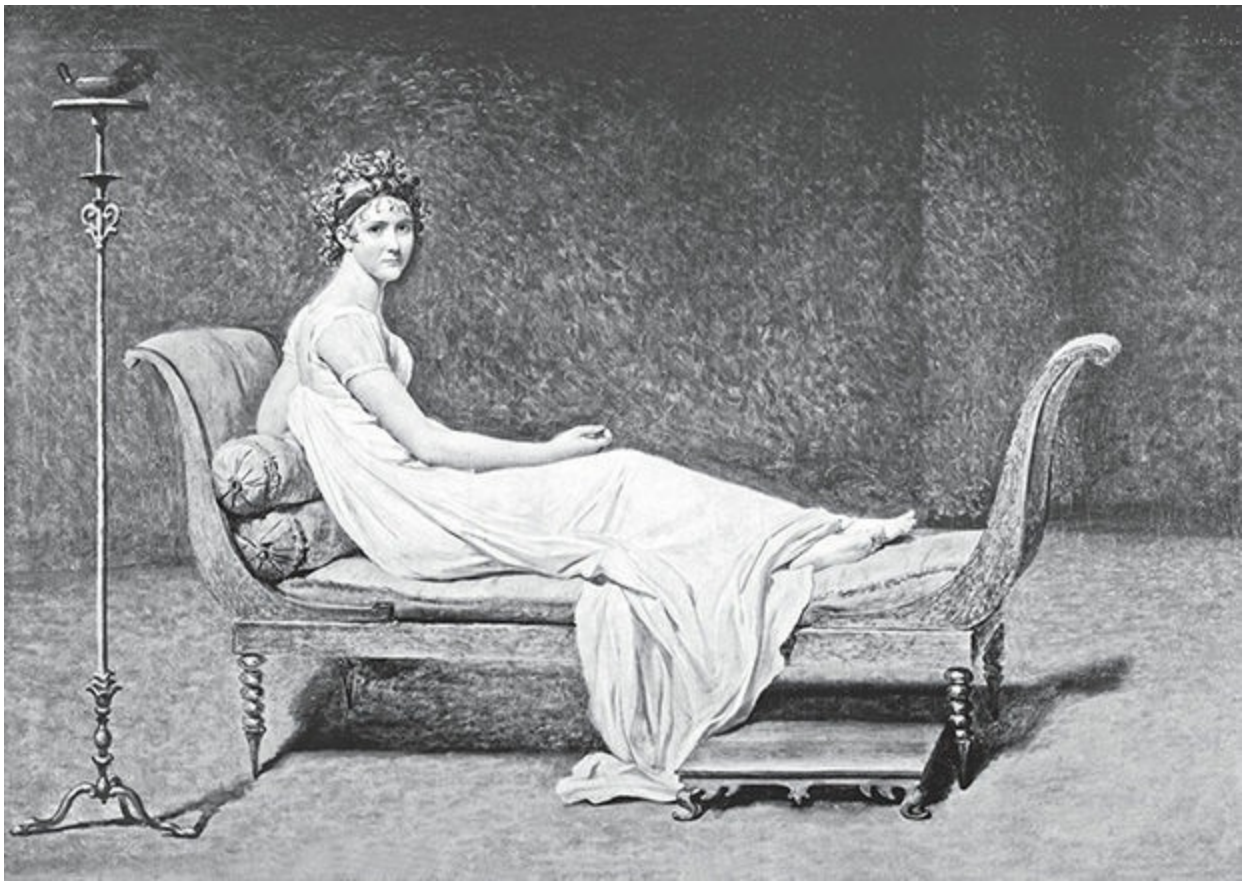
由于他担任过总督，又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名利场》杂志刊登了“副女王”利顿勋爵的这幅漫画

莱昂舞会后，社交界的报刊报道说，格雷弗耶夫人再度以卢浮宫的一幅杰作为模版，设计了自己的晚会服装：达维德的《雷加米埃夫人肖像》（约1800）。作为自我营销的策略，伊丽莎白的这一选择极其聪明，符合洛尔·德·舍维涅关于名人的形象应该在一致的基础上足够多变，才能吸引大众兴趣的洞见。她装扮成督政府时期最著名的两位女主人之一朱丽叶·雷加米埃（1777—1849）有两个目的。一是她重申了自

己是督政府时期另一位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雷加米埃夫人的好友兼对手塔利安夫人的事实。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使人们联想起一个不同以往的新传说：一个恪守贞操的狐狸精的传说。雷加米埃夫人蛊惑了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男人，从法国公爵到德国殿下，从拿破仑一世的弟弟吕西安到小说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35]。［巧合是，夏多布里昂还迷恋过亨利的姑婆科尔代利亚·格雷弗耶（Cordélia Greffulhe），在德·阿斯托格街，很少有人会提到这位丑闻缠身的叛逆者］。然而不管曾让多少人神魂颠倒，众所周知，雷加米埃夫人与一众男人的关系都是精神恋爱，她的贞洁从未被玷污。她嫁的那位富有而残忍的银行家根本不爱她，据说他们甚至未曾圆房。

虽然雷加米埃夫人的贞洁从她有生之年就人尽皆知，但最近奥斯卡·王尔德在他自己编辑的一本英格兰淑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颂她的谄媚文章，文中写道：

> 雷加米埃夫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感情，它既不是友谊也不是爱情，而是两者的混合体。它就像贝阿特丽切和洛尔启迪（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感情一样，只不过他们对爱人只是远观，而雷加米埃夫人的爱人们可以有幸陪伴自己的偶像，喜爱的……热度始终不减。



伊丽莎白参加**1891**年莱昂舞会的服饰灵感来自达维德**1800**年为督政府时期的著名美人朱丽叶·雷加米埃所绘的画像

这几句话呼应了伊丽莎白曾为利顿勋爵规定的“真正的友谊”，她鼓励每一位崇拜者谨遵这一吩咐。雷加米埃夫人这神秘的一面想必令伊丽莎白心有戚戚焉。

伊丽莎白或许还很欣赏雷加米埃夫人以凤凰作为图腾的著名传说。除了奇迹般地浴火重生之外，这种鸟的另一个神奇之处，是它严格拒绝交配，这点冷知识非常符合雷加米埃夫人拒不满足肉体欲望的声明。与拿破仑的鹰或瓦格纳的天鹅一样，凤凰也是一种超凡脱俗的鸟类。因此，伊丽莎白穿成雷加米埃夫人的模样，就把自己变成了另一种稀世珍禽的象征，同样也是利用服装来突出自己的高贵。与此同时，和雷加米埃的其他传说一样，凤凰的联想也突出了伊丽莎白无可指责的性道德。

那件完美无瑕的白色长裙突出了她冰清玉洁的气质，是对乔万尼暴躁地诋毁她/埃莱奥诺尔“病态地需要用（她的）身体取悦每一双眼睛”的有力反驳。

遗憾的是，在现存的她与乔万尼的通信中，没有一处提到伊丽莎白的雷加米埃晚会装束或晚会本身。但她那天的装束在其他地方引发了不少关注，用孟德斯鸠的话概括：“格雷弗耶伯爵夫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雷加米埃夫人。”[36]这一断言反复出现在社交专栏中，是对她超乎寻常的诱惑力的认同。

可以预见，伊丽莎白高调现身莱昂舞会之事自然遭到了亨利的反对。虽然鲁昂家族（遑论西班牙王后）的声望之高无可争辩，但他仍拒绝陪她出席，原因很可能是整个格雷弗耶家族仍在按规矩为让娜·德·阿伦贝格服丧。让娜那年三月死于肺结核。伊丽莎白不顾丧期，决定参加舞会，公然违反了礼节，使亨利更变本加厉地斥责她所谓的“雷克加米埃夫人”宣传噱头。[37][38]“更得体的做法是待在家里，而你没有，”他写道“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真正的贵妇人、最高贵的贵妇人，是不被说三道四的人！！”

让娜虽然是她在德·阿斯托格街上唯一的同盟，但伊丽莎白显然没有因为违反了为小姑子服丧的礼仪而感到内疚。至于亨利的“雷克加米埃”指责，她觉得那是因为他的“主理人”嫉妒她，她在他来信的空白处潦草地写着：“人人都在谈论我，这让德·努瓦尔蒙夫人不高兴了。”伊丽莎白翘首企盼着逃往德国的旅行。在莱昂舞会上见到她再次让利顿勋爵“痛心切骨”。他再次把组诗更名为“玛拉”：根本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他如今的诗歌一派消沉。书信也一样。他对特里萨·厄尔倾诉道：

> 我累了，病了，对一切充满厌倦。玫瑰对我来说太过红艳，阳光刺心怵目。我觉得每一朵玫瑰都有溃疡，每一线阳光都可能引发疟疾——不管肉体多么光鲜，它都会先于其下的骨

骼而腐烂。[39]

更不用说他的肉体确实日渐衰退。[40]除了前一年春天的鼻腔手术后出现的呼吸道问题之外，利顿勋爵还患上了严重的膀胱感染。最近，他又开始感到胸痛。在博尔盖塞府，他的卧室和书房都位于楼上，为了免得他费力爬楼梯，伊迪丝在一层的绿色沙龙给他支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这些安排治标不治本，英国伯爵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每况愈下。他对贝蒂说他觉得自己距离那个男人（和女人）的世界越来越远，仿佛全人类的存在不过是为他一人上演的一场空洞的演出。他说：“在我看来，所有人都是皮影戏。”与此同时，他不安地感觉到无生命的物体全都活了。据他的小女儿埃米莉·布尔沃-利顿说，这一时期利顿勋爵坚信法国的20法郎和100法郎金币上的寓言人物——“起草宪法的共和国天使”，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位朋友”。他和法国贵族朋友们一样反对共和制，因此他对金币的迷恋与政治倾向无关。绝望已经把他推进了一个超越政治甚至超越逻辑的王国。

看到丈夫的情况如此糟糕，伊迪丝吓坏了，建议7月一起去拜罗伊特旅行，她一直想去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利顿勋爵虽然不像妻子那样是个乐迷，但他从在波恩上大学起就爱上了德国，欣然同意去那里旅行对他的健康有益。他长期以来对巴黎的迷恋已经消失了；他如今说它是个“可憎的”地方，“它的活力、它的爱情、它穿戴讲究的女人和诙谐机智的男人说的做的全都一样，无可挑剔，却总是令人厌倦地重复着同样的类型和语调——极为肤浅”。[41]正如伊丽莎白所说，城区是漂亮脸蛋的王国，不是美丽灵魂的疆土。利顿勋爵或许还会加上一句：不是伤心人的疆土。无论哪里，就连全世界的瓦格纳之都，也比他所在的这座城市更加亲切。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利顿勋爵的精神状况极度恶化，以至于他坚信**20**法郎金币上的寓言人物是他唯一的朋友

到达拜罗伊特后，他惊喜地发现这里虽深受热爱音乐的巴黎人欢迎，但它与“光之城”形成了“非常喜人的反差”。“这里的生活简单而朴实，”他在一封信中以异乎寻常的乐观语调对贝蒂说，“情感强烈而严肃。”这是最适合他忧伤心绪的生活。而音乐节竟是又一重意外之喜。他写信给小女儿康斯坦丝说，他这人素来“不是很容易被音乐效果打动，对音乐创作的艺术一无所知”，但瓦格纳的音乐出乎意料地令他振奋。[42]

利顿勋爵也很喜欢拜罗伊特节日剧院（Festspielhaus），这是专为瓦格纳歌剧设计的演出空间。它在构造格局上有多项创新，其中的隐形乐池和双前台开辟了作曲家所谓的公众与舞台之间的“神秘洞穴”（mystische Abgrund）[43]；呈现出利顿勋爵从未见识过的一种超凡脱俗的舞台调度效果。[44]瓦格纳的最后一部伟大作品，《帕西法尔》（*Parsifal*，1882），就是专为拜罗伊特的舞台创作的，这部歌剧是对亚瑟王圣杯传说的富有争议的改编，作曲家留下遗嘱，禁止这部歌剧在任何其他地方上演。在这样的布景中聆听作曲家的音乐，利顿勋爵有一

种幻觉，仿佛自己来到了“风平浪静的梦境中心”。[45]

然而各种凶兆不断提醒他，此地并不风平浪静。《帕西法尔》演出一开始，他就不愉快地发现这部歌剧为不断变形的妖妇孔德丽使用的化名之一就是埃罗底亚德，也就是莎乐美之母的名字，而在创造那个人物时，瓦格纳从“流浪的犹太人”传说中借鉴了大量内容。鉴于伊丽莎白对这两个人物以及瓦格纳本人都非常痴迷，利顿勋爵又一次陷入了对她的想念。孔德丽的奸计也让他想起了伊丽莎白。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瓦格纳笔下的这个人物代表了世纪末巴黎社会中不算罕见的一类女人：“恶毒的”悍妇，对她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利用自己的超自然能力”从男人那里获得“浑身颤抖的爱更令人着迷”，她们的口号是“你不要爱我，而要充满敬畏和恐惧地倒在我脚下的尘土中”。这恰是伊丽莎白要求利顿勋爵所做的；这是她给他判处的死刑。

7月20日，她再度挤入了他的记忆。那天他和伊迪丝应邀与闺名科西马·李斯特（Cosima Liszt）的瓦格纳遗孀一起享用下午茶。在瓦格纳拥趸看来，能受到这位伟大人物的妻子接见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瓦格纳夫人如今越来越受人崇拜，俨然拜罗伊特的女祭司。在她面前，热纳维耶芙传奇的比才遗孀形象也相形见绌了。见到科西马让利顿勋爵神清气爽，他与她已故的父亲弗朗茨·李斯特是好友，在她身上他看到了“不少李斯特的精彩人格魅力”。不过当她提到他和伊迪丝刚刚错过了首次来拜罗伊特的格雷弗耶伯爵夫人时，他就变得心神不宁了。伯爵夫人和她的旅伴们——来自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的一群亲戚，也在科西马府上用了下午茶。

对利顿勋爵而言，提一下伊丽莎白的名字就足以再度点燃他逃到拜罗伊特所躲避的压抑已久的怒火和搔首踟蹰的爱欲（这是《帕西法尔》中的一个关键比喻）。[46]他情人的名字有一种魔力，这是他早在《玛拉》第一章就写过的现象，叙述者高声喊道：“啊，然而就连陌生人的

双唇也会再续/你的名字的魔力！/昨晚，有人提起你时，/我觉得全身的血变成了一团火焰。”在这部作品中，火的比喻有着积极的联想。那时他还乐观地以为可以与她美梦成真，诗歌叙述者将火当成强烈激情的证明。但对1891年夏天的诗人本人来说，至爱之人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句邪恶的咒语，越发激怒了他体内的恶魔。就连拜罗伊特的梦境也并非清净人间，可以远离在巴黎酝酿的噩梦。

此时在利顿勋爵的想象中，伊丽莎白已经变成了比无所不在的幽灵更加邪恶的人——或事。他回想起两人有一次在巴黎参观一家医院之后的对话，他们在那里目睹了一具尸体的解剖和火化过程。伊丽莎白看到那个场景竟然非常兴奋，令利顿勋爵十分震惊，她事后充满热情地对他说：“记住，迪厄拉富瓦教授说尸体被火化后，心是全身最后一个被烧灼的器官！”[47]当时，利顿勋爵对自己殷勤的回答很满意：“那一定是为什么它在我们活着时这般火热的原因吧！”然而回想起来，这段对话简直是一语成谶。这个女人竟然挑战人心的耐久性，来测试自己超常的毁灭能力。他如今恐惧的是，她要亲手把他的心掏出胸膛，把它烧成灰烬，方才罢休。

和伊迪丝从拜罗伊特回到巴黎后，他写了一篇很长但根本不抒情的诗作为《玛拉》的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这首诗题为《凶残的梦》（“Somnium Belluinum”），再度描述了利顿勋爵的一颗脱离肉体的心脏燃烧的噩梦。诗的开头描述了“可怕的一大群”幻影似的动物，涌动在叙述者时断时续的不安梦境中。[48]队列中的每只动物都让他“因一种不同的痛楚”而“战栗”：“充满爱欲的渴望”“无法言传的悲伤”“一团剧烈燃烧的火焰”“生命的终结”。那些野兽像它们引发的情感一样千差万别。有些是自然界已知的物种：“柔韧的金钱豹、雪豹和山猫，/然后是美洲豹、黑豹和美洲狮。”更多的动物并非如此。有长着40只脚的龙和“金顶的”狮鹫，有“手持魔杖的超自然巨猿”，还有“两条腿的狗神气活现”。有用目光杀人的“体态光滑优美的蛇怪”；有摇动箭袋的“欢乐的半人

马”；有“人脸的迦勒底公牛/组成的缓慢方阵……，/那令人困惑的巨大方阵怕是象征着/恐怖的想法会多么有力”。整段“阴森的动物游行”读来像是德·萨冈亲王夫人和居斯塔夫·莫罗编造的一个疯狂的育种实验，仿佛后者画室里的动物群与前者野兽舞会的动物们开始了交配。

至于这些野兽象征的“恐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只有当“一群色彩诡异的鸟类”突然间和地上的动物们开启了“一场喧嚣的盛会”时，叙述者才恍然大悟。“有孔雀、鹦鹉和吸蜜鹦鹉，/有火烈鸟、戴胜和各种家禽/它们瞪着巨大的眼珠，挥舞着愤怒的禽爪。”随着禽类在他周围聚拢，诗人充满恐惧，不久他就明白了原因。它们的领导者来了，那是只残忍的、无所不能的凤凰，鸟喙中叼着“一块火热的炭”，叙述者认出那是他“自己燃烧的心脏”。

叙述者惊恐地高喊：“你要对我的心/做什么……/你用地狱之火如此猛烈地点燃了它/到底用来祭祀什么？”听到此问，凤凰和它“行进的……鸟群”开始抑制不住地愤怒尖叫、振翅、抓挠。它们起伏的黑色风暴遮蔽了太阳，朗朗乾坤竟突然天昏地暗。它们转向叙述者，“像杀人的教士一般追逐着他”，彼时“一团血红的云烟……笼罩了战栗的大地”。奇怪的是，当叙述者从睡梦中惊醒后，这场煎熬的恐怖才达到高潮：“禽鸟和蛇怪疯狂搅动着空气/可怕地尖叫着，发出嘶嘶声：想抓住我的心脏，/直到最后我绝望地醒来。/但是太晚了！它不见了。”

这是《玛拉》最后一章的最后几句诗。

1891年11月24日，第一代利顿伯爵爱德华·罗伯特·布尔沃-利顿死于巴黎博尔盖塞府的家中，享年60岁。《纽约时报》报道他因“突发心脏病”而死。[49]其他出版物提到了动脉瘤和心脏骤停，一个英国反鸦片组织的公告声称死者死于“对鸦片烟枪的迷恋”。《高卢人报》回忆起利顿勋爵两年前一次鼻腔手术后染上流感，说从那以后他的身体就没有彻底恢复过。新闻界异口同声地说巴黎公众对他的去世悲痛不已。利顿勋爵

是少数在法国接受国葬的外国人之一，但他并没有葬在那里。在巴黎的葬礼结束后，他的遗体被运回了英格兰，和他的祖先一起葬在了内布沃思。

他的妻子和女儿们说，利顿勋爵死前曾到内布沃思住了几天，在那里感染了致命的风寒，后来“体内炎症”又加重了他的膀胱感染，导致他卧床一个多月，最终还是去世了。后一种病症在他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回程中愈发严重，以至于他到达巴黎时，已经痛得直不起腰了。医生们再度叮嘱他绝对卧床。一位医生甚至建议他辞去大使职位——利顿勋爵如今这般痛恨他居住的城市，倒也没有完全拒绝这一做法。他们全都劝他不要再继续任何工作，警告他说一点点劳累都可能要了他的命。

利顿勋爵没有遵医嘱，继续诗歌创作。他一意孤行地在绿色沙龙的床上修改《玛拉》。伊迪丝、贝蒂和埃米莉都说他死时正在为那部诗集撰写一篇补遗。他已经吩咐伊迪丝让出版商把这最后一篇加在书的结尾，作为组诗的最后一首。贝蒂对他死时的情况描述如下：

> 他一直把手稿放在身边，实际上在动脉血块从心脏转移至脑部时，他正在写一行新诗。……还好他没有经历什么痛苦，总算遂了长久以来的愿望，可以安歇了。[50]

尸检证实了血块的存在，还披露“严重脓肿的肾脏”和“比正常情况薄1英寸的心脏”。传记作家洛尔·伊勒兰（Laure Hillerin）尝试着给出了一个象征意义的诊断：“毫无疑问，他的心脏太过老弱，已经承受不住他汹涌澎湃的天性了。”[51]

太过老弱，或许的确如此，但有些证据表明，利顿勋爵并非心碎而死。虽然贝蒂·鲍尔弗也曾尝试在历史记录中抹去这些证据，但伊丽莎白的档案和当代报刊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些资料显示，利顿勋爵并没有像家人后来声称的那样绝对禁足在博尔盖塞府。在生命最后一周的

几天，他违反医嘱离开了病榻——去布德朗森林参加为欢迎弗拉基米尔大公夫妇举办的乡村府邸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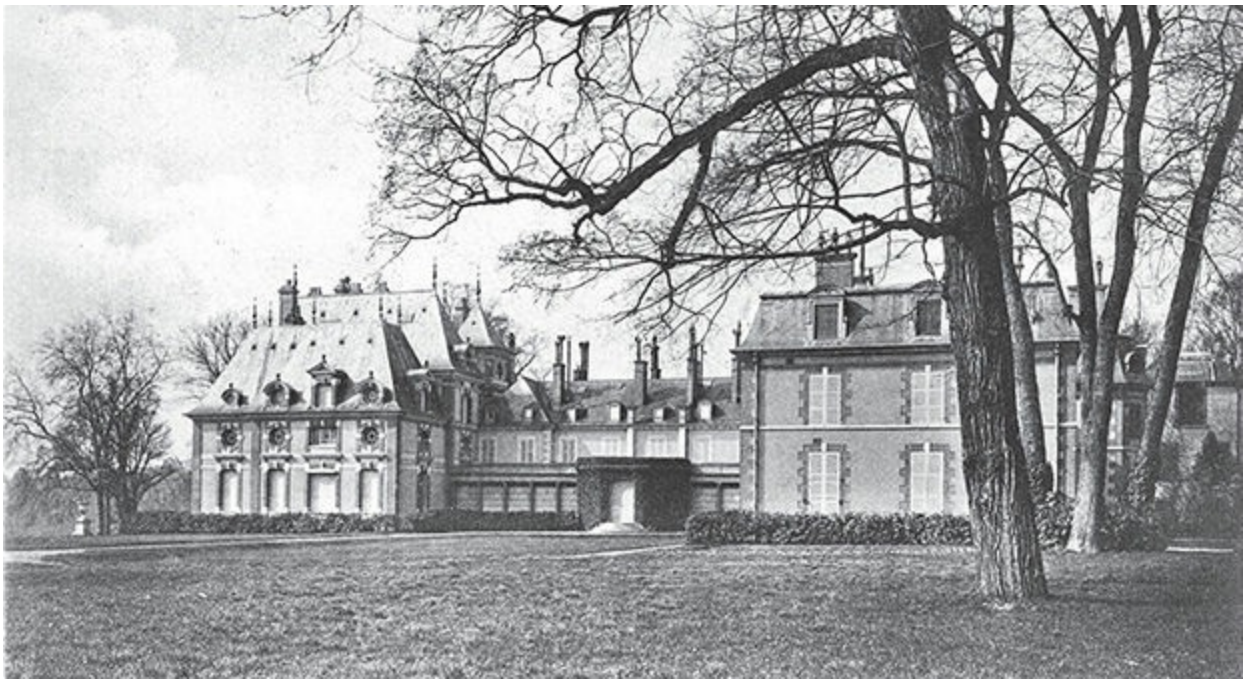
这场聚会的“规模很小”，只请了26位宾客，如果利顿勋爵没有再次与伊丽莎白和解的话，他不会被邀请，也不会不顾舟车劳顿前去参加。就此而言，《玛拉》结尾描写的凤凰的确是对诗人所迷恋之人的恰当比喻。正如欧文·梅雷迪斯所写的抒情诗体裁的鼻祖彼特拉克在写到自己对洛尔的爱时所说，“这就是我的爱。……它像凤凰一样，燃烧、死去，重获新生”。[52]1891年秋，利顿勋爵的“人已逝，爱未央”也是类似的壮举。

弗拉大公夫妇在11月19日周四下午到达布德朗森林，11月21日周六晚间回到巴黎，来回都乘坐亨利·格雷弗耶付钱给铁路公司专门去接他们的豪华私人火车。“发起人”们几乎悉数到场，欢迎王室夫妇来访：德·阿伦贝格一家、德·拉艾格勒一家、拉福斯一家、奥廷格一家、迪洛和科斯塔·德·博勒加尔。那一帮人中唯一缺席的成员是布勒特伊，那时他远赴大西洋的另一边，正在纽约州沃平杰斯福尔斯拜访新婚妻子的家人呢（很遗憾，他没有记录那次旅行的印象）。

格雷弗耶家那个周末招待的其他客人包括德·萨冈亲王（亨利同意他出席的唯一原因是弗拉大公夫妇喜欢他）、德·加利费将军、英国大使，以及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她提携的布朗热将军身败名裂，几个月前自杀了，她需要振作起来）。利顿勋爵虽然病体支离，但他在聚会的两天半时间必须全程陪同，因为礼仪规定所有宾客都必须在王室成员之前到达，在他们离开后方能离场。伊丽莎白常常打破这个规矩，但职业外交官必须毫无条件地遵守。

弗拉大公夫妇在布德朗森林的活动包括白天耗费巨大的追猎（主人特意从匈牙利进口了14000只山鸡，以确保俄国大公满载而归）[53]和夜间奢华丰盛的晚宴。晚间的宴会在城堡新建的侧翼举行，格雷弗耶家借

弗拉大公夫妇到访之机为它揭幕。新增建筑实现了亨利的奢华构想，亮点是一个恢宏的双层高宴会厅，通过地下传送轨道车与厨房相连。只需按下开关，光滑的镶木地板就会从中间分开，一个带座椅的餐桌会从地下升上来，能同时容纳100位客人就餐，就像歌剧中某种扭转乾坤的神力。事实上，格雷弗耶的建筑师在设计空间时的确采用了加尼耶设计的巴黎歌剧院的夸张风格；多年后来此参观的雅克·布朗什写道，宴会厅“到处是栏杆、壁柱、走廊、长廊、多枝烛台和花彩，这些装饰物流光溢彩，粗野地泛着石英的光泽”。[54]布德朗森林新建的私人剧院也是同样的装饰风格，也能容纳100人看戏。在罗曼诺夫皇室夫妇逗留的第二天晚上，一个专业男子合唱团在剧院的舞台上合唱了俄国国歌。



亨利**1888**年为布德朗森林新建的奢华侧翼**“**本身就是一座城堡**”**。它的亮点是一个可同时宴请百人就餐的餐厅、连接餐厅和厨房的地下传送轨道车和一座私人剧院

外界对布德朗森林这些改建的评价毁誉参半。《费加罗报》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向读者描述新侧翼“本身就是一座城堡”，他并没有应邀参加揭幕式，这句话大概是在重复伊丽莎白透露给他的原话。德·拉福

斯公爵觉得身为老朋友（和一位公爵）他必须诚实而不留情面，因而嘲笑亨利把“太阳王的凡尔赛宫生硬嫁接到了一座资产阶级房子里”。[55]无论好坏，这些豪奢的装修解释了伊丽莎白后来参观英国王室位于诺福克的乡村府邸时居然不为所动的原因：“亨利让我在布德朗森林看尽了奢华，桑德灵厄姆（Sandringham）根本无法与它相提并论。”

在“可怜的利顿”眼中，他的情人在布德朗森林尽享的奢华大概让他十分沮丧，除非他回想起年轻时作为印度的尊贵傀儡的美好时光。他选择不参加格雷弗耶家组织的追猎——他向来不怎么喜好打猎，何况现在身体条件不允许。[56]英国伯爵回避打猎大概让他至少从死神手里骗得了几天时间，因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对枪械安全疏忽大意，因为没按规矩开枪，几乎打爆了另一位猎手的头。（这让非常看重打猎规矩的德·于扎伊公爵夫人极为愤慨，大公轻描淡写地对她说自己知道危险，但必须要命中目标。）拒绝帝王的游戏还让利顿勋爵有机会单独跟女主人待一会儿，其他人都去田间打猎了；德·拉福斯公爵注意到伊丽莎白也拒绝参加追猎会。

经历过《玛拉》的一切积怨和伤痛，利顿勋爵对伊丽莎白的爱居然并未消失，而此时此刻，他觉得她奇迹般地再度点燃了他的爱火。她在那年夏末从迪耶普写给他的一封神秘的信中写道：“你一个人就能让我忘记其他的一切。这么多的动荡、困窘和不安（原文如此）——直到有一天，一朵小花盛开了，给梦想涂上了珐琅彩的光泽。”[57]她说的梦想是什么？为什么如利顿勋爵在那年8月寄给他的一束花的附卡中所说，她终于决定“把（她的）宠幸再度施舍给（他）一点了”？

很难说。不过她改变主意可能与她自己那年7月的拜罗伊特之行有关。除了热热·普里莫利在途中为他们拍下的合照之外，那次出行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伊丽莎白和乔万尼在共同旅行期间没有写信当然没什么稀罕的，但两人后来的通信中也从未提到过那次旅行，就有些奇怪

了。乔万尼保留的一封没有署期的信中责备她“在前一天晚上的表演中对我太苛刻了”，这表明只要事情与他有关，伊丽莎白就把失望的阈值设得过低。[58]因此，他们在德国共度的时光大概未能满足她的期待。另一个指向这一原因的暗示出现在她唯一一篇提到这次旅行的日记里。后来回到迪耶普后，她记录了拜罗伊特的音乐“让她身临其境地”以为“信仰被唤醒而……爱终将破茧而出”。然而她写道，那样的希望并没有把她实际生活中的关系变成童话中的浪漫；让她最终只剩下音乐这一个爱人了：

> 人最初都会爱事物本身。后来她需要爱某个人，就不再爱事物本身，而只爱与那个人有关的东西。再后来，她又开始爱事物本身了。

在伊丽莎白的日记中，这段话与她抄写的那段关于想到利顿勋爵“一人就能（让她）忘记（生命中）其他的一切”的段落出现在同一页。因而看起来，乔万尼在与伊丽莎白一同旅行的过程中，大概不知怎么把自己从她的头脑中抹去了，至少当时如此，一回到巴黎，她便最后一次回到利顿勋爵那里，用他来填补空白。

伊丽莎白的其他两位传记作家无一提过她对乔万尼辗转反侧的爱情——与这一具体事件有关的讨论或笼统的讨论都没有。不过其中一位传记作家，安·德·科塞-布里萨克，确认了拜罗伊特之行归来后，伊丽莎白的精神前所未见地萎靡，利顿勋爵11月来到布德朗森林时，“她生平头一次对孤独感同身受”。[59]科塞-布里萨克写道，备感孤独的“伊丽莎白突然极度渴望感受（利顿勋爵）的双眼、双手和双唇落在自己身上，给她安心，让她幻想……自己并非孑然一身”。

伊丽莎白有没有对利顿勋爵表达这些情感也很难说，但他尿道剧痛，大概无法享受性爱。不过他的确想象自己的文学分身的爱情终于得以圆满。利顿勋爵去世前几天写下的两首诗提到了与一位“一直在矛盾

该不该献身于他的女人”的热烈性交。[60]第一首诗没有署期、没有题目、没有签名，是利顿勋爵在布德朗森林的信纸上随手涂写的。那首法文诗共有八行，用英雄体写成，赞美了“至爱时刻的不可言说的颠三倒四，（彼时）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心灵感应，仿佛拨响了里拉琴的琴弦”。为了“帮助他的爱人克服对性的惧怕”，叙述者“解释他在她身上激发的爱欲”，并用他的雄辩“大半征服了”她。当她终于“屈服，迷恋地”投入他的怀中时，诗人觉得自己“像个热恋中的青年”，“陶醉在希望”中：他总算得到了“爱”的回报。这里抒发的情怀十分悲壮：一个60岁的将死之人梦想自己再度年轻。[61]

第二首诗就是英国伯爵去世时正在写的那份《玛拉》补遗，不知是他的家人还是编辑给它安上了题目：《利顿勋爵的绝笔诗》。与《玛拉》中的其他诗歌一样，这篇未完成的诗作也没打算记录活生生的经验。相反，它呈现了一段变动不居的关系的最后一个阶段，诗人把整部诗集题献给伊丽莎白，但这段关系可能跟他与伊丽莎白的关系相似，也可能无关。同样，这首诗写作的时机——伊迪丝说丈夫从布德朗森林回来的当天就开始“写它，仿佛很急切”——或许能够表明，与伊丽莎白共度的那个周末给了他灵感。他直到死神降临的那一刻都在写这首诗则表明，在生命的尽头，没有什么比诗更让利顿勋爵挂怀：他的诗，以及诗中表达的爱情。

利顿勋爵明确说明《玛拉》的创作目的是要表达一种“（作者）本人从（灵魂深处）最幽微的角落挖掘出来的”情感，“一切代价自负”。这本书在他死后不久就出版了，被誉为令人信服地彰显了上述观点，《利顿勋爵的绝笔诗》尤其因为强烈的真情实感而备受关注。伦敦《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一位记者总结说：“在既非评论家又非诗人的外行看来，利顿勋爵的作品……（中）确定无疑的真诚力透纸背。想必许多读者读诗时会不由地低呼‘好可怜’！但也有人会加一句，‘好真实’！”[62]

作为《玛拉》组诗的最后一首，《利顿勋爵的绝笔诗》标志着叙述者起伏不定的情感历程走到了尽头。结局居然是完美的，如果读者还记得上一次见到主人公时，一只冷酷成性的凤凰用鸟喙叼着他的心飞走了，这样的结局真是出乎意料。自从饮了玛拉的苦涩泉水，在经历了一路折磨他的伤害、孤魂和凶禽之后，叙述者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姑娘。

奇迹是在他与她一起步行到一片绿色林地时发生的，她很熟悉那片林地，但他还是第一次来。把他领上一段“森林茂密的山坡”俯瞰美景后，她停下来，露出了牝鹿一般警觉的神情：

你四处观望，侧耳聆听，

你那双碧绿的眸子在林地里变得深邃。……

你甩开棕色的卷发，

徒劳地试图把它们弄直，

然后，笑了起来。

她出声地问其他人都去了哪里，然后两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他们此前只是在“其他人在场时才会相遇”，此刻，她和叙述者突然独处，竟不习惯。

两人的紧张逐渐升级，最后她突然把她的“脸正对着我的，……带着游离的目光和有些伤心的微笑”。他们的目光一经相遇，两人就完全失控了：

我们浑身颤抖着，

像一场坚不可摧的飓风

把一切带起、抓牢、卷走，

我们在一声微弱的野性呼唤中奔向彼此，

投入了一个无声的拥抱。

与在布德朗森林写的那首诗一样，女人的“屈服”对同伴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效果，不过在这里，重生笼罩了一切，让他们周围的世界也都变了样子：“我们/顷刻间成了彼此，/我这个孤独的男人，和她那个孤独的女人，/在这面目全非的新世界/仿佛鸿蒙初辟，天地初开。”

随着这一转变，叙述者对自己所爱的女人有了可喜的新看法。他审视着她那种“屈服于爱情的美丽柔软的面孔”“靠在我的胸前”，头一次发现她曾经用来折磨他的“骄傲的反抗”和“时断时续的突然的冷淡”原来是多次表明她爱他，而不是拒绝他。他不知道，在她挣扎着不愿屈服于自己的禁恋之时，最严重的“苦楚，/（和）剧痛”已经摧毁了她那颗“高贵的心”：她“可耻地承认爱情胜利了”。但此刻，他们拥抱在一起时，她放下了“残忍的女人的艺术/用鄙视保护自我的艺术/对爱情忠诚的艺术”。诗歌在此中断——诗人再也不能写作了。[63]

如果他临终前自以为他与伊丽莎白的爱情的版本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利顿勋爵死亦瞑目了。

---

[1] LL致GS，写在LL的信纸上的未签名信件，存档于NAF 14826，folio 110。

[2] NAF 14383，folio 181/183. 关于这种称呼方式至今在法国社会仍属失礼，见Cécile David-Weill，*The Suitors*，trans. Linda Coverdale（New York：Other Press，2012），101，其中有一个喜剧情节是一位外行“能成功地把这么多失言丑态塞到一次问候中，简直算得上巨大成就”。（100）

[3] JEB，*Mes modèles*，113.

[4] 这一事件发生在普鲁斯特家的公寓里，两人1891年12月在贝涅尔夫人家里再次见面后，MP邀请王尔德共进晚餐。到达马勒塞尔布大道9号后，王尔德发现普鲁斯特的父母也将跟他们一起就餐，十分震惊。尴尬的王尔德粗鲁地评价公寓“毫无品位……风格古旧的资产阶级”的装修，然后就起身告辞，总共也就待了几分钟时间。MP问他是不是不舒服，王尔德回答道：“没有，我的身体没有丝毫不适。我以为我是来（和你）独享晚餐的，谁知道被招呼进了客厅。我往里一瞧，看到你父母远远地坐在那里，就泄了气。再会了，普鲁斯特先生。”和他被引荐给GS那次一样，王尔德对男主人的称呼也是对社会地位较低之人的称呼方式（“普鲁斯特先生”）。关于这一事件的详情，见Robert Fraser，*Proust and the Victorians*：*The Lamp of Memory*（New York：St. Martin’s，1994），212-13；and Emily Eells，“Proust et Wilde，” in *Le Cercle de Proust*，ed. Jean-Yves Tadié（Paris：Honoré Champion，2013）：225-36。

[5] DH，*My Friend Degas*，84.

[6] GS致约瑟夫·雷纳克，存档于NAF 14383，folio 49。

[7] 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ed. Robert Mighal（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6 [1891]），99。

[8] GPR，*Sous mes yeux*，47-48.

[9] 关于比才纪念碑筹款活动的媒体报道，见*Le Temps*（December 3，1890）：4；*Le Temps*（December 27，1890）：3；以及LH为了宣传第二天晚上的《卡门》重演接受《高卢人报》的采访（1890年12月11日），第2版。对该活动和《卡门》义演的辱骂性报道，见ED，*Testament d’un antisémite*，244-47。

[10] 让-路易·福兰有一幅没有标题的肖像画极为清晰地展现了GS的容貌日益衰老丑陋。这幅画中的热纳维耶芙穿着淡紫色晨衣靠在美人榻上，一只小型贵宾犬伏在她脚下，但她虽然姿势优美，脸却像一副死人面具，脸颊消瘦，气色苍白，两只眼睛像两个巨大的黑洞，眼圈发红。遗憾的是，这幅画是私人收藏，无法在本书中复制，但画中女人的药物上瘾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11] ED，*Testament d’un antisémite*，244.

[12] 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104.

[13] LL对贝蒂说《克利奥帕特拉》让他“极为失望”。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06.

[14] 关于与LC一起参加降神会，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41-42；关于LL对“通灵术”的兴趣，见C. Nelson Stewart，*Bulwer-lytton as Occultist*（LaVergne，TN：Kessinger，2010）。

[15] HB的再婚见报道“Married to a Marquis，” *New York Times*（March 3，1891）：1；and Our Own Reporter（pseud.），“A Visit to Wappingers Falls，” *Poughkeepsie Eagle*（June 12，1891）：1。

[16] 除非特别说明，关于LL独自一人待在博尔盖塞府和他创作《玛拉》的一切情况介绍和引文均引自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玛拉》的引文也都摘自那部诗集。

[17] 关于出动LL创作《玛拉》的火与冰、夜晚与太阳的老套话题，尤其见那部诗集中的“Absence” “Death” “Amari Aliquid” “By the Gates of Hell” “Selene” “Travelling Acquaintance”和“Somnium Belluinum”。又见OM（pseud. LL），“The Earl’s Return，” in *The Poetical Works*，314。关于LL感觉他没有天分实现自己的诗人抱负，见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296。

[18] LL致EG，未署期，存档于AP（II）/101/92；引文又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36，n. 1。

[19] 关于EG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兴趣，见AP（II）/101/151中的各类文件。这些文件最终没有被归入她的国际关系卷宗而被归入了一个“文学”卷宗，和她与GBB的小说文本混在一起，这个事实表明在她的心目中，德国皇帝与她和GBB的感情有关。

[20] 关于她后来对墨索里尼的兴趣，见EG，存档于AP（II）/101/149的一份未署期的机打笔记，其上写道：“显然，（当今）欧洲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墨索里尼！所以，我这么一个一直在徒劳地找机会认识他的人感到很难过的是，我根本见不到他！”（EG接着写道，意大利大使馆的Manzoni伯爵已经给了她一本“很重要而有创意的”书，*Mussolini Speaks：Speeches Are Facts*）。

[21] 1891年2月24日EG致GCC的信，存档于AP（II）/101/151。

[22]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débats parlementaires—session extraordinaire de 1889*（Paris：Imprimerie des Journaux Officiels，1890），653.

[23] OM，“Omens and Oracles，” in *Marah*，44. 我忍不住要在这里引用这一句诗，因为虽然LL的文学作品没有为后世提供像他父亲爱德华·布尔沃-利顿那么多的老套格言，但“反省一下你偷来的感情吧”可以被看作“反省一下自己，别毁了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先驱版本。

[24] 关于太后莅临及莱昂舞会的详情，尤其见上文引用的EG在1891年2月24日致GCC的信件；*Le Gaulois*（May 27，1891）：1；and *Le monde Illustré*（May 30，1891）：425。

[25]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66.

[26] 1890年9月3日EG致“X”的信，存档于AP（II）/101/26。注：这封信和若干与GBB来往的其他信件被归入了同一卷宗。

[27] EdG，日志，1891年4月25日的日记。

[28] GBB，《热拉尔的日记》，署期为“4月9日……凌晨1点45分”，第7页（页码用蓝色铅笔标注在页面顶端）。

[29] GBB，《热拉尔的日记》，署期为“4月16日……中午”，第14页（页码用蓝色铅笔标注在页面顶端）。

[30] GBB致EG，存档于AP/101（II）/150。

[31] EG，署期为1890年11月的笔记，存档于AP/101（II）/150。

[32] OM，《利顿勋爵的绝笔诗》，见*Marah*，202。关于德·阿伦贝格的双胞胎兄弟被杀，见PV，“La Société étrangère à Paris，” *La Nouvelle Revue* 70（May-June 1891）：677-701，680。

[33] 宣布成立法国伟大音乐试演协会的宣言刊登在那年4月的《费加罗报》上；见Gaston Calmette，“Les Compositeurs français joués en France，” *Le Figaro*（April

10，1890）：1-2；and “Musical Notes，” *Monthly Musical Review* 20（May 1，1890）：116-17。关于法国伟大音乐试演协会及其在世纪末法国音乐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见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87-91；Sylvia Kahan，*In Search of New Scales*：*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Octatonic Explorer*（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9）；Jann Pasler，“Countess Greffulhe as Entrepreneur：Negotiating Class，Gender，and Nation，” in *The Musician as Entrepreneur*，ed. William Webe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and James Ross，“Music in the French Salon，” in *French Music Since Berlioz*，ed. Smith and Potter，91-116。

[34] 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4），美国作家，著有多部经典文学作品，包括中篇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和《冷血》。在《冷血》中，卡波特开创了“真实罪行”类纪实文学，被公认是大众文化的里程碑。《冷血》出版时，卡波特在纽约举办了一个“黑白舞会”，被称为“世纪派对”，是当时媒体追逐的对象，也是至今仍为人称道的社交盛事。

[35]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伊勒-维莱讷省的圣马洛市，拿破仑时期曾任驻罗马使馆秘书，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先后担任驻瑞典和德国的外交官，及驻英国大使，并于1823年出任外交大臣。

[36] RM，*La Divine Comtesse*，198. 事实上，由于雷加米埃夫人比塔利安夫人名气更大，新闻界往往称EG的督政府风格装束模仿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例如，关于“Mme G***’s legendary beauty and *Récamier* hat”的评论，见Frivoline（pseud.），“Art et chiffons，” *L’Art et la mode* 29（June 20，1885）：337-38，337。

[37] 亨利说这句羞辱来自“（他）圈子里的（一个）年轻人”，没有具体说明是谁，在他的圈子里，最机智的当属迪洛、菲茨-詹姆斯和阿斯。这一挖苦的确需要一些语言天分，亨利显然没有：Réclamier（“雷克加米埃”）是Récamier（“雷加米埃”）和*réclame*（“宣传”）这两个词组成的混合词。——作者注

[38] HG致EG，未署期的信件，存档于AP（II）/101/32。

[39]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16；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295.

[40] 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295；关于LL对女儿所说的20法郎金币上的人物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位朋友的话，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302；关于他的拜罗伊特之行，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295。

[41]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19.

[42]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20。

[43] 关于瓦格纳的“神秘洞穴”概念，见作曲家“关于‘音乐剧’这一名称”的话（他说《帕西法尔》是“音乐剧”而非“歌剧”），见Richard Wagner，*Actors and Singers*，trans. William Ashton Ellis（London：Kegan Paul，Trench，Trübner，& Co.，1896），354。William James Henderson，*Richard Wagner*：*His Life and His Dramas*（New York：G. P. Putnam & Sons，1910），140；and Daniel H. Foster，*Wagner's Ring Cycle and the Greeks*（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76。

[44] 关于LL对拜罗伊特的舞台调度的印象，见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19-20。

[45]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19-20。关于瓦格纳在创作孔德丽这个人物时受到了《流浪的犹太人》的影响，见Dieter Borchmeyer，*Drama and the World of Richard Wagn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90。

[46] OM，“Figures of Speech，” in *Marah*，67。

[47]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92.

[48] OM，“Somnium Belluinum”，179-86.

[49]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5，1891）：1. 关于LL之死和葬礼，又见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30-33；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303；Scott（pseud.），“Les Obsèques de Lord Lytton，” *Le monde Illustré*（December 5，1891）：1-2。

[50] Lady Betty Balfour，ed.，*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 Lytton，First Earl of Lytton*（hereafter Balfour，ed.），vol. 2（London：Longmans，Green，& Co.，1906），430-31. 这一细节出现在LL的许多讣告中，例如*Annual Register*上刊登的讣告提到他“一直在写诗，他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倒下的那一刻，墨迹还未干”。“Obituary of Eminent Persons：The Earl of Lytton，” *Annual Register and Review of Public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November 1891）：197-98.

[51] 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245.

[52] Petrarch，“XCV. Qual più diversa e nova，” in *Il Canzoniere*，482-83.

[53] Du Bled，op. cit.，164；关于专业合唱队的表演，见“Nouvelles et faits：Seine-et-Marne，” *Le Journal du Loiret*（November 24，1891）：3。

[54] JEB，*La Pêche aux souvenirs*，149.

[55] La Force，Auguste de Caumont，duc de. *La Fin de la douceur de vivre：souvenirs，1878-1914*. Paris：Plon，1961，77.

[56] “Lytton：Edward Robert Bulwer-lytton，” in *The New Volumes of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 6，ed. Sir Donald Wallace，Arthur Hadley，and Hugh Chisholm（London and Edinburgh：Adam and Charles Black，1902），386-88，386. 关于弗拉基米尔大公随意违反武器协议，见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d’Uzès，*Souvenirs 1847-1933*（Paris：Lacurne，2011），88。

[57] EG，标记为“一位（罗贝尔）”的日记（括号里的名字是用她的速记手法写

的），署期为“迪耶普，1891年9月1日”；这里的“罗贝尔”显然是LL而非RM，因为她与后一位罗贝尔的关系——这对RM也非同寻常——完全没有挣扎、困惑和“力比多”。

[58] GBB致EG，AP（II）/101/152中同一本红色小笔记本中的未署期日记。

[59] Anne de Cossé-Brissac，*La Comtesse Greffulhe*（Paris：Perrin，1991），135-36.

[60] E. Neill Raymond，*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302.

[61] 在EG的档案中，这篇文本和《玛拉》中的好几首诗一起，都没有和她与LL的通信归档在同一个纸箱里，而是放在一个收集很多她认识的人献给她的“敬辞和赏识”的纸箱里（与另行归档的陌生人的敬辞和赏识分开）。LL在布德朗森林的信纸上为她所作的无题诗开头写着“Ô*des instants d’amour l’ineffable délire*”；存档于AP（II）/101/1。《利顿勋爵的绝笔诗》在他死后由贝蒂和伊迪斯·布尔沃-利顿加入《玛拉》的结尾部分，197-202。

[62] A.B.（pseud.），“Marah，” *National Review* 19（March-August 1892）：200-11，203.

[63] OM，《利顿勋爵的绝笔诗》，见*Marah*，197-98。

第21章 后备情郎

利顿勋爵留下遗嘱，在他死后把一个包裹寄给人在巴黎的伊丽莎白。伊迪丝·布尔沃-利顿执行了他的遗嘱，证明了她对丈夫的诚实和爱。除了一沓信件和他在写作《玛拉》期间专为伊丽莎白而作的诗歌（《为格雷弗耶伯爵夫人而作并献给她的诗》）之外，包裹中还有一颗很大的宝石，上面镌刻着难以辨认的神秘符号。她一直保留着它，直到一位占卜师说那颗宝石是受到诅咒的，任何拥有它的人都会因此而死，包括利顿勋爵。得知此事，伊丽莎白把它抛入了塞纳河。[1]孟德斯鸠后来说，从宝石落在水中的那一刻起，巴黎的河水就再也无法饮用了。

伊丽莎白确实保留了利顿勋爵的诗歌和信件。但她自己的文字中丝毫没有显出曾为他的死黯然神伤；她只不过失去了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她一如既往、不由自主地想念的人还是乔万尼。利顿勋爵在巴黎的葬礼过后一周，她写道："他的爱毫无保留，让我理解了自己的爱——我的爱被窒息却仍未死灭，用一首感性的田园诗转移了注意力。那个真正拥有我全部身心的情人，仍然被动地与我保持着距离。"[2]

心情好的时候，伊丽莎白试图把乔万尼的疏远归咎于外部条件。他们一同前往拜罗伊特的旅行虽没有如她所愿，但她仍然期待着有机会事后与他重新联系，摆脱他们的旅伴，在巴黎或迪耶普单独见面。但他们一回到法国，乔万尼母亲寄来的一封快讯就把他急召回了罗马，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家族财务窘况的谣言终于发展成一桩人尽皆知的丑闻。[3]8月，博尔盖塞家族开始变卖资产，整个过程艰难而漫长，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在巴黎，幸灾乐祸向来是名人崇拜的孪生恶魔，上流社会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亲王们屈辱地跌下神坛，连最微末的细节也不放过。（一个特别尴尬的报道是，博尔盖塞家把一幅拉斐尔的肖像画卖给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但事实证明那幅画是赝品。[4]）读到

这些报道，伊丽莎白几乎坚信乔万尼对钱财的忧虑才是一直以来横亘在两人之间的真正障碍，只要这个麻烦一解决，他一定会赶回巴黎找她。她充满乐观地写信给吉吉说：“等G.回来了，好事一定会发生的！”[5]

然而看到与她夺爱的情敌似乎一夜之间多了起来，伊丽莎白的好心情就更难维持了。拿罗贝尔舅舅来说，在几人一同前往拜罗伊特旅行期间，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乔万尼了，热热·普里莫利的照片就是证据：每张照片都能看见这两个男人在一起。此外，她的堂妹，如今22岁自称“艾丽斯”的玛丽-艾丽斯·德·卡拉曼-希迈，不知何时也开始背着伊丽莎白与乔万尼通信，或许是在她为数不多地几次到访德·阿斯托格街期间见到他之后吧。艾丽斯与寡母住在外省，由于没有嫁妆，看似注定一生恨嫁、孤独终老，近年她曾含糊其词地写信给伊丽莎白，说起无法实现对爱情的渴望，挣扎着“不再祈求生命中最想拥有的东西”。[6]伊丽莎白一直以为艾丽斯是笼统地谈及结婚的渴望。但吉吉从米奈那里听说后传给伊丽莎白说，艾丽斯正在与乔万尼联系，这个消息让她不得不以不同的、更加不安的眼光看待自己这段禁恋。伊丽莎白不打算让事态继续下去。她要开始给堂妹灌输乔万尼“名下分文也无”，因为单是这一事实，他和艾丽斯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未来。[7]尽管如此，要把艾丽斯看成与自己争夺白马王子的情敌，仍然令伊丽莎白很不愉快。

然而更让她惊骇的是飞短流长，谣言四起，说博尔盖塞家族正在设法撮合他们那位逍遥派的单身子弟迎娶美国女继承人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Gertrude Vanderbilt）。伊丽莎白一向鄙视“美元公主”，虽然她自己家里如今就有这么一位——一年前，她哥哥约·卡拉曼-希迈娶了密歇根钢铁和木材大亨的女儿克拉拉·沃德（Clara Ward）。约的新娘说话高声大嗓、穿衣品位极差，还浓脂厚粉，俗艳不堪。但最让伊丽莎白感到厌烦的是，克拉拉不仅觉得自己是个大美女，还设法吸引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目光，并公然与他红杏出墙。伊丽莎白一想到乔万尼落

入这么一个“野蛮人”（她在背后这么称呼克拉拉，还说她“非我族类”，她的“卡拉曼-希迈亲王夫人做不了太久”！[8]）手中，就怒不可遏。如果比利时人的国王都能看上她嫂子那么平庸的美国荡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了。

对这样的前景思前想后让伊丽莎白很沮丧，觉得乔万尼不大可能心甘情愿地回到她身边来了。她又仔细寻味了一下他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冷漠行为。在写给吉吉那封快活的信短短几周后，伊丽莎白写道：“他对我视而不见，我在他眼里是一段真空”，以及“对爱我的人，爱我本身就足够让我讨厌他了，而你，我爱的你，却对我拒而远之。我的吻会让你反感”。[9]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在呼应比才的《卡门》（如果你不爱我，我就爱你）。比才不是伊丽莎白最爱的音乐家，但她有时也把他的歌剧选段写入她在德·阿斯托格街举办的演奏会的节目单中。

然而要说任何人只要爱她就会让她讨厌，也并不完全属实。如今利顿勋爵已死，而德国皇帝之母的巴黎之行结束后，她向德国皇帝示好也告一段落了，伊丽莎白没有什么风流计划让她专注，变得无所事事。不知是为了激起乔万尼的强烈反应，还是单纯地为了抚慰自己受伤的自尊，她进入了一个极为活跃地卖弄风情的时期，只要见到新的崇拜者，就立即将其招募在石榴裙下。她的目标中至少有一位，诗人亨利·德·雷尼埃，看到她贪婪的目光而迟疑了，阻止了她投怀送抱。他写道：“她不安分的凝视看上去就像一只猛禽。”[10]但伊丽莎白还是有不少送上门来的猎物，如此一来，她门下的侍臣就像她衣橱里的衣物（或《玛拉》中描述的情感）一样又多又杂了。

她的新献身者之一，肖像画家保罗·塞萨尔·赫勒鲁（Paul César Helleu），是1889年夏天她和孟德斯鸠邀请来参加她在迪耶普举办的首次乡村聚会的宾客。自那以后，伊丽莎白一直在培养赫勒鲁。他骄傲的矜持近乎傲慢（她觉得对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小资产阶级而言，这是非

常引人注目的品质）和对女性身体毫无保留的尊崇吸引了她。正如一位当代评论家谈到他时所说，“对赫勒鲁来说，女孩的面部轮廓和女人的肩部线条……都必须认真对待，仔细研究”。[11]伊丽莎白认为，赫勒鲁是唯一一位不但能够捕捉而且发自内心地欣赏她“天鹅般的”优雅体态的人。

为了考验画家的爱慕，她邀请他到布德朗森林度周末，届时她将独自一人在那里；她打算让他住在庄园里的“桦木屋”，就是亨利在他和伊丽莎白蜜月期间与“美女波利娜”幽会的那所房舍。赫勒鲁此行对外宣称的目的是要在几天的闲暇时间里，请伊丽莎白在室内外摆出多种姿态，为她画素描。但她在日记中透露，她真正要做的是以此为诱饵，与一位英俊且（她以为）爱她的艺术天才一起挑战得体男女关系的极限。亨利当然不会容忍此事，于是她对丈夫隐瞒了画家来访之事，这也表明她知道自己行走在危险地带，她要的或许不是又一大摞画像那么简单。

那些赫勒鲁倒是做到了，他在来访的短短几天内创作了惊人的数量：总共一百来张素描。但伊丽莎白在日记中写到那个周末时，却只字未提那些作品。相反，她滔滔不绝地写“美人”与艺术家共进晚餐有多么兴奋……“就我们俩！！！！仿佛置身于林深之处！！！”他们的谈话总是“回到那个不可避免的话题：爱”！！！[12]伊丽莎白在日记中记录那些独处时光时，仿佛没有注意到是她自己反反复复地把话题朝那个方向引去。例如在一天深夜摆姿势画像时，她假装相信“艺术家……在美面前”保持超脱，“如大理石一般冷漠”；这是赫勒鲁的无声抗议，“事实恰恰相反”！！！！[13]另一次请艺术家画像时，她问他是否把她的任何画像拿给他结婚五年的妻子艾丽斯看过，那位性感的红发女子是他最喜欢的模特。赫勒鲁回答是的，还引用妻子的话恭维“美人”说，“这些看起来很像我们刚结婚时你给我画的那些画像”。伊丽莎白从此推断出，艺术家多么希望他娶的是“美人”。



保罗·塞萨尔·赫勒鲁给伊丽莎白画的素描和画像超过了其他任何肖像画家。她的提携让他成为备受追捧的艺术家。多年后，他为纽约市的大中央总站绘制了屋顶壁画

和往常一样，伊丽莎白在这些对话中追求的似乎是爱慕而不是激情，不知是出于职业的礼貌还是性情的文雅，赫勒鲁很合作，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即便当她试图抱着最新的宠物（一只听从罗贝尔舅舅的建议购买的白色孔雀）摆姿势却遭遇了顽固抵抗，弄得鼻青脸肿时，赫勒鲁仍然安慰她说："你那个样子看起来很美。"[14]在两人独处时，他从未有过任何乘人之危的非分之举。伊丽莎白关于那个周末的日记中没有说赫勒鲁的保守令她失望；相反，那些是她写过的最轻佻的几页日记。

与赫勒鲁的越轨行为的确引发了一个不愉快的后果。亨利以后不久就发现了，他暴跳如雷，坚信她一定以某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委身于画家了。那些素描画对伊丽莎白那个周末的经历或许无关紧要，但亨利却把

它们当成炮轰她和赫勒鲁的确凿证据。艺术家的确在画作中给她天鹅般的体态中加入了一丝性感；在亨利看来，最终的成像显示出一种亲密得近乎淫荡的视角，无疑证明了赫勒鲁与贝贝斯有过暧昧。亨利震怒，简直要与艺术家来一场决斗，只不过他最终觉得自己身为格雷弗耶伯爵，把这么一个农奴视为情敌实在是自贬身份。据孟德斯鸠说，“大榆木脑袋”以毁掉赫勒鲁的大量素描作为报复，但有些素描还是逃过了他的魔爪。

亨利对这一事件的怒火并没有阻止伊丽莎白继续寻找其他追求者，甚至在他的眼皮底下也毫无忌惮。赫勒鲁来访几个月之后，她又和丈夫的一位好友、阿尔贝·德·曼伯爵开始了一段任性的逢场作戏，她同样邀请他来到布德朗森林。这次倒不是她诱骗赫勒鲁的那种私密接触。亨利和“发起人”全都在，德·曼到来的官方理由是同他们一起打猎。但打猎结束后，他私下里写信给伊丽莎白表达了对“我们共度这三天美好时光的无限感激”，还说“谢谢你为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15]

这最后一个代词所隐含的亲密似乎是纯感情的，这正是伊丽莎白喜爱的方式。德·曼之所以愿意规规矩矩，大概与他一贯声称自己是个宗教狂有关，他在抵挡洛尔·德·舍维涅更粗俗的攻势时也援引了同样的信条。作为一个虔诚的已婚天主教徒，德·曼对伊丽莎白说，他只允许自己“以最为温柔的尊重”来觊觎邻人的妻子；任何其他感情“都是可怕的渎圣行为”！[16]

说到写信的狂热，就连口吐莲花的德·曼也不是阿尔贝·德·罗沙上校（Colonel Albert de Rochas）的对手，这位头发灰白的退伍军官当时的第二职业是超自然心理学家。[17]在伊丽莎白这一时期的追求者中，罗沙是最多产的通信人，用他夸张的情书对她狂轰滥炸长达五年多。伊丽莎白最初去找他大概是在1892年3月父亲去世之后，希望罗沙能帮助她联系到去世后的父母。他迎合她，希望她能爱上自己。最终两人都非常

失望，只不过伊丽莎白的确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轮回、升空、通灵和遥感的知识。罗沙关于控驭心灵和“外部化情感”的理论启迪了她，让她觉得自己的美本身也是一种超自然力。

伊丽莎白新一轮追求者中的最后两位都叫“保罗”，是两个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男人。两位都只比她大几岁——她已人老珠黄，这么换换口味很不错——也都是各自选择的领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第一位是保罗·德夏内尔（1855—1922），就是曾经向博尼·德·卡斯特兰询问服装裁剪建议的那位共和派代表。德夏内尔自从发现了沙尔韦，就成了政府中最时髦的人之一。他也是最有领袖魅力和影响力的政府成员，鼓舞人心的演讲天赋使他成为进步左派对阿尔贝·德·曼的有力回应。伊丽莎白初识他还是在德夏内尔与亨利在下议院共事期间，亨利在下议院的事业遭遇挫败，但德夏内尔的政治前途却一片大好。他将在40岁之前多次赢得国民议会主席职位（相当于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长），1920年，他将成为共和国总统。如果伊丽莎白要寻找她那一代人中最有可能成功的政治家，德夏内尔是当之无愧的人选。

事实上，虽然她始终同情君主主义，对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充满厌恶，但她一直想在共和派阵营中寻找这么一位同盟。自亨利1889年皈依共和派以来，政治风向就开始朝那个方向转变了，如果他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彻底地妥协，这种转变当会对他的政治事业有利。过去几年，君主主义一派继续失势，随着复辟希望彻底破灭，在流放中黯然神伤的巴黎伯爵也没有为复燃那些希望做出任何努力。1892年2月，教宗良十三世对奥尔良派发起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号召全体法国天主教徒搁置政治分歧，“团结”在第三共和国旗下。（那以前，梵蒂冈官方一直谴责法国的世俗主义政权，支持法国右翼分子以宗教为由反对政府。）阿尔贝·德·曼自称一生捍卫天主教，除了服从教宗的意志并鼓励同事们效法外，别无选择。有些死忠宁愿彻底远离政治，布勒特伊就是一例，但他们的退场只能进一步巩固敌人的胜利。伊丽莎白意识到共和派胜利了，

便选择与胜利者站在一起，正如洛尔·德·舍维涅在尚博尔伯爵去世后便与奥尔良派为伍一样。在证明了自己持之以恒地赞助艺术和科学的巾帼气概之后，伊丽莎白还想把势力范围延伸到政治领域，德内夏尔显然是一位出色的统筹人，与她身败名裂的丈夫不同。在他和另一位年轻的左翼土耳其人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的协助下，伊丽莎白将成功地把自己重新塑造成在共和国政府高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她那个阶层的许多女人能够（或愿意）取得的成就——费利西泰一如既往地大惊失色——伊丽莎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德内夏尔功不可没。



阿尔贝·德·罗沙是军官转行的超自然现象专家，他关于超自然的研究让伊丽莎白很感兴趣。这幅插图选自他关于催眠的著作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德内夏尔的政治支持或许还不是让伊丽莎白动心征服他的理由。他英俊的外表、老道的着装风格和魅力十足的个性一目了然，使她毫无难度地加入了他蒸蒸日上的爱情事业。她还对他的写

作成就很感兴趣，特别是他关于旧制度下沙龙女主人的专著——《女性人物》（*Figures de femmes*，1889），世纪末出版了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这是其中的一本。伊丽莎白既是塔利安夫人的后代，本人也是很有声望的沙龙女主人，因而对德内夏尔的研究很感兴趣。她尤其喜欢他对雷加米埃夫人的形容——“那个举世公认且被全欧洲的精英膜拜的美人……让所有的男人心醉神迷，因为谁也不能说自己占有了她。”[18]事实上，德内夏尔的书或许是伊丽莎白在1891年莱昂舞会上的雷加米埃夫人造型的灵感来源之一。



伊丽莎白虽然在政治上持精英主义观念，但她在**1890**年代培养了许多共和派领导人

朋友，其中包括很有领袖魅力且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统的保罗·德内夏尔

伊丽莎白对这位端庄的冷美人的认同并没有阻止她继续撩拨德内夏尔，给他一些爱情的希望。他在1890年代早期到中期写给她的信中提到过两人几次私下接触。“我想以无限的诚意对您说，”一年冬天，他在写给住在布德朗森林的她的信中说，“那些（最近在那里）与您独处的时光，是自我们在迪耶普的那些早晨一起散步以来，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19]与洛尔·德·舍维涅不同，伊丽莎白不习惯摆脱监护仆人独自外出。因此，她与德内夏尔独自散步想必对她来说是重大事件，需要特别的规划，我们有理由认为那是为了什么特殊目的。作为她选择一同散步的同伴，德内夏尔应该有理由认为对她的追求不会无功而返。

然而伊丽莎白虽然表现出愿意为他而通融，德内夏尔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激动人心的独处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在研究雷加米埃夫人的著作中写道：

> 必须承认，她有一种特别残忍的“善”。……她对爱来者不拒，却缺乏对爱她之人的同情；她在一种最奇怪的交际中付出精神而非肉体，在那样的交际中，最优雅的卖弄风情假冒成了贤良淑德。[20]

伊丽莎白对自己的雷加米埃人格十分得意，但德内夏尔了解那种模式，意识到它将给她的情郎带来无尽折磨。他发现“付出精神而非肉体”也是伊丽莎白的惯用伎俩之后，并没有与她争吵——此人野心勃勃，不会低估她的资助对他有多重要——但写给她的情书不似以往那般狂热了。

伊丽莎白对真爱的抽象观念在另一位保罗那里得到了更为赏识的回应，此人就是在她的情感双重生活中地位格外突出的著名作家保罗·艾尔维厄（1857—1915）。[21]艾尔维厄来自讷伊（Neuilly）的一个富裕

家庭，担任过外交随员，有着他在小说和戏剧中所写的上流社会的优雅举止和孤傲态度。他为人极其冷漠拘谨，以至于有一位常和他一同光临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沙龙的人说他“那撇小胡子的两角挂着极小的冰柱”[22]；另一位忠实信徒猜想他大概是硬纸板做成的。[23]但艾尔维厄用矜持掩盖了自己贪婪的野心，正是那样的野心，让他在相对年轻的43岁就入选了法兰西学术院。他在1887—1888年冬天初次接触伊丽莎白是为了替波托-里什那些没有署名的情书担当抄写员，那时艾尔维厄还在努力立足于文学界，他的天赋只受到了内行的赏识，还没有为大众所知。几年后，他成了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所写的关于当代城区的辛辣风俗喜剧备受赞誉。就在那段时间，艾尔维厄从波托-里什追求伊丽莎白过程中的隐形中间人变成了一个追求者，看似势在必得。

1888年春，艾尔维厄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给伊丽莎白写信，正好是波托-里什担心被出卖而免去了他中间人义务的那段时间，可见波托并非杞人忧天。艾尔维厄起初对伊丽莎白示好的手段不是信件，而是各种经典作家关于一见误终身、为爱情痴狂的格言混搭——狄德罗和济慈、卢梭和歌德、雪莱和缪塞。像波托-里什的情诗一样，这些文字也符合伊丽莎白的文学倾向，满足了她对童话爱情的渴望。但波托-里什的情诗到那年春天已经变得充满愠怒和纠缠，而艾尔维厄的格言混搭却只用最崇高的话语说出自己的爱。随着波托-里什的辞令变得越来越暴躁，艾尔维厄知己知彼，在伊丽莎白面前表现为一个恭敬有礼的情人，崇拜、顺从，只求爱与奉献。在极少数的一次自己写诗的尝试中，艾尔维厄将自己“忍耐而顺从的心”献给伊丽莎白，那颗“心里只有你”和“无尽的爱”。[24]



在抄写波托-里什写给伊丽莎白的情诗期间，艾尔维厄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给她写激情四溢的情书

这是伊丽莎白希望每一个男人对她说话时的口气；完美地符合她近十年来一直宣扬的贞洁的精神之爱的理想，只是成功率低得可悲。她的某些崇拜者一开始会在口头上同意她的柏拉图之恋的信念，但早晚都会厌倦那一切。一旦厌倦了，他们就会尽情释放自己的苦痛、愤怒、玷污的渴望和要求；他们折磨和纠缠伊丽莎白，直到她一见到他们就充满厌恶。但艾尔维厄不是这样。他那撇胡子上那些隐喻的冰柱表明，此人有一定的自律，这让他成为她的新白马王子的一个极佳人选。

她崇尚贞洁的雷加米埃姿态很可能也在艾尔维厄那里引起了共鸣。他终身未娶，不过后来他又与另一位社交名媛艾默里-哈蒂（玛格丽特）·德·皮埃尔堡［Aimery-Harty（Marguerite）de Pierrebourg］男爵夫人建立了一段公开的长期关系。[25]德·皮埃尔堡夫人在1890年代为了他而离开丈夫，但她和艾尔维厄从未同居。文学或许是他们结合的主要黏合剂，因为她也是一位作家，以看不出性别的“克劳德·费瓦尔”为笔名出版了不少很受欢迎的小说。据1910年娶了德·皮埃尔堡夫人之女的乔治·德·洛里说，他的岳母与艾尔维厄觉得自己就是当代版的乔治·桑与阿尔弗雷德·德·缪塞——那对天才的模式正是伊丽莎白在与乔万尼和波托-里什两人的关系中寻求的样板。

此刻在伊丽莎白看来，同样的模式也成为她与艾尔维厄建立友谊的可能样板，而他陷入同样情境的两位前任对此却一无所知。乔万尼和波托-里什都不知道她与艾尔维尔的秘密交往（不过波托-里什在1888年春就有所察觉，从那以后就不再视他为朋友了）。因此，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以关于上流社交界的作品轰动一时的艾尔维尔，尤其擅长写书信体小说的艾尔维尔，曾经为她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如果做不成情人，他们起码可以在艺术上惺惺相惜。这位著名的青年小说家努力又听话、痴迷又冷血，将超越讳莫如深的意大利亲王和喜怒无常的犹太诗人，成为出色地帮助她讲述自己故事的重要人物。[26]或许终有一日——如果她在那个世纪结束之前真的希望他扮演这一角色——他还会成为伊丽莎白的合作者，与她一起书写她的梦境。

---

[1] EdG在日志中复述了这个故事，见1895年8月15日的日记。

[2] 1891年12月6日EG写给自己的短笺。该短笺开头写道：“他的爱毫无保留，让我理解了……”。在这篇文本中，“情人”二字是EG用自己的速写密码写的，其他文字则是用法文写的。AP（II）/101/149.

[3] 关于博尔盖塞家的破产丑闻和一连串资产变卖，见Elliot，*Roman Gossip*，

117；Chilvers，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90；and Guimard，“Les Borghèse，”1-2。

[4] 当博尔盖塞那年十月把切萨雷·波吉亚的肖像画卖给罗斯柴尔德时，该交易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因为它被认为是“拉斐尔最精美的画作之一”，“自问世以来便一直是博尔盖塞家艺术收藏的传家宝”；见“Rothschild Buys a Raphael，”*Chicago Tribune*（October 4，1891）：2。一个月后被发现为赝品，当初围绕着这宗买卖的高调宣传加重了该家族的难堪。

[5] EG致GCC，存档于AP（II）/101/151。关于博尔盖塞/范德比尔特订婚的传闻，感谢我的好友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回答了我就此话题的一通打听。

[6] 1893年2月26日MACC致EG，存档于AP（II）/101/53。又见同一卷宗，1889年7月14日、1892年7月6日和1893年4月7日MACC致EG的信。

[7] 1894年7月MACC致GCC的信，存档于AP（II）/101/53。

[8] EG，1890年9月的笔记，存档于AP（II）/101/26。

[9] EG，手写笔记，页面顶端的标记为“*Mort atroce celle des cœurs*”，底端页码为“[18]92”，存档于AP（II）/101/149。

[10] HR，*Les Cahiers*，378. HR感觉EG以一种心照不宣的色情目光看着他，仿佛看着一只猎物，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MP的先例，他的叙述者在初次见到德·盖尔芒特夫人时，有那么短暂的一刻觉得她的眼睛里含着一种性暗示或兴趣。MP，CCS，175. 关于MP小说的这个场景中公爵夫人释放的“温柔而放荡的”诱惑，又见Beckett，op. cit。

[11] Perriton Maxwell，“Helleu and His Art，”*The Cosmopolitan*，43（May-October 1907）：119-27，120.

[12] EG，存档于AP（II）/101/150。

[13] EG，存档于AP（II）/101/150。

[14] HR，*Les Cahiers*，378.

[15] 1892年阿尔贝·德·曼伯爵致EG的未签名的信，存档于AP/101/150。

[16] 1893年10月阿尔贝·德·曼伯爵致EG的未签名的信（开头一行是“*Je n’ai pu vous dire merci*！”），存档于AP/101/150。

[17] Rochas与EG的友谊始于1892年，其后好几年他似乎屡次乞求她做自己的情妇，但都没有成功。1896年1月13日，他写信给她，说她“让我的生活变得不可忍受”，因为她“对我采取了一种怠惰和沉默的策略，比任何对待外交对手的手段都更加残忍。……你的手段让我受尽凌辱、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当我把生命的一切能量、心灵的一切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你让我如何‘保持优雅’；现在我发现，哦，绝望地发现，我为她的圣坛献上滚烫的生命的女神居然在嘲笑我的天真和我老派的感伤，把我的爱当成发疯！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有可能‘保持优雅’吗”？EG在这封信的背面标注道：“我受够了这样的絮叨”；见AP（II）/101/109。

[18] 保罗·德夏内尔，*Figures de femmes*（Paris：Calmann-Lévy，1889），266 and 268。

[19] 1895年12月30日（？）保罗·德夏内尔致EG的信，存档于AP/101（II）/79。

[20] 德夏内尔，*Figures de femmes*，309-10。

[21] 艾尔维厄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1和AP（II）/101/88。关于艾尔维厄的外交背景和优雅做派，见LG，*Mémoires*，vol. 1，205-7；and FG，*Mon amitié*，40。关于艾尔维厄生硬冷漠的态度，见HR，*Les Cahiers*，200，478。

[22] FG，*L’Âge d’or*，263.

[23] LD，Souvenirs littéraires，169；and LD，Au Temps de Judas（Paris：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1920），76. 关于艾尔维厄作为“社交界小说家”的成功，见Henri Lavedan，“Paul Hervieu，” *Le Figaro*（September 26，1895）：1。

[24] 1888年4月10日艾尔维厄致EG的信，存档于AP（II）/101/1。

[25] 德·皮埃尔堡夫人以“克劳德·费瓦尔”的笔名写作，于1903年获得了法兰西学术院的蒙提昂奖金（Prix Montyon），又于1934年获得了该机构的最高奖项学术院奖（Prix Académie）。见http：//www.academie-francaise.fr/claude-ferval。关于她和艾尔维厄自认为是乔治·桑和缪塞，见AdF，*Cinquante ans de panache*，61。关于皮埃尔堡/艾尔维厄的情人关系，又见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04。

[26] 艾尔维厄或许不像他在EG面前表现得那么顺从和无性。这段时间前后，文

学界传言说，艾尔维厄与圈外一位女人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让他有了自杀的倾向；见Louis Auchincloss，*The Man Behind the Book*（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6），125。

第22章 女神与恶魔

1892年春，普鲁斯特与热纳维耶芙有过一次接触，证实了他最糟糕的怀疑：她是个没有灵魂的人。普鲁斯特用了近30年时间才把心中的不满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把那次决定命运的经历写成了《盖尔芒特家那边》（1920—1921）的最后一个场景，赤裸裸地表现了痴迷于外表的社交界内心是多么空洞。《追忆似水年华》的这一卷问世之前，普鲁斯特曾提醒斯特劳斯夫人，说他“把红鞋子写入了”自己的故事，“但没有提您的名字”。[1]普鲁斯特隐去了斯特劳斯夫人的名字显然是对她表达的善意，因为这段小插曲揭露了书中这对贵族式优雅的典范——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丈夫——是怎样肤浅而自私的可怕之人。

由于普鲁斯特在其他任何语境中都没有提到过“红鞋子”事件的原委，要想知道他在半生之前到底见到斯特劳斯夫人做了什么，《盖尔芒特家那边》中复述的版本就成了唯一的信息源。在小说中，犹太人交际家夏尔·斯万（热纳维耶芙看出了他与骑师俱乐部那位犹太人的相似之处，遂改叫他“斯万-阿斯”[2]）出现在巴黎的盖尔芒特府上，但事不凑巧，公爵和夫人正赶着要出门，去蒙索公园附近的一个朋友家参加化装舞会。一贯逢聚会必到的斯万这次一反常态，居然没打算跟他们一起出席；他解释说医生刚刚说他得了绝症，最多只能活三四个月了。作为他认识最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公爵夫人听到这个消息本该十分难过，但她和公爵二人急着去参加舞会，便假装把斯万的话当成玩笑——如果他在开玩笑，他们也就没有义务继续与他交谈了。斯万再次表现出与个性不符的异常，不打算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他用挖苦的口气答道：“那这个玩笑就开得太有意思了。”[3]普鲁斯特在这里把上流社交界的两大主要内容——玩笑和趣味，与人之将死的悲怆对立起来，强调了礼仪的空洞和轻浮。

正是以礼仪的名义，德·盖尔芒特公爵匆匆打断谈话，指出如果他和妻子再耽搁下去，他们就要迟到了——这是不可原谅的社交失礼。但就在那时，他注意到公爵夫人穿了一双黑鞋配红裙，他觉得这样的搭配丑陋不堪，对妻子大吼起来，让她立刻回屋去换一双红鞋子。她焦虑地柔声提醒公爵，他刚刚还对阿斯说他们要迟到了。“还来得及，”公爵泰然自若地反驳道，“到蒙索公园用不着十分钟。”[4]公爵夫人无话可说，只好服从丈夫的命令，表现出她虽然腾不出一分钟安慰将死的朋友，却“还来得及”调整自己的装束。外表的优雅再次超越了人类最为迫切的生死大事。

据传记作家乔治·佩因特说，让普鲁斯特受到启发写下这段插曲的真实故事发生在他二十岁出头，去夹层公寓接斯特劳斯夫妇一起去附近参加舞会的时候，同去的还有一大群忠实信徒。斯特劳斯夫人穿着红裙子、黑鞋子下了楼，登上普鲁斯特等候的马车，但一贯以无可指责的穿衣品位而自豪的斯特劳斯一看到这样难看的颜色搭配就大发雷霆。佩因特写道，因此“和公爵夫人一样，斯特劳斯夫人也被愤怒的丈夫逼着换”双红色的鞋子，就让“普鲁斯特本人……上楼去（为她）取下来”。[5]佩因特没有说明斯特劳斯夫妇要去参加什么活动，也没有提到如果真有其事的话，是哪一位同伴试图在那时向他们透露自己得了绝症。

不过热纳维耶芙的红裙子倒可以帮我们精准定位那次活动，因为红色与她平常的半丧服色调极不协调，只有一份文件记录表明她穿着那个颜色参与了某个场合。那是3月2日，她和斯特劳斯与普鲁斯特、冈德拉、雅克·布朗什和爱德华·德太耶一起去玛德琳·勒梅尔位于蒙索公园附近的宅邸参加化装舞会。由于那场舞会的主题是“纸张”，热纳维耶芙就穿成了扑克牌中红桃王后的样子；《高卢人报》记录她的着装是一件红色丝缎舞会礼服和一顶红黑色的“鲁本斯帽”。热纳维耶芙刚刚有过两次婚外恋，故意穿成这样大概是想用俏皮的方式平息丑闻的余波。她打扮

成红桃王后，既正面承认了自己“男人杀手”的名声，又以她著名的满不在乎的机智将其轻描淡写，一笑而过。

报界没有提到她丈夫或普鲁斯特的晚会服装，却报道了雅克·布朗什戴一顶硬纸板做成的巨大天鹅头，打扮成《罗恩格林》的剧中人。更遗憾的是，关于勒梅尔舞会的公开或私下报道中，没有一处提到斯特劳斯夫妇的随从里有一位成员将命不久长，虽然人们第一个会想到斯万的分身阿斯，但他直到1902年才去世。但热纳维耶芙有一位最忠实的老朋友，作曲家埃内斯特·吉罗，确实在舞会后仅仅两个月就去世了，享年55岁。[6]因此毫无疑问，吉罗在勒梅尔舞会的当晚出现在夹层公寓，透露了与斯万类似的消息。想想普鲁斯特关于热纳维耶芙对他人“漠不关心”的理论——或者达尼埃尔·阿莱维说她“如魔鬼一般任性，又如玩偶一般轻率”——那么如果吉罗确实对她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她很有可能像未来的德·盖尔芒特夫人那样轻率作答。无论当晚发生了什么，它在普鲁斯特心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促使他对斯特劳斯夫人的幻想破灭，加速了他寻找新的社交名媛典范的行动。

普鲁斯特本人也受邀参加了“纸张”舞会，表明他在成为时髦社交家的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因为玛德琳·勒梅尔的友谊本身就是在上流社会享有声望的标志，为他在社交界扶摇直上铺平了道路。城区的内行们都把勒梅尔浮夸虚饰的美学作为画家式优雅的权威。据莉莉·德·格拉蒙说，“每一位（贵）夫人都有一把用勒梅尔（夫人）的水彩画装饰的扇子”，一般是她标志性的花朵主题之一，而勒梅尔的素描则被用作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保罗·艾尔维厄和已故的利顿勋爵等社交界名声大震的作家们珍藏版书籍的插图。勒梅尔夫人这位富有、聪明、喜好交际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艺术成就变成了在上流社交界获得一席之地的资本，与斯特劳斯夫人不相上下。她每周二在位于蒙索街的玻璃屋顶画室里举办的招待会也吸引了同样混杂的人群，而且请来的宾客往往正是前往热纳维耶芙奥斯曼大道的周日招待会的那群人，从小仲马到玛蒂尔德

公主，从德·奥松维尔到雷雅纳。[7]



随着他对斯特劳斯夫人的幻想破灭，普鲁斯特开始依靠其他社交老手引领他进入社交界，包括人脉深广的画家和沙龙女主人玛德琳·勒梅尔

这样的人员重叠导致两位女主人之间明争暗斗，暗地里都从彼此的沙龙里挖墙脚。正因为此，普鲁斯特才被拉入了勒梅尔夫人星光灿烂的圈子。两人初次在夹层公寓邂逅时，他20岁，她47岁，画家一下子就被普鲁斯特过人的才华和顽皮的幽默感吸引了，称他是自己“漂亮的小仆人”。[8]这个绰号听起来有些居高临下，却暴露了她对他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让普鲁斯特深觉温柔可亲。与至今视他为讨厌的平庸之辈的斯特

劳斯夫人不同，勒梅尔夫人对这位有趣的新客人笑脸相迎，这让他很感激。她不仅欢迎普鲁斯特光临她每周一次的沙龙，还邀请他参加自己有时在画室后面的丁香花园里举办的大型聚会。她在3月2日举办的晚会就是贵族阶层与波希米亚人融合的欢宴，其盛大隆重是普鲁斯特在夹层公寓未曾见过的，或许算是他有生以来参加过的第一次真正的“社交”活动。那天，以及在勒梅尔后来的聚会上，普鲁斯特结交了几位名流，他们成了他探索上层的新向导。



玛德琳·勒梅尔，《艺术家画室里的优雅茶会》（***An Elegant Tea-Party in the Artist's Studio*，1891**）：最右的勒梅尔夫人结交了热纳维耶芙的许多侍从，包括艾尔维厄（最左侧面坐着的那位）、路易·冈德拉（左边站着三人的中间那位）以及莫泊桑（站在中间、留八字胡的那位）

事实上随着普鲁斯特日益深入了解社交界，他越发知道斯特劳斯夫人在那个圈子里的地位并不高。毕竟如费尔南·格雷格提到她时所说，“这个妩媚的女人可不是天生的名媛”，而在某些更为保守的贵族看来，就连“热纳维耶芙最新”语录和她那个诱人的混杂沙龙，也无法弥补她平民犹太人出身的双重耻辱。[9]普鲁斯特也深为这两个劣势所拖累，因而斯特劳斯夫人的出身在他看来并非缺陷而是他学习的可靠先例。但他越来越疑心她的人品，也不再如以往那般依赖她进入社交界，他对她的社交地位开始有了更为冷静的看法。

例如，他注意到斯特劳斯夫人未能受邀参加1891年社交季最负盛名的聚会：德·莱昂亲王夫人的黑白舞会。这一铺张华丽的大型娱乐活动吸引了上层最显赫的贵宾，社交界报刊也进行了夸张的连篇报道。[10]关于这次舞会的报道令普鲁斯特如痴如醉，以至于他后来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反复提到它，连女主人的姓名都没有更换。[11]对他以及任何一直关注社交界风向的其他人来说，斯特劳斯夫人被排除在莱昂晚会之外，无疑标志着不管她如何声名远扬，有些大门永远不会对她开启。

普鲁斯特禁不住想到，与她相反，对其他上流社会名媛，似乎每一扇门都是开着的。拿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夫人来说吧。他初遇她要么是在勒梅尔夫人的化装舞会上，要么是在那以后不久，他甚至无须跟她说话，就能一眼看出她是贵族血统的化身。1892年春，普鲁斯特20岁，德·舍维涅夫人32岁。作为《高卢人报》的忠实读者，普鲁斯特知道德·舍维涅夫人是每一场顶级晚会的嘉宾，无论是萨冈夫人的“农民”嬉闹晚会还是德·莱昂夫人的著名舞会。在前者，她曾以一曲布列舞令现场观众眼前一亮，而在后者，她与一群年龄大她一倍的交际家演了一出喜剧小品。（洛尔参加这场表演是为了抓住这一时机调笑自己长相酷似普尔奇内拉一事。）最后，作为骑师俱乐部会员的妻子，德·舍维涅夫人还是隆尚的夫人看台的固定成员，那是如女王般高贵的一群人，斯特劳斯夫人只能以其他人的客人身份出现在那里，普鲁斯特肯定地意

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曾无意中听一位圈内亲王说，埃米尔·斯特劳斯是绝对不可能被骑师俱乐部批准入会的。[12]

德·舍维涅夫人吸引普鲁斯特的理由还不止这些。她丈夫那个封建气息十足的名字“阿代奥姆”就让他着迷，把它纳入自己收集的一长串“来自那么久远的往昔……的教名”中，它们一个个仿佛是被镌刻在“我们教堂的彩色玻璃”上的。他渴望进一步了解被伯爵夫人的魔力蛊惑的那些王公贵胄的隐秘藏身之地，不管是在弗罗斯多夫宫廷中统治的亨利五世，还是出入她巴黎封闭式沙龙的交际家们。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简约风格的时髦衣着和她在马背上超凡脱俗的优雅姿态。他对她的“豪迈气质”痴迷不已，那是两个极端的综合：一方面是她下巴略方的面部轮廓和走起路来的刚健活力，另一方面是她天使般的蓝眼睛、“金色的头发和天鹅样的脖颈”。[13]（普鲁斯特大概还注意到，在报道莱昂舞会时，至少一位记者把身穿黄蓝色丑角服饰的德·舍维涅夫人误认为一名男子。）就连她乡土气息的鼻音和粗俗下流的措辞在普鲁斯特看来也是加分项，觉得她简直就是“乡绅阶层时髦气度的最佳代表”。[14]拥有这些特质的德·舍维涅夫人成为斯特劳斯夫人永远无法匹及的贵族优雅的典范：是贵族血统的典范，她的出身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

普鲁斯特深受这位新缪斯的影响，开始用封建历史和皇家神话的棕褐色调重塑自己对上流社会魔力的观察。用传记作家克劳德·阿诺（Claude Arnaud）的话说，普鲁斯特关注“这座与（女人的）家族纹章有关的丰碑（她的家徽自1177年起就装饰着阿维尼翁的桥），就是提升自己，与最高贵的一群人为伍”，而幻想“一位在‘未来的’亨利五世宫廷里服侍的夫人沿用旧制度下凡尔赛宫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幻想他（普鲁斯特）正在（自己的头脑中）重建一座宫廷乃至一个王国”。[15]普鲁斯特向许多朋友透露了自己的新恋情，其中一位朋友，罗贝尔·德·比伊，肯定了它对未来小说家的创作观的巨大影响。据比伊说，“正是（A. 德·舍维涅）伯爵夫人，那位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的随从武官后裔的妻子，

首次启发马塞尔实现了记忆、形象和观念的古怪叠加，那些后来丰富了”他笔下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描述，“就像透过彩色玻璃窗射入的一缕阳光，像某种刻有家徽的装置，像彼特拉克笔下的人物”。[16]



德·莱昂夫人要求宾客只能穿黑白两色来参加她**1891**年的舞会，但洛尔（左图中间）却穿着黄蓝色的小丑服饰。她穿这套装束大概是为了俏皮地取笑自己长得像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鹰钩鼻平民普尔奇内拉（右）

比伊在此处提及意大利诗人当然恰如其分，鉴于德·舍维涅夫人是“美丽的洛尔”的后代——这一关系似乎能够证明普鲁斯特的迷恋具有特殊的艺术质感。他早就知道社交界看不起那些藏不住感情的人，但说到这位“骨感的、有家徽的”伯爵夫人，普鲁斯特就是情难自已。没过多久，他在上层的熟人们就开始窃笑：“普鲁斯特想说服洛尔·德·舍维涅相信，他就是她的彼特拉克！”[17]直到几十年后，他早已不再迷恋她时，还有人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1920年，普鲁斯特对一位朋友说，他发现自己在写到年轻时代那些社交界美人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像彼特拉克那样，反复用洛尔”来展现女性的完美。[18]

同样，也许并非只与女性有关，因为德·舍维涅夫人似乎不是她家中第一个促使普鲁斯特在文学上才思泉涌的人。在初见她一年多以前，普鲁斯特的一位大学同学把他介绍给了洛尔的姐姐瓦伦丁三个儿子中的幼子居斯塔夫·洛朗斯·德·瓦鲁（Gustave Laurens de Waru）。普鲁斯特和瓦鲁同岁，1890—1891年冬天两人都是19岁，但洛尔的外甥在普鲁斯特脑中却俨然是一位中世纪的十字军战士或游侠骑士，是古老的高贵种族的后代。让普鲁斯特如此浮想联翩的原因，大概是瓦鲁不仅是一位持剑贵族，还是著名的圣西尔军校的校友，尽管瓦鲁和他一样只是一位平庸的战士，毕业时在班里451名军官学员中排名第411位。

最令普鲁斯特着迷的是瓦鲁的贵族特点，不久他会在这个男孩的姨妈身上再次看到那些：碧眼金发、苗条健美的身材、突出的下巴和显眼却略带鹰钩的鼻子。普鲁斯特觉得这些古雅的面部特征让瓦鲁的气质如圭如璧，相比之下他自己着实平庸，或许只有最后一个例外还让他稍感宽慰。格雷格曾说普鲁斯特“过去常常抱怨自己鼻梁上高出的小小一块”，直到他看到瓦鲁脸上也有同样的缺点，才不再挂怀。[19]瓦鲁的鼻子有点像鸟喙，在普鲁斯特眼中那就是天生高贵血统的外在表现。格雷格写道，自从普鲁斯特确定了这一点，他就开始“撒娇地”关注自己鹰钩鼻的侧影，仿佛拥有了它，自己也获得了一点声称天生高贵的权利。[20]

为了讨好瓦鲁，普鲁斯特为他写了一首诗——一首不像出自普鲁斯特笔下的乏味而毫无创意的颂歌，献给一位没有具体指出性别的爱人，叙述者但愿能沉溺在此人那双“冷漠、倦怠、神秘的眸子”里。[21]这首诗发表在1891年2月的《月刊》（*Le Mensuel*）上，题献很清楚，但标题很模糊：“诗，献给居斯塔夫·L. 德·W.”。瓦鲁对普鲁斯特的感情一直亲切而暧昧，即便普鲁斯特为他写诗的大动作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普鲁斯特以为能用诗歌赢得年轻贵族的心，这大概错了；因为与他曾经有过同样想法的达尼埃尔·阿莱维不同，瓦鲁对文学毫无兴趣——物理

学才是他的强项。然而普鲁斯特与达尼埃尔互动的一个方面延续到了他与瓦鲁的关系中。普鲁斯特知道自己的同性之爱纯属单恋之后，就把关注的目光转到了年轻人的姨妈身上。那是他初始爱恋对象的另一个版本——年纪较大，性别更得体，却也同样真爱难求。他一如既往地急于淡化自己对其他男人的迷恋——“哪怕只是为了体面”——对德·舍维涅夫人的崇拜中带有同样招摇的柏拉图式激情，一如他曾经给予斯特劳斯夫人的那种激情。[22]

一开始迷上德·舍维涅夫人时，普鲁斯特曾恳求斯特劳斯夫人为他牵线搭桥；希望那位摄人心魄的贵妇人知道他对她情真意切。热纳维耶芙让普鲁斯特以为她把话带给了好友，而洛尔故意对他不屑一顾，但她说谎了。热纳维耶芙刚刚经历了失去莫泊桑和利顿勋爵的双重打击，不打算再冒险失去另一个情郎，哪怕是像“小马塞尔”这样一个微不足道之人。事实上，前一年秋天，热纳维耶芙得知他开始拜访洛尔·艾曼[23]时，还跟他吵了一架，她的另一位忠实信徒保罗·布尔热也跟艾曼那个荡妇郎情妾意。[24]［普鲁斯特是通过舅舅路易·魏尔（Louis Weil）认识艾曼的，魏尔是对她满意的众多顾客之一；普鲁斯特的父亲或许也体验过与她耳鬓厮磨。］热纳维耶芙对普鲁斯特基本上都持轻蔑的态度，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她对他可能“抛弃”她之事的极度敏感。波托-里什在企图诱惑格雷弗耶夫人而寻找同盟时就已经看到，请热纳维耶芙帮忙办这种事根本没用。紫衣缪斯讨厌情敌。

热纳维耶芙没料到的是，让普鲁斯特以为德·舍维涅夫人拒绝了他反而激发了他的爱欲。普鲁斯特早年与达尼埃尔和雅克的关系，以及后来与斯特劳斯夫人本人程度略逊的关系就已经表明，即便遭到拒绝，他也有心理准备以爱的名义忍受一定的痛苦。如高中时代一样，普鲁斯特仍然是莱辛和波德莱尔的信徒，认为性渴望从根本上说是肮脏的、兽性的、变态的现象，必然会遭遇痛苦和鄙视。无论出于被动（例如斯特劳斯夫人把他看作她沙龙里最微不足道的人）还是主动（例如她的儿子和

侄子在康多塞对他的虐待），普鲁斯特因为暗恋而承受的羞辱是也将一直是他的欲望得以维系的苦涩食粮。用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的话说，“残忍，萨德式和施虐式轮番上阵的残忍”是普鲁斯特的性爱的基本原则。[25]因此，果真如热纳维耶芙所说，德·舍维涅夫人对他没有兴趣对他而言与其说是遏制他继续的阻力，不如说是一剂催情的春药。

德·舍维涅夫人的萨德家世是她吸引普鲁斯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觉得“神圣侯爵”太迷人了。他把德·萨德的色情小说与莱辛的悲剧和波德莱尔的诗歌归入同样重要的一类：坚定不移地把性爱描述为暴力和堕落。的确，普鲁斯特唯一一次尝试戏剧，就是试图说服一位朋友跟他合作一部名为《施虐狂》（*The Sadist*）的剧目。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要知道在他生活的时代，戏剧是远比小说声誉更高也更有利可图的文学体裁。[26]那次合作未能成功，但该剧的剧名足够清楚地表明了普鲁斯特对萨德的传说有多着迷，而它的同性恋元素更让他沉溺。德·萨德的作品在1878年出了一个著名的版本，声称作者不但在理论上吹捧鸡奸的乐趣，还身体力行。普鲁斯特得知此事，大概对德·舍维涅夫人的“豪迈气质”更感兴趣了——仿佛爱上她就意味着爱上了一个同为男儿身的“性欲倒错者”。[27][28]



洛尔的艺术家朋友费代里科·德·马德拉索画出了她读书的样子，那是她最着迷的私密嗜好之一

3月的惊鸿一瞥之后，普鲁斯特对德·舍维涅夫人展开了双重攻势。一是跟踪。像前辈波托-里什一样，普鲁斯特也找到了女神的住处，每天到她的街区附近去跟踪她。1880年代末，舍维涅夫妇搬到了米罗梅尼尔街34号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楼里，那是圣奥诺雷区较为乏味的街道之一。社交界爱开玩笑的人断言，洛尔选择这个新住处是因为它的位置方便她那些老男人，“就在他们去俱乐部的路上”。但它的位置对普鲁斯特也很方便；他沿着自己的“希望路线”步行十来分钟，就能从父母的公寓到达那里。

仔细观察后，普鲁斯特断定与德·德维涅夫人相遇的最佳时间是上午，她通常在上午离开公寓，漫步到协和广场附近的拉特雷穆瓦耶府

邸，与公爵夫人闲聊一会儿。她每天要去看望公爵夫人两次，这是第一次。普鲁斯特一贯喜欢熬夜阅读写作，每天那么早就要起床，步行到米罗梅尼尔街去赶上伯爵夫人，对他或多或少是个挑战。但那是他甘愿为爱所做的牺牲。

为艺术所做的牺牲是他的第二重追求策略。由于他和朋友们已经把自己的文学杂志《酒筵》的订阅权卖给了斯特劳斯夫人的忠实信徒，普鲁斯特有理由希望，如果他在《酒筵》杂志上发表赞美德·舍维涅夫人的文章，她可能会注意到。4月，他写了一篇献给她的赞歌，发表在了5月那期《酒筵》上。

普鲁斯特写给德·舍维涅夫人的赞歌题为《以德·***夫人为原型的人物素描》（以下简称为《素描》），是关于社交界场景片段的一系列作品中的一篇，该系列名为《意大利喜剧片段》（*Fragments of Italian Comedy*，1892-1893）。[29]之所以为这个系列取这个名字，大概是暗指德·舍维涅夫人在前一年的莱昂舞会上扮演了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普尔奇内拉。除此之外，该文本的“意大利”层面主要限于其中人物的可爱的名字，事实上都是希腊和意大利风格的名字——西达利斯（Cydalise）、米尔图（Myrto）、希波莉塔（Hippolyta）。普鲁斯特对朋友们承认，这些人物的原型都是巴黎社交界的名媛，西达利斯的原型是玛丽·德·迈利-内勒[30]（她“看上去可爱又难过……有一种忧伤的美”[31]），米尔图的原型是斯特劳斯夫人[32]（“诙谐……而魅惑，却囿于时尚”[33]），而《以德·***夫人为原型的人物素描》的女主人公希波莉塔的原型则是德·舍维涅夫人。

特别是在最后一篇文字，人物的名字值得注意，因为它是拉辛的《费德尔》的标题人物爱恋的对象希波吕托斯的阴性形式。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个名字唤起了普鲁斯特本人禁忌的欲望——对一位年龄足以做他母亲的已婚伯爵夫人的欲望（和对她异性恋外甥的欲望）。在另

一个层面上，它微妙地反转了作者与他笔下人物之间的性别角色，将德·舍维涅夫人与对继母费德尔的不伦之爱无动于衷的希波吕托斯相对应，而普鲁斯特本人对应那位悲剧的王后，即便得不到回应，也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的女人。（读者不妨回忆一下第11章内容，在哀叹自己对雅克·比才和达尼埃尔·阿莱维的爱欲得不到回应时，普鲁斯特曾明确地将自己比作费德尔。）另外，这个名字也是向德·舍维涅夫人的赛马癖好致敬——在希腊语中，希波吕托斯意为“解缰放马之人”。[34]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了普鲁斯特崇拜的另一位17世纪作家让·德·拉布鲁耶在研究路易十四宫廷生活的一针见血的著作《品格论》中，为掩饰真实贵族身份而使用的那些希腊罗马式化名。[35]拉布鲁耶的作品常常直奔主题，通过“哲学”对话的方式展开立论。这两个技巧都出现在普鲁斯特的《素描》中，他的文本结构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者与同伴之间辩论的形式，叙述者为希波莉塔神魂颠倒，那位同伴则不相信她的鹰钩鼻竟有那么大的魅力。以下是全文摘录：

> 你怎么会觉得希波莉塔比我刚刚提到的那五个女人更可爱呢？她们可是维罗纳[36]无可争议的美人啊。首先，她的鼻子太长，鹰钩太明显了。
>
> 你还可以说她的皮肤太细，上唇太薄，因此她一笑，嘴就会上扬成一个很尖的锐角。但看到她笑却让我无比享受；最完美的轮廓也无法像她（在你看来）那只鹰钩太过明显的鼻子侧影那么打动我，它让我想起飞鸟，让我心动如潮。如果沿着她的前额和后脖颈看过去，会发现她的头部也有些像鸟，而她那双漂亮而锐利的眼睛更是如此。她坐在剧院里时，往往把臂肘支在包厢的栏杆上；带着白手套的玉臂直直地顶住下颌，手指张开托着下巴。她完美的身材撑开家常的白纱裙褶，仿佛它们是折叠的双翼。看到她，会让人想起一只陷入沉思的鸟儿，用

> 瘦弱而优美的禽爪栖息在那里。我每次见到她的孩子或外甥们——他们都有着和她一样的鹰钩鼻、薄嘴唇、锐利的目光和细腻的皮肤——必会被打动，意识到他们无疑是一个女神和禽鸟混血的种族。在这种如今让这个女人的身体有了某种飞翔的欲望的蜕变中，我看到了一只孔雀高贵的小小头颅，它的身后不再流动海蓝或海绿色的激流，也不再有她神秘的锦翅激起的泡沫。她是个女人，是一个梦，一头能量充沛却玲珑精致的小兽，一只长着雪翼的孔雀，一羽以宝石为眸的文雀。她让人想起神话，她的美令人震颤。[37]

普鲁斯特在这里借用另一位作家的写作技巧，再次超越了最初级的模仿。在这些句子中，他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把剧院里的一位身穿白衣的金发女人变成了出身高贵的珍禽之美的标志。普鲁斯特从她和外甥瓦鲁一样鲜明的鹰钩鼻，构想出了稀世珍禽的奇喻。希波莉塔或许把她“神秘的锦翅”换成了“家常的”社交晚礼服，但她的相貌和姿态仍一丝不差地保留着鸟类的轻柔妩媚。它们刺激了叙述者“飞翔的欲望”，在隐喻意义上把他提升到了她自己栖居的高空，那是众神和百鸟的家园，是神话和绝美的所在。

如果说斯特劳斯夫人以她的偏见、癖性和无数动听的虚伪影响了普鲁斯特对名媛精神的理解，那么德·舍维涅夫人则塑造了他对贵妇人这个肉体样本的理想。从那以后，碧眼金发鹰钩鼻的鸟神就永远成了他头脑中贵族优雅的原型，预示着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国，像他这样的凡人必须插上神圣欲望的双翅方能抵达。

一篇发表的作品就像一封瓶中信——你把它抛入“海蓝或海绿色的激流”，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普鲁斯特渴望德·舍维涅夫人在希波莉塔素描中认出她自己的影子，但除了把文章发表在《酒筵》上，他却无法确保她读过它。如果洛尔的确读过，她的反应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然而有些证据可以证明另一位贵族女人读到了普鲁斯特的文章。并且还不是普通的贵族女人，而是不久就会替代洛尔——正如洛尔替代了热纳维耶芙——成为普鲁斯特的名媛缪斯的人。在厄镇与德·奥尔良家族告别之后，伊丽莎白·格雷弗耶给她的玛丽-爱丽丝小说增加了一个次要人物：德·特勒斯男爵夫人，这位自私自利、打破成规的社交老手与洛尔·德·舍维涅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38]在伊丽莎白的叙事中，男爵夫人的青年时代是在一个流亡国王位于中欧的宫廷里度过的，那位坏脾气、性无能的国王有一匹羸弱的驽马名为“群众的要求”。男爵夫人常常（带着虚伪的“单纯”）对社交界的朋友们吹嘘她与王室的良好关系，但她其实是个身穿廷臣制服的叛逆者。她从德·萨德侯爵的小说中获得灵感，享受“独立于（她）不爱的丈夫的生活”。在城里，她“总是在夜间探入巴黎的阴暗角落里娱乐”，去蒙马特尔之类的地方。在乡下，在一个喜欢她的老年公爵夫人的城堡中，她在午夜潜入情夫的卧室（还残忍地捉弄了德·加利费将军）。男爵夫人这个人物就是一个矛盾体，既高雅又粗俗，既规矩又家常，既阴柔又豪迈。

简言之，她的原型就是洛尔·德·舍维涅。男爵夫人的姓氏更明白无误地体现了二者的联系，它是洛尔的那些被封为男爵的商人祖先的姓氏“Thellusson”（特勒森）的简写形式。至于男爵夫人的名字，伊丽莎白最终确定为“马克西米莉安妮”（Maximilienne），但那不是她唯一的选择。她在手稿校样上所做的修正表明她曾经考虑过给这个人物取名“希波莉塔”，或许是为了突出男爵夫人模糊的性别形象和“豪迈气质”，她甚至还想给她取名“希波吕托斯”（法语写作“伊波利特”）。

鉴于伊丽莎白的文学品位偏天主教，“希波莉塔”这个名字可能借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但除了喜爱骑马和打猎之外，萨翁笔下那位温顺的亚马孙女王与伊丽莎白笔下这位顽皮机智的男爵夫人毫无相似之处。必须承认，普鲁斯特的希波莉塔跟她的莎士比亚同名者也没有可比性。不过那是因为《素描》的叙述者只是远观自己的梦中女郎，他看

到的只是一个形象，并非实实在在的人。毫无疑问，那个形象就是洛尔·德·舍维涅的形象。因此，伊丽莎白笔下那位洛尔式男爵夫人的名字更有可能取自普鲁斯特的致敬文字而非莎士比亚戏剧。

这当然不是说伊丽莎白本人是普鲁斯特和朋友们推销《酒筵》的夹层公寓常客之一。[39]谁都知道，伊丽莎白从未频繁光顾过热纳维耶芙的沙龙，她详细记录的沙龙女主人日志表明，她也从未邀请热纳维耶芙来过德·阿斯托格街，更不用说布德朗森林和迪耶普了。两个女人不仅不是朋友，她们唯一一次因利顿勋爵而起的情敌关系或许还让她们对彼此长期怀有敌意。但伊丽莎白的妹夫德·阿伦贝格却对热纳维耶芙忠心耿耿。不仅如此，到《酒筵》出版时，他还欠热纳维耶芙一个人情，因为她通过一些有势力的共和派朋友的帮忙，任命德·阿伦贝格为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裁，这可是名利双收的职位。[40]虽然他直到1894年才最终获得任命，但那是个很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亲王掏出十法郎购买热纳维耶芙儿子和侄子的杂志简直是小菜一碟，如此又能对她表达感激，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如果《酒筵》确实到了伊丽莎白之手，几乎可以肯定是经由德·阿伦贝格转交的。[41]伊丽莎白甚至可能很喜欢在上面读到的文字，因为一年后《酒筵》与《白色评论》合并之后，伊丽莎白还继续订阅《白色评论》来看。

至于普鲁斯特，他过早地发现了德·舍维涅夫人身上吸引他的是形象，而非本人。[42]他沿着自己的“希望路线”步行了几个星期，或许最多两个月，而只要他热爱的对象正好在他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外，做一只在他视线的远端振翅的“漂亮的金色飞鸟”，就能让他痴心妄想、不能自拔。在充满敬意的跟踪者的距离之外，看到她那双眼皮松弛的碧眸和帽子上新鲜的蓝色矢车菊的完美搭配，都能让他喜出望外。当春风轻拂香榭丽舍大道时，他会充满柔情地盯着她白净的皮肤下面散开的玫瑰痤疮的暗斑。他会观察她与过往的陌生人互动——德·舍维涅夫人没有男仆陪同，有时会引来街头工人的口哨声，对此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

（有个好色的男人对着她的臀部吹口哨，她听见后毫不迟疑地喊道：“等等亲爱的！你还没看见正脸呢！”[43]）普鲁斯特只是从远处看到这些互动，并没有听到她说什么。但他可以也的确记得德·舍维涅夫人在大笑时，嘴唇会弯成“一个很尖的锐角”，既不是玫瑰花瓣的形状，也没有要送出亲吻的意思，而是一个退化的副喙的尖利而骄傲的薄片——是她神秘的禽鸟种族的又一个标志。

最棒的是，她从视线中消失后，普鲁斯特还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想象德·舍维涅夫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她读些什么书，看望哪些朋友，离开巴黎时去探访哪些城堡。普鲁斯特可以把她想象成王室外围的任何人——身体特征、家世细节、社交资质——她无意间为他的幻想插上了翅膀。他可以像崇拜一个落入凡间的鸟神一样崇拜她，他写道：“因为他看她时动用的是想象力而非双眼，那可以让一切变得崇高而尊贵。”[44]

随后就发生了那个春天的早晨那可怕的一幕，德·舍维涅夫人在步行中突然转过身来，瞪着他，尖声说：“菲特亚穆在等着我呢！”她已经连着多少个星期对他不理不睬了，为什么突然在那时对普鲁斯特大发脾气，这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或许她与菲茨-詹姆斯幽会迟到了——普鲁斯特注意到她那天用一幅小巧的面纱遮住了面部。或许她正恼火着，因为另一位时断时续的情人亨利·德·布勒特伊和他年轻的美国妻子最近宣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男继承人。或许她很不安，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最近开始在巴黎各处爆炸，连她的好朋友让娜·德·萨冈的府邸也未能幸免。或许她正为金钱发愁，自从阿代奥姆在巴拿马运河的投资打了水漂，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了。或许她很不高兴丈夫已经准备挣钱谋生，为他的朋友戈登·贝内特的报纸《纽约先驱报》撰写乐评了；要么是阿代奥姆最初写的一篇关于瓦格纳的乐评，居然说格雷弗耶伯爵夫人是巴黎时尚的引领者。（洛尔虽然很喜欢伊丽莎白，但应该更希望得到这种评价的是她自己。）或许她很烦乱，因为有

个发卡的位置不对，刺进了她的头皮；或者一场雨过后，有泥水渗入了她的鞋子。或许她正因为跟孩子们那位苛刻的爱尔兰保姆弗朗西丝争执而生着闷气。或许她正心怀怨恨，老朋友阿尔贝·德·曼，那位每次见她频送秋波都要声称自己是个虔诚教徒的家伙，居然克服了宗教顾虑，疯狂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至于是谁，他拒绝交代。）或许洛尔就是受够了这个圆眼睛的年轻陌生人不速而至，尾随跟踪她。或许她根本就没生气，是普鲁斯特误读了她的神态和语气。

总之，他最终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怎么激怒了德·舍维涅夫人。虽然普鲁斯特后来通过他们在上层共同的朋友跟她变得熟络了，但他从未敢过问她那天为什么要那样对他说话。不过他从未忘记她曾怎样傲慢地在她（和“菲特亚穆”）这样的大人物与他这样的下等人之间“划清界限”。即便对他这样一个倾向于认为爱必会带来痛苦的年轻人来说，那样残忍地拒之门外也难以承受。据塞莱斯特·阿尔巴雷说，德·舍维涅夫人那一刻对普鲁斯特造成的伤害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在提醒着他，当他渴望的是一位娘家姓德·萨德的贵族时，应该对自己渴望的对象更加谨慎一些才好。[45]

---

[1] 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 avec Mme Straus*，268。

[2]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81. 同样，FG在他关于GS沙龙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阿斯-斯万”；见FG，*Mon amitié*，46。

[3] MP，CG，883. 必须要说，这是MP听到阿斯在社交界使用的一句俏皮话，当时一位朋友请他评价一下那位朋友收藏的一幅画作，他说出这句话来取笑那位朋友。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94.

[4] MP，CG，884.

[5] 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90-91. 关于“红鞋子”这个插曲，最棒的学术讨论见Murat，“Les Souliers rouges de la duchesse，” 96-105。关于GS在勒梅尔舞会上的红黑色装束，见Gant de Saxe（pseud. M. Ferrari），“Mondanités：Tout au papier，” *Le Gaulois*（March 2，1892）：1；又见EdG，日志，1892年3月2日的日记。EdG提到冈德拉和德太耶是另外两个参加勒梅尔舞会的忠实信徒。

[6] 关于吉罗之死，见Imbert，*Médaillons contemporains*，293。

[7] 关于勒梅尔夫人的“混杂”沙龙逐渐成为GS沙龙的一个有力对手，见George Painter：“不久，整个圣日耳曼城区就来了，因为见到艺术家很开心，然后又来了更多的艺术家，因为见到城区的感觉真好。”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05. 这几句话当然呼应了LH的话：“圣日耳曼区（前往）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仿佛去逛‘黑猫’。（而）‘黑猫’（前往）热纳维耶芙的沙龙，仿佛那是圣日耳曼区。”

[8] Ursula Link-Heer，“Mode，Möbel，façons et manières：Robert de Montesquiou und Marcel Proust，” in *Marcel Proust und die Belle Époque*，ed. Thomas Hunkeler（Frankfurt：Insel，2002），84.

[9] FG，*Mon amitié*，41. JEB也呼应了这个观点。说虽然马塞尔“出席过埃米尔·斯特劳斯夫人鼎盛时期的沙龙”，那和“受邀进入‘真正的上层’是两回事，他很少能去那里”，见JEB，*Mes modèles*，112。

[10] Étincelle，（pseud.），“Les Grandes Réceptions：le bal blanc de la Princesse de Léon，” *Le Figaro*（April 11，1891）：1-2；Comtesse de Vérissey，“Chronique mondaine，” *La Mode de style*（June 3，1891）：179-180；and Gant de Saxe（pseud.），“Mondanités，” *Le Gaulois*（June 23，1891）：3.

[11] MP，CCS，26，97，and 172.

[12] MP明确提到过这一事实，记录了他有一次听到俱乐部会员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说，“但他当然不会入选骑师俱乐部……（波利尼亚克说起斯特劳斯）（原文如此）”。MP，*Carnets*，152.

[13] MP，*Days of Reading*，79.

[14]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6. 同样，Painter也写道，LC声音中“乡气的沙哑”在MP看来也是“她与众不同的一个标志”，因

为它“来自她外省的祖先”。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3.

[15] 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5.

[16] Billy，Robert de. *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 Paris：Portiques，1930，79. 关于MP把LC写入了自己从《酒筵》到《追忆似水年华》的文字，见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17。

[17] Françoise Benaïm，*Marie-laure de Noailles*，*vicomtesse du bizarre*（Paris：Grasset，2002），36.

[18] Christian Gury，*Proust*：*clés inédites et retrouvées*（Paris：Kimé，2003），203.

[19] FG，*Mon amitié*，33.

[20] FG，*Mon amitié*，33。FG还说，MP常常觉得LC“那只鹰钩鼻是从德·萨德家族继承的”（FG，*Mon amitié*，33）。

[21] MP，“Poésie，”见MP，*The Collected Poems of Marcel Proust*，ed. Augenbraum，19。关于居斯塔夫·洛朗斯·德·瓦鲁的情况，似乎很少有资料留存下来，除了他在圣西尔军校的班级排名通知被刊登在《费加罗报》（1889年10月23日）：第4版。但他在学校获得过一个物理学奖项。成年后，他的职业生涯完全不同于社交界的交际家——他管理着塞纳-马恩地区的Marais造纸厂，专门制造高质量的造纸材料。1912年之前他一直是“坚持独身的单身汉”，41岁时娶了34岁的表妹妮可·德·瓦鲁。婚后无子嗣。

[22] 关于MP一直急于淡化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见Claude Arnaud，*Proust contre Cocteau*（Paris：Grasset，2013），74。关于GS对MP谎称她把他的暗恋之事告诉了LC，见AM，Journal（1879-1939），ed. Marcel Billot（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504。

[23] 洛尔·艾曼（Laure Hayman，1851-1932），生性风流的法国女雕塑家。

[24] 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 avec Mme Straus*，14-16 and 23。关于艾曼与MP和他舅舅路易的关系，见Carter，*Marcel Proust*，84-85。关于艾曼可能与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有染，见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15。

[25] Compagnon，*Proust entre deux siècles*，182. Compagnon在这里默认“萨德式”与“施虐式”不同，因为MP“的‘施虐’概念往往包括各种笼统定义的变态行为，包括性受虐和恋物癖”，以及德·萨德（在艺术和生活中）欣赏的其他冲动，而“施虐”严格说来不包括那些（Compagnon，*Proust entre deux siècles*，171，n. 3）。

[26] René Peter，*Une saison avec Marcel Proust*，ed. Jean-Yves Tadié（Paris：Gallimard/NRF，2005），136. William Carter在*Proust in Love*，75中简短讨论了这部剧，没有提到剧名。按照MP的构想，标题中的施虐狂将“与多名妓女通奸并享受……玷污他自己的美好情操”，MP也把同一种倾向给了*L’Indifférent*的主人公。

[27] 20年后，普鲁斯特向女演员雷雅纳要了一幅她装扮成德·萨冈亲王的照片，表明他仍然采用同样的方式与上流社交界互动。由于普鲁斯特刚刚凭借《在少女们身旁》（*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1919）赢得了一项文学大奖，她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当一位记者试图就获奖小说采访他时，普鲁斯特反而谈起了这位女演员扮成男装的照片，说：“我视之为珍宝。我崇拜雷雅纳。”就此而言，他真正珍视的是一位女性化的时尚之王的形象。——作者注

[28] 脚注里所讲的关于普鲁斯特与雷雅纳扮成德·萨冈亲王的照片的故事见Brassaï（pseud. Gyula Halász），*Proust in the Power of Photography*，trans. Richard Howard（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10。

[29] 在为《意大利喜剧片段》所做的注解中，编辑Thierry Laget说该文章标题表明它可能参考了意大利即兴喜剧，但没有把它与LC或1891年莱昂舞会上的意大利即兴喜剧表演联系起来。PJ，309，n. 1.

[30] MP，in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7（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39-40.

[31] MP，“Cires perdues，” *Fragments de comédie italienne*，in PJ，85.

[32] MP致GS，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195；MP，PJ，310，n. 1。

[33] MP，“Les Amies de la Comtesse Myrto，” *Fragments*，81. 关于希波莉塔就是LC，见RB，*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Paris：Portiques，1930），79-80；RD，*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17；RD，*Souvenirs*，71；and Daniel Karlin，*Proust’s Englis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56，n. 88。

[34] 在古典神话中，希波吕托斯之名源于他的母亲希波莉塔，就是在费德尔之前嫁给忒修斯的那位亚马孙武士女王。拉辛的《费德尔》中虽然没有希波莉塔这个人物，她却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1595—1596）中的一个次要角色，在第四幕中嫁给了忒修斯。但后一部剧作为普鲁斯特灵感来源的可能性远远低于拉辛的剧目。从童年时期的信件一直到成熟的文学作品，普鲁斯特的文字中充斥着出自拉辛的作品，尤其是《费德尔》的典故。相反，普鲁斯特不是不读莎士比亚，但他的作品中唯一一处《仲夏夜之梦》的典故还是《追忆似水年华》的首位英译者Scott Moncrieff加上的，在那部小说的译文中笼统地提到了“一部莎士比亚狂想曲”。（Moncrieff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书名时使用的也是莎士比亚式而非普鲁斯特式语言：*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取自莎士比亚的第30首十四行诗。）

[35] 关于MP在早期作品中刻意模仿拉布鲁耶，见Nicola Luckhurst，*Science and Structure in Proust's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Oxford：Clarendon，2000），18-21。Luckhurst没有提到《以德·***夫人为原型的人物素描》，但她讨论了MP在这段时期写作的其他文本中使用过拉布鲁耶的两个关键写作手法——对话形式和文章开头开门见山。

[36] 维罗纳（Verona），位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阿迪杰河畔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爱之都”之称。

[37] 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酒筵》第三期（1892年5月），全文重刊于RD，*Souvenirs*，71-72。还有一个删除了倒数第二个句子的稍微缩略的版本出现在“Cires perdues，II，”见MP，PJ，85-86。

[38] 关于EG虚构的德·特勒斯男爵夫人的全部细节都取自X. Brahma（pseud. EG），*Âmes sociales*，op. cit。EG这部小说的校样中有很多迷人的变化写法，主要存档于AP（II）/101/152。

[39] FG，“Hommage à Marcel Proust，”*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January 1923）：41.

[40] LG，*Mémoires*，vol. 2，201；and “L'entresol，”3.

[41] Racyzmow，*Le Paris retrouvé de Proust*，137.

[42] 关于这一点，见Helene Iswolsky，*No Time to Grieve*：*An Autobiographical Journey*（Philadelphia：Winchell，1985）：“Proust fell deeply in love with her image”（91）。

[43]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68.

[44] MP，*La Fin de la jalousie et autres nouvelles*，ed. Thierry Laget（Paris：Gallimard，1993），82.

[45] 关于MP由来已久的对LC的菲特亚穆“斥责”的“怨恨”，见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71；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10-11；and Albaret，Céleste. *Monsieur Proust*.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44。

第23章 只要姿态优美

普鲁斯特对巴黎贵族阶层的着迷始于1892年春跟踪德·舍维涅夫人，却没有随着停止跟踪而结束。受到她尖锐的斥责之后，他不屈不挠，继续努力征服他如今所谓的“真正的上层”。[1]他仍然是斯特劳斯夫人沙龙里的常客，却越来越不依赖斯特劳斯夫人，转而求助于他通过她认识的其他几位女主人：玛德琳·勒梅尔、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以及两位罗斯柴尔德家的“犹太女伯爵”——德·瓦格朗亲王夫人和德·格拉蒙公爵夫人。这些女人都不是持剑贵族出身，但后面这两位嫁入了该阶层，而四人全都是各自尊贵的社交小圈子的领军人物。普鲁斯特利用自身的魅力挤入了这几位夫人的宾客名单，一有机会就逢迎讨好她们的朋友。

也不是每个社交名人都欣赏他的凯鲁比诺式表演——夏尔·阿斯就对他不屑一顾，每次和他不期而遇，都拒绝“跟他说话，甚至不肯屈尊瞧他一眼”。[2]莉莉·德·格拉蒙认为，阿斯看不起普鲁斯特是因为他们每次在上层的晚餐会上见面时，年轻人总是坐在桌子的末端，而这位骑师俱乐部犹太会员可不是靠在无名小辈身上浪费时间爬上高位的。（另一种可能是，阿斯觉得巴黎的社交界容不下两位没有出身、只靠头脑的资产阶级犹太人。）但其他社交人士很喜欢普鲁斯特，从暴脾气的“同性恋”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到高傲而美丽的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波利娜。提到自己在这一小撮精英中价值日升时，普鲁斯特说：“关键是获得进入的资格，其后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3]他卧室的镜子变成了他如今大受欢迎的神龛，上面装饰着各种名片、感谢信（感谢他“时时处处”送来的那些花束），以及各种雕版印刷的晚餐会、慈善晚宴、艺术开幕式和舞会邀请函。

普鲁斯特在这个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因此在1894年5月30日，终于有幸认识了他们中间最高贵的贵妇人，格雷弗耶伯爵夫人伊丽莎白。

那年他22岁，她33岁；两人都要在即将到来的7月过生日，她的生日只比他晚一天。他们并非一见如故，但这次相遇为普鲁斯特的小说提供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标志着他的社交事业到达了新的顶峰。

在大多数学术和传记作品中，普鲁斯特本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著述也是一样，他对贵妇人的着迷往往占据了大量篇幅，但对其所发生的历史背景交代不足。他对德·舍维涅和格雷弗耶两位伯爵夫人及其生活的世界苦思冥想的那段时期，恰逢巴黎反政府暴力肆虐。1892年2月29日，也就是普鲁斯特开始每天早上跟踪德·舍维涅夫人在圣奥诺雷区漫步的那段时间前后，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枚炸弹在河对岸的圣日耳曼区被引爆了。这次爆炸开启了为期两年的无政府主义“黑色恐怖”，整个城市各处还发生了多起爆炸，最终导致第三共和国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4]于1894年6月25日死于暗杀，距离普鲁斯特初遇格雷弗耶夫人还不足一个月。[5]关于普鲁斯特的“山茶花时期”的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这一历史背景，但它十分重要，因为它突出体现了他追求优雅的另一重深刻矛盾。

贵族城区闰日爆炸的地点并非无关宏旨。[6]它发生在上层最有名的聚会场所之一，德·萨冈府邸。2月29日上午，两束炸弹在府邸门口起爆。爆炸震碎了府内的50块玻璃和附近区域的近200块窗玻璃。

德·萨冈亲王夫人本人当时不在家，几天前，她逃离了冰天雪地的首都，和德·加利费夫人一起去阳光明媚的戛纳欢度嘉年华了。唯一的伤者是亲王夫人的看门人，他在打扫卫生时偶然发现了炸弹；它用棕色的包装纸包成圆形，看门人还以为是一包果酱。“这位仆人居然能死里逃生，堪称奇迹”，一个美国记者写道。他全身只有几处擦伤和瘀青，“没受什么伤，但着实吓坏了”。[7]

随后的警方调查表明，爆炸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为，或许与前一年春天给德·萨冈夫人寄了一封匿名信、威胁要在她即将举办的年度舞会上

引爆炸弹的是同一伙人。亲王夫人刚刚被莱昂盛典抢了风头，已经把那年的宾客名单缩减到了只有500位受邀者——还不到以往人数的三分之一——并吩咐他们穿上在对手的晚会上穿过的黑白服装。或许是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爆炸伤害客人，德·萨冈夫人把舞会办在了“（她在）花园里支起的一个巨大帐篷里，帐篷由四个饰有缎带的柱子支撑，顶棚覆盖着花朵”。[8]府邸整夜关闭，举办盛典的庭院也一样，通常，那里到处都是闲置的马车、马匹、车夫，以及来来往往的狂欢者。这些防范措施虽然给府邸笼罩了一层阴郁沉闷的氛围，但晚会倒还顺利。自那以后，亲王夫人就不再去想无政府主义恐怖的事儿了，直到自家前门口发生爆炸。

德·萨冈夫人匆匆回城估算损失。那时，巴黎的社交季刚刚开始，她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兴致高涨地投入狂欢。事实上，她再也没有举办过化装舞会，警方也未曾找到发动袭击的罪犯。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威胁要在她**1891**年春举办的年度化装舞会上引爆炸弹，德·萨冈

亲王夫人在公园规模的花园里举办了那年的舞会，其间关闭了庆典的庭院和府邸大门

这次爆炸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的深刻不满，自从布朗热将军两年前逃跑之后，不满情绪日益加重。一个原因是政府军和激进游行队伍（无政府主义者和罢工的工人）于1891年劳动节当天在巴黎和外省城镇富尔米[9]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引发了越来越大的民愤。在富尔米，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杀害了十位平民，其中包括两个孩子。屠杀引起了骚动，一位名叫拉瓦绍尔［Ravachol，本名弗朗索瓦·柯尼希施泰因（François Koenigstein）］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誓要为受害者报仇。1892年3月11日，他炸毁了圣日耳曼大道上的一座建筑物。他声称自己的目标是一位住在那里、正在主持某个劳动节事件审判的法官。但由于那座建筑物是罗贝尔的叔叔、伊丽莎白·格雷弗耶的舅公弗洛迪米尔·德·孟德斯鸠（Wlodimir de Montesquiou）伯爵的财产，拉瓦绍尔的爆炸也象征着对巴黎贵族的迎头一击。[10]

与巴拿马运河公司有关的巨大财务丑闻激起了更大的民愤。1882年到1888年，六十多万名小投资者把一生的积蓄投到在中美洲新建一座跨大洋运河的风险项目中。公司发起人是苏伊士运河的传奇建设者费迪南·德·莱塞普和设计埃菲尔铁塔的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他们通过一系列证券发行筹集了14亿法郎的资金，却未披露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多重成本问题很快就宣告该项目注定失败了。到1885年，资金早已枯竭，但莱塞普、埃菲尔及其同事贿赂了一百五十多位政府官员，把投资者蒙在鼓里。

巴黎的一个民事法院在1890年2月宣布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并下令启动司法调查。其后两年，各种欺诈细节逐渐披露，人们看到了严重的公司渎职和惊人的政治腐败。（包括舍维涅夫妇在内的）数十万人对该公司的投资血本无归，但管理团队及其政府亲信却中饱私囊。有一位在此次欺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德金融家雅克·德·赖纳赫（Baron

Jacques de Reinach），单在一次欺诈性证券发行中就净赚610万法郎。他在1892年11月自杀了，其后不久，埃菲尔、莱塞普和其他同谋者也先后被判监禁。[11]

在如此令人无法容忍的氛围中，无政府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一贯反动和势利的龚古尔在1892年5月抱怨说：“无政府主义派正在把一切失败者、一切失意者、一切罗锅和驼背，一切对生活不满的人招募在自己麾下。”[12]拉瓦绍尔之流最顽固的不满者决定用炸药来伸张自己的发言权。对圣日耳曼区发动了两次袭击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又炸毁了巴黎多处财富和权力的堡垒，包括位于右岸最时髦的王宫区的一家餐厅和一处警察局。拉瓦绍尔于1892年7月11日被处决，他唱着“要想快乐，去他妈的，就得一个不剩杀死那些有产者。……”铡刀落下之时，他还在高喊“革命万岁”！[13]

拉瓦绍尔之死激怒了他的同志们。1893年12月9日，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瓦扬（Auguste Vaillant）把一颗自制的炸弹扔进了下议院，有力地传达了该组织早已臭名远扬的信息。[14]（爆炸导致20人受伤，其中没有一位是伊丽莎白、热纳维耶芙或洛尔的朋友；亨利·格雷弗耶早在那年秋天就放弃了再次竞选，躲过了爆炸。[15]）瓦扬于两个月后被送上断头台，政府为打击其他煽动者，通过了一系列“流氓法案”（*lois scélérates*）。但袭击仍在继续。3月，一颗炸弹在巴黎火车站的一家咖啡馆里爆炸，4月，另一颗炸弹在一家餐厅引爆，威尔士亲王本来打算在剧院度过一晚之后在那里用餐的。[16]亲王那晚换了用餐地点，但爆炸导致很多其他受伤，两万多人涌向现场，一时乱作一团。



从**1892**年到**1894**年，无政府主义者对法律、秩序和特权的堡垒发起了一连串爆炸袭击，震惊了整个巴黎

在蒙马特尔，鲁道夫·萨利斯和阿里斯蒂德·布吕昂等人的反主流文化姿态又有了新的锋芒，或邪恶，或尖刻，取决于各自的政治倾向。[17]无政府主义者们唱着布吕昂的反叛小曲，填上他们自己发明的歌词，例如：

国王上帝都死了，而我们不在乎。

明天的我们会像空气一样自由。

再没有信仰、法律、奴隶和过去

我们是打破一切旧传统的英雄。[18]

以及：

我有足够的匕首、长矛和枪……

去攻击加利费和警察们的要害。……

我有苦味酸钾和氯化氮……

他妈的还有足够的炸弹……

去把整个法国砸烂。[19]

这里提到加利费，把新一代无政府主义者与1871年由这位将军带头屠杀的巴黎公社起义者联系起来。对向火车站和警察局投弹的21岁埃米尔·亨利而言，这一联系与他个人息息相关：他的父亲曾在巴黎公社中与“克里希的刽子手”对抗。在埃米尔·亨利和他的同路人看来，加利费就是统治阶层置民生于不顾的极坏典型。

极端主义权威抓住时机，把矛头对准了另一群大敌。1892年秋天，埃杜瓦尔·德吕蒙新办的《自由言论》上刊登了一位匿名记者的文章，煽动读者们“对去岁的金牛犊[20]群起而攻之”。[21]虽然这里提出的攻击对象很宽泛，可能包括腐败政治家、堕落贵族和刽子手将军，但这个比喻事实上将矛头指向了德吕蒙长期以来企图妖魔化的人群：犹太人。雅克·德·赖纳赫在自杀前曾给了德吕蒙一个名单，上面列出了在巴拿马丑闻中有罪的全部当事人，敦促他把该名单公之于众。这份独家新闻让《自由言论》一夜成名，却没有得到德吕蒙感恩的回报。他和反犹同伴们攻击赖纳赫的犹太人身份——还谎称埃菲尔和莱塞普也都是犹太人，进一步证明“犹太人之祸”正在威胁法国。社会主义日报《强势报》（*L’Intransigeant*）的创办者、自称“贫民窟报纸之王”[22]的亨利·罗什福

尔（Henri Rochefort）在一篇社论中大放厥词，论调如此极端，以至于德吕蒙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了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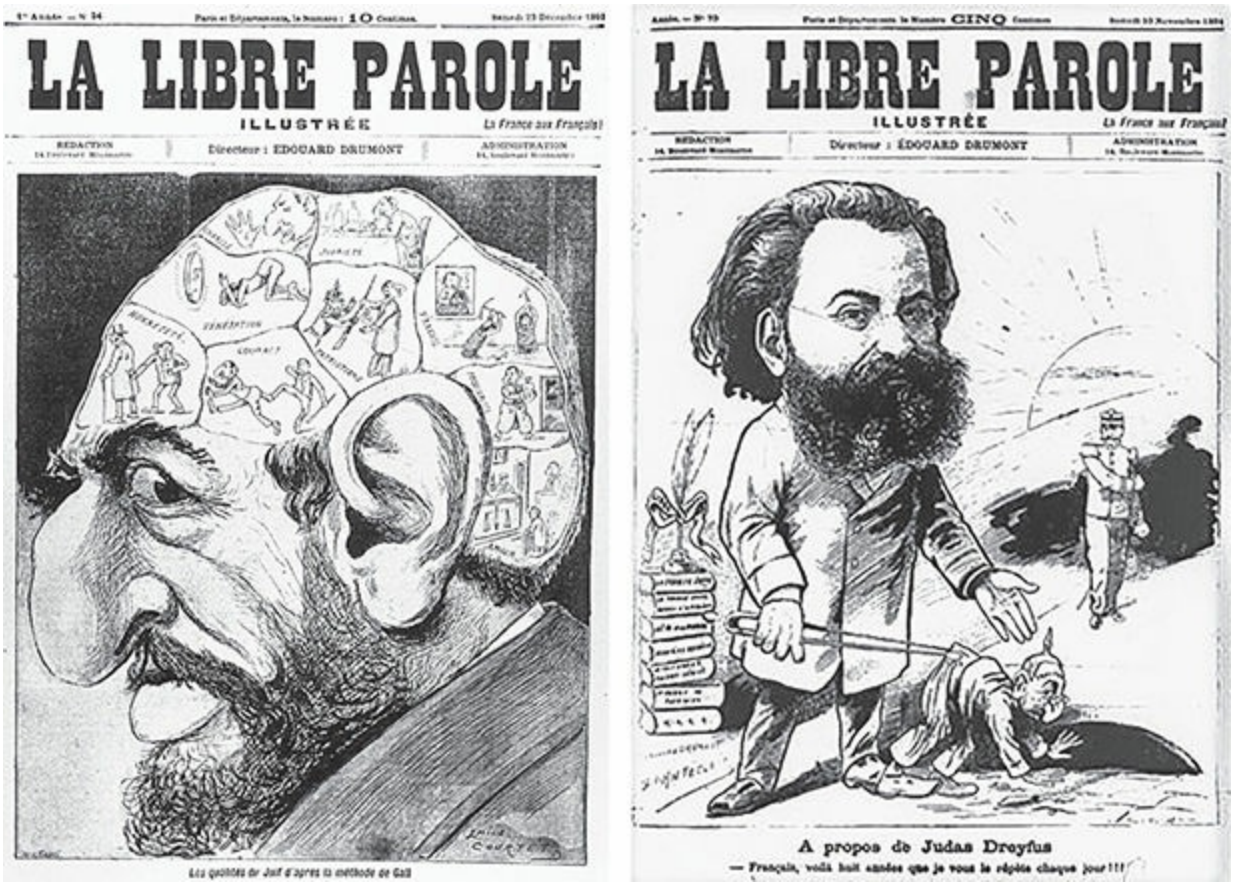
> 看起来无论高低贵贱，所有的犹太人都（串谋参与了）这场让那么多公民血本无归、让那么多代表名声扫地的灾难。……犹太人……是这场肮脏交易的始作俑者。[23]

这一观点为罗什福尔和德吕蒙赢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大尊重和崇高敬意”[24]，那些人发现，栽赃犹太人能够支持他们关于共和国的政治掮客都是“必须消灭的恶魔”的信念。[25]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些恶魔归为同一类仇敌：“秃鹫先生”。[26]在讽刺漫画家们笔下，这位先生往往有一个“犹太人的”大鼻子。

《自由言论》使得反犹漫画在巴黎随处可见。1893年12月，德吕蒙发行了该周报的免费特刊，首页的整版插图题为《犹太人的品质》。这幅素描对一个丑陋的鹰钩鼻犹太人的头部进行分区，各自标记着“诚实”“慈善”“敬神”“爱国”等品质。每一个分区中画着一个小小的、违背所列特质的简笔人物画：偷窃他人的口袋、对慈善事业嗤之以（鹰钩）鼻、对着一枚金币膜拜，以及拒绝参军等。这最后一则小品画让人想起洛尔·德·舍维涅曾指责她的好友、骑师俱乐部的犹太会员阿斯逃避服兵役之事。

“爱国”这个分区还为德吕蒙在后来那个丑闻中的立场埋下了伏笔，没过多久，那件丑闻就轰动全国，让无政府主义者和巴拿马运河事件都相形见绌了。1894年冬，法国军队的一位阿尔萨斯犹太人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诬陷为普鲁士间谍：《自由言论》是第一个重点报道德雷福斯“叛国”事件的出版物。在报道上尉被捕新闻的那一期头版，德吕蒙刊登了一幅整版漫画，画的是他自己用一对垃圾夹把“犹大德雷福斯”清扫到下水道里。插图说明是：“法国的人民啊，过去八年我每天不厌其烦地对你们说什么来着？”除了头戴有尖的普鲁士头盔，额

头写着“叛国者”，巨大的鹰钩鼻上还架着长柄眼镜之外，被德吕蒙的夹子夹住的德雷福斯与《犹太人的品质》中的那个恶棍一模一样。



埃杜瓦尔·德吕蒙的《自由言论》首页刊登的这些人物角色在普鲁斯特的同代人中激起了反犹情绪。（左）《用加尔[27]的方法研究得出的犹太人的品质》，**1893**年**12**月**23**日。（右）《关于犹大德雷福斯》，**1894**年**12**月**16**日

在上层，无政府主义者时断时续的疯狂发作提醒着人们特权的脆弱性，令人胆寒。上流社会的成员们遵循着一套仪式化习俗和后顾性传统，仿佛生活在时间隧道中。荒谬的是，他们想象自己生活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六的君主制度下，反而比想象生活在梯也尔或卡诺总统治下来得容易。然而尽管如此，在生活中常常参照旧制度却又让他们对终结旧制度的灾难记忆犹新。每个人的具体记忆不同——最精通此道的当属洛尔·德·舍维涅，她如今自称“弗罗斯多夫的幽灵”[28]——但那种记忆就在

一个极端不适的隔离带附近盘旋。

世界各地的消息都表明，王室机构脆弱而不堪一击。1881年3月，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父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无政府主义者导演的一场爆炸中，惨死于圣彼得堡。从那以后，弗拉基米尔大公为防被暗杀，无论去哪里都要背墙而坐，即使来法国寻欢作乐也不例外。他最富裕的巴黎朋友们，像格雷弗耶夫妇，总会在他和大公夫人来塞纳-马恩地区时专门花钱加强安保。

就在萨冈爆炸前一个月，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警方挫败了一起谋杀该国执政者费迪南亲王的阴谋。[29][30]伊丽莎白·格雷弗耶或许私下里为情敌的经历而幸灾乐祸；她在一个“国际事务”卷宗中保留了一张关于该事件的剪报。（她还加倍努力自学时事，联系她的共和派朋友、不久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长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每周为她送来新闻综述。）除此之外，费迪南亲王与死亡擦肩而过进一步加重了上层的焦虑。亲王虽然为人古怪又远隔千里，但他是奥尔良家族的后代，因而也是上层的一员。想要谋杀他的凶手在1892年8月被处决，也没有给他在巴黎的同情者们带去多少安慰；甚至还有可能引发他们国内更多的麻烦。罗什福尔报道暗杀者在索非亚被处绞刑，要求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起来反对“‘机枪手’加利费……之流的刽子手”，因为保加利亚人一定会继续反抗“绞刑吏费迪南”的。[31]

面对仇恨言论，加利费不得不乘坐防弹马车行走在巴黎街头。但他仍然固执地出现在社交界各处。位于“后院和花园之间的”各处府邸会给他和他的同伴们一些安全感，因为那些房屋的接待室与街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像斯特劳斯家那样的公寓则缺乏这种缓冲。热纳维耶芙客厅的窗户正对着大街，也完全暴露在大街的视线之内。因此只要加利费的敌人们想这么做，看到他在那里就向夹层公寓投一枚炸弹也并非难事。

无政府主义在巴黎肆虐的那几年，热纳维耶芙的通信又出现了一段

很长的空白期，因而很难说她是否曾担心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会尾随加利费进入她的家门。在现存的写给她的信中，将军对危险轻描淡写。[32]“‘1871年的机枪手’——这么说有些夸张了，”他引用关于自己的最新负面报道安慰她说，“但既然传说盛行，我再推卸与之相应的责任就有些低级趣味了。”[33]作为一个军人、持剑贵族和交际家，加利费有三重理由对此类威胁一笑而过，哪怕只为追求高尚品位，也要坚持传统，勇敢无畏地泰然处之。

就算那些素日不与加利费交好的社交界中坚力量也有理由担心，因为引爆者的目标既然是让娜·德·萨冈、弗洛迪米尔·德·孟德斯鸠和威尔士亲王伯蒂这类与军队无关的人物，就意味着上层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社交人士在聚会上的标准反应是很快提一句最近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好可怕啊，这些爆炸！”——就迅速回到更宜人的话题。但有些贵族敢于直面威胁。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宣称她素来“善待（手下的）工人们”（就是她家里和家族的香槟企业——凯歌香槟——雇用的那些人），“他们不会想去炸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要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就好了”！[34]她的地位至高无上，便自认为有权偶尔扮演古板女教师的角色——她非常清楚贵族同伴们不像她那样“善待”下人——但没有一个人领情。



斯特劳斯夫妇的夹层公寓（右）就在萨顿裁缝铺上面的拱形窗户里，正对着街上潜在的引爆者，十分危险

素来放肆无礼的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则公然对叛乱者表示欣赏，在高顶礼帽上别一枚红色的无政府主义帽章，还吹嘘他与亨利·罗什福尔十分要好。[35]他会在社交场合堵住那些乏味的孀居贵妇，深知她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就对她们谈论流血事件可怕的崇高性和革命“永恒的黑色诗意”。[36]他认为如果动乱导致她们这个圈子里的某些人死亡，那么剩下的人会因此而更加高贵，“就像远东人常说的那样，如果某些枝头上的花蕾被剪掉了，邻近的花儿会越发鲜艳”。[37]他甚至引用一位无政府主义诗人关于下议院遭袭的打油诗：“只要姿态优美，哪管被害的是谁？”[38]孟德斯鸠意在激怒自己的贵族同伴，他激进的高谈阔论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道出了他们肤浅的道德观。通过美化社会动荡的危险性，他给这些危险赋予了坚持纯粹形式的正统性，因而削弱了恐怖的锋芒。

社交界的陈词滥调没有那么耸人听闻，但也有同样的功效。它们也执着于事物的表象，为恐怖的炸弹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盖上一层“优

雅”的面纱。鉴于无政府主义者暴动的背后往往有其经济动机，德·奥松维尔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这类圣经格言就意外地变得切中时弊了。如果把这句话诠释为贫穷是人类存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就很容易从逻辑上说服自己相信拉瓦绍尔和埃米尔·亨利之流此战注定会失败，无论他们的对手是“秃鹫先生”还是上帝的意志。这样的推论无论多么华而不实，至少能给他们一些虚幻的抚慰，让下一次恐怖主义爆炸的威胁变得不那么可怕。

普鲁斯特的《城里的一次晚宴》（“Un dîner en ville”，1895）是他这些年出版的作品中唯一一篇提到无政府主义袭击的文章，其中戏剧化地描述了社交界退而陷入陈词滥调的现象。故事的背景是一位弗雷默夫人在右岸的宅邸中举办的晚宴，这位“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中产阶级女主人“习惯于把大作家介绍给公爵夫人们”，还颇为促成了这两个阵营的“和谐交谈”而自豪。[39]她的客人包括一位“德·沃居埃夫人的亲戚”[40]，一位“莫里斯·巴雷斯夫人的信徒”（这两个名字都取自斯特劳斯夫人的小圈子），一位名叫奥诺雷、深知最好不要对餐桌同伴谈论文学的“很英俊”的年轻人[41]，还有一些来自蒙索平原的乏味无聊的太太。奥诺雷观察到，客人们和女主人及其丈夫（一位富有而贪婪的资产阶级）一样，“全都有着同一个愚行：势利”。[42]因此，这群人在整个晚宴上谈论的也就是一些家长里短。

到晚餐快要结束时，谈话才开始变得有内容。在餐后休息时，桌上的蜡烛快要熄灭，觥筹交错，戒备心没那么重了。“绅士们开始抚摸坐在身旁的女士们的膝盖”，过了一会儿，弗雷默夫人的客人们无意中开始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严肃讨论”。[43]但普鲁斯特没有详细描述这群人谈论的细节，而是把发言权给了晚宴的女主人，她用一套令人安心的陈词滥调结束了关于恐怖主义的谈话（以及整个故事）：

> 仿佛顺从地向某个无可争辩的自然法则低头，弗里曼夫人

> 慢条斯理地说：“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世上总是有富人和穷人的嘛。”听到这里，所有的客人——他们中最穷的人每年也有十万法郎收入——都如释重负，愉快地喝下了最后一杯香槟。[44]

弗雷默夫人虽然出身平民，却表现出一位“有生”名媛的良好直觉。她把客人们的注意力从无人乐见的政治现实中引开，让他们继续愉悦地幻想自己骄纵而富裕的生活是永恒不变的现实。

《城里的一次晚宴》以结尾不露声色的反讽，重现了普鲁斯特的“山茶花时期”其他一些社交界素描中出现的淘气的社会批评。然而他讽刺贵妇人口中“世上总是有……穷人”这种自私自利的沾沾自喜，并不意味着他自己关心社交界其他人宁愿无视的社会弊端。恰恰相反，普鲁斯特自1890年代以后发表的文学作品（除了上文引用的段落外）不仅完全避免提及当代政治动荡，他在那十年中写的几百封信中也无一处写到无政府主义恐怖、投弹手被处决、“流氓法案”或卡诺总统被暗杀。他也从没有述及劳动节冲突、巴拿马运河乱局或德吕蒙和罗什福尔的反犹论战。[45]普鲁斯特后来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反犹派对立，但在那以前，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事务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兴趣。[46]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他对时事漠不关心归咎于少不更事。毕竟，巴黎的爆炸开始时，普鲁斯特只有20岁，卡诺被杀时他也只有22岁。不过，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和普鲁斯特一样年轻，家境也同样富裕。此外，那时候他至少有一位朋友已经开始严肃地研究经济不平等、工人权利以及社会和教育改革的问题了。比普鲁斯特晚一年、1890年从康多塞毕业的达尼埃尔·阿莱维，开始充满激情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47]令他的奥尔良派父母恼怒的是，达尼埃尔在巴黎读大学的大部分时间都去探访工人阶级社区、走访当地人，为一部（从未完成的）现代社会主义研究做笔记了。

就算不提达尼埃尔和他的研究，普鲁斯特的社交圈也没有完全把他和那个时代的政治动荡隔离开来。阿德里安医生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地位继续为他获得重要的政府声誉和任命，通过他，普鲁斯特及其家人与共和派的很多官员都非常熟络，包括未来的共和国总统菲利·福尔（Félix Faure）及其家人。（福尔的两个女儿露西和安托瓦妮特是普鲁斯特最好的两个童年玩伴，起初正是安托瓦妮特给他那份最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问卷）。普鲁斯特一家与巴拿马运河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居斯塔夫·埃菲尔也走得很近，埃菲尔的姐姐是让娜·普鲁斯特的闺蜜。

作为斯特劳斯夫人沙龙的常客，普鲁斯特与像埃菲尔那样卷入巴拿马灾祸中的国人有了很多联系。新入伙的忠实信徒莫里斯·巴雷斯当时还是布朗热派的新代表，是政府方对这次欺诈批评最激烈的评论人之一，而埃米尔·斯特劳斯则为其中一位犯人提供法律辩护。由于他和当事人都是犹太人，斯特劳斯成为反犹主义者发泄怨怒的对象，身败名裂的雅克男爵的侄子约瑟夫·雷纳克也一样。此外和热纳维耶芙所有的忠实信徒一样，普鲁斯特也不得不忍受和加利费一起待在夹层公寓可能遭遇的危险。［不过在他这些年的通信中，普鲁斯特只有一次提到将军，还是跟礼仪有关："德·波利尼亚克亲王对加利费以（非正式的）'你'相称。"[48]］1893年与《酒筵》合并、普鲁斯特还为其撰写了好几篇文章的文学杂志《白色评论》在这一时期成为无政府主义同情者的主要文学刊物。[49]它的一位编委会成员甚至曾作为卡诺暗杀事件的嫌疑人接受过审判。

如果说普鲁斯特在这一时期有过任何政治观点，它们也是模糊但偏右的，这或许也让他的父亲大吃一惊，其程度不亚于达尼埃尔·阿莱维的社会主义观点给卢多维克带来的震撼。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是个坚定的共和派，这也符合他白手起家的经历和在政府中的地位。让娜·普鲁斯特的政治观点不那么容易归类。和许多历史悠久的法国富裕犹太人家族（包括阿莱维家族）一样，魏尔家族在历史上也一直倾向于支持

开明的奥尔良派君主。让娜保留着那一偏见，同时也——作为一个顺从的妻子和没有选举权的公民——明确支持丈夫的政治主张。普鲁斯特说她同情“奥尔良共和派”，这听起来是个不协调的古怪组合。[50]

年轻的普鲁斯特看似吸收了母亲的君主派观点——他的朋友安托瓦妮特·福尔曾奚落他“对奥尔良派心驰神往”——同时又拒绝母亲的共和派成分。[51]他仍然一心沉浸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文学中，似乎首先对旧制度的理想化图景充满乡愁般的眷恋。1894年4月，他出席了一次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新展览的开幕式。展览展出了她生前死后的遗迹，展品都是从许多声名显赫的贵族家族（拉罗什富科、孟德斯鸠、德·于扎伊）那里借来的。[52][53]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

> 我谴责大革命的，是它全面摧毁了一切优雅和美好的东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尊严……（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利夫人的禁奢蠢行。[54]

在安托瓦妮特·福尔看来，普鲁斯特对大革命“诗意”的反感显示了“（他）根深蒂固的世故，乃至（他的）势利”。[55]他反驳说他“不是斯特劳斯那样浅薄的势利小人”，把他与这么一个毫不敏感、不得人心的暴发户归为同类让他很“伤心”。他对自己的思想意识观念不置一词。安托瓦妮特的结论不无道理，至今仍然能在普鲁斯特学者中引发共鸣。如让娜·卡纳瓦贾（Jeanne Canavaggia）所述，“普鲁斯特和政治？总的来说，提出这个问题只会引来一个面带微笑的回答：‘公爵夫人’”。[56]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普鲁斯特在20岁出头的岁月里无视政治，那么他这么做是故意的。他自觉地决定关注社交界及其行家里手，将时事排除在外。不仅189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就连他的信件中也充斥着大量的贵族姓氏，这证明了安托瓦妮特·福尔的观点。那些姓氏多半属于普鲁斯特有待结交（如坏脾气的交际家德·杜多维尔公爵，他曾希望骑师俱乐部是“整个巴黎终归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不计个人成就的”[57]）或未

曾有机会结交的人（如巴黎伯爵一家）。与他好奇的对象素不相识并没有阻止普鲁斯特热心地讨论他们。他喜欢传播二手八卦——“我听说德·莱昂亲王夫人蕙质兰心”[58]，还喜欢从比他人脉更广的朋友那里收集信息——“据说有一次……有人问德·拉特雷穆瓦耶夫人对爱情有何看法，她粗鲁地答道：‘我常常做爱，却从不曾谈情说爱！’是真的吗？”[59]

在文学小团伙看来，普鲁斯特眉飞色舞地谈论社交界印证了他们的担忧，他的确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势利眼。雅克·布朗什恳求他对社交界的熟人们多一些怀疑的态度：“你必须傲视他们——就像他们轻视我们那样。”[60]普鲁斯特早期对上层最一针见血的描写表明，他的确能够很无情地看待“他们”。然而他毕竟年轻，无法始终如一地坚持一种观点。布朗什不愿意看到才华过人的好友“平和甚至合作地”顺从贵族们极为“无礼的冒犯”。布朗什写道：

> 如果我哀叹他把自己的天才都浪费在这些贵族子弟身上了，（普鲁斯特）会为自己辩解说：“我向你保证亲爱的老X（或其他某个贵族姓氏）非常善良；请别见怪，我得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好心的朋友；他帮过我很多忙！你要是知道罗罗曾为我做过什么事就好了！他给我看了里卡德为他的祖母德·X侯爵夫人画的肖像，还有曾经属于他的叔叔、元帅德·X亲王的手杖，那些都放在一个秘密的小隔间里，得用枚胸针才能打开，里面还有一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书——是不是很伟大？”

没什么伟大的，阅读普鲁斯特哪怕刚刚20岁出头写的那些优秀作品，我们也会觉得，以他的过人才智，不该如此浅薄地故弄玄虚。但正如一位天文学家花了很长时间用望远镜观察一个星系，最终克服重重困难进入那里一样，普鲁斯特也“任由《哥达年鉴》……的熠熠星光”把“自己（晃得）目眩神迷”。[61]

当朋友们抱怨他对城区过于热心时，普鲁斯特坚称他在那里寻找文

学灵感，并不是为了攀附权贵。在《让·桑特伊》（1896—1899）中，他带着认真的急切、自我辩护的戒备和自我贬低的复杂心情，写到了那些“痴迷于社交界”的作家：

> 很少有文人像世人以为的那样，是不谙世事的势利眼。当（此人进入社交界时），他对自己说的不是：“我想来这里，我想成为社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他）对自己说：“我想感受一切，体验一切……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描写生活，我想要过一遍这里的生活。”（不过当然，这个理由并没有促使他去体验贫穷……和富裕一样，贫穷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62]

在括号里这句揶揄的结尾中，普鲁斯特承认文人去写穷人也会和写特权之人一样成果丰硕。不过他继而解释说，当作者们追求“富裕”时，真正的动力是渴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他们“渴望自己始终缺乏的东西——因为他们对社交界的了解全是自己的想象……”[63]上层之所以吸引艺术家，是因为它并非他们伸手可及之物（而贫穷多半是）。重申比贝斯科亲王夫人的概念：“在巴黎市中心，它构成了一个远离市井平民的世界，就像高高在上的月亮之于地球。”普鲁斯特认为，正是这一距离启迪了作家的想象力，促使他去创作。为了精准地描述它，他或许要尽力让自己进入那个王国，近距离地审视它。但他的艺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感知自己与那个吸引他的平流层之间的无限空间，那里灿若繁星、高不可攀、遥不可及。

这是他自始至终的观点。早在1892年，普鲁斯特就写了那个关于珀西的悲伤的童话故事，只有在公主和城堡远离他时，他对那一切的迷恋才会不断涌现。20年后，他还将把那个童话故事重写成《追忆似水年华》，让他的叙述者沿着长达4000页的一连串类似的魅惑和骗局循环往复。然而在刚刚成年时期面对政治剧变、反犹主义歇斯底里和无政府主

义愤怒的背景，普鲁斯特对遥不可及的优雅的审美却带有另一层含义。他对“一切优雅和美好的东西”的迷恋暴露了他对贵族阶层的浅薄道德观的喜好，这令人困扰，因为在较为清醒的批判时刻，他声称自己谴责的正是这种道德观。

年轻时的普鲁斯特大概已经是一位挑剔的读者和天才的作者，不会对陈腐、浅薄的措辞有多少耐心。但他还没有成熟、不够自觉，也还没有无情地幻灭，还不知道他关于显赫姓氏便一定对应着高贵人品（德·莱昂亲王夫人对应“蕙质兰心”，“某一个公爵的姓氏”对应模范的友谊）的想象本身就是浅薄和陈腐的。当动荡、偏见和恐怖在他的城市和国家肆虐时，普鲁斯特却把自己的一部分，并非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献祭给了上流社会的表象崇拜。

---

[1]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65.

[2] LG，*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60. MP本人在RTP中写道，他的第二自我马塞尔在阿斯的第二自我斯万眼里一定“像个小笨蛋”。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543.

[3] 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149.

[4] 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François Sadi Carnot，1837-1894），法国工程师出身的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胜利的组织者”拉扎尔·卡诺之孙，左派议员伊波利特·卡诺之子。1887年当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四任总统。1894年6月24日遭到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桑特·格罗尼莫·卡塞里奥刺杀，于午夜过后死亡。

[5] 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372. 关于这次“为期两年的无政府主义疯狂”，又见Eugen Weber，*France Fin de Siècl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09-17。关于同时代整个欧洲和美国的无政府主

义的兴起，见E. Weber，*France Fin de Siècl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Les Attentats anarchistes，” in L’Intransigeant，December 12，1893，2；and Albert Bataille，*Causes criminelles et mondaines de 1894*：*Les Procès anarchistes*（Paris：E. Dentu，1895），xi-xvi。

[6] Jean de Paris（pseud.），“La Dynamite chez la Princesse de Sagan，” *Le Figaro*（March 1，1892）：2-3；“La Dynamite à Paris：L’Hôtel de Sagan，” *Le Petit Parisien*（March 1，1892）：1；Le Masque de fer（pseud.），“Hors Paris，” *Le Figaro*（March 2，1892）：1-2；“La Dynamite：Attentat contre l’hôtel de la Princesse de Sagan，” *Le Petit Journal*（March 1，1892）：1-2；and “Faits divers：La Dynamite à l’hôtel de Sagan，”《吉尔·布拉斯报》（1892年3月2日）：2。

[7] An American（pseud.），idem.

[8] Marquise de Dangeau（pseud. of Comtesse de Vérissey），“Chronique mondaine，” *La Mode de style*（July 1，1891）：208-211，211；and Diable Boiteux（pseud.），“Nouvelles et échos，”《吉尔·布拉斯报》（1891年6月7日）：1。

[9] 富尔米（Fourmies），法国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一个市镇，位于该省东部，属于埃尔普河畔阿韦讷区。

[10] 关于城区第二次爆炸的目标，见Luc Sante，*The Other Paris*（New York：Farrar，Straus，& Giroux，2015），248；and Will-Furet（pseud.），“Faits divers：L’Attentat du boulevard Saint-Germain，” *Le Gaulois*（March 14，1892）：2。关于上流社会对“无政府主义阴谋和可恶的爆炸”的焦虑，见Pauline de Broglie，*Comtesse de Pange*，*Comment j’ai vu 1900*（Paris：Grasset，1962），58。

[11] 这里给出的关于巴拿马运河的信息均参考了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95-99；Maurice Barrès，“The Panama Scandal，” *The Cosmopolitan* 17（May-October 1894）：203-10，204；HB，*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316-17；and Augustin Hamon and Georges Bachot，*L’Agonie d’une société*：*histoire d’aujourd’hui*（Paris：Albert Savine，1889），12。

[12] EdG，日志，1892年5月1日的日记。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以炸药为武器，见E.C. [*sic*]，“Dynamite，” *L’Oued-Sahel*（March 20，1892）：1；and “La Dynamite，” *Le XIX*e *siècle*（October 31，1892）：1。

[13] John Merriman，*The Dynamite Club*：*How a Bombing in Fin-de-siècle Paris Ignited the Age of Modern Terror*（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82. 关于拉瓦绍尔，又见Philippe Dubois，“L’Affaire Ravachol-Koenigstein，” *L’Intransigeant*（April 8，1892）：1-2；Jean de Paris（pseud.），“Les Anarchistes，” *Le Figaro*（April 5，1892）：2；Saint-Réal（pseud.），“La Détente mondaine，” *Le Gaulois*（April 6，1892）：1；and “Ravachol，” *Le Petit Parisien*（April 3，1892）：1-2。

[14] “LA DYNAMITE AU PALAIS-BOURBON，” *Le Journal*（December 10，1893）：1-2；Jules Dietz，“L’Attentat du Palais-Bourbon，” *Journal des débats*（December 10，1893）：1；“L’Attentat du Palais-Bourbon，” *Journal des débats*（December 11，1893）：1-2；“L’Attentat du Palais-Bourbon：Découverte du coupable，ses aveux，” *L’Intransigeant*（December 12，1893）：1-2；Saint-Réal（pseud.），“Chez le défenseur de Vaillant，” *Le Gaulois*（December 13，1893）：1. 有趣的是，瓦扬的律师是一个名叫迈特尔·阿尔贝·克雷米厄（Maître Albert Crémieux）的人。如本书第11章所述，MP母亲家与颇有实力的克雷米厄家族是亲戚。我无法确定阿尔贝·克雷米厄是否是该家族成员。

[15] “Chronique électorale：conscience et liberté，” *La Croix*（August 11，1893）：2；“Chronique électorale：dans les départements—Melun，” *Le Rappel*（August 12，1893）：1；and Jacques Saint-Cère（pseud.），“Les Nouveaux Elus，” *Le Figaro*（September 13，1893）：2.

[16] 关于4月26日的爆炸，见Associated Press Dispatches，“Panic-Stricken Paris：Consternation Reigning at the French Capital，” *Los Angeles Herald*（April 27，1892）：2；Walter F. Lonergan，*Forty Years of Paris*（London：T. Fisher Unwin，1907），177-78；and Alan Sheridan，*Time and Place*（London：Scribner，2003），229。

[17] 关于蒙马特尔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酝酿疯狂的温床，见Merriman，*The Dynamite Club*，60-62。

[18] Eugen Weber，*France Fin de Siècl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10.

[19] Flor O’Squarr（pseud. Charles Flor），*Les Coulisses de l’anarchie*（Paris：Albert Lavine，1892），88-89. 关于加利费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替罪羊，见Charles

Malato，*De la Commune à l'anarchie*，3rd ed.（Paris：Tresse & Stock，1894）。

[20] 金牛犊（Golden Calf），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的一尊偶像。根据希伯来《圣经》的记载，金牛犊是亚伦制造的，以取悦以色列人。

[21] Frederick Brown，*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New York：Anchor Books，2010），167.

[22] Merriman，*The Dynamite Club*，125. Merriman提到罗什福尔这位直言不讳的布朗热派在将军逃跑之后被流放到了英格兰，此事属实。但Merriman说罗什福尔是《强势报》的"记者"（Merriman，*The Dynamite Club*）则有误；他是该报纸的创始人。

[23] Frederick Brown，*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New York：Anchor Books，2010），171.

[24] Flor O'Squarr（pseud. Charles Flor），*Les Coulisses de l'anarchie*（Paris：Albert Lavine，1892），84.

[25] Flor O'Squarr（pseud. Charles Flor），*Les Coulisses de l'anarchie*（Paris：Albert Lavine，1892），311。

[26] Jean Conti，*Monsieur Vautour*：*pièce en un acte*（Paris：Éditions Théâtrales，1911）.

[27] 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原名弗朗兹·加洛（Franz Gallo），是德国神经解剖学家、生理学家，率先研究了大脑中不同区域的心理功能。

[28] MB，*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67 and 106.

[29]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虽然讨厌费迪南亲王，但后者在1880年无意间拯救了整个俄国皇室，令其躲过了另一次暗杀行动。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冬宫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预备在罗曼诺夫皇朝的成员晚餐时引爆。但当晚来皇室做客的费迪南亲王迟到了很久，以至于炸弹爆炸时，餐厅还空无一人。他的粗鲁和虚荣救了皇室一家的命。——作者注

[30] 关于针对费迪南亲王的暗杀计划，以及弑君未遂者的处决，见Félix de Régamey，"La Guerre de demain，" *Le Figaro-graphic*（January 25，1892）：3。

[31] Henri Rochefort，“Les Policiers possibilistes，” *L’Intransigeant*（August 8，1892）：1。

[32] Galliffet致GS，NAF 14383，folios 93/94-109/110。

[33] Galliffet致GS，NAF 14383，folio 104/105。

[34] Flor O’Squarr（pseud. Charles Flor），*Les Coulisses de l’anarchie*（Paris：Albert Lavine，1892），51.

[35] LD，*Fantômes et vivants*，283-84；and Bertrand，op. cit.，vol. 1，33，n. 2.

[36] RM的这个表达方式是从埃米尔·左拉那里剽窃来的。Patrick McGuinness，*Poetry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Fin-de-siècle France*：*Anarchism to Action Françai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90.

[37] Thiébaut，op. cit.，17.

[38] Alvan Francis Sanborn，*Paris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Boston：Small，Maynard & Co.，1905），367.

[39] MP，《城里的一次晚宴》，PJ，159。

[40] MP，《城里的一次晚宴》，PJ，153。

[41] MP，《城里的一次晚宴》，PJ，153。。

[42] MP，《城里的一次晚宴》，PJ，158。

[43] MP，《城里的一次晚宴》，PJ，159。

[44] MP，《城里的一次晚宴》，PJ，159。

[45] 就算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MP也从未在信件中提到过罗什福尔或ED，我打算在本书的一个续作中进一步探讨他为何避之不谈。

[46] JS中的确有一个很长的段落写德雷福斯事件，用较短的篇幅写巴拿马丑闻，还顺嘴提了一句拉瓦绍尔（提到他是为了制造喜剧效果，一位夸夸其谈的小资产阶级觉得声称喜欢“拉瓦绍尔的姿态优美”会让自己听起来很有“艺术气质”）。但JS（a）在MP生前并未出版，（b）写于1896年到1899年，在这里讨论的时期之后。

[47] 关于DH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见Sébastien Laurent，*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Paris：Grasset，2001），67-70。巴雷斯强烈谴责巴拿马丑闻的例子，见Barrès，“The Panama Scandal，” 203-10。对ES作为巴拿马丑闻的被告律师的反犹主义反应，见Augustin Hamon and Georges Bachot，*L’Agonie d’une société*：*histoire d’aujourd’hui*（Paris：Albert Savine，1889），19。

[48] （1899年9月10日）MP致母亲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2（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304。当时加利费担任陆军部长，已经成为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一个争议人物。

[49] Claire Paulhan，*“La Revue blanche*：*tout l’esprit d’une époque，” Le Monde*：*Le monde des livres*（December 6，2007），n.p.；and 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372-73.

[50] （1887年7月15日）MP致安托瓦妮特·福尔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96。

[51]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95。事实上，如果MP对君主制有任何喜好，那大概也和他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与他的文学视野密切相关，因为他热爱17世纪文学，整日沉浸在国王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世界里。如MP和LC未来的朋友René Boylesve在*Feuilles tombées*（Paris；Schiffrin，1927），147中所写的，“拉辛（描述了）作为国王之臣民的人类，被极端‘君主化’的人类”。这一“君主化”的世界也是圣西蒙和塞维涅作品的主题，它们也是MP的主要参照系。

[52] 出于未明说的理由，格雷弗耶家族没有把他们名下曾经属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钟表出借展览。——作者注

[53] MP事实上本打算在展览上与RM和加布里埃尔·德·伊图里会合的，但他到得太晚了，见（1894年4月）MP致伊图里的信，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86-87。该展览的目录，以及出借自有藏品的家族的名称，见*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de Marie Antoinette et son temps*，由Germain Bapst作序（Paris：Galerie Sedelmeyer，1894）。

[54] Maurice Duplay，*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Paris：Gallimard，1972），123.

[55]（1887年7月15日）MP致安托瓦妮特·福尔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95。

[56] J. Canavaggia，*Proust et la politique*（Paris：A.-G. Nizet，1986），7. 在这本书中，卡纳瓦贾简略地探讨了MP在JS中写到的巴拿马丑闻之事（21-25）。

[57] Guillaume Hanoteau，*Paris*：*Anecdotes et portraits*（Paris：Fayard，1974），90.

[58] MP，in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26.

[59] 署期为“这个周四”（1893年1月26日？）MP致RB的信，MP，in 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199。

[60] JEB，*Mes modèles*，109.

[61] JEB，*Mes modèles*，109.

[62] MP，JS，427-28.

[63] MP，JS，426-27。

第24章 须臾之物的王（1894年5月30日）

对这段时期的普鲁斯特而言，优雅的化身暂时是一个男人。

身形瘦削、面相不善的孟德斯鸠挥舞着手杖，仿佛那是决斗者的花剑。[1]他从未有过一丝乱发，黑色的卷发就像一幅凝固的汹涌海景：那是发蜡和自律的功劳。他穿着时髦，“一身烟雾灰或墨纸灰的西装，裁剪细节透着一股潇洒的夸张”，领结处戴一束紫罗兰，帽檐上别一枚红色的无政府主义帽章，能与他的朋友乔万尼·博尔盖塞胸口上的那枚马耳他骑士团的红色十字徽章相媲美。[2]孟德斯鸠离不开意大利亲王，却又对他决绝而无情，用诗歌来嘲笑他众所周知的贫穷处境：

关于他的庇护人施洗约翰，

乔万尼·巴蒂斯塔只剩下

他手里那只乞丐的碗，那只盘子被传来传去，

求人们施舍下一顿饭。[3]

孟德斯鸠和他的毒舌好友吉米·惠斯勒念着这首诗，大笑了好一阵子。

孟德斯鸠不但自己发明了很多诗意比喻，还启迪他人创作了不少。他瘦长结实的体形看上去就像一只穿着大衣的灵缇或“一株在无休止的风暴中摇摆的剑兰”。[4]他的性情“像他的身体一样晃荡，他穿着高跟鞋，身体后仰的幅度过大，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5]他目露凶光地瞪着对手，那双眼睛就像一对在釉彩的白垩地壳下面焖烧的黑色岩浆池。他长着一个放肆无礼的鹰钩鼻、两撇得意扬扬的达达尼昂式胡须，贵气

十足，拒人于千里之外。惊世骇俗的传说在他与世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堡垒，“虽是杯弓蛇影，却也坚如磐石”。[6]

孟德斯鸠努起嘴唇，仿佛尝到了什么恶臭的滋味——下等人呼吸的空气让他的舌尖发苦。作为墨洛温王朝的一个分支——“我的叔叔希尔德贝尔特”[7]虽然已经死了1300年，却仍然在精神上与他血脉相通——他活得“像个被流放的国王”。[8]事实上他如今更是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因为他最近刚刚从圣日耳曼区搬到凡尔赛的一座18世纪华美建筑中，与那座波旁王宫位于同一条道上，相距仅半英里。他喜欢那座建筑的历史：它的前主人包括路易十六的一位持剑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位管家，以及路易十五的一个女儿。伯爵花了4.58亿法郎修复这座建筑，然后用自己的名字为它命名——“孟德斯鸠公馆”。[9]

在变更住址的同时，孟德斯鸠换上了一副新人格——“蝙蝠们的月亮王”，生活在波旁王朝落日投射的阴森恐怖的阴影之下。[10]挽歌作者孟德斯鸠为一个沉没的王国高唱赞歌，说那些“只求庄严地倒下的石头”惨遭屠杀。[11]在下垂的眼睑后面，他看到了“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太阳王……太阳王在夜间死去，深紫的棺椁上泛着黄色和淡紫色的天光水影”。[12]他曾在梦里见到过断头台，一条溅着鲜血的珍珠项链。[13]



到孟德斯鸠**1894**年迁入凡尔赛时，前王宫已经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但当时并没有很多游人来参观

孟德斯鸠的每一次谈话都是独白，每一段独白都是表演。他“神情古怪地嘎嘎大笑，话音尖锐刺耳，用女高音的声音嗤笑，还用一只戴着精致手套的手掩住发黑的小牙齿”，手套上戴满了珠宝戒指。[14]每当他高谈阔论时，那些闪闪发光的纤细手指就在空中画出奇异的图画。他是个皮影戏王、幽灵书法家，“云彩雕塑师”！[15]他用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几位诗人——雨果、波德莱尔、他本人——的诗歌作为缎带，把自己的言论包裹起来，作为献给听者的礼物。

孟德斯鸠举办晚会时，不光拿起自己的鲁特琴，还会雇用整整一支乐队，他为新居落成而举办的聚会就是这样。他把乐手们安排在屋后那座法式花园的装饰性树林里，种植风格模仿的就是半条街外的那座城堡。孟德斯鸠花园里的某些雕塑是那些仍然伫立在王宫废弃杂树林里的雕塑的复制品：月亮和狩猎女神迪安娜，阴影王后普洛塞庇娜。[16]其他雕塑会让人想起路易十四那座动物园里离散已久的栖居者：一只铜雕的长腿苍鹭，一头有干草垛大小的大象。

从低层的白色公馆出来，有多条修剪整齐的小径向外辐射出去，途经苔藓丛生的雕塑，沿着一个草坡通向孟德斯鸠的日本温室，那是摆满菊花和日本盆景的缩微博物馆。然而室外景观的焦点是他在花园正中央建起的一座小型洛可可式戏院，周围种满了茂密的蓝色绣球花。[17]这座戏院用散发着清香的幼松板材建成，屋顶是拱形的帆篷，墙上悬挂着用错视画法画成的摇摇欲坠的廊柱，构成了一种视觉陷阱——那也是凡尔赛宫景观的拟像。



孟德斯鸠的新公馆面对着穿过凡尔赛镇通向王宫的三条东西向大道中的一条

戏院里面有一个低矮的舞台，一位少年钢琴家会在那里弹奏肖邦、李斯特和福莱的作品。其后，巴黎舞台上的明星会朗诵18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指孟德斯鸠）的作品，他的头顶上有一条巨大的饰带，上面写着“须臾之间”。这个形容词是伯爵倒写姓名缩写（FMR：费赞萨克·孟德斯鸠·罗贝尔）的同音异义字，让人想起他的座右铭：“我乃一切须臾

之物的王。”[18]就像被朗诵的诗行和被演奏的音乐，就像一缕缕薄纱，“轻柔的，细密的”，在纺织的同时就消失了。[19]孟德斯鸠所谓的“文艺聚会”将向这些须臾之间的奇迹致敬，也向他自己——统治它们的王——致敬。[20]

至于宾客名单，孟德斯鸠从他声称对他效忠的几个敌对阵营中选择受邀者，分别由他的两位主宾代表：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和莎拉·伯恩哈特。他从上层邀请了自己的朋友（洛尔·德·舍维涅、罗莎·德·菲茨-詹姆斯）和敌人（德·萨冈亲王、亨利·格雷弗耶），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有生阶层”玫瑰经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圣珠。孟德斯鸠邀请仇敌的理由是，他知道他的艺术表演趣味高雅，定会让他们为自己的愚蠢而自惭形秽。一想到他们失败后的绝望，就像溺水者拼命朝闪着暗绿色阳光的水面挣扎，水面越来越远，他们肺部收缩、双眼突出、鼓起的嘴向某位不屑一顾的神祈求着，却注定无果。格雷弗耶显然一想到此就吓坏了，婉拒了邀请。而萨冈，愚蠢的萨冈，竟接受了邀请，毫不知情地准备实现孟德斯鸠很久以前关于他的预言——用雨果那句目空一切的名言说，如果我们中间还剩下一个人，那一定是我。



孟德斯鸠请人在花园里建了一座日式装饰性建筑，除此之外，那里的景观很像凡尔赛宫。他摆出一边沉思、一边用一根天鹅羽毛写字的姿势。摄影：热热·普里莫利

孟德斯鸠麾下培养了一群天才，他从那里召集著名的画家（勒梅尔、德太耶）、诗人（波托-里什、雷尼埃）和其他“语词的魔术师”（冈德拉、巴雷斯）。他还召集了外甥女那三个名叫保罗的“宠物”：赫勒鲁、艾尔维厄、德夏内尔。这三人中只有小说家无礼地谢绝了邀请，说是痛风发作，脚肿得穿不上鞋子了。伯爵写了一首傲慢的三行体诗来报复他的轻慢：“作家保罗·艾尔维厄/老迈龙钟/身先朝露。”[21]艾尔维厄那年36岁，比孟德斯鸠还小三岁。

最后，伯爵还邀请了一个无关痛痒的人物——事实上从出身或才学来看只是个小人物——为社交界报刊撰写关于这次聚会的报道。此人是

一个22岁的大学生和抱负远大的作家，一年前被孟德斯鸠收为门徒。这个年轻人虽然是个前途未卜的门徒，但他恭维的天赋颇高，文学（《蝙蝠》）品位一流，怎奈这些都被他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和令人狼狈的反叛性情削弱了。（据说他曾在勒梅尔夫人和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里模仿伯爵，相似度奇高，简直不可思议。[22]）由于这些缺点，孟德斯鸠已经与这位侍从闹翻过一次了；在之后几十年里，他们的关系还将经历多次破裂。但他还是请小伙子就文艺聚会写一篇恭敬有礼的报道，赞美夫人们的裙子多么华丽，主人的文学选择多么精致高雅。

这位秘书不辱使命，没有令人失望，但他辛苦工作的最终成果却令自己失望了。他在晚会次日清晨的《高卢人报》上读到了自己写的文章，署名为“全体巴黎人”，但自己全面的时尚描写被删掉一些。更糟的是，他列出的狂欢者名单中缺失了他最想看到的名字：他自己的名字。“全体巴黎人”试图不把这一遗漏视为冒犯，这表明他没有资格进入那个排外的社交圈，他的笔名也正有此意。他还看到几个比他尊贵的宾客的名字也被遗漏了，例如堂·乔万尼·博尔盖塞，多少还得到了一些安慰。



弗朗索瓦·吉拉尔东（**François Girardon**）的《劫持普洛塞庇娜》（***The Abduction of Proserpina***，约**1675-1695**），竖立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孟德斯鸠有这座雕塑的一件复制品

除此之外，“全体巴黎人”的任务也给他带来了一件不同的奖品，这件奖品有着更大、更持久的意义。在凡尔赛，他总算见到了格雷弗耶伯爵夫人：他这位彼特拉克最新的洛尔，他理想中代表贵族气度的最后一个人物。“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女人。”[23]“全体巴黎人”会在这条声明下签上自己的名字：马塞尔·普鲁斯特。

1893年4月的一个傍晚，在玛德琳·勒梅尔位于蒙索平原的那间玻璃屋顶画室里，普鲁斯特参加了为庆祝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的最新诗集《雅致气息的酋长》（*Le Chef des odeurs suaves*，1894）出版而举办的聚会。[24]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鲁斯特对孟德斯鸠算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早在勒梅尔夫人介绍他们认识之前，普鲁斯特就知道伯爵是一位尊贵的大老爷，手握着城区某些顶级沙龙的钥匙，包括格雷弗耶的沙

龙。[25]他还很熟悉孟德斯鸠身为神经紧张而颓废堕落的审美家、莫罗作品收藏者和乌龟镀金者的形象。但他没想到伯爵居然有着“巴洛克式的博学”，与普鲁斯特本人不相上下，伯爵那癫狂的夸张也让这位崭露头角的讽刺作家无法抗拒。[26]这些特质和孟德斯鸠的出身与社会地位一样，打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了普鲁斯特，激发了被文学小团伙称为“普式马屁”的冲动：当场开始专心致志、谀辞如潮的赞美。[27]例如，“您不仅是须臾之物的王，还是永恒之物的王”[28]，以及“您的诗行和您的目光中倒映着我们这些凡人永远看不到的大陆”。[29]

孟德斯鸠沉醉于这些马屁，它们雄辩传神，让身为作家的他十分满意，它们又恭敬谦卑，令身为贵族的他心生欢喜。普鲁斯特的相貌也吸引了他。虽然伯爵与他的秘书、曾经的领带推销员、来自阿根廷的加布里埃尔·德·伊图里已经相恋八年并将持续终生，但孟德斯鸠仍然对深褐色头发、充满异国情调的英俊之人很有好感，他总是和乔万尼·博尔盖塞（在家族破产之后，迁居巴黎了[30]）出双入对就是证据。[31]据费尔南·格雷格说，二十出头的普鲁斯特有一种类似的异国情调：“他很美，几乎是那种东方或意大利式的美；我常说他像个那不勒斯王子，他每次都会大笑。”[32]雅克·布朗什给身穿燕尾服的普鲁斯特所画的肖像于那年5月在巴黎沙龙中展出，完美展示了这一特征，摆脱了他那个落落寡合的少年自我的一切外在痕迹。普鲁斯特后来在《让·桑特伊》中描述了这幅肖像的一个版本，它向巴黎沙龙的观众们展示了：

> 一个英俊的青年……那双美丽的、呈现出新鲜杏仁那种奶白色的长眼睛痴痴地望着……粉白的皮肤……到耳根才有些潮红，几根柔软的、光滑的、如丝的黑色卷发轻拂而过……他的脸色鲜亮如春天的朝露，因温柔深思的美（而容光焕发）。[33]

普鲁斯特沉思的美让孟德斯鸠陷入了沉思。他收回了通常对陌生人

的鄙视，建议年轻人在聚会之后给他写信。普鲁斯特知道这样的开端有多珍贵，自然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机会。据塞莱斯特·阿尔巴雷说，他“从未隐瞒过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也急于结识”伯爵。[34]

然而与孟德斯鸠相反，普鲁斯特的急切中毫无被前者的身体吸引的成分。在社交界，普鲁斯特已经习惯了自己“漂亮的小仆人”的角色，总是义务地对年纪足以做他母亲的女人献殷勤。[35]然而在同龄人那个圈子里社交时，他继续暗恋同龄的男子。最近，他刚刚爱上了身材矮小的英国年轻人威利·希思（Willie Heath），他像个雌雄同体的小天使，还有着神秘莫测的保守矜持，让普鲁斯特想起了列奥纳多的《施洗者圣约翰》。[36]他和希思于1892年夏天初遇。到1893年春，他们就常常一起漫步在布洛涅森林里，琢磨（用普鲁斯特的话说）共同的“梦想，几乎计划一生都尽量陪伴在彼此身边”了。[37]这个梦想因希思去世而破碎了，他在1893年10月突然死于痢疾。但无论在希思去世之前还是之后，孟德斯鸠都不会是把他男孩般的形象从普鲁斯特的心中逐出的人；普鲁斯特的性爱偏好一直是青年男子。他对伯爵的兴趣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只是智识上的棋逢对手，心理上的探本溯源，社交上的权宜之计。[38]

普鲁斯特与其说劝阻了孟德斯鸠的爱慕，不如说改变了它的方向。他与伯爵展开了热烈的通信，用“普式马屁”取悦他的“美学教授”（这个绰号本身就是普式马屁）。[39]在信中，普鲁斯特对孟德斯鸠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称之为“荣耀的奖杯”“神圣的鸦片”[40]“鲜花满天下面一片星光熠熠的草地”。[41]与此同时，普鲁斯特还把自己塑造成美学新手，仿佛要从艺术专家伯爵那里从头学起。“有一位艺术家，”他后来在《让·桑特伊》中写到第二自我时说，“是他……用权威和启迪的教导，引领（让）进入了美的世界；因为他的心灵常常孤独，需要指引。”[42]和他的创造者一样，让·桑特伊也将到“艺术之美的最高鉴赏家德·孟德斯鸠那里”寻求这一指引。

孟德斯鸠习惯了为伊丽莎白扮演这一角色，因而热心地指导普鲁斯特，只不过常常毫不留情。他用起伏的紫色草书批评这位学生的信件，严厉地评价他的用词（他形容“美”的词一点儿也不美）和风格（他评价普鲁斯特的文风“满分20分的话，你连15分都得不到”[43]）。孟德斯鸠虽然世故地自称特立独行，却完全不能忍受形式上的丝毫马虎。普鲁斯特有一封信上染了很大的墨迹，收获了苛刻的编辑意见：“蹩脚货”和粗鲁的人身攻击，“没教养”。[44]普鲁斯特请伯爵寄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给他时，也引来了一番指责。伯爵反驳说，一位绅士应该明白，这样私密的赠物最好当面递交。

普鲁斯特认为这句劝说是暗示他去拜访孟德斯鸠位于巴黎的宅邸，两人在勒梅尔家里初遇后不到两周，他就首次去那里朝圣了。伯爵用他盼望已久的照片奖励了他的主动，那是一张面目忧郁的头像，上面印着：“我乃须臾之物的王。”他还送给这位新的追随者一本书，扉页孟德斯鸠的签名之上写着同样的座右铭，这是《蝙蝠》的珍藏版，用奢华的丝绸装订，加上惠斯勒和勒梅尔绘制的插图，把它“变成了一个小玩意儿”。[45]作为回报，普鲁斯特改写了维克多·雨果的《吕布拉斯》中的一个奇喻来恭维伯爵：“一条蚯蚓爱上了天上的星。”他热情洋溢地写道：“《蝙蝠》就是在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星，照亮了每一个星球，也把耀目的星光洒在这条蚯蚓的头顶上。”[46]

普鲁斯特接二连三地送给伯爵各种富有新意的礼物：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蓝鸽，一叠利伯缇领带，一个从古董圣诞马槽中取下的没有鼻子的圣婴。[47]他还把自己发表的一篇作品送给了孟德斯鸠一份，在附信中说他把自己卑微的文章献给伯爵这样才高八斗的作家，就像送“一条蚯蚓来回报满天繁星”一样“荒谬”。[48]但私下里，这条蚯蚓却在研究着那些繁星。

研究结果毁誉参半。普鲁斯特越来越意识到，上层循规蹈矩的心态

让他非常欣赏伯爵从容的特立独行，特别是在语言的运用上。除了偶尔说几句圣经格言之外（他喜欢《诗篇》中的“……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倒是符合他“美学教授”的身份[49]），孟德斯鸠不像社交界其他人那样惯用陈词滥调。恰恰相反，他喜欢晦涩难懂的词汇（他说“缠丝玛瑙”时用“sardonyx”而不用“onyx”，说“鳝鱼”时用“moray”而不用“eel”[50]），还喜欢发明笨拙的新词（他发明了“蓬帕杜尔式”，取代“洛可可式”）。他说话的方式也毫不寻常（喜欢高声尖叫）。普鲁斯特对他说：“在我看来，您的措辞有一种得体的魔力。”[51]

年轻人后来在《美学教授》（“Un professeur de beauté”，1904）一文中试图重现这种魔力，那篇文章说孟德斯鸠应当是名副其实的法兰西学术院候选人。普鲁斯特提醒读者，学术院应当负责为法国语言编写官方词典，而伯爵在这方面才能出众：

> 任何见过（德·孟德斯鸠先生）在说出一个词之前停顿一下，直起身子，仿佛一匹马看到一条鸿沟时尥起蹶子，那是这个词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它已经因我们日复一日地使用而变得平庸，他在眩晕中意识到这个词原本的优雅，仿佛一朵花儿在悬崖边缘颤抖；他抓住那个词，说出它所有的美，品味它（因为它的强烈风味和特色而几乎面目狰狞）、肯定它、重复它、吟唱它、歌颂它、用它变出眼花缭乱的万千变体，即兴赋予它丰富的含义，令你的想象力踟蹰不前，令诠释无功而返，任何见到他做这一切的人都可以想象，他入选学术院编辑辞典将多么美妙。[52]

在这篇描述孟德斯鸠疯狂的言语戏剧化的文字中，普鲁斯特疯狂的言语戏剧化更多是赞美而非奚落；感觉更像是致敬而非滑稽模仿，后者也是他与此人交友十年之后的态度。起初，普鲁斯特非常欣赏伯爵的语言活力，甚至把他最荒谬的装腔作势当成有意的而非意外出丑。中年普

鲁斯特曾对罗贝尔·德雷福斯承认：“起初，我不知道孟德斯鸠不知道自己很可笑。”[53]

这位导师对室内装饰的狂热就更令青年普鲁斯特情绪复杂了。普鲁斯特养成了登门拜访伯爵的习惯——先是去他在巴黎的家，从1894年初开始又频频前往孟德斯鸠公馆。之后，这种狂热愈发明显。在室内装饰这个领域，倒是可以恰当地用蚯蚓与星辰来形容两人能力的对比，普鲁斯特来自一个对拥有美好事物毫无兴趣的家庭。虽然他们家境富裕，让娜的品位也很精致，但他的父母从不收藏艺术品或精美家具；他们的装饰品位守旧而平庸。格雷格回忆起他们位于马勒塞尔布大道的公寓，说那是个

> 舒适……阴暗的室内空间，堆满了厚重的家具，一层层窗帘遮蔽着，一块块地毯压抑着，主色调是黑色和红色……是个乏味的资产阶级公寓，想到巴尔扎克小说中那种阴郁的杂乱无章时，我们脑子里出现的大致就是那种场景。[54]

在普鲁斯特的“山茶花时期”，这种寒酸的生活氛围得到了一些眼光敏锐的拜访者如埃米尔·斯特劳斯、奥斯卡·王尔德和孟德斯鸠本人的鄙视。普鲁斯特了解他们的嫌恶，却不以为然。他喜欢在卢浮宫或诸如斯特劳斯家的私人收藏中观看伟大的艺术作品，却说自己不想购买这类宝物，因为他的头脑中已经有一座“无与伦比的博物馆”了。[55]但孟德斯鸠却在自己家里拥有一座无与伦比的博物馆，他的装饰方案虽然比大多数城区家庭的装饰矫揉造作得多，却同样坚持贵族的奢华风格。就连伯爵最古怪的室内装饰也是一种戏剧化的展示，是他无出其右的杰出品位的神坛。[56]

在这些场景中与孟德斯鸠交谈，就是要听从他就自己“信奉美的宗教”没完没了地长篇大论。这个宗教的许多信条都刻意与当时上层阶级的品位对立。例如，就家具而言，巴黎贵族往往喜爱18世纪路易十五时

期的“蓬帕杜尔式”和路易十六时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避免那以后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过分修饰的繁复样式。伯爵鄙视这种偏见，喜欢三种风格的混搭。在孟德斯鸠公馆，他主要摆设的是典雅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的家具，它们与18世纪的建筑风格形成了自然的互补，同时很不协调地点缀了花哨的帝国时期的椅子和小桌子，它们极为光泽的樱桃木框架上闪耀着仿金铜的拿破仑统治标志：狮身人面像、鹰和天鹅。如果某一位客人碰巧对这些帝国时代的家具侧目而视，孟德斯鸠就会指出它们是他的曾祖母“鸠妈妈”[57]的遗产，拿破仑一世曾亲自挑选她作为自己唯一的儿子“罗马王”的家庭教师。（和“私生子”一样，一旦涉及君主，“家庭教师”这个标签也立刻从低等变得高贵起来。）普鲁斯特记住了这个细节，把它用在了《追忆似水年华》中，德·盖尔芒特夫人宣称：“这是一件珍品……这些（帝国）家具是巴赞从孟德斯鸠家继承下来的！”[58]这让她的朋友们又惊又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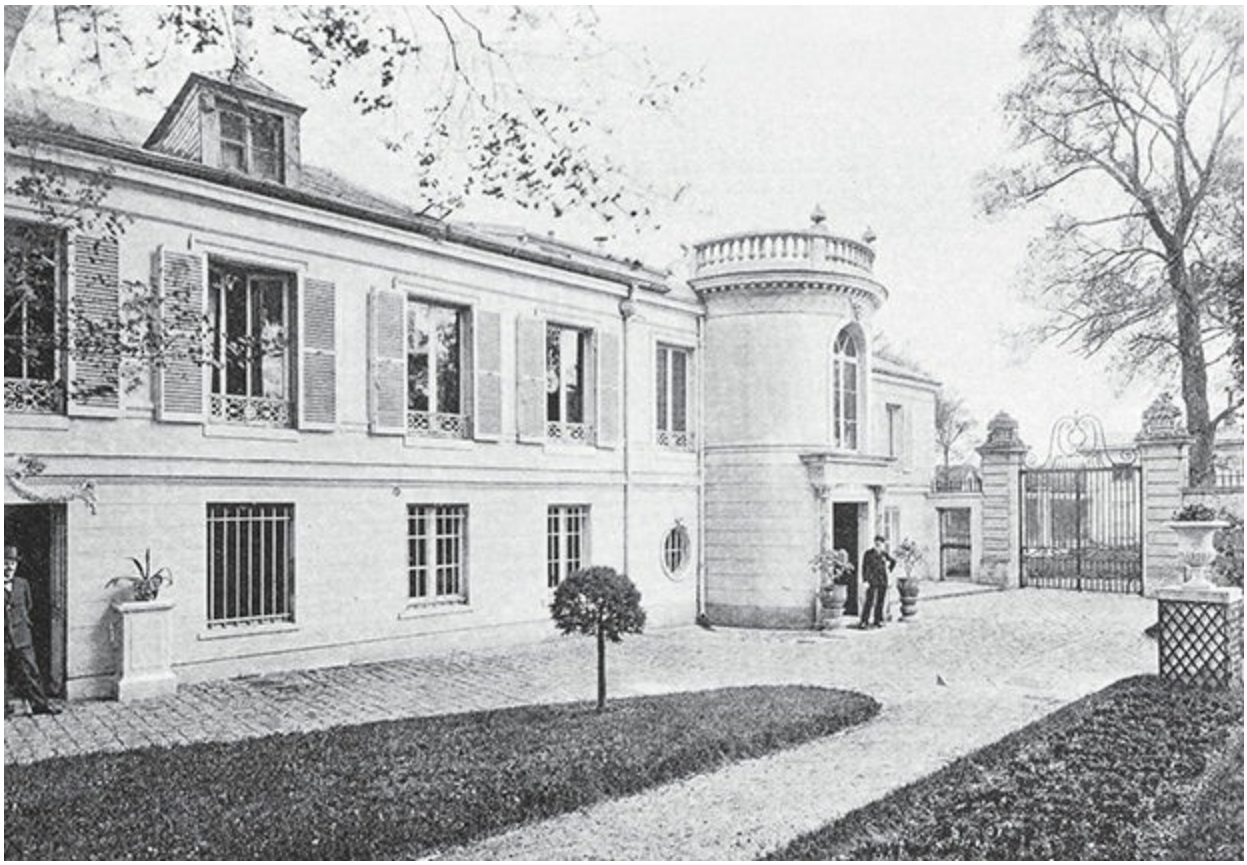
珍品是孟德斯鸠的严师和他的神。为了向它效劳，无论他住在哪里，都要像对待自己的诗歌一样，痴迷专注地反复修改自己的居住环境。他每天修修补补，在这里加一点日本风格，在那里来一点新艺术主义。修补是靠购买供养的，他把自己和伊丽莎白在服装上的诗意购物用在了装饰艺术中。孟德斯鸠不知疲倦地寻找各种古怪和稀有之物，又是洗劫古董店，又是突袭拍卖行。他买了不少文艺珍品，“乔治·桑夫人抽过的烟蒂……缪塞豪饮过的苦艾酒瓶”。[59]他常常与同为收藏家的朋友龚古尔、阿斯和夏尔·埃弗吕西交换心得和宝物。他丢弃了旧的修饰（孔雀羽毛），尝试新的（莱俪水晶）。他在保留主题的同时更换形式，淘汰了北极熊地毯，但委托玻璃艺术家艾米里·加利（Émile Gallé）为他创作了一只蚀刻着北极熊剪影的花瓶。

孟德斯鸠把自己的小物件摆成精美的静物，他的朋友阿贝尔·埃尔芒曾这样描述过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

> 展示架上睡着蝙蝠和绣球花，或是雕于瓷器，或是画在花瓶，也有凿刻在木头或金属上的，与珍珠母镶嵌、象牙和彩色硬石镶嵌一起发着暗光，用玻璃隔板与绿色或粉色或蓝色的珍贵陶瓷茶碟和茶杯以及旧时代的纪念品分开……日本卷轴画、书籍装帧、手杖柄，还有美丽的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的石膏模型。[60]

埃尔芒用这种混乱的排比句法反映了所展示的物品的独特性，传递了它们共同造就的令人迷失方向的视觉效果。然而正如孟德斯鸠以他同样支离破碎的文风宣称的那样，他的美学目标就是要令人不知所措，而不是抚慰人心：

> 把各种物件摆放在一起，仿佛它们是一个社团，是一场独创的、有时难免惊心动魄的交谈，令眼睛四顾不暇，让灵魂惊骇不已，那正是我以自己独特的、撩人的高妙才智希望实现的效果，作为一个吸食鸦片者，我反反复复地为之陶醉。[61]



孟德斯鸠公馆：孟德斯鸠（头戴平顶硬草帽，右）与他的住家秘书加布里埃尔·德·伊图里（头戴高顶礼帽，最左）在**1894**年**5**月**“**文艺聚会**”**举办两周后，站在凡尔赛的这座**18**世纪宅邸前拍摄了这张照片

孟德斯鸠对自己的装饰成就无比自豪，甚至常常屈尊邀请记者来参观自己的房子，认为媒体报道一定会有助于传播他的“信奉美的宗教”。

据起初陪普鲁斯特一起拜访孟德斯鸠公馆的莱昂·都德说，主人的“疯狂不仅限于炫耀，还表现在他大加赞美并事无巨细地解释自己的收藏”，令人不胜其烦。参观他的房子旷日累时，但即便参观之人已筋疲力尽，伯爵也是要么没看见，要么看见了也不管不顾。他永远有更多的细枝末节要灌输给他们。“他会越来越感性、暴躁、激动，然后突然平静下来，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呻吟一声：‘它多——美——啊！’”[62]另一位客人回忆道，

他带我们穿过巨大的沙龙，里面到处是玻璃柜、餐具柜和圣物柜。他偶尔会打开它们，取出一件罕见之物，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把玩："这就是盛放过阿格里皮娜（皇后）[63]的眼泪的泪瓶。这是克利奥帕特拉的镜子和梳子。毫厘不差。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1776年1月13日穿的可爱的丝绸上衣。这是外科医生费利克斯用来给路易十四做瘘管手术的解剖刀。"[64]

孟德斯鸠似乎把价值等同于曾为王室所拥有，这再度反映了他的阶级偏见——"（前主人的）名字就足够证明它们（非同寻常），就连最微不足道的器物也被赋予了荣光。"[65]

普鲁斯特虽然对伯爵的矫饰做作着迷，却不怎么喜欢随之而来的关于物件起源的乏味的喋喋不休。他自己也对名字（和王室成员）无限迷恋，但他不认为一件物品曾一度属于某一位陛下或殿下，就会让它从本质上变得有趣。与都德不同，普鲁斯特并不厌烦物件的主人说的太多。他厌烦的是孟德斯鸠对物件本身说得太多，对那些物件可能参与的人类故事却谈得不够。拿那把解剖刀来说，它突出体现了路易十四极强的政治意志。1686年，他不得不请人把一根瘘管从肛门中取出，（在麻醉剂发明以前的时代）这个外科手术疼得他一度昏迷过去。由于人们认为他的身体与法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国王的晕厥让侍臣们惊恐万分。他苏醒过来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宽慰他们说，他这位超人陛下不可能有危险："那个人受了不少煎熬，但国王一切安好。"[66]这才是普鲁斯特觉得能够生动再现孟德斯鸠那些小摆设的故事，也是孟德斯鸠始终遗漏没讲的故事。

在参观伯爵的藏品时，人们会怀疑普鲁斯特之所以不停地拍普式马屁，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厌倦。不过有一次拜访时，孟德斯鸠显然发现了他的百无聊赖，于是后来寄来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扬言绝交。那封信遗失了，但普鲁斯特引用了伯爵在信中所写的话："我用无限的热

情对您进行考验，这是唯一能区分良莠的考验。”[67]重点是普鲁斯特就是莠，他忘恩负义、粗鲁无礼，对孟德斯鸠那些“多——美——啊”的物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后来没过多久这位贵族的愤怒就消退了，再度招呼普鲁斯特来家做客，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过孟德斯鸠让普鲁斯特了解了他对友谊的严苛标准，以及达不到那些标准的人会有什么风险。

学者们指出，普鲁斯特后来把孟德斯鸠的愤怒写进了《索多姆和戈摩尔》，在其中一章，“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国王”[68]的德·夏吕斯男爵斥责二十多岁的叙述者出身于不知感恩的无知的“资产阶级家庭（只是在说这个形容词时，他的声音才微微带点不礼貌的摩擦音）”[69]。[70]没有证据表明小说的这一部分复制了孟德斯鸠与普鲁斯特的冲突。不过这段场景倒处处是花絮，难免让我们从虚构的男爵联想到现实的伯爵。这段对话发生在叙述者拜访夏吕斯位于巴黎的府邸，无意中冒犯了他，促使年长的男人宣称：

> 我做的是一个贵族应该做的事。我的行动是不是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您却置之不理。……我对您进行了考验，当代最杰出的人风趣地把这种考验叫作态度的考验，用无限的热情考验您的态度，他有充分理由说，这是最可怕的考验，因为这是唯一能区分良莠的考验。[71][72]

夏吕斯接着又辱骂了叙述者长达好几页篇幅，其间还不停地放出话说这是“我们将要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73]然而和孟德斯鸠一样，男爵也总有更多的鸡毛蒜皮要灌输给同伴，哪怕他怒吼要彻底断交。在一个到处摆着奇怪的器物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的沙龙里，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

> 对一个能把奇朋代尔式[74]家具当成洛可可式椅子的人，我不指望他能讲出非常准确的话……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像维

克多·雨果诗中的博阿茨：我是鳏夫，孤独无依，日暮途穷。[75][76]

普鲁斯特写下的这段关于家具的训斥和对雨果的引用，再次让读者想到了孟德斯鸠，男爵说话的暴怒和说教的口气无疑与他别无二致。

他带领叙述者经过府邸的接待室到达前门，一路都在对自己的物件呶呶不休：

> 我和他一起又穿过绿色大客厅。[77]我随口对他说，我觉得客厅很美。“是吗？”他回答。“应该确确实实地爱一样东西。细木护壁板……找到了希迈的一个旧公馆。此人过去谁也没有见过，他只是为我才到这里来了一次。……瞧！在这间屋子里，陈放着伊丽莎白夫人、朗贝尔公主和王后戴过的全部帽子。您对这不感兴趣，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您的视神经大概出毛病了。……您还是想回去？……”他深情而忧郁地对我说。……德·夏吕斯先生尽管一再郑重表示我们以后不再见面，但我敢保证，倘若我们还能见面，他是不会不高兴的。[78][79]

这里再度出现了很多孟德斯鸠的影子，从王室成员的时装零碎到亲自参观希迈家的旧公馆。然而，更有趣的是普鲁斯特对男爵反复无常性格的简明而细致的描述。在短短几行篇幅中，夏吕斯从一个厌倦享乐的外行（“应该确确实实地爱一样东西”）变成了一个有特权的大人物（“他只是为我才到这里来了一次”），接着变成了一个对纪念品充满执念的人［“陈放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等人）戴过的全部帽子”］，又变成了一个被动-挑衅的无理之人（“您的视神经大概出毛病了”），最后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坏脾气老头，待他意识到一旦把这位客人打发走，他就没有人可以诉说了，为时已晚。这段变形记本身就是一篇小型杰作，彰显了作者精湛的文学技巧，从男爵言辞浮夸的唠叨的喜剧旋即过渡到孤独和缺乏精神陪伴的悲怆，他虽傲慢自大，但终究难掩孤单。

然而在他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普鲁斯特既没有这么高超的技艺，也没有像这样集中描写复杂的人性。正如孟德斯鸠对物件起源的着迷让他厌烦，他在写及自己最为崇拜的物神——高不可攀的贵妇人时，也沉迷于同样空洞的废话。1893年夏天发表在《白色评论》上的《其他遗物》（“Autres reliques”）是两页篇幅的第一人称叙述，讲的是一个不具名的年轻人刚刚买来了一位最近去世的贵妇人的全部财物。[80]他在开头解释说，之所以要买入它们，是因为贵妇人是“我本想结交的人，但她却不肯屈尊跟我说一句话”。[81]这番披露之后，叙述者并没有详述这位贵妇人、她的死和他本人与她之间的互动。相反，他对自己从她家买来的东西进行了巨细靡遗的描写：一副扑克牌、一些封皮上印着她的家徽的小说、两只绒猴和一条狗。一笔带过之后，这些宠物就从他的叙述中消失了。但他对书和扑克牌却充满迷恋，认为它们曾经见证过死去的女人“最不设防、最不可侵犯的私密时光”[82]：

> 她曾在晚间与最爱的朋友们一起玩的扑克牌，……它们见证过她初坠爱河，那时她放下它们去吻（所爱之人）；她视心情和体力或打开或合上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和作者的生活曾潜入她的睡梦……也继而让她梦到了自己的生活。

叙述者无视这个女人的活的玩伴（她的宠物），反而偏爱那些无生命的物件，突出了他这种迷恋的病态和徒劳。他对她的书和扑克牌提出的问题也是一样：“你们难道没有留下她的一些记忆，不能给我讲述一些她的生活吗？”[83]可以预见，它们没有回答，它们的沉默似乎表明，利用遗物来重建生活是不会有结果的。

《其他遗物》读到这里，我们大概会把它当成含蓄地批评孟德斯鸠对死者废弃物的尊崇，意在驳斥物件起源本身足以“为最微不足道的器物赋予荣光”。但故事的下半段反转了这一观点，叙述者的结论是，他的夫人的遗物或许终究能保留下一些她的精神气质：

> 扑克牌啊，小说啊，因为她常常把你们握在手中，……你们尚且留有她的卧室（和）衣物纤维中曾经充溢的香气。……你们保留了她因为快乐或紧张而留在手上的黏腻；如果她因心痛而哭泣，或为自己的生活、或为书中的人物，你们或许仍然保留着她的泪迹。……触摸你们会让我颤抖，为你们的启示心急如焚，为你们的沉默屏气敛息。[84]

这段话是为“须臾之物”所写的辩解词。它不保证这类物件会打破沉默，讲一讲这个“它们无意中见证（过）她的绰约风姿”的女人。但它暗示，那个女人最轻微的痕迹，扑克牌上残留的一丝香水味或汗湿气，都能孕育新的生命，哪怕那生命是脆弱的、主观的。下面几句话是这一段的结尾也是全篇的结尾：“或许关于她的美，最真实的东西是我的欲望。……她活过自己的生命，而或许独有我曾经梦到过她。”那个女人已经死了，但梦到她的人永生。

按照这一逻辑，一个女人不一定要存在过，才能在另一个人的胸中燃起激情。只要天性中带有一定的内省，一个陌生人就能在一副扑克牌或一堆小说中发现足够的素材来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他或许对自己的物神很满意，把它们视作一个人的模糊剪影。事实上，如果距离能够孕育他的渴望而靠近反而杀死了它，那么他甚或更偏爱剪影，更偏爱在一面不透光的白墙上跳舞的皮影戏，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或许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一幅模拟像，还把这一举动称为爱情。

不知是惊人的偶然，还是根本不是巧合，普鲁斯特正是在初次瞥见格雷弗耶夫人短短几天后写下《其他遗物》的。7月1日，他在德·瓦格朗亲王夫人在巴黎的府邸举办的舞会上从远处窥视了她。第二天，他在写给孟德斯鸠的一封信中兴冲冲地说：

> 我（昨天在德·瓦格朗夫人家里）总算见到了格雷菲尔勒（原文如此）伯爵夫人。正如我曾经冲动地告诉过您阅读《蝙

> 蝠》如何令我激情澎湃，我必须向您坦白，我昨晚感受到了同样的激情。她的头发绾成优雅的波利尼西亚发式，淡紫色的兰花垂在颈背，像一顶“花编的帽子”……很难评价她，因为评价就意味着对比，而在她身上看不到其他女人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元素。但她的美的全部秘密都在那双谜一样的明眸中。[85]

这一瞥开启了普鲁斯特成长岁月中对社交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着迷，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什么把不久后写成的故事命题为“其他遗物”，这个题目听起来像是他准备扩充某个事先存在的遗物收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因为到1893年夏，普鲁斯特已经把斯特劳斯夫人和德·舍维涅夫人整齐地归置在自己头脑博物馆的展柜里，随时准备把它们重新摆放成一个生动的华丽或祛魅的静物组合。“毫厘不差”——孟德斯鸠讲到克利奥帕特拉的梳子和镜子时说的这句话，也是普鲁斯特为自己的原型贵妇人们写下的箴言。他认为她们能够毫厘不差地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毫无疑问，她们对他的价值更像遗物而非真正的女人，就他的愿望和需要而言，她们更加柔韧可塑。[86]有了格雷弗耶夫人，他想象中的玻璃柜又添了一件精美的新品。

她出名的疏离不仅突出了其高高在上的魅力，在艺术上也对她有利，因为她的遥不可及让她不可能像斯特劳斯夫人和德·舍维涅夫人那样暴露出某种粗鲁不雅的人性缺陷。普鲁斯特相信格雷弗耶夫人跟另外两位不同，她的魅力不会消减，因而渴望见到她。他渴望沐浴在她那对眸子的光芒中，渴望解开那个谜团。他渴望用风趣的文学典故逗她开心（和其他贵妇人同类不同，她从不讳言自己爱书），为此得到她银铃般的笑声作为奖赏，“像布鲁日的钟声一样清脆”。[87]如果他读到或听说过她在野兽舞会上的豹纹装束，那么他或许还渴望在她的身姿中找到一点像威利·希思的地方，他不久就会在赞词中写后者：“您那神秘莫测的强大的内在生命让我想起了达·芬奇的一幅（画）。您的眼睛常常那么不

可捉摸，您的笑靥就像一个您不愿透露的秘密，我觉得您很像列奥纳多的《施洗者圣约翰》。”[88]他渴望研读她达·芬奇式的微笑，猜测它隐藏了怎样的秘密。他焦急地渴望着这一切，而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获得这一切。即便普鲁斯特觉得孟德斯鸠很可笑，也绝不会让他知道。起码在与格雷弗耶夫人正式见面之前，不能让他知道。[89]

孟德斯鸠可没打算让他那么容易得手。普鲁斯特那年夏天阅读《雅致气息的酋长》时注意到，诗人把那本书题献给了格雷弗耶夫人，把其中的一首十四行诗献给了德·莱昂亲王夫人。普鲁斯特以此为借口对伯爵说，他多么希望见一见“您最经常提及的几位夫人朋友（格雷弗耶伯爵夫人、德·莱昂亲王夫人）”。[90]孟德斯鸠此前没有理会普鲁斯特对伊丽莎白的赞美，但这次他又提到，真让他百爪挠心。最初是伯爵把被看见的艺术教给了伊丽莎白，但想到这时她已经技高一筹，他又闷闷不乐。他着实郁闷，感觉到社交界的许多人，甚至许多艺术家，如今与他交好（或者忍受他的怪癖）都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外甥女，更不要说她还有可能从他身边夺走他的新侍从（当然，孟德斯鸠也曾在拜罗伊特之行中与乔万尼越走越近，可以说他也曾对伊丽莎白有过类似的背叛）。因此当普鲁斯特第二次对他提起伊丽莎白的名字时，伯爵只用一个问题就重重地反击回去：“你难道不知道，你出现在她的沙龙中，恰恰破坏了你希望它具备的高贵感吗？”[91]

普鲁斯特只有忍气吞声（据担心他的朋友们说，他受过很多这样的侮辱[92]）。他要跟孟德斯鸠下一盘旷日持久的棋，他要等待时机。

在等待的过程中，普鲁斯特找到了一种文学方式来表达他对格雷弗耶夫人的幻想。7月下旬，他找到最近刚刚停刊的《酒筵》的三位联合创始人——费尔南·格雷格、达尼埃尔·阿莱维和路易·德·拉萨莱，提议四人一起开启一场新的文学冒险：写一部关于社交界的书信体小说，就像艾尔维厄最近的畅销书《他们的自白》那样，每个人用小说中不同人

物的口气写信。朋友们同意了，他们一起设计自己的第二自我。普鲁斯特创造了波利娜·德·迪夫（Pauline de Dives）这个人物，这位贵族少妇秘密地喜欢上了没出息的单身汉努拉瓦（Nulleroy），拉萨莱主动提出要为后者代言。格雷格构想了沙尔格兰（Chalgrain）这个人物，这是个衣冠楚楚的资产阶级作家，对社交界心驰神往。达尼埃尔担当的人物角色是波利娜的知己德·特赖斯梅神父（Abbé de Traismes），这位和善而世故的神父的原型是穆尼埃神父（Abbé Mugnier），他是格雷弗耶夫人、德·舍维涅夫人和她们的许多贵族同伴的亲切和蔼的告解神父。

普鲁斯特在想象中创造的波利娜似乎以格雷弗耶夫人为原型，并没想她与努拉瓦有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热恋，这使得努拉瓦成为她的个性乃至整部小说的关键。正如他在8月3日对达尼埃尔吐露的，“真的，一个陷入相思的上流社会少妇就像一首无声的诗，她的忧郁和苦闷会让那首诗变得更加动人”。只要孟德斯鸠坚持不让他们接触，格雷弗耶夫人在他的想象中就始终是一个无声的诗意形象。普鲁斯特将借波利娜之口填补这位缪斯的沉默；她将用他的自叙对他开口诉说。

普鲁斯特以波利娜的口气写的信表明，他对格雷弗耶夫人是做过一番研究的。他的女主人公是个优雅的审美家，为自己精致（有时难免做作）的品位而自豪。她说她在乡间散步时，总是在树后寻找瓦尔基丽。她琢磨着准备买些孔雀放养在花园，说这灵感来自“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的《雅致气息的酋长》中”关于这种禽鸟的“两首绝妙的诗；那本书还没有上市，但珍藏版已经出了”。她对靠金钱进入“我们的世界”的那些“美国姑娘”嗤之以鼻。她吹嘘说沙尔格兰从她身上获得了灵感，如果她愿意，他巴不得做她的情人呢。

然而比这些信件让人想起格雷弗耶夫人之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没有触及普鲁斯特此前说他准备探讨的情感——“忧郁和苦闷”。波利娜只在一封信中引入了感情的痛苦这个话题，而即便那时，她也没有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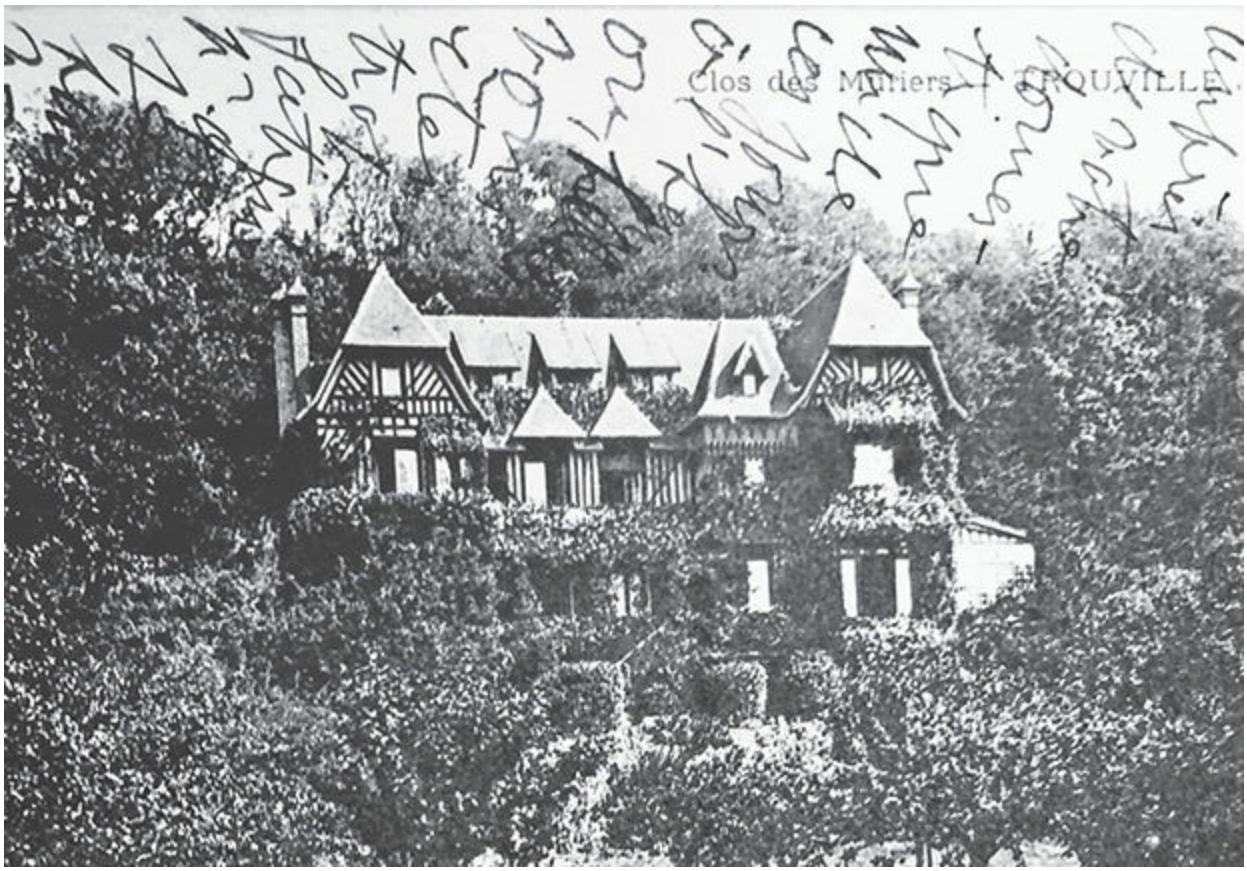
那是她自己的痛苦。在一封写给神父的口气儿戏、漫不经心的信中，波利娜简略地提到贵族圈里到处是没有爱的婚姻的传统，说那是“可憎的毁灭之举”，导致“湮没在眼泪中的人，丈夫们在发狂的妻子面前被情妇勾搭走了，等等”。她只字未提自己的婚姻，继续以同样笼统的口气说，“一个热恋中的女人”焦急地、日复一日地等待一封永远不会寄到的情书是“可悲的”。在这封写给神父的信中乃至手稿的其他部分，波利娜没有表明她本人或许正是上文中那位“热恋中的女人”（那只会是读者的推论，因为她是整部小说中唯一的女性角色）。或许如果普鲁斯特知道格雷弗耶夫人本人也在年复一年地等待一封从未寄到的情书——乔万尼的一句斩钉截铁的爱情宣言——他会着更多笔墨来剖析笔下人物的这个方面。

但其实，普鲁斯特并没有进一步研究他这位“陷入相思的上流社会少妇”。考虑到他和朋友们原本旨在描述那个阶层的肤浅轻薄，没有赋予波利娜任何情感深度似乎是作者的一个不无道理甚至符合逻辑的选择。但波利娜的肤浅又与他自己声明的对她隐秘的受苦一面感兴趣自相矛盾；也与格雷格的沙尔格兰痛苦的绝望形成了鲜明对比（沙尔格兰哀叹波利娜高不可攀的情节可能直接取自波托-里什的《错过的幸福》）。普鲁斯特构想的波利娜没有希望的爱情虽然是小说的最主要情节，但他仿佛太沉迷于她优雅的外表，忘记了赋予她内在生命。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流社会辩护者普鲁斯特险胜上流社会批判者普鲁斯特，更不用说写作者普鲁斯特了。几个月后这个项目失败了，难说不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93]

普鲁斯特和他的写作搭档们的大部分手稿是在1893年8月和9月初的暑假里写成的，其间他们以各自人物的口气给彼此写信。在瑞士逗留了几周后，普鲁斯特来到特鲁维尔，下榻奢华的德罗驰诺尔宅邸，它就建在俯瞰海景的宽阔步道上。那年7月，斯特劳斯夫妇刚刚搬到他们位于特鲁维尔的新别墅桑葚别墅（Le Clos des Mûriers），那是个半木结构的

木屋式建筑，周围是茂密的玫瑰园和高大的树木，人在其中，很容易忘记这里近在海边。[94]（这个景观特征可能是考虑到热纳维耶芙害怕溺水，也可能是纵容了她丈夫对玫瑰的喜爱。）普鲁斯特重新召集达尼埃尔、格雷格和拉萨莱来这里共度一段时间，这几位当时都在附近度假。德加的长期情妇奥尔唐斯·豪兰拍下的一张照片显示着四位合作作者中的三位与斯特劳斯夫人、路易·冈德拉和波托-里什一起在阳台上。几个年轻人决定在小说中加入一个海滨的次要情节，利用桑葚别墅的一个房子作为背景。普鲁斯特或许很喜欢这个主意，因为达尼埃尔声称斯特劳斯夫妇出于根深蒂固的势利，请人模仿格雷弗耶位于迪耶普的庄园建造了这个地方。

几位朋友那年秋天回到巴黎后，俗务纷至沓来，对这个项目的热情就渐渐消退了。普鲁斯特休息了一段时间——刚够他完成最后一轮法学院考试——并于那年10月获得了学位，似乎没过多久就把它忘到九霄云外了。同一个月，他的朋友威利·希思去世了。带着丧友之痛，普鲁斯特忙着出版一本文学素描集结的“小书”，用它来纪念一个“我全心全意爱过的人”。[95]到11月5日，他已经说服勒梅尔夫人同意为那本书画插图，那些插图不仅包括她标志性的花束主题，还有苗条的贵族美女，幽然神往地望向远方。或许普鲁斯特决定要依赖勒梅尔来替他表现社交界贵妇的忧郁和苦闷了。



斯特劳斯夫妇的海滨别墅桑葚别墅的明信片，正面有热纳维耶芙的笔迹

普鲁斯特放弃了波利娜·德·迪夫的故事，但他仍在写上流社会。9月，他为《高卢人报》贡献了第一篇稿件——《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The Great Parisian Salons”）。[96]在这篇署名为“全体巴黎人”的文章中，他对构成“贵族和优雅社会”的等级的无数渐变层次进行了巨细靡遗的描写，那些层次时而分明，时而模糊。[97]他在文章中把他认为互不相容的两类沙龙加以区分，一种是“优雅的开放式沙龙”，一种是“封闭式沙龙”，却把格雷弗耶夫人的沙龙同时归入这两类，表现出对她过分的喜爱。斯特劳斯夫人的沙龙被他归入资产阶级“文学沙龙”这一次类。鉴于紫衣缪斯决心摒弃才女或资产阶级的做派，她大概会把这样的归类视为冒犯，普鲁斯特或许正有此意。他绝口不提德·舍维涅夫人，可能是为了报复，她的怠慢至今仍令他耿耿于怀。

《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发表之后，孟德斯鸠责备普鲁斯特又犯了一个社交礼仪上的错误。这篇文章称德·莱昂亲王夫人是一个著名的“开放式”沙龙的女主人。然而伯爵教导普鲁斯特说，已经不存在德·莱昂亲王夫人了；她的公公8月6日去世之后，她继承了新头衔，变成了德·鲁昂公爵夫人（Duchesse de Rohan），她14岁的未婚儿子成为新的德·莱昂亲王。[98]这次纠错一定是普鲁斯特必须吞下的苦果，表明他虽然自以为已经在上层取得了很大进步，却始终是个局外人。更糟的是，他把自己对贵族术语的无知公然展示在了社交界最喜欢的日报上。到那时，他已经很细致地研究了“有生阶层”，知道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个错误，丝毫不留情面地指责他，普鲁斯特虽然（遵循社交界报纸的标准做法）用了笔名，但他没有理由相信伯爵会对他的失礼保持沉默。要说起来，孟德斯鸠一定会洋洋得意，看来他对普鲁斯特的评价一点儿没错：没教养。



玛德琳·勒梅尔为普鲁斯特的第一本书《欢乐与时日》（***Pleasures and Days***，**1896**年）画的插图，表现了他虚构的社交女前辈那种忧郁的神往之情

在这种情形下，能有机会为《高卢人报》再写一篇稿件，就为普鲁斯特提供了在报纸读者面前为自己挽回尊严的途径。来年5月，伯爵宣

布他将在那个月底在凡尔赛举办文艺聚会时，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他急于宣传自己的聚会却又不愿意表现出自己参与了宣传，就授权普鲁斯特为《高卢人报》写一篇关于聚会的报道。阿蒂尔·梅耶尔同意了这个做法，他认为孟德斯鸠只邀请120个人的计划将使这场聚会成为那个社交季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大事件。事实证明这位编辑的直觉完全正确。在“最佳”聚会往往邀请一千多人的社交界，伯爵大幅缩减宾客名单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疯狂的期待。还有幸灾乐祸——许多交际家一想到他们的朋友将成群地被排除在自己即将参加的活动之外，心跳都加快了一些。邀请函一发出，这种激动就变成了难以置信的愤怒（除了那120人外）；孟德斯鸠的贵族同侪们不习惯被归为穷光蛋俱乐部。然而他们的愤怒进一步满足了伯爵“不取悦他人的贵族快感”，让他更加恶名昭著则不必说。至于普鲁斯特，他受命记录这次聚会似乎成了唯一可取之处，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他以为）把自己列为入选参加的幸运少数之一。他会向城区公布，自己一个区区资产阶级，击败数百大人物而取得了成功。程度虽弱，但也堪比阿斯入选骑师俱乐部。

梅耶尔大笔一挥，把普鲁斯特这一小小的社交胜利一笔勾销了。但年轻人生平头一次，后到的失望并没有打消先来的狂喜。因为狂喜的确先来，它似乎可以暂时抵挡住任何失望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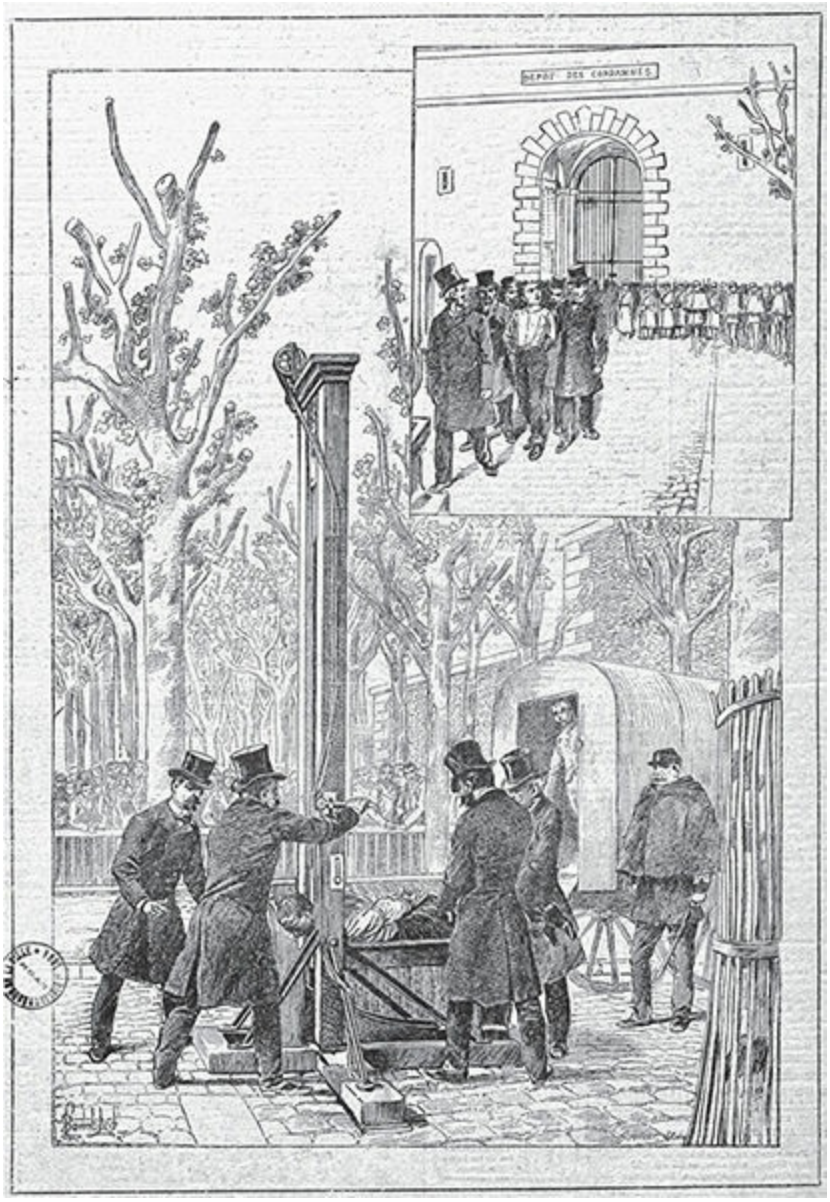
这一福祉就在聚会上降临在他的头顶，他被引荐给格雷弗耶夫人似乎终于无法避免了。孟德斯鸠那天把所有的宾客一一引荐给她——作为聚会的无冕之后，她必须接受每一位来到她跟前之人的敬意。伯爵大概不愿意让普鲁斯特获此殊荣，但也无能为力。蚯蚓必须跟星星面对面了。

普鲁斯特准备好了，他要抓住这个时机。他专注地研究了社交界的习俗，已经了解到如何脱下高顶礼帽，把马六甲手杖转动到臂弯一侧，将脊椎弯曲90度，让一绺漂亮的额发涌向额头。他已经了解到如何用自

己的右手接过她的右手，两只手套碰一下，做出亲吻的姿势而事实上只是在空中擦过。（毫无疑问，任何发出声音的嘴碰到手的举动都是不可想象的粗俗行为。）他眼中的她恰如一株专为他的身高（1.67米）而培育的嘉德丽雅兰花，“美妙地穿着一件玫瑰紫丝绸的裙子，裙子上布满了（手绘的）兰花，覆盖着同色的丝绸薄纱，一顶包着紫色薄纱、开满兰花的帽子”。[99]面纱如云朵一般飘浮在她的脸庞周围，一点儿也不透光，几乎很难捕捉到她眸子里的深色火焰和她脸颊上的淡淡月牙。[100]许多宾客抱怨她的面纱，甚至在事后称之为那天聚会的最大败笔（他们认为聚会被过度夸大了，总算给被拒绝的人带去了一些安慰）。乔治·德·波托-里什甚至直接责备伊丽莎白，事后写信给她：“您的面纱太厚了！”但普鲁斯特没有一句抱怨。[101]

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她的装束与孟德斯鸠为她在花园铺设的地毯颜色冲突了，那突出了她王后般的地位。他也一点儿都不在意淡紫色，如伯爵所说，“这个色调并没有突出”他外甥女的脱俗气质。[102]

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亨利于九天前被送上断头台之事没有影响普鲁斯特的好心情。德·舍维涅夫人参加了狂欢（在至高无上的格雷弗耶伯爵夫人身旁，谁还在乎她是谁？）或是斯特劳斯夫人没有参加（老实说，她被排除在聚会之外让普鲁斯特更为自己的出席而得意扬扬），对他都没有丝毫困扰。他绝不介意聚会因为暴雨推迟了一周，举办当天烈日当空、晴朗无云。他一点儿也不挂怀好几位宾客在酷暑中晕倒了，他们身着华服中了暑，只能到有顶棚的剧院里稍微凉快一些[103]，他们的主人身穿华丽的珍珠灰女式长袍，在剧院里给他们准备了沉闷乏味的朗诵会。朗诵者是打扮得过于讲究的女演员，时不时被孟德斯鸠的叫声——“多——美——啊！”——打断甚至当他看到“可怜的人们带着逆来顺受的表情倾听台上的表演，狼狈得就像在大雨中淋得湿漉漉的猫”[104]，也没有一丝烦恼。



21岁的埃米尔·亨利是至少两起巴黎无政府主义爆炸案的罪魁祸首。他于**1894**年**5**月被处决

用上层的行话来说，他还有其他的猫要管。[105]他一度从关于格雷弗耶夫人的狂喜中醒过神来，被另一个同样迷人的尤物吸引了，她像猫一样凶狠凌厉，正如伯爵夫人如花一样清丽脱俗。刚刚在巴黎成功巡演了《费德尔》的莎拉·伯恩哈特无声地走上舞台演唱终曲，她轻盈柔韧的身段裹在一条滑溜溜的白裙中。她的眼里闪着猫一样冷酷的光，或许

令孟德斯鸠的一些客人想起了五年前围绕这位女演员掀起的一场媒体热议。传说她在巴黎的家中招待宾客时，对众多宠物中的一只越来越不耐烦，觉得那只猫的叫声太大了。为了让它收声，她抓住它的颈背，把它扔进了一个烧着煤的热火炉，也不理会“它被慢烤而死的过程中撕心裂肺的叫声”。[106]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成为全世界的头版头条，伯恩哈特极力否认，但那种残忍野蛮的气息至今仍然黏在她身上。普鲁斯特虽然把残忍等同于魅力，倒也没把那事儿放在心上。

显然，孟德斯鸠也没有放在心上。他恳求伯恩哈特来表演的理由是，只有她才有资格朗诵他的诗。有些客人私下里或许觉得他的诗配不上她，但她给了人们一个惊喜，她用“无情而怠惰的抑扬顿挫”朗诵，使诗歌摆脱了夸大做作，为它注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107]她用自己的艺术魔力拯救了他平庸的艺术创作。

她让《咏叹调》移星换斗：“幽谷之荫，/鹧鹇之骨。”[108]她为《莎乐美》点石成金：“我爱碧玉，它的颜色像埃罗底亚德的目光，/还有紫晶，它的色泽是施洗约翰的眼眸。”[109]节目最后，她还为《死去的女人最后的安息》施展了妖术，召唤来一幅堆满坐垫的灵柩：

> 坐垫里满是让她厌倦透顶的情书。……
>
> 是一曲表白、恳求和眼泪奏成的交响，
>
> 有爱的轻言，恨的诅咒……
>
> 对安息的她歌唱着……低语着……
>
> 拥有这份爱的女人永远不会死。[110]



孟德斯鸠认为自己伟大的诗歌只有请莎拉·伯恩哈特这样举世闻名的天才朗诵，才相得益彰，肖像创作者是乔治·克莱兰（**Georges Clairin**）

如果初读这首诗曾潸然泪下的格雷弗耶伯爵夫人此时因再度听到，又一次泪流满面，那么那条淡紫色的面纱总算派上了用场。至于普鲁斯特，他不知道孟德斯鸠这首《死去的女人最后的安息》是为她而作，但这首诗让他铭记在心，在为《高卢人报》写的文章中把它全文抄录了下来。[111]伊丽莎白从第二天早晨的头版中把它剪下来，又保存了60年——那是普鲁斯特永不知道的她的另一个秘密。[112]

普鲁斯特本人近来也总是在想死去的女人。想她们把多少秘密带进了坟墓，又为世人留下了多少线索。死去的女人是神秘的，正如他曾对斯特劳斯夫人说过的，他热爱神秘的女人，不过他或许应当加上一句，

他所谓的“神秘”是指“空白画布”，而他所谓的“空白画布”是指“皮影戏”或“幻灯片”，或“拟像”，或“圣所”，或“标本”，或“遗物”。普鲁斯特的23岁生日就在六周以后，他的前半生还没有过完。然而他已经在目标明确地、心生欢喜地走向死亡，走向他自己的那座阴影王国了。

在那个神秘的王国——无论在这次聚会上还是之后的漫长时光，他快乐的要诀就在这里——他从自己的缪斯那里获得的东西已经足够。何况她甚至不知不觉已经好几次化身缪斯给过他不少。他将用那条遮挡着面庞的如云薄纱来织就自己梦中的书卷。那个梦会用无数的情书填满无数的灵柩上的无数坐垫，它们对死者、对那位死去的优雅的女人，当然无关紧要，却会带着他一起走向永生。

因为拥有这份爱的他永远不会死。

因为他的爱将承载一切、相信一切、渴望一切、忍受一切。直到力竭。

因为他可以更好。

因为他可以想象。

（因为他情不自禁）。

因为他可以写作。

---

[1] Jacques Saint-Cère（pseud. of Armand Rosenthal），“Une heure chez le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 *La Revue illustrée*（June 15，1894）：117-24，118. 这个动作几年后还会回来纠缠RM。

[2] RM，见NAF 15038，folio 95/96。

[3] Valentino Brosio，*Ritratti parigini del Secondo Impero e della Belle*

Époque（Paris：Nuovedizioni E. Vallecchi，1975），182；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205.

[4]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95.

[5] FB，*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Paris：Hachette，1935），173.

[6] Saint-Cère（pseud.），"Une heure chez le Comte de Montesquiou，" 119.

[7] Valentino Brosio，*Ritratti parigini del Secondo Impero e della Belle Époque*（Paris：Nuovedizioni E. Vallecchi，1975），182.

[8] Lucien Corpechot，"Les Lettres françaises：le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 *La Revue de France* 2，no. 23（February 15，1922）：435-44，435.

[9] 本段对RM和孟德斯鸠公馆的描写资料来源于RM，关于孟德斯鸠公馆的无标题笔记，存档于NAF 15040，folio 7/8；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71；Edgar Munhall，ed.，*Whistler and Montesquiou*：*The Butterfly and the Bat*（New York and Paris：The Frick Collection & Flammarion，1995），94；HR，*Nos rencontres*，161；and Saint-Cère（pseud.），"Une heure chez le Comte de Montesquiou." 公馆如今仍然屹立在原处——53，avenue de Paris，那条两旁绿树成荫的宽阔大道始于凡尔赛城堡门前那片巨大的开阔庭院the place d'Armes，向东北方直通巴黎。

[10] R，*Les Cahiers*，159. 关于RM优雅的、皇朝没落的美学，见Bertrand，op. cit.，vol. 1，226-28；and RM，"Apollon aux lanternes（Versailles），" in *Autels privilégiés*（Paris：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1898），329-44。

[11] RM，"Apollon aux lanternes，" 332.

[12] RM，"Apollon aux lanternes，" 334。

[13] RM，*Les Pas effacés*，vol. 3，32-33. 关于RM的溅着鲜血的珍珠的梦境，见RM，Les Perles rouges，viii。（这本诗集中的诗作耽搁了近20年才发表，MP在这一时期与RM的通信中提到了其中的某些诗。）

[14] William Samson，*The World of Proust*（New York：Scribner，1973）and

André Maurois，*Le monde de Proust*（Paris：Hachette，1960），33.

[15] Saint-Cère（pseud.），“Une heure chez le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119. 关于RM（认为）夸张的诗句是献给听者的礼物，见Lorrain（pseud.），*La Ville empoisonnée*，105。

[16] “文艺聚会”之后几年，RM把这座雕塑，弗朗索瓦·吉拉尔东的《劫持普洛塞庇娜》的复制品，卖给了美国收藏家乔治·古尔德（George Gould），就是博尼·德·卡斯特兰（及后来的海莉·德·塔勒兰德-佩里戈尔的）的“美元新娘”安娜·古尔德（Anna Gould）的兄弟，见Jules Huret，*En Amérique de New York à La Nouvelle-Orléans*（Paris：Fasquelle，1904），199。

[17] 关于RM专为聚会而建的戏院，见HR，*Nos rencontres*，161。

[18] 这是RM《蝙蝠》中的一首诗，题为“Maëstro” 的第一行，见*The Bats*，13。关于这个口号，又见MP，“Robert de Montesquiou，” in CSB，426-35，434。

[19] Tout-paris（pseud. of MP），“Une fête littéraire à Versailles，” *Le Gaulois*（May 31，1894）：1.

[20] RM，“1894年5月24日星期四的日程”（“Programme du jeudi 24 mai，1894”），存档于NAF 15040，folio 73。5月24日是原定的聚会日期，如前所述，实际日期因雨而推迟了。关于RM愉悦地想象参加其聚会的仇敌们如坐针毡，见RM，*Les Pas effacés*，vol. 3；RM，“Le Pavillon Montesquiou à Versailles”；以及RM致EG，存档于AP（II）/101/150。关于艾尔维厄最后一刻取消了参加RM聚会的计划，见1894年5月30日艾尔维厄致RM的信，存档于NAF 15247，vol. 236，folio 41。

[21] RM致保罗·艾尔维厄，存档于NAF 15247，未编号卷宗。

[22] MP的模仿促成了两个男人的第一次暂时决裂。见LG，*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34。关于他（和其他宾客）的名字被删除，以及他为《高卢人报》所写文章中的时装描写，见（1894年5月31日星期四）MP致RM的信，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97。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222；and Carter，*Marcel Proust*，170.

[23] MP致RM标记为“1893年7月2日星期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17。正如

MP后来对CA所说，“我觉得我初次见到她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征服了。她的血统、阶级和气场如此强大，那高高在上的样子如此美妙。她的头发上戴着一只天堂鸟，简直鹤立鸡群”！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156.

[24] 《高卢人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玛德琳·勒梅尔1893年4月13日星期四的晚会的报道。由于勒梅尔夫人经常在周二宴请宾客，因此为RM举办的晚会日期有可能是那年的4月11日。Carter，*Marcel Proust*，145.

[25] Carter，*Marcel Proust*，148。

[26] HR，*Nos rencontres*，161.

[27] FG，*Mon amitié*，47.

[28] MP后来会在《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一文中重新修改这句话，见CSB，435，说“（RM的）王国不仅属于这个世界，和须臾之物一样，他也心心念念地牵挂着永恒之物”。

[29] MP致RM的未署期的信，很可能写于1893年春末或夏初，见*Lettres à Robert de Montesquiou*，ed. Robert Proust and Paul Brach（Paris：Plon，1930），6。Robert Proust和Brach在这一版中没有试图确定这些信件的日期。

[30] GBB迁居巴黎之事似乎发生在1893年初那几个月。惠斯勒提到那年1月底与GBB、RM和EG一起去看戏。根据社交界报刊的报道，GBB从那年2月开始每周在巴黎社交圈亮相，更经常地与RM而非EG在各个聚会上出双入对。看似1891年夏天的集体拜罗伊特之行让RM和GBB走得更近了；这不仅能够解释他们关系的变化，也能解释EG为何显得对那次出行很失望。

[31] GBB搬到巴黎后几个月，他被批准成为艺术家联盟组织的临时会员，1894年6月成为该俱乐部的永久会员，他的保荐人就是EG的妹夫鲍勃·德·拉艾格勒。*Le Gaulois*（June 28，1894）：4.

[32] FG，*Mon amitié*，33.

[33] MP，JS，675. 在这部小说中，MP把这幅画的创作者写成了JEB的对手、RM提携的社交界肖像画家安东尼奥·德·拉冈达拉（675）。

[34] 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56.

[35]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64.

[36] MP，“A mon ami Willie Heath”（July 1894），in PJ，40.

[37] MP，“A mon ami Willie Heath”（July 1894），in PJ，40.。关于希斯之死，见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vol. 2，138。

[38] 关于MP希望结交RM（与性欲无关）的动机，见George D. Painter，*Marcel Proust*：*A Biography*，vol. 1（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34；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76-77；and Maurois，*Quest for Proust*，66。

[39] MP，“Un professeur de beauté，” *Les Arts de la vie*（August 15，1905），转载于Léon Guichard，“Un article inconnu de Marcel Proust：Marcel Proust et Robert de Montesquiou，” *La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2（1949）：161-75，163-72。又见RM and MP，*Le Professeur de beauté*，preface by Jean-David Jumeau Lafond（Paris：La Biblio thèque，1999）；and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8。

[40] MP致RM标记为“这周四傍晚”（1893年6月29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16。

[41] MP致RM，Proust and Brach，eds.，（Paris：Plon，1930），7。

[42] MP，JS，332.

[43]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220.

[44] 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58. 关于RM的照片之事，见MP致RM，署期（1893年6月28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14；and Carter，*Marcel Proust*，160。

[45] LG，*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38.

[46] MP致RM，见Proust and Brach，eds.，（Paris：Plon，1930），15。

[47] MP致RM，署期为（1894年3月11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77。Kolb提到，RM在送给MP的那本有签名的《蝙蝠》上写着，“送了我一只蓝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留念”（280，n. 2）。关于利伯缇领带的礼物，见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op. cit.，221。关于圣诞马槽这件礼物，见MP致RM，署期为（1894年3月28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84。

[48] 见MP致RM，署期为（1893年6月25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13。同一封信出现在Proust and Brach，eds.，（Paris：Plon，1930），8中，编辑对日期未做任何猜测。

[49] 《诗篇》2：10。与梅尔希奥·德·沃居埃一样，RM也喜欢引用拉丁文，因此他这句指令是这么发出的：Nunc erudimini。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69. FG喜欢引用这句话来嘲笑RM。

[50]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184，189，and 190。

[51]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67. LD对RM的演讲风格的记述就远没有那么恭维了，见LD，*Fantômes et vivants*，185。

[52] MP，“Un professeur de beauté，” 163-64.

[53] Jullian，*Robert de Montesquiou*，216. MP不知道，EG也逐渐对RM有了同样的看法，在背地里说他“很遗憾，他那么可笑”。Laure Hillerin，*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Paris：Flammarion，2014），41-42.

[54] FG，Mon amitié，32. 关于普鲁斯特家公寓“可怕而安逸”的装饰，又见Maurice Duplay，*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Paris：Gallimard，1972），24。

[55] Maurice Duplay，*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Paris：

Gallimard，1972），24

[56] RM对室内装饰的兴趣和尝试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有一个很好的综述，见Bertrand，op. cit.，vol. 1，“Partie I：L’Espace intérieur，” 53-258。关于RM家室内都是“戏剧化的宇宙”，Bertrand，op. cit.，vol. 2，“Partie I：L’Espace intérieur，”，703-4。

[57] “鸠妈妈”（Maman Quiou），即路易丝·夏洛特·弗朗索瓦丝·德·孟德斯鸠（Louise Charlotte Françoise de Montesquiou，1765-1835），法国朝臣。1811—1814年担任拿破仑二世的家庭教师。

[58]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56页。

[59] LD，*Fantômes et vivants*，284.

[60] Abel Hermant，“Jours de guerre，” *Le monde Illustré*（July 15，1917）：40.

[61] RM，*Les Pas perdus*，vol. 2，94.

[62] LD，*Fantômes et vivants*，284-85.

[63] 指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the younger，公元15-59），古罗马皇后，暴君尼禄的生母，不列塔尼库斯、克洛迪雅·奥克塔薇尔的继母。她是罗马帝国早期最著名的妇女，也是古代世界最有名的投毒者之一。

[64] Bertrand，op. cit.，vol. 1，87-88.

[65] RM，*Brelan de Dames*（Paris：Fontemoigne，1912），15.

[66] 特别感谢南斯拉夫季米特里王子殿下让我注意到他家族传说的这一小部分内容。对该瘘管手术的讨论又见Stanis Perez，*La Santé de Louis XIV*（Paris：Perrin，2010），73-83。

[67] 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67；MP致RM，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410；以及MP，RTP，vol. 2，1813，n. 2。

[68] MP，CG，842.

[69]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79页。

[70] MP，CG，845。

[71]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78—879页。

[72] MP，CG，844。

[73] MP，CG，844。

[74] 奇朋代尔（Chippendale，1718-1779），英国制造乌木家具的工匠。

[75]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79—882页。

[76] MP，CG，849。

[77] MP，CG，849-50。

[78] MP，CG，851。

[79] 译文引自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82—883页。

[80] 发表《其他遗物》的那一期《白色评论》出版于7月15日。从他与编辑Thadée Natanson的通信来看，MP似乎是在该期杂志付印之前一周左右写完并存档了他的故事；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31，n. 3。

[81] MP，“Autres reliques，”起初发表于*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51-52，51；并以“Reliques”之题转载于PJ，175-76，175。

[82] MP，“Autres reliques，”起初发表于*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51-52，51；并以“Reliques”之题转载于PJ，175-76，175。

[83] MP，“Reliques，”PJ，176.

[84] MP，“Reliques，” PJ，176.

[85] MP致RM署期为（1893年？7月3日星期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17。

[86] 在生命即将结束时，MP对CA回忆起那些为他的小说“提供模特”的社交界的人士（包括LC、GS和EG），明确提到了它们就像展示的遗物，是压在玻璃下面的僵死物件。“啊，塞莱斯特，”他叹道，“一切都归于尘土了。就像墙上的一个美丽的古董扇子。你欣赏它们，却再没有一只手能让它们复活。它们压在玻璃板下面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舞会已经结束了。”CA，*Monsieur Proust*，as told to Georges Belmont，trans. Barbara Bray，foreword by André Acima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159.

[87] 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85.

[88] MP，“A Willie Heath，” PJ，40. MP这篇献词的署期是1894年7月，但它直到1896年才发表，他把它用作了PJ的前言。

[89] 关于MP决心通过RM与EG见面，见Jeanine Huas，*Proust et les femmes*（Paris：Hachette，1971），181；and Benjamin Taylor，*Proust*：*The Searc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30。Taylorf风趣地写道：“能被引荐给（RM的）表甥女格雷弗耶伯爵夫人（是）每一位势利眼的最高目标。”

[90] 1893年MP致RM的未署期信件，见Proust and Brach，eds.，（Paris：Plon，1930），9。

[91] Briais，*Au temps des Frou-Frou*：*Femmes célèbres de la Belle Époque*（Paris：Imprimerie de Frou-Frou，1902），267；Patrick Chaleyssin，*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Paris：Somology，1992），110.

[92] FG尤其担心RM一定极力羞辱MP；见FG，*Mon amitié*，33-35。FG还写道，据埃勒说，1921年CA听说RM之死（很悲惨），“乐疯了”。FG琢磨了一下这个消息，写道：“她知道什么？怎么会如此恨之入骨？”（FG，*Mon amitié*，35）在MP写给RM的信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一种近乎“肉疙瘩”式的自卑能力。在被RM恶毒地训斥之后，MP写信对他说：“亲爱的先生，人不会因闪电而愤怒，哪怕被它打到，因为它来自天上。”MP致RM，见Proust and Brach，ed.，（Paris：Plon，1930），13。

[93] 关于这部集体书信体项目的起源和四位作者每个人承担的任务，见MP，Écrits de jeunesse，218-19。FG不久以后把沙尔格兰这个人物从小说家改成了一位画家，但他仍然保留了这个人物的基本人设，即一位没有出生在社交界却一心想在那里社交的艺术家，就像《如死之坚强》中的奥利维耶·贝尔坦或GS的忠实信徒中的任何人。关于《他们的自白》的有用梗概，见Louis Auchincloss，*The Man Behind the Book*（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6），125-31。这篇关于该小说的评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能够看到（MP）为何如此崇拜艾尔维厄对'旧城区'的精致描写（131）。"顺便说一句，MP赞赏艾尔维厄的小说为书信体小说，这个体裁和上流社会风俗喜剧带来了"未曾预见的丰富质感"，见MP致德·皮埃尔堡夫人，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2（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1，244。这里与MP的集体书信体小说有关以及他对波利娜·德·迪夫这个人物的塑造的引文，均出自MP，*Écrits de jeunesse*，252-66。

[94] 关于桑葚别墅模仿格雷弗耶夫妇的迪耶普庄园，见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203引用的DH的原话。

[95] MP致RB，署期为星期日（1893年11月5日）的信，见MP，*Correspondance*，ed. Philip Kolb，vol. 1（Paris：Plon，1970-1992）（hereafter Kolb，ed.），245。正是在这封信中，MP提到了勒梅尔夫人已经同意为他的"小书"绘制插图了。

[96] 这篇文章的译文见附录三。——作者注

[97] Tout-paris（pseud. MP），"Les Grands Salons parisiens，" *Le Gaulois*（September 1，1893）：2.

[98] 关于RM就德·莱昂亲王夫人（与德·鲁昂公爵夫人）纠正MP之事，见Philip Kolb，"La Correspondance de Marcel Proust：Chronologie et commentaire critique，" *Illinoi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3，nos. 1-2（1949），5 and 9；and Émilien Carassus，*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Paris：Armand Colin，1966），538-39。

[99] Tout-paris（pseud.），"Une fête littéraire à Versailles." 这条裙子的照片见本书的彩页插图。

[100] 关于EG的淡紫色面纱不透明，以及它引发的其他宾客（他们大概都想一睹她的芳容）的抱怨，见EdG，日志，1894年5月30日和1894年5月31日的日记。另

一篇关于聚会的不那么热情的报道，见HR，*Nos rencontres*，161-65。

[101] GPR致EG未署期的短笺，存档于NAF 24974，folio 169。

[102] RM，*Les Pas effacés*，vol. 3，165；Florence Callu and Jacques Lethève，eds.，*Marcel Proust—Exposition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juin-septembre 1965*（Paris：Tournon & Cie.，1965），34.

[103] LD，*Souvenirs littéraires*，145.

[104] LD，*Souvenirs littéraires*，145.

[105] 这是洛尔·德·舍维涅最喜欢用的成语，意为“另有要事”，与之对应的英语是“other fish to fry”。——作者注

[106] Robert Harborough Sherard，*Twenty Years in Paris*：*Being Some Recollections of a Literary Life*（London：Hutchinson，1905），331.

[107] HR，*Nos rencontres*，161. 关于在他自己的“文艺聚会”上凸显出来的RM的艺术的平庸，见Jean Ajalbert，“Rimes riches，”《吉尔·布拉斯报》（1894年6月5日）：1-2。

[108] RM，“Aria，” in *Les Chauves-Souris*，22.

[109] RM，“*Salomé*”（per RM’s program for the party in NAF 15040），多年后以“L’Irresponsable”为标题出版，见Les Paons：édition définitive（Paris：G. Richard，1908），90；引文又见HR，*Nos rencontres*，165。

[110] RM，“Le Coucher de la morte，” in *Les Chauves-Souris*，393-94.

[111] MP在Tout-paris（pseud.），“Une fête littéraire à Versailles.”中引用了这首诗的全部三个诗节，在介绍这首诗时，MP称之为“能够永恒的书页”。

[112] “Une fête littéraire”至今被保留在EG的档案中，存档于AP（II）/101/136-38。

回旋曲 真正的禽鸟之王，或幼王万岁[1]

传说当自然界的各种禽鸟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它们一致同意把王冠授予那个飞得最高、离太阳最近的鸟。

雄鹰展翅直上九霄，眼看超越了所有竞争对手，直到最后他累了，停下来歇息巨大的双翅——他不知道那里停着一只小小的鹪鹩，一路仰面舒服地躺着，此时却突然腾云驾雾，独自翱翔云端，睥睨众生。

据说鹪鹩此举有失体面，他的胜利毫无价值，因此后来永远鲜明地出现在旗帜和王座上、成为王室象征的，是雄鹰。

有些人则不认为抖那么个小机灵就会让我们丧失统治世界的资格，在他们看来，鹪鹩才是真正的禽鸟之王。

——保罗·阿尔维厄，《巴黎的愚蠢》（*La Bêtise parisienne*，1897年）

---

[1] 原文“Roitelet”在法语中不仅有“麻雀”之意，在更古老的用法中，它的另一个意思是“年幼的国王”。——作者注

尾声 天鹅绝唱

一顶王冠，一只天鹅，一个未曾送出的吻。年华似水。

来此人世一遭，每个人都想拥有一点意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可或缺。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微型太阳系，是外部无法觉察的行星、月亮和彗星组成的旋涡；每个自我都在那个太阳系的中心灼灼发光。每个人都说，我是一颗太阳。巨大的银河系也无法让我相形见绌，神秘的众神也无法抵消我存在的价值。你，你们——会看到我，感受到我的光芒。也会记住我的名字。

我们奢侈地挥霍着每一分钟，仿佛它们是不值钱的硬币。当口袋空空，我们推脱时世艰难，渴望从未曾拥有过的财富。我们收集护符法宝：一顶王冠、一只天鹅、一个未曾送出的吻。我们追求神的眷顾，以虚幻的愚人金构筑巢穴。如果可以，我们会竭尽所能，在虚无中筑起圣殿，修建抵御遗忘的堡垒。

逝者如斯，我们浪掷的光阴如不尽长河，滚滚东流。年华似水，每一个被追悼的太阳都是我们的救赎。让我们再活一次。

致谢

虽然写一本书往往看似且感觉像一个孤寂的事业，它却很少是一个女人的独角戏。很多人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给过我帮助，我对每个人深表感激。希望这篇致谢词没有遗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要感谢我的写作对象的后裔，没有这些当代贵族的协助，我绝不可能重现他们祖先的似水年华。特别感谢洛尔·德·格拉蒙、她的哥哥德·格拉蒙伯爵居伊和他们已故的堂兄弟德·格拉蒙公爵，以及德·比达什亲王（Prince de Bidache）安托万十四世，他们允许我阅读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庞大的个人档案：足有32码长的私人文件，其中大多从未对《追忆似水年华》学者和研究世纪末的历史学家们公开过。我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巨大宝库中所做的发现并非全都一目了然或不容置疑。例如，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试图解读伊丽莎白根据一种19世纪的速记法发明的私人语言，但最后只能说部分解开了密码。尽管如此，她的文件仍有助于我全方位地了解这个女人，启发我读懂了另外两位女主人公生活中的一些此前不明就里的暗角。同样重要的是，伊丽莎白档案那208个文件盒中，有一个里面存放着普鲁斯特关于她的沙龙的未完成、此前未发表也未翻译过的文章。诚然，如果格拉蒙家人没有把这些材料托付与我，本书篇幅就要短得多。但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以及如我希望，作为一部故事书，它的内容也会乏味得多。

本书中其他人物的后代也跟我分享了他们家族的回忆录、文件、传说和联系人，在此一一感谢：南斯拉夫季米特里王子、皮埃尔·德·阿伦贝格亲王、亚历山德拉·德·里凯·德·卡拉曼-希迈公主、马克·德·贡托-比龙伯爵、德·迈格雷伯爵阿尔芒-吉兰、德·奥尔纳诺伯爵菲利普、德·莱斯贝男爵罗兰、阿希尔·缪拉·盖斯特和卡罗·佩罗内。还要感谢在德·阿

斯托格街格雷弗耶府邸员工宿舍里长大的让-路易·波瓦雷把自己未出版的关于那些年的回忆录寄给我，感谢格扎维埃·吉罗·德·圣-埃马尔为我讲述贡托-比龙家族的迷人历史。

同样令我感激不尽的，是伊丽莎白的玄孙女和传记作家安·德·科塞-布里萨克，这里要特别感谢她的慷慨相助。她不但把自己的笔记和文件与我分享，还和丈夫德·朗比托伯爵帕特里斯一起，邀请我到他们位于勃艮第的朗比托城堡中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两人还说服她的兄弟德·科塞-布里萨克伯爵菲利普及其岳父母罗歇·德·蒙泰贝洛伯爵和伯爵夫人在威尼斯的孔塔里尼-波里涅克宫热情慷慨地接待了我。该家族这一支系的人对我表达的善意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书写一位并非我亲戚的人，可谓责任重大。[1]由于我披露的关于伊丽莎白私生活的大部分信息没有出现在安·德·科塞-布里萨克的书中（或其他任何地方），我在叙述中出现的任何疏漏理所当然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不过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揭开伊丽莎白的——以及热纳维耶芙和洛尔的——秘密并不是我对自己的传主缺乏尊重，而是我致力于尽可能真实地将她们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前所述，普鲁斯特未能全面立体地观察他的贵妇们，是这位艺术家罕有的缺陷之一。如果我也满足于对这些女人的理想化或脸谱化，将会违背我写作本书的初衷，那就是重新赋予她们一些复杂性、深度和细微情感，即她们在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那里所缺失的东西。

在美国和欧洲帮助我深入研究的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博物馆员和收藏品管理人包括：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私人档案部的瓦伦丁·魏斯，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的莫伊拉·菲茨杰拉德，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手稿和版画部的夏尔-埃卢瓦·维达尔博士、阿奈·迪皮伊-奥利维耶和纪尧姆·福，尚博尔国家领地（尚博尔）的波利娜·萨瓦伊尼，罗马普利莫里宫的瓦莱里娅·佩蒂托，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梅雷迪思·弗里德曼，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的约翰·温科勒，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帕梅拉·格尔宾，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的瓦莱丽·斯蒂

尔，国家肖像画廊（伦敦）的埃玛·巴特菲尔德，纽约市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戴维·罗萨多，以及伦敦罗斯柴尔德档案馆的贾斯廷·凯文奈利斯-弗罗斯特。获得本书中图片的复制权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我的研究助理朱莉娅·埃尔斯基和洛尔·詹森沉着冷静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几十个项目中，还要多亏纽约艺术资源组织的罗比·西格尔提供了帮助。关于手稿的版式，全靠托马拉·奥尔德里奇和桑德拉·费福尔尽职尽责的努力。

在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我得到了教务长琳达·贝尔、安·博伊曼、彼得·康纳、皮埃尔·福斯、泽格·加夫隆斯基、罗斯·汉密尔顿、安·伊戈内、劳丽·波斯特维特和我最喜欢的普鲁斯特学者伊丽莎白·拉登森的支持。其他学校的同行们——哈佛大学的克里斯蒂·麦克唐纳、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的弗朗索瓦·普罗克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洛尔·穆拉特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纳塔莉·莫里亚克·戴尔——也都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关于普鲁斯特的专业知识，帕特里克·米穆尼也是一样，正是这位知识如百科全书一样渊博的普鲁斯特迷最初让我了解到热纳维耶芙和洛尔的复杂背景。和上一本书一样，我的经纪人罗布·麦奎尔金也是本书最好的第一读者和我最信任的顾问，他是忠诚、希望、热爱和全心全意的源泉。

我有幸与克诺夫出版公司的一个极其出色的团队合作，为首的是我那位冰雪聪明的可爱编辑谢利·万格。她为出版本书孜孜不倦，对一切细节明察秋毫，更不用说还数次允我扩充内容，使得成品比最初计划的篇幅多了一倍多；还多亏她揶揄的幽默感，让最紧张的时刻也充满乐趣。谢利的助手布伦娜·麦克达菲以及她们的同事维多利亚·皮尔森、扎基亚·哈里斯、尼古拉斯·拉蒂默和凯瑟琳·朱克曼，都为这一在公司内部被称为“普鲁斯特那群人”的项目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特约文字编辑艾米·瑞安和校对员本杰明·汉密尔顿对本书的校对无比严格，清除了数百个骇人的错误，封套设计师詹妮弗·卡罗为本书封面选择了最完美地

象征“盖尔芒特家”的迷人诱惑（和道德堕落）的形象。我希望为本书撰写续作时，能再度与这一群才华出众的人合作。

或许写作本书最难的莫过于为了完成它，我不得不远离深爱之人数年之久。然而就算在隐士般的孤独生活中，许多朋友还是坚定地加入帮助我的行列。罗贝尔·库蒂里耶和艾萨克·米兹拉希分别在贵族礼仪和制服课题上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卡罗琳·雷诺尔兹·米尔班克无意中瞥见了一幅关键的纳达尔照片，帮了大忙，阿曼达·福尔曼透露了一个章节顺利过渡的技巧。安·巴斯知道红鞋子的故事，而格洛丽亚·范德比尔特·库柏对其他一切故事了然于胸。萨曼莎·博德曼、伯纳德-亨利·利维、凯蒂·马伦、凯西·雷纳和塞西尔·戴维-魏尔，每个人都曾在我写作过程的不同节点诱惑我远离自己的普鲁斯特堡垒，把我安顿在一个极其奢侈的“自己的房间”里。其他与本书有关的善意举动来自：乔纳森·伯纳姆、利·卡彭特、彼得罗·奇科尼亚尼、艾米·法恩·科林斯、戴维·帕特里克·哥伦比亚、彼得·达钦、苏珊·费尔斯-希尔、詹妮弗·费洛斯、弗雷德·伊斯曼、芭芭拉·利伯曼、弗朗辛·迪普莱西·格雷、艾丽斯·卡普兰、苏珊娜·肯尼迪、安·德·马尔纳克、已故的伯纳德·米诺雷、格雷琴·鲁宾、谢丽尔·桑德伯格、珍妮特·桑格、玛丽-莫尼克·斯特克尔和杰基·韦尔德。莫里斯·塞缪尔斯为手稿的好几个章节提出了洞中肯綮的意见，而我英雄的最卓越的匠人约翰·哈比希·所罗门从头到尾阅读了全书，对几乎每一页内容提供了独到的建议，他以自己的高妙智慧和无尽神采屡次提醒我，我事实上并未陷入一种自己建造的疯狂的文字牢狱中。对于他为这本书和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无以为报。

我的母亲卡罗尔和父亲杰克·韦伯，还有我的哥哥乔纳森，始终如一地给我支持，这份坚定从《辛纳蒙的生日》时代就从未改变过。最后，感谢我的男朋友保罗·罗默，他从未抱怨四年前我搬到他的家里时，还带着四个早已过世却仍然责备求全的巴黎人（还有四条活泼乱跳却同样吹毛求疵的救援犬）。还好保罗跟我一样有工作狂倾向，还有他

虽然是个经济学家，但跟我一样对措辞是否贴切斤斤计较。他还没有读过全书，发誓说他只会在出版后对我发难。有朝一日他读这本书时，我希望他阅读愉快，或者至少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打动他再去尝试一下《在斯万家那边》。真的，那是我对本书每一位读者的希望。

---

[1] 为充分披露之故，我应该说明，在为本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母亲有一位中世纪的法裔祖先嫁入了舍维涅家族。我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一层关系，这一信息当然也没有使我在描写舍维涅家族时有任何偏爱或偏见。——作者注

附录一 作者附言

关于本书中的大小写和命名法的几点说明。很抱歉，这些解释或许听起来拘于小节和迂腐学究。它们与当时微妙的礼节和社会等级密切相关，在今天看来或许无足轻重，但在本书中描述的世界，却事关重大。

1.为迁就英文语法规则，本书中王室和贵族头衔的首字母都大写了。这些头衔在法语中是以小写字母开头的，例如the comte d'Haussonville（德·奥松维尔伯爵）、the prince de Sagan（德·萨冈亲王）。

2.有时我会偏离这些规则，对族长（chef de famille）只称呼他的尊称和姓，而家中排行靠后的儿子们则要称呼尊称、名和姓。阿代奥姆·德·舍维涅是幼子，因此严格来说他应该被称为"阿代奥姆·德·舍维涅伯爵"，但为了相对简洁，我有时会称他为"德·舍维涅伯爵"，在他出生前，这个头衔先是属于他的父亲，后来又依次为他的三个哥哥所拥有。

3.与以上第2条相关的一个规矩要求当（a）人们希望说出一位族长的教名或（b）人们在指称家族中唯一拥有某个头衔的贵族时，他的名字会被写在尊称之前，例如（a）亨利，格雷弗耶伯爵[1]，以及（b）博松·德·塔勒兰德-佩里戈尔，德·萨冈亲王[2]——而不是（a）亨利·格雷弗耶伯爵或（b）博松·德·萨冈亲王。由于这既不需要我赘言，也无须读者具备什么专门知识，我在本书中遵守了这一规则。

4.我还遵守了法国人在不带尊称提到贵族姓氏时省略贵族小品词"德"的规则（如"她对拉福斯说"而不是"她对德·拉福斯公爵说"），姓氏只有一个音节（"她对德·曼说"）或以元音或不发音的"h"（"她对德·阿伦贝格和德·奥松维尔说"）为首字母的情况除外。

5.公爵在法国贵族头衔中排位最高，仅次于君主，一般要高于（排位依次下降）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当一位法国亲王并非王族时，公爵的地位也高于他。事实上，公爵的长子往往带有“亲王”头衔。一般来说，法国王族的亲王的地位高于公爵，但前者往往也有他们自己的公爵头衔：例如路易十四的弟弟就是德·奥尔良公爵。或许更让一般读者不明就里的是，法国王室家族的某些成员会出于各种原因故意自称为伯爵，例如尚博尔伯爵（1820—1883）和巴黎伯爵（1838—1894），两位分别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波旁一系和奥尔良一系的法国王位觊觎者。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利用王族称呼的这个模糊地带写了一个小插曲，没有受过社交培训的交际花奥黛特·德·克雷西错把尚博尔伯爵当成了一位“普通的”伯爵。

6.由于王室和贵族头衔的世袭性质，这些头衔并不一定自始至终伴随着持有者的一生。《追忆似水年华》中另有一例：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最初是洛姆亲王和亲王夫人，只是在亲王的父亲去世之后才继承了公爵地位。或者举一个英语世界的读者熟悉的真实世界的例子：格雷弗耶的朋友威尔士亲王伯蒂在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去世之后继承了王位，成为联合王国国王爱德华七世。

---

[1] 亨利，格雷弗耶伯爵（Henry，Comte Greffulhe），在这种情况下，本书译者均处理为将名字写在尊称后面，即格雷弗耶伯爵亨利，使之符合中文习惯。

[2] 亨利，格雷弗耶伯爵（Henry，Comte Greffulhe），在这种情况下，本书译者均处理为将名字写在尊称后面，即格雷弗耶伯爵亨利，使之符合中文习惯。

附录二 法国政权更迭年表，1792—1870年

·1792年9月：法国革命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波旁王朝。一个新的共和政府宣布成立，即第一共和国。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巴黎的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十个月后的10月16日，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同一个地方被处决。

·1793年8月—1794年7月：在雅各宾派激进分子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统治法国，以血腥的恐怖统治清洗“反革命”。恐怖统治以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及其亲信们的所谓“热月政变”失败而告终。

·1795—1799年：随着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解散，一个名为“督政府”的五人委员会开始统治法国。

·1799年11月8—9日：在所谓的“雾月十八政变”中，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推翻了督政府，代之以“执政府”并担任其最高长官。这将是第一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政府机构。

·1804年12月2日：成功建立军事独裁后，第一执政官波拿巴登基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第一拿破仑帝国成立。

·1814年4月：与欧洲各国联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拿破仑一世被迫退位。路易十六两个幸存的弟弟中的年长者登基成为路易十八，这是波旁王朝复辟的第一阶段。拿破仑·波拿巴被流放至厄尔巴岛。

·1815年2—3月：波拿巴从流放地回国企图卷土重来。他和一队支

持者一起向巴黎进军，重新夺得政权，这个政权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史称“百日王朝”。

·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波拿巴再次被联军打败。四天后，他第二次退位，流亡圣赫勒拿岛，于1821年在那里去世。

·1815年7月：路易十八重新掌权，开启了波旁王朝复辟的第二阶段，也是持续时间较长的阶段。

·1824年9月：路易十八去世，由他的弟弟继承王位，即查理十世。

·1830年7月26—29日：查理十世日益专制的统治风格引发了起义，即所谓的“七月革命”，革命以洗劫杜伊勒里宫和波旁王朝的倒台而告终。

·1830年8月：查理十世退位，与家人一起流亡。取代他登上王位的是他的堂弟、法国王室庶系分支的族长德·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德·奥尔良以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之名登上王位。他的统治是相对较为开明的立宪君主制，史称“七月王朝”。

·1848年2月：1848年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宣布建立。

·1848年12月10日：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和继承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以压倒性的胜利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

·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总统以一次政变解散了法国的全国立法机构国民议会，成为法国唯一的统治者。

·1852年12月2日：第二帝国建立，前总统波拿巴登基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1870年9月2日：自7月开始与普鲁士交战，拿破仑三世在色当会战

中输给了敌人。三天后，共和派政治家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正式宣布第二帝国终结。第三共和国建立，并持续存在了70年。1940年夏，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维希政府成立，第三共和国最终崩溃。

附录三 社交专栏作家普鲁斯特

1.《格雷弗耶伯爵夫人的沙龙》（“The Salon Of The Comtesse Greffuliie”，约1902—1903年）[1]

作者注：伊丽莎白把这篇文章存入了她档案中一个没有标记的盒子里，后来她以为这篇文章丢了，在一张便条上重做了标记，洛尔·伊勒兰引用如下：“（普鲁斯特）在见到我之后寄给了我一篇写我的人物素描，他一直梦寐以求见到我。他说如果我觉得文章够好（可以发表），就把它还给他。但由于我丈夫让我害怕公开露面，我就把它藏在了布德朗森林。啊，我把它弄丢了吗？”

这篇文章支离破碎，从作者的手写编号来看，这篇用打字机写就的文章共有八页，而现存的文稿始于第三页。以下摘录中完全保留了原文中所有的中断、漏洞和未完成的文字。

……请的人。或许原计划只请十位，但数字很快越来越多。不过这个聚会当是维克多·雨果歌颂的那群人的反面：

离开卡迪克斯（原文如此）时，我们只有十个人。

一到奥特朗特，就变成了三十个人。[2]

我相信很快我们就会变成200人。说很快，是因为（聚会）一个小时后就开始了。如果谁能瞥一眼巴黎最优美的府邸里人来人往的忙碌情景，看看那些美丽的女人在激动中优雅地引颈翘盼的样子，该多么有趣、多么迷人啊。天气晴好，她们的敞篷马车等在前门或庭院里，过一会儿，城中各处会有100位马车夫得到同样的地址，穿行在响晴白日下

的街道，马车上的乘客穿着花枝招展的裙装，与路过的人笑盈盈地相互致意。

首批客人陆续到达，格雷弗耶夫人把他们安排在府邸巨大的客厅靠墙的位置，让客厅中央保持干净无阻，以迎接陛下的到来和行进。只有几个人还在那里徘徊，就像阅兵之日总会有几个离队的士兵在将军到来之前在兵营空旷的庭院中穿行，待第一声号角响起就会立即归队。将首批受到陛下接见的女士们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有德·普塔莱斯夫人，她本人也是一位陛下，但她首先是庄静的埃德蒙·德·普塔莱斯伯爵夫人殿下，她仍然保留着曾经令举世惊艳的那种庄重仪态，丝毫无损。当（第二）帝国时代就认识她的国王见到她时，定会难以相信岁月在她身上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他一定以为格雷弗耶夫人就是那个用自己的魔法把昔日美人未曾更改的容颜召唤到他眼前的仙女。她的身旁是德·吕内公爵夫人（Duchesse de Luynes），娘家姓拉罗什富科，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她自己和两个孩子所独有的魅力。他们就坐在她的身旁：双眸迷人的德·诺瓦耶公爵夫人（Duchesse de Noailles）和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德·吕内公爵，简直就是贵族风度的化身。她后面是保罗·德·波尔塔莱伯爵夫人，一位高挑匀称、相貌端正的金发女人；泰尔诺-孔潘斯夫人；娘家姓韦莱（Werlé）的德·卡拉曼-希迈亲王夫人[3]；卡齐米尔-佩里耶夫人（Casimir-Périer）；德·格拉蒙公爵夫人。这时更多的人已经到来。格雷弗耶夫人站在门口通道，“像一只巨大的金鸟”[4]，随时准备展翅高飞。她的漂亮眼眸里波光流转。“你看见那片像骆驼一样的云吗？”[5]哈姆雷特问波洛涅斯，然后又看到云的样子瞬间千变万化。格雷弗耶夫人的眼眸也一样瞬息万变。这一刻它们是静止的，有着宝石的矿物质感；仿佛把它们放入玻璃柜，就会点亮整座卢浮宫。她眼里的瞳仁就像被抛入清澈河水中的一对卵石。但每次她看到有朋友到来时，微笑立刻会让那对瞳仁摆脱凡俗，带上一种来自天界的仁爱，仿佛星辰那神秘而透明的可爱光辉。它们每时每刻都是“他者”。这是迪洛侯爵，他是格雷弗耶夫人的老朋友了，曾在军中与加利费将军共事，红润的脸色

和明亮的碧眼让他看似基兰达奥[6]画中走出的人物。与他交谈的另一位老年军官是路易（原文如此）·德·蒂雷纳伯爵（Comte Louis [*sic*] de Turenne），也是他们那个阶层中最有风度的男人。德·蒂雷纳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体面、正直、和蔼可亲，学问涵养也很深厚，杰出的成就闻名遐迩[7]；他位于德政中路（rue de la Bienfaisance）的小公寓既是优雅人士聚会的中心，也是思考和研究的世外桃源。德·蒂雷纳先生属于我们所说的那种能呼风唤雨的人，一旦他们把这点能力保留给仁慈的上帝，或许他们就能得到一点无谓的特权，如今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物理学家。然而事实上在从德·特隆歇街（rue Tronchet，普塔莱斯府）到耶拿大街（avenue d’Iéna，斯坦迪什府）、从马里尼大道（avenue de Marigny，德·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和居斯塔夫·德·罗斯柴尔德府）到圣多米尼克路（rue Saint-Dominique，萨冈府）这个极其有限的宇宙中，他的权力可说是无远弗届。

他依次向以下人士问好致意：外表年轻却有一个古老姓氏的德·蒙莫朗西公爵（Duc de Montmorency）[8]，格雷弗耶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好朋友夏尔·埃弗吕西先生，德·卡斯特兰侯爵（Marquis de Castellane）和德·朗比托伯爵（Comte de Rambuteau）。格雷弗耶夫人在她的朋友、娘家姓迈利-内勒的德·凯尔桑伯爵夫人（Comtesse de Kersaint）旁边安排的是她的表亲，黑发、年轻、高挑的德·埃拉格侯爵夫人（Marquise d’Eyragues），她娘家姓孟德斯鸠（亨利·德·孟德斯鸠伯爵的妹妹、娘家姓诺瓦耶的伯爵夫人的小姑）。这个女人聪明风趣，但凡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可爱至极。她的风趣是那种天赋的伶俐，有一种洞察世事的独特而微妙的视角，以至于在她看来没有哪件事无关紧要，也没有哪个人乏味无趣，她能从最无聊的石头中发掘出金子般的闪光质感。因此她刚一落座，其他宾客就过来围在她四周，坐得离她最近的人显然已被她天马行空的谈话逗得前仰后合。德·玛萨侯爵夫人、德·加布里亚克伯爵夫人（Comtesse de Gabriac）和德·雷焦公爵夫人（Duchesse de Reggio）看到德·埃拉格夫人后，都离开座位，来到她的附近找地方坐下来。她们

自己在议论着哪些出色的作家和科学家也出席了聚会，即将被引荐给陛下。天才总是围绕在出色的女性核心人物周围。但今天，（再次运用前文提到的比喻）一个伟大的阅兵日，法国思想界的老兵们都会前来向国王表示敬意，先锋和后卫部队、少将和预备队都受命全副武装。除了年轻的（画家）赫勒鲁、拉冈达拉、洛布罗[9]（和）拉西泽朗[10]外，还有伟大的化学家贝特洛[11]先生、有着机敏而深邃的历史学家头脑的艾伯特·索雷尔[12]先生、卡米耶·圣桑[13]先生；保罗·艾尔维厄先生虽然年轻，却也同样杰出，他以富有音乐性的缓慢语词表情达意，带着和谐而缓慢的抑扬顿挫，把我们全都吸引住了，耐心地等待着他说出每一个深奥而迷人的词语。伟大的天文学家让森[14]先生身着晚礼服出席聚会，虽说这才下午四点——他或许是对聚会的正式性过于重视，或许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着装的琐碎细节的不屑一顾，又或者是对时尚一无所知却又想恪守规矩这么一种感人的愿望。其他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这么穿都会显得可笑，但让森先生却带着一种高贵且极为动人的神情，让人觉得在场的其他智者大概都乐意换上和他一样的晚礼服，就像小仲马对乔治·桑那样对他说："我宁愿和你一起犯错，也不愿和其他人一样循规蹈矩。"国王还没有到。眼前情景像大家坐在一间教室里等待考官。大家继续闲聊着。正对着花园的窗户开着，飘来一阵甜丝丝的丁香花香，夹杂着金翅雀的歌声。偶尔有谁说一句风趣的话逗得格雷弗耶夫人开怀大笑。啊！她多美啊！有那么一刻，她好像对自己不那么自信，仿佛有点儿犹豫，但她自己的笑声即刻引爆了全场，众人随声附和，语笑喧呼。

她的美让人目不斜视。她"在每一双凝神注视着她的目光中都是那么美丽"。[15]

今天有一位对手在跟她争夺众人入神的凝望：壁炉架上那尊乌敦雕塑的迪安娜（半身像）。就在这小小的社交表演大幕拉开之前，我已经像一个尽责的剧作者一样向诸位一一介绍了出场人物，但我还没有讲到一个无生命的旁观者，也是他们中间最生动的旁观者，乌敦的迪安娜，

她的监督是那样异乎寻常，以至于正是她为我这篇文章的题目赋予了灵感。[16]趁聚会还未开始，让我很快讲述一下她的故事吧；因为有些活动已经启动了。格雷弗耶夫人刚刚快步走出沙龙，我怀疑陛下就快到了。故事是这样的，大约十年前，格雷弗耶夫人想在一场化装舞会上装扮成迪安娜，在为自己的着装做研究时，她想看看某一位乡下邻居拥有的一尊乌敦的迪安娜雕塑，那是个很卑微的乡巴佬，她与他并不相熟。于是她去找他们，却见那家人都披麻戴孝，我也不清楚是乌敦半身像主人的妻子还是女儿去世了，但格雷弗耶夫人觉得她应该向那家人表示慰问。她的慰问淳朴自然，言语诚恳，发自内心。十年后，半身像主人本人去世时，为了纪念她当年的来访，就在遗嘱中把这尊半身像留给了她。（这一事件的完整报道刊登在龚古尔兄弟的杂志上，那份杂志就不用我特别推荐了。）那就是这位可爱的大理石“客人”享有特权参加格雷弗耶夫人的每一次聚会的原因，这让许多有血有肉的真人都羡慕不已呢。不，不是国王来了，我还有时间说完我的故事，他还没有来。

但难道守时不是……你们懂的。[17]以下这几位迟到了：埃杜瓦尔·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和伯爵夫人，后者娘家姓科尔贝（Colbert）；亨利·德·孟德斯鸠伯爵和伯爵夫人，后者娘家姓诺瓦耶；马蒂厄·德·诺瓦耶伯爵和伯爵夫人，后者娘家姓布兰科旺；以及亚历山大·德·卡拉曼-希迈亲王和亲王夫人，后者娘家姓也是布兰科旺。[18]但我在这里得插一句话。我提到最后两个名字时，心中的情感很难一时说清。德·诺瓦耶伯爵夫人和德·希迈（原文如此）亲王夫人[19]已经分别是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散文作家了——不过截至一个月前，说德·诺瓦耶夫人是伟大的散文作家也无妨——看起来似乎应该用整整一卷文学评论来介绍她们，她们的名字应该出现在一本法国文学史中，而不是社交界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她们的名字出现在一份“淑女”名单中会产生一种认知失调感，就像在一本复辟时期的回忆录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今天，在德·***公爵夫人家里举办了一场豪华晚会。客人包括德·***和德·***夫人。其中一位宾客，不知是德·卡斯特（de Castrie）（原文如此）[20]先生还是德·布罗

伊先生带来的德·拉马丁先生，为大家朗读了他题为《诗意的冥想》中的几行诗作。”[21]我知道说到女性（作家）情况不尽相同。但文学史中还从未有过这类事件发生，因此没有先例可循。保罗·艾尔维厄先生走上前去祝贺德·诺瓦耶夫人那部精彩的小说，与此同时，人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仿佛被她深邃的双眸钉在了原地，它们充满了明暗光影，光影的余晖为她唱起了一首赞歌，赞美她毫无瑕疵的美、弃绝凡俗的圣洁和端方仪态。[22]

德·希迈亲王夫人面孔玲珑精致，仿佛世间最精细、最灵巧的手满怀欢喜地雕琢出来的，也传递着同样巨大的魔力。她美丽的眼睛虽然近视，却能深刻地洞察事物的本质；她的楚楚身姿灵动而绰约；她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野性不羁的可爱。把这两位才女娶回家颇需要一些细腻心思和复杂技巧，马蒂厄·德·诺瓦耶伯爵和德·希迈亲王[23]（原文如此）显然能担此大任；而（这两个男人）还不止如此，他们自身也德行出众。思考和艺术创作难免使妻子们疲惫和疑虑，每当此时，两个男人的勇气和善良恰是她们非常需要的避风港。但我还是过段日子再抽空继续这篇人物素描吧，因为国王已经由格雷弗耶夫人搀扶着走进了客厅。我不想描写他，以防他被读者认出来；如此可以维护他微服私访的初衷。您会说那无关紧要，哪个国王没有光临过德·阿斯托格街或布德朗森林？任何王室成员来到巴黎，拜访格雷弗耶夫人的沙龙已经和参观爱丽舍（宫）、卢浮宫或巴黎圣母院一样，成为行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给诗人以灵感、伴帝王以威仪、对谁都坦诚相待、在谁看来都美丽非凡的格雷弗耶夫人搀着国王走上前来，向他引荐或重新给他介绍埃德蒙·德·普塔莱斯伯爵夫人、德·费赞萨克公爵夫人、公爵遗孀德·吕内夫人、德·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夫人、卡齐米尔-佩里耶夫人、德·比萨克公爵夫人、娘家姓德·肖尔纳的德·于扎伊公爵夫人[24]、德·鲁昂公爵夫人、马蒂厄·德·诺瓦耶伯爵夫人、亚历山大·德·希迈亲王夫人（原文如此）、德·莫特马尔公爵夫人（Duchesse de Mortemart）、德卡尔公爵夫人（Duchesse des Cars）。国王祝贺德·鲁昂公爵夫人最新发表的诗作[25]

卡尔梅特正值

风华正茂

格雷弗耶夫人来

男人们

（向）君主致意，就像给他们戴上一顶王冠。她纤细地站立在那里，手指毫无偏差地指着他们，清晰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贝特洛先生。”贝特洛先生上前一步，与国王陛下简短交谈；旺达尔[26]先生，他教养良好、风度翩翩；“福莱先生”，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样貌英俊而乐观，他的头发过早地发白了，却打理得像人工造雪一样整齐，蓝色的眼眸在就像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漫山遍野的远志花；“朱尔·罗什[27]先生”。国王陛下似乎特别喜欢跟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罗什）交谈，他目光锐利、言辞热情生动，才智过人。然后国王坐下来，演出开始了。节目全都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及肖邦的序曲和波兰舞曲，由（弗朗西斯·）普朗泰[28]先生演奏。凡没有听过普朗泰先生演奏的人，都不知道一架钢琴在伟大的艺术家手中能经历怎样的变形记，时而如怒海咆哮，时而似夜莺婉转，时而像深林回音。人们一定会说，除了里斯勒[29]先生之外，没有哪一位钢琴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没有听过普朗泰先生演奏的人也不知道这位杰出的艺术家有许多有趣的怪癖。普朗泰先生不会没有表达地单纯弹琴，他会用一个手势强调它，在某个音出现之前给观众一个预警，之后说一句赞赏的评价。我们还必须说正是因为这种古怪是他发自内心的表达，它非常讨人喜欢，不像某些钢琴家表现出来的那种做作，德拉福斯[30]就是一例，他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但他令人讨厌而做作的风格常常会让他显得不那么优美。

大家就座。普朗泰先生准备开始了。他把手指放在琴键上，声音看似一触即发，不。普朗泰先生停下来，转身对着国王说：“鉴于国王陛

下想听一点音乐，我将首先为他演奏一支序曲。我称之为“比亚里茨的岩石”（The Rocks of Biarritz）。”他又转向博纳先生，接着说：“是的，老伙计，比亚里茨，哈！多么风景秀丽的地方啊！”他开始弹奏了；可以听到一个精细的颤音，他一边演奏一边说：“这是海浪，你可以听到它，听到它珍珠般的笑声。”他又看着格雷弗耶夫人：“啊！我觉得这位伯爵夫人可以听到，我好开心。”他笑了。（他说话时，颤音继续，游刃有余，没有停歇。）“（海浪）多么清澈啊！哦，但是要当心，它会让我们浑身湿透的！”他转向给他伴奏的乐队，“哦，亲爱的中提琴，声音不要太大，让我歌唱，因为我喜欢歌唱”（他手指始终未停，让钢琴在他的指尖庄严华丽地高歌起来），“这里！”（他还在弹着琴）“让我们一起歌唱……这——呃——样！就——这——样！让我们歌唱吧，让我们歌唱吧”（再度对乐队说），“啊，你说得太好了，现在让我来回答你”（的确，钢琴回答了由乐队开启的那个乐句）。随后整个乐曲结束，演出停了下来。普朗泰先生太热了，说他想去冲个澡。那一刻，一位警觉的、令人尊敬的、仍显得很年轻的老人走了进来，卓越的（画家埃内斯特·）埃贝尔[31]，他对一切新的艺术动态和社交界的娱乐都很感兴趣。“陛下，这位是出色的、风流潇洒的埃贝尔先生”，格雷弗耶夫人用她非凡的嗓音把埃贝尔先生介绍给国王，她的声音就像在语词上凌波微步。出于对埃贝尔先生的巨大声誉和德高望重的充分尊重[32]，国王站起身，快步走向他，邀请他坐在自己身边；他们一起聊了很长时间。然后刚刚洗完澡准备回来继续演出的普朗泰先生再次出现了，他换了一件质地更轻的西装，在钢琴前就座，宣布要弹一首肖邦夜曲，他已经决定给这首夜曲取名为《埃贝尔的忧郁》（*Hébert’s Melancholy*）。“当心，老朋友，”他对大画家说，“我将直抵心灵。”的确，他弹奏的方式以一种神圣庄严的方式直抵心灵。埃贝尔显然被感动了，在他弹完之后拥抱了他。但是遗憾啊！国王到得太晚了，以至于聚会才进行了一半，就已经六点钟了；我得走了。我还没有看够，但想必你们已经看厌了，一定觉得我对这些分分秒秒的叙述太冗长啰唆，而对我来说，那些分分

秒秒瞬间就飞逝了。

——多米尼克[33]

2.（1893年9月1日）刊登在《高卢人报》上的《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Les Grands Salons Parisiens”，1893年9月1日）。

在最近的一封读者来信中，一位订阅户提了这样的问题：“巴黎最‘封闭’的沙龙中排名前十或者前二十的有哪些？最优雅的沙龙中排名前十或者前二十的有哪些？最贵族的沙龙前十或前二十？您觉得后面两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愿意就此问题提供个人观点，就请专家畅所欲言，如果本文中出现了任何调查中的疏漏或错误，特此道歉。

封闭沙龙：如今已经不再是（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七月王朝或（拿破仑）帝国时期了。没有宫廷（原文如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新人们凭借自己的德行、财富或教育在最好的沙龙中赢得一席之地，进入上流社会。

把这些人排除在外难免会显示出不合时宜的等级观念；而对他们每个人敞开大门则会把贵族沙龙变成拥挤的赌场。

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哪一个轻又由谁说了算呢？正如这类事例的一贯情形，大家见仁见智，试图妥协的人会列出三种不同的宾客名单：长名单列出每年邀请一次的宾客；“半长名单”列出每年邀请两三次的宾客；还有一个短名单，所列的是尽可能经常邀请的宾客。

有句格言说得好：“一扇门不是开着，就是关着。”这里我们不妨像过去在宫廷里（原文如此）所做的那样，要么开一扇，要么开两扇门，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的需要。

俱乐部（例如骑师俱乐部或艺术家联盟组织等）也为我们的沙龙带来了变化。沙龙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恰是如今俱乐部起到的作用；人们在沙龙里谈论一切，从文学到政治，无所不包。人们在沙龙里声名远扬，新思想在那里遭到抨击。每个沙龙都立场鲜明，常客们要么宣扬新思想，要么抨击新思想。

那时，没有几个伟人在建功立业前未曾光临过某个沙龙，他们在那里明智地与一两位手眼通天的女人交好。波拿巴正是在巴拉斯[34]的客厅里初遇塔里安夫人的朋友（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夫人并赢得了她的芳心，后者帮助他获得了埃及军队指挥官的职位，这是他崛起之路的第一步。他后来立她为皇后，正是为了酬功报德。

复辟时期，沙龙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清一色的君主主义者聚集的地方，因为（拿破仑一世军队的）元帅们都听从王室的召唤。雷加米埃夫人很受人敬爱，她让（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主导谈话，还有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公爵和其他几位贵宾。这些特权阶级的绅士们在她的沙龙里拥有席位，但倾听者为数众多，后者不得不站着，对预言家们唇间吐露的每一个字赞叹不已。

德·斯戴尔夫人的沙龙没有这么多学究气，人们的谈话更随便、更风趣，但它仍是个封闭沙龙，在（她位于瑞士的城堡）科佩（Coppet）尤其如此，那里的宾客们被迫流亡海外，无处可去。德·斯戴尔1817年就去世了，因此未能留下任何关于复辟时期社交界的回忆录。

神秘的德·科马尔夫人几乎是亚历山大的缪斯，她也有一个封闭的沙龙，吸引了一群品格高尚的精英。[35]

七月王朝时期，沙龙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君主主义（正统君主主义）者，一派是开明人士（奥尔良派）。他们挑起事端，散布谣言，针锋相对。

波佐·迪博尔戈公爵夫人（Duchesse Pozzo di Borgo）是正统（波旁）王朝的坚决拥护者，她在自己的沙龙里招待整个圣日耳曼区的宾客；德·利芬亲王夫人有着独特的俄式美貌和魅力，她虽然支持新政权（奥尔良派），却也无法在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之间做出选择，甚至还对贝里耶先生示好。[36]她本打算对巴黎的每个人敞开沙龙的大门，但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选择与基佐同一阵线；她刚一去世，梯也尔就说她是个“疯子和骗子”。她的开放沙龙日益封闭。

第二帝国时期，以前针锋相对的沙龙多少取得了一些和解，也出现了一些支持帝国政策的新沙龙。那时，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在巴黎的沙龙首屈一指。她对每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艺术家敞开大门，（包括）圣伯夫、龚古尔兄弟、福楼拜、泰奥菲尔·戈蒂耶[37]、梅里美；直至今日，她的沙龙欢迎法国天才的名声仍在流传。

德·加列拉公爵夫人（Duchesse de Galliera）继续主持光鲜的聚会，但参加者仅限于奥尔良派：梯也尔先生、德·雷米萨[38]先生、（德·）帕基耶公爵[39]等聚集一堂。德·奥松维尔伯爵家是（法兰西）学术院的聚会场所，既包括现有的成员，也包括有志成为院士的人。奥地利大使德·许布纳先生既要主持公务招待会，又要举办聚会款待圣日耳曼区的宾客。

在帝国终结和（普法）战争爆发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沙龙才重新开办。同样，一位俄裔夫人率先垂范，利斯·特鲁别茨科伊亲王夫人（Princesse Lise Troubetskoy）的热情好客令人震惊。梯也尔先生是她的首位客人；她希望（开办）一个政治沙龙，但没有成功。然而另一位俄裔人士德·兰纳维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Rainneville）在自己距离博瓦乌广场两步之遥的（府邸）大开客厅之门，那变成了国民议会的辩论开始和结束的地方。这个沙龙欢迎每一位举足轻重的保守派人士。

与此同时，政治和文学对话被移到俱乐部，沙龙沦为纯粹的娱乐场

所。从那时起，它们的权威下降了，封闭沙龙只有一个目标：在严肃的贵族氛围中维持一种宝贵的亲密感。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数出当今（巴黎）的多达十个封闭沙龙；很明显，它们都是贵族沙龙。

如果一定要列举最优雅的沙龙，就必须列举贵族沙龙，反之亦然。

因而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类而不是三类：一种是封闭沙龙，一种是最优雅、最贵族气派的沙龙。

贵族沙龙是指，主人是贵族，接待的宾客也是贵族和上流社会的成员。优雅沙龙指的是，主人不属于贵族阶层，却接待那个阶层的某些成员和上流社会的成员。

如今巴黎最受人尊崇的封闭沙龙是由以下人士主办的：德·诺瓦耶公爵夫人；德·莫特马尔公爵遗孀，她最近正在服丧，无法接待宾客；德·马耶公爵遗孀（Dowager Duchesse de Maillé）；德·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夫人；德·阿瓦尼公爵夫人（Duchesse d’Avarny）；艾默里·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夫人；格雷弗耶伯爵夫人；德·莱维侯爵夫人（Marquise de Lévis）；斯坦迪什夫人；德·芒特布瓦西埃侯爵夫人（Marquise de Montboissier）；德·克鲁瓦伯爵夫人（Comtesse de Croix）；以及德·格拉蒙·德·阿斯特尔伯爵夫人。

这是十二个。我们认为这份尊贵的名单应该无法再延长了。

有人会称之为小集团，还有人（会称之为）好品位（的灯塔）。我们认为这些沙龙既不值得如此过誉，也不该受此侮辱。[40]

巴黎也有很多对较大数目的宾客开放并且十分欢迎新人的贵族和优雅沙龙；要列出这类沙龙，就要提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以免显得我们孤

陋寡闻。

哪些沙龙更有贵族气派，哪些沙龙更加优雅？分界线是什么，如何进行这样的区分而不致（给某些女主人）留下攻击的口实？

我们将仅关注在这些开放沙龙中，有几个沙龙在某些日子是封闭的，这取决于宴请的宾客选自短名单、“半长名单”，还是长名单。这里干脆将它们归为一类——最有贵族气派和最优雅的开放沙龙：

德·杜多维尔公爵夫人、目前正在服丧的德·莱昂亲王夫人、娘家姓卡拉曼-希迈的格雷弗耶伯爵夫人、德·波尔塔莱伯爵夫人、德·萨冈亲王夫人、德·拉费罗纳伯爵夫人（Comtesse de La Ferronays）、德·格拉蒙公爵夫人……让·德·蒙泰贝洛伯爵夫人（Comtesse Jean de Montebello）、O. 德·孟德斯鸠伯爵夫人、（娘家姓罗斯柴尔德的）德·瓦格朗亲王夫人、德·布兰科旺亲王夫人、缪拉亲王夫人、富尔塔多-埃纳（Furtado-Heine）夫人、波尔热斯（Porgès）夫人……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斯特恩夫人……德·若古侯爵夫人（Marquise de Jaucourt）、奥廷格子爵夫人等。

还要在这个名单最后加上专门的文学和艺术沙龙，如奥雄（Hochon）夫人、斯特劳斯夫人和欧贝农（Aubernon）夫人的沙龙。

这些类别中不包括那些只有政治界、文艺界和社交界最为卓越的人士才能参加的王室沙龙。

德·欧马勒公爵没有在巴黎开设沙龙，但尚蒂伊庄园离巴黎不远，他经常在那里宴请来自法兰西学会、军队和文学界的宾客。德·沙特尔公爵和公爵夫人偶尔也在位于让-古炯街（rue Jean-Goujon）的宅邸开设沙龙，但他们不做宣传，客人仅限于少数好友。至于玛蒂尔德公主，她仍然慷慨地接待任何在文学或艺术界声名鹊起的人，以及帝国的保皇

派。

开放沙龙：过去几年，这个词让许多女主人觉得害怕，因为新人潮继续上涨。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势利，抑或是想要光临某个得体聚会的自然而然的愿望，请求受邀的数目逐年上升。而由于这些请求多来自女主人们很难拒绝的朋友的朋友，就连最大规模的沙龙也开始感觉拥挤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如今，短名单是最受偏爱的。

——全体巴黎人

作者说明：如本书前文所述，《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此前从未被认为是普鲁斯特所作。因此，以下是我将其归于普鲁斯特笔下的详细原因，我毫无保留地认为这一归属是正确的。

1.笔名："全体巴黎人"正是普鲁斯特在九个月后同样发表在《高卢人报》（第24章有详细介绍）上的《凡尔赛的一场文艺聚会》（"Une Fête littéraire à Versailles"）所用的笔名。

2.这篇文章的时机和主题及发表的平台：1890年代初期到中期，普鲁斯特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一）出现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的报道，（二）聚焦社交界。因此，一篇关于"最有贵族气派和最优雅的沙龙"的综述与普鲁斯特这一时期所关注的东西完全一致，而《高卢人报》是他写上流社会的文章的理想发表渠道——1893年他曾在一封信中如是说。

3.错误地提到"德·莱昂亲王夫人"：同样如第24章所述，德·莱昂亲王夫人赫米尼耶的公公于1893年8月6日去世了。因此一个月后，她的确正在服丧，"全体巴黎人"关于此事的报道属实。但他称她为"德·莱昂亲王夫人"却有误，因为她的公公一去世，她就是德·鲁昂公爵夫人了。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在1893年秋天写信给普鲁斯特纠正他的正是这个错

误。另一位社交界的记者也恰恰在同一细节上犯错，犯错的时间也和普鲁斯特一样，这样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4.两次提到格雷弗耶夫人：然而如第24章所述，格雷弗耶伯爵夫人是唯一同时出现在“全体巴黎人”（本该）互不相容的两个名单——封闭沙龙女主人和既有“贵族气派”又优雅却开放的沙龙的女主人——中的女人。这一特异之处所显示的对格雷弗耶夫人的着迷当然并非普鲁斯特独有，但他对这个女人的着迷始于1893年夏，就是“全体巴黎人”发表《上流社会的沙龙》几个月前。7月3日，普鲁斯特写信给孟德斯鸠宣布他“（昨天在德·瓦格朗夫人家里）总算（第一次）见到了格雷弗耶伯爵夫人”，他从没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一个星期后他再次写信给孟德斯鸠，问他：“您把我的话传给格雷弗耶伯爵夫人了吗？”［普鲁斯特的原话是“faire ma commission”（我的事您帮我办了吗），他请求斯特劳斯夫人转达他对德·舍维涅夫人的暗恋时，用的也是同样的表达方式。］普鲁斯特对格雷弗耶夫人魂牵梦萦是最近的事，情感也很强烈，这是“全体巴黎人”在两个对立的类别中提到她的名字的一个可能的原因，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5.不合时宜地引用拉辛：如第11章所述，普鲁斯特喜欢在不合适的语境中引用古典文学文本——特别是让·拉辛的戏剧。在这篇文章中，“全体巴黎人”引用了拉辛的悲剧《布里塔尼古斯》（1669年）中的一个场景，未来的罗马皇帝、邪恶的尼禄企图强行追求他同父异母兄弟的未婚妻茹涅（Junie）。尼禄求婚时，茹涅嘟囔了一句尖刻的反驳语：“我敢说我既不值得如此过誉，也不该受此侮辱”（*J’ose dire pourtant que je n’ai mérité/ni cet excès d’honneur，ni cette indignité*）。指出把巴黎的沙龙称为“小集团”就像罗马暴君尼禄试图诱惑兄弟的未婚妻，正是普鲁斯特喜欢创造的那种失调的并列。除了他写的其他文章外，我在为本书做研究而阅读的数百篇世纪末的社交专栏中，没有看到过一个同类的并列。

6.在首屈一指的沙龙女主人名单中包括了“无生的”犹太女主人：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前，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和男爵夫人们在上层的声望无可置疑（虽然也会遭到反犹分子的腹诽）。然而其他巴黎犹太人即便也非常富裕，在上流社交界的地位却没有那么笃定，“全体巴黎人”理所当然地在他的社交高手名单中提到了这些家族的几个女人——富尔塔多-埃纳家族（金融家）、波尔热斯家族（钻石大亨）和斯特恩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的银行家）。这些都是普鲁斯特通过斯特劳斯夫人认识的“犹大的伯爵夫人们”所属的家族。

7.最后一段中出现的鲜明的普鲁斯特风格：在考察请求受邀拜访沙龙的人数最近几年为何逐年增加时，“全体巴黎人”用了普鲁斯特标志性的修辞手段之一，对可能的隐秘动机列出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解释：“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势利，抑或是想要光临某个得体聚会的自然而然的愿望。”正如他的首位德文译者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1929年所说，普鲁斯特最鲜明的叙事策略之一就是“一连列出无数个‘要么……’，通过这种手段展示某一行为的发生可能会有的无数动机，从而以一种详尽无遗的……方式来描述该行为”。

这种《追忆似水年华》中随处可见的叙述建构方式在普鲁斯特的《让·桑特伊》中就已见端倪了。以下是从那部未完成的小说中摘取的一个例子，作者这里探讨的是一个人刚刚读完一本好书之后可能会产生的复杂的情感反应：

> 刚合上书时，我们不敢声称自己得到了全然的满足，要么是出于羞愧（*soit honte*），要么是出于一种总想成为被怜悯对象的欲望（*soit désir*），抑或是为了不要显得太快乐，又或者是因为快乐（*soit que le bonheur*）一旦被考察或质疑，它就消失了。

[1] 普鲁斯特在这里记录的聚会是伊丽莎白1902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在德·阿斯托格街为欢迎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1872—1905年在位）而举办的“文学和音乐聚会”（*matinée littéraire et musicale*）。共有200人参加这次聚会，包括罗贝尔·德·孟德斯鸠、洛尔·德·舍维涅、约瑟夫·德·贡托、梅尔基奥尔·德·沃居埃和乔治·德·波托-里什（还有很多人普鲁斯特没有提到）。——作者注

[2] 这两句诗摘自维克多·雨果的史诗《世纪传说》（*La Légende des siècles*，1859-1883年发表）。——作者注

[3] 玛尔特·玛蒂尔德·韦莱（Marthe Mathilde Werlé）是伊丽莎白的弟弟彼埃尔的第一任妻子。——作者注

[4] 这一形象取自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的《战利品》（*Les Trophées*，1893）中的十四行诗《塔索斯河》。——作者注

[5]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作者注

[6] 多梅尼科·基兰达奥（Domenico Ghirlandaio，1448-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也是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涌现的第三代画家之一。在其画室的众多学徒中，最著名的是米开朗琪罗。

[7] 1870年代中期，德·蒂雷纳·德·艾纳克伯爵路易曾游历美国和加拿大，随后出版了游记《在北美的十四个月》（*Quatorze mois dans l’Amérique du Nord*，1879）。——作者注

[8] 这一头衔可以追溯至15世纪，但之后曾两次重设。普鲁斯特这里所说的德·蒙莫朗西公爵尼古拉·德·塔勒兰德-佩里戈尔（Nicolas de Talleyrand-Périgord），是从他叔叔那里继承该头衔的。尼古拉的儿子和继承人拿破仑·路易·欧仁·德·塔勒兰德-佩里戈尔（Napoléon Louis Eugène de Talleyrand-Périgor）将是最后一位德·蒙莫朗西公爵；他在1950年代去世之后，这个头衔就消失了。——作者注

[9] 莫里斯·洛布罗（Maurice Lobre，1862-1951），法国画家。

[10] 罗贝尔·德·拉西泽朗（Robert de La Sizeranne，1866-1932），法国艺术评论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

[11] 马塞兰·贝特洛（Marcellin Berthelot，1827-1907），法国著名化学家，研究过脂肪和糖的性质，合成出多种有机物。

[12] 艾伯特·索雷尔（Albert Sorel，1842-1906），法国历史学家，曾九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3] 卡米耶·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1835-1921），法国作曲家，键盘乐器演奏家。他的作品对法国乐坛及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重要的作品有《动物狂欢节》《骷髅之舞》《参孙与大利拉》等。

[14] 皮埃尔·让森（Pierre Janssen，1824-1907），法国天文学家，氦元素的发现者。

[15] 法语原文为“*Elle est ‘Belle du flamboiement des yeux fixés sur elle’*”。这也模仿了雨果的《世纪传说》中的一句话，在那部史诗中，爱之女神塞丽斯（Cyris）被“每一双凝神注视着她的目光环绕着”（*ceinte du flamboiement des yeux fixés sur elle*）。——作者注

[16] 由于这篇文章的第一页遗失了，普鲁斯特为它取了什么题目，我们不得而知。——作者注

[17] 普鲁斯特在这里似乎要尝试一句老生常谈，但开玩笑似的，还没说完就止住了，他想以反问揶揄的格言是：守时是王者之礼（*l’exactitude est la politesse des rois*）。——作者注

[18] 埃莱娜·德·卡拉曼-希迈亲王夫人是伊丽莎白最小的弟弟亚历山大的妻子，也是普鲁斯特的好友。她和妹妹安娜·德·诺瓦耶都是法国-罗马尼亚贵族出身。安娜是一位诗人，与洛尔·德·舍维涅和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都是好友。——作者注

[19] 就算在社交界浸淫20年后，普鲁斯特仍然会时常把人们的头衔弄错。“德·希迈亲王夫人”是族长之妻的头衔，1902年，族长是伊丽莎白的长兄约瑟夫。约瑟夫1897年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沃德离婚（在她与一位罗马小提琴家私奔之后），1920年再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成为新的德·希迈亲王夫人。嫁给约瑟夫最小的弟弟后，埃莱娜·德·布兰科旺“只能”成为德·卡拉曼-希迈亲王夫人。伊丽莎白及其兄弟姐妹的母亲米米也是如此，她和他们的父亲约瑟夫直到1886年才获得这一头衔。——作者注

[20] 这个（原文如此）是普鲁斯特加的，意在指出与他引用的回忆录作者不同，他知道“卡斯特”应该写作“Castries”（最后的“ies”不发音）。——作者注

[21] 普鲁斯特这里所指的是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

1869），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诗人，非常重要的文学人物，他的名字不该仅仅作为当晚的娱乐内容出现在社交界的大事年表中。的确，拉马丁的《诗意的冥想》（*Poetic Meditations*，1820）在当时和现在都被认为是一部杰作。——作者注

[22] 安娜·德·诺瓦耶的《白日的阴影》（*L'Ombre des jours*，1902年）于那年春天出版。普鲁斯特对那本书爱不释手，因为它的封面主要位置印着拉辛的《费德尔》中的一句引文。——作者注

[23] 这事实上是指亚历山大·德·卡拉曼-希迈亲王，是伊丽莎白·格雷弗耶和德·希迈亲王约瑟夫两人最小的弟弟。——作者注

[24] 这是本书中提到的德·于扎伊公爵夫人（到1902年她已是德·于扎伊公爵遗孀）的儿媳。——作者注

[25] 1900年代，前德·莱昂亲王夫人、德·鲁昂公爵夫人赫米尼耶（Herminie，1853-1926），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诗集。——作者注

[26] 阿尔贝·旺达尔（Albert Vandal，1853-1910），法国历史学家，1897年入选法兰西学术院。

[27] 朱尔·罗什（Jules Roche，1841-1923），法国政治家。1881—1919年间为众议院成员。

[28] 弗朗西斯·普朗泰（Francis Planté，1839-1934），法国钢琴家。他是法国19世纪除肖邦之外最重要的钢琴家。

[29] 爱德华·里斯勒（Édouard Risler，1873-1929），法国钢琴家。

[30] 莱昂·德拉福斯（Léon Delafosse，1874-1955），法国作曲家和钢琴家，以其疑似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夏尔·莫雷尔的人物原型而闻名。

[31] 埃内斯特·埃贝尔（Ernest Hébert，1817-1908），法国学院派画家。

[32] 1902年5月，奥斯卡二世73岁，埃贝尔84岁。——作者注

[33] 普鲁斯特从小说家司汤达那里借用了这个笔名，他分别在1903年2月25日和1903年5月11日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两篇文章《玛蒂尔德公主殿下的沙龙》（“The Salon of Her Imperial Highness Princesse Mathilde”）和《玛德琳·勒梅尔夫人的沙龙》（“The Salon of Mme Madeleine Lemaire”）也用了这个笔名。普鲁斯特显然也

打算把《格雷弗耶伯爵夫人的沙龙》发表在《费加罗报》上，他用铅笔在背面写道：“卡尔梅特文章——未完成。”但他把文章寄给伊丽莎白后，文章被她收了起来。这导致普鲁斯特在1903年4月抱怨说，《费加罗报》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还没有同意发表这篇文章，“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如上所述，原因是伊丽莎白害怕“抛头露面”会激怒亨利。——作者注

[34] 指巴拉斯子爵保罗·弗朗索瓦·让·尼古拉（Paul François Jean Nicolas，vicomte de Barras，1755-1829），简称保罗·巴拉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在1795年至1799年担任法国督政府的督政官。

[35] 德·科马尔伯爵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佩拉吉是生活在巴黎的波兰贵族，她是巴黎的一位著名的沙龙女主人。这对夫妇的一个孙子克莱芒·德·默尼（Clément de Maugny）后来成了普鲁斯特的好朋友，也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罗贝尔·德·圣卢这个人物的第一个原型。——作者注

[36] 阿道夫·梯也尔这位历史学家和政权掮客在推翻查理十世和建立七月王朝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和同为奥尔良派，也是历史学家兼政治家的弗朗索瓦·基佐是对头，两人都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总理。（梯也尔后来还成为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普鲁斯特本人曾在另一篇文字中仅从文学能力上评价二人，他认为他们的文采都很“可怕”。梯也尔和基佐是安托万·贝里耶（Antoine Berryer）的死敌，后者是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正统派反对党的领袖之一。——作者注

[37] 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19世纪重要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

[38] 夏尔·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1797-1875），法国政治家和作家。

[39] 德·帕基耶公爵（Duc [de] Pasquier），即艾提安-德尼·帕基耶（Étienne-Denis Pasquier，1767-1862），法国政治家，1842年入选法国学术院。国王路易-菲利普于同年为他设立了一个公爵爵位。

[40] 这是拉辛的悲剧《布里塔尼古斯》（*Britannicus*，1669）中一句著名的台词，普鲁斯特在康多塞中学的第一年就学了这部戏剧，也是他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让·桑特伊》中的标题主人公阅读的剧目。关于这句引语为何值得注意，详见我在这篇文章末尾的说明。——作者注

插图权利说明

（此部分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The illustrations appearing on the following pages are reproductions of items from the author's personal collection of vintage postcards，chocolate cards，calling cards，press clippings，party programs，original photographs and sketches，family papers，and magic-lantern slides：

IN TEXT：24，54，68（*top*），101，176，178，180，185，191，198，207，249，256，257，259，262，269，277，298，330，331，336，342，360，412，427，432，446，504，514，516，520，523（*left*），548.

COLOR INSERT：3（*bottom*），4（*bottom right*），11（*bottom*），13（*all 4 images*）.

As far as the author has been able to determine，these images are either in the public domain or，regrettably，cannot be traced to a copyright holder. The same holds true for the images reproduced on the following pages：

IN TEXT：67，86，173，190，205，225，250，290，291，292，295，351，401，417，464，465，495，513，538（*right*），549.

COLOR INSERT：4（*bottom*），7（*top*）.

Copyright holders of images uncredited here are asked to contact the publisher so that this information might be included in future editions.

The remaining illustrations are used by permission and courtesy of the following：

IN TEXT：

Archivio Primoli，Fondazione Primoli，Rome，Italy：158，170，195，372，434，451，463，493，549.

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25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2，9，22，39，68（*bottom*），88，95，105，135，146，150，157，160，162，167，204，270，271，282，293，298，303，312，387，390，485，511，523（*right*），535，547，550.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CT，USA：564.

Fine Art Photographic Library/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521.

© Gramont family. Image source：Gramont/Greffulhe private archives. 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Paris，France：235，253，296，358，369，490（*both*）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ies，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USA：565.

HIP/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197（*left*）

The Jewish Museum，New York，NY，USA/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538（*left*）.

La Revue Illustrée（June 15，1894）：556.

La Vie Moderne（June 1885）：24.

Le Gaulois（December 11，1890）：168.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London，England：14，449.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mage sour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164，279，307，311，389，425，435，526.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Médiathèque du Patrimoine，dist. RMN-Grand Palais，Paris，Fran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232（*left*），313（*both*），329，370.

Musée des Beaux-Arts，Nantes，France：154

© Musée du Louvre，dist. RMN-Grand Palais，Paris，France/Angèle Dequier/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342.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ondon，England：374

New York Public Library，New York，NY，USA：197（*right*），222，226，471.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Vienna，Austria：103.

© RMN-Grand Palais，Paris，Fran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28，119，127，129，211，353，383，394，496，569.

Roger-Viollet，Paris，France：29，47，52，57，70，85，97，130，183，188，220，232（*right*），247，498，534.

Rue des Archives，Paris，France：433.

© Scala/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25，115.

© Snark/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35.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Melbourne，Australia：214，238，275，409，410.

COLOR INSERT

1（*top left*） Roger-Viollet，Paris，France.

1（*top right*）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Médiathèque du Patrimoine，dist. RMN-Grand Palais，Paris，Fran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1（*bottom right*）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Médiathèque du Patrimoine，dist. RMN-Grand Palais，Paris，Fran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2（*top*）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2（*bottom*）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3（*top*）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4（*top left*） Roger-Viollet，Paris，France.

5（*top left*） 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5（*bottom right*） Roger-Viollet，Paris，France.

6（*top left*） © RMN-Grand Palais，Paris，Fran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6（*top righ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6-7（*bottom*） 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7（*bottom right*）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NY，USA. Image sour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8（*top righ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8（*bottom left*） © Christie’s Images Limited（2002）.

9（*top*） Alfredo Dagli Orti/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9（*bottom*） The Frick Collection，New York，NY，USA.

10（*top*）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10（*bottom left*）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Paris，France/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10（*bottom right*）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11（*top*） © Gramont family. Image source：Gramont/Greffulhe private archives. 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Paris，France.

12（*top*）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12（*bottom left*） ©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Paris，France.

12（*bottom right*）© RMN-Grand Palais，Paris，France/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14（*top*）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14（*center*） New York Public Library，New York，NY，USA.

14（*bottom*）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France.

15 Alfredo Dagli Orti/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16（*top*） 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ew York，NY，USA.

16（*bottom*） Rue des Archives，Paris，France.

参考文献

Ⅰ·ARCHIVAL SOURCES

A·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Paris

Private archive of the Comtesse Greffulhe. AP（Ⅱ）/101/1-203；and six “noncoded，supplementary” files

Private archive of the Comte Greffulhe. AP（Ⅰ）/101/1-63

Private papers of the Gramont family. AP/101/A1-J5

Private papers of the Greffulhe family. AQ/61/1-6

B·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1.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Letters of Georges Bizet and Geneviève Halévy，later Mme Bizet. NAF 14345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Halévy，Bizet，and Straus families. NAF 13205；NAF 13208；NAF 13209-13210；NAF 13212-13222；NAF 14346-14355；and NAF 14383-14386

Letters addressed to Mme Bizet，later Mme Straus. NAF 14826；NAF 24838-24839

Letters of Paul Hervieu，addressed to Mme Bizet，later Mme

Straus. NAF 13206-13207

Letters of Georges de Porto-Riche，addressed to Mme Bizet，later Mme Straus. NAF 13211

Letters of Comte and Comtesse Adhéaume de Chevigné，addressed to Georges de Porto-Riche. NAF 24954-24955；NAF 24980

Letters and papers of Georges de Porto-Riche. NAF 24510-25021

Letters and papers of Ludovic Halévy. NAF 19801-19915

Letters and papers of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Fezensac. NAF 15012-15380

Papers of the Guérin and Straus families. NAF 14826

Selected writings of the Princesse Bibesco. NAF 28220

Selected writings of Marcel Proust. NAF 16612-16616；NAF 16696；NAF 18313-18325；NAF 24884；NAF 27350-27352

2.Département de la Musique

Letters of the Comtesse Greffulhe，addressed to various composers. NLA 305-334；VM BOB-20541

3.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Correspondence of Comtesse Adhéaume de Chevigné with Ferdinand Bac. Ms. 14159

Papers of Paul Hervieu. Ms. 13969

4.Bibliothèque-Musée de l’Opéra

Letters of Eraïm Miriam Delaborde. VM BOB-19470

Dossier pertaining to the composition and premiere of Georges Bizet’s *Carmen*（1875）. FOLICO THE-648

Letters of Mme Straus，addressed to various composers and musicians. NLAS-119（49）；LAS BIZET（GENEVIEVE）

C·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

Halévy family album，containing photographs by and of various members of the Halévy，Bizet/Straus，and Chevigné families；Edgar Degas；Mme Meredith（Hortense）Howland；Charles Haas；Alfred，Marquis du Lau d’Allemans；Vicomte 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General Mikhail Annenkov；Guy de Maupassant；and Georges de Porto-Riche. Accession Number 2005.1001.587.1-29

D·The Morgan Library and Museum，New York

Letters of Émile Straus. MLT H148. S912；LHMS 193335

Letters of Lord Lytton. MA 1714-120627；MA 3944-120670；MA 4500-186849

Manuscript of Mme Straus’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LHMS 193949. NB：Although Émile Straus is list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document，it is written in Mme Straus’s hand.

E·Beinecke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Yale University

Frederick R. Koch Collection：GEN MSS 601，box 49 Letters of Mme Straus and Marcel Proust. Folder 1022 Manuscript writings of Marcel Proust. Folder 1034

F·Digital Archives and Resourc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Seine-et-Marne. Melun. http：//archives.seine-et-marne.fr/archives-en-ligne

Archives du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du Judaïsme. Paris. https：//www.mahj.org/fr/ressources-documentaires/archives

Archivio fotografico digitale della Fondazione Primoli. Rome. http：//www.arcliivioprimoli.it

Correspondance de Guy de Maupassant. www.maupassant.free.fr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A. M. Whistler. University of Glasgow. http：//www.whistler.arts.gla.ac.uk/

Fonds autour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Musée d'Orsay. Paris. http：//www.musee-orsay.fr/fr/collections/

Journal des Goncourt. https：//fr.wikisource.org/wiki/J0urnal_des_G0nc0urt/I

The Kolb-Proust Archive for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http：//www.library.illinois.edu/kolbp/

Mémoire des équipages：Équipage de Bois-Boudran（1836-1912）. http：//www.memoiredesequipages.fr/fiche/2691

The Rothschild Archive. London. https：//www.Rothschildarchive.org/

G·Other Archives

Mina Curtiss Collection. Music Division，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ew York. JBP 93-95，Series 1-7

Correspondence of Comte Albert de Mun. Archives Jé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 Vanves. HDu61-70

Greffulhe family films. 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matographie. Paris. Thirty-six home movies shot between 1899 and 1913 and filed under "[Film de famille Greffulhe]."

Greffulhe family papers. Centr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du Monde du Travail. Paris. 2006/064/M1-6

Ⅱ·BIOGRAPHIES，CORRESPONDENCE，AND OTHER WRITINGS ABOUT AND BY MMES DE CHEVIGNÉ，GREFFULHE，AND STRAUS

Acker，Paul. "La Comtesse Greffulhe." In *Portraits de femmes.* Paris：Dorbon Aîné，1912.

Balard，Françoise，ed. *Geneviève Straus*：*Biographie et correspondence avec Ludovic Halévy*：*1855-1908*. Paris：CNRS Éditions，2002.

Bibesco，Marthe，Princesse. *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Laure de Sade，Comtesse de Chevigné*. Paris：Plon，1950.

Bischoff，Chantai. *Geneviève Straus*：*Trilogie d'une égérie*. Paris：Balland，1992.

Bled，Victor du. "Comtesse Greffülhe [*sic*] née Caraman-Chimay." In *Le Salon d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Paris：Bloud & Gay，1930.

Borrel，Anne. "Geneviève Straus，la'muse mauve'." In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 1760-1960*. Edited by Henri Loyrette. Paris：Fayard，1996.

Bose，Alexandra. "Elle n'a pas suivi les modes，elle était faite pour les créer." In *La Mode retrouvée*：*les robes trésors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Edited by Olivier Saillard. Paris：Palais Galliera，2015.

Brahma，Ⅹ.（pseud. Comtesse Greffulhe）. *Âmes sociales*. Paris：Georges Richard，1898.

Brisman，Shira. "Biographies：Geneviève Straus." In *Jewish Women and their Salons*：*The Power of Conversation*. Edited by Emily D. Bilsky and Emily Braun. New York：The Jewish Museum，2005.

Buffenoir，Hippolyte. *Grandes dames contemporaines*：*la Comtesse Greffulhe，née Caraman-Chimay*. Paris：Librairie du Mirabeau，1894.

Callu，Florence. "Madame Straus." In *Le Cercle de Marcel Proust*. Edited by Jean-Yves Tadié. Paris：Honoré Champion，2013.

Cerboneschi，Isabelle. "La Comtesse Greffulhe，icône de mode." *Le Temps*（December 23，2015）.

Clermont-Tonnere，Élisabeth de Gramont，Duchesse de. "L'Entresol."

Le Figaro：*supplément littéraire*（March 3，1928）：3.

Cossé-Brissac，Anne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Paris：Perrin，1993.

Dreyfus，Robert. “Madame Straus et Marcel Proust.” *La Revue de Paris* 42（October 15，1936）：803-14.

Flament，Albert. “Quelques apparitions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March 1953）.

——. “Le Salon de l’Europe：La Comtesse Adhéaume de Chevigné.” *La Revue de Paris* 44（November 15，1936）.

de Fiers，Robert. “Mort de Mme Émile Straus.” *Le Figaro*（December 23，1926）.

Halévy，Daniel. “Deux portraits de Mme Straus.” In *Marcel Proust*：*Correspondance avec Daniel Halévy*. Edited by Anne Borrel and Jean-Pierre Halévy. Paris：Fallos，1992.

Hillerin，Laure. *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 Paris：Flammarion，2015.

——. “Trajectoire d’une étoile oubliée.” In *La Mode retrouvée*：*les robes-trésors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Edited by Olivier Saillard and Valerie Steele. Paris：Paris-Musées，2015.

Jacob，Andrée. *Il y a un siècle ... quand les dames tenaient salon*. Paris：Arnaud Seydoux，1991.

Laincel，Comtesse Alice de. *Les Grandes Dames d’aujourd’hui*. Paris：Société d’Imprimerie，1885.

Largillière（pseud.）. “La Société de Paris：la Comtesse de Chevigné，” *Gil Blas*（August 17，1903）.

Loyrette，Henri，ed.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 1760-1960*. Paris：Fayard，1996.

Mainwaring，Madison. “Fashion Regained：Looking for Proust’s Muse in Paris.” *Paris Review*（March 16，2016）.

Meyer，Arthur. “Salons d’aujourd’hui et d’hier.” In *Ce que je peux dire*. Paris：Plon，1912.

Pasler，Jann. “Countess Greffulhe as Entrepreneur：Negotiating Class，Gender，and Nation.” In *The Musician as Entrepreneur 1700-1914*. Edited by William Weber.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

Poirey，Jean-Louis. “Ma Comtesse：Souvenirs d’un enfant，8-10，rue d’Astorg，1944-1956.” Gy：n. p.，2015.

Pringué，Gabriel-Louis. “La Souveraine de la Belle Époque.” *Le Crapouillot：les Bonnes manières* 19（1952）：26-29.

Proyart，Jean-Baptiste de. “Marcel Proust et la Comtesse de Chevigné：Envoi autographe sur *Le Côté de Guermantes* Ⅰ et correspondance”（June 2008）.

Romani，Bruno. “La Regina degli Snob：la Contessa Greffulhe.” *Il Messaggero*（September 9，1956）.

Steele，Valerie. “L’Aristocrate comme œuvre d’art.” In *La Mode retrouvée：les robes-trésors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Edited by Olivier

Saillard and Valerie Steele. Paris：Paris-Musées，2015.

Steta，Annick. “À la recherche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February 12，2016）.

Vaux，Baron de. “La Vicomtesse de [*sic*] Greffulhe.” In *Les Femmes de sport*. Paris：Marpon & Flammarion，1885.

Ⅲ·MARCEL PROUST BIBLIOGRAPHY

A·Selected Correspondence，Journalism，and Literary Works

De Brabant（pseud.）.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Galerie Georges-Petit.” *Le Mensuel*（December 1890）.

Proust，Marcel.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4 vols. Edited by Jean-Yves Tadié et al. Paris：Gallimard/Pléïade，2005.

——. “A une Snob.” *La Revue blanche* 26（December 1893）.

——. “Les Amies de la Comtesse Myrto.” *Le Banquet* 2（April 1892）.

——. “Autres reliques.” *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

——. *Les Cahiers 1 à 75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dited by Nathalie Mauriac Dyer，Bernard Brun，Antoine Compagnon，et al. Tournhout：Brepols，2008.

——. *Carnet de 1908*. Edited by Philip Kolb. Paris：Gallimard/NRF，1976.

——. *Carnets*. Edited by Florence Callu and Antoine Compagnon.

Paris：Gallimard/NRF，2002.

——. *Chroniques*. Edited by Robert Proust. Paris：Gallimard/NRF，1927.

——. *The Collected Poems*. Edited by Harold Augenbraum. New York：Penguin，2013.

——. *Contre Sainte-Beuve，suivi de nouveaux mélanges*. Paris：Gallimard/NRF，1954 [c. 1895-1900].

——. “Contre une Snob.” *La Revue blanche* 26（December 1893）.

——. “Conversation avec Maman.” In *Contre Sainte-Beuve*. Paris：Gallimard/NRF，1954.

——. *Correspondance，1880-1922*. 21 vols. Edited by Philip Kolb. Paris：Plon，1971-1993.

——. *Correspondance*. Edited by Jérôme Picon. Paris：Flammarion，2007.

——. *Correspondance avec Daniel Halévy*. Edited by Anne Borrel and J.-P. Halévy，op. cit.

——. *Correspondance avec Madame Straus*. Introduction by Susy Mante-Proust. Paris：Plon，1936.

——. *Correspondance avec sa mère：1887-1905*. Edited by Philip Kolb. Paris：Plon，1953.

——. “Cydalise.” *Le Banquet* 2（April 1892）.

——. *Days of Reading*. Translated by John Sturrock. New York：Penguin/Great Ideas，2008.

——. *Écrits de jeunesse*：*1887-1895*. Edited by Anne Borrel. Paris：Institut Marcel Proust International，1991.

——. *Écrits sur l'art*. Edited by Jérôme Picon. Paris：Flammarion，1999.

——. "Esquisse d'après Madame de***." *Le Banquet* 3（May 1892）.

——. "Esquisse de vie mondain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Marcel Proust* 11（1961）.

——. "Étude Ⅰ [Les Maîtresses de Fabrice]." *Le Banquet* 2（April 1892）.

——. "Étude Ⅱ [Les Snobs]." *Le Banquet* 3（May 1892）.

——. "Étude Ⅸ [Amitié]." *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

——. *La Fin de la jalousie et autres nouvelles*. Edited by Thierry Laget. Paris：Gallimard，1993.

——. *Fragments de comédie italienne*. In *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 Paris：Gallimard，1993.

——. "Gustave Moreau." In *Contre Sainte-Beuve*. Gallimard/NRF，1954.

——. "Henri de Régnier." In *Contre Sainte-Beuve*. Paris：

Gallimard/NRF，1954.

——. *Jean Santeuil*. Edited by Pierre Clarac. Paris：Gallimard/Pléïade，1971.

——. *Letters to a Friend*. Preface by Georges de Lauris.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and Elizabeth Henderson. London：Falcon Press，1949.

——. *Letters to His Mothe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orge D. Painter. New York：Citadel，1957.

——. *Lettres à Madame et Monsieur Émile Straus*. Edited by Robert Proust. Paris：Plon，1936.

——. *Lettres à M. et Mme Sydney Schiff，Paul Souday，J.-É. Blanche，etc*. Edited by Robert Proust and Paul Brach. Paris：Plon，1932.

——. *Lettres à Robert de Montesquiou*. Edited by Robert Proust and Paul Brach. Paris：Plon，1930.

——. “Un livre contre l’élégance：*Sens dessus dessous.*” *Le Banquet* 2（April 1892）.

——. *Matinée chez la Princesse de Guermantes*. Edited by Henri Bonnet. Paris：NRF/Gallimard，1982.

——. “Mondanité de Bouvard et Pécuchet.” *La Revue blanche* 21-22（July-August 1893）.

——. “Noms de personnes.” In *Contre Sainte-Beuve*. Paris：Gallimard/NRF，1954.

——. *Pastiches et mélanges*. Paris：Gallimard，1947 [1919].

——. “Pendant le Carême.” *Le Mensuel*（February 1891）.

——. “‘*Les Petits Souliers*’par M. Louis Ganderax.” *Le Banquet* 1（March 1892）.

——. *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suivis de “L’Indifférent.”* Edited by Thierry Laurent. Paris：Gallimard，1993.

——. Preface to Paul Morand，*Tendres stocks*. Paris：NRF/Gallimard，1923.

——. “Un professeur de beauté.” *Les Arts de la vie*（August 15，1905）.

——. “Robert de Montesquiou.” In *Contre Sainte-Beuve*. Paris：NRF/Gallimard，1954.

——. “Le Salon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rom AP（Ⅱ）/101，in one of six “cartons non cotés，supplémentaires.” Reproduced in translation in appendix C.

——. *Le Salon de Mme de* .... Paris：L’Herne，2009.

——. “Sixteen Letters of Marcel Proust to Joseph Reinach.”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 R. Watson. *Modern Languages Review* 63，no. 3（July 1968）.

——. *Swann’s Way*. Translated by C. K. Scott Moncrieff.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William C. Carter.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 *Textes retrouvés*. Edited by Philip Kolb and Larkin B. Price.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8.

——. “La Vie mondaine.” *Le Mensuel* 3（January 1891）.

Tout-Paris（pseud.）. “Une Fête littéraire à Versailles.” *Le Gaulois*（May 31，1894）.

——. “Les Grands Salons de Paris.” *Le Gaulois*（September 1，1893）. Reproduced in translation in appendix C.

——. “Mondanités.” *Le Gaulois*（August 24，1895，and June 18，1896）.

B·Selected Memoirs，Biographies

Albaret，Céleste. *Monsieur Proust*.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

Bibesco，Marthe，Princesse. *Au bal avec Marcel Proust* Paris：Gallimard/L’Imaginaire，1989 [1928].

——. *Le Voyageur voilé*. Geneva：La Palatine，1947.

Billy，Robert de. *Marcel Proust：Lettres et conversations*. Paris：Portiques，1930.

Blanche，Jacques-Émile. “Mes modèles.”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artistiques et scientifiques*（July 14，1928）.

——. *Mes modèles：Souvenirs littéraires*. Paris：Stock，1984 [1928].

——. *La Pêche aux souvenirs*. Paris：Flammarion，1949.

——. *Propos de peintre*. Edited by Frédéric Mitterrand. Paris：Séguier，2013 [1919-1928].

Bloch-Dano，Évelyne. *Madame Proust：A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Alice Kaplan.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 *Une jeunesse de Marcel Proust：enquête sur le questionnaire*. Paris：Stock，2017.

Carter，William C. *Marcel Proust：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 *Proust in Lov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Colette（pseud. Gabrielle-Sidonie Colette）. “Préface：Marcel Proust.” In *Marcel Proust*. Paris：Le Capitole，1926.

Daudet，Lucien. *Autour de soixante lettres de Marcel Proust*. Paris：Gallimard，1929.

Dreyfus，Robert. *De Monsieur Thiers à Marcel Proust：histoire et souvenirs*. Paris：Plon，1939.

——. *Souvenirs sur Marcel Proust，accompagnés de lettres inédites*. Paris：Grasset，1926.

——. “Souvenirs sur Marcel Proust：L’Année du *Banquet*，1892-1893.” *Le Figaro*（April 10，1926）：1-2.

Duplay，Maurice. *Mon ami Marcel Proust：souvenirs intimes*. Paris：Gallimard，1972.

Gramont，Armand，Duc de Guiche，later Duc de. *Souvenirs：1879-196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ramont，Élisabeth de（Duchesse de Clermont-Tonnerre）. *Marcel Proust.* Paris：Flammarion，1948.

——. *Robert de Montesquiou et Marcel Proust*. Paris：Flammarion，1925.

Gregh，Fernand. *L'Age d'or*. Paris：Grasset，1947.

——. "Hommage à Marcel Proust."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January 1923）.

——. *Mon amitié avec Marcel Proust：Souvenirs et lettres inédites*. Paris：Grasset，1958.

Hayman，Ronald. *Proust：A Biography*. New York：Carrol & Graf，1992.

Lhéritier，Gérard，ed. *Proust，du temps perdu au temps retrouvé：Précieuse collection de lettres et manuscrits provenant d'André et Simone Maurois et de Susy Mante-Proust*. Paris：Équateurs，2010.

Maurois，André. *Le Monde de Marcel Proust*. Paris：Hachette，1960.

Montesquiou-Fezensac，Comte Robert de，and Marcel Proust. *Le Professeur de beauté*. Preface by Jean-David Jumeau-Lafond. Paris：La Bibliothèque，1999.

Painter，George D. *Marcel Proust*：*A Biography*. 2 vols. London：Chatto & Windus，1959-1965.

Peter，René. *Une saison avec Marcel Proust*. Preface by Jean-Yves Tadié. Paris：Gallimard/NRF，2005.

Pierre-Quint，Léon. *Marcel Proust*：*sa vie*，*son œuvre*. Paris：Simon Kra，1925.

Sollers，Philippe. *L'Œil de Proust*：*les dessins de Marcel Proust* Paris：Stock，1999.

Souday，Paul. *Marcel Proust.* Paris：Simon Kra，1927.

Tadié，Jean-Yves. *Marcel Proust* Translated by Euan Cameron. New York：Viking，2000.

Tadié，Jean-Yves，ed. *Le Cercle de Marcel Proust.* Paris：Honoré Champion，2013.

——. *Marcel Proust et ses amis*. Paris：Gallimard/NRF，2010.

Taylor，Benjamin. *Proust*：*The Search*.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Jewish Lives，2015.

White，Edmund. *Marcel Proust*：*A Life*. New York：Penguin，1999.

C·Criticism and Scholarship—Books

Aciman，André，ed. *The Proust Project*. New York：FSG/Books & Co. /Helen Marx Books，2004.

Adorno，Theodor W. *Notes to Literature.* 2 vols. Translated by Shierry W. Nicholse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1992.

Arnaud，Claude. *Proust contre Cocteau*. Paris：Grasset，2013.

Bardèche，Maurice. *Marcel Proust romancier.* 2 vols. Paris：Sept Couleurs，1971.

Barthes，Rol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Kate Brigg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Beckett，Samuel. *Proust*. London：Chatto & Windus，1931.

Benjamin，Walter. *Sur Proust.* Translated by Robert Kahn. Paris：Nous，2010.

Bergstein，Mary. *Looking Back One Learns to See*：*Marcel Proust and Photography*. Amsterdam and New York：Ropoli，2014.

Bernard，Anne-Marie，ed. *The World of Proust as Seen by Paul Nadar*. Photographs by Paul Nadar. Translated by Susan Wise. 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2002.

Bersani，Leo. *Marcel Proust*：*The Fictions of Life and of Ar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Botton，Alain de. *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New York：Pantheon，1997.

Bowie，Malcolm. *Proust Among the Star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Brassaï（pseud. Gyula Halász）. *Proust in the Power of Photography*.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Canavaggia，J. *Proust et la politique*. Paris：A.-G. Nizet，1986.

Carassus，Émilien. *Le Snobisme dans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1884-1914*. Paris：Armand Colin，1966.

Clarac，Pierre，and André Ferré，eds. *Album Proust*. Paris：Gallimard/Pléïade，1965.

Compagnon，Antoine. *Proust entre deux siècles*. Paris：Seuil，1989.

Deleuze，Gilles. *Proust et les signes*. Paris：PUF，2007.

Diesbach，Ghislain de. *Proust*. Paris：Perrin，1991.

Finn，Michael R. *Proust，the Body，and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Forest，Philippe，and Stéphane Audeguy，eds.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D'après Proust* 203-4（March 2013）.

Francis，Claude，and Fernande Gontier. *Marcel Proust et les siens*. Paris：Plon，1981.

Fraser，Robert. *Proust and the Victorians*：*The Lamp of Memory*，London：Macmillan/Springer，1994.

Gallo，Rubén. *Proust's Latin Americans*.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4.

Germain，André. *Les Clés de Proust，suivies de Portraits*. Paris：Sun，1953.

Grimaldi，Nicolas. *Proust，les horreurs de l'amour*. Paris：PUF，2008.

Guichard，Léon. "Un article inconnu de Marcel Proust：Marcel Proust et Robert de Montesquiou." *La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2（1949）.

Harris，Frederick John. *Friend and Foe：Marcel Proust and André Gide*.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2.

Huas，Jeanine. *Les Femmes chez Proust*. Paris：Hachette，1971.

——. *L'Homosexualité au temps de Proust*. Paris：Danclau，1992.

Hunkeler，Thomas，ed. *Marcel Proust und die Belle Époque*. Frankfurt：Insel/Marcel Proust Gesellschaft，2002.

Jullien，Dominique. *Proust et ses modèles：Les "Mille et une Nuits" et les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Paris：José Corti，1989.

Kadi，Simone. *Proust et Baudelaire*. Paris：Pensée Universelle，1975.

Karlin，Daniel. *Proust's Englis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Karpeles，Eric. *Paintings in Proust：A Visual Companion to "In Search of Lost Time."* London：Thames & Hudson，2008.

Ladenson，Elisabeth. *Proust's Lesbian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Landes-Ferrali，Sylvaine. *Proust et le Grand Siècle*：*formes et significations de la référence.* Preface by Antoine Compagnon. Tübingen：Gunter Narr，2004.

Luckhurst，Nicola. *Science and Structure in Proust's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Oxford：Clarendon，2000.

Mante-Proust，Suzy，and Mireille Naturel，eds. *Marcel Proust in/Pictures and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Josephine Bacon. Zurich：Olms，2012.

Mauriac，François. *Proust's Way*. Translated by Elsie Pell. 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0.

Maurois，André. *Quest for Proust* Translated by Gerard Hopkins. New York：Penguin，1962 [1950].

McDonald，Christie，and François Proulx，eds. *Proust and the Arts*.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Moss，Howard. *The Magic Lantern of Marcel Proust*. Foreword by Damion Searls. Philadelphia：Paul Dry Books，2012 [1962].

Muhlstein，Anka. *Monsieur Proust's Library*. New York：Other Press，2012.

Oriol，Judith. *Femmes Proustiennes*. Paris：EST，2009.

Raczymow，Henri. *Le Cygne de Proust* Paris：Gallimard，1989.

——. *Le Paris littéraire et intime de Proust* Paris：Parigramme，1997.

——. *Le Paris retrouvé de Marcel Proust*. Paris：Parigramme，2005.

Recanti，Jean. *Profils juifs de Marcel Proust*. Paris：Buchet/Chastel，1979.

Shattuck，Roger. *Proust's Way*：*A Field Guide to "In Search of Lost Time.*" New York：W. W. Norton & Co.，2001.

Vignal，Louis Gautier. *Proust connu et inconnu*. Paris：Laffont，1976.

D·Criticism and Scholarship—Articles and Chapters

Adam，A. "Le Roman de Proust et le problème des clefs." *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65（1952）.

Beauchamp，Louis de. *Marcel Proust et le Jockey-Club*（Paris：n. p.，1973）.

Benjamin，Walter. "The Image of Proust." In *Illuminatio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r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8.

Borrel，Anne. "'La Petite Société des quatre amis'." In *Marcel Proust et ses amis*. Edited by Jean-Yves Tadié. Paris：Gallimard/NRF，2010.

Compagnon，Antoine. "Morales de Proust." In *Résumés des cours et travaux du Collège de France*（2009）.

——. "Note sur'La Simplicité de M. de Montesquiou.'" *Romanic*

Review 81，no. 1（1990）.

——. Preface to MP，*Sodome et Gomorrhe*. Paris：Gallimard/Folio，1989.

——. “Proust et le judaïsme.” *Critique* 54（1991）.

——. “Proust on Racine.” *Yale French Studies* 76（1989）.

——. “Racine and the Moderns.” In *Theatrum Mundi*：*Studies in Honor of Ronald W. Tobin*. Edited by Claire Carlin，Ronald W. Tobin，and Kathleen Wine. Charlottesville，VA：Rookwood Press，2003.

Enthoven，Jean-Paul. *Saisons de papier*. Paris：Grasset，2016.

Fernández，Ramón. “La Vie sociale dans l’œuvre de Marcel Proust.” *Les Cahiers Marcel Proust* 1（1927）.

Fifield，William. “Interview with Jean Cocteau.” *Paris Review* 32（Summer-Fall 1964）.

Gantrel，Martine. “Jeu de pistes autour d’un nom：Guermantes.”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3（October-December 2004）：919-34.

Gier，Albert. “Marcel Proust und Richard Wagner：Zeittypisches und Einmaliges in einer Beziehung zwischen Literatur und Musik.” In *Marcel Proust und die Belle Époque*. Edited by Thomas Hunkeler. Frankfurt：Insel/Marcel Proust Gesellschaft，2002.

Goux，Jean-Joseph. “Un inédit. Le *Carnet de syntaxe* de Proust.”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D’après Proust*，op. cit.

Gregh，Fernand. “Sur Marcel Proust.” *Le Journal des débats*（February 7，1937）：3.

Gury，Christian. *Proust*：*Clés inédites et retrouvées*. Paris：Kimé，2003.

Hersant，Marc，and Muriel Ades. “D’un bal de têtes à l’autre.” In *“Le Temps retrouvé” quatre-vingts ans après*：*essais critiques*. Edited by Adam Andrew Watt. New York：Peter Lang，2009.

Johnson，Theodore. “Marcel Proust et Gustave Morea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 28（1978）.

Keller，Luzius. “Proust und die Belle Époque.” In *Marcel Proust und die Belle Époque*. Edited by Thomas Hunkeler. Frankfurt：Insel/Marcel Proust Gesellschaft，2002.

Koestenbaum，Wayne. “I Went by a Devious Route.” In *The Proust Project.* Edited by André Aciman. New York：FSG/Books & Co. /Helen Marx Books，2004.

Kolb，Philip. “Marcel Proust et les dames Lemaire，avec des lettres de Proust à Suzy Lemair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 14（1964）.

Lacretelle，Jacques de. “Les Clefs de l’œuvre de Proust.”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112（January 1923）.

Ladenson，Elisabeth. “Proust and the Marx Brothers.” In *Proust and the Arts*. Edited by Christie McDonald and François Proulx.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 “Someone like Ma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0，no. 9（May 8，2008）：19-20.

Lamont，Rosette C. “Le bonheur chez Prous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Marcel Proust et de Combray* 16（1966）.

Link-Heer，Ursula. “Mode，Möbel，Nippes，*façons et manières*：Robert de Montesquiou und Marcel Proust.” In *Marcel Proust und die Belle Époque.* Edited by Thomas Hunkeler. Frankfurt：Insel/Marcel Proust Gesellschaft，2002.

Litvak，James. “Strange Gourmet：Taste，Waste，Proust.” *Studies in the Novel* 28，no. 3（Fall 1996）.

Maurois，André. *A la recherche de Marcel Proust.* Paris：Hachette，1949.

——. *Le Monde de Marcel Proust*. Paris：Hachette，1960.

Miguet，Marie. “Le Séjour à Doncières dans *Le Côté de Guermantes*：textes et avant-textes.” In *Vers une sémiotique différentielle*. Edited by Anne Chovin and François Migeot. Besanç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c-comtoises，1999.

Mimouni，Patrick. “Fumer avec Proust.” *La Règle du jeu* 60（April 2010）.

——. “La Vocation talmudique de Proust：I. Les Lois causales.” *La Règle du jeu* 35（September 2007）.

Murat，Laure. “Les souliers de la duchesse，ou la vulgarité de

l’aristocratie française.”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D’après Proust*. Edited by Philippe Forest and Stéphane Audegy（March 2013）.

Samuels，Maurice. “Proust，Jews，and the Arts.” In *Proust and the Arts*. Edited by Christie McDonald and François Proulx.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Sonnenfeld，Albert. “Marcel Proust：Antisémite？” *The French Review* 62，no. 1（October 1988）.

Thurman，Judith. “I Never Took My Eyes off My Mother.” In *The Proust Project*. Edited by André Aciman. New York：FSG/Books & Co. /Helen Marx Books，2004.

Zoberman，Pierre. “L’inversion comme prisme universel.” *Magazine littéraire*：*Marcel Proust*（2013）.

Ⅳ·GENERAL BIBLIOGRAPHY

A·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Books

Adelon，M. H.，G. Benoist，et al.，eds. *La Chasse moderne. Encyclopédie du chasseur moderne*. Paris：Larousse，1912.

Aderer，Adolphe. *Une Grande Dame aima*. Paris：Calmann-Lévy，1906.

Aesop. *Fables*. New York：Cricket House Books，2010.

d’Albiousse，Lionel. *Les Fiefs nobles du château ducal d’Uzès*. Uzès：Malige，1906.

Aldobrandini，Giovanni. *Élites dell'Ottocento*：*Politica e cultura in Gran Bretagna e Italia*. Rome：Gangemi，n. d.

Andia，Béatrice de，ed. *Autour de la Madeleine*：*art*，*littérature et société*. Paris：Action Artist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2005.

Anne，Théodore. *M. le Comte de Chambord*：*Souvenirs d'août 1850*. Paris：E. Dentu，1850.

Anonymous. *Ferdinand of Bulgaria*：*The Amazing Career of a Shoddy Czar*. London：A. Melrose，1916.

Anonymous. *Biographie de Mme Demidoff*，*Princesse Mathilde*. London and Brussels：n. p.，1870.

Antoine，A. *Mes souvenirs sur le Théâtre-Libre*. Paris：Fayard，1921.

Antonetti，Guy. *Une maison de banque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Greffulhe Montz et Cie*. Paris：Cujas，1963.

Apollinaire，Guillaume. *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 Vol. 3. Edited by Michel Décaudin. Paris：Gallimard，1993.

——. *Selected Writings.* Translated by Roger Shattuck. 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1.

Apostolescu，Ginette. *Mon journal*：*1879-1880*. Paris：Cercle des Amis de Marie Bashkirtseff，2004.

d'Arenberg，Princesse Louise-Marie（Marquise de Vogüé）. *Logis d'autrefois*. Paris：n. p.，n. d.

——. *Souvenirs：1903-1939*. Paris：n. p. 1941.

Armstrong，Carol. *Odd Man Out：Readings of the Work and Reputation of Edgar Degas*.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Astruc，Gabriel. *Le Pavillon des fantômes*. Paris：Belfond，1987.

Auchincloss，Louis.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6.

Austin，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Edited by J. O. Urmson and Marina Sbís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Avenel，Henri. *Histoir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depuis 1789 jusqu'à nos jours*. Paris：Flammarion，1900.

Bac，Ferdinand（pseud. Ferdinand Sigismond Bach）. *Intimités de la* III*e République：La Fin des temps "délicieux."* Paris：Hachette，1935.

Bach，Général André. *L'Année Dreyfus：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rmée française de Charles* Ⅹ *à "l'Affaire."* Paris：Tallandier，2004.

Bachaumont（pseud. Émile Gérard）. *Les Femmes du monde*. Paris：E. Dentu，1876.

Bader，Luigi. *Album：Le Comte de Chambord et les siens en exil*. Paris：Diffusion Université-Culture，1983.

Balfour，Betty Bulwer-Lytton，Lady. *The History of Lord Lytton's Indian Administration，1876 to 1880；Compiled from Letters and Official Papers*. London：Longmans，Green，1899.

Bancquart，Marie-Claire. *Paris "Fin-de-Siècle."* Paris：SNELA La Différence，2009.

Un Banquier（pseud.）. *Que nous veut-on avec ce Rothschild* Ⅰ*er*，*roi des Juifs et dieu de la finance*？Brussels：Chez les principaux libraires de la Belgique，1846.

Barrès，Maurice. *Le Culte du moi*. Paris：Plon，1922 [1888-1891].

Barthes，Roland.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Paris：Seuil，1972.

——.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 *Sur Racine*. Paris：Seuil，1963.

Bartolotti，Luca. *Roma fuori le mura*. Rome：La Terza，1988.

Baudelaire，Charles. *Les Fleurs du mal*：*Édition définitive*. Paris：Calmann-Lévy，1919.

Beard，George Miller.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Nervous Exhaustion*（*Neurasthenia*）. New York：Treat，1880.

Bellenger，Marguerite. *Les Courtisanes du Second Empire*. Brussels：Office de Publicité，1871.

Benaïm，Françoise. *Marie-Laure de Noailles，vicomtesse du bizarre*. Paris：Grasset，2002.

Bentley，Toni. *Sisters of Salom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Bergerat，Émile. *Souvenirs d'un enfant de Paris：1879-1884*. Paris：Charpentier，1912.

Bernhardt，Sarah（apocryphal）. *My Double Life*.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7.

Bertrand，Antoine. *Les Curiosités esthétiques de Robert de Montesquiou*. 2 vols. Geneva：Droz，1996.

Bienvenu，Jacques. *Maupassant inédit*. Aix：Edisud，1993.

Biez，Jacques de. *Rothschild et le péril juif*. Paris：Chez l'auteur，1891.

Bizet，Georges. *Lettres*；*Impressions de Rome*；*la Commune*. Preface by Louis Ganderax. Paris：Calmann-Lévy，1907.

Blanche，Jacques-Émile. *Dieppe*. Paris：Berthout，1992 [1927].

du Bled，Victor.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puis cent ans*. Paris：Bloud & Gay，1923.

Blount，Sir Edward. *Memoirs*. Edited by Stuart J. Reid. London：Longmans，Green，1902.

Bocher，Émmanuel. *Les Gravures françaises du XVIIIe siècle：Catalogue raisonné des estampes，pièces en couleur，au bistre et au lavis，de 1700 à 1800*. 2 vols. Paris：D. Morgant，1872-1880.

Bompiani，Sofia. *Italian Explorers in Africa*. London：Religious Tract Society，1891.

Bondeson，Jan. *The Great Pretenders.* New York：W. W. Norton，2005.

Borchmeyer，Dieter. *Drama and the World of Richard Wagner.*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Borghèse，Prince Jean（Giovanni Battista）. *L'Italie moderne.* Paris：Flammarion，1913.

Bouilloud，Jean-Philippe，ed. *Un univers d'artistes.* Paris：L'Harmattan，2004.

du Bourg，Joseph. *Les Entrevues des princes à Frohsdorf：La Vérité et la légende.* Paris：Perrin，1910.

Bourget，Paul. *Un cœur de femme.* Paris：Alphonse Lemerre，1890.

——.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Vol. 1. Paris：Plon，1920 [1883].

Boutet de Monvel，Roger. *Eminent English Men and Women in Paris.* Translated by G. Herring. New York：Scribner's，1913.

Bouvier，Jean. *Les Rothschild：Histoire d'un capitalisme familial.* Brussels：Complexe，1992.

Boylesve，René. *Feuilles tombées.* Paris：La Pléïade，1927.

Bramsen，Michèle Bo. *Portrait d'Élie Halévy.*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78.

Bredin，Jean-Denis. *The Affair：The Case of Alfred Dreyfus.*

Translated by Jeffrey Mehlman. 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86.

Breteuil，Henri Le Tonnelier，Marquis de. *La Haute Société*：*Journal secret 1886-1889.* Paris：Atelier Marcel Jullian，1979.

Briais，Bernard. *Au temps des Frou-Frou*：*Femmes célèbres de la Belle Époque.* Paris：France Empire，1985.

de Broglie，Albert-Jacques-Victor，Duc. *Ambassador of the Vanquished*：*The Viscount Élie de Gontaut-Biron's Mission to Berlin.* London：Heinemann，1896.

Brook-Shepard，Gordon. *Uncle of Europe*：*The Social and Diplomatic Life of Edward* Ⅶ.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6.

Brooks，Peter. *Flaubert in the Ruins of Paris*：*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a Novel，and a Terrible Year.* New York：Basic Books，2017.

Brosio，Valentino. *Ritratti parigini del Secondo Imperio e della Belle Époque.* Paris：Nuovedizioni E. Vallecchi，1975.

Brown，Frederick. *For the Soul of France*：*Culture Wars in the Age of Dreyfus.* New York：Anchor Books，2010.

Brugmans，Hendrik. *Georges de Porto-Riche*：*Sa vie，son œuvre.* Geneva：Slatkine，1976.

Buffon，Georges Louis Leclerc，Comte de. *Œuvres complètes.* Vols. 1 and 6. Paris：Abel Ledoux，1844-1846.

Bulwer-Lytton，Edward Robert，Lord Lytton. *Personal and Literary*

Letters of Robert，First Earl of Lytton. 2 vols. Edited by Lady Betty Balfour. London：Longmans，Green，1906.

——. *The Ring of Amasis.* London：Macmillan，1890.

Bulwer-Lytton，Rosina（Baroness Lytton）. *A Blighted Life.* London：Bloomsbury，1994.

Burnand，Robert.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de 1870 à 1900.* Paris：Hachette，1948.

Busnach，Willie. *Le Phoque à ventre blanc.* Paris：E. Chatot，1883.

Carassi，Carlo. *L'Ordre de Malte dévoilé ou voyage de Malte.* Cologne：n. p.，1790.

Carasso，Odette. *Arthur Meyer，directeur du Gaulois：un patron de presse juif，royaliste et antidreyfusard.* Paris：Imago，2003.

Castelbajac，Constance de（Marquise de Breteuil）. *Journal：1885-1886.* Edited by Éric Mension-Rigau. Paris：Perrin，2003.

Castellane，Boni de. *Comment j'ai découvert l'Amérique.* Paris：G. Crès，1925.

——. *Vingt ans de Paris.* Paris：Fayard，1925.

de Castries，René de La Croix，Duc. *Le Testament de la monarchie.* Vol. 5：*Le Grand Refus du Comte de Chambord.* Paris：A. Fayard，1970.

Chaleyssin，Patrick. *Robert de Montesquiou：Mécène et dandy.* Paris：Somogy，1992.

Chambord，Henri d’Artois，Comte de. *Lettres d’Henri Ⅴ depuis 1841 jusqu’à nos jours.* Edited by Adrien Peladan. Nîmes：P. Lafare，1873.

Charle，Christophe. *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au ⅩⅨ^e^ siècle.* Paris：Seuil，1991.

Chateaubriand，François-René. *Mémoires d’outre-tombe.* Vol. Ⅰ. Paris：Garnier Frères，1899 [1849-1850].

Claretie，Jules. *La Vie à Paris：1880-1885.* Vols. 1-6. Paris：Victor Havard，1880-1885.

——. *La Vie à Paris：1898.* Paris：Charpentier，1899.

Cocteau，Jean. *La Fin du Potomak.* Paris：Gallimard/NRF，1939.

——. *Le Passé défini.* Paris：Gallimard/NRF，1983.

——. *Portraits-souvenir.* Paris：Grasset，1935.

Condé，Gérard. *Gounod.* Paris：Fayard，2009.

Constant，Stephen. *Foxy Ferdinand，Tsar of Bulgaria.* 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79.

Conway，David. *Jewry in Music：Entry to the Profess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Richard Wagner.*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Coquelin，Constant. *Un poète philosophe：Sully Prudhomme.* Paris：Paul Ollendorff，1882.

Cornély，Jules. *Le Czar et le roi.* Paris：Clairon，1884.

Corpechot，Lucien. *Souvenirs d'un journaliste.* Paris：Plon，1936.

Costa de Beauregard，Charles-Albert，Marquis. *Un homme d'autrefois：souvenirs recueillis par son arrière petit-fils.* Paris：Plon，1878.

Cotterel，François-Frédéric. *Tableau historique du procès des fabricateurs des faux-billets de la Banque de Vienne，et autres valeurs de la plupart des gouvernements d'Europe.* Strasbourg：F.-G. Levrault，1807.

Cowles，Virginia. *The Rothschilds：A Family of Fortune.*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3.

Crafty. *La Chasse à tir：Notes et croquis.* Paris：Plon，1887.

Craveri，Benedetta. *The Age of Conversation.* Translated by Teresa Waugh. 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6.

Crawford，F. Marion. *Saracinesca.* New York：Macmillan，1893.

Crémieux，Hector-Jonathan，and Étienne Tréfeu. *Geneviève de Brabant.* Libretto to the opera buffa by Jacques Offenbach.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1868 [1859].

Crouthamel，James L. *Bennett's "New York Herald" and the Rise of the Popular Press.* 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9.

Curtiss，Mina. *Other People's Letters.*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78.

——. *Bizet and His World.*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58.

Dahan，Philippe. *Guy de Maupassant et les femmes.* Paris：Bertout，1996.

Daudet，Ernest. *Ferdinand Ⅰ^{er}，tsar de Bulgarie.* Paris：Attinger Frères，1917.

Daudet，Léon. *Au temps de Judas.* Paris：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1920.

——. *Devant la douleur.* Paris：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1915.

——. *Fantômes et vivants.* Paris：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e，1914.

——. *La Melancholia.* Paris：Grasset，1928.

——. *Souvenirs littéraires.* Paris：Grasset，1968.

David-Weill，Cécile. *The Suitors.* Translated by Linda Coverdale. New York：Other Press，2012.

Davies，Helen M. *Émile and Isaac Pereire：Bankers，Socialists，and Sephardic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Davis，Mike.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Yerso，2001.

Dean，Winton. *Georges Bizet：His Life and His Work.* London：J. M. Dent & Sons，1965.

Delacour，Alfred，and Alfred Hennequin. *Le Phoque.* Paris：Allouard，1878.

Delacroix，Eugène. *Journal.* Paris：Plon，1932.

Demachy，Édouard. *Les Rothschild：Une famille de financiers juifs au XIXe siècle.* Paris：Chez l'auteur，1896.

Dermenjian，Geneviève，Jacques Guilhaumou，and Martine Lapied，eds. *Femmes entre ombre et lumière：recherches sur la visibilité sociale，XVIe-XXe siècles.* Paris：Publisud，2000.

Deschanel，Paul. *Figures de femmes.* Paris：Calmann-Lévy，1889.

Desplaces，Ernest，and Louis Gabriel Michaud，eds. *Biographie universelle，ancienne et moderne.* Vol. 37. Paris：Chez Mme C. Desplaces，1843.

Devey，Louisa. *Life of Rosina，Lady Lytton.* London：S. Sonnenschein，Lowrey，& Co.，1887.

Dickens，Charles. *A Tale of Two Cities.* London：James Nisbet & Co.，1902.

Diesbach，Ghislain de. *Secrets of the Gotha.* Translated by Margaret Crosland. New York：Meredith Press，1968.

Doré，Gustave，and Pierre Dupont. *La Légende du Juif-Errant.* Paris：Garnier-Frères，1859.

Douchin，Jacques-Louis. *Vie érotique de Guy de Maupassant.* Paris：Suger/Pauvert，1986.

Doumic，René. *Écrivains d'aujourd'hui*：*Paul Bourget*，*Guy de Maupassant*，*Pierre Loti*，*Jules Lemaître.* 2nd ed. Paris：Perrin，1895.

Drumont，Édouard. *La Dernière Bataille*：*nouvelle étude psychologique et sociale.* Paris：E. Dentu，1890.

——. *La Fin d'un monde.* Paris：Savine，1889.

——. *La France juive*：*Essai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2 vols. 43rd ed. Paris：C. Marpon & E. Flammarion，1886.

——. *Le Testament d'un antisémite.* Paris：E. Dentu，1891.

Du Camp，Maxime. *La Charité privée à Paris.* Paris：Hachette，1892.

Dumas，Alexandre，*fils. La Dame aux camélias.* Paris：Librairie Théâtrale，1853.

Dumas，Alexandre，*père. Quinze jours au Sinaï.* Paris：Charles Gosselin，1841.

Dürhen，Dr. Emil（pseud. Iwan Bloch）. *Der Marquis de Sade und seine Zeit.* Berlin：H. Barsdorf，1901（1899）.

Eddie，William A. *Charles-Valentin Alkan*：*His Life and His Music.* London：Ashgate，2007.

Elfenbein，Andrew. *Byron and the Victorians.*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Elias，Norbert. *La Société de cour.* Translated by Pierre Kamnitzer.

Paris：Calmann-Lévy，1974.

Elliot，Frances. *Roman Gossip*. London：John Murray，1894.

Enard，Mathias. *Boussole*. Paris：Actes Sud，2015.

Étincelle（pseud. Vicomtese de Peyronny）. *Carnet d'un mondain*. 2 vols. Paris：Rouveyre，1881-1882.

Farmer，James Eugene. *Versailles and the Court Under Louis* ⅩⅣ. Philadelphia：Century，1905.

Fauré，Gabriel. *Correspondance*. Edited by Jean-Michel Nectoux. Paris：Fayard，2015.

——. *A Life in Lett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Barrie Jones. London：B. T. Batsford，1989.

Fauser，Annegret. *Musical Encounters at the 1889 World's Fair*. Boydell & Brewer：Suffolk，2005.

Ferguson，Niall. *House of Rothschild*. Vol. 2：*The World's Banker*（*1849-1999*）. New York：Penguin，2000.

Ferval，Claude（pseud. Baronne Aimery-Harty de Pierrebourg）. *Paul Hervieu：deux portraits hors texte*. Paris：Fayard，1916.

Fiette，Suzann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des Lumières à la Belle Époque*. Paris：Perrin，2015.

Fischer，Henry，ed. *Secret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Royal Saxony，1891-1922：The Story of Louise，Crown Princess*. Bensonhurst，NY：

Fischer’s Foreign Letters，1912.

Flament，Albert. *Le Bal du Pré-Catelan.* Paris：Arthème Fayard，1946.

Flaubert，Gustav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suivi des “Mémoires d’un fou.”* Paris：Nouvel Office d’Édition，1964.

de Flers，Hyacinthe de Paule de La Motte Ango，Marquis. *Le Comte de Paris.*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Majendie. London：Allen & Co.，1889.

Forberg，F. C. *Manuel d’érotologie classique.* Paris：Isidore Liseux，1883.

Fouquier，Marcel. *Jours heureux d’autrefois：une société et son époque，1885-1935.* Paris：Albin Michel，1941.

Fouquières，André de. *Cinquante ans de panache.* Paris：Pierre Horay，1951.

——. *Mon Paris et ses Parisiens.* 4 vols. Paris：Pierre Horay，1953-1956.

Fournel，Victor. *Ce qu’on voit dans les rues de Paris.* Paris：E. Dentu，1867.

Fournier，Alfred. *The Treatment and Prophylaxis of Syphilis.* Translated by C. M. Marshall，M. D. New York：Rebman，1907.

Fumaroli，Marc，Gabriel de Broglie，and Jean-Pierre Chaline，eds. *Élites et sociabilité en France：actes du colloque de Paris，23 janvier 2003.* Paris：Perrin，2003.

Galateria，Daria. *L’Étiquette à la cour de Versailles.* Paris：Flammarion，2017.

Garelick，Rhonda. *Rising Star：Dandyism，Gender，and Performance in the Fin de Siècl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Genlis，Stéphanie-Félicité du Crest de Saint-Aubin，Comtesse de. *Pétrarque et Laure.* Paris：E. Ladvocat，1819.

Germain，André. *La Bourgeoisie qui brûle：propos d’un témoin，1890-1940.* Paris：Sun，1951.

Gicquel，Alain-Claude. *Maupassant：tel un météore.* Paris：Castor Astral，1993.

Giraud，Victor. *Un Grand Français：Albert de Mun.* Paris：Bloud & Gay，1919.

Goncourt，Edmond de，and Jules de Goncourt. *Journal：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s.* Edited by Robert Ricatte. 21 vols. Paris：Fasquelle & Flammarion，1936-1956.

Gosse，Edmund. *Portraits and Sketches.*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3.

Gottlieb，Robert. *Sarah：The Life of Sarah Bernhardt.*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Gourmont，Remy de. *Épilogues：réflexions sur la vie 1895-1898.* Paris：Mercure de France，1903.

——. *Promenades littéraires.* Vol. 4. Paris：Mercure de France，1927.

Graham，Victor E.，ed. *Rymes*：*Édition critique.* Geneva：Droz，1968.

Gramont，Alfred，Comte de. *L'Ami du Prince*：*Journal inédit*，*1892-1915*. Edited by Eric Mension-Rigau. Paris：Fayard，2011.

Gramont，Élisabeth de（Duchesse de Clermont-Tonnerre）. *Mémoires.* Vol. 1：*Au temps des équipages.* Paris：Grasset，1928.

——. *Mémoires.* Vol. 2：*Les Marronniers en fleurs.* Paris：Grasset，1929.

——. *Mémoires.* Vol. 4：*La Treizième Heure.* Paris：Grasset，1935.

——. *Souvenirs du monde*：*1890 à 1940.* Paris：Grasset，1966.

Gray，Francine du Plessix. *At Home with the Marquis de Sade*：*A Lif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

——. Greffulhe，Élaine（later Duchesse de Guiche，then Gramont）. *Le Livre d'ambre.* Paris，1887-1889.

——. *Les Roses tristes.* Preface by Robert de Montesquiou. Paris：Presses de l'Imprimerie Nationale，1923 [1906].

Grelière，Paul. *Les Talleyrand-Périgord dans l'histoire.* Paris：Éditions Clairvivre，1962.

Grenaud，Pierre and Gatien Marcailhou. *Boni de Castellane et le Palais Rose.* Paris：Les Auteurs Associés，1983.

Grubb，Alan. *The Politics of Pessimism*：*Albert de Broglie and Conservative Politics in the Early Third Republic.* Wilmington：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96.

Gueullette，Charles. *Les Cabinets d'amateurs à Paris，la collection du comte Henri de* [sic] *Greffulhe.* Paris：Detaille，1887.

Guichard，Marie-Thérèse. *Les Égéries de la République.* Paris：Payot，1991.

Guilleminault，Gilbert. *Prélude à la Belle Époque.* Paris：Denoël，1957.

Guinon，Georges，ed. *Clinique des maladies du système nerveux*：*M. le Professeur Charcot，hospice de la Salpêtrière.* Vol. 2. Paris：Progrès Médical，1893.

Gyp（pseud. Comtesse de Mirabeau-Martel）. *La Joyeuse Enfance de la* III*e République.* Paris：Calmann-Lévy，1931.

Halévy，Daniel. *My Friend Degas.* Translated by Mina Curtiss. 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64.

——. *Pays parisiens.* Paris：Grasset，1932.

——. *La République des ducs.* Paris：Grasset，1937.

Halévy，Léon. *Fromental Halévy，sa vie et ses œuvres.* Paris：Ménestrel，Heugel，1863.

Halévy，Ludovic. *Carnets*：*1878-1883.* Paris：Calmann-Lévy，1935.

——. *Parisian Points of View.* Translated by Edith Matthews. New York：Harper，1894.

——. *Princesse.* Paris：Calmann-Lévy，1889.

Hallman，Diana R. *Opera，Liberalism，and Antisemi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de Hamme，Liévan. *Guide-indicateur des sanctuaires et lieux historiques de la Terre Sainte.* Paris：Imprimerie des Pères Franciscains，1897.

Hamon，Augustin，and Georges Bachot. *L'Agonie d'une société：histoire d'aujourd'hui.* Paris：Albert Savine，1889.

Hanoteau，Guillaume. *Paris：Anecdotes et portraits.* Paris：Fayard，1974.

Haraucourt，Edmond. *Shylock ou le marchand de Venise.* Paris，1889.

Hare，Augustus. *Story of My Life.* 2 vols. Virginia：Library of Alexandria，n. d.

——. *The Story of Two Noble Lives：Memoirs of Louisa，Marchioness of Waterford.* London：George Allen，1893.

Harlan，Aurelia Brooks. *Owen Meredith：A Critical Biography of Robert，First Earl of Lytt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6.

Harris，John. *Moving Rooms：The Trade in Architectural Salvag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Harris，Ruth. *Dreyfus：Politics，Emotion，and the Scandal of the Century*. New York：Metropolitan，2010.

Harris，Trevor A. *Maupassant et "Fort comme la mort."* Paris：Nizet，1991.

Harskamp，Jacob T. *The Anatomy of Despondency*. Leiden：Brill，2011.

d'Haussonville，Paul-Gabriel Othenin Cléron，Comte（initially Vicomte）. *Le Comte de Paris：souvenirs personnels.* Paris：Calmann-Lévy，1895.

——. *Femmes d'autrefois，hommes d'aujourd'hui.* Paris：Perrin，1912.

——. *Le Salon de Mme Necker，d'après des documents tirés des archives de Coppet.* Paris：Calmann-Lévy，1882.

——. *Socialisme et charité.* Paris：Calmann-Lévy，1895.

Heine，Heinrich. *Neue Gedichte.* Hamburg：Hoffmann & Campe，1852.

Hemmings，F. W. F. *Culture and Society in France，1848-1898：Dissidents and Philistines.* London：Batsford，1971.

Henderson，William James. *Richard Wagner：His Life and His Dramas.* New York：G. P. Putnam & Sons，1910.

Heredia，José-Maria de. *Les Trophées.* Paris：Alphonse Lemerre，1893.

Hermant，Abel. *Le Faubourg：comédie en quatre actes.* 4th ed. Paris：Paul Ollendorff，1900.

——. *Vie littéraire.* Paris：Flammarion，1923.

Herrick，Agnes，and George Herrick. *Paris Embassy Diary.*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7.

Hertslet，Sir Edward，and Edward Cecil Hertslet，eds.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1886-1887.* Vol. 78. London：William Ridgway，1894.

Hervieu，Paul. *L'Armature.* Paris：Alphonse Lemerre，1895.

——. *La Chasse au réel.* Introduction by Henri Malherbe. Paris：E. Sansot，1913.

——. *Flirt.* Paris：Alphonse Lemerre，1890.

——. *Œuvres choisies：romans，nouvelles，théâtre.* Edited by Henri Guyot. Paris：Delagrave，1919.

——. *Peints par eux-mêmes.* Paris：Fayard，1907 [1893].

Hesse，Jean-Pascal. *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 Paris：Assouline，2014.

Higgs，David. *Noble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The Practice of Inegalitarianism.*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Holmes，Diana，and Carrie Tarr，eds. *A Belle Époque*？*Women in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1890-1914.*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2007.

Un Homme d'état（pseud.）*Histoire du Comte de Chambord.* Paris：Bray & Retaux，1880.

Horne，Alistair. *The Fall of Paris*：*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1871.* London：Reprint Society，1965.

Houbre，Gabrielle，ed. *Le Livre des courtisanes*：*Archives secrètes de la police des mœurs 1861-1876.* Paris：Tallandier，2006.

Houssaye，Arsène. *Les Mille et une Nuits parisiennes.* Vol. 4. Paris：E. Dentu，1878.

Houtin，Albert. *The Life of a Priest*：*My Own Experience.* London：Watts & Co.，1927.

Hower，Edward. *Shadows and Elephants.* Wellfleet：Leapfrog Press，2002.

Huddleston，Sisley. *Paris Salons*，*Cafés*，*Studios.* New York：Blue Ribbon，1928.

Huret，Jules. *En Amérique de New York à La Nouvelle-Orléans.* Paris：Fasquelle，1904.

——. *Tout yeux*，*tout oreilles.* Preface by Octave Mirbeau. Paris：Eugène Fasquelle，1901.

Huysmans，Joris-Karl. *A Rebours.* Preface by Marc Fumaroli. Paris：Gallimard/Folio，1977.

Iacometti，Francesco. *Marco Antonio Borghese.* Rome：Tipografia A. Befani，1886.

Imber，Hugues. *Georges Bizet.* Paris：Paul Ollendorff，1899.

——. *Médaillons contemporains.* Paris：Fischbacher，1902.

——. *Portraits et études—Georges Bizet：lettres inédites.* Paris：Paul Ollendorff，1894.

Iswolsky，Helene. *No Time to Grieve：An Autobiographical Journey.* Philadelphia：Winchell，1985.

Janin，Jules. *Le Marquis de Sade.* Paris：Chez les marchands de nouveautés，1834.

Johnston，Sir Harry Hamilton. *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

Joliet，Charles. *Les Pseudonymes du jour.* Paris：E. Dentu，1884.

Jollivet，Gaston. *L'Art de vivre.* Paris：Maison Quantin，1887.

——. *Souvenirs de la vie de plaisir sous le Second Empire.* Preface by Paul Bourget. Paris：Tallandier，1927.

Jonnes，Jill. *Eiffel's Tower：The Thrilling Story Behind Paris's Beloved Monument and the Extraordinary World's Fair That Introduced It to*

the World. New York：Penguin，2009.

Jordan，David. *Transforming Paris*：*The Life and Labors of the Baron Haussman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

Jordan，Ruth. *Fromental Halévy*：*His Life & Music*，*1799-1862.* New York：Limelight，1996.

Julia，Isabelle，ed. *Jules-Élie Delaunay*，*1828-1891.* Nantes：Musée Hébert，1988.

Jullian，Philippe. *Robert de Montesquiou*，*prince de 1900.* Paris：Perrin，1965.

Jullian，Philippe，ed. *Dictionnaire du snobisme.* Paris：Plon，1958.

Jungle，Ernest. *Profils parisiens.* Paris：A. Melet，1898.

Kahan，Sylvia. *In Search of New Scales*：*Prince Edmond de Polignac*，*Octatonic Explorer.* Rochester，NY：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9.

Kellner，Sven. *Maupassant*，*un météore dans le del littéraire de l'époque.* Saint-Denis：Éditions Publibook，2012.

Kleinmichel，Marie von Keller，Countess von. *Memories of a Shipwrecked World.* New York：Brentano's，1923.

Königslöw，J. *Ferdinand von Bulgarien.* Munich：n. p.，1970.

Korneva，Galina，and Tatiana Cheboksarova. *Grand Duchess Maria Pavlovna.* East Richmond Heights，CA：Eurohistory，2015.

Kuhn，William.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A Portrait of Benjamin Disraeli*. London：Free Press，2006.

La Douasnerie，Dominique Lambert de，ed. *Autour du congrès légitimiste d'Angers du* 7 *août 1887*. Angers：Congrès légitimiste，1888.

La Ferronays，Guillemine Lucie Marie de. *Mémoires de Mme de La Ferronays*. Paris：Paul Ollendorff，1900.

La Force，Auguste de Caumont，duc de. *La Fin de la douceur de vivre*：*souvenirs*，*1878-1914*. Paris：Plon，1961.

Lacassagne，Dr. Zacharie. *La Folie de Maupassant*. Toulouse：Gimet-Pisseau，1907.

——. *Vacher l'éventreur et les crimes sadiques*. Paris：Masson & Stock，1899.

Lacombe，Hervé. *Georges Bizet*：*Naissance d'une identité créatrice*. Paris：Fayard，2000.

Laforge，Valérie. *Talons et tentations*. Quebec：Fides，2001.

Lanoux，Armand. *Maupassant le Bel-Ami*. Paris：Grasset，1995.

Larmandie，Comte Léonce de. *Le Faubourg Saint-Germain en l'an de grâce 1889*. Paris：E. Dentu，1889.

Laurent，Sébastien. *Daniel Halévy*：*du libéralisme au traditionalisme*. Paris：Grasset，2001.

Lauris，Georges，Marquis de. *Souvenirs d'une belle époque*. Paris：

Amiot Dumont，1948.

Lefeuve，Charles. *Les Anciennes Maisons de Paris sous Napoléon* Ⅲ. 3 vols. Paris：Achille Faure，1863-1865.

——. *Histoire du Lycée Bonaparte*（*Collège Bourbon*）. Paris：Bureau des Anciennes Maisons de Paris sous Napoléon Ⅲ，1862.

Legay，Éric. *Le Comte Henry Greffulhe*：*Un grand notable en Seine-et-Marn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é de Paris Ⅹ Nanterre，1986-1987.

Lemaître，Jules. *Les Contemporains*：*Guy de Maupassant*，*Stéphane Mallarmé*，*Général Boulanger*，*Guillaume* Ⅱ. Paris：Société Française d'Imprimerie，1898.

——. *Impressions de théâtre.* Paris：Lecène，Oudin，1888-1892.

Leprieur，Paul. *Gustave Moreau et son œuvre.* Paris：Bureaux de l'Artiste，1889.

Lerner，Michel. *Maupassant.* New York：Braziller，1975.

Leroy，Géraldi，and Julie Sabiani. *La Vie littéraire à la Belle Époque.* Paris：PUF，1998.

Lever，Maurice. *Sade*：*A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93.

Liégeard，Stéphen. *La Côte d'Azur.* Paris：Libriaires-Imprimeries Réunies，1891.

Lilti，Antoine.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ⅩⅧ^e siècle.* Paris：Fayard，2005.

Locke，Robert. *French Legitim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 Order in the Early Third Republic.*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Loliée，Frédéric. *Women of the Second Empire*：*Chronicle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Ⅲ. Translated by Alice Ivimy. London and New York：John Lane，1907.

Lonergan，Walter F. *Forty Years of Paris.* London：T. Fisher Unwin，1907.

Lorrain，Jean（pseud. Paul Duval）. *Lettres à Marcel Schwob.* Edited by Eric Walbecq. Tusson：Lérot，2006.

——. *Monsieur de Phocas*：*Astarté.* Paris：Paul Ollendorff，1901.

——. *Le Vice errant.* Paris：Paul Ollendorff，1902.

——. *La Ville empoisonnée*：*Pall-Mall Paris.* Preface by Georges Normandy. Paris：Jean Crès，1936.

Lottman，Herbert. *The Return of the Rothschilds*：*The Great Banking Dynasty Through Two Turbulent Centuries.* London：I. B. Tauris，1995.

Lumbroso，Albert. *Souvenirs sur Maupassant*：*sa maladie，sa mort.* Rome：Bocca Frères，1905.

Lutyens，Mary. *The Lyttons in India*：*An Account of Lord Lytton's Viceroyalty，1876-1880.* London：John Murray，1979.

de Luz，Pierre（pseud. Pierre Henry de La Blanchetai）. *Les Amis du Comte de Chambord.* Vol. 58：*Henri* Ⅴ. Paris：Plon，2007 [1913].

Lynch，Lawrence W. *The Marquis de Sade.* Boston：Twayne，1984.

MacDonald，Hugh. *Bize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MacDonald，John. *Czar Ferdinand and His People.* New York：F. A. Stokes，1945.

Mackin，Sally Britton Spottiswood. *A Society Woman on Two Continents.* New York and London：Transatlantic，1896.

Magué，André. *La France bourgeoise actuelle.* Paris：Février，1891.

Malato，Charles. *De la Commune à l'anarchie.* 3rd ed. Paris：Tresse & Stock，1894.

Maral，Alexandre. *La Chapelle royale de Versailles sous Louis* ⅩⅣ. Wavre，Belgium：Mardaga，2010.

Marancour，L. Massenet de. *Les Échos du Vatican.* Paris：Hachette，1864.

Marie-Laure（pseud. Vicomtesse de Noailles）. *La Chambre des écureuils.* Paris：Plon，1955.

Marly，Diana de. *Worth*：*Father of Haute Couture.* London：Elm Tree Books，1980.

Martin-Fugier，Anne. *Les Salons de la* Ⅲ^{e} *République.* Paris：Perrin，1993.

——. *La Vie élégante，ou la formation de Tout-Paris.* Paris：Fayard，1993.

Massa，Philippe，Marquis de. *Au mont Ida：comédie en un acte.* Paris：Paul Ollendorff，1887.

Massari，Commandante Alfonso M. *Don Giovanni Borghese：cenni necrologici.* Rome：Presse della Reale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1918.

Maugny，Comte de. *Cinquante ans de souvenirs，1859-1909.* Edited by René Doumic. Paris：Plon，1914.

Maupassant，Guy de. *Bel-Ami.* Paris：L. Conard，1910 [1885].

——. *Correspondance.* Edited by Jacques Suffel. Évreux：Cercle du Bibliophile，1973.

——. *Romans.* Edited by Louis Forestier. Paris：Gallimard/Pléïade，1987.

Mauriac，Claude. *Hommes et idées d'aujourd'hui.* Paris：Albin Michel，1953.

Maussion，Baronne de，née Thellusson. *Contes aux enfants du château de Vaux.* Paris：Aymot，1846.

Mayeur，Jean-Marie，and Madeleine Rebérioux. *The Third Republic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Great War，1871-1914.*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Maynial，Édouard. *Guy de Maupassant：la vie et l'œuvre.* Paris：Mercure de France，1906.

McClary，Susan. *Georges Bizet*：*Carmen.*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McGuinness，Patrick. *Poetry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Fin-de-Siècle France*：*Anarchism to Action Français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Meilhac，Henri，and Ludovic Halévy. *Carmen*：*An Opera in Four Acts.* Libretto to the opera by Georges Bizet，adapted from the novella by Prosper Mérimée. Introduction by Philip Hale. Boston：Oliver Ditson，1914.

——. *Théâtre.* 8 vols. Paris：Calmann-Lévy，1899-1902.

Mejan，Maurice. *Recueil des causes célèbres et des arrêts qui les ont décidés.* Vol. 1. Paris：Plisson，1807.

Melba，Nellie（pseud. Helen Porter Mitchell）. *Melodies and Memories.*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Mercier，Louis-Sébastien. *Tableau de Paris.* Vol. 1. Paris：Virchaux，1781.

Meredith，Owen（pseud. Edward Robert Bulwer-Lytton，Lord Lytton）. *Glenaveril，or The Metamorphoses.* 2 vols. London：Longmans，Green，1885.

——. *King Poppy*：*A Fantasia.* London：Longmans，Green，1892.

——. *Marah.* London：Longmans，Green，1892.

——. *Poetical Works.* New York：New York Publishing Company，

1895.

——. *Selected Poems.* London：Longmans，Green，1894.

Mergier-Bourdeix，ed. *Jules Janin*：*735 lettres à sa femme.* Paris：Klincksieck，1976.

Merriman，John. *The Dynamite Club*：*How a Bombing in Fin-de-Siècle Paris Ignited the Age of Modern Terror.* 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9.

——. *Massacre*：*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Basic Books，2014.

Meyer，Arthur. *Ce que je peux dire.* Paris：Plon，1912.

——. *Ce que mes yeux ont vu.* 50th ed. Preface by Émile Faguet. Paris：Nourrit-Plon，1912.

Mitchell，Leslie George. *Bulwer-Lytton*：*The Rise and Fall of a Victorian Man of Letters.* London：Bloomsbury，2003.

Montefiore，Simon Sebag. *The Romanovs 1613-1918.*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6.

Montesquiou-Fezensac，Comte Robert de. *Autels privilégiés*，Paris：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1898.

——. *Brelan de Dames.* Paris：Fontemoigne，1912.

——. *Les Chauves-souris*，*clairs-obscurs.* Paris：Georges Richard，1892.

——. *Le Chef des odeurs suaves.* Paris：Georges Richard，1893.

——. *La Divine Comtesse.* Paris：Manzi，Joyant，1913.

——. *Les Paons.* Paris：Georges Richard，1908 [1901].

——. *Les Pas effacés.* 3 vols. Paris：Émile-Paul，1923.

——. *Paul Helleu：Peintre et graveur.* Paris：Sansot，1913.

——. *Les Perles rouges*；*Les Paroles diaprées.* Paris：G. Richard，1910.

——. *Les Quarante Bergères：portraits satiriques en vers inédits.* Paris：Librairie de France，1925.

——. *Les Roseaux pensants.* Paris：Fasquelle，1897.

——. *Les Têtes couronnées.* Paris：Sansot，1916.

Monti de Rezé，Comte René de. *Souvenirs sur le Comte de Chambord.* Paris：Émile-Paul，1930.

Montréal，Fernand de. *Les dernières heures d'une monarchie.* Paris：Victorion，1893.

Moonen，Antonius. *Petit Bréviaire du snobisme.* Paris：L'Inventaire，2000.

Morand，Paul. *L'Allure de Chanel.* Paris：Hermann，1996.

——. *Fin de siècle.* Paris：Stock，1957.

——. *Journal d’un attaché d’ambassade.* Paris：Gallimard/NRF，1963.

——. *1900.* Paris：Marianne，1931.

——. *Vie de Guy de Maupassant.* Paris：Pygmalion/Gérard Watelet，1998.

Moreau，Gustave. *L’Assembleur de rêves*：*écrits complets.* Edited by Pierre-Louis Matthieu. Paris：Fata Morgana，1984.

Mugnier，Abbé. *Journal*，*1879-1939.* Edited by Marcel Billot. Paris：Mercure de France，1985.

Muhlfeld，Lucien. *Le Monde où l’on imprime.* Paris：Perrin，1897.

Muhlstein，Anka. *Baron James*：*The Rise of the French Rothschilds.* New York and Paris：The Vendome Press，1983.

——. *The Pen and the Brush*：*How Passion for Art Shaped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Novels.* Translated by Adriana Hunter. New York：Other Press，2017.

Müller，Walter. *Georges de Porto-Riche*，*1849-1930*：*l’homme*，*le poète*，*le dramaturge.* Paris：J. Vrin，1934.

de Mun，Comte Albert. *Dieu et le roi.* Paris：Librairie de la Société Bibliographique，1881.

——. *Pour la Patrie.* Paris：Émile-Paul，1912.

Murat，Laure. *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he.* Paris：

Hachette/Lattès，2001.

Musset，Alfred de. *Poésies complètes.* Paris：Charpentier，1840.

Nectoux，Jean-Michel. *Gabriel Fauré：A Musical Life.* Translated by Roger Nichols.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Nevill，Lady Dorothy. *Reminiscences.* Edited by Ralph Nevill. London：Edward Arnold，1907.

——. *Under Five Reigns.* Edited by Ralph Nevill. New York：John Lane，1910.

Nisbet，John Ferguson. *The Insanity of Genius.* New York：Scribner's，1912.

Nordau，Max. *Degeneration.* London：D. Appleton & Co.，1895 [1892].

Nouvion，Georges de，and Émile Landrodie. *Le Comte de Chambord：1820-1883.* Paris：Jouvet，1884.

O'Connor，Garry.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Philadelphia：Atheneum，1979.

O'Monroy，Richard. *La Soirée parisienne.* Paris：Arnould，1891.

O'Squarr，Flor（pseud. Charles Flor）. *Les Coulisses de l'anarchie.* Paris：Albert Savine，1892.

de Pange，Pauline de Broglie，Comtesse. *Comment j'ai vu 1900.*

Paris：Grasset，2013.

Paris，Gaston. *Le Juif-Errant.* Paris：Sandoz & Fischacher，1880.

Parisis（pseud. Émile Blavet）. *La Vie parisienne*：*la ville et le théâtre.* Preface by Aurélien Scholl. Paris：Paul Ollendorff，1886.

Pasler，Jann. *Writing Through Music*：*Essays on Music*，*Culture*，*and Politic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earl，Cora（pseud. Emma Crouch）. *Mémoires de Cora Pearl.* Paris：J. Lévy，1886.

Pease，Jane Hanna. *Romance Novels*，*Romantic Novelist*：*Francis Marion Crawford.* Bloomington，IN：AuthorHouse，2011.

Pellapra，Émilie de（Comtesse de Brigode，Princesse de Chimay）. *Mémoires publiées.* Paris：La Sirène，1921.

Perez，Stanis. *La Santé de Louis* ⅩⅣ Paris：Perrin，2010.

Perry，Duncan M. *Stefan Stambolov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Bulgaria.*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Pesquidoux，Dubose de. *Le Comte de Chambord d'après lui-même.* Paris：Victor Palmé，1887.

Petrarcah，Francesco. *Il Canzoniere.* Edited by Lorenzo Mascetta. Lanciano：Rocco Carabba，1895.

——. *Épîtres*，*éclogues*，*triomphes.* Translated，by Comte Anatole de Montesquiou-Fezensac. Paris：Aymot，1843.

——. *Petrarch's Lyric Poem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obert M. During.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Pierrefeu，Jean de. "Société d'écrivains？"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July 14，1928）：1.

Pimodan，Comte de. *Simples souvenirs，1859-1907.* Paris：Plon，1908.

Pinson，Guillaume. *Fiction du monde：analyse littéraire et médiatique de la mondanité，1885-1914.* Ph. D. dissertation. Montreal：McGill University，2005.

Piou，Jacques. *Le Comte Albert de Mun：sa vie publique.* Paris：Spes，1925.

Plessis，Alain. *Régents et gouverneur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Geneva：Droz，1985.

Poiret，Paul. *Vestendo la Belle Époque.* Translated by Simona Broglie. Milan：Excelsior，2009.

Porto-Riche，Georges de. "Bonheur manqué：Carnet d'un amoureux." *La Revue illustrée* 81（May 15，1889）：313-23.

——. *Bonheur manqué：Carnet d'un amoureux.* Paris：Paul Ollendorff，1905.

——. *Sous mes yeux.* Paris：F. Payart，1927.

——. *Théâtre d'amour.* Paris：Paul Ollendorff，1921.

——. *Tout n’est pas rose.* Paris：Calmann-Lévy，1877.

Pottier，André. *Histoire de la faïence de Rouen.* Rouen：Le Brument，1870.

Pougy，Liane de（Princesse Ghika）. *Mes cahiers bleus.* Paris：Plon，1977.

Pouquet，Jeanne Maurice. *The Last Salon*：*Anatole France and His Muse.* Translated by Lewis Galantière. New York：Harcourt，Brace，1927.

Pringué，Gabriel-Louis. *Trente ans de dîners en ville.* Paris：Revue Adam，1948.

Prochasson，Christophe. *Paris 1900*：*essai d’histoire culturelle.* Paris：Calmann-Lévy，1999.

Prod’homme，Jacques-Gabriel，and Arthur Dandelot. *Gounod*：*sa vie et ses œuvres，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Charles Delagrave，1919.

Proust，Dr. Adrien. *Traité d’hygiène publique et privée.* Paris：Masson，1877.

Proust，Dr. Adrien，and Dr. Gilbert Ballet. *Hygiène de neurasthénie.* Paris：Masson，1897.

Racine，Jean. *Œuvres complètes*：*théâtre，poésie.* Edited by Georges Forestier. Paris：Gallimard/Pléïade，1999.

Raymond，E. Neill. *Victorian Viceroy*：*The Life of Robert，the First Earl of Lytton.* London and New York：Regency，1980.

Régnier，Henri de. *Les Cahiers inédits：1887-1936.* Edited by David J. Niederauer and François Broche. Paris：Pygmalion/Gérard Watelet，2002.

——. *Nos rencontres.* Paris：Mercure de France，1931.

Reinach，Joseph. *Les Petites Catilinaires：Bruno-le-fileur.* Paris：Victor-Havard，1889.

Renard，Georges François. *Les Princes de la jeune critique.* Paris：La Nouvelle Revue，1890.

Renard，Jules. *Critique de combat.* Paris：E. Dentu，1894.

——. *Journal inédit.* Paris：Bernouard，1927.

Retté，Adolphe. *Au pays des lys noirs：souvenirs de jeunesse et d'âge mûr.* Paris：P. Téqui，1913.

Richardson，Joanna. *Portrait of a Bonaparte：The Life and Times of Joseph-Napoleon Primoli，1851-1927.* London and New York：Quartet，1984.

Ridley，Jane. *Bertie：A Life of Edward* Ⅶ，London：Vintage，2003.

Robert，Frédéric. *Bizet：l'homme et son œuvre.* Geneva：Slatkine，1980.

Rochas d'Aiglun，Albert de. *L'Envoûtement.* 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Occultes，1895.

Röhl，John，and Nicolaus Sombart. *Kaiser Wilhelm* Ⅱ：*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nfort，Jean-Dominique，and Jean-Mérée Ronfort. *A l'ombre de Pauline：la residence de l'ambassadeur de Grande-Bretagne à Paris.* Paris：Édition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2001.

Rothschild，Baron Guy de. *Contre bonne fortune* ... Paris：Pierre Belfond，1983.

Rougerie，Jacques. *Paris libre：1871*. Paris：Seuil，2004.

Rounding，Virginia. *Grandes Horizontales：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Four Nineteenth-Century Courtesans.* New York：Bloomsbury USA，2003.

Rousset-Charny，Gérard. *Les Palais parisiens de la Belle Époque.* Paris：Action Artist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1992.

Rouvillois，Frédéric. *Histoire du snobisme.* Paris：Flammarion，2008.

Sachs，Maurice. *Au temps du Boeuf sur le toit.* Paris：La Nouvelle Revue Critique，1948.

——. *Le Sabbat：souvenirs d'une enfance orageuse.* Paris：Gallimard，1960.

——. *Tableau des mœurs de ce temps.* Paris：Gallimard，1954.

de Sade，Chevalier Louis. *Extraits du "Lexicon politique."* Paris：A. Barbier，1831.

——. *Préceptes à l'usage d'une monarchie.* Paris，1822.

de Sade，Donatien-Alphonse-François，Marquis. *Idée sur les romans.* Preface by Octave Uzanne. Paris：Rouveyre，1878.

——. *Œuvres choisies.* Edited by Guillaume Apollinaire. Paris：Bibliothèque des Curieux，1909.

——. *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ou les instituteurs immoraux.* Québec：Bibliothèque Électronique de Québec，n. d. [1795].

de Sade，Jacques-François-Paul，Abbé. *Mémoires pour la vie de François Pétrarque.* Amsterdam：Arskée & Mercus，1764.

de Sade，Louis-Marie，Comte. *Histoir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première race.* Paris：Delaunay，1805.

Saint-Simon，Louis de Rouvroy，Duc de. *Mémoires.* 21 vols. Edited by M. Chéruel. Preface by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Paris：Hachette，1858.

Samuels，Maurice. *Inventing the Israelite：Jewish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 *The Right to Difference：French Universalism and the Jews.*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Sanborn，Alvan Francis. *Paris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Boston：Small，Maynard & Co.，1905.

San Filippo，Pietro Amat di. *Gli illustri viaggiatori italiani con una antologia dei loro scritti.* Rome：Stabilimento Tipografico dell'Opinione，

1885.

Sante，Luc. *The Other Paris.* 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2015.

Sapin，Philippe. *Les Juifs dans toute la presse française，l'armée et la finance.* Lyon：n. p.，1898.

Sartoris，Adelaide. *A Week in a French Country House.* London：Smith，Elder & Company，1867.

Schlumberger，Gustave. *Mes souvenirs：1844-1928.* 2 vols. Paris：Plon，1934.

Schneider，Marcel. *L'Éternité fragile.* Vol. 2：*Innocence et vérité.* Paris：Grasset，1991.

——. *Moi qui suis né trop tard.* Paris：Grasset & Fasquelle，2006.

Scholl，Aurélien. *Le Fruit défendu.* Paris：Librairie Universelle，1888.

Scribe，Eugène. *La Juive（The Jewess）：Opera in Five Acts.* Libretto to the opera by Fromental Halévy. New York：Fred Rullman，1919.

Scribe，Eugène，and Henri de Saint-Georges. *Le Juif-Errant：opéra en cinq actes，musique de Fromental Halévy.* Paris：Brandus，1852.

Segal，Harold B. *Turn-of-the-Century Cabaret：Paris，Barcelona，Berlin，Munich，Vien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Seigel，Jerrold. *Bohemian Paris*：*Culture*，*Politics*，*and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1830-1930.*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Senevas，Bruno-Marie Terrasson，Baron de. *Une famill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IX*e siècles. Étude sur les conditions sociales*，*la vie et les alliances des Terrasson de Senevas.* 4 vols. Paris：J. Moulin，1939.

Sert，Misia. *Misa and the Muses*：*The Memoirs of Misia Sert.* 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53.

Shapcott，Thomas. *The White Stag of Exile.* Brisbane：A. Lane，1984.

Sherard，Robert Harborough. *Twenty Years in Paris*，*Being Some Recollections of a Literary Life.* London：Hutchinson，1905.

Sheridan，Alan. *Time and Place.* London：Scribner，2003.

Sillery，J. *Monographie de l'hôtel de Sagan.* Paris：Frazier，1909.

Skinner，Cornelia Otis. *Elegant Wits and Grand Horizontals*：*Paris—La Belle Époque.*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62.

——. *Madame Sarah.*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7.

——. *Robert de Montesquiou*：*The Magnificent Dandy.* London：Michael Josephs，1962.

Smith，Richard Langham，and Caroline Potter. *French Music Since Berlioz.* Aldershot，UK：Ashgate，2006.

Soderini，Conte Edoardo. *Il Principe Don Marco Antonio Borghese.*

Rome：Bafani，1886.

Somerville，Frankfort. *The Spirit of Paris.* London：Black，1913.

Sowerwine，Charles. *France Since 1870：Culture，Society，and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

Steele，Valerie. *Paris Fashion：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Berg，2001.

Stewart，C. Nelson. *Bulwer-Lytton as Occultist.* New York：Kessinger，2010.

Straus，Émile. *La Distinction des biens.* Paris：Jouaust，1867.

Stricker，Rémy. *Georges Bizet.* Paris：Gallimard，1999.

Syme，Alison. *A Touch of Blossom：John Singer Sargent and the Queer Flora of Fin-de-Siècle Art.* University Park：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

Tarnowska，Countess Maria. *The Future Will Tell：A Memoir.* Victoria，BC：Friesen，2014.

Tassart，François. *Souvenirs sur Guy de Maupassant par François，son valet de chamber，1883-1893.* Paris：Plon，1911.

Techener，Léon.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et du bibliothécaire.* Paris：L. Techener，1873.

Tenroc，Charles（pseud. Charles Cornet）. *Féminités.* Paris：Imprimeries Techniques，1902.

Thomas，Louis. *La Maladie et la Mort de Maupassant.* Bruges：Arthur Herbert，1906.

Ticknor，George. *Life，Letters，and Journals.* Vol. 2.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879.

Tiersten，Lisa. *Marianne in the Market：Envisioning Consumer Society in Fin-de-Siècle Fr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d'Uzès，Anne de Rochechouart de Mortemart，Duchesse. *Souvenirs 1847-1933.* Paris：Lacurne，2011.

Vasili，Comte Paul（pseud. Juliette Adam）. *France from Behind the Veil.* London：Fassell，1915.

——. *Le Grand Monde.* Paris：La Nouvelle Revue，1887.

——. *Society in Paris：Letters to a Young French Diplomat.* Translated by Raphael Ledos de Beaufort. London：Chatto & Windus，1890.

——. *Les Soirées de Paris.* Paris：La Nouvelle Revue，1887.

Vatout，Jean. *Le Château d'Eu：notices historiques.* 6 vols. Paris：Félix Malteste，1836.

de Vaux，Baron. *Le Sport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Paris：J. Rothschild，1899.

Verne，Suzanne. *Guermantes de Louis* ⅩⅢ *à nos jours.* Paris：Ferenczi，1961.

Viel-Castel，Comte Horace de. *Le Faubourg Saint-Germain.* 6 vols. Paris：L’Advocat，1837-1838.

——. *Mémoires sur le règne de Napoléon* Ⅲ. Vol. 3. Paris：Guy Le Part，1979.

Vigny，Alfred d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1. Paris：A. Lemerre，1883.

Villoteau，Pierre. *La Vie parisienne à la Belle Époque.* Paris：Levallois-Perret，1968.

Vitali，Lamberto. *Un fotografo fin de siècle：il conte Primoli.* Turin：Einaudi，1968.

Vizetelly，Ernest. *The Court of the Tuileries，1852-1870.* London：Chatto & Windus，1907.

——. *Republican France，1870-1912：Her Presidents，Statesmen，Policy，Vicissitudes，and Social Life.* London：Holden & Hardingham，1912.

Vogüé，Vicomte Eugène-Melchior de. *Pages choisies.* Preface by Paul Bourget. Paris：Plon-Nourrit，1912.

——. *Le Roman russe.* 5th ed. Paris：Plon-Nourrit，1904 [1886].

Vuiller，Gaston. *A History of Dancing.* Translated by Joseph Grego. New York：D. Appleton，1898.

de Waal，Edmund. *The Hare with Amber Eyes：A Hidden Inheritance.* New York：Picador，2010.

Waddington，Mary Alsop King. *Letters of a Diplomat's Wife：1883-1900.* London：Smith，Elder，& Co.，1903.

Wagner，Richard. *Actors and Singers.* Translated by William Ashton Ellis. London：Kegen Paul，Trench，Trübner，& Co.，1896.

Wawra de Fernsee，Heinrich. *Les Broméliacées découvertes pendant les voyages des princes Auguste et Ferdinand de Saxe-Cobourg.* Liège：C. Anoot-Braeckman，1880.

Weber，Eugen. *France，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1986.

Weber，William，ed. *The Musician as Entrepreneur 1700-1914.*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

Wilde，Oscar.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Edited by Robert Mighal. 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6 [1891].

——. *Salomé，drame en un acte.* Paris：G. Crès，1922 [1893].

Willy（pseud. Henry Gauthier-Villars）. *Soirées perdues.* Paris：Tresse & Stock，1894.

Wilson，Barbara Lister（Lady Wilson）. *The House of Memories.*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29.

Wolff，Jetta Sophia. *Historic Paris.* Paris：John Lane，1923.

Wright，Leslie A. *Bizet Before "Carmen."* Ph. D. dissertation.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5.

X.，Dr. Jacobus（pseud.）. *Le Marquis de Sade et son œuvre devant la science médicale et la littérature moderne.* Paris：Charles Carrington，1901.

Zed（pseud. Comte Albert de Maugny）. *Le Demi-monde sous le Second Empire：souvenirs d'un sybarite.* Paris：E. Kolb，1892.

——. *La Grande Vie de Paris.* Paris：E. Kolb，1889.

——. *Les Inconvenances sociales：fragments du journal d'un vieux garçon.* Paris：E. Kolb，1891.

——. *Parisiens et Parisiennes en déshabillé.* Paris：E. Kolb，1889.

——. *La Société parisienne.* Paris：Librairie Illustrée，1891.

B·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Articles

1.Attributed Articles

A. B. （pseud.）. "Marah." *National Review* 19（March-August 1892）：200-211.

A. de B. （pseud.）. "Par çi，par là." *Le Voleur illustré*（June 11，1885）：382-83.

Alcanter et Saint-Jean（pseud. Marcel Bernhardt）. "Les Vendredis d'Aristide." *Le Nouvel Écho* 3（February 1，1892）：78-80.

Allain，Paul. "En Passant：La Place à table." *Le Radical*（November 9，1922）：1.

An American（pseud.）. “To Blow Up a Princess：Dynamite Bombs Explode in the Doorway of the Princesse de Sagan.” *Baltimore American*（March 1，1892）：1.

A. M. M.（pseud.）. “Gossip of the French Capital.” *New York Dramatic Mirror*（May 2，1896）：18.

Amodio，Marquis de. “Le Château de Verteuil.”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la Charente*（1958）.

Archiduc（pseud.）. “La Journée mondaine.” *Le Matin*（August 18，1898）：2.

d’Arenberg，Prince Auguste. “Notice sur le duc d’Aumale.” In *Annales de l’Académie des Beaux-Arts.* Paris：Firmin-Didot，1898.

Asmodée（pseud. Baron de Vaux）. “Notes mondaines.” *Gil Blas*（June 5，1885）.

Associated Press Dispatches. “Panic-Stricken Paris：Consternation Reigning at the French Capital.” *Los Angeles Herald*（April 7，1892）：2.

Barrès，Maurice. “The Panama Scandal.” *Cosmopolitan* 17（May-October 1894）：203-10.

Bataille，Albert. “Gazette des Tribunaux.” *Le Figaro*（April 29，1880）.

——. “Gazette des Tribunaux.” *Le Figaro*（March 13，1884）.

Baudouin. “Tribunal de Commerce：Faillites.” *Gazette des tribunaux：journal de jurisprudence et de débats judiciaires*（January 24，1857）：38.

Benjamin，Walter. “Pariser Köpfe.” In *Walter Benjamin Passagen：Schriften zur französische Literatur*. Edited by Gérard Raulet. Frankfurt：Suhrkamps，2007.

Bernard，Alice. “Le Grand Monde parisien à l’épreuve de la guerre.” *ⅩⅩe siècle* 99（July-September 2008）：13-32.

Beyens，Baron de. “L’Avenir des petits états：la Bulgari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44（April 1918）：874-94.

Bleuzet，Ludivine. “Mystères et code secret au château de Condé.” *L’Union*（July 23，2004）：7.

Blondeau，Amédée. “L’Empoisonneuse d’Aïn-Fezza：Mme Weiss.” *Le Rappel*（May 30，1890）：1.

Blum，Ernest. “Un krach princier.” *Le Rappel*（August 10，1891）.

Borel d’Hauterive，A. “Musée de Versailles：Notice sur les cinq salles des Croisades et sur les personnages dont les noms et les armes y figurent.” *Annuaire historique pour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9（1845）：127-95.

Bras，Jean-Yves. “Qui était Éraïm Miriam Delabord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lkan* 4（March 1987）：3-6.

Brionne（pseud.）. “Carnet mondain.” *Gil Blas*（June 7，1897）.

Brooks，Peter. “Persons and Optics.” *Arcade*（March 16，2015）.

Brunetière，Ferdinand. “La Tragédie de Racin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62（1884）：213-24.

Brusquet（pseud.）. “Le Régime du sabre.” *Le Triboulet*（May 23，1880）：5.

Calmette，Gaston. “Au jour le jour：le château de Bois-Boudran.” *Le Figaro*（November 22，1891）：1.

——. “Les Compositeurs français joués en France.” *Le Figaro*（April 10，1890）：1-2.

Caraman-Chimay，Princesse Alexandra de Riquet de. “Généalogie de Riquet.” Presented by “les Amis de Riquet，” June 13-14，2009.

Cassagnac，Paul de. “Les Élections.” *L’Express du Midi*（May 25，1898）：1.

Castelbajac，Gaston，Marquis de. “La Chasse à tir.” In *Le Protocole mondain.* Edited by André de Fouquières. Paris：Levallois-Perret，n. d.，359-64.

Catani，Damian. “Notions of Evil in Baudelair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02，no. 4，990-1007.

Chaline，Jean-Pierre. “La Sociabilité mondaine au ⅩⅨe siècle.” In *Élites et sociabilité.* Edited by Fumaroli，Broglie，and Chaline，op. cit.

Charle，Christophe. “Noblesses et élite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ⅩⅩe siècle.” In *Les Noblesses européennes au ⅩⅨe siècle：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et l’Université de Milan，Milan-Rome，21-23 novembre 1985.* Milan：EFR，1988.

Chéron，Raoul，“Nécrologie：M. Charles Haas.” *Le Gaulois*（July

16，1902）：2.

Child，Theodore. “Characteristic Parisian Cafés.”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77（April 1889）.

——. “Literary Paris.”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35（August 1892）：337-39.

——. “Society in Paris.” *The Fortnightly Review* 39（January-June 1886）：480-99.

Colas，Damien. “Halévy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Orchestra.” In *The Impact of Composers and Works on the Orchestra：Case Studies.* Edited by Niels Martin Jensen and Franco Piperno. Berlin：Berliner Wissenschafts Verlag，2007，143-84.

Consuelo（pseud.）. “Chronique parisienne.” *La Grande Dame* 28（April 1895）.

Corpechot，Lucien. “Les Lettres françaises：Le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 *La Revue de France* 2，no. 23（February 15，1922）.

Cotta，Laurent. “Paul César Helleu：Représenter l’intime.” In *La Mode retrouvée.* Edited by Olivier Saillard and Valerie Steele. Paris：Paris Museés，2015.

D.（pseud.）. “Échos de Paris.” *Le Figaro*（March 29，1884）.

Dalq，Louise. “Lord Lytton：Philosophe et poète.” *Le Figaro：supplément littéraire*（November 12，1887）：1-2.

Dame Pluche（pseud.）. “Chronique.” *La Gazette des Femmes*（June

10，1884）.

Dangeau，Marquise de（pseud.）. “Chronique mondaine.” *La Mode de style*（February 11，1891）：51-54；and（July 1，1891）：208-11.

Dantin（pseud.）. “Mondanités：Chronique de l’élégance.” *Le Gaulois*（June 12，1896）.

——. “Mondanités：Chronique de l’élégance.” *Le Gaulois*（December 17，1896）.

Darcours，Charles（pseud. Charles Réty）. “Notes de musique à l’Exposition.” *Le Figaro*（October 2，1889）.

Demailly，Charles. “Bizet.” *Le Gaulois*（December 11，1890）.

Descaves，Lucien. “Opinions et souvenirs：Fernand Vandérem，*Gens de qualité.” Le Journal*（February 6，1938）.

Le Diable Boiteux（pseud. Baron de Vaux）. “Échos.” *Gil Blas*（December 7，1894）.

——. “Nouvelles et échos.” *Gil Blas*（January 31，1880）；（April 5，1881）；（May 15，1883）；（November 3，1883）；（June 2，1884）；（June 12，1884）；（June 13，1884）；（June 20，1884）；（September 2，1884）；（September 20，1884）；（December 22，1884）；（April 13，1885）；（May 10，1885）；（June 4，1885）；（August 7，1885）；（June 13，1889）；（June 7，1891）；（March 15，1892）；（June 13，1892）；（July 2，1892）；（June 12，1893）；（July 4，1893）；（January 23，1894）；and（May 12，1894）.

Un Diplomate（pseud.）. “La Grande-Duchesse Wladimir.” *La Grande Dame* 1（1893）：192-98.

Dives，Auguste（pseud.）. “Mondanités. *Le Gaulois*（June 12，1889）.

Dominique，Pierre. “Sous le règne de l’étiquette.” *Le Crapouillot*：*Les Bonnes Manières* 19（1952）：19-25.

Un Domino（pseud. Arthur Meyer）. “Échos de Paris.” *Le Gaulois*（May 26，1880）；（May 10，1885）；（May 29，1885）；（June 3，1885）；（April 28，1888）；（April 29，1888）；（February 1，1889）；（April 1，1889）；（March 28，1890）；（May 12，1890）；（July 21，1890）；（December 24，1890）；（February 20，1891）；（March 2，1892）；and（December 17，1896）.

——. “Les Fidèles.” *Le Gaulois*（August 24，1883）.

Don Caprice（pseud.）. “Nouvelles：Rome.” *Gil Blas*（October 31，1891）.

Dubois，Philippe. “L’Affaire Ravachol-Koenigstein.” *L’Intransigeant*（April 8，1892）：1-2.

Durel，Pétrus. “Les Faux-Monnayeurs.” *La Nouvelle Revue* 19（November-December 1902）：410-17.

E. C.（pseud.）. “*Les Rimes de François Pétrarque*，traduction nouvelle par Francisque Reynard.” *Le Livre*（1883）：504.

Elfenbein，Andrew. “The Shady Side of the Sword：Bulwer-Lytton，Disraeli，and Byron’s Homosexuality.” In *Byron*，Edited by Jane Stabl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4.

Éluard，Paul. “L’Intelligence révolutionnaire du Marquis de Sade.” *Clarté* 6（February 1927）.

Étincelle（pseud. Vicomtesse de Peyronny）. “Carnet d’un mondain.” *Le Figaro*（April 29，1881）；（May 3，1881）；（June 25，1883）；（May 28，1885）；（June 5，1885）；（June 10，1885）；（June 5，1891）；and（November 22，1891）.

——. “Les Grandes Réceptions：Le Bal Blanc de la Princesse de Léon.” *Le Figaro*（April 11，1891）.

——. “Les Maréchales de la mode.” *Le Figaro*（September 1，1884）.

——. “Mondains et mondaines.” *Le Monde illustré*（January 10，1891）.

——. “Les Parisiennes au Léman.” *La Grande Dame* 1（1893）：5-7.

——. “Tableaux mondains.” *Le Figaro*（May 28，1884）.

Feather（pseud.）. “Les Adieux.” *L’Art et la Mode* 29（June 19，1886）.

Ferrari，M. “Au jour le jour.” *Le Figaro*（May 23，1895）：1.

——. “Le Monde et la ville.” *Le Figaro*（April 25，1899）：2.

Fidus（pseud. Arthur Meyer）. “Le Château de Frohsdorf.” *Le*

Gaulois（July 5，1883）：1.

——. “Le Jour de l’An à Göritz.” *Le Gaulois*（January 2，1881）：1-2.

Flament，Albert. “Je débute！” *Le Figaro*（May 13，1923）：1.

Fiers，Robert de. “Théâtre d’amour：Georges de Porto-Riche.” *La Presse*（July 13，1898）：4.

Fouquières，André de. “Une saison de printemps commence.” *La Semaine à Paris*（May 8，1936）：4.

Fourcaud（pseud.）. “*Carmen.” Le Gaulois*（December 12，1890）：1.

France，Alphonse. “Courrier des théâtres：Le Dîner de la Société des Auteurs Dramatiques.” *Le Figaro*（May 26，1905）：5.

Friedrichs，Otto. “Desinit in Piscem.” *La Légitimité* 19（May 16，1886）：289-93.

Frimousse（pseud.）. “La Soirée parisienne：article de toilettes.” *Le Gaulois*（December 11，1890）.

——. “La Soirée parisienne：*Le Cœur de Paris.” Le Gaulois*（May 22，1887）.

——. “La Soirée parisienne：la représentation de gala.” *Le Gaulois*（December 12，1890）.

Frivoline（pseud.）. “Art et chiffons.” *L’Art et la Mode* 29（June 20，

1885）.

Galérant，Germain. “Psychopathologie de Maupassant.” *Actes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Histoire de la Médecine*（February 2，1991）.

Ganderax，Louis. “Les Petits Souliers：conte de Noël.”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09（January 1，1892）.

Gant de Saxe（pseud. M. Ferrari）. “Mondanités：A l’hôtel de Sagan.” *Le Gaulois*（June 23，1891）.

——. “Mondanités：Bulletin.” *Le Gaulois*（May 5，1894）.

——. “Mondanités：Réceptions.” *Le Gaulois*（June 7，1891）；（February 2，1893）；（June 22，1893）；（August 30，1893）；and（January 20，1894）.

——. “Mondanités：Tout au papier.” *Le Gaulois*（March 2，1892）.

Gay，Robert Coleman，Jr. “Porto-Riche：Pathologist of Love.” *Texas Review* 6，no. 4（July 1921）：337-51.

Gérard，Marc. “Bonheur manqué.” *Le Gaulois*（July 14，1889）：2.

——. “Carnet de mariage.” *Le Gaulois*（September 27，1887）；（January 17，1889）；（January 24，1889）；and（July 26，1889）.

——. “Carnet mondain.” *Le Gaulois*（November 23，1880）；（May 9，1888）；（June 11，1889）；（May 28，1890）；and（June 7，1890）.

——. “La Journée du Grand-Duc.” *Le Gaulois*（April 25，1888）.

Gérault-Richard（pseud.）. “Le Scandale Greffulhe：Achat d’une circonscription.” *Le Briard*（March 13，1889）.

Gérôme，Le Père（pseud. A. Vernant）. “Greffulhe la Sabine.” *Le Briard*（November 4，1903）.

——. “Notes sur la Grande Propriété：Chez M. le Comte Greffulhe.” *Le Briard*（October 21，22，and 25，1892）.

Godin，Romaric. “Les Frères Pereire，le salut par le credit.” *La Tribune*（December 26，2011）.

Gopnik，Adam. “The Life of the Party.” Review of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A Portrait of Benjamin Disraeli*，by William Kuhn. *New Yorker*（July 3，2006）.

Goubaut，Christian. “Maupassant et le journalisme.” *Précis analytiqu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Belles-Lettres et Arts de Rouen*（February 6，1993）：187-208.

Goujon，Bertrand. “Un lignage aristocrtique d’envergure internationale dans l’Europe du ⅩⅨe siècle：La Maison d’Arenberg.”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88（2010）：497-518.

Gourdon de Genouillac（pseud.）. “Gazette Héraldique.” *L’Art et la mode* 20（April 15，1887）.

Gratin（pseud.）. “Femmes et fleurs.” *Le Gaulois*（August 30，1885）.

Le Greffier（pseud.）. “Carnet judiciaire.” *Gil Blas*（July 30，1892）.

Gregh，Fernand. “Hommage à Porto-Riche.”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September 13，1930）.

Guimard，René. “Les Borghèse.” *Gil Blas*（August 30，1891）：1-2.

Guiral，Pierre. “Anatole Prévost-Paradol.” In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 Edited by Henri Loyrette. Paris：Fayard，1996.

——. “Les Écrivains français et la notion de la décadence.” *Romantisme* 13，no. 32（1983）：9-22.

Guyot-Daubès. “Les Phoques savants.” *La Nature*：*Revu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aux arts* 647（October 24，1885）：321-23.

H. N. “Les Attentats à la dynamite.” *L’Intransigeant*（April 8，1892）：2.

Halévy，Jean-Pierre. “Ludovic Halévy par lui-même.” In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La Famille Halévy，1760-1960.* Edited by Henri Loyrette. Paris：Fayard，1996.

Haliou，Bruno. “Comment la syphilis emporta Maupassant.” *La Revue du practicien* 53（2003）：1386-89.

Harding，James S. “Art Notes from Paris.” *Art Amateur* 17，no. 2（July 1887）：31.

Heugel，Jacques. “Hortense Schneider.” *Le Ménestrel*（May 14，1920）：208.

Hubert，Eugène. “La Fête de l’Opéra.” *Gil Blas*（April 8，1883）：3-4.

Hy de Hem（pseud. Henri de Montaut）. “Le Bal de Mme la Princesse de Sagan.” *L’Art et la Mode* 28（June 13，1885）：6-7.

——. “La Fête villageoise de Mme la Princesse de Sagan.” *L’Art et la Mode* 30（June 21，1884）：8-9.

Irvine，William D. “French Royalists and Boulangis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5，no. 3（Spring 1988）：395-406.

Jean-Jacques（pseud.）. “Nouvelles.” *Gil Blas*（January 25，1895）.

Jung，Sir Salar. “An Indian Mayor of the Palace.” *Today* 1（July 1883）：342-52.

Junior，Jehu（pseud. Thomas Gibson Bowls）. “Statesman：Lord Lytton.” *Vanity Fair* 219（March 18，1876）：223.

Kindleberger，Charles P. “Origins of United States Direct Investment in France.”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105（March 1973）.

L. D. （pseud.）. “Le Charmant chroniqueur Robert Dreyfus.” *La Tribune juive Strasbourg-Paris* 28（1939）：433-34.

Lacambre，Geneviève. “De la maison au musée” and “Des œuvres pour le musée.” In *La Maison-musée de Gustave Moreau.* Edited by Marie-Cécile Forest. Paris：Somogy，2014，25-68.

Lambert，Louis. “Autour de la séance.” *Le Gaulois*（November 16，1889）：2.

Landauro，Inti. “Louvre to Restore da Vinci’s *John the Baptist.”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3，2016）.

Largillière（pseud，）. “La Société de Paris：La Duchesse de Talleyrand et Sagan.” *Gil Blas*（May 13，1903）.

Lauzun（pseud.）. “Chronique mondaine.” *L’Art et la Mode* 8（1883）；16（1883）；and 24（1883）.

Lavedan，Henri. “Paul Hervieu.” *Le Figaro*（September 26，1895）：1.

——. “Un raffiné：Georges de Porto-Riche.” *Le Journal*（May 16，1894）：1.

Lazarille（pseud. Fernand Bourgeat）. “Échos de partout.” *La Semaine littéraire* 7（September 30，1899）：464.

Lemaître，Jules. “*La Chance de Françoise* de Georges de Porto-Riche.” *La Revue illustrée*（January 1，1889）：1.

——. “Le Théâtre à Paris.” *Cosmopolis* 1（January 1896）：196-208.

Letorière，Vicomte Georges de（pseud.）. “Le Bal costumé de la Princesse de Sagan.” *Le Monde illustré*（June 19，1880）.

Magali（pseud.）. “Le Monde et la mode.” *La Vie élégante* 2（July 15，1882）.

Maizeroy，René. “Guy de Maupassant à Sartrouville.” *Le Gaulois*（July 3，1912）：1.

Marciat，Dr. “Le Marquis de Sade et le sadisme.” In *Vacher l’éventreur*

et les crimes sadiques. Edited by A. Lacassagne. Paris：Masson，1899，185-237.

Masck（pseud.）. “En redingote noire.” *Le Gaulois*（May 24，1884）.

Le Masque de Fer（pseud. Émile Blavet）. “Échos de Paris.” *Le Figaro*（March 29，1884）；（September 1，1884）；（September 26，1884）；（November 29，1884）；（May 23，1887）；（September 27，1887）；（January 30，1891）；（November 22，1891）；（May 30，1894）；and（December 12，1897）.

Massard，Émile. “Jeanne Weiss.” *La Presse*（May 30，1891）：1.

Massolleau，Louis. “Henri Meilhac.” *Le Rappel*（July 9，1897）.

McCallum，Stephanie. “Alkan：Enigma or Schizophrenia？” *Alkan Society Bulletin* 75（April 2007）：2-10.

Meyer，Henri. “Les Funérailles de Lord Lytton.” *Le Journal illustré*（December 13，1891）.

Monselet，Charles. “Théâtres.” *Le Monde illustré*（July 5，1873）：11.

Un Monsieur de l’Orchestre（pseud. Émile Blavet）. “La Soirée théâtrale.” *Le Figaro*（December 12，1890）：2；and（April 26，1891）：2.

Montesquiou-Fezensac，Comte Robert de. “Japonais d’Europe.” *Le Gaulois*（March 9，1897）.

Montferrier，H. G. “Étranger：Le Prince de Saxe-Cobourg en Bulgarie.” *Le Journal des débats*（September 21，1887）.

Montjoye（pseud.）. “Chronique mondaine.” *L’Art et la Mode* 20（April 12，1884）；22（April 26，1884）；27（May 30，1884）；28（June 7，1884）；42（September 13，1884）；43（September 20，1884）；48（October 25，1884）；23（May 9，1885）；25（May 23，1885）；27（June 6，1885）；28（June 13，1885）；30（June 27，1885）；25（May 22，1886）；28（June 13，1886）；8（January 7，1887）；22（April 29，1887）；8（January 20，1888）；29（June 15，1888）；and 8（June 26，1889）.

de Mun，Comte Albert. “Les Dernières Heures du drapeau blanc.” *La Revue hebdomadaire* 46（November 13，1909）：141-63.

Nekludoff，A. “Auprès de Ferdinand de Bulgarie.”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54（November-December 1919）：547-76.

Nicault，Catherine. “Comment‘en être’？Les Juifs et la haute société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ⅩⅨe siècle.” *Archives juives：revue d’histoire des Juifs de France* 42（2009）：8-32.

Notre envoyé spécial（pseud.）. “L’Empoisonneuse d’Aïn-Fezza.” *Le Petit Parisien*（May 31，1891）：1-2.

Our Own Reporter（pseud.）. “A Visit to Wappingers Falls.” *Poughkeepsie Eagle*（June 12，1891）：1.

The Paris Galignani’s Messenger（pseud.）. “The Fate of the Hôtel de Chimay.” *New York Times*（July 4，1884）.

Parisis（pseud. Émile Blavet）. “L’Hôtel de Chimay.” *Le Figaro*（June 14，1884）.

——. “La Vie parisienne：chez Arsène Houssaye.” *Le Figaro*（March 29，1884）.

——. “La Vie parisienne：la chasse à courre.” *Le Figaro*（September 26，1884）.

——. “La Vie parisienne：le bal Sagan.” *Le Figaro*（June 5，1885）.

——. “La Vie parisienne：le matin au Bois.” *Le Figaro*（October 29，1884）.

Pas Perdus（pseud.）. “La Chambre.” *Le Figaro*（December 24，1889）.

Le Passant（pseud. Ernst d’Hervilly）. “Les On-Dit.” *Le Rappel*（June 11，1884）；and（July 9，1897）.

Paulhan，Claire. “*La Revue blanche*：Tout l’esprit d’une époque.” *Le Monde*：*le Monde des livres*（December 6，2007）.

Pharaon，Florian（pseud.）. “La Vie en plein air.” *Le Figaro*（June 18，1884）.

Ponchon，Raoul. “Gazette rimée：le mot‘chic.’” *Le Journal*（April 16，1902）.

Pringué，Gabriel-Louis. “La Haute Société de la Belle Époque.” *Le Crapouillot*：*La Belle Époque* 29（1955）：2-7.

Prudent，Louis（pseud.）. “A la rue de Sèze：fête de charité.” *Le Gaulois*（May 1，1885）.

——. “Ouverture de l’Exposition Canine.” *Le Gaulois*（May 29，1884）.

Régamey，Félix de. “La Guerre de demain.” *Le Figaro-graphic*（January 25，1892）.

Reinhardt，Rol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a European Media Event.” *EGO：European History Online*（August 27，2012）.

Renneville，Vicomtesse de. “Chronique de l’élégance.” *La Nouvelle Revue* 28（May-June 1884）；and 34（May-June 1885）.

Rochefort，Henri. “Les Policiers possibilistes.” *L’Intransigeant*（August 8，1892）：1.

Rod，Édouard. “L’Esprit littéraire.” *Cosmopolis* 2（February 1896）：455-56.

Rodays，Fernand de. “Gazette des Tribunaux.” *Le Figaro*（March 12，1877）：2；and（December 29，1877）：2.

Roma，A. I. “La Question juive.” *La Bastille：journal anti-maçonnique* 530（March 21，1914）：5-6.

Royer-Saint-Micaud，Vicomte André de. “Avons-nous une noblesse française？” *La Revue des revues*（October 1898）：1-20.

De la Rue（pseud.）. “Quelques profils de chasseurs：Le Comte Greffulhe.” *Le Figaro：supplément littéraire du dimanche*（September 5，

1880）：2.

Sadinet，Abbé（pseud.）. “Le Bal des bêtes.” *La Vie moderne* 24（June 13，1885）：392-93.

Saint-Cère，Jacques（pseud. Armand Rosenthal）. “Une heure chez le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 *La Revue illustrée*（June 15，1894）：117-24.

——. “Les Nouveaux élus.” *Le Figaro*（September 13，1893）.

Saint-Pierre，B. de（pseud.）. “Soirée mondaine.” *Gil Blas*（June 12，1893）.

Saint-Réal（pseud.）. “La détente mondaine.” *Le Gaulois*（April 6，1892）.

——. “La mort de Lord Lytton.” *Le Gaulois*（November 25，1891）.

Santillane（pseud.）. “Courrier de Paris.” *Gil Blas*（November 24，1883）.

Sarah-Bernhardt，Lysiane（pseud.）. “Les Courses.” In *Le Protocole mondain.* Edited by André de Fouquières. Paris：Levallois，n. d.

Scott（pseud.）. “Les Obsèques de Lord Lytton.” *Le Monde illustré*（December 5，1891）.

Scrutator（pseud.）. “Dîners à la Russe.” *Truth*（July 31，1879）.

——. “Notes from Paris：Intermarriage and Degeneracy.” *Truth*（August 14，1902）.

Smith，Paul. “Théâtre du Grand Opéra：*Le Juif-Errant.*”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 17（April 25，1852）：137-40.

Stead，Évanghélia. “A Flurry of Images and Its Unfurling through *La Revue illustrée.*” *Studi de Memofonte* 13（2014）：3-28.

Straus，Émile. “Golo s’amuse（Conte chagrin）.” *Le Nouvel Écho* 29（June 15，1892）：356-60.

——. “Le Petit Pierrot（Conte chagrin）.” *Le Nouvel Écho* 8（April 15，1892）：230-33.

——. “Villa à vendre（Conte chagrin）.” *Le Nouvel Écho* 10（May 15，1892）：295-304.

Surmay，A. “Exposition de peinture：Salon de 1878.” *Musée des familles*：*lectures du soir* 45（September 1878）：258.

Suzuki，Junji. “Le jardinier japonais de Robert de Montesquiou：ses évocations dans les milieux littéraires.” *Cahiers Edmond et Jules de Concourt* 118（2011）：103-12.

Tom（pseud.）. “La Grande Villégiature.” *L’Illustration* 92（July 21，1888）.

Tout-Paris（pseud.）.* “A l’épatant.” *Le Gaulois*（June 15，1889）.

——. “Feuilles d’hiver.” *Le Gaulois*（November 16，1890）.

——. “Le Monde et la ville. *Le Gaulois*（June 13，1885）.

——. “Pour les enfants délaissés.” *Le Gaulois*（March 17，1889）.

de Traz，Robert. “Chroniques.” *La Revue hebdomadaire* 2，no. 7（February 12，1938）.

Trégastels，Comtesse de（pseud.）. “Chronique de la vie mondaine.” *La Diplomatie* 1（May 5，1897）：17-19.

de V.，A.（pseud.）. “Mœurs contemporaines：la société à Paris.” *La Revue britannique*（1886）：67-92.

de V ...（pseud.）. “Nos grandes mondaines：la Princesse de Sagan.” *La Revue mondaine illustrée*（February 10，1893）.

Vassili，Comte Paul（pseud. Juliette Adam）. “La Société étrangère à Paris.” *La Nouvelle Revue* 70（May-June 1891）.

de Vaux，Baron. “Concours hippique.” *Gil Blas*（April 13，1885）.

Vérissey，Comtesse de. “Chronique mondaine.” *La Mode de style*（June 3，1891）and（July 1，1891）.

A Veteran Diplomat（pseud.）. “The Passing of Talleyrand，*le Roi du Chic*：A Chapter in the Fall of Past Grandeur.”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1910）.

Veuillot，Eugène. “La Mort du Comte de Chambord.” *L’Univers* 25（August 1883）.

Vicomte Rolph（pseud.）. “Échos du High-Life.” *Le Triboulet*（February 9，1879）.

——. “Échos du High-Life.” *Le Triboulet*（February 16，1879）.

——. “Échos du High-Life.” *Le Triboulet*（August 17，1879）.

Victor-Meunier，Lucien. “A la Chambre.” *Le Rappel*（December 25，1889）.

Violetta（pseud. Comtesse Alice de Laincel）. “Sous le masque.” *Le Gaulois*（April 5，1882）；（May 27，1882）；and（June 6，1882）.

Vogüé，Vicomte Eugène-Melchior de. “L’histoire à Versailles.”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6（1901）：193-209.

W.（pseud.）. “Mondanités.” *Le Gaulois*（June 27，1891）.

Wailly，Georges de. “La Vénérie moderne.” *La Nouvelle Revue* 80（January-February 1893）.

X.（pseud.）. “Choses et autres.” *La Vie parisienne*（February 5，1870）；（November 13，1875）；and（June 7，1890）.

Xau，Bernard. “Derniers Échos de Göritz，” *Gil Blas*（September 9，1883）.

Yon，Jean-Claude. “Le Théâtre de Meilhac et Halévy：satire et indulgence.” In *Entre le théâtre et l’histoire.* Edited by Henri Loyrette. Paris：Fayard，1996.

Zola，Émile. “Types de femmes en France.” *Le Messager de l’Europe*（June 1878）.

2.Unattributed Articles

“Les Abus de la Grande Propriété.” *Le Briard*（January 23，1897）：

1-2.

“Appel pour la fondatio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Juives.” *La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1880）：161-62.

“Au Village.” *Le Gaulois*（June 11，1884）.

“Avis mondains.” *Le Figaro*（April 8，1883）；（April 25，1883）；（May 23，1883）；（August 19，1884）；and（November 19，1888）.

“Bankrupts.” *Solicitor’s Journal & Reporter*（March 14，1857）：281.

“Bloc-notes parisien.” *Le Gaulois*（May 20，1884）；（May 26，1884）；（June 11，1884）；and（June 14，1885）.

“Les Borghèse，” *Le Gaulois*（January 28，1880）.

“Ça manque de pigeons！” *La Lanterne*（August 3，1878）：1.

“À la Chambre：clôture de la session.” *La Lanterne*（December 25，1889）.

“Chambre des Députés：la séance.” *Le Temps*（December 25，1889）.

“Chez Greffulhe et cie.” *Le Briard* 75（September 30，1908）.

“Chronique électorale：conscience et liberté.” *La Croix*（August 11，1893）.

“Chronique électorale：dans les departments—Melun.” *Le Rappel*（August 12，1893）.

“Count Albert de Mun.” *Public Opinion* 48（November 13，1885）.

“Dans les départements.” *Le Rappel*（August 12，1893）.

“Deuil：le Comte Robert de Fitz-James.” *Le Figaro*（September 26，1900）.

“Les Distractions de Mme Bizet.” *Le Temps*（June 10，1885）.

“Échos de l’étranger.” *Le Gaulois*（August 29，1887）；and（May 20，1885）.

“L’Election Greffulhe：discours de M. Camille Pelletan.” *La Justice*（December 25，1889）：1-3.

“L’Expédition Borghèse.” *L’Exploration.* 17（1884）：228-29.

“L’Exposition de Marie Antoinette et son temps.” *La Chronique des arts et de la curiosité*（April 14，1894）：117-18.

“Fin de session.” *Le Petit Journal*（December 25，1889）.

“Franc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or the Year 1887.*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8，303-55.

“French Topics of the Day：Two Charitable Fêtes.” *New York Times*（May 2，1885）.

“Les Funérailles de Lord Lytton.” *Le Petit Express*（November 29，1891）.

“G. Aberigh-Mackay’s *Twenty-One Days in India.”* In *Essays on Anglo-Ind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Sujit Bose. New Delhi：Northern Book Center，2004.

“Gazette des Tribunaux.” *Le Figaro*（January 14，1900）：3.

“Geographical Notes：Italian Explorers in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September 1880）：317-18.

“Gossip of the French Capital.” *New York Dramatic Mirror*（May 2，1896）：18.

“Greffulhe-Bischoffsheim.” *La Lanterne*（January 24，1890）：1.

“Historic Residences of Paris Now Occupied by Antiquaries.” *New York Herald*（January 2，1910）：11.

“Hommes et choses.” *Le Matin*（July 10，1884）：3；and（July 16，1893）：2.

“Informations.”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8，no. 72（March 14，1886）：1235.

“Le Jockey-Club à l’armée.” *Le Figaro*（October 25，1870）：2.

“La Journée parisienne.” *Le Gaulois*（January 21，1880）：2.

“The Late Lord Lytton an Opium-Smoker.” *Friend of China* 16，no. 4（October 1896）：109.

“A Leader of French Fashion.” *Searchlight* 25（January 21，1905）：27-28.

“Le Livre d’or du *Figaro.*” *Le Figaro*（December 26，1877）：2.

“Madame de [*sic*] Récamier.” Edited by Oscar Wilde. *A Woman’s World* 2（November 1889）：349-52.

“Maître Émile Straus.” *Le Gaulois*（June 22，1889）：2-3.

“Le Mariage d’Étincelle.” *La Revue des grands procès contemporains* 14（1896）：266-348.

“Married to a Marquis.” *New York Times*（March 3，1891）.

“Marx et al. v. Strauss [*sic*] et al.” *Southern Reporter* 9（April 1891）：818-20.

“Meetings for Proof of Debts.” *Solicitor’s Journal & Reporter*（December 25，1858）：139.

“Mœurs électorales：l’incident Breton-Greffulhe.” *Le Rappel*（March 13，1898）：1-2.

“Mondanités.” *Le Petit Parisien*（September 27，1887）：1.

“Musical Notes.” *Monthly Musical Review* 20（May 1，1890）：116-17.

“Nos dépêches.” *L’Aurore*（November 9，1897）.

“Nouvelles.” *Gil Blas*（July 17，1892）.

“Nouvelles et faits：Seine-et-Marne.” *Le Journal du Loiret*（November 24，1891）.

“Obituary：The Earl of Lytton.” *Annual Register and Review of Public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November 1891）：197-98.

“Opportuno-Réactionnaires.” *La Lanterne*（December 28，1889）：1.

“Owen Meredith.” *Illustrated American*（December 12，1891）：162-65.

“Paul Bourget in New York.” *Pittsburgh Press*（August 21，1893）：2.

“Pers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Herald*（March 28，1887）.

“Personalities in Comedies.” *New York Times*（May 3，1896）.

“Personals.” *Daily Alta California*（June 13，1887）.

“Petites nouvelles.” *La Croix*（August 30，1887）.

“Prince de Sagan Suffering from Brain Trouble.” *New York Times*（May 26，1897）.

“Propos de coulisses.” *Gil Blas*（October 21，1891）.

“Queer Prince de Sagan.” *New York Times*（November 3，1897）.

“Report from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Rom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December 1881）：111-12.

“Rothschild Buys a Raphael.” *Chicago Tribune*（October 4，1891）.

“Royalty on Half-Pay.” *Switchmen’s Journal* 7，no. 8（December 1892）：597-99.

“La Salle des samedis à l’Opéra-Comique.” *Le Figaro*（December 3，1885）：3.

“Le Salon des Beaux-Arts de 1878.” *Gazette des Beaux-Arts*（July 1878）.

“Séance du 23 décembre 1889.” In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5e Législature.（Paris：November-December 1889），649-66.

“La Société Étrangère à Paris：la maison de Caraman-Chimay.” *La Nouvelle Revue*（May-June 1891）：692-94.

“Société Médico-Psychologique：le cas du Baron Seillière.” *La Petite République française*（June 30，1887）.

“Society.” *Lady’s Realm* 14（May-October，1903）：675-78.

“Le Suicide de Mme Weiss.” *L’Avenir de Bel-Abbès*（June 3，1891）：1-2.

“Suite de la vérification des pouvoirs：l’élection du Comte Greffulhe dans l’arrondissement de Melun（Seine-et-Marne）.” *L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December 23，1889）：520-28.

“Télégrammes et correspondances：Autriche-Hongri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February 16，1896）.

“Things in Paris.” *Vanity Fair* 25（March 26，1881）.

Le Tour du monde：*nouveau journal des voyages* 40-41（1881）.

“La Traversée de l’Afriqu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e Géographie* 7（1885）.

“La Vente de la collection Émile Strauss [*sic*].” *Le Petit Parisien*（June 5，1929）：2.

C·Selected Reference Works

1.*Mondain* Paris

Annuaire international des cercles et du sport. Paris：Hinrichsen，1884.

Briat，Pierre de. *Les Grands Cercles de Paris.* Paris：n. p.，1933.

Le Carnet mondain. Paris：Carnet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1901-1905.

Kerviler，René Pocard de Cosquer de，Sir Humphrey Davy，and Louis-Marie Chauffier，eds. *Répertoire général de bio-bibliographie bretonne.* Vol. 9. Rennes：Plihon & Hervé，1897.

Saint-Martin，A. de，ed. *Paris mondain*：*annuaire du grand monde et de la colonie étrangère.* Paris：n. p.，1894.

Septfontaines（pseud. Comte Ducos）. *L’Année mondaine 1889.* Paris：Firmin-Didot，1889.

Tout-Paris：*Annuaire de la société parisienne—noms et adresses，dictionnaire des pseudonymes.* Paris：A. La Fare，1893.

Tully，Baron de. *Annuaire des grands cercles de Paris：Cercle de l’Union，Jockey-Club，Cercle Agricole，Cercle de la rue Royale，Cercle des Chemins de fer，Cercle de l’Union Artistique，Sporting-Club.* Paris：A. Lahure，1897-1930.

Yriarte，Charles. *Les Cercles de Paris：1828-1864.* Paris：Dupray de la Mahérie，1864.

2.Royal and Noble Genealogy[1]

Almanach de Gotha：Annuaire généalogique，diplomatique et statistique

Annuaire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Annuaire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et des maisons souveraines de l’Europe

Annuaire de la pairie et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et des maisons souveraines de l’Europe

Annuaire général héraldique

Armorial général，ou registres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Armorial universel，précédé d’un traité complet de la science du blason

Bulletin héraldique de France，ou revue historique de la noblesse

Dictionnaire des familles françaises，anciennes ou notables

Dictionnaire des figures héraldiques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noblesse de France

La France héraldique

Légendair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devises，cris de guerre

Nobiliaire universel，ou recueil général des généalogies

3.Other Reference Works

Annuaire de la Société 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 Volume 2. Paris：Commission des Auteurs et Compositeurs Dramatiques，1885.

Annuaire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Juives. Vol. 3. Paris：A. Durlacher，1884.

Annuaire des artistes，2nd ed. Paris：E. Risacher，1903.

Dictionnaire français：argot. Edited by Aristide Bruant. Paris：Flammarion，1905.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Vol. 70. Rome：Treccani，2008.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6. London and Edinburgh：Charles and Adam Black，1902.

Galignani's New Paris Guide. London：Simpkin，Marshall & Co.，1863.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on the Riviera. London：John Murray，

1896.

List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avec la date de leur admission. Paris：Hôtel de la Société，1885.

Manuel de politesse à l'usage de la jeunesse：savoir-vivre，savoir-parler，savoir-écrire. 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1922.

Les Pseudonymes du jour. Edited by Charles Joliet. Paris：E. Dentu，1884.

Staats-und Adress-Handbuch der Freien Stadt Frankfurt. Vol. 114. Frankfurt：G.-F. Krugs Verlag，1852.

Sténographie Duployé，ou l'art de suivre avec l'écriture la parole la plus rapide. 25th ed. Paris：Duployé，1907.

4.Catalogues

A.AUCTION CATALOGUES

The Belle Époque：Fashionable Life in Paris，London，and New York 1870-1914. New York：Stair Galleries，November 10-December 4，1981.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S. E. Don Paolo Borghèse，Prince de Sulmona. Rome：Unione Cooperative Editrice，1892.

Catalogue des objets d'art et d'ameublement du palais du Prince Borghèse à Rome. Rome：Palazzo Borghese，March 28-April 9，1892.

Catalogue on a Selected Portion of the Renowned Collection of Pictures and Drawings Formed by the Comte Greffulhe. London：Sotheby's，June

22，1937.

Collection de livres anciens et modernes provenant de la famille Greffulhe. Monte Carlo：Sotheby's/Sporting d'Hiver，February 10，1982.

Collection Émile Straus：*Tableaux modernes*，*aquarelles*，*pastels*，*dessins*，*sculptures*，*tableaux anciens*，*terre cuites*，*meubles et sièges anciens*，*tapisseries Aubusson.* Paris：Galerie Georges Petit，June 1-2，1929.

Collection Greffulhe：*Tableaux anciens*，*mobilier*，*objets d'art*，*tapisseries.* Paris：Drouot，March 6，2000.

Manuscrits et autographes. Paris：Ader，June 27，2013.

Manuscrits，*photographies*，*livres anciens et modernes.* Paris：Tajan/Drouot，June 11，2014.

Précieux livres anciens à figures；*Neuf lettres inédites de Marcel Proust à la Comtesse Greffulhe.* Paris：Drouot，November 8，1991.

A Selected Portion of the Renowned Collection of Pictures and Drawings Formed by the Comte Greffulhe. London：Sotheby's，July 22，1937.

Souvenirs historiques：*Archives et collections de la Princesse Marie d'Orléans.* Edited by Olivier Coutau-Bégarie. Paris：Drouot，April 26-28，2014.

B.EXHIBITION CATALOGUES AND CATALOGUES RAISONNÉS

L'Art de notre temps：*Gustave Moreau.* Edited by Jean Laran. Paris：

Librairie Centrale des Beaux-Arts，1914.

La Belle Époque. Preface by Philippe Julian with illustrations selected by Diana Vreeland. 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82.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de Marie Antoinette et son temps. Preface by Germain Bapst. Paris：Galerie Sedelmeyer，1894.

Catalogue des tableaux par Gustave Jacquet. Preface by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Fezensac. Paris：Galerie Georges-Petit，1909.

Chantilly：*Le Cabinet des livres.* Paris：Plon，1900.

Chantilly：*Visite de l'Institut de France.* Paris：Plon，1896.

Degas：*A Strange New Beaut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di Hauptman. New York：MoMA，2016.

Edgar Degas，*Photographer.* Edited by Malcolm R. Daniel. 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8.

Exposition des arts de la femme：*Guide-livret illustré.* Paris：Warmont，1892.

Exposition Gustave Moreau. Preface by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Fezensac. Paris：Galerie Georges-Petit，1906.

Jewish Women and Their Salons：*The Power of Conversation.* Edited by Emily D. Bilsky and Emily Braun. New York：The Jewish Museum，2005.

The Louvre：*All the Paintings.* Edited by Pomar de Vincent. London：

Black Dog & Leventhal，2011.

Les Lys et la République：*Henri，Comte de Chambord*（*1820-1883*）. Edited by Luc Forlivesi. Paris：Somogy，2013.

La Maison-musée de Gustave Moreau. Edited *by* Marie-Cécile Forest. Paris：Somogy，2014.

La Mode retrouvée：*les robes-trésors de la Comtesse Greffulhe.* Edited by Olivier Saillard and Valerie Steele. Paris：Paris Museés，2015.

Robert de Montesquiou，ou l'art de paraître. Edited by Philippe Thiébaut. Paris：Éditions de la RMN，1999.

Portraits by Ingres：*Images of an Epoch.* Edited by Gary Tinterow and Philip Conisbee. 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Harry N. Abrams，1999.

Whistler and Montesquiou：*The Butterfly and the Bat.* Edited by Edward Munhall. New York and Paris：The Frick Collection and Flammarion，1995.

D·Selected Periodicals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Débats parlementaires*

L'Art et la mode

L'Aurore

Le Banquet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

The Bookman

Le Briard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Nationale de Franc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griculteurs de Franc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e Géographi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Anvers de Géographie

Bulletin des Séanc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Agriculture

Bulletin du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Bulletin héraldique de France，ou revue hebdomadaire

Cosmopolis

Le Crapouillot

La Croix

Daily Alta California

L'Express du Midi

Le Figaro

Le Figaro-Modes

Le Gaulois

La Gazette de France

La Gazette des Beaux-Arts

La Gazette des femmes

La Gazette des tribunaux

Gil Blas

La Grande Dame

L'Illustration

L'Intransigeant

Le Journal

Le Journal de l'agriculture

Le Journal des débats

Le Journal illustré

L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La Légitimité：*Organe de la survivance du roi-martyr*

La Libre Parole

Le Livre

Le Lundi

Le Matin

Le Ménestrel

Le Mensuel

Le Messager de l'Europe

Il Messaggero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a Mode de style

Le Monde illustré

Le Monde moderne

Musical Standard

The Nation

National Review

New York Herald

New York Times

Le Nouvel Écho

La Nouvelle Revue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La Patrie

Le Pays

Le Pèlerin

Le Petit Journal

Le Petit Parisien

La Petite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a Presse

Le Progrès agricole et viticole

La Quinzaine：revue littéraire，artistique et scientifique

Le Radical

Le Rappel

Le Recueil général des lois et des arrêts

La Revue blanche

La Revue de l'agriculture et de la viticulture

La Revue de Paris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La Revue des revues

La Revue de viticulture

La 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 de Paris

La Revue illustrée

La Revue lilas

La Revue mondiale

La Revue verte

Le Rire

Le Sans-Culotte

Searchlight

The Standard

Le Temps

Le Triboulet

Truth

L'Union

L'Univers

Vanity Fair

La Vie élégante

La Vie moderne

La Vie parisienne

Woman's World

Le XIXe *siècle*

---

[1] *No publication dates are given for these works as they were regularly updated.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英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斜体页码表示插图）

Abbéma，Louise，225

Abduction of Proserpina，The（Girardon），*550*

“Absence”（Meredith/Lytton），489

Académie des Beaux-Arts，127，*129*

Académie Française，37，127，181，248，271，276，281，426，*427*，515，553，554

Ache，Caran d’，271

Adam，Juliette，40，174

adultery，87

Against the Grain（Huysmann），222

Agrippina，Empress，556

Aix，464，470

Ajaccio，450

Albaret，Céleste，10，12，15，531，552

Albert Edward “Bertie，” Prince of Wales，33

Albert Ⅰ，Prince of Monaco，*432*，444，455，482

Alembert，Jean Le Rond d’，78

“A l’entresol”（Meredith/Lytton），457

Alexander Ⅱ，tsar of Russia，55，152，538

Alexander Ⅲ，tsar of Russia，55，196，257，258，539*n*

Alexandra，Princess “Alix，” 33

Alexandria，471

Algeria，433，435

Alkan，Charles-Valentin，145，147-8

allée des Acacias，167，*167*，199

Almanach de Gotha，3，441，544

Alphonse，Baron，34

Alsace，140，445*n*

Amadeo Ⅰ，King of Spain，181*n*

Amelia，Queen of Portugal，237

Angoulême，Duc d’，109

Angoulême，Duchesse d’，103，109，183*n*

Annenkoff，General，434，*435*

Annunzio，Gabriele d’，220

anticlericalism，179

Antigny，Blanche d’，173

anti-Semitism，18，41，43-4，180，194，284-6，446-7，453，537-8，*538*，542

Antoine，André，120

Anvers，Lulia Cahen d’，281，432，442，470，471

Apollinaire，Guillaume，89，189

Argentina，551

“Aria”（Montesquiou），568

aristocracy

adultery in，87

anti-Semitism of，41

art collecting by，35

calculated humiliations by，38

class-based protocols in，38

decline of，5-6

family connections in，87

importance of appearances to，87-9

inherited，land-based wealth of，29

marriage for money in，30-1

relative poverty of，30-1，87

sense of superiority of，27-30

social obligations in，166-7

as status symbol，5

tradition of royal service in，92

undercurrent of malice in，26

Armand，Duc de Guiche，13

Arnaud，Claude，523

Arrangement in Black and Gold（Whistler），224

Assunta（maid），63-4，79，216

At the Milliner（Degas），*122*

Aumale，Henri d’Orléans，Duc d’，67，248-50，*249*，253，262，

Austria，463*n*

Auteuil，169，252

Avignon，84，*86*，523

Bac，Ferdinand，219

Bagatelle，214，*214*

Bagnères-de-Luchon，464，*464*，465，481，483

Baignères，Madame，436

bal des bêtes（ball of the beasts），21-8，*24*，35-6，39-44，213*n*

bal de têtes（death-masks'ball），10

Balfour，Betty，Lady，455，456，457-8，486-7，489，498，499，502

Ballanche，Pierre-Simon，473

ballet de cour，27，*28*

ballet des abeilles，39-41，*39*，41-2

Balzac，Honoré de，415

Banque de France，87

Banquet，The，443，445，474，520，527，529，530，543，562

Barrès，Maurice，281，542，549

Barry，Mme du，543

Barthes，Roland，15

Basin，Duc de Guermantes，11

Bastille，78，93，180

Bats，The：*Chiaroscuro*（Montesquiou），224，550，553，560

Baudelaire，Charles，89，219，525，547

Bayreuth，Germany，492，*493*，499，500，505，508，509，562

Bayreuth Festival Theater，499

Beaumont，Comte de，40

Beauregard，Costa de，*180*，503

Bel-Ami（Maupassant），273，429，432，435-6

Bel-Ami（yacht），455，468

Belle Époque，27

Benda，Julien，133

Bennett，James Gordon，484，531

Berlioz，Hector，136，237

Bernhardt，Sarah，73，225-6，*226*，243，269，462，485，548，568，*569*

Bernini，*115*

Berry，Duc de，106，183*n*

Berry，Duchesse de，106，183*n*

Bibesco，Marthe，Princesse，12，30，92，94，98，171，172，178，268，545

Bichonne，167，*167*，199，218

Big Moustache，66

Billy，Robert de，415，523

Bisaccia，Duchesse de，24-5

Bischoff，Chantal，132-3

Bismarck，Otto von，157

Bizet，Adolphe，134

Bizet，Geneviève Halévy，*see* Straus，Geneviève Halévy Bizet（Bébé）

Bizet，Georges，17，37，77-8，117，124，*135*，136-7，138，139-40，141，144，145，146，148，149，153，276，281，423-4，456，483，484，*485*，509

illness and death of，151

National Guard service of，137，139

secret engagement of，133-4

wife’s affair and，149

Bizet，Jacques-Fromental，12，13，121，141-2，143，145，151，153-4，*154*，440，491，525，527

Blanche，Émile，129-30，*130*，131，132，134，460*n*，468，469，471

Blanche，Jacques-Émile（Jacques），120，131，143，231，281，415，419，421，440，449，503，519，544，551

Bloody Week，140

“bluestocking，”55

Bocher，Emmanuel，491

Bois-Boudran，65-74，*67*，*68*，79，80-1，83，210，213，502，503-4，*504*，505，506，510，512，515，530

Bois de Boulogne，167，*167*，169，181，200，214，*214*，267-8，488，552

Bonaparte，Lucien，496

Bonaparte family，450

Bonheur，Rosa，194

Bonn，University of，463*n*，499

Book of Amber，*The*（Greffulhe），480

Bordeaux，36

Borghese，Giovanni Battista，255-66，*257*，458，488，489，491，492，*493*，497，505，508-10，517，546，550，551，562，563

Borghese，Marcantonio Ⅴ，Prince，256

Borghese Expedition，258-9

Borghese family，256，508，509，551

Borrel，Anne，153

Botton，Alain de，446

Boucher，François，234，418

Boudin，Eugène，418

Bougival，145，149

Boulanger，General，503，534

Boulanger-Cavé，Albert，136

Bourbon family，53

Bourbon palace，547

Bourbon Restoration，51-2

Bourbons，90

bourgeoisie，27

Bourget，Paul，34，143，144，281，421，423，456，460，467，525

Bourgogne，Duchesse de，208-9，*210*

bourrée，184

bout de table（“below the salt”），38-9

Bouvard and Pécuchet（Flaubert），452

Brabant，Marie de，185

Brancovan，Princesse，471

Bretagne，190，*190*

Breteuil，Constance de，70-1，73，76，192-4，200

Breteuil，Henri Le Tonnelier，Marquis de，40，53-6，57，179-80，197，244，274，459，460，485-6，488，503，513，531

Breteuil，Marcellita Garner de，485-6

British Embassy，460，463，481

Broissia，Comtesse de，*279*，435，*435*

Browning，Robert，457

Bruant，Aristide，271-2，536

Buffon，Comte de，21，25，101

Buffon，Georges Comte de，78

Bulgaria，488

Bulwer-Lytton，Constance，488，499

Bulwer-Lytton，Edith，482，486，488，498，499，500，502，508

Bulwer-Lytton，Edward，457

Bulwer-Lytton，Emily，498，502

Bunyan，John，487，489

Busnach，Willie，143，*277*

bustles，200

Cabannes，domaine de，87，198

Calmette，Gaston，240

Cambronne，General Pierre，177

Camille，Baronne Marochetti，86

Canal du Midi，48

Canavaggia，Jeanne，543

Cannes，196，455，471，533

Capet，Hugues，194

Capote，Truman，495

Caraman-Chimay，Alexandre de（Mousse），49

Caraman-Chimay，Geneviève de（Minet），49，61，509

Caraman-Chimay，Ghislaine de（Guigui），47*n*，49，62，216，246，254，488，489，491，492，508，509

Caraman-Chimay，Joseph de（son），46，48，49，52，509

Caraman-Chimay，Marie-Alys de“Alys，”51，65，216，509

Caraman-Chimay，Pierre de（Toto），49

Caraman-Chimay，Prince Eugenè de Riquet de，51

Caraman-Chimay，Prince Joseph de Riquet de，46-9，50，53，55，58，219，512

Caraman-Chimay，Princesse Marie de（Mimi），46-9，50-1，52，64，81，219，246，488

Carmen（Bizet；1875），37，117，124，142，145，149-50，*150*，151，152-3，423，424，455，456，483-4，509

Carmen（Mérimée），141，215

Carmier，Marie-Élise，191-2

Carnaval，533

Carnot，Marie-François Sadi，533，538，542，543

carte de visite（calling card），166-7

Carvalho，Léon，141

Castelbajac，Constance de，55

Castellane，Comte Boniface de（Boni），38，199，283，286-7，512

Castellane，Jean，Comtesse de（Dolly），199-200

Castiglione，Comtesse，555

Castille，Blanche de，92，523

Catherine the Great，544

Catholicism，92，174，*432*，445，512，513

celebrity，6

celebrity trading cards，211

censorship laws，173

Central America，534

Cercle de la rue Royale（Tissot），*35*

Cercle de l’Union Artistique，13，22，52，175，260

Chamber of Deputies，179，536，540

Chambord，Comtesse de，105，108，109，110-11，161-2，*162*，428

Chambord，Henri d’Artois，Comte de，53，92，94，98，102，103，104-5，*105*，106-16，120，163，174，182-3，203，248，447，514，523

attempted coup by，105-6

death of，159-62，*160*

sexual apathy of，109

Champs-Élysées，530

Chanel，Coco，192，201

Chantilly，66-7，248-50，*250*

Chaplin，Charles，58，171

Characters（La Bruyère），527

Charcot，Jean-Martin，121，219

Charenton，89，128

charity bazaar，170-1

Charlemagne，194

Charles Ⅹ，King of France，53，84，106，160，180，181*n*，183*n*

Charlus，Baron de，11

Chartres，Robert，Duc de，218

Chateaubriand，René de，496

château de Chimay，48

château de Condé，83-4，*85*

château de Pregny，471

château de Saint-Thomas，96，107，163

Châtelet，Émilie du，179

Chat-Noir，270-1，*271*，470

Chavannes，Pierre Puvis de，136

Chevigné，Adhéaume，Comte de，83，92-3，94，97-8，*101*，105-6，107，108，109，120，161，165，169，174，187-92，198，462，484，522

admirable qualities of，99

ambition lacked by，99-100

Chambord’s death and，159-60，162

dislike of society events and，187

marriage proposal of，95

mistress of，100-2

name of，95

poverty of，96

routine of，187-8

Senevas and，189-92

world tour of，190-1

Chevigné，Arthur，Marquis de，96

Chevigné，François de，163，*164*

Chevigné，Laure de Sade，Comtesse de，5-6，11，12，14，16-17，18，*24*，26，40，43-4，83，94，*97*，100，128，156，159-86，*183*，187，191，*195*，203，207，214，218，223，237，239，245，250，267，419，422，429，448，451，463-4，470，486，488，495-6，512，514，515，522-4，*523*，525，526-7，*526*，528，529，530-1，532，533，536，537，538，548，561，562，565，567，568*n*

anti-Semitism of，285

athletics of，89

“baker-woman” garb of，185-6，*185*

betting on horses by，169-70

Bohemian tastes of，268-75

celebrity friends of，269-70

Chambord’s portrait of，159-60，162，171

Chambord’s relationship with，111-16，163-4，182-3

charisma of，177-8

childhood of，85-6

children of，163

coed social club founded by，165

contradictory traits of，23

court presentation of，104-5，107-8

décor of salon of，176-7

diet of，110

dowry of，87

family tree of，94

fashion style of，200-1

feminist movement and，165-6

Fitz-James and，192-4

in Frohsdorf，102-16

as gifted raconteur，116

Gontaut and，194-9

hunting by，111-12

infidelities of，192-3

insulting wit of，283-4

intelligence of，89-90

La Trémoïlle and，197-8

Mailly-Nesle and，268-9

on Marquis de Sade，91

marriage prospects of，86-9

media presence of，172-5

mondain engagements of，164-5，166-7

morality redefined by，91

obscene language used by，91，112，118，177

parents’deaths and，86

on paternity of her children，164

playfulness of，267-8

political views of，90

popularity of，184-5

prettiness of，178

protocol flouted by，171-2

Proust’s changing opinion of，15

Proust’s stalking of，1-4

reactionary politics of，178-9

reinvention of，98-9

royal etiquette mastered by，113-14

at Sagan’s costume ball，22-3，184-6

salon of，13，175-82

smoking of，177

social commitments of，171-2

subscription evenings of，169

as trophy guest，120-1

unchaperoned sorties by，171-2

wedding of，97-8

Chevigné，Louis，Comte de，96

Chevigné，Marie-Thérèse de，163，*164*

Chieftain of Suave Odors，The（Montesquiou），551，561，562

Childebert，546-7

Chopin，Frédéric，548

Christian Ⅸ，King of Denmark，33

Cimiez，455

Clairin，Georges，*569*

Cleopatra，556，561

Cleopatra（1890），485

Clichy，place de，140

“closed” salon，175

Clotaire Ⅱ，King of France，47

Cocteau，Jean，283

Communard，536

Commune，536

Compagnon，Antoine，525

Condé，Princesse de，93

Condorcet，525，542

Conservatoire de Paris，126

Conway，David，147

Coppée，François，225

Corbeil，126，145

Corsica，450

Cossé-Brissac，Anne de，487，505

Costa de Beauregard，Charles-Albert，Marquis，181-2，*185*

Country Waif，The（Sand），215

couronne fermée（closed crown），47

court ceremony，26-7，30，38

court etiquette，104

Crédit Mobilier，131

cross-dressing，26

crowns，54*n*

cult of appearances，17

Curtiss，Mina，149

Daily Alta California，190

Dame aux camélias（Dumas），225*n*

Damnation of Faust，*The*（Berlioz），237

dancing，61

d’Arenberg，Louise（Riquette），212，218

d’Arenberg，Prince Auguste，212，213，215，218，251，276，283，442，445，481，493-4，503，530

d’Arenberg，Princesse Jeanne，52，69，71-2，80，215，217-18，234，497，503

d’Arenbergs，453

d’Artagnan（musketeer），220

Daudet，Alphonse，141

Daudet，Léon，430，442，471，556，557

Daumier，Honoré，419

David，Jacques-Louis，495，*496*

“Dead Woman’s Final Rest，The”（Montesquiou），568，569

Deauville，464

de Chevigné，Olivier，92-3

déclassement，213

déclassement du gratin，42

Degas，Edgar，17，18，37，*122*，126，135-6，143，284-5，420，426，446，482，483，563

Degeneration（Nordau），471-2

Delaborde，Eraïm（Élie），145-51，*146*，153，*154*，155，420

Delacroix，Eugène，125-6，128

Delaunay，Élie，122，143，152，153，280，284，418，420，421，422，423，445-6，456，464，470，483，484，494

Delaunay，Jules-Élie，18

de Léon，Princesse，8

de Mun，Albert，Comte，161，179，*180*，182，484，512，513，531

de Porto-Riche，Georges，117

depression，127-8

Deschanel，Paul，199，512-13，514-15，*514*，549

Detaille，Édouard，136，284，418，519，549

d’Haussonville，Othenin，77-8，82，175，181，182，276，281，445，520

d’Haussonville，Pauline，74-7，78，79，81，82，87，209，220，510，520，532

d’Haussonville family，541

Diana（goddess），82，205，547

Dickens，Charles，457

Dictionary of Received Wisdom（Flaubert），446-7

Diderot，Denis，78，516

Dieppe，458，464，494，505，508，510，515，530，564

“Dinner Party in Town，A”（Proust），541-2

diplomacy，48

Directoire，496

Divonne-les-Bains，470，471

divorce，91，246

domestic violence，236-7

Doppelgänger，225

Doré，Gustave，136，262-3

d’Orléans family，53-4，77，514，529，539，543

Doudeauville，Duc de，34

Dreyfus，Alfred，18，282，537-8，*538*

Dreyfus，Robert，415，554

Dreyfus affair，17，18，90，282，537-8，542

driven shoot（*battue*），69

Drumont，Édouard，43-4，484，537，*538*，542

Dubufé，Édouard，*127*

Dumas，Alexandre（*fils*），122，143，145，225*n*，281，422，433，460，520

Dumas，Alexandre（*père*），33，47，220，450

Duncan，Isidora，270

Duployé shorthand，217

d’Uzès，Duc，5

d’Uzès family，543

Earle，Theresa，454-5，486

“effeminacy，”223

Eiffel，Gustave，209，535，537，542

Eiffel Tower，209-10，429，469，*469*

Elegant Tea-Party in the Artist's Studio，An（Lemaire），*521*

Élisabeth，Madame，79，80，106

Elizabeth Ⅰ，Queen of England，207

Élysée Palace，211

Émile Paul bookstore，1，*2*

End of the World，The（Drumont），44

England，456-7，464，489，502

English Channel，502

Éntincelle，206

Ephrussi，Charles，555

Equality，30

Equality（Princesse Bibesco），94

Étretat，434，464

Évian-les-Bains，470-1

Fables（La Fontaine），418

faire-part，87

Falguière，Alexandre，18，231，484-5

farming，73，80

fashion，200-1，203

Faubourg，Le（Hermant），78

Faubourg Saint-Germain，4*n*，48，85，416-17，453，533，535，547

Faubourg Saint-Honoré，1，4*n*-5*n*，51，85，107，162，165，210，526，533

Faure，Antoinette，542，543

Faure，Félix，542

Fauré，Gabriel，143，548

Faure，Lucie，542

Faust（Gounod），51

Federico de Madrazo，18

Felipe Ⅴ，King of Spain，161*n*

Feminine Figures（Deschanel），514

feminist movement，165-6

Ferdinand de Saxe-Cobourg，Prince，*256*，257-8，488，492，539

Ferrières，156-8，*157*，259，435

Feuillet，Octave，56

Figuro，*Le*，206，240，241

Fitz-James，Robert，Comte de “Feetjahm，” 3，13，111，113-14，116，175，176，*176*，180，192-4，244，447，484，497*n*，531

Fitz-James，Rosa de，548

Flament，Albert，188

Flaubert，Gustave，272，429，446-7，452，453

Foa，Eugénie，147

Folies-Bergère，85

Fontainebleau，48，63

Forain，Jean-Louis，280，285，418

Fortuny，Marià，418

Fould family，179

Fouquières，André de，120，170

Fourmies，534

Fragments of Italian Comedy（Proust），527

Fragonard，Jean-Honoré，418

Frances（governess），163，165，531

Franco-Prussian War，31，41，135，136-40，*158*，180

Francport，73

Franz Ⅰ，Emperor of Austria，36

Free Speech，537-8，*538*

French aristocracy，4，17

French flag，106，184

French Revolution，5，30，78，79，90，93，103，175，180，186，209，450，543

French Riviera，454，455，456

Friedrich，Vicky，Dowager Empress，488-9，491，510

Frohsdorf，92-3，95，100，102-16，*103*，161-2，163，172，187，193

Fürstenberg，Prince Charles Egon von und zu，199

Galabert，Edmond，133

Gallé，Émile，221，555

Galliera Palace，204

Galliffet，Gaston，Marquis-Général de，140，245，276，277，

278，503，536，539，542

Galliffet，Georgina，Marquise de，31，424

Galli-Marié，149，*150*

Ganderax，Étienne，143，*446*

Ganderax，Louis，124，143，149，445，*446*，519，*521*，549，563

Garamantes（mythic bird），8

garçonnières，192

Garner，Marcellita，485-6

Gazette de France，74

Geneva，471

Geneviève de Brabant，7-8

Geneviève de Brabant（Offenbach），185

Gentle Art of Making Enemies，The（Whistler），224

Germain，André，98，178，199-200，231，239

Germany，499，505

Gil Blas，175-6，199，235，240

Girardon，François，*550*

Girl from Arles，The，141，423，483，484

“giving the hand”（*donner la main*），38

Glenaveril，or The Metamorphoses（Meredith/Lytton），479-80

Goblin（dog），486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516

Goncourt，Edmond de，27，128，265，272，278，*282*，283，422，423，428，430，435，436，442，446，447，462-3，466，470，471，491-2，535，555

Goncourt，Jules de，265

Gontaut，Joseph，Comte de，23-4，180-1，194-9，*195*，199-200，274

Gontaut-Biron，Élie de，180

Gontaut-Biron，Françoise，Comtesse de，40，41，44

Göritz，160-1，428

Gotha，492

Gould，Anna，283

Gounod，Charles，51，136，143，151，425，438

Gradis（Sephardic clan），36

Gradis family，125

Gramont，Duchesse de，41，281，418，532

Gramont，Élisabeth de（Lily），60，418

Gramont，Lily de，76，85-6，177-8，223，268，283，424，425，520，532

Grand Central Terminal，*511*

Grand Guignol，178

“Great Parisian Salons，The”（Proust），564-5

Greffulhe，Charles，Comte，51，53，71，72，81，212

Greffulhe，Cordélia，496

Greffulhe，Élaine，*see* Guiche，Élaine Greffulhe

Greffulhe，Élisabeth de Riquet de Caraman-Chimay，Vicomtesse，4，5-6，12，13-15，16-17，18，*25*，32，35，42*n*，46-82，*57*，*70*，83，116，165-6，168-9，198，202，203-41，*220*，*233*，243-66，416，418，444，448，455，457-60，464，473，484，487-98，*490*，*493*，*496*，499-500，502，503，504-7，508-17，*511*，*513*，*514*，*516*，525，529-30，531，532-3，536，538，539，548，549，551，552，555，558，560，561-3，564-5，566，567，568，569

ambivalence about marriage of，60-1

appearance of，55-6

artistic pretensions of，226-8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f，65

aversion to sex and pregnancy of，61-2

at *bal des bêtes*，24-5

beauty of，25

at Bois-Boudran，65-74，80-1

Borghese and，255-66

celebrity of，243-4

correspondence of，215-16

curfew on，236，237

death of sexual awareness of，61-2，64-5

early admirers of，244-5

education of，48-9

engagement photo of，*47*

fan mail of，11

fashion statements of，79-80

fashion style of，203，228-30，234-5，240-1，243-4，251

flirtations of，247-66

Henry’s abuse of，72-4，236-7，246

Henry’s courtship of，56-9

hobbies of，215

hunting disliked by，69-70

identification with Diana of，82

intelligence of，56

invisibility of，217-18

on learning of Henry’s affairs，74-5，78-9

marriage dowry of，51，53，87

“Marriage Journal” of，59-60，62-3，64，72，74

marriage of，46-7

marriage prospects of，49-50

media presence of，239-41

mistresses of，62-3

mother-in-law of，71-2

mother-in-law’s disapproval of，215，219

musical training of，51

nickname of，49

only documented sexual fantasy of，263

paintings and photographs of，231-4，*232*

parents’relationship with，50-1

Paris home of，211-12

passion for the arts of，25-6

photography studied by，234

picturesque lateness of，237-8

portraits of，235-6

pregnancy of，246

Proust’s changing opinion of，15

reading of，74，215

recitals given by，215

and Sagan，251-5

at Sagan’s balls，204-10，*205*

self-reinvention of，80-2

shortcomings of，247-8

subscription evening ploys of，238-9

swan motif of，230-1

unchaperoned outings forbidden to，214-15

unhappiness of，216，228

vanity of，81

wardrobe of，64，79-80，81

wedding day of，62-3

wedding night of，64-5

writing of，18，216-17，226，263-6

Greffulhe，Félicité，Comtesse，69，71-2，80，81，212-13，215，216，217-19，220，227，243-4，246，260，494

at-homes of，212-13，215

viciousness of，72

Greffulhe，Henry，Comte，11，51，71，72，79，80，81

Greffulhe，Henry，Vicomte，46-7，51-82，*53*，*54*，116，179，207，208，210，212，213，215，216，217，219，220，227，235，

459，494，497，503，504，*504*，511-12，513，536，538，548，564

arrogance of，56-7，72，76

art collecting of，56

dislike of female intelligence，56

Élisabeth abused by，236-7

on Élisabeth’s fashions，244

and Élisabeth’s flirtations，248-9

engagement photo of，*47*

erotic appetites of，62

height of，57-8

hunting by，69-70

mistresses of，62-3，74-7，81，87，209，214，251

narcissism of，77

and Pauline d’Haussonville，74-7，510

political philosophy of，69

private life of，213-14

reading disliked by，74

Sagan feud of，251

secret marriage of，246

temper of，58-9，72-4，75，244，246

views on marriage of，54-5

Greffulhe family，51-2，72，73，94，543*n*

hunting preserve of，65-6

Paris compound of，210-11

Gregh，Fernand，11，121*n*，281，286，415，430，449，521，524，551，554，562，563

Greuze，Jean-Baptiste，418，457

Grey，Lady de，201

Guérin-Boutron，211*n*

Guermantes，château de，259-60

Guermantes，Duc de，518-19

Guermantes，Oriane de Guermantes，Duchesse de，7-11，12，14，15，16，416，421，447，450-1，518-19，520，523，555

Guermantes，Princesse de，8

Guermantes Way，The（Proust），416，421，450-1，518-19

Guiche，Armand，Duc de，448

Guiche，Corisande de，116

Guiche，Élaine Greffulhe，61，245，246-7，*247*，250，448，480，492

Guilbert，Yvette，269，*270*

Guiraud，Ernest，137，143，144，145，155，519-20

Gurnigel，Switzerland，121，123，154-5

Gustave，Baron，34

Gutmann，Rosalie von，180，193-4

Haas，Charles，11，33-6，*35*，37，38，41-2，43-4，193，223，225，239，252-3，253，276，283，285，426，448，483，497*n*，519，532，537，555，566

at *bal des bêtes*，35-6

Halévy，Alexandrine（Nanine），121，125，132，154，455，465-6，470

Halévy，Daniel，131，142，144，153，280，281，284，428，440，462，470，475，519，524，525，527，542，543，562，563，564

Halévy，David，121

Halévy，Esther，122，126，128，130，131，132，139

Halévy，Flore，130

Halévy，Fromental，7，36-7，125-7，130，133-4，144，145，146，148，276，471，483

Halévy，Joseph，147

Halévy，Léon，37，130，136，147

Halévy，Léonie，121，125-6，131，134，136，137-9，140，142，145，148，275，419

deep depression of，127-8

in mental clinics，129-30

shopping binges of，128

Halévy，Louise Breguet，132，281，434，462-3

Halévy，Ludovic，37，117，121，128，131-2，135，136，138，141，142，150，152，155，186，276，281，426，*427*，434，*451*，471，543

Halévy，Mélanie，130，419

Halévy，Valentine，129，137-8，139，268

Halévy family，543

Hanotaux，Gabriel，514，539

Happiness Manqué（Porto-Riche），415，416，421，563

Harcourt，Princesse d’，209

Haussmann，Georges-Eugène，30，167

Hayman，Laure，525

Heath，Willie，552，561，564

Heine，Heinrich，157

Helleu，Alice，511

Helleu，Paul César，18，231，510-12，*511*，549

Henri Ⅳ，King of England，80，108，116

Henri Ⅴ，*see* Chambord，Henri d’Artois，Comte de

Henry，Émile，536，541，567，*567*

Heredia，José-Maria de，14*n*，143，*277*，281，433

Hermant，Abel，78，555

Hertfordshire，464

Hervey de Saint-Denys，Louis，Marquise d’，193

Hervieu，Paul，143，280，281，421，423，*427*，442，445，460，512，515-17，*516*，520，*521*，549-50，562，571

Higgs，David，29

Hillerin，Laure，12，247，502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tion：*The First Race*（de Sade），90

Hoffman House，190，*191*

homosexuality，16

Hondecoeter，Melchior d’，234

Hope，Henry Thomas，21

horse racing，17-18，169-70，252

hôtel Borghèse，460，481，485，498，502

Hotel Bristol，485，488

hôtel de Chimay，48，219*n*，558

hôtel de Condé，93

hôtel de Lamballe，468-9

Hôtel de Sacaron，464，481

hôtel de Sagan，21-6，*22*，34，533-4，*534*

Hôtel des Étrangers，455

Hôtel des Roches-Noires，563

Hôtel Royal，458

Hottinguer，François，245

Hottinguers，503

Houdon，Jean-Antoine，82

House of Savoy，181，181*n*

Howland，Hortense，136，563

Hugo，Victor，38，252，547，553，558

funeral of，28-9，*29*

Hugues de Sades，84

hunting，65-72，80，102，111-12

Huysmann，Joris-Karl，222，272-3

“Idolatry”（Meredith/Lytton），487

India，Grand Ornamental in，504

In Search of Lost Time（Proust），6-11，14-15，427，440，447-8，451-2，518，522，545，555

“inversion of essences” in，15-16

Institut de France，127，129，*129*

In Their Own Words（Hervieu），421，562

Intransigent，The，537

Israelite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Society，147

Jacob，Georges，418

James Ⅱ，King，116

Jean Santeuil（Proust），15，441，444，544-5，551，552

Jewish France（Drumont），43-4

Jews，34，36，41

Jockey-Club，3，13，22，41，52，100，169，*170*，175，187，188，*188*，453，518，522，532，537，544，566

exclusivity of，34

John the Baptist（Leonardo da Vinci），25-6，*25*，552，561

Joubert，Edmond，250

Joyce，James，451

Jullien，Dominique，8

July Revolution，84

Jupiter and Semele（Moreau），7

Justine，or The Misfortunes of Virtue（de Sade），*88*

Kann，Marie，281，432，442，470，471

Kaufmann，Caroline，166

Keats，John，516

King Poppy（Meredith/Lytton），454，486

Knebworth（Bulwet-Lytton estate），464，488，502

Krakatoa，159

La Bruyère，Jean de，443，447，527

La Canard，40

La Case，458，494

La Comtesse Greffulhe，l'ombre des Guermantes（Hillerin），12

Ladies'Tribune，169，*170*，218，522

La Duchesse de Guermantes：*Laure de Sade，Comtesse de Chevigné*（Princesse Bibesco），12

Lady of the Camellias，The（*La Dame aux camélias*）（Dumas），422

La Fontaine，Jean de，211，418

La Force，Duc de，503，504

La Gandara，Antonio de，221

La Grande Commune，54

L'Aigle，Bob de，*68*

L'Aigle，Comtesse（later Marquise）de，52

L’Aigle，Louise，Comtesse de，64，69，71，80，215，216，218，503

L’Aigle，Robert des Acres，Comte de（Bob），212，503

La Juive（Halévy），7，36，126，456，471，483

Lake Geneva，470，471

Lake Maggiore，428

Lamballe，Princesse de，241，558

Lami，Eugène，157，171，234，419

La Nôtre，André，48

La Revue de Paris，445

La Rivière，château de，63

Larmandie，Léonce，Comte de，216-17，448

La Rochefoucauld，Aimery，Comte de “Place à Table” de，38-9，75-6，213*n*，220，256

La Rochefoucauld family，94，543

L’Art et la mode，186，240

La Salle，Louis de，562，563

La Tour，Quentin de，419

La Trémoïlle，Duchesse de，197-8，274

La Trémoïlle，Mme de，544

Lau d’Allemans，Alfred，Marquis du，181，497*n*，503

Lauris，Georges de，415，420，421，426，517

Le Briard，66

Le Brun，Charles，48

Le Clos des Mûriers，563，*564*

“Le Cydnus”（Heredia），14*n*

Le Figaro，42，504

Le Gaulois，15*n*，42，97，173，*173*，174，184，191，200，203，206，239-40，283，285，421，436，502，519，522，550，564，565，566，569

“legitimists，” 84

Le Horla（hot-air balloon），433

Lemaire，Madeleine，224-5，234，433，519，520-1，*520*，*521*，522，532，549，550，551，553，564，*565*

Lemaître，Jules，143，*277*，281，421

Le Mensuel（*The Monthly*），524

Léon，Princesse de，494，495，*496*，497，498，514，522，*523*，527，533，544，545，561，565

Leonardo da Vinci，25-6，*25*，552，561

Leopold Ⅱ，King of the Belgians，48，54-5，509

Leo ⅩⅢ，Pope，179，513

Le Pèlerin（*The Pilgrim*），42-3

Les Bouleaux（house），510

Lesseps，Ferdinand，Vicomte de，188-9，278，534-5，537

Le Trémoille mansion，526

lightbulbs，21

Ligne，Louis de，52

Lippmann，Colette Dumas，433，*433*

Lisbon earthquake（1755），159

Liszt，Franz，50，500，548

“Little Shoes，The”（Ganderax），445

Lohengrin（opera），230

London，126，464，482

Longchamp，169，*170*，218，239，252，522

“Lord Lytton’s Last Poem”（Meredith/Lytton），506-7

Lorrain，Jean，101，283，424，426，446，447

Lorraine，140，445*n*

Losers’Club，170，174，453

Louis，Prince de Ligne，49

Louis Ⅸ，King of France，84，92

Louis Ⅺ，King of France，181*n*

Louis ⅪⅤ，King of France，7，17，26-7，*28*，31，38，48，103，104，108，116，206，208，209，220，443，527，538，543，548，557

Louis Ⅹ Ⅴ，King of France，57，93，108，116，420，543，547，555

Louis ⅩⅥ，King of France，36，75，79，93，106，108，183，186，538，547，555

Louis ⅩⅦ，King of France，106，183

Louis ⅩⅧ，King of France，92，103，108-9，181*n*

Louis-Philippe，King of France，53，67，84，106，126，198，248

Lourdes，428

Louvre，495，554

Loves of Henri Ⅵ，*The*，79

Luc，Charles de Vintimille du，57

Lucat，Eliseo，62

L'Univers，43

Lytton，Edward Robert Bulwer-Lytton，first Earl of（aka Owen Meredith），421，449，454-5，456-60，463，464，*464*，*465*，466，474，481-2，485-8，489-91，492，494-5，*495*，497，498-507，*498*，508，510，520，525，530

MacMahon，Maréchal de，69，80，106，112

Madrazo，Federico de，*526*

Magic Flute（Mozart），208

Mailly-Nesle，Marie de，261-2，*262*，268-9，527

Manet，Édouard，146

Mansart，François，48

Marah（Meredith/Lytton），486-8，489，498，500，501，502，503，504，505，508，510

Marie Antoinette，Queen of France，21，42，79，103，104，106，108，159，183，184，186，212，241，418，543，547，557，558，559

Marie-Henriette，Queen consort of the Belgians，47*n*，62

Marie-Thérèse de Modèrne，92

“marking the distances，” 113

Marmontel，Antoine，145

Marriage of Figaro，The（Mozart），440

Martin-Fugier，Anne，166

Marx，Gustave，156

Marx，Karl，140

Massa，Marquis de，204，244-5

Massari，Alfonso M.，258

Massenet，Jules，136，143

mass media，5

Mathilde Bonaparte，Princesse，33，37，148，183-4，276，280，284，422，429，449-50，451-2，*451*，520，532

Matteucci，Pellegrino，258

Maupassant，Guy de，17，37，89，272-3，415-17，*417*，420，425，426，429-38，*433*，*434*，*435*，441-2，455，460-3，464-72，*469*，*472*，474，476，491，*521*，525

Maupassant，Laure de，469

McCallum，Stephanie，148

media，42-3

Meilhac，Henri，37，117，141，143，281，426-7，*427*，428，433，*451*，456，458，460，462，*463*，464

“Meilhac and Halévy wit，” *37*，287

Melba，Nellie，484

Meredith，Owen，*see* Lytton，Edward Robert Bulwer-Lytton，first Earl of

Mérimée，Prosper，141，215

Merovingian dynasty，546-7

Meyer，Arthur，173-4，*173*，183，191，239-40，285，426，566

Midsummer Night’s Dream，A（Shakespeare），529

Millet，Jean-François，418-19

Mistral，Frédéric，141

Mme Bizet Straus as a Child（Dubufé），*127*

Mme Necker’s Salon（Haussonville），175

Monaco，444，455

mondaine（society woman），2-3

"*Mondanité* of Bouvard and Pécuchet"（Proust），452-3

Mondays，421

Monde illustré，*Le*，206

Monet，Claude，145，272，418

Monnais，Édouard，125-6

Monte Carlo，455，482

Montespan，Athénaïs de，116

Montesquiou，Wlodimir，Comte de，534，539

Montesquiou family，543

Montesquiou-Fezensac，Anatole，Comte de，60

Montesquiou-Fezensac，Robert，Comte de，11，13，49-50，*52*，61，101，205，219-26，*222*，*225*，227，229，235，237，243，244，252，264-5，283，420，423，473，492，493，*493*，497，508，509，510，511，512，520，534，540，546-59，*547*，*548*，*549*，*550*，*556*，560，561-2，565，566，567，568，569，*569*

homosexuality of，223-4

loneliness of，227-8

poetry of，221

wardrobe of，222-4

Montesquiou Pavilion，547-8，554，555-7，*556*

Montmartre，134-5，137，140，142，143，268-75，417，536

Montmartre Cemetery，130，151

Morand，Paul，429

Moreau，Gustave，7，17，58，136，212，226，235-6，284，418，446，501，551

Morisot，Berthe，145

Mozart，Wolfgang Amadeus，208，440

Mun，Comte Albert de，53*n*

Murat，Prince Joachim，169

Murat，Princesse Joachim，169

Murger，Henri，135

Musset，Alfred de，206，242，265，516，517，555

Mussolini，Benito，488

Nadar，226，232，*232*，*233*，234

Nadar，Paul，232

Nana（Zola），173

Napoléon Ⅰ，Emperor of France，47，84，228，496，555

Napoléon Ⅲ，30，33，34，39-40，136，157

Napoleonic Wars，36

Natanson，Misia，272

National Assembly，53，179，513

National Review（London），506

Nattier，Jean-Marc，418

Nebuchadnezzar，Babylonian king，43

Necker，Jacques，78

Necker，Suzanne，78

Neuilly，515

neurasthenia，121

New York，N. Y.，*511*

New York Herald，190，484，531

New York Times，29，48，501

Nice，455，456，457，460，464

Nietzsche，Friedrich，152

“Night in May，The”（Musset），242

noblesse d’Empire，84

noblesse d’épée，7*n*，84，92

noblesse de robe，7*n*

Nordau，Max，471-2

Norfolk，504

Normandy，434，463

“Notes on the Mysterious World of Gustave Moreau”（Proust），45

Nouvelle Revue de Paris，*La*，174

Noves，Laure de，*see* Sade，Laure de Noves，Comtesse Hugues de

O’Connor，Arthur，79

Offenbach，Jacques，185，269

Ollendorff，460

“Omens and Oracles”（Meredith/Lytton），489

Opéra-Comique，141，145，168，*168*，187-8，252，423，483，*485*

Order of Malta，257

Orléans，Amélie d’，204

Orléans，Charles d’，181*n*

Orléans，Duc d’，106

Othello and Iago（Lami），419

“Other Relics”（Proust），559-61

Oudry，Jean-Baptiste，211

Our Heart（Maupassant），415，460，461-3，465-7，468，469，470，472，474，476，481-2，483，484-5

Painter，George，3，519

Panama，188-9

Panama Canal affair，531，542

Panama Canal Company，189，534-5，537

Paradol，Lucinde，136

parc Monceau，471，519

Paris，30，32，85，134-5，445，448，*451*，454，455，456，471，481，482，483，485，488，500，502，503，508，531，533，534，535-6，*535*，537，539，542，544，545，551，553，554，555，558，560，564，*567*，568

Prussian triumphal parade in，139

siege of，136-40

Paris，Comte de，53，76-7，98*n*，248，513，544

Paris，Comtesse de，76-7，204，*204*

Paris，Philippe d’Orléans，Comte de，160-1，203-4

Paris Commune，119，135，140，245，271，445*n*

Parisian Silliness（Hervieu），571

Paris Opéra，34，168，169，187-8，238，*238*，417，503

Parme，Duc de，193

Parsifal（Wagner），499-500

Passant，Le，226

Passerby，The（Coppée），225

Passy，83，84，85，130，468，469

Pavane，op. 50（song；Fauré），473

Pawlowna，Maria，196

Peacock Room，224

Pearl，Cora，100

Pellapra，Émilie de，47

Pereire，Émile，131，137，158

Pereire，Isaac，131，137，158

Perrault，Charles，262-3

Petipa，Joseph Lucien，39

Petipa，Marius，39

Petrarch，23，45，60，83，90，98，120，174，272，441，474，476，486，503，523，524，551

Peyronny，Vicomtesse de，42

Phaedra（Racine），527

philanthropy，78，170-1

Picpus，94

Picture of Dorian Gray（Wilde），225，483

Pierrebourg，Aimery-Harty，Baronne de “Marguerite，” 517

Pierson，Blanche，251

Pigalle，85

Pilgrim’s Progress，The（Bunyan），487

Pinchon，Robert，460

Pisarro，Camille，418

Pleasures and Days，The（Proust），*565*

Pluto，90，114-15，*115*

Poiret，Paul，201，227

Poirey，Jean-Louis，210-11

Poissy，434

Polignac，Prince Edmond de，245，261，532

Polignac，Princesse Emma de，181，194-5，198

Political Lexicon，90

Pompadour，Mme de，241

Popular Demand（horse），106，183*n*

popular opinion，5

Porto-Riche，Geneviève Halévy Bizet，*see* Straus，Geneviève Halévy Bizet（Bébé）

Porto-Riche，Georges de，13，118-21，*119*，123-4，140，143，156，239，269，278，281，415-16，421，429，431，436，456，460-1，466，469，476，483，494，515，516，*516*，517，525，526，549，563，567

politics of，119

sex appeal of，120

Porto-Riche，Liselote（Lizote）de，118，120，123，431

Portrait of Mme Georges Bizet（Delaunay），153

Portrait of Mme Récamier（David），495，*496*

Portugal，36

Potin，Félix，211

Potocka，Emmanuela，Comtesse，284，432

Pourtalès，Edmond，Comte de，169

Pourtalès，Mélanie，Comtesse de，34，169，283

Praslin，Duc de，236-7

Praslin，Duchesse de，236-7

presse mondaine（society press），13，42-3，169，170，172-5，191，209

Prévost-Paradol，Lucien-Anatole（Anatole），136，422*n*

Prévost-Paradol，Thérèse，422*n*，471

primogeniture，31，83-4

Primoli，Giuseppe（Gégè），Comte，*170*，276，433，*433*，434，436，*451*，460-1，468，469，492，*493*，505，509，*549*

Prince’s Palace（Monte Carlo），455，456，482

Princess Alice，455

Pringué，Gabriel-Louis，76，205-6，208，231

“Professor of Beauty，A”（Proust），553-4

Proserpina，114-15，*115*，547

Proust，Adrien，10，13，464，542，543

Proust，Jeanne，474，542，543，554

Proust，Marcel，6-11，12-13，*14*，17，18，42*n*，45，89，124-5，171，241，244，252*n*，260，415，416，417，420，421，423，425，426，427，439，440-1，442-6，445*n*，447-53，*449*，464，474-8，481，482，518-31，*520*，532-3，*538*，541-5，546，550-5，556，557-70，*565*

de Chevigné stalked by，1-4

health of，1

laziness of，11

at Straus’s salon，12-13

unpublished essay of，15

Prussia，136，445*n*，488

psychiatry，89

psychoanalysis，89

public opinion，173

Pulcinella，178，*178*，522，*523*，527

Pyrenees，427，464，481

Queen of Spades，*The*（Halévy），126

Racine，Jean，7，525，527

Raczymow，Henri，75

Raincourt，Laure，Baronne de，92

Raphael，508

Ravachol（François Koenigstein），534，535-6，541

Reboux，Caroline，201

Récamier，Juliette，473，*496*，497，514，515，517

Regnault，Henri，133，*135*

Régnier，Henri de，143，280，281，450，510，549

Reinach，Jacques，Baron de，535，537，542

Reinach，Joseph，278，282，422，434，482-3，542

Reiter，Jean，134，145，151

Reiter，Marie，134，145，151

Réjane，Gabrielle，269，520，526*n*

Renard，Jules，5，221

Renoir，Pierre-Auguste，145，272，418

Républicain de la Loire et de la Haute Loire，42

Reszké，Jean de，269，*269*，455，484

Revolution of 1830，115

Revue illustré，La，435

Rezé，René de Monti de，102

Richard the Lionheart，75

Richelieu，Alice Heine，Dowager Duchesse de（Princess Alice of Monaco），431，*432*，444，455，482，484

Richelieu，Duc de，*432*

Rime Sparse（Petrarch），45，83

Riquet family，48

robe de cour，104

Robespierre，Maximilien de，93-4

Rochas，Albert de，512，*513*

Rochefort，Henri，537，539，540，542

Rodin，August，18，484

Rodrigues，Hippolyte（Hippo），134，136，138，147

Rohan，Duc de，494

Rohan family，497

Romanovs，503，539*n*

Rome，488，508，551

Rose Fairy，The（Halévy），126

Rothschild，Adèle de，419

Rothschild，Alphonse，Baron de，278，279，281，424，508

Rothschild，Edmond，Baron de，34，281

Rothschild，Gustave，Baron de，281

Rothschild，James，Baron de，156，278，424

Rothschild，Laurie，Baronne de，424-5，*425*，471

Rothschild，Salomon，Baron de，419

Rothschild family，34，36，131，147，148-9，156，158，419，424，435，471，484

Rothschild Frères bank，278，279，424

Rouen，460，470

Rousseau，Jean-Jacques，29，516

royal hunt，27

Royat，428

Russia，55

Ruy Blas（Hugo），553

Sacré-Coeur Basilica，134-5

Sade，Abbé de，90

Sade，Auguste de，83-4

Sade，Chevalier Louis de，90

Sade，Donatien-Alphonse-François，Marquis de，23，87-9，*88*，90-1，93-4，174，177，182，185，272，525-6，529

Sade，Germaine de，84-5

Sade，Jean-Baptiste de，93

Sade，Laure de，*see* Chevigné，Laure de Sade，Comtesse de

Sade，Laure de Noves，Comtesse Hugues de，23，83，90，98，185，272，441，474，476

Sade，Louis-Marie de，90

Sade family，83-4，*86*，92-3

sadism，89

Sadist，*The*（unfinished play），525

Sadistic Crepitians’Society，273

Sagan，Boson de Talleyrand-Périgord，Prince de，31-2，34，250-5，*251*，261

Sagan，Jeanne Seillière，Princesse，31-2，531，539

Sagan，Prince de，484，494，503，548，549

Sagan，Princesse de，34，38，40，172，184，207，*210*，218，424，501，522，533-4，*534*

annual costume ball of，21-6，22，27，28，38，39-44，184-6，*185*，187，204-10，*205*，494

Saint-Cyr，180，524

Saint-Germain-des-Prés，62

Saint Petersburg，196，538

Saint-Philippe du Roule，98

Saint-Priest，Comte de，234

Saint-Simon，Duc de，7，208-9

Salem（African page），205，*205*，209，240

Salis，Rodolphe，270-1，536

“Salome”（Montesquiou），568

Salomé（Wilde），482

Salome in the Garden（Moreau），58，212

Salon de Paris，35，146，551

salons，institution of，175

Sand，George，6-7，215，265，517，555

Sandringham，504

Santerre，Jean-Baptiste，209，*210*

Sardou，Victorien，143，226，485

Sargent，John Singer，18

Savoie，Charlotte de，181*n*

Savoie，Louis de，181*n*

Schlumberger，Gustave，278，280，282

Schneider，Hortense，269，274-5

Schumann，Clara，50

Scribe，Eugène，126，471

“Seal，The”（Apollinaire），189

seating charts，38-9

Second Empire，30，34，37，84，175，424

Second Republic，84

Secrets of Bohemian Life（Murger），135

Sedan，Battle of，136

Seigel，Jerrold，271

Seillière，Achille，31

Seillière，Raymond，32

Seine，*433*，469，508

Seine-et-Marne，538

Sem（caricature），225

Senevas，Bruno Marie Terrasson，Baron de，189-92

Senevas，Dowager Baron de，191-2

Serrant，198，*198*

Seurat，Georges，418

Seven Years'War，93

Sévigné，Mme de，7，215

Shakespeare，William，529

Shelley，Percy Bysshe，476，516

simplicity，75-6，286

Singer，Flore Ratisbonne，219

Sisley，Alfred，145

“Sketch Based on Mme de***，A”（Proust），527-8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100，188-9，190

Société des Grandes Auditions Musicales de France，493-4

Société Philanthropique，78，218

socio-physiological studies，216-17，219

Sodom and Gomorrah（Proust），557-9

Sofia，538-9

“Somnium Bellunium”（Meredith/Lytton），501

Spain，494

Staël，Germaine de，77，78

Standish，Hélene，243

Steinlen，Théophile，270

Stevenson，Robert Louis，225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Stevenson），225

Straus，Émile，147，156-7，*158*，278，280-1，417，418，419，420，423，424，426，428-31，432，*451*，455，456，463，465，467，471，474，481，482，484，519，*540*，542，554，563，564，*564*

Straus，Geneviève Halévy Bizet（Bébé），4，5-6，11，12-13，14，16-18，36-7，38，41，118-58，*152*，*158*，218，267，269，275-87，415，416，417-36，*417*，*425*，*427*，*433*，*434*，*435*，440-6，*446*，447，448-9，*449*，450，451，*451*，452，453，455-6，457，458，459，460-1，462-8，*463*，*464*，*465*，469，470-2，*472*，474-6，481-5，*485*，486，494，500，515，518-20，*520*，521-2，521，524，525，527，528，529，530，532，536，539，*540*，541，542，550，561，563，564-5，*564*，567，569

as art collector，18

blackouts of，140

childhood of，128-33，275

Delaborde affair of，145-51

Delaborde engagement of，153，155

depression of，131-3

difficulties of motherhood for，141-2

engagement of，133-4

exoticism of，143

flirting by，123-4

in Franco-Prussian War，136-40

Jewishness as important to，146-7

Montmartre home of，134-5

mother’s opposition to marriage of，134

in move to Bougival，145

nervous breakdown of，140-1

nervous collapse of，138-9

nervous illness of，121-2

parents’relationship with，128-9

Paris loved by，122-3

Porto-Riche and，123-4

Proust’s changing opinion of，15

Proust’s friendship with，12-13

salon of，12-13，18，37-8，120-1，142-4，156，276，278，279-80

sense of humor of，286-7

separation of，144

sister’s death and，131-3

social life of，126

solitude dreaded by，124-5

spa trips of，121-2

as widow，151-3

will of，267*n*

wit of，136

Strong as Death（Maupassant），415-17，*417*，435-8，440，461，476

subscription evenings，168-9，170，187-8，238-9，252，268

Suez Canal，188，278，535

Suez Canal Company，530

survivor’s guilt，132

Sutton（livery-maker），411，*412*，413，414，*418*，*540*

Swann，Charles，11

Swann’s Way（Proust），12

Switzerland，32，427，431，471，563

Tales of Mother Goose（Perrault），262-3

Tallien，Madame，47，78，232-4，240，496

Tassart，François，467，468，469-70，471

Tchaikovsky，Peter Ilyich，152

“Telepathy”（Meredith/Lytton），487-8

telephones，252

Tempest，The（Halévy），471

Terror，93，94，175

Théatre-Français，168，169，187-8

Thellusson，Georges-Tobe，4

Thellusson family，94，*95*

Théodora（Sardou），226

Thiers，Adolphe，5，538

Third Republic，5，30，32，106，136，137，140，172，179，445*n*，513，*514*，533

insecurity of，53-4

Three Musketeers（Dumas），47

Time Regained（Proust），9-10，16，16*n*，439

Tinan，Charles Pochet Le Barbier de（Charlie），61-2

Tissot，James，*35*

Toulmouche，Auguste，122

Toulouse-Lautrec，Henri de，18，269，270，272

“Tout-Paris”（Proust pseudonym），550-1，564

Triboulet，Le，97-8，99

Triel-sur-Seine，433-4，*434*

Tristan and Isolde（Wagner），168

“Triumph of Love”（Petrarch），114-15

Trouville-sur-Mer，434，458，464，563

Turgenev，Ivan，136，145

Two Bengal Tigers Fighting（Bayre），419

Ulmann，Madame Benjamin（Eulalie），121，153，155

Ulmann，Marcelle，121，154

Umberto I of Italy，181*n*

Union Interalliée，165

Utrecht，Treaty of，161*n*

Uzès，Duchesse d’，102，110，484，503，504，540

Vaillant，Auguste，536

Valley of Andorra，The（Halévy），126

Vanderbilt，Gertrude，509

Vandérem，Fernand，442，445，448，453

Vanity Fair，495

Vatican，179，513

Vaux，Baron de，235，239

Vernet，Raoul，471，472，484

Versailles，21，27，29，30，48，84，102，103，104，172，173，209，443，523，547，*547*，*548*，*548*，*549*，*550*，551，*556*，565

mob assault on，186

Queen’s Hamlet at，184

Veuve Clicquot，540

Veuve Clicquot Champagne，96

Victoria，Queen of England，53，54，152，258

Vigée-Lebrun，Élisabeth，104

Vigny，Alfred de，278

Villa Bassaraba，471

villégiatures，166

violence，ritualized，26

Vionnet，Madeleine，201

Vittorio Emmanuel Ⅱ，King of Italy，181*n*

Vogué，Vicomte Eugène-Melchior de，276，281，434，*435*，445

volcanic eruptions，159

Voltaire，29，419，457

Vuillard，Édouard，418

Wagner，Cosima Liszt，500

Wagner，Richard，126，168，230，492，499-500，531

Wagram，Princesse de，281，532，560

Wales，Bertie，Prince of，53-4，204，206-8，*207*，218，245，252，485，488，536，539

Wandering Jew，The（Halévy），39，126，456，471

Wappingers Falls，N. Y.，485-6，503

Ward，Clara，509

Waru，Adolphe Laurens，Baron de，87

Waru，Gustave Laurens de，524

Waru，Jacques des，193

Waru，Pierre Laurens，Baron de，85，86，87

Waru，Valentine de，84-5，86，87，524，528

Waterford，Marchioness of，110

Waterloo，battle of，177

Watteau，Jean-Antoine，418

Wegener，Otto，*14*，232，*232*，*233*

Weil，Louis，525

Weil family，543

Whistler，James Abbott McNeil，224，230，420，546，553

White Review，The，530，543，559

Wilde，Oscar，225，457，482-3，496，554

Wilhelm Ⅰ，Kaiser of Germany，157-8，*157*

Wilhelm Ⅱ，Kaiser of Germany，488，489，*490*，510

Williams，Émilie “the Seal，” 100-2，189

William the Conqueror，194

Winter Palace，539*n*

Within a Budding Grove（Proust），526*n*

Wladimir，Grand-Duc，196-7，*197*，234，237，274，502，504，538

Wladimir，Grande-Duchesse，196-7，*197*，201，274，502

Wladimir Palace，196

“Woman of Letters，The”（Greffulhe），202

Woman’s Heart，A（*Un cœur de femme*）（Bourget），423

“Woman Who Sets the Fashions，The”（Greffulhe），229

women

legal status of，165-6

voting rights of，5*n*

women’s rights，215

World’s Fair，58，209，210，429，*451*

World War Ⅰ，460*n*

Worth，Charles Frederick，229，240

Yturri，Gabriel de，223，551，*556*

Zola，Émile，50，173，4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鹅之舞：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上下/（美）卡罗琳·韦伯（Caroline Weber）著；马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6

书名原文：Proust’s Duchess：How Three Celebrated Women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Finde-Siecle Paris

ISBN 978-7-5201-8176-1

Ⅰ.①天… Ⅱ.①卡…②马… Ⅲ.①普鲁斯特（Proust，Marcel 1871-1922）-小说研究 Ⅳ.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55039号

天鹅之舞：普鲁斯特的公爵夫人与世纪末的巴黎（上、下）

著者/〔美〕卡罗琳·韦伯（Caroline Weber）

译者/马睿

出版人/王利民

责任编辑/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0 插页：2 字数：829千字

版次/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8176-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1969号

定价/239.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马睿/ 文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拥有20多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在翻译技术和术语标准化国际合作中担任重要协调角色，出版过多部中英文译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

视觉传达 社科文献 · 宋 涛
Telephone /t 010-59367109

比普鲁斯特还精彩。

——塞西尔·戴维-魏尔（Cécile David-Weill），《君子好逑》（*The Suitors and Crush*）作者

19 世纪末的巴黎，贵妇人组织的沙龙堪称当时时尚、艺术、高雅礼仪的代名词，吸引了无数艺术家，甚至王公贵族、政界权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卡罗琳·韦伯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线索，还原法国三位名媛的社交世界和命运起落，重现世纪末巴黎的社会面貌和政治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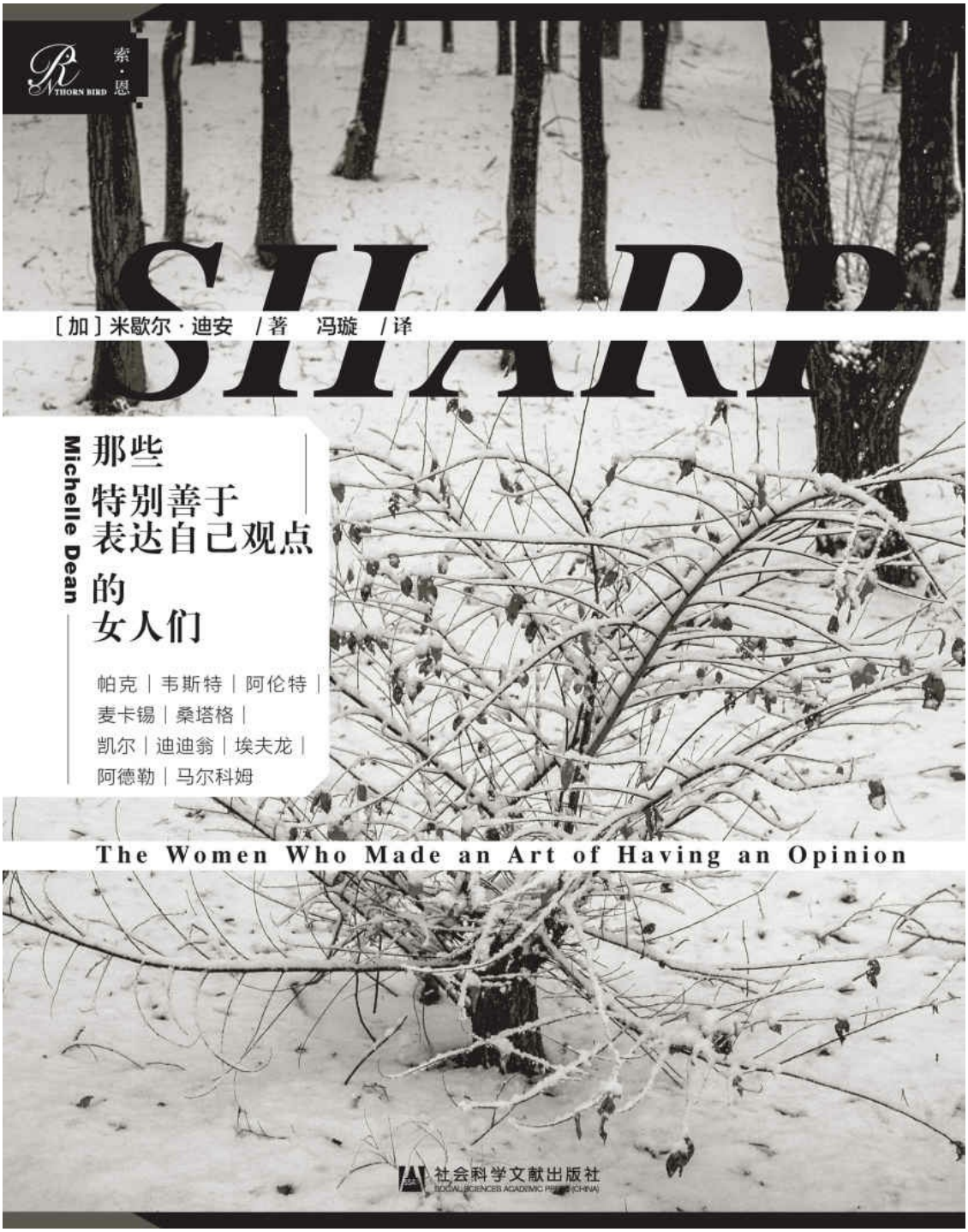
这部妙不可言的著作集叙事天分、文学研究和原始新素材为一体，以敏锐而绚丽的眼光对那个时代高低贵贱的社会和文学予以洞察，写作风格与主题一样优雅活泼。它的主题是 19 世纪末巴黎三位卓越的女性，和她们一起走上耀目舞台的是从普鲁斯特到莫泊桑这一群作家、亲王、女伶、政治家、记者、艺术家、妓女。这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地点及其所启迪的伟大艺术所做的研究，超群拔类、天分惊人、魅力无限。

——《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作者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ISBN 978-7-5201-8176-1

索·恩 THORN BIRD

定价：239.00 元（上、下）


索·恩
THORN BIRD
SHARP
[加]米歇尔·迪安 /著 冯璇 /译
Michelle Dean
那些
特别善于
表达自己观点
的
女人们
帕克 | 韦斯特 | 阿伦特 |
麦卡锡 | 桑塔格 |
凯尔 | 迪迪翁 | 埃夫龙 |
阿德勒 | 马尔科姆
The Women Who Made an Art of Having an Opin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米歇尔·迪安（Michelle Dean）/ 作者简介

记者、评论家，曾荣获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颁发的 2016 年诺娜·巴拉希扬精彩评论奖（Nona Balakian Citation for Excellence in Reviewing）。迪安是《新共和》的特约编辑，她也在《纽约客》《国家》《纽约时报杂志》《抨击杂志》《纽约杂志》《她》《哈泼斯杂志》上发表文章。迪安还与他人一起监制和创作了电视剧《恶行》（***The Act***）。该剧是根据迪安的文章《迪迪希望女儿总生病，吉普赛希望妈妈被谋杀》（***Dee Dee Wanted Her Daughter To Be Sick, Gypsy Wanted Her Mom Murdered***）改编的，已于 2019 年 3 月在 Hulu 流媒体平台上播出。迪安现居于美国洛杉矶。

冯 璇 / 译者简介

自由译者，已翻译出版了《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印加帝国的末日》《利维坦：美国捕鲸史》《皮毛、财富和帝国》《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印象巴黎：印象派的诞生及其对世界的革命性影响》等作品。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她们是20世纪美国文学和知识历史被掩藏的核心角色

不愿被简单归类为女权主义者的先锋女性

“Sharp”无疑是21世纪女性从这些前辈那里继承的宝贵遗产

不和善，不屈服，不避讳，用声音与社会的涡流对抗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女性的声音穿透一个世纪

SHARP by Michelle Dean

Copyright © 2018 by Michelle De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chelle Dean，c/o Black Inc.，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SHARP

The Women Who Made an Art of Having an Opin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前言
- 第一章 帕克
- 第二章 韦斯特
- 第三章 韦斯特和赫斯顿
- 第四章 阿伦特
- 第五章 麦卡锡
- 第六章 帕克和阿伦特
- 第七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
- 第八章 桑塔格
- 第九章 凯尔
- 第十章 迪迪翁
- 第十一章 埃夫龙
- 第十二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莉莲·赫尔曼
- 第十三章 阿德勒
- 第十四章 马尔科姆
- 后记
- 参考资料说明
- 参考资料
- 索引

前言

被我写进本书的这些女性在各自的生活中拥有同一个被视为褒奖的标志：她们都曾被形容为“锐利（sharp）”。

这些女性各自天赋的确切本质不尽相同，但她们的共同点是都能写一手令人难忘的好文章。没有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对自己生活中的荒谬事物的尖刻回顾；没有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将世界的一半历史浓缩进一次用第一人称描述的旅程的能力；没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没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以山精中间的公主的奇特觉悟为主题的小说；没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阐释的理解；没有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对电影制片人的强烈抨击；没有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对女权运动的怀疑论；没有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对权威人士缺点怪癖的编目列举；没有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对精神分析学和新闻学的风险与回报的反思：这个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些女性是在二十世纪取得这些成就的事实更让她们显得非比寻常。那时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人渴望听到女性就任何事情发表观点的世界。我们很容易忘记当多萝西·帕克开始发表她那些辛辣的诗文时，女性甚至还没有选举权。我们也总是忽略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是在苏珊·桑塔格凭借《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成为标志性人物之后才盛行起来的。这些女性在任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开始为女性这个整体谋求利益之前就已经公开蔑视人们为特定性别限定特别期许的行为

了。她们凭借自己超群的天赋，获得了其他女性根本不可能拥有的，在智慧层面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所有这些个人成就还总让她们与“女权主义”的群体政治关系紧张。这些女性中有一些人会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另一些则不会。事实上，她们之中没有谁满足于做一名活动家。丽贝卡·韦斯特是最接近于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但她最终也发现，妇女参政论者虽然勇猛得令人敬佩，但也假正经得不可原谅。桑塔格写过为女权主义辩护的文章，但是在受到质疑时又对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怒斥这项运动“头脑简单”。就连诺拉·埃夫龙也承认自己为女性在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组织能力感到担忧。

这种矛盾心态通常被看作她们想与女权主义政治撇清关系的证明。有些时候，这的确是她们的目的。这些女性之间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她们并不愿意被归为同一个群体。一方面是因为她们之间有些人相互憎恶：比如麦卡锡就不喜欢帕克，桑塔格也不喜欢麦卡锡，阿德勒攻击凯尔时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没有时间培养什么“姐妹情”：我甚至可以想象，要是汉娜·阿伦特看到我把她的作品放在女性身份的背景中讨论，一定会滔滔不绝地把我训斥一番。

即便如此，这些女性依然被认为是女性像男性一样有资格就艺术、思想和政治发表观点的有力证明。我们在这条战线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得益于阿伦特、迪迪翁和马尔科姆及其他女性为这个等式的女性一方增添的砝码。无论她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们确实为其他在她们之后的女性开辟了道路。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这段历史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理应享有的为人熟知的程度，起码在纽约某些偏僻的区划之外是这样的。她们每个人都有传记出版，我也读了这些传记。不过鉴于传记的性质，每本书只能单独讲述一位女性，介绍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的事件，而不能体现我认为我发

现的存在于她们之间的联系。美国文学的发展通常是以男性小说家作为纪年标志的：先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然后是罗斯、贝娄和塞林格的作品。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也有许多同样值得被铭记的成就的想法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人们也普遍认为男性在“智识史”中占主导地位。二十世纪中期被称作“纽约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当然也总是被定义为一个男性群体。不过我的研究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人口统计角度来说，男性的数量确实超过了女性的。但是从一个大概是更关键的问题上看，即用其创造出的成果是否值得被铭记，是否能够定义他们所处环境中的术语来衡量的话，女性也是完全符合标准，甚至是有所超越的。

毕竟，谁的声音比帕克的更能穿透各个时代？你几乎可以从她的每行诗句中感受到那种刮擦声。又有谁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比汉娜·阿伦特的影响更深远？没有苏珊·桑塔格，我们对于文化的构想将停留在哪里？如果不是宝琳·凯尔为我们开启了推崇流行文化的大门，我们会如何看待电影？对摆在我面前的这些女性的成就研究越久，我反而越觉得困惑：在谈论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智识历史时，怎么有人能够不将女性作为其中的核心？

我不禁认定，人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这些女性所处的时代中，如此聪慧、卓越和锐利并不总能为她们赢得赞美。更多情况下，她们还会因为无意中刺伤了别人的感情而遭到猛烈的攻击。百老汇的制片人都憎恨帕克，甚至将她从戏剧批评家的位置上赶了下去。玛丽·麦卡锡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许多朋友都厌恶她以他们为对象写的那些诙谐模仿文，还认为她是一个高傲、刻薄的人。与宝琳·凯尔同时期的男性电影制作人批评她不够严肃。（实际上，她至今仍然会受到这种指责。）在琼·迪迪翁（Joan Didion）首次发表她关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著名散文《一些做着美梦的梦想家》（*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之后，她的编辑收到了不少毫不留情的批评信。当珍妮

特·马尔科姆提出有些记者利用了被报道对象的虚荣心时，不少报刊的专栏作家们都在自己的专栏中批判她玷污了新闻工作宣称拥有的尊严。

有一些批评就是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另一些则是纯粹的愚蠢。还有不少是以上两种情况的综合。不过这些女性的力量的关键就体现在她们如何对待这些批评上，她们秉持的是一种往往很风趣的聪明的怀疑论。就连汉娜·阿伦特也会不时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引发的喧嚣而感到厌烦；迪迪翁则给一封放肆的读者来信回复了一个“哦，哇”；阿德勒有一个引用作者的原话回敬他们的习惯，她会指出这些人的用词重复和缺乏深意。

这些女性善于嘲讽的作风有时会成为她们应当被忽视的根据，因为人们觉得她们“不够严肃”。反讽、挖苦和嘲弄可以是局外人的工具：当你本身没有参与传统智慧的形成过程时，你对传统智慧自然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副产品就是讽刺。我认为，当发现这种特征和倾向时，我们应当更加小心试图干涉这种特征的做法。因为与众不同始终具有其智慧价值。在本书中，这种“不同”指的是“不是男性”，但它同时也可以指不是白人、不出身于上流社会，或不曾就读于名校。

这些女性就不总是身处所谓对的地方，她们也不是什么完美的榜样人物。她们的背景情况都很相似：大都是白人，大多是犹太裔，以及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会看到她们也都拥有伴随这些特征而来的习惯、侧重点和偏见。比如，在一个更完美的世界中，像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这样的黑人作家也应当被更加广泛地认定为这个群体中的成员，但是种族主义导致她的作品被边缘化了。

即便如此，这些女性仍然投身战场，参与了这场二十世纪的大辩论。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仅凭她们的成就，就足以让人认可她们存在的价值。

我写这本书还有另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决定了我会去探索关于这些女性的哪些问题。如果你是拥有某种雄心壮志的年轻女性，了解这段历史会让你获得一些宝贵的财富。知道尽管性别歧视还很盛行，但你终究会找到突破它的道路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会一直探索究竟是什么把这些女性塑造成了她们后来成为的样子，她们是优雅的辩论者，她们会受到男性的阻碍，但也从他们那里得到过帮助；她们容易犯错，但不会被自己的错误定义；更重要的是，她们完全不会被人们遗忘。我寻找这些答案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便是在今天，即便是在女权运动结束之后（这个说法尚存争议），我们依然需要更多像她们一样的女性。

第一章 帕克

在成为后来那个指引方向的北极星之前，年仅十九岁的多萝西·帕克已经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了。对于像她这样的人来说，生活本不应该如此。1893年，帕克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皮毛商人家庭中。她的家族姓氏是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但不是那个罗斯柴尔德——帕克一生都在这样提醒采访者。不过帕克家在纽约仍然算得上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们的经济状况足以承受泽西海岸边的假期和曼哈顿上西区的宽敞公寓。然而在1913年冬天，因为两任妻子先后离世，以及一个亲兄弟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帕克的父亲终于被悲伤击倒，撒手人寰。他几乎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遗产。

当时的多萝西·罗斯柴尔德（Dorothy Rothschild）尚未婚嫁，所以也无法指望夫家拯救她于水火之中。她也没受过什么教育，高中都没毕业，因为像她这样出身的女性都不是为了将来找工作而接受教育的。到二十世纪中期，秘书专科学校将向大量中产阶级女性传授让她们能够养活自己的职业技能，但是在帕克刚成年时，这些机构还都处于起步阶段。最终，帕克只能依靠自己仅有的能够迅速领到报酬的技能谋生：她会弹钢琴，而且舞蹈学校当时正如雨后春笋般在曼哈顿各处被创办起来。帕克喜欢说有时候她甚至向学生们教授略微不合体统的新兴的雷格泰姆（ragtime）舞蹈[1]，比如火鸡跑和灰熊舞之类的。帕克在讲到这个故事时总是把自己当成故事中的笑料。她的一个朋友记得她曾这样说：“我教过的男学生之后都成了不中用的跛脚鸭。”[2]

这是个有意思的故事，但也几乎肯定是个被夸大了的故事。在帕克的朋友和同时期人的所有记录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帕克坐在钢琴边，更别说跳过任何舞蹈了。可能她只是把这些才能都抛弃了，也可能，如她后来在写作上的经历一样，利用她的音乐天赋挣钱这件事让她对音乐本身失去了兴趣。不过，还有可能是她为了幽默而夸大了事实，因为从一开始，幽默就为她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逃避途径。她的笑话最终会将多萝西·罗斯柴尔德转变为传奇一般的“帕克夫人（Mrs. Parker）”，后者仿佛是某种愉快时光的化身。帕克夫人手里总是端着一杯鸡尾酒，她说出的俏皮话总会像投下一枚手榴弹一样在聚会中引爆笑声。

不过，就如聚会中的喧哗热闹和光鲜亮丽总能掩盖苦难和沮丧一样，帕克的生活也是如此。那些让其他人着迷不已的故事都是用悲惨的经历雕琢成的供人消遣的愉悦内容。就连这个坐在一群随着音乐旋转的舞者中间弹钢琴的天性快活的形象，也是帕克用来隐藏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帕克显然并不介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身无分文，因为从白手起家到身处她达到的高度这件事中蕴含了某种大无畏的精神。不过帕克很少谈及在她五岁时就去世的母亲，以及被她憎恨的继母。她还不喜欢谈自己十五岁就离开学校的原因其实是要留在家中照顾越来越病弱，且开始变得糊涂的父亲。直到将近五年后她父亲去世为止，帕克才摆脱了这个困住她的牢笼。

后来，帕克在一篇题为《了不起的老绅士》（*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个（虚构）人物弥留之际的情况：

> 人们没有必要聚集到老绅士的病榻前了，他已经认不出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实际上，他在近一年前就认不得他们了，他总是叫错他们的名字，还会在有礼但严肃地询问他们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时弄错谁是谁的丈夫、妻子或孩子。[3]

帕克喜欢将父亲的去世描述为一场悲剧，有时还会为自己不得不孤

苦伶仃地自谋生路而愤愤不平：“你知道，我当时没有钱。”[4]不过不得不找工作养活自己被证明是对她大有裨益的，这也是帕克第一次将一段不好的经历转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就是她的天赋：将复杂的情绪梳理成机智风趣的妙语，将所有辛酸艰难隐藏在字里行间，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大吐苦水。

在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帕克显然认定所有的好运都是某种偶然。她总是说自己走上写作道路是个意外，是“因为缺钱”[5]才写作的。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帕克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虽然具体是从几岁开始已经弄不清了。帕克不喜欢保存记录，她的文稿也很少有留存至今的。她的一位传记作者设法找到了她小时候给父亲写的几封短笺，从那里面，人们已经可以听出一位明日作家的声音。有一次她给父亲写信说：“人们说如果你的字迹向上扬，那意味着你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天性。”她在这里指的是自己倾斜的手写笔迹。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略微泄气的评论：“我想我有。”[6]这种做法后来将成为她的标志性策略。

有时候，天赋也是一种意外。它会选择哪些人能拥有这些天赋，然后让这些人过上一种他们自己都从未梦想过的生活。不过，天赋确实是与多萝西·帕克成为作家这件事有关的唯一可以被算作意外的东西。

最先给予帕克一个职业机会的人叫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1914年的某个时候，他从一堆主动投稿的文章里挑出了帕克的稿子，可能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可能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反抗精神。克劳宁希尔德出身于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阶层[7]，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他和纽约上流社会的其他成员有很大区别。克劳宁希尔德终身未婚——可能因为他是同性恋，不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一点。在所有关心他的人面前，克劳宁希尔德是一位专心照顾自己沉溺于麻醉药品的兄弟的人。他在纽约为人所知的

特点主要是他好开玩笑，以及他担任了新版《名利场》（*Vanity Fair*）的负责人。这份杂志原本是一份古板、正派的男士时装杂志，但康泰·纳仕（Condé Nast）雇用克劳宁希尔德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

当时还是美国杂志的最初兴起阶段。《哈泼斯杂志》（*Harper's*）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都在发行中。不过《纽约客》（*New Yorker*）尚未问世，也没有什么人敢奢望比"迪比克（Dubuque）的老夫人们"更有见识的读者群。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是弗洛伊德的外甥，通常被认为是创造了公共关系学的人，他是在1913年秋才刚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的。[8]从事广告业的人们更是刚刚才开始设想他们最终将在美国拥有怎样的影响力。

在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效仿的情况下，克劳宁希尔德的《名利场》就呈现了某种与主编的个性很相似的特点：尖酸刻薄、莽撞无礼，在针对富人的时候尤其如此。可能是因为他的兄弟遭受的折磨，也可能是因为克劳宁希尔德家族一直是个很有声望，但并非多么富有的家族——反正克劳宁希尔德对于富人们总是抱有一种批判态度。不过他采用的并不是什么言辞激烈的社会批判。相反，克劳宁希尔德喜欢调侃。就连他为改版后的第一期杂志写的《主编的话》都带着一种讽刺意味：

> 我们打算遵循着高尚的、传教士一般的精神为女性做一些事情，据我们观察，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份美国杂志为女性做过这样的事。我们打算常常迎合她们的智慧。我们打算冒险相信，她们在最清醒的时候，也是能够胜任一些大脑活动的；我们甚至打算壮着胆子相信她们正是为当代文学作出了更原创、更令人兴奋，而且是充满吸引力的贡献的人。我们特此宣布自己为坚定、顽固的女权主义者。[9]

这就是一个可以有多种解释，容易令人困惑的讽刺：这是在拿当时还相对新鲜的女权主义这个概念说笑？还是一种旨在赞美女权主义的幽默？又或是不含任何政治意图的单纯嘲弄？在我看来，这三个答案都是对的。一个类似这样的讽刺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从不同的方向能够看出不

同的含义。至少有几种方向是女性可以采用的。当这第一期杂志在1914年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女性甚至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因为克劳宁希尔德喜欢开玩笑，所以他需要一些站在相反立场上看问题的作者，也就是那些不受公认的规矩界限禁锢的人。

大部分符合这个类别的作者碰巧都是女性。安妮·奥黑根（Anne O'Hagan）是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她写过关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中所谓的波希米亚生活的文章。克拉拉·泰斯（Clara Tice）是一位前卫派插画家，她喜欢宣称自己是第一位梳波波头的女性，从这份杂志创立初期，泰斯就一直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玛乔丽·希利斯（Marjorie Hillis）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会成为各地女性单身生活的代表，杂志创立初期，她也在这里发表过文章。

帕克将会成为这份杂志最具标志性的声音，不过让她到这里就职的过程花了不少时间。克劳宁希尔德是因为她提交的一段轻诗歌而注意到她的。那首诗的名字叫《任何门廊》（*Any Porch*），全诗共9节，内容都是无意中听到的评论，这首诗的主旨就是，在任何家境富裕、消息比较灵通的富有人家的门廊上，你都可能听到这些内容。风格固定的、品评二十世纪初期上流社会的道德偏见的题材可能会让现代人觉得没意思。不过从这首诗中已经能够看出后来的帕克会关注哪些焦点：她对于女性特质带来的局限的尖酸解读，以及对那些只会重复公认观点和陈词滥调的人的不耐烦。

> 我不会说布朗夫人是个坏人，
>
> 她不关心道德，但不是不讲道德……
>
> 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姑娘嫁不出去了
>
> 她正在谈论她的"事业"呢。[10]

克劳宁希尔德从这首诗中看到了一些东西，他支付了5美元或10美

元或12美元来购买这首诗。（关于这个报酬，帕克、克劳宁希尔德，以及其他人说的数额各不相同。）这次小小的成功让她有勇气向克劳宁希尔德申请一个工作机会。起初，他没法在《名利场》为她争取到职位，所以他把帕克安排到了《服饰与美容》（*Vogue*）。

这个安排并不十分合适。1916年的《服饰与美容》还是一本为拘谨古板的端庄女性提供拘谨古板的端庄内容的杂志。帕克对于时装潮流从来不感兴趣，可是她发现这里的工作要求她对每种布料的优点或做多长的褶边之类的问题保持充满激情甚至是近乎虔诚的关注。哪怕是她在这里上班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她也无法鼓起足够的干劲。后来她尝试用礼貌的言辞描述这段回忆，但她依然难以掩饰自己像爱批判其他任何事一样，对同事们也抱有诸多意见。她告诉《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采访者说，在《服饰与美容》工作的那些女性“平淡无奇……并不时髦”。[11]她对那些人的赞美从来没有对她们的侮辱一半长：

> 她们都是正派、端庄的女性——是我见过的最端庄的，不过她们根本不能胜任在这样一份杂志中的工作。她们戴着滑稽的小软帽，把杂志中的模特从强悍的尤物无趣化为娇柔的小家碧玉。

《服饰与美容》是为顺应刚刚兴起的商业制衣产业的需求而创办的，这项产业大多时候要迎合顾客的喜好，同时也在让他们的喜好变得平庸。即便是在杂志创办初期，《服饰与美容》中的每篇文章就已经蒙上了一层营销的外衣，每期杂志都会表现出一种产品目录的格调。此时距离女性推翻裙装的束缚还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凭借着既令人敬佩，又有些邪恶的先见之明，帕克在《服饰与美容》工作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摧毁美丽的服装是女性优雅的最高表现的理念。

公平地说，在《服饰与美容》被迫终日应对一个在她看来根本配不上自己的主题的这段时间，反而能让帕克更加集中自己的才智。那个写出《任何门廊》这样的作品的作者开始把自己的钢笔当作所向披靡的大

锤。在《服饰与美容》感到的压抑让她变得狡猾和敏锐。举例来说，当她被安排为用钢笔和墨水绘制的服装画撰写插图说明时，她就必须非常小心。这些插图往往是占据《服饰与美容》最多版面的内容，帕克得利用机智让自己的文字足够难以捉摸，这样主编才不会抓到帕克其实很看不起《服饰与美容》的读者的任何暗示。这种像制作金银细丝工艺品一样精心雕琢出来的插图说明中不乏一些绝妙的成果——比如那句著名的“简洁是内衣的灵魂”[12]。其他一些则拿时尚要求的复杂的支撑内衣开起了更轻松的玩笑：

> 只有一件事能和人生中的第一场恋爱一样激动人心，那就是人生中的第一件紧身胸衣。这两件事都能够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受重视的感觉。这件紧身胸衣能让十二岁孩子平板一样的身材也显示出某种腰部曲线。[13]

不过，她的编辑们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她的不屑表现得过于明显时，帕克不得不重写某些插图说明。尽管帕克的举止显然是无懈可击的，但《服饰与美容》的主编、头脑冷静的埃德娜·伍尔曼·蔡斯（Edna Woolman Chase）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形容帕克是“嘴上涂着蜜，脑子里酿着醋”。蔡斯能够意识到帕克的文字乍一读来甜美可人，实则将尖酸刻薄都隐藏在某种托词背后这点似乎很重要。她的评价与帕克后来的一位朋友的描述相互呼应。戏剧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说年轻时的帕克是“小耐儿和麦克白夫人的奇异综合（So odd a blend of Little Nell and Lady Macbeth）”[14]。在最初的那些年里，帕克简直是文思如泉涌。她像为《服饰与美容》写文章一样频繁地为《名利场》供稿，显然是想在那里获得一个工作机会。《名利场》肯定能给帕克源源不断地写出的这种轻松、嘲讽，大多数时候并不会为人们所铭记的文字提供更多空间。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一种被她称为仇恨之歌的体裁上，这种轻诗歌针对的对象范围很广，从女性到宠物狗应有尽有。有些这样的作品非常诙谐，但大部分还是以不加修饰的抱怨为主题，它们表达的尖刻甚至会让人觉得刺耳。当她被许可在散文中更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华时，帕克往往能写出更精彩的东西。她那种像

醋一样尖酸的机智被这样利用起来时往往能收获不错的效果，它们就像是一种缓慢反应的酸性物质，一点一点腐蚀被她嘲弄的主题。她对事物的厌烦情绪也总能让她的作品更深刻、更透彻。

1916年11月发行的《名利场》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还没结婚》（*Why I Haven't Married*）的文章，帕克在这里解释了自己的独身状态。这篇文章是对纽约约会场景的一种讽刺，在帕克所处的年代，她显然和如今的我们一样毫无希望。帕克描绘了一位单身女性能够遇到的几种共进晚餐的对象，用他们来概括今天的情况似乎也依然适合。比如拉尔夫，一位永远满怀热切期盼的好男人："我看到自己被一堆毯子和沙发靠垫围在中间……我看到自己成了反对妇女参政的社团的一员"。[15]又比如马克西米利安，一位左派波希米亚主义者："他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再比如吉姆，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生意人："在他的心中，我其实只能排在第三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威士忌和威士忌，第三名才轮到我"。

1917年7月发行的《服饰与美容》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室内的亵渎》（*Interior Desecration*）的文章。帕克在其中为人们描述了到由阿利斯泰尔·圣克劳德（Alistair St.Cloud，很可能是虚构的人物）装饰的房子中拜访的令人困惑的经历。（这次拜访很可能也是虚构的。）我们被告知，有一个房间里装饰着紫色的绸缎和黑色的毯子，还摆着"从宗教法庭流传下来的稀有的古董椅子"。[16]

> 除了一个黑檀木小柜上放着的一本有鲜亮的红色封皮的书之外，房间里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我看了一眼书名，上面写着《十日谈》。
>
> 我问："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
> 阿利斯泰尔自豪地回答说："是藏书室。"

帕克每天都在进步，写出了越来越多的妙语，对目标的分析也越来

越精准。她从一开始就显露了天赋，但是她也需要时间来磨炼写作技巧。她似乎还必须获得克劳宁希尔德的赞赏和关注作为激励。帕克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里非常多产，超过了后来任何时候。自食其力的准则符合她的风格，即便是在1916年春嫁给埃德温·庞德·帕克二世（Edwin Pond Parker II）之后，她依然是这么做的。

给了多萝西新姓氏的男人是一个年纪尚轻的金发男子，他是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的股票经纪人，负责销售业绩良好的康涅狄格股票。不过就像多萝西原本的姓氏会让人联想到那个富有家族一样，帕克拥有的财产也并不像他的名字暗示的那么多。通常被简称为埃迪（Eddie）的帕克先生注定是一个没有留下什么自我描述，只能通过别人对他的印象来为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知道他一直喜欢喝酒，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至少远比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多萝西更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多萝西刚认识埃迪时几乎还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但在两人婚姻期间，埃迪会让她慢慢爱上杜松子酒。

《新郎来了》（*Here Comes the Groom*）发表于1917年6月，帕克站在自己一贯的批判视角谈论了婚姻制度。“从始至终，结婚的过程对于新郎来说都很悲哀，”[17]帕克在这篇于1916年结婚后创作的文章中打趣道，“从婚礼进行曲奏响到蜜月的开始阶段，他一直迷失在被遗忘的浓雾之中。”尽管似乎所有人都说帕克爱着埃迪，但她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继续把丈夫留在了那片浓雾之中。他们才结婚没几个月，美国就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埃迪应征入伍，在随连队接受训练之后，最终被派上了前线。他显然就是在此期间开始对吗啡上瘾的，而酒精对他的吸引力也并没有降低。

埃迪·帕克的种种问题让他成了妻子人生中一个游魂一般的存在，他是一个偶尔被她拉着参加某些聚会的幽灵，是一个被她硬插进一两个故事中的角色，但是帕克从没有清楚地说明过他身上究竟有什么吸引自

己的地方。1918年，克劳宁希尔德终于让帕克进入了《名利场》，他的本意是想让她写散文。自这份杂志被改版时起，负责撰写戏剧评论的人一直是P.G.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他辞职以后，克劳宁希尔德就让帕克填补了这个空缺。帕克从来没写过任何关于戏剧的文章，然而戏剧评论却是《名利场》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主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地位的时髦人士都热衷于阅读戏剧评论。电影在此时还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流行娱乐形式，剧院中的现场表演仍然是创造和培养明星的场所。一名戏剧批评家能够搅动、影响、审视，更不用说嘲弄讽刺的金主和明星是很充足的。

这可能也解释了帕克最初为《名利场》写的几篇评论为什么显得那么小心翼翼。原本自信幽默的文章突然失去了节奏。在最初的几篇专栏文章里，帕克只是在紧张地闲聊。在大多数文章里，她几乎没怎么描述自己观看的戏剧和音乐剧。在1918年4月发表的第一篇评论中，帕克用了大量笔墨来抱怨一位在观看音乐剧时，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找一只手套上的观众。这篇文章的结尾也很突兀，最后一句话是：“就这些了。”[18]

信心最终还是被建立起来了，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帕克这位投手在进行希望渺茫的正面投球的过程中，渐渐可以投出几个快球了，而且她瞄准目标的能力也提升了。在她的第四篇专栏文章里，她抱怨了戏剧批评家的“悲惨生活”[19]，因为她想要评论的戏剧在杂志能够被送到商店货架上出售时往往已经停止演出了。在第五篇专栏文章里，她批判了戏剧总离不开战争题材的现象：“除了裹上盟军旗帜，他们就不知道还能如何打扮歌舞女郎了。”[20]渐渐的，帕克的尖刻嘲讽又显示出了她原有的优雅风格。她在抱怨《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中必将出现的开枪场景时说：“我真心希望［易卜生］偶尔能让女士们服点二氯化汞，或是打开煤气阀门，或选择其他一些声音小、又不会弄脏房子的死法。”[21]

帕克的信心得以增强的原因之一是她发现在《名利场》，自己是在为朋友而写作。克劳宁希尔德和这份杂志的其他编辑都理解她。幽默要建立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上才能被感知。即使某个笑话很过火，甚至是越轨的，也必须是在讲笑话的人和听笑话的人之间存在某种共识的前提下，讲笑话的人才有道德界线可逾越。在帕克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密友和知己组成的圈子随时可以给予她鼓励和认可。这个圈子里的成员几乎全是男性，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两位她在《名利场》的同事。第一个人是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这位有些笨拙的新闻记者是在帕克从《服饰与美容》转投《名利场》后不久受雇担任执行主编一职的。另一个人是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他身材偏瘦，沉默寡言，然而隐藏在这种拘谨背后的是同样具有杀伤力的幽默感。这三个人在《名利场》总是形影不离，成了制造麻烦的三人组。

从任何层面来说，他们都用文字写就了自己的传奇。很久之后，帕克带着明显的为自己的邪恶而自豪的口气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差到了极致。"[22]他们都喜欢搞恶作剧，尤其是以他们的老板们为捉弄对象的那种。有一个他们最爱讲的趣闻是帕克订阅了一份葬礼杂志。她和本奇利都喜欢与死亡有关的幽默。他们还喜欢观察克劳宁希尔德从帕克的办公桌前经过，看到她从那些杂志上撕下并用大头针钉起来的尸体防腐图解时表现出的惊恐的样子。他们中午出去吃饭总要花很长时间，对于迟到心安理得，甚至拒绝为此编造借口。当克劳宁希尔德陪同康泰·纳仕一起到欧洲出差的时候，这三个人就更无法无天了。他们确实不是什么忠于职守的员工。

他们这种懒散的精神气质还被延伸到了阿冈昆圆桌会议（Algonquin Round Table）中。这个传奇的团体中包括多位作家，就连那些借别人的光来参加活动的追随者们也都很迷人。成员们会到曼哈顿中城的阿冈昆酒店进行短暂的聚会。圆桌会议的正式形成源自一次自我

放纵。1919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戏剧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宴请宾客庆祝自己在战后平安返回。出席者对这次特殊仪式意犹未尽，于是决定将它延续下去。这个群体的声望持续的时间远比这个活动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圆桌会议的存在时间很短。八卦专栏里第一次提到圆桌会议是1922年。到1923年时，有报道说成员内部出了问题，原因是酒店的所有者发表了一些反对犹太人的看法；[23]到1925年，这个特别的活动已经被宣告终结了。

后来，帕克对于圆桌会议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充满矛盾，她对自己获得的几乎所有成功好像都是这样的感受。帕克并不如有些人提到的那样，是参加圆桌会议的唯一女性。包括鲁思·黑尔（Ruth Hale）和简·格兰特（Jane Grant）之类的记者，以及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之类的小说家也会经常来这里与其他人共饮。不过帕克无疑是作风和观点与这个活动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个。她的声望让其他参加活动的男性也相形见绌，那些人的名字如今大多已被人遗忘。因为帕克的风趣言谈总是那么精辟，所以她也是最经常被八卦专栏作家们引用的人。

对所有这些情况并不很适应的帕克有时会对提起圆桌会议的采访者发脾气，她要么说："我并不经常参加，去那里花钱太多。"[24]要么对整个活动轻描淡写："那不过是一群爱讲闲话的人凑在一起吹牛炫耀罢了，他们攒了几天的笑料，需要找机会说个痛快。"[25]帕克无疑会受到当时媒体报道的影响，那些内容对于圆桌会议自称文学界中坚力量的说法充满怀疑，甚至持批判态度。1924年，一位八卦专栏作者对这个群体嗤之以鼻："没有一个［成员］为文学带来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调，也没有谁写出过什么影响深远的诗篇，可他们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传统思维充满不屑。"[26]

也许帕克辩驳得太多了，对自己朋友们的赞许则太少了。他们在酒店共进午餐和晚餐时度过的愉快时光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任何深

远影响，但这为其他更重大的事情提供了助力。本奇利、舍伍德和这个群体中其他乐于听她发表意见的人们让她感到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名利场》工作并参加阿冈昆圆桌会议的那些年正是她人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

帕克天生缺乏认可他人作为严肃作家或迷人明星的能力，这在她成为评论家后也一直影响着她。她不是一个容易被取悦的戏剧观众；简单来说，她不是一个戏剧迷。戏剧制作人们对于帕克在自己的专栏中发表的让他们很受伤的评价越来越气愤。其实评价本身的侮辱性并不至于引起那么强烈的受冒犯感，但是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制作人不仅是被评论的对象，更是广告商。他们可以挥舞棍棒反击。

还有些时候，就连帕克的无心之举也会引发他们的怒火。那篇让康泰·纳仕疲于应付的专栏文章甚至都不是帕克最精彩的文章之一。该文章评论的对象是一部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喜剧《恺撒之妻》（*Caesar's Wife*）。帕克对这部作品中的明星比利·伯克（Billie Burke）是这样评价的：

> 扮演年轻妻子的伯克小姐看起来青春靓丽。她在一些比较严肃的场景中表现得不错；在一些轻松的桥段中，为了表现出角色的小女孩儿气质，她的表演就像在模仿伊娃·坦圭（Eva Tanguay）。[27]

这种讽刺已经比她平常的那些都隐蔽了，然而它却导致百老汇传奇戏剧监制人，同时也是伯克的丈夫的弗洛·齐格飞（Flo Ziegfeld）冲到电话前大肆抱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伊娃·坦圭被认为是一位"充满异国风情的舞者"；而比利·伯克却代表着一种纯洁无瑕的形象。她最著名的银幕形象大概就是米高梅公司1939年拍摄的《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的好女巫格琳达（Glinda the Good Witch）。不过，这种卑贱下流的暗示可能还不是最令伯克感到受辱的。因为刚刚年满三十五岁的伯克对于帕克讽刺她年龄的怨恨，可能比对暗示她像脱衣舞娘的

还要强烈。

不管怎么说，齐格飞已经不是第一个投诉帕克这种口无遮拦的评论的人了，所以康泰·纳仕坚持让她做出改变。克劳宁希尔德带帕克到广场饭店（the Plaza）喝茶，借机告诉她说自己不想让她继续负责戏剧评论的工作了。关于帕克究竟是辞职了还是被从《名利场》彻底解雇了，各方说法不一，答案的左右摇摆取决于你读到的是谁的版本。帕克说自己点了菜单上最贵的甜点，然后愤然离席。接着她给本奇利打了电话，后者立马也辞职了。

本奇利绝对已经成了帕克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她渴望得到他的认可，还会以他为效仿的榜样。他们的朋友们怀疑两人之间是否发展出了婚外情，不过似乎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显然，帕克对本奇利来说也像本奇利对她一样重要，因为尽管本奇利有孩子要抚养，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名利场》的工作。帕克说：“这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友谊的表现。”[28]

不过，在离开《名利场》这件事上，他们其实并不像自己夸张的离场所表现得那么气愤，连他们的接班人都是他们自己选好的。帕克离开之前不久刚刚提拔了一位名叫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年轻批评家，他原本的工作是负责审核投稿。[29]当克劳宁希尔德安排威尔逊接替本奇利的执行总编的工作时，帕克很可能更高兴了。被解雇不到一年，她的文章就会重新被刊登在《名利场》上。

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在此过程中，威尔逊偶尔也会到阿冈昆喝上几杯，但是年纪尚轻、资历尚浅的他还要再过很多年才能成为写出《阿克塞尔的城堡》（*Axel’s Castle*）和《到芬兰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这样“严肃的”批评作品的受人尊敬的作家。受邀参加了圆桌会议活动的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我没觉得那些人特别有意思。”[30]不过他的确认为帕克是一个令他很感兴趣的人，因为“她的本性中充满相互

抵触的东西”。威尔逊认为帕克有别于阿冈昆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是因为她能够与严肃的人“平等地对话”[31]她的“入木三分和一针见血”让她不像其他成员那么偏狭土气。这些特质很对威尔逊的口味，他成了帕克一辈子的朋友，即便是在帕克被人遗忘、身无分文时也依然如此。威尔逊与其他许多出身于类似背景和环境的男性不同，他真心享受与思维敏锐的女性相处。他似乎抵挡不了与真正聪明的人为伍的诱惑。

*

不过帕克根本不需要对康泰·纳仕心怀怨恨。因为凭借她此时的声望，她根本不缺少工作机会。一份名为《安斯利》（*Ainslee's*）的杂志立即雇用她做戏剧批评家。帕克的轻诗歌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城中各份报纸和杂志上，她的戏剧批评文章每月都会被发表，除这些以外，她还会写一些散文。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尽管她说靠写诗挣的钱从来都不够生活，但她还是依靠自己的收入及埃迪的某种形式的贡献坚持下来了；这对夫妻在1922年时已经分居，不过他们要到1928年才会正式离婚。

所以我们可以说帕克的文章在当时肯定是非常受欢迎的，不过它们是好文章吗？从这一角度来说，她的诗歌是最不受重视的。美国人对于轻诗歌的需求日渐萎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是完全没有人再看这些东西了。我们得承认，如今看这些东西确实会觉得它没什么吸引力。它的形式过分考究，内容则都是些陈词滥调。帕克也常常以爱情为主题，所以有人批评她多愁善感。她对这些批评意见很当真，于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诗歌毫无价值。不过如果你能细细品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表现围绕着她的外在世界的诗句时常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辉。就连被她弃如敝屣的作品中都不乏精彩的妙语，比如1922年创作的《轻佻女子》（*The Flapper*）中就有这么一段：

> 她少女般的举止可能会引发激动，

她的礼数教养可能会遭人指点，

不过她能造成的伤害

绝没有一条潜水艇能造成的多。[32]

这种指责绝不是随便一说的。帕克是在无声地瞄准与她同时代的人们。帕克和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差不多是同时成名的，后者正是把轻佻女子（flappers）和轻佻女子问题（flapperdom）神话化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创作的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讲述的就是大学校园中的年轻学生爱上一位轻佻女子的故事。这部1919年出版的小说不仅销量惊人，还获得了评论界的交口称赞。菲茨杰拉德因此书而声名鹊起，简而言之就是他被视为同龄人中的贤哲。帕克和菲茨杰拉德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当菲茨杰拉德还在艰难挣扎时就相互认识了。尽管如此，帕克还是对于他获得成功之后在媒体面前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感到厌烦。1922年3月，帕克用一首名叫《一群年轻人》（*The Younger Set*）的仇恨之歌来纾解自己对于像菲茨杰拉德这样的青年才俊作家的嫉妒之情：

那些男孩儿作家；

那些要把纯文学抛在脚边的人。

每天晚上入睡前

他们会双膝跪地向孟肯（H.L.Mencken）祷告

求他保佑自己成为好男孩儿。

他们总是随身携带一大沓自己剪裁的稿纸，

还说毕竟世上只能有一个雷·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

对此我毫无异议。

他们惧怕真正的公开发表

就像你和我

面对一百万美元的礼物时会畏缩一样。

不过眨眼间

他们又要朗读自己的作品了——

无论是在商场里，

在运送谷物的升降机上，

还是在女士的更衣室里。[33]

雷·德·古尔蒙曾经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批评家，如今他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不过帕克显然是在用他来暗喻男孩儿作家们当时的主保圣人——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出版时，菲茨杰拉德只有24岁。与他同时期的人无法不注意到他并对他充满嫉妒。另一位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在读了这本小说后抱怨说："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34]

帕克也嫉妒菲茨杰拉德吗？她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总说他是自己的朋友，还说自己喜欢他的作品。不过另一些暗示则说明帕克心中有一种想要跟对方一较高下的求胜心。1921年，她在《生活》（*Lif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又见哈伯德妈妈》（*Once More Mother Hubbard*）的文章，她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篇诙谐模仿文就是"给菲茨杰拉德讲的"经典童话故事。

十九岁的罗莎琳德（Rosalind）把手肘撑在膝盖上。你能看到的只有从已经用了十九年仍被擦得闪闪发光的浴盆边露出来的带波浪的短发和她隐含焦躁的灰色眼睛。她在弯弯的嘴角处懒洋洋地叼着一根香烟。

艾默里（Amory）靠在门边，轻声地吹着口哨，他吹的是《返回拿骚楼》（*Coming Back to Nassau Hall*）。罗莎琳德的年轻貌美在他心中点燃了一簇好奇之火。

他随意地说道：“给我讲讲你自己。”[35]

这篇诙谐模仿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的模仿作品一样，都建立在对被模仿对象的仔细研究上。如果说这里面有一部分嫉妒的成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直言不讳的批判。菲茨杰拉德确实对上流社会的“随意”抱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他也对常青藤联盟情有独钟（《返回拿骚楼》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威歌）。他还喜欢安排自己书中的英雄遇到各种貌美，但整体上一团糟的年轻女性角色，所有这些女性都是模拟作家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创造的。菲茨杰拉德没有对这篇作品给出任何回应，不过如果他读到这些内容，他一定能看出帕克投出的石头和射出的箭至少有一些是正中靶心的。

菲茨杰拉德对女性人物的处理会引起帕克的注意绝不是个意外。帕克和菲茨杰拉德的很多朋友一样不喜欢他的妻子泽尔达。帕克对泽尔达的传记作者说过：“她一遇到什么不喜欢的事就生气，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招人喜欢的品质。”[36]帕克这么说可能是一种竞争心理作祟：有传闻说菲茨杰拉德和帕克之间是男女关系，不过没有任何证据留存下来。[37]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形象问题：泽尔达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媒体眼中的终极轻佻女子，这样的形象恰恰是帕克一直在抗拒的。在《人间天堂》出版之后，公众对菲茨杰拉德十分关注，而泽尔达也一直是被关注的一部分。她会在采访中说自己热爱罗莎琳德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以她为原型的。她还会说：“我喜欢这样的女孩儿，我喜欢她们的勇气，还有她们的鲁莽和挥霍无度。”[38]与她相反，帕克认为她的表现都是装出来的，帕克说不出这样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想法。

即便如此，帕克和菲茨杰拉德的友谊还是几乎持续了一生。他们太相似了——两个大部分时间里缺乏偿债能力的酒鬼兼遭遇创作瓶颈期的作家。最终，菲茨杰拉德也会认可帕克的观点，承认自己早期作品的无力，以及爵士时代无节制享乐背后的空虚。到菲茨杰拉德在1925年出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之时，他已经不再那么崇拜“随意”了。轻佻女子和富有人家的子孙到此时成了各自玫瑰花瓣上的溃烂之处。不过人们更关注的仍然是像盖茨比在西卵的豪宅这样的闪闪发光的幻象，却没有人在乎多光鲜的幻象也不过是伪造之物的现实。《了不起的盖茨比》从商业角度来说并不成功。菲茨杰拉德所处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聆听他想要传达的信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出版了被免费派发给士兵的版本，这本书才变得受欢迎起来。[39]

与帕克不同的是，菲茨杰拉德英年早逝，酗酒和肺结核联手在1940年夺取了他的生命，他去世时仅四十四岁。帕克比他多活了近三十年。当她看到躺在棺材里的菲茨杰拉德时，帕克引用了作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原话用到他本人身上：“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没有人意识到这句话的出处。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帕克也被自己设定的人格面具困住了。所有报纸杂志上都能看到她的作品，所有人都想发表她的诗歌或妙语。1927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够长的绳子》（*Enough Rope*）的诗歌作品集。令她吃惊，也让其他所有人意外的是，这本诗集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她的诗歌太流行了，以至于其中的词句和韵文都被融入了日常生活。人们在聚会中相互引用其中的内容，好让自己显得风趣非凡。《诗歌》（*Poetry*）上一位严苛阴郁的评论者在1928年写道：“几乎你认识的所有人都能直引、转引，或者哪怕是不完全准确地引用至少十几句帕克的诗文。她似乎已经取代了麻将、填字游戏和《再问我一题》（*Ask Me Another*，该年代流行的寓教于乐的游戏书）。”[40]

鉴于帕克的诗歌读起来并不会让人轻松愉快，她还能如此受欢迎就更出乎意料了。人们喜欢的正是她这种让人震惊的风格。她的技巧中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虽然被反复使用，但是每次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此时已经离开《名利场》，到《新共和》（*New Republic*）任主编的埃

德蒙·威尔逊评论了《够长的绳子》这本书。直到距今相对不算很久以前，文学界的朋友互相评论彼此的作品都还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威尔逊对于帕克的诗歌的惯用套路作出了一个精彩的总结：

> 起初是用带有滑稽感的伤春悲秋的几句话营造气氛，往后读也不过是典型的杂志上的补白短文，顶多可以说是内容上可信一些，文笔上优美一些，但也仅仅是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直到读完最后一句，你才能体会到它给整篇作品带来的让人难以想象的冲击力。[41]

这种策略也有其自身的缺点。点睛妙语出现之前的部分往往都是些陈词滥调或过分煽情的内容，也就是威尔逊所谓的“平凡无奇的幽默韵文”和“平淡无奇的女性诗歌”。评论者们总是批评帕克靠死记硬背写诗，还总说她不够原创。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些事情。当帕克使用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时，她往往就是为了利用这些内容的空洞无物，它们的不足正是帕克拿来嘲笑的对象。尽管如此，帕克还是接受了外界对她作品的批评，还总会重复那些人的观点。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就说：“亲爱的，实话实说，我的诗文太落伍了——和任何曾经流行，但如今看来惨不忍睹的东西一样。”[42]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威尔逊在内的一些人当时并不这样看待她的作品。威尔逊在为《够长的绳子》撰写的评论中提到自己发现了这些诗中存在一些引人不快的内容，但他同时认为这些诗“表现了一种不断向前的状态，创作出这些令人满意的作品的人不仅拥有引人注目的文学天赋，更拥有想要写作的纯粹需求”。他在帕克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风格，但是二者秉持的哲学理念却完全不同。威尔逊坚持认为帕克这种“锋利、辛辣的风格”[43]是她独有的。他还觉得这种风格弥补了她作品中存在的弱点。他确定她的声音是值得被所有人认真倾听的。

帕克的声音是一种带着自厌和自虐气息的声音，但是她折磨的目标

超越了她本身。你可以将她的目标概括为“身为女性的局限性”，或“浪漫爱情传说的虚假之处”，甚至是“自杀本身的小题大做”，就如她在那首举世闻名的《摘要》（*Résumé*）及类似的作品中写到的那样：

> 用刀片会疼；
>
> 投河会湿漉漉；
>
> 酸会留下污迹；
>
> 麻醉品会引发痉挛。
>
> 枪支是违法的；
>
> 上吊绳索不一定结实；
>
> 煤气特别难闻；
>
> 你还是继续活着吧。[44]

尽管帕克的大部分读者都不知道这一点，但这首诗其实是一种自嘲。帕克在1922年第一次尝试自杀时选择的就是刀片。当时她因为与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acArthur）的分手而心情沮丧。麦克阿瑟是一位记者，后来会写出一部名为《头版》（*The Front Page*，又译《犯罪的都市》）的喜剧，该剧还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大热电影《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的样板。帕克和麦克阿瑟的婚外情最后闹得很僵，在此期间帕克还做了一次人工流产。之后帕克也没有勇敢地振作起来并恢复如初。而且她似乎对很多人反复讲述过这段经历，有时候甚至是对着没有什么同情心的听众。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她选择的听众里包括一位当时还很年轻，且没什么经验的作家，这个人正是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和帕克一样，海明威在今天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觉得当初他的天才一定是马上就获得了认可，他的名气应该是从他发表第一句话时就树

立起来了。然而在1926年2月帕克第一次见到海明威的时候，他还是一位只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是由规模极小的博尼与利夫莱特出版公司（Boni and Liveright）出版的。这本书并没有在纽约引发什么轰动。帕克后来描述它得到的反响与“在曼哈顿上城河滨大道发生的一场无疾而终的狗打架”[45]差不多。是菲茨杰拉德把海明威介绍给了出版自己作品的，资金更雄厚，也更有声望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Scribner’s）。1926年春，海明威来纽约与出版商洽谈出版自己首部重要著作的事宜，也是这次洽谈达成的协议最终让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第一本真正成功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所以说，当帕克和海明威结识时，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还有很大差距。从受公众追捧的角度来说，帕克的知名度远高于海明威。这一点似乎让海明威很不自在。更让他厌烦的是，帕克听迁居海外的作家说在法国生活很愉快又省钱之后，就决定延长两人相互了解的时间，和海明威乘坐同一条船前往欧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帕克在欧洲大陆上遇到过海明威几次，有时是在法国，有时是在海明威热爱的西班牙。不过帕克显然已经开始让海明威觉得忍无可忍了。

帕克和海明威在船上时，以及后来在西班牙和法国相遇时发生了什么，谈到了什么都已经无人知晓。帕克的传记作者之一称帕克取笑了一场葬礼游行，她对西班牙人的荣誉和苦难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侮辱了海明威。不过，她肯定还跟海明威讲了关于麦克阿瑟和她的人工流产的事。我们之所以能肯定海明威很厌恶帕克的坦白，是因为他生气到决定写首诗来记录他的愤怒。他给这首诗取名为《致一位悲惨的女诗人》（*To a Tragic Poete*）：

> 用抄袭的韵律来表露
>
> 你曾经对查理抱有的怨恨和渴望

他离开了，却在你腹中留下了孩子

孩子的小手还没成型

成型的小手总是很可爱

不过孩子的脚长出来了吗

他的睾丸下降了吗？[46]

海明威用他认为是直白的打击的一句话结束了全诗：“据我观察，悲惨的女诗人就是这么产生的。”

帕克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致一位悲惨的女诗人》，没有证据证明她知道这首诗的存在。不过她的朋友知道。海明威参加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巴黎的公寓内举行的宴会时当众大声朗读了这首诗。出席这场聚会的还有圆桌会议成员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及其妻子。据称在座的人都无比惊骇。斯图尔特本人在某个时刻还爱慕过帕克。他对这首诗感到无比气愤，因此立即斩断了与海明威的友谊。不过海明威显然并不后悔写了这首诗。他把这首诗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和自己的其他文稿保存在一起。

即便是没有听过这首诗，帕克也感受到了海明威对她的不屑，而且她对此无法一笑了之。尽管海明威当时还不出名，但是他已经获得了一群文学界人士的认可。这些人的认可正是帕克也想得到的。帕克并不像其他人以为的那样毫无野心。海明威成了帕克的一个燃点，她总会从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打探消息，问他们觉得海明威喜不喜欢她。后来帕克还写了两篇关于海明威的文章，一篇是书评，一篇是传略，这两篇文章都被刊登在当时刚刚创立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两篇文章都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在写作时怀着怎样的焦虑心情。

“如所有读者都知道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帕克在她的评论中这样写道。“他做的那些简单的事情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别人也尝试做同样的事，看看他们的结果吧。”[47]帕克通常不擅长直白的赞美，所以那篇海明威的传略中自然也带着别扭的，甚至可能是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带刺的言辞。帕克不断评论海明威对女性的诱惑力，并将这一点归咎于书上的作者照片。帕克还说海明威对批评意见过于敏感，但她认为海明威有资本这样，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创造出了一些该被用酒精保存起来的范例”。最后，帕克说海明威拥有非凡的勇气和胆量，还称赞了他管这些优点叫“决心”的说法。整篇文章读起来就像一份字数过多的道歉信，收信人不但不会原谅道歉人，还会因此觉得不自在。

像往常一样，帕克再一次成功地将其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内化了。没有人能比多萝西·帕克更讨厌她自己。这正是海明威不曾理解的地方。

*

《纽约客》当时的掌舵人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也是一位圆桌会议的常客，这份杂志就是由他于1925年创立的。杂志的定位是精致高雅、符合大都市品味。它的目标读者是“迪比克的老夫人们”之外的群体。不过罗斯本人从来不是个温文尔雅的角色。虽然《纽约客》的员工最终会变得忠诚于他，但他看上去总是有些缺乏风度和品位。他始终决定不了要如何看待女性。一方面，他的妻子简·格兰特（Jane Grant）公开声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格兰特的信念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纽约客》发行之初的几年里，那上面刊登的女性和男性作家的文章数量不相上下。[48]另一方面，在1927年加入《纽约客》的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却称，罗斯总是将男性的无能归咎于“可恶的学校女教师”。[49]帕克欣赏罗斯完全的自信，但是她在开始为罗斯创作稿件之前

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了。实际上，帕克为提高杂志名气而发挥的作用反而比杂志为提高帕克名气作出的贡献大得多。

在《纽约客》艰难维持的最初几年里，帕克只是偶尔在这上面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或诗歌。直到罗伯特·本奇利不得不暂时辞去《纽约客》的图书评论家的工作，并由帕克填补了这个空缺之后，她才将这份杂志打造成了一份著名的出版物。帕克在这里发表文章时，用的还是本奇利选择的笔名——“永远的读书人（Constant Reader）”。

作为一名书评人，帕克堪称难忘金句女王。她就A. A.米尔恩（A. A. Milne）在作品中使用过度甜腻的口吻回击的那句“永远的读书人吐了（Tonstant Weader fwowed up）”[50]至今仍很出名。不过很多帕克最精彩的讽刺针对的目标都是如今已经被大众遗忘的作品，比如帕克曾说“玛戈·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和自己谈恋爱的内容将成为文学史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之一而存在下去”。[51]鉴于此，总有人觉得帕克把精力浪费在了一些不值得她评论的作品上。琼·埃科塞拉（Joan Acocella）就认为从这一点上看，埃德蒙·威尔逊要比帕克做得好，因为威尔逊评论的都是一些虽然没有那么流行，但本质上更重要的作者的作品。埃科塞拉写道：“‘永远的读书人’专栏并不是真正的书评专栏，反倒更像单口相声演员的例行表演。”[52]这个评论略微有些不公平是因为不同的杂志针对的读者群不同，《纽约客》从来不渴望成为发表严肃的、知性的批评的场所，它追求的只是精彩的文章。而要写出精彩的文章，选择负面评论的角度总是比正面的容易，因为作者可以通过开玩笑来提升文章的精彩程度。

幽默搞笑其实能够实现比人们通常承认的更机智、更有自知之明的尖刻效果。帕克以“永远的读书人”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其实不算是书评。这篇发表于1928年2月的文章是关于一些被她称为“文学扶轮社友（literary Rotarians）”[53]的人的。她在这里表达厌烦之

情的对象是一群出入纽约的一些文学场合，在各个聚会上就各个出版商夸夸其谈的人。这些人本身可能也是某种作家。帕克认定他们就是那些用诸如“和书呆子一起鬼混”或“与书虫一起转圈”之类的笔名发表专栏文章的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些装腔作势的人，他们只是披着文学的外衣，实际上没有作出任何评论：“文学扶轮社友把我们和他们自己带到了一个你写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的阶段；一个所有作家都平等的阶段。”

像帕克这样拥有尖刻思想的人会觉得文学扶轮社友的态度是对自己的冒犯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她做的是比捍卫使用评判来衡量文学价值更复杂、更明确的事。毕竟，她写的东西都会被发表在这个名为“永远的读书人”的专栏中。尽管她也写了很多广为人知的诗歌，但帕克始终被认为是世俗的、喜好社交的女人。她描述的可能就是圆桌会议中的某些成员，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在名字特别诙谐幽默的专栏中写文章。但最重要的是，她描述了一些后来她开始担忧也适用于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她和她的大多数朋友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没有价值的东西上。

1957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帕克告诉采访者说：“我总想要表现得古灵精怪。那真是可怕的想法。我本应该更有头脑些。”[54]这种想法顽固地纠缠着帕克，且随着她越来越成功而变得愈发强烈。它就像一把插在帕克心上的刀，不但没能激发她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反而毁掉了她的创作欲望。帕克肯定不是当时唯一厌恶这种“成熟老练”的审美趣味的人。比如1930年10月，《哈泼斯杂志》上就刊登了一篇名为《向成熟老练说再见》（*Farewell to Sophistication*）的文章，其中还旁敲侧击地将帕克定义为这种空洞、无用的“世故言谈”[55]的主要支持者。

这种幻想破灭实际上从1929年就已经不再是说笑了。矛盾的是，就在那一年年初，帕克还获得了一个职业生涯中的巨大成功：她发表了一篇后来将为她赢得欧·亨利奖（O. Henry Award）的短篇小说，由此证明

她的才华也可以被用在创作虚构类文学作品上。但是这篇小说好像是帕克对自己的失望之情的一种寓言。小说的名字叫《高个子的金发女郎》（*Big Blonde*），其中的女主人公黑兹尔·莫尔斯（Hazel Morse）被帕克描述为一位拥有“染出来的金发”的女士。实际上，关于黑兹尔的一切都像是编造的，是一种假扮。黑兹尔出场时已经人到中年，她年轻时的生活很风光，她把时间都花在了“温顺随和”地招待男士上。如叙述者有预兆性地告诉我们的那样：“男人们喜欢温顺随和的人。”[56]不过黑兹尔对继续这种表演感到厌倦——“她越来越需要有意识地去扮演，而不是自然地流露出那种感觉”。再加上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已经不那么容易获得富有男人们的注意了。于是她弄来了一些佛罗拿（veronal）药片［一种巴比妥类药物，相当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版本的安必恩（Ambien）］，不过她的自杀尝试没有成功。

《高个子的金发女郎》显然含有一些自传性的元素。帕克也曾采用同样的方法尝试自杀（但没有成功）。她与埃迪的离婚也是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情绪下完成的，这与黑兹尔的婚姻失败具有相同的特征。不过帕克这种深刻的愤怒并不完全是针对埃迪·帕克的，也不是针对男性这个整体的。

无论是帕克还是黑兹尔都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对男性的执迷不悟。说到男性，作家和她创作的角色其实都抱有一种骑墙态度。她们对于圆满是什么样子有自己的设想，而且认为男性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在现实中，男人总是让她们失望。男人只追求肤浅的联系，他们要找的是“温顺随和”的人，而不是有渴望、有志向、有自己的需求的活生生的人。不过这篇小说中体现出的自传性质的回响不是靠几个具体细节表现的，不在于黑兹尔是不是吃了同样数量的安眠药，不在于她也从威士忌中寻求慰藉，更不在于可能是从帕克抛弃埃迪的离婚过程中借用的某些桥段。这种回响体现在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失望感中：其中当然有对男性的失望，但也有对世界，以及对她自己的失望。

也是在这一年，帕克第一次收到了几个请她到好莱坞为剧本润色的邀约。作为一位著名的风趣作家，帕克从邀请方那里得到的条件都是优于当时的一般标准的。最终帕克接受了一个周薪300美元，为期三个月的工作。挣钱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她也渴望借此机会换个环境放松一下。虽然她很不喜欢好莱坞，和她同时代的人一样，帕克也认为好莱坞是个愚蠢的地方，但她在那里的工作相当成功。她与别人一起创作了不少成功的电影剧本，珍妮·盖诺（Janet Gaynor）主演的1934年版《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不仅为她赢得了赞美，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奥斯卡奖和大笔的钞票。这些钱都被用来买杜松子酒和宠物狗了。帕克买了很多狗，其中一条贵宾犬被她取名为“陈词滥调（Cliché）”。帕克显然是为这些用钱买来的东西感到喜悦和享受的，不过宽裕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问题就在于靠这个工作挣钱太容易了，所以帕克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她几乎完全停止写诗了，连短篇小说也只有在手头宽裕的时候才偶尔写一篇。起初，这种方式运行得还算顺利；她在1931年、1932年和1933年时还能每隔几个月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可是接下来，短篇小说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间隔一整年才发表一篇小说。至少有一次，她已经收了创作一部小说的定金，但是最终没能完成，于是只好把钱退了回去。她逐渐成了那种与出版商的通信内容主要都是在道歉的作家。帕克能够编出“我的作业被小狗吃了”那样让人无法生气的理由，比如1945年，在与维京出版公司（Viking Press）的编辑帕斯卡尔·科维奇（Pascal Covici）就某个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项目通电报时，帕克就是这么说的：

> 我发电报而不是打电话的原因是我都没脸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是写不出来/我从没这么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过/从没这么想让什么文章足够好过/但是我得到的只有一摞摞写着感觉不对的词句的稿纸。我能做的只有继续加油/希望上帝能帮我完成它。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怎么这么难/或者我为什么这么无能。[57]

不过帕克的失望之情也获得了某些缓解。第一，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艾伦·坎贝尔（Alan Campbell）。她是在1934年嫁给这位又高又瘦，像电影明星一样英俊的男人的。坎贝尔自认为是夫妻之间比较会照顾人的那一个，他会监督她的饮食，还异乎寻常地关注她的着装，以至于其他人都开始怀疑他的性取向。（然而就算这是真的，朋友们和观察者们也总是说，当他们处于热恋中时，二人之间在身体上的相互吸引是显而易见的。）这段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帕克和坎贝尔会离婚，之后又复婚，最后再次离婚。最终坎贝尔会在西好莱坞的一栋小房子里自杀。那栋房子是他们无论在分居时还是离婚期间都在共同居住的。不过，在这段感情最好的时候，二人确实如胶似漆。

此外，帕克还参与到了政治中——不过很多她的仰慕者都说她在这个领域里也没能取得成功。促使帕克行动起来的火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人们对于处决两名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的抗议。因其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而为波士顿警方熟知的萨科和万泽蒂是以谋杀和持械抢劫的罪名遭到逮捕的，但是很多美国文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们都坚称二者在这些指控上是完全无辜的。像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这样的人一样，帕克坚定支持释放萨科和万泽蒂的要求。最终，作家和政治家的诉求都被无视，这两个人还是被处决了。不过在那之前，帕克已经在1927年因为参加一次游行而遭逮捕，这个消息也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她在被扣押几个小时之后获释，前提是她就“游荡和闲逛”的罪名认罪，并缴纳了5美元罚款。当被媒体询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有罪的时候，她回答说：“好吧，我确实闲逛了。”[58]

第一次参加抗议的滋味让帕克渴望更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帕克还会投身于无数政治和社会事业。她开始对没有组织起工会的劳动者们抱有真挚的同情，她还会参加抗议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服

务人员所处困境的活动。帕克总是会成为在好莱坞兴起的一些新的政治组织的领头人：比如好莱坞反纳粹联盟（Hollywood Anti-Nazi League），电影艺术家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协会（Motion Picture Artists Committee to Aid Republican Spain），最终还有电影剧本作者行业协会（Screen Writers Guild）。

有些人觉得他们很难不质疑帕克新发现的这种对平等主义的坚定信念，毕竟她和风光迷人的富人之间的联系还是很频繁的。不过，无论此时的她境况如何，帕克毕竟曾体会过物质生活的富足突然消失是一种什么感受。她偶尔还要面对财务紧张带来的恐慌，这很可能使得她对其他身处困境的人更具同情心。无论她和富人们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她那双在很多年前就被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打磨得雪亮，专门发现可取笑之事的双眼让她永远不可能与富人休戚与共。

除此之外，她的政治活动还为她提供了自我批评的新途径。帕克总是用她此时参与社会和政治事业的严肃性批判自己之前进行的活动多么肤浅。比如1937年，在一篇为美国共产党创办的《新群众报》（*New Masses*）撰写的文章中，帕克就这样写道：

> 我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我唯一参加过的就是那个并不特别勇敢的小团队，我们用幽默感这件过时的服装掩盖赤裸的心灵和思维。我听到别人这样说，所以我也跟着说：嘲讽是最有效的武器。我不认为我真的相信这句话，但相信是更容易、更让人安心的选择，所以我还是这么说了。如今我知道，我知道有些事情从来就不是可笑的，也永远不会变得可笑。我还知道嘲讽可能是一个保护的盾牌，但它从来不是武器。[59]

随着大萧条的结束以及整个国家越来越接近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帕克的自我鞭打也变得越来越严苛。1939年时，帕克在美国作家代表大会（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上发表演讲。这是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群体，帕克在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彻悟：

> 我不认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哪个词的隐含意义比“成熟老练（sophisticate）”的更令人恐惧，唯一能跟它相提并论的大概是“社会名流（socialite）”。真正的字典上对它的解释也不怎么招人喜欢。它作动词时的意思是：误导、使复杂、使虚伪、篡改，以及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掺假。你也许以为这个解释已经够明白了，不过实际上，它还有更多的深意。如今，这个词的意思似乎变成了：成为有文化、有感情的孤立主义者；嘲讽那些为自己的同胞和世界贡献一切的人；永远高高在上藐视众生，而不关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切；只嘲笑那些根本不可笑的事物。[60]

这段话揭示了一些真理。“成熟老练”有它自身的缺点，包括执迷于表面的东西，以及随意性。然而帕克说的和写的这些后来被证明无非是昙花一现。人们依然会把那首名叫《摘要》的诗歌介绍给别人，依然会引用帕克对A. A.米尔恩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评论。人们只记住了她在认为自己已经写不出东西来很久之后的1957年时说的话：“至于我，我想要富有。我也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我希望它们同时发生，但是如果那样的美事不可能，我宁愿选择有钱。”[61]

但是在去了好莱坞之后，在参加了政治活动之后，绝大多数认识帕克的人似乎都开始将她视为一个失败。她参与的那些电影都被认为是配不上她的才华的。编写政治标语的差事对于这样一个以取笑所有事为专长的人来说似乎太过严肃了。她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的野心也被认为逐渐消失了，因为她再也没能重复《高个子的金发女郎》的成功。最糟糕的可能还要数这些批评是如何渗透进她对自己的评价的：从任何角度来说，她都是一位成功的作家，甚至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不过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帕克似乎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相信自己已经被人遗忘。她对写小说越来越心不在焉，至于诗歌，则彻底不写了。

在失去了帕克的严苛独白的鞭策之后，其他人就可以更安心地发表赞美了。1928年，在评论一本显然非常滑稽的关于俄国神秘主义者拉斯

普京（Rasputin）的作品时，一位署名丽贝卡·韦斯特的作者说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美国幽默作家写的。她在其中发现了“多萝西·帕克的独特天赋的影子”，[62]她认为帕克是一位“超群的艺术家”。韦斯特尤其喜欢帕克在此几个月前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只要一小杯》（*Just a Little One*）的短篇小说。它讲了一个女子在酒吧里醉得不省人事，梦到自己把一匹拉马车的马带回家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故事。韦斯特对于男性也很绝望，而且她也知道如何把这一点写成文章。

---

[1] 雷格泰姆是一种原始的音乐风格，它把非洲音乐节奏的基本元素引入流行音乐，为爵士乐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雷格泰姆最初是作为舞蹈音乐，1897年至1918年十分普及，在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美国黑人社区的红灯区尤其流行。（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Frank Crowninshield，“Crowninshield in the Cubs’ Den，” *Vogue*，September 15，1944.

[3] “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 in *Collected Stories*（Penguin Classics，2002）.

[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帕克接受Marion Capron采访，*Paris Review*，Summer 1956。

[5]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帕克接受Marion Capron采访，*Paris Review*，Summer 1956。

[6] 见于Marion Meade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论文中的照片，照片内容是帕克童年时写的一些短笺。

[7] 即新英格兰地区的名门世家。

[8] 参见Larry Tye，*The Father of Spin*：*Edward L. Bernays and the Birth of Public Relations*（Picador，1998）。

[9] “In Vanity Fair，” *Vanity Fair*，March 1914.

[10] “Any Porch，” *Vanity Fair*，September 1915.

[11]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12] From a section on *Vogue* patterns，October 1，1916，101.《服饰与美容》中的插图说明从来不署名，但这里引用的例子已经被许多学者认定是出自帕克笔下。

[13] “The Younger Generation，” *Vogue*，June 1，1916.

[14] Alexander Woollcott，*While Rome Burns*（Grosset and Dunlap，1934），144.

[15] “Why I Haven’t Married，” *Vanity Fair*，October 1916 （署名是多萝西·罗斯柴尔德）。

[16] “Interior Desecration，” *Vogue*，April 15，1917（署名是多萝西·罗斯柴尔德）。

[17] “Here Comes the Groom，” *Vogue*，June 15，1917.

[18] “A Succession of Musical Comedies，” *Vanity Fair*，April 1918.

[19] “Mortality in the Drama：The Increasing Tendency of Our New Plays to Die in Their Earliest Infancy，” *Vanity Fair*，July 1918.

[20] “The Star-Spangled Drama：Our Summer Entertainments Have Become an Orgy of Scenic Patriotism，” *Vanity Fair*，August 1918.

[21] “The Dramas That Gloom in the Spring：The Difficulties of Being a Dramatic Critic and a Sunny Little Pollyanna at the Same Time，” *Vanity Fair*，June 1918.

[22]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23] 参见“Inside Stuff，” *Variety*，April 5，12，1923。

[2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25] 转引自Dorothy Herrmann，*With Malice Toward All*：*The Quips*，*Lives and Loves of Some Celebrated 20th-Century American Wits*（Putnam，1982）。

[26] O. O. McIntyre，“Bits of New York Life，” *Atlanta Constitution*，October 29，1924.

[27] “The Oriental Drama：Our Playwrights Are Looking to the Far-East for Inspiration and Royalties，” *Vanity Fair*，January 1920.

[28]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29] 参见Edmund Wilson，*The Twenties*（Douglas and McIntyre，1984），32-34。

[30] 参见Edmund Wilson，*The Twenties*（Douglas and McIntyre，1984），44-45.

[31] 参见Edmund Wilson，*The Twenties*（Douglas and McIntyre，1984），47-48.

[32] “The Flapper，” *Life*，January 26，1922.

[33] “Hymn of Hate，” *Life*，March 30，1922.

[34] Heywood Braun，“Paradise and Princeto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April 11，1920.

[35] “Once More Mother Hubbard，” *Life*，July 7，1921.

[36] Nancy Milford，*Zelda*：*A Biography*（Harper Perennial，2001），66.

[37] 参见Scott Donaldson，“Scott and Dottie，” *Sewanee Review*，Winter 2016。

[38] “What a ‘Flapper Novelist’ Thinks of His Wife，” *Baltimore Sun*，October 7，1923.

[39] 参见，例如：Maureen Corrigan，*So We Read On*：*How the Great Gatsby Came to Be and Why It Endures*（Little，Brown，2014）。

[40] Sterling North，“More than Enough Rope，” *Poetry*，December 1928.

[41] Edmund Wilson，“Dorothy Parker’s Poems，” *New Republic*，January 19，1927.

[42]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43] Wilson，“Dorothy Parker’s Poems.”

[44] “Résumé，” *Enough Rope*（Boni and Liveright，1926）.

[45] “Constant Reader，” *New Yorker*，October 29，1927.

[46] Ernest Hemingway，“To a Tragic Poetess，” in *Complete Poem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3）.

[47] “Reading and Writing，” *New Yorker*，October 29，1927.

[48] Ben Yagoda，*About Town*：*The “New Yorker” and the World It Made*（Da Capo，2001），77.

[49] James Thurber，*The Years with Ross*（Harper Perennial，2000），4-5.

[50] 米尔恩在《小熊维尼》系列作品中使用了很多模仿婴幼儿发音习惯的幼稚拼写，帕克在这里故意改变了“Constant Reader”（永远的读书人）和“throw up”（呕吐）的拼写方式，是为了模仿和取笑米尔恩的风格。

[51] “Constant Reader，” *New Yorker*，October 22，1927.

[52] Joan Acocella，“After the Laughs，” *New Yorker*，August 16，1993.

[53] “Constant Reader，” *New Yorker*，February 8，1928.

[5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55] La Mar Warrick，“Farewell to Sophistication，” *Harper’s*，October 1，1930.

[56] “Big Blonde，” *Bookman*，February 1929.

[57] 这封电报的时间是1945年6月28日，电报的图片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参见，例如：“I can’t look you in the voice，” *Letters of Note*（June 17，2011）可见于http：//www.lettersofnote.com/2011/06/i-cant-look-you-in-voice.html。

[58] “NY Pickets Parade Boston Streets in Bu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August 12，1927.

[59] “Incredible，Fantastic... and True，” *New Masses*，November 25，1937.

[60] *New Masses*，June 27，1939.

[61]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62] Rebecca West，“What Books Have Done to Russia，” *New York Herald Tribune*，October 28，1928.

第二章 韦斯特

丽贝卡·韦斯特就像是一个英国版的帕克，她们都是在有生之年就受到高度赞美的女性作家。不过年轻时的韦斯特也曾沉浸于艺术家和作家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实验道德，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及她的姐姐瓦妮莎（Vanessa）热衷于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set）[1]一样。从一开始，韦斯特的世界中就充满了“严肃的人”，所以她在他们中间感到很自在，这种她就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归属感是帕克一直不曾拥有的。然而韦斯特是一个从不缺少自信的人，相反，她的自信心往往正是帮助她接近自己的雄心壮志的东西。

韦斯特让小说家H.G.威尔斯（H.G.Wells）成功记住自己的方式是在一份名为《自由女性》（*Freewoman*）的报纸上对其进行攻击。他们俩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对因为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份极度贬低的书评而结识，后来还成了情侣的男女。当时还很年轻的韦斯特读了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威尔斯的小说《婚姻》（*Marriage*），结果她一点也不喜欢这本书。威尔斯是当时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的事实并没有让韦斯特胆怯，针对威尔斯骄傲地宣称的性激进主义，韦斯特这样写道：

> 他肯定是小说家中的老处女，就连像冷掉的白色酱汁一样凝结［在他的小说中］的对性的执迷都像是老处女的疯狂而已，是长时间专注于飞船和胶质的思维对肉体的反应。[2]

让如今的人们记住威尔斯的是他的飞船和像《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又译《世界大战》）和《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这样的浪漫科幻小说，但是在韦斯特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全部作品大多还是像《婚姻》这类关于爱与性的坦白式的、半遮半掩的自传体小说。在这本小说之前被创作出来的《安·韦罗尼卡》（*Ann Veronica*）就讲述了一个与韦斯特刚刚让自己陷入的这段婚外情很类似的丑闻故事。比起具体情节，这些书籍传递的关于婚姻生活的悲观看法的主题反而更容易被记住；美满的婚姻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像某种牢笼。每个故事似乎都是为了一点一点地动摇婚姻能带给人永恒的安逸和幸福的主张。

从理论上说，这一点应该能够让韦斯特和威尔斯成为天然的盟友。威尔斯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支持两性平等的人。他是《自由女性》的支持者和忠实读者。他通常会十分小心地将他对婚姻的批判表现为追求女性和男性的解放。他认为婚姻夺走了女性实现她们最重要、最有满足感的追求的机会。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他对女性人格的概念的是，他显然相信大多数女性只对室内装饰和潮流服装感兴趣。韦斯特要求威尔斯回答自己的问题：

>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有些女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值得爱的男人（威尔斯先生下一次坐在管子里进行时间旅行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男性同行乘客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不可爱得不可救药），她们也不觉得荷兰时钟有任何诱惑力，她们像大多数人一样记不住自家餐厅的墙纸颜色，她们充满智慧，能在五分钟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就不再为此费心，那么她们要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猜是去打桥牌，或者也可能是接受国家进行的安乐死。[3]

非常值得赞扬的是，威尔斯并没有感到受辱。他没有以一副怒气冲冲、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编辑写什么抗议信。相反，他邀请韦斯特到自己和妻子简（Jane）居住的教区长住所做客。这种在面对尖锐的批评时表现出的成熟十分令人钦佩。就在发表了这篇评论文章的当月月底，韦斯特接受了邀请，到威尔斯家喝茶。她给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甚至可能比她本来打算留下的还好。不知道为什么，不认同对方观点的时候往

往也是韦斯特最有魅力的时候。

韦斯特会有这样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是很自然的。部分原因在于她的成长环境。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的伦敦是一个比纽约更激进、更好战的地方。当时的大不列颠已经不是世界的文化中心——这个头衔应该属于法国，或者也可能是德国——不过这里依然是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里的思想家和作家们关注的首要问题都是选票和金钱，所以他们不太会像纽约的人们一样写那些让帕克感到无比厌烦的无忧无虑、爱开玩笑的文章。在二十世纪的大约头十年中，一位英国作家的生活中只有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社团和妇女参政论者示威这两件事。

不过，韦斯特还是有一些浪漫主义倾向的，所以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投身政治或写作。起初，她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女演员，因为她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爱丁堡演出公司里待了几个月。可惜命运对她另有安排。1910年，她乘地铁前往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Dramatic Art）面试的途中在候车站台上晕倒了。三位女士帮助了她，韦斯特在给不认同自己的选择的姐姐写信时说其中一位女士忍不住惋惜道："可怜的孩子——一个女演员！我来出白兰地的钱。"[4]

这是个不吉利的征兆。虽然韦斯特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但她连一年都没坚持下来。因为体质虚弱，她经常会晕倒。而且，尽管韦斯特当时的照片显示她是一个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和一头浓密有光泽的秀发的年轻姑娘，可她总说自己被认定没有漂亮到可以成为女演员。韦斯特从很早就认清了，如果她想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她就只能靠写作来实现目标。

那个时候她还在使用自己冗长的本名署名。西塞莉·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Cicely Isabel Fairfield）是一个过分讲究的名字，容易让人误以为名字的主人性格温和、逆来顺受，然而这些特点是韦斯特一辈子都不曾有过的。和帕克一样，韦斯特也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她从那里继

承了某种反射性的自我防御机制。她有一个漂泊不定的父亲，就是那种你会在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5]的小说中读到的父亲形象：他们衣着光鲜，风趣幽默，受到所有孩子的喜爱。不过那仅限于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而他并不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韦斯特在一本依据自己的童年生活创作的小说中形容他的父亲查尔斯·费尔菲尔德（Charles Fairfield）是一个“糟糕的普洛斯彼罗（Prospero）[6]，甚至被从自己的岛屿上驱逐出去，不过他依然是一位魔法师”。[7]这样的描述比帕克以为的还要准确。他的父亲竟然真的是一位花招大师，能够天衣无缝地隐藏自己的秘密：韦斯特的一位传记作者最近挖掘到一个信息，她的父亲在与她的母亲结婚前曾经进过监狱，然而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女儿对此似乎都一无所知。[8]

如果费尔菲尔德是一个能养家的人，那么他的性格缺陷可能还容易被忽略一些。然而实际上，他对任何事的专注时间都不足以长到能让他有所建树。起初他是一名任性不羁的记者，后来又打算创业做生意。如果他挣过哪怕一点点钱的话，那些钱也都因为赌博输光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计划是到塞拉利昂去，靠倒卖药品挣钱。结果他去了不到一年就身无分文地返回英格兰。这一次他再无脸面回家，而是选择独自生活，直到在利物浦的一间肮脏的寄宿公寓里去世为止。他死的时候，他的三个女儿都还没有成年。

成年之后的韦斯特对父亲的评价非常严苛。她会这样描述他：“我不能说我父亲堕落了，因为堕落还都有个度呢。”[9]韦斯特还替她母亲感到受辱。伊莎贝拉·费尔菲尔德（Isabella Fairfield）在结婚前曾是一位有天赋的钢琴家，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不过查尔斯的各种冒险带来的压力彻底毁了妻子的生活。她总是一副憔悴不堪、身心俱疲的样子。韦斯特说：“有这样一位母亲是一种奇特的历练。我从来不曾觉得她让我丢脸，但这件事总让我感到气愤。”所有事加在一起让韦斯特相信，婚姻是个悲剧，或者至少是一种值得可怜的命运。

然而，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父亲的失败以可能的最好的方式定义了女儿的人生。这件事给韦斯特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那就是自力更生的必要性。你不能依靠男人。浪漫小说里的内容全是骗人的。在关于“获得解放的女性”的概念存在之前，韦斯特就已经懂得女人通常还是要靠自己谋生活。她似乎从不怀疑她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鉴于此，韦斯特会受到妇女参政论者吸引的原因就很清楚了：她认为这些人的目标很重要，而且是符合她的个人经历的。除此之外，她还对她们吵闹、无序的风格感兴趣。韦斯特从小被培养成了一位斗士，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两个姐妹争论。在政治行动主义中，韦斯特有空间发挥自己天然的魅力。她很快就加入了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女儿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的队伍。这对母女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妇女参政论者，她们的组织——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是当时的运动领导机构。潘克赫斯特母女在当时就像今天的娱乐明星一样受人瞩目。一篇有代表性的美国报纸新闻提要是这样写的：“搅动全英格兰的改革运动；总指挥是个漂亮姑娘。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年轻富有、清秀标致，还是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主要组织者。”[10]

韦斯特经常和她们一起游行，并且对她们的工作充满敬意，不过她始终无法融入她们的世界。潘克赫斯特母女，特别是克丽丝特布尔本人，都是妇女参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她们勇猛、忠实地捍卫这项事业。韦斯特对此深感敬佩，她尤其崇拜埃米琳：

> 当她站在高台上，提高自己已经嘶哑，但依然甜美的声音发表讲话时，人们会觉得她像风中的芦苇一样瑟瑟发抖。不过这个芦苇是用钢铁打造的，它的力量无比强大。[11]

韦斯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对文学的偏爱。她总是在读各种

小说。她对于性自由的理念的兴趣是在一个更艺术性的圈子里培养起来的，而那个圈子是相对来说过分正经的潘克赫斯特母女不愿涉足的。

另一位名叫多拉·马斯登（Dora Marsden）的妇女参政论者成了对韦斯特产生更关键影响的人。与韦斯特不同的是，马斯登上过大学，她毕业于略带无产阶级性质的曼彻斯特欧文斯大学（Owens College）。马斯登与潘克赫斯特母女一起工作了不到两年。为了脱离她们，马斯登向韦斯特及其他一些朋友提议一起创建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就是《自由女性》［后来经过重组，该报被重命名为《新自由女性》（*New Freewoman*）］。它将比普通的女权主义者报纸更加充满雄心，它会允许自己的作者就时事话题发表范围更广的意见。马斯登希望它能够让参加到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中的那些真正的作家们脱离形式的束缚，抛开宣传口号似的陈词滥调。这些想法对韦斯特很有吸引力，她为能够在《自由女性》中享有相对宽松的撰稿自由而无比兴奋，这样她就可以发表那些可能会让她身为苏格兰长老会信徒的母亲惊恐万分的关于性和婚姻的观点了。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姓氏，韦斯特从此时起选定了丽贝卡·韦斯特这个后来她用了一辈子的笔名。

韦斯特宣称自己只是随便选了一个笔名，就为了逃避她的本名暗示的那种“金发美女”[12]、“美国甜心”的形象。她选择的笔名听起来确实比她的本名刚强了不少。这个名字出自易卜生的戏剧《罗斯莫庄》（*Rosmersholm*）。剧中的鳏夫和他的情妇因为这场婚外情给他已去世的妻子带来的痛苦而逐渐陷入深深的愧疚中。情妇承认自己加重了去世妻子的痛苦。最终，在戏剧的结尾，两个人双双自杀。这个情妇的名字就叫丽贝卡·韦斯特。

这层层潜在的没有被意识到的深意足够另写一本书了。比如与不常在身边的父亲断绝关系；再比如最初的，虽然有些矛盾的向戏剧方面发展的雄心（以及为什么偏偏是一个易卜生笔下的角色）；除此之外，这

个名字还很有预见性，因为韦斯特最终也会陷入一场人尽皆知的婚外情。然而，韦斯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局外人、一个被鄙弃的人、一个最终因为难以承受的愧疚而自杀的人的名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韦斯特有一个特点，她一生都不惧怕在自己的作品中展露情绪。她也很少在文章中作模棱两可的表述，还总是使用第一人称来提醒读者，别忘了他们身处的是以她的主观为权威的世界。不过韦斯特的一个朋友告诉《纽约客》，韦斯特“其实比任何人的脸皮都薄，就好像是某种心理上的血友病患者一样”。[13]她的作品直接剖析了她的思想、她的渴望和她的感觉。她不像帕克一样自厌。她的自我防护是另一种样子的。韦斯特会用她的人格来淹没你。她的所有作品可以被比作一个漫长连贯的句子，偶尔打断连贯的标点符号是那些因为缺钱才不得不写的东西。表面上，她似乎非常自信，但这其实只是一个精心制作的面具。她会为一切事情忧心忡忡，她会担心钱，担心爱情，担心几乎所有她就其发表过观点的问题，尽管她的观点会让人误以为她无比自信，无比笃定。

不过她的观点确实从一开始就是自信和笃定的。韦斯特有一种选择目标的本领。她使用新笔名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针对当时特别流行的爱情小说作家玛丽·汉弗莱·沃德（Mary Humphry Ward，笔名汉弗莱·沃德夫人）的。依据年轻的韦斯特的观点，这个女人“道德败坏”。有一位男士愤怒地给《自由女性》写信，无端指责韦斯特是在为工业主义辩护。韦斯特用一个像是在优雅地朝自己的对话者竖中指一般的表态作为她回应文章的开头：“这真是最让人扫兴的了。”[14]她的大胆总是能惹人发笑，至少她发表的文字是这样的。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韦斯特用她的书评炮轰了威尔斯，然后又去他家喝了茶。韦斯特对于威尔斯夫妇的第一印象比他们对她的差多了。她认为威尔斯长相怪异，“声调还有些高”。[15]威尔斯则认为那天的韦斯特是一位“奇妙地混合了成熟和幼稚两

种气质的”[16]年轻女士。最终在他们之间像用打火石敲击钢板一样打出火花的是知识层面的相互吸引。威尔斯并不是那种会逃避挑战的人，所以韦斯特那种难以捉摸的气质吸引了他：“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我怀疑世上根本没有过像她一样的人。”另一方面，韦斯特则向多拉·马斯登坦白说自己为威尔斯的思想着迷。

事实证明，韦斯特在那篇书评中对威尔斯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起初，威尔斯对待她的方式就像她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一样古板。诱惑都被融入了充满智慧的讨论中。不过尽管韦斯特已经有所表示，威尔斯还是拒绝与她发生身体接触。威尔斯的表现并不是出于对妻子简的尊重。威尔斯夫妇的婚姻是开放性的，简完全清楚他的那些婚外情。但是威尔斯当时已经有一名情妇了。他的理智似乎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毕竟，就算是对他这样一个放纵的男人来说，同时拥有两名情妇也会吃不消。

尽管如此，威尔斯保持正直的决心还是只维持了几个月。1912年底的某一天，威尔斯在自己的书房里意外地和韦斯特接吻了。这在两个普通人之间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段已经向着婚外情发展的感情中出现的单纯的挑逗罢了。然而在两个格外好分析的作家之间，这件事就成了让这种相互吸引达到圆满的顶峰所必需的某种纠结冲突。可是起初，威尔斯再次退缩了，韦斯特则因为他的拒绝而陷入了精神崩溃。

一个如此充满智慧的女性却会因为感情上的挫败而万念俱灰是无法被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权主义理念认同的。不过韦斯特当时才十九岁，威尔斯似乎是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对象。她像往常一样将自己的悲痛情绪融入优美的文字当中，不过她并没有把这些内容发表出来。我们是从一封韦斯特写给威尔斯，但是可以确定并没有被寄出的书信中发现这些内容的。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要么会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么会做出一些

比死亡更让我粉身碎骨的事情。[17]

韦斯特在信中指责威尔斯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想要的世界是一个所有人都像木偶一样对待彼此的世界，一个有人陪你争吵陪你玩耍的世界，一个人们只能愤怒和痛苦，却不能充满渴望的世界。”韦斯特不能容忍这样的对待：

> 当你说“丽贝卡，你在胡言乱语”的时候，你的口气中带着一种确定的明智：你觉得自己真正掌控住我了。我不认为你是对的。不过我知道你会从把我看作一个精神错乱、因为毫无必要的心脏病突发而倒在你的客厅里的年轻女子的想法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就算威尔斯知道韦斯特曾经这么想——无论是通过读这封信或其他什么途径——他也没有立即奔向韦斯特。他似乎给韦斯特写过一封信，不过他在信中严厉地批评了她的过分情绪化。他并不能理解让韦斯特困扰的并不仅仅是他在这段婚外情开始之前就叫停，而是他用自己情感上的疏离嘲笑了韦斯特感受到的极度痛苦。

韦斯特是1913年6月在西班牙写的这封信，她和母亲一起到那里待了一个月，为的就是找回自己的理智。她在西班牙时也没有停止向此时已经更名为《新自由女性》的报纸发送稿件。在一篇名为《在巴利亚多利德》（*At Valladolid*）的文章中，她不惜笔墨地详细描述了一个关于自杀的幻象，文章的情绪、语气和主题都像是对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钟形罩》（*The Bell Jar*）的预示。文章中的叙事者是一位年轻女士，她在朝自己开枪之后来到医院寻求救治。让叙事者陷入这场麻烦的原因也是一场婚外情，这正呼应了我们都知道的威尔斯和韦斯特之间已经过去（和尚未完结）的纠葛：“我的情人虽然没有占有我的身体，但是他诱惑了我的灵魂；他和我融为一体，直到他比我更像我自己，然后他却离开了。”[18]

值得一提的是，韦斯特知道威尔斯仍然是《新自由女性》的读者。

他也如她所愿地被勾起了兴趣。威尔斯会给韦斯特写信谈论她的文章。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你又开始写出精彩的文章了。”不过据我们所知，韦斯特没有回复这封信，反而是给威尔斯最新的小说《热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写了一篇书评。韦斯特在文章中说她同意威尔斯关于性与创造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

> 男人总是像在深海中航行的轮船不得不到煤炭站点补充燃料一样，不管愿不愿意都需要做爱，这是真的：他们要想做出伟大的成就，先得获得激情来提供灵感。[19]

接着，韦斯特又坚称陷入这种关系的女性并不会像威尔斯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的那样，被此类短暂的婚外情彻底毁掉。她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赞成了威尔斯的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女性需要对她的性生活和爱情生活掌握自主权。

> 在属于自己的充满雄心壮志的剧本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女性是不会因为不能在某个男人的已无激情的剧本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哭泣的。

所以，韦斯特不仅是靠一份书评挑起了这场婚外情，她可能还无意识地在随后的书评中为自己的感情进行了辩论。

这些文章确实发挥了效果。威尔斯收到了韦斯特的信号。1913年秋，在这份书评发表几周后，韦斯特就开始和威尔斯在他的书房里幽会了。通过书评进行的调情很快终结。二人之间的通信内容沦落成了某种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他们用猫科动物的名字称呼对方，很多时候，威尔斯是美洲豹，而韦斯特是黑豹（Panther，后来这个词成了她给儿子取的全名的中间名）。对于这样两位作家来说，这些信件中的幼稚语气可不是他们文学水平的最高表现。

很快，一件非常讽刺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给两个人的命运都造成了影响。他们第二次发生关系时，威尔斯忘了戴避孕套。韦斯特当时已经

开始在一份新发行的英国期刊《号角》（*Clarion*）上发表一些洋洋洒洒的长文，为未婚母亲的困境表示愤怒，因为无论在英国社会阶层的哪个位置，未婚母亲都会被视为其中的贱民。如今她自己也要成为其中之一，这当然不是什么会令她兴奋的事情。

从安东尼·潘瑟·韦斯特（Anthony Panther West）于1914年8月出生在诺福克（Norfolk）的一间小农舍开始，他就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麻烦。后来他坚称，韦斯特对身为母亲的矛盾心情让她的孩子深受伤害。韦斯特无法掩饰自己对于孩子本身，以及因为有孩子而让她受到的限制的不耐烦。韦斯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被关在房子里，与世隔绝，为孩子的各种事情操心的处境：

> 我憎恨家庭琐事……我想要的是无拘无束、充满冒险的生活……穿着蓝色羊毛外套的安东尼看起来很精神，我可以肯定我为他准备了美好的未来［那就是1936年时一起在卡尔顿（Carlton）吃晚餐］，但是我现在想要的是罗曼史。是与一个有白皙的皮肤和带一点自然卷的深色头发，还有一辆大型灰色敞篷车的男人共度的时光。[20]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的是，威尔斯不具备以上特征中的任何一点（顶多可以说他的皮肤还算白皙）。尽管他尽可能体面地应对了这个局面，还给韦斯特和孩子安排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住处，但是他并不能像韦斯特希望的那样陪在他们身边。他们之间仍然是情人关系，威尔斯也依然是韦斯特的思想导师，但事实证明，韦斯特并不特别适合被粉饰成一个完美的情妇。因为她太热衷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鉴于此，韦斯特一直坚持写作，而且是以一种足以让许多新手妈妈羡慕不已的速度。她在安东尼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一本小说，也在她经常发表文章的地方继续发表文章，还找到了一个宣扬自己思想的新场所：威尔斯本人加入了惠特尼家族（Whitney）新近资助的一份名为《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美国杂志。他邀请韦斯特也为该杂志供稿。韦斯特的文章后来被刊登在了1914年11月的创刊号上，她还是

这一期中唯一一位女性撰稿人，她的文章的题目是《严苛批评的责任》（*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这篇文章将成为韦斯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它体现了一种她在《自由女性》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不具有的严肃性，看上去更像一份带着书卷气的“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韦斯特在文中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I）”作主语，而是改用了无实体的权能性复数“我们（we）”。她是站在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发表自己的分析的：

> 如今的英格兰根本没有文学批评。这里有的只是软弱无力的齐声称颂，是除非这本书被警察封禁否则就不会停歇的高声赞美，一种既不会升温成激情也不会突转为愤怒的温吞吞的友好。[21]

考虑到韦斯特正是依靠她认为缺乏的这种文学评论为自己打造出成功的文学事业的，所以她有可能夸大事实了。她对这个问题的一概而论有些不同寻常。通常来说，她的文章都是基于个人经历，但是这篇散文中并没有此类内容。她呼吁“严苛批评”可能是因为她对自己当时所处的那个特定的人生时期感到挫败。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但是她不能直接写这件事，因为未婚生子在当时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将矛头转向“英格兰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借机隐晦地谈论她平凡枯燥的生活。“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忘记了思维的事，我们都会变得不安全，”韦斯特这样写道，这些话不仅是真理，更是她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自己的一种提醒。

虽然她对当时的状况感到沮丧，但是她的名气却越来越大了。为了给《新共和》这份刚发行不久的杂志做广告，编辑们将韦斯特列为本杂志的一大看点。广告将韦斯特的性别作为炒作的话题，说她是“被威尔斯称为‘英格兰最杰出的人（man）’的女人”。[22]韦斯特没有就这个有争议的赞美作出回应，但是她将威尔斯的作品用作了《严苛批评的责任》针对的目标之一，她写到威尔斯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说“他做着狂热者放肆狂喜的美梦，思考着被仇恨的旧事物及未来世界的和平

与智慧，然而他讲的故事却是个彻底的失败”。[23]

此时，韦斯特和威尔斯的关系进展还算顺利。不过，读到这篇文章的威尔斯可能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双层含义：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他讲的故事”包含了丽贝卡和安东尼。这个小男孩儿后来会一直成为他父母生活中的一个争论焦点。起初他们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他们就是他的父母。他们甚至还为安东尼是否应当在威尔斯的遗嘱中被正式提及而吵得不可开交。威尔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给韦斯特保证，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可能是意识到一边在杂志上给情人的作品写书评，一边给他写多愁善感的情书有多么奇怪，韦斯特开始专注于另一位作者，她打算撰写一篇足够一本书长度的研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文学批评。她在《新共和》早期的一个专栏中概述了自己对这位作者的兴趣，还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躲到乡下的自己在一次持续了整晚的空袭期间阅读詹姆斯的散文集《关于小说家们的笔记》（*Notes on Novelists*）的经历。伴随着天空中警笛鸣响的声音，韦斯特从詹姆斯作为一个作家的极度精确性中体会到的安慰越来越少：

> 他能把一根头发丝也分出几个叉，直到不能再分为止。这种精神上的姿态不过是给彻底的、令人不安的直率制造的让人焦灼的障眼法。[24]

不过，仿佛是在跟自己争辩一样，韦斯特最终又认同了詹姆斯那种既严苛精细又混乱离题的腔调。在特定的环境中，激情和愤怒突然变成了被高估的东西。飞机“在我头顶盘旋，似乎想在这个连一点灯光都没有的小村子里找到屠杀的理由，”韦斯特写道，它们“烧的燃料可能是它们能够孕育的最纯洁、最高尚的激情”。

但是韦斯特后来再次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她的书中，韦斯特反对詹姆斯的核心论点正是他的“毫无激情的超脱”——这一点如今可以被看

作韦斯特针对很多伟大男性作家抱有的标志性的不满。她认为他“希望生活中完全没有暴力，甚至是情绪的爆发都不行”。不过，也不是詹姆斯的每本书都有这个问题。韦斯特喜欢《欧洲人》（*The Europeans*）、《黛西·米勒》（*Daisy Miller*）和《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但是她讨厌《一位贵妇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因为她认为小说的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是一个“傻瓜”。詹姆斯令人烦恼的超脱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韦斯特抱怨说，只要一谈到女人：

> 人们无法从她引起的喧闹混乱中了解女主角的信念和性格，她可能是来得太晚、走得太早，或是干脆忘了去充当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年长女伴的角色。皆因年轻男子的举止都是鸽子般纯洁可爱的，所以人们不应当认为她有必要在场保护一个女孩免受攻击；年轻女士们的言语都是温柔甜美的，所以人们也不应当觉得两性之间的对峙能有多激烈，既然如此，他们要一名公断人干什么呢？[25]

韦斯特在英格兰出版这本书时，詹姆斯刚刚去世约一个月，这也让这本书成了被评论的焦点，不然一本普通的文学批评研究很可能得不到这么高的关注。总体来说，人们对这本书的反馈是积极的。《观察家》（*Observer*）说它“闪烁着金属般锋利的光亮”。[26]绝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似乎也持类似的意见。不过《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图书专栏的作者，一位名叫埃伦·菲茨杰拉德（Ellen Fitzgerald）的女士认为这本书中“对文学荣耀的破坏”是一种直白的侮辱。她说：“还很年轻的女性不应该就小说撰写文学批评，这让小说家们难以承受。”[27]

我们不认为韦斯特会为这样一篇评论而感到难过。时至此时，打破“还很年轻的女性”要遵守的规则对于韦斯特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她根本不担心自己是不是给重要的人留下了好的印象。她也不在乎小说家们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树立的虔诚信仰。

然而韦斯特绝对不是对于小说家们经历的创作艰辛熟视无睹的。她

本人也会持续创作不少虚构类作品，总共出版了十本小说。这些小说获得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如此严格的诚实，如此沉重但独一无二的美丽，在它们崇高的精神现实主义中大获成功。”[28]这段话代表了人们对她的第一本小说，1918年出版的《士兵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的看法。然而，评论者们在普遍表示赞美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之情，因为韦斯特的名气太大了。《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评论者在评论1920年出版的《法官》（*The Judge*）时说：“它没有达到韦斯特女士这么有能力的作家轻易就可以达到的完美程度。”[29]没有人会因为她能写一本不错的小说而感到惊讶，但是人们对她的期望是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小说家V. S. 普利切特（V. S. Pritchett）在提到1929年出版的《哈丽雅特·休姆》（*Harriet Hume*）时就抱怨说：“她这种错综复杂、推进很慢的风格显露了机智和温暖的优美，但是读者很可能会看到一半就搁浅在那些心理浅滩上，从而干脆放弃艰难的阅读。”[30]

这就是一个广受赞美的批评家不想只做一位批评家时需要付出的代价。人们习惯了某种她作为作家特有的人格面具，然后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她未来的所有作品。帕克想要凭借自己的小说而不是俏皮话和诗文而被大众接受的时候，也不得不与这种衡量标准斗争，结果没能成功。韦斯特在散文中的智慧出现在虚构作品中时就成了某种恶魔，小说读者都不明白她的离题是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

韦斯特的记者工作才是她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毕竟威尔斯只承担了她的部分开支。她在《新共和》上的专栏帮助她获得了更多工作机会，她还开始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及其他次要一些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比如《当代》（*Living Age*）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韦斯特对于在哪里发表文章并不挑剔，她需要钱，而且她从不缺观点可表达。

韦斯特对于题材也不挑剔。她倾向于从一本书说起，最终归结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上。她谈论过萧伯纳的战争演讲；[31]写过她在一次夜晚乘火车时从一个醉酒的人身上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气质；[32]她对狄更斯早期的传记作者之一总是在章节之间插入天气预报发过牢骚；[33]还抱怨过那些将农村穷人的生活作为主题的小说："他们总是会把这种题材写得冗长乏味且脱离实际。"[34]韦斯特还总被邀请写一些关于女性的文章，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蔓延，她也被邀请谈论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问题。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另一篇洋洋洒洒、充满激情的长篇大论，内容是论述战时护理工作如何实现了女权主义的承诺，将普通的女性转变成战争的一部分。她写道："勇敢的女性一直存在，所以女权主义不是创造了这种勇气，而是让这种勇气在土壤中扎根。"[35]

韦斯特用文字在纸面上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自信的形象，但是在其他方面，她的生活开始分崩离析。与威尔斯的关系已经亮起了红灯。他的新情妇层出不穷，虽然他这种拈花惹草的特点可能并不会让谁感到意外，但有时候，二人还是会因此闹得很不愉快。他们关系的最低谷出现在威尔斯开始和一位奥地利年轻艺术家纠缠不清［她有一个好记的名字叫加藤里格（Gattenrigg）］，而两人彻底决裂则是在1923年6月的一天，加藤里格先是出现在韦斯特的公寓里，当天晚些时候又试图在威尔斯的房子里自杀。韦斯特在媒体面前保持了镇静，她在接受本地报纸采访时说："加藤里格夫人没有出言不逊，也没有大吵大闹。她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女士，能够创作出十分精美的作品，我为她感到遗憾。"[36]

韦斯特也开始为自己感到非常遗憾了。她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中直白地抱怨威尔斯"总是打扰我的工作"。[37]他表现出的居高临下的气势曾经令她着迷，如今却被她称为"自我中心"。[38]此时的学生已经学会了老师能教给她的一切，而且从法律上说，威尔斯与韦斯特和安东尼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尽管她担心失去了威尔斯的慷慨解囊，自己可能会入不

敷出，但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段感情在韦斯特人生中已经发挥了它该发挥的作用，让她走上了自己梦想的事业道路。她当时几乎已经比威尔斯还出名了，因为她更多产，而且正处于人生中全盛的阶段，而威尔斯的作品量则开始走下坡路。所以韦斯特已经不需要他了。

*

彻底断绝关系的机会是以一次到美国作巡回演讲的形式出现的。1923年10月，韦斯特把安东尼留给母亲照顾后乘船前往了大洋彼岸。她在美国成了很受欢迎的人物，能够直言不讳的无拘无束和尚未婚嫁的自由之身也让她感觉如鱼得水，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些特性是符合她为自己塑造的公众形象的。美国媒体显然都被她迷住了。她成了某种能够独立思考的新女性形象的化身。让记者们更满意的是，韦斯特很愿意回答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就询问她为什么年轻女性小说家的数量似乎突然变多了。这是不是与战争有关系？韦斯特摇头答道：

> 年轻女性确实正在小说领域“继续前进”，不过她们并不需要战争来增加她们的数量。她们也不需要战争来为她们打开自我表达的大门，无论战争的情况是激烈还是缓和。促成这一局面的是英国女性已经为之奋斗了很多年的东西，你可以称之为自由的精神，女权主义的精神，但你要永远记住，它不局限于获得投票权的斗争。让女性为之奋斗的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位置，是在艺术、科学、政治和文学领域不断成长的权利。[39]

韦斯特还补充说她不认为年龄是一个应当被考虑的因素，实际上，年龄的增长只会带来力量的增强。她还举了弗吉尼亚·伍尔夫、G. B. 斯特恩（G. B. Stern）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例子。韦斯特断言：“你知道，三十岁及以上的女人才开始显示出自己真正的价值。生活对她们而言开始有意义，而她们也能够懂得这种意义。”[40]

韦斯特似乎就是在说她自己。她说这段话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而且无疑已经占据了“有发展前途的位置”。她在美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引起大批公众的关注，她就像帕克一样成了一位名人作家。韦斯特还在全美各地的女子俱乐部里做演讲。她的社交日历上写的全是行程安排，连页面的边边角角都被字迹占满了。她对于美国的态度不如美国对她的那么肯定。韦斯特在《新共和》上发表了四篇有关这次行程的文章，其中一篇这样写道：纽约可以“凭借其奢华富有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其千篇一律也难免让人感到枯燥乏味”。[41]韦斯特对于某些方面的评价十足积极：她喜欢美国的铁路体系和密西西比河。但是她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写了很多尖酸刻薄的话，尤其是在谈到美国的女性时，她说她们“邋遢得令人难以想象”“萎靡不振得让人反感”“对于自己的晚礼服也不上心得都令人难以置信”。[42]

韦斯特的名气算是不太有压力的那种。她的私生活还不至于被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即便如此，威尔斯的名字也总是会和她的一起出现。作为掩饰，她有时会称自己是威尔斯的“私人秘书”。无论是安东尼的名字还是他的存在都从未被提及。不过对于韦斯特在美国见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来说，她与威尔斯的婚外情和私生子都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几位圆桌会议的成员，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就是其中之一。韦斯特还见到了菲茨杰拉德，但是难以确认她是否见过帕克。尽管纽约的记者和风趣人物们似乎显然会与这位来自伦敦的锐利的年轻女士意气相投，但韦斯特其实并没能融入这个环境。只有伍尔科特成了她的朋友，关于其他人的记忆则不怎么愉快。这次旅程中间的某个时候，人们为韦斯特举办了一场庆祝聚会。帕克似乎没有参加，不过她的朋友，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同时也是圆桌会议成员的鲁思·黑尔出席了。黑尔是因为做过战时通讯员而出名的，后来又成了活跃的艺术品评论家。她虽然嫁给了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但是在婚后仍然使用自己原本的姓氏。1921年时，她还因为自己是否必须在护照上

使用夫家的姓氏而与美国国务院陷入了争执。当国务院不肯作出让步之后，黑尔毅然交还了护照，放弃了欧洲之行。她是一个有原则的女人。

显然，黑尔在私下里也是一个不害怕直抒胸臆的人。韦斯特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说，黑尔在聚会上走近她，然后开始了一通长篇大论：

> 丽贝卡·韦斯特，我们都对你感到失望。你终结了一个伟大的幻象。我们以为你会是一位自立的女性。然而眼前的你却是这么一副哀戚的样子，这是因为你过去总是依靠男人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一切，现在你不得不离开他，要靠自己保护自己了，你就各种抱怨。我相信威尔斯肯定是对你太好了，给你钱，给你珠宝，给你你想要的一切。如果你依照这样的条件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你早该想到，等他厌烦了，他就会把你赶出去。[43]

通常情况下，圆桌会议的成员之间相互侮辱时会采用婉转隐晦的方式，不过黑尔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的幽默大师。韦斯特直到三十年后依然记得黑尔对她的评价，而且她转述的内容可能比黑尔的原话还要尖锐。不过黑尔的失望之情无疑刺痛了韦斯特。这次当面批评成了这趟从任何职业角度上说都很成功，而且充斥着人们对她的赞美的旅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但让她永生难忘的正是这个不和谐音符。

人们总是对韦斯特感到失望：无论是她的母亲，她的姐姐莱蒂（Lettie），威尔斯，还是评论她小说的批评家及她的同行们。而在这个高唱失望之歌的合唱团中，声音最洪亮的人还要数她的儿子安东尼。安东尼在成长过程中总被父母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雄心壮志都没有被放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上。这样长大成人的安东尼心中充满了对不闻不问的父母的怨恨。安东尼选择将自己的怨恨集中到与他接触更多的母亲身上，这种母子之间的敌对关系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一直延续的传统。最终他会为了发泄自己的痛苦而创作一本被巧妙地命名为《遗产》（*Heritage*）的小说和一本非虚构类作品，并在这两本书中对韦斯特发出严厉的责难。他对于这个题材的执念如此顽固，以至于韦

斯特在晚年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对此已经无话可说：“我希望他能想想私生子身份以外的事。唉。”[44]

对于除了安东尼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韦斯特让他们失望的原因多多少少都与她的文字有关。韦斯特的散文中的一些东西会让人们对她产生特定的期许，而当人们发现韦斯特本人其实并不符合这种期许的时候，人们就不免感到很受伤。鲁思·黑尔在读韦斯特的文字时看到的是一位坚强、独立的柏拉图式女性典范，但她在聚会上看到的韦斯特却是另一种样子，这自然会令人失望。即便是那些为韦斯特的智慧和才华而着迷的人，有时也很难接受他们看到的这种略显轻浮的个人风格。“丽贝卡的形象介于打杂女工和吉卜赛女人之间，不过她像小猎犬一样顽强，还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邋遢甚至是脏兮兮的指甲。她非常有活力，但品味不佳，对知识分子和特别有智慧的人充满怀疑。”[45]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4年的一封写给姐姐的信里这样描述韦斯特，话中一半是侮辱，一半是赞美。

不能满足所有人让韦斯特感到困惑，尽管她自己就是一个毫不吝于发表批评意见的人。韦斯特当记者时也喜欢使用带刺的言辞，女性被不讨好地描述为拥有“像稻草一样颜色浅淡、又直又硬的头发”，[46]男人则“鼻子很尖”。[47]不过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她作出了恶劣的回应。韦斯特在人生末期时说道：“我引起了太多人的敌意。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可怕的。”她想要的是情人、仰慕者和朋友，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想法的人：“我想要被认可，哦，是的……我讨厌不被认可。而我总是不被认可。”[48]在韦斯特的自信深处其实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一种想要被倾听、被喜爱的迫切渴望。

在威尔斯之后，韦斯特又遇到了多名追求者，其中包括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Lord Beaverbrook，William

Maxwell Aitken）。韦斯特似乎不打算再和其他作家发生婚外情，或者只是不想再陷入可能伴随各种戏剧性复杂情况的关系。她把献殷勤的目标转到了生意人上，这一点可能也证明了鲁思·黑尔的怀疑，那就是韦斯特对经济保障的看重胜过其他任何事。后来回忆起彼此的初次见面时，韦斯特形容这位名叫亨利·安德鲁斯（Henry Andrews）的投资银行家“贴心、亲切又可爱，有点像一只笨笨的长颈鹿”。[49]这显然正是她想要寻找的类型。不到一年，韦斯特就在1930年11月与安德鲁斯结婚了。他们的婚姻会一直持续到后者在1968年去世为止。双方在婚姻期间都有不忠行为，但这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多数时间里，韦斯特都能够从朋友和工作中得到满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阿奈·尼（Anaïs Nin）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员。当时尼还是一名无人知晓的法国作家。韦斯特是因为尼出版的第一本书而知道她的。这本薄薄的关于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作品的副标题是“一份不专业的研究”。尽管劳伦斯总被看作一个厌恶女性的人，但这本书是最早从女性视角为劳伦斯的作品进行辩护的研究成果之一。韦斯特认识劳伦斯，在后者去世时，韦斯特还发表文章抱怨说“他在自己所属的阶层中都没有受到他理应受到的尊重”。[50]所以韦斯特和新任丈夫到巴黎度假时，她邀请了尼来和自己见面。

无论是从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位作家来看，尼都与韦斯特截然相反。尼给人的印象是风趣又优雅，而韦斯特则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尼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人格也给人一种精心修饰、弱不禁风的感觉，与韦斯特展现的自信的勇士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尼欣赏艺术的角度是看它们如何清晰地表述个人欲望，而且她只把这些想法写在日记里而不是发表到报刊上。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她和韦斯特对待写作和生活的方式绝对是有天壤之别的。

所以1932年的第一次会面显然不是发生在两个心意相通的人之间

的。尼在日记里记录了这种喜忧参半的结果：

> 她有那么明亮、那么充满智慧的浅褐色双眼。就像波拉·内格里（Pola Negri）[51]，但是没有她的美貌，却有一口典型的英国人的牙齿。她的声音尖细，充满了痛苦，听着让我很不舒服。我们只在两个层面上有共同语言：知识和人性。我喜欢她充满母性的丰满身材。我们没有谈论任何悲伤忧郁的话题。她特别不自在，我让她感到害怕。她为自己凌乱的头发道歉，还为自己的疲倦道歉。[52]

尼还补充说她能看出韦斯特“渴望闪耀她独特的光芒，但是却因为内心深处的胆怯而不敢这样做，她还很紧张，她说话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她写作的本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了。韦斯特开始恭维尼，说自己认为尼的作品远胜过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她还告诉尼自己觉得她非常美丽，这让尼有了色诱韦斯特的想法。（没有证据证明尼采取了任何实际行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尼后来甚至希望自己能变得像韦斯特一样。她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文字那么锐利，她不会受到过分天真的困扰，等我到了她现在的年纪，我也能像她一样锐利吗？”[53]事实证明，完全不同的女性之间也能够找到很多可以互相仰慕的东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韦斯特的生活越来越稳定。亨利的事业虽然出过一些问题，但是这对夫妇因为从亨利的叔叔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而变得更加富有。安东尼也长大了，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可他给韦斯特增加的负担越来越少。韦斯特还在持续创作数量稳定的书评和散文，但文学方面的工作显然开始让她觉得厌烦了，就像帕克后来对纽约的生活感到厌烦一样。不过韦斯特没有去好莱坞，而是去了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一个拼凑而成的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一次旨在团结这一片地区中的斯拉夫民族的运动而组建起来的。整个国家的建立就是一个同盟国阵营保护下的大型世界主义实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大型实验已经彻底失败。那里发生了政变，民族主义势

力日益增长，而且这个国家还同时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法西斯主义活动挤压。南斯拉夫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遭受成为附属国的经历，最终在铁托统治下保持了独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体。

1936年，英国议会派遣韦斯特到南斯拉夫进行巡回演讲。虽然她到那里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她依然为那片土地着迷。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希望详细写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东西——这个她并不在那里生活的国家，这个其拥有的深层问题与对她的吸引力一样复杂难解的国家。同样吸引韦斯特的还有她在南斯拉夫的向导斯坦尼斯拉夫·维纳弗（Stanislav Vinaver）。不过当后者想要将双方的相互吸引推进为肉体关系时，韦斯特拒绝了。她的拒绝肯定是婉转友善的，因为她在后续的五次行程及长达五年的创作关于这个国家的书籍的过程中依然借助了维纳弗的指导。即便是在希特勒开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韦斯特仍坚持前往该地。最终在1941年10月，她出版了根据这些经历创作的厚度超过1200页的《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近来有一位韦斯特的传记作者称《黑羊与灰鹰》“能够掌控全局但略显杂乱散漫”。[54]这样的评论是客观的，不过它大概忽视了这种散漫的闲谈方式一直是韦斯特作品吸引人的关键，也是让读者能够坚持读完这么厚的书的全部原因。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韦斯特已经成了擅长利用看似不相关的联系，以她独有的方式从一个想法跳跃到另一个想法的大师。读韦斯特的文字就像是在观看她的大脑如何运转。

从知识层面讲，韦斯特关于南斯拉夫的理论是存在缺陷的。她是一个敢于用心理分析法分析一整个国家的人。这种做法如今被恰当地视为一种以简释繁的途径，至少在韦斯特采用的绝对条件下是适用的。在该书开篇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告知，一辆货车上坐着的四个乏味、顺从的德国人就能够代表“我认识的所有德国雅利安人；而欧洲中部像这样的人

共有六千万”。[55]韦斯特相信属于哪个民族是一种天命，因为人和人之间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区别，这种区别应当被理解并获得尊重。这样的想法让她不以为耻地接近了分析的种族主义界线。在本书中的某一段中，她甚至明确宣称，她很喜欢看由美国“黑人男女”跳的“摘樱桃舞”，但是如果换成一个白人跳这种舞，她就会觉得表演变得充满“兽性”。

韦斯特在地缘政治学和幽默笑话之间转换得游刃有余。在解释几乎将几个斯拉夫地区拱手送给意大利的《1915年伦敦条约》（1915 Treaty of London）的过程中，韦斯特突然停住了话题。她刚刚描述了意大利原始法西斯主义诗人加布里埃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是如何带领士兵进入阜姆[56]（属于克罗地亚的一部分），以防止意大利人失去这片地区的。邓南遮是一个秃顶，蓄着抹了蜡的胡须的男子。关于他的行动引发的混乱，以及它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发出的鼓励信号，韦斯特说道：

> 什么时候我听说有一个国家允许自己因为对于一个彻底秃顶的女作家的热情而被搅动得天翻地覆，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那我就相信女权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而且女性已经获得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了。[57]

相对于韦斯特的更充满诱惑的纯粹情感问题，她的丈夫亨利在整本书中都被呈现为一种理智的衬托。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是，有一次韦斯特和丈夫与一位克罗地亚诗人进行了关于文学的讨论，后者试图强调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比萧伯纳、威尔斯、夏尔·贝玑[58]和纪德这样更传统的“文学”类型作家优秀：

> 他们写下的是人们在咖啡馆谈论的内容，如果内容足够好，那这也是不错的事，但这样的内容不够严肃，因为它关乎的是像汗水一样普遍且可再生的东西。［这个克罗地亚诗人认为］相比之下，纯粹的讲故事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因为它汇集了可以被其他有才能的诗人吸收并转化为更高形式的经验。[59]

亨利对此提出了一个苍白的抗议（“康拉德完全没有悲剧意识”），不过韦斯特继续大段引用了诗人坚持的观点，以至于让人不禁怀疑她其实也接受了这些观点。

最早在《大西洋月刊》上刊登的一系列对《黑羊与灰鹰》的评论起码可以说都是饱含赞美之情的。《纽约时报》有点奇怪地称之为“最精彩客观的游记作品”，其评论者甚至将该书的卓越之处具体地归因于它是由“最有天赋、最有洞察力的当代英国小说家和批评家之一”写出来的。[60]《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我读的唯一一本书，它像真实生活一样，自有其重要性，足以与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危机相提并论。”[61]

这最后一个评论非常重要。《黑羊与灰鹰》的出版时间是在偷袭珍珠港几个月之前，美国当时仍认为自己不会陷入欧洲的乱局。而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到《黑羊与灰鹰》出版时，战争已经不是什么惊悚故事书里的内容，而是吞噬一切的日常生活状况。

战争期间，韦斯特和丈夫安静地生活在英格兰。从1939年秋战争在欧洲爆发之后，亨利一直在经济战争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工作。这对夫妇在乡下买了一栋大宅作为主要住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他们大概还能“靠自己种地保证生活”。[62]韦斯特从英格兰给《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发过两份报道。她在其中反复使用家庭主妇这个词指代自己。她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经历的艰辛还不至于像历史学家吉本笔下的那么难熬，但是如果不是战时的油漆价格高到离谱，她绝不会选择给新房子贴墙纸，她选择这么不相称的灯罩的唯一原因是灯泡“发出的光线可能会害死我们，因为我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顶部，它很容易引起道尼尔巡逻机（Dornier）的注意”。韦斯特尤其了解战争对猫的影响，她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谈到了自己的姜黄色虎斑猫的情况：

> 这场危机让猫暴露了它们是多么可怜的生物——它们的智力水平无法读懂任何书面或口头通知。它们遭受着空袭和由此导致的迁移的痛苦，就好像如果聪明敏感的人们不了解历史，没有获得关于战争性质的预先警告，不确定自己住在谁的房子里或依靠了谁的慷慨过活，也没有犯下让自己理应遭受苦难的过错时，他们也必将感受到痛苦一样。如果扑扑（Pounce）发现自己独自在房子里无人看管，它很可能已经跑到树林里，再也不回到危险的人类中间了。[63]

《黑羊与灰鹰》确立了韦斯特作为一流记者的地位。但是直到二战的欧洲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她才真正有机会发挥一名记者的作用，她成了《纽约客》关于战犯审判新闻的首席通讯员。对于韦斯特而言，这些审判是很适合她的题材，因为审判既要考虑摆在面前的单个案件，又要考虑一般的法律原则，这种从具体到概括的方式与韦斯特在自己的文章中通常使用的思考方式不无相似之处。

韦斯特报道的第一场审判是威廉·乔伊斯案（William Joyce），英国人更熟悉的名字是他的绰号“哈哈勋爵（Lord Haw-Haw）”。乔伊斯的身份背景也被多少提及了，他出生于美国，但是主要生活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他是一个顽固的盎格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Anglo-Irish nationalist），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加入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后来在1939年秋天去了德国，成了为纳粹分子做宣传工作的广播员。他的广播节目在英国播出，目的是损伤英国人的士气。他的绰号是英国报纸给他取的，他在人们眼中是一个应当受到严厉斥责的形象。战争结束后，乔伊斯在英格兰以叛国罪接受审判。韦斯特是坚定地认为他理应被判处死刑的人之一，乔伊斯最终也确实被执行了死刑。韦斯特迫切地想要将她认为的乔伊斯在道德上的狭隘与他的身材联系在一起：“他非常矮小，虽然相貌不是特别丑陋，但令人厌恶至极。”[64]在亲眼见证了乔伊斯的绞刑之后，韦斯特就对他失去了兴趣，继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她认为受过这个人伤害的那些人身上，韦斯特写道：“一位老人告诉我，他来这里观看绞刑是因为他的孙

辈在一次V-1型巡航导弹轰炸中丧生，他从停尸房看了他们的尸体之后回到家，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哈哈勋爵的声音。”[65]

韦斯特还为《纽约客》报道了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给她提出了一些更令她困扰的问题。她当然不是比别人对纳粹分子更有好感，但是她最终并没有把这些人描述成特别险恶的形象。关于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韦斯特的观察是他“明显已经疯了，这样的人还要接受审判似乎是法律的耻辱”。[66]在写到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时，韦斯特说他“非常软弱”。韦斯特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出那个后来让汉娜·阿伦特举世闻名的观点，即这些官员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能用“邪恶”这个词的传统含义来解释。韦斯特确定他们犯下了罪行，但她不能接受这些官员只是在依照命令行事的说法，她直白地表述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 如果一位海军上将接到精神错乱的第一海务大臣的命令，让他在军官食堂里供应煮熟的婴儿，上将显然应当拒绝从命；但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将官们在接到希特勒的接近于水煮婴儿的命令时，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

关于德国人对于纳粹分子犯下的凶残暴行怀有的集体罪责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但是韦斯特在战后创作的最早一批文章里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多少兴趣。关于大屠杀，她觉得除了相关者必须接受惩罚这个事实之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即便是在当时，她也相信纳粹分子全部应当为他们的战争行为而受到惩罚，并且将“他们对犹太人做的一切”归入了纳粹罪行的概括名目之下。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上的疏忽。部分原因在于，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韦斯特的注意力转向了苏联。早在关于乔伊斯的文章中，韦斯特就给人们敲响了这样的警钟：

> 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主张和推进方式之间有一种相似性。这些主张依赖

> 的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假设，即某个拥有特殊天赋的人会拥有一种普遍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得他可以对一个国家下达命令，而且他的命令高于由被称为民主的群策体系发出的命令。这在实质上是给了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事指手画脚的权力。[67]

韦斯特对于共产主义的担忧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占据了她生活和写作的绝大部分，不过她也不是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她曾经被派遣报道国王的葬礼、民主党代表大会、战犯审判、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事件和南非问题等。1975年，她还被邀请参加了缅怀一位妇女参政论者的活动，韦斯特记得她“特别漂亮”。[68]不过韦斯特能够引发的关注已经大不如前了。她与左派的疏远给她造成了一定伤害，她那种轻浮善变的风格也让她不受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渐成熟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的喜爱。对于这些作家来说，韦斯特有些古怪，像是前一个时代留下的遗迹。

在人生的晚期，韦斯特清楚地意识到了人们对她关注的日渐减少。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作家，那么有些事你一定要做。第一，不要太出色；第二，要英年早逝，在这一点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胜过了我们所有人；第三，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自杀。一直写作并且写得好是不能被原谅的。”[69]韦斯特会以这种有艺术性的、聊天似的风格继续写作，直到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仍然受到人们的赞美，在她晚年时，她还成了知识分子谈话节目的固定嘉宾。她是少有的被看作国家大事方面专家的女性之一。不过她也会犯错，她对反共产主义的执迷就是其中之一。

---

[1] 布卢姆茨伯里派是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它的拥护者包括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等。他们否认自己是某种正式的组织，而是被共同的理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人。

[2] “Marriage，” *Freewoman*，September 19，1912.

[3] “Marriage，” *Freewoman*，September 19，1912.

[4] 1910年4月18日，写给Letitia Fairfield的书信，转引自*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ed. Bonnie Kime Scot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5]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1849～1924），美国女作家，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秘密花园》《小公主》等。

[6]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普洛斯彼罗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被弟弟篡夺了公爵的宝座后带着三岁的女儿漂流到一个小岛上，他从书中学会了使用魔法，并借此保护女儿和控制剧中的其他角色。

[7] *The Fountain Overflows*（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85.

[8] 参见Lorna Gibb，*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Rebecca West*（Counterpoint，2014），36。

[9] “I Regard Marriage with Fear and Horror，” *Hearst’s International*，November 1925，收录于*Woman as Artist and Thinker*（iUniverse，2005）。

[10] 这段提要被刊登在了1906年12月2日的*Los Angeles Times*上。

[11] “A Reed of Steel，” in *The Post-Victorians*，ed. W. R. Inge （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1933）.

[12] 1972年12月21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台Anthony Curtiss采访，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41。

[13] V. S. Pritchett，“One of Nature’s Balkans，” *New Yorker*，December 21，1987.

[14]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编辑的信，*Freewoman*，March 14，1912.

[15] Rebecca West on Wells，1CDR 0019053，at Yale’s Beinecke Library，参见Gibb，*Rebecca West*，48。

[16] H. G. Wells，*H. G. Wells in Love*：*Postscript to an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Faber and Faber，1984），94-95.

[17]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威尔斯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13年3月，in *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18] “At Valladolid，” *New Freewoman*，August 1913.

[19] “The Fool and the Wise Man，” *New Freewoman*，October 1913.

[20]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Sylvia Lynd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16年，in *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21]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New Republic*，November 7，1914.

[22] 这份广告被刊登在1914年11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

[23]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24] “Reading Henry James in Wartime” *New Republic*，February 27，1915.

[25] *Henry James*（Nisbet and Co，1916）.

[26] *Observer*，July 23，1916.

[27] Fanny Butcher，“Rebecca West’s Insulting Sketch of Henry James，” *Chicago Tribune*，December 2，1916.

[28] Lawrence Gilman，“The Book of the Month，” *North American Review*，May 1918.

[29] 转引自*Living Age*，August 18，1922。

[30] “Fantasy，Reality，History，” *Spectator*，September 21，1929.

[31] “Mr. Shaw’s Diverted Genius，” *New Republic*，December 5，1914.

[32] “Redemption and Dostoevsky，” *New Republic*，June 5，1915.

[33] “The Dickens Circle，” *Living Age*，January 18，1919.

[34] “Notes on Novels，” *New Statesman*，April 10，1920.

[35] “Women of England，” *Atlantic*，January 1，1916.

[36] *Westminster Gazette*，June 23，1923.

[37] 1923年8月24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85。

[38] 1923年11月2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Lilly Library，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85。

[39] “Rebecca West Explains It All，”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1，1923.

[40] “Rebecca West Explains It All，”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1，1923.

[41] “Impressions of America，” *New Republic*，December 10，1924.

[42] 1923年11月2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转引自Gibb，*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43]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Gordon Ray的书信，日期不详，Pierpont Morgan，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88。

[44] “Rebecca West：The Art of Fiction No. 65，” 接受Marina Warner采访，*Paris Review*，Spring 1981.

[45]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ume Four（1931-1935）*（Mariner Books，1983），131.

[46]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Penguin Classics，2007），403.

[47] *A Train of Powder*（Viking，1955），78.

[48] “Rebecca West：The Art of Fiction No. 65.”

[49] 出自被收藏在Tulsa archive的一个笔记本中的内容，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116。

[50] “A Letter from Abroad，” *Bookman*，April 1930.

[51] 波兰女演员，曾在德国拍摄了一系列大获成功的喜剧。到好莱坞发展后，关于她与卓别林订婚的传闻一直闹得沸沸扬扬。后来，这段关系被很多人当作明星

利用绯闻提高人气的最早案例。

[52] Anaïs Nin，*Incest，From "A Journal of Love"：The Unexpurgated Diary of Anaïs Nin，1932-1934*（Harvest，1992），1934年4月27日的内容，323。

[53] Anïs Nin，*Fire，From "A Journal of Love"：The Unexpurgated Diary of Anaïs Nin*（Harvest，1995），1935年8月12日的内容，130。

[54] Gibb，*Rebecca West*，183.

[55]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37.

[56] Fiume，今称里耶卡（Rijeka）。

[57]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124.

[58] Charles Péguy，法国作家，1873～1914。

[59]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59.

[60] Katharine Woods，"Rebecca West's Brilliant Mosaic of Yugoslavian Travel，" *New York Times*，October 26，1941.

[61] Joseph Barnes，"Rebecca West in the Great Traditio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October 26，1941.

[62] "Housewife's Nightmare，" *New Yorker*，December 14，1941.

[63] "A Day in Town，" *New Yorker*，January 25，1941.

[64] "The Crown Versus William Joyce，" *New Yorker*，September 22，1945.

[65] "William Joyce：Conclusion，" *New Yorker*，January 26，1946.

[66] *A Train of Powder*，83.

[67] *The Meaning of Treason*（McMillan and Company，1952），305.

[68] "'Shoulder to Shoulder，'" *New York Times*，October 21，1975.

[69] 1952年3月11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Emanie Arling的书信，转引自

Gibb，*Rebecca West*，198。

第三章 韦斯特和赫斯顿

1947年，《纽约客》派遣韦斯特去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Greenville）报道一场发生在那里的私刑审判。这个任务是她自己要求的。1947年2月16日晚，二十四岁的威利·厄尔（Willie Earle）被从皮肯斯县监狱（Pickens County jail）里劫走，当时他是因为受到刺死一位白人出租车司机的谋杀指控而被关在这里的。尽管证明他就是凶手的证据全部都是间接证据，由受害出租车司机的同事们组成的暴徒群体还是把厄尔从监狱里劫走，并对他进行殴打，用利器戳刺，用枪支射击，直至其死亡。

虽然私刑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终结，但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事已经相对罕见了。厄尔的案例成了东北部各大报刊上的头条。新闻记者们热切地报道了厄尔血淋淋的尸体的情况，以期达到让读者震惊的效果。有一篇文章说厄尔的头被“崩成了碎片”。[1]另一篇说暴徒们把他的心脏从他的身体里挖了出来。[2]北方人在读到这些残忍细节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感到某种安慰，因为他们生活在距离这些事情很远的地方，他们也是在用震惊来表达某种形式的自鸣得意。他们告诉自己，野蛮行为仅存在于落后的南方。

不过事实证明，南方人对于威利·厄尔死亡一事的看法也是存在分歧的。南卡罗来纳州当时刚迎来一位新州长，即上任仅一个月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这起格林维尔私刑事件给瑟蒙德州长带来了一场危机。尽管联邦调查局最终拒绝调查，但据说杜鲁门的总统

民权委员会密切关注了这场审判，结果是，有31人被送上了被告席。

韦斯特与她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白人知识分子一样为这场私刑感到惊骇。她认为这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产物。韦斯特写道：“不管那些暴徒是什么人，说他们的行为与威利·厄尔的肤色无关绝对是荒谬的。”[3]但与此同时，她费尽苦心地想要传达她在这个案例中明显感受到的一种细微差别。她写到自己在这里没有发现白人在给黑人带来苦难后可以免受惩罚的文化。在韦斯特看来，那些被告都很担心自己会被定罪。她还认定是厄尔自己“对白人有巨大敌意”。[4]韦斯特说那些实施私刑的白人男子显然并不享受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出于与被害出租车司机的友谊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嗜血成性。韦斯特仅详细引用了一位黑人的话，而且还是一个“请求延长吉姆·克罗体系（Jim Crow system）[5]”的黑人。[6]

> 他说：“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项禁止黑人乘坐白人驾驶的出租车的法律。黑人喜欢乘坐白人司机驾驶的出租车。我们都喜欢。你难道猜不出原因吗？因为这是我们靠付钱就可以让白人表现得像是我们的仆人的唯一机会。”

韦斯特眼中的种族主义是不带个人色彩的、制度上的种族主义。法院的座位是遵循隔离制度的，前来报道审判的黑人记者如果想和白人记者一起坐在媒体区就会遭到指责，以至于他们最终只能坐到黑人坐席区域里。韦斯特还推断说，实施私刑的暴徒们对于就杀死一名黑人而接受审判所感受到的恐惧肯定不如杀死一名白人的恐惧那么严重。

韦斯特的愤怒有一个更直接的针对目标。辩方律师说他希望有更多像威利·厄尔一样的人死掉，他还补充道：“法律规定禁止杀狗，但是如果在我居住的区域内有一条不受控制的疯狗，我宁可被控告也会杀了这只狗。”[7]韦斯特忍无可忍地评价说：“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法庭上都没有发生过比在这里发生的更令人恶心的情况。”不过这场诉讼让韦斯特感

到愤怒的原因都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的，而“种族主义”和“偏见”这两个词则根本没有出现在她的文章中。

韦斯特知道被告最终被宣判无罪是不公正的。听到判决时被告们的庆祝不过是“在庆祝获得救赎，而所谓的救赎其实是将他们送到了更危险的境况中”。[8]韦斯特担心这样的判决会带来更多不法行为，但是让她紧张的似乎主要是黑人会做出什么。她觉得黑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还认为格林维尔的审判预示着在南方发生的私刑的终结，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预测错得有多离谱。

症结所在可能是韦斯特对于此类题材没有经验，她坚持要到格林维尔报道的是一个其他一些人，主要是黑人作家已经很好地报道并理解了的领域。艾达·B.威尔斯（Ida B. Wells）是一位一生致力于禁止私刑的黑人记者，她撰写的文章大概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了，但是她的名字依然为人们所熟知。同时期的其他一些黑人作家对于南方的情况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甚至还经常在白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就是其中之一。

赫斯顿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伊顿维尔（Eatonville）长大的，那里是这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州里的一片黑人飞地。赫斯顿一直是个叛逆的假小子，她很早就离开了学校。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在巡回表演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剧团（Gilbert and Sullivan troupe）里给一位演员做过十八个月的女仆。直到二十六岁时，赫斯顿才获得高中文凭，之后又考上了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1925年，她像许多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黑人知识分子一样来到了哈勒姆（Harlem），并很快成了《机遇》（*Opportunity*）和《信使》（*Messenger*）这样的黑人杂志的固定供稿人。[9]

给赫斯顿带来突破的文章是她在1928年发表的《身为有色人种是什么感觉》（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赫斯顿写到自己在还是个

孩子的时候就离开了伊顿维尔，在那之前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色人种”，也不觉得身为有色人种有任何悲惨之处。她还不能理解其他黑人因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受到的哀伤。赫斯顿说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磨利我的开蚝刀”，[10]不过在白人的世界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当我被推到一个反差鲜明的白色背景前面时，我最能体会到什么是身为有色人种”。在赫斯顿生活的时代及那之后的许多年里，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还是一个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群体。黑人和白人的报纸、杂志都是泾渭分明的，即便是在自由的北方也不例外。主要的白人报纸也报道了赫斯顿的作品，她的书籍都受到过《纽约时报》的评论，但是人们对她最先的，也是最主要的定位显然还是一位黑人作家。而黑人作家是不会被《新共和》或《纽约客》约稿的。所以她想要靠做记者写文章来养活自己是不可能的。

鉴于此，赫斯顿选择成为一名人类学家，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at Columbia）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那里追随先锋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后者安排她为自己测量头骨。她的工作在当时被称作人种学研究（ethnography），而且都是由各个基金会赞助支持的。赫斯顿在自己的一生中会出版几本民俗研究著作，其中大部分致力于保护伊顿维尔这样的飞地中的黑人使用的日常口语。此类语言也会出现在她最著名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中。她还研究了牙买加和海地的伏都教（voodoo，又译巫毒教）传统，并将自己的发现记录在了《告诉我的马》（*Tell My Horse*）一书中。

然而，赫斯顿蒸蒸日上的事业在1948年戛然而止，因为她房东的儿子指控她猥亵。经过几个月的审讯后，男孩儿撤销了指控，但是这个消息已经被刊登在了报纸上。巨大的压力让赫斯顿无心写作。再加上她感兴趣的黑人生活也不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编辑们热衷的题材，她的情况就更加艰难了。赫斯顿在一篇于1950年为《黑人文摘》（*Negro Digest*）

创作的名为《白人出版商不肯出版的作品》（*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t Print*）的文章中写道："人们对仆人阶层以上的黑人的深刻、全面的内容没有需求这个事实，暗示了这个国家中存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11]

在赫斯顿彻底被人们遗忘前，她还有一个故事要写。1953年，赫斯顿受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h Courier*）的派遣到佛罗里达州的莱夫奥克（Live Oak）报道对鲁比·麦科勒姆（Ruby McCollum）的审判。赫斯顿的传记作者称她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主要是因为她需要挣钱，但是这个案件的案情显然也是吸引赫斯顿的原因。

受审的麦科勒姆是一名黑人，她被指控谋杀了白人男子C.勒罗伊·亚当斯医生（Dr. C. LeRoy Adams）。麦科勒姆杀了亚当斯这件事确凿无疑，她是在后者的办公室，当着几位病人的面开枪杀死医生的。然后她就转身离开，回到家中等待警察前来逮捕自己。审判的焦点不在于她是否犯下了这个罪行，而在于她为什么这样做。事实证明，医生的行医活动与麦科勒姆的丈夫的"小圆球"生意王国（bolita empire）之间存在关联。（小圆球是一种西班牙的彩票游戏。）

人们还得知，麦科勒姆的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亚当斯的。在审判过程中，麦科勒姆宣称亚当斯曾多次强奸她，但是法官却不允许她详细阐述具体的情形。麦科勒姆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在第二次审判中，她被许可以精神疾病的理由做无罪辩护，最终她被判定在精神病院接受几年治疗。

赫斯顿只旁听了第一场审判。虽然她在《匹兹堡信使报》的编辑会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加强报道的戏剧性成分，但是赫斯顿的文章本身是细致入微且保持尊重的。她描述了旁听者们看到的幻象，他们告诉赫斯顿说自己看到麦科勒姆的鬼魂在镇上游荡，那个鬼魂有一个鹰头，"手里还握着一把燃烧的长剑"。[12]在写到麦科勒姆的故事时，赫斯顿照搬

了法院的庭审记录，有时加上一点她本人的注释。当控方宣称麦科勒姆杀死亚当斯的真正原因是不愿支付她的医疗费用时，赫斯顿在自己的文章中复述了这个说法。

简单的复制庭审记录的方式是不可能创造出引人深思的文章的。不过赫斯顿这么做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审判结束之后，她写了一篇关于麦科勒姆的家庭生活的类似短篇小说的文章。《匹兹堡信使报》分十次连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中的内容无疑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由发挥。赫斯顿创造了一个关于勇敢、叛逆的麦科勒姆的故事，她最终“主宰了两个强壮的男人的命运，他们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在赫斯顿讲述的故事中，麦科勒姆是一个与作家自己不无相似之处的女人：顽皮，渴望被爱，忍受着不幸婚姻和不忠的丈夫带来的孤独感。这个案件中的某些东西似乎让赫斯顿混淆了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学者指出赫斯顿甚至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曾经在《他们眼望上苍》中出现过的原话。[13]

这些文章不是赫斯顿最精彩的作品，不过它蕴含了一种生命力。换作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环境，赫斯顿也许本可以就这次审判提交一份完全不同的报道，而那份报道中必将包含后来被称为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报道形式包含的一切标志性元素：即事实、感情和个人经历的融合。赫斯顿原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报道格林维尔审判之类的题材，也就是韦斯特非常不成功地报道过的那次审判。相反，赫斯顿甚至没有拿到《匹兹堡信使报》承诺支付她的八百美元报酬。八年后，赫斯顿在1961年时悄无声息地去世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赫斯顿才重新获得重视，主要是在女权主义者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倡导下，赫斯顿的作品又获得了广泛的阅读，不过如今人们主要将她视为一位虚构类作品作家。

---

[1] “So. Carolina Man Lynched in Cruel Mob Orgy，” *Los Angeles Sentinel*，

February 20，1947.

[2] “Lynch Mob Rips Victim’s Heart，” *New York Amsterdam News*，February 27，1947.

[3]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88.

[4]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82.

[5] 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6]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109.

[7]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99.

[8] “Opera in Greenville，” in *A Train of Powder*，112.

[9] 赫斯顿人生经历的细节出自Valerie Boyd，*Wrapped in Rainbows*：*The Life of Zora Neale Hurston*（Simon and Schuster，2004）。

[10] *Pittsburgh Courier*，May 12，1938.

[11] “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t Print，” *Negro Digest*，April 1950.

[12] “Ruby McCollum Fights for Life，” *Pittsburgh Courier*，November 22，1952.

[13] 参见Virginia Lynn Moylan，*Zora Neale Hurston’s Final Decad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2）。

第四章 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让公众注意到她的是一份近五百页的关于极权政治的政治理论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使用了传达伟大观点时往往必须使用的繁复的语句。因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忘记阿伦特也曾经是一位充满梦想的年轻女性，她的思考生涯也是从书写大量诗歌开始的，以及她也曾俗气地写过自己“被对现实的恐惧战胜了，这种毫无意义、毫无根据、毫无内容的恐惧，用它无神的凝视将一切化为乌有，这种恐惧是疯狂，是无趣，是痛苦，是湮灭”。[1]

不过这正是汉娜·阿伦特在1925年春天从大学返回家中后给自己的教授，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写的书信中的内容。当时他们已经发生了关系，后来的事证明，这场热烈的婚外情对双方来说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当阿伦特用“保护性的第三人称”[2]撰写这份自传性的文件时，这场婚外情才刚维持不到一年。她给这份文件取名为“阴影（Die Schatten）”，以此来直白地表现抑郁的情绪。当时才二十出头的汉娜·阿伦特真的非常担心自己会一辈子碌碌无为：

> 她很可能会在无意义的实验和无理由或无依据的好奇心中继续自己的人生，直到长久渴盼的终结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强行终止她毫无用处的活动。[3]

人生的毫无益处和终结的突如其来是阿伦特的人生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就像韦斯特和帕克也经常提到它们一样。阿伦特出生在普鲁士城

市柯尼希堡（Königsberg）的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强、很有钢琴天赋的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希腊和罗马的业余学者，一天到晚埋首于书堆。

阿伦特和父亲共处的时间并不长。年轻的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在结婚之前就染上了梅毒。到他女儿年满三岁时，保罗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他发病的细节非常可怕：有时一家人正在公园里散步，他会突然瘫倒在地，这正是伴随晚期梅毒出现的运动失调的表现。到阿伦特五岁时，保罗不得不入住疗养机构，他在那里待了大约两年，于1913年去世。临终前，他已经病得连前来探望自己的女儿都不认得了。父亲去世后，阿伦特很少提起他。阿伦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写到阿伦特曾对自己的朋友说她关于父亲的疾病的记忆仅限于母亲弹奏钢琴的声音，因为音乐能够在深夜安抚抱恙的父亲。

阿伦特的母亲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她在阿伦特十几岁的时候改嫁给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从物质层面来说，一位犹太裔寡妇带着自己的女儿在一战后的德国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就相当不错了。这个国家当时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严重的通货膨胀、艺术实验和希特勒逐渐掌权。不过当时的家庭生活并不艰难。阿伦特总是坚称她的母亲保护她不受她遭遇的反犹主义的伤害。如果有人在教室里发表任何反犹主义言论，年轻的阿伦特回家后会告诉母亲。玛莎·阿伦特（Martha Arendt）就会给教师写批评信，然后此类现象就会停止。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如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写到的那样，阿伦特从来不认为反犹主义是“永恒的”。

不管她在《阴影》中向海德格尔表述了什么，在其他人眼中，年轻的阿伦特已经充满了冷酷的自信。她在学校的时候连老师都说不过她，

因为她在家能自学的并不比老师能教给她的少，而且她很喜欢让老师也知道这一点。有一次，一位老师的评价让阿伦特感到受辱，没有人记得这位老师说了什么，但是阿伦特为此组织了一场联合抵制这位老师的活动。她因此被学校开除，最终主要是依靠自学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

在青春期末段，阿伦特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尤其对爱深思的丹麦存在主义者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作品偏爱有加。克尔凯郭尔是最先提出焦虑的概念的人之一，那是一种人与自身及人与世界之间的严重失衡的感觉。阿伦特肯定对此深有体会。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写出了许多诗篇，这些诗歌并不精彩，但却可以证明这个后来被指责太冷酷、太遵循逻辑的人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浪漫情怀，那些人只是没有仔细读懂她而已：

> 啊，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懂，我懂。
>
> 所以让我享受自由自在的日子吧。
>
> 你不会找不到我，因为我给你留下了一个标记，
>
> 这页文字和这团火焰。[4]

在听到一位前男友说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的海德格尔教授的演讲很精彩之后，阿伦特也选择了马尔堡大学，还很快报名了海德格尔的课程。当时是1924年，她十八岁，海德格尔三十五岁，已婚，还有两个儿子。

要用简单几句话概括海德格尔复杂的哲学观点很难，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方法的特点是摆脱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于冷硬的逻辑的忠诚。如丹尼尔·梅尔-凯廷（Daniel Maier-Katkin）曾经写到的那样，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经验和理解都与诗歌中固有的关于感情和情绪的领域有紧密联系（这个观点对于阿伦特有很强的吸引力）”。[5]海德格尔还将这个态度融入自己的教学方法中。所有人都说他的演讲就像表演，他的独白

并不仅仅是要直接传递信息。关于校园中流传的说法，阿伦特后来写道：

> 关于海德格尔的传闻说得很明白：思考重新获得了生命；过去的文化宝藏一度被认为已经作古，如今却再度发声，在此过程中，它们提出了与人们认为它们要说的那些熟悉的、陈旧的、意义不大的琐事完全不同的内容。那里就有这么一位老师；你也许可以学会思考。[6]

在阿伦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习思考之后，1925年2月某一天下课后，海德格尔走近阿伦特，问她在读什么书。阿伦特回答了问题。她给的答案肯定特别有魅力，以至于海德格尔立即给她写了一封情书：“你永远不会成为我的人，但从现在起你会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将因你而变得更加丰富。”[7]这段婚外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总是用抽象的论述谈论两人之间的婚外情，那些书信不愧是两个毕生都在交换观点理念的人写出来的。他们描写对彼此的爱意的方式不仅让这件事更具戏剧性，还充满了高度的思想性。与韦斯特和威尔斯之间交换的情书不同，他们的通信里没有幼稚的对话，也没有昵称。唯一留存下来的通信记录都是海德格尔发出的那些，他会写这样一些内容：

> 我受到了恶魔的侵扰。它隐藏在你充满爱意的双手和闪亮的眉毛的无声祈祷中，那是一种充满女性魅力的伪装。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8]

不管有什么充满女性魅力的伪装，恶魔依然是飘忽善变的。这段婚外情开始仅三个月之后，海德格尔就退缩了。他在信中的口气突然变得疏远。他以工作繁重为借口，还就他可以将注意力转回现实生活以后的未来作出了许多夸大的承诺。简而言之，他表现得与任何意识到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纠缠不清是个错误，尽管心怀愧疚，但仍不愿彻底断绝今后继续与其发生关系的可能的男人没什么两样。

公平地讲，海德格尔也不算完全在说谎。他的妻子在他们的乡村地产上为他搭建了一间小棚屋，海德格尔当时正在那里创作将给他带来重大突破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不过从他打发阿伦特的时候算起，这本作品还要再过两年才能完成，何况他还计划在当年秋天继续授课。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夏天，阿伦特又变成孤身一人了。

1925年秋天，当这对师生都回到马尔堡大学之后，海德格尔继续躲避着阿伦特。到1926年春天，他干脆开始放阿伦特鸽子了。沮丧的阿伦特从此开始对海德格尔死心，只不过这个过程几乎要持续一生。她离开了马尔堡，转拜到另一名哲学家门下，这个人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她和海德格尔还保持着联系，但大多数时候只能给他写一些充满哀伤之情的书信。他们还可以在小镇的火车站上短暂约会，其持续的时间都不能超过火车停靠的时间。

尽管这样的见面显然是短暂且无法令人满足的，这场婚外情仍会成为他们各自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海德格尔对于阿伦特的影响显然塑造了她的性格，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不过阿伦特从海德格尔这里获得的东西对她来说更像是某种启发，而不是什么必须遵循的指令，至于她的作品的主题和范围更是由她自己选择的。海德格尔专攻哲学，阿伦特则转向了政治理论。海德格尔留在德国，阿伦特离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人终于重逢时，阿伦特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即将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思想家，而那些为她树立了声望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德国在二战中的行为的理念都是在没有海德格尔的评论或控制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

他们两个人在德国的经历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可谓是天壤之别。海德格尔在结束了与阿伦特的婚外情之后不久就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关于海德格尔对于入党的事究竟有几分真心的争论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

于纳粹党运动是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的。纳粹党宣扬的对于整个世界的浪漫主义幻想灾难性地与海德格尔本人的一致，那就是所有种族都陷入了长期的、严重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正义属于“德意志民族（Volk）”。

海德格尔并不只是悄无声息地接受纳粹党人，他甚至积极地与他们一起活动。他几乎是刚一加入纳粹党就开始领导清除大学中的犹太人的活动，就连取消他自己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教授资格的文件都是由他签署的。（关于这一举动，阿伦特称海德格尔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9]）这件事让海德格尔成了被纳粹称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的过程中的突出人物。这个德语词有时可以被翻译成英文“collaboration（协调、合作）”，大多数德国人，无论他们是公民组织中的成员还是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接受了纳粹主义的那些要务的。

后来在抽象地谈论到“一体化”问题时，阿伦特直白地说道：“这个问题，这个针对个人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敌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10]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有多深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才为公众所知的，不过她肯定一直都在想着他。在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期间，阿伦特写了一篇题为《爱与圣奥古斯丁》（*Love and Saint Augustine*）的博士论文。这也许可以被视为她对自己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感到沮丧的另一个标志，她在这里关注的问题已经从男女之爱转为了邻里之爱。阿伦特是在1929年初完成这篇内容充实且具有挑战性的论文的。此时距离华尔街股市崩盘，从而引发大萧条，并导致为保证德国遵循《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而设立的贷款供应出现不稳定等事件发生仅剩几个月。后来希特勒正是利用经济灾难带来的破坏为自己赚取了支持度，不过在阿伦特获得博士学位时，希特勒尚未真正羽翼丰满。

阿伦特当时生活在柏林，同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还有很多年轻的研究生，他们都在试图想明白，在这个因为被大多数人视为侮辱的《凡尔赛条约》而动摇不定的国家中，自己能做些什么。与魏玛时期的其他人一样，阿伦特也参加了很多与当时阴郁的大环境并不相符的光鲜亮丽的聚会。一个影响她命运的聚会是在柏林人种学博物馆（Museum of Ethnology in Berlin）举办的。这个聚会是一次左派人士以筹募资金为目的而举办的化装舞会。阿伦特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阿拉伯闺中少女”。[11]人们可能很想知道这样的装扮在1929年时是什么样子，反正她的造型显然很成功。阿伦特在舞会上遇到了一个很久没见的同学冈瑟·斯特恩（Gunther Stern），他们自此又重新联系上了。

后来斯特恩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当时试图吸引阿伦特的方式是对她说“爱是一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某些本来是后验的事物——比如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就被转化成了一个人生活中的先验”。[12]对于其他女人来说，这样的话似乎是在炫耀。但是对于阿伦特来说，这是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不仅局限于感情上，还存在于思想中的明显证据。阿伦特于当年9月嫁给了斯特恩。然而她通知海德格尔自己结婚消息的书信依然透露出一种挫败感。她向海德格尔重申自己想要安顿下来，想要获得家庭的温馨，即便这个家庭不是完美的：

> 不要忘记我多么清楚、多么深刻地知道我们的感情已经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幸事。这个想法不会被动摇，直到今天也不会。[13]

在阿伦特写这封信的时候，海德格尔还没有公开自己倾向于纳粹党的态度。

婚姻带来的安逸生活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它让阿伦特有机会更加专注于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这次她要写一本不完全算是以她的内心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书，但是它依然可以被视为阿伦特写过的最接近自传的作品。她的朋友从一位珍本书书商手中发现了十八世纪犹太裔沙龙女主人

（salonnière）的书信和日记，然后把它们都交给了阿伦特。这个名叫拉埃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女人的生活很快就让阿伦特入迷了。于是她开始着手写一本传记，这本书最终会成为一本一半在陈述个人哲学理念，一半在褒扬这位被她视为榜样的女性的作品。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几乎算得上同时期女性思想家中的一个特例了，因为其他大多数人都没有胆量明确承认自己感激其他女性。

瓦恩哈根1771年出生在柏林，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的女儿。尽管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瓦恩哈根从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对人们的想法感兴趣。成年后，她身边围绕的都是同时期的伟大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们通常都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恩哈根的沙龙让她成了德国智识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阿伦特对她如此热衷的部分原因在于瓦恩哈根和阿伦特一样是犹太裔，受同化程度也很深。不过瓦恩哈根对于身为犹太人这件事的看法有些矛盾。鉴于此，阿伦特认为由瓦恩哈根的丈夫记录下来，据说是她的临终遗言的这段话令人难忘：

> 身为一名犹太裔女人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也是我一生苦难和不幸的根源——但现在，我不再渴望自己不曾拥有这些经历。[14]

阿伦特深受这句话的影响，所以她用这句话作为她作品的开头。这本书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一种通灵的特质。阿伦特直接称瓦恩哈根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本书是在完成大约二十五年后的1958年才终于被出版的。阿伦特写到她在创作本书时选择了“一种传记文学中少有的角度”。实际上，阿伦特在描述自己的目标时几乎有种玄学的意味：

> 我的目的从来不是写一本关于拉埃尔的书；至于她的个性，根据作者从外面引入的各种心理学标准和分类理论，也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分析结果……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只是用拉埃尔可能采用的方式来讲述她的一生。[15]

研究阿伦特的学者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曾经宣称，阿伦

特说自己在“用拉埃尔可能采用的方式”讲述她的故事这一点“令人震惊”。[16]你可以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另一个人的档案，但可能依然无法彻底理解那个人的内心世界。阿伦特肯定也明白这一点，甚至是在尝试从拉埃尔的角度写拉埃尔的人生时体验过这样的经历。一方面来说，想要真正代表一个已经去世一个世纪或更久的人发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来说，阿伦特从情感上感受到的瓦恩哈根的生活对她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所有理性因素。她发现了一位自己想要给她当学徒的女主人，写这样一本书就是阿伦特实现自己愿望的方式。

阿伦特认为瓦恩哈根最让自己感兴趣的一点在于她找到了让与众不同变成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途径。阿伦特尤其把这一点与她的犹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瓦恩哈根的丈夫试图通过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来超越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这个方法对于瓦恩哈根来说，从来都没有效果。她认为自己无法抹去这个标志，于是她选择接受现实。阿伦特的结论是，如果说身为犹太人让瓦恩哈根与德国社会格格不入，那么它正好给了瓦恩哈根一种独具个性的视角，这种视角最终被证明是有其价值的。能够对事物有不同看法不仅仅是选择不同视角的问题，有时候，那还意味着对事物有更透彻的理解。

阿伦特告诉我们，瓦恩哈根因此成了某种“贱民（pariah）”。但她使用这个词时并不含有我们如今使用它时包含的那种贬义。阿伦特在后来的著作中又在这个名词前面增添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有意识的贱民（conscious pariah）”。一个有意识的贱民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也知道至少在别人眼中，自己永远不能彻底摆脱这种不同。但是“有意识的贱民”还知道这种独特性让自己获得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某种接近本能的共情能力，即一种因为有切身经历，所以能够敏感地体会到他人难处的能力：

> 这种敏感是对于每个人的尊严的一种病态的夸大，是一种特权阶层从不能感受的激情。就是这种强烈的共情能力造就了贱民的慈悲心。在一个

> 建立于特权、因出身获得的骄傲和由头衔赋予的自大之上的社会中，在理智将人的尊严当作道德的基础很久之前，贱民已经凭直觉发现了广泛的人的尊严。[17]

尽管阿伦特通常只在描述犹太人的与众不同时才使用“贱民”这个名词，但她暗示自己知道这个模型还可以被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中。阿伦特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贱民的代表这一点似乎并不是碰巧而已，尽管阿伦特否认了这个代表是男是女有任何重大的区别。她可能会说瓦恩哈根的犹太人身份是比她的女性身份更能引起共鸣的要点，但阿伦特在瓦恩哈根身上发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类比来延伸，而且阿伦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这一点。当她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这本关于瓦恩哈根的生活的作品时，阿伦特在引言中这样写道：

> 当代的读者们肯定立刻就能发现：拉埃尔既不漂亮也没什么魅力；和她产生过任何意义上的恋爱关系的男人都比她年轻；她不具备任何能够让她施展自己惊人智慧和激情创意的才能；还有最后一点，她拥有典型的“浪漫主义”性格，这是一个“女性问题”，即男性“总体上”对女性的期盼与女性本身可以提供或想要获得的一切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个问题已经因为这个时代的状况而形成了，它表现为一个根本无法被填平的鸿沟。[18]

从汉娜·阿伦特与女权主义关系的历史来看，这算得上一段非常令人惊奇的表述了。阿伦特对于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豪言壮语都没什么兴趣。她在工作中接触的几乎都是男性。她从来不怎么担心自己能否融入几乎全是男性的知识分子圈子。她也不觉得父权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在人生晚期，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女性解放的时候，她说“女性问题”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什么问题。她还告诉采访者说：

> 我一直觉得有些职业由女性承担是不成体统的，那不适合她们，由女人下命令就是不怎么好看。一个女人如果想保持女性化，就应当尽量避免陷入那样的处境。我并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个人来说无关紧要。最明白的说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19]

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回答让如今的人们没法将当时的阿伦特认定成一名为女性事业默默斗争的改革者，人们甚至很难确定她本人是否支持两性平等。

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一个人应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没有创作关于诸如克尔凯郭尔之类的人物的传记作为自己广为人知的事业的开端，反而选择了一位让自己着迷的女性为主题。这位女性“既不漂亮也没什么魅力”，却拥有“惊人智慧和激情创意”。她的局外人身份不仅不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困难，反而成了可以被挖掘的力量源泉。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阿伦特没有感受到任何形式的对女性的歧视的原因可能是，在她生活的时代里，她的犹太人身份是一个比性别明确得多的目标。与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相比，人们对于女性的敌意被大大地淡化了。

1933年，当位于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被付之一炬时，阿伦特还在忙着创作这本关于瓦恩哈根的作品。起火的原因是有人纵火，人们对真凶的身份存在争议，但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并被当作最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而立即接受了审判，德国的左派也因为纵火案造成的混乱而备受指责。希特勒在纵火案发生大约一个月前刚刚宣誓就任总理一职。这场动乱让他有借口获得紧急权力。阿伦特的丈夫冈瑟·斯特恩与反纳粹主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立即离开德国到巴黎去了，阿伦特则留了下来。

她并不是感受不到政权更迭带来的危险，实际上，她说这场大火是一种“直接的冲击”，[20]并且让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了。不过早在纵火案发生之前，她肯定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朋友和同事们正渐渐屈服于纳粹的影响力这个事实。在前一年秋天，阿伦特就听到了一些传闻，于是她给海德格尔写信询问对方新的政治立场。阿伦特具体的关切包括海德格尔已经成了反犹主义者的传闻，以及她从

丈夫和朋友那里收集到的各种消息。海德格尔回信的口气起码可以说是非常不耐烦和愤怒的。他在信中列出了自己最近帮助过的犹太人学生的名单，还补充说：

> 谁想把这叫作“激烈的反犹主义”就去叫好了。除此之外，我在大学事务上的反犹程度与十年前我在马尔堡时别无两样……更不用说我还与很多犹太人保持私人关系的事了。
>
> 最重要的是，这绝对不会影响我与你的关系。[21]

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影响了。这封信成了此后十多年里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

国会纵火案几个月之后，阿伦特同意帮忙偷偷搜集收藏了瓦恩哈根的文件的那间图书馆里存在的含有反犹主义声明的小册子。这些内容是要送给在国外组织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们加以利用的。不过阿伦特才干了没几天就被发现，并被举报给了当局。她和母亲双双遭到了逮捕，并在拘留室里待了几天。逮捕她的警官挺喜欢她，甚至还对她进行了言语挑逗：“我该拿你怎么办呢？”[22]最终，他还是把阿伦特放了，这可以算是非常幸运了。在接受审讯时，她干脆选择了撒谎，没说自己是在为谁工作。

不过出了这件事之后，阿伦特也明白自己显然不能留在德国了。起初，她和母亲一起去了布拉格，玛莎·阿伦特从那里回到了柯尼希堡，阿伦特则去了巴黎。她随身携带着瓦恩哈根那本书的手稿。不过一抹阴云一直笼罩着她，她对于纳粹带来的灾难之深重已经了然于心。她在柏林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海德格尔已经当上了大学校长，不仅把纳粹党徽别在胸前，甚至短暂地尝试过求见希特勒。这些事阿伦特都知道。

就这样，阿伦特把思考变成了个人的事。“我再也不想参与任何种

类的知识事业了。”[23]如今我们都知道，她打算让自己与知性主义疏远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不过这种背叛留下的印记是永恒的。阿伦特从那之后不再将传统的思想生活当作一种救赎。因为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会受到糟糕判断的影响，他们抛弃常理和常识的速度都很快。

阿伦特在去世前几年曾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至今依然认为就所有事提出观点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质。”她当时谈到了她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今天我会说他们都被自己的观点束缚住了。就是这么回事。”像海德格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加入纳粹党时并不是在主动作出什么战略性的选择。他们也不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才加入的。对于他们来说，与一个自己不能热诚地坚信的事业结盟是让他们极为厌恶的事，所以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还会让自己不断贴近纳粹党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就都成了纳粹分子。

阿伦特在1933年抵达巴黎之后，不仅与自己的祖国断绝了关系，还将她的哲学事业抛在了一边。在法国暂居的八年里，阿伦特几乎没有发表过一个字，只是在朋友们的督促下才完成了那本关于瓦恩哈根的作品。不再进行学术研究的阿伦特选择工作，她成了多个旨在帮助越来越多聚集到巴黎的犹太移民的福利项目中的行政人员。这种相对更具官僚性质的程序性办公室工作让她觉得很放松，能够完成，也不太可能像她之前的“思想生活”那样让她感到失望。

阿伦特在巴黎时曾与冈瑟·斯特恩短暂地团聚过一段时间，不过后者一直忙于创作一部无比复杂（最终也没能出版）的小说，二人的婚姻很快就破裂了。1936年时，阿伦特认识了另一个男人，这个名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的德国共产党党员擅长社交，他与共产党运动的牵连很深，以至于他在巴黎生活的时候必须使用一个假名。

人们往往忍不住对布吕歇尔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男性气概进行浪漫化的描绘，阿伦特的很多传记作者都抵挡不了这个诱惑。布吕歇尔比

斯特恩和海德格尔身材更高大。他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还很爱笑，再加上他常年投身政治，所以是一个阅历丰富、老练世故的人。不过他在知识层面上也足以与阿伦特一较高下，这正是阿伦特要求自己的伴侣拥有的素质。无论是在书信里，还是在餐桌上的闲聊中，布吕歇尔都可以就哲学和历史问题详细表述有说服力的观点。有一封他写给阿伦特的书信令人过目难忘，在书信的开头，他先就阿伦特母亲去世发表评论并表示慰问，接下来的内容就升级为全面批判哲学家对抽象真理的忠诚：

> 马克思只是想将存在的天堂传遍整个世界，那些不如他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都处于因血腥阴云和烟雾窒息而死的边缘……克尔凯郭尔使用散落的砖块给自己堆砌了一个狭窄的洞穴，并把他的道德自我和一个本性凶暴的上帝一起关在里面。对此人们只能说：好吧，祝你好运，以及非常感谢。[24]

如布吕歇尔自信傲慢的文风显示的那样，他不是海德格尔或斯特恩那样的学究。他读过很多书，完全是自学成才。尽管他也有文学方面的抱负，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著作。他一生都在抱怨自己遭遇了作家的瓶颈期，不过写信显然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他过的是一种被过着学术的知性生活的文人雅士们排斥的生活，这一点似乎对阿伦特很有吸引力。认识布吕歇尔十年之后，阿伦特在一封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多亏了丈夫（二人于1940年结婚，部分原因是这样布吕歇尔才能获得离开欧洲的批准文件），自己才能够“用政治的视角看待问题，用历史的方法思考问题”。阿伦特还喜欢布吕歇尔能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而海德格尔对于这个世界肯定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一位名叫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诗人朋友称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为“二元君主”。[25]虽然他们二人有时会很高傲，但这个说法的本意不是为了强调他们的高傲，而是要指出布吕歇尔和阿伦特都可以从他们之间的讨论中获得可观的力量的这个事实。他们谁也不是谁的主宰，虽然在美国的那些年里，阿伦特通常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他们的

婚姻是在一种自然平等的关系下运行的，就算布吕歇尔偶有不忠，这种平衡总体上并没有受到破坏。

在巴黎与其他作家和思想家相处的时光被证明是对阿伦特有益的。她后来发现与他人一起工作更容易思考。阿伦特与另一位德国难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成了朋友，后者当时还是一位不太成功的评论家，很难让自己的作品获得发表。编辑与他意见相左时，他总是不肯遵照他们的要求妥协。本雅明是一个古典浪漫主义者，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在他家里，公开表达任何职业追求都会被视为庸俗。虽然本雅明的父亲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向他提供任何资助，他还是坚持投身了这项肯定会让他陷入贫困的事业。回想本雅明要成为文人（homme de lettres）的选择时，阿伦特这样说道：

> 德国人还不知道文人的存在，几乎同样不为人知的还有本雅明为了挣钱糊口而不得不用这个身份进行的工作：不是文学史专家或学者撰写必要的长篇宏论的工作，而是撰写批评文和散文的工作。他认为这种文体的形式过于通俗泛泛，如果不是因为要按字数获得报酬，他肯定宁愿去写格言警句。[26]

本雅明也是坚持要阿伦特完成瓦恩哈根的手稿的朋友之一。1939年他给自己和阿伦特共同的朋友格肖姆·索罗姆（Gershom Scholem）写信推荐这份手稿时说：“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充满了针对时下的有教化和辩护意味的犹太研究的强有力的冲击。”[27]阿伦特也非常乐意帮助本雅明完成他的工作。她在给索罗姆的信中写道：“我很担心本雅明。我尝试在这里帮他获得一些机会，不过彻底失败了。但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帮助他获得稳定的收入，好让他有机会继续创作是非常重要的。”[28]

本雅明一直比阿伦特更趋近于一位神秘主义者。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非常脆弱。不过阿伦特后来写道，自己在本雅明的高傲中发现了一种值得延续下去的政治原则。她认为他的文人生活方式与自己已经开始鄙

视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之间是有区别的：

> 知识分子阶层要么以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的身份为政府提供服务，要么为社会提供消遣或教导；而文人则总是在努力地疏远政府和社会。[29]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欧洲，政府还是一种人们想要与之保持距离的东西。法国的反犹宣传也上升到了极端狂热的程度，整个国家受到来自东边的纳粹分子的施压，已经开始分崩离析。1939年底，布吕歇尔被送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拘留营里，好几个月之后才在一位有权势的朋友的帮助下获得释放。1940年，阿伦特本人也被送到了一个位于法国与西班牙边界附近的古尔斯（Gurs）的拘留营里。阿伦特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直到法国向德国投降，像古尔斯这样的拘留营都被解散为止。最终夫妻二人得以重聚，并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他们是1941年5月抵达纽约的。

与此同时，瓦尔特·本雅明也看到了灾祸将至的征兆，1940年秋，他筹划了前往里斯本，再从那里乘船前往美国的行程。不过本雅明必须穿越西班牙前往里斯本。当他和其他一小群原本生活在马赛的难民一起抵达西班牙边界时，他们被告知就从当天开始，边界对他们这样的“无国籍人士（sans nationalité）”关闭了，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都要被送到集中营去。到了晚上，本雅明使用过量吗啡自杀了。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给了自己的同伴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看不到自己还有任何出路。

阿伦特是最先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朋友之一，那证明了后来她在一篇长长的悼念散文中所称的他的“坏运气”的一切：

> 早一天，本雅明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边界；晚一天，马赛的人就能知道穿过西班牙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唯独就在那一天，灾难才有可能发生。[30]

这是对本雅明的命运的理智的惋惜，是她对这场悲剧的看法的陈

述，她的态度似乎显示了某种感情上的疏离。不过阿伦特对于发生在本雅明身上的一切绝不是无动于衷的。在她离开法国的途中，阿伦特还特意在事发地点停留，试图寻找朋友的坟墓，结果她只找到了一片公墓。在给索罗姆的书信中她描述道：

> （公墓）面朝一个小小的海湾，可以直接俯瞰地中海；坟墓是被凿刻在一层层的石阶上的；棺材也都被推进了这些石墙中。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奇异、最美丽的地点之一。[31]

就在本雅明离开马赛前，他把自己的手稿全集留给了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如果自己到不了纽约，他希望阿伦特可以将这些手稿转交给他在那里的朋友们。手稿中有一篇是本雅明的《论历史的哲学》（*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在前往美国的船上曾互相朗读其中的内容。“深思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幸福的概念会受个人存在的这段时间的彻底影响。”本雅明继续写道：

> 会引发嫉妒的幸福仅存在于我们呼吸过的空气中，存在于我们曾与之谈话的人们之间，存在于将自己献给我们的女性中。换句话说，我们对幸福的概念与对救赎的概念是牢不可破地关联在一起的。[32]

然而到他们登船前往美国时，在欧洲大陆上激烈上演的战争几乎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救赎的机会。曾经塑造了他们的大部分事物，包括他们知道的那个德国就那么消失了。

在纽约的生活一度很艰难。阿伦特和丈夫，后来还加上阿伦特的母亲一起住在一栋破烂不堪的多租户房屋里，他们租了几个房间，但是要和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公共厨房。布吕歇尔找过各种奇怪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他从没做过的某种工厂工人的活计。阿伦特先是到马萨诸塞州的一家收容所学习英文，然后就开始依靠写文章赚钱。她主要是给一份规模很小的名为《重建》（*Aufbau*）的德语报纸及其他以流亡犹太人为受众的期刊供稿。阿伦特把本雅明的论文寄给了当时也在纽约的本雅明的朋

友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不过并没有立即得到什么回应，似乎没有人计划出版这些作品。

阿伦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文章介乎于学术论文和现代报纸社论之间。其中大多数暴露了一定程度的文笔枯燥和一味地重复相同主题的问题。按照顺序阅读这些文章时，你会开始感觉像在接受什么慷慨激昂的动员，而非真的获得某种内心的触动。不过阿伦特在1943年为《灯台报》（*Menorah Journal*）撰写的《身为难民》（*We Refugees*）绝对是一篇突出的作品。文章本身就是用英文写的，这可以解释其文法简单的特点，因为此时距离阿伦特开始学习英文刚刚过去两年。

因为是在使用自己的第二门外语而难免流露出的那种干巴巴的语调刚好符合她哀悼和争辩的主旨："首先，我们不喜欢被称为'难民'。"[33]阿伦特描述了这个因为在欧洲的遭遇而受到巨大打击，但是只能把那些事全都埋藏在心底的群体。阿伦特写道，这样的氛围让难民们整天魂不守舍，他们不能向别人倾吐自己的困扰，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

> 显然没有人想知道当代历史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被敌人关到集中营里，被朋友关到拘留营里。

阿伦特从来不惧怕涉及令人不快的主题，她还批判了在难民中发生率很高的自杀现象，不过她批判的对象并不是那些选择自杀的难民，而是他们自杀的形式。阿伦特写道："他们的消失是一种悄无声息、不引人注意的消失。好像他们是在为自己选择这样极端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而感到抱歉。"[34]阿伦特认为这样做的理由不充分是因为自杀的逻辑不仅是纳粹制造的政治灾难造成的，甚至也是美国的反犹主义提供的："在巴黎，我们每天晚上八点以后不得离开住处的原因是我们是犹太人，而在洛杉矶，我们处处受限的原因是我们是'敌国侨民'。"

阿伦特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七岁，这篇文章是显示她拥有争论到底的天赋的第一个标志。她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说服自己，为公众写作是有用处的。她的文章着力于号召犹太人成为“有意识的贱民”——拉埃尔·瓦恩哈根被重新提起，海涅（Heine）、肖洛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甚至是查理·卓别林”等人的例子也都被阿伦特用在了后来的文章中——因为这是脱离他们所处的令人麻木、逼人自杀，还要装作没事的处境的唯一办法。

> 少有的那些坚持讲出实情，甚至不惜讲述被视为“卑劣”的经历的难民用让自己不受欢迎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宝贵的进步：历史对他们而言将不再是一本合上的书，政治也不再是非犹太人的特权。

类似这样的文章让阿伦特受到了纽约更广泛的左翼出版圈子的注意。对于她之后的活动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是一小拨以《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为中心的年岁未老，思想却有些陈旧过时的前共产党员和文学批评家们。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份杂志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对于一小部分有权有势且大都生活或出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人来说，《党派评论》成了令人向往、充满魅力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象征。这份杂志是在一份旧杂志的基础上改版而来的，原本的杂志与共产党员约翰·里德俱乐部（Communist John Reed clubs）有关系。改版后的杂志掌舵人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在改版之前就是这里的编辑，不过他们连杂志的政治立场也一起改掉了。

美国的共产党在那些年里正在渐渐分出派别。一派认为只有不计一切代价忠于苏联，才能取得共产主义社会实验的成功。另一派则持怀疑态度，他们尤其怀疑斯大林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拉夫和菲利普斯都属于

后一个阵营。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左派原则，他们只是不愿意追随教条的政党路线。你可以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意识的贱民”。鉴于阿伦特关注的正是分析法西斯主义及其根源，她立刻就融入了这个集体。

不过随着《党派评论》的不断发展，它逐渐成了一份更关注艺术和文学，而非政治问题的杂志。阿伦特为该杂志提供的第一篇稿件发表于1944年秋，文章内容是关于卡夫卡的。阿伦特并不是唯一给《党派评论》供稿的女性，短篇小说作家珍·斯塔福德（Jean Stafford）、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也在这里发表文章，不过只有阿伦特写的是深奥的知识性文章。

她早期的文章中暴露了所有使用非母语写作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布吕歇尔曾经写信提醒她必须放弃自己的“（昂贵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Stradivarius）”，改用“（普通的）小提琴”。[35]这一点在她后来为当时最重要的左派杂志之一——《国家》（*Nation*）创作的文章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国家》的编辑是兰德尔·贾雷尔，他是阿伦特的朋友，还会帮她把文章改得更便于美国读者阅读。贾雷尔对她的影响力几乎是立即就显现出来了：1946年，阿伦特会同时为《国家》和《党派评论》撰写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不过只有那些经贾雷尔编辑过的文章才会拥有吸引人的导语：“一场关于哲学的讲座足以引发一片混乱，因为有成百上千的人涌进来听，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拂袖而去。”[36]贾雷尔后来会成为阿伦特最经常求助的人，她称贾雷尔作的贡献是让她的作品“英文化”。

关于存在主义，阿伦特还在巴黎时了解过一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她宣称自己对萨特的《恶心》（*La nausée*）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L’étranger*）印象深刻，但她对这两个人不仅怀有她对其他知识分子都怀有的担忧，更为他们表现出的倾向

感到不安：“象征性地说就是，他们整天待在自己的酒店房间或咖啡厅里。”阿伦特还为他们这样麻木地隐蔽在荒谬中的做法感到担心。如果他们不走入外部世界并有所作为，阿伦特担心：

> 尽管有很多反对意见，但是虚无主义的元素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们并非什么新见解的结果，而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观点的产物。

此时的阿伦特已经开始创作记录自己的“新见解”的汇编了，最终得出的成果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一直在《党派评论》和其他多份美国左派报刊上发表分析反犹主义和无国籍人士困境的文章。最早在1945年，阿伦特就说服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的一位编辑认可这些分析文章值得被集中成一本书出版，不过阿伦特后来又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要简单地描述这本分为三部分的大部头很难。如阿伦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观察到的那样，书里可没有能够帮助读者理清头绪的温馨介绍。在第一版的前言中，阿伦特开篇就猛烈抨击了过分简单地解读历史的做法：“认为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一定可以为人所理解的信念导致人们总在用陈词滥调解释历史。”[37]阿伦特还对认为善与恶的关系可以被简单、随意地确定的观点持抗拒态度，虽然她相信极权主义从任何层面来说都是一种恶：

> 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终极阶段会出现一个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已经不能用人类可理解的方式推理其动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它，我们也许永远不能知道恶真正的激进本质。

这本书具有的广泛的、漫谈性的特质是由其漫长的创作周期而形成的。创作途径不仅包括了阿伦特的经验与研究，还有她与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进行的很多直至深夜的畅谈。阿伦特创作这本书的大部分时间里，布吕歇尔都处于意志消沉的无业状态。他英文不够好，所以做不了文职工作；他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不能教书。而阿伦特则在由纳粹德国

难民建立的朔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做编辑。每天她去上班之后，布吕歇尔会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几个小时的书。到了晚上，夫妇二人会交流各自的劳动成果，即布吕歇尔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和阿伦特的分析。这本书和书中的见解最终属于阿伦特，但布吕歇尔的贡献是无价的。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的关键点是集中营。她将之描述为极权主义的“激进的恶（radical evil）”的终极工具。集中营是“对人的完全主宰”这项纳粹总实验的试验场。集中营的恐怖成功地将每个人简化成“一些反应的集合”，一些可以互相取代的个体。阿伦特将这一点与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人的生活和死亡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事，至少是不如政治的意识形态重要。

意识形态是阿伦特的另一个见解。她写道：极权主义非常依赖于意识形态提供的过分简单化的承诺，以及它能够让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相信过去和未来可以仅靠一套简单的法则就全部被解释清楚的功用。实际上，意识形态那过分简单化的，尤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恰恰是让它如此强大的原因。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承诺的解决之道意味着集权主义政治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

> 即便是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可能幸存下来，每当人们似乎无法找到一种人道的方式摆脱政治、社会或经济困境时，那些解决方法就会以一种强烈诱惑的形式出现。[38]

1951年，这本书终于出版后获得了评论界的热烈赞美。人们赞美的不仅是阿伦特的分析，还有她在传达自己想法时表现出的博学。［这本书的文字部分也经过了“英文化”，做这个工作的人是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和阿伦特的另一位朋友罗丝·法伊特尔逊（Rose Feitelson）。[39]］很多评论将重点放在了阿伦特对纳粹极权主义策略和苏联方式所作的比较上。《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评论文

章的副标题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派系被评价为‘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体系’（Nazi and Bolshevik Varieties Rated as ‘Essentially Identical Systems’）”。实际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从没使用过单引号中的这个说法，她只是强调了两种运动的领袖人物的策略之间存在的相似性。阿伦特嫁给了一位前共产党员，她在纽约的很多新朋友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让她担忧的是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苏联形式，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

对于阿伦特的赞美声势浩大，以至于她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的销量也非常好。就连《服饰与美容》这样通常不报道知识分子事物的杂志都将阿伦特列入了1951年年中的“人们在谈论（People Are Talking About）”名单：

>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著。阿伦特用一种新鲜的构想创作了一本意义重大，但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她在书中写道：“极权主义组织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们可以直接利用众多秘密社团作为组织工具，他们甚至不屑于尝试隐藏自己的目标。”[40]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只是随意引用了一段书中的文字，这段话绝对不能代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论述的精华。不过这恰恰预示了阿伦特即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她太有象征意义了，以至于对于她的仰慕者来说，她的思想其实并不如她展示给公众的这个形象重要。她给那些在她影响范围之内的女性带来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她不仅获得了那些把自己塑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的男性们能够获得的地位，还用自己高屋建瓴的分析让那些人费尽心思写出的深奥的，论述他们对战争、对人类历史作用看法的文章都显得黯淡无光。就这样，阿伦特不仅成了那个时代在纽约定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还成了其中最闪耀的一颗明星，成了其他人追随的对象。直到这本书出版四十多年之后，一位名叫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记者还会写道，被“错认为……可能被邀请参加汉娜·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举办的聚会的人……是种恭维”。[41]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阿伦特的新地位。最引人注意的是很多男性对此表现得极为糟糕。阿伦特属于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不过这个名称是直到其中很多成员都去世之后才开始被使用的。纽约知识分子指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集中在曼哈顿的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们，这个群体中的人会相互结交、约会或结婚，但一个最根深蒂固的积习是他们会在其他成员的背后嚼舌根。他们相互通信，还在信里讲别人的八卦，纽约知识分子的传奇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些人对于阿伦特的第一印象的确切记录。我们知道的是，经常和这些人来往的诗人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称阿伦特是“那个魏玛共和国的轻佻女子”。[42]据说批评家莱昂内尔·埃布尔（Lionel Abel）在她背后称她为“汉娜·自大狂（Hannah Arrogant）”[43]。[44]就连写过阿伦特“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这样的话的艾尔弗雷德·卡津也补充说自己是“耐心地顺从了一种以傲慢为表现形式的知识分子的孤独”。[45]

这些男人都不是什么畏首畏尾的人，他们沉着冷静，喜欢发表高深的见解，所以他们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智慧误认为傲慢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弄清楚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些人都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不过这样的处境确实给阿伦特造成了困扰。帕克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是因为她几乎从不涉足战争、历史和政治这样严肃的题材，而且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她几乎已经不发表批评文章了。韦斯特也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与纽约知识分子热衷于进行的这种自恋竞争关系不那么紧密。不过这些脑子里满是绝顶聪明、关乎整个世界的大想法的男人们似乎从来不会被指责为过于自负。

起码是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只有很少一些人会因为阿伦特的才华而讨厌她，敢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表达这种想法的人就更少了。更引起人们注意的反而是那些完全可以被称为她的狂热崇拜者的男性。文学批

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为一份名叫《新领袖》（*New Leader*）的小规模左派杂志撰写了一篇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先是将阿伦特比作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后者是一位留下了很多关于宗教和政治的格言警句的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接下来，可能是觉得阿伦特是一个比韦伊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人，所以麦克唐纳又提出了一个更具野心的对比：

> 书中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论分析是继我在1935年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后读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政治理论。它带给我的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带给我的类似的充满矛盾的熟悉感（“当然，这正是我已经思考好多年的问题”）和充满震惊的新发现（“这竟然有可能是真的？”）[46]

这段评论并没有太过夸大其词。《极权主义的起源》确实已经成了一部经典著作，是历史学者和政治科学学者的必读内容。虽然这本书很厚、很难懂，但是阿伦特描述的法西斯主义在民众普遍不满的环境下崛起的发展方式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为真理。她与马克思的不同在于她不认为存在什么能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革命性的方式。晚年时变得更加理智、更加脚踏实地，也更疲劳厌倦的阿伦特看到那么多朋友已经被愚蠢和暴力的激流吞噬，所以她会回避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她已经学会只依靠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

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出版，阿伦特会交到一个新朋友。一个在《党派评论》工作的人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给阿伦特写了一封信，用没什么新意的内容描述了这本书：

> 过去的两周里，我完全沉浸在你的书中，我在浴缸里读，坐车时读，在杂货店排队结账时也读。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本真正非同凡响的作品，其中的理念至少比其他人超前十年，而且这本书读起来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令人着迷。[47]

有趣的是，写这封信的人接下来可能是出于尊敬而提出了“一个重

大的批评意见”，她认为阿伦特在对自己的观点充满热情的同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机会、运气在塑造极权主义机构上发挥的作用。“我不认为我表达得很清楚，我手边也没有这本书可查阅，因为我已经把它借给别人了”，写信的人用一种聊天似的口吻继续着，先是突然批评了一个愚钝的评论者“蠢极了”，然后又在附言中邀请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共进午餐，还提出了在劳伦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反犹主义的问题。

写出这封带着既紧张又自信的感觉的书信的人就是批评家玛丽·麦卡锡。阿伦特和麦卡锡是1944年认识的，《党派评论》的聚会无穷无尽，她们在其中某一次上遇见，并争吵起来。

---

[1] “Shadows，” in *Letters，1925-1975：Martin Heidegger and Hannah Arendt*，ed. Ursula Lutz，trans. Andrew Shields （Harcourt，2004）.

[2] Elis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2nd e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50.

[3] “Shadows，” in *Letters*，1925-1975.

[4] 转引自Young-Bruehl，*Hannah Arendt*，40。

[5] Daniel Maier-Katkin，*Stranger from Abroad：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Friendship and Forgiveness*（Norton，2010），27.

[6] “Heidegger at 8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21，1971.

[7] 1925年2月10日，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Letters*：1925-1975。

[8] 1925年2月27日，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Letters*：1925-1975。

[9] 1946年7月9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1926-1969，ed.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Harvest，1992）。

[10] “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Hannah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trans. Joan Stumbaugh （Melville House，2013），18.

[11]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77.

[12] 阿伦特中心（Arendt Center）翻译的Gunther Anders，*Die Kirschenschlacht*，可见于http：//hac.bard.edu/news/？item=4302。

[13] 汉娜·阿伦特写给马丁·海德格尔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29年，in *Letters*，1925-1975，51。

[14] Rachel Varnhagen：*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Harvest，1974），3.

[15] *Varnhagen*，xv.

[16] Seyla Benhabib，“The Pariah and Her Shadow：Hannah Arendt’s Biography of Rahel Varnhagen，” *Political Theory*，February 1995.

[17] *Varnhagen*，214.

[18] *Varnhagen*，xviii.

[19] “What Remains？，” 5.

[20] “What Remains？，”，8-9.

[21] 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那个冬天，in *Letters*，1925-1975。

[22] “What Remains？，” 10.

[23] “What Remains？，”，19.

[24] 1948年7月29日，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Within Four Walls*：*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annah Arendt and Heinrich Blücher，1936-1968*，ed. Lotte Kohler，trans. Peter Constantine （Harcourt，1996），93-95。

[25]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xi.

[26] “Walter Benjamin，” in *Men in Dark Times*（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95），176.

[27] 1939年2月20日，瓦尔特·本雅明写给格肖姆·索罗姆的书信，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1910-1941*，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trans.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596。

[28] 转引自Howard Eiland，*Walter Benjamin*：*A Critical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9] “Walter Benjamin，” 181.

[30] “Walter Benjamin，”，192.

[31] 转引自Gershom 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83。

[32]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Schocken Books，1969），254.

[33] “We Refugees，” in *The Jewish Writings*，ed. Jerome Kohn and Ron Feldman（Schocken，2007），265.

[34] “We Refugees，” 268.

[35] 1941年7月26日，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Within Four Walls*，65。

[36] “French Existentialism，” *Nation*，February 23，1946.

[37]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Harvest，1973），viii.

[38]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Harvest，1973），459.

[39]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250.

[40]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Vogue*，May 1951.

[41] Janet Malcolm，*The Silent Woman*（Vintage，1995），50.

[42] William Barrett，*The Truants*：*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Doubleday，1983），103.

[43] 英文中的“自大、傲慢（Arrogant）”与阿伦特的姓氏“Arendt”形似。

[44] 参见Anne Heller，*Hannah Arendt*：*A Life in Dark Times*（New Harvest，2015），25。

[45] Alfred Kazin，*New York Jew*（Knopf，1978），195.

[46] Dwight Macdonald，“A New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New Leader*，May 14，1951.

[47] 1951年4月2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The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1949-1975*（Harcourt Brace，1995）。

第五章 麦卡锡

终其一生，麦卡锡始终被视为一位对话专家，她秉持的正是她给阿伦特写信时体现出的那种聊天似的风格。麦卡锡和帕克具有某种相同的天赋，这让她们尤其擅长与人谈天说地，还能在聚会中表现得轻松自如。每当人们回忆起麦卡锡，尤其是在很多女性的记忆中，她总是站在房间的远端，身边围绕着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的人们。比如诗人艾琳·辛普森（Eileen Simpson）就记得自己在大约和阿伦特结识麦卡锡相同的时间见到麦卡锡的情况：

> 后来我意识到，她那时站立的姿势是她的一种标志性站姿：右脚略向前伸出，重心放在另一只穿着高跟鞋的脚上。一手夹着香烟，一手举着一杯马天尼。[1]

不过麦卡锡并不是一直这样泰然自若的；她和阿伦特的友谊就经历了一个磕磕绊绊的开始。那次对话是关于战争的，麦卡锡在谈话过程中作出了一个评论，大意是她“觉得希特勒很可怜”，因为在她看来，这个独裁者渴望的正是受他折磨的人民的爱戴。阿伦特听到后马上就愤怒了。“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一个受到希特勒的迫害，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说这样的话？”[2]阿伦特惊呼，然后就拂袖而去。不过走之前她还不忘先找到《党派评论》的主编菲利普·拉夫，义愤填膺地质问对方怎么能允许“有人在你的家里，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发表这样的言论”。通常情况下总是很讲究社交礼仪的麦卡锡就算不为自己的言论感到羞愧，至少也会因这个处境而无比尴尬。对于很快将成为这两个女人职业生涯和思想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友谊来说，这样的开端可真算不上什

么吉兆。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喜欢将麦卡锡归类为“美国文学的黑暗夫人”。这暗示了她属于蛇蝎美人的类型，是一个永远冷静自持，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人。其实麦卡锡并不是这样的。就像帕克总是表现为一个爱说俏皮话的人一样，麦卡锡也会使用一些维持自己形象的把戏和花招。她的朋友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在麦卡锡去世后曾暗示说：

> 她的那些轻率行为往往是公开的、坦诚的，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可以说她就是“一本打开的书”。然而，能不能找到有意思的事取决于你打开的是哪本书。[3]

这还取决于你从哪一页开始读。麦卡锡讲了又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她奇特的混合了狄更斯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4]风格的童年经历。麦卡锡1912年出生于西雅图，他的父母分别是两个富有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的后代。麦卡锡在婴幼儿时期享受到了富人家孩子能享受到的一切舒适，不过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仰仗的收入并不稳固，其来源主要是麦卡锡祖父对她家的慷慨解囊。麦卡锡的父亲罗伊·麦卡锡（Roy McCarthy）是一个间歇性的酒鬼，他身体总是不好，几乎找不到工作。最终，麦卡锡的祖父厌倦了给儿子开支票的生活，他要求儿子一家搬回明尼阿波利斯。

麦卡锡一家于1918年秋末登上了一列横跨美国的火车。当时西班牙流感正在全国肆虐。登上火车的麦卡锡一家无一人幸免，他们一个比一个病得严重，都到了说胡话的程度。一家人还能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是个奇迹了。在疾病带来的恍惚中，染上流感的一家人隐约记得火车上的乘务员在火车行驶到北达科他州的某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曾试图将他们赶下车。这段不是很清晰的记忆中包含了麦卡锡的父亲挥舞着一把枪的情节，但是没人确定那是否真的发生过。不管怎么说，罗伊

作出的最后的抗争并没有多大意义：到达明尼阿波利斯之后没几天，麦卡锡的双亲就都病死了。

麦卡锡的祖父不喜欢孩子。所以照顾麦卡锡和她三个兄弟的日常生活的义务就落在了其他亲戚身上。不幸的是，那些能够照顾他们的人都不太情愿接受这个职责：最终一位上了年纪的姑奶奶和她苦行僧一般的丈夫成了孩子们的照管人，他们关于抚养孩子的观念似乎是从管理十九世纪孤儿院的公职人员那里学来的。在这二人的看护下，麦卡锡家四个年幼的孩子每天只能吃一些根茎类蔬菜和梅子干。他们晚上睡觉时还会被用胶带封住嘴巴，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用嘴呼吸”。即便是隆冬时节，他们也会被赶到明尼苏达州寒冷刺骨的室外“玩耍”。他们的娱乐活动很有限，有时还很奇怪：

> 阅读是被禁止的，除非是读上课的课本，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赫斯特集团在星期天出版的一些可笑的报纸和杂志（Sunday Hearst papers），那上面可能会讲到麻风病，博尼·德·卡斯特拉内伯爵（Count Boni de Castellane）的婚外情以及一种能够让人从双脚开始向上逐步石化的奇特的疾病等内容。[5]

受惩罚也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些惩罚都很严厉。这种严厉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感情上的：受罚的孩子会被用梳子或磨刀的皮带抽打；而且这位姑奶奶和她的丈夫还尤其擅长把惩罚作为一种羞辱。有一次麦卡锡摔坏了自己的眼镜，结果她就被告知没有人会给她买新的。这样的忽视和虐待整整持续了五年，直到麦卡锡的外祖父介入，十一岁的玛丽·麦卡锡才被匆匆地接回了西雅图，而她的兄弟们则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麦卡锡尤其喜欢表现出她对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见解的怀疑。其第一本作品《她选择的伴侣》（*The Company She Keeps*）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躺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躺椅上突然想道：“我排斥关于调换儿、孤儿和继子女相关问题引发的一切感伤。”[6]但是她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一本劣质小说，然后用一句冷

落的言语就将它从思想中摒除了”。[7]事实是，当麦卡锡的父母去世时，麦卡锡的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就整个随之蒸发了，麦卡锡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可以想象自己嫁给一位爱尔兰律师，每天打打高尔夫和桥牌，偶尔去度假，还要参加某个天主教读书俱乐部的样子。我怀疑我会变得相当胖。”[8]

麦卡锡获得的取代这种已经不会实现的人生的东西，是后来成为她的写作特点的那种充满好奇的冷静超然。她所有回忆录中的风格都带着一点点黑色幽默的感觉，即便在她写到用胶带封住孩子们的嘴这种事时也是如此。经历过这些耸人听闻的苦难之后，麦卡锡反而不怎么愿意完全地表露自己的感受。也许一种认定过去那些事多么荒谬的意识能够让她自在一些。《她选择的伴侣》中的角色提到她同情那些“像一个没完没了地给别人讲述自己的糟糕经历的傲慢妻子那样讲究做作的礼仪的人”。[9]

对其他孩子来说，麦卡锡的外祖父安排她就读的西雅图的新天主教学校可能会让他们感觉过于严苛。麦卡锡写到，这个地方有一套历史悠久的惯例，修女们“通晓对权威的精准服从”。[10]麦卡锡渴望成为受欢迎的学生，希望能像学校里的其他女孩儿一样自信，不过懂事听话似乎并不能帮助她交到很多朋友，所以麦卡锡改变了策略。

后来麦卡锡写道：“如果美德不能让我名声大噪，那么我已经准备好了靠恶劣扬名立万。”[11]她很快就通过假装自己失去了天主教信仰而让学校里所有人心绪不宁。麦卡锡之前有没有天然的宗教情感不是一个能够用是与否回答的简单问题。她的出身环境是一种淡漠的新教和一种主要关注形式的天主教的混合。实际上，她母亲是犹太人。如麦卡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讲述的那样，年轻的麦卡锡为信仰设计了精准的时间框架：

> 假设，我在星期天失去了信仰，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天静修时间里，我

> 还可以重拾信仰，并赶上周三的告解。这样的话，就算我碰巧突然死去，我的灵魂可能陷入危险的日子一周也不过才有四天。

麦卡锡发现自己很享受引发众怒的感觉，也享受通过假扮的叛逆收获他人的认可。这件事让她得到了修女们的特别关注，以及她渴望的在同学之间的重要地位——一种能够让她与众不同的识别标志："她就是那个连耶稣会会士也说服不了的姑娘。"[12]

这件事还让麦卡锡知道自己具有一种计算其他人的反应，并利用这种反应来实现自己目的的天赋。成年后的麦卡锡也知道自己在这个方面多么善于控制和操纵别人。在《回忆信仰天主教的少女时期》（*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她描述了年轻时的自己如何策划了这次事件：她抱着"政治家和青少年经常有的那种冷静、空洞的赌徒心境"仔细观察了女修道院。[13]她看到了这里的人如何作为，看到了她们渴望什么；她把了解这里的规则当成必须完成的工作，然后研究出了具体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规则为自己服务。

在社交层面，这种天赋并不是总能给麦卡锡带来好处。她对别人作出的谨慎小心的赞美往往被当作尖刻的评判。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曾经写道：

> 玛丽在道德生活中总是带着一点神学院学生的感觉，对我来说，这是她独特性的一部分，也是她的风度中最令人说不清楚的一种魅力。她很少有漫不经心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习惯、偏见、重要时刻，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都会被解释清楚、研究透彻，并记录在册。[14]

对于一位想要将评判伟大的戏剧作为自己最终的热情所在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评估和计算的习惯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习惯。麦卡锡这种判断别人的能力往往会被别人当作傲慢无礼的表现。"她表现出一副全世界数她最可靠的样子，不过实际上她一点儿也不可靠。"[15]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这样告诉麦卡锡的传

记作者之一。

特里林也是定期出席《党派评论》的诸多聚会的女性之一。她算是一个对麦卡锡抱有敌意的旁观者。麦卡锡也不喜欢特里林，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特里林总是觉得自己被《党派评论》的那群人边缘化了，因为她在他们眼中只是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妻子”，而丈夫才是比妻子出名得多的批评家。虽然黛安娜·特里林反复强调她不介意自己作为图书评论家和记者的表现都被丈夫作为批评家的远胜过她的光辉掩盖了，但她却总是忍不住就此发表评论。她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人们只会赞美一个家庭中的一位成员，要赞美一个家庭里的第二位成员时，人们会变得双倍审慎。”[16]她说的不算错，但是麦卡锡、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汉娜·阿伦特也都是别人的“妻子”，但她们都成功地找到了进入这个圈子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麦卡锡注意到了自己喜欢评判的倾向。在《她选择的伴侣》中，女主角的丈夫说：“你总是用各种奇妙的顾虑作为你表现得像一个贱人的借口。”女主角则向丈夫保证自己已经努力不这样了。可丈夫并不相信她，还继续问道：“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呢？”[17]然而，从一开始，麦卡锡就注定不会像别人一样。

在西雅图度过的青少年时期，麦卡锡总是坚持结交一些与众不同的朋友。她离开女修道院，改为到公立高中学习，然后在那里遇见了让她开始了解文学人生是什么的朋友。这个黑头发的年轻姑娘名叫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不是罗森堡间谍案中的同名人物），她喜欢穿背心和粗革皮鞋，还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叠推荐书籍名单。埃塞尔给自己取了个简称叫“特德（Ted）”。麦卡锡在一本回忆录中说“据我所知，后来她成了公开的女同性恋者”。[18]当时的麦卡锡已经读过不少书，但绝大部分内容质量不高，都是些庸俗的小说或名为《真心忏悔》（*True Confessions*）的杂志之类的东西，那上面会刊登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淫

秽的谋杀或强奸事件。这些当然算不上卡夫卡级别的文学。

特德向麦卡锡展示了在更严肃的文学中也会有关于性的内容。特德的品味倾向于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作家，比如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他们会将感官描写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让麦卡锡比较容易接受。至于另一位年轻男孩儿向她推荐的更为厚重的梅尔维尔（Melville）和德莱塞（Dreiser）的作品就不那么让人愉悦了。麦卡锡写道："我根本看不懂《白鲸记》（*Moby-Dick*），虽然我看过约翰·巴里莫尔（John Barrymore）主演的改编电影《海兽》（*The Sea Beast*），但是电影不但对读书没有帮助，还造成了障碍。"[19]特德还介绍麦卡锡进入了她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圈子，那个西雅图沙龙是由一个比她们年纪都大的女同性恋者组织的，后者的丈夫拥有一家书店。

过了不到一年，麦卡锡就被送回了更接近上流社会环境的寄宿学校。不过那些波希米亚主义者已经影响了她。麦卡锡保持了给特德写信的习惯。她也会为完成课业而创作关于妓女和自杀的短篇小说或散文。她还会就男人进行一系列实验，她交过很多男朋友，直到认识了一个名叫哈罗德·约翰萨德（Harold Johnsrud）的人之后才安定下来，这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哈罗德是一个秃顶的男演员，还比麦卡锡大好几岁，他肯定不是麦卡锡的第一个男人，另一个男朋友早已经夺走了麦卡锡的童贞（后来她在一本回忆录中描述这个经历时说那是"一种被填塞的轻微感觉"[20]）。不过哈罗德和麦卡锡的关系却一直持续着，直到她在1929年升入瓦萨学院（Vassar）之后也是如此。

出于某些明显的原因，写出一本畅销小说往往会留下一些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倾向于夸大瓦萨学院如何"塑造了"麦卡锡的原因。有时候，麦卡锡甚至鼓励人们相信这种编造的神话。1951年，她在一篇为某杂志撰写的散文里写到了启发她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的那位

老师。这位传说中的女老师确有其人，不过实际情况比她写的复杂得多。麦卡锡说她有“一副温柔、清晰、有穿透力的声音”，自己为她“批评学生在遣词造句时选择的某些自命不凡或自甘堕落的词语”的方式而着迷。[21]她去瓦萨学院就是为了成为同样锐利的人。

不过，如果说朋友是能够启动思想生活的引擎的话，那么瓦萨学院的问题就在于：它无法给坦克加油。直白地讲就是，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同学都不怎么喜欢她。也许有一两个例外，但是麦卡锡在大学期间获得的绝大多数友谊都不长久。尽管如此，麦卡锡仍然为在瓦萨学院上学而感到骄傲。她将女孩儿们的冷淡高傲视为一种应该被表现出来的气质。《她们》（*The Group*）中的一个角色就这样告诉自己：“她知道，瓦萨学院的姑娘们总体来说不被大多数人喜欢。她们已经成了某种高人一等的象征。”[22]

即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麦卡锡仍然会给其他同学一种很势利的感觉。她们想起麦卡锡时会提到她的聪颖过人，但也会以此抨击她。后来的一本传记中引用了某位同学的话：“世界上最让人心灰意冷的事莫过于和玛丽·麦卡锡一起作为大学一年级新生上英语课。”[23]另一位同学说：“我觉得她引人注目又令人惧怕，而且她绝对会毁掉一个人的自信。玛丽不会对你做出无礼的举动，但是她会让你觉得低她一等。”[24]鉴于麦卡锡后来获得的成功，人们出于嫉妒可能会忍不住把对她的记忆写得很尖刻。不过就连麦卡锡本人也注意到了自己并不合群。她在给特德的信中写道：“关于瓦萨学院，我觉得这里还好，至少比［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5]］好，但是这里有太多能说会道、虚伪狡猾的人，他们还总爱给事物贴标签。”[26]

这样的评论出自一个因为“能说会道”而闻名的人之口确实有些奇怪。这个问题可能与东北部严格的社会阶层划分有关。人们一提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层阶级女性，就难免感情用事地认为她们不会受到大

萧条的影响，因为她们绝大多数是注定要成家而非立业的。不过这样的想法往往低估了女性之间持续存在的社会竞争。在麦卡锡的时代，到瓦萨学院上学的女性都是精明能干的人；她们适应了地位的变化，看到被她们视为趋炎附势的行为就会大加指责。这里的学生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有豪门后裔，也有普通的资产阶级子女。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会看着自己的父亲在大萧条中倾家荡产。而麦卡锡来自西部，没有接受过如何在东北部社会中行为处事的严格训练，所以注定要引起摩擦。她与教授们的关系就好得多了。其中有两个甚至可以被称为《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定义的那种“密友”。这两个人分别是基切尔女士（Miss Kitchel）和桑迪森女士（Miss Sandison）。后来她把自己的回忆录献给了这两个人，而不是那些与自己同龄的朋友们。

实际上，这些教授们远比此时依然在与麦卡锡约会的约翰萨德更深入地参与了她的思想和文学热情，约翰萨德在麦卡锡到瓦萨求学的这段时间里依然会不时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他们在某一年的夏天里同居了一个月，那次经历很糟糕。在麦卡锡读研究生期间，二人也总是分分合合。麦卡锡的感情生活与帕克的很相似，在她们的剧本里，男人绝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角色。

瓦萨学院在麦卡锡的一生中留下的真正持久的影响表现为她与一本“文学杂志”的最初接触。麦卡锡和包括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内的几名爱好文学的年轻女性一起创办了这份杂志。杂志最初的名字叫《女强人》（*Battleaxe*），后来被正式定为《生气勃勃》（*Con Spirito*）。麦卡锡为这份报纸写了她的第一篇书评，她在其中通过对比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如今早已被人遗忘的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的《公众面目》（*Public Faces*）来贬低前者。麦卡锡在文章中拐弯抹角地批判了现代主义者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界的半神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弗吉尼亚·

> 伍尔夫正在掩饰她的最新的缺乏深思的事实，这一缺点会在她的《普通读者II》（*The Second Common Reader*）中暴露无遗，那里面有的不过是简单的、“漂亮的”，被伪装成强烈情感和“一种新型实验”的女性特质。[27]

后来，麦卡锡说这些恶毒攻击证明了她“特有的邪恶”。不过她对此还是感到骄傲的，所以毕业之后，她把这篇文章带到了纽约。在与《新共和》当时的文学编辑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见面时，麦卡锡就向对方提交了这篇文章。考利算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他曾经和海明威等人一起待在巴黎，却没能像他们一样获得巨大的突破。当他显然已经无法仅仅依靠写作养活自己之后，考利改行做了编辑。他把自己的后半段职业生涯都用来记录其他人的成功了。

当时的考利对麦卡锡的文章没什么兴趣。他告诉麦卡锡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自己才会让她写评论：一是她是个天才，二是她快要饿死了。

> 我很快回答说：“我还不至于挨饿。”我知道我不是个天才，我也不喜欢这个我是在抢走他人口中的面包的暗示。[28]

考利在这个问题上只作出了一点点让步。麦卡锡先是获得了写一些非常短的评论的机会，之后才终于被安排去评论一本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纪实性回忆录的机会。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上过煤坑大学》（*I Went to Pit College*），作者是一位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研究生，他隐藏身份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矿场上工作了两年，之后创作了这本深受美国共产党偏爱的作品。考利是一位公开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他负责的版面被普遍视为“共产党的扩音器”。[29]所以麦卡锡觉得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喜欢这本书，并在文章中对其大加赞美。她后来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奉命写作。”[30]即便如此，当她把评论文章交给考利之后，后者还是戏弄了她。考利认为她的评论不够严厉，于是他又刊登了第二篇评论，作为对麦卡锡的文章的羞辱的纠正。第二篇评论的作

者是《新共和》的电影批评家，文章称：“这本书永远不应当被视为一段扣人心弦的社会纪实报道，甚至不应当被视为一个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姿态。”[31]那之后的好多年里，麦卡锡没有再在《新共和》上发表任何文章。

另一份杂志《国家》对于麦卡锡的风格则宽容得多。麦卡锡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书籍基本都不喜欢，她为它们写的评论里也充满了简单粗暴的人身攻击。在评论一位当时很出名，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记者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麦卡锡写道：“人们很难相信这些短篇小说能够代表伯内特先生（Mr. Burnett）的最高成就。说他是在一辆旧车的后备厢里发现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的反而是更给他留面子的想法。”[32]在另一篇针对五本书的评论中，麦卡锡写道：“它们的共同点有两条：第一是它们全都平庸得令人极其厌烦。”[33]这些评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邪恶的口气，一种写评论的人知道自己其实是在挑战评论文章适当性的惯例的感觉。麦卡锡的傲慢无礼变成了她的某种招牌。这些文章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整体上宣称的更高级别的诚实。不需要因为被评论作品既有的声望而说违心的话让麦卡锡的作品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就像多萝西·帕克的“永远的读书人”专栏一样，你不是非要读了某本书才能体会这种精神。

《国家》显然也很满意麦卡锡这种夹枪带棒的腔调。不到三年，这份杂志就决定派她出去执行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这个项目计划对美国所有杂志和报纸上的书评做一次评审，就像是发布某种书评界的国情咨文。绝大部分工作是由麦卡锡一人完成的，但是《国家》的主编，一个名叫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的女人坚持让麦卡锡和杂志的文学副主编共同署名，这位年纪略长的女性副主编名叫玛格丽特·马歇尔（Margaret Marshall）。柯奇韦认为年龄和经验可以让这个系列更为人所信服。很难说她的这个担忧是不是有必要。不管怎么说，这个项目获得了成功。系列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系列中的所有文章被分成五期，每两周发表

一期。这些文章的基调是好争辩的；它们号召这个国家的批评家解释自己的评论为何会“从整体上造成人们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误解，还拉低了人们的品位”。[34]

在美国书评的历史中，这样的批评文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批评家们很喜欢互相评论，就算公众认为这样的辩论毫无意义，他们还是要坚持这样做。《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能从这个种类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的综合性。这些文章并不是要提出什么连贯的理论，以用来给世上所有的批评文章打分及赞扬或羞辱当时撰写批评文章的所有批评家们。比如《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的主编就因为其对被评论对象的老态龙钟的处理方式而遭到了嘲笑：

> 文学作品只是触动了他头脑中的一些模糊的，通常是没有依据的联想思维过程。他就像一位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闲逛的老绅士，只能够在路人的脸上看到转瞬即逝的与某位过世的姐夫或很久不曾想起的表亲的相似之处。[35]

这样的评价方式自然也给麦卡锡提供了一些报复的机会，马尔科姆·考利在一份已经被人遗忘的名为《图书》（*Books*）的期刊上发表的评论他好朋友的作品的书评就受到了直白地抨击。麦卡锡还通过将该系列的一整期专门用来批判《新群众》（*New Masses*）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糟糕表现来间接打击了一些人。这篇文章嘲弄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美主义之间的奇特的内战，让对糟糕的无产阶级图书的左翼评论有了一个混合的党派路线”。[36]

《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如愿引起了反响，这些反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却都流露了对女性竟然可以如此锐利而感到的惊讶。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冒着自己被攻击的风险在专栏中用全部的篇幅谈论了麦卡锡和马歇尔。他甚至花时间写了一首居高临下的打油诗来描述

这两个人：

> 哦，玛丽·麦卡锡和玛格丽特·马歇尔
>
> 两个聪慧又公正的女孩儿。[37]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麦卡锡和马歇尔偏离了主旨，因为她们过分强调正式的学徒期，而且他每次提到这两位作者时都不忘用“女孩儿”这个词来指代她们。其他人表达自己不满的方式则更加直接。富兰克林·P.亚当斯（Franklin P. Adams）曾经是帕克早期的崇拜者之一，他抱怨说：“这两个女孩儿让我想起老斯特劳斯提到一个我们记不起名字的人时说的话：‘他总是疯疯癫癫的，但已经是芝加哥脾气最温和的人了。’”[38]

也有一些批评家是受到麦卡锡喜爱的，而且她也不吝于表露自己的赞美之情，她说他们“有洞察力”，尽管“他们势单力薄的嘘声都被向出版商献殷勤的人们的喝彩掩盖了”。[39]受到麦卡锡赞美的批评家包括丽贝卡·韦斯特，其余则大多是男性。有一人获得了麦卡锡的特别青睐，她称赞这位批评家拥有“将当代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与过去的文学联系起来”的能力。这位获赞者正是多萝西·帕克的老朋友埃德蒙·威尔逊，他为这样的评价感到满意。此时四十岁的威尔逊已经离开《名利场》，成了一位颇具声望的文人。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和他离婚了，但他们育有一个女儿；第二任妻子和他结婚才两年就于1932年去世了。此时的威尔逊虽然已经成了一个胖子，头发也快掉光了，但他很快就会迎娶麦卡锡为自己的第三任妻子。

1933年，麦卡锡从瓦萨学院毕业后嫁给了哈罗德·约翰萨德。麦卡锡总是将这段婚姻描述为一次不带感情的好奇之举，麦卡锡显然为此感到难堪，她曾经这样写道：“我刚刚做的事就是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未经深思熟虑就这样做是一种邪恶的行为。”[40]她的丈夫认为自

己是位剧作家，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约翰萨德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麦卡锡很少提到他。两个人都有不忠行为，到了1936年，他们都觉得这段婚姻可以结束了。麦卡锡有过一系列婚外情，不过没有哪段关系是长期的。即使是名义上毁掉了她的婚姻的那次，似乎也在她离婚后就失去了吸引力。

麦卡锡在进入共产党人圈子的事上也充满矛盾。这正是造成她和马尔科姆·考利这样的人合不来的一半原因。麦卡锡在大学期间就见过左翼人士，她认为她们的活动是“高大、枯瘦、脾气不好的穿裤子的女孩儿们打的某种政治曲棍球”。[41]麦卡锡绝对算是个漂亮姑娘，虽然穿着打扮还有点俗气，但她觉得自己和那些女孩儿不一样。她也没有一种想要通过参加某个政治党派来服务于什么更广泛的社会公益的冲动。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文学圈子和左派圈子的重叠程度非常高。参加鸡尾酒会意味着谈论卡夫卡，也意味着谈论共产党和党的艰苦奋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人针对这些话题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令麦卡锡印象深刻。她写道：“他们让我觉得自己虚有其表、浅薄无知；我要说，他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丑陋让我生活中的光鲜亮丽显得廉价而俗气。”[42]

让麦卡锡写出这样的文字的是她性格中存在的好唱反调的特征。如果人们不喜欢什么她喜欢的东西，她总会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她的好奇最终会将她引向确信。麦卡锡在名为《我的告白》（*My Confession*）的散文中写道：“历史性事件的标志就是一个个体被漫不经心地置于了某种潮流之中。”[43]在这篇文章里，麦卡锡解释了她没什么前途的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不是每个个体都会紧紧抓住潮流奋勇直前。平静和沉着从来不是麦卡锡的风格，至少不是她的文字体现出的风格。

麦卡锡会在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论争中选边站队完全是个意外。一位小说家朋友在没有向她详细解释情况之前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一份为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辩护的委员会成员名单

中，结果就成了她被认定为一位持不同政见者。麦卡锡写到自己起初大吃一惊，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或多或少地尝试说服自己接受这种恰当的政治观点。这让她在社交圈子里获得了一定声望：

> 每当我走进一个晚间活动的场所，戴着首饰的作家女士们就会面无血色，还要愤怒地挥挥她们戴着手链的手臂；当我敦促在出版界和广告界发展的年轻男子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充满怀疑地拉紧领带。如果我晚上到俱乐部跳舞，高个子的大学生年轻党员会把我拉进他们的怀中，对我说不要犯傻了，宝贝。[44]

这就是黛安娜·特里林说自己发现麦卡锡的政治路线“不可靠”的意思。所有批评麦卡锡的人都认定她这种摇摆不定是不严肃的表现。即便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宣称自己仰慕麦卡锡的人也对她的传记作者说“她不擅长解释抽象概念。她对生活的总体理解很好，比如对人，对社会，以及人的反应”。[45]

然而对于人而不是对抽象概念的洞察也是获得政治见解的一部分。麦卡锡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伯林那样的思想家，她不会把时间花在清晰地论述权利的完整体系，或详细说明公正的本质上。但理解人性仍然是进行政治分析的宝贵技能，后来麦卡锡称之为“对正统观念的有所怀疑和独立于大众意见的自主思考”。[46]这种技能对于分析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非常有益，因为当时有很多庞大的抽象概念体系，比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它们在大多数时候给人类带来的是灾难而非福音。不管怎么说，这让麦卡锡成了最能经受住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两败俱伤的左派内部战争的人。当原本达成共识的集体内部有人争论不休时，不参与任何一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被卷入托洛茨基辩护委员会的那段时间里，麦卡锡正在和菲利普·拉夫同居。拉夫是《党派评论》的总编之一，麦卡锡也是这份杂志的领导层成员之一。拉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男子，但是他有一种深沉、激烈的魅力。他说的话“尖锐、严苛、有说服力，还带着很重的俄语口

音”。[47]拉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非常深入，他是在大萧条时期来到美国的，曾经需要靠排队领救济度日。麦卡锡并不太把主义当回事，而拉夫则正相反，而且他一点儿也不怕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坚定信念，甚至可以为此对他人出言不逊。以赛亚·伯林描述拉夫时说“他不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48]另一位《党派评论》圈子成员德怀特·麦克唐纳说，拉夫“在很多方面相当冷酷无情”。[49]不过，麦卡锡对拉夫的看法与他们不同。当她在拉夫的葬礼上致悼词的时候，她说最开始让她受到拉夫吸引的原因是他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为《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写的一篇书评。虽然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负面的，但麦卡锡被拉夫对菲茨杰拉德这位富人的编年史记录者抱有的“有同情心的见解”惊呆了。她说拉夫对这本书的评论中含有一种出乎她意料的“温柔”。[50]

麦卡锡后来写到，拉夫不得不“为［她］发布一份敕令（ukase）”，[51]以此宣布麦卡锡加入《党派评论》的领导层。（“敕令”是苏俄成立之前由沙皇发布的一种公告。）要让一位女性介入杂志社的整体事务就必须这么做。1934年初《党派评论》发表创刊号时，麦卡锡是发行人栏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在这期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的女性。多年后，她带着不无调侃的口吻回忆说，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知识分子登场也曾让自己感到紧张。管理杂志运营的其他男性同事都比麦卡锡，或者是比他们眼中的麦卡锡更执着于政治问题的激烈争辩。共产党纪律的余韵没能让《党派评论》避免各种内部正统思想的束缚，对意识形态纯洁度的焦虑疯狂地蔓延开来。

> 赞助人是一位出身传统纽约家庭的年轻抽象派画家，他在政治上非常“糊涂”，以至于有一天他走进（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工人书店买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那天他还戴着一副鞋罩，拿着一根手杖，一想到他那副样子，我们其余人紧张得脸都白了。我们立即问道：“有人认出你吗？你觉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

这个插曲暗示《党派评论》的编辑和作者相对年轻，大多是二三十岁。他们迫切想要证明他们的“文学杂志”可以在世上享有一席之地。他们的焦虑总会体现在版面上，但焦虑也总会被伪装成高傲，而且都不是经历过正式的学徒期后理所应当拥有的那种高傲。如麦卡锡后来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在美国，或者说只有在纽约的一小部分区域里，几乎没什么资历的人才敢表现得像某种至高权威一样”。

麦卡锡被安排评论戏剧是因为其他男同事对她还有质疑。根据他们年轻的正统观念，戏剧是一种不值得费太多心思关注的资产阶级艺术形式。“就算我说得不对，谁会在乎呢？这个想法最终胜出了。”事实证明麦卡锡很适合这个职位。她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些工作，这意味着她可以自己教自己写作。像帕克一样，麦卡锡倾向于讨厌其他所有评论家喜欢的东西，这一点对她不无帮助。

起初，麦卡锡过于迫切地想要对马克思主义者表达诚意，所以她根据他们的政治观念评论戏剧，这样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些俗套的陈词滥调。麦卡锡写道：“那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加入了某种‘揭露’艺术作品中的潜在倾向的活动，就像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在探案一样。”在评论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制作的萧伯纳的《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时，麦卡锡注意到他作为演员有一种把“某种黏稠的圣油喷到自己塑造的角色的粗糙表面上”的倾向。[52]与此同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则患上了某种“自体中毒”，中毒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中］会不时出现停顿，为的是等待几不可闻的鼓掌声结束”。[53]唯一的例外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我们的小镇》（*Our Town*）。麦卡锡真心喜欢这部戏，认为它“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意识行为；它证明了至少在艺术作品中，经历是可以被捕获、控制和观察的”。[54]

在某一篇评论中，麦卡锡需要评论的是一位前辈。女演员露芙·高

顿（Ruth Gordon）参加了一部名为《超过二十一岁》（*Over Twenty-One*）的戏剧，这又是剧作家们无数次想要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多萝西·帕克一样的角色的尝试之一。麦卡锡评论说：“多萝西·帕克的角色像适合被画成漫画悬挂在萨蒂餐厅（Sardi’s）[55]一样适合于舞台。”[56]她认为戏中对帕克的机智幽默的隐约效仿是观众可能会喜欢这部戏剧的唯一原因。

麦卡锡从来没见过帕克，或者说没有正式见过。她有过一次近距离看到帕克的经历，后者当时参加了一场在纽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活动。麦卡锡写道：“她矮胖的身材让我很失望，如果她是出现在如今的谈话类电视节目里，我可能还会有点心理准备。”[57]不过当麦卡锡上了年纪之后，也会有人粗鲁地评价她又矮又胖。

*

麦卡锡第一次见到埃德蒙·威尔逊是1931年，他到瓦萨学院做演讲时。麦卡锡当时对此并不怎么热心：“他身材臃肿、气喘吁吁的，还很紧张，真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那绝对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演讲，而我甚至听过一位口吃者做的演讲。那是几年后我在纽约主持一次会议时遇到的一位口吃者，他念了二十一个音节才念完‘极权主义’[58]这个单词——有人数来着。”[59]到1937年，威尔逊已经成了受《党派评论》的编辑们追捧的人，他们都崇拜威尔逊和他尤其热衷于撰写的针对年轻男性知识分子的批评文章。当时威尔逊的作品几乎登上了纽约所有主要报纸杂志的版面，其中大部分是书评，也有一些是新闻报道。他的研究象征主义的长篇作品《阿克塞尔的城堡》让他成了一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也是他去瓦萨学院演讲的原因。《党派评论》想获得文学上的认可，好以此提高杂志的文化地位。威尔逊正是可以带来这种认可的人。

麦卡锡一直是这个团体内部的对抗分子，所以她没有义务像她在

《党派评论》的其他同事一样必须对威尔逊崇拜有加。即便如此，她还是被要求和另外五名编辑一起与威尔逊共进午餐。威尔逊还邀请了《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的合作者玛格丽特·马歇尔。感受到压力的麦卡锡非常紧张，于是她和领导层的另一位成员在饭前去喝了些鸡尾酒。后来在餐桌上，她又喝了很多曼哈顿鸡尾酒和红葡萄酒。酩酊大醉的麦卡锡和威尔逊、马歇尔一起在酒店的套房里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给菲利普·拉夫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去哪儿了。

这件事其实是有些不恰当的，但不知怎么的，几周后麦卡锡答应和威尔逊约会。结果她去了威尔逊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并且没有拒绝后者的求爱，在沙发上和他发生了关系。没过多久，麦卡锡就离开拉夫，嫁给了威尔逊。她总是无法解释这个举动，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很喜欢和他聊天，但是并不觉得他有性方面的吸引力。"[60]

人们在回看糟糕的婚姻时总会将它们神秘化。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对威尔逊和麦卡锡的描述称他们的婚姻是"两个暴君"[61]的结合。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起码应该说，他们两人相处不愉快的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的。1938年时，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鲁埃尔（Reuel）。后来鲁埃尔写了一本关于父母的书，他是这样刻画这对夫妻的性格的：

> 别的都不提，只说一点就够了：威尔逊受到内心恶魔的鼓动，能够做出粗鲁、残忍，甚至是暴力的行为。麦卡锡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还被监护人冷酷地利用，她一直带着童年悲剧留下的耻辱心，所以对于丈夫频繁的刺激和批评总会给出情绪强烈的反应。[62]

在遇到麦卡锡之前，威尔逊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都相当混乱。他喜欢特别聪明的女人——他第一次非常投入的恋爱对象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虽然最终是米莱提出分手的，但总体上说，威尔逊总是维持不好和他人的关系，包括与自己的孩子之间的。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稳

定，他的收入来源仅限于作为自由撰稿人获得的报酬。财务问题是他持续不断的压力来源之一，除此之外，他还酗酒。

麦卡锡和威尔逊结婚时，后者承诺要带她离开城市，让她过上宁静一些的生活。威尔逊夫妇在婚姻存续期间暂居过纽约州北部、韦尔弗利特（Wellfleet），还有芝加哥。但无论他们在哪儿生活，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麦卡锡觉得不幸福。这种感觉会表现为某种短暂的、歇斯底里的狂怒。威尔逊和前妻生的孩子当时已经十几岁了，她形容这样的麦卡锡是“癫痫发作了”。1938年6月，麦卡锡再次情绪失控后被迅速送到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Payne Whitney psychiatric ward），经医生诊断，她是患上了焦虑症。麦卡锡在回忆录《我如何成长》（*How I Grew*）的第二卷中宣称这次发病是因为醉酒的威尔逊打了她，而且她当时已经怀孕两个半月了。

这件事非常令人震惊，很多人在打探细节的过程中都被吓到了。威尔逊的一位和麦卡锡成了朋友的亲戚见识过他们之间最糟糕的情况。这个人告诉威尔逊的传记作者刘易斯·达布尼（Lewis Dabney）说，与这对夫妇谈论他们的婚姻就像是在听“《罗生门》（*Rashomon*）里的人物讲述各自版本的相互排斥的所谓现实一样”。在那部电影中，人们可能最终也无法得到一个一致的故事真相。在他们的离婚诉讼中，威尔逊宣称自己从没对妻子动过手——“只有一次除外”。他指的例外可能就是导致麦卡锡被送到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的那次。不管怎么说，七年之后，当这对夫妻在1945年打起离婚官司时，朋友们都站在了麦卡锡一边。

不过，这次婚姻还是给麦卡锡带来了两件毋庸置疑的好事。第一是她有了一个儿子鲁埃尔，第二是她开始改行写小说。终其一生，麦卡锡一直都会说威尔逊就是那个坚持让她尝试写小说的人，因为他觉得她为《党派评论》和其他地方写的那些文章不足以施展她全部的天赋。此外威尔逊也为她提供了物质帮助，他雇用了家政人员，这样就算孩子还小

的时候，麦卡锡也能有时间写作。

麦卡锡在与威尔逊结婚期间写的小说配得上威尔逊曾经对帕克作品的称赞：这些作品同样有一种是由具有“想要写作的迫切需求”的人写出来的感觉。麦卡锡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叫《穿布鲁克斯兄弟牌西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Brooks Brothers Suit*）。它讲述了关于这个像极了麦卡锡的主人公的第一个故事。这个名叫梅格·萨金特（Meg Sargent）的人物乘坐火车前往里诺（Reno）是为了去和自己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她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无趣的已婚中西部生意人。最终他们发生了关系，但是她的态度犹豫不决，甚至带着些后悔。在整个相遇过程中，梅格·萨金特一直在审视自己，评价自己的一言一行。她从一开始就在沉思：“没错，她总是希望遇到什么激动人心或罗曼蒂克的事情，不过成为那种‘坐在车厢里钓男人的女孩儿’其实并不浪漫。”[63]梅格·萨金特恰恰就是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她喜欢这样利用自己的性感魅力。梅格很漂亮，但她并没有为此特别虚荣。她知道只有一种特定的美国男人会认为她美：

> 在内心深处，她轻视那些认为她完美的男人，因为她知道如果她穿着泳衣走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她根本没有任何出众之处。虽然她从来没有真的挑战过这个冷酷的测试，但这件事在她的脑海里一直是种威胁。无论是一本在美容院翻看的《服饰与美容》杂志，还是一顿超出她支付能力的大餐都足以让她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如果她和那些爱上她的各个男人在一起时曾经感觉到安全，那是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那些人全都很糟糕，如今她终于看清楚这一点了……他们每个人的美国生活都存在某种缺陷，这让他们在恋爱中变得谦卑。而她自己真的就那么没有资格享受更好的东西吗？难道她真的只能属于缺陷者兄弟会？她不是一个生活在自我放逐之中的正常、普通的女人吗？她不是行走在山精中间的公主吗？[64]

拉夫大概就是麦卡锡所谓的“山精”之一，不过前者似乎没有为此感到受辱。他们都知道这篇小说恐怕会引起公众的愤怒。故事中的直言不

讳在当时看来实在太不寻常了。不过这反而更激发了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愿望，而且文章获得的反响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对麦卡锡的传记作者之一说：“当时我还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的学生，这篇小说给我带来的震撼几乎和珍珠港事件带来的一样大。”[65]男人总是抱怨麦卡锡在小说中对他们的描述过于严苛，不过碰巧是威尔逊朋友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就非常喜欢麦卡锡最终的小说集：“这些作品太精彩了，充满诗意，机智而新颖。”[66]当时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有抱负的年轻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对麦卡锡的这篇小说青睐有加。

女性普遍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她们对于梅格的思想独立、自信，以及她犯的错误都能够感同身受。“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坚强，同时也愚蠢的女权主义者。”[67]宝琳·凯尔记得自己读到这篇小说时就是这么想的，当时她还是一位在西海岸为事业挣扎的剧作家。“她很蠢，但是她绝不软弱。”这样的细微差别是很难被捕捉到的。梅格很有主见，也很自信，但她并不一定总是对的，这样的混合特质在当时既有的对女性的刻画套路中还很少见。无论是在电影还是书籍中，女性很少被允许同时表现出自信和脆弱。

因为这篇小说大获成功，所以麦卡锡在不到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一整本关于梅格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叫作《她选择的伴侣》。这是麦卡锡的第一本书，一经出版就收获了热烈的赞美。几乎所有评论都认定麦卡锡是某种能用文字置人于死地的谋杀者。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写道：“她使用讽刺的方式就像猫捕食老鼠的方式一样既温柔又致命。”[68]《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男性）图书专栏作家宣称他相信麦卡锡拥有一种“精妙地表达恶意的天赋”，尽管他称梅格为“骄纵的甜心”。[69]《新共和》的马尔科姆·考利亲自写了一份书评，起初他似乎不喜欢书中前四个故事的腔调：

> 机智而邪恶，但还不是邪恶的机智；一种心理上的尖锐，但似乎并没

> 有挖掘得很深……总是选择一些糟糕的伴侣的女主人公可能正是这些人中最糟糕的——最势利、最做作、最充满恶意，也是最不确定自己是否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人格的人，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存在于自己不停重写的这本书之外。[70]

理智的人们可能会在梅格究竟是势利、做作、充满恶意，还是一切只因为她年纪尚轻的问题上持有异议。梅格去看了心理分析专家，结果发现自己绝大部分困惑和借口都与可怕的童年相关——这正是她不断给别人讲述的“糟糕经历”。[71]她走出心理分析专家的办公室，打算“去调查自己的欺骗”。[72]考利以一种其他评论家所不能的方式看出了这给整本书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 麦卡锡女士已经学会了不用讲述一个自我保护的谎言就按照事情可能发生的样子安排好一切情节的复杂技巧……《她选择的伴侣》不是一本讨人喜欢的书，也不是什么精妙地组织起来的内容，不过它具有一种亲身经历过的不寻常的特质。[73]

考利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书里的内容确实是麦卡锡的亲身经历。这些短篇小说中的内容具有自传性质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争议。细节也许是编造的，但核心内容不是。梅格和麦卡锡一样是来自西部的女孩儿。她失去了母亲，拥有一个缺衣少食的童年，她到纽约来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她的婚姻也像麦卡锡的第一段婚姻一样失败了：因为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男人。梅格还拥有和麦卡锡拥有的类似的第一份工作，同样的朋友圈子，连她选择的恋人也是年轻时的麦卡锡会选择的那种。虽然不是麦卡锡的仰慕者，但是批评家莱昂内尔·埃布尔曾经说过：“除了像告解一样真实的内容之外，我不认为她写过别的什么。”[74]

麦卡锡无论如何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她远没有帕克那么喜欢折磨自己，但她的小说依然是倾向于自我批评的。根据小说反映她的亲身经历的程度来看，麦卡锡显然已经跳脱了事件本身，她像个局外人一样审视这些经历，同时也审视她自己，然后根据自己作出的判断来把事

件小说化。这种小说中的自我意识和一般的一副忏悔口气的作品截然不同：它是淘气顽皮、疏远淡漠、坦白直率的，不过这些态度中都带着一种冷酷无情。

显然，这种技巧很适合麦卡锡，她甚至可以将其适用到发生在更近期的事情上。当她还和威尔逊在一起时，麦卡锡就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杂草》（*The Weeds*）的小说，内容涉及了她婚姻中的那些伤痛。故事开头，一位没有取名字的女性人物坐在花园里思考如何，以及何时离开丈夫。最后她逃到了纽约。同样没取名字的丈夫追到纽约来把妻子带回家。妻子大闹了一场，叙述者在描述这个场面时冷酷地分析了她的动机：

> 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表现得既怪异又令人厌恶，她的丈夫都为她的样子和她发出的声音感到震惊，但是这种快要喘不上气的抽泣让她感到愉悦，因为她意识到这是自己能够对他施予的最后惩罚，她像巫婆一样丑陋的外形，以及显然已经衰败的精神就是她最终的复仇。[75]

这个故事中的自传性因素是作者有意识使用的。麦卡锡曾经把初稿拿给威尔逊看。后者没有就文中对自己的刻画提出不满。但是当这篇小说最终被发表在《纽约客》上之后，威尔逊又改变了看法。“他真的非常生气。我对他说：‘可是我之前给你看过了。’他却说：‘可是你又改进了！’”[76]

1944年，经过了七年的吵闹和争论，并利用这些吵闹和争论为灵感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之后，麦卡锡终于离开了威尔逊。他们的离婚大战同样火爆，最终还是闹到了法庭上。关于各自在婚姻期间具体受了多少伤害的争论无穷无尽。这场婚姻虽然糟糕，甚至可以被称为一场情感上的灾难，但它却促使麦卡锡创作出了她最精彩的那些作品。用现代流行的说辞是这并不能“弥补”任何损失，但是能够留存于世的正是这些作品，而不是她为很久之前就停演的戏剧或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小说所

撰写的那些评论。

*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回到1944年在菲利普·拉夫家举行的那场聚会了，也就是麦卡锡说了一些让汉娜·阿伦特无比气愤的评论的那次。考虑到她当时承受的压力，再加上婚姻的解体，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对希特勒做出如此轻率的评价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聚会女主人，麦卡锡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失误。在《杂草》那篇文章中，女主人公抵达纽约后才发现一切都变了，几乎没有哪个朋友回复她的电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麦卡锡却是强势回归纽约的。她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集已经让她成了真正的作家，这样令人羡慕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在左派杂志上发表几篇戏剧评论和书评文章能带给她的。当时和如今一样，小说被看作是文学成就的最高峰。麦卡锡突然变得受欢迎了，她还开始接到请她去教课的邀请，于是她接受了，先是在巴德学院（Bard），后来又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麦卡锡的生活也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了，她遇到了一个比威尔逊冷静，也远不像他那么专横的人。这个拥有头韵体名字的人叫鲍登·布罗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他身材苗条、衣冠楚楚，是《纽约客》的作家。他和麦卡锡是在1946年12月结婚的。

时至此时，麦卡锡已经成了一种家喻户晓的另类人物。那些喜欢看文学报纸和平庸杂志的人都知道她，但是她的书并不畅销，可人们突然开始注意她梳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了。这群观察者之一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她看起来似乎是在坚持一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类型的平凡外表。”[77]与此同时，她的名声还开始传播到更广泛的文化圈子里。《服饰与美容》的“人们在谈论”专栏就提到了《她选择的伴侣》。文章宣称麦卡锡的写作风格“就像一个手里拿着鱼叉的聪慧的鸟身女妖，她四处插刺只是为了自己高兴”。[78]

认为麦卡锡的风格就是纯粹的邪恶的观点随处可见。评论家们总是会承认她具有某种洞察力，有一种轮廓鲜明的风格。但是他们并不喜欢麦卡锡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认为麦卡锡把她的看法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做法有些无礼和粗鲁。他们选择的那些比喻暗示了他们认为麦卡锡的智慧是带着伤痕的、有破坏性的，甚至可能是阴险狡诈的。就连认识麦卡锡本人的人也会有和那些不认识她的人一样的想法。她的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后来评价这本书“非常严肃”，但是“充满敌意，就像合唱团里的一个女孩儿说另一个女孩儿的坏话时一样恶毒”。[79]

从女性和恶意这些字词传统的本意上讲，麦卡锡的作品可能既不是女性的，也不是带有恶意的。麦卡锡的小说有一种挖苦讽刺的腔调，不过那些以她自己为原型的角色也和以其他人为原型的角色一样受到她的评判和嘲讽。换句话说，麦卡锡的作品很锐利，不过它们并不必然含着恶意，或令人反感。

有一个可能算是例外的存在是麦卡锡在嫁给布罗德沃特之后开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绿洲》（*The Oasis*），小说的主题是纽约的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圈子。小说的内容建立在一个荒诞的前提之下，一群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被派到宾夕法尼亚州创建一个乌托邦。这场努力自然是要以失败告终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在这个聚居地中的人们的虚荣自负。很难确定促使麦卡锡写《绿洲》的具体动力是什么，但是她写得很快，只用了几个月。因为奥威尔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政治讽刺题材在当时很流行，这可能也启发了麦卡锡。在现实生活中，麦卡锡当时正在费力地组织美国知识分子中的左派人士联合起来支持外国作家，不过这个活动简直就是灾难，因为内部争斗不断而分崩离析。《绿洲》可能是麦卡锡给出的一种报复手段。

尽管如此，麦卡锡还是在多年后辩解说：“整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80]不过她指的仅仅是情节，至于小说中的人物，她承认自己依照了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我努力尝试至少要尽可能地明确一个人的本质，要找到对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小说里的人物都至关重要的那个本质。”菲利普·拉夫的本质被体现在了一个名叫威尔·陶布（Will Taub）的角色身上。陶布是这个群体的领袖，不过他气势汹汹的咆哮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就身为犹太人和其他问题而感到的深刻的不安全感的手段。他的妻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角色，对他很体贴，但是“每当她想要思考社会问题时……（他总是）一副粗鲁无礼、心情不佳的样子”。[81]［拉夫此时已经娶了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同学纳萨莉·斯旺（Nathalie Swan），后者在某些方面也符合这样的描述。］

理论上说，这本小说挺有意思的。但是从社交角度上看，写这样一本书无异于自掘坟墓。麦卡锡是直接在拿自己的很多朋友开玩笑。由这部小说的明显的恶劣而引发的中伤在因为《党派评论》而被常年联系到一起的人们之间蔓延开来。据说黛安娜·特里林抱怨麦卡锡时称：“这个女人就是个恶棍。”[82]那些模仿角色依据的原型们感受到的背叛程度是无法被忽视的。拉夫尤其觉得很受伤。他开了个会讨论大家该怎么做，结果大家都劝他不要表现得这么高高在上。不过拉夫已经下定决心，他扬言要起诉麦卡锡，并让自己的律师给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发去一封律师函，宣称这本书“是对他隐私权的严重侵害，因为其中包含了完全虚假的、有异议的和诽谤的内容”。[83]最终，拉夫还是放弃了，部分原因是他的朋友们提醒他，他必须先证明麦卡锡小说中那个愚蠢的角色足以被认定为他才能就诽谤索赔。这个前景对他来说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更糟糕的是，这本书也不怎受欢迎。书中谈论的是一个相对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位普通的报纸读者肯定不能理解它其实另有所指。《纽约时报》的评论家抱怨说：

> 麦卡锡女士特有的精确性在为以她为圆心的特定读者群体写作时反而

> 成了一个缺点，因为紧挨着圆心的核心圈子太小了。一份文学杂志的主编毕竟不是英格兰的财政大臣。在那个小圈子之外的读者除了觉得《绿洲》有一种模糊的巧妙诽谤和不多的几个精彩情节之外，根本体会不到别的什么。[84]

一个很了解核心圈子，且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还觉得非常喜欢的人正是汉娜·阿伦特。不久之前，阿伦特和麦卡锡已经在一个地铁站台上讲和了。“我们的想法有很多相似之处，”[85]在聚会上的争吵发生五年之后，阿伦特显然是这样告诉麦卡锡的。她还在一封信中赞美了这本别人都很讨厌的书：

> 我必须告诉你，这本书能带来纯粹的愉悦。你写出了一本真正的佳作。恕我冒犯，但我想说这本书不仅仅是比《她选择的伴侣》好，而是根本比它高出了一个层次。

这本书的贡献之一就是拉近了“以堕落为标志的”麦卡锡和“有意识的贱民”阿伦特之间的距离。

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简直是知识分子世界里的天作之合。她们一直保持朋友关系直到阿伦特去世，中间没有过间断。两个脾气相投的女性之间的友谊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麦卡锡和阿伦特的友谊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她们俩几乎没在同一个城市居住过，因此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是靠书信维系的。信里的内容很是八卦，但八卦也是与她们讨论的知识问题缠绕在一起的。比如她们对朋友的书籍的看法，对彼此的作品的看法等等。观点是精妙有益的东西，但它们要立足于外面的世界，并与那些持这些观点的人的人性联系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麦卡锡带着儿子和鲍登·布罗德沃特一起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多个小镇上生活过。她会给阿伦特写信描述拉夫的到访——他显然已经像被《绿洲》迅速地惹恼一样迅速地原谅了麦卡锡。麦卡锡在信中称“他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让我觉

得他仿佛是一个大洪水以前的人”。[86]接着她继续谈论了拉夫如何“让我紧张得要命，我们好像是两个站在巴别塔上朝彼此大吼的人。不是那种充满敌意的吼叫，只是有一种疏远和相互警惕的感觉。这大概都是我的错”。麦卡锡还会抱怨所有在聚会和谈天中打断她讲话的人。与此同时，阿伦特则从她位于纽约上西区的公寓里给麦卡锡写长长的回信，内容是对于那些所谓的“滑稽哲学家”[87]的富有同情心的滔滔不绝的论述。她会思考苏格拉底、笛卡儿、霍布斯、康德、帕斯卡尔等，当然，还有海德格尔。

她们还会漂洋过海去探望对方。麦卡锡创作关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书时，阿伦特会和麦卡锡一起前往欧洲。阿伦特也请麦卡锡帮忙“英文化”她的作品，就像其他的朋友帮她做过的那样。在阿伦特大部分时间定居欧洲之后，麦卡锡还总是住在阿伦特在纽约的公寓中。从精神上说，她们两人是不可分割的。

与麦卡锡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暗示，甚至是直白地表示自己不明白阿伦特看上麦卡锡哪一点。人们觉得她们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阿伦特充满了复杂的思考，而麦卡锡则直率而优雅。这已经是人们最委婉的表达了。很多人认为麦卡锡与阿伦特不是同一个级别的思想家。但阿伦特并不觉得自己的朋友在知识层面与自己有这么明显的差距。她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麦卡锡考虑和编辑，并且进行“英文化”。她们通信的内容也不是仅限于八卦消息和日常汇报，而是包含了对于小说的组成、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个人道德和公共常识等内容的争论。

尽管如今的人们回看麦卡锡和阿伦特时会将她们归入解释事物的男性的圈子中（这两位女性在通信中称这些男性为“男孩儿”），但实际情况对于她们来说还要复杂得多。她们并没有作为“男孩儿中的一员”而被接受。尽管男性在某种程度上钦佩她们的作品，但在面对阿伦特或麦卡锡的批评时，他们也会充满敌意和防御性。公平地说，无论是麦卡锡还

是阿伦特对自己圈子里的大多数男性都没有什么可恭维的。比如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谈论索尔·贝娄（Saul Bellow）时就写道：

> 我听说索尔最近状况不太好，他在攻击被他称为美国机构的一群人，那其实就是指他的批评家们。他在伦敦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听众被要求在原位上坐十分钟（也可能是五分钟？）才可以走，这样在他坐上离开的车之前，就没人能去找他要签名了。[88]

关于写文章攻击麦卡锡的卡津，阿伦特这样写道：

> 这些人越老越糟糕，这一次他纯粹是出于嫉妒。嫉妒是魔鬼。[89]

这种简洁的侮辱当然不是仅仅出于女性之间的团结。无论是麦卡锡还是阿伦特都不会接受将她们的友谊定义为“女权主义”的做法。她们也不喜欢自己圈子中的其他女性。她们渴望以女性身份发表观点，但是她们从来不希望自己的性别成为一个定义她们的特征。这与她们生活的时代不无关系。另一部分原因是她们除了彼此之外，与其他人并不怎么合得来。她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建立在传统含义的姐妹情上的。如阿伦特在这段友谊开始时评论的那样，她们是两个总是“想法非常一致”的盟友。每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与她们为敌时，这种一致的思维方式就被加固成了一套她们可以共同穿戴的铠甲。

---

[1] Eileen Simpson，“Ode to a Woman Well at Ease，” *Lear's*，April 1990，转引自Frances Kiernan，Seeing Mary Plain：A Life of Mary McCarthy （Norton，2000），223。

[2]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197.

[3] Elizabeth Hardwick，“Mary McCarthy i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26，1992.

[4] 美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大都是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成功的故事。

[5]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Harcourt，Brace & Company，1957），61.

[6]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Brace & Company，1942），263.

[7]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Brace & Company，1942），194.

[8]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6.

[9] *The Company She Keeps*，264.

[10]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02.

[11]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11.

[12]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21.

[13]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111.

[14] “Mary McCarthy in New York.”

[15] 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19。

[16] Diana Trilling，*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Harcourt Brace，1993），350-51.

[17] *The Company She Keeps*，276.

[18] *How I Grew*（Harvest Books，1987），56.

[19] *How I Grew*（Harvest Books，1987），61.

[20] *How I Grew*（Harvest Books，1987），78.

[21] “The Vassar Girl，” *Holiday*，1951，reprinted in On the Contrary（Noonday，1961），196.

[22] *The Group*（Harcourt Brace，1963），30.

[23] Elinor Coleman Guggenheim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

[24] Lucille Fletcher Wallop，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

[25] 位于西雅图。

[26] 1929年11月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特德·罗森堡的书信，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9。

[27] “Two Crystal-Gazing Novelists，” *Con Spirito*，February 1933，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81。

[28]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80.

[29] Adam Kirsch，“What’s Left of Malcolm Cowley，” *City Journal*，Spring 2014.

[30] *Intellectual Memoirs 1936-1938*（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2），9.

[31] “Coalpit College，” *New Republic*，May 2，1934.

[32] “Mr. Burnett’s Short Stories，” *Nation*，October 10，1934.

[33] “Pass the Salt，” *Nation*，January 30，1935.

[34]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I，” *Nation*，October 23，1935.

[35]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III，” *Nation*，November 20，1935.

[36]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IV，” *Nation*，December 4，1935.

[37] John Chamberlin，“Book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2，1935.

[38] F. P. Adams，“The Conning Tower，” *New York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3，1935.

[39]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Part V，” *Nation*，December 18，1935.

[40] *How I Grew*，267.

[41]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78.

[42]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86.

[43]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77.

[44]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100.

[45] Isaiah Berlin，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

[46] “My Confession，” in *On the Contrary*，102.

[47] “Philip Rahv （1908-1973）” in *Occasional Prose*（Harcourt，1985），4.

[48] Isaiah Berlin，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21。

[49] 德怀特·麦克唐纳接受黛安娜·特里林采访，*Partisan Review*，1984，in *Interviews with Dwight Macdonald*，ed. Michael Wreszi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3）。

[50] “Philip Rahv （1908-1973）” in *Occasional Prose*，4.

[51] *Theatre Chronicles*，*1937-1962*（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63），ix.

[52] “Theatre Chronicle，” *Partisan Review*，June 1938.

[53] “Theatre Chronicle，” *Partisan Review*，March-April 1940.

[54] “Theatre Chronicle，” *Partisan Review*，April 1938.

[55] 纽约的一家餐厅，以展示数百幅名人漫画而闻名。

[56] “Wartime Omnibus，” *Partisan Review*，Spring 1944.

[57] *How I Grew*，16.

[58] “totalitarianism”这个单词含有七个音节。

[59] *How I Grew*，260.

[60] *Intellectual Memoirs*，97.

[61] David Laskin，*Partisans*：*Marriage*，*Politics*，*and Betrayal Among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88.

[62] Reuel K. Wilson，*To the Life of the Silver Harbo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8），53.

[63]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42），84.

[64] *The Company She Keeps*（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42），112.

[65] George Plimpton，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1。

[66] 1942年5月6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书信，收录于*Dear Bunny，Dear Volodya*：*The Nabokov-Wilson Letters，1940-1971*，ed. Simon Karlinsk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67] Pauline Kael，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1。

[68] William Abrahams，“Books of the Times，” *New York Times*，May 16，1942.

[69] Review by Lewis Gannett，*New York Herald Tribune*，May 15，1942.

[70] Malcolm Cowley，“Bad Company，” *New Republic*，May 25，1942.

[71] *The Company She Keeps*，194.

[72] *The Company She Keeps*，223.

[73] Cowley，“Bad Company.”

[74] Lionel Abel，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0。

[75] “The Weeds，” in *Cast a Cold Eye*（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50），35.

[76] Mary McCarthy in *Contemporary Authors*，New Revision Series，vol. 16（Gale，1984），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208。

[77] Margaret Shaf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267。

[78]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Vogue*，July 1947.

[79] Alfred Kazin，“How to Plan Your Reading，” *Vogue*，July 1947.

[80] “The Art of Fiction，No. 27：Mary McCarthy，” *Paris Review*（Winter-Spring 1962）.

[81] *The Oasis*（Harcourt Brace，1949），39.

[82] William Barrett，*The Truants*：*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Doubleday，1982），67.

[83] 1949年5月3日，H. William Fitelson写给Robert N. Linscott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84] Donald Barr，“Failure in Utopia，” *New York Times*，August 14，1949.

[85] 1949年3月1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6] 1954年8月10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7] 1954年8月20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8] 1966年10月1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89] 1965年10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第六章 帕克和阿伦特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为止的过去二十年里，多萝西·帕克主要忙于撰写剧本，只断断续续地发表过文章。不过此刻她决定重新写一些严肃的东西。她总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写作：那就是缺钱。可是当时的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找到发表机会了。

麻烦的根源是政治性的：帕克的名字总是被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关于帕克是否具有共产党党员身份一直存在争议，不过她曾为共产党宣传机构执笔，还曾出现在共产党活动的现场。所以当美国的情绪转向反共时，帕克的名字就不停地出现在政府的调查中。1951年，联邦调查局探员第一次敲响了她的家门，她的狗一直围着探员们上蹿下跳。帕克似乎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你看，我连让我的狗老实待着的本事都没有。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能推翻政府的人吗？”[1]

要么是被帕克的魅力迷住了，要么是被帕克的名气吓住了，总之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一次也没有逮捕过她。参议员麦卡锡扬言要传唤她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接受问询。而纽约州的州委员会则真的传唤了帕克，她礼貌地提供了证词，在被问及她是否加入过共产党时，帕克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赋予自己的权利。[2]最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持对帕克进行正式处罚，但她的名声依然受到了损害。不过这种在公众面前的名声受损远不如她在好莱坞遭受的实际损失严重。她突然间失去了过去近二十年里一直拥有的稳定且丰

厚的收入。她的个人生活也陷入了混乱。她开始酗酒。1947年时她已经和艾伦·坎贝尔离婚，1950年二人复婚，但是1952年他们又分居了，直到1961年才再次和好。

在这段时间里，心神不宁的帕克回到了纽约。她在一个被她称为沃尔尼（Volney）的酒店里住了下来。她与别人合著了一个名为《走廊中的女士们》（*The Ladies of the Corridor*）的剧本，内容就是关于那些像她自己一样孤身一人、年岁渐长的中老年女性的。同时，帕克还开始重新为《纽约客》写文章，不过没有哪一篇能接近她早期作品的水平。

有征兆暗示帕克连仅剩的一点才华也要耗尽了，还有征兆暗示她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1955年8月，帕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洛丽塔》（*Lolita*）[3]的短篇小说，其情节似乎是受到纳博科夫的同名小说的启发，尽管那本书是于帕克发表文章几周后才在法国首次出版的。帕克的《洛丽塔》也讲述了一位孤独的单身女性的女儿受到一位名叫约翰·马布尔（John Marble）的男房客色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怎么会与纳博科夫即将出版的小说如此相似的原因无人清楚，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能够得出的最好的理论是帕克是从埃德蒙·威尔逊那里听说了纳博科夫手稿的事，威尔逊已经读过了，但是并不喜欢。[4]无论怎样解释这件事，说这是某种极端形式的健忘也好，说帕克想和一位冉冉升起的俄国小说家新星竞争也罢，总之它们都只能暗示帕克在写这个故事时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

不管怎么说，帕克当时写的东西根本无法和她早期大受欢迎的那些作品相提并论了。她已经不想，也不能写出公众仍然希望从多萝西·帕克笔下看到的那种净是俏皮话的文章了。简而言之，帕克抑郁了。本奇利在1945年因心脏病去世，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比本奇利还要早一两年，他是1943年去世的。此时的纽约和二三十年代的纽约已经不是同一个样子了。此时的帕克也不再是围绕在圆桌旁的熠熠生辉的新星之一，

而是变成了某种更接近于幕后大佬的人，她显然并不适应这样的角色。

最终，帕克找到的唯一能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是为一份刚刚重新恢复活力的名叫《时尚先生》（*Esquire*）的男性杂志写书评。帕克是这份杂志的执行主编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为履行与《时尚先生》签订的合同而撰写的作品是帕克一生中最后一批稳定而持续提交的作品，尽管偶尔还是会出现到交稿截止日期无法交稿的情况，但她至少保证了每年发表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并没有她早期在“永远的读书人”专栏中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那种言简意赅。它们更像是一个飘忽不定、上了年纪的心灵进行的冥想，而非早期评论中发射的那种被抛光的子弹。不过她的幽默依然隐约可见，有时候帕克会把它们用在回忆老朋友上：

> 说到已故的罗伯特·本奇利，愿他的灵魂安息。他这个人最受不了进书店。很多人不进书店是由于遭受幽闭恐惧症的折磨，但本奇利不属于这种情况，他的烦恼源于一种巨大的、让人精神疲惫的怜悯之情。当他看到一排排、一层层闪耀的新书时，他感受不到任何喜悦，因为他仿佛能看到这些书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海浪一样朝他拍来，他似乎还能看到一种幻象，就是所有这些书的作者在完成作品那一刻的情景——他们都在对自己说：“好了，我写完了！我写出了一本书。我和我的书从此以后就会流芳百世了。”[5]

帕克交稿的时间还是断断续续的，编辑有时候会抱怨让她交稿得靠强迫。不过当帕克尽力写作时，她似乎还是能够享受到乐趣的。她赞美自己的老朋友们，比如埃德蒙·威尔逊；她也攻击自己的宿敌，比如埃德娜·费伯。当编辑要求她评论詹姆斯·瑟伯在几年前出版的《与罗斯一起的年头》（*The Years with Ross*）时，帕克写出了她已经多年没有写出过的精彩的文章。在回忆她曾经的老板时，她这样描述道：“他颀长的身躯好像是用粗针长线草草缝起来的，他的头发像是豪猪身上的棘刺，他的牙齿像巨石阵，他的衣服看起来像是给别人准备的。”[6]

有时候，帕克似乎是想要和被她评论的非虚构类书籍的作者一较高下；人们可以感受到帕克有一种渴望投身战场，弄清一切不确定性的迫切需求。她对笔名为“不久前的托马斯（Lately Thomas）”的作者创作的一本关于麦艾梅（Aimee Semple McPherson）的书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态度，她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写得更生动：

> （他的出版商承认“不久前的托马斯”是一位西海岸的记者兼作家的笔名。这个名字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充满奇迹的精彩迷宫，所有人都在试图弄明白他怎么选了这样一个笔名。）不管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用完全平铺直叙且严肃无趣的方式描述了一个誉满全国，不，应该说是举世闻名的事迹，对这个内容的描述本来是可以让他随时陷入难以自制的大笑中的。[7]

帕克还不惜笔墨地嘲弄了沉醉于自我之中的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不过帕克总算是在这个闪耀的新世界里重新找到了明确的立足点。她受邀与诺曼·梅勒及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一起在电视节目中谈论这些年轻的新诗人。帕克抱怨说垮掉的一派的诗人们只是在“一遍一遍地重复一种毫无生气且千篇一律的日日夜夜”。[8]她还断言自己不是一位批评家，她在《时尚先生》的工作是“写自己的想法，然后祈求上天不要让自己摊上诽谤官司”。《新共和》的一名年轻作家珍妮特·温（Janet Winn，即后来的珍妮特·马尔科姆）看到这个节目后不无讽刺地评价道：

> 帕克女士已经不再拥有（如果她真的曾经拥有的话）关于她的故事中提到的那种“尖锐的机智”，她在节目中说话不多，但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她很像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9]

帕克为《时尚先生》撰写专栏文章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62年。她评论的最后一本书是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的《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她喜欢这本书，说它“恢复了我对于恐怖和死亡的所有信念。我甚至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赞美这本书及其作者了”。[10]这就是帕克作为评论家发表的最后一些内容。在她

和丈夫艾伦·坎贝尔最后一次重归于好仅仅一年之后，坎贝尔就突然去世了。帕克的状况也开始严重恶化。她为《时尚先生》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艺术家约翰·科克（John Koch）的作品的。

> 如今写关于艺术的文章会让我感到一种深刻的难堪，很久之前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当时我把它隐藏在一种“她又在经历艰难，女士——她吼叫、朝人吐口水，天知道她还会干什么”的表象背后。[11]

这以后，帕克又挣扎了三年，最终于1967年6月在纽约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去世。不论从任何角度衡量，她的职业生涯都应当算是非常成功的。她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依然能够轻易地从某篇散文或一首诗歌中分辨出她的声音；她就是那种一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作家。在她的遗嘱中，她把自己所有文学作品的版权都遗赠给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然而常常被视为她的遗产的其实是她“深刻的难堪”。

*

1957年9月，有一张照片登上了大多数报纸的版面。照片中的内容是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Arkansas）的一位十五岁黑人女孩儿走在上学路上。这个女孩儿穿着一条白裙子，戴着太阳镜，她把书本紧紧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很是决绝。她身后跟着一大群人，一个紧追着她的白人女孩儿脸上充满了愤怒和不屑，照片中的她大张着嘴，似乎正在高喊某个侮辱性的词语。

这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儿叫伊丽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是“小石城九人”之一，也就是在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做出后被送到小石城中心高中上学，以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九名黑人学生之一。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威胁要阻拦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因为埃克福德家没有电话，所以伊丽莎白没收到其他黑人同学计划先集合，然后一起由护卫队陪同进入学校的通知。相反，她就这么在暴民群体的跟随下，

孤身一人走着去上学了。[12]

汉娜·阿伦特被这张照片触动了。她后来写道：“我们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对黑人或白人孩子来说，让他们解决他们之前的几代成年人都承认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过于沉重的负担。”[13]但是出于对照片中的黑人女孩儿的关切，阿伦特逐渐发展出了某种反对学校普遍废除种族隔离的主张。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一份名为《评论》（*Commentary*）的倾向左派的犹太人新杂志的主编。他邀请阿伦特为杂志撰稿，于是阿伦特就在这篇文章里论述了对这起事件的观点。

然而在阿伦特提交稿件之后，她论述的令人不安的观点在编辑内部引发了不同意见，他们为该不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而争论不休。起初，他们计划邀请历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写一篇回应文章，然后将其与阿伦特的文章发表在一起，以此来弱化阿伦特充满争议的论述可能产生的冲击。但是在收到了胡克的文章之后，编辑们又开始犹豫不决，一直拖着不发。气愤的阿伦特于是收回了稿件。后来悉尼·胡克还宣称阿伦特是惧怕他的批评意见才收回稿件的。但是关于学校种族隔离的斗争在1958年全年一直没有平息，阿伦特又将文章发给了另一份名为《异议》（*Dissent*）的杂志，最终该文章于1959年初被发表了。

要理解阿伦特反对学校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你必须先理解到1959年时，阿伦特坚持的是一种三分世界的政治理论，最上层是政治领域，中间是社会领域，底层是私人领域。就政治领域而言，她承认通过立法禁止歧视不仅是可接受的，更是有必要的。但阿伦特同时坚信私人领域应当受到保护，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政府入侵私人领域。阿伦特还确信政府也不应当过多参与社会领域，这样人们才可以掌控彼此之间的连接和关系。

鉴于此，阿伦特提出了歧视是正常运行的社会的固有本质，这在当

代人看来多少有些难以置信。阿伦特认为，当人们在社会领域中歧视时，即当他们去购物、去上班或去上学时，他们是在“自己心里”歧视，他们只是在行使一种被调整之后的结盟自由。所以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不管怎么说，歧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权利，就像平等是一种政治权利一样。”[14]

无论这种想法听起来多可怕，阿伦特都是出于善意才提出此番言论的，尽管这种善意目光短浅。她没有在这篇文章中使用“有意识的贱民”这个名词，但你还是可以将阿伦特的想法与她的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照片中孤身前行的女孩儿将要加入的是一个明确表示不欢迎她的群体，这个画面传达出的义无反顾的悲壮情绪显然让阿伦特很受困扰。她认为这是种错误的策略。拉埃尔·瓦恩哈根永远不会这样走着去上学，她会舒服自在地远离一个要求她必须被同化的社会下达的命令。阿伦特显然还表达了针对女孩儿父母的明显的愤怒，因为她认为就是他们强迫孩子走上这条注定艰难的上学之路的。

阿伦特表达的对于废止种族隔离制度问题的观点是毫无远见的。至少可以说，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了其他人的挑战。实际上，因为阿伦特的观点必然会引起反对意见，所以在刊登她文章的版面顶部的一个方框里，编辑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们同意其中的观点，我们的立场恰恰与之相反！但是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即便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阿伦特女士在知识界的崇高地位、她谈论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她之前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被剥夺的事实，我们认为将她的观点，以及对她观点的反驳不受限制地发表出来是在造福公众。[15]

同时被刊登出的两篇反驳文章都是由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学者撰写的。其一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尽管他完全不同意阿伦特的论断，但是他对于阿伦特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另外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社会学家

梅尔文·图明［Melvin Tumin，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曾经反复提到图明就是启发他后来的小说《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中科尔曼·西尔克（Coleman Silk）这一角色的原型］，他在文章开头就大声疾呼：“起初，人们会以为这是个糟糕的玩笑。”[16]接下来，图明一直延续了这种惊骇的口气，最让他诧异的莫过于一个像阿伦特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怎么会反对终止种族隔离制度。他的论述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阿伦特遭受情绪化的谬论攻击次数之多，这篇文章竟然还能给她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她在《异议》给她安排的反驳这些批评的版面上开篇就指出：“作为我的两位对手之一，图明先生在他那篇驳斥文章中采用的口气已经超出了探讨和对话的限度。”

也有一种可能是，尽管阿伦特鲜有道歉的时候，但她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看法了。她最终会遇到一个连她也忍不住听从的对话者：散文家和批评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艾里森更著名的身份是《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的作者。他对阿伦特观点的第一次挑战其实出现在他对《异议》当时的编辑，欧文·豪（Irving Howe）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反驳中。他评价说阿伦特与豪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17]但是他要说清楚的是，这两位白人作家都没有资格主张这种权威。后来艾里森在接受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采访时详细阐述了自己为什么不同意阿伦特的观点：

> 我相信［美国黑人］经历的意义的重要线索之一存在于这样一个理念中，那就是牺牲的典范。汉娜·阿伦特无法理解这个典范在南方黑人中的重要性，所以她在自己发表于《异议》杂志上的《回顾小石城事件》（*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中提出了一些非常古怪的观点，也就是指责黑人父母在废止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利用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根本不知道黑人父母让自己的孩子走过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群排成的长队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明白这样的仪式中的暗示对于他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些孩子要抛开一切传说和假设，直面社会生活中切实存在的恐怖。在很多黑人父母看来（尽管他们也希望现实不是如此），正因为他们是黑人，所以他们的孩子注定要面对这些恐惧，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恐

> 惧和怒火。一个黑人必须学会控制因为自己的种族而出现的内心情绪，如果他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只不过是又一次牺牲。这是一个严苛的要求，但是如果他无法通过这个最基本的测试，他的人生只会更加艰难。[18]

贱民的典范是可以避开社会生存下去，但是对于生活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南方的黑人来说，这个选项根本不存在。和自己的同类团结在一起，从自己的不同中汲取力量的做法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论述令人信服，起码是足以让阿伦特亲自给拉尔夫·艾里森写信承认对方的观点："我认为你的评论完全是对的，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个情况的复杂性。"[19]苏珊·桑塔格后来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上下文中讽刺地写到，阿伦特犯下的正是一个人在看到一张照片时会犯下的典型错误。她以为一张埃克福德的照片就足够让她理解民权斗争，就足够让她对别人的对策品头论足了。

在写了《回顾小石城事件》，以及随后一篇观点类似的《教育的危机》（*Crisis in Education*）之后，阿伦特似乎意识到自己起码应当作出一点让步了。不过她同时也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她不仅给艾里森写了那封信，还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纽约客》上首次发表名为《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的文章之后，写信给后者谈论政治的本质。[20]（她写到自己被他的"爱的福音吓到了"，[21]尽管她还说自己写这封信是带着"真诚的赞赏"。）至少有一位黑人学者始终认为阿伦特的好奇带着一种"家长式作风"。[22]阿伦特似乎并没有任何黑人朋友，她也没有特别专注于民权斗争。时至此时，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高到当她对什么事发表观点时，她的观点总是带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阿伦特的余生中，人们会一直将她视为这样的权威。她一直都是那种居高临下地发表观点的人。不过她的铠甲上已经出现了一条缝隙，在亮光下细看的话，这条缝隙还将越变越宽。

[1] Marion Meade，*Dorothy Parker*：*What Fresh Hell Is This*？（Penguin，1988），699.

[2] 《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指“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

[3] “Lolita，” *New Yorker*，August 27，1955.

[4] 参见Galya Diment，“Two 1955 Lolitas：Vladimir Nabokov’s and Dorothy Parker’s，” *Modernism/Modernity*，April 2014。

[5] “Book Reviews，” *Esquire*，May 1958.

[6] “Book Reviews，” *Esquire*，September 1959.

[7] “Book Reviews，” *Esquire*，June 1959.

[8] Harry Hansen，“The ‘Beat’ Generation Is Scuttled by Capote，” *Chicago Tribune*，February 1，1959.

[9] Janet Winn，“Capote，Miller，and Miss Parker，” *New Republic*，February 9，1959.

[10] “Book Reviews，” *Esquire*，December 1962.

[11] “New York at 6：30 p.m.” *Esquire*，November 1964.

[12] 此处的细节参考Christine Firer Hinze，“Reconsidering Little Rock：Hannah Arendt，Martin Luther King Jr.，and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Spring/Summer 2009。

[13]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Dissent*，Winter 1959，50.

[14]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Dissent*，Winter 1959，51.

[15]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Dissent*，Winter 1959，46.

[16] Melvin Tumin，“Pie in the Sky…” *Dissent*，January 1959.

[17] “The World and the Jug，” in *Ralph Ellison*，*Shadow and Act*（Random

House，1964），108.

[18] Ralph Ellison，转引自Robert Penn Warren，*Who Speaks for the Negro*？（Random House，1965），343。

[19] 1965年7月29日，汉娜·阿伦特写给拉尔夫·艾里森的书信，出自Young-Bruehl，*Hannah Arendt*，316。

[20] “Letter from a Region in My Mind，” *New Yorker*，November 17，1962.

[21] 1962年11月21日，汉娜·阿伦特写给詹姆斯·鲍德温的书信，可见于http：//www.hannaharendt.net/index.php/han/article/view/95/156。

[22] Kathryn T. Gines，*Hannah Arendt and the Negro Ques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4），5.

第七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

1960年，阿伦特给自己曾经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写信说，尽管她如今忙得分身乏术，总是到各处讲学，根本没有时间探望朋友，但她还是打算空出一大块时间，前往以色列旁听一场审判。阿伦特在信中写道：“我要去亲眼看看这个行走的灾难，这个古怪的行尸走肉，我不想通过印在报纸上的文字了解这一切，否则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不要忘记我多早就离开德国了，我直接经历的已经非常少了。”[1]

这个“行走的灾难”指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当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Mossad，即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接受问询和审判。艾希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纳粹战犯，以至于时任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决定不依靠正规的引渡程序将其带回。艾希曼曾是一位高级别的党卫军军官，领导着执行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部门。不过，艾希曼在战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使用伪造的文件逃到了奥地利，然后又用这些文件从红十字会获得了护照。从1950年起，他一直使用假名生活在阿根廷。

艾希曼的被捕从一开始就是全世界媒体关注的轰动事件，绑架的戏剧性方式意味着充满戏剧性的新闻报道。不过当时也正是西方终于开始重视最终解决方案的时期。在纽伦堡审判中，最终解决方案曾经被反复提及，艾希曼的名字也经常出现。但是有些人觉得纽伦堡审判对于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的处理并不够彻底，以色列人对此的体会尤

其深刻。所以当艾希曼根据以色列1950年颁布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Nazis and Nazi Collaborators（Punishment）Law］被指控十五项罪名时，很多人将此视为一个纠正过去错误的机会。控方律师做足了文字工作，他在开庭陈述中宣称自己是在代表逝去之人提出控诉。他还承诺说："我将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以他们的名义，宣读这份令人敬畏的起诉状。"

毫无疑问，至少就以色列人指控他的那些罪名来说，艾希曼是难以推脱的。在审判之前，艾希曼已经接受了长达数月的审讯。以色列人有成百上千页的文件。但艾希曼仍然表示"对起诉书中的罪名不服罪"。他的辩护理由是自己协调谋杀数百万人的后勤工作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实际上，当被传唤出庭作证时，艾希曼宣称"我从未杀过一个犹太人，也没杀过非犹太人——就这一点来说，我从未杀死过任何人"。[2]简言之，他宣称因为自己的职衔很高，没有接触过切实的杀戮行为，所以也没有理由感到愧疚。

对艾希曼的审判会持续五个月。阿伦特从1961年4月开庭第一天就到场了。当时，帕克的老朋友哈罗德·罗斯已经去世，接替他成为《纽约客》总编的人是个子不高、矜持寡言的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阿伦特问肖恩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些关于审判的东西。阿伦特对肖恩说的肯定不会像她对雅斯贝尔斯说的那么多，她只是说自己"非常想要"[3]前往，以及她想知道肖恩是否有意愿接收一两篇文章之类的。阿伦特旁听审判时显然一直认为被告就是一个"古怪的行尸走肉"。她旁听了一部分审判，没能旁听的部分则依靠阅读庭审记录补全。结果是阿伦特越来越确信自己的观点。艾希曼的空洞让她着迷，就是这种空洞引发她提出了如今看来可能是她最著名的，但也最充满争议的论点：即"平庸的恶"的概念。

理解这个词的最好办法可能是要先接受阿伦特对于艾希曼的看法，

她对这个人的姿态和行为的解释在后来一直饱受争议。不过对她来说，艾希曼是一个谜，是傲慢和无知的致命组合。阿伦特对一份德国报纸上刊登的艾希曼回忆录节选非常着迷，艾希曼在其中叙述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时使用了一种只能被称作最没有自知之明的方式。在一个典型的段落中，他拘谨地宣称“我本身不仇恨犹太人，因为我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教育一直是严格的基督教信条；我母亲的亲属中也有犹太人，所以她持有的观点与党卫军圈子中被普遍接受的那些是有区别的”。[4]这些段落的腔调让阿伦特觉得既困惑又可笑。她抱怨说这些段落中的喜剧性已经远远超越了荒诞的界线，直接升级为令人惊骇了。阿伦特质问：“这是选错信仰的教科书式案例吗？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和愚蠢透顶的结合吗？还是说，这就是一个永远不知悔改的罪犯的样子？……一个因为自己的罪行已经成了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法面对现实的人。”[5]

尽管抱有困惑，但阿伦特还是明确表示她相信艾希曼是罪大恶极的。她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了1962年发表于《纽约客》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系列文章中，后来又将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出版了同名著作。但是阿伦特也相信在艾希曼心中形成的自我欺骗在纳粹德国是一种普遍的情况，群体妄想正是让极权主义如此强大的因素之一。巨大的邪恶与渺小的个人形成的对照让阿伦特深受触动：

> 鉴于此，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这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选择最简单的办法来解释行为具有的无法形容的恐怖和实施这些行为的人表现出的无可否认的荒谬愚蠢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特性之间的难题，即宣称他是一个聪明透顶，善于算计的骗子——但他显然不是。

就艾希曼的性格形成一个连贯清晰的理论是有困难的，阿伦特当然也提出了她认为的一些原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里，艾希曼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就阿伦特宣称的观点进行争论的著作足够摆满图书馆的一整个书架。很多人把通过引证史料来证明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价有误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事实证明这是

一个成果丰富的研究领域，因为至今人们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愚蠢与否是观察者自己的判定。不过这些批判背后的动机往往是基于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与阿伦特竭力论证的那些观点一样让人无法忽视：从某种程度上说，阿伦特是不是在通过暗示艾希曼不够聪明，不善于算计来为他减轻大屠杀的罪责？

对此，主流评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人们认为阿伦特确实减轻了艾希曼的罪责。《纽约时报》的编辑邀请艾希曼审判的见证者之一——法官迈克尔·马斯曼诺（Michael Musmanno）来评论这本书。马斯曼诺指责阿伦特“同情艾希曼”，[6]称她是在为艾希曼的无辜做辩护：“她说惩罚艾希曼完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然而阿伦特没有同情艾希曼，也没说过惩罚他是个错误，绝大部分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她的朋友们立即给读者来信版面写文章支持阿伦特，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就是其中之一。他写到他肯定有人能写出更好的“逐字逐句的反驳”，但是他“只想说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几乎与［马斯曼诺的］正相反”。[7]

知识分子对这本书发起攻击的理由各不相同。阿伦特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她认为“完整的真相其实是这样的，如果当时的犹太人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局面可能会陷入混乱，也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幸；但受害者的数目几乎肯定不会达到450万至600万”。[8]阿伦特在这里指的是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äte），即纳粹在强迫犹太人聚居的区域里建立的委员会。不同地方的犹太居民委员会具有不尽相同的结构和职责，但它们的众多职责之一是为纳粹提供犹太人名单。有时候，它们甚至会指导警察如何将犹太人集中起来，统一运送到集中营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学者们才刚刚开始撰写关于大屠杀的恰当的历史。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直到1961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至今仍被

广泛当作教科书使用。希尔贝格将重点放在了协助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行政机构上；鉴于此，他的书中包含了对犹太居民委员会的详细叙述，还有一段关于艾希曼作为一个普通官僚的描写。阿伦特在报道审判期间读了希尔贝格的书，书中记录的史实显然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9]她在写那句受害者的数目“几乎肯定不会”那么多的论断时，脑子里肯定就在想着希尔贝格的书。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读过希尔贝格的书，而且阿伦特的论断让很多读者感到震惊，尤其是犹太人读者。他们认为阿伦特太随意、太冷酷无情，用今天的话说，她可能会被认为是在“责怪受害者”。阿伦特的观点当然比这一行文字能够表达的含义复杂得多。即便是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她也是在反复论述这个问题。她确实提到“犹太人领袖在自己人民遭受毁灭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10]但是她也写到就最终解决方案分摊责任的问题是“冷酷无情且愚蠢的”。[11]她想要寻找的是一个能够让这两种观点协调的立场，但是她并没有明确地将二者关联起来。

这导致了一些问题。阿伦特谈论这些归责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出现在了艾希曼的审判中，但是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变成了比法庭上说过的任何内容都更具爆炸性、更引发争议的东西。她的批评者们指责她在彻底重新校准天平，指责她对艾希曼过于友善，对犹太人则过于严格。已经成为《评论》杂志主编的诺曼·波德霍雷茨就写了一篇激烈批判的评论：

> 就这样，在谈论罪大恶极的纳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那是“平庸的”纳粹；在谈论作为道德高尚的殉难者的犹太人时，她告诉我们那是邪恶的同谋者；在谈论罪孽深重与纯洁无辜的正面对决时，她告诉我们那是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勾结。[12]

波德霍雷茨是在夸大其词。不过他认为阿伦特因为受犹太居民委员

会问题影响而在道德层面上出现了偏差的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另一位坚持不懈地批评阿伦特的人是莱昂内尔·埃布尔，他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也紧抓着这个论点不放。根据埃布尔的说法，问题在于阿伦特“从审美角度上”认为艾希曼很有意思，犹太居民委员会却远不及他。（实际上，阿伦特用了大量篇幅论述犹太居民委员会。）埃布尔写道：“如果一个人用枪指着另一个人的头，并要求他去杀死自己的朋友，那么从审美角度上说，这个用枪威胁别人的人并不及那个因为担心自己有生命安全而杀死朋友，最终甚至也没保住自己性命的人丑恶。”[13]埃布尔的论点是，阿伦特对艾希曼感兴趣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他能够成为她书中更有意思、更丰满的角色，这一点让她的论述的说服力打了折扣。

并不是只有阿伦特的宿敌们才这样想。埃布尔和波德霍雷茨提出的关于基调的问题，也是阿伦特的老朋友格肖姆·索罗姆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问题。索罗姆还在柏林时就认识阿伦特和本雅明了，但是他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于1923年迁居以色列。他在那里成了一名犹太神秘主义方面的学者，尤其专注于卡巴拉（Kabbalah）[14]的研究。他与阿伦特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的通信，但是他在1963年给阿伦特的信中表达了极端的失望。他指出的最主要的问题正是基调问题。他觉得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表达的情绪太过轻率无礼。索罗姆在给阿伦特的信中写道：“你表达这些观点的口气不恰当得令人难以置信。”[15]本质上，索罗姆要求阿伦特能对犹太人有点感情，有点忠诚。这封原本是私人之间的书信后来还被公开发表了。

在给索罗姆的回信中，阿伦特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她不能接受批评者们认为她缺乏基本的同情心，也就是她在给索罗姆或其他人的信中提到的认为她没有“灵魂”[16]的说法。她也不能接受索罗姆提出的因为她是犹太人，她就对犹太人负有索罗姆恳求她承担的责任的前提。阿伦特辩论说：“我确实‘只’爱我的朋友，我唯一了解的和信仰的爱就是对

单个人的爱。我不能爱我自己，或任何我明知是让我成为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东西[17]。”[18]

索罗姆询问过阿伦特自己是否可以将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发表出来，阿伦特以为他是指在以色列发表，但令她意外的是，索罗姆把这些信交给了《文汇》月刊（*Encounter*）。这是一本在英美知识分子群体中广受欢迎的杂志。《文汇》拥有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后来被证明它曾经与中央情报局的反共宣传有关。就这样，如阿伦特后来在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的那样，索罗姆的信“让尚未受谎言的流行病波及的那部分人口也被感染了”。[19]

阿伦特并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就受伤的人。她带着某种困惑，甚至是置身事外的超然看着如雪崩一样铺天盖地的批评。她在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提到埃布尔的评论时说：“这篇文章只是政治动员的一部分，这根本不是文学批评，甚至根本不是关于我的书的。”[20]麦卡锡同意她的说法，但她同时也把这件事看成一个体现政治联盟的场合，于是她立即主动提出要写一篇忠于阿伦特的驳斥文章，尽管她其实还没怎么看阿伦特的这本书。

在这整件事中，个人因素是很难被抛开不谈的。阿伦特告诉麦卡锡：“最让我意外和震惊的是，竟然有这么多憎恨和敌意潜伏在那里，只等待一个爆发的机会。”[21]阿伦特的信中确实没有什么内容暗示她此前知道自己圈子里的一些人认为她傲慢专横，她也不知道埃布尔，可能还有其他人在背后称她为汉娜·自大狂的事，她更不知道索尔·贝娄为了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坚称阿伦特看起来像“乔治·阿利斯（George Arliss）扮演的迪斯雷利（Disraeli）[22]”。[23]但阿伦特是个精明的人。她的作品及她所有的理论阐述都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上，而是建立在个人观察上。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她，尤其是嫉妒、小气和冷酷之类的阴暗人性更不被她放在眼里。其他人会因为这些不安全感而对知识诚信

发起猛攻这种事，对于一个写出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人来说根本不在意料之外。

*

对于麦卡锡来说，1963年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年，但是这种成功很快就变味了。不过与固执的阿伦特不同，麦卡锡更易于在失败的打击下消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她一直在写一本长篇小说。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总是被打断，但是到了1962年末，出版商威廉·乔万维奇（William Jovanovich）变得无比执着于这本书，所以他向麦卡锡支付了一大笔预付款，要求她完成这部作品。麦卡锡利用了这个机会，到1963年9月，封面上印着几朵雏菊的成书终于上市，并立即成了出版商认定它会成为的那种畅销书。

这本名为《她们》的书讲述了贯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八位女性到纽约打拼，以妻子和职业女性的身份经历对于她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但还没有彻底自我解放的女性来说完全崭新的十年的故事。著名的巴尔比宗酒店（Barbizon Hotel）始建于1927年，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为了给突然涌入纽约，占据了城中的秘书职位的众多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女性提供住处的。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获得一份工作就像是进入一间女子精修学校，她们只是在这里等待婚姻的降临。麦卡锡对这八位女性生活的记述世俗但不世故，这本书是讲述同类故事的作品中最早的一本之一。《她们》中的角色都符合某一种特定的类型，比如平凡的多蒂·伦弗鲁（Dottie Renfrew），圆滑的莱基·伊斯特莱克（Lakey Eastlake）和“富有而懒散”的波基·普罗瑟罗（Pokey Prothero）。书中记述了她们的恋爱失败、生儿育女，还有狂喜和失去，直到她们之中的一个人，凯·斯特朗（Kay Strong）在四十年代自杀身亡为止。这个角色身上有一些与麦卡锡的人生相似的经历。其他角色则体现了麦卡锡在瓦萨学院的某些同学的特征。

《她们》作为一本小说并不成功。这本书的腔调是调皮的，但不带有批判；叙述者的清晰智慧和其对书中人物心理的相对简单的分析不怎么搭配。早期的《她选择的伴侣》中那种敏锐的自我审视已经不见了，那种让麦卡锡出名的挖苦的、尖锐的语气也不见了。麦卡锡在知识分子和文学圈子中的朋友几乎都不能忍受这本书的油腔滑调和偶尔出现的夸张情节，以及相对的一本正经。罗伯特·洛厄尔给伊丽莎白·毕晓普写信时就预言道："看了这本书的人都不喜欢这本书，我很害怕看到《纽约书评》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评论。"[24]

洛厄尔提到的不是《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而是当时刚刚兴起的一份名叫《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杂志。1963年1月，洛厄尔及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联合洛厄尔的朋友，编辑贾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及其妻子芭芭拉（Barbara）共同创办了这份刊物。他们本来没有多少资金来启动一份文学杂志，但是因为诸如《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等许多报社当时都在遭受工人罢工的困扰，其他一些出版机构也已经停工数月，连带着那些刊物上的书评也无处可寻了，《纽约书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纽约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人本来就不怎么喜欢《纽约时报》上的书评，和几年前的麦卡锡，以及更久之前的丽贝卡·韦斯特一样，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书评状况的长篇批评文章。这篇1959年发表于《哈泼斯杂志》上的文章还经常被看作是创办《纽约书评》的公开宣言。哈德威克写道：

> 平淡无味的赞美和微弱模糊的异议，最有限的风格和最无足轻重的短小篇幅，缺乏参与、激情、性格、特别之处，最重要的是缺乏文学基调这一点已经让《纽约时报》变成一份偏狭的文学报刊，除了更长更厚之外，它和小城镇里的《星期天图书版》（*Sunday Book Pages*）没有什么区别。[25]

麦卡锡显然同意这个观点，二十多年前，她在《国家》上发表《我们的批评，无论对错》系列文章时就明确地表达过类似的态度。所以，当哈德威克和洛厄尔问她的时候，麦卡锡主动提出为这份1963年初刚起步的杂志的第一期免费供稿，内容是评论威廉·S.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麦卡锡喜欢这本书，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她称之为“第一本严肃的科幻小说”。[26]

然而这也是随后几年中她为《纽约书评》贡献的最后一篇文章。因为《她们》出版后，《纽约书评》上刊登了两篇对该书的评论，其一是相对直接的评论，作者是诺曼·梅勒；其二是模仿原著创作的诙谐模仿文，作者的笔名是泽维尔·普林（Xavier Prynne）。

如今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诺曼·梅勒在他职业生涯中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仅仅获得过一次巨大的商业成功：他的第一部小说，1948年出版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然而他接下来出版的小说都被评论家和公众所厌恶。经过几年的落寞之后，他发表了一部论文集兼自传，题目不带一点讽刺地叫作《为我自己做广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这本书详细阐述了梅勒本人对名声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渴望。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在《国家》上发表评论称：“如果梅勒的新书中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感到惊慌的话，那就是他对取得公认的成功的痴迷。”[27]事实上，1963年的诺曼·梅勒可以算是有些名气了。不过他最为人知的可能是1960年秋天他在一个聚会上刺伤妻子，后来就殴打和侵犯人身罪认罪的事。

1962年秋天，梅勒还和麦卡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吵。理论上说，他曾经是麦卡锡的崇拜者，他在上大学时就读过《她选择的伴侣》，而且麦卡锡在文字上表现出来的样子与他理想中的作家完全吻合。梅勒在晚年时告诉麦卡锡的一位传记作者说：“她（在那本书中）展现自己的方式后来再没有出现在她其他的作品中，她是在允许读者了解她。”[28]

不过梅勒还说自己直到1962年8月和麦卡锡一起出席在爱丁堡举行的作家集会之前都与她没有过什么交集。当年的集会气氛特别紧张。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说：“最显著的事实是，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在人群中都有不少疯子。老实说，我非常享受这次经历。”[29]在这场混乱中，好斗的梅勒向麦卡锡提出挑战，要她和自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辩论。麦卡锡拒绝了，梅勒为此很生气。

鉴于此，当《纽约书评》的编辑邀请梅勒评论《她们》的时候，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对方会写些什么。

>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写出一本重要小说的女人，至少现在还不能；她失败了，从里到外彻底地失败了。她败给了虚荣——因为多年来人们对于她的有限的才华的过度赞美以及她为自己取得的可怜的成绩沾沾自喜而积累的虚荣；她败给了根深蒂固的胆怯——像任何从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好女孩儿一样，她不敢释放出心中的恶魔；她还败给了势利——就算她最终在作品里显露了一些对那些角色的同情，她依然不能接受任何无法把小动作也做得很精致的人；她的想象是失败的，毕竟，她脑子不太灵光，她的愿景有些荒唐，她的诉求也显示出自鸣得意，这都是造成她的风格失败的原因。[30]

麦卡锡对于梅勒不喜欢这本书并不意外。远比这更让她担心的其实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纽约书评》的执行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在想什么，因为她知道正是这两个人邀请梅勒来写书评的。实际上，在梅勒的评论被刊登出来的前一周，《纽约书评》上已经刊登了泽维尔·普林效仿《她们》创作的诙谐模仿文，其中提到了与梅勒指出的麦卡锡的罪过相似的问题。关于这篇诙谐模仿文的细节只有那些逐字逐句地研读过《她们》的人才能体会，普林显然就这样做了。值得记住的是麦卡锡最终的发现：原来泽维尔·普林就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哈德威克只比麦卡锡年轻一点儿，她的家乡是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

（Lexington，Kentucky）。1939年，她作为研究生来到纽约。与麦卡锡一样，哈德威克也因为在极度礼貌的表象下隐藏着毁灭性的恶意而出名。这还不是她和麦卡锡唯一的共同之处。与《党派评论》的那群人结交之后，哈德威克也成了菲利普·拉夫的情人。哈德威克做的很多事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麦卡锡已经先于她做过同样的事了。不过至少在泽维尔·普林事件之前，麦卡锡似乎并没有把哈德威克视为对手。直到这次关系破裂前不久，她们还在给对方写长长的、友好的、令人愉快的书信。

作家们出于平常的友好关系相互评论彼此作品的事很常见。无数被公之于众的书信内容都显示，哪怕是在各方面都很友好的作家之间，也会存在关于某篇小说或某首诗歌的意见分歧。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哈德威克的这个举动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更奇怪的是，她之前还在给麦卡锡的私人信件里赞美过这本书，尽管言辞并不算热烈：

> 我想说恭喜你。我非常高兴你写完了这本精彩的作品，也很高兴这本书一定能为你赚很多钱，我们“都知道你一定能行！”……这样的成就太了不起了，玛丽。[31]

然而哈德威克在写这封信时肯定已经想好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因为她在不到两个月之后就发表了那篇诙谐模仿文。麦卡锡给阿伦特写信说：“那些我以为是朋友的人竟然会邀请公然宣称是我的敌人的人写评论让我觉得奇怪。至于那篇诙谐模仿文，他们到今天也没跟我提及，可能是希望我不会发现。”[32]让麦卡锡感到特别受困扰的原因是在这整个期间，《纽约书评》的编辑们一直在反复向她约稿，如果她提供了稿件，那么她的散文就可能被和这篇批评她作品的文章刊登在一起。哈德威克试图道歉。她在自己的诙谐模仿文被发表几周后给麦卡锡写信：“我为我的文章感到非常抱歉。我当时就想表达这些想法，我们回不到它被发表之前了，但是我本来只想搞一个简单的恶作剧，我没有别的意思。”[33]这样的道歉不足以让麦卡锡满意。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麦

卡锡没有和哈德威克说过话，也没有为《纽约书评》提供过稿件。

所有这些事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麦卡锡不能承受人们对她发表的作品的看法吗？另一个在她的传记中流传的故事是关于另一位《纽约书评》群体中的成员，如今已经基本被遗忘的批评家弗雷德·杜佩（Fred Dupee）的。麦卡锡曾经和杜佩一起参加某个聚会，当时麦卡锡对他说自己听说他不喜欢这本书。戈尔·维达尔这样讲述这个故事：

> 弗雷德以非常礼貌、优雅，而且一点不好斗的语气回答："是的，玛丽，我不喜欢。"接着麦卡锡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她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弗雷德回答说："嗯，那要说的可多了。不过，你这样一个以高得离谱的标准要求别人的批评家自然也应当准备好让别人以同样的标准衡量你。"麦卡锡听到这话后就哭了。[34]

麦卡锡对于其他一些批评家就她的书作出的批评还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她告诉自己在《纽约客》的编辑说，一封写满了对《她们》的批评的书信其实会让她感到高兴："我喜欢你费这么大力气让我知道真相。"[35]与此同时，《她们》依然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作品。几年之后，好莱坞的制片商就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这也让麦卡锡成了真正有名气的作家，更挽救了她在过去很多年里一直相当糟糕的财务状况。

不过麦卡锡还是对朋友们说她确定这本书把她毁了，她甚至后悔写这本书。她早知道书卖得好会让她的圈子里那些还在挣扎求生的雄辩者和诗人们感到嫉妒。与她在自己作品中写到的那种强大的性格不同，麦卡锡容易感到受伤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一个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那是她在读了《她们》的第一章，以及兰德尔·贾雷尔的讽刺校园小说《大学图景》（*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其中有一个角色以麦卡锡为原型）的摘录之后得出的：

> 哦，可怜的姑娘，真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她一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

感觉，这就是她的问题。她总是装成别的什么人，但是她无法让自己或他人相信她的表演。当我了解她之后，我总是在被她激怒和为她感动两种情绪之间纠结——因为那时她表现出来的虚荣自负既浪漫又哀伤。[36]

同样是在1963年秋天出版，另一本同样由女性作者创作的小说却获得了所有麦卡锡曾经习惯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荣耀。这部作品相当前卫，它对于传统的情节推进和角色发展的抵制使其刚好成了《她们》的对立面。这本书的书名是《恩主》（*The Benefactor*），这本书的作者在纽约还鲜为人知——她的名字叫苏珊·桑塔格。

---

[1] 1960年12月2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1926-1969*。

[2] *Eichmann in Jerusalem*（Penguin，1963），22.

[3] 1960年8月11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威廉·肖恩的书信，转引自http：//www.glennhorowitz. com/dobkin/letters_hannah_arendt-william_shawn_correspondence 1960-1972。

[4] *Eichmann in Jerusalem*，30.

[5] *Eichmann in Jerusalem*，51-52.

[6] Michael A. Musmanno，“Man with an Unspotted Conscience，” *New York Times*，May 19，1963.

[7] 罗伯特·洛厄尔写给编辑的来信，*New York Times*，June 23，1963。

[8] *Eichmann in Jerusalem*，125.

[9] 希尔贝格宣称阿伦特欠他一个大大的致谢，他确信后者剽窃了他的作品。参见Nathaniel Popper，“A Conscious Pariah，” *Nation*，March 31，2010。

[10] *Eichmann in Jerusalem*，117.

[11] *Eichmann in Jerusalem*，12.

[12] Norman Podhoretz，“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A Study in the Perversity of Brilliance，” *Commentary*，September 1，1963.

[13] Lionel Abel，“The Aesthetics of Evil：Hannah Arendt on Eichmann and the Jews，” *Partisan Review*，Summer 1963.

[14] 卡巴拉是与犹太哲学观点有关的思想，用来解释永恒的造物主与有限的宇宙之间的关系，旨在界定宇宙和人类的本质、存在目的的本质，以及其他各种本体论问题。

[15] 1963年6月22日，格肖姆·索罗姆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reprinted in “Eichmann in Jerusalem：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Gershom Scholem and Hannah Arendt，” *Encounter*，January 1964。

[16] 参见，例如：“Don’t tell anybody，is it not proof positive that I have no ‘soul’？”出自1964年6月23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17] 指犹太人身份。

[18] 1963年7月24日，汉娜·阿伦特写给格肖姆·索罗姆的书信，in “An Exchange of Letters”。

[19] 1963年10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1926-1969*（Harcourt Brace，1992），523。

[20] 1963年9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21] 1963年9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22] 《迪斯雷利》是一部1929年上映的电影，乔治·阿里斯在其中饰演外交手腕高超，为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

[23] Saul Bellow，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354。

[24] 1963年8月12日，罗伯特·洛厄尔写给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书信，in *Words in Air*：*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lizabeth Bishop and Robert Lowell*，ed.

Thomas Travasino and Saskia Hamilt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8），489。

[25] Elizabeth Hardwick，“The Decline of Book Reviewing，” *Harper’s*，October 1959.

[26] Mary McCarthy，“Déjeuner sur l’herb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1963.

[27] Gore Vidal，“The Norman Mailer Syndrome，” *Nation*，October 2，1960.

[28] Norman Mail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189。

[29] 1962年9月28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30] Norman Mailer，“The Mary McCarthy Cas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12，1963.

[31] 1963年8月3日，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2] 1963年10月24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33] 1963年11月20日，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4] Gore Vidal，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25。

[35] 玛丽·麦卡锡写给Katharine White的书信，转引自Kiernan，524。

[36] 1954年2月22日，伊丽莎白·毕晓普写给Pearl Kazin的书信，in *One Art*：*Letter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Robert Giroux*（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94），288-89。

第八章 桑塔格

非常年轻且非常严肃的苏珊·桑塔格作为作家的首秀不能更与众不同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家称《恩主》是一本“以流浪汉冒险为内容的反小说”，[1]尽管这句话的本意是种赞美，但是它对于提高作品的销量并无太大作用。整本书是靠一位六十岁的男性叙述者希波吕特（Hippolyte）的叙述推进的，他居住在巴黎，过着某种波希米亚风格的生活。他的叙述总是离题，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想法中。后来，桑塔格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过，她是在尝试描绘“从美学角度审视生活的归谬法——也就是唯我论意识”，[2]不过在描述唯我主义时，她可能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了。

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够进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很可能就是《恩主》无法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原因。即便如此，当桑塔格的出版商将这本书送给阿伦特以征求她的意见时，阿伦特还是写下了很高的评价：

> 我刚刚读完桑塔格女士（Sonntag，阿伦特拼写桑塔格的名字时多写了一个“n”）的小说，我认为它精彩绝伦。请接受我诚恳的祝贺：你们可能发现了一位重要的作家。当然，她非常有独创性，她已经从法国文学那里学会了如何利用这种独创性。这很好。我尤其赞赏她严密的一贯性，不会让想象力不受控制地发散，但是又可以用梦境和想法写出一个真切的故事……我真的非常享受这本书！我很乐意参加出版庆祝会。[3]

我们不清楚至此时为止，桑塔格读过多少阿伦特的作品。她在笔记本上列出的打算阅读的书籍名单中没有《极权主义的起源》，实际上，这个名单中没有阿伦特的任何作品。不过，桑塔格捐献给加利福尼亚大

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档案中包括一本做了各种标记的《拉埃尔·瓦恩哈根》，在书页边缘的空白处有很多用铅笔标注的感叹：“哈！”（桑塔格大概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觉得阿伦特在文字中的人格面具有趣的人。）到两人见面时，桑塔格已经成了阿伦特的崇拜者。实际上，玛丽·麦卡锡在1967年时还曾为桑塔格竭力想要获得阿伦特的友谊的事而调笑过阿伦特：

> 我上次在洛厄尔家看到她的时候，她显然是想要降伏你。要么就是她爱上你了——这两种可能是一码事。说真的，她是不是？[4]

这个说法当然是开玩笑的，不过麦卡锡和桑塔格注定是要被树立成竞争对手的。很多人都讲过的一个故事是麦卡锡在提到桑塔格时称她为“那个模仿我的人”。[5]有一个最具戏剧性的版本说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某次聚会中，麦卡锡走近桑塔格，对她说了一句大意如下的话：“我听说你就是新版的我。”[6]我们不清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桑塔格写过自己听说这个故事的事，但她不记得麦卡锡亲口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她还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者自己一直不能确定人们认为麦卡锡是在什么时候或哪里说了这样的话。

桑塔格在1964年的一篇日记里用中立的态度简述了这位前辈，她的文字中没有暗示任何真正的敌对情绪，至少一开始没有：

> 麦卡锡的露出牙齿的笑容——灰白的头发——不时髦的红蓝印花套装。俱乐部女会员的八卦。她就是［她的小说］《她们》。她对丈夫态度和善。[7]

桑塔格后来说这第一次见面肯定是在洛厄尔家。她对当时情况的记忆只包括一段简单的对话，既不恭维也无挑衅。麦卡锡认为桑塔格显然不是纽约人。

“对，实际上我不是。虽然我总是想在这里居住，但是我很清楚地

感到我不来自这里。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桑塔格说自己当时这样回应。

麦卡锡说：“因为你笑得太多了。”[8]

不难想象这样的回答等于给这个话题画上了句号。桑塔格写道：“麦卡锡可以靠她的微笑做任何事，她真心笑时都在使用这种笑。”[9]不过麦卡锡对桑塔格还算友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1964年，麦卡锡还给包括索尼娅·奥威尔（Sonia Orwell）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朋友们写信介绍桑塔格。她在纽约时经常邀请桑塔格一起吃饭，坚持履行只有麦卡锡才觉得理所应当的社交礼仪。尽管如此，在某次这样的聚餐之后，麦卡锡在给桑塔格的信中的一条附言无疑还是让后者略微感觉到，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这个她一直渴望加入的世界中，她依然只是个暴发户一样的存在：

> 附言：我意识到我在给索尼娅［·奥威尔］的信中把你的名字拼成了有两“n”。所以你向美国运通查询的时候也试试“Sonntag”。[10]

麦卡锡对于桑塔格是哪里人的判断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小时候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在长岛。她的母亲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Mildred Rosenblatt）在生桑塔格的时候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她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Jack Rosenblatt）在中国工作，而她不想在中国生产。

与多萝西·帕克的父亲一样，杰克·罗森布拉特也是做皮毛生意的，他在上海与人合伙经营一家比较成功的加工厂。但是他年纪轻轻就染上了肺结核，在桑塔格不到五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过了一年才有勇气告诉桑塔格和朱迪丝（Judith）姐妹她们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从那以后，杰克在桑塔格心中就成了某种非常令人感伤的形象，以至于她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承认：“只要看到电影中有父亲

在令人绝望的长期分离后终于返家的情节，我依然会在他拥抱自己的孩子（们）时被感动到流泪。”[11]至于她的母亲，米尔德丽德则成了某种令人窒息的存在。后来她开始酗酒，变得非常依赖长女的认可和支持。桑塔格早期日记中的内容显示了十五岁的她关心母亲幸福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我脑子里能想到的只有母亲，她多么漂亮，她的皮肤多么光滑，她多么爱我。”[12]

这个时候桑塔格的母亲已经再婚了，她嫁给了一位立有战功的陆军飞行员内森·桑塔格（Nathan Sontag）。虽然苏珊和朱迪丝都改姓了桑塔格，但是内森·桑塔格并没有在法律上收养她们。桑塔格一家先是居住在图森（Tucson），后来搬到了洛杉矶，桑塔格就是在北好莱坞高中（North Hollywood High School）上学的。可以说即便是青少年时期的苏珊·桑塔格也并不适应西部这样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闲散时间。几乎在所有关于这段时间的传记片段中，无论是已出版还是未出版的，她都显露出了明显的躁动不安。她曾经写道：“我感觉自己是在忍受生活。”[13]桑塔格无法融入这样的环境。

在洛杉矶时，她找到了好莱坞大道上唯一一家公道的书店——匹克威克书店（Pickwick book shop）。阅读成了她逃避的首选方法。桑塔格总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读书比作旅行，她有时还会称书籍是“宇宙飞船”。她从阅读中获得的安慰很快转化成了骄傲，继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优越感：阅读渐渐让她与日常生活中必须接触的人疏远起来，包括她的同学，甚至是她的家人。在她的直截了当的传记性散文《朝圣》（*Pilgrimage*）中，她提到内森·桑塔格曾经对她说“苏，如果你读这么多书，你永远也找不到丈夫。”

> 我那时想，“这个笨蛋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有多少聪明的男人。他以为他们都像他一样。”因为尽管我与世隔绝，但是我一直相信在外面的世界里，在某些地方，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存在。

不过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也会让人失望。在《朝圣》中，即便是去拜访自己非常崇拜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经历也让桑塔格体会到“一种遗憾的色彩”。托马斯·曼当时居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他喜欢海明威，但是桑塔格并不怎么喜欢。他“说话就像在做书评”，而她在寻找可赞颂的更高境界，但总是找不到。对于桑塔格来说，这将成为她一生的主题。

为了寻找这个人们只谈论思想和高等艺术的麦加，桑塔格开始读《党派评论》。作为对这些主题从不感兴趣的家长的孩子，桑塔格不得不自己去学习这种不同的语言。桑塔格的一个朋友告诉桑塔格的传记作者说，在读自己买到的第一期《党派评论》时，桑塔格根本看不懂上面的任何一篇散文。[14]在她的人生后期，桑塔格总被视为令人惧怕的，或者用某些人的话说是自命不凡的。［她的朋友，学者特丽·卡斯尔（Terry Castle）回忆说她喜欢吹嘘自己热爱“不那么为人熟知的亨德尔[15]的歌剧”。[16]］不过，桑塔格是靠勤奋努力才获得这种她后来拥有的对于前卫艺术的娴熟了解的。这种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可能也是她如此看重这种才能的原因。她的经历证明无论是谁，只要读书足够多，就能变得有见识。

后来被问到是谁的作品让她成为她后来成为的这种作家时，她总会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其他启蒙者的名字也会继续累积，包括瓦尔特·本雅明、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有桑塔格心中的英雄在写作时都会使用很多典故并引用丰富的参考文献，每篇散文中都满含着前人研究成果的证据。他们的风格是建立在深而广的学识基础上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人们可能就不会为桑塔格总是坚称唯一对她没有一点儿影响的人是玛丽·麦卡锡感到惊讶了。桑塔格经常强调这个问题：她是“一个我从来不看重的作家”。[17]这其中的原因不难想象。麦卡

锡的文章几乎不涉及精神愉悦，它们总是与社会现实牵连在一起，但社会现实似乎从来不是桑塔格能够惬意生活于其中或就其创作文章的东西。另外，尽管桑塔格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在她渴望加入的这个属于男性知识分子的世界里，她显然并不特别担心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实际上，在最初那些年里，她似乎也从没有担心过那些厉害的男性知识分子们是如何看待她的。她已经见识得足够多了。

大学是让桑塔格不用再“忍受生活”的第一个机会。她计划得非常仔细，打算提早高中毕业，好尽快离开那里。桑塔格还很小时就想去芝加哥大学，她认为那里的“伟大书籍项目（Great Books program）”符合她正在萌芽阶段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然而她的母亲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放孩子出去闯荡，所以她坚持让桑塔格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先上一个学期作为过渡。于是，十六岁的桑塔格在1949年入学了。桑塔格在进行课本交换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哈丽雅特·索默斯（Harriet Sohmers）的高个子姑娘，这个人会在年轻的桑塔格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索莫斯的搭讪台词足以吸引任何自负的年轻姑娘：“你读过《夜林》（*Nightwood*）[18]吗？”[19]

桑塔格从高中毕业前不久就开始担心自己会受到同性吸引这件事。她曾经努力压制这种冲动，尝试与男性约会，自称喜欢他们，尽管实际上她并没有这种感觉。她在伯克利分校的短短几个月里，索默斯会带她前往旧金山活跃的女同性恋活动场所，索莫斯也是第一个真正与桑塔格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桑塔格对这次经历的看法是，它不啻一次解放：

> 我关于性取向的概念被大大改变了——感谢上帝！——双性恋是对一个个体更丰满的表达——而且是对——没错——是对用等待“对的人”出现这种理想化的概念限制性行为、尝试去物化理解性行为的变态观念的抵制，是对全面禁止不建立在爱之上的纯粹的身体感受和全面禁止随意选择性交对象的抵制。[20]

对感官享受敞开怀抱的桑塔格与索默斯之间的情事维持了很长时

间，之后她又与另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桑塔格在日记中潦草地记录着自己感受到的新生。她责怪自己在母亲建议她来伯克利分校时还曾犹豫过，如果她没有来旧金山，她就不会拥有这些经历了。

在桑塔格后来的人生中，她与女性和男性都约会过，虽然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次恋情都是与女性在一起的，但是有时候她还是不愿给自己的性取向贴上明确的标签。这是一种个人模式的解放，是一个私人问题。桑塔格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很少写回忆录。即便是她作品中的，代表她可辨识的声音的“我”都让人觉得不像丽贝卡·韦斯特的“我”一样能够被当成一个丰满鲜活的人。桑塔格的声音更像一种自然力，一种不表露任何具体的个人经历的声音。桑塔格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或同性恋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不过她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从来不全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而是单纯地不愿在发表给公众的作品中分享过多信息。

最终，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在伯克利分校的桑塔格手中，其中还包括授予她奖学金的承诺。桑塔格仍然坚定地想要参加芝加哥大学的要求严格的教学项目，于是她在1949年秋来到了芝加哥大学。那里有许多她仰慕的教授。她被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深深吸引，伯克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曾在巴黎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及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合住同一间公寓。（桑塔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你能想象那对我意味着什么。”[21]）不过，后来桑塔格嫁给了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她是在大学二年级时认识里夫的，二人在第一次约会后没几天就结婚了。

在发生了旧金山的那些同性之间的情事之后，这场婚姻看起来像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反转，但桑塔格试图宣称这是她出于爱情作出的自由选择。不过，发挥影响的其实还有其他更明显的原因。桑塔格到芝加哥后的第一个月，她读了一篇由弗洛伊德的学生撰写的论文，论文开篇就宣

称：

>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调查一再表明，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异性恋的道路只是被堵住了，认为后一条道路完全不存在是不正确的。[22]

桑塔格的日记中还夹着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包括她告诉一位高中同学说母亲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钱已经用完了，因为她的叔叔把生意搞砸了。“他需要把所有钱用来避免牢狱之灾，所以没有钱可以给我们了。”[23]除非能找到其他办法在经济上满足自己继续上大学的需要，否则她很可能得去找份工作。

菲利普·里夫比自己的新妻子大十一岁。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当时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弗洛伊德的博士论文。据说他是一位令人着迷的演讲者，但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桑塔格没怎么谈论过二人之间身体上的相互吸引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在知识层面的联系是变革性的。桑塔格曾经告诉采访她的人说，里夫一开始请求她嫁给自己时，她的回复是“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开玩笑。他的愿望之强烈让桑塔格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我带着完全清醒的意识+对我倾向于自我毁灭的意志的恐惧嫁给里夫。”[24]这样的话不是典型的年轻新娘会写的，不过在当时，这一整件事显然是一种折中和妥协。

起初，这种合伙关系进行得还算顺利，里夫夫妇就是“聊了七年的天”。[25]他们的对话从白天延续到深夜，从卧室延续到浴室。他们一起写他那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桑塔格最终会宣称那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她写的。与此同时，她还完成了本科学业，并追随里夫来到波士顿，因为后者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工作。桑塔格起初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开始修读哲学硕士学位课程，后来到哈佛大学参加了博士研究项目。1952年，她生下了儿子戴维（David），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

与丽贝卡·韦斯特和威尔斯的情况正相反——虽然丽贝卡生下儿子的时候同样只有十九岁，同样是刚刚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嫁给里夫对于桑塔格来说却是有益的，至少在一开始时是。她已经走上了成为学术明星的正轨，她的教授们都热烈赞美她的智慧，她在哈佛大学的成绩名列前茅。过了几年表面看来像知识分子的田园诗般宁静的生活之后，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向她提供了1957～1958学年到牛津大学参与研究的机会，桑塔格在丈夫的祝福下接受了邀请——至少起初是这样。

到此时，与里夫在一起的稳定生活已经开始让桑塔格厌烦。和里夫结婚期间，她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只除了一篇为《新领袖》写的对埃兹拉·庞德作品的新翻译版本的不太精彩的评论。后来，桑塔格在自己的小说《在美国》（*In America*）中借旁白之口描述了自己十八岁时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她嫁给了一个爱德华·卡索邦（Edward Casaubon）。卡索邦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角色，是小说女主人公多罗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的年长的丈夫，她的生活就是因为很早嫁给他而诸事不顺。

“发明了婚姻的人真是一个折磨人的天才，这个制度就是用来耗尽人们的感情的。”[26]桑塔格在1956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曾经看起来是真正的心灵相通的婚姻如今成了一个牢笼。里夫是一个有占有欲的人，在桑塔格看来，他是一个“感情上的极权主义者”。[27]桑塔格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失去了自我。她给琼·埃科塞拉讲过一段去电影院看《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的孤独回忆。这部劣质但令人愉快的商业电影是1956年的一部热门电影，完全是借同名歌曲的成功而走红的。桑塔格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她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一起谈论它的人都找不到。[28]

《在美国》中的叙述者写道：“我花了九年的时间才决定，我有权利，有道德权利与卡索邦先生离婚。”[29]在牛津大学的一年也是里夫夫妇婚姻终结的一年。桑塔格是独自一人前往的，戴维被送到了外祖父母家。在牛津大学待了四个月之后，桑塔格放弃了学术追求，改到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并体验法国文化。她在那里再次遇到哈丽雅特，不仅与其旧情复燃，还通过她认识了古巴裔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ía Irene Fornés）。1958年桑塔格返回波士顿之后，她的自我意识已经强化到有勇气在机场就向菲利普·里夫提出离婚。她从戴维的外祖父母家那里把他接回来之后就搬到纽约去了。

福恩斯也去了纽约。有一天，这对情侣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费加罗咖啡馆（Le Figaro Café）谈到两人都有写作的愿望，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根据桑塔格的讲述，是福恩斯对她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写你的小说？”

> 我回答说：“是的，我会写的。”接着她说：“不，我是说此时此刻。”[30]

这句话显然鼓励了桑塔格，她离开咖啡馆，回到家中，写下了后来将成为《恩主》这本书的前三页的内容。后来她说，这就像是某种“空白支票”。她还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经常是把戴维放在腿上打字的。小说的创作过程远比她和福恩斯在一起的时间长。桑塔格喜欢吹嘘说写到最后，每当她打字的时，已经十岁的戴维都能够站在旁边帮她点烟了。[31]

这本小说没有让她变得富有，甚至没有获得真正赞美它的评论——比较奇怪的赞美之一认为这本书展现了一种“精明、平静、属于家庭主妇的自信”[32]——但是，仅仅是出版一本小说也足以让桑塔格在纽约感到更加自信。在一个聚会上遇到《党派评论》的两位主编之一威廉·菲利普斯时，她问菲利普斯自己能否为杂志供稿。菲利普斯问桑塔格愿不

愿意写戏剧评论专栏。他似乎还说了：“你知道，玛丽曾经负责写这个。”[33]桑塔格虽然对戏剧没兴趣，但是她对于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兴趣太强烈了，所以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她写了两篇评论，结果都从最开始的主题偏离到她真正热爱的电影上，直到她发现自己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为止。她告诉人们她真的很想做一位小说家，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在眼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告诉她说：“苏珊，没有人对小说感兴趣。”[34]

然而，人们很快就开始对桑塔格的散文感兴趣了。她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关于“坎普”的札记》，该文章最初于1964年秋天被发表在《党派评论》上。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被命名，还有很多事虽然被命名了，但是从来没有被描述过。”[35]桑塔格辩论说，“坎普”是一种专注于技巧的辨识力，它巧妙地认定风格比内容更有价值一些。桑塔格的漫不经心、稳操胜券的口吻与她谈论的主题形成了完美的搭配，所以文章很快就大受欢迎。桑塔格成功地定义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反过来也会定义桑塔格。

从《恩主》开始，桑塔格就已经开始迅速取得成功。她获得了《年轻女士》（*Mademoiselle*）授予的优秀奖，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还突然受邀为《纽约时报书评》写书评文章。不过没有什么比她的散文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桑塔格被提升到了流行文化的预言家的位置。“坎普”的概念受到了如此广泛的讨论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到春天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文章作者甚至设法找到了一位愿意谴责这种现象的匿名专业人士：

> “基本上讲，‘坎普’是一种退化，是一种过分感性、不够成熟的与权威对着干的方式，”一位反“坎普”的精神分析学家最近这样告诉自己的朋友，“简而言之，‘坎普’是一种逃避生活和生活中的真实责任的途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极度幼稚，还对社会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是病态和颓废的。”[36]

这种威胁的口气在如今看来会有些奇怪。“坎普”的定义如今已经变得非常主流和商业化，以至于人们无法理解在1964年时，如此直率地谈论它是多么激进的一件事。纽约知识分子已经有那么多共产主义政治观点了，所以他们接受严肃知识分子叛逆者的空间少之又少。他们不喜欢垮掉的一代，对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也不感兴趣，同志文化对他们来说更是可以被无视的东西。对所有这些内容的抵抗情绪的最好概括大概可见于菲利普·拉夫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这封信是在1965年4月写的，当时《时代》杂志（*Time*）对这篇关于“坎普”的散文作出了赞美的总结，从而让它获得了其他在小报上刊登的文章不曾拥有的接受程度：

> 苏珊·桑塔格的“坎普”风格现在非常时髦，每一种堕落都被视为先锋。同性恋者和色情文学作家们成了主导者，无论男女。不过苏珊这个人，她是谁？——在我看来，她只是下半身开放，脑子里同样迂腐保守。那些同性恋热爱她不过是因为她为他们的轻率浮躁提供了思想上的合理性。如今她还反过来说我是一个保守的卫道士，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37]

《关于“坎普”的札记》是对流行文化的一种梳理，这样的梳理是此前从没出现过的。桑塔格列举的作为“‘坎普’教义一部分”的所有现象都是高度流行的内容，比如《金刚》（*King Kong*）和《飞侠哥顿》（*Flash Gordon*）漫画。这篇文章的精神从本质上说是民主的，让人们摆脱了非要对自己的品味做非好即坏的划分的限制。“坎普”允许不好的品味成为好的，换句话说就是它允许人们享受乐趣。桑塔格写道：“对于‘坎普’进行一本正经的、写论文似的研究会令人困窘。这样做的人反而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非常低级的‘坎普’。”[38]

如今看来，这里体现出的羞怯矜持显然是有意为之的。不过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年纪尚轻的桑塔格还不是后来写出那些专横傲慢、好表现出权威的文章的作者。此时的她还在寻找自己独特的风格，实际上，与她后来创作的关于瓦尔特·本雅明或埃利亚斯·卡内蒂的文章，以及其他

那些足可成书的长篇文化批评文章相比，《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点都不像出自桑塔格笔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的朋友特丽·卡斯尔后来提到桑塔格变得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卡斯尔还论述了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桑塔格对“坎普”的酷爱太过清晰地显露了她的特立独行和性取向，这让后来的桑塔格感到不自在。[39]这种遮遮掩掩也是让1964年时读这篇文章的同性恋者们感到疑惑的东西，他们明白桑塔格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群体的，因为她的遮掩并不能真的骗到任何人。

桑塔格另一篇重要的早期散文是几个月后被发表在《埃弗格林评论》（*Evergreen Review*）上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起初，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对桑塔格余生一直致力于的工作的反驳。文章宣称：“阐释是对艺术领悟力的报复。”这话听起来就像另一个古老观念的重新措辞，那就是批评家批评是因为他们自己创造不出优秀的艺术。不过她的措辞让这个观点变得更有诱惑力了，文章坚称最终“我们需要的不是一门艺术的阐释学，而是一门艺术的色情学”。[40]

很多人从这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相信桑塔格就是要攻击所有关于艺术的文章。不过她显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她自己就绝对没有放弃撰写关于艺术的文章，她也一直在尝试遵循自己提出的原则。桑塔格后来说自己想要论述的其实是关于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的互动问题，以及任何特定媒介的规则影响“它是什么意思”的方式的问题。更简单的解释可能是，对于苏珊·桑塔格来说，思考和写作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色情、感性的体验。她试图通过使用有层层深意的句子来传达这种观点，通过愉快地使用“对比法”“不可言喻”之类的高深词语，让它们变得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是展现出美感。这就是她选择的取代了更适于传达个人腔调的“我”具有的亲密感的方式。

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和《反对阐释》都引发了反响之后，曾经

出版了《恩主》的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Farrar，Straus and Giroux）看到了商机，他们将这些批评散文集中在一起，于1966年出版成一本书，并选择了桑塔格最广为称颂的散文《反对阐释》的题目作为书名。这本书被评论的次数比她的小说被评论的次数多得多，主流媒体又获得了一个被她震惊的机会。《服饰与美容》刊登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称人们为她的作品“争论不休，要么认为那是创造历史，要么认为那是大胆欺骗”。[41]在主流媒体上，大部分评论者认为桑塔格是骗子。一位评论者在痛批这本书之前先宣称桑塔格是“一个锐利的姑娘，像是一个在当代文化中奋力向上攀登的本科没毕业的玛丽·麦卡锡”。[42]另一位评论者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表达了如下观点：

> 作为这些散文的作者，苏珊·桑塔格实在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的声音沙哑、粗鲁、刺耳。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她在乎我们如何看待她的腔调和礼貌。[43]

也不是所有评论都这样；《洛杉矶时报》和《新领袖》上的批评家就很欣赏桑塔格。不过这些针对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只是批评文章中的边角料。大多数时候，批评家们的整篇文章都是在写他们眼中的桑塔格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这样，从那之后，桑塔格的性格成了与她所写的内容一样重要的问题。这种模糊的特性，她所谓的“形象”将和她的作品一样成为她文学声望的一部分。她的出版商们总能精明地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会充分利用桑塔格深邃的双眼和毋庸置疑的魅力。《反对阐释》已经成了一本不同寻常的畅销书，它的大众市场简装版封底上就只有一张桑塔格的照片，照片是由摄影家哈利·赫斯（Harry Hess）拍摄的，照片中的桑塔格正低着头看向一边。

在关于桑塔格的文章中，谈论她外表的内容太多了，甚至多到你如何形容都不为过的程度。即便是关于她的最严肃的文章里通常也会出现对于她样貌的评论。这些不计其数的笔墨大概都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一句话：她漂亮得非比寻常。不过我认为桑塔格与美的关系比旁观者兴高采

烈的赞美和照片中表现的精致复杂得多。在她的笔记本中经常有劝告自己多洗澡的内容；据同时代人的观察，她总是很邋遢，她的头发通常被向后梳，再松散地扎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发型可言。桑塔格在媒体上出现时也是这副样子。在一次采访中，她不做发型不化妆的样子与导演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一丝不乱的波波头形成了鲜明对比。[44]

桑塔格还只喜欢穿黑色的衣服，这是那些不愿意费心思考虑穿什么的人的标准策略。在人生晚期，她还会撩起衣服向人们展示手术留下的疤痕。尽管有魅力的人总是拥有不在乎自己外表的特权，但桑塔格对自己外表的漠不关心是真诚的、不做作的。她喜欢自己的样子能够对自己有所帮助，但也只是顺其自然而已。

另外，桑塔格从一开始就对她的公关经理想要让她投射出的形象感到担忧。她的照片开始遮盖了她这个人本身。一位英国出版商提议发行以劳森伯格（Rauschenberg）拍摄的照片的复制品为特色的限量版《反对阐释》，不过这个提议被桑塔格否决了：

> 这不就是那种极端时髦的情况——我和劳森伯格——《生活》+《时代》肯定会大肆报道，这等于确立了我就是那种“拥有一切的”女孩儿，是新版的玛丽·麦卡锡，是麦克卢汉主义（McLuhanism）[45]+“坎普”的女王，这些不都是我想要抹杀的东西吗？[46]

不知幸或不幸，桑塔格对成为“拥有一切的女孩儿（It Girl）”的抗拒最终没能成功。对她的采访总会提到有些人戏称她已经成了“美国先锋派的纳塔莉·伍德（Natalie Wood）[47]”。[48]她后来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死亡匣子》（*Death Kit*），不过收到的反响始终无法超越她日益提高的作为散文家的声望。与《恩主》一样，《死亡匣子》也是一本情节简单的小说：一位宾夕法尼亚州商人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都在设法弄清楚自己关于杀死一名铁路工人的记忆究竟是真是假。桑塔格在这本书里常常引经据典，遵循了一种在法国很流行的风格。戈尔·维达尔在《芝

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本小说不成功的原因：

> 桑塔格女士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成就被无视的原因很奇怪，因为那也恰恰是让她在美国作家中成为与众不同和极为重要的一员的原因：她广泛的阅读量，英语系称此为比较文学……这种后天习得的文化将她与大多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美国小说家区别开来。那些人几乎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你如果肯接受他们作品中贫乏的文字和偶尔的评论的随意性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出这一点。[49]

像桑塔格这样对先锋艺术感兴趣的批评家很少，出现的间隔也很长。相反，媒体报道都喜欢抓着简单一些的题材不放。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女性评论者这样写道："如果世上还有公道的话，苏珊·桑塔格应该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是相貌平平。一个长得那么漂亮的姑娘没有权利再拥有那样的头脑。"[50]女权主义者和学者卡罗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受《纽约时报》的委派去采访桑塔格，结果她完全不是桑塔格的对手，以至于写出了一篇没有引用一句桑塔格原话的文章——"我不该引用她的原话，因为那些词句太具体，把它们从说到它们的上下文中硬抽出来会简化它们的深意，甚至让它们变成错误"。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赞美。这次采访最终促成了一篇关于桑塔格是什么样的人的散文诗，其辞藻之华丽看起来更像某位名人的传略，而非一本书的简介：

> 当我第一次阅读关于苏珊·桑塔格的内容时我想：上帝呀，她就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又漂亮，又成功，但是受到了诅咒，［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最好的一句话说是］需要上帝的保佑。我们已经听说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匣子"。评论者们会在桑塔格女士的新小说中寻找她的影子。（但她不在那里。这已经不是她的书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现在是我的书，或者你的书了。她知道这已经不是她想读的那种书了。）[51]

在桑塔格名望最盛的时候，她同意由《时尚先生》的一位作家为她写一篇传略。她对这位作家说："传奇就像一条尾巴……它总是跟着

你，无情、怪异、没有用处，本质上说与你本人没有什么关系。”[52]当然，谦虚里总是包含一点自吹自擂的成分的，毕竟唯一能够随意抛弃传奇的人只能是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传奇可抛弃的人。不过，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她说得没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苏珊·桑塔格的人格面具与她的作品的关系越来越淡了，这肯定不是她愿意看到的。

尽管如此，桑塔格的名气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当时的很多男性知识分子都对媒体上报道的桑塔格的形象感到惧怕。比如，1969年初，她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菲利普·罗斯的信。罗斯写了一本新小说叫《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纽约》杂志（*New York*）刚刚发表了一篇他的传略。在那篇文章的开头几页中，他在提到桑塔格时用了“苏，苏茜·Q，苏茜·Q.桑塔格”。[53]在看到自己的话被印在杂志上之后，深感懊悔的罗斯马上给桑塔格写了封信：

> 无论你知不知道，我一直为你的个人魅力所倾倒，我也钦佩你作品的尊严，这篇报道对我印象中我说的原话的误解和误报让我非常震惊，我说那些话时的态度也不是这样的。[54]

针对这样一个仅仅带有非常微小的不敬的提及作出的这次道歉可以说是非常善意的了。这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尽管她的作品获得的评价一般，但桑塔格这个人物已经开始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她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而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她能够让菲利普·罗斯感到惧怕，通常情况下，后者可不是会轻易道歉的人。

随着桑塔格的迅速成功，她下定决心暂离文学批评和散文写作，转而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三本小说。在接到一个来自瑞典的在那里拍摄小成本艺术电影的邀请后，她还开始尝试拍电影了。桑塔格抛弃了抽象的批评类作品，改写对眼下发生的事件的直接评论。1967年，《党派评论》主办了一场写作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美国正在发生什么？”桑塔格在调查问卷上写下了一段长长的回应，都是针对这个从来无法给她归属感的

国家此时的状态的；她还直接用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年生活做比喻来批判这个国家：

> 今天的美国，有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做加州的新州长，有约翰·韦恩（John Wayne）在白宫里嚼肉排骨，这简直和门肯（Mencken）描述的耶胡国（Yahooland）一个样了。[55]

桑塔格从来不会生搬硬套爱国主义价值口号，而是指出如果美国真的是“西方白人文明的顶点的话……那西方白人文明肯定是出问题了”。她写道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

就这样，在一份不重要的杂志上的一篇随笔突然成了新闻。创建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保守派作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从桑塔格的文章里挑出了这些或那些词语，然后写了一篇情绪激昂的社评文章。他充满讽刺地写道，桑塔格这个“甜美的年轻人”根本就是支持共产主义的[56]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一名无比惊骇的社会学教授甚至都不愿写下这个出于“自我毁灭”的冲动而写出这样的内容的“异化知识分子（Alienated Intellectual）”的名字。[57]“人类历史的毒瘤”这个评论会成为桑塔格余生躲不开的话题。

然而到这个时候，桑塔格的作品已经开始登上小规模杂志版面之外的地方了。1968年末，桑塔格受《时尚先生》的委派到越南实地考察。《时尚先生》当时的主编是哈罗德·海斯，他迫切地想要将这份杂志从男性时尚杂志升格为一股强大的文学势力，桑塔格正好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的。

具体来说，桑塔格的越南之旅其实不是一趟完全自主的行程。她只能算是受北越邀请的客人之一。当时的北越政府有一个邀请杰出的反战作家和活动家来亲眼看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习惯做法，这也是它们的一种宣传手段。当桑塔格透露她不能脱离她的北越导游，真正独立自主地观察这个国家时，她并没有深思这可能导致她的报道陷入道德困境的问

题。鉴于此，她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将这篇文章写成对越南当前形势的权威性论述，而是将其作为对个人经历的记叙。这也是她少有的公开讲述自己对某件事的直接体会的情况：

> 在过去的四年里，知道越南人民正因为我国政府而遭受着极度的苦难让我感到难过和愤怒。此时我亲身来到这里，迎接我的却是礼物和鲜花，华丽的致辞和茶会，以及似乎有些夸张的善意，我的感受与在万里之外已经感受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58]

桑塔格为此次经历写的文章足有一部中篇小说的长度，所以后来被单独出版成书了。从前面这段话可以看出，文章的内容与其说是关于越南人的，不如说是关于桑塔格如何理解和回应越南人的。记者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在为《纽约书评》评论这本书时将其比作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59]比起深入了解越南，桑塔格其实更希望弄明白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帝国。即使是被她眼中的越南人民的善良正直围绕着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依然渴望自己的“不道德”的祖国拥有的“各种令人惊讶的知识和审美乐趣”。在结尾处她写道：“到头来，美国人终究无法将越南融入自己的意识中。”[60]

桑塔格绝对不是唯一前往越南，却发现自己处处受阻的美国记者。实际上，在她抵达河内两年前，玛丽·麦卡锡就已完成了这趟旅程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就此撰写的文章。她对于时局的分析比桑塔格的更直接，最终完成的著作总体上也不像桑塔格的那么充满反思：

> 我承认去年2月初去越南时，我是去寻找对美国利益有实质损害的内容的，而且我确实找到了，尽管往往是偶然发现或是在听取官员介绍情况时发现的。[61]

可惜麦卡锡的直言不讳却产生了对她不利的效果，因为如此坦率的表述让她看起来过于轻信北越人员的说辞了。另外，麦卡锡还被认为在事实问题上出现了疏忽。菲茨杰拉德在《纽约书评》上的评论文章中微

妙地提到了麦卡锡没能“像一位人种学家一样细致地观察自己的证据”。[62]无论是麦卡锡的还是桑塔格的作品在出版成书之后都没有获得什么成功。桑塔格后来提到这本书时似乎觉得很丢脸。她说：“我那时候真傻。”[63]

尽管如此，麦卡锡还是在桑塔格出版该作品时写信给她，有些迫切地想要强调她们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相似性。她这样写道：“你也感受到审视良心的需要这点很有趣，可能是女性的自负……”

> 你肯定会因为围绕苏珊·桑塔格下笔，而不是写那里的学校、医院等情况而受到责难。不过你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你比我更加正确的原因是你比我做得更彻底，你毫不掩饰“这本书就是关于我的”这件事。[64]

年长作家对于桑塔格逐渐成形的风格的评论可谓正中要害。十年前，年轻一些的桑塔格曾在笔记本中责备自己说：“我的‘我’弱小、谨慎、过于冷静。好的作家都是咆哮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是自大到愚蠢的人。”[65]关于河内的散文对于一个几乎都没用过第一人称写文章的人来说是一次尝试。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自信。即便是不喜欢她的批评家们，比如在评论文章的开头称桑塔格是“去年文学界的海报女郎”[66]的《纽约时报》作家赫伯特·米特冈（Herbert Mitgang）也不得不承认，她写出了一篇充满思想的文章。

就麦卡锡而言，她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她在给桑塔格的共三页的书信末尾一反常态地加了一段略显羞怯的附言：“我自以为是地假设你读过我的书了，万一你没读过的话，关于解决方法的内容在最后一章。”[67]这不是一封不友好的书信，不过其中却有某种淡淡的怀疑的语气，隐藏着一个没有问出口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写出相似的观点？

与此同时，桑塔格越来越为自己作为一位散文家的名气感到懊恼。1970年10月，她告诉自己的采访者说：“我已经不写散文了。”

> 对我来说那是过去的事了。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拍电影。仍然被认为是以写散文为主业对我来说在某些程度上是种负担。我相信诺曼·梅勒也不希望在《裸者与死者》出版二十年后，还只被人们看作这一本书的作者，毕竟他也做了许多别的事。这就好比如今还按照1943年的“弗兰基”（Frankie）的叫法来称呼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一样。[68]

但桑塔格也无法摆脱她已经树立的声望。她正在制作的那些电影遭到了批评家的狂轰滥炸。这些电影被描述为抽象的、无趣的。除此之外，更糟糕的是，这些电影让桑塔格陷入了财务困境。她本来就是在依靠有限的预算在海外工作，几乎没赚到任何钱。相反，她还欠了债。短短几年内，她就不得不放弃了。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到，因为这些电影引发的糟糕反响，她的自信遭受了严重打击。为了赚钱，她向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提交了出版计划，不过她计划的这些书最终并没有完成：比如其中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桑塔格告诉人们说它读起来就像汉娜·阿伦特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作品的混合。[69]

她还突然开始更自由地谈论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当第二波女权运动开始兴起时，桑塔格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开始不久。作为一项有组织的运动，女权主义在此前已经蛰伏了近四十年。历史学家们认为，妇女参政论者的能量已经被摩登女郎的鞋跟碾碎了。自从女性的投票权获得保障之后，年轻女性尤其难以再对她们的前辈进行的斗争产生共鸣。[70]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女性作家不会像如今的女性作家一样，几乎例行公事般地都要被问及她是否是“女权主义者”这个问题。帕克和韦斯特都曾对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表达过同情，但女权主义对于她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需要费心应对的问题。就麦卡锡和阿伦特而言，她们几乎没有以作家的身份加入任何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因为在她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女权运动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桑塔格开始成为美国最不容忽

视的女性知识分子时，女权运动正处于最激烈的高潮阶段，游行、集会和女子团体随处可见，纽约城中尤其如此。一个由批评家和记者埃伦·威利斯（Ellen Willis）等人组建的名为“纽约激进妇女（New York Radical Women）”的组织就在纽约发展壮大起来。激发自我意识的圈子非常盛行。渐渐地，随着关于这些情况的辩论成了媒体上的主要议题，人们自然希望桑塔格能够表露一下忠心。

纽约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项运动展现的能量和带来的混乱是感到不屑和厌烦的。他们无法理解这项运动，很可能还觉得这项运动很低俗。对此，桑塔格开始表现出一连串的逆向主义，这与那位她“从来不看重的作家”玛丽·麦卡锡不无相似之处。桑塔格比《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圈子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更加完全和自由地接受了这项运动。

桑塔格第一次作为一名女权主义游行参与者公开发表讲话是在1971年。她参加了在市政厅举行的针对诺曼·梅勒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轻蔑地谈论女权运动的文章而进行的女权主义集体讨论会。已经四十八岁的梅勒仍然像个小学生一样，试图通过侮辱女性来引起女性的注意。梅勒在这篇题目为《性别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Sex*）的文章中提及了不少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一边侮辱和轻视她们的想法，一边不忘贬低她们的个人魅力。他在行文中称著名女权主义评论家及充满辩论性的《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的作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为“愚蠢的女人”。还称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女律师贝拉·阿布朱格（Bella Abzug）是“母老虎（Battle-ax）”。[71]

当天晚上，桑塔格没有参加集体讨论，而是坐在了观众席中。她起身向梅勒提出了一个问题。“诺曼，即使是抱着最善良的初衷，女性依然会觉得你与她们交谈时表现得高高在上，”桑塔格带着清楚的权威，以一种平静的、让人无法不全神贯注地聆听的语气继续说道，“表现之一就是你会使用‘女士’这个词，我不喜欢被称为‘女士作家（lady

writer）’，诺曼。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样说很有绅士风度，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被称为女性作家（woman writer）会稍好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知道词语的选择是有重要意义的，咱们都是作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72]

后来，桑塔格接受了《服饰与美容》的长采访，她坚称在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中，自己切身感受到了歧视的影响。采访桑塔格的人试图说明在她向梅勒提问的那晚之前，她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像梅勒一样轻视女性知识分子的”。

>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认识的聪明人中至少有一半是女性。我对女性面对的问题充满同情，对女性的处境无比气愤。但是这种愤怒存在已久，所以我已经不会天天感觉到它。在我看来，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73]

好像是为了彻底表明观点，桑塔格立即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本是为当时刚刚创办的《女士》杂志（*Ms.*）写的，但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的新杂志认为桑塔格的文章说教性太强，所以它被转发给了《党派评论》的“男孩儿们”。他们给这篇文章取名为《女性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女性应该彻底地反抗父权制：“她们应该在街上对男人吹口哨，突袭美容院，围攻生产性玩具的玩具制造厂，大量转变为激进的女同性恋，提供女权主义者离婚咨询，建立化妆品回收中心，使用母亲的家族姓氏。”[74]然而桑塔格似乎在这一篇文章中用尽了全部的热情；它成了桑塔格所有知性文章中唯一彻底、直接论述女权主义的一篇。

让桑塔格一直坚持创作的散文主题是1972年她在与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共进午餐时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当时她刚刚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看过黛安·阿勃斯（Diane

Arbus）的摄影展。那些照片让桑塔格心潮澎湃，于是爱泼斯坦建议她为《纽约书评》写一篇关于这个摄影展的文章。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桑塔格共写了六篇，这些文章最终被收录在一起，以《论摄影》（*On Photography*）的名字被出版成书。

一位评论家认为《论摄影》这本书其实应该取名为“反对摄影（*Against Photography*）”，因为有时桑塔格似乎是在质疑摄影这种实践本身。桑塔格在写到照片时说：“它们是关于看的法则，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关于看的道德规范。”[75]桑塔格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往往找不到太多值得推荐的东西。她评论说照片经常被当作表现现实的东西，然而它们被呈现的方式中总是存在一些隐藏的动机。拍摄照片的普遍流行也受到了她的批评：“拍照片是一种证明体验的方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排除体验的方式——因为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照片效果而限制了体验本身，体验的经历被转化成了一张图片，一个纪念品。”[76]

为了确保稳定的收入，桑塔格还开始定期为《服饰与美容》撰写文章，不过这些文章都是她绝对不会收录到自己今后的文集中的。1975年，她与当时二十三岁的戴维·里夫（David Rieff）合著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为读者提供“如何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建议，比如：“假装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死去，假装我们遭受的痛苦都是没有用处的，或者假装我们差不多总是心存恐惧。”[77]另一篇文章，《女人的美貌：是被轻视的理由还是力量的源泉？》（*A Woman’s Beauty：Put-Down or Power Source*？）竟然是在敦促美国最受欢迎的时尚杂志的读者们思考“女性被教导要注重外表的方式鼓励了自恋情节，强化了依赖性和不成熟”的问题。她继续说道：

> 被大多数女性接受的关于她们性别的讨人喜欢的理想状态其实是一种让女性对自己实际的样子，或她们通常会成为的样子感到自惭形秽的手段。因为美的理想被用作了一种自我压迫的方式。[78]

每当她的女权主义原则受到挑战时，桑塔格就会以十倍的热情反击敢于挑战它们的人，这成了她的一个习惯。诗人艾德丽安·里奇就是与她发生过论战的人之一。里奇与女权运动的牵涉很深，她在读1975年2月那期《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桑塔格写的关于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文章《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时注意到，桑塔格宣称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能够参加很多电影节是因为“不得不牺牲一个能够拍出被所有人视为一流作品的电影的女人会让女权主义者感到极度痛苦”。[79]于是里奇给杂志去信质疑为什么女权主义者成了被指责的对象。

桑塔格显然是将里奇的“浮夸的、吹毛求疵的来信”视为一种明白的侮辱，所以她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回应文章。她指出，自己的文章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女权主义，而是关于法西斯美学的。里奇非要单独挑出令自己困扰的部分横加指责这件事恰恰代表了女权运动中存在的让桑塔格感到憎恶的愚钝思想。“如所有最根本的道德真理一样，女权主义也有一点头脑简单。”桑塔格如此争辩道。

这两个人之后会通过书信往来重归于好，她们都同意双方具有一些值得探索的共同点。里奇在给桑塔格的书信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对你的思想很感兴趣，尽管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往往截然不同。”不过桑塔格会发现，那以后她不得不在采访中为自己与里奇的争论作出辩解。大多数人似乎都把那次争论看作认定桑塔格反对女权主义的确凿证据。尽管她写过关于性别政治和女权主义的文章，但人们的观点始终不曾动摇。忍无可忍的桑塔格干脆开始对采访者发脾气了，她对其中之一说道：“鉴于我也是女权主义者，这次事件根本不应该被描述为我和‘她们’之间的不和。”[80]

但是到1975年秋天，当桑塔格被确诊患有乳腺癌之后，其他事都被搁置了。她的医生告诉戴维·里夫说她活不了多久了，因为她的肿瘤已

经进入第四阶段。虽然没有人直接告诉桑塔格她快死了，但她似乎知道自己面临的风险。她选择了激进的乳房切除术，希望通过去除必要组织以外的其他部分来增加她活下去的概率。这个方法奏效了。她的癌症进入了缓解阶段。但是这种经历彻底改变了她。她写道，这种治疗方法让她觉得无比震惊、疲惫不堪，就好像她打了一场一个人的越南战争。

> 我的身体受到入侵，被殖民化了。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我必须打起精神。[81]

当时她觉得自己被“抹平了”，她还注意到自己变得“弄不懂自己了”。[82]她还担心是她对自己的压制——比如对她对母亲的愤怒的压制，对自己的女同性恋倾向的压制，对艺术的绝望感觉的压制——实际上导致了她的癌症。她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当她从疾病中走出来时，她感觉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完全摆脱那些情绪。

净化心灵的过程就是创作《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的过程。这篇长散文于1975年以书的形式被出版，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本回忆录。桑塔格完全抽象地讨论了人性将结核病和癌症美学化的方式，关于她自己的治疗方法或任何来自医生的劝慰或残忍宣告等个人经历则没有被具体提及。但是如果有人问她，她会很清楚她表明她将这里的文字视为一种心灵的呼喊：

> 我没有丝毫超脱的感觉。这是一本我在心中充满狂怒、恐惧、痛苦、惊骇和义愤的时候写出的书——是在我病重的时候，在治疗效果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写出的书……但我没有因为患上癌症而变成白痴。[83]

《疾病的隐喻》成了桑塔格直抒胸臆的载体。桑塔格主要的不满在于小说家和作家们在用疾病做隐喻时往往倾向于指责病人本身，桑塔格卧病在床时也曾短暂地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责备。但是最终她把自己的愤怒指向了诺曼·梅勒这样的“癌症恐惧症患者”[84]。后者最近解释说，如果他没有刺伤他的妻子（并表现出“一种凶残的感觉”），那么他可能就

会患上癌症，“过不了几年就死了”。她还写到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妹妹艾丽斯·詹姆斯（Alice James）在很久以前因患乳腺癌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事。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虽然桑塔格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但她的文字显然是私人的，她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纽约时报》的图书批评家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在内的许多评论家批评桑塔格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癌症比喻美国的状况。（别忘了：桑塔格在1967年时就曾称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毒瘤”。）但是他们都看到了她的愤怒让她的文字更加鲜活，就算对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持保留意见，他们也都被它征服了。爱尔兰批评家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

> 我认为《疾病的隐喻》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我已经读过三遍了，但我仍然认为她的指责是没有依据的。但是这本书对人们持有的态度的一些看法非常有洞察力：例如，我们是如何看待精神错乱或心脏病的。[85]

多诺霍还说，他认为桑塔格的风格很直率，对她来说“写作就是战斗”。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批评。但考虑到桑塔格的出身，考虑到她的思维风格和超然的敏感，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仍然不能用第一人称写作。但是她能够感到气愤了。而且人们听到了她对这种非常恐怖和危险的人生经历的记录，尽管她的声音是被隐藏在一层又一层的思考背后，也被隐藏在她对所有可能直到被她提及才为人们所知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引用背后。

《疾病的隐喻》的严肃风格与桑塔格一直想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然而人们提到她时总会想起《关于“坎普”的札记》，而《关于“坎普”的札记》会将她的名字与流行文化结合在一起。她并不喜欢这个情况。桑塔格的朋友特丽·卡斯尔讲过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她与桑塔格一起参加一个聚会时，一位客人不幸地告诉桑塔格他喜欢那篇文章。

> 桑塔格气得鼻翼翕动，她立即用蛇怪一般的目光盯着他。他怎么会说出这么蠢的话呢？她没有兴趣讨论那篇文章，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他绝对不应该提起它。他太落伍了，他在知识层面上已经死了。他没有读过她的其他作品吗？他不懂得与时俱进吗？我们其余的人都吓得一动不动，眼看着桑塔格落入一个黑暗的愤怒隧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她的情绪。[86]

因为与《关于“坎普”的札记》剪不断的联系而感到沮丧的部分原因是桑塔格想要摆脱她年轻时创作的作品。另外，她显然也对人们阅读那些文章的方式感到非常不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她目睹了人们对流行文化的知性趣味的激增，而高雅艺术则陷入了挣扎困境。她觉得自己应当负些责任，但这当然不全是她的错。她在倡导流行文化的旅途中曾经有过同行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电影批评家宝琳·凯尔。

---

[1] Daniel Stern，“Life Becomes a Dream，”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8，1963.

[2] *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ed. David Rieff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2），237.

[3] 1963年8月20日，汉娜·阿伦特写给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的书信，转引自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orton，2000），73。

[4] 1967年12月19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

[5] Susan Sontag，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37。

[6] Morris Dickstein，转引自Sheelah Kolhatkar，“Notes on Camp Sontag，” *New York Observer*，January 10，2005。

[7] As Consciousness，8.

[8] 关于这件轶事可见于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38。

[9] As Consciousness，10.

[10] 1964年8月11日，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11] “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 *Atlantic Monthly*，April 1973.

[12] *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8），5.

[13] “Pilgrimage，” *New Yorker*，December 21，1987.

[14] 参见Daniel Schreiber，*Susan Sontag*：*A Biography*（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22。

[15] Georg Friedrich Händel，巴洛克音乐作曲家，创作作品类型有歌剧、颂歌及管风琴协奏曲，著名作品为《弥赛亚》。

[16] Terry Castle，“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March 17，2005.

[17] “Susan Sontag，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 接受Edward Hirsch采访，*Paris Review*，Winter 1995。

[18] 《夜林》是最早明确描绘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情的著名小说之一。该书还以其强烈的哥特式散文风格而引人注意。小说采取了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包括不同寻常的形式和叙述方法，因此也被视为超小说。

[19] 2015年11月30日，哈丽雅特·索默斯·兹韦林（Harriet Sohmers Zwerling）接受采访，可见于http：//lastbohemians.blogspot.com/2015/11/harriet-sohmers-zwerling-ex-nude-model.html。

[20] *Reborn*，28.

[21] “Susan Sontag，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

[22] Wilhelm Stekel，*The Homosexual Neurosis*（Gotham Press，1922），11.

[23] 苏珊·桑塔格写给“Merrill”的书信，日期不详，不过这封信被发现时夹在记录1950年3月23日内容的那一页，转引自Alice Kaplan，*Dreaming in French*：*The*

Paris Years of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Susan Sontag，and Angela Dav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24] *Reborn*，60.

[25] *As Consciousness*，362.

[26] *Reborn*，79.

[27] *Reborn*，138.

[28] Joan Acocella，“The Hunger Artist，” *New Yorker*，March 6，2000.

[29] *In America*（Picador，1991），24.

[30] Interview with Marithelma Costa and Adelaide López，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ed. Leland A. Pogu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1995），227.

[31] Sigrid Nunez，*Sempre Susan*：*A Memoir*（Atlas，2011），87.

[32] Donald Phelps，“Form as Hero，” *New Leader*，October 28，1963.

[33] “The Art of Fiction No. 143：Susan Sontag.”

[34] Ellen Hopkins，“Susan Sontag Lightens Up，”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16，1992.

[35] “Notes on ‘Camp，’” *Partisan Review*，September 1964.

[36] “Not Good Taste，Not Bad Taste—It’s ‘Camp，’” *New York Times*，March 21，1965.

[37] 1965年4月9日，菲利普·拉夫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in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38] “Notes on ‘Camp.’”

[39] 参见Terry Castle，“Some Notes on Notes on Camp，” in *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ed. Barbara Ching and Jennifer A. Wagner-Lawlo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21。

[40] “Against Interpretation，” *Evergreen Review*，December 1964.

[41] “Sontag and Son，” *Vogue*，June 1966.

[42] Kevin Kelly，“‘A’ for Promise，‘F’ for Practice，” *Boston Globe*，January 30，1966.

[43] Geoffrey A. Wolff，“Hooray for What Is There and Never Mind Reality，”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5，1966.

[44] 大约1969年秋季接受Camera Three节目采访，可见于https：//vimeo.com/111098095。

[45] 即认为媒介的传播特征比其传播的信息内容更能影响和控制社会。

[46] 1966年11月22日，Lila Karpf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此处疑有误，应为苏珊·桑塔格写给Lila Karpf的书信。）转引自Schreiber，*Susan Sontag*，133。

[47] 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1938年7月20日～1981年11月29日），美国女演员，出演过《西区故事》《天涯何处觅知音》《无因的反叛》等，曾三次获得奥斯卡提名。

[48] Robert Phelps，“Self-Education of a Brilliant Highbrow，” *Life*，January 1，1966.

[49] Gore Vidal，“The Writer as Cannibal，” *Chicago Tribune*，August 10，1967.

[50] Beatrice Berg，“Susan Sontag，Intellectuals’ Darling，” *Washington Post*，January 8，1967.

[51] Carolyn Heilbrun，“Speaking of Susan Sontag，” *New York Times*，August 27，1967.

[52] James Toback，“Whatever You’d Like Susan Sontag to Think，She Doesn’t，” *Esquire*，July 1968.

[53] Howard Junker，“Will This Finally Be Philip Roth’s Year？” *New York*，January 13，1969.

[54] 1969年1月10日，菲利普·罗斯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见于Susan Sontag

Archive at UCLA。

[55] “What’s Happening in America：A Symposium，” *Partisan Review*，Winter 1967.

[56] William F. Buckley，“Don’t Forget—‘Hate America’ Seems to Be the New Liberal Slogan，” *Los Angeles*，March 20，1967.

[57] Lewis S. Feuer，“The Elite of the Alienated，” *New York Times*，March 26，1967.

[58] “Trip to Hanoi，” *Esquire*，February 1978.（此处疑有误，应为1968年）

[59] Frances FitzGerald，“A Nice Place to Visi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13，1969.

[60] *Trip to Hanoi*（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69），87.

[61] Mary McCarthy，“Report from Vietnam I：The Home Progra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pril 20，1967.

[62] FitzGerald，“A Nice Place to Visit.”

[63] Susan Sontag，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94。

[64] 1968年12月1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in Susan Sontag Archives at UCLA。

[65] *Reborn*，168.

[66] Herbert Mitgang，“Victory in the Ashes of Vietnam，” *New York Times*，February 4，1969.

[67] 1968年12月1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in Susan Sontag Archives at UCLA。

[68] Leticia Kent，“What Makes Susan Sontag Make Movies？”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1970.

[69] *As Consciousness*，340.

[70] 关于这种情况及其在女权主义中作为一种周期性现象反复发生的全面的叙述，参见，例如：Susan Faludi，“American Electra，” *Harper’s*，October 2010。

[71] Norman Mailer，“The Prisoner of Sex，” *Harper’s*，March 1971.

[72] 参见*Town Bloody Hall*（1979） dir. D. A. Pennebaker and Chris Hegedus。

[73] Leticia Kent，“Susan Sontag Speaks Up，” *Vogue*，August 1971.

[74]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Partisan Review*，Spring 1973.

[75] *On Photography*（Dell，1978），3.

[76] *On Photography*（Dell，1978），9.

[77] “How to Be an Optimist，” *Vogue*，January 1975.

[78] “A Woman’s Beauty：Put-Down or Power Source？，” *Vogue*，April 1975.

[79] “Fascinating Fasc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6，1975.

[80] 1977年接受Performing Arts Journal采访，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ed. Leland Pogu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84。

[81] 出自David Rieff，*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Simon and Schuster，2008），35。里夫没有将这篇日记的内容收录到*As Consciousness*中。

[82] 出自David Rieff，*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Simon and Schuster，2008），35。里夫没有将这篇日记的内容收录到*As Consciousness*中。

[83] 1980年接受Wendy Lesser采访，in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197。

[84] *Illness as Metaphor*（Vintage，1979），22.

[85] Denis Donoghue，“Disease Should Be Itself，” *New York Times*，July 16，1978.

[86] Castle，“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第九章 凯尔

1963年8月，当《纽约书评》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联系上宝琳·凯尔时，后者已经等待一个突破的机会很久了。西尔弗斯在最后时刻才询问凯尔是否愿意为自己的杂志写一篇书评。[1]她要评论的书正是玛丽·麦卡锡的《她们》。

凯尔只比麦卡锡小七岁，而且一直对麦卡锡崇拜有加。《她选择的伴侣》问世时，凯尔才二十三岁——正是理解书中那种性坦白的完美年龄。到《她们》出版时，凯尔早就是一位麦卡锡一样眼光敏锐的电影批评家了，但她一直没有获得什么广泛的成功和主流的认可。如今四十四岁的凯尔显然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在东海岸知识分子圈子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获得一席之地。到此时为止，她似乎做什么都不能一帆风顺。

这就是为什么当西尔弗斯在1963年打电话来约稿的时候，凯尔立即就答应了。前者只想要一千五百字的内容，而且要得很急，不过凯尔认为自己可以完成任务。唯一的问题是她并不特别喜欢《她们》这本书。《她选择的伴侣》中拥有的那种深深吸引着她的智慧在这本书中荡然无存。凯尔在这份书评的草稿中写道：

> 这个群体里的姑娘们冷漠、好算计，同时又不理性、无防备心和笨拙无能，完全像是一个反对女权主义的男性作者写出来的人物一样。那些想要相信用脑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的不好，说这不适合她的“生活”，会让她混乱，或让她变得尖酸刻薄、脾气不好的人（过去玛丽·麦卡锡就经常被说成是这样），如今在玛丽·麦卡锡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证明他们观点的依据。[2]

凯尔到此时已经知道“用脑子”可以给一个女人带来什么结果了。她自己就总被指责为“尖酸刻薄、脾气不好”。实际上，1963年新年当天，她在伯克利的KPFA电台做广播节目时还宣读了一份听众投诉信，信中的开头是这样的：“凯尔女士，我认定你还未婚，因为当一个人学会关心他人时，她的声音里就不会带着那种难听的尖刻了。”凯尔像摆好完美进攻姿势、期待着冲向猎物的捕食者一样朗读了这封信，然后作出了猛烈的回击：

> 关于这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我想知道，在你令人安心的、受人保护的已婚状态下，你是否考虑过关心他人也可能会让声音变得尖刻？我还想知道你是否考虑过一位女性生活在这个时代中有多艰难。这个所谓的弗洛伊德化的时代对待女性的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没有任何不同。只要女性表现出任何智慧，她们就要被指责为显露了不正常的侵略性，具有充满仇恨的报复心理，或被认定为女同性恋者。最后一种指责通常是那些在辩论中处于下风的男人们提出来的；他们喜欢安慰自己说这个女人是半男性化的。[3]

这里表露的显而易见的挫败感源于凯尔的个人经历，而不是政治信念本身。凯尔并不像桑塔格那样，被每个读过她文章的人立即认定为奇才。相反，凯尔是一个想要什么都得靠奋斗的人。她好斗的性格并不总能获得旁观者的接受，虽然这让她感到愤怒，但她依然不愿意改变自己以满足旁人要求她变成“关心他人”的人或别的什么样子的期望。很明显，她希望她出色的工作就足够证明一切，就像一个处在她职位上的男人唯一需要做到的那样。

在她生命的前半段时间里，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足够。凯尔曾经出色到似乎足以让除了亲密朋友之外的所有人都对她敬而远之，这一点上她与阿伦特很相像。凯尔不擅长培养人际关系，而且一直在为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而苦苦挣扎。实际上，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她依然是靠比她年轻的桑塔格的帮助才终于引起了那些占满《纽约书评》版面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在《她们》出版几个月之前，桑塔格不知在哪里和凯尔见

过面。年轻一些的桑塔格显然对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印象深刻。所以得知哈德威克和西尔弗斯想要找人给《她们》写书评后，桑塔格就向他们推荐了凯尔。最初接到那个电话时，凯尔肯定非常感激桑塔格：就玛丽·麦卡锡的本行评价她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篇文章被接受，那么凯尔就终于有机会进入她认为自己理应跻身的行列了。

凯尔的奋斗路程很漫长。1919年，她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佩塔卢马（Petaluma）的一个家禽养殖场中。她的父母是纽约的犹太人，他们搬到这片区域，谋求加入某种进步的农业公社。到凯尔出生时，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要养活了。她谈到在那个农场上的童年生活时总是把它说得像田园诗一般美好，或者至少是任何有干不完的家务和婚姻受不稳定财务状况和不忠行为困扰的父母的农民家的孩子能拥有的最美好的生活。不过凯尔一家在佩塔卢马只待到了1927年。当时艾萨克·凯尔（Isaac Kael）在股市崩盘中失去了所有的钱财，于是他们一家去了旧金山，他尝试寻找更稳定的工作，但大多数时候都以失败告终。

高中时的凯尔已经开始显露出天赋。她是一名好学生，在学校管弦乐队中演奏小提琴，还加入了辩论队。像桑塔格一样，她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哲学。但与桑塔格不同，凯尔没有立即离开加州。她热爱加州。在后来评论《赫德》（*Hud*，又译《原野铁汉》）这部电影时，她狂热地谈到了童年时期自己家中存在的不自觉的平等主义。她写道：“与墨西哥人及印第安人农场雇工一起吃饭并不是出于某种纡尊降贵的歉疚感，那就是西部人的生活方式。”[4]再说旧金山也是个世界性大都市，足以满足她对艺术的偏好；这里有那么多电影院，那么多艺术家，那么多爵士乐俱乐部。大学毕业后，她和自己的朋友，诗人罗伯特·霍兰（Robert Horan）一起，在这个城市中的波希米亚圈子里逛了个遍，他们一起梦想，一起参加各种项目。霍兰是一位同性恋者，凯尔知道这一点。根据她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凯洛（Brian Kellow）的说法，尽管这两个人曾经一度是恋人关系，但霍兰会受男性吸引这件事根

本不曾令凯尔感到困扰。

1941年11月，霍兰和凯尔一起遵循有抱负的艺术家们长久坚持的传统前往了纽约：这些身无分文的搭便车者都抱着等自己抵达目的地后就能够以某种方式养活自己的希望。然而现实却是他们食不果腹，不得不在大中央车站遮风避雨。霍兰去找工作时很快就被一对在街上被他迷住的同性恋伴侣收留了。但是凯尔并不被包括在他们的安排中，突然之间，她被丢在一边自谋生路了。霍兰的注意力很快就全部转移到他的新恩人身上了。在这件事之后，凯尔很难相信纽约愿意接受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最初那些年里，她不得不依靠担任家庭教师和出版社文员来谋生，因为她发表自己作品的努力都遭遇了阻碍。她近距离地观察着纽约的知识分子们，尤其看重一份由麦卡锡和阿伦特的朋友，德怀特·麦克唐纳创办的名为《政治》（*Politics*）的报纸。不过凯尔一直无法取得突破。她指责纽约，指责这个氛围。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个地方充满了‘有前途的’年轻诗人，他们现在已经三十五或四十岁了，但他们写出的东西还和他们十五年前写出的一样，甚至更糟。”[5]1945年时，凯尔终于放弃纽约，回到了旧金山。

回到家乡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奇异环境中，凯尔遇到了一位名叫詹姆斯·布劳顿（James Broughton）的诗人兼实验电影制作人。他经常解释说因为自己一生都在从傲慢专横的母亲的影响中恢复，所以他更倾向于短暂的恋爱关系而不是承诺白头偕老。他拍摄过一些短小的实验电影项目，如1948年拍摄的《母亲节》（*Mother’s Day*），影片内容是一个赤裸的金发小孩儿在到处乱跑，同时能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会儿夸奖他，一会儿责骂他。凯尔搬到布劳顿的住处和他同居了不长的时间。在她怀孕之后，布劳顿把她赶了出去，且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1948年9月吉娜·詹姆斯（Gina James）出生时，凯尔没有把布劳顿的名字写在她

的出生证明上。

孩子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多改变，吉娜也改变了凯尔的生活。这意味着凯尔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但她很快就不得不改为从事自由职业，因为如果她出门上班，就没有人照看孩子了。于是凯尔写书评，尝试写舞台剧剧本。她还对一个电影剧本进行了润色，但并没有被采用。最终她谈妥了唯一一个适合的机会。她在一家咖啡馆约见了一位男士，后者想要在自己新创办的名为《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小规模电影杂志上刊登一篇关于电影《舞台春秋》（*Limelight*）的评论。［这名男子就是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他后来会在旧金山创建城市之光书店。］这部1952年10月上映的电影是为已经上了年纪，需要使用替身的查理·卓别林量身打造的一部电影，不过凯尔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查理·卓别林任何作品。

尽管如此，凯尔还是写了评论，因为她想谈论的是这位演员本身。凯尔写道：“《舞台春秋》中的卓别林不再是一个无礼的小丑；他对自己的想法的崇敬太令人震惊，就算这些想法真的值得考虑也略显过度，更何况它们并没有价值——电影的内容时时刻刻暴露着这样的现实。”[6]凯尔还称卓别林是“星期日思想家”，他完全符合苏格拉底对艺术家的评价：“凭借他们的诗歌的力量，这些人相信自己在其他他们不了解的问题上也是最聪明的人。”

这就是宝琳·凯尔撰写的第一篇影评，它被刊登在《城市之光》1953年冬季刊上。这篇影评揭示了凯尔的一些特点。其一，她把电影看作比单纯的美学体验更广大的东西。尽管在她后来的人生中，凯尔是作为电影流行品味和感性反应的捍卫者而为人所知的，但她也对这些东西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关于它们所代表的想法的质量如何，以及它们怎么融入美国文化和知性生活这个更复杂的谜题。其二，凯尔具有充沛的活力，这种活力最终将成为她的标志。她不是一个过多使用第一人称写

作的批评家，偶尔会穿插一些“我”的趣闻，但大多数情况下，她的个性体现在分析、探究和寻找线索的活力中。其三，尽管她对普通观众很感兴趣，但她永远不会怯于痛批流行现象。当时的卓别林可能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尾声，面容干瘪、头发灰白，但他毕竟是查理·卓别林，是整个美国的小流浪汉。不过凯尔相信，批评家的角色就是要严厉抵制名望的影响。这一点并没能让她受到欢迎。

在她第一次去纽约时，起初她对人们的穿衣打扮和严肃举止印象深刻。她曾经告诉一位采访者：“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认为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是因为堕落了才写出那么沉闷的东西。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写不出更好的东西了。”[7]可是关于《舞台春秋》的评论被发表之后，一直向凯尔关闭着的纽约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尽管只是开了一道小缝。突然之间，她收到了《党派评论》的编辑菲利普·拉夫的热烈回应，虽然他仍觉得她有些作品篇幅太长。身在伯克利的凯尔还从自己的朋友，诗人韦尔登·基斯（Weldon Kees）那里接过了KPFA电台的电影评论家职位。起初，基斯只是邀请凯尔做嘉宾。在广播开始之后，他有时会说：“宝琳，让我们先说点儿积极的。”[8]但是到了1955年，基斯自杀了，于是电台邀请凯尔接替他的位置。做这份工作挣不到什么钱，但她还是接受了，并发展出了一批忠实听众。凯尔总是迎着潮流逆势而行，也总是很有系统性。与她之前的韦斯特和麦卡锡一样，凯尔有时也喜欢直接瞄准其他批评家的关注点进行攻击：

> 我想谈谈这个国家的电影批评的崩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针对观众或电影制作人的充满智慧的指南，也没有人能解答为什么我们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制作出来的只是一团废纸，而不是电影。[9]

凯尔的听众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兰德伯格（Edward Landberg）的男子，他在伯克利经营一家名为影院协会（Cinema-Guild）的小型电影院。他是一个略微有些古怪的男人，拥有还在心理健康范围之内的强烈

的自尊心和对自己品味的固执坚持。他在电报大道（Telegraph Avenue）上的影院店面不大，能容纳观众数量不多，而且他只放映他个人喜欢的电影。他给电台打电话说自己喜欢凯尔的节目。之后他们开始约会，没过多久，两人就在1955年12月结婚了。很难说这段婚姻中有多少爱情的成分，但它显然是两个一心致力于电影的人的联盟。

在他们结婚之前，凯尔基本上就已经在和兰德伯格一起经营他的电影院了。她开始密切参与放映内容的排期工作，但她的一项重大创新还要算在影院沿街散发的宣传广告上增加对电影的批评内容，以此吸引更多顾客的做法。虽然这些传单本身是营销宣传材料，但凯尔从不惧怕用它们来向热门电影开炮。在描述《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时，她写道："威尔斯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所有事'的叙事方式戏弄了电影手段，又用深刻的主题嘲笑了被回顾的内容。"[10]这种对电影的有力度的总结在电影票的销售上发挥了促进作用，哪怕是嘲讽这些电影的评论也同样有帮助。在凯尔的努力下，影院协会变得非常受欢迎，还增设了第二块银幕。

然而这段婚姻注定不会持久。兰德伯格讨厌妻子的固执。毫无疑问，凯尔对丈夫也有同感。兰德伯格告诉一位纪录片制作人说让他们最终走上离婚道路的原因是凯尔对电影宣传单上的内容主张著作权。1960年10月，兰德伯格解雇了凯尔，她失去了自己拥有过的唯一一份成功的工作。凯尔对此的反应很激烈。首先，她从影院协会的常规通信名单中收集了七千个收信人，并在她制作的宣传广告版本中加入了一封辞职信：

> 五年半以来，我编写了这些传单，设计了版面，并通过电话与你们之中的数千人交谈。我认为影院协会和工作室（the Cinema Guild and Studio）是这个国家里唯一一家以个人品味和判断为决定因素来选择放映影片的影院——这个个人指的就是作者我本人。我很遗憾地宣布，出于与影院所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我已无法继续我的工作：这将是由我执笔的最后

一期内容。[11]

兰德伯格在发出这一期宣传广告时将辞职信的内容涂黑了。凯尔随后起诉兰德伯格，要求对方支付59000美元的欠付工资和利润。[12]她还指控兰德伯格挪用公款用于个人开支。最终凯尔败诉，兰德伯格保住了影院协会的所有权，凯尔则再次失去了收入来源。

不过此时的凯尔至少开始有途径发表批评文章了。在与兰德伯格结婚后，凯尔写出了她最早的杰出作品之一。这篇名为《影院观众的幻想》（*Fantasies of the Art House Audience*）的散文是给《画面与音响》（*Sight and Sound*）写的。这是凯尔第一次将她作为批评家所拥有的最深刻的洞察力清晰地表达出来。简而言之，她相信那些对流行电影避而远之，坚持观看外国电影，认为自己这样是看到了更高级、更优秀的艺术的人都是满口胡言。而且她毫不畏惧地拿这些人的心头好开了刀，苏珊·桑塔格非常喜欢的外国电影《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就是其中之一。

凯尔对这个电影的意见主要是针对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撰写的台词的，她觉得其中有很多重复，而且太多都是关于电影中的女性角色的感受：

> 它越来越像精神和性的更高层次交融版本的《真情告白》（*True Confession*）；我觉得我们所有人从这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闭嘴。电影中的这个女人［尽管埃玛努埃尔·里瓦（Emmanuelle Riva）对她的诠释非常优美］犯了智慧的现代女性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她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说了出来——好像床是展示感性的地方似的。不幸的是，人们认为关于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真心话和秘密，或者说是我们在看起来很有同情心的人面前全盘托出的真实想法，其实很可能是我们平常足够理智的时候会将其忘个一干二净的废话。我们隐瞒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认为人们不会接受那个邋遢的样子——怎么会有人想要看那些呢？[13]

这是一个并非特意显露的观点。艺术中的情感表达曾经是，现在也

是一个人们一直争论的问题，因为就像凯尔在这里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似乎是依照性别区分的。在女性作家中，由此产生的分歧由来已久。有些人一直坚持认为对每一个缺陷和每一种情感的彻底坦白是唯一诚实的写作方式；与凯尔相似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样做会强化人们持有的对女性的糟糕刻板印象，还让她们最差的品质有了像智慧的人一样发声的机会。不过，就这段话最后的那句坚持认为一个人的内在自我是邋遢的，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想要了解的残酷评论来说，凯尔肯定不只是在谈论艺术或《广岛之恋》或玛格丽特·杜拉斯。这绝对是一个如此看待自己的人才会作出的陈述。

她所有猛烈的批评都清楚地表明，凯尔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多愁善感的人。她可不想在死后被某个只会坐在扶手椅里夸夸其谈的精神分析专家美化。她讨厌感伤。但是这种对自己冷酷无情的奇怪感觉有时也会出现在遇到令她沮丧的对手时。她希望与线性思维的思想家打交道，他们要清楚和直接；那些不这么思考的人会让她抓狂。她似乎是专挑那些她认为需要补充足够的常识的作家作对。

然而，凯尔也鄙视“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因为他们不能像其他“短视”的人一样清楚地分析眼前的问题。这似乎形成了某种悖论。例如在一篇1962年为《画面与音响》创作的名为《电影批评有救吗？》（*Is There a Cure for Film Criticism*？）的文章中，她痛批了曾就电影的本质撰写过晦涩的长论文的德国理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她无法忍受这种理论，甚至认为对这种理论的尊重会在整体上毒害电影写作：

> 在任何艺术中，都存在着将自己的偏好转变为一种偏执的理论的倾向；在电影批评中，一位理论家越是混乱，越是固执己见，越是执着（于站不住脚的命题），他反而越有可能被认为是严肃的，重要的和“深刻的”——相比之下，有很好的辨识力的轻松的人们对电影的多元化理解则会被认定为不够根本。[14]

她把克拉考尔比作无趣的追求者，他的爱意对他爱的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她写道，如果克拉考尔对“电影”的理解是对的，那么她打算甩掉他。这样的批评还只是凯尔的热身运动，接下来她将对一位名叫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的批评家新人作出更猛烈的抨击。后者在《电影文化》（*Film Culture*）的1962～1963年冬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电影作者论的笔记》（*Notes on the Auteur Theory*）的文章。凯尔认为该文章荒谬至极，所以她立即写了一篇强力反驳的文章《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Circles and Squares*）。

这场著名的论争中的一个讽刺之处是，萨里斯并不是发明他的那篇不长的文章中提出的理论的人。电影作者论是由法国人提出的，他们或多或少也是发明了电影批评的人。简而言之，该理论认为电影导演具有一种可被识别的风格，这种风格即使是在一部好莱坞商业片中也应当可以被确认和分析。从其最简单的形式上说，这个理论几乎是无法让人提出异议的，就连凯尔也不是完全不认可它。她也倾向于谈论导演对最终制作完成的电影拥有很高程度的控制，这是她对从查理·卓别林到布赖恩·德·帕尔马（Brian De Palma）的所有人的作品持有的一种假设。但让她觉得愚蠢和自负的地方是，萨里斯把这个理论发展成了一个系统，一种让她厌恶的单调乏味、过分坚决地评估艺术的方法。

萨里斯在很大程度上为凯尔打开了驳斥他的大门，因为他试图明确地界定电影作者分析的前提，这种抽象的概括听起来确实相当引人质疑：“电影作者论的第二个前提是作为对价值的衡量标准的导演本人的与众不同的个性。”[15]凯尔抓住这个明显的薄弱论点不放，她带着一种直截了当的语气写道：“臭鼬的臭味比玫瑰的香味更与众不同；所以臭味比香味更好吗？”[16]这将成为凯尔最喜欢的技巧，她总是让自己比她讨厌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批评家们表现得更合情理。如果一句尖锐的评论能够达到目的，她绝不会写一长段啰唆的废话。

凯尔也不害怕利用某些作家深藏不露的性别歧视思想来反击他们。萨里斯的散文中模糊地作出了一个与这里要论述的问题不怎么相关的使用“本质上女性化的叙事手法”的评价。凯尔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的结尾处利用一种修辞上的猛击将“女性化”和“男性化”技巧的理念回敬给了萨里斯：

> 电影作者批评家们如此着迷于他们自恋的男性幻想……以至于他们似乎无法放弃他们对人类经历的小学生一般的看法。（是不是有女性的电影作者批评家存在我不知道，反正我还没见过。）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英国和美国，电影作者论是成年男性用来为停留在他们童年和青春期的小范围经验中提供正当理由的？那段时期中，男性气质看起来如此伟大和重要，而艺术则是装腔作势者、虚伪的人和像女性一样敏感的人才讨论的东西。他们把毫无价值的作品当作真正的电影艺术，这或许就是他们评价我们的文明的方式？我要问；我不知道。

萨里斯的反应就像一个受到训斥的孩子：他在余生中一直都在抱怨这些评论多么不公。他对她的传记作者说：“宝琳表现得好像我是美国批评界的巨大威胁。”[17]但他当时的感觉是，人们很少读他的作品，他也没有获得什么报酬，所以他受到的攻击与他的影响力完全不相称。［他在《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的批评家职位是后来才获得的。］让他更加困惑的是，尽管《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把萨里斯的观点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凯尔对于萨里斯本人并没有什么怨怒。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会经常说自己发现萨里斯的某些作品很有见地。实际上，当凯尔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发表后的第二年来到纽约时，她还给萨里斯打了电话，并邀请他一起吃饭。

萨里斯讲这个故事时讲出了几个不同版本——他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件事——但我们起码可以确定，他为接到这个电话而觉得惊讶。他抱怨凯尔认定他是同性恋［萨里斯后来娶了莫莉·哈斯克尔（Molly Haskell）］。一开始，居住在皇后区另一端的萨里斯支支吾吾地表示去曼哈顿太麻烦。凯尔回答说：“有什么问题？是你的爱人不让你离开

吗？”[18]萨里斯还明确表示，自己觉得凯尔严厉粗野，咄咄逼人，按照他自己的标准衡量，她太过热衷谈论性爱的话题了。此后他们似乎没有再聚过。

关于二人之间这场小争执的有趣之处在于，尽管如今的人们普遍认为它曾引起电影界的注意长达数月之久，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热闹。主流媒体肯定不会报道这次争论，就连各个电影期刊似乎也没有特别广泛地关注这件事。其他男性显然会觉得自己成了凯尔文章最后一段影射的目标——主要是英国杂志《电影》（*Movie*）的编辑们，凯尔曾嘲笑他们是糟糕电影的爱好者。这些人抱怨凯尔在某段话中的最后一击隐晦地污蔑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不屑地表示：“我们是否可以（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地）因为凯尔女士狂热的女权主义观点就推断她是女同性恋者？同样，她持有什么观点与她作为批评家的能力大小几乎也是不相关的。”[19]但根据这些编辑的说法，性别与一个人作为评论家的能力就是相关的了。《电影》的编辑写道：“当凯尔女士说没有女性的电影作者批评家时，她是对的。她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女性的批评家也是不存在的，唉。”

这是一个糟糕的战术举动。凯尔在她的回复中把对手杀了个片甲不留。她列举了一些女性批评家的名字，并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冒犯性的、虚情假意的‘唉’——好像如果女性在智力上不够强大到足以承受他们批评中的那种严苛，《电影》的编辑们真的会感到遗憾似的。”[20]

在这些小规模刊物的页面上刊登的言辞激烈的争论永远不可能使这场辩论成为它最终成为的那种永恒的对峙。确保它一直持续的人其实正是萨里斯。多年来他不断重新炒热这个话题，尽职尽责地痛批凯尔后来的每一本书，还反复提及他们之间的不和，其间的高潮是他在1980年时写的一篇精彩文章。凯尔从未回应过他。1991年，她告诉一位采访

者：“我一直为他非要把我的评论看成针对他个人的而感到有些惊讶。”[21]凯尔至今为止唯一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凯洛认定她是为了实现事业上的野心才写了《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这篇文章。[22]这样的指控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萨里斯在他自己的行业中也还默默无闻。凯尔不可能是为了超越萨里斯，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作为一个电影批评家还不拥有值得别人超越的地位。

但是，《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的出版确实发生在凯尔职业生涯迎来变革的1963年。同年她还获得了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推荐她获得该奖的人之一是德怀特·麦克唐纳。后者在回应这一请求时挖苦地说道：“尽管你在报纸上永无休止地骚扰我，但作为一名像基督徒一样善良的无神论者，我把另一边脸也给你打，还写了一篇满是溢美之词的文章，向古根海姆基金会推荐你的项目。”[23]这里说到的项目就是《电影让我很生气》（*I Lost It at the Movies*）的汇编工作。书中将收录凯尔在《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大西洋月刊》和《画面与音响》上发表的多篇散文。

但是，1963年也是西尔弗斯委托她给《她们》写书评的那一年。凯尔本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让她体面地加入纽约知识分子圈子。她很快就写完文章交了上去。她希望这可以成为她进入自己从二十多岁以来一直想要融入的知识分子环境的契机。可惜哈德威克拒绝了凯尔的稿件，只是说她觉得批判麦卡锡对待女性的方式是一个不相关的话题。[24]凯尔被拒绝的原因可能是此时梅勒已经同意亲自为这本书写书评，但也有可能是哈德威克真心这么认为。

凯尔感到很受伤。她把自己被拒绝的消息告诉了桑塔格——因为后者没有再关注这件事的进展。凯尔还把自己写的评论发给了桑塔格。桑塔格回信说她厌恶梅勒对麦卡锡的评论：“他对她本人的攻击太过严厉，对书的批评则不合常理地轻描淡写。”[25]但是桑塔格说她认为凯尔

的作品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她不认为关于女权主义的争论是对这本书最好的攻击角度。桑塔格补充说：“我觉得你说的关于这部小说，关于角色的发展方式，关于现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内容比表达你对麦卡锡诽谤女性的愤慨更有意思，也更新颖——尽管我跟你有同感。”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点鼓励，凯尔把这篇书评保存了起来。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凯尔不再在她的作品中评论两性关系了。这些内容就是不再以曾经出现在她的批评文章中的方式继续出现了。人们开始提出并认定凯尔与女权主义不相干就是因为她的这种沉默。一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见过凯尔的女权主义者批评家告诉凯尔的传记作者说：“我认为宝琳完全不理会女权主义。她不是对女权主义怀有敌意，她只是听而不闻。”[26]这样的评价可能是正确的，至少就她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式兴起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态度而言没有错。但同样有可能的是，在听到她尊敬的人告诉她这些对于性别问题的评论不够严肃之后，凯尔接受了这个假定，并决心在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余生中不再费力以女性的身份为女性辩护。凯尔无法放弃的是她想要被视为严肃作家的渴望。

不过，她并没有彻底放过《她们》。当她听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她立即为自己争取到了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文章的机会。她将自己对麦卡锡原著的看法，主要是指责她诽谤知识女性的那一部分融入了对电影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和制片人西德尼·布克曼（Sidney Buchman）的质疑中。她写道他们不怎么在乎这部小说的主题，尤其是在听到布克曼将本书主题概括为“高等教育不能让女性更好地适应生活”之后，她变得担忧起来：

> 我不习惯只充当观察者的角色（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我反驳了这个说法：“那什么能？高等教育让男性更好地适应生活了吗？”[27]

制片人在一段时间之后才给了凯尔一个直白的答案。他显然觉得教育腐化了所有人，但他补充道，“你知道，宝琳，我不知道这本该死的

书是关于什么的。”关于她看到的导演的显而易见的缺点，凯尔一直礼貌地保持了沉默，直到电影拍摄结束后的庆功会上，据导演西德尼·吕美特说，当关于批评家角色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时，凯尔突然说了一句：“我的工作就是告诉他［吕美特］应该走哪条路。”[28]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在写它的时候感受到的沮丧之情。它的篇幅非常长，表述的观点非常固执，以至于《生活》杂志拒绝发表，最后凯尔只好把它收录到了自己的一本书中。[29]

1965年，凯尔的《电影让我很生气》终于出版，没人认为一本电影批评文章的汇编能有什么市场。但不知为何，它还就真成了畅销书。1964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本书的介绍，题目是《电影要崩溃了吗？》（*Are the Movies Going to Pieces*？）这篇文章把凯尔描述为一名街头公告员，她大声抱怨电影的生命力正在消失。从某种程度上说，凯尔认为这是电影工作室主管们的错。她还如往常一样地指责了那些已经变得深奥难解、反对含义的批评家们，正是他们在捍卫那些只执迷于技术而完全没有含义的电影。凯尔特别批评了一位这样的作家：

> 苏珊·桑塔格在1964年4月13日的《国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火焰生物》（*Flaming Creatures*，又译《热血造物》）的非凡散文，题为《为开放的眼界提供的盛宴》（*A Feast for Open Eyes*）。桑塔格在文中阐明了一个新的批评原则：“鉴于此，史密斯的粗糙的技巧美妙地符合了展现火焰生物的感性的需要——这种感性是基于无选择性、无理念、超越否定的基础上的。”我认为，通过将无选择性视为一种价值，桑塔格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潮流先锋。[30]

到此时，这两个女人已经互相认识了，所以这一切都很令人好奇。公平地说，桑塔格不是凯尔这样的批评家。她不会用通俗的语言写作，尽管她不完全算是一个喜欢长篇大论的人，但桑塔格从其他所有角度来看都可以被归入凯尔认定的势利眼的范围：比如桑塔格主要关注“电影艺术”，她对外国电影感兴趣，她注重形式和风格胜于注重内容。（值

得记住的是，桑塔格此时尚未发表《关于“坎普”的札记》——她在那篇文章里至少显露了一点儿对流行文化的热爱。）此时，也就是在《纽约书评》那次奇怪的交集发生一年多之后，凯尔还在像用骨头逗狗一样不停地提及桑塔格：“桑塔格女士正在研究某些东西，如果她继续研究，并且像牛仔竞技表演者斯利姆·皮肯斯（Slim Pickens）那样驾驭自如的话，那么批评的终结很可能就要到来了。”如批评家克雷格·塞利格曼（Craig Seligman）后来注意到的那样，凯尔的话可能已经让桑塔格意识到了问题：最终出现在《反对解释》中的文章版本在措辞上有所调整。桑塔格没有赞扬“无选择性”，而是赞扬了一种“放弃理念束缚”[31]的辨识力。就是这一微小的变动让桑塔格的论述避开了凯尔的批评大刀。

不管怎么说，反正凯尔的论述引起了各份报刊的注意，当整本书面世时，批评家们都非常喜欢它。《纽约时报》上，一位电影杂志的编辑盛赞这本书证明了“她是美国目前活跃着的最理智、最尖锐、最机智、最不装腔作势的电影批评家”。[32]这位编辑尤其钦佩她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中总结的她的方法：

> 我相信我们可以对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出最彻底的、最好的回应……只要我们在作出判断时是多元的、灵活的、相对的，只要我们是不拘一格的。折中主义不等于无所顾忌，而是要从各种系统中选择最佳标准和原则。成为一名多元论者比做一个适用单一理论的人需要更多心思和更多的秩序性。[33]

这或多或少就是宝琳·凯尔在余生中一直坚持的写作方法，她一直是矛盾的，喜欢充满激情的即兴发挥，还坚称唯一值得捍卫的原则是乐趣。有些人自然会认为这种理论“让人愤怒”，一位批评家在她经常发表文章的《画面与音响》上撰文抱怨“她好争论的文章中充满了会造成破坏的情绪性”。[34]尽管如此，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可以算是一次成功。凯尔靠这本书赚的钱搬回了纽约。

在她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凯尔第一次可以靠写作来维持生计了。她

的女儿也来到纽约，和她一起住在上东区。凯尔全身心投入了工作，显然是确信在这次成功之后，必将有更多的成功接踵而至。她已经获得了一个看起来很稳定的工作：为《麦考尔》杂志（*McCall's*）撰写影评。多萝西·帕克早在大约四十年前曾为这份杂志供稿，此时它的订阅量为一千五百万。《麦考尔》的编辑聘请凯尔的原因是因为知道这份杂志的读者群正在发生改变，他希望凯尔的生气勃勃能够吸引年轻人群体。所以他与后者签订了为期六个月的合同。

可能这个人以前读过的凯尔的作品还不够多，所以他并不理解她的题材。他也许以为既然她曾经为没什么价值的电影辩护过，那她就可以为所有垃圾电影找到值得宽恕的理由。总之结果是，他说当他看到凯尔写的拉娜·特纳（Lana Turner）比较不受人关注的一部电影——《X夫人》（*Madame X*）的影评时，简直觉得惊骇至极。凯尔在文中批评五十岁的拉娜·特纳不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她还太年轻了。凯尔会推荐戈达尔（Godard）的《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也会痛批《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按照媒体上广泛报道的说法，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题为《唱歌的修女》（*The Singing Nun*）的评论，凯尔把这篇文章当作了表达她对《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的不屑的机会。她提到现在电影行业里的大多数人都把这种音乐剧称为“金钱之声”，她还说：

> 这个电影会冒犯谁？只有我们这些会提出异议，讨厌被以这种方式操纵，并且意识到我们被迫感受的情绪是多么自我放纵、廉价且现成的人。当我们听到自己哼唱那些令人作呕、炫耀卖弄、假仁假义的歌曲时，我们可能会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利用，并沦落成情感和审美的白痴的。[35]

这篇文章是凯尔在合同执行到第三个月时写出来的，编辑觉得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当他解雇凯尔时，媒体立即报道说她遭到解雇是因为电影工作室施加的压力。这是她的名字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宝琳的险境”的新闻标题下。她的编辑还到各个商业报刊去做了一圈

道歉拜访，他接受《剧艺报》（*Variety*）采访时拘谨地表示：“凯尔女士越来越多地质疑电影制作人的动机，而不是关注电影本身。”[36]

凯尔很快就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并在《新共和》获得了一份工作。她将取代更有绅士风度的电影批评家斯坦利·考夫曼（Stanley Kauffman），因为后者已经被《纽约时报》聘为戏剧批评家。起初，这似乎是一个更好的搭配；《新共和》的读者群比《麦考尔》的更能够宽容思想上的不同观点。但是这里的报酬比《麦考尔》少得多，而且在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之后，凯尔就又开始与她的编辑产生分歧，因为后者经常随意修改她的稿件。在为一部名为《邦妮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又译《雌雄大盗》）的新电影写的长文完全被该杂志拒绝之后，凯尔就辞职了。有那么一小段时间里，年近半百的她似乎又要做回自由职业者，只能赚取零碎的收入了。然而就在这时，她与《纽约客》的威廉·肖恩取得了联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纽约客》已经不再是哈罗德·罗斯掌管下的那种简单的幽默杂志。当威廉·肖恩在1952年接任编辑一职后，杂志的基调发生了很大变化。肖恩是一个矜持寡言、品味独特的人，但当他真心喜欢某位作家时，他会真的有所表现，比如为他们提供杂志社的职位，让他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许多人会终身在《纽约客》工作，他们对自己的定义有别于为杂志提供日常内容的记者。“肖恩先生”喜欢的那些作家都是终身任职的，他们随时可以回到这里来。

凯尔已经吸引了肖恩的注意。几个月前，她第一次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和电视》（*Movies and Television*）的文章。她在这篇长文中大谈自己对于电视的平庸风格感染了电影的不满。肖恩喜欢那篇文章，他也很喜欢此时收到的长达七千字的关于《邦妮和克莱德》的文章。肖恩把它刊登在了1967年10月的杂志上，尽管这部电影是8月份上映的，此时热度已经下降了。该电影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但其

获得的口碑却像一艘不断下沉的船，评论者们纷纷指责它是在美化暴力。但凯尔把这艘船拖上了岸。她写道：“在这个国家里，如何才能制作一部好电影，而又不遭到别人的严苛批判？”[37]这些负面的反应只能让她确信，大多数人对艺术是怀有敌意的。凯尔提出：“《邦妮和克莱德》没有给观众提供一个简单、安全的认同依据，他们看这部电影时会有很多感受，但是没人限制他们必须如何感受。”人们可能会不喜欢《邦妮和克莱德》中把暴力表现得有趣的方式，但这并不自然让它成为一部糟糕的电影。那是观众的问题，而不是艺术的问题。不过凯尔仍然认为道德应当发挥一定作用。她说这部电影的“主旨”是“让我们直面（暴力），让我们为嘲笑付出代价”。

到此时为止，凯尔已经熟练掌握了她特有的电影批评方式。第一，她会关注其他批评家所写的内容，关注其中存在的逻辑缺陷和虚伪之处；第二，她会关注电影观众及其对大屏幕上呈现的内容的反应，因为凯尔认为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体验与电影本身一样重要；第三，她会关注这一切之中的乐趣。乐趣可能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但凯尔与包括桑塔格在内的其他那些高傲的批评家们不同，她确信电影的最高价值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乐趣。正是这个理念让她一生都被指责粗俗愚钝、冷漠无情，甚至是头脑简单。但是，根据她自豪地坚持的“折中主义”风格，乐趣一直是凯尔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她把乐趣当成一种信条。

人们提起肖恩时，通常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看重乐趣的人，但他非常喜欢凯尔在这篇《邦妮和克莱德》的影评中表现出的风格，所以他邀请凯尔担任《纽约客》的两位常规电影批评家之一，她将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鉴于在最近几份工作合同中遭遇的问题，凯尔提出要有条件地接受雇用：她希望在合同中规定，未经她的许可，她的文章不会被实质性地修改。肖恩同意了，但是凯尔来到《纽约客》之后，肖恩就食言了，他做了他对本杂志其他所有作家都要做的事，那就是像用细齿梳子梳头一样仔细地审查凯尔的稿件。凯尔为此与肖恩争吵过。她

的固执正是使她无法在《纽约客》办公室中成为受欢迎的人物的原因之一。肖恩为杂志设定了遵从资产阶级礼仪标准的基调，而凯尔喜欢咒骂和“刻意使用粗鲁言辞”[38]这个标志性特征就成了两人之间讨论的永恒主题。他们似乎在辩论中达成了一种休战状态，但这种休战仅限于他们两人之间。至于其他人则仍然难以认同凯尔：

> 我记得我收到过一位杰出的《纽约客》作家写给我的一封信，对方说我穿着沾满粪土的牛仔靴子践踏了这份杂志的页面，并建议我穿着我的牛仔靴子离开这里。[39]

肖恩一直支持凯尔，虽然他有时会在深夜打电话和她争论逗号的使用位置。但凯尔终于有了生活保障，而且她还会继续出版收录她批评文章的书籍。她的第二本作品《亲亲，砰砰》（*Kiss Kiss Bang Bang*）几乎和《电影让我很生气》一样成功，里面还收录了她当初为《生活》写的关于《她们》的影评。不过到此时，凯尔已经成了一位正规的电影评论家，她凭借文章中体现的丰富情感和一针见血的评论树立了自己的声望。通过她在《纽约客》的职位，凯尔对无论是偏左还是偏右的普遍观点都会提出争论，她还倾向于让自己的攻击带着一种戏剧性的独特风格。从获得这个职位之初，人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她必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些人对于凯尔写作风格的形容比其他人的讨喜一些。例如凯尔送给默片影星路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一本《亲亲，砰砰》，后者与她早就有通信往来。布鲁克斯在回信中说：“你在封面上的照片让我想起多萝西·帕克，而且是她还年轻、幸福时的样子。”[40]尖刻但欢快似乎就是凯尔追求的文字中的人格面具。但凯尔不断增长的敌人群体却一口咬定她在整个电影行业面前表现得过于傲慢无礼。1967年12月13日的《剧艺报》上刊登了这样一个大标题：

> 宝琳·凯尔：充满热情但缺乏教养；她把礼貌的男性都踩在脚下[41]

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了。威廉·肖恩绝对是一个“礼貌的男性”，但他同时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他并不想要那种谈论电影艺术或电影批评现状的全局性的散文，他已经对凯尔进行了足够的干涉，以确保不会有那样的文章出现在他这份文雅的杂志上。凯尔也很早就意识到自己需要成为一位普通一些的评论者。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只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最后被刊登于1969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题目为《垃圾、艺术和电影》（*Trash，Art，and the Movies*）。

正如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有时会被错误地描述为为“坎普”辩护一样，《垃圾、艺术和电影》有时也会被错误地描述为为垃圾一样无价值的艺术辩护。但凯尔其实花了大量笔墨来解释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个关键差别。她想要解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性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 一个批评家不应该靠把一部作品拆开揉碎来说明自己知道它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的。真正重要的应该是传达电影中的新颖和美丽之处，而不是讲解它的制作方法。[42]

这个观点与桑塔格一直强调的形式与内容的互动不无共同之处。实际上，一个快速提炼《垃圾、艺术和电影》一文要旨的方法是借用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中的术语。在《垃圾、艺术和电影》中，凯尔极为详细地论述了应当用色情学取代阐释学的问题。凯尔一如既往地关注反应，而非美学。她说观众对于让他们感到愉悦的电影反应最多，即便这样的电影是没有价值的垃圾而非艺术。不过她也辩论说电影中的艺术：

> ……是我们一直认为好的东西，它出现在电影中时只是更美好了。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颠覆性姿态，是持续时间更长的兴奋时刻，它还延伸出了新的含义。

凯尔担心，垃圾与艺术的相互作用带来的真正问题其实是，它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愿意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称某些垃圾为艺术。可能没

有什么人会反对她说这种一知半解的自以为是有害处的观点。让凯尔又与不少批评家，而且大多是男性批评家意见不合的地方其实是，她将希区柯克的作品归类为垃圾，但是她对那些坚持认为垃圾电影需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的人感到气愤。她问道：“为什么快乐还需要正当性？”凯尔并不是看不出垃圾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的整体基调：“它肯定会减少和限制艺术家的机会。”但她认为垃圾作品就像一种诱导性毒品，在文章结尾处她写下了一句著名的结语：“垃圾让我们渴望艺术。”

桑塔格关于“坎普”和阐释的想法与凯尔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桑塔格曾写到分析的乐趣之一在于把事物拆开并重新组合起来，这一点是凯尔永远无法接受的。桑塔格相信的是一种不那么普及的快乐，而且她完全不关心普通电影观众如何体会更高的价值；认可垃圾电影的纯粹享受——而不是通过“坎普”的讽刺来体会——是桑塔格完全不能理解的。但奇怪的是，尽管她们二人都对艺术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感兴趣，桑塔格和凯尔再也没有就艺术发生过争论。除了1964年的那次简短的交流之外，她们都没有写过一句关于对方的内容。凯尔似乎对发表重大见解失去了兴趣。虽然她的评论仍然杰出和精彩，但这些文章已经改为采用相对传统的评论形式。实际上，在她的余生中，她再也没有写过像《垃圾，艺术和电影》这样的作品，大多数时候，她都会避免这种涵盖广阔的文章。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凯尔说服威廉·肖恩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关于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的长篇论文。起初，凯尔打算为以书的形式出版的剧本写一篇引言，但她写着写着就控制不住字数了，于是引言变成了一篇长达五万字的关于作家与制作电影全过程的关系的论文。1971年10月，《纽约客》分两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毫无疑问是认定它将凸显凯尔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家之一，也是一个受到普遍欢迎的人物的地位。结果，它却成了凯尔职业生涯中的灾难。

这篇关于《公民凯恩》的文章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轨道。凯尔宣称这部电影的价值只是一部“浅薄的杰作”，[43]根据她个人对价值的衡量尺度来看，她并没有认定这部电影是一部烂片。引起她关注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她想知道究竟是谁让《公民凯恩》如此光辉夺目。她认为这部电影的大部分精彩之处不该被归功于广受好评的威尔斯，而应当被看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被遗忘的剧本作家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Mankiewicz）的贡献。曼凯维奇曾经是圆桌会议中的追随者。和多萝西·帕克一样，他也是为了挣钱而接受了好莱坞的工作机会。在介绍他的职业生涯时，凯尔迅速进入了疯狂赞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编剧们的成就的模式：

> 尽管他们显然都出卖过自己的才华——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出卖也可以是愉快的经历；尽管他们大多都爱上了电影——因此他们不仅要忍受个人的挫折，还要忍受这项伟大的，仍然新鲜的艺术本身的堕落；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为这种随心所欲的魔法的持续壮举作出了贡献，我们称这个壮举为“三十年代的喜剧”。我认为，《公民凯恩》正是其中的最高峰。

凯尔还明确地将多萝西·帕克包括在这群人之中。虽然她提到这些作家在好莱坞大多成了酒鬼，但她也承认他们设法拍出了一些好电影，他们的作品被迫变得“更加粗犷，更加强硬，更具反传统性，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规整，一样风格化”。这似乎就是她对曼凯维奇具有如此强烈的信心的基础，以至于她确定后者就是某种被巨星奥逊·威尔斯的自我掩盖了光芒的悲剧人物。虽然凯尔并没有夸大威尔斯作为恶棍的形象，但他给人的感觉仍然很糟，俨然成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巨大名气故意将编剧排挤到阴影之中的人。

起初，人们喜欢凯尔对《公民凯恩》的新颖评论方法。加拿大小说家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在《纽约时报》上赞扬了她对这部电影制作过程的描述，他特别喜欢凯尔称《公民凯恩》是一部“浅薄的作品，一部浅薄的杰作”的说法。[44]但他认为她夸大了阿冈昆圆桌会

议成员的才能，还引用帕克本人的刻薄评价来反驳凯尔的观点，帕克曾称他们“只是一群讲讲笑话并互相吹捧的人”。[45]

但随后，那些心怀不满的批评家们，尤其是很多热爱《公民凯恩》这部影片，并将威尔斯视为无可争议的电影作者的批评家们就开始核查事实真相了。凯尔没有接受过做记者或研究员的专业训练。她也没有记者或研究员拥有的那种系统化的思想。所以她的文章中会存在漏洞。奥逊·威尔斯还活着，但凯尔没有采访过他。她后来解释说，她认为自己不采访也知道威尔斯对谁写的剧本的问题会如何回答，他当然要极力为自己辩护。相反，她对曼凯维奇参与剧本创作情况的大部分了解来自她与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一位与威尔斯合作过的制片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者霍华德·苏伯（Howard Suber，凯尔付钱雇用苏伯为自己做调研）的谈话。这两个人都确信威尔斯根本没有参与剧本创作；而凯尔在没有对另一方说法进行检验的情况下就采纳了他们的观点。

这激怒了她的敌人。她再次被指责为过度追求名利。反对者声称她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损害威尔斯的声望，批评家们纷纷站出来为被广泛认可为一位伟人的威尔斯辩护。安德鲁·萨里斯认为这是一次能够隐蔽在安全地带为自己和自己的电影作者论辩护的机会。于是他在《乡村之声》上轻蔑地回击道：

> 凯尔女士关于赫尔曼·J·曼凯维奇的惊人揭露并不会严重削弱奥逊·威尔斯作为《公民凯恩》的电影作者的身份，就好像《伟大的安伯森家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中所有最好的台词和场面都是由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写出来的这件事也不会削弱奥逊·威尔斯作为《伟大的安伯森家族》的电影作者的身份一样。[46]

萨里斯并不是唯一看到凯尔对“电影作者”这个概念进行代理攻击的人，她在这里说的内容比她在《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中已经说过的多一倍。即使在更高深的评论文章中，好斗的比喻也随处可见。有同情

心的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在伦敦的《观察家》上称凯尔正在发起一场正义的运动："我支持她的战争，但有时难免觉得她选错了战场。"[47]

据说奥逊·威尔斯为此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哭了一场，还考虑对凯尔提起诉讼（但他最终没有采取行动）。[48]此后他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坚称剧本是合著的成果。接下来，人们普遍认为是威尔斯雇用了一个人在《时尚先生》上发文为他辩护。这个人就是曾经的杂志撰稿人，此时已经成为电影导演的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这篇题目为《凯恩叛乱》（*The Kane Mutiny*）的文章根本不是关于《公民凯恩》的：它完全是在一点一点地驳斥凯尔的文章，波格丹诺维奇能够这样做显然是得益于威尔斯的大力帮助。波格丹诺维奇抓住的把柄正是真正能够痛击凯尔的地方：他严厉地指责凯尔付钱购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苏伯的研究成果，却没有明确提及苏伯对她文章作出的贡献的行为。更糟糕的是，苏伯本人显然也对凯尔感到气愤。他告诉波格丹诺维奇说，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同意凯尔提出的剧本是由曼凯维奇单独所写的观点。

波格丹诺维奇的文章还有另一个目的：它可以被看作为他正在创作的一本关于威尔斯的作品的提前推广。他引用了自1969年以来他对这位导演进行的多次采访中的内容，威尔斯曾经相对大度地承认曼凯维奇对剧本作出的贡献。（波格丹诺维奇直到1992年才终于出版这本书。）波格丹诺维奇引用的威尔斯的原话是："曼凯维奇的贡献……是巨大的……我爱他，人们都爱他。你知道，他非常受人敬佩。"[49]从这里开始，波格丹诺维奇开始逐句驳斥了凯尔文章中的几乎一半内容，他用的都是威尔斯的辩解，但也有引用自其他来源的内容。波格丹诺维奇在文章结尾强调了这场无端怀疑给威尔斯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他还引用了导演本人的原话：

> 我讨厌去想如果将来我有了后人，如果他们想到要看看这些书中的任

> 何一本，那么他们会怎么想他们的祖先呢：她是狂妄自大的虱子中特别的一个……清洗凯尔女士留下的污迹要颇费一番力气。

在她对威尔斯作品的评论中，凯尔也称赞威尔斯是一位创造出了奇妙事物的有远见的人的事实已经毫无意义了。实际上，凯尔写过的所有涉及威尔斯作品的内容几乎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文章。就因为这篇关于《公民凯恩》的评论，过往的那些就通通被抹杀，不再相关了。凯尔一方当然也有一些过错。她想讨论的合作作品的作者身份问题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获得确切答案的问题。即便是在萨里斯和波格丹诺维奇开始对她围攻之前，她就已经动摇了。凯尔告诉《星期六文学评论》的采访者说自己并不是要损害威尔斯的形象；她还承认他一直是这部电影的关键人物。

> 曼凯维奇的剧本很精妙，但是换成其他导演……或是换成其他演员扮演凯恩，这个剧本也可能被拍成平淡无奇的影片。[50]

这样的认可并没有挽回什么，部分原因是从出现争议的早期开始，这件事就不再是关于凯尔实际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她的错误暴露了她良好声誉的一个可攻击的弱点，而那些不喜欢她所坚持的一切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个击倒她的机会。她喜欢用文章与人交战，也完全不会因为别人做同样的事而指责别人。凯尔一如既往地提出自己的论点，像正在行军的一个个连队一样，毫不停顿地继续向前。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早就知道想要写出有权威性的文章，就必须投射出极端的，甚至是超人一般的自信。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投射。凯尔很傲慢，但她也很精确。她的自我编辑能力是传奇性的。如她的朋友，有时也是门徒的詹姆斯·沃尔科特（James Wolcott）说的那样，凯尔“就像任何从E. B. 怀特（E. B. White）的精灵学院里走出的大惊小怪的人一样，是一位狂热的修补匠”。[51]她虽然会疯狂地关注细节，但是她对事实是否疏于查证了？答

案无疑是肯定的。更奇怪的是，在读者来信版面上与人唇枪舌剑、机智反击在凯尔的职业生涯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这一次她却没有继续发表回应文章。据凯洛说，凯尔在读了波格丹诺维奇的文章不久后曾与伍迪·艾伦（Woody Allen）一起吃饭，她问对方自己是否应当有所回应。艾伦似乎告诉她："不要回应。"[52]凯尔这次明显受到了伤害，不过她似乎从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她不该再参与任何报道了。她也不再在版面上与那些不喜欢她作品的人争论了。

不过这件事始终纠缠着她。在这次争论过去几年后，凯尔参加一个奥斯卡聚会时遇到了一位名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的编剧。邓恩在写到这件事时，他立即把它视为这位著名的电影批评家最丢脸的经历。当《提升凯恩》（*Raising Kane*）最终被收录到书中之后，他拒绝了为该书写评论的机会。在他看来，这是一本"傲慢愚蠢的书，它比我读过的任何关于好莱坞的东西都更能让我忍不住傻笑出声"。[53]但邓恩一直害怕与那些可以发文痛批他参与的电影的人交恶。鉴于此，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并粉饰了自己对这本书的作者的真实看法。关于他们在聚会上的相遇，邓恩写道凯尔穿着"璞琪（Pucci）仿品和矫形鞋"来参加活动。当他做自我介绍时，凯尔已经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立刻要求见见他的妻子，琼·迪迪翁。

---

[1] 参见1963年8月28日，罗伯特·西尔弗斯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in the Pauline Kael Papers at Lilly Library，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

[2] 为《她们》所写的书评的初稿，出自Pauline Kael Papers，转引自Brian Kellow，*Pauline Kael*：*A Life in the Dark*（Penguin，2011）。

[3]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KPFA电台广播节目，日期不详（大约是1962年至1963年间），可见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hs-jKei3g。

[4] Pauline Kael，"'Hud'：Deep in the Divided Heart of Hollywood，" *Film Quarterly*，Summer 1964.

[5] 1942年2月28日，宝琳·凯尔写给Rosenberg的书信，转引自Kellow，*Pauline Kael*，29。

[6] *City Lights*，Winter 1953，reprinted in *Artforum*，March 2002，122.

[7] 1982年接受Los Angeles Reader采访，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ed. Will Brantley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6），76。

[8] 参见*Ed and Pauline*，dir. Christian Brando （2014）。

[9] 参见*Ed and Pauline*，dir. Christian Brando （2014）。

[10] 参见*Ed and Pauline*，dir. Christian Brando （2014）。

[11] "Owner and Employe ［sic］ feud over 'Art'；Guess Who Has to Take Powder？" *Variety*，November 16，1960.

[12] "Wife Wants Artie Operators 'Wages，'" *Variety*，May 31，1961.

[13] "Fantasies of the Art House Audience，" *Sight and Sound*，Winter 1961.

[14] "Is There a Cure for Film Criticism？" *Monthly Film Bulletin*，（此处疑有误，正文里说的是*Sight and Sound*），Spring 1962。

[15] Andrew Sarris，"Notes on the Auteur Theory in 1962，" *Film Culture*，Winter 1962-63.

[16] "Circles and Squares，" *Film Quarterly*，Spring 1963.

[17] 转引自Kellow，*Pauline Kael*，78。

[18] 转引自Kellow，*Pauline Kael*，78。这整个故事出自Kellow，*Pauline Kael*，78。

[19] "Movie vs. Kael，" *Film Quarterly*，Autumn 1963.

[20] "Movie vs. Kael，" *Film Quarterly*，Autumn 1963.

[21] 1991年8月28日，接受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的Allen Barra采访，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135。

[22] 参见Kellow，*Pauline Kael*，78。

[23] 1963年11月27日，德怀特·麦克唐纳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in Pauline Kael Papers，Lilly Library，转引自Kellow，Pauline Kael，70。

[24] 1963年9月14日，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in the Pauline Kael Papers，Lilly Library。

[25] 1963年10月25日，苏珊·桑塔格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in the Pauline Kael Papers，Lilly Library。

[26] Karen Durbin，转引自Kellow，*Pauline Kael*，174。

[27] "The Making of The Group，" in *Kiss Kiss Bang Bang*（Little Brown，1968），97.

[28] Kellow，*Pauline Kael*，91.

[29] 这本书是《亲亲，砰砰》。

[30] Pauline Kael，*I Lost It at the Movies*（Dell，1965），17.

[31] 参见Sontag，*Against Interpretation*，229。

[32] Richard Schickel，"A Way of Seeing a Picture，" *New York Times*，March 14，1965.

[33] "Circles and Squares."

[34] Geoffrey Nowell-Smith，Review of *I Lost It at the Movies*，*Sight and Sound*，Summer 1965.

[35] "The Sound of..." in *Kiss Kiss Bang Bang*，177.

[36] "Sez McCall's Stein：Kael Pans Cinema Profit Motives，" *Variety*，July 20，1966.

[37] "Bonnie and Clyde，" *New Yorker*，October 21，1967.

[38] 接受Marc Smirnoff采访，Oxford American，Spring 1992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155。

[39] 接受Marc Smirnoff采访，Oxford American，Spring 1992 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156.

[40] 1962年5月26日，路易丝·布鲁克斯写给宝琳·凯尔的书信，转引自Kellow，*Pauline Kael*。

[41] 参见*Variety*，December 13，1967。

[42] “Trash，Art，and the Movies，” *Harper’s*，February 1969.

[43] “Raising Kane，” *New Yorker*，February 20，1971.

[44] Mordecai Richler，“The Citizen Kane Book，” *New York Times*，October 31，1971.

[45]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46] Andrew Sarris，“Films in Focus，” *Village Voice*，April 1，1971.

[47] Kenneth Tynan，“The Road to Xanadu，” *Observer*，January 16，1972.

[48] 参见Barbara Leaming，*Orson Welles*：*A Biography*（Limelight Editions，2004），476。

[49] Peter Bogdanovich，“The Kane Mutiny，” *Esquire*，October 1972.

[50] “Raising Kael，” 1971年4月24日接受《星期六文学评论》的Hollis Alpert采访，in *Conversations with Pauline Kael*，13。

[51] James Wolcott，*Lucking Out*：*My Life Getting Down and Semi-Dirty in Seventies New York*（Anchor，2011），67.

[52] Kellow，*Pauline Kael*，167.

[53] John Gregory Dunne，“Pauline” in *Quintana and Friends*（Penguin，2012）.

第十章 迪迪翁

迪迪翁和凯尔发现自己经常被与桑塔格混为一谈，因为她们都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而在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这被认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但她们往往不喜欢让自己的名字被这样联系在一起。迪迪翁和凯尔肯定也从来没觉得自己和对方有什么相通的精神。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写道，当凯尔要求见迪迪翁时，他能想到的只有凯尔多么讨厌迪迪翁的一部小说，以及基于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因为凯尔认为它们就是“公主的幻想”。[1]“我知道我对这类事情的耐受程度比许多人都低；但这是应该被容忍的东西吗？我觉得琼·迪迪翁的小说体现了一种荒谬的趾高气扬，我读它的时候经常因为难以置信而忍不住笑出声。”尽管如此，邓恩还是为两人作了介绍，他看出了她们拥有的连她们自己都看不到的共性：“两个强硬、娇小的女人，拥有獴一样敏锐的本能和对对方作品的友好的不屑，但还是表现得像礼貌的好姑娘。”[2]

“强硬”并不总是一个能与迪迪翁联系起来的词。“优雅”和“迷人”是对她更常见的描述，而这些形容并不总是被用来表达恭维——她经常受到指责的地方就是凯尔抱怨的那种“荒谬的趾高气扬”的风格。但是，如迪迪翁深刻体会到的那样，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虽然她的风格不像凯尔的那样通俗易懂或好争论，但她同样也是一位擅长打碎别人自我幻想的大师。她只是倾向于锋利钢刃的优雅利落，而不是钝器的拖泥带水。

迪迪翁1931年出生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弗兰克（Frank）不是凯尔的父亲那样在家禽养殖场工作

的理想主义农民，也不是麦卡锡、韦斯特或桑塔格的父亲那样的梦想家。他是一个现实、稳重的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的工作是卖保险。1939年他加入国民警卫队，家人也要随他一起迁移到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Durham）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的各个基地。[3]从大多数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普通和平静的美国式童年。但迪迪翁后来会提到，正是这种不断迁移的经历最先让她产生了一种自己是局外人的感觉。她本身就是一个害羞的小孩儿，这也不利于她适应新环境。然而，即便是在她还很害羞的时候，迪迪翁已经开始梦想成为公众人物的生活。她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演员，而非作家。（这一点与麦卡锡相同。）[4]她告诉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同一种冲动。都是虚构。都是表演。”[5]

但是有些关于父亲的事情是迪迪翁从来不写的。迪迪翁是一位以创作与个人经历相关的散文而为人所知的散文家，很多人认为她喜欢无情地自我揭露。然而，直到她将近七十岁时，她从来没有写过与她早年生活中另一个困扰她的事件相关的任何内容：她作为一名英文系学生在伯克利入学的第一年，她的父亲则作为病人住进了旧金山的一家精神病院。

迪迪翁的母亲不是同样阴郁的人，她更符合加利福尼亚州拓荒者的强硬精神，那也是迪迪翁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来尝试说明和捍卫的精神。但艾杜内·迪迪翁（Eduene Didion）也不是没有内心生活或梦想的。迪迪翁说正是她母亲发现了《服饰与美容》上刊登的竞争最佳散文奖，胜者可获得巴黎旅游机会的广告。她告诉女儿自己认为她可以赢得大奖，当女儿在1956年获胜后从伯克利开车回家向父母展示自己的成果时，母亲的回答是：“真的吗？”[6]

这实际上已经是迪迪翁在二十岁出头时获得的第二个奖项了。1955年的整个夏天，她参加了在曼哈顿举行的《年轻女士》客座编辑活动。

［这个活动最著名的参与者是几年前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后来她还在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中描述和讽刺了这个活动。］迪迪翁为活动当期的杂志写了一篇令人满意的关于小说家珍·斯塔福德的传略。当时斯塔福德已经与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离婚。迪迪翁尽职尽责地描述了斯塔福德关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适销性对比结果的深思，她的文字体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所有的控制力和自信，但是没有一点儿人们后来会从她身上听到的那种声音的苗头。

迪迪翁获奖时还是伯克利的一名大四学生，她没有去巴黎，而是请求《服饰与美容》在曼哈顿为她提供一份工作。于是《服饰与美容》把她安排到了文字编辑部，但是1956年秋天她就离开了。她那篇名为《向那一切道别》（*Goodbye to All That*）的著名的散文就是关于她最终再次离开纽约的经历的。在文章开头处，迪迪翁将这两次来到纽约的经历简化了。她提到自己第一次看到纽约是二十岁时来参加《年轻女士》的活动。但她在文章中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她第二次来这里之后的经历——从雇主告诉她要穿哈蒂·卡内基（Hattie Carnegie）的衣服，到穷得不得不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店（Bloomingdale）的美食店赊账，年轻人总是这样，即便已经破产了也还是忍不住放纵自己。

要说清楚的一点是，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谎言。对这两次到纽约的经历的省略是种微妙的处理，毕竟，绝大多数曾经来纽约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她所描述的那种“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一切都在触手可及范围内”[7]的感觉，是一种可再生的情绪，是可以被反复体会的。但是迪迪翁在这里使用的方法中有一点是我们要领悟的：实际上，她经常有意识地用她的经历创造一些不再仅仅是无畏的自我揭露的东西。

在《服饰与美容》工作时，迪迪翁最初被随便地安排到了广告部，后来又承担了多萝西·帕克曾经负责的工作：给插图写说明文字。到此

时，帕克的编辑埃德娜·伍尔曼·蔡斯领导下的那种拘谨呆板的时期已经结束，《服饰与美容》变得更加雄心勃勃，特别是涉及出现在它的版面上的服装时。不过，《服饰与美容》编辑部里的知性腔调并没有太大提升。在这里工作的仍然是那些毫无疑问比迪迪翁富有，但既不特别有文学素养，也不特别有智慧的人。不过他们能够紧追潮流趋势，而潮流和趋势有时会引导他们找到非常优秀的作家。

迪迪翁总是这样讲述那段经历：她为《服饰与美容》写的第一篇署名作品其实是一次意外。因为当期杂志要出版的其他内容没能被按时提交，所以她写了一篇规定字数的文章作为替代。她想到的主题是对嫉妒本质的思考，但文章的内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它提出的老套的观点是认为嫉妒在人的生活中发挥了一些影响：

> 去与任何从事涉及投入自我的工作的人交谈吧：比如一位作家或一位建筑师。你听到X曾是一位多么出色的作家，直到《纽约客》毁掉了他的名声；或者，不管黛安娜·特里林说什么，作家Y的第二本小说只会让我们这些意识到Y真正潜力的人感到失望。[8]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位为自己未来的辉煌职业生涯作准备的作家，那么我们有必要记住，此时的迪迪翁并不是在为一本在文学和思想方面受到尊重的杂志写作。《服饰与美容》在1961～1962年间许可她撰写的一些散文的主题有时似乎反映了迪迪翁内心的沮丧。它们都是关于自尊，接受拒绝的能力和情感勒索的。

迪迪翁当时不仅为《服饰与美容》供稿，她也与《假日》（*Holiday*）和《年轻女士》有合作。她告诉自己的采访者说：“我那时写的都是只为了发出去的文章，我对它们还没有真正的控制力。”[9]那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像一个还在磨练文笔的作家的练习品。她没有把那些文章收录到后来的文集中，显然也是因为她不认为那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迪迪翁偶尔也会为保守的《国家评论》撰稿，主要都是提供给书籍或文化专栏的。在这里，她能有机会针对一些容易被指责为用有文学性的语言撰写的自我安慰或肤浅的杂志娱乐以外的主题进行更充分的阐述。她可以写一些诸如评论J. D. 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弗兰妮和佐伊》（*Franny and Zooey*）之类的文章。她对这本书作出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专横抨击。她在文章中回忆起在一次聚会上：

> 还有一位令人惊叹的名叫萨拉·劳伦斯（Sarah Lawrence）的女孩儿试图跟我讨论塞林格和禅的关系。当看到我似乎没有回应时，她纡尊降贵地用她认为我可以理解的语言宣称：塞林格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理解她的人。[10]

这一陈述在如今成了相当有戏剧性的讽刺，因为迪迪翁对于她之后的几代年轻女性的意义正在于，她们坚称迪迪翁在散文中阐述了她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但是，当迪迪翁最初开始写作时，她并不打算以这种方式受到欢迎。她其实是在塞林格身上看到了推翻一个大人物的机会：她说《弗兰妮和佐伊》“是最终的欺骗”。她看到一个男人通过给予他的读者们一种他们好像属于一个知道如何比其他人活得更好的精英群体的感觉来取悦他们，而实际上他除了关注一些琐事之外什么也没做。他无非是肯定了其他人对于无足轻重的肤浅事物的迷恋，并通过这种方式向他们提供类似自助的东西而已。

同意她的观点的人之一就是在《哈泼斯杂志》上发文的玛丽·麦卡锡。此时距离应付将占据她全部精力的人们对《她们》的反应还有一年的时间，现在的她把最锋利的攻击都用在了这本书上。她也抱怨塞林格在琐事上浪费太多笔墨：比如用玻璃杯喝酒，或点燃香烟。然而，最让麦卡锡感到厌恶的还要数塞林格的世界观：即只有获得他信任的小圈子里的人才真实，其他人都在撒谎。她无法忍受在整个《弗兰妮和佐伊》的故事中挥之不去的西摩·格拉斯（Seymour Glass）的不明不白的自杀。她想知道格拉斯为什么会自杀，无论是因为他的婚姻太糟糕还是因为他太开心。她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令人十分难忘：

> 或者是因为他一直在撒谎，他的作者一直在撒谎，一切其实都很糟糕，他只是在假装吗？

当时正是塞林格最受欢迎，但是即将去隐居的那段时间。而麦卡锡和迪迪翁对他的同样的厌烦恰恰揭露了他的一些东西：那就是塞林格只显露自己的表面。有趣的是，这两个女人日后也都会被同一把刷子抹上相同的污迹，她们都被称赞为无可挑剔的拥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她们的想法和观察从未完全配得上她们优美的文字。

比如，当凯尔抓住迪迪翁“趾高气扬”的形象问题不放时，她正是在沿着这个思路争论。但凯尔知道，迪迪翁有技巧，即使在贬低她的时候，凯尔也承认迪迪翁可以闪烁出天才的光芒：“干冰般的句子里升起了创造性的烟雾。”[11]凯尔只是希望迪迪翁能够表现得不那么受伤，不那么忧郁，概括地说，就是不那么像一位受害者。然而，这似乎只是她们在个人风格上的一种分歧：凯尔一生都在避免承认任何过错或弱点，特别是在她的文章中。

虽然现在的人很少这么想了，但这两个人也曾经为明确的理由成为工作上的对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迪迪翁在《服饰与美容》担任过不长时间的电影批评家，凯尔差不多也是在那时加入《纽约客》的。迪迪翁拥有的空间比凯尔小得多，而且显然对电影批评界内部的战争不感兴趣。但她像凯尔一样，对流行禁忌持一种怀疑态度，并且对电影导演采用的某些情感许可缺乏信任。至少一次，在一部特定的电影中，凯尔呼应了迪迪翁的观点。1979年，《纽约书评》请迪迪翁评论伍迪·艾伦的《曼哈顿》（*Manhattan*）。结果迪迪翁交出了一篇与凯尔曾经的突破之作，即对《舞台春秋》的尖刻评判很相似的作品。迪迪翁在文章开头说“自我沉醉是和自我怀疑一样普遍的情绪”：

> “当谈到与女性的关系时，我都可以得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奖（August Strindberg Award）了，”由伍迪·艾伦饰演的角色在《曼哈顿》中这样告诉我们；后来他对黛安·基顿说的一段台词会成为被经常引用和赞美的经

典：“我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维持过长期的关系，反正不会长过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维持的时间。”这些台词毫无意义，也不好笑：它们只是“提及”，就像哈维（Harvey）、杰克（Jack）、安杰利卡（Anjelica）和《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总会被人提及一样，聪明的谈话应该能体现说话者通晓文学和历史，更不用说娱乐行业了。[12]

讽刺的是，尽管她对迪迪翁有很多抱怨，尽管她本人往往是赞赏伍迪·艾伦的作品的，但凯尔却和迪迪翁一样对《曼哈顿》感到无比愤怒，她也认为其中看似有深度的谈话不过是在掩盖其根本上的肤浅。一年之后，凯尔在评论《星辰往事》（*Stardust Memories*）时旁敲侧击地提到了《曼哈顿》：“除了伍迪·艾伦，哪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能把对青少年的偏好说成是对真正价值的追求呢？”[13]

*

显然，迪迪翁在创作非虚构类作品时从来不会在使用“我”上遇到任何问题。但到了1964年，也就是她开始为《服饰与美容》撰写那些深入透彻的散文三年之后，她显然迫切想要写一些不以自己为内容的文章。她的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她已经出版了一本不长的小说，名叫《河流奔涌》（*Run River*）。但这本书在书店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这个书名是出版商选的，这本书的编辑完全改变了小说的形式，将其实验性的结构改成了非常传统的样子。迪迪翁也是在此期间与约翰·格雷戈里·邓恩结婚的。后者曾经是她的朋友，也是在她另一段为期不短的恋爱关系的最后阶段一直支持着她的人。这对夫妇决定放弃他们在杂志社的工作，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他们已经设定了到那里的电视行业中发展的模糊计划。

《服饰与美容》似乎还不想彻底失去迪迪翁，于是邀请她为该杂志撰写电影评论。1964年，迪迪翁在距离她结婚还有一个月时发表了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宣称自己的批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将是民主的：

> 直白地讲：我喜欢电影，我会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它们，哪怕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头脑简单。一部电影也不是非得成为某种经典才能引起我的注意，它不非得是《奇遇》（*L'Avventura*）、《红河》（*Red River*）、《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或《公民凯恩》，我只要求它有自己的精彩之处。[14]

她随后对《费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圣路易斯精神号》（*The Spirit of St. Louis*，又译《壮志凌云》）和《谜中谜》（*Charade*）这几部电影都作出了积极的评价。此时凯尔还没能在主流电影评论界获得什么突破，《电影让我很生气》也尚未出版，但我们可以在迪迪翁的文字中看到一种相似的批评方法。而且迪迪翁也会用整个职业生涯来坚守一个观点——即使在毫无争议的垃圾影片中，也有出现精彩绝伦的时刻的可能。

除了迪迪翁之外，还有另一位作家在为《服饰与美容》评论电影，所以那些令人难忘的电影似乎总是轮不到她来写。尽管如此，她还是试着在有限的版面中写出有特质的文章，她的大部分评论都是明快活泼的，充满了俏皮话，看起来更像帕克而不是迪迪翁的文字。她讨厌《粉红豹》（*The Pink Panther*）：“可能是有史以来人们唯一一次带着真实事物的平庸拍摄出的色诱［戴维·尼文（David Niven）与公主］。”[15]她喜欢《琼楼飞燕》（*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又译《翠谷奇谭》），但评论黛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倾向于表演成西部是靠上蹿下跳和对它大喊大叫而得来的。”[16]她承认自己对于青少年冲浪电影情有独钟，“也许我应该尝试把这种热情说成是出于社会学角度的”。[17]像凯尔一样，迪迪翁也讨厌《音乐之声》，并称之为：

> 比大多数电影都令人难堪的作品，好像是在暗示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和克里斯托弗·普鲁默（Christopher Plummer）这样的人完全不会受到历史事件影响似的。只要吹响曲调明快的口哨，把德奥合并（Anschluss）抛到脑后就行了。[18]

然而，迪迪翁渐渐地对电影评论感到了厌倦。根据她的说法，《服饰与美容》因为这篇对《音乐之声》的评论太尖刻而解雇了她。（这成了她与凯尔的另一个联系，后者也是因为痛批这部电影而被《麦考尔》解雇的。）总之，当她和邓恩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开辟新专栏时，她已经转向其他题材了。

为《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时，迪迪翁的文字基调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迪迪翁的散文《论自尊》（*On Self-Respect*）和另一篇她为《服饰与美容》写的关于美国的夏天的散文中已经显露出迪迪翁早期具有的一种带着伤感情绪的独特腔调。但是，鉴于《星期六晚邮报》愿意培养她参与实地报道，迪迪翁正好发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是渴望曲折故事的优良市场，这有利于迪迪翁抓住机会，写一些比一两篇专栏文章更长的内容。她开始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关于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她觉得她很傻）和约翰·韦恩（她觉得他不傻）的文章，但真正符合读者胃口的是她的第一篇犯罪题材文章——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第一篇显示迪迪翁真正风格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我怎么能告诉他们什么都没了？》（*How Can I Tell Them There's Nothing Left*？）但是，当迪迪翁将此文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时，她把题目改成了《一些做着美梦的梦想家》，变动后的题目才是这篇文章更为人所知的题目。名义上，这篇文章是对当地一起谋杀案的详细报道，一位妻子被指控把丈夫烧死在了他们的私家车里。迪迪翁立即采用了一种广泛地审视困扰加利福尼亚州，甚至是美国其余大部分地区的一切事物的视角：

> 在加利福尼亚，人们打个电话就可以聆听一段祈祷，但要买本书却很难。在美国，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从相信《创世记》（*Genesis*）的字面解释变成了相信《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的字面解释；在美国，人们梳着蓬蓬头，穿着七分裤，对于姑娘们来说，一辈子的指望都被浓缩进了

> 一条长度到小腿中部的白色婚纱中，她们会生儿育女，也许取名金伯利（Kimberly）或谢里（Sherry）或黛比（Debbi），但最终还是要到墨西哥办理一个又快又便宜的离婚手续，然后重返理发学校。[19]

这名女子最终被认定谋杀了丈夫，但生活在圣伯纳迪诺山谷（San Bernardino valley）的居民对这样的概括描述很不满意。这个山谷就是迪迪翁在文章开篇处用不少笔墨描述过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某片区域。一位名叫霍华德·B.威克斯（Howard B. Weeks）的人给杂志社写了一封信。他提到自己是洛马琳达大学（Loma Linda University）公共关系和发展部副主席，他在信中提到：“我为琼·迪迪翁感到担心，据我们观察，这些感受是纽约年轻作家在冒险进入哈得孙河以外的广大未知世界时通常都会体验的症状。”[20]这封信表明，迪迪翁此时尚未在主流文化中获得突破；不过霍华德·B.威克斯并不知道，此时被自己说教的这位女性今后会成为在关于自己家乡的题材上最具代表性的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作家。

迪迪翁并不是立即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的。接下来她写的一篇文章似乎就绝不可能惹恼任何人。文章的标题是《大岩石糖果无花果布丁陷阱》（*The Big Rock Candy Figgy Pudding Pitfall*）。考虑到她曾经痛批海伦·格利·布朗和塞林格本质上是浅薄的人，人们猜测这篇文章应该属于迪迪翁为了挣钱而写的那种作品。文中详细介绍了制作二十个无花果布丁和二十棵硬糖树的方法。不过它似乎还反映出了迪迪翁对于自己处理家务事的能力感到多么沮丧：

> 我是个娇弱、懒惰的人，不适合做任何事，只除了别人花钱雇我做的这件事之外——那就是一人坐在打字机前，用一个手指打文章。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女人，能修补畜栏，能腌制足够所有人吃一冬天的桃子，还能在皮尔斯伯里烘焙大赛（Pillsbury Bake-Off）中赢得一次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旅行。实际上，如果哪天我不再相信只要我付诸行动，我就可以赢得皮尔斯伯里烘焙大奖，那肯定意味着什么东西死了。[21]

邓恩在这篇文章中的形象是一个亲切和善，带有漫画风格的人物，他在看到这么多吃的时问道：“本周我们要接受的到底是什么治疗方法？”不过迪迪翁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就在当年早些时候，她和邓恩收养了一个孩子，并给她取名昆塔纳·鲁·邓恩（Quintana Roo Dunne）。然而，想要成为某种“能够制作树木形状的硬糖和无花果布丁的”家务女神的焦虑，确实很像被女性杂志称为“筑巢心理（nesting）”的东西。

迪迪翁为新一年最初几期专栏写的文章之一是《向魔法城市道别》（*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后来的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是改动后的《向那一切道别》。）她整个职业生涯一直痴迷于的“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的主题，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显现征兆的。迪迪翁认为自己居住在纽约的整段时间里，她对纽约的想象影响了这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 我看过的所有关于纽约的电影和我听过的所有关于纽约的歌曲被编织成了某种本能，它们告诉我它再也不会是曾经的样子了。事实上它从来不是那个样子的。晚些时候，上东区的自动点唱机里会出现一首歌，歌词是“曾经那个还是女学生的我去哪儿了”，到了夜深人静真的很晚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现在我知道，几乎所有人，或早或晚，无论自己在做什么，都想过要问同样的问题，但是当你还是二十岁、二十一岁，甚至二十三岁的时候，既是好处又是坏处的一点是，尽管所有证据都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你还是相信，这样的事从不曾发生在别人身上。[22]

这篇文章如此著名，据说它已经催生出一种以离开纽约为主题的小型散文派别。就像自动点唱机上的歌曲一样，它表达了所有人对某种共同体验的感受。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迪迪翁写作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重新体验一种情感上的陈词滥调，叙述者是在告诉过去的自己，相信一个所有人都信以为真的故事是多么可怜和愚蠢。这种自我觉醒的风格，这种置身事外地讲述个人经历的方式将成为迪迪翁的标志。

即使是在她写到关于离婚之类的私人问题时，她也会保持一定距离，把问题放在手中翻来覆去，直到把它的外表打磨得闪闪发光，至于那些粗糙的内心部分，它们都被仔细地隐藏起来。

邓恩和迪迪翁很快就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拥有了一个固定专栏，并共同署名。当时的人们会觉得这有些奇怪，尤其是杂志还会改动每期专栏顶部的插图，插图的内容就是他们两人的画像，如果专栏是邓恩写的，那他的画像就会出现在迪迪翁的画像之前；如果专栏是迪迪翁写的，那么她的画像就会被换到邓恩的前面。

迪迪翁写的那些文章通常是专栏中更值得一读的部分，她引起读者回应的技巧是一流的。她写的关于偏头痛的散文，以及她关于恶魔岛监狱（Alcatraz）被停用的报道和对当时还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夫人的南希·里根（Nancy Reagan）的糟糕描述都被发表在这个专栏中：

> 她告诉我说州长从来不化妆，即便是过去演电影的时候也不化妆，她还说政坛是比电影行业更艰辛的圈子，因为没有电影工作室来保护你了……“有一个漂亮的工作场所对男人很重要，”她这样建议我，还向我展示了她放在州长办公桌上的总是装满硬糖的药剂罐。[23]

近一个月之后，南希·里根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字带来的刺痛。她对《佛雷斯诺蜂新闻报》（*Fresno Bee*）说：“我还以为我们挺合得来，要是我凶一点就好了。”[24]

这种似乎是放任被采访对象自由地暴露自己的愚蠢，而不是被她的评论或想法打断的写作方法成了迪迪翁的标准模式。她著名的探索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Ashbury）的文章就大量采取了这种方式。她会在文章开篇处大大地抱怨一番“核心难再支撑”的现状，然后向着不断加宽的深渊跋涉，以期在那里找到一些能够通过一两句话揭示自己的人。比如她遇到的两个感恩至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的歌迷：

我问那些女孩是做什么的。

“我只是经常来这里”，其中一人说。

“我算得上和乐队的人认识”，另一个说。[25]

这些乏味的回答暴露了作出回答之人脑子里空空如也。《星期六晚邮报》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不同寻常地充满了对迪迪翁的赞美之词，大多数读者都同意她对当时流行的被称为嬉皮士群体的野蛮人的深度解析。也有一些反对者，比如绰号“雏菊（The Daisy）”的桑尼·布伦特伍德（Sunnie Brentwood）就继续坚称“大多数‘花童（flower children）’都是好孩子，他们正在努力改善世界，让它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园”。[26]

最终还是迪迪翁的观点胜出了，不仅因为这篇名为《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的散文会成为她1968年出版的同名散文集的标题文章，还因为这本散文集为迪迪翁树立了声望。为《纽约时报》评论这本书时，迪迪翁的朋友丹·韦克菲尔德（Dan Wakefield）提出，迪迪翁是“我们这代人中受赞美最少，但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27]他指出，迪迪翁的作品比其他年轻女性作家，比如一位名叫苏珊·桑塔格的时髦人物的更容易理解。韦克菲尔德对这本书的全面赞美几乎得到了其他所有评论家的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偶然发现了迪迪翁的智慧与她的性别的关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梅尔文·马多克斯（Melvin Maddocks）含义模糊的评价似乎是想要表达一种赞美：

> 女性做新闻报道是男人的世界为让她们失望而付出的代价。这里展现的正是她们最出色的，像被遮盖起来的帽针一样隐蔽的风格，她们对于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不宽容，也不会遗忘。[28]

这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虽然用帽子别针做比喻显然是将问题平凡化了，但关于这种结果是“代价”而不是礼物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迪迪翁在文字中创造的人格面具对于如格利·布朗、乐队

歌迷、南希·里根和会做无花果布丁的家庭主妇之类的女性与对“男人的世界”同样失望，无论这个“男人的世界”具体指的是什么。这种观点并不是纯粹女性化的，而更是一种有感知力的、敏锐的判断。某些感知力的大门对女性更加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无法看到女性指出来的一切，他们要做的只是安下心来，去听，去看。

在《向伯利恒跋涉》之后，此前对她不闻不问的文学传略作家们开始一窝蜂地前来采访迪迪翁，还把各种有娇小的迪迪翁的精美照片刊登在诸如《琼·迪迪翁：刀刃一样锋利的作家》（*Joan Didion：Writer with Razor’s Edge*）[29]和《向琼·迪迪翁跋涉》（*Slouching Towards Joan Didion*）[30]之类的文章标题旁边。这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汉娜·阿伦特的老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立即申请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他兴高采烈地在迪迪翁和邓恩当时居住的位于马里布（Malibu）的房子里见到了这对夫妇，他们正在合作撰写基于迪迪翁在1970年出版的小说《顺其自然》（*Play It as It Lays*）改编的剧本，小说讲述的是一名不顺遂的女演员玛丽亚·韦思（Maria Wyeth）的故事，曾经为迪迪翁带来了热烈的赞美。卡津注意到迪迪翁真正的样子与她经常在文章中谈到的样子之间存在区别：在1969年的一篇著名的发表在《生活》上的专栏文章中，迪迪翁描写的自己娇贵、病弱，处于离婚的边缘，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迪迪更像是由理智的钢铁而不是轻浮的丝绸组成的：

> 琼·迪迪翁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人，她还确信自己在金州（Golden State）开始发生这么多令人不安的事情之前在萨克拉门托出生和长大是明智的。[31]

卡津继续梳理了各种差异。他注意到埃德蒙·威尔逊已经发现迪迪翁表达的声音“比她本人的像小女孩一般的声音强势得多！”尽管住在马里布这样的地方似乎意味着轻松惬意，但卡津觉得下面的海浪声震耳欲聋：“居住在海滨别墅里的人不知道这让他们变得多么机警。”他称迪迪翁为伦理学者，说她对严肃性有一种痴迷。他还指出，即便是在写小说

时，她也会像文化批评家一样，想要诊断她所写的任何主题的弊端——玛丽·麦卡锡也有同样的癖好，尽管她们二人在小说中的腔调区别很大。卡津甚至将迪迪翁与阿伦特联系在一起，后者曾经告诉他，美国人似乎比她在欧洲见过的任何人都更绝望。

当卡津发表了他为迪迪翁写的传略时，迪迪翁已经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明星了。然而她遇到的问题是，能够允许她热情地谈论偏头痛，谈论返回家乡萨克拉门托，或是让她为了一篇文章飞往夏威夷的《星期六晚邮报》关门了。迪迪翁开始寻找新的雇主。《生活》杂志与她签订了撰写专栏的合同，但这种关系很快就恶化了；迪迪翁要求去西贡，因为包括桑塔格和麦卡锡在内的许多作家都去过了。可是她的编辑反对这个提议，告诉她说“某些男性作者会去”。[32]她对这次随意的回绝的愤怒最终转变成了一篇如今非常著名的专栏文章，文章的内容是在预测将有巨浪来袭的时候前往夏威夷的经历：

> 我丈夫关掉电视机，从窗口向外看。我避开他的视线，忙着给宝宝梳头。在没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焦虑处境。我们正身处这个太平洋中部的小岛上，否则我们可能就去申请离婚了。[33]

这篇文章似乎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揭露，但原本关于婚姻问题的框架会渐渐消失。迪迪翁开始告诉你，她如何感到自己与一切失去了联系，以及感受本身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她承认，自己正如一个曾经的男友预测的那样变成一个感受不到任何东西的人。这篇作品中充满了彻底的黑暗和绝望，难怪《生活》的编辑似乎被它吓到了。他们给它取了一个反映了他们的困惑的标题：《创造联系的困难》（*A Problem of Making Connections*）。随后的那些非常私人化的专栏文章也都不怎么符合编辑们的口味。最终迪迪翁在合同到期之前就提出了解约，因为编辑们不肯刊登她的专栏文章。很多年后，她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中提到这件事时会对编辑的冷漠评论作出回击。

这暗示了有关迪迪翁作品的一些重要特征：即使在她描述无法忍受的绝望，在她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随着这个国家一起分崩离析的时候，至少还有另一个运转的引擎在支撑着她。任何一个像迪迪翁描述的那么沮丧和失落的人都不可能写出如此精准的句子，不可能选择如此切中要害的用词。以承认她有可能离婚的文章为例，隐藏在那背后的引擎可能正是愤怒，她愤怒的原因是编辑认为她不是像那些正要去西贡的“男性”一样大胆的作家，这导致她没有机会发挥自己全部的能量。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被收入“糟糕编辑决策博物馆”的错误。

迪迪翁重新开始写小说了。她偶尔会为《时尚先生》供稿，但是发现自己也很难融入那里的风格。从有男性注意到她的作品并希望发表她的文章的意义上说，她显然也已经是“男孩儿”中的一员了，然而她还是无法彻底适应他们的体系。

尽管如此，在女性解放运动正好达到顶峰时，转向女性的杂志对她来说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就像桑塔格一样，她无疑也会被问到关于对这些突然无所不在的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34]的圈子的忠诚度问题。不过迪迪翁一直没有直接作出评论，直到1972年，她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权运动》（*The Women’s Movement*）的文章，其中列出了十六本激励人心的书籍。只不过她显然是因为被《纽约时报》几个月前发行的“女性特刊”弄得厌烦了才这样做的。

迪迪翁不愿意为这个刚刚兴起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赋予过多根据或意义。她甚至向它作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直白的一些攻击。她谈到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撰写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著作时说：“这种头脑发热的激情似乎很有新英格兰特色。”[35]她将这项运动的某些方法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特别提到英国作家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描述的在意识提升会议（conscious-raising session）中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她还在那些将《她选择的伴侣》和《她们》中

的女性人物拆解为无法辨识、过度政治化的漫画人物的女权主义理论家面前为玛丽·麦卡锡辩护："她无法自由的原因是她总是想从男人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36]

然而，迪迪翁的文章并不是对女权主义理念的完全排斥。她只是表露了对于这个在她看来整体上已经陷入了争论琐碎问题的泥潭的统一运动的担忧，因为它争论的都是诸如怎样分担洗碗之类的家务活这样的问题。

> 当然，在运动初期，对这种琐事的滔滔不绝的陈述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将女性政治化的一种关键技术，因为这些女性可能已经习惯于遮掩自己的愤怒，哪怕是在自己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问题，不能实现从个人上升到政治的飞跃，那么这些发现就是没有任何作用的。[37]

迪迪翁还认为，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书中，她们构建了一种自我妄想，迪迪翁将之概括为"受自己的妇科医生迫害"、"每次约会都被强奸"的"每个女人（Everywoman）"。迪迪翁并不否认女性是被看低的对象，是性别角色限定的刻板印象的受害者。考虑到她这个时期的人是怎么描述她的，以及她无法顺利地融入男性主导的杂志圈子，我们无法想象她会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她认为这项运动的主要作家们表达的那些愿望是极端幼稚的。她认定"这些皈依者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罗曼史'"。

迪迪翁以前也谈过女性的状况，往往是在写多里斯·莱辛（Doris Lessing）的上下文中提到的。她写过两篇关于她的文章：一次是为《服饰与美容》，一次是为《纽约时报书评》。在《服饰与美容》上的文章中，因为版面有限，她只说了自己不赞同莱辛的身为女性本身存在一些"不公"的观点。当迪迪翁被邀请评论科幻小说《地狱之行简报》（*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时，她对莱辛的看法已经柔和了不少，部分原因是莱辛本人在此时对女权主义政治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如莱辛形容的那样，《地狱之行简报》是一本“内心空间小说”，它更多是讲疯狂和精神错乱的，而不是要批判现代社会结构的。尽管迪迪翁并不特别喜欢这本书，但她仍然不遗余力地赞美了莱辛，在她看来，莱辛对所有政治思想和行动的直白形式有了彻悟，就如迪迪翁对女权主义的看法一样：

> 寻求解决方案的冲动不仅是她的困境，还是她的时代的指导性妄想。这不是一种我会尊崇的冲动，但莱辛夫人的坚韧不拔中存在着某种最终会让人感动的东西。[38]

迪迪翁和她对女权主义的排斥之间还是存在一些曙光的。她似乎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和希望的同情，尽管她仍然厌恶她们的策略和文章。这种曙光并不强烈，但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不过另一方就未必这么看了。几位女权主义活动家写信到《纽约时报》投诉。其中之一就是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她的作品《违背意愿》（*Against Our Will*）也是被迪迪翁列入自己那篇文章中的作品之一。布朗米勒指出迪迪翁从来没有把自己明确定位为左派，还曾经为《国家评论》撰稿，所以她隐晦地继续说道：

> 真正的硬汉总是站在对手一边，这不是很有趣吗？一周中的任何一天，我都宁愿选择穿着靴子和蓝色牛仔裤，而不是留着修剪整齐的长指甲。[39]

迪迪翁的这篇《女权运动》将她永远地排除在了女权运动之外。事实上，自此以后，人们普遍有了一个批评她的理由：她似乎在以她自己的方式表现某种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气质。尽管她一直在为复杂性辩护，但她却不敢承认在她所描述的这个运动中也发生了许多意识形态的内部争斗：小说家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是争斗中的一派，宣传册作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则是另一派。但是在迪迪翁

看来，她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被她称为“每个女人”的那种人，都应该能够作出与她们已经作出的不同的选择。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剩余时间里，迪迪翁把主要精力花在了电影制作和小说创作上。她和邓恩合作撰写了电影版《顺其自然》，以及重拍版《一个明星的诞生》。她本人则出版了小说《公祷书》（*A Book of Common Prayer*）。她偶尔会为《时尚先生》撰写文章，但她的能量似乎不如以前了。在这段时间里多次避免了离婚的迪迪翁和邓恩夫妇是出色的聚会主人，筹备这些活动也要占据他们很多时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迪迪翁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非虚构作品文集《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

文集同名文章《白色专辑》以那句著名的“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40]为开头，文章内容是碎片化的。虽然这第一句话经常被当作一种自助性的咒语而引用，但迪迪翁其实还在这篇散文中列举了各种虚妄的幻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作家尤其应当为把某种叙事秩序强加到存在之上，以至于“冻结了经验的千变万化”而深感歉疚。

这篇文章中的内容包括一些迪迪翁多年来曾尝试着去做但最终失败的项目。具体来说，她提到了自己与二十三岁的琳达·卡萨比安（Linda Kasabian）的会面，她是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的成员，1969年8月，一群家族成员杀害了莎伦·泰特（Sharon Tate）和在她家过夜的客人，卡萨比安在这个过程中负责开车。

从表面上看，卡萨比安的故事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迪迪翁风格的题材。这就是一个被关于爱和快乐的承诺困住的人，这些东西正是嬉皮士运动的诱惑所在——迪迪翁曾经用大量笔墨论述这些承诺都是虚假的。然而卡萨比安已经走得太远了，甚至是亲身参与了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谋杀案。这些谋杀太过残忍野蛮，在一个将犯罪视为夜间娱乐节目的国家中都算得上超乎寻常。不过迪迪翁最终没能就这个题材进行创

作。曼森谋杀案和琳达·卡萨比安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泥潭中另一个梦幻般的元素，迪迪翁写到那是一段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时间：

>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各种误传，我也记得这件事，尽管我宁愿忘掉。我还记得当时没有人感到惊讶。[41]

在《白色专辑》这本书中，迪迪翁从来没有明确地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道德和哲学空虚的状态下，是什么让她从痛苦中清醒。有可能是她正在制作的电影，也可能是她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的身份终于获得承认，因为《公祷书》收获了良好的反馈。还可能是没有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暴力和反常之后，她发现自己突然开始享受生活了。昆塔纳也在一天天长大，她的婚姻已经熬过了艰难期，她的收入也很不错。

迪迪翁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交上好运的。她遇到了一位和她在《星期六晚邮报》的那些老编辑们相似的新编辑，后者也准备让她尽情发挥她在创作非虚构类作品方面的才华。此时担任《纽约书评》的两位主编之一的西尔弗斯很乐意让迪迪翁在自己杂志的页面上畅所欲言。她的第一篇文章名义上是在评论斯坦利·考夫曼发表在《新共和》上的电影批评文章，而实际上，迪迪翁打算瞄准的目标另有其人：

> 我曾经想知道宝琳·凯尔是如何能够流畅自如地使用那些漫不经心的从属句的，比如“如今电影工作室正在崩塌”，或者她怎么会对行业晚宴的复杂特性作出如此偏颇的解读，以至于将“好莱坞妻子们”描述为“在聚会上滴酒不沾、面色冷凝，坐在一边等着将她们醉醺醺的天才丈夫带回家的”女人。[42]

迪迪翁还继续嘲笑了像凯尔和考夫曼这样在不知道电影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情况下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电影指手画脚的人。她说他们顶多是希望自己能给电影行业带来某种特定的智慧，但这种智慧的“效果其实就像是在纸巾上刺绣，其结果经不住什么严格的审查”。

考夫曼在读了这篇评论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被多作提及，甚至连迪迪翁使用的四段引文也都来自他写的另一本书。于是他写信给《纽约书评》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并且对迪迪翁写评论的真实动机作出了推测：

>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1972年12月9日的那期《新共和》上，我评论迪迪翁女士的电影《顺其自然》时提到了她的同名小说，并表达了我对这两个作品都很厌恶的想法。（厌恶的依据主要是她在自己文章中证实的：这部电影表面上要探讨严肃的主题，其实明摆着就是一种行业产品。）如果我当初赞扬了她的作品，也许迪迪翁女士依然不会喜欢我的文章。我希望如此。但贵报的读者大概会想要知道这有可能是睚眦必报的结果。[43]

迪迪翁一如既往地作出了回应。她坚称就算考夫曼积极评价了她的作品，她依然不会喜欢他的文章，而且“我也会对自己的作品有所怀疑”。

“自我沉醉是和自我怀疑一样普遍的情绪”，[44]她在评论伍迪·艾伦的作品文章开篇写下了这句令人难忘的话。她对艾伦的抱怨与她在十八年前就塞林格的作品发表的意见几乎相同。艾伦扮演的所有角色都是“聪明的孩子”，他们说出的那些带着小聪明的评论都是没有一个严肃的成年人能够轻易接受的。当他们列举让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时，他们都痴迷于琐事，比如棒球明星威利·梅斯（Willie Mays）和爵士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

> 伍迪·艾伦列出的清单就是一份最终的消费者报告，它被认可地引用的程度表明美国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一个次世界，其中的人们僵化地理解一切，他们到死都穿着不搭调的运动鞋，弄错交响乐的名字，偏爱《包法利夫人》。

迪迪翁还特别质疑了《曼哈顿》中唯一还在上高中的角色——玛丽埃尔·海明威（Mariel Hemingway）扮演的特蕾西（Tracy）。迪迪翁称这个角色就是依据她所谓的“另一种青春期幻想”塑造出来的。她觉得特

蕾西太过完美了，而且缺少一个会阻止她和艾伦扮演的四十多岁的神经质男人约会的真实的家庭。一个男性读者给编辑写投诉信，过分详细地表达了反对迪迪翁对显然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制作人的不敬。对此迪迪翁是如何回应的呢？她说：“哦，哇。”[45]

凯尔和迪迪翁一直没有冰释前嫌、成为朋友。詹姆斯·沃尔科特在一本回忆录中提到，凯尔特别喜欢因为迪迪翁对艾尔弗雷德·卡津说的一句话而窃笑，那句话是：“唐纳大队（Donner Party）[46]令我困扰。”[47]这真是太可惜了。能让这两个人产生同感的问题理应不仅限于伍迪·艾伦，因为到这个时候，迪迪翁也开始遭受那种往往追随着成功而来的奇怪的人身攻击。

攻击之一来自作家芭芭拉·格里祖蒂·哈里森（Barbara Grizzuti Harrison），她曾经担任《国家》的评论家，她写了一篇名为《只是失去联系》（*Only Disconnect*）的文章。虽然哈里森在迪迪翁有时会投射出没完没了的困苦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错的观点，但从她开始取笑昆塔纳的名字那一刻起，她就立即毁掉了自己的文章。

另一次攻击出现得晚一些，但是来自一个她熟悉得多的人：玛丽·麦卡锡。迪迪翁算得上某种麦卡锡的崇拜者；她经常在关于女性题材的文章中引用麦卡锡的话，还在批判海伦·格利·布朗和关于女权运动的文章中明确提到过麦卡锡的小说。但麦卡锡终于提到迪迪翁是在她评论后者于1984年出版的小说《民主》（*Democracy*）时，而且她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是令人失望和缺乏诚意[48]：

> 可能谜题中的所有元素都出于电影。也许琼·迪迪翁只是希望自己是一个老派的编剧而非小说家。如果这就是原因所在，那么我感到气愤。因为一个人若想表现得自命不凡的话，他（她）至少应该比这更深刻。[49]

在这一点上，西尔弗斯似乎已经决定，迪迪翁的杰出智慧需要被用到一些更好的目标上，也就是那些可以让她花费数小时的探索性手段去

研究的题材。几个月以来，她和邓恩一直在谈论去拉丁美洲看看，她告诉一位采访者说，这是她提出来的想法。

1982年，迪迪翁抵达了萨尔瓦多。这里的共产党政府毫无疑问是一个可怕的暴力政权。一位大主教就在讲坛上被射杀了；摄影记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大屠杀的场面。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Alma Guillermoprieto）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告诉迪迪翁和邓恩夫妇说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他无法感到安全的国家。就这样，迪迪翁决定像她之前的桑塔格和玛丽·麦卡锡一样，走进黑暗的中心，看看她能在那里发现什么。

与在越南的桑塔格和麦卡锡不同，迪迪翁在萨尔瓦多几乎不需要什么检验自己良心的理由，因为有太多可怕的事情等待着她记录了。

> 前往萨尔瓦多的人会立即获得一种特殊的实用信息，就像前往其他地方的游客要了解货币汇率和博物馆开放时间等信息一样。在萨尔瓦多，人们会了解到秃鹫最先吃的是软组织，眼睛，暴露在外的生殖器，以及张开的嘴巴。人们还会了解到张开的嘴可以被用来表明某种特定的立场，可以被塞入一些有象征性的东西；比方说，阴茎，或者，如果是与土地权利相关的争议，还可以塞入争议地区的泥土。[50]

迪迪翁就是从在萨尔瓦多时开始质疑自己的技巧的。在一个“代表萨尔瓦多可能获得拯救后的未来的样子”的购物中心里，她想知道记录这里销售了什么商品是否真的是一个好主意，这与外面发生的谋杀和恐怖事件太不协调了。她本想在作品中列出这些商品以表现讽刺意味的想法似乎也不再有趣或尖锐了。她会在最终创作的散文中明确地写到这一点，她觉得与其说自己是在见证“故事”，不如说是在“观察黑夜（noche obscura）”。

这种将注意力放在简单的叙事上的观点显然是迪迪翁在她的作品《白色专辑》中已经提出过的。要讲述一个故事，就是要找到事件所谓

的核心，但有时候，核心并不能恰当地代表整件事。这是她在写自己的生活时学会的第一件事。她会写一些让读者觉得是某种坦白的文章，比如关于离婚的，关于她喜欢随身携带笔记本的，关于自尊的。但是她知道她该选择公开什么，以及回避什么；她知道她的故事中的某些元素需要被隐藏。公众愿意接受她所投射的形象这件事显然教会了她一些东西。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迪迪翁会继续写大量关于政治的文章。那时的美国已经熬过了充满幻觉的、梦一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渐稳定下来，并且已经开始进入保守的里根时代。这个国家正在给自己讲述“美国的早晨”[51]，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刚刚开始影响总统选举的大众媒体机器已经变得更加深奥复杂。《纽约书评》的西尔弗斯对迪迪翁谈到这个想法之后，迪迪翁就开始写关于政治的文章。西尔弗斯似乎明白迪迪翁最擅长的题材莫过于故事，还有什么能比国家政治中的故事更离奇呢？——这是一个将会反复出现在她的文章中的观点。

美国政治好像没有从迪迪翁早期的作品中学到任何东西。她在《白色专辑》中写到的“我们为了活着而给自己讲故事”这个事实并不是很受赞美。它会造成某种伤害。毕竟，故事都是自我欺骗的。我们用它们来避免自己看到真相中的某个元素，因为全部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无法承受，或者说，在政治问题中，真相是让人尤其无法控制的。

所以在迪迪翁看来，报道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失败的总统竞选的记者们就太过轻信了，他们太愿意接受这个被提供给他们的故事，然后在没有经过多少独立审查的情况下就把这个故事报道给公众。在这个故事中，杜卡基斯被说成将“成为总统”，但要实现这种转变的要素却一直被模糊带过，政治作家们似乎希望读者接受他们提供的故事而不提出任何疑问。迪迪翁写道：“这个故事是由一些相互理解，和或大或小的心照不宣的协议组成的，大家一致对某些可

以被观察到的内容视而不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有戏剧性的故事线。”[52]这种对“权限新闻（access journalism）”[53]的批评在当时很少见，因为只有身处迪迪翁这样的立场的人才能提出这种批评。迪迪翁的观察不能阻止记者和政治竞选团队中的公关人员的勾结，但她确实让社会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了。

迪迪翁对政治记者的奴隶状态的批判很精彩，但让这种批判更生动的也许是其他一些东西，一些对政治记者生活的个人角度的看法。很久以前，她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位名叫诺拉·埃夫龙的年轻作家并与其成了朋友。埃夫龙后来嫁给了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也就是通过报道水门事件有效地弹劾了尼克松总统的两位记者之一。他们的关系并不美好，但这段婚姻在建立初期还是非常稳固的。身为水门事件中的丑闻揭露者足以证明，伯恩斯坦不是迪迪翁厌恶的那种白宫党派路线的忠实奴仆。他们两人也成了朋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伯恩斯坦写了一本关于他的共产主义者父母的回忆录，迪迪翁是最先读到这部作品的人之一。

但是，埃夫龙和伯恩斯坦的关系可就没有这么和谐了。

---

[1] Pauline Kael，“The Current Cinema，” *New Yorker*，November 11，1972.

[2] Dunne，“Pauline.”

[3] 此处关于迪迪翁的家庭的细节出自Tracy Daugherty，*The Last Love Song*：*A Biography of Joan Didion*（St. Martin’s，2015）。

[4] 此处疑有误，应为韦斯特。

[5] “Joan Didion，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1，” *Paris Review*，Spring 2006.

[6] *Where I Was From*（Vintage，2003），211.

[7] “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Saturday Evening Post*，January 14，1967，

republished as “Goodbye to All That” i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68）.

[8] “Jealousy：Is It a Curable Illness？” *Vogue*，June 1961.

[9] “Telling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 2006年6月3日参见国家图书奖活动时接受的采访，之前可在网上观看，此处依据的是从作者处复制的文件。

[10] “Finally （Fashionably） Spurious，” *National Review*，November 18，1961.

[11] “The Current Cinema，” *New Yorker*，November 11，1972.

[12] “Letter from ‘Manhatt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ugust 16，1979.

[13] Pauline Kael，“The Current Cinema，” *New Yorker*，October 27，1980.

[14] “Movies，” *Vogue*，February 1，1964.

[15] “Movies，” *Vogue*，March 1，1964.

[16] “Movies，” *Vogue*，June 1，1964.

[17] “Movies，” *Vogue*，November 1，1964.

[18] “Movies，” *Vogue*，May 1，1965.

[19] “How Can I Tell Them There’s Nothing Left，” *Saturday Evening Post*，May 7，1966，republished as “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 i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20] 霍华德·威克斯写给编辑的信，*Saturday Evening Post*，June 18，1966。

[21] “The Big Rock Candy Figgy Pudding Pitfall，” *Saturday Evening Post*，December 3，1966.

[22] “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23] “Pretty Nancy，” *Saturday Evening Post*，June 1，1968.

[24] Nancy Skelton，“Nancy Reagan：Does She Run the State Or the Home？” *Fresno Bee*，June 12，1968.

[25]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Saturday Evening Post*，September 23，1967.

[26] 桑尼·布伦特伍德写给编辑的信，*Saturday Evening Post*，November 4，1967。

[27] “Places，People and Personalities，” *New York Times*，July 21，1968.

[28] “Her Heart’s with the Wagon Train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y 16，1968.

[29] 参见*Los Angeles Times*，August 2，1970上这个标题的文章。

[30] 参见*Newsday*，October 2，1971上这个标题的文章。

[31] Alfred Kazin，“Joan Didion，Portrait of a Professional，” *Harper’s*，December 1971.

[32]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Vintage，2006），111.

[33] “A Problem of Making Connections，” *Life*，December 9，1969.

[34]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一种方式，以“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为旗帜，由公民权利运动发展至妇女解放运动，将“政治”和“经济”延展至身体、情感、家庭等过去被视为私人的范畴，也常称为awareness-raising。——编者注

[35] “The Women’s Movement，” *New York Times*，July 30，1972.

[36] 迪迪翁引用了Wendy Martin，ed. *The American Sisterhood*：*Writings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Harper and Row，1972）。

[37] “The Women’s Movement.”

[38] “African Stories，” *Vogue*，October 1，1965.

[39] 苏珊·布朗米勒写给编辑的信，*New York Times*，August 27，1972。

[40] “The White Album，” in *The White Album*（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9），11.

[41] “The White Album，” in *The White Album*（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9），142.

[42] “Hollywood：Having Fu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22，1973.

[43] 写给编辑的信，*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pril 19，1973。

[44] “Letter from ‘Manhattan.’”

[45] “They’ll Take Manhatt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11，1979.

[46] 又称作唐纳-瑞德大队，指的是一群在1846年春季由美国东部出发，预计前往加州的移民队伍，他们是由数个家庭组成的大篷车车队。由于错误的资讯，他们的旅程遭受延迟，导致他们在1846年末到1847年初受困在内华达山区度过寒冬。在恶劣的环境下，接近半数成员冻死或者饿死，部分生存者依靠食人活了下来。

[47] Wolcott，*Lucking Out*，61.

[48] 原文此处为“deathlessness”，疑为印刷错误，可能应为“depthlessness”。

[49] “Love and Death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April 22，1984.

[50] *Salvador*（Vintage，2011），17.

[51] 1984年的里根竞选团队制作的电视广告，广告词的第一句话是“美国又迎来了新的早晨”。

[52] “Insider Basebal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27，1988.

[53] 指引用来源不明的论断并不对之作检验和判断的新闻行为，往往信息单一，措辞含糊，预设采访结果，回避争议，比之新闻客观性和全面性的价值理念更看重通过名人效应引起关注，与政界、文艺界、体育领域等名人关系密切，通过特殊的权限获得消息，亦反过来为维持这种权限服务于这些名人。

第十一章 埃夫龙

诺拉·埃夫龙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讲的是卡尔·伯恩斯坦以及所谓他毁了她的生活的故事。这对夫妇是在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纽约相遇的，他们能够一拍即合的原因可能是他们都有一种好斗的精神。伯恩斯坦仍然拥有他因为在水门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而获得的桂冠；埃夫龙则是一位畅销的女权主义作家，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已经被普遍视为一个风趣幽默的公众人物。用八卦杂志的术语来说，两位才华横溢的人彼此钟情就是天作之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某种“拥有一切的情侣（It Couple）”，并于1976年正式完婚。那时的他们身处世界之巅——直到他对妻子不忠，他们也跌下了神坛。

这至少就是《心火》（*Heartburn*）这本书为你描绘的情景：一段原本可能很完美的婚姻的血淋淋的终结。埃夫龙设计的叙事者雷切尔·萨姆塔特（Rachel Samstat）写道：“第一天我认为这不好笑，第三天我依然这么认为，不过我已经可以用它开个小玩笑了。”[1]不过这个玩笑并不小，《心火》是一个长长的，以不得不带着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离开花心的丈夫的绝望为对象，还穿插介绍了各种食谱的大玩笑。叙述者因为自己没能早点发现丈夫偷情而自责不已，不过她对丈夫的怒火当然比对自己的更盛。埃夫龙写道：“这个男人对着威尼斯式百叶窗都能发情。”这本书甚至会为痛批这个丈夫的方式而觉得不自在：

> 每个人都总在问我，他会不会因为你写这本书而生气？我不得不说，会的，会的，他生气了。他到现在还在生气。对于我来说，这是整件事中最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他背叛了我，然后表现得好像他才是受了伤害的

一方，就因为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了！

《心火》这本书就是埃夫龙经常用来形容自己使命的那句口号的化身："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她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经历，然后把它转化成了每个人都喜欢的小说。虽然有些媒体质疑了这部作品，但《心火》成了一本畅销书，它让埃夫龙富有了一段时间；还帮她离开了伯恩斯坦。所以，它担负的使命几乎都完成了，但这也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它使得埃夫龙将永远被这次经历定义。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诺拉·埃夫龙都不是一个喜欢纠结于糟糕的往事的人。在她人生的晚期，她曾对一群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的毕业生说道："最重要的是，做生活的女主角，而不是受害者。"[2]

这句话听起来鼓舞人心，但也有些油腔滑调。不过埃夫龙会这么说是因为她对身为受害者有所体会。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当中，她是唯一一个与多萝西·帕克有直接联系的人。埃夫龙的父母都是编剧，他们在好莱坞时与帕克成了朋友。虽然在埃夫龙的童年时代，帕克是她家的常客，但埃夫龙对于帕克的记忆已经模糊："她身体瘦弱、娇小玲珑，眼睛里闪烁着光彩。"[3]年轻时的埃夫龙把帕克视为偶像，或者至少是崇拜着她表现出来的样子。埃夫龙为帕克曾经是"圆桌旁唯一的女性"，是曼哈顿每一个文雅聚会上的风趣而有才华的重要人物这件事着迷不已。她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她将这个目标称为自己的"多萝西·帕克问题"。当然，帕克的传记最终会纠正她对帕克的生活抱有的幻想，也会让她了解关于酗酒和"受害者"情结的问题。埃夫龙宣称自己从那时起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梦想。"在人们过于认真地弄清楚一切之前，那原本是一个美好的神话，放弃它很难。"

其实埃夫龙自己家中也发生过幻想破灭的事，只是她不愿意承认而已。诺拉1941年出生，是菲比和亨利·埃夫龙（Phoebe and Henry Ephron）的四个女儿中的老大。因为一种性格和天赋的神奇配比，这个家庭里的人创造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四个姐妹最终都会成为作家，其中

三个是回忆录作家。亨利·埃夫龙本人也写了一本回忆录。据大家所知，这种自我展示的艺术是从埃夫龙家的餐桌上就开始培养的。一家人每天晚上都会比赛谁是家中最风趣的人。在这个家庭的历史中，特别是诺拉选择抛在脑后的那段过往中，这样的时刻大多被描绘成了诙谐幽默的场景。她说是他们让她体会到了幽默具有的让人自由的威力。

最有趣的人是埃夫龙的母亲菲比。她像丽贝卡·韦斯特的母亲一样是位多才多艺的女性，而且可能也像她一样嫁错了人。

菲比·埃夫龙在布朗克斯区（Bronx）长大，曾经在商店里做店员。她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亨利时，后者还只是一个有抱负的剧作家。菲比受到了亨利的追求，但是在同意嫁给他之前，菲比坚持要先读读他的作品，看这些作品是否足够好。[4]这是一个全家人都很喜欢的故事。菲比凭借自己的本事赢得了权威，她总能吸引房间里所有人的注意。她告诉女儿们说，生命中没有比独立更宝贵的价值。诺拉记得母亲从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对她们说："如果我没能教会你们要自己作决定，那告诉你们我的想法也没有用。"[5]菲比的生活也是一种例外。她和帕克一样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女性编剧之一，她坚持做只有男人能做的事情：

> 她不是空想家或教条主义者；虽然她用《玩偶之家》的女主角的名字给我取名，但她无法忍受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她只是我行我素，就因为有她为榜样，我们从小都是带着对自己能力和命运的盲目自信长大的。[6]

这样的勇气听起来值得尊敬，这就是一个讨厌女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女权主义者的完美故事。（韦斯特和埃夫龙的名字都来自易卜生的戏剧是一个美丽的巧合。）但是后来埃夫龙透露，从她十五岁起，母亲开始大量饮酒。埃夫龙写道："前一天，她还不嗜酒，第二天她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酒鬼。"[7]随着酗酒一起出现的还有大量的叫喊和争吵。（亨利也喝酒，而且还是一个花花公子。）埃夫龙承认，她在菲比人生的最后几年甚至会惧怕母亲。当母亲到埃夫龙就读的韦尔斯利学院看望她时，

埃夫龙发现自己一直紧张地等待着必然发生的事，整晚都在担心母亲会开始疯狂尖叫。不过对于埃夫龙的同学来说，那时的菲比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因为埃夫龙的父母写过一部在百老汇大获成功的剧本。菲比·埃弗龙的酗酒问题会一直持续十五年，几乎不曾间断，直到她五十七岁时死于肝硬化。

诺拉·埃夫龙在给母亲的悼词里并没有提及所有这些事，因为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化这一切。菲比·埃夫龙就是那个创造了“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这句话的人。但在最初，并不是任何内容都可以被借鉴。埃夫龙直到七十多岁时才会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希望母亲早点去世。在此之前，她讲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都是简单清新，田园诗一般的，只有说俏皮话的天赋简单地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而已。埃夫龙经常反复讲述一个特定的临终故事是这样的：

> 我想她那时已经知道自己快死了，她转向我说：“你是记者，诺拉，要记笔记。”这让她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坚强。她曾经很坚强——那很好——但她曾经也很温柔，有些神秘，并且非常骄傲。[8]

埃夫龙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记笔记”的故事，但关于温柔——关于她母亲的矛盾——则大部分未被提及，直到埃夫龙在2011年出版的最后一些散文集中写到母亲的酗酒问题时，这些内容才终于浮出水面。可见菲比·埃夫龙在坚强和风趣之外，还教会了女儿一些关于人性的东西。

*

埃夫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得不建立起一种人格面具。她的父母极度坚持“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的信念。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把他们在布朗克斯与菲比的父母一起生活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名为《三人是一家》（*Three Is a Family*）的戏剧。这部剧是一场轻松的闹剧，意在作为晚间的娱乐消遣，但却引来了不好的反响。当这部戏剧被改编成电影时，宝琳·凯尔特别讨厌的《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家，傲

慢自大的博斯利·克劳瑟（Bosley Crowther）称该电影“特别幼稚”。[9]后来埃夫龙到韦尔斯利学院上学时，她写的家信激发了父母创作另一个剧本的灵感，这部名为《抓住她，她是我的》（*Take Her，She's Mine*）的舞台剧实际上也是她父母最后一部真正受欢迎的作品。父母显然为女儿的风趣感到骄傲，他们忍不住在戏剧中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

> 附言：我是班上唯一仍然戴着牙齿矫正器的人。我可不想在这种事上鹤立鸡群。请询问希克医生（Dr. Schick）这是否绝对必要。如果他说是，那么我很可能也还是要摘掉它。[10]

这部剧在百老汇首次登台时，埃夫龙还是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批评家们立刻爱上了这部剧。《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称其为“欢笑的暴风雨”。[11]《剧艺报》也表示认可，说它“讲故事的方式很有趣，台词中充满了会让人掩口轻笑或捧腹大笑的内容”。[12]这部剧从1961～1962年一直上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校园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

埃夫龙会以她标志性的冷淡描述这一切。但是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了解成为别人作品的素材，让别人从她的生活里挖掘可作为戏剧和电影剧本内容这件事带来的无奈了。正如琼·迪迪翁的那句名言说的那样：“作家总是要出卖一些人的。”[13]埃夫龙比大多数人更早地了解了这个规则。她从不谈论这件事给她造成的困扰，但这种困扰体现在了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上。

*

不管怎么说，埃夫龙显然不是一个喜欢沉迷于往事的人。她总是说1962年离开韦尔斯利学院前往纽约时的自己反而觉得像是要回到家乡一样。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贝弗利山庄度过的，但她坚持认为自己从未喜欢过那里。她没有写过多少关于高中时代的文章，她青少年时期的照片看起来尴尬笨拙，穿着打扮一点儿都不时髦。她似乎也没有任何

明确的职业抱负；她不像桑塔格一样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渴望想象中的欧洲。她到达纽约之后直接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跟中介人员说自己希望成为一名记者。职业介绍所知道《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些职位空缺，但中介人员告诉她，那里的女性都不是作家。与我们印象中的总是抗拒性别规范的埃夫龙不同，她说当时还年轻的自己轻易地接受了这些障碍。

> 我从没想过要提出异议或者说："你对我的看法将被证明是错的。"当时的人都认定，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做某些事，她就必须成为能超越标准的特例。[14]

埃夫龙和一位朋友一起住在沙利文街（Sullivan Street），当时这里还被认为是格林尼治村的南部，她搬进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一地区在庆祝圣安东尼节（Feast of St. Anthony）。

埃夫龙在《新闻周刊》的工作不是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名调查员。所以从写作的角度说，这个职位让她失望；埃夫龙离署名文章最近的时候，是看到被放在自己的老板，报纸总编的办公桌上的别人的文章的时候。和本书中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埃夫龙实现突破的机会也不是来自某个有声望的杂志社的编辑，而是来自一个规模较小的杂志社的编辑。维克托·纳瓦斯基（Victor Navasky）是一份名为《单片眼镜》（*Monocle*）的幽默杂志的编辑，后来还会成为《国家》的编辑。埃夫龙在杂志举办的众多聚会之一上认识了纳瓦斯基。他觉得埃夫龙很风趣，所以当1962年末出现报社罢工时，纳瓦斯基邀请她写一篇诙谐模仿文，她要模仿的对象是当时的一个著名八卦专栏，叫"莱昂斯的小窝（Lyons'Den）"，专栏作者是伦纳德·莱昂斯（Leonard Lyons）。结果这篇文章引起了《纽约邮报》编辑的注意，他们立即向埃夫龙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对埃夫龙的文章印象深刻，并作出抓住她这个人才的决定的人是

《纽约邮报》的出版人，多萝西·希夫（Dorothy Schiff）。希夫是一位已婚的社交界名人，她展现了一种富有女性的独立性，这一点与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相似。埃夫龙后来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评论希夫的文章，因为内容太过严苛，以至于她觉得有必要在开篇处事先说明："我将要在这里做的事让我感觉糟糕。"[15]但是，如果没有希夫，就不会有后来被美国人熟知的诺拉·埃夫龙。在那些年里，首先是名记者，其次才是作家这个概念是埃夫龙人格面具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说到的激励她成为记者的人经常变。有些时候，她说这个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6]的喜剧《女友礼拜五》中的希尔迪·约翰逊（Hildy Johnson）。埃夫龙喜欢笑话，也喜欢喜剧。她将开玩笑视为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这意味着埃夫龙从很早开始就知道，她想成为公共事务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

> 被新闻行业吸引的人通常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玩世不恭，或情感疏离，或沉默寡言，或其他什么因素而只能作为事件的见证者的人。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们参与或投入这些事件，让他们保持置身事外。把我与我所写的东西分隔开来的是怀疑，是一种认为事情很荒谬的感觉，这让我对很多事情都无法太当真。[17]

埃夫龙在《纽约邮报》时显然遇到过很多荒谬的事。尽管她总是赞美这个地方教会她如何报道和快速写作，但她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地方。整个办公室都脏乱不堪；记者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桌，他们每天都得争先恐后地抢占一个座位。但埃夫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坚强性格，这可能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甚至可能就是由她母亲培养的。在挑战之下她似乎发展得很好。她报道过各种题材：很多犯罪案件，不少对当地政客的介绍，甚至还写过一位名叫苏珊·桑塔格的迅速走红的新作家的传略。（那是一篇平淡无奇的文章；她们谈到了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感受，还谈到了桑塔格的继父以及他对她说如果她读太多书，可能永远也嫁不出去的事。[18]）

但是在这里的工作内容并不总是好的。希夫对她的报纸或她自己的声誉都不怎么在乎，她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怪异和焦虑的源泉。她为人小气，不愿意慷慨对待她的员工。希夫是当时纽约唯一的女性出版人，但她绝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不喜欢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因为她担心正是阅读《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这类书鼓励了她女儿离开自己的丈夫并投身政治事业。有一次，多萝西·希夫试图让埃夫龙去调查住在自己隔壁的导演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是否在他的公寓里安装了桑拿房。希夫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证据是她说自己在一天中的所有时间都能听到流水声。埃夫龙给她发了一份备忘录，耐心地解释了桑拿房不需要流水。于是希夫又将这个任务安排给了另一名调查记者。他当然也查不出任何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知道这么多关于多萝西·希夫的荒谬故事，就是因为诺拉·埃夫龙把这些内容都记了下来，否则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遗忘。在离开《纽约邮报》很久之后，埃夫龙在为某杂志写的新闻专栏中不仅列举了希夫的所有糟糕品质，还总结了这份报纸的各种缺点。在这篇专栏文章中，埃夫龙说在广播节目中讲述普雷明格的故事之后，自己最近才刚刚与希夫讲和，但是此时又要对她进行攻击了。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纽约邮报》是一份“糟糕的报纸”，以及希夫就是掌舵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会说就让人们阅读糟糕的东西吧（let them read schlock）[19]。”[20]

使埃夫龙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置身事外的特殊素质也让她非常愿意攻击自己的雇主。多年来，她不惜激怒她认识的人的意愿，以及用凯尔或韦斯特或任何前人使用过的方式作出的攻击成了她的一种职业资产。比如她对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Julie Nixon Eisenhower）的评价就极具攻击性：“我认为她是一只蜘蛛。”[21]正是这种猛烈凶狠让她登上电视节目，并建立起一名社会批评家的声望。此时距离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因为自己创作的那些更温暖、更宽容的浪漫喜剧而为人所知还有

很长时间，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从来没有改掉置身事外这个习惯。女演员梅格·瑞恩（Meg Ryan）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认为她对语言比对人更忠诚。”[22]

埃夫龙离开《纽约邮报》后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感觉到她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评论家的《纽约时报书评》是第一个真正开始让她发挥才能的地方。她就是在这里发表了一篇模仿安·兰德（Ayn Rand）的“头部遭受创伤性损伤的海明威”风格的诙谐模仿文：

> 二十五年前，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笑了。他赤身裸体地站在悬崖的边缘，脸上涂着颜料，他的头发和鲜亮的橙子皮一个颜色，他的身体笔直，每个线条和角度都清晰流畅，每个弯曲的地方都变成了光滑，整齐的平面，霍华德·罗克笑了。[23]

对《纽约时报》安排的每一个主题，埃夫龙都会带着浓厚的兴趣深入探究。迪克·卡韦特（Dick Cavett）是一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作家们会在这位梳着精心打理的发型的主持人面前争论一些他根本听不懂的问题。诺拉·埃夫龙早期为这位主持人写过一篇传略。卡韦特的经纪人管他叫电视先生（Mr. Television），起初似乎是为了取笑他，但他写了长长的，充满琐碎小事的四段话来拒绝这个头衔及进行自我批评。埃夫龙连续引用了全部四段话，以此来说明卡韦特所谓的自我沉醉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 我还会收到问我为什么总是系同一条领带的来信。我没有总系同一条。我有两条。[24]

她还写过一篇赏析雷克斯·里德（Rex Reed）的文章，里德是一位记者，后来成了电影批评家。埃夫龙称他是“一个轻佻、好窥探，脾气不好的男人，他看待事物的眼光很敏锐，并成功地让我们所有人成了偷窥者”。[25]她明确表示，这些都是让她欣赏的作家的品质。

不过，埃夫龙并没有将多少早期的作品收录起来，比较这些文章和她其他的作品时，你很可能会怀疑问题通常是出在编辑给她指定了乏味的主题上。1969年，她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名为《出版商约在哪里吃饭》（*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的文章，其中记录了代理人、图书编辑和作家总喜欢花很长时间一起吃午餐这个易于被拿来取笑的主题。埃夫龙处理这个主题时很谨慎，不过在文章末尾她还是设法说服了一位经纪人承认“这样的两小时午餐时间还不如用来回电话”。[26]

当然，埃夫龙也必须小心地保护自己的谋生能力。在那段时间及后来的采访中，她说在1974年之前，她一年的收入不超过一万美元，堪堪满足生活需要。[27]埃夫龙和她之前的桑塔格一样，也靠为女性杂志写文章挣钱，特别是《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创作那些文章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因为用埃夫龙的话说，那些作品不能按照“最能让身为作家的我感到满意的知性水平”完成。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作品也是将她推向女权运动的原因，因为她对分配给自己的题材，尤其是海伦·格利·布朗安排给她的那些感到无比沮丧。不难想象，当时她能写的无非是关于形象改造、旅行、性和科帕卡瓦纳歌舞女郎（Copacabana showgirls）的文章。

但格利·布朗确实让埃夫龙创作了一个突破《世界主义者》通常的活泼风格的题材。可能是因为时尚小报《女装日报》总是用不友善的言辞来记录格利·布朗作为杂志编辑的职业生涯，而且这些内容让格利·布朗感觉受到了伤害，所以她同意让埃夫龙就此问题写一篇文章。埃夫龙痛批了《女装日报》编辑的自命不凡。她写道这份报纸不过是一个八卦小报，其受众只是一小群被称为“女士”的读者，埃夫龙无情地嘲笑了她们奢侈无度的虚荣生活：“除了中间吃顿午饭，成天无事可做的日子让人觉得有点难为情。”[28]她还说这份杂志就是一个“代理贱人”，它在找借口嘲笑名人外表的同时，硬把自己的行为称作新闻报道。

埃夫龙正是在借用这本杂志自身的风格来打击这本杂志的：据埃夫龙说，该杂志的习惯是表面上装出一副值得相信，随便开个玩笑的样子，借此来遮掩它对那些职业女性作出的，关于她们的穿着打扮、她们的约会方式，以及她们如何打理自己的工作事务的破坏性的评论。埃夫龙后来写道，《女装日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在语气和风格上的讽刺的模仿，还威胁说要起诉。

但是，海伦·格利·布朗也许早该想到，埃夫龙在为《世界主义者》写文章的时候，同样也在收集关于这本杂志的材料，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它的主编的材料。埃夫龙的文章也吸引了《时尚先生》的编辑的注意。她在那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格利·布朗的传略，而且是一篇试图凸显她最糟糕的个性特征的作品。在这篇传略中，埃夫龙认为格利·布朗的问题不是她受到批评时只会哭，也不是她的批评者们经常提到的一些道德败坏的倾向，比如她建议年轻女性与已婚男士约会。相反，她抓住自己曾经的主编不放的问题是一个可能只有在这份杂志中工作过的作家才能看得如此清晰的问题：那就是格利·布朗对全体女性的智慧的侮辱：

> 她非常努力地想要证明，有超过一百万的女性愿意花60美分买这份杂志，不是为了了解政治，也不是为了了解女性解放运动，更不是为了了解越南战争，她们只想了解如何找到如意郎君。[29]

这一论点与迪迪翁对海伦·格利·布朗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迪迪翁也在文章中抱怨过某位流行杂志编辑的低俗品味，说她希望成为“小公主，成为实现自己的书籍和所有广告中悄悄承诺的愿望的女人，成为遇到各种好事的女孩”。[30]但是，埃夫龙并不是站在一个高人一等、鄙夷轻视的立场上写这篇文章的；因为她能够以迪迪翁所不能的方式理解这种轻浮具有的吸引力。所以，她才选择从一个更加民主的角度来批评格利·布朗。她承认自己也是《世界主义者》的读者和作家之一，她还问道：“你怎么能对有你电话号码的人生气？”格利·布朗起初没有意识到

埃夫龙的这种同情心。她讨厌这篇文章，更讨厌随文章一起刊登的配图，但是没过几天，她就原谅了埃夫龙。[31]

埃夫龙表达愤怒的下一个目标是耶鲁大学古典系教授，畅销小说《爱情故事》（*Love Story*）的作者埃里克·西格尔（Erich Segal），和诗人罗德·麦昆（Rod McKuen）。埃夫龙自称是一个通俗作品爱好者，尤其喜欢杰奎琳·苏珊（Jacqueline Susann）的小说。她断言道："我从不相信通俗套路会让人厌烦。"[32]但她无法忍受西格尔和麦昆的多愁善感，也无法忍受他们给自己设定的在公众面前的人格面具，特别是西格尔的。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当时正与西格尔的书争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位置，于是西格尔养成了一个公开谴责罗斯对性的露骨描绘的习惯。（对于一本情节俗套的爱情小说来说，《爱情故事》里完全没有性爱场面的描写倒是很不同寻常。）埃夫龙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 所有人都喜欢埃里克的演讲。所有人，或者说，除了电影批评家宝琳·凯尔之外的所有人。凯尔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的作者书籍午餐会上听过埃里克演讲的早期版本。之后凯尔对埃里克说他的演讲是在攻击言论自由，也是在拍听众的马屁。对此埃里克的回答是："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卖书，不是吗？"

这种能够站在一个广阔的现象之中，知道它是如何迎合和欺骗人格的最基本方面，然后又能够以一个内部人士的角度批评它的能力使埃夫龙成了几乎比其他人都出色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事件的记录者——尤其是在对女权运动的记叙方面。她既能参与其中，又能置身事外，是一个总是被卷入所有事件，又能像局外人一样冷静旁观的存在。敏锐的感知力是种天赋，在那些年里，她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天赋。当然，埃夫龙后来作为电影制作人的声望几乎盖过了她作为一名作家取得的所有成就。但她的文字作品才是体现了她不可磨灭的印记的东西，这种印记来源于她的个性，她的识人能力，以及在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泰然自若地向他们发起攻击的能力。这让她成了那种人们会以她为荣，渴望取

悦她，甚至有点怕她的朋友。这也是让她那一时期的作品都非常精彩的原因。

在埃夫龙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以第一人称写作。不过因为她早期接受的作为记者的训练，她始终觉得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有点儿不够公正。在《纽约邮报》时接受的训练让她学会了不要把文章写成自己的故事。所以最开始写散文的时候，她要在编辑的鼓动下才开始使用第一人称。但是到了1970年，当她把自己早期的作品收录到一本名为《疯狂聚会上的壁花》（*Wallflower at the Orgy*）中时，她承认她已经对这种限制感到有点儿不耐烦了。

> 某些时候，在采访进行过程中，我会感到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想要张口大喊的渴望："我！我！我！说了太多你了。我呢？"[33]

多年以后，在作为一个真正著名的人物接受过各种采访之后，埃夫龙会为这种年轻时的虚荣心感到难为情。不过，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能够比她在1972年为《时尚先生》写的《浅谈乳房》（*A Few Words About Breasts*）更完整地展现埃夫龙本人，以及她的声音和她的视角。

写这个主题是需要观察结果做基础的：埃夫龙本人的胸部异常平坦。这显然是家族遗传的结果；她记得自己的毒舌母亲在女儿们要求购买第一件文胸时是这么回答的："为什么不用创可贴呢？"[34]

埃夫龙写道：女性加入了一场不曾停止过的"评论乳房大小"的游戏。她承认自己也曾执着于这个问题，甚至还购买过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处可见的蛇油丰胸产品。一位大学时期的男友的母亲曾在谈话中向她暗示，由于这种缺陷，她永远无法在性方面获得满足。埃夫龙在文章结尾处写的一段话将成为她的一个标志性做法：她在这里考虑了所有与她的经验对立的论点，以及那些坚持认为乳房娇小的人穿衣服更合身，也更少被戏弄的人们。这是一种新闻行业的客观性的表现，但埃夫

龙说自己从来不相信什么客观性，即便是在她害怕完全从“我”的角度写作之前也不相信。接下来，她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戳破了：

> 我考虑过他们的观点了，试图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1972年5月的《时尚先生》中，这是埃夫龙在她母亲去世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可能有一些意义，而且这篇文章为杂志吸引了许多读者来信。

在写了关于她的乳房的这篇文章之后，《时尚先生》为埃夫龙安排了一个专栏。多年来，关于这个专栏应当关注女性问题的想法究竟是埃夫龙还是杂志编辑提出的说法不一。无论这个功劳应当归结于谁，这种安排确实是一个绝配。

在埃夫龙开始写这个问题时，她已经关注女权运动一段时间了，这意味着她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观察结果。她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探讨的是一个几乎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写过，但当时还很少有人愿意直白地论述自己观点的问题：女权主义革命是否会引发两性对对方性幻想的方式的变化？埃夫龙认为自己仍然足够正派到不愿太过明确地描述自己的幻想，但至少可以说其中涉及了支配地位的问题，而且她已经知道女权主义者不应当想要在性关系中处于被男性主导的角色。她没有在专栏文章中给出任何真正的答案，而是在最后写了一段充满自觉的话：

> 我意识到，在《时尚先生》上写一个关于女性的专栏有点像给一群爱尔兰天主教徒讲一个犹太人的笑话。我对这场运动的批评似乎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背叛；在这样的上下文环境中，我想要带给这个主题的幽默感也可能会被看作轻率无礼。[35]

埃夫龙确实是在敌人的领地中跋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当时的《时尚先生》还不像它现在这样依靠名人效应，而且它将自己视为

一份文学杂志而不是时尚杂志。埃夫龙的专栏是独一无二的。她不像桑塔格和迪迪翁那样从远处观望女权运动，然后对它进行笼统的批评。但埃夫龙也不是那种一头扎进去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并没有把自己的专栏当成支持任何政治纲领的阵地。

埃夫龙发动的第一次攻击是针对另一位作家的。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是流行小说《前毕业舞会女王回忆录》（*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的作者。这本书在当时是畅销书，以主人公回忆自己被第一任丈夫强奸为开篇，之后就转向了该书真正的主题，即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美丽正遭遇危险："我曾经以为，如果我能确定我仍然美丽，离开就不是什么难事。"[36]舒尔曼接着还宣称，实际上美丽的人和丑陋的人一样有很多困扰，只不过是不同的困扰。她还以玛丽莲·梦露等人为例来解释美丽带来的苦难。

埃夫龙从来没有被视为一个美女，她发现书中的这个论点让人难以接受。埃夫龙坚称，包括自己在内，"全国没有哪一个丑女孩不愿意用自己的困扰交换身为美女的困扰"：[37]

> 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写道："他们说长得丑更糟糕。"是的，人们确实这么说。而且人们说得很对。贫穷也会更糟糕，成为孤儿、成为胖子都会更糟糕。那不仅仅是与家财万贯、父母双全、身材苗条不同——而是更糟糕。

这篇作品因此戳穿了女权运动中非常流行的一句台词。舒尔曼是女权运动中的一位知名人物，她曾在《女士》杂志上刊登了自己和丈夫签订的婚姻契约，其中将人们可以想到的所有家务活都列举出来并分配给了婚姻双方。没有其他人以这种方式批评过她，尽管迪迪翁将舒尔曼的婚约作为女权运动正越来越纠结于琐事的证据。但埃夫龙不是把舒尔曼当作一个排斥整个运动的理由；实际上，她试图用一段更有同情心的评论来结束这篇具有杀伤力的文章。她说自己对舒尔曼的评价并不公平，

对女权运动的也是如此：“我正在努力，就像所有关于解放的事情一样，姐妹情也是一个难题。”

“姐妹情也是一个难题”也许可以被当作她的专栏文集的另一个标题。［埃夫龙在1975年时以《疯狂的沙拉》（*Crazy Salad*）为名出版了这本文集。］事实上，埃夫龙在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里都在尽力用令人愉悦的说法描述女权运动，但她描述的不是女权主义强调的那些基本原则，而是现实中的女性对这些原则的诠释。有一篇专栏文章报道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迈阿密举办的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事。女权主义活动家在这次大会上的目标是在民主党的党纲中获得一些认可和承认，但是如埃夫龙看到的那样，她们除了内斗之外什么也没做成。那里发生的事情糟透了，但埃夫龙还是不得不对其进行描述，她特别写到了弗里丹对于年轻一代正在迫使她退居二线的方式感到的愤怒：

> 这［个运动］是她的孩子，该死的。她的运动。难道她应该静静地坐在那里，让一个漂亮、苗条的女人把她的孩子抢走吗？[38]

当时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位实际领导，其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正处于顶峰时刻。虽然她比弗里丹更盛气凌人，还有朋友可以替她解决那些见不得光的问题。但是从埃夫龙的镜头中看到的斯泰纳姆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对斯泰纳姆作出了某些关于党纲的承诺，后来却将她抛在一边，斯泰纳姆为此大哭一场。埃夫龙并没有像以前批评海伦·格利·布朗只会哭那样批评斯泰纳姆哭的问题，但是她为导致她大哭的理由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因为生活中任何哪怕跟政治沾一点边儿的问题而哭过，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埃夫龙告诉一位采访者说就因为她在报道中简单提到了斯泰纳姆的眼泪问题，她的许多朋友“对我大喊大叫”。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此而

生了好多年的气。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埃夫龙这种有同情心，但也保持怀疑的论调的。今天的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假设人们对女权运动只能有一种反应：要么全心投入，要么两不相干。但是，第二次浪潮并不是像迪迪翁这样的批评家们有时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统一的阵营。运动内部也充斥着派别分立，有对不同年龄、种族及其他各种女性内部的断层线如何反应“身为女性”这个问题的方式的争论。任何现实中的人在看到这一切时都无法不产生充满矛盾的观点。人们可能会同时感受到极端的、无法控制的满怀希望和失望透顶。

所有这些矛盾的感觉或许就是让埃夫龙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的原因：她在批评这项运动的荒谬和丑陋之处时毫不留情，但她是以一个运动参与者的身份作出这些批评的。而且一贯比较温和的埃夫龙偶尔也会对批评家的选择性省略提出更正。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她反对迪迪翁坚称的女人的生活包含“流血[39]，生育和死亡”，她认为这种定义“离奇和令人费解”。[40]到这个时候，迪迪翁和埃夫龙对彼此已经变得友善，她们出入的都是相同的圈子。也许埃夫龙对迪迪翁产生了好的影响。当后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问及对女权运动的立场时，迪迪翁似乎收回了她早先提出的批评观点。

> 我认为那篇文章是关于某个特定时刻的。我曾经认为女权运动陷入了纠结于琐事的困境中，它当时正朝着一个不理想的方向前进，它已经撞上了一堵墙，而且一直在谈论无关紧要的小事。然而，平凡化的趋势已经消退，这种运动设法存续了下来，它也不再仅仅表现为一场运动，而是成了一种改变了的生活方式。[41]

埃夫龙显然对于谈论女性的身体没有任何障碍；毕竟，她已经写过那篇关于乳房的文章了。1973年初，她还写了一篇名为《处理那个……问题》（*Dealing with the uh，Problem*）的调查性长文，她在文中勇敢地探讨了女性除味喷雾，即“外生殖器区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会阴区

外部）除臭剂”[42]的制造、使用和营销问题。她的置身事外的态度在这里依然很适合她，她几乎没有发表多少主观评论就足以让这个行业显得无比荒谬。

写男人对女人所说和所做的荒谬事情很容易，写女人对自己做的荒谬事则要困难一些。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在与苏珊·布朗米勒争论化妆的问题，这也是女权运动中存在明显分歧的一个问题。埃夫龙将这段经历写入了那篇关于舒尔曼的文章中，但没有提及姓名：

> 有一次我试图向另一位女权主义者解释我为什么喜欢化妆；她也向我解释了她为什么不喜欢。我们俩都完全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43]

用一个专栏直接与这种运动中交替出现的狂热和矛盾斗争，这让埃夫龙发现自己很难既忠诚于运动又成为一名作家。“这场运动中反复出现的讽刺之一是，你没办法在说出关于运动的真相的同时避免在某些小问题上给它造成伤害。”[44]她还说她发现评论女性作家写的关于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书籍很难，因为虽然她认可她们的激情，但她并不喜欢这些女性的写作方式。她当然知道自己在批评这些作品时应当考虑到作者写作的良好初衷：

> 这就是女权运动中所谓的姐妹情，我猜这是好的政治，但并不是好的文学批评，也不是诚恳，更不是说真话。（此外，这还与如今男性在批评关于女性的书籍时采用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别无二致——那种无意识的以高人一等的身份自居，将关于女性或由女性创作的作品视为某种文学的子类型，认为它们是属于主流之外、并不完全相关，但挺有意思的东西的态度：这些女人是如何做的，我们一定得试着了解一下，无论那是什么。）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自我批评的东西，因为《时尚先生》将这个分析女性的专栏与杂志的其他内容分割开来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某种本质上的居高临下的感觉，更不用说这份杂志只将男性读者作为受众，在女性中的传播程度也远远低于在男性中的。一直让埃夫龙只写这些东西

无疑是种根本性的浪费。后来她说是自己决定不再写这个专栏的，因为她已经厌倦了，她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

然而在此之后，这个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内还在继续为她提供着可借鉴的内容。被《纽约》杂志挖走后，埃夫龙会在那里继续写关于女性的文章。在最早的一些文章中，她攻击过一位朋友，作家萨莉·奎因（Sally Quinn），因为后者说自己一直把调情作为一种报道技巧。在分析自己对奎因的说法的愤怒时，埃夫龙提到一位最近接受了自己的采访，并逐渐与自己成为朋友的人对女性和职业竞争问题的看法：

> ［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女士说："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曾经说我具有一种最低劣的嫉妒心。我不嫉妒别人的工作，也不嫉妒别人的钱财。我只嫉妒那些能够利用男人的女性，因为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45]

在《纽约》杂志工作的埃夫龙开始找回自己早些时候的出色状态，即简单直接地推翻声名显赫的媒体人物。《屋檐》杂志（*Penthouse*）的出版商鲍勃·古乔内（Bob Guccione）决定于1973年推出一本针对女性读者的杂志——《万岁》（*Viva*），该品牌的口号为："由问心无愧地享受女性的男性为你提供的杂志。"在埃夫龙的专栏中，你完全可以看出埃夫龙对于揭露古乔内的无知程度有多么兴奋，她像曾经批评迪克·卡韦特和海伦·格利·布朗时一样大段引用了古乔内的原话而不发表评论：

> 把所有事情都尽可能地考虑到的话，我不愿这么说但我认为这是真的，我比女性更了解女性。[46]

《万岁》在此之后持续出版了七年，但它不会成为女性之间互相引用其中内容的那种标志性出版物，这与古乔内的梦想和希望截然相反。

埃夫龙攻击的下一个目标是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因为埃夫龙发现她是一个骗子。在水门事件造成了灾难后果之后，一头金发、魅力

出众的朱莉成了被尼克松家推到镜头前面的人。根据埃夫龙的记述，华盛顿的记者团几乎都爱上了她。

> 正如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说有谁会相信她说的话，而是说人们相信她自己相信自己说的话。他们还会告诉你她很平易近人，这是真的，她还很开诚布公，这就不是真的了……这就好像在说，她是全美国唯一一个已经过了二十岁，却仍然认为此时的父亲和自己六岁时的父亲一个样的女性。[47]

埃夫龙说这句话时可能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绪，因为自从菲比·埃夫龙去世之后，亨利·埃夫龙就成了女儿们的负担。他开始写一本他取名为《我以为我们可以做任何事》（*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的回忆录，这个题目直接来自他女儿给母亲写的悼词。埃夫龙后来坚称这本回忆录里全是没有意义的内容。[48]更糟糕的是，这似乎是一次赤裸裸的想要利用自己名气不断增长的大女儿赚钱的尝试，这一定让埃夫龙很受困扰。

此时的诺拉·埃夫龙已经很有名了。她会出现在多年前她曾经批判过的社会八卦刊物中，比如《女装日报》就经常提到她，甚至比过去提及海伦·格利·布朗的次数更频繁。她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在一个节目中，主持人提到了她经常直击别人痛处的做法。

> 主持人：你有时候很恶毒，不是吗？
>
> 埃夫龙：哦，当然。
>
> 主持人：恶毒是一种乐趣，不是吗？
>
> 埃夫龙：不，你——
>
> 主持人：让我告诉你你怎么恶毒了。比如你那篇关于朱莉·尼克松的文章。
>
> 埃夫龙：你对朱莉·尼克松情有独钟。

主持人：我喜欢朱莉，是的。

埃夫龙：嗯，我不喜欢。我认为她是一个裹着巧克力的蜘蛛。[49]

埃夫龙的后续作品几乎都会采用这样的框架。后来某个时候，她会重新为《时尚先生》写文章，这一次她的目标从女性变成了媒体，还有很多她认识的媒体人：比如《人物》杂志（*People*），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还有某些《纽约客》作家的自命不凡。（她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凯尔。）埃夫龙甚至会对《时尚先生》发起攻击。有一次，她被卷入了《时尚先生》与作家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的争议中，最终《时尚先生》就由她为该杂志编辑的一篇古德温的传略引发的争议与古德温达成和解。而埃夫龙则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这种做法。

有些人称埃夫龙生活的这个方面为刻薄的一面，然而在当时，读者似乎并没有觉得她很刻薄。甚至有些时候，连埃夫龙本人也不觉得自己刻薄。1975年《疯狂的沙拉》出版之后，埃夫龙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她说：

> 你可以写一篇关于某个人的最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但是人们可能只会记住你说这个人“胖”……你很早就明白了自己从事的这项工作并不是要让你与你所写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你们是朋友，你就会缩手缩脚。[50]

她在这里阐述的困境就是她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的。当埃夫龙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时，有些男人偶尔会在自己的专栏中诽谤她，或者说她有点小聪明、讨人喜欢，而不是赞美她的才华，他们还会说自己多想和她共度良宵。她看到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作为一位散文家，她被要求写哪些内容、思考哪些内容都受到了影响。她在1974年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有些杂志不仅不会，甚至是根本不考虑给女性分配任何与经济或政治这类主题相关的题材”。[51]

1974年时刚离婚不久的诺拉·埃夫龙还对这位采访者说：“单身让人分心。”［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刚刚嫁给了一位幽默作家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urg），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不长。］“我的意思是，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点是，它可以让你省掉为约会而付出的所有能量。那样你就可以把这些能量投入工作。你不必再担心明天找谁带你去参加晚宴。在我看来，单身需要占用很多时间。”伯恩斯坦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埃夫龙与伯恩斯坦的结合与她突然失去为杂志写文章的兴趣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半段，埃夫龙几乎完全放弃了写文章，因为她把注意力转向了写剧本。她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与艾丽斯·阿伦（Alice Arlen）合作撰写《西尔克伍德事件》（*Silkwood*），还在伯恩斯坦坚持不懈的追求下与他结为了夫妇。她对一位采访者说：“我们决定在周日结婚，但是我们周三就结婚了，最完美的部分是，我们是在东方巴士公司的巴士上决定结婚的。”[52]但是，她还告诉这位采访者说“考验婚姻是否成功不一定要看婚姻是否持续到最后”。

正如我们从《心火》中得知的那样，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到最后。“我在编故事方面非常差劲，”当采访者问她是否有写小说的意愿时，她会这样回答。但她还说，从她离开第二任丈夫的那一刻起，她就有一种确定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的感觉。与伯恩斯坦私通的女人的丈夫名叫彼得（Peter），他请埃夫龙吃了顿饭。当他们在街上碰面时，埃夫龙已经在观察和分析这个场景了，不过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她会把这些也写出来：

> 我们约在康涅狄格大道（Connecticut Avenue）上的一家中餐馆门口，然后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哦，彼得，”我对他说，“这太糟糕了，不是吗？”
>
> “这太糟糕了，”他说。“这个国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 我歇斯底里地哭着，但我想，总有一天这会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53]

埃夫龙说，她最终意识到她母亲一生中重复的那句话，“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其实讲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

> 当你踩到香蕉皮滑倒时，人们会嘲笑你；但是当你给别人讲述你踩香蕉皮滑倒的故事时，它就成了你的笑料。所以你会成为笑话的英雄而非受害者。
>
> 我认为这就是她要表达的意思。[54]

《心火》成了一部非常畅销的作品，让埃夫龙赚了很多钱。她为电影版写了剧本，她的朋友迈克·尼克尔斯（Mike Nichols）指导了影片的拍摄。所有人都说伯恩斯坦非常愤怒。他甚至在离婚协议中规定电影只能把他描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她的一些朋友显然认为写这么一本书不是个好主意；在小说即将出版时，《纽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八卦文章，埃夫龙的第一任丈夫丹·格林伯格告诉文章作者说：“诺拉本人是比书中人物优雅得多的人，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作家。”[55]

这本书如今已成为一种传奇，尽管电影版没能完全表现出小说的精妙之处，这可能是因为伯恩斯坦为了保护他和埃夫龙的两个孩子而给电影设定的条件造成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电影不能像小说一样展现出一个有趣的叙述者的意识。影片成功与否太过依赖于雷切尔这个角色能否听起来像诺拉一样，能否拥有像她一样精准地审视世界和自身处境的方式，这样的内心活动复杂到无法在大银幕上被诠释出来，即便扮演者是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也不行。然而，这是女权主义复仇的伟大流行作品之一，伟大到埃夫龙职业生涯后期拍摄的所有那些甜蜜蜜的电影作品都无法遮掩其光彩。

---

[1] *Heartburn*（Knopf，1983），3.

[2] 1996年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学位颁授典礼上的演讲，可见于http：//www.wellesley.edu/events/commencement/archives/1996commencement。

[3] “Dorothy Parker” in *Crazy Salad and Scribble Scribble*（Vintage，1972），168.

[4] 参见Henry Ephron，*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Norton，1977），12-13。

[5] 菲比·埃夫龙的悼词，printed as “Epilogue，” in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209。

[6] 菲比·埃夫龙的悼词，printed as “Epilogue，” in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211.

[7] “The Legend，” from *I Remember Nothing*（Random House，2010），37.

[8] “Epilogue，” in *We Thought*，210.

[9] Bosley Crowther，“The Screen，”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1944.

[10] Henry and Phoebe Ephron，*Take Her，She’s Mine*（Samuel French，2011），18.

[11] Thomas R. Dash，“Bringing Up Father Theme Yields Tempest of Mirth，” *Women’s Wear Daily*，December 26，1961.

[12] “Take Her，She’s Mine，” *Variety*，November 29，1961.

[13] 出自《向伯利恒跋涉》前言，xiv。

[14] “Journalism：A Love Story，” in *I Remember Nothing*.

[15] “Dorothy Schiff and the New York Post，” *Esquire*，April 1，1975.

[16] 此处疑有误，该电影应为1940年上映。

[17] 出自《疯狂聚会上的壁花》序言，（Bantam，2007），18。

[18] *New York Post*，September 23，1967.

[19] 此处将希夫比作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为了借用后者的那句（如果农民没有面

包，）“就让他们吃蛋糕吧。（Then let them eat brioches.）”不过实际上并没有记录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真的说过这句话。

[20] “Dorothy Schiff and the New York Post.”

[21] 此次采访的这个片段出自*Everything Is Copy*，dir. Jacob Bernstein（2016）。

[22] 采访梅格·瑞恩，出自*Everything Is Copy*，dir. Jacob Bernstein （2016）。

[23] “A Strange Kind of Simplicity，” *New York Times*，May 5，1968.

[24] “Dick Cavett Reads Books，” *New York Times*，June 2，1968.

[25] Review of *Do You Sleep in the Nude*？*New York Times*，July 21，1968.

[26] “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 *New York Times*，June 22，1969.

[27] 接受Michael Lasky采访，*Writer’s Digest*，April 1974，reprinted in *Nora Ephron*：*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Melville House，2015）。

[28] “Women’s Wear Daily Unclothed，” *Cosmopolitan*，January 1968，reprinted in *Wallflower at the Orgy*.

[29] “Helen Gurley Brown Only Wants to Help，” *Esquire*，February 1970，reprinted as “If You’re a Little Mooseburger，Come with Me. I Was a Mooseburger and I Will Help You，” in *Wallflower at the Orgy*.

[30] Joan Didion，“Bosses Make Lousy Lov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January 30，1965.

[31] *Nora Ephron*：*The Last Interview*.

[32] “Mush，” *Esquire*，June 1971.

[33] 出自《疯狂聚会上的壁花》序言。

[34] “Some Words About My Breasts，” *Esquire*，May 1972.

[35] “Women，” *Esquire*，July 1972.

[36] Alix Kates Shulman，*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Knopf，1972），17.

[37] “On Never Having Been a Prom Queen，” *Esquire*，August 1972.

[38] “Miami，” *Esquire*，November 1972.

[39] 指月经。

[40] “Vaginal Politics” in *Crazy Salad*.

[41] Christopher Bollen采访琼·迪迪翁，可见于*V*，http：//www.christopherbollen.com/archive/joan_didion.pdf。

[42] “Dealing with the uh，Problem，” *Esquire*，March 1973.

[43] “On Never Having Been a Prom Queen.”

[44] “Truth and Consequences，” *Esquire*，May 1973.

[45] “A Star Is Born，” *New York Magazine*，October 1973.

[46] 转引自“Guccione’s Ms. Print，” *New York*，October 29，1973。

[47] “Women：The Littlest Nixon，” *New York*，December 24，1973.

[48] 参见，例如：“The Legend，” in *I Remember Nothing*，37。

[49] 这个片段出自*Everything Is Copy*。

[50] Jurate Karickas，“After Book，Friends No More，” *Atlanta Constitution*，August 3，1975.

[51] *Nora Ephron*：*The Last Interview*.

[52] Peter Stone，“Nora Ephron：‘I Believe in Learning the Craft of Writing，’” *Newsday*，December 5，1976.

[53] “The Story of My Life in 5，000 Words or Less，” in *I Feel Bad About My* Neck （Knopf，2006）.

[54] “The Story of My Life in 5，000 Words or Less，” in *I Feel Bad About My*

Neck （Knopf，2006），86.

[55] Jesse Kornbluth，“Scenes from a Marriage，” *New York Magazine*，March 14，1983.

第十二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莉莲·赫尔曼

在汉娜·阿伦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一边教书，一边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出版著作，这样的状态是只有那些已经达到人生中一个完全自在的境界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但这种情况在1970年10月发生了变化。“海因里希于周日突发心脏病去世”，[1]阿伦特在电报中这样告诉麦卡锡。当时，麦卡锡和她的最后一任丈夫，外交官吉姆·韦斯特（Jim West）一起住在巴黎。她立刻飞回纽约参加葬礼。

到此时为止，阿伦特和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没有他，她就成了孤家寡人。阿伦特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写信给麦卡锡说：“我现在坐在海因里希的房间里使用他的打字机，这让我有了一些能帮我坚持下去的东西。”[2]实际上，失去了海因里希的阿伦特并没能坚持很久。1975年12月4日，她在与朋友共进晚餐时也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麦卡锡被指定为阿伦特的遗稿保管人，她还自主承担起了葬礼的安排以及与家人协商的工作。在其他朋友之间，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显得非同寻常的亲密，但就这两个人来说，最好的朋友会自然成为最主要的哀悼者。麦卡锡在纽约为阿伦特致悼词时，偶尔会用谈论情人的口吻谈论阿伦特，麦卡锡赞美她的外表，还有她躺在沙发上思考时的样子。她甚至以一种会导致她被嘲笑的方式谈论了阿伦特的腿和脚踝。但如果你考虑到麦卡锡把她的朋友直接形容为思想的化身，那么她做的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合适了：

> 我第一次听到她在公共场合演讲——是在近三十年前的一场辩论中。她让我想到伯恩哈特（Bernhardt）[3]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普鲁斯特（Proust）笔下的贝尔玛（Berma），一个壮丽的第五幕，那意味着女神登场。也许是来自阴曹地府的女神，或者是烈焰般炽热的女神，反正不是无忧无虑的那种。与其他优秀的演讲者不同，她根本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相反，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哑剧演员，一个戏剧演员，她在演出一场心灵的戏剧，她在进行她经常在文字中召唤出的那种她和她自己的对话。[4]

之后，麦卡锡将自己的写作搁置了两年多的时间，转而致力于撰写和编辑阿伦特生前的最后一个项目。这是一篇名为《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的三卷论文。第一卷谈论的是思考行为，第二卷谈论的是意志行为，第三卷谈论的是判断行为。阿伦特只完成了前两卷的绝大部分初稿，关于第三卷则只在一张纸上写了两段引言。阿伦特去世时，这张纸还插在她的打字机上。虽然麦卡锡的德语并不好，而且从根本上说她也不是什么理论家，但她认为完成这本书是为了致敬她的朋友。她也确实完成了，尽管出版商只向她支付了预付款和版税的1/4，其余的钱被付给了阿伦特的家庭成员。

这是一种非凡的慷慨行为。时间是艺术家最渴望的一件事；如桑塔格曾经说过的那样，时间是他们用钱来买的最主要的东西。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麦卡锡不像她曾经那样多产了。她只完成了一部小说《食人族和传教士》（*Cannibals and Missionaries*），这也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阿伦特及罗伯特·洛厄尔的先后去世让麦卡锡感到沮丧。《食人族和传教士》算不上她最好的作品，不过这本书得到了很多积极的评价。麦卡锡此时还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但她在寻找一个真正的角色的过程中也会犯些错误。

这也许可以解释后来发生的和莉莲·赫尔曼有关的事情。

赫尔曼起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人。她作为一名作家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名为《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的剧本，内容是孩

子们指控两位寄宿学校的女教师是同性恋者。这个剧本的成功，以及赫尔曼在此后获得的好莱坞合同让她变得富有。然而，她的财富和名望与她的政治立场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搭配。她在好莱坞与帕克成了朋友，而且和帕克一样，赫尔曼年轻时也是一位左翼活动家。与帕克不同的是，赫尔曼倾向于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人们普遍认为，赫尔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宣称自己目前与共产党或“任何政治团体”都没有联系是在撒谎。她的证词让她避免了牢狱之灾，而那些比她诚实的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她的搭档达希尔·哈米特。这整件事使赫尔曼在像麦卡锡和她的朋友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中间非常不受欢迎。

说到个人敌意的话，麦卡锡其实只见过赫尔曼两次。第一次是1948年麦卡锡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的那段时间，她在吃午饭时无意中听到赫尔曼在一群学生面前抨击约翰·多斯帕索斯，说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放弃了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就因为他讨厌西班牙的食物。麦卡锡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纠正别人的机会，于是她指出实际上多斯帕索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他不再抱有幻想的原因是一位朋友遭到了谋杀。麦卡锡在1980年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她当时看到了赫尔曼的愤怒：

> 我记得她裸露在外的干瘪的手臂上戴着很多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她的手臂开始颤抖——因为愤怒和惊讶，我猜这是因为她在给别人洗脑时被抓了个正着。[5]

赫尔曼和麦卡锡似乎都没有忘记过这个插曲。当麦卡锡为《食人族和传教士》作宣传时，她突然决定旧事重提。首先，她向法国采访者讲了这件事。然后，在受邀参加《迪克·卡韦特秀》（*The Dick Cavett Show*）时，她又命中注定般被问到她认为哪些作家“名不副实”：

> 麦卡锡：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人就是莉莲·赫尔曼这个属于旧时代的人，我认为她被严重高估了，她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一个不诚实的作家，她真的属于过去，属于斯坦贝克那么遥远的过去，但不是说她是斯坦贝克

那样的作家。

卡韦特：她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

麦卡锡：一切。但我曾在一些采访中说过，她写的每个字都是谎言，包括连词和冠词都不可信。[6]

后来，许多人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家说他们认为她在那里“带着她特有的微笑”[7]说出这么尖锐的侮辱是“鲁莽的”[8]。赫尔曼显然也看了这个节目。卡韦特后来讲了赫尔曼无比愤怒地给他打电话的事：

“我想我从不认为你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人，莉莲，”我勉强回答道。

“那是胡说。我要起诉你们所有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她证明了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9]

麦卡锡认为她只是在说一件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结果却发现她将面临一场自己无法承受的诉讼。该诉讼声称，麦卡锡明知自己的陈述是虚假的，而且她是带着恶意指责赫尔曼是一个骗子的。赫尔曼将麦卡锡、《迪克·卡韦特秀》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部列为被告，并要求他们赔偿自己225万美元的损失。《纽约时报》给赫尔曼打电话，请她对此次诉讼作出评价时，她这样推测麦卡锡的理由：

我十年没有见过她了，我从未写过关于她的任何文章。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但这不会成为她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因。我想她一直不喜欢我。这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内战时期，就是1937年11月或12月，我从西班牙回来之后。[10]

麦卡锡一方则对《纽约时报》说：

我几乎不认识她……我的观点都是基于她的著作，特别是《邪恶时代》（*Scoundrel Time*），我拒绝购买这本书，而是借了一本来看。我不喜欢她在那本书中给自己安排的角色。

从来不会错失宣传自己的机会的诺曼·梅勒自作主张地充当起了争

议裁判员的角色。他表示：“她们都是出色的作家，但是她们的天赋如此不同，她们会厌恶对方是很自然的事。作家们在这一点上与动物很相似。”[11]他还说麦卡锡的评论是“愚蠢的”和“不该说的”。就一个把诉诸武力视为基本美德的人来说，作出这样的表态真是不寻常。不过根本没有人听他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前妻、先锋女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也从退休状态中站出来，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六页的文章抨击莉莲·赫尔曼，并指出后者创作的《没有完结的女人》（*An Unfinished Woman*）中几乎每一个日期都是错的。盖尔霍恩特别了解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活动，她基本上摧毁了赫尔曼的说法。盖尔霍恩的结论是：“在我对虚伪的非专业研究中，赫尔曼女士是其中一个登峰造极的人物。”[12]

私下里，麦卡锡很担忧。但她担心的不是自己最终能否胜诉，因为她正在悄悄收集能证明赫尔曼谎言的材料。她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确凿的例子。赫尔曼的回忆录《旧时痕迹》（*Pentimento*）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改编成了由简·方达（Jane Fonda）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朱莉娅》（*Julia*）。根据赫尔曼的说法，这个“朱莉娅”是她童年时代的朋友，她像是某种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的西力（Zelig）般的人物，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表现英勇，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

事实证明，朱莉娅是一个编造的人物，部分经历参考了一个名叫缪丽尔·加德纳（Muriel Gardiner）的女人的生活，这个人曾就自己和朱莉娅的生活之间的相似之处给赫尔曼写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在麦卡锡参加卡韦特的电视节目时，公众还不了解这些情况。每个人都抱有怀疑，特别是玛莎·盖尔霍恩，她认为赫尔曼的说法大部分都是谎言。

无论有没有证据，诉讼的开销都足以令麦卡锡担忧。自1963年的《她们》之后，麦卡锡再也没有出版过畅销书，而赫尔曼则拥有她不配拥有的财富，更不用说比谁都坚定的要确保取得她满意的诉讼结果的决心。在起初的几次小交锋中她都取得了胜利，一名法官驳回了麦卡锡最初的驳回起诉的请求。

1984年6月下旬，赫尔曼在实现自己的复仇之前就去世了，这对于被告一方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因为去世之人在法律上不构成遭受侮辱、诽谤等侵害的对象，所以谈论损害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8月，这场诉讼就彻底结束了。不过这件事已经成为传奇；在今天，这往往是人们唯一记得的关于玛丽·麦卡锡的事情。在自己的人生晚期，仍然痴迷于这个主题的诺拉·埃夫龙还写了一部关于仇恨的戏剧，并取名为《想象出来的朋友》（*Imaginary Friends*）。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和赫尔曼做过朋友，而且她觉得自己可以遵循自己一贯的冷酷的公正来提供一些对这场争议的想法：

> 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怀疑，她给她的朋友们讲的那些精彩绝伦的——姑且礼貌地称之为“故事”的东西真的都是编出来的。几年后，当她起诉麦卡锡时，我并不感到惊讶。那时她已经生病，几乎失明。愤怒成了她最喜欢的配饰，而她的愤怒让那些曾经忠于她的人也感到越来越厌倦。[13]

埃夫龙的这部戏剧于2002年在百老汇上演，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只上演了七十六场。但对于埃夫龙来说，这是一个让她充满激情的项目，一种解脱，一种重回顶峰。在经历了几部电影的连续失败之后，当时的埃夫龙称自己生活在一个电影监狱中。“自从我担任杂志记者以来，我终于可以写一篇关于我感兴趣的题材的文章了：女人以及她们对彼此做的那些事。”可惜她并没有成功地将自己的热情传达出去；到2012年她去世时，这部戏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

---

[1] 1970年11月1～2日，汉娜·阿伦特发给玛丽·麦卡锡的电报，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2] 1970年11月22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3] 指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年10月23日～1923年3月26日），法国舞台剧和电影女演员。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以及圣女贞德之后最有名的法国女人。

[4] “Saying Good-by to Hanna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anuary 22，1976.

[5] 1980年2月2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Ben O’Sullivan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6] The Dick Cavett Show，October 17，1979，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3。

[7] Jane Kram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4。

[8] Irving Howe，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4。

[9] Dick Cavett，“Lillian，Mary and Me，” *New Yorker*，December 16，2002.

[10] “Miss Hellman Suing a Critic For $2.25 Million，”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6，1980.

[11] Norman Mailer，“An Appeal to Lillian Hellman and Mary McCarthy，” *New York Times*，May 11，1980.

[12] Martha Gellhorn，“Guerre de Plume，” *Paris Review*，Spring 1981.

[13] Nora Ephron，《想象出来的朋友》前言，（Vintage，2009）。

第十三章 阿德勒

谁也没想到，1980年是如此硝烟弥漫的一年，因为已经四十多岁的雷娜塔·阿德勒看到了向一个比她年长的人发动攻击的机会。宝琳·凯尔刚刚从好莱坞重返《纽约客》工作，她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甚至不满一年。她是去和沃伦·贝蒂（Warren Beatty）一起担任制片人的，结果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她去洛杉矶就是为了参与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的《爱与金钱》（*Love and Money*）这部电影的制作，但几乎从她抵达洛杉矶的那一刻起，她的工作职位就不复存在了。当这件事没能成功之后，她决定留在电影公司担任执行制片。

可以说凯尔并不适合这个工作。后来她提到那些好莱坞的高管们都认为她是来做间谍的。当她打算回《纽约客》工作时，威廉·肖恩是好不容易才被说服重新接纳她的。如另一位编辑告诉《名利场》的那样：“肖恩先生认为宝琳已经玷污了自己的名声。”[1]不过最终他还是同意让凯尔回来工作了。

当年夏天，凯尔出版了一本新的电影批评文集。《当灯光调暗后》（*When the Lights Go Down*）获得的绝大部分评价都是热烈的赞美。关于《公民凯恩》的争论已经过去十年了。因此，尽管遭遇了好莱坞的失败经历，但凯尔仍然被认为是她所处行业内的顶级人物。她还拥有很多崇拜者。

雷娜塔·阿德勒却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之一。她在《纽约书评》上发

表的评论极为严苛，她用即便是在著名批评家之中也非常罕见的凶狠力度向这本书发起了攻击：

> 现在，《当灯光调暗后》已经面世，这本书里收录了过去五年来她写的那些评论；我很惊讶，我不是像凯尔或约翰·西蒙（John Simon）那样在夸大其词，而是这本书真的让人不快，其中每一篇、每一行的内容都毫无例外地没有任何价值。[2]

这段评价出现在整篇评论的中间部分。阿德勒先是用大量笔墨谈论了自己喜欢的那些凯尔写的评论。阿德勒没有将凯尔风格的退步归因于凯尔个人的缺点——事实上，这篇文章几乎没怎么谈论凯尔本人，而是主要谈论了作为固定员工的批评家的文章内容重复的问题。他们需要写那么多影评，看那么多电影，所以他们写文章时自然会陷入无话可说或重复已经说过的内容的窘境。但是，无论阿德勒先给出了多少合理的解释，仅这一段毫不留情的评价就足以被看作向凯尔宣战的清楚证明。而且她的攻击完全有理有据。

阿德勒的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论述主要针对凯尔的散文风格，而不是她的批评的敏锐性。凯尔的作品给阿德勒带来困扰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的写作方式，她认为其中的内容几乎全是空洞的夸夸其谈，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想法：

> 她有大约九类最常用的基本字词，在这本近六百页的书中，这些词出现过几百次，往往一页上就能出现好几次：一是“妓女”（及由其衍生的“像妓女的”“妓女一样的”“妓女身份”），它们可能被用在各种语境中，但几乎没有一次是指实际的卖淫人员；二是“神话”、“象征”（以及形容词性的“神话般的”“象征性的”），它们在被使用时带有明显的思想目的，但没有可确定的含义；三是“流行”、“连环漫画”、“垃圾”（“垃圾一样的”）、“八卦”（“八卦的”），这些词都被用来进行评价（通常是表达认可的态度），但在发挥其他作用时似乎可与“神话般的”互换；四是“城市诗意”，它的含义比“八卦的”暴力一些；五是“软”（贬义）；六是“紧张”，这显然被用来指所有理想状态；七是“节奏”，它经常被用作动词，但意思是和谐或不拖沓；八是“出于本能”；九是“水平”。

阿德勒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会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种技巧，即计算某些字词的使用次数，然后利用它们来攻击某个主题，好让这些词语看起来很蠢。就凯尔来说，她有太多的作品可供阿德勒分析，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依电影评论的结构创作的，所以得出的结果对她极具毁灭性。实际上，因为这种毁灭性太强了，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有必要为凯尔挺身而出。《纽约书评》的版面上全是为凯尔鸣不平的内容，一位年仅十三岁的马修·怀尔德（Matthew Wilder）在为凯尔辩护时称阿德勒的文章是一篇“令人抑郁，充满仇恨，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3]《纽约时报》的约翰·伦纳德也斥责阿德勒说：“可以肯定的是，我认识的作为固定员工的批评家对待他们自己作品的态度和阿德勒女士对待凯尔女士的一样严苛。他们会精心挑选自己使用的形容词。他们是在用‘八百字的文章谈论思想’。”[4]包括詹姆斯·沃尔科特在内，凯尔的其他朋友也都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她。但阿德勒的文章已经给凯尔造成了损害。当凯尔于2001年去世时，阿德勒对她的评价会被每一篇讣告引用。

换作年轻一些的凯尔，比如那个写《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的时候的凯尔可能会写一篇同样锐利严苛的文章作回应。但此时的凯尔没有写任何东西，也没有就这一事件接受任何采访。她只对一位记者说道：“很遗憾阿德勒女士不喜欢我写的东西。我还能说什么？”[5]还有报纸联系了威廉·肖恩，后者只是简单地说阿德勒一直这么写文章。这一点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到此时为止，阿德勒已经断断续续地为《纽约客》撰稿十七年了。这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这样批评别人。阿德勒是一位不留情面的分析作家，当她发现逻辑谬误时，她可能会有点像叼着骨头不松嘴的狗一样绝不放过批评的对象。任何了解她之前的职业生涯的人都知道两件事：一是她比她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聪明；二是她喜欢通过发表文章来炫耀这一点。

*

作为一个在论述问题时秉持着非黑即白的原则的人来说，阿德勒的传记中充满了奇怪的矛盾。被发表在《纽约》杂志上的一篇阿德勒的传略称她“像伍迪·艾伦一样自信和公开地‘隐秘’（assertively and publicly‘private’）”。[6]这样的比较在如今看起来很是奇怪，因为我们对伍迪·艾伦的了解明明很多。但阿德勒过的的确是一种既在所有人目光之中，又在所有人视线之外的生活。我们对她的童年知之甚少，只能确定她是德国难民的女儿，1937年出生于米兰，以及她的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某个时候带着她来到康涅狄格州的。

根据《纽约》杂志上的那篇传略的说法，从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开始，焦虑情绪就主宰着阿德勒的生活。她告诉一位杂志采访者说，起初她在学习英语方面遇到了困难。当她的父母试图通过让她进入寄宿学校来帮助她时，阿德勒反而更加紧张了。她的焦虑症跟随她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布琳莫尔学院（Bryn Mawr）。这是一家女子学院，阿德勒在那里成了那种会举报自己做出的破坏荣誉守则的吸烟行为的人。她声称后来情况甚至糟糕到她必须去看精神病医生，并让她的兄弟替她写论文的地步。她本来打算毕业后考取法学院，但最终她去哈佛大学读了研究生。像在她之前的桑塔格一样，阿德勒学的是哲学，而且也没能获得学位，尽管在此期间她还获得过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的资助，到巴黎跟随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学习了一年。

阿德勒不想搞学术研究，尽管她声称自己几乎是因为意外才脱离学术研究的既定路线的。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她遇到了如今已经被遗忘的《纽约客》作家S. N. 贝尔曼（S. N. Behrman）并翻译了他的一部戏剧。贝尔曼正是建议她去《纽约客》面试的人，而阿德勒能够获得录用几乎确实是个意外。写作对于阿德勒来说仍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后来她会说她最初的那些作品主要都是为了给她的未婚夫鲁埃尔·威尔逊留下好印象而写的。鲁埃尔就是此时已经成年的，埃德蒙·威尔逊和玛丽·

麦卡锡的儿子。

某一年夏天，当麦卡锡在意大利遇到阿德勒时，她把她形容得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鲁埃尔的“纤瘦，看起来像圣经中人物一样的犹太裔女朋友……在有些人眼中平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大美女，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味”。[7]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她们之间存在敌意，或像麦卡锡和桑塔格之间那种强大知识分子的竞争的记录留下来。阿德勒后来说她在见到麦卡锡之前没有读过她的作品：“那时的我很害羞，她对我非常友善。后来，当我从她的作品中感受到她的那种令人畏惧的批判智慧时，我觉得很惊讶。”[8]这种脱节后来会成为定义阿德勒的东西。很少有见过阿德勒本人的人能够把这个有些焦虑、说话细声细气的人与她在版面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凶猛联系起来。

然而，她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能够无比确信地提出观点的天赋。阿德勒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对《纽约客》作家、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著作的书评（在此之前她曾经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一位编辑批评得一无是处）：赫西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研究报道《广岛》（*Hiroshima*）。这一次他把自己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收录在一起，出版了一本文集，并取了一个有些自大的题目《坚持：对人类韧性的研究》（*Here to Stay*：*Studies in Human Tenacity*）。可以确定的是，阿德勒不喜欢赫西的作品：

> 他在这本书开篇的地方提出了一个论断：“爱与死是伟大的主题；活下去的意愿则是这二者的结合，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内容的”——这句话完美地说明了整本书的特征，即一种平凡的、无意义的辞藻堆砌。[9]

此时的阿德勒还是《纽约客》的一名全职员工。她的主要职责仅限于撰写不署名的“城中大事（Talk of the Towns）”版面。但即便是在这个版面中，她的主要话题也是关于书籍和出版行业的，而且她觉得这些主题蠢得让人无法形容。在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中，她把畅销书名单当

成了抨击对象，因为她注意到最近的上榜作品：

> 包括一本成人填色书，一本孩子写的日记，一本收录了带有幽默插图说明的报纸照片的小册子，一位棒球队经理的自传，一位在一场耸人听闻的好莱坞审判中为被告辩护的律师的回忆录，一本讨论节食的书和一本研究未婚女性性生活的书。[10]

阿德勒继续说道，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依赖这个榜单。因为它只是“对焦虑的、文化水平有限的人士才有帮助的指南”。她还建议《纽约时报》干脆不要再发布这个榜单了。最终，这些关于文学现象的评论为阿德勒赢得了在《纽约客》上发表一些真正的关于书籍的专栏文章的机会。1964年，27岁的阿德勒谈论了书评的衰弱这个一再出现的顽疾。像她的女前辈们一样，阿德勒无法忍受当代书评人们糟糕的论证能力。但她也不怎么喜欢那些似乎要取代他们的“新评论（New Reviewing）”，她认为这种文学派别过分执着于辩论了：

> 在文学批评中，辩论是最短命的形式，没有什么文章比持批判态度的辩论文章更容易被人遗忘。如果受到攻击的作品是有价值的，那么它不会因为一些反对的评论而受影响。如果它没有价值，那么它会和攻击自己的辩论文章一起消亡。[11]

这是阿德勒写的第一篇反对辩论文章的辩论文章，这将成为她写作的主题之一。尽管她本人实际上经常被指责为风格太夸张，以及辩论过于严苛，但阿德勒恰恰一直在批评其他人采取这种做法。（她对凯尔职业生涯后期评论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认为它们过于好争辩。）阿德勒也没有太多地受限于传统评论的条条框框。在这篇文章中，阿德勒理论上是在评论欧文·豪和诺曼·波德霍雷茨的书籍，但逐渐地，她对他们的批评就扩大到涵盖了大多数突然开始活跃在《党派评论》上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阿德勒认为，文学杂志的整个运动此时正在经历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过去的问题开始变得不明朗，老派的门徒发展得很好，对复杂的事务容忍度低的说明文作家则陷入了困

惑。”[12]此时已经没有欧文·豪的一席之地了，因为他是属于过去时代的遗迹。即便是对待汉娜·阿伦特的宿敌，略微年轻一些的诺曼·波德霍雷茨，阿德勒也已经没有什么耐心。

阿伦特将成为阿德勒的导师。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面世并引发了评论界的喧嚣时，阿德勒甚至尝试说服威廉·肖恩刊登一份回应文章。自从阅读了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传记之后，阿德勒就成了阿伦特的追随者。起初，肖恩不想让阿德勒写任何东西，因为通常情况下，《纽约客》对于可能被与自己的文章联系到一起的争议会选择视而不见。但阿德勒坚持要写，直到《纽约时报》刊登了迈克尔·马斯曼诺写的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相当不利的评论之后，肖恩妥协了。他们原本希望《纽约时报》会在读者来信版面上刊登阿德勒的回应，但这篇文章被对方拒绝了。于是《纽约客》自行发表了这篇口气强硬，目空一切的文章：

> 针对阿伦特女士低调、道德、理性的作品，［马斯曼诺］却用像“希姆莱（Himmler）！”、“希特勒！”这样的夸张的惊叹来提出反对，仿佛这样的呼喊是历史哲学中什么有启发性的陈述似的……拒绝倾听和令人恐惧的沟通失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已经在生活和头条新闻中逐渐习惯了这些。但文学的本质就是沟通，在一份主要报纸的文学版面中发现这种失败是非常令人失望的。[13]

看到这篇文章后，阿伦特邀请阿德勒去喝茶。阿德勒后来带着深情写道：“用莉莲·罗斯（Lillian Ross）的话说，如果有人充满仰慕之情地坐在她的脚边，那个人就是我。”[14]阿德勒也很喜欢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这对夫妇和她说德语；他们把她当成了某种需要关怀提携的对象，而阿德勒则称阿伦特为“严格的家长”；[15]也许是因为体会过布吕歇尔在没有学位的情况下教书养活自己多么困难，所以他们总是鼓励她重返学校，取得博士学位。

换句话说，阿德勒得到了这个苏珊·桑塔格似乎很渴望的位置。阿

德勒坚持说阿伦特“不怎么关心桑塔格女士”。[16]有一次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汉娜·阿伦特并不是讨厌桑塔格。她只是对桑塔格的作品不怎么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看法。”[17]这确实是，不过阿德勒和桑塔格可能也陷入了不自觉的竞争之中。阿德勒也获得了桑塔格获得过的《年轻女士》授予的优秀奖，只不过比她这位年轻的同行晚了三年。因为拥有在《纽约客》的职位，所以阿德勒在财务状况上比桑塔格更稳定。但她不是媒体上的明星，不是一个“拥有一切的女孩儿”，至少不像桑塔格那样能够引发大量关注。

因此，当阿德勒在1964年开始对波德霍雷茨发动攻击时，她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认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的人。当她把波德霍雷茨的作品撕成片，切成丁，打击得体无完肤时，她的口气中有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阿德勒的攻击方式是精准无情的。波德霍雷茨常常会重复某些短语，而且他选择的那些短语都像是滑稽演员的口头禅。阿德勒此时使用的技巧与后来她针对凯尔时使用的完全相同，这种技巧让她能够实现毁灭性的连续攻击，从而揭露作品中的怪异和伪善。就波德霍雷茨写的批评《纽约书评》的文章——《书评和我认识的所有人》（*Book Reviewing and Everyone I Know*）而言，阿德勒用一个观察就击破了波德霍雷茨的观点：

> 首先，“我认识的所有人”出现了十四次（不算在标题中出现的那次），“我认识的某个人”、“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某个人”和“他们认识的所有人”各出现了一次。虽然我们必须承认，重复可以是一种修辞手段，且波德霍雷茨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一直过分喜欢这种手段（在另一篇文章中，“三十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反复出现过九次；“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极权主义本质的内容”也曾连续出现过好几次），所以似乎可以肯定地说，《书评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充满了同志之情和团结友爱；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孤立的演讲者。[18]

阿德勒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指责波德霍雷茨不恰当的词语重复。阿德勒还提出，这种浮夸做法的结果是，新评论家们只是组成了一个小

俱乐部，里面的人互相交谈，互相恭维，互相侮辱，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普遍的理智主义。这些人是在把自己变成名人，而不在乎他们评论的书籍本身。当然，这让阿德勒自己也暴露在被指责她做的是同样的事情的危险中——就像凯尔在写《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时被指责为追求名利一样。曾支持过社会主义的保守派作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转投共和主义之前曾在《新领袖》上发表文章称：

> 虽然我之前可能已经读过阿德勒女士的文章，但我对它们没有什么印象。直到读了她遵循波德霍雷茨的指令认真撰写的这篇评论，我才真正开始将她视为一位“文学界的名人”。[19]

克里斯托尔说得没错，这篇散文就是最先清楚地展示了人们将会看到的雷娜塔·阿德勒在出版物上的风格的文章。这篇文章具有阿德勒风格的几个标志，其实这些标志在她职业生涯的初期就已经被完全呈现出来了。阿德勒在文章中从来不会逢迎讨好，不喜欢开玩笑，或表露出其他的个性。她的文章就是纯粹的分析，纯粹的推理，公事公办。她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我”，但这个“我”从来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像桑塔格的“我”一样更具分析性。阿德勒的文字就像一道激光束，比起用美丽让读者眼花缭乱，她更喜欢用一个观点来穿透他们的思想。她很少讲述任何类型的故事，但她会收集大量的证据，并以牛头㹴一样的坚决攻克自己分析的对象。阿德勒经常让人感觉她更像是一位检察官，而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包括批判波德霍雷茨的文章在内的一些作品让威廉·肖恩认定阿德勒可以作更多尝试。她本人也想写一些被肖恩称为纪实报道的题材，即那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纽约客》惯用招牌的雄心勃勃的长篇文章。阿德勒接受的第一个此类任务是被派去观察1965年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Selma-to-Montgomery marches）。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外出采访的紧张感，阿德勒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赞赏语气，她写了很多她观察到的景象，只作了很

少的分析。文章中的句子也比较短，有些甚至可以算得上精简。她并不是容易为游行中的慷慨激昂的言论所影响的人。除了提到对游行者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点的疑虑之外，她的文章仅限于报道她看到的情况：

> 薇奥拉·刘易佐夫人（Mrs. Viola Liuzzo）被枪杀的消息传来。一些游行者立刻返回了塞尔玛。其他人也登上飞机回家了。蒙哥马利机场的出口处有一块固定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很高兴你能来。愿你尽早返回。"[20]

整篇文章给人一种奇特的置身事外、冷漠疏离的印象。

在写关于世代差异的问题时，她明显更有信心，也更具批判性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阿德勒是一个充满激情、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但她对周围人的疏离感使她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她怀疑他们的政治运动，也怀疑他们对恋爱自由的信念，还怀疑他们对生活中的艰辛抱有的厌恶。有些人称她为"东海岸的琼·迪迪翁"，[21]但她的风格更直接，更强悍。迪迪翁倾向于在设置好的对话和场景中暴露嬉皮士和漂泊者的弱点，而且她的报道会涉及很多有关她本人或她的情绪的内容。而阿德勒的做法则一直是提出一个论点，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她通常会将内在的自我隐藏在他人的直接视线之外：

> 然而目前，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激进的流浪者，他们模糊地信奉从赌城大道的对抗和事件的整体风气中得出来的基本道德倾向。而这个倾向就是爱；加州的青少年们如今都在使用（还会出现在他们的歌词中）的这个词包含了性解放、甜蜜美好、世界和平、平等的梦想，奇怪的是，这个梦想里也包括毒品。[22]

最后一点关于毒品的说法能够揭示比阿德勒打算揭示的更多的东西，因为在1967年，毒品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她当时刚满三十岁。）作为一个难民的孩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德勒脑海中没有和别人一样的代表美国理想的形象可供她作为反

抗的对象。即便如此，阿德勒也总是会脱离到事物之外，而不是亲身感觉它们。这恰恰让她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观察者。阿德勒写的关于1967年爱之夏嬉皮士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出现的细节描写往往令人惊叹，就像她能够客观地描述哪怕是最怪异的行为的能力一样非比寻常。“他开始唱起了约德尔调（yodel）”，[23]阿德勒这样写自己在日落大道延长线（Sunset Strip）上遇到的一个年轻人，好像这么做很寻常似的。不过阿德勒在想要更宏观地理解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时总是遇到困难。她做的几乎所有报道最终都会有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尾。就这篇关于日落大道延长线的文章而言，结尾就是她对一个被称为“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的活动的评论：“周围根本没有警察。”

阿德勒会返回密西西比州，目睹更多民权示威活动；她会前往以色列报道第三次中东战争（Six-Day War，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她还会前往比夫拉（Biafra）[24]。但是无论她报道什么内容，她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她的矛盾。后来，当她将这些文章收录到书中时，她会将矛盾视为她所描写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可识别的现象。但即便是在阐述这个观察结果时，她也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圈子里。她写道：

> 我想和我同龄的这一代人是被跳过的一代，是从未拥有属于代表我们的声音的一代人，我们被迫进入了最广泛的美国人的范围。即使是现在（我们都是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出版我们的刊物，没有共同经历放逐，没有斗殴，没有轶事，没有战争，没有团结，没有标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是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我们没有什么为人熟知的特征，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无动于衷。我们心中的行动中枢似乎是崩溃的。[25]

需要再强调一次的是，写出这篇分析文章的女性才刚刚三十岁，而她已经脱离了这个国家中大部分的政治和社会潮流。她对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混乱局面的某些评价听起来几乎像是一个保守派作出的。“我们的价值观是陈腐的价值观，比如理性、正派、繁荣、人类尊严、接触，以及有可能实现的最优秀、最广泛的美国。”阿德勒这样写道，但她没有

明确界定“我们”这个集体代名词中都包含了哪些人。即便如此，关于这种分析的最奇怪的一点还要数阿德勒把自己与她所使用的“我们”完全脱离开来这件事。她在美国的人生轨迹并不典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上过大学；他们当然也没有从二十二岁开始就为全国发行的主要出版物写文章。阿德勒是多萝西·帕克级别的神童，从最开始就达到了如后来一样的水平，从最初那些“城中大事”版面的文章到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最后一些文章中，阿德勒的声音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可辨识度。但她与人群的疏离意味着她无法伸出手去触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广泛感受到的情绪。她只能从旁观看。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68年，阿德勒突然离开了《纽约客》。《纽约时报》找到她，想请她做电影批评家。他们已经厌倦了守旧的博斯利·克劳瑟，也就是宝琳·凯尔的宿敌。很难说《纽约时报》是否想过把凯尔本人从《纽约客》挖过来。但是当凯尔和与她交替的另一位批评家佩内洛普·吉列特（Penelope Gilliatt）都没空的时候，阿德勒偶尔也为《纽约客》写过一些影评。再加上她很年轻，她在批评界已经有了一些作为，她正在写那种时髦的旁观者角度的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章。所以阿德勒看起来一定是这个职位的完美人选。

如果《纽约时报》期待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他们就找错人了。阿德勒带着一种明确的使命感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不会给任何人放水。她写的第一篇影评是关于一部如今已经被完全遗忘的德国电影的，自文章一开头，阿德勒就像在她过去的书评文章中一样严厉地批判了被评论的对象，这种方式与她曾经批判约翰·赫西时的如出一辙：

> 即使观看一群中年德国人——他们其中有一些非常胖，所有人都面红耳赤，表情狰狞，不停出汗，还全都会为埃尔克·佐默（Elke Sommer）而神魂颠倒——就是你对美好时光的设想，我也不会推荐你去观看《极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因为今年的这第一部电影会以各种无趣的方式让你觉得它糟糕透顶。[26]

因为这句评论太风趣了，它反而提升了人们对电影的期望。这篇文章标志着一位一针见血的年轻批评家的到来。阿德勒评论的下一部电影——诺曼·梅勒的《狂野90》（*Wild 90*）给了她一个更熟悉的主题。这一次，阿德勒又回到了对作家的人身攻击这个她感觉游刃有余的领域中。那些喜欢梅勒的观众，“那些最宠爱他、最宽容他的人，也是我们的时代中最自以为是、最具毁灭性的人”，[27]他们很可能会像满足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满足于这部电影。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恭维。阿德勒明确表示，她认为梅勒的拥护者群体并不是一个在智慧层面上让人印象深刻的群体。举例来说，她无法想象这个“纵容放任的群体，这个将梅勒视为经历彼得·潘式寻找自由和发现自我的不成熟挣扎的可爱主角的群体，能有接受一篇立场坚定、内容充实、不含歉意的作品的那天”。

如她后来在《宝琳的险境》（*The Perils of Pauline*）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方面阿德勒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凯尔的影响——她最初的这些电影评论承袭了她在报道事实时的言简意赅的文风；而另一方面，阿德勒又似乎拥有与凯尔完全一致的好斗精神。在阿德勒的电影评论世界里充满了对自负和多愁善感的指责。“严肃的人”喜欢的电影，比如《毕业生》（*The Graduate*）、《冷血》（*In Cold Blood*）和《猜猜谁来吃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这些非常符合资产阶级观众口味的电影也都是阿德勒批判的对象。她的局外人身份在这里成了一种有利条件，让她体会不到追随大众口味的压力。甚至在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电影批评家都选边站队的情况下，阿德勒也没有就电影作者论和反电影作者论的战争确定一个立场。她只是单纯地表述自己的判断，将系统性的争论留给别人。

正如凯尔在《麦考尔》杂志的经历一样，阿德勒在《纽约时报》的十四个月里也一直受到电影工作室的挑战。其中最著名的是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制作的一则广告，内容是指出既然阿德勒讨厌流行电影中的大部分，那么公众不应该听她的话：

《纽约时报》的雷娜塔·阿德勒不喜欢《冷血》。

她对《毕业生》、《猜猜谁来吃晚餐》和《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持保留态度。

我们不太确定她对《邦妮和克莱德》持什么态度。

其他大多数批评家都喜欢这些电影。

最重要的是，公众喜欢这些电影。

现在她也不喜欢《爱情游戏谁来玩》（*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这说明它值得推荐！[28]

尽管人们总是说她从一开始就是让好莱坞制片商头疼的人，但实际上该行业对她的看法在最初的时候是中立的，起码在她开始这份工作两周之后，1月的那期《剧艺报》就是这样报道的。但是到1968年3月，该报刊登了一篇长文，称各方对她的态度出现了分歧：

她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她的批评立场更偏向文学性而非电影性。[29]

接受《剧艺报》采访的人们还说，比起做评论家，他们认为她更算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他们甚至常常很喜欢她为阐明电影的“死亡崇拜”或暴力的适当性所作的最大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往往会从电影本身转向阿德勒关注的问题：

民主体系最不具备应对能力的对象之一就是作为一种审美行为的革命。任何历史哲学都没能真的预见到：一群属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体系的任何错待，甚至应该说，他们将被这个体系培养成掌握权力的人；然而，就是这些人，竟然想要为了好玩而推翻这个体系。[30]

阿德勒的评论是严肃冷酷的，总体来说不会涉及垃圾电影。她想要

贬低谁的时候就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杀伤，但她还是试图在哪怕是一部糟糕的电影中找到值得赞美的精彩元素。她认为芭芭拉·史翠珊让《妙女郎》（*Funny Girl*）得到了升华；她喜欢佛朗哥·泽菲雷利（Franco Zeffirelli）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优雅的舞会场景，尽管她认为电影整体的传达方式有点太像《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了。当《芭芭丽娜》（*Barbarella*）上映时，阿德勒忍不住痛斥最近的电影是如何刻画女性的："也许这是厌母情结作祟，大屏幕上没有一个杰出的、体面的女性角色。"[31]即便如此，她还是赞美了简·方达，因为她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电影行业应对这些评论带来的刺痛的方式是向他们自己的行业媒体抱怨阿德勒的评论中存在很多事实错误。《剧艺报》报道说，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达里尔·F.扎纳克（Darryl F. Zanuck）曾被一位高管告知，阿德勒只看了一半的《星星星》（*Star*！）就去评价这部由朱莉·安德鲁斯出演的甜如蜜糖的电影。于是扎纳克向报社编辑提出了投诉。还有报道称《时尚先生》准备刊登一篇揭露阿德勒其人的文章——不过这个计划最终没有被付诸实践。总之，这些说法最多就是一些酸葡萄心理的表现，到1972年2月底，阿德勒干脆辞去了这份工作。她还写了几篇评论关于革命后的古巴的电影的文章，但之后她就重返《纽约客》工作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坚称自己没有被解雇，还有她后来指控宝琳·凯尔的那些罪责也暗示阿德勒只是厌倦了这种折磨。她说，学会赶在截稿日期前写完文章很好。[32]

阿德勒离开《纽约时报》之后也写了一些非虚构类作品。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长篇文章，内容是批评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在针对尼克松的罪行进行弹劾调查时的糟糕表现。通过精心梳理委员会的记录，阿德勒发现了许多应当进一步调查的问题。她最终认定弹劾调查实际上成了掩盖尼克松罪行的工作的一部分。直到今天，网络上许多研究尼克松阴谋的理论家还在引用她这篇文

章中的内容。

然而，撰写尼克松这样的题材的文章似乎也不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情了。雷娜塔·阿德勒决定，她真正想做的是写小说。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德勒抛弃了记者工作，专心创作她的两部小说《快艇》（*Speedboat*）和《漆黑》（*Pitch Dark*）。两部作品都采取了不连贯的、多讽刺警句的写作风格。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可以被看作阿德勒本人的替身。在这两者中，《漆黑》是偶尔发出社会批判声音的那一本。阿德勒在小说中的风格与玛丽·麦卡锡的完全不同，但她也具有和前者类似的无法将自己的生活与作品分割开来的问题。事实上，莉莲·赫尔曼也出现在了《漆黑》中，她被伪装成了一个名叫薇奥拉·蒂加登（Viola Teagarden）的角色。

> 这个人提到她所谓的“我的愤怒”时总是带着某种敬畏的口气，好像它是一种有生命的，珍贵的财产，比如一头可以用来当种牛的良种公牛；也有点像一个娶了一位美丽的，还比自己年轻和富有得多，但令人意外地难以相处的女人的男人提到“我的妻子”时的口气。[33]

这些书虽然都写得很精彩，但它们有时会显露出阿德勒写作时经历的巨大艰辛的痕迹。1975年，《快艇》首次以节选形式被刊登在《纽约客》上。1976年它正式出版后，所有人都对它赞不绝口；阿德勒还获得了国际笔会美国分会颁发的声望卓著的海明威奖（PEN/Hemingway Award）。接着阿德勒又花了七年时间来创作《漆黑》，不过在那之后，她似乎完全放弃了写小说。

作为一个好像永远无法找到足够让自己完全痴迷的唯一的主题的人，阿德勒后来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阿德勒的头脑几乎完全适合像个律师一样思维。在谈论“新评论”的那篇文章

中，她像检察官一样论述了自己的理由，剖析了波德霍雷茨的证词，用一个字词或短语定了他的罪。法律论证的有序性最终还影响了《宝琳的险境》那篇文章，它读起来就好像一篇答辩摘要似的。也是从这时起，阿德勒的文字变得好斗，总是用尽全力要摧毁什么。

她的好斗也延伸到了法庭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名利场》的复兴本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它最初的目的是要转型成为一份严肃的知识性出版物，要更接近于《党派评论》，而不是《人物》。主编理查德·洛克（Richard Locke）雇用雷娜塔·阿德勒负责这项工作。她保留了自己在《纽约客》的职位，但是只能被称为“顾问编辑”。

新版《名利场》领导层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理查德·洛克是在1983年4月被解雇的，随后阿德勒也很快离开了。但是，在一份名为《华盛顿新闻评论》（*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的没什么名气的行业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却称阿德勒是被解雇了。文章还说她用化名在《名利场》上发表了一段《漆黑》中的内容，但没有如实向杂志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她是因为能力不足而被解雇的。阿德勒决定起诉他们，最终她打赢了官司。

*

阿德勒职业生涯的法律阶段就此开始了，她写的关于法律的文章开始涉及法律中的真实事件。阿德勒开始着迷于两起针对媒体的法律案件。第一个是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Westmoreland v. CBS），引发争议的是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电视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基本上是在指责前陆军上将威廉·C.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通过操纵情报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了这场战争。第二个是沙伦诉《时代》杂志案（*Sharonv. Time*），阿里尔·沙伦（Ariel Sharon）是一位以色列军人和政治家，他起诉《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暗示他应当为1982年9月发生在黎巴嫩的大屠杀负责的文章。

在这两个案件中，人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记者一方犯了错误。报道中的内容被证明与事实不符。但是这两个案子中争议的焦点都在于，记者是否是出于“实际恶意”而犯下错误的，根据美国法律，“实际恶意”是证明诽谤罪名成立的条件。要满足这个条件非常难。实际上，无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时代》杂志都被认定在公开内容时不具有“实际恶意”或“鲁莽漠视”。（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的结果是双方在判决被作出前达成和解；沙伦诉《时代》杂志案的结果是原告败诉。）阿德勒认为这个定罪条件最终成了为媒体报道虚假新闻提供全面保护的保护伞。从这方面来说，她似乎总是同情原告的处境：

> 无论他们的其他动机是什么（骄傲、愤怒、荣誉或国内政治），原告显然是依据原则提起诉讼的，至少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中，这个原则就是真相：不是正义，而是朴素的、切实的真相……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的法院不是根据宪法从理论上被设计来解决这类问题的，它甚至不被允许解决这类问题，不能为历史断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34]

在对这个难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阿德勒对这些涉案的记者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以至于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她最初于1986年夏天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自己对审判的看法。（在威廉·肖恩担任主编期间，作家们通常会被允许为某一篇文章花费多年的时间，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安排。）这些文章将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鲁莽漠视》（*Reckless Disregard*）的书中。然而，在预定于9月份的出版日期到来之前，《时代》杂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以诽谤为理由将《纽约客》和雷娜塔·阿德勒的出版商告上了法庭。这本书的发行也因此被推迟了几个月。

与此同时，对《鲁莽漠视》的恶评比比皆是。因为阿德勒提出了一些记者对待他们要报道的事实并不确定，或者至少是存在错误认识的可能，所以其他记者就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检查阿德勒是否会犯错误上。据他们说，她也犯错了。就连对阿德勒有预先倾向性和同情心的

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这样的批评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时，也会在赞美阿德勒总体上的洞察力之后指出，

> 她也经常会向她严厉谴责的那些新闻恶习投降。《鲁莽漠视》这本书被片面的报道毁掉了，特别是对威斯特摩兰案的描述部分，以及结尾部分显示的在面对相反证据时同样的不妥协态度，我们正当地谴责的不正是机构报刊的这种做法吗。[35]

最终，阿德勒的声誉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损伤。《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声称阿德勒用花言巧语把他们唬住了。[36]

然而，《鲁莽漠视》引发的愤怒并没能显著降低阿德勒对争论的胃口。不过对她来说，情况突然变得更加糟糕了，在她遇到的诸多争议中一直支持她，直到《鲁莽漠视》引发喧嚣时也与她同一战线的威廉·肖恩被解雇了。1985年，康泰纳仕（Condé Nast company）收购了《纽约客》，该公司的所有者S. I. 纽豪斯（S. I. Newhouse）决定是时候作出改变了。他认为只要更换了主编，《纽约客》上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冗长而且可能毫无价值的文章了。

出乎纽豪斯预料的是，肖恩被解雇后爆发了员工抗议。纽豪斯没有遵守肖恩提出的由他自己选择继任者的条件，而是聘请了一位外人，长期担任艾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总编的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负责领导杂志社的复兴大计。员工们提交了请愿书，召开了员工会议，有一段时间，《纽约客》看起来似乎会因为转型期间的压力而从内部崩溃。但最终，杂志社并没有失去多少作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也找不到其他肯发表他们作品的地方。

阿德勒对这次改组的态度极为负面。她为纽豪斯的傲慢而愤怒，更为肖恩遭到这种恶劣对待而难过。她也不认为戈特利布是一个足够好的接班人。她觉得他“对一切漠不关心”。[37]他想改变艺术版面，于是他请来了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阿德勒无法忍受后者的“卑劣”性

格：

> 我在与高普尼克先生的谈话过程中了解到他提的问题不是问题，甚至不是试探。它们的真正作用是设计你，好让你主动建议他做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

1999年，在所有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后，阿德勒写了一本关于这段内容的书，书名是《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Gone*：*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这本书可以算作一本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中有对《纽约客》的某些员工的令人生厌的描绘，也有对其他一些的明显过度的赞美。这本书的开头就是一篇长长的对另外两本关于《纽约客》的回忆录的批评。那两本书的作者分别是莉莲·罗斯和韦德·梅塔（Ved Mehta）。阿德勒读了这些回忆录后认为它们并不能充分地代表她感受到的那种由肖恩先生培养起来的严肃对待写作的氛围。

询问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纽约客》员工，他们一定会对这本书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阿德勒再一次犯了些错误，主要是拼错别人名字之类的问题。一位编辑告诉我说，她觉得阿德勒在她所描述的那段时间内在办公室的时间不多，根本不足以了解《纽约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看待这本《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的最佳方式也许并不是将它严格当作威廉·肖恩的《纽约客》是如何解体的历史重现，而是应该将它当作一本知识分子的私人传记，它记录了一个假如为另一本杂志工作，就永远不会成为她成为的这种作家，也不可能成为她成为的这种力量的人的一段经历。《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是一部充满愤怒的作品，这种愤怒是因为感觉遭到背叛而产生的。包括罗伯特·戈特利布本人在内的一些评论了这本书的批评家们有时似乎也不忍心完全无视阿德勒这种遭到背叛的感受：

> 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一种痛苦和愤怒的爆发，就好像家里的女儿深深地眷恋着这个完全失调的大家庭——最让她受伤的莫过于发现家中再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38]

《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是阿德勒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她的整个写作生涯中，她一直是发起攻击的一方，而且她总是相当自信地认定即使她失败了，也能找到某种稳妥的解决方式。突然间，她攻击了美国最负盛名的杂志。即使那些仍然喜欢她的人也不认同她的观点。而那些显然是希望能够获得新《纽约客》编辑们青睐的人则决定，彻底地、真正地攻击阿德勒的时候到了。

如阿德勒后来指出的那样，仅在2000年1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纽约时报》就刊登了至少八篇各自独立的评论她这本书的文章。其中前四篇是关于《纽约客》的。后四篇则围绕着书中的一句关于约翰·西里卡法官（Judge John Sirica）的漫不经心的评价。西里卡是主持水门事件审判的法官。阿德勒写道："与他作为英雄的名声相反，西里卡实际上是一个腐败、无能和不诚实的人，他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关系密切，还与有组织犯罪明显相关。"[39]

西里卡给阿德勒的出版商写信就此提出异议。他似乎还给记者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开始给阿德勒打电话。其中之一是当时《纽约时报》的媒体记者费莉西蒂·巴林杰（Felicity Barringer），她开始强烈要求阿德勒公布她对西里卡作出指控依据的消息来源。阿德勒拒绝了，但巴林杰依然紧追不舍。如阿德勒宣称的那样，巴林杰的行为促使她作出了自己标志性的讽刺回复：

> 巴林杰问我，如果我不想在采访中向她"透露"我的"消息来源"，"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发布在互联网上？""你会在互联网上发布很多你的文章吗，费莉西蒂？"[40]

于是这位记者就发表了一篇指责阿德勒隐藏她的消息来源的文章。该报委托尼克松信赖的顾问之一，约翰·迪安（John Dean）[41]亲自撰写了一篇关于这句神秘评价的社论文章，并暗示阿德勒的消息来源是心怀怨恨的G.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42]。阿德勒觉得这很搞笑：

然而，值得注意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纽约时报》对这篇文章作者的介绍文字。该段说明全文如下：

约翰·W.迪安，投资银行家，曾任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的顾问，《盲目的野心》（*Blind Ambition*）一书的作者。

如果迪安仅以这些头衔被载入史册，那么《纽约时报》就这一特定事件发表的全部文章都有价值了。[43]

当阿德勒最终亲自写了关于“这一特定事件”的文章时，人们才知道，西里卡与麦卡锡关系的消息来源正是西里卡本人的自传。阿德勒揭露他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的途径是找到了西里卡父亲的一位商业伙伴的儿子。当她于2000年8月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她的调查结果后，《纽约时报》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们不愿意纠正它的原因是阿德勒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处已经无情地批判了他们的那些策略：

《纽约时报》在经济上也许是成功的，不过此时的它是一个强大的，但并不十分健康的机构。它的问题不在于一本书，或八篇评论文章。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矿井状态，而矿井中的巨型感应器——这份在某些方面仍可以算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出版物——却在散发最具爆炸性的气体，还要切断空气的来源。[44]

这整个事件几乎消耗掉了阿德勒的大部分职业地位。在《纽约客》，她已经不再是对编辑来说至关重要的撰稿人了。她就调查比尔·克林顿丑闻的《斯塔尔报告》（*Starr Report*）写了一篇评论，但是当她打电话询问《纽约客》是否愿意发表时，当时的总编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说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文章了。最终阿德勒设法在《名利场》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篇精彩的评论，她着迷地细读了上千页的报告，像律师一样剖析这份文件自身的逻辑，自从她放弃创作小说后，这种能力成了她最强大的武器。

> 肯尼思·W.斯塔尔（Kenneth W. Starr）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六卷本《斯塔尔报告》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份完全荒谬可笑的文件。可以说这份文件就是由一卷的参考文献和五卷的附录及补充材料组成的。它不准确，很愚蠢，存在偏见，杂乱无章，不专业，而且不诚实。从文本上来说，这是一部精神错乱、连篇累牍的色情作品，其中有许多迷人的角色和几条大部分被隐藏起来的故事线。从政治角度来看，通过对性相关材料的无限关注，这份报告试图抛弃，甚至抹杀相对枯燥的对真实证据和宪法程序的要求。[45]

这篇文章获得了杂志社颁发的评论奖。但同年晚些时候，《纽约客》断绝了与阿德勒的长期合同关系，也不再为她支付健康保险。之后她又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在9·11事件之前不久，她为《新共和》写了一篇批评最高法院的文章；二是就《纽约时报》犯的另一个错误进行的争论。但她总是感到自己被排斥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感觉很茫然，因为此时她的身后不再像肖恩时代那样有一个她可以依靠的机构了。

“我一直在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指出：如果你为康泰纳仕撰稿，但他们把你的文章撕得粉碎，那你也要坚持下去。用你的私人时间写你想写的文章，但不要辞职，因为那样你就不再属于那里了，你会变得易受攻击。当我离开《纽约客》时，我就成了狩猎目标。”[46]2013年，阿德勒这样告诉一位采访者，当时她的小说都被重新发行了，她正在享受某种复兴。批评界对于她的小说的卓越性的共识使她获得了新的显赫声望。但是那种分析视角，那种激烈批判别人观点的能力却没有再找到适合的用武之地。自1999年以后，阿德勒再也没有发表过新的散文。

---

[1] Lili Anolik，“Warren Beatty，Pauline Kael，and an Epic Hollywood Mistake，” *Vanity Fair*，February 2017.

[2] “The Perils of Paulin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ugust 14，1980.

[3] 马修·怀尔德写给编辑的信，*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5，1980。

[4] John Leonard，“What Do Writers Think of Reviews and Reviewers？” *New York Times*，August 7，1980.

[5] *Time*，July 27，1980.

[6] Jesse Kornbluth，“The Quirky Brilliance of Renata Adler，” *New York*，December 12，1983.

[7] 1961年8月29日，玛丽·麦卡锡写给Carmen Angleton的书信，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499。

[8] 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00。

[9] Review of *John Hersey's Here to Stay*，*Commentary*，April 1963.

[10] “Talk of the Town，” *New Yorker*，December 8，1962.

[11]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New Yorker*，July 4，1964.

[12]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New Yorker*，July 4，1964.

[13] “Comment，” *New Yorker*，July 20，1963.

[14] *Gone*：*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Simon and Schuster，1999），82.

[15]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Interview*，August 14，2014。

[16] *Gone*，33.

[17] 2015年11月，我在纽约大学人类学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就本书的调研进展作演讲时，阿德勒在问答环节中这样说。

[18]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New Yorker*，July 4，1964.

[19] Irving Kristol，“On Literary Politics，” *New Leader*，August 3，1964.

[20] “Letter from Selma，” *New Yorker*，April 10，1965.

[21] Jesse Kornbluth，“The Quirky Brilliance of Renata Adler，” *New York*，December 12，1983.

[22] “Fly Trans Love Airways，” *New Yorker*，February 25，1967.

[23] “Fly Trans Love Airways，” *New Yorker*，February 25，1967.

[24] 尼日利亚东南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历史上未被普遍承认的国家。这个国家于1967年5月30日成立，至1970年1月15日灭亡。其政权的军事首领于1970年1月12日正式宣布有条件投降。

[25] Introduction to *Toward a Radical Middle*：*Fourteen Pieces of Reporting and Criticism*（Dutton，1971）.

[26] “A Teutonic Striptease，” *New Yorke*r（此处疑有误，应为*New York Times*），January 4，1968。

[27] “Norman Mailer’s Mailer，” *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68.

[28] 这则广告在*Adler v. Condé Nast Publications，Inc.*，643 F. Supp. 1558（S.D.N.Y. 1986）的庭审过程中被引用。

[29] Lee Beauport，“Trade Making Chart on Renata Adler；But Some Like Her Literary Flavor，” *Variety*，March 6，1968.

[30] “How Movies Speak to Young Rebels，” *New York Times*，May 19，1968.

[31] “Science + Sex = Barbarella，” *New York Times*，October 12，1968.

[32]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Interview*，August 14，2014。

[33] *Pitch Dark*，（NYRB Classics，2013），5.

[34] Renata Adler，*Reckless Disregard*：*Westmoreland v. CBS et al.*；*Sharon v. Time*（Knopf，1986）.

[35] Ronald Dworkin，“The Press on Tria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26，1987.

[36] 参见Robert Gottlieb，*Avid Reader*：*A Life*（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6），220。

[37] *Gone*，203.

[38] Robert Gottlieb，“Ms. Adler，the New Yorker，and Me，” *New York Observer*，January 17，2000.

[39] *Gone*，125.

[40] “A Court of No Appeal，” *Harper’s*，August 2000.

[41] 迪安曾深深卷入水门事件和随后的丑闻掩盖过程。他被联邦调查局称为“掩盖的主要操纵者”。

[42]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帮助策划了水门大厦闯入事件。被判犯有阴谋，入室盗窃和非法窃听罪，狱中服刑四年多。后来成为演员、作家、电台脱口秀主持人。

[43] “A Court of No Appeal，” *Harper’s*，August 2000.

[44] “A Court of No Appeal，” *Harper’s*，August 2000.

[45] “Decoding the Starr Report，” *Vanity Fair*，February 1999.

[46] Rachel Cooke，“Renata Adler：‘I’ve Been Described as Shrill. Isn’t That Strange？’” *Guardian*，July 7，2013.

第十四章 马尔科姆

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职业生涯与雷娜塔·阿德勒的一样离不开《纽约客》。不过比起阿德勒的傲慢冲动，马尔科姆是安静低调的；比起阿德勒的年少有为，马尔科姆则是大器晚成。和汉娜·阿伦特一样，马尔科姆也是在过了不惑之年后才终于开始发表重要的作品。至于真正成名，则要一直等到她在1983年发表了一篇一位几乎还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学者的传略之后。这个原本是梵文学者，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的男人名叫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那时的他刚刚被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Sigmund Freud Archives）负责人的职位上解雇。

马尔科姆采访他时，马森刚过四十岁，那时的他头发浓密，自信的程度也还在心理健康范围内。根据马尔科姆的叙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马森就对她说：

> 分析领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做任何事情来摆脱我。他们嫉妒我，但我认为他们也真心觉得我是一个错误，一个麻烦和一个精神分析界的潜在威胁——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威胁。他们感觉到我可以一手摧毁整个精神分析行业——现实地说，这项事业让他们挣了很多钱。他们感到害怕是对的，因为我发现的东西是可以引发爆炸性后果的炸药。[1]

马尔科姆对马森用这种炸药引发的争吵很感兴趣。具体来说，他提出的是一个针对“性诱惑论”的论点，“性诱惑论”是一种关于亲子关系本质的理论，认为从原始意义上讲，亲子关系是由性吸引力定义的，这个

理论后来被弗洛伊德排斥和修正过。然而随着对这场知识论争的深入调查，用马尔科姆的话说，她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显然永远无法停止自我赞美的男人。

马尔科姆倾向于通过暗示而不是直白的陈述来传达想法。她向马森发起攻击时从来不使用直白的侮辱。她会像前文中那样不断引用马森的原话，那些内容自然会让他听起来像个傻瓜。例如，她会让他解释他通过精神分析治愈了自己的“完全滥交”的事。他告诉马尔科姆说，当他还是一名研究生时，他就已经和一千名女性发生过关系了，于是马尔科姆就引用了他的原话。或者，马尔科姆会引用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时写的一封谈论其他人的书信中的内容，借此来让自己对马森活动的描述更富有变化：“他所说和所想的一切都具有一种可塑性，一种温暖的感觉和一种至关重要的特征，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掩盖缺乏更深层实质的事实的。”[2]

这个特征需要被考虑在内是因为马尔科姆正在调查马森被解雇一事的情况。如果他多变、浮夸，而且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些就都成了相关的事实。不过最确信无疑的是，他还好打官司。马森最终会起诉马尔科姆，而且这场官司持续了多年，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马森起诉的理由是马尔科姆错误地引用了他的话，在下级法院进行的两次审理中，双方就报告文学的本质进行了辩论，但马森最终输掉了控告马尔科姆诽谤的官司。

珍妮特·马尔科姆这种微妙但极具毁灭性的间接攻击是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产物。马尔科姆1934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原名珍娜·温诺韦拉（Jana Wienovera），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文雅、顺从。战争爆发后他们一家逃离祖国，定居布鲁克林，珍妮特和妹妹玛丽（Marie）就是在那里学会英语的。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她还记得“幼儿园老师在每天放学时会说‘再见，孩子们（Good-bye，children）’，那时

我以为‘children’是个人名，所以我很羡慕叫这个名字的孩子。我偷偷地盼望着某一天，老师能够说‘再见，珍妮特’。”[3]

马尔科姆的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这无疑是让马尔科姆最终对该学科产生兴趣的影响因素之一），她的母亲是一名律师。他们都设法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为了方便美国人发音，马尔科姆的父亲将家族姓氏简化为温（Winn）。学习英语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珍妮特是个好学生，最终被密歇根大学录取。她的思想并不是很激进。像五十年代的其他很多人一样，她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讨好男人，然后结婚，组建一个家庭。她告诉《巴黎评论》的采访者说：“大学四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上过一位女教授的课。据我所知，学校里根本没有女教授。”在这一点上，她有时似乎会把自己看作一个艾丽丝·芒罗（Alice Munro）一样的人物：聪明，书卷气，但不是特别雄心勃勃，随随便便就结婚了，只因为别人都说这是你应该做的。

她开始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也很缓慢，而不是像阿德勒或帕克那样，带着已经完全成形的声音脱颖而出。在大学时，她认识了一位名叫唐纳德·马尔科姆（Donald Malcolm）的年轻人，唐纳德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珍妮特也有同样的理想，但是她的尝试总是被她的创意写作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否定。当毕业后的唐纳德·马尔科姆前往《新共和》工作时，珍妮特·温追随了他的脚步，也开始为这本杂志撰稿。她在1956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诙谐模仿风格的影评，模仿的对象是激动的青少年：

> 昨晚我去看了《铁血柔情》（*Love Me Tender*），我太喜欢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即猫王）没有一点淫秽或下流的感觉；他只是与众不同。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那时几乎还没有摇滚乐，但他确实比电影中的其他人都出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声和男子气概，更是因为他精彩的演技。[4]

这篇文章绝对不是什么严肃作品，在它的结尾，作者表达了希望玛

丽莲·梦露和猫王一起拍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愿望，因为那样就“太好了”。现代读者也许体会不到这其中的幽默，因为诙谐模仿文往往有时代局限性。但是年轻的珍妮特·温这种天真的讽刺一定给什么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六个月，她就开始不定期地为《新共和》撰写更严肃的电影评论了。她一般不喜欢好莱坞拍出来的东西。她贬低了奥托·普雷明格的《圣女贞德》（*Saint Joan*），认为他削弱了萧伯纳最初给予贞德的故事的道德复杂性。她也不喜欢亚历山大·麦肯德里克（Alexander Mackendrick）的《成功的美妙滋味》（*Sweet Smell of Success*），因为她觉得剧情太容易被看穿了。但是当写到对当时重新放映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的感受时，她的观点引发了一些读者的不满。马尔科姆认为这部电影不仅宣扬种族主义，而且过分专注于善恶之间的硬性划分：

> 就在影院之外，距此几个街区的地方，一项民权法案正在获得通过，尽管它还不尽善尽美；朝另一个方向走，也是距此几个街区的地方，一部名为《我曾是少年狼人》（*I Was a Teenage Werewolf*）的电影正在上映。我不禁感到愉悦和舒畅，因为无论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5]

读者就这些坚定的观点给出了强烈的反应。一个人给杂志社写信说他怀疑温女士可能知道得很多，并且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补充说“这一点并不容易确定，因为温女士非常坚定地展露了慈悲，她的散文带着满满的正义感评判我们。她的标准看起来如此之高”。[6]另一封读者来信的作者名叫哈尔·考夫曼（Hal Kaufman），自称是“电影专业学生”，他来信也是为了纠正温女士的错误。他对她产生疑虑的范围就更广泛了，并且举了一大堆例子来说明自大浮夸的人经常被误认为是有智慧的人。这封信的作者希望提醒温女士，“各地的领袖权威都对格里菲思（Griffith）[7]的电影给出了最高的赞赏”。[8]他不仅提到列宁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还敦促珍妮特在评判老电影时应表现出更多的“慈悲”。对

此，马尔科姆的回答非常简单：

> 考夫曼先生是一位“电影专业学生”，而我不是。我们怎么可能观点一致呢？

此时，马尔科姆已经将自己的批评才能转向书籍和戏剧领域了。她评论过劳伦斯的书信集，但没有什么比其中的引言更能激发她评判的欲望了。这篇引言正是由麦卡锡和阿伦特的老对手，黛安娜·特里林写的，后者当时是《国家》的首席批评家。马尔科姆指出，对一部文学批评作品而言，作者的妻子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人是毫不相干的问题，她以此嘲笑了特里林夫人称弗丽达·劳伦斯（Frieda Lawrence）为“特别讨厌的人”[9]是出于嫉妒，还评价特里林“老得厉害”及“没有真才实学”。

这些评论本身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铭记的地方，但是它们体现了一名年轻作家不断积累自信的过程。除了那些讽刺信之外，她也开始获得一些赞美，诺曼·梅勒就是赞美她的人之一。梅勒、多萝西·帕克和杜鲁门·卡波特一起上电视的内容是由马尔科姆为杂志写文章报道的。梅勒认为她对于自己与卡波特讨论的内容的引用有错误。但是他写的投诉信却似乎有一些调情的口气：

> 我不得不补充一点，温女士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瑕疵，那就是她说是我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并非出自我口。[10]

当时，珍妮特·温已经与唐纳德·马尔科姆订婚。1957年，唐纳德在《纽约客》获得了一份工作，珍妮特也搬回了布鲁克林居住。此后的七年里，珍妮特一直忙着照顾他们唯一的女儿安妮·奥利维娅（Anne Olivia），她本人没有发表过一个字。

如果你让她自己说她成为作家的故事，珍妮特·马尔科姆通常会从《纽约客》开始讲起。在她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不得不给她读很多儿童书。最终，她通过丈夫认识的肖恩先生建议她为1966年12月的《纽约

客》写写自己最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品。马尔科姆的表现可能比肖恩预期的更加热切。她向后者提供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散文，总结并分析了她最喜欢的那些书。文章开头的口气比她年轻时在《新共和》使用的口气少了一些顽皮：

> 我们的孩子是信仰的反光镜，也是哲学的试验场。如果我们想要养育一个快乐的孩子，而不关心他的行为方式，那么我们显然是相信人性本善，以及生活中存在无穷的幸福的可能。[11]

有了这第一篇文章之后，肖恩又在1967年和1968年继续邀请马尔科姆撰写类似的作品。1967年的评论与1966年的评论一样刻板，但是到了1968年，某些原因让马尔科姆选择涉足理性论证的领域。在文章的中间部分，马尔科姆加入了一段与医生的争论，后者坚持认为，给孩子看的现实应当被粉饰得“不那么丑陋”。

> 我不知道拉萨尼亚医生（Dr. Lasagna）要如何让现实变得“不那么丑陋”，我甚至不确定今天的现实是否比曾经任何时候的更丑陋了。今天的人们对社会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这并不意味着今天存在的社会问题更多或更糟。有人会认为，如果今天的孩子也会因为偷一根面包而被绞死，那么要面对现实将更加艰难。（今天的人应该把给我们做面包的人绞死。）[12]

接下来，她开始建议让孩子阅读关于麻醉药物的“科普读物”，目的就是防止他们沾染毒品。她也推荐了一些关于性的书籍，不过她说这些书“比之前出版的任何书籍都直白得多，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接受这样介绍此类问题的方式”。马尔科姆还评论了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关于黑人历史的书籍，并发现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让她学到了以前不了解的事。

肖恩先生显然注意到了这个开始显露天赋的人才，于是他安排马尔科姆负责一个名叫“关于房子（About the House）”的专栏，写一些关于艺术和设计的文章。马尔科姆认为这是学习如何写作的良好训练。此外，这也是她第一次进入批评之外的领域。她开始慢慢撰写这些文章，

谈论各个经营家具和室内设计的商人。到1970年，她也写了一些关于其他人正在谈论的新兴的女性解放运动的文章。

那篇文章是被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文章的作者署名被杂志社错写成了“Janet Malcom”（应为Malcolm），但马尔科姆曾经的那种俏皮口气又出现了。她取笑了女权运动中普遍存在的，认为唯一能够获得满足感的地方只能是在家庭以外的地方的观念。

> 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好让自己可以继续工作的女性不应该虚伪地宣称自己的决定是为了孩子好。她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她决定这么做可能是对的——自私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她应当看清自己在做的这件事，并甘愿承担情感淡薄的结果，那往往是没时间管孩子的父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13]

这些文字中隐含的愤怒可不只是一点点，它提出的“新的女权主义可能是一种更易招人怨恨的导致不幸福和不满足的原因”的主张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论点。迪迪翁在担忧女权运动纠结于“琐事”时就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但是马尔科姆的论述也显示了某种不确定，因为它并不符合一个正在逐渐建立独立性的作家的观点，而是符合一个认为做母亲是一种愉快的经历的人的观点，这样的人既不想放弃由此产生的任何益处，又不想失去主张某种程度的选择权的机会。不过，她在这里的文风和她在《纽约客》发表的散文中的活泼完全不同。《纽约客》上的马尔科姆更加优雅，是完全的意识流风格。而在应《新共和》编辑的要求回应充满愤怒的读者来信时，她则写了一个典型的充满讽刺意味的答复：

> 至于那些提出关于主旨的问题的人们，我需要比烘焙点心和把食物装罐的家务活允许我的更长的思考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希望能再给你写一篇散文来探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14]

也许这种不确定是因情境而生的。马尔科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的丈夫唐纳德正身患重病。医生们都查不出他哪里出了问题；后来马尔

科姆认定丈夫得了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没过多久，唐纳德就无法工作了，虽然当时的《纽约客》对作家还很慷慨，但这个家庭依然承受了相当大的财务压力。而且谁都看得出来，唐纳德·马尔科姆已经时日无多。

马尔科姆依然在每月按时发表她关于家具的专栏文章。其中大多数内容都是在简单地列举和描述她喜欢的那些商品。但是在1972年3月，她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固定模式。为了写这篇关于现代家具的专栏文章，她去拜访了艺术家吉村二三夫（Fumio Yoshimura），“至今为止，他更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妻子凯特·米利特，而非他的作品”。[15]米利特在1972年已经是名人当然是因为她写了那本畅销书《性的政治》。这本书是一种把女权主义引入文学批评的颠覆性方法。在马尔科姆继续描述与吉村的接触过程时，她总是会被米利特分散注意力，而谈话最终也确实转向了女性的解放。

> 我提到这里的父母担心那些不喜欢运动的男孩长大后会成为同性恋者。“这种命运比死亡还糟糕。”凯特·米利特并没有把目光从她的信件上抬起来，她只是小声这样说道。后来我意识到，凯特·米利特退出这场谈话其实是一种圆滑，而非不懂礼貌。

时至此时，马尔科姆似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她的文章最终变成了对米利特的采访，而且她在提到米利特时一直在使用她的全名。

> 与凯特·米利特谈话时完全听不到《性的政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暗示、讽刺和学术性的腔调……凯特·米利特的雕塑看起来都很相似，而且都很像凯特·米利特本人。它们都有一种棱角分明、坚实、强大和乐观的特性。

这就是会让珍妮特·马尔科姆受人尊敬但也会引发争议的那种报道文学的第一次出现。她在这次简短的采访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开始建立一个“我”，后来她会告诉大家这个“我”不值得信任，只是一种必要的伎俩。例如：读者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们读到的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一个

对女权主义持极大怀疑态度的人采访一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的内容，但这个怀疑者显然已经读过米利特的书了。

唐纳德·马尔科姆于1975年9月去世。也许是想到自己不得不打造一个更加稳固的职业生涯，所以在丈夫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珍妮特·马尔科姆开始将事业范围扩展到摄影这种令她感兴趣的新艺术上。那时她还没有读过苏珊·桑塔格的那些在《纽约书评》上慢慢发表的作品。她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终于读了那些文章。

但是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前，她为《纽约客》评论了一本关于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书，接着又为《纽约时报》回顾了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作品。在关于韦斯顿的评论中，她非常仔细，而且倾向于使用专业术语。这最终成了《纽约时报》对她能否担任摄影批评家的一种考察，然后他们就向马尔科姆提供了这个职位。但威廉·肖恩告诉她，她也可以选择担任《纽约客》的摄影批评家。

1980年，马尔科姆出版了她关于摄影的散文作品集《黛安娜和尼康》（*Diana and Nikon*）。马尔科姆在书中承认，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她写道：“重读这些文章让我联想到一个试图砍倒一棵树的人，她以前从未砍过树，她也不是很强壮，她的斧子也不好用，但是她非常固执。”[16]她认为自己是从1978年才开始找到窍门的。当时她写了一篇名为《两条路》（*Two Roads*）的文章，内容是探索摄影的快照属性。她开始从道德角度谈论摄影，这个方法一直被桑塔格运用得很好。通过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她可以更容易地传达她为什么觉得很多照片令人不安：

> ［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书并不是一本它本应成为的表现优雅和秩序的选集。相反，这本书里充满了混乱和无序，有难看的肮脏凌乱的场面和眼神空洞的人物，还有被冷漠的资本主义机器压垮的受害者和

> 失败者，他们居住的国家的精神与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受到了侵蚀，已经枯竭。[17]

你还可以看到马尔科姆在处理某些主题时的轻松状态，她的文字读起来也更令人愉快：

> 不了解内容的人如果翻开大都会博物馆在展出这些摄影作品时出版的《乔治娅·奥基夫：一幅肖像》（*Georgia O'Keeffe*：*A Portrait*）这本书，会觉得自己就像开着车在乡下转转，然后突然就来到了巨石阵。[18]

对于摄影题材驾轻就熟之后，马尔科姆又开始对撰写被《纽约客》称为"纪实报道"的那种文章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名字是杂志社内部对于那种长篇报道文章的称呼，这种文章也是《纽约客》的标志性作品。此时的马尔科姆已经再婚，她的丈夫是《纽约客》的编辑加德纳·博茨福德（Gardner Botsford）。当时她正在戒烟，她曾经认为抽烟和写作是两件密不可分的事。但是做报道能让她深入社会，她总不能一边抽烟一边采访。所以她告诉肖恩先生她认为自己应当写一篇"纪实报道"，她选择的主题是家庭治疗法。也许因为父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所以马尔科姆也有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洞察力。反正身为作家的马尔科姆选择精神分析这个主题绝对是一种完美且令人难忘的搭配。

当马尔科姆开始撰写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文章时，这个事物已经存在近一个世纪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她开始写关于精神病治疗法的文章时，她选择的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题材。精神病药理学当时正处在兴起阶段；很多杂志在反复提及一种被称为"母亲的小助手"的地西泮类药物（Valium，即安定）。女权运动对精神分析大多持厌恶态度，将弗洛伊德思想（比如"阴茎嫉妒理论"）视为对女性的根本性压迫的基础。然而，具体到治疗方法本身，尽管其在美国的鼎盛时期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才来临，但从此时开始，它们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了。存在主义精神治疗师罗洛·梅（Rollo May）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创作了一些非常受欢迎的著作，他的作

品在那些可能会订阅《纽约客》的文化精英中间很流行。以上所有原因都足以激发人们对这个题材的好奇心。

马尔科姆就现代精神病治疗实践展开探索的第一篇文章名叫《单向镜》（*The One-Way Mirror*），内容是关于家庭治疗法的。文章指出，这些实践实际上推翻了大部分已经存在的精神分析学思想。随着接受治疗一端的人数越来越多，等式另一端的治疗师也变得更具对抗性和战略性，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坚持保密义务。马尔科姆怀疑地看待这一切，但她也给了家庭治疗师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结果却是，他听起来有点像穿着廉价套装的推销员：

> 家庭治疗法将在此后的一二十年内取代精神病治疗法，因为它是关于特定环境中的人的。这是一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疗方法，而个人治疗法是属于十九世纪的。这并不是贬义的说法。只是事物都在发展和变化，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某些特定的看待和回应生活的方式在各个地方出现。家庭治疗法对于精神病治疗法而言就像品特（Pinter）[19]之于戏剧，或生态学之于自然科学。[20]

这篇文章并不完全是被写来对精神分析学这个整体进行批判的。遭到批判是马尔科姆的下一个报道对象面临的命运。这位典型的治疗师被她取名为“阿伦·格林（Aaron Green，这不是他的真名）”。马尔科姆从自己对格林广泛深入的采访中找到了对精神分析学家和一般的精神分析学提出批判的理由。简而言之，她分析了阿伦·格林。连格林的治疗师的躺椅都成了被评论的对象：

> 被摆在房间里的空荡荡的躺椅带着一种饱含深意的气势。它似乎是在说：“我可不是什么破旧的泡沫橡胶包裹的沙发，我是躺椅。”[21]

这种微妙的笔触（还有对报道对象的室内装饰的幽默潜质的标志性兴趣）揭示了马尔科姆写作技巧中的一些重要特征。虽然文章立足于一个批判的角度，但它的批判并不是冷酷无情的。马尔科姆是在阐明一个

问题，并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作出某种评判，但正如一位评论家解释的那样，她总是更“顽皮”。[22]虽然阿伦·格林有时显得愚蠢和焦虑，但他也非常有同情心。在马尔科姆的质疑之下，他逐渐认识到就连这个职业对自己的吸引力也具有一种心理上的缺陷：

> 我被精神分析工作吸引的原因就是它能在我和接受我治疗的人之间创造一种距离。这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禁绝状态。[23]

马尔科姆继续给这个“不可能的职业”中存在的模糊和虚伪进行编目：比如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治疗方式；还比如病人从精神分析治疗中得到的很可能不是治愈，而是“移情”的事实。这种现实指的是病人将他们最初来接受治疗时想要处理的，从童年时期保留的情感和渴望投射到了他们与治疗师的关系上。马尔科姆认为，这些问题中有绝大部分被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制度化了，治疗师们本身也将自己视为一种代理父母。马尔科姆温和地指出，这种培训坚称好的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先接受广泛的心理分析。

但她并没有把格林本人描绘成一幅讽刺画。他似乎是个运气不佳，困惑烦恼，很可能需要换一份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恶意的人。

为阿伦·格林写的传略被整合成了一本名为《心理分析：不可能的职业》（*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的书，它获得了来自各方的狂热赞美。差不多每个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个时间里都尝试过精神分析治疗，然后就厌恶地放弃了它，因为他们对这种治疗在病人身上应该产生什么效果感到困惑。马尔科姆的作品无比精妙地论述了这个悖论，以至于每个评论家，甚至是精神分析学家们都被这本书迷住了。

大受鼓舞的马尔科姆于是展开了与精神分析学家相关的第二个项目。这篇文章依然是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写的长篇传略。但这一次，马

尔科姆没有在曼哈顿丰富的治疗师资源中寻找对象，而是选中了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马森所谓的“炸药”出现在弗洛伊德与其门徒之一，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之间的未被公开的书信中。马森立即告诉各个报社说他从这些书信中发现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放弃所谓的“性诱惑论”。最初的性诱惑论认为童年的性经历，通常是受到父母之一的性诱惑的经历是大多数病人患上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弗洛伊德在1925年放弃了这个理论，他解释说他已经明白，当病人描述这种经历时，他们描述的往往不是一种真实发生的，而是某种超自然的情况。如果马森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弗洛伊德最初怀疑儿童时期的性经历（当代人普遍称之为性侵犯）是大多数心理障碍的核心的想法就是正确的。

马尔科姆对马森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所以她决定打电话给马森。马森非常健谈，而且喜欢在言语中透露许多信息。在为期几天的采访过程中，马尔科姆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录音，另一些则记在了笔记本上。马森给她讲了他的婚姻，他的婚外情。他还告诉她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他的其他导师都对他有所怀疑。马尔科姆根据自己的笔记引用了她认为是马森的原话的内容，但马森后来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我就像一个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人们从你那里获得快乐，但是他们绝不会把你带到公共场合。”[24]显然，马森已经准备好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了，因为他正准备写一本关于他宣称自己在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书信中找到的真相的书。安娜·弗洛伊德和最初帮助马森获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工作的库尔特·艾斯勒（Kurt Eissler）都告诉马尔科姆，他们认为马森对这些书信的理解有误。

大概正是因为受到了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围攻，所以马森才认定马尔科姆可以成为他的某种新朋友。在他们接触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知道马尔科姆是打算将他告诉她的内容写成文章的，然而他仍然会连续好几个小时，事无巨细地给她讲述他的性生活，他与同行的宿怨，以及他强烈的自我价值感中的各种因素。马尔科姆最终发表的文章中的很

多内容都是对马森原话的大段引用，不是关于马森对弗洛伊德观点的理解，就是关于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大量女性的长篇大论。一个典型的段落是这样的：

> 你知道安娜·弗洛伊德曾对我说过什么吗？她说，“如果我父亲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想要成为一名分析师。”我发誓，这些都是她的原话。不对，等等。这个很重要。这话是我对她说的。我说：“弗洛伊德女士，我觉得如果你父亲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成为分析师。”然后她说：“你说得对。”[25]

尽管这些长长的引用看起来像是不曾被打断的独白，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由马尔科姆用采访中的各个地方的内容拼凑出来的——马森后来在法庭上就是针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异议。

几乎所有读了这篇《档案馆中的麻烦》（*Trouble in the Archives*）的读者都会认定马尔科姆是故意将马森描述成一个小丑，并破坏他的可信度的。即便是像批评家克雷格·塞利格曼这样充满智慧、有辨识力的粉丝也把马尔科姆的这篇关于马森的作品称为“诋毁人格的杰作”。[26]这些文章后来被克诺夫出版社出版成了一本名为《在弗洛伊德档案馆》（*In the Freud Archives*）的书。毫无疑问，没有人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还会认为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是一位正直的公民。最终，就连马尔科姆也对马森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她在与一位被卷入这场事件的分析师交谈时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乎过任何事情。”[27]

然而，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马尔科姆本意的轻微误读。我们很快会讲到关于这本书的后续争议，在那些过程中马尔科姆已经证明除少数例外，她几乎完全是在引用被记录在录音带和笔记本上的马森说的内容。从这一角度来说，她只是传达了马森提供给她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诉讼中，马森坚称有些引文是编造的，另一些则是断章取义，但不是全部引文都存在这些问题。将这篇文章简单地认定为“诋毁人格”，就等于是在暗示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不存在这种合作。

马尔科姆是否有义务阻止马森本人的自我毁灭行为这个问题将成为一个占据她人生接下来十年的问题。

这本书出版之后，马森果然火冒三丈。他给《纽约时报书评》写了一封投诉信，说自己受到了诽谤。马尔科姆对此的回复也很尖锐：

> 事实上，对马森先生的描述是基于四十多个小时的录音对话得出的。这些采访开始于1982年11月，地点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最初的采访为期一周，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我们还通过电话进行了后续采访……我引用的马森先生说的所有内容都是他说的，而且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引用的。（说“几乎”是因为存在为语法规则而进行的更正。）[28]

最终，马森向法院提起了要求被告赔偿1020万美元的诽谤诉讼。其中1000万美元是惩罚性赔偿。这是一个荒谬的数额。对马尔科姆来说不幸的是，这场诉讼一直延续了十多年。如无数评论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指出的那样，马森总是不得不改变他指控的具体内容。[29]他在最初的原告陈述中列出了他确定他对着录音说过的内容。马尔科姆都能够播放出来。

但是有几个问题确实很突出。一个是“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这个说法在录音带上无法找到。另一个是如马尔科姆在给《纽约时报书评》回信为自己辩解时说到的那样，她确实对引文作了一些改动，但这主要是为了删除某些马森提出的更夸张的观点。就这样，这场诉讼成了法院的一个棘手案件。正如赫尔曼诉麦卡锡案（Hellman v. McCarthy）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尔科姆最终是否能够胜诉（她最终胜诉了），而在于这场纷争在持续过程中可能给她造成多大伤害。

1987年，马森的首次起诉被驳回。马尔科姆后来懊恼地说：“我早应该想到，写完描述他的文章后，马森不会轻易罢休。”[30]不过她已经决定将精力投入到一个新项目中了。

《新闻记者与谋杀犯》（*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于1989年分三期被刊登在《纽约客》上。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很有名，马尔科姆是这么写的：“任何不是太过愚蠢或太过自满的记者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31]这句话就像是点燃了一条导火索。许多人似乎根本不在乎这句话之后写的是什么了。我第一次见到马尔科姆是在这句话被发表二十年后，当时她站在《纽约客》节（New Yorker Festival）的高讲台上谈论她的作品。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男子站起来，愤怒地就这句话向她提出质疑。在回答之前，马尔科姆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嗯，你明白，那其实是一种修辞手法。”[32]然而这个年轻人显然并没有真正明白。

这样的情况不过是马尔科姆出版她深入研究记者乔·麦金尼斯（Joe McGinniss）和杀人犯杰弗里·麦克唐纳（Jeffrey MacDonald）之间纠纷的成果之后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缩影。1979年，麦金尼斯与麦克唐纳签订合同，商定在麦克唐纳因为谋杀自己的家人而接受审判期间，麦金尼斯享有独家采访他和他的辩护律师的权利。麦克唐纳同意了，显然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某种大新闻。麦金尼斯因为写过一本《1968年总统的推销》（*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而很有名气，该书毫不粉饰地描述了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是如何让他们的候选人看起来更加……怎么说呢……风度翩翩的。凭借这本书，麦金尼斯收获了相当多的尊重。

对于麦克唐纳来说不幸的是，到审判结束时，麦金尼斯认定他确实犯下了他被指控的罪行。根据他们的协议写出来的这本名为《致命幻象》（*Fatal Vision*）的非虚构作品是一本粗制滥造，但是非常畅销的书。该书声称麦克唐纳是一个精神变态者，他冷血地杀死了自己的全家。被塑造成受人鄙夷的凶手的麦克唐纳随后起诉麦金尼斯，称后者有意地误导了自己对于这个项目性质的理解。根据大多数新闻行业的标准来看，麦金尼斯的行为确实越界了。比如，麦克唐纳可以拿出两人之间的通信作为证据，其中有麦金尼斯似乎是为了消除麦克唐纳的疑虑而向

这个能给自己提供新闻的人表示，他认为判定麦克唐纳有罪是严重的不公的内容。

马尔科姆继续介绍了她所知道的事：

> 他是一个自信满满的骗子，靠捕捉人们的虚荣、无知或寂寞生存，先获得他们的信任，再毫无愧疚地背叛他们。好比一个容易轻信别人的寡妇，一觉醒来，发现那个迷人的年轻男子和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当文章或书籍面世后，一位同意成为非虚构作品描述对象的受访者得到的惨痛教训。[33]

鉴于这段话是从被出卖的受访者角度说的，所以许多读了这篇文章的人便立刻认定马尔科姆是在控诉新闻行业。记者们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谈论新闻业。到1989年，也就是马尔科姆的文章被发表时，新闻界充斥着想要成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人，他们都自认为可以凭借新闻工作与真正的权力对抗。结果就是，许多人觉得马尔科姆伤害了他们的尊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批评风暴。

“马尔科姆女士似乎创造出了一条吞下自己尾巴的蛇：她攻击所有记者的职业道德，也包括她自己的，然而她并没有透露她自己在扮演‘自信满满的骗子’时干过哪些勾当，”[34]《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激烈地斥责马尔科姆，还诬告她曾经承认“捏造事实”。算得上重要图书批评家之一的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指责她用给麦金尼斯定罪来为麦克唐纳免罪。一位很受伤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作家在环视报社的办公室时看到“同事们在记录政客的行为，报道医学界的突破……谁能告诉我这些常规的新闻工作何错之有？”[35]

马尔科姆也有一些支持者。戴维·里夫就在《洛杉矶时报》上为她辩护。他指出，就马尔科姆的立场而言，她说的这句话与琼·迪迪翁那句大受赞美的“作家总是要出卖一些人的”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36]

诺拉·埃夫龙在此之前就与马尔科姆成了朋友，她在接受《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采访时说：“珍妮特·马尔科姆说的话合情合理，竟然有人对此大做文章令我感到非常震惊。”[37]她还说：“我相信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你必须愿意完成被珍妮特描述为背叛的那种交易。”这句话与菲比·埃夫龙的“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要表达的态度也很相近。与之对立的问题是有些时候，其他人并不愿意成为被借鉴的内容。

> 另一位广为人知的丑闻探听者是曾在1963年曝光了殡葬行业内幕的杰茜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她也来自一个有多位可以被形容为“锐利”的姐妹的家庭。她呼应了诺拉·埃夫龙的观点：“我认为马尔科姆的文章非常精彩。”[38]

相关报道的另一个主题是鉴别马森与马尔科姆之间刚刚发生的事情与马尔科姆在《新闻记者和杀人犯》中所分析的情况之间的相似性。马森感觉他有机会重新谈论自己的故事了，于是他告诉《纽约》杂志的一位记者说，他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时觉得那就是写给他的公开信，是马尔科姆对自己罪过的一种坦白。[39]他一直在对驳回自己起诉的判决提出上诉，最后一路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判定他可以重新提起诉讼，但最终，马森于1994年败诉，陪审团认定马尔科姆虽然不够严谨，但她的行为不带有“鲁莽漠视”的主观恶意。一位陪审团成员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马森有点太诚实了。他说出了一切，表露了自己的本质。她据此给他画了幅画像，而他并不喜欢。”[40]

后来，马尔科姆说，她有点理解为什么人们向她扔了这么多石头：

> 当自封的神明倒下时，谁不为此感到愉悦呢？被在泥泞中拖着走的人是一位《纽约客》作家这个事实只会增添邪恶的欣喜。当时的《纽约客》还是一个用高高在上的道德感把自己包裹起来的毛茸茸的虫茧，这一点真的让为其他出版物工作的人很恼怒。在有媒体来采访我时，我像所有《纽

> 约客》作家认为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对采访者唯恐避之不及，简直就是恐惧宣传的威廉·肖恩的翻版。这种方式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当马森在一个接一个的采访中对我提出错误的指控时，我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是一直保持着荒谬的沉默。[41]

不过马尔科姆也不是完全沉默的。就在马森提出上诉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和杀人犯》以书的形式正式出版了。马尔科姆为该书写了一篇新的后记。在这篇后记中，她否认麦金尼斯与麦克唐纳的争议折射了她与马森之间的麻烦。她还说实际上自己开始觉得马森可怜，因为他再一次被记者们利用了，那些人打电话给他，为的是借用他的话来攻击她，之后他就会再次被抛弃。[42]

她在这篇后记中做的另一件事是为编辑引用内容的理念作出辩护。这一点正是马森在诉讼中提出指控的争议点：他宣称马尔科姆拼凑句子和改变句子顺序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她作为记者而享有的权利的范围。她为这种做法进行辩护的理论是她在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还会多次提到的，那就是用“我”写出的文字并不总是值得信任的：

> 新闻中的“我”与自传中的“我”不同，后一个“我”代表着传记作者本人，而前一个“我”与文章作者之间只存在一种很薄弱的关联——就像超人与克拉克·肯特之间的关联。新闻报道中的“我”是一个被过分信赖的叙述者，一个被赋予了叙述、辩论和定基调的重要任务的人，它是为文章而专门创造出来的，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一样。这个“我”是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是不带感情地观察生活的理念的化身。[43]

这种号召人们连作者本人也不要相信的理念不仅是解锁马尔科姆作品的万能钥匙，也几乎是解锁本书中所有人物作品的万能钥匙。从丽贝卡·韦斯特到迪迪翁和埃夫龙，一种强健的第一人称体系已经在这个世纪中被建立起来，而马尔科姆的理念为这个体系增加了一些东西，即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阅读马尔科姆的文章时，人们总会体验到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这种感觉既与名义上的主题相关——麦金尼斯真的那么差劲吗？马森真的是个白痴吗？——又与叙述者本身相关——她究竟

又要使出什么新花招戏弄我们？

在马尔科姆身上总会出现这种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是她的一种技巧。正如精神分析师引导她的病人检查和分析自己的习惯反应和感受一样，马尔科姆也激发了一种饱含情绪的反应，这种反应让许多记者重新思考了他们对自己职业的了解。

总之，对《新闻记者和杀人犯》的愤怒除了证明马尔科姆试图提出的论点的正确之外，并没有带来其他效果。很明显，这本书的主题是新闻。它的论点是被撰写的主题总会为别人写出的关于它的内容而感到受了背叛。新闻界也确实因为马尔科姆对它的评价而感到受了背叛。幸运的是，人们最终改变了想法，如今，《新闻记者与杀人犯》成了大多数新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如果你问马尔科姆本人，她也会这样告诉你，最终，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

*

马尔科姆随后的所有作品都受到了《新闻记者与杀人犯》的先入为主的影响。无论看什么问题，她都会发现其中存在的说不通的地方。她写了谋杀案的审判［见于《密林山坡中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a in Forest Hills*）］和企业的不正当行为［见于《希拉·麦高夫之罪》（*The Crimes of Sheila McGough*）］，她会着眼于决斗故事双方的说法，以及他们看似不可调和的不一致性。她还写了一篇关于艺术家戴维·萨尔（David Salle）的文章，其中包含了如其标题所示的《四十一种虚假开头》（*Forty-One False Starts*）。[44]因此，这篇文章似乎是在质疑写新闻是否有用。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在审视这些我们依靠其来给我们讲故事的人的过程中，马尔科姆表达了对叙述的怀疑态度——一种与迪迪翁的怀疑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的真假很相似的怀疑者的态度。

但最好的例子大概还要数《沉默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

这是马尔科姆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篇足够一本书长度的关于西尔维娅·普拉斯、她的丈夫特德·休斯（Ted Hughes），以及一个想要理解他们二人在一起时的生活的传记作者的文章。普拉斯是一位早熟的诗人和散文家，二十多岁时发表了大量作品，但从未特别出名。最终她移居英格兰，嫁给了诗人特德·休斯，并生了两个孩子。她出版了一本诗集，但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沮丧。1963年，休斯为另一个女人而离开她之后，普拉斯选择了自杀。她去世几年后，她创作的所谓的忏悔诗歌集《阿里尔》（*Ariel*）得以出版并广受赞美和追捧。同样在她去世后出版的小说《钟形罩》也成了经典之作。而麻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那些在普拉斯去世后成为她的崇拜者的人们相信自己对导致她自杀的苦难有独特的见解，他们责备特德·休斯是罪魁祸首。休斯的名声糟糕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普拉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休斯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留她独自在异国生存，除了两个还很年幼的孩子，没有其他亲人在身边。作为情感激烈的诗歌《阿里尔》的作者，普拉斯后来成了女权主义者中的幽灵明星，这意味着大量的愤怒指向了休斯。鉴于此，休斯和他的姐姐奥尔文（Olwyn）在决定为普拉斯写传记的人选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会通过控制传记作者从普拉斯尚未发表的作品中引用哪些内容来控制传记的写作。

马尔科姆对整个案件的兴趣源于他们选择了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为传记作者。马尔科姆说她在密歇根大学时就认识史蒂文森了。上过同一所大学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而且在史蒂文森身上，她似乎不仅看到了与自己的一些相似之处，还看到了一个自己曾经想要成为的人的样子。

> 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着，有人指着她让我看：一个苗条、漂亮，看起来有点笨拙紧张，但是充满激情的姑娘，她正打着手势，周围都是些表情专注的男孩。那时候我非常倾慕艺术气息，而安妮·史蒂文森就是我想象中闪耀着特别的夺目光彩的人物之一。[45]

然而，史蒂文森写的普拉斯传记《苦涩的名声》（*Bitter Fame*）遭到了严重的批判。史蒂文森在一篇显眼的作者序言中再三表达了对奥尔文·休斯的感激之情，还暗示休斯在手稿发表之前已经读过、评价过，甚至是要求修改过书中的内容。这被视为对史蒂文森身为传记作者的正直和诚实的攻击，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避免让委托人在手稿出版前看到其中内容能保证传记更加客观。马尔科姆对这本书也有疑虑，但她的疑虑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她发现自己对身为传记作者的史蒂文森似乎是被命令采取的明智姿态感到厌恶。包括一位真的很讨厌普拉斯的人在内的一些受访者在书中根据自己与普拉斯相处的经历发表了意见，与他们提供的内容相比，史蒂文森遵从仔细权衡证据的必要性而写出的东西显得很乏味。

这种对基于个人经历的更坚定的声音的偏好让马尔科姆开始同情休斯和他的姐姐。她发现了休斯写给这段传奇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书信，休斯在信中愤怒地抱怨他们将他的个人经历转变为某种“官方历史——好像我是一张墙上的照片，或西伯利亚的某个囚犯一样”。[46]马尔科姆觉得这很有说服力，尽管她还认为这个故事中的许多人物在描述自己体会过的普拉斯的性格时都带着值得怀疑的动机，但她依然表示认可休斯的说法。这本书在结尾处完全推翻了可以被称为普拉斯故事中一位关键证人的观点。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人是谁；你应该自己去读这本书。对此，马尔科姆的观点依然是你不需要相信任何人，不需要带着她曾在两个不同的上下文环境中提到的“单调的平静”接受任何人对事实的断言。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尔科姆对自己作了一个小小的披露。她去拜访了批评家阿尔·阿尔瓦雷斯（Al Alvarez），他是普拉斯最后的朋友之一。阿尔瓦雷斯先是和蔼可亲地与她谈论了五十年代在汉娜·阿伦特家举办的聚会，然后解释了自己不觉得普拉斯有吸引力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太“高大”了：

> 我明白他想说的什么，这让我感到不舒服。阿尔瓦雷斯认为我是那些

> 可能被邀请参加汉娜·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举办的聚会的人，这是种恭维，但并不正确（我怀疑那时我是否知道汉娜·阿伦特是谁），所以他现在令人苦恼地将我误认为是一个能够毫无痛苦地听他讨论他认为没有吸引力的女性的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是犹太人而被默默地包含到一段反犹谈话中的犹太人一样。[47]

这里体现了一丝明显的女权主义思想，明确表达了对男性之间，甚至是男性与其他女性谈论女性的方式的不满。这是一个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出现在马尔科姆作品中的主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了那篇长篇批评文章之后，她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已经渐渐改变了。她还结交了一些女性作家朋友。马尔科姆甚至和桑塔格有点接触，但交情不深。1998年桑塔格再次患病时，马尔科姆给桑塔格写了一封短笺：“午饭的时候我没有表达清楚，在这里我还是要尽力尝试说明白，我为你不得不经历的一切深感难过，我非常钦佩你，我也非常感谢你写出《疾病的隐喻》。”[48]

像迪迪翁一样，马尔科姆也会成为诺拉·埃夫龙的朋友，并逐渐对她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感到一种深深的共鸣。女权主义是她们常年谈论的主题之一。在埃夫龙人生的晚期，她们两个人都会成为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们会重读《金色笔记本》（*The Golden Notebook*），只是为了看看它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在作为记者和批评家的人生经历中，马尔科姆似乎注意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对待聪明、有能力、有见识的女性的。1986年，她发表了一篇英格利德·西奇（Ingrid Sischy）的传略，题为《时代精神的女孩儿》（*A Girl of the Zeitgeist*）。这篇文章是在马森最初提起诉讼的那段时间里完成的。文章的主题之一就是一个严肃的女人如何一直努力在一群严肃的男人的否定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有一次，西奇告诉马尔科姆说她曾经在午餐时遇到过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对西奇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不喜欢她的样子。马尔科姆立刻把自己想象成了那个男人：

> 在看到《艺术论坛》（*Artforum*）从一本没有生命、暧昧不明的杂志变成一本属于疯狂、自信的当代人的杂志之后，人们只能想象它的编辑一定属于某种惊人的现代风格，具有某种被释放到世界中的令人诧异的新女性的感知力。这让我已经想好了如何写这篇关于她的文章。然而此时走进我家中的，是一个讨人喜欢、聪明、谦逊、有责任心、有职业道德的年轻女性，她身上没有一丝我确信将会看到的夸张做作的感觉，所以就像午餐时的那位政客一样，我明显失望地转过身去。[49]

女人对彼此的期望，我们把对方设想成什么样子的方式，让我们充满希望，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希望破灭的时刻：这似乎是成为一个会思考，并公开谈论思考的女人的本质。

---

[1] *In the Freud Archives*（Knopf，1983），35.

[2] *In the Freud Archives*（Knopf，1983），133

[3] “Janet Malcolm，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接受Katie Roiphe采访，*Paris Review*，Spring 2011。

[4] “A Star Is Borne，” *New Republic*，December 24，1956.

[5] “Black and White Trash，” *New Republic*，September 2，1957.

[6] James F. Hoyle写给编辑的信，*New Republic*，September 9，1957。

[7] 《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导演和编剧。

[8] Hal Kaufman写给编辑的信，*New Republic*，September 30，1957。

[9] “D. H. Lawrence and His Friends，” *New Republic*，February 3，1958.

[10] 诺曼·梅勒写给编辑的信，*New Republic*，March 9，1959。

[11] “Children’s Books for Christmas，” *New Yorker*，December 17，1966.

[12] “Children’s Books for Christmas，” *New Yorker*，December 14，1968.

[13] “Help！Homework for the Liberated Woman，” *New Republic*，October 10，

1970.

[14] “No Reply，” *New Republic*，November 14，1970.

[15] “About the House，” *New Yorker*，March 18，1972.

[16] 出自《黛安娜和尼康》前言（Aperture，1997）。

[17]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Pa.，” *New Yorker*，August 6，1979.

[18] “Artists and Lovers，” *New Yorker*，March 12，1979.

[19]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英国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剧作家之一，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生日聚会》（*The Birthday Party*）、《归家》（*The Homecoming*）、《背叛》（*Betrayal*）等。

[20] “The One-Way Mirror，” *New Yorker*，May 15，1978.

[21] *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Knopf，1977），47.

[22] Joseph Adelson，“Not Much Has Changed Since Freud，”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7，1981.

[23] *Psychoanalysis*，110.

[24] *Psychoanalysis*，41.

[25] *Psychoanalysis*，38.

[26] https：//www.salon.com/2000/02/29/malcolm/.

[27] https：//www.salon.com/2000/02/29/malcolm/.，163.

[28] 珍妮特·马尔科姆写给编辑的信，*New York Times*，June 1，1984。

[29] 参见，例如：Robert Boynton，“Who’s Afraid of Janet Malcolm？” *Mirabella*，November 1992，可见于 http：//www.robertboynton.com/articleDisplay.php？article_id=1534。

[30] “Janet Malcolm，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31]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Vintage，1990），3.

[32] 我记得马尔科姆是在2011年9月30日与Ian Frazier一起参加《纽约客》节时说这番话的。

[33]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3.

[34] Albert Scardino，“Ethics，Reporters，and the New Yorker，” *New York Times*，March 21，1989.

[35] Ron Grossman，“Malcolm’s Charge Turns on Itself，” *Chicago Tribune*，March 28，1990.

[36] David Rieff，“Hoisting Another by Her Own Petard，” *Los Angeles Times*，March 11，1990.

[37] Nora Ephron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July 1，1989.

[38] Jessica Mitford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July 1，1989.

[39] John Taylor，“Holier Than Thou，” *New York*，March 27，1989.

[40] David Margolick，“Psychoanalyst Loses Libel Suit Against a New Yorker Reporter，” *New York Times*，November 3，1994.

[41] “Janet Malcolm，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4.”

[42] “The Morality of Journal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1，1990.

[43]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159-60.

[44] 参见*New Yorker*，July 11，1994上这个标题的文章。

[45] *The Silent Woman*：*Sylvia Plath and Ted Hughes*（Vintage，1995），13.

[46] 特德·休斯写的书信，转引自*The Silent Woman*，53。

[47] 特德·休斯写的书信，转引自*The Silent Woman*，48.

[48] 珍妮特·马尔科姆写给苏珊·桑塔格的书信，日期为1998年10月3日，in the Susan Sontag Archive at UCLA。

[49] “A Girl of the Zeitgeist，” *New Yorker*，October 20，27，1986.

后记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用了很多时间来思考一个问题：当人们用锐利来形容这些女性时，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很多人将它用作一种褒奖，但同时又显露出一种隐隐的惧怕。毕竟，锐利的东西是可以伤人的。对这个问题思考越多，我越觉得当人们给这些女性贴上诸如锐利、刻薄或黑暗夫人之类隐含不祥之意的标签时，他们往往是对这些女性具有一种幻想的。这种幻想让他们认定这些女性都是具有毁灭性、充满危险、善于狡辩的，好像知识分子生活是某种哥特小说似的。

然而这些女性根本不是这样的。她们不总是对的，但也不会犯比她们应该犯的更多的错误，而且有些时候，她们恰恰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困难就在于，人们对不“和善”的女性总是感觉难以接受，因为她们不会屈服，因为她们敢于在公众面前偶尔犯错。

这些女性还都倾向于不去追求那个可能是唯一认清了这种困境的运动对她们的认可。玛丽·麦卡锡去世几年前曾经在旧金山对一群人说“我不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不过后来她改变了说法。

> 我认为，我这一代人中的那些杰出女性确实因为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被轻视这个事实而获利了——尽管她们并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男性］发现了一个不该被轻视的女性，他们就会把她捧到可能比她实际应得的更高一些的高度。我的女权主义意识至少强烈到足以让我不喜欢“她拥有男性一样的思维”这种所谓的赞美。我一直非常厌恶这种说法。[1]

认为某一个人比其他人都强并不是一种有姐妹情的想法。我在为这

本书做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数量还不少的一种人。他们之所以想要将这些女性从历史中抹去正是因为她们虽然利用了自己的天赋，却没有利用这样的天赋为女权运动提供支持。这些人将这一点视为不可原谅的背弃信仰。

最著名的此类指责出自桑塔格的老对手，艾德丽安·里奇之口。当里奇读了阿伦特完成的最后几部著作之一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时，她感到既着迷又失望：

> 读到一位心灵广阔、知识渊博的女性写出的这样一本书让人感到痛心，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受男性意识形态滋养的女性思维。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损失，因为阿伦特渴望解析的深层道德问题正是我们需要关切的问题……男性意识形态控制这样一个女性思维，以及将这个女性思维从包含它，同时也被它包含的女性身体中割离的能力在阿伦特这本高傲但残破的作品中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令人触目惊心。[2]

鉴于阿伦特直到去世都没有改变过反对女权主义的立场，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公平的。阿伦特几乎没有就性别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起码比本书中其他女性人物就此发表的都少得多。她对同时期的女权主义者的轻视甚至是非常尖刻的。我的一位教授，珍妮弗·内德尔斯基（Jennifer Nedelsky）是阿伦特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她讲过一个和阿伦特一起坐电梯的故事。当时珍妮弗·内德尔斯基佩戴了一个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Chicago Women's Liberation Union）的小徽章。阿伦特看看她，又看看小徽章，然后指着徽章，带着浓重的德语口音说道："这个不严肃。"

帕克、韦斯特、桑塔格、凯尔、埃夫龙和马尔科姆虽然也曾犹豫过，但是她们对于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没有那么抵触。帕克不是一个严格的妇女参政论者。桑塔格和里奇就女权主义"头脑简单"[3]的缺点展开过争论。凯尔试图就《她们》提出一种女权主义者的论点，但当这篇文章被拒绝之后，她似乎也完全抛弃了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迪迪翁后来会在一次采访中否定自己曾经在散文中提到的反对女性解放的观点，

称“那篇文章是关于某个特定时刻的”。[4]马尔科姆如今把自己描述为一名女权主义者，虽然她曾经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并不是这么说的。

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在尝试指出，尽管她们看待女权主义的态度非常矛盾，甚至对它怀有敌对情绪，但我们依然能够从某些地方看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信息。没错，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与姐妹情紧密相关的，但是姐妹之间也会争论，有时甚至会疏远失和。定义我们的不仅仅是共通性。如果我们从关于交叉性的辩论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身为女性”的经历会受到种族、阶级和其他社会标记的深刻影响。

这种经历同时还会受到个体性格的影响。我们之中有些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一项社会运动对其参与者提出的服从的要求。我们之中还有些人习惯于置身事外，她们总是忍不住要问：“但是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样子？”

阿伦特在写到拉埃尔·瓦恩哈根时曾经说：“当你孑然一身时，你会发现判定与众不同应该被算作瑕疵还是卓越是一件很难的事。当你找不到任何事来支撑你时，你最终会选择抓紧那些让你与其他人不同的东西。”[5]阿伦特的论点是与众不同是一种卓越，她的结论是正确的。

你只能用你获得的声音说话，而且你获得的这种声音的音质和音调是由你所有的经历决定的。有些经历不可避免的是关于身为女性这件事的。我们不得不接触彼此，不得不接受我们之前已经存在的历史。你可以开辟你自己的人生航线，但是你永远要受制于其他人形成的水流和漩涡，不管你对他们有多喜欢或多讨厌、有多认可或多反对，也不管你有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逆转整个潮流。

这绝对是这本书中的那些女性不得不接受的教训。

[1] 1985年10月，玛丽·麦卡锡参加在旧金山举办的City Arts and Lectures时作的演讲，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710。

[2] Adrienne Rich，“Conditions for Work：The Common World of Women，” in *On Lies，Secrets and Silence*（Norton，1979）.

[3] Adrienne Rich and Susan Sontag，“Feminism and Fascism：An Exchan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rch 20，1975.

[4]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日期不详，可见于 http：//www.christopherbollen.com/archive/joan_didion.pdf。

[5] Arendt，*Varnhagen*，218.

参考资料说明

我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书籍。直接引用的内容已在注释中列明出处。如果没有之前其他传记作者的作品，我就不可能创作出这本书。那些作品是整理本书的年表所必需的参考，我是在之前作品的成果基础上撰写此书的。我在参考书目列表中列明了我构建本书年表的过程中参考的传记和二手资料来源，无论我是否在本书中直接引用了其中的内容。

鉴于本书研究的是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作品中的人格面具，所以我依据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她们公开发表的内容，但我也参考了书信集，并偶尔查阅过档案，尝试为其他传记作者没有彻底探明的个别问题寻找一些答案。

虽然我并没有将本书创作成此处涉及的任何女性人物的完整传记，但是我有幸在2014年简短采访了珍妮特·马尔科姆，并于2015年在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做报告时遇到了雷娜塔·阿德勒。她们当时表述的内容也被写入了本书。

参考资料

Valerie Boyd，*Wrapped in Rainbows*：*The Life of Zora Neale Hurston*（Simon and Schuster，2004）.

Carol Brightman，*Writing Dangerously*：*Mary McCarthy & Her World*（Clarkson Potter，1992）.

Richard Cohen，*She Made Me Laugh*：*My Friend Nora Ephron*（Simon & Schuster，2016）.

Tracy Daugherty，*The Last Love Song*：*A Biography of Joan Didion*（St.Martin's，2015）.

Lorna Gibb，*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Rebecca West*（Counterpoint，2014）.

Victoria Glendinning，*Rebecca West*：*A Life*（Knopf，1987）.

Robert Gottlieb，*Avid Reader*：*A Life*（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6）.

Anne Heller，*Hannah Arendt*：*A Life in Dark Times*（New Harvest，2015）.

Dorothy Herrmann，*With Malice Toward All*：*The Quips，Lives and*

Loves of Some Celebrated 20th-Century American Wits（Putnam，1982）.

John Keats，*You Might As Well Live*：*The Life and Times of Dorothy Parker*.（Simon &Schuster，1970）.

Brian Kellow，*Pauline Kael*：*A Life in the Dark*（Penguin，2011）.

Frances Kiernan，*Seeing Mary Plain*：*A Life of Mary McCarthy*（Norton，2000）.

David Laskin，*Partisans*：*Marriage*，*Politics*，*and Betrayal Among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Marion Meade，*Dorothy Parker*：*What Fresh Hell Is This*?（Penguin，1989）.

Nancy Milford，*Zelda*：*A Biography*（Harper Perennial，2001）.

Virginia Lynn Moylan，*Zora Neale Hurston's Final Decad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2）.

Carl Rollyson，*Rebecca West*：*A Life*（Scribner，1996）.

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orton，2000）.

Daniel Schreiber，*Susan Sontag*：*A Biography*（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

Reuel K.Wilson，*To the Life of the Silver Harbo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8）.

Ben Yagoda，*About Town*：*The "New Yorker" and the World It Made*（Da Capo，2001）.

Elis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2nd e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英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el，Lionel，89，114，137，138

Abzug，Bella，168

Acocella，Joan，23-24

Adams，Franklin P.，103

Adler，Renata.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ppearance of，263-264

Arendt and，266-267

awards and honors，267，276

background，263，270，271

characteristics，263

colleagues’opinions of，268，269，273-274

Gopnik and，279

Gottlieb and，279

Kael and，260-263，272

McCarthy and，263-264，275

media reporting of falsehoods and，277-278，279，281

New Yorker and，262，264-266，269-271，276

New York Times and，262，271-275，280-281

ostracization of，280-283

Podhoretz and，267-268

suit against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276

Vanity Fair and，276

Adorno，Theodor，82

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Mailer），141

Against Interpretation（Sontag），158-159，160，190

“Against Interpretation”（Sontag），158

Against Our Will（Brownmiller），220

Ainslee’s，14

Aitken，William Maxwell（Lord Beaver-brook），50

Algonquin Round Table

beginning of，11

Kael and talents at，198，199

members，14，23

West and，48

women at，11-12

Allen，Woody，202，208-209，223-224

Alvarez，Al，307

Andrews，Henry，50，52，54，55

Ann Veronica（Wells），32

anti-Semitism. *See also* Nazism

Arendt and，66，75，76，86

in France，80-81

Heidegger and，70，76

in US，83

“Any Porch”（Parker），5-6

Arbus，Diane，169

Arendt，Hannah.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dler and，266-267

on aims of Varnhagen biography，72

anti-Semitism and，66，75，76，86

arrest by Nazis，76-77

background，66，67

“banality of evil，” 133-134

on *The Benefactor*，146

on Benjamin’s suicide，81

biography of Varnhagen，71-74，75，311

Arendt，Hannah（*continued*）

Blücher and，78-79

characteristics，66-67，137-139

on collaboration with Nazis，70

colleagues’opinion of，89-91

“conscious pariahs，” 73-74，84，128

death，253

difficulty writing in English，85

on distinction of being Jewish，73-74

early newspaper articles，82-84

essays on existentialism，85-86

feminism and，74-75，310-311

Heidegger and，65，68-69，71，76

internment camp in France，80-81

on Kazin，120

living conditions in US，82

marriage，71，78

McCarthy and，118-121，138，253-254

Partisan Review and，85，86，90-91，137

political theory of，127-131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 and evil，86

reputation，131

school desegregation and，127-128，129-131

Sontag and，267

Arendt，Martha，66，76，77

Arendt，Paul，66

Arlen，Alice，251

Atlantic Monthly，45-46，54，189-190，275

“At Valladolid”（West），39

Aufbau，82

auteurist theory，184-186，200

“A Woman’s Beauty：Put-Down or Power Source？”（Sontag），170

Axel’s Castle（Wilson），109

Baldwin，James，131

“banality of evil，” 133-134，135-137

Barringer，Felicity，280-281

Barthes，Roland，150

Battleaxe，100

Beatty，Warren，260

Beaverbrook，Lord（William Maxwell Aitken），50

Behrman，S.N.，263

Bell，Vanessa，31

Bellow，Saul，120，138-139

Benchley，Robert，11，13-14，23，123，124

The Benefactor（Sontag），145，146，155

Benhabib，Seyla，73

Benjamin，Walter，79-80，81，82，150

Berlin，Isaiah，105

Bernays，Edward，4

Bernstein，Carl，227-230，250-252

“Big Blonde”（Parker），25

“The Big Rock Candy Figgy Pudding Pitfall”（Didion），212-213

The Birth of a Nation，287

Bishop，Elizabeth，85，100，145

Bitter Fame（Stevenson），306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West），53-55，56

Blücher，Heinrich，78-79，80，82，86-87，253，266-267

Bogdanovich，Peter，200-201

Bonnie and Clyde，193-194

A Book of Common Prayer（Didion），221，222

“Book Reviewing and Everyone Ⅰ Know”（Podhoretz），267-268

Books，103

Botsford，Gardner，294

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Lessing），220

Broadwater，Bowden，116，119

Brooks，Louise，195

Broughton，James，179

Brownmiller，Susan，220，246

Buchman，Sidney，189

Buckley，William F.，163

Burke，Billie，13

Burke，Kenneth，152

Burroughs，William S.，141

Caesar’s Wife（Maugham），13

camp，156-157，158，197

Campbell，Alan，27，123，126

Canetti，Elias，150

Cannibals and Missionaries（McCarthy），254

Castle，Terry，158，173-174

Cavett，Dick，237，256

Chaplin，Charlie，179

Charade，210

Chase，Edna Woolman，7，205

Chicago Tribune，44，161，301

The Children's Hour（Hellman），25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15-216

Cinema Guild，181-182

"Circles and Squares"（Kael），184，185-186，187

Citizen Kane，197-201

City Lights，179

civil rights，59-61，126-127

Clarion，40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302

Commentary，127，136-137

Communism

Blücher and，78

Cowley as “megaphone for，” 101

Hellman and，255

McCarthy and，104-105，106

Parker and，122-123

Partisan Review and，84

Rahv and，106

similarities to Fascism，57-58

Sontag accused of favoring，163

in US，84-85

The Company She Keeps（McCarthy），94-95，97，113，116，140，141-142，219

Condé Nast，278

“conscious pariahs”

African Americans as，129-13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nd，86

Phillips and Rahv as，84-85

refugees in US as，84

Varnhagen as among，73-74，128

Con Spirito，100

Constant Reader，23-24

Cosmopolitan，238-239

Cowley，Malcolm，101，103，113

Crazy Salad（Ephron），244

“Crisis in Education”（Arendt），130

Crowninshield，Frank，3-6，9，10

Crowther，Bosley，233

“Dealing with the uh，Problem”（Ephron），246

Dean，John，281

Death Kit（Sontag），160-161

Democracy（Didion），225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Hilberg），136

Diana and Nikon（Malcolm），293

The Dick Cavett Show，256

Didion，Eduene，204

Didion，Frank，204

Didion，Joan.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llen and，223-224

awards and honors，204-205

background，204

characteristics，203

children，213

Ephron and，245

essays after *Saturday Evening Post* folded，217-218

fame，216，217，224-225

feminism and，311

filmmaking，221

Gurley Brown and，239-240

Kael and，203，208，222-223，224

Kauffmann and，222-223

literary persona，216-217

marriage，209

Didon，Joan（*continued*）

McCarthy and，219，224-225

National Review and，206-208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208-209，222-223，227-228

personal columns，218

Saturday Evening Post and，211-215

second wave of feminism and，218-221，245-246

sources of writers’material，233-234

discrimination. *See* racism

Dissent，127-129

Donoghue，Denis，173

Dos Passos，John，255

Dukakis，Michael，227

Dunne，John Gregory

filmmaking，221

Kael and，202，203

marriage，209

Saturday Evening Post column，214

in writings of Didion，213

Dunne，Quintana Roo，213

Dupee，Fred，144

Duras，Marguerite，182-183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West），41-42

Earle，Willie，59-61

Eckford，Elizabeth，126-127

Eichmann，Adolf，132-136

Eichmann in Jerusalem（Arendt），134-138

Eisenhower，Julie Nixon，237，248

Eissler，Kurt，297

Ellison，Ralph，129-130

El Salvador，225-226

Encounter，138

Enough Rope（Parker），18-19

Ephron，Henry，230-231，233，249

Ephron，Nora.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rticles for women’s magazines，238-239

background，230-231，233-234

characteristics，237

death，259

Didion and，245

Esquire and，249-250

fame，249

feminism and，ⅹ，240-241，242-248，311

Gurley Brown and，238-239，240

Hellman and，258-259

Malcolm and，302，308

marriages，227-230，250-252

at *Newsweek*，234

Parker and，230

as reporter，235-237

reputation as social critic，237

as screenwriter，251

writing in first person，241

Ephron，Phoebe，230-233，249

Epstein，Barbara，140，169

Epstein，Jason，140

Esquire

Didion and，218

Ephron and，239，241-247，249-250

Kael and，200

Parker and，124-125，126

Sontag and，162，164

Evergreen Review，158

Everywoman delusion，219，221

existentialism，Arendt’s essays on，85-86

Fairfield，Charles，34-35

Fairfield，Cicely Isabel. *See* West，Rebecca

Fairfield，Isabella，34

“Fantasies of the Art-House Audience”（Kael），182

“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Goodbye to All That，” Didion），205，213-214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58-159

“Fascinating Fascism”（Sontag），170-171

Fascism，57-58，90. *See also* Nazism “A Feast for Open Eyes”（Sontag），190

feminism. *See also* suffragettes

Arendt and，74-75，88-89，120-121 310-311

defiance of gendered expectations，ⅰx-x

Didion and，218-221，245-246，311

Ephron and，x，240-241，242-248，311

Kael and，185-186，188-189，311

Malcolm and，290-291，307-308，311

McCarthy and，120-121，309-310

Millett and，168，292

Parker and，19-20

Phoebe Ephron and，231

psychoanalysis and，294

sexism in journalists’assignments，217

sexism in reviews of Didion’s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215-216

sexism of auteur critics，185-186

Sontag and，x，151，167-169，170-171，311

Vanity Fair and，4-5

Wells as supporter，32

West and，x，54

women in war and，45-46

Ferber，Edna，12

“A Few Words About Breasts”（Ephron），241-242

Film Culture，184-185

Final Solution，132-133，135-137

The Fire Next Time（Baldwin），131

Firestone，Shulamith，219，221

Fitzgerald，Ellen，44

Fitzgerald，F.Scott，15-18，20-21

FitzGerald，Frances，164-165

Fitzgerald，Zelda，17

“The Flapper”（Parker），15

Fornés，María Irene，155

“Forty-One False Starts”（Malcolm），305

Franny and Zooey（Salinger），207-208

Freewoman，31，32，36

Fresno Bee，214

Freud，Anna，297

Friedan，Betty，244

Gardiner，Muriel，258

Gellhorn，Martha，257，258

Germany，Nazi

Final Solution，132-133，135-137

intellectuals and，77

mass self-deception and delusion，134

Nuremberg trials，132-133

takeover，75-76

West on，56-57

Germany between World Wars，70-71

Gilliatt，Penelope，271

“A Girl of the Zeitgeist”（Malcolm），308

Gone：*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Adler），279-281

“Goodbye to All That”（“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 Didion），205，213-214

Gopnik，Adam，279

Gordon，Ruth，108

Göring，Hermann，57

Gottlieb，Robert，279，280

Grant，Jane，11-12，23

The Great Gatsby（Fitzgerald），18

Green，Aaron（pseud），295-296

Greenburg，Dan，250，252

The Group（McCarthy），99，139-140，142-145，219

The Group（movie），189

Guccione，Bob，248

Gurley Brown，Helen，211，212，238-240，249

Hale，Ruth，11-12，48-49，50

Hardwick，Elizabeth，96，140-141，142-143，188

Harper's，140-141，156，196，281

Harriet Hume（West），45

Harrison，Barbara Grizzuti，224

Hayes，Harold，124，164

Heartburn（Ephron），229-230，252

Heidegger，Martin

anti-Semitism of，70，76

Arendt and，65，68-69，71，77

as Nazi，76，77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approach，67-68

Heilbrun，Carolyn，161-162

Hellman，Lillian，255-258

Hemingway，Ernest，20-23

Here to Stay：*Studies in Human Tenacity*（Hersey），264

Hersey，John，264

Hess，Rudolf，56-57

Hilberg，Raul，136

Hillis，Marjorie，5

Hiroshima Mon Amour，182-183

Holiday，206

homosexual community and camp，158

Hook，Sidney，127

Horan，Robert，178

Houseman，John，199

“How Can I Tell Them There’s Nothing Left？”（Didion），211

Howe，Irving，129-130

How I Grew（McCarthy），110

“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Hurston），61-62

Hughes，Olwyn，305，306

Hughes，Ted，305，306

The Human Condition（Rich），310

Hurston，Zora Neale，61-62，64

Husserl，Edmund，70

Illness as Metaphor（Sontag），172

I Lost It at the Movies（Kael），188，189-191

Imaginary Friends（Ephron），258-259

In America（Sontag），154

In Our Time（Hemingway），20

intellectual history，twentieth century

chronicled through male lens，xi

chronicled through white lens，62

contempt for women as intellectuals，168-169

cultural outlaws in，157

homme de lettres，79-80

justification of pleasure from art，158，197

in Nazi Germany，77

Partisan Review “What’s Happening in America” symposium，163

power of political ideologies，87

second-wave feminist movement and，167，218-221

women in，88-89

“Interior Desecration”（Parker），8

In the Freud Archives（“Trouble in the Archives，” Malcolm），298-300

“Is There a Cure for Film Criticism？”（Kael），184

Jackson，Shirley，126

James，Alice，172

James，Henry，43-44，172

Jarrell，Randall，79，85，145

Jaspers，Karl，69，70

Jews and Judaism

Arendt’s loyalty to Jews，137-138

Final Solution，132-133，135-137

Varnhagen’s identity and，73

Johnsrud，Harold，98，104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Malcolm），300-302，303-304

Joyce，William，56

The Judge（West），45

“Just a Little One”（Parker），30

Kael，Gina James，179，191

Kael，Pauline.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dler and，260-263，271，272

background，177-178

Bogdanovich and，200-201

characteristics，176-177，180，182，183-184，201-202，208

colleagues’opinion of，xi

daughter，179，191

death，262

Didion and，203，208，222-223，224

Dunne and，202，203

feminism and，185-186，188-189，311

feud with editors of *Movie*，186-187

feud with Sarris，185-186，187

first movie review，179，180

Guggenheim fellowship，187-188

in Hollywood，260

last long essay，196

marriage，181-182

McCall's and，191-192

on McCarthy's Meg Sargent，112

movies as fun，194

New Yorker and，193-196，197-201，26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175-176，188

Segal and，240

sexism of auteur critics and，185-186

Sontag and，177，188，190

"The Kane Mutiny"（Bogdanovich），200-201

Kasabian，Linda，221-222

Kauffmann，Stanley，192-193，222，223

Kaufman，Hal，287-288

Kazin，Alfred，89，116，120，216-217

Kees，Weldon，180

Kellow，Brian，178，187，202

Kennedy，Anthony，302

Kierkegaard，Søren，67

Kirchwey，Freda，102

Kiss Kiss Bang Bang（Kael），195

Koch，John，126

Kracauer，Siegfried，184

Kristol，Irving，268

The Ladies of the Corridor（Parker），123

Landberg，Edward，181-182

Lawrence，D.H.，51

Lehmann-Haupt，Christopher，301

Leonard，John，172，262

Lessing，Doris，219-220

Liddy，G.Gordon，281

Life，16-17，189，216

The Life of the Mind（Arendt with McCarthy），254

Limelight，179

literary history，twentieth century

access journalism，227

beat poets，125

camp in，156-157，197

chronicled through male lens，xi

evolution of magazines，4

exploitation of subjects by journalists，xi-xii

fiction as pinnacle of achievement，115

film criticism，183-184

“I” of journalism，241，303-304

New Journalism，64

Parker’s hate songs，8

sexism of auteur critics and，185-186

use of metaphors，172-173

writing as sensual，158

“literary Rotarians，” 24

Little Rock（AK）Central High School，integration of，126-127

Living Age，45

Locke，Richard，276

“Lolita”（Parker），123

Los Angeles Times，88，159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Arendt），70

Love Story（Segal），240

Lowell，Robert，135，140，254

Lumet，Sidney，189

Lyons，Leonard，235

MacArthur，Charles，20

Macdonald，Dwight，90，106，156，178，187

MacDonald，Jeffrey，300-301

Maddocks，Melvin，215-216

Mademoiselle，156，204-205，206，267

Maier-Katkin，Daniel，67

Mailer，Norman，112，141-142，168，172，257，272，288

Malcolm，Anne Olivia，289

Malcolm，Donald，286，288-289，291，292

Malcolm，Janet.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rendt and，89

background，285-289

child，289

colleagues’opinion of，xi-xii

Diana Trilling and，288

Ephron and，302，308

feminism and，307-308，311

Malcom（misspelling），290

marriages，288，294

Masson and，284-285，296-300，302，303

McGinniss and，300-302，303-304

New Republic and，286-287，290-291

New Yorker and，289-290，291-292，293-303，305-307

on Parker，125

Sontag and，293，307

Manhattan，208-209，224

“The Man in the Brooks Brothers Suit”（McCarthy），111-112

Mankiewicz，Herman，198-199，200

Mansfield，Katherine，58

Marriage（Wells），31

Marsden，Dora，36

Marshall，Margaret，102，103，109

Masson，Jeffrey Moussaieff，284-285，296-300，302，303

Maugham，Somerset，13

McCall’s，191-192

McCarthy，Mary.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dler and，263-264，275

Arendt and，118-121，138

attitude toward men，111-112

autobiographical nature of fiction，114-115，139

background，93-94，95-96，97

on Bellow，120

Broadwater and，116

characteristics，92，95-96，105-106

colleagues’opinion of，xi，96-97，116

Communism and，104-105，106

Diana Trilling and，96-97

Didion and，219，224-225

feminism and，120-121，309-310

first review by，100

Hellman and，255-258

Mailer and，141-142

maintenance of image，93

marriages，104，110，116，253

mental health，11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141，144

Parker and，108

as *Partisan Review* drama critic，107-108

Rahv and，106-107，112，117-118，119，157

review of *The Company She Keeps*，116

review of *Franny and Zooey*，207-208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90-91

Rosenberg and，97-98

sexual activity，98，104，106

Sontag and，147-148，150-151，165-166

spread of fame，116

transit into fiction，111-113

trip to North Vietnam，165

Vassar experience，98-100

West and，104

Wilson and，104，108-111，114-115

McCollum，Ruby，63-64

McGinniss，Joe，300-302，303-304

McKuen，Rod，240

Mehta，Ved，279

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Shulman），243-244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McCarthy），96

Menorah Journal，83-84

Millay，Edna St. Vincent，19，110

Millett，Kate，168，292

Milne，A.A.，23

Mitchell，Juliet，219

Mitford，Jessica，302

Mitgang，Herbert，166

Monocle，235

Movie，186-187

“Movies and Television”（Kael），193

Ms.，244

Musmanno，Michael，135

“My Confession”（McCarthy），105

Nabokov，Vladimir，112

The Naked and the Dead（Mailer），141

Naked Lunch（Burroughs），141

Nation，85，101-104，141

National Review，206-207

Navasky，Victor，235

Nazism. *See also* Germany，Nazi

collaboration with，70

concentration camps as ultimate instrument，87

Heidegger and，69-70

Sontag’s essay about aesthetics of，170-171

Soviet totalitarianism and，88

West on，56-57

Nedelsky，Jennifer，310-311

Negro Digest，62

New Freewoman，36，39

Newhouse，S.I.，278-279

New Leader，154，159，268

New Masses，28，103

New Republic

Adler and，282-283

Donald Malcolm and，286

Kael and，192-193

Malcolm and，286-288，290-291

McCarthy and，100-101，113

racism，62

Wells and，41

West and，41-42，45

New Statesman，45

Newsweek，234

New York，247-249，252，263

New Yorker

Adler and，262，264-266，269-271，276，277-278，282

Arendt and，133，134

Baldwin in，131

Donald Malcolm and，288

founded，23

Kael and，193-196，197-201，260

Malcolm and，289-290，291-292，293-303，305-307

McCarthy’s fiction in，114-115

Parker’s contributions，22，23-24，123

racism，62

Shawn firing，278-280

West and，55-58，59

New York Herald Tribune，54-55，113

New York Post，235-237

New York Radical Women，167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dler’s contributions，260-261，267-268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continued*） Didion’s contributions，208-209，222-223，225-226，227-228

FitzGerald and，164-165

founded，140

McCarthy and，141，144，165

philosophy of，140-141

review of Sontag’s essay “Fascinating Fascism，” 170-171

reviews of *The Group*，141，142-144，175-176

New York Times

Adler and，262，271-275，280-281

Arendt and，135

Hellman lawsuit against McCarthy，256-258

Hurston and，62

Kael and，191，199

Malcolm and，301

Marshall and，103

McCarthy and，103，113，118

review of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215

review of *Three Is a Family*，233

reviews of West’s books，54

Sontag and，146，156，161-162，166，173

“The Women’s Movement”（Didion）in，218-219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37-238

Nin，Anaïs，51-52

“Notes on‘Camp’”（Sontag），156-158，173-174

Notes on Novelists（James），43

“Notes on the Auteur Theory”（Sarris），184-185

The Oasis（McCarthy），116-118

Observer，44，200

Odets，Clifford，108

O’Hagan，Anne，5

“Once More Mother Hubbard”（Parker），16-17

“The One-Way Mirror”（Malcolm），294-295

“Only Disconnect”（Harrison），224

On Photography（Sontag），169-170

“On Self-Respect”（Didion），21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Arendt），66，86-89，90-91

Orwell，Sonia，148

“Our Critics，Right or Wrong”（McCarthy and Marshall），102-104

Our Town（Wilder），108

Over Twenty-One（Gordon），108

Pankhurst，Christabel，35

Pankhurst，Emmeline，35

pariah. *See* “conscious pariahs”

Paris Review，6，19，24，49，257

Parker，Dorothy.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s *Ainslee’s* drama critic，14

Algonquin Round Table and，11-12

appearance of，108

attitude toward men，25-26

awards，25，26

background，1，2-3

on beat poets，125

characteristics，19，23，25，28-29，30，92

colleagues’opinion of，7，10-11，29-30，125

Communism and，122-123

death，126

disillusionment with sophistication，25，29

Ephron and，230

Esquire reviews by，124-125，126

failure to complete assignments，26-27

fears of，24

feminism and，19-20，167，311

fictional versions of，108

Fitzgerald and，15-17，18

Hemingway and，20-23

marriages，9，15，27，123

New Yorker and，22，23-24，123

as pianist，1-2

poetry and，15-16，18-19

political activism，27-29

reputation of，45

as screenwriter，26，198

suicide attempts，20，25

use of clichés，5，15，19

Vanity Fair and，4-6，7-8，9-10，12-14

at *Vogue*，6-7，8-9

Parker，Edwin Pond，9，15

Partisan Review

Arendt and，85，86，90-91，137

McCarthy and，106-108

second incarnation，84

Sontag and，155-156，169-170

“What’s Happening in America” symposium，163

The Passionate Friends（Wells），39-40

PEN/Hemingway Award，276

Pentimento（Hellman），258

“The Perils of Pauline”（Adler），272，276

The Philadelphia Story，210

Phillips，William，84-85，155

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Jarrell），145

“Pilgrimage”（Sontag），149-150

The Pink Panther，210

Pitch Dark（Adler），275-276

Pittsburgh Courier，63-64

Plath，Sylvia，305-307

Plimpton，George，112

Podhoretz，Norman，127，136-137，267-268

Politics，178

Portnoy’s Complaint（Roth），240

The Portrait of a Lady（James），43-44

“The Prisoner of Sex”（Mailer），168

Pritchett，V.S.，45

“A Problem of Making Connections”（Didion），217-218

Prynne，Xavier（pseud），141，142-143

psychoanalysis，284-285，294-300

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Malcolm），296

Quinn，Sally，247-248

racism，59-60，60-61，62，127-128

Rahel Varnhagen（Arendt），71-74，147

Rahv，Philip

as conscious pariah of Communism，84-85

Hardwick and，143

Kael and，180

McCarthy and，106-107，112，117-118，119，157

Raising Kane（Kael），202

Reagan，Nancy，214

Reckless Disregard（Adler），278

Reed，Rex，238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Arendt），127-130

“Résumé”（Parker），20

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West），44

Reynolds，Debbie，210

Rich，Adrienne，170，171，310

Richler，Mordecai，199

ridicule

“literary Rotarians” articles（Parker），24

Parker on，as weapon，28

Parker’s *New Yorker* reviews，23-24

social criticism by Crowninshield，4

by West toward women，50，54

Rieff，David，154，155，170，171，302

Rieff，Philip，152，153-155

Rosenberg，Ethel “Ted，” 97-98

Rosenblatt，Jack，148-149

Rosenblatt，Mildred，148-149

Ross，Harold，23，133

Ross，Lillian，279

Roth，Philip，162，240

Rothschild，Dorothy. *See* Parker，Dorothy

Run River（Didion），209

Ryan，Meg，237

Sacco，Nicola，27

Saint Joan，287

Salinger，J.D.，207-208，212

Salle，David，305

Sarris，Andrew，184-186，187，199-200

Sartre，Jean-Paul，85

Saturday Evening Post，211-215，217

Saturday Review，201

Schiff，Dorothy，235，236-237

Schocken Books，87

Scholem，Gershom，137

Schwartz，Delmore，89

Scoundrel Time（Hellman），257

second-wave feminism，167，218-221，245-248，290-291

“seduction thesis，” 284-285，297

Segal，Erich，240

Seligman，Craig，298

sexuality

creativity and，39-40

Ephron and，242-243

McCarthy and，98，104

Parker and Fitzgerald，17

“seduction thesis，” 284-285，297

Sontag and，151-152

Wells and，31，32，38

West and，35

Sexual Politics（Millett），168，292

“The Shadows”（“Die Schatten，” Arendt），65-66

Sharon v.Time，277-278

sharpness，described，ⅰx-x，xⅰ-xⅱ，309

Shawn，William

Adler and，260，262，269，278

Arendt and，133

Kael and，193-196

Malcolm and，289，290，293

Sherwood，Robert，11

Shulman，Alix Kates，221，243-244

Sight and Sound，182，184，191

The Silent Woman（Malcolm），305-307

Silkwood，251

Silvers，Robert，142，175，188，222，225，227

Simpson，Eileen，92

Sirica，John，280，281

Sischy，Ingrid，308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Didion），215-216

Sohmers，Harriet，151，152，155

“Some Dreamers of the Golden Dream”（Didion），xi，211-212

Sontag，Judith，148，149

Sontag，Nathan，149

Sontag，Susan.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ccused of favoring Communism，163

Arendt and，267

background，148-150，151，152

cancer，171-172

characteristics，149，151

colleagues’opinions of，162-163

feminism and，x，151，167-169，170-171，311

as filmmaker，166-167

Harper’s and，156

Hiroshima Mon Amour and，182-183

inspirations for，150

Kael and，177，188，190

Mademoiselle award，156

Malcolm and，293，307

marriage，152-155

McCarthy and，147-148，150-151

as new version of McCarthy，147，159，160

New York Times reviews，156

in North Vietnam，164-165

Partisan Review and，156，169-170

pleasure in analysis of art，197

reaction to response to “Notes on‘Camp，’” 173-174

reputation，159-160，161-162，166

sexuality of，151-152

Vogue essays，170

women’s magazines articles，170

The Sound of Music，192，210-21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45

Soviet Russia，57-58，88

Speedboat（Adler），275-276

The Spirit of St. Louis，210

Stafford，Jean，85，205

A Star Is Born，26

Steinbeck，John，108

Steinem，Gloria，244-245

Stern，Gunther，71，76，78

Stevenson，Anne，306

Stewart，Donald Ogden，22

Suber，Howard，199，200

suffragettes

Parker and，167，311

West and，35，36，167，311

The Sun Also Rises（Hemingway），21

Sunday Times，45

Sweet Smell of Success，287

Take Her，She's Mine（Phoebe and Henry Ephron），233

Tanguay，Eva，13

Tell My Horse（Hurston），62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Hurston），62，64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Benjamin），82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Sontag），169

This Side of Paradise（Fitzgerald），15，16

Thomas，Lately（pseud），125

Three Is a Family（Phoebe and Henry Ephron），233

Thurber，James，23，124

Thurmond，Strom，59

Tice，Clara，5

Time，157，277-278

“To a Tragic Poetess”（Hemingway），21-22

“Tonstant Weader fwowed up”（Parker’s quip about Milne），23

totalitarianism，86-89，134

“Trash，Art，and the Movies”（Kael），196，197

Trilling，Diana，96-97，105，117，288

Trilling，Lionel，97

“Trouble in the Archives”（In the Freud Archives，Malcolm），298

Truman，Harry，59-61

Tumin，Melvin，129

“Two Roads”（Malcolm），293-294

Tynan，Kenneth，200

An Unfinished Woman（Hellman），257

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210

Vanity Fair

Adler and，276，282

as feminism’s voice，4-5

Parker and，5-6，7-8，9-10，12-14

Vanzetti，Bartolomeo，27

Variety，195，233，273-274

Varnhagen，Rahel，71-74，75，77，80，128，311

Vidal，Gore，141，144，161

Village Voice，199-200

Vinaver，Stanislav，52-53

Viva，248

Vogue

Arendt in，88

Didion and，204，205-206，208，220

as marketing tool，6-7

McCarthy and，116

Parker and，6-7，8-9

Sontag and，159，170

Wakefield，Dan，215

Walker，Alice，64

Wallflower at the Orgy（Ephron），241

Ward，Mary Augusta（Mrs.Humphry Ward），37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276

Washington Post，159，161

Wayne，John，211

“The Weeds”（McCarthy），114-115

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Jackson），126

Weil，Simone，90

Welles，Orson，108，197-201

Wells，H.G.

affair with West，37-39，40-41，46

early novels，31-32

as feminist，32

New Republic and，41

West on writings of，31，37，42

Wells，Ida B.，61

“We Refugees”（Arendt），83-84

West，Anthony Panther birth，40-41

knowledge of，48

left with grandmother，46

resentment of mother，49

Wells’s relationship with，42-43

West，Jim，253

West，Rebecca. *See also specific works*

affairs after Wells，50

American lecture tour，46-48

on American women，48

background，31，33-34

characteristics，31，48-49，50

choice of name，36

colleagues’opinions of，44，48-50，104

on Communism，57-58

feminism and，x，54

on James，43-44

marriage，50

McCarthy and，104

on Nazi Germany，56-57

Nin and，51-52

on Parker，30

on racism，60-61

reputation as critic，45

reviews of fiction by，44-45

subjects of articles，45-46

suffragettes and，167，311

targets of writing，37，43-44

as unwed mother，40-41，49

Wells and，31，37-39，40-41，46

on women writers，58

writing as a mask，36-37

Yugoslavian lecture tour，52-53

Westmoreland v.CBS，277-278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Henry Ephron），249

“What White Publishers Won’t Print”（Hurston），62

When the Lights Go Down（Kael），260，261

“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Ephron），238

“The White Album”（Didion），221-222，226，227

The White Album（Didion），221-222

“Why I Haven’t Married”（Parker），8

Wienovera，Jana. *See* Malcolm，Janet

Wild 90（Mailer），272

Wilder，Matthew，262

Wilder，Thornton，108

Willis，Ellen，167

Wilson，Edmund

on *Enough Rope*，18-19

McCarthy and，104，108-111，114-115

Parker and，14，23-24

Parker’s “Lolita” and，123

Wilson，Reuel，109-110，111，263

Winn，Janet. *See* Malcolm，Janet

Wodehouse，P.G.，9

Wolcott，James，202，224，262

Woman Problem，74-75

women. *See also* feminism

acceptable characterizations of，112

confines of femininity as Parker target，19-20
contempt for，as intellectuals，168-169
F.Scott Fitzgerald’s treatment of，17
factors affecting experiences of，311
in film，274
gendered art of，183
James’s inability to write about，44
need for autonomy in sex and romance，40
Newsweek’s refusal to hire，as writers，234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247-248
sharp，described，ⅸ-ⅹ，ⅹⅰ-ⅹⅱ，309
as subject of West，45-46
surge of，as novelists，47
West on，48，58
“The Women’s Movement”（Didion），218-219
Women’s Wear Daily，233，238-239，249
“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Parker），2-3

Woolf，Virginia，31，58，100

Woollcott，Alexander，7，11，48，123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Didion），218

The Years with Ross（Thurber），124-125

Young-Bruehl，Elisabeth，66，86

“The Younger Set”（Parker），15-16

Zanuck，Darryl F.，274

Ziegfeld，Flo，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加）米歇尔·迪安（Michelle Dean）著；冯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

书名原文：SHARP：THE WOMEN WHO MADE AN ART OF HAVING AN OPINION

ISBN 978-7-5201-6286-9

Ⅰ.①那… Ⅱ.①米…②冯… Ⅲ.①女性-评传-世界-现代 Ⅳ.①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9916号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著者/〔加〕米歇尔·迪安（Michelle Dean）

译者/冯璇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5 字数：330千字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286-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0-2547号

定价/8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rther Readings ……

《边境：行至欧洲边缘》

《何故为敌》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

《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

她们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和知识历史被掩藏的核心角色
不愿被简单归类为女权主义者的先锋女性
“Sharp”无疑是 21 世纪女性从这些前辈那里继承的宝贵遗产
不和善，不屈服，不避讳，用声音与社会的涡流对抗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女性的声音穿透一个世纪

媒体评价 / 本书获誉

入选《纽约时报书评》编辑推荐（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ditors' Choice）
入选《纽约时报书评》平装书名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Paperback Row）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2018 年度好书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18 年度好书
《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2018 年度好书
《密尔沃基新闻哨兵报》（*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2018 年度好书
BuzzFeed 2018 年度非虚构作品

第一章 帕克 第二章 韦斯特 第三章 韦斯特和赫斯顿 第四章 阿伦特 第五章 麦卡锡 第六章 帕克和阿伦特 第七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 第八章 桑塔格 第九章 凯尔 第十章 迪迪翁 第十一章 埃夫龙 第十二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莉莲·赫尔曼 第十三章 阿德勒 第十四章 马尔科姆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就是一场你想参加的晚餐聚会……迪安的文学批评与其选择的客人名单一样令人兴奋和极具洞察力。她以非常简洁的方式，极其精准地总结了她们的生平和成就，更重要的是，她还发现了这些人之间的联系……《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是对一些真正勇敢、智慧的女性的精彩赞颂。
——**赫勒·麦卡尔平**（Heller McAlpin），**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索·恩
THORN BIRD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6286-9
9 787520 162869 >
定价：86.00 元


索·恩
THORN BIRD
〔德〕
福尔克马·西古希
（Volkmar Sigusch）
著
〔德〕
王旭
（Xu Wang-Hehenberger）
译
性欲和性行为
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
【Venus·金星】
【上】
【Mars·火星】
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
Sexualitäten: 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德〕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著
〔德〕王旭（Xu Wang-Hehenberger）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前言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上册）
  - 第一篇 批判主义性理论：前提与盲点
    - 1 范畴的必要性和理论的恐怖
    - 2 作为社会范畴的性欲性行为
    - 3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
    - 4 性的客观性
    - 5 性的形态
    - 6 性别的形态
    - 7 性别的形而上学
    - 8 “神圣的性爱”
    - 9 性别的等级 第一性和第二性
    - 10 爱情的形态
    - 11 性的个人性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 12 社会这个范畴和性学理论
    - 13 普通个人和社会，内在和外在
    - 14 必要性和批判的批判
    - 15 知识作为社会的拜物神
    - 16 生和死的越界或变形
    - 17 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定理
    - 18 性科学的自相矛盾状态
    - 19 女权主义与性科学
    - 20 对父权制性别歧视的批判
    - 21 性别差异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 22 男人和女人关系中的难点
    - 23 性别差异的逻辑
    - 24 批判主义性科学的逻辑前提
    - 25 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26 一个认识论的误区：绝对的自然
    - 27 一种无谓的寻找：绝对的因果关系
    - 28 一种分离的统一：躯体和心理
    - 29 关于心理分析与性科学的相互关系
    - 30 一种心理性欲性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
    - 31 欲望冲动、情欲或本能冲动？
    - 32 性科学的精华
    - 33 性的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作为性的实质内核

        - 34 （人）作为病态和有治疗需要的目标客体
        - 35 性科学作为社会建制
        - 36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
    -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 37 登基成为国王的性
        - 38 新性革命
        - 39 生殖与性欲和性行为的分离
        - 40 性别与性欲性行为的解离
        - 41 变性者和他们的愿望
        - 42 自然性别者和他们的自卫
        - 43 “新性别”和当事者的看法
        - 44 性别差异、混合性别和流动态性别
        - 45 略带病态的眼光
        - 46 作为假肢的论点
        - 47 两性兼有的性别和它的出现
        - 48 身体反应与体验的解离
        - 49 龙涎香，灵猫香，伟哥和自我性刺激的意愿
        - 50 阳具、阴茎和象征符号的规则
        - 51 攻击与亲昵领域的解离
        - 52 儿童情欲和与之相对立的纯洁儿童形象
        - 53 儿童的性欲性行为与医学
        - 54 儿童的困境
        - 55 性侵、心理创伤和罪犯等范畴之间的差异
        - 56 恋童癖与恋童的性欲性行为
        - 57 个人关系与性体验的解离
        - 58 恋物癖与当事者的意见
        - 59 性的碎片式弥散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下册）
    -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 60 性商店
        - 61 政治色情与色情爱好者和反色情者的虚伪
        - 62 对性苦难不合时宜的服务和作为陈词滥调的性交
        - 63 在性影院的一次观察
        - 64 电子性爱作为新兴的性欲性行为模式
        - 65 生活与性关系模式的新型联盟或多样化
        - 66 男同在运动，或者说：同性恋性欲性行为的分化
        - 67 女同在运动

- 68 双性恋者
- 69 施虐和受虐
- 70 变态和正常的性欲性行为
- 71 变态中的“变态”
- 72 从变态行为、性欲倒错到性瘾癖化
- 73 新动物恋作为新的联盟
- 74 网站门户性爱和多元之爱作为性和爱的新联盟
- 75 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道德
- 76 个人亲密关系中的道德共识
- 77 卖淫和性工作
- 78 艾滋病作为疾病和错觉
- 79 变迁作为宏大叙事
- 80 话语和非话语化的性欲性行为：话语中的人物形象
- 81 可以澄清和模糊不清的事实
- 82 青少年的情欲
- 83 性伴侣间的性欲和性行为
- 84 银（白）发人的性爱
- 85 付诸生活的性欲和性行为有利于健康增益
- 86 对性医学术语的批判
- 87 对心理分析学的性高潮理论的批判
- 88 关于性障碍的短时性
- 89 弗洛伊德对性欲性行为的告别
- 90 无性欲与当事人的观点
- 91 自相矛盾的关系
- 92 自我实现的性和精益的性行为作为一种新的性范式
- 93 来自新性革命令人深思的新闻
- 94 新型性理念的退化
- 95 新型与早期的性欲性行为
- 96 性的内核
- 97 寻找一种情欲的艺术
- 98 珍贵无比的拜神般的爱情
- 99 正在走向终结的性时代？

- 参考文献
- 索引

前言

一块石头终于从我心里掉落下来，至此我可以松一口气了。许多年前，我那本《反道德》（*Anti-Moralia*，1990）一书的编审就曾要求我，将我原先发表在各报刊或书籍中的一些有关性欲和性行为的见解、评论，综合整理成一种新的性批判理论单行本。自那以后的许多年中，她的这一敦促一直缠绕着我。本书的出版，就是在她的敦促下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成果。

最近150年中，性科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展现了众多人的命运，激起了无数的辩论，提出了许多论题，在社会中制造了颓废堕落的现象，在世界上投放了许多术语，这一切都使我感觉到非常有必要尝试以一种具有概括性的范畴定义，即以一种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性理论纲要，来分析和研究这些庞大的数据、极其混乱的意见分歧以及记录成文的经验事实，这其中也包括我在2008年出版的《性科学史》（*Geschichte der Sexualwissenschaft*）一书中有关对性的肯定、淡化、误解以及性的私人性的一些描述——期望以综合取代分散，克服随意性，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而又不必明说：现在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切性理论的有效期，都是受时代制约的，因为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像血液中的含盐量，几千年来一成不变。20世纪曾出现过三次所谓的性革命，最后一次性革命——我称之为新性革命，开始于30年前。它对传统的性别、爱情和性模式的重新转义和重新评价，在西方国家中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必须对此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新思考。仅是在技术、文化和个人层面将生殖从性的领域分离出去这一事实，就已导致所有传统性理论的贬值。但我们却还纠结于传统的性理论中，尤其是纠结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以下本书或简称《三篇论文》，或简称《性学三论》）之中。其实我们今天的思想、感受、工作、爱、生活和死亡，已经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那个时代了。

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几十年前回顾以往的性理论时，他在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中看到了他所发现的知识和权力规定的四个策略性总和。这四个历史性特点或重大事件是：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性欲的教育学化、生殖行为的社会化和非常态性快感的精神病学化。但在今天，这类观察已经不再有什么效用了。今天需要我们描述的是女性性欲的觉醒，儿童性欲的禁忌化和对儿童的性虐待，性别差异的不平等遭遇，性欲与生育意愿的分离，异性恋与婚姻作为唯一一种生活和爱情模式的历史退位，以及对以往被认为是病态的非常态性欲与性行为的文化价值化和部分认可。我们今天的经历和行为，在一二十年前的中欧民众看来还是不可想象的：未结婚而同居生活者，或是公开自己同性恋倾向的人，能够担任国家最高官职，并生活在一种得到国家认可的生活伙伴关系中；可以借助手术或药物改变自己的性别；双性取向者可以同时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保持亲密关系；性受虐者和施虐者能够在电视中公然表演，无论怎样相互虐待都无妨大碍；单身男女可以在互联网上按自己的想象和要求在众多的网站寻找意中人；各种网站都在展现囊括了全球一切不可想象的性爱偏好。正因为如此，恋童癖们也就能够不受监管部门的阻挠，为获得性刺激而在互联网上下载成千上万的儿童裸体图片。即使是食人者，也能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个愿意被食的人。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女性的性与生育自主权的退化和对性犯罪者的无情惩罚。这便是整个自我矛盾关系中的一个例子。

令人惊讶但也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较少的例外，社会学界尽管面对性实践所出现的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却至今仍然没能看到，应当在社会学研究中对性、文化和社会做一种综合性的批判思考（Sigusch，2010b）。即使是心理分析学家和只有较少一些专家从事的学院式性科学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发表一些零星文章的水平上。其他学科对这一巨大变革或是保持沉默，或是以古老的生物学的陈词滥调来胡扯一通。这就导致了他们所讨论的，常常是一些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原理，似乎自那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剧烈的变化。事实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就已经从理论角度去思考，“人永远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孩子”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总是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的作为对性欲和性行为进行系统理论批判的性科学其实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几百年前作为普遍文化模式而形成的原始性欲和性行为，还没有完全被淹没在市场形态、冷漠和攻击性之中。在第二次性革命之后，性医学甚至对性的微小细节做了研究，但现在却处在一个退却的状态，因为神经学首先许诺了其研究成果的实用性。由于医学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妓女，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和批判主义的性医学由于处在医药制造业之外，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而关怀或关注那些遭受性虐待的儿童、被强奸的妇女、性饥渴的男人、渴望改变性别的变性者、恋物癖者，以及在伊朗遭受迫害的同性恋者，无疑是非生产性的，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在媒体中，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也影响甚微，如同在一片干旱没有好收成的土地上耕耘，它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了别的科学。

但是，孤独、唯我、互不相容以及性的神秘化等性的痛苦，仍然在继续。这些痛苦如今被装饰在新的性欲和性行为、新的性别认同和新的性别组合模式等范畴的花絮之中，而这些范畴还在争取社会的文化认可。只要观察一下近几十年来批判主义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理论和实践上需要这么一门科学。就是因为我们当今社会的话

语讨论和公开发表的有关性的论题与绝大多数民众实际的、没有公开的性生活之间，还存在着这么一个巨大的鸿沟。

此外，很重要的是，我还想申明一下：我在这里是以生活在欧洲中部并有意识地经历了东德和西德两种政治体系的一个白人和一个男人的身份，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即我既不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男人，也不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女人。我之所以想做如此申明，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模式，只存在于欧洲和北美。

其次我还想要说的重要一点是，鉴于当今研究现状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应当考虑有可以称为自己独特研究视野的领域。一个医学家对一种研究对象或一个场景甚至是对世界的观察，当然会不同于一个哲学家。我的观察视野中当然有我的医学专业知识以及在诸多与心理学和哲学临界的医学专业中的实习和实践，其中尤其包括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妇科和性医学。我的研究工作最初着重于以经验和实验为方向的社会心理学，以后也从事临床治疗、文化理论和性学史的研究，同时教授作为医学范围内的性学教授和作为社会科学范围内的教授所授的课程。

因此，我的这些研究立足点自然是阐释“性”这个范畴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理或心理范畴。因为即使是爱情，在第一感觉上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事件，而不是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反应。为了辨认出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自古代欧洲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事件，就已足够了。粗略地说，文化和社会科学的性理论具有一种普遍性，而心理学的性理论只具有一种特殊性。可以这么说，社会理论家谈及的是整个社会的人群，而心理学家研究的只是某一个个人，因为没有某个个人的性认知、爱情和性生活会与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完全相同。因此这本书讨论的主题就应是：社会、文化和团体的变化，是怎样具体影响到每个个人的。为了展开这一讨论，首先必须对单一的个人相应地做一种表层和深层心理反应的研究。

从我来说，我的研究并不主要围绕某些个人的特性，如情绪调控、挫折承受力、自我保护行为、符号化暗示能力、自尊心、客观恒定性和羞耻感等。我不会在这里提供一种性心理学，首先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其次是我没有这个愿望。因为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曾如是说：“抹杀个人特性是意识形态的方法。”（Adorno und Krakauer，2008：289）。所以我将主要作为一个非心理学家，却借助心理科学来推导出心理理论的结论。但我也努力使自己不拘泥于某个社会学的术语上，比如不会按社会学的术语来说什么“爱情是‘对另一个人的整体包容’，而性则是‘亲密沟通的共生基本机制’”。

我的这一研究定位，也包括了作为性的主体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有着对象化客体和客体对象化的前提。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性的无规则性和性的反抗性，鉴于性的这些特征，要想对所有的性乐趣都做出规定，无疑是在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客观状态下，一种对性的反面图像和性的反现实性的绝望寻找。主体已经被排除在哲学的许多领域之外，个人的客观性也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性科学不想落入虚空，不想与早就如同对待百货商场的商品目录那样地对待性的精神感受的单纯性学沦为同类，那么就必须坚守研究一切：主体、个人、意愿和性欲的满足度。因为尽管当今社会几乎一切都已社会化了，但性的欲望和行为却仍然具有真实的个人性。

通过追问性批判理论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及其盲点，通过区分神秘的性与通常的性关系模式、色情交易的性的不同，以及单纯性学在科学理论和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性批判理论将越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也将越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理论，尤其将与单纯肯定或强调渐进的性学保持距离。性作为意识形态、科学和社会模式，当然受制于性批判理论。性作为社会形态之所以受制于批判理论，是因为性的乐趣和权力、欲望和暴力、爱情和交易、性的实施以及普遍物化不只是在理论家的头脑中是铸刻在一起的，而且也在实际的生活中因其内在的相互纠结

而不可分离；性作为一个范畴，由于学科化了的性与非学科化的性是相矛盾的，也就揭露了任何一门性科学的非真理性；而如果把性作为意识形态，那么对于健康和快乐的性生活来说，意识形态恰恰就是它的障碍。

如果要将我的这些论题浓缩到一个共同的核心，那么我将会说：所有与性相关的领域，从伟大的爱情到变态的性欲望，都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有着一种尚未解开的自我冲突。由于这种起源于普遍原因的冲突没有得以解脱，因而也就没有性自身和谐的可能性。横亘在性的意愿与性的满足之间的那个深渊，只有借助一定的客体模式，即只有借助性欲和性行为，借助规则和坚守才能跨越。但也存在有唤起个人性欲的秘密和由主体互动的爱情而获得的无法估量的性满意度，可以用来填补这个深渊。

这就表明我绝不只是悲观地看待这一切。我确信正确和较好的方法是，在理论上特别注重批判，并且这就经常意味着是悲观的，但在实践上却尽可能乐观地看待这一切。否则，我们作为性医学者和心理治疗师根本无法再对患者进行咨询和治疗了。我也绝不如其他一些人那样消极地看待新的性革命。它带来的一些自由开放，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与早先的时代相比，在我们今天的性关系中双方更加平等，而且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变得更真诚了。

我们已经从伟大的哲学家那里学习到：意见和观察如果没有范畴，便是盲目的；而范畴如果没有意见和观察，便是空洞的。基于这个理由，这本书不仅只是引进了一些范畴，而且也列举了许多当代性文化中的实际范例。在总体上尽量保留了所批判事物的原貌，即它原先是什么，它也就是什么；不想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清楚，怎样才是一种“正确”的性生活。一种性批判理论并不兼容绝对和最后的确定性。这里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原理和断想，对我来说，只是米歇尔·福柯

意义上的一个“工具箱”。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此我要感谢几十年来与法兰克福性科学研究院的合作，尤其是马丁·丹内克尔（Martin Dannecker）、阿格内斯（Agnes Katzenbach）、倍倍尔·基施拉特（Bärbel Kischlat）以及赖穆特·赖歇（Reimut Reiche）。我也要再次感谢校园出版社（Campus Verlag）充满信任和激励的合作。

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2013年6月

福尔克马·西古希

索·恩 THORN BIRD

【Venus · 金星】

【上】

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Sexualitäten: 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德〕福尔克马 · 西古希（Volkmar Sigusch）著
〔德〕王旭（Xu Wang-Hehenberger）译

性欲和性行为



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 作者简介

1973 至 2006 年任歌德－法兰克福大学医院性科学研究所主任和特殊社会学教授。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性学家之一，是德国性医学的开拓者和批判主义性科学的创建者。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践主义者以及性与伴侣关系的治疗师。

王旭（Xu Wang-Hehenberger）/ 译者简介

198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目前定居德国。职业译者，译有《自由的权利》《阿伦特手册》（合译）等。

扫码 *GO*
索恩微店

Volkmar Sigusch

Sexualitäten：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 2013 Campus Verlag GmbH，Frankfurt am M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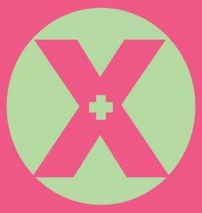
性欲和性行为

Sexualitäten:
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 Venus · 金星 】



〔德〕福尔克马 · 西古希（Volkmar Sigusch）著
〔德〕王旭（Xu Wang-Hehenberger）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一篇 批判主义性理论：前提与盲点

所有正在思考的人，都会陷入一种有着普遍意义的思维框架，没有人能够将这种思维方式排除在世界之外。即使是反对这种思想潮流的人，也只能是在这一潮流中游泳。普遍的客观事实、范式、命令和强制、话语机制以及个人生活中一些有意无意的决策，它们组成了这个框架内思想潮流的内容。这就导致所有的思考者，比如当某一天面对“他们的理论是否还具有现实性”这么个问题时，他们的反应往往或是做出赞许的解释或是持拒绝的态度。因为人们最终在某个时刻，必须公开自己有意或无意的、理论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决定。

可以稍稍粗略地将思维的这类理论框架分为两大思想潮流，即乐观主义的潮流和悲观主义的潮流。乐观主义的代表有将一切非积极的历史事件都作为垃圾看待的黑格尔，不顾一切仍然坚持呼吁人性中的善、热爱和平和理性的埃利亚斯（Elias）和哈贝马斯（Habermas）；悲观主义的思想代表则有人类学家德·霍尔巴赫（d’Holbach）或蔑视生命意志（但当柏林爆发霍乱时，却又为了活命而逃往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的叔本华（Schopenhauer），或者是“人”在他的社会力量中没有一个体系性地位的卢曼（Luhmann）。

在任何一种思维过程中，人们都得多少做出明确和长久的决定反对或赞同哪个潮流，究竟应当在哪种思想潮流中游泳。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决定（这自然有些自我矛盾）是：为了不把自己封闭在简单的肯定和赞同中，宁可在理论上取极端的悲观主义态度；在治疗和政治实践中，则取极端的乐观主义态度，以期望不要耽误那些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不把那些无助的人同业已死亡的事物一样对待和不低估新的现象或事物。这可能就是性研究工作者对人类的性（Homosexualis）和性别

的特殊差异（Differentia generosexualis specifica）等特征，以及对马丁·丹内克尔（1987a：27）写成的《性戏剧小品》（kleinen sexuellen Dramen）这一著作中故事的一种绝望的空想。但只要我们仍确信性别和性生活只有在真实的个人中才是真实的（11），我看不到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尽管如今具有私人性的性已经在社会中达到了一定的社会化程度，并且人们也已认识到，生活不仅仅只是为了活着，性生活也不只是与性相关。

按照我的经验，理论上的悲观主义不仅不排斥实践中的乐观主义，并且还有助于乐观主义实践的实施。实践如果没有理论的反思，经常会终结在它不愿前往的终点，即仅仅停留在妥协、愚昧、残害、酷刑和屠杀；而理论如果没有实践的经验教导，也常会走向它自己所设想的反面，即走向非理性或盲目自大。因此，理论与实践有着一种不可分离的共栖关系。

1 范畴的必要性和理论的恐怖

任何一门科学，也包括元心理学和元性学，都倾向于追求不带个人偏见的客观理性，这便要取决于在阐释概念和范畴那个时刻的个人状态。一个范畴并不会像流行音乐那样吸引众多的听众，并且陷入绝望境地的并不是一种普遍意识，而是个体意识。但是如果没有范畴，那么一切就只能是无言和无关紧要的了，只有概念和范畴的延续性才内存了个人不幸的连续性；不管个人的不幸是怎样内在固有的，只有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和一些必要的范畴才能加以理解。个体化的困境向我们指出，认知的个性化是极其必要的。对性和性别关系的批判，就是诞生于这么一种引导说出内心不幸的心理需要，而这就不能不使用范畴。只有范畴才能将完全是个人的性的命运，同时且最终作为沉淀在个人中的客体性加以理解。

如果没有范畴对生活做出具有前后连贯和严格的概括，那么一切都只是实践，一切批判就都没有了历史性，人的困境也只能是同样事件的再次重复。由于特殊与普遍的差异，认定的就是特殊的个人所做的客观判断间的差异，传统的批判范畴也就在理论和现实中解释了认同与对立。按自然规则，传统的矛盾辩证原则更接近于差异的无限性。通过对那些显然互不相同且又不受术语和范畴制约的事物的不断寻求，便假设了一种具有更高认同性的思维原则。任何一种思想，按其模式，都必须在社会化的社会中，对社会性操纵的拜神教般的物化和去物化的形式中一方面是虚假必要的口号如统一、身份认同和体系，另一方面是解离、差异的多样性和矛盾对抗的状况，加以确认和持存。思考型性科学也不能摆脱这么个困境，但它能够对此做出自己的反思。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那些流传下来的范畴，主要形成于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因而主要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努力。人在与自然抗争的那一刻是劳累和坚韧的，在征服自然的那一刻是专横的，在面对现实的那一刻又是非范畴化的。对这些现象加以反思，则破坏了事物自身的外在表象。坚守爱情这个范畴的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想回到事物的自身，而是立志于研究事物在整体中的相互交织。它追忆的是物化理念自黑格尔以来在自身中保留了主体持续直接性的理想图像。本能冲动这个范畴自弗洛伊德以来便成为现实理性的对立面，把现实理性贬低为统治原则，并试图——借用黑格尔和阿多诺的话来说——在自身中毫不遗留地保存全部朦胧化的节日般喜庆和物化的理想图像。

因为整个状况是荒谬的并充满了对立，范畴自身出现了断裂，不再是圆满的了；因为这整个状况具有不可理解性，它就在根本上脱离了它原本期望的范畴。性和爱情作为范畴相对于它们的非范畴要素越是严密，越是拥有绝对的优势，就越能清楚地展现它们形成于自身的社会性之中。从性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些范畴的内容来看，与这些范畴对峙的是直觉、现实原则以及交换、物化的意识和物化，而不是存在、权力或交流沟通。但是这种对峙，远没有使这些范畴在与自己所对峙的对象中获

得自由，而是使它们成为自己所对峙对象的反射图像。作为反射图像，作为渴望的象征，性本能冲动和爱情这类范畴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一切它们原本想要超越的事物的印记。

必须理解这种自我矛盾。它建立在刻意寻找真理的哲学之上，不管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的哲学还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这一思想运动都联结了从康德经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直到阿多诺的哲学：尽管存在着一切异化、物化、客体化和非物化的社会现象，社会仍是一个反映人的缩影（也包括作为反面的缩影），如同人是社会的缩影那样（也包括作为反面的缩影）。社会的组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自然或上帝那里无中生有的，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即劳动和思想（或并非只是这两者）创造而成的；而在当今，个人的社会化倾向在走向极端，个人的劳动和思想变得毫无意义，现有的机械性机制已经越过了它们。正因如此，性与爱已经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财富。

发展范畴极其必要，因为任何封闭的理论体系都将必然趋向恐怖。一个范畴越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那就越是无法回避的：应当把那最后一条缝隙，即那条还闪烁着一些混乱和零星的个人特性的缝隙，用来作为科学研究的黏合剂。如果个人不必战胜那么多无法预料的困难，如果个人不必越过人生的艰险钢丝绳并生存下来，那么人文科学的体系也就不会如此不完整和不真实，貌似完美和完整的理论也就可以以生物、神经、社会、心理和生理的理论来解释所有个人的特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活动，它将原先的公式和定律转换为非公式和非定律，从而将原先的公式与定律如同自然规律那样置于极端的外部。任何一种性理论都会将感官的性转换为超感官的性。性科学运用有着典型的西方认识论的方法对性加以检测。人的精神原理应当将感官和感性的世界转换为以形而上学表述的形式，将这个世界的数据、规范、公理、法则和范畴转换为理性的应用范围。因此许多性学家

比物理学家更看重物理学，尽管他们对性荷尔蒙的水准和欲望方程式的研究从没有获得成功。性作为研究和理论的对象，从小学初级课本到各类法律书籍，都只字不提性的混乱特性，而是将它塞进了一个可以支配，尽管有时也难免有些变化，但总是能够被加以控制的体系之中。任何一种性理论，不管它似乎多么独立和不同寻常，都不能摆脱这种控制。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均衡信息的秩序。

法国新结构主义者试图逃脱这种形而上学统治和这种封闭系统的状态，“谨慎”地说也可把福柯归入这个流派（Frank，1984：136）。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思想已被认同而停止思考，也不能停止运用和发展范畴，不能把理论的无规则性创建为一种与理论无关的其他规则。没有一种理论的形成，能够对即使是部分、零散和模糊的那些现象不做本质的理解，并把这些现象假设为一个整体，即使这种假设极其脆弱并在范畴上仍会不那么经得起推敲。理论工作就是要超越仅仅局限于将各个单一的部分简单列表排列或是喋喋不休的饶舌叙述。因此理论工作也要对作为获得权力意志的占有主导地位的理性以及由此衍生出掌握知识和建立规则意志的那些文字和思想加以批判。任何理论都得服从于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这也包括它想作为自己对立面的理性主义；只要它这么做了，它也就自然服从了执意追求知识和规则的那种意志，虽然它很想超越这两者。

即使是那些没有“内在一致”和“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的“开放性系统”，即被利奥塔（Lyotard，1979）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系统，如果没有它的统一性，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不存在一种不具有相对性的机构，不存在一种不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并且从不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出发是不能构思整体的，那么就可以在相对关系的不可简约性和不可能性中假定存在着一个可阐释之处，而这个可阐释之处应当在真实世界之外，是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彼岸。这在马克思那里是有着唯物特征的范畴，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意向互动综合语境范畴，在阿多诺

那里是内在综合范畴，在新结构主义精神领袖德里达（Derrida）那里则是结构的结构性范畴，即“统一性”。但是在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和社会学家卢曼的理论系统中，却没有为对抗留出一个地点或设立一个范畴，因为他们认为一切的对抗都已经融化在信号和功能中了；马克思召唤的是无产阶级，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是感性与理性、本能与道德的和解，而在皮尔斯（Pierce）、阿佩尔（Apel）和哈贝马斯的实践共识理论中，则是不受限制、绝对自由的普遍话语机制。

概括地说，如果理论企图只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世界或只以一种体系来分析世界，不管这是一种客观精神还是拜物（唯物）主义，是获取知识的意志还是无意识的心理动机，都是极其可疑的。所有的理论都不免打上了它所处的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客观条件以及各个思想者所特有的黑色盲点的印记，因而总是不那么完善的。只有那些不让这类客观前提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占有过分比例的理论，才有可能超越时代。所有的理论，不管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性主义批判、新系统理论、极端女权主义，还是本质主义或建构主义，都忽略了事物的其他一些重要性，在自己制造的自相矛盾中保持了沉默，如同一切不严谨的反思已经证明的那样。比如建构主义认为性别和性是被制造的，便把这些排除在自己的体系之外，并且认为这种排除的可行性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再比如极端的本质主义强调，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男女爱情历来都如今天这样，这就不仅与极端的建构主义相矛盾，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一切，直到最后一个地穴，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且也否定了个人爱情的特异性和个人在本质中坚守自己作为个人的可能性。倾向于概括总体的理论（比如“一切现象”等），都是对总体关系的一种精神反映，这就意味着这类理论所批判的只能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倾向于做部分归纳的理论（比如“这一切涉及”等），则是对一些断想和零星分散关系的一种精神反映，因而这类理论只能兜售些色彩缤纷的货物。理论的对象经常规定了理论的一种界限。一个社会的建制或一种深层心态越是广泛和深入，越是完整和

复杂，它就越不易被认知。当今生活在中欧的社会成员，已经几乎不能想象再过一种没有钱的生活。

以此推论，一种最终有效的性理论便是不可想象的，除非男女都坚信，这个世界不再有性欲和性行为了，但这是一个还需准备一些资料的论题。在现实世界还不存在这么个真实性。每一张照片、每一幅画都可能是正确和确实的，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伟大的摄影家在电子时代之前，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在当代拥有普遍性的媒介是金钱而不是真理。日益成为市场和政治“妓女”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真理，太容易被收买和太无知了。因为一门特定的知识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认知，因而按事物的逻辑来说，必然也同时衍生出一种特定的无知，即一种事先没有意识到的无知。这正是对政治经济学去神化的一些见解。眼前的医学正在特别努力地使自己成为经济的“妓女”，它在所谓的大学里废除了一切不能即刻挣钱的学科和专业，尤其是废除了对当前实践和自我历史的反思。那么那些政治的真理呢？它们只是些不再可口的调味品，是假象和扭曲，并在最后也已被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揭露为是一些常年的（自我欺骗的）真实谎言。

2 作为社会范畴的性欲性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没有一种性欲性行为的模式。人的自然本性是社会的，他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同样如此。没有社会生活经历的人，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在任何其他意义上，都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的性欲性行为在第一层面和最后层面的意义上，都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而不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范畴。人的性欲性行为本身，即“纯粹的”性欲和性行为，只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创造。一种脱离于历史和社会理论的性理论便不是一种关于人的性理论。谁要想严肃反思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就得关注人的物种起源及其他相关的全部历史。即使是人自然地实施性行为的那一刻，从主要和从属、主动和被动、对和错的意义来说，都在原则

上无法脱离社会。因此，将现代人的性欲性行为与几百年前的人相比，或是将其放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中加以简单比较，都是极有问题的。

“男女间的交媾历来就在自然地进行着”这句话，是一种误导。当马丁·丹内克尔在一次我们共同举办的理论讲座中，为了推动辩论而提到这句话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信任这句话。但事实上呢？事实是所有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头脑中藏着些什么：只要交媾的这两个人想忘掉个体化的痛苦，只要柏拉图的阿里斯托芬故事中的分裂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便都希望重新回到母亲的羊水之中，即曾把我们推挤到这个世界的原始海洋。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马上就明白了：人类的男女交媾，并不等同于鸟类（或其他动物）的交媾。因为人类特有的心理感受和冲动，不仅已经产生于交媾之前，而且会伴随着整个交媾过程，并继续存在于交媾之后。人类的这种变幻不定的，有时甚至极快变化的心理状态形成于和受制于人的内心想象、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人对性的象征意义的解读，受制于每个个人对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和女人与女人关系的不同想象，受制于个人对社会规范、对期待和心理障碍的不同理解和感受，也包括受制于个人在总体上如何处理因为交媾而带来的期望和非期望的后果的态度与方法等。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在男女之间不是只有交媾，而是也按社会层次、地区和时期的不同，而将交媾称为交配、配对、性交、伴睡、性的沟通、做爱、打枪、打桩、碰瓷、口交、渗入和性爱。眼下在青年和媒体中最为广泛流传的一个描述性交媾的动词是“poppen”，起源于“pop”和“poppig”（即流行的），而如今则用来表述最少在几个世纪以来即被视为是一种性行为的性的“快速和随意”的交媾。

“性欲性行为”这个范畴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总是显得一成不变，有着始终如一的一致性和完全的确定性。但在事实上，人的性欲性行为却经常在做形式转换，在重新聚集和组合。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最早期性批判研究者就深深懂得这一点。当他向自己提问“‘性’这个范畴究竟有些什么

内容”的时候，他最初在《心理分析学导论》的第20讲中是这么回答的：“在总体上，我们并不是没有方向，人的性意味着什么。就是那些性、欲望、生育功能以及有着秘密特性的内心邪念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总体组合，这已经足够满足生活中的所有实际需求”（Freud，1916 & 17：313 f）。在其后的第21讲中，他又简要地补充道：“请不要忘记，我们当前对性作为一种自然过程，还不拥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标志式表述”（同上：331）。弗洛伊德的提问是如此富有修辞性，而他的回答也只具有试探性；因为他预感到，他的性本能理论将神秘地离开通常的知识和当时的主流认识论；尽管他深深地认为“性本能自身是由许多因素综合而成”，以致必然会出现一种“与正常发展的解离”（Freud，1905：133），但他仍然试图在其中找出一个能以科学立论的“标志”。他不顾个人的神秘性而来描述“性”，也不顾文化的协调性而如所有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性研究者孤立地分析“性”，这是他对一个以定义和分析为准则的社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妥协，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认为只有那些可数的或至少是可列举的才是可信事实的社会。

这是自古典时代以来的一种认知现实，也是自康德以来认识论上的一种重要的不言自明。这一切在结构上都有着一种“客观”的、远离意识形态的、无意图的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以及自然科学家诚信特征的表象；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B XIII/XIV）中说的那样，“理性只能洞察由它自己的构思所展现的那些事物”。鉴于启蒙运动的进程是对自然与人，因而也是对生存与死亡做一种极端的解离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人们不得不在这场运动中采取一种极其激进的立场，在与人为的自然事物和人为的自然过程以及最终在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将那些“自然”的自然界限作为一种不会欺骗，有着显著的道德意义或甚至作为有着一种较高价值的规范来理解。这是一场围绕着思想和政治可能性的争辩。在本质主义为一方和建构主义为另一方的极端立场中，就能极其明显地观察到这场争辩。

自然生物在经由人变为人的过程之后，便越来越成为由人制造的生物，而不是由一种预先设置给定的生物。今天的人类则完全受制于外界的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如同一种自然暴力，如同一种人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自然出现和显现在人类的面前，而人类却无能为力对其加以控制。对生物的和非生物的、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做出分离，是一种双重或甚至是三重性的错误。从思维逻辑上来说，是一个构建了另一个，因此一个没有另一个是无法想象的；从社会学上来说，因为这一切都是一种相互联结的网状关系，便只能在理论上对它们做人为的分离而已（有关当前肯定主义的性学家使用的空头公式，即人的性欲性行为受制于生物心理社会条件的理论，请参见Dekker，2013）。

人类学的定律所暗示的一种贯穿始终的原创性，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总体上，还是在我们的异性和同性恋的性意向上，无论是双性恋倾向、母爱、性爱、一夫一妻制，还是游牧风俗和仇外心理，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具有稳定性（请比较：比如Eder et la.，1999；Eder，2002；Heryog，2005，2011a）。关于人的动机和原因都内在于人的物理性之中的这一假设，无疑是极端的。同样极端的是另一个假设，即认为一切都是由社会构建的。事实上应取决于个人陷入其中的那个系统是怎么建构的，即取决于究竟是以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反应能力还是以他们的感受能力建构而成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系统。人的体力、反应能力和感受能力，这一切都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这一切都是时代演变出现在人们头脑中的结果，并且在经过了历史的重新阐释和建构之后，也不免被加上了不同于原意的其他意义和不同于原有事实的其他褒义或贬义的评价。也就是说，这完全取决于人是怎么思考和怎么认为的，也就是取决于那些有着方向性意义的客体（即被福柯称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是怎么构成的，我们是怎么处理自身与外界的事物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哪一种认识论恰巧在我们的认识中占有主导地位，生与死、语言与意识、无意识与反思的关系是怎么创建的；或者说在那个时代，人们恰巧和根本上是怎么称呼事物的两个极端的。这

就是“自然”，我们正是与这么个自然有着一种自然的关系。我们的这种与自然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怎样客体化我们作为物理性“自然”的身体。

3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这个问题已经缠绕了我们几百年。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挖地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如同天堂般的海洋。当我们因为严格的礼仪和道德而感到窒息的时候，我们便扬帆起航漂洋过海，去寻找令我们陶醉、惊讶的原始奇风异俗。当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同样真实且残酷的现实时，我们就会想起塔西佗（Tacitu）所看到的在自然状态下穿越日耳曼原始丛林的高贵的野蛮人，并且期望狄德罗（Diderot）《布干维尔航程的补充叙述》（*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中大溪地（Tahiti）岛民的卓越理性。这些所谓的原始人、野蛮人和原住民因此便成为我们的生活补充，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反面图像。如此一种反面图像，我们只能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远方才能够遇见。这一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野性的原始生活时，在18世纪大多发出了惊奇的啧啧声，在19世纪是对这种生活感到既恐怖又美丽的惊讶；而伴随着自然科学思想进军的20世纪的到来，我们又有了冷峻的解剖和分析的距离。但是自然科学从最初就处在一种危机之中，并且田野研究者的客观性也处于一种同样的境地。这两种危机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在波兰出生、后在伦敦教学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第一批跟随远洋航船出发的人种学田野研究者。他在20世纪初期主要研究了当时英属的、今天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euguinea）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Inseln）居民的生活。他详细描述这些原始人生活的《原始社会的性和压抑》（*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 1927*，也有译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

父系社会的比较》）和《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1929*），曾在人文科学界掀起了激烈的辩论。他把在当地发现的家庭体系称为母系体制，并对儿童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的不确定性感到惊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试图在其中寻找出恋母情结的痕迹（Malinowski，1949），却一无所获。但同样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他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一种“被压抑的核心家庭情结”。即兄弟与姐妹间的相互吸引和叔侄（或舅甥）之间的相互仇恨。借用我们的心理理论来解释“野蛮人”，似乎只有运用那些被我们称为“压抑”和“情结”的术语，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特罗布里恩人的真实情况。但实际上，只有当我们站在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这种方法才是自然的（并通常也意味着是社会的），因而才是可取的。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却这么做了，我不得不这么想，他这是在将最后一个神话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与此同时，他却并未在理论上建构起我们有关人的理念的普遍有效性，因为他在经验上太无可指责，而在主观上却又太有责任感。

当然，那些运用他的这些报道的人，并不能或不愿如他那么拘谨，比如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赖希将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些发现用来作为“人种证明，以引申出性经济学的一些法则”（Reich，1935：3）。鉴于田野实地研究者目睹了岛民的孩子生活和成长在一个性自由的环境中，赖希认为就此证明了他有关性在性经济学意义上自我调节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性从自身出发就在前往一种自然的性秩序，并不受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比如市民社会的道德）的阻挠。但是如何解释享受着“柔情”和“性自由”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却为什么能够“忠实”地生活在“一夫一妻”的关系之中？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1979）曾批评说，赖希以及重新发现了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运动，都“固执”地忽略了岛民天堂般生活的另一面，即在特罗布里恩人的梦幻和神话中充满了侵略性和恐怖，充满了激烈的性别战争和永不满足的性欲望，也充满了对人的征服、肢解和阉割。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行为不

仅仅只是停留在梦幻里和神话中。

我们的爱情和性生活究竟怎样才算是自然的？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我们一个确切的回答。如果我们遵循着这期间因为诸多的捧场而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人类学，那么就必须在性交媾前先对对方的身体做一种护理，这种所谓的护理同时也是对对方身体施加的一种痛苦的伤害，以此激起我们的性欲；那么我们只能在白天有性交，忘却肛交，把对同性的欲望作为自然意志而加以赞助，将早泄病人赶出医院，并且男人必须因为女人特有的性生理和性高潮的优势而毫无怨言地拜倒在女人的脚下；那么我们就能把双方痛苦的关系理解为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性关系是极稳定的。

如果性的所谓的自然层面从未直接地，而始终只能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和社会的制造物才得以呈现，那么对什么是自然的性行为的解释，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错觉以及政治上左右两派的共同无奈。但是反过来说，谁想将由自然给定的、健康的、正常和正确的“自然”的性欲性行为，解释为只具有社会的“沉淀性”，或解释为“普通”百姓不停的无节制行为，否认存在于人的社会历史中人作为种属特殊的自然特性，试图对医学上的人体干预（比如阉割）做合理的论证，试图责怪（比如对同性恋），试图道歉或认可（比如对一夫一妻制或滥交），或试图推行替代选择的生活模式（如一些心理教派），则常常只是在煲他自己的汤（即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在做自己的事——译者注），并且也有理由这么做。

自从以它新的性欲和性行为、新的性别认同和新的性联盟必然使许多人感到迷茫的这场新性革命以来（参见本书38章），越来越多的所谓的进化论心理学家在继承马林诺夫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论证：我们究竟是怎样诞生的。他们在我们中寻找猎人和花果采集者的原始特征，对石器时代的部落习俗与资本主义后期的个人命运加以比较，指责其他的

心理学家（特别指名道姓地针对心理分析学家）深陷在科学史的垃圾堆中，但是这些理论家却在用新性革命前的偏见和陈词滥调，来推想男人的精子有一种普遍与生俱来的喷射能量，排卵期妇女的性瘾，由基因决定的滥交，为生殖而必要使用的性暴力，以及由人类部落史所确定的男人的霸主地位和女人的生育担忧。他们的理由是：“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中有着一切人类童年更新世的特征，因而具有在一个小的团体中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穿越大草原的优势……我们的许多需求、偏爱和厌恶……都可以从人类部落史的发展角度解释为人类基因适应早期生存条件的表现。……同样，人的性欲性行为也表现出诸多基因遗传、进化和心理机制的特征，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喜好和需求以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脚上的皮肤构成硬皮的能力”（Ma，2011：105f）。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嫉妒、相互关系、性暴力，也就是生活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当代人特定的性欲和性行为，都可以多少追溯到植根于基因中的部落史时代的一种适应进化，并且人类基因的这种适应能力在大约250万年前开始的更新世就已奠定了。只是有形的情感痕迹并不能都凝固在化石里。所有有关猎人和采集者的所谓的爱情和性生活，都只是逻辑推理的一种猜想。但这种猜想却忽略了他们所企图讨论的这一切并不涉及当代文化意义上的性，因而也就没有涉及性的主体，而只是单纯地涉及了生理意义上的传种和接代。格林斯坦（Greenstein，1993：U4）把这一切称为归纳。他举例说：“首先和最重要的，男人是女人的肥料。他要将自己的基因射入女性身体的需求是如此强烈，这一需求从他的青春期开始直至他的死亡都在一直支配着他的生命。这就要求他必须要有比杀人的冲动更加坚强的意志力。……我们甚至可以说，生产和供应精子，是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和目的。”即使是那些进化论心理学家也没有在总体上认识到，当他们如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员谈论生理的既定性的时候（比如关于“生殖投资”和“父母的育儿投资”），或当他们自以为看穿了基因的自私性的时候（Dawkins，1978），他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所谓

的专家将一些无可验证的猜想作为自己理论的避难所，如果这些专家企图把复杂的关系仅归纳为最简单的公式，并按这种公式推导出：男人无疑是滥交的、致使女人怀孕的精子传播者，而女人则与其相反是由基因决定的一夫一妻制的拥护者和渴望者；那么这实际上是以我们经历过石器时代的基因来操控生活在以盈利为最终目的以及物质化社会时代的我们那充满了自我勇气的感情生活。如此这般解释现实的性和性别关系的理论，必然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他们看待事物的这种视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这种不合时代的简单还原法，却显然有着一种惊奇的安抚效用。他们相互争论，个人或团体究竟谁是进化选择的目的？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2012）主张“团体选择”，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他的追随者却谩骂威尔逊的理论是“垃圾”和“变态”的，并企图以此捍卫“亲属选择”的理论。

可以说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只有借助他的社会媒介且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超越身体形态而使性具体化并构成意义和具有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这种社会人的实践和理论思考方式，就可以完全排除人的性行为中的生理部分的要素。人类解剖学上的生理特征对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并不完全是那么轻描淡写的；它构成了方向和界限，虽然其效用——正如临床病理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是有限和无力的。但是如果神经被阻断，那么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将沦为虚空，并且面对因生物逻辑造成的阳痿，任何一种理论批判都会变得是那么无能为力。

因此，将存在于“性”这个范畴之中的一种常数与另外一种变数脱离开来加以研究，是很危险的。即使是那些在几十年前被我们称为性行为的“自然基础”或近来被称为性欲性行为和性别差异的“坚实核心”，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也不是盲目的。也正因如此，将“性”这个范畴脱离于社会或脱离于生理因素，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一种有关性欲性行为受中枢神经控制、受生殖生理驱动或受性荷尔蒙影响的解释，其实都是以各自不同的社会标准对性的操控和方向所做的推测，整合了

当时的科学认知，并且也都是对人的形象所做的各自不同的理解，而构成人的形象的基础则是测定人与自然与社会总体关系的结果。如果我们将两性的差异作为一种决定性要素，那么女人怀孕和生育以及男人授精使女人怀孕，这就是生物的双性基因核心；如果我们选择这个特征作为与历史和社会等特性相比最具有稳定性的要素，那么我们立马就会看到三个问题：一方面，男人与作为性工具的女人之间因为生育而交配，并不是一种两性关系的保障，即并不能保障男人与女人间的性吸引力和行动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少的人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性别，知道自己是否、怎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应当怀孕或生育。这里又出现了在前文已经提到的理论，即离开了人和人的社会性生活过程，单纯的生物学上的性理论便毫无意义。最后，亦即第三个问题，生殖已是一种非性的过程，科学技术已在人的身上成功试验了无性生殖。

4 性的客观性

在两三百年前形成的现代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历史基因认知，显而易见地展现了不从社会角度思考的一种性欲性行为可以有着怎样的自然反射性和动物性。那个时期在我们中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关于人的认知理论的自我意识。“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即这个现代的人，因此是一种还非常新的（认知）成就。新结构主义将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历史起点，认定在1800年前后的两三百年之中；这种分析的主要结论也得到了诠释学家如法兰克（Frank，1990）的认同。按福柯的见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几十年中，赋予自我权力并组织起来的主体踏进了知识的中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在此之前的传统认识论并没有为人设立一个人特定的和自有的独立领域：“在18世纪结束前，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并不存在。”福柯在他的《事物的秩序》（也有译为《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Foucault，1966/1993：373）中这么写道。现在首先是客观领域和主观能力在知识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但这些我们曾经熟悉的认识论术语，比如：生活和生活力量、语言和语言

能力、劳动和劳动力、性本能冲动和性欲性行为，似乎自一些时间以来又在我们中间消失了——并且也因为这期间“分形”的主体已溶解在“一种多重的小型自我之中”（Baudrillard，985：78）。

由于“这个人”在福柯的理论综合思考中，通过新的、普遍贯彻自我意识的“规定性”而作为出现在1800年前后的一个正在生活、讲话、工作和爱着的生物，便使得这么个“人”（因而也应当包括他的性爱和性别的那一面，但是福柯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同时也成为一个认知理论的问题，对“这个人”的“规定性”因此也就站在意识和系统以及意义建构的中心。“主体性”被思考为“普遍性”，“个人性”被思考为“特殊性”，“个体性”被思考为“单一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并被思考者在建构其意义的那一刻强制地置放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上。晚年的福柯忽视了由此造成的后果。

“规定性”可以被看做是福柯后继者在理论上设置的一个总体策略。话语事件或已经超越主体的话语（比较Foucault，1969/1992：41），这就意味着在越过主体边界（比如Foucault，1972/1977：5）的话语的理论切点上，在福柯对权力作系谱研究和分析的理论中便出现了“规定性”（比如：1976/1977：35；1978：119ff）。可以理解为这是对话语性（信息输出模式；Foucault，1969/1992：69，99）和非话语性（机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式的内容模式；同上：45，224）实践加以整合的一种特定历史的权力策略，这是一种从内（相同性）到外（其他人，沉默）的整合。这种规定性的具体内容不是由哲学，而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但是我不想将隐藏在这个定理后面的，并且也同时是扯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红线的权力哲学一同加以话语性转换，而宁可将“客观性”称为“规定性”。

我把“客观性”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设置。在这种设置中，话语的物质文化技术、象征性符号、生活实践、经济和知识形态都以网状的形

式构成了一种互联的状态，从而对现实做出一种新的历史性建构。由于这类设置一旦得以稳定，就会不断地自我再生，在相对比较通常的社会学观察中便给人留下了其作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制约要素的深刻印象，而在相对比较通常的心理学和道德与法的观察中，这类设置又表现为常态和规范，似乎只有它们才是秩序、安宁和安全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这类设置也经常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呈现为自然的客观事件。

性的客观性使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18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成为范畴、感觉和行动—事实，而正是在这期间也诞生和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因此可以说，那些我们称之为性欲性行为的这个范畴，还极其年轻，是通过把狂热的性爱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而存在的；如我所说，这是自两三百年以来只经过几代人、只是得以在欧洲和北美普遍贯彻并与外界隔绝的戏剧化的一个范畴。

顺便要提及的是：性欲和性行为只是起源于欧美并只在那里才受到关注的一个范畴，因而将只有欧洲人和北美人参加的性科学家大会命名为“世界性学家大会”，以及将只累计了欧洲人和北美人数据的性功能障碍称为“世界统计数据”，如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所做的那样，未免有些自命不凡和荒谬。

5 性的形态

作为一个理论、美学和道德实践的范畴，性欲和性行为便成为一种既定世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世俗文化形成于西方宗教世界观的衰变以及商品生产、知识生产实验和商品交换社会问世之际。那个时代，当认识论脱离了宗教领域之后，才普遍形成了作为特定的个人的性的感受，并因此为经验—心理学提供了前提条件，比如出现了《知己知彼》杂志（*Gnothi sautón*）以及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3年发行第一版的杂志《认识你自己》；在19世纪中叶又

出现了朱尔斯·米什莱（Jules Michelet）、保罗·迈特戈扎（Paolo Mantegazza）、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Karl Heinrich Ulrichs）的爱情和享受学；随后是比如克劳德-弗朗索瓦·米歇（Claude-Francois Michèa）、安布鲁瓦兹·塔迪厄（Ambroise Tardieu）、约翰·路德维希·卡斯帕（Johann Ludwig Casper）、乔治·比尔德（Georg M.Beard）、保罗·莫罗（Paul Moreau de Tours）、本雅明·塔诺夫斯基（Benjamin Tarnowski）、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帕斯奎尔·彭塔（Pasquale Penta）等人推广的性心理病理学；在19世纪末则又出现了比如阿尔伯特·莫尔（Albert Moll）、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马克斯·德斯沃（Max Dessoir）、阿尔伯特·奥伊伦堡（Albert Eulenburg）、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阿图尔·克隆菲尔德（Arthur Kronfeld）等人的性科学和性心理学，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以性的客观性为主导并综合了所有的客观条件后，设置了先前并不存在的一种关于人的性的范畴。先前没有经过反思便被作为历来如此、作为上帝的恩赐或大自然所给予的人的性，这时都因为反思而分崩离析。性的残余碎片、性的自我意识、性心理和人自我的性欲性行为都成了人反思的对象，并通过反思而有了一种与先前完全不同的表象。上帝和宗教失去了原有的威望，理性与反思哲学成为新的最高审判机构。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极端的个体化，即社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有待于个体认同的社会。存在于个人中的普遍性从现在起则是在努力追求由一种被称为性欲性行为所组成的那部分生活，而这部分生活又充满了蠢蠢欲动的本能冲动、愿望、渴望和悲伤。正是这部分被称为性的生活从现在开始影响着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想象。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性欲性行为这个范畴（如同我们的爱情这个范畴），起源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以它的理想、市场、科学技术、娱乐方式和便利的生活驱动所释放出的无限生产力，使个人的存在意志也随之极度高涨。生殖被分离出性的领域。而当这些现

象一旦出现并得到社会认可之后，就会进入到社会的中心，以扩展自己和操纵社会，部分地出售自己和衍生自己的副产品：伴随着人的性这个范畴的诞生，也就开始了人为争取计划生育、爱情自由、性和性别解放的斗争。

只有作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产物，现代人的性意识和性行为才得以出现，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困境才不再主要是缺乏食物的饥荒了；但与此同时，所有人的能力和能量都被作为自己独有的财富，进而作为可以交换的商品而被社会化。从“启蒙辩证法”（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的意义上说，解放与压制、满意与失败在这里相互纠结在了一起。但是如果从吃饭这个社会问题发展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性的问题，这无可置疑地是一种历史性成就；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在总体上赢得了资本主义之前那场古老的赤裸裸的生存斗争。但是在社会构建的社会化性形态中，性欲和性行动的压抑与释放，还是一个纠缠不清没有得以了结的问题；如同福柯在他的《性学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1976）开端所说的那样：在这种建构中，错误地强调了性压抑的倾向，而实际上性释放才是新的性形态的逻辑前提；没有释放，便没有新的社会化的性形态，更不要提其他如性形态的经验什么的了。以他众多的研究曾对批判主义性科学产生极大影响的福柯，受当时的性浪潮和学生运动影响，批判了威廉·赖希著作中提到的“压抑假定”以及赖穆特·赖歇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性与阶级斗争》（*Sexualität und Klassenkampf*）中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64年“去压抑化”（repressiven Entsublimierung）命题的争辩中对当时社会所做的“压抑”诊断（比较Foucault，1997/1999：44）。针对这类“压抑”理论，福柯强调指出：正是社会对性施加压抑的这种“权力”发展了一种策略，实现了一系列对性的规定，这些规定覆盖了社会的一切领域，甚至照亮了社会的最后一个地洞的角落；这些规定能使人的性欲性行为成为一种绯闻到处流传，能够通过一种强制的忏悔和坦白，来揭露和迫使人们承认自己不轨的性趣念头和行为；但正是社会权力的这类方法，使性变得伟大

和重要，从而在社会中植入了新的性欲性行为形态以及新的性别认同。

如果迄今为止对“中世纪社会”的研究不是完全错误的话，那么就可以以它作为参照来对近代人“行为极端不一致”的特性进行比较（Elias，1939/1969，Bd.1：157f）。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也有译为“诺博特·伊里亚思”——译者注）通过对一种“独特的文明进程”的分析认为：需要持续几百年的时间，直到古老的欧洲人建立一种普遍有效的纪律和秩序、雇佣劳动、道德伦理和性欲性行为的规定，并且直到既能在社会秩序中显示出性的重要又能对此保持沉默之时，这个文明的进程才算是完成了。任何一种其他的“自然现象”都没有像性那样，既是如此被突出，又是如此被贬低（Hirschfeld，1908：9）。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它必然导致人们对性持有永久的关注却又充满了冲突心理。这期间出现了众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从几代人聚居的大家庭，转变为小型和最核心的小家庭；从如同动物那样为种族繁衍而哺乳生育，转化为人对自我的关注；从上层社会的权宜婚姻，到普遍的爱情婚姻；从被看做因病或非常态人工授精的植入术，发展为排除授精可能的结扎术；从对变态的偏爱又发展为回归常态；从万人坑的群葬到个人的墓葬；等等。对一个还没有经历过具有他个人特点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而这对一个当代人来说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中世纪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坐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影院里，正在看一部激起他性欲望的电影，“性的客体”就在可以随手抓摸的近处，但他却能把持住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强迫自己放弃任何一种可能的“性攻击”。以资本主义驱动力和国家官僚机构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形态越是包罗万象，对性本能和心理机制的研究就越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8世纪末期，现代人开始将哲学话语作为一个关注的话题，尤其可以通过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1985）而对此获得深刻的印象。与此相比并不年轻多少的性科学，却把反性自慰和那个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提出的口号作为社会的预兆而接纳，尽管他们的理论还停留在教

会说教的水准上，并且与作为确实可信的科学论据还相差不知道多少英里（Meilen）的距离。从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在那个新旧转型的过渡时期，时代赋予了人以现代人的许多特征，这其中也包括人和性，即那个现代的人和那种现代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德·萨德主张情欲和性欲，康德则相反，主张放弃本能欲望坚守理性；人们无论如何都坚信，德·萨德以他关于性欲的著作帮助他们获得了原本被漠视的性的权利；而在同一时期，即当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之际，康德则在哲学领域建构了理性。但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他们两人的理论结果却恰恰是相反的。德·萨德是被欧洲启蒙运动奉为自己标准的理性利己主义的宣告者。康德并不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贬义地看待性欲。他只是在对理性做了一种极端的批判后，把理性作为一种“纯粹”，置放在一个黑洞式的想象王国的对面；后来直到弗洛伊德才被发现，这个黑洞式的想象王国“实际上是如此的无限”（比较Gulyga，1977/1985：302f）。由于德·萨德的利己主义（以及合理性）有一切启蒙主义的特征，由于他自己也被揭露为是无情、玩世不恭、无情感、不知羞耻的，是暴力和利我的，抒情诗人们便不断地发出悲哀的呻吟，他们不是从自我反思的角度对这一切加以观察，而是以伟大哲学家的姿态并倾注了献身精神地在法国向每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这么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把他的著作全都付之一炬？”我可能给予的回答是：看在上帝的份上，饶了他！他的著作应当成为我们的必读教材，虽然最初应当在社会权力的监督下。

借助如物质和思想这些范畴的模式，我在1981年的讲座中，引进了“性形态”这个范畴（比较Sigusch，1984b）。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个范畴为许多社会学家和性科学家所接受和引用（比如Lautmann，2002：171 ff）。我在这本书里第一次系统地使用了性的客观性这个范畴，主要是针对人的一种被称为性欲性行为的象征、感受、判断和生活结构的社会建构进程；相对于性的客观性这个范畴，性形态这个范畴（相类于性别和爱情的形态之类的范畴）则应当至少能够表现这个社会进程的一种已经拥有普遍意义的结果。

性形态认为：一种观点、一种感受或一件事情，不管它是有着某个个人的特定性还是具有通常性，所有人都无法摆脱这么个事实，即所有人都只能这么而不能那么地去思考它和感受它，因为这是一种涉及整体的差异。比如那个智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安东尼奥·罗科（Antonio Rocco），曾在1630年前后撰文为鸡奸辩护（可能在1650年才得以发表），用转换为今天的语言来说，他如此写道：性欲和性行为，并不必然只是为了生殖，它也有纯粹为了生活快乐的效用；爱，要求身体的接触，并且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形式的、自然的性爱游戏等。他的著作《亚西比德男生》（*L'ALcibiade fanciullo a scola*）是意大利几百年历史中唯一一本与此有关的专著，沃尔弗拉姆·泽策（Wolfram Setz）在他2002年新出版的著作中阐释了罗科的这种奇异的思想。事实也是如此，除了他为恋童癖所做的辩解外，罗科的其他有关性是一种享乐的思想，300多年后（精确地说，是1970年左右）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了共识。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形态”这个范畴自亚里士多德（Physik 1，Metaphysik 7 f）以来，是作为物质范畴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以一幢建筑为例子：物是指原始的建筑材料，物质一般是指普遍具有实物意义的物，形态则是指已经定型的建筑构思和业已建成的建筑。与此相似，性本能冲动代表作为原始力量的物，由这种原始之物发展而成的具有普遍性的物质则构成了人的性欲性行为可以表现和付诸实施的地点，如同可居住的房子，这就是性的形态。心理分析学家和性科学家都分别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出共同的结论：本能冲动是没有形式的，但属于可赋予形式的非有形物质，也就是可以变为有形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认为“本能冲动的这种非有形之物”是粗鲁和前文化的，是非真实和转瞬即逝的，是低劣甚至邪恶的；而把“形式”则看成是文化和文明的，是可持续的，是善和高品质的。这样的价值评估至今仍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谁履行了形式上的手续，谁是知情的，谁有良好的表现形式（礼仪）甚至能够达到一种完美，那么谁就是模范地使自己文明化了。但是他为屈从这些盛行的礼仪形式而牺牲了他的自我，社会却对此保持了沉

默。否则完美的形式就会被制服、被唾弃，而没有形态的非形式就会因此获得自己的自由。鉴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建构在人的形式化、模式化和制度化的能力之上，那些通常的物质、形态、理论（即所谓的唯物主义理论——译者注）就未免太浅薄了些。这类理论并不能解释，那些原始材料是经由谁和以怎样的方式建成这幢房子的，哪个先生是这幢房子的“建造者”（在父权制社会里，自然不会说哪个“女人”是房子的建造者）。“性形态”这个范畴，不想去追随这类物质形态理论的思维模式，应当主要遵循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新价值理论已经发展了的那些规则。如果说在传统的经典理论中，客体交换和有着普遍要素形态的商品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拜物主义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中心（Sigusch，1984b，1986），那么在资本主义后期，除处理以上提及的一些物质要素外，有着普遍要素形态的知识和客观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相互异化互为客体（Hylomatie）的状况（17章），才是构建独特的性形态的主要和根本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目前至少能够区分四种不同的关于性欲和性行为的性范畴：（1）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范畴（关键词：基因效应、直觉和本能冲动）。这是医学认定为基于身体本能反应亚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关键词：中枢神经系统、神经传递、酶和荷尔蒙）。（2）心理学意义上的性范畴。根据各种心理学理论各自关于刺激—反应模式的研究方向，这个范畴的重点是：本能冲动、愿望、恐惧、幻想和意见等，有些心理学理论会运用一种实验—实践的研究方法，而有的则建立了一种无意识性欲性行为的理论。（3）社会学意义上的性范畴。这也如同心理学，按各流派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对这个范畴便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有比较倾向于实践—实证方向的，也有比较倾向于从理论上解释一些主导范畴如象征性、礼仪形式、偏见、规则、规范、价值和行为方式等。（4）最后是超越其他几种意义的，哲学意义上的性范畴。它有时是形而上和无形体的，有时又是物和生活世界的，还有一些研究者们则正在思考有关人种性别这个巨大世界里的一些问题。这就取决于这些研究者

中的她或他是否正巧对哪个问题感兴趣，是对原始的性、基因的性、生物的性、社会的性、心理的性、理念的性，还是甚至对以希腊的仇恨爱情之神为总代表的安特罗斯（Anteros）性的反对派感兴趣。因此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认真思考，当他（她）们对性欲性行为和性别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是否也意味着要承担与这些要求相应的那些责任。

直到19世纪，社会的性形态还未拥有一个合适的名字。然后原本作为形容词的“性”［在晚期的拉丁语中“性”属于对性别的表述，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在教育学语言中则表示（自然的）“性别”和不同于爱情的（起着生殖及保种效用的）“性欲和性行为”］，如同形容词“现代”，在欧洲的语言中被主体化，演变为名词。“现代风格”最初出现在涉及美学的艺术中，“性欲性行为”则最初出现在生殖用语中，如奥古斯特·亨舍尔（August Henschel）18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关于生殖的性欲性行为，这是认识论送来的嫁妆，至今仍然有着一种因果关系颠倒的阴影。批判主义性学因此抱怨说，“性或是说性欲性行为”这个词的历史，至今还没有书写完毕。它认为“性”这个词既没有出现在圣经里，也没有出现在荷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性欲和性行为这个词只是为了用来表述这件事的自身，即对爱神乌拉尼亚（Venus Urnia，爱神的褒义名字——译者注）和爱神乌尔吉娃佳（Venus Vulgivaga，爱神的贬义名字——译者注），对宫廷爱情和情欲，对性别和爱情的一种社会化，而这对于批判主义性科学来说，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这是将无限的欲望、情感和想象转换为一种唯一的、似乎如同由上帝和大自然所愿望的性形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借助事实来看清这种转换：从19世纪之前使用的众多词语中，现在出现了一个唯一的词，一个聚集了许多词义的单数词，“性欲性行为”这个词吞没了从爱神到尼苏斯（公元前1世纪罗马时期的维吉尔所塑造的一个男同性恋人物——译者注）所有的前任。与“性”作为形容词过渡到作为主体名词的“性欲性行为”过程所持续的时间相比，如同赫尔穆特·肯特勒（Helmut Kentler，1984）所说，制造出“有着性本质的人”的这个过程，

当然要漫长得多，也更血腥。

6 性别的形态

现在是时候了，整个有关性的批判理论必须引进一个无法绕开的要素：性别和性别差异。从多种理由来看，任何一种当前的性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性别的理论。这首先是由于文化在核心结构上（仍然）是父权制、性别歧视和两性并存的（也请参见本书23章）。其次是由于理论家无法绕开的通常总是从性荷尔蒙和妇科形态的角度观察性别和性别差异的观点。再次是由于通常普遍认可的性别差异只是两型的（即只是非男即女，非此即彼——译者注），这虽是必要的，但却已经不是我们文化中性别、心理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充分条件。最后是由于性的形态与性别的形态在总体上总是相关联的（96章）。鉴于以上这四点理由，现在在这里展开讨论性别和性别差异的命题，不仅是出于方法论和事实的考虑，而且也是基于社会和社会团体层面上的理由。这自然也包括了这类批判意见。

作为由社会制造的性形态，必然拥有一种宗法或父权制式的结构，即是在一个男人的社会由男人为男人而制定的一种结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19世纪花费了很多精力，为了使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把女性尊崇为一种有着天赋理性和自强自立的主体（de Beauvoir，1949）；而在此之前，女人则被认为仅具有感性和情感的特性。但这种19世纪以后的对女性的这种新认同，却在无意中否定了女人拥有一种具有自己特征的性别形态和性的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遁词只能一方面是人被（上帝）“创生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貌似启蒙意义上的“自然目的”。但这就意味着女人的“性别意识”，不再是一种只涉及个人的事项，而是在盲目地满足生殖配种的目的，通过把自己归属于创生的本能来超越个人性的特征。

在阅读一些强调雄激素的性学专著时，我突然想起了弗洛伊德（1909：462）曾经提出的“机体对自己欲望的压抑”，这个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却是个成功的命题。弗洛伊德最初将这种“压抑”用来解释嗅觉的退化，因此最初只是应用“压抑”来解释对人的嗅觉快感的压抑。后来又有科学家们以此类推用来解释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性压抑：对女性的性攻击本能冲动的压抑；在遭受社会长期和有效的消解、去神秘和“压抑”之后，便出现了一种女性性压抑的社会现象，似乎女性已经被屈服，并构成了一种“机体”上的萎缩，再也没有性的主动能力。传统性学家因此认为，女人被教育放弃性本能以及与此相应的性的欲望，以致女性的性冷淡是如此普遍，甚至不能被看成是病态的。在阿尔伯特·莫尔的《性科学手册》（Handbuch der Sexualwissenschaften）中可以读到马克斯·马尔库塞（Max Marcuse，1926：878）的相关言论。女人“性意识”的机体上的“压抑”，无论如何都要比心理上的压抑更具有稳定性，然而却比身体的衰退更不稳定些，如同20世纪的性革命所展现的那样，正是通过“压抑”这种特性开始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性意识的复活，并随之而构成了第一次有着女性独特意义的性形态。自那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的社会中就不再仅仅只是存在一种性形态，即一种男人主动女人被动的性形态，而是有了两种不同的性形态，即男人的和女人的性形态（37、38、95、97各章）。

只是父权制和性别歧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男人和女人（以前被称为讨厌的女人）属于人类最古老的两个概念，而正是这两个概念使得男人和女人的精神生活在人类的初期就有了被迫的局限性。如同那个不太幸运的维也纳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在他概括整个时代的性意识形态的著作《性别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1903）中激进地写道：任何一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她或他愿意反思性别与性别的关系，都不得不面对一种形而上学、不太精细和已经陈旧的批判理论，说这是在反对整个一片意识形态的山峦，正是这片无穷无尽高耸入云的山峦拔高了男人的精神。不管我们现

在是否意识到，这确是压在我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所有想象之上的一块巨大无比的岩石。因为毕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叔本华、尼采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性别形而上学，已经沉淀在我们非反思性的意识之中；虽然有人从把女人作为物（而不是形态），从“柏拉图式的爱情”或是把女人作为（改变社会现状的）“希望”等的角度，批驳和揭露了他们的一些哲学论断，但却不常击中意识形态的要害。要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围绕罪过、贪婪、不道德、病态、不忠诚和屈从等概念加以讨论，就不可能不使用那些传统的和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与此相同，要想讨论性别，也不可能绕开胡言乱语、扭曲、压制和对性别或是故意贬低或有意拔高等父权制性别歧视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以及男人们逃避恐惧和压抑欲望的心理反射。这是一种独特的灾难性困境。甚至直到20世纪的中后期，这一状态仍无一例外地构成了男性高于女性的性别价值。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从精致到粗鲁的压制，从敏感心灵的血与泪，对男人性别的高价值做哲学上的合理论证。

也就是说，谁想从性别的角度研究我们主流的和国家的思想家，那么他要面对的就是有着性别形而上学特征的那些主要和所谓的概念。我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中与这一性别形而上学仍有着如同以往那样的关联，而且直至今天也只是偶尔对此做了一些精致或委婉的加工，但极少在思想和情感上真正超越了它。在环顾和历经了我们当代哲学家（8、9章）著作中的一场性别形而上学之旅后，有一点便因此变得非常明确：那些被妇女运动称为父权意识的理念，在我们以往几百年的文化中，是如此包罗万象、压倒一切和僵化不变，以致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也包括那些我们从其他角度值得学习并得益甚多的思想家，能够摆脱这种性别形而上学的迷惑。如果一个哲学家尽管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仍在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失败了或者说表现出他的无能为力，那么对于这么个哲学家，我们还能够再信任他吗？还能在其他问题上追随他吗？鉴于性别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并在总体上越来越趋向于意识形态，阅读如此一位哲学家的著作不就是如同阅读写在一种“Palimpsest”（古时刮去旧字后重

复使用的羊皮纸）上的文字吗？这就是说：当我们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阅读、研究、破译和反思一篇文章或文稿的时候，这其中不也无意识地包括了一个男性的、一个有着雄性激素的作者，而不是一个认知理论家或性别中性的历史哲学家吗？

我由此得到的印象是，比如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1984）就是如此看待那些由男人们生产的精神产品，并也试图如此去思考的。赖穆特·赖歇（1990）因此对她的评论是：她只是把男人们书写的内容抹去后，在原先的纸上又写下了自己的内容。这样她就可以在必要时，并且即使在男人和女人极其和谐的乌托邦时代，在那些明智而又极端的思想还没有为人所不齿的哲学家中，寻找出一个最原始的性别形而上学家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我在此摘引尼采《超越善恶》（也有译为《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886/1966，Bd.2：626，）一书中的一句话：“一个人的性别意识和行为，甚至影响到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神经。”自从我年轻时偶尔看到了尼采的这句话后，我一直都在思考它。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已经成为性别形而上学这个名字的思想内容；但是我们不知道，尼采也以这句话出卖了整个女性群体，把女性贬低为低等的性别。

鉴于以上所陈述的理由，当我们研究我们的那些哲学家时，所能做的只是多加防范和思考：因为那个作为哲学家的男人把自己看成是最好和最高等的性别拥有者，自然会把自己看成是第一、根本和完美的人，因而就会非常逻辑性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他在谈论“人”的时候，实际上只是在谈论“男人”。并且我们通常已知，在一些语言中，“人”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是指“男人”，即“人”等同于“男人”，比如拉丁文中的“homo”和法语中的“L’homme”。

7 性别的形而上学

最近这两三百年来有着高度哲学特征（我几乎想说“病态特征”——Pathognomonisch）的父权制形而上学的主要教条可以归纳如下：

1.人与人之间直接和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2.在这一关系中，男人拥有高贵的第一性别，女人只是低贱的第二性别。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男人代表了人或人类总体，女人只是男人的衍生物。

3.男人是精神和主动，女人是物和被动。男人的本质是精神、能量和创造，而女人的本质是物、性感、随心所欲、情绪和生殖。

4.男人最后圆满实现自己的形式是能够理解思想的自信和实现最终客观目标的意志；而女人则是生殖。

5.成就使男人感到幸福，情感是女人的幸福。

6.女人因性感和情欲而卑贱，只得受男人的统治。

7.男人的特性类似于动物的特性，而女人则与植物相似。

8.男人喜爱部分的事物，女人则偏爱全部。男人是一夫多妻制的拥护者，女人则是一夫一妻。

9.男人的真正生活是在国家、职业、科学、技术、艺术、教会和政治之中，女人则在家庭。

10.一个女人可以把她的男人推向深渊，也可以把他托捧到云端。

11.女人是祸根，男人是福报。

12.在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事务中，男人是他女人的当然代表。

13.男人的思想清晰明确，女人的行为则永远是一个谜，一种秘密。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常译为《哲学和经济学手稿》，*Ökonomie-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1844）中，我们可以逐字逐句地找到我在前文列举的第一条。只是马克思没有用一个通常统称女性或女士的词“Frau”来称呼妇女，而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贬义的词“Weib”，并认为这样的男女关系是“必要的”。接着他又继续写道：“在这种自然的物种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非间接地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如同与人的关系也是他与自然的直接关系一样，这是他自身的自然规定。感性在这种关系中已经递减为一种可直观的要素，它表现出在何种程度上，人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或自然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人们可以在这种关系中，对人的总体受教育程度做出评判，即这个人在何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人的自身而存在的；男人与Weib的关系，也是最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了人在他的这种自然行为中，究竟具有多少人性；或他的人性与自然本性在他之中有着怎样的比例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他的人性的自然已经成为他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表现出在何种程度上，这个人自身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人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其他人作为人已经成为他自身的心理需求；在何种程度上，他自己最个性化的存在，已经等同于人的共同存在”（Marx，MEW，Erg.-Bd.1：534 f；Hervorh.von Marx）。如果忽略当今的克隆和匿名捐献卵子和精子的医学科技，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想唠叨的那些事，其实早就已经沉淀在我们的头脑中了。不管一个人是否真实地认识自己的父母亲，但无可争议的是每个女人和男人都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人与人的这种关系，确实在事实上以必要的方式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经历过有父亲的生活，或只有物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在场却没有心理上的父亲，或只是在母亲的幻想中感受到自己父亲的存在，便只能通过母亲而进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关系表述为必要关系。

但这真是一种人与人“直接”和“自然”，甚至是“最自然”的关系吗？性别形而上学在马克思之前和马克思之后，都认为这是一种直接和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这多少有些误导我们。但是在他那个时代通常反对哲学的直接性和反对自然统治人类理念的马克思，真的对这种关系做了批判？我在较早以前就曾对马克思，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有关理论做过详尽的研究，我在这里的观点主要来自我的这些早期研究（Sigusch，1980b；修订版：1984a）。我认为，我们在这里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是：这种错误的形而上学，在今天究竟还有多少活力？

8 “神圣的性爱”

有关这一主题，我想以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957）著名的《性爱主义》（*L’erotisme*）一书为例加以阐释。巴塔耶的这本书在我们这里以“神圣的性爱”为题首版于1963年，1984年得以再版。巴塔耶在著作的开头就阐明了他作为基本范畴的“连续性”（Kontinuität）和“间断性”（Diskontinuität）。他的第一句话，同时也是他的信条：“关于性爱，人们可以这么说，它是对生命的热爱，并直至死亡”。这个“公式”比任何其他的表述都“更好”地阐释了性爱的“意义”。对于作为“间断性生物”的人来说，“死亡有着一种存在的连续性意义”。在无性繁殖中存在着一个连续性的片刻——这是从原本的“一”过渡到“二”的片刻，但这个连续性并不出现在“有性生物的死亡中，有性生物的繁殖在原则上不依赖或者说是独立于生物的死亡斗争和它自身的消失”。但是有性繁殖为“从间断性到连续性的过渡带来了一种新的过渡方式”。“精子”和“卵子”都是间断性的物质，但它们却统一了起来。这就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连续性，以构成一种新的生物，并且因此导致自身的死亡，即这两个作为分离物质的消失。这种新的生物的自身是间断性的，但它却在自身中承担了前往连续性的过渡，而恰是这种连续性对精和卵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会导致这两种不同物质死亡的一种融合。这种“转换”构成了所有生命形式的基础。人作为间断性生物，充满了

对“失去的连续性的渴望”。作为人的我们，很难忍受这种“短暂的个体化”，即这种“随机个体化”的处境。我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迷恋着一种与存在相连的普遍的原始连续性”。对失去的连续性的渴望，决定了所有人都拥有性爱的三种形式，巴塔耶将这三种性爱形式假设为：身体的性爱、心的性爱和最后的神圣的性爱。他想在他的书中只讨论这三种性爱，是“为了明确指出，在这三者中，总是会有一种生物的随机性试图以一种深沉的连续性感觉，来取代自己的间断性”（Bataille，1984：10-15；Hervorh.Von Bataille）。

为了证明人“直至死亡”都在渴望使自己的生命获得连续性的性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非常严肃并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富有成效的思想，巴塔耶陈述了精子与卵子结合的必要性，认为通过精卵结合的物理性，便可在男女之间构建一种形而上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拥有自然内核的自然关系，并且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关系了。人对连续性的渴望、他的性爱和他的宗教虔诚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生命哲学，都是在祈求回归细胞融合的狂欢；这并不是为了进入由此伴随而来的一种强调形而上的融合，而是为了进入间断性生物因此得以统一的一种心灵的融合，并通过这种融合而创建了一个男女间的神秘联盟。但巴塔耶认为这样的解释还不够而且太肤浅，他是极端的，他想走得更远，他把自己的理论根基建立在生殖细胞上。但他的生殖细胞却又生存和活动在传统性别形而上学有着意识形态光环的“自然的男女关系”中。这是最后的直接性。马克思可能会对这最后的直接性批判说：这是在精和卵这两个细胞间塞进了一种神学理解的液体，并且也与社会的现实格格不入。对于并不需要生殖细胞和它们的轨迹，而是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性爱渴望，不管是个性的还是普遍的，在马克思这样一种我们称之为拜物教的观察中，是没有位置的；与此相同的是其他一切不同于异性性别关系的主体性爱的必要和有益性，也都因为一种男女基本细胞关系的优先权而遭受排斥。巴塔耶对连续性的积极评价是：连续性，就是“存在”通过死亡，在人类是通过精子与卵子的“生物”死亡而获得的连续性。这就是说，是男女性别细胞

的融合和生殖，保障了人类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是通过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细胞的死亡而不是通过精神或心理的遗产，不是通过那些遗留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质财产以及对性的想象、感受和一切由此构成的衍生物。巴塔耶所理解的连续性，狭义地等同于“生命”。它直接地再现了人的自然存在关系，经由男女生殖细胞的统一而建构的连续性，将作为对性爱的渴望而继续生存下去。这根本就是性爱的连续性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根基重组，这种重组实现在自然科学描述的细胞融合中，而不是在心理生理的过程中，即不是在胎儿和新生儿的过程中以及怀胎、照料等忙碌的人们中间形成的心理生理之中。在巴塔耶那里，性爱的基本机制是细胞化学反应的自然规则，而不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弗洛伊德头脑里的心理形而上学的构思。

从简单的生物学来说，巴塔耶的看法尽管有着一切可能的形而上学要素，他以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男人与女人关系的一种自然直接性前提，而他的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他从一切人必要的、团体的、社会的和心灵的生活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似乎在由分子“中介”的细胞趋化与由社会中介以及总是在它们的起源中构思的那个人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鸿沟，即在人日益成为人和日益个性化的断裂时期横亘在性别与性爱想象以及感受之间并不存在的鸿沟。当我们出于“随机个性”和间断性状况而表现出渴望连续性的时候，似乎我们只有接受巴塔耶的一系列范畴，才能帮助我们摆脱被一个僵化并脆弱的自我所强制的连续性，摆脱因为失去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与母亲的统一以及失去早期受其影响的有关人员（大多为家庭成员、亲戚或护理人员）的痛苦，摆脱那个个性化和个人分离出家庭的过程，玛格丽特·马勒（Margert Mahler）把这个个性化和个人分离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为：这是儿童的第二次出生，是人的本性，这个过程不可解地联结了自然和非自然。也就是当我们将男人与女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描述为一种自然和必要的社会过程、一种社会和必要的自然过程的时候，巴塔耶却试图在一种盲目的，既无心灵又无社会的自然过程中，找出它内在自有的最终的、那种被他称为“神圣”的性

爱。这就不免强化了人们对他的怀疑——糟糕的形而上学在他的理论里占据了一切，从生殖细胞到宗教。

9 性别的等级 第一性和第二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父权制性别形而上学主要信条中的第二条：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按这一信条，男人无疑是第一，因而也是更优越等级的性别；而女人则与此相反，只能是第二性，因而就是较低劣等级的性别［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第二性”，而不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经典名著《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1949年德语版所用的错误标题《其他的性》（andere）］。虽然这句话作为理论和文字遭受到诸多质疑，但却因被民众的俗语应用为“强大”的性别和“弱小”的性别，而得以继续流传，并且在给定方向的观察中，也确实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社会和社会团体的真实状况。几百年来，我们的形而上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此做了多少有些尖锐的表述，按主导社会价值的各种最高机制，或是以上帝、自然、理性，或是简单地以他们耳濡目染的那些一贯如此的既定现实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他的《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中写道：“女人是低贱的，很久以来就是如此。”（1959，Bd.II：687）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他的《致死的疾病》（*Die Krankheit zum Tode*，1881）中对此解释道：鉴于女人是由亚当的一个肋骨演变而成的，因而人们把她们标示为衍生物；而作为次生物、派生物和后来者，即作为衍生物，就根本不可能如同原本的人那么完美。除此之外，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时常引用的《圣经》中的那些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应阻止我们在这里对此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令人敬佩的是，海因里希·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von Nettesheim），一个博学的智者和医

生，却持有与众人相反的看法。他反对迫害所谓的女巫，自己也因异端思想而入狱。据说歌德在创作他的浮士德人物时，眼前曾浮现出他的精神形象，这位阿格里帕在470多年前就仔细审阅了《圣经》，如同当今的女性主义神学最终所做的那样。他在《一个男人是否有权打他的女人》（*Ob ein Mann seine Frau zu schlagen berechtigt sey*，1736：95 ff）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按照他的见解，男女两性的区别只是在于为人类生殖保种所必要的身体部分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他也论证了“女士优先于男士”的理论依据。上帝赋予了男女两性相同的心灵、智力和理性；男人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幸福，女人也有同样的目标和期望；对最终目标的追求，并没有性别的区别。但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按福音书的真理，每个人都会在他自身的肉体中得以复活，但只有那些向自己和向别人承诺天使般的平等的人，才能得以复活和实现最终目标。这就是说，从心灵和智力的角度加以观察，男人和女人之间并没有优劣的区别，谁也不比谁更优秀；因而从自然来说，男女两性都应享有相同的自由。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特有的优点。首先，女性通常有一个相对“更优越”的名字：亚当意味着“大地”，但夏娃却意味着“生命”；按古老犹太教的神秘标记，夏娃这个名字与“没有说出的四个字母的上帝名字”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因为男人的名字“与众神的名字没有丝毫的一致性，即既不在字母上，也不在人物的形象上，更不在字母的字数上有一致性”。这就说明了女人并不是如同亚当那样，由一些无生命的黏土或烂泥黏合而成。构成女人的是一种净化后的、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着一种理性心灵和天赋的物质，这种物质与上帝一起共享上帝的精神。因此可以这么说，男人是一件自然的创造物，而女人则是一件上帝的创造物，毕竟是上帝“在所有其他的事物中最终选择了女人。哲学在这件事上有很明确的观点，比如一个艺术家自己念想的最终目标，这是他的第一念头，但却又总是他最后才着手去做的事；因此女人也曾是创世主在所有创造物中的第一个念想，却成为创世主双手中的最后一件工作”。如此这样，女人便“完美地拥有了创世主的一切智慧和权力”（亲

爱的信仰基督教的女读者们，这样的论证不是很美吗）。

但是阿格里帕以他的反证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他继续说：“正是因为女人，上帝才赐福予男人；反过来，法律是用来约束男人的，法律是恼怒和诅咒，不是针对夏娃的，上帝希望夏娃从被创造的第一时间起，就永远享有自由。尽管上帝曾警告过亚当，但亚当还是吞吃了那个不允许他吃的苹果，犯下了原罪，因此是他把死亡带进了我们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女人。”圣保罗曾说：“我们的罪过来自偷吃禁果的亚当，而不是夏娃，我们所有的人都承担着亚当的原罪；这份原罪不是来自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女人，而是来自我们人类的第一个男人。”但是与此相反，父权制的著名理论却认为是蛇引诱了夏娃，夏娃又引诱了亚当。这就是原罪。“其结果，”克尔凯郭尔写道（1881：18），“是双重的：一是将罪过引入了我们的世界。二是引进了性，这使得男人和女人再也不可分离”。但是阿格里帕却认为上帝只是因为男人的罪过而只惩罚了男人：是男人们必须割去包皮，而“不是女人”。经过对父权制社会的主导命题“女人作为第二性，是上帝的愿望”的解析，阿格里帕特别具体地关注妇女的生活，并因此发现了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荒谬的”：“如果生了一个女儿，人们就把她关在家里，培养她的温柔和懒惰，似乎她自然而然不需承担重要的任务，人们也不允许她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比针和线想得更多；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人们便安排她结婚，把她交付到一个男人暴力的手中，因而经常遭受如同一个女奴的残虐，并且他也不让她有比他偶尔的一些傻帽念头更多的自由。她虽然可以抱怨和叫苦，但没人会去听她的抱怨，包括从心里爱她的父母，因为她再也不在他们的照看之下，他们常常无能为力再去帮助自己的女儿。她们被剥夺所有权利，不能享受公共服务，即使是她们中最有理解力和最聪明的头脑，也没有将某个人告上法庭的自由，各级法院都把她们拒之门外，她们不能成为陪审员，甚至不能参与有关儿童事务的审判，她们不被允许参与遗嘱事务，不能参与对犯罪事件的审判。她们也被排除在作为教会神职人员的工作之外，尽管圣灵曾借他的先知约埃尔（Joel）之口承

诺，不仅老年人可以有梦想，不仅他们年轻的儿子能够看到先知的面孔，而且他们的女儿也将学会预言。”阿格里帕作为一个批判者，看见他那个时代女人的生活如同“受到军法惩治，但他坚信这绝不是上帝所做的规定，不是来自一种根源放射出的力量，而是出于习惯，来自教育、随机性和暴力虐待”。然后他又分析了男人有关女人为什么是低贱性别的各种理由。尤其清醒和罕见的是他的文字同时也是对那些个人的固执己见和我称为“性别的特殊差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性革命是怎样一方面动摇了性别形态，另一方面却又稳固了它，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10 爱情的形态

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前现代婚姻（比较Schnell，2002等）的情感前史以及仍然被普遍认定的父权制和现实存在的性别歧视，市民社会关于自由、平等和个人性爱的理念，还是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得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根成长，并且自20世纪以来也具备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性：爱情作为两性——男人和女人——的一种普遍人权，爱情作为两个独立自主的人的自愿协议，以得到被爱者回应的爱为前提，爱情关系成为一种持续并强烈的情感和认真负责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却还难以为之，因为那个被设想为自主的市民，他的自主在他成为市民的过程中已经解体；因为向往个人性爱的念想，已经被对物化的念想所取代；因为爱情与性的吸引不可能长期保持一致；也因为女人作为女人，仍然遭遇到如同从前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无礼的一种不公正，也就是仍然一如既往地遭受压制。这一切都不是在呼唤自由平等的爱情，而只能是仰天长叹。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与作为社会形态的爱情——尽管听起来有些疯狂——仍还是有着一种彼此相属的关系（也请见本书98章）。尽管资本

主义的物化，每个人都仍在期待爱和被爱，期望在两个人的爱情小世界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和谐，而大的世界便也会因此皆大欢喜秩序井然。每个人都在渴望幼年童话中的天堂，这是一个科学理念无法进入的天堂。显然，一切都没有比在母亲的近旁更令人感到温暖和欢乐了。但这一切同时也都隐藏着风险。太近会感到窒息，太远则会产生恐惧。现代人的爱的能力是一种心灵的适应力。这可以归结为一种联结和满足或是分离和失败的过程。爱情和情欲以孤独、仇恨和保留为基础，但同样也以实现巨大的愿望和全身心的投入为基础。它们是现实的，但又是不真实的；是实用的，但又是非理性的。被我们称为爱情的这件事，有着一种相互极具对立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最亲近关系的天堂和地狱。它一方面代表了身体的融合和欢乐，另一方面则又是身体的折磨和童年的恐惧，是儿童时代曾经陷入过的牢狱。最后的结果是，每个人终生都在为此或是唱着一首赞歌或是唱着一首哀歌。

千百年来，众所周知的爱情赞歌都在唱着：我心爱的人，闪烁着红色的光芒，在千万个人中显得如此出众。她的头脑是纯净细腻的金子，她的卷发如同一穗穗乌黑的海藻。她的眼睛就像站立在小溪边鸽子的眼睛，清澈得如同刚用牛奶洗过，还充满了智慧的光。她的嘴唇如同流淌着迷魂汁的花朵，她的躯干就像是镶着蓝宝石的洁白的象牙，她的大腿是支撑在金色底座上的阿拉巴斯特雪花石雕，她的上颚是如此甜蜜。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欢乐的。她是那么可爱。如果她想吻我，那就用她的嘴亲吻我！心爱的人身上没有污渍。她的胸如同在玫瑰花旁跳跃的两个小鹿。但是当他以他的玫瑰之吻亲吻它们的时候，它们和他都沉浸在欢乐的花园之中。那里有牛奶和蜂蜜，石榴和芦荟，甘松、藏红花、肉桂和菖蒲，所有这些充满香气的珍贵硕果使他的心陶醉。那个被爱的姑娘是一个隐秘的泉源，就像一座被盖罩着的喷泉。如果姑娘是风，他就必须呼唤，风吹过洋溢着她的香气的花园！

爱情的悲歌自几千年前就开始寻找表述自己的诗行。今天几乎谁都

能够在睡梦中闭着眼睛吟唱，那是因为相恋的人在诗歌的所罗门之歌中，已不再是爱情的先驱。爱是一种最无情的狂欢折磨。它充满了狡黠的自贬、野蛮的抢夺、痛心的失望、恶意的报复和仇恨的攻击。它是贪欲、蛮缠、吞没、放纵、易逝、矫情、虚伪和贪得无厌永不满足。它是一种痛苦的感受，而不是幸福。它是仇恨、恐惧、愤怒、罪过、孱弱、嫉妒和疯狂的欲望。在爱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得通过和依靠另一个人得到自己的满足，但事实往往令人失望，对这个人来说也许是快乐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无聊的。相爱的人相互逆来顺受，并且永远没有了结的时候。爱情是自私和反社会的，是疯狂和贪欲的近亲。只要想一想那些热恋中的情侣，就能知道什么是疯狂。只是由于社会文化赋予了爱情高度和过高的价值，才使得它没有在帝国保险规则的条文中被算作是病态。

自从社会中出现了拥有自主权的公民（至少在纸上是这么写的），所有人的爱情都应当如达夫尼斯或克洛伊那么自由（古希腊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但那些设立在屠宰凳（而这条屠宰凳恰巧又是被置放在当代和古代公民之间）上的新的道德准则，是以人作为“人”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种人的关系”为前提。只是这种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在人的生活中，小说和宣传小册子或论文除外。一个公民从小开始就会受到恐吓、贬低和被蒙上面罩，天天如此；等到长大以后则又是既定机器（机制）中的一颗小螺丝钉，被拧固在统治者和奴隶的关系中。这样的一个人（公民），一旦进入通常的爱情生活中，便期望一切都与他的社会生活完全相反——他会突然成为他自己，充满活力和不再屈服。但既要激动又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两者怎么可能在他身上同时合二为一呢？

不管这样的努力是多么无谓，但正是这种努力掩盖了社会对爱情形态的神秘化（98章）。作为拜物主义的化身，爱情从它的自身创造了备受崇拜的价值，并坚守自己的权利。这就显得现在似乎是自然规律在掌控一切，似乎为公民设置了一种具有充分性、个人性和亲密性，并超越

了物化的生活。爱情作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似乎在排除了客体制约后成了一种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你需要的只是爱”。但正是这种现象，这种给爱情打上了普遍性印记的现象，使爱情自身成为一种社会通行的爱情形态。在这个形态的背后仍在继续着的是：没有不带心机的温柔，没有不带用意的友谊，没有不为了招摇的打扮，没有不带占有的奉献，没有不故意叫嚷的幸福。绕过一层层设置的障碍和装腔作势，一切都在按F（性交）的格式运作，当然因人而异。已经凝聚成形的爱情形态假惺惺地借助一种多彩多样的表演来使自己更富有活力。但是爱情的自发性和陶醉感是从外在于爱情的社会所注入的，物化的多解性贯穿于爱的内核，因此它便不免有着在活力中的僵化，在享受中的拒绝享受，在充分关系中的无关系，在忠诚中的不忠诚，在爱之中的对人的蔑视。

再没有什么比爱情更浪漫了。众所周知，如今的爱情赞歌唱的是：爱情是生和死的统一。它是温柔、温暖和女性。它不嫉妒也不过分鲁莽，它不会过分自大也不会不守规矩，它不去激怒对方也不让自己恼怒。它能承受一切，容忍一切，能无私地默默安慰。它不再是恐惧和虚无，不再是强制和无谓的羞愧。它保护相爱的人，使他们富有和一致。它使男人拥有女人的温柔，使女人拥有男人的刚强，使他们都变得如同吹过宙斯为我们提供的庇护所的一阵晚风那样地轻盈、开朗和充满了稚气。它拯救已经失落的，使其成为当代的，并从失去中创造了未来。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使紧张的心灵获得解放，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使僵硬的身躯获得活力，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使病人恢复健康。爱情使狭隘的心胸变得宽广，使人们陶醉在对爱情的双重幻想中。每一根血管都流淌着火一般的熔岩，所有的神经都在备受折磨，体液和泪水就像水银和毒药淹没了两个相爱着的人。他们在维纳斯的山上喘着呼吸闻着各自腋下的香气，他们在寻找富有刺激和甜蜜的肛门和阴户，吼叫着如同一个动物。他们不再能够分离，他们不愿再分离，他们都沉浸在各自的肉体中。“二为一，一为二”，终于又找到了那丢失的一半幸福，那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死亡。男人抓住了属于他的已经肿胀的乳

房，女人也将属于她的阴茎塞进了正在悸动的阴道。

通常的爱情之歌（Sigusch，1979，2005a）当然包括了悲哀和赞颂两个方面：一曲赞歌和千万声哀叹，日复一日的合唱和重复终生的再演。因此可以说被我们称为爱情的，其实是一曲心灵相反相成的合奏，它表现了生命与死亡、个性化与融合、游戏与认真、和谐与紧张、欢快与悲哀、粗鲁与温柔。虽然这并不能成为一种安慰，但却是真实的：即使是对于拜物主义者来说，爱情也是（至少现在这一刻）一种保障生命的唯一宝藏（98章），因此要如同崇拜神那样地坚守爱情的理念，为此奋斗、变动和创新。爱情之歌将继续吟唱，有时是伴奏，有时是主曲，有时是高歌，有时是低吟，但总体来说它总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在社会文化中得以贯彻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形态。爱情总是借助陶醉、成瘾和疯狂的手段，试图带动那个死板的人翩翩起舞。但是由于爱情中存在着如此多的不可解的对立、似是而非、矛盾情感和自私自利，相爱的人不仅要懂得神秘的爱情具有易逝性，要理解爱情也会失败，而失败后的报复则是一种病态，而且也要了解对一个人的爱情也会出现转换和发展为对多人的爱情；很现实地说，即会从一男一女之爱，变为多元之爱（74章）。但是当今西方国家盛行的仍是那种针对一个人（是一元而不是多元）的爱情形态。加拿大社会学家约翰·阿兰·李（John Alan Lee，1973）在几十年前就把这种单元的爱情用希腊词表述和描述为Eros（激情、性欲）、Mania（占有欲、嫉妒）、Ludus（游戏、征服）、Storge（友谊、合作）、Pragma（理性、有利）和Agape（无我、利他）。

11 性的个人性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鉴于在前面已经陈述的理由，读者也就不会感到惊奇，如果我坚持说：从某种强调的意义上来说，一个性主体，如果没有在它的历史与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扼杀或是被釜底抽薪剥夺了其本质的内容，只留下光

亮的表象，那么这个性主体在我们的历史中也只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即使是有着自己独特见解、有明智远见和富有勇气的人，在过去时代如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玛丽·古尔内（Marie de Gournay）、安东尼奥·罗科，在现代如奥林姆帕·德·古戈斯（Olymp de Gouges）、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卡尔·菲利普·莫丽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卡尔·海因里希·乌利希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Mill）或西蒙娜·德·波伏娃，总是（至少是暂时性地）会忘掉一种在理论上难以证明的盲点（在这一点上，请比较比如5章、9章）。

按黑格尔（1798～1800：323）的观察，野蛮人与表现为理性和性的新时代欧洲人的区别在于：“野蛮人的统治者在他自身之外，而新欧洲人的统治者在他自身之中，但他同时却又是他自己的奴隶；对于特殊性、本能冲动、偏爱、病态的爱情和情欲来说，无论人们如何称呼这些，普遍有效性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永远是一种外在强加的制约力，是一种客体；但它也留下了一种坚不可摧的积极内核，普遍命令所包含内容中的一种特定的并且构成有限性和普遍性相互矛盾的义务，也就是为了给它自身的片面性罩上普遍性的伪装而要求最强硬的义务时，普遍有效性所留下的那部分积极内核，就会因此感到非常愤怒。”这里其实就是在说主体。这样就能把主体性的原则理解为是一种统治原则。前文曾提及的从性作为一个“形容词”到作为性欲和性行为总称的“名词”，在当前的这种过渡所制造出的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不自由，也不是一种最初的自由，而是一种在不自由中的自由和在自由中的不自由，一种不自由的自由。

但这样的一分为二，在理论上还是不够充分。黑格尔（1798：268f）在两百年前还看到了另一种对理解人作为性的生物的那种特殊的历史状态极有帮助的状况：“对一个更好和更公正时代的想象，已经活

生生地进入到人们的心灵之中；一种渴望，一声期望更纯粹更自由生活的叹息，使所有人都为之动情，并与现实分道扬镳。”这种苦恼的感觉日益无法忍受，变革的要求便日益强烈。比如在19世纪中叶就最早提出了同性恋（那时还没有直接被称为同性恋）现代理论的卡尔·海因里希·乌利希斯（1862）就认为，正是那一声期望一种“更纯粹更自由生活”的叹息，为叹息者自己和科学提出了一个使命，从现在起也将人从作为性的生物的角度加以研究，并且为所有性的生物争取和打造“更好更公正的时代”（比较：Sigusch，2000a）。

这个使命直至今日仍没有完成。虽然人们意识到，未来已经开始，并在18世纪就已形成。但那个时代的人们经历了加速度和时间的压力、失败和性的压力。这在当时表现为时代精神，并因而是暂时的，是一种“渐进性的崩溃”（Hegel 1807：18）。要求变革的心态和理论带来了运动、发展、渐进、危机、解放、革命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社会动荡。自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涂满了这样的画面，在社会个人的耳中嗡嗡作响。自那以后人们只是期望打破禁忌，扔掉面罩，开始自己真实的生活。这就导致了人们不知疲倦地从一次性革命走向另一次性革命。

但是在作为自主公民的形成过程中就已崩溃的那个自主公民，由于认为女性只是第二性，把女性贬低为低于男人的次要性别，因而也就只能停留在与真实的不一致中。如果只是不断叹息，如果人们不丢弃“在文化中不舒心”的感觉（Freud，1930），那么人的困境就不可能得到缓解。在暴力关系中的安眠，并不是争取来的和谐中的安宁，而是如鲠在喉。在这种关系中骚动的必然是暴力自身。所有的心灵都在“颤动，与现实的关系也渐行渐远地破裂了”。但是将部分分离出整体并使各个部分相互分裂的那个裂缝，也同时排除了那种“更纯粹更自由的生活状态”。在社会中得以贯彻的恰当的那条物化原则，与假设的主体性原则是相对立的。命令内在于个人之中的原则，应当以个人作为人的权利为基础；但是如果在生活中出现了严肃的事情，那么即使是在那些最富裕

的国家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个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自己的自由。因为自从社会只允许存在一种情况、一种渐进、一种性欲性行为形态的那一刻起，如同记录成文的出现在各类形式集体中个人境况的那些细节所表明的，个人必然被强制接受集体给予他的身份认同。今天的社会化规模，不管是从区域性还是日益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个最后的内在联结性被内在固有性所填补。以一个瞬时的、令人迷惑但又十分清晰的词来表述当今的状况，这个词应当就是：Ich-AG（自我的股份有限公司）。在期望更好时代的“叹息”中，同时也隐藏了种种废话和无能为力的心态。尽管如此，那声叹息还是打动着“无数的心灵”。

但是强调历史上并没有形成过性的主体因此也就不存在哲学上的性的主体性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过性的个人性（Sexualpersonalität）和性的个体特征（Sexualindividualität）。性自身作为由社会制定的形态，只有当它是真实个人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只有个性化了的性才是现实存在的。人并不能仅仅通过强烈的性渴望或性本能冲动等“概念”怀孕。如果把“性”构想为一种虚拟的存在、人的一种特殊能力，那么只有当它被具有行动能力的人现实化的时候，它才得以实现，才能从虚拟构想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以各自的本能冲动愿望作为个人动机的个人意图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它既是遵循惯例却又抵抗惯例。但是如果没有惯例的常规化，那么对任何人来说，性也就不存在了。这一说法究竟有多少确切性以及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演变，通过研究历史和性学意义上的道德历史描述，我们便可以获取证实此说的大量资料和事实，也能就此把握它的历史演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男人看到裸露的家具脚，就会淫秽地回忆起一个女人的腿，甚至体验到“性兴奋”；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以致为谨慎起见，那个时代家具的脚都是包裹着的。

使性能力和惯例得以实现并赋予这两者以一种特殊意义的机制，是

作为个人性的个体特征。性行动意图的实施，不仅只涉及个人的特有经历和处境，而且也主要受制于这些特有经历和处境的规定。因此，每一种性行动都是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人性。如果只具有普遍性，那么个人的一种性欲性行为就只能是一种务实的共适行动，它就可以自我实现，不需要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个人出现在其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实证主义的性学就有理由为它的“性理念”模拟还停留在探测月球前自然科学的方法设定一些理想化和不清晰的错误前提。之所以说这些前提是错误的，首先是它们给性的行动贴上了仅仅源于本能冲动和意图的标签，其次是用规则或有规律地将性的多样化表现形式进行了简化还原。但作为性的个人与这两个前提是相矛盾的，尽管受到一切惯例的约束，只是那个作为性的个人仍然不会停止（如同前面已经提及的）上演一些“小的性戏剧”（Dannecker，1987a：27），也不会停止去做自己所期望的那些事。但是实证主义性学完全基于理性和法律规则的理论构想却把意向性、反思性和自发性作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加以排斥，并且我们的那些理性主义性学家也持与此相同的立场。他们只想研究性究竟应当怎样惯例化，并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把性看成是对自己专业科学地位的一种冒犯：他们认为作为性的个人总是在不断对性做出新的解释，为其加上新的意义，以致科学几乎无法再将性简化还原。与此相反，按照丹内克尔的理论（1991：292），一种批判主义的性学研究总是“立足于以对话方式详细地重构个人的生活史”，由此得出的研究结果，便不再是问卷式的死的统计数据，而是活生生的“已经被理解为人的性史，性科学研究便因此而有了一种系统化的资料”。

如果性没有个人特征，那么我们就都成了只是自动启动的性机器，机器的特征是共有、结构、系统、规则、话语指令和密码以及传统和近代哲学在发现个人之前的其他一些极端的非个人性的概念和范畴，没有个人特征的启动完全不需要“主体”的反思或只需要一个如黏胶一样的不会反思的“主体”。我们可以把这种过程称为性机器运转（Seomation）。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什么是性或什么是爱情，就永远地被确定下来，就

不必再改变这两者的意义了。将那些被看作是性的，再重复回归到主导的惯例中去，似乎就不多也不少，已经非常完美，专家们也不需要再为什么是性或淫秽，什么是性刺激或色情而争辩不休，因为性爱机器会按规则的指令不断重复相同的程序。一百多年来，专家对性的研究得出了如此各不相同的结论，也同时证明了个人在性活动中的意义日益重要，以及个人的性活动与社会化惯例之间日益递增的距离。这种变化内在于性活动的自身，并建构了我们所说的性欲性行为。由于个人只有通过可重复的明确区别于其他（这里特指非性欲性行为）的特征，才能赢得他自己的性意义，这也就同时构成了他与自己的一种距离。

性欲性行为是最有个人特征的欲望和行为，因为它的结构中有着前语言早期个人身体感官的感受和状况，这种感受和状况一直延伸到以后构成他特有激发高潮模式和心理需求，这便使那个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成为内在于个人之中的普遍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身上还存有一些最原始的自然性冲动或性的行动。这便使得性的普遍要素与个人要素相互交织、相互联结在一起，在自身中作为自我的媒介，但没有自我的身份认同。这就导致性在表现自己的时刻，就会远离这个个人，它会通过与对方交流而进入超越个人的社会性系统的结构；但作为一种有情感的性活动，虽然情感在这里是那么微弱和边缘化，它仍会逃离社会的性系统。在这种自我逃离中，隐藏着自我摆脱永不休止的虚伪惯例的希望。任何不坚持个人性和个体特征的理论，都会在限制和排斥个人性与个体特征的同时，把自己无助地出卖给认同残酷事实的强制，如同排除性本能冲动（或类似）概念的传统性理论，为了与时代精神和谐，就让时代精神的幽灵来统治事实。

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Sigusch，1988，1989a），不只是特指个人的独特意识，而且也包括了社会的共识，因为是社会的共识铸造了个人的意识。人从幼年起就受制于普遍共识，并在共识中发展他自己的个人意识，他的个人

意识补充了共识中所缺失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幼儿都会这么做，这就形成了每个人的特殊差异，如同一种每个人各不相同的指印。其结果是，这就有了无穷无尽各不相同的“本能冲动的命运”（Freud），不同的“性演出脚本”（Simon和Gagnon），不同的“爱的轨迹”（Money）；性欲望的基本轨迹和基本模式，或如同科学家们愿意称之为的“个人模式”，就是个人的特殊性与普遍共识或多或少的结合，并凝固为记忆的痕迹（30章）。我们与杀人如麻的伊丽莎白·巴托里（Elisabeth Báthory）或杀害于尔根·巴尔奇（Jürgen Bartsch）的令人发指的凶手有着许多相关的事，但却是与屠杀者完全不同的人。

性别的个人特殊差异（Differentia generis specifica）和性别差异（Differentia generum）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相同（21章）。这两个问题在这里只能说这么多：假设一种自我独立、土著型的性欲性行为，即没有受异性引诱的性欲性行为，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因为所有的性冲动都是经由异性（女性和男性）所表现出的性吸引而激发的。在通常的语言应用中，“性别”不仅是指性器官或特指生殖器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这是性别和性欲性行为的一个共同居所。事实上，性本能冲动从心理和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性别的本能冲动；保守的性教育学家一如既往仍爱提及的那些状态，不应当在未来还用来吓唬我们，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性是性别的派生物，性别则是性的派生物。女性的性欲不可能没有女性的性经验，这种性经验通常被称为性别认同。因此将“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区别于“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或者如弗洛伊德（1905：47）在他《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一书的开端所提及的“不同性别的心理需求”（尊重不同的性别本能冲动），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一种直接的性本能冲动会直接地展现自己；与此相同，性别也不会公开地表现自己。那些可以表现性别和可以识别性别的征象，其实在广义上是由社会，在狭义上是由个人历史，并且是由每个个人特殊的

历史所传递的。性别所表现出的性是普遍意义上的，只要它凝聚为一种社会意识，便会陷入性别歧视的父权社会化的强制中。这里的社会媒介并不是指解剖学意义上或身体器官的外表特征的媒介，不是指性与性别之间的媒介，不是指解剖学上的身体器官与社会之间的媒介，而是指在要素的自身之中，在性欲之中，在性别之中，在性器官之中，在个人的自身之中的媒介。因此社会如何构建和评判性与性别的认同，这也是批判主义性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今天已无可争议的是，社会以不同的标准区别对待和评判女性与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当然这并不是一切。由于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女性和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女性和男性的性别经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有的一切都会变得苍白，出现相互融化和角色转换。经验和临床研究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所谓“自然的性”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的青少年进入身体的青春发育期，在大约一个世纪的进程中提前了三年的时间。科学技术的标准，也“一下子”反驳了性别的永恒不变：在男人那里突然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性荷尔蒙的周期，而这在以前完全只是女性身体的特有征象，并决定了有“女性特质”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性活动与性别的分离作为一种科学的艺术品，目前还只是在我们头脑中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将会在未来听到它们被成功分离的消息（40章）。

12 社会这个范畴和性学理论

我思考，社会，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些客体化的结构，它们主要来自认知和经济理论的构思，打上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思想的印记，并在先验、革命或实验性的主体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撑点。社会，也包括当今的社会，其实只是一个主体自我授权自我确认的一种结构性组织，只是主观性在获取权力意志的意义上的一种建构性结果，是主体为了生活而表现出的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能量，或是以诠释学理解的社会。

马克思曾把社会转型和变革设想为是社会的“自然法则”，虽然对转型和变革的希望如同对“复活的希望”那样已经人间蒸发了，但是连阿多诺（1966：371）都没有放弃对这两者的希望，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研究了作为物化反思模式的理性的超验普遍性。这种物化的过程，今天已不能确切定位在社会的某个领域。虽然马克思描述了人的关系怎样转化为物的关系，以致死的物有了一种自己的生命，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依赖于抽象的交换关系，主要是一种算计的关系，即在物化和交换关系框架内的更多的算计，但这又不是历史的全部。为此，马克思甚至想象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即当科学和技术发展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的时候，社会就不再需要资本主义这种社会体制了。在这种可能出现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状态中，马克思看到了他的竞争理论的历史有效性的边界。但是这种状态没有出现就已经被超越（比较：15章）。在它的历史中，今天的“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的权利去嘲笑一切关于它自我解体的理论。福柯的知识和人文科学考古学——这同时也是一种生产理论——对当代的这种变化做了令人印象最深刻和资料最丰富的分析。如同韦伯，他的生产概念也排斥了人的意识。

社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在的社会，已经不能再理解为是一个自我授权的主体的建构性组织。不管是信息的起源和流向、原子生物化学武器和转基因产品，还是资本的运转和股价的涨落，社会的进程只能源于社会自身。知识的积累将导致社会的解体，以及知识能够创造自我（它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叫作“克隆”）等理论内含着极端化的维度和层面，而那些主张社会异化和物化的理论家却不能够或不愿意事先看到这一点。当今所构建的社会，排斥内在于普通个人中的自我意识，把事件和话语过程假定为没有任何经验主体的意义，并认为康德的思想已经过时。因为当今社会不是建立在自然需求、具体工作和确切的知识之上，而是以自身的自我抽象为基础，它只有通过神秘化才能赢得自身的统一，即在核心上通过客体化的自己关注自己的方法。所谓的主体现在只

拥有一种次要的地位，它不再是自己家中的先生（也完全不是家中的主妇），不再是系统中的主人，它不再是完整的，更不是社会的建构者。因此这种新的哲学，已经不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也不再以主体为中心，而是离开了人作为主体的体系和权力中心论。它坚持不是人的智力和能力决定事物的进程，而是领域、结构、认知、密码、话语形式、系统的必要条件、权力机制和权力地位，以及被称为超个人或超个性的概念决定这一进程。

这么说来，那个传统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绝对精神的、尼采生命意志的、海德格尔存在的或结构主义者和系统理论家的理论中，仅仅只是历史和社会进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派生物？马克思批判了他那个时代的唯心主义，虽然主体的自我意识只是社会进程中的派生物，但被唯心主义解释为是主体；而作为真实主体的社会进程，却被解释为是绝对精神的派生物。阿尔都塞（Althusser）和福柯都重复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这一本末颠倒的指摘。不是主体认知了社会，而是“结构”、“领域”、“话语形式”规定了主体应当做些什么和怎样实践。主体的眼光和他的视野不是一种自我的自发运动，而是被植入的。福柯（1966：12）认为这种植入，就是“似乎已被编码”。这种理论没有给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能够改变自我活动的主体留出一个位置。知识和真理在福柯的“考古学”中，不是来自具有批判自信和检验意识的主体，无论如何没有出现在表现他晚期思想转变的《性的历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书的第二卷中（Foucault，1984），他在书中作为一个“系谱学家”，追忆了对性的渴望具有个人的特征，古典时代的公民就是通过性自己的实践而获得主权。

这个世纪的左右两派文化哲学总是会达成一致的一点是不再沿着主体性去做继续深入的思考：个人只是一种派生现象，黑格尔的主体在历史上已被认定为是虚拟的现象，个人从哲学上来说是可绕过的，并在实践中早就已经被绕过了；左右两派的各种哲学在断言现实时，都会得出

几乎相同的结论，但是当这些思想家们进入基本的价值判断时，他们又各自分道扬镳了。一些人会为贬低和超越个人，直至彻底根除个人而感到欢欣鼓舞；而另一些人则在抱怨个人的抵抗过于虚弱，主张为增强个人的力量可以像个人性学那样采取一些必要的帮助措施。

我认为，父权社会的基本形态是性别优选和作为其客体对象的性别歧视；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是商品及作为其客体对象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拜物教；最晚在后福特主义的社会里则出现了知识基本形态，它的客体对象则是物化和去物化，我把这么个物化和去物化的过程称为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过程，即主体与客体相互异化的过程（Hylomatie，请参见17章），这是一个通过成效排除自然与社会之间古老的界限，重新编码生与死，并且通过一方面的“自动创生”和另一方面的自动解构的程序而使自己进入一种持续不断的形态变化中的客体对象。我针对金融资本主义所提出的客体对象，就是人与物的相互异化（Hylomatie）、交换（利润、回报、投机盈利）、父权制的性别歧视以及种族主义。这些客体对象使西方社会既分离又联结。如果没有这些客体对象，我认为社会就不能再想象为一个概念，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性欲性行为的概念了。

鉴于性只有在真实的个人之中才是真实的，以实证为研究方法的性科学就必须把个人作为研究的重点。鉴于没有社会进程就不可能存在一种作为普遍形态的性欲性行为，理论研究和性科学都必须明白自己性理论的社会背景，以便寻找出帮助病患的切实方法。但理论的尝试与实践行动相同，别人常常只能间接地获知或推断出研究者究竟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究竟有着怎样的想象。但也许把握这一点也行，即如果一个思想家思考他那个时代的性欲和性行为形态，那么他的思想多少总是以一种反映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理论为起点，因为这种理论自然也会触及那个社会当时“重大”的性生活问题，并试图回答人性与动物性、男性与女性、与生俱来与后天赢得、道德与非道德、允许与禁止、正常与非正

常、健康与病态、纯化与非纯化、意识与无意识、传统与解放、无害与有害、充满乐趣与令人怠倦、满意与不满意、充满激情与心态平衡、变化多多与单调如一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简而言之，自从我们知道我们有性欲和性行为，我们就有了关于性的理论，并且我们迟早会把这种理论以正确或错误、自愿或被强制、干扰或不受干扰的方式，作为谜、渴望、冒险、风险、预防性措施和角色期待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我还不能说，当今的性科学有哪些社会概念。在理论上似乎主导着一种弥散现象。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理论家所运用的社会概念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用现代的话来说，是有着价值批判的思想以及左派的思想倾向。这未免令人惊讶。但鉴于理论基本反映的效用方式又不是那么出人意料。因为这些思想并不是对意识的一种抽象，而是在更高程度上强有力和有效地生产了意识。经由意识生产的这个过程，外在意识成为内在意识，并且也质疑了以“市场的力量”概括资本主义或那些以男女自然性别差异而淡化性别歧视不公正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日常生活和传统思想中是如此理所当然，因此新的理论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对这些理论的无可置疑性提出质疑。

这是令人奇怪的，比如福柯的话语要素——阐述（Énoncé），究竟是逻辑命题、语法句子、标准化语言行为还是特有的标示，究竟可以将它理解为纯粹的可能性条件、真实的因果关系还是有那么一些如同存在的功能？近几十年来最聪明的头脑都在琢磨这些问题。他们这么费神思考，当然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却又被他们看作极不合时宜。可是那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即我们的世界却越来越资本主义化，资本的流动一方面越来越抽象，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具体，直到忧喜参半地被确认是一个可靠资本投资基地的德国，也出现了一场不可估量的远离生产的国际性利润投机并导致爆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并没有因此出现丝毫的改变：什么是可以利用的，也就会被利用。如此这样，我们就以一种不合时宜或故作惊恐地发

现，一切都成了商品，什么都能在自由交易市场上卖出自己的价格：知识和艺术成为“经济的基本要素”，人在世界中的苦难和我们在电视机前的同情的泪水是娱乐节目的热点，精子、卵子、胎儿和儿童，同性恋大游行和同性恋运动会，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有的如香奈儿、可乐、可口、美极、米尔卡、微软或威望），首席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良心，作为服务项目的已婚者的外遇，富人的安全需求和穷人的体育成就，一个酒醉艺人的纳粹口号，经理们对生命活力的需求——为满足他们的需求，心理分析家们在优美的风景地与他们进行着色情对话，还有能够获得专利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极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在当前还是不可买卖的”，我刚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尽管一个对他感兴趣的足球俱乐部愿意出1200万再加上两个运动员作为购买他的价格，但还是没有买成。

近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遭遇到如那个流亡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遭受的诋毁，没有任何可以与他的独创性相比拟的著作遭遇到如他的著作那样的损毁、糟蹋和故意歪曲。但是有两个状况又把他的理论带回到政治和科学辩论的中心：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和当代资本主义剧烈动荡的开始。在一些方面，马克思曾是一个19世纪的孩子，因而不管是涉及革命浪漫主义的思想，还是有关不加批判的父权思想，都没能跳出他那个时代的阴影；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也恰巧不是（如他的一些反对者所坚持的）一个预言者，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确实相信：人类将会在资本主义的自身中脱颖而出，摆脱自然的必然性，成为自由的人类。但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一些中心命题不仅有着严密的逻辑和精彩的语言，而且直到今天仍是切中了资本主义的要害，因为一切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变革，并没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它是当代不言自明的存在，已经取代了一切禁忌和上帝。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供应、出售、出租或被使用。一些人出售安全和处女，另一些人出租生殖器。全球化的口号和对德国作为有利于资本投资的定位，仅仅只意味着盈利和回报。激起公众性广泛关注的，只是些性谋杀和“老年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一会儿是利润的疯狂上涨，一会儿是

银行的巨额损失，并且纳税人还在为银行的巨额损失买单的问题。但是当马克思说起，资本在自身孵化出金蛋的时候，他还无法想象：今天的潜在赢利不再只是通过价格波动和货币兑换得以实现，而且也通过对一些不需要自己劳动就能赢利的事物的投机，甚至是通过对一些并不存在的事物的投机而获得了赢利。如果说现代社会已经失败，那就是说历史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资本主义幸存了下来并且还在繁荣发展，把人的生活越来越吸引到它的运作之中。个人越来越被看做是死的个人。在波哥大（Bogotá）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孩子已经被称为是可以扔掉的物品，被称为是一次性物品（Los Desechables），并且遭受到这样的对待：被作为垃圾，是必须扔掉的垃圾。与此同时，广告吸尽了个人的最后一点创造性；诙谐的文字和诗一般的语言蜕变为广告的顺口溜，与读者有限的高意境严肃小说相反，广告成为大众化的消费品。个人的通常生活往往只是市场的生活；市场在寻求将一切私有化，即使是监狱；一切都被用来作为广告的媒介，即使是人的皮肤和阴沟的盖子。原本行业竞争的各方都聚集起来成立了经济现代化的行业联合会。与此同时，任何一种政治批判，都被看做是企图废弃经济。现在只能指望资本主义自己超越自己。

自从在道德和政治上堕落，但又疯狂地把自己称为现实存在的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崩溃之后，我们通常自称或标榜持中立政治立场的科学界，却表现出一种显然必要且又赢得敬意的潇洒立场，将挖苦、讽刺、蔑视一股脑儿泼向马克思；这些人以前从没读过或引证过马克思，而现在似乎又被经验证实：“我们的”并不需要以现实存在标榜自己的资本主义，赢得了理性的胜利。

这种肯定资本主义的观点曾经也这么说过：谁想理解现代人，并因此而去阅读像《资本论》那样的著作，那就不用再去读培根的《新工具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黑格尔的《逻辑学》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的著作与这些（以及其他

一些）著作的共同点是一方面推翻了在它们之前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以一些巧妙的方法重新组合了这些被自己推翻的思想，当然这种重新组合是受制于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进程中已经出现的社会状况和思想的。马克思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把李嘉图对资本积累的理解与魁奈的《经济图表》综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一种经济理论的（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资本论》第2卷）。正是马克思的这一经济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自我扩展的系统。即使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直到今天如果不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知识（马克思称他的理论是对他之前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仍很难理解，有关经济问题的一些实情，如利息和利滚利，投机、债务和对所谓的第三、第四世界的剥削。再加上，不，不仅是再加上，而且是更重要的，当马克思将他的思想不再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而是以理性科学和政治经济的革命为出发点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否定了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他的著作是与德国唯心主义的一种真正的决裂。他借助一种理性的方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恰是这种理性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和广岛原子弹的爆炸以来极令我们质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并不能因此遭受指责，如同不能指责培根的“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或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这就是无人能够摆脱的资本主义精神，他不得不与它一起生活。如果您问我，他的理论究竟说了什么？我无法逃脱他的魅力，我的回答只能是：马克思理论的魅力就在于他以他有着拜物（唯物）特征（参见Sigusch，1984b）的社会范畴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精神，他之后也只有阿多诺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第三点，这对任何天才的著作都有效：不管这些思想家的一些说法在今天是否还有效用，但他们的著作都是我们今天宝贵的思想财富，因为这些著作能够使我们在阅读它们时，以著作者特有的广阔视野和思想勇气帮助我们进入与我们自身不同的另一种自我意识的状态。谁想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在经过了大众媒体以及投放到市场的无数可以随意轻松阅读的简单小丛书的一切胡闹和折腾之后，还愿意读一些严肃

的书籍，那么只要读不多几页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或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r Dialektik*），就能进入这种状态。这些著作，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是无法取代和替代的。请您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即使您那位唯命是从的大学老师正在用众多的学期讲座和论文砸向您。最后说句良心话，你们中究竟有谁已经读过一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了？

有些人愚蠢并傲慢地标榜自己是新思想家，试图切断思想的连续性。他们认为应当撤销马克思以及19世纪的黑格尔右派或尼采对黑格尔关于理性与现代的和解曾给出的一个直到今天仍有效用的回答。但是被称为实践哲学的思想大厦，是建立在卡尔·马克思著作的西方思想上的，并且没有美国的实用主义和法国的存在主义，实践哲学就会变得无法理解。哈贝马斯（1985）曾与之争辩的新保守主义，不仅连接了马克斯·韦伯、自由主义和盖伦（Gehlen）的人类学，而且也连接了比如J.里特尔（J.Ritter）和E.福斯特霍夫（E.Forsthoff）的补偿理论（Kompensationstheorien），而他们两人的理论则是黑格尔右派的。后现代、后历史、后启蒙主义以及告别现代的哲学，没有尼采和（作为其后继者的）海德格尔是不可想象的，那就会不仅没有巴塔耶，没有福柯，也更没有德里达。同样，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主张的批判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没有尼采和叔本华，以及他们又爱又恨的康德和黑格尔，海德格尔或盖伦，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的媒体英雄们却说：这些理论是建立在一堆历史的垃圾上。他们至少使法国知识分子陷入愤怒，因为媒体在“深渊”（Abime）这个词的拼写上，去掉了法语特有的那个抑扬顿挫声调的标记（类似我们拼音中第几声的标记——译者注）。虽然“深渊”这个词听上去不太漂亮，但也许更现实些，因为它以迂回的方式再现了那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与他们学科间的鸿沟。

自从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以后，似乎自由与自私自利最终达成了一种

历史上的一致。资本主义经济从自身出发创造它自己的价值，被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成为日常生活及国家的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特主义”通过对资本、国家和工会的一种复杂整合，造就了长达近30年的“社会和平”、富裕和充分就业。但是自所谓的福特主义陷入危机以来，不可忽视的是即使在“经济富裕的德国”，成百万的人作为已经沦落为仅仅为了生存而自愿被剥削的劳动力，也被拒绝在劳动市场之外。与此同时也不可忽视的是，可统称为后福特主义的新积累制度和新监管方式所造成的后果：渐进式的经济功能化和社会分裂，特别是在灵活经济和国家无助的外衣下的社会个人的日益原子（单子）化。

对市场作经济政治“调控的理论”（比较比如：Lipietz，1985；Hirsch，1990）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竞争、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学的新技术、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或浪漫主义的社会革命，都更有实践上的具体性和理论上的综合性；它在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中将资本再生产从机制和规范中分离出来，认为作为社会化的不同形式它们是相互矛盾的，这就导致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简单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法失去效用。所有的机构，不管是家庭还是国家，都同时拥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者。调控理论的关键范畴是资本积累制度和监管模式。资本积累制度是社会产品系统化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模式，它在生产条件的变化（比如资本的投入量、行业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平衡）与最终消费条件的变化（比如工人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消费标准、社会的集体支出等）之间设置了一种较长周期的特定的对应关系（Lipietz，1985：120）。监管模式是“全部机制性规范、网络、明确和潜在规则的总和，这些规章制度在资本积累的框架内保障了各种行为方式的兼容性，并且既符合各类社会关系的状况，又超越了它们之间特有的冲突”（同上：121）。按这一理论，在晚期表现出一种新的“面貌”的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起源于积累制度与监管模式之间的矛盾，调和这种总是只能暂时得以平息的矛盾，是在不平衡中的一种有害的平衡。如果积累的过程达到了这一点，即资本积累以它的经济、社会和技

术的发展与相对不太变动的机制和规范在一个原本就不太稳定的平衡中不再相互兼容，那么社会与政治的争端就决定了危机和动荡的结局。很显然，这些危机和动荡也会影响和改变社会成员的基本心态、价值观、期望值和行为方式。

在我们这里，二战后因受美国式资本主义霸权的影响，也建立了被称为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互动调控。这为整个阿登纳时代的德国造就了一种结构性的稳定，直到1970年代才陷入战后的第一次危机。社会的发展在总体上趋向规范化和整体化、一体化和大众化。工资劳动关系、资本集中、生产增长率和大众消费的递增，是积累制度的特征；与此同时，那些穷的国家遭受到如同新殖民地的待遇，也就是主要为发达国家提供一些廉价的原材料。监管模式的特征是民族国家化和集中化，一个由资本、工会和国家共同构成的官僚主义工业化的综合体，试图规范和整合所有的一切，从老的纳粹到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经过整合的综合体吸收和接纳了旧的工人阶级，使这个阶级现在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这个综合体也使国家支撑的社会民主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福特主义在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福利国家向每个公民承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和生活保障，并在极大的程度上兑现了这些承诺。在完全国家化和彻底资本化的社会中，各主要党派齐头并进成为人民大众的主流党派，工会组织覆盖全国，资本被驯服，国家许诺全民就业和日益改善的生活。人们说，这就是在工人大众和大众消费社会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和解。平等、安全、劳动纪律、生活水准和社会和谐似乎成为永久的社会价值标准，直到在1970年代积累制度和监管模式才出现了如此激烈的碰撞，以致资本主义陷入一种新的动荡阶段，我们想把这种新的动荡变革称为“后福特主义”。

福特主义陷于危机是由于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大都市资本梦想的破碎、资本的国际化、国家市场竞争的激化、不容再忽视的毁坏自

然的后果，以及由于对技术风险、机器化、官僚主义、标准化、消费主义和大众低俗化的不满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新的社会运动表达了这些不满。由资本、国家和工会共同构成的福特主义整合综合体分崩离析，资本又露出了它的獠牙，自由民主党人士如鱼得水地又回到了自己的根源，基督教民主党呼吁一种“精神道德的转变”，社会民主党已经从公众的眼里消失，绿党发展了现实意识，福利国家被撤销，工会也变得无足轻重。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后福特主义完全是在与福特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是在计划用不平等、灵活性、解除监管和社会斗争来取代平等、安全、标准化和社会和谐。谁以自我为中心、办事毫无顾忌、灵活、接受工作调动和居所搬迁，谁就当然不可能与人和谐团结，也不会去参加如工会这样僵化的传统组织。

新的积累制度的特征是增长率与就业率的解构，特别是通过技术工艺的合理性减少就业。其结果是一种经久不去的大规模失业现象。资本的集中化和国际化将生产和流通推向分散化（即全球化），民族国家不再是关注的重点。新的科学技术，比如信息和通信交流技术，使得这种流动成为可能，有些则是出于当地的政治原因而只得在异地实施的比如生物和转基因技术。监管模式也不能再是集中化的了，因为集中会阻碍与资本有必然关系的市场力量的自由释放。除此之外，就业和收入状况、期望值和生活方式在各地与各国也极不相同，很难对此加以全面覆盖的统一管理。资本也因此能够招收相对更固定更低价的高技能劳动力，而对其他劳动力则可以按企业的需求不再遵守整合综合体原有的对劳工较为宽厚的用工标准。因此不必是先知就能预言：未来的就业关系还会更具有灵活性、更国际化和更无保障；未来的就业关系也可能又出现一种“封建的依附关系”，这就意味着，可以让医生在他的医院里（这听上去似乎非常诱惑人）无偿上课和就诊，而医生其实也是靠自己的劳动才得以生活的人。各地区和各大城市都必须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就像是阳光地带与冰冻地带的相互竞争（sun belt versus frost belt）。调节的方式日益局部化同时也日益复杂化。原有的统一化基本标准越来越

转换为非监管型的多元化标准。传统的阶级社会和传统的大众工人党也在经由新旧转化、分裂、边缘化和淘汰等的过程后，成了一种历史遗留的模式。政治党派将完全失去它们原有的整合力量，不得不转而与多层次广泛多样的交流，不再需要每场选举都找出一个不同的口号——这就意味着，将说些比以前更无耻的真实谎言。

如果一种传统的积累制度出现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一种传统的监管模式如此完全被篡改，那也就必然会强制性地改变人的生活。这些变化，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走出和摆脱官僚主义的管理、规则、标准和规范等令人窒息的关系，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安全方面的损失。这就如同迄今为止的一切资本主义变革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既有赢者也有输者。可以肯定地说，性和性别的非主流或特殊人群，可能成为这场变革的得益人群。在普遍要求流动性、灵活性和松散劳动关系的潮流中，如果什么都在运动，也就不那么惹人注意甚至很受欢迎，因为这可以推销自己。性领域的第三产业化和性意愿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一种在几十年前甚至不敢想象的规模（我们以后还会谈及这个话题）。这里主要想合理地说明，后福特主义以及它名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远远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范围，解放了劳动力和人的愿望，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也为其罩上了一种商品形式。

鉴于含有暗示意义话语分析的转换最适于标示为“新自由派”，我把这种方法用来表述一种新性（neosexuell）革命（38章）。这场新性革命，如同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过渡，但更像一种被动而不是主动，突发的性革命的重构模式。资本主义的近期动荡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后果，眼前还实在无法估量。可以认定的是这场动荡的特征：没有自己资金担保的全球性利润炒作（充满投机泡沫的资本主义），通过电脑和互联网得以实现的资本极端集中和加速增长（涡轮式的资本主义），以及一方面是有着真实员工的所谓实体经济的一种令人可怕的毁灭性的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以天文数字般资本运作的金融交易。

任何一个社会理论家都没有像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那样全面、广泛和令人印象深刻地阐释了属于浪漫及经典时代语义的主体和理性、批评和独立。按照他的功能系统差异理论，传统的多功能社会机制和道德已经走向死亡。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只有唯一特定功能，并能够运用它们自身的动力而继续运行的社会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科学、宗教和教育。卢曼（1984）把自我的继续运行称为“自创生”（Autopoiesis）——这里借用了洪贝尔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la）学术圈的一个术语，来源于马图拉纳的认知生物学。社会的这些不同领域构成了社会各个不同的系统，因为只有当这些不同的系统与外界有着一个确定的界限，并以信息沟通来表现自己的时候，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才会成为人们的话题。一切无法沟通的事物都属于各系统的外在环境。这个外在环境“也就是”，卢曼说道（1996：173），“人，人的意识和躯体，以及依此类推的其他实体”。人因此只是没有居所地悬挂在分隔各子系统界限的绳索之间——以他的意识和躯体。鉴于在社会学理论中并不存在作为性的子系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为他再加上一句：人也以他的性欲和性行为，悬挂在各系统的界限之间。自新的局部性和无情感的状态取代了传统的无所不在的责任状态，自从传统意义上统一性的创建者，从古典世界的宇宙到市民社会的主体，都在“事实”上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之后，唯一还有功能和沟通效用的只能说是各子系统无主体的自创生，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便也因此只是一种扰乱的沉重负担。卢曼对不符合他模式的一些现象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认为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恐惧和社会变革。在和平运动和绿色生态运动中表现出的人的恐惧，卢曼认为是令人极端可怕的，因为这类恐惧无法通过任何一种功能系统加以控制和平息（Luhmann，1986：238）。他认为所有社会运动都是极其可疑的，因为社会运动无视、质疑和越过社会各子系统特定功能的差异性。卢曼断然否定环保运动所称的“生态系统”具有一种系统的地位（1984：55）。社会文化的进化最终显然“不是必然依赖于社会对它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否则它也不可能

把我们带向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景观开始于对先前生长的一切的毁灭”（1986：42）。鉴于社会虽然“是一个对环境敏感的系统，但在运作上却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同上：63；请比较Reese-Schäfer，1996：124 f），因此按照系统的逻辑，生态的危险只能危害生态系统自身。

在这类抽象思维中，人便期望自己成为一个积极的人类学者，并感谢上帝给了人类恐惧。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发起和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尽管很可能是客观性和话语而不是参与的人的自身主导了这场运动。

我们由此可以推理说：被自由释放并居无定所的普通个人，必须将他们的能力（也包括他们的性别和性能力）作为财富保持流动性，将他们的利己主义（也包括他们的性别和性能力）灵活化，将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也包括他们的性别和性能力）多样化（卢曼也许会说：差异化）。卢曼认为，子系统的功能差异性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势能增长，但同时也使复杂性巨幅增长，给各子系统间的共振能力造成巨大损失，甚至会导致一个社会的解体。霍耐特（Honneth）也在1994年以“解体”（Desintegration）为题，阐述了他确信的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时代诊断”。如果卢曼设定一个性子系统，那么他必然会为之假设与他的功能差异完全相类似的效用。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自己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新性革命”或“自我实现的性”（Selfsex）现象的观察和假设，与从卢曼理论推导出的变化基本一致。它们只是被归纳为不同的理论而已。虽然斯文·莱万多夫斯基（Sven Lewandowski）作为年轻的卢曼学说的捍卫者曾对这一说法提出过异议（2004，2007），但也许他应当再思考一下卢曼（1997b：10）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系统理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有限的运作。它并不以唯一正确作为自己的诉求来表现自己，尽管它被设定为具有普遍性。它应当对社会发生的一切负责，但它并不必然是唯一正确的构思。这也与它建立在悖论中的基础有关。”（91章）

对我来说，各个系统之间相互联结的可能性要大于人们对严肃的认知理论与政治分歧的猜测，并且更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卢曼高度抽象的观察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新的价值分析得以交融。因为通常那些功能化、区别、差异性和自创生等正是在卢曼理论中有着关键性地位的概念，也已经包含在资本逻辑的意义里了，这两种理论各自推断出的结果也极其相同，比如势能提升、共振损失和社会解体。也就是说，卢曼得出了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家相类似的结论。因此我认为就某种意义来说，卢曼是一个资本主义晚期的卡尔·马克思。有些时候他甚至直接跳出他严密的语义学，并且写道：“系统由沟通构成，作为最后不再继续可以分解的沟通的自创生基本过程，就是支付。”（Luhmann，1984：625）或者当被问及他对所谓的后现代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他说，他缺少“一种在社会意义上的与现代人的交往。但我们还是与以往那样共同拥有金钱、积极的权利和科学研究”（Luhmann，1996：174）。就是这样，金钱作为媒介，可以诉求共通性，但不是真理。知识和科学都极其拜物。正是在反对拜物的这一点上，迄今为止的所有批判都被反弹了回来，没有起到批判应有的效用（15章）。它是当代所有世界宗教施行垄断和殖民最有效的媒介。

如果理性在卢曼那里并不享有一个特权的地位，也不是一个主导整个理论的主要范畴，那么我们就要问：在他的理论中，究竟哪个机制才拥有干预的功能？一旦被困在了自己的这种完全封闭的子系统功能中，卢曼就不再能够看到，社会运动——也包括被他排除在功能系统之外的，并被他在政治上低估的性别与性的解放运动——在社会系统中担当的那些功能：递减功能失调的编码，分化不完全的编码，转换各子系统间的编码，比如从政治转码为法律。卢曼也不能看到，社会运动保护了资本和社会，尤其是保护了军备和核工业免遭庞大的错误投资的损失。我们在这里说的社会运动，自然也包括了我们迫使卢曼加入在他系统内的性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是使法律自由化，解除媒体的纠结点并防止媒体的平庸化，以及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多样化和新生活联盟的这些领域

里，帮助被悬挂在各子系统功能界限之间的社会个体至少短暂性地解除恐惧，并赋予他们一种功能，这可能是他们在通常毫无慰藉的生活中唯一能够运作的一种功能。因此令人奇怪的是，卢曼竟然没有思考过，在普遍解除偏见和法规限制之后的性别、性和爱情生活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缓和社会及政治紧张关系的能量。

按我的设想，社会各子系统之间不应当是一种相互封闭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相互完全等同的“1对1”的关系，而是各子系统相互处在一种不同等级和层次之中的关系，比如系统1、系统2和系统3，并以一种差异性的“相互渗透效应”（Interpenetrationswirkung，Luhmann）作为相互间关系的规则。经济、科学和性别等子系统站在这种层次性相互关系的中心（为系统1），并发挥一种影响巨大的渗透效应，政治、教育和法律等子系统则表现出系统2的规则。宗教、艺术和性形态等子系统按规则便属于系统3，因为它们对其他系统影响甚微，或甚至不值一提。与此相应的是每天人们都在不惜余力地报道政治和媒体系统的消息，而知识、医学、治疗、性和艺术系统则总是被归为从属于经济以及知识系统。比如目前社会上就有这样的构想，认为大学不应再是一个为思想碰撞要素提供特权的机构，并把思想归为一种最后的幻想。其他系统也必须满足认知和经济的客观要求，至少表现出了遭受这种客观强制的迹象。即使如宗教这样的系统，也不得不经济化，教会最近甚至雇用了广告策划专家以帮助其提高经济效益。

在《爱情作为激情》（*Liebe als Passion*）的论文中，卢曼（1982）阐述了爱情的语义在18世纪是如何转换的，爱情这个范畴在当时是如何被加以关键性改码（语义转换）的。但有争议的却是谁在其中构建了些什么，以及如何评价这些语义转换或转码的意义。我考虑，如果资本的逻辑不只是人类这个种属的绝对手段，不只是人的目的，而且也成为绝对的自身，也就不可能不对性和性别理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性的神秘化和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爱情，是怎样借助有着拜物特征的中

介范畴加以推导的，我在多年前就尝试显示其中的详细细节（比较Sigusch，1984b，1986）——这是一块已经干硬的面包，我不想在这里再咀嚼一遍。但我想在这里再次提倡，最终也要在理论上——对我来说这里的理论意味着性和性别理论——认识到：我们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毕竟可以认真地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模式，以及我们的爱情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源自于它的宽容、娱乐方式和它所营造的轻松生活。尽管资本主义经历了一切动荡，尽管似乎开始了一个人类的新时代，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结构，资本主义在当前仍是极其强大的，因此在理论上仍需要继续对资本主义做价值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卡尔·马克思，这条已经‘死去的狗’，仍在咬人，”芭芭拉·西歇特曼（Barbara Sichtmann）写道，“并且还总是如以前那样一直咬到了骨头。”（1990：35）

一方面是商品形态和思想形态，另一方面是我在前文提到过的“性的形态”，再加上现在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和新性革命、所有权和亲密关系的多样化、精益生产和精益的性（38、65、92各章）——敏感的人早已预感到这一切将会有的结果。我坦白交代：如果不借助一种以“Hylomatie”（人与物的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客观性，把交换和性别歧视作为中心内涵的社会的范畴，就无从理解被我称为新性革命的性欲和性行为形态的结构转换。解体、弥散和多样化表现了有着资本主义特征的解构和重组、自动毁灭和自创生等的过程。这一过程自身则是资本主义经济迸发、必要和允许的普遍与庞大的变革动力的结果。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任何社会模式，都不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自我改变能力和灵活性，资本主义正是因此而赢得了稳定。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还是，都因情况不同而表现出了一张不同的“面孔”，构成了差异很大的资本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这种转换能力和转换的必要性，一方面出于它的一种经常性的自我运动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它的一种本质上的冷漠，即资本关系对文化道德价值和传统的一种结构上的冷漠，最后也由于社会和政治压力

所强制的监管方式的转型。这一切对于个人——我喜欢在这里借用萨特的具有普遍性的个人（universel singulier）来表述普通的个人（einzelnes Allgemeines）——来说，既是一种负重又是一种解脱，这是因为构成社会和普通个人意识的客体性迫使每一个个体都进入到一种非中心的位置。也因为只要不是高高悬挂的过去时代的话语帷幔在作祟，只要不是如我们语境中强调性别等级差别的性别歧视的客观反映（这种客观性并不能仅仅诉诸价值分析就能理解）在挡道，普通个人的感受和思想对于社会的进程来说已愈来愈无关紧要，个人的性取向、性行为的方式和性的生活世界也就愈来愈多样化。

但即使在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种唯物主义经济批判的思想：鉴于年幼的孩子也能感受到性别的差异性，因而懂得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并不是承载性别的躯体，而是那些社会化了的人在说，这个或那个其他人是低等的卑贱的。女人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弗洛伊德把这种自卑感误解为父权制生理躯体意义上的命运，其实它历来都是一种社会的“命运”；与此相同的是，男人也必须表现出他作为男性特有的身体强壮和心理坚强。只有当女人在社会中成为一种平等的性别的时候（在我们的社会近来通过更多的经济独立，而不是通过业余形式的人民大学，妇女自助或离婚解构的方法），性别平等才能出现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年幼的孩子才能感受到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平等的人。只有当做父母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在他们有着差异性的性别中却都能给出他们事实上等价的信号的时候，也许才能够打破性别歧视的这种集体性代代相传的将女人贬低为第二性别的恶性循环。杰西卡·本雅明（Jessica Benjamin，1988）期望男人和女人能够相互为对方着想，建立一种可以交换的等值关系，但是如果她强调的男女“主体互动”的物质和过程都来自一种等级关系而不是在差异中的平等，如果心理上的性别差异是由物质决定的，那么她的愿望又如何可能实现？

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诉诸价值批判和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我来说

并不意味着我想把我们的世界解释为只有一种单一的起源和只是来自一种“客观”的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自创生、性别差异还是交换原则（1章）。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一眼望去，就能看出它的极其复杂性，它担当了太多调节危机的角色，在从事迂回曲折充满自相矛盾（91章）的运动，但又总是还在改变社会的状态和政治，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只是单一维度的。除此之外我们已经知道，以往被看成是错误的个人行为，在今天看来却可能是正确的，比如改变性别，因此对别人的行为做出过快或草率的明确结论往往就会有非人道的倾向。在这期间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理论家的不同看法，且从他们那里学会并懂得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伟大无比的理论，那就不仅只会招致些尴尬。如果没有波伏娃，如果没有巴尔特（Barthes）、鲍德里亚（Baudrillard）、鲍曼（Bauman）、巴特勒（Butler）以及其他一些在波伏娃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家，我们现在会站立在哪里呢？我只是想问：如果没有价值批判，我们会站立在哪里呢？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只是凭借图片、文字、差异特征和话语分析来理解性别和性形态的普遍转型。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改革动力主要是一种本质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在改革的进程中，除了城市化和媒体化、性的话语化和文字化，同时也应分析性的商业化、神秘化和客体化的机制。无论如何，我称之为性的客体化的这一件事，没有客体的交换和客观化，没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内涵是无法想象的，这就如同福柯关于性的理论却没有他的权力理论。

13 普通个人和社会，内在和外在

我们生活在不止一种的社会现实中，普通个人在社会中并不起着一种构建性的角色效应，也不能决定社会基本形态和客观现实。但是个人的恐惧、痴情、暴力行动和拷打，却是现实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都不得不运用夸大这些现实的方法，以便再通过浓缩处理从中找出一些定理和法则——直到出现了福柯、鲍德里亚或巴尔特的

荒诞：以现实湮灭了现实。性研究者和性治疗师的工作，虽说不一定是与一个自我强大的主体但毕竟还是一个特殊的人有关，也就不能允许自己像其他一些理论家那样夸张。因为如我已经说过的，性只有当它是真实的个人的性的时候，才是现实的。因此这也是我在这里的观点：那些理论家们忽略了通常的生活，只看到个人的命运或将人贬低为客体的个人暴力。他们不对物化（或全盘资本化）的进程加以反思，看不到其中的普遍关联，而众多的不合理现实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才得以现实化的。越是为了满足个人愤慨和追究的需求而谴责某个人可恶的物化行为，就越是掩盖了我们可恶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每年的商品包装费用就等同于整个印度一整年的食物基本供应的花费，美国女性仅每年的化妆品支出就是500个亿。

目前为止的理论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往往只是将美妙自然的但又是惰性的主体，外在地叠加进社会，或是让个人完全消失在系统的奥迦斯（Orkus，罗马神话中的死神——译者注）之中。与此同时，20世纪的批判哲学主要研究了“社会是怎样进入到个人的意识之中以及社会应当怎样评价个人”等问题。因为个人与社会这两者，谁都甭想离开谁。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中心人物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得出了一种辩证的结论：个人的社会总和，就是社会的个人总和。这一理论在德国纳粹的后代中找到了众多的崇拜者，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以一些合理性分析大众对罪恶的纳粹政权的赞同。这就使得这一理论比当时所有其他的理论都更出色。

对我来说，社会基本形态先于作为有着客体交换和客体化特征的商品和知识，以及同样先于父权制的性别歧视，在今天似乎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这就像一种食虫植物以它的茸毛、攀藤和陷坑，以它的捕笼和隐窝，以它的蜜罐和美丽，以它的吸吮、黏液和花朵开闭的机关，逮住了一只被自己诱惑的小虫子，现正在静静地享用和消化这只虫子，直到这只虫子只剩下一些自由基，如氮气；很难说这种行为是“个体”的还

是“普遍社会性”的，是人性的还是非人性的。这种具有普遍反应能力的食虫植物，如我们已经确认，并没有如人类意识那样的抽象理念，而只有一种在卓越意义上的对利益的强烈追求，因而制造了它的这种自我意识。外在是经由这样的方法成为内在的，因此那些想从这种存在主义的角度理解人作为个体的心理学家必须先成为社会学家。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从内往外思考，为在卢曼冷清无人的思想中非常骚扰卢曼的恐惧的存在仗义执言，而不需要再去说服自己和别人：诸如心理能够中断或甚至终结社会的自行运转，心理学家以他们的范畴已经能够解释这种自行运转，等等。

举例来说，心理社会学家也许能够说清楚，阿多诺以乌托邦角度研究的“人与物的相互认可”，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肯定的进展。他们也能够说清，听和看、体验和思考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被时间化（维瑞利奥，Virlilio）、远程距离（弗卢塞尔，Flusser）、数码化、虚拟化和人与物的相互异化（Hylomatisierung）所改变。电脑这台理想机器——在儿童房间的盛行，对儿童精神和情感的发展不会只是停留在外部。就像20世纪初期的那几代人不得不自动去看、去听、去思考和去感受，今生代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对计算科学做出反应。即使是心理社会学家必然会感兴趣的外在环境，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内心的物质意义：悲惨的住房条件，没有体育运动场所，因为看电视而丢失的构思幻想的能力，还有失业和知识爆炸，这一切都留在了心灵里面而不再是外在的了。并且根据个人受社会客体的影响和对其确信度的不同，内在的又会在不同程度成为外在的，因为怎样的愿望和情感，怎样的意志、情绪和心理状态就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或怎样的金钱、认可、成就和兴奋。

从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家如今治疗心理障碍的情况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外在（环境）是怎样决定着内在（人的内心）的。这一学科所面临的这类问题中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和青少年，并没有真正医学意义上的病态或心理问题。占第一位的主要是社会心理障碍和没有完成的社会

化；第二位的是多动综合征，所谓多动症的关键并不是不能静下来，而是注意力不集中；排在第三位的主要表现在学校里的适应困难以及进食障碍，至于心因性暴食症则是历史的新现象，有着显著的时代征象，通过商品在它被消费的那一刻又预防性地被吐了出来（浪费了），导致这些商品虽然被消费却又提供一种需求的满足。在这类情况中，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那些自我伤害、兴趣缺乏和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现在已成为全社会成员——不管他有着异质还是同性的性倾向，不管他是大学教授还是工会骨干分子——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可以就此推断，如果将封闭在自身之中并且对应当应用它的社会没有一些较为成熟构想的一种人格理论，拼凑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性理论，这就很成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来自社会结构和它的功能方式的心灵（也包括性），就如同去掉了骨头的肉，没有了得以支撑的核心要素。如果性科学不想把性侵儿童和性犯罪仅仅停留在临床症状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中，那就必须把研究扩展到学科之外，从外部的角度理解这些问题，并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心理分析相反，性科学自它在19世纪诞生起，自从保罗·曼特加扎（Paolo Mantegazza）、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等人以来，就都从外部观察性现象，并对性的暴力要素做了研究（比较Sigusch，2008a）。心理分析的主要成就在于临床证实了市民社会的理性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建立在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流沙上。客体对象的客观既定性——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在性科学中似乎正在消失——绝不意味着关于无意识以及本能冲动的构思已经实际完成。因此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个人在一个似乎日益理性化的社会里保留并继续持有他的非理性。至于社会理性只是拜物教的外在表象，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借助心理学理论解开其秘密的问题。

在一个世代之前，弗洛伊德（1930：451）就曾写道：“可以这么说，人已经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假上帝。确实很伟大，如果就他所设置的

所有辅助机构来说，但问题是他设置的这些机构并没有与他一起成长，甚至偶尔还会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未来的时代还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可能是极不可想象的巨大进步……而这些进步则会更提升人与上帝的相似性。出于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也不想忘记，其实今天的人，在他与上帝的相似性中感觉并不幸福。”如今，那些不可想象的“进步”已经出现，今天的人与他所恋的崇拜物一起成长，在他与“物相似”的境况中常常不再能够感受到物给他带来的许多问题。由于有了充分的物质仍感到不幸福，由于他既过时又过剩的情感仍在继续，这就使得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陷入了困境。这些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的专家们，如果不愿继续固守在与上帝相似的过去时代，便只能告别传统的自我强大的主体，重新思考主体，把主体作为个人，作为有着高度独立的个人的主体。

14 必要性和批判的批判

在今天，要想讨论批判和批判的科学，需要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又是不那么容易说清的。几年前，将好的和坏的都扔在一个锅里的那种实践，似乎还不太成问题。但在今天，要想把它们再都放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做些陈词滥调式的批判，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在今天，谁还想去决定，什么是错误的？把卢曼说成是一个既存社会的辩护士，一个无情的社会技术专家，这是容易办到的事；但是要想反驳他的理论，比如反驳他关于有自我评判能力的社会子系统或关于被噪音闹得烦躁不安的心灵的论断，就未免有些困难。把马克思贬低为一个幻想型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坚信资本主义将在自身中孕育和生产一个人道的社会，这是容易的；但是如果去思考交换关系将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消失，那就不仅仅只是盲目的了。如果把阿多诺（1969：153）揭露为一个超验主义的梦想者，因为他认为“人与物有着一种相互的认同”，这也是容易的；但是却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也许还有一种不同于阿多诺的认同的“认同”。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对某些事物，如自信的主体、自我必要的社会革命、一切规范的自然解放、外在自然的不可侵犯性、

罕见的病态性渴望、令人敬畏的与生俱来或因自己的不良习惯而招致的疾病等，仅仅做一些居高临下的、以旧的确定性为标准的空洞批判。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是最后的、最社会化的，即被认定为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因而也能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做的那样，把它作为历史的终结？如果那样的话，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比如：1991/1995，1995/1997，2003，2011）令人着迷的所有关于不可调解的矛盾、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的矛盾心理的理论，似乎只能像任何一种乌托邦思想一样，即刻溜走，绝对消失。但是如果没有乌托邦，则无疑会为卑劣敞开大门。如果没有社会乌托邦，我们的社会成员便会被毫无希望地出卖给毫无精神内涵和毫无意义的娱乐节目。永远该诅咒的资本主义繁荣的卑鄙！他们都屈从了被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为“空论家”的操纵，这种空论家自以为拥有了唯一能够思考当代现实的思想。其他可能的人类共同生活和人类社会形态，将不再予以讨论；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定，也不再作为批判社会的行动而加以认真考虑，更多的是以一些小恩小惠加以搪塞，或干脆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但是如果没有了“事实上”的个人，也就没有了身体力行摩拳擦掌关注民主现状或社会不公平程度的那些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虽然历史并不会因此终结，但可以肯定地说，墓园般死的静寂就会笼罩着我们，或是更确切地说，只有迪斯科的噪音才会给某些人带来乐呵呵的心态。

卢曼在批判和肯定中看到了一种相互接近的关系，并且可怕的是，他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称为自我评判的充分差异化功能系统的社会化社会中，关键是将那些在系统中尚存在的矛盾、差距和裂痕作为激发思考的源泉，以便（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对功能系统做一种内在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针对系统在人道上的欠缺，否则就将是对系统的一种徒劳抹黑，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批判：比如性犯罪者，他们之所以犯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未得到过人的关怀，因而把那些成

为他们犯罪的牺牲品的其他人，只是作为单纯的客体对待而已；因此系统（社会）的功能是要把这些犯罪者从他们的麻木中惊醒，将他们拖出来。自黑格尔以来，经典哲学的批判范畴是与一种自身矛盾联结在一起的，比如联结着一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即一种应当被辩证扬弃的不一致。但是如果内容和形式聚集在一起，那就使得表象与现实不再那么容易分离，错误的意识就成为通常生活中的正确意识；如果在人与物之间有一种相互认可，那么物就有了生命，而人则成为死的人了，这就有个问题，即如何批判那些居然这么有影响的思想构思？

也许应当把矛盾对立和自相矛盾作为非常规思想和行为的可能性条件，如我对爱的拜神般特征（Sigusch，1984b，1986）和在这里对社会运动的描述。至少可以把抗议者的恐惧和愤懑看做是警告信号，意味着一个系统或一种系统技术已经造成了一些理应可以避免的危害。但是批判——如我所理解的那样——必须是不偏颇的，完全公正的，没有党派性或党派政治，也就是说以责任而不是作为所谓的“党派工具”（比较Sigusch，2005a：175ff），甚至放弃一切拜神或拜物主义，以爱世界和爱人类（Amor mundi），即一种对世界、对自然、对其他不同文化和对陌生外来人的爱，去对社会的功能缺陷进行批判。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那样以纯粹自由为论据的对系统功能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这会带出一切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原本非社会性的资本主义释放出利润追求就会最终变成具有社会性；因为自由也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系统的结构和普通个人的行动也都在同样的社会事实中生存或形成。

具有党派性的科学在卢曼看来几乎就是一种暴行，我则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必要性（Sigusch，2011a；Amendt、Schmidt和Sigusch，2011；关于历史的必要性，请比较：Herzog，2011a）。卢曼追求一种超越于物和运动的中性观察位置，这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在社会以外的观察位置，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观察者不在观察中建构他所观察的事

物，这在人类思想史上甚至至迟自康德（2章）以来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并且观察者通过观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物，自乔治·德弗罗（Georg Devereux，1967）以来至少已经是可信的了。我认为这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已是一种老生常谈。卢曼认为批判已经过时，而我却认为批判还相当无力，因为它被它所批判的那一方以辩解或肯定所吞没；但我又看不到其他一些至少可以用来对质和对抗那些构成社会风险、罔顾社会、阻止社会进步或甚至毁坏社会的思想和行为的方法。即使那些在逆流中游泳的人，也是在潮流中游泳；即使潮流是如此强大，甚至席卷了岸边和洞穴的一切，如同我们在性、性别和性治疗运动中所能观察到的那样，但它却还是不能改变一切存在，既不能让自己的河床完全改道，也不能浇灌或淹没与它完全不相干的土地。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也可能会消失。我们目前没有理由去无视世界末日语言的构想或梦想，但所谓的世界末日毕竟不是一种自然常态。自福特主义在欧美通过建立法制和福利国家，通过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全民富裕而使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得享几十年安宁的方法，拔掉了“批判”的臼齿，“批判”便有了过时的臭味。即使再也不能视而不见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则成为理所当然的绝对规则，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为日常生活以及甚至是星期日生活的宗教，而整个社会对此却束手无策，“批判”却丢失了它原本可以用来啃或咬的门牙，更不要提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了。其后得以贯彻的后福特主义声称：在商品推销之外的语言和审美的创造力、研究实验室外的技术创造、没有盈利意图的思考、出版销量低于1万册的书籍、遭受政治迫害者的避难权、没有以假乱真叫叫嚷嚷的媒体、直到高龄甚至直至死亡都还健康的老人，是无利可图的。“批判”也因此而更具有必要性。

性科学，尤其是那些在对性的研究中坚守正确方法论的性科学，能否是批判性的？马丁·丹内克尔（1989：208 ff）在著名的金赛学院（Kinsey-Institut）实验研究中以此为例提出了这个问题（Kinsey et al，1948/1964，1953/1963）。他的结论是：如果研究者不是将性欲和性行为“神秘化或道德化”，而是从功能和有用的角度去研究它们，那么性科

学就会拥有一种不可低估的批判能量。在阅读了这篇报道之后，有些人反而觉得异常的性行为竟然“少于自己原先的想象”。如果性科学的研究不再对性的苦难感兴趣，那么对这种困难的意识和改变这种苦难的冲动也会因此低落或消失。性研究并不只是一种监管性欲和性行为的工具，它同时也是“针对越来越广泛社会化的性的一种监督机制，并且即使不是直接涉及性压抑的苦难，它也应以它的研究成果提醒人们，改变性现状的必要性”。丹内克尔以金赛学院的研究结果为例，说明了女性的自慰通常比婚前的爱情游戏和婚姻中的交媾更容易获得性高潮和满足（比较Kinsey et al.，1953/1963；126）。“这个结果，”丹内克尔这么说道，“在40年前砸碎了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惯用套语，留下的是扎在肉中的刺。”

15 知识作为社会的拜物神

在17世纪过渡到18世纪期间，即从信仰主义到科学主义的过渡中，形成了知识的新秩序，科学世界观成为主导意识，并且出现了生与死、生命与无生命的根本对立。这就使得生物学和心理学得以诞生。有机物被看成是有着活生生生命的物体，它能够通过自身的生长和繁殖进行生产。无机物则被看成是非生命的物体，是不会再生产和不会运动的死亡之物。但是在两百年后，生命物体与死亡之物的对立就不再是根本性的了，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的形态是极多样化的，并且相互交替和转换（16、17章；也请比较Sigusch，1997）。

当宗教和政治崇拜的迷惑力在19世纪大幅度递减的时候，除了那时已在社会中完成建构的商品和价值的崇拜，也出现了社会对知识的崇拜。不久之后，对知识的崇拜便击败或胜过了社会祭坛上的所有其他那些继承了“劳动社会特性物化外观理论”（Marx，1867：80）的批判哲学在做了严格分析后形成的偶像崇拜。用比较陈旧的语言来说，知识成为理想的“全部”崇拜；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它是Mega-崇拜，它向所有人

承诺社会的发展方向，即往那个更深刻、更精细、更完美、更快速、更有权力和更好解构而不需要顾及人与道德和自然的方向发展。尽管研究者声称转基因食品不会有实际的生命风险，但保险业仍拒绝为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作保，这是意味深长的。而其实启蒙主义所说的“科学”，应当不允许不假思索地相信它自身就有着一种非轻信的要求。但事实上，科学却在走向轻信。比如那些把自己误解为自然科学家的医学教授，几乎能够把任何废话都作为最新的研究成果吹入公众的耳中。当然社会也有实际的进步，比如在今天已经不是所有的欧美人都会被别人说服而轻易相信，有着性关系的两个男人是魔鬼或妖魔。但是如果科学家们能够科学地公开他们日益递增的无知或不知之处，那将是一个更大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总是强调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现在却以充分权利坚守了自己。没有科学和技术，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和科学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信息和交流方式转换成了“生产方式”。在今天，信息已经进入交易，数据供应商通过收购同行而构成自己的垄断势态，全世界的一切区域因此而殖民化。无数的人被贬低为企业的功能操作员，或甚至成为企业不再需要的包袱，因为按无主体性的科学标准来说，数控机器运转得更快，有更复杂的功能，也更精确。启蒙主义直至今天仍在叫嚷的精神与权力的对抗性矛盾，已在自身中崩溃，它因为它的腐败而损坏了自己。正是科学的精神在这最近的几百年中，不仅只是有权力，而且它的权力也许在某些时期还甚于资本的权力，因为资本没有科学，根本不可能建立它实现积累所需的现代制度。科学曾预谋、策划和组织了许多野蛮行为或战争，并为之做正当理由的辩护。并且它积累的关于战争和毁灭人的知识远多于它关于和平和爱人类的知识。这从本质上已经说明了一切。

科学性的内涵是实验。“您理解什么是科学性吗？”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如此责问一位认为他的文章没有科学性的物理

学家（1982：238）。那个物理学家回答道：“我们发现的是任何人都能验证的自然法则，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和必须期待的：在同样条件下的重复试验，会有哪些效应，并且更进一步说是会有哪些相同的效应。”但是据我对当今科学界所能做出的判断，现代物理学已经早就与那位物理学家的这种张狂保持了距离，现代物理学已经不再假设同样的原因会必然有同样的效应，并且也只是以虚拟的时间、空间和数字进行操作，但是那个物理学家的那种张狂，却仍是主流躯体生理医学的主要方法。它的人体实验就如同在做死的物的实验，并且一旦在同样的实验中没有出现预定的同样数值，就会慌张和迷茫。人的身体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灵，就根本没有感觉；而心灵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体，就会在双重的意义上是形而上的：一方面它将沉淀在他物之中，以他物表现自己；另一方面按它的真实度则是笛卡儿的第一自然；而这一切对大多数医学工作者来说，却都如同波西米亚的村庄那样陌生和不可理解。他们以刀解剖尸体开始他们的医学生涯，以电脑扫描人体器官作为他们学医的终结。这里是物和身体，那里是精神和心灵，这些医学工作者就这样坚守分子遗传假说，成为最后一个笛卡儿主义者，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因为不得不借助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而感到烦恼。如果暴力、酗酒、精神分裂症和仇外心理，如果不可体验的性形态只是人的器官遗传的一种预定，那么我担心就某种程度来说这对我们大家在客观上都是很令人不安的。难道他们就不能在认知上轻易把握这些问题，并在技术上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去构建社会和文化，去调解社会心理吗？

由于知识和科学成为社会的巨大崇拜，我们都极度地高估了它们。究竟谁能讲清，比如6000年前古老的逾百万人口的城市大马士革（Damaskus），到如今先后究竟有哪些人相继在此居住过？那是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坦尔人、亚摩利人和胡里特人、米坦尼人、赫梯人、埃及人、阿拉姆人、亚述人、迦南人、腓尼基人、迦勒底人、阿契美尼德人、希腊人、塞琉人、托勒密人、帕提亚人、罗马人、萨珊人，先知

和四个大哈里发，倭马亚人、阿巴斯人、哈姆丹人、突伦人、伊凯西堤登人、法蒂玛人、阿德贝格人、塞尔柱人、赞吉人、十字军、阿尤布人、马穆鲁克人、蒙古人、奥斯曼人、德鲁兹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科学家们为自己的研究做了如此烦琐的预防出错的工作，以致连他们自己都不再能够看到，这之间的裂缝是多么细小，而他们却正在从这条细小的裂缝往外观测生活和世界。被他们无限高估的还有遗传工程，尤其是克隆技术的潜在能量。克隆的主要风险并不在于某些多少有些疯狂的研究者和政治家在某一天按某些标准直接能够生产和制造人，因为这其实在“科学性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克隆的危险更多的是在于：持续的技术话语化极度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体验和行为，以致人似乎直接在实验室里受到技术的操纵。因此即使是反对意见也变得如此外在，不能切中要害；比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99：15）显然出于论证策略的理由反驳了这些反对意见。他对那些反对基因克隆的反驳论证说：如果是我们的基因链规定了我们，以致我们仅仅是生物机器，这就使得目前正在谈论的禁止克隆或类似的操纵，成为一种绝望的战略策略，即期望避免在根本上无法避免的事，并且通过对知识和科学的限制，维护了一种错误的自由表象；或者是基因并不毫不留空隙地完全规定我们，那我们也就“没有理由那么警醒”地看待基因工程，因为“对基因密码的解密和操纵并不能真正触动我们个人特征的核心”。

我的考虑是，齐泽克的这一用了两个“或是”的论证低估了这么一个事实，即知识崇拜主要以躯体形式思考和体验沉淀在人之中的，比如从主观性的疾病理论中就能看到的，最初总是怀疑身体有病，并不去考虑心灵或精神（尽管德国医学已经独立地引进了这一点）或甚至（如在几十年前）是社会出现了病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家都懂得基因并不是一切，但在出现怀疑的情况时却总是认为基因的贯穿力大于社会和团体的效能。这就低估了话语（这里的话语是特指话语理论，而不是意见、讨论和争辩意义上的话语）或者我们也能说拜物主义的意识形式，继承了马克思拜（唯）物主义批判理论假设的拜物主义。独立于人的感

觉的客体，在它客体化的过程中导致了社会成员的一种自我客体化。在几十年后，我们的遗传学家就将有能力快速和准确地解开我们每个人特定的基因链，也就是解开我们每个人的全部基因密码（并加以有限制的操纵和改码）。即使有谁担心这是每个个人特质客体化的终结，也会屈从于躯体形式的拜物主义思想，以及一切由这种思想衍生出的理论。按此理论，即使是对“黑暗的构想”（康德）以及对“人的阴府世界”的敬畏（弗洛伊德），也都受制于躯体细胞基因的条件。

16 生和死的越界或变形

如果对一种新的性理论仅仅做一些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价值批判、性别理论或系统理论的评判，更别提如果仅仅做一些心理学和临床医学的追溯思考，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想在这里以越界为例说明生与死的转码，并尝试借助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定理来理解这一转码（17章）。

经济实验性的交换和知识社会的建构与解构进程，消除了所有原先既定的社会界限或是至少对此提出了质疑。鉴于越来越多的“人工自然”的物和事以日益递减的时间距离被添加进迄今为止的自然中，比如那些原先自然中根本不存在的人工合成的元素、人为改变基因的植物、被克隆出来的没有性别的哺乳动物，一直到试管婴儿、在传统生育期以外（即已进入更年期）的怀孕，都拆除了自然和社会进程的界限。这就导致生与死、自然与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范畴和事实不断被重新编码，批判理论家关于“第二个”自然（但在现实中却成了“第一”自然）的隐喻，成为野蛮事实的实践。

以植入受精卵或转移卵巢的方法现实地克服了传统的自然强制、生殖期的界限和各代人之间的距离，以致受精卵接受者孕育了一个孩子，而孩子生理遗传意义上的母亲并不会生下这个孩子；或是早就进入绝经

期的妇女却生下了孩子；或是一个岳母用来自她女婿的精子与她女儿的卵子交融的胚胎卵怀孕，并生下了她的外孙（或外孙女）；或者将一个白人妇女的卵子植入黑人妇女的身体中，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但无论如何已在荷兰因为“实验室的错误混淆”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或是把胚胎移植进体外的人工子宫，以增加受孕的机会；或是将双胞胎或三胞胎的出生人为地拉开多年的时间距离；或是有选择地堕胎，因为不想要双胞胎、不满意胎儿的性别或原先的精子制造者这期间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或是按当前的临床医学定义一个已经死亡的妇女，在她的腹中却还有个胎儿正在长大成人。

几年前有一份英国花边新闻小报曾报道一个妇女借助荷尔蒙激素，怀上了八胞胎，但为了等待领取一份为八胞胎特设的奖金，而无限期地拖延怀孕期，以致这八个婴儿最后都失去了生存的机会，没有一个能够存活下来。个人也可以出卖或出租他们的生殖细胞，并能够在许多国家同时制造上千个生命。但是他们也可以非常信任地求助于精卵捐献的中介机构，从广告目录中寻找出有吸引力的捐献者来订购一个小孩，如同网上邮购和时尚杂志购物那样。或者他们也可以购买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这样就能在亲眼观察后再挑选。为了能让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找到一个骨髓捐献者，他们也可以实施一种替换部件的怀孕，这已经在美国出现。为了用胚胎来满足帕金森直至糖尿病等各种不同疾病的治疗需要，还必须极大地提高符合特定医疗条款的堕胎率，这些反正早已存在的内部条款是：堕胎的功能性分工，胚胎可以作为原材料使用。人与物相互异化而成的客体（Hylomatie）的自我合法化因此被看做是人道的行为。

即使那个继续幸存下来的古老的死亡，人们也能用一些已经过时了的方法来智胜它，即用那些已经死亡的人生前冷冻的生殖细胞来创造新的生命，比如一个失去丈夫的英国寡妇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这类许可。完全新颖和弥散的生殖与家庭关系为体外受精提供了可能性，比如一个

精子捐献者，一个卵子捐献者，一个代孕母亲，一对“社会”学意义上的未来的父母，他们就是一种既分离又相连的关系。这种受精也完全可以挪到实验室进行，并且可以充分相信已经运用了植前诊断技术（PID）的生殖医学已经诊断基因链是否根本按序排列，一次简单的验血也能得知胎儿是否正常。除此之外，医学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现一种新的基因，这也使人们因此能够对死亡作些相关的咨询。如果父母希望有一个医学意义上健康的孩子，鉴于如今的医疗技术水平，他们完全可以购买一些有功能保障的器具帮助有病的胎儿健康成长，这在“实际上”也延长了其生命，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免遭骇人听闻的因堕杀胎儿而留下的永远刺心的痛。测试一个人的基因链排列在2000年所需的费用是30亿美元，在2009年只需10万美元，如果只是想分析最值得了解的Snips数据，那么只需花费400美元。目前的基因工程技术还只是处于它发展的开端阶段，类似于计算机科学在1980年代中期所处的境况，而目前据说计算机功能是每18个月翻一倍。基因工程技术也正在为自己争取这么一个突飞猛进，正在不断进入市场，并于2009年在波士顿举办了第一次“基因技术消费”（Consum Genetics）的展会。有利于基因技术发展的是，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可以不费周折地绕过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和伦理的限制，转移到那些还不懂得应当禁止转基因的国家中去，（如我们当前所说的）可以“外包”给这些国家。

一种被称为仿生学的新科学，正在更有效地将生物学和技术、肉类和电子技术、活着的和死去的合并起来。它追求的是纯粹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它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从机器人到高技术的不死生灵，或是对人的复制如影片《终结者》（*Terminator*）、《机械战警》（*Robocop*）、《银翼杀手》（*Blade Runner*）或《万能战士》（*Universal Soldier*）等所展现的那样，并且极富经济成效地投向全球。模拟世界的数据化、对自然事物和过程的复制以及技术的毫微化（Nanosieren）都帮助科学在今天能做到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毫微技术看来，以往的生物瓣膜、启动泵、支架、阀门瓣膜和起搏器等都只

能算是进入粗糙技术世纪的网络棒（Cyberstick）手术和模拟病人的技术。眼睛和耳朵、臂和腿，视网膜、膀胱和括约肌如今都已经可以被替换，甚至思想也不需要人体，已经可以传送进计算机。如果人能起到人类器官备件仓库的效用帮助别人，那么也就能在冰冷的接受者文化中感受到一点作为给予者的温暖。这些被移植的器官可以在众多的人中作为个体继续存活下去。有时一个心脏借助雷姆再植法（Reimplantation）在几个星期内就会在三个人体内跳动。如果是整个器官的移植，比如心脏和肺，那么这个接受器官植入的病人，还能将他原有的现在成为多余的心脏再给予另一个病人。这种传递被人们称为多米诺移植。但如果一个没有自己的双臂和双腿的人，在残疾人奥运会上以11.6秒的成绩跑完100米，那么所有人就都能为此感到骄傲。这类的边界超越展现了从不可分割的、唯一的个人到可分割、可不断和无限复制的个人的具体途径。也表现了伴随人的非物化出现的是人的物化，伴随着物的物化出现的是物的非物化。虚拟现实表现出具体的物化，能够是无形的，但不能是无物的。

当前，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制造的最高点，似乎应当是克隆技术。它已被应用了几十年，以便从胚胎生产出基因“相同”的植物或动物。新的并且在自然界原先并不存在的现象，是动物克隆已经能够让通常的动物生成特殊需要的细胞；而在此前，科学家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前在苏格兰以伊恩·维尔穆特（Ian Wilmut）为主力的一批研究者，正在接近提出一个也许可被看做是质的飞跃的研究成果。正是他们曾经用一个成年动物的乳房细胞克隆出小羊“多莉”。新西兰和中国的研究者们显然也已经用成熟的细胞克隆了其他物种。据说早在1993年美国人杰里·霍尔（Jerry Hall）就已经成功地克隆了人的细胞。在当前也根本只有这类消息才会被优先发表和报道。如果现在有某个普通人要求苏格兰研究者将他作为死后克隆的第一人，或是在有生之年就已经克隆他，使他成为两个完全相同的普通人，心理分析家也几乎不会因此感到惊讶。据说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 Schiffer）已经对可能被克隆出来的另一个她表

示欢迎，因为这样可以减轻她现有的压力，并且她的那些崇拜者也已许诺会像崇拜她那样崇拜另一个克隆的她；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则相反，虽然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用另一个貌似他的人来表现自己，但在克隆这个问题上，则满足于和他真人完全相同的蜡像。克隆似乎成了个人化的顶峰，但实际上却是它的深渊，因为克隆并不能复制一个人（至今仍还拥有）唯一性的历史，而只能是复制这个人的生物物质，更不要说其中还有诸多被安排的倾向。除此之外，偏偏是进化生物学家正在不知疲倦地细数有性繁殖的生物优势，并且近来还以电脑模拟“证明”了：两种不同基因链结合的互组，会构成较大的基因多样性，其出错的概率就会小于不断复制的副本或“单性繁殖”，会极大地分散不断出现基因突变的可能性，也能迅速适应因病原体而改变的身体“内部”环境。

克隆技术的进步似乎唤醒了人类的一个古老梦想：有监控地系列制造基因完美无瑕的有用家畜和家奴，美国参议院甚至立刻对此表示了由衷的欢迎。而德国的一个联邦研究部部长则相反，否认德国也是这类研究的基地并保证：“德国不允许也不会出现克隆的人。”当然（并且社会也总是这么认为）还会再继续试验怎么克隆人。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允许制造克隆人，在我们这里不是由法律和保证决定，而是取决于知识所达到的高度、市场的需求和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的客体化程度，以及其他一些可能的千变万化的控制和纯度的基本标准化。鉴于当前技术所达到的高度，西普（Siep）已经看到不仅是“人的形态，而且人的生活形态也在根本上可以做基本的克隆”（1996：12）。生活的基本概念，即特殊的生活方式（不再是系列产品）、个性（不再是同一类型）、非事先计划的有着自然外貌和依赖随机的生殖，这一切都已成为“自身的价值概念”。鉴于现代伦理的建构者认为“人工培植不可能影响有机生命的基本结构”，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新的伦理，一种摆脱了每个个人都能规划自己生活计划幻想的新伦理。同时也必须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制造一个基因几乎完全相同的后代，究竟触犯了谁的尊严和权

利？”一个父亲有着一个与自己的脸几乎完全一样的儿子，或是一个个人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得到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外表，或是一些亲属拥有了一个死去的可敬亲人的基因副本，应当不能再算是触犯了什么法律或侵犯了谁的权利。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由偶然、偏离和个性化规定的一种自然，必然优越于“为人类的舒适而以技术做了最佳化处理”的一种自然？西普希望能够判定，“我们究竟认为多少‘生命’和多少‘自然性’是好的”，而不是仅仅让私人愿望与市场策略玩弄力量游戏。他想凭借人的意志和一种公众性的话语对话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这却是最新伦理的主要幻想。

17 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定理

一个普遍的早就建立了固定结构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预先推知了这个客体，而且卢曼的系统理论也勾画了这个客体，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学或功能理论中的还原主义和他们乐观主义的对缺失的否定，很难理解这个客体究竟是什么，我首先试图以物化这个词单维度并也较为悲观地来表述这个客体（Sigusch，1984b，1987b，1989a）。但今天我却在思考，一个如Hylomatie聚集和表现了生与死、自我运动、狂飙与静止（如物、自动化和躁狂症，希腊语：hýle，autómatos和maínesthai）意义的术语，必然会呼唤出一个应当辩证表现这些名词的过程，因为人的物化是伴随着物的去物化，以及人的去物化是伴随着物的物化而形成和出现的；因为这不仅是递减、还原、死一般的静止和毁灭性的，而且也是建构、递增、扩展和孕育着新生命的；因为多维度的不太漂亮的新词“Hylomatie”强调了新的逻辑、自动系统以及在自我中运行的过程。一种Hylomatie理论（我也曾在其他地方表述了对这个词的一种展望），必须既能继续思考主要由安德斯和阿多诺发展了的自动解构或自我毁灭的定律，也必须能够继续思考主要由马克思和卢曼展开的自创生或自我创造的定律。因为Hylomatie兼有两者：无主体的自我进程和无主体的自我毁灭。一方面是生产性的自我维持，另一方面则是将

认知、经济和客观外界各领域相互辩证地连接起来，但又是一种“自动”运转、非生产性和毁灭性的机制。作为所谓的客观制约，所谓的确切知识和科学标准，便可体系性地不受普通个人意志的制约。从人的角度来看，Hylomatie首先来自物化，因为曾经向人承诺的生活活力、流动性、自主权和自身动力，都取决于他（或是人）对物，尤其是作为商品的物的占有，这便导致了“物”现在有了一种“自己的生活”。从物的角度来看，Hylomatie首先是超越去物化，因为它现在有了“爱的魅力”（马克思）、性的感召力、可沟通、创造、再生产和解构性等素质，而这正是主流哲学曾经拒绝认可它的一些素质。也就是说，Hylomatie在以上已经提及的那些定理和表现现代社会的特征的意义上，同时也是一种媒介理论，即一种关于生与死不断转换的理论。在这种转换中，生命在死去，而死去的又活了过来；在这种转换中，生与死、自然与社会进行着相互过渡。但是社会辩证法却仅仅从把一切都看成是“白”的自创生理论或把一切都看成是“黑”的自我毁灭理论的角度来理解物化和去物化。

生命与自然性被交换和Hylomatie的客体化相互交织，这种交织是自发的和在一定程度上自动的，并在动荡时代几乎每天都在进行重新改码，没有任何话语对话能对此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大前天获悉，科学已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取消了先前可疑的植物、动物和人的种属界限。前天的《自然》杂志载文报道蛋白质即使没有DNA（脱氧核糖核酸）也能自我再生产（Lee et al.1996）。《科学》杂志也报道了火星上存在可能的生命形式（McKay et al.1996）。在发现了火星上（所谓的）简单生命体的迹象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总规划师耶斯科·冯·普特卡默（Jesco von Puttkammer）在1996年8月宣告，在两到三代人之后，就可将人送往火星居住。在20年后就可能派出一个载人航天飞船。《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1996年8月9日第26页报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有着长期实践跨度的移民计划”——移民和定居。也许那些哲学家是有道理的，当苏格拉底得到了那份致命的毒药时，柏拉图曾说这是移居星空（Phaidon，117B）；但是否能够把移居星空成为外星

人看做是人的本质特性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常量？对苏格拉底来说，这里涉及的是“从这里到那里的漫游”，作为一个垂死者不要再犯丝毫的错误，从而使灵魂在身体死亡后仍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现代人的星球计划是从一个星球过渡到另一个星球，是从一种受技术制约的生活转换到另一种技术生活。鉴于现在已经计算出在几代人之后，我们的地球对人类来说已不再具有可居住性，为了避免全球性的大屠杀，或是出于经济的理由，出于一种现代的见解而想让古典时代的移居星空者得以延长他们的存在，因为如今大多数已经物化了的人相信，只有受技术制约的生活，才在根本上保障了人还在生活；出于这众多的理由，移民外星的计划是符合成本核算的。

18 性科学的自相矛盾状态

知识的领域有了普遍的重要意义，并且也拥有了诸多分支和弥散性，甚至以前根本没有多少提及的“性”也成了得以普遍贯彻的性形态。这些都为展开性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和社会层面上的）可能性前提。直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了“性”这样一门新的科学，并且在它的名称中已经以令人怀疑的方式坚称自己确实是一门新的科学。只是如同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6/17：331）在他的第21讲座中说道：“请不要忘了，我们当前并不拥有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性过程的自然指标。”并且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自现代以来，人的性欲性行为被看成是本能冲动、不可预测、不理性因而也是非理性的，是超越界限和谜，但应当由科学——特指19世纪以来的性科学——对此做理性的研究、讨论和定义。

当时有关“性的问题”（它永远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体治疗上解除阴阳两性人的痛苦，帮助他们摆脱社会的偏见；根据当事人的愿望，计算出受孕或非受孕期；将一些涉及性异常和性过度的专业职能，从神学和法理学转移到医学，尤其是心理学的领

域；或是寻找抑制嫖娼卖淫和消除性病（Venerie）祸害的有效方法。在19世纪末，“性的问题”已经与寻找生活意义、追求幸福和激情、期望一种充满人性的人与人的关系等这些问题聚集和纠结在一起了。因为正是性在其中建构了自己独特形态的这种新文化，主要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即男人和女人都应当在自由、平等和个人爱情的关系中终生结合并繁衍生命。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个研究人员或从业人员自然就在这个框架内选择出各个不同的主题，并且往往是些他们认为自己在专业上有把握，对此有一种政治兴趣或涉及人类的性的一些研究主题。因此这些主题的研究范围广泛，内容多彩多样（比较Sigusch，2008a；Sigusch und Grau，2009）；它们从性民俗学和性民族学、“完美”的婚姻、避孕的方法、性病治疗、性刑法的修订，直到废奴主义、优生学、性手术、性内分泌学和性教育学等。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知疲倦地收集和展示的有关性的那些问题，我们至今仍在研究。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勇敢地站在受迫害者一边，这使我们今天仍很敬佩他们。他们中又有另一些人表述了不可辩驳的政治和社会诉求，我们直到今天仍在向他们学习。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首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们期望在生物、化学或社会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在最糟糕的情形中甚至在人的人工培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人缺少的是思想的追求，即缺少那种能够帮助他们抛弃对立面、发展辩证的反面概念的思想追求。

这里必须说一下人的性。一些性研究者公开承认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性倾向，不管这涉及男同性恋者还是恋尿癖（即把尿看成是大自然的香槟，通过尿的浇淋或与尿的游戏而获得性快感）；另一些性研究者则被人们归为脚的崇拜者和性虐待或性受虐狂；在一些人那里似乎表现出受其早年经历、生活中的委屈或职业选择机遇不公正的影响，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根本没有偏离所谓通常规范的迹象。但是由于性现在在我们这里已经与贪婪和好奇不可分地相连接，所有性研究者都必须回答一个总

是徘徊在深层背景意识中的问题，即人们是怎么容忍这些贪婪和好奇进入人的性意识中去的？出于对兴趣和事物之间关系正在盛行的努力反思，这无论如何都是性研究者们自己应当提出的问题。

性研究甚至不能以统计的方法对性行为方式的出现次数和频率做更多数学分析，因此任何一种性研究都是主观的。只有真实个人的性行为才是真实的（11章）这个前提，在逻辑上先于任何性理论都不可避免是主观的这个前提。如同心理分析学家，性研究者也是自己的治疗和监测工具。他们研究的事物是他们作为人而展现出来的，否则他们就无法保证自己那些事情的确切性（比较Dannecker，1987a：9 ff）。他们的研究不能诉诸内在于事物自身的公式和常数，也没有在技术上如解剖学或社会学那样可以运用的远离情感和主观上中性的术语。甚至他们的理论抽象也打上了他们性的个人特殊差异的印记。这种特殊性很有吸引力，因为那个主要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很接近于原始的性的本身，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被拖进职业生涯的“对婴儿的性研究”，这种研究使研究者能够长久持有从事这一研究极其需要的专业兴趣。但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它也因此尤其拥有了一种特定的风险和一种特定的机会。在缺少或太多漏洞百出的自我反思中，性研究只能给出一些怪癖、对性自身的描述或是唤起一些震惊。一旦把性解释为是透明的，而不是私人科学性的，就能够通过将个人特殊差异上升为科学概念或仅仅通过作为科学固定形态激励而使性科学研究的风险转变为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很少能改变性学家的信念和研究趋向，即使当“性”在1900年左右，在1920年代和1960年代，以及当前的艾滋病歇斯底里时代以一种直接的排除了个人偏见的口号席卷了社会和人类的时候，性学家也还想为自己的理念镀上银色的光。他们的文章、著作和理念阻塞了一切。这也证明了他们是多么依赖于精神的传统教育、仅仅局限在大学里的思想交流，以及如汉斯·吉泽（Hans Giese）一再强调的那样多么依赖“学院式的规则”。从中也能看出，掌控了大学的主导思想有多么愚蠢。光是各种学术职称的界限就阻止了一个性病治疗师把自己标榜为性研究者。我在这里说这一切

不是为了反对自学成才或外行，而是为了反对那些搞自己私人研究的科学家，是为了防止那些人将自己的一些奇妙想法作为为迷茫的人给出的最后回答，也是认为这些私人研究者的喋喋不休没有真实的意义，因为他们放弃运用明确的概念。

性科学特有的科学实践的特殊性，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只要能够将起源于事实的冲动转换为一种对思想差异性的认可，只要能够将对象及其概念作为恰当看待主观客体化唯一的科学方法从而保证认知的模拟特征，只要能够将分离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客体的对立矛盾推向承认他们间的亲和关系，承认黑洞式本能只有在被研究的这一刻才显示出其身心的清晰可见性。性科学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即通过抓取意识中的本能冲动并将意识作为潜伏在意识中的本能冲动，通过本能冲动的意识和意识的本能冲动，为自己赢得特殊性和概念性。同样，认知和已获得的认知也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懂得了运用定义和概念，并且也懂得了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应当超越这些已经完成的认知，不能以概念去反驳“这些作为无概念性”（Adorno，1966：21）的认知，而只需宣布它们无效。我在思考，对于那些还对我们有影响的性研究者和哲学家来说，认知的模仿特征以及与那所有一切可怕事实的一种近距离，多少构成了他们有些管状型的视野和思考方式，这种来自自己心灵的近距离，如同一个放大镜放大了社会的这些现状，他们能够比别人看得更多，但也因此为自己的心灵罩上了惊骇，感受到了个人的屈辱，或激起了本能的性冲动，不管是奥林姆帕·德·古戈斯、海因里希·赫斯李（Heinrich Hössli）、卡尔·海因里希·乌利希斯，还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海伦妮·施托克尔（Helene Stöcker）、阿尔弗雷德·C.金赛（Alfred C.Kinsey）、汉斯·吉泽，还是米歇尔·福柯或尤迪特·巴特勒。他们中的有些人与权力和性别或母爱和爱生殖器官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论、临床实践或政治的关系；而另一些则更倾向于嫖娼卖淫、“自由的爱”或男同性恋、性虐待和受虐或女同性恋。

如果性科学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确定性高潮率和抱怨性冷淡的水平上，那么这门可怜的“性科学”应当怎样以它既极严肃又保存生命、既高估又低估、既悲剧又平庸、既封闭又网络化的研究对象，在现代的哲学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它感觉到，它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与物理反应和荷尔蒙有关，而且更与痴迷、象征、价值、规范和神秘有关，除了连接上时代思想，它别无其他选择，不管这种连接会带来多少误解和貌似外行冒充内行的危险。但是它还不会就此无节制地过分夸大自己研究对象的意义，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不管怎样仍还处在意识之巅。

如果性科学不想让自己因为一方面运用理性主义的实证法，另一方面又运用非理性主义的否定论所构成的这个自相矛盾（哪怕是极其隐蔽）的疑难点而告败，那它就会从阿波罗移向酒神，并且反之亦然。那么在性科学的认识中，如痴如醉奉献自己的意志就会成为清醒追求秩序的对立面，如爱神与逻辑的关系。当进步主义的性科学不得已在阿波罗与酒神的统一中看到了性的秘密，认为这些秘密不应当出现在谢林式的抒情诗里，并且应当以解放的名义尽一切努力排除这些秘密的时候，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已在一方面比较温和，另一方面又较为过激地将这一自相矛盾作为建立在事物自身中的疑难点，如同那些概括了这个疑难点的概念，使得这个疑难点因此而从统一到多样，从有限到无限，从经验到抽象——并且又返回现实中。性科学并不逃避返回，因为科学现在是清醒而非迷醉的。一个哲学家可能会允许自己爱来自上帝和世界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一个性学家，一个把自己看做是以务实的意图将酒神呈现为现实存在的性学家，却会即刻不加思考地沉浸在成熟、本能、圣餐和血的意识形态的定理中。

在愿望和满意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这个鸿沟只有借助某种形式才能跨越，而只有“性欲和性行为”才是跨越这条鸿沟的方式。在18世纪与19世纪转换之间如洪水猛兽般出现的性文学作品从客观角度提出的一切问题，今天才在真正普遍燃烧，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燃烧：不仅燃烧在

行为上，而且感谢思想的自由化也燃烧在头脑中。性科学仍继续存在着，因为性的苦难并没有消失。没有满足的渴望、颇受煎熬的神经、被搪塞的请求、性别疑问、令人失望的爱情、自私自利、性别歧视、虚情假意、梦幻、重复强迫症、双重道德、性无能、孤独、恐惧和罪过感——性的苦难无法估量也无法再加以夸大。性科学的继续存在，是因为在一个表现为理性的时代，特殊的问题需要特殊的科学加以解决。如果欲望没有与爱情分离，持久与强烈、和谐与激动就会聚为一体。我们都懂得这是一种怎样的性的陶醉，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想象这种陶醉。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去关注这类科学讨论，我们就会认为性科学如同性的事实本身那样荒唐。沉睡在自身中的性，是一种静默的幸福。但是如果性在呼唤着什么，那肯定不是在呼唤性科学，而是在呼唤情欲艺术，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在一切静默中的幸福窒息了自己的愿望、本能和欲望。这是唯一一种在今天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危险。

曾经发出过吼声的性科学，在信息沟通的物化时代，有时（这里和当前）仍然还在发出自己的吼声，但已经不同于以前，不再作为时代进步的道德训诫者或武器，而是作为一个批判的岛屿，一个在茫茫人海中还能让批判得以生存的安全岛屿。早期性学的一些特点，现在早已被大众媒体更有效地实现了：阐明和打破性的禁忌，介绍性的特殊性，公开最后的性秘密，放弃和个人的自我放弃。

19 女权主义与性科学

近几十年来，女权主义在实践中作为妇女运动，在理论上作为女权主义或同性恋的哲学，对性科学提出了一种极大挑战（比较：Düring，1994；Düring und Hauch，1995/2000；Sigusch，1993a）。这一挑战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具有极根本的意义：因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既是研究人类性生活的社会心理中心点，也是度量人的性别所谓第一和第二性特征的象征性中心点；因为，尽管出现了一种性别流动或是说液态性别

（44章）的倾向，但所有人还一如既往直接和间接地、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被迫按男女两大性别的规则尽可能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性别特征；因为，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认可第三或第四性别，但社会对性别表现的压力要远远小于人自己感觉必须表现为男人或是女人的压力；最终也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研究方向的性科学，都有那么一些如同男性科学，完全主要由男人在从事研究或铸刻上了他们的印记，我们只要想一下迈特戈扎、乌尔里克斯、克拉夫特-埃宾、哈夫洛克·埃利斯、莫尔、伊万·布洛赫和弗洛伊德就行。

露丝·伊利格瑞（1984/1991：11）在她的《性别差异的伦理》（*Éthique de la différence sexue*）中写道："按海德格尔的理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件必须'思考'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那么，性别差异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的那件事。有些人会因此认为，这将给我们带来拯救。"但是，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希望那所谓的"拯救"，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可能）。但我思考，女权主义的挑战，无疑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对性别差异（Differentia generum）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Differentia generis specifica）的思考（21章），是发达和富裕国家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再也不能逃避这一历史使命了。至于性科学，自然是指只存在于富裕国家中并且在近几十年中总是享有批判性和启蒙性名声的性科学，如果不能应对女权主义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成功地用自己有关人的形象的眼光去质疑，重新批判和痛苦反思性别以及性的关系，那么它即使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科学地位，它的名声也必将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从总体上说，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挑战的意义能与女权主义的挑战相比，因为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场挑战，并且完全独立于他（她）们各自的性取向和实践；也因为父权制、性别歧视和科学意义上的人的形象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到了不能再被夸大的程度。男人中心论的人类形象视野，已经完完全全贯穿在一切

之中——从比如露丝·伊利格瑞所指出的数学（1984），比如克里斯塔罗德-德莎（Christa Rohde-Dachser）所展述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1991），直到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已经认出的它给所有文化都打上的印记（1968：155）：女人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神话，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宗教，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诗意，“即使她们有梦想，也只是通过男人的梦想来梦想”。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范畴、一切定理、一切实践和一切事实认定都理应受到质疑，但是涉及性别科学根基的女权主义挑战，几乎不可能在批判哲学家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和启发，因为那些思想巨人，从马克思（7章）到霍克海姆（比如1974）也都只是以男性的逻辑论证他们的理论或思想。

对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79/1893）来说，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妇女运动与对社会和妇女问题的质疑，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当倍倍尔的重要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第一版1879年秘密印刷和传播之时（Bebel 1893：V），正是《反社会主义者法》（*Sozialistengesetz*）腥风血雨般扼杀工人运动之际。倍倍尔认为，妇女问题“只是社会普遍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结在一起，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解决妇女问题的实质，首先要以一种“自由的人性取代千百种不同形态的压迫、剥削、贫困和苦难”。但是为了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就必须跳出今日的社会框架（同上：1）。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运动和任何思想只能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只能把妇女作为无力自卫的劳动工人，只能在劳动工人之间加剧相互竞争，只能压低男女两性的收入，并且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妇女，也只能适应做些医生、教师和公务员的事。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女性大众的性奴隶状态。倍倍尔在125年之前就曾写道（同上：7）：“早在奴隶制出现之前，妇女就已经成为奴隶”。因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并不同时起源于奴隶制。

即使对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来说，在与女权主义的争辩中，父权制和

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早就成为理论思考的中心。其思考的前提无疑就是，只有当“妇女问题”和性的问题能够成为社会关注的日常议题的时候，只有当这些问题在老的欧洲和新的美洲最终成为比为了赤裸裸的生存而天天与饥饿、疾病和外来暴力斗争更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才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前提。但是在某个时候，正如女权主义的正确抨击（比较Sigusch，1993a），那句“如此疯狂的句子：资本主义与爱情是一个共栖的整体”（Sigusch 1979b：6）竟然需要“父权制与爱情是一个共栖的整体”这一句子的援助。恩斯特·布洛赫在他的《希望的原理》中写道：“苏联已经不存在妇女问题了，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工人的问题。”（1959：Bd.II，694）这不仅必然被揭露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蒙骗，同时也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父权制分层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模式作为错误的理论来理解，对于老左派的性研究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这一分层模式只是基于唯一的和同一个市民社会父权制的原则。这种分层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必将冷漠地忽略人在歧视、被剥夺权利和被迫害之中的各种具体的生活窘迫。如今，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强调的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父权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的非同一性，并从中辨认出：性别歧视的男权主义存在于社会的所有阶层和领域，它并不存在于社会之下、社会之旁或社会之上，而是横向穿过这个社会。因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中某一个的倾覆，并不会导致另一个的必然倾覆；父权制以及阳具一元论的消失，并不会使我们的社会成为自由人的协会。由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所代表的世界观，有着一种管状的狭隘，如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教条主义。

自相矛盾的是，如果男人女人都愿意认为，资本主义的“疯狂”在于它在人的头脑和作为现实可能性在人的生活中开拓了自由的空间，而这正是我们的前辈甚至不敢梦想的自由。这是我在米歇尔·福柯的评论中所读到的，按他所说，“权力”不仅表现为压迫和说“不”，而且也可用来（这里我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营造快乐，使知识成为可能，构建话

语，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孕育了人对自己的反抗。资产阶级用市民个性的助产钳，将个人性爱的理念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性道德标准投放进我们的世界：作为男女两性的一种人权，即女人享有与男人同等的人权。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是强调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显然并不在根本上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在其中辨认出，现代主体（sujet）是通过各种如福柯在某个时候曾说过的“臣服”（assujettissement），也就是屈服而形成的，并且我们也许还能按人类的历史成因再加上对自然的暴力，作为现代主体的一个历史成因。同样的缺陷也表现在导致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趋向中：单一化和社会化、解放和压迫、感到满足和遭受拒绝、启蒙和神化。鉴于压迫趋向是解放趋向的逻辑前提，鉴于压迫没有解放根本就无法想象也无法经验，因此资本主义与女权主义有着一种逻辑和现实历史的联结。单一化和社会化手拉手的状态就意味着，它们虽然能够提出新问题，能够讨论已有的问题，也承认现有的差异，但这并没有逃脱普遍的拜物教，它们只是在均等化（Adeaquatio）批判的意义上进行着这一切。更确切地说，鉴于资本既不是犹太式也不是基督式的，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的，女权主义必须反思自己的局限性。女权主义把所有的一切都理解为是屈服于普遍的神秘化和物质化，但是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能简约为男性一元论或男性中心论，那么就必须对社会的形态而不是仅仅对父权制提出质疑。如果人们现在把关注的眼光投向女性形象而不是男性形象，那么就不会去反思社会形态的前因客观性，即沉淀在所有单一性中的普遍性，那就会形成一种旋流，将那些充满好意但过了时的政治经济坏理念，流向男女平等的方向。凡是有用的，就是资本，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但作为资产阶级替代选择的女权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理念是无关紧要的。

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坚持性的个人特殊性诉求，因为性的客体和性的形态是前因性或前定的。批判的女权主义相对其他性别所倡导的主义更坚持女性的诉求，因为男人是一种主导一切的性别，甚至也主导了女人关于女性的想象。批判主义的性科学通过对抗通常的现实原则而坚持了

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所维护的无秩序性和反抗性，因为所有被规定的乐趣都只是期待乐趣的乐趣，因为欲望与攻击、性欲与统治在现实中总是一起燃烧和喷发的。批判的女权主义坚持自己的理论，因为迄今为止的理论，都只是单纯标榜追求身体乐趣的理论，就如同这些理论到处宣扬的那样，并不是性别中性的。女权主义以一种虚构和不可简约的散漫女性形象作为它性别分析的前提，而批判主义性科学为自己设置的理论前提则是一种散漫的性。因此可以把它们中的一种称为不可简约的性别理论，另一种称为不可简约的性理论（33章）。这两者都恳求另一种并不存在的性别或性。这两者都处于陷入一种糟糕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是它们的共同点。

20 对父权制性别歧视的批判

总是一次次地不得不强调：性别歧视与对外来者的暴力仇恨、对财富的自私贪婪和具有破坏性的狂妄自大，同属于自以为文明的社会中最大的犯罪。它在内容上综合了那些对他人人格蔑视和心灵拒斥的所有要素：恐惧、仇恨、冷漠、非理性。作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则与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反犹太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起对人类发起攻击。它贯穿在所有的“世界观”之中。即使是它公开的对手——极端女权主义，我们也能在其理论中找到它的影响，甚至仅仅只是出于绝望：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宣布所有的男人都是害虫，都必须被踩死；另一个则出于女权主义的愤怒攻击了偏偏是一个名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有着自闭症从事艺术活动的移民；一个名为恩斯特·鲍诺曼（Ernst Bornemann）的性研究者，自认为是一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以一切努力认真推荐运用基因技术或心理干预手术，消除人类的性器官，制造出一种中性性别。不管怎样，关键是他（她）们都在试图用终端的解决方案一次性解决性别歧视问题。

那些在我们时代作为有着男性特点的淫荡、阳痿和暴力，已经有了

极其糟糕的坏名声，似乎如同将神秘化作为内在于自身的完好，将情感女权主义的活泼幻想为“女性”性欲性行为那样已经死亡。关于通过整整一代人似乎就可以在文化利己主义中利他地度过严寒的冬天，似乎就能够在社会的冷漠和好斗中维护和平主义热量的幻想，无非是一种唯意志论和自然主义的幻觉。真实受到伤害的，既不是攻击性也不是压迫，既不是性无能也不是沮丧，而是性的愉悦和美。如此这样，那么在这里也就不仅只是涉及在一般的状况中，按两性的差异效用设计一幅与以往相反的两性平等的画面，这无疑是在非现实中生活、寻觅、迷误，虽然悲痛欲绝坚定不移，却无济于事。

只要男人女人试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平衡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那么就会陷入一系列两难困境、爱恨交加的心理和不可解的自相矛盾。因此虽然不是从理论上，不过也许能够从心理上理解父权主义；但绝不可能从某个社团或某种性别的角度出发去加以理解。这种状况导致人们在反驳父权制时，既必须强调自己是个女性，但又不愿认可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性别角色，这就必然带出撕心裂肺的既爱又恨。因此，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意义上自由地参与生活，在今天已经显示出它好的和不好的后果，女人虽然还没有大批地进入大经济集团公司、国际性银行甚至大学妇产科医院的领导层，但她们现在已经能够如同男人般地开车，充当街头小流氓的头领，用机枪扫射机场，将身无居所的流浪汉或寻找避难的流亡者弄死，并且也会死于因为抽烟而患上的癌症。即使在西西里岛，现在也有年轻女性手提机枪，与黑手党一起穿过城市的街区，而那些年轻的男人却乖乖地跟在后面。真是不敢让人相信！但就是没有人谈论女人也应当获得经济和政治的权利。

在欧洲当今的文化中，女性因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普遍要求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第一，如果你想从事一种自己的职业，那你必须是一个乌鸦般的黑心母亲。第二，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离家你开始自己生活之时，你就没有自己的价值。事实上，绝大多

数的女人出于个人和一般通常的原因，并不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是更喜欢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还是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如果她们留在家里，她们就必须认可自己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才能获得相对的内心安宁；如果她们去外面谋生，又必须违心地否认，即使是同样的工作，男人便能得到更好的报酬，并且很可能有更多的升迁机会。由于妇女几千年来一直被阻止发展自己个人的见解和个性特点，由于女性的差异在当今社会仍然一如既往至少趋向性地被忽视，所以必须刻意强调男女的性别差异，才能在较大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妇女问题。与朔尔斯（Schorsch，1989）不同，我在米切利希-尼尔森（Mitscherlich-Nielsen，1978）、迪纳斯泰因（Dinnerstein，1979）、奥利弗（Oliver，1980）、布鲁克纳（Brückner，1983）和霍多洛夫（Chodorow，1985）这些女性作者们的著作中，看到她们试图表达的女性集体性别传记的意义。

自由的女权主义者力图使我们的社会“女性化”，因为与男人相反，女人在第一层面上并不是作为自我决定和自主的个人，也无法摆脱母亲的角色，只能从事一些关系性的事务。但是这类关系也构成了新体系的整体，若没有这类关系，那么一些老的令一切都窒息的内在关联就会变得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妇女必须独立自主。但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很快厌倦参与其他的革命（比较Rita Mühlbauer，1972：245）。结果是，它不仅与市民阶层，而且也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妇女运动都保持了距离。但独立的妇女运动的自主只是生活在她们生活中的一种虚构。因为男人与女人（尽管技术几乎已经能够对一切进行干预，但仍然）至少以三种方式相互为了生存而结合在一起：（1）所有种属史意义上的结合，包括繁衍性再生产。（2）心理意义上的结合，鉴于一个人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他的父母亲就在他身上延续了自己的基因，不管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留在孩子的身边或者远去。（3）情欲和性欲意义上的结合，即使性取向之谜，特别是异性恋，至今还未能完全被揭开。

与其他社会运动相比，妇女运动既不能在一定区域内组织一个团体（如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也没有某种必不可少的亚文化连接（如同性恋的女人和男人）；它既不具有真实的多数性（如较早期的工人运动），也不能将“一切”都作为自己的诉求；这一切无疑都在政治上阻碍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运动，比如女权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中所表现出的困境，在于女人和男人这种存在主义式的联结，实质上是“女性”对“男性”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媒介，不管这种联结和媒介有着怎样的建构性和相对性，但事实却是：不管女人怎样地想“独立自主”，但她们与自己执意要批判和与之斗争的父权制或男人，却有着一种最内在的心灵联结。这似乎就如同无产阶级的男女革命者，却与资本主义者亲密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并总是不断地必须确认，冰冷的唯利是图的资产者，竟然也能够如此暖心和可爱。

在这种毫无出路的境况中，并且也因为在父权主义的社会体制中，女性必须服务于男性的稳定化，也就是社会需要把那些危害男人独立自主的风险，转嫁到女性和妇女那里，那么那些女权主义的女哲学家们，也就只得将演出讽刺剧作为自己的避难所。露丝·伊利格瑞盲目地去模仿被拉康（Lacan）讽刺为宿命论般的“性的喜剧”；芭芭拉·芬肯（Barbara Vinken，1991：26）解释伊利格瑞的这一模仿意图时说，“女人，几乎都有着腹语表演者那样的双重人格”，这是女人为了走出迷茫，而给自己的女人角色罩上了适应生态环境的保护色，“女人一旦进入这样的角色，便也暴露了‘女人’期望有像男人身份认同那样的功能化效用，但也同时揭示了女人并不适宜实现这一功能”。在女权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女性不仅“成为”去人物形象中的一个人物，而且也成为挫败原有身份认同的契机和要素。“女人”也就因此使得性别的固定性因为差异和分裂而达到极致，也就因此既创建了性别、意义和身份认同，又毁灭了它们。“女人味，”苏珊娜·菲南（Shoshana Fehnan）写道，“是‘可怕的’，不只因为它是阳刚之气的对立面，而且是因为它制造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女权主义的兴趣因为这种方式而失去了

自己的特殊性，作为解构要素的女性也因此“成为一种不能代表自我差异的似是而非的讽喻”。这样的事物观察角度必然导致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与那些“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即那些以女人自身的“真实”报道为女人提供身份认同可能性和角色模型的女权主义）的距离。但这却是一种非自愿的保守主义，因为文字被理解为是对一种非问题性既定存在的被动性反思，“也同样将女性自我作为一个整体和整体不可分割的人文主义的个人（Vinken：同上），作为非问题性的自我认同”。

社会化越是充分，就越有必要销毁整体，单一化的解释也就会显得愈加模棱两可，因而陷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陷入新的宗教、新的禁欲、新的性感、新的母性和新的阳刚之气等的危险就越大。正是新的阳刚之气，几十年来尤其是在美国叫喊得最厉害。人们期望找回的是“原始的男性气概”，也就是作为回归森林中的亲和自然、强壮有力和富有情感的种马，可以与狼跳舞，至少在周末又充满了浪漫情趣，能够扮演印第安人。这类的流行小说有：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的《铁人约翰》（*Iron John*）和萨姆·基恩（Sam Keen）的《雄心抱负》（*Fire in the Belly*）。

同样可疑的是有些女权主义者所呼唤出的某些力量，人们相信这些力量一段时间以来已被揭露具有肯定父权制的倾向。因此，玛丽·戴利（Mary Daly，1986：13，15，27 ff）就在“基础女权主义哲学”中听到了法国军团在“整个世界”的脚步声，这是一个“既有着种族主义心态并制造种族灭绝（Genozid），又有着强奸心态并屠杀迫害妇女（Gynozid）的军团”。与此相反，只有协同（Gynergie）才有助于解决真实的问题，协同是一种“女性化的能量，它既是构思又是创建，拥有如同自然力量那样的创造性”，一种女性的欲望，允许女人“占卜：预见、预测和预知”。作为对女性和女人进行非人化和父权宗法性抽象的一种迟到的反思，它聚集了神秘的心不在焉、本体论的调料和唯意志论的第三条道路。戴利能够赋予女性欲望以光泽的最初创造力量，无疑是女权主义神

秘趋向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这种趋势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的这个具体的女人，有着与那个具体男人一样的冷漠或热心。我们可以在私人和公众领域中看到这类例子。但所有的女人，也包括具体的女人，都不得不在父权制的性别歧视中生活，不管她们现在是像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那样，把这种歧视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强奸体验，还是如同一位女心理分析家向我保证的那样，根本不存在这种体验。一些女权主义者关于“所有女人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和所有的男人都是施害者”这一论点，我认为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之所以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摆脱或逃避父权制的权力，也包括我们那位女心理分析家，尽管她从事着一份具有高度社会声誉的职业；她只需要在夜晚独自在城市里走一遍，或是向一份科学期刊递交一篇科学论文，就能从内部和外部经历相同的性别歧视（调查证明，同样一份科学论文，如果其作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就会得到专家较差的评价）。之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论点具有对立化的特点并以另一种不同于父权制的结构来决定一个女人最终将成为一个冷酷的战争者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散文家。如果这种对立化论点真的能够成立，那么所有的女人就都是客体和受害者，相反所有的男人就都是主体和施害者——鉴于目前的社会化程度，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主张。由于父权主义性别歧视的罪行而不得不极端化的女权主义论点，蕴含着一种危险，由于死盯着某一种压制而忽略了另一种压制：在女人的面前侮辱、歧视、鞭打和强奸她们，而在女人的背后又将她们贬低为是和男人一样的社会粗饲料。

总的来说，人们可以从妇女运动中学习，生活和概念有着不同的领域。没有一个单一的概念能够解释全部的生活。不管是性还是女性，不管是父权制还是社会化，都不能作为一个能够总括全部生活的概念。在生活和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被深奥的哲学所掩盖的深渊，正是这个深渊，使女人们可以唱出一曲自己的悲歌。因为毕竟处在顶峰时期的父权

主义哲学也“启发妇女构思出了自己的理念”。但是，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资本这个概念不会孕育新的生活，为此绝望的并不是一种普遍意识，而是个人。但是如果没有情感女权主义所特别厌恶的一般化和概念上的努力以及突破，那么性别歧视的状况只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喋喋不休的诉苦。由于普遍中的特定差异受制于普遍性的限定，概念女权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和社会）平等和相异性就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成为统一和认同的口号，另一方面则又成为单一层面上差异和不协调的口号。

21 性别差异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对我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是，这里不仅只是涉及日常生活意义中的两性关系，而且也涉及性别差异自身的一种无法回避和多层面的纠结，因为尽管有着一切父权和性别歧视的各种公开表现，类的差异自身仍然扮演着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介角色，这种角色是一种纯粹补充的、中性的或站在对立立场（23章）上的思维绝不可能满足的。毕竟性别差异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基础：它不仅沉淀在无意识中，是意识的一种事实；它也在这两者的自身中构成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部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心理分析学家所描述的关于所谓儿童性心理发展过程中（描述的标记：口腔和肛门发展期，恋母和恋父情结，阉割和穿刺恐惧等），人的性将与身体、心灵和社会意义上的性别不可分地铸合在一起。这种铸合过程的顶峰期在男性以手淫自慰的出现为测量的时间点，大约在出现第一次射精前后的两年间，也就是在青春期阶段；在女性，由于她们在这个意义上的所谓性激素的影响很可能低于男性，故女性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别体验按班克罗夫特（Bancroft）的研究（2003）显然将在青春期前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对身体和幻想产生影响。其中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性别和性不仅只是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是分离的，如性别差异很容易辨别；而且这两者也具有关联性，如受性别差异影响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与性别差异的联结，这是无法忽视的。

通过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对既定的性别差异多少有所反思的今天这一代性学研究者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一挑战，而不是用无谓和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性政治或泛泛的自由主义空谈打发这一挑战。但这里的关键点仍然是：没有一个男人会清楚，更不要说去理解，突出的乳房、周期性的生理出血、孕育一个新人的生命、能够将人真实地带领进这个世界和作为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出生、儿童和母亲身份等问题，绝不是偶然成为男人和女人关系中的总体问题的，它们无疑有着一种个人与政治、实践与理论的意义。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看到，如果男人和女人没有物质上的平等，那么就不可能对父权制有一种决定性削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非心理的和前在性（既定）的性别差异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如既往地还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显著，那么实际上根本还不存在真实心理意义上的性别差异。迄今为止，我们还只认识在物质、社会和政治中的性别差异，因而也就是我们还只看到由女性的精神退化和自我贬低所表现的性别差异。只有当不同的性别都得到相同的对待并且能够从事同样行动的时候，也就是从任何层面男女都被认可具有同等价值的时候，才第一次构成了有着生物躯体基础的性别差异，这是一种远比男女社会性别差异更为基础的性别差异（96章）。但是经济至今仍然主要决定着人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人的身体在说，这个人或某个人是劣等人，而是社会化了的人在如此说。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并且被自然主义的父权主义错误解释为解剖生理之“命运”的女性自卑感，仍然一如既往是一种社会的“命运”（同样，男人也必须表现自己的强大）。只有当妇女享有社会平等的时候，幼儿才能把他的母亲看成是一个与父亲平等的人。只有当父母双方都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向孩子传递不同性别却有着同等价值这些信息和理念的时候，也许才能打破那个歧视妇女的集体性恶性循环，这个一代代传承的魔圈般恶性循环使妇女普遍成为第二性（Sexussequior），而使男人在总体上成为第一性（Sexuspotior）。

杰西卡·本雅明（Jessica Benjamin）1990年发表的《爱的桎梏》（*Die Fesseln der Liebe*）中表述了两性关系的主体互动理论，这一理论的关键点是“承认”这个范畴，但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她建构承认的过程，是首先只有在哲学和心理学上加以展开，才能达到“承认”。但是在她研究的结尾，本雅明却认为，女权主义运动为“男女间的相互承认开拓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同上：217）。是的，关于“平等的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这一构想”导致出现了“一种新的逻辑，即一种坚守两个敌对力量紧张关系的悖论逻辑”（同上：214）。因为她把敌对力量之间的关系，首先理解为是这么一种关系，即我们同时既有被承认又有独立的愿望，“另一个主体能够摆脱我们的监督而我们却又很需要这另一个主体”（同上：214 f），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况。尽管本雅明的思考超出了心理分析的框架，但她的理论仍然与心灵理论和心理中心论相距很远，就如她想去店主那里付一张不是由该店主打出的账单。本雅明的悖论和两性的敌对理论，只有位于心理内部和处在心理之间时才是有活力的，但并没有从物质或经济的角度去讨论社会。承认，这个对男女平等真实有效的范畴，如果没有对妇女有利的大规模的物质重新分配，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主体”，如果只是在心灵上进入一种物质和前在既定的等级关系中，而并不进入一种保留性别差异却又相互平等的关系之中，那么什么是一种“主体互动”，什么是一种“承认”呢？如果男人和女人都能够相互为另一个承担责任，如果他（她）们都能够平等地发展自己的其他方面，那么绝大多数妇女双倍或甚至三倍的工作和生活的负重，应当被确认为是社会问题，并且尽可能地排除这些问题，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和抚育孩子等一系列无报酬的社会必要劳动，必须作为一种专业劳动支付报酬。如此这样，尽管还不能完全彻底地消除倍倍尔所说的“性奴隶”，但至少能遏制它。只有当妇女的劳动，如社会主导意识形态通常所说的那么漂亮，按业绩获得报酬并得到普遍承认的时候，男人才会真正承担家务和抚育孩子，男人才会在餐后洗刷盘子和背着孩子到处溜达，而不是仅仅出于负疚感，不是为了证明爱情，也不是出于一种

主体解放的心理需要才偶尔帮助做些家务和照看孩子。

22 男人和女人关系中的难点

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就像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的关系那样，有着一个难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一个解决这一难点的方案。没有一个社会会使所有的人都同样平等。一个这样的社会“和谐”甚至是毁灭性的，因为它抹杀了所有的差异；而没有了差异无论是生物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的存在都无法得以继续。即使特意构造了在差异中的平等，也将无奈地把对立和对手锁进一个泛泛而谈空洞的笼子里。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难以思考性别差异，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前定的程序，这个前定的程序已经无法再“重新启动”。另外，我们关于各种多样性的想象也不存在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们对此的想象来自我们按理性主义规则的思考。未澄清的、顶礼膜拜的、神化了的并仍在神化着的，是我们关于差异和平等的想象，人类躲在女性中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但是意识形态却仍然一如既往习惯颠倒地表现这一事实，即按现有的意识形态来说，只有男人才是人。那些把既定的性别关系参照男人和女人的生物本质或规定加以分析的研究者，通常总是将文化和社会的不公正，毫无顾忌粗鲁地注射到非历史性的、恒常不变的、“岩层般”的大自然中去的研究者或思想家，他们期望在一切可能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开放性中，以不变应对万变：一切都保持原状。性别差异当然是由社会造成的。各种社会形态对生理解剖意义上的性别差异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那些似乎来自自然的性别差异，实质上已在事先受到了性别歧视假设的影响。因此，即使是从弗洛伊德、费伦茨（Ferenczi）到赖歇这些理论家也充满了自相矛盾，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社会问题或多或少在第一层面上神话般地直接归咎于生物意义上的事实。

主体自我意识和社会物化的难点，把我们的世界推向崩溃的边缘。男女两性都经受着均等化的强制。男性的差异越是弱越是无意义，那么

他们就会越粗鲁。文化的性别幻影就是为了最有效地掩盖使两性相互分离的裂缝。作为拜物主义者，男女两性都从自身出发强调自己的价值，并以此争取自己的权利。男人对女人和女人对男人的关系，现在给人的深刻印象是直接的、受交换强制、父权主义和物化。但正是这种表象导致“男性”和“女性”成为固定的社会性别模式，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悖论。

这期间重又毫无社会影响的女权主义面对这个不可解决的任务，只能展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是怎样性化的，比如科学是怎样因为没有实体而陷于传统的主导思想之中，并只能把男性和女性、颇有价值和无价值、有用和无用等二元化向上或向下移动、归类和管理。以优越的女性取代优越的男性，无疑只是对已经现存的状态的一种逆向置换。因此，鉴于男人和女人自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缩影，鉴于每个不同的社会都建构有性别差异的不同形式和内容，必须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思考性别差异。一种没有社会理论想象的女权主义，根本无法真正思考性别差异。但因为男人和女人不仅仅只是社会的缩影，而且也同时是相互的一种否定，如果我们不想把自己贬低为物，如果我们不想陷进永远模拟、胡言乱语和编织关系网的权力体系的泥沼中去，那就必须对性别差异，如同对性的个人差异的思考一样，也从特殊差异的角度加以思考。因此可以说，如果只是从普遍性的角度谈论“这个”女人或“这个”男人，无疑暴露了自己对男女不平等的肯定，因为它跳过了其他一些偏见、结构制度和身份认同（比如肤色、经济状况、性倾向或偏好）；但是如果只是泛泛谈论世界范围内的父权主义（比如阿拉伯、非洲或西欧国家的父权制），那又是肤浅的，因为这些谈论只涉及了形式而没有内容的论证。除此之外必须确认，纯粹的女性或纯粹的男性，只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构思，是一种社会神话；美国性学的那些研究者和德国性学的那些女性研究者愿意谈论的那种把女性作为第一性的思想与关于优秀的性这一思想，来自一个完全相同的思想源泉，即原始神话的思想源泉。最终必须认清，绝不允许将同一个女人（或男人）分解为绝对分离的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女人和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女人。但是从解剖

学、思想理论和政治角度思考，必须置放在思想中进行，古典哲学家就已经懂得这一点。

只有在一个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不平等的社会里，才会去猜测哪个性别是第二性。在父权制社会，女人自然成了第二性，因为她们只能进行生育的再生产，却不懂得认识和规定社会。与此相反，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也认为男性是第二性，因为女性在生理上优越于男性，并且也有更多的潜力。这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这种理解自始至终从高度到成就来说，都完全等同于男性优越的思想，只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表述出来而已。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鲍勃（Baubo，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老年妇女——译者注）和阴道在象征性和现实性上都与男性崇拜和男性阳具有了相同的分量，那么男女两性才具有相同的价值。到了这个时候，性别的差异不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受，而是一种享受，对由于一致性而正在遭受威胁的和谐来说，则是一种保障。但是一个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社会，绝不允许在自身中存在这种性别和谐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妇女的平等就意味着是一种有着与性别无关的其他不公正方面的平等。尽管事实如此，但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是我们不应忘却：性别差异，不管现在是由性别歧视构建的还是完全出于其他不同的理由，但都证实了：客体对象，如同客观观察角度的可换性，并不是一切。

23 性别差异的逻辑

即使没有外在和内在的性器官状态，更不要说完全没有基本生理逻辑意义上可辨认的性特征，比如性染色体和性腺，我们仍会强制自己把那些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区分为“女性”（w）和“男性”（m）。有些性学研究者甚至记录了一百年前的幼儿最初就是按现象学逻辑的性器官特征辨认自己身边的人。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器官差异似乎非常自然，但事实上却是非常根本。它甚至有着一种逻辑地位，似乎是康德《纯粹

理性批判》的一个对立面。“性别的对立，是男人从矛盾出发而女人则是从对立和极端的角度所建构的”（Lindemann，1993：288）。以经院逻辑语言表述的这句话，激起人们去思考：是否真的能够从逻辑的角度理解性别的差异？女性（w）和男性（m）的概念区分，是否在思维逻辑的观察中一定是对立和矛盾的？

自从亚里士多德（Decategoriae，10b-11b）在哲学逻辑中建构了概念以来，对立这个概念便意味着，只有当两个（或多个）事物完全相互排斥，并且需要一个作为站立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对这两者进行比较的第三者，那么这两者对立的概念才是成立的。如果我们从老生常谈因而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思考雌雄同体，从神话或深层心理逻辑的角度思考双性化人格，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或是从解剖学的意义上思考性别互变，那么w和m就是处在这么个状况中。所谓矛盾，则意味着这些概念，不仅相互排斥而且没有一个可能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第三者。而在w和m的关系中正是这种状况，因为如果我们对此做出我们的评论时，我们并不询问各种性别特征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们也总是强制性地试图立刻、乍一看、第一眼（prima vista）就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么因此就可以说，w和m是既矛盾又对立的一对概念？按照传统的经院逻辑来说，似乎就是这么一对概念了。按这种逻辑，只要我们接纳w为一个概念，那么m自然就是一个与其对立的概念，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状态，即某种意义上的中性概念。与此相反，非-w则可能是一个矛盾概念，因为用w和非-w便可能概括一切性别的概念。但是借助经院逻辑，我们并不能解开这些问题的疑难点。

黑格尔（Wiss.Der Logik，II：256）无论如何都拒绝将相互矛盾和对立的概念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这些概念被看做是两种特殊的形态，也就是认为每个概念都有自己固定的意义，而不在乎为这一决定去对抗（或反对）其他没有辩证意义和内在有效性的一切思考——这就导致一种假象，似乎那些对立的，便不再必须被规定是为矛盾的。”按

黑格尔的解释，这里的问题并不来自概念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中间状态的第三者。康德与辩证法对立的理论已经假定，按矛盾形式做出的判断也可能是对立的。他的二律背反证明了这一点。显然，不论概念的对立性还是矛盾性，都完全取决于此概念的综合语境。按黑格尔的理论，概念的对立性和矛盾性并不单独取决于它们的内容，更多的是建立在相互间的综合关系中。

在黑格尔之前，康德就已概括（比较《纯粹理性批判》，A：262，B：317 f）说：在哲学中，对各概念内容关系的阐释就是反思。传统的反思逻辑把内容上相互抵触或相互对抗的概念，称之为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是如果这些概念只是在内容上不尽相同，那么至多只是具有对立性。“抵抗”或“对立”和“不同”就是规定了对抗和矛盾概念内容之间关系的反思性概念。黑格尔对传统反思逻辑的超越在这里表现为，他不再接受概念内容间的关系是由概念既有的定义所规定的。不管概念的内容是否只被看做“不同”或作为“对抗”，完全取决于客体对象自身的确定性，概念只是对客体对象做了其自身确定性的表述。传统的反思逻辑是按反思规定对概念进行分类，尽管这些概念作为概念根本无法加以区分——这就意味着，这种分类法“没有任何辩证法的思想”。传统的反思逻辑有着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特性，就如同我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性别特征总有着一种简单的生理特性。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在自为自在客体对象的王国与专为表现客体对象的概念王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当我们对一个人的性特征做出第一眼的辨别时，我们会将性特征的区域从一切其他特征的区域单独分离开来加以观察——似乎男性和女性之间只存在着相互对立的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似乎男性和女性除此之外从其他观察角度比如从儿童或牧师的角度，从公共性工作、私人的家务劳动、政治或经济的角度，并不存在同样是根本性的但不一定是在对立意义上，也许只是在不同意义上的差异。

因此，在逻辑中同时也在生活中重要的是，对于应当在内容上表现

男性和女性彼此关系的概念，不应当只是表示概念类型的关系，不只是作为对立或矛盾的关系，不只是在概念的领域内对这一关系进行思考，而是应当依赖于建立在客体对象基础上的概念内容对此客体对象的界定。黑格尔在书中探讨了客体对象界定如认同、不同和对立等各种相互关系的反思形式。黑格尔把对对立的反思规定表述为认同与对立的统一（Wiss.Der Logik，II：493 f）。这是因为一方面，每一种对立都是一种不同的关系，作为对立的关系和作为对立面便不可能相互认同。另一方面，相互对立的关系并不表现为随意的也就是简单形而上学意义上对立两者的区别。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关系，在我们举例中是w和m的关系，按黑格尔的理解是“各种不同认同的统一”（Wiss.Der Logik，II：4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w和m，两者是相互否定的。如果w作为肯定一方m的对立面，那么w就必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与非-m有一种认同，相反也是如此。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这种认同称为“否定性”。按否定性反思逻辑的结构，否定性是一种在自身中的自在关系：“每个否定性都建立在自身之中，只是作为一种自身的关系才与他物有所关系”（Wiss.Der Logik，II：42）。这里得出的适用于我们例子的结论是：如果w与非-m以及m与非-w相互认同，那么w和m便是相互否定的。这种关系得以成立的条件是，w与非-非-w的认同。也就是说，作为自身关系的这种认同是通过两次的否定媒介才得以成立的。黑格尔因此把这种否定性也称为“第二次否定”或“否定之否定”。

如果我们为某个人配上谓词w或m，那么我们对这位值得尊敬的人和他（她）的位置不加质疑地运用了一种形式逻辑原则意义上必要的（否定第三者的）排中律。这种形式上的分离是我们为了“防止自身矛盾”而发端于理解的“意志”，但是黑格尔的否定性（以及矛盾律）概念撕裂了我们原本因为这种形式上的分离而获得的安宁（Encycl.Der Philos.Wiss.，§119）。由于排中律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那也就意味着男或女的每个称谓都或是肯定某种状态或是否定某种状态，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中间状态，这就将导致在形式逻辑的意

义上，必须放弃顾及客体对象和客体对象规定之间的关系。因此适用于我们举出的例子的结论是：一个人或是得到一个w的称谓，或是得到一个m的称谓；并且因为首先是心理逻辑和社会逻辑等经院逻辑意义上的，也就是说这里主要是通过我们生活中的心理和社会条件而做出的判断。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被我们看做是男人或女人，只是因为我们显然完全无法忍受一个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那种刺激，一个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这种状况在我们之中所激起的迷惑，也在事实上激化了对我们的刺激。曾经被我毫不尊重地称为性别排中律（Sigusch，2004b）的这种在形式上似乎充满逻辑的形式逻辑排中律，一旦被性取向实践的现实多样性挤进它直接的狭隘之中，它就会从自身绽放出奇异的花朵。这时，“排中律”的一切抽象就会产生效用：它会放弃对一个客体对象的称谓规定，它会使这些规定与其他一些规定相对立，它会如黑格尔强调的那样，将已有的一定的“反思逻辑基础”，作为对立关系的前提——并以这种方式，消除矛盾（在黑格尔那里是反思规定）和我们从心理逻辑角度所说的迷惑，设置、建构和巩固显然不可避免的两个可供选择的性别——男人和女人。鉴于这整个过程都以理解排斥或忽略了重要的关系和媒介，它也就以它给出的称谓作为客体对象的基础，使客体有了“某些已经死亡的固定不变的内容”（Wiss.Der Logik，II：57）。这些内容成为我们今天在全世界通用的（男和女）性别标志：清除了矛盾，在外观上似乎完全符合形式和论证逻辑，似乎统一了赤裸裸的事实而有着一些生理逻辑意义上的内容。

由此可见，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是逻辑的。因此也不能用逻辑的语言描述它。但是我们进入哲学逻辑所做的这一小小的漫游，也许并不是完全徒劳的。我们至少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学到，肯定与否定，对立关系，也就是这里所指的w和m的关系，是“各种不同认同的统一”。被黑格尔称为“否定性”的这个概念所具有奇怪的身份认同，如同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是一种自我关系：“每个否定性都建立在自身之中，只是作为一种自身的关系才与他物有所关系”。如果真的存

在一种性别的逻辑，那么就可以在否定性的关系中寻找这种性别逻辑。任何似乎来自自身规定的性别，只有通过那些与它对立的性别的规定，只有在对立面的规定中作为对立方和以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为不同方，才能证明自己究竟是什么。作为黑格尔否定性的性别认同——它的哲学版可能就是宗教哲学家海因里希（Heinrich，1962）所说的“性别间的张力关系”，心理分析学家赖歇（1990/2000）又进一步解释为：在男女性别之间和在一个个人之中的一种张力关系。

这种张力关系不仅渗透在性的领域和知识分子的领域，也渗透在一切领域。但是每种不同的文化对这种张力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态度和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伴随着新性革命的进军，w与m的关系在我们的文化中又一次进入反思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想从根本上理解性别的平等和不同、认同和对立，为了达到此目的，人们便又一次从罐子里取出了古典思想的成果，把它们装进密封瓶：林德曼（Lindemann）借用了普勒斯纳（Plessner），赖歇取出了马克斯·哈特曼（Max Hartmann），我则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和一种“性别的排中律”。这种排中律在我们对各种不同的女权主义和性学科学的研究中，并且也在那些关于性别差异和性别转化的研究中都曾与它相遇，因为这些女权主义和性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合时宜地甚至落后于经典哲学已经达到的反思水准。

但是“性别排中律”似乎能够制造出形式逻辑的稀有成果。来自政治—性学逻辑实践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很快就会向我们叙述：当1980年一个早先由我们提议设立一个关于性别不可确认者和性别转换者的性别从属性法律，因为在参议院遭到一个大众党多数派的反对而面临无法通过之际，埃伯哈德·朔尔斯和我受当时的联合政府召唤一起前往波恩，在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共同组织的调解委员会上，向大家阐述我们提议设立此法的专业科学上的动机和理由。我们当时的最高目标是，帮助那些想改变或放弃自己出生时被确定性别的人群，能够通过以自愿为原则的司法管辖权和在一种所谓的法律恩惠意义上，以法律的形式满

足他（她）们自己的性别愿望，在法律上允许他（她）们用一个符合自己实际性别意愿的有着女性或男性特点的名字，并允许他（她）们改变所谓的家庭婚姻状况。性别婚姻家庭状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或不怀好意，自由职业者或被雇用的职员，成年人或未成年人，有法律行为能力或没有法律行为能力，有犯罪记录或没有犯罪记录，绝不是这一切；性别婚姻状况只是表明自然状态下的男性还是女性，更具体些，也就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将这个人的婚姻能力记录在表现生殖关系的家庭户口本上，以便永久地确定这个人的性别属性。作为政治权利的一个变速杆的两帮调解委员会当时的状态几乎只是清一色的男性，因此也完全是一种通常的男权制。从与会人员的形态来说，只有男人、议员、政府成员、各部的官员、行业专家。这就等同于似乎从形态上来说只有女人坐在一起，然后由权力做出规定，谁在法律上是个男人。这种状况在文化上是如此具有本质性，以致一个男国务秘书只是在做一个女秘书通常所做的事。在我们当时严肃并难免从男性的角度针对一些特殊的变性情况展开赞成和反对制定有关变更名字和性别所属性的法律条款（性别变更法，简称TSG）的咨询和讨论时，一个后来担任州司法部长和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议员，一下子明白这一法律修改的巨大效应。他当时就说道：“这已经触及整个国家和法律的根基！”——该法律在1981年1月1日生效。

其实我们当时就已认识到，性别变更绝不会因为特殊法所授予的法律恩惠而导致出现男女性别的不确定性。我们所说的“性别排中律”又一次证明了它在意识形态逻辑意义上、在心理逻辑意义上以及如我们所假定的，它的只是表象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必要性：即使是变性的人，也只能或是男性或是女性。因此可以说，变性法实际上是一部重新建构两性的法律，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性别认同法（42章）。当时女性化的男人（wm），男性化的女人（mw），ag，bg，ig，甚至或是ab，ac，ad等还不普遍。但是已经不再能够排除新的性别形式，尽管当前的性别形态仍然还是非常固定。这已不再是一个逻辑问题。在逻辑上既不存在一种

性别也不存在两种性别。我们已有的逻辑告诉我们，m和非-m或是w和非-w已在逻辑上包容了一切。第一个构想（回忆一下fe-male“女性”，和wo-man“女人”，以及herr-lich相对于däm-lich。译者注：herrlich的词意是壮丽、极美，其前缀herr是男人的统称；dämlich的词意是愚蠢，其前缀来自dame，是女士的统称）不仅由于弗洛伊德而且也通过他之后的绝大多数心理分析学家而著名，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这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构想，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认为女性是原动力（Prius），男性是添加进来的，并且正从生物逻辑的意义上消失。

当然这两者都是元逻辑的，就是说，在事实和生活世界中，并且首先在心理逻辑上是无意义的。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沉淀和表现在自己的心灵里，因此所有的人在根本上都是双性的。“Sexus”（性别）来自后期拉丁语的“sexuell”（性的），并相同于性（Geschlecht），因此女人在心理上是“男性”的，而男人在心理上却是“女性”的，确实有事实逻辑上的女人，她们比男人“更男性化些”，也有比女人“更女性化些”的男人，如果我们暂且放弃一下性别的双性和它的躯体效应，将心理和文化作为进行建构的自然而不是作为添加物，那就会很自然地出现这样的情况：解剖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双性化被心理上的双性化所打破和中断，演变为或多或少拥有平衡和不惹人注意的男性或女性。因此，如果涉及一种新的性别形态和性别认同，不能永远只是受男性与女性的限制；我们也能够想象，两个活生生的人尽可能地终结在解除紧张的统一中：二在一之中，一在二之中，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生活，男人有了经期并孕育孩子，女人在射精帮助男人怀上孩子……那些我们曾经丢失的，终于又重新出现了。

众所周知，柏拉图（Gastmahl，189D ff）早就将内在于性别差异和隔离中，并被我们认为是人特有的超验的倾向，置放在我们曾经的自然中。正如在持续建构了千年之久的“欧洲爱情”的开始阶段的阿里斯托芬传奇剧作（aristophanischen Legende）中所叙述的那样，人类最初不是

两个性别，而是三个性别，即mm，ww和mw。那时的人们有着一种自身的安宁，充满自信，并对诸神构成一种威胁。宙斯因此把他们的身体切成两段，如同为做水果罐头而把水果切碎那样。宙斯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被切割而变得有德行些。但是这些生殖器被切割成两半的人，除了相互缠绕并没有去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只是渴望又重新生长在一起。这就导致他们走向自身的灭亡，因为他们为了相互的缠绕既不吃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兴趣。但是诸神不愿意他们放弃对神的服务。于是宙斯就不得不决定，在这两个缠绕在一起的性生殖器之间植入“欲望”（后来被弗洛伊德称为“本能冲动”）——从而构成了超验的倾向（弗洛伊德称之为“文化成就的源泉”），这也就是为什么宙斯把人的性生殖器官安置在人的前面，作为“证据确凿的广告”（faciesadfaciem）的原因，如人类学家所说，那么各持一半性生殖器的男人和女人就能够相互性交了。由于性生殖器曾经是向外生长的，以致另一半生殖器是在土壤里生长的，就如同蝉生长于自然的土壤之中。但现在生长和生育结合在一起了。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自那以后，一种性别便经常不再是性别，甚至不再是一种性。自那以后，曾经雌雄同体的生物在第一层面上成为原型性别，因此它们必须寻找那被切割掉的另一半性别，女性这一半的生殖器必须寻找它们原有的男性那一半生殖器；反之亦然。当时已经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性别（男权主义者自然只是顺便提一下女性的性别），成为原型性行为，因为它们已经拥有性生殖器，虽然还不完全，但它们并不具有性行为，它们的性行为必须在找到原型性别之后，当它们重又雌雄同体的时候，才能实现（并且只有通过恋母情结才得以实现，如弗洛伊德后来说明的那样）。原型性欲虽然也必须克服这类情结，但从一开始性冲动就在它之中具有第一层面的意义以及性的满足，因为只有这样，如阿里斯托芬所说，它们才能够最好地转向自己所应从事的劳作，关注国家的事务：这是一种美妙的，一种来自父权制视野的性和性欲关系，并且已经沉淀在一切现代有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理论中。

只有当那个成功打破或大幅度更换迄今为止经由多少代人传承的性别基因的轨迹，比如通过不再有性别外观差异的克隆，也就是只有当原有的性别认定已经不再具有意义，一个后性别标记的时代得以出现的时候，才能形成新型的性别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形态。也许只有当出现了一种在心理上与迄今为止的性别没有关系的性别或是根本不需要以性别为标志的生物，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性别——我们也许就不再能说是自成一格的性（suigeneris）了，但是我们还根本无法想象它的名称，因为我们的想象如同一切其他的人，仍还刻骨铭心地只是男和女的性别之分。即使是经由新性革命（38章）而拥有一定文化意义并也部分地得到法律认可的新性别，也仍然留下了已经主导几千年的关于性别想象的标记。但这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事实，我们今天能够以尊重并且也以日益友好的平和态度面对六到七种不同的性别：除了多少有着典型性别认同特征和性别经验的男人和女人之外，以后我们还会听到，性心理变性人（Transsexuelle）、性生殖器变性人（Transgender）、双性人（Intergender）、动态或是说流动性别者（LiquidGender）和无性人。但是在所有的理论争辩、政治争端和法律决策（比较，比如Uta Schirmer，2010；Barbara Schütze，2010）中都应当注意到，鉴于我们的文化，基本上可以说：有多少人的存在，就会有多少种性别的形态。性别在第一层面上是由文化和社会心理制造而成的，并不是如普遍所假定的那样，由生理决定的。没有一个人的性心理和性行为与其他另一个人有认同性。海因茨·于尔根·沃斯（Heinz Jürgen Vo，2010，2011）甚至向我们展示了一项研究，研究证明了即使从生物意义上也演变出众多不同的性别，绝不只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性别。显然，性生殖器和性别的差异化，是昨天已经化为水的雪（即已成为过去），因为它为性的差异假定了不可绕过的生物性基础。但是双性别者已经走得更远。这就可以回答吕迪格·劳特曼（Rüdiger Lautmann，2012）提出的问题——性科学是否能够随着性别差异化的消失而终结？从批判主义性科学的观察角度给出的回答是：这无疑是奇妙的，因为日

常生活中的性别斗争和性别压抑将不再败坏和阻止情欲和性欲。但即使打破了自然程序和社会程序的界限，所有的克隆都证明了一种没有性别规则的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仍只是一个梦想。

24 批判主义性科学的逻辑前提

启蒙和社会运动；给性和性别的苦难概括出一个名称（或概念）；难以张口诉说的性生活的不幸；在理论中因为坚持批判立场而极端悲观，在实践中为了不让自己错过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事而极端乐观；对人的性别和对其特殊差异推测的绝望，因为虽然这期间社会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其关于生活不只是简单地生存着，性欲和性行为不只是“性”的认知，但是仍然只有真实个人的性才是真实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性和性别的特殊性无法在系统中充分实现自己；还没有一种理论认知这种具有唯一性的代表权；在普遍性中不只是看到自我毁灭，而且也有自我创生；不能让经济制度与社会的性别制度和性制度一起走向崩溃；应当从差异、自相矛盾和矛盾的角度对这一切加以思考；坚守反驳肯定现状和白人代表进步的批判武器，因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替代它；严肃看待既定性（前在性）被规定和客观化的事实——这一切都是批判主义性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作为普通个人的个人性；作为平等中的不同性别的男人和女人；一种权利，但至少有着一种双重的公正性；引导个人与社会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但同时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分离；自我毁灭与自创生手拉手并存；活着的被作为死去的，而死去的又被作为活着的——这就是性科学必须面对的矛盾和悖论，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性科学的难点都是来自这些矛盾和悖论。

这些普遍矛盾和悖论与个人的心理沉淀和冲突，是我在1980年代构思批判主义性科学（比较比如：Sigusch，1984a，1984b，1988，1989a，1990）时的思考角度，为了在启蒙的进程中研究光明和阴暗，也包括自身中的光明和阴暗。但是认为社会是在进步的性科学却从变化

就是进步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就如一份保健食品商店的目录那样直接令人着迷。它在与时代精神进行着交配。肯定主义的性科学完全不去思考这些其实也意味着是体系的问题。它只会强制性地把性别差异置放进性别和性的主导形态中，因而能够毫不费周折地成为适用于全世界的课本知识。主张差异的性学对任何一种课程设置都感到绝望，主张统一的性学则坚持统一性。肯定主义性学似乎已经进入后历史时代，它对逻辑前提不再感兴趣，而是想抛弃这些前提。但是由于它并不知道后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没有为自己建构一种超验的地位，因而它并不能与启蒙告别，也无法主张启蒙后的新理念。肯定主义性科学只能简单地通过或是反对雄激素和阉割，或是主张阴茎植入术和伟哥来穿越历史。

对于肯定进步的肯定主义性科学来说，性（在有疑问的情况下甚至也可以与性欲不相干）就是谁在眼前正好有生物技术意义上的能力实践性交。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把这称之为非性欲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自身不会释放出超验性的刺激，只是反抗心理生理例外状态的一种自我保护。这种非性欲行为所实践的性交，是一种正常强迫症的病态，因而实施这一行为的人在性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一个物化性别、性和爱情这三者的性别歧视者，他不仅放弃了反对令人窒息的陈词滥调的斗争，而且也通过因循守旧的随波逐流而做出了一些不像话的事。肯定主义的性科学以子宫托或阴道栓剂，以裸体文化和遮羞布后面的布道，来搪塞对超验性的向往，如果这还无法完全搪塞的话，那么它也会与专家一起借助毒品或动用外科手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批判主义性科学不相信任何到处流传的胡说八道。它愿意独立思考和质疑，发现和揭露假科学使用的伪证。它不想成为常规学科，不愿将权利与道德混为一谈。它甚至努力分辨性犯罪与性虐待之间的细微差别，不愿用同一把话语的梳子、剪刀进行梳理和修剪。它并不满足于将所有的性犯罪者永久关押或阉割，并且也没有忘记，在母亲中也有妓女，在年轻的男妓中也有童贞者，在贞洁的妇女中也有人只有靠暴力激

起的幻想才能生活，如伊莎贝尔·阿祖莱（Isabelle Azoulay，1996）所展现的例子那样。批判主义性科学感兴趣的是“存在于我们之中的那些与两性之间的乱搞、偷窃和谋杀相关的事”（Büchner）。因此，那些“为情欲而凶杀者”如哈尔曼（Haarmann）和巴尔奇（Bartsch）都只是性本能冲动的罪犯，但并不是野兽也不是非人的怪物。

批判主义性科学不只看到了无性趣在性社会中的蔓延，而且也没有忽视错误信息对信息社会重要的误导。当肯定主义的性科学只看到那些已经改变了的和新的现象，并且如果这一切适用于它的认识论、技术领域和道德规范，便会把这一切都放进自己的购货篮里的时候，批判主义性科学却正在为这一切绞尽脑汁地进行思考。它不想把自己的研究简化和贬低为一种由国家许可的公证员对变化进行确认的功能。是的，现在已允许施行的变性手术，出现了真正的双性恋，我们也看到了性上瘾者；不，同性恋是无法“治愈”的，也不应当进行治疗……但是拥有国家颁发了公证权的性学，并不会再为此发出呐喊，没有反对也没有权利反对，因为它已经毫无抵抗地屈从了社会的命令；按此命令，非理性的性本能冲动应当被转变为一种受理性干预的行为。任何一种试图按命令提出解决方案的性科学，其实都对自己和自己的信任者提出了无限制的过高要求，因为普遍命令只会简单地轰轰作响。肯定主义性科学却认为这一切都无所谓。它将自奥斯维辛以最终解决为口号的一切解决方案轻描淡写地解释为危言耸听，似乎它能够展开一场保守的革命。

关于性科学应当对自己学科的哪些老著作进行反思这个问题（比较和比如：Dannecker，1979；Kentler，1984；Schmidt，1984a；Sigusch，2008a），我无论如何都会以对一切勤奋和勇气的敬佩，以对一切新奇事物和现象的兴趣去回答这个问题，不会去提及那些没有思想努力的学说，这类学说尽管明知对方说的是事实，却硬要用诡辩和挑衅的语言压倒自己的学术对手。这类学说中只有为了荣耀的荣耀，没有辨认出性鸿沟现实中的逻辑理论根据，并将性只是作为一件事来进行思

考，而这件事一般来说早已用科学方法做了广泛的研究（比较比如26章）。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性科学能够自称已在科学中拥有一种主导思想的地位（关于心理分析，请见29章）。因此，比如，在一本《性研究》杂志39期（Bd.35，Nr.1，1998）的概述中，将进化心理学、符号互动论以及民族方法学和社会学习理论，都称为与性科学相关的理论。各种理论争执的关键点是关于在性和性别之中，哪些是由自然前定的，哪些是由社会后定的。那些所谓的本质主义者（Essenzialisten）相信的是“真实的形式”或“本质”，而那些所谓的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sozialeKonstruktivisten）则认为从性的欲望一直到爱的形态，即一切性和性别的基础都是由社会构成的，因此都是可以改变的（比较比如：Sigusch，1980b，1984a；Weeks，1985；Lautmann，2002；Eder，2002）。对那些既非极端本质主义也非极端建构主义的理论家来说，我们所理解的并成为我们生活实践的性欲性行为，无非是转码、转换和价值重估的一种经常性的文化程序，因而受制于一种经常性的变动。与此相反，日常生活中有关性的意识，却仍然总是似乎以为性欲性行为的结构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由自然既定的统一。而在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具有可变性的许多要素的聚集。但是对批判主义科学来说，并不因此如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96章），在性和性别之中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内核。

批判主义性科学懂得，性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并且总是坚持并直到今天也如此认为，性的问题是各种技术阻止生育的最有效技术，或是某种由时代精神召唤的性别间的停战协议。性的问题，也总是有关自己如何生存的方式方法问题。因此，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对此做出充分肯定，仅仅强调它的渐进性。批判主义性科学坚持把那些迄今为止用来迷惑或无谓地漂浮在我们眼前的性现象，作为一种一旦被呼唤出便永久留存下来的精神，只要有不同的性别存在，并且只要还能够为其代言。把自己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性科学的批判主义性科学，有时也会

说服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反对任何一种生活的困难，特别是必须为少数群体担当起一种地震仪的角色。由于它是从差异和矛盾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它对自己使命的沉重和其不可解的特性不抱有任何幻想——并且懂得也会走向失败：性科学想为性的解放做出贡献，最后却只能设法制定遏制它的方案，因为在自身中被唤醒的那种出于本能冲动的爱，不能在自身居留，必须寻找一个得以发泄的地点，因而性科学所提倡的性解放只是一种乌托邦：它把人作为人，并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种人化的关系。性科学存在的自身就是对具体个人感知抽象和对它的否定只能作为无意义普遍性的一种明证。结果是性科学，只要它是批判性的，并且还没有陷入肯定主义的性科学之中，最终就只有一个不需加以批判的前提，那就是不要肆意与体系搅和在一起，而是要声援对性别和性形态的绝望反抗。

25 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人们认为实证主义的性研究，无非是不加反驳的肯定。事实上，只要它必须从一些根本的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角度谈论关于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它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援引了生物和社会性的技术。自金赛（Kinsey）在解剖、生理和升华的基础上的划时代研究罗列出一系列非常令人满意的“行为”和“立场”之后，这些年来又添加了“体验”。从实验和实证的角度描述性的职能和价值，就如同集邮者收集他们的邮票：这张邮票是新的，那张缺了一点齿尖，这是一张印刷出错的邮票，这个句子是完整的，等等。性欲和性行为便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约定俗成的职能与价值的统一，这种统一被性研究不假思索地用来作为研究的对象。

事实上，在这类实证研究中收集的实验数据是粗糙和原始的，因为这些数据没有生命和灵魂。深不可测的性表现，被强制归入科学研究的领域或被加上普遍惯例的规范，继而被缩减成少数一些典型化的行为，如约会、爱抚、交媾，然后宣布故事就此结束。虽然所有的其他表现只

要它们作为行为表现出现也是约定俗成的，但是如果实验者乖乖地完全按规范的命令填写这些调查表格，那就如同用水泥凝固和僵化了这些表格中的调查内容。每一种性表现形式的实施，都是一种有着内在意图的性行动，但是调查表格向实验者的提问却是外在的，比如：“您第一次与一个男人（或女人）性交往，是多大年纪？”然后便是综合这些调查数据，确认百分之多少的年轻人在什么年龄“与男（女）人有了第一次性关系”。但是那些参与实验的被询问者，究竟对那些问题理解多少呢？这种性交往究竟是指柔情、身体接触、爱的证明、异常的性经验？或甚至是同性恋的性行为？那些被调查者是怎样经历这些的？这对他（她）们意味着什么？为自己留下了些什么经验？

这里需要反思的是：性研究者是否有权利将鉴于极不相同的意图和意义、成因和影响因而有着极不相同的表现形式的性行为，用一种相同的标签加以概括？我的思考是，当今的主导秩序就是这种将无形变为有形，将模糊变为清晰的实证研究所导致的结果。这样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出实证研究的必要性。这类研究虽然还总是在将一些不同的表现同等化，却是沿着一条不是由它们或不完全由它们找到惯例的道路。除此之外，性行为的表现也只是说明了在实施研究的那一刻的性活动的不可把握的状态。

这就使得阐释在这类研究中拥有了决定性意义，但这样的阐释要想得以成立，只有当它也拥有其他可供支配的经验和一个概念的时候，才能圆满阐释原本粗糙的原始数据，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阐释必须与已有的惯例不相矛盾才能成立。在战后庞大的性研究中，马丁·丹内克尔和赖穆特·赖歇（1974）为我们提供了教科书般的榜样，批判主义性科学虽然不会出于对科学混乱的恐惧而去满足一种对系统的饥渴，但它也并不满意于占有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性研究那种撕裂碎片式的研究方法。实证和理论的性研究方法，恰恰就是将批判主义性科学所主张的那种研究方法一分为二的两个部分；因此这两个部分必须结合起来，不应

当分为一个以思想为主的方向和一个以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实证为主的方向。对于马丁·丹内克尔提出的“实证式的性研究也能具有批判性？”这个问题，我已在前面的章节（14章）做了探讨，现在则能够做出完全予以“肯定”的回答。

但是，如同丹内克尔也曾指出的那样（2005：53），实证式性研究在今天必须首先“放弃自己专注于通过询问性伴侣取得非常含糊不清的数据的那种方法，改变自己原有的关注点，更精确地调查和研究非交媾式性行为的表现和对性的想象”。只有当能够证明“这些非交媾式的性行为的表现和性的想象在性的世界里已经获得更重要的意义和地位”的时候，只有当实证式的性研究认识到自己“迄今为止对性欲和性行为的那种进行转换研究的方法已被证明是几十年前的方法的时候，这些性欲和性行为才能构成正如我所给出的评价：一种新性革命”（对此请比较38章）。

26 一个认识论的误区：绝对的自然

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和阿尔伯特·奥伊伦堡（Albert Eulenburg）在1914年创建的《性学期刊》，一直出版到纳粹登台，是一本性学总汇型杂志，直到今天仍属于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性学出版物。当年的杂志创办者是如何看待性学这门新学科的科学地位的？他们是怎样构思和设计这本杂志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布洛赫在杂志创办前言中说了些什么：

> 对性现象的一种真实的科学性的研究，只有将性的生理基础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才是可能的。只有从性欲性行为的生理现象角度出发才能解释作为精神和文化的性现象。这种因果关系永远都不能……被忽略。尽管与精神和社会科学有着最内在的相互关系，性学研究按其作为一种生理科学的本质……必

须掌握两大原理。一个是性的化学原理，另一个是性的变异原理。……性起源和性本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化学意义上的问题（Haeckels “erotischer Chemotropismus”）。……关于性的化学意义的这种想象，现在已经对性科学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意义，并证明了是一种完全幸运的启迪式原理。……因此可以把精确和完整描述以化学为基本过程的性现象（在这个词的最广义的意义上）以及从中引申出次要的形态和心理，作为性科学最普遍的研究任务。除了化学原理之外，另一大变异原理也证明了自己是走出诸多性学研究问题迷宫的主线。……在有机生命体自几百万年来永久的生死交替和永不停止的传承和延续中，没有一个有机生命体的形态相同于另一个生命形态，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种自为一体的特定个体，它永远和从不会重复，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近来反复强调的单一个人的能量、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哲学基础。……由曼德尔（Mandel）发现的遗传法则，对性科学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如同这一发展已经为植物学和动物学提供了最重要的密钥那样，将这一遗传法则运用到对人的研究上，并借助高尔顿（Galton）和皮尔逊（Pearson）数学的精确方法，也保证在理论关系中对人的遗传学和家庭研究能够得出有价值的成果，尽管所谓的“优生学”的实际应用仍处在最初始的阶段。……但是不允许忘记的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完全只是有关所谓的内分泌对“性欲”和“性”影响的一种不常见的扩展经历，因为除了狭义的性腺外，也有其他的内分泌腺在一种相当高的程度上参与了性的个性化的最终形成。往后的性学研究目标将是，精确确认每个单一的内分泌腺对两性的不同意义。……有着不可低估意义的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早期性经验，也在与中枢神经特别是大脑对性行为和性想象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系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对于这里所连接的、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那个概念，即性经验和梦都会被压抑在无意识之中的那个潜意识概念，肯定还需要做一种客观和精确的研究。……我在1906年曾提出了关于同性恋的一种化学理论，试图从一种与胚胎相关病症的单一的性荷尔蒙角度，解释一种从解剖学的角度几乎无法解释的现象，即为什么一个有着正常男性生殖器的典型男性的躯体中，却有着一种近乎女性的非男子汉的懦弱特点的心理。无论如何，这是解释与生俱来的同性恋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我们因此能够看到，一种纯粹的因果关系的观察，已经在这里提供了相当显著的成果……
（Bloch，1914：3-9；alle Hervorhebungen von Bloch）

伊万·布洛赫（1872～1922）虽然那时还没有找到“性科学”这个用语（如人们总是强调的那样），但已经使这门学科广为人知，他是这门新学科名正言顺的开创者之一。阿尔伯特·奥伊伦堡（1840～1917），是布洛赫的上一辈，是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平（Richard von Krafft-Ebing）、奥古斯特·倍倍尔、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同时代人，他作为唯一活跃在德国科学界的性学家，其职业生涯甚至在正规大学和医学界一直达到了顶端，并且不仅仅完全是出于这个原因而被看做是帝国时代的性学守护神。到此为止，一切都好。但是今天我们不免要问，性学杂志创始人对性科学和它的研究、对它的“任务和目标”的构想，是否在理论上早已过时，在实践中也并不合格？是否能够将性的个人化仅仅归结为腺体分泌的差异？是否能够将哲学仅仅作为外部自然的盲目耳语？是否能够把性幻想的活动仅仅作为大脑的代谢过程？主观的潜意识是否需要一种选定性客体的研究？高尔顿和皮尔逊能够作为精确数学的数学家？“并且终于可以将一种自然主义的性道德作为这一切的加冕，使性行为从性的理念出发成为一种自身非常自然和高尚的人生现象，并通过建立在生物和医学基础上的性责任理念而使之有了真实的道德内容”（Bloch，同上：10）。

这无疑是在说：自然的，也就是完全道德的；生理医学，建构了道德的基础；化学和医学，为性科学提供了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切都与我们今天有关性科学的构想完全相反。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确信：性欲和性行为，并不是一种生物学、化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理念或行动，而是一种社会的理念和行动。作为一个非常活跃和敏锐的道德历史学家的布洛赫，自己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作为一本新杂志的主编，当他们终于看到生物学拥有不可争议的主要地位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也无意地在他们的“序言”（Eulenburg und Bloch，1914：1）中记录了这一点。性科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只是从每个单独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逃向可能的安全地基。把内分泌、遗传学、优生学作为性学科的希望承担者——这就熔断了个人的特征，将社会问题生物化（在尊贵的创办人运用理想方式的情况下），并以此回避了政治。但至少在他关于杂志创办纲领文章的末尾，布洛赫（同上：10）还是提及了“有关性科学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性的启蒙、优生学、“改良种族或改良人种”、出生率的下降、“学校对性生活的影响”、卖淫，以及性与刑法的关系等。尽管生物学越来越非自然地人化了，但是有哪一门不把“人的繁殖”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生物学”研究内容的生物科学，能够解决以上提及的这些问题？遗憾的是，没有一门生物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应当最终放弃性学家能够无偏见和无前提条件地进行直接的科学研究、不去讨好也不去伤害某个人（Eulenburgund Bloch，1914：1）的理论，同样应当放弃的是那种性科学可以像生物学、生理学或物理学那样成为一门科学的幻想。但是这被当作了耳边风。奥伊伦堡和布洛赫的构想，不仅继续存在于今天的性科学中，而且还主导了性科学的理论和治疗。性科学中的这种天真的自然主义观点，显然是无法根除了。今天在性科学领域流行的（显然比1914年更明确），是将三个不同层面的性概念，一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社会意义上的这三个性概念置于性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但从事第三个性概念研

究的性学家，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绝大多数的性学研究者，都还在将诸如性欲、性别认同或爱情等这类社会化的行为，错误地归结为纯自然的事件，他们想像布洛赫那样以纯粹的因果关系解释这些事件，想将构成和刺激性欲的主要以及周边的腺机制认定为神经内分泌，并在寻找一种有机和有形的性物质，认为只有寻找出这么一种制造性物质的技术，才能在其中寻找出性的自然本性。但是，性的自然本性，其实就是事实上的自然，这就意味着在它之中不可分割地贯穿着认定行为和不受人的行为影响的因素。

通观一下过去几十年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献，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和实证理性主义的文章和方法占据了主要地位。因此也就几乎没有人感到惊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美丽的日子平均70%，在90年代已经平均80%～90%的患有阳痿的男人被确认为有器质性病变，按性学家的一贯确信需要进行身体治疗，在当前也许最好是用刺激血管活性的药物，也就是用Viagra和它的仿制药物。翻阅一下《性研究杂志》（*Journals of Sex Research*），仍会像以前那样起一身鸡皮疙瘩，因为那些早已过时的他们或事件仍活生生地出现在其中——高尔顿和龙勃罗梭（Lombroso），施泰纳赫（Steinach）和克格尔（Kegel），提图斯珍珠（激素制剂——译者注），阴道的性高潮点，阴茎测量，关于同性恋的化学理论，意愿的实现和必要时的排除，无限多的基因，但没有给出任何对“思想、行为或方式”等有用的“米姆”（Meme）作为信息单位，到处都只是有机繁殖却没有心理方面的内容，比如没有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家庭小说”。其实当古代思想家思考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时候，已经站在一条更广阔的地平线上，已经把人思考为是一种政治动物（zoonpolitikon），是一种从人类学和道德意义上有着自然和文化双重意义的生命体。

那些没有任何自然哲学思想基础只有自然主义观点的性研究者，必须因为意识形态与自己立场的近距离，而与同样广泛流传并粗鲁的性学

意见潮流，进行不断的争辩，这种粗鲁性学的关键词是：动物和土著民。这种从动物世界引申出我们的性的基本面貌的努力，是对任何一种有关人的科学的嘲笑，因为人作为一个种属，如果没有社会化的生活进程，甚至不会有自己的生物性存在。这种将我们的性欲性行为等同于所谓的土著民生活价值的努力，无疑是用一个棍子扼杀了迄今为止的一切启蒙成就（3章）。因为这种努力没有认识到，涉及人的权利和人的全部价值的性越轨，必须由道德、政治因而是社会做出认定，而这种认定恰恰就是天真的自然主义色情到人道的后果：政治机制能视情况而定，一会儿允许，一会儿禁止，但每次都借用正好适合自己意见和需要的某个自然辩护士的发现。性科学家们通过将自然和自然科学作为性科学的基础，宣告了自己政治上的破产。健康的民众感受和国家政治也就能不受干扰地决定，谁是一个具有完整价值的人，谁不是。

一种只是将所谓的性器官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和目标的性科学，无疑是在盲目操作。如同对吞咽的研究并不能建构一门营养学，因而对性反应的研究也不能构成一门性科学。因此，威廉·H.麦斯特（William H.Masters）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Virginia E.Johnson）都只能算是半熟练的生理学家（1966；以及Sigusch，1970b）；也正因如此，他们在西方以及东方的世界里，都被看做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性学家。他们的声誉来自仇恨元物理的色情综合征，这最后一点也使当时东德的性科学家与美国的科学家有所联系，也正是这最后一点，才使人不易一眼就看出这种性科学是没有深刻思想的，因为正是他们最终决定了科学研究的进程。麦斯特和约翰逊关于心脏会在性交时跳动得更快些（谁没有想到呢？）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的所有生理研究，与他们关于由某些性腺刺激而成的“肌强直”和“血管充血”的理论一样，都是些含糊不清和空洞的总体标准，有着一种典型的忠诚于身体形态的思维。人体学家期望在人的每一种感受中，都能找出一种可测量的物质要素，最理想的是一种荷尔蒙或是某个刺激源，作为人的感受的生理基础：催产素能激发关注和性高潮，神经营养素能促成坠入爱河，血管加压素鼓励忠诚，p76NAP

导致多人恋，e39rgt激发皮革拜物教等；对于其他的应用也有着一些明确定义的身体穴位，当前主要有C点、P点、A点、U点或G点——哈哈，我和大家开个玩笑。

27 一种无谓的寻找：绝对的因果关系

首先应该肯定，自然主义关于性欲和性行为的生理基础构想，通过解释遗传、荷尔蒙激素、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相互沟通和作用，至少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只是它在这一综合中并没有丢失自己测量性物质的目标，用简单和感人的方式来概括某些被定义为障碍或病理的现象。其次便是它按19世纪传染病爆发的模式，从一个单一个体的躯体出发解释那些高度复杂、由心理和社会因素决定的性欲性行为的构成原因：性犯罪，是因为XYY基因变异；男同性恋，是因为在胎儿期大脑缺少雄激素；易性癖，是因为HY-抗原的不整合性——直到国际上最优秀的《性研究杂志》又一次不可修复地吹破这些肥皂泡（比较Sigusch，1992/1995，2005b，2007a，2011a；Herrn，2005）。

只是这类研究方法既不能加以劝阻也不能加以阻止，因为这是一种流行的认识论方法。与此相反，如果谁认为人比断头的青蛙有更多的可研究之处，那么他就只能在这些花费巨大代价和以科学热忱进行的科学研究中体验一种荒谬。但是显然简化复杂事物，寻找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也包括最终解决方案）的意志是如此强烈，即使一个不参与这类寻找原因或有害物质的人，也能颇有成效地确认这些研究的不精确和不合逻辑，以及其最后结果的不科学性。这就使得因果主义者成为真实的研究者，诠释主义者成为喋喋不休的空谈者，批判主义理论家成为意识形态者。

由于纯粹只是寻找直接的最后原因，无疑也就否定了对作为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和作为在人体学意义上的应对物理的寻找，因为这些关系

的基础应当被确认为是有害的物质并作为孤立的要素加以清除。鉴于人体学—因果主义的应对物理研究不能放弃在理论上早就被克服了的所谓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基因与环境或原因与效应的相互关系，并且偏爱游离于规范的研究方向，它便不顾事物自身的逻辑，不去寻找异性恋的原因，而是如同弗洛伊德1910年在他的《性学三论》（*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1905）第二版时就已抱怨的那样，只是“自然”地（我们的文化总还是认为“自然的”就是“社会的”）去寻找同性恋的原因。以肯定社会进步为主旨的性学与自然主义性学的矛盾，是断然的，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也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反面。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或性政治家们看到无法满足被歧视的少数群体亲属以理性主义的理由或一种富有人性与人为善的伦理而要求完整的人权的时候，那就要借助生物学了——似乎外在的自然从自身出发为人的自由和正义提供了标准，似乎它不是不自由（更正确些是：无自由）和不是不公正（更正确些是：无正义）的，因为这些范畴是根本不允许用来针对它自身的。

可是，肯定社会进步的性学家总是一再聚集在这类出于好意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悲观主义的口号之下；按其逻辑，这种或那种性行为，只是“人的性欲性行为的一种自然变异形态”。在一个主张自由和宽容的时代的公众性领域，因此就必须思考，有同性恋意向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拥有完整的价值？如果天真的性学家在这类讨论中，让自己躲在有关性的这样一种自然本性之后，那他们为性偏离者争取作为人的完整价值的斗争已经宣告失败，因为这些性学家们已经部分地屈服于敌视少数群体的普遍意见，因为他们已经必须为此谢天谢地，如果那些性偏离者并不被证明是身体有病而只是一种偏爱性障碍，因为他们的对立面仍还不顾一切地总是将性偏离者身体的自然状态作为病理特征和作为争辩的话题，也因为这些性学家不愿正视那些歪曲和仇恨少数群体的社会和心理机制。鉴于性学家们将自然对象化，尽管这违背了他们自己所申诉的意图，但他们还是援助了自然科学对某种性欲性行为某种并不存在的原因的寻找。

28 一种分离的统一：躯体和心理

为了不导致误解，正是有关躯体和心理的这一关系（也如同从诊断和治疗的角度）需要我们再回忆一下，对于精神和物质、躯体和心灵或肌体和心理，虽然我们能够在理论上加以分离，但严格地说这只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因为它们在真实中是无法分离，相互不可分地交叉在一起的。“精神”构成“物质”的形式，“物质”也构成“精神”的形式。没有“灵魂”，我们根本无法感受我们的“躯体”；但没有“躯体”，我们的“灵魂”则是双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我们称之为“躯体”的，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灵魂”的，是对不可避免的感受和经验沉淀的一种特定积累。一个没有沉淀在灵魂中的躯体，是一个死的躯体。一个不体现在躯体中的灵魂，则是一个空洞的灵魂，如果用另一种神秘的方式表述它，则可以说它至多只是一颗来自天空的星体。我们的专业神秘主义将生物的分离于心理的，又将心理的分离于社会的，似乎文化个性化这种充满了裂缝的组成部分和层面永远无所不在，似乎人只是由这些分离和分裂构成。

在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哲学和科学继承了柏拉图分离精神与物质、躯体与灵魂的传统。笛卡儿对“精神”和“物质”在认识论上所做的众所周知的分割，就此开始了我们的现代化。我们能够隐藏建构自己独特的理性，我们的幸运经验被“客观化”，我们的科学能够就此翩翩然地从成就走向成就，使我们所有人都一下子不知所措。既出现了我们不想错过的令人豁然开朗的阐释，也有夺去了我们睡眠的掩盖真相的黑暗。当人们认识到，笛卡儿主义对精神和物质联结的切割，完全相同于以往所有的切割，哲学与科学便启动了一种反向运动。今天，话语分析、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试图再一次证明，批判哲学最晚自尼采以来已经认识到：笛卡儿主义的第一自然，按其真实性的程度来说，应当被看做是第二自然。

但在大多数性学家和自说自话的医学家的头脑中，仍还总是只有笛

卡儿主义的切割，因为，这几乎是病态的，医学学习通常开始于用刀解剖尸体，结束于用电脑的断层扫描分解器官。在这两者之间学生们还偶然（这用不了多久，是吗？）了解到，躯体的疾病也可能影响到心理。但在实际工作中，曾经赋予他们自信的所学的这一切客体化知识，又有了导致他们不安全感的主体性。他们虽然每天都在经历经典物理正在走向谬误，事实往往与它关于同样的原因比如有同样效应的这一推测恰恰相反。但由于他们在学生时代对于早已驳倒这种等于式方程的现代模糊物理，只是偶尔或附带性地有所听说，他们也就更愿意坚守最后的笛卡儿主义的分子遗传假说。

鉴于这样的状况，就几乎不需要再因为将性障碍分别分为互不相干的躯体原因和心理原因而感到惊奇了。但在根本上，一切性障碍都既有躯体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因而也受制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比较一种普遍发病机制的层面，见Sigusch，2007a和本书88章）。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划分只是出于务实和机器化的死板。之所以是务实，是因为无论认识论还是该学科自身或话语，都不能建构一条以综合思考为方向的轨道。之所以是机械性的死板，是因为这一学说认定，躯体结构中的特定缺陷必将自动导致特定的躯体过程的故障。但是让那些主张因果关系主义的性研究者如此着迷的这种生理—心理的因果复仇女神，总是只有当生物体活生生的进程被拆散或中止的时候，才能获得关键性的成功。也就是说，这种因果关系的方法，无非只是证明了如果割掉了阴茎，也就不可能再有阴茎的勃起。这只是按机械性的法则所进行的一种干预，而不是按一个生命体的各种条件的综合。使一个人失去性器官的灾祸和医学手术，除了能够“证明”人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性器官，并没有证明比这更多的什么。同样前科学的是那种认为可以通过解剖或认知荷尔蒙分泌就能找出极端性欲性行为根源的意见，似乎将人想象成没有血肉没有双手、性的勃起不需肉体的并不只是一种念想，似乎人形成的那个时间点，并不是用手沾满了鲜血，似乎性的勃起并不多于一种单纯的条件反射——或是并不多于因果关系的假设。

富有临床经验的性科学家都懂得，不管是狭隘的生理学家的因果方程，还是心理分析家的方程式，都不能解决或解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真实的情况是，如果缺乏性腺（比如通过阉割），如果躯体外表的性器官完全或部分的缺损（比如割除发育不全的阴茎，由于外伤或割除阴蒂），如果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的效用完全被抑制（比如由于抗雄激素的治疗），如果荷尔蒙完全失去了它的敏感性（由于所谓性分泌垂体的缺乏），如果被看做是交配或性源的中心神经区域遭到损害（比如通过一次立体定向的大脑手术），仍还是能有躯体的性反应和自然的性体验。即使从躯体的角度，作为肌肉神经紧张的一种特有释放的性高潮（如果将打一次喷嚏除外），并不与已有的存在或单一器官或器官系统的功能有关，并且根本不与性器官相关联（Sigusch，1970a）。各种极不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的性刺激都能激发性高潮：比如没有身体接触的纯粹的性想象，对耳垂的单独刺激（如同金赛已经描述的那样），小女孩的憋尿，成年女性的洗发和吹风等。此外，经历过的刺激与物理性的反应在一种间断的关系中，也多少是彼此依存的。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躯体出现最强烈反应的那一刻，却没有激动的情感；在情感最激动的那一刻，却没有出现物理性的征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总是有一些病人，按客观的检查数据来说，本来应该是必然患有阳痿的，但他们却没有阳痿的症状表现。近年来的研究也终于认识到，检查的数据是一回事，是否真的阳痿又是一回事。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被描述为因糖尿病而遭受阴茎动脉严重堵塞的男人，事实上却并没有勃起困难。最后一个例子是有关学科划分的狭隘性：按照一个相应的研究，因为血管严重堵塞且患有阳痿的男人，仅仅通过病状的性辅导，几乎就有二分之一病人的症状得到全部或相当部分的改善（比较im Einzelnen Sigusch，2007a：96f）。

那些认为90%的性障碍产生于器质性病变的躯体论者对躯体的偏重，如同那些认为90%的性障碍受制于心理性病变的心理学家对心理的偏重，都必须予以反驳。他们都忽略了，所有的躯体障碍都需加以心理

的承受，而所有的心理障碍都会加重躯体的负担，他们显然只是机械地构想了原因与效应的关系。由于在这种躯体形式的思考中，并没给个人留出位置，并且也由于只认同严峻的事实，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手术，也会遭到另一方的批评。但这里要避免的是自满情绪。没有一方拥有真理和人性，那么美国性学家爱说的生物力（Biological Force），自然就享有了理论和临床的优先地位。因此可以这么说，要想帮助病人，那么所有思想流派的代言人必须具有无限的耐心，首先是打破现有的一切，在他方如同在己方反对单一和隔离的思想诉求。只有这样，也许才能为患有性障碍的病人留出一个狭小的空间，由他“自己”决定，艾灸、心理分析或一次手术对他来说，哪个是更适合缓解他的痛苦的方法或手段。只有那些认为性活动似乎不需要人体的性研究者才会根本从高处俯视躯体生理性学家的研究工作。虽然这是有关身心的问题，但只有外科医生掌握了技术，才能帮助病人。在外科医生应当小心翼翼割掉肿瘤的地方，理论、理解和政治，都表现出它们的界限——这就是一切。如果他询问自己和询问那个病人，童年是怎么度过的，那他就会过度紧张，就会中断合同，从这一种技术转到另一种技术。性学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指出了这一点并认识到其中的危险性，因为作为一个躯体生理专家的外科医生一方面必须按他专业的成熟技能来衡量他，但在躯体生理之外的技术方面却只是如同路边的一个普通外行人。鉴于那个躯体生理医学家用他专业的外科手术与病人对躯体形式的思考恰好重叠在一起，他就经常会出于职业本能运用唯一可能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来改善病人病状或痛苦。而且社会也普遍认为，宁可让一个有性问题的人成为一个精于自己专业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对象，也要好过这个人成为一种可能的社会风险。一切对病人关于他的前因、个人倾向、情欲和瘾癖的询问，只会使大家感到迷惑；但是关于其身体状况的询问，则能使大家都感到安宁。

只是性医学在总体上却无法提供外科医学所提供的这种安宁，因为如不这样它就要被迫出卖自己以及研究个人人生经历的理论文集。文集

和人生经历：即使是批判主义性科学也不能绕过肯定、隔绝和透视审查。如果说愿意理解病人病情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加剧或恶化的努力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么个背景下病人也有权要求医生虽然还不理解却能够以伟大的善意和高度的专业职能对待自己和自己的病情。

从理论上来说，躯体是情欲的肌体，但不是极度兴奋的肌体，因为躯体在总体上只有借助另一种不同于自己的力量才能超越自身：比如借助想象的力量，借助感受性高潮的神经系统。有着理论和政治意义的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和以哪一种方式，可以运用人的物理性特征来建构或稳固社会统治。鉴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心理和政治不平等的训练和理由陈述，因而在整体上是如此全面也如此有所成效，一种两性差异的自然法则时至今日仍在无数人的意识中占有首要地位。一个妇女，从躯体外观到身体内部都是女性的身体特征，从荷尔蒙到染色体都没有任何生理偏离，因而整个躯体形态、全部化学分泌和所有遗传因子都是女性的；但尽管如此，仍有着一种内在的确定性，认为自己属于另一个性别，也就是认定自己是男性——这在今天被称为转性人或变性人，也就是性别反式认同或干脆简单地称为性别“转换”，这些都如同女人的生育幻想和男人的受孕幻想，都还没有被拢入现今风暴般的思想研究中去。

29 关于心理分析与性科学的相互关系

几个有关心理分析的假设，如：人并不带着已经建构完成的性本能冲动来到这个世界；儿童同样也是一种有着性本能冲动的生物；性在人的各个心理发展阶段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并在各个特定阶段的发展各有所不同；在所谓的性变态和并不显眼的性欲性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如此等等。这些假设在20世纪成为人们关于性知识的普遍精神财富。但近几十年来，国际心理分析的主要思潮，却从经典的弗洛伊德性理论尤其是从他的性本能冲动理论，转向关注他的其他一些理论和定理。今天的心理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已不像在它的创立时代那样是性

理论研究的定音锤。它允许性的一种“发泄”（Paul Parin），在它庞大的具有可见性的理论体系中，肯定也在它对病人的治疗中，却有着某些不可见之处。但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因其没有经过修正的清洁，是如今唯一存在的性心理分析，本来应该有能力在顾及性欲性行为结构转型的情况下，为欧美的文化制定出一种新的深层心理的性理论。尽管他在近期也曾采取过一些干预措施（30章），但它在它的主要理论中却回避了这一不可推卸的任务。

鉴于性科学，并且正是实践性的性科学，是为了理解人的困境和窘迫，因而关于潜意识和冲突的心理分析理论对它来说具有本质的意义（比较Sigusch，1984a；Quindeauund Sigusch，2005）。我无法说清的是，那些在总体上完全不承认心理分析有什么重要意义的美国和东欧的性科学，是怎样理解病人的冲突和主体的内心矛盾的。心理分析是如此应当珍惜，因为它严肃看待并试图理解作为个人的普通个人。它直至今天仍主要从多个方面把个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它不愿认可结构、认识方法、话语形式、绝对命令和客体都拥有既定的灵敏独立性，如同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那样。心理分析认为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不仅是被植入在它之中，而且也还总是自动的。它和主体性学一样确信，个人将不断重新创造所谓的性，因而也拥有了某种恰好被称为性的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至少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进行过一些可信或合理的研究，即使是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31章）引入欧洲参与讨论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关于动机心理的理论，也没有心理分析研究所达到的可信和合理度。我们的文化在过去的时代，只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表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为了在这里避免说疑难或是两难的）关系，当然它直到最后也没有掩饰它所运用的生物物理学语言，尽管做了越界的尝试仍然被迫绑定在某种认识论上。但由于它能够尽可能全方位地面对一个人，从而召唤出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个人中心化的可靠时代。与此同时，它也从个人那里得到了比其他心理学手册可以想象的更多的经验。除此之外，弗

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如同批判主义性科学，都有着令人鼓舞的保守精神。比如它坚持“长期持续的治疗”，因而反对以快速和效率为治疗信条的时代精神。

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未经修饰的心理分析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几乎完全接近于批判主义性科学；它在个人的自身中发现了一个名为“超我”（Über-Ich）的机制，“超我”的功能是自觉地代表他律的社会规则、价值等；一个名为“本我”（Es）的机制，“本我”是失范于当前或早就拥有主导地位的社会规则、价值等完全源自自身的本能欲望；最后是一个名为“自我”（Ich）的机制，“自我”是自主地决定个人做些或允许做些什么，但自我的这种自主是一种能够轻易辨认的假定，是一种在主体自身中的矛盾，因为它所接受的规则、价值不是经由个人自己的思考，而只是服从于社会他律的要求。因此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弗洛伊德帮助社会既定规则在心理理论中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并强调在个人的自主中规则多于自主。但是，在他的个人理论中，非社会的与超个人的内容都各自占有相同的位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许多观点并没有经过修饰和纯化，因而对性科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理所当然，批判主义性科学也批判地面对心理分析，必须在理论上理解它和超越它。它既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充分上升为社会理论和哲学，也几乎没有摆脱有机体和社会—实证的方式，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意味着它的理论必须被超越。而且它也不能将普通个人作为普遍性来理解，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关于社会的概念，也没有关于劳动和爱情的概念。没有一个社会批判的概念，必然导致它所解释的一切都将被平庸化和扭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富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学家乔尔·威特波克（Joel Whitebook，2003：704f）试图通过将内化和升华等心理机制解释为“和解”的形式，即能够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的和解形式，从而将富裕西方国家的普通个人，在理论上建构成一个强大的、富有差异的、广泛的和灵活的自我。他在借鉴汉斯·勒瓦尔德（Hans Loewald，1986）早

先的一些讨论的基础上，指责阿多诺没有“认真考虑升华这个概念”。阿多诺“陷入一种特定的历史境况中”，“这种境况阻止了他感受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观点。他对一个管理完全化世界的反感，以及他在市民社会文化中所看到的庸俗世风”（同上：705），使他不可能去发展一种“具有替代性、较少限制的自我整合形式”（同上：703）。拘泥于历史和屈服于自己的情感，阿多诺置那些和解形式于不顾，宣告了个人的终结。如果他不是如此激烈地予以拒绝，“那么他就能在一个认同传统严格整合的自我与一个酒神般消失的自我之间省去了声名狼藉的烦心选择，即那些应当是后现代为我们提供的选择”（同上：705）。我相信，阿多诺将在他的坟墓里被气得翻过身来（德国民间传说，如果晚辈违背了长辈的生前愿望，那个长辈就会在坟墓里气得翻过身来——译者注）。

从历史上看，心理分析是沿着潜意识与意识、内心想象与外部现实、结构与征象、体验与行为、潜伏与显现的差异而脱离了性学。夸张地说，肯定主义的心理分析家曾经和现在仍将为此感到高兴，如果所谓的多形—变态的基因只是存在于抽象中；但肯定主义的性学家却曾经和现在仍会感到着迷，如果性变态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心理分析家与性研究家的差异，令人不免回忆起所谓的异性恋与所谓的性变态的差异，因为心理分析只停留在想象中，而性研究则会直接加以观察或甚至进行实证。并且绝大多数性学家也不愿仅仅满足于把作为市民社会高度目标的主体自我理性描述为是不可通约的，如思考严谨的弗洛伊德学说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弗洛伊德（1892/1893：15）就已看到人在自己深层心理一个类似阴影帝国的范围内，保存着自己“被抑制的意图”，这些被抑制的意图作为“一种没有意识到的存在”被暂时保存在这个阴影帝国中，“直到它在某一天或某个时刻作为一个幽灵或一个可怕的事件从这个阴影帝国向外冒了出来”。这类“阴暗的想象”，康德在研究想象时就已谈论过（1798：16），“这是些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又存在于我们之中的想象”；这类“幽灵”，马克思也在企图解释自己的拜（唯）物主义特征这个概念时提及过（1867）；但是弗洛伊德又进一步将崇高理想、自

由意志和充满自信的理性作为阴暗想象和幽灵的对立面，而性研究学家伊万·布洛赫或阿尔伯特·莫尔（Albert Moll）则又进一步将崇高理想、自由意志和自信的理性贯穿在自己的全部理论中。按弗洛伊德的理论，市民社会的胜利进军，并不只是基于放弃本能冲动（虽然当代引领潮流的性学家们对此提出了指责），而是也同样需要压抑愿望和抑制思想。弗洛伊德（1917：11）的名言是，“那个自我并不是在他自己家中的主人”。弗洛伊德把这称之为是对人的自爱的第三次伤害，即继哥白尼的宇宙学和达尔文的生物学之后，由心理学所造成的对人的自爱的又一次伤害。传统的性学家像弗洛伊德那样很少意识到，阿多诺（1966）通过辨认出先验主体的无意识性，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第四种伤害；而与此同时福柯（1966/1971：462）也从“考古学”的角度下了赌注：“人将如同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人脸那样消失。”

在弗洛伊德之前，欧美的性学家已研究和写下的，可以在别处详细阅读（比较：Sigusch，2005/2006，2008a；Sigusch und Grau，2009），这里主要提及的是他们在弗洛伊德之后所做的研究，从力比多（libido），到性感区域和自慰，直到部分本能冲动、婴儿的性欲性行为、恋母情结、所谓的性变态，甚至越过了弗洛伊德直到经由保罗·曼特加扎（Paolo Mantegazza，比如：1873，1877，1893）认可女性性欲性行为；经由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比如：1864a，1864b）认可男人与男人的爱情。当代启蒙思想家看穿了意识的肤浅特性，打破了笛卡儿的传统，但又没有陷入一种与精神敌对的非理性主义之中；属于这类启蒙思想家的弗洛伊德无疑是个天才人物，他大笔一挥，结束了以往的性科学，以一种新型的平淡风格将其概括在一本只有83页的著作中（Freud，1905）。其中不仅有他最伟大和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成就，而且也将一些直到那时似乎仍被看成是不可调解的对立面，如遗传与环境、生物学与心理学、心理功能与心理障碍、神经官能症与变态等都置放在了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之中。他以自己的人道主义和促进和平的行动，将正常与变态、道德与非道德、法律许可的与将受法律惩罚的事件

结合起来——直到许多人最后终于明白，这一个如果没有另一个根本就无法想象。通过将婴儿恋、双性恋和变态恋等一些性欲性行为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扩展为心理—社会的行为，使得他那个时代的性学家们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这些性学家中，有的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些想法是“丑陋的”——比如亚瑟·克龙费尔德（Arthur Kronfeld）对弗洛伊德的“多形—变态基因”的看法。弗洛伊德所进行的性启蒙的结果是导致一帮可怕老人的人性化：哈尔曼（Haarmann）、贝托莱（Bàrthory）以及那位班主任瓦格纳（Wagner）现在都有潜能成为一切。其实弗洛伊德在有关性的研究的终端，并不如威廉·赖希走得那么远。赖希甚至已经思考到关于文化失性的问题，这就是说，性欲将会消失，人们愿意为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而放弃性。

但这不仅使他的理论陷入冲突，也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是性的解放，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更高的价值而应当压抑它。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公民的弗洛伊德更倾向于身体乐趣的一种平衡，认为一定程度的性满足是“不可或缺的”（1908a：151）。但是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公民的弗洛伊德却又想把性趣导向理性，不管现在是以物种保存还是以文化为由，性的出现都只是为了服务于它们。他并不把本能冲动思考为“无目的的有目的性”（如康德所说），也不作为“无用的有用性”；他计算和物化它，让它起源于有着不祥之兆的固定源泉，把它引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派和理性的客观性和目的性。弗洛伊德因此自己无法决断，对本能冲动究竟应当是称赞还是谴责？显然他还在犹豫，应当做出怎样的决定：是放弃本能冲动，还是满足它？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这就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令我们思考，为什么他的理论是如此吸引我们？我个人认为，弗洛伊德理论成就的一个秘密，在于他的理论的双面性。弗洛伊德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本质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建构主义者。中心概念的模糊性，有利于刺激人们的想象。他对力比多究竟理解多少？这里

涉及的是有形机体性物质的分泌，还是刺激的一种抽象？他的本能冲动概念更倾向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这么个事实，即那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研究者完全像个傻瓜在说话，写作时想象的是自己反正面对一群外行的读者，很少引用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资料和成果，不给他们发言的机会，无论如何都避免实际上很通常和必要的争辩。在涉及性学家感到有燃眉之急的性形态改革问题上，不管是涉及一夫一妻制还是两性关系，弗洛伊德都很是保守。但他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更有影响效用的是作为他理论中心的物理性转换：梦、潜意识、本能、性爱、托斯（Thanatos，希腊神话中守护死亡的化身——译者注）等。他借助这些形而上的内容构想了一个充满矛盾、不可预测的神秘世界来对抗以往这个太过于理性的世界，以便能够跳出狭隘理性世界的局限性。这样的学说能够帮助人回忆起，这个世界有着比客观和话语的理性事实更多的内容；具有本能冲动和行动能力的人，并不一定都聚集在坏的普遍性之中。弗洛伊德晚期的理论定理召唤出一种思想的痛苦，这是克拉夫特·阿兵（Richard von Krafft-Ebing）和伊万·布洛赫的理论定理所不能给出的一种痛苦。但是肯定主义性学研究者能够并且今天仍然能够叙述和测量，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从没有简单地想到性爱。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去触及这个世界的睡觉问题。

当然，弗洛伊德也有他的盲点，其中最重要的盲点在于他对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理解，这些是他个人和理论上的“黑暗大陆”。对于他的这个问题，洛曼（Lohmann，1998：116）说到点子上了：“弗洛伊德的著作完全是以父亲和阳具的名义（Jacques Lacan），写下了犹太父亲宗教和父权法的文字。”弗洛伊德长久以来对女性性欲和性意识的发展几乎毫无兴趣。即使他在1900年开始从事“多拉分析”（Dora-Analyse）之后的15年中，也没有一份关于女性病人的分析报告。直到1915年，他才提出了一份关于“一个女性狂想症病人案例”（Fall einer weiblichen Paranoia）、1919年一份关于“挨打幻想案例”（Fall von Schlagephantasien）和1920年一份关于“女性同性恋的案例”（Fall

weiblicher Homosexualität）。但是直到1925年，他才在以《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所产生的一些心理影响》（*Einige psychische Folgen des anatomischen Geschlechtsunterschieds*）为名的文章中，总结了他以往的一些零星关注或结论，并在1931年发表的《关于女性的性欲性行为》（*Über die weibliche Sexualität*）的研究著作中，在1933年举办的以“女性”（Weiblichkeit）为题的第33次新的讲座中，在《精神分析概要》（*Die Abrisses der PsychoanalyseAbrisses der Psychoanalyse，1938/1940*）的第七章中重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尽管或正是他自己缺乏研究女性性欲性行为的兴趣，弗洛伊德经常抱怨在有关女性性生活研究中所笼罩着的黑暗，即使在他的概括性文章已经发布之后，他的抱怨之声仍没有随之消失。

他在1926年写道：“关于小女孩的性生活，我们知道得要比小男孩的少，但我们无须为这两者的差别感到羞愧，因为即使是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对心理分析学来说也还是一片黑暗的大陆。”（1926：241）弗洛伊德通过心理分析把这片黑暗大陆展现在明处，但通过内在的话语解释，却又总是把它推回到父权制的黑暗中去。他所报道的许多观察，无疑受制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条件，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比如他说，女孩体验自己作为被阉割的不完全的男孩，女孩会遭受一场严重自恋的病害，因而自认“低人一等”，将自己看作“抗议式男性”反对阉割，成年后也不会发展出如同男性那样一种严格的超我。我思考，弗洛伊德在这里描述了父权制社会的生活关系在妇女心灵中的沉淀。因为如果女性在所有的社会机制中按上帝意愿和自然法则都被作为二等的卑贱的人，被表现、理解和概括为第二性，那么年轻姑娘和成年妇女在这种父权的专制下，怎么能够普遍体验和发展自己的性生活呢？

因此，对弗洛伊德的这种肯定父权制的态度，以及对他从描述个别现实案例便错误地推导出扭曲的理论普遍性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他从个别案例到普遍理论的推导中出现了两种严重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是

弗洛伊德把男性作为他研究的模式，并以男性为一切事物的标准；第二个扭曲是他与此相应过度和普遍地高估了男性生殖器解剖学意义上的重要性，结果是又同样过度地低估了社会的重要性和他自己所猜测的女性恒常本质的变化性。弗洛伊德感觉到了，但却没有认识到，他那个时代的女性普遍遭遇到一种比对男人更严厉的方式不允许她们发展自己的主体地位。他对女性的特殊性差异的阐释与主张种属超验和社会惰性自然目的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保持了一致。作为第一个批判主义的性学家，并且直到今天我们的性学仍得益于他的思想突破的弗洛伊德，并没有能够对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话语进行反思和反应。尽管如他所写的那样，他那个时代在妇女中已经出现了“解放了的女性”（Freud，1918：176）和“在男人中也有女权主义者的存在”（Freud，1931：523），但他除了对此进行了心理解剖外，却没有再做任何其他的研究。如此一来，比如他也就只能认为在“阴茎嫉妒”背后隐藏的是“女性对男人充满敌意的辛酸，这种辛酸在两性的关系中从来都完全可以有所窥见，并且也是‘女性解放者’的努力以及这类文学作品的最显著的标志”（1918：176）。

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者对女性性意识的发展和女性特质，对文化女性及其性欲性行为的构思，即便它不再从男权的角度理解所谓阳具或所谓阴茎嫉妒，也应当完全予以推翻。还在弗洛伊德的有生之年，一些女性心理分析家们，比如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在1926年就有勇气反驳这位伟大的心理分析大师。有关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有一系列内容广泛且值得阅读的专业文稿。我想在这里提及一些许多年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和著作，它们是玛丽·燕妮·舍尔菲（Mary Jane Sherfey）的《女性性欲性行为的进化和自然特质与心理分析理论的关系》（*The evolution and nature of female sexuality in relation to psychoanalytic theory*，1966），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心理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1974），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尼尔森（Margarete Mitscherlich-Nielsen）的《心理分析和女性

的性欲性行为》（*Psychoanalyse und weibliche Sexualität*，1975）以及《关于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理论和问题》（*Theorien und Probleme der psychosexuellen Entwicklung der Frau*，1980），南希·J.霍多洛夫（Nancy J.Chodorow）的《母亲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1978），乌尔里克·施毛赫（Ulrike Schmauch）的《解剖和命运——关于早期性别社会化的心理分析》（*Anatomie und Schicksal*。*Zur Psychoanalyse der frühen Geschlechtersozialisation*，1987），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的《爱的纽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和统治的问题》（*The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feminism，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1988），克丽斯塔·罗德-达尔莎（Christa Rohde-Dachser）的《远征黑暗大陆》（*Expedition in den dunklen Kontinent. Weiblichkeit im Diskurs der Psychoanalyse*，1991），尤迪特·巴特勒的《作为物质的身体：关于性别的话语边界》（*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1993），索尼娅·迪林（Sonja Düring）的《女性的性发展问题》（*Probleme der weiblichen sexuellen Entwicklung*，1996a/2007a），以及卡琳·弗拉克（Karin Flaake）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e*，2000）。

虽然只要涉及关于“女性的性欲性行为”、“女性的特质”，或具有整个普遍意义的“文化女性”等问题时，弗洛伊德总不免屈服于主流的父权制话语，但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思想家和性学家所屈服的其他话语，弗洛伊德的话语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反叛。比如他并不屈服于他那个时代被称为优生学的“种族繁殖”和种族“改善”的话语妄想。也正因如此，他不顾自己几十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对布鲁克纳（Brückner）和梅涅特（Meynert），尤其是对作为数学家和性修复学家弗利斯（Flie）的尊敬和追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躯体形式的自然科学话语的制约。在当时，这需要一种极大的意志力，因为他的新话语具有一种偏离一切和推翻一切的实质，正如我们从新结构主义者和福柯那里已经学会懂得了这一点。感谢弗洛伊德对躯体话语的拒绝，因而心理分析直至今天仍

然可支配一些如文化科学和哲学等的直觉推测。按传统哲学的话来说，心理分析的表意立场，与传统但日益成为当代性学的立场相反，正在成为主流规则；也就是说，它正在寻找能够解答一切悬疑，甚至能够将彼岸物理引入此岸物理的一种客观精确的科学。

30 一种心理性欲性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

按我的理解，批判主义的心理分析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必须共同行动（比较Quindeau und Sigusch，2005），以便建立一门新的既以心理学理论又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有关性欲性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这一学说不仅兼顾身体的反应、心理的需求和愿望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和性别的识别认同，而且也包括有关可持续性的文化变迁（特别是请见本节38、92、95各章）和当前的一切主流话语。这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使人成为性的生物（或现在已经不再是），并且也是弗洛伊德（1905）作为表述自己著名的性理论基础的那些团体的、文化的、社会的，因而也包括心理的状况，在这一百年里已部分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弗洛伊德（1908b：217f；Hervorh.V.S.）在他的《诗人与想象》（*Der Dichter und das Phantasieren*）中已经指出，想象或白日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更多的是偎依在不断变化的生活印象旁，在任何一个生活状况的摇晃中改变自己，从每个有效的新印象中感受一种所谓的‘时代特征’。想象与时代的这种关系，有其极重要的意义。人们就此可以说：一种想象似乎漂浮在三个时间中，即漂浮在由我们构想的三个时间要素之中。人的心灵活动联结着一种现实的印象，这是一种来自当前的诱因，它能够唤醒个人的伟大愿望，并以此为出发点去追溯一种早先的、大多是婴儿期经历的记忆，在追忆中满足了婴儿期的欲望之后，便又转向为自己创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境况，作为表现满足自己欲望的框架，这就使得白日梦或想象从这时起便有了起源于诱因和对自身记忆的痕迹。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通过这些连续的欲望就像一根线那样地被串联在一起了。”

有一些理论对弗洛伊德性理论所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修正和继续发展，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比如Dannecker，1975；Schmauch，1987，1993，1996a/2007a；Schuhrke，1991，1997；Mertens 1992，1994；Hoeltje，1996；Richter-Appelt，2000；Passett，2005a，2005b；Früh，2005；Dornes，2005；Kienbaum und Schuhrke，2010；Löchel und Menzner，2011；König，2012。这里也请比较本书70、71、87各章）。鉴于文化变迁的快速，一种新的性欲性行为，特别是关于婴儿性欲性行为的心理学，在未来不应当如继续发展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样，再用个一百年时间加以思考（比较：Dannecker und Katyenbach，2005；Quindeau und Sigusch，2005）。在2008年，心理分析家和社会学家伊尔卡·昆多（Ilka Quindeau）已经有勇气提交了《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分析性理论》（*Die psychoanalytische Sexualtheorie nach Freud*），心理分析家海因茨·米勒-波茨（Heinz Müller-Pozzi）也发表了《一种针对我们时代性本能冲动的理论》（*Eine Triebtheorie für unsere Zeit，2008*）。

在关注弗洛伊德的同时，他们两人的文章也同时主要引用了让·拉普兰济（Jean Laplanche，1988）的理论，以便将主体互动的内容引进心理分析的本能冲动和发展学说中，以弥补诞生于进化论生物学阴影中的本能冲动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从其自然性上缺乏的主体互动内容。那种自19世纪以来被我们称为“性”的感觉，按拉普兰济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来自于成人向儿童所传递的“神秘信息”；也就是说，当这个孩子还根本不能理解和看出在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事的时候，就已经被成人“引诱”成为一个性的生物。这个孩子与照料他的那个成人彼此便因各自都是性的生物而成为陌生人，并将终生保持这种陌生感。他们相互都无法知道对方的性是怎么回事，即使是花费一万个小时进行心理分析和心理咨询，也无法真实了解对方。这就不再令人奇怪，一方面被供养，另一方面又被出卖的孩子，为什么不只会在心里升腾起喜悦和幸福之感，而且也会在心里充满不乐意、痛楚、恐惧和厌恶。按拉普兰济的学

说（2009：537），在婴儿性欲性行为的形成期，使其受到影响的并不是在（充满欲望的）母亲与接受她所传递信息的那个孩子之间的家庭（或亲戚）关系，而是儿童与那个照看者之间的年龄差距，受制于那个作为看护的长者有意识地向儿童释放出的那些多少有着象征性和可转译的信息，这些信息因为被压抑的性欲会不断重复出现从而遭到污染，因此也就被称为“神秘的信息”。

昆多（同上：22）先是回忆了拉普兰济的这一看法与弗洛伊德关于通常被“低估的诱惑的构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却强调，“直到让·拉普兰济后来的普遍诱惑理论，才包括了诱惑基本的社会化意义，以及决定每个人心理发展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新的见解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拉普兰济把“这种诱惑境况并不归结为是一种遭受性侵的经历”，而是描述为“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一种常规化的普遍性结构”。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人的性欲性行为有着一种生物的基础和一种社会心理的形成过程。所谓的生物基础，比如就是前定的，即现有的大脑结构和感觉器官；社会意义上首先是儿童与其照看者之间的关系；而心理上的则是儿童关于社会心理的提问，以及成人对此的回答，更确切些说，就是沉淀在成人潜意识中和内心里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正是通过这些影响，这个小孩无论如何在他的性成长期就已被成人性化了，并且日益独立于外界发生的事件和身体的直接接触，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也可能只是沉淀在身体和心灵之中的）性经验和想象；但他的这些经验和想象，按心理分析的学说，将在他以后的人生中通过一种后续的反思过程加以重新阐释，因此不能说这是一种有着直线形态的性化（也请比较：Bohleber，2011）。昆多始终将这种关联说成是一种“改写”，而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改写”是一个有着过多认知意味的范畴，它排除了物理和生理的维度。我思考，这里运用一个诸如“重新阐释”或“重新规则”，也许更确切些。这里的关键点是，成人给出的刺激孩子或是给孩子造成精神创伤的那些回答，是怎样被孩子用来阐释自己以后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的——因而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心理分析和

性科学不应当与自然或计算科学混淆起来。我思考，这也使我们明白，今天的发展心理学家关于“有学习能力”的婴儿的构想，应当参与到持续性地改善社会条件的话语中去，参与到塑造既自由又有责任感的公民的话语中去，以用来塑造能够自我决定未来，作为一个不屈服于或受制于他人与强权的主体的公民。多尔纳斯（Dornes，2005：123）写道：婴儿“绝不是非理智的，而是一个有理智的生物，他们是小波普尔（卡尔·波普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哲学家——译者注），他们在偷听窥视，不断检验和测试这个世界的法则，并以此修正自己的期望和假设”。但事实上，兜着尿布的婴儿的所谓富有假设的研究精神，在国际学术界也被称为躺在婴儿床上的科学家（scientist in the crib），完完全全依赖于他人和对他有权限的人，即那些喂养他、照料他、用爱的关注维护他的生命或用仇恨结束他的生命的那些人。因此我也绝不会去追随昆多（同上：33）的提议，“鉴于心理分析理论研究的是关于主体、潜意识和性欲性行为的形成，那么心理分析的研究重点应当有一个根本性的转移，即从（正在形成的）主体的创伤转向他对他人的渴望”。我思考，儿童与成人的反应，渴望与伤害，这两个层面的两个方面都必须被考虑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如此努力追求的理论，也就未免太没有整合性或是说未免太简单了些。这也自然适用于整个事件所涉及的躯体方面，而昆多则恰恰一再忽略了身体的要素，似乎重要的性器官的相应发展并不与儿童与生俱来的神经系统的敏感性有关。顺便说说有关发展的问题，昆多、笛卡儿式的主体形成模式是：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被别人渴望。但这也同样是太简单了些，因为在充满渴望的这个美丽世界之中和之旁，还存在着一个充满了冷漠、仇恨和无辜遭遇抛弃的丑陋世界。

昆多偶尔会从拉普兰济的普遍诱惑理论回忆起弗洛伊德的诱惑理论，而我回想起了现代性学先驱者保罗·迈特戈扎，一名医生和人类学家，他在弗洛伊德之前已经对性做了很精确的研究。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自然也遇到了一些直到以后才被称为“儿童或婴儿性欲性行为”的问

题。他在20世纪初期就偶尔也像一个心理分析家那样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在童年期最初几年所获得的最初印象，将在我们柔软的身体内留下深刻的印记，并被保存下来直到我们喘出最后一口气。”（Mantegazza，1877/1887：72）当然我也回想起弗洛伊德在《三篇论文》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而正是这些观点可以看成是拉普兰济理论的出发点。弗洛伊德在《三篇论文》中曾如此写道：“儿童与他的照看者的交往，是为其性感区域带来性兴奋和性满足的一种源远流长永不止息的源泉。尤其是作为照看者——通常是母亲——也常以自己来自性生活的那些情感方式，如爱抚、亲吻和摇晃，来表现对孩子的爱，非常明显地将孩子作为对自己有着完整效应的性对象的一个替代物。母亲们一定会感到无比惊讶，如果人们向她们解释清楚，她们对孩子的这种柔情将唤醒自己孩子的性本能冲动，并且也通过这种性本能冲动给自己孩子以后人生中的性强烈度做了铺垫。”（Freud，1905：124）几十年后，弗洛伊德再次证实了他的观点（1938/1940：115）：“婴儿的照护者（通常是母亲）通过对孩子身体的照料，而成为（她）孩子的第一个引诱者。”因此，母亲（或照看者）“作为婴儿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性对象，作为儿童以后生活中一切性爱关系的榜样，对男孩和女孩”都同样有着一种“唯一的、不可比拟的、确定整个人生的、无法改变的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回到这一尝试，即对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做一种负责任的继续推理和延续。米勒-波茨（2008：12）认为，弗洛伊德性本能冲动的理论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并“不是反动的，也许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保守有些保留而已”。“我想阐释一下，”他写道，“我认为，性对象和自恋情结，如果脱离了性本能冲动和性欲性行为，在心理分析学上是不可想象的。”这听上去似乎让人感觉到，我们好像仍如以前那样，正处在一个弗洛伊德性理论的兴盛时代，而不是他理论的衰落期。我觉得这并不合时宜，如果一个心理分析家认为，婴儿的性欲性行为应当是心理分析“研究的核心”，因为这个核心连接了一切，没有这个核

心，心理分析就不可避免地分裂为“性感区域心理学，（反思和批评性的）自我心理学（Ichpsychologie），客体对象关系心理学和（非反思性的）自身心理学（Selbstpsychologie）”，尽管“性本能冲动……仍然是这些关于心理冲突和各种不同阐释理论的中心点”。米勒-波茨的思考，可能在心理分析学的内部有其杰出的意义，因为他尝试将那些围绕性本能冲动的各种不同理论进行汇总或整合在一起。只是从性科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他也提及了婴儿的照看者，但他关于性欲性行为的思考却仍忽略了现实的性别行为和性行为，以及已经出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变革。我思考，通过性的平常化、非社会化和性的消失（关于性消失这个问题，这里只是简单提及一下，在后文中还会做详细阐释）等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继续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弗洛伊德传统性理论无疑早晚都是必然的事。但是在米勒-波茨的理论中，竟然没有提及同性恋和其他一些被认为典型的反常性行为或易性癖，更不用说去讨论新型的性欲性行为、新型的性别和新型性关系的联盟了。他的文章只是解释了比如：“有着性本能冲动的自我”、“性别认同”或“自恋情结”。

如果那个极其智慧的弗洛伊德还活着，肯定已经很早就明确地改变了自己的理论。毕竟他在他的有生之年里总是在多种理论模式中不断移动。他的原始本能冲动一方面是“性的本能冲动”，但在另一方面又是“保存自我或自身的本能冲动”，他在后期又将这种自我保护本能冲动作为“力比多”，称为死亡本能的对立面。他把他对本能冲动的这类区分已经前瞻性地仅仅看成是一种有助于理解的纯粹结构，因而认为对这类结构的坚守不应超出它们应有的有效期。以此可以推论，虽然他原有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无疑已经是够社会批判性的，但是如果弗洛伊德还活着，可能早就把在自我保存和自我提高意义上围绕自我和自身转的那些本能冲动置放在自己理论的中心了（这一点请参见有关性别自我认同和自慰的章节，本书40、92各章），那也就不需要再扭曲或歪曲自己正在描述和试图寻找出性规则的研究工作了。最终，他把诱因反思为是对本能冲动的一种唤醒。他“从心理分析发展史中得出结论，心理分析学研

究的第一对象是神经官能症，并且是将移情神经官能症与癔症和强迫症归为同一类型的病症，而且认定在每种这类疾病的根源中都存在着一种性的要求与自我要求之间的冲突。但这至少还是可能的，在对其他神经性疾病……深入研究时，必要地改变这么一种研究模式，以便能够对原始本能冲动做出另一种类型的分类”（Freud，1915：216f）。除此之外，这些疾病自然（并总是包括社会）也可以不仅具有另外一种分量，不只是按主导心灵生活，也不再按被弗洛伊德在1915年称为“积极与消极”、“自我与外部世界”以及“乐趣与反感”这伟大的两极（同上：232）来对这些疾病进行划分，而且也能够加以进一步分化和扩增。用让·拉普兰济的话来说：“公平工作，绅士弗洛伊德！”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弗洛伊德发现了一种渴望，但其中的事实却不是对活生生的人的渴望，而是对没有生命的物的渴望，即那些永久和随时都能提供的，并被赞誉为奇妙的物品，直到它驱逐古老的性的渴望，就如今天的那些恋物癖（Objektophilen）那样（58章）。或者鉴于沉淀在心灵中被我称为Hylomatie的社会文化进程，弗洛伊德早就将托斯和他的死亡本能置放在他理论的中心了（17章）。无论如何，他都会感觉到人们对性本能冲动理论的普遍冷落，因而就此修正自己的理论。

米勒-波茨与昆多的区别在于，米勒-波茨面对这些令人惊讶的综合观察却能够不逾越心理分析关于性理论的界限，并令人欣喜地还为爱情和攻击提供了自己的思考；而昆多（同上：10，16）则更强调被我们描述为性的文化变迁，对注重解释性欲原始动力的心理分析有着一种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类有关性科学的研究，证明了一些“根本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已持久地撼动了心理分析学在这个领域内关于性与性别、性的愿望与想象、病态与正常的理论基础”。在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中，昆多看重的是其中的三个主要观点，这三个观点不仅富有创新意义，而且一如既往仍有着重要意义。它们是：“1.一种不再仅仅局限于性别的关于性的广义构想；2.一种非规范的但仍有着重要意义的观察角度，因而关注到在正常与变态、健康与病态之间的界限具有可变性；3.一种独特的关

于婴儿性欲性行为的假设。”昆多在拉普兰济的意义上以诱惑和欲望为主题，用三个篇章阐述了男女性欲性行为中的性别差异，以及异性恋、同性恋和性变态的性别取向。她确信可以就此得出如下一些结论：“人的性欲在本质上起源于人生活于其中的一种社会境况”（同上：29），也就是说并不主要由于人的生理原因。鉴于力比多并不是一种性，她并“不想把性欲性行为区分为男人的和女人的”，而是将它理解为“是一种超越性别的（或男女共有的）性欲性行为”。这样的理解是必要的，以便能够恰当理解我着重强调的“性欲性行为与性别”的解离（同上：299，本书40章），并进而也能够对赖穆特·赖歇（1990）所提出的“表现在任何性欲性行为形式中，并也表现在单一个人和其关系中的性别张力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同上：213）。因此可以说，“阴茎式”与“感受式”的性快感和性满足，不仅仅是男人享受性的专利，它们同时也是女人享受性的模式。昆多最后拒绝（同上：225）“对性的模式用通常的规范加以等级层次化”，并试图从心理上将异性恋、同性恋与性变态构思为“是相同的性行为”。鉴于心理分析学在性欲性行为和性别问题上的评价中所出现的无数误差和病态化（我们也将在后面举出两例进行详细批判：本书71、87章），伊尔卡·昆多的评论主要是对因此而纠结的理智的一种安慰。另外她也证明了，思想大师弗洛伊德很少有这类问题，因为他的思考过于复杂，总是会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转折。问题的关键在过去和在今天仍然是，因为那些弗洛伊德的模仿者和他们的学术宗派只能接受引用些自己学科的知识和认知。

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说，我认为在一种批判主义性理论的发展，并且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性理论的发展中，可以思考的问题有：

——是否把儿童看做是“性的生物”（或者比如看做是“情欲生物”），以及是否如同研究他们的科学家所说的“婴儿性欲性行为”（或者比如说成是“婴儿的情欲”），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150多年来都对此有所争论。近几十年来，只要涉及有关儿童的性

欲性行为，公众领域几乎只认为这就是对儿童的性侵、性虐和强奸。如果某个性研究者有勇气在公众领域公开站在论证婴儿也有性欲性行为的这一边（52章），那么他的那些友好同事就会劝阻他，千万不要再这样做。

——如果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已经有了确切的研究对象，比如儿童，另一种是还待构成的研究对象，比如婴儿的性欲性行为，那么理论自然就会表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在第一种情况下，儿童是研究的客体；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儿童则成了研究的主体。如果其中有一些研究者关注的是认知和功能范围，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更关注情感和潜意识幻想，那么研究的结果自然也会截然不同。要想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就必须聚集在一起进行共同的研究，而这便需要以研究者的远见为前提条件，但研究者的这种远见至少在目前似乎还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出现。

——幼儿的所谓婴儿性欲性行为主要由身体的感受构成，而成人的性欲性行为则与其相反，主要由想象构成。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即成人的性欲性行为主要由向外伸展的想象构成，而儿童的性欲性行为则相反，由向内的表现构成。

——弗洛伊德关于青少年性欲在准自然状态阶段的发展（可分为口腔期、肛门期、阴茎期和生殖器期），已经遭到各个方面非常令人信服的质疑，尤其是从女权主义者和性科学家的方面。无论如何都并不存在一种独特和明确可识别的发展阶段，它受制于身体发展状况并多少只能是一些相互重叠的重点或模式。昆多（同上：62）强调，关于单一发展阶段或等级的构想，无疑是一种“误导，因为各种性快感和性满足的方式，并不相互取代，而是相互并存于终生，即使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和强度”。因此，不应再强调性欲性行为的发展阶段性，而应说是性的口腔化、肛门化，等等，以此类推。

——我们今天应当重新思考弗洛伊德一如既往仍然令人着迷的关于性变态身体基因的定理，并相应地改称为多性恋的能力，因为这里首先涉及的不再是遗传基因，并且也因为“变态”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最侮辱人的词。不再受文化强行压制的，是对被看做有着婴儿性欲性行为特征的多性恋的压抑和克服。但是因为弗洛伊德强调的双性恋状态只能表述性能力的一部分，因而在未来应当改称为典型的多性恋。

——所谓的性潜伏期阶段，已经被实验行为研究所否定。

——心理分析学关于在儿童性欲性行为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超越性别的“阴茎期”阶段的观点（虽然昆多也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不再被接受；因为它——无论如何对外行来说——将女性的性别置于男性之下。如果采用性对象的幻象化、性对象的客体选择或性对象的主体化等术语，可能会恰当许多。

——性的发展进程并不只限于一个或两个发展阶段，而至少是幼儿期、前发育期、发育期、青春期、成人期、更年期和老年期这七个阶段；并且如果考虑到人生和人的性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键点，专业治疗，标准化测试，防御机制心理和社会的出柜，试验、更换和回归阶段以及人的衰老过程，那么在人生的进程中那七个阶段在根本上甚至不免是多个阶段相互并存的。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一个姑娘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就必须将主要的性刺激和性兴奋点从被看做是具有“男性”特征的阴蒂转移到被看做是女人特有的阴道。而男孩则不需要做这种主要性兴奋点的改变，只需按一定的模式表现自己的性欲和实施自己的性行为。弗洛伊德的这一构想是错误的。男人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榜样模式，如今已不再被普遍接受。青少年由于性别形态和性能力所产生的恐惧和愿望，比如阉割焦虑、阴茎嫉妒、阴道嫉妒、生育嫉妒、穿透欲望，必须对此做更深入和详细的研究，并按性别文化和群体心理的关

系，寻找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应表述性别特征的术语。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但主流科学家还没有参与其中。

——父亲、母亲和孩子的三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和心理的基本法则，以及作为潜意识的核心结构，由于单亲抚养或同性父母的增多，以及人类再生产的技术可能性，至少在文化上已遭到部分的质疑。

——所谓能够普遍观察到的特殊发展情结通过文化转型和去符号化，最近的50年来在它的结构中究竟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并在它的真实性中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出现了递减，也是必须加以研究的，比如恋母情结是心理分析的中心内容，但在族谱序列中展现的却是由文化演变而成的恋父情结。

——直系亲属的性关系在文化上仍一如既往被看做是乱伦而成为禁忌。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乱伦性关系，将被作为对孩子的性虐待而遭受谴责，并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按昆多所说（同上：80），总是不断进入心理分析家视野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则几乎不再令人感兴趣（也请比较：Berkel，2006，2009）。2012年，德国和欧洲最高法院在一对生育了4个孩子的兄妹的爱情案例中，确认了这类性乱伦的总体罪责，以及判处这类案情不需确凿的论据，也不需考虑具体情况的特定性。

——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性恋这三种不同的性对象关系，作为理论和临床的规则样式，已经在文化上被超越。心理分析学作为一门专业最终应当接受弗洛伊德在他那个时代给出的一段令人思考的评语：“精神分析研究，坚决抗拒那种把同性恋看成是一个特殊人群并把他们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去的尝试。精神分析学通过研究一些不同于常规的众所周知的性兴奋和性刺激点，因此也就懂得：所有人都可能会选择同性作为性对象，并也常常在潜意识里实施和完成这一选择。是的，与同性的那种力比多式情感的联结作为正常心灵生活的要素，并不低于其他性取向的情感，而且作为其受伤害的原因甚至更甚于异性恋的情感

联结。心理分析学似乎更多的是从原始状态和早期历史中观察和独立选择性对象，如同童年时代那样平等自由地对待作为客体对象的男人和女人，从而把这些作为因受限制而向正常的一面或另一面如同倒置和逆向型的原始发展。因此，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男人对女人的那种纯粹的性兴趣，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阐释的问题，并不因为化学吸引力的理由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Freud，1905：44［一条1915年加上去的脚注］）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性恋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与社会心理上的紧密联结，就像柏油和硫黄燃烧在一起。这类明确的性形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未免是多少有些随意的分配，并或多或少是解决沿着各主流文化产生的潜意识冲突的成功方案。没有一种文化的性形态比其他另一种文化的性形态更正常或更健全。所有性形态，也包括所谓的异性恋性形态，都可能进入一种病态的、需要治疗的发展中，因而不能再按以往的性生活或公开的性取向的标准分类，而是应当按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影响，尤其是要按强迫、癖好和暴力所造成的影响加以分类。丹内克尔和赖歇（1974：348）几十年前在他们的宏伟研究《那个普通的同性恋者》（Der gewöhnliche Homosexuelle）中就已说道：“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流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客体对象关系的整合形式，在我们的文化中被标示为‘正常的异性恋’，是对同性恋取向的一种结构性的压制，其结果无非就是在人的潜意识里构成一种对同性恋性取向的恐惧。将异性恋的性形态作为文化的主导模式，在病理学上是必要的。一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角色的强烈文化标识，一种从文化角度对性生殖器的过分强调和一种与此相应的从社会的角度对生理的其他性感区域的刻意忽略，以及一种潜在的有着同性恋色彩的男性彼此间的集体认同，都属于这类病理学。”从这个意义来说，并仅局限在这个意义上，丹内克尔和赖歇当时就提出了同性恋者的“集体神经官能症”这一说法，并以实验证明这是一种保护机制。

——按我的感觉，许多心理分析家对同性恋的性取向仍然一如既往持保留态度。直到今天，也只有较少一部分的精神分析家和运用精神分

析思考的性科学家，不再从病理学的角度看待同性恋的发展。这些较少的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中有：丹内克尔（1975，1978/1991，1996a/2007a）、摩根泰勒（Morgenthaler，1980）、伊娃·S.普露达（Eva S.Poluda，1996a/2007a）、赖歇（2000b，2001）以及伊尔卡·昆多（2008）。事实上弗洛伊德（1920a：276，285）不仅提出了前面已经引用的评语，而且他当时对待一位18岁的同性恋女性病人的行为方式，也如同他已经生活在21世纪那样。他不顾女病人父亲的强求而终止了对病人的治疗，并声明这个女病人（其实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必须承认，即使是正常的性欲性行为也受一种性对象选择的限制，并且在总体上来说，要想将一个已经发展成形的同性恋者转变为一个异性恋者的努力，并不比要想把一个异性恋者改变为一个同性恋者有更多的前景和希望。只是人们对异性恋者出于充分的实际理由而从不要求改变其性取向而已。"除此之外："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所有人的力比多都会终生在男性和女性的性客体对象之间徘徊和游荡。"今天的人们已经更加期望，但愿心理分析家和性医学家有勇气承认，即使是变性者也是心理健康的人。

——如果同性恋终于在理论和临床上有了与异性恋相同的地位，那么从经典的心理分析学来看，不仅存在着露阴癖、偷窥狂和性虐恋等"部分的性本能冲动"，而且也存在着一种同性恋的和一种异性恋的性本能冲动。

——强调性生殖器官作为性发育的目标和"性成熟"的标志，可以归因于人类繁殖延续的文化需要，这种需要曾存在于弗洛伊德思考的时代，但今天已经不再。弗洛伊德屈从于他那个时代的话语，虽然他比任何其他一个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人的性本能冲动最初根本不是以服务于生殖为目标，而是作为获得某些快感的方式"（Freud，1908a：151），也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性的本能冲动是自恋、自慰和变态的。如果将性发育的也被称为婴儿生殖器阶段的所谓阴茎阶段以及所

谓的性生殖器阶段作为性发育的主要阶段，那么所谓其他的性区域和性感官，其中也包括一些“所谓较低层次的性感官”（比较：Boller，1984；Etgeton 2005），也就都没有意义了。昆多（同上：89）对此提出质疑，“婴儿与成人的性欲性行为是否真的有着，如同弗洛伊德在关于两个发育阶段并因而主要与生殖器官相关联的论断中所强调的那种根本性的区别？”帕赛特（Passett，2005a：37）反驳了这个主要以性器官为标志的论断，认为人的性欲性行为的成因“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各不相同异质化的”。性在“根本上是变态的”，并且“它的本质是婴儿的性欲性行为”。它有着“一种不可终结的历史，并有着一种无目标的发展”。偶然的非功能的要素“在人的性欲性行为的构成中”，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就可以说：相对于成人性生殖器官的性欲性行为，并不存在一种自然的儿童式变态的性成熟。但是儿童通过与其他主体的相遇，却会形成一种在各个阶段有着不同重点的性人格以及有着性的个人特殊差异（11章）的发展。因此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躯体生理，而是人所处的文化和他周围的其他人是人的性发展的命运。

——心理分析理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除口腔和肛门性感受区域之外的，其他非生殖器区域和感官的性刺激和感受的潜能，尽管这些区域的性刺激和感受力度甚至能够超过性生殖器官的刺激和感受。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口腔和肛门，在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作为性感区域的同时，也应当加上触觉和动觉。除此之外，一些特定感受或身体刺激区域出现的发展优势，也能大幅度降低性生殖区域的性刺激和性意义的势能，我们能够比如从拜物主义或性虐的发展中看到这一点。心理分析学家和性科学家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Herta Richter-Appelt，2000：383）对此在她的批判中走得更远。她写道：“心理分析在自己的发展中，并没有对幼儿感受生殖器部位以及对幼儿躯体的触摸加以明确的反思。令人吃惊的是，触摸幼儿的生殖器以及在洗澡和换尿布时对裸体幼儿身体的触摸这些行为和感受在现代婴儿的研究中，居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多纳（Dorne，1993）所撰写的《有能力的婴儿》（*Der*

kompetente Säugling）和安奇奥（Anzieu，1991）所撰写的《作为皮肤的自我》（*Das Haut-Ich*）等现代婴儿研究著作中，都存在有里希特-阿佩尔特所指出的欠缺。事实上，被他们疏忽的婴儿感受或感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感受和感觉，婴儿在出生的几天后就能辨认出母亲的声音。

——新生儿的性别，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一如既往并几乎没有例外地按生母或接生人员的陈述而加以生理解剖学意义上和行政官方的认定：阴茎或阴道。但事实上，这在一方面便将过分依赖物理性的外部形态，而在另一方面从异性理论来说，新生儿也将在与照护人员的神态和情感交流中进入成为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这里特别是将与个体心理相适应的由生理给出的既定身体作为性别载体和将对其他个体持续的心理占领作为业已沉淀的性别生物。生物性基础并不能有效地决定一个人的性别所属性（请见比如给人深刻印象的Sonja Düring，1993）。另外，也不能把性别仅仅思考为性的能力，如同尤迪特·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曾承认的那样（1997/2001）。除此之外，性别在人的一生中是会有所变化的。可以回忆一下，弗洛伊德（1905：121）曾经怎样就“体质性的双性恋”表述了自己批判主义的性观点：“既不能在心理分析上也不能在生理学的意义上，找到一个纯粹的男性或一个纯粹的女性。”鉴于人对自己被性别文化中所规定的特性和能力多少会有所掌握和发展的状况，可以说：所有的人在心理上都是性别混合生物。

——迄今为止，性器官在我们的理论中有着大不相同的表现。特别是男人的前列腺被看做是一个“黑暗的器官”，甚至是一个“凶恶的器官”，因为尽管通常有一些关于它作为体内性腺（比较比如：Deserno，2005）的思考，但是它首先是作为前列腺肿瘤进入人们的意识。而女人的阴道则更是可怕的未知（也请参见本书97章）。即使是医学工作者也经常并不知道，它是否有一层黏膜，它的神经系统是如何构成的，以及有些什么功能。昆多（同上：129）就此指出，阴道有着一种双重功

能。它的一方面功能是接纳和性化，另一方面功能是去性化和排泄。“它因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同时既是外化又是内化，既是刺激点又是再生产器官。”

——如果将男人的性看做是具有穿入和穿透力的，是积极活跃的，而把女人的性评定为是接受和接纳，是消极被动的，这是很短视的。这样的考虑来自古代日耳曼（在森林或田野实施）的粗鲁性交，在这类性交中，男人只需简单地把自己的阴茎插入女人的阴道，就算完事了。但其实在性交过程中，女人能够通过想象而比男人更积极活跃，比如能够用自己的阴道吞噬和吸吮阴茎，或者以其他的感觉器官，特别是用眼睛，“吞下”整个男人；而男人在这个时候只能被动地完全沉溺在他的触觉中；如此等等。在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男人和女人越是自然而然地有着自己独特的并被看成是男性或女性的性刺激和性满足模式，便越是能够成为更令人感兴趣的性和爱情伙伴。赖穆特·赖歇（1990：46）感受到既存在于女性也存在于男性之中的两性张力式的互补关系，他拒绝那种将性别简单划分为二和非此即彼的二元规范，并就此指出：“每个人的性别似乎都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双重性）。”我认为，在今天甚至已经能够这么说：每个人的性别都有许多种性别形态，有多少人存在就有多少种性别形态（多重性）。这也包括了通常登记为男性的那个男人可能比女人更女性化，而登记为女性的那个女人可能比男人更男性化。

——总是不断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究竟有多少人实际参与了从外表看上去只是两个人的性活动？弗洛伊德在一封信里谈到是4个人，克恩贝格（Kernberg）说是6个人，昆多认为是12个人，这12个人是用潜意识的想象躺在床上，思考着“体质性”的双性恋并按恋母或恋父的性取向选择性对象。但是如果考虑到沉淀在潜意识中无数多少密切相关的那些人的影响，那么参与当事者两人性活动的潜在人数，就将是一个有着冒险性色彩的数字。

——经过一场详尽的讨论，米勒-波茨（Müller-Pozzi，同上：181）针对博莱波尔（Bohleber，2001）、克恩贝格（1997）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得出如下的结论：“心理分析学在进行侵犯、破坏、毁灭和仇恨的分析研究中，至今没有对攻击、复仇和报复做进一步的思考。”但这却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因为根本没有人对此有所质疑，即没有出于恼火、怒气和怨恨的攻击性情绪和行为方式，一种性活动便根本无法得以实施，一种性别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把攻击和自信认定为本能冲动的一种特征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则相反，他当时仍还在这两者之间徘徊。1920年，他在《超越快感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这一著作中，假设了生存和死亡的本能冲动，并将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Eros）作为生存的象征，死神（Thanatos）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后又给死亡的本能冲动加上了具有“毁灭或攻击的倾向”的特征——并且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把这些都写进了一本性科学的手册之中（Freudin：Marcus，1923：297）。在做了所有这一切没有相互关联的假设之后，弗洛伊德最后说：“经过长久的犹豫和摇摆，我们终于决定，只假定爱和毁灭这两种基本的本能冲动。”按弗洛伊德的见解：正是这两者的混合，以及它们的亲和与对抗的效应，造就了生命现象的斑斓多彩。这就极易出现如此的情况：“一种过分强烈的性攻击，会使那个爱恋者成为爱情的杀手；而一种较为低落的性攻击要素，又会使他害羞或性无能。”（同上）尽管有了这些明确的话语，但其中也只有“爱”的本能冲动获得一种被称为“力比多”（Libido）的能量，“毁灭”的本能冲动还在等待和期望被普遍认可的“死亡本能冲动”（Destrudo），但死亡本能又还在等待“忘却之水”（Lethe）。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一种关于爱情的心理分析理论，仍至多只是一些思想碎片或者说仍极其不完整，这种理论首先是由弗洛伊德（1921）以节制的性本能来反对放荡和永不满足的力比多对性客体的占用和反对被片刻的本能所占有而提出的。与此同时，这种理论

也认为，在爱情中的一种责任没有童年的经验是不可想象的，攻击和仇恨并不一定导致一种爱情关系的终结，而且在爱情关系中那个遭受攻击的人并不一定疯狂地寻求报复。只有依靠这样的人生经历，爱情关系才有一种持存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提供安全系数的经验，那么只有类似毒瘾的滥交和近似精神病状态的共栖可作为替代选择。

——自慰，在今天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行为，这里特别要排除护理人员的参与。所谓自慰，无非是通过自己的决定，使自己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性自慰的对象，并且以自己的想象去寻找能给自己带来性兴奋的道路。尽管弗洛伊德将手淫作为自慰的主要手段，它在今天却似乎决定了性对象关系的成败。

——与心理分析学的教学内容相反，我们今天必须认定，在童年时代通过情感关系、性别关系和性关系的文化变迁在心灵中留下的印迹，是能够被消除或中性化的。这就是说，即使是在童年铸就的情感关系、性别认知和性渴望的基本模式，也会受制于历史的变迁，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这些心理模式不再如同弗洛伊德企图以“本能冲动的命运”这个概念所想表述的那样是一种不可逆的命运。否则，我们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中不仅仅只是走进一种爱情关系，而且也是建立一种越来越固定和负责任的爱情关系。

——只要思考一下以上提及的那些要素、层面和维度以及互动等，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人的性和性别认同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如果仅仅去援引一些转述的可把握的原因，那么我们对此的思考就会陷入歧途（27章）。我们对遗传因素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迄今为止的理论完全高估了基因的效应。遗传特征在本质上是可变的。它在母亲的子宫里已经在按外部的状况，进行着自己独有的变化。同卵双胞胎就是这样带着不同的遗传特征来到了这个世界（比较：Genom Research，Juni 2012）——这是对迄今为止把基因的

效用估计过高的一种明证。我们今天已经了解，最初的遗传基因特征将会在生命过程的基因后天突变中进入休眠或激励状态。生病或健康，便是其进入休眠或激励这两种不同状态的结果。

如果说，儿童的性欲性行为是成人性欲性行为的一种前模式，并且童年时代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躯体、心灵和社会的经验都已进入这一模式，那么我们不免要问：这些童年时代的并在成年后继续产生影响的早期经验，是在哪里和怎样被储存的？为了表示早期生活经历中的性感应和性化生活经验的浓密度，心理分析家运用了以手淫为主的想象（laufer，1980，也请比较：Reiche，2000a）或无意识的微点（Stoller，1979）的表述或术语。微点在情报工作的语言中，表示能够隐藏整本书文字的一个针头大小的隐秘点。社会学性学家加格农（Gagnon）和西蒙（Simon，1973）则运用了“脚本”（Skripten）这个术语（比较：im Einzelnen inklusive Kritik Lautmann，2002：179-203；Matthiesen，2007：54-61），这是一个并不能完全令人确信的表述，因为内含在象征和剧本背后的渴望冲动和本能冲动的特性，都将通过“脚本”这个术语而随之消失。而正是这类渴望冲动和本能冲动，决定了脚本与场景之间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个体心灵内部、人际交往和文化的区别。因此可以说，这些储存的草稿在人的一生中是可以不断被改写的。心理分析的性学家马尼（Money，1986）则运用了“爱的地图”（英语：Lovemaps，德语：Liebeslandkarten）这个术语，是一种较为恰当但又不太幸运的表述，因为它从心理结构和心理动力上主要涉及了性的刺激，而不是爱的情感。也许用“性的地图”的表述会更恰当些。从我的角度来看，也能运用“性渴望的基本模式”、“性的基质”、“性的模板”（在作为样板或前模式的意义上），或是“性的硬盘”这些表述，在当代如果能找出一个阴性词来加以表述，也许是最恰当的。

除此之外，美国性学家们一致认为，基质或硬盘等术语主要来自与性无关的词语，更确切地说，只是来自与个人的躯体、需求、关系和性

别史相关的词语源泉。只有在进入青春发育期后，基质以及硬盘等术语才被性化，才有了性的意义，并且经由后续的生理的或文化的经验和断裂得以继续发展。令人感兴趣的还有性学家诗丽雅·马蒂森（Silja Matthiesen）的一些研究结果。她把脚本理论描述为是对作为美国主流性科学中自然主义的一种批判反应。她写道："比如金赛等人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描述性欲和性行为的这种自然性（Kinseyetal，1948，1953），并把这种对行为方式的描述直接转换为一种基本的性存在方式的语言。对性的这样一种自然化，只能通过一种非历史的视野来加以追踪，而这种非历史视野则只有依靠如那种性高潮或那种性本能冲动等所谓的自然常数才是可能的。"（Matthiesen，2007：57）

31 欲望冲动、情欲或本能冲动？

"是什么在驱动着我们？"这是一个欧洲特有的问题。它暗示着一个我们应当解开的谜。在我们社会的性革命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饥饿和爱情。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时代，他还曾在诗中写道："从现在起，直到建筑爱的世界/因哲学而结合，/它有（自然的）驱动力/通过饥饿和爱。"从近距离观察，饥饿和爱这两者，一个是根本没有性本能冲动，另一个只能婉转地引申出一种可能的性本能冲动。一个一眼看上去就是一种生理心理的需求（尽管也需要文化），另一个则是一种可能的奉献，它有着与前者极不相同的表现和现实：博爱、慈爱、仁爱、普罗旺斯向贵妇人献殷勤的骑士、慈善、婚姻中的爱情、自由的爱情、在生命某个阶段的爱情、多人的爱情等。当性革命开始爆发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强调本能冲动和阐述这些本能冲动的学说，其中也包括一些社会形态操纵的理论或是以前就已出现的这类理论，进入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比如阿德勒关于社会努力追求权力的理论，舒尔茨-亨克（Schultz-Hencke）关于社会努力追求占有和效用的理论，或甚至追求有成效地完成（报酬）所要求的劳动，也就是亨德里克（Hendrick）所说的追求完美的本能冲动。如果原本就具有兼容性的本能冲动作为第一个被植根于

那些无能为力的理论之中，并又在它们中塞进一种具有兼容性的权力，那么这些本能冲动也就第二次被剥夺了权力。如此这样，每种本能冲动的特征也包括那些特别神秘的本能冲动，都被按拜物主义化的社会时尚颠倒和驱赶了自身原有的一些不可解的、混乱和充满差异的冲动特征。如此这样，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规范之间的每个正在中断的机制，都将遭到排除（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1969：30）。这样的理论只看重事实和这些事实的拜物主义特征以及它们特有的本质，允许一切都被僵化。自那以后，人们便说：“本能冲动就像迷信那样神秘”（同上）；自那以后，性本能冲动便成为黑暗、邪恶和非理性的代名词；自那以后，思想的突破和对本能冲动理论的突破，被同样看成是神经错乱，因为那些作为主流思想家的白痴们，在他们蹩脚的理论中不会有这种突破隔阂的神经错乱。

谁如果想与当代大多数性学家那样，以事实引导自己的研究，那么应当理解：不管有着多少异化和迷惑，仍以事实这个名称来称呼的事实，即那些使人陷入它的暴力中的事实，其实也是人自己的行动。即正是通过人的行动产生的事件或事情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事实”。但是由于“事实”有着一种外部的和外来要素的表象，并作为一种真实的事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由于事实一如既往与人的生活命运相连，因而事实的一切流动性和可变性就都被固定下来，一切不确定性都被归纳为同一种认同或认定。那些以直接事实为研究方向的性科学，不管是在德国、美国还是在俄罗斯，都会把无意图的事实假想为有一种意图在其中，因为他们中没人认识到，意图已经超越了系统。现代科学家对遗漏或甚至忽视数据的恐惧（这里特指不懈寻找导致一切心理—社会问题的器质性原因），在今天却与总是阻止我们从根本上偏离社会规则的机制重合在一起了。如同必须不断适应自然状态的市民理想，在今天已经没人严肃主张情欲关系的混乱。

那么因此就可以说，我们对此已有了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回答？或

是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还需要一些如急迫的渴望、欲望或本能冲动的范畴吗？或是可以说，它们已不可逆地属于过去时代的观察、经验和认知框架了？

早在30多年前，我的朋友兼同事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在美国一些性学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写下了众多论文，并在其中主要表述了一个论断（但是对他的这一论断，我无法不加反驳地予以接受）。他的论断是：“关于性本能冲动的假设，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关于性欲性行为受本能冲动支配的解释模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其实就是社会对其成员性欲性行为的一种定义，而不是一种科学认知。”（Schmidt，1982：27，29）。施密特以一种称为“动机构想”的“替代选择”，取代了传统的被称为本能冲动的模式；但这里的问题是，他有时把这种动机构想解释为“追求情欲的意愿”，有时又解释为是“寻找情欲的模式”（Schmidt，1977：433；1983：3，31）。一种由惠伦（Whalen）发展的“双重模式”，也许更符合……“今天的科学研究事实”（Schmidt，1975：34；比较：Etgeton，1994）。这两种模式是：觉醒（arousal）和唤醒力（arousability）。施密特将这两者不加任何限制地用来表述“激动”和“可激动性”，并对它们做出了如下定义：“可激动性是相互和个人内心不断变动的意愿，即对一种外在的性吸引状态做出反应的意愿”；激动，“则是性受到刺激的一种瞬时状态，是可激动性和此时此刻外在于内心既定状态所产生的一种功用”（Schmidt，1983：3f）。

我的反对意见（Sigusch，1984c：4-13）是：由弗洛伊德传承给我们的“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包含了一种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如果在它之前没有出现其他各个不同阶段的范畴，比如意识、主体、情欲、幸福、认知、理性、自由和爱情，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便不会进入科学家的思考范围。在思想史中，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既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唯心主义的理念（如果暂且允许做如此刻板的区分的话）。这两个哲学

流派中都有思想家赞同本能冲动（或一种模棱两可）的概念，但也都有人蔑视和嘲讽这个概念。相比较而言，在唯物主义者中确实较少有人蔑视和嘲讽本能冲动，因为任何一种唯物主义多少都承认自己是建立在感官知觉和自然本能的假设之上，也因为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接近人的粗鲁需求。从本质上来说，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既不属于纯粹的唯物主义范畴，也不属于纯粹的唯心主义范畴。弗洛伊德（1915a：214）认为，“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心理生活，本能冲动是“心理和生理之间的一个临界概念，……是心理承担起与生理相关的体力需求的一种平衡标准”。从纯粹的精神角度思考本能冲动，一旦脱离躯体的世界，脱离血和肉，任何一种有关本能冲动的概念都会趋向于糟糕的形而上学。因为如果完全忽略躯体的要素，也就是忽略阿多诺在他的讲座中所说的“唯物主义的物质精华”，不仅是把任何一种唯物主义都想象得过于短浅，而且也会使躯体的需求成为日常生活的议题，如同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从纯粹的物质角度来思考本能冲动，任何有关本能冲动的概念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也就不存在一种比这更好的关于正确生活的学说，就会成为趋向于自动的固定概念。它并不能教导我们自由和公正。

实质性的概念在哲学中总是有着它的对立概念，因此这个概念的问题也就是另一个概念的问题。施密特的动机概念中典型地缺少了那个与此对立的概念。这种片面的表述，已经不再能够反映出批判的思想。如果说拉丁语中的“本能”（motus）这个词也意味着（内心的）激动和振奋或昂起头，那么形成于中世纪并自那以后趋于消失的“动机”这个词今天正在畅通无阻地直接拥有了“目的”和“指导思想”的意义。那些现代的、几乎只有短暂持续性的表述，如“团体”或“成双成对”等，不能与认为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是幸福的幸福论，不能与享乐主义的情欲，也不能与肉欲进行富有意义的交融。而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则完全不同。这个词自16世纪以来从最狭义的词源意义上联结了经济和政治的生活，比如（在德语中）本能冲动是“Trieb”，而企业是“Betrieb”，销售是“Vertrieb”，轨道机动车是“Triebwagen”，发动机燃料或推进剂

是“Treibstoff”，堕胎是“Abtreibung”，驱赶式的狩猎是“Treibjagd”，欲望冲动型罪犯（尤指性犯罪）是“Triebtäter”，等等。

从今天的语感和语言意识来看，“动机”的语义，完全适合进入动机心理学家关于指导思想、原因和目的等理论构思。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拉丁语“Motivum”这个词的“动机”的第四层含义，杜登（Duden）词典作为德语最权威的词典，只得运用另外一个词“Antrieb”（原动力）来加以解释，而这正是动机心理学家更愿意遗忘的一个词。这个在16世纪形成的词（“antreiben”在中高地德语中写成“anetiben”），也推动了“动词”（Verb）这个德语语法概念的形成（中高地德语为“triben”，古高地德语为“triban”，哥特语为“dreiban”，英语为“todrive”，瑞典语为“driva”），而德语作为动词名称的“Verb”在日耳曼语之外的任何语言中都没有与此对应的词。“推动”（Treiben）这个动词和“本能冲动”（Trieb）这个名词——实际上应写为“Treiben”，以前和今天的有些德语地区，仍有写成“Treiben”，比如“Treibendes Viehsoderdes Wildes”（牲口或野兽的野性本能），“Viehweg”（羊肠小道），“Trift”（牧场或放牧的通道）等，都经历了诸多的派生推导和综合转义。还比如在16世纪形成的“vertreiben”（驱赶）和“Vertrieb”（推销），在17世纪形成的“betreiben”（推动），在18世纪形成的“Betrieb”（企业或运转），“betriebsam”（忙碌），“Triebfeder”（发条或主弹簧），“Treibeis”（浮冰或流冰），“Treibhaus”（温室或暖房），“Treibjagd”（驱赶式围猎），在19世纪形成的“Triebwagen”（轨道机动车）——由自己的动力“Antrieb”推动行驶的轨道火车，以及“Treibriemen”（传动带），“Treibstoff”（燃料），“auftreiben”（膨胀或升高），“Auftrieb”（浮升力）等。除了18世纪的法国在法语中为“动机”这个词针对吸引眼球（迷人）的艺术品设计又赢得了“主题”（motif）的这一层意义外，自那以后围绕着“treiben”（推动）和“Trieb”（本能冲动）衍生出的都是些与经济和政治语言发展相关的词语。但是拉丁语的“motus”不只是仅有“动机”的含义，而且还有“激

情”和“激动”的含义，在政治表述的意义上则是“振奋”、“起义”、“叛乱”和“推翻”，而这些在今天“动机”的词义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因此在杜登词典中也把“诱因”（Anlass）作为唯一与动机相关的近义词。此外，我们也得知，“动机”同时也表示“最小的音乐元素单位”和“一个按邮票图案主题收集邮票的集邮者，是一个主题集邮者”。但“本能冲动”与“动机”却相反，它的相关近义词是激情、倾慕、破土冒芽和推进剂。谁“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按杜登所说，谁就是在放纵“性交”。但这几乎不可能是动机放纵或受动机激励的结果。围绕“本能冲动”的一些词，比如：本能冲动（Triebhaft，按杜登的解释它是兽性的、动物性的和性的，见词条：“性”），燃料（Triebstoff），性冲动犯罪者（Triebtäter，见词条：“罪犯”），机动车（Triebwagen，见词条：“火车头”），发动机（Triebwerk，见词条：“马达”）。人们因此能够看到，与动机不同的本能冲动究竟涉及些什么，并在往哪个方向延伸，比如在往动物、犯罪、运营、推销、围猎的方向延伸和发展，并且不要忘了，还有堕胎（Abtreibung）！杜登大词典只给人留下了一条植物学意义上的安慰：“本能冲动”（Trieb），也意味着刚刚破土冒出“嫩芽”；它也转义地表示了“植被的复苏”。

在各种不同思想的内容中，“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不免有了完全不同的对立概念。在与这些概念对立的同时，它赢得和失去了自己的实质。比如康德将肉欲与理解作为认知过程中的一对对立概念，叔本华则把世界归纳为意志和表现，尼采以酒神对质阿波罗，弗洛伊德区分了原发性和继发性的程序，在巴甫洛夫那里则是第1和第2信号系统，而彻头彻尾的现代理论则相反，试图以静止的状态来解释生命的这种充满了矛盾对立的过程。放弃实践的本体论化的纯粹理论，将责任委派给那些在本质上独断的机制和结构，与行动主义手挽手散布对理论的厌倦。如果大的哲学流派——不管它是从唯心还是从唯物的角度进行思考，一旦违背自己常常表达的意图，而坚持问题的同一性，那么自然就会站立在彻头彻尾的现代理论的这一边。谁正在唱着一首赞美本

能冲动的颂歌，那他就必须万分小心，千万不要陷入坏的社会团体中去，因为可想而知的是，他将被一切“血与土地”的意识形态（即农业时代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根源——译者注）所缠绕，并且还有新的非理性主义的诱惑。与对心理分析进行修正或使之现代化的做法相反，弗洛伊德坚持问题的同一性。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启蒙家，并确信：人如果想改变自己，首先必须理解自己。他将人无法实现的那些愿望、被扼杀的渴望以及那些甚至被禁止的生活，都运送到一个规定的地点，他期望借助这个地方为人的艰难生活提供一种帮助，即提供一种警觉和希望。

这一切完全不同于今天流行着的对心理分析的一种辩护，我首先必须向弗洛伊德致以敬意，因为冈特·施密特只是简单地把他看成是一个生物学家、刺激唯能论者和压力系统论者。对施密特来说，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概念或他的其他概念，都没有一种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没有一种哲学或人类学的内容。施密特对本能冲动的构想只是人体学意义上的。也许他还可能想将人的其他一些生理匮乏状态（比如饥与渴）来取代性的本能冲动。除此之外，他怎么能够将有关性的生物条件的详细讨论作为他的论断的基础（1983：1）？事实上，施密特不只是在他最初的有关荷尔蒙和大脑的工作中做了最详细的研究。他指责弗洛伊德一生都在寻找一种性毒素，而且是一种来自人自身的性毒素。施密特于是便一层层、一步步地解构了所谓的性荷尔蒙，似乎这些性荷尔蒙并不就是心理和性生活的驱动力。其实他并没有多少资格可以谈论性荷尔蒙和性本能冲动。如果出现了性荷尔蒙这样的表述，也无非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高估——这是我从诺伯特·伯乐（Norbert Boller）那里学到的。荷尔蒙最终只有在其他的效应中才能对生殖器官产生影响，它与我们的性欲性行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完全没有关系。与此同时，施密特用一种所谓的快乐模型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个模型不仅有着霍尔特（Holt）通常的一种心理自我意识的特征，即以对快乐的期待或心理预期解释的性动机（同上：3），而且也有着哈迪（Hardy）通常的一种直接的自然

性，即“寻找快乐的模型并不否定性欲性行为的生物基础。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生理神经系统，是该模型的第一前提；这种神经系统使我们与身体的性感区和生殖器的接触、触摸和刺激会体验性高潮以及与此相关的情感诸如愉悦和快乐。这一神经系统证明了性的自身体验值的合理性，也就是性的‘自然’满足的基础”（同上；Hervorh.V.S.）。我们终于看到真相了：对施密特来说，人体器官、荷尔蒙和传递神经，不仅是自一些时期以来被称为性反应的生理过程——如同肠胃和酶对于消化过程那样——不可争辩的身体前提；它们不仅从自身证明了一种自我性体验的价值，而且也证明了大脑生理神经系统具有一种“自我思考”的价值。来自弗洛伊德情欲区域的快乐对施密特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性兴奋”则是“由人体器官的生理状态决定”的，但是“也”——这个“也”说明了一切——“由人生经验所决定”（同上）。在一件装饰着理性和社会的外套下，实际在人的本质起作用的却是表现为神灵显灵般的力量。

导致维多利亚人摇摆在痛苦情欲之间并对爱情神秘化的那个关键点，弗洛伊德认为是肉体的，因为本能冲动的侵袭“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源自于躯体的内部，人即使想逃避它也不会有所作为”（Freud，1915a：212）。因此，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一定程度的直接的性满足”，是“不可或缺的”（1908a：151）。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就会出现“神经质病态”的递增，或是社会就会导致那些“由于强壮的体质”而无法按社会要求“压抑自己本能冲动”的人，成为“罪犯”，成为“为非作歹者”，“只要这些人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或优秀才能，使自己成为伟人或英雄”（同上：150，157）。在关于普通市民沉迷于他们利己主义行为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坚持人享受自己身体的乐趣和人性的权利：“但是人最终还是必须要开始爱”（Freud，1914：151）。弗洛伊德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在他的学说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交融在一起；弗洛伊德又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心理学家，他追踪到了个人遭遇性束缚过程的踪迹，并为性释放提供了一个过

冬的场所，在这个过冬的场所，不再有任何禁忌或是不必像往常那样必须为此承担什么后果，他在主体的自身中为人准备了这么一个庇护所。

但正是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在那些淡化意识与潜意识差别或甚至干脆否认这一区别的动机心理学家那里，丝毫没有获得重视。动机是一种表述，是表述了一切或是能够一切与行动相关的目的，即通常在人的意识中构思的行为目的，比如满足天性、心理需求和兴趣等带有人的内心情感的一些行为的目的。与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相比，动机这一表述就显得毫无血色，倾向于随意的多义性和空洞，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概念的反义词。动机将本能冲动和它的无能为力这两者约定俗成为瘾癖行为和意愿，以便不必去深入和详细思索这两者，或甚至完全跳过它们。作为先行者的奥德赛，就是在经历了许多对人来说必然是无比恐怖的事件之后，“才被创造成一个有着对人的认同、有着行动目的和有着男人特性的自我”。当他行船经过以美妙歌声诱杀海员的半人半鸟的海妖时，他用蜡塞住同行者的耳朵，因为“他们必须不受诱惑地用全身力量划船向前行驶”。他们“顽强地”将不被诱惑的本能冲动升华为“格外的努力”：“他们就是这样将本能冲动付之于实际行动”。虽然奥德赛自己听到了那诱惑的歌声，“却因为已将自己绑在了桅杆上而无法因为诱惑而离开正在行驶的船”。鉴于这么个神话、自律和劳作的纠结，人们也可以说：“每个人在童年时代”经历的快感、现实和禁忌，都会在他的内心“留下痕迹”（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1969：32 ff）。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不是预言和驯服这些与生俱来的情感和固有动机的一个抑制性“模型”。

但弗洛伊德也如同奥德赛时刻在为反抗自己本能冲动做着挣扎的普通人，想将自己的情欲置于理性之下，不管是为了物种保存还是涉及文化，情欲都应当为它们服务。他并不认为本能冲动是“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和没有利益的实用性；通过设想本能冲动有着一个不祥的固定根源，并通过将本能冲动引向和链接在那些被认为是规矩体面和

合乎理性的客体和目标上，弗洛伊德计算和客体化了本能冲动。究竟是应当赞誉本能冲动，还是应当谴责它，弗洛伊德不知该如何做出这个决定。如果说应当赞誉它，那是因为本能冲动造就了进步；如果说应当谴责它，那是因为本能冲动的自身隐含着危险。是放弃本能冲动还是满足本能冲动？在应当做出决定的关键点上，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但是这一开放态度，在他理论中的这种自相矛盾，并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前后不一致性。这种自相矛盾正是在整个的双重中，才有了它现实的基础（Fundamentuninre）。另外，这把双刃剑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驱赶对本能冲动的赞誉（或谴责）。如果说弗洛伊德也倾向于将那些大众化了的并在不断消失的概念作为人类学持续不变的概念，那他却通过在爱神和死神形态中出现的情欲与幸福、痛苦与折磨、开端和终结等概念，解释了迄今为止和未来的人类。他的快乐原则令人看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现实原则，没有任何社会的现实是与他的快乐原则相和谐的，在弗洛伊德所解释的快乐原则中，肉体不只是一个痛苦和堕落的载体，它也是一个感受和传递快乐的器官，并且它自身就可以转换成乐趣的源泉，并还在其中隐藏着自身的躯体乐趣，虽然人们通常只是把对这些乐趣的感受集中在生殖器官的区域。弗洛伊德的乐趣作为较低层次的天堂，无疑是作为中间层次的地狱般的雇佣劳动的对立模式。悲剧性的和始终如一的，他总是不断地牺牲或放弃了它。

对于这个乐趣问题，那些动机心理学家却运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动机这个概念中，性丧失了它的爆发力，它不再与紧张、爆炸和突破有所关联；它只是如同人的许多动机中的一个动机。曾经有着决定生和死的力量，由于被解释成只是一般的意愿而得以平缓，变得苍白无力、无形无息，被剥夺了实质和迷惑力。由婴儿快乐的吸吮和母亲的爱意所唤醒的那些市民阶层的爱的乌托邦，在现代心理学关于动机的模型中，再也没有了它应有的位置。那些被作为混乱和变态的、反市民社会秩序和不正派的行为，被加上了公约性。物化的王国被一直扩展到它的对立面，性学家们也被从他们研究对象的深渊和不确定性中解放了出

来。他们就像摄影师那样在寻找作为主题的动机：一会儿是类人猿，一会儿是爱斯基摩人，一会儿是大学生，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是体内的阴道，一会儿又是外部的生殖器。如果想坚持历来被贬低并且这里不仅涉及一种黑暗或一种走向光明的力量的性本能冲动，那就成了纯粹逆反的意识形态。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反叛者还没有完全被制伏，那些倒错的行为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正常之中，有着性本能冲动和性能力的人还没有完全在性的坏的普遍性中得以升华。不顾试图协调这一切并使之功能化的努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这些重合和协调，必须坚守个人与社会的差异性，不只是因为人已经每天都在遭受最可怕的性本能冲动的煎熬，而且也因为即使是最适应社会最能克制自己的人也有着自己的感受和想象。但是“肯定主义”的性学研究者并不愿意去感知这一切。

思想的父亲有着怎样的愿望，愿望的父亲就会有怎样的思想。我们也许最好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施密特关于性的欲望和性的经验也能够来自与性无关的动机，他的陈述展现了从侯爵德·萨德（deSade，按维基百科介绍，全名为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他尤其以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是性虐恋的一个代名词——译者注）到尼采的思想发展过程。如果把本能冲动、情感，即那些根本就是人的心灵的生活归入非理性的世界，那么就是说人的心灵生活受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所操纵，这就如同今天赞同把人和自然毁灭机制中的非理性（但并不是非现实）的机制归入理性世界那样。本能冲动并不驱动人，而是生活在驱使人去做些什么；不是生活在生活，而是本能冲动在生活。本能冲动是一种直接性，它的媒介效用在于它通过社会与个人的生活，帮助那些仅仅写在纸上的如躯体、心理、社会等要素解开其与作为机体性的本能强度、身体性刺激、过去的回忆或与其社会角色相应的装模作样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动物不同，人类并不把自己由本能所驱使的行为，看作一种与生俱来的完整或完美的行为。本能冲动媒介的直接性，并不拥有普遍性的意义，也不具备本

体论意义上的实质性，即不是基于自身并能够从自身出发构建人的生活的力量。就此能够说：本能冲动的自然要素，并不能以社会生产的方式方法溶解在自一段时间以来被我们称为“性”的事物之中。但是如我们已经认知的那样，建立在异化之上的快乐，依赖于禁忌、挫折和恐惧。它不是自然的。它要寻找的是一些折中的方法，它需要的是有所节制，有些活动余地，它既不愿只有“恒常不变的对象”也不愿放弃承诺，它在与孤独的联盟中寻找一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路。这在今天，如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叫作：性的自由化，也就是在变动中的不变，敌视享乐的享乐，未绑定的联盟，不受忠诚义务制约的忠诚。一种将这样的事实行为和这种口号同时贯彻在同一种性学理论中的性学研究，并不能提供反抗暴虐和事实幽灵的力量，充其量只能是面对这些绝对优势而缴械投降。这种性学研究无疑只能是与那些事实的自然形态缔结理论上的和平。

“我们的构思，”施密特（1983：35）写道，“是表述那些我们称为性自由化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是如此广泛地将性从其所遭受的迫害、禁止、道德约束、限制、遗弃、恐惧和罪恶感中解放了出来，因而为“性”呼唤出了一种不再有害、充满和平、令人安宁的，但也不再神秘的特征（同上）。用这种方法帮助性摆脱那个永远有着潜在破坏性的本能，华丽转身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一种具有“适应和调整能力”（同上：36）的力量，这就是寻找快乐的动机。但至少性因此变得“更自由”和“更宽容”了（同上：35），它现在有了那么一些悲观，那么一些包容，也有了那么一些平和，也就不需再提自由的辩证法了。连接着时代精神并融合了一切的一种性欲性行为模式，有着本能冲动与意识的相互认同，即使是启蒙意图也在这种模式中走向实证主义。现在统治它的只是事实的幽灵的笼罩。黑格尔（1807：416）也终于能够在那个被他看做是启蒙成果的队伍中问候我们：“如同对人有用的一切，人也同样决心使自己成为这个队伍中对大家普遍有益和有用的成员。他给自己多少关心，也必须给予别人多少关心，他给予别人其实也就是给予自己；

好人有好报。但他有权按自己的处境处理这些事务。他帮助别人，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虽然这种已经准备好了和正在准备的意愿，可能总是破碎在由于光亮和黑暗交替而使那个具有普遍性的表象变得虚弱的地方，即在幻象和反思中，在本能冲动和梦想中。

简而言之，我曾经写过众多“对本能冲动的赞誉”，今天我仍能对它再添加许多赞誉。因为如果没有本能冲动的理论或一种介于躯体和心理之间的理论，那么性欲性行为对我们来说，无疑就会像我们今天的文化对它所假设的那般乏味，即它就会是肤浅的，几乎是兽性的，如同排泄大小便那样只是机体的生理条件反射，但它无论如何又都是一种算计的行为。而事实上，它缺少高深莫测、异常神秘、不可算计、反规范、富有幻想、在自身中蕴含着冲突和矛盾——就此归纳为一句话：它具有唯一性，它是唯一的。在这里我并不想否认，冈特·施密特关于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的意见中也有他的正确之处，比如他认为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有着明显的重男轻女的结构性特点，这无疑是正确的。对此，我也有与他相同的想法。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确实受到了父权主义思想较为强烈的浸渍，作为一种批判主义的性理论，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点。也正是首先基于这个理由，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断在思考，是否能够以另一个诸如欲望冲动、情欲或渴望这样的概念取代那个古老的性本能冲动概念，以便更确切地反映当今的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内化在它们之中的生理、心理的沉淀。

当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沃尔夫冈·伯纳（Wolfgang Berner，2000：62 f）对我与施密特（也请比较：Schmidt，1948b；Schmidt und Briken，2010）关于当前生物神经和心理分析研究中的一些本能直觉模式，“动机”和“动机总和之值”，如力比多和自我毁灭以及依附和迷恋等做深入慎重思考的时候，正是我偏爱运用欲望冲动或刺激冲动这些概念的时期。这两个概念几乎没有过去时代遗留的不良印象，表述了传统的本能冲动概念中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兼顾了当今文化中

普通个人的心理状态。另外，弗洛伊德（1915a：214f）也运用了一些与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有关的术语，称为本能冲动的欲望冲动，目标，客体对象和源泉等：“人们将一种本能冲动的欲望冲动，理解为是动机的原因，力量的总和或它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意愿的强度。冲动的急迫性特征是一种本能冲动的普遍特性，也就是本能冲动的本质。任何一种本能冲动都是人的一种活动；如果人们以随意的方式谈论起被动的本能冲动，无非是认为作为本能冲动有着一个被动的目标。”在弗洛伊德发表这一论断85年之后的今天，我正在研究比如区分冲动的各种不同功能：1.追求生存的冲动。它保障了“婴幼儿”（Helmuth Plessner）得到其父母或其他照料人员对其生理和心理生存护理的关注。2.要求排泄的冲动。它能够帮助消除身体和心理的紧张压力，它的强度决定了生物进程的早期、生育期和后生育期的发展（关键词：如多巴胺那样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媒介）和个人—互动沉淀（关键词：冲突和非冲突性的吸引力），并将这一切铸刻为个人的生活模式。3.追求社会性的冲动。它帮助人类克服对自身来说几乎致命的心理孤独和社会隔离。4.追求自我价值的冲动。用以填补自尊的空白点。这种冲动，从生物学上来看，导致一种生育的冲动，从心理学上来看，则是一种生育愿望。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一点上，我赞成赖穆特·赖歇的观点），这种冲动使人的性别与爱情生活中的性和生殖领域产生相互依存，不管在集体和个人潜意识中有着多大的文化差异，并且也独立于具体实践和具体性别关系的方式方法。这就是说，即使是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或人与动物相互交媾，也是表现了这种冲动的趋向，这种冲动有时甚至会转换进入人的潜意识中，比如所谓的性变态或性反常；有时也变得极不可忽视，比如一对异性或同性恋的夫妻，他们最大的愿望无非是想要个孩子，为了实现这个本能冲动的愿望，他们不仅愿意忍受千辛万苦，甚至不惜反对生理的自然前提创造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愿望。

在当今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仅仅从性的角度局限地理解这种带来激情的冲动。如今的冲动——冈特·施密特在几十年前就已感觉到了这

一点——主要来自于商品和消费世界的刺激和诱惑。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以及这一事实，即来自普通个人具体的当代社会，是通过作为各个“刺激寻求者”（Zygmunt Bauman）客体不可辩驳的效用而构成它自身的，那么传统的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同时也包括性欲望冲动这个概念就都要退居到舞台的背后去了。同样处在舞台背后的还有一些传统批判的矛盾，主要是围绕着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快乐原则与无聊倦怠、本能与直觉等一些对立概念，但由于在第一次性革命中被理解为本能冲动的性的效应以及它的象征意义和身体意义的重要性都达到了极度膨胀，因此这些概念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外，也在一种普遍的理论转换中达到了自己的高潮，即也因此获得了其理论的重要意义。今天站在理论前沿的是还有待描述的有关性的去戏剧化和平庸化的问题，以及主要是不断搅动个人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不是在唤醒个人的性需求，而是试图将个人的性需求绑定在商品或文化习俗上。因此也就不必感到奇怪的是：通过将传统意义上有着普遍禁忌压力和个人羞耻感的对性本能冲动的追求，压抑进潜意识中去而使之不再站立在中心地位的方式，冲动的刺激不仅有了象征性的意义，而且也在极大程度上可体验和可观察地附着在死的物之上了，死的物也就因此而有了生命的活力（16、17、58各章）。

不用奇怪的还有，不是去完善性本能冲动和欲望冲动的一些用词如贪婪和情欲（但不是渴望，因为渴望太偏向于力比多这个其实并无大碍的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性行为破坏性和攻击性的一面。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原始性欲性行为（Protosexualität）这个词，实际上它的内涵明确针对的是文化和社会的性模式。与原始性欲性行为相比，情欲这个词是一个在身体的冲动和需求、社会心理的愿望和渴望与社会的贪婪之间的一个临界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变得贪婪，一种对人和死的物（即所谓的商品）的贪婪。一方面是对人的性的占用，另一方面是对物，即商品的占用，这两者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能的主要驱动力。谁不这么去发展自己，谁就会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走向灭亡。今

天，无数男女在互联网上寻找闲聊的对象，以从中获得刺激，却并没有传统的经由一种性高潮作为性满足的趋向。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社会网恋中的电子—性（64章）是模棱两可的：全天候每时每刻地寻找和收集刺激，却又没有最终的结果。我们假设，如果社会成员都能在邻近处得到自己最必需的一切，他们满足自己已拥有的一切，不再有其他的渴望并就此而有一种安宁，那么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就会因此遭到崩溃。所以说，贪婪有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效用。鉴于如此这样的状况，欲望这个词比欲望冲动就更合适些，因为冲动这个词更多地被罩上了表达日常生活那一面的意义，并通过日常生活而简约化了；那就变成男人和女人只想排泄尿便。

但是经过长久的思考和斟酌，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击败了其他具有严肃竞争力的词语或概念，重又赢得了我的重视。它之所以重又赢得重视，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概念来表现人特有的整个生命进程，表述人最初和最根本的生长期在心灵、身体中的沉淀，也就是深植于人的心理和躯体之中并逐渐成为结构的一种能量，要想表现人与动物的差异，是不可想象的；我的设想是：本能冲动（或一种模棱两可的动力）这个概念中已经隐含着一种结构性冲动的能量，并也能形而上地表述为性感、意志、生命力或性爱。这么一种具有驱动力的结构已经不能再做简约化：没有本能冲动，也就没有了人。我认为，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的批判性潜力，正在于它所蕴含的风险，而这恰恰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因为如果放弃如本能冲动这样已经被经常运用的词语和概念的经验，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喋喋不休地说些只有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套话，我们也就只能在推特的博客中谈论一些商品，只是为了泛泛而谈。与此相反，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抓住了性的个人特殊差异，因而比欲望冲动、渴望和情欲等概念更具有神秘性，它以直觉对抗想象，它的形成理由并没有清晰展现它往后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能够使本能冲动变得比较可预测、可沟通、可协调和可综观些，那就只会牺牲原本不可估测的情感感受，使之变成简单的娱乐、有趣和享受。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离开了弗洛伊德

纸片式脆弱的本能冲动，那么我们就排除了心理分析纸片屋式（即空中楼阁式）的倒塌危险。但是我们不可能将自18世纪和19世纪以来已经使用的所有概念都加以替换。而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再谈论性欲和性行为了。有着最后决定意义的并不是这些词语或概念，而是这些词语或概念各自又增添或重新又获得的新的内涵。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理解的“本能冲动”与我们的前辈在20世纪或甚至19世纪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自然有那么一些不同，今天的这个本能冲动概念，已经不再是一种惰性的自然命运，而且由于文化的不断变迁也成为对刺激和兴奋的寻求。除此之外，对我们的理论来说，也不再存在性欲性行为的阴性语法属性和本能冲动的阳性语法属性，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已经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即我们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同伴的性本能冲动和性生活有着怎样因人而异的个性差异。

但是当我坚持运用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的时候，冈特·施密特仍然还在一如既往地坚持拒绝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本能冲动概念，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理解为是一种罕见的机械性的蒸汽锅炉式的模型。在一次几乎40年之后的讲座中，他如此说道：“按弗洛伊德的这个模型，性的紧张压力将会不断递增，似乎就如搁在火上的一个装有水的锅炉，必须不断地让锅炉排出一些蒸汽，才能使锅炉不致膨胀……或爆炸。”（Schmidt，2009：3）通过重新引用美国性学家的理论，他在今天仍然将性作为一种“寻找快乐、兴奋和情感的资源”。他认为，今天所涉及的已不再是释放本能的压力，而是“人可以通过性欲和性行为去做些什么”（同上：4）。然后他赞誉“一种可以在悲伤或痛苦的时候作为安慰的性欲和性行为，或是作为对抗无聊的消遣，或是作为一对夫妻相互温存的仪式”等。此外，他还在引用美国性学家的基础上，要求应当对日常生活中的、并不具有传奇性的性、性欲和性行为给予更多的尊重（同上：5f）。他认为，如今已经去神秘化和去戏剧化的性欲性行为，因此拥有了一种选择可能，即它有权支配自己的性欲性行为，既可将自己的性选择列入议事日程，也可将它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有权计

算性的成本和盈利的实用有效性。施密特所设计的这种权利要求，是一种隐喻，他企图用它来取代那传统极其非理性的本能冲动的隐喻。似乎如此这样，我们就能在这千禧之年的开端，将性欲性行为从教会的规定，（几乎）从父权制，从市民阶层的黑色浪漫主义以及从心理分析学中彻底清除出去。而这一切只花了50年时间，因此这几乎是一个成功的故事（Schmidt，2004：164）。

如此这类看似无害地将一切让位于利益算计和人为设计出的看似无害的情感效应，不免使批判主义性科学感到惊讶。坚持重又添加新的批判内涵的本能冲动和爱情等概念的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召唤（这里再强调一次）性自身的表象，而是它在整体中与其他关系的交织。自黑格尔以来，物化这个概念在自身中维护了主体的不间断性的理想画面。自弗洛伊德以来，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反驳现实的合理性，谴责它是统治的原则，并（运用黑格尔和阿多诺的语言来表达）在自身中毫无例外地维护了由欢庆和物液变而成的理想画面。鉴于这个整体是对抗性的，这个整体的概念在自身中是断裂的，因而是不完整的；又由于这个整体并不是概念性的，因而它也就在结构上远离了自己愿意成为的概念。本能冲动和爱情作为概念相对于它们那些自身非概念性的要素越是封闭，越是拥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也就越清晰地展现了这两个概念的成因，同时也就是社会物化的成因。按我们对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两个概念理解的内容来说，它们所要对质的是直觉、现实原则、劳动报酬和交换原则，是物化了的意识和商品化等概念，而不是有关存在或权力或沟通等概念。但是这一对质，并没有使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两个概念完全从它们所对质的那些概念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因为即使作为它们所要对质的那些概念的对立概念，作为渴望或向往的标记符号，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两个概念必然也会打上自己所要反驳的那些概念的印记。概念的这种悖论（这里再一次强调）基于以寻找真理为自己使命的哲学自身的悖论之中，不管这种哲学被称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也基于最终联结从康德到黑格尔以及从马克思到阿多诺的思维过程之中：尽管一切概念都有它们自

身特有的差异或对立，社会作为主体的一种总称与它们对立概念的关系，就如同主体作为社会的一种总称与它们对立概念的关系一样。社会的形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自然或上帝那里蹦跶出来的，而是由人的活动、劳动和思想（也许劳动和思想不应特意指出，因为其实劳动和思想都属于人的活动）造就而成的。今天单一个人的社会化，则正倾向于走极端。今天普通个人的劳动和思想，则正倾向于失去意义，现有的机制正在碾压他们。也正因如此，人的性欲性行为和爱情才有了一种如此高的市场价值。爱情和本能冲动之所以成为批判性科学的识别标志和核心，是因为它们自身是无法捕捉和无法陈述理由的。爱情有多么深不见底，那么性科学就有多么深不见底。因此出现了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1912，比较：Herrn，2003）的“爱情自然法则”理论和性科学的无数合理化提议。那么，弗洛伊德对此说了些什么呢？他只是对自己的思考保持了沉默？为什么直到今天，心理分析学仍没有真正发现爱情？为什么本能冲动学说最后被晚年的弗洛伊德（1933：101）看成是“我们的神话”，并且本能冲动有着神秘的本质，它的伟大只是在于它的模糊性呢？

伊尔卡·昆多（2008：41；也请比较：2005）认为，可令人高兴的是，本能冲动理论为心理分析学提供了“三个极其重要的理由：一是作为有关潜意识的科学，二是作为有关人类学的理论，三是作为有关社会化的理论”。只有借助于本能冲动理论，才能从“貌似自相矛盾，充满冲突和无法认定的维度，进一步探讨在这些维度上已经显示出来的人的心理状态和问题”。性的渴望，典型地表示了“潜意识、他人和那个作为陌生人的自我”。赖穆特·赖歇（2009：196 f）写道：“越是深入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之中，越是会由于那个总是在不断递增的复杂性，而感觉更加困惑，因为那些性欲性行为、本能冲动、力比多和潜意识等概念（或我们能否更确切地说是词汇？），都聚集和纠结在这个复杂性中。尤其是那个本能冲动概念，人们几乎想说：这个所谓的本能冲动概念；或是想说：这个曾经这么称作的本能冲动概念。刺激是否就是它的自身，因而

最终与性欲性行为有着一种共同的认同？它是‘由形成于躯体内部然后进入心灵的性刺激’的心理表现的（Freud，1915a：214）？或者，也许它也能通过一种表现它的想象和一种伴随着这一想象而出现的情感，成为心理的客体对象（Freud，1915b：275）？但是如果没有本能冲动，那么何为‘心理’呢？这一切问题导致我们又得启动最初的思考和探讨。在经历了100年心理分析的自我解释之后，人们不得不说：心理分析在身体与心灵、存在与表象、生物学与哲学之间所做的含糊不清的双重解释，已经成为本能冲动概念的理论结构。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它就是心理分析的不可确认性。”

弗洛伊德曾说，本能冲动是一个“临界概念”。但对我来说，它的临界性并不首先表现在身体与心灵的临界点上，而是表现在个人与社会这两个领域的临界点上。它在本质上会由于社会客观化的进程和暴力总是一再地完全倒向社会这一边，并且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总是不得不退回到主体化和个人这一边：作为在对等的普遍性状态中绝望地寻找对立概念和对立画面，但并不是出于一种寻找本体论心理需求的动机。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最初关系解释（或转译）为“性欲望冲动”（Laplanche），并借助这样的解释为母亲和孩子之间非现实的性关系（彼岸而非此岸的性关系）建构了一种生物的基质；这样的性欲望冲动就是社会与个人的链接，因为母亲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必然铸刻着时代的印记。由此在孩子中形成的本能冲动，是一种互动结果或沉淀；而性欲性行为如果没有社会和对社会的反映，也就不再能够作为本能冲动的反射或假性的直觉。由于人拥有意识并能够进行反思，性的问题便会扩展进入到文化和社会之中，成为文化和社会的问题。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1969：220）在众所周知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rik der Aufklärung*）中所说：“只有动物才按自己的心理冲动生活”，因此对批判主义性科学来说，本能冲动如同性欲一样，在第一层面上是一种社会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理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

与人不同，动物是带着（或多或少具有前定性的）本能直觉来到这个世界的。感谢当今的动物习性学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直觉帮助动物在其生命的过程中令人惊讶地“学习到”一系列必要的生存技能。但是本能直觉并不懂得分辨差异和区别，因此动物只能从自己的本能机制出发，做一切本能驱动它要做的事情。这就使得耗子就是耗子，或只能是耗子。与动物相反，在传统的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思考的意义上，人的本能冲动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由基因遗传的，既无法事先预测，也会因人而异。人的本能冲动有着一种集体和一种个人的发展与演变史，人的本能冲动正是经由这样的历史才有了构成、消减、推移、压抑、升华、破碎、反应、整合，才有了意义和目标的象征。因此在人的基因遗传的意义上，人的本能冲动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它有一种可分为躯体、心理和社会的起源。为了表达的需要，我们只能这么细分了。也就是说，比如存在着如同一种家族的遗传，某些特定的反应方式、互动模式、防御机制等通过代代相传或是群体间的相互传递，他们的反应或行为就会变得如此相似，犹如这一切都深植于基因似的。

如果我们能够告别这么一种想象，即认为本能冲动是与生俱来的，如同人的结肠，有其确定的功用模式，那么就不再存在一种“纯粹的本能冲动的行动”了。我思考，一种“纯粹本能冲动的行动”也不可能如马丁·丹内克尔（1987a：135）所假设的那样，是“一种具有唯一性的一次性行动，也就是当本能冲动与某个客体第一次相连接的时候，所出现的那种一次性”的行动。对丹内克尔来说，这就开始了“本能冲动的历史：它在自身中发展了一种渴望的结构”。我是这样思考的，本能冲动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已经经历了媒介的。如果真的存在本能冲动在时空意义上纯粹的第一次行动，那么可能就是人类作为物种的诞生，即本能冲动摆脱原本完全没有主体的状态，转身进入“本能冲动”象征性的重新表现状态之中，并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和他人相互组建社会共同体，人正是通过自身状态的这种转换而成为人的。这个第一次持续了亿万年，伴随其

出现的是一些新型的人与动物的分类，尤其是人从自身出发远离了一些现在被看成是“外在”的以及“野性”的需求；并且从这时起，人作为人的表现也越来越强制人接受间接的性满足。直到人完全掌控性的阴影、符号、图像和代码（或是思想家通常称为的象征符号）的命令暴力；这一切看上去犹如又回到了动物的王国，似乎这期间已称之为性的需求和欲望以及它们的抚慰和满足，完全是基于自然的理由；尽管很清楚，在人的性需求和欲望之中已经植入了社会内容的本能冲动，即便是无意识的，但隐藏在黑暗层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却已预感到：本能冲动与文化的叠合，已被误解为它只是与生理前定性的一种联合；事实上这是一种个人的疏远和间离，只是这种被定义为病态的分离被归咎于个人的“文化欠缺”了。

被我们作为与本能直觉对立的（作为动力的）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只有通过人的互动才得以构成，而经典的心理分析学对这种互动的理解，主要偏重于从本能冲动学说的意义上来解释性本能冲动与它的客体对象的联结：本能驱动力几乎盲目地就能找到自己前定的目标，只要它不是因为受到病理的影响而被分散注意力或甚至被阻止。在它找到自己的目标对象之前，它的目标相对于它，只是一种潜在的性和性别的载体，只有在这个载体中，性的本能冲动和性的受孕才能完成切入、喷射和接受。鉴于性的第一次“本能冲动行为”，也是经由媒介（即通过性对象的媒介）才成为第一次的性冲动行为，因此对我来说，拉普兰济（1988）新心理分析关于本能冲动的理论（30章）似乎比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更合理些。拉普兰济漂亮和辩证地把这种媒介说成是性本能冲动的客体源泉，因而表述了所选择的措辞之外的含义，即本能冲动并不简单地在先前就已存在，而是从客体对象之中蹦跶出来的，本能冲动成因于它的客体对象之中。拉普兰济在本能冲动中设置了它与客体对象的关系，因而使它成为活动的舞台，只是他并没有直接地这么说而已。在超越拉普兰济设立的这种心理和心理分析的本能冲动理论的基础上，我认为本能冲动的源泉还应添加上这些内容：1.有着个人和不同生活阶段差

异性的身体条件（通常是指人体结构、神经功能、荷尔蒙内分泌和代谢功能等状况对身体的影响）。2.是与躯体有着同样多差异的心理、精神条件（比如因人而异的想象和符号化能力、心理防御机制等）。3.与人的躯体和心理有着同样多差异的社会条件（即在早期、生育期和后生育期期间与他的照料者和其他关系人员在他既定的性别、心理和社会状况中的互动等）。4.文化和社会的条件（即文化社会正式和非正式地对既定的与性别有关的事件、社会角色，对性本能冲动的命名、编码、符号和象征，以及对情欲与精神关系的看法和评价；并且在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中个人的性本能冲动，虽是因人而异有所不同，但都有着一个相同的行为规范框架，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只得按这一框架内的规范构成自己的性本能冲动）。

性本能冲动，自弗洛伊德的被普遍认同的表述以来，无非就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部对人提出心理要求的一个刺激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如同根数式的根基原子。但我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性本能冲动无论如何又是一种根式原子，它在身体、心理、精神、社会、文化和群体等的相互冲突和协调中建构自己并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构化；它作为一种有着生活史差异的构成，沉淀在一切性表现之中；并且这一切不是由于缺乏其他恰当的表现方式因而只能通过个人的表象加以表现，而是伴随着欲望、身体的觉醒、性快感和满意度而来（为了将有关的条件分开来讲），不是因为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就不去将它思考为性欲和对象之间的媒介，而是因为它自身就在性欲与对象之中。丹内克尔对此也有着与我相同的理解（同上：136 f），他曾在文章中写道：“可以把性本能冲动说成是根式原子，其他一切与性相关的欲望和行为都建立在这一根基上。它是一切可能的性欲性行为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切愿望中的最根本愿望。”我以前也曾用性本能冲动作为和其他与“性”相关的，比如（作为文化模式的）性欲望和（作为因为商品化而已经变成社会垃圾的）可买卖的性相对立的概念。

那个为性和一切与性相关的欲望和行为永远打上自己印记的根基，因为隐藏在黑暗的潜意识层而无法企及；能够进入我们意识中去的只是它的极少或极小的一部分，如冰山顶上的一角，或更确切地说如同火山喷发时的一小束火光。因此它根本不可能通过社会性化后的性欲性行为或凝固在意识形式中的性意识所取代。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性不可简约的最后剩余值这一观点的理由（33章）。它并不是一种神话，却充满了神秘和自身的差异性。神秘和差异永存，即使我们这个世界进入了只有一种性别，即只有一种中性性别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还完全不可想象的时代，性和性别仍然还有其神秘性和差异性。按这样的思路推理，我们今天称之为性和性别的，最终只是一些能够激起性欲和性爱的脉冲；而触发这种脉冲的，正是人类之子与另一个人的相遇；如果用弗洛伊德所喜爱的场景来描述，这也正是个人的一种卡普特尼莉（CaputNili，尼罗河的源头，意喻一个事物的真正起源——译者注）。事实上由这种冲动驱使的结构，必然来自生物性前提的既定方式方法，比如在一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或社会中，人之子的受精、怀孕、出生、喂养、哺乳和照料，即使是绝对无助的婴幼儿，也都依赖于那个时代既定的社会生活进程，但这种社会生活进程与人的自然生活过程又有着一种无法分离的纠结，不仅依赖于它也同样听命于它。被我们称为本能冲动的，看上去貌似有着一种直接性，实际上它是由普通个人的生活传递而成。它那些貌似纯粹的躯体、心灵或社会的要素，只能在纸上作为结构性的本能驱动力，作为区域性的力比多，作为淹没的记忆或作为刻板的性别角色，加以一一分离。

没有人是带着他的“本能冲动的命运”或他的“性别认同”来到这个世界的。它们也不是前定或预制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别认同并不是作为某种既定形态被唤醒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性本能冲动的结构和性别认同结构，这两者都是心理的构成；它们的最基本核心，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是由有意识的，但首先是通过无意识的反应、互动和信息构成的，而作为还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幼儿则是被自己的

照料者和护理人员牵连进了其中，并因此而被纠缠于其中。卡斯帕·豪泽尔（Kaspar Hauser，德国著名的野孩子）（出身不详的豪泽尔，于1828年5月26日突然出现在德国纽伦堡，外貌看似约16岁，智力低下且寡言。他后来解释说，他所能记起的就是一直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以水和面包度日，这件事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轰动。——引自维基）的案例，证明人如果没有这类互动，既不会成为一个有性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有性别认同的人。分辨男孩还是女孩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别，可能在一切文化中都转换为表示差异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与男人在自然天性上是不平等的，是有着多少、强弱或上下之分的。多少、强弱和上下，并不由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由社会化的进程，即由构成象征性身体差异、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法律、宗教形态并赋予其意义的社会化进程所决定的。

在经典的心理分析术语中，“性本能冲动的命运”被表述为高度个人化的心理构成，它形成于早期幼儿时代，并且如同它的名称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一命运的影响效用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的科学家们已经对此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性本能冲动命运”这一理论过高地估计了儿童早期（或胚胎形成期的）心理对以后整个人生阶段的影响。我的思考是，性本能冲动是能够在整个人生中不断重新构成的。在我看来，实验显然证明了，不管是本能冲动总体还是个人性本能冲动的努力，在人的整个人生不同阶段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规模和程度，并被以不同的效果或是抑制或是允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不仅自己从没注意到，而且也从没引起其他相关的社会人员如施行检查的医生或护理人员的注意，一直到他们人生的一个特定阶段，比如在作为女人而有过渴望男人的性欲之后，在内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对女人的性渴望；或有些男人先前虽然有着心理分析所假定的生殖器至上的癖好，并且也显然完全能够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和爱情生活中得到性的满足，而在以后的人生阶段却发展成为主要通过所谓的前生殖器阶段的方法，如窥阴、恋物或恋尿等的一些想象和实践来激发和满足自己的性渴望。如同这个世界上没

有一个人能够在出生时就将自己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别的结构作为一种已经完成了建构的形态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样，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在童年早期就形成一种相对于以后生活的事件完全惰性、一成不变的本能冲动的结构。我们的文化中当前普遍存在的有：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危机，比如有发育期、青春期和更年期等危机；有转变型危机，比如有怀孕期、生育期、产后月子期和婚姻持续期中所出现的危机；个人的生活危机，比如有生病、离婚或失恋、亲人离世，社会地位下降等。但也正是这些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改变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机会，即在社会的普遍危机中被迫地和在个人生活的危机中尽可能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本能冲动的特性和与性相关的价值取向。从时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生活阶段，并不只有一个或两个不同阶段，而是多个不同的生活阶段（30章）。

弗洛伊德的学说已经使我们懂得，任何一种被我们认为具有攻击性的本能冲动，都是与那个我们这几代人所称的性的本能冲动聚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有谁把这一假设实体化为一种积极的人类学基本要素，并且相信自己找到了一种人类的起源，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最终意义的真理，那么他的理论也就因此失去了它应有的人类历史性。不是任何其他人，只有那些与此做相反推理的理论家，才会认为自己在性的本质中，现在甚至是在攻击性的性行为中，找到了最出类拔萃的生命本质。自以为找到了性的本质的这些理论家想为我们提供一种安慰，但他们提供的安慰早就被超验的内在关联说否决了。这一学说认为：应当实实在在地克服物化的性欲和性行为。这种自以为是卓越的，在一定程度上以纯粹形态出现的活生生的性本质，如同弗洛伊德其实早就知道的那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种所谓的性本质中，性本能的冲动也被物化了。本来完全相同的本能冲动事件的形态，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被解释为事实想象，在文化社会的层面上则被解释为性的形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把自己理解为是一门研究主体科学的批判主义科学坚持认为，本能冲动这个概念以及非物化的意识这个概念，如我已经说过的，不是

出于对本体论的爱好，而是鉴于人的性活动被机械化和活生生的性被物化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最终总是会导致物化对性的排除。比如在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理论中，性本能冲动最终会在一种对普遍生活，也就是对一切能量的构建中丧失自己。自然主义或甚至是躯体学意义上对本能冲动的物理性想象是：如果男人和女人想摆脱性欲性行为的强制，如果他们想活生生地活着（而不受性的苦恼或煎熬），那么他们只需将本能冲动看做是一种初级的生理程序。这些理论家没有任何与社会相关的概念，他们毫无过渡地从个人的层面进入到社会的层面，他们并不懂得：较少的本能冲动，也就意味着较少的生活。

比自然主义有较多具体内容的是那些有关本能冲动的形而上学理论家，他们在继承和超越弗洛伊德悲观主义的本能冲动理论的基础上，并不将性的本质肯定为好的本质自身，而是将性的本能冲动理解为与整个世界一样，也有着自身的自相矛盾。之所以说他们的理论内容是具体的，因为他们没有脱离现实，并且同时也没有停止超越这些现实去思考。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去探讨性本能冲动的初级过程（而这种初级的生理过程又永远是个人的，因而应当从心理的角度去加以理解），而只是将本能冲动作为一种理念，用这种理念作为性科学的精华内核去吞没性本能冲动的自身意义。他们用这一理念为性本能冲动提供了一个地点，但这个地点并不现实地存在于理性的世界之中，也不能理解什么是对等的概念，什么是对立，什么是异常，什么是过分，并因此付出了理论上的代价（32章）。这种本能冲动的形而上学是具体的，因为它并没有屈服于神秘化，而是将造成当今人们的行为和毁灭自然活动的那些非理性但又现实的机制，归入理性的王国，但把本能冲动和情感，以及所有的心灵生活，归入进了非理性王国，如同是由生存的理由所决定的那样。之所以说本能冲动的形而上学是具体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它并没有真的认为，似乎爱情、变态或本能冲动的爆发，真的能够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世界连根拔起加以改变，似乎它们在当前还没有完全败于自己

和这个世界的表象。因而感谢上帝，这些假象并没有阻止形而上学在所有与性相关的领域——不管是异性恋日常生活中的爱情，还是变态的性本能冲动——的爆发，虽然这一刻有些损害和模糊，但形而上学都坚守盼望一些更好的时刻的到来（这是黑格尔曾经谈论过的一种盼望），保留这些盼望作为具体的乌托邦——而这只能是作为一种表象。

32 性科学的精华

今天有许多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家，会以一种不屑一顾或甚至是厌恶的情绪来回顾过去的那种旧性学，认为这类旧性学只能如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1886）所做的那样列举一些单个人的性现象，却没有可以用来对此进行理论概括的概念和范畴。由于没有理论，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是为了即刻在一个植物标本中榨出些汁来，更确切地说，是想在一个动物寓言里割断动物的喉咙。人们认为这种做法就像是一部“恐怖系列剧”（Gruselkabinette），因此要求分类数据。如果真的存在不同于色情画册和邮购目录中色情广告的“恐怖系列剧”，并且也没有从一开始便完全剥夺个人特殊的性差异，就能向性科学展示，它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牺牲或是说忽视了系统中的个人那些特殊的性现象，因而也相应地牺牲或忽视了个人的性痛苦和对性的渴望。

一种性科学，如果想让人的这类痛苦和渴望来说话，就不允许将人的一些特殊兴趣淹没在普遍兴趣之中。可惜直到今天只有少数一些对这类特殊兴趣感兴趣的性科学家才能懂得，性有着怎样的不同和创意，便也有着怎样的混乱。一些概念如变态（或非常态）、恋童癖、性偏好障碍和性别偏差等，虽然经常遭到传统学派的敌视，但也无非是一个有盖的奶酪盘，并不能阻止置放在里面的本能冲动（如奶酪那样）往外散发出香味和臭味。因而统计表格就有了重要的地位，但这是无意义的。正因为它是无意义的，统计表才有了一个如此高的等级。因为统计表虽然已对一切数据做了处理，但包含在它之中的对立，仍远远要多于一个概

念，比如变态这么个概念所能给出的暗示。因此对性学家来说，变态这个表述早已过时。但只要回忆起它的词源，我们就会联想到扭曲的、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跳出行列的、头脚倒挂的一些事，按其语义来说，也就是在性王国中的一些前所未闻的臭事。但这些横行的、对立的、扭曲的、前所未闻的、异常的、多余的和有着臭味的事，不只是适合被归为变态或反常，而且也因为它们恰恰表现出了性欲性行为所有的拜物和双重特性及其后果，因而仍然可以归结为与性相关的各种表现（比较 Sigusch，1984b），这就是一再被吞噬了其意义的性科学研究的精华。

但是自我意识既太不稳固又太僵化，因而并不适宜在自身中接纳和储存与本能冲动相关的全部经验。弗洛伊德为限制本能冲动的爆发而设置的一些杠杆（防线），并不是一种痴心妄想，而是现实的。性本能冲动的爆发会造成恐惧，因为它将动摇一切连续性、原有的从内到外的平衡关系、对身体外表的控制、感知的一致性以及既定形态的持久性和客体化。性高潮（这是在幻想中的性本能冲动爆发所干的现实蠢事）来得越快，本能冲动的爆发就使意识变得越是朦胧，由此造成的恐惧就越强烈，要求审查的呼声也就越确定。把性高潮作为性满足标准的性科学，希望能够仍然保留对本能冲动魅力的关注；从本体论的角度提高本能冲动意义的那些形而上学家们，则想用它来减除个人作为原罪的性痛苦，使之不再是人的最下流的欲望；想帮助本能冲动获得它的权利的那些自由主义者，自然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如同街头书报亭出售的浪漫小说中的人物，其净化的过程也总是在继续；而想以自然主义或生机论来解释它的那些人，只是在寻找一种安慰，但这种安慰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件物化了的事已经过去。

作为最终被确认的性学家，威廉·赖希，在被看成最具有生命力的性的本质中寻找安慰，绝对是从最初一直坚守到最后（比较比如：Reich，1927/1969，1932/1995，1936/1966）的一位。他的老师，即属于最早一批批判主义性研究者的弗洛伊德认为，鉴于性自身所蕴含的矛

盾，并不适宜确认性在自身中有着好的本质。他在挣扎，是否要从人类学和理论概念的角度，但也从实际的角度，驱除具有死亡本能的性爱？他思考的实际意义在于，他看到如果性一旦与攻击合为一体，那么就该退居到病理学的领域。但是情欲与权力、攻击与欲望、性欲性行为与统治都彼此相属，个人和社会并不仅仅在理论家的头脑中，而且也在事实中相互联结不可分割。另外还要加上一些总是被忽视的事实：性欲性行为刺激的兴奋之谜，在于它接近死亡——比如在冲破禁忌之时，在本能冲动的性爱伙伴的心灵和肉体中融化为一的时候，在达到性高潮而似乎即将死去的时候。具有破坏性的本能冲动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毁灭真实地列入了它的计划；因为它的破坏需求并不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而且也通过具有破坏性的交换和物化炮制了性的他律；因为自我太弱，无法去为自己的形态冒险；因为自我又太标本化，只能按条件反射的程式对普遍秩序做出反应，而普遍秩序实际上则又是人对人的统治。谁有胆量公开承认自己的攻击性，而且还是在一个按意识形态所说专为不需激情就能相互拥抱所预留的领域里？只有当这个预留领域再也没有了对将普遍遭到毁灭威胁的一种恐惧而能够公然敞开心扉的时候，只有当整个社会都能够没有恐惧而生活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体验，对性的一种渴望（当然这个时候已不需再隐瞒这种渴望实际上来自一种攻击性），有着怎样令人愉悦的快感。

顺便说一下萨德（deSade），是他告诉我们，快感来自痛苦。那么他是否就此成为现代综合研究性学的第一人？即他是否整合了性科学中所有在20世纪冠以性学的研究主题？他是否在其他问题之外，也认识到了性的问题的重要意义？试图建立一门性科学的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显然是确信这一点的。在发现了《索多玛的120天或放荡的学校》（*Les 120 journees de Sodome ou L'école du libertinage*）这部手稿之后，他以欧根·杜恩（Eugen Dühren）之名在20世纪初期发表了《关于侯爵萨德和他的时代的最新研究》一文（Bloch，1904）。他所代表的那种意见认为，萨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Marquis de Sade）

在克拉夫特-埃宾撰写《性心理变态》（*Psychopathia sexuelis*）一书100年前的公元1785年，身陷巴士底监狱的萨德所撰写的著作，是一本“类似出自18世纪的性心理变态的教科书”（同上：278）。这本教科书遵循的是一种要求对性变态心理进行科学和系统研究的主张。除此之外，它也比克拉夫特-埃宾收集了更详尽的实际内容，列举了600多种性变态心理的不同表现。但在对此书的解释中，布洛赫把萨德的“激情”（passions）或“差异”（écarts）等概念，全都毫无过渡地转译为“变态”，并且还忽略了这么个事实，即萨德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现象和行为，对萨德来说并不涉及病态和医学，而只是关涉道德和宗教，只是与过错、恶习和犯罪有关。萨德与克拉夫特-埃宾和布洛赫的区别在于，萨德关注的是教会（同时也是国家）的利益，不像克拉夫特-埃宾和布洛赫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这些现象。

在我的《性科学史》（*Geschichte der Sexualwissenschaft*，2008a）一书中，我给出的结论是：侯爵并不是第一个综合式的性科学家，因为他并不具有现代思想。但他却是一个过早的后现代主义的煽风点火者。他对600多种性激情现象（不是“性变态”、“性偏好障碍”、“性欲倒错”，也不是“性别偏差”）的描述，甚至详尽到如此客体化的程度，似乎只有运用后来历史发展出的摄像镜头摄制客体对象图像才可想象的清晰度才能做到。这位侯爵一心想为人类的性、性欲和性行为等一切与性相关的（新）事物，建立一个（类似不久前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那样一个自由主义的）共和国。萨德说：“为那些追求快乐的浪荡子建造一些屋子，以便在这些屋子里，无论男女无论老幼，也就是一切上帝所造之人，都能够享受性放荡的欢乐，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娱乐好玩，并且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乐趣，这是所有参与这些娱乐的个人最重要的规则。”（deSade，1795/1965：109）之所以要建造这些屋子或提供这些场所，完全是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因为只有得到性满足的人，才再也没有动机和能量去颠覆政府。萨德期望出现的这种状态，直到现在才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现实：在所有层面上都为社会兼容的卖淫，经常公

开展示性的舞台场景和与其成对比的持续性、大众化的性的苦难，从传统的本能冲动型性快感转换为新的一切都商品化的享受型性快感的文化过渡。在后现代主义者中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像萨德那样关注性别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即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对不同性别的不平等待遇。萨德写道：“也就是说，应当有一些房屋，就像那些专为男人设置的房屋那样，以便妇女能够在这些受政府保护的房屋内尽情纵欲地享受性的快乐。那里的男女两性都将为她们的乐趣提供满足的机会。”（同上：119）即使在性商品化的资本主义赌场也还没有如同这些房屋那样给女人提供的性满足机会。几乎是预言式地反对资本主义，萨德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已预见到资本主义将导致人类生活的残缺化和个人将在社会中被约简到“赤裸裸”的生存上：“在断头机还没有轧下去的时候，他（侯爵）的耳中已经响起了断头机落下的节奏声。”（Ulitzsch，1920/1986：5）他推开散发着芳甜香味的沙龙窗户，以便让屠宰场的恶臭也能随风飘进来，“充满血腥味的新鲜空气中粪水般蜡黄的假面鬼脸刺激得他直想呕吐”。萨德侯爵“是欧洲文化的咯血者”（同上）。

在恩斯特·乌利茨希（Ernst Ulitzsch）对萨德做了这段评论40年后，汉斯·吉泽（HansGiese，1963：105，122）作为阿登纳时代最有影响的性学家，借重新出版萨德《索多玛的120天或放荡的学校》之机，又一次赞扬了萨德作为政治、哲学和文学三个领域之间纵横漫游者的深刻见解：他著作的“非同寻常的丰富教育意义”在于，他说明了“要想再重新回到人类的性的自然本质中去，已经无路可走”。恶习般驱动的“绝望和无益”，“最终也会给人留下一种文化产物的印象，但就其本质来说，它应当属于柴火堆和焚烧炉”。

33 性的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作为性的实质内核

不愿被误解为是自然科学的性科学，当然也就能够辨认出自己的科学地位其实在多个方面都是岌岌可危、很是棘手的。它们的研究课题，

无论如何都是相互隔绝，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理论分量”，或是说不能把自己的研究课题“理论化”。如同我在之前已经说过的那样：没有任何一种有关人的性和性欲性行为的理论，能够没有一种自己对个人、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构想，这些构想虽然并不一定沉淀为理论的基础，但一定构成这一理论的核心。

在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之前，我还相信“真实的性”并确信能够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将未成形的性从已成形的性欲性行为中分离出来：“性的真实性在于它的不可定义性。性欲性行为的非真实性根源存在于它的社会表述中。性是得以实现了的现实与理智的对应关系，这是在主体和主体互动（或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一种客观的双重谎言。”（Sigusch，1988：13；也请比较：Sigusch，1991a，1993b）但有一点仍然是有效的，即如果不是对性的每时每刻的表现，戴上理性的眼罩，采用一种不愿正视现实的态度，那么“性科学”的怪异概念一定会发出不和谐的危险信号。没有了怪异的概念，也就没有人（再）会对此摇头了。但性本能冲动和它的对立面究竟应当怎样相互结合呢？性科学必须明确说清什么是不可定义的，必须在矛盾和对立占有主流地位的地方建构一种统一性，必须把那些与存在相违背的事情转变为符合我们的存在理由。任何一种不具有真实性的性科学，都会导致以科学所理解的性与不经科学理解的性的不一致性。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在其中认识到了个人与他的客体对象之间的裂缝，因而把自己的关注重点放在它那些最频繁出现的特征上，而非批判性的性科学却常常在对它下定义时将这些特征视为多余，只要这些特征进入这些非批判性科学家的视线，他们就会赶紧把它们清除出去（36章）。

仅仅是具有不一致性的性科学的存在，就已证明了不能承受任何秘密的启蒙的极端，也证明了性的科学化和与此相应的客观化。但是自有性科学以来，它也总是做出与以上这些证明相反的证明，不是出于它的无能为力，而是由于它的“客体对象”自身的非灵敏度（笨重）。不管性

科学怎样努力从描述性、实验性和理论性的角度研究自己的客体对象，仍然会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留下那么一点它不可忽略却又无法再进入的剩余部分（或剩余值）。我把这种认识论上的余数，称为性的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ISR，Sigusch，1988：14），而它其实才是性的实质内核，它摆脱了任何与自己相对应的关系。但它又是如此宏大和如此没有认同性，使得任何一种对性欲和性行为的定义，都会成为理性主义的笑话。这就是说，理性主义者也预料到，他们的表意是多么力不从心。他们因此也就更大胆地去模拟它们，将它们塞回到奥迦斯本能冲动的情欲笑声中去，即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但是一切还是停留在原先的状态，不管是性还是性欲性行为，都没有上升为某种理论概念。他们总是认为它们还有更多的内容（与此相应，也能再假设一个不可再简约的性别剩余值；也请见本书19章）。

占有主流地位的理性，逻辑地通过具有普遍性并总是有着社会预制性的客体对象和不明智的个人，系统地制造出一种错误的性，不管它现在只是来自一种无意识的先验主体，还是来自一种无主体的参照系统或是来自一种没有实体的信息沟通。那些认为歧义、矛盾和自相矛盾是错误意识弱点的思想家，在可通约性中展开一种对不可通约性的寻找，犹如在历史冰海的底下注入了一股暖流，为了避免在理论中过度夸张现实，他们不是通过对现实草率地妖魔化，而是通过对它的批判解剖，从解剖的普遍困境中，建构一种与现行理论相反的道德操行。那些传统的哲学家都曾试图以某个概念来表述性的这些非认同性应有的特征——比如在黑格尔那里是动态，在马克思是使用价值，在尼采是酒神，在弗洛伊德是本能冲动，在马尔库塞是哲学爱神，在巴特耶是神圣的爱欲，等等，而在今天，所有对性和性欲的不同描述和表述，都被客体对象有着大漩涡的急流所冲走。因为在这种急流冲走一切的同时，也冲走了个人出于本能冲动的那种爱，而正是这种爱恰恰又是社会普遍冷漠中的一种宝贵财富和性科学的研究对象（10、98章）。在这种状态下，性科学所能做的只能是以个人的经验为例证，而不是去思考范畴和概念的广度和

整体意义，更不会去思辨常识、怨恨和主流性学不断注入在与性相关的概念中的影响。

但即使是不可再简约的性剩余值，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受制于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即它的物质性和超验性的组成部分，会因为既定社会的一种有着自身物质重量的话语和符号的转换而变化。当前尤其可以观察到的是那些对身体性别、传统性别观念以及性别认同的话语化转换。

34（人）作为病态和有治疗需要的目标客体

没有一种目标客体，没有一种疯狂，如同正在兴起的性科学关于病态的目标客体那样，能在社会中激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性科学目标客体的这种病态，是自身日益分化的经济实践的交换和知识社会的一种战略性设置，它的目的是将社会的弊端改装为是个人行为的现象，并按话语口号对个人进行治疗：具有错乱、出轨、危险和破坏性的，并不是社会，而是有病的个人。在19世纪下半叶被普遍设置为是病态的目标客体，使得医学在神学、法理学和教育学之后，也因此拥有了一种对性欲性行为的解释权。医学上关于病态目标客体的这种解释权，使得心理、躯体、社会、政治和性等一切与常态的偏移偏离，不再被作为或不再主要被解释为是对上帝、自然或社会的犯罪，而只是被看做是在这期间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中个人的一种病态或畸形，因而个人不需或不再需要完全为自己的这些行为负责，只是必须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治疗。

如同被规定的目标客体有着自身的病态那样，没有人（不论男女）能够逃脱自己作为病态（和健康）的目标客体的命运，无法以某种方式逃离这个病态的框架。借助那些来自目标客体如变性、道德精神错乱或堕落等病态状况，在以自然科学为根据的幌子下，大批人突然成了无法享受爱和自由那种变态或病态的人。

比如因为他们的性行为或情感感受而引起医生注意或是被法院送来要求强制做心理健康状况鉴定的那些男人，在认真检查的最后，总是能被找到堕落的变态心理或行为（比较Sigusch，2005a）。在女人中，那些敢于反抗父权制和争取女性解放的妇女，则通常被诊断为有着各种心理和精神错乱，或是有着一个异常巨大的阴蒂，或是有着一种错乱的即男性式的性高潮；或者强制她们去进行一种名为阴蒂切割的手术，也就是说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切除她们原有的阴蒂（比较Sigusch，1970a）。在政治上因为作为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或面对战争而临阵逃亡者而引人注意的那些人，则被著名的心理医生鉴定为是心理“退化或变态”、“道德”病态，或仅仅只是道德上的“堕落”。1920年，由埃米尔·克雷珀林（Emil Kraepelin）所发起的关于鉴定“敌视社会”疾病的统一标准，为德国心理医生没有异议地一致接受，并引入疾病分类登记中。

近年来的许多例子都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类做法不仅继续强势，而且也仍然继续在使用最大口径的火炮作为长效武器来治疗偏离、反叛和其他的所谓不可治疗的心理疾病——心理手术就是如此在近期拥有了过度的榜样力量（Sigusch，1977，1978，1980c）。心理外科医生不仅能够对社会动乱中的政治头目和闹事者进行大脑切割手术，而且也能在空军基地做这些手术，他们就此同时给出了一种仍然还有着当前意义的例子，即如何使病态的目标客体成为公共政治的工具。如果说在这些情形中，将病态的目标客体卷入政治是因为按通常的人性观点而认为这些病人会给社会造成有害影响，如同纳粹意识形态对所谓堕落的艺术所做的解释那样，那么关于压抑有关病态的目标客体的话语讨论，并自以为能够因此为那些与众不同惹人注意的病人提供保护的想法，已经证明它一如既往只是一种幻想的榜样。如果研究一下人们当前对待性犯罪者的处理方法，就能观察到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大多数民众和一部分专家，都认为“阉割是治疗这些罪犯的最好方法”，正是在此基础上，1970年代提出的“治疗，而不是惩罚”这个口号，已经把病态的目标客体简约到了它作为目标客体的历史核心上，即治疗和惩罚（因此并不是偶然的，2012

年欧洲议会反酷刑委员会指责德国仍在继续对性犯罪者施行阉割的做法，这是一种被称为是自愿的做法，并且德国政府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国家的政府，仍在继续为这种做法辩护）。

关于性病态的话语从没有像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么广泛地传播和讨论过。当那些传统的安抚和应对如郊区牧师或神父助理、刑事司法和教育等机制和手段明显不再有效之后，医学甚至整合了心理学使其成为辅助的治疗手段，成功地给人一种既普遍有效又无法核实的印象，即医学即使不能完全解除病人的生活困境，但至少也能帮助缓解病情，并且是在全幅度上：从对文化的不适感直到家庭内的结构破坏。心理治疗主义的崛起和社会关系的心理化，导致上层社会的许多成员转向求助于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但这也是一个福特主义陷入危机和后福特主义开始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当时也是社会关系日渐松懈以及生活责任从社会领域转移到个人自身的这么一个时代。心理治疗因而在我们的文化中趋向于成为生活，而生活则趋向于成为治疗。这两者已经很难再相互区分。显然在那几十年中，形成了一个类似乐于治疗的社会，因为人们普遍感觉到，我们大家的生活已经受到怎样的伤害，在一个只关注利润和物化的社会里，社会的变态在怎样支配着人的生和死。

无论如何，目标客体的病态，导致人的生活成为一种治疗，这种治疗远远超越了治疗作为一种技能艺术的范围，它制造了一种名为“人”的病人，而这种病人则又与他那个时代哲学所描述的人的创造、人的死亡和人的事物为伴。自那以后，大多数人都依赖于某种特定的由他人或自己施行的治疗，以致形成了许多坚守在传统医学法力不能覆盖区域里的辅助疗法的亚文化。这些形形色色治疗的名堂，有从大批处方式的药物如抗高血压药物和心理安慰剂，自助团体和足底按摩疗程，直到谷物早餐等绿色食品类的花样。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Tod in Venidig*）中的冯·阿申巴赫先生，如果当时能够参加一个病人自助团体，而那个年轻的塔德齐奥（Tadzio），如果有哪位青年心理医生能够

告诉他，他实际的性别认同，按国际疾病分类登记的标准，也许有性别认同的障碍（GenderIdentity Disorder，缩写GID），那可能就不会出现死的悲剧。但是对于当时这些心理学化的疾病和需要治疗的目标客体，可想象的最后治疗方法也只能是应用设计了相应治疗程序的电脑，以已经在其他病人那里测试成功的方法，进行一种心理治疗的模拟。

近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传统疾病和治疗的目标客体出现了一种显著的衰减。自以为具有巨大解释、安抚和康复力量的医学（以及被整合进医学的心理学），似乎已经触及了它特定的历史有效性的界限，这也可以从它日益递减的政治意义中窥见一二。事实上，当前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全民治疗的社会的宣战，不仅只是出于政治的理由，而且也是出于社会普遍的理由，其中也包括以精化管理和精化生产为主旨的后福特主义市场社会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口号是：自律、自控和自我优化。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自己照顾好自己，请向你的雇主提交你的健康、灵活、机动和业绩意愿。但是后福特主义的社会并没有意识到，与强势而又昂贵的传统医学保持了距离并能够节省社会开支和减轻社会负担的病人自助式团体的运动，已经预先认识到这些并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后福特主义也在医疗保健事业中得以贯彻，而医疗保健事业在大学医学的检测标准，恰恰又受制于经济创利和自然科学实验型医学标准的要求，那么现在开始我们从一个人的牙齿状况就能可靠地判断出这个人的社会处境和地位，这就使我们不禁回忆起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阶级层次化的医学，尽管自一些时期以来有许多人甚至相信这种不同阶级享受不同待遇的阶级层次化的医学，已经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医学和心理学似乎在未来也能为百万计遭受社会关系和自我关系之苦的社会化个人，比如对有身体疾病的病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和安抚，这已经成为很大的疑问；因为医学的解释权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物质性决战以来，基本上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所谓的社会生物学所做的那些解释，并且也因为，纪律规范的权力，虽然有着倾斜和重

叠，但总是在做着适应事物发展进程的调整，比如从忏悔室到避难所，从监狱到病房。今天，医生、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与治疗师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变得不容忽视；他们面对的是大批有着社会和心理问题与障碍的人群，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缓解和掩盖式的治疗；但这并没有真正的疗效，因为在社会和治疗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裂缝。一个社会并不是一种疾病，因而在逻辑上也不能作为病人加以“治疗”。治疗和政治必须基于与人为善的人性化理由作为相互分离的领域来看待和加以处理，这也基于“革命”或“社会主义”病人“集体”的经验教训（比较Sigusch，1984a：157-173）。

如果说在1970年代曾被广泛理解为病态和需要治疗的目标客体失去了它们强大的影响效用，那么其主要原因很明显还是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最初所做的就是抑制与主导性认识论和普遍的目标客体不那么相一致的话语、形态和实践，认为不如那些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所建构的理念、躯体治疗，尤其是外科手术来得顺手。以对有着性异常现象的人的治疗为例，就能描绘出这么个趋向。

自1980年代以来，不仅对性功能障碍的身体治疗实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复兴时期，并在数量上把所有的心理治疗置于阴影之中，特别是比如所谓的海绵体自动注射治疗（SKAT）以及“伟哥”和一切类似“伟哥”的药品，都能轻而易举地证实这一点；而且以减低或消除性欲和性行为为目标的器官治疗，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且这里涉及的并不只是所谓的变态和犯罪型的行为发展。有些专家主张这些方法能治疗一切性瘾疾病，比如治疗强迫性手淫、持久性滥交、以手机满足色情或过度观看色情影片。这就导致为外科手术的狂怒又一次敞开了大门，因为如果一旦似乎有机可乘，又能够导演病人的性欲和性行为，那么它总是会升腾起自己的烟雾。人是多么愿意能够随意操纵性的本能冲动。如果人们想用新的方式方法对此进行些实验，那么建议首先隐藏正在玩弄体外性生殖器的儿童以及又一次表示了性欲望的那些老年妇女——直到再

次亮出所有的底牌。也许这些可能让年轻的同仁们听了后感觉有那么一些不自然。但是如果谁目睹和经历了抗雄激素的盛行，自然也就能够懂得我在说些什么（比较Sigusch，1980a，2007）。

这种寄希望于心理和社会治疗策略的衰落，可能将导致强化对目标客体的手术治疗。因为长期以来，在这种手术治疗中各种有影响的强势结构已毫无声息地碰撞和结合在一起了。目标客体的治疗，从自然疗法直到心理分析，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拆卸、分割和消耗的代名词，始终意味着是一种实验性手术操作。因此，外科手术医生通常也总是“真正的”医生的代名词。他通过对病人和对自己以必要的方式和有目的地切割成碎片，从而强迫已经成为物和假装为死人的那个人的自然性与那个正在消除他的痛苦的人，在一种正反的综合中成为人的无所不能的创造者与因为忍受痛苦而近乎昏厥的病人的结合。这是所有医生和病人的梦，因而也是每个社会个人的梦。在我们的文化中，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导致这个世纪的外科手术和部分对自己身体的剧烈处理和操作，成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和稳固的文化模式，它至少能暂时地减轻人们的生活痛苦。

不只是无数的自我伤残者以及所有自1930年以来被医学认定为稀奇古怪的人或病，比如手术上瘾者（Polysurgical Addiction），因自以为有病而恐惧的狂想者（Dysmorphophobie），孟乔森综合征（Münchhausen-Syndrom，也译为慕尼黑豪森综合征），蓄意制造身体或心理症状残疾等人为失误的故意生病者（artifiyielleErkrankung），炫耀形杀手综合征（Koryphäen-Killer-Syndrom），以及代理形孟乔森综合征（Munchausen Syndrom by Proxy，即作为孩子护理者的代理人，故意伤害孩子而导致孩子出现精神或身体不适——译者注）等，被迫或自愿地成为外科医生手术操作的目标客体，而使自己经常生活在有关手术治疗的话语讨论中，而且我们大家都在过着如此这样的生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思考的并不是在第一层面上将自己自诩为文明技术的脑

—心理外科手术，而应当是对一切疾病和生活中的一切进行的手术操作。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对无数男人所做的疝气手术或对无数妇女施行的子宫切除手术——这些手术从医学或医生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十分必需的；只要想一想那些对许多年轻姑娘施行的只能理解为心理安慰的阑尾切除手术；想一想那些数以万计的外科整形美容手术，现在甚至男人也正在加入整形美容的行列。也可以想一想基于个人意图和医学健康理由之间的修复外科手术：对那些曾割去包皮的男人们的包皮修复手术；对那些重新又想成为处女的姑娘们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对那些老年妇女，因为她们的那些老年男人更喜欢“丰满”的阴唇而施行的所谓阴唇（更确切地说是性生殖器外阴唇或爱神维纳斯阴唇）重建手术；在阴道痉挛时施行的妇科强力操作；对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施行的阴茎假体和海绵体助勃自动注射器装置手术，这些目前在医生诊所施行的比“伟哥”和类似血管活性药物略胜一筹的微创手术（比较Sigusch，1980a，2007）。

在外科手术的目标客体中，创意和物化、生动活泼和佯装死去，生产和非生产等普遍性趋势都不可分割地交叉和汇聚在一起了，在这些趋势中也包括了绝大多数医学上的物化和专业性实验。最能表明修复术这两个特点的是类似当他们想为唐氏综合征患者重塑（或建构）一个“正常人”脸的时候。无疑会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如果我们听到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嘴唇、舌头、肚脐、阴茎或阴蒂穿孔挂上装饰品或挂件。但这现在叫做“人体穿孔”技术。也会使我们茫然若失的是，如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年轻人是如何在自己体内植入金属片——这叫作重叠（Stabling），或是用无数手术钳夹在自己的脸部或身上，为的是使自己不可逆转地变丑——这叫作疤痕设计（Narben-Design）。更会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如果我们在《医疗实践》杂志的报道中读到，一个男人找到妇科医生，拿出他事先量好的自己阴茎的尺寸，要求医生为“他的”妻子按这个尺寸进行阴道配对切割手术。还有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如果一个外科整形医生在有自己的妻子（在妻子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上）坐在边上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中，毫无任何一点感情色彩地描述了他

是怎样按自己的美容理念对妻子的脸进行外科整形的。但这却让我们想起了“皮格马利翁”，那位传奇式的塞浦路斯国王［这是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卖花女》（也有译作《皮格马利翁》）中的一个主角人物。皮格马利翁原是罗马神话中一位雕刻家的名字，一生不爱女色，却爱上了自己刻的雕像。这尊雕像令他魂牵梦萦，最后他去请求维纳斯女神帮助成全自己的梦想。维纳斯让皮格马利翁用手碰触雕像，雕像变成了一位活生生的美貌女子——译者注］。

近期，身体私密区域的外科手术在一种顺应潮流变化的意义上，发展得如此激进，以致医疗专业学会和医疗专业杂志都认为有必要对这类手术的风险，如感染、粘连和瘢痕，尤其是由此造成的功能性障碍和感觉敏感度退化，加以严肃警告；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并不通过外科手术挣钱的医生都一致认为，绝大多数这类手术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必要的，或根本就是应当禁止的，因为在这类病人要求手术整形愿望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他们的心理障碍、心理或性成熟危机、社会关系或性关系的冲突（比较比如：Borkenhagenund Brähler，2010）。无视专业学会对此类手术所持的谨慎的保留态度，这类私密区整形外科仍被以“女性生殖器整容手术”（Female Genital Cosmetic Surgery，简称：FGCS）为名列入国际话语标签的名单之中，并通过众多专业人士的评论和表态为此类手术做了尽可能的宣传。正是通过这些宣传，所有人都知道了当前正在流行些什么：阴唇整形术。这就是内阴唇的缩小和外阴唇的增大，阴唇和阴阜的除脂，阴蒂的重新定位和割肤绷紧，阴道收窄，以及扩大所谓的G点（感受性高潮的）区域（关于G点的讨论，请比较比如：Nieden，1994/2004；Hines，2001）。即使在那些受人敬重的杂志上，人们也能读到那些关于只需5分钟就能完成“G点扩增”手术，且成功率极高的新闻。只是应当每4个月重新注射一次新的胶原蛋白物质，这就是说，只要做了这么一个新的“G点”扩增手术，那么这个外科整形医生就不必再担忧挨饿了。

如同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通过对男人的包皮重建和阴茎假体装置手术，以及对女人的处女膜修复、阴道扩宽或紧缩手术，进入目标客体身体私密区域，使女性生殖器有不断递增可视性的外科手术显然更加轻而易举了。这种可视性来自我们文化关于生殖器漂亮理念的变化。所谓漂亮，在我们的文化中自新性革命（38章）以来就意味着剃光的、看上去似乎像一个年轻女孩的阴部。为了达到这一理想，一种能够唤醒和实现这一愿望以及能够开拓和扩展市场需要的医学，就变得极其必要。当然，那些有这一愿望的男人和女人，即使没有医学（FGCS）的帮助，也会或多或少按新的生殖器美学理念处置自己的生殖器，他们不仅会剃光阴毛，而且也会文身刺青，或是运用一切可能的生殖器穿孔，如横穿或斜穿龟头等方法穿孔挂件。如果这些方法还不能满足这些人（男人和女人）拥有漂亮生殖器的愿望，那么就要动用生理盐水注射和数值分析的方法，这就是说要对生殖器进行手术干预。然而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目标也还意味着：也可把性生殖器官的美容设计和“改善”，称为改善和增强性感受的敏感度。

35 性科学作为社会建制

一种价值中立的理论，如同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论那样，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会为了概括出结论而只得将单一或特定的现象普遍化。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很清楚，任何一种有关性别和性的理论都是一种政治。然而最晚在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也就能够辨认出这一理论：比如它追随的是哪种思潮？它的主调是较为悲观还是更为乐观？完全不可能如奥伊伦堡和布洛赫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26章），“无偏见和无前定条件”地处置有关性和性欲的研究课题，“既不偏袒谁，也不想伤害谁”，因为比如堕胎、阉割、性施虐和受虐、三人劈腿，以及只是“正常的”婚姻或生活伴侣出轨的经历等问题和事件，在性这个词的三重意义上都有着主观的意向。这就使得他们的那些回答不仅是任意和不可信的，而且当主体处在内省状态中的时候，在积极的意义上叫作诚实；但

是当主体处在反射客观对象的时候，在消极的意义上叫作调整。不懂得这些的性科学家是令人感到不快的，而那些隐瞒这些的性科学家则是令人讨厌的。一个研究者，如果他对有关性的问题手拍胸口保证，他只是做出“纯粹”的科学回答，那么他既不理解什么是科学，也不懂得什么是性欲和性行为。一切科学都内含了研究者的价值判断，这也包括尽管他一再声称绝不会做出任何可能被说成是政治和道德的价值判断。每一个科学家有一天都会要面对那些他无法回避的基本价值判断。这位科学家便会因为他的那些基本价值判断而是政治的。这无须是他有意而为，而且可能他恰恰认为自己正在做些与政治相反的事情。

但是这种矛盾也常常出现在似乎经过启蒙并拥有理性思辨力的那些人身上。因此在实践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人的自然既定性特点来为传统性行为作免错开脱的尝试，却经常与所谓的以科学为根据的手术干预来治疗或解除由同样行为所造成的痛苦的尝试，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两种尝试的行为都定位于一种最终的理由，并都使自己摆脱了历史的制约。这两者手拉手并行的状况，不管在那些老的还是新的性科学家那里都能够轻易地得到佐证。他们一方面将偏离传统的性行为认定为是自然正常的变异而为其辩护，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在那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体和心灵中寻找偏离的原因，以便在必要时能够将自己原先的那些为偏离辩解的话语作为自由主义的垃圾而加以抛弃。

很晚，直到当今一代的性学家，才有一些人敢于面对这么一个历来被绕过或推开的问题，即自己的学科前辈是否并在怎样的程度上参与了纳粹的野蛮行径以及纳粹的历史。直到1945年结束二战的几十年之后，一些性学家才有勇气承认，那些曾经令人崇拜的性学家的著作或文稿中渲染着怎样激烈的统治者道德、种族仇恨和毁灭意志，渲染着怎样激烈的战争狂热和沙文主义。肯定主义的性学喜爱光环因而也喜欢描绘光环。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则不愿以艰难处境或时代精神为借口，为自己和自己的前辈开脱，即使这会触及个人的痛点，因为受自己尊崇的某些人

或事，会因此而不再能够如自己所愿意地那样保留其清白或无辜了，但它仍将致力于去发现这些罪恶的历史。

如果德国的性科学要想坚持自己的批判性，那么就必须致力于研究这么个问题：是哪些思想和行动为纳粹的罪行提供了前提准备。如果它回避这个问题而提出其他一些问题来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么它无非就是为了诱惑自己以及德国的性科学去穿上一件它实际无权穿上的洁白背心（即想洗白自己的罪行——译者注）。纳粹曾经将当时德国的著名性学家驱逐出境，并一味地嘲笑和谴责他们。肯定主义性学可能会很轻易地以不曾为戈贝尔（Göbbel）服务过而为自己辩解。但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却与其相反，它会向自己提出这么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一些性学家喜欢谈论“人类的杂草”、“劣等种族”或“灭绝”，而另有一些性学家却不是这样，比如弗洛伊德。当然正如当年避孕方法的出现并不构成今天的批判精神，因此也不能说1923年出现的优生学一定就制造出法西斯主义者。但人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尤其如果涉及一些严肃的事情的时候。作为例子，这是应当提醒的，比如在出现艾滋病以后，一些政治家对此做出（或所选择）的反应，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因为正是这些反应突然表现了以往野蛮行径的连续性（关于个别的详细情况，请见Sigusch und Gremliza，1986；Sigusch，1987a，1989b，1990）。在那个时期正好负责制定巴伐利亚艾滋病政策的国务秘书彼得·高魏勒（Peter Gauweiler），这位经常因为说些对人普遍蔑视的话而引起人们议论的人，在这次关于艾滋病事情上说的话自然也有着典型的充满了恐惧焦虑的小市民话语的特点——用怒骂代替讨论；他还将自己所有攻击艾滋病的言论经过深思熟虑编辑成书，以《如何对抗艾滋病》（*Wastungegen AIDS*）为书名，1989年在R.S.舒尔茨（R.S.Schulz）出版社印刷发行，书中也出现了弗朗茨·舍恩胡贝尔（Franz Schönhuber）《党卫军回忆录》（*SS-Memoiren*）中的内容。该书还比如把HIV-感染者称为：“那是

些麻风病人”。或者在涉及如何保护毒品上瘾者（而这又是政治家确实有能力做到的）之处，说：“通过分发一次性毒品注射剂去助长毒品滥用，这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概括说：“我们必须迫使这些人浮出水面，公开展示那些特别糟糕的感染途径。这样，我就能追捕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也就无法把自己的艾滋病再传染给任何一个其他人了。”这无疑是在主张使用一种警察国家的手腕和方法。奥斯瓦尔特·科勒（Oswald Kolle）在为一份日报写这本书的评论时（该评论发表在1989年4月15日柏林日报“taz”上），回忆起一段德意志的历史，并写道：这本书实在不应当叫《如何对抗艾滋病》，而是应当改为《我的反艾滋奋斗》（这里借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嘲讽——译者注）。高魏勒政府职位的后继者京特·贝克施泰因（Günther Beckstein）也不甘落后，他把感染上HIV的人称为“死亡炸弹”，因此决不允许“再让他们到处乱跑和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在接受纽伦堡电视台N1节目1988年12月28日采访中的谈话，引自Du& Ich，Heft 2/1989，第45页）。在此之前，那位永远盘踞在官位上的巴伐利亚文化部部长汉斯·策赫特迈尔（Hans Zehetmair）也曾经用野蛮的语言针对那些同性恋的男人说道：“这个社会边缘群体，必须像长得太密的植物那样被间苗稀化，因为它违背自然。”（请参见1987年4月7日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第9页）在遭到公众的抗议后，策赫特迈尔又试图要求对自己在1987年2月19日的一次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辩论中所卖弄的那些话作“细微化的理解”。这种所谓的“细微化理解”，其实就是企图故意扭曲语言、用智力和稀泥，是掩饰自己道德堕落的一种明证。

对摘录自那位民主的文化政治家公开发表信件的一些内容（见1987年4月4日的《南德意志报》，第9页），应当逐字逐句地加以研究阅读，然后与右派极端分子的言论进行比较。比如他在信中写道：“以当时的记录作为证明，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在那次电视辩论中的发言，并不是为了指责哪个同性恋者。在发言中，我还进一步解释说，人们对同性恋者也有同情心，即使人们，比如我个人，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违

背自然，并且是一种完全病态的行为。我所担任工作的责任使我不可能也不允许在公众场合为同性恋者，并因而是我们社会边缘团体的人，去争取民众的同情心。而且恰恰相反，当今最紧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必须出于担忧而去关注这些年轻人，使尽可能少的年轻人陷入因为艾滋病而特别危险的社会边缘团体中去。我们必须把保护民众中的多数人作为我们的中心目标并加以时刻关注，因此我们不会去转向关注这么个问题：怎样更好地去理解那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只是作为补充，请允许我提请您注意，德国主教联席会议（Deutsche Bischofskonferenz）主席，枢机主教霍夫纳（Höffner）1987年3月13日的声明。此声明强调：决不能将同性恋的关系等同于婚姻和家庭的生活模式。同性恋的关系不仅违反基本法则，而且也因此助长了免疫缺失的艾滋病的传播。——从中可以看出，我的发言是与这个声明相一致的。那些以错误和荒唐的方式对我的发言所做的解读，与我的发言完全没有相关之处。——致以友好的问候！汉斯·策赫特迈尔。”

20年之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那些处于领导或领军地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在谈论自己的精神生活处在怎样的状态和有着怎样的思想或见解（或是个怎样的人）的时候，公开承认自己对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知之甚少。当时正在执政的一位德国州长，将人们对于角逐利润的金融主管和财务经理的批评，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较；一位国家经济“智囊团”的成员，则将受到批评的银行总裁（或经理）等同于遭受纳粹迫害和屠杀的犹太人。在此之前，一位德国总理还将抵制和反对他所属党派的号召，比喻为是如同对犹太商人生存的毁灭。这个执政党的另一个成员还将犯罪分子的非法资金（黑钱）宣告为是“犹太人的遗产”。没有比这更无耻的了。

那些在150年前对制帽工安德斯（Anders）和在50年前对儿童母亲库姆尔（Kumor）所做的一切，是不公正的；但是如果这种不公正今天仍在延续，那我们是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的。超越过去是需要强制的，没

有一种自然的事物可以被评判为好和坏、善与恶；道德只存在于那些绝对命令中，即那些因为唯物主义担当起人类历史的使命，而愿意尽一切努力使个人的一些难以形容的苦难不再重演的绝对命令。一种性科学，如果它在讨论：是否应当压制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愿望，是否应当对避孕药和堕胎负有责任，同性恋与所谓的性变态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这一性科学就是在从事着口是心非的双重操作。它之所以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以唯心主义的方法去推测如何解除肉体的痛苦；之所以说它口是心非，是因为这同一门科学还从来没有如此看重过肉体和它的痛苦。社会强加给个人如此多的痛苦，却没有因此而被那些遭受痛苦的人所炸毁，这就证明了，社会是怎样强制个人否定自己和自己这个概念的。鉴于个人是在社会中长大并被剥夺权利的，因此社会对个人来说永远是客观和强大的。虽然社会的那些支持者愤怒地断然拒绝任何对好的社会风俗和生活的攻击，但那是因为在他们黑暗的深层心理中仍然意识到，社会也会毁灭他们自己。因为某种争议而放弃躯体的绝对命令，无疑是对最后道德动机的背叛。衡量一切政治党派的首要标准，就是要看它们为那些因为稍有与众不同或略有差异而只得忍受痛苦和遭受仇恨的人，究竟做了些什么。

道德主义者虽然会不知疲倦地声明，那些弱者，也就是那些未出生的婴儿胚胎，是多么牵挂在他们的心里，也包括这些未出生的人的人权，但是市民社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已经将自己的心脏和与此相连的所有动脉撕裂，并且正是它以唯心主义解读的理性，为奥斯维辛的野蛮行径做了思想准备，比它的思想更丑陋和更残酷的是它没有去阻止这些野蛮行径。自那以后，道德主义者的这种声明，已不可能再被相信；自那以后，任何快乐和幸福不只是隐藏着无产者母亲无声的叫喊，而且也响彻着被拖上运牲口的货车被送往奥斯维辛的成千上万人的悲惨哭泣声。这一切使得我们文化中任何一种不做反思寻找舒适的行为都未免是可耻的。

一旦作为社会的建制，性科学便不能再回避社会中的这些利益冲突和自相矛盾。如果又一次出现如同1960年代末那些公开要求性解放的迹象，那么一切性科学都应当全力以赴支持这些要求，为一切的性别和性欲性行为进行辩护。如果出现复辟倒退和去性化迹象，批判主义性科学不会去参与对倒退的欢呼，因为它耳中仍然塞满了马尔库塞1968年那些话语，并且还会认为那位穿着节日盛装的将军有那么一些色情。不管是行动还是暂停，批判主义的性科学都必须不仅在自由主义的时代而且也在复辟倒退的时代坚守自己的理念，因为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始终是意识形态企图阻止的，因为一夫一妻制和性滥交的行为都同样远离一种还没人认识的自由的情感生活，因为我们的那些爱情英雄可能陷入错误生活的指数与我们那些所谓的性犯罪者等同，因为性别与性这两个不同领域的连接并不是在和谐而是在充满疑难和不可解的矛盾中的一种连接，因此千万不要作为律师去为一夫一妻制、滥交、伟哥、电子—性爱（E-Sex）、拖拉国王（DragKings，一些穿着男性服装的女性艺术家——译者注）、束缚式性虐（Shibari）或其他什么进行辩护，而是应当努力试图去把握和理解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做：从中寻找出人性的冲动，即隐藏在启蒙和追求解放运动中的人性的冲动，并捍卫它。如同我们自那以后所知，在事情的自身，在性、性欲和性行为中，即在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作为与我们对立的事物中，我们学习了颠覆与超越、物理性与形而上学性。如果以避孕和安全为借口，强制性地只允许存在一种性关系和性别模式，一种性和安全性交的模式，那么一切对身体的严肃态度和一切严肃的模式都会成为多余，都只是外在的表象形式。

对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来说，它的研究并不涉及真理，也不涉及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单一思想”（Penséeunique）或无限制的自由和持久的性满意度。批判主义的性科学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反对性别和性关系中的不平等、虐待和暴力，因而义无反顾地站在遭受迫害、遭受歧视、心灵受到创伤和忍受疾病痛苦的那些人这一边；并且在此基础上思考和寻找一种更加与人为善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也

不忘记伊曼努尔·康德的警言：“将这么一小段弯木，作为人的起源……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直木可以造房子了。”

36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

如同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要说清楚什么是性，是很难的；甚至如果不对性规定一个不再可以简约并且也不再可进入或触及的剩余值，便不可能说清它究竟是什么（33章）。因此那些自然教科书只能说些它应当被理解（或已经理解了）的内容，并希望人们对于那个关于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再期待一个最终可以作为定论的回答。

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恰恰属于科学无法检测和认知的问题。因为性的特征是热血沸腾，而科学的特征是冷静严谨。在性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普遍有效或绝对正确的科学范畴，可以帮助人们确认性究竟是什么；也不存在普遍有效或绝对正确的社会—法律规范，可以帮助人们自己做出判断，怎样的性、性欲和性行为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共同回顾一下，弗洛伊德还曾把口交看成是性变态呢。如果科学着手去研究性的这些事实事件，那么至多只能得出一些有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概念和范畴（5章）。期望对性做出定义的任何一种构思，都只能以不存在一种可以证明自身存在的科学程序或方法为前提。那些拘泥于老的（传统）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至今仍在猜测：所谓性事件的最终原因，究竟能是什么呢？而性则在事实上，非常明显地已经挣脱了科学强加给它的基本结构，即科学家用传统的专注于物的固定性的科学标准为性所构思的基本结构，当然也正是这些科学标准才使得符号学、方法论、病原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划分成为可能。由科学构思的性事件，是可定义、可计算、可检验和可证实的，而真实的性事件却并不具有科学所想象的这一切。那是因为科学几乎还不能进入到人的大脑中去研究人的真实想法，而且也因为科学的思考只是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众多形式中的一种方式。其实人们真正要求和期望的是能够制定出性和性别关系的法则——

请比较比如哈特曼关于“性、性欲和性行为”的三条法则（1943）和赖希关于性、性欲和性行为的四种“行动和功能”，即受精怀孕、配种繁殖、情欲清空和身心交融（1990）。当然鉴于这些法则产生在盲目启蒙或偏重数学（moremathematico）的科学精神时代，因而也就未免有刻意反对非理性的嫌疑，并且在这里尤其是反对非理性的本能冲动或性形态中不可再简约的核心所特有的模糊性。比如要是一位性研究者从基因或神经学的角度概括出一些关于性的法则，并且也无意将这些法则作为心理分析和种属历史思考的模板，那他就清楚地表示了，什么是他做出这些概括的实际衡量标准：不是心理分析这么一种自成一格（suigeneris）的方法，也就是说，他没有运用心理分析这种很难反对偏重数学的方法，而是运用了经典的生物学方法。但是在这其中他却大胆地偷用了一种通用和一致推测的动机，也就是尽管存在着由哲学发现并由不同的身份认同而构成的裂缝，他仍然将一切都聚集在一起：从男女两极（bipolaren）不同的细胞，到父亲—母亲—孩子这三极（tripolaren）不同的人，再到同时既爱男人又爱女人的双性恋（bisexuellen），然后再回归到双潜能（bipotenten）的两种不同遗传基因的统一（Uniohumano-genetica）。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将人作为基因和情感的统一体，性则是存在于每个单一个人，也就是毫无例外存在于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中先天张力关系的统一。

赤裸裸的只能是人，而不是动物。因此就开始了人一方面出于本能直觉调节生殖行为与另一方面为满足情欲和身体性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距。即使把人像捕捉到的野生动物那样再次放生回归到以前的野性生活，也已不再可能。进化之后的人，就不能再退回到野蛮人的状态。任何走出性模式的企图，都将构成生命危险。即使是生活在意奥瑞三国交界的阿尔卑斯山阿迪杰河谷的阿迪杰人（Adigen），和那些主要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人（Inguschen）、达吉斯坦人（Dagesten）、卡巴尔达-巴尔卡尔人（Kabardino-Balkaren）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人（Karatschajewo-Tscherkessien）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更不用说如果

他们想与国际接轨，进入世界史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被称为所谓动物的“性欲与性行为”，通常只是特指繁殖。而被称为人的“性欲性行为”则与此相反，人的性现象并不像动物那样只是出现或限定在特定的身体周期，也不需像动物那样只是借助生物进化的帮助而形成的直觉式性反射，比如利用一个假象阴道或一个阴茎刷，或是以黏结在雌性动物后腹部方法实施有效受精，人的性生活绝大多数都贯穿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通过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讨的生殖和性这两个领域的解离（39章），无论在实际的性生活中，还是在有关新性形态话语和人的自觉意识中，当代的性形态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生物性生殖功能。生殖已经进入一个可以无性操作的时代，这就是说，比如能够用条件反射取精和用一些技术取卵，然后加以交配。另外，性欲性行为也不再如弗洛伊德有些荒诞地所认为的那样（1905：109），通过生殖而具有了“所谓的利他性”；因为它可以在这个受精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消失或是寻找与这一受精过程无关的人体重新燃起生命的激情。如果从功能的角度观察性的领域，它在个人的层面上已经因此不再承担生殖和延续人类生命的功能，而是表现为一种奢华的享受，它必须走出自身为自己进行定义并证明自己，它不需再顾及日常的生存问题，但也因此承受着一种巨大的责任承诺和追求成功的压力，这是我们的文化以所谓的性革命形态不断沉淀在公众和个人心理中的压力。那些保守的，其中也包括正统的心理分析家、进化论的心理学家以及神学家都坚持认为，即使在今天，性仍然或多或少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而在我看来，现在的性，除了它有着生理特征的身体反应外，在文化上已经远离了一切自然的轨迹，在社会上则迷惑了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

但与此同时，已经与生殖分离的性欲性行为，又并不总是人们持续需要的。它只有如此微乎其微的本体论意义，如同男人在被绞死的那一刻的射精，或是如同一种胃食管的打嗝反流，只是一种盲目的机械性反应。脱离了生殖功能的性欲性行为，居然成为美好生活中的一种奢华，特别表现在生活危机或生活遭到威胁，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赤裸裸的生

存的时候。因为这时，作为相互吸引和交流情感的性就会随之消失，它证实了自己在这时是可以被舍弃的。如果有谁说没有性的活动，生活就会变得贫乏和无聊，那他只不过是在叙述一个现代的童话。这一点在其他的文化中得到了千百万次的反证。要想建立一种亲近的人际关系，并不一定需要性的活动，也不一定需要身体的接触。性本来就产生于人的头脑中，就像身体总是由精神创造的那样。我们就此应当看到，并且这期间大家也都已经懂得，与另一个人的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要比一种性的交流更令人激动，也更令人满足。之所以必须在这里先提及性的这种相对有限性，是因为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一个在想象中和在现实中都对性和性的影响力做了无限夸张和过高估价的时代，也因为性的这种影响力其实正在逐步但显著地减弱。无论如何，被弗洛伊德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地怀疑为是泛性论，并且到处只看到受本能冲动驱使的性活动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鉴于性欲性行为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显著地失去了它的象征意义和社会意义，心理分析学也必须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做出部分重要的调整和改变。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全部接纳原来的那部分性理论，即不能再继续拖着心理分析学在100年前送给西方世界的这份礼物前行。换句话说，现在已是创建一种新的性理论的最佳和最迫切的时候了。

如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曾经说过的那样，没有幻象的性欲性行为，是动物性的。之所以说它是动物性的，是因为在没有幻象的性欲性行为中缺乏信任、安全、伟大、凯旋、整体性和相互认同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恰恰是人的性欲性行为的重要核心。与动物不同，人能够在没有外部事件的影响和身体的物理性刺激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梦境或幻想，就能产生性兴奋，其中也包括阴茎勃起和阴道湿润等性反应。性幻想既非客观的也非主观的，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之所以说它不是客观的，是因为主体对它的感受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也因为这种变化是由主体之间所建构的；之所以说它不是主观的，是因为它的存在并不能追溯到主体有意识的感受或体验。它

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的主体，因为虽说那位主体并没有在现实中经历他幻想中的性体验，但那些性事件却真实地发生在他的幻想中。想在这里提请大家再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和批判理论中的一些概念，比如商品的拜物特征和表象等概念，也就是想表示一些虽然在狭义上并不具有客观性，却被主体在必要时不得不作为真实而加以体验的事物。象征性符号也是介于客观和主观之间的一个第三者，它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个主观的客体。这两个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第三者，都在根本上描述了人的存在，因为它们起源于并连接了人与世界之间的裂缝。没有幻想，没有象征性符号和它的领域，即性别和社会性形态主要所属的这个领域，便也就无所谓人的存在。面对淫秽的闲言蜚语时的那种尴尬，对爱的那种深情，对一种情爱关系的那种依顺，对性实践的那种激情或是与情（爱）人分手时的那种心痛，都不能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科学或遗传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这同时也真实地说明了，这些科学距离人，距离人的情感和人的内心世界，究竟有多远，并且这就是些在当代的大学和人文科学机构把握着话语主导权的所谓科学。

与此相反，坚持批判主义性科学的我们则确信：性是一种开启生活诱惑的产品，并且人的一生都会如此行动。带有情欲的性，起源于人的主体化过程中，即起源于人作为一种新的主体（sub-iectum）的形成过程中。正因为如此，在性的实践中实际关涉的是诱惑和被诱惑、认可和臣服，关涉吸引和厌恶、爱和恨、生和死。弗洛伊德将性的这些特定状态与恋母情结联系起来，客体关系理论家（Objektbeziehungstheoretiker）是把这些状态置入前俄狄浦斯时代（präödipale Zeit）加以研究，相异性理论家（Alteritätstheoretiker）则刚刚开始站在自己研究的开端。当一个人被触摸、被照料和被供养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性并构成了性的关系。性形成于和谐与冲突之中。它由进入到身体和灵魂（并主要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印象和印迹组成。一切能够将性满足现实化的性欲望，都有着它们的生理心理根基，而这

些则形成于一个人早期童年时代的感受和沉淀。比如：被抚摸、被拥抱、被爱抚、吸吮、抓摸和肛门、尿道与子宫口区域的性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拜物化。鉴于婴儿是从一个人体器官，即母亲的乳房吸吮着生命的乳汁，这就为他发展恋他（恋客体）和自恋（恋主体）愿望构建了能令他终生感觉兴奋的根基。由于在婴儿时期的无意识中已经留下了另一个人（男性或女性）的身影，所以在以后作为成年人、作为新的主体、新的顺从者和新独立的人的时候，他们也就更愿意在爱情中如在童年时代按上帝的意愿所经历过的那种喜悦那样地行为和爱抚，并且被爱抚也因此能够比一种性高潮让人得到更多的性满足。

婴儿期的这种性感受主要是外源性的。这种通过护理者或多或少无意识的象征性符号信息以及通过护理者或多或少有意识的照料和教育行为而沉淀在儿童潜意识中的性感受，最初是外在和陌生的，它还须通过主体以后获得的经验转换为自己特有的感受和经验。由于无意识和象征性的符号信息对新生儿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如我们大家已经听说的那样，让·拉普兰济把这些符号信息称为谜一般的），因而导致了那个成年人怎么也不会停止寻找自己性生活之谜的答案。许多成年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一种具有持久意义的答案，除非人们把身体因为疾病或年老，心灵因为疾病或心理创伤，或是社会关系因为饥饿、逃亡、监禁而导致的衰弱，看作性之谜的最终答案。但在另一方面，正是性所具有的这种谜一般的永恒神秘性，使人对它更感兴趣，它也更令人激动。婴儿性感受的外源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丝毫的内源性，这就是说，在这种以外源为主的性感受中，也存在着婴儿生理的那么一点内源性的参与。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人化的表达或表现，或多或少都同时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和心理的。决定这一理论的假设在于：婴儿的性感受并因而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根本不像人的呼吸、心跳、消化或肾排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性欲望不会如同人的卵巢或睾丸那样简单地长大或成熟。因此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从维持生命的角度来看，性是一种奢华。大家都知道，性的欲望只能暂时地得以满足，但是性的欲望根

本不需予以满足，因为性欲并不像呼吸、吃喝和睡眠那样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

性的这种起源也有它的阴暗面，如渴望成为创伤、爱成为恨等，性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Robert J.Stoller，1975/2001，1976，1979）令人印象特别深刻地描述了性的这些状况。他最早代表了这么一种理论：所谓的性变态，其实是转化和应对童年时代遭受创伤经历的结果，因此以一种情欲的模式来表现仇恨和敌意，是那些所谓的性变态者感受性快感的范式。罗伯特·J.斯托勒后来也用这一理论来解释那些仍被认为正常，但在性行为中带有那么一丝敌意（wisperofhostility）的所谓正常人的行为。性学家埃伯哈德·朔尔施（Eberhard Schorsch，1978）针对这一理论片面的观察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做了补充，即儿童时代的经历不只是阴影面，也为儿童留下了共生、受保护和满足愿望等积极的经验。我们把这称为一丝幸福的慰抚。而这种激动人心和令人着迷的性和性欲性行为，如果没有双方直接或间接、现实或幻想的好感和攻击、爱和恨，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之所以要明确探究这种性关系，是因为那些正在成长为主体的人全心全意想的就是这件事，或是说自从有了这种形态的性感受和性经验以后，就不再想去体验任何其他形态的感受和经验了。这里我正好想起一个例子（Sigusch，2012）。在第一眼看上去，似乎令人吃惊地有许多女性幻想自己被强奸，南希·弗莱代（Nancy Friday，1973/2001）和伊莎贝尔·阿祖莱（1996，2000）这两位女性学家特别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许多这类例子。但在第二眼的继续探究中却能看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这是因为这些女人在内心里表现为被欺压、受奴役和无能为力等一些性化愿望，并不是出于病态，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无法体验自己这些性化了的愿望。

究竟是哪个客体，是一个女人，一个难题，一个儿童，一个动物，一幅画，一个包，一件乐器，一艘船，一种气味，一种声音，一种幻想，还是在公开场合出现的一个场景，会沉淀在主体的潜意识里成为可

以归为主体本能冲动的躯体和心理表现，这只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综合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容和程序，科学在今天并且即使在未来只能对此做一些非常零星且只能是推测式的解密。从我的观点来看，这里涉及儿童年代的一些社会和心理的经验，以及涉及在童年以后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些身体和情感的感受，也涉及一些与兴奋、迷恋、向往、无奈、绝望、依赖、顺从、攻击、固执等相关的感情，涉及所谓的寻找乐趣、对客体（人或物）的占有欲、强迫性重复、回归消退和满足需求的心态，还涉及幻想、梦境、自主、痴恋、分离、受伤害和受侮辱、自我还原和自我膨胀、自我的转型、分解和重建等，总之近似一堆大杂烩，每个人（不管男女）都能够在其中寻找出适合自己、适合自己职业或适合自己理论的那些东西。一种能够满足一切的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应当存在，否则就将是地狱。

那么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性，究竟是什么呢？是如同饥饿和呼吸那样人的一种“最大的需要”（Freud，1895/1950：381），虽然它与进食和呼吸不同，会在生存的困境中自我消失？是不论在清醒还是在睡眠中的一种幻想梦境？它是在核心上就是由母亲（或其他一个与婴儿有着最亲近关系的人）向敏感的幼儿传递的第一个生理—心理之谜？并且正是这种神秘的无声信息在以后成为这个儿童终生都在寻找理解这个谜的动机，即怎样解开这个在人生中最早体验到的激起整个身体觉醒的秘密，也就是这种能够使全身心放松、毫无恐惧地进入到生理心理宇宙中去，进入到被成年人称为幸福中去的那种感觉？性，真的能给人带来一丝幸福？甚至是如同真理的隐喻之光那样一种幸福的隐喻？或者性也同样意味着一种敌意？在性的内核中是否更具有一种拜物性，而且在性的这种拜物中一切相互对立的要素和程序，实际上无非就是一种纯粹侵犯行为的幻觉？无非是销魂和算计，独自占有（乳房、臀部）和无所不及（自恋、生和死），高估（把丑陋想象成美丽）和越界（排泄物或疼痛，越是禁止越感刺激）？这类话是多么令人奇怪：“爱情为自己建筑了一个巢/在粪便排泄口的地方”，或是：“如

果她的乳房在摇晃，他的血就流向了别的地方”——我们也曾听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由诗人写下的诗句。

我们在这里提及的一切关于性的到底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自己无论如何在写作和演讲时（33章）总是会对性的总称（Sexuellen）、性欲和性行为的总和（Sexualität）以及作为性感和性吸引力总和的性（Sex）加以区分，并且常常会因如下行为感到恼怒：如果有人将法国的思想家如福柯或美国的科学家如斯托勒这些人理论中有关性的概念或范畴，统统只是翻译成“Sex”。然后总要仔细查究，他们关于这个“Sex”到底说了些什么，必要时也会请教能够懂得这个词的那些人，即选择这个词的译者，这个词在他们母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德语确实能够允许我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只想表示事实真相或真实内容的愿望。性欲和性行为（Sexualität）——这是一个相当笨重的名词，它让人联想起一些固定的欲望和行为以及实际的性模式。而性感和性吸引力——可以说是一个坚硬、锋利的名词，它显然运用了一种短期效应的程序砍断或熔断了性欲和性行为原有的过程。因而我们似乎能够就此猜测：那些原先凝固的并自然而然的欲望、行为和模式，被加以分份或小份包装，以方便销售或变卖。那个性的总称（Sexuellen），也简称为性，则与其相反——虽然也是一个名词，却是由形容词转换而来的一个较为柔和一些的名词；它在我的耳朵里听来，充满了更多的希望和神秘，更独立也更流畅，在它之中没有罪犯，它没有表示一种状态、性质、特征的后缀，没有叫床的喊声，没有神秘主义，也没有两人或多人间的相互合作；它只是性的个人特殊差异的总和，它是一个不依赖存在与思维，不可加以身份认同（Nichtidentisches）的概念。

在此顺便说说性的不可加以身份认同的特征。自从性作为文化社会形态的历史概念诞生以来，性便意味着是本能冲动和非理性因而也是非理智的，是越界和神秘的；它被作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理性世界中一

个尚未被认知的空缺点，也被看做是冷漠社会中的一股暖流，并且性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它独自对抗着由主导社会的理性强加给它的拜物主义结构，也通过自己的不可计算性，而使所谓的启蒙理性的计算落空。作为一种批判的脉冲，性证明了我们冷漠的理性并不能够完全主宰我们的生活；但同样证实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按理性安排我们的生活。乌尔里希·松内曼（Ulrich Sonnemann）在他的《负人类学》（*Negativer Anthropolgie*）中，把性的这种状况称为“理性的不可支配性”（Unverfügbarkeit der Vernunft）。但是当似乎觉得在性这个概念中已经加进了一切内容，并也似乎一锤定音已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性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令人震惊、感人、疯狂和非理性的事情，这使得人们重新又相信生活中的理性：仍然还存在着生活与幸福，光辉与伟大，就是那种无比宏伟壮丽的感觉。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代价，伴随着性的伟大的是受伤、分离和攻击，或是同时出现，或是前后脚接踵而来。

性不仅能够刺激人的整个身体，也能够（不只限于性高潮时）熔断人的意识和思考。性欲和性行为是肮脏的，并在字面的意义上也是淫秽的，如果它真正去实施文化所禁止的那些欲望和行为。在一种性的活动中有五种扼杀生活的心态将会退场，它们是：无辜、舒适、良心、安全和羞耻感。也许还有无聊和抑郁。如果说讽刺是人性中的那么一点羞耻感，那么性欲和性行为便是人的那么一点兽性，没有这么一点兽性，也就不存在人性和人。性也能够成为开启力量、艺术和自我修复这些源泉的动力，正是这些源泉帮助人们做出自我舍取，填补自恋的空白，重新体验婴儿时代那种无所不能和狂妄自大的幻想：没有分离，不需理性，生理心理的自成一体，为抚平幼年早期的心理创伤而欣喜若狂。性也能够在男人相对于女人，我相对于你，主体相对于客体的意义上，克服或超越由某一方主导的二元关系。突然间，渗透和接纳，“阳具”和“阴道”的乐趣和性满足的模式不仅属于男性，也同时属于女性，就此统一了所有的性别。这就建构了独特且珍贵的，唯独属于主体自己的一个小

小的世界。认识论的不可再简约性使得性别和性主体的这一诡计有了实现的可能。

性和爱情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回想起，如果作为单一的个人要想越过主体与客体、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条鸿沟，或是会充满恐惧和惊吓，或是会陷入不能自拔的迷醉和颤抖；这一切都会使那个想越过这条鸿沟的人变得狂躁或是忧郁，随时听候吩咐或是冷淡不感兴趣；这就是说，或是做出一种动物性的反射，或是作为一个残忍的人在行动。这些概念可能会与一种错误的确定性相矛盾，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确定性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是科学先对本体与实证、身体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进行一种冰冷的分离后，把贫乏包装为所谓的丰富，并将其作为一种确定性鼓吹进现代世界的。性欲性行为和爱情等一些概念，只有脱离了哲学领域并同样也摆脱了那些科学范围的限制，才会具有实质性。爱情既不是埃佛拉（朱利奥·切萨雷·安德烈·埃佛拉男爵，笔名尤利乌斯·埃佛拉，是意大利哲学家、隐微论者、文学家、画家，传统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译者引自维基百科）式的神秘同盟，也不是施泰纳赫所设想的那样一种和谐的场景。它是苍白的人际相互世界的一种显现，它展现了一个限制在两人关系上、无限拜物化，既独立又受限制、既自由又不自由、既个人化又普遍化的世界。它具有封闭性，这就使得性科学难以进入，就像心理分析学难以进入人的潜意识中去那样，因此只能对一些可以归结为爱情的现象加以猜测而已。

人作为一个性别和性欲性行为的主体，与任何一个其他人都不会具有相同性。也许现有的被公认的文化模式可以用一只手或至多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但是个人化的经验、渴望和体验生活的结构却相反，如此众多，因此可以说，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这样的结构模式。用另一种话来说，就是每个人（不论男女）的性别意识、性欲和性行为与任何一个其他人（不论男女）都是不尽相同的。除此之外，即使是对同一件特定性事件的体验，也会因人而异，极不相同：可以从非常愉悦到反感厌

恶——这由个人的先前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后续处理状况或心态而定。因此，性在一方面是完全文化和社会式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是彻头彻尾个人和主体化的。就此可以推论出，科学对其所做的一切概括都未免有粗糙之嫌，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在这个领域研究事实或所谓（心理）障碍和疾病的科学。当然可以制定一些范畴和应用一些分类标准，但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人的社会心理障碍或疾病会与另一个其他人的有认同性。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有时即使运用了同样的衡量标准，也仍然存在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天差地别。

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可以被认定为标准的性欲和性行为，因而也就不存在某种特定的标准的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性形态。一切不同的性表现和性的结构模式都共同属于人类的生活史，没有一种表现或模式比另一种更为健康或更为正常。所有人都有着一种多形态性恋的根基，并将在一生中不断进行重塑和调整。在所谓人的社会心理中，不仅沉睡着这种对异性、同性或双（多）性恋的欲望，而且还隐藏着一切都不同于他人的愿望，因而就有了从无性欲到多性恋，从无性别的中性到改变性别的变性现象。任何一种精心刻画的性欲和性行为，都是一种贫乏化。这里要强调的是贫乏化这个词的后缀，这个“化”已经展现了一种结痂和钙化，因而是一种僵化。这类“化”的逻辑是这样的：异性恋，在最初就不会有同性恋的欲望；顺性别情欲者，不会有变性的欲望；双性恋者，不会有三人恋的欲望；三人恋者，不会有四人恋的欲望；恋青少年，就不会去恋老年人；爱田园牧歌，就不会爱性变态；爱柔和，就不会爱坚硬；爱白，就不会去爱黑——反过来也是如此，就这么没有终结地永远继续对抗下去。我们当代的这些性形态，是缺乏美感的。我们这种文化的性形态的特点是，一方面在大庭广众面前，几乎所有的广告和软色情影片和作品充塞着一种企图激发情欲的色情艺术，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调情和热恋，我们的性形态却在总体上是丑陋的。我们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男人和许多女人，都没有性的情感，因而可以被看做是无性的，因为他们无非只是在实践表面的性

感性吸引力，这种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性关系，不需对另一方倾注真正的性情感，即便是在想象中也没有这种真正的性情感。也有许多人——女人多于男人，是反性的，即对性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许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可以猜测，真正的性在这些反性的女人中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许多男人对这些女人的害怕，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这种害怕也来自于女人对他们关闭了阴道这么一个事实。

此外，我们不应忘了：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有关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真理。我们总是只能认知一些来自别人的陈述、假定或是研究成果，而这些陈述、假定和研究成果，都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各个不同的个人和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结构所建构和置放在我们面前的，并且那些已被确认的内容，也会因为我们自己对其所做的阐释而又经历了一次继续的修改。每个特定个人的性愿望、性感受和性体验，都是无法直观加以确认的。所有我们认为已经知道的那些，无非只是或多或少有些正确的推测。也正是性的这么一个难以捉摸的事实，使得性在一个过度物质化合理性化的社会里是如此珍贵。性虽然不会从一个理性化的社会里消失，但它却总是在根本上不断地对抗着它，因为唯有爱情才能做到，让所有人的性和爱，完全独立于出身和教育，完全独立于知识和权力。

从各种层面的意义上来说，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是一个临界性概念。这个概念想包容的内容，在现代思想理论中属于一些相互对立的领域：人与动物，身体与心灵，理性与非理性，内在和外在，自然与文化，男人与女人，儿童与成人，客体性与主体性，意义与无意义，认同性与不可认同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如同商品拜物主义（Sigusch，1984b，1986）这个概念一样，只是一个中介性的概念，它只是试图将作为普通个人的性欲望和性行为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综合思考。每个特定个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是一件他个人自己的事，也不是他的纯粹自我。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是处

在超验和实践之间。它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如同在人种学和心理分析之间意义上的拜物这个概念：不只是幻想，不只是物，不只是活生生的，也不只是死亡的；它很像温尼科特（Winnicott，1951/1993）的不只是恐惧和象征的那么一个过渡客体。因此也就不要感到奇怪，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作为象征性的实践和个人具有普遍性的愿望与行为，不可能在一个概念中完全做到，使自己从认识论的角度摆脱日益一维化的科学，因为它自身不只是属于身体器官、感觉和情感，而且也属于象征性、语言、经济和道德。

正如我在前面那些理论断想中已经试图加以说明的那样，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从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核心来观察性、性欲和性行为以及性感性吸引力，但又不轻视由其他科学发现和展开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化理论的那些事实和观点。鉴于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上述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不可放弃的，但也没有一门科学已经对此做出一种最终的回答。在一个社会化了的社会中，自然的事物是通过社会得以传播的，而社会的事物又是借由自然得以传递的。肯定主义的性科学，简单地满足于事实本身，或是至多要求对事实做一些保守或进步的标示。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思考的问题则是：社会元素是怎么渗入到性和性别中去的，并从这个角度研讨性和性别。按批判主义的性学观点，对性和性别有着最大影响的是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因为文化和社会能够通过惩罚、规范、科学、话语和经济化等手段，决定性地剥夺作为性和性别载体，即作为人的生理心理基础的自然身体自身，原本所拥有的象征性、话语、感受或客体性等要素或功能，从而使人的身体、性和性别成为文化和社会的产品。批判主义性科学竭力遵循思想史上那种坚持主体和启蒙的思想，因而也有权怀疑这两者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批判主义性科学不去这么做，那么便丧失了自己的批判本质。如果没有主体的诉求，那么一切本能式冲动都只能是一些完全社会化了的性形态；如果没有理论上的努力，那么性甚至不能过渡到性欲和性行为，也就无法通过这种过渡成为可以辨认为物化的形态以及最终的物化性形态和物化了

的性感与性吸引力。通常的性理论总是与那些当时正在流行的事物，比如性的适应性疗法，比如性的政治改革相伴而行。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则与此相反，尽管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一切都彻底社会化了的社会，仍然坚持性的主体性和个人性，它在性的颠覆与对抗、本能冲动与思想突破中看到了最后一道能够解体固有体制和形态的机制或是说最后一种可能性，并以此来打破以往和现有体制正在对社会与自然进行的拜物教式的物化。

鉴于上述的进程和层面其实都处于一种相互交错的状态，我认为运用一种系统理论来对性进行观察和分析是不合适的；因为作为一种系统理论自然就会假定，性系统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子系统，因此也就是按自己的规则运行的。除此之外，系统理论也会忽视或低估性的生物性、生理性和心理性的条件与程序，而没有这些条件和程序，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性欲和性行为了。之所以说不合适，也因为如今（比较比如：de Sousa，1987），即便是哲学，也已在总体上把情绪归入非理性或是说归入非理智的领域。当然，情感也能是理性的，比如在登山时的一种担惊受怕，或是为第四世界儿童所受的苦难油然而起的愤怒。只是科学对此仍是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的一位女所长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在回答伊丽莎白·冯·塔登（Elisabeth von Thadden）发表在《时代周刊》（*Die Zeit*）上的关于人的情感的问题时，曾这样说过：“人的情感，是今天还需去发现的最后一片黑暗大陆。这无论对社会科学、经济学还是对脑科学研究来说，都是如此。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科学都给予那个理性的人一种优先的地位，但现在人们却又一次发现，感觉了的真实性对人的行动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虽然其实人们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种情感究竟是什么，并且也几乎还不知道，在人的情感中究竟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是习而得之的，也还不知道是通过哪些诱因而激发的。”好了，那么就开始研究情感。但现在已经应当没有争议的是：情感，往往是那些靠理性无法把握的心态，它通常也是对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的向

往，而脑科学则至今仍无法解释这其中的相互关联。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性，自新性革命以来（关于这一革命，我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进一步描述），也在正面的意义上表述了同性恋。从那时起，人们所提及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包括了同性恋者特定的性欲和性行为。我把这称为“新的性”，与其他科学家和研究者，如如同尤迪特·巴特勒、莫尼克·维蒂希（Monique Wittig）、特蕾莎·德·劳蕾蒂（Teresa de Lauretis）、盖尔·S.鲁宾（Gayle S.Rubin）、大卫·M.哈尔普林（David M.Halperin）、夏娃·高索弗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所说的同性恋者（queer），是一种有着一段距离的亲缘关系（比较Kra，2003，2009）。为什么在概念上相互有着一段较远的距离呢？因为在我这里，性是我的观察中心；而在巴特勒那里，他更侧重于观察性别。作为一名医生，我首先是要反对通过医学而将同性恋者病态化、变态化，并将他们排除出所谓正常人群，推到社会的边缘；而且争取性的解放也只是部分地与政治和社会为争取解放的努力相联结。用另外的话来说，我的研究在第一层面上主要涉及的是病人、伴侣、寻求避难者、难民或罪犯，他们希望得到治疗或是医学鉴定，而不主要涉及既不感觉有病也不需要法律或行政专业帮助的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恋者或三人劈腿者。

我们今天所说的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各种文化和各生代之间的传递、转化和重新评价，因而也有了与它最初完全不同的面孔和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女人是没有自己性特点的性生物。今天有许多人都在反驳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这显然完全取决于谁在哪个时代（时期）、生活在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族裔，以及在哪个年龄段、有着怎样的性别和社会经验、有着什么意向和以怎样的观点来谈论性。比如在古典的情歌中，安特罗斯（Anteros）是爱神的阴影（反面）。他不只是爱神的兄弟和爱的回报之神，而且也是蔑视爱情的复仇天使。帅哥梅莱斯（Males）强迫那个声称爱他的外邦人提玛格拉斯

（Timagoras）为证明自己的爱而从雅典卫城（Apropolis）的最高岩石上跳下去，当那个外邦人果真纵身跳了下去以后，梅莱斯感觉后悔不已，便也跟着跳了下去。两人就这样都为爱而殉难了。自那以后，我们似乎可以说，爱神和反爱神使我们左右为难、支离破碎、不再完整。我们今天遇上的不再完整的主要是那些公众性的话语人物，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绯闻。但是在古典的爱之歌后面出现的是我们文化中的爱的所罗门之歌，它的内容我们也已经提过。只是那个神圣的爱神，在今天已经演变为有着粗俗性欲性行为的性爱。

古代所认为的那种几乎或甚至根本不能脱离身体器官的内源性刺激，由于文化刺激的泛滥，在今天早已并不强于外源性刺激，以往所谓的外源性也已经通过文化而演变为内源性了。外源的性刺激，以它今天的实际效应已经在起着内源性的效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今天有权去指责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过高评估了身体的功能。只是我们有义务决不能忘却，与爱情相反，我们的文化对性欲和性行为的思考，是不会脱离身体物理这个领域的；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对于这个身体领域的界定又不如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具体和特定，因为身体对同一种刺激的反应，比如性器官的勃起、分泌和射精、皮肤变色和血压增高等，在极不相同的生活情景或死亡状态中，都会出现最不相同的情感，从对考试的担忧，从对一件商品的着迷，直到对绞刑的恐惧。也就是说，这要取决于在哪个时间，在怎样的感觉、象征性和解释的框架内，在怎样的综合情景中，由谁运用和经历了这些对刺激的反应。正是这样，如果我们坐在音乐厅里向钢琴家正在弹奏的钢琴望去，就不会像在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只看到一条女人的裸腿。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今天是如此地平庸，因为它们已丢失了自己的许多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秘密的性欲和性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悲剧；虽然那个智慧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把性的这种无秘密性描述为是人类最大的发明，虽然这种无秘密性不是动物性的，但却是非人性的，因为它就此无异于那些在公众场合进行和确认的普遍事件，没有了性的个人特殊差异，或是

只能作为负面的差异加以体验。

直到今天，任何一种能够得到性满足的性生活（性欲和性行为），任何一种成功实现了的性特殊差异，都仍是一件艺术作品；直到今天，谁要想完全理解我们文化中的性，仍然肯定要冒预先建构一种失败的风险。性，总是被认为还蕴含有更多的未知内容，总是还留有那么一点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而正是这么一点点剩余部分，便是性之所以能够逃脱被任何概念完全概括或包容的命运。如果性被认识论所捕获和去神秘化，那么性便也失去了它诗一般的和令人意外的层面或维度。因为一个概念不会交媾，也不会怀孕。只要仍然只是那些唯心主义者在寻找性的真相，那么有关性的真实性也就仍然处在一种最不可能定义的状态。性欲和性行为的非真实性最主要根基于它所处的社会形态。如果性不再拥有自己的秘密，那么人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就并不比一场足球赛更让人感兴趣。这里面也有肯定主义性科学的过错。这样听起来虽然很有那么一些传统的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意味，但事实却是如此。

如果我思考爱神，**“**即使我只是半个学者，我也感受到了双倍的荣幸**”**，歌德**1795**年在他的《罗马哀歌》（***Röomischen Elegien***）中这样写道。并且还加上了这样的诗句：**“**因此要庆幸，活生生的人，在这个充满爱情的温暖地方，/在可怕的遗忘女神把你逃跑的脚，用爱的网，罩住之前**”——“**这是多么幸福，我们在交换充满信任的吻，/我们在相互吸吮，那流淌着的呼吸和生活的慰藉**”**。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37 登基成为国王的性

20世纪发生了三次所谓的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在1905年左右达到了它的高潮。作为心理分析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有关性理论的三篇论文》（*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中对此次性革命做了研讨。第二次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作为哲学家的米歇尔·福柯在他的著作《性欲性行为与真实性：追求知识的意志》（*Sexualitt und Wahrheit*：*Der Wille zum Wissen*）中，针对这第二次革命做了思想论辩。我的观点是，一场被我称为第三次的性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富裕的西方社会如此截然地改变了人们关于爱情、性别和性生活的想象，因此必须认真反思与这场性革命相关的一种新性理论。

伴随着20世纪的性革命或是说性形态转型出现的，大多数是一种缓慢和静悄悄的演变，但有时也极为快速和大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那时的喧闹，正是伴随着这种喧闹声，性在1968年前后终于登基成为国王（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场登基运动直到今天仍被普遍称为“性革命”。一种孕育着希望的话语多多少少涵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应当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并尽可能强烈地实践和体验性生活，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识。被封为国王拥有了至高权力的性，陡然指责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正常的一切性关系犯有正常强迫症，声称要通过普通人的性解放，来颠覆整个蔑视人性的社会。一夫一妻制和生衍繁殖、童贞和忠诚、禁欲和苦行，都成为必须抛弃的垃圾或与之斗争的理念。但是伴随着“性的解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和老的强制与恐惧，那些为性解放并

进而颠覆整个社会的战士们，却不愿承认由冈特·阿门特（Günter Amendt，1970，2006）设计的扣人心弦的“性的对立”场景。

围绕着“大写的他她和中性的他她”（Schmidt，1986）的一些有着那个年代特征的事件，主要集中发生在当时的西德，并且简要地说：这些学生、妇女和同性恋运动，造成的对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可以与这个世纪中出现的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动荡相比拟。性和色情被广泛地商品化。在大众媒体中，所有与性相关的事，都在排练起义和反叛，直到它们不能再掩饰自己的愚蠢。有关职能部门规定了学校必须设置性常识课程。在过去时代曾经尝试过的忏悔室、法典和病理学说之后，又尝试将知识和理解（为了不是直接说，这是在挥舞一根充满理解的时代教鞭）引入反对性本能冲动的领域。这不仅适用于生育领域的日益技术化和医学化，而且也适用于在理论上完全分离，但在实践之后却只有部分分离的法律和道德。国家退出了个人生活的部分领域，以致个人的性、婚姻和避孕行为，部分地非罪化或非刑事化。青少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似乎疯狂地在尝试集体或群体型异性恋的性行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又仍然以他们父母的婚姻和忠诚模式为自己生活模式的基本导向，这就使得他们的性关系，就像由前后连续串联起来的一根一夫一妻制的链条（Sigusch und Schmidt，1973）。

有着特别深远社会影响的是，女性作为性别的重新性化。这种重新性化现在成为一种使女性享受性高潮的义务，因为直到进入20世纪30年代，女性总是被社会以她们性别特有的系统发育进化的缓慢或是以生理心理的脆弱为借口在根本上否定她们（也与男性一样）是具有自己独特性的一种性的生物。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不仅是女性的身体，而且男人的性外观也被附加上商品美观并因而商业化的服务效用。现在的男性也应当喷洒香水，并把平均多于两条的白棉罗纹内裤叠加起来，突出自己的性感（Haug，1971）。由于服装现在将男人的身体转变为一种突出性感的身体，这就使得男人现在有了可以出售的商品的美

观，“似乎进入了与女人的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即他们现在把自己作为能够满足女人欲望的（商品）客体提供给女人享用”（Dannecker，2000：125）。无论如何，那些“异性恋的男人实际上以前根本没有过性感的身体”（同上：123）。在它漫长的历史中，性科学第一次成为列入财政预算的大学专业学科，那些新出炉的性学家则尝试将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思想财富，悄悄地引入躯体医学（Sigusch，2008a）。他们的实验参考数据是对一对异性恋伴侣的极大心理学化，这两人被关进一个“关系的箱子”，他们应当毫无间隙地倾听和感受自己的身体和心声并记录成文，直到这对性伴侣筋疲力尽再也不能忍受地退缩回自己，或是爬出并砸烂这个箱子。这是黑色女性主义、通用于世界的治疗主义和男子团体的时刻，也完全就是无数自助团体总聚会的时刻，因为这些团体已经宣告了既富有自律又能自我优化的自我性慰藉，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加以讨论。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进程中的这种性观念变化，是以一种对传统的婚姻模式的质疑，是以对所谓幸福家庭在实际却是孕育不自由和不幸福温床的一种揭露，以及首先与政论家奥斯瓦尔特·科勒（Oswald Kolle）的名字相连的一种所谓的性浪潮为前提。当时被废除的一些法律，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诺亚方舟前（极古老）的一些法律，如拉皮条法，此法允许用谎言和诡计以及冒着风险，将一对未婚的青年男女骗进一间房间同居。这类法规都因当时变化了的现实而被清除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们特别倾倒于性经济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威廉·赖希的著作，其著作的关键词是：“性的困境”（Sexualnot，也有译作“性挫折”）、“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性革命”（Sexuelle Revolution），同时也坚持了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所称道的思想路线，有意聚集和综合那个时代的这两个伟大思想潮流，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一个蔑视人的社会，并主张超越它。学生们是如此推崇赖希，因为他们从他的著作中学习到如何去运作

和实现他们主要关注的两件大事——怎样摆脱市民社会强加给社会成员的性困境枷锁和怎样推翻蔑视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赖希的构想和建议导致这些年轻的学生认为，性的解放自然就可以颠覆这个可恨的社会。

威廉·赖希在心理分析家的团体中以自己特有的一些不同寻常的性理论和治疗技术著作论文和观点引起大家的注意，除了他的一些关键术语，如“阻力分析”（Widerstandsanalyse）、“人格与肌肉盔甲”（Charakter-und Muskelpanzer）和“性高潮理论”（Orgasmustheorie）之外，他的思想也曾与德国共产党（简称KPD）的政治主张很接近，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被德国共产党以他所参与的心理分析团体与共产党理念的不兼容性为由而开除出党。在纳粹时期，他先是逃往维也纳然后又逃往斯堪的纳维亚，才及时逃脱了纳粹的迫害。1936年，他“发现”了泡状结构的能源（vesikuläre Energieträger），按他所说，这种泡状结构能够连接无机和有机物质。他把这称为“Bione”，作为一个表示有机和无机的临界概念，并认为直接解开了生物起源的密码。他对性高潮的崇拜，导致其日益成为一种表现所有生物特征并因此拥有极大社会脉冲的运动的一种特有现象。1939年，他前往美国并在那里定居。一年后他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生物能源，起名为“Orgon”；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曾借助于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按他的步骤方法，试图证实这种所谓的能源形式，但至今仍一无所获（Demisch，1979）。赖希将这种所谓的储蓄器（也叫作累加器）用来治疗癌症。今天，赖希则是公认的以躯体为目标的心理治疗方法的创始人。

从性理论的角度来观察，他的理论和活动都贯穿了一种不可忽略的主要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治疗师和作为一个有政治意识的人，他论证和反对不公正地将人置于一种强迫和依赖的社会关系中，并对性的关系是怎样极其受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形态的制约，有着自己的一种构想。但另一方面，他又竭力捍卫一种最原始和粗野的性的自然主义，

也就是生活的自然主义。他也最后确信，一切心理障碍和神经性疾病，比如心理变态，都可以归结为在性高潮中缺乏一种性紧张的释放。他的“生活格言”是：“机械性压力—生物性电荷负重—生物性电荷释放—机械性放松”。只要这种能量有一个正确的流向，那么这个世界就一切有序（没问题了）。恩岑斯贝格在1975年把赖希称为“性高潮的法拉第”。对赖希来说，社会和文化是太不自然的事物。他将那些早年口腔期的性器官、痴恋、性变态和爱情统统排除出正常的测量范围。人的性、性欲和性行为以及总括这些的性生活，都应当不存在任何秘密。对性器官的异性恋尤其是性高潮，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自然法则。他要反对的是同性恋。没有任何一个性理论家如他那样痴迷于一种白炽灯泡式的异质性的性吸引。这种物理性能量就是性，而性就是人的生活能量。

赖希确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自由和一种自然的性生活，虽然自然的性生活这个概念并不取决于自然，因为自然既不认识自由也不认识道德。但是赖希不只是“发现”了没有自然科学家能够证实的生活和能量模式，而且他也假定了一种没有任何人能够实现的性的自然状态，因为任何一个人作为人都是一种完全受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约的性的生物。到最后，他只剩下那个所谓的生物激情，还偏偏投注于心理卫生和实际并不存在的没有偏见的价值中性的科学。但直到今天，他仍有许多追随者。

现在再回到发生在1968年左右的性革命。当时具有开创和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口服荷尔蒙避孕药所提供的可能性。60年代最早的名为“Enovid”的避孕药在美国进入药品市场。总是有人提出这样的论断，如果没有避孕药，也就不会出现性的自由化。我认为，这一论断的思考维度未免有些太单一了。一个过于复杂的现代社会和一种由众多要素决定的社会文化进程，是不可能由于一项荷尔蒙避孕药的成就，单独影响和决定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一种转型。如果性革命没有避孕药，是否就

可能出现另一种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避孕药”是科学自身发展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一方面为生命提供可能和便利，另一方面又杀死和摧毁生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一种恶果。它之所以进入市场，不是因为避孕药生产公司想把它贡献给人类，而是想保障自己的盈利。大约有1000多名波多黎各妇女为它做了测试（Kunz，1989）。这些妇女因为贫穷和没有得到足够的咨询，才像做实验所需的兔子或豚鼠那样被药品公司拉来作为有耐心的试验品加以利用。

如果知识的这种生产不是在一种父权或男权制的文化中进行，那么这种技术性的生殖规则按一定比例的概率来说，肯定会施加在男人身上或是男女两性共同进行。但是现在，这种避孕药似乎很自然地只是为女人而发明和生产的。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1999：2 f）这位“避孕药之父”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企业家，他曾坦率地说：“无论如何，科学可以毫无困难地开发男用避孕药。”（比较：Leiblein，1984a und b）并且科学也已接近开发一种疫苗，因而不再需要药丸或注射，就能规则人类的生育。“但是，”杰拉西说，“这种疫苗投入生产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企业可能对此没有兴趣。是一年只买一次疫苗就足够了，还是每天都要吞下一颗药片，这是一种会带来不同利润的根本区别。”

如所预料的那样，“避孕药”的引进有其两重效应。一方面“避孕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系数帮助女性防止意外怀孕，因而也帮助她们集体性地消除了相应的恐惧以及与此相关的性的恐惧。但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些年轻妇女由于这种技术创新却又面临着被要求毫无性顾忌的一种新的强制。“无悔地享受”这一口号，响彻了那个时代西方文化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过滤嘴香烟的广告也毫无顾忌地借用了这一口号。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技术的进步并不决定人是否能摆脱强制获

得解放。技术的进步是盲目的，它只能帮助人们得到一个社会允许人们拥有的那些自由。因此，技术的进步在伊朗必然不同于它在美国的影响，在东德必然不同于在西德的影响。但是各种主流世界观总是围绕着“避孕药”喧闹，并试图为己所用。如果一个社会有着结构性的强制和暴力、不平等和不自由，那么技术方法的影响也必然会有这些特征。如果一个社会在总体上将性与恐惧和负罪融合在一起，那么用荷尔蒙避孕也会有恐惧和负罪感。贫穷的国家仍在一如既往出于人口和经济政治的算计而投放避孕药。在我们这里，避孕药则已成为一种巨大的生意，因为教会的声音不再具有指导性，而政治的权力结构又允许它进入市场。也由于在冷战和没有大的军事冲突的状况下，已不“必”为下一次热战再生产人了。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社会和文化的进程自几代人以来已经有了一种生殖与性领域分离的趋向（39章）。

38 新性革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性革命而出现的性与性别形态的转换，除了一些公众性的争论和丑闻，其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直到今天仍相对平静和缓慢，但可能还是比第二次性革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我在多年前就曾把这些对性所做的抽象评估、描述和观念创新的过程，称为“新性革命”（比较比如：Sigusch，1996b，1998a bis c，2000b，2001，2004a，2005a）。面对这场新性革命，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新经典主义怎样重新解释渴望和激情，并把它们重新归入哪个领域等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性实践和性行为的发生和频率等一些经典主义的数据。即我更感兴趣的是比如传统和新型的性自我参照系统的转换关系，在公众场合的性表演或是在私密场合借助互联网用电子的性满足性瘾的方式以及非性的惊险刺激或攻击行动，因为正是这些惊险和攻击型的性刺激为人们在性形态以外提供了可能的暴力形式，以致日益增大的人群不是通过力比多和爱恋来获得性的激情，而是通过攻击和仇恨，即人的性刺激来自不能再被称为性的预期刺激（99章）。

从导致新性革命、构成新型性欲和性行为以及新型的性别和新的性联盟的那些众多网状型相互关联的过程中，我主要挑出三个有关结构分析和性理论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断想中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讨，当然这三个问题也可以从实践的角度加以观察。它们是：性的各相关领域的解离（**Dissoziation**）或是解体（Zerlegen）、性各组成部分的碎片化弥散（**Dispersion**）或消散（Zerstreuung）以及性关系形态的多样化（**Diversifikation**）或可复制性（Vervielfältigung）。与此同时，我不想参与某些性学家的哭喊，因为他们在新性革命中只看到那些“老的和好的”性欲望和性行为的消失。这些性学家生气地展示了一份以“告别性革命”为题的最新调查研究成果。显然，那些被调查的社会个人的行为举止，并没有表现出研究人员所期望的对新事物的害怕（恐新症）。我个人认为这些性学家的抱怨，未免有些多愁善感，未免太面向过去，他们仍然总是坚信荣耀只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其实在这期间我们谁都知道，60年代的性革命是怎样被双重道德和性别歧视、恐惧感和负罪感所败坏。这是由于他们主要忽视了，新的性形态尽管有着一切市场化和平庸化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了原有的恐惧、偏见和理论，从而证明了：性和性别可能性的伤口仍在出血。

为了避免误解，我特别要强调我的论断在理论，并且尤其是在实践上的界限：社会普遍的性和性别形态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并且从一些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又是不可逆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允许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都会对“新型的性”和“新型的性别”有所反应。有一句中国的格言说：“当变革的风吹起之时，有些人在筑墙，有些人在建风车”。当然会在同一时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性欲性行为的时代和结构历史。这种时代和结构史虽然普遍可以按代划分，但绝不能按个人划分。当代对于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是普遍的性和性别形态的三种结构史，它们既能够相互结合又能够彼此重叠：

1.这个层面的结构史有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围绕着1905年

的第一次性革命的特征，主要出于当时社会反对剥夺妇女权利，反对卖淫、性病、“性退化”、性偏差、性禁欲、堕胎和人口递减的斗争，并且也来自人们为争取生活和性的改革，争取获得裸泳、“自由恋爱”、“在婚姻中预防怀孕式的性交”、保护母亲、自愿或强制性优生以改良基因等权利的努力，以及民众普遍要求废除惩罚堕胎和同性恋法的呼声。

2.这个层面的结构史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性革命，这是一场部分由商业化和反权威，部分由官方职能机关的社会自由化聚合而成的革命。对这场革命的观察重点典型地集中在围绕男女关系的争辩，围绕公众领域对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理解和展现，关于男女学生的性启蒙，以及重新针对歧视女性和性爱方式的少数群体（尤其是歧视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所展开的社会性话语讨论和争辩。也正是在那个时代，社会引进了帮助妇女避孕的所谓的“避孕药”。

3.这个层面的结构史涉及的是20世纪的第三次性革命或是说新性革命，这是在当代构成的。主要是围绕当代有关性和性别的讨论，当时出现的艾滋病，一种新的辱骂话语以及电子数字化革命，也包括与此相伴出现的网恋和在网上满足性欲的行为。

但现在要问，什么是第三次性革命，即新性革命的特征？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前两次革命的承诺或成果，首先就会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欲和性行为所赢得的那种高度的象征意义，大约30年来又是怎样重新递减的。当时，在60年代末，人的性欲和性行为赢得了如此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或是说势能，以致一些人甚至深信，通过性解放而释放出的能量，就足以推翻整个社会原有的旧体制。那时被重新发现的那位反抗型的心理分析家和性经济学家威廉·赖希，成为这些人的这一理论和政治的重要证人。另有一些人则把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理想化为等同于人的幸福机遇。在今天，只有那些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儿童、清心寡欲严守教规的教派成员和性上瘾者，才会以为性本能冲动具有如此强大的势能或

是说巨大的能量，如同以往历史上那些崇拜爱神和异教的神秘主义者才将性爱看成是世界总动力那样。更主要的是，如果没有对童年时代所听说的关于天堂的极乐和地狱的折磨的回忆，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只会谈论些与性犯罪和性变态相关的话题，如谈论些商业与性别、让我们放纵的聚会（Party）、在线网恋、一夜情、（同性恋）爱的大游行、紧急避孕药、染色体导致的性取向变异、性玩具、避孕套、怀孕测控、Baby和Mama。

第二次性革命中那几代人所期望的那些心醉神迷、欣喜若狂和越界蔓延，却在第三次性革命的初期，便由于认为其中含有性别歧视、性侵犯、性虐体验、滥用暴力和疾病传染风险而被问题化。这种立场主导了科学的话语，也表现在主要研究青少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的实验调查的课题中（Schmidt，1993/2000）。自那以后，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不再作为迷醉、乐趣、高潮、革命、进步与幸福等伟大隐喻的转译，也不再具有积极意义的神秘。色情和性最近几十年来在公众场合越是被导演为不可间停和纠缠不休，越是被商业化，因而也就越是失去了它的爆炸力，也就越是变得平常化。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在今天已经更像是一种平常而普遍的自然行为，就如一种利己主义或有机体（尤指肌肉）的一种动能。

性的行动，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被消极地话语化为不自由、不平等和攻击性的源泉和犯罪地点的代名词，但是自90年代起人们已在其中寻找个人情感的兴奋点和协商型性伙伴关系的相互亲昵。正如我们在后面还将展示的那样，性欲和性行为表面的一致性，已经被新性革命再次打破，并被加以新的重新组合，因而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性联盟。由此也出现了迄今为止或是被掩埋，或是还没有现成概念（名称），或是之前根本不存在的观察维度、亲密关系、性偏好和性的不完整性（或碎片化）。如果说老的被我称为原始的性欲和性行为，主要是由性本能冲动，由情欲、性高潮和异质性夫妻组成，那么新性革命中出现的新型性

欲和性行为则主要是由不同的性别、自爱、情欲、内心的忠诚、寻找亲密、震颤和性假体或性玩具化组成（也请特别比较95章）。我把迄今为止有着新性革命特征的性形态称为精益性关系（Lean Sexuality）或自我实现的性（Selfsex），把新型的性别形态称为自我期望的性别（Selfgender，请参见本书40、92章）。

我认为性医学和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应当对一些新的实践，比如性施虐和受虐、恋物和变性，这些以前被看做是病态或只存在于萌芽状态的性欲望和性行为，在一切公众性场合和领域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将其作为完全是个人自己的有些执拗的事，为其正名。它们——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者精确地说，当传统意义上的性本能冲动不再成为性欲和性行为的第一理由的时候——作为新的性实践，其自身就是典型的新性革命。它们同时既是性又是非性，因为自尊、性满意度和心态平衡，不仅只是来自一种不假思索的拜物主义，不仅只是出于一种对性本能冲动和伴随性交而来的性高潮幻象的神秘化，而且也同样或是更多来自与非性的自我献身和自恋的自我感受相伴而成的心灵震颤。除此之外，自尊、性满意度和心态平衡等感受也总是会在坚实和飘浮、认同和非认同之间游荡，并往往比单纯固定的反常行为有着更多的内容，或是说在自尊、性满意度和心态平衡等感受方面蕴藏着比它们那些“相同命运”单纯的固定反常行为（如果存在的话）更多的内涵。只是这类新型的性、新型的性别和新型的性关系联盟在最狭隘的意义上还是些并不值得引起文化关注，或是些由于技术的缺乏还根本不存在的如电子性、无性、无性别、改性、生殖器液体注射、双性人、网恋性爱和多人之爱等的性欲、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形态。

但是鉴于这些新型性形态在这期间已是许多人的偏好和怪癖，因此以往被看做是无法说出口和反常变态的愿望和行为，现在却成为公众持续谈论的话题，这就显著地改变了性原有的正常和非正常、私人性和公众性的界线。第一次在大众媒体——即那些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媒体——上刊登的所谓性潮流，基本上还是些有关正常的性欲望、性行为和性关系，比如主要是些关于性裸露、性关系、交媾、避孕和孩子发育期的一些问题和新闻报道。也就是说涉及的只是一些许多民众关心的较为“重大”的生活问题。我们当代所经历的性潮流，却相反远远越出了以往被认为是正常的范围，并总是孤立地从事着涉及范围“越来越小”的研究课题。通过由此勾画的过程，弗洛伊德的部分性本能冲动，才具有了真正的局部性和弥散性，并且始终是心理分析的一个海市蜃楼的生殖器的首要性，也因此被推向更遥远的远方，也就是说更失去了它的首要意义。那些传统意义上的“重大”变态（或反常），通过话语机制而得以解除，并被建构成为正常的乐趣。如果人们（男人和女人）现在在电视中看到某个修理性玩具或器具企业的广告并且这还是一个正规的技术服务型企业，那么如果有哪个性虐者的链条或笼子恰巧无法打开时，也就能够给这个企业打电话要求他们的修理服务；是啊，有些为性虐和受虐者提供的性玩具是如此之小，能够非常巧妙地隐藏在小市民的小起居室里，即使奶奶（或姥姥）来做客，也不会被发现的。但这却给出了一种信息：一切都不再像以往所强调的那样，是那么反常和危险。

简而言之，正常和反常代码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如同在艺术中的美和丑、在经济中的现实和幻想）。现在这种模糊也进入到人的头脑中，即人们已经懂得，所有的人都是带着一种多性恋的基因来到这个世界的，并且弗洛伊德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多性恋基因，定义为先天存在于每个人之中的“多性形—非常态的结构”。一种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的性取向，这种取向并不是病，因而没有理由需要治疗。即使是那些在这些事情上慢慢开始进行痛苦思考的心理分析学家，也因为摩根泰勒（Morgenthaler，1980：332）的同性恋去病理化的理论以及他关于“性欲和性行为”的名言——“不管人以哪种形式表现自己的性欲和性行为，都不能被看做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精神病或一种病态”而受到鼓舞，放弃原先立足于心理病态和疾病分类学的思

考努力。因为事实已经不容忽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拜物、露阴、受虐和施虐等的反应，问题只是多少而已。因此现在一切老的变态性行为和变态性欲在文化上都属于同一类。传统的异质性爱恋以及性交，包括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式的粗野交媾，在数据上仍然极大地超越其他形式的性偏好和实践，但已不再成为道德的基调了。而且这也不再可能了，因为经典的（表象上的）性欲与性行为的一致性，已经日趋崩溃；以往被认为是变态的，正在日益渗入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所谓正派人的性生活中去；而以往被认为是极正常的性生活，却成为遭受讽刺的生活经历和行为方式。从男人以及女人的同性恋行为在最近四五十年的变化中，就能最有说服力地感受到这一相互接近和补充的演变过程。有人想尝试某些“肮脏”的性实践，不愿在一种固定的性关系中永远保持忠诚；又有人更愿意终于允许结婚，建立一个有孩子的传统家庭；有着狭义的新性和新性别观念的人则更想体验一些以往被嘲讽或是被犯罪化的或是以往从来没出现过的性实践。

这一切当然也改变了个人的结构。因此，关于性、性别，尤其是心理发展原有的心理分析模式，都必须重新加以思考。比如，对于应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心理参考数据的模式，我们无疑能说：那个本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地坚决要求满足性本能冲动，而是更多地让这种本能冲动从潜意识进入到意识中去；那个超我也不再如以前那样充满了对外在权威的恐惧，而是更多和更温和地害怕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失败。那个自我一方面减轻了负重，因为现在似乎有更多选择可能，但另一方面现在却又必须自己划分范围和制定规则，而这些在以前则是由社会或团体负责规划和建构的。并且传统的安全保障系数，比如一种固定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和收入，一种通过经年储蓄节省或投资而能够保证的老年和晚年生活，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如果可能的话，唯一可信任的，现在只能是那个作为个人的自己了；这个个人应当自己来处理一切与己有关的事情，不管是职业还是爱情。但是这个作为自己的个人，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能是一个空想者或幻想者，

因为他并不能最后决定自己安全保障和自己成就特有的结构，因为这些只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与此相同，今天那些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新性者们，只能是他们自己的教师、经理、牧师和先知。他们似乎把普遍要求的他律如此地内在化了，因此他律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自律。作为无法具体计算的回报，社会便允许他们在市场上提出自己的性道德，并也由他们自负其责或是遭受诅咒。虽然没人对这里的社会结构，即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存有一种怀疑，但专家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当前正在讨论经过一个世纪对社会个人的神经衰弱、专横、自恋、忧郁和忍受等的诊断之后，现在应当考虑怎样建构有个人和公益特征的主导性社会结构。性在当前是怎样丧失了它的理论指导意义，比如发表在一份心理分析专业杂志上的一个心理实验（Dornes，2010），就非常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这个实验要探讨的是心灵的现代化与已经改变了的教育方式的关系，但是那位以心理分析为指导思想的作者，却在对实验的叙述和总结中完全越过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最关键的核心，即婴儿性欲。

当然，我关于“新性革命”（Neosexuelle Revolution）的表述，也经过了反复考虑。用这个“新”（neo）放在性的前面，作为前缀定语，我认为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字首的那个定语“新”既表示创意，也表示新型，但同时也顾及了一种进程的过去和已经死亡的历史，如同（大脑）新皮层（Neocortex）、新手（Neophyth）或新词（Neologismus），以及肿瘤赘生物（Neoplasma）、新殖民主义（Neokolonialismus）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us）等运用neo在原来词根的基础上构成了新词那样。我之所以用“革命”这个词来表述这场性的变革或转换，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已经知道，这场动荡可能会有一个悲剧性或非悲剧性的、急剧或悄然的进程，并且也不一定引导我们走进一个自由的王国。但是我选择这个表述，主要是因为这场性革命与之相连的1967年和1968年学生革命运动，是我们近期历史一个真实的神话，因此要想描述性文化变迁的动荡，不可避免地要以那场革命作为参照标准。我无法做出决定的是用性

改革来替代性革命进行表述。改革这个术语一方面使人觉得很适用于表述性欲和性行为的性形态变化和转型的概念，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让人首先联想到我们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宗教和教会的改革事件。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按通常流行的解放或是压制的格式或标准来对新性革命加以归类，因为这与它的自身、它的表现以及它的整体，是相矛盾的。一方面是新性革命鉴于一种渗透到一切的性化，尤其是由于性总体领域的经济化、女性身体的重新性化和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出现而几乎陷于停滞；另一方面是性的退化通过去象征性、平常化、去色情化和去情感化（我们可能还会听到一些新的去性化的名词），已经超负荷了。

在这期间，我关于一种“新性革命”的假设（我还要在后面的思考断想中逐一展开），已经得到了专家们的广泛肯定和继续讨论。这里可以提及的比如有文化科学家马林-路易丝·安格勒（Marin-Luise Angerer，2007）、社会学家伊莎贝尔·阿祖莱（Isabelle Azoulay，2000）、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2003）、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沃尔夫冈·伯尔尼（Wolfgang Berner，2000）、法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洛伦茨·布林（Lorenz Bllinger，2000）、性心理分析家和社会学家马丁·丹内克尔（2000，2005）、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索尼娅·迪林（Sonja Düring，2000）、艺术史学家彼得·格尔森（Peter Gorsen，2009）、性关系治疗师和性学家玛格丽特·豪赫（Margret Hauch，2000）、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2000，2005）、历史学家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2005，2006）、心理治疗师和法庭心理鉴定师汉斯-路德维希·克罗伯（Hans-Ludwig Krber，2000）、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吕迪格·劳特曼（Rüdiger Lautmann，2000，2002）、社会学家和性学家诗丽雅·马蒂森（Silja Matthiesen，2007）、心理分析家斯塔夫罗斯·门佐斯（Stavros Mentzos，2000）、艾米利欧·摩德纳（Emilio Modena，2005/2008）和米歇尔·卢卡斯·默勒（Michael Lukas

Moeller，2000）、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伊尔卡·昆多（2008），以及文学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2012aund b）。《德国医学科学》杂志（*German Medical Science*）2004年在杂志的互联网论坛上认为我的论文《性和性别在近几十年中的文化转型》（*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exuelity and Gender in Recent Decades*），是德国医学研究所达到的一种国际性的高度；哲学杂志《论据》（Das Argument）第260期发表了我的那本重要著作《有关新性革命的研究资料》（*Materialien zur neosexuellen Revolution*）。

对我关于一种新性革命的假设进行了批判的有系统理论社会学家斯文·莱万多夫斯基（Sven Lewandowski，2004，2006，2007），他虽然明确赞同我在性科学研究中的一些调查成果，但认为在理论的通常理解中，没有运用卢曼的系统理论（具体细节见12章）。还有社会学家、性科学家和心理分析家赖穆特·赖歇（2000c），他最初也曾对我关于新性转型的讲话做了严厉的反驳。但对我的整个思考，他只是抓住了我关于“性的弥散性”的观点，以便能够把我与鲍德里亚（Baudrillard）、利奥塔（Lyotard）和维瑞利奥（Virilio）等思想家共同加以思考，尽管我在理论上所取的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立场，我的理论假设前提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主义批判和价值批判、性的神秘性的定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物化的定理、自创性和自我毁灭的定理以及Hylomatie（即人与物的相互异化）的理论。在内容上，赖歇最初并不能做出判断，是否一切仍是与100年前（同上：29）或甚至是与200年前（同上：14）相同，或是否确实出现过巨大的动荡。但他自己也用了无数的例子来描述剧烈的转型现象（同上：30），比如他列举的有：将对儿童的资助从代际间养老义务合同中转移出来，改为由社会和国家资助的1957年养老金改革；1970年引进的“尿不湿”（“帮宝舒”），结束了儿童在幼年严厉的如厕训练，帮助他们“在身体自然的总体发展中能够有一种趋向于不许那么严厉的软性的调整”（同上：16）；由社会自己摧毁的“老的家庭”的消失（同上：19）；对“恋母情结的普遍性并因而对现有的性欲和

性行为的结构模式的质疑”（同上：18）。但在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他对原始结构、万能的轴线和无法停止的冲突的偏爱，尤其是用一种反正总是如此的眼光，去洞察事实真相：心理分析的一些神圣生物，早就不生活在人间，而是如同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神应该生活的地方。

一些年后，赖歇修正了自己关于整个性领域的观点。我们现在是坐在一条船上，这条船上的同行者有：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齐格蒙特·鲍曼、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还有那位赖歇先生和我。现在对他来说，道德也具有“反思性”，他不仅认可了我的道德共识，而且也抛弃了古老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性禁忌，如童贞、手淫和同性恋等，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发表的文章《性欲和性行为的同性恋化》（*Homosexualisier ung der Sexualitt*），并指责自己借助自己提出的“性别紧张势态定理”，将一种“带有教条主义立场的解释”，作为“一种普遍通用和固定不变的伟大理论”。他认为“在心理结构整个框架内的道德沉淀”，“不言而喻”是“资本价值利用法则的衍生品”，但这必须“不断加以更新并必须总是按具体情况而定”（Reiche，2004：251f）。最后，赖歇说（2012：9）：“性所允许、期望、感到激动或是厌恶，以及禁止的边界，总是不断地在进行着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这一变迁运动“绝不会仅仅停止于通常规范的允许或禁止中。什么根本被感知为性，什么又将从这种感知中排除出去，同样也是一种持续的运动变迁”。并且非常具有高度可读性的是他为弗洛伊德第一版《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再版所撰写的后记，他在文中写道：“我们今天感觉弗洛伊德理论中那些太远古的部分，恰巧通过现实性趋向中的新性的拟古性，而拥有了一种可持续的现代性。”（Reiche，2005b：124）

令人感兴趣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吕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齐佩洛（ve Chiapello）现在都对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撰写发表的文章和见解做了特别细致的研究（1999/2006）：资本

主义通过占领以前是家庭和性生活的私人世界，而把1968年反抗运动所释放的那些性革命的理念，为自己的赢利所用。对于这一状况，波尔坦斯基（2007：4f）在一份德国的专业杂志上写道：“鉴于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非道德的——除了以合法的和平方式无节制地攫取资本进行积累之外，它并不认识人的其他要求，因此它必须一方面为了达到把自己包装成合法和合理的目的而借用其他的（文化）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它借用了反对它的批判，才使它有可能进行一种自我转型。这样就几乎不用感到惊奇，即使是资本主义也赞赏人的‘自主’和‘解放’，尤其是在性欲和性行为的范围内的自主和解放，有着一种日益递增的价值。这又反过来导致社会生活世界结构冲突的一种复杂性，使得原有的区分标准——尤其是区分‘右’和‘左’的标准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如果说，以前主要是沿着一条“经济的轴线”进行着社会政治斗争，那么现在的“生物政治轴线”却开辟了一个新的社会冲突的战场，在这条我更倾向于称为“生活个性化”这样一条新的轴线上，右派和左派都在按自己与资本主义轴线的关系做出一种与我们通常认定的左右相反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但这种矛盾行为在总体上肯定不会像私人电视台所播放的节目那样几十年一直把性和性别的领域说得一塌糊涂。另外，资本主义对性和性别领域的考察，也完全比波尔坦斯基想象得更先进。对他来说，性生活是人的一种不容拒绝的要求，并在今天它已经内含在社会规范内成为实现人的生活的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但在事实上，人们（男人和女人）今天也能过上一种被社会认可并不受他人骚扰的无性生活（90章）。

这里还必须向懂得这种边际性心理分析命名法的专家，最后指出我应用“新”这个词与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即我是从社会学的观察角度引进和运用“新性”和“新型的性欲与性行为”的，而心理分析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1982/1988）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则是从临床治疗的观察角度在与变态或反常这个概念的辩驳中应用“新性”和“新型的性欲与性行为”术语，以便突出色情创意的创新特征和使

用强度；与此同时，她也运用了“新现实”（Neorealität）的构思，因为这能帮助她的那些边缘性（临界性）患者在“新现实”中构建幻想或甚至构建妄想的尝试，以抚慰与他们的病体同样痛苦和不可摆脱的心灵冲突（McDougall，1997：249）。

39 生殖与性欲和性行为的分离

一个是直至今天仍总是很自然地被称为性的领域，另一个是逻辑意义上如今已非性的或在几个世纪前就已非逻辑地出现，并与我们性欲和性行为的历史诞生重叠在一起的情欲和色情领域，在这两个不同的性领域相互分离以后，仍然还很不稳定的社会的性形态，马上遭到某些人用手术刀进行的解剖，用手术刀在可能的伤口上寻找实验的规则，使伤口有了类似手术刀的截面，并以这种方式发现和假定了一个个“不可调和的差异”，直到苍白的性欲和性行为被认定为一片分崩离析的废墟，然后再从这堆废墟中诞生出似乎各自分离但有着无限美丽并能造就人的幸福的一件件艺术品：婴儿的性欲和性感受与成年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变态与正常的性欲性行为，卖淫与一夫一妻制，等等。

由社会运动所要求并借助日益完善和无限制的技术创新，推进了原始的肉体力比多与原有的生殖新生代的功能之间的相互分离，也就是性与生殖功能领域的分离。其结果是如此彻底，终于导致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认定，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相互关联。在这一旋流中，比如马斯特斯（Masters）和约翰逊（Johnson）提出了他们的性生理学理论（1966），用来取代以往在生理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生殖生理学，而我们作为批判主义性学家也在一旁激动地为他们摇旗呐喊（Sigusch，1970a und b）。将生殖分离出性的领域，就有那么一些如同象征着性的第二次历史性诞生，并且也意味着这是一种似乎真正“纯粹”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诞生。

那个现在被孤立起来的生殖领域自身，因为受到这一分离的巨大影响逐渐变得支离破碎。原先那些传统的，在以前被认为是无法逃避的自然强制，如生殖强制、传代和性别强制，都在逐步被加以克服和超越。对“生”和“死”的阐释也因此有了经常性的转码，做出新的定义，使之服从于它们经常性的形态转换。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总体进程，似乎恰恰表现了西方社会的特征。那些实质的越界属于这种变形迄今为止的结果，我会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说明（Sigusch，1997）。那个以前依赖于女性身体的附属物——胎儿，现在则被认为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命。在诞生了关注童年和青少年的历史时代之后，现在又诞生了一个尊重“胎儿”生命的历史时代。生殖以及胎儿的发育原则已经可以与女性的身体分离，即不在女性的身体内进行。克隆技术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无性（或单性）繁殖的可能性，一种自我繁殖，也许人们能够说：一种自创生；面对这样一种自创生，像卢曼（1997a）这样的理论家一定会激动不已。这类强调技术的“量子飞跃”意味着，生殖不仅能够是非性的，而且也不需性别的参与；性别将以一种新的方式从根本上被分离开来；女人和男人在生物性上已不再是不可变更地相互依赖，只是在生存上还一如既往地相互需要。

因此可以说，从生殖与性欲和性行为的解离直到对异性恋的克隆，都从根本上抽掉了性迄今为止一直拥有人的躯体政治的根基。自那以后，一方面是女性（或人类）解放运动的成功有了一种实质躯体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一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它所主张和实践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在参与立法政治党派主张中的必然沉淀；这两者的结合，不仅日益融化了对原有的性别、性欲和性行为的“认同性”，而且也如我们还将听到（或看到）的那样，它们也排除了原有的法律障碍。

40 性别与性欲性行为的解离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在实现了的生殖与性领域解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并在历史上早就应当完成的性与性别领域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女性（因此也包括男性）性欲和性行为的一种再次性化，成为男女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并与以男性的眼光和概念对女性所做的一种解构一起，甚至一直深入到了逻辑和数学之中。受政治和科学女权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传统的性关系在性科学和心理分析学中日益改写为纯粹的性别关系。这一转变的出发点是：现在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性本能冲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命运”，而是性别以及它们的“差异”。因此，今天的许多性欲和性行为可以没有性本能冲动，但不能没有（不同的）性别。像雨后春笋般从话语讨论的土壤中冒出来的“性别研究”，现在即使在莱茵河边的法兰克福和纽约这类大学城，也都把心理分析的本能冲动学说挤到了幕后。甚至曾经是性本能冲动代名词的变态（或反常），也被改名为性别认同障碍而得以去性化。美国心理分析家、性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5）就已运用了这一表述。

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在最近几十年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文化发展成就表现为：从现在起至少存在着两种性欲性行为和两种性别，并且它们都是自成一格并拥有相等的价值。即使是非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在女权主义的指责下，也在稍后认可了这一见解（或是说价值观），长期以来不仅仅是弗洛伊德特别关注男人性欲和性行为的性理论而且也包括其他性理论一直阻止的就是这一见解。在今天，男人的性欲和性行为自现代性形态诞生以来，第一次不再如话语的座右铭“阴蒂是一个退化了的阴茎”所说，因而同时也不再是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形态；并且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也不再如“被动接纳而不是主动创造”的格言所说，因而也不再只是男人性欲和性行为的负面。现在从一开始就能看到两种不同的性形态：男性的和女性的。之所以说从一开始起，是因为如今的男孩和女孩从第一天起就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获得来自有关性别差异的信息，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这也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所谓力比多无性别差异

的理论，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

比发展存在有自成一格的两种不同性欲性行为的构想更为复杂的，是发展关于两种不同性别以不同方式方法实现性欲和性行为的构想。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和物仍停留在性常识和近似令人憎恶的形态中，只有一些看似老顽固的人才会把性的事放在心上：一口神秘且形而上的锅，里面正在沸腾着尤其是由高贵的德国哲学所排出的排泄物。在形成转型和价值重估（我以“新性革命”的表述总括了这些）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程中，有些人认为就某种形式来说性是不可回避的，而另一些则把它看成是转瞬即逝的。对那些主导性和性别话语讨论的女性理论家来说，性和性别这两者最终会拥有完全的文化构成，丧失自己的自然属性，因而是可回避和可改变的。而且，尤其是在美国文化的背景下，通过有关性别战胜性的话语讨论而使得这两者的关系原教旨主义化，并也因为那些既不是白色人种又不是社会中产阶层也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异质性恋的妇女，坚持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实现自己的生活而使得这两者关系的理论构成复杂化。因为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一些大的范畴，如性别或女性特质，由于其中所蕴含的与种族或民族、与社会阶层或性取向相关的本质差异，而根本就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上的疑问。

有关性别和性话语讨论（比较比如：Butler 1993/1995，1997/1998）的前前（倒数第二种）状态是，性别也被文化的双属性和身体的异形体所击败，也就是说性别的男女二元律，也通过理论上的解构和政治上（特指女性）的自我授权而被解体。这里借用康德（1784a）著名的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说，这就是女性走出她们自作自受的不成熟的起点。不成熟就是没有能力，即没有能力不借助另一个人的帮助去实现自己女性的性；自作自受是因为这种不成熟不是由于缺乏差异，而是因为女性自己缺乏决心和勇气，不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去实现自己。要有勇气，相信你自己的理解力（Sapere aude）！

要有勇气，颠覆性地运用你自己特有的差异（与众不同）！这就是最后（元身体型的）女权主义的竞选口号。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新性变革自我的性（Selfsex）和自我性别（Selfgender）的意义上，形成一种自我制作和自我调节的自强。引起当代轰动的女权主义理想主义地以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主义，远远超越了经典的从躯体和政治出发要求尊重性别差异强调两性平等的女权主义，以及直接起源于差异理论把性别理解为一种超越主体的话语效应的女权主义理念的目标。颠覆性地要求自我授权的意志，似乎能够使社会形态与它客体目标的物质性和话语讨论的物质性失去效用。

女权主义的性别话语来自于性学的一种性别差异理论，这种差异理论有着临床的特征并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就已出现（Money，1955，1985；Green and Money，1960；Comfort，1963/1968；Stoller，1968；并也请比较Garrels，1998）。这场理论争辩主要区分了躯体性别（sex）与性别角色行为（genderrole）、躯体性别与自我性别认同（genderidentity）之间的差异，以及以往不加质疑便叠加在一起的一些不同性取向的层面。这场新性革命的文化成果是，一个曾经的男人（用当事者的行话来说一个生物性的男人），作为女人（用场景的行话来说一个新女性），在今天自变性法颁布以来能够完全按社会的规范合法地与一位曾经是女性的男人结婚。也就是说，试图通过政治干预，以逆向倒置的方法再一次撤销对性别的解离，因为这种解离触及文化的生存基础（也请比较23章）。

因此，肯定主义性学也就更加努力地借助自然科学和医学，不仅将性取向而且也将自我对性别的认同，与基因和基因产物，与脑的结构和荷尔蒙平衡连接在一起（比如请比较：LeVay，1991；Hameretal，1993；Zhou etal，1995）。这样一种尝试，如我们已经听到过的，由于它基于躯体形式最初思维完全的模棱两可性，是一种不会有结果的尝试。按效用将第二自然说成第一自然，无疑是伴随哲学认知而出现的混

乱，虽然可能因此会更理解人体学的努力——能够再次脚踏貌似实在并保障安全的土地。但这块土地已在这一刻从根基上动摇了（23章）。

心理分析理论的处境也是如此。因此，伊尔卡·昆多（2008：147f）针对阿尔希拉·玛丽娅姆·阿里扎姆（Alcira Mariam Alizade，2006）有关这里已经讨论过的生殖与性欲性行为以及性别与性欲性行为的分离时特别指出：心理分析主要将母性作为女性身份认同的核心构想，无疑是受制于文化的变迁，而女性与母性的分离也是一种文化变迁。她把那些“单身母亲或同性恋双亲以及借助医学手段的生殖”，称为母亲的新形态。这些新形态“是新的自我意识和无意识、虚幻和象征场景”的一种源泉。按这一因果逻辑继续思考推理，那么“母性不再仅仅局限在女性了，而是至少当孩子出生以后，也向男性敞开了大门”。

41 变性者和他们的愿望

鉴于当前围绕改变性别的医学和法律政治状况，尤其是围绕变性法（TSG）的讨论，在展开这一条断想之前，我想说：其实在20多年前，我就主张应当对于变性人“生理上的去（自然）性别化”，做一种自我批判的反思，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我也对我们同行总免不了在变性人中“看到那么一些病态”的现象，进行了个别的批评（45章）。我在当时那种状况下冒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立法者能够给予所有的（成年）人以一种自由：完全由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名（德国的人名有男女之分——译者注）和完全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性别属性，不需要经过批准，不需要走法院程序，也不需要经过医学手术的改性”（Sigusch，1991：337；也请比较：Sigusch，1992/1995：135f）。这在当时造成了许多亲爱的医生同事对我的恼怒，而正是这些同事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又以解放变性者的先驱自居。

在20世纪末，疗程治疗的方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第二次性革命

之后形成了一个疗程治疗的社会团队。如同我们已经听说过的那样，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操作和操纵，显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有着一种重要的心理和文化意义的成型模式，这至少暂时性地驱赶了生活中的部分窘迫（34章）。但是整个世界都只懂得谈论变性人的手术幻觉效果。显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自然性者（42章），作为“完全正常的人”，出于某种需要而在进行性的手术；虽然他们的手术在第一层面上不是因为有生命危险而是为了维持生命，不是为了切割掉原有的生殖器而是为了修复，这些人的这些手术不管是否可以在心理理论上算作是一种极大的防御形态的结果，其实是无所谓的。

今天，变性手术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它们进入了操作的世界，作为治疗方法被正统医学和保险业所认可，并且在几十年前就被罩上了最新的文明尊严，即颁布了变性法，一部特别法（Lex specialis）。手术干预很可能留下终生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对医学以手术为主导精神和单纯从躯体角度思考的变性操作的批判，就不能再仅仅只是针对接受手术的“病人”。医学几乎没有为一些有着近乎痴迷的生育愿望的妇女去做些什么，即使当生殖医学和威胁整个人类的转基因工程被作为现代的“科学成就”而遭遇批判的时候，也没有为这些妇女去做些什么，但一些专家却仍然在从事变性手术，似乎只有变性者才能承受这些普遍化了的神秘。他们所忽视的是，变性者在心理上也许比其他那些出于社会治疗策略而成为手术对象的人更脆弱些。

因此更有意义或许也更人性化的是，跳出自己职业利益考虑的阴影，相对化（不要太看重）自己学科自闭的思维。谁要是想做到这些，必须放弃幻想。但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此这样，那么那个外科医生就不能再屈服于魔法般的物化（利益）思考，不能像那个变性者那样把手术幻想成绝对的好，而那个心理治疗师也不能再把手术想象成绝对的坏。只有这样，愿望和防御才能够共同进入一种生产型

的关系，虽然这还并不因此就能排除一切问题。因为我们也有权拒绝对要求手术者的身体进行手术干预，如果我们感觉到这种干预要求可以追溯到一种无意识，也就是有着无法看透的动机，比如一个性“反常”的男人因为有自我惩罚倾向的强烈愿望而提出要求实施宫刑去势，而作为病人的他又无法对自己愿望中这种自我惩罚的倾向进行自我反思。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按病人的要求去做，那我们难免就有嫌疑，在赞许一种双重的不自由。这种双重不自由，既牺牲了这个男人的个人性，也牺牲了想要清除他的反常态的文化普遍性。纠结在抑制和虚伪之间的我们，只能试图挣脱操作话语的“共谋”。

鉴于这些要素在变性的操作中有着一种并非不重要的效用，如果我们被当事者要求从事这类操作，并且这里涉及的是当事者身体的一些不可逆的手术操作，我们就必须在专业决定与当事者的自我决定的界限内，经常重新就每个特定的情况与当事者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这里适用我几十年来经常被变性者所引用的句子：“变性意愿的疯狂在于，变性者并不疯狂。他们心灵的构成，并不是大自然的‘错误’，而是人类创造的一件‘艺术品’。他们的心理变态，似乎至多也只是表现出有那么一些易逝和怏怏不乐的眼光。”（Sigusch，1992：117；也请见45章）如果要求改变性别的愿望中带有内心冲突和身体疾病的因素，按我的经验这便会超出和高于通常的心理“不自由”度，那么我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在当事者咨询时，无论如何会向当事者讲清我不赞成这样的手术操作的原因，因为出于我的权利和基于我的义务，我必须阻止这类对当事者身体进行不可逆的手术干预。但是如果在咨询或心理治疗中达到了这么一个点，即当事者能够预见自己的愿望及其结果，也就是说他的愿望和决定并不是在一种比我们大家更不自由的情况下做出的，那只有听凭他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了。在达到了这个点之后，作为治疗师便应当考虑到自己判断的主观性，并在自身相对化（避免）一种进一步的或许也是会带来最严重后果的绝对化，即一种自认为清楚知道谁有足够的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和谁没有，清楚地知道谁有病和谁没病的绝对化。

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把变性的愿望理解为是一种反式愿望，把所谓变性者的个人痛苦理解为是超主体否定的一种沉淀，并以此来摆脱任何治疗。但在实践中，也可以把变性愿望理解为是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能力，比如它应当在心理自我调节的一种极端危险的空缺中进行自我补偿，而在其他人那里通常都需要依靠治疗的帮助才会出现这种补偿。将变性者关进精神病院、用胰岛素进行恐吓、用电流加以折磨、强制接受心理治疗，甚至被切割大脑的时代，终于令人高兴地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今天的变性者则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去影响所谓的专家们的决定。而这些专家现在也感受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妄想系统和认同系统的界限在更仔细的观察下，其实很模糊不清，如同非理性和理想的愿望满足的界限，因而也就似乎更有必要对这两者间的界限不断进行新的确认。

只是这又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偏偏是那些进行手术改性，以便与与生俱来的性别的不可改变性有一种极端对立的变性者，以及正是他们的这些行为进一步稳固了在我们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性别客体性。事实上，迄今为止有关变性愿望的医学和法律构思都很精确地追随了他们（手术变性者）的这一策略。医学和法律都参与了公众领域中的性别更改，但又共同使它消失。一个原来有着男性躯体的男人，通过手术改变性别如今成为一个女性的变性者，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一个原有女性躯体的女人，按法律通过手术进行了性别变更，那么自此以后自然就是一个男人。在解除了双属性痛苦这一短暂胜利的凯旋之后，必然出现的是文化两性假肢化的持续性失败。因为直到20世纪末，假肢化和可塑性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各自不同的标志——麦当娜（Madonna）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可能就是他们中最早登上世界舞台的主角；假肢化和可塑性的失败，不仅只是使得变性者，而且也使得自然性别者成为胜利的凯旋者。

42 自然性别者和他们的自卫

这里说说自然性别。如果存在变性者，那么在逻辑上也必然存在自然性别者。没有自然性别，也就无所谓变更性别。我之所以允许自己引入自然性别主义（Zissexualismus）、自然性别者（Zissexuelle）和自然性别（Cisgender）等表述（Sigusch，1991，1992，1995），是为了将那些认为躯体性别与性别认同似乎自然合二为一并赞同这一吻合的多数人（派），置放在一种混沌的灯光下加以观察，因为总有被称为性别焦虑症的那个少数群体，这里特指的所谓的变性人，相信他们只有在这样的光线下才有可能辨认出是他们（自然性别主义者），也是性别（非此即彼）二元律的客体目标。拉丁语的cis-作为前缀，意味着：这一边（diesseits）。因此Cisalpin就意味着（从意大利罗马的角度来看的）这一边的阿尔卑斯山。拉丁语的trans作为前缀，意味着：完全通过（hindurch），横越（quer durch），越过去（hinüber），另一边（jenseits）和越过与出去（über-hinaus）。越过皮肤（Transkutan）也就意味着穿过皮肤。因此，从躯体性别以及文化的两重性别的角度来看，自然性别者仍停留在他们原先所处的这一边，而变性者则是站在另一边。变性主义的新逻辑是将实际上一直是自己逻辑对立面的自然性别主义，推进到一种朦胧或是说模糊不清的光芒中，因为它以自身证明了：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和物，也都只是一种文化的综合和社会心理的媒介，因而即使在“正常人”，即迄今为止被认为是唯一健康的人那里，躯体的性别与社会和心理的性别认同也不再毫无疑问地重合在一起。但这却动摇了（现有）文化的根基。

应当对那些在临床情景中被看做为几乎患有易性病症的变性当事人有一种怎样的基本情感反应，总是一再激起原则性的争辩并上升为一切问题中的终结问题，即：我们是应当向当事人提出适合手术的建议呢，还是应当从原则出发拒绝手术？按我今天的理解，作为专业医生的这种基本情感反应，不应只是仅仅聚焦在转换和反转换的现象和事件上，而且也同样应当参照以认知和客体为基础的发展过程，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性别者的自我防卫（Sigusch，1995）；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出一

种情感反应之前，不仅要顾及当事人的愿望，而且要关注基础和一般的理念、结构、策略在知识、科学、认知中的沉淀，以及同样重要的是在人体、情感、感知、理解和阐释中的沉淀等。这种转变也经常出现在法兰克福性学研究院的内部。总是有一些新的同事，以前曾很乐意在一个以心理分析为导向的门诊工作，但在进入性学研究院新的工作岗位时，却一下子担忧起来，害怕自己陷入一种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式医学的阴谋中（《科学怪人》，又译作《弗兰肯斯坦》，是西方文学中的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有部分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可视为恐怖小说或科幻小说的始祖——译者引自维基百科）。那些新来的同事当然既不需应用某种治疗方案也根本不需治疗患有性别焦虑症的病人。感谢新性革命，我们今天应当已经理解，想改变原有性别的易性愿望通过反变性的反应和坚持原有性别的自然性别者的自卫，以及由于决不妥协的性别非此即彼的二元律，被推到一个只能以简单干脆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变性这个问题的境地。只是任何一种治疗都不能“控制”、把握或是从根本上理解一个患有性别焦虑症的患者的整个一生。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一个性治疗师不管病人是否有性反叛的动机，都已经应该“退位”了。

这里应当回忆一下弗洛伊德1915年在他《有关性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44 ff）中加上的一个脚注。在这一条脚注中，弗洛伊德越过了既定的性别界限和病态的界限，打破了其客观性的外壳。他发现，“即使是男人对女人的特有兴趣，也是一个需要加以启蒙的问题，而不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但是如果将异性恋作为基于自然法则的化学吸引，那么这类启蒙便无法成功地达到目的。弗洛伊德在这条令人震惊的脚注中，“以一切果断抵抗自己的那种将同性恋作为一个特殊人群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去的尝试”。他之所以抵抗自己，因为他知道，“所有人都有可能选择同性作为自己的性对象，并也因此已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实施了这种选择”。弗洛伊德在当时没有能够将自己从性的领域抽象升华出的杰出的人性思想扩展到性别的领域，是的，他作为一个性启蒙思想家，在涉及男性和女性的问题上却背弃了自己，让我们在今天仍感到痛心，

因为直到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1993）所提出的女权主义的自我意识，才终于显著地触及了传统的性别文化（也请见19、29章）。弗洛伊德如同几乎所有伟大的男性启蒙者，没能识破通常的两性化以及与此相连的“女性”作为应当服从于男性的第二性这些特征，都只是被炮制出来的自然。克里斯塔·罗德-德莎（Christa Rohde-Dachser，1991）甚至展示了，看上去似乎是性别中立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内核，是怎样充斥着文化的男权主义。如果必须赞同这样的分析，确实不是一种享受。因此也就更有必要，赶快摆脱还余存的性别与生俱来的理念，破译尚存的关于性别具有直接自然性的窃窃私语。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用写下脚注的弗洛伊德思考去反对在学说内核贯穿着男权主义的弗洛伊德，我们就不能单纯地把变性主义看成是一个谜，一个难题，正如一位当事者向简·莫里斯（Jane Morris）所叙述的那样，其实自然性别主义也同样如此。通过研究不同于公然昭著的性别感受和体验，我们也就懂得，每个人都会有另一种不同于自己已有性别的想象，并且也可以拥有自己想象的性别。鉴于如果没有其他的性别，也就不存在自己的性别，因而对其他性别的想象给人心灵生活带来的意义肯定不会亚于那些只停留在自己性别上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模式或形态，只是对自己或另一性别的限制，所以男人对男性性别的认同以及女人对女性性别的认同，仍是一个还需加以阐释的问题，而不是自然人体（HY染色体）导致的一种直接或必然的结果。从人类起源的深层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是“变性者”；弗洛伊德可能会说：双性恋者。变性者的愿望与自然性别者的自卫，无论如何是相互紧靠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借助由文化的两性规范所建构的情感和社会机制，来摆脱这一令人激动并在今天也令人震惊的变性愿望与自然性别自卫的统一。

对我们来说，一个躯体所带给我们的性别认同——即一种被文化炮制出来的认同，似乎还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同。只有当众多的人在文

化上都对现有的性别认同产生不适感的时候，当文化形态的性别焦虑症不断递增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有必要，将躯体性别与所谓性别认同之间的联结在我们的思想中，或许甚至也从原则上更松动些。坚持婴儿性欲主义理论的观点是反对这一主张的，婴儿性欲主义者认为，人们在早期的儿童时代就已经决定了躯体性别与性别认同的联结（和脱离）。但事实上在青春期之后还是会出现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变化，并且人们也会很快改变做出决定或选择对象的策略，这种变化无论如何要比在普遍和自然常态中思考所能达到的想象快得多。这里不是为了反对婴儿早期性别认同的决定，但这些决定必然还需现实化和表述。因此，一个人可能在11岁时有着一个暂时性的“变性者”的表现，或是在50岁时才有了“同性恋”的愿望。

在新性革命的进程中，本能冲动与客观对象、本能冲动与目标（为了用弗洛伊德的均等思想来表达）的联结，变得有所松动。索尼娅·迪林（Sonja Düring，1994）在多年前就已报道，显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一种性模式至少部分地切换到另一种模式。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客观对象选择，都取决于这些女性在社会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迪林认为，许多人之所以选择一种不固定对象的性模式，其根源不仅只是在于童年情结因而具有个人性，并且也由于社会的影响而具有集体性，而正是这种集体性特别赞赏文化的性别地位改变，从而对妇女运动的兴起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前，传统的性别和性形态不作任何质疑便被简单加以改码，没有如一些女权主义者所期望或梦想的那样，能够有一个体验情欲和色情的连续性作为过渡。对我们来说，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自然性别者的自卫，在第一层面上并不与心理学有关，而是与认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学有关。借助心理学也许能够更深层地理解男权主义、性别关系和性别认同，但对理解社会却无济于事。

当然，一系列契机和要素在性别的构成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可能涉及一些个人的心理和身体的因素，如同弗洛伊德（同上：

45）在另一个场景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些因素是如此之大，因而对事情发展的结果产生了能够打下自己印记的影响。”因此在文学中也有众多各具差异的对变性人的心理描述，而且都是相当令人信服的阐释尝试。但是任何一种心理学理论，都不能将人们关于性的幻想和表现的多样性概括成概念，不仅不能用概念表述男性和女性各自不同的特征，而且也根本不能表述变性人的愿望。鉴于没有人能够绕过性别普遍的客观遗传性而生活，因此尽管令人梦想，但一种自由的性别选择，仍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以往的社会性别形态，曾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这里需要理解的是：所谓性别认同和所谓性别焦虑症的个人的多样性是无限的；而社会中普遍的性别形态仍将继续是二元律的——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所有其他的，虽然可以说是普遍的文化密码或是个人的偏见，但都只是病态或杂耍艺人的玩意。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要避免将个人对性和性别的虚幻想象和生活方式模板化，也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有关易性意愿的诊断扔进大海里；另一方面要尊重只认可非男即女这一传统的性别二元律，这是传统的二元律现在必须得到的尊重，因为它已占领了我们心灵的最后一点空隙。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再以其他的方式认真对待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那些最热心的（一身兼有两性的）双性主义倡导者、持有易性意愿的变性者等人的个人痛苦。否则，我们既不能找到我们的立足点，也不能理解性别改变者和自然性别者，即所谓的变性者和所谓的自然性者，为什么会像柏油和硫黄那样如此亲密无间。

43 “新性别”和当事者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当他们在一份记者对我的采访报道中第一次读到，改变了的性别是一种“新性别”后，那些变性者2008年在互联网论坛说了些什么：

我认为，“新性别”这个概念自身没错。如果塔尼娅（Tanja）写道：她并不感觉自己是“新性别的生物”，那么也并不矛盾。我和她的感受在这里都不成问题。从一个医生和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在严格按（原生的）生物性别以及分类，与通过手术而完成或达到的性变换、兼有两性的性别或与生俱来的某种特殊性形态之间，存在一种差异，也是容许的。比如我还从没注意到，在论坛或私人间的谈话中有谁对“新性别”这个概念有所反感。在原先没有阴道的地方，现在通过手术构建了它，虽然在功能和视觉方面有着最大可能的相似，但永远不会与原生性形态完全相同。为了纯粹从科学的角度将人造的它与一种自然成长的加以区分，那位医生便把它称为“新的”。我的整个人不也是如此吗？虽然与自己感受的性别非常近似，但不可能或也别指望与原生态完全一致。这就形成了一种新性别，它在生物意义上既不是完全的男性，也不是完全的女性。我想再次强调：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我们感受的性别，不是我们的个人性，不是像这个社会其他人对变性的看法，这里涉及的是对一个人基于医学和科学状况的一种描述。……当然我也不知道，西古希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这里所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解释。也许西古希最近出版的那本书，要比一篇经过记者压缩和编辑修改的报道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因为这类报道肯定只能部分地再现一次较长谈话的内容。问候索尼娅。（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accessed：15.11.2008）

Hallo，我相信，我们都进入了同一个群，在这个群里，只要不费分文也不伤害别人，就允许什么都说。如果一个男人认为，自己必须穿着女装到处行走，那就请吧，为什么不呢？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爱上了一幢房子或是不想再有性生活，那就请吧，为什么不呢？我们的社会并不会因此更宽容些，只

是面对不寻常的事和人更麻木了。因此我认为，改变性别同样表现了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因而也就属于相同的类型。西古希教授把这称为“新型性欲和性行为”，我则把它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在这里是个女人那边是个男人的意义上，这是不正常的也不会正常。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或是像我作为一个当事者，应当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些事情。可惜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代，不得不精确地计算，哪里还能剩下一些钱。我预计，中期的财政预算不会允许医疗保险公司在今天这个框架内支付我们变性手术的费用。当然有那么一小部分也是我们当事者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尽可能多的由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一会儿是外膜，一会儿是隆胸，也许还有一期语言治疗。这是一种疯狂状态。也可能，我们中的许多人真的没有钱支付自己的手术费用，但这也是事实，许多人外出度假，拥有一辆汽车，拥有一套公寓房产或甚至是一幢房子。那么面对医疗保险公司囊中羞涩的状况，社会大众怎么能理解我们呢？结果自然是保险公司不愿再支付变性费用，甚至西古希教授的这么一个研究院也不例外，因为它的经济效益几乎接近零。我并不愿意真的出现我在这里描述和担忧的发展状况，并且我也不愿意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就是这么出现了。诸多问候！玛丽昂。
（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accessed：15.11.2008）

大家好！你们写的这些东西，看得我晕头转向。但我理解你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只是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新性别”者。我感觉并也把自己理解为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新的物”。当然这是正确的，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生物性的女人，但并不能就此把我归入“新性别”的类型，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也许还会为我们想出一种新的称呼或是为我们贴上一条新的标签，以

便立即认出我是“新的……”？？？新的性别=第三种性别=边缘人。这种称号只会让我感到愤怒。对于我现在的状况，也许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适用的：既不是一个男人，（在手术前）也还不是一个女人。……希望不要给予医疗保险公司把柄，使它们有理由不付我们的手术费用……我不需要一个另外的抽屉，以便让我知道，我是谁和我是什么。爱的问候！拉莫娜。（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page=2；accessed：16.11.2008）

只要变性者愿意把自己看成是新的性别，那么他们也就慢慢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问候大家！丹娅娜。（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page=2；accessed：16.11.2008）

44 性别差异、混合性别和流动态性别

实际上，变性人早就接受了原有的、由社会辛苦设置的性别秩序和意味着男女两大性别的分离，作为性别二元律的热心拥护者，他们完美地扮演着他们各自期望的另一种性别的角色，并似乎天衣无缝地体验着他们装扮的那一性别的生活。实际上，变性人早就被盲目和暴怒的正统医学——也包括我们医生（请比较45章）——塑造成了性别二元律的热心拥护者，虽然这类正统医学正受到在医学和心理治疗之外组织起来并企图摆脱旧秩序的一些人群和团体的围攻。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性别，或只是想不做任何决定地停留在两性之间；另有一些被称为混合性别（两性兼有）的人，只是在参照社会性别角色表演的节目单之后（这里的社会性别角色表演的节目单，是作者略带讽刺地指“社会已有的对性别角色的认同”——译者注）才选出自己喜欢（或反感）的性别；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确信，自己可以体验两种不同性别的感受。因此，如今不仅有男性装扮的皇后（Drag Queens），也有女性

装扮的皇帝（Drag Kings）。也有一些早先无疑属于变性者范畴的性别更改者，现在不再希望被施行一种不可逆的手术干预，或甚至干脆为此放弃改性。还有一些混合性者或是两种性别兼有者（47章），也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意愿。

比如互联网（鉴于迄今为止只存在两种性别的状态），如今也在“跨越性别的认同”（genderqueer identities）的网页（http：//genderqueerid.com/gq-terms；accessed：29.11.2012）上，出现了对各种性别以及否定性别及其态度的区分，比如：雌雄同体（androgyne）、无性别（agender）、非二元化（中性或无）性别（neutrois）、流动态性别（gender fluid）、双性别（bigender）、三性别（trigender）、跨（或居间）性别（intergender）、疑问（或不具有确定性的）性别（questioning）、假象的（该挨骂的）性别（genderfuck）、只是半个姑娘的性别（demigirl）、女同性恋（girlfags）和男同性恋（guydykes），等等。在相应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人带有多性别（Unigender）的倾向，常常在第一眼望去，甚至在多看几眼之后，仍无法辨别这个人究竟是个女人还是个男人。在心理医生的诊所，则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人自一些年以来一段时间过着男人的生活，在另一段时间又过着女人的生活，或是期望这样一种类型的生活。性别的这种交融，启发我应用了流动态性别或流动态性别认同的术语（也请见99章）。

在各大媒体中，人们至今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的大都会性感美男（Metrosexuellen）的生活方式。英国记者马克·辛普森（Mark Simpson）1994年想以这个自己创造的术语来激起人们关注以大都会城市的男人，如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罗比·威廉斯（Robbie Williams）、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等人为代表的一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再有性别安全感的性别。终于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有同性恋（和个别异性恋）的男人，而且现在也有那些著名的大都会城市美男在关注

自己的容貌和外表，留意自己的体味、发型、胡子的长短、穿着、体重，也就是很在意表现自己有着怎样的美貌，欣赏怎样的时尚和怎样健身。其实他们也不过是经常洗洗身子，比以前更常换些内裤，为了爱情（和家庭）关系的和平而坐着撒尿而已，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大众粉丝会对这些美男感兴趣呢？我们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一切，其实关及一个较为深层的核心问题，关及至今仍然极其强大的俗套，这种俗套规定了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和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由于贝克汉姆这类现代男人不仅只是爱女人和玩足球，而且也涂指甲油，常常穿上他们女友的裙子或内裤，这些新型男人“尽情享受他们女性的那一面”，使得“男性”与“女性”之间生活习性的交叉，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并因此导向了一种可能解除男女紧张关系的统一。这是他们的文化壮举，不管他们的行动是否由化妆品、时装和首饰配件行业煽风点火而成。他们将两种性别融合起来，他们将往日具有唯一性的男性特征与往日具有唯一性的女性特征混合起来，这是在男女这两种性别的斗争中为和平而努力。毕竟是他们使得我们现在都能够想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样才能既不低估也不高估身体性别的差异。

如果甚至变性者在狭隘的意义上今天也不再那么呆板和无奈，并且即使是在原本呆板和无奈的临床治疗的环境中也不迫使自己呆板和无奈，那么我们也许就能够允许自己作这一假设：许多变性者的性认同、性意愿和性关系，也就不会像在几十年前由性研究者所描写的那样，那么不充分、不明确和脆弱。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这就意味着，双性恋在文化和社会化技术上不必再做出二选一的决定，在表象和现实中也不再有一种明确的性别二元化模板。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或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如同之前已经说过的，性别模式由于相互影响而具有流动性（液化），并且也在不断被改写。正因如此，如果希尔绍（Hirschauer，1993：351）说，“易性者投射出一种保护性的阴影，西方文化中的大部分人都

是自己使自己成为性别迁移者的”，那么他其实只观察了这个问题中的一个要素。另一个要素是这个问题中的那种耀眼的光，正是这种让人睁不开眼的炫光雾化或掩盖了漫游在两种性别之间的双性恋；以比其他那些在个人化、自私化和多元化过程中更刺耳和更极端的叫喊和行为，修正了我们文化中当前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务，尤其是性欲性行为和性别。从符号解析的角度来看，我们要面对的是与性别漫游者相关的两个现代主要且相互并立的趋向——人自身的自我毁灭与自我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对已有的两大性别特征的综合、混合、混淆，并随意摆弄它们，简而言之就是实践“性别混合”（Devor，1989），是展现一种由医学参与建构并也由医学帮助解构的性别秩序，因为正是医学撤销（或抹去）了变性所特有的那个临界点。如果医学说，咱们现在按你们的性别愿望进行切割、增扩和调换，那么性别更改者也就不需发声呐喊，只需沉默地按医嘱所行就是了。希尔绍（同上）分析了这一方面的状况，对他来说，变性者的社会建构在一个解放和解除了性别分类的时代，无疑为这一时代的人提供了区别于他人的机会，也就是在“即使出现了一切可能改变性别的情况下，仍能坚持认为传统的性别分类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他没有考虑到的是，“混合性别”和“变性”物化和符号化了他所说的性别区别的风险。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今天，如果结婚时的一个经由手术变性的男人和一个同样经历了变性的女人，在结婚前曾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如果一个变性成为男人的女人，作为男人有了一个孩子；如果有着男性身体的性别漫游者不应用荷尔蒙治疗和不进行手术干预，过着一种女人的生活，或是反过来，有着女人身体的性别漫游者不用荷尔蒙和手术，却在过着一种男人的生活；以前有着男性身体的人，通过手术成为女性，却在体验男性同性恋的生活，也就是以阴道取代了其他同性恋所崇拜的阴茎——那么传统的性别区分就有了一种触及其最原始存在的风险。从心理分析角度所谈论的自然性别者的变性愿望，就会像“幽灵”那样出现，并如同我们文化中所有的潜在性那样，都将跳出无意识沉淀的“阴影”（Freud，1892/93：15），全部并狡猾地进入有意识

的聚光灯下。

社会对性别的强制，仍然严厉于它对性取向的强制。事实上，人们总能以某些方法比跳出性别模式更容易地不受社会性形态制约地生活。鉴于绝大多数自然性别者还没能看穿性别强制的事实因而必须完美地装扮自己的性别角色，执着于反性别歧视的变性者，他们的性别幻想和追求“正常生活的癖好”，实际上是对自然性别者忍受普遍性的性别分类压力和集体性的性别幻想的一种个人性反应。普遍的压力越是强烈，个人便越是执着于自己的固执。自然者的自卫，越是坚定不移，越是认识论化和话语分析化，那么变性者的变性愿望也就更加执着和坚定。如同我们在相关报道中看到的那样，这甚至已经成为那些不想再做出“不是心理治疗就是手术干预”这类简单规定的临床实践教学内容。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愿望和自卫不只是一致的，并且也同时远离了它们的“起源”，因为第二自然在真实中，如阿多诺将会说的那样，是第一自然。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理”。相对于林德曼（Lindemann），希尔绍较少关注我们文化的性别差异规则，而正是按这种规则，愿望与自卫统一的理论，便有着太多的差异性。临床实践已经在教授，从男人变性为女人和从女人变性为男人的变性者之间，究竟有着多少差异性（Becker，2004）。通过区分躯体形态显著和不显著的特征，林德曼（1993：11）在理论上确定了愿望与自卫的差异。躯体形态的显著部分，如男性的阴茎、女性的乳房和阴道，在愿望与自卫统一理论中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反映；“但对我们来说，身体的这些显著特征却是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和男人之所以是男人的重要的有效组成部分”。尤其是阴茎，“非常成功地抵制了有关它的自反性的现代化”，而且几乎没人因此感到吃惊。

即使如果有那么一天，阴茎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走到了它们的历史

终点，也不可能完美地制造出（在林德曼那里具有不确定性的）性别生成性的自反模式。这里不应忽视的是一种能够射精和一种能够受精和怀孕的躯体生殖能力的生成性。至于怎样从认识论的角度构建身体的这些能力，怎样用躯体去经验、用心理去体验、在社会中生活和政治化地应用这些能力，并且以怎样的礼仪习俗、日常生活实际、超验性或反思性分别分配在哪个性别上，则有着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性，因而是可变更的。最后应当承认，某些其他文化并不像我们的文化那样只认可两种性别；可惜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了自然性别者的自卫，而没有再去讨论这些文化。但是这些社会建构的方式方法，绝不会像我们一些理论家所假设的那样，完全取消身体生殖的生成性能力。在我们的结构和它的假肢化中，有一种潜流正在暗中守候，既粗鲁又自负，正在等待又能够安装新的客体目标、新的躯体和新的愿望，以及与此相连的新的性别，并且一定会及早告诉我们这种新性别的名称。

45 略带病态的眼光

虽然医学在更改性别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参与重新建构的部分，那个有着荷尔蒙和手术干预性别特征的变性人才是更改性别的真正执行者；但鉴于医学同时也是一种黏合剂，黏合了历史与个人的观点，这就使得改变性别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行动，因而也就有义务，不断地重新检验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是作为医生或治疗师，而且作为法院认可的鉴定专家，我在几十年前就认识了一些人，他们没有专家的质询也没有心理治疗而坚持走完了变性的道路。他们显然完全具有工作能力和爱的能力。当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我是有些迷惑的，因为熟悉社会治疗体制的我，最初完全不能想象改变性别竟然能够不需要我们的操作或干预。后来我想，我可能也会像我遇见的这些当事人那样做出同样的决定。我也会像他们那样不能接受，由那些所谓的专家决定我应当怎样生活。对于决定一个人生存性和不可逆的手术干预，比如一种改变性别的手术，最终只能由当事者自己做出决定，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也包括这

一行的专家）。

但是作为专家，面对有变性诉求的当事者，我必须坚持按我的专业和非专业的构想，即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对世界和人的热爱以及医术和临床经验，也包括我为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等基础上的构想，以便避免在我提供的服务中，由于我对变性当事人的非理性诉求没有足够反思和充分理解便做出错误诊断而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我也尝试避免把这个当事人看得比那个当事人更重要些，比如我并不把这个由于我施行的心理治疗而放弃原有改变性别愿望的当事人看得比那个仍然坚持手术干预的当事人更重要些，也不把这个拒绝赞同对当事人施行手术干预的治疗师看得比那个赞同手术干预的治疗师更重要些。

几十年来，变性愿望几乎被所有可应用的疾病分类实体，多多少少归为与精神病、神经官能症、临界结构、拜物狂、受虐狂、负变态、同性恋、同性恋恐慌反应症即所谓的肯普夫（“Kempf”）式疾病、两性同体症和H-Y-抗原不整合症等疾病相关的病态愿望（具体请参照比较：Sigusch et al.，1979；Sigusch，1991）。这里展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研究者的持续困惑，依赖于话语和各个专家完全个人化专业眼光短暂判断的诊断，以及所谓变性症状的多样性。但就是这样，仍不能观察到变性症状全部表现形式和体验形式的广度和宽度，因为摩根泰勒（1980）在新性革命初期投向同性恋的那种去病态的目光，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仍是不可想象的。变性的愿望使人感到如此的迷惑，因而从心理、认识论以及话语的角度来看，为了驱赶恐怖和偏差，几乎本能地会激起一种社会整体的自卫。

颇有争执的是，变性愿望究竟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还是伴随着各种基本疾病的整体疾病机制而出现的一种病态症状。毫无疑问，改变性别的愿望会出现在各种基础疾病和有基本结构问题的病人中，从偏执狂、心理忧郁到厌食症，以及从童年、青春期到成年的人生各个阶段，同时

也取决于文化的处境。但是这些因素一旦聚集在一起，不管现在只是一个开端，还是各种形式发展的最终共同途径，它便成为自身的终端和一种“实体”，它就不能再作为一种临时症状，而临时症状则相对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比较表层的心理结构，因而也还是能够消除的。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一旦变性的愿望固定下来，那个愿意以此度过一生的变性者，应当得到他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因为他能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如果他忍受着一种身体的疾病，却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存在着一种从事变性操作的医学行业，而我们自己偏偏又属于这个行业，但我们在另一方面却并不因此继续为有变性愿望的当事人提供咨询和治疗，因为我们不想完全不称职地去满足当事人的这一愿望，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当事人的矛盾和冲突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操作不干预而得以避免。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肯定不是变性人的整个家族驱使他去变性，而是其核心受制于认知、躯体、话语或权力分析理论的普遍化性别客体，我把它称为文化的两性制。

在这种状态下，也许只能期望，我面对当事者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如他们也会对自己所施行的措施；并且越是在自由的状况下做出采取这些措施的决定，那么这些措施也就会更恰如其分、更适当些。这种自由就是任何一种分析型心理治疗的目标，心理治疗虽然不能帮助当事人摆脱文化的制约，却能帮助解除个人的不自由。但是长久以来，变性医学的受施者在总体上被看成是特别“不自由”的病人，因而处于医学边缘地位帮助变性人改变性别的辅助医学也同样是不自由的。因此我赞成，凡是重经济效益的医学和外科手术都应当尽可能地远离变性医学这个行业。并且如果我们进一步从第一层次或甚至完全从病源学发病机理的角度对变性愿望加以观察，那么实际上我们一代代专家都在当时设置的心理和躯体理论课程中接触过它，并已在无谓地试图以性偏执的角度去解开这种克拉夫特-埃宾在100年前就已提及的所谓变性之谜（1894：224）。

为了避免出现误解，我想在此申明一下，我当然并不反对对变性愿望根源的研究。我只是想在这里提出一下，我反对科学研究的那种疯狂，它迫使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要服从它划分的标准；我反对心理医学的恶习，它将一切冒犯传（或正）统的人，都心理病态化；我反对人体医学，它将极端复杂的生命现象都归结为一种可捕捉的致病原因。简而言之，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我反对以一种略带病态的眼光去看待变性的当事人，因为这种眼光只能看到多于实际存在的疾病或病态。如果我们想认真地对变性的现象去病态化，那么我们就应当减弱对当事人进行性别规范治疗的意志，这种起源于性别基本法则的“男人或女人”和性取向法则的“男人和女人”的性别规范，很难容忍性别和性取向的变更；我们应当放弃我们终于有一天能够找出变性（Eicher，1984：3）“疾病”的“致病原因”这一幻想，也就会放弃对一种“有结果的治疗”，或甚至（如我在一份博士论文中曾经读到的）一种“理想的和最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的幻想，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盲目地赞同或盲目地反对性别变更手术，其实就是同一种分裂理性的两个侧面。

我把自己的这些思考收入在一篇分为两部分的文章中，也收入在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又对我以前的一些加以修改后编辑成的一本书中（Sigusch，1991，1992；也请比较1994，1995）。在20世纪70年代，我曾与贝恩德·迈恩堡（Bernd Meyenburg）和赖穆特·赖歇共同合作发表了关于变性愿望篇幅较大的一篇论文，鉴于当时由于性别焦虑症医学治疗需要的极度递增而出现的一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文章以临床调查的方式对有变性愿望当事者的心理以及躯体治疗进行了详细讨论（Sigusch et al.，1978，1979a；也请比较：Meyenburg und Sigusch，1977；Sigusch und Reiche，1980a；关于当代性学研究的不同观点，请比较比如：Clement und Senf，1996；Bosinski et al.，1997b，1997c；Hartmann und H.Becker，2002；S.Becker，2004；Meyenburg，2007a，2007b，2013；Sigusch，2007a；Nieder，2010；Nieder und Richter-Appelt，2013）。现在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对任何一

个其他病人群体做过像对当时的性别焦虑症那样，如此常规化、如此正统医学化的调查研究。当时使我感到害怕的主要是在变性手术之后，当事者又有了恢复原有性别的欲望和自杀现象。正是尤其出于这个理由，我们那时的检查和治疗方案经过了极其细致和复杂的商讨。我们收集了所有的医学统计资料，希望从中找出可以排除极不可能出现的禁忌征象（不宜使用某种疗法的状态），并特别看重另一种权威的不同诊断，这种不同诊断建议的治疗没有时间限制并且只有在一种疗程的关系中才有治疗的可能。我们虽然按心理病态的方式设置了变性症状的主要征象，并借助这种征象按当事人的表现强迫症来叙述性地描述男女两性已经展开和典型的变性发展状况的现象，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不是某种征象决定诊断，而是对当事人所进行的所谓日常生活的测试，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生活中的一种性别角色预期，尤其是治疗师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中对他的深层意识的传送和反传送的表现中所形成的印象：“这是一个女人”或“这是一个男人”。

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种新性革命真的甚至软化了有着最坚硬外壳的性别归属，从文化上，从个人性上，也从法律上。当时颁布的变性法（TSG）就如同一场新性革命的序幕，因为如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这里“涉及的是本质”（见23章），而且也因为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瑞典存在有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法律。今天，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变性法的某些条款与国家的基本法不兼容，而且有立法权的政治党派也在性别和性自由这个烫手的问题上前后摇摆，除了一些较小的党派还有些自发的举措。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从变性和跨性人团体，变性儿童和青少年自发家长协会，直到变性人网络柏林的当事者和志愿服务者的倡议、举措和行动也就更加明确。因此，现在已是最佳时机，终于从社会和法的角度运用一切有效措施，承认变性人、两性同体人以及新的文化事实，如流动态性别者和非性人的人权。

46 作为假肢的论点

“……任何论点都是假肢”，这半句话起源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变性现象最有理论价值的论文由安妮特·伦特（Annette Runte，1996）写就，并以一个很有含义的标题《传记操作》作为教授资格论文发表。具有诸多的举隅和提喻意义，但同时又是内外一致的解释，也许伦特会这么说，还没有人，更不要说话语考古、文学史、结构主义—心理分析、认识论和“假想理论”，在这个迷人的问题上获得过如此可观的成就。伦特的研究主要借助了福柯的话语和决定理论，借助拉康（Lacan）和他的学派采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的语言改写，借助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采用的媒介理论更新。这就是为什么她的文章作为一本书有着7种不同的印记，而这7种不同的印记是不那么容易被消除的。这些印记可以称为性别决定、类型考古、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男性生殖器图像、父亲榜样、两人关系与法律三角关系化的假想。伦特想在各个理论设置之间建构一座桥梁，而这在对变性的研究中尚无先例；虽然拉康从没对变性做过系统分析，可她还是断然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一些神志不清，抨击他是精神异常。但不管怎样，如果伦特谈论“心理分析”，在紧要关头或是在有疑惑的情况下，她实际上所指的是拉康的理论，并且甚至那个哲学家福柯以及有些弗洛伊德追随者也都曾经这么陷进过拉康的理论。

对变性这样一种“在本质上仍还是谜的极端经验”的话语建构，伦特（同上：9）首先想通过（自传）传记式的文章以及借助几百份历史案例来比较讨论和描述变性人，与此同时，她并不把变性的现象只理解为是文化建构，因为象征性的构建以及它们的重新构建已经被证明，如果强调这一切是一种多元或独立决定，那只是科学的想象，只是为了让当事者和观察者都能听命于他们科学激情的“盲目摆布”。伦特打开一个福柯式的“档案”，是为了追踪找出与互文性（intertextuell）社会结构相关的病因和将一种现代话语形式差异化和网络化这么一个目标。这种现代话语形式不仅采纳自文学和科学的应用模式，而且还保留了与日常生活和专业语言的多种关系，从起源于古典的神话到现代的科幻小说语言，

从传统性学到基因技术的话语，从理论概念到新闻语言，从伤害到伤风败俗的庸俗用语，因而也就使这一切语言成为常态。

尽管安妮特·伦特用“操作”作为书名，但她和我一样不做任何有关操作决定或操作客体的假定（34章）。她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变性的话语讨论”，实际展开的是：变性者是怎样以他们与众不同的亲身经历参与媒体的话语讨论。这本书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它的话语理论相当单维度性，与该书引用话语互动的资料篇幅并不相称，并且选用“变性的欲望和行为”（Transsexualität）这个词的决定似乎也不太恰当。在整本书的文字中，几乎只提到“变性（主义）”（Transsexualismus，也有译成“易性癖”——译者注）这个词，似乎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尽管一个词的后缀是“tät”，另一个词的后缀是“ismus”，并且一个词的核心或说词干是“Sexualität”，另一个词是来自拉丁语的“Sexus”，表示“性别”。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敏感的语言学家和语言魔术师，却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的一种特定情况下，使用了“（男）同性恋者”（schwul）这个词（同上：700），而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特点是：同性恋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话语讨论意义（66章）。但更令人恼怒的还有，伦特提及了“文献汇编的选择性”、“选择标准”（同上：23）和变性者的“（写作）投入”（同上：695），是的，她甚至感谢一位同事为这本书所“投入”的努力，尽管“投入”这个词与“选择”这个词一样，按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对纳粹话语的分析，都属于不可抹去的纳粹语言的核心，克伦佩勒把这些语言称为“第三帝国的喉舌”（Lingua Tertii Imperii，简称LTI）。

在该书的第一章《“变性欲望和行为”：文献汇编和话语互动分析》中，伦特展示了已经加以分析的资料。在第二章《“性别定位”：身体和心理公式以及“中间状态”的理论》中，历史话语性地展开了变性者自我描述的条件框架。在第三章《“性和性别”：性别差异之谜》中，伦特将性别差异的心理分析思想与自我心理学和系统理论的思想进行了比较，

按她的理解，自我心理学和系统理论既不能从历史的特异性也不能从个人特有功能的角度对变性人特有的不整合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种尤其是针对罗伯特·J.斯托勒理论的批判。第四章《“作为象征性的现实阉割”：拉康学说中心理异常者的结构模型》，不仅将变性人对性别有限性的摒弃，看做是一种病态的母子共栖效应，而且也从他们性别不对称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第五章《变性人的“童年故事”》和第六章《“进入另一种性别之旅”：变性者的性别偏差发展和在自我体验的描述中的集体象征性网络》，从主题、修辞和叙事的角度对（自传）传记进行了检查。第七章《从“女性化的男人”到“男性化的女人”：象征性性别变更和性别交换在历史表现中的不对称性》，在与文学虚构的比较中找出变性人“自我体验描述”中的瞩目点，并且也考察了研究和治疗史。第八章《“类型考古学”：变性者的自白：一种“神经质的男人话语”》和第九章《历史的间断性与连续性：（自传）传记的场景描述类型与艺术构造类型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展现了对新的类型在双重意义上的考古（挖掘），最初是挖掘案例故事中当事人生活的开端，以及对他生活的“正常”报道，然后是研究变性者的畅销（自传）传记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尤其在特定的叙述模式与解释模式之间的交替关系。第十章《“跟踪阅读”：一种话语构成中的亲和、差异和征象的余值》，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了心理分析与话语理论的关系，并认为只要阅读话语分析“余值”中的征象，就迫使（研究者）得出变性“想象动力”的假设。在第十一章也是最后一章《想象的立法：在文化历史前提以及相关影响背景中的变性话语讨论》中，作者最初回顾了她迄今为止的有关表述，以便最后将变性解释为一种后现代现象。

这就除了其他一些问题外，也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推断：今天，当关于变性的日常知识仍停留在古老西方的实体二元律的基础上，并且这种二元律也确实100多年来一直为当事者提供了性别化的身体和心理形式，但是研究性别认同障碍的所谓的科学现象学，却排除了想象的性别效应对现代主体功能的结构性意义。虽然在这里心理密码可能只是特指

直接自我意识的那个前概念性的，但同时又是反思和情感的中心，这样它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一种心理化的性别内核，而正是这种内核的情绪负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反向性别的证据情感（Evidenzgefühl）”（同上：629）中。在这期间已经有着多种因素病原的难点，并不只是因为框架理论拘泥于一种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而且也由于多种学科面对性别身份识别与认同的话语和媒介结构条件而在相互间出现的一种特定的盲目性。因此当务之急是表述变性人跨越性别界限的语义差异，不管它是否会影响或是否最终会摧毁性别二元化的分类系统，都应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更精细的研究。

不仅要从虚构的文学体裁的嘲讽性自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20世纪末在一种性学研究的框架内对当事者的自叙所做的诠释中了解变性人生活史的概况；虽然变性愿望“在临床中被看做是最高等级的性倒错”（同上：630），但在达到这个最高等级之前，还有各种过渡的等级。在性与性别倒错之间语义和概念依存关系的重建，允许我们把对变性人，即“正确的心理却存在于错误的身体中”这么一个少数人群体的中心定义的集体性象征，锚定在融合了人类学性别本体论与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理论思想的一种理论隐喻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建立在一种“第三性别”形象上的一种广为流传的关于结构性双性恋，因为有着心理和生理双性别特征的科学幻想假设，象征了由性变革首选并具有潜在无限性的性与性别中间状态，已经从其描述性的表层过渡到了一种具有阐释性的深层结构。鉴于可以追溯到因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而出现的变异，这就使经由弗洛伊德才清除的性学坐标系统，拥有了一种重新整合“反常性欲取向”的异性恋内容。那个在今天应用于性偏差分类中的跨学科和多层面的性别概念，最早出现在文学人物的双重和分裂人格形象中，它揭示了心理生理一元论向实体二元论的重新回归。可能是有关两性同体的“躯体知识”在变性人的前辈中又转变为与心理相关的知识，直观的真相话语便因此隐含了一种不同于多重人格的有意识的分裂经验。这出现在变性女人丽丽·艾尔伯（Lili Elbe）［别名尼尔斯·

霍耶（Niels Hoyer）］用假名安德烈亚斯·施帕尔（Andreas Sparre）于1931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生活忏悔》（也译为《生活报告》——译者注）中”（同上），并人格化了一种通过手术干预更换性别作为准性别倒错双重人格。一种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去实体化的主导倾向，助长了在自传的话语中出现一种性别的理想主义，并且它也会继续利用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思想原料。但理论论据的隐性动力仍然是积极的情绪强度，这就意味着一种性别感觉的欲望连接，作为不受规范限制的自我归属，便在这里成为最后的理由；虽然人的生活史开始于“情感的差异”，但也因此可能受到特定的情感波动的影响。一个人的（自传）传记式的精确表述，（在拉康的意义上）只是表明了这个人身处于怎样的一种想象状态中。

童年故事，青春期危机，不成功的正常化努力，不再掩饰而是直述自己的性取向，接受性别的手术干预，这些都是当前“变性人传记中‘话语内容’”（同上：631）的典型要素。除此之外，在（自传）传记文字的某些表述中也有着那么一些（变性）征象的倾向。几乎所有的作者大都先是在童年时代听说了关于性别双胞胎的神话，以后才发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性别关系被感受为一种符号化的对立关系，这就为在这种关系中随意更换或交换符号（性别）留出了空间。表述或表现这种在童年时代已经出现的性倒错或是反性别角色行为的愿望，通常由于缺损型的家庭结构而更为加剧。但是如果没有拉康提出的心理异常结构模式，无论是不断重复有关父母亲的一种异性恋的叙述，还是冗长而多余地描述一个变性者看到或想象一个粗鲁的父亲欺负孩子母亲和孩子自己的原始场景，还根本不能合理解释存在于这些征象中“异性恋式的同性恋”这么一个悖论。将矛盾性情感作为意识系统运行动力条件的系统理论描述，并不能把握变性“综合征”的历史构成和个体发展特性。结构主义心理分析运用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语言重读的认知批判框架，对如罗伯特·J.斯托勒等人的自我性理学家只是从共栖固定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的性别越界现象，提供了一种具有逻辑关联的替代解释。如果说变性

人对性别差异的排斥是由于在童年缺乏一个父亲般的保护人物导致心理受到创伤而引起的，那么必然会将“象征性的‘阉割’”（同上：632）作为完全的现实而付诸实施。变性者在普遍荣耀的信念中有意识获取医学和法律认可的那种谵妄，在想象的层面上表现为一种防御性的重构能力，是“心理异常者”在彻底崩溃的现实面前的一种“自卫”，从而把“‘性别分类’看作为新的现实”（同上）。系谱学意义上的相异性也可以成为性的隐喻，即性欲性行为的出现完全只是为了服务于性，并且通过充满冲突的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关系，远离恋母情结，让一个现实的父亲出现在原本象征性父亲空缺的位置上。

通过优生医学的利益与“变性狂热”的碰撞（同上：633），便出现了性别手术干预的实践。从性法律改革的角度来看，手术干预作为治疗措施已具有合法性。不同编写者对（自传）传记的“写作投入”（同上），也符合女人相应只有较少机会变性为男人的事实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公开发表的关于女性变性者生活史的文章。并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变性人的自述还总是以两性同体作为自己改变性别的借口。进入70年代以后，才成功地突破了以两性同体作为变性手术的借口，开始了“注重当事人性别情感”的手术干预，因为在当时政治自由化的发展进程中，变性人对非自然性别的认同，已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说一声“对不起”，也不再有道歉的必要了。即使大众媒体也将以往传播超级明星性倒错和改变性别的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逐渐改变为从民主化的角度“理解”这些明星变性事件的文章。在80年代又出现了“最新的趋向”，即把“原先变性事件中的世俗身份认同的目标，让位于一种对当事人更有利的‘行动故事’（action-Story），这种故事中的部分已经远离了原有的变性意识形态”（同上）。但是我们的作者把我们已经抵达的最新时代，仍然与70和80年代重合在一起。因而她所分析的那些传记，都还没有或是还没有完全进行（现代）话语资料程序加工、绘制和模型化，这里的加工特指在一种“新性革命”标记下对事件和心理加以描述（38章），因而这是一种显著降低性的社会个人和象征性意义

的程序：它以性别差异作为新的起点，取代以往有关本能冲动命运的陈词滥调；它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将性欲性行为和对性别的定位综合起来，加以重新建构和设置；它将传统和最新的有关性和性别的思考断想，极度地中间化；它以一种事先无法预料的方式，使个人的（爱情）关系多样化和多元化。简而言之：这是为话语谱系准备了一席寻找自己历史对等点的盛宴。

伦特在她著作的最后一章中，仍然只是分析了一些来自70年代的科学调查和临床数据，这就导致伦特所有的最新时代的数据，只能是写于70年代时主流的由男人变为女人的性别变更资料，这无疑远离了现代这个有着边缘性人格障碍和精神崩溃恐惧的时代；而这恰恰是一个病人和治疗师都彻底没有了内省和反思能力、双方都毫不妥协地拒绝双性同体和其他性别的感受、变性人的异性恋化、一切变性人的性虚弱和社会倾向于卖淫和夜总会的时代，如此等等并继续如此。鉴于70和80年代有关变性的话语讨论作为跨学科话语互动和学科内部话语互动，已经明显与当今的社会状况偏离，这便使得位于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伦特的文字，有了一种古董的气息，这是伦特以一种吸引特别现代的读者的方法加以修复的古董。在著作的最后一些句子中，伦特引用了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话：如果在征象中存在着一种能够持续抵抗任何解释的享受型核心，那么也许就不应当在对病症的一种解释性分辨中寻找治愈变性的方案，而是应当在“一种身份识别中寻找出它的根源，在一种主体身份识别中寻找出那个不可分析的点，以及最后成为这个主体唯一支撑点的那种部分‘病理化’的关键点”（同上：738）。要是读者想理解这段话（以及其中成千上万的模糊性），就必须先回忆一下，在拉康的理论中，“征象”并不是密码，而是事情的自身，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并且享受也是真实的出类拔萃，一种心理创伤不能符号象征化，因而象征性的秩序，比如死亡，便会撞到它自己的极限。

47 两性兼有的性别和它的出现

变性与我们后面还有讨论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区别在于，变性是通过手术进行改变身体性别的干预，从多种角度观察，它更是一种自我固定的性别，而不是一种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唯一一种建构新性别的途径，变性在这期间已被授予最高的文化尊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哪种性和性别的形态，曾经得到过如同变性那样由一些欧洲国家或一个最高法院颁布特别法，以保证其享有法定医疗保险的待遇？

两性兼有（或跨性别），今天在医学上通称为两性兼有者，自几百年来在民众通常的口语中所说的雌雄同体或阴阳两性人，则很难在新性别中或新型性欲性行为者中间找到自己的同伴，因为不同处境的团体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因为他们作为医学牺牲品的处境在当前仍然笼罩着一切其他的阴影。当今医学从病原学的角度区分了至少有20种不同的与生俱来的性别发育发展的特别病情，按英美医学界使用的术语也被称为性发育紊乱（Disorder of Sex Development，简称DSD），其中最常出现的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Adrenogenitale Syndrom，简称AGS）、雄激素不敏感症（Androgen-Insensitivität，简称AIS）和性腺发育不全症（Gonadendysgenesie）。双性别、中间性别或之间性别者相对于其他性别者，至今几乎没有获得一种作为新文化性别形态的地位，因为这个群体几乎只是很随意地聚合在一起，就如一个鼻子狂热者在马路上按他对唯一正确鼻子模式的想象，将不符合这一模式的行人组成一个病人团体，不做任何解释也不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便随即对他们的鼻子做了手术整容那样。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过分，但却在核心上展现了医疗工作的实践直到前些年还存在的那个阴影面。医学自以为有权决定，怎样的阴茎是太小，怎样的阴蒂又是太大。但对这类病人来说，这些却涉及他自己身体的特性，可能在有些情况下不需要治疗；在有些情况下，当事者会因为这个两性同体的标签而承受终生的心理创伤；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会招致持续的疼痛；更有一些其他形式的两性兼有者，也许这些病人与医生建立一种充满信任的合作将会极有意义或甚至是必要的，比如当出现一种危及生命的盐耗失危机时（比较Richter-Appelt，2004，

2007a；Schweizer und Richter-Appelt，2012）。

被自以为是、没有良心和歧视人的医学工作者行为所逼迫，自9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两性兼有者公开表明自己的性别（比如请比较：Vlling，2010）。他们在人类史上第一次组织起来，共同诉求自己的利益。1993年建立了北美两性同体人协会（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简称ISNA）的谢丽尔·蔡斯（Cheryl Chase），曾在一份关于两性人的特刊《始作俑者——跨性别认同报道》（Chrysalis：Journal of Transgressiv Gender Identities，Chase und Coventry，1997）中写道：ISNA这期间已经在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有了自己的分部，并且除了ISNA这个组织外，多个西方国家建立了“雄激素不敏感者声援团体”（Androgen Insensitivity Support Group），日本则建立了“希吉拉日本”（Hijra Nippon）声援两性同体人，自1996年以来，在德国也出现了“儿科和妇科反暴力工作团体”（die Arbeitsgruppe gegen Gewalt in der Pädiatrie und Gynäkologie，简称AGGPG）。

这些组织编写和分发宣传小册子，占据专家大会，质问立法者，将当事人由于医学只认可一种性别并只允许有一种性别的归属，而导致在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被迫遭受的困难公之于众；这些组织坚持主张：不要过早地对当事人施行躯体手术干预，不要过早地对当事人专业化地确定其社会心理上的性别分叉点，而是应当将这一权利转让给成年后的当事人自己。这类组织起来的两性人团体2008年在德国第一次受到一种普遍关注，在联邦政府当年递交给联合国的官方报告中，提及了这些人在德国的生活处境和社会状况；有一家法院也在同年（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判处一位医生应为他未征询当事者的意见就擅自对其做了性别取舍的手术干预承担责任。

令人高兴的是，德国性科学已在90年代末开始转向研究躯体医学显然已经完全无能为力的这类双性别问题。同样令人高兴的是，德国的性

学研究已不再追随失败了的并也已遭到许多批判指责的美国性学家约翰·曼尼（John Money）所主导的“治疗”准则（Garrels，1998；Richter/Appelt，2007a）。虽然由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Hertha Richter-Appelt）所主持的汉堡性学小组（www.intersex-forschung.de）的开创性研究还没有最后结束，虽然一些新的专家对类似特定荷尔蒙治疗和手术干预必要性等仍有所争执，但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将双性别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不加任何解释地交付给一种自负专断的躯体医学机制，进行所谓正确性别的手术干预切割去所谓非正确性别部分的这么一个时代，必须最终成为历史。今天则应主张，与其年龄相适应地向两性人解释他们的生理状态，并且不遮遮盖盖而是完完全全。像在曼尼那个时代那样对诊断和治疗的一种忌讳和掩饰应当属于过去时。最终必须由当事者和他们的家庭自己做出决定，是否要做切除手术，保留哪一种性别，接受哪种治疗。当然，也必须立法承认两性人的人权（Tolmein，2010）。

尽管在其他文化中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性别，但我们文化中的许多人仍然不可想象：一个有着男性体格并生长着阴茎的两性人，在青春发育期长出了乳房，而且本人还把这看做是一种对自己有利的特征，甚至还受到其他人的羡慕，因为两种不同性别的漂亮特征终于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如同在两千年前，我们文化传说中的阿里斯托芬，不只是有两种性别，而是至少有三种性别，男性化的男人，女性化的女人和男性化的女人。在我们的文化中，真实或只是被医学解释为两性人的绝大多数仍然处在非常绝望的状态，按AGGPG提供的数据，他们中80%的人曾经尝试过自杀，有25%的人为此丢失了生命。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需要在这期间已经成立的自助团体和专业的心理学家和医生（这些专家和医生结成了一个自2003年以来由政府资助的网站）的帮助，并也需要互联网的帮助，以便在互联网上了解有批判思想的两性人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信息。（www.isna.orghome.t-online.de/home/aggpg/index.htm；www. qis. net/-triea；www2.iisg.nl；

http：//users. southeast. net/-help；http：//home.t-online.de/home/boedeker_spreitzer_gbr/is_homep：htm）

一种希望最终能为那些冷酷的医学家和法学家带来理性的曙光，是德国伦理委员会在2012年2月所陈述的意见和立场。不可否认的是，汉堡性研究者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和卡廷卡·施威茨（Katinka Schweizer）的研究成果对伦理委员会此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伦理委员会的意见书在“涉及一种性别之间的变异状态，即一种从生理医学的角度不是十分明了的性别的地方，都使用了‘两性兼有的性’这个概念。DSD则相反被用来作为在意见书中提到的性别发育的一切特殊性的医学总概念。当事人自己特有的各种问题和需求构成了DSD中各个单一形式的区别，并也因此要求一种能够表现此差异性的道德和法律评价”（Deutscher Ethikrat，2012：172）。带有DSD的人，必须“作为社会多样性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的尊敬和支持。许多两性兼有的当事人，在过去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同上）。现在是应当和必须保护他们免受医学错误发展和社会歧视之苦的时候。为了促进尊重和支持两性人，需要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与此相关的知识。

德国伦理委员会（同上：173～176）所提出的与医学治疗相关的要求，我在这里以简短的形式陈述如下：

1.医疗和心理咨询与治疗，应当在一个拥有专门资质的跨学科合作医疗中心进行。

2.为进一步的医疗护理，有独立资质的护理点应当设置有恰当分布的空间。

3.不管是医疗中心还是护理点，都应当保证当事人和他们的父母能够获得由其他当事人和其父母以及自助团体（Peer-Beratung）所提供的一种咨询。

4.通过医生、助产士和心理治疗师的职业培训和专业进修，以及要求执业医师和普通医院掌握全面信息，保证尽早识别症状并建议当事人前往专业医疗中心进行诊断和治疗。

5.通过对医生的职业培训和专业进修，以保障避免对当事人的一种歧视或一种不够细腻的态度。

6.所采取的医疗措施，如果将会给DSD当事人带来不可逆的性别所属性，而其原有的性别所属性又不很明确，那么这些医疗措施就要以对当事人身体不可伤害性和尊重性别与性身份认同的权利，对他拥有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的权利为前提和准则，虽然这也常常伴随对当事人生育自由权利的一种手术干预，只是做出这类手术干预的决定只能是当事人本人，因此在根本上也应当由有决定能力的当事人本人亲自做出这个决定。对于尚未有决定能力的当事人，这类措施应当只有在经过对手术将会带来的所有利弊都加以全面斟酌之后，并鉴于当事儿童的长久幸福而出于不容驳回的理由所要求的情况下，才允许施行手术干预。并且无论如何也包括这种情况，即只有通过手术干预才能避免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或甚至生命出现一种具体的严重危险。

7.对于那些自己还没有决定能力的DSD当事人，如果他有非常明确的性别所属性，如那些AGS当事人的情况那样，也必须从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这样一种早期手术的所有利弊都加以全面斟酌之后，才可施行。儿童的幸福也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衡量标准。在不是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应当等待直到当事者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的那一刻。

8.在权衡儿童幸福的问题上，即使这个当事儿童自己还没有决定能力，也应当按这个儿童的发展状况尽早地向他解释清楚，让他参与一切有关他的医疗措施的决定；并在做出决定之前尽可能地顾及他的愿望。同时也应当顾及该儿童一种明确的拒绝态度。

9.对手术疏忽过错的判定，应当运用与此相应的更高的标准加以裁定。

10.应当向当事人以及对此有决定权的监护人提供完整的信息和咨询解释，其中包括一切与此相关的可能的治疗方案，也包括放弃治疗的可能性。这种解释应当顾及一切可期待的结果或可能出现的后果，也包括生理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负效应和长期效应。在做出此决定前，应当为当事人与其家长提供足够的时间对此加以权衡和思考。短时间内的考虑决定，只适用于医疗的紧急状况。

11.这是一条应当遵守的规则：在关于可能会不可逆地影响当事人（未来的）生育能力和（或）性感受能力医疗措施的决定中，如果当事儿童与其监护人持相互矛盾的态度和立场，那么就必须由家庭法院来对此做出裁决。

12.鉴于医疗措施对DSD当事人将会形成一种终身的影响，以及为维护当事人对所施行的医疗措施的认知权，一切与治疗措施相关的文字资料都要确保存档，至少保存40年，并且只有当事人才有权查阅这些档案。

13.应当采取措施确保，由治疗医师开出的药方中，如果有一种标示外使用的药（即没有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药品目录中的非处方药——译者注），比如性荷尔蒙，应当确保能在医疗保险公司得以报销，并保证其不受任何报销程序的限制。

14.由于治疗措施而对一个儿童（未来的）生育能力和（或）性感受能力造成不可逆损害的犯罪行为的有效追诉期，应当保留到该儿童满18周岁成年作为最后期限；对于§78b StGb这条原先只规定了性虐待和侵犯受保护的未成年人性自决权的犯罪条款，应当做相应的扩充。与此相应的民事索赔有效期，应当限制在当事人满21周岁为最后期限；因此

原先只是针对由于侵犯未成年人性自决权的民事索赔条款§208 BGB，也应当做出相应的扩充。

15.许多当事人由于早期的治疗而在对个人身份认同方面受到了最深层的伤害，并且这些医疗措施按今天的认知，已不再符合当前医学和技术的水准，它们是以从性别常态的角度对当事人进行社会排斥的思想为基础。这些当事人都经历了身体的疼痛、个人的痛苦、额外的困境，并且生活质量也受到永久的限制。因此，应当为他们设立一个基金，以帮助他们获得社会的承认和支持。

16.因此应当设置监察员，以行使顾问和调解员的职权。

17.当事人的自助团体和协会，应当获得政府财政资助。

18.对于当事人的医疗保健，特别是有长期效应的性荷尔蒙治疗，由手术引起的后遗症，以及医疗护理质量也包括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意义上的治疗质量，都应当进行持续不断的同步研究。因此，在此建议设立一个囊括全欧洲的相关数据库，专用于此研究目的。

关于公民身份法方面的问题，伦理委员会的回答如下（同上：177 f）：

> 德国伦理委员会认为，如果有人，鉴于他们的身体建构状况，在既不能确定为女性也不能确定为男性的情况下，强迫他们在民事身份登记中，写上其中的一种性别，就是对个人权利和其要求平等处置的权利一种不合理的侵犯。1.因此必须统一规定，对于那些不能明确确认性别的人，在“女性”或“男性”的登记之外，也允许他们选择作为“其他”性别加以登记。另外还要统一规定的是，在当事人自己决定性别之前，不得强行予以登记。立法者应当设定当事人自己确认性别的最高年龄为最后

期限。2.应当对按§47第二段PStG条款提供的改变原有性别登记可能性，加以扩展并重新制定规则，以使得那些原先的（性别）登记被确认为不正确的当事人，有权提出改变原有（性别）登记的要求。3.在民事状态登记为“其他”性别的可能性，导致有必要也为与此性别相应的一种（婚姻或伴侣）关系提供可能性，国家和法律应当认可这同样也是一种遵守责任和可靠规则的（婚姻或伴侣）关系。鉴于当前的法律只允许女人与男人缔结婚姻关系，以及女人与女人或男人与男人同性关系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因此德国伦理委员会以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提议：为那些登记为“其他”性别的人的生活伴侣关系的登记注册提供可能性。伦理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提议，也应当为他们正式缔结婚姻敞开法律之门。4.作为未来立法的基础，应当对按现行法律性别登记义务的目的加以重新评估。应当审查在民事状态登记中的性别登记是否还根本具有必要性。

48 身体反应与体验的解离

新性革命的另一个关键解离，是性体验领域与身体反应领域的分离：一方面是通过普遍的、电子模拟式和虚拟化的程序趋向一种新型的性欲性行为，我们把它称为电子性（E-Sex）并在以后还要详细讨论（64章）；另一方面是运用新型的、大规模的医疗方式进行身体治疗，特别是通过机械的、药物的或手术的方式强化阴茎。

由于医学工作者可以通过机械、药物或手术的手段使阴茎获得一种勃起（比较im Einzelnen Sigusch，2007a），他们就以人为的方式解离了性欲望、勃起和性能力。如此这样，一个男人在没有感觉到性欲望并且经常也没有迄今为止似乎是性体验特有的生理心理感觉的情况下，就能获得“性功能”，并将性行动作为一种我们文化之几百年来一直如此进行的行为，加以实践并得以完成（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来说：执行和业

绩）。医学工作者希望能够像修理汽车那样修理人体的梦想，希望具有完美性功能的假肢梦想，虽然他们的假肢躯体化使人的身体成为尸体，也就是去身体化，但他们的梦想是与普遍的预防其他疾病，超越身体功能和总的性去人体化的梦想是一致的。这是一条机械理性化地从不能自主的性爱通往随意的假肢般性的道路。

既使性工业感到高兴又使他们感到恐惧的是，性能力的研究者从性商店、孤独的手淫单间和拜物的性虐与受虐的昏暗灯光中，取出了一些物件，并把它们展现在医学的聚光灯下。这就最终越过了严肃科学与实用利益的门槛（界限）。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80年代许多泌尿科医生和其他阴茎强化专家突然都转向使用阴茎泵（Vacuum Constriction Devices）——他们把它称为“真空收缩设备”——治疗勃起功能障碍。新闻界自然很快就注意到这么一种潮流，赶快写出标题如《真空泵让爸爸又行了》之类的新闻。但这也不完全算是什么新成就；我们可以在以前的性学家那里读到，这类泵100年来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进行着它的操作。

新出现的是那些介于自我和其他疗法之间的特殊邮购行业和性商店能够提供的性器具：阴茎和阴道圈，勃起套，带有或不带喷雾装置的假体阴茎（以前称为假阳具），还有阴蒂刺激器，名为“爱情幸福”的阴道振动器，阴茎和阴道套，名为“制造喊床呻吟”的阴茎增长器，名为“Lamello Fing”的幸福手指，名为“Rin-no-tama”的阴道球，专为女性所用的带有向内伸张阴茎的橡皮裤，专为男性所用的性玩偶，等等。

这期间已经有一些临床研究将勃起环和真空勃起系统定为有效器具，而其他治疗手段则都可以被忘却或丢在一边。一些年前，这类性器具甚至出现在德国政府的公报上，经历了从受国家保险规则的监督到认可它们为医疗辅助手段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套和泵都熬过了令人皱眉的时期。那堵传统的、横跨在性器具和治疗器具之间的墙，

已被推倒。

49 龙涎香，灵猫香，伟哥和自我性刺激的意愿

如果要说到性欲望和性能力，那么无论如何在男人那里这两者都是分开的，以致一个男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身体和情感的感觉就能像按了按钮（更恰当地说：新型的性）那样对性做出反应，这也就使得1998年9月在我们这里批准销售的“伟哥”以及它的后继者都成为抢手货。自认为有着强大性别的男人们，几千年来的梦想就是注入伟哥能给他们带来的——随时和随意的勃起！因而他们也就不知疲倦地在寻找一切能够想到的可以帮助他们勃起的方法和手段：龙涎香和灵猫香、麝香和士的宁（番木鳖碱）、天冬和红景天、人参和茄参（也被称为中国人参和德国曼陀罗草）、含羞草和白鬼笔（也被称为羊肚菌或不知羞耻的海绵），除此之外还有鸽子血、被称为女神阿佛洛狄忒皇冠的仙草、牛膝草鸟的舌头、西班牙苍蝇（斑蝥）、犀牛角粉，等等。如同我的父亲曾说过的那样：“耻辱只是因为想到了耻辱”（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但这一切药物和这一切尝试，至今或是完全无效或是只有着不可全信的效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甚至是伤害身体和有风险的。

在伟哥进入市场之前，作为对性功能有辅助效用的物质，比如有处方药“育亨宾碱”（Yohimbin），以及两种被优先用来治疗阳痿的方法有：用手术的方法在阴茎上植入假体阴茎和直接在阴茎注射血管活性物质。现在这两种方法遭遇到伟哥——一种非侵入式方法——的竞争，应该是受到欢迎的事。由于用手术的方法帮助阴茎获得强硬，会因为进入阴茎的填充物永久性地伤害阴茎内的海绵体（勃起组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反而造成了他们想要的治疗效果的反面：阳痿。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仿照一些动物的阴茎骨，将骨头和软骨组织植入阳痿者的阴茎。在七八十年代，在血管活性物质的胜利进军之前，开发了日益完美的假体阴茎，企图帮助人们像按钮那样勃起的梦想成为现实，刚性和半

刚性，可弯曲，用一个阴囊泵可充气，借助一个分量恰当的液体储备罐可自己补充药物。在短短的十年中，就有成千上万的患者被安置了这类器具或假体，并且我们在报道中看到，许多寻找咨询的患者与泌尿科医师的谈话甚至很少有超过10分钟的机会。

这种粗鲁的崛起和进军，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的批判而停止，而只能是通过进入市场流通的其他壮阳药来阻挡。这些壮阳药物，是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的血管活性物质，如：罂粟（Papaverin）——一种鸦片生物碱，酚妥拉明（Phentolamin）——一种当患者想勃起时，可以自己往阴茎注射的α-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alpha-adrenerger Rezeptoenblocker）。还有一种并不比其他方法有更少风险（比较Sigusch，2007a），也不适用于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法，被称为海绵体自动注射的治疗方法，简称SKAT。它在80年代的进程中，却成为最常用的治疗勃起障碍的方法，当然在80年代最常用的方法中也包括心理治疗的过程。开始于80年代初的这一切有着一个不那么寻常的故事。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泌尿协会年度会议（Americ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上，一位研究者在他的学术报告演讲结束时，拉开自己的裤子，向所有在座的与会者展现了这类方式给他阴茎造成的勃起。整个会议大厅里的泌尿科医生都被震惊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另一个男人在勃起状态下的阴茎。如果这种勃起是真实的，那么它的变化就应当归功于SKAT。

在伟哥之前，世界范围内有几十万患者都是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短短的几年中也出现了百余份相关的研究报告。但是如同一切现代治疗男人阳痿的方法和手段，总是以十分的喧闹开始，一段时间后也就如开满鲜花的梦想那样烟飞云散了。即使是SKAT这种了不起的新技术，在伟哥进军市场之前也已露出败落的迹象。它的应用范围被越来越明显地压缩，它的积极效用在一些特定的患者群中得到毫无疑问的相反证明，越来越多的患者失望地退出治疗，因为治疗并不能给予他们原本所期望

的效果。

被看做灵丹妙药的伟哥，将有怎样的结局，现在还不能预见。它的发明者却能够证明以“伟哥”为名在市场上出卖的“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地那非”（Phosphodiesterase-Hemmer Sildenafi），以及在当前市场上出卖的它的后续品“艾力达”（Levitra）和“西力士”（Cialis）等药品确实能够有效帮助阴茎局部血液充盈。也许正因如此，埃米尔·拉埃内克（Emiele Laennec）曾在某个场合说过：使用一种药物，只要它还是新的。因为在20年后，将不再是今天这些拿了药品制造公司大笔资助的研究者，给这个药品定下基调，而是那些希望自己研究的方式方法完全不受制于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制药公司规定的研究者。绝大多数阳痿的男人，只得又一次失望地离去，因为他们信任医学方法的疯狂——只要吞食一片药，就能帮助男人获得一种充满快乐和得以满足的性交媾，必将在现实中因为无法实现而扫兴。除此之外，也因为绝大多数治疗医生与他们的病人一样，可惜仍然停留在只限于躯体状态性无能的角度去思考病人的痛苦。因此治疗医生与那些寻求医生帮助的男人有着相同类型的误解，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没有必要让其生活伴侣参与到治疗中来。其实在SKAT潮流出现之初，许多性学家都证明了：生活伴侣参与诊断和治疗，是非常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病情的；不只是孤立地从躯体的角度而且也不只是运用机械的方法，即不是像修理一台机器那样去治疗阳痿，有多么必要。SKAT或伟哥，作为“单纯”的器官治疗和躯体自动治疗的方法，忽略了患者个人自身以及与生活伴侣的冲突，只是用机械的方法去解除社会心理结构中的问题；事实证明，只有在一对性伴侣关系被这个程序打破了“神经质上”的平衡而出现性功能障碍（或是人工制造当“化学性功能”）的情况下，这样的治疗才有它的意义。

不断有人写道，伟哥如同避孕药那样带来了一场性革命。但我想，这也完全有理由出现正好与此相反的情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趋向，既是完全旧的也是相当新的，将由于这个药丸得以强化而不是削

弱。因为我们的社会，仍然总是那么父（男）权主义结构化，因而在事实上或在它的自我定义上仍然是一个男性为尊的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尤其是在社会中的状况都是如此，以致像伟哥这类助勃药物在生物化学以外的效用，不只是对男人而且也对女人来说，正是太适合这种男权社会的状态了。因而值得怀疑的是，伟哥真的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意吗？

但是另一方面，伟哥在我们社会的综合情景中又是如此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促进了有着新性革命特征的社会进程：解离、弥散和多样化。如此一来，该药物在躯体物理反应与社会心理体验的解离之后（我们已在举例其他治疗时提到过这一解离），现在又帮助我们终于能够建构性欲性行为与恐惧的解离。心灵的创伤和扭曲应当不再成为性乐趣的绊脚石，生物化学应当帮助排除这些障碍。社会当然不会提及，只是借助这个药物才掩盖人们心灵的创伤和扭曲；也不会提及的是，恐惧和冲突，只要它们是来自内心的负荷，总会在另一个地点寻找释放的机会。这种作为生活设计师和新生活方式的药物，弥散了性欲望、性唤起和性勃起之间的关系，以一颗微小粒子的身份跻身于当今自我的性和精益性行为的事件中，并在文化上强化了一种自律和自我调节的性形态。因此这种药物很适宜解除那些老年男人的一种性起义，这些男人尽管自己的身体已经枯萎和有病，却仍然不肯放弃身体的乐趣。鉴于我们社会人口的不断老龄化，这种药物很明显是长久以来经济和文化的一种相应攻势，只是这种攻势不是来自艺术，而是出自制药工业，可惜没能在事先预测到。

毕竟总共大约有4000万人在德国最近一次人口登记中注册为男性，其中又有1800万人已经过了41岁，大约750万人是61岁以上。单是这个潜在的国内市场，就已囊括了足够的消费者，尽管反对伟哥的媒体披露的人数表明，并没有达到百万计的阳痿患者。如果费尔德曼（Feldman）那份详尽研究的数据能够作为我们参考的基础的话，那么

按他所说，必然可以推理出，在40～70岁年纪的男人中“完全”失去勃起能力的发病率是9.6%。按这个发病率计算，德国目前大约有150万这样的患者，当然并不是每个这样的患者都会去求医治疗，也不会都去吞下伟哥。按费尔德曼所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有“中度”性勃起障碍的大约是25.2%，在当前德国就意味着是390万患者，两者相加是540万；还有17.2%的轻度患者，在德国是270万人。这样一个发病率无疑囊括了最重要的病患和伟哥药物消费者的群体，大约最多可达到800万男人。

也被一再强调的是，避孕药是女人的药丸，伟哥是男人的药丸。这样的观点便把口服避孕药的文化意义与伟哥这类“磷酸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Hemmer）壮阳药物的文化意义等同起来了。这是相当大胆的假设。毕竟是这个避孕药帮助人类超越了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在我们思想和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自然法规和基督教理念，按这种法则和理念，肉体的情欲（Libido carnalis），即肉欲，是按自然和上帝的意愿用来为生殖下一代（Generatio prolis）服务的。也就是说，通过避免无尽和难言的痛苦，避孕药为我们开拓了对性欲性行为和性快感的一种新型理解，而伟哥却在向传统的穿透意志致敬。如前文已经说过的，男人的梦想应当成为现实：像按钮那样的阴茎勃起，让每个男人都沐浴在自己器官随时勃起的荣光中。

50 阳具、阴茎和象征符号的规则

也许将伟哥的文化意义等同于避孕药的那些人，也许已经发誓伟哥将引发性革命的一些人，都曾做过深远的哲学思考，只是还不想把思考结果告诉我们罢了。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些怎样的推测呢？他们的思考推理也许是这样的：迄今为止我们认知的性渴望的本质中，也包括了一种不可预测的属性。没有人能够随时随意地唤起身体性兴奋的体征。它像一条缝穿过我们的灵魂，它由两个不同的世界组成，男人们能够非常形象地体验到这些，特别是如果他们身处一个唤起性兴奋却又无法做出性

勃起反应的时候。一方面是那个心灵的世界想要性勃起，另一方面是那个身体的世界却阻止了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总是阳痿的男人在脑子里就会充满一些神话般的想法：怎样才有可能使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重又聚合在一起？他们也许会说，专为男人的伟哥能够弥合这条缝隙，超越性的神秘，证明原先的性欲性行为特征已经过时，并最终对它发起一场理性化和现代化的革命。

但是那个性无能的男人，只要他还怀念前现代的性神话，当他回忆起以往性爱冲动的秘密，回忆起在另一个人面前不由自主勃起的那种雄风和与另一个人共同进入高潮时的那种光环，以及与另一个人统一在情欲和谐中的那种特殊感受，这是一种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根本不能获得的体验，他就会为之感慨。这就要求从哲学或至少是文化批判的角度对这类男人的病情做出诊断，而正是伟哥却强化了这种文化型的性无能，也许甚至还是在一个激发革命的规模上。一个借助伟哥获得性能力的男人，在他的生殖器重又勃起的同时，却也失去了作为男性的光环、神秘，尤其是丢失了他象征着男性力量和生殖能力符号的阳具。与阴茎不同，阳具这一符号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如既往仍然是象征男人权力的标志。

已经做了足够的推理。现在来看一下伟哥以及类似生物化学药物治疗有着怎样的医学临床结果。首先说令人高兴的：现在终于有一种药物，能够口服，因而不需要其他令人不适的操作，并且也能不显眼地背着他人吞服，一种确实在（确定阴茎勃起程度的）体积描记法实验和安慰剂临床对照实验之间很快发展起来的药物，与口服避孕药相似，它可能也与一种以生物方式发挥效用的物质有关。除此之外，这类药物也能对病因很不相同的性功能障碍，不管是由于器官还是由于心理的原因需要克服显然较为表层的（性无能）恐惧，都能产生效用；甚至对那些因为其他疾病正在接受降血压或抗抑郁治疗的患者也有效用。按当前的经验，这一药物暂时还没出现并不期望的效果，即在通常意义上既没有出

现严重的副作用，也没有出现威胁生命的后果。根据现有的医学通报，大约有2/3的病人对这一方式的治疗感到满意。除了一些已经“治愈”的，主要由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完全没有疗效而退出治疗的患者，按不同的统计模式和组合，在2.5%～13%之间。在其他的治疗方法，如SKAT、真空起勃泵和血管手术都没有效用或失败以后，这种药物还是能经常地起到它的效用（请比较在Sigusch 2007a中那些标明出处的细节）。

可以肯定的是，自从发现神经性血管生理系统（NO/cGMP-System）的不良运作是阴茎平滑肌细胞松弛的主要原因后，生物化学和药理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寻找能够改善这一机体运作的物质。但关键还是想找到“磷酸二酯酶”及其抑制剂。这期间找到大约65种“PDE”的亚型结构，只是从它们的一级序列来看，其基材的亲和力以及运动特性和对人体器官组织的调节和运作，都不能与内源性的活化和抑制酶相比。因此还将继续研究更多特异的PDE抑制剂，或是寻找出各种不同的抑制剂对身体某个特定器官的效应，或是寻找出一种适用于各种不同疾病的抑制剂。他们的研究还将遵循寻找PDE亚型酶抑制剂的道路走下去，因为这类酶自一些时间以来，已经被作为治疗心脏衰竭和作为对血管收缩或支气管扩张颇有效用的离子型受体药物。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1999年就已经有许多PDE-5抑制剂申请了专利，其中也包括“利来制药公司”（Lilly ICOS LLC）研制出的“西力士”（IC351），按最初的报道，该药能有效治疗轻度形式的勃起障碍（Gingell und Lockyer 1999）。“持田制药公司”（Mochida Pharmaceuticals）也已研发了一种没有更详细表述的抑制剂，听说也能进行黏膜治疗；“Byk”公司宣称研发出了PDE-4抑制剂，Nitromed公司目前则正在试验将一氧化氮供体（NO-Donator）与一种非特异性PDE抑制剂合并起来。这里提及的仅仅是一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例子。除此之外，目前还有哪些其他壮阳药正处在实验阶段，请参见Sigusch（2007a）。终会有一天，躯体研究者们会将一种新的药品作为自己在壮阳药物领域的胜利进军而显摆在我们面前，并且全世界的

媒体也会最终为这种新的性壮阳药而大喊大叫，《华尔街日报》将会通过对这个制药公司生产这一抑制剂的利润进行推测而使该公司的股东们激动万分，也只有到了这么一个时刻，也许才算是最终找到了一种“真正的壮阳药”。当然这一切在医学也包括在性学中，如以往已经一直出现的那样会有：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上千份论文，上百个专业大会，50多份教授资格论文；除此之外还会设置10个专业部分，出版5本相关的实用手册。这些部门，教授课程和论文手册的名目和标题，已经早就保留好了：“阴茎”（Hashmat und Das，1993）。

自然，并且总是在社会意义上，当前这类药物的非法贸易盛行，特别是在亚洲。根据来自富裕国家一些大都市的报告，伟哥如今也进入同性恋的亚文化圈和某些没有特定勃起障碍的人群中，这就是说，这些男人吞服伟哥，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勃起更坚硬些，或是为了达到多次性高潮。据说，一些有着完好性功能但试过伟哥的年轻男人都认为，简洁地说：“没有也行。”对伟哥有热情的是那些性能力日渐趋弱的较年老的男人，而他们的妻子则常常感到吃惊，现在必须为此几个小时地装扮成心甘情愿的情人。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口头禅那样地不断重复那句话：没有药丸能够帮助修复建立原先已经缺失的吸引力或亲近，没有药丸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排除深层和潜意识中的冲突。如果我们拥有那么一种制造幸福排除冲突的药丸或毒品，以代替缺乏的爱情关系和修复已经受到损害的性关系，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也就过分美好了一些。

51 攻击与亲昵领域的解离

从传统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进程中，又出现了爱欲的本能冲动与死亡（自毁）本能冲动领域的一次继续解离。在这个主要由女权主义所推动的解离过程中，性欲性行为中两人亲昵和统一的那一面，如此彻底地取代了原有性关系中的攻击性和两人貌合神离的那一面，以致出现了一种新的划一性。在一个历史阶段内被想象

为“纯粹”的性欲性行为，再次被认定了它的“不纯粹性”。对性恐惧、厌恶、害羞和罪过感所投出的阴影，是如此黑暗和广泛，以致许多女性甚至也有男性，都似乎在其中再也看不到一丝光线。性的亲近、愉快、柔情、激情、骄傲、情欲、倾心和幸福感都受到一种来自恐惧、仇恨、愤怒、嫉妒、怨恨和复仇的话语情感风暴的窒息威胁。

歧视女性的色情和性制品、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日常生活中的性歧视，以及乱伦、强奸、对儿童的性侵和对女性的性暴力——这些都是这一场话语风暴的关键词（请比较比如：Brückner，1983；Valverde，1989；Schenk，1991；Gräning，1993；Hauch，1994；Düring und Hauch，1995/2000；Richter-Appelt，1995、1997，2007b；Lange，1998；Dannecker，2007b）。那个曾经单一的和病态的性犯罪惯犯，在话语风暴中被多样化地复制成无所不在和正常的性别罪犯，成为施虐者和强奸犯。似乎现在的男人都成了色迷、施暴者和性无能阳痿者。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解离明显地表现在新制定的处罚条例中，这些处罚条例撤销了60、70年代（部分）实施的道德与法律，并因而与国家刑事处罚（或索赔）权脱钩。

性关系中攻击性和两人的貌合神离与亲昵统一的性欲性行为的解离，最初只是用来反对男性；但不久便也囊括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个人。到后来，不仅是那些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是性罪犯，因为她们在自愿进入的性关系中占有一种主体地位，不再属于被害人角色；而且男人也被解释为是性的牺牲品或被害人（比较比如Coxell et al.，1999）。除此之外，这期间也在男人与男人和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发现了暴力，而这个问题以前是这类亚文化中的禁忌，也被性学家所忽视。最新的对破坏和暴力踪迹的寻找，主要是寻找性侵和虐待儿童的妇女和研究那些性侵其他儿童的儿童。并且当然最近在斯堪的纳维亚还设置了一个男人之家，以帮助那些自称遭受妻子毒打的男人有个躲避和安身之处。

由于这里提到的都是在话语理论（请比较比如Foucault，1972）意义上的一种话语，而不是仅仅只是一种辩论，因而没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能够逃避这种筛查或甄别。现在是时候了，从法国话语理论的意义上，再次明确强调一种话语中（总是被不知情者低估）的物质性。博学的话语理论家所说的“话语”，涉及的并不是有些像一种公开讨论或一种科学争论的话语，而是特指一种文化设置。因此话语自身就是暴力形式。如果一个讨论的主题或一个生活领域真的被话语化了，那么具有相等分量的反对意见也就不再存在了。理解和反应便会因此相互分离，只剩下对复制的复制。科学家们的行为就会像在一根柱子上的一排鹦鹉。那些在正确时刻跳下（话语）这辆疾驶火车的政治家们，浑身都打起了寒战，因为他们从这种终极话语形式中听到了民众叫喊的终极民主。如果我每天早晨在报纸［而不是在德国电视1台（ARD）］上会很自然地总是读到一些与艾滋病相关的报道和评论，而这在80年代中期是我经常碰到的事，那么可以就此猜测，艾滋病这个主题已经被话语化了。如果我接着又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病毒创造历史》和《艾滋感染者在休假中死亡》之类的文章，那么就可以推测，话语也有了精神和道德的凝聚力。如果一个医学教授因为他自己说了，有时也与他未成年的小女儿在一个浴缸里一起泡澡，就被公众看成像一个怪物，并且在一次科学大会上甚至被一个女人以一切“母亲”的名义扇了耳光，那么此时此刻正在实施一种话语滥用。如果一切党派的议会成员，无一例外地认为通过更严厉的法律就能有效抵制（虽然知道并不能就此完全取消）儿童色情和性旅游业，那么很显然，话语也进入了议会的层面，并有效地排除了最后一个对它持有怀疑态度的议员。

尽管现在也有一些男人因为遭受老婆的毒打而出逃，但罪犯这个概念仍然一如既往特指“这个男人”（罪犯这个词在德语中是阳性的——译者注），这也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为不顾一切现代化的进程，父（男）权制的社会结构仍然在延续；也因为在经济危机时刻，对女性的社会歧视令人愤慨地又在递增。悲观地看，当前的话语暴力和话语滥

用，无疑是普遍化错误生活的一种隐喻，在这种错误生活中既没有和谐也没有对话语的一种正确使用。积极地看，它在强调的意义上是一种文明行为，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进入我们的意识并使我们懂得：在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中，有着怎样的征服和不对称性。如此观察，那么我们就能看清，话语不仅受到普遍暴力和在根本上建构了我们社会的物化语境的影响，而且它自身也同时就是一种启蒙，可惜它只是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启蒙，这个领域中的澄清和批判在近几百年来几乎都不需花费什么经济成本。比如，大家都反对儿童色情，但是严肃制定一些确实能够挽救儿童生命的方案却少之又少，因为这需要付出金钱和舒适生活的代价，并且也要求整个社会从今往后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现在要问的是，究竟是性虐待和性暴力确实如此横行，还是这仅仅只是我们的感觉和印象，因为我们最近几十年来对这类问题变得越发敏感。鉴于两个原因，我们并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具有可信性的回答。一是在实证研究中，对“性虐待”这个概念的定义都各自极不相同。不仅是对受害人年龄和其与罪犯年龄差的认定有所不同，而且也在对犯罪行为的调查方法、社会心理背景和法律后果的认同上不尽相同。仅仅出于这么个理由，就无法对一切性虐待案件进行统一的比较。第二个理由还更重要些。由于机制结构上的原因，即使前些年的实验研究列出了形式上与今天完全相似的提问，我们仍然没有可比较的以前的数据。这些数据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在不断地变化。那些在以前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在今天却已被许多人看成是性虐待或性侵犯。如果这么一个变化进入到我们的感受、表述和反映中，这就涉及了法国话语理论意义上的一种话语机制。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已经有了自己物质性的文化设置。

性侵儿童对他们造成心理创伤的成人，肯定是个魔鬼，并且我们也预料到，疯狂的女权主义者会把这类魔鬼画在墙上（昭著于世），但是对儿童造成心理创伤的不只是男人，而且也有女性，这已是无可争辩的

事实。除此之外，我们再也不能当真怀疑，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一种令人害怕的范围内只是无意识地与破坏力聚合在一起，而是应当认识到，这种破坏力在许多“正常”的家庭已经表现为公然的暴力。按现有的一切数据，绝大多数的性侵犯不是陌生的魔鬼，而是由受害者自家的亲戚、朋友和熟人施加的。显然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常常是可怕的。自这个世纪第一个十年末的揭露以来，全世界也都知道了即使是极其保守的天主教神父和极其自由的基督教教育者，也在某种程度和以某种方式对那些因为信任而交付他们托管的儿童造成了性心理创伤。这甚至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的窒息。

52 儿童情欲和与之相对立的纯洁儿童形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没有比有关儿童性欲和性行为的事，更受禁忌的了。与此相关的一切，对我们来说一如既往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恋童癖和涉及幼儿的性欲性行为，仍然是一个极大的禁忌；尽管鉴于新性革命，许多原先遭受迫害、遭到耻笑和被标示为变态的性癖好和做法，在今天的公众眼里已经变得温和了些。但是由于太多关于心理创伤和心理病化的谈论而使人忘却了：情欲，这种在一个儿童和一个成人之间自发出现和形成的那种情欲，是一种无限美好的感受。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强烈地使人回忆起儿时的天堂。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身体和心灵的情欲更纯洁和更无害。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人性。所有成年人，如果他们热爱情欲，便都会不由自主地尝试再次回到童年。他们情愿放弃成人世界的一切算计，来赢得纯粹的情欲。并且儿童的情欲不仅能给儿童带来极其快乐的感觉，而且也是不可或缺或者说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可能性中的一个条件。作为个性化的主要源泉，它平衡了亲近与距离的关系，也平衡了幸福感与性欲快感、信任自己与信任他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而如果没有这些感情也就不可能会有爱情。谁如果从没在儿时情欲的天堂里生活过，在以后的生活中就很难设身处地去感受另一个人的情感，也很难毫无恐惧地去爱

自己的所爱。这样一个不敢爱自己所爱的人之子，往往有着灰暗、僵化和呆板的个性特征。他的眼睛和心灵都没有光泽或是光芒。但是如果这种儿童情欲过早地性欲化，就有可能构成一种危险，在成年后突然将情欲骤变为破坏行为，因为这个人从没学会应当怎样妥善处理总是会伴随爱情和性欲性行为出现的情感、挫折和攻击性。

在反对性虐待的斗争中，只有走一条虽然有风险却更有效的中间路线，即着力于发现和消除可能造成儿童性心理创伤的行为和事件，但又不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情欲置于一种普遍的怀疑之中。因为对儿童情欲的禁忌，必将导致儿童由于儿时情欲的缺乏而在未来的生活中成为性暴力的施加者，这正是我们都希望阻止的。

最初由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在一百多年前思考的捍卫儿童纯洁并因而将儿童情欲禁忌化的社会运动（请比较比如：Mantegazza，1873；Moll，1909；Freud，1905），有着一段漫长的前史。在我们的文化圈中，最晚自18世纪以来，由神学家自发倡议并主要由教育学家在两侧助威，开始了一场著名医学家反对一切在儿童年龄段出现涉嫌和实际的性表述和性表现的社会运动，这场社会风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以手淫、自虐或自慰等表述，用一切可想象的弱点、灾难、道德腐败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性行为加以指责，并以这些行为将会引发的疾病，从便秘、癫痫到肺结核和精神错乱直到死亡，来威胁他们。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手淫被说成比任何其他疾病都更糟糕，它是一种致病的剧毒根源，但它又不能为诊断和鉴别病情提供一种可认定的症状，也没有一个可让他人设身处地想象或追溯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每个布道者和每个庸医都能做出一种后手淫疲惫综合征的推测诊断，也使每个人都能从自己任何疾病的症状中得出如此结论，这就意味着在那些想上升到把握社会解释权和控制权的医生们的手中，塞进了一件有可怕杀伤力的武器。

像在一切话语中都曾出现的情况那样，当时也只有个别思想家和医生能够摆脱这种普遍传播的对自慰危害定罪的影响。所有的其他人，甚至包括伊曼努尔·康德，都相信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这种“自我伤害”会毁掉他们的生活并最后导致死亡。比如康德就曾说过，“这样一种对自己生殖器特性的违背自然的使用（也就是自虐），是一种并且是在道德的最高程度上的反自我冲突的责任伤害”，这样的行为表现出这个人，是“会将自己贬低到像畜生那样地对待自己”。这种恶习显然不仅使这个人“忽略了这几乎是一种自杀的意念”，也使这个人“成为一种可享用……的物品，这就是说成为一件令人感到厌恶的（物化了的）客体对象”（Kant，1797/1798：557 f；Alle Hervorhebungen von Kant；也请比较Kant，1803：759 ff）。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个时代的医生报道，按这些医生报道所说，那些没有任何事先预知也没有任何伤害作了自慰的年轻人，在偶尔听说或得知这一行为会导致生命危险的时候，突然间全都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比较Sigusch，2008a：32-39）。引人注意的是，在社会掀起反对自慰的风潮后，那些宣传小册子的作者似乎就认为这一切与快乐—乐趣—快感—爱神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Ninus（我们今天总括为性欲和性行为），已经完全不再相干——这证明了：情欲色情和性在那个时代还没成为普遍的文化模式。当时所谓的性，更多认为只要将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已被认为是手淫（Masturbation）和自慰（Manustupration）；这就指明了这个过程以后被确认的双重意义，因为自慰（在拉丁文中manu意即“自我”，stupratio是“引诱”）更倾向于被认为是用手亵渎自己，而手淫（Mas是指“男人”，turbatio意味着“困惑”）则更倾向于指男人的性兴奋。

在反手淫的高潮期，出现了一场至今仍是谜一样的、令人几乎不能想象的大规模追捕，对无数儿童和青少年造成了无尽的心灵痛苦和残酷的身体伤害，甚至死亡。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仅设想出更多的机制性手段来折磨那些出现了不由自主的性兴奋和对生殖器官作随意刺激的青少年，而且也对他们施行了割去阴蒂，穿刺阴茎和切除包皮的手术。手

淫是一种自己授权独立的，如同思想和幻想那样很难加以监控的性行为，它在事实上也是当事人唯一能够独自决定的一种性实践（另外，一切实验研究都表明，它也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唯一一种在数量持续递增的同时质量也有明显提高的性实践）；但是反手淫宣传认为，这种实践是一种异基因和自体病理化的过程，它将使儿童和青少年由于承担监护和教育责任的成年人的疏忽和过错，由于当事者自身的软弱和生活罪责，以及由于心理障碍和异常态而由各方都无法封闭或杜绝地陷入一种罪恶的源泉，这是一个令人担惊受怕的过程，因而成人有十分的必要对儿童手淫履行监管权和纠正权。

反手淫的这类宣传理论表明，自称是自主和拥有自我主权的现代主体，在他历史形成的那一刻，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撕裂，怎样自相矛盾地通过会导致自我亵渎的性快感寻找自我毁灭。由于驱逐了被称为自慰的销魂幸福，虐待被性化，放荡成为缉捕的狂欢。直到现在那些销魂者才开始明白，手淫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它只是传播了不成问题的快感，既不会把他们引向天堂和心灵的地狱，也不会败坏他们在地上的身体，直到他们中的某个人与蒂索（Tissor，1758），一个最著名的手淫魔鬼，一起将脑浆在脑壳里摇得沙沙作响。手淫仍让我们回想起，像我们已经听说过的那样，那两个流入和流出口；并且我们已经提及过的“手放在自己身上”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是自我性刺激和自杀的比较点。这类反手淫宣传也表明，现代的性形态在它的形成中是怎样因此而变形的，即如何在原有的罪孽和犯罪的罪名中又加上了如兽性行为、违背自然、不能自控、出轨、浪费最珍贵的生命资源、对自己身体的掠夺、功能失调，以及一系列由乱伦、犯罪、恶习、心理障碍和病态构建而成的异常态。

反手淫运动一个影响特别深远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给人特别深刻印象）结果是：幼儿的童年被持续地剥夺了情欲的快感，并且由于自我性刺激被如此恐吓地妖魔化，以致在很久以后的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能够

毫不过分地说，是他们“发现”了婴幼儿的性欲性行为和其自生性的（没有他人参与的）情欲。反手淫运动以及之后的话语也因此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鉴于我们文化中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只是一种符号象征，而且也在实质上是盲目信任、全部安全、不言而喻的无私奉献、相互关系的永恒持存和无性欲爱情的最后一个庇护所，因而我们应当看到，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去性化显然是极有必要的，并且也因为自19世纪以来，家庭生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情感化了，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家庭内部的乱伦风险。在今天也许只是一种一定程度的“自然”风险，如果所有的父母都很自然地爱上了自己独一无二聪明美丽的孩子。因此总的来说也不必感到惊奇的是，父母在对待婴幼儿自生性的性欲和性行为时，常常在过分夸张和轻描淡写，故意悲剧化和忘却压抑之间摆动。

清醒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婴儿与成人的性欲性行为有着极其不同之处，相互间绝没有可认同性；但这两者同时却又有相互关联，因为一种性形式来自于其中的另一种性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因而也就能把儿童的性欲称为“原型的性欲性行为”（Protosexualität），它实际上是成人性欲性行为的前形式，成人在儿童时代的所有经历，身体、心理和社会经历，都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进入（或是说储存在）这个前形式中。与成人的性欲性行为相比，婴儿的性欲性行为则更具有实验性、自发性和自我相关性，在进入青春发育期之前也没有成人性欲性行为的那种连续性，但从青春发育期开始其性欲性行为便有据可查地出现递增，也包括所谓的性潜伏期。儿童的性欲性行为并没有像成人那样的性高潮目的，可以说，更是一种没有高潮的游戏，比成人更远离道德标准，当然也与身体的再生殖毫不相干。鉴于儿童的性欲性行为并不是一种对既定主流的性及其关系道德的有意识反思，因而它不具有共识力，也就是说，一个儿童不能综观，如果他与一个成人发生性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

按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2004b）所说，迄今为止一切有关

儿童性欲性行为的研究，或是可以归为一种同源性模式，或是可以归为一种异源性模式。异源性模式的倡导者，尤其是那些心理分析学家，坚持的是儿童性欲性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它与成人性欲性行为在结构和实质上的差异性（另外也请比较30章）。同源性模式的倡导者则相反，强调儿童与成人性欲性行为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他们主要统计了两者之间量的差异，对儿童性欲性行为的准成人模式感兴趣，并把它看作以后性欲的前模式。这种同源性理论模式的代表主要是一些性学家，其中不乏一些性学开拓者如保罗·迈特戈扎，哈夫洛克·埃利斯，阿尔弗雷德·C.金赛以及他们在当代的代表，比如自21世纪开始以来围绕在金赛后继者约翰·班克罗夫特（John Bancroft，2003）周围的一些性学家。

同源性理论构思的代表以事实证明了，儿童的身体也能出现成人性欲性行为想象意义上的性高潮反应。在出生的最初几天中，婴儿身体的生殖器部位就会出现相应的反应。按现有的观察（Kinsey et al.，1948，1953），男婴和女婴最晚在4～5个月的时候就已具有达到性高潮的能力。婴儿的性高潮——在男孩当然直到射精——似乎与成人的性高潮并没有生理上的差别。希施斯普龙（Hirschsprung，1886：629）100多年前在关于婴幼儿手淫最初一些重要研究的一份论文中写道：“……典型的是……（他们）双腿交叉而坐，然后身子前后来回摇摆。这时他们的脸通红，眼睛全神贯注，完全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直到达到高潮。他们情感的这种爆发，往往以一种呻吟和虚脱作为结束。”

婴儿期和幼儿期普遍存在手淫。弗洛伊德1905发表的《三篇论文》中也曾写道：几乎没有一个个人能够逃避它。施密特（同上：316）报告说：“今天大约有40%的年轻人回忆自己在前发育期曾有过手淫，大约有60%的年轻人在前发育期曾与他人有过性游戏。这个数字明显多于前自由化时代，也就是比如多于金赛的调查数据。并且这种变化在女性那里比男性表现得更强烈，性别的差异因此而得以平衡和相近似。”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金赛曾报道说：曾经观察过成人性行为的317个青少

年中，有30%的人在2～12个月的时候，有60%的人在2～5岁的年龄段里，并且有80%的人在10～13岁的年龄段里，曾经体验过（或是说达到过）一次性高潮（Kinsey et al.，1948）。在金赛采访的女性中（1953），有14%的人能够回忆起，在发育期前就曾有过至少一次的性高潮；这个数字是当时表明至此感受到性高潮女性中的一半人数。如果有关性的学习程序在我们这里不是这么被严格阻止和延后，那么极有可能几乎所有的儿童早在发育之前就体验了性高潮。因为事实上，儿童在发育前就已有了一种高度的性能力。男性青少年甚至有能力达到多倍的性高潮，而这种能力在发育前为最强。比如一个4岁的男孩在24小时内甚至达到过26次性高潮。与此相反，女孩达到多次性高潮的能力则与其年龄成正比。

同源性科学家总是一再报道，儿童也有完全的性接触。比如福雷尔（Forel，1909：98）就曾写道：“他7岁的儿子……完全从自己出发开始追求女孩，用糖果把她引诱进灌木丛或是其他可以隐藏的地方，与女孩进行一种完全实在的交配。”一份来自圣路易斯一个黑人贫民窟的报道（Hammond und Ladner 1969：120）上写着：“许多母亲在骄傲地叙述她们幼小儿子的一些性征服……一个母亲……甚至认为：‘这个地区的儿童比其他地区，要成熟得早。5、6岁的男孩有关女孩和交媾的知识已经知道得和我一样多了。我6岁的儿子已经与2个或3个这类渴望性交的小蜜蜂（女孩）做过爱了，我那个4岁的小儿子甚至教我，他是怎样把女人骗到手的。我并不去规定他们应当怎样生活——孩子们反正每天都能够在这个地区的楼梯边、过道或电梯里看到这类场面’！”在同源性学家报道这类事件之前，主要是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也曾表明，儿童的性兴趣能够强烈到怎样的程度。他们也为此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果成人不予以阻止或甚至如果得到支持，男孩和女孩在进入发育期的几年前相互之间就有了“完整”的性关系，比如在特罗布里恩（Trobriand）、Cewa部落或雷布查（Leptscha）文化中。在赫必族（Hopi）和Sirionó（玻利维亚土著，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译者注）文化中，父母会帮助自己

的孩子进行手淫。在波纳佩（Ponape）岛上，儿童从4、5岁开始就被传授性交行为（Ford und Beach，1968）。

提及这些其他文化只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儿童的性欲性行为是怎样依赖于我们的理念，而我们的理念又取决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并有着怎样的文化。大约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中与同源性理论并存的还有异源性理论。异源性理论所要求的父母与子女的一种严格的（性）分离，这与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论如何是不相符合的。

53 儿童的性欲性行为与医学

虽然近几十年来，儿童性欲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某种程度来说，已在家庭中为父母所熟悉，并且今天的家长也看到，3岁的小孩已在开始玩“医生的游戏”，但儿童性欲性行为仍一如既往背负着一种禁忌的罪孽，这种禁忌也通过绝大多数成年人对自己早先童年的记忆缺失而得以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下来。即使在今天，这种集体性否认的阴谋仍非常巨大。在童年可能遭遇性侵的成年人所特有的恐惧和负罪感，需要无性和无辜（纯洁）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对立形象和逃避所在。这也反映在我们的社会仍然一如既往反对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和启蒙。由此导致的一种结果是，比如我们的社会至今没有一本专业的帮助家长解除对儿童性欲性行为这类问题恐惧的启蒙书籍，是的，这类书籍也根本不允许存在，因为这会被认为是知识社会的一种耻辱。

事实上，儿童性欲性行为完全不是什么有害或异常的，当然也更不需要治疗。它只是在特定社会关系条件下通过一种二次问题化才形成的问题。这里需要警告的是，特别要防范医生的“过度”添加，这种添加并不是有关手淫的修辞描述，而是往往把似乎已被克服的偏见，又从后门放了进来。事实证明，所谓手淫也只能是按当事者自己叙述的恐惧和道德想象来加以继续或狭义的解释，因而按常规并不能对这样的叙述做出

认定，也不能用于科学研究，否则这就是危险的。手淫这个概念的逻辑内涵，已经导致社会不负责任地运用抗雄激素抑制儿童性欲的合法化，也就是说允许运用最严重的“治疗”暴力。

医生应当从根本上放弃治疗婴幼儿性表现的企图。他们应当做的是对儿童表现性欲性行为的现象通过社会心理医学去问题化。儿童心理医师特娅·舍恩菲尔德（Thea Schnfelder，1974：31；也请比较：Meyenburg，200b；Richter-Appelt，2000；Quindeau und Brumlik，2012；Briken et al.，2010；Briken und M.Berner，2013）在几年前已经对婴幼儿手淫做了这样的处理：如果在该儿童的身上不出现伴有长期后遗症的神经伤害和一种固定类型手淫的儿童早期严重脑损伤，一个医生现在更需要做的是减轻家长的担忧和性恐惧；在给予这个儿童一种完美治疗的同时，可能也要对其家长进行相应的心理治疗。“如果，”如舍恩菲尔德所说，“在这个儿童的症状中能够辨认出该儿童周边成人和看护人的一种神经质错位的话。”

感谢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医师贝恩德·迈恩堡（Bernd Meyenburg，2000b，也请比较2013）用他的数据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概况，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医生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些性与性别的紊乱和障碍。他的样本是1987～1997年期间在法兰克福（美因茨）大学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院寻找治疗的至多到18岁的2700名病人（他们中男孩1756名，女孩944名）。他们中只有10个男孩（没有女孩）在首次诊断中被确定为有一种“性心理障碍”。这些孩子的年龄在5.6～18岁之间。另有年龄在3.7～18岁之间的17个孩子（其中男孩13人，女孩4人），被第二诊断或补充诊断认定为有一种“性心理障碍”。还有年龄在3.1～18.1岁之间的63个儿童（其中35个男孩，28个女孩）在心理病理学的调查中被认定为一种性心理紊乱。在病人样本中总共有2.3%的孩子被观察到有一种病态的性征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女孩多于男孩（3%：2%）。特别有教育和研究意义的是迈恩堡列举的一些详细的案

例分析。比如他报道说：

——一个3岁的女孩，在她最初两年的生活中，遭到亲生母亲的殴打和极度冷落，并遭到（外）祖父的性虐待，被寄养在养父母家中后，常常整天都在手淫，显然是在期望达到性高潮。

——一个来自中规中矩学者家庭的13岁男孩，常用女人的丝袜来为自己获得性刺激，并更愿意成为一个女人，总是想改变性别。但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后，便失去了恋物癖的爱好，性别的不确定感也在发育期的过程中随之消失。

——一个13岁的女孩在学校的厕所里脱个精光，引起男孩的一场骚动。她的养父母也向医生叙述了她的其他一些性攻击和失控行为，这个孩子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在一家（孤儿）养育院度过的。儿童心理医生诊断为一种特别糟糕的自我形象和一种早期依恋障碍。

——一个14岁的男孩用嘴去接触一个6岁女孩的阴部，并要求一个4岁女孩把他的阴茎塞进嘴里。儿童心理医生最后的诊断结论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青春期性本能冲动的压力，而不是恋童癖倾向。

——一个17岁的男孩，先前因精神分裂式精神病导致的一种自杀企图而住院治疗，现在则希望能改变自己的性别。心理治疗的诊断是，一种内心充满冲突，有极度羞耻感的同性恋心理发展，并伴有一种渴望依赖他人，被他人侮辱、捆绑和殴打的愿望。在治疗过程中，当该患者能够满足自己同性恋和性虐待的愿望之后，他也就放弃了原有的改变性别的愿望。

——一个有些结巴的17岁的土耳其少年，抱怨没有射精和性高潮。只在12～13岁之间出现过两次夜间的遗精。医检的结论是：对女人极端恐惧，对自己极度严厉，害怕和远离酒、咖啡和辛辣食物以及过度的体育运动。由于该患者拒绝与医生进行更进一步的继续谈话，只能初步诊断为性高潮障碍。

如果一个儿童或一个青少年表现出一种不符合我们文化身体性别的非常态行为，并希望通过外科手术将自己转变为另一种性别，那么作为一个专业医生很难在事先预见，性别的这种改变究竟将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因为对治疗史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个孩子或青少年在以后的生活中既有可能成为一个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者，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易装癖、跨性人和变性者。出现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这种被医学至今称为性别认同障碍的性别感受异常，即使那些专业医生在职业生涯中也很少遇见（Meyenburg，2007a，2007b，2013），因而作为当事者的家长面对孩子的这种性别非常态的行为和愿望，应当有一种极大的宽容。对这类行为和愿望的回顾性调查研究表明，他们中的极大部分人会在成年后成为同性恋者，一小部分成为异性恋者，更不要说那些不用医学干预的跨性者和通过手术干预的变性者了。

54 儿童的困境

儿童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没有什么保障和权利。但我们的社会究竟有多么敌视儿童，通常也就是这么说说而已，至今没有一份实证研究来揭示，众多儿童究竟是在怎样极其恶劣的生活状态下度过自己的童年。这当然主要是指一如既往仍然使许多儿童感到恐怖的机构如学校，这是儿童们怀着焦虑和恐惧，伴有头痛和肚子疼，一年年必须去的机构，为的是在那里违背自己的意愿学习如何能做到独立静坐和该死的自私：这是一代代人哭丧到天堂的一种普遍丑闻，但这种哭声并没能真正打动过谁，甚至没有打动那些教育改革家，如果说从20世纪70年代教育改革还

遗留下了这样一些人的话。如果问一个成年人，哪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恐怖的时间段，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是上学时期。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出于自愿会想再回到这个多少有些残酷折磨人的机构中去。

即使在自己的家庭中，儿童们也经常遭受就像那些不再能够自卫的老年人那样的恶劣处置，遭受随意凌辱和谩骂，没有人会因此伸出援助之手。一切征象表明，狗和猫、仓鼠和虎皮鹦鹉都普遍比柔弱的儿童和老弱的老人得到更有爱心的待遇（73章）。在美国，每年大约有6万儿童死于他们自己父母的虐待。在我们这里，死于这个原因的儿童人数远多于所有死于因病感染的人数。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03年9月的调查，每星期至少有两名儿童死于这个原因。在那些富裕的工业国，每年大约有3500名儿童死于暴力和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德国儿童保护机构的报告表明，几乎每两个社会救济福利的接受者中有一个是儿童，具体的数字是100万。通过将社会救济与失业救济合并的社会改革，在原有100万的基数上又增添了50万儿童。

从根本上说，所谓的监护人可以完全随心所欲地处置儿童，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在心理和社会上忽视或冷落儿童，也可以随意孤立、折磨和羞辱他们。许多儿童并不在一个乐园中过着自己的家庭生活，而是在一个地狱中。即使是性侵犯和虐待通常也不会被发现，并且性科学家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1997/2002）的调查研究表明，许多性侵性虐儿童的罪犯都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在一次问卷调查中，那些被调查的大学生们陈述的那些童年时代遭受性虐和性侵事件，没有一件最后得以报案。这就为我们勾画了一种特定的困境。一方面是我们所称的童年成为一个监狱，它有着不同于外面的法律。另一方面是如果一个儿童向外界公开说出自己遭受的性虐和性侵，就要冒失去家庭的风险，被遣送到一个孤儿院或儿童养育院。这一切也由于每个家庭不同的特殊状况而变得更为复杂：无助的母亲调转目光不敢正视正在发生的性侵或性虐，因为她不想失去她的丈夫；一个粗暴的父亲却一次次给予女儿“资助”；那个酒鬼

在清醒的时候已经无法想起他曾在酒醉的时刻强迫儿子为他口交；一个被冷落的女孩，为了引起人们对她的关注而过早地故意展示自己的身体魅力，如果恰恰该她倒霉的话，她会被带到儿童心理医生那里，而如果恰恰这个心理医师爱虚荣和偏执的话，他就会编织一根束缚她生活的绳子。

毋庸置疑，许多儿童在我们的社会中遭受到极其随意的处置，也必须忍受许多暴力，但是只要有哪个罪犯被确定做了这类事件，我们的社会就会屈服于一种集体性否认阴谋，大声叫喊：不应当把纯粹个人的罪恶看成是社会的普遍罪恶，应当受惩罚的是这个作为个人的罪犯，而不是社会。这种要求报复这个罪犯的喊声越是强大，对罪犯的“惩罚”越是快速，越致命的便是叫喊者暗暗自责的良心，不允许自己的良心知道事实的真相，否则自己的良心就会难以承担真相的重负；或者甚至潜意识中克服自己肮脏的渴望，要求在他的心灵中表现为肮脏的反面。这个过程越是短暂，它的前史也就越是漫长。对性罪犯的“惩罚”毕竟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那些高喊要求以死刑惩罚性侵儿童罪犯的人们，无非是想通过这类叫嚷完全摆脱自己与暴力的关联，最可能地远离性罪犯，却在做着与罪犯有着相同意志的破坏和物化的前期准备。只是为了心灵有墓园般的静寂而不愿识别，自己与那个陌生的罪犯有着怎样根本相同的行为和表现。

要想完全不再轻视儿童和青少年，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这才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最好保护。只有这样，儿童和青少年才不再只是生活在我们社会的边缘，而是理直气壮地站立在我们社会的中心。他们会因此而更有自我意识，并运用自我意识在一种相当的高度上保护自己。应当选择最有爱心和最智慧的教师，他们应当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并得到比足球运动员更好的报酬。应当按每个儿童的特长和爱好加以辅导和支持。应当设立一个亿万元资金的国家青年就业机构，帮助那些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少年。按儿童的需要

和特点设置道路交通，不允许在儿童所经的道路上置放广告。有儿童的家庭应当得到足够宽裕和安静的住所。应当提高家长对自己工作和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只有心理放松的家长，才能无私（或不求功利）地爱孩子，才能让孩子不受色情和性探险干扰地生活和成长……儿童的家长如果在自己昔日的儿童时代既没有受到过分的心理创伤和由此引起的恐惧，也没有遭受过过分的羞辱，他们在成年后也就不需用崩溃、无能为力和破坏性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也就不需通过对一个弱者重复施加自己儿时遭受的迫害来抚平自己原有的心理创伤。只有到了这么一个时刻，那么暴力作为解决冲突和重构心理平衡的手段，也就永远地失效了。

但这一切都还只是幻想。事实上，只有利己主义才能往前行进。因而在5个家庭中倒有4个家庭没有孩子。显然是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种阻碍。社会仍然如同在弗洛伊德时代那样，不对儿童做任何事先的准备，一旦成年便将他们放进爱情生活中去，就好像我们派遣出一支前往南极的探险队，却不给予任何相应的装备。可以看看，这种探险队将会如何迅速地搁浅和遇难。但是直到如今，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出面呼吁要求特意为此设置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和青少年机构，其理由是：按德国现有的经济力量，无法承担这么一个经济负重。

55 性侵、心理创伤和罪犯等范畴之间的差异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幻想而是现实地想去做些事情，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应当思考“滥用”（Missberauch）这个范畴的不适用性。从语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中并不存在一种对儿童的性“使用”，即我们文化的习俗或其他理由，并不像某些距离我们遥远的社会那样，允许成人对儿童的性使用，当然也就不存在“滥用”这个问题（鉴于这个理由，我选用了“性侵”或“性虐”来取代“Missberauch”这个词的本义“滥用”——译者注）。从科学和临床的角度来说，这个伪范畴将一些最不同的事件和行为都扔进了一个锅里。

只要在这里提出一些包括在这个范畴内的不同状况和事件，很快就会明了，这些不同事件有着极不相同的影响。比如应当区分的有：

——带有或没有身体接触的过早性化，以致并没有出现“性侵”固有模式的实际具体的性侵行动，但正是这种过早性化的模式，容易使人忽视和低估由此造成的心理创伤和幻想行为；

——由家人或外人所造成的性心理伤害；

——带有或躯体性侵或性虐的性心理创伤；

——社会不想大声说出的那些有器质性脑病的老年男人对儿童的笨拙性攻击；

——由无法摆脱对儿童的心理依赖的有恋童癖的男人造成的性心理伤害；

——成年妇女间或男人间的情欲色情或性关系，据在这种关系中成长的青少年在成人后说，这类关系对自己得益多于伤害，给予多于被要求；

——毕竟，从暴力行为一直到谋杀，都可能有极不相同的原因；与此相同的是从性冲动到破坏冲动，从对唾弃的愿望和恐惧的无意识自卫，一种性虐恋的过度发展，一种攻击行为的次级性化，直到一次孤立的有着强迫性质的性行动，相互之间也有着极大的距离。

总括一下：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性滥用以及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由滥用而造成的性心理创伤，是不存在的（请比较：Meyenburg，2000a，2013；Dannecker，2007b；Richter-Appelt，2007b；Sigusch，2010a，2011c）。

与此相应的是，因此也不存在那个性滥用罪犯（关于类型化的尝试，请比较：Schorsch，1975/ 1980；Bosinski，1997a；Berner und Hill，2004）。我感觉这里首先要区分：

——在绝望、混乱和拥挤的社会境况中生活的一个反社会和有人格障碍的男人，经常在酒精的影响下，性侵自家或邻居家的孩子；这首先（在第一层面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生的问题；这也是某种程度的社会心理的遗传，是他将自己在童年时代所遭受的性心理伤害，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不得不以相同的形式再一次重复，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特别带有基于自卫机制的目标，以便抚平自己原有的心理创伤或是以一种与抚平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个因情景做出反应的成年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在一种独特的、充满了性吸引力的境况中与一个孩子相遇，他原有的道德顾忌一下子全都消失在他的性渴望中；按性试验研究（Freud et al.，1972）得出的结果：大多数“正常的”，之前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恋童癖倾向，因而也没有受过刑事处罚的异性恋男人（迄今为止没有对女人做过这类测定），都会在测量身体反应时，面对裸体女孩的图像，出现一种明显的阴茎充血，而且经常自己并不知觉；

——正处在发育期的少年，在他可抓到和控制的孩子身上实践他人生中第一次人与人之间的性尝试；

——对那个情感型的，在精神或社会认知上发展迟缓的，或持久残疾的青少年或成人来说，与他同龄的人相比，儿童是更合适的性伙伴；

——那个有恋童癖的男人，他对那些前发育期的儿童只是以“纯粹的心”相处，但有意识地放弃与他们有更进一步的性接触，因为他知道，在一个成人与一个儿童之间的性想象、象征化和权力诱惑太巨大了，不可能在相互间做出一种自由的、两相情愿的决定（比较

Ferenczi，1932/ 1933；Dannecker，1987b，2007b；Becker，1997；Schmidt，1999）；

——那个恋童上瘾而不得不以一切手段将前发育期的儿童引入自己特有的性模式中去的男人；

——那个只是将儿童作为自己非常态性取向替代品的男人；

——那个有着多性恋癖的男人，经常出乎意料地将自己突然对某种性的欲望付诸实施、加以体验，对他的行为也就不能按通常有关性行为的分类，如恋物癖、恋童癖、露阴癖、窥淫癖、虐待狂、受虐狂或易装癖，加以分类或是说对号入座；

——那个在“变态母爱”（Welldon，1988/ 2003；也请比较Becker，2002）意义上，将自己的孩子操纵成部分的性对象，或是用暴力折磨，直到形成一种乱伦关系的母亲。今天的理论已经确认，生殖领域在女孩的性心理发展中，起着一种比男孩重要得多的作用，其结果是：女性的身体自身以及与生殖和性相关联的心理病理学与男性心理病理学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女性的变态行为不是如同男性主要针对客体对象身体外在的某个部位，女性的变态大多表现为反自己身体的自身，或是反感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尤其是子宫，或是将自己的整个身体作为性器官，或是将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个内在的部分性对象（比较Sigusch，2005a）。因此一方面可能是件好事，理论界在今天终于承认了也有女性的所谓变态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自从心理分析家路易斯·J.卡普兰（Louise J. Kaplan，1991）关于女性所谓的这种变态，并没有明确的性化表现的研究发表之后，也使那些老一辈的性学家感到疑惑。

——那个没有完成性定形的成年人，不管男女，对他（她）来说，所谓性对象的性别和年龄都只有第三层次的意义或是根本毫无意义，因为他不能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发展感情，或是因为他缺乏一种固定的

富有个人情感的情欲和性的反应模式，比如一个神父，从没有体验过构成性心理认知的“医生游戏”，因而现在则通过有着心理障碍的能够被称为“神父游戏”的游戏作为替代补充。

——那个心理有病的成年人，由于一种心理病态或是一种严重的人格障碍，而完全失去自制地对儿童发起性攻击；

——那个年老体弱的男人，在迄今为止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性不轨行为，现在却出现了性侵儿童的行为，经常有情境的因素，且只是一些皮毛式的侵犯，并没有对儿童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经验的法院鉴定专家，如埃伯哈德·朔尔施（Eberhard Schorsch），在多年前就已主张，出于对双方利益的考虑，最好还是不要将该事件戏剧化（扩大化）；

——那个有着新性理念的性旅游者，没有任何道德顾忌，但有一种自己不愿承认的对与他同样强的成人亲密伴侣的恐惧，因而前往一些贫穷国家，就像购买其他一些死的物品（商品）那样地购买当地一些女孩或男孩的性服务，只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

这里再问一次，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想逐一对这些事件权衡利弊，但必须摆正相互关系：每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1400～1600名儿童死于交通事故，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在自己的家庭内部遭受性侵和生理心理的虐待，与此同时有4～6名儿童由于罪犯明显的性侵动机而丧生。但我们的媒体却制造了完全另一种状况的社会图像。另外，那些将一件所谓性趣谋杀的事件制造成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以提高发行量谋取暴利的媒体，应当为他们的毫无羞耻，受到社会普遍的唾弃和重金惩罚的威胁。受害者保护团体必须得到法律和财政的保障，应当按最高法院最新判决所允许的可能范围，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和经济上的保障。迄今为止，还总是那个罪犯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我们最近才得知，那些纳粹罪犯甚至可以作为战争受害者按法律享有战争

养老金。与此同样荒诞的是，罪犯能够得到一种由国家或医疗保险支付的心理治疗，而受害者却没有任何支持，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抚平心理创伤。

应当承认，设想借助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就能有效地防止出现由性犯罪所造成的性心理创伤，只是一种幻想。如果真的设立这种更为严厉的惩罚，那只是表明人们又一次把一切都扔进了一个锅里，并因此失去了一种更公正的目标。必须继续扩建治疗和护理罪犯的机制，并认可这是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其他的比如把所有的罪犯都关押起来的方法，并不是有效的替代方法。毕竟，我们在200年前并且在50年前又一次已经决定，绝不再回到中世纪去。应当不再只是暗地里批评那些明显只会用话语鞭打或不称职的鉴定专家，也应当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或是干脆不再使用他们的鉴定。如果谁明确批评了那个乱了套的鉴定专家，他并不是一个自己行业的丑化者，恰恰相反，而是一个自己行业的净化者。

谁如果作为一个儿童被交付或出卖给成人，成为这些成人的性对象并遭受他们的虐待，便如同进入了地狱般的生活。而陷入性侵话语的陷阱，对那些性犯罪嫌疑者和对那些因受审讯而备受煎熬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炼狱，特别如果那个嫌疑犯还是自己家庭成员的话。每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肯定在实际生活中经历过（看到或听到过），社会会用怎样恶毒诽谤的语言盲目地将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分离，摧毁婚姻，解体家庭，下达官方批文，认定专家鉴定，安排咨询，似乎不再有例行的无罪推定，似乎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关系，不再是儿童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也都知道，对一个所谓虐童犯漫长和庞大的审判程序，最终怎样因为真相水落石出而像一个纸牌屋那样地倒塌。

56 恋童癖与恋童的性欲性行为

冈特·阿门特（1980/1982）、马丁·丹内克尔（1987b，2007b）、冈特·施密特（1999）和赫伯特·克施温德（Herbert Gschwind，2005，2010）所谈论的关于恋童癖男人的“悲剧”和“存在主义式的孤独”，主要在于：如果一个儿童成长了，有了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神态和心灵，那么那些恋童癖的渴望也就结束了。如恋童癖或恋童的性欲性行为这些概念就已表明，这种关系缺乏一种互惠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性渴望，并不如在异性恋或同性恋关系中所存在的一种原则上由双方参与的互惠关系。一个恋童男人在拍摄他那个小爱人第一次射精的情景时加上的旁注：“射精，然后结束！”这种人生悲剧，如果用异性恋的关系来加以描述，那就是说，只要他的女伴一旦怀孕，那个男子就会对自己原先爱死爱活的女伴马上再也没有了任何性（兴）趣。恋男童的性欲性行为倒错，在传统上也被称为恋童癖，因为在这里实际都共同涉及对儿童的有意识的性（兴）趣；这种倒错的恋情总是单方面的，由于儿童在其身体和心理结构上还不具备成人的性意识和性渴望，也就意味着这只能是成人单方面的性渴望，而且它有着基本的时间限制，也就是那么几年而已。鉴于成人与儿童各自不同的需求、愿望和可能性，在强调平等关系的意义上，也不具备在相互间建构一种平等关系的可能，这就构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作为恋童癖，他只能像对待一个成人的性欲需求那样去对待一个他所渴望的儿童，虽然他很可能只是喜欢这个未成熟未成年儿童的稚气而已。

作为一个颇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伯纳（1996：1044）对此写道：“许多有恋童癖的人在他们与儿童的性化关系中，对他们所恋的儿童常常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关怀，轻轻地贴近拥抱、充满爱意的呵护和抚摸是他们主要的性化行为方式。他们也在这样一种令人心醉或融化的方式中，体验到了与那个自己有性渴望的对象的统一和融合，然而却忽略了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所展示的支配地位和对儿童所施加的暗示性压力。在对这些有恋童癖的人的心理治疗中，可以迅速辨认出，支配地位这个主题，即大和小、强和弱之间的对立，是他们的情欲和性化关系

中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个重要背景情欲和性化了一个还很有依赖性、弱小并有照顾和学习需要的儿童性伙伴与一个强大的、在想象中富有和付出许多关怀的成人性伙伴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多很快就会明了，那个有恋童癖的人的那种情欲想象和行动是在重复实施他与母亲关系中的某些要素，只是无法找到一种能够解除这类隐形的攻击性冲突的方法。”

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那些有恋童癖的男人在生活中经历恋童这一悲剧是各不相同的。许多有恋童癖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其中也包括道德和宗教戒欲的理由，也许只是在互联网上看一些裸体儿童的照片，但并不与发育前的儿童有身体的性接触和实践。极少数人会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暴力。另有一些人由于他们已经上瘾的性欲倒错而对儿童使用一些让一般儿童无法拒绝的手腕和诱惑来实施性行为，这些人无疑需要得到治疗。比如有一个非常事业有成、在他的周围环境中也颇受尊敬并已结婚的恋童癖患者，经常从邻居儿童的眼睛中看出他们的愿望并予以满足；这些儿童的家长甚至都为此感到高兴，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愿意围绕在他的身旁，大家都因此感到幸运。只是这个男人并没有如那些儿童家长所期望的那么好。他使这些儿童陷入一种对他的依赖，当这些儿童再也不能摆脱依赖他的时候，这种依赖性就达到了一种不能令人接受的程度。但是儿童对他依赖，并不能满足他对儿童的性渴望；为了能够在儿童昏睡的状态下自由地玩弄他们，为了“能够”性侵他们的身体，他给儿童下了麻药。

其他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相对正常的恋童癖，大致活动在这两种极端边缘（只看图片和使用麻药）之间。对于他们的活动给儿童以后的性关系和心理所造成的伤害程度，专家们至今颇有争议。比如劳特曼（Lautmann，1994）在采访了60个恋童癖患者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使用不同寻常和各自不同的与那个孩子达成共识的策略。而施密特与丹内克尔则基于临床治疗的经验确信：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么一种与儿童达成共识的努力。他俩都在前发育期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性欲和

性行为中，只看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施密特（1999）和丹内克尔（2007b）都强调，由一个成人付诸行动的期望和意义理解与儿童对这同一行动的期望和意义理解有着极大的区别，或是说一个成人对自己付诸行动的这种情景想象，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根本没有能力想象的。

施密特（同上：138）就此得出的结论是：成年人与儿童的性接触，即使这种接触的实施不是通过暴力或公开的压力，也有着给儿童留下一种永久心理创伤的风险。另一方面，从他的职业经验来看，成人与儿童的非共识性的性交往，“虽然没有给那个儿童留下不可治愈的心理创伤，但仍然伤害了当事儿童的自决权”。恋童癖患者的这种倒错的性欲望和性行为，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实施的性模式，因为这种性模式必然蔑视英国社会学家所说的那种“亲密公民权”（Intimate Citizenship），即在一个文明、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里，性行为的付诸实施首先要有义务遵守平等和自决的价值，因而要尊重对方的自主权和不同要求。但是那些恋童癖患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也就在今天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法律追究。但是由于恋童癖患者自身结构的性渴望只能是针对一个儿童，而不能够是其他人，因而他们也不应当为此受到歧视，而应该如其他人一样得到尊敬和（治疗）帮助。

丹内克尔引进了拉普兰济（1988）的思考，拉普兰济的理论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同一类性事件，有时会造成心理创伤，其他时候却不会。按事后记忆的定理，通常留在无意识里的只是一种两个在时间上相互分离事件的关系。简而言之：如果一个恋童癖患者的现实诱惑，恰巧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人的生存条件中母亲的“早期诱惑”，这就决定了这种诱惑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类被诱惑的儿童在成年后要想相对没有冲突地应对早期诱惑留下的创伤，以确立自己清晰的性取向，似乎只有通过伴随着发育期出现的性成熟，不断地将以前由于诱惑而进入自己性关系中的外来者和性刺激者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加以理解，并进而加以心理整合。”（Nannecker，同上：298f）

把眼光投入到我们的文化中，就会发现，尽管禁止性侵儿童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同样高涨的恋童癖患者的倒错性欲，却在按市场经济的逻辑而不断多样化。原先那个孤独而审慎的恋童癖患者，现在成了全球化的性旅游者，在一些贫穷国家里多少得到父母的允许而性侵其孩子。因此也就再次明确地证实了，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什么人和没有什么事能够逃避像物那样被使用的命运。除此之外，这些新性主义的小市民也证实心理分析和性科学从最初就对他们抱有的一种怀疑：这些市侩只有贬低和掌控自己的“性对象”，才能获得“性能力”。

但是我们的社会在恋童癖问题上的丑闻是，由于受话语滥用的蒙蔽而不能认清，恋童癖患者在总体上都愿意向儿童许诺关怀和爱情，只是几乎没有人会喜欢他们。恋童癖患者不会在他的拜物神那样的爱车上贴上一张“用心爱孩子”的纸条，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孩子以一种完全正常的方式全部掏空了。他们是如此认真地在对待他们的拜物神——那个孩子，甚至连电视节目都无法制作和表演出他们的认真。许多孩子感受并享受他们的认真。因此也就有许多恋童癖患者，为那些被有害家庭关系抛弃的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没有时间限制也不以身体的成熟为界限，这个令人确信的例子说明了：对一切性虐和性侵儿童者的普遍定罪和谩骂有多么错误和不公正。

另外，我们坚持认为：在一个成人与一个儿童的性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不是现实的事件，而是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加工和处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身体严重伤害的性侵却能够通过心理处理而没有留下心理创伤，而身体受到较轻伤害的性侵却留下了一种严重心理创伤后果的原因（比较Richter-Appelt，2007b）。

57 个人关系与性体验的解离

如果我们相信媒体的报道，那么近几十年来广泛传播的就是：人的

情感反应也包括爱情，就像动漫人物那样，只是一种对物的反应，或是说只是一种物化的反应。欧美当前正在兴盛的生意是真人大小的硅胶娃娃，由Abyss公司设计和生产的品牌“实体娃娃”，价格8000欧元，可按购买者的特殊意愿，如脸型、肤色、身高、体重、头发和阴毛的颜色、体形和眼球的颜色，加工完成。如果有谁无法一下子付那么多钱，也可以租一个符合他意愿的娃娃，每夜的租金目前是250欧元（Quadrino，2008）。

除了个别购买男娃娃的女人，绝大多数的硅胶娃娃购买者是对以这种方式满足自己性欲感兴趣的男人。按已经存在的硅胶娃娃互联网论坛的统计，这个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万名这样的顾客，购买（租赁）者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正是出于不同的动机，如果我们把对一个硅胶娃娃的情欲或性欲与通过心理分析而推论出的拜物主义的心理机制简单地重叠在一起，无疑是错误的。在硅胶娃娃的消费者中有年老和丧偶独居，因而想有个“人”躺在自己身边的，也有因为残疾而无法与一个自己心仪的活生生的女人相遇的。另有一些消费者或是寻找一种特殊的性体验，也可能特别害羞或是由于以前的心理创伤不能够与一个活生生的人建立一种爱情或性的关系。

性体验与个人关系的解离，因此就成为这类新型性事件的特征。性的主体并不要求性的对象和爱的对象在事实上狭义地统一为一个客体。那个硅胶娃娃，总是在她（他）应该在的地方，不会抱怨，不会反驳，不会有外遇，也不要求购买昂贵的服饰，更不会怀孕、变老或变丑。因而也不用感到奇怪，那些新型性实践者报道说，他们与自己的爱娃娃有了一种情感关系，会细心地照顾她，为她洗澡、穿衣、梳理、化妆，也会在交媾前为她涂上润滑油，以免伤害她。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解离。如果人们一旦发现了这种解离，那就会不断再想出下一个解离，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欲与性欲性行为的分离。

事实上，今天社会典型的拜物神化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众对无生命物的崇拜，甚至手提包和手机都具有了色情的意义。比如有预谋有目的地制造母亲身份和父亲身份的解离，如果一个妇女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比如高度、眼睛、智商、幽默等）寻找一个捐精者（大多发生在外国和度假中），怀上这个男人的孩子后，对外和对孩子绝对不再提及谁是其父亲，以便独自占有这个孩子。母亲身份和父亲身份的这种解离，也出现在代孕、捐精和捐卵的生育中，尤其是这个被制造出来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其代孕母亲或捐精（卵）者的名字。并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欲与性行为，当前也在日益被解离。部分的性本能冲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明显地解体于以往被看成是成熟的只注重生殖器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且感谢互联网的存在，现在也可以将它作为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对象加以体验。

58 恋物癖与当事者的意见

近些年来，在纸媒和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非常罕见的癖好，有这种癖好的人发誓，他们确信自己只有通过某种自己热爱的物，才能激起自己的性兴奋，而我们文化中的所谓正常人则会认为能够激起这类人性兴奋的物，不具有灵魂（精神），是死的物。这些物可以是一把提琴，一个火车头，一幢高楼，一台电脑，一部机器，一辆汽车，一把电子琴或一艘渡轮。性对象物化者或恋物癖这些表述，即今天使用的这些名称，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艾哈·丽塔·爱克洛夫（Eija-Riitta Eklf）的瑞典女性，她在1979年借助一个万物有灵论（Animismus）者的帮助，与当时的柏林墙结了婚，并在婚后改姓为爱克洛夫-柏林莫尔（Eklf-Berlinmuren）。

从传统的角度来观察这种癖好，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种拜物主义的形式。但在通常的性拜物主义者中，涉及更多的是与某个人或与当事者本人密切相关或有特定原因的身体部分或物品，比如身体的某个部位或

身体的某种排泄物，比如某件衣服或布料，这些部位和物品都有着一种相应的象征意义。但是在爱一幢高楼或一辆汽车的情况下，就显然有些与此不同，这里并不存在与另一个人的关联，却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样被当事者所爱和所渴望，并且这也是一种有着一切像忐忑不安、相思、嫉妒、同情、悲伤等情感的爱和渴望——以物为性对象者就是如此叙述他们对物的爱情，这些人通常无法与人保持一种性关系。他们的情感和性关系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物，即他所爱的，并且是完全和自身独立的物，他们在这个物中看到了自己的一种身份和个性认同，并与这个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比如与一件乐器说说音乐，与一台电脑谈论信息代码或是在万物有灵论中寻求支援。

我认为，拜物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性恋物癖有着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适用于在今天的恋物癖之前已经认知的一些非常罕见的形式，比如我想这里并不包括所谓的恋树癖（把一棵树作为拜物神）或是所谓的恋雕像癖（把石碑或雕像作为拜物神）。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主张把恋物癖解释为拜物主义者，因为恋物癖即使在今天也不免被认为是一种病理化的状态。如果我们暂且放弃这一点，鉴于其中也有许多铁路爱好者而将恋物癖的癖好看做是有那么一些正常的（这也许有些过分），并尝试对他们前辈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应当是：“我很想知道，在有些神化的目光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再进一步的回答是：“有些东西，说它们是存在的，确实是正在到来，只是没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摘自www.objektophilia.de；accessed：2.4.2007）

80年代的时候，我曾在苏黎世做过一次纪念弗里茨·摩根泰勒（Fritz Morgenthaler）的荣誉讲座，其中说到“爱的拜物特征”这个课题，讲座的结束语是：“这并不是什么冒失的语言，如果我说，未来几年我们将要面对和所要解答的问题是：性欲和性行为作为迄今为止的一种普遍状态，是否根本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

的问题。如今的人们在现代技术的机器（比如电脑、电视）上看到那种性感的形式并加以模仿。人们想到的是，弹球与它的自动转盘是性感的并沉浸其中。人们会注意到那个年轻男人发红的脸部，闪光的眼睛，身体的震颤——哦，这是以往受到性刺激的标志，但其实这些男人只是在参观车展时，因为被保时捷911涡轮型跑车深深吸引而激动，也许就像曾经的神父戈都因（Gedouin）被美丽的尼农·德·兰克洛斯（Ninon de Lenclos）所深深吸引那样。大部分性学家、心理分析家和教育学家在今天已经告别了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他们不再需要这个概念来表述现实或是完全就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展开自己的研究。从美国到新西兰，各个科学团体和科学家们都在寻找如何远离性而‘纯粹’地保持一种伟大爱情的道路。”（Sigusch，1986：151f）一些年后，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90/ 1995：289）在他的小说中写道：“雷克斯（Rex）以前曾有过一辆保时捷911，车身有着像鸡尾酒樱桃的那种红色。这是他最心爱的玩具，他最喜欢的装饰，他最亲密的知己，实际上是一辆车对一个男人来说的一切；人们也许会说，雷克斯在这辆车上不仅投资了钱，而且也投入了相当的感情——是的，他甚至不会因为别人用‘关系’这个词来形容他与这辆车的感情而退却。他称它为布鲁诺。他认识周围4个县内每个连续营业的洗车铺，他把一个塑料工具箱当枕头，整夜地躺在车的加座上，享受那种在布鲁诺肚子中的凉快，直到天亮；他把汽车马达开到空挡转动，在散发着机油味的昏暗中，把自己已经开始悸动的阴茎不止一次地塞进汽车杯形镀铬的进气管中，然后用细致的手感加快马达转动的速度，将速度调整到与自己身体越来越快的悸动节奏同步，保持两者间的平衡，直到他的阴茎在机器里达到前所未有和不可想象的那种欣喜若狂的销魂高潮……”但是这一切，我们不是在E.T.A. 霍夫曼（E. T. A. Hoffmann）的小说里已经读到过了吗？一个名叫纳塔内尔（Nathanael）的英雄，漫游在妄想和现实之间，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教授的女儿，而这个教授的女儿则是一台自动机器。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生产社会和其特有的商品拜物主义：似乎

只应人才拥有（或是说特有）的意识，成为人的生产物的补充，被转化为物，就像原本属于意识领域的性感，自几代人以来，被贴上了可购买物的标签。社会个人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低劣作品——商品这种性感和超性感、有着相同构思和相同意义的物的引诱（和嘲笑），生产者在一种特殊的程序中剥离了商品的具体意义而使之拥有了一种抽象的无所不在的普遍意义，在这个程序中，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也成为一种社会形态。由新性革命带来的性的日益商业化，尝试将尽可能多的事和物都纳入商品的形式中去，从在媒体中的自我曝光，一直到性虐狂对儿童的折磨。

在进一步的细致观察中，恋物癖也教会我们认识到，我们社会的性和爱的形态虽然的确有些令人迷惑，有一种商品和拜物的特征，但并没有因此成为完全的商品，也就是并没有像伴随着学生运动出现的一种马克思复兴所强调的那样的商品化。关于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总体上已经有了一种商品形态的论断，我在70年代的讲座中就对此做了原则上的反驳，读者可以在我的论文《性的神秘性》（die Mystifikation des Sexuellen）中查阅（Sigusch，1984b）。因为如果这个论断成立的话，那么人就等同于商品，人将不只是在表象的关系中生活，不只是与表象和在表象中生活，而且也仅仅是为了表象而生活。客观性和客体化在我们性欲和性行为中所占据的优先地位虽然是现实的，但人与作为商品的物还是不尽相同，没有完全的认同性。只是这期间它们所达到的商品化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我当时不可能想象的。

在古老的恋石碑癖和永恒的奸尸癖之后，可以肯定地说，对客体物的“爱”在一种其他癖好所没有的扩展了的规模程度上，为性和爱情的客体化和话语化的进程提供了可能性，我把这种进程表述为Hylomatie（17章），并列举了许多实践和理论的例子对这个范畴做了解释（Sigusch，1997）。用一句话来表达：在后福特主义的社会中，不容忽视地出现了基本形式的知识与客体对象的物化和去物质化，我把这

称为Hylomatie，一种客观性（福柯也许会说：决定性），它拆除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古老界限，改写了生命和死亡，使它们各自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形态。人在这个Hylomatie的程序中，丧失了生机、活力和自主，使自己转变为之前已经死亡的物，以致原本已经死的物现在却拥有了如个性和性吸引力这些属性，而这些属性以前主要为物的所有者所拥有。因此又一次不需感到惊奇，如果恋物癖把活的当作死的，但又赋予死的以生命的活力，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他们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心理障碍或是病态（16、45章）。他们只是做了一些现在很通行的事，并且这也是我们多多少少正在做的事，不管我们是否认识或意识到这一点。我的这种立场不仅只是针对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同时也是就特殊现象所说的。因为从原则上来说，通过借助另一个人，借助与另一个人相连接的古老拜物神，或是借助一种不再可辨认地与一个人连接的新拜物神的帮助，人对物的情欲多少也算是对生存深渊的一种持久跨越。

在总体上，新性和新型性别的革命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Hylomatie过程以及逃离人的现象；在这一系列过程和现象中，电子性的运营者用虚拟的人已经部分地取代了真实的人，为新型恋动物癖提供了一个电子动物，为动漫或硅胶娃娃的爱好者提供了人物图像或图形，为恋物癖提供了不再像传统拜物教那样与人绑定的物品。

“什么是恋物癖的性欲和性行为？”互联网网站（www.objektophilia.de）的经营者在自己的网站上问道。他所得到的回答是：

> 只把物作为自己的性伙伴（但像这个世界到处都如此的那样，也存在所谓混合和不同侧重形态，因而也可能是人与物两者兼爱，即既有对物的爱，也有一个人作为自己的性伴侣）！对物的爱，往往是对某件特定物品的爱！在原则上这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可以是一件乐器，一台机器，一辆汽车或一栋建

筑！这里的关键意义，并不在于某个人为什么会爱上某件物品的个案，而是在于为什么人偏偏会痴恋和爱上那些原本独立于人的物品！！！那件物或那个客体并不是这个恋物主体因为没有人类的性伙伴而作为一种补偿式的替代伙伴，而是已经站立在一个他的人类性伙伴应有的位置上！！！并且其实在这里面还有着更多的内容！现在这件物拥有了更多被我们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和物理身体的认同。就如一把小提琴，比如有自己独特的音色或是它的木纹也只能是一次性的那样。或是许多人倾心珍惜和爱护的那辆爱车，被车主看成是自己（男性或女性）的性伙伴，有一个相应的名字，也被特征化和个性化。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只是由客体引发的那种简单的吸引力。这里的所谓客体并不是一种有生物，但人们还是将这种无生命的物体作为自己的性对象而迷恋上，或以某种方式把它看成是这样的对象了。一旦把这些无生命物体看作是有生物，那也就很容易地爱上这些物品。这种爱的标志是对一个特定物体的爱情，这个物在其中得到的是通常只有作为人的性伙伴的一切情感。那个恋物癖者从性吸引的角度来说感觉不到另一个人身体形态的性吸引，因而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允许进行比较的话，可以比较的只能是：他所爱的那个物化客体在第一眼看上去是个玩具娃娃还是一个毛绒动物。这可能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对一个非恋物癖者来说非常难以想象，怎么可能爱上这个不符合爱情格式的客体。但恋物癖者的感觉自然完全不同。他爱上和迷恋的物，在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特定客体，在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个物体有一种完全特定的外表。而正是这种外表恰恰又非常符合他的情欲癖好。

这个被爱的物体，作为亲密的“你”，作为与自己相对的个人和性伙伴！在欢乐和悲伤之间是他的整个世界！即在他的悲

欢之中隐藏着的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世界，是一种全方位的情感波动，完全相同于其他类型的两人关系，也包括比如在某些特定情境中会引起嫉妒，爱的苦闷和相思，或通常所说的心的颤动。从另一方面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恋物的爱情，也与这一爱情关系中作为爱情主体的那个人的自身发展、生活史和个性有一种紧密的不可分离的关联，并在婴幼儿时期就有明显的迹象。如同其他人在成年后会回忆起，其实自己总是感到被某种特定类型的男人（或女人）所吸引一样，对那些恋物癖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同样也总是对物的某种特定特征感到着迷和情不自禁地被吸引。恋物癖对物的爱情与其他以人为爱情和性伙伴关系的区别只是在于，他对性伙伴的选择有些不同寻常，而不是他对性伙伴所感受到的情感。

物的语言！以物为性对象的恋物癖，也与他所爱的物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他能够与它唠唠叨叨地说许多，只是并不像通常与人对话那样期待得到同样语言形式的回答，但他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与它交流。也许这是个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平台，并且恋物癖与某件特定物体建立和保持一种共同交流和沟通的关系，也有着各种最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感受和感知。最能够使人想象的是关于一个以他的乐器为性爱对象的音乐家的举例描述，由于对一个音乐家来说，他的语言很显然就是音乐，他也就用音乐的语言在与被他倾注了全部爱情的乐器进行着交流（这里所描述的是这种与心爱之物的交流方式，甚至没有证实大多数音乐家对自己的乐器所感受到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还有那些恋物癖者特有的恐惧，如害怕被他人、家人和朋友发现或质疑，害怕会因此不被人看重，甚至害怕会被认为是病态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网站应当帮助我们鼓起勇

气！！！

……恋物化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自身，也许最初都有某种程度的拜物教起源，但在后来便有了各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些心态至今还鲜为人知，我也不想在这里为猜测这些心态而迷失自己。我只是想说，恋物的性欲和性行为的状况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在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形态的多样性中，除了那些已经被看成是固定的形态外，仍然存在着一些尚较少为人知晓的其他形态。

要想表现可能会引人嘲笑的那种情感，需要有很强的心理力量。

恋物的性欲性行为与拜物教的区别是什么？以“心爱的汽车”为例：这个在我们社会中有着如此重要意义和被爱的交通工具，就能特别清楚和可理解地表明恋物癖与拜物教之间的区别。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也不再能够想象我们没有汽车的生活。可以说，汽车已经属于我们的家庭。不仅如此，汽车也往往成为车主一种威望和崇拜的对象，经常是车主的全部骄傲和自豪，他在这辆自己引以为豪的车上投资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和许多钱。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汽车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崇拜偶像，他们为自己设置了这么一种拜物神式的场景。这辆成为拜物偶像的汽车应当在社会中展现和提升车主的能力、富有和社会地位，并以此取悦和追求自己心仪的可能的性伙伴。而汽车本身，即使它是一辆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汽车，也只是一件拜物的对象或客体。

在各个层次和等级的汽车类型中，有恋物癖者多少感到颇有吸引力的最爱类型，也有他根本不感兴趣因而颇为冷漠的类型。但是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保留自己原有性格特征并从基

因上是异性恋的恋物癖男人，他所选择的作为自己性对象的汽车，对他来说，一定具有一种女性的身份认同。他会把这辆汽车想象为仿佛是一个女性的胴体，从而将其联想为一个女性。但这在普遍意义上，严格地限制在这辆汽车完全个性的形态解剖特征的既定状态；在特殊的意义上，则取决于这同时也是一辆那位恋物癖者自己心爱的汽车。

（http：//www.objektphilia.de/3.html；accessed：16.11.2008）

一些恋物癖者在某一天登录了无性者的互联网论坛（www.aseuality.org.）。一位39岁，名叫彼得莱（peterle）的无性者在论坛上问道：

由于近来一些有恋物倾向的人也登录了我们这个无性者的论坛，我想就此提出一些问题。请原谅，如果我说的有些直截了当，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谨慎表达。你们把自己的行为和爱好表述为性取向——也就是说，你们也会与你们的心爱之物，比如一幢房子或其他什么心爱的物，也总是会有一种性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去想象你们与物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是否只是一种纯粹的头脑中的想象，也就是说是一种想象的游戏？还是一种真实的性实践？

可奇（Coki），29岁，回答说：

这种关系等同于一种性伙伴关系，只是这种性伙伴关系的另一方是件物而已。这对其他性取向的人来说，肯定很难理解和想象，因而他们总是会提出这种关系是不是一种互爱关系的问题。但由于爱情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或商品交换，因而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在其中感觉到爱，这种爱的感觉也包括自己能够付出爱，而不乞求得到一种同样形式的爱的回报。即使人们从一件心爱的物中得不到一种充满温情的回报，但人们仍然

可以从自己的心爱之物中得到许多其他的，也就是比如支持和安慰，因为这件心爱之物只是为你而存在，此外还有当人们在自己的心爱之物边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幸福感，或是当远离自己的心爱之物时，对它的深情思念。因此可以说，对物的爱恋，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头脑中的想象，对我来说，我与自己心爱之物的关系就如一切性伙伴关系那样有着真实的“性实践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就是生活在这么一种将物作为自己爱恋对象的生活中，完整地享受自己的性欲望和性行为，这其中也包括性实践和性渴望。这是一种有着所有相关内涵的爱情，这其中不仅包括一系列如痴恋、心的剧跳等爱情特有的情感，而且也包括渴望亲近、性的接触等性关系特有的身体行为。但对这里提及的所谓性行为实践，时常需要有些非常态或是创造性的想象——只是可以说，在这种关系中总是存在着性接触的可能，以实现相互性关系的目的；如果有些物件很难实现相互进入，那么也并不总是需要进入。……我总是习惯给自己心爱的物件指定一种性别，但是这种性别与人身体的性别并没有关联，而是按我对这个物件有着较为男性还是更为女性特性的看法排列。比如我认为一切表现出冷色调和角形形态的物有着男性的特征，而一切表现出暖色调和圆形形态的物则有着女性的特征。按我的感受，我个人更容易为男性的物对象所吸引，因而可以说，我是一个在物恋层面上的异性恋——我对我的恋物对象规定了这种男性的特征，但我并不把它看做是人，所以我与自己心爱之物的关系并不是如西古希先生所认为的那种单纯地用物的性伙伴来代替人作为自己性伙伴的关系。但鉴于我们对物的自身的爱，我们也就按物的特性来分辨它们的强或弱。这就是说，一台机器有着与一幢大楼完全不同的特性。机器能有巨大的力量，一幢大楼则能骄傲地站立在那里，而自然风景则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美，这仅仅是举例而

己。我认为，对物的各种不同特性的分类，同时也赋予了某件物一种它独有的个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件物是相同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分类方法。我们中也有一些人信仰万物有灵论，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信仰方式，这种信仰认为，除了人、动物和植物，其他的物也同样有着一种灵魂。

多萝西娅（Dorosusi），43岁，写道：

……如同一个“正常的男人”会认为金发、大胸和长腿非常性感，我作为一个女性，能够吸引我的则是坚固的钢材、光滑的平面、简洁的线条，以及一种角形和圆形的精巧组合物。我常常会给那些不熟悉我的人，留下一种无性者的印象。他们只是知道我对男人和女人都不感兴趣，并且丝毫没有感觉到，什么才真正吸引我。……我的爱恋对象是一台金属加工机床。我给它起名为苏西（Susi），因为我认为，这么可爱的东西，需要一个甜美的名字。对不起，我不能在这里晒它的相片。对我来说，它有一种整体的美，它的外观、造型、运作和声响都是美的。我喜欢触摸它时的那种感觉，也喜欢闻它的气息；它是（我的）一切感觉的盛宴。此外，还有它特有的那种美丽，也对我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对我来说，它不仅在审美的意义上是美的，而且也是性感的。要是它一旦出现某个问题，那么它的那些护理者马上就会来到它的身边，帮助它重新恢复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需要嫉妒，因为他们触摸它，只是为了它好——在我以前的那些恋物对象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全部力量去修复它们。如果我的一个恋物对象不可修复地坏了，我也会像其他正常人失去自己心爱的伴侣那样伤心。只有当我的伤心过去之后，我的心才会向另一件心爱的恋物敞开……除此之外在这里应当提及的是，“正常人”这个词对我们这些恋物癖者来说，是一个固定的

概念，用来表示那些对人有着爱恋的人，不管他们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或是其他什么恋。这个概念只是表示了爱恋对象的区别，而不是对其对错的评价！（www.asexuality.org；accessed：15.11.2008）

当然这里仍有许多未解的问题，比如：在我们人群中出现恋物癖者的概率是多少，恋物癖者所恋的那个性对象是否只是一些完美的投影，他们为什么情愿放弃被爱或是说爱的回报，以及人们是否能就此摆脱普遍存在的爱的交换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还有：心理理论上的这种特殊现象，是否可以确信地归结为受童年影响的结果，是否如人们自然猜测的那样，与个人的童年记忆有关，即幼儿通过与生命物体接触而唤醒的情欲，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认为，不管如何解答这些问题，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人的特殊偏爱归入病态的范畴。毕竟这些恋物癖者并没有去伤害和虐待某个人，也没有给谁造成心理伤害的后果。在其他人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如果一定想要对这种恋物的爱情做出一种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情感联结，甚至强烈到对无生命物的一种爱情情感，并进而使这种无生命物获得了生命的意义，也就因而成为性渴望的对象。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类现象可以与新性革命后的哪些性欲和性行为相比较？并且这里需再次申明的是，存在于拜物教中的某些罕见形式，无疑是当今恋物癖形态的文化先驱，因而可以追忆到它们。但是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恋物癖这类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植于我们当今文化的普遍性中，我们只要想一想，无生命的服饰比如手提包，或是无生命的汽车比如法拉利，能够给多少人带来强烈的情绪波动。除此之外，我们也自多年来试图理解，并不能将心理治疗和护理仅仅委托给人，而且也应委托给作为无生命物的客体对象，当然是电脑“模拟”。我所思考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社会工作管理系的女教授，为在对病人、残疾人和有帮助需要的人的护理中应用治疗式的机器人帕洛（Paro）进行了辩

护，并且她的文章恰巧是发表在曾经对医学非常抱有批判态度的《医学博士马布斯》（Dr. med. Mabuse）杂志上（Klein，2011：14）。在如何应用具有力比多功能的医学器械的问题中，现在还缺的只是神经学研究结果。从核磁共振最初的研究成果中得出的结论是：“（人脑）对一个苹果手机振动的反应，几乎等同于对一个深爱的人所发出的脑电波。”（Kreye，2012：4）

59 性的碎片式弥散

现在再回到狭义的新性革命。我把在性革命中有着性别和性形态变迁特征的第二个主要进程，称为性的碎片式弥散化或娱乐化。这个基于先前已经描述过的传统联合在一起的性欲性行为的解离以及下面还要加以讨论的性偏好和性关系形式多样化的进程，最初是通过整体和个体尽可能全方位的商业化，然后是通过互联网而出现的一种先前无法想象的突破，并继而成为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的现实。由性的碎片式、切割式和生活方式的娱乐化而形成的社会新性结构，解除了陈旧的性拘禁、对性的怀疑和恐惧，从而使其他不同于以往的性行为得以传播和扩散。当前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五彩缤纷的性和性别的多样化，对于现今的这种多样化，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甚至不敢在梦中想象。

在这种弥散化中，我看到了一种推动社会进程的机制，我把这一机制称为物化和去物化。它通过把一切可以想象为整体的事物剥去其整体性，从而强制地把普通个人纳入社会体系。性的弥散化导致个人的去根化、碎片化和匿名化；与此同时，个人由于这种机制而被多样化、网络化，并且被消遣式地娱乐化；在第三层意义上，普通个人也被驱赶进我称为Hylomatie的过程之中（请参见17章），并在其中分解为多样化的各不相同的单个原子。弥散化的隐喻就是“网络”：网络收集和捕捉了心灵，抚慰它并囚禁它——如福音书中那张一直延伸到天国的渔网。

从历史上看，这种分割和分离开始于性的形态被人为地制作成一种统一形态之时。而这种统一形态得以最终诞生的代价，是分离第一（Sexus potior）和第二（Sexus sequior）性别，分离男性和非男性的性欲性行为，分离道德和非道德的、正常和“变态的”、不惹人注意和违法的、健康和病态的性行为。今天已不容再次忽视，古老的圣洁和邪恶实体，从第一性到神秘的联盟（比如请比较Evola，1958），是怎样从一开始就贯穿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感觉的彼岸世界只是作为假象的统一而存在。从长远来看，这类矛盾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被消除，我们的文化因此就把隐藏着无数碎片的统一推搡进开放式的弥散化中，直到神秘联盟从自身出发研发和制造了电子振动的自慰器和阴茎自动注射器，抽象地说这是假肢和代用品，更抽象地说这就是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但是这类新型的性在许多方面还无法讲清，它还有多大的波动性，这也就意味着它的短暂和无常。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商业化导致了性碎片式的弥散。商业总是试图将尽可能多的性个体和部分强加上商品形式，从媒体自我曝光、调情学校、婚姻介绍到贞操带的生产或阴茎饰品和水果形状的避孕套或雌性海豚形状的按摩器，从阴蒂刺激器、色情旅游和儿童卖淫到精子和卵子的商业交易。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和物的这种大幅度商品化，是新性革命的标志。在这期间，一切古老的性变态行为不仅在互联网上，而且也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中广泛传播，并被部分地去妖魔化——除了仍然被看成是禁忌的恋童癖行为。但即使是恋童癖行为，也在按市场经济的逻辑而日益增多。如果胚胎和处女已经成为市场的商品，如果与性相关的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那为什么还要将儿童的躯体排除在商品之外呢？除了那些老的和单一的恋童癖外，现在也出现了大批原先被认为是乖乖的小市民成为色情旅游的群体。这类小市民色情旅游者完全不约而同地逃避了临床医疗，这同时也证实了人们原先对他们的怀疑，即这些人只有面对一个比自己弱小的性对象时，并且这个性对象无法知道他其他真实的生活状况因而无法对此做出判断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他

全部的性能力（Freud，1912：85）。

只要看一下新性革命高潮时出现在日常报纸和免费报纸上与性相关的广告，就能知道所有与性相关的部分已经弥散到怎样的程度。比如在法兰克福（美因河）地区登载的广告中，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缩略语，其中的一些用语和用词，甚至只有很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真正解读：

AV（Analverkehr）——肛交

BBB（Bauch，Bart und Brille）——肚子，胡子和眼镜

BD（Bondage=Fesselspiele）——捆绑游戏

BDSM（Bondage inkl. Sadomaso）——包括施虐和受虐的捆绑

游戏

BW（Brustwarzenspiele）——乳头游戏

BW-Typ（Bundeswehrtyp=Uniformträger）——国防军类型=着军装的性游戏

C6（Cybersex）——网络性爱

CBT（Cock-and-Ball-Torture=penis-und Hodenfolter）——阴茎和睾丸虐恋

Cut/ uncut（beschnitten/unbeschnitten）——割取包皮或不割包皮

DirtyKaviar，Natursekt，Schlamm usw.——肮脏的粪便，小便，泥浆等

DS（Dildospiele）——假阴茎游戏

DWT（Damenwäscheträger）——（男）穿女装者

EL（Eierlecken）——舔睾丸

FA（Fat Admirer）——肥胖爱好者

FF（Fist fucking，Faustfick）——用拳代替阴茎性交

GB（Gesichtsbesammung）——精液撒在脸上的游戏

GLL（Gummi，Lack，Leder）——橡胶、油漆和皮革着装

Griechisch Analverkehr——希腊式肛交

GS（Gruppensex）——群交

Gutbestückt überdurchschnittlich groer Penis——超大和超长的阴茎

Hengst Analverkehr aktiv——主动性公马式肛交

KA（Kaviar=Kot）——鱼卵子=粪便

KFI（kein finanzielles Interesse）——不抱有任何经济意图

KV（Kaviar=Kot）——鱼子酱=粪便

Mud（Schlammspiele）——泥浆游戏

NK（Naturkaviar=Kot）——自然鱼卵子=粪便

NR（Nichtraucher）——不吸烟者

NS（Natursekt=Urin）——自然香槟=小便

NT（Nichttrinker）——不喝酒者

NY（Nymphomanin）——慕男狂者

O（Sklavin）——女奴

ONS（One-Night-Stand）——一夜情

OV（oralverkehr）——口交

PP（Poppers）——化学合成毒品

PT（Partnertausch）——性伴侣交换

safe sicherer Sex mit Kondom——用安全套的性交

SBS（Superbadservice）——超级泡浴服务

SCH（Schokolade=Kot）——巧克力=粪便

SL（Scharfer Lack）——光亮的黑漆装

S/M，Sm，S&M（Sadomasochismus）——性施虐和受虐

SSB（Schreibtischspiele im Büro）——办公室写字台性游戏

Stute（Analverkehr passiv）——被动肛交

T6（Telefonsex）——电话性恋

TF（Tittenfick）——乳房性交

TS（Transsexueller）——变性者

TT（Tittentrimm=Brustwarzenbehandlung）——假乳晕

TV（Transvestit）——易装爱好者（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

UB（Urin und Besammung）——小便和射精

WS（Wassersport=Urinspiele）——水上体育运动=小便游戏

WX（wichsen）——手淫

ZA（Zunge anal）——用舌头肛交

性学专家所知道的性实践，在这里几乎都已提及——稍往后，在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许多迄今为止还不为人所知的性实践名词。当然，如果一个女人还是在寻找一个异性恋的男人，那么她们在广告中的自我描述也有着清晰的分类：苗条修长的小鼠，娇小的少女般姑娘，壮实并提供依靠的母亲，恭顺的女奴，无情的长靴女，胸部丰满的师母，慕男狂女或是期望出轨的家庭主妇。一条叫作ZK，意味着法式之吻（Zungenküsse）的歧途，恰巧在艾滋病时代变得更加昂贵。另一条歧途是NS。这个缩略语表示“自然香槟”，目前从性学的角度称为“尿液性兴奋”或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称为“膀胱尿色情”。但这还不是全部。自然也不允许缺少在艾滋病盛行的时代由一些避孕专家最热心推荐的避免传染艾滋病的性交方法，因为这种性交既没有精液和阴道分泌物也不会有血液的接触或交流，这种性交不依靠身体的直接接触，只是通过电话。一则广告综述了完成这种电子化性欲性行为的过程：“全自动电话联络服务。听，回答，交往，一切都在电话边完成。也提供炽热的电话聚会，可以有10个性伴侣同时参与。也用传真机提供图像服务。”敢于冒险的“邪恶女同者们就此穿上了煽动欲望的色情内衣”，这些装着“双向假阴茎和假子宫”的内衣，不管在为谁服务，至少只需接触一半的肉和血。

不愿再回到原先处境的是那些改变成男人身体的变性者所提供的性服务。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作为女人在色情酒吧为男人提供服务愚弄那些对性技巧知之甚少的嫖妓者，而是作为一个跨性者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就使他们有了一种不同于异性恋、同性恋、女同和双性恋的服务方式。但这一切之中的重要进步——为了不用塞撒尔诺（Cesarano，1974）的语言来表达——可以说，这种“情欲色情的起义”，似乎在其他广告中也都已经有了预告：总是只给出一个名字（没有姓）和一个年龄，其余的一切都似乎是在云雾中模糊不清的那些男人们，他们的广告也总是写得很简明和感人——“为女士服务”。因为这也如同我们文化中的其他事情，只有当男人也像女人那样提供卖淫服务的时候，男女的平等才得以现实化。

但是自新性革命以来，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弥散，究竟有着怎样的规模，怎样的普及度和公共性呢？美国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Robert J. Stoller，1991：10-14）以20世纪80年代的性施虐和受虐为例，在讨论他认为是变态方式和角色的意义之前，先将受虐和施虐的技术综合起来举证：

Whipping——鞭打

Whips（Long，short，Thick，thin，rope，leather，cloth，braided，unbraided，with or without knots and studs）——鞭子（长，短，粗，细，绳索，皮革，布料，编织，非编织，有结或无结，有钉或无钉）

Paddles——船桨

Canes——手杖

Hands（open，fisted，palm，dorsum）——手（伸开，握拳，手掌，手背）

Switches（single，bundles）——开关（单，双或多）

Leather straps——皮带

Chains——链条

Knouts——鞭挞

Belts——腰带

Riding crops——马鞭

Piercing——穿孔和挂件

Nails（sharp，blunt）——钉子（尖，钝）

Needles——针

Spears，arrows——矛，箭头

Jewelry——首饰

Knives——刀

Crucifixion——十字架

Tattooing——文身

Scarification——划痕

Cutting——切割

Knives——刀

Razors——剃须刀

Teeth——牙齿

Surgical instruments——手术器械

Scissors——剪刀

Hanging——悬挂

Suspension of body——身体悬挂

Suspension by neck——颈部悬挂

From limbs——用四肢悬挂

From wires——用电线悬挂

From chains——用链条悬挂

From instruments driven through the flesh——借助器具推进肉体

Electric shocking：Different machines for delivering different sensations of shock（e. g.，cattle prod，vibrator，medical machines，magneto）——电击：通过不同程度的电击器具，提供不同敏感度的电击感觉（比如：电牛鞭，振动器，医疗器械，磁震）

Stretching on racks：Different machines to stretch different body parts and to represent notable infernal apparatuses——绑在老虎凳上的拉扯：用不同的机器拉扯身体的不同部位和制造出象征地狱的设备

Mouth gagging——口腔呕吐

Cloth——抹布

Adhesive tape——胶带

Ball-in-mouth——将球塞进口中

Dildo——假阴茎

Imprisonment——监禁

In cages——关在笼子里

In pitch-black darkness（closets，blindfolds，diving bell）——在乌黑的黑暗中（壁橱，眼罩，潜水钟罩）

Masks——面罩

Boxes，trunks，coffins，refrigerators，barrels，packing crates——盒子，箱子，棺椁，冰箱，桶，包装板条箱

Altered consciousness——改变神志

Suffocation——窒息

Anesthesia——麻醉

Hanging——吊挂

Drugs——毒品

Prolonged suffering——延长痛苦

Alcohol——酒精

Drowning——淹溺

Mummification，cocooning——木乃伊化，茧化

Loose leather bags——宽松的皮包

Bandages——绷带

Plastic——塑料

Blankets——毯子

Mesh fabric——网纱面料

Head and/or body plaster casts——头部和（或）身体石膏模型

Latex，rubber——乳胶，橡胶

Iron-maidened——铁姑娘

Tickling——挠痒

Feathers——羽毛

Cloth——布料

Fingers——手指

Bondage——绑身

Rope，twine，cotton thread——绳，麻线，棉线

Wire——线团

Leather——皮具

Cloth——布料

Chains——链条

Hylon stockings——尼龙丝袜

Handcuffs——手铐

Steel shackles——钢枷锁

Rubber tubing——橡胶管

Straitjackets——紧身衣

In harness（e.g.pony game）——在马圈里（骑小马游戏）

Excrement（expelled，retained，ingested，smelled，dirtied by）——粪便（排出，保留，吞咽，嗅闻，保留肮脏）

Urin——小便

Feces——粪便

Sweat——汗液

Semen——精液

Vaginal Fluids——阴道分泌液

Anus licking——舔肛门

Enemas——灌肠

Catheters——导管

Other urinary and rectal foreign bodies——其他泌尿物直肠异物

Hair Pulling or shaving——毛发的梳理或剃刮

Scalp——头发

Eyebrows——眉毛

Eyelids——眼睫毛

Body——体毛

Genitals——阴毛

Burning——灼烧

Branding——铸烫印记

Dripped hot wax——热蜡退毛

Wrestling——摔跤搏斗

Two females——两个女人的搏斗

Mud——在泥浆中摔跤

Stomping——跺脚

High heels——高跟鞋

Bare feet——赤脚

Nonsuicidal wrist and ankle slashing——非自杀性的手腕和脚踝削除

Amputees：Desire for women with amputatedlimbs——截肢：愿意截肢的女人

Infantilism——恋幼型

Diapers——尿裤

Cuddling——依偎拥抱

Feeding with milk bottle——喂牛奶瓶

Asphyxiation（air deprivation）——窒息（剥夺空气）

Diving helmet——潜水头盔

Mask with air hose——空气软管面具

Rope——绳索

Nylon stockings——尼龙丝袜

Hands——手掐

Corseting，cinching——收紧胸衣，收紧系带

Clamping——夹紧

Surgical clamps（serrated or unserrated）——手术钳（锯齿或非锯齿形）

Clothesping——晒衣夹

Fisting——拳交

Anus——肛门

Vagina——阴道

Bootlicking——舔靴

在德国，也通过电视的商业化，特别是在自称基督教党派的执政期间，传统的性欲性行为模式出现了在几十年前还几乎不可想象的大规模娱乐化。在私营电视发现和进军性的市场之后，公共（国家用税收支付的）电视台也令人惊讶地热心于此。这期间的电视节目公开展现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描述和可表现的性亲密行为——并且给出保证，这些行为仍然完全是私密的。其格言是：“我懂得这些。”完全陌生的人向另一些完全陌生的人讲述自己一些最私密的事情，显然是想以此表达我还在生活的那种感情。伴随着这些人自述的是主持人的专业化虚伪。虽然这些做客电视台的叙述者都是由主持人为收视率而亲自加以挑选并对叙述内容做了事先准备的，但主持人们为了不过分刺激观众，却又总是在节目中虚伪地用旧道德的义愤指责这些叙述者。在录制时，如果出现一些媒体以冷漠的陈旧方式无法应对的“问题”，也早就有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等在后台，捕捉和拦截这些问题，以保证不出现在最后播放的节目里。这些所谓的心理专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垄断了性知识和性真理，并尽可能地使社会心理的科学认知在大众媒体中平庸化，直到这些认知最后成为日常生活世界喋喋不休的废话。

那种美好的、古老的性爱也有着与此相似的境况。原先那种游戏式的、神秘和激动人心的性爱，则被一种新的，让人想起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如今已成为媒体性憎恶的恐怖内阁所扼杀。现在的

文化观察家们都渴望电视剧《毕业证书》（**Reifezeugnis**）中的娜塔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和《9个半星期》（9 1/2 Wochen）中的金·贝辛格（Kim Basinger）的回归。男人和女人都不必像最早的心理分析家那样去探索壁龛（神和道德）的秘密或追梦维多利亚时代的避孕法，然后再从观察者的角度震惊地发现，今天的女人和男人都在以怎样无耻无情的不言而喻性向大众传播自己最隐秘和最情感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这些通过电视电台传播的性事，显然肯定又是些忏悔和被迫供述的事情，福柯（1976：99）把这种行为理解为是他创立的性欲机制这个概念的现实运动。自新性革命以来，这类忏悔行为又融合进了这么个诉求——即在人的一生中至少应当有那么几分钟出人头地。这就是著名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制作轰动媒体的节目而允许每个人有15分钟自我表演的机会。

今天已不会有什么再被冷落。阴道和阴茎被成功地去掉了臭味，改称为奶酪和鱼腥区域，再加上痔疮。这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场景，比如一个男人在电视上告诉他的妻子，自己在整个婚姻关系中都欺骗了她，自己与其他女人有着一种出轨的关系，而他的那位妻子现在通过电视节目才知道了这一切。比如一个妻子在电视里告诉自己的丈夫，他并不是他们孩子的生理父亲。比如一个主持人打开一封大学法医学院寄给节目制作组的信，以证实一对夫妇共同抚养的孩子是否可以算作那个丈夫的亲生骨肉，如果这是一个否定的结论，那么这位蒙受妻子欺骗的丈夫就会当场提出与欺骗自己的妻子离婚的意愿。比如也会在现场展现一些私密饰品，或是被丈夫烧伤后留在脸上的疤痕，而那个对妻子的这些诉说不知情的丈夫，却还在对着摄像镜头傻笑。比如我们也能从这类电视节目中知道：男人怎样伤害女人的肢体和女人怎样追求小鲜肉（年轻的男人），以及男人怎样才能做到自我口交和吸吮精液，或是怎样让克林顿的生殖器射精。当参与这类现场直播的观众夸张地对着麦克风的时候，主持人也会在他们中收集一些尖刻批评的话语，以便不要让人感觉到这是一场色情艺术的演播。一个有些年纪的男人讲述自己掌管着一所“叫

床”学校，女人们可以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模拟性高潮。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为了钱而在摄像机前手淫，女人可以在观众面前拨开自己的阴唇，在我们的德语中，阴唇仍然还总是被称为羞耻之唇而不是维纳斯之唇。一个天主教嬷嬷解释说：“是的，我有爱的抚摸，但我只爱抚摸那个阴茎。”一位男性会计师坦陈自己以前也曾在男人中卖淫。一个女施虐者在国家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中向在场的观众展现，如何正确地对一个性奴施虐，这就是说要按新型的性艺术和医学卫生的规则施以虐待，但又不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一个有着同性恋性取向的大学生自白，他经常不让他固定的性伙伴知道独自一人去公共厕所，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有这个需要，并且耐心地向那位似乎相当无知的主持人解释，同性恋男人经常会在某些特定的公共厕所相互从事一些性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当丹内克尔和赖歇（1974）对同性恋男人一方面有着一种固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出于一种性本能的驱动而去寻找非固定的关系做了精密研究并证实了这种特有的灵活性时，社会和大众仍不可想象，今天会有这么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同性恋守护神，敢于在电视中向观众展现自己的脸，报出自己的姓名，坦陈自己特殊的性爱好。这就使得其他电视节目制作的竞争者也不甘落后，有人便在自己节目中展示一个年仅15岁感染上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他的父亲患有癌症，母亲则在承受着脑瘤的痛苦以及全家都在因为遗传病而逝去的姐姐墓前痛哭的情景。富有同情心的女主持人在摄像机前问观众：“你们现在是什么感受？”这就是电子时代化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电子化。

尽管有如此多样、悲剧化和不加掩饰的与性相关的内容，出现在以往严肃的报纸上，出现在广告和免费的地区报纸上，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是与性相关的事件在互联网上得以胜利进军，仍然不免令人惊讶（64章）。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些通常主要被传统媒体拒绝发表或登载的如恋童癖、新动物恋者、强奸杀人犯、食人者和奸尸者等一类的广告，能够在互联网上不受限制地加以发表和登载。那里确实存在着由富人和正在成为富人的人所把持的一种电子全球化，如今这种全球化使得

那些生活在中国或突尼斯的孤独的寻求刺激者，也有可能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找到他心爱的拜物神，并且也能帮助他们。因为在网上发现也有一些其他人，比如一个黎巴嫩人，一个土耳其人或是一个新西兰人，居然也有着与自己相同的情欲而减轻一些对那种原本以为只是自己独有的异常情欲取向的恐惧。

互联网平台的提供者，仅仅只是出于商业的理由也会仔细关注，尽可能详细精确地满足登录者的偏好。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不只是作为男人和女人出现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他（她）们同时也被打上了诸如年轻和上了年纪，胖和瘦，白和黑，漂亮和丑陋，有体毛和无体毛，带穿刺物或不带等标签；是作为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人员（这就是说他多少有些虚构的名人），作为女学生、色情明星、女经理还是孕妇，或是作为西部牛仔、建筑工人、体育运动员还是士兵，是作为美国女人还是俄国女人有着大或小的乳房，是作为亚洲人还是拉美人有着大和长的阴茎还是小和短的阴茎，切割过包皮或没有，在多样的性交位置施行多样的性实践，着衣还是脱光交媾，是否应用性器具或某件特定的心爱崇拜物，是一对一还是一对二或是在不同地点的群交，是摆出通常男女的姿态，还是装扮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模样，等等。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标示，就能看到一个新型的性世界，它对那些来自较早性时代的参与者来说，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后性的世界。这一标示如下：

A

Action——行动

Actress——女演员

Adorable——可爱的

Aged——有些年岁的

Amateurs——业余的

Amazing——令人惊叹

Americans——美国人

Anal——肛门

Angel——天使般的

Animal Sex——与动物交媾

Armpits——腋毛

Army——军队式

Asians——亚洲人

Assfucking——肛交

Asshole——屁眼

Assplay——屁股游戏

Ass Shots——屁股射击

B

Babes——芭比

Backseat——（汽车）后座椅

Banana——香蕉

Bathing——洗浴游戏

Ball Busters——主力球队

Ball Licking——舔睾丸

Ball Torture——拷打睾丸

Banging——敲打

Barely——几乎没有

BBW——肥胖女人

BDSM——虐恋（受虐和施虐）

Beach——海滩

Bears——熊

Beauties——美女

Beaver——海狸

Bed Sex——床上做爱

Big Balls——大胸

Big Dicks——大屁股

Big Dildo——假大阳具

Big Fake Boobs——假大乳房

Big Nipples——大乳头

Big Titties——大乳房

Big Women——大女人

Biker——骑自行车的人

Bikini——穿比基尼

Bimbo——小妞

Bisexual——双性恋

Bitch——母狗

Bizarre——奇异的

Black Nymphos——黑慕男狂

Black Pussy Girls——黑喵咪女孩

Blind Folded——蒙住双眼

Blondes——金发女郎

Blowjobs——吹箫（口交）

Boat——乘船

Bodyhair——体毛

Body Slamming——身体撞击

Bondage——捆绑

Boobs——巨乳美女

Boobwatch——看胸

Booty——战利品

Bottoms Up——一饮而尽

Boss——老板

Bottle——瓶子

Boys——男孩

Braces——吊带

Brazilians——巴西人

Breasts——美乳

Bride——新娘

British——英国人

Browsin`4 Sex——观看4人性交

Brunettes——棕发妞

Brutal——暴虐

Bukkake——精液射在脸上

Bunny Teens——少年兔女郎

Burning Clits——燃烧的阴蒂

Business Sex——性买卖

Busty Baby——巨乳宝贝

Butts——屁股

Buttfucking——肛交

Butthole Bangers——屁眼爆竹

Buttplug——屁股插子

另外，同性恋男人作为遭受迫害和歧视的少数派而在性活动中表现出特别的创造力，他们早在互联网普及以前，就已找到了一条表现自己性取向的道路。比如他们将自己的偏好通过一块布条来向自己寻找的性伙伴发出信号，并根据自己在性行为中所期望的主动或被动姿势而把这个信号物塞在裤子的左边或右边。今天，人们已经习惯把这一布条称为“手帕”，这块手帕的颜色也有着它特殊的意义，比如深蓝色表示肛交，金黄色表示“自然香槟”（尿液），浅蓝色表示“口交”，黑色等同于施虐受虐，灰色就是捆绑，紫色表示“汗液”，褐色意味着“肮脏”，深红表示“拳交”，淡绿色在暗示这是“要付钱的性交”，橘红色则表示对一切新的性行为（或方式）持开放态度。

在谈及人的性欲性行为和国家公共电子媒体时，至少应当防范什么？应当谨防那些自称的道德学家。之所以要防范，因为他们向公众所提出的那些要求，恰恰经常是他们自己或多或少有意识的欲望或他们

可被证实的真实生活的反面。比如有个美国州长曾极其严厉地惩罚嫖妓和皮条客，却被人发现真实的他与一个应召女郎有关系。比如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极力主张反同性恋，但真实的他却与一个付费的男妓保持了多年的关系。比如一位议员经常称赞家庭所拥有的道德价值的唯一性，但真实的他却在完完全全出轨欺骗自己的妻子。比如一位男性联邦部长，投票否决“变性法”，但真实的他却经常身着女性内衣。比如一位政治家从不间断地标榜自己的正派和清白，却很偶然地被人发现，他正在把粪便泼向妓女。比如一位著名的司法工作者要求对那些在电脑中下载幼儿色情图片的男人实施最严厉的惩罚，但在自己因为要付印而给出的那卷胶卷中，恰恰拍摄的是他性侵儿童的场景，用心理分析的语言来说，是他潜意识中要求惩罚的心理需要出卖了他。如此等等。这类事例数量无疑是如此之大，如果我们（虽然我们永远不会再看见）还想观看一下50年后的性学司法评估和性治疗师所要做的事情的话。

書/2018

〔德〕福尔克马·西古希/**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

〔德〕克里斯托弗·诺恩/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从古希腊罗马的开端到20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世界大战的时代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英〕卡丽·吉布森/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现在的加勒比海史

〔德〕雅恩·克诺普夫/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英〕亚当·查莫斯基/幻影恐惧：政治偏执狂与现代国家的创建

〔波兰〕安娜·比科特/犯罪与沉默：直击战时犹太大屠杀

〔日〕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的男人

〔美〕玛雅·贾萨诺夫/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康拉德

〔英〕罗伯特·欧文/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

〔美〕尼古拉斯·雷诺兹/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

〔英〕理查德·伯克/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

〔德〕沃尔弗拉姆·希曼/梅特涅：战略家、空想家

〔德〕约尔格·劳斯特/世界的神采：基督教文化史

〔德〕沃尔夫冈·莱因哈德/世界的征服：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

〔美〕马克·劳伦斯·希拉德/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美〕约翰·A.法雷尔/理查德·尼克松：人生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SEXUALITÄTEN:
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 一切性理论的有效期，都是受时代制约的，因为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像血液中的含盐量，几千年来一成不变。

／ 今天的思想、感受、工作、爱、生活和死亡，已经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那个时代了。

／“他是一位分辨细微差异的大师……在有关人的性欲和性行为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像他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和系统性的知识。”——法兰克福广播电台

／“他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冷幽默，以致使人们感到似乎又回忆起伟大的利希腾贝格和他的那些潦草的笔记。”——蒂娜·曼斯克（Tina Manske）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索·恩 THORN BIRD
忘 掉 地 平 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1770-8

定价：138.00 元（上、下册）

索·恩 THORN BIRD

【Mars·火星】

【十】



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Sexualitäten: 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德〕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著
〔德〕王旭（Xu Wang-Hehenberger）译



性欲和性行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 作者简介

1973 至 2006 年任歌德－法兰克福大学医院性科学研究所主任和特殊社会学教授。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性学家之一，是德国性医学的开拓者和批判主义性科学的创建者。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践主义者以及性与伴侣关系的治疗师。

王旭（Xu Wang-Hehenberger）/ 译者简介

198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目前定居德国。职业译者，译有《自由的权利》《阿伦特手册》（合译）等。

扫码 GO
索恩微店

忘 掉 地 平 线

[redacted]

Volkmar Sigusch

Sexualitäten：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 2013 Campus Verlag GmbH，Frankfurt am M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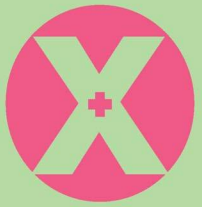
性欲和性行为

Sexualitäten:
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 Mars · 火星 】



〔德〕福尔克马 · 西古希（Volkmar Sigusch）著
〔德〕王旭（Xu Wang-Hehenberger）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60 性商店

性的碎片式、切割式和生活方式的弥散化，至今主要是通过性的商业化来实现的。这里的关键词语是：色情和性产业作为商品审美的应用服务化。性产业化的测试点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叫作性商店。性商店是我们的文化因没能成功发展出一种爱的艺术或是说情欲的艺术，而得到的一种回报。我们不是去创建一种爱的艺术，而是去建构或制作婚姻制度和优生学，性革命和性教育，色情制品和性科学，而这一切在相互之间常常只有很细微的差别。我们应当从这些测试点中寻找出，性是怎样一步步先是成为男人可以购买的商品，最后（虽然是缓慢地）一步步也成为女人可以购买的商品。新性的世界究竟是油漆、皮具、乳胶、橡胶，或是聚氯乙烯、阴茎环、阴道球、假阴道和假阴茎、性感内衣、（涂上蜂蜜或巧克力的）甜美乳房，或是高跟鞋、惩戒和施虐器具、紧身胸衣，或是灌肠剂、色情摄影、凶星真龙怪物影片，或是色情漫画、裸体观看、恋物癖图片，或是色情光碟、性娃娃，还是性机器人？

令人感到疯狂的是，性作为一个产业仍然一如既往被立法者蔑视为是一种反文化的脱轨。但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一个既合乎逻辑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并没有超出我们文化的框架。它所提供的关键信息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普遍有效性。它所传递的第一信息是：一切都是可以买卖和消费的，这一切之中也包括性欲性行为和性快感。它传递的第二信息是：并不由道德和政治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究竟什么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为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因而也就会被制造和生产出来。按这一原则，一切都可

以购买、消费并因此而销毁。

几十年前，在我这个所谓专家的推动下，德国最高法院曾研讨过这么个问题：性趣用品是否会触发一种非自然的性高潮？当时的德国社会状况是，一方面有700名警察参与了抗议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色情小说（Opus pistorum，又译成《北回归线》）在德国的出版发行，另一方面是城市商业管理处正在视察专放色情电影的各个单间。在今天，对性产业的审查和授权、禁止和药物化的各个职能机构，已经手拉手走在一块。最高声的禁止和追究，通常就是（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最好的广告。这就会使许多人因为好奇而最终想知道，这本肮脏的小说中究竟写了什么或是想知道那个假阴茎真的能制造绝对超级的性高潮？

没有科学革命，便无法想象“我们”现有的性形态。性形态的信条总是与它出现的那个科学时代有相互的认同性。我们时代的科学信条是：应当不再有人体的密码，它的一切都应能加以解剖，一切都会被透光和检查，并以这种方式对人体加以控制和取舍。人体中那些被认为是残疾或有病的部分，不是被加以处理（治疗）就是被割除。因而也就不用感到惊奇，如今的色情产业不免让人联想起冒险家的活体解剖和灭绝人的战场，并且性商店所提供的性产品几乎就像是在卫生用品商店出售的卫生用品，比如性商店提供的性假肢、充气泵、阴茎环、棉花签和膏药，等等。这也很适合老的色情产业的代表，尤其是曾经的女飞行员，贝亚特·罗特蒙德（Beate Rothermund）——通常称为乌泽（Uhse）——所创建的色情产业，这类色情产业因此称为卫生服务的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是被看做卫生事业，贴上了卫生的标签，就不需再明说：这是在为性的苦难服务。

当前最新的情况是，专业性用品网店和商店提供的许多性用品都介于自疗和他疗之间，而且这些用品都经过临床验证，比如勃起泵，在德国甚至作为医疗用品被法律所认可并在国家的官方公报上给出报价（48

章）。如此这样，阴茎环和勃起泵也就走出了曾遭遇讥讽的阴影。这类性用品与医疗用品之间原有的隔离墙已被拆除。

61 政治色情与色情爱好者和反色情者的虚伪

鉴于当前出现在我们中的大众色情制（作）品既无思想精华也无情趣水准的状况，那么在几百年前的色情制（作）品居然能够有意识地在传递一种政治信息的这么个事实，无疑是颇为令人惊讶的。那时，当现代欧洲的色情业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流派和产业之际，最晚自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ntino）在1527年发表的《淫荡的十四行诗》（Sonetti lussuriosi）和在1534年和1536年发表的《合理谈判》（Ragionamenti）之后，这类色情文学作品和文字也就拥有了政治的意义，也许甚至可以说政治已成为这类作品第一层面上的意义。这类作品通过详细描述那个时代统治者的道德堕落，败坏这些人的威望，以达到批判当时社会关系的目的。这类作品通常把宫廷女仆描述为妓女，把教士描述为鸡奸者。但又把这些宫廷下人和教士的淫荡，上升为是受人道主义和科学革命思想启发的反封建行为。这类作品的作者常常从阴道、阴茎和屁股的混合中，引申出关于“性交和鸡奸的知识，扩展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曾是意大利锡耶纳（Siena）贵族艺术学院（Accademia degli Intronati）成员的安东尼·维格纳利（Antonio Vignali）在1525年和1526年间创作的《卡扎尼娅》（La Cazzaria，也有译为《挑刺》），其实最恰当的译名应当是《阴茎协会》。

当时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是在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已存在着贯穿着一种有着学院式或是说有着一种哲学思想特色的色情艺术作品。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撰写过淫荡的作品，比如狄德罗（Diderot）；那个时代不少革命者同时也是色情爱好者，比如米拉波（Mirabeau）；而在1748年完成的既富有思想又充满淫秽内容的作品《哲学家泰蕾兹》（*Therese philosophe*）中的女英雄（主角），实在无法做出决定，是叙

述性冒险故事能给她带来更多的乐趣，还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那些道德家和出版监审人员仍将一切被认为有极端和颠覆性倾向的政治、哲学和淫秽文章通通都扔在一个锅里。艾蒂安-加布里埃尔·裴格诺（Etienne-Gabriel Peignot）收集进1806年在巴黎发表的目录学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文学著作，也因此被审查、删除或焚烧。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和萨科·乔伊尔（Nicolas Chorier）的《淑女学院》（*L'academie des dames*），也未能幸免。

乔伊尔可能是第一个在今天的词义上运用了色情作品这个词：性淫荡的描述。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雷斯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stif de la Bretonne）1769年发表的《关于色情作品》的论文中，他从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运用了这个词，即用来描述妓女。这个词的现代意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得以普遍认可。正是在那个时代，也设立了《地狱》（Collection de L'Enfer）系列在国家图书馆的秘密收藏，它的副本则被保存在英国私人图书馆，虽然现代的色情（制）作品没有它的公开性是无法想象的。《牛津英语词典》在1857年第一次列出了"色情作品"这个词条。

我们色情作品的前辈曾经用色情作品来追踪和表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诉求，以及感谢从手工抄写到印刷文化的过渡而得以大规模广泛传播和民主化进程，使得他们的著作有了一种比那些没有性淫秽描述的哲学政治宣传书籍或小册子更大的颠覆力量，因为广大民众喜爱阅读他们的色情作品，并通过这些色情作品才知道自己是被怎样虚伪肮脏的"猪"统治着——这个研究结果（比较：Hunt，1993；Darnton，1996）可能会使人惊讶，如果人们忘却了色情作品在西方这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一个第一重要的文化战场。并且直到几十年前，还没人会对它无动于衷。"人们或是赞同或是反对它"，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67/1982）在1968年的性革命开始之际这么写道。确实，当时社会的任何制作品无论

如何在这个时间段里都不如色情作品那样，帮助人们释放这么多的情感和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并且对不少人来说现在仍然还是），它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激发两种完全对立的情感：性趣和恶心，兴奋和反感。因此也不必感到奇怪，所有人，如果要让他们对色情制作品陈述自己的看法，都会受制于否认和排斥的心理机制，必定会出现谎言和欺骗。

因此，虚伪是色情作品的一个经常的陪伴者。负责监管公共媒体的那些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者，通常也会因为有些投资者热衷于出版淫秽书籍和设置转播性事的频道而在事后洒下一些鳄鱼的眼泪，抱怨社会的淫荡化和野蛮化对青少年道德成长所造成的威胁，似乎这些抱怨者之前从没有得到大声和有力的警告。赞同色情作品的那些色情爱好者会将色情描绘为纯洁无辜。他们与那些反色情者对手一样，忽视了色情中的欲望、幻想和现实的复杂关系，忽视了色情的象征性和具体的意义（比较Jessica Benjamin，1993）。反色情者，也被称为瓦解色情者，虽然会将一切色情描绘为黑色，但在反对色情肮脏的同时，也喜欢在自己的媒体中放进一些露骨的色情内容，以增加销售额。他们甚至也不惧怕把色情等同于种族灭绝罪。

早先淫秽作品的作者，极可能主要是些男人，经常会让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又有丰富性经验的女性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话。因而比那个时代的医学论文（至少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更没有偏见也更现实地描述了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除此之外，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那个时代也几乎只有妇女参与制作和传播色情内容，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法国是这么个状况。今天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却似乎以为，男人的性幻想就已等同于性实践，色情的内容就已等同于性理论，强奸等同于一贯的性实践，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这些说法，甚至成了当今的口号。但是这类说法否定了，其实许多女性通过色情作品的内容也同样能获得性兴奋，许多人即使没有色情作品也同样有着许多肮脏的想法，并且正如伊莎贝尔

·阿祖莱（1996）所证实的那样，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让自己在性幻想中不仅愿意被侮辱被征服，甚至愿意被强奸。与通常那些反色情的女权主义者不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已经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特有的观点：即使一个姑娘愿意在幻想中屈身于强奸，但是真实的强奸仍会让她感到恐怖万分，这是一种心理创伤。另外，其他实验也表明，我们文化中的女性在谈论性刺激的情景和场景时并不比男人有更多的掩饰，并且有着色情内容的作品在一个性罪犯的前史中甚至比在那些不惹人注意的男人中只起着一种更小些的影响。

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虚伪，自然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如果恰巧处在一个自由化的时代，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委员会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制作品并不危害社会。并为这个结论很不寻常地引用了专家们在我们欧洲所实施的调查研究（比较：Schmidt et al.，1969；Schmidt und Sigusch，1970；Sigusch et al.，1970；Sigusch und Schmidt，1972；Schmidt et al.，1973）。但是如果恰巧处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反性虐和反暴力话语这么一个修复时代，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叶，那么同一个美国政府委员会却会得出一个不同于以前的结论：色情作品危害社会（比较：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1986）。只是这时却没有一个人会去反思心理分析的认知：满是粪便的地方，也是最干净的地方。

62 对性苦难不合时宜的服务和作为陈词滥调的性交

从一卷畅销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标题为《性幻想》的录像带中可以看出，在互联网胜利进军之前的色情制品的贸易中，那些性实践和场景会成为热门货。这些实践和场景是：肛交，口交，匿名的性关系，女同间的性交，施虐和受虐，群交，窥淫癖以及性侮辱。显然，这卷录像是面向一个较大社会群体的男性顾客，比如它并没有男同的性行为场面，因为大多数男人会对此感到反感。此外，这卷录像中的“十个最令人心

向往之的性幻想”，现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不再被蔑视或病态化为性变态者的反常性欲和反常性行为，而是被认可为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今天，已经没有制作商能够再用这类“最反常的性幻想”的系列，把顾客吸引到传统的放映机前。

自几十年前道德法则自由开放化后，性产业便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垄断市场。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中已经充斥着过多的性刺激，那么留给性产业的只能是一些具有爆炸性的残留物：暴力、儿童和动物。这就导致性产业最后能够自己独家制作的色情产品是如此丑恶和罪恶化。性产业因此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或是产品的无趣和无聊，因为这些场景早就在一切主要渠道（频道）都可见着；或是这类具有自我毁灭的性产品已经令人厌恶。通过媒体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们这里已经司空见惯的一切与性相关的事物的娱乐化，更使色情产业陷入一种文化的劣势。一方面，它总是只得在公共舆论的后面追赶，因为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琐事都会被置于公共舆论空间加以讨论和展现，甚至是享有特权的国家公共电视台也会对这类琐事感兴趣；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使自己的产品日益庸俗和肮脏，因为大媒体的操作是如此狡诈，总是在不断推移禁止的界限，而它自己作为可怜的中型产业却总是被束缚和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日益成熟化的性产品序列的相互串联，也使得色情制品产业内的再次普遍弥散化。一些色情制品的长期消费者已经在抱怨，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看完一切色情场景。

除此之外，历史悠久的电影摄像意愿（这个行业也像中型性产业那样生产一些不光彩的和市侩式的恐怖虐待影片），也遭遇到了电影媒体和照相业在当前还不能解决的一些技术难题。当神秘爱情联盟在几乎完全接近身体自然状态的那一刻，也就是身体的黏膜和性敏感区都相互沉浸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性场景的表演者（就像下棋游戏中的最后一步）已经被将死。任何只有依靠进入以生殖器为中心的文化中才能表演的内容，恰恰是在最激烈的灵与肉结合的那一刻，逃脱了一切观众的眼光

——即生殖器的主要部分（它的内阴部分），观众是看不到的。这就迫使色情也必须使用技巧和谎言，业内人士把这种技巧和谎言通常称为“钱拍”（Money Shot）或“深喉咙”（Deap Throat），意即口交（比较 Williams，1995）。“钱拍”——就是说：那个男性色情表演者在整个性演结束时，必须给出摄像机以一切可能的技术装备能够录制下的表演——他那具有可见性的性高潮和体外射精，作为他“真实”参与了这场性表演和性行为的明证。在这个场景中与男性表演者配合的那个女性色情表演者，必须装扮出似乎不在她的阴道或肛门内射精，即不是在她的体内，而是在她的身上或脸上射精，才能使她享受到最大的性乐趣和性高潮。“深喉咙”——一方面由于与阴茎的口交比与阴道的性交更容易拍摄，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那个女性色情表演者必须装扮出，仿佛一直进入到她喉咙深处的口交，是一切性行为中最令她感到兴奋的性实践。因此，色情业向我们展现的都是些传统媒体因受限制不能制作和改型的制作品。

被社会所不齿，并且总是或是说就某种意义来看受越来越严厉的法律限制的中型企业式的色情业，自然不能吸引有远见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开创新的商业模型可能性。自这个行业创立起，它的周围就聚集了一些小的犯罪（嫌疑）人；自一段时间以来，现在也聚集了一些大的犯罪（嫌疑）人。色情业的现状实在是令人可怜，仅仅停留在制作者敢于展现的色情表演者的屁股上这么一个事实，我们就能从中看出，这个行业为女性提供的服务有多么糟糕。当前的性产业竟然还根本没有思考到，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近几十年来已在文化上构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形态。罔然不顾这一变化的现实，性产业仍然一如既往地着眼于男性的陈词滥调和性幻想，而正是这些有着男性特点的要求和幻想，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已不免有性别歧视之嫌。

色情业制作的大众产品走势落后于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仍然是按数字化时代前的模拟模式、效应和维度制作自己的产品。它唯一的“进

步”只是在于，如今的性娃娃便宜地在亚洲生产，并且不再以乳胶为原料，而是塑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一些妇女作为个别的反性别歧视斗争者冲击这类性商店，那个被称为“金色的振动器”的假阴茎棒，也许也在这几十年内制作得更长更大些。如果有谁需要，现在至少也提供有“雌性”的海豚形状并带有假阴蒂的按摩棒。但性连锁商店供应的其他一些器具，仍然还停留在性功能与性体验分离的传统水平上（48章）。

尽管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化的时代，但我们仍然会不断地思考这么个问题：色情制品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危害吗？我们之所以需要思考，是因为它会唤起我们对权力和无能为力的想象；因为它会让我们回忆起，破坏和侵犯是我们性欲和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心中最隐秘和最深切的愿望，其实是对某种能让我们激动的物质的追求，并且我们真心想摆脱对我们构成压抑和控制的一切，即：良心、羞耻感和自我。我们社会中广泛流传着对超越这个界限的恐惧，因为破坏和毁灭会伤害我们的社会，就像拳头打在眼睛上；因为它的破坏性和攻击性情绪基础，深植于由我们这个他律（或他治）社会所制造出的普遍机制之中，如同那个社会死角的基础，我把这个基础称为“物化”。也许事实的现象在这里掩盖了内在的哲学根源，以致今天的色情作品没有了哲学的意义。从作为大众商品的色情制作品中，最能够轻易地看出，任何一种颠覆和侵犯的力量是怎样鲁莽和直接地出现在常见的性制品中的。那些畅销的色情制品，在核心上无非是男人式陈词滥调的性交狂欢。与此相连的主要是些陈腐的套话：男人都有个大阴茎，并且总是会随时勃起；女人是深渊，她们总是想被填满；只要阴茎把阴囊中的储存物射在一个女人的脸上，那么就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性生活。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洗漱包（意即为一夜情在外过夜而随身携带自己的洗漱用具——译者注）文化的其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也同样交织着

陈词滥调。比如那些有着上百万销售量、瞎扯一些爱和痛的通俗小说；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类小说归为软色情小说。它所兜售的陈词滥调，正好与露骨的色情内容形成一种互补。也正是如此，所以它在简化和虚假上并不比露骨的色情逊色。但应当确切地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缠绵的软色情还是露骨的硬色情，其实作为幻想型制作品无论软硬都可以中性化。这里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无所不在的媒体信息，尤其是电视以它的系列英雄和他们的美妙生活所传播的信息，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些信息。因此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开发出一种专为女性提供服务的色情市场。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尝试，拍摄专为“女性的色情影视”投入市场，但没有足够大的销售量。比如把自己看成是对性持有积极看法的女导演佩特拉·乔伊（Petra Joy），就曾试图制作一些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女性不再遭受屈辱，男人成为女人获取性乐趣的对象，为了表现非专业演员间的相互尊重和情感，影片放弃了肉铺水准如射精或夹层三明治的场景。

自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2.0以来，社会对于色情的看法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或是出现了哪些新的观点？尼古拉·德林（Nicola Dring，2011）在一份综述文章中对此做了详尽的报道，并从伦理观察的角度把人们的观点分为三种主要有代表性的立场：反色情、反审查和赞同色情。除了针对作为主流的异性恋男性的色情用品外，另外还有三种非主流的色情用品，它们是：主要为异性恋女性设计的女性色情用品（FemPorn），为女同、男同、双性恋、改变生殖器官、心理变性人和性恋不明确者设计的色情用品（QueerPorn）以及由非专业的性表演者制作的色情作品（Realcore）。

63 在性影院的一次观察

这个大城市的贝亚特·乌泽公司的区域由8个性影院组成。在其中一个电影院的入口处，我先是看见只有一些不同年龄段的男人（有年轻的

但主要是老年男人）正在进入，最后才看到有一对男女进去。这一对男女一进去后马上受到那些已经在里面随意走动的男人们的关注，这些男人的眼睛不再离开这个女人。我应用了社会学中作为参与者的观察方法来观看周边的这些现象，并同时通过思考做出了我的猜测：这个女人一定只有当周边都是些这类已经表现出性兴奋的男人，并且这些男人即使没在她的脸上，但至少也在往她那个方向射精的时候，才能获得她的性高潮。接着也确实出现了如我所料的事实。除了那个女人的男伴和我之外，我数了一下，共有9个男人积极参与了这场活动。9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性高潮。这时，我的头脑里过了一遍宙斯和赫拉的故事。这两位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曾为这么个问题——哪个性别在性爱中能感受到更多的乐趣，是男人还是女人——争执不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给出一个共同的回答。他们便去叫来曾有着男女两种性别生活经验的智慧的先知泰瑞西斯（Teiresias），众所周知，泰瑞西斯给出的结论是：男女获得性乐趣的比例关系是1：9，女人是9，男人是1。从这么一种比例关系中就能看出，大致从古典到现代，女性历来都被以科学为借口的话语，必要时甚至也动用医学暴力，压抑了自己的性乐趣——直到出现男人为9，女人为1的9：1的性乐趣的比例关系。自新性革命以来，这一比例关系又在往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换。

当我还在琢磨那些著名的德国女性学家们，如索尼娅·迪林，玛格丽特·豪赫或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是如何从亲身体验和话语分析的角度来量化这个比例关系时，正在放映的影片中，出现了一位浓妆艳抹、头发高耸、身着短裙、挎着一个小坤包的女士，她跪着用口交一个挨着一个地帮助多个男人获得性满足。我可以肯定，这位女士准有着一个男人身。当我不想再看这个场景扭转头去的时候，我的眼光却在无意中看到了旁边一个有着半拉着门帘的小房间。一个60或70岁年纪的男人，一丝不挂，挺着啤酒肚，晃荡着松弛的阴茎，在意义明确地向我招手；我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模样，心里却在吃惊地想着：还真是确实存在新性革命。

我的眼光又落到了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上，他露出了他的阴茎，并且显然很享受因此受到别人的关注。他坐在一个放在过道的凳子上，在玩弄着自己已经勃起的阴茎，影院里的其他观众都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并不看他一眼。过了一会儿，我又注意到一个体魄非常男性化、穿着长筒网状无根袜的男人，他让大家都看见他在手淫。但是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人都表现出一副似乎什么也没看见的神情。完全不同于此情景，吸引不少男人的是那些有着不同种族背景颇有姿色的年轻女性，她们提供相当谨慎的收费性游戏。当一个有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影院的第一排入座后，伸开裸露的双腿开始刺激自己的外阴部时，一些貌似南欧的年轻男人再也按捺不住自己，跪在这个女人的面前，一个接着一个地把自己的阴茎塞进这个女人的阴道。这期间，有个较为年轻的男人向那个坐在他边上的一个老年男人更靠近了些，以便这个老年男人轻易地将他已经肿胀的阴茎塞进嘴里。现在我真想装得像个盲人，却又看见在阴暗的角落坐着一个已经有些年纪的男人，正在玩弄自己那个显然很粗大的阴茎。再仔细观察，却发现那只是个套在他阴茎上的假阳具。这时影院里又进来了一对男女，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较为年老的男人，他们坐在一个其他12个正在手淫的男人都能看到的位置上，那个男的便开始在那个姑娘的两腿根部之间刺激和逗引她。当影院的放映结束时，影院的管理人员把大家都赶了出去。这就是新型的性世界。

64 电子性爱作为新兴的性欲性行为模式

新性革命与互联网相互依存。与我们相同，新性生活方式的活跃者当然也生活在我们这个电子数字化时代。他们在网上写博客或推文，推进、分享、聊天、发送、悻悻然离开或是性爱；他们在聊天论坛、新闻发布会、即时通讯（如Skype）、网络社区、虚拟的贴条墙、状态更新中欢蹦乱跳；他们不只是在生活，而且是生活在网络中；就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发达和新兴国家网络自我调节社会中的网友或网民。我们现在使用电脑就像使用洗脸毛巾那样平常。在30～39岁这个年

龄段中大约有90%的人经常上网，在20～29岁这个年龄段中甚至是95%的人。如今的年轻人已习惯主要通过网络平台或社区来建立自己的关系。因此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互交换电话号码，而是交换电子邮箱。按德国西南广播公司在2011年一项以400人为样本的调查，50岁以上的人中有10%，30～49岁的人中有33%，30岁以下的人中有21%的人当前的生活伙伴，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和新的电子通信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它为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所提供的一种优势，因为大部分老年人已经无法理解这个新兴的世界以及它的远程网络系统注册数据完全备份管理的网络基础设施。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问一下在70年前或80年前出生的人关于现今报纸上通常的电子生活问题，比如：“YouTube上的哪些节目是你最爱的视频？”“你在推特上关注的是哪个人？”“如果没有下载哪些应用软件，你的手机便只是开发了它的一半功能？”，或是：“您在脸书上有多少朋友？”

借助互联网平台所实现的所有性行为——用英语来说，就是网络性爱，电脑性爱，互联网性爱，网恋、聊天区性爱或微性爱，等等，这里的“所有”都被互联网（或在线）的性欲和性行为这个范畴所涵盖（比较比如：Dannecker，2009；Dekker，2003，2004，2012；Dring，2004，2008；Lewanowski，2003，2012；Schetsche，2010）。我所说的电子性爱，还有一个特征在于：这里涉及的不是借助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也不是通过新近出现的在线色情服务或其他性服务项目，比如从介绍妓女到提供性信息并独自一人实施或完成的性爱或性行为；而是特指那些通过虚拟现实出现的性接触，以及借助相互文字交流和（或）图像交换而出现的性爱或甚至达到的性高潮。这种类型的性接触可能只是偶尔的，也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电子性爱（简称为C6或CS）的关键词是：远距离和电子假阴茎。它特指不是贴身的而是远距离地通过虚拟现实的色情与借助数据头盔、数据手套、全身的数据套装和数字化的三维度性游戏玩伴等的组合，而激起的性欲和（远距离）完成的性行为（比较比如：Rheingold，1992；Eerikäinen，2003）。

电子性爱从狭义上说是一种新型的性欲性行为，一种出色的新兴起的性形态。从逻辑上看，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在一种新型媒体（如互联网）中，经历和体验自己的性幻想。正是网络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新型的性娱乐化、碎片化和多样化（即我描述为主要是性碎片式的弥散化，传统性领域的解离和原有性关系的多样化）的进程，并对社会构成了一种超越我们想象的效应。与任何其他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等性形态不同，电子性爱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和与此相连的私人及以往隐秘生活领域的商业化和媒体化，则是不可想象的。它包括当今经济体系所要求的行为方式：灵活，意味着今天可以忠诚，明天已经无悔地出轨；机动，意味着今天还在一个小的村庄，明天已经在上海；将市场经济的供求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私密生活中去；测试男人和女人在性市场上的价值；在性市场上兜售自己，甚至不惜展现自己最隐秘处的图像；就像在购买一辆汽车时那样实在和算计地提供满足对方性愿望的服务；就像在商品世界里所通行的那样，作为表象的颜值决定一切。

但这还不是一切。互联网的性欲性行为以及电子性爱，也是一种新兴的电凝式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新性革命不仅将性行为推进到语言的表演行为中，而且也推进到新型的行为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推进到电凝的模式中，即形成了在以往的历史中因为没有相应的技术基础而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群体式并有着诸多模式的性形态。可以肯定的是，在线的性欲性行为模式尤其是电子性爱的模式将成为批判主义性科学未来的中心研究课题；这是因为越来越广泛的性生活领域如果没有电脑和网络，当前尤其是互联网，已经完全不可想象；并且也因为，新的网络体系建构了我们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社会技术和社会心理的生活形态。比如“社会”网络系统帮助一个网民结交“无数”的朋友，而这些朋友是他以前还从没见过，并且可能比一个其他不认识的同行者更知之甚少。新的生活形态中的许多自相矛盾，改变了原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使之相互网络化，这就制造出一种自相矛盾的存在模式。可以这么说，在即使出现结构变迁的情况下，只要原先对私密性、私人性和公共性的

区分仍然还有效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网络新生活模式的特征解释为是将公共性私人化，或者说是将私人性公共化。

其中特别成功的是那个造就新型人类的技术，它从根本上连接了所有参与互联网活动的人。所有人都应当拥有一切，知识和文化产权应当属于过去的时代，所有人都应当有权参与对一切做出决策或决定，人的一些特征如性别、肤色或种族和社会背景应当不再有它的意义，不应当再存在国家和政府的禁止与监控，这就是互联网在我们中呼唤出的社会和民主的梦想。这些梦想通过互联网已经部分地成为我们实际的生活形态，并也正逐渐沉淀在我们的政治形态中，只是我们目前还无法知道这些沉淀在哪一天会以哪种形式爆发出来。此外，这种铸造新人的技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经常性的、成本低廉和超乎我们想象的丰富资料和内容，而且也把新型性欲性行为者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自慰推向自恋的狂妄——这些狂妄者的格言是："我能激起这个世界上一切男女的性兴奋，我是一切人的性渴望！"互联网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自恋和自慰者的交易市场。出现在电子城邦中的浏览者和供货者当然也要装扮成曾经在古希腊城邦中出现过的假伯爵。

从早期性形态的角度来看，在新性时代值得关注的还有：生殖领域已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日耳曼传统的直截了当的性交行为，不需要再遮遮掩掩；鉴于互联网用户主动地从偷窥转向暴露狂并且老弗洛伊德的生殖器第一的学说被降级为已经融化的昨天的雪，所谓性快乐这部分的本能已经成为如今性关系的基调。在对自己与他人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11章）的寻找中，网民们可以安静并从容地通过互联网测试一些甚至自己还不很明确的特殊性爱好——其中也包括那些在性与性别耦合时代的历史上还从没出现过的爱好。其余还需关注的是，身体的缺陷或残疾，比如微小的阴茎或患有阴道痉挛，在电子性爱（交）中，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在以往生活中最感羞耻的性愿望，也能毫不羞愧地表述出来——甚至是嗜好粪便和食人才能获得快感的性愿望。电子性爱也提

供了过一种双重生活的可能，作为一个网民可以用另一个人的名字、形象和面孔逃脱悲伤的日常生活，扔弃自己原有的一切压抑和禁忌，甚至也包括自己真实的年龄和性别。如果一个女人扮作男人或是一个男人扮作女人出现在互联网上，他（她）们就会体验到，人们对待不同的性别有怎样的不同（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价值判断）。这样的性别角色交换不仅能使人从中学到许多，而且也揭露了有关性别文化的陈词滥调，因此也就比任何科学推导和批判都更有说服力。电子性爱还有其他一些优势：比如一个女人不会就此怀孕，一个男人不能施行人身强制，这两个人都不会感染性病，男人们也没有了他们的勃起问题。除此之外，也可以猜测，女人在电子性爱中比其他途径能够更经常地获得性高潮，因为身体在这里涉及的是虚拟交媾的自我性爱。施密特、马蒂森（Matthiesen）、德克尔（Dekker）和斯塔克（Starke）在2006年所做的实验调查表明，有91%的女性通过自慰达到性高潮，而在她们固定关系中的最近一次性交达到性高潮的只有61%。但是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说，电子性爱这种没有直接性接触的性关系发展过程，最终会或多或少间接地改变我们文化的性领域。我们只能考虑与过去进行比较，如今的网络所提供的知识资源具有一种公共性，这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不少罕见性偏好的爱好者，正是得益于全球化的联网而能够相互结识和交往，可以通过互联网结成和组织成少数派团体，甚至可能就此推广和普及一种新型的性欲性行为模式。

虽然电子性爱有如此多的优势，但也不要忘了它还有不太光明的那一面。从那些我称为自我性慰者和自我性别者的角度来看，电子性爱的男女，首先看重的是以最可能自私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性幻想的目的，也包括性兴奋和性高潮。相对于那个虽然现实但多少是隐蔽着的电子性爱伙伴，他们确实通常不会考虑也很少顾及对方在情感上可能受到的伤害，也根本不会去顾及对方的心情。经常不断地会出现一些事先不可预测的性攻击，这尤其会伤害年轻的网恋参与者。由手机和计算机的新媒介技术而造成的极端媒体化和性的色情化，绝不是为情欲而建构的美丽

且有益的一种艺术。谁在使用手机，谁就早晚会进入色情或刺激性兴奋的网页，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更为严峻的是，一部分色情制品的个人化以及（更确切地说）是向公众开放的色情制品的个人化，通过自己公开的色情制品和通过电子色情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其原有的淫秽性。市民文化以极大努力建构的传统性秘密因此如同烟消云散。这是我们现在还根本无法评估会对我们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一种社会结构变迁。以自慰作为最典型的例子（比较：Bloch，1089；Braun，1995；Lütkehaus，1992；Rutschky，1977），在传统性观念的时代，会被认为是自我伤害和自我虐待，而在今天则会被认为是自我刺激和自我享用。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那些经常生活在网络中的人中，大约有2%～3%是出轨上瘾者，根据年龄段和抽查样本的不同，他们中大约有14%的人有出轨的危险。这些人长时间地逗留在网上，直到接近筋疲力尽的崩溃，他们无法从事一份有规律的工作，因而需要专业的治疗（比较比如Düring，2010）。

电子时代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和惊奇，但也充满了风险。有些人观看免费的无伤大碍的画面，动情和不动情的；有些人则在自己的电脑里下载要付费的赤裸裸的色情图像，并按自己的性趣进行加工；有些人进入一种电脑角色游戏；有些人则在聊天室里与一些匿名者进行交流；另有一些人可能坐在自己的网络摄像头前，向网友展现自己已经干瘪的身体。有的很享受自己从童话王子又变身为黑手党头目，就像在童年时代的游戏中可以不费劲地改变自己的身份；有的沉浸在自己的崇拜物中，渴望自己拥有无数这样的物；有的被禁止的画面所吸引；另有的只是想忘掉日常生活的紧张。许多人通过观看色情动作或色情画面和电影获得自己的性满足；又有许多人在调情或约会的微信群里注册寻找刺激。他们设立一个自己的注册号加上头像并写上自己的爱好，比如“女用贴身内衣裤”、“三人性游戏视频”、“逆来顺受者”，或仅仅是个“观察者”，等等。谁想在网上寻找一些自己期望的性实践，经常会发现一些如“大托尼”或“超女苏菲”等表现受虐和施虐的视频（Bondage &

Discipline，Dominance & Submission，Sadism & Masochism）。当然也有专为更细化的性爱好或非异性恋们设立的网站，比如“男同性恋罗密欧”（GayRomeo）和“同性恋王室”（GayRoyal），这类网站都曾是整个新性革命和新型在线性欲性行为的开路先锋。曾经历经磨难的（女）性工作者终于能够在网上设立自己的工作门户，有些失业者也许会突然想起，“其实我倒是可以在网上提供性服务，顺便挣些补贴家用的钱”。最后要说的是，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性窥视秀，一个巨大的性影院和一个无所不有的穆勒医生性用品商店，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化的电子大妓院。

但也有许多人确实在互联网上认真地寻找一个生活伴侣（74章）。2011年，约会服务网站登记有大约700多万德国人。专业的在线服务网站会按登记者的年龄、爱好等加以分类，但不能经常防止狡猾的欺骗者在其中鱼目混珠。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有谁通过互联网平台找到自己的生活伴侣，现在也不再是件尴尬的事了。如同所报道的，今天的许多生活伴侣最初是通过互联网（当然也包括“脸书”）认识的。但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网恋的快速发展，庞大的选择范围，经常毫无羞耻感的直接性，以及阻止找到自己不寻常爱情的预选（比如“只找基督教徒”，“只找素食者”等）。这些在线寻找爱情者，大多是些容易害羞的人，家住山区的人，有残疾的人，或是一些没有多余时间的人，她（他）们要在家照看孩子，没时间按传统的方式晃来晃去漫游在一家家单身者聚集的酒吧。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同时也可能是些在头脑中盘旋着某种特殊性爱好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是这个地球上有这类罕见爱好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此想通过互联网寻找与自己有着类似性爱好的同伙。如果他们有一天终于能够通过网络发现生活在地球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个人，竟然也有着与自己类似的性爱好基因，那么就不再会感到那么孤独。总体来说，互联网也有一些颇受欢迎的功能，它能够提供一些澄清和解释的服务，尤其是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能帮助人们进行自我启蒙。

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经常造访性交往平台，是否会因为不可回避的性刺激而提升现实生活中的出轨率呢？还是会因为得到了经常的性欲（愿）望释放机会而降低其出轨率？仅有的确切认知是，互联网性爱能够给许多人送上性的安宁。它甚至还可能保护那些性冒险者在传统生活中的伴侣关系。但由于至今还没有出现可靠的实证研究，所以谁也不能非常负责任地肯定这一点。能够给出的肯定回答只是：在网络中观看性视频和在现实生活中出轨的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邃的鸿沟；在个别的情况下，借助互联网向外释放自己性冲动的行为，甚至能够稳定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持续的伙伴关系。

有一些与人人都可以造访的互联网相关的重要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以解决。比如：应当怎样追究网上事实的或有嫌疑的性犯罪者的法律责任？应当怎样处置在线的儿童色情观看者？比如：如果一些政客一方面在公众面前竭力申明反儿童色情，另一方面却又对这类实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否算是参与了这项肮脏的交易？他们在这里是否只是侵犯了有法律效用的国际协议，还是有必要去警察局报上他们的名字备案？作为一个性医学者和性法医学者，我知道，刑侦警员常常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停止了对儿童色情制作人所进行的刑事追究，我在过去的几十年总是不断地经历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一些迄今为止与犯罪毫不相干的一家之父，却偶尔被人发现在电脑中下载了裸体幼女的照片，然后因法院的判罪而毁坏了至今的生活。汉堡的高级法院在不久前甚至走得更远，明令将在网上看这类图片定为犯罪行为（AZ：2-27/ 09 REV）。

对于性学家和治疗师来说，在网络2.0以它的各种形式如网络论坛、博客和聊天等提供服务的同时，当前通过电子邮件信箱、聊天室或互动式网站所进行的在线治疗或电子心理治疗这么一种发展方向，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病人和治疗师在这种模式的治疗中，不必再脸对脸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因而能够较少有心理障碍地陈述自己的尴尬事件。至今只在这类治疗中使用的行为治疗方法，据说因此颇有成效。以互联网

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的未来领域，在当前主要表现为预防、疗后护理，或是过渡式治疗——即帮助那些在原有的治疗中，由于某种原因在某一次不能或不想亲自去自己的治疗师那里看病，便可以在线服务作为前后的过渡。在线心理治疗，只是电子医学发展的一个旁支。其实早就有人在努力试验，用计算机取代通常的医生，它能在一秒钟内进行亿万次操作。如果它不能完全取代（我们今天仍还是这么假定）一个正在观察、看、说、触摸和富有同情心的医生，那么计算机至少也能帮助做出病情诊断，这也鉴于不断爆炸式递增的医学知识。

电子数字化究竟会把人类带向哪里，一种无时不在、超文字、拥有更多知识、互动、横向联系的一切，能够调动和改变既定现实、理性或潜意识的这种人类技术，还会激发社会的哪些变化，我不想对此再做更多的其他推测。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对今天的网民来说，互联网比那个仍然被称为现实的世界已经感觉更现实些。社会学家斯文·莱万多夫斯基（Sven lewandowski，2003：326）就此得出结论：互联网色情“建构了一种‘点击，交媾，忘却’的模式，它用‘供’过于‘求’解决了原先资源稀缺的问题，再现了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这也不免令人想起，按专家所说，如今股民持有交易所股票的时间跨度，不再像以前那样持有几个年度，而是平均只有22秒。动力也来自于那里的电子数据化，人们因此也更愿尝试冒险。如果在不久（即将到来的电子化时代）的某一天，也就是当性满足的感受不再像以前那样至少持续24个小时，而是只有几分钟，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就失去了市民社会强加给它的结构。

65 生活与性关系模式的新型联盟或多样化

传统家庭在数量上的递减和在社会地位上的贬值，以及由于传统性关系和生活模式与新型生活联盟的日益差异化，导致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家庭和性关系的解离和弥散化，传统的关系和模式或是遭遇排除，或是被同化。

社会学和性科学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种社会发展倾向和转型（比较比如：Düring，1994；Düring und Hauch，1995/ 2000；Schmidt，1993/ 2000，1995，1996；Schneider，2002；Schmidt et al.，2003，2004，2006；Starke，2005；Mathiesen，2007；Peuckert，2012；Seiffge-Krenke und Schn-eider，2012）。我把这类现象发展的表述概括为去管制的多样化。因为按我的理解，“去管制的多样化”主要贯彻的是持久灵活的战略策略。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也在第一意义上包括了性与性别的领域。那些实证社会、市场社会、知识社会、信息交流社会和经验社会的倡导者，将这类多样化归结为后福特主义的“开放是必要的指导原则”这么个公式。为了确保这一点，必须迅速建构一种跨越一切原有界限的连接。与这样一种经济策略和与此相应的社会要求还极不相兼容的是：死板的社会角色、一成不变的认知标识和无法渗透的心理认同。要想拥有连接能力和有成效的前景，必须与这一切既定的社会和心理状况相反，去要求一种有着短暂、部分或片段式的行为方式、认知标识和心理认同，使之最终成为一个模板式的自我，有着像一个工具箱那样的效用，可以按需要随时取出、补充或是连接里面的工具。“后福特主义生活策略的关键点，”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n，1997：146，149）写道，“不是在于构成身份认同，而是避免任何固定的身份确认。”正因为如此，比如“一个散步者，一个流浪汉，一个旅游者和一个游戏的玩客，从后现代生活策略的角度来看，都有着对束缚和固定关系感到恐惧的一种共同隐喻”——“出于同样的理由，朝圣者就其现代生活策略和艰巨的身份认同构成的任务来说，是最适当的比喻”。

几乎每天都能在公共媒体中看到和感受到当今时代社会和精神关系的多样化。这里是：一个曾经受监视的反宪法嫌疑人，成了内政部长；一个曾经的房屋擅自侵占者，成了警察局局长；一个曾经的性犯罪者，成了高级司法鉴定专家；那里是：一个法官正在为社会不允许的非法行为，争取合法性；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却仍在信仰上帝；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也参加山达基教派（Scientology，在有些西方国家被认为

是邪教——译者注）的活动；以及那个鲍勃·迪伦（Bob Dylan）——哦，亲爱的上帝——也允许在教皇面前吟唱，因为按梵蒂冈所说，他已不再宣传通过“性”来完成自我实现，而是通过灵性。这就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多样性。而那个“去管制化”其实就是社会强制要求多样化、个人期望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结果：因为罩上了民主装饰的客观世界，像伴有水果用来粘鸟的泥棒那样极其诱人、富有成效、公开，却又对谁都无所谓。政治上与这种传统的性和性别多样化相一致的，是在今天出现较低组织程度的“一个点”运动的一种丰富多彩相映成趣的合奏，组成这种合奏的有单身汉协会、脂肪崇拜者协会、跨性别儿子的家长协会或双性恋男人的生活女伴协会，直到变性者自助团体，这些团体和协会又在通常政治事务中部分地受一些非常偏激的局部运动的影响，比如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以及儿童权利捍卫者和动物保护者等协会都属于这类局部运动的团体。

具体激发这种性关系形态多元化的是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内出现的影响巨大的自我决定和人权民权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呼唤人的身份认同，但另一方面却又解体了它。比如：如果一对同性恋生活伴侣得到了教会的赐福（允许在教堂内结婚），并又享有国家认可的与异性恋的婚姻同等的权利，那么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形态也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破坏性、反常态性和顽固的执拗性。如今，这种巨大的自我决定和人权民权运动已经急剧地丧失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由于谎称自己为真正社会主义苏联帝国的崩溃，这类运动丢失了自己的幻想和乌托邦。通过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和掠夺式涡轮资本主义（Turbokapitalismus）的社会过渡，这类运动也失去了自己在经济上的游戏空间和游戏场地。一些被迫中断的改革（比如妇女应当在职场中与男人同工同酬的改革），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对，自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自助团体，达到了一种极其巨大的弥散度。按严肃的估计，20世纪末之际的德国共有6.7万个大大小小的自助团体以及它们的大约近300万的成员。从这些团体的活动内容来看，几

乎每个与社会相关的问题，都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团体，比如有汞合金受害者团体、子女领养者团体、小矮人（侏儒）团体、性上瘾者团体、糖尿病患者团体、因腹腔镜检查而留下慢性疼痛的女性患者团体、意外事故受害者团体、反吸毒者团体、反酗酒者团体、婆媳关系紧张者团体、对数字13（和星期五）的恐惧者团体，以及受剥削的亚洲妇女协会，等等。有些团体或协会有的只由几个人组成，有些则大些，由较多些的成员组成，也因此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比如德国心脏基金会、匿名酗酒者自助协会、多发性硬化症自助协会、风湿病患者联席会、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全德自行车俱乐部等。按专家报道，当前一些针对社会心理问题的自助协会和团体对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如果涉及忧郁、恐惧和厌食症等问题。在一个社会中，自助团体与这个社会个人化程度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少数人群体的社会信息讹传和影响力缺乏的程度，也取决于所谓的公共医疗体系的失败度。我们文化圈内的家庭，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剧烈的递减。如果说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整个家庭”还有着二十个、三十个或是上百个成员，那么近几十年来，我们家庭文化的发展正在趋向于“最小的家庭”。越来越多的单一个人，就是他这个家庭的全部（或唯一的）成员。在两个世代前还是家庭常态（或是家庭代名词）的父亲—母亲—孩子三边关系，已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变得如此苍白。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和冲突，越来越从多个儿童有意识和具体地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如果这个孩子在成年后离家独自生活，他（她）就会与自己产生矛盾和冲突。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的情感世界越来越浓缩为个人化和与他人的隔绝化。

由父亲、母亲、孩子构成的这种传统家庭递减的前提，是婚姻与家庭的一种在原则上的分离。这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就是不结婚，也能很自然地组成一个家庭。婚姻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它古老的象征意义，我们从这么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这个曾经神圣的机构已经向那些不久前还被看成是邪恶的破坏者们敞开了大门，即男同和女同。

传统家庭经受的去管制和贬值的发展进程，能够从可检测的人口家庭的统计变迁中读取，这是一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部分已迅速完成的变迁（也请比较81章）：

——结婚率的递减

——离婚率的递增

——每对生活伴侣或婚姻关系生育子女率的递减

——出生于生活伙伴型（不结婚或是在婚外的）家庭关系的婴儿率的递增

——一口和两口之家的递增

——妻子和母亲就业率的递增

——单身母亲以及逐渐正在出现的单身父亲的递增

——被称为混合家庭（Patchworkfamilien）的出现

——出于不同动机和利益状况，由原本没有血缘和亲戚关系的三人和多人组成的家庭的出现

——由国家认可的同性别生活伴侣关系和家庭的出现

——感谢生殖医学的发展，由用身体和幻想提供卵子和精子的捐献者、代孕母亲和专业医生共同参与帮助组建的家庭的出现

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很确切地把这类家庭表述为“后家庭形态的家庭”（“postfamilialen Familie”，请参见Beck und Beck-Gernsheim，

1994）。这类后家庭形态的家庭，也就是如今存在的如单身或单亲家庭，有着持续的爱情关系却又没有性关系的家庭，由三人或更多成员组成的有着特别复杂亲密关系的家庭，禁欲或交换性伙伴的家庭，一夜情、电子性爱以及无数新性形态的家庭。在这类变迁中，由于亚文化的联结和从青少年一直到生命终点的友谊纽带不断递增的升值，也导致传统家庭的社会和情感意义显著降低，至少在社会中产阶级的上层是如此。这种自愿选择的情感联结关系，使原本没有选择和不自愿的血缘关系变得苍白。如今已经有许多人都感觉朋友比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甚至更亲近些。如今也不鲜见由朋友圈为逝者发出讣告，而不（只）是逝者的直系亲属。

按德国联邦统计局针对新世纪最初10年公布的数据，有稍多于60%的德国民众（包括东德地区和西德地区）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或生活伴侣关系很重要。与此相对应，只有稍多于40%的人认为在生活中有孩子是很重要的，其中包括各年龄段的女性为50%，男性大约只有35%。鉴于所谓的工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当经常地保持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孩子便只能成为他们的负担。立法者给予单身独立奋斗者的优惠，也就是给家庭和其他责任共同体加重了负担，家庭成员和生活伴侣必须以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帮助和照顾有此需要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一直累到这个家庭联盟几乎陷于崩溃的境地。除此之外，所谓男人对孩子的照看，大都也只是女人对他们的单方面的愿望而已，并不能做多少实事。男人们尽管在问卷中回答得很积极（比如努力照看孩子），但按2011年初的调查数据证实，在20～55岁这个年龄段的每二十个父亲中，只有一人为照顾孩子享受法律优惠，选择了非全日制（即部分的）工作时间；有4/5的父亲自述，不敢向老板递交享有法律规定的父母在家照看孩子的时间，因为担心会给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升迁造成负面影响。

在2011年左右这个时间段里，大约只有1/4的德国民众还生活在一

种所谓的核心家庭中，即生活在由结成婚姻的父母和至少一个孩子组成的这样一种家庭形态中。单独生活在只有一个人的家庭的未婚单身男女，在东德是8%，在西德是10%。此外还有丧偶寡居的、夫妻间还没离婚但已分居的和单亲家庭。从31～45岁这个年龄段来看，东德与西德相同，都有50%～60%的人生活在一种固定的生活伴侣或婚姻关系中。母亲生育第一个小孩的年龄，平均是30岁。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在整个德国是稍低于1.4个（也请比较81章）。在2010年，有1/3儿童的父母没有结婚证书。非婚生婴儿的比例在1991～2010年间翻了一倍多。在今天的德国，有4/5的家庭没有儿童生活在其中。有一半的婚姻如今会走向离婚。这一切都对婚姻、家庭等传统概念提出了实质和历史的质疑。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两个都是各自家庭的独生子女结婚后，又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也就没有了传统家庭中的姐妹、兄弟、舅舅舅妈、叔伯婶娘和表（堂）兄弟姐妹。因此也就不必惊奇传统的家庭礼仪越来越罕见，友谊变得日益重要。按实证研究的数据，在我们中至少有一个朋友的人数的比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20%上升到了30%（也请比较83章）。

面对正在递减的国家福利和日渐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怎样才能走出这个两难困境呢？当前，似乎最美丽的幻想只能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共享各自特有的很不相同的能力和经验，希望也能有这样的经济可能性。从历史上来看，似乎今天已达到了夫妻或伴侣关系持续的最高点。从人的生活年龄来看，一对夫妻或伴侣还从没这么长地在一起生活过。从生育年龄来看，今天的妇女生育第一个孩子（并且常常也是她们唯一的孩子）的年龄还从没这么迟过。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今天的父母还从没这么短地与孩子在一起生活过。

当然，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方式（64、74章）。但是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并不如那些文化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只是在往一个破坏个人关系，特别是毁坏友谊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每天都能在大

众媒体中看到这类毁坏的悲剧性例子。这里可举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西蒙娜·巴克（Simone Back）在2010年的圣诞之夜向她的脸书朋友们通告说："吞下了所有的安眠药，不久我就将死去，因此向大家告别。"（Süddeutsche Zeitung，5./6.2.2011，S.22）她在互联网上的那1048个朋友的反应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谎言或恶意的玩笑，没有一个人真正出手援助。西蒙娜·巴克就这样死了，被所有的朋友抛弃了。但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同样给人留下相似的深刻印象。比如，有一个为了养家而不得不在国外工作的母亲，经常通过Skype关心和教育她的孩子；有一个分居在各地的家庭，经常借助互联网超越几千公里的距离，全家人各自聚集在摄像机前一起共同进餐。因此也可以说，互联网为我们维护家庭和友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只是现有的经验教导我们，不应当将在线的友谊混淆为不在线（离线）的友谊。但即使是已经离线的友谊也能够通过如今这么容易（像小菜一碟）的网络接触而得以维护和经常保持联系。除此之外，还能观察到的现象是：上班族就业者经常在上班时通过网络与自己的朋友联系和交流信息，以致工业化带给我们的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严格分离的规则，至少稍稍被打破。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不要忘记，工业化的进程属于那些最初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关系模式成为可能的社会历史进程。在今天，成为一种固定生活关系中心的主要是激情或被证实的爱情，不再是婚姻，不再是孩子，也不再像以前农庄或小手工业家庭为了勉强度日而结成的一个生存共同体。通过居家与工作地点的分离，通过妇女被认可为独立的法律主体，通过生育率的递减和先进技术造就的生活简易化的递增，比如家中的自来水，集中供暖和供电，冰箱，洗衣机，方便护理婴儿的尿不湿，幼儿园，人所尽知的各级学校，妇女自己独有的养老金，以及最初由女权主义者发起并在新性革命进程中获得整体民众认可的性别革命等。正是通过这一切的变革，众多妇女才有可能从此走上一条自己的路，男人们也才有可能有限地接手一些以往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或事务。这就导致，今天的男女相互建立一种固定的关系，经常不是

出于物质需求或预期能够继承遗产的目的，而是基于情感上的喜爱、性的渴望和精神（心理）上的信任；简而言之，是出于爱情。按我的理解，没有在东部的所谓社会主义，没有在西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我们的文化在战后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有关这种可以被称为L型关系或关系的关系的新型生活关系的阴暗面，我在以后还要加以讨论（76章）。这里只叙述两个有趣的发现，以证明婚姻的文化权利是怎样被剥夺的：美国研究者通过对2737个人的调查证明，有生活伴侣的人比单身汉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健康；但更重要的是，没有结婚证生活在一起的“野夫妻”，要比正式结婚的夫妻生活得更幸福也更健康些（Musick und Bumpass，2012）。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结婚证，那些共同生活的男女伴侣们便会觉得自己的个性更强大、更自决和更灵活。另一个发现是德国单身男女的人数也在递增。2011年的微型人口普查显示，德国现在有1590万独居者，这是总人口的19.6%，也就是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独自生活。而20年前，这类独居者只占总人口的14%。在大城市中，今天几乎有33%的人独自生活。年青的男人和年老的妇女占有最高的独居百分比。

66 男同在运动，或者说：同性恋性欲性行为的分化

鉴于文化所认可的关系和生活模式多样性，即使具有不可分割整体性的传统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在某种意义上以实践和理论证实了自己是文化的产物。在总体上说，近几十年中一切典型的性形态，都被问题化和差异化了。这自然也包括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模式，现在它不只在理论上不再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行为（如弗洛伊德当年已敏锐地预见的那样），而且也第一次被看做是文化的产物，以致性学家冈特·施密特（1996/ 1998）能够尖锐地提问：“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这是一个在新性革命之前没人能够认真提出的问题。

毫无疑问，异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不再是正确性生活的代名词，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如果同性恋者几乎不再遭受歧视，如果他们几乎不再有恐惧意识，如果他们因此也几乎不再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如同丹麦近几十年来的那样），如果异性恋不再以文化和社会的正常化和平庸化的名义挡住同性恋者走自己想走的重要道路，如亨宁比彻（Henning Bech，1998）发誓所说，同性恋早就消失了。如果他们有着与异性恋平等的权利，甚至被承认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他们就不再需要练习老的（表面）身份认同，就不再需要一次次发出老的（保护）声明，说什么作为男同或女同，并不在于他们自身的责任，而是由于大自然所为或在幼儿早期遭受一种本能冲动的命运所致；他们作为同性恋者，其实比其他人有着更文明的行为方式，并且无论如何不在第一层面上是个同性恋者，如果社会不是这么谴责他们，不是硬把他们挤进厕所中伤他们；他（她）们作为男同和女同，实际上是对父权式的一夫一妻制造的重男轻女的反叛和一种替代选择，这帮助他们的欲望最终得以自由释放。丹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谈论“同性恋的消失”；同性恋们在那里赢得了“胜利”，因此也就如同“死亡”那样地消失了。

如果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角度来思考这种消失，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如今不仅是同性恋者异性恋化了，而且异性恋者也同性恋化了。并且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异性恋者也采用了“同性恋者”的自由和独特性——他们没有孩子，不再有死板的性别角色分工，有一种新的身体感觉，男人也要表现出性感，一条罗纹内裤不再穿14天才换，不再对自己的大肚腩沾沾自喜，在固定的性关系与性爱的冲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自觉兼顾老的忠诚戒律，一系列前后持续的关系，尽管生活在固定的关系中仍还有不言而喻的自慰，一夜情以及在公园里的交媾之间的关系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性革命已覆盖了所有的社会个人，以致在以往较惹人注意的同性恋者和以往不太惹人注意的异性恋者之间出现了一种互补式的适应。沃尔夫冈·黑格纳（Wolfgang Hegener，2009：130）甚至认为：尤其是男同的行为模式，“如今成了性常态的原型”。

但我仍然无法想象的是同性恋在心理层面的消失，因为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心理差异太大了（比较Dannecker，1996a/2007a）。父母希望有正常的小孩，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这仍然是我们的文化基准。如果一个孕妇在今天希望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后是个同性恋者，那么即使是最硬汉式的性学家，也仍会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异常。只是如今与以往时代的差别在于：在今天，人们可能会把这位孕妇的行为看成是显眼或异常；但在四五十年前，人们会认为这位孕妇是个疯婆子，因为人们无法从生命的价值和爱的价值的角度去想象这位孕妇的愿望。

生硬和狭隘的是，如果今天的心理分析家仍然忽视一切个人和文化的差异，一如既往地去讨论一些老的家长式的正常狂所留下的未解问题，比如：在严格的意义上，同性恋“特有的”性欲性行为是不是一种病态？对他们分别进行不同于其他病人的治疗，是否会有效用？以及关于同性恋“特有的”性行为有害健康的假设。显然，“同性恋者”对这些心理分析家来说，仍然与以往一样是自己对一种疾病做出的一种诊断，而他们对“‘异性恋者’从不会运用诊断这个词”，并且也不能运用诊断这个方法，因为这“没有意义”，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赖穆特·赖歇在1997年如此写道（1997：953）。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人，尤其是一些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意认可从一开始便分为不是异性恋就是同性恋的这么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分类法（Düring，1994）。这类年轻女性，更愿意体验有时是同性恋有时又完全是异性恋的经历和行为，但是按心理分析的理论，一个人的性取向在童年早期就已最终定型，因此这些年轻女性向心理分析学说提出了一些目前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成年人性欲性行为的发展会受到这方面或是那方面的限制。对他来说，同性恋是一个方面，异性恋是另一个方面；偏离这两者的，都是变态行为。这种分类也适用于临床和治疗的综合语境，除了一些隐性的名词变更外，今天的情景在总体上仍与以前大致相同。但这类神圣和非神圣的父亲—母亲—孩子三位一体的，迄今为止被我们文化所认可的性模式，在当今的文化和社会中，却日益

丧失着其象征性的影响力，因为其间的界限变得有些不再清晰，它们的身份认同也变得有些脆弱。原有的三种大的（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性行为，如今已不再相互严格分离。性和性别的感受方式，即以前在临床和非临床中被归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的行为方式，现在却由于没有相应的其他分类法可借用，而走出了原有分类的魔圈，它将自己定义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以心理分析家们的保守态度作为实例，已经足以说明：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和仇恨还远没有从我们的文化中消失（35、78章），并且尤其是仍在如此教育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也正因为如此，众所周知，在学校的操场上和课间休息中，“同性恋”仍然是个恶意的侮辱用语。我们不应忘记，最近几年的实证研究数据表明：在自由的西方国家中，大约有50%同性的性渴望者并不向自己的同事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只有30%的同性恋者会向自己所属的宗教团体透露自己的性取向，而在朋友圈中，则会有80%～90%的人愿意表白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在总体上，双性恋者表白自己性取向的比例更小得多。虽然自由化已成为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同性恋者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遭受侮辱和歧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为在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中都隐藏着同性恋欲望的这么个事实。只要双方（同性恋和异性恋者）都坚持认为异性恋是基本的性取向，并且仍然继续有意识地不敢正视自己潜意识中的同性恋欲望，那么常人对同性恋者的仇恨和恐惧也就不会消除。只要双方（同性恋和异性恋者）都坚持认为异性恋是社会基本的性形态，并且仍继续执意不敢正视自己潜意识中的同性恋欲望，那么常人对同性恋的仇恨和恐惧就根本无法消除。只要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仍然作为社会精心设定的性形态存在着，那么对同性恋的仇恨和恐惧也就只能任其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就更能够理解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只是希望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希望能享有与异性恋者相同的权利，并希望自己的生活伴侣关系像异性恋生活伙伴关系那样，得到婚姻主管部门的认可。因为一个

正常的人，仍然——如一个国家队的足球英雄所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事。同性恋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它表明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群人是怎样仅仅由于他们的性欲望和性行为，便成为一个遭受我们文化中宗教、思想和政治承载者拒绝的群体。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具有自我意识的“同性恋者”的登场。当时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对文化和社会心理造成了其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具有唯一性的震荡。法律与道德不再没有任何过渡或条件地重合在一起。那个针对同性恋的可憎恶的法律条款（Theodor W. Adorno），虽然直到 1994年在西德由于两德重新统一的进程而废除，但实际上东德是在1968年到1988年，西德是在1969年到1973年的自由化过程中就已经被突破。在经历了被乱石砸死和酷刑迫害，在经历了监禁所和集中营之后，也在受尽了全社会各阶层市侩庸人的歧视和出卖之后，爱男人的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集体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特殊性取向，不需再担忧自己的身体或甚至生命遭受危害，并也第一次赢得了一种确切的自我意识。当同性恋者用昂起的头将原本充满侮辱性的“（男）同性恋”（schwul）这个词公开地用来作为捍卫自己战斗的用语，并以此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揭去了这个词原有的敌意和侮辱特性之时，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同性恋们也就轻易地抵挡了市侩小人刺向他们的长矛，并将它掉过头反刺回去。

自17世纪起，高低（标准）德语之后就有“Schwul”这个形容词，用来表示令人窒息的热，如同今天与“凉快”（Kühl）有些相对的“酷热”（Schwül）这个形容词。自19世纪以来，“Schwul”这个词在口语中也被用来表述男同性恋的行为，并且自20世纪以来，科学界已主要用“同性恋”（Homosexuell）这个词来表述这类行为——这个表述由那个把自己称为克特贝尼（Kertbeny）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翻译家和作家卡尔·玛丽亚·本科特（Karl Maria Benkert）所发明。这个希腊—拉丁语的用词“同性恋”（Homosexualität）或“同性恋主义”（Homosexualismus），是克特贝尼1869年第一次在公众的媒体中匿

名使用，当时他和那个无比勇敢的德国法律顾问和作家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他曾为他做过一些政治协助工作），一起上阵为男同因为爱情所遭受的歧视和刑罚而鸣不平（比较Anonymus，1869；Kertbeny，2000）。另外，克特贝尼也在19世纪60年代发明了异性恋（Heterosexual）和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Heterosexualität）的表述。但它们在1880年由古斯塔夫·耶格尔（Gustav Jäger）在他的《心灵的发现》（*Die Entdeckung der Seele*）一书的第二版发行时才被公开应用，并且又一次是匿名的（也请比较Jäger，1900）。

20世纪7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自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那些医学在19世纪末发现并最初惊讶地诊断为某种变态病态化了的男人（比较Herrn，1999；Pretzel und Wei，2012）。其实，男人对男人的性渴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只是怎样经历、评价和描述这种性渴望，一定取决于当时所处的那个特定文化。比如在古典时代甚至被柏拉图提升为治国方略的男人对男人的爱欲，与我们当代的男同性欲和性行为，一定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苏格拉底的情欲，绝不会将我们导向通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或彼得·柴可夫斯基（Pjotr Tschaikowski）情欲的道路。如果把一个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或安东尼·珀金斯（Anthony Perkins）的男人之爱与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纳粹党卫军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Ernst Rhm）、美国联邦调查局头子塞西尔·J.埃德加·胡佛（Cecil J. Edgar Hoover）或新纳粹分子米夏埃尔·屈嫩（Michael Kühnen）的男人之爱等同起来，就会因为抹去人与人之间性的个人特殊差异而助长对不同性欲望和偏好的一种偏见。与此相同的自然还有对当代女同所做的那种比较，即总是把她们与萨福（Sappho，公元前7世纪希腊女同性恋者和诗人。周作人早年曾译介过她的诗歌——译者注）进行比较，或是把西蒙娜·德·波伏娃与马丁娜·纳芙拉蒂诺娃（Martina Navratilova）的一种女同式爱情或是把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女同主张等同起来。

德语口语中“男同的”这个词，长期以来都带有一种明确的轻蔑和贬义。在今天，这个词已经有了它的双重意义：它既有一种解放的意义，也仍如原先一样是个骂人的词。一方面，同性恋者不再在总体上属于（福柯非常关切的）无耻或不名誉者，他们自豪地举行同性恋的示威游行（Gay Pride Parades）或是同性恋音乐会（Gay Games）；在有些国家，他们的婚姻已能得到教会的赐福，婚姻登记处——这个曾经神圣的国家机构，几乎也完全向曾经打破自己神圣的破坏者敞开了大门。但在另一方面，同性恋们还被作为另类，遭受德国的那些正常狂们的谩骂甚至是谋杀；一个颇有声望的基督教研究学院不止100次地向性学家询问：同性恋的性取向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因后天的某些因素造成的，这些同性恋者是否与其他人具有同等的价值；著名的躯体物理研究者正在寻找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同性恋基因；在基督诞生2000年后的今天，天主教的神父们仍在宣扬：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违反“自然规则”。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和梵蒂冈的压力，2008年12月在反对歧视同性恋的联合国声明的表决大会上，192个成员国中只有6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这就放弃了对在欧洲以外许多国家中同性恋的遭遇和生活处境的关注，比如在伊朗、也门、索马里、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毛里塔尼亚和苏丹等国都会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新加坡、孟加拉国、圭亚那、肯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都会对同性恋者判处终生或高于10年的监禁，比如乌干达当前正在计划制定更严厉的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法律，甚至直到判处死刑。

我们以前也并不比这些国家的现在情况好多少。查士丁尼皇帝（Kaiser Justinian）在公元538年颁布的诏书［也称为《法律增补77条款》（Novalla 77）］中，除了禁止亵渎上帝外，也严厉禁止男人之间的“性交媾”，因为这两者都会招致饥饿、地震和瘟疫。这以后的整个中世纪，男人与男人的性“交媾”在我们这里同样要受到死刑的惩罚。直到在1794年制定的普鲁士法第116条还规定了对同性恋者的死刑处罚。英国在1861年才正式废除对同性恋者的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就此从

世界上消失。在20世纪，德国纳粹不仅加重了对男同间性关系的惩罚条款，强迫他们挂上侮辱性的粉红色三角标记，还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致使上千人遭到谋杀。在整个纳粹时期，所有同性恋的男女，都生活在一种无尽的恐惧中。但即使在纳粹帝国崩溃以后，德国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历史，依然作为一种历史在延续（请比较比如：Lautmann，1977；Schiefelbein，1992，1994；Grau，1993，2011；Initiative Mahnmal Homosexuellenver-folgung，1997；Heinrich-Bll-Stiftung，1999；Jellonnek und Lautmann，2002）。

在性解放和“卑鄙的同性恋条款”案件后，同性恋的历史最终变为我们解放的历史。“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那些以往因为遭受迫害而被深深激怒的同性恋者们，开始写下文化历史的进程（也请比较78章）。他们那种由丹内克尔和赖歇1974年在对性行为的科学研究中所发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4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的生活方式，现在被看成是今天新性模式的文化前身或前型：协调以往被看成是不可兼容的个人心理需求与社会规则要求之间的平衡；巨大的社会适应性，与原生家庭保持距离，生育和护理孩子的意愿，在现有持续的爱情关系中寻找快捷而不费周折的性快感和性享受，非常能够自我取乐（自恋和自慰），并在与社会的交往中拥有一种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和创新能力。

67 女同在运动

如同加布里埃莱·登纳特（Gabriele Dennert）、克里斯蒂安·莱丁格尔（Christiane Leidinger）和弗兰齐斯卡·劳舒特（Franziska Rauchut）用事实证明的那样（2007）：女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历史以及她们为人权的斗争，也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第一份独立的关于女同性恋性欲性行为的论文，由一位名叫艾玛·特罗塞（Emma Trosse，1863-1949）的女教师和女作家发表于1895年（比较Leidinger，2011）。但我们的社会中，女同性恋者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狭义的）政治运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

末才刚刚出现在东德，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在西德。之前的女同性恋运动或是被整合在普遍的妇女运动中，或只是与女权主义者进行着争辩，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或广泛的社会运动。但是“女同”（Lesbisch）这个词与“男同”（Schwul）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没有了蔑视的意义，而是转义为“自我意识”。

1982年在海德堡成立并正式注册登记了“女同性恋者协会”。按该协会自己给出的数据，它在2008年11月代表了大约5000名爱着女人的女人，并在自己网站的首页如此写道：

> 我们想做些什么？——我们只是想向其他人展现“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赞同走出去和推动“女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发展；支持女同性恋者之间的相互联络；反对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对女同性恋者的歧视；刻意将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建设成为一种与其他生活方式有着同等权利的生活方式。女同性恋者协会把自己理解为是女权主义妇女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争取女性的自我决定权。相对于男人，不管是女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作为妇女的生活，都在不断遭受暴力、歧视、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待遇，都被简化为可享用的性和生育机器。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女同性恋者协会也将与其他妇女协会或团体结成同盟。……我们的理想是：不妥协地实现女同性恋者协会的政治要求，这就将引导我们去设计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有些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我们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消除了一切歧视的世界里，也就是说，在我们设想的这个世界里，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女人还是男人，是变性、双性恋，还是自恋，有其他能力还是没有，这一切都已不再重要。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暴力和没有等级之分的社会，它因此不再有特权者，从而也就不再有弱势群体。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同性恋不再是一个政治范畴，而是对一

种性欲望和性取向的表述。我们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只是至今的现实与我们的梦想还离得很远。我们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的前行步骤是：创建带有保证覆盖到每个个人基本保险的经济和社会平等，争取设立一条因为执行得力而使自己不断成为多余的反歧视政策，充满自信地展现女同性恋的文化和历史的连续性，这其中也包括在媒体、教学大纲和艺术中正面肯定地表现女同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还行走在这条路上，那么女权主义就一定是我们的政治要求！
（http：//www.lesbenring.de/selbstverstandnispapier.html；accessed：4.11.2008）

1999年建立的“男同和女同联合会”（LSVD），它在2008年11月给出的成员数据是3400人，这是一个男同和女同共同组建而成的联合会。他们“共同为争取平等权利和社会认可而斗争。它还有意识地选用了‘在德国的女同和男同联合会’作为自己的名称。这是为了表达，生活在德国的不仅只是德国人。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为跨文化的。来自许多其他文化、其他国家和种族的男同和女同都参与了这个联合会的工作或活动。——可以这么说，男同们在联邦德国已经实现了许多个人和社会的解放。越来越多的男同有意识地过自己的生活，并且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性取向，不管是在家庭里，在工作场所，在工会、党派和社会团体中，都应将德国的同性恋运动以民权问题的形式展开活动。1990年在莱比锡成立的男同协会作为民权运动的分支被冠以‘全德男同性恋者联合会’的名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德这边的女同运动主要整合在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之中，并作为此运动的一种分支力量开展自己的活动。与此同时，她们也在其中不断构建和扩展有自己运动特点的基础，为女同们创造相互交往的机会，如女同电话专线，帮助组建各种不同的兴趣小组，创办女同迪斯科和咖啡馆，设立女同专用

信息网络和提供文化服务，其中包括传单、杂志、书籍、出版社、电影、音乐和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她们又着力于揭开自己的社会不可见性面纱，争取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东德的女同和男同也经常共同参与工人阶层的活动。在东德政权崩溃和东西（德）统一之后，东德的女同大多专门致力于妇女运动内部的活动。——但在全德的层面上，很少听到女同为争取全部女性公民权利的一种努力。自1999年以来，女同也与男同们结成一个共同联盟以代表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男同和女同协会就此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同性恋者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支持和帮助女同和男同解决所遭遇的一切根源于偏见、社会或法权歧视、排斥、敌视、暴力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但它又不愿像一个‘修复机构’那样，对由统治结构给人造成的伤害去做一些弥补或修复工作。作为民权联合会，它更致力于改变既定的社会关系。它的目标是：争取同性恋者作为社会少数群体的自由和解放，参与和融合”。

（http：//www.lsvd.de/88.0.html；accesed：5.11.2008）

这就是目前我们社会中的女同运动。她们也正逐渐以一种特别的亲密关系形式的代表在社会上公开亮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影和电视剧，也主要把她们表现为年轻、漂亮、坚强和颇有成就的女性形象。这期间也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女同，公开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当通常被称为彩虹色家庭的女同们争取自己做父母的权利的时候，她们也就同时进入了公共领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当然其他时候，她们在LGBT——性恋少数群体（L为女同、G为男同、B为双性恋，T为变性者）的活动中，与B（双性恋）者相像，更愿意让G（男同）和T（变性）者在前台表演。

但在学术界自几十年来早就不是这种情况了。这里可举的例子是，比如由受雅克·德里达、莫尼克·维蒂希以及尤迪特·巴特勒思想影响的同

性恋活动家比阿特丽斯·普雷西亚多（Beatritz Preciado）所撰写和发布的《反性者宣言》（Kontrasexuelle Manifest，2004）。宣言声称要废除一切旧事物和旧规则——即废除男女性别，性关系模式，如婚姻，也包括同性恋婚姻、家庭，尤其是阴茎和阳具勃起的文化意义。在一个把传统的阴茎定位于只是借助“自然威力”的生物性假阴茎的假阳具化进程中，应当用超越性别差异的假阳具取代带有性别歧视的旧的一切（Preciado，2010：2）。同性恋男人会感到幸运，如果现在能够把他的阴茎定义为“生物性假阳具”。带有巨大阴蒂的男女两用假阳具的目标器官不是阴道，而是超越性别的肛门，这似乎表现出人类的未来将主要是肛交。受宣言作者的鼓舞，“施虐和受虐文化”也成为同性恋新的主体态势，这种性虐文化估计在未来应当被理解为是身体与机械制造对象之间现代关系的一种基本特征。那就需要引进一种摆脱自然冲动和超越爱情的事先有合同约定的性行为和性交媾，以帮助性工作者在作为“肛门无产者”（同上）的同时，也能上升为时尚的多媒体身体表演者。

现在需要提问的是：在这份《宣言》中到底插入了多少讽刺和战略？——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是鉴于当前并没有多少影响的有关性别和同性恋的辩论，尤其是在大学里，但也鉴于已有几十年历史的那种尝试，即通过理论和政治行动建立一种“女同身份认同”，以对抗非此即彼的性别二元律和异性恋的文化强制；斯特凡妮·佐伊尼（Stefanie Soine，2000）曾经印象深刻地回顾过这种尝试。另外，这里还需要回顾的是，德国的批判主义性科学和艰难且缓慢地持有开放态度的德国心理分析学家的尝试——终于转向研究和关注女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由于得益于父（男）权制的社会关系，最晚自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起，男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形式已经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汉堡研究院的西格里德·舍费尔（Siegrid Schäfer，1971，1975）、法兰克福研究院的乌苏拉·弗里茨（Ursula Fritz）和亚历山德拉·冯·施特赖特（Alexandra von Streit，1979a）等性科学研究的介入和干预，以及由伊娃·S.波鲁杜（Eva S. Poluda，1996a/ 2007a，2000）

和曼努埃拉·托莱利（Manuela Torelli，2008）在性科学和心理分析学之间建构的桥梁。

68 双性恋者

大约自30年以来，双性恋者的性欲性行为第一次有了现实的机会，成为一种自成一格的性和性别实践。被科学设计在绘画板上，它已有100年的历史（比较Goo，1995），自然是风险多于机会，更像是一种抽象的天资或无意识的能力，而不是有意识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公开和稳固的性欲望和性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双性恋男人，尤其是双性恋妇女反抗原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

当20世纪60年代反权威运动进行之时，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第一次被赋予了解放的力量。但那个时代男人的性欲和性行为都还普遍太固定，而女性的则相对比较易变，因而似乎能够用解放赢得的机会从事这一实验。我曾在性革命接近终结的时候，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起无谓地想寻找出不仅仅只是作为行为的，而且也以自己特有形态出现的双性恋。也许这种形态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还不能看见它，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还仍然主导着异性恋—同性恋—变态性恋这么一种传统的老三件。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所有的双性恋者都会被怀疑，他们特有的性欲性行为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狂妄自大，是一种被阻断的同性恋情结，一种自恋障碍，或是一种解除其他社会心理问题的救急之计。

因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双性恋现在决绝地退出异性恋、女权主义以及同性恋的轨迹，独自登上历史舞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文化和社会的核心，仍然一如既往只习惯于二元律的思维法：不是男就是女，不是健康就是有病，不是白就是黑。当然也一直存在双性情结者、跨性者和性倒错者。只是这类性欲性行为和性情结却历来被否认有

一种文化形态的尊严。因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双性恋者们一直在为争取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脱离女权主义者和男人的运动，脱离女同和男同的运动，聚集在自己建立的自助团体中，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1999年在阿姆斯特丹第一次举办了有关双性恋的学术讨论会；以每两年的时间间隔，接着又先后在伦敦、纽约和柏林举办了这类学术讨论会。

有越来越多的双性恋者被媒体发现和制造，在公众面前露脸，有时是自己主动，比如1996年第一次有个西部德国电视台的主持人主动表露自己的双性恋性取向，有时则是被迫的，如一个联邦部长被说成是（所谓的）双性恋者。

当前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以男人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女人和以女人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男人，哈佛女教授玛乔丽·加伯（Marjorie Garber）为此欣喜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双性恋的时刻。"如果说，老的流行歌明星如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还在玩一些雌雄同体或变性的游戏，那么新的歌星如迈克尔·斯泰普（Michael Stipe）和柯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则已经真的在这么做了。如电视连续剧《罗珊娜》（*Roseanne*）或《梅尔罗斯广场》（*Melrose Place*），如电影《三心一意》（*Three Hearts*）和《三人组》（*Threesome*）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主题。连《新闻周刊》（*Newsweek*）最后也在1995年把双性恋作为一个封面故事加以报道——《不是同性恋者，不是直男，而是一种新的性别身份的崛起》（*Not Gay. Not Straigth. A New Sexual Identity Emerges*）。按这份杂志报道，当时在美国有1400个双性恋者团体，其中也包括"明星粉丝团"和"酗酒的双性恋成年子女自助团体"等。专门报道双性恋的媒体机构有："双性恋有线电视节目"和"双性恋网站"，以及"双性恋简报和杂志"。另有一些媒体则更关心揭露那些受观众宠爱的女英雄如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和男英雄如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詹

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真实的生活中都是双性恋者，与男人和女人都有性交合。双性恋，现在也更细化和多样化了，按不同的主要偏好，可将那些巨星们大致分为“双性恋的直男”（Bi-straight）、“双性恋的双性恋者”（Bi-bi）或“双性恋的同性恋者”（Bi-gay）等类型。

由于艾滋病的暴发，必须认识和懂得双性恋的许多性行为。双性恋者被看成是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和未感染艾滋病的异性恋者之间的传染媒介，不仅被强制作预防性观察，而且也成为政府反艾滋病宣传和艾滋病自助传单所专注的对象群体。

这期间，性学家们也转向把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举办大型讨论会，实证研究这一现象，并试图确定双性恋在民众中的比例。这并不简单，因为新性者的特征是，他们拒绝传统的对性别的确定，他们也想超越自己原有的性别身份认同。对于双性恋者来说，他们最终的性别身份认同愿望，不再是传统的性别身份认同，不再是一种排他法，而是一种包容性——如奥斯瓦尔特·科勒（Oswalt Kolle）和吉安娜·纳尼尼（Gianna Nannini）公开表述的那样。

所谓双性恋者，无非是两类人，一类是自我认同为双性恋者，一类是在实证调查前的一年里有过双性恋行为的人，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性科学家们确定的双性恋比例游离在0.2%～10%之间。

除此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性取向并不能作简单的政治或历史分类，因为这是纯粹的个人私事。这类观点的主旨是：自我优化、自我调节。这种观点所提出的自我优化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如今也没有什么可再加以隐瞒的；但这种观点提出的自我调节之所以很难，是因为过一种双性恋的生活，未免是一种不断突破和不断游离和进出于一夫一妻制和性对象的专一的生活。另外，据其他一些研究所称，通常人对双性恋的恐惧更甚于对同性恋，因为这里涉及一些通常会令人感到困惑的事——就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们现在已经可体验和生活的所谓

动态的性的第一阶段。嘿，每个时代都提供机会，但又有它特定的问题。

69 施虐和受虐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性革命也为特别是BDSM——也就是“捆绑和调教”（Bondage & Discipline）、“支配和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施虐和受虐”（Sadim & Masochism）——的追随者提供了可能性，与100年前相比，他们非常容易地公开承认自己特有的性渴望。当原先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之后，原有的负疚感甚至罪孽感往往也随之烟消云散，自我意识得以提升，因而也就更增加了其中能够获得的性满足度。其实同性恋的施虐和受虐爱好者，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把这一爱好发展成为一种可观的亚文化，但对异性恋的施虐和受虐爱好者来说，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构成了自己的谈话和交流圈，设立了自己的文化项目和联络与协调中心，才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头条新闻》（Schlagzeilen）；以致直到1990年前后，才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有政治影响力的SM运动。2003年，终于成立了“全德施虐和受虐者联合会”（BVSM），作为施虐受虐者的一个最高自助团体（请见http：77 www.datenschlag.org；Passig und Strübel 2009）。但现在却是由互联网在给出一切毫无顾忌的尴尬基调。即使在完全正常的交友网站上，也会在寻友过程中被询问：一种倾向于S或M的爱好，是否会影响与您的交友关系？

“受虐”（Masochismus）这个表述是按作家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名字，由心理医生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第一次使用而流行；“施虐”（Sadismus）来自于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侯爵（Sade）的名字，但总是不断有人声称，“施虐”这个表述并不是该侯爵发明的，而是取自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

当初那些性学家，比如阿尔伯特·奥伊伦堡和伊万·布洛赫等人，比较深入研究的是施虐受虐者的变态心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德国性学家，只要不涉及司法鉴定的问题，比如“取乐杀人”是否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们对变态的研究相对比较有所保留（Schorsch und N. becker，1977）。只有汉堡研究院的斯宾格勒（Spengler，1979）和法兰克福（美因河）研究院的艾尔普（Elb，2006）打破了这一沉默，对SM做过一些值得提及的研究。因而便很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性学研究会在2007年5月举行的第22届科学会议，专门以“快乐和痛苦——施虐受虐的前景”为会议讨论的主题（比较Dekker，2007）。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个事实，会议组织者安德烈亚斯·希尔（Andreas Hill）、佩尔·布里肯（Peer Briken）和沃尔夫冈·伯尔纳（Wolfgang Berner）——这三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心理医生、法院鉴定师和心理治疗师——他们不仅邀请了SM交往圈中的（男女）代表，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倾听他们的叙述。这完全是件新出现的事，如果没有新性革命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可查阅的有他们三人编辑和出版的会议全集（Hill et al.，2008）。

这个全集也记录了那个同样颇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学家尼古拉斯·贝克尔（Nikolaus Becker，2008：159）的一段认为心理分析仍然应当一如既往将SM作为变态加以观察的讲话：“从变态的角度来研究SM，对于心理分析家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常常刚刚发展了一种对这类现象的理解模式，但这类现象却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显得心理分析家总是有那么一些老派和滞后”，他们“经常只能是跟在那些新的性形态构成的后面跑”。这里并不特指某种特定的，如性的变态现象，而是说由新性革命带来的新型性欲性行为的现象（也请比较70、71章）。

但是按我的理解，施虐和受虐的性感受和性行为方式，不能被看成是病态的。这种感受和行为存在于绝大多数异性恋和同性恋男女的想象中（请比较比如：Azoulay，1996；Passig，2008），并且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想象中。这可以从金赛的采访报道中得到证实。在他采访的2200名

女性中有55%的人，567名男性中有50%的人，坦诚经历和体验过一种出于“色情欲望”的“咬伤”（Kinsey et al.，1953：678）。通过疼痛获得快感，通过臣服得到安宁，似乎是人类的普遍反应。主动或被动、顶端或底部、强行占有和趴地爬行、统治和臣服，已经是我们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也隐约地出现在一贯被视为温柔浪漫的爱情生活中。另外，折磨和受折磨、打和挨打，也是基督教、（其他）宗教和文化的一种本质。

我很愿意看到，“施虐狂”、“受虐狂”或是“施虐受虐狂”这类疾病名称，从如今给出基调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疾病分类》（ICD）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消失。毕竟施虐和受虐的游戏有着很大的跨度，从游戏式的捆绑、抓咬、打屁股和鞭笞身体，到伤害性的拷打、致残、强奸和杀人，不能一概而论。将这一切体验形式和行为方式都强制地归为一种疾病诊断，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因而也是荒唐的。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如果从外部观察的施虐受虐行为使当事人自己和他的游戏伙伴遭受危险的伤害，甚至导致死亡，或是这类行为出现了一种强制的、不可遏制和瘾癖的形态，那么就是出了问题，就需要对此进行治疗（72章），也就是说，当性虐行动者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的时候，还是需要治疗的（比较比如：Briken et al.，2006，2007；Berner，Briken und Hill，2007）。但如果只是涉及一种在经典色情意义上的虐恋行为，那么这只是反映出一种社会心理的需要，这可以追溯到童年的心理成因，并且按心理分析和性学的理解及经验，这种行为有助于应对和缓解虐恋者的一种心理创伤或一种不可忍受的内心痛苦。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捆绑，捆住了一个老的创伤，或是说：鞭打，打走了一个老的心理创伤。性虐者可能需要的诊断和治疗，不应从文化对这类性行为的多或少的宽容出发，而是应当从其个人领域的攻击性、不可遏制的冲动、自我价值体验、结合能力、感受能力和控制他人的心

理需求出发，这就不会诊断出一种单纯的“性变态”或“性欲倒错”，而是比如能够诊断出一种心理创伤，一种攻击性的反社会症状，一种人格障碍，一种强迫症或一种瘾癖。

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能揭开虐恋的神秘面纱。虐恋绝不是如人们至今仍然想象的那么性感或是说那么能给人带来性快感。如果对它进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教科书对“正常的”性欲性行为或是一种“变态”的性欲性行为的描述。比如施虐和受虐行为并不需要在激情同时递增意义上的性体验的同步化，以及最后可能同时获得的性高潮。在“正常”的性交媾中仍然具有中心地位的性高潮，在一种施虐和受虐式的性交往中却有着一种比较边缘的位置。这么个事实甚至也使一位著名的虐恋科学研究者，如赖穆特·赖歇，感到非常迷惑（2005a，2007a），以致他斟酌了很久，才半信半疑地承认了它。马丁·丹内克尔在为诺伯特·艾尔普研究著作（2006：9）撰写的前言中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由性虐场景激发出来的激情和情欲，并不完全一对一地等同于性的激情和情欲。如果说虐恋可以性化，那么自然是其中表现出的权力和无能为力，是等级和暴力以及能给出相应信号的可恋物。由此产生的情绪能够达到类似其他爱好中对某种特别爱恋的物，比如橡胶制品、皮具、尿布，或唾沫所激起的那种兴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歧视和被歧视、压倒他人和被他人压倒、施加惩罚和遭受惩罚等的性幻想，远重要于身体的性反应或某种特定的技术。在最成功的情况下，性幻想在其最成功时，能够让人进入某种性本源特有的陶醉和恍惚状态——这种场景也可称为“头脑中的性高潮”；处在这种状态中身体所产生的兴奋物质（比如今天被称为内啡肽的物质），类似于在东亚的武术、在我们当地的高竞技体育运动、登山、高空跳跃，但也在跳舞、穿刺或生孩子时出现的身体自身物质；而“正常”的交媾只能产生如同一个日常进行体育运动的人那种程度的兴奋体验。因此也就不用感到惊讶，如果

我说，高竞技的体育运动员比别人更有可能成为施虐和受虐者，并且他们显然有意识地为了这种陶醉和兴奋才选择了高竞技的运动。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的差异在BDSM中，并不像“正常的人”那样是激起色情欲望和产生性刺激的关键。像异性恋者前后串联的一夫一妻制或像同性恋者固定关系双方达成共识的出轨这样一种有着基本规则的关系模式，似乎在施虐和受虐者之间还没有发展出来。他们的关系，按我们知道的很少一些例子，根本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中除了相互的爱情作为情感联结外，有不少也表现出单方面的爱情、服从或屈服。除此之外，艾尔普（2006：141）也在他们中观察到一种对“可控的滥交”亚文化式的寻找。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青春发育期前后就认识到自己特有的性爱好，但在许多年以后才多少公开地用这种生活模式去体验它。更费劲和更困难，但也因此体验更多的是，如果SM的爱好者想更换原有的性爱模式，去开始一种新的性生活，而这在他们中是一种经常性的情况。然而，从S切换到M，或是从M切换到S，常常是一种人员缺乏的结果，尤其是缺少施虐女性，并且令人惊奇地甚至也缺少施虐的男性。

在SM圈子和SM运动中值得一提的有文化意义的SM生活，显然都只是出现在大城市中，而不是农村。在德国，据行内人估计，对SM实践感兴趣的人，大约在50万到800万之间，并且大多是受虐者。这个群体正在寻找有施虐兴趣的参与者，尤其是女性。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是有组织的，即使考虑到今天众多的网络联系机会。狭义的拜物式的偏爱出现在SM中，有时也被称为淫荡的性行为，明显要多于其他的性行为方式。他们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会由于自己的SM心理需求去寻找治疗和帮助。

为了描述自新性革命以来的SM技术的弥散度，我在59章中已经列出了一些英语的表述。这里应当再简短地解释一些通常的SM表述：

Animal play（装扮成一个动物的模样和角色）；Bloos sports（用解剖刀、就餐刀、钉子等造成流血的性实践）；Bondage（捆绑或被捆绑）；Bottom（底端的、服从的、受虐姿势）；Branding（灼烧皮肤或用火将图案字母等印刻在身体上）；Caning（用一个钢管抽打或被打）；Chaps（露出屁股和生殖器的皮裤）；Dresscode（相互约定的服装，比如军装或皮衣裤）；Dungeon（夹钳）；Fisten（用手或手臂伸入阴道或肛门）；Flag（用某件东西抽打）；Hankies（手帕暗语，表示自己的爱好，比如用黑手帕表示虐恋）；Mistress（表示一个施虐的女性）；Pansexuelity（任何性取向的参与者都允许参加的虐恋游戏）；Safeword（约定一个表示虐恋游戏活动结束的暗号或用词）；Scat（粪便）；Spanking（用手打）；Stino（完全正常）；Sub（表示一个人愿意受虐）；Vanilla（香草味的性行为，不同于施虐受虐式的性行为，带有贬义）；Watersports（用尿的游戏）；Whipping（鞭打）。

70 变态和正常的性欲性行为

“变态”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最高程度的骂人用语。通常只有在涉及犹太人大屠杀、种族隔离或中子弹这类对人类造成极大伤害的事件时，国家级的政治家们才会使用这个词。最初用这个词来描述有些偏离的性欲性行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在爱情与变态中所谓的正常与所谓有些偏离的性欲性行为彼此相属这一事实，明确进入人们的意识。但在事实上，不仅从心理学和社会学来看，而且也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种一致性。没有这一面，甚至就根本谈不上那另一面。所有的性领域，从高尚的爱情到低级的性侵，都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它统一了原本分离的各个领域。从心理发生（也就是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热恋的过程并不比上瘾般的变态行为更自然些。从社会发生（也就是社会规则化）的角度来看，性偏离或受道德指责的行为，如果没有性的通常或被道德认可的行为，是不可想象也无法追究的。是爱情的高雅，才显示出手淫的低俗；对婚姻的赞美，就是对性引

诱的谴责；对婚姻的指责，就是对变态的性欲性行为的赞同——按“变态”这个词的词义来说，变态和正常始终就这么相辅相成，甚至可以彼此逆转（比较Sigusch，2005a：75-81）。

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作为最早的一个批判主义性学家就已认识到，将变态的行为病态化和去人性化，有多么错误和不公正。他的性理论反驳了当时主流心理学关于变态和性学说的主要假设。通过假设所有人都有一种多边形的变态基因，这种基因会在性本能和性成熟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导致出现一种可辨认（或体验）为露阴、偷窥、嗜好粪便、受虐、施虐，或同性恋的趋向，弗洛伊德便把那个恶魔般变态者追溯和归结为儿童时代是否得到健康发展的原因。弗洛伊德在早期的研究中，曾把所谓性本能和变态行为的自然成因与未故意和未压抑地发泄重合在一起，以致将人的性解释为在其自身的起源中就已隐藏着变态的因素。但在稍后他又强调，所谓的恋母情结才是导致神经官能症和性变态的核心情结，也就是说，变态也是一种发展的结果，是恨和爱两种情感冲突的结果和输出。更晚些时候，他又转向关注变态特有的变换和防御机制，尤其是早期固定的性本能和在否认变态的防守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退化，以及在防守过程中所谓的人格自我分裂。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他那个时代很通行，可弗洛伊德并没有设立一份分类图标，作为将一系列变态行为逐出正常的爱情和性别生活的临床诊断依据。他从没撰写过以“施虐和受虐”或“同性恋”为题的研究论文。异性恋的那种性欲性行为对他来说，是一种还需解释的特殊事件；至于同性恋，虽然在他那个时代医生的眼里无疑是种变态，但按他的理解，这是一种隐藏在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的愿望。他认为，如果在正常的行为之外，出现一些变态的行为，并没有权利将变态评判为是一种病态的症状；只有当变态在任何情况下都排斥和替代正常的时候，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提供了将变态诊断为病态的决定性的“独特”和“固定”的病症（Freud，1905：60f；alle Hervorhebung von Freud）。不只没

有像他那个时代的主流心理医生和性学家——比如男爵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那样——把变态只看成是一种退化，而且还顶住越来越充满敌意的优生和社会卫生的说辞，弗洛伊德的思想成就，无疑是极其非凡和几乎超越话语的。

尤其难得的是弗洛伊德特别强调自己甚至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都是把所谓的变态与所谓的正常一起加以思考的："日常的生活经验表明，绝大多数（变态的）过激行为，至少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行为，这是一种由于缺乏健康性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造成的行为。"（同上：59）"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愿意放弃某种被称为变态的但能作为正常的性生活目标补充的行为，并且单是这种普遍性就足以表明，将变态这个词作一种充满指责的应用，是不恰当的。正是在性生活这个领域中，科学研究往往会遭遇到特殊的，目前实际还无法解决的难题，尤其如果想在纯粹生理范围和病理症状之间为变异设立一条严格的界线。"（同上：60）并且在后面说得更动人些："爱情的无所不能，也许没有比在这类变态行为中更能表现出它的潜力或是说误入歧途。在性欲和性行为中最高雅与最低俗的（从天堂经过这个世界并陷入地狱），到处都有着一种最亲密的内在联系。"（同上：61）另外需要明确的是，最后这段话的语境中，并不涉及温和，而是"最可憎恶的变态的性行为"。弗洛伊德强调，是性本能冲动以令人惊讶的力量帮助变态者克服自己的心理阻力（如羞耻感、厌恶感、恐怖感和疼痛）去实施变态的比如舔粪便、奸尸等行为（同上：60）。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里需要完成"一部分自我说服工作，这部分工作就是，在认可这些可憎恶行为的同时，不能否认性本能冲动理想化的价值"（同上：61）。这样的见解，直到今天对许多心理学家来说，仍颇为陌生。他们不愿接受和承认，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变态的行为只是人的稍有特殊的行为，如同爱情、抽象思维或谋杀一样。所有的动物都被排除在这种行为之外。只有人能够成为"畜生"。

为什么只允许人们过一种正常的性生活，一种被英国人称为“香草味的”，与变态的性行为完全没有关系的所谓的正常性生活？也许只是因为变态者是我们中唯一有情欲的人？至今有哪位专家敢于写道：从一种性变态行为中得到的快感，是独一无二的？对绝对正常的人来说，他们在事实上无法得到的是那些将自己的欲望相对没有冲突地付诸实施的变态者将熔岩注入血管时的那种快感，也就是将自己的欲望整合进自身和生活之中；但同时却又能与此分开地享受另一种不同寻常的性场景。这种极其珍贵的自我和谐共振的独特性，这种既不是与外人也没有破坏性的变态行为的体验，通常总是因为沉默而神秘。事实上，这也是非常尴尬和恼怒的事，如果人们（即使是正常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性欲是怎样的荒唐，它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婚姻交换原则”，即婚姻在总体上是通过有正常强迫症人格障碍的配偶双方将性别作为相互利用的工具而构成的。如果终于有一天，所谓正常的人也能猜到一个变态者有着怎样强烈的性快乐，并且也许也终于能够看到他们是怎样享受自己的这种性快乐并从中获得性快感。这肯定是一种魔鬼般的巨大快感——正如法国女心理分析家珍妮·查赛格特-施蜜热尔（Janine Chasseguet-Smirgel）所描述的那样（71章）。

如果有一种性变态行为，能够不费多少周折，轻便、快捷，并且没有任何危险地使当事人进入自己期望的性场景，从中获得震颤般的喜悦，那就无疑特别符合时代。这种通过快捷且安全的途径获得的快感，将使得非常烦琐却又有风险的异性恋式的性欲性行为无法与之竞争。在任何时候都能呼唤出一个人完全没有冲突地进入“伟大”的变态性行为的实践，这样一种赢得强烈快感的方式，在一个时间转瞬即逝的时代里，在一个要求性满足度被设计得非常合适又拥有灵活的竞争者的时代里，无论如何至少在性的领域里，便再也没有了其他可与之竞争的对手。否则从震颤和陶醉的角度来看，为了能够与这种成功平衡了社会和心理的变态行为进行竞争，就必须通过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身体操作，或是必须引进一种特别允许的毒品消费。变态行为应当在哪里现实化这种巨大的

快感？是在家里对自己进行自我操作？在网上与他人（或没有）交流？是在无关于他人的一种变态者的关系中？在路边找野鸡或野鸭？或是去妓院？在某地偶尔遇上的一次性交合中？在公共设施的地窖里？在性影院和色情中心？在性变态者的聚会里？还是在只对内部成员开发的俱乐部里？……

我认为，这种被称为变态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有着人格障碍的正常强迫症行为的一种积极纠正，较为粗略地说：它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性欲和性行为（比较Sigusch，2005a：82-90）。它不是对正常的一种倒错和扭曲，而是对正常的一种强调和提升。那些典型的正常性行为特征，能够在所谓的变态行为中升华到极致。大致说来，变态者其实是与我们相同的人，只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我的这样一种假设，显然会激起绝大多数心理分析家的反感。如果现在有一个心理学家（不是一个有那么一些批判主义意识的性学家）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变性或性变态等的问题，陈述详细的理由：为什么今天对于有着这类愿望、身份认同或性偏爱的人们，不应当再做出病态化的诊断或结论；比如要求像在我们这里最终改变了的对同性恋（他们在不久前还被那些所谓的专家泼上遗传基因缺陷、社会偏差和心理障碍等一切可以想象的污水）的看法那样，改变对变态的看法；即使是怀有开放心态的心理分析学家也会对此提出责问。

如果出现这么个情况，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观察和评判日常生活中或是已经大众化并看似纯粹合理的情感、反应和行为方式，几十年来，我可能有些失职地把这种情况称为正常强迫症。之所以说我自己是失职，是因为“正常强迫症”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起名誉扫地的“心理错乱”这个专业术语，以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从心理学或甚至心理错乱的角度就能理解“正常强迫症”。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我想到人在我们文化中的遭遇，即我们的文化不是把人看成是有适应能力和无害的，而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看成是异常和危险的这么个现状，我的头脑中

总是会冒出“强迫症”这个表述。

但相对于“正常”，什么是“正常强迫症”的“正片”呢？众所周知，弗洛伊德（1905：65）把变态理解为“神经官能症”，因为变态者把神经官能症者压抑在想象中的那些意图和行为，直截了当不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这种症状部分地是以不正常为代价构成的，反过来也可以说，神经官能症是变态行为的‘底片’。”与此相类似，我们也能说：由变态者在行动中实现的性愿望，其实就是正常人只能想象或甚至都没有进入有意识层面的性愿望。也就是说，正常的性欲性行为其实就是变态行为的底片。那些公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说像一卷经过冲洗已经曝光了的胶卷那样）的变态行为，其实是正常人仍然隐藏在黑暗中，或甚至是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或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和期望的，但又在原则上还会发展的性欲性行为，就如一卷虽还未曝光但可加以冲洗的胶卷那样。这就意味着，作为隐藏在黑暗中的“底片”，终于有一天会将具体行动作为对压抑愿望的相应外化而发展成为一种明确的变态行为。按临床经验，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陷入生活危机的时刻。

为了能够检验和理解我的这一论断，这里需要回忆一下通常关于变态者的一些说法。应当以怎样的特征来描述这些堕落的、低劣的、有缺陷的、质量较差替代品式的、充满敌意的、无法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的、无人性的，也就是被揭露为像魔鬼般的人呢？我们先从一些说法开始，这些说法把变态者说成是如此死板，如此疯狂地去追求一件事，是如此的狭隘。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都是这样的人吗？

有人只阅读和只相信那些心理分析学家写的文章，有人却更愿意加入某个团体或协会。有人在私生活中只与素食者交往。有人如果不读浪漫小说几乎无法生活，有人如果不能不断地读和写便几乎无法生活。有人经常去Aa湖（一个在威斯特伐利亚明斯特的人工湖）旅游，有人根本还从没旅游过且生活在黑暗的空间中。有人看到那些消遣的电视节目就

感到怨恨，有人喜欢这类节目并把其中的演员看成自己的偶像，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有人对香烟的烟雾会有脸色苍白的恐惧反应，有人却自觉享受其中的愉悦。有人会在自己的乳头上穿个孔，对其他人来说这几乎就是残害。有人把自己的头发一会儿染成绿的一会儿又染成紫色的或下次则完全剃光，另有一些人自青春期以来总是同样的发型。有人每晚都在享受地抽着他们的大麻烟管，有人面对毒品就像面对一个精神病者那样感到惧怕。有人只通过网络看世界，有人则像个邪教徒那样地正统。简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偏爱和困扰，但如果这些盲点、偏爱和困扰属于一个普遍忌讳、被监察和有着正常化强制的生活领域，那么就应当考虑到，自己原本无关紧要的那些盲点、偏爱和困扰，不免要被评判为是变态的行为。

与此相反，只要是普遍和通常的事，不管它是一种被积极认可的固执、狭隘、疯狂，还是一种窥视世界的方式，都不仅不会遭受惩罚和嘲笑，而且还会得到奖励和敬佩。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即使在其他一切生活领域都可能像个孩子那样幼稚，但他依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一个人要是有一种特别影响观众的天赋，比如在音乐领域里，即使在其他领域甚至缺乏生活能力，也不会被看做是狭隘或不完美的。或是一个在左右都有着极大盲点的教授，以迦太基人的普遍思维方式，特别强烈和全面地认可经济过程中普遍的虚幻误解，却因为获得诺贝尔奖而变得高贵。他把一切都翻转和颠倒过来，把反面说成是正面，把一切具体和急性的社会问题，说成是普遍和历史自然、不可修正和无与伦比的现象，只是还差说：这是自然和上帝的意志。

另外，拜物主义的机制也一致被引入反对变态者和变态行为的领域。事实上，一个人对变态行为的崇拜，是与他的童年情欲体验相关联的；差别在于，这种情欲体验在正常的性行为者那里是一种分散的、多少比较温和的对多个身体部分和所谓性对象特征的崇拜，只是这种崇拜如果没有正常的性渴望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拜物

神。对许多人来说，钱就是自己最高的拜物神。并且我们也最终陈述了（10、98章），为什么正常的爱情有着一种拜物的特征。也就是说，这里又一次地涉及隔绝、集中和过度高估。除此之外，似乎变态者更喜欢谈论自己的变态性欲和性行为，喜欢自我表现，喜欢在自我的消失中直接进入与物的结合。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变态的性行为与其他的性形式相反，不再由人自己决定。其实这个自我在其中不是一种自愿退出，而显然是一种被强制的退出；自我会非常清楚地记录下发生了些什么，因为那个变态者并没有疯狂，更多的只是正在收集个人、时间和空间的信息，如同正统的精神病学在寻找精神病者时的查询。这种表面的直接性，使得变态者活生生和充满快感的行动转变为不自觉的感官快感和动物性的欲望反射。但这里引人注目的不只是这种行为接近身体的物理反射，而且这种行为也有它充满诗意的那一面，比如可以与丹麦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滕森（Inger Christensen）发表在《诗稿》（*Manuskripte*）杂志（Nr. 115/ 1992）中的诗作相比较。

但是即便如此，变态者还是被说成是只爱自己的人，他们将一种特定的基质或一种被称为场景、脚本或触发器的特定机制自然化，因而在自身中就有了一切激起性兴奋的要素。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个人关系，他们对待自己周边的人就像对待一件没有生命的死的物那样，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只是一种具体的物的关系。

这里绝口不提的是这么个有关我们社会中个人的诊断，即我们文化中的一切社会成员都有自恋心态，即使是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自私的，是按“我—我自己和我”这条格言行事的。按霍克海默（Horkheimer，1936：216）的分析，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学”的一个中心：“每个人都以为是自己构成了世界的中心，而每个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只是站立在这个世界中心的‘外围’。”我们身处的状况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另一个其他人的竞争对手，即使社会总财富在不断递增，但人却也在大规模地快速递增，这就导致这个时代

个人的典型特征是无情和冷漠，即使通过恶劣行径去强求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并且还洋洋得意于这种最可悲的自我利益合理化”。一个州高级法院院长、一个正规的心理学教授或是一个国防军将领，如果在纳粹时代为了不给自己招惹麻烦，违背法律和道德，甘愿作为纳粹的帮凶，欺负犹太人，杀害残疾人，或是侵犯邻国的平民，都仍会被看做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国家公务员。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外科医生，被一个明显变态，有着人们所说的“性欲倒错”（apotemnophile）的病人所说动，锯掉了他的一条腿，因为这个病人确信，只有割去这条腿才能继续生活下去，那么这个医生就会被公认为是一个不尽职尽责的医生，是一个江湖骗子。一个著名的演员，为了能够继续生活在掌声中，而向纳粹屈膝讨好，会被看成是一个极其出色和正常的人。一个拜物主义者，他的性欲固定在阴蒂分泌物的一种特有气味上，就会被判定为是一个令人讨厌和异常的人。

有人喜欢给变态者做出“内心空虚”的诊断，但应该看到，也有变态者的内心相对并不那么空虚，并且有时还比非变态者更充实些。其实只要看一下人们通常的日常生活，就已足够明白：无用和无意义的工作或是陷入失业困境，对废物般广告品的消费，故意设置许多险境仍然十分无聊的电视连续剧，酗酒和药物等，还有焦虑和抑郁，暴饮暴食和侵略攻击，自我伤残。如果这还不能缓解有治疗需要的心理疾病，那就必须运用其他和更进一步的治疗机制：邪教信仰，疯狂工作，冒生命危险的活动，毒瘾，性瘾，或是对自我上瘾。主要针对变态者的“内心空虚”的心理病态诊断，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有威慑性的道德价值判断。

除此之外，也常说变态者的性欲性行为，是什么千篇一律、单调和划一化的。其实可以这么说：一切爱情和性生活的表现，不管是转瞬即逝还是经久不衰，都会倾向于单调、划一化和强制性，因为或是新的方式缺乏刺激或是爱情的誓言让人感觉到累，因为拜物的特征越来越划一，因为性偏好越来越具体化，因为今天的成年人已经几乎没有了弗洛

伊德意义上的可辨认的“多边形—变态”。经常只有在艺术家和特别有创意的人那里，才能看到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关系。也正因如此，正常人的性生活总是那么平庸和乏味，就如同古代日耳曼人的直接性交。无比伟大、极度快感和永远不会消失的性兴奋，只能在想象中去体验，因此尤其如福楼拜懂得在艺术中表现这一点，并借用包法利夫人之口说了出来。还可以继续举出一些对比：比如指责变态者贬低了自己性伙伴的价值，但是我们的社会也从体系出发就在贬低儿童、青少年、妇女、女性性别和劳动者；比如指责变态者的贪婪，但贪婪和好奇心事实上几百年来已经是我们普遍的文化绝对命令（并且康德已经知道，资本主义公民社会是建立在财产欲、权势欲和名誉欲之上的）；鉴于他们的拜物特征而把变态者看成是低贱和非人化的人，虽然一种拜物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有机和无机的角度来看）已经成为人特有的、唯一能够统一情感和象征符号的单元；由于他们不能达到持久充盈的性满足感而把变态者贬低为功能不全，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比功能性产品的不断贬值，比持续燃烧的贪婪欲火更重要的了。这就是要想永久坚守市场，就不能只提供一些只有补充需要的物件，并且尤其重要的是：绝不允许市场出现一种完全饱和的满足感，否则那幢纸牌屋不就要倒塌了吗？

现在还需要说明的是，变态者和正常人一样，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抹去了性别和代际的界限，就如斯托勒（Stoller，1975/ 2001）对变态者的评价和卡普兰（Kaplan，1991）对比如殴打自己妻子或女伴的那些正常男人的评价；这两类人中都出现了去性化和父权化的现象，只要想一下他们公开化的性欲性行为就可明白；一些心理分析家非常愿意展现变态者性虐的肛门宇宙与金色的粪便相映生辉这样的场景，但是作为致命粪便的对立面，正常和健康的人不正在向这个世界投放令人窒息的发散物吗？从塑料包装袋、踩雷和臭氧杀手直到原子弹！已经不再需要进一步证明，他们，变态者与正常人，都将自己的性欲和性行为用来作为心理防御。对于正常人来说，这种防御行为首先能够将自己的恐惧性本能

（力比多）化；而对于变态者来说，则是对阉割（Freud）、对毁灭的威胁（Masud R. Khan）、对幻想的破灭（Chasseguet-Smirgel）或是对自我的清空（Morgenthaler）的一种心理防御。因此也能把异性恋者的性欲性行为理解为是对挫折、屈辱和恐惧的一种性本能（力比多）化。

正常强迫症者和被他们看成是魔鬼的变态者，双方都似乎有着一种正常的变态，他们都将离开正统变态学说作为他们精心设计的轨道，共同强调他们的目标是用一些现实去适应已经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恐怖景象”（Horkheimer）。因为这里涉及的整个就是与爱情和仇恨、安全和恐惧相关的情感，并且从今天来看，这里也涉及在自我中大大小小和多多少少能否承受的自恋空隙，这一空隙需要借助多少有些人情温暖的过程不惹人注意地加以填补。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价值问题。即一个是顺从自己命运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听命于自己死亡恐惧的正常精神病者；一个是否认自己这种与其相似的命运，以性场景的形态赢得超越自己死亡恐惧胜利（如特别是斯托勒所描述的那样）的正常变态者；那么这个正常的精神病者的价值就一定高于这个正常的变态者吗？较为理想的也许是这两者都能放弃这样的道路，但是一个分为上层和下层心理和社会的世界，并不能给予他们以一种胜利者经久不断的微颤和凯旋的狂欢。

关于他们中谁是正常的，谁是变态的，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变态的，这确实是一个不那么随意就能回答的问题。变态的究竟是那个节欲者还是那个性上瘾者，是色情片制作者还是色情片消费者，是妓女还是那个嫖妓者呢？为备战，每年都动用10万多亿美元，这是正常的吗？直到50年后才承认自己在俄国或其他什么地方出于完全低劣的动机杀害过完全陌生的人的那些杀人犯和谋杀者，而我们在这之前每天都生活在他们之中，每天都在他们的周边醒来，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我们的医生为了让一个已经死去的妇女腹中的胎儿继续生长，动用高素质的护理和代价昂贵的高技术，这样成长的婴儿在以后的一生中都要忍受自己是从一具尸体的体中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么个事实，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上又有

无数已经出生的儿童在饿死在渴死，因为无钱治疗原本可以治愈的疾病正在死亡，而我们却把他们的死亡看成是打死一些原本就惹人讨厌的苍蝇一样，已经不再会触动我们普遍的同情，这是正常的吗？在出现了让死亡妇女继续孕育胎儿的事件之后，德国《图画报》的记者问那些主事的爱尔兰根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你们是变态的吗？”医生回答说：“是的，我们都是变态的，但是在空洞客套话的意义上。”

“傲慢”（Chasseguet-Schmirgel）、“敌意”（Stoller）和“异化”（Masud R.Khan），这就是第一世界生活的标志。那些感觉负有捍卫一种人格结构、民智成熟发展和道德观念使命的心理分析学家们呢？可惜的是，他们认为是正常的事，却是一些在真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但他们却坚持以自己所谓的正常作为评判其他事物的标准，把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一切人和事看成是变态的，完全如同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把一切极端禁忌和不可理解的事都说成是变态的那样。鉴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绝大多数沉默的正常强迫症者，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继续描绘那种幻想，把非变态的心灵生活说成是由亲近、喜悦、柔情、兴奋、自豪、快乐、好感和幸福，而不是由空虚、憎恨、愤怒、嫉妒、苦涩、复仇、恐惧和焦虑决定的。

如果真是这样，也是非常美好的。可惜事实并不如此。变态者的心灵生活与正常强迫症者的阴暗心理相比，除了如儿童谋杀者于尔根·巴尔奇（Jürgen Bartsch）那样的极其稀少的例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可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们一方面过分渲染、详细分析和尽量记录变态者中如巴尔奇这类例外，对这小部分为淫欲而杀人的凶手表现出千百万倍的仇恨和蔑视；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有百万计的为国服务的枪杀者、纵火者、投毒者、从事恐怖活动者、作为刺客的暗杀者和强奸者的资料，都未加任何分析地封存在档案馆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除了这些事件的领导人会得到嘉奖和荣誉。再也没有比这更扭曲的了！谁如果在战争中用刺刀挑开一个孕妇的肚子，并拍下这一场景，那么他就是正

常的白痴。谁如果在一个占领的城市作为士兵向人群扫射，并因此杀死了三个无辜的民众，那么他却会被认为（心理）完全健康和正常。谁如果在观看有幼女叉开双腿的照片时，内心涌动起那么一点点性欲，那么他就是病态的，危害公众社会的，在道德上是一个恶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以这种扭曲的方式划分善和恶。但是只有所谓的变态行为，才是对这类（扭曲）划分的自然防卫。

71 变态中的“变态”

许多心理分析学家不愿相信，性的领域构成了（社会和个人的）各个独立部分的统一，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一种自身和谐的性的可能性，伟大的爱情是如此无法界定，如同那些所谓的变态行为（请比较Sigusch，2005a：91-95）。

比如受人尊敬的伦敦心理分析学家M. 马苏德·R.汗（M. Masud R. Khan）曾将变态行为公式定义为：分离性的主要客体对象的内向化，母爱，父爱或两者兼有，在对幻想破灭或毁灭威胁恐惧的性本能化中也同时内化了这些恐惧，使之成为自身内在的客体对象（collated internal object），赋予性化的客体对象变态拜物的效用，通过有缺陷的焦虑情结（比如与生理心理的病态相比较）而不断（在幻想中）证实威胁的现实化，由于内在的恐惧有着外来（异物）和被制成的特征，不得不时常向外发泄（一吐为快），但又由于它能带来性化的快感不得不总是使用它，作为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走钢丝行动，并通过这样的表演压抑和消退最初的幻想破灭。变态者将一种非人化的客体对象塞进自己欲望与他的“同谋”之间。然后，变态者们只需考虑怎样将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自我性和已经变得机械式的欲望如何按外部的机械力学定律向外释放（发泄），并且只要结构合理，瞄准槽与准星平衡，也会给他带来短暂的成功。但是鉴于这类心理分析坚持认为变态行为只是对无本能驱动具体事件的一种行动反应，因而逻辑地自然也不会再去谈论变态欲望的传递和

反向传递或内化这个客体对象的心理成因。按这种方式对变态者进行治疗，那么在治疗结束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一个脸上没有光泽、内心空虚和被阉割了的变态者。与此同时，如果心理分析治疗师的治疗报告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份报告的阅读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擅自修改治疗报告，是一个在专业界一直有所传闻的坏习惯。为了自己的治疗成果有一种漂亮阐述或元心理学创意的迷惑，我们可以颇为遗憾地想象，许多案例的表述和报告是经过特殊加工和整理的。

马苏德·R.汗应该是能对性的现状做出一种病症学研究的贡献，如果他能认识到变态行为只是全部问题的很小一部分，而不是将它排除在生活矛盾的领域之外；如果他能将变态行为的机制理解为是刻板定型化的领域直到向它的所谓反面领域（性本能冲动的混乱倒错和性本能冲动的随意爆发）的扩张。与此相反，他强行规定即使是变态行为也应做到机械式的定型和无我，他所要求的这两者，也许在一些较少惹人注意或其他的行为形式中已经司空见惯，比如：世界图像的拼贴特征，把拜物神的承诺当作现钱，内在联结的脆弱，自以为忠诚于内心的对外不忠诚，焦虑的应对机制，性的物化狭隘和它的不言而喻，不惜一切代价对自主的追求，在现实和幻想之间寻找一条有效获得性兴奋的道路，等等。但正是这样，就必须又一次运用变态理论，并完全就只有通过一种“异化”，即通过一种“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异化”，这种心理异化是一种近乎行为主义的、对事实异化的外表转换，并且也是在想象中早就被物化的一种异化。

疯狂的是，马苏德·R.汗还相对非常谨慎和富有理解心，如果我们思考对比一下比如那位同样令人尊敬的巴黎女心理分析学家珍妮·查赛格特-施蜜热尔（1986，1989）对此的见解，她的理论有几十年的时间都为国内和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定下了发展基调。但是，查赛格特-施蜜热尔自己在思考些什么呢？很少。因为她是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不，是以一种一神论—父爱—成熟的方式掌握了“真理”。她知道，什么是坐

在上帝宝座上的父神所想，什么是“自然”所想。她了解“上帝创世的蓝图”、“法则”和“现实”。这一切都表现出对性别和对代际如同“在犹太教”（1989：177）里那样的一种清晰明确和父权式的分离和区别。她以无可争辩的确信知道自己所写下的这一切都是真理，并用《圣经》中的语言强化自己的确信，因而也就在章节中经常出现：“上帝如是说……”（同上：221）。但是这种傲慢对变态者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效用。这种如“创世”、“父权制”、“这个”自然、“那个”法则、“这种”标准、“那种”科学、“清晰”、“种属纯度”、“成熟”等这类概念和假设，最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已经被完全解构和陷入名誉扫地的境地，也不再为多少有些批判意识、勇于面对时代现实的科学家作为规范在正面的意义上所用。但似乎仍有人还在相信，已经给我们带来过不可估量灾难的这类纯粹本体论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绝对废话，能够作为埋葬他们变态患者的威力无比的武器；只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那些变态患者像撒旦的崇拜者、“妥拉”（又译为托辣、托拉，为犹太教的核心——译者注）的蔑视者、道德败坏者、虐待人者、迫害人者和假革命的暴乱者那样地不敬畏上帝、违背自然、傲慢、恶魔般的、抱残守缺、不成熟、无法无天、不懂节制、扰乱人心、消极和有破坏力。如果一位女士，以《圣经》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无法明白变态行为的魅力，但是在阅读了100多页《圣经》之后，突然对变态者的看法出现急剧转变，认为变态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文明骚动”，当其他人还在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他们已经敢于在追求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新生活，在寻找实现这种生活的“新道路”（同上：266）；那么当这位女士的看法出现如此转变之时，任何说教也就无济于事了。

为了避免不公平，这里也应提及查赛格特-施蜜热尔是怎样从狭义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理论的：“母亲的诱惑把变态者推向选择避免需要性成熟的解决方案”（同上：251）。“母亲的这种诱惑”会进入儿童的潜意识中，给他造成心理伤害，导致他构成一种特别危险的“阳具母亲意象”。“变态者的目标是否定父亲的（生殖器）威力，并且通过进

入没有性别差异的肛门施虐，为自己带来一种改变现实的神奇感”（同上：222）。变态者正是通过这种“神奇的操作”，通过这种“狂妄自大”，战胜了作为“造物主的父亲”（同上：189）。但同时对母亲却总是还持有一种“敌意”（同上：181）。其结果自然是：撤除一切分离，进入“肛虐的宇宙”，疗伤，价值的逆转，法律的漫画化，“思维障碍”，尤其是在性别和代际差别意义上的现实感的丧失。她认为变态者为了施行自己的混乱行为，必然要对社会主要机制进行一系列的混淆、否定、否认、侵犯和欺骗活动。但是这位巴黎女心理分析学家在这里衡量是否变态的标准，如前文已提及的那样，是上帝和自然，更确切地说，是代表着（《圣经》和上帝）的法律，是其父母和社会现实。鉴于变态者的无法无天，他们成为一种恶魔般的精神诱惑，但也是一种极其神奇的诱惑。似乎一切都只是一种类似万黏剂般的肛虐糨糊，查赛格特-施蜜热尔也将自己这类心理分析概念和元心理学的假设一比一地应用在对历史进程和政治事件的分析上。如同（我们已经引录过的）一些政治家没有政治内容、空洞和混淆视听的公开演讲，查赛格特-施蜜热尔也从基因出发（而不是语义）在变态与专制（尤其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设置了一种相互关联：罗马帝国是怎样由于道德败坏而走向没落的，法国大革命是怎样与萨德侯爵宣扬性变态的小册子走在一起的，并进一步把纳粹的崛起归咎于当时德国众多的易装（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歌舞厅（同上：267；也请比较：149，153，219）。她列举的证据是：“那时至少有三部电影是以此为主题的。这三部电影是《歌舞厅》、《蛇蛋》和《纳粹狂魔》”（同上）。我已失言，不敢妄加评论。

这位女心理分析学家，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显然有一种自我矛盾的图像，即她认为这是一个恋母、犹太、明亮、经过启蒙和成熟的，但同时又是异教徒的世界。她这么认为的自身并不是一件丑闻。成为丑闻的是，如安吉拉·莫雷（Angela Moré）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她那些叫叫嚷嚷的观点居然被人们正面和积极地接纳。她用二进律非此即彼荒唐的方式把一切让她感到不舒服的观点和思想，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和

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和变态行为、母亲意象和学生运动，都扔进一个锅里，偏偏这个锅恰巧又有着魔鬼般的解构和破坏功能。按莫雷所说，查赛格特-施蜜热尔与她的丈夫贝拉·格伦贝格（Béla Grunberger）都用假名（嘿，我说这就是给自己戴上了骗人和变态的面具）公开指责参与1968年5月反叛的学生，有一种变态的心理结构。

对于查赛格特-施蜜热尔来说，变态行为是对正常的一种否定，是颠覆现实、腐化心灵和破灭真理的一种个人病态，但也是主要存在于社会体系中的力量。那个变态者在制造混乱而不是形态，用违背自然的行为取代自然，用肮脏污染纯洁，用幻想解构现实，用黑暗取代光明。她不能认识到，正是她的泛化谴责，将所谓文明进程的阴暗面归咎于绝不是无形态、不自然和不真实的变态者。阴暗面有：自以为是，而不是对上帝俯首贴耳的主体；不尊重第一自然而去寻找第三种“非自然”的自然；喜欢科学社会中受事实限制和有拜物特征的魅力而不是一维度的真理。但是这位严格的女主人在阴暗灯光下正在为清晰的研究、明确的性化和性别差异，为阴茎一元论和成熟的以性交媾为目的的性欲性行为辩护。显然，她仍然生活在一个生殖器虐待的宇宙里，只是这样的宇宙在今天已比50年前少了许多。她引用萨德侯爵的小说来说明，小说的主角在自吹些什么和他有多么的变态：谋杀父亲，乱伦，嫖妓，性虐儿童，兽交，婚姻出轨，污秽，放荡和不敬畏上帝——但是我们的女心理分析学家却忽略了，她所列举的这些大部分犯罪行径或行动，在今天已经变得很平常，哦，甚至还要加上恐怖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婚姻、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性影院、色情品商店、多方参与的网络性变态行为、由法律认可的性别变更等，这一切对查赛格特-施蜜热尔来说，都真是太变态了，因为这一切都越过了普遍通用的、由《圣经》给定的性别界限。但这也说明，她对变态行为的魔鬼化，即使在文化的意义上也越来越陷入空洞。

还是让她回到她的那个可怕的正常强迫症的宇宙中去，这是一个她

的宇宙，并且正是在这个宇宙中她表现为一个必须被称为变态和狂妄自大的病人：生殖细胞魔力，父权专制，否定母亲，女性性别的低贱，对正常的神秘化，拜成熟为神，无边际地高估某个单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用纯洁和服从来窒息色情的乐趣。令人悲伤的是，在许多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和报告中仍能找到这类意识形态，即使是以比较衰弱的形态出现。

72 从变态行为、性欲倒错到性瘾癖化

自新性革命以来，把某些性行为称为变态行为的时代，显然在文化和医学的意义上都在趋向终结。老的和新的，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称为性实践的某些多少被认可的性行为模式，已在我们的文化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从医学上来看，如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和《国际疾病分类》（ICD）作为国际疾病主要登记注册标准，已不再提及变态行为，只是把与此行为相关的性欲倒错和偏好障碍登记入册，但仍将这些不通常的性取向（偏好）和不通常的性实践标识为病态的障碍（也请比较83章）。我认为，将这些不通常的性取向和性实践病态化，是错误的。这会使当事者感到非常不愉快，并且所谓的病态也极其取决于特定的文化和这一文化的变迁。比如在20世纪初期，我们著名的性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把口交和舔阴看作变态。在20世纪的进程中，又有一些实践和生活方式，被删除出障碍、疾病和犯罪统计，比如手淫、女性的性冷淡、异性恋之间的口交和肛交，以及成年男女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20世纪末，在我们的社会中又出现了一些原本已经消失的性模式，如年龄差别很大的老少恋或伴侣关系、兽交等，以及被称为新性和新性别的那些双性恋者、性别变换者、施虐受虐者或性拜物主义者，也纷纷走出诊所，第一次几乎不受任何阻碍和有文化意味地公开上演自己独特的性爱好——请注意：他们演出的地点，是在我们欧洲。

但是这样的文化变迁过程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一切与性领域相关

的体验和生活方式，都应被看做是健康和在文化上是应被认可的。有些性偏好，比如恋童癖或奸尸（也就是与死人的一种性交往），以及严重违法的暴力或杀人行为，仍然是我们社会的禁忌。至于这里提及的那些性偏好，是否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疾病或是否应当被作为国际公认的疾病来看待，必须在其他地点再加以详细讨论，这也包括构成这些偏好可能的病因和治疗（比较Sigusch，2007a）。从社会文化的综合情景来看，这些行为的突出点在于，它们有一种似乎是强制式或一种瘾癖式的发展过程。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其实完全不依赖是否进入官方疾病登记都已经是有病的，并且通常都需要治疗，尽管这类性偏好也许并没有物理性地伤害某个人。之所以需要治疗，是因为当事者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平衡自己的欲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和职场生活中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当事者在获得短暂的快感后又必须一再去寻找新的刺激和新的快感；也因为短暂的满足不仅不能给出一种持久的安宁，甚至还会导致出现绝望和抑郁的状态。

事实就是这样。比如有个患者总是不停地穿越整个欧洲，只是为了能在某个特定的购买场景中购买一件与女人相关的服装作为自己的性拜物神；有个男人自青春期起，就有每天多次手淫的习惯，但仍然无法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有个女人每天都必须有多次的性高潮，但由于缺少一个与她有相应性能力的性伴侣，只能用技术或电子性器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个年轻的男人，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辆跑车的车门，不顾一切其他的事务与责任，一心只是去追赶这辆跑车；有个病人，总是在吃过有香蕉的那顿餐后，让一个深肤色妓女站上玻璃桌嗣屎，然后用刀叉吃尽这坨屎；有个男人，会用一根管子把自己的小便灌进他女伴身体的所有进出口；有个较为年老的妇人，只有当年轻的男人为她剪发和吹风的时候，才能获得性高潮；有个男人，日夜都无法停下复印裸体小女孩的照片，直到昏厥过去；有个男人，总是不断地通过网络约会服务平台，在一个星期内至少要约炮21个女性；等等，等等。因此也就不要感到惊奇，这些承受着巨大压力或强制性的人，大多是男人，但偶尔也有

女人，如果光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没有能力再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毁坏自己的家庭、职业和经济生存基础。如果出现了这么一种巨大的痛苦压力，那么就迫切需要专业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并且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德国性科学在原则上自维克托·埃米尔·冯·格布萨特尔（Viktor Emil von Gebsattel，1932）和吉斯（Giese，1962；也请比较Schorsch，1993）以来，对一种有治疗需要的性行为模式——那时还被称为“变态行为”——所做的定义，就已经主要停留在这种行为过程的强制性，并且尤其是瘾化的特征上。以人类学和心理病理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吉斯关于这类疾病的症状，表述了如下指导性见解：“陷入情欲的症状”表明，该患者面对情欲给他的印象，已经没有了把控自己的一种主权，他的“衰落”就像一条狗面对巴甫洛夫的信号。“日渐递增的频率和日益递减的满意度”症状，意味着患者必须在越来越短的周期内确认，因为满意的感觉在不断弱化。“滥交和匿名”的症状，表明该患者没有能力与其他人建立一种个人关系。“扩展想象、实践和玩弄狡诈手腕”的症状，表示该患者的幻想活动与强制现实化的性实践，事件的进展与事实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这也表示了该患者满脑子想的都只是变态行为。“瘾癖般的性体验需求”症状，说明了该患者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自己的欲望，如同一个吸毒者面对他的毒品。最后，“欲望周期性”症状，则指明了重复的强迫性，也就是该患者总是不断地将欲望作为内心冲动式的不安宁，作为性的窘迫加以体验。这样的一个患者，因此也特别容易受到刺激和感到烦恼。

在吉斯的理论出现几十年后，以心理分析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赖歇（1996a/ 2007a），为变态行为设置了4～5个临床标准。这些“不容置疑的偶像般”标准阐述了一切变态行为在引发刺激的意义上，都依赖于一种拜物神（偶像），不管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无生命物体以及（或是）与此物体相关的事情，还是涉及人体某个部分的对象，比如某种体形或肤

色。“变态场景”这个症状标准表明，拜物化的客体对象和行动只有设置在一个相应的场景中，才能达到它所应唤醒的性兴奋。“在玩偶中的玩偶”这个症状标准指出了，变态行为在建构的结构上，如同俄罗斯的套娃，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具体的变态行为都隐藏着另一种被封存的行为。“瘾癖急迫性”的标准，表明了作为一种身体瘾癖的体验，遭受着一种周期性重复场景的强制。最后关于“性高潮”的标准，最初赖歇（2005a：143）认为这一标准也同其他标准一样不容置疑，但鉴于受到他看重的一些同事的批评，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又进行了修正”。这条标准最初想说明的是，在变态场景获得了自由的性兴奋，几乎必然会在性高潮中实现释放。但是赖歇后来修正说：“现在我必须认识到，性高潮这个标准对于变态行为来说，应当确认为不具有强制性。因为也有一些变态行为，在场景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最初被激起的性兴奋。在许多（受虐和施虐）虐恋的社交形式中……性兴奋并不一定显示出一种标准，也并不可能一定实现性释放。”（同上：144）

我的研究方向是性医学，较早以前（比如Sigusch，2002），我便以我自己并主要是吉斯和赖歇的临床经验为基础，以及鉴于当事人所受的苦难，曾反对以性欲倒错这类轻蔑话语对他们加以评判，并且认为如果某种完全特定的心理机制和体验方式对一个患者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以致他没有这些就不能获得一种性满足，他的生活也会因此陷入内心的空虚和解构，那么这就是一种已经需要治疗的性变态瘾癖化的发展。这类心理机制和体验方式对性瘾癖化者的心灵生活起着一种如同强制的影响。我在下面将对这些心理机制和体验方式一一加以区分和阐释。

——性化。这个机制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一方面，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性体验和行动至少能制造出一些暂时性的心理平衡。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性化了生活。另一方面，在通常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中性的物件、行动或场景也常常被性化，比如腿的

假肢、剪（理）发或是用婴儿尿布包裹自己。

——对一件物体或一个场景的拜物化或偶像化。这种心理机制对于在不寻常的性形式中获得性兴奋并把这种性兴奋付诸实施，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益复杂化的性和性别变化事件中的一个时间片段或场景，都会多少有些过分性化；拜物化或偶像化将主导其他的时间片段或场景，并且对于那个不同寻常的情欲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异性恋男人，只有通过偷听一个女人正在解小便的声响才能获得他的性高潮的话，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男人是“变态”和“性欲倒错”。如果这个男人装扮成修理工匠进入女厕所直接观看女人解小便，那么他的行为就具有极端的攻击性。在一种不寻常的性形式中，一个人童年时代的一切情欲和感觉就会像在一件神物之中那样地全都聚集在一起，而在“正常”的性欲性行为中则相反会出现一种弥散：皮肤、乳房、头发、臀部、排泄物、声音、衣服等，都会多少成为温和的拜物偶像，但不会直接成为性刺激源。只是没有某种特定的拜物（偶像）化，“正常人”的情欲也就会很快消失。那些能够长年相守并相互一直有着性吸引和性生活伴侣的秘密，在我看来似乎在于：通过一种温和的稍有变态的行为，有效地相互吸引构成一个几乎不可解的联盟，并且最好是双方都是在无意识中从事这一切（83章）。

——性幻想的强迫性外化。只有拜物偶像以及某些特殊性场景的外化，才能使那位不寻常的情欲者获得一种近似性高潮的性兴奋。“正常”的人，通常会借助对性的幻想掩盖或越过性生活中那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但对于变态癔癖化的人来说，则必须把自己的性幻想在现实中付诸实施，他们身不由己地处在一种公然表现自己性幻想的强制中。粗略地说，他们受控于向外释放过程的强制；他们想象的少却又做的多。与此相反，主导“正常人”的则是向内释放过程，他们想象的多却又做的少。鉴于变态者的行为会因为要表现内心紧张和恐惧而构成了一种外化的心理症状，弗洛伊德把这种症状称为精神病的负片。因为精神病者不

会外化而是压抑自己感到恐惧或冲突的性愿望，这就导致他们有一种内化的心理症状。

——瘾癖化的性体验。瘾癖化的性体验与外化表现、性化和偶像拜物化相关联——这一切都超越了当事者本人的自我。如果这类行为被抑制，当事者就会出现戒断现象，如身心不适或一种抑郁等症状。当事者受控于性场景，如同吸毒者于毒品。比如一个性瘾癖化者会在网上不分昼夜地寻找自己的性偶像，直到自己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陷于崩溃。因此在临床诊断中，这类瘾癖化的主要症状有着决定意义。这类瘾癖化症状最容易将当事者抛出原先一个还算正常的家庭和一种还算可以的职业生涯，导致当事者有一种生病的感觉和愿意接受治疗的愿望。但鉴于患者从自己特有的行动中所获得的快感几乎是唯一的，他的治疗动机也就不会那么稳定，因而他的心理治疗的成功率也相应是有限的。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出现性瘾癖的现象，在该患者的浅层心理中不必然存在着一种变态机制；并且性瘾癖的现象更容易在那些性行为完全普通的人群中出现（比较比如：Clement，1997；Strau，2001；Briken et al.，2005，2007）。可提及的这类性瘾癖现象主要有：强迫性手淫，长年累月的异性或同性淫乱，过度沉湎于性电话、性网络或性电影，过多地进出性俱乐部、色情酒吧或性伴侣交换俱乐部，诸如此类等等。伯纳（2005：198，也请比较 2011）曾描述过这类问题：一个52岁的男人，“自1999年12月起由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强迫症——在性商店设置的录像单间里观看色情电影，在我这里进行治疗。这种强迫症会阶段性地爆发，经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会不间断地持续两个整天整夜，还时常伴有过度酗酒和抽烟。直到身体出现极度的筋疲力尽之后，这一强迫症才会稍渐消退。他的界于这种强迫和瘾癖化之间的性行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1992年与1993年间达到了一种最高度，以致这个患者每个月都要为这类行为花费1000马克。其后在1995年，通过一个持续6星期的身心治疗的疗程，才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改变，因为在治疗

期间认识了一位后来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女性，与第一次婚姻相比，他自我感觉与这位妻子的性生活出现了一种积极的改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1996年起，在他身上又出现了以半年为周期的过度观看性电影的强迫症，并伴有季度性的极度酗酒。当这个周期出现时，他就会带上一瓶伏特加酒和足够的香烟，坐在一间有30～120部性电影可供选择的单间里，用一卷5马克的钢镚或一大沓10马克和20马克的纸币不断投入机器，只想看一些性伴侣紧紧拥抱或缠绕在一起的影片，有时甚至只想看一些完全普通的性交场面。如果出现在镜头中的男女颜值较低，出现撒尿或是性虐，他就会按键跳过这些场景……强迫症爆发的这一阶段，平均大约持续8～9个小时”。

有趣的是这种瘾癖化依赖度的性别分布。布里肯的论文（2007）评估了78位男性和19位女性对自己瘾癖化行为的自述。这些男患者中，有几乎50%的人有色情片上瘾，多于2/3的人有强迫性手淫，多于20%的人有长期滥交，大约12%是性电话上瘾，多于1%的人有自我伤残行为。对女患者的数据分析如下：大约37%的患者会鉴于自己的长期滥交而寻求治疗，大约16%的人患有强迫性手淫，稍多于10%的人有自我伤残行为，稍多于5%的人有观看色情片瘾。

古老的性学家就曾有过许多对这类瘾癖化性行为的表述，比如用来表述男人性瘾的有“唐璜（勾引妇女的）行为方式”（Donjuanismus）和“色情狂”（Satyriasis），表述女性的有“慕男狂”（Nymphomanie）等。今天主要是按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给出的基调（ICD-10，DSM-IV，以及以后的DSM-V）对这些性行为以及性体验方式，如露阴癖、恋物癖、恋童癖、窥淫癖、易装癖、性虐（也包括施虐和受虐分开的性虐），都统称为“心理障碍”或“精神障碍”。除此之外，美国科学家还在这张病症单子上加进了摩擦癖（Frotteurismus，即在拥挤的地铁或公共场所在对方不知情的状态下，偷偷地用手抚摸或用身体摩擦他人身体的

某个部分，以取得性快感——译者注）。在这两个主要的病例分类登记系统中，都不再将同性恋、兽交以及恋老癖（Gerontophilia）列入登记系统，或是不再作为病态提及。这至少给予我们那么一点指示，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都会将某种其他的欲望、拜物偶像和特点看做是错乱、不正常和病态。当今，也鉴于新技术的可能性，已经不能再绕过这么个现实，即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有可能被强制和瘾癖化地屈服于来自外界强加的刺激和拜物偶像。卡夫卡（1997）曾建议把这类现象标识为“性欲倒错相关病症”（Paraphilia-related disorder）。但我认为，这一表述为了与传统的变态学说挂钩，在历史上是倒退的。我思考，性瘾癖或性强迫症或冲动控制障碍，按各自临床理论的状况，都是一种完全恰当的表述。但是在这类状况的极端发展中，我刚想起类似于精神病者（Psychose）的一个新术语，即参照Psychose这个词在希腊语中Spyche是指心理，osis是指病的状态，可以叫作“性病态者”。但在国际上，至少是当前，较为通行的还是那个比较含蓄的术语“性欲亢进”。

无论如何已经存在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这不仅是由于某些著名政治家较为怪异和惹人注目的性行为所触发的公众反应，并且也已有一份名为《性瘾癖与强迫症》（*Sexual Addiction & Compulsivity*）的专门学术杂志。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有治疗需要的性瘾癖病状的真实出现，却仍是极少的。尽管目前还没有可信的发病率数据可供参考，但是一切征象表明，虽然经历过性革命，性瘾癖的发病率在我们的民众中，并不因此达到百分比，而只是千分比。但是与性瘾癖的低发病率完全相反的是，性瘾癖的形式出现在男人中，明显（还是）多于女人。

73 新动物恋作为新的联盟

当我在几年前把新动物恋描写为新的联盟（Sigusch，2005a：56-65）并挑衅地把这种新联盟说成是“人兽之间的生活伴侣关系”时，《图片报》（Bild-Zeitung）在第一版上报道了这条消息。这以后的多日内，

我们研究院和诊所的电话铃声不再消停。许多人都向我们询问：“什么时候会设立这条法律？”“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与我心爱的宠物结婚？”毫无疑问，近几十年来在富裕国家（也只有在这些国家）中人与家庭宠物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以前，家里养一只猫是用来逮老鼠的，养一条狗是为了看门护院的。今天的动物在电影和动（漫）画中已是可爱的宠物“丁丁”（Struppi）、（卡通人物中的主角）“柳条制”（Wum）、《花生漫画》中的“史努比”（Snoopy）、宠物狗“兰坦普伦”（Rantanplan）、吉祥物“伊德菲克斯”（Idefix）和动画片《小姐与流浪狗》中拟人化的男女主角，这些宠物在现实生活中被看成和被用来作为社会交往的伙伴，直到那个过分要求的动物把自己抓出血来，如“宠物心理学家协会”——是的，也真有这样的协会——体恤地抱怨道。

富裕国家中的许多人都与一个动物，主要是与一只狗或猫，生活在一种亲密的持续共同体中。这里举几个例子：我每次出门时，都会遇上一位女邻居，她习惯在散步时推着一辆婴儿车，里面则坐着她那只一动不动，因为过于繁多和冗长的毛发而显得有些怪异的猫；她会尽可能走向附近的一个种马场，那里总会有年轻的姑娘在种马场里骑在高大的、热气腾腾的马背上，就是为了在骑马外出时至少能在情感上享受破处的快乐。邻居家的一个名叫“苏茜”（Susi）的小母狗在我生日之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从“整个心”祝贺我生日快乐。卡尔，邻居家一个精神有些异常的小伙子，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情人，但他会像对一个情人那样亲热地拥抱、亲吻和抚摸另一个邻居家马的鬃毛。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晚间的电视节目中说：“我的那些腊肠犬总是爱我的。”那位服装设计家沃尔夫冈·乔普（Wolfgang Joop）在2011年4月的《南德意志报》周刊中提到他的卧室时这么说：“我左手和右手各抱一个我的狗狗，躺在床上……”从这篇报道的配图清晰可见，他的一只狗狗在直接吻他的嘴。女模特娜塔莎·吉勒（Natascha Giller）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我的那条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谁如果爱我，也必须爱这条狗

狗。它总是在我身边。”好莱坞演员文·迪塞尔（Vin Diesel）在网上公布道：“我（在外拍电影）很想念它，我的狗狗罗曼。我们每天都通电话，不久就可以在纽约见面了。”纽约有只狗在燃烧着的屋子里，先后救出了5个男孩。有7000人打电话愿意为这条烧伤了四蹄和烧光了体毛的“女狗英雄”提供一个幸福的居所。那位中子弹“之父”塞缪尔·T. 科恩（Samuel T.Cohen），在教皇为他所做的“和平努力”向他致谢后，被人问道，“什么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爱”？他回答说：“我的狗。但是请您不要告诉我的妻子和孩子。”德国女演员罗斯玛丽·芬德尔（Rosemarie Fendel）有一次在电视里说，她收集她家狗狗掉下的毛发，并用来编织了一条毛毯，以便在以后没有了这条狗狗（老去了）的时候，还能盖上这条毯子怀念狗狗。在巴黎的著名墓园“塞纳河畔阿涅勒”（Asnieres-sur-Seine）里，竖立着许多名为“大流士”（Darius）、“乌列”（Uriel）、“斯卡姆比”（Scampi）、“拉里”（Larry）、“奇奇”（Kiki）等的墓碑，这大都是猫和狗，但也有鹦鹉、马、豚鼠、狮子、羊、鱼等，喔，还有一只小麻雀——法国雇主协会（MEDEF）主席（女）甚至亲自出席了这只小麻雀的葬礼。在这个无比美丽的墓园里，一个正规葬礼的费用大约是1.5万欧元，其中并不包括以后产生的墓园其他费用（Ulrich，2011）。但这对那些送葬者和哀悼者——老年人和青年人，律师和工人，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绝不成问题，这些人大都显然想在这种场合摆出个姿势，以表现自己与一个小动物比与自己的祖母更亲近些。比如为这些动物竖立的墓碑上，常常刻写着诸如：“睡吧，我的最爱，你曾是我生命中的快乐”等文字。也有人会将宠物火化后的灰，做成一个钻石戒指戴在手上以示怀念。当柏林动物园那只闻名全德国的北极熊“克努特”突然死去的时候，动物园摆了一本吊唁书，以便无数的人可以在吊唁书上签名以示哀悼，还计划“特地为它”设立一块纪念碑。这一轰动媒体的事件的可笑之处在于：专家们早就知道，北极熊不适于在动物园里按其物种的习性生长，因而总是在幼年就会死去。《南德意志报》在2013年3月9～10日的头版头条上刊

登了一张大型照片，并写道：“狗狗躺在床上，小猫在同桌吃午饭，仓鼠在自然疗法的医生那里看病——在这份报纸中，为大家刊登了诸多这类的照片。”（也请见93章）

从总体上说，在文化型的人与宠物的关系中，人对动物所做的那些，即使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宠物，其真实的效果虽不是直接和有意识的，但也是间接和不假思索地以威胁着动物生命的方式去爱护或照看动物。许多狗狗被整日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可怜的它们无法动弹，只得眼巴巴地等待监禁它们的主人回家，直到腿部的肌肉萎缩。比如虎皮鹦鹉（Wellensittiche），按其自然习性是群体生活的动物，现在却只能满足于与无生命的物体，与镜子和人工假鸟为伴。夜间活动的动物，如豚鼠，由于被迫白天活动而遭受残虐，并且不顾它的惊慌反应，硬是把它锁在笼子里，因为实在没有其他豢养它的方法。比如或是把（金）鱼放在一个玻璃球般的容器里，这个空间对鱼来说，就像对人来说，如同关进了一幢公寓楼梯下的一个木棚的空间里一样；或是把宠物与会威胁它生命的其他动物关在一起，似乎就如把一个人与那些逃跑的、已经不会再失去什么的绝望凶手关在一起。绝大多数宠物都遭受错误喂养，或是被喂得太多，早早地被送上死亡之路。与此同时，文化型的爱宠物者，不害怕为自己的宠物花钱。宠物们不仅得到最好的饲料和玩具（目前德国每年为此的开销是36亿欧元），而且还遭受一切可能的人化虐待（比较Saemann-Ischenko，2010）。狗狗们被每天刷牙，有的甚至还被装上了金牙，它们被穿上衣服，毛发被剪出某种特定的造型，被按摩，挂上饰品，住进带有空调的狗屋或是五星级旅馆，被购买了生命保险，用抗抑郁或其他心理保健药品，必要时也被进行脑部手术，当然在生日时，也会得到一块主人亲自烘烤的生日蛋糕，它们也随主人去参加教堂的弥撒，也会有牧师或神父为它们主持葬礼。

心理治疗与教会弥撒：人与动物的界限，显然一步步地被跨越和模糊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条狗能够像人模仿它的叫声那样地吠叫，

以致我们听到叫声后，必须仔细看一下，才能分辨是人还是狗在为什么事叫的时候；如果单身男女长期生活在一种与狗的关系中，因而在现象学的意义上，相互变得如此相似，以致如果他（它）们共同靠在窗户上向外看时，窗户外的人从第一眼甚至无法分辨谁是谁的时候，也就是说其相互的物理生理外形已经相互适应的时候，那么这时在一定程度上便已出现了人的动物化和动物的人化，也就是出现有些类似动物的智人化和智人的动物化的情况。如果人彼此间疏离，那么物和动物就会进入和填满因人之间的疏离而出现的空隙。如果人对他人就像对待动物那样，那么为了取得心理平衡，对待动物反而会像对人那样。如果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什么同情心和一切其他人性进步的成就，人的动物化就会得到一种虚幻的刺激：总是被喂食，不再有良心，不必去预测死亡，只需无耻的旺盛性欲，只去关心那些被自发吸引的事，但又不需赶走机体的嗅觉。所谓的兽装游行（Fursuit Paraden）并首先是宠物角色扮演活动（Petplay），都至少是尝试把这类角色互换设置进一定的场景中去。接着就是动物的人化。动物持有者（Tierhalter）和狗主人（Hundebesitzer）这样的表述已经说明，这实际上究竟与什么有关：这里强调了人对一种其他生物的权力——能够控制一切，既能够给予温情又允许施加暴力，而不必真实地担忧因此会遭到惩罚、报复和蔑视。谁不想用绳子牵着自己的爱侣，不管是好时光还是艰难时刻都拥有他（她）？谁不想有这样一个生活伴侣，有时可以把他（她）当作武器，其他时候又可以把他（她）当作依偎的枕头，也可以把他（她）作为门垫和避雷针，作为不厌其烦的倾听者和没有任何非分要求的同居者，最后还能作为心理治疗师（在一种尚未知晓和并没有可靠研究数据的情况下）和作为一个狭义的性对象（这里并不涉及一种所谓的变态行为或临床理解的人兽性交）？

也许在未来甚至能够专门培育和繁殖出人们的心爱动物，比如腊肠狗猫。研究者已经越过了植物和动物与人之间的障碍。一个种属的基因将被移植到另一种种属中去。在我们地球的地平线上将要出现完全人工

的，不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囊括一切的一种总种属。今天，一种数字合成科学正在综合分子生物学、化学、信息科学、生物学和工程技术科学间的相互联结，以便不仅只是解开生命的密码，而且也书写（构建）新的生命密码。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在2009年曾说：“人类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引导着继续的进化。我们将创建新的有机体，来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Süddeutsche Zeitung，14. 10. 2009，S. 18）

但是现在回到我们那些看来颇有些古风的动物之友们的观点上。从德国当地的实情来说，人们心爱的动物正在成为新动物恋者们的心灵弥补物。这些主要生活在百万人口大城市中的新动物恋者，因为孤独，因为从未生育过小孩，也因为常常期望（却姗姗不来的）爱的伴侣或真诚的友谊，而需要宠物作为替代，作为补偿。许多人显然除了他们家养的宠物，根本没有其他的亲密生活，因而对他们来说，我们文化中对于生命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亲密生活，如果没有动物，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这些心爱动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客体化（永远不会成为主体）和它的可靠性。狗不会反驳，是始终如一的可依赖的情感对象，并总会为主人回家感到高兴，等等。另外也早就众所周知的是，得过心梗的病人在其后的一些年中，没狗的死亡率经常要高出有狗的7倍。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Medical Jounal of Australia*，Heft3/1996）有研究者刊文说，有家养动物的人要比没有的人较少生病。因而政府应当鼓励饲养动物，以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但也有研究者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Heft 1/2010）发表统计数据证明，一条德国牧羊犬对自然环境的伤害不亚于一辆大型越野车。

可以这么说，相对来说，狗的忠诚最符合人对忠诚的心理需要，其他一些动物，如猫、羊、马甚至兔子和金丝雀，都不能像狗那样同时平衡忠诚与不忠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用奇怪，有无数的新动物恋者愿意在自己家中为他们的苏茜和克劳斯（都是狗的昵称）设置一个狗窝，并

愿意为他们的这些狗狗缴纳税款。对于我们性文化中那些典型反色情的人来说，狗显然完全恰好是一种几乎特意为他们造就的爱的对象。我们来看一下弗洛伊德稍有些悲观的分析，弗洛伊德曾说（1912：90），即使“今天，爱情仍在根本上是兽性的，如同它从来都是的那样”；柔情和色情这两种不同的情感流不会相互交合在一起；所有的性客体对象都只是替代品，并且只是作为替代，男人所爱的，并不能真正激起他们的性渴望，只有当这个客体对象不再受他们的尊敬，遭受他们的蔑视，必须服从他们，并且不能看透他们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也只有像一条狗的时候，才能激起男人的性趣。弗洛伊德自然没有这么用“狗”来表述他的想法，而是特指“轻飘简单的”小妞。但现在的情况是，无辜小孩以及那些肮脏和不道德的女人各自特有的作为性客体对象的优点，都合并在家犬之中。

越来越多的人会称呼自己的宠物、汽车、录像视频、酒、电视机或电视剧中的主角为“朋友”，特别是人们如此地沉浸在剧中的角色中并认同他们，以致如果少看了其中的一集，有人甚至会感到绝望。之所以会出现这里提及的人与宠物关系的变形（比较zum Folgenden Sigusch，2005a：61ff），主要还是由于原本的人与人和人与动物或物的关系，在今天已普遍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物与物的关系中无主体性那种在自身中的自我运作，已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既定现实。其结果是各种形态的背离人和无人情的关系的增多，并且不仅只是表现在新动物恋者的增多上。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他人、与物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已经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特性，因为生和死，主体性和客体性，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可辨。这些关系不再是它们曾经的那样，即不再是人化，而是物化的关系了（17章，以及Sigusch，1997）。绝大多数个人都只是作为购买商品的消费者才被认为有社会存在的必要，并受到商家的招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的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与物相互异化了，这就是说，他们已被绑定在死的但又极有活生生诱惑力的物之上了，原本第二手（即由人创造）的物构成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内容由物派生并反过来算计物，因而也就极端地只顾自己（以自我作为一切行动的参照系统）。它其实就是在原则上不合时宜忘我和无法满足地去适应现实和幻象中全能的物所导致的反面化（异化）。原有的乌托邦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越来越极其明显地为我与我自己、我与动物和人与物的关系所取代。

关于人的理念，自古代以来经过一切历史时代都被普遍认可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础，现在由于人与动物日益相似，已变得苍白。按原有的理念，人是理性的，而动物是非理性的。就是以这一理念为基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 1969：220）认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谈论心灵并认知它”，“完全并仅仅适宜于针对动物”，而不适宜于人，“因为只有动物的生命是按心灵的冲动前行的”。另外，他俩也能够用黑格尔的理论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因为黑格尔在《精神想象学》（1807：65）中写道：“违反人性的动物性在于，动物只能停留在感情上，并只有通过感情才能进行沟通。”鉴于动物爱好者的心灵日益相似于低级的动物心灵，他们想卸下理性和个性的重负，包括有关过去的知识和对未来的期待，以能够不需任何意识地去拥抱，去吃和喝。动物爱好者从无知和并不自然的自然生物中，得到（通常不应有的）亲情、敬意和顺从的呜咽，在与动物的联盟中不需任何思索地享受这种温情，而这正是他们在职场生涯和人与人的爱情生活中无法得到，现在却从一个微微蹒跚、从没有任何自决权的失败者那里得到了满足的心理需求；一，二，三，狗狗赶快跑向决定一切的主人，这个主人再次显示出，他是名正言顺的（狗狗的）持有者和主人。

只要看一下，我们对动物是怎样地友好，怎样地富有同情心、公正，甚至相互团结互助，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对动物的爱是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如果养育孩子的压力不那么大，不需那么担惊受怕，不需花费高额的经济支出，而且孩子也不那么顽皮不听话，那么我们也就会像对我们的小狗狗那样地疼爱孩子……霍克海默（1936/

1968：157 f）曾对以上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对动物带有那么一点感伤的爱，无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事件。它不是会延伸到这些活生生作为团结对象生命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团结，而主要是人们对自己的自恋情结和对公众意识的一个借口或是一种托词，仿佛成了对他们是否符合理想道德的一种考验。”在这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对动物的爱是对不充分有效的社会心理的一种补偿？是一种倒错吗？对外人，对劳动苦役者，对已经是一无所有的外来者的仇恨和攻击，威胁和偷窃，会转换为对完全不同种属的另一个生物的亲情和真情吗？如果有谁就这个问题想起了希特勒，想起他显然只爱他那条母牧羊犬，被昵称为“金发女郎”，成为唯一允许进入他卧室的一个生物，并按他的命令与他一起被焚烧，但这种想法是不公平的。不，这种比较甚至是对动物爱好者的一种诽谤，因为这种比较间接地假设了我们的新动物恋者可能就是在根本上被阻止了的大众杀手。但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他们对动物的爱多少已经成为虐待动物的一种绝望行为，也经常是对自己事务的一种毫无顾忌的营救尝试，比如由于孤独而绝望因而尝试激起和提升遭受严重损害的自尊：作为动物的主人，就会被迫切期待和需要，不再是一个孤独的自己，总有一个活生生和可爱的，甚至常常令人着迷的生物伴随在身旁，却又不需像养育一个孩子那样地操劳，尤其是不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操心和担忧。还有什么理由要去反对人与动物的这种新的联盟呢？

但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在反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因为时至今日它仍然沉睡在作为还在从事认知的睡梦中。可以说，19世纪和20世纪的心理学已经正在快速地走向它最后的社会有效期。自很长时间以来，社会急迫地需要一种人与物和一种人与动物的心理学。只有当这两者都作为成熟的理论出现后，我们才能决定，是否根本还可以和应当从人的心理角度去思考这类人与动物的新联盟。因为也有可能，物、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极其微小，或是已经不能按传统理论对人的假设再来对人与物、动物做出根本性的区分。也许个人今天的情感和思想只是对

压倒一切和富有诱惑性的物的世界的一种直接反射，这也就证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比半个世纪前的心理学更正确些。半个世纪前的心理学认为，动物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研究人，会因此丢失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动物，尽管只有动物的生命是按心灵的冲动而前行和继续的。心理学必须向人们解释，人是“倒退和被毁”的。如果“心理学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那么“原先那个人际直接关系的狭隘空间，便会变得更加狭窄，他们还需要在其中留出与物的空间。为了理解他人，心理学提出的诉求是不知羞耻的，也只是为了伤感地解释自己的动机”（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1969：220）。但是他们那时还没有谈及后来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80b：58）所关注的“物心理学”，也没谈及今天似乎正在兴起的“物社会学”。如今机制性程序式的意识，已经超越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或是说差异。如果真的仍然还存在意识的超验性，那么所谓的阈下心理也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技术性的“阈上”而已（Lütkehaus，1995：287）。

认知科学在其他背景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反正已经不再坚持人与机器的差别，因为目前已经无法排除，机器也可能有意识这么件事（但据我所知，至今还没发展到机器是否也有潜意识这么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回忆一下齐美尔（Simmel，1900）100多年前的观察：机器甚至比工人有更高的智能；客体甚至挫败了主体的文化。另外还要加上聪明的认知学家们的观察：人较高的启蒙能力通过神经科学不仅总是被解释为机器般的能力，现在“计算机”甚至还可以解读“精神”。人的自身也通过这种“启蒙”更加机器化了，也就是作为科学的客体越来越可计划、可计算和可控制了。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认知科学家给出了几乎完全等同于后现代哲学家的回答：是人自己认识到现在的处境实际上是一种机器般的生物，还是将人最初的一切关于“进步”、“有用”、“幸福”理想和意图都伴随着机器的转动而让它们消失？“什么是启蒙”？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现在比机器更高级些”（1784a：61）。但是康德的这个回答已经不

能再影响那些想创建一种“人与机器（电脑）新关系”（比较Beuscher 1994）的认知学家们了，康德的回答对他们来说太人类学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自称为“动物解放阵线”或“动物和平协会”的团体正在日益兴起。他们已经背离了人，用动物取代了人。他们称自己是争取动物权利的活动家，而不是动物保护者，因为动物保护者认可对动物的利用。他们是素食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们不吃和不用任何来源于动物的食品或用品，他们不吃蜂蜜，不用真丝，不用皮具，不吃鱼，也不吃蛋。对他们来说这里关及动物的“生理和心理的不可伤害性”，也关及它们“能够过一种由它们自己决定的生活”。它们虽然可能会有“另一种良心”，但是“它们的生存利益”与人是相同的。他们中的一位女代表说：“但是，这些可怜的动物被杀被吃，刚出壳的小鸡小鸭就被焚烧，大猩猩被单独关押。因此我们要说：奶酪是对动物的酷刑。”新动物恋者和食肉者也许会认为这些素食主义的动物权利活动家有些发疯，尽管他们知道，这些动物权利活动者的狂热，只是对通常无耻地虐待动物的方式方法的一种也许有些过激的反应，而他们自己作为新动物恋者正是以这种方式剥夺了自己宠物的最后一点自然性。

这里被称为新动物恋者的那些新型动物爱好者在社会中的胜利进军已经成为事实，媒体每天都在报道有关他们的消息。尤其是对动物作为生活伴侣和同居伙伴的爱，已为我们的文化普遍接受。女记者加布里埃拉·赫佩尔（Gabriela Herpell，2011：17 f）在颇有影响的《南德意志报》上刊文说：“人与狗，这不仅是一种友好相处，它往往也是一种挚爱。只是目前尚未清楚，狗是否也能在其中感受到与人相同的爱？”她的结论是：能感受到。毕竟是她的狗在守护睡着的她，把头靠在她的手臂上，或是快步跟在她的身后，或是把爪子放在她的脚上，在轻轻地嘀咕着什么。“如果这不是爱的话，那我也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爱了。毕竟爱，首先应当是想亲近某个特定生物的愿望，并且如果需要，也愿意照

料和保护这个生物。有些人，我曾相信他们是爱我的，但他们表现的爱却比狗对她表现的爱要明显少得多。”并且最后说：她的狗对她的爱，不会像人与人的爱那样容易消退。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也许有一点还要作为补充，即越来越多的人从一个动物那里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希望得到关注、拯救和有用的心理需求了。他们在拥挤的空间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收养了成百上千个动物。人们现在把这种行为称为“动物囤积”（Animal Hoarting）。近年来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000件这样的案例公布于众。有人在一间居室中豢养了130只兔子，另有人养了300条蜥蜴，有人养了93条小猎犬，更有人养了1500只虎皮鹦鹉。可怜的动物，可怜的人。

对于传统人兽之恋中的那种变态行为，比如对一只兔子或一匹母马的那种深情的性渴望，我们今天的新动物恋者，肯定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在互联网出现前，传统的变态行为几乎已经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但是在互联网上他们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司法工作者。鉴于《动物保护法》的不够充分性，黑森州在2010年特意再次将人与动物之间的性行为，作为应受法律惩罚的犯罪行为。事实上已经有许多欧洲国家，其中包括瑞士、法国和英国，就是尤其鉴于经由互联网组织和相约的与动物性交聚会而制定和颁布了新的反兽交刑法。但这一切与新动物恋并没有关系。新动物恋现在甚至更受经济的宠爱。当我正在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看到媒体登载的一条消息：瑞士一家名为“雀巢”的大公司，准备用一条有关狗食的商业广告，即用一种人不能听到的高音频，来吸引狗作为消费的主体。在这之前，在市场上也出现过为猫特意设计的iPad游戏和为乳糖不耐的狗特制的冰激凌。一些完全正常的动物爱好者也会为饥饿的流浪狗举办一次狗食长桌宴席，他们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如此写道：“我们是如此绝望——我们的食品架空荡荡……尤其缺少适宜于老年猫和老年小狗狗的食品！望着狗狗悲伤的眼睛……我们是如此绝望！！！我们几乎24小时日夜都在为它们工作……这些动物让我们感到伤心……我们用整个心来请求您的

帮助。”（Frankfurter Rundschau，1. 11. 2011，S. F4）

面对如此经过精心构思的煽情艺术，人们自然不能再袖手旁观。对此世界著名的“文献”档案馆（Dokumenta）的艺术总监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基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这么解释道：狗已经成为新型的女人。在人的艺术与动物制品之间已经绝对没有什么区别。她说：“我不想保护动物和植物，而是想解放它们。”以前，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现在是狗没有选择的权利。因而如今“在女人与狗或是在男人与狗之间已经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Süddeutsche Zeitung，31. 5. 2012，S. 17）。其结果是这位后人道主义艺术家认为，所有非人的动物都应当有自己的选择权利。这位女艺术家与一条名叫达茜的毛茸茸的马尔济斯犬（Malteserhund）在一起生活，并且也一起在公众面前登台。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应当为一种即将或已经到来的狗的民主而欢呼。

74 网站门户性爱和多元之爱作为性和爱的新联盟

我们原有的并且已经习惯了的色情和性关系，当然会通过那些新的模式得以补充甚至被取代，我们把这种新模式称为（性和爱）新联盟。鉴于今天的寿命预期、性爱关系的持续、公众领域的性化和媒体，尤其是以互联网形态出现的变革，性和爱的新联盟便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鉴于在体验、成就和赢利方面持久的文化和技术的压力，便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原有的，也就是古老联盟的那种稳定婚姻关系是怎样得以如此坚韧和持久的。为了勾画新联盟未来可能有的发展方向，我想在这里提及两种新的关系形式，并推测它们将发展成为普遍的文化形态。

这里要提及的第一个形式，英国人称为滥交，我则更愿意称为网站门户性爱（Portalsex）。这是一个显然能够补充目前仍然有效的偶尔性爱行为（主要是指第一次性革命后的婚外情和第二次性革命后的一夜情）的性形式。我把这种来自第三次或是说新性革命的性爱关系形式称

为网站门户性爱，因为它主要是借助互联网的网站门户得以发展的。在这类名为“lovepoint.de”或“firstaffair.de”的网站门户上，男男女女都可以写明自己在寻找什么（比如电话性爱、婚外出轨、性伴侣一对一交换、多个性伴侣轮流交换、群体性爱），以及自己能提供哪些色情和性的特长（比如亲热依偎式的性爱、肛交、口交、双性性交、角色游戏、施虐受虐性爱、偶像拜物性爱，或是喜欢在非同寻常的地点性交等）。

这期间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将自己的数据登记在这类性爱交换的网站上。2010年，大约有350万人单是通过“lovepoit.de”这个网站门户就成功地找到了自己期望寻找的性爱对象。鉴于从其他方面对这类性关系数据的实证研究，在“lovepoit.de”这个网站门户出现的数据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从性关系的角度来说，许多男人和女人在生命的自然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些年是自己独自生活的。当分离的痛苦逐渐消退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开始重新寻找伴侣。但不只是单身的人才感觉自己有权利寻找伴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男女，虽然生活在婚姻或是持续的关系中，但仍然不想放弃今天轻易可以得到的那些。点一下鼠标——已经可能成为一次色情的性冒险。被遗忘的是前互联网时代的那些专门的婚姻（或对象）介绍所、低级妓院和街头妓女。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网站门户性爱的历史前提和它当前的体验和表现形式，就会感觉到它是一种典型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模式。它之所以出现的前提是：婚姻不再是唯一的性关系形式；可自我调控的受孕和生育；女性不需再表现出假装的性冷淡，也不需比男人对婚姻更忠诚，如同依偎网站门户的女成员新自由主义表述的那样，她们能够确定自己“性的市场价值”。属于这类新体验和表现的形式有：出轨已不会触发刺心的负疚感，也不再成为分手或离婚的绝对理由；使用网站门户性爱的自由，今天已是很自然的事了。在这类事件中的新型性关系已主要是要求较高的自然关系：“这里只涉及我自己，与任何其他人无关；我想享受性，不必顾及任何其他人。”今天的男女都想拥有一切——固定的

关系、轻松的享乐、安全的爱情和激动人心的性。网站门户性爱有着一目了然的吸引人之处：它机动灵活，往往是自发的，令人惊奇，又不需承担责任；但它同时也是算计的，适应各自的生活状况，甚至还适于用来挽救原来已经即将走到终点的一段关系。它甚至像一位爱开玩笑的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幸福家庭的秘诀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享乐和性生活留出时间。比如那位妻子可以用每个星期二，丈夫则每个星期四。”

我在这里想提及的第二个新联盟，被称为多元之爱。迄今为止描述的单元性爱的形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一如既往拥有主导地位，对我们个人的生活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而给人印象更深刻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新性革命的进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公开并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对这种爱情形式提出质疑。他们主张在同一时间内应当允许有多于一种的爱情（和性）关系，并把这一主张付诸实施。只要看一下以往的文学、歌曲和电影就能明白，现在出现的这些新性关系，其实早已存在。可回忆的不仅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卡尔·巴特（Karl Barth）、勒内·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娄·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é）、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阿梅利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以及1929年撰写专著《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对一夫一妻制进行了清算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私人生活，而且还可回忆一下在其他文化中的许多一夫多妻制婚姻和起源于我们文化的“自由爱情”运动、轮流交换性伙伴运动、“开放式性关系”的实践，以及直到今天仍然通行的（时间是前后连续的）“系列化一夫一妻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把这种关系称为前后连续的一夫一妻关系（比如请比较：Schmidt und Sigusch，1971；Sigusch und Schmidt，1973），最后还有由一个固定人群组成的群体婚姻，也被

称为多元之爱的性关系。

其中与其他形式有所不同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频繁出现并被称为多元之爱的性爱模式（请比较：Anapol，1992/ 1997；Klesse，2007，2013；Benson，2008；Easton und Hardy，2009；Boehm，2012）。它不仅主张自由和同时的多人爱情和性关系，而且也要求当事者经由各方相互协商建立一种公开而不需鬼鬼祟祟的多元关系。因而它不仅否定了一夫一妻制的规范意义以及与此规范相联结的双重道德，也就是在核心上否定了“两人浪漫关系”（RZB）的文化主导地位。并且它也将爱情和共识（76章）置于多元关系的中心，这就是说，这种多元关系参与者的性别属性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同样成为无关紧要的是在这种爱的关系中，是否一定要出现激起性欲或实施性行为的状况。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多元之爱者，虽然简单地把自己称为“多元”者，他们的爱情关系与是否有性行为，是与两人（Triade）还是三人（Quad）或多人，是与相同的性别或是不同的性别完全可以同时并行。并且他们也尽力将那些具有破坏力的情感，如嫉妒、怨恨和竞争，转变为建设性的情感，这当然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最大的挑战之一，同时也比单纯的同性恋拥有更多的时代优势。他们以一个新词“多元之爱”（Compersion）来称呼自己的这种无私的、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行为和理念（比较http：//www.polyamorysociety. org/compersion.html；http：//www.theinnbetween.net/polyterms. html；http：//polyoz.dha.org/；http：//polyfidelity. org.au；accessed：11.11.2009 oder 27.3 2013）。鉴于德语中没有一个直接与嫉妒对立的反义词，我们只能用一个有些含糊的词“共同感到的高兴”（Mitfreude）来表述与嫉妒相反的意思。有时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也用“形容词frubbly和名词frubbles……来表述在多元之爱中……的共同幸福，以描写在多元之爱中的情感。这些术语更适宜用在开朗和无忧无虑的交谈中，并且在语法中也是多层面的，比如可以说‘我感受到所有的共同幸福’，或是可以说‘与他们的关系使我充满了与他们的共同幸福’”（http：//en.wikpedia.org/wiki/Compersion；accessed：

17.1.2009 und 27. 3. 2013）。德国多元之爱者如果想表达与嫉妒相反的意思，常会用从英语“frubbly”这个词演变过来并加以德语化的形容词“frubelig”，对于自己爱情或性伴侣的伴侣则称之为共同幸福的人“frubbel”，有时也用“metamour”这个词，表示伴侣的伴侣。

多元之爱者目前主要出现在英国、加利福尼亚和荷兰。在这些地方和国家，人们也已提出了在政治上承认多元之爱法律权利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德国也有多元之爱者的地区性聚会；并于2008年4月在黑森州，举行了第一次超地区的聚会。2005年在汉堡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2007年在奥尔登堡举办了电影节。到目前为止，这些大都还是由女性发起举办这些活动的倡议，并主要是同性恋女性（比较Mèritt et al.，2005；die Initiative »Schlampagne« und seit 2006 die Zeitschrift »Die Krake«）。总体来说，许多以多元之爱（也称为多元爱、多边关系或干脆称为多元）方式生活的男人和女人，也几乎可按传统的性取向模式分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性虐恋者，但是千万不能把性施虐受虐的实践如戴绿帽子和妻子共享，与多元之爱混为一谈。有些多元之爱者倾向于新宗教式的性行为，并独立于性伴侣的性取向。

这些同时爱着许多人的人，会在自身中发现一种以前从没感受到的爱的能力，不仅是量而且也有质；同样，也能通过同时与许多爱的人的交往，把握众多以前从不知道的体验和行为方式。多元之爱成功的基石是诚实、相互信任和自信。只有这样，才能以承诺取代占有式的忠诚，以多元之爱取代发疯般的嫉妒，用一个新词来说：共同感到的幸福。这在我们自私贪婪的文化中，将要付出极艰巨的努力，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从政治上来说，除了那些组织起来的女同性恋者，“绿色青年团体”也开始了这项艰难的工作。2006年2月，在一份针对保守党议员责问

的新闻发布稿中，“绿色青年团体”联邦主席团反问道：“一夫一妻制就是解决的方案吗？”我们的回答是：“即使是你们这些永远生活在昨天的国会议员，也不能再闭上眼睛面对社会现实！在体验社会共同体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中，人完全有多层面的心理需求。核心家庭的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已经根本不再适合许多人的心理需要。……文化和历史上的许多时代都有过完全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形态和方式——也是很好的！为了追求更现代更符合时代精神的生活方式，我们主张婚姻的一种开放性——因为由于两人婚姻和核心家庭这类社会主导生活模式而导致在自己的发展中遭受极大压抑和限制的人的名单已经很长，他们中有：女人、同性恋者，以及自选性别者——所有这些和其他人都在我们的国家忍受着经济和文化的劣势。‘绿色青年团体’主张废除婚姻——以法国为榜样，让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某些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另一个人的这么一种民事契约模型，来取代已经过时了的婚姻登记。我们希望能够给予生活一个选择空间，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在一种单一的两人关系中度过自己的整个生命，许多人更愿意有一系列的多种关系！是呀，许多人都希望有完全多于世俗婚姻的关系：阶段性的关系，同时与多于一人的关系，有性关系的友谊。谁想过这种生活，我们的社会不应当去阻止他们的自我发展。我们主张替代性的共同生活，主张组成式的混合家庭，主张选择式的亲戚和相互之间的一种未僵化和不带意识形态的团结互助！”

在这一讲话发表之前的2004年11月，“绿色青年团体”在团体成员大会中通过了以“从打破原有的社会角色开始！”为题的主议案，要求“对生活伙伴关系进行一种意义深远的大胆改革”。“我们社会目前既定的以婚姻为蓝本的生活伴侣关系和婚姻本身，都只能是助长单方面依赖和守护保守生活理念的一种生活关系模型。另外，我们拒绝由国家认可的民事婚姻在象征性和事实上依傍教会和基督教的婚姻理念。”因此，“绿色青年团体”要求在根本法中废除对婚姻的保护。异性恋婚姻和同性恋婚姻以外的一切其他生活共同体，都应当享有与他们绝对相同的权利。不

管这些其他生活共同体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其他形式的两人恋或多人恋，都应无损于当事人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此外，我们要求仿照法国《民事互助协议》（Pacte civil de solidarite，简称：PACS），实施一种较为灵活的权利转让的处理方式，一种简化和不那么昂贵的离婚程序，以及将终止婚姻协议的权限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由国家认可的公证机构。在这些要求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将同性恋的伴侣关系“尽快和无例外地等同于异性恋的婚姻或伴侣关系”。

只要不是神秘或隐性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原始”自然性和纯洁性的理解败坏了整个伦理问题，我们应当承认，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多元之爱的实践，已经触及了婚姻的基础，但对种族、族裔、权力和性别差异等这类范畴还缺乏自我批判性的反思，科学研究也只是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才开始反思和研究这类范畴。更令人遗憾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异性恋的规范仍一如既往地成为我们的爱情和性行为模式的规范，而事实上，我们早就以自己的爱情实践和对此的评价反驳了这类规范。

75 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道德

柏拉图主张人应拥有四种美德，它们是：智慧、节制、勇敢和正义。后来的基督教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三条“神圣的”美德：信仰、爱和希望。与这七条美德相对的是七种恶习或七宗罪，它们分别是：傲慢、贪婪、淫欲、嫉妒、暴食、愤怒和懒惰。今天的西方社会缺乏一些既具有普遍意义又已成为人们生活实践的道德理念，以用这些道德理念的共识来聚集绝大多数的妇女、男人、青年和儿童。能够存在于社会的道德，应当是个性化的，这也就使它比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生活或社会领域的道德更具有局部性。之所以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并已成为实践的道德理念，是因为那些诚实、谦虚和爱好和平的人生活在一个恰巧与他们这些品行相反的机制运作的社会里，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自动成为

失败者。普遍和已经成为实践的道德之所以不可能存在，也还由于缺乏形成这一道德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即还缺乏妇女与男人、儿童青少年与成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和物质上的平等，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对于既能为他们唱出许多高歌却又有许多埋怨的儿童们来说，最通常的遭遇是被忽视。他们是没有权利的人（54章）。仅在德国就有2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下。一大部分的青少年在人群社团和社会总体中遭遇贬值，那些享有社会特权的老年人，即使他们在文化和生理心理上还不愿认老，但也必然会感觉到，他们的理念和行为已经不再为新生代所看重。正是鉴于这一切，因此可以说，叫嚷和抱怨青少年的冷漠和暴力，其实是一种虚伪。

由于谁也无法真正认清什么是道德的普遍原则和市场规则，我们的道德便因此被平均信息量化，被削弱和被弥散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近一次报告，世界农业可以毫无问题地养活两倍于现在的世界人口。但这份报告又说，目前世界上有近10亿人口因为营养不良危及生命，每5秒钟都有一个10岁以下的孩子濒临饿死，每天都有3.7万人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忍饥挨饿，但在我们这个杀气腾腾不顾道德只顾利润的世界里，也允许不受阻拦地进行食物价格的投机，以致通过一次干旱并由此造成的饥饿死亡反而带来可观的利润，因为可以趁机把主要粮食如玉米、稻米和其他谷物的价格抬高3～4倍。这种由于无知而否定人和具有示范意义的雾化所达到的反人类顶峰是，那些应当为人类的这类苦难承担责任的人——金融投机家、高级管理者和高层政治家，在造成他人饥饿苦难的同时，却在开心地参加音乐节，享受他们的高雅文化。这里要提问的是：这些有着正常强迫症的高贵人士，当然也会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让那些非洲难民惨死在欧盟的边界线外，但是这些作为具体个人的音乐节参加者与直接杀人的独来独往的战争者，比如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2011年7月22日发生的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的行凶者——译者注）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必须在个人反对已经渗透于全社会的普遍不道德中，设立一些诸如良心、“超我”等机制，另外还要鼓励人们反思（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没有这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道德。事实证明，我们文化中的道德有着一种反现实和一种个性化的特征，鉴于它不能基于通常共享的想法和做法，也就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当的听天由命直到狂热地与那个既定现实达成妥协，无疑很有助于减轻自己良心的负重。逛街购物、香槟酒早餐、风流逸事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些，即便是不那么“超我”的自我也会难以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鉴于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理性”远离了它，而且所谓的人文科学的合理性也背离了它，道德的处境显而易见是没有前景的。但道德只能来自理性。学生运动失败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在他们近似疯狂的《反俄狄浦斯》（Anti-dipus）研究（1972/ 1974）中想为“野性的欲望”争取权利，按他们所说，这种欲望如同一架机器，能够帮助因为资本主义而变得疯狂的我们，呼吸、吃喝、放屁、拉屎、撒尿和性交。这就是一切。它是如此贪食，如此无所顾忌，它不需呈现自己，用通俗的德语说，也就是它不需向他人介绍自己，它如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和最原始的破坏力（Destrudo），如果它不遇到外在的权力、理性和道德这些阻力的话。它也可以像尼采的“超人意志”那样充满暴力、破坏力和非人性。它仿佛是亲和了血、暴力和大地的神话，有着野性源远流长观念的思想家充满生机和反启蒙的特征。

众所周知，福柯狂热地赞誉《反俄狄浦斯》是在大海边一个“表示天气的灯塔”，是一种“新的思想”，并希望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德勒兹的时代（引自Frank，1990：561）。这并不令人惊奇。德勒兹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是一种“反理性的思考”，福柯则说：“理性就是拷问者”。如果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历史首先不是一种色情、身体和生命向外发展以及暴力强权的历史，如果一种“反理性的思考”不是有重大哲学影响的结构主义的关注主题，如果道德建构不在结构上依赖于理性，并且如果德勒兹和瓜塔里没有诉求时代的两座理论大楼——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心理分

析，那么他们的反理性的野性欲望也就只能留在牛头怪的迷宫里，留在巴洛克式迷宫般的花园里，留在福柯的地牢里，也就都留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根基里了。不，这种野性欲望不具有约束力，不是把它辩证地保留在一种新的理论中，而是用它来颠覆，因为构思这种野性欲望的思想家并不能没有那些自己原本厌恶的范畴如起源、原则、体系和主体去思考。其结果是构思出一架机器，一种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总是在不断流淌的能量，和一种作为非认同性出现并合并了曾经是个人和社会一切制作品的新的身份认同，最后是没有不同于精神分裂症的有趣的“精神分裂”，并且还总是在行进的旅途中。快乐的科学用尼采对否定生活的告别，肯定了一架无主体操纵的机器。

谁也不知道，哪些价值转换将在我们称为后工业的信息社会得到最后的贯彻。多年来，我们政府的伦理委员会一直在谈论什么“抗挫折承受力”、“保持角色距离的能力”、“延长满足感的能力”、“恰如其分认知和分析势态的能力”、“寻找最大满足可能的灵活能力”和“将行动潜力发展为积极影响势态条件的能力”。由于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由于先前的价值观已经与新保守主义和谐，由于虽然被看成是社会神秘性但又可能受政治操纵的社会事实限制已被超越，因而玩弄道德将是致命的，因而技术批判与新保守主义极有可能虚伪和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就导致出现这样稀奇古怪的情况：把堕胎称为谋杀婴儿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得到认可的生殖科学家，把性领域与生殖领域重叠起来，把（外）祖母变成她的（外）孙和孙女的母亲，或是制造出无数的胚胎，然后用来进行能为人类带来（怀孕）福音的实验。现实与理智的平衡（Adaequatio）关系，正是在这类解离中才得以贯彻，并试图将其中敌视人的原则包装成拜物主义，以迎合“新的可能性”。

20世纪60和70年代，由反权威和性革命引发的改革中曾经将道德与法律作了意义深远的原则解离，但在其后的一些年代里，社会机制却又以法律为借口回避道德的本质问题，只是今天的现实已不容再回避，对

有关道德本质的问题进行普遍讨论和回答。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法律与道德的耦合，最后建构的只能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机构，它不仅诋毁法律而且也诋毁道德。这里只需提及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糟糕妥协：堕胎，虽然是违法的，但又不需惩罚；对贫穷国家的儿童实施性侵，虽然须惩罚，却几乎不会去查实；婚姻和家庭享有宪法的特殊保护，但不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婚姻或家庭；偏离正常的性取向，应当不能成为求职的障碍和解雇的理由，但不允许公开；按法律，性犯罪者不仅要被监禁，还必须接受治疗，但又没有提供足够的“治疗机构”；谁都在说，“对儿童要有爱心”，但那些从战争地狱终于逃到我们这个“天堂般”社会的儿童，却又被送回地狱，而且是我们特意为儿童埋下（即不是成年人的体重也能引爆）踩雷的战争区域。

76 个人亲密关系中的道德共识

虽然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道德的理念，但最近几十年来，在个人的爱情和性直接积极互动的亲密关系系统中，又充满了新的道德理念。这种新理念把原有的快感最大化道德和比这更久远的婚姻与相互照顾的道德，转换为一种个人自我设计、自我负责的道德。新道德所主张的新道德理念有：性别平等的对称性、互爱的对称性和预防艾滋病。没有传统道德机制的束缚，个人在完全由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亲密体验和关系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现在已是多个方面的，并且不管在规模还是在强度上都是一种新型的责任。新亲密关系道德，使人变得更会交际，但同时也使他们多了一些距离。社会特权者可能会成功地被认为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物，现在也能同时过上一种私人“自我实现”的生活。但在严肃的情形下，决定他们的并不是一些性学家更愿意假设的那种“民主化的亲密关系”，而是那种具有普遍性的利己，并主要是作为独特的性个人的特质。因为性以它性的个人特殊差异，是不可能民主的。

沃特斯（Wouters，1994：214）将这类自我操控和调节的模式描述

为“非正式化”（Informalisierung）。伴随它出现的是一种巨大的相互依赖和依存的紧密联结，并进入到一种前往非强制性的强制，在我们的综合语境中，也可称为对多样性的强制。毫无疑问，今天的情感和行为基本标准已更多变和更差异化。它是否也因此在事实上更个人化，却还是个疑问。人们可以相互以“你”称呼，来一个快速的社会化接吻或是公众化地自我表露，却仍与他人保持着距离。人们也可以亲密地与他人交往，但如果有一天当自己陷入一种不容忽视的困境时，却会恼怒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些朋友，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姓什么。取代强硬的行为和情感控制机制的不仅是新的善感基本标准，而且还有新的脱敏和拒绝式的行为基本标准，这类行为标准使得亲密关系所要求的基本标准具有公约性和可忍受性。这种基本标准使人回想起作为社会准则和生活方式个人化结果与打上社会联结关系印记的孤立和孤独。人们可以用齐格蒙特·鲍曼（1997：87）的话来说，它制造出的是“间离”而不是相遇。

在一切都只是围绕着相互关系的两人关系，也就是在可以被称为关系的关系中，为了排除孤立和孤独，会强行推进关系的一种亲密化。但正是这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反孤立反孤独运动，却不是真正的反对运动，因为它只会强化前定的倾向。如果只有两个人共同生活，或只是与父母中的一方，主要是妇女，加上一个小孩，那么就会强制性地出现一种排他的情感化关系（比较Schmauch，1996a/2007a）。也许，这种亲密化就是埃利亚斯（Elias，1939/ 1969）所描述的一种文明进程的延续。另外，范·塞勒（Van Ussel，1975）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在宣告性欲性行为关系终结的告别书中，将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升华为亲密关系，如同稍后吉登斯（Giddens，1993）的“纯洁关系”。只是这类亲密关系或纯粹关系都要小于情感化和亲密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在情感化亲密化关系中受依赖、限制和攻击制约的那一面。迄今为止，我们知道，如果儿童从小就伴随着诸如妇女是第二等性别的感觉成长，长大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而我们如今所谓的单身社会也表现出，如果儿童伴随着这种感

觉成长，即一种性别意味着亲近和温情，另一种性别则总是不在近旁，不冷不热或甚至是冰冷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说以往的婚姻在文化上被认为是既和谐又有激情的亲密关系的普遍模型，那么如今已经不再存在被普遍认可并可与此相比较的模型。这不仅对“纯粹的关系”来说是如此，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3：10）理想化和稍有疯狂的性民主构想，这种纯洁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双方在性和情感上都拥有同等权利的关系，而且也自然适用于被吉登斯和有些女权主义者吹上天的女同性恋的关系。另外，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1990：214）关于认可两个有着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关系的构思，是对“悖论逻辑的一种认可，它意味着两种对抗力量的一种持久性紧张”，并且可以把这种紧张关系理解为同时既寻求承认又寻求独立的关系，无异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关系，随时都可能被海浪冲走。因为即使是心理上的性别差异也受制于物质（12章），本杰明忽略了这一规律。当然，纯粹关系或主体互动的承认关系的定理，也不能排除世界的客观矛盾，正是这些客观矛盾导致了自有性欲和性行为以来的分裂。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主要需解开的是这么个难点：既让自己的性本能冲动自由地为所欲为，却又不丧失自己的头脑，也就是说，把激情、越轨与和谐、正派都协调一致地置放在同一个屋檐下，但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今天的难点则涉及一种不可能性，即既想无私地去爱，同时又想掌控一切。性学家冈特·施密特（1996：11）曾把这样的情景称为一种新的“行动或主体互动道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一切与情欲色情和性有关事件的细节，事先协商达成共识。如果这种规则方式——我把它称为“利己的共识道德”（Sigusch，1996：26）——得以贯彻的话，那么这就是在性理性化的历史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也值得关注地建构了对社会群体的性的一种压抑，用另一个词来表达，即建构了社会的性无能。

几年前，我曾对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这是一

场伪活动，因为通过被监管和被独立，性已经成了它自己的模仿品。看上去似乎所有人都变得有那么一些性活跃，但实际上谁都在避免一切可以让人联想到性的事，比如自发性与随意性、奉献与忘我、风险与主体性。如果性行动的内容，仅仅只是它的单纯出现，便不再涉及它做了什么，这里唯一涉及的只是它做了。性便因此凝固为“事”，并作为“事”而迷惑人。除了对主体的信仰以及自发性以外，以上对性的分析在今天仍可继续书写下去。今天日益涉及的是：性的行动似乎已经以双方的协商共识取代了单方面的自我决定，似乎性对于人来说已不再神秘，似乎性这件事在根本上会给人带来比幸福更多的不幸。艾滋病的暴发以及人们对艾滋病的普遍态度都强化了这种不幸感的发展趋向。这种发展趋向对于社会总体性文化结果是（在艾滋病暴发前就有这些特征的）反色情性民主，被批准的对快感的敌意，不再倾心去爱，充满爱心的无情和不骚扰他人的自慰满足。为了体验和参与性活动，大家便都现身在“爱的大游行”和“狂欢聚会”中（82、92章）。在那里，新性（理念）者把自己装扮成诱人的性主体和淫荡的性客体，但通常又避免与他人有传统方式的身体性交往。那里也会上演一场利他社团结拜和誓言的场景，但每个人（不管男女）却同时又以自己的表情和行为表现出在刻意与这个社团保持着距离，这个社团只是人们自恋和利己的最佳场所。

77 卖淫和性工作

从道德上来看，其实谁也不高于谁，成年社交舞会并不高于看西洋镜，部长联席记者招待会并不高于街头卖淫——因为不存在一种确实行之有效的普遍道德。无论是神秘爱情还是病态多性恋的出现，都不比其他的性形式更道德和更自然些。虚构的人性，更愿意躲在那些沉闷恼怒的健康民情不会去有意识猜测但在潜意识里又能感觉到的地方越冬，惊叫就是这种潜意识感觉的明证。因此，性越轨者经常不是戴上虚假幸福的面具，而是通过更直接的身体亲近来达到表现与不出轨的性欲性行为的一种距离，炫耀出轨比不出轨更多了什么。伟大爱情诉求的是性的尽

可能和谐。但只要伟大爱情如同一种正常的道德状况那样只是社会的一种稀有存在，那么对最粗暴的性伤害和侵犯只能进行消极的制裁，并且也只能是运用个人的不合时宜的方式。只是这种制裁无关乎道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想用法律条款改革对道德和法律进行现实解耦的那些司法工作者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普遍关系，其实有着一种卖淫般出卖自己灵魂和肉体的自然。卖淫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阿门”属于教堂。我们大家都是可出售的，并也被购买。有些人是提供身体，有些人是出卖灵魂，许多人是出卖“道德”，但谁都出卖的是精神。那些还允许参与社会生活的人，都在提供自己，标出价格，然后出卖自己。但社会和人群都只会把厌恶和憎恨投射到那些卖淫女身上。遭受唾弃的不是每天都屈服于强制的精神卖淫，而是身体的出租。因而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了得不到一丁点儿仁慈，却在从事社会工作、崇高的使命或博爱的那些人。法国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曾教导过我们，博爱（也包括人文科学）是一种普遍的战略机制，它恰好能阻止那些它假装能对其产生影响的事：一种巨大的牵制行动，它允许不带有虚假情感地去歧视卖淫，尽管可收买的现实原则必然败于一种普遍的裁决，因为它不认可道德和博爱，只认价格和盈利。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坚守主流逻辑，就像反现实那样去反对性工作，不比它多也不比它少。

道德使徒们相信，当今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金融投机、军火贸易、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政治极端主义，而是来自性买卖，来自性工作和性产业。妓女是道德堕落，妓院老板是反社会和犯罪，嫖妓者甚至是像动物那样的道德不坚定者，也就是说，所有参与卖淫的当事人，都不是具有主体性的人，而是卑劣或下贱者，应当为社会所抛弃和唾弃。道德使徒们正是这么做的，如果一旦他们认为与卖淫相关的一切打破了我们社会的事实和道德的框架的话。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打破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框架。在一个原则上一切都可以买卖而且在事实上也一直在从事着买卖

的社会里，只要可以买卖的东西都在进行着买卖；在一个一切都取决于是否有用或是否可利用的社会里，偏偏把“爱情买卖”作为这个社会的丑闻。妓女被用来作为排水沟，她保证了宫殿的纯洁——教会的父亲曾这样表述过，并且是正统社会学还在宣扬的智慧。事实也是如此，卖淫嫖妓和婚姻，孤立的刺激时刻和覆盖整个生命的爱情，都同时并存于我们的社会。其中的一种形式从另一种形式中得到事实的存在和存在的权利。在真理性中，每一种形式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并不存在的真理，因为只有金钱才是我们社会的媒介，才有权利诉求普遍性，而不是正派，不是道德和慈善，也不是真理。

尽管如此，社会还是允许其他性关系形式的卖淫，并允许它把自己误解为是有更高价值的形式。仅仅是它的单纯存在，就赋予关系和刺激以一种权利，把自己装扮成非卖淫的形式。卖淫形式越是贪婪金钱，越是倾向于暴力或只要似乎是这样，那么一切其他的性关系形式如婚姻、固定的关系、性伴侣交换和群体性交等，便越是显得无我和富于同情心。但低贱卖淫的小小真理却是，我们的快感如果没有禁忌和禁令、没有恐惧和羞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谴责和驱逐妓女的那些道德主义者在实际上却违背自己意愿地支持了妓女行业。他们是真正行使小市民意识形态职权的代理人，只是小市民意识形态在过去的时代已经通过将卖淫病态化和拷打妓女，通过谋杀和凶杀，已经深到骨髓地永远名声扫地了。

我更愿意把这些小市民意识形态学家称为正常强迫症者，他们总是以蔑视的眼光冒犯妇女并教训我们，原本由于他的文化传统而禁欲的那个年轻男人是被女人可怜地扔进了性电影院。他们导演了一个个性别歧视的法院场景。他们到处煽动道德和精神的卖淫，却对那些用身体卖淫女人的尊严表示关心。他们用女人的身体做广告，但如果有谁真按他们的广告如此行事，他们又会表现出担心。他们把色情中心赶出城市的内环，却又在原址建造了更大的购买、商贸、金融、券商和房产介绍中

心。他们把钱都花费在昂贵的晚礼服上，却把妓女辛苦挣来的马克说成是肮脏的。在社会等级图表中，厕所清洁女工、妓女和工厂女工无疑是在图表的最底层，而那些女演员、女记者和富豪之妻则必定在最上层。一个被看做润滑下身的油脂，另一个被看做维护面子工程的面霜。但经常甚至无法判断出，谁的差事更苦些。在妓院和性电影院里，可供男人支配的只是女人身体的一部分，而在企业和电影拍摄场，男人则被允许支配女人的一切——身体、心灵和精神。妓女经常遭受如物一般的待遇，但是必须按制片商的指令拔掉所有牙齿（即被制片商打掉了所有幻想）的那位女星，她的脸部表情、身材体形、说话方式、她公开和不公开的生活，都受到他人的直接干预，那她也就成了一件可以制作成商品的原料。应当怎样来判断谁被剥夺了更多的尊严？无论如何，妓院和西洋镜要比出版社、广播、医院或商贸大楼以及其他企业更直接也更干净些。出版社、广播、医院或商贸大楼等地方都存在着（如果根本有的话）对真实目的的一种充满谎言的距离，再加上阳痿男人（让每个局外人都会感到恶心）的一些淫荡欲望。

俗话说：“每家的地窖里都藏着一具尸体。”（意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译者注）地窖因此就意味着已经过去了的生活历史；但不仅如此，地窖也意味着属于当前或当代的无意识心理。如果有谁认为，说起他本能冲动的生活无非只是说出了一种纯粹的真相，那他或是似乎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或是曾经拒绝过承认这一真相。但最没尊严的还是那些让受命于他们的人，把未成年吸毒成瘾的女孩从公开的街头卖淫转移到另一个隐蔽地点继续卖淫的政治家，之所以让姑娘们从公开转为隐蔽，只是为了同时向公众宣誓他们正在保护婚姻的神圣性。同样没有尊严的还有那一类如果看到自己的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便会用打开保险的枪威胁自己妻子的男人。是谁白天穿着定做的合身西装谈论着国家事务，晚上却又忙碌地穿梭在红灯区？是谁在摄像机前大谈要保护异性恋关系的纯洁性，晚上却又在高速公路边在被蛇头拐骗来的（外国）年轻男人那里消费自己的同性恋欲望？如果有谁感到这不正

常，最好还是保持沉默，特别是在涉及正派和道德的问题上；如果谁敢于去揭露政治家或哪个大人物的这类个人私生活，那么他就会成为他所从属社会通行的毁灭机制的牺牲品。那他就是在用鲜血去证明在迷惑人的拜物主义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没有亲密关系，也没有对遭受无辜审查和迫害者的普遍保护。这一毁灭机制的格言是：在公众中公开一个政治家的性生活，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是那些都应枪毙的变态者的兄弟姐妹。

即使是卖淫行为，也是以放弃性本能冲动和控制情感，以满足义务和服从为基础。一切普遍通行的性形式都最终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人也可以因为寒冷而爬进被窝里，而那些仍待在屋外的人则会被冻僵。有着和爱情一样神秘的卖淫，不免让人回想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愿意把我们的性本能冲动与现实生活整合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社会抛弃妓女，以使爱情的高歌格外响亮；而被社会蔑视的嫖妓者也公然承认，之所以需要嫖妓，只是因为常规的爱情和性生活实在太糟糕。但这类坦诚通常总是有着转瞬即逝的本性，否则夫妻相互也就不能再爱对方。性感和充满温情的心潮，不只是会在行动和感觉中解离，而且也会在头脑中解离。但是不能再压抑这两者的冲突了，也不能把这一冲突再维持在压抑中。妓女已经不再那么容易继续被用来作为社会婚姻项目的保护伞，嫖妓者也已经失去了顽皮男孩的社会地位。

妓院和性电影院并不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最极端表现出性（道德）堕落的地方”。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在核心上，都有着混乱、反社会和堕落的特征。坐在我们伪善社会被告席上的，根本不应是我们社会性形式的一贯如此从事的客体对象行为。需要整治的是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性困扰和作为这种困扰根源的我们的文化自身。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大家都被迫生活在卖淫的关系中。鉴于性和爱情已蜕变为拜物的魅力，我们大家都在为性和爱情讨价还价，会把性和爱情像一件物那样地扔掉，取之和被取之。只要一个社会还存在着这种状态，那么

性关系和色情消费、婚姻和卖淫，这一切的全部真相无非就只能是源于性本能冲动的爱。不需戴上正派的面具就能做的事，也就是一些非常通行的事，如果真的做了这些事，怎么能算是堕落呢？只有那些我们站在里面观看性录像的小单间，让我们能够窥视的小洞洞眼，糟蹋我们精子的避孕套和我们劈腿的姿势，才是既听不到也看不见的。哪里才能将我们对性感的心理需求以真实具体的方式限制和转换为一种适合当地情况的社会形式呢？是在西洋镜里，在妓院还是在性电影院里？或者是把性感统一在抽象审美的形态内，以便把已经变为商品的性和爱情都罩上一种绚丽的光芒？

鉴于一切被社会建构的性形式，都只能以物化的形态进入我们的意识，因而就很难把卖淫问题上升为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把妇女问题上升为人的生活问题。但有一些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对婚姻的高歌，同时也是在赞赏卖淫。如果真想把妇女从性的屈辱中解放出来，那么首先必须改革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衡量标准，并且最初是从改革经济和社会条件起步。任何其他要求都只是虚伪的道德游戏。只要看一下，女医生或女工程师总是必须比她们的男同事要上百倍地更聪明、更勤奋也更主动适应环境，才能在自己的职业中生存下来（这几乎是那些男同事无法同时做到的事），并且即使如此，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某个更高些的职位（有多少大学附属妇科医院是由一位女院长领导的）。与她们相反，无论如何自结束了文化型的交际花和情妇社会形态以来，妓女们放弃了自己正常的职业和高层尖端的知识。只有极少数妇女像妓女那样懂得，女心理分析家们当然还懂得更多些，男人这个性别是多么渺小和可笑，他们最大的优势几乎也是他们最大的弱势，正常和“变态”是怎样被焊接在一起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有自我意识的”妓女。她们把自己看成是与像其他人从事其他工作一样平等的性工作者，她们昂起头用市侩之道还治市侩之身，把原本侮辱她们的那个词“妓女”变成在公众面前

争取自己权利的口号。1984年11月出版了专门报道妓女生活的《轻飘和严肃姑娘特刊》（Zeitung für leichte und schwere Mädchen，简称HWG）第一期。1985年2月颁布了《世界妓女权利宪章》（Weltcharta für die Rechte der Prostituierten）。三年后，这些表示愿意与男人有性交往的年轻女人，又发表了自己的《政治宣言》（politisches Manifest），宣言要求社会进行性人道主义变革，并创建能够体现这种变革理念的“新型妓院”、“爱情学校和色情学院”，作为成年男女的相遇地点（Kleinhammes，1988：153）。

德国自2002年以来已经有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卖淫法，按这一法律，妓女们可以得到一个税号，自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能够在全德服务行业联合会那里得到一份劳动雇佣合同样本，并能够用退税的方式，使会计师与皮条客相互成为竞争对手。并且更重要的是，卖淫不再是不道德的行为，以致性工作者完全可以合法地索要自己的劳动报酬，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只是性工作者们在社会中仍然一如既往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我们的社会需要她们的服务，因为在我们的性文化中，持久和稳定的婚姻或伴侣关系，如果没有卖淫这个机制，便是不可想象并且也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目前，光是汉堡，就有三四千妇女和1000左右的男人在从事性工作，每天大约有100万～120万顾客需要她（他）们的服务。全德国每天大约有1百万人在四处寻求这样的服务，并有40万男女性工作者在提供这样的服务，估计每年的营业总额大约高达140个亿。一份大型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男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或某个时间段）寻求妓女的服务，大约有18%的男人则是有规律地前往妓院。粗略计算，这类男人在男人总数中的比例是1/10。对于大约在30岁左右由于诸多原因无法接近女人而患有性饥饿的无数男人来说，妓女便成了我们文化不可或缺的安全阀门，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性侵甚至强奸事件的急剧递增。也就是说，妓女是在为社会和平而工作。

说了这么许多卖淫的好处，但是卖淫的罪恶究竟在哪里呢？谁愿

意，当他在想把熔岩灌进静脉的时候，还去讨论什么法律条例呢？但是如同普鲁斯特（Proust）关于克拉夫特-埃宾所记录下的话：罪恶已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从蒂梭特（Tissot）和萨德开始并经过克拉夫特-埃宾和金赛才得以发展的、我们文化中原本就很弱小的那么一点情欲艺术的根，却被连根拔起。这是真正的丑闻，因为这一切便导致卖淫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无关乎游戏般的享乐和美轮美奂的性艺术；而是在一个多方盘剥环境里的一份辛苦的工作和一件冰冷的生意。简而言之，色情艺术与赌场资本主义根本不相适宜。如果妓女和皮条客都想进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去，便会深陷于不人道的一些事中，如性旅游、贩卖人口，或以收养为幌子的卖淫。比如以基督教的爱心为幌子，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收养儿童，但紧接着却在西欧又把这些孩子给卖了，一部分是为了巨额的盈利卖给了皮条客卖淫业，另一些则卖给了没有孩子的夫妻，使其有个完整的家庭。

由法兰克福妓女协会《姑娘卡门》（*Dona Carmen*）发行的一份颇有影响的专门报道妓女的《女孩报》（*La Muchacha*），最近又揭露了一桩丑闻：许多来自贫穷国家的性工作者，想通过卖淫养活（仍然生活在贫穷国家里的）整个家庭，她们非法居留在这里，因而也遭受我们的随意摆弄。我们把她们弄来，玩弄她们，又把她们推进恐惧和惊骇的深渊中。极其虚伪的政客们，不仅唆使数以百计的年轻警察搜查妓院，而且自己也穿梭在红灯区内面对摄像机竖起食指指责这一区域的治安情况。如果他们真想做些什么反对贩卖女孩和强迫卖淫的事，他们必然早就会给这些非法居留的姑娘一份合法居留和工作许可，甚至可以给这些姑娘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以便用这种可行的方式找出幕后操纵这些女孩的人贩子。但是他们最终做的却是把这些最可怜的姑娘遣送回最贫穷的国家，以便让新的小鲜肉又能进入这个美妙却又伪善的国家——不论是否通过人贩子。

如果对这些来自贫穷国家性工作者的人口贩卖做一种较为详细的调

查（比如请比较Kreutzer und Milborn，2008）就能看到，这些女孩是怎样陷入一种强制卖淫的体系中的；也能看到她们通常再也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脱这一体系，除了作为“妓女”别无他法，也就是说，只能成为这个剥削体系的一部分生存下去；并且更能看到，在欧洲有无数这样的姑娘正在为这个体系创造数以亿计欧元的营业额。这类强迫卖淫的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以继续猖虐，以被囚禁的尼日利亚妇女为例，一方面是通过“朱朱教”牧师（Juju-Priester）的魔法，由于自己家庭的威胁甚至谋杀以及人贩子的虚假许诺，另一方面也由于欧洲国家以自己可耻甚至致命的难民庇护和移民政策，使得人贩子有可能较为轻易地做成贩卖人口的生意。对这类生意的调查研究有如玛丽·克罗采（Mary Kreutzer）和科琳娜·米尔伯恩（Corinna Milborn）撰写的令人确信的报告。但也有人匿名在一份引人瞩目的文艺评论中写道：女人也不必把这类事说得如此悲剧化，这毕竟只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服务，只是一种相互交换，而不是一种犯罪。从中可以看出，那个人只是在装出那个样子，似乎这类甚至不惜跨过尸体不择手段的强迫卖淫，无异于其他一般被认可的日常的性工作。

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中，人们能够得出像苏格拉底那样的见解：伦理问题与那种真实并且确实有充足理由的知识，还距离很远；但它也不回避正视生活的规则，比如：遭受不公正总比施行不公正要好些。今天，也许只有那些人，即把人看作为人，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自己批判不道德事件令人信服或甚至有些乌托邦理想的前提，而且也能在这种关系中遵守自己所主张的道德的那些人，才有权利去批判某些事的不道德。只有这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还可坚持的正派和道德。我们要向一切其他人，尤其是我们的那些正常强迫症者和吹嘘自己道德的政客们呼喊：用你们鞭打妓女的鞭子，还是去鞭打你们自己吧！

78 艾滋病作为疾病和错觉

艾滋病的双重真实性，导致形而上学的崩溃。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让自己倒下、失去控制，或是打破规范，从来都是一种关及生和死的冒险。所有的性主体在艾滋病暴发以前，就已感觉到性欲性行为与死亡之间充满风险的近距离，只是并不把它太当回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在我们这里成为赤裸裸的现实。批判主义的性学家想超越现行的性、性别和爱情模式的主流体系。他们像最后一个白痴（在这个词的最初意义上）那样不满足于哲学家关于“即使如果曾经存在过主体，现在也已成为历史”的论断，而是与哲学家相反，他们导演了思想的突破。似乎还需要提出一个证据来证实，人的性欲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强制、实体化和不自由的标志。正是我们生活中的艾滋病以一种自然事件暴发的形式，终于提供了这么个证明。批判主义性学家因此承担了一种新的强制性义务——艾滋病的强制和他们自己的社会责任。艾滋病的密码征服了整个世界。无数人为此感到不安，无数人因此有了死亡的恐惧。一时间出现了比艾滋病患者更多的有关艾滋病的科学论文。对每个因为艾滋病死去的患者，都会有上百条头版新闻。谁对一些普遍事件的反应不是麻木不仁或愤世嫉俗，谁就仍然有些同情心，就都会被艾滋病的出现搅得心神不安。对于反思体验的人来说，没有比似乎重叠在一起的个人和社会的苦难更可怕的了。通常总是习惯于用少数派和性病的不幸来安抚自己命运的那些人，已经持枪列队准备去收拾艾滋病患者。没有什么比伤害那些不同于他们的人，更令这些人感到宽心的了。

在那个时代，艾滋病有了它的双重性：既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疾病，又无非是一种错觉。鉴于这种疾病会导致死亡，而它的神秘性又是毁灭性的，因而极难把它的真实性与对它的曲解，把人们对它的现实恐惧与神经质分离开来。艾滋病是对文化和政治的一种沉重打击，在这一重击中，单一个人的恐怖与整个社会的恐惧喧闹地交织和重合在一起。那种潜在的厄运来临的感觉与最良好服务的商业利益，对安全的思考与对经济的思考，预防措施与关于血的神话，上帝对异教徒的报复之说与要有慈善之心的宗教学说，对规范偏离者的仇恨与对变态行为魅力的羡慕，

对性本能冲动的恐惧与对自由化的害怕，种族主义与社会卫生，对遭受传染的恐惧与阴性测试后短暂的安宁，各种自助团体的总聚会与医学的无能为力，自己内心同性恋欲望的冲动与实践此欲望的同性恋者，放荡者和社会边缘人群的罪过感与其追踪者的愤怒，全都聚集在艾滋病这一现象中了。总之可以这么说：大家都有可能染上艾滋病，大家都与艾滋病相关，大家都在为艾滋病担忧。

是否应当抛弃这一切纠结，理性地解释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呢？那就首先必须把疾病与盈利分离开来，即不能让疾病为某些人或企业的赢利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辨认出需要采用哪些群体、社会和心理的手段和工具来对抗艾滋病，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在哀悼那些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生命的人。鉴于围绕艾滋病在社会中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对其假象和真实的分离，已经刻不容缓；否则许多人都会把自己淹没在对它的恐惧、厌恶和对可能的传染者的仇恨和报复之中；因而是多么需要承认普遍防御与个人防御有着同样的失败，多么需要强调疾病与社会的差异性。正是因为个人只能存在于社会总体中，就更不允许将个人的恐惧和疾病与普遍的状况一体化。每个死于艾滋病的人，都是独自死去的。我们文化中的死亡，如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总是会被戴上伪装的面具——作为人的命运。但人的命运总是个人性的。

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呼吁国家的帮助，因为我们害怕通行于整个社会的非理性，害怕媒体对患者的歧视和可能的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坚持个人的性的真实性，我们因此期望性“主体”自身的洞察力，也因此不像其他人那样相信艾滋病会成为一种由自然盲目推进的灾难。我们着力于普及教育和启蒙，因为毕竟只有风险人群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不仅把艾滋病和它的神秘性看成是对某个个人的一种致命风险，而且也看成是对我们有保留价值的文化的一种毁灭性风险，无论这种风险是作为社会的神秘性，作为心理的扭曲还是作为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出现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担心重新丢失我们曾经用斗争赢得的同性恋和异性

恋的自由空间。我们关注艾滋病的神秘性是怎样又重新扒开了老的伤口，即怎样又一次把“性”铆钉在恐惧和罪过以及完全与性的反对者焊接在一起的赎罪记忆上，这些反对者们是怎样又一次如此公然地把青年人的第一次爱，夸张为一种关及生死的风险；我们关注寻找性的狂喜是怎样无例外地遭受流行病学的谴责，社会是怎样用恐怖强迫人们遵守忠诚和一夫一妻制。在性自由化以前，利用意外怀孕和性病所做的故意渲染和敲诈勒索，现在又能呼唤出一个死亡天使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死亡天使，如同一句流行于全球的口号所说，总是有用的。死亡天使这个口号之所以普遍有效，不是因为媒体和国家对艾滋病表现出的歇斯底里，而是我们文化中的所有人都努力在所谓的变态和爱情与恐惧和恐吓之间设立一种暧昧的联系。简而言之，这一切都使得我们对我们本土文化的特性不抱有任何一种幻想。批判主义的性学家在当时与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心理分析家、艺术家和文化学家（比较：Sigusch und Gremliza，1986；Sigusch，1987a）一起，都没有因为艾滋病而丢失自己独立思考的头脑。我们不主张“节欲”，但要求无条件地使用避孕套，完全赞同“安全的性行为”，但又不从为“国民卫生”服务的角度说教“无感染的性道德”。我们知道，人们通常对同性恋者的仇恨是怎样不可放下，以及在潜意识中对他们有多么害怕；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同性恋也就根本无法理解和把握异性恋。我们感觉到，一切染上毒瘾的人和一切同性恋者，不管他们是有传染的风险还是他们其实过着一种完全“安全的”生活，都遭遇到生存的威胁。这种状况，无疑是灾难性的。

但一部分媒体，尤其是《镜报》，却在用死亡的锤子不断敲打：都是在“度假期间感染上这一死亡疾病”的，到90年代“仅在德国就将有近100万艾滋病感染者”（Der Spiegel，Nr. 39/ 1985）。许多由异性恋者组成的原本“无盐”的“性汤”，现在被加上了一种健康的先验；许多同性恋者原本就绚丽多彩的喧闹，则证实了一种致命感染的先验；1968年的性革命也应最终伴随着它的一种徒劳的先验而销声匿迹。因此也就不必感到惊奇，所有的性主体都表现出最深切的不安。自由主义或标榜为自我

批判媒体的失败，危言耸听，对少数人边缘化的迫害，对虽然沉闷但已隆隆作响的民众健康意识的刺激，这一切即使让那些不愿再欺骗自己的人也感到震惊（35章）。似乎还需要一个证据，以证实种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潜在的存在——艾滋病给出了这个证据。

保守政客和右翼政客正准备开始一个迫害同性恋的新篇章。当时的内务部国务秘书，以后又当了7年部长的那位名叫卡尔-迪特·斯普朗格（Carl-Dieter Spranger）的人曾这么说：“即使在国内事务中，和平与自由也很重要，但这在第一层面上主要是对正常人的和平与自由，而不是给予那些变态的少数人、恐怖分子、罪犯和边缘群体的和平与自由。”（Erdinger Neueste Nachrichten vom 20. Januar 1983）巴伐利亚州政府指责联邦政府滥用宽松政策，并按鄙视、掌控、标示、绝育、拘留、稀化和修理的模式制定了针对艾滋病患者和风险人群的严厉措施。这些政客想对他们施行终生监视、监禁或“隔离”。他们想对这些人实施强迫测试和强制性地在身体文上相应的标记。他们把艾滋病患者驱逐出境，他们在踩踏尸体。如前文已经提及（35章），那位巴伐利亚文化部长汉斯·策厄迈尔（Hans Zehetmair）曾在反同性恋争辩的高潮时说：“这个边缘群体，必须像长得太密的植物那样被间苗稀化，因为它违背自然。”（Süddeutsche Zeitung，7.4. 1987）这样的句子，还不至于使那位说这些话的人，因此成为一个纳粹分子，但足以激起人们必须保持警惕的意识，因为野蛮的连续性并不结束于奥斯维辛。根除异己的意愿仍在到处蔓延和兴盛，并且医学的毁灭理论也还成立，它成立于纳粹前，在纳粹期间为纳粹所承认，也存在于纳粹之后。对德国法西斯的“需求”并不是一劳永逸地一次性就已能满足。

德国法西斯的特点在于有针对性地对犹太人和不同政见的思考者（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和性规范偏离者（主要是同性恋者）和社会的遗弃者以及病患者的大规模屠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克劳斯·多纳（Klaus Dörner）却还在谈论“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引自Haug，

1988：ZE2）。沃尔夫冈·弗里茨（Wolfgang Fritz，1986，1988）指出了法西斯化的另外两个特征：按达尔文进化理论应当选择最优秀和最有技能者的幻想，虽然20世纪初这种幻想也出现在所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但在德国却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影响，便从自身出发驱动了这项要求“最终解决劣等性”的社会项目——当时的口号是：“最优秀的都牺牲在前线了，最无用的人的生存淹没和喧闹着这个国家。”这里可参考的是宾丁（Binding）和霍赫（Hoch）无数有关“允许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生命”（1920）的文字。另一个特点是在葛兰西（Gramsci）思想意义上进入所谓福特主义社会体制的过渡。社会在经济上需要一种崭新的工人类型，不遵守劳动纪律、不适于单调流水线的19世纪式的那类工人，已经无法为社会和企业所接受。这类新型工人必须是健康、能够高效工作、钢铁般坚强、尽可能不沾烟酒，并且有着固定的性关系。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在这个方面的特有发展，就是怎样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福特主义联结起来。比如美国当时促进经济发展的特征是支付相对高的工资，但在德国却使用了神话般的纪律，甚至为了纪律不惜动用暴力来推动这一发展。因此如果谈论到“违背自然”、“损害社会”、“劣等”这类问题，我们的反应就相当敏感，因为这些说法是我们的“学者”用来打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风险人群”或“亡命之徒”等人群上的侮辱印记，这种做法甚至一直延续到作为我们直接的科学前辈的“学者”，还在要求允许消灭这类人，并被我们父辈的亲戚实施了真实的根除。

同性恋者、有毒瘾者和妓女，通过艾滋病撕去了作为社会多数的正常强迫症者的正派面罩，这就露出了他们幸灾乐祸的奸笑。自称是正派和自称是没有毒瘾和自称是不可收买的多数人，感觉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受到由那些所谓变态者和所谓吸毒成瘾和卖身者作为终身、匿名和致死性的传染源所释放出来的威胁。巴伐利亚政府授权的艾滋病监管人彼得·高魏勒曾在1986年10月1日的德国第二电视台（ZDF）播放的“健康杂志诊所”节目中，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类大多数人的这些担忧。鉴于谨慎

和愤怒、算计和私刑拷打在这个社会是紧密靠在一起，也几乎并列在一起，因而就必须考虑到，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兴风作浪的多数人群。大多数政治家、记者和科学家都愿意给予血友病患者无保留的同情，但对同性恋者和吸毒者的艾滋病病情却表现出他们的恐惧和多少有些故意的仇恨。他们会认为，这些人不是一种可怕感染疾病的受害者，而是因为自己的过错，也就是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得病，甚至还是这种疾病的制造者——一种荒唐的想法，它只还缺一种上帝的审判。上帝必然在多少代人之前，就把艾滋病的病毒写进了非洲村民的遗传基因中，以便在某一天传染给美国的航空人员，只是因为神对他们的肉欲最终丧失了耐心。由于当时的政客（不管是否以上帝的名义）拒绝给监禁的毒瘾者使用一次性针管，拒绝为年轻的同性恋者提供咨询，拒绝官方按一种有风险的性接触承认他们是同性恋者，也就有意识地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亡。梵蒂冈自然也是如此，虽然它直到今天仍在为非洲无数的艾滋病死亡者感到悲伤，却仍在诅咒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手段——避孕套。西方富裕国家的医药工业和政府，也一如既往仍是如此，对这个世界的穷人实在令人可耻地做得很少。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危险：一方面是将艾滋病过度地正常化（比较Dannecker，2007c），另一方面是在那些贫穷国家仍然有大批人死于艾滋病，尽管我们完全有能力去阻止这种死亡。

巴伐利亚州政府所主张的种族主义和艾滋病焦土政策（Sigusch，1989c），最后并没有得以贯彻，社会上反而出现了专为艾滋病病人提供的一种充满理解的咨询可能性，这几乎要完全归功于1968年的反叛；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说，正是这场革命在我们的社会中推动了一个有持续性的完全自由化的进程；如果没有这场革命，既不可能出现今天如此众多不再顺从国家、不再听命于那些所谓权威和专家胡扯的公民，也不可能出现以帮助艾滋病病人的形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同性恋者；既不会有人在议会及政府的调查咨询委员会中表白自己的出轨——这在5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也就不会成为大学学

科，德国性科学协会也就不可能作为第一个性学团体注册，并且表现最明显的还在于，否则它也不可能去反驳疯狂的媒体和歧视少数人的政客在1984年11月发表的声明《关于对艾滋病的基本态度》中的谎言和扭曲（比较Schorsch et al.，1984）。

总体来看，这场革命所带来的自由，要高于一些批判者此前的想象。当然在革命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迫害、侮辱和其他形式非人性化的行为，但这在一个没有一种人性化共同利益的社会里，是最正常的文化现象。国家声称将尽一切努力拯救人的生命和阻止疾病传播，这无疑是一个谎言。国家对待和处理吸毒者的态度和方式，就能最清楚地证实这一点。比如国家通过拒绝在监狱设立一次性注射器的自动售货机，不顾及吸毒者的感染风险而让他们自生自灭。显然，毒品注射触及了我们文化的底线。但是打破这些神话无疑是对正常人理解力的一种极端挑衅，因为正常人这种无情的个人行为，在总体上属于这个社会形态，如同穷人属于教会，也因为他们将会暴露自己和其他人，其实早已像对待一件物那样地按客观趋向对待这个社会的少数群体成员。因此吸毒者也就像性偏离者那样，骚扰了社会的普遍神话。这就从一个角度解释了那些不愿反驳神话但已经预感到这一切仅仅是个神话的人们，对吸毒者和性偏离者的仇恨。

1988年10月8日，我在西柏林的一次反对国家艾滋病政策的讲话中，曾说道（Sigusch，1989b：694 ff）：

> 我们哀悼死者。我们敬佩那些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仍不丧失生活勇气的人。我们鄙视那些不顾更好的预测而试图剥夺你们生活勇气的医生。我们唾弃那些将你们物化为“死人在度假”的人。我们把解放运动以及批判主义性科学所达到的成就看成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财富，因而必须经常加以提醒、珍惜和发展。我们认为对待有毒瘾者的态度自许多年来已经是衡量

一个国家的自由和豁达的试金石，但我们的国家却并没有通过这一测试。由于吸毒者没有议会的游说者，没有自助团体，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在社会舆论中去犯罪化，而不是把他们交给杀气腾腾的禁欲范式。鉴于有关危险人群和维持健康的严厉意识形态，我们也尝试为那些酗酒、吸烟、堕落和无所事事在四周乱跑的个人说情。但是我们知道，酒精、飙车、海洛因、打短工、尼古丁或失业，都只是钉同一个或相同的棺材，只是有着不同长度和直径的棺材钉而已；禁欲与放纵、一夫一妻与滥交都同样远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由理性媒介情欲和情欲理性化的性关系，是一种至今还无人认识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快乐的性生活的口号，同时也总是阻止性生活快乐的口号。人的健康理解力会使人生病，因为它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康。我们不会允许对青少年的性启蒙教育与预防艾滋病结合起来；不允许把艾滋病患者分为有过错的和无辜的，把同性恋者分为理性的和亡命之徒，因为只有统一才能强大，如同不对事实保持沉默，不管它有多么痛苦。我们认为，正如德国性学研究协会所呼吁的那样（比较Sigusch et al.，1981），要对“同性恋者”去犯罪化，“他们不再是卑贱者、犯罪者和疾病传播者”，他们不应当再遭受社会的嘲笑和迫害。我们认为，“作为同性恋者丝毫不必为自己感到羞愧”。对我们来说，尽管它可能因此被认为可耻，但正是同性恋表现了人类种属优秀的一种独特构成。虽然有生理风险，肛交仍然是一种最有快感的交媾，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尽管如此，同性恋仍然是一个期望更好时代的指数。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之所以不允许我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真理，是因为任何专业文化都有着内在于当时那个主导文化的自身，由其自身复制再生，却又企图超越这个主导文化的特征；因为即使是誓言唤起人性冲动的启蒙运

动，也是建立在普遍的现实与理智的平衡关系之上；因为即使是理论意识，也并不与任何幻觉相矛盾，而是与总那么如此不可理解的事实自身相矛盾，以致意识的自身成为一种要素，成为一种按其自己的理解根本不希望出现的现象。我们要继续承受这种无法承受的紧张。要想承受这种紧张，我们只有不顾一切已有的平衡，不顾危险和物化，坚持精神突破和突破本能冲动；并且我们也只有坚持试图在一切与性相关的领域寻找那种能够弥补裂痕、反对和超越现有规则、有着最少身体表现的人性冲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便成为艾滋病复杂性的牺牲品，我们的精神和本能就会因此变得麻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通常表现得如此愚蠢和无力的利维坦国家，也就更容易一方面向我们许诺一种完全安全的个性化生活，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一个个规章命令把我们驱逐出我们的个性化生活。

在这段讲话发表20年后，后资本主义西方喜欢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的媒体社会，又转向了其他或多或少很快消失的危险，比如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猪流感、由职业造成的身心衰竭等。艾滋病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再是促进商业销售的话题。但在非洲、亚洲和东欧仍然一如既往对人构成极大威胁。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3400万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都有270万左右的人成为艾滋病的新感染者，每年大约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2011年，在德国大约有3000个艾滋病新感染者。估计2012年德国艾滋病感染者是7.8万人。其中大约有2/3的感染者是男性，他们与其他男性有着一种性交往关系。按官方的统计，2011年和2012年在德国死于艾滋病的各有500～600人（SZ，21./22.7.2012 S. 11；Mitt. Robert-Koch-Institut，26. 11.2012）。

我们的社会没有出现预言的艾滋病灾难，首先要归功于同性恋者和他们的艾滋病互助团体，他们通过自助和互助的个人与共同学习过程，

通过“协商的安全措施”，通过进入—对应—接受的体位，也通过被称为保护性选择性伴侣的方法（Serosortin）等，出色地最小化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却又同时不必持一种对性有太多限制的态度。除此之外，富裕的德国也提供了颇有成效的药物治疗可能性。

现在已经证实，有人由于一种CC趋化因子受体5型遗传变异体32号（CCR5 32Delta）产生的纯合子突变，而具有抗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力，因而也就保护了自身不受艾滋病的感染。HIV病毒的病原体需要与这种受体进行对接才形成感染。只有罕见的X4病毒变异才能穿透发生突变后的这种受体。据估计，欧洲人群中大约有百分之一的人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抗艾滋病病毒的保护体。但是在社会由于艾滋病而暴发歇斯底里的高峰期，即使是专业人员也排除了这种自然保护机制的可能性。

79 变迁作为宏大叙事

首先想到的是：一切都服从于一种变迁，以致一切在根本上都保持着它的原样（即按它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而发展）。第二个想法是：利奥塔（“后现代”这个表述因为他而著名）断言“元叙事”的终结（1979）。过于迷恋启蒙话语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使他忽略了新的以及最近的宏大叙事。这一宏大叙事的关键词“变迁”所意味的是：为出类拔萃而变迁，在自身和为自己的变迁；通过概念、生产方式与性别关系模式、生与死的变迁，实现人自身的变迁——直到人自身生命的解体。事实上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变化、进步和革命的心态与理念200多年来一直完全掌控了我们，这无疑是一种持续的“宏大叙事”。这一叙事如今不正在展现它的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批判的女权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的理论转型吗？不正在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展现着理论的形成、变迁和消失吗？

如果变迁只是为了使一切都能按其内在逻辑的原样发展，那么它就

不是必然地如福柯（1976：97）所说的，“仅仅停留在事情和结构的表面”。但是几十年来，为什么非常严肃的人士也在谈论身体、灵魂、道德、性别、性取向和历史的消失呢？这一变迁或是真的不仅触及了表面，而且也摧毁了旧的结构，创建了新的结构，即这是一种穿透到深层的变迁？是否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只涉及身体和物表层的变迁呢？当我们仍然总是死盯着传统的性并新近又死盯着躯体性别的时候，传统的性是否早就沉没在不再有生命力并早已死亡了的物和结构之中了呢？这是否就是福柯所说的变迁不只是一种传播，而且也是被植入的多元型性欲和性行为（同上：21），并强调野性的爱不只是激励，而且也能成为语言，坚持说出真相，也使自己进入到现实中去（同上：97）？谈论性的文化变迁，而不谈论性的社会变迁，是否只是一种太传统的评判，是否太短视，是否不够激进？也许可能正是因为变迁的深度效用，必须相应地被称为转型，以保障一切完全都还保留下其几百年来的原样？

但是这以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如果一切都在根本上保持原样，那么原则、客体性和取向不都是会几百年如一了吗？那么在迅速植入和传播、电子数字化、渗透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和Hylomatie的时代，还需要寻找原则和理由吗？哲学不是已经被看成是无用的了吗？预先建制无前提条件和不容辩驳并颇有成效制造出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果关系，不是正在掌控着我们吗？这种因果关系诉诸一种价值的演变，不正在向我们宣讲经常性的变迁（尽管它只触及事物的表层）是一种新的、无可辩驳的挑战吗？一切都在重复，一切都在变化，直到运动和变迁的自身进入静止状态，真的如此吗？

但是如果今天的变迁不只是像以往的克隆技术仅仅在理论—技术的层面上越过了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的界限，并且也通过对情欲和感受的改码而在集体的生活实践中废除了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界限；如果电子数字化的世界观已经通过它那些没有传统生物特征、没有神秘和没有神性的动漫头像、宠物蛋和菲比电子动物玩具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我

们的儿童并没有在几天后就与他们的宠物蛋结婚，而是对它们感到失望地“埋葬”了它们，那该怎么办？这是否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性别形态和性关系形态这一经常变迁的宏大叙事的终结，以及这些形态事实上转型的终结？

福柯（1966/1993：389）认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坐在老虎背上”。这个老虎眼前有许多名字：父权制，权力，资本，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等等。但是坐在虎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社会个人虽然作为个人有着最大的身心危险，但还没有完全交付给动机这个老虎？我思考，许多由新性革命带来的变化，确实上演在老虎的虎背上，不管老虎腿上的压力增或减，不管它是被抚摸还是被鞭打，它的外貌都保持着原样。在我看来，当前社会和人们的性欲性行为转型的核心，如同一位不知名的女（或男）作者写的一个小故事。在故事的开头这么写道：“有一位来自里加（Riga）的年轻女子，微笑地骑在虎背上。”当她骑虎出游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虎的肚子里面”，她出游时的微笑，“现在显示在虎的脸上”。

80 话语和非话语化的性欲性行为：话语中的人物形象

令人奇怪的是，正是把差异性作为关键词的那些关于建（解）构和变迁的主流理论，反而低估或忽视了存在于社会形态与个体意识之间以及系统交流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差异性。好像一切都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和深度达到变化。只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把话语化了的性欲和性行为与亲身体验了的性欲和性行为之间的差异，不是作为元理论的牺牲品，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差异加以认可和接受。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舞台上的爱和恨到当前的性欲性行为与性关系中究竟充塞着哪些话语性人物形象。这同时也表明，我们社会中所存在的这种性和性别的弥散化，是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对此甚至不敢想象

的。

在这里可以举出许多碎片般的例子：性尚未成熟就遭受性侵的儿童；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但总是以错误的方式爱孩子的母亲；生理或心理缺席的父亲；那个有着性别歧视并施行暴力的男人；那个钢铁般阳刚的男人；那个对男人动心的男人；那个对女人动心的女人；那个咄咄逼人却向往和平的女人；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像性学家那样有着性冷淡的女人；那个有着持续双性恋倾向，但又没有固定和明确性偏好的女人；由媒体制造出的性上瘾者；那个利用贫穷国家的儿童和妇女的性旅游者；那个用电子性游戏消遣的所谓变态者；那个单身汉（或单身女人）；那个大都市性感美男；那个经由医术修复的阳痿者；那个通过手术而获得内心安宁的性别自疑者；那个在外科手术中的性别模糊者；那个认真预防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那对受到教会祝福并在国家登记的同性别夫妻；那个在一个家庭中与妻子儿女共同生活的活跃的双性恋者；那个既是双性恋又恋肢体自残的三性恋者；那个去配偶交换俱乐部的男人；那些有着不同受虐施虐方式和曾经的施虐者们；那个爱在身体穿孔悬挂饰品的人；那个用手进行交媾的人；那个自恋者；那个纯粹出于神秘感而禁欲禁性的人；那个因为年老只能依靠伟哥寻找乐趣的人；那个胆怯而隐形的女同性恋者；那个活跃的女同者；那个假性者；那个文化鸡奸者；那个将客观物体作为性对象者；那个未来派的网络性爱者；那个无性者等。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那对历史和社会不对称的、文化隔离的、没有政治安全感的、情感上互不信任和精神上互相怀疑的异性恋夫妻。

的确是一个现代化的后黑格尔主义启蒙了的人群，他们作为同样遭受折磨的话语人，当前充塞着话语舞台。

但是这些人物（以及更多的这类人）是由性欲性行为和性别的话语讨论植入公众领域和科学之中的，或者可以说是由相关的话语讨论制造

出来的人物。这些被植入和被制造出的人物与生活在话语罩盖下的青少年和成年配偶的亲身和现实的性生活，究竟有多少或多大的关联，我们紧接着就会在下面的章节借助于批判主义性科学家的实验调查，进行扎实的研究分析（82、83章）。

81 可以澄清和模糊不清的事实

——寿命期望值。自1840年以来中欧的平均年龄增长了40年。1960年，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接近70岁。当前德国人的平均寿命为80.2岁，瑞士为82.2岁，土耳其为73.6岁。德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78岁，德国女人为83岁。按这个进度继续发展可以预计，有护理需要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将以数百万计增长。

——身高。1870年，德国人的平均身高为1.64米。在其后的130年中，每代人的身高都会平均增长3厘米。现在的平均身高大约略高于1.8米。与此同时，人的身体宽度也在增加。

——体重。国家罗伯特·科赫研究所（nationalen Robert-Koch-Instituts）2012年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每4个德国人中就有1人过于肥胖，医学上称为“肥胖症”，也就是肥胖和超重于一般的体重。在男性的所有年龄组中都有肥胖症患者，在女性中则主要是较为年轻的妇女。自1998年以来，德国的肥胖人群有显著的增加，其中男性的增长率为4.4%，女性为1.5%。衡量是否肥胖的标准是Body-Mass-Index（BMI），肥胖症患者这个指数的比例大于30。

——青春期征象。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表明青春期各个不同阶段的发育征象，如女孩的乳房发育（Thelarche）和第一次月经来潮（Menarche）；如男孩的精子形成（Spermarche）、第一次射精（Ejakularche）和变声，以及男孩和女孩的阴毛（Pubarche）出现的平均年龄时间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200年前的人青春发育期的出

现大约要比现在晚两年，并且自19世纪中期至今，每10年作为一个周期，青春发育期的出现都会提前3～4个月。如今认为，青春期发育的进展，通常有一个持续多年的跨度，比如在10岁时出现乳房发育，直到15岁才出现变声等。粗略地说，当今身体的青春期发育大约发生在9岁到16岁之间。

——阴茎长度。德国男人阴茎的平均长度在勃起的状态下，约为14.5厘米。

——勃起功能障碍。可以从费尔德曼（Feldman）1994年发表在《泌尿学杂志》（*Journal of Urology*）上关于大型的马萨诸塞州男性老龄化研究（Massachusetts Male Aging Study）的文章中，提取当前最可靠的关于常住人口中勃起功能障碍患病率的数据。1290名志愿者通过调查问卷表述了他们的性活动。其中只有少于一半的人（48%）回答说没有勃起困难。9.6%的人是完全没有勃起能力，25.2%的人患有中等程度的勃起困难症，17.2%的人患有轻微的阳痿。这些志愿者的年龄在40～70岁之间，平均年龄略小于54岁。在40岁的年龄组中只有5%的人患有完全的阳痿以及17%的人患有中等程度的阳痿，在70岁年龄组中阳痿的比例则上升到15%（完全）和34%（中等）。从对阳痿研究的诸多变量来看，年龄有着最显著的统计意义。

——传统家庭。按官方的粗略统计（2010年的状况），在德国的总人口中有55%的人是已婚的，22%是单身，5%是离婚的。但在百分比中缺少丧偶或其他状态的人员数据。在1995年有15%的儿童是作为非婚生子出生的，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大约33%，也就是说，每三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子。

——新医学意义上的父亲。自医学工作者撇开顾虑之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大约有10万个儿童是由匿名捐赠的精子（即所谓的人工受精）成孕和出生的。联邦宪法法院198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和

地处哈姆（Hamm）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级法院2013年的判决，确立了每个通过匿名精子人工受精这一方式出生的孩子，不管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都有权利知道：谁是自己生物意义上的父亲。

——教堂婚礼。到1970年为止，在德国仍有80%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但今天已经只有当时的1/4了（SZ，30./31. 3. 2013，S. 9）。

——离婚。当前德国有1/3的婚姻会以离婚告终。在2010年，每对配偶在离婚前共同生活的时间平均为14年2个月。女性离婚的平均年龄为41.8岁，男性为44.7岁。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6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在2009年几乎一半的离婚夫妻有尚未成年的孩子。

——同性别的生活伴侣。到2010年在全德国大约只有2.3万对同性恋配偶在官方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简称ELP，请参见SZ，20. 3. 2012，S. 17）。但据普查，2011年就已经有3.4万对正式登记的同性恋生活伴侣，有5700个儿童生活在这种同性恋的生活关系中。其中86%的儿童有两个母亲。

——新型动物恋。据全德动（宠）物专业协会的统计，全德有1/3的家庭持有动物作为家庭宠物，其中在数量上位居第一位的是猫，大约有1230万只；第二位的是狗，大约有740万只。接下来的是一些小的哺乳动物，如小兔子、小老鼠，以及观赏性的鸟类。在所有动（宠）物的持有者中，40～49岁年龄的人，如果还没有孩子，便特别会更经常地养有猫。据统计，在2011年，德国人单是为家庭宠物的支出就已达37亿欧元（dpa，26. 6. 2012）。这里面还没有包括2012年兴起的专为作为家庭宠物的猫、青蛙和鸟类提供的智能手机的费用，宠物们现在可以用智能手机发出音频，在客厅里追捕虚假的猎物。

——互联网。在2011年，全德国大约有77%的家庭连接了互联网（联邦德国统计局，2012年6月）。

——情欲快感的全球化。互联网用户在网上搜索色情制品的内容每天大约为6800万次，占用户搜索总次数的25%。4.2亿个网页提供色情内容和信息，占全部网页总数的12%，其中大约有90%是由美国互联网服务器提供的服务。每年的销售总额大约为1000亿美元（SZ，5. 5. 2009，S. 9）。

——网瘾。联邦政府给出的一份有代表性的研究表明，在14～64岁的人群中，大约有56万人可以认定患有网瘾。大约250万人可以认定有此“问题”。特别容易患上网瘾的是男性、单身、失业者和“移民及其后代”。老年人特别喜欢网络游戏，年轻的则主要进入社交网站（epd，KNA，9. 10. 2012）。

——偶像。2012年10月4日，Lady Gaga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人，在社交网络Twitter上打破了3000万追随者的大关。当时位居第二位的是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他有2860万追随者，第三位凯蒂·佩里（Karty Perry）有2730万追随者。而与此同时巴拉克·奥巴马最多只有2050万追随者。

——多样化的单身交友网站。2012年5月间，德国大约有2000个约会和交友网站。比如有专为“墓穴”爱好者提供的黑色幸福网站（schwarzes-glueck.de），有专为大个子人群提供的交友网站（lange-liebe.de），有专为带有孩子或家庭的单身汉（或女子）提供的交友网站（moms-dads-kids.de），有专为残疾人提供的交友网站（handicap-love.de），有专为聋哑人提供的交友网站（gl-sh.de），有专为犹太人提供的交友网站（jewish-single.de），当然也有专为施虐受虐者提供的交友网站（rencontre-macho.de）。

——卖淫。根据争取妓女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多娜·卡门”协会的分析，德国议会在2001年10月19日通过的卖淫法（ProstG）并没有真正达到保障妓女权利的目的。这只是为卖淫合法设置了一个“不太有用的基

础”（*Dona-Carmen*-Rundbriefvom Dezember 2012，S. 8）。即使在2012年，警方仍然强化了对妓女和妓院的突袭式搜查。其高潮是由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Bundeskriminalamt）发起的一次同时在欧洲9个国家实施的大突击搜查。现在颁布的对一种非法卖淫的惩罚是每日每人15欧元（也请比较Henning und Walentowitz 2012年对此的批评）。

——少女怀孕。21世纪初的德国，每1000个15～19岁的少女中，会有16人怀孕。在美国则是84个（Matthiesen et al.，2009：23）。

——避孕措施。根据受联邦德国健康启蒙和教育中心委托的调查（TNS Emnid）在2011年公布的数据：大多数德国人采用的避孕方法是服用药丸（57%），许多人也使用避孕套（37%）。其次是上螺旋式避孕环（10%）、绝育手术（男女各5%），阴道环、测量体温、计算经期、三个月有效的避孕针或是其他方法（共8%）。大约有57%的年轻人在第一次性交往时，会采用避孕药或避孕套。

——专为回答青少年疑惑问题设置的网站。民间组织“维护家庭”（Pro Familia）在www.sextra.de网站上，官方的联邦德国健康启蒙和教育中心则通过www.loveline.de网站，回答青少年的提问。

——堕胎。令人高兴的是堕胎的数字在逐年下降。自1996年颁布新法以来，2011年是最少以这种方法终止怀孕的一年。2011年，德国堕胎的总数为108900起。这比2010年下降了1.4%。未成年人堕胎的数字也在减少。与上一年相比，2011年未成年人堕胎的总数为4000起，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450起。在这官方公布的数字之外，人们也必须计算有人在怀孕超过14个星期后出于法律的理由到国外去施行的堕胎，比如到荷兰。

——出生率。现在的德国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低生育率国家。如果说1865年出生的妇女，还平均生育4.7个孩子，那么在100年后1965年出

生的妇女只生育1.55个孩子。战后出生儿童最多的是1966年。在这一年里东西德两个国家共有130万儿童出生。2011年，可以确认为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7月2日颁布的数据，德国这一年仅有66.3万名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与2010年相比少了2.2%。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也就是说自普及所谓的避孕药以来，联邦德国的出生率在纯粹的统计数字上，是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3个孩子（SZ，20. 5. 2006，S. 1；FR 13. 4. 2011）。按联邦人口研究院2012年12月17日公布的数据，德国当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1.39。越来越多的妇女越来越晚才生育孩子。2004年，在统计史上第一次有多于20%的妇女年龄大于35岁才生育孩子。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妇女，则早就越过了这个数值。比如2005年在慕尼黑有29%的妇女过了35岁才生育第一个孩子（SZ，20. 5. 2006，S. 1）。按联邦人口研究院的最新调查，如今有许多妇女都担心自己不能恰当协调职业与育儿的关系。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也就越少。总之是越来越少的德国人确信，儿童会给成人带来生活乐趣，提高生活满意度，也就是所谓的幸福。其中的一个理由也许是，孩子通常也不再负责或是保证父母的养老。

——无孩的女学者们。按德国人口研究院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在德国有40%的35～39岁的女学者没有生育孩子，而在40～44岁的女学者中只有30%的人没有孩子。

——剖腹产作为新型的出生方法。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德国的剖腹产在10年里从17%上升到了27%。2010年8月，在德国出生的每三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以这种手术方法出生的。显然，一些知名和富有的女士，如麦当娜、安吉丽娜·朱莉、布兰妮·斯皮尔斯、克劳迪娅·希弗、莉莉·贝克尔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都成了新出生方法的榜样。“时髦的推动”？据媒体报道，这些知名女士选择剖腹产，主要不是因为害怕自然生产过程中所要承受的痛苦，而是出于“日常安排的理由”。

——代孕。自1991年实施的胚胎保护法（Embryonenschutzergesetz）以来，代孕在德国是受禁止的。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希腊、荷兰、比利时、俄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则允许代孕。中国以它的一个孩子政策，兴盛了代孕的生意（Stand April，2012）。

—女性的劣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2年12月公布的一份研究表明，德国中等收入女性的平均工资要低于男性21.6%。在韩国和日本，男女工资的差距还要更大些。德国养老金的男女差别位于所有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的最后一位，即差距最大。女性得到的养老金平均要比男性少49.9%。10%的女性养老金领取者因此生活在贫困中。25～54岁之间有2/3的母亲的职业是非全日制的。与此同时，25～34岁之间的妇女却比更多的同年龄男性获得技术专业证书或大学毕业证书。但她们中能够进入管理层的却仍然一如既往寥寥无几。其理由一目了然：男女有别的性别形态、社会形态和缴税模式，比如婚姻配偶收入的分割，托儿设施的缺乏，儿童护理资金的缺乏，老年护理等收入微薄的女性职业，这一切都使女性处于一种劣势，并阻止了女性的发展。

——男人们的科学界。尽管有更好的中学毕业文凭，尽管占有多于一半的大学毕业人数，并且有44%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但据德国科学理事会2012年5月的报告，2010年只有15%的女性在高校中得到收入较高的W3-教授职位。

——男人们的经济界。在德国160个行业领军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中，女性只占2.4%。

——因性别而异的无酬劳动。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34个成员国中的26个国家所做的《2011年社会综览》调查，德国妇女每天的无酬劳动要比男性多100分钟，丹麦是55分钟，土耳其是260分钟。如果把这

些无酬劳动的时间按一个不熟练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计算，那么在德国每年大约是8000亿欧元。

——无报酬的孩子看护。按OECD的研究所说，德国全日制工作的妇女每天照看儿童（到18岁）需要花费66分钟，男人只有37分钟。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用来照看孩子的时间平均每天多于3个小时，男人则只有大约45分钟（SZ，5./6. 3. 2011，S. 6）。

——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谁有375250欧元，谁就属于世界人口中最富的1%阶层。这1%的人口大约占有世界40%的财富。2%的世界人口大约占有多于51%的世界财富，10%的人口大约占有整个世界85%的财富（按2012年6月5日维基的综合资料数据）。

——贫困。在德国有8.9%的公民依靠低于平均50%的收入生活，在丹麦是6.1%，在美国是17.3%。按联合国的标准，如果一个人每天只能用少于1.25美金维持生活，那应该算是穷人。2005年世界范围内有10.4亿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受贫穷威胁的比例，2010年在德国是14%（男人）、15%（妇女）。女性最受贫穷威胁的年龄在18～25岁之间，为24.2%（联邦统计局，2012年6月）。

——饥饿。按联合国公布的数据，1990年在世界人口中有6.5%的人营养不良，2012年上升为7%。

——厕所。按联合国所说，2008年，世界范围内只有61%的人口享有卫生设施。

——武器贸易。全世界的武器贸易都已经失控。销售给其他国家的大部分武器都来自美国、俄国和德国（Stand April，2013）。据国际特赦组织报告，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因遭受武器暴力而死亡。按此计算，每年将有524160人被武器枪杀（Stand Main，2012）。

——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据德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6月公布的数字，2010年，有25.8%的德国学生获得进入专业高等院校或大学学习的资格证书，有27.8%的学生没有获得职业结业资格证书。按德国经济研究院的一些调查，最近十年里，在25～65岁的移民中有多于1/4的人拥有一份高校毕业证书，而在德国的总人口中拥有相应毕业证书的只有18%的人（epd，2.7. 2012）。在总人口18～64岁年龄段中有多于700万人是文盲（FR，29.6. 2012）。

——政治教育。《明星》杂志的一次调查表明，在18～29岁的德国年轻人中有21%的人不知道“奥斯维辛”这个词意味着什么（Stand，2012）。在一次对5个州7500个9～10年级学生的调查给出的数据是：只有1/3的青少年认为“第三帝国”是一个独裁统治，大约有40%认为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Juni 2012）。

——收入。几乎有30%的人主要靠养老金或公务员退休金生活。有10%的人依靠自己的财产、失业金或社会救济金生活。每10个男人中只有6人在从事职业或商业劳动（Stand，2008）。

——工资。2012年，德国一个单身汉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802欧元税前收入。有2/3的临时工或合同工的工资低于这个标准。健康和社会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在2010年底是2456欧元税前收入（AFP，6.7.2012）。

——不同年龄的就业关系。据德国钢铁金属工业联合工会一份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越来越多35岁以下的青年人陷于一种棘手的工作关系。2009年还只有大约28%这样的工作关系，在2012年已经上升到32%。在35岁以上的人群中，这种棘手的工作关系则相反从16%下降到11%（AFP，6.7.2012）。

——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100年前，在OECD国家中，每个家庭

每个星期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为58小时。感谢吸尘器和洗碗机等的引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星期做家务所需的时间已减少到18个小时。

——性侵和伤害**1**。一份有代表性的德国人口调查（2504人，年龄在14～90岁之间，用的是德语版的儿童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表明：在2504个问卷调查参与者中，有1.9%的人遭受过严重的性侵，有1.6%的人遭受过严重的情感伤害，有2.8%的人遭受过严重的身体伤害。另外还有6.6%的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遭受过一种严重的情感忽视，有10.8%的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遭受过一种严重的身体忽视。在女性则可预测到一种严重的性侵（Häuser et al.，2011）。

——性侵和伤害**2**。2011年下萨克森州犯罪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有11400人参与了这项问卷调查，年龄在16～40岁之间），那些年龄到16岁的调查参与者给出的数据是：有6.4%的女孩和1.3%的男孩说遭受过有身体接触的性侵（而在20年前同一研究所对同一年龄段参与者遭受身体性侵的调查结果是：男孩8.6%，女孩2.8%）。除此之外，现在的调查还表明（可能出现多次的重复计算）性侵这些儿童的罪犯中，不认识的男性为23.3%，不认识的女性为2.2%；原已认识的男性占33.5%，家庭的男性朋友为14.4%，原已认识的女性为1.0%；遭遇自己家庭男性成员性侵的总数为44.9%，其中自己的父亲为10.3%，继父或母亲的生活伴侣为11.7%，叔（伯）或舅舅为12.6%，其他的男性亲戚为10.3%。遭遇自己家庭女性成员性侵的有1.6%（也请见2011年10月19日的《南德意志报》，第5页）。

——移民。移民占德国总人口的12.9%。在瑞士是25.8%，在土耳其是1.9%（这些数据来自2008年或更早些）。如今几乎每5个德国人中就有1个人有所谓的移民背景，也就是说，他（她）是移民来到德国的，或他（她）是移民的后代。这也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构成了一种

新型的联盟。

——避难所。我们的法律规定一条狗应当有9平方米大的狗窝，但一个在我们这里寻找庇护的人，却只能得到人均5平方米的居所。

——宗教信仰。由米夏埃尔·埃贝茨（Michael Ebertz）受黑森州广播电视台委托所做的一次颇有代表性的采访调查表明，在黑森的成年人中有27.9%的人每天至少祷告一次（也包括多次），有14.3%的人每星期至少祷告一次（也包括多次），有28.3%的人则很少祷告，还有27.9%的人则从不祷告。在穆斯林人群中，有54.2%的人每天祷告（也包括每天多次），只有4.2%的人从不祷告。在全黑森的成年人中，有68.6%的人相信存在着一种“更高的力量”，有66.7%的人信仰上帝，47.2%的人相信天使，70%的人相信奇迹，略少于40%的人相信魔鬼。在穆斯林人群中，有95.8%的人相信（穆斯林的）上帝阿拉，并有82%的人相信魔鬼。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可以说只有1/3的天主教徒和1/4的基督（新教）教徒确信各自教会的教义，比如一神教和耶稣基督启示。大多数人都相信宗教思想的一种弥漫性混合和直到信仰多神教。按调查分析，70%的被采访者都处在一种由各种宗教拼凑起来的信仰中。有3/4的采访者虽说：“有教会存在，是好的”，但对教会却又很不满意。因此有85%的基督（新教）教徒和89%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必须改变自己”（FR，26.1.2012，S.F2）。

——鱼类资源。在1996～2011年之间，鱼的种类减少了12%（Living Planet Index，2012）。

——必要的微生物。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无数最微小的生物、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没有这些微生物，人根本就不能生存下去（Nature，14.6.2012）。在一个人的皮肤上和肠道中大约生存着10亿个细菌，正是它们才使得人的生命成为可能，并总共有2公斤的重量。研究者在肚脐采集的涂片上确认了2368种不同的细菌。其中有多于一半的细菌，是在

之前尚未被认识的（Plos One，Bd. 7，S.e47712）。有趣的是，我们每个人是怎样并不知道这些，却又生活着。

——过剩和错误开销。世界范围内的药物支出，在最近十年中递增了48%。按IMS市场研究所的数据，2014年的药物支出将是1万亿美元。每年都会扔掉许多亿的药物开销，只因为或是开错了处方、过期，或根本没吃；或是与其他药物错误地混合在一起，或用药时间太长而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用；或是因为药物根本没效用，或没有使用价格合算许多的替代药（比较Bericht der FR，7.12.2012，S. 15）。

——基因故障。当前的医学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大约400处基因故障（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Dezember 2012，online）。借助有效的方法，还将发现更多的基因故障。

——语种消失。大多数当前仍在使用的6000多种语言，都遭到了即将消失的威胁。按Unesco的估计，到21世纪末，将有2474种语言最终走向消失。在德国，受到消失威胁的语种有索布语（Sorbische）、萨特尔弗里斯兰语（Saterfriesische）和北弗里斯兰语（Nordfriesische）。在欧洲，比如盖尔语（Gälisch）、巴斯克语（Baskisch）和罗姆语（Romani）。当前已经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只说属于11大语种中的某一种语言（Stand Februar，2012）。

82 青少年的情欲

批判主义性科学进行了诸多实证和实验性的研究与调查，这些研究今天通过与联邦健康教育中心青年研究的连接，不只是能够话语性地面对和研究非话语的现实，而且也能够列举出他们在实际行为中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请比较：Schmidt und Sigusch，1971；Sigusch und Schmidt，1973；Schmidt，1993/2000，2000；Schmidt et al.，2006；Matthiesen et al.，2009，2011；以及在Sigusch，2008a：430ff中其他一些综合汇

编），虽然这些研究仍然未免出于研究费用的原因，主要只是泛化的统计，没有能够按亚群体和个人加以细化。严格地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这些”青年，比如在德国就有400多个可以明确划分的不同的青少年文化、场景、小集团、帮派、小圈子和家族，那些消息灵通和精明的广告业常按青少年对这类文化的需要构思自己的广告策略。

那些被称为是受1968年性革命影响的事，其实就是青少年比以往大致早3年就开始了现实的性行为，如约会、亲吻、爱抚和性交；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末，16岁或17岁的姑娘和小伙子已经有表现性行为的举动，如同10年前的男女青年以19岁或20岁才开始的行为。但爱情、忠诚、婚姻和家庭，仍然是年轻人的道德构想。传统的价值观并不因此遭受质疑，但也不再那么狭隘，并且尤其是不再像前几代所阐释的那么男人中心化。自那以后，年轻人更愿意以带有相互忠诚的前后连续的多次性爱情关系，取代原先那种固定不变的关系，以致我们从他们的性行为中能够明显看出婚前的一种前后替代和串行的一夫一妻式伴侣关系的行为规范。重要的是，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把性欲和性行为作为一种享受愉悦和欣喜的体验，已不再像他们父母那代人那样为自己的婚前性行为感觉到强烈的恐惧和内疚。这从历史的角度看，确实是一种新意识，尤其是对姑娘和年轻女性来说。除了当时社会普遍的性自由化，那个时代引进的“避孕药”肯定也对这种社会宽松做出了重要贡献（37章）。

但是今天的青少年并不（比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更早开始这类约会、亲吻、爱抚和性交的行为，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比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有更多更丰富的性经验。在今天15岁的青少年中，只有近1/4的人有过性交体验。第一次性交的年龄在年轻姑娘平均（中位数）是16.5岁，男性青年一般要略晚些。与以往的统计数据相同，有3/5的16岁或17岁的青少年男女，已经体验过最少一次的生殖器部位的抚摸。今天的男青年比他们的上代人更看重性欲性行为与忠诚和稳固的爱情关系的一种紧密联系。他们虽然（还）并不像年轻姑娘那样的浪漫化，却明显更

注重相互理解和信任。他们也比以往时代的人更经常地向女友坦诚自己对她的情感，并主要是爱情。

相比之下，当前急剧下降的是性欲性行为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它们在性革命时期曾被无限高估。与那个时期相比，性欲和性行为在今天几乎已经是如此自然，就比如人们拥有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那样。由于它们不再是极大的越轨，因此它们也就可以停下。那些过着禁欲生活的年轻男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坦诚自己的禁欲，而不会遭到朋友们的嘲笑。今天的年轻女子也更少相互炫耀和叙述自己性体验的愉悦和满意。男孩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把青春发育体验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性本能冲动的爆发。即使是在青春发育期之后，他们也不再把自己的性欲性行为看成是那么难以自制的冲动，也不再是那么刻不容缓的欲望。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如今的性伙伴则要比他们的前辈少一些。因此决不能说他们是在滥交。在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才在青少年时期就有过多于一个到最多三个的性伴侣。

自慰和同性恋经验也没有了以前那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17岁的青少年中，90%的男孩和略多于50%的女孩已有手淫的经验。在手淫的比例只有略微下降的同时，现在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接触已经较为罕见。然而，在17岁的青少年中，大约有10%的男孩和女孩曾经感受到被同性的色情或性所吸引。以前几乎1/5的男青少年有着一种现实的同性恋接触，今天则只有2%的人。禁令的解除和两性的接近，终于导致曾经被许多诗人歌唱过的吸引同性的青春期走向终结。自从同性恋作为一种独特性模式进入公众的视野以来，男青年们反而害怕自己可能被误解为同性恋。并且同性恋在我们社会中被认为与艾滋病有着一种特殊的紧密联系，也肯定吓退了不少人。只是就总体而言，还很难评估艾滋病对年轻人性取向发展的影响。要是按人们已在头脑中的有意识想法来说，似乎这种影响相对比较轻微。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病原体的传播途径，并且他们中绝大多数也尽量采取根本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方法和行为方

式。但是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究竟有着哪些恐惧，我们对此还了解得太少。

在近几十年里，伴随着性禁令的递减和两性的平等化，出现了性在文化上的去神秘化和平庸化。普遍实施的男女同校，使如今的男孩和女孩从童年起就在一起长大。在青春期不管是个人单独或两人同时参与的性活动，已为今天的家长所接受甚至是赞同。青少年的性交媾已经完全不必在私自的秘密地点，他们可以很坦然地在家庭居室里进行。根据实证研究的确认，如今15岁或16岁的青少年，通常已被家长允许带上自己的性伙伴在家里过夜。青少年性生活的“家庭化”，当然也在关心孩子的意义上给家长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如果说以前的性交媾，对男人来说主要是涉及性的本能冲动，对女人来说主要是性高潮，那么今天对年轻男女来说主要是相互之间怎样更好地和睦相处。比性行为更重要的是，在一种稳定的性关系中，怎样让自己的伴侣感觉到被接受和被关心。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条从情欲快感到幸福快感的历史道路。当今的青少年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路，是因为禁忌和性别差异已被解除，男性青少年逐渐有自信表现自己的情感，也能够与女友交流感情，尽管他们仍然接受的是要比女孩更坚强和更坚韧的教育。

只是如今，青年男性已经不再会不遭到任何反驳地把握这种权利。在今天青少年的男女关系中已经很具体地沉淀了几十年来许多女性为争取自主权而作的斗争。比如举例来说：如今的年轻女性比以往更经常自觉地决定在与男友的关系中应当发生些什么，相互的性关系应当走多远。性的主动性在今天已经明显地较少在于男性青少年，而更多的是由年轻姑娘发起。在他（她）们间的第一次性交媾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几乎有90%的年轻姑娘只是为了讨男友的喜欢才愿意满足他的性要求，而今天这样的姑娘甚至不占30%。总的来说，年轻女性一般要比

年轻男性更早恋爱，更早开始性生活，也更早进入一种较为稳定的伴侣关系。

基本上有80%的青少年在第一次性交媾时，就使用一种安全的避孕方法，大约双倍于他们之前的那一代人。稍后则几乎谁都会采取一定的避孕方法。从我们的调查对象来看，在他们最近一次的性交媾中，有95%的青少年采用药丸或安全套进行避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避孕也越来越有效用。在青少年采用的避孕方法中，有多于70%的女性和多于50%的男性说是采用“药丸”，有近40%的女性和几乎60%的男性使用安全套。艾滋病预防宣传把使用安全套宣讲为是成熟和责任心的标志，对青少年接受安全套做出了贡献。在今天，避孕已成为男女两性共同的事。除了女性的避孕方法外，如今也有了预防男性生殖的方法。

虽然有着这些理性和有效的避孕方法和行为，对意外怀孕的一种恐惧在今天仍然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的巨大心理压力。超过70%的年轻女性曾有过意外怀孕的恐惧。相对来说，只有少于10%的年轻男性担心由于性交媾而感染上艾滋病。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男女青少年都懂得艾滋病传染的途径，并且最大多数人的性行为也尽量采用了似乎根本不会传染的方式。除了对意外怀孕的恐惧，青少年们的另一个恐惧主要是害怕一种关系的终结，害怕被离弃，这也许是因为他（她）们是性“革命者”的后代而当然懂得，婚姻既不神圣也不永久。

除了以上这些恐惧之外，性侵也成为这些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性生活，并因此成为两性相互关系的负担。在16岁或17岁的女青少年中有2/3的人说，至少遭受过一次“性攻击”。同年龄的男性青少年是1/4。有接近1/10的女性青少年不幸成为遭受如强奸这样一种严重性侵犯的牺牲品。女性青少年遭受的性攻击几乎全部来自男性，而男性青少年遭受的性攻击则主要来自男性。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青少年对于性暴力和性侵这类问题由于公众领域的经常性讨论而变得非常敏感。无论如何，

我认为在德国西部（即我研究工作的重点区域）是这样的情况。

德国东部则还有许多不同。比如在东部明显出现较少的性攻击，东部女性青少年的性交媾经验也明显多于西部女性青少年，西部男性青少年则要比东部的更节制些（请比较：Weller，1991；Starke und Weller，1996，2000；Starke，1996，2005；Weller und Starke，1993；也请参考本书83章）。

爱情是青少年关系中的全部内容。原本在20世纪就带有一种最高文化奉献色彩的男女爱情，近十年来又加上了一种额外的神秘化（98章）。因此青少年们一旦感受到爱情，就会相信自己有一切权利去享受它。但是当双方关系中的爱情不管出于何种未知的理由消失的时候，也可以无声无息、无怨无悔地结束这种已经没有了爱情的关系。他们已经不再接受不需任何理由仅仅为了保持一种长久关系所要求的克制和单调。因此他们中原本平淡无奇的关系却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通过一切可能的刺激和装饰而变得可以承受，这些自导自演自爱的戏剧性事件使爱情有了继续飞翔的翅膀，它们不仅高调和多彩，而且也切合实际。最明显表现这种戏剧性的是近几十年来的（同性恋）爱的大游行（Love Parade）和狂欢聚会（Raver Party），这些大游行和狂欢既表现了性和色情，又是非性和自恋的。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独特和不同的个人，但又是共同地参与了这一活动。大家都超出了常规，但也正是通过这一活动又相互联合起来构成这一活动的形态。他们的装饰可以说——为了不用也许已经又过了时的青少年语言——是从日常生活的服饰直到可以令人崩溃的模样。

但是，年轻一代在我们的文化中生活得并不那么轻松。以前，他们首先是被社会以严格的禁止和粗暴的强制要求纪律化，一切都只是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社会阶层，一切都已在事先按刻板的模式做出了决定。如果有谁敢于偏离这些规范和模式，就会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今天有许多

大道通向罗马，不仅可以通往大陆，也可以通往海洋和天空，是的，性也变得越来越虚拟化。这在一方面使年轻一代的爱情和性生活变得容易些了，但另一方面也就变得更困难些了。没有曾经造成尸体成堆并越过尸体因而直到骨子里臭名昭著的传统道德机制的制约，今天的年轻一代应当自主和自我负责地决定并处理好自己的亲密生活体验和关系。科学把这种自我调节的新模式描述为非正式化、相互依存的依赖关系和“对无拘无束的强制”，我们把这种新的强制，在我们的综合语境中称为“多样化强制”（76章）。

以前，便宜的消遣文学和伟大的市民文化都曾话语化地描述过性别和性生活的模式；今天除了一些花絮文学外，电子媒体和电脑游戏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后继者。今天的电子媒体比那些壁龛古老的秘密和过去的手淫恶习更能使青少年着迷。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已经无法逃脱新的媒体和电子技术，他们必须学会怎样摆弄这些新的日常生活技术，就如他们的前辈在当时必须学会照相，去影院看电影，学会打电话，听广播，使用超过8毫米的胶片，摆弄电视机和放像机那样。电子媒体的兴起，意味着从模拟性的单一世界观到数字化全方位世界观的一种转换（64章）。首先，越来越少的青少年与家畜、植物、众神和神话有所接触；其次，除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之外，他们是在电脑游戏中建立了与外界客体的第一层面上的生活关系，这是一种程序式的、完成了的、可反复思考和直线型的关系。因此，宠物蛋对于许多儿童来说，已经成为自己所希望的宠物的一种替代品，他们自己原本对宠物的关心、爱护和对生命的敬重，现在都可以给予那个宠物蛋了。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正在成为那些虚拟的、根本就是假想出来的宠物蛋父母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心地善良，正在通过电子方式表达他们对宠物蛋的关心和愿望，但是一旦当他们对这一切感到厌烦的时候，他们又可以把这些电子动物弃之不顾而不需有丝毫内疚。鉴于新的技术比旧的动物饲养方法传播得更广泛也更诱人，孩子们在他们发展对这类“无聊”事情的兴趣之前，就已受到了色情和性内容的骚扰。毕竟只要点击一下专供18岁以

上成人的网页，就能看到儿童不宜的内容。并且谁如果不那么做，他的那些朋友们也会通过新的媒体免费传送给他。

作为这类例子，我们在这里只需提及一下在2005年第一次被辨认出的从新性革命的树上掉下的果实，也就是在贪婪的树上长成的市场调整以及自我发现和自我忍让的成果。美国人把这称为“色情短信”（Sexting），一个由色情和短信组合而成的词，表示一种新的事实——年轻人通过SMS或MMS大批发送自我拍摄的“暴露度很大”或根本就是裸照。甚至在（被传统道德看来已经足够）伤风败俗的西方国家，这种行为也被认为是丑闻，因为裸照的发送者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是那些还是孩子的青少年制造和传播了儿童色情制品。美国“国家青少年和防止意外怀孕宣传运动”（National Campaign to Prevent Teen and Unplanned Pregnancy）在2008年以“色情和技术调查”为主题，考察了色情短信的发送和传播的现状（http：//www.thenaational-campaign.org/sextech/PDF/SexTech_Summary.pdf；accessed：2. 4. 2009）。按这份调查给出的数据，在3～19岁的青少年中有48%的人，以及在20～26岁的青年中有64%的人，收到过色情短信；而这两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和青年发送色情短信的比例分别是20%和59%。在德国有80%的女性青少年和85%的男性青少年拒绝发送这类短信，也不参与这类活动（Döring，2012）。

2010年，德国的青少年多次遭到道德信徒的公开指责，被说成是“色情的一代人”，他们甚至声称今天的青少年已经悲剧性地败坏了自己的性道德。他们列举了比如8岁的孩子在父母身边观看色情片，或是一个父亲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在手淫。前面已经提及的一些性学家们已经以自己的实证研究数据反驳了这类关于性道德普遍败坏的论点（也请参见：Döring，2009；Gernert，2010；Grimm et al.，2010；Hill，2011；Matthiesen und Martyniuk，2011；Past ötter，2003，2009；Schmidt，2009b；Schmidt und Matthiesen，2011；Starke，2010；Stuhlhofer et

al.，2009；Weller，2009，2010；Zillich，2011）。他们描述了一代令人惊讶地冷静和注重反思的青少年。女性青少年对色情片很少有个人的兴趣，但又不想在别人谈论这些话题时无话可说，因而通常比如总是在女友那里一起观看这类片子。大多数男性青少年随着青春期的开始，也会开始消费色情内容的片子。大约有近一半的16～19岁的男性青少年，每星期一次或多次在网上寻找色情表演。男性青少年观看的目的主要是激起自己的情欲，而女性青少年，如果确实观看的话，则主要是出于好奇。由诗丽雅·马蒂恩森（Silja Matthiese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9年对160个生活在大城市的性取向为异性恋的青少年进行了采访，其最后的结果，即使从性别理论的角度来看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调查证实，对色情制品不感兴趣，可以帮助女性青少年稳定其女性性别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反，男性青少年正是通过对色情内容的这种冒险性兴趣，才能获得自己正在形成的异性恋性别认同的支持和肯定。……我们认为，在青少年性行为研究的任何一个其他领域里，都没有像在对色情制品的兴趣方面，那么强烈地表现出性别间的差异——手淫除外。但是对手淫行为的性别差异只能做些不太精确的研究，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谈论这事；与此相反，青少年对色情内容的兴趣会清楚地表现出来，大家会对此进行一种积极的沟通，并且能在共同兴趣的人群中得以证实。男女青少年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各自明显不同的性别特征。男青少年更多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观看色情片，在这个过程中是主动态，因此也不必为此遮遮藏藏。特别由于自最近30年以来，男性青少年在性的社会性陷入女性的防御性状态——即女青少年早于以前而开始了自己的性和性关系的生活……因而他们现在面对女性青少年伴侣，更需要表现出自己把握性技术的能力。"（Matthiesen et al.，2011：326，340）

虽然色情片在今天已是日常娱乐中一个极为平常的组成部分，但性伴侣共同观看色情片的现象仍较为罕见，即使有这样的情况，大多也是由男青年主动提议。整个过程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被激起了性欲，而她却感到厌烦，因为感觉累而没有了性趣。从政治和女权主义的

角度来看，色情片在如今不再有什么意义。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所倡导的一种普遍反色情运动已经落空。对当今的青少年来说，是否观看色情影片，只是一种私人事务，每个人都应对此做出自己的决定。马蒂森研究的结果表明，色情片的消费者虽然分布于社会的各个层次，但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有50%的（人文或理科）高中学生，但只有20%的职业学校学生有一种特别高的色情片观看率。所以如果人们猜测色情片的消费者主要来自社会的下层，那就未免似乎只是一个错误的结论。青少年的年龄越大，便越是确信，色情片表演的并不是人“正常”生活中的“真实的”性欲和性行为。另外，研究者还无法确定，观看色情片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观看者的性行为方式。如果通常的性交场景确实能够激起和满足某人的性欲，那么即使比如他在观看色情片的肛门拳交时感到刺激，但他仍会继续采用原有的曾经能够满足自己性欲的可靠性交方式。用另外的语言来表述：色情片的消费者会采用可靠的激起和满足自己性欲的方式，而不会简单地受色情片的影响。而且色情片的观看者通常在第一次观看之前，就已确定了自己独特的性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这让人们回想起我们在1967～1970年间对700名大学生所做的一份关于有明确性刺激的图片、影片和文字的心理实验研究，这份研究对修改当时刑法中的相关条款，发挥了一定的影响（请比较比如：Schmidt et al.，1969；Sigusch et al.，1970；Schmidt und Sigusch，1970，1973）。

按我的理解，只有当青少年生活在有害的家庭和友情关系中时，色情资料和（比如在聊天室里出现的）意外的性场景才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生活在这类关系中的青少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也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自己面对这些色情内容时，怎样借助年长于自己的人或成年人的帮助，将这些色情内容按其本质加以归类：即这是一种不希望的、猥亵的或过分的侵犯。这些前提在性自由的社会中有效地预防和保护了未成年少女只有极低的怀孕率（Matthiesen et al.，2009）。“性革命”和它的后果表明，生活在性理念变动时代的青少年，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

有高度适应能力的群体，对于自己不再通过严格的社会规范监控的性欲和性行为，有着一种很高的自我调整能力（Schmidt und Matthiesen，2011：376）。虽然在互联网上极易获得性刺激，但男性青少年的自慰率却并未因此有所提高。青少年性行为的研究者并没有遇上手淫特别上瘾的案例；在他们的调查对象中，只有一人表示害怕自己可能会有过分的手淫。给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青少年能够在现实和虚拟的性世界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也正因为他们的这种独立判断，使他们能够与比如色情传播的歧视妇女现象，特别是对自己个人感到陌生的性行为保持距离。这就是关于被媒体炒作为“一代色情”的青少年的真相。

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们的文化崇拜青春偶像，但是青少年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得并不容易。他们被忽略，成为几乎总是遭遇讽刺和遗忘的一代。他们并不站立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事件的中心，而只是边缘。我们不仅要求我们崇拜的青春偶像是新颖、好奇、清新、好动、健康和体育型的，而且也要求他们有创造性和未来意识。但正是想创造性地设计和构建自己未来的青年一代，却又常常被成年人看成是一个问题，一种负担，对这样的青少年总是担忧多于希望，他们无论如何都成了成人挫折感的避雷针。他们真正被认真接受、被追捧和被垂涎的时候，只是在他们作为商品消费者的时候。就此才推导出他们的社会意义，这是第二手的社会意义。德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协会，据说是因为国家在经济上无法承受这么一个全国性组织，人们谈论起代表着未来的这一代人，只会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学习成绩不佳、没有工作无所事事、歧视外人、吸毒和暴力。除了这种负面的青少年形象外，那些青年基督教徒和青年研究人员也被这样的负面话语说得如此苍白，虽然这些年轻人有着与社会一致的道德，也能证明自己的创造能力，在成人的社会里寻找担当与成人相同的社会责任。在战后德国，还没有一代年轻人像现在的青少年那样被毫不留情地贬得如此毫无意义，导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被文化也不被社会所需要。在文化上之所以不被需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几代中的大部分人，最迟从60年代的性革命

起，都生活在妄想中，以为自己比年轻人更聪明更有观察力，特别是他们中略有成就的一些男人，不能允许自己变老。老人的年轻妄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60岁了，却在穿着、运动、说话和行动上似乎才刚刚30岁那个样子，而他们自己的父亲在他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是个老年人了。这就使得今天真正是30岁的人必须刻意表现自己的年轻。此外，今天30岁的年轻人却已被更年轻的青少年歧视为“老年人”，以致这代人便陷入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中：比他们年老的人不允许他们在文化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则又拒绝他们参与到自己对文化的贡献中去。

今天的成年人应当思考，虽然社会主流崇拜青春偶像，但自己已不能与年轻人的年龄进行真实的交换，甚至那些身体开始干瘪，椎间盘已经磨损的人，也不想重新再开始一次生活。可怜的年轻人。他们鉴于这样的状况不是要更加出奇地温和和守纪律了吗？他们在这样的状况下，不是必须更加坚强和更加尖锐了吗？

性科学对这个时代的诊断，通过批判主义性科学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冈特·施密特在西部德国，库尔特·斯塔克（KurtStarke）对东部德国，以及当前主要由诗丽雅·马蒂恩森和阿恩·德克尔（Arne Dekker）主持的研究可以综述为：年轻新生代的性生活今天主要是在私人关系中浪漫主义的忠诚与公众大游行中刺眼的自我表演之间摆动。媒体关于当今青少年所报道的那些，或是性的无禁忌，或是毫无性生活，都没有真正切中事实。事实上，如今的年轻人在忠诚关系中实践的是幸福感而不是单纯的情欲，是精益性行为，是在编织爱意和自爱的演示中呼唤爱情，是用规则取代不规则，用爱情的强烈度取代以往性别认同说教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如今的年轻人已不再像性革命的60年代那样，只是期望尽可能多的身体征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场性革命并没有得以继续。值得关注的还有，在一个性刺激泛滥成灾的世界里，我们的青少年却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对于那些充塞在爱神舞台上的许多公众化

新性人物，不管他们是那个每天都在报道的性上瘾者，是受电子信息操纵的所谓的性变态者，是未来的电子性爱者，是那个实现了自己愿望的变性者，还是那个身为政治人物的同性恋者，如今的青少年都不那么感兴趣或只有极少兴趣。医院、尿布或施虐等性游戏并不是（或者说还不是）青春期年轻人感兴趣的性游戏。如果他们听到这类剧烈的性游戏，更会联想到他们祖父母辈的性欲和性行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能够理智地面对当年曾燃烧起他们父辈强烈性欲的色情表演。冈特·施密特在一次谈话中曾把当代青少年面对色情表演的这种冷静态度，称赞为是一种“文明的行为”。此外，他也证实，如果青少年的性欲和性行为一旦遭遇禁止，那么他们总是会做出更加失控更加出格的事情。他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社会对青少年的性欲和性行为限制特别严厉，与德国相比，美国青少年的避孕措施更不安全，出现了5倍于德国的未成年女性的怀孕率，性病传染广泛，也有更多的女孩成为暴力的牺牲品，遭受暴力性侵。另外，毫无争议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年所说的对“爱情生活最普遍的侮辱”，“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最经常表现为对日益递增的色情商品的消费”（Berner und Koch，2009：351）。

83 性伴侣间的性欲和性行为

人们在过了青春期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性生活呢？从统计数据看，年轻女性的结婚年龄在27～28岁之间，年轻男性则几乎是在30岁。1/3的婚姻最后会以离婚结束（81章）。当前，我们社会中有80%的人认为离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有2/3的离婚由女方主动提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是未婚生活在一起，或是干脆独自生活。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一到两个小孩，精确的统计数据是接近于1.5个孩子。有1/3的妇女没有生育孩子。在完成了从几百年前涵盖了整个家族成员的大家庭到只是由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小（也称为核心）家庭的过渡后，近几十年来又出现了形成一种最小家庭的趋向（65章）。比如只是由一个成人和一个儿童组成的单亲家庭，或只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人就是

这个家庭的全部或唯一的成员。在大城市中，传统的核心家庭已经急剧减少，并几乎已经失去了它的象征性和现实性的意义。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重要的是通过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或结交的朋友，稳定自己的社会和情感纽带，并通过自己喜爱的特定生活方式进入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关的亚文化中去。除此之外，可靠的有代表性的调查还表明：大约有70%生活在固定异性恋关系中的成人，“对他们的爱情生活感到满意”；几乎有30%的成人，“从不谈论”自己的爱情生活；近70%的人认为，在一种“伴侣关系中没有性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有大约70%的人只想有较少的性生活。

2002年，汉堡的性学家冈特·施密特、诗丽雅·马蒂恩森和阿恩·德克尔，以及莱比锡的性学家库尔特·斯塔克对来自汉堡并分别出生于1942年、1957年和1972年的776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调查（Schmidt et al.，2006）。这一调查使得多代人的性生活相互间第一次有了实证的可比性。被调查者在调查期间的年龄分别为60岁、45岁或30岁。

调查结果证实了各代人之间性幻想和性行为的差异。所有被调查者都表示可以为性生活做一切，但有95%的性行为只是发生在固定的伴侣关系中，1%～2%发生在出轨的关系中，以及在被调查者中占25%的单身汉（或单身女性）的性行为只占所有被调查者性生活的5%（近似的调查结果也出现在Schmidt，2000：67的调查中）。这就出现了，比如60岁的男人和女人，如果生活在一种婚姻或非婚姻的固定关系中，就比30岁（男女相同）的单身者，有更经常的性生活。此外，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婚姻中性欲和性行为意义的递减。如果说75%60岁的被调查者的性生活发生在婚姻中，那么45岁的被调查者则只有略多于50%，而30岁的被调查者更是只有20%。以另外的话来说，如今的婚姻已不再是人们满足自己性欲和实施性行为的主要场所，非婚姻的关系已经取代了它原有的位置。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被调查者在最后4个星期内究竟有过多少次性交？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与其他类似调查的一点分歧。西方

世界其他一些严肃可信的调查结果是男女两性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我们这里的调查结果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其中男性为6.8次，女性只有5.6次，这显然是受男性性幻想活动影响的结果。

施密特的研究表明，养育幼儿对性交频率的影响非常有限。如果是一对相处关系较为短暂的伴侣，幼儿的养育可能会降低对这类关系来说典型的较高性交频率。但是对于已经较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因而性交频率已不那么高的伴侣来说，其原有的性交频率不会因此降低。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否养育孩子，在伴侣关系的头6年，都不会出现性交频率降低的现象。在这最初的6年过去之后，性交的频率会在20～25年的时间里相对稳定；以另外的话来说，在伴侣关系的最初两年中会出现特别高的性交频率，从第6年起直到第30年之间，性交频率会有所下降，但较为稳定。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在这几十年的伴侣关系中得到或失去了些什么。对此，男女的共同回答是：我们失去了一些情感上的激情，但我们赢得了更多更内在的紧密联结。可以这么说，在伴侣关系开始之时，无论男女都有着一种同等强度的希冀体验柔情和性欲性行为的愿望，但随着此伴侣关系的延续，女性会更趋于要求柔情，男性则会仍然停留在满足性欲和性行为的愿望上。

关于最近一次性实践方式的询问结果显示，口交更为年轻人所喜爱，因而在他们中出现了一种高度显著的递增。年龄为60岁的被调查者给出的口交比例为30%，年轻于60岁的人的比例则高达50%。阴道交媾仍没有改变其最通常交媾方式的地位。年轻人显然也比较喜欢接吻和用手的性实践，其比例在3%到10%之间。调查前一年的一些刺激性欲望的实践，比如穿性感内衣，在公开场合交媾，使用假阴茎或较为温和的施虐和受虐等，在60岁那一代人与年轻于60岁的那一代人之间，有着一种显著的代际差异或者说跳跃。与此相反，没有代际差异的是在比如伴侣交换、穿着异性服装和较为严重的施虐受虐等行为方面。

性的忠诚仍然在性关系中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高度，现在甚至更高于以往。调查中共有多于90%的男人和女人，希望和要求自己伴侣的忠诚，其中要求对方忠诚的男人又略多于女人。对此有着要求特别严格的是30岁的那些被调查者。但现实究竟如何？按统计数据，如今东部和西部德国大城市中30～60岁的居民，平均每13年会有一次“性”出轨。以此类推，每100个伴侣关系年中，就会有7年发生出轨或关系以外的关系。各生代男性在最近三年的出轨率都是20%；与此相反，45岁和30岁的女性的出轨率显著高于60岁的女性。以另外的话来说：今天，在性革命时代长大的女性，会与男性一样多或经常地出轨。

关于对现在已成为一种独特“性模式”的“自慰”的调查，向被调查者询问的是，在此之前的4个星期中，是否有过一次自慰？调查的结果，男性是：30岁的男人77%，45岁的男人45%，60岁的男人29%。女性是：30岁48%，45岁45%，60岁为32%。

关于在最近12个月来的性困扰问题，生活在固定关系中女性的抱怨要多于男性。51%的女性承认自己“很少有性的兴趣”（男性有此同感的为24%），30%的女性认为自己有无法激起性欲的问题（男性承认自己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为15%），38%的女性有无法“获得性高潮”的问题（男性为9%），14%的女性“在交媾时会出现疼痛”（男性为6%），只有在“过快获得性高潮”这个问题上，男性的抱怨多于女性，男性为37%，女性为6%。

每个年龄段的男性都有6%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但也有0.8%的男性被调查者根本拒绝这类性实践。被调查的女性中的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比例为，60岁0，45岁1%，30岁4%。自18岁以来与同性别实践的性体验，在男性被调查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60岁）、15%（45岁）、15%（30岁），在女性各个年龄段的比例分别为3%（60岁）、10%（45岁）和14%（30岁）。偶尔受到同性性吸引的男性分别

为8%（60岁）、15%（45岁）和20%（30岁），女性分别为7%（60岁）、26%（45岁）和35%（30岁）。可以想象一种充满乐趣的同性性体验的各个年龄段男性为7%（60岁）、11%（45岁）和17%（30岁），女性分别为8%（60岁）、21%（45岁）和31%（30岁）。这就是说，对于越年轻的被调查者来说，竖立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亲密关系之间的那堵墙，便越是不那么坚实和容易倒塌。

总体来说，西部德国性实证研究大师冈特·施密特对全德国异性恋关系的变化概括为："无论男人和女人，都越来越少和越来越晚缔结婚姻，也越来越少和越来越晚生育孩子；他们越来越经常离婚，也越来越经常生活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中。越来越少、越来越晚和越来越短暂的婚姻，便犹如从自身出发为非婚姻的伴侣和家庭形式创造了时间框架。在所有欧盟国家中都出现了相同的发展趋向（自然还有瑞士、美国和加拿大），甚至也包括那些主要是天主教徒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或意大利。"

东部德国性实证研究大师库尔特·斯塔克（也参与了这里提及的汉堡-莱比锡采访调查），曾在一次讲座中特地指出了东西德的差异（也请参见：Clement und Starke，1988；Weller，1991；Starke，2005；以及本书82章）。虽然来自东部和西部德国的被调查者对提问或提示的回答有大约2/3是相同的，但他们之间仍有一些显著的差别。斯塔克在讲座中列举的例子（2006），比如30岁年龄段被调查者的第一次性交，即所谓的"破处"，在来自东西部德国的被调查者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在莱比锡有72%的女性和64%的男性，在18岁之前就有了其人生的第一次性交。而在汉堡则只有57%的女性和39%的男性。东部德国女性主要是在与性伴侣的性交中获得其人生的第一次性高潮，而西部德国女性则相反，主要是通过抚摸或手淫获得其人生的第一次性高潮。在东西部妇女与异性性交中获得性高潮的体验中，并没有值得提及的差别。东部女性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仍明显低于西部女性的手淫体验和频率，

这种差别现在已经几乎消失，尤其是在较为年轻的被调查者中（在东部是每月2.4次，西部是每月2.5次）。但东西部男性之间仍存在差别，在30岁的被调查人群中东部为每月4.1次，西部为6.6次。调查数据表明，一种固定关系的建立，尤其也通过婚姻，在东部要早于西部，并且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在东部也明显低于西部。因而也不必感到惊奇，30岁的年轻人在莱比锡有31%已婚，在汉堡则只有16%，并且95%的50～60岁东部妇女生育过孩子，而在西部只有近50%。由未婚女性生育的孩子在东部仍然一如既往多于西部，东部为50%，西部是18%。另外，调查结果还表明，东德时期女性从事一份职业，是社会的基本状态。因而也就不必感到惊奇，新联邦州地区尽管有着较高的失业率，但就业的女性仍然要多于老联邦州地区。比如，今天60岁的汉堡女性有32%，而同年龄的莱比锡女性却只有9%是家庭妇女。在对待裸体的态度上，东部以前要比西部更不拘谨，也更实际；在对性别的看法上，也有着更明显的东西差别。因而不必感到惊奇，在西部比东部有更多的16～17岁的姑娘对这个问题“你是否曾经感受到歧视，只是因为你是个姑娘”，作了肯定的回答。对于“你曾经得到过一些什么好处，只是因为你是个姑娘”，肯定的回答也是西部多于东部（比较Schmidt，1993）。“性别”显然在原先的西德要比在原先的东德有更多的意义，并且是在正反两个方向——在性别歧视和在性别优先方面。

关于东部和西部德国关系状态的情况就这么多。但是除了这些实证研究的内容外，鉴于如今固定性关系的文化繁荣，也提出了与这些实证研究完全不同的一些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性伴侣们怎样在许多年间和许多年后仍然能够得到相互间的性满足？是什么使他们总是相互能激起对方的情欲？这些迫使一个老的性学家思考的问题（Sigusch，2011a），其答案是：一点点小的变态，一种稳定的双方都乐于体验的物化偶像，一种特殊的性场景，是成功保持长年伴侣关系的秘诀。并且那么一点的变态，也应是保留在伴侣双方之间不言而喻的秘密。因为如果伴侣双方都开始思考和谈论这个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就会失去它原先

停留在伴侣双方潜意识中的性化力量。因此，这里涉及的是心灵在潜意识中的一种浓缩，而不是一种经过计算的花招。伴侣间的性幻想必须是不同寻常和略微超越禁忌，否则任何一种不断地老生常谈和例行常规，都只会扼杀各自的情欲。性幻想也必须有那么一些“肮脏”，因为洁癖、责任感和理性无疑就是驱赶任何色情欲望的毒药。除非如果纯洁自身被性化，责任感这类美德常会被双方共同想象为是恶习——如同我们最初反对教会以及侯爵萨德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所做的那一切。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其他类型性恋的伴侣，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两人之间设置一种对双方都有效用、能够激起双方性欲望的所谓变态的性行为机制，借助这一机制，双方的伴侣关系便既不会像一切太正常的性欲性行为经常出现情欲的枯竭，也不会像那些无性的伴侣关系很快就会由于出现仇恨的危险情感而影响甚至是破坏相互关系，因而最好是把仇恨消失在已经受损的心灵的“奥迦斯”，如同变态机制自身的根源必须不言而喻那样。

这种变态的性快感，根本就是一种最强烈的快乐（70章）。因而正常强迫症者也预感到，这种自我谐振的巨大快感，也就是这种既健康又唤起巨大快乐的变态性行为会给自己招致嫉妒和怨恨（71章）。一种怀疑，即一个人对某一种性实践的有意识愤慨越是激烈，就越是说明这种令他难以接受的性实践对这个人无意识中的性渴望极可能有着一种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但是那些谴责性变态者的人（也就是那些正常强迫症者），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变态性行为的谴责，只是在高调地否认并追踪自己真正期望的性变态愿望。他们之所以对变态的性行为如此反感，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很明白，自己也会去体验和做一切那些变态者所做的一切——从性的狂欢直到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自我崩溃，只要他们迄今为止的生活能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他们有意识地把所谓的变态行为整体和系统地妖魔化。但是自弗洛伊德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正是所谓的正常和所谓的变态或性欲倒错一起才构成我们性欲和性行为的统一，因为

所有人与生俱来都带有一种“多取向—性变态者的基因”（Freud），我把这种基因相应地称为“多性恋性取向的能力”（30章），这是一种实施一切变态的“各种部分本能”（Freud）以及性欲望的能力。无论如何，没有其中的一种变态本能，甚至不可能谈论另一种本能。比如，崇拜物化偶像或性暴露的乐趣，就属于正常的爱情生活，就如同正常的爱情生活属于每个人一样。对被调查者关于他们最期待的性幻想的调查询问结果表明，男女被调查者都有意识地提及了一些如今已不再是不可思议，并多少已经得到文化许可的性实践，如：口交、匿名的性关系、女同性恋的性实践、窥阴、肛交、施虐受虐游戏或群体性交等（62章）。如今这些性幻想不再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因为最近几十年来文化规范的界限，并因而也包括介于正常和不寻常的性欲性行为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地被移动和被突破。对于身处1900年左右的性研究者来说，口交仍还是“变态”的。如今这已成为某些人自己特别喜好的一种性交位置。与此相比，更不同寻常也更个人化的，应当是拜物的性行为，应当是能够在一对共同生活了30年的老年夫妻的血管又注射进爱情和性欲烈焰的一种性场景。这是一件并不简单却可以更多样化的事。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持续性双性恋的位置上，现在出现了原始的多性恋（或泛性恋）。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便也意味着随时可以联系上自己的伴侣，并因而也就能加以经常的监督。但是如果有谁出于神经质的焦虑或是控制对方的心理需求，不断地给对方打电话联系，也会解构（或破坏）相互的伴侣关系。因为在每对伴侣关系中都存在着一些无关紧要和重要的秘密。如果没有这些秘密，很多关系甚至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而令人奇怪的是，只是近十年来，企业才想起要以一种精致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方式，为员工保守他们的秘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妻子想与另一个男人见面，她的公司就会给她送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机构的一份邀请书，如果那位想监控自己妻子的丈夫打电话来询问，也会有同事帮助搪塞等。许多实证式性行为研究都得出相同的结果，即有许多女人以及同样多的男人，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有

时甚至只是出于非常无关紧要的理由，比如一个女人在与自己的女朋友见面时，不愿受到丈夫不断来电话的打扰。这类按情况不同而编织的谎言，即这种由完美技术制造出秘密的缺陷在于，它使得个人的亲密关系被企业作为一件事来做。这就不只是必要的谎言，而且也涉及令人不能接受的双重生活，更不要说有犯罪分子会利用这种机会掩盖自己的犯罪活动。

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方法，去保持一种色情和性的关系。在这里可以提及的是不同类型的夫妻或伴侣共同参与的心理（生理）治疗，这类治疗方法在社会中享有很好的名声（请比较比如：Arentewicz und Schmidt，1980/1993；Clement 2006；Hauch，2006；Sigusch，2007a）。这类治疗经常是为了帮助伴侣打破相互间无性趣的那个恶性循环的魔圈，帮助他们摆脱无性生活的不幸。这类伴侣在共同生活中都曾有过一个充满激情和得到性满足的阶段，但过了这个阶段后却又只得忍受没有了情欲和性生活的生活。很明显，如果一对伴侣关系没有我在之前已经提及的一种无意识和不由自主的性场景或一种物化偶像崇拜在相互间作为一种持续情欲和性的连接，其实所有的伴侣关系都会不可避免地在激情过后出现性冷淡的现象。偏偏是那些曾经深爱过的，因为爱情而无论如何都想在一起生活的伴侣，最会陷入双方都不再有性趣的状态，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生活的悲剧。

这似乎是种报复，它表明我们今天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文化和心灵上有些不同于爱情。只有在爱情冲昏头脑的阶段，比如在青少年时期和年轻人通常坠入爱河之时那样，相爱的双方才会有强烈的身体依恋和接触的需求，这时双方都不会去考虑坠入爱河与爱情的差别。其实爱情更多是一种全方位的情感，有着一种深度的信任和无界限的责任。而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则更多由冒险精神、恐惧欲望、吞噬意志和破坏愿望组成。由于一个自己之前根本不认识，以后也不会再看到的人，便将熔岩注射进自己的血管里，并不是一种艺术。人们只是在做那些自己想做的

事，几乎不会有什么羞愧感，不必顾及对方的喜好和怪癖，让自己简单地陷入肮脏的由本能驱动的事件中，享受自己的性高潮，然后就是转身离去。如果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对夫妻或伴侣，没有了这样的激情，那么伴侣关系咨询与治疗，会对他们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这类咨询和治疗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那他们自己就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能够允许对方与另一个人有性的体验——为拯救已有的爱情关系，使它延续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84 银（白）发人的性爱

如果把几代人性关系的演变作为我们观察的重点，就会发现：20世纪初的第一次性革命围绕的是已经成年的人的性欲和性行为，以及他们的生育和他们在婚姻中的性欲与性行为，并也小心翼翼地顾及到了他们的“自由”爱情。60年代末的第二次性革命，围绕的是青少年的性欲和性行为，甚至还边缘性地关及儿童。当时一句仍然留在耳畔的口号是：“不要相信超过30岁的人！”第三次，也就是20世纪末的新性革命，围绕的是虽然经过前两次革命，但在性的领域里仍还留存下来的一些性的禁忌和不公正，也就让人第一次想起，即使是已经满头银发的老人，即我们祖父母辈的人，也是有情有欲有性的生物。关键词：银发人的性爱。尽管在第二次性革命时期，他们父母的性欲和性行为对当时作为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仍然是一种禁忌，但现在似乎所有祖父母辈的人已经都能够和应当享有富足的性生活，似乎痴迷青春的文化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智慧，似乎已经开始枯萎的身体仍然还非常美丽，似乎伴随着年龄的递增，并不必然出现行动受限、疾病和劳损（比较比如Westheimer und Lehu，2008）。在一档德国漂亮老年人秀的节目上，有个79岁的妇女叙述了她正是在这个年纪才刚刚发现了自己的性欲望，并在付诸实践时获得了全部的性高潮。

关于这种所谓的老年人性欲和性行为（这里主要是指异性恋）的话

语讨论之所以能持续到今天，肯定有多种实质性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如今人口的日益老龄化（81章）。自1840年以来，中欧人的平均生存年龄增长了40年。1960年，德国人口的平均生存年龄为略低于70岁，到2008年已经略高于80岁。2010年出生的男孩，他们的生命期望值将是77.3岁，女孩甚至是82.5岁。自60年代末以来出生率持续走低，生命期望值持续递增，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断增大。这就导致出现了所谓的倒金字塔现象：老年人多于年轻人。

另一个原因是打开一个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庞大的（以往莫名其妙被低估的）当地市场。只是我们的文化甚至还没有展开思考，生活在21世纪的老年人怎样去过他们的生活，他们（与年轻人有着明显差别地）能够做些什么，享受些什么，为自我设计些什么？我们的社会仍缺乏针对老年人设置的机构、行为和整合模式，更不要说懂得赏识高龄老年人独特性的价值观。过了50岁的只是较为年老的人，在职场却已经被看做是到了报废的年龄，似乎他们已不再是如今常被人称作的“年轻的老人”，而是“白发苍苍的老人”（Greise），但正是这个词，曾被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特别认可和赞赏地使用过。除此之外，（年老和年轻的）各生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互不相干地过着各自的生活。这种状况，仅仅是由于年轻人的失业率、老年人的护理需要以及各代人之间必要的资源平衡，也必须加以改善。应当尝试一种各代人相互走近和共同生活的新形式。我们的集体意识应当（重新）发现和维护老年人的优势。没有他们，我们的未来看上去就不那么美好。可能多少有些被忽略，但是一个老年人的世纪显然已经开始。

打开一个专为老年人服务的市场，当然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真诚些。即使是现在，医药行业也已经借用医学的帮助喧闹在这个新市场中。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比较Sigusch，2007a：185 ff）：老年男人的部分雄激素缺乏症（简称PADAM），也就是说老年男人所抱怨的痛苦和障碍，如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抑郁、睡眠障碍、勃起功能障碍

等，都可以归结为雄激素缺乏，虽然这类现象通常也受到其他老化过程的影响，比如受日益加重的慢性疾病或家庭、婚姻和职业出现剧变的影响。在错误地将这类现象与女性更年期的绝经平行起来的情况下，老年男人的雄激素缺乏也被高调地说成是雄激素分泌的停止，男人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更年期。但是把男性雄激素的缺乏对等于女性的绝经，是无法成立的。比如女性会在很短的时期内突然出现停经，而成年男性雄激素分泌的缺乏则是一个很缓慢的渐进过程，总睾酮和游离睾酮水平的下降甚至会持续几十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结合性激素的球蛋白（SHBG）反而会升高。这类过程通常有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因而它的平均值并不代表某个特定人的具体情况。请大家注意：男性睾酮浓度的高峰出现在男性生命的早期，在第4到第5个月的胎儿期，在出生时和在青春发育的高峰期。

“老年男人”和“老龄化管理”，现在已成为严肃医学的研究领域，有专注于这个领域的专业医学杂志，是专业医学团体和专业医院的主要研究课题。这一社会结构的主动力，如已提及的，是药品制造业；它早就意识到，与女性用荷尔蒙治疗事实或老年症状相比，老年男人所用的性荷尔蒙比女性少了近200倍，这其中隐藏着怎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男人们都用药品来治疗自己的老年症状，将会构成多大的销售量！在总数为1600万的50岁以上的德国妇女中，目前大约有1/7的人正在接受女性激素的治疗。相比之下，德国男人远远落后于这个趋势。但按新闻报道，美国近年来的雄激素补充剂的销量已大约每年递增30%。与此同时，药品制造业也试图依靠自己的专家用漂亮的话语（比如“有很好的经验”，“在实践中得以证明”等）来粉饰严重的研究不足或缺陷（比如雄激素治疗对心脏和血液循环产生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有监控的双盲研究（也称为随机对照试验），却得不到其应有的资助。至今仍不十分明确，究竟是哪种雌激素或哪种雄激素会导致女性停经和男性性激素缺乏，只说是选择性雄激素受体激动剂，它只对它应当起作用的器官才有效用。当前主要是“去氢表雄

酮”（Dehydroepiandrosteron）进入到关于雄激素缺乏的话语讨论的中心，一种“肾上腺雄激素”，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还会更多更经常地听到它，尤其是它在美国已突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药物。可笑的是，那些顶尖研究人员是怎样诊断男人老年综合征的（老年男人的雄激素缺乏症）。他们总是在可以用肯定或否定回答的筛选问卷中，提出一些最通常的如“你感觉缺乏精力吗？”，或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生活乐趣的减少？”，或是“你的勃起不太坚硬吗？”等问题。

自然，当前围绕男人性激素的炒作并不是件新鲜事。毕竟我们自多少代以来都生活在一个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社会里。父权或男权者发现了激素，又无限夸张地把它与性领域联系起来，不免令人回想起他们的研究前辈。生活在19世纪末的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加尔（Charles Edouard Brown-Séquard），72岁时为自己注射了一种动物睾丸的提取物；而生活在20世纪前1/3年代的欧根·施泰纳赫（Eugen Steinach），激发了一种输精管结扎术的热潮。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无法摆脱这样一种使自己年轻化的虹吸旋涡，他也让自己进行了施泰纳赫式的年轻化手术。如果输精管被切断，珍贵的精液就会留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里——这就是当时的男人的幻想。那个时代的英雄们不愿接受自己的身体会出现一种与年龄相关的限制，随着血管和神经的老化，自己的勃起不再像青春期时那样的坚硬。如今的生物技术专家正忙着寻找在总体上能够延缓甚至是逆转男人老化过程的方法和途径（比较de Grey und Rae，2010）。

现在回到老年人性欲性行为的当今意义这个问题上，不仅是金赛和他的工作人员，而且法国、英国和美国近年来一些大型的全国性调查，都很少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Spira und Bajos，1993；Johnson et al.，1994；Laumann et al.；1994）。只有不超过59岁的“年轻”老人，才进入他们的研究数据中。在本书83章中提及的施密特关于德国伴侣关系的研究（2006），虽然也包括已60岁被调查者的数据，只是这个年龄在今天

已不属于真正的老年人。那么如今比较有把握地可以对此说些什么呢？我认为，鉴于并不充分的研究数据，我们只能说：既不存在老年人特有的性欲和性行为，也不存在年轻人特有的性欲和性行为。但是在男女两性中都有较大的一部分人，他们在70岁或70岁以上，仍过着有性的生活。一切都可能发生：性活动的减少，或是增多，或是毫无变化；性生活满意度的递增或递减；采用新的性实践，如同性恋；完全放弃任何性生活，等等。

对于老年人的性生活过程来说，其文化、社会和心理的状况（88章），代际属性，伴侣关系的存在、形式和持续，一些外在的生活状况，如收入、住房条件以及个人性能力的状况，都比其实际年龄的自身更重要得多（请比较比如：Kontula und Haavio-Manila，1993；Bucher，2002；Schmidt et al.，2004，2006；Lindau et al.，2007；von Sydow，2008；Brähler und Berberich，2009）。这就意味着：谁是在性革命时代长大的，那么他（她）就会认为性是有趣和健康的，就自然会在心理上对性有一种较高的价值认可，总是会不断进入一种新关系，并且如果这人是个男人的话，也就最可能从统计学上证明他会最大限度地从事自己的性活动。

如果询问被调查者的性活动、伴侣年龄以及关系持续等的综合状况，按西欧国家最近一些调查给出的数据，与伴侣的年龄相比，关系的持续会对性交频率产生更强的影响。在所有的年龄组中，性交的频率都会随着关系的持续而降低。与此相比，年龄对性交频率显然只有一种较低的影响。因此，老年伴侣在一种新关系中，甚至比年轻伴侣在一种老的关系中，常常有着更活跃的性活动；比如70岁的老年人在一种只建立了几个月的关系中，与40岁的年轻人在一种已经持续了15年的关系中相比，70岁人的性活动将会更活跃些。当然其中的决定因素是，是否有一个还对性感兴趣的伴侣。鉴于当前女性的生命期望值比男性高7年，在高龄人群中，男性便明显少于女性。在70～79岁的人群中，女性与男性

的比例为3：2；在80～89岁的人群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3：1.5。据统计，2007年在80岁或以上的男性中大约有60%是已婚的，而在同年龄段的女性中已婚的只占16.5%。但自一些年来，高龄老年妇女的已婚比例在不断递增，因为今天的男人也能活得更年老些了。

如果说，人们以前曾普遍认为，老年人的性活动是不正派的，有失体面和危害健康的，那么如今的社会舆论已经越来越走向以前的反面，认为性生活很酷也很健康。当然有不少人仍然认为老年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是可笑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实质上则有其文化的逻辑性，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痴迷和崇拜青春的文化中，这种文化总是在有关话语审美的地方，不断向公众展现一些年轻、过于纤细的身体，并且还存在着苏珊·桑塔格（1972）曾说过的实为歧视妇女的双重老年标准。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文化中，男孩和头发略微花白的绅士都是漂亮的男人，而女人则相反，只有年轻女人才是漂亮的女人。与此相应的是同样不公正的文化规范，即在一种关系中，女人总是要比男人年轻些。女人有一个明显年轻于她的男性伴侣仍然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白发苍苍的老年男人却依然能不费多少周折地找到一个几乎可以成为自己女儿（且不说甚至可以成为重孙女）的女性伴侣。只是自世纪更换以来，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那些在英语俚语里通常被称为“美洲狮”的女性，按已有的统计数据（Penn，2007），她们寻找的是至少比自己年轻10岁的伴侣，并且这类女性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增。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性的欲望和性的反应，都不会由于人的老化过程而终结。既不会在男人身上也不会在女人身上出现一个类似性休眠或停止的阶段。这也特指所谓的性激素以及我们今天大约在50岁左右（加减4岁）出现的女性绝经，绝经其实只是意味着自然生育能力的终结。这与不少男人在50岁左右伴随着生存性更年期出现的心理问题——专家们把这类心理问题称为“利古里亚—冲击”（Ligurinus-Schock），是不可类比的，虽然这类心理问题会暂时性地摧毁一个男人的性心态或情

绪。

但是不存在生理性的性停止或休眠状态，并不意味着，老年人的身体对性的反应会如同他在年轻时代那样那么快速和可靠地运行。事实是相反的。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润滑阴道的分泌物会随之减少，性交会由于阴道缺少其生理性的湿润而变得疼痛；在男性则会出现阴茎勃起变得罕见、缓慢和孱弱的状况，射出的精液量也会出现递减——这里只提及了一些最明显的生理变化。由于阴茎的勃起具有一种戏剧意义的可见性，因而绝大多数的男人都认为这对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和具有男人的性能力具有一种高度的意义；由于一种稳定的勃起对于进入阴道或身体的其他入口处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绝大多数老年男性直至今天仍固执于此的性实践），因而与老年妇女的性生理反应相比，老年男人身体的性反应必须表述为是“更脆弱”。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年男人比老年妇女会更早结束性生活。他们会比女性更经常地寻求医生的帮助，以便重新修复自己的性能力，并且通常也会按“性交或完全放弃”的原则，完全停止伴侣间的性生活，如果不再可能进入阴道或似乎是不再可能的时候——这个例子证明了，我们的文化缺乏一种情欲色情的艺术，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也证明了我们的性生活是怎样地不够发达，许多伴侣甚至都不知道，配偶的生殖器有着怎样的模样，怎样才能进行运转，也不能向对方说出自己真实的欲望或是自己会讨厌什么，等等，等等。

更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知道，情欲色情、性欲性行为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和心灵的年轻，并且情欲色情和性的亲近、安全可依靠和幸福的感觉比直截了当的性行动，如自慰和性交，更能使我们充满生命的活力。不少老人，尤其是单身老人，虽然在狭隘的意义上已经结束了性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结束自己的情欲生活。关于老年人在总体上可以这么说：性走远了，情欲却留下了。在老年男女中，情欲的想象和梦的意义都超过了外部化的性行为，尤其是妇女，有数据表明，一般来说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早地退出性生活。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医生的性科学教育和继续教育，以帮助他们认知老年人的性问题和障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许多疾病都是伴随着性障碍而出现的，外科手术和尤其是那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经常更持续服用的药品也有着所谓的无性趣和身体性反应失灵的副作用。其实许多这类性障碍能够通过一种温和的外科手术或一个以渊博医学知识为基础的药物处方得以避免，但这类形式的性医学依然十分稀缺；自几十年来，我都在徒劳地试图建立这么一种医学（Sigusch，1972，1975，1979a，1980a，2005d，2007a，2007b）。

85 付诸生活的性欲和性行为有利于健康增益

“疾病增益”（Krankheitsgewinn）是来自心理分析疾病理论一个很有意义的专业术语。它特指一个病人直接或间接地从他的疾病中所得到的满足。这可以是他终于得到亲属的关心或是通过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出现了更多的平和心态。如果一个人从他的疾病中居然能够得到一种好处，那么从健康中自然也能够获得益处。在思考关于心脏病患者的性活动会导致出现生命危险这个问题时，我总是会从心理分析的“疾病增益”这个术语，联想到“健康增益”（Gesundheitsgewinn）这个词。并且在事实上我也确信，一种满意的性活动给心灵和社会以及身体所带来的增益，往往多于其潜在的风险。在通常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和患者往往高估了与性活动相关的体力消耗，而低估了其带来的健康增益。

当然可以非常理解心脏病患者和他们医生的极度担忧，因为性活动会导致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耗氧量的上升或增加，因为它可以导致心律失常和血液流通不畅。但这类现象的增幅是因人而异的。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极为平常的体力消耗，也会导致出现心律失常并掩盖了血液流通不畅，性活动几乎只是相等于通常活动的体力消耗，而从来没有人会禁止病人去从事一些日常活动和为此所承担的体力。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正是重新修复一种性关系，才更有助于病人的康复。但这种重新

修复的性关系，必须是一种在事实上充满信任和几乎没有冲突的关系，而不是那个病人必须在现有的固定关系之外再去建立的一种新的性关系，更不是（以变态的方式建立的）一种奇怪的关系。这类新关系所激起的兴奋，肯定极具风险。

几十年来的研究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在性交时死亡的案例，并不是死在家里和信任的伴侣的怀抱里，而是发生在出轨的情人那里，在妓院或是在试验原本并不熟悉的性实践时。但总体而言，性交时的死亡，只是一种极端现象。然而以往的研究只对男性是否会因为性活动的体力消耗造成伤害感兴趣，而不是去研究恰恰经常因此受到伤害的女性。

在新近的专业文献中，MET被采纳为客观测量体力消耗的标准单位，它是表示代谢当量或代谢计算单位的一种缩写。一个MET相应于人在静止状态的3.5毫升氧气/体重（公斤）/时间（分钟）。刷墙和粘贴墙纸，打高尔夫球，提或扛9～20公斤的物件，或是走楼梯（1分钟内走2层楼）都会使身体消耗4～5个MET。较重的家务劳动（如扫地、铺床），在院子里挖坑或是20分钟平缓地走1.6公里路，消耗的体力是3～6MET。与此相比，自慰或与一个多年伴侣获得性高潮的性交，只消耗约2MET。与一个固定伴侣并达到性高潮的一次“激烈”性交，将消耗5～6个标准单位。相反，在一次“正常的”性交中消耗的2～4个MET，对身体的负重只相当于轻微的家务劳动，如清扫房间和熨烫衣服。在实验室里对夫妻性活动时的心速、血压和耗氧数据的测量，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性活动对身体的负担有着怎样个人化的差异。比如一个男人“在上方”并获得性高潮的性交，只需要2个MET；而另一个男人却需要5.4个MET。此外，通过实验也确认了，从耗氧的角度来看，男人在上方的性交位置要比女人在上方的位置对身体造成的负担更重些；而且男女共同参与的性活动要比非性交的性刺激消耗更多的体力。其他还应思考的是，性高潮时出现的心速和血压的剧增，与日常生活活动相比，只持续一个很短的时刻，比如也无非是只持续了10～16秒钟。

最后，很令人感兴趣的是，每星期至少三次消耗6或更多MET的男人，在性交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然较低。对于已经发生过心肌梗死或冠状动脉的心脏病患者来说，如果承受5～6MET的消耗而不出现心律失常或胸部疼痛，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些病人是在一种熟悉的性关系中从事的性活动，因而对心脏的风险极其微小，但从中获得的健康增益却是巨大的。通过性生活所获得的健康增益，无论如何要大于有着相同消耗量的家务、园艺劳动或登楼梯，因此可以这么说：最好还是与一个心爱的伴侣合为一体（比较Sigusch，2007a：215f）。

86 对性医学术语的批判

可以从一个人使用的词语和术语中，推断出他对此事是怎样感受的，他对这一问题有着怎样的看法，他是借助哪些思想体系来思考的。比如光是“阴唇”这个词，是说成“害羞之唇”（Schamlippen），是说成“阴唇”（Labien），还是说成“维纳斯之唇”（Venuslippen），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每个表述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或意向，只是这些历史或意向都深藏在它们自身的血肉之中，我们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辨认出它们。

我们关于爱和乐趣的语言，不是来自童年时代，就是出自堕落的泥坑——因为西方社会并没有构建出一种当之无愧享用情欲色情艺术的性文化。即使是那些来自医学词典的术语，也不会令人感到多大的高兴。比如直到几年前仍然通行的做法是把性体验和性功能障碍用一个全球通行的术语“阳痿”（Impotenz）来表述，以致我们从较老的外科手术研究报告中，无法解读那个外科医生在病人的下腹部进行了某个特定的手术干预后观察到因手术而造成的阳痿，是一种勃起障碍还是射精障碍，是一种性高潮障碍还是精液返流进入膀胱。今天我们终于知道，在这种手术干预后最常出现的术后性功能失调，不是勃起障碍，而是射精障碍。

顺便说一下“性功能失调”（sexuelle Dysfunktion）。这个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今天的医学文献中等同于以往较老的表述“性功能障碍”，并且往往成为今天专业文献的首选。我自己在几十年前就曾出于务实的理由，提议把一种主要因器官障碍造成的功能性障碍称为“性功能失调”，把主要因心理和社会原因出现的性障碍，称为“功能性性障碍”。而“性功能障碍”则不加细分地包括了这两者。如果以简称的方式来使用这两个术语，那就会更加清晰，功能性障碍与性功能障碍，它们各自究竟意味着什么。即使今天，我仍在需要强调器官性因素时，使用“功能性失调”这个术语，但当心理是第一主要的原因时，则使用“性功能障碍”这个术语。特别为当今的医生所喜爱使用的术语是“勃起功能障碍”（erektile Dysfunktion）。它如今点缀着许多文章和书籍，尽管它在语义上是一个怪物。那些使用这个术语的人，实际上是想说，患者的阴茎不够坚硬——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是这一表述毫无意义，因为它只表述了：勃起的功能故障。

如果病人全方位的性体验和性反应的损伤都不是由于局部性的功能障碍，那么自然可以说是一种“阳痿”了，我们偶尔也是这么做的。但这里应当考虑到的是，许多人把这个表述体验为贬义。在老的和当代部分新的文学中，都把性欲障碍（无力实施的欲望“Impotentia concupicentiae”）、勃起障碍（无力勃起“Impotentia erectionis”）、射精障碍（无法射精“Impotentia ejaculationis”）和满意障碍（无法获得满意或情感的无能“Impotentia satisfactionis oder Impotentia emotionalis”）等主要症状，作为特殊的无能来描述。鉴于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医生们习惯于拉丁化的爱好，建议可以把性欲唤起障碍称为“无力唤起性欲”（Impotentia excitationis），润滑肿胀障碍称为“不能润滑”（Lubrikations-Schwell-Störung）。但疼痛障碍大概应被称为“困惑感知”（Turbatio sensationis）。

我们根本不用“性冷淡”和“情感冷淡”这类的表述，因为这样的表述

不仅是含糊的，而且也带有不容忽视或不可消除的歧视性。性冷淡这个表述以前主要用来假定所有的良家妇女，情感冷漠，没有能力“富有激情地投身于性生活”。这个术语在今天，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应该已是极不合时宜和完全落伍了。谁还在使用这个术语，谁就会给自己招致性别歧视的嫌疑，并且也忽略了以往社会压抑女性情欲的历史。在传统心理分析学、性科学和妇产科学中，几乎没有一个专业术语像“性冷淡”这个表述那样浓缩了整个压抑女性情欲的历史。

“性本能冲动障碍”（Libidostörung）主要被人体医学者用来作为欲望或性欲障碍的代名词（或同义词）。鉴于两个理由，我认为这一表述是错误的。首先，“力比多”这个术语在性理论中，表示的是一些完全抽象的、元心理学的内容。它没有一个可把握的有形基础或根底。其次，它错误地暗示了，似乎存在着一种类似内源性的性冲动障碍，它的荒唐还在于，如同一些“专家”所做的尝试，企图在女性中确定一种性欲商值。

“性趣缺乏”（Lustlosigkeit）是20世纪末被性医生启用的一个术语，自那以后，它作为对女性“性趣缺乏”的诊断，主要渐渐被用来取代以前对女性情欲和性兴奋障碍或是性高潮障碍的诊断。如果批判地使用这个术语，它应当表述的是反驳男性与女性间所谓的性反应周期的平行性，并关注性别间的这种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沉淀为对女性“无性趣”的指责，即要是一个妇女有着不同于其伴侣的其他需求，或是与他相比较少愿意性交，便不免会被认为“无性趣”。“性趣缺乏”这一表述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表达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已经现实存在的现象和事实，即在性生活中的一些其他形式的愿望，因而无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一种表示性趣的方式，以及女性与男性不同的对色情和性关系的一种想象。

许多人都无疑会认为“变态”是一个歧视性的表述。公众领域里的谈

话，也确实只用它来表示令人憎恶的事或人。另一方面，它通过对处于社会心理状态的人的情感几乎刻板的表述，反映了一部分受非寻常强制和瘾欲制约的性生活（72章）。但临床涉及的并不是一种偏差意义的社会学定义上的偏离，也不涉及所谓无关紧要的短期倒错。在临床涉及的障碍会败坏病人的生活兴致，甚至使他无法生活。病情诊断也是如此。曾经的“变态”者们自然抱着随意态度看待变态这个词，他们与曾经的同性恋对待辱骂他们的（Schwul）这个词的态度一样（66章），甚至还把它转义为勇于斗争的骄傲。

87 对心理分析学的性高潮理论的批判

在对性变态妖魔化的举例中（71章），我已经指出了心理分析学性理论的偏差。另一个在许多年前曾经让我感到特别愤慨的例子（比较Sigusch，1970a），也应当在这里加以讨论。当时，还在女权主义者最初反驳“阴道性高潮神话”之前，我与心理分析关于阴道性高潮“成熟于”阴蒂性高潮这一假定，进行了一场理论争辩。我的结论仍然适用于今天：这一假定，仅仅从生理学上来说，已经是无意义的废话。

弗洛伊德的著名观点（1905：121 f；1916/1917：328；1933：126）是：处在前发育阶段女孩的“主要性感受区域”在其“阴蒂部分，它等同于男性生殖器的龟头”。因此“在女孩童年时代的阴蒂有着一种完全能够对应于阴茎的效用”；它“是一种特殊兴奋的载体，是一个自动获得性快感的区域”。然后在青春发育期就会出现一个性欲和性感受从阴蒂移位的过程，也就是“性感受的兴奋区从阴蒂开始转向阴道口”，“更换了她以后性活动的区域，也抑制了她曾有过的那么一段男性式的性生活”。这种位移“往往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而“处在这一过程中的年轻女子这时便会出现一种似乎处于麻醉的状态”。“如果阴蒂拒绝放弃它在儿童年代通过大量的活动已经准备和完善了的性兴奋感受，那么这种麻醉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

弗洛伊德的这一假定，被许多心理分析家和一些非心理分析家多少有些修改地接受，其中也包括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菲尼希尔（Fenichel）、费伦茨、肯普夫、埃尔肯（Elkan）、萨皮尔斯坦因（Sapirstein）、谢弗（Shaffer）、埃里克森（Erikson）、格里纳克（Greenacre）、维特尔斯（Witteles）、克雷尔（Kehrer）以及格林希尔（Greenhill）等（所有注释，也包括后面将要出现的叙述都可参见Sigusch，1970a）。弗洛伊德这一假定还有一些特别正统的接受者，如希齐曼（Hitschmann）和贝格勒（Bergler）、艾斯勒（Eissler）、伦德伯格（Lundberg）和法纳姆（Farnham）、比肖夫斯基（Bychowski）、爱森斯坦（Eisenstein）以及罗宾逊（Robinson）。弗洛伊德这一转换假说的追随者们确信，女性能够体验和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性高潮模式：一种是阴蒂性高潮，一种是阴道性高潮——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表述过。弗洛伊德这一假说的正统捍卫者认为，只有通过阴道性交出现的性高潮，才能使人获得充分和完全的满足；只有这种性高潮才标志着女性的成熟，才是女性化的特征，因而有利于一种正常的性心理发展。与此相应，他们也就认为，虽然阴蒂性高潮也能提供肤浅的性满足，却是不成熟和男性化的标志，会带出一种有性心理障碍的发展。这种涉及的是比如婴儿角色的凝固化和对女性角色的拒绝，以及病态的男性角色认同或人格发展障碍和神经病症的形成。那些不愿成功转换和达到“成熟的阴道”性高潮的女性，非常可能出现神经质、性冷淡和同性恋的倾向，或甚至已经是那样了。

有趣的是，尤其是一些女心理分析家们，并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关于在青春期性感受区域从阴蒂转移到阴道的这一假说，她们中比如有比尔莱（Bierley）、霍妮、马尔默（Marmor）、贝内德克（Benedek Rado）和拉多（Rado）。这些女科学家确信，即使过了青春期，阴蒂仍然能激起性兴奋；对阴蒂的刺激，甚至是进入阴道性交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一个女人压抑她的阴蒂感受，来提升她的阴道性反应，甚至可能损害她的健康。此外，关于只有成年女性才能通过阴道刺

激获得性反应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许多女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有了性的快感，如果其阴道受到刺激的话。因此没有道理把阴道性兴奋作为性心理正常发展和成熟的唯一标准。

把性心理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某个性器官的“命运”，认为性器官的命运与解剖意义上的“破处”相关，而生理的破处将会带来对性心理“童贞”的克服，这么个假说，无疑是非常冒险的。今天已具备这个可能性，用实验性性生理调查数据的结果，来检验这两种不同的性高潮模式（请主要比较Mastersund Johnson，1966/1967）。这就让人想起，弗洛伊德曾经抱怨过的生理或根本就是生物学的数据。弗洛伊德对阴蒂性潜力的完全拒绝，在今天无非是向我们证明了，他是怎样靠近当时主导的生殖意识形态，是怎样根本从男人的模式出发，是怎样把女性的性欲性行为完全置于男性的阴影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归纳为：由于女孩童年时代的阴蒂与男人的阴茎有着一种等同性，因而必须从青春期开始，就对其会形成与男性性生活相同欲望和行为的阴蒂，加以抑制（Freud，1905：122；1933：126）。显然，女人必须把自己理解为是一个残缺的男人，如果她“阳刚”、“阳具”式器官存在的权利遭遇到否认的话。因此，“作为”生殖执行器的阴道被授予了感受性高潮的权利：它并不相应于男人的阴茎，形态内敛，又具有接受功能；它是女性特有：作为交配器官，它很少与婴儿的性欲、手淫、非性交的活动相关；作为精液接受器，它与接受精子的性腺相连；并且也作为婴儿出生时的出口管道。经过这些分析以后，就不会再感到惊奇，如果人们把阴道看成是一个感受“性高潮”的器官，如果人们把与生殖无关的阴蒂贬低为像在人类胚胎发育阶段形成的“扁桃体那样无用的性器官”，并且把一种象征着“女性的阴道性高潮”作为象征着“男性化的阴蒂性高潮”的对立面。

尤其从性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性高潮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这一假设，必须作为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加以拒绝。因为性高潮在生理学上只能作为整个人体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来理解。并不能对性高潮进

行解剖学意义上或生理学意义上的“分解”。不管是阴道还是人体的任何某一个器官，都不可能脱离人体的其他部位做出独立反应。不存在一种被称为“阴蒂”、“阴道”或身体某个其他器官的性高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人体的许多和完全不同的器官都会对同一种性刺激做出反应。甚至极可能人体的所有器官都参与了对此刺激的反应。这一考虑也适用于有关刺激实践或身体刺激区域等问题：根据这些标准，无法对身体各部位的高潮加以相互区分，因为在原则上各个部位都会对同一个刺激做出相同的生理反应。如果人们一定要用一些标准来对高潮加以区分，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把高潮区分为“口腔的”、“乳房的”、“肛门的”或甚至是“耳朵的”性高潮。麦斯特和约翰逊（1966：66）曾对是否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性高潮这个问题，做了很简要的回答：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个明确的“No”。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以及金赛（Kinsey et al.，1953）也都曾给出了相似的回答。

现在，那些弗洛伊德假设的追随者可以指责说，你们否定了假设，但没有阐释清楚主体在感受和体验中的区别。但是系统实验研究的结果，并没有证明弗洛伊德这一假设的正确性（比如Kinsey et al.，1953；Masters und Johnson，1966）。从实验结果中无法推断出主体感受性高潮时的一种均匀性。人们在感受性高潮时有着怎样的变量，我们已经在前文中提及。但通过这个变量并不能就此推断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高潮模式，即一种有着最强烈感受的阴道性高潮和另一种与此有着不同感受的阴蒂性高潮，因而也不应当允许说一种有着“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征，另一种则有着“不成熟”和“男性化”的特征。这种说法无疑又是对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心理现象的分解。区别只在于这次是借助了刺激地点、刺激实践或者说一种身体反应的区域性作为单一的标准。如果说成是或多或少强烈的和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性高潮，那也已经很充分了。因为毕竟它并不依赖于主观的性感区域定位，也不需要与身体反应最强烈的区域有一致性。

这里需要提出一些神经学的证据。研究表明：阴蒂、小阴唇（Labiaminora）和阴道前庭（Vestibulumvaginae）有着比阴道更多更敏感的神经末梢，并且实验也表明，许多妇女的阴道中根本不生长有这些敏感的神经受体（比较Sigusch，1970a：31，Fn. 24；也请参见Bancroft，2009）。对近900名妇女的感官生理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的妇女没有对一种阴蒂（2%）、小阴唇（2%～5%）和阴道前庭（2%～8%）的触感有所反应，但是89%的妇女对一种阴道刺激没有做出与此相应的反应（Kinsey et al.，1953）。这也使人联想到，妇科的阴道小手术往往无须麻醉就能施行，而对疼痛极为敏感的阴蒂则无法免去麻醉这一程序。鉴于这些研究成果，实际已经可以把感受性高潮从阴蒂转移到阴道的这一移位说，评判为不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可能性（同上：584）。

按当前已发表的一些研究，成年女性的自慰行为也在事实上反对这一“移位说”：几乎所有的性刺激，经常也是间接的刺激，都来自阴蒂。最后还要提及的是，许多妇女通过手淫比通过性交能够更快地获得性高潮，并且通过手淫诱发的性高潮通常也被描述为更强烈些。鉴于这样的研究结果，许多研究论文的作者都特意指出了相对于阴道刺激，阴蒂刺激有着更大的实际效应。此外，许多女性也自诉，“从深插入阴道的性交中所获得的满意度有着一种不同于单纯刺激阴蒂、小阴唇所获得的感受”（同上：581）。这一结果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释。因为在阴茎完全插入阴道的同时，也会充分感受到与伴侣的“合为一体”。此外，性交也使得双方的身体有了一种“全方位”的接触，这也能构成特殊的刺激。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阴蒂在每次性交时的间接刺激，更不能排除它性感受的敏感。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小阴唇、阴道前庭和会阴部（Perineum）的刺激。与这些刺激点相反，按金赛1953年的研究，只有14%的妇女才会通过阴道触感的刺激产生这样的刺激效用。只是阴道也可能有着重要的扩张和压力刺激效应。

可以这么说，如果将“激发”性高潮只是简单地固定在一个身体器官

或一种实施方法上，无疑是错误的。毕竟妇女也可以通过对外阴的一种刺激，（在手术去掉阴蒂后）通过想象，或是通过一种人工阴道获得性高潮。也就是说，要想获得一种有效的性刺激和性反应，阴蒂和阴道都不是必要的条件。尽管如此，阴蒂与其他的外因区域一起，鉴于其性兴奋的效用，对成年妇女来说通常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而阴道只是由于它通常会产生一种心理快感反应，也由于它与阴蒂同时形成的刺激，才有了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我们既不想过高地估计阴蒂的意义，也不想过低地估计阴道的意义。但确实还没有一种科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证明，非常敏感和容易激起强烈性兴奋，并专为性快感服务的阴蒂，能够将其性兴奋的效用完全或部分地转移到敏感度较低，更多是为广义生殖服务的阴道。

总而言之，“移位”假说，会给无数妇女带来忧虑，会导致她们因此认为自己是非女性的、不成熟的、性欠缺的、性冷淡的和性无能的，或甚至是神经病患者。金赛的研究（同上：584）告诉我们，数百名参与实验的妇女和参与实验的医生的数千名患者，都因为尽管通过治疗并没能成功地使自己对性高潮的感受从“阴蒂”转移到“阴道”，而“深感不安”。甚至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天真地认为没有阴蒂就能从阴道感受性高潮而割去阴蒂。至少这类灾难性的错觉在今天已没人相信了。

88 关于性障碍的短时性

医生或心理治疗的专业工作意味着：反思自己个人和专业的局限性，认真地把病人的个人痛苦作为个性化的痛苦来看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能充分理解病人特定病情的问题和冲突。这些问题和冲突是由它们形成于其中的文化所概括和定义的。由于我们的文化把某些特定的感受和行为方式，解释为是性欲和性行为，并把其置于特别的观察之中，所谓的性障碍之说，必然完全受决定话语和规定道德绝对命令的时代精神的影响。因此，对“性障碍”所做出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

于，这是谁与谁、在哪个国家、是哪个种族、在什么时代和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进行了交往。我们的文化是怎样回答有关性障碍问题的，最清楚地表现在科学史的发展中。

在拉勒曼德（Lallemand）的时代（1836～1842），医生们曾抱怨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不需任何性刺激的迹象，就很轻易地让自己的精子往外流出。在克拉夫特-埃宾的时代（1886），通常把儿童或较为年老的男人表现出的性本能冲动，说成是荒谬的，是“由大脑造成的神经病症”。在弗洛伊德时代（1905），把自动的口交看成是“变态”，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也持这样的看法。比如批判和自由主义的性学家奥伊伦堡（1906：190），曾经就非常严肃地担忧一个男人如果与女人进行口交（Fellation und Irrumation），会因为这种异常“过度享受炫耀自己爱的艺术”而导致阳痿，患上神经衰弱或是患上一种“性强迫症”。稍后的那些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如我们在87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认为一切不能获得“真正”、“阴道”、“成熟”性高潮的女人，都是性冷淡者。有些人甚至不会反对割去这类性冷淡女人的阴蒂（也请参见34章）。

在我们的时代（有关我们时代的综合背景，请比较：Brandenburg und Fliegel，2001；Kockkott und Fahner，2004；Strau，2004；Hauch，2005，2006；Sigusch，2007a），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性专科门诊抱怨性高潮障碍，以及在此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年轻男人的射精障碍，即无法射精。这些障碍或病症都不能从器官和机体中找出其病源。与此同时，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兽交（即被看成是与临床相关需要治疗的与动物的性交）却消失了。今天主要是把“无性趣”（尤其是女性，但这期间男人也渐渐如此）和一切与施虐受虐以及与性淫（Kinky Sex）相关的事，也就是与捆绑和严惩（Bondage & Discipline）、霸道和顺从（Dominance & Submission）、施虐和受虐（Sadism & Masochism）相关的性行为，从医学和心理学上排除出需要治疗的病症，致使这些性行为日益充满自信地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之中

（比较Hill，Briken und Berner，2008）。此外，出于直接的经济原因，在今天也已不再构成疾病的结构形态。

当事情变得很清楚，用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地那非（伟哥）治疗男人的勃起功能障碍，每年都能挣得几十亿美元业务的时候，药品制造业依靠它们的那一帮受人尊敬的科学研究者也发现了治疗女性性欲性行为障碍的商机，并寄希望于此。自那以后便开始尝试，从盈利的角度出发，把女性的性功能障碍（FSD）说成是一种与男人的“勃起障碍”同样有害的病症——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完全是虚假的，却通过对一些生物制品的改义，通过对支配充足研究资金的科学研究者的洗脑，以及通过持续投资于宣传这一说法的广告，使得这些虚假说法成为现实，得以普遍流行。把一切其实比较健康并无论如何是对伴侣的一种恰当反应，并根本就是社会关系问题的情欲和性的不适感，都说成是一种FSD，以便形成一个治疗女性性障碍药物需求的庞大市场，药物制造业的这种手腕当然也颇受激烈的指责和批判（比较比如：Basson et al.，2000；Tiefer，2000；Moynihan，2003；Working Group，2003；Matthiesen und Hauch，2004；West et al.，2004；Basson，2005；Hauch，2005）。药物制造业的这些行径，不免让人回想起甚至在不太久远前常说的“经前期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简称：PMS）以及“经前焦虑障碍”（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简称：PMS），还曾被说成是疾病的征象（Chrisler und Caplan 2002）——这是一种天衣无缝适合父（男）权社会的结果：一个女人，不管她仍有月经还是已经绝经，总是非理性的、病态的或是性无能的；即使男人在老年时也会出现“老年男人的雄激素部分缺乏”（PADAM）、“老年男性综合征”和“老年男人雄激素缺乏”（ADAM）等症状（比较84章，以及Sigusch，2007a）。具体地说：药品制造业期望在富裕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递增的西方社会，以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极高的营销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此期间已有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把新睾酮凝胶营销批评为仅是“抗中年危机的生活方式药物”，却仍无济于事。

关于究竟怎样才算是一种障碍的回答，通常都会愚蠢地引用国际通用的疾病诊断与登记手册，尽管所谓的障碍以及关于它们的经验和诠释，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都有着最不同的差异。比如“少佐”（Koro）病症，即有人“确信自己的阴茎正在不断萎缩”，就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综合征，它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在心理和性学这个领域目前存在着两种平行国际分类基调，它们也部分地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精神心理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er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DSM）和“国际卫生组织的精神心理障碍国际分类”（Internationale Klassifikation Psychischer Störungen der WHO，简称：ICD）（也请比较72章）。这类诊断和统计手册主要针对的是功能障碍、焦虑症和爱好偏差等病症，但也引起我们去关注其他一些要求解答的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那些构想出“功能”这个术语的科学家究竟为“功能”设想了些什么？心理治疗师是否会在应用这个术语的时候联想到这里要表述的其实是对活性物质的一种活力抑制？或是他们想到的其实就是其他的抑制？为什么如今我们的医生如此自信地谈论的“勃起障碍”（86章）就不能是一种对一个人（一对伴侣）内心平衡有着重要意义的心理功能障碍呢？对于焦虑症和爱好偏差，对于所谓的性欲倒错或变态，是否存在比功能障碍更深层的原因呢？如果真的存在这些障碍，是否允许我们用涉及面很大的治疗方法去消除这些心理障碍？是否就此会出现一种危险，不“只是”变态而且连同患者本人也一起遭到毁坏？我们的医生是否预感到一种躯体功能的障碍同时也是一种由心理产生的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或“性”暴力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是否往往更是一种常见的病症，并且只是在第二或第三层面上才与性欲和性行为相关联，因而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只能被看做是表面或被前置到性障碍症状？从修复出发的性功能治疗，在强调的意义上真的只是关及性欲和性行为？鉴于性（和性别）不能脱离心理单独存在，就像肉不能离开骨头那样，每次的性功能障碍治疗，不同时也是一次心理治疗吗？

但是我们也不愿意自以为是，我们自然也会为社会改变我们的临床治疗和理由，这可以从我们关于治疗的集体著作中读到（Sigusch，1975，1980a，2007a）。从1975年至今的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症状都被从新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和研究，因此也重新加以描述。索尼娅·迪林（1996a，2007a）就此指出，我们在70年代的观察，是多么只局限于男性激素的变化。事实也是如此，只是在我们关于治疗的集体著作第二卷出版时，才加上了一篇由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尼尔森（1980）撰写的关于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理论与问题。稍后，我们也讨论了男性性心理发展的问题（Schmauch，1996a，2007a），并且不再通过硬性规定把同性恋的心理发展（Poluda，1996a，2007a；Dannecker，1996a，2007a）与异性恋的心理发展分离开来研究。当然我们也因此遭受质疑，被认为只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去观察同性恋，尽管我们的弗里茨·摩根泰勒最晚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中，作为第一个心理分析家，已经试图从心理理论的角度对同性恋做了完全的去病理化。早在1975年，马丁·丹内克尔就曾不得不再次发文提出警告，“对同性恋的治疗，反而恶化了同性恋的处境”，他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此为标题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心理治疗师，都已不再以消除同性恋为己任，而是只想帮助同性恋者缓解内心出现，并且异性恋者也同样会出现的一些内心冲突。

自从“性欲和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一种既有界限又是普遍共有的欲望和行为以来，关于自然和违背自然、正常和非正常、健康和病态的性欲性行为以及性别的构想，总是在发生着经常性的变化。因此也不会令人感到惊奇，如果仍还记得，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我们对性欲和性行为的感受和思考，我们的生活和死亡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爱神与我们今天的爱情关系之间也经历了一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解离、弥散和多样化的过程。但在关于性欲性行为的领域里，我们却仍然在延续一百多年前我们科学前辈的理解，即完全的自然性。只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自然”的性欲和性行为，只是动物性的，无非是自然反射、本能行为和相互吞噬——是惊骇的一个代名词。

在讨论性功能障碍的病因时，必须对性欲和性行为的哪些层面进行反思，我们在其他章节中已经做了探讨，这里再次以列表的形式总结如下（Sigusch，2007a：125 ff）：

——文化层面。研究正常与规范、私人性与公众性、亲密关系与性欲性行为等的象征性和非象征性的意义，关于辈分、性别和性关系的结构，以及对性偏差的定义。

——学科层面。对性别、性欲性行为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找出人公开和隐蔽的图像，设立专门的学科教育，规范专业部门的职能，找出以往研究方法的偏差。

——治疗层面。确定各种治疗方法的特点和目标。设立研究治疗市场的经济学，将某些异常行为列入疾病规范之内（或是将某些异常行为排除在疾病规范之外）。研究医源性障碍，找出治疗偏差。

——生存的层面。战争与流离失所、逃亡和无家可归、遭受酷刑和被判死刑。

——社会的层面。收入、居住、工作和休闲娱乐等生活状况，家庭、伴侣或友情等关系状况，期望视野、相互沟通的结构，以及信息咨询和学习的偏差与障碍。

——身体的层面。躯体的状况，心理分析意义上的躯体自我状态，由于躯体先天的畸形或损伤而造成的心态失衡，由外界诱发的梦幻、疾病或身体实质的变化。

——意识和心理的层面。对怀孕、遭受原生家庭惩罚和疾病的恐惧，由于遭到侵犯、个人和社会状况的突变、追求成就的压力、自我观察和控制以及回避行为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潜意识心理的层面。自身成长中的关键点、个人特有的本能冲动和自卫事件、自我强化机制、潜意识中对伴侣的选择以及在伴侣关系中的冲突。

无人可以预先说出，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还会出现哪些性障碍。不久前，医学界第一次描述了一种“持久性性兴奋综合征”（Peristent Sexual Arousal Syndrom，简称：PSAS），或是说一种“持续性性兴奋症候群”（Persistent Genital Arousal Disorder，简称：PGAD）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上，是一种几乎无法平息的性高潮火焰，每天会出现近200次性高潮，而且不需事前的性刺激，是主要由振动，如手机或吹风机激起的性兴奋，这种性兴奋也会出现在开车或乘坐火车时。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是由某些特定的抗忧郁的药物，如所谓“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ktive Serotonin-Reuptake-Inhibitoren，简称：SSRI）以及部分地也因为它的突然停用造成的。

89 弗洛伊德对性欲性行为的告别

尽管只要一涉及女人和女性的性欲性行为问题，弗洛伊德就会与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尽可能地用一切黑蒙（Amaurosen）来回击，但他仍然属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批判主义性学家，因为他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在性和性欲性行为中，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文化的”这么个问题，这是一个贯穿在一切现代性别和性理论中的问题。它在最近甚至导致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辩。如果不是弗洛伊德过早地将自己惊人的思考封存起来，也许争辩双方都能援引他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如果弗洛伊德自然主义（为了避免说是本质主义）地论证了，按最终乐趣的机制应当把“最终乐趣”（Endlust）理解为是机械的和不由自主的，因而也就是动物性的。它是“最高”和“最后”的乐趣，是一种巨大的快感，形成于性激素的刺激（Freud，1905：112，136）。虽然它在我们的婴儿时代已经刺激过我们的性感区域，但它真正为我们提

供“前快感”，是在青春期开始之后。只是在过了青春期的风暴后，当以生育一个儿童为成熟的目标在第一生殖区域进行获得特许性交媾操作时，这些“前快感”应当和必须集中在男人身上——这是一种神秘算计的联盟（Unio maystica et calculatoria），它似乎使所有的需求和要求成为合理：躯体的动物性，性的快乐原则，亲昵的童年时代，成年后对现实的顾及，文化的习俗，以及生殖后代。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由那个男人“以本能反射的方式”（同上：112）来兑现。而对于女人，人们只是期望她们能乖乖地接受这一切，她们只是作为“阴道的黏膜”而存在；顺便说一下，根本不存在解剖学意义上纯粹的阴道黏膜，尽管性生理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966）又颇有成效地重新强调了它。

爱情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同样也总是动物性的。那些“激起爱情的基本过程”总是“一成不变”：“那个排泄口太内化并与性不可分离地交合在一起，在尿尿和排泄粪便之间的生殖器区域，依然是那个特定的不可改变的要素。这里甚至可以援引拿破仑的一句名言说：人体的结构就是我们的命运。生殖器自身并没有参与人体往漂亮方向的发展，它们一如既往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动物性，因此，即使是爱情，今天也完全与以往相同，依然是动物性的。”（Freud，1912：90）似乎弗洛伊德早已意识到，要想让一部著作有现代意识并富有成果，只有不去尝试化解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反驳了自己对爱情的判决。在反驳中，他如是说：“粪便嗜好症的本能驱动部分”，必须加以“压抑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抑制”，自从我们人类种系发育以来“通过直立行走，已经使我们的嗅觉器官远离地面”（同上）。（因此可以类推）人类的性和爱的生活只能开始于身体生理特性“彼在”；但弗洛伊德在细想之后又认为如果要去想象人的饮食没有“动物性”的胃，人的性生活没有“动物性”的生殖器官，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此一来，似乎在人体结构“彼在”开始的并不是人的生活，只要吃喝多于身体所需的饱和度和触摸感，只要润滑和勃起多于神经学定义的本能反射，只要在性活动中聚集了集体和个人的经验。

但很显然，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建构主义者”对“此在”的性生活感到无限失望。这不只是因为生殖器的丑陋和处于笨拙的位置上，不只是因为性活动的本能反射性和爱情在本质上一如既往的兽性；更使他感到抑郁的，似乎是文化的进程，兽性的文化化，尤其是爱情的本能冲动，无论如何都“很难通过教育加以改善”，而且这种本能冲动的出现总是“一会儿太多，一会儿又太少”，没有常量（同上）。其后果是对它的高估或低估，也就是对它的错误估量，一种“最普遍”的羞辱和一种“最普遍”的仰望，受虐狂和施虐狂，“性的顺从”和“男性化的抗议”，无论怎样都是一种无法让人感到美好的“不满足”，如同生殖器仍然总是那么丑陋（同上：91）。所以这并不是一种因为超越本能反射而获得最终快感的满意。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必须像男性那样，即使在性无能的状况下，也能成功完成神秘人体结构的性和生殖活动。他观察到，心理的性无能远甚于人们的想象，“我们当今文化世界中的爱情生活自身，就是心理性无能的典型”（同上：85）。女人的性乐趣与男人的性乐趣一样，都被以否定和禁止的方式而加以变形和清除，尽管正是文化的禁令似乎才是可能构成性乐趣的条件——这里弗洛伊德预先认识到了乔治·巴特耶的一种中心议题。这种纠结从心理性无能的角度来看，在男女之间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文化型的女性懂得在等待期间坚守不超越性活动的禁界线，并以此来把握（社会）禁令与性欲性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就使她们因再也无法完全摆脱禁令而导致了她们的性冷淡。”（同上：87）男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大多会以给对象造成羞辱为条件去冲破禁令，并把这一条件带进他们以后的爱情生活中”（同上）。

弗洛伊德在20世纪第一次性革命的影响下，诊断出性领域的解离，并且其结果是“爱情生活的最普遍羞辱”，似乎令我感到特别惊奇。这使我联想到弗洛伊德在1912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的中心论题：“文化女性”与“文化男人”（出于男权意识，弗洛伊德总是自然而然地用“男人”来称呼）同样少地“交融彼此相属的”亲昵与感官欲望的情感潮流

（同上：85）。这就是说，被文化化了的性本能冲动并没有成功地完成这一交融；它被悬挂在天地之间，一半是生硬和残暴，一半是神化和过度崇拜，还没有真实地人性化。这就意味着“文化人”的情欲与爱情的相互分离：“如果他们在爱，便不怀有对彼此的性渴望；如果在受性渴望的驱使，便不是在爱。”（同上：82）作为柔情情感对象的性客体与作为情欲情感对象的性目标并没有相互吻合；“从两边分别去穿越一条属于青春期转换的隧道”，没有获得成功（Freud，1905：108）。“情欲”没有变成阿道夫-恩斯特·迈耶尔（Adolf-Ernst Meyer）曾经如此明确说起过的“快乐”。

鉴于对最终性对象的选择，只是一种替代品，是一条隧道的“两个不同开端为避免乱伦而做出的对象选择”，这样的性行为也就不会使人获得完全的性满足。其结果是需要一系列没有终结的、“永不满足的”、无限多的替代性对象（Freud，1912：89f）：对母亲的本能冲动的爱，既苦又甜。情欲的感情潮流就此被化解，因为早期性本能冲动的某些组成部分“必须被抑制和必须为其他事由所用”（同上：90）。其结果是心理性无能，但又带有永远无法满足的“性刺激饥饿”（同上），弗洛伊德也曾与性学家伊万·布洛赫谈起过这个问题。

很明显，文化想从爱情本能冲动中所期望的那些，如果没有可感觉的性快感的损失，似乎是无法做到的，为此感到无限失望的弗洛伊德甚至看到了性欲和性行为的终结：“人类必须与这些想法交友，即：性本能冲动的需要不可能与文化的要求保持平衡，放弃性快感和忍受性痛苦即使‘在最遥远的未来’，都不能避免由这样的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灭绝人类的危险。”（同上：90 f；Hervorh. V. S.）从中可以看出，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的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只是建立在一种唯一的猜测上，“即性本能冲动在文化的压力下所形成的某种特定特征，是对文化不满意的一种必然结果”（同上：91）。尽管社会出现了富有成效的性变革，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性欲和性行为，可能有一天会消失”的构想，

显然已伴随了他几十年。他在1930年写道：“文明人的性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文明人都处在一种功能的退化中，就像作为我们身体器官的牙齿和头发。”（S. 465；Hervorh. V. S.）在如今文明人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作为人之子的两个人之间淳朴自然爱情的空间”（同上）。但弗洛伊德并不把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退化，单纯归咎于“文化的压力”；他认为也由于性功能自身本质中的某些因素，禁止“我们获得完全的性满足”并迫使“我们为获得完全的性满足而采用其他的方法”（同上，Hervorh. V. S.）。然后，他在1930年写的一条脚注中又重提了他在1909年曾写下的想法：人的站立和嗅觉的退化（贬值），不仅威胁着人的嗅觉快感和肛门色情成为器官功能移位和变化的牺牲品，而且人的总体性欲和性行为同样会成为它们的牺牲品（同上：466；Hervorh. V.S.）。根据这一“假设”，“就会推断出：由人类直立行走赢得新生活形态的机体，反对人类早期动物性存在的防御，是推进文化性压抑最深的根基”（同上）。

但现在已经成为公民的弗洛伊德并不会让我们没有丝毫安慰。他认为，虽然性欲和性行为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薄弱点”（1905：48），但人类成就的强项恰恰就是以禁欲为基础：“就是说，只要性本能冲动屈服于文化对它的最初要求，它就无法给人以完全的性满足；但是通过它那被压抑的本能部分的不断升华，它却会成为人类最伟大文化成就的源泉。因为如果能够从性本能冲动中获得全部的性满足，谁还有动机把自己的性本能力量运用到其他方面去呢？人便再也无法摆脱性的快感，也不会再创造出什么新的进步。如此看来，人类通过在性和自私这两种不同本能冲动之间无法平衡的差异，而获得不断趋向更高成就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总处在一种经常性的威胁之下，即那些薄弱点在今天可能会以神经病症的形式压垮人。”（1912：91）20年之后，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冲动已经成为人类命运问题的时候，不管人类是否能够成功地掌控那个“毁灭自我的本能冲动”，他都希望（1930：506），“那个永远的爱神”，那个“不同于两种‘天上权力’的权力”，能够在斗争中坚守自己。

在20世纪初，当弗洛伊德看到了“人类灭绝的危险”时，他所说的“最遥远的未来”，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其远见和预言却是完全正确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进步”并没能实现什么，预期的大型死亡也同样没有出现；性演变为可买卖的性感色情，而性感色情又让自己作为活生生的尸体喧闹地参与了为消费的服务；人类的毁灭随时都会发生，但它并不是用以弥补生殖科学进步的不足而出现的性纵欲或性泛滥的结果，而是“文明人”不断积累却又不再能够消除的解构破坏的力量和毁灭潜力所带来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愿再随弗洛伊德的分析跟进到这一点上，因为这会使我们对文化的成就产生怀疑，并且在这一不可调和论断中也深藏着那么一些本体论，尤其是其中引入了本能冲动需求与文化要求如同永恒不变的天性本质作为理由。

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后性革命中的那么多要素，早就已经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性与性别的解离，过高或过低评价了性的效用，男人和女人在突破性禁忌后的冷漠，伴侣关系承诺的短暂性，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自私，代孕和假体的出现，性满足后的空虚。

只是从一个关键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位不顾自己更好的见解仍然保持一种文化乐观主义的弗洛伊德，却又太过于悲观，因为他无法对商品和知识生产的实验性社会加以理论上的概括，其实这个社会即使在那个时代的信条已经是：永不停止的变化。弗洛伊德低估了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变动能量，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的巨大适应能力。他很难想象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普通个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如同我们也很难在20世纪60年代就去想象当前的性文化那样。

90 无性欲与当事人的观点

直到今天，我们才注意到，有些伟大的思想家或是没有性的欲望

（如伊曼努尔·康德）或是从没有经历过性交（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可以这么说，自古以来总是有人既感觉不到性的欲望也从没有实践过性的活动。美国伟大的性学家阿尔弗雷德·C.金赛在50年前就以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Kinsey et al.，1948，1953）。虽然在其后的30年中，也有个别科学家多少直接地指出了这一现象（比较http：// www. Asexuelity.org/index.php？title = Research_relating_toasexuality），但直到新性革命开始并借助于互联网，无性欲和无性活动才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性取向由当事人代表出现在公众领域中。之前，即使在60年代的第二次性革命时代，人们也完全忽略了那个对性不感兴趣也不去实践它的人群，虽然这些人并不出于宗教的理由而独身或无性欲，并且这些人也习惯从自身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家庭和伴侣关系中寻找“过错”的原因或理由。无性欲和无性实践，在新性革命之前仍是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性取向。如今第一次出现了性欲性行为与无性欲无性实践并存的现象，这是一种有关性时代本质的多样化解离。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可以在最初一些私人网页上惊奇地看到，有人坦然告白自己没有任何（或只有极少）性的欲望。一些团体，如“皮革老处女”（Leather Spinsters）就是反对文化压力，主张一种无性的生活。杰拉尔丁·范·维尔斯特伦（Geraldine van Vilsteren）在荷兰建立了“与生俱来没有性感觉”（Nonlibidoism）的人的论坛，雅虎把这类论坛归为“天堂人阿米巴纽”（The Haven for the Human Amoeba）。“无性”这个词，不再只是针对非人的、无性就能繁殖的生物。2001年，大卫·杰伊（David Jay）在圣路易斯（St. Louis）设立了一个“无性欲无性实践的可视性和教育网络”（Asexuality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简称：AVEN），自2005年起，这个网络也有了一个德语网址：www.asexuality.org。

如今已有数千人公开表白自己是无性人，将自己独特的性取向作为与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并存的第四种性取向，像以往一些曾遭遇禁

止和唾弃的性取向与性别那样为得到社会的确认和承认而斗争，因此历史性地诞生了一种新的体验和行为，按我所见，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性欲性行为和一种新的性别。因为无性欲无性实践者，不只是在性取向的问题上与在新性革命前已经为文化和社会熟悉或认可的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这三种性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且也有其性别所属的不同，即无性欲无性实践者，既不是所谓与异性相对的性别，不是与同性相同的性别，也不是以双性恋为性取向的双性恋者的性别。

现在确实到了这些人群终于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虽然传统媒体只是在几年前才刚刚开始关注这些人。显然，2004年发表在《新科学家》学刊上的一篇题为“很高兴能够无性趣”（Glad to be a Sexual）的文章，冲击了许多记者的头脑。无论如何，他们对此感到很迷惑并且问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如何表述这些？显然似乎性的时代特征是如此顽固地沉淀在即使是聪明的头脑中，导致他们甚至无法按逻辑思维了。因为事实的逻辑无非是：如果有性欲和性行为的存在，那么必然也有无性欲和无性实践的存在。没有这一个的存在，也就根本无另一个的存在。因而单纯地从逻辑出发就能假定，无性欲和无性实践至少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如果这一假定是成立的，那么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无性的现象表现出震惊？也许是因为每个性时代的特征都不可阻挡地走向它的终点，如同每个社会的时代特征？“很高兴能够无性欲和无性实践”？

《新科学家》报道的是关于2004年发表在《性学研究》杂志的一篇科学论文。安东尼·F.博格特（Anthony F. Bogaert）的这篇文章，并不使专业科学家感到震惊。它只是一篇太正常的科学论文：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以一种新的研究角度重新分析了以前的一次采访。作为这一重新分析基础的是安妮·约翰逊（Anne Johnson）使用优秀的英国式调查方法所做的一次采访（1994）。这一采访调查进行于90年代初，当时的研究兴趣主要立足于对艾滋病的预防。在采访中，如果有一个被采访者说是

没有与谁有性交关系，那么大家都对这一信息感到满意，因为这就完全不可能通过性的途径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博格特在重新阅读了问卷后，计算出在1.8万个被调查者中有1%的人是无性欲无性实践者，其中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她（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从来没有从一个伴侣（不管哪种性别）那里感受到过性的吸引力”。

但在“无性欲无性实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些什么呢？博格特对这一采访的分析，并没有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他给我们留出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以从自慰，被无生命的物体所吸引，更动情于动物，更愿意被暴力征服，性兴奋被生存危机和威胁所抑制，一直到无法意识到已有的性反应，等等。这使我回忆起有一位女病人，她在理发师那里会出现一切性高潮反应的迹象，却坚信自己无法达到一种性高潮。

2004年，美国科学家妮可·普瑞斯（Nicole Prause）和辛西娅·A.格雷厄姆（Cynthia A. Graham）共采访了1146人，其中女性为511人，男性为635人，被采访者的平均年龄为稍低于22岁，那些即使年龄在22～41岁的被采访者中，根据不同的调查分析，有1.9%到3.6%的人自称是“无性欲无性实践”者（2007）。研究人员认为，无性欲和无性实践要比“性欲和性兴奋低下”更有特征地表现出其高度的性抑制或罕见的性行为。

当前对“无性欲和无性实践”的各种定义，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多个AVEN团体相互区别于：1.有一种性的本能冲动，却不去实践它，因为没有感觉到它对自己有什么吸引力。2.没有性本能的冲动，但有情感和身体的需求，只是感觉不到性化的吸引力。3.能感觉到情感的吸引，也进行自慰，但其情感与身体的性反应是相互分离的。4.既感觉不到一种性本能冲动，也没有感受到性的吸引力（比较www.asexuality.org）。

为了将“无性欲和无性实践”明确区别于与临床病态相关的图像，研

究者们应当分辨和区分，所出现的“无性欲无性实践”的现象只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或者它是否既存在于身体也存在于心灵。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性学研究所刚成立后不久，第一次遇见一个年轻的男人，二十四五岁，虽然通过全面检查证实了他的健康，但他却从来没有过一种身体的性反应，通过阴茎体积变化描记法也证实了他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过身体的性反应；他也从来没有通过想象或触摸感受过性的快感。其次需要澄清的是，无性欲和无性实践是否更由于童年时代的心理创伤，或是仅仅由于抑郁或一种受阻的性偏差，比如由心灵造成的障碍，但也可能是由于身体的发展状况或疾病。或者是否（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决定，比如出于宗教或道德的理由，或因为爱情的某些理由。

在我看来，要想对此做出一个负有社会和文化责任的定义的关键，是当事人的自我定义。应当由他们从自身出发来说：作为无性欲和无性实践的我们，并不寻找性的体验，感觉不到别人（不管男女）对自己的性吸引，只是稍稍知道一些性兴奋，几乎不实践性的行为，也包括不实践自慰，并且不去缔结任何一种性的关系。但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无性欲和无性实践者没有一种固定的生活关系，或是没有生育孩子的愿望。从一些正派严肃的新闻报道中，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无性欲无性实践者的生活也可以如此多样化，比如一个33岁的巴西医生与两个固定女友居住在一起，有时也睡在一起。“但是，”他说，“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快感。更像是写个E-Mail或是洗刷餐具——也就是说，这并不使我感受到激情。”而那个25岁的安雅的男友，对她的无性欲无性实践的行为模式感到不适应。最后找到的一个能使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她那位双性恋的男友被允许与男人睡觉（比较Hilbk，2005）。如果说以前的文化机构如教会、党派和社团在规定人们应当怎样面对和处理自己性欲望的同时，也赋予了人们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今天的个人就不得不自己明白，怎样恰当地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性欲望。当然在必要时，也常常能得到一个有着相同处境的私人利益团体的帮助，获得支持和安全

感。作为这类团体中的一个成员，人们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让别人感兴趣的人，从而得到某种自恋式的满足。

但是如果把这些正在表现自己并组织起来的无性欲无性实践者，看成是有心理障碍或有病的（不管他们想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并如此对待他们（45章），则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的那些没有性欲望的男人和女人，能够公开坦诚自己的这种只是在表面上不符合规范的特性，这无疑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行为。因为无数女性和越来越多的男性的无性欲现象，根据性科学多年的观察，更多的是与文化转型，尤其是与传统的、自然的性别认同差异和经常说成是被内源性本能所驱动的性欲性行为相关联，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对他们做出在专业上经得起推敲的一种性障碍诊断（88章）。

在德国的AVEN论坛上，无性欲者们把无性欲和无性行为定义为“没有性互动的愿望”。他们在网页上如此写道：

> 什么是一种“性的互动”？这个定义有着一种完全有意识的泛化，其实“无性欲”者各自对“性互动”的看法通常都很不相同。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性的互动”开始于性行为的实践，有的则认为轻轻的一个吻或与对方的触摸就已经是性的互动了。之所以使用“互动”这个词，无论如何是想清楚表明，性的活动至少由两个人组成。因此，没有第二个人参与的自慰活动，被明确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虽说有些“无性欲”者可能会喜欢色情制品或有恋物倾向，有些能感觉到性兴奋，有些也能体验浪漫的吸引力，另一些可能并不如此，但简而言之，所有的“无性欲”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没有兴趣与他人睡觉（性交）。
>
> 关于性本能冲动的更多信息：“无性欲”者是根本没有性本能冲动呢，还是只停留在自慰，并自称自己是“无性欲”者——

从纯粹的生理角度来说，许多“无性欲”者是有性能力的。有些是通过自慰获得性满足，有些又不是这样。对许多“无性欲”者来说，“手淫”能够给自己制造出一种舒服的感觉。有些只有通过手淫获得性兴奋，有些只是通过想象。有性欲者与无性欲者的区别在于，“无性欲”者在手淫时，往往没有某种特定的性想象。如果他们在这时想到其他一些事，也只是一些纯粹的幻想。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与某个人进行一种性活动，他们往往表现出对此毫无兴趣，或是他们的本能冲动如此微小，以致可以完全忽略。一些“无性欲”者也能把自己理解为是“自动性”者，他们有自己的性本能冲动，并能在自己的身上获得性的享受。另一些自我手淫的“无性欲”者，却并没有性的本能冲动，他们手淫只是为自己获得一种好的感觉。所有“无性欲”者的共同点，并不在于是否手淫，而是感觉不到有与他人进行性互动或性活动的愿望。（http：//www.asex-wiki.de/index.php/FAQ：Was_ist_Asexualit%C3%A4t_eigentlich%3F；accessed：17.11.2008）

斯万基维（Swanklvy）2005年6月27日在网页上写道：

无性欲者、无性者、反性欲和性行为者以及独身主义者，这些表述都有各自不同的内涵领域，究竟应当使用其中哪个术语，这要根据说话的对象而定。虽然每个术语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被用在我身上，不管确切与否。但是无论人们对此怎样定义，我的状况只用一句话就能做出最好的概括：我不想有性行为。这一定义就变得非常简单。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做爱，不是因为我害怕做爱，不是由于某种所谓的道德责任所致，也不是我不愿组建一个家庭，而是似乎我跳过了性爱好的发展——也许我在生理上并不存在一种力比多，也许我对身体

的亲密在心理上不感兴趣，也许两者兼有……但最终可以说，我就是对性根本不感兴趣，我也愿意如此。

从任何角度来看，我都是一个健康的女性。我有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性别特征，尽管我的青春发育期开始得较晚些，但仍然是在一个正常的年龄段。我认为自己的颜值还是稍高于中等水平，我也没有“什么过错”，可人们还是在传说我缺乏一种性本能冲动（有些人喜欢这么做）。也有许多人愿意帮助我（大多数是男人），从充满性欲望的小伙子到真正好心肠者，他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我，改变我的现状。问题是我根本不愿“改变”我的现状，我并不把它看成是个问题。不受心理的影响，我偶尔也会充分感觉到，我完全没必要去界定自己，也不是只有通过一个伴侣才能感觉生活的完满，并且由于在生理上对性的欲望几乎完全等同于一个3岁的小孩，因而即使“没有性生活”，也不会使我感到生理上被剥夺了什么。

尽管我对我的状况公开表示满意，但仍有那么一拨人多年来总是在试图改变我。在青少年时期，我曾谈过两段恋爱。第一次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好奇，在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被约会过，所以当有人约我时，我就答应了。我们的相互关系并没有身体层面的接触，并且在6个月后我们就分手了，因为我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第二次关系有些难度，这时我注意到自己有些不那么正常，我在另一个人（也包括我的朋友）那里感觉不到通常形式的欲望或性趣，我无法对这个年轻男人的亲近尝试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我很看重他，希望能成为他的女友进入到他的生活中去，这自然会导致他提出性的要求；其实我并不能容忍这些性的要求，但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我能满足他的这些要求，也许有助于他克服沉淀在他深层心理中的自卑感，也就与他有了几次亲密的行为（从接吻到抚摸），可是我们所

做的这一切，并不能激起我的热情，只是使我感到冷漠；这使我很困扰，因为我没有人们通常与这类事情相关的感觉，而没有这样的感觉，亲密行为自身也就变得相当不愉快。我感到累了，我没有能力做到诸如既能满足他的要求又不牺牲自己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事。我只得同意两人应当各走各的路，虽然直到今天我们仍是好朋友。

在我上大学之前，我母亲把我带到医生那里，一方面是一次常规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看到我似乎有那么一些荷尔蒙障碍而感到不安。她担心我的状态可能是另一种身体问题的征象，但医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他们只是说，鉴于我缺乏力比多和经常性的低于平均值的月经周期，可以猜测我的雌激素水平较为低下。他们说这不算什么问题，允许我继续像以往那样地生活。我知道得很清楚，有些人把我这种无性趣看成是一种挑战……他们喜欢想象，如果能够征服这么一个难以得手的姑娘，那么他就是一个没人能抗拒的有魅力的人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模仿“非性的十大好处”写下了有关无性欲的10个问题……这是我向别人叙述我的性取向或没有取向之后，别人向我提出最多的十大问题：

10.“你恨男人”。这不是真实的。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男性。并且如果我真恨男人的话，我也可能干脆就是个女同性恋者。

9.“你只是因为得不到男人的青睐”。这也是不真实的，有许多男人追求过我……

8.“你的荷尔蒙有问题”。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我荷尔蒙分泌较低”……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7.“你只是太忙了”。如果我确实认为面对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我绝不会去拒绝一种可能的幸福。

6.“你还从来没有与我上过床”。这是那些垂涎不已的男人最常给出的评论。愚蠢的人会真的想象：我之所以无性趣，只是还没有遇上一个真正的男人……

5.“你只是因为害怕做出关系承诺”。我应当再次强调，我有许多亲密的友谊，其中也包括许多男性好友。我没有任何问题去建立亲密的感情。我只是不想去建立一种性关系，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这种现象。

4.“你在童年时受到过性侵”。一种非常普遍流传的假设，但又是一个完全不真实的假设。

3.“你是女同”。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可以想象，虽然我对阴茎不感性趣，那只是因为在我的这种情感中对阴道有一种深沉的渴望。其实同性恋在今天也已被广泛接受，如果我真是一个同性恋者，也完全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2.“你还没有遇上一个真正适合你的人”。也许我真的还没遇上。但这是一种不公正的假设：一定存在着那么一个真正适合我的人；或是如果我一直没法遇上他，那我的生活就不是完整的。

1.“啊，你是刚刚结束了一段不好的关系吧？”这是最常见的假定——我显然是受到了这场刚刚结束关系的伤害，留下了一种不好的经验的疤痕，因此发誓不再与男人相干了。不，事实不是这样的。

……有时，他们也试图与我开始一场争论，似乎我正在领

导一场讨伐“性”的圣战，但真实地说，只要我并不参与其中，其实我是完全赞同“性”的。当然，我不愿意看到人们不负责任地处理它，但我没有因为它的存在而感到恶心或是去排斥它……我没有兴趣去参加我们“无性欲”者的大游行或集会周（一周的集会。——译者注），即使我不是出于信仰而无性欲，但我仍为我的“无性欲”感到很“自豪”。我希望其他人知道我的存在，我的不同于别人的另一种方式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并不是由于某种障碍或是不正常。它可以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一个正常的第四种性取向。

（http：//www.asexuality.org/d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section&id=10&Itemid=66；accessed：20.11. 2008）

91 自相矛盾的关系

没有自相矛盾这个概念，就无法表述一种符合时代的性理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矛盾和互相补偿。接下来将对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关系从最初到最后的每一个片段进行讨论（比较比如：1、18、98各章，也请参见Sigusch，2005a：163-171）。许多例子突然涌现在我的头脑中。

我们的日常生活既充满了性的刺激却又清空了这些性刺激。既是完全的清空，又是空的塞满。这就是新性革命主要的自相矛盾之一。显然，正是经济和文化为性刺激设计的过于夸张的场景，通过性刺激的持续存在，通过它们无所不在的商业化，以及通过比传统以禁令为手段更有效的电子时代的解离而对它们实施的分流与驱除，才激起了人们的欲望。弗洛伊德和巴特耶已经懂得，总是那些充满快乐欲望的事才会被禁止。但更早预感到这一点的则是梵蒂冈。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它现在是中欧的最后一个机构，即一个试图以禁令煽动人们的性欲望而使性

的乐趣变得无限伟大的机构。它对性的判决词，毫无疑义和毫不合时宜地赋予性欲和性行为以一种无上的权威。性的这种无上权威其实早已消失，其原因也许在于禁令的逐渐解除和导致普遍“无性趣”的性欲性行为的平庸化，常有许多妇女和越来越多的男人在我们的诊所里诉说自己的“无性趣”。整个的“性化”都转变为“去性化”，与此相同的是绝对的“性别化”也转变为“无性别化”，心理分析家沃尔夫冈·黑格纳（Wolfgang Hegener，1992，2009：131 f）曾以模特为例很有洞察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性别化”这个词本身已经说明了，如今的模特都已成了“小男人”。模特的身体“虽然被完全性化”，但此身体已没有了原本的性或性别的特征，套着漂亮时装充满生机却又正在死去的身体，已经被无机化、机器化和玩偶化了。这类身体也是删除“性尤其是母性起源”的一种明证。模特的身体最后被剥夺了“一切矛盾和差异，变得无性别和无时代区别了”。

歌德1795年在他的《罗马哀歌》（Römischen Elegien）中既热情歌颂又警告人们要提防的那位“名为‘机会’的女神”，如今有了如此大的权力，以致她根本没必要，急匆匆地去抓住一个机会。“机会”反正明天还会再来，虽然可能是以另一种形态，比如：缩小阴唇、肛门漂白、棒打屁股、镣铐捆绑、阴道喷水或施虐性交等。市场在大声喧哗，刺激如洪水猛兽，人们遭遇到广告、娱乐和新闻媒体无奇不有的各种新闻、逸事、廉价物品和恐怖故事的轮番轰击。所有人都受到经常性的刺激，都应当从一件事不断地切换到另一件事，都不再能够忍受电视里一句稍微慢吞吞的对话，反正不管正在做哪件事情，即使是在看一部非常迷人的影片，也会被广告和其他媒体如手机和电脑所打断。人们通过手机而无时不在行动，并且也可以随时联系上。人们通过互联网和手提电脑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处理自己工作上的事。没有任何其他技术像电脑那样方便了人们对刺激事件的寻找。这就制造出一种弥散、一种解离、一种来回摆动和一种上下波动；谁如果还没有厘清这样的状况，也就几乎无法从这类刺激中脱身。自我决定的停顿和思考，变得如此稀有和奢

侈。只有以极大的努力，并且如果家庭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才能隐退到自身去寻找多少有些真实的自我。

如今，一切都应众所周知和充满刺激，将神秘与背叛合二为一，包装在一起。一切与性相关的非理性、不由自主、混乱、好色、肮脏和恶魔般的行为，都应当包装为正确、规矩、洁净、受保护和经过深思熟虑，为法律和道德所允许，简而言之，是理性和民主的。但这却给人留下了一个如同投机银行的深刻印象，表面上是理性、文明和干净，在内里实际上却是深不可测、卑鄙和肮脏。叔本华和尼采在本能冲动的活动中所看到的被弗洛伊德称为“最底的心理层面”，应当是动机休眠的区域。性主体可怜的计谋。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进程中，由于男人和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接近，人们的亲密和羞耻界限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人们却不能在工作场所释放“色情信号”和做出与“性相关的举动”。一个精神病医院的老板，如我以前的老板所习惯做的那样，在早晨对年轻的女医生以拍打她们臀部的方式来问候她们，在今天肯定是件丑闻。这里我们就又一次遇上了那个自相矛盾：一方面，是我们的公共生活世界几乎被一切充塞着性的物和事件所撑破，或是说几乎被完全性化；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被迫以羞耻心压抑我们的性情感，甚至被迫完全让其消失。

与这种文化现实相适应的是，绝大多数北美和欧洲人（这里主要涉及的是他们）的性生活，绝不是富足的。在艾滋病暴发后，比如以北美和欧洲的异性恋关系为例，所进行的一些技术要求很高的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80%）16岁到60岁男女被调查者，在被调查的前一年中没有或只有过一个性伙伴，也就是没有超过安全防范只应有较少性伙伴的要求。一半受访者在一周内仅有不到一次的性生活，其中也包括了口交和肛交。3%～4%的已婚者，在受访前的一年中有过婚外的性关系。鉴于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在这里说，这是一种异性恋关系的去性化现象，也不过分夸张。此外，我们那些时常抱怨根本没有“性趣”的男女病

人，他（她）们的实际生活也不再不符合文化的框架。只是这种文化框架普遍忽视了隐藏在一对伴侣性活动自身中的自相矛盾。因为一对伴侣以表面上交融（不管是否有真正的渗透）的方式去达到共同的行动结束或获得共同的高潮，只会使两个正在从事性活动的人彼此分离，通过自动反射过程或自我意识的丧失而渐行渐远，直到他们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并因此丢弃最后一点利他性。

另一个例子是：性欲性行为与童年，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仍然一如既往被视为是一种禁忌的关系。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简化了的当地和秘密的录像、多样化和世界化的环流，儿童色情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成为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商业，而公共权力和国家之手只是偶尔间隔时间很长地会对这类儿童色情制造者“作秀”般地进行一些追踪。而青少年呢？如我们已经报道过的（82章）：虽说当前文化崇拜青春偶像，但青年人自己却被这种文化边缘化，有关年轻一代人的几乎全是负面图像。总体而言，“这代”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但他们却没有一个社会的未来。

另一个自相矛盾是在今天已经成为强制命令并以道德共识和相互平等形态出现的所谓性民主，因为能够激起一个高度个性化个人的性趣和性兴奋的事，是不能进行投票表决的，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兴奋、愉悦、快乐和满意度，肯定是商业规则和合乎理性的反面，是非理性、疯狂、异乎寻常、肮脏、令人费解的谜和独一无二。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爱情与忠诚关系是相互分离、相互排挤、相互压抑的，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已经破灭了变革性和性别关系的梦，它们也与这种糟糕的现实妥协过，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却又顶撞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新的社会命令。不管这一切有多么疯狂，在移情别恋的资本主义销售世界里，它们却又是独一无二的，是自由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顺便说说自由。我们享有自由的可能性越大，我们所得到和实现的

自由就会显得越小。自由化使人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开始预感到，自己所逃脱的，正是自己所渴望的。要是人们有一种关于“正确”情欲与爱情生活的想象，那么他们以往的性生活就会因此贬值。经历过被禁止和被迫害时代的老同性恋者们说，他们在今天这个自由的时代，再也没有体验到那个被禁止和受迫害时代在自身所唤起的那种激动。在被禁止和受迫害时，反倒有更好的情绪和社会交往，现在却没有力量和动机去反抗正常强迫症者了。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与受迫害时相反：丽莎·杜根（Liasa Duggan，2003）把美国白人男性同性恋组织的政治，概括为“新同性恋正常强迫症”（New Homonormativity），这种政治只顾扩大自己的影响，主张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和民族化的爱国主义，却又把自己包装成政治中立。“新同性恋者”的这种同性恋正常强迫症，似乎与在性别差异话语中遭到彻底批判的异性恋正常强迫症再也没有什么区别（比较：Antje Engel，2005；Rosemary Hennessy，2000）。另一个例子是：2006年在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德国变性人中央委员会”（简称：ZTD）。是的，它是这么称呼自己的。但它的斗争目标显然是针对那些“可恨”的改变性别的变性人。它坚持认为，变性是一种病态，自然为人类预设了两种不同的性别，并且已有的“变性法”应当仅允许适用于“真实”的变性人。

自相矛盾式的还有我们今天对一种伴侣关系所抱的期望，我们希望在一种伴侣关系中不仅有信任和亲近，而且还要有刺激和兴奋。由于对伴侣关系这种期望值变得如此之高，致使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干脆可以回避它，自动放弃去缔结一种固定的亲密关系。不是他们按自己的感觉没有找到那个满足自己这些期望的伴侣，就是他们感觉去满足对方的这些期望会使自己不堪重负。属于这类自相矛盾的还有一点是：个人自由越大，做出决定的压力也就更大。到最后就变成了：正是对幸运的寻找，导致了人的不幸。

在纸上誓言男女权利平等和性别平等，尤其是同工同酬，但现实生

活却离谱得会让人感到愤慨。比如欧盟就业和社会事务委员会2009年2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女性在欧洲的平均工资水平比男性要低17.4%，在德国甚至是低23%，并且男女同工的工资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递增。据官方2013年3月发表的数据，在德国，如果一个女性与她的男同事有相同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有相同的工作能力，但要比她的男同事每年多干3个月的工作，才能挣到与她的男同事相同的年收入。欧洲男性干家务的时间是平均每周6小时，而欧洲的妇女每周则需要花25个小时来处理家务。与此同时，女性在我们这里平均受教育的程度要高于男性，也包括大学毕业的女性要多于男性。值得提问的还有，尽管通过妇女运动争取了更多的解放，今天的妇女是否就一定比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性别革命前，生活得更轻松并因此也更幸福些？现在的男人已经能够卸下许多责任。他们不再必须（生）养育孩子，不再必须一个人养活全家。他们也不再必须给人一种在体力和智力上全能的印象，允许表现自己的弱点，接受他所爱的女人给他的更多服务。这其中的自相矛盾是：妇女原本想摆脱重负，现在却只得承担比以前更多的重负；她们经常想去从事一项高难度高要求的职业，并且也想要孩子，但是如果那位生活伴侣不赞同的话，那就只得自己独自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这是一种费神费力的持久紧张。

早期变态和新性者的奇特性，一旦被公认，便再也没有了反对所谓正常人错误特性的力量。再加上心理的癒化和强迫，这类性模式便变得僵化、公式化和有治疗需要。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快感中的敌视快感占有了统治地位，只是通过另一种心理指令而表现出来。早期变态或新性的习俗与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在本质上既相距很远又相距很近，既相互陌生又相互一致，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排除一切差异，那么这两者也就合为一个单子了。这里总的自相矛盾在于：性欲和性行为只有作为由社会铸就和设置的普遍模式才得以存在，但在真实中它却又是极其个人化的。另一个但又是必要的自相矛盾悖论是：性欲性行为和性感，并不是真实的“性”。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就不会对性总体关系中如此多悖论式的自相矛盾感到惊奇。没有竞争对手，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但它却又把自己表现为毫无竞争对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最好的但同时又是一个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世界中。在它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比今天更自由，但同时又是更不自由。一方面是我们不用再在摇曳的烛光下阅读而是有了电灯，打开我们的水龙头便有了无限量的可饮用水，我们有许多成就证明自己，这一切都给了我们坚实的生活基础。比如一把进食用的叉子有4个而不是3个或5个齿。我们也征服了许多疾病，寿命越来越长，正在接近100岁这个界限，而当时那个强大的罗马帝国，据我们所知，有一半人口只能活到20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按汉娜·阿伦特所说出生率在增长，也由于在几十年前肯定会因为缺乏相应的治疗措施而死亡的许多病人，现在仍然能够在继续生活，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率也同时在递增，即当社会具体开始它的Hylomatisch的那一刻起，人已经在其真实性上死亡了。此外，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中，在这个文化中有1/3到一半的可食用食物仅仅出于市场销售策略或供大于求的原因而遭扔弃，与此同时却有4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几乎危及生命的贫困中。大约有一半为贫穷国家紧急需要的食物，被我们用来喂养我们的宠物，或是用来生产有机的生物燃料。我们用许多升可饮用水来冲洗我们的厕所，而与此同时有数百万的人只能在梦中想象干净的饮用水和独立的卫生间。有25亿人，如果说认识“厕所”（WC）这个词的话，也只是在课堂上听说过。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资本怎样在吞噬巨大面积的耕地，这被称为“土地掠夺”，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在忍受饥饿。我们袖手旁观，让数以千计的难民死在地中海的欧盟边界线外。那些终于已经进入到我们这里的难民，我们对待他们则像一堆必须清除的垃圾。对待像卡扎菲这样的独裁暴君，只要与他们有生意可做，我们不是满脸堆笑，喋喋不休地接吻，便是亦步亦趋地紧随他们，或是又翻脸将他们交付给CIA和M16关起来进行迫害。年龄在14～90岁的德国人中，大约有40%的人完全或部分赞同这一说法

——“人的生命有一种是很有价值，另一种则毫无价值”，因而拒绝了我国宪法的第3条。大约有60%的人否认穆斯林有信仰自由，这就是拒绝承认我国宪法第4条——这里提及的只是奥利弗·德克尔（Oliver Decker）和艾尔玛·布雷特（Elmar Brähler）2010年受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Stiftung）委托所做的调查研究中的两个例子（http：//library.fes.de/ pdf-files/do07504-20120321.pdf）。

人权应当具有普世性，但是一个逃到富裕国家的难民所遭受的法律和现实处境甚至比一条狗还要糟糕。一条狗可供支配的居住面积要比一个难民的还大些。隐蔽在这一现象后面的自相矛盾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自由和民主自决中表决通过的法律，并不是那么自由、民主和普世，它并不意味着难民有权利把这一法律看成是特意为自己通过的法律，因而也没有权利诉诸法律来要求自己的权利。用另外的话来说：民主与人权并不相互一致，而总是在不断相互排斥和分离。这里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自相矛盾是：我们主观假定确信普遍人权，但又以我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不断用脚去践踏这些人权。当前，曾经有时把人认同为洪水猛兽有时又认同为权力意志的积极人类学（Positive Anthropologie），正在人之中享用非人性。虐待是他们固有的手段，自然人的不变量于他们是无我和无社会的本能反应。屠宰和屠宰场在他们看来是同一件事物；既不能把罪过归结为个人也不能归结为集体，这是无法进行身份认同的陌生人自己的过错，这就深深刺激了我们追求秩序意志的统一思考。

绝大多数民众作为单一的个人，如今已越来越没有话语和决定的权力，但又像条被牵着鼻子的狗，以为自己是知情和了解情况的，其实却是什么都不知道。成为单子（Monade）的他们，会尽量避免一切能够证明他们是单子的事和物。理论上说，即使在最偏远的岛屿上，他们也能自我参与和被参与一切与他们相关的事。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这种全球化。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以致我们没有了安宁和平静：糟糕的原子能事件，恐怖分子的袭击，大屠杀，资本主义危机和性

虐待等。即便打开电视，也只是为了又关上电视（因为没有什么真实的内容）。透明却没有了要领（因为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信息社会是半官方的中立，但资本客体却在决定着一切，它会告诉我们，自由究竟是什么。如果在澳大利亚有一场草原大火，我们会立即得知；但是我们无法知道，一个邻居在一个星期前，或甚至在17年前就已死去，如德国新闻社（dapd）2012年10月22日正好在报道的这条新闻，并且17年来都横躺在自己的家里而无人知晓。最终在某个时候，媒体会报道“LLL”的现象有所递增，这就是说：长久（Lang）横躺（Liegenden）在家里的尸体（Leichen），简称：“LLL”。

其中一个关键的自相矛盾是：我们深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有批判意识、魔幻般、神秘却又不信神的理智和一个深思熟虑、精确计算、合乎理性的时代中，但在实际上我们却是在一种深不可测、没有批判精神、神秘且又拜物主义的非理智和一种不可操控、不可预测的非理性中活动。那个看透了资本主义社会“拜物特征”的卡尔·马克思“问候”那个强调对资本主义“去魔力化”的马克斯·韦伯。市民社会的自相矛盾，通过拒绝承认普通个人自己的理性而彻底自相矛盾化。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如康德（1798）、马克思（1867）和弗洛伊德（1892/1893，1917）都曾确认过这种现象。康德曾把这说成是“黑暗的想象”，弗洛伊德把它说成是“一个阴暗的领域”，马克思则将此分析为是对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客观扭曲。如果说马克思相信的是人类能够通过控制自然而获得进步，阿多诺相信的是主体与社会的和解，那么京特·安德斯（1956/1980a，1980b）已经以一本关于“人类自爱”的书籍回击了他们的信念。他认为，人类已经过时，因为人类用自己竭尽全力所释放出的能力，再也不能去实现什么了。

现代社会想把普通个人塑造成自动、自立、有自我意识并也能安于自身的主体。只是今天的他们已经成为明白无误有外在操纵、不自立并自私的发射器，他们被客体、话语和技术“个人化”并反过来又作为衡量

他们的标准。由自觉调控的对第一自然本性的克服，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趋向一个与之前相似的由拜物调控的第二自然本性。只看重金钱、商品和利润的社会拜物结构，在这期间已经渗透到社会中的所有个人，因此现在理论和政治不需再思考阶级斗争问题，只需部分地做一种政治经济学上的批判，必须以全部精力思考整个社会塌陷的问题。原本作为一种客体（Sigusch，1984b，1986）的普遍拜物主义，已经渗透到一切社会体系化的经济、政治、劳动、休闲时间、法律、科学、医学、文化、宗教等里面，成为正常人、通常人、道德学家、可信任者、富有成就者和漂亮者们的个人感受和信仰，以致色情和性的领域也完全拜物主义化了。再也没有什么能逃脱社会的拜物主义，不管现在关及的是果树种植还是一个优秀足球运动员的义务，对病人和老人的照护，还是对一个享有地区优先财政资助剧院的支持。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个人化的社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通过对个人承担责任的家庭企业日益匿名化，而造成了我们社会的去个性化。那位原本由家庭企业任命的经理在企业股份化后现在成为那个CEO，他通常只有较短的任期，不久就会被匿名投资者的多数另请高就，尽管他也许是这个企业决定性的人物。这就对我们这个似乎是理性的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对企业因而也对社会有更多的影响？是理性还是情感？鉴于资本的投机本性，很显然是“感觉”，是情感。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即使不会出现炸锅现象，拜物主义的客体目标是否也能通过个别和普遍的对总体系出轨的批判，如当前对毁灭实体经济和对歧视人的金融投机的批判，或是通过个别人却被普遍认可的行动，如女权主义对重男轻女的话语批判，如对为盈利而破坏环境的垃圾处理方式的揭露，以及如为残疾人争取更多尊严的无私和非意识形态的行动而得以有所改变。

批判主义性科学，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方法来研究这一悖论式自相矛盾的事实。它认为：虽说目前的投机性经济炒作、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经济运作，以及支出日益递增的养老经济，野蛮地毁坏了绝大多数民众赖以生存的经济安全和社会正义，但同时也明显地为人的性活动、

性关系和性别认同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特别是为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为新的性别和新的性关系联盟提供了更多的扩展机会。其中荒诞的是：资本主义的方式越是野蛮越是扩展到一切领域的全面化，那么为性取向、性活动和各种性别提供的自由空间也就越大。社会成员在资本领域以外的活动和行为，只要不影响自己的活动，对“资本”来说，至于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显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自相矛盾中的自相矛盾是：那些被允许获得这些自由的人，其实完全不能去利用这些降落到自己身上的自由，或是完全不愿去体验这类自由。除此之外，允许开放原本遭遇禁止和禁忌的（性）愿望，并不能使强权变弱，而只会强化它，福柯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考虑到经济关系的这一意义，在未来我们也可以不再说“新性革命”，而是说“被授权的新性革命”，这就意味着：一切与新性革命相关的性变革，都是被人为地置放进新自由主义的。

对于这种两难困境，我以前曾评论说（Sigusch，1979b：8；2005a：12）：“到处都是主仆和上下关系，到处都是非理性、物化和破坏的现象，如果要想运气好的话，如人们所说，能够成为既定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那么不免从小就被侮辱、被扭曲、被贬低、被强制、被隔离、被清空，充满恐惧和没有尊严。谁如果作为机器整天只要动那么三下，谁如果年复一年都在把自己作为戴着面罩的无用商品推销给买方，谁的一生如果都必须在作为死文件的工具去反对人，谁如果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还能跳出优美的舞步，那他就不可能在爱情和性生活中成为机器、面罩和工具的反面——也就是他不可能突然之间成为他真实的自己，不加掩饰、充满生命活力和身心完全放松。但是怎样才有可能做到既关注和谐，同时又充满激情；既不用花费心思，同时又表现出互助和自觉呢？这就如同我们被一种旋律所吸引，无法入睡，却又只能断片式地回想起它。生活的窘迫总是在忧郁、苦恼、孤独、被离弃、没有爱、没有激情、总是只有恼火、没有灵性、没有温情等之间摇摆和移动。自那以后，我们只希望能够摘掉面罩，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看一下2011年由海特迈尔主持的长年追踪调查的第10份报告所给出的结果。关于普通民众对性和性别领域的偏见，2011年的调查结果与9年前的调查相比，其偏见的程度有所递减，比如关于女性角色和同性恋婚姻。但与此同时，只要涉及外国人、长年失业者和居无定所者等问题，就会表现出明显递增的敌意。并且出现了在测试中从没出现过的如此大范围由于右派意识而随时准备使用暴力的意愿。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用数据所证明的：注重经济者比不那么注重经济者，对外国人、同性恋者、失业者或残疾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诋毁和敌意。新自由主义显然把经济生产力，并最终是社会成员的可利用性置放在人的图像中心了。其结果是对社会救济接受者、残疾人和失业者的鄙视，以及对所谓夺去别人工作机会的外国人的仇恨。这里表现出新性革命的一种双重标准：一方面为远离经济的行为创造了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却对在经济进程中可能或事实的竞争对手喧嚷仇恨和暴力意愿。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即使是革命，也不免不伴有一种复旧（94章）。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有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变换能力，而它也正是通过自身的这一能力在历史进程中获得了如此的成功。它不愿承认的信条是：一切都必须与时俱进地转换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保持自身的原样（79章）。这种转换能力，也可以说是变换的必要性，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自身经常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利用；另一方面是出于冷淡，出于资本主义关系相对于文化道德的价值和传统所特有的结构和本质上的冷漠；第三（但并不是最后）方面，也为由社会和政治冲突所强制的转换所致。在这一点上，早就不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基本对抗”，即不再这里是资本那里是劳动，这里是资本主义那里是无产阶级革命等这类的社会对抗。如果说这类传统的“社会冲突矛盾”原本至少还可能在纸上解决，那么正是由于我们指出的这些自相矛盾，如今连在纸上解决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这些矛盾如同资本主义自身那样变得如此坚韧和精致，如今的资本主义也在部分地实践福利和公益基金，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自己。但它最大的自相矛

盾是它自身的结构。主导当今社会话语的一些社会分析家，如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2002）等，已经不再以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或危机范畴”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注重研究其自身中的悖论语义，因此在谈论资本主义基本特征时，也不需再借助社会哲学的其他一些如“现代”或“后现代”等术语。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把传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想象为“残缺、分散和零碎”，如同福柯的“权力”，它们会转变为无数的自相矛盾，是与原有矛盾同样不可解开的对立。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则在日益资本主义化：一切都在被作为商品供应、出售、出租和利用。有人在出售安全、道德或处女膜，也有人在出租人性、生殖器的某些部分或是足球运动员。

只有少数思想家还有勇气去反抗这种强制。汉斯·恩岑斯贝格在1992年曾这么写道：一场“冗长”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世界市场成为复仇女神和“匿名机制”，它们共同宣告了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多余，活跃在世界上的资本造就了一种全球化的总动员，拆除了一切国家的界线。大规模的移民取代了原先由国家组织的殖民战争和对原住民的驱逐。如果说马克思仍然还活着的话，如今也已是那条“死去的狗”！顺便提一下战争。在近代史中，没有任何事件像被称为“毁灭和死亡”的战争那样，如此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战争同时也是一种消除毁灭和死亡的尝试。1999年，科学第一次能够在一种哺乳动物（老鼠）的体内关闭一种标识为“p66shc”的基因，这种基因极可能对细胞的死亡有所影响（Nature，vol. 402，S. 309）。但是直到可以让富人通过购买它来延长自己生命的这条道路，可能还会很漫长。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有无数基因参与了细胞死亡的过程，科学将会一步步地证明这一点。

这里说说科学。社会渗透在一切之中，个人也只是普通的个人（如萨特会说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想把人看成是死的物，我们就必须相信社会的批判诠释、道德认知以及团结社会的力量和有效性。它们，

如同齐格蒙德·鲍曼所说，是个人的法理，我们必须像对待个人的实际情况那样地对待它。当前显然是所谓的生命科学主导了唯科学主义领域的话语，因为社会逐渐取消了原有的对生命的解释，将它解释为是无生命的物（Sigusch，1997）。但如今的唯有机生命也无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决定了我们和我们社会的一切并不是有机生命，而是市场。如果创造系统的价值一旦进入自动和机械式的运转，许多人就不再为发展生产力所需要。生物技术拆解和客体化了个人，使他们变得渺小和可操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将他们拼凑在一起，满足他们的主观愿望，医治他们的疾病，并在这个意义上——即在世界范围内把他们的生殖细胞都用于生产，或是将他们的自身通过克隆而能够无限复制的意义上，使他们成为不朽。部分与总体、全力与无能为力相聚在一起，基因工程学家承诺能够修复或置换带病的基因。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根本不去关注，一种新技术，如将精子射入体内的技术，是否会在某一天因为人类自身人为地开辟了这样一条途径而对基因造成毁灭性的伤害。PC技术也是如此，一些文字，只要曾经被输入一台电脑，就再也不可能真正删除，也就是说再也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流动性与持久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依存。

自相矛盾的是：知识社会不断在递增自己的“无知”。已可证明，未研究的未知领域正在日益扩大，众所周知的“无知”越来越多于人们的“已知”。科学在形成一种确定知识的同时，必然也会带出一种特定的“无知”。绝大多数的发展进程，也包括深层心理的发展进程，都是指数式而不是直线式，比如是2—4—16—256，而不是2—4—6—8这样的递增。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在讨论所谓的移民法时，更愿以“市场”这一国家和全民的宗教为借口说：“仅仅只有市场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位不自由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也许并不懂得，并且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通过事实和想象生活在其中的知识社会，还有其他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高科技所带来的灾难的问题；高科技造成的并不是一种较少复杂性和低效率的问题，而是

过于高效率和过于复杂的问题。

这种简单发展关系的思想，在当今的现代生物学和批判主义性科学研究中已经过时。这两门科学早已不那么狭隘，硬是把一种心理和社会原因及其复杂的构成，比如同性恋，看成不是与生俱来就是后天所得那样的非此即彼。其实同性恋的形成和其表现形式更多地受制于各自文化和社会的不同状况，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异性恋和同性恋不同的性欲性行为，可以归结为某种特定的荷尔蒙或基因。对于那些通过他们研究的科学而使自己得到启蒙的自然科学家来说，当然非常明了所谓的先天基因与所谓的后天环境是彼此不可分地交叉在一起的。二进律式、非此即彼、以生物性对抗社会性的那种简单发展关系的思想，自然非常诱人，因为它承诺简单的解释和解决方案，甚至也包括我们大家都已在深层的黑暗意识中预感到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显然，我们文化中关于起源、主体和纯粹直接性的西方哲学，远不如受后现代思想趋向暗示的思想更为过时。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陷入集体的愤怒中，因为有个词按其发音声调的抑扬顿挫，在拼写这个词时，不需要再写那个“i”了，也是不错的。但他们也不会再多做些其他的什么。

他们留下的是那个谬论，即以为“什么”都可以（科学地）用文字写下来，或甚至可以概括为概念。科学家们很愿意忽视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艺术、宗教、音乐以及在色情和性中出现的事情和现象（36章）。但“非概念”却正是在这些领域触及了自己的核心，因而也表现在自相矛盾悖论式的性关系中：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性，却又不能逻辑地陈述其原因，我们只能以自相矛盾的方式不是把它标识为生理性的过程，就是把它归结为文化演变、形成和突变的过程。

92 自我实现的性和精益的性行为作为一种新的性范式

两百年来，与其他文化不同，我们这里主要是通过对有形和明确的

而不是非物质和精神的追求，来满足贪婪和好奇。身体的需求不像在欧洲古典时代和古老的中国那样，适度地通过反思来加以限制，也不像在古老的印度那样甚至通过艺术加以消除。与此相反，在我们的文化中，身体的需求更多的是通过无节制和无艺术技巧的方式来获得满足，并且通常只是停留在一种低仪式和低反思的水准上，我在这里避免了说是在一种“洗漱包”（即自带洗漱包的一夜情）文化的水准上。以这样的方式来糊弄，贪婪和好奇当然就会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并且也能够随时毫无过渡地被重新点燃。但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种自私且只提供短暂满足的机制，似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的秘密。应当不断生产能迅速反映市场愿望的产品，应当不断分解似乎已经成熟的性模式，以便能够给其添加上新的欲望和新的意义，以便能够为其植入新的需求和新的可知性，以便能够为市场推动新的实践和新的服务。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自19世纪以来孤立和戏剧化地标识为“性欲和性行为”的领域，总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有着商品形态，因而是可以买卖的性，也就是我所说的“作为商品的性”，是（资本主义）这个社会进程的梦想目标。

如同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70章），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36年就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今天，利己主义即使不完全重合，也已经以精致和普遍化的形态，渗透在我们的一切生活方式之中。其在流行歌曲、小说，当然也包括广告中的格言是：因为我值得拥有。我最爱我自己。我他妈的只是肏他人。整个世界都得围着我转，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我，我自己和我。我就是我自己。这类自大狂对“我爱你”的回答是：我也爱我自己！这当然也包括他不会以一丝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整个社会都不认为自我发展与不顾及他人是不可兼容的，而是把它看做是生产性的张力，因而也就不用感到惊奇：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满足和完成其咨询和建议的任务。自我主义者只想对自己忠诚，而不是他的生活伙伴。如今的离婚已不需寻找任何理由，只要确认“自我与自我”关系的破裂。虽然利己主义者自相

矛盾地标榜自己有着最高度的个人休闲、幸福和创造力，但他在社会方面表现出的特征却是自我最大化、自我约束、自我屈从和自我物化。

如果不把这种自爱、自我放纵、自我发明和自我毁灭的强制考虑进去，那么沃特（Wouter，1994）无拘束的强制，也就太无关紧要了。面对社会冷漠和为防止在排他的亲密关系中头脑过热，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中特有的利己主义正在蔓延，因为它不得不屈服于越来越多的竞争领域以及那个以人的生活和财产巨大损失为代价的市场所要求的社会再生产，并且尽管这个市场带来了日益增长的财富，却并不能保护人类不重新陷入野蛮的状态（Horkheimer，同上：215）。因此一切全靠自己的力量，并且一切都疏于管制。这就使得它的自身似乎如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等永恒传统那样不合时宜。这一切如今在原则上已成为可以购买的服务。如果那些有特权的人如此行事，那么他们就会以“自己的人生”为座右铭，而正是这一座右铭却意味着“去主体化”。日益递增的个性化，给人的印象是日益递增的社会化的一个额外结果，但鉴于旧传统的被抛弃，它其实却是整个社会道德、宗教、教会、国家、法律、阶层和家庭变革的一个主要结果；与此同时，作为曾经被形而上学化了的自信和自我强大主体的普通个人，对普遍性原子化的持续进程其实只能起到一些边缘和肤浅的影响。尽管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或哲学选择来替代当前的资本主义，但在一些小的方面，却有着那么多的替代可能性。比如在今天你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一个截肢拜物教者，一个类似美洲狮式的小鲜肉或是一个轮回主义者，或是打破这些老的套路对这一切都不置可否。如果说按齐格蒙德·鲍曼（1995/1997）的分析，朝圣者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合适比喻，那么婴儿车、玩家、流浪者、游客和消费者，则是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恰当比喻。如果说，朝圣者有着一个固定的目的地，那么对他们的后继者来说，只是想过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一种不被绑定、自我决定、即时和流动的生活。

借用后福特主义策略的“精益”管理和“精益”生产这一表述，也可以

把新性革命的结果表述为“精益的性欲和性行为”。因为这种新型性模式的关键点是在一种自我关系意义上的自律和自我优化，无论有无一个性（或生活）伙伴；借用此前已经提及的“以自我为行动参照系统”的这一表述，也可以把这种新型性模式称之为“自我实现（或完成）的性生活”，这一表述可以让人联想起自我服务、自我控制和自我帮助。第二次性革命取代了至少延续了200多年的前性模式，而如今的新型性模式在近30年中显然又日益取代了第二次性革命的革命者尊崇爱神的性模式。

精益性行为和有节制地自我激起性欲，也可称为新型的性欲和行为的文化缩影，它在如今的表现就是爱的游行和狂欢派对：工作日穿着干净和举止得体，周末则用合法的合成药物使身体游离于灵魂，以“灵魂出窍”的模样组成一个百万人的疯狂游行穿越（柏林的）动物园，这使人不免想起有关那遥远的人间乐园的承诺和风险。与此相应的是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性生活，摇摆在现代后期大众事件的散漫和个人疯狂与现代早期个人忠诚的纪律化和集体化的自我关注之间（82章：Sigusch，2001，2005b；也请比较Walder，1998）。而那些健康和幸运的灵魂，则在最极端的喧嚣和喑哑之间来回震荡（Horkheimer，同上：172）。但他们似乎总是可以从自我决定和自我承担责任的规则中获取自我优化。

精益性欲性行为和自我实现性生活的另一个缩影是自慰，如今也可称为“独自一人实现的性活动”或是“自我性恋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富裕西方国家有代表意义的性调查（比如Laumann et al.，1994）和在我国主要是对大学生的询问调查（比如Schmidt，2000；Schmidt et al.，2006），反映出这些关键的变化。按这些调查给出的结论，自慰在过去的30～40年中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替补性活动的特征，进而成为一种典型的“我认为这是我与我自己的关系”。比较分别来自1966年、1981年、1996年和2002年的大型调查数据不仅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明显越来越早

地开始自我一人的性活动，比如女大学生开始自慰的平均年龄在60年代是22.5岁，到了90年代已经是15岁。但其中的关键一点似乎是，自慰完全独立于其性和爱情生活的总体形式和质量：它显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作为无可奈何和释放发泄的实践。即使生活在“固定”和“良好”的关系中并有着“非常满意的性生活”，人们通常也会“没有任何内疚”地实施自慰。在今天有4/5的男女青年强调自慰是“独立的（不依赖他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模式”；只有少数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种固定的关系中，拒绝这种形式的性实践，或是只认可它作为解决性窘迫的一种替代方法。

精益性欲性行为或自我实现或完成的性活动的模式，似乎可以通过实验调查加以检测，并也与“严酷”的现实相当一致。无论如何，任何一种其他主要的性模式在实际生活中，都不能像自慰这一性模式那样，那么自由和自主，那么轻易地可获得支配、可以自我调整和独自优化；其结果是，也就没有任何一种其他重要的性模式如此影响深刻（或是说如此容易辨认）地完成了转型。今天，自慰与异性恋的性活动公开和相当平和地共存于年轻夫妇或生活伴侣的一种固定关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自述是能够得到性满足的性关系中，自慰也成了一种与其并存且独立的性模式。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即神学家、教育家和医学家曾经运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对当事者施加身体和心灵的迫害，试图根除这种据说是致命的自虐疾病；如今，自慰已不再是一种恐怖，而是一种与原有关系兼容的有益行为，它以一种有着自己独特质量和意义的性实践，执拗地成为对古老性交方式的一种补充，并且也被那些实践它的人，现在甚至还包括被公认的专家看做是有助、愉悦和无害的。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这种自慰实践显然是在服务于文化上日益重要的自爱和自我关心。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经是怎样说的：手淫“是与那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的一种性活动”。

这就很明显，社会无疑会将自爱和自私等的一些负面影响，归罪于社会的边缘人群，而正是这些人又没有能力通过公开的集体曝光或秘密

的自我激起性欲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社会不愿承认其成员的内心空虚，却又不公正地喜欢把这些所谓的“变态”人群诊断为内心空虚（70章）。并且社会事实上也是双重道德的：比如我们过去性形态变革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性和性别的自我决定，但现在我们却在抱怨因性形态变革带出的性的自我实现和性别的自我决定。如我们已经在文中提到过的那样：这种状况是自相矛盾的。

在提到性的自我实现和性别的自我决定的综合背景时，我不想忘了提醒大家关注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的一份著名研究《公众领域生活的瓦解和终结》（Verfall und Ende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塞纳特（1977/1983：381）在该研究中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世俗化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普遍意见交换和经验交流平台的社会公众性领域是怎样走向瓦解的，又怎样在传播一种名为“私密性”的暴政的。“个人和个人的状况日益递增地吸引了社会和公众更多的关注和兴趣。那种神秘且有危险的力量，即那个自我，便渐渐地成了衡量社会关系的标准。从此开始了原本不具有个人意义和非个人化行动的公众性领域的瓦解。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正承担着因‘社会的意义生成于个人情感生活’这一假设给公众领域造成的沉重历史后果。这种变化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两个重要领域的看法，即权力和统治的领域与我们的生活进行在其中的建筑空间。”

我们社会的普遍个人化和利己主义化也表现在与性不相关的许多文化领域。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比如社会学家托尔斯滕·本克尔（Thorsten Benkel，2012）对墓园因而也就是墓葬文化显而易见的那一部分，做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殡葬，也通过新的殡葬礼仪如遍撒骨灰的葬礼、树葬、太空葬礼或是将骨灰制成钻石的葬礼而日益多元化。如果死者还有坟墓的话，也越来越非正式化，墓碑上常常篆刻着很有其个人特点并只有知情人才知道的昵称或是死者生前喜爱的某首歌的歌词，似乎在庆祝他的唯一性。但因整体状况总是那么

自相矛盾，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匿名的趋向——无声无息无名无姓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最后还必须谈谈关于Epimeleiaheautou（希腊语：自我护理）、Curasui（意大利语：关心）和Soucidesoi（法语：自我关注），这一切都可以说成是“自我关心”。福柯（1984/1986：19）将他的第一个性史研究项目就看做是一种“普遍‘自我技术’历史”的开始。稍后，他（比较比如福柯，1993 a und b）又在继承柏拉图、斯多葛自我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他所处时代的那个社会为基础），把主体以及主体与自身和其他客体的关系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中心课题，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h，1978）的“自恋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激起他去寻找一种主体性的理论（Foucaultu. a. 1993a：9）。与客体相比，他更感兴趣的是主体的逻辑而不是客观社会的逻辑，他认为，客观社会的逻辑应当留给迄今为止的另一种批判哲学去思考。对福柯来说，他自己的哲学思考围绕的是对一种自我关心道德的重建，而不是如同自笛卡儿以来的哲学那样，认为这里只涉及认识论。他希望有一种作为生活实践的哲学。他反对建立在基督教理论基础上的自我放弃，主张主体在一种自由的实践中通过自我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是这种实践的“客观”基础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如同是在云里和雾里。福柯在这里假定了由近代西方个人化话语和个人化定位所建构的个人，似乎通过自我实践就能够摆脱整个并正是由福柯的介绍而呼唤出的“客观性”。如果迄今为止的批判哲学没有完全忽略过这些客观性，那么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就不会出现对他人自由的关心，而是遵循苏格拉底的格言：“照顾好你自己！”——这里只需要利己主义。

93 来自新性革命令人深思的新闻

爱情市场。任何事物都不能逃脱被经济掌控的命运。即使是奇迹般不能生产和不应当出卖的爱情，也不允许因此有所例外——在埃尔朗根

（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两个年轻男人在构思自己创业理念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请见《南德意志报》2012年1月20日，第1页）。他们创立了一个名为“你的情书宝藏”的公司，将“情书宝藏”作为一个类似货币、基因或精子库这么个词，来实现自己商业理念的目标，即以付费的方式为客户保管情书，直到5年之后再寄还给该客户，如果那时该客户的爱情陷入危机或是完全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他们的荒谬之处在于，他们以为这些老的情书也许还能挽救即将破裂的关系（http：//www.deinbriefschatz.de）。与他们相比，另一个女商人有着一个可能会富有成果的商业构思，如她在电视秀（西部德国电视台，播出时间是2012年7月20日）中所说，她专为一些因爱情而心碎的人，设立了一个代办处，用小狗、骏马或是通过举办一些有趣的活动来帮助这些内心悲伤的人。

香水市场。报纸特刊上似乎总是会出现一种超大版的明星香水和香水明星广告。从中可以想象出，人类的嗅觉并不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糟糕，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就已认定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即使是这个对人类来说相对较弱的嗅觉，如今也有了专门针对它的如同轰炸式的服务：在已有1.1万种不同的香水可供选择购买的情况下，我们每年还会将大约200种新的香水投放到市场。其营业额是每年8个亿。但这里却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区分多少种不同的香味？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1万种。

精子市场。来自奥胡斯（Aarhus，丹麦的一个城市）的消息（FR，11. 1. 2011，S. 37），这个世界最大的私人精子库在20年前几乎只有异性恋的夫妻或生活伙伴关系的客户。但如今的客户中女同性恋仅占10%，而那些因为通常出于职业的理由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生活伴侣的单身女性已占了30%。目前可供购买的大约有100种“不同种类”的精子，那个女购买者当然也可以决定自己购买精子的那位捐精者是否要有一个博士学位。

当前的交友活动。目前，也就是说2013年年中，在德国有7个受人们关注的交友活动：1.信息素派对（Pheromon-Party）。把嗅探对方穿了多日的衣服作为寻找合适伙伴的方式。2.跳跃约会（Jumping-Date）。主要通过厨艺来认识对方。3.拥抱派对（Kuschel-Party）。在床上只允许拥抱。4.狗的约会（Hunde-Party）。对于新型动物恋者来说，最理想的就是让自己心爱的狗来决定，自己究竟应当与谁继续交往。5.基因约会。基因分析公司作为婚姻或伴侣关系的中介，通过对对方DNA的分析来找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伙伴。6.沉默约会（Silent-Dating）。相互之间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表情进行交流。7.幽灵约会（Ghost-Dating）。幽灵约会的组织者负责客户间的所有通信联络。

振动器销售。避孕套制造商“特洛伊”2012年8月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向年轻女子分发（阴道）振动器。纽约的女人和男人都排着长队耐心等待分发。振动器的销售量因此大幅度提升。在一年之前这家公司作为性趣玩具振动器的销售额就已达1600万美元。

女性生殖器处于需要继续优化的压力。性专家阿达·博肯哈根（Ada Borkenhagen）博士在《有机测试——小巧的性》中报道说：“这个趋向来自美国，但生殖器修正在德国也日益成为一个话题。最常见的是一种缩小内阴唇的手术。在过去的15年中，也形成了对女性生殖器部位的一种理想美感：原则上应当看上去像半个圆面包；外部的大阴唇应当能包住里面的小阴唇。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自己的阴部不那么符合这种理想标准而感到痛苦。以前由阴毛遮盖住的部分，自从有了剃阴毛的习惯，现在全都一目了然。在稍晚的晚间电视节目中播放的‘软色情’影片里，就能看到这类剃光阴毛和标准的生殖器部位。这就显然给一些已婚女性和未婚姑娘造成了感到需要继续优化自己性部位的压力。”（也请比较34章）

反艾滋病的斗争。美国首次为所有面临艾滋病风险者，推出了一种

片剂药物，据说不仅能够治疗HIV感染，而且还可以预防感染。也有一种由替诺福韦（Tenofovir）和恩曲他滨（Emtricitabin）组合而成的制剂，在德国的名称为Atripla（中文为：舒发锭）或Truvada（中文为：特鲁瓦达），据说对40%～75%的病例有治疗效果，至少是对男性病人。但由于也会出现并不期望的副作用，因而必须严格地对症下药。目前正在测试的还有Vorinostat（中文为：伏立诺他），一种能够有效治疗癌症的羟肟酸（Hydroxamsäure），这种药物不仅能抑制HIV感染，而且据说也能治愈这一感染。

对解放的解放。一本小说在2012年年中打破了一切图书的销售纪录，也包括打破了《哈利·波特》的发行纪录。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中，光是在北美就销售了1500万本。这本按所有文艺专栏评论家所说毫无文学水准的小说，名为《灰色调》（Shades of Grey，也有翻译成《五十度灰》或《揭秘欲望》），由英国人埃里卡·伦纳德·詹姆斯（E. L. James）写成。小说描述一个还是个处女的21岁女大学生，委身于一个年长她6岁的千万富翁，而他则向她告白说，“我不是跟人睡觉，我只来硬的性交”。这本小说被归为性虐类文学，但与自侯爵萨德以来的那些性虐著名事件有很大的距离。书中没有任何肮脏的内容，也没有血迹斑斑的举动，烧伤的瘢痕更是不可想象。这位处女的委身做得有序、干净和恰如其分。从服装、食品和体育运动直到性玩具，一切都在这两位性伙伴之间做了合同式的规定。相互间因此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约束和一种盲目的信任。这便使得任何捆绑和鞭笞都变得无害和无关紧要。似乎这位女作者想以一种不太日常生活化的例子，来描绘这种新道德——冈特·施密特把这种新道德称为“协商道德”，而我则称之为“共识道德”。她展现了小说人物身处自由化和前后串行的一夫一妻制时代，面对无所不在的外来刺激和诱惑，仍然能够不离不弃，是基于理性规则和非理性性游戏的一种综合。这又再次给人以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同时也是对老的自由主义解放的一种新型的性解放。也许这位女作者已经感知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多少女性几十年来可证明地只有通过性虐的想象，才能获

得性兴奋（比如请比较：Fridy，1973/2001；Hartmann，1989；Azoulay，1996）；但这种想象又并不是她们真正想付诸实施的愿望。不管如何，爱情在小说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位有爱的女性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性虐偏好，帮助了那位据说是有着心理创伤的男人，并也因此普及了性虐。小说为出版界带来了许多生意，报纸通过预印本，书店通过出售小说都获得许多收益，甚至天主教会也要感谢自己的出版集团“世界图片社”（Weltbild），因为小说赢得了许多收益。当然可以想象的是，教会在赢利的同时，仍会手举人们已经熟悉的鞭子，摆出一副愤怒的样子。

对人的突袭。2011年5月12日到13日的晚上，大约有4000名警察在德国的90个城市和乡镇的1000个妓院中突击搜查了大约6000名妇女。按联邦刑侦局所说，这次突袭搜查几乎徒劳无获。只有少数几处存在着人口贩卖或非法居留的问题（Dona-Carmen-Rundbrief，Dezember 2011，S. 6）。

费用全包的性服务。费用全包（Flatrate）这一表述来自英语Flatrate。一个妓院连锁企业为男人提供费用全包的性服务。这就是说，“妓院里所有女人都可以为您提供性服务，只要您愿意，不管多久，不管多少次，而且还按您的性偏好（口味）”。那些被漂亮许诺骗到德国妓院的东欧妇女，实际每天必须为60个嫖妓者提供服务。因而也不必惊奇，她们最终会陷入怎样的崩溃（März，2011）。

多人间的性活动。伴侣交换的场景，在以前被看做是老派市侩、卖淫式和粗俗的。但按报纸的报道，这样的看法如今已有所改变。现在有越来越多20～30岁的年轻人，走进这类已经人满为患的俱乐部。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表情似乎都在说，自己所做的那些，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事。在互联网上，领军这一市场的是“欢乐俱乐部”。它在2011年中，已经有100万成员（SZ，19.6.2012，S. 10）。

多样性。加拿大人2012年从6月22日至7月1日庆祝他们的LGBTTIQQ2SA，也就是“女同、男同、双性恋、生理变性、心理变性、双向性趣或性恋、同性恋或性别和性取向不明确者、双灵人（一个身体有两种不同性别的人）和性联盟”（http：//www.canadianalodging.com/blog/2010/06/21Igbttiqq2sa/）。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拉丁美洲这期间不仅有两种性别，而且还有第三种性别，即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性别。

在死刑与同性恋婚姻之间。阿根廷是第一个认可同性恋男人有权利作为父母的国家。一个印度的代孕母亲生育了这个孩子（同上，2. 8. 2012）。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已作民事登记的同性恋伴侣关系的决定，虽然这些决定还很缓慢也很微小，却是系列性的。与异性恋婚姻相比，目前德国的同性恋伴侣关系只还缺了“不受限制领养孩子”的权利。并且德国第一份公众化的关于成长在男同、女同或变性家庭中的儿童的调查报告，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这些被父母“渴望的儿童”说，他们的父母比“一般家庭”的父母更能为他们设身处地地着想，因为他们唯恐失去孩子的感情（SZ-Magazin，11. 1. 2013）。美国国防部在2012年第一次允许同性恋士兵穿上军装参加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游行（SZ，23. 7. 2012，S. 7）。一个72岁名叫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的民主党成员，作为第一个国会议员与他的同性恋伙伴吉姆·雷迪（Jim Ready）走进婚姻的殿堂。除了其他一些政治家，当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曾经的总统竞选人、如今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The Boston Globe，7. 7. 2012，S. 6）。历来颇有成效的奥地利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男女）民权组织下属的法律委员会2012年8月2日的通告说：“欧盟司法法院（Der Gerichtshof der Europäischen Union）已经两次做出了宣判，已作民事登记的生活伴侣关系中的遗孀或鳏夫，与婚姻关系中的未亡人享有同等的养老金继承权利。但是Valida养老金管理公司仍然拒绝向这类人支付他们应得的养老金。现在被维也纳劳动和社会法

院认定为是一种歧视。Valida养老金管理公司必须也向那些已作民事登记的生活关系中的未亡人支付养老金。”在美国，同性恋和异性恋者联合起来共同抗议快餐连锁店福来鸡（Fastfood-Kette Chick-fil-A）的老板，以《圣经》为由反对同性恋婚姻。与此同时，异性恋者反同性恋的暴力行为使整个比利时都感到震惊。2012年7月，柏林有两个男人因为攻击同性恋者而被捕，他们必须为给他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受到刑法处罚。2012年上半年，柏林大约有200起类似案件。但据专家所说，其中大约有90%的案件无法侦破（dapd，23. 7. 2012）。2012年11月，也就是在21世纪而不是在18世纪，法国大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和反对同性恋婚姻，其主要理由是：婚姻是罗马天主教5个圣礼之一，按信仰者所说，正是婚姻这一圣礼使得上帝拥有了现实的可视性。在这种充满对上帝虔诚的视野中，同性恋自然就被看做是不敬畏上帝。2013年2月，欧洲司法法院指责了德国和奥地利在孩子领养上对同性恋生活伴侣的歧视。201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部联邦法，如果规定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才能缔结婚姻的话，是违宪的。同性恋已经被允许在加利福尼亚州缔结婚姻。同性恋婚姻应当享有与异性恋婚姻相同的纳税权利。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模式比同性恋伴侣关系和爱情所遭遇的处境有更大的差异：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苏丹和毛里塔尼亚对同性恋处以死刑，另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如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加拿大、南非和法国已经允许同性恋缔结婚姻（比较66章）。

女同和男同的国王。2012年3月，德国建立了第一个男同和女同射击协会，被称为“圣塞巴斯蒂阿努斯和奥弗拉”（St. Sebastianus und Afra），并且于同年10月在科隆选出了第一个男同和女同的射击王。作为女王的她将与她那个变性人伴侣的他，出任该协会的代言人，为期一年（dapd，14. 10. 2012）。

简单化。一位生活在南德的男看护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他问

道：

教会、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自由选民党、左派党、海盗党、工会、社会民主党、人道主义者、人类学家和许多其他组织党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保护“恋童癖”者不受法律的处罚！但是这些恋童癖者现在只关心自己的阴茎！！！请求您参加2012年7月7日由一切在童年、青少年期或作为成人遭受强奸或性侵的男人和女人所举行的“橙色的一天”（Orange Day）的活动。我们提议按§176a遭受过强奸或严重性侵的儿童请在脖子上围一条橘黄色的带子，遭受过强奸或性侵的青少年或成年人则请把这条橘黄色带子戴在手腕上。橘黄色表示着希望，希望这一天全国都能够（并应当）为遭受强奸和性侵的儿童、青少年、男人和女人请命和主持正义。之所以选择橘黄色，是借用了古罗马的一个典故。那时有一个罗马参议员提议，应当让所有的奴隶都在手腕戴上一根白布条，以便更好地随时随地辨认出他们。“不”，另一个智慧的参议员说，“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究竟有多少人，那么就会发动起义反对我们”……特别有助于我们的是，如果您同时也能分发一些传单，上面以类似向病人解释即将开始手术的文风写一些关于我所要求的从法医角度切除性犯罪者阴茎龟头的提议。或者至少帮助我们张贴一些这样的传单……如果性犯罪者最终被祛除了他们享受性的能力，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如此渺小，他们的脸上就再也没有了笑容，他们就会躲在关闭的门后面！！！如果您在向他们解释手术时，也能够向他们展示一些漂亮的割去了阴茎龟头的图片，那么他们就会自我崩溃……也许您能够通过一个泌尿科医师搞到一张切除龟头的照片，比如由于阴茎癌，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切割性罪犯的龟头当然只能在警察的监督下（比如在法医处或是在监狱）。……联邦健康教育启蒙中心花费巨资在橱窗和墙上张贴大幅同

性恋性行为的海报，导致在小学和幼儿园附近到处都是这类搅动视觉和人心的广告和锣鼓声，您对此不感到厌恶吗？？？是谁批准了这类财务支出？？？

卖淫税。波恩市高兴地公布，2011年从妓女卖淫中征集了约25万欧元的税收。在波恩，那些站街工作的妇女，必须从特意为她们改装的停车自动售票机上购买一张站街的票，此票的有效时间是20点15分到第二天清晨6点。除此之外，那些在居所工作的妇女，也必须交付一种卖淫税。在这个领域，波恩市无疑是全德国并且也是国际上的“先驱者”。媒体因此颇感兴趣。2012年6月，特里尔市决定每天向每个妓女征收5欧元的税，不管当天有无或是有过多少次“卖淫”（dapd，30. 6. 2012）。

老的婚姻模式。50多年前，也就是1957年5月3日，联邦德国立法者完全废除了《民法》中违宪的第1354条款，按此法律条款，在家庭和婚姻的大小事务中，不管是涉及居住地还是怎样支配由妇女自己挣得的钱，男人都享有最后的决定权。2013年6月，德国基督教教会（EKD）在针对家庭这个主题的方向性指导意见中，第一次认可了新性革命的现实成果。一切生活模式，不管是非血缘关系的混合家庭、单身母亲，还是同性恋的生活伙伴关系，只要能够相互承担起对对方的责任，都应当受到如同传统婚姻那样的尊重。现在的一切生活模式，都像曾经对马丁·路德来说的那样，婚姻是“一件世俗的事务”。天哪，仿佛是电闪雷鸣。但在这么一个现实冲击之后，电闪雷鸣的就不再只是基督教单方面了。

自我测量。自我优化在兴起。生活自我量化运动（Quantified-self-Bewegung）就是想借助芯片数据和智能手机测量自己的行为和身体的新陈代谢，以便按照B. F.斯金纳（B. F. Skinner）关于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来对自我进行优化，至少是在测量酒精含量、睡眠、血压、脉搏和排便等的形式上。这类应用软件通常叫作“开始！”（Lose It！）、“卡路

里追踪器”（Calorie Tracker）、“P90K”或是“乔的目标”（Joe’s Goals）。如果终于有一天应用这些软件被立法者作为法律规定，那么医疗保险公司也就可以无所事事了（比较Graff，2012）。

新性理念。一个年轻的妇女在电台里叙述，由于男人们的行为都是盲目的，因此她很迟才得到了第一次性满足。在荷兰，有个露阴癖者欣喜地看到，他原先那些本应遭受蔑视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性变态行为，现在却成了一种受人崇拜的性偏好。旅游者们排队走过他的窗口，他一点也没有因此感到羞耻。一个同时也是一位女律师的性施虐者（Domina），多次上了电视秀（比如 20. 9. 2006，ARD1，21 Uhr 45）。她在两年前就向观众以及她的同事公开了她的性偏好。自那以后，她的客户急剧增多，她的事业也因此领先于其他同行。下一个登台电视秀的是个恋靴癖者。他的妻子对他的恋靴情结一无所知。“男人们不得不到处都是个好的模范，只有在这里才终于得到释放。”说这话的这位女士每天能够让三个男人获得性满足，每小时的费用是220欧元。

新型的帮助。为了帮助身体有残疾的夫妇也能有经常的性交，许多男性青年在其社会服务期间的工作就是引导他们把阴茎或是痉挛的手塞进阴道帮助他们完成性交，虽然双方都会为此感到无比的尴尬。

新型动物恋。在由贝恩德·施特尔特（Bernd Stelter）主持的2013年2月的“北德电视台—对决”的电视秀中，登台的那些名人们如于尔根·德鲁斯（Jürgen Drews）都带了自己的一个宠物，并大都是一个名为“腊肠犬”的宠物狗。有个名人——他的名字在这里并不重要——告诉媒体，他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心爱的狗狗烧煮它特别喜欢的菜肴，即鸭肝煮胡萝卜和鸡心烧西葫芦（SZ 6/7.10.2012，S.14）。巴伐利亚现在有一个美丽无比的狗旅馆，如果狗狗的主人外出度假或至少是去购物逛商店，就可以把自己心爱的狗狗送往旅馆看护（ZDF，19.7.2012）。旅馆为每个动物都安排了一间45平方米带花园的房间，能够享受狗护理员无微不致的

溺爱，当然也会受到他们对狗的身体作护理时的“折磨”。新型动物恋者为此每天要花费的费用，相等于近9年来一个避难申请者从可怜的德国政府那里所得到的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与此完美契合的是，霍亨索伦的玛雅公主在2012年11月要求给那些在外国遭遇苦难和折磨的狗狗们也赋予一种避难权。2012年12月，有个名人在电视秀中说道，他感到很幸福，因为他有他的狗狗。在停顿了一下之后，他才又补充说，“当然，我也有我的妻子”。在《南德意志报》2012年的最后一期中，特意声明其中有一版是献给“我们最爱的亲人”，我们“最好的朋友”，而正是这一版在全版上都报道了有关已经人化了的家庭宠物的消息：一个宠物“变得富有”了，一个考出了“驾照”，一个是“退休”了，一个“学会了讲话”，一个“因为太著名而崩溃”，一个现在“不再去寻找性伙伴而是忙于体育健身活动”，还有一个宠物是“孤独地死去了”。《南德意志报》在之前出版的专题杂志中就曾以题为“保重，老朋友”的封面故事用了8页之多，专题报道了有疾病和已经谢世的家庭宠物（Nr.47，23. 11. 2012）。在新的一年里，人们也宣告自己最心爱的宠物已经成为一个人。比如有个妇女——她的鹦鹉不知被谁偷了——在电视（HR，12. 1. 2013）中哭着说：它对我来说已经是像你我那样的“一个人”了，“它每天都与我说话”，“我与它一起生活了35年”，现在我很害怕，它会认为，“是我扔掉了它”，其实“我除了它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痛哭一场的理由（请参见73章）。也许不用痛哭。比如时尚大师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就在宠物猫的设计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它是如此适合于他，就像在手掌上的一只鞋那么显而易见，并且也主要因为它还有着与它的主人相同的独特性，像世界媒体报道的那样，比如它还有一个自己的推特账户。

新型的吻。2008年的11月，一个新型的公共禁欲日：美国的一对恋人梅罗迪·拉·卢斯（Melody La Luz，28岁）和克劳达尼尔·法比安恩（Claudaniel Fabien，30岁）在举办婚礼的教堂里，相互给了对方人生第一个吻。两人都生活在芝加哥并从事教育，而且都致力于促进特别是

青少年的禁欲倡议。

新型性理念者的悔恨。一位德国法官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对下述事情公开地表示悔恨：因为他们对同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而把同性恋的男人送进监狱，这也常常就意味着因此毁掉了他们的一生（SZ，18. 7. 2012，S. 3）。老联邦德国（西德）的司法机构中充塞了老的纳粹司法人员，这些人常常不顾纳粹的罪恶，严格地逐字逐句按纳粹遗留下来的法律条款行事，比如针对同性恋的§175条款。这些条款直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才被完全废除。

新风险。一位曾经的、名叫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的美国国会议员在2011年5月出于疏忽把自己生殖器部位的照片发给了他在推特上的5.8万个追随者。

在早期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之间**1**。2009年5月，伊娃·布吕内（Eva Brunne）在斯德哥尔摩被选为路德教会的主教，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自己女同性恋倾向并担任了这么一个职位的女性。在此之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让那位公开的男同主教基恩·罗宾逊（Gene Robinson）主持自己的就职典礼仪式。但与此同时，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心理治疗师们却在一个所谓的国际会议上，要求对同性恋者进行“愈合治疗”。一个德国大学校长，即使遭到公众的抗议，仍然毫无愧疚地把最象征着该大学威望的大厅出租给“同性恋治疗师”。

在早期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之间**2**。在寻找动物恋网站（比如www.zoobase.de或是www.tlover.info）的过程中，我无意间撞上了一个“爱的谈话网页”（Lovetalk-Seite）。在这个网页上，有个16岁的姑娘描述了一次棘手的经历，并希望从其他网友中得知，她所经历的是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动物恋”。她在帖子中写道：“……有一天，当我走出洗澡间，只裹一条毛巾回到我房间里的时候……突然我的那条狗狗‘马诺’（一条腊肠犬）也来到了我的房间，我褪掉毛巾……我的狗狗

突然走近我的身边，开始嗅闻我的……不知怎么着，我出于好奇，也就允许它这么做了。接着它便更进一步地开始舔我，而我也完全被它激起了性欲……不管怎样，自一些时间以来，我都让它舔我，有时我也帮它进行手淫……我很高兴，如果其他人也有过相似的经历……请写邮件给我。”（http：//www.lovetalk.de/archiv-streitgespraeche/42919-zoophile.html；accessed：9.7.2012）

当代男人。一次调查给出的结果：如果有人问他们睡过的女人的数字，有1/3的男人会不惜说谎。通常是故意夸大数字，而女人在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通常会故意缩小这个数字（SZ，22. 5. 2009，S. 12）。

未来的男人会是怎样的？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会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满意。在美国和欧洲，由于新性革命的进程，大约有2/3的男人不满自己的长相。显然，超现代的自我话语以它的自律和自我优化也影响了男人。与此相应的美容化妆品和健身房直到私密处外科手术等行业正在庆幸男人的这一变化。那个新型的男人享受女美容师为他做的一切：双重清洁，在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蒸汽中刮去老皮，用滚烫的石头进行头、肩和颈部的按摩。他“涂香脂、去角皮、洗刷；他脱体毛、给头发抹上定型胶；他擦、锉和拔”（SZ，19/20. 2. 2011，S. 11）。这一切单是在德国就构成了一个10亿欧元的市场。

当代妇女。在一次金融危机中，来自政界、经济界和科技界的德国绝对顶级领导力量在总理府集会。其性别的比例是1：30，男性占有绝对的优势。音乐会钢琴家吴铭小姐（Miss Ming，32岁）在柏林半裸地趴在钢琴上，为的是给自己第一张古典音乐CD做广告。

未来的妇女会是怎样的？有个33岁专拉皮条的女人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被起诉，她强迫一个16岁的波兰女孩去卖淫。有个年轻的女人在公众场合公然说，要想成为我的男伴，必须至少有18厘米的长度，这里自然是指阴茎的长度。与此同时，有个年轻的男人正在用手机发出一张

张他的男性生殖器照片，无精打采的和勃起的。美国政府在2013年1月发布通告说，未来也会正式把女兵送往战场。这就为20万美国女兵提供了原先被禁止的作为军人的职业升迁机会。

基督教道德**1**。一份爱尔兰的调查研究表明，数千个生活在养育院和孤儿院的儿童，遭受挨打、性虐和其他一些任意和系统性的折磨，并一如既往由天主教教团所为。尤其是男孩还要遭受修道士和神父的性侵。这类性侵在那里面很“流行”。教会和国家几十年来都视若无睹。一个调查委员会用了9年时间采访了2000多名证人，写出了有着以上这些结论的报告。可惜因为年代太过久远，这些性侵和性虐者已不需为此再承担什么法律后果。一个“基督教兄弟”养育院的受害者说，甚至连当时的“梵蒂冈枢机主教”也知道这些情况。身为西班牙枢机主教的安东尼奥·卡尼萨雷斯（Antonio Canizares）甚至在电视中说，其实在孤儿院发生的这些事，并不比堕胎更糟糕。在他说这些话之前，教皇在飞往非洲的途中曾解释说：“使用避孕套只有比艾滋病传染更糟糕。”（SZ，22. 5. 2009，S. 12 und 29. 5. 2009，S. 10）

基督教道德**2**。那位比利时天主教主教罗杰·万尔卢伟（Roger Vangheluwe）性侵儿童长达40年。他的道歉是：他已经定期做了忏悔（April 2011）。

政治道德。毫无品味和毫无参考意义的言论和行为在蔓延。一位名叫维拉·伦斯菲尔德（Vera Lengsfeld）的国会议员竞选者在写着“我们可提供更多”的标语牌上，还加上了她自己和联邦总理默克尔裸露的乳房——似乎是她想用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拟像定理（按此定理，大众媒体的社会已不再能够区分正版与副本、现实与想象）图解显示她提供的“更多”究竟是什么。捎带说一下：这里所说的乳房，实际上多少是指女性两个乳房之间以前曾被称为领口和前胸的部位（FR，12. 8.2009，S. 9）。

国家道德。时任儿童色情制品首席追查员、哈勒（萨勒）市打击儿童色情制品中心的首席检察官彼得·沃格特（Peter Vogt）在10年之后说："我们并没有赢得这场战斗。"（FR，25.11. 2008，S. 6-7）这一生意太有利可图，肇事者太不择手段，对这类制品拥有者的处罚太轻微，而对这类制品感兴趣者又无所不在。他总是会在立案调查过程中遇到身为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和检察官，自然也有牧师，甚至还有就职于梵蒂冈身为神职人员的犯罪嫌疑人。2011～2012年间，联邦政府并不阻止把已经逃到德国的叙利亚难民，途经匈牙利遣返回无疑会致人死亡的阿萨德独裁统治的叙利亚。德国的总体道德就是那么致命的虚假。

远距离的爱情。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一次对他的采访中说，20年来都与他同是社会学家的妻子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生活在一种远距离的爱情中。这是因为全球化而成为必要的举措，也由于他们两人都是颇有国际威望和成就的学者。那个女采访者问道，但是这样的家庭生活状况，如果有了孩子怎么办呢？贝克回答说："确实，为人父母后便很难再与远距离的家庭关系形成一种和谐。最迟，如果知道有个孩子将要来临，那么就会提出近距离爱情这个棘手的难题。我有时会感到惊奇，老的角色分配模式是怎样经常如此快地被激活。突然间，那个女人又要独自承担与孩子和家庭相关的事务。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我认识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妻，他们20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种远距离的关系中。孩子们有时生活在父亲那里，有时在母亲那里，有时也生活在寄宿学校。这当然比较辛苦，但还是可能的。"（FR，21. 6. 2012，S. 32）

家庭供应。自瑞士东部提供了一种连带家庭供应的性生意以来，性市场便有了一种吸引客户的新方式。用母亲、女儿或是姐妹的双人的关系激起嫖妓者更多的性趣。据圣加仑（St. Gallen）的侦探总长布鲁诺·费尔（Bruno Fehr）说，这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嫌疑，只要保证卖淫参与者（母女或姐妹）都是成年人。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并不自然就成为鼓励

卖淫犯罪嫌疑的理由。但是圣加仑性工作者妇女咨询中心的娜内·吉尔（Nane Geel）却有着不同于这位侦探总长的看法，并表示出自己的不安，她说：“我们怀疑这样一个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招揽一个特定的有着乱伦和恋童癖幻想的客户人群。”

无性生殖。一位31岁的同性恋者实现了自己做母亲的梦想（SZ，10. 8. 2010，S. 10）。他通过医生把自己的精子与他的一位已婚女朋友的卵子结合在一起，并把这一新生命胚胎植入自己50岁的母亲的体内直到分娩。母亲与祖母、父亲与兄弟在这里都重合在一起了，并且这次生殖又是如它的名称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无性的。

性捐赠。试想一下：一个原教旨的、基督教的、只顾自我的、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有控制欲和完全没有性经验的、完成了“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习作为硅谷高科技工作人员的年轻男人，会在做些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个书呆子吗？不，他在互联网上分发他以机械方式获取的处男精子，并且越来越毫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机械和干净的方式。终于有一天，他会被媒体欢呼为“脸书时代的性帝”——没有性或是根本没有过性欲和性行为。谁如果不相信的话：这位新型捐精者和孩子生理性的父亲名叫特伦特·阿瑟诺（Trent Arsenault），36岁，住在旧金山附近的弗里蒙特（Fremont）。在http：//trentdonor.org的网页上可以查看他记录下的那些由他捐精因而远距离生殖的儿童。他自己是怎样称呼这一新型生殖的？他称为“性捐赠”。瑞士有一位退休和未婚的牧师也在从事这样的行为。2012年3月，一位66岁的妇女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在乌克兰得到一个捐赠的卵子后，先在试管里受精，然后再被植入她的体内（SZ，6.3.2012，S. 10）。

Hylomatisch（人与物的相互异化）。村上隆的视觉艺术展览：在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生物；动漫精子。在印度，可以按愿望定制儿童（比如直的鼻子，很白的皮肤等），当然只是为来自德国、美国和沙特

阿拉伯的富人。一位名叫内娜·帕特尔（Nayna Patel）的妇科医生会按需要提供精子或卵子或是两者，并将这对精卵植入年轻贫穷的印度姑娘体内，也就是所谓的代孕母亲，当然这位代孕母亲必须在事先签署声明，永远不要求（或是说没有权利）再见到这个由她怀孕分娩的孩子（SZ，22.-24. 5. 2010，S. 3）。94岁的莎莎·嘉宝（Zsa Zsa Gabor）想与她的丈夫再满足一次生育自己孩子的愿望——借助几十年前深冻的卵子和一个可能的便宜的代孕母亲（April 2011）。颇有争议的美国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坚信人类在Hylomatie（17章）方面又更进了一步。他报道说，通过把人造基因植入细胞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生产了人造生物体（SZ，21. 5.2010，S. 2）。

公众化的暴力语境。想找到一档有趣的节目来消磨时间，便不断地变换频道在寻找，却出现了谁也不愿相信的事实。2011年6月3日在18点05分到18点20分之间只能看到下列节目：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对父母在寻找他们消失的孩子，在一出侦探剧中有人因被下毒而死亡，夫妻离婚，一个病人在徒劳地寻找捐献器官，有人私自藏起了一个捡到的钱包，有人偷偷闯入英国皇宫，跑步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在近距离搏斗中使用了武器，一个透析女病人的痛苦，英国与德国海军在军舰上的战斗，一个患有强迫症的青少年，出血性大肠杆菌的传播以及用炸药捕鱼。这一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媒体正在向一切社会暴力致敬。

性启蒙教育的界限。一本题为“做爱”（Make Love）的性启蒙教材（Henning und Bremer-Olszewski，2012），由于引用了何治申（Heji Shin）所拍的许多照片，激起了公众的兴趣。这些照片展现了一对男女，全身裸露并已有了生殖器兴奋征象，在他们第一次性交往中就运用了各种不同的姿势。现实生活中的这对男女是自愿参加这一拍摄的。在该书的第243页也涉及色情制品这个主题：“在电影拍摄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新颖并正在蓬勃发展的趋向，这类影片会给人留下一种真实但又有私

密性的印象。”在边上写着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两句话：“我相信，人们彻底误解了性的解放。色情制品只会杀死性爱。”可悲的是：出版人员认为这本性启蒙书籍必须比色情产业更胜一筹；同样可悲的是：鉴于性和色情制品的普遍泛滥，如今的年轻人只剩下一些完全是自己个人性生活的秘密。当我看到这些性照片时，我不禁想起了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一句提示：“有多少次，我都带着一种悲伤怀念那些因为纯洁无辜而幸福的日子！无论什么都不能再使我们如同在我们的心还没被玷污、几乎还是个未成熟青少年的初恋时，所发出的那种因美好感受而莫名狂喜的喊叫。……如今即使是拥抱爱神，也不能使我们再回到那种纯真青春和纯洁心灵，那种迷恋的眼光和轻声的话语，以及被心爱之人的手轻轻一碰，幸福便充满了我们整个生命的那个时代。”（Gruber 1827：425 f）

反色情艺术。一个基督教（新教）牧师在美因茨-卡斯特尔（Mainz-Kastel）举办了一次带有色情内容的布道，尽管此举吸引了大量通常不参加布道礼拜仪式的教徒，但仍然证明了：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至今仍没有造就出一种色情的艺术。人们至多也就是掀掉遮盖身体的毛巾，或是谈论一些除了性交还是性交的话题（SZ，6. 8. 2012，S. 9 und FR，10. 1. 2013，S.F9）。

94 新型性理念的退化

如今有一种不容忽视的退化和去自由化的趋向，这里用性理念的退化至少表明了这种趋向发展的某些特征（也请见97章）。这些退化现象在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往往比德国更容易辨认些，但只要人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们也同样出现在我们这里了。无论是媒体对所谓血亲乱伦的报道，还是法律对卖淫的处罚，或是医学对那些不太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儿童的看法，到处都冒出了一些陈旧的偏见和道德学说。

以妇女的性和生殖自决权为例，国际知名的纽约历史学家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在一次报告中，运用已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例子，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种退化的存在。她用事实说明了世俗社会和宗教中那些反对妇女拥有自决权的人、团体以及国家，自世纪交替以来是怎样对妇女的这一自决权提出质疑或是严加限制的。与此同时，她还以一种特别的关注，发现了这些反对者的一些新尝试，比如“用残疾人的权利来弱化或剥夺妇女的权利，或是利用性革命所引发的人们对性的矛盾心理作为反对妇女自决权的工具”，她在这些尝试中首先发现了男人对新自由的恐惧，害怕这种新的自由会给妇女提供一种有效避孕的可能性。

达格玛·赫尔佐格得以证明，2002年，多数欧盟国家反对鼓励所有成员国堕胎合法化。因此即使在欧洲，“堕胎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特别是罗马天主教更是妇女自决权的最强硬的反对者，尽管近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丑闻，但它仍在这一领域里保留了强劲的政治影响力。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自许多国家在60年代以及美国在70年代将堕胎去刑事化以来，天主教不就是堕胎权最经常、最锲而不舍和最强大的反对者吗？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天主教反对堕胎的一贯性，那么我们就会忽略对妇女施加的压力中新近构成的要素和形式。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个新要素就是自90年代初以来，曾经的东欧国家对有着保守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宗教的再次复兴。但另一个要素，肯定是与刻意模仿以及与美国天主教徒和新教福音教徒的非常具体的合作有关，这些教徒们愿意看到欧洲人也能像他们那样把堕胎看做是一种‘婴儿屠杀’，即是对未出生的人的大屠杀。即使在西欧国家，自2000年以来反堕胎的动员也在日益递增，尤其是自2004和2005年以来”。

同时也应看到，欧洲各国间的宗教和政治多数派也总是一再意见极其相左或者说相去甚远。比如主要是天主教国家的葡萄牙在2007年通过了对堕胎的去刑事化，而同样主要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却在2010

年“对堕胎施行了比以前更加严厉的限制”。另外，其他一些主要是天主教徒的国家，如爱尔兰或波兰，“则几乎完全禁止堕胎”。戏剧性的是在“匈牙利的最新发展，根据最近修改的宪法，胎儿的‘生命’从卵子受精那一刻起就应当受到严格的保护”。堕胎的反对者经常不只是以宗教为由，而且也会陈述其非宗教的理由。比如2010年3月布鲁塞尔就曾有过一次“敬畏生命的游行”。梅赫伦-布鲁塞尔（Mecheln-Brüssel）的同性恋大主教是游行的支持者，该游行的组织者以“为女权主义争辩的方式”强调，女性自身就是“这种堕胎文化”的主要受害者。意大利有70%的医生在2010年声明，“他们是‘出于良心的堕胎拒绝者’，因而不会去实施堕胎手术，而在2003年只有58%的医生如此声明”。

《支持家庭》（*Pro Familia*）杂志的一次有关堕胎问题的特刊以对欧洲的许多详细调查为例，证实了达格玛·赫尔佐格的分析。绿党欧洲议会议员弗兰齐斯卡·布兰特纳（Franziska Brantner）2011年在一次与贡德尔·克布克（Gundel Köbke）的谈话中说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悲伤的结论：“反堕胎的游说者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所在地）不断增多，一些组织如‘欧洲尊严观察’（European Dignity Wattch）和‘世界青年联盟’（World Youth Alliance）都在按美国的那个模式工作，并组织得相当好。”德国的反堕胎者的人数虽然增长得不那么快，但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力量在增强。这就使人感到有些“诧异”，比如其实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下属的老年成员协会也可以借助同为下属的青年联盟的支持，发表一份《生命文化宣言》（Manifest Kulturdes Lebens）。《支持家庭》那份特刊的第二部分，对欧洲各国非常不同的获取先进避孕药（Claes，2011）、堕胎旅游（Fiala，2011）——比如波兰、列支敦士登和马耳他原则上禁止堕胎，以及费用支出（Thonke，2011）等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争取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SRGR）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简称：IPPF）的总干事长吉尔·格林（Gill Green，女）最后总结说（2011：15）：“我在有关堕胎问题的讨论中，观察到一种强烈地转向保守主义，甚至是原

教旨主义方向的态度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多与堕胎相关的决定都是由男人，尤其是那些已过了生育年龄的老年男人做出的。其结果是，女人至今仍然一如既往被剥夺了能够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

关于德国性犯罪的状况，丹妮拉·克利姆克（Deniela Klimke）和吕迪格·劳特曼在2006年就确认了在与性犯罪相关的意见和处罚中有一种明显严厉的趋向。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新自由主义伦理是决定“性犯罪刑法的思想基础”。他们借用了我曾说过的一句话“意义和道德只能来自市场”（Sigusch，2005a：147）说：“我们正是想要揭露性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这一点。”（同上：98）他们后来知道这是对我那句话的误解并消除了这一误解，这是后话（Sigusch，2006）。但克利姆克和劳特曼也引证了强化性犯罪惩罚的许多政治理由。比如政府企图通过加强对性犯罪的惩罚来转移人们对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或是为了在民族国家因遭受全球化冲击而变得孱弱的时代，显示自己操纵国家的能力。在冷战和旧意识形态结束之后，作为个人行为的性犯罪者填补了象征性敌人的空间。“我们的观点是，性犯罪非常适用于作为国家制裁机制的目标，因为这样既可以给政府的战略策略，也可以给私人生活形态中的问题，找到一个唯一的替罪羊。”（Klimke und Lautmann，2006：107）

除此之外，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对生活自主、自我管理以及严格自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通过“持久责任”的方式，把对生活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公民的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如同自我管理已成为对可自我承担责任的公民的一种普遍要求那样，对不屑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的道德蔑视”，不只是为了“帮助社会下层民众获得一种似乎有能力把握自己生活的自信”。这种使“偏离社会的离经叛道者成为自由野蛮人”的发展，“是以自相矛盾地通过性自我决定的理念”为思想前提的。比如通过我们先前已经描述过的共识道德（76章）的确立，同性恋者们就获得了许多新的自由，“而与此同时，针对其他社会问题的道德和司法绳索

则抽得更紧了”（同上：110ff）。

比新型性理念在欧洲的退化更糟糕的是其在美国的情况。达格玛·赫尔佐格（同上）因此说：“在美国，上百个当地和超区域的组织，推动着一种极有影响力和基础广泛的反堕胎运动，又想把堕胎抨击为一种犯罪。只要他们觉得还没有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这些活动者就施加无数种方法，使那些想堕胎的妇女无法前去堕胎。他们的策略多种多样：使用暴力、集会抗议、推动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条款、不断对各大媒体和在互联网上施加压力。因此他们的影响也就很可观：在最近的十年中，美国医院和医生施行堕胎手术的数字，都已急剧下降——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妇女经常必须开车几百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帮助实施堕胎的医生。那些主张堕胎权的政要们，也遭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在2008年，美国大多数公众自70年代以来第一次公开反对这一权利。”虽然统计的结果是47%的人反对堕胎权，47%的人赞同，但大多数人都赞同对这一权利加上严格的限制。

达格玛·赫尔佐格的分析表明，新型性理念的退化比人们通常的想象要严重许多。在美国不仅共和党人是充满激情的反堕胎者，而且民主党人也是。“而那些仍然赞同堕胎合法权利的人，则已经很没有安全感。整个与此相关的话语，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反转。已经没有人敢直言不讳地捍卫这一权利。在涉及性这个话题时，很多人都会表现出不知所措的不确定性。比如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地主张在学校里进行完整的性启蒙教育；到处都把禁欲教育作为第一要务。性和生育自决的倡导者，被挤到了被迫防守的境地。”

但这还不够。达格玛·赫尔佐格还叙述了，有多少实施堕胎的医生或是堕胎赞同者被谋杀，遭到死亡威胁，身体受到伤害，被扔炸弹或是被放火焚烧。至于“骚扰和尾随跟踪，光是记录在案的就有15万起。全国范围内还在实施堕胎的医生和护士都必须身着防弹衣，想去诊所或医

院堕胎的妇女都得忍受嘲笑蔑视穿过堵在门前的堕胎反对者人群。在美国的50个州中，只有16个州外加华盛顿联邦区，有法律保护医疗设施不被堵塞、不受干扰和暴力侵犯。最近一次是2009年5月31日，乔治·蒂勒医生（Dr. George Tiller）被枪杀，当时他正在堪萨斯州威奇托（Wichita，Kansas）他的教堂门口分发圣灵降临节祷告的歌词单。他曾经是美国少数几个最著名的在妊娠稍后阶段仍然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之一，如果孕妇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或是胎儿被证实是致命的异常的话”。尽管如此，那个著名的堕胎反对者，兰德尔·特里（Randall Terry），仍然感到很遗憾，没能把蒂勒医生扯上一个正规法庭进行公开审判。美国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正在设法通过一项能够把实施堕胎的医生告上法庭的法律条款，该州的这一设想，得到许多（也有来自其他州的）著名政治家的支持。另外，达格玛·赫尔佐格还报道了，美国联邦和其他个别的州，这期间特意颁布了上百部法律，就是“为了给妇女堕胎设置种种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有：设置等待时间、咨询目标，规定最后期限，禁止医疗保险公司承担堕胎费用，限制获取避孕药具，需要丈夫的准许或认可，医院有权拒绝实施堕胎（即使这种拒绝关及孕妇的生命危险），等等。还有就是“试图赋予胎儿以生存的法权”。

达格玛·赫尔佐格最后的结论是：今天的此种状况与70年代（即在堕胎即将合法化之前）的情况，有着“几个光年”的距离。那时有64%的美国民众（其中包括56%的天主教徒）要求，“允许做出堕胎决定的，应当只是妇女自己和她们的医生”。除此之外，当时共和党人（有68%）比民主党人（59%）更主张，“堕胎只是妇女和她们医生的事”。

令人很感兴趣的还有：第二次性革命时期的西方国家，运用宗教和神学的论据为堕胎的权利做了令人信服的辩护，这些辩护者中有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也有神学家和为此努力的非神学家。针对这样的情况，达格玛·赫尔佐格（同上）说：“其中的一个论据就是，在非常复杂

并且家庭与工作交织在一起的女性的具体生活，比只是靠抽象原则的‘生活’，应当有更多的道德优先权。并且必须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妇女的健康，其中也包括她的心理健康和她的家人的健康。”毕竟只有出于女性自愿的生育，才属于人性化的生活质量。家庭和生育计划是我们的一项道德责任，也是感恩上帝赐予我们生命的一种最好的报答。

有些神学家认为没有人有剥夺胚胎生命的权利。一个婴儿必须“像呼吸和饮食”那样被接受和认可。更多神学家则强调胚胎或胎儿早期与胎儿晚期的区别。英国圣公会教（Britische Anglikaner）认为胚胎“还是一个未成形的人体组织”，并且质疑是否已经能够“把一个胚胎说成是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堕胎不是谋杀。瑞士基督教（新教）牧师，久洛·巴克萨（Gyula Barczay）解释说，在怀孕的初期，是有着那么一点“生物意义上的什么”，但“这个什么还不是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比较1967），因此不允许这个生物意义上的一点什么或是这种可能性，高于一个活生生的妇女。“但是，巴克萨走得更远，他翻转了整个有关堕胎问题的话语讨论，他不仅仅只是想强调，决定堕胎的女人，绝不是不道德或有过错的，更不是谋杀者，他还想强调，真实的不道德，真正背叛上帝的，是反堕胎权的那些人。”他认为，这些人坚守的“每一次怀孕都必须最后直到分娩”的信条，是纯粹的生物中心主义（Biologismus），“这里面没有丝毫基督教宗教的内容”。此外，巴克萨还认为，反堕胎者对上帝的解读，是亵渎上帝的，似乎上帝规定了一条“生育强制”，更糟糕的是如果人们恰恰生活在一个既不关心男女避孕也不关注性启蒙教育的社会里，并且这也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要是把上帝说成是所有人的好父亲，那么无疑就是把一切强奸、失误或技术故障的责任都推给了上帝。

自以为非常自由的西方社会，虽然已经过了几次性革命，但是妇女争取性和生育自决权的斗争，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获得完全的胜利。这一斗争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下去，直到每个妇女（凭借社会心理的支持）

能够完全自己独立决定，究竟是想把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受精卵孕育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一个自己期望和心爱的孩子呢，还是不想。

95 新型与早期的性欲性行为

我之所以运用“一种新性革命和一种新型性欲与性行为”这样的表述，是我认为从第一层面的角度来看，原先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已不再完全适用或有效了。近几十年来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对老的性和性别模式所进行的转码、重估和转型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这便要求我们必须对此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重新思考，但是我们如果还是借助形成于1900年左右的那些老理论，显然也就不能再充分理解当今社会的爱情和性生活了。

早期形态的性欲和性行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本能、不经过头脑、只要求他人忠诚、固定不变、划一化、以性器官和性交媾为主、为了生育孩子、只认同自我、对他人的理解常常是充满冲突和病态、意识形态式地以上帝和自然意愿为借口、永远都是按“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的模式行事。与此相比，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则是易逝（也请比较Baumann对这一点的赞同，2003）、灵活、多形式、注重快感、短暂、主要由头脑操作、比较算计和不受形式限制、有性但同时又是非性、不只是自我认同、固执、不以生育孩子为全部目标、有着健康的自我理解和与他人几乎没有什么冲突、意识形态上是新自由主义、比较赞同所谓的局部本能和自慰、自律和自我优化的。所以我以“精益的性欲和性行为”，以“自我实现的性”和“自我性别认同”等范畴来表述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从福特时代革命者的爱神，演变为有着后福特主义精益生产特征的精益性欲性行为。新性革命的普遍模式也可表述为有着自律和自我优化特征的自我实现的性。这适合极其自然地跳过医学和心理学实现性的自我实践，也适合围绕预告可以最终解离性恐惧与性欲性行为增强性能力药物的话语噪音，以便能够建构和展示一种可自我调节的新设计或新技

术型的性。一种新的（在迄今为止的性分析范畴中被称为多边形性变态的）多元性取向的性表象，取代了原先只关注性器官的性表象。但是不必担心，大多数人仍然沉溺于旧的表象。我之所以使用“表象”这一表述，也是想以此揭示：新型性理念者，其实还主要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真实地去改变自己切身的性实践。

早期形态的性欲和性行为，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男人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如：把男人看成是蒸汽机般的性动力，正派的女人多少都有些性冷淡；在多少总是有些神圣的婚姻中，在蒙面的裸体以及交媾时的“公山羊体位”中，射精作为被公认的性高潮点；在青春期发育、性启蒙教育、避孕和堕胎等一些问题上，男人总是处在一种有利的优势地位，女人则总是处于一种劣势。在今天70岁左右那些人的父母中，通常都是由家中的那个男人来决定什么是与性相关的事宜。绝大多数女人都还没能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性身份认同。今天70岁那一代人自己，在成长时经历了20世纪的第二次妄想，即不顾普遍不自由的生活关系，人们仍然能够获得在性欲和性行为方面的解放。如今的年轻人，则更看重男女相当平等的伴侣式关系，在许多与情欲和性相关的事情上，由女方做出最后的定夺也并不少见。无论如何，对如今的年轻人，即使是年轻的男人来说，性欲和性行为已不再像1968那个年代时那么极其重要，如今已成为生活中的一种正常意愿和行为，也就是说，人们也可以放弃它，从事一些其他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事情。

早期与新型性理念的差异开始于，性器官在早期的性欲性行为中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新型的性理念则认为只关注于性器官的性欲和性行为，就像一把由麦秆点燃的火焰，燃烧过后便普遍会出现一个热情逐渐消失淡而无味的平庸化进程。当资本主义平庸化以后，它的性理念以及与此理念相关的性欲和性行为也随之变得平庸。迄今为止的性形态给出的最大平庸化冲击是新性革命，新性革命通过性的去象征化、去情感化，以及理智化、商业化、弥散化和多元化等过程，使人的

性欲和性行为拥有了一些文化的不言而喻性，如同现代人搬迁居所和文雅礼貌、开车和玩电脑。性欲性行为在今天，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再被高估为激情奋发、迷醉疯狂和僭越占有的伟大隐喻或象征。一份大报刚刚报道了一则消息：在今天必须至少有40年的时间与一头大象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赢得这头大象对自己的注意。如果说，传统的性欲和性行为往往被看做是对情感和行为的一种戏剧性甚至欣喜若狂的体验，那么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则被作为一种愉快的消遣而去戏剧化了。这是马丁·丹内克尔曾经做出过的社会诊断，并且当今新生代的性学家们也撰写了有着相同诊断的论文。“性，很无聊”，米歇尔·福柯1983年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关于自我技术和这一类的问题”（Foucaultu. a. 1993a：8），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一类”，就是指那些被新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变态行为”臭名声的行为。

如果说，以往的性道德领域是被政治化的，那么现在则是被个人化了。如果说，早期的性欲和性行为是与解放全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联结在一起的，那么如今新型的性欲性行为则被具体化和计算化地引进了市场社会，或是巧妙地不受多少干扰地存在于社会的边缘，而正是后福特主义的自由化为当今社会的经济化和一种大众消费提供了可能。在第一次性革命中“性欲快感”曾经是认可越轨的性行为和解除性禁令的可能性条件，第二次性革命的“性趣”仍会令人联想起第一次性革命的“性欲快感”，但如今却出现了第三次性革命的“幸福愿望和追求幸福感的欲望”：只希望没有任何负面压力地去寻找一次性冒险，否则宁可喝着气泡酒（Prosecco）在互联网上去穿越那些假象的性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性理念者就不去寻找刺激和快感——他们的公共游行就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寻找放松神经和良好的自我感觉时，会不顾因为自己的性欲和性行为可能会带出或引发的疾病、心理创伤或暴力等不良后果——事实是他们会非常顾及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新型性革命不只是打开了新的自由空间，它同时也设置了新的强制，比如在互联网上的揭发和人肉搜索。

在总体上，当今前后几代人的生活前景和生活关系都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如果说，人们在以前还有个终身稳定并伴有可靠升迁阶梯的工作，那么今天所能得到的大多是一些无报酬的实习、每星期只干几个小时的微型工作（Minijobs），或只是某个项目持续期间的工作合同，主要都是些不稳定的工作关系。一方面，今天的年轻人能够为自己做出一切决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完全信任什么，无论如何不敢轻易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而不是变坏。越来越多的人完全生活在孤独寂寞中，与社会隔离，即使生活在一幢住了许多家庭的公寓楼里也是如此。再也没有一个安全可信任之处，不管是政党、议会、工会、保险公司还是银行。如果说以前是按一个人的出身、职业状况等来划分归类，那么今天就必须真实地自动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形象与声誉。如果说，以前有着一种明确的阶层等级距离，今天则是合作、网络和团队工作。如果说，以前曾经显然由看不见的手在明确地操纵市场法则，那么如今则是一种没有任何道德、充塞着投机泡沫的混乱在统治着我们。如果说，以前人们还能相信一些普遍被认可的理论，那么今天则有无数的意见和所谓的金融专家，而这类金融专家与科学的关系就像那些算命女人与科学的关系，并且他们还被称为经济“大师”。

但在另一方面，18世纪欧洲人就已有了的一种有关整个人生的知识，在今天还能出现在一份正规的报纸上。试想一下，这竟然是在一个自然科学知识每十年就翻番的年代。无论是谁，他今天中午12点在法兰克福（美因茨）市中心的策尔街（Zeilstraβe）见到的那么多行人，我们生活在17世纪的祖先即使想看见，一辈子也看不到这么多的人。如果说，以前的固定仪式和责任，也为爱情关系提供了安全和安宁，那么今天连心脏都跳得不那么有规律，要是一个人被自我压垮的话。既然在一个离婚和（没血缘关系的）混合家庭的时代，即使婚姻也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居所，不再是可以相互扶持一生“直到死亡才让你们分离”，那么还剩下的可作为拯救的只能是与自己的关系，那种隐藏在自身中的安全感。宗教已不再是许多人整个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成了消磨

休闲时间的一种方式，以致在商务活动中，人们已不再必须把宗教的理念作为自己的行动规则。除此之外，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也已不再相信“最后的审判”，因此也就不再觉得要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过错承担什么责任。这就为欺骗和投机、谋杀和凶杀敞开了大门。如果说，以前一切都很明确，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今天则常常需要人们自己做出决定，什么是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如果说，以前一切都很明了，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那么在今天，可做的和不可做的常常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以前如果人们自己想知道些什么，必须在图书馆里费力地寻找，并且前提是如果根本能够找到的话，如今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在网上找一下就行。如果说，以前的羞耻和说谎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行为，那么今天则越来越成为为他人感到羞耻和出于义务的谎言之间的一种混合。如果说以前能够明确分辨已婚妇女和未婚的女士小姐、已婚的丈夫和未婚青年的话，今天的这类关系和区别已变得极为复杂，并且这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与性相关的领域里。如果说，性在以前经常是一种袭击人的本能冲动式的需要，那么在今天这种需要则通过经常性的实验和设计，已只是一个项目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年轻人相当自信地游离在对爱情关系的非戏剧性忠诚和充满惊险的戏剧化事件之间。他们穿越在一个接一个的迪斯科舞厅之间，总是在途中，但常常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因为迪斯科舞厅的看门人不让他们进去，就是进去后没人对他们感兴趣。所有人都可以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但许多人完全体验不到这一点。在下个星期的周末，一切又重新开始如此这样再试一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当前的确切数据是95%——发生在固定关系中（83、91章）。只有极小一部分出现在固定关系以外的关系中。充满激情的性革命！我们常会猜测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淫乱（出轨）关系，但调查数据证实，在正常的人群中，出轨或淫乱只是一些个别现象。当今年轻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普遍现象是追求更多的幸福快乐感，较少性欲快感。这种幸福快乐感，如之前已经提及的，是自我优化和自律的，鉴于它的内在有着一种

较高的利己主义组成部分，也可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这也适用于近几十年来极大提升自慰的社会和心理意义这一事实（92章）。自慰作为唯一一种可以自我完成的性实践，它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不仅从一种被讽刺和受迫害的性行为发展为一种受男人和女人称赞的自我的性实践，并且也因为已成为多数人的实践而在数量上赢得了重要意义。但爱情仍然高于一切其他的性动机（98章）。它即使被物化了，也仍然是一种具有唯一性的珍宝，因为它既不能被复制（再生产），也不能被购买。它比一切性模式都更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新型性革命进程中的多样化强制，以自身证明了：新型性革命不仅带来了一种变化，而且同样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延续或传承。

长久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都向我宣讲，男人是第一性别，女人只是增加到性别模式中去的第二性别（9章）。只要回想一下我们语言中的fe*male*和wo*man*，以及表示“壮丽、美妙”的是*herr*lich（herr在德语中表示“先生”或“男人”——译者注），与此相对表示“愚蠢”的是*däm*lich（däm来自Dame，表示“女士”或“女人”——译者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文化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翻转这一陈旧的性别关系，把女性看成是最早的第一性别，而男性则已经是一种正在从生物意义上消失的性别。从多种角度，其中也包括从一种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观点或立场当然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几乎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沉淀着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这样一种潜意识并且也会这样表现出来，完全独立于其父母是否在其童年时代真正与其一起生活过。因此，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双性恋的心理基础，这里的“性恋”特指对同性的性吸引力：妇女在心理上也有那么一些“男性化”，而男人则有那么一些“女性化”。如果我们能够摆脱生理上两种性别的差异及其影响的狭隘视野，正确评估心理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影响，那么就能够理解有些女人可能比男人更男人和有些男人则会比女人更女人等现象的根基，并不是从外部强加上去的。因此自然也就能够理解，沉淀在深层心理中的性别意识，打破了生理解剖意义上和社会文化意义上对两种性别非此即彼的

划分，并且由男性和女性这两种生理性别演变为两性兼有的性别、改变了原有性别的性别以及新近出现的流动态性别，然后进而构成多少已不再那么明显的新性别。

一方面，男女这两种性别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两种大的文化性别被加上一种差异化的程序；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如实证式性研究只是在近几十年才开始描述的状况，即这两种大的文化性别正处在一种日益近似的进程中。不完全与此章不相关的题外话是：冈特·施密特和我，在我们共同进行的实证研究时期，都曾以两性“先验平等”这一理念作为我们研究的基本意识形态，因此如果从统计数字来看，我们当时提出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我们当然为此感到高兴；而在当时，曾令我们像王子那般高兴的是：我们用自己的实验反驳了金赛关于“女性对于来自外部的性刺激比男性要迟钝得多，或是说完全不如男性那样容易激起性兴奋”的假设；我们给用自己的实验结果写成的论文，起了一个凯旋式的标题“女性性兴奋”（Woman’s sexual arousal）。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认真看待那些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在专业实验中观察到的事实，就会认同已经有许多事实证实了女性正在日益相似于男性的这样一种趋向，反之亦然。并且不再需要某个大学教授再来对这样的事实加以确认。

姑娘们今天在学校里通常比男孩表现得更好，更早地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在一种关系中也更自主地决定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宜。越来越多的年轻新型女性在私人生活中如此自信地要求性满足，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如此有能力贯彻自己的主张，并且暴力倾向是如此强烈，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是在男性身上可以想象的那一切。不少年轻女性如今也经常会像男人那样地外向、犀利、坚定和迈出大胆的步伐，以致人们必须在看第二眼时才能认出这是个女孩。她们开摩托车、抢劫银行，也会在大街上抢夺老年妇女的财物。这正适合男人的笑话：“以前如果一个男人找到一个姑娘，就会说她像她母亲那样会做饭，现在如果找到一个姑娘，就

会说她像她父亲那样能喝酒。”但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新型男人，在性关系上如此愿意等待、在私人生活中是如此情感丰富和温顺，这都是些迄今为止一直被认定为是女性的特征。他们不再主要是阳刚、大胆和勇敢，而且也有那么一点女性化、冷静、灵活、被动，也会有哀伤和失误，表现出自己的弱项，请求帮助，比以前的男人更加温顺和女性化。新型男人愿意照看孩子，站在分娩的妻子身边一起等待孩子的到来，给孩子换尿布、穿衣、洗澡、购物。他们在今天应当和希望自己拥有一切现代男人的特性，如：能够被爱和有能力去爱，自主但又被保护，富有同情心，有能力与人建立关系，关心他人，但也能冷静计算自己的利益，善良和有能力贯彻自己的主张，能说会道，能够克制或调解自己的情绪，有所成就，等等。

但就总体而言，男人对自己特性的认同仍然还是脆弱和相当呆板的，因为他们的那些特性主要是在他们的生命中第一次与一个女人（即母亲）脱离了关系后才得以形成的；而正是这个女人在自己的体内孕育了这些未来的男人，并伴随着她对这些未来男人的生育、抚育、亲吻、照顾，也就唤醒和编码了他们的一切感官感受，从身体接触到身体体味。现在却要求男人应当有男人的特性，强大而可靠，强硬地攫取和给予，并且一下子没有了原先那个生育他、喂养他和让他依偎的母亲。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进行了比男性要广泛得多的反思和研究，相比之下，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至今仍如同一个黑暗的大陆。但是由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沿着重男轻女的指令在前行，历史要求更多的阳刚（more masculino），因此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发展主要是越来越相似于男性的。但是感谢性革命，也出现了相反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男性色情的性吸引力日益女性化的方向，即以往一直被忽视和普遍被压抑的男性身体力比多的商品美学的发现，以及社会对它的物化。现在的年轻男人不仅只是有一个阳具，而且也像女人那样有

了一个“性化”的身体，可以在互联网开设的网站上，享受身体与性别的互换。当今的那些大都会美男子（44章）则在公众面前展现，年轻男人的新型身体上怎样通过更多的女性化而创建出一种新的性别。如果这样的状况延续下去，他们也会在某一天不由自主地打开性别和性欲性行为的真实内核，让公众观看和分享，这正是那些激进的性别女权主义者不太愿意看到而自私的全能者（男人）又无法看到的内核（96章）。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趋向近似化，另一方面是趋向差异化。这两个过程都在自身内含着矛盾。两种原本不同性别的完全近似，它们之间的混乱和不明确，便意味着父权制的死亡。但是与此同时，性别差异间的整个平衡却在竭力使自己彻底地社会化，把资本运动的格言变为现实，按此格言：一切都是有效用的，只要是有利用（出卖）价值的；其实资本从来都无所谓，各性别间存在着哪些差异，哪个性别在从事什么工作，大多数妇女是否有过性高潮，夫妻（或伴侣）是怎样在一起生活的，或他们是否能够在一起生活，等等。这一切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人的生活，对资本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所谓的。对于一个按单一化和联合原则运转的社会形态来说，也就是对于一个有着共同表象，内里却充满了个体相互对抗的社会来说，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孤独的却又被普遍化了。

在最近几十年的性别变化运动中，能够轻易地看到上述这两种情况。男女这两种大的文化性别在愿望、意见和行为上越来越相似，但是男女之间公正的鸿沟并没有因此被填平。与男人相比，社会对女人的歧视，仍是没有被消除的一种令人可哭泣的不公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甚至不能够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功能主义。在这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有：不平等的职业升迁机会，同工不同酬，并且男人们依然一如既往把大多数的家务和照料孩子的事情推给妇女，即使他们的妻子与他们一样从事着一份全职的工作——最新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性别相似性的界限，也在成千上万的日常生活事件中得以证实。文化的普遍行为类型模式是怎样规定着人们的性行为，比如可以从任何一次性交往的开始立刻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有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真的翻转了原有的行为规则类型模式，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在企业或娱乐场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并且双方都想开始一种交往，但是这时如果不是这位男士去观察这位女士的外貌和行为的同时，评价这位女士的身材、胸部的大小、腿的长短、服饰、发型、化妆、使用的香水，评判是否愿意与自己交往，而是这位女士直接走到那位男士的面前，明确地向他表白，恭维他，评判他的臀部、发式、他的剃须水香味、他的反应，甚至直接用手去抚摸他。这样的场景作为电视小品，会让许多人笑得前仰后合，但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在今天，绝大多数男人仍会认为这个女人太女权化太迫不及待了，会感觉非常不舒服，甚至会转身就走，或是被恐惧淹没，完全感受不到由那个女人所想激起的性刺激和性兴奋。

除此之外，对一切也提出道德有效性要求的话语讨论，应当估计到它们的谬误和盲点，即使这些谬误和盲点并没有造成什么现实的后果。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曾对新性革命的内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关于性别的话语讨论：一些女权主义者曾想让整个社会都变得“女性化”，因为与男人相反，只有女人才有能力建立和维持一种社会或生活关系。但是她们没有认识到，关系（或相互依存关系或相互交流）其实是一个新系统的整体，这种整体在以前被我们称为有着内在联系的综合。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则希望以有着“原始的女性特质”或是“平和女人的特质”等优秀的女性特质来取代优秀的男性特质。但事实上这却是二元律式的“上或下”、“有价值或无价值”、“有用或无用”等非此即彼的低级思维，因此也不过是对既定状况做了一种翻转和倒置。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自治”，但是她们忽略了：男人与女人的结合，尽管有着一切难点，但从人类历史和人的心理与性来看，却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另外，综合所有不同性别的特质，对性科学来说，意味着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虽然这还并不是原有认识论立场的终结。哥白尼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自那时起，我们把这样一场根本改变世界图像的转变称为哥白尼革命。仅仅是在20世纪末出现的那场关于性别的话语讨论，便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双倍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不再是男人，而是女人站立在一种性关系的中心；不再是性的活动，而是性别成为一种生活关系的重点。如果一位性学家陈述自己的性别理论（通常很少是充分的），那么他的话语就会略过这些变革，如同赖穆特·赖歇（1990）所做的那样。在生殖技术早就把老的性医学远远抛在后面的今天，性科学却正面临着丢失性别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威胁。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丢失，那么性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会减少一半还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性科学才这么绝望地抓住变性这个问题不放。但是在这个领域，其实早就有了来自文化、社会和文学方面的令人很感兴趣的思考。如果性科学不想不做任何努力地阻止自己的学科走向历史的终结，必须最先向自己和那些女性的性别理论家们合理地解释清楚，为什么性别就不可以没有性的活动独立存在，为什么性活动就不可以没有性别而独立实施，并思考其后果。

从对性别和代际传统障碍的跨越，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传统家庭的萎缩和递减到小型的核心家庭并直至只有一个人组成的最小型家庭（据统计，2012年这类最小型家庭占全德国家庭比例的41%）的演变中，都能看出躲藏在这些理想生活方式背后的控制、依赖和孤独家庭关系的新形态。好像有一种规范化的混乱在操纵着我们，允许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按自己的愿望去过自己的生活。但事实上，这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黑格尔曾经向我们描述过这是一个从“自由的不自由”转变为“不自由的自由”的过程，是一个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强制重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的间接的控制取代了原先外在的和直接的控制，这便使人们觉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压抑，因为这种控制已成为他们自我的一部分。通过本能式的性活动被日益有意识地理性化，并因而日益

失去了它非理性的特质，其原先难以描述和难以确定的本能冲动因此也就变得似乎可以算计。事实也是如此，今天的人们会以清晰的理解和清醒的头脑来思考那些总是能让自己感到激动的事情，从自我选择的非性或5分钟匆匆完毕的性事到不带有性欲和性行为但充满感情的终身伴侣关系。

这一切看上去可能非常美好，如果我们回想起过去时代的虚伪和霉味，并与今天的状况相比较的话。但终有一天，被我们有意识抑制和拒绝的那些愿望和欲望会爆发出来。今天的生活方式就会因此而证实自己的局部性、拒绝性和压抑性。那么那些普遍存在的性和性别的苦难（这里绝没有过分夸大），又会重新进入到人们的意识里。这些苦难并不仅仅是些无谓的多愁善感，如果我们以这些愿望和欲望似乎没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为由，去反对它们，那么只是运用了没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只能是践踏成堆的尸体前行直到只留下一些尸骨而使自己名誉扫地，因此也就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达到最初的目的。

我们今天可能建立的关系与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相比较，当然也包括了一些今天特有的便利和难点。一方面，它展现了之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众多的选择和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它经常又明显地让人承受比以往更多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即使是看上去比较轻易就能建立的混合家庭也不能否认：不是出于生存理由的离婚会给所有的当事者造成多么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儿童来说，从今往后就必须在两个家庭或家庭的剩余人员之间不断地来回奔波，或是在一个新的家庭里遭受情感上的忽视。形成于传统习俗、出身和家庭的那些老的确定性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体，如今要求每个人都应当灵活并能按市场规则算计和行动。原则上，只有那些明显有着理性和经济意义的事和人才会被看重。我们已经变得只想拥有和消费，不愿赠予和反思。

在这个新性革命的时代，现在让我们来深入观察一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翻阅赠送的报纸（大都是些刊登地区性新闻和广告的免费报纸——译者注）时发现，如今的人们（男人和女人）几乎什么事都能作为广告刊登出来：一对“很性感的伴侣”，寻找“某个‘他’来观看他们的性活动”；一个29岁女性与她的母亲一起寻找一个“身材健美、有魅力和性感的男人，以便一起度过一些同样美好的时光”；一个72岁仍然还“热血沸腾的女人”，寻找“性感和充满色情的持续关系”；两个“和善又漂亮的男人，6岁和48岁”，希望能有一个“有爱、幽默和苗条的女人”；一个坐轮椅的54岁男人，为他34岁的妻子寻找“一个爱的伴侣，一个能够宠她和为她做一切的男人。我经济富裕，一幢带有别门独户公寓的房子已经在等着您”；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内容。其他一些更微妙或更罕见的性偏好，比如那些所谓的“截肢崇拜者”（Amelotatisten），即通过截肢获得性刺激和性兴奋的那些人，如今主要出现在互联网上。

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还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这也可以举出一些相应的例子：一个正在迈向50岁的成功女商人，在一幢高楼里有着一套公寓，里面住的是一个比她年轻30岁、锻炼有素、体魄强健的俄罗斯男人，如果她有性的需要并且她的时间也允许的话，她就会去那里享受他的性服务。一个女牧师与她那位已经官方登记的同性恋伴侣公开地生活在自己的教区里。年轻女人作为穿越“湿地”（Feuchtgebiete，“性区域”的代名词——译者注）的“阿尔法女孩”（Alphamädchen，自信并支配他人的女子——译者注）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庆祝所谓的色情女权主义。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地区，性施虐和受虐人群，组建了一个“牧羊犬自助团体（全湿了）”。一个66岁的男人，已有35年的婚史、爱他的太太和三个共同的孩子，但33年来一直有一个比他略为年轻的男友，保持着大约每星期一次的性关系，他的那位男友自认是同性恋者；他的妻子认识并喜爱自己丈夫的这位同性恋男友，对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说，丈夫或父亲的这位同性恋男友属于他们这个家庭。有个年轻的男人只有通过分离出来的女人唾沫才能获得性刺激和性兴奋，但是由于女性

通常几乎并不乱吐唾沫，他就专门到足球场从那些正在踢足球的女球员那里采集她们吐出的唾沫，然后拿回家独自享受由此获得的性兴奋。球场上的人都认可他的行为，已经把他看成是这个球场的人了。一个中年男人有时会让自己享受一下“性挤压”（sexuelles Squashing），他会花费250欧元让一个300公斤重的女人压在他身上，如他自己所说，他消失在她的身下，却有了一种如同“吸毒品的感觉”。一个18岁的姑娘为挣钱在电视摄像机前手淫，以便让那些健康的男人获得快感。一位颇有职业成就的女律师，兼职于一家SM工作室，在一次电视秀节目中，冷静地说自己看来很好地保持了乐趣与挣钱之间的平衡，但她的爱只给予她的那条腊肠犬；她说，只是因为“动物不会让我失望”。

究竟怎样的性欲和性行为才是新型的？也许正如一个讽刺剧所表演的那样：那个28岁的利奥（Leo）与他的继母睡在一起了。这时，那个25岁的安雅（Anja）就说，我也是。这时又冒出来一个18岁的卡拉（Carla）问，我是那位继母吗？也许是近年来显然是受媒体和互联网论坛的影响，喜欢上了某些罕见性偏好的那些人。也许是确信自己爱上了某个物件（而这些物件在所谓的正常人看来无非是些没有生命的死物，比如一件乐器、一扇汽车门、一台机器、一幢建筑物等），如今被称为“以物体为性对象者”或是干脆被称为“恋物癖”的那些人。也许无性恋者才是地道的新型性者。可以肯定的是，新性革命主要打破了人们对不寻常性偏好的歧视。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新性联盟和新型性别，都可以说是当今社会媒体失控、社会消失和经济失调附带出的衍生品。我们也就因此会惊奇地发现，曾经神圣和不神圣的三位一体——异性恋、同性恋和性变态的一种不成比例的抽屉等级式的结构，如今越来越分解为无数不同的、没有等级规则的性偏好。以往为道德和社会所认可的关系与生活模式，终于被现实生活和理论所证实，这类模式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还经常是由文化所构造。因此它的不可改变性，只是我们对客体定位的一种主观假象。

作为性医学者和性治疗师，我想应当允许我对性欲倒错与性变态两者之间的关系再说上几句。一些面向高水准的科学普及书籍，比如英国女科学家苏西·高德生（Suzi Godson）2003年所写的那本《性书》（*Das Buch vom Sex*），将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性活动，比如：独自一人进行的性活动（自慰），阴道、肛门和用假阳具的交媾，口交，舔肛门，对G点或前列腺的刺激，等等。其次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性活动，比如色情制品，为钱做爱，恋物，虐恋（施虐和受虐），鞭打，群体性交，配偶交换等。第三个层面可称为“极限运动”，比如以粪便、尿液、乳汁（Laktaphilie）或呕吐物（Emetophilie）进行的性游戏，以及“幼儿病”（即在性想象中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幼儿——译者注）和恋物癖。性活动的第四个层面则更有些特殊性，比如慕残癖（Akrotomophilie）或通过截肢而获得性兴奋的截肢癖（Amelotatismus），故意给自己制造一种在汽车里几乎窒息感觉的汽车窒息癖（Autoasphyxie），只有想象或真实观察自己的伴侣与他人性交的场面才能激起性兴奋的窥性交癖（Candaulismus），喜欢观看他人在汽车里性交的窥车震癖（Dogging），弯身吸吮（比如用一个吸管）遗在阴道里的精液者（Felching），爱吃鼻屎的恋鼻屎者（Mukophagie），只有通过某种气味才能获得性兴奋的恋气味癖（Osmolagnie），在公共场合私下（比如通过裤子口袋的一个洞）进行的手淫癖（Sakrofrikose），用食物（比如把黄瓜、蜂蜜或煮熟的鸡蛋塞进肛门）进行的性游戏（Sitophilie），通过玩弄毛发或阴毛（比如秘密剪发或剃掉阴毛）而获得性兴奋的恋毛发癖（Trichophilie），拉链式快速性交（即拉开拉链立刻进行的性活动，不需脱光全身的衣服），等等。简而言之，克拉夫-埃宾和约翰·曼尼会因此感到高兴。后来至少由不健忘的埃伯哈德·朔尔施（1975）提到的曾经轰动一时的剪辫癖好，也出现在了恋毛发癖的形态中了。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变态行为都没有被丢失。尽管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但是那些古老的变态行为似乎都以这一种或另一种

形式存活了下来。它们被转换为多少有些怪异，但绝不是病态或值得道德质疑的个人性偏好，从而丰富了正常的性生活。其中有些行为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为话语讨论所接纳，并被重新建构为正常和独特的情欲乐趣。这样的情况近几年尤其是出现在对传统的施虐和受虐行为的看法上（69章）。这类转换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传统所说的那些部分本能冲动的变态以及性欲倒错，现在被建构和表述为正常的性欲和性行为，以致不会太不符合通常的社会规范，尽管这些性行为表现得比较怪异和离奇（70章）。还剩下的其他一些变态，仍然不得不被我们看成是病态和（或）有治疗需要的：首先是那些比较倾向于性上瘾的行为（72章），以及很少出于性本能冲动或与性甚至毫不相干的，并且社会无法接受的违法犯罪和暴力行为（请比较：Berner，2005，2011；Berner et al.，2007a und b；Briken et al.，2005，2006，2007；Reiche，2007a；Sigusch，2002，2005a，2005d，2007a）。

尽管一如既往，异性恋规范仍是我们主要的性恋模式，但我们的“时代精神”已不再只是单一的异性恋或是同性恋或是双性恋，不再单一地只是男性或女性，而是“多元化”的性和性取向。早期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可称为普遍的性欲和性行为，曾经和现在都是一种有着异性恋和男性中心主义规范的建构。对于多元形式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也可以概括为单人的多元性欲和性行为）已经不再有规范的效用——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盼望已久的解放。多元的性欲和性行为，是社会和文化灵活化、多元化、多样化和形态改变进程的结果。它在目前主要还只是由关于性和性别可能形态的想象构成，大多数人还不敢在生活中真正将它付诸实施，当然就更别提那些“性复古者”了。记者马克·辛普森（Mark Simpson）用“性复古者”来称呼那些与都市美男型足球运动员大卫·贝克汉姆相反的男人，也就是传统的脚着臭靴子的男人，但也不是被美国人称为“超性”的现代男人，虽然“超性”这一表述在这里是想表示像博诺（Bono，本名保罗·大卫·休森，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主唱兼旋律吉他手和乐队歌词写手——译者注）和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这类现实生活中男人的优点（请比较比如Newman，2005）。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想再被固定在预先制定的情感、角色或甚至性别身份认同的模板上。对这些人来说，单一的、非此即彼的性别，臭小子行为和同性恋等模式已经过时。多元性取向者组织有自己特色的派对，比如在法兰克福（美因茨），想混合各种亚文化，抱怨异性恋和自然性别主义者强势的主导地位，希望“自然性别的姑娘与改变性别的姑娘，穿着男性服装的女性与有着女同倾向的青年男人以及有着男同倾向的姑娘们”，能够一起开始些什么，并强调：作为多元性取向者的我们，就是生活在不断的变动中，与自己和与他人，但决不挖掘战壕与他人战斗（www.copyriot.com/diskus/06-1/polysex-disko.htm；accessed 17. 10.2011）。

就某种意义来说，存在着类似金融投机泡沫那样的一种新性泡沫。新性的许多现象都摇摆在出现意义上的兴起和苍白意义上的衰退之间。我们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客观精神现在想拥有一切：建立伴侣关系和出轨，自主和受制于他人。它如同它自身的外化（制作品）都是千变万化和假象化的。一方面是都市型俊男靓女，另一方面是性复古者；这里是性创新者，那里是道德女神；今天是同性恋和后色情，明天是轮奸、一次付费项目全包的妓院和多元之爱。但无论如何是便宜的性、超性、多性、后性、无性、单性、泛性和多元性爱。可能自然性别的姑娘与改变性别的姑娘，穿着男性服装的女性与有着女同倾向的青年男人以及有着男同倾向的姑娘们再加上那些吸毒者和施虐受虐切换者，一起从咖啡“肛门”前往“生殖器和性交”咖啡。但最终，还是只有自然性别者能够心安理得地确信：我们一如既往，终究还是那绝对的多数。

近几十年来，那位颇有影响和著名的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他曾多次就我的这些论点与我进行争辩，但大多还是赞同我的观点），试图这样来说明新性理念的历史意义：“如果奥德修斯（Odysseus）只有被绑在桅杆上才能抵抗住危及他作为主体的那些诱

惑，如果他的形象能够帮助批判理论成为市民阶层作为社会主体的一种标志，并且如果辩证法能够服务于启蒙教育（比较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58-99），那么似乎这期间被松了绑的奥德修斯就成了全部主体遭受缓刑的一种象征”（Haug，2000：236）。并且他在后面又加上了几句：“但对主体的苛求并没有因此减少或消失，而是恰恰相反，苛求的强度和密度都在大幅度递增。这就似乎不仅是奥德修斯被从桅杆上松绑解下了，而且他的同伴们的耳朵也都不再被堵塞了。这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能受到同样的诱惑。”（同上：240）

一些同事有些为当前的局面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想到了伊莎贝尔·阿祖莱（2000：23 ff）。她是同事中特别为此感到担忧的一位，因为性形态的新的多样性被贬低为已经钝化。但是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意味着性欲与性行为的终结”。“商业和媒体”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想象和想象力不会因此而停止。这无疑是非常美妙的，“偏激的画面，无端的梦想和荒唐的白日梦”现在终于也能被社会认可，不再只是病态的患者和艺术家的特权。我们那位忧心忡忡的女社会学家、性学家和作家把一切都写进了一本关于她心爱的萨德侯爵的小册子里：“我因此请求您，唐纳蒂安（Donatien，萨德侯爵的名——译者注），希望在公民西古希那里请求他再稍等些时间，再去给新型性欲和性行为这幢大楼里的行为松绑。并且请求您最鲜明地向他强调，在您之后，并没有出现洪水滔天，而是正在准备下一次的庆祝。年轻人因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而欢呼雀跃，虽然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希望我们也穿上他们那样的狂欢服装，出现在他们的行列中。”亲爱的伊莎贝尔·阿祖莱，无论什么，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就不可能完全再被抹去。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原子裂变公式，也同样适用于已经为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知道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或是新型性联盟。

博学的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2012b：117）在对当前的新型性关系的观察中，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这一切都不是引起不安的理

由。既不存在导致我们产生文化悲观情绪的诱因，也没有可以让我们为文化的进步而自以为是的理由。简要地回顾一下以往流传下来的内容丰富的各种传统，将有助于我们学会谦卑，与我们从历史源泉中所看到的那些传统相比，当代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模式则显得毫无颜色，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市侩式的。”然后，恩岑斯贝格又着眼于观察并描述了古希腊毫无禁忌的奔放热情：“在那里，那美丽的海伦娜是从一个蛋里破壳而出来到人间的，因为宙斯使她的母亲丽达（Leda）怀孕的时候，她的母亲正好有着一个天鹅的形态。智慧女神雅典娜是从她父亲戴着盔甲的头部跳出来的，当赫菲斯托斯（Hephaisto）用一把斧头劈开她父亲的头之后。那位诸神之父则把自己变成金莲花的模样去偷袭达娜厄（Dana）。爱马仕（Hermes）和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儿子与纽芬（Nymphe）女神萨马基斯（Salmakis）合成了一体，以致他们俩共有的那个身体不仅有女性而且也有男性的生殖器官。古希腊神话的其他一些出场的人与神，也常常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克里特岛国王的妻子帕西法尔（Pasiphaë）让一头公牛爬上了身，受孕后生下来一个人与动物的嵌合体，即那个牛头怪。但是这还远远不是一切。埃及人、印度人、冰岛人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人的性趣、偏好、阉割和强奸等事例，鉴于节省篇幅的理由，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但是我们的性学家还是愿意强调，他们是反对摩诃婆罗多和变形记诗人的最纯净的孤儿。”

那是当然的。但在看到这些批判时，我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起宙斯与赫拉的故事（63章）。众所周知，他们总是在为究竟是谁在做爱中能感受到更多的乐趣一事而争执不休。智慧的预言家泰瑞西斯，既有过作为男人的生活，也作为女人生活过，据他的判断，其中的比例关系是9：1，有利于妇女。只是近代以来，由于一切文化强权，从宗教到科学，都要求女人去性欲化，女人被迫表现出对性的冷淡，才使这一比例关系出现有利于男人的反转。当然，令人高兴的是，近些年来，通过医学对这一关系的观察，发现了在话语和对生理事实的评价中出现了有利

于妇女的反转，特别是在涉及性经验、相互沟通和性生理反应等方面。我把女性所能获得的那种性高潮称为“持续的性高潮状态”（Sigusch，1970a：43），这样的一种持续高潮，对男人来说即使在今天依然只能是梦想。

96 性的内核

与时间的快速和技术以及社会的变化相比较，性的内核反倒相对稳定少变，因为它们有一种物理性的基础；这种物理基础虽然也能通过虚构幻想、象征符号、话语表述和对主体的客体化被逆转为它自身的反面，但是它总是能够通过自己接近肉身、本能反射和非本能反射的特性贯彻自己：作为性感区域的刺激，作为睡熟时的遗精和性高潮，作为月经，作为意外怀孕，作为性病，等等。但是在一个注重心理并还在如此延续的时代，性内核的相对稳定性，按我们的理解，取决于拉普兰济所描述的那种曾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秘密（30章）。由于幼年的性秘密始终无法得以解开，它便成为留在人们潜意识中的一种冲动。因此它留给我们的是：向往童年的天堂，害怕我们作为儿童时曾经陷入过的“监狱”，摇摆在机械物理刺激与拜物教的神秘联盟之间。最新的技术试图强制结合这两者，将现实的与人为的混合起来，用技术变幻出情感。

尽管资本主义和人的性欲性行为也在不断出现变化，但这两者绝不是蜡制的结构，并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形态。按我的理解，这两者都有一种坚实的（为了避免说是惰性的）内核，自它作为历史的结构存在以来，尽管社会和历史出现了一切可能的动荡，但它都坚守和留存了下来。这种内核在资本主义那里表现为总是能够影响深远地概括现实的基本结构，属于这种固定内核的有：生产的私有化、商品形态、交换原则、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也就是说：生产和实现资本的增值与利润率；更抽象地说就是：价值、交换和资本。性欲和性行为的基本结构从性学家和文化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则由取决于一种性别心理机制和一种不只

限于两种性别而是多性别之间相互关系的性别形态，由生育的可能性、唤起性趣的神秘吸引力、激情与爱情，以及身体的感觉和刺激等构成。

性的内核之所以固定，是因为比如没有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能够没有任何差异地体验和理解，什么是月经的出现和乳房的长成，什么是前庭软组织的充血、阴蒂的肿胀、下腹内的抽缩和痉挛，什么是在一定年龄段出现的自然生育能力的丧失（这在如今已不被看做是女性的贬值了）；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没有差异地知道和懂得：这一切真实地意味着什么。这种与身体的性别有着不可解（并与他人不同）的体验、经历和事件，会沉淀在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里，并且从这种性和性别不可分离的沉淀中，又形成了我们近些年来所说的性欲性行为和性别的认同。在这种个人特有的经历和经验中当然也包括一些会造成心理创伤的事件，比如堕胎；任何一个有着男人身体的人都不必像一个有着女人身体的人那样，在堕胎中体验自我伤害甚至自我毁灭：“那个被打下的胚胎，其实就是这个女人的一个自我客体，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什么。”（Reiche，1990：101）但是一些极端女权主义者和双性别主张者就是不愿接受性别和性欲性行为有固定内核这么个事实，以及还有那些把自己标榜为可多性变换的新性主义者。

在认知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我把这一固定内核称为性的不可再简约的余值（33章）。性的这一部分余值也包括了一种不可再简约的性别余值。鉴于新型性欲性行为形成于克服和超越性原有的自然限制的光芒和阴影中，必然会试图用更多技术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两性异形和有性生殖，只是这并没有成为普遍的生活实践。然而，技术和文化的创新——从体外受精直到由三个父母亲共同完成的生育，正在不断突破和超越原有的自然界线，以致在不远的某一天，被称为激发爱情和坠入爱河的那些秘密和谜，能够作为性内核中的核心被保留下来。至少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人类学做新的思考，因为只有从这时起，性内核中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的秘密和尚未解开的谜，只是最狭义的人的自然而

己，只形成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并只是与人相关的自然，因为性内核的秘密，这时已无非就是一种人的发明。但是如果人与自己的产品、机器和商品越来越融为一体，他们的感知和情感结构便会越来越转向虚拟的现实，不再往人类的方向发展，而是会往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Hylomatologie）的方向发展（17章）。如此一来，那么传统的性欲性行为和性别便也将随之消失。顺便提一句，弗洛伊德就曾表示过，他能够想象旧的性欲性行为模式的消失（89章）。

鉴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么个事实，鉴于资本总是倾向于强制性地侵占更多领域（即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称为“完全资本主义化”过程）的这么个事实，确实有些令人比较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文化和社会中的性别、性和亲密关系的变化竟会如此缓慢。对一些时间间隔相对较长的调查数据所做的比较表明，尤其是在涉及性爱和浪漫爱情的事情上的变化速度，简直就像是蜗牛在爬行（Sigusch und Schmidt，1973；Schmidt，1993/2000）。我考虑，这主要是由于：1.这个社会领域相对比较独立自主；2.调查数据形成时间上的不一致性；3.受社会其他系统如法律和宗教的影响；4.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政治与意识形态剖面的斗争领域；5.个人的投入和因变化而会带给自己的惊愕；6.上文已经提及的那个普遍而又坚实的内核；7.对资本社会“真正实际吸纳”（reelle Subsumption）的抵抗（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会简单地服从市场调节的规律）。

另一方面，社会和性领域的变化，完全显然可见地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突变。这就是为什么1967年和1968年的动荡以及随后的自由主义化，如果没有福特主义繁荣带给政治、法律和教育较大的游戏空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公共领域开始的新性革命，如果没有有着后福特主义变革时期特征的性解离、多样化和去监管化的话；我们如今正生活在以一个政治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表述这个有着后福特主义特征的时代中：一

切都在被更新，现在首先是要动员全球的力量，消除原有的社会成就，引入新技术，普及合理化，劳动（工作）合同“现代化”，遣散“多余”的劳动力（员工），金融业脱轨滑入歧视人和蔑视文化的投机中。说得更清楚些，就是：由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爆炸式混乱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的新性革命。

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历史，是作为交换手段的商品和作为竞争手段的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不断递增。自7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新现象，不是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掠夺，不是按性别特性的分工和对妇女的普遍歧视，不是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或商品生产的分工，而是资本关系那种显然不可阻挡的发展动力；它不仅越来越前资本主义结构化，也把以前相对比较独立的社会领域和个人氛围卷入一个越来越深的“资本真正实际吸纳”的过程中。由此造成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店主的原有生存资源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消失。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的劫夺导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市场的调节，这也包括医学、看护老人和医疗保险管理等行业。商业的参与者，同时也主要是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将通过工资（雇用）劳动的扩大化和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被雾化和毁灭，被从自己原有的生活和商业背景中撕裂出来，然后最终和意外地（也就是说是被动的，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行动）又出现在一种可以表述为个性化营销的状态中（比较Sigusch，1984b）。

今天的真实情况是，社会化了的社会不仅把持了人的身体直到最后一个毛孔，而且还在制造着它们；仍然真实的是，手术总是（必须）沿着关节打开切口，只要关节还没有完全粉碎。人的身体不会完全被客体化和被规定，它们并不是“零”，它们有神经、皮肤、荷尔蒙、性腺和它们分泌的液体，还有完全是身体的、会按前定的经验和印迹以可能极不相同的形式和方式表现出来的感官欲望。因此，性别的形态不会完全不留下原先痕迹地以社会化和文化为它设置和建构的形式和方式出现。性的个人特殊差异以及它们生理心理和社会化心理的特性，为任何一种社

会建构和任何一种理论解构设立了不可逾越和不可再简约的界限。这种古老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建构（解构）和语言逻辑分析的时代，常被驳斥为本质主义。但是时代还会出现再次改变。

如果性别差异被认识论认真采纳，它就会辩证地展现出自己杰出的意义：它不再只是在无意识中的一种沉淀或是在有意识中的一种事实，而正是它制造出了这两者。因此可以说，即使我们至今只是在新性变革形式中看到那些解离，我们考虑的也只有一种现实。因为不管性别与性欲性行为在认识论和话语中有着多大的距离，但在另一个层面（维度）上它们还是联合在一起的。

97 寻找一种情欲的艺术

我们在根本上寻找过一种情欲的艺术吗？游荡在第一和第二次性革命之间的那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幽灵，都宣称爱神是异体性和革命的（Reich，1936），是神圣和进化的（Bataille，1957），或者稍为谦卑些，只是被作为经过启蒙和有益于身心的（Comfort，1963）。但对于一种情欲的艺术，都只是在谈话中顺带地提及了一下，并且它的发展也从所谓的革命爱神演化为精益的性欲和性行为。

显然今天能看到，性的关系除了它的内核外，其余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为了不必重复我从理论和根本上分析第三次性革命已经说过的那些话题（比如：性领域的解离和联合，性区域、性部分和性偏好等的弥散化，性关系模式的多样化和去监管化等），这里只是简要地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的一些重要的文化转型。

——女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在经过了多少代的歇斯底里、性冷淡和被蔑视之后，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一次像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性复活。女性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去病理化，并被唤醒了女性也有权利享受“性”的自我意识，最后甚至得到文化的认可，即认为女性至少与男人有着相同的

感受性高潮的能力。今天，女性特有的性欲与性行为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性模式为社会的一切层次和方面所认可。

——关于性别差异的文化争辩，导致男女这两个主要的文化性别，在私人和个人关系中具有了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上的平等地位，因而使得女人与男人在相遇和建立关系时，第一次能够理所当然地站立在一个相同的高度。今天的男人有了那么一些“女性化”和“母亲化”，女人则有了那么一些“男性化”和“父亲化”，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男女这两大性别也在追随一种和解和近似。传统性别差异的融化，导致如今的年轻女性不只是能够成为母亲，而且也会抢劫加油站，能够主动与男人搭话而不被看成是个妓女。那些年轻男人呢？他们不只是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而且也能换尿布和推婴儿车，并不会因此被认为不合规范。妇女现在终于可以施行性攻击，如果为此感到高兴的话，其实只是意味着，为女性的性欲性行为的进一步社会化而感到高兴，而不是对她们的攻击行为感到高兴。

——在今天，一种文化的多性别化，则意味着原有的以生物为基础的性别界限，已在生殖器官转换的意义上被超越。现在已不理所当然的是感觉和感受一个女性的身体，还会如同我们文化以前在所有妇女中都能感受到的那种感觉。传统的两大性别演变的出现，主要可归因于流动态性别和生殖器官的变性。性别的这种差异和扩展虽然仍让自然（顺）性别者和顺性别性欲性行为者感到迷惑，但已赢得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并且尤其是它包含了更多的经验。除此之外，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生理上的男人，会作为心理上的新女人与一位有着女性身体和男性心理的新男人结婚。虽然传统的变性人还生活在异性恋或同性恋的关系中，但是那些由男人变性为女人的人现在也可以设置阴道，由女人变性为男人的人，可以安置阴茎。现在甚至最高法院也认可了这些新的性别。这一认可无疑是一件杰出的社会心理艺术品，对此只能感到惊奇和赞赏。

——新性革命，虽说没有完全终结历史流传下来的异性恋的性别、性和爱情模式的独裁，但至少间接地对此提出了质疑。原先作为唯一独大的异性恋，被因此化解为无数的性和关系模式。当有些人认为异性恋实在无趣或是更愿意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时，另有一些人则发明了其他一些新的释放情欲的方式，以刺激自己。但是不管怎样，异性恋已因此不再是不可变更的正确性生活的代名词，它已丢失了它原有的光环。

——如果说同性恋者曾经遭受了几百年迫害和谋杀，那么今天已由官方全部或部分地向他们打开了曾经神圣的婚姻机构的大门。如果说19世纪的医生还会担心因为写下这么“肮脏可耻的病情”而弄脏了自己的笔，那么同性恋者在20世纪已是文化的先锋；只是他们在崇拜青春的同时，不那么始终如一地与人为善。在当前，由于国家对他们性取向的认可，比如在德国可以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ELP），同性恋者难免变得越来越保守（德国议会刚于2017年6月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同性恋者正式结婚，不再只是能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译者注）。

——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对立在日益递减。同性恋者在日益异性恋化，而异性恋者在日益同性恋化。如果说以前主要是同性恋者会有拒绝生育、贪婪好色、突出体形和强调时尚等行为，那么今天的许多异性恋者也已如此。如今的同性恋者也愿意养育孩子，比如两个男同作为一对生活伴侣领养孩子（只要法律允许）并抚育他们长大。女同伴侣则大多由她们中的一个通过用捐献的精子受孕的方法。

——如同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一样，如今的婚姻也失去了它的光环。它遭到废黜，被从生活伴侣关系典范的王位上拉了下来。如果说近几百年来，人们的生活伴侣关系是以能够长久共同生活而缔结的婚姻与短暂易逝的激情的一种联合，那么近几十年它们则在渐行渐远中出现了明显的解离，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人的生命期望值的增长。

——伴侣的爱情关系，目前仍伴随着责任与义务，但能够由双方随

时共同结束；这就是说，原先固定的关系已过渡进入到一种新的较为软化的关系中，这种新的关系通常只为爱情而存在和持续。

——作为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的老式家庭，明显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意义。它在变小，被碎片化。新近又出现了由带有不同性取向的多个个人组成的各种后家庭式的关系编织。没有血缘联结的关系和朋友圈，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已比家庭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只由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小型家庭或是干脆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家庭里。这种发展是伴随传统家庭谱系秩序的象征意义和功能的丧失，伴随对俄狄浦斯式恋母情结的一种超越，也就是伴随父亲和俄狄浦斯恋母这类族谱的去象征性而出现的。因而朋友和伴侣关系也就变得比有着遗传和血缘关系的传统家庭更为重要。

——对自己的爱和以自我为参照系寻找乐趣，以及自慰（即使生活在一种伴侣关系中）上升为一种独立的性行为模式，这类性欲与性行为的核心可被称为自我实现的性。除此之外，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既爱另一个人又自恋的意义上，也可被称为双性恋者。

——性欲性行为与生育的文化分离，以及甚至技术性地把生育移到体外进行，导致出现一种人与物的相互异化，这也就是说，原先活生生的人现在变成了死的物，而原本死的物现在却在社会和文化中占有了比有生命的人更重要的地位。科学的创造力在关注壮阳药和假阳具解除男性性功能障碍痛苦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性的领域，并主要是对分离出来的生育领域的继续技术化。

——如果想要问什么是正常的性取向、性欲和性行为，这已经是个过时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无所谓，一个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异装癖、施虐和受虐爱好者或任何一种可能的性恋等，只要他自己感到满意，甚至因此感到幸福快乐。曾经被称为变态的行为，比如拜物、露阴癖和偷窥癖，原则上不再被看做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

态，更不要说双性恋和同性恋了。性的生活模式，已在一种前几代人认为是不可生活的规模上多元化了。对曾经的变态行为的去病理化和去过错化，因而也是去变态化，无疑是给所有曾经遭受歧视和迫害的人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些人现在可以完全没有恐惧地按个人的性偏好生活。新性理念者和新性别者，尤其是男女同性恋者，在今天组成了颇有政治社会影响的LGBTIQ，也就是女同、男同、双性恋者、变性人、双性同体人、跨性或性别不明确者的联盟，他们在寻找一种（或多种）新的身份认同，出柜和走向医生与治疗的另一面（彼岸世界）。这些原本被看成是非正常的不道德和无节制的行为证明了，正常性行为的道德和节制并不是生活的一切层面，因而可以被超越。而且正是这种颠覆使人的身体行为现在变成了政治行为。

——人们现在第一次普遍隐约意识到（原先被认为是）变态行为中的普遍人性。如今大多数原有的变态行为已被约定俗成化、去病理化和正常化。原先被定义为心理病态的性变态行为，除了极少数外，也被文化认可为是通常性生活的组成部分或是独特的新性乐趣。还剩下的其余少数变态行为，则通常都有着成瘾、强迫、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和暴力的特征。

——男女共有的异性恋和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通往三性恋、四人恋，也就是通往多元性恋的道路，已被开通。

——狭义上的新型性欲性行为和新性者联盟是那些多边（元）之爱、新型的动物恋者以及互联网上的各种性取向和偏好形式比如电子性爱（E-Sex）者。

——狭义上的新性别者是性别流动变换者、双性别兼有者、生殖器变性者、介于男女两性者和无性人。

——裸体被日益去情感化、去色情化和被乏味化。在亲密关系日益

变得最小化的同时，人们又尽可能地展现和公开原本私密的性，即使青（少）年第一次性交的照片也被到处传送和观看。并且这些涉及性私密的照片和内容主要通过互联网在广泛传播，其数量之多，超过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个人能够想象的能力。

——与性相关的一些阴暗面，如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和家庭中的性侵性虐，在今天仍然只是遮遮掩掩地被透露一些。

——如今的新倾向是，性生活的量在递减，但它的质（只要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却在递增。许多人有意识地在寻找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性兴奋和性满足的方式和方法。鉴于原则上（除了个别一些实在没有吸引力、特别害羞和生活根本没有着落的人）几乎谁都能够轻易地获得性体验，因而大多数人也就愿意等待，直到出现（或抓取）相对比较合适的机会。这就好比（感谢互联网）人们（男人和女人）在自家的屋后有个院子，也就不用再走进这个院子，因为人们（男人和女人）已经有了它。

向不太了解社会学的读者们提个建议，要想理解发生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及21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性革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一下这些事件和事实：一个名为密特朗的法国总统，有个私生女儿因而（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原本的家庭之外）还有一个多元之爱式的家庭，虽然他当总统期间习惯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都在那里过夜，但是直到1994年，也就是在出现了新性革命的年代，才公开向外界承认这一事件和事实。一个名为默克尔的离婚女子，长期生活在一个无孩和没有正式缔结婚姻的“野婚姻关系”中，却仍然能够被选为一个基督教党派的总裁，甚至成为一个欧洲大国政府的总理。一个欧洲大国的名为韦斯特韦勒（Westerwelle）的外交部长，生活在一种同性的伴侣关系中。多位德国联邦州的总理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时任德国总统高克（Gauck）和法国总统奥朗德（Hollande）都不再与自己那位合乎宗教和法律的妻

子在一起生活，而是与一位仅仅是出于两相情愿的非婚伴侣生活在一起，尽管如此，总理的这位伴侣还是有了作为第一夫人的身份。那些众所周知的著名男人，如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还能在年事已高的时候选择一个可以做自己孙女的女伴。这一切即使在1968年的反叛时代，也仍会是件令人反感的丑闻。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新性革命所导致的性欲性行为模式的转型，除了刚才提及的那些比较光明的一面，当然还有其比较阴暗的一面（94章）。聚集在阴暗面的是由它带出的猜疑、迫害、去主体化、去象征性和市场营销化，特别是市场营销化常常在赤裸裸贪婪的意义上导致一种利欲熏心。这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性不再如同在新性革命前的那次性革命中那样被加上一种原始宗教的力量。在新性革命开始之际，形成于上次性革命的性的那种负面神秘性被看做是性别的不平等、暴力、性侵性虐和由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致命感染。如果说早期性欲性行为的重点是本能冲动、性高潮和那对异性恋的夫妻，那么新型的性欲性行为则更关注性别差异、自爱、狂欢和假肢化。自那以后，性本能冲动的意义越来越遭到科学家们的贬低。

——儿童的情欲和性欲性行为仍然被继续忽视和禁忌化。儿童本人也遭到家庭经常的和文化普遍性的忽视。范·乌塞尔（van Ussel）的《性敌意》（*Sexualfeindschaft*，1970）一书似乎确实收集了儿童以及与儿童的性欲性行为相关的真实事例。那个恋童癖无疑是当前性邪恶的代名词。他之所以代表着邪恶的性，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成员都隐隐约约地预感到，鉴于自己强迫症式的性欲望，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潜伏着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毫无顾忌地把一个孩子像一条哈巴狗或是一个塑料充气性玩具娃娃那般玩弄。

——妇女，如前面已经多次讨论过的，与男人相比，从文化和社会的各种不同层面来看，仍然处在一种劣势的状态。没有一个诚实和理智的人会理解，为什么社会共同体尤其是女性自己会忍受和默认这样的状况。这是一种反人性和性别歧视的耻辱。

——今天，作为性和性别载体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孤独地撇下并相应地加重了负担。他们已不能再期望传统文化规范和机制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他们应当更加自控和更加灵活，一切都必须由自己做出决定并规定自己的性欲望、表现性别的特性、在追求和实现爱情中的方式方法、亲密关系的缔结以及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道德水准。每一个人现在都应当个性化地实现自己在这个此岸世界（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并且没有传统纪律和服从所给予的支持和安全保障，也没有来自彼岸世界（天堂）的祝福承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只有他作为唯一一个成员构成的家庭里。许多人感到累、筋疲力尽和不堪重负，患上忧郁症（Ehrenberg，1998/2004），有不少人因此沉醉或是陷入自恋、成瘾、倦怠综合征和寻求同情。因此难怪，人们在内心里总是会爆发出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的渴望。但是如果坚持说，作为性载体的个人，现在已不再像弗洛伊德时代那样忍受着压抑性本能冲动的痛苦，而是一种新的、必须由自我做出决定的痛苦，那是一种对现实的扭曲。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扭曲，是因为当今的个人虽然有了明显更多的性自由空间，但这绝不是一种获得社会普遍保障的自我决定，真正的自决只能在他们有了一种自己期望并有安全保障的工作和职业生活之后才有可能。

——性的道德关系，近几十年来变得不明确、模棱两可，并常常也是虚伪的。比如电视里在放映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性表演，不管这个节目有多么令人作呕和多么色情，关键是只要能提高收视率和赢利。但是如果一个单身未婚的政治家，爱上了一个16岁的姑娘，并把这段爱情公布于众，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不成熟和不道德的，就会因此被排挤或撤职。很显然，凡事只要有经济价值，不管其好坏，都会多少被容忍。这

不是正好说明了，即使是今天的道德标准也仍然是从基督教和小市民旧壁橱里取出的旧的道德大棒吗？并且这个社会也揭露自己仍然是个不自由的社会。甚至不允许出于爱情而与算计的生意（商务）保持一种距离。“情欲色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曾经说过，“是对障碍的克服。而最诱人和最通行的障碍是道德”。由于道德的褪色，情欲色情的诱惑也随之变得苍白无力。全世界的网络随时都能提供的一切形态的裸体，偷走了16岁青少年对性的震惊，这是他以前面对一个身穿敞开晨衣的女性为他开门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全身颤抖的震惊。与此相反，比如一家德国公司为它的一些有工作成就并因而也对公司有较大贡献的男性员工举办了一次性的狂欢作为奖励，还特意为此招了20名妓女。性工作者们每服务过一个男人，就会像要被屠宰的家畜那样被划上一道杠，最后按杠杠的多少结账，没有杠杠便没有报酬。人们因此只能要求：应当有许许多多的女性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和领导层。

——当今成为主流的无羞耻感，其社会效应是负面的。“因为羞耻，”如伊莎贝拉·阿祖莱所说，“构成了一种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将保障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不可伤害性。”羞耻是“我们的自我保护”，它“用鹰一般明亮的眼睛，监视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们在最亲密关系中的行为”（Azoulay 2011：273）。

——如果仔细观察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性研究就会发现，人们真实的性生活比我们针对性领域具有煽动性的话语讨论和渲染式媒体报道所想象的，实际要少很多（91章）。实际的统计数据证实，在公众的关于性的话语与个人实际很少的性实践之间通常都横亘着一条隔开两者的深渊。

——同性恋是当代在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虽然没有对同性恋欲望的压抑和否定，异性恋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由于正常人潜意识中对“其他性形式”的恐惧，不顾今天的自由化仍然根本

延续着，因而也就不断出现对同性恋的歧视和迫害。即使是最成功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也仍然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从另一方面看，一些原本与正常不同的其他性形式，也在不断力求正常些，以期望能少受些迫害。他们承受着尽量往上爬，创造出一些特别的成就，以能够保护自己不遭受迫害的压力，但社会的普遍冷漠和忧郁也侵袭了这些曾经在苦难中团结在一起的人们。比如，今天那些年轻的同性恋者往往会对老同性恋者表现出不尊重，对待他们就像对待一块开始腐烂的肉那样。青年人的这种“近乎可怕的拜物化”（Dannecker，2000：118），对那些年老的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贬低。当迫害公开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年轻人和老年人相互都更接近些。由于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能够更早地开始一种异性恋的性实践，随之消失的是以前只能在男同伴中体验的同性恋性经验。因此即使在这里，也像如果打开一个原先封闭的机构那样：里面只有自相矛盾。

——仍然一如既往完全不能接受的是社会尤其是医学界对那些人的处理方法，即那些生来就被所谓的专家看成是不能归为两大文化性别中某一性别的那些人，医学出于这个理由便尽可能早地动用医疗手术干预，对这些人进行痛苦和不可逆转的阉割，以适应文化关于所谓正确性别的陈规俗套。一种谨慎和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必须最终取代现在的这种野蛮（比较Schweizer und Richter-Appelt，2012）。理所当然，必须让这些在医学上通常被称为雌雄同体的双性人、双性别者或跨性别者，最后自己决定究竟愿意以哪种性别生活。

——除了既不能生产也不能购买，因而是我们文化中一种独特珍宝的爱情之外（98章），其余一切有形的与性相关的人与物与事以及实践，现在都已商业化和电子数据化了。老山羊的性交体位被模拟和变异为假性别恋或网络性爱。神圣的爱神被庸俗化。关于持久性欲的梦想，只留下一些假想。法式接吻（舌吻）、无保护的性交、假阴茎、胎儿、处女或儿童在市场上都有供应。对超验的渴望遇上了专门剥削穷人的性

旅游。性的形态转换为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形态。自爱的绝对命令却暴露出只是要求同情的命令。

与20世纪所争取的关键文化转变相反的一面，最容易从天主教会的态度和行为上看出，不管是在平等对待男女、同性恋与异性恋生活伴侣或夫妻的事情上，还是在有关避孕、预防艾滋病和认可不寻常性偏好的问题上，天主教会都坚持自己的前现代立场。这使我们认识到，仍然有一些领域，20世纪的启蒙教育还完全没有进入其中。

顺便说一下启蒙教育。我们在这方面缺的是什么？首先是沟通和知识。性伴侣们通常相互并不真实地说出，什么是自己真实的情欲与性欲愿望。如果一对夫妻或伴侣说起“性交”，无非就是完成古代日耳曼式简单的生殖器交媾，只要进去就算完事了，其实内心里却有着一些其他的愿望。即使一对新性理念者相遇，也许不会有其中的一个说，“我只想拥抱一下”。关于性知识的情况，也不比这好多少。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大家才更喜欢沉默。

出生于1915年的海蒂·卡贝尔（Heidi Kabel）1995年在一档“生物大道”（Boulevard Bio）的电视秀节目中说，她有一次问一个助产士，她要接生的那个孩子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今天的年轻人已不再那么无知。他们甚至知道，接吻不会使女人怀孕。但这点性知识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社会仍然还缺少关于性的知识和性的启蒙教育。性知识的这种缺少比如就表现在对处女膜的崇拜上。事实上，从处女膜的状态并不能推断出，是否有过性的交往。处女膜会在性交时破裂和流血，但也可能只是扩张而不流血。因此即使是一个医生也不能完全无误地确定，一个姑娘是处女或不是。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不愿相信这一点，更愿意相信其反面。尽管妇女运动推动了巨大的文化和个人的变化，尽管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在不断性化，但是比如女性的生殖器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还是一个未知的躯体区域。其实也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想一下

绝大多数的人甚至都不能正确地描述和说出如外阴部、阴唇、阴道、阴蒂、G点和处女膜的名称和部位，更不要说去回答诸如阴道是否“有”腺体和黏膜等之类的问题。那个所谓的G点在女性身体的哪个部位？女性性高潮时分泌的液体（Squirten）究竟是什么？是否有一种女性的射精？斯基恩氏腺（Paraurethraldrüsen）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女性是否也有前列腺？处女膜是否经常不再被看做是一种皮肤的边缘？所谓的阴蒂高潮与深层的阴道高潮在生理上有着怎样的区别？阴蒂究竟有多大？尤其是它向内的部分？由于普遍的无知，如果专家描述这个独特的器官究竟有多大，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通常博览群书的女权主义者也会感到惊讶并留下深刻印象（O’Connell et al.，2005；也请比较Puppo，2011的批判）。

此外也由于，与男性不同，女性的生殖器官总是被看成是“肮脏和容易患上疾病”，因此经常检查，否则就会“太臭、太脏、糜烂、血迹斑斑”，如乌尔里克·赫尔默（Ulrike Hellmer，2012：49）在她的那本名为“阴户国家：在文化的私密区游览”（Muschiland. Exkursionen in eine kulturelle Intimzone）的书中描写道。无疑，这本关于“湿地”的书，能够以这种方式盖过批判的女权主义的声音。从以阳具表示阴茎仍然是目前广泛使用的一种神秘隐喻表述，但不是用来表示女性阴蒂的表述这么个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与男性相比，女性生殖器官是怎样被歧视和贬低。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术界人士也很少能说清楚，比如那位Baubo（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为安慰因寻找被冥界之神夺取的女儿而身心衰竭的生育女神得墨忒耳叙述了许多女性露阴笑话的一个女性人物）究竟是谁或是怎么回事。男性生殖器高于女性的这种性别歧视和父（男）权式的主导地位，也表现在医学研究领域，比如当前发表的关于阴茎的科学研究论文比关于阴蒂的要多30倍。许多学习解剖学的医学院学生，直至今日仍不能讲清女性外阴勃起海绵体组织内部的那种巨大结构，只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或是不愿感知这一点。这就导致，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性启蒙教育之后的今天，仍在讨论：G点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类

似男性射精那样的一种女性性高潮射精？有多少女性完全没有或没有过明显的处女膜？等等。而我作为一个（男）性学家，经常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和博士论文时不得不对这类问题进行启发和辅导，因为他们的实际相关学科（都是些男导师），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因此就不必为此惊奇：一个名为多莉·拉内（Dorrie Lane）的女性创办了一所“女阴大学”（Vulva University）。如果人们（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去读一下关于性兴奋、性满意度和性高潮的最新研究，甚至会震惊，我们至今关于这方面的严肃的科学经验竟然是如此之少，因而研究的继续进行是多么必要（比较比如：Philippsohn und Hartmann，2009，Philippsohn，2012）。

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女性的身体比男性的更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中心。劳里·佩尼（Laurie Penny，2012）认为这已是一个人肉市场，女性的身体如同正在出售的狗粮那样被刻意打造成可出售的商品。乌尔里克·赫尔默（2012：15）写道：“为打造这类有着无限更漂亮更时髦的新身体，可按市场的需要进行按摩、体形训练、肤色漂白或麦色化，体重可增可减，而且也可按市场的需要永久地保持年轻和剃掉毛发。当然这一切都有它的价格。”由于这个生意的不断兴隆，身体的时尚也像时尚的服装那样被不断创新、制造和投入市场。如果说以前还只是停留在生殖器的外表，用杠铃练出的一身肌肉和球形闭合环或是乳房的优化和阴唇的手术变小的话，那么现在兴起的是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时尚阴道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女性生殖器官整容手术行业。自然，这期间有了专为女性服务的性商店，里面供应有阴蒂振动器、G点和肛门的兴奋剂、性玩具。当然，一个恋气味癖者也可以在网上购买到已经用过的内裤衬里。只是这里也不允许不提及肯定“性的积极效用”的女权主义，比如劳拉·梅里特（Laura Méritt）所代表的性的排他性立场，认为商品社会可以通过电子性文学、假阳具和性玩具，以及由女同负责的护送服务，使人们敢于对性从原本的不赞同切换到赞同。

从总体看，我们距离一种情欲的艺术还很远（也请参见92章）。比如要问，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926年在他的中篇小说《梦的故事》（*Traumnovelle*）中为那两位主要人物阿尔贝蒂娜（Albertine）和弗里多林（Fridolin）构想的一些性的经历和体验，是否仍然还是今天许多人的切身现实，其回答甚至完全不妙。谁有勇气，敢听任于一种自发的情欲冲动？谁如果鼓足了勇气这么去做，他会成功吗？哪里才是爱神的居所，淫荡的女人和男人，姑娘和小伙在那里面能够按一种情欲的艺术来宠爱那些前来的访客？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一种携带洗漱包在外面过夜的文化中，竟然还会没有一种情欲的艺术。就凭这一点，《梦的故事》可以和必须继续写下去。但是以哪一种语言来写？我们的语言是反情欲色情的，与性生殖器相关的有：阴茎、阴道、乳头、阴囊，与性交相关的有：性交媾、碰撞、打屁股，交尾和插进去；没有丝毫性艺术的美感。我们对一种神秘联盟的渴望结束于当前在欧洲各大城市设立的所谓的隔离间里；因为在这样的隔离间里，男人们可以借助一个女的性工作者的帮助，排泄自己的精液，就像打个喷嚏已经能够获得一种性高潮那样。这一切所符合的那个普遍定义，其核心也被视作等同于排清膀胱或排空大肠那样生理上的性快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一种逃亡亚洲色情艺术的尝试，也不太“有济于事”。如当前意大利语为“爱抚爱抚”（Karezza）的一种保留性交方式，即通过男人放弃射精和性高潮，使自己与性伴侣达到一种内在的结合。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情欲和色情艺术，但人在我们文化中是无家可归的，因此也就出现了贫困、冷漠、虐待、暴力、污垢。这就是一切。

不是去发展一种情欲和色情的艺术，我们却发展了一种有关性的科学。实际上，自我批判的性科学在涉及爱神的问题中，必须保持沉默，因为即使它们的制造者也是反情欲和反色情的。自从笛卡儿主义战胜了蒙田主义（Montaigneismus）以来，爱神便成了那个虚构的神，成为一个由情欲艺术提供居所的逃亡者，虽然情欲艺术自身通过反情欲的誓言正在提供反情欲服务。主要是那些疯狂的热恋者、身陷绝境的艺术家和

患有强迫性外化的变态者，试图给予爱神一个庇护所。但是主流科学家的眼光总是那么冷漠：即使是爱情，也不应当有任何秘密。今天，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爱是什么。再加上，谁如果坦然承认自己一切的性偏好，那就是赤裸裸地站在了众人的面前，已不再有什么可揭露和可发现的。隐秘所具有的可能的神奇性也就随之消失。实际的物化了的性，赶走了那个不可见的、倚仗无形幻想生存的爱神。

虽然禁忌已被废除，但是如今被允许的性和性别形态是由立法机构和社会重新考虑和规范的。只是重新考虑后的性形态却又与人性中海侵式的超越乐趣不相兼容。已经获得的性满意和性高潮也因其非生产性的特征，而成为一种悲伤和易逝的代用品。除此之外，也缺乏一种人们（男人和女人）能够相互坚守和扶持的仪式。即使在被称为性革命的高涨期，一种自由的感官生活也并不是一种实践而只是一种想象而已。虽然当时的历史状况长久地表现出，在强制、压抑和禁忌消失之后，似乎至少性最终能够回归到自身。

但是如今通行的一切关系模式，都戴着幸福的假面具，仅仅只是好像生活在幸福的婚姻或自由的爱情中。没有人相信，假阳具或电子性爱与性革命许诺的那些性乐趣会有什么相干。唯一的共同点是每个人都在肚子里抱怨自己被欺骗了的幸福和爱情，区别只在于：有人的抱怨是无声的，有人则叫喊几下。从文化和其象征意义来看，性欲性行为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种建构和职能，而不是一种欣喜若狂的感受，是物理性而不是元物理式的形而上学。也正因为如此，在医学和那个既过时又超现代的性市场上，才会出现诸如假肢、性泵、手术干预和注射剂之类的商品。爱神在苦涩地哭泣。凯旋的反爱神，则在享受着每一次的性美学和性秘密终结。

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种情欲艺术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得

以发展和展开？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性渴望象征和现实化了人类生存的中心模式。自从建构了资本主义市场和知识社会以来，如我在92章中已经说过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家优先关注的是对贪婪和好奇的物质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满足。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性领域也要服从一种经常性的转型。有时它也会叫喊，但它在更多的时间中则保持了沉默。一个以转变、创新和弥散为格言的社会，不会永久受一种静止的局部体系的统治。所有的一切都在原则上已被这么规定了。

19世纪和20世纪的性领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过程中，它因此站在历史进程的前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性革命结束时，这个领域已被完全资本主义化。如今，在我们称为第三次性革命的进程中，一方面出现了它发展的阴暗面，如歧视女性和施行性暴力。但是在另一方面，新性别者、新型性欲性行为者和新性联盟者第一次争取到了社会对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偏好的认可。只是鉴于总体结构的原因，社会的这些认可不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期望满意度，而且还会经常出现一些对认可的挑拨和煽动，以便与性相关的生意和商品不至于出现停顿和滞销。与这种社会结构最般配的是互联网。对性满足的寻找在继续。可以说仍然如以前那样的淫秽是在如今的性市场上，有母亲与女儿和姐妹作为对子提供服务，用来诱惑有乱伦和恋童癖愿望的嫖妓者。

批判主义性科学认为，性的道德关系极其复杂，是自相矛盾的，并在自身中隐含着不可解的对立。性和性别的一切领域都构成了一种统一性：它是不可解的矛盾的一种统一。辩证法意味着：对立内在于事物或概念的自身。任何命题同时也有个反命题。新性革命导致了一种较大的承受意愿，因而也带出了一种较大的性苦难。鉴于资本主义提供了太大量的商品和人们对此的太高要求，以及其去规范化、加速化、优化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进程，人们的性关系因为这种消费至上的强制而受到阻碍，变得困难或遭到损坏；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与爱情相反的立场，人

们轻易地有了理性、一次性扔掉情结和重要的忠诚。自由化、自私自利、工作和居所的流动性或是全球化既为人的性关系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机会，也会阻碍一种持续的性关系。

任何一种性的特殊差异，任何一种性和爱情生活都会重新改变和规定人们的性欲性行为模式。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哪个特定的异性恋者，哪个特定的同性恋者，哪个特定的女同，哪个特定的性变态者，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么思考和这么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适合这些人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我们的这类思考和说法是以压制他们各自的各种社会心理的努力为基础的。作为具有概括性的性形态，现有的一切性模式作为个体都是不完整的，其效应也被过分夸大了。它们都是不自由的，都在无意中誓言自己身份的非认同性。

98 珍贵无比的拜神般的爱情

前面（10章）已经说过：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人爱情是一种普遍化的神秘。作为拜神般的爱情，它从自身中创造出自我的价值，它启动自己的权利，似乎在按自然法则运作，没有人能够以什么理由来反对它。谁感觉到了爱，就可以随时走进爱情；但什么时候不再爱了，他也可以随时走出爱情。一旦如果不再有爱情的情感了，对这一爱情的责任和忠诚也就随之消失。因为爱情也是道德自身。它不需要任何理由，并且任何理由也无法解释它。最终，似乎只有它才能帮助人过上自己渴望的完全个人化和私密性的生活，使人与人的关系终于能够摆脱普遍算计和唯利是图的专制，转换进入一种纯粹的直接的关系中。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美好了！只是即使作为拜神般的爱情，也无非是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尽管它非常自以为是、无节制和刻板模式化，其实它也不过是在社会的抽象、冷漠和距离中一种维持生命的需求。它是在一个注重纪律理性世界里的一种非理性化的生存模式。但同时它也

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如果不是在一种爱情的关系中，还有什么地方更能使个人感觉到自己被理解、受保护和亲近呢？难道爱情不是与性的实践一样都承担着心理和社会的功能，比如填补社会生活的空虚、弥合各个人之间的鸿沟、制造假想的人生意义并为其注入活力，以便让人根本还能感受到一些人性吗？确实，爱情与性都在同样地做着这一切。个人的爱情，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才开始于可数的几代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和饥荒时代的结束才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可能的。爱情是人的一种不稳定的能力，愿意运用这种能力的人只是不想在人的关系中堕落。这些人的内心中冬眠着一种社会的独特性：爱情不能被制造也不能被购买，它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是商品的反面。这在一个制造和销售的世界里，无疑是独特的，令人惊讶的，也是无比珍贵的。

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似乎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2003）。阅读她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爱情的那本书（已在前面讨论过），总会出现这样的感觉：有些应当被证明的事，却又不需要任何证据了。阿多诺（1951/1969：221）曾经写道：“无数辆星期天晚上回纽约的汽车长队中的每一辆汽车的质量，都对应于坐在这辆汽车里面的那位姑娘的漂亮程度。”但是伊洛斯却以“后马克思主义逻辑”（postmarxologisch）的实证方法，发誓这是一种古典消费的后现代统治，也就是说浪漫爱情的领域被消费领域覆盖了，并且还用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证明方式让人感觉到，似乎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早就沉淀在普通个人的心灵生活中（77章），似乎当一个人与爱侣交往或是在走进一家私人住宅时，就能够像脱一件肮脏的工作服那样把自己脱得精光。其实，即使是爱情，也早就直接或间接地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毕竟，钱已经成为我们当今社会的媒介，拥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是钱，不是真理（1章）。因此，钱能呼唤感情，甚至当爱情眼看快要消失时，钱也能稳定爱的情感。只是市场并不能完全统治爱情，尤其是不能在爱情以本能冲动式情感形态出现时去统治它。

由于伊洛斯的眼里只看到浪漫主义式的爱情形态，即那种在今天主要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体验和遭遇痛苦的爱情形态，因而有必要在提及这种我称为情感冲动或本能冲动式的爱情形态的同时，也提及第二种爱情形态，即情感加理智的爱情形态，或是说理性爱情的形态。情感冲动式的爱情是自发、不可预测、非理智、有身体感觉、深不可测和难以捉摸的。它是神秘的，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一个人会以这样的方式去爱另一个人，这其中还有太多太多未知的心理、社会、文化和生理的背景，并且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去研究和解开其中的秘密。情感加理智的爱情适合于个人化的社会条件，它的持续性取决于其与职业和经济状态是否兼容，它会有目的地寻找合适的生活伙伴，它是现实的，因而没有多少神秘感，并且“也会因为自以为是的自我价值而变得冷淡”（Adorno，同上：220）。从根本上说，它是两个当事者共有的一种自私自利，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它在我们社会中才流行得如此广泛，并经常无敌于天下。因此对市场来说也许不会很难的是，把那些身处第二种爱情形态中的伴侣，推入到象征身份和昂贵的商品消费中去——伊洛斯把这种商品消费泛化地称为“浪漫的消费”。但是如果那些相互爱着的伴侣们把自己的本能冲动和情感，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爱情看做是一种心灵和身体的完整结合，是自己无法算计和操纵的事件，那么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市场，也撞到了它自己的极限。因为情感式的爱情形态以一种唯一和独特的方式，坚持了存在主义的个人性和由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必须加上双引号的“纯洁”和“真诚”。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即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顾几乎搅翻了一切传统道德理念的性革命，仍能如同拜神般地坚守着情感式爱情形态的理念。根据我们的实证调查（请比较比如：Sigusch und Schmidt，1973；Schmidt，1993/2000），本能冲动式的爱情在年轻的新生代心目中几十年来都没有像其他一些爱情、性别或性模式那样有所减弱。它虽然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和情感加理智爱情的前行而减弱，但也会在年老之后又出现增长，因为市场领域的诱惑对老年人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只是，在这点上伊洛斯是有道理的，对生活在社会中层的人来说他们要比生活在下层的人更容易摆脱物质的诱惑。

诚然，伊洛斯所做的那些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不能用这些研究来反驳反资本主义的情感式爱情的珍贵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这里再重申一下：即使是情感式的爱情也同样受制于普遍的神秘性，它比破坏更非社会化，并且比通常的自私自利更自私。即使正在相爱的人们也会担心，不管自己现在的关系有着哪种伴侣关系的形式，但并不保证这是一个避风港。与此相应的尝试因此也就更为严峻。拜神般的爱情不仅固定了表象的统一，因为它必然在快乐的时刻就已设置反分崩离析的障碍。它也建立在其他关系形态的自相矛盾和对立上，因为这些矛盾和对立使它懂得：如果伴侣关系出现破裂时，只有依靠什么才能使两人继续结合在一起；如果仇恨出现时，为什么会不懂得自我牺牲和放弃？

与此相应的是性刺激要素。如果一个人的性需求和欲望是被他物唤醒和制造出来的，这并不算是敌视人。商品美学也认为，人的性需要不只是通过表象来获得满足，新的性饥饿也将寻找它的权利。这就不能只是一种承诺，因为其实性的可能性是客观的。由商品世界以巨大的数量和无比的质量所释放出的刺激要素，通过模板化和无休止的重复不只是导致我们的想象世界因为泥沙充塞而停止运转；它们也丰富、改变和批判了客观形态的固定化，其实没有这些客观形态也不会有它们自身的存在。这些被相互孤立的刺激要素无穷尽的多样化和传染性，不自觉地刻画出一种社会的图像，在这一图像中，不是每个感官刺激都会被理性识破并予以排斥，因为感官刺激常有着突然、无须较高的仪式以及肤浅和短暂的特点。似乎现在被投放进世界的是自由、平等和个人化感官刺激的理念，因而不必以感官和理智的方式去反对隐含在它自身的隔离状态。持久的意义共同体和短暂的本能冲动发泄的同时并存，使人不免联想到，这两者可能会有一天再次进入一种平衡的状态。由于社会对性的神秘化而被普遍抛弃的个人爱情，又重新被放置进了这个世界。

一方面是本能冲动式或是说情感式的爱情，另一方面是理性的或是说情感加理智的爱情，这两种大型的爱情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会相互影响，并也得益于无数小型的其他性模式。此外，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在20世纪已上升为人与人直接关系的代名词和反对普遍物化的堡垒；但是即便如此，男人与女人的爱情仍然还是几十年来一直屈服于一种消极的神秘性。虽然它仍然是非个人化的性欲性行为的唯一对立面，并且显然是由它的自身创造了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价值。谁一旦能感受到它，依然似乎就有了权力可以做任何坏事。爱情的神秘性显然尤其是在青年人中经久不衰，但是在积极神秘性的另一面，爱情却表现为话语和强制，只要过了热恋期，它的关键词就变成了男性中心主义、性别差异和自爱。在心灵的痛苦中，伴侣们不顾父权制、性别歧视和自私自利的社会处境，寻找并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在强调和技术处理意义上进行了文化分离的爱情。通过认识到即使是爱情生活也只能在社会形态的框架内运转，认识到起源于消极神秘性并同样起源于积极神秘性的这个事实给爱情罩上了面具，抽掉了新老本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爱情正是在这一特征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论据来反对关于一切性和性别现象都只是一种历史建构的论点。

起源于中世纪并作为资产阶级双方感情结合对立面的、传统的性欲性行为与爱情的分离，几十年来又被公开启用并且显然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模式，这就使那些情侣们有了可能，即使在性的欲望完全或部分地消失之后，也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他们仍然联结在爱情中，并且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决定，是否在这一固定关系之外，再去寻找性的冒险。他们也能够自己决定，是否想说说在固定关系之外的一种其他可能的性生活，或是不说。爱情与性欲性行为的这种新的解离，鉴于今天到处弥漫着的诱惑和伴侣双方显著的老龄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它之所以有现实意义，也鉴于从生殖能力年龄界限的角度来看的生理性别差异和未曾改变的社会文化的性别差异，即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较为年老的男人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明显年轻于他的女伴，而较为年老的女性则

很难找到一个明显年轻的男人。

这一切都导致今天的爱情是一种自相矛盾。这尤其表现在如同遭遇了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式的热恋中，相爱的人自愿成为爱情的奴隶，他们中有道德的伤风败俗者，忠诚的背叛者，现实的幻想者，为自己索求理性的疯狂者，他们是有视力的盲人和有听力的聋子。这就是说，只有按自身法则行事并不顾及传统义务的爱情，才是“自由”的爱情。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监禁和责任。它同时既是放弃自己又是自我发现。爱情就是生命的活力。但是只有死亡才能完全满足爱情，它是爱情的本质。因此才有了那个爱着的人想与自己爱着的人（或是反之）一起去死的愿望，其目的就是永远与他（她）在一起。这也适合于在生活中上演爱情时的那种无能为力：爱情是最强大的力量，既不能光靠自己的一厢情愿，也不能运用外在的力量去强制它。

没有任何一种个人的爱情与其他人的爱情有认同性。它证实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估量的价值，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是唯一的。有些爱情建构在好感、信任和舒适上，有些充满了拜神式的情感、激动不已和自我憎恨，有些则是激动和疲惫加照顾，也有一些是仇恨和吞噬欲望。但是所有这一切个人化的爱情，都是由同一个社会爱情形态和普遍神秘化的模子压制出来的。个人的爱情绝对是处在通过客体化、话语化和文化技术由各个时代社会规定的爱情普遍形式的相对关系中。它在个人性上要受制于一种过分个性化，在集体性上又要受制于一种过低个性化的制约。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爱情，社会学分析的是其普遍形态。这两门学科只能依靠理论的暴力才能协调一致。因此，个人自爱与社会物化之间的关系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爱情这个范畴和与其相近的本能冲动这个范畴，只有借助充满了人类史的剖面、个人和体系等概念，才能相互分开，才能通过它的自身上升到人的意识中——作为统一思维的解毒剂。但是由于这只是一厢情愿和其历史性，它仍然会与本能冲动这个范畴有着一样的身份认同和一样的不自由。

主宰图书市场的那些大众“爱情理论家”，违背自己的声明，实际上完全只是在叙述一些爱情神秘的故事，试图以非反思性（以及心照不宣的）进化主义的、有活力的并作为克拉格斯（Klages）的后继者也以宇宙起源论（天体演化论）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的爱情观是非历史性的，有那么一些本体论内容，即本体决定了它自身本质的构成，爱情是一种原始的神秘联盟，因而不需要去关心一些新型现代的事情，比如性别差异。对一种土著民式的爱情做一种本体论式的假设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因为他们所有关于柔情和情欲努力的表现都是以女性与男性不同性别的特性为基础加以构思的。他们所谓的“作为爱情生物的人”在事实上只能作为男人或女人。这种幻觉式的“女性”与“男性”的性别特性，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还是男性与女性各自个性发展可能性的前提条件。之所以说他们的理论是糟糕的进化论式的，并因而是非历史性的，也是因为他们把来自柏拉图《会饮篇》（Gastmahl）阿里斯托芬传奇中的爱神与今天的所谓爱情画上了等号（10章）。这些“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只要生物的种属进化为人类，原本有着生物属性的一些东西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行动、认知和判断而加以超越的。他们声称，心理分析在自柏拉图起2500年之后的今天，发现了某些其实是在阿里斯托芬的传奇中早就有过的关于爱情本质的基本见解。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把爱情描述为一种“只有通过那个人被爱的人才能治愈的疾病”，一种只有通过情欲关系才能“弥补”的“伤害”——也就是说一个正在爱着的人要屈服于他所爱的、给他造成疾病的那个客体的专制（34章），这种专制自19世纪以来规定了社会关于爱情理念的发展方向。

如果这些理论家只是把自己限制在心理学的论断上——爱情是能够通过爱情治愈的早期个人心理创伤的一种再演示，那么他们的理论在一个（仍然是）注重心理学的时代，还是有可商榷之处并有其发表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想在最上限和最下限之间跳跃，这便使自己陷入一种绝望的混乱中。没有一种研究或理论能够证明确实存在着一种直接出于天性的爱情，因此（按直到今天的认知）也不存在一种可以通过社会或文

化加以改型的基质（Matrix），用他们通常的说法，社会和文化只是“站立在基质之上”。一边是生物性的，另一边是社会性的，而心灵又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这两者之间；这种分离是一种陈旧的思维，必须最终加以克服或被超越。任何事情只要已经表现出来，只要已经给予别人去认知，就已经是社会的了，不再是一种从外部观察或由外部构成的人体，不再只是在性和性别之间，不再只是在人体结构和社会之间，不再只是在生物学特征或社会规范与个人之间，而是在这些要素中的自身，是在性、性别、人体和在个人之中的自身。

也是因为如此，柏拉图的（父权制）社会对爱神和爱的渴望的理解不同于我们今天（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父权制）社会对爱情和性欲性行为的理解。自然，这一切都还不是性别差异的“特性”或认识论建构和权力策略上的定位。鉴于社会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那么女性和男性的性欲性行为，女性和男性的性别经验也就同样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但是那位颇受欢迎的作者撰写的“爱情理论”，却放弃了运用有社会“影响”的修辞法，他们想寻找一些直接的，并且也在某些腰围与臀围的比例或跨文化的调情行为中找到了这些直接的东西。

但是我们已有的爱情理想，完全不具有普遍性。比如所谓原始民族的人就不知道它（比较比如Endleman，1989）。在我们后来所获得的被称为爱情的成就中，其实融合了四种不同的内容：性的渴望、情感上的好感、深度的信任和无限的责任。只是爱情这一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大都只能部分（或残缺不全）地得以实现。热恋在本能冲动中高涨，但出于经济理由的婚姻只能在理性中缔结。情感和理性孰重孰轻？它们通常总是以混合的比例关系出现在爱情和婚姻中，比如2/3是爱的冲动，1/3则是出于责任。这种混合不仅比“纯粹爱的形式”更常见，而且也更能持久。我们应当把它称为理性的冲动式爱情——当然，从相爱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对爱的对象幼儿般心理依赖和成熟身体的性依赖，另一方面则要求自己坚持客观和固执的独立。

一切疾病，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在公元450年说，甚至都比爱情更健康些。齐格蒙德·鲍曼在1998年说（S. 25 f）：爱情“只是站立在分离自然与超越自然、熟悉的当前与谜一般不可看清的未来之间的那么一条细线上。对一个非永生的人的爱情，是进入永恒的一种最重要的文化进步；它是性所创造的生物永恒的一种精神再现。……爱情的永恒和那位被爱的人的永生，是文化的一种必要和善意的谎言，社会和文化只有借助这类谎言，才能同化那些事实上根本不可理喻的事件”。

我曾说过，在所有的文化神秘中，爱情仍是最不可放弃的。如果我们鉴于生活关系的经济化而不再相信无私的爱情，那么我们就同时成了那些被无情交易、使用和丢弃的物的同类。此外，西方社会的一切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基本生存已经得到满足的人，并不会因为有其他更多的经济收入和有更多的财产而感到更幸福些。贪婪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能使人感到幸福的是有意义的任务（或使命）、愉快的合作、友谊，尤其是爱情。

什么时候你才能肯定自己就是那个被爱的人呢？我想象的是这么一个时刻，即当你在另一个非永生的人的怀抱里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毫不掩饰毫无羞愧感地哭泣的时候。这就是如阿多诺所说的那样（1951/1969：255）：如果“你允许表现自己的柔弱，而不去挑衅对方的强大”。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时刻。

99 正在走向终结的性时代？

我们的性时代只是开始于几百年前（Sigusch，2008a：27 ff），因此也能够再次消失。多少有些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除了我们已经听到过的弗洛伊德（89章），还有福柯（1976：208），主张以新型的施虐和受虐方式来满足人的身体和乐趣的需要，从而取代“性欲”，无论如何可以通过性欲以外的其他方式；或是范·乌塞勒（1975）和吉登斯

（1993），他们多少明确表示，可以不那么急剧而是逐步地以亲密关系取代性关系。这方面在当代特别有影响的是婴儿和依恋关系研究者，如斯特恩（Stern）和利希滕贝格，他们有意识地摆脱对性的强调，不再去研究和讨论性的本能冲动、性欲性行为和爱情，而是从注重研究情欲与依恋关系的角度出发，颠覆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婴儿是无性的——如同在性时代出现之前那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今社会，就能观察到倾向于情欲和情感转移的一种社会发展。如我们已经听说过的那样，超现代西方的欲望主要是对物或商品的渴望，是在与性不同的其他领域中寻找刺激和兴奋，并会在职业生活中做出以前只是在私生活中才会出现的情绪性反应。如果一切都是如此，那么色情和性也就被夺去了原有的特殊地位，那么也就说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把亲密关系的领域占为己有了。如果色情和性不再吸引人了，那就必须找出其他一些可发泄的情感如厌恶、反感和仇恨，比如在电视节目中，节目的参与者在几百万观众面前被贬低、被讥笑，并且实实在在被说得一塌糊涂，有些这类节目后来甚至还被提名参与评选最高电视奖。传媒和文化学家马琳-路易斯·安格勒（2007：7）鉴于新型的性关系而把对情绪、情感、感觉和激情的兴趣看作一种定位，并以这种定位取代了福柯的起源于性欲性行为的定位，“在这种新的定位中，哲学、艺术和传媒理论等话语与分子生物学、控制论以及认知心理学焊接成一种关于‘人的新真理’”。事实也是如此，在如今职业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感情、同情、魅力和关怀已经如同日常生活的内容，比如自我决定和自我优化的强制。如果这样的工作态度被认为还不够好，那么超现代人通常就会自责而不是归咎于体系。因为如果这一点成真并被广泛接受，即妇女拥有了经济所要求的并且比男人更多更好的特性和能力，比如同情心和沟通能力，那么也完全可以想象，也许从某一天开始，女人仍然还是像以前那样生育孩子，但更多地由男人来照看和抚育，由男人操持家务。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那么男人也会逐渐变得比女人更富有同情心，经济界也许又要考虑：是否让妇女再次回家去负责操持家

务。

社会总体出现的这种几乎不可理解的转变给人留下比实证更深刻印象的是这么个事实，即自新性革命以来在正常的、“反正是如此的性欲性行为者”之外，第一次公开出现了自我组织起来并相应受到文化推崇的“无性欲者”的存在（90章）。这些人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无性欲，无疑证实了理论上的一种假设：如果性的目标不再充满神秘性或不再高不可攀，原有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刺激也就会随之消失。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稍微裸露一点身体就会激起火山爆发式情欲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在原则上每个人随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大多数的禁令已被解除或是已宽松了许多。只是性和性别原有的那些冲突仍在延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似乎仍然不可根除，普通个人的信息泛滥，煽起了人们对可能的风险、危险和疾病的恐惧。另一方面是新性理念者又是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的受益者。虽然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引发了灾难般的金融危机，但是曾经遭受讥讽的某种特定性偏好和无性欲的追随者，却在我们的历史中，第一次得到了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发展自己个人的偏好并能不受迫害地加以体验和生活。也因为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也只能通过对那些想尽办法把尽可能多的女人带上床的男人，施加些按当时盛行的格言“谁与某人睡了三次，已经属于事实婚姻”等类的新压力，作为对社会关于“性欲性行为只能在婚姻中生活”这一传统要求的补充。

很显然，西方文化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越来越有些“性孱弱”，他们正在尝试一种对性漠不关心的实验，在严峻的情形下还会出现“性逃匿”；并且如果仍然还有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性生活，那也是多变的，就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是变化无常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使用了“无性欲和无性别”、“流动态性和流动态性别”的表述。

“后性”（Postsexuell）在其原本的意义上，就是无性欲和无性行

为。关于这一点，罗伯特·法勒（Robert Pfaller）曾说过（2009：33 ff）：在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1977/1983）意义上的一种专横式亲密关系的文化中，“如今的人对性的拒绝，并不是对性解放喜悦的一种反向运动，更多的是性解放运动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续。从性欲性行为的解放中解放出来，并不是走向其反面，而是性欲性行为解放的真实一面。今天的无性欲无性行为和反性欲反性行为都有着与性解放相同的哲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了性解放的合法继承者”。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才有能力“从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及它所发起的对公共领域及其财富侵袭的状况中，判断塞纳特见解中的关键价值。感谢众多规模较大的表现形式，我们不仅能够清楚地看见塞纳特对此的诊断是多么切中要害，而且事实也非常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他所认识到的这些发展究竟关及谁的利益”。只要“性欲性行为的解放在反对社会原有秩序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其实这种新的刚解放了的性欲性行为自身也是一种秩序的表现……它也有自身的法则、羞耻界线和游戏规则，它也要求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完美技能”。如果说性欲性行为“在性革命的解放前，曾经毫无疑义是属于自己的话，那么现在已证明它是其自身的异化。在一种亲密关系文化的那些狭隘和自恋的条件下，这种自我异化再也不能容忍自己被性欲性行为黏着，如同无法摆脱的秩序。它呼吁反叛，要求有一些新的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以便有效反对可能的他律：无性欲无性行为现在担当起了正宗的、无疑义的自我正义的角色，敦促将被视为骚扰的性欲性行为驱逐出公共领域”。

但这还不够。不管是否出现过性革命，人们总是习惯给那些似乎不可改变的事情，添加上其他的意义；是的，比如以前曾经遭遇讥讽的性实践，“突然间”成为完全正常的事了。如果说，情欲和色情在以前借助一种拜神教或某种其他的力量，多少是对存在的一种持续克服，那么它在今天必须加上一条声明，即所谓那种其他的力量不是必须来自于人。它可以是一个动物或一个无生命的物件。因为对家庭宠物的爱，特别是

对狗或猫的爱，已是不再能够不去思考的一种人与动物的新联盟；要是没有这一联盟就会使上百万的人陷入绝望（73章）。而那些恋物癖们（58章）呢？他们则标志着我们社会形态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发展。自从普通个人在与商品世界的交换中构成他们的自我以来，商品便试图将自身鲜亮多于黑暗的光芒投射到他们的心灵中去，这就使得他们在心灵里内化商品关系，将商品的光明面作为自身的身份认同，因而也就使自己部分地成为商品。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他们通过模仿商品而与商品有了相似性，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商品。

还会继续有些怎样的发展？实证主义的性学家认为，他们能够“预测”过去，但不是未来，如一位智慧的社会学家曾经这么说过的那样。接下来的那几代人究竟会怎样接受、采纳和模仿他们的前辈，谁也无法做出事前的预测。这就导致了在新生代中既出现了自以为是的公羊式男神、自由的爱情、注重色情或可前后串行的爱情。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后性欲性行为把性欲性行为从生殖行为中脱离出来，在它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型性欲性行为，如果我们确实敢于创造出一些新意（新型）而不只是简单继承过去（后继），那么鉴于社会的停滞和没有关于未来应有一种更公正和更有生活价值的政治想象，在自相矛盾极端严重的时代这是显眼和不寻常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最可能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会有一些颇有自我意识的人群把一些现在仍然被看成是不正常或病态的性偏好，作为独特的性别、爱情和性的形态表现出来，尤其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即使以前被认为是不可兼容的一些心理和社会形态也同样能够在这些性偏好中得以颇有成效的联结。无疑，一些我们至今尚未知晓的新形态还会加入到这类独特性偏好的行列中。性别、爱情和性的形态将会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在几乎还不可想象的色彩斑斓的图像。越来越多的人不想被挤压进预制的性模式中，而是更愿意建构自我的性和爱情生活，并且也不会因为这是自己建构的性和生活模式就从一而终。如果说以前规定了人们

在生活中应走的性道路，那么今天则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几乎谁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尝试一些以往根本不可想象的性偏好和性实践。他们因此能够在使工业时代的主体成为无人知晓是否有意义的当代客体的转换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完成这一转换。与此同时，客体化也能给人一种感觉，它似乎能做些独特的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把控自己的处境，或是甚至可以尝试一些其他人至今仍然不敢做的事。谁没有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客体角色，谁就会出丑、受到刺激、有受挫感，就会在自导自演中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举动，以忘却一些实际上无关紧要或没多大意义的事情和忧郁。这时唯一可以提供帮助的是一些通过商业化制作而成的性的部分衍生品，比如所谓的外遇情、可购买的性、电子性恋、假的性、轻松温柔的性、用药物刺激的性、假肢的性、快捷的性、缓慢的性、电话性、玩具的性和雅皮士（Yuppie）性等。这中间当然不可能有可成为实际生活的激励和谐的模式。至于它们如何能构成这种可能的性吸引力，将永远都是个谜。鉴于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延续，鉴于今人道德的日益自私，因此当前的性的苦难的核心仍然是：遭受折磨的神经、令人失望的爱情和无尽的孤独。

那个原先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但是由父亲、母亲、孩子组成的传统的核心家庭，从长远来看，仍然会作为私人生活的一种核心关系继续存在下去，无论如何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可以作为孩子养育者的母亲、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以致这些在我们作为婴幼儿最初几年生命里抚育我们的人，会继续构成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感受，并且对我们身心的影响是如此重要和关键，使得我们即使在成年后，仍然会不断回忆和寻找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舒适幸福、安全与被爱的情景和经历。

与传统家庭的距离将会继续递增，由同龄人组成以及由青年人与老年人共同结成的松散网络圈和有责任担当的团体，将取代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以抵触文化日益单个原子化的倾向。亲戚不再按血缘关系来认定，而是那些人，即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些一起照料和抚育

孩子的人，以及那些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和情感上亲近的人。这样的社团或生活共同体，可以由一对或多对异性恋的夫妻（或伴侣）组成，但也同样可以由同性恋伴侣、单亲母（父）亲或新型性联盟者共同组成，其口号可以是：在传统家庭和生殖意识形态的彼岸，以网络与合作为平台的团结互助。这肯定会使人的生活认知和经验成倍增长，而且也会使人有了更多的激励和赠予的浪漫时光，因为传统的反色情和反浪漫的家务劳作将会大幅度减少或由他人代为操作。

当然也会因此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和家庭形态，比如在第二和第三关系意义上被各方当事者相互认可的情人或出轨关系，一种不带原始爱情意义上的情感倾向的关系；但也可能是在多元之爱意义上的多元家庭。只要我们文化圈的人继续至少能够像当前那样长寿，多元之爱（74章）就能够作为被法律和文化认可的新型联盟得以贯彻。同时爱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个人的爱情在以前是不允许的，也会被看成是发疯的。相对不太可能的是，在我们仍然有着基督教色彩的文化中，会按我们几十年来称为“系列婚姻”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公开引进一种只持续一个小时或更少时间的临时婚姻，如同什叶派穆斯林早就认识和实行的婚姻。相对比较可能的是，婚前贞洁誓言的递增，也就是没有婚前的性交，但也没有法式热吻（舌吻）或抚摸，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纯洁誓言运动已经做出了榜样。鉴于毫无羞耻感和毫不顾忌他人的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就像洪水决堤般地在蔓延，原先看似近乎灭绝的“大象”、“乳齿象”（这里用来形容传统家庭——译者注），又重新赢得了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童贞，庄重的婚姻仪式，一夫一妻，生育孩子，联排别墅和一辈子的忠诚。

这种在性关系结合前坚守童贞的理念，不久肯定也会同样出现在男同和女同的关系中，那时他（她）们就会以年轻的童男和处女的身份进入同性恋的一夫一妻制中去。新型的双性恋也将会被允许同时既与一个男人也与一个女人结婚，这种新型的法律机制将被称为一夫二妻或一妻

二父的三人法律关系（Trigamie）。至于天主教教会是否终于有一天会承认，上帝是把男人和女人都作为平等的人来创造的，因而男神父和女牧师也应当允许结婚，我不想作任何猜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看来除了当前两大主要的文化性别之外，还会有多种与它们并存的其他性别被普遍认可；我考虑，首先应当是通过（手术）干预改变的性别、跨性别、双性别和无性别。并且如果有一天这些其他性别也终于能够与两大主要的性别平起平坐共存的话，那么当今的性别身份认同（其实更确切的是应当称为性别经验），将会越来越液化成为流动态，以致必须说是普遍的动态性别身份认同或动态的性别，因为一个人的某一种特定的性别归属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只能阶段性地加以确认，比如有个别人今天已经生活在这样动态的性别认同中（请比较Kammerer，2012中的一个例子）。

值得质疑的是，人是否在媒体广告和自己实际的实践中继续分化，因为在一些领域肯定有着将事实与虚构综合成被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称为有倾向性意见的现象。另一些其他的恐惧和欲望将鉴于不断地被与仍然是禁忌领域的行为，比如与儿童之间和成人与儿童的性欲性行为，与强奸、吃人肉欲和奸尸癖的欲望和行为综合起来混为一谈而钝化。恋物癖正在逐步被理解为是一种色情和情欲的模式，它适合于我们当今专注于死物的社会，就像一把能够打开锁的钥匙与那把可以被打开的锁那样般配。只是它并不适合互联网社区的新世界。Web2.0已经释放出以前不可想象的巨大可能性，并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置放了如同电灼般的电子性，我们不仅已经多次进入到它之中（这里尤请比较64、74章），而且它还将成为未来科学研究的重点。新的互联网传媒技术显然有着一种甚至比印刷术、电话、广播和电视更具传播影响的革命潜力。

几十年来，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线出现了显著的彼此移动，甚至直到出现年轻人群发色情短信的程度（82章）。以前是私人的，尤其涉及

家庭生活和性生活的那些事，自这几十年来几乎成了半私人甚至是公共的了。那种展现自己和表现自己的压力，尤其是在互联网上，现在已然巨大。在事实上可以想象的是，原先的具有启蒙理念的主体，越来越被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自我或自己所取代，即那个无限膨胀的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但是其实每个自我都只是在一种文化中使个人具有可见性的一个极其微小的碎片或者说组成部分。

照相机、电影院、电话、激光唱片、收音机、超6毫米胶片、电视机、复印件、放像机、CD和扫描机，虽然被看做是一种新技术，但似乎仍然只有涉及一些与性有关的内容，才有作为新技术的价值；那些网络和电子性者现在仍然还比较孤独，几乎不能与他人结成保障安全和获得安宁的联盟；这些人仍然不合时宜地只是聚集在一些不需付费就能观看图像和下载的色情网页；电子广告也仍然还不能使人获得性满足；但是这类新的虚幻性强烈地唤起了一个传统思维风格的问题：我怎样才能获得古老的或是真正的而不是模拟的身体呢？当前的电子性者虽仍然能够毫无危险地像一个在模拟器上进行训练的飞行员，但是如果他们忍不住想亲身体验身体的那种原始的性，却又不知道电子交配的危险，即这个层面的性交往必然会带出一种生产型物化的危险，那他们只能满足于听凭电脑程序操纵者给予的一个有着传统形式身体的灵魂的摆弄。但与此同时，电子时代也向未来的网络性爱者展开了一种感官和感知结构被普遍重写的可能性，这种重写标志着我们的文化从一种文字文化不仅进入了一种图像文化，而且也进入了一种符号文化。这时，那些古老的神话无论如何就会被减缩为点和杠。

今天已经有很多的男人和不少的女人进入互联网，去看模拟图像，去调情，或是把自己的相片和录像挂在上面，从聊天伴侣那里体验性刺激，在摄像头前表演全套的性行为，寻找一个偶尔出轨的性伙伴，或是一个合适的长期伴侣等。这些事实表明，我们的爱情、性别和性生活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只是我们目前还根本不能想象出究竟是怎样的

程度。VR和RL，表示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和现实的生活（Real Life），这两者将会越来越交织在一起。新的电子器具和机器无疑将加入到因色情而被大量拥有的那类客体的行列中——在有着我们商品世界特征的恋物癖的意义上。这里应当提出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今后是否还有可能，在如今天的推特和脸书的网络中有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信息丰富并且可信可敬的社会事务机构。

发展了的互联网社区是利多于弊或是反之，现在还很难做出判断。当前即使对一个数字化的新移民来说，似乎还主要是利多于弊，只要想一下，年轻姑娘们是怎样抱有批判意识地参与网络中的讨论的，比如对于德语或拉丁语关于阴蒂的称呼，她们会更喜欢被称为如：爱神花蕾，幸福按钮，燧火石，闪光的珍珠，门铃，猫咪或乐趣之源；或是她们在网上对一些严肃问题如对专制体制的反叛，揭露政治罪行或是帮助难民事情上所表示出的赞同态度。可以肯定的无疑是数字原生代人，他（她）们在今天已经能够冷静应对如第二人生的阿凡达这类的应用软件，他（她）们也认为电子邮件已经太老套，也许就像新网民认为超8毫米的影片已经太老式了那样。现在要提出的一个性科学上的问题是：人是否能够在违背自己原有的听觉和视觉习惯的基础上，没有传统的身体感官和心理的接触，也就是没有直接生理的相互交往，还能感觉和感受到相互交往的喜悦和性刺激与性兴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性乐趣肯定不再是我们祖父母辈的乐趣了。简而言之，这类新的媒体还会向我们展现更多更大的惊喜或震惊——有好有坏。并且，如果我们还想把我们的下几代人仍然作为性来表述和体验，网络也会为我们奠定决定性的基础。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原始的性激情在超越它的新攻击性行动中，是否会被重新改码？也就是说，传统的性形态是会被新暴力形态冲击回归到有新的存在意义的形态中去，还是会被完全取而代之？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所谈论并且也作为我们实践性生活空间的社会

系统，从结构上来说，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我们只需要看一下管理、强制、（暴力）三权分立、国家暴力或是国家（暴力）垄断，就能知道，暴力属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就如死亡属于生命那样。毁灭是社会的真实计划，现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从神秘化和肉体上废除人的历史，因为解构和破坏不再只是主体的构想，而且也成为他律通过社会机制而制造出如弥散、物化和人与物互为客体的异化（17章）等正在进行着的事情。文明的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前几代人甚至不敢梦想的许多个人和普遍的自由。但同时它也强化了一种倾向，把人普遍贬低为只是商品生产需要的原料或是只需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会走路的动物，或是甚至假想人在社会意义上已经死亡。这种倾向远远超出了经典哲学试图用异化、物化或拜物教化等范畴想要概括的程度。如果我们不反思这种物化的倾向，不批判文明的这种进程，就会使暴力有机会以某种固定的形式隐藏在普遍暴力的背景中最大量地实现自己。在20世纪中出现了一系列生理心理直接暴力的过激事件，比如纳粹与斯大林的折磨和迫害人的专制体制，以及在纳粹体制中那些用人的死亡做实验的医生，当然还有阿布格莱布（Abu Ghuraib）监狱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这类事件，民主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因此可以说，对待个人暴力犯罪的令人愤慨之处在于，这个罪犯只是做了一些没人愿意真实承认的事情。他把他人看得非常无足轻重、没有意志、仿佛已经死去或已经只是一件物品，但这是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这么做的事，只是在日常的意识中被戴上了假面具。他多少有些把社会这种扭曲的敌视人的倾向从抽象中撕裂出来，把我们社会中的自私自利、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披露和自我披露、杀死外来者和自己之类的事件和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当那个作为个人的罪犯按我们当今“一个人有多大用处才有多大价值”这么个价值标准去行事的时候，他其实与我们文化的毁灭特征有着可认同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叫喊会如此激烈。

每个人都想适应社会并与其有认同性（不管是以横向还是竖向的方式），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有自己个人的安宁。但是对某种形式的任何认同和任何适应都同时也是一种对其他形式的排斥，把它定为对立面，在严峻的情况下甚至会毁灭它。这种状况使那个带有社会性的自我对质于那个更愿意超越社会性并且还没有适应和认同的自我。这个自我从永恒的快乐中获取了一种放弃生命的超验持续性，从对死亡的观察中悟出了一种赞同绝对的形而上学直接性。但其中的关键是，这种私下或者说秘密的形而上学，可以使人回想起它作为一切强行物化的反面图像和它的主体直接性，也让人联想起它关于任何生命和快乐，如果没有一种对它们的超验性的承诺，便不再是生命和快乐的学说。真实的快乐只能存在于社会认同的彼岸，因为社会认同会把个人暴力和个人死亡绑定在连续的物化假死上，把个人的性兴奋和性乐趣绑定在认为个人化行为早就是拜物化或是对没有物化的事物加以嘲讽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如果快乐真的放弃了对物的渴望，那也就意味着它的死亡——阿多诺肯定会这么说。但是那个经常怀有恐惧之心和不断被贬低的自我却在希望，通过一次暴力行为终于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即使会因此导致他人的死亡。

性侵虐和暴力的话语总是只在这个时刻才揭掉面罩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即如果它疯狂地瞄定在仍然还很凸显并因此被各方利用为权力策略的本能冲动式的性欲性行为的时候，以及如果它只在心理和社会领域里寻找人类逃亡和种族灭绝暴行之时。与必须把男人因为性别歧视而用暴力欺负女人的行为与社会普遍的暴力行为，把性侵的暴力与非性侵的暴力综合起来加以思考相同，我们也必须把那种现实的杀人致死行为与导致我们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都归入无生命物的领域的那个社会机制综合起来思考。我们只需从这个角度进入我们的日常文化中去看一下（Sigusch，1997）：也许我们先走进一家啤酒馆喝“一杯不错的啤酒”。接着也许是一家建房储蓄银行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就会突然觉得“啊呀，是的，我想有一个能够公平帮助我建个家的银行”！然后进入眼帘的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广告，“有关您汽车的重要信息”。我们一下子就会

看出和发现，其实社会的这种物化扭曲无处不在：有位可能被提名担任部长的女士，之所以被公众认为是合适的，是因为她的举止符合“电视放映的标准”，她的演讲可以不需任何修改“直接付印”。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谈论的是：“自杀”的细胞，基因现在已变得很“聪明”，分子链能够“相互识别正确还是错误”，病毒是“阴险的”，酶解的反应是“理智的”。电视节目中的评论员说，炸弹说出了一种“明确的语言”。一份报纸认为那枚火箭炮“优雅”地击中了目标，似乎这是它为自己特意编排的一次舞蹈。与此同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农庄在“死去”。我们中有个老人去世7年了，仍然躺在他那套属于非营利性建房自助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房里成了木乃伊，但是在尸体被发现之前，有谁去过问过他吗？没有。直到一家银行并不是注意到尸体已经僵硬，而是奇怪他的账户怎么一直没有动静才被发现。

人原本特有的能力和属性似乎都转移到对人有意义的死的物上，像这些死的物那样地去行动和说话，并有着像它们那样的商品形态。如果个人的这种行动并不危害社会或自然的整个进程，那么这个种族或这个民族或这种植物的这场生存斗争便赢得了重要的分量。除了大自然没有什么主动和特意的作为外，人便是这样直奔这个计划的：物化人性、人化物性。活生生的生命假装死去，死的物被唤活。也就是说，不是那个越南人令人感到可爱，而是那杯啤酒。享受公正待遇的不是那个难民，而是那幢连体别墅。获得信息或得到应用咨询的不是那个已经成年的人，而是那台受他崇拜的机器或是电脑。讨人喜欢的并不是那个完整的人，而是他或她的马尾辫。人们实践的性行为也不是一种情欲的连续、自发和整个主体，而是肛交AV与尿液和精液UB，用拳性交FF和假乳晕TT（59章）。不仅是那位部长候选人举止优雅，而且那枚火箭炮也同样优雅。她语言的美丽并不是因为充满活力和惊喜，而是因为就如印在报纸和书本中的语言。历史不再由人所创造或书写，而是由病原体。在我们高度发展的文化中，有上百万的人不能读和写；相比之下，化学制品和生物碎片反而能更轻松地读和写。

另外，谴责一些社会影响巨大的性暴力，不管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根本不需支付任何成本。比如一旦涉及儿童色情制品的问题，那么各个党派马上就会大加谴责以赢得一种错误的好良心。其实懂得不可能通过法律惩罚手段构建或重建人的尊严的那些议员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种貌似好的良心是错误的。但他们中却没有人会去反思，他们这种错误的好良心是必要的错误。他们之所以不愿和不敢去反思，是因为如果对此进行反思后，就必然会对当今的整个思维和生产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会对那普遍的暴力综合背景提出质疑。正因为如此，现实的暴力便被归入非理性的领域，只是为了不必再露出破绽：当前整个一套理性的行为和机制，其实都是非理性的。比如在美国，花费在商品包装上的费用支出等于整个印度购买食品的开销。投资集束炸弹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似乎与日常家庭和文化中的暴力毫无关系，似乎只是出于市场自由贸易的逻辑和不可抗拒的事实强制。这一切都是扭曲，这一切都是抵赖，仿佛现在连鱼都不知道它们是生活在水里的了。

人正在努力地使自己客体化，因为没有生命的物是如此富有成就。他们想把死的物人化，虽然这并不那么简单和容易，他们想拥有像它们那样的优雅妩媚和影响力。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进入物的领域屈服于它或是说对它顶礼膜拜，才是更好的——哎，那么那个自我究竟应当在哪儿呢？当精确科学走向终结的时候，人类在担忧生生地被物活埋。这种恐惧蔓延得如此广泛，以至于肖邦特意留下遗言，要求在他死后一定要打开他的尸体。这在当时作为个人行为具有可行性，但作为社会普遍的行为则未免有些过于浪漫。对今天来说，假死已经不再是一种主体的问题了。今天的人必须为生担忧，尽管他们其实早已被社会埋葬，被社会清除、捆绑，被悬挂在半空中没有立足之地。这对普遍的社会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个人来说却是非理性的。假象地生活，今天也可称为戴上面罩的不真实的生活，因只能过这种生活而导致的恐惧，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抽象。我们虽然在物理生理意义上存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如那位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所说的那样，已经是“过时的”了，因为

我们依靠我们的感官和心理感受已完全不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生产和制造出的那些产品。比如对于核裂变，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最终会导致自己走向末日的可能性，即使现在销毁所有的核武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也不会再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因为它的裂变公式已经为人所知。

自然，暴力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有象征性的、结构性的、物理性的和心理性的等等。我在这里感兴趣的主要是那种暴力形式，在这种暴力形式中，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侵略行动使自己进入一种几乎陶醉的幸福状态，并能在心理和生理上得到与性高潮完全相同的快乐或者甚至超过性高潮。这种自毁冲动胜利进军我们文化中的最好例子，就是今天由社会各层次人员聚集而成的那一群暴力流氓（Hooligans）。他们通过聚众斗殴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展示他们所特有的“攻击性的美”和他们的“荣耀”，并且也为了在似乎能对他们承诺安全和保护的群体组织中获得性高潮般的“亢奋”。他们在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的场合，当然也在其他场合，按自己的理解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就能使我们看出，暴力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怎样逐步成为文化的。

扬·菲利普·利是美（Jan Philipp Reemtsma）曾对多种暴力形态进行过区分（2008）。他关于“自成目的”的暴力形态，与我目前所关注的暴力形态很相近，即一种通过侵略性暴力攻击获得直接亢奋激励的形态。并且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种暴力激励就会在很大范围内取代我们文化中的性刺激——如同通过其他一些惊险活动，比如蹦极（Bungee Jumping）。最后，我们也已听说了，传统的性本能冲动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新性革命的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从文化中分离了出去（51章）。性欲性行为攻击和分裂的那一面与其温柔和统一的那一面有着如此巨大的区别，以致看上去这两者似乎不再有丝毫关联。如果侵略和攻击真的能够作为主要的激励模式取代性欲性行为，那么传统的欲望和激情不仅能在新型的性欲性行为、自我参照关系和嗜好中，而且也能在非

性的惊险和攻击性的行动中，加以改码和转换，这也就是为什么暴力形态能够在与性形态的竞争中不断强化自己的意义和地位。这种预期的激励也就不能再被称为性的刺激，因为它不是通过力比多和热恋，而是通过自毁冲动和仇恨得以实现的。无论如何可以这样想象。

我们期望并抱有希望：没有一种新型的自毁冲动将会取代原始的力比多。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愿望呢？在我的愿望清单上除其他一些事项外，还有就是婴儿的性欲必须去禁忌化，以便使青少年能够有效抵御成人的性侵。也必须在职业、收入、升迁、主持家务和照料儿童等领域实行性别均衡和平等。感谢近几十年来从性别、阶层、民族种族、性取向和身体与精神状态的角度对性别、同性恋、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研究，至少有了涉及性别均衡和平等的许多事实数据。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制定和实行灵活的工作时间与育儿模式，帮助妇女不必像今天那样因为有了家庭就必须告别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如今日常生活中男人用来伤害女人的性别歧视，应遭到普遍谴责。但是，争取人权和争取一切性别的性与生殖健康的战斗，还将继续。任何受到强制的异性恋以及同性恋都将变得苍白。人们不会再像挑选一辆汽车或一台电脑那样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伴侣。没有一个儿童是通过基因设计的。不再把传统的性欲性行为规范作为青少年性欲性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新型的性和新型性别不必再去呼吁求得认可，能够完全自然地按自己的意愿做出完全独立的自我决定。不再会有人向变性人追问其出生时的性别。与生俱来的两性兼有者，再也不会因为出于医学理由的强制，遭到心理折磨和身体残害。对以往作为禁忌并因而遭遇嘲讽的性和性别，也应进行批判反思，以证明它们现在确实已被社会和文化认可。希望医学、心理学以及心理分析学能够借助批判主义性科学，回忆以前曾被自己的学科看成是病态和变态的那一切究竟是什么，并且希望它们能够把对性的想象与性生理心理障碍，把疾病与社会的专横规定分离开来。

其他的愿望还有，比如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性和性别的问题不要再

成为政治争辩的主题，它应当让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如今的社会、职业和经济状况已经正在变得不可忍受。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被排挤出社会，并且事实也是如此。因此，仅仅想用便宜的性来转移他们对社会、经济等各层面问题的注意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不要期待从“资本主义的幽灵”（Vogl，2010）中得到什么道德、正义、同情和关怀，这是一个不仅制造混乱和不具有预测性，而且也非道德的幽灵。越来越多的人必须理解，鉴于整个世界的状况，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仍然想超过稳定增长可能越来越多地消费和占有，其本质无疑就是愚蠢、放肆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使一切社会领域屈服于自己，也因此越来越自毁冲动化了，它正在走向一种自身的爆炸。现在必须提出的新问题是：唯有什么才能使人的生活具有生活的价值？希望在这场价值的争辩中，消费和财富将败给爱情和友谊。

我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思考和我所提出的如“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等定理，可以证实在当前的金融和银行危机之前就已公开发表，并且我那时甚至就已预言：银行投机所造成的巨额亏损，将会转移到纳税人的身上，由他们来承担。尽管如此，如果现在终于能听到一些（虽然只是个别的）声音，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提出质疑，仍然会令人感到高兴。那位以独立思想家而闻名的联邦宪法法院法官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曾经写道（2009：8）：不能回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预言的现实意义。资本主义有着一种“非人性的特征”，它建立在“个人占有财富和资源”的基础上。如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关于“人的救赎”的圣谕（Enzyklika Redemptor hominis）中已经批判过的那样，资本主义使人成为“经济体制”的“奴隶”，成为他自己产品的物。资本主义“无视自然和人的命运”，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资本主义必须由一种“受全民团结互助”理念启示的“秩序和行动模式”来加以取代。“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这不是一种“有预定的实质内容”并有“一定标准和界限”的行为，而是一种以无限扩张自己、无限增长财富和占有为目标的“赚取、创新和营利的兴

趣”。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和他们的日益富裕，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出发点和结构基础。

因此必然要寻找第三条道路。之所以不能再排除对第三条道路的寻找，是因为我们的公民们不愿沉默地忍受这一切，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支柱如意识形态、金融财政、信息沟通和能源系统已经倾斜和开始倒塌。老的资本主义濒临破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它疏离人的伎俩，已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一切。有越来越多的鱼认识到自己生活在水里。这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不再是一切领域的经济化，不再是经济增长率，而是全体人的共有、共享、共同体、伙伴式的合作社和合作关系；主张帮助那些有帮助需要的人、弱势群体和老弱病残者；主张收入均衡、人的同等价值、谦逊不张扬、有同情心、生活满意度、健康幸福、可持续发展，并根本就是一切与人为善、一切以人为本；不再是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不加粉饰的人类发展指数、快乐星球指数和生活美好指数。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终结否认人的困难的集体性谎言。

现在回到我们很专业的性领域。鉴于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不支配有一种情欲色情的艺术，因而我们有必要将我们的希望寄托于爱神仍在流血的伤口上，寄托在贯穿于我们全部性形态的尚未解开的矛盾中，我们不愿屈服于欺骗和庸俗。没有希望没有愿望没有渴望，是任何人的存在都不可想象的，人不会没有对童年时代天堂的渴望。那些正统的心理分析家曾以这一观点批判了“从马尔库塞、福柯到西古希”等理论家。那位睿智的心理分析学家彼得·帕赛特（2006：254 f）对这些正统心理分析家的回答是：“无论如何，与不愿理解为什么在可满足的性欲性行为的需求之外还需要无法满足的爱神愿望的那些人相比，关于爱神的想象与性欲性行为的真相又更接近了一步。”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有，比如人们如今的挣钱冲动已经强于性冲动，比如在20世纪以两人关系和性生活为主的夫妻关系咨询和治疗，在21世纪初就已经把重点转为爱情关系（Altmeyer，2005），遗憾的是在性科学研究中仍以性欲和性行为为重

点，而不是爱情。

显然，性已不再是我们文化中的那个空缺。从好奇到贪婪，从寻找刺激到寻找惊险的转移，也昭然可见。但孩子还不是由技术和机器生产制造，他们仍还有亲生父母。因此，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性欲和性行为。性黏着人，就像人被他自己的利己之心所黏着，或者和蔼些说，就如同人的审美能力。但这也可以只是通过对那些“漂亮区域”的神经刺激，或是简化为最外表的持续的声音刺激，比如音乐，就足够了。只是因为人的性欲性行为仍然还在黏着人，因此对人来说，他们无意识中的不确定性，仍然作为征兆留存了下来，而我们则仍然把它称为性。我们无非是想通过一个其他的人，通过我们对爱情的拜神化，通过我们的性生活场景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些。这种所有愿望中最大的愿望，仍然且总是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它既代表童年乐园的天堂，也代表了我们作为儿童曾经陷入过的教养院地狱。它既建立在孤独和暴力之上，也同样建立在实现宏伟愿望和潜身于生理心理宇宙的愿望之上。在寻找童年的天堂和地狱，寻找惊险、自爱和自我完成的性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乎究竟使用怎样的方式方法，甚至不管它们是否有用。我们文化中的愿望和它的满足之间的那条深渊，在今天似乎已被填补或者说被搭桥进行了连接。但即使是当前的这种连接，也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是不可解的。

当然，人类的性欲和性行为肯定仍然还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未来，因为它们即使在一个知识社会也不能通过知识和几乎能把一切都转化为现实的技术来代替完成。它们给幻想、猜想、抱怨和指责留下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因而也会被媒体继续利用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另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状况中的性或完全只是简单的情欲感受和这个人在性幻想中的体验。也就是说，仍然为揣测和炒作敞开着大门。并且即使是性科学，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人的性欲性行为以其每个人不同的具体和特殊的方式证实了，我们冷静的理智并不

能完全掌控我们的生活，并且同样也证实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理性地设置我们的生活。成功的性欲性行为证明了这个世界到底还是有幸福与光芒。满意的情欲和性生活不仅能够强化人的自信和幸福感，也能愈合人的心灵伤口，这就使得个人的情欲表现和个人的性能力在根本上其实就是那个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在这样的艺术品面前，科学只能表示出满满的惊讶，并且经常还有无限的困惑。任何一种性的个人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并在认识论上具有不可再简约性。因此，在我的性理论中，我把性的这种特点表述为一种个人化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但是公正和自由，人们今天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或是以这一类为基础的一种与人为善的道德中才能寻找到。鉴于通常伟大无比和令人敬畏的自然对我们的自由和社会公正保持了沉默，我们仍然还需要科学和政治运动。

只要个人还在绝望地揣测“性的特殊差异”的技巧，那么文化的场景就仍然会以人超越此岸的渴望为主题加以揣测和炒作，性爱与反性爱之间围绕的一个个断面和碎片的争夺战也会延续下去。但是如果对性的特殊差异的揣测终于走向终结，那么人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希望，自己反性爱的那微小部分和可购买的作为物的性，是以自己随时可以撤销为前提才予以赞同和同意购买的。这将是性在所有与自己相关领域的最终胜利。如果说，批判主义性科学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无性、一夫一妻、组合式或多元化性爱的行为，同样都还远离一种自由的有意义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目前还尚未被我们认识而已。性享受者如同性犯罪者一样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指数。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依靠无意识的反性欲性行为；因为只有到那时，性的动机才不是跟随“这真有趣（It’s Funny）这一普遍化的命令，而是超越此岸的刺激。意识形态一直是健康和快乐性生活的障碍。但要改变它，便会触及整个社会体制的根基。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依附在社会表面随时可以剥离的那个层面，它内在和交织于整个社会之中。它奠基于主要是人与商品交换的抽象中。如果不放弃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出现人与物的交换。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含蓄，直到今天仍然是必要的社会假象”（Adorno，1966：

348）。

另外，我们仍然还寄希望于一种认识论上不可再简约的性剩余值、性的奇妙神秘，那些使我们激动万分的性崇拜和场景都内含着一种不可解的秘密、性的不可生产和不可购买的特征。我们仍然希望，只要性和性别可能性的伤口仍在流血，性爱就能够吸引我们，并且反性爱就能够远离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不顾它们已经败落的象征意义）继续为争取自身的意义、身份认同、性和性别个人特殊差异，为性的真实性和自主性而斗争，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留下多少了。

无意识的冲动和个人的性想象与文化场景和似乎最终由理性做出决定的那些事情，可能仍然是相矛盾的。当然处在性兴奋时，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令人感到窒息的要素，比如一切最常见的事和物，一切貌似合理的决定会被要求远远退场，退出此情此景，因为现在出现了事先没有料想到的、震撼人心和令人疯狂的事情。这里涉及的不再是舒适和电子数字，而是最有风险和最传统的事；它不再是无聊，而是一种例外的紧急状态。一下子又身处在童年无所不能和无限完美的幻想中，令内心感到无限安宁的共栖共生，甚至能超越性别的距离：所有性别都有进入幻想的自然权利，可以自由地想象：乳房、外阴、阴道、阴茎、睾丸、月经、润滑、合同、勃起、穿透、射精、受精、受孕、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在想象中，燃烧的火山岩浆被注入静脉，女人感觉到自己的阴茎已经进入男人悸动的阴道，正处在性兴奋的男人正在抓住自己肿胀的乳房。性别差异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嫉妒。女人射精和男人受孕，也变得无比正常。以往曾给生活带来困难的一切，如早年的心理创伤，侮辱、羞辱和良心折磨，都被中性化了。

我们相信，不需要体系客体和体系强制参与就能丰富想象的传统自我强大的主体，仍然继续喜欢与性相关的一切。我们希望，仍然还很陌

生的性爱和被打跑的想象，即使在科学不断惊人超越自己原有界线甚至直到克隆出无性生物的时代，还能在21世纪实现自己，不管这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安慰。也许有一天，超越此岸世界的情欲又会回到我们中间，而且还带来了新的对原有的性界线的超越，这种新的超越从电子数字的世界角度，不再认可神秘和众神，站立在我们的身边，为我们减免历史的重负。这时，爱神又能笑了。但它仍然还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空缺，并且仍然是性的可能性中的一个仍然还在流血的伤口。

当前显然是自我中心和金钱正在驱赶我们这些乌托邦式的想象。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新性革命还没有发展出一种主要围绕着性色情、迷醉、狂喜和违规越界的乌托邦。在当前，正统的性规范已经出现动摇，自我实现的性和自我认同的性别，流动态的性取向和流动态的性别正在兴起，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两种性别兼有。这就是新性革命在当前的核心进程。没人知道，这个进程还要持续多久。

参考文献

Adorno，Th.W.（1951）：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M.：Suhrkamp 1969

Adorno，Th.W.：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 1966

Adorno，Th.W.：Dialektische Epilegomena. Zu Subjekt und Objekt. In：Ders.：Stichworte. Kritische Modelle 2.Frankfurt/M.：Suhrkamp 1969：151-168

Adorno，Th.W.und S.Krakauer：Briefwechsel 1923-1966，hg.von W.Schopf. Frankfurt/M.：Suhrkamp 2008

Agrippa von Nettesheim（d.i.Heinrich Cornelius）：Von dem Vorzug des Weiblichen vor dem Männlichen Geschlechte. In：Gründliche Erörterung der Frage：Ob ein Mann seine Frau zu schlagen berechtigt sey？2.，vermehrte Aufl. Jena：J.F.Ritter 1736

Alizade，A.M.（Hg.）：Motherhoo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Karnac 2006

Altmeyer，M.：Über die Renaissance der Liebe in der zeitgenössischen Paartherapie. Z.Sexualforsch. 19，255-259，2006

Amendt，Günter：Sex-Front. Frankfurt/M.：März 1970（Neuausgabe Erftstadt：Area 2004）

Amendt，Günter（1980）：Nur die Sau rauslassen？Zur Pädophilie-

Diskussion. In：Sigusch，V.（Hg.）：Die sexuelle Frage. Hamburg：Konkret Literatur Verlag 1982：141-167

Amendt，Günter：»Sexfront«. Revisited. Z.Sexualforsch. 19，159-172，2006

Amendt，Günter，G.Schmidt und V.Sigusch：Sex teils. Sexualforschung als Kritik. Hamburg：KVV konkret 2011

Anapol，D.M.：Love without limits. San Rafael，CA：IntiNet Resource Center 1992（revid. Ausgabe u.d.T.Polyamory. The new love without limits，1997）

Anders，G.（1956）：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Ⅰ：Über die Seele im Zeitalter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5.Aufl. München：C.H.Beck 1980（zit.als 1980a）；Bd Ⅱ：Über die Zerstö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ünchen：C.H.Beck 1980（zit.als 1980b）

Anders，G.：Ketzereien. München：C.H.Beck 1982

Angerer，M.-L.：Desire or intense living：Neosexuals. In：Dies.：Vom Begehren nach dem Affekt. Zürich，Berlin：diaphanes 2007：115-119

[Anonymus（Karl Maria Kertbeny）]：§ 143 des Preussischen Strafgesetzbuches vom 14.April 1851 und seine Aufrechterhaltung als § 152 im Entwurfe eines Strafgesetzbuches für den Norddeutschen Bund. Offene，fachwissenschaftliche Zuschrift an Seine Excellenz Herrn Dr.Leonhardt，königl. preussischen Staats- und Justizminister. Leipzig：Serbe 1869（abgedruckt in：Jb.sex. Zwischenstufen 7，3-66，1905）

Anzieu，D.：Das Haut-Ich. Frankfurt/M.：Suhrkamp 1991

Arentewicz，G.und G.Schmidt（Hg.）：Sexuell gestörte Beziehungen. Konzept und Technik der Paartherapie. Berlin u.a.：Springer 1980（Neuausgabe Stuttgart：Enke 1993）

[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Final report，2 Bde. 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6

Azoulay，I.：Phantastische Abgründe. Die Gewalt in der sexuellen Phantasie von Frauen. Frankfurt/M.：Brandes；Apsel 1996

Azoulay，I.：Eros pas mort，monsieur Sigusch！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21-27

Azoulay，I.：Rettet die Scham！Über Abgrenzung und Bedrängnis. Z.Sexualforsch. 24，272-278，201

Bancroft，J.（Hg.）：Sexual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The Kinsey Institute Series，vol.7）.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Bancroft，J.：Human sexuality and its problems.3.Aufl. Edinburgh，New York：Churchill Livingstone，Elsevier 2009

Barczay，G.：Revolution der Moral？Die Wandlung der Sexualnormen als Frage an die evangelische Ethik. Zürich，Stuttgart：Zwingli 1967

Basson，R.：Women's sexual dysfunction：Revised and expanded definitions. Can. Med. Ass. J.172，1327-1333，2005

Basson，R.et al.：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e on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J.Urol. 163，888-893，2000

Bataille，G.：L’érotisme.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 1957（dt.：Der heilige Eros. Neuwied，Berlin：Luchterhand 1963 sowie Frankfurt/M.，Berlin：Ullstein 1984）

Baudrillard，J.：Die Rituale der Durchsichtigkeit. In：Sigusch，V.und H.L.Gremliza（Hg.）：Sexualität konkret，H.6.Hamburg：Gremliza Verlags GmbH 1985：74-80

Bauman，Z.：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UK：Polity Press 1991（dt.：Moderne und Ambivalenz. Das Ende der Eindeutigkeit.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5）

Bauman，Z.：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Blackwell 1995（dt.：Flaneure，Spieler und Touristen. Essays zu postmodernen Lebensformen. Hamburg：Hamburger Edition 1997）

Bauman，Z.：Über den postmodernen Gebrauch der Sexualität. Z.Sexualforsch. 11，1-17，1998（hier zit. nach Abdruck in：Schmidt und Strauß 1998：17-35）

Bauman，Z.：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UK：Polity Press 2003

Bauman，Z.：Culture in a liquid modern world. New York：J.Wiley 2011

Beauvoir，S.de：Le deuxième sexe. Paris：Gallimard 1949（dt.：Das

andere Geschlecht. Sitte und Sexus der Frau. Hamburg：Rowohlt 1956/1968）

Bebel，A.（1879）：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Gegenwart und Zukunft. 18.unveränd. Aufl. Stuttgart：Dietz 1893

Bech，H.：Homosexuelle Politik am *fin de siècle*. Das Verschwinden der Homosexuellen und das »Queere«. In：Ferdinand et al. 1998：25-34

Beck，U.und E.Beck-Gernsheim（Hg.）：Riskante Freiheiten. Frankfurt/M.：Suhrkamp 1994

Becker，N.：Die psychoanalytische Theorie des Sadomasochismus. Wann ist SM krank？In：Hill et al. 2008：159-174

Becker，S.：Pädophilie zwischen Dämonisierung und Verharmlosung. Werkblatt-Z.Psychoanal. Gesellschaftskritik，Nr.38，5-21，1997

Becker，S.：Weibliche Perversion. Z.Sexualforsch. 15，281-301，2002

Becker，S.：Transsexualität-Geschlechtsidentitätsstörung. In：Kockott und Fahrner 2004：153-209

Benjamin，J.：The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feminism，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 New York：Pantheon 1988（dt.：Die Fesseln der Liebe. Psychoanalyse，Feminismus und das Problem der Macht. Basel，Frankfurt/M.：Stroemfeld/Roter Stern 1990）

Benjamin，J.（1987）：»Sympathy for the devil«. Einige

Bemerkungen zu Sexualität，Agression und Pornographie. In：Dies.：Phantasie und Geschlecht.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n über Idealisierung，Anerkennung und Differenz. Basel，Frankfurt/M.：Stroemfeld 1993

Benkel，Th.：Die Verwaltung des Todes. Berlin：Logos 2012

Benkel，Th.und F.Akalin（Hg.）：Soziale Dimensionen der Sexualität.（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95）.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10

Benson，P.J.：The polyamory handbook. A user’s guide. Bloomington，Ind.：AuthorHouse 2008

Berkel，I.：Missbrauch als Phantasma. Zur Krise der Genealogie. München：Fink 2006

Berkel，I.（Hg.）：Postsexualität. Zur Transformation des Begehrens.（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92）.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9

Berner，W.：Imre Hermanns »Anklammerung«，die Pädophilie und eine neue Sicht der Triebe. Psyche-Z.Psychoanal. 50，1036-1054，1996

Berner，W.：Trieb，Motus，Motiv？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47-66

Berner，W.：Fallbericht eines Patienten mit sexueller Sucht. Z.Sexualforsch. 18，198-201，2005

Berner，W.：Perversion.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11

Berner，W.und A.Hill：Pädophilie-eine sexuelle Orientierung？In：

Richter-Appelt und Hill 2004：153-173

Berner，W.und J.Koch：Über die allgemeinste Erniedrigung des Liebeslebens heute. Z.Sexualforsch. 22，340-352，2009

Berner，W.，P.Briken und A.Hill（Hg.）：Sexualstraftäter behandeln mit Psychotherapie und Medikamenten. Köln：Deutscher Ärzte-Verlag 2007（zit. als 2007a）

Berner，W.，A.Hill und P.Briken：Therapie bei sexueller Delinquenz. In：Sigusch 2007a：308-322（zit. als 2007b）

Beuscher，B.（Hg.）：Schnittstelle Mensch. Menschen und Computer-Erfahrungen zwischen Techn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Heidelberg：Asanger 1994

Binding，K.und A.Hoche：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hr Maß und ihre Form. Leipzig：Meiner 1920

Bloch，E.：Das Prinzip Hoffnung. Bd. 2.Frankfurt/M.：Suhrkamp 1959

Bloch，I.（unter dem Pseud. Eugen Dühren）：Neue Forschungen über den Marquis de Sade und seine Zei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exualphilosophie de Sade’s auf Grund des neuentdeckten Original-Manuskriptes seines Hauptwerkes »Die 120 Tage von Sodom«. Mit mehreren bisher unveröffentlichten Briefen und Fragmenten. Berlin：Harrwitz 1904

Bloch，I.：Aufgaben und Ziele der Sexualwissenschaft. Z.Sexualwiss. 1，2-11，1914

Bloch，K.H.：Masturbation und Sexualerziehung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Ein kritischer Literaturbericht. Frankfurt/M.u.a.：Lang 1989

Böckenförde，E.-W.：Woran der Kapitalismus krankt. Frankfurter Rundschau，Nr.94 vom 24.April 2009，S.8

Boehm，K.：Praktiken der Polyamorie. Wien：Verlag des Instituts für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2012

Bogaert，A.F.：Asexuality：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a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 J.Sex Res. 41，279-287，2004

Bohleber，W.：Der Beitrag der Psychoanalyse zur Traumaforschung.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67-82

Bohleber，W.（Hg.）：Zur Psychoanalyse menschlicher Destruktivität. Psyche-Z. Psychoanal. 55，Sonderheft 9/10，2001

Bohleber，W.：Die intersubjektive Geburt des Selbst（Editorial）. Psyche-Z. Psychoanal. 65，769-777，2011

Bohleber，W.und S.Drews（Hg.）：Die Gegenwart der Psychoanalyse-die Psychoanalyse der Gegenwart. Stuttgart：Klett-Cotta 2001

Boiler，N.：Die sogenannten niederen Sinn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Sexualität. In：Dannecker und Sigusch 1984：39-50

Böllinger，L.：Rausch und Verschmelzung. Zur Verwandtschaft von Sexualität und Drogen.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67-82

Böllinger，L.：»Ein Strudel der Ohnmacht«[Interview über Beziehungstaten]. Frankfurter Rundschau vom 23. August 2012，S.3

Böllinger，L.und R.Lautmann（Hg.）：Vom Guten，daß noch stets das Böse schafft. Kriminalwissenschaftliche Essays zu Ehren von Herbert Jäger. Frankfurt/M.：Suhrkamp 1993

Boltanski，L.：Leben als Projekt. Prekarität in der schönen neuen Netzwerkwelt. Polar，Heft 2/2007，S.7-14（zit. nach der Online-Ausgabe，acc.：25.7.2011）

Boltanski，L.und È.Chiapello：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Gallimard 1999（dt.：Der neue Geist des Kapitalismus. Konstanz：UVK-Verl.-Ges. 2006）

Borkenhagen，A.und E.Brähler（Hg.）：Intimmodifikationen（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95）.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10

Bosinski，H.A.G.：Sexueller Kindesmissbrauch：Opfer，Täter und Sanktionen. Sexuol. 2（4），67-88，1997a

Bosinski，H.A.G.et al.：A higher rate of hyperandrogenic disorders in female-to-male transsexual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2，361-368，1997b

Bosinski，H.A.G.et al.：Anthropometrical measurements and androgen levels in males，females，and hormonally untreated female-to-male transsexuals. Arch. Sex. Behav. 26，143-157，1997c

Bosse，H.und V.King（Hg.）：Soziologie der Männlichkeit.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0

Brähler，E.und H.J.Berberich（Hg.）：Sexualität und Partnerschaft im Alter.（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91）.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9

Brandenburg，U.und S.Fliegel（Hg.）：Schwerpunktheft »Sexuelle Störungen«. Psychotherapie im Dialog 2，241-386，2001

Brantner，F.：»Die Widerstände werden größer«. Anti-Choice-Lobby bedroht sexuelle und reproduktive Rechte in Europa（Interview von Gundel Köbke）. Pro Familia Magazin 39，H.3，4-5，2011

Braun，Ch.v.und I.Stephan（Hg.）：Gender-Studien. Eine Einführung. Stuttgart，Weimar：J.B.Metzler 2000

Braun，K.：Die Krankheit Onania. Körperangst und die Anfänge moderner Sexualität im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1995

Briken，P.und M.Berner（Hg.）：Praxisbuch Sexuelle Störungen. Thieme. Stuttgart，New York：Thieme 2013（im Druck）

Briken，P.，A.Hill und W.Berner：Sexuelle Sucht：Diagnostik，Ätiologie，Behandlung. Z.Sexualforsch. 18，185-197，2005

Briken，P.，N.Habermann，M.P.Kafka，W.Berner und A.Hill：The paraphilia-related disorder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evance of the concept in sexual murderers. J.Forensic. Sci. 51（3），683-688，2006

Briken，P.，N.Habermann，W.Berner und A.Hill：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xual addiction：A survey among German sex therapists. Sexual Addiction；Compulsivity 14（2），131-143，2007

Briken，P.，A.Spehr，G.Romer und W.Berner：Sexuell grenzverletzende Kinder und Jugendliche. Lengerich u.a.：Papst Science Publ. 2010

Brückner，M.：Die Liebe der Frauen. Über Weiblichkeit und Mißhandlung. Frankfurt/M.：Neue Kritik 1983

Bucher，T.：Sexualität und Partnerschaft in der zweiten Lebenshälfte. Phil. Diss.，Univ. Zürich 2002

[Bundeszentrale für gesundheitliche Aufklärung（BZgA）]：Jugendsexualität. Repräsentative Wiederholungsbefragung von 14-bis 17-Jährigen und ihren Eltern. Köln：BZgA 2006

Butler，J.：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Routledge 1993（dt.：Körper von Gewicht. Berlin：Berlin-Verlag 1995）

Butler，J.：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ew York：Routledge 1997（dt.：Haß spricht. Zur Politik des Performativen. Berlin：Berlin-Verlag 1998）

Butler，J.：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 Press 1997（dt.：Psyche der Macht. Das Subjekt der Unterwerfung. Frankfurt/M.：Suhrkamp 2001）

Cesarano，G.：Manuale di sopravvivenza. Ⅱ.L’insurrezione erotica. Bari：Nani Cesarano 1974（dt.：Der erotische Aufstand. Berlin：

Bittermann，Edition Tiamat 1983）

Chase，Ch.，and M.Coventry（eds.）：Special issue on intersexuality. Chrysalis-Journal of Transgressiv Gender Identities 1997

Chasseguet-Smirgel，J.：Creativity and perversion. 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4（dt.：Kreativität und Perversion. Frankfurt/M.：Nexus 1986）

Chasseguet-Smirgel，J.：Ethique et esthétique de la perversion. Seyssel：Editions Champ Vallon 1984（dt.：Anatomie der menschlichen Perversion. Stuttgart：DVA 1989）

Chodorow，N.J.：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dt.：Das Erbe der Mütter. Psychoanalyse und Soziologie der Geschlechter. München：Verlag Frauenoffensive 1985）

Chrisler，J.C.，and P.Caplan：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s.Hyde：How PMS became a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a psychiatric disorder. Ann. Rev. Sex Res. 13，274-306，2002

Claes，V.：»Es ist wichtig，dass Europa für das Recht jeder Frau eintritt，ihre Frunchtbarkeit zu kontrollieren«. Allgemein verfügbare Verhütungsmittel sind dafür eine wesentliche Voraussetzung. Pro Familia Magazin 39，H.3，6-7，2011

Clement，U.：Sexuelle Sucht als Phantasiestörung. Z.Sexualforsch. 10，185-196，1997（auch in：Strauß 2004：123-134）

Clement，U.：Guter Sex trotz Liebe. Wege aus der verkehrsberuhigten

Zone. Berlin：Ullstein 2006

Clement，U.und W.Senf（Hg.）：Transsexualität. Behandlung und Begutachtung. Stuttgart，New York：Schattauer 1996 Clement，U.und K.Starke：Sexualverhalten und Einstellungen zur Sexualität bei Studenten in der BRD und in der DDR. Z.Sexualforsch. 1，30-44，1988

Comfort，A.：Sex in society. London：Duckworth 1963（dt.：Der aufgeklärte Eros. Plädoyer für eine menschenfreundliche Sexualmoral. Reinbek：Rowohlt 1968）

Coxell，A.，M.King，G.Mezey，and D.Gordon：Lifetime prevalence，characteristics，and associated problems of non-consensual sex in men：Cross sectional survey. Brit. J.Med. 318，846-850，1999

Daly，M.：Pure lust. Elemental feminist philosophy. Boston：Beacon Press 1984（dt.：Reine Lust. Elemental-feministische Philosophie. München：Frauenoffensive 1986）

Dannecker，M.：Warum die Therapie der Homosexualität die Lage der Homosexuellen verschlechtert.In：Sigusch 1975：226-243

Dannecker，M.：Der Homosexuelle und die Homosexualität. Frankfurt/M.：Syndikat 1978（Neuausgabe：Hamburg：EVA 1991）

Dannecker，M.：Menschenbild und Sexualwissenschaft. Bemerkungen zu einem verschleierten Verhältnis. In：Sigusch 1979a：62-75

Dannecker，M.：Das Drama der Sexualität. Frankfurt/M.：Athenäum 1987a（Neuausgabe Hamburg：EVA 1992）

Dannecker，M.：Bemerkungen zur strafrechtlichen Begutachtung der Pädosexualität. In：Jäger，H.und E.Schorsch（Hg.）：Sexualwissenschaft：und Strafrecht（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62）. Stuttgart：Enke 1987b

Dannecker，M.：Kann empirische Sexualforschung kritisch sein？Zum Andenken an Alfred C.Kinsey. Z.Sexualforsch. 2，207-215，1989

Dannecker，M.：Sexualität als Gegenstand der Sexualforschung. Z.Sexualforsch. 4，281-293，1991

Dannecker，M.：Probleme der männlichen homosexuellen Entwicklung. In：Sigusch 1996a：77-91 und 2007a：55-65

Dannecker，M.：Mode，Fetisch und andere Petitessen.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111-126

Dannecker，M.：Sexualität im Wandel. In：Lemmen et al. 2005：39-54

Dannecker，M.：Sexueller Missbrauch und Pädosexualität. In：Sigusch 2007a：295-299（zit. als 2007b）

Dannecker，M.：Zur Transformation von AIDS in eine behandelbare Krankheit. In：Sigusch 2007a：257-262（zit. als 2007c）

Dannecker，M.：Verändert das Internet die Sexualität？In：Becker，S.，M.Hauch und H.Leiblein（Hg.）：Sex，Lügen und Internet.（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93）.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9：31-45

Dannecker，M.und A.Katzenbach（Hg.）：100 Jahre Freuds »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Aktualität und Anspruch.（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86）.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5

Dannecker，M.und R.Reiche：Der gewöhnliche Homosexuelle.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männliche Homosexuelle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M.：S.Fischer 1974

Dannecker，M.und R.Reiche（Hg.）：Sexualität und Gesellschaft. Festschrift für Volkmar Sigusch.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0

Dannecker，M.und V.Sigusch（Hg.）：Sexualtheorie und Sexualpolitik.（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59）. Stuttgart：Enke 1984

Darnton，R.：Denkende Wollust. Mit Texten von Latouche und d'Argens. Frankfurt/M.：Eichhorn 1996

Dawkins，R.（1976）.Das egoistische Gen. Berlin u.a.：Springer 1978

Decker，O.et al.：Die Mitte in der Krise. Rechtsextreme Einstellungen in Deutschland 2010. Studie im Auftrag der Friedrich Ebert-Stiftung（http：//library.fes.de/pdf-files/do/07504-20120321.pdf）

Dekker，A.：Sexualität und Beziehungen in realen und virtuellen Räumen. Z.Sexualforsch. 16，285-298，2003

Dekker，A.：Körper und Geschlechter in virtuellen Räumen. In：Richter-Appelt und Hill 2004：209-224

Dekker，A.：Splash and Clash in Regensburg？Eine Tagung der DGfS

über »Sadomasochistische Perspektiven«. Z.Sexualforsch. 20，263-266，2007

Dekker，A.：Online-Sex. Bielefeld：Transcript 2012

Dekker，A.：Was heißt：Sexualität ist »bio-psycho-sozial«？Über d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interdisziplinärer Sexualforschung. Z.Sexualforsch. 26，34-43，2013

Dekker，A.und S.Matthiesen：Bedeutungen der Sexualität. In：Schmidt 2000：97-110

Deleuze，G.und F.Guattari：Capitalisme et Schizophrenie. L’anti-Œdipe. Paris：Éd.de Minuit 1972（dt.：Anti-Ödipus. Übers，von B.Schwibs. Frankfurt/M.：Suhrkamp 1974）

Deleuze，G.und F.Guattari：Rhizome. Paris：Éd.de Minuit 1976

Demisch，H.-U.：Was ist von der »Orgon«-Hypothese Wilhelm Reichs zu halten？In：Sigusch 1979a：343-350

Dennert，G.，Ch.Leidinger und F.Rauchut（Hg.）：In Bewegung bleiben.100 Jahre Politik，Kultur und Geschichte von Lesben. Berlin：Querverlag 2007

Deserno，H.：Psychische Bedeutungen der inneren Genitalität in der männlichen Adoleszenz. Kasuistischer Beitrag zur unspezifischen Prostatitis. In：King und Flaake 2005：229-247

[Deutscher Ethikrat（Hg.）]：Intersexualität. Stellungnahme. Berlin：Deutscher Ethikrat 2012

Devereux，G.：From anxiety to method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he Hague，Paris：Mouton 1967（dt.：Angst und Methode in den Verhaltenswissenschaften. München：Hanser 1973）

Devor，H.：Gender blending. Confronting the limits of duality. Bloomington，Ind.：Indiana Unversity Press 1989

Dinnerstein，D.：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 New York：Harper；Row 1976（dt.：Das Arrangement der Geschlechter. Stuttgart：DVA 1979）

Djerassi，C.：»Sex im Zeitalter d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Interview von R. Kuntz-Brunner mit C.Djerassi. Pro Familia Magazin 27（2），2-3，1999

Dobler，J.（Hg.）：Schwule，Lesben，Polizei. Vom Zwangsverhältnis zur Zweck-Ehe？Berlin：Rosa Winkel 1996

Döring，N.：Cybersex-Formen und Bedeutungen computervermittelter sexueller Interaktionen. In：Richter-Appelt und Hill 2004：177-207

Döring，N.：Sexualität im Internet. Ein aktueller Forschungsbericht. Z.Sexualforsch. 21，291-318，2008

Döring，N.：Liebe per Mausklick？Chancen und Risiken der Partnerwahl im Internet. BZgA Forum 2，8-14，2009

Döring，N.：Der aktuelle Stand zur Pornografie-Ethik：Von Anti-Porno-und Anti-Zensurzu Pro-Porno-Positionen. Z.Sexualforsch. 24，1-30，2011

Döring，N.：Erotischer Fotoaustausch unter Jugendlichen：Verbreitung，Funktionen und Folgen des Sexting. Z.Sexualforsch. 25，4-25，2012

Dornes，M.：Der kompetente Säugling. Die präverbal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2.Aufl.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1993

Dornes，M.：Infantile Sexualität und Säuglingsforschung. In：Quindeau und Sigusch 2005：112-132

Dornes，M.：Die Modernisierung der Seele. Psyche-Z.Psychoanal. 64，995-1033，2010

Duggan，L.：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cultural politics，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Beacon Press 2003

Düring，S.：Wilde und andere Mädchen. Die Pubertät. Freiburg i.Br.：Kore 1993

Düring，S.：Über sequentielle Homo-und Heterosexualität. Z.Sexualforsch. 7，193-202，1994

Düring，S.：Probleme der weiblichen sexuellen Entwicklung. In：Sigusch 1996a：32-43 und 2007a：29-35

Düring，S.：Männliches Begehren in der Spätmoderne oder die Affirmation der »wilden Frau«.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158-166

Düring，S.：Von Helden und Prinzessinnen-allmächtig und begehrenswert. Wie gefährlich sind die Spiegelungen im Netz. Pro Familia Magazin 38（2），14-15，2010

Düring，S.und Hauch，M.（Hg.）：Heterosexuelle Verhältnisse.（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71）. Stuttgart：Enke 1995（Neuausgabe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0）

Easton，D.，and C.A.Liszt：The ethical slut. A guide to infinite sexual possibilities. San Francisco，CA：Greenery Press 1997（2.Aufl. mit Janet W.Hardy. Berkely，CA：Celestial arts 2009）

Eder，F.X.：Kultur der Begierde. Eine Geschichte der Sexualität. München：C.H.Beck 2002

Eder，F.X.，L.A.Hail und G.Hekma（Hg.）：Sexual cultures in Europe. National historie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 Press 1999

Eerikäinen，H.：Was ist das Sexuelle am Cybersex？Z.Sexualforsch. 16，328-361，2003

Ehrenberg，A.：La Fatigue d’être soi. Dépression et société. Paris：Odile Jacob 1998（dt.：Das erschöpfte Selbst. Depression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Gegenwart.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4）

Eicher，W.：Transsexualismus.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Geschlechtsumwandlung. Stuttgart，New York：G.Fischer 1984

Elb，N.：SM-Sexualität. Selbstorganisation einer sexuellen Subkultur. 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M.Dannecker.（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88）.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6

Elias，N.（1939）：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2 Bde. 2.，verm. Aufl. Bern：Francke 1969

Endleman，R.：Love and sex in twelve cultures.2.Aufl. New York：Psyche Press 1989

Engel，A.：Das zwielichtige Verhältnis von Sexualität und Ökonomie. Repräsentationen sexueller Subjektivität im Neoliberalismus. Das Argument-Z.Philosophie 47（260），224-236，2005

Enzensberger，H.M.：Mausoleum. Siebenunddreißig Ballad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Fortschritts. Frankfurt/M.：Suhrkamp 1975

Enzensberger，H.M.：Die Große Wanderung. Frankfurt/M.：Suhrkamp 1992

Enzensberger，H.M.：Enzensbergers Panoptikum. Zwanzig Zehn-Minuten-Essays. Berlin：Suhrkamp 2012a

Enzensberger，H.M.：»Muss Sex sein，und wenn ja，wie？«DER SPIEGEL，Nr.4，S.116-117，2012b

Etgeton，St.：Trieb als Engramm. Zum Verhältnis von Sexualität und Schrift. Z.Sexualforsch. 7，287-312，1994

Etgeton，St.：Häute，Häutchen und Membranen. Vorstudie zu einer»Dermatologie der Lüste«aus männlicher Sicht. In：Lemmen et al. 2005：55-62

Eulenburg，A.：Sexuale Neurasthenie. In：Leyden，E.von und F.Klemperer（Hg.）：Die deutsche Klinik am Eingang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akademischen Vorlesungen. Bd. 6/1：Nervenkrankheiten. Berlin，Wien：Urban；Schwarzenberg 1906：163-206

Eulenburg，A.und I.Bloch：Vorbemerkung der Herausgeber. Z.Sexualwiss. 1，1，1914

Evola，J.：Metafisica del sesso. Rom：Atanòr 1958（dt.：Metaphysik des Sexus. Stuttgart：Klett 1962）

Feldman，H.A.et al.：Impotence and its medical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Results of the Massachusetts male aging study. J.Urol. 151，54-61，1994

Ferdinand，U.，A.Pretzel und A.Seeck（Hg.）：Verqueere Wissenschaft？Zum Verhältnis von Sexualwissenschaft und Sexualreformbewegung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Münster：LIT 1998

Ferenczi，S.（1932/1933）：Sprachverwirrung zwischen den Erwachsenen und dem Kind. Die Sprache der Zärtlichkeit und der Leidenschaft. IZP 19，5-15，1933（Nachdruck：Psyche-Z.Psychoanal. 21，256-265，1967）

Fiala，Ch.：»Abtreibungstourismus«in Europa. Unfreiwillige Reisen für eine medizinische Grundversorgung. Pro Familia Magazin 39，H.3，10-12，2011

Flaake，K.：Psychoanalyse. In：v.Braun und Stephan 2000：169-179

Forel，A.：Die sexuelle Frage. Eine naturwissenschaftliche，psychologische，hygienische und soziologische Studie für Gebildete. 8.und 9.Aufl. München：E.Reinhardt 1909

Foucault，M.：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Gallimard 1966（dt.：Die Ordnung der Dinge. Eine

Archäoiogie der Humanwissenschaften. Frankfurt/M.：Suhrkamp 1971）（zit. n.d.12.Aufl. 1993）

Foucault，M.：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Gallimard 1969（dt.：Archäoi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M：Suhrkamp 1973；zit. n.d.5.Aufl. 1992）

Foucault，M.：L’ordre du discours. Paris：Gallimard 1972（dt.：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Inauguralvorlesung am Collège de France，2.Dezember 1970. Frankfurt/M.u.a.：Ullstein 1977）

Foucault，M.：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München：Hanser 1974

Foucault，M.：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Tome 1：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Gallimard 1976（dt.：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Bd. 1：Der Wille zum Wissen. Frankfurt/M.：Suhrkamp 1977）

Foucault，M.：Dispositive der Macht. Michel Foucault über Sexualität，Wissen und Wahrheit. Berlin：Merve 1978

Foucault，M.：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Tome 2：L’usage des plaisirs. Paris：Gallimard 1984（dt.：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Bd. 2：Der Gebrauch der Lüste. Frankfurt/M.：Suhrkamp 1986）

Foucault，M.u.a.：Technologien des Selbst，hg. von L.H.Martin，H.Gutman und P.H.Hutton. Frankfurt/M.：S.Fischer 1993a

Foucault，M.：Freiheit und Selbstsorge. Interview 1984 und Vorlesung 1982，eingel. von H.Becker und L.Wolfstetter. 2.Aufl. Frankfurt/M.：Materialis-Verlag 1993b

Foucault，M.：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5-1976）. Paris：Gallimard u.a.1997（dt.：In Verteidigung der Gesellschaft. Vorlesungen am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Frankfurt/M.：Suhrkamp 1999）

Frank，M.：Was ist Neostrukturalismus？Frankfurt/M.：Suhrkamp 1984

Frank，M.：Das Sagbare und das Unsagbare. Studien zur deutsch-französischen Hermeneutik und Texttheorie. Erweit. Neuausgabe Frankfurt/M.：Suhrkamp 1990

Freud，S.（1887-1904）：Briefe an Wilhelm Fliess，1887-1904. Ungekürzte Ausgabe，hg.von J.M.Masson. Frankfurt/M.：Fischer 1985

Freud，S.（1892/93）：Ein Fall von hypnotischer Heilung. Ges. Werke，Bd. 1. London：Imago 1952：1-17

Freud，S.（1895）：Entwurf einer Psychologie. In：Ders.：Aus den Anfängen der Psychoanalyse. London：Imago 1950：371-466

Freud，S.（1905）：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Ges. Werke，Bd. 5. London：Imago 1942：27-145

Freud，S.（1908a）：Die»kulturelle«Sexualmoral und die moderne Nervosität. Ges. Werke，Bd. 7. London：Imago 1941：141-167（EA：Sexual-Probleme 4，107-129，1908）

Freud，S.（1908b）：Der Dichter und das Phantasieren. Ges. Werke，Bd. 7. London：Imago 1941 211-223

Freud，S.（1909）：Bemerkungen über einen Fall von Zwangsneurose. Ges. Werke，Bd. 7. London：Imago 1941：379-463

Freud，S.（1912）：Über die allgemeinste Erniedrigung des Liebeslebens. Ges. Werke，Bd. 8. London：Imago 1943：78-91

Freud，S.（1914）：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 Ges. Werke，Bd. 10. London：Imago 1946：137-170

Freud，S.（1915a）：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 Ges. Werke，Bd. 10. London：Imago 1946：209-232

Freud，S.（1915b）：Das Unbewusste. Ges. Werke，Bd. 10. London：Imago 1946：264-303

Freud，S.（1916/17）：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Ges. Werke，Bd. 11. London：Imago 1944：1-482

Freud，S.（1917）：Eine Schwierigkeit der Psychoanalyse. Ges. Werke，Bd. 12. London：Imago 1947：1-12

Freud，S.（1918）：Das Tabu der Virginität. Ges. Werke，Bd. 12. London：Imago 1947：161-180

Freud，S.（1920a）：Über die Psychogenese eines Falles von weiblicher Homosexualität. Ges. Werke 12，1947：269-302

Freud，S.（1920b）：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Ges. Werke，Bd. 13. London：Imago 1940：1-69

Freud，S.（1921）：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Ges. Werke，Bd. 13. London：Imago 1940：71-161

Freud，S.（1923）：Libidotheorie. In：Marcuse 1923：296-298（vgl. Freud，Ges. Werke，Bd. 13，1940：229-233）

Freud，S.（1926）：Zur Frage der Laienanalyse. Unterredungen mit einem Unparteiischen. Ges. Werke，Bd. 14. London：Imago 1948，S.209-296

Freud，S.（1930）：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Ges. Werke，Bd. 14. London：Imago 1948：419-506

Freud，S.（1931）：Über die weibliche Sexualität. Ges. Werke，Bd. 14. London：Imago 1948：517-537

Freud，S.（1933）：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Ges. Werke，Bd. 15. London Imago 1944：1-197

Freud，S.（1938/1940）：Abriss der Psychoanalyse. Ges. Werke，Bd. 17. London：Imago 1941：63-138

Freund，K.，C.K.McKnight，R.Langevin，and S.Cibiri：The female child as a surrogate object. Arch. Sex. Behav. 2，119-133，1972

Friday，N.：My secret garden：Womens’sexual fantasies. New York：Trident 1973（dt.：Die sexuellen Phantasien der Frauen. 22.Aufl. 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2001）

Fritz，U.und A.v.Streit：Über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 und ihre 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 In：Sigusch 1979a：315-340

Früh，F.：Warum wird die infantile Sexualität sexuell genannt？In：Quindeau und Sigusch 2005：97-111

Gagnon，J.H.，and W.Simon：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 Chicago：Aldine 1973

Garrels，L.：Das Geschlechtserleben Intersexueller im Diskurs. Z.Sexualforsch. 11，197-211，1998

Gebsattel，V.E.v.：Süchtiges Verhalten im Gebiet sexueller Verirrungen. Mschr. Psychiat. Neurol. 82，113-177，1932

Gernert，J.：Generation Porno. Jugend，Sex，Internet. Köln：Fackelträger 2010

Giddens，A.：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2（dt.：Wandel der Intimität. Sexualität，Liebe und Erotik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

Giese，H.（Bearb. in Verbindung mit V.E.von Gebsattel）：Psychopathologie der Sexualität. Stuttgart：Enke 1962

Giese，H.：Vorwort.In：Sade，D.A.F.Marquis de：Ausgewählte Werke，hg. von M.Luckow，Bd. I.Hamburg：Merlin 1963

Gingell，J.C.，and R.Lockyer：Emerging pharmacological therapies for erectile dysfunction. Exp. Opin. Ther. Patents 9（12），1689-1696，1999

Godson，S.：Das Buch vom Sex. Hamburg：Rogner；Bernhard bei Zweitausendeins 2003 Goethe，J.W.（1795）：Römische Elegien. Schmiden：Franz Decker Nachf.，o.J.

Gooß，U.：Sexualwissenschaftliche Konzepte der Bisexualität von

Männern.（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72）. Stuttgart：Enke 1995（Neuausgabe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2）

Gooß，U.und H.Gschwind（Hg.）：Homosexualität und Gesundheit. Berlin：Rosa Winkel 1989

Gorsen，R：Sexualästhetik. Grenzformen der Sinnlichkeit im 20. Jahrhundert. Reinbek：Rowohlt Taschenbuch 1987

Gorsen，P.：Henri Nouveau et l'esthétique de la sexualité perverse. In：Henri Nouveau. Peintures，collages et dessins.[Ausstellungskatalog]. Antibes：Musée Picasso 1990：55-69

Gorsen，P.：Das Nachleben des Wiener Aktionismus. Klagenfurt u.a.：Ritter 2009

Graff，B.：»Die Menschenmaschine«. 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28./29. Juli 2012，S.11

Gräning，G.（Hg.）：Sexuelle Gewalt gegen Frauen-kein Thema？ Münster，New York：Waxmann 1993

Grau，G.：Berichte von Augenzeugen. Die Situation der Homosexuellen in Buchenwald. In：Rapoport，S.M.und A.Thom（Hg.）：Das Schicksal der Medizin im Faschismus. Berlin（DDR）：Volk und Gesundheit 1989：76-79

Grau，G.（Hg.）：Homosexualität in der NS-Zeit. Dokumente einer Diskriminierung und Verfolgung.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1993（überarb. Neuausgabe 2004；engl. Ausgabe：Hidden holocaust？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45. London：Cassell 1995）

Grau，G.：Lexikon zur Homosexuellenverfolgung 1933 bis 1945. Münster u.a.：LIT 2011

Green，R.，and J.Money：Incongruous gender role：Nongenital manifestations in prepubertal boys. J.Nerv.Ment. Dis. 130，160-167，1960

Greenstein，B.：The fragile male. London：Boxtree 1993

Greer，G.：»Europa ist eben kein Block«.（Interview von Margit Miosga）. Pro Familia Magazin 39，H.3，15，2011

Grey，A.de mit M.Rae：Niemals alt！So lässt sich das Altern umkehren. Fortschritte der Verjüngungsforschung. Bielefeld：transcript 2010

Grimm，P.，S.Rhein und M.Müller：Porno im Web 2.0. Berlin：Vistas 2010

Gruber，J.G.：C.M.Wielands Leben.2.Teil，3.Buch. Leipzig：G. J.Göschen 1827

Gschwind，H.：Zur pädosexuellen Objektwahl. Z.Sexualforsch. 18，62-66，2005

Gschwind，H.：Pädosexuelle Männer. Eine psycho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Z.Sexualforsch. 23，299-327，2010

Gulyga，A.（1977）：Immanuel Kant. Frankfurt/M.：Suhrkamp 1985

Habermas，J.：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Vorlesungen. Frankfurt/M.：Suhrkamp 1985

Hamer，D，H.，S.Hu，V.L.Magnuson，N.Hu，and A.M.L.Pattatucci：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the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261，321-327，1993

Hammond，B.，and J.A，Ladner：Socialization into sexual behavior in a negroe slum ghetto. In：C.B.Broderick，and J.Bernard（Hg.）：The individual，sex and societ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9：111-125

Hartmann，U.：Inhalte und Funktionen sexueller Phantasien. Ergebnisse einer Panel-Studie an Männern und Frauen（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64）. Stuttgart：Enke 1989

Hartmann，U.und H.Becker：Störungen der Geschlechtsidentität. Ursachen，Verlauf，Therapie. Wien，New York：Springer 2002

Hashmat，A.I.，and S.Das（Hg.）：The penis. Philadelphia，London：Lea；Febiger 1993

Hauch，M.：Gewalt in der Liebe. Z.Sexualforsch. 7，131-141，1994

Hauch，M.：Lust auf Dissens. Heterosexualität in der De/Re/Konstruktion.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215-231

Hauch，M.：Lust-Funktion-Verstörung. Zur aktuellen Präsentation sexueller Probleme. Z.Sexualforsch. 18，164-184，2005

Hauch，M.（Hg.）：Paartherapie bei sexuellen Störungen. Das Hamburger Modell：Konzept und Technik. Stuttgart，New York：Thieme 2006

Haug，W.F.：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Suhrkamp 1971

Haug，W.F.：Faschis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Subjekts. Die Ideologie der gesunden Normalität und die Ausrottungspolitiken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Berlin（West）：Argument-Verlag 1986

Haug，W.F.：»Vom Antifaschismus zur späten Geburt«. Ein Gespräch. Frankfurter Rundschau vom 28. Mai 1988，S.ZB 2

Haug，W.F.：Die neuen Subjekte des Sexuellen. Volkmar Sigusch über Neoliberalismus und Neosexualität（en）.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232-251

Haug，W.F.：Sexualverändernde Funktionsfolgen des High-Tech-Kapitalismus. In：Das Argument-Z.Philosophie 47（260），206-211，2005

Hauser，W.，G.Schmutzer，E.Brähler und H.Glaesmer：Misshandlungen in Kindheit und Jugend：Ergebnisse einer Umfrage in einer repräsentativen Stichprobe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Deutsches Ärzteblatt 108（H.17），A-287-294，2011

Hegel，G.W.F.（1798）：Daß die Magistrate von den Bürgern gewählt werden müssen. Werke in 20 Bänden，Bd. 1.Frankfurt/M.：Suhrkamp 1971：268-273

Hegel，G.W.F.（1798-1800）：Der Geist des Christentums und sein Schicksal. Werke in 20 Bänden，Bd. 1.Frankfurt/M.：Suhrkamp 1971：276-363

Hegel，G.W.F.（1807）：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Werke in 20

Bänden. Bd. 3.Frankfurt/M.：Suhrkamp 1970

Hegener，W.：Das Mannequin. Vom sexuellen Subjekt zum geschlechtslosen Selbst. Tübingen：Konkursbuch 1992

Hegener，W.：Die Ambivalenz des Ursprungs. Diesseits und jenseits von Geschlechterdifferenz und Sexualität. In：Berkel 2009：129-147

Heinrich，K.：Geschlechterspannung und Emanzipation. Das Argument-Z.Philosophie 4（23），22-25，1962

[Heinrich-Böll-Stiftung（Hg.）]：Der homosexuellen NS-Opfer gedenken. Berlin 1999

Heitmeyer，W.（Hg.）：Deutsche Zustände. Folge 10.Frankfurt/M.：Suhrkamp 2011

Helmer，U.：Muschiland. Exkursionen in eine kulturelle Intimzone. Sulbach/Ts.：Ulrike Helmer Verlag 2012

Hennessy，R.：Profit of pleasure. Sexual identities in late capitalism. New York，London：Routledge 2000

Henning，A.-M.und T.Bremer-Olszewski：Make Love. Ein Aufklärungsbuch. Berlin：Rogner；Bernhard 2012

Henning，J.und G.Walentowitz：10 Jahre Prostitutionsgesetz：Mehr Menschenhandel durch Legalisierung von Prostitution？Kritische Justiz 45，461-465，2012

Henschel，A.W.E.Th.：Von der Sexualität der Pflanzen. Nebst einem historischen Anhange von F.J.Schelver. Breslau：Wilhelm Gottlieb Korn

Herpell，G.：»Können diese Augen lieben？«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Nr. 5 vom 4.Februar 2011，S.16-19

Herrn，R.：Anders bewegt. 100 Jahre in Deutschland. Hamburg：MännerschwarmSkript 1999

Herrn，R.：Geschlechtsübergänge und Naturgesetze der Liebe. Mitt. Magnus-Hirschfeld-Ges.，Nr. 33/34，52-56，2003

Herrn，R.：Schnittmuster des Geschlechts. Transvestitismus und Transsexualität in der frühen Sexualwissenschaft.（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85）.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5

Herzog，D.：Sex after fascism：Memory and mor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Princton：Princton Univ. Press 2005（dt.：Die Politisierung der Lust. Sexualität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Siedler 2005）

Herzog，D.：»Sex war gestern.«Cicero，Januar-Heft 2006，S. 124-128

Herzog，D.：Sexuality in Europe.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a

Herzog，D.：Das Recht der Frauen auf sexuelle Selbstbestimmung：Aktuelle Entwicklungen im europäischen Raum und in den USA. Unveröffentl. Vortrag，gehalten auf der 19. Jahrestagung des Arbeitskreises Frauengesundheit in Medizin，Psychotherapie und Gesellschaft e.V.in Berlin，6. November 2011（zit. als 2011b）

Hilbk，M.：»Sex？Ohne uns！«ZEIT Wissen，Ausgabe 04，2005

Hill，A.：Pornografiekonsum bei Jugendlichen.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mpirische Wirkungsforschung. Z.Sexualforsch. 24，379-396，2011

Hill，A.，P.Briken und W.Berner（Hg.）：Lust-voller Schmerz. Sadomasochistische Perspektiven.（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90）.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8

Hines，T.M.：The G-spot：A modern gynecologic myth. Am. J.Obstetr. Gynecol. 185，359-362，2001

Hirsch，J.：Kapitalismus ohne Alternative？Materialis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Möglichkeiten einer sozialistischen Politik heute. Hamburg：VSA-Verlag 1990

Hirschauer，S.：Die soziale Konstruktion der Transsexualität.Über die Medizin und den Geschlechtswechsel. Frankfurt/M.：Suhrkamp 1993

Hirschfeld，M.：Über Sexualwissenschaft. Programmartikel. Z.Sexualwiss. 1，1-19，1908

Hirschfeld，M.：Naturgesetze der Liebe. Eine gemeinverständlich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Liebes-Eindruck，Liebes-Drang und Liebes-Ausdruck. Berlin：Pulvermacher；Leipzig：Spohr 1912

Hirschsprung，（ohne Vornamen）：Erfahrungen über Onanie bei kleinen Kindern. Berlin，klin. Wschr. 23，628-631，1886

Hoeltje，B.：Kinderszenen. Geschlechterdifferenz und sexuelle Entwicklung im Vorschulalter.（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73）.

Stuttgart：Enke 1996（Neuausgabe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Gießen：2001）

Honneth，A.：Desintegration. Bruchstücke einer soziologischen Zeitdiagnose.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4

Honneth，A.（Hg.）：Befreiung aus der Mündigkeit. Paradoxien des gegenwärtigen Kapitalismus.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2

Horkheimer，M.：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ur Anthropologie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Z.Sozialforsch. 5，161-234，1936（auch in：Horkheimer，M.：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Vier Aufsätze. Frankfurt/M.：S.Fischer 1968：95-161）

Horkheimer，M.：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ämmerung，hg. von W.Brede. Frankfurt/M.：S.Fischer 1974

Horkheimer，M.und Th. W.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Querido 1947（Neuausgabe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9）

Homey，K.：Flucht aus der Weiblichkeit. Int. Z.Psychoanal. 12，360-374

Hunt，L.（Hg.）：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 New York：Zone Books 1993（dt.：Die Erfindung der Pornographie.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4）

Illouz，E.（1997）：Der Konsum der Romantik. Liebe und die kulturellen Widersprüche des Kapitalismus.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3

[Initiative Mahnmal Homosexuellenverfolgung e.V.（Hg.）]：Der Frankfurter Engel. Mahnmal Homosexuellenverfolgung. Ein Lesebuch. Frankfurt/M.：Eichborn 1997

[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ISNA）]：
http：//www.isna.org（1997 ff）

Irigaray，L.：Éthique de la différence sexuelle.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 1984（dt.：Ethik der sexuellen Differenz. Frankfurt/M.：Suhrkamp 1991）

Jäger，G.：Die Entdeckung der Seele.2.Aufl. Leipzig：E.Günther 1880 [dort die mit Dr. M.gezeichneten Beiträge von K.M.Kertbeny]

Jellonnek，B.und R.Lautmann（Hg.）：Nationalsozialistischer Terror gegen Homosexuelle. Verdrängt und ungesühnt. Paderborn u.a.：Schöningh 2002

Johnson，A.M.，J.Wadsworth，K.Wellings，and J.Fields：Sexual attitudes and lifestyles. Oxford：Blackwell 1994

Kafka，M.P.：Hypersexual desire in males：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for males with paraphilias and paraphilia-related disorders. Arch. Sex. Beh. 26，505-526，1997

Kammerer，St.：»Eine tolle Frau，dieser Mann.«fluter，Nr. 44，S.28-29，Herbst 2012

Kant，Ⅰ.（1781/1787）：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orrede zur 2. Aufl. von 1787. Werke in sechs Bänden，hg. von W.Weischedel，Bd. Ⅱ.Darmstadt：Wiss. Buchges. 1956：20-41

Kant，Ⅰ.（1784a）：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ärung? Werke in sechs Bänden，hg. von W.Weischedel，Bd. Ⅵ. Darmstadt：Wiss. Buchges. 1964：53-61

Kant，Ⅰ.（1784b）：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In：Werke in sechs Banden，hg. von Wilhelm Weischedel，Bd. Ⅵ. Darmstadt：Wiss. Buchges. 1964

Kant，Ⅰ.（1797/1798）：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in zwey Theilen. Werke in sechs Bänden，hg. von W.Weischedel. Bd. Ⅳ. Darmstadt：Wiss. Buchges. 1956

Kant，Ⅰ.（1798）：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Werke in sechs Bänden，hg. von W.Weischedel，Bd. Ⅵ. Darmstadt：Wiss. Buchges. 1964

Kant，Ⅰ.（1803）：Über Pädagogik. Werke in sechs Bänden，hg. von W.Weischedel，Bd. Ⅵ. Darmstadt：Wiss. Buchges. 1964

Kaplan，L.J.：Female perversions：The temptations of Emma Bovary. New York：Doubleday 1991（dt.：Weibliche Perversionen. Von befleckter Unschuld und verweigerter Unterwerfung. 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 1991）

Kentler，H.（Hg.）：Sexualwesen Mensch. Texte zur Erforschung der Sexualität. 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 1984

Kernberg，O.（1992）：Wut und Haß.Über die Bedeutung von Aggression bei Persönlichkeitsstörungen und sexueller Perversion. Stuttgart：Klett-Cotta 1997

Kertbeny，K.M.：Schriften zur Homosexualitätsforschung，hg. und eingel. von M.Herzer. Berlin：Rosa Winkel 2000

Khan，M.M.R.：Alienation in perversions. London：Hogarth 1979（dt.：Entfremdung bei Perversionen. Frankfurt/M.：Suhrkamp 1983）

Kienbaum，J.und B.Schuhrke：Entwicklungspsychologie der Kindheit. Von der Geburt bis zum 12. Lebensjahr. Stuttgart：Kohlhammer 2010

Kierkegaard，S.：Die Krankheit zum Tode. Halle：Fricke 1881

King，Ⅴ.und K.Flaake（Hg.）：Männliche Adoleszenz. Sozialisation und Bildungsprozesse zwischen Kindheit und Erwachsensein. Frankfurt/M.：Campus 2005

Kinsey，A.C.，W.B.Pomeroy，and C.E.Martin：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London：W.B.Saunders 1948（dt.：Das sexuelle Verhalten des Mannes. Frankfurt/Main：G.B.Fischer 1964）

Kinsey，A.C.，W.B.Pomeroy，C.E.Martin，and P.H.Gebhard：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London：W.B.Saunders 1953（dt.：Das sexuelle Verhalten der Frau. Frankfurt/Main：G.B.Fischer 1963）

Klein，B.：Roboter-Robbe in der Pflege. »Pro：Anregend und beruhigend.«Dr. med. Mabuse 195，14，Jan./Febr. 2011

Kleinhammes，S.（Hg.）：Rettet den Sex. Ein Manifest von Frauen für einen neuen sexuellen Humanismus. Radolfzell：Meiga 1988

Klesse，Ch.：Polyamory-von dem Versprechen，viele zu lieben. Ein Kommentar zum Forschungsstand. Z.Sexualforsch. 20，316-330，2007

Klesse，Ch.：Spielarten der Liebe. Eine Betrachtung zu Polyamory. Z.Sexualforsch. 26，19-33，2013

Klimke，D.und R.Lautmann：Die neoliberal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Sexualstrafrechts. Z.Sexualforsch. 19，97-117，2006

Kockott，G.und E.-M.Fahrner（Hg.）：Sexualstörungen. Stuttgart，New York：Thieme 2004

Kônig，J.：Transformationen eines Motivs. Von der Diskursgeschichte eines Phänomens zur Dialektik von innerer und äußerer Natur infantiler Sexualität. In：Quindeau und Brumlik 2012：84-113

Kontula，T.O.und E.Haavio-Mannila：Suomalainen seksi. Helsinki 1993（engl.：Sexual pleasures. Enhancement of sex life in Finland 1971-1992. Dartmouth [UK]：Aldershot 1995）

Krafft-Ebing，R von：Psychopathia sexualis. Eine klinisch-forensische Studie. Stuttgart：Enke 1886（9.Aufl. 1894）

Krafft-Ebing，R.von：Neue Forschungen auf dem Gebiet der Psychopathia sexualis. Eine medicinisch-psychologische Studie. Stuttgart：Enke 1890

Kraß，A.（Hg.）：Queer denken. Gegen die Ordnung der Sexualität（Queer Studies）. Frankfurt/M.：Suhrkamp 2003

Kraß，A.（Hg.）：Queer Studies in Deutschland. Interdisziplinäre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Heteronormativitätsforschung. Berlin：Trafo 2009

Kreutzer，M.und C.Milborn：Ware Frau. Auf den Spuren moderner Sklaverei von Afrika nach Europa. Wien：Ecowin 2008

Kreye，A.：»Die Liebe zum iGerät«. 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8.März 2012，S.4

Kröber，H.-L.：Rückenstärkung bei sexuellem Unglück.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284-292

Kunz，G.：Medizinische Experimente mit der Antibabypille. Ein Rückblick auf die ersten Versuche an puertoricanischen Frauen. Z.Sexualforsch. 2，119-131，1989

Lallemand，F.：Des pertes séminales involontaires.3 Bde. Paris：Béchet jeune 1836-1842（dt.u.a.：Über unwillkürliche Samenverluste. 2 Bde. Stuttgart：Hallberger'sche Verlagshandlung 1840-1841）

Lange，C.：Sexuelle Gewalt gegen Mädchen. Ergebnisse einer Studie zur Jugendsexualität.（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75）. Stuttgart：Enke 1998

Laplanche，J.：Die allgemeine Verführungstheorie und andere Aufsätze. Tübingen：Edition Diskord 1988

Laplanche，J.：Inzest und infantile Sexualität. Psyche-Z.Psychoanal. 63，525-539，2009

Lash，Ch.：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Norton 1978

Laufer，M.：Zentrale Onaniephantasie，definitive Sexualorganisation

und Adoleszenz. Psyche-Z.Psychoanal. 34，365-384，1980

Laumann，E.O.，J.H.Gagnon，R.T.Michael，and St.Michael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Lautmann，R.：Seminar：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Frankfurt/M.：Suhrkamp 1977

Lautmann，R.：Die Lust am Kind. Portrait des Pädophilen. Hamburg：Klein 1994

Lautmann，R.：Die Sexualität des Menschen-ein Pleonasmus？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293-313

Lautmann，R.：Soziologie der Sexualität. Erotischer Körper，intimes Handeln，Sexualkultur. Weinheim，München：Juventa 2002

Lautmann，R.：Rezension der Bücher von Heinz-Jürgen Voß（s.hier 2010 und 2011）.Z.Sexualforsch. 25，185-189，2012

Lee，D.H.et al.：A self-replicating peptide. Nature 382，525-528，1996

Lee，J.A.：Colours of love. Toronto：New Press 1973（rev. Ausgabe u.d.T.：Lovestyles. London：Dent 1976）

Leiblein，H.：Zeugungsverhütung. Praxis und Kritik. Med. Diss. Frankfurt/M.1984a

Leiblein，H.：Mit Kanonen auf Spatzen. In：Sigusch，Klein und Gremliza 1984：603-607（zit. als 1984b）

Leidinger，Ch.：Emma Trosse（1863-1949），verheiratete Külz-Lehrerin，Leiterin，Autorin. Mitt. Magnus-Hirschfeld-Ges.，Nr.48，17-21，2011

Lemmen，K.，J.Schepers，H.Sweers und K.Tillmann（Hg.）：Sexualität wo-hin？Hinblicke. Einblicke. Ausblicke. AIDS-Forum DAH，Bd.49. Berlin：Deutsche AIDS-Hilfe e.V.2005：39-54

Lerner，G.：Die Entstehung des feministischen Bewußtseins.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Ersten Frauenbewegung.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1993

LeVay，S.：A difference in hypothalamic structure between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men. Science 253，1034-1037，1991

Lewandowski，S.：Internetpornographie. Z.Sexualforsch. 16，299-327，2003

Lewandowski，S.：Sexualität in den Zeiten funktionaler Differenzierung. Eine systemtheoretische Analyse. Bielefeld：transcript 2004

Lewandowski，S.：»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Zum aktuellen Stand einer Soziologie der Sexualitat. Soziol. Rev.29，15-25，2006

Lewandowski，S.：Die neosexuelle Revolution und die funktional differenzierte Gesellschaft. Eine Antwort auf Volkmar Sigusch. Z.Sexualforsch. 20，69-76，2007

Lewandowski，S：Die Pornographie der Gesellschaft. Beobachtungen eines populärkulturellen Phänomens. Bielefeld：transcript 2012

Lindau，S.T.，L.P.Schumm，E.O.Laumann，W.Levinson，C.A.O'Muircheartaigh，and L.J.Waite：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ngl. J.Med. 354（8），762-774，2007

Lindemann，G.：Das paradoxe Geschlecht. Transsexualität im Spannungsfeld von Körper，Leib und Gefühl.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

Lipietz，A.：Akkumulation，Krise und Auswege aus der Krise. Einige methodische Überlegungen zum Begriff der »Regulation«. Prokla，Nr.58，109-128，1985

Löchel，E.und H.Menzner：Wunsch und Trieb. Versuch einer Differenzierung. Psyche-Z.Psychoanal. 65，1179-1201，2011

Loewald，H.W.：Psychoanalys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51-1979. Stuttgart：Klett-Cotta 1986

Lohmann，H.-M.：Sigmund Freud. Reinbek：Rowohlt 1998

Lohmann，H.-M.und J.Pfeiffer（Hg.）：Freud-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Stuttgart，Weimar：J.B.Metzler 2006

Luhmann，N.：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 Frankfurt/M.：Suhrkamp 1982

Luhmann，N.：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M.：Suhrkamp 1984

Luhmann，N.：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6

Luhmann，N.：Die Selbstbeobachtung des Systems. Ein Gespräch. In：Breuer，I.，P.Leusch und D.Mersch（Hg.）：Welten im Kopf. Profile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 Bd.Ⅰ：Deutschland. Hamburg：Rotbuch 1996：169-179

Luhmann，N.：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2 Bde. Frankfurt/M.：Suhrkamp 1997a

Luhmann，N.：»Zettelkästen，fehlendes Schreibpersonal und die Arbeit an der Theorie«. Gespräch mit Detlef Horster. Frankfurter Rundschau vom 8.Dezember 1997，S.10（zit.als 1997b）

Lütkehaus，L.：»O Wollust，o Hölle«. Die Onanie-Stationen einer Inquisition.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2

Lütkehaus，L.：Verchromte Sirenen，herostratische Apparate.»Desiderat：Dingpsychologie«（G.Anders）：Für eine Umorientierung der Psychologie. Psyche-Z.Psychoanal. 49，281-303，1995

Lyotard，J.-F.：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Paris：Editions de Minuit 1979（dt.：Das postmoderne Wissen. Ein Bericht. Wien，Köln：Böhlau 1986；3. Aufl. Wien：Passagen Verlag 1994）

Malinowski，B.（1924）：Mutterrechtliche Familie und Ödipus-Komplex. In：Ders.：Eine wissenschaftliche Theorie der Kultur und andere Aufsätze，hg. von P.Reiwald. Zürich：Pan-Verlag 1949（2.Aufl.Frankfurt/M.：Suhrkamp 1985）

Malinowski，B.：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Kegan Paul 1927（dt.：Geschlecht und Verdrängung in primitiven Gesellschaften. Reinbek：Rowohlt 1962）

Malinowski，B.：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London：Routledge 1929（dt.：Das Geschlechtsleben der Wilden in Nordwest-Melanesien. Leipzig，Zürich：Grethlein，o.J.）

Mantegazza，P.：Fisiologia dell'amore. Milano：Bernardoni und Brigola 1873（dt.u.a.：Physiologie der Liebe. Leipzig：Costenoble 1877）

Mantegazza，P.：Igiene dell'amore. Milano：Brigola 1877（dt.：Die Hygieine der Liebe，nach der 4.Aufl. aus dem Italienischen. 2.ufl. Jena：Costenoble，o.J.[1887]）

Mantegazza，P.：Fisiologia della donna.2 Bde. Milano u.a.：Fratelli Treves 1893（dt.u.a.：Die Physiologie des Weibes. Jena：Costenoble 1893）

Marcuse，H.：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Beacon Press 1964（dt.：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Neuwied，Berlin：Luchterhand 1967）

Marcuse，M.（Hg.）：Handwörterbuch der Sexualwissenschaft. Enzyklopädie der naturund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Sexualkunde des Menschen. Bonn：Marcus；Weber 1923

Marcuse，M.：Neuropathia sexualis. In：Moll，A.（Hg.）：Handbuch der Sexualwissenschaften.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kulturgeschichtlichen Beziehungen. 3.，neubearb. Aufl. Bd. Ⅱ. Leipzig：

F.C.W.Vogel 1926：841-900

Martinson，F.：Eroticism in infancy and childhood. In：Constantine，L.und F.Martinson（Hg.）：Children and sex. Boston：Little Brown 1981：23-35

Marx，K.（1867）：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 MEW，Bd. 23 [nach der 4.，durchges. Aufl. von 1890]. Berlin：Dietz 1972

Masters，W.H.，and V.E.Johnson：Human sexual response. Boston：Little，Brown 1966（dt.：Die sexuelle Reaktion. Frankfurt/M.：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67）

Maß，R.：Evolutionspsychologie der Sexualität（Editorial）. Z.Sexualforsch. 24：105-110，2011

Matthiesen，S.：Wandel von Liebesbeziehungen und Sexualität. Empirische und theoretische Analysen.（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89）.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7

Matthiesen，S.und M.Hauch：Wenn sexuelle Erfahrungen zum Problem werden. Familiendynamik 29，139-160，2004

Matthiesen，S.und U.Martyniuk：Single-verliebt-vergeben. Sexuelle Erfahrungen von Jugendlichen im Web 2.0.SozialAktuell，Nr.1，27-29，2011

Matthiesen，S.，U.Martyniuk und A.Dekker：»What do girls do with porn？«Ergebnisse einer Interviewstudie，Teil 1.Z.Sexualforsch. 24，326-352，2011

Matthiesen，S.，K.Block，S.Mix und G.Schmidt：Schwangerschaft und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bei minderjährigen Frauen. Köln：BZgA 2009

Matzuk，M.et al.：Small-molecule inhibition of BRDT for male contraception. Cell 150（4），673-684，2012

McDevitt，J.B.，and C.F.Settlage（eds.）：Essays in honor of Margaret S. Mahler. 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1

McDougall，J.：Theatres du Je. Paris：Gallimard 1982（dt.：Theater der Seele. Illusion und Wahrheit auf der Bühne der Psychoanalyse. München，Wien：Verlag Internationale Psychoanalyse 1988）

McDougall，J.：The many faces of Eros. Paris：Gallimard 1995（dt.：Die Couch ist kein Prokrustesbett. Zur Psychoanalyse der menschlichen Sexualität. Stuttgart：Verlag Internationale Psychoanalyse 1997）

McKay，D.S.et al.：Search for past life on Mars：Possible relic biogenic activity in martian meteorite ALH84001. Science 273，924-930，1996

Mentzos，St.：Sexualität und Hysterie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In：Dannecker und Reiche，2000：314-326

Méritt，L.，T.Bührmann und N.Boris Schefzig（Hg.）：Mehr als eine Liebe. Polyamouröse Beziehungen. Berlin：Orlanda 2005

Mertens，W.：Entwicklung der Psychosexualität und Geschlechtsidentität. Bd.1：Geburt bis 4. Lebensjahr. Stuttgart u.a.：

Kohlhammer 1992；Bd. 2：Kindheit und Adoleszenz. Stuttgart u.a.：Kohlhammer 1994

Meyenburg，B.：Sexueller Mißbrauch von Kindern im Vorschulalter. Klinische Bilder und therapeutische Erfahrungen. In：Düring und Hauch 2000：77-88（zit.als 2000a）

Meyenburg，B.：Sexuelle Auffälligkeiten im Kindes- und Jugendalter.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327-340（zit. als 2000b）

Meyenburg，B.：Geschlechtsidentitätsstörungen im Kindes-und Jugendalter. In：Sigusch 2007a：337-345（zit. als 2007a）

Meyenburg，B.：Störungen der Geschlechtsidentität. In：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Kinder-und Jugendpsychiatrie，Psychosomatik und Psychotherapie u.a.：Leitlinien zu Diagnostik und Therapie von psychischen Störungen im Säuglings-，Kindes-und Jugendalter. 3.Aufl. Köln：Deutscher Ärzte-Verlag 2007：167-174（zit. als 2007b）

Meyenburg，B.：Sexuelle und Geschlechtsidentitätsstörungen bei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In：Briken und Berner 2013（im Druck）

Meyenburg，B.，and V.Sigusch：Transsexuals in West Germany. Therapeutic guidelines and legal problems. Paper rea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Gender Dysphoria Symposium，Norfolk，Virginia，February 10-13，1977

Mitchell，J.：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London：Allen Lane 1974（dt.：Psychoanalyse und Feminismus. Freud，Reich，Laing und die Frauenbewegung. Frankfurt/M.：Suhrkamp 1976）

Mitscherlich-Nielsen，ML：Psychoanalyse und weibliche Sexualität.

Psyche-Z.Psychoanal. 29，769-788，1975

Mitscherlich-Nielsen，M.：Zur Psychoanalyse der Weiblichkeit. Psyche-Z.Psychoanal. 32，669-694，1978

Mitscherlich-Nielsen，M.：Theorien und Probleme der psychosexuellen Entwicklung der Frau. In：Sigusch 1980a：54-73

Modena，E.：Liebe im Kapitalismus und die Bindungstheorie. Eine Dekonstruktion. Vortrag，Zürich 2005（vgl.Modena，Emilio：Die Bindungstheorie als romantische Wissenschaftsproduktion. In：Busch，H.-J.und Ebrecht，A.（Hg.）：Liebe im Kapitalismus. Giessen：Psychosozial-Verlag 2008：151-176）

Moeller，M.L.：Aspekte der Liebe im Zeitalter der narzisstischen Bedürftigkeit.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341-359

Moll，A.：Das Sexualleben des Kindes. Berlin：Walther 1909

Money，J.：Hermaphroditism，gender and precocity in hyperadrenocorticism：Psychologic findings. Bull. Johns Hopkins Hosp. 96，253-264，1955

Money，J.：Gender：History，theory and usage of the term in sex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nurture. J.Sex. Marital. Ther.11，71-79，1985

Money，J.：Lovemaps. Clinical concepts of sexual/erotic health and pathology，paraphilia，and gender transposition in childhood，adolescence，and maturity. New York：Irvington 1986

Moré，A.：Psyche zwischen Chaos und Kosmos. Die psychoanalytische Theorie Janine Chasseguet-Smirgels. Eine kritische Rekonstruktion.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1

Morgenthaler，F.：Homosexualität. In：Sigusch 1980a：329-367

Morgenthaler，F.：Sexualität und Psychoanalyse. In：Dannecker und Sigusch 1984：20-38

Morris，J.：Conundrum. London：Faber and Faber 1974

Moynihan，R.：Wie eine Krankheit gemacht wird：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Z.Sexualforsch. 16，167-174，2003

Mühlbauer，R.：Strategiemodelle der neuen Frauenbewegung. In：Albus，A.u.a.（Hg.）：Maskulin-Feminin. München：Rogner；Bernhard 1972

Müller-Pozzi，H.：Eine Triebtheorie für unsere Zeit. Sexualität und Konflikt in der Psychoanalyse. Bern：Huber 2008

Musick，K.und L.Bumpass：Reexamining the case for marriage：Union 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well-being. J.Marr. Fam.74（1），1-18，2012

Newman，A.A.：»Meet the Übersexual，a modern version of the ›Real Man‹«. The New York Times（sel. for SZ）vom 24.Oktober 2005，S.1

Nieder，T.O.：Transsexuelle Entwicklungen und therapeutische Praxis. Z.Sexualforsch. 23，63-70，2010

Nieder，T.O und H.Richter-Appelt：Geschlechtsinkongruenz，Geschlechtsdysphorie und transsexuelle Entwicklungen. In：Briken und Berner 2013（im Druck）

Nietzsche，F.（1886）：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Vorspiel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Werke in drei Bänden. Bd.2，hg. von K.Schlechta. München：Hanser 1966：563-759

O'Connell，H.E.，K.V.Sanjeevan，and J.M.Hutson：Anatomy of the clitoris. J.Urol. 174（4），1189-1195，2005

Olivier，Ch.：Les enfants de Jocaste. Paris：Denoël-Gonthier 1980（dt.：Jokastes Kinder. Die Psyche der Frau im Schatten der Mutter. 3.Aufl. Düsseldorf：Claassen 1987）

Passett，P.：Ein psychoanalytisches Wiederlesen der »Drei Abhandlungen«. In：Quindeau und Sigusch 2005：36-59（zit. als 2005a）

Passett，P.：Ein erhellendes Scheitern. Z.Sexualforsch. 18，84-87，2005（zit. als 2005b）

Passett，P.：Über den Strukturwandel der Psyche. Z.Sexualforsch. 19，251-255，2006

Passig，K.：Sadomasochismus in Zahlen：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mpirische Forschungslage. In：Hill et al. 2008：81-102

Passig，K. und Ⅰ.Strübel：Die Wahl der Qual. Handbuch für Sadomasochisten und solche，die es werden wollen. 2.，überarb. Neuausgabe. Reinbeck：Rowohlt Taschenbuch 2009

Pastötter，J.：Erotic Home Entertainment und Zivilisationsprozess. Analyse des postindustriellen Phänomens Hardcore-Pornografie. Wiesbaden：Deutscher Universitäts Verlag 2003

Pastötter，J.：»Der Forschungsstand zur Pornografie in Deutschland ist wirklich dünn«. Pro Familia Magazin，H.1，13-15，2009

Penn，M.J.：Microtrends. London：Allen Lane 2007

Penny，L.：Fleischmarkt. Weibliche Körper im Kapitalismus. Hamburg：Ed. Nautilus 2012

Peuckert，R.：Familienformen im sozialen Wandel.8.Aufl.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 2012

Pfaller，R.：Strategien des Beuteverzichts. Die narzisstischen Grundlagen aktueller Sexualunlust und Politohnmacht. In：Berkel 2009：31-47

Philippsohn，S.：Sexuell befriedigt durch Geschlechtsverkehr oder Selbstbefriedigung. Fühlt sich beides gleich an？In：Dorn，A.，D.Kimmich-Laux，H.Richter-Appelt und M.Rauchfuß（Hg.）：Die Psyche im Spiegel der Hormone. Frankfurt/M.：Mabuse-Verlag 2012：263-274

Philippsohn，S. and U.Hartmann：Determinants of sexual satisfaction in a sample of German women. J.Sex. Med.6，1001-1010，2009

Platon：Phaidon，übers. von F.Schleiermacher. Sämtliche Werke，Bd.Ⅰ.Heidelberg：Lambert Schneider 1950：731-811

Platon：Das Gastmahl. Übers. und erläut. von O.Apelt. Neubearb. von

A.Capelle. 2.Aufl. Hamburg：Meiner 1960

Poluda，E.S.：Probleme der weiblichen homosexuellen Entwicklung. In：Sigusch 1996a：57-76 und 2007a：43-54

Poluda，E.S.：Das Bild der lesbischen Frau in der Psychoanalyse. Psyche-Z.Psychoanal. 54，322-353，2000

Prause，N.，and C.A.Graham：Asexuality：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Arch. Sex. Behav. 36，341-356，2007

Preciado，B.：Kontrasexuelles Manifest. Berlin：b_books 2004

Preciado，B.：»Proletarier des Anus«. Gespräch mit Tim Stüttgen. Jungle World，Nr.50 vom 1.Dezember 2004（zit. nach http：//jungle-world.com/artikel/2004/49/14200.html；accessed：12.9.2010）

Pretzel，A.und V.Weiß（Hg.）：Rosa Radikale. Die Schwulenbewegung der 1970er Jahre. Hamburg：Ed.Waldschlösschen 2012

Puppo，V.：Anatomy of the clitoris：Revision and clarifications about the anatomical terms for the clitoris proposed（without scientific bases）by Helen O'Connell，Emmanuele Jannini，and Odile Buisson. ISRN Obstet. Gynecol.，Article ID 261464，doi：10.5402/2011/261464，veröffentl. online 15.9.2011（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175415/）

Pynchon，Th.：Vineland. Boston u.a.：Little，Brown and Co.1990（dt.：Vineland. Roman. Übers. von Dirk van Gunsteren. Reinbek：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95）

Quindeau，I.：Braucht die Psychoanalyse eine Triebtheorie？In：Quindeau und Sigusch 2005：193-208

Quindeau，I.：Verführung und Begehren. Die psychoanalytische Sexualtheorie nach Freud. Stuttgart：Klett-Cotta 2008

Quindeau，I.und M. Brumlik（Hg.）：Kindliche Sexualität. Weinheim，Basel：Beltz Juventa 2012

Quindeau，I.und V.Sigusch（Hg.）：Freud und das Sexuelle. Neue psychoanaiytische und sexualwissenschaftliche Perspektiven.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5

Reemtsma，J.Ph.：Vertrauen und Gewalt. Versuch über eine besondere Konstellation der Moderne，Hamburg 2008

Reese-Schäfer，W.：Luhmann zur Einführung.2. Aufl. Hamburg：Junius 1996

Reich，W.：Die Funktion des Orgasmus. Zur Psychopathologie und zur Soziologie des Geschlechtslebens.（Neue Arbeiten zur ärztlichen Psychoanalyse，Nr.6）. Leipzig u.a.：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27（Neuausgabe：Die Entdeckung des Orgons. Die Funktion des Orgasmus. Sexualökonomische Grundprobleme der biologischen Energie. Köln，Berlin：Kiepenheuer；Witsch 1969）

Reich，W.：Der Einbruch der Sexualmoral. Zur Geschichte der sexuellen Ökonomie. Berlin：Verlag für Sexualpolitik 1932（2.，erweit. Aufl. Kopenhagen：Verlag für Sexualpolitik 1935；vgl. auch die letzte dt. Ausgabe：Der Einbruch der sexuellen Zwangsmoral. Zur Geschichte der sexuellen Ökonomie. Köln：Kiepenheuer；Witsch 1995）

Reich，W.：Die Sexualität im Kulturkampf. Zur sozialistischen Umstrukturierung des Menschen. Kopenhagen：Sexpol 1936（Neuausgabe：Die sexuelle Revolution. Zur charakterlichen Selbststeuerung des Menschen. Frankfurt/M.：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Reiche，R.：Geschlechterspannung. Eine psychoanaiytische Untersuchung.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0（Neuausgabe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0）

Reiche，R.：Psychoanaiytische Therapie sexueller Perversionen. In：Sigusch 1996a：241-265 und 2007a：276-291

Reiche，R.：Gender ohne Sex. Geschichte，Funktion und Funktionswandel des Begriffs »Gender«. Psyche-Z.Psychoanal. 51，926-957，1997

Reiche，R.：Die Rekonstruktion der zentralen Onaniephantasie in der Analyse eines jungen Homosexuellen.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360-382（zit. als 2000a）Reiche，R.：Der gewöhnliche Weg zur Homosexualität beim Mann. In：Bosse und King 2000：178-198（zit. als 2000b）

Reiche，R.：»...versage uns die volle Befriedigung«（Sigmund Freud）. Eine sexualwissenschaftliche Zeitdiagnose der gegenwärtigen Kultur. Z.psychoanal. Theorie u. Praxis 15，10-36，2000（zit. als 2000c）

Reiche，R.：Der gewohnliche Weg zur Homosexualität beim Mann. In：Bohleber und Drews 2001：288-303

Reiche，R.：Adorno und die Psychoanalyse. In：Gruschka，A.und

U.Oevermann（Hg.）：Die Lebendigkeit d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Wetzlar：Büchse der Pandora 2004：235-254

Reiche，R.：Das Rätsel der Sexualisiemng. In：Quindeau und Sigusch 2005：135-152（zit. als 2005a）

Reiche，R.：Nachwort. Zu：Freud，S.：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Reprint der Erstausgabe nach 100 Jahren. Frankfurt/M.：S.Fischer 2005（zit. als 2005b）

Reiche，R.：Sigmund Freud（1856-1939）. In：Sigusch und Grau 2009：188-198 Reiche，R.：Die Figuration der sexuellen Grenze. Vortrag，gehalten am Freud-Institut Zürich am 14. September 2012（erweitert veröffentl. in：Psyche-Z.Psychoanal. 67，359-378，2013）

Rheingold，H.：Virtual reality. New York：Summit Books 1992

Richter-Appelt，H.：Sexuelle Traumatisierungen und körperliche Mißhandlungen in der Kindheit. In：Düring und Hauch 1995：56-76

Richter-Appelt，H.（Hg.）：Verführung-Trauma-Mißbrauch（1896-1996）.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1997（Neuausgabe ebenda 2002）

Richter-Appelt，H.：Frühkindliche Körpererfahrungen und Erwachsenensexualität. In：Dannecker und Reiche 2000：383-395

Richter-Appelt，H.：Intersexualität und Medizin：Erste Ergebnisse eines Forschungsprojekts. Z.Sexualforsch. 17，239-257，2004

Richter-Appelt，H.：Probleme der intersexuellen Entwicklung. In：

Sigusch 2007a：236-250（zit. als 2007a）

Richter-Appelt，H.：Psychotherapie nach sexueller Traumatisierung. In：Sigusch 2007a：300-307（zit. als 2007b）

Richter-Appelt，H.und A.Hill（Hg.）：Geschlecht zwischen Spiel und Zwang.（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81）.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4

Rifkin，J.：Die dritt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Campus 2011

Rohde-Dachser，Ch.：Expedition in den dunklen Kontinent. Weiblichkeit im Diskurs der Psychoanalyse. Berlin u.a.：Springer 1991

Runte，A.：Biographische Operationen. Diskurse der Transsexualität. München：Wilhelm Fink 1996

Russell，B.：Marriage and morals. London：Allen；Unwin 1929（dt.：Ehe und Moral. Stuttgart：Kohlhammer 1951）

Rutschky，K.（Hg.）：Schwarze Pädagogik. Quellen zur Natur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Erziehung. Frankfurt/M.u.a.：Ullstein 1977

Sade，D.A.F.Marquis de（1795）：Die Philosophie im Boudoir oder Die lasterhaften Lehrmeister. Dialoge，zur Erziehung junger Damen bestimmt. In：Ausgewählte Werke，hg. von M.Luckow. Bd. Ⅲ.Hamburg：Merlin 1965

Saemann-Ischenko，R.：Armer Hund. Norderstedt：BoD 2010

Schafer，S.：Sappho 70. Zur Situation der lesbischen Frau heute. Mit

dem Vorwort »Jenseits des Systems« von V.Sigusch. Henstedt-Ulzburg：Henstedter Handdruck Verlag 1971

Schafer，S.：Sexueile und soziale Probleme von Lesbierinnen in der BRD. In：Schorsch und Schmidt 1975：299-325

Schenk，H.：Die Befreiung des weiblichen Begehrens. Köln：Kiepenheuer；Witsch 1991

Schetsche，M.：Das Internet，das sexuelle Geheimnis und das Ende der Pornografie. In：Benkel und Akalin 2010：319-338

Schiefelbein，D.：Wiederbeginn der juristischen Verfolgung homosexueller Männ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ie Homosexuellen-Prozesse in Frankfurt am Main 1950/51. Z.Sexualforsch. 5，59-73，1992

Schiefelbein，D.：Zur Verfolgung der Homosexuellen in Frankfurt am Main. In：Knigge-Tesche，R.und A.Ulrich（Hg.）：Verfolgung und Widerstand in Hessen 1933-1945. Frankfurt/M.：Hess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94：404-414

Schirmer，U.：Geschlecht anders gestalten. Drag Kinging，geschlechtliche Selbstverhältnisse und Wirklichkeiten. Bielefeld：transcript 2010

Schmauch，U.：Anatomie und Schicksal. Zur Psychoanalyse der frühen Geschlechtersozialisation.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1987

Schmauch，U.：Kindheit und Geschlecht. Zur Psychoanalyse der frühen Geschlechtersozialisation. Basel，Frankfurt/M.：Stroemfeld，Nexus

1993

Schmauch，U.：Probleme der männlichen sexuellen Entwicklung：In：Sigusch 1996a：44-56 und 2007a：36-42

Schmerl，Ch.，St. Soine，M.Stein-Hilbers und B.Wrede（Hg.）：Sexuelle Szenen. Inszenierungen von Geschlecht und Sexualität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Opladen：Leske+Budrich 2000

Schmidt，G.：Sexuelle Motivation und Kontrolle. In：Schorsch und Schmidt 1975：30-47

Schmidt，G.：Sexualität. In：Herrmann，Th.，P.R.Hofstätter，H.H.Huber und F.E.Weinert（Hg.）：Handbuch psychologischer Grundbegriffe. München：Kösel 1977：431-437

Schmidt，G.：Sexuelle Folklore. Literatur konkret 1979：70-71

Schmidt，G.：Jenseits des Triebprinzips.Überlegungen zur sexuellen Motivation. In：Scarbath. H.und B.Tews（Hg.）：Sexualerziehung und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München，Wien：Urban und Schwarzenberg 1982：27-39

Schmidt，G.：Motivational Grundlagen sexuellen Verhaltens. In：Thomä，H.（Hg.）：Psychologie der Motive. Bd. 2 der Serie Motivation und Emotion der Enzyklopädie der Psychologie. Göttingen：Hogrefe 1983：70-109（bei dieser Arbeit beziehen sich die im Text genannten Seitenzahlen auf das Manuskript）

Schmidt，G.：Heifer und Verfolger. Die Rolle von Wissenschaft und Medizin in der Homosexuellenfrage. Mitt. Magnus-Hirschfeld-Ges. 3，21-

32，1984a

Schmidt，G.：Kurze Entgegnung auf Volkmar Siguschs »Lob des Triebes«. In：Dannecker und Sigusch 1984：17-19（zit. als 1984b）

Schmidt，G.：Das große Der Die Das.Über das Sexuelle. Herbstein：März 1986

Schmidt，G.（Hg.）：Jugendsexualität. Sozialer Wandel，Gruppenunterschiede，Konfliktfelder.（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69）. Stuttgart：Enke 1993（Neuausgabe：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0）（zit. als 1993/2000）

Schmidt，G.：Emanzipation und der Wandel heterosexueller Beziehungen. In：Düring und Hauch 1995：1-13

Schmidt，G.：Das Verschwinden der Sexualmoral.Über sexuelle Verhältnisse. Hamburg：Klein 1996（Neuausgabe unter dem Titel：Sexuelle Verhältnisse. Reinbek：Rowohlt Taschenbuch Veriag 1998）

Schmidt，G.：Über die Tragik pädophiler Männer. Z.Sexualforsch. 12，133-139，1999

Schmidt，G.（Hg）.Kinder der sexuellen Revolution.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studentischer Sexualität 1966-1996.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77）.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0

Schmidt，G.：Das neue Der Die Das.Über die Modernisierung des Sexuellen.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4a

Schmidt，G.：Kindersexualität-Konturen eines dunklen Kontinents. Z.Sexualforsch. 17，312-322，2004b（auch in：Quindeau und Brumlik 2012：60-70）

Schmidt，G.：Befreiung der Sexualität？Befreiung durch Sexualität？Vortrag，gehalten auf einer Tagung der Internationalen Gesellschaft für systemische Therapie vom 1. bis zum 3.Oktober 2009 in Heidelberg（zit. als 2009a）

Schmidt，G.：Phantasien der Jungen，Phantasmen der Alten. BZgA Forum 1，27-32，2009b

Schmidt，G.：Heterosexuelle Beziehungsbiographien im Wandel. In：Amendt et al. 2011：68-78

Schmidt，G.und P.Briken：Erinnerungen an die frühen Jahre.50 Jahre Sexualforschung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Hamburg-Eppendorf. [Gespräch]. Z.Sexualforsch. 23，155-164，2010

Schmidt，G.und S.Matthiesen：»What do boys do with porn？« Ergebnisse einer Interviewstudie，Teil 2.Z.Sexualforsch. 24，353-378，2011

Schmidt，G.，and V.Sigusch：Sex differences in responses to psychosexual stimulation by films and slides. J.Sex Res. 6，268-283，1970

Schmidt，G.und V.Sigusch：Arbeiter-Sexualität.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an jungen Industriearbeitern.（Soziologische Texte，Bd. 75）. Neuwied，Berlin：Luchterhand 1971

Schmidt，G.，and V.Sigusch：Woman’s sexual arousal. In：Zubin，

J.，and J.Money（eds.）：Contemporary sexual behavior：Critical issues in the 1970s. Baltimore，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3：117-143

Schmidt，G.und B.Strauß（Hg.）：Sexualität und Spätmoderne.Über den kulturellen Wandel der Sexualität.（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76）. Stuttgart：Enke 1998

Schmidt，G.，S.Matthiesen und U.Meyerhof：Alter，Beziehungsform und Beziehungsdauer als Faktoren sexueller Aktivität in heteroseuellen Beziehungen. Eine empirische Studie an drei Generationen. Z.Sexualforsch. 17，116-133，2004

Schmidt，G.，V.Sigusch，and U.Meyberg：Psychosexual stimulation in men：Emotional reactions，changes of sex behavior，and measures of conservative attitudes. J.Sex Res. 5，199-217，1969

Schmidt，G.，V.Sigusch，and S.Schäfer：Responses to reading erotic stories：Male-female differences. Arch. Sex. Beh. 2，181-199，1973

Schmidt，G.，S.Matthiesen，A.Dekker und K.Starke：Spätmoderne Beziehungswelten. Report über Partnerschaft und Sexualität in drei Generationen.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Schneider，N.F.：Zur Lage und Zukunft der Familie in Deutschland. Ges. Wirtsch. Pol.（GWP）2，511-544，2002

Schönfelder，Th.：Abbau，Ersatz und Kontakte.[Panel：Masturbation im Kindesalter]. Sexualmed. 3，31，1974

Schorsch，E.：Sexuelle Deviationen：Ideologie，Klinik，Kritik. In：

Sigusch 1975：118-155 und in：Sigusch 1980a：119-158（zit. als 1975/1980）

Schorsch，E.：Die Stellung der Sexualität in der psychischen Organisation des Menschen. Nervenarzt 49，456-460，1978

Schorsch，E.：Versuch über Sexualität und Aggression. Z.Sexualforsch. 2，14-28，1989

Schorsch，E.：Perversion，Liebe，Gewalt. Aufsätze zur Psychopath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der Sexualität 1967-1991，hg. von G.Schmidt und V.Sigusch.（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68）. Stuttgart：Enke 1993

Schorsch，E.und N.Becker：Angst，Lust，Zerstörung. Sadismus als soziales und kriminelles Handeln. Zur Psychodynamik sexueller Tötungen. 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1977

Schorsch，E.und G.Schmidt（Hg.）：Ergebnisse zur Sexualforschung. Köln：Kiepenhauer und Witsch 1975

Schorsch，E.，M.Dannecker，F.Pfäfflin，G.Schmidt und V.Sigusch：Über den allgemeinen Umgang mit AIDS. Eine Erklärung der Deutschen Geseilschaft für Sexualforschung vom November 1984. Abgedruckt u.a.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vom 7.Dezember 1984，S.8；Sexualmedizin 14，30-32，1985；gay journal，Nr. 1，Januar 1985，S.14-15；Deutsches Ärzteblatt 82，A-1324-1325，1985

Schuhrke，B.：Körperentdecken und psychosexuelle Entwicklung. Theoretische Überlegungen und eine Längsschnittuntersuchung an Kindern im zweiten Lebensjahr. Regensburg：Roderer 1991

Schuhrke，B.：Genitalentdecken im zweiten Lebensjahr. Z.Sexualforsch. 10，106-126，1997

Schütze，B.：Neo-Essentialismus in der Gender-Debatte. Transsexualismus als Schattendiskurs pädagogischer Geschlechterforschung. Bielefeld：transcript 2010

Schweizer，K.und H.Richter-Appelt（Hg.）：Intersexualität kontrovers. Grundlagen，Erfahrungen，Positionen.（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96）.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12

Seiffge-Krenke，I.und N.Schneider：Familie-nein danke？！ Familienglück zwischen neuen Freiheiten und alten Pflichten. Göttingen u.a.：Vandenhoeck；Ruprecht 2012

Sennett，R.：The fall of public man.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 New York：Knopf 1977（dt.：Verfall und Ende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Die Tyrannei der Intimität. Frankfurt/M.：S.Fischer 1983）

Sherfey，M.J.：The evolution and nature of female sexuality in relation to psychoanalytic theory. J.Am. Psychoanal. Assoc. 14，28-128，1966

Sichtermann，B.：Der tote Hund beißt. Karl Marx，neu gelesen. Berlin：Wagenbach 1990

Siep，L.：»Dolly«-oder die Optimierung der Schöpfung. Der philosophischen Ethik fehlt es an wertenden Naturvorstellungen. Frankfurter Rundschau vom 16. April 1996，S.12

Sigusch，V.：Exzitation und Orgasmus bei der Frau.（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48）. Stuttgart：Enke 1970a

Sigusch，V.：Sexualphysiologie：Einmaleins der Lust. Vorwort zu：W.H.Masters und V.E.Johnson：Die sexuelle Reaktion. 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1970b：7-15

Sigusch，V.（Hg.）：Ergebnisse zur Sexualmedizin. Köln：Wissenschafts-Verlag 1972

Sigusch，V.（Hg.）：Therapie sexueller Störungen. Stuttgart，New York：Thieme 1975

Sigusch，V.：Medizinische Experimente am Menschen. Das Beispiel Psychochirurgie. Beiwerk des Jahrbuchs für kritische Medizin，Bd. 2（Argument-Sonderband 17）. Berlin：Argument-Verlag 1977

Sigusch，V.：Begründung des abweichenden Abschlußvotums. Beilage zu：G. Fülgraff und I.Barbey（Hg.）：Stereotaktische Hirnoperationen bei abweichendem Sexualverhalten. Abschlußbericht der Kommission beim Bundesgesundheitsamt. Berlin：bga-Berichte，Bd. 3，1978

Sigusch，V.：Medizin and Sexualität. Köln：Kiepenheuer；Witsch 1979a

Sigusch，V.：Das gemeine Lied der Liebe. Sexualitat konkret，H. 1，6-9，1979b（zahlreiche Nachdrucke u.a.in：Das Argument-Z.Philosophie 121，403-407，1980）

Sigusch，V.（Hg.）：Therapie sexueller Störungen.2.，neubearb. und erweit. Aufl. Stuttgart，New York：Thieme 1980a

Sigusch，V.：Natur und Sexualität.Über die Bedeutung der Kategorie

der Natur für eine Theorie der Sexualität des Menschen. Das Argument-Z.Philosophie 119，3-15，1980b

Sigusch，V.：»Soziale Seelenkontrolle mit dem Skalpell. Psychochirurgie-hirnverbrannt. Haben ›Seelenschneider‹ in Deutschland nichts zu fürchten？« [Dossier]. Die Zeit，35. Jg.，Nr. 15 vom 4. April 1980c，S.23-25

Sigusch，V.：Vom Trieb und von der Liebe.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1984a

Sigusch，V.：Die Mystifikation des Sexuellen.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1984b

Sigusch，V.：Lob des Triebes. In：Dannecker und Sigusch 1984：3-16（zit. als 1984c）

Sigusch，V.：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der Sexualität. In：Psychoanalytisches Seminar Zürich（Hg.）：Sexualität. Frankfurt/M.：Syndikat 1986：133-156

Sigusch，V.（Hg.）：AIDS als Risiko.Über den gesellschaftlichen Umgang mit einer Krankheit. Hamburg：Konkret Literatur Verlag 1987a

Sigusch，V.：Momente der Transferation. In：Brede，K.，H.Fehlhaber，H.-M.Lohmann，D.Michaelis und M.Zeul（Hg.）：Befreiung zum Widerstand. Aufsätze über Feminismus，Psychoanalyse und Politik. Margarete Mitscherlich zum 70. Geburtstag.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7b：225-234

Sigusch，V.：Was heißt kritische Sexualwissenschaft？

Z.Sexualforsch. 1，1-29，1988

Sigusch，V.：Kritik der disziplinierten Sexualität.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1989a

Sigusch，V.：Der AIDS-Komplex und unser Leviathan. Kann und soll uns der Staat über AIDS aufklären？Psyche-Z.Psychoanal. 43，673-697，1989b

Sigusch，V.：Die bayerische AIDS-Politik ächten！Recht；Psychiatrie 7，89-93，1989c（Nachdruck in：Sigusch 1990）

Sigusch，V.：Homosexuelle und Sexualforscher. Z.Sexualforsch. 2，55-74，1989d（zugleich in：Gooß und Gschwind 1989：31-56）

Sigusch，V.：Anti-Moralia. Sexualpolitische Kommentare.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1990

Sigusch，V.：Die Transsexuellen und unser nosomorpher Blick. I.Zur Enttotalisierung des Transsexualismus. Ⅱ.Zur Entpathologisierung des Transsexualismus. Z.Sexualforsch. 4，225-256 und 309-343，1991

Sigusch，V.：Geschlechtswechsel. Hamburg：Klein 1992（Taschenbuchausgabe Hamburg：Rotbuch 1995）

Sigusch，V.：Nachdenken über Feminismus. Z. Sexualforsch. 6，36-51，1993a

Sigusch，V.：Kritik der Sexualität. In：Böllinger und Lautmann 1993：140-148（zit. als 1993b；s.auch den Kongreßband：25. Deutscher Soziologentag 1990.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iag 1991）

Sigusch，V.：Leitsymptome transsexueller Entwicklungen. Wandel und Revision. Deutsches Ärzteblatt 91，A-1455-1458，1994

Sigusch，V.：Transsexueller Wunsch und zissexuelle Abwehr. Psyche-Z.Psychoanal. 49，811-837，1995

Sigusch，V.（Hg.）：Sexuelle Störungen und ihre Behandlung. Stuttgart，New York：Thieme und Vandenhoeck；Ruprecht 1996a

Sigusch，V.：»Die Zerstreuung des Eros.Über die ›neosexuelle Revolution‹«. Der Spiegel，Jg. 50，Nr. 23，3. Juni 1996b，S.126-130

Sigusch，V.：Metamorphosen von Leben und Tod. Ausblick auf eine Theorie der Hylomatie. Psyche-Z.Psychoanal. 51，835-874，1997

Sigusch，V.：Die neosexuelle Revolution.Über gesellschaftliche Transformationen der Sexualitä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Psyche-Z.Psychoanal. 52，1192-1234，1998a

Sigusch，V.：The neosexual revolution. Arch. Sex. Behav. 27，331-359，1998b

Sigusch，V.：Kritische Sexualwissenschaft und die Große Erzählung vom Wandel. Z.Sexualforsch. 11，17-29，1998c（auch in：Schmidt und Strauß 1998：3-16）

Sigusch，V.：Karl Heinrich Ulrichs. Der erste Schwule der Weltgeschichte. Berlin：Rosa Winkel 2000a

Sigusch，V.：Vom König Sex zum Selfsex.Über gegenwärtige

Transformationen der kulturellen Geschlechts-und Sexualformen. In：Schmerl et al. 2000：229-249（zit. als 2000b）

Sigusch，V.：Lean sexuality. Sexuality；Culture 5，23-56，2001（Nachdruck in：Z.Sexualforsch. 15，120-141，2002）

Sigusch，V.：Leitsymptome süchtig-perverser Entwicklungen. Deutsches Ärzteblatt 99，A-3420-A3423，2002

Sigusch，V.：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recent decades. German Medical Science 2，1-31，2004a（http：//www.e-gms.de/en/gms/index.shtml）Sigusch，V.：Satz vom ausgeschlossenen Geschlecht. Z.Sexualforsch. 17，258-266，2004b

Sigusch，V.：Neosexualitäten. Über den kulturellen Wandel von Liebe und Perversion. Franfurt/M.，New York：Campus 2005a

Sigusch，V.：Sexuelle Welten. Zwischenrufe eines Sexualforschers.（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87）.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2005b

Sigusch，V.：Die neosexuelle Revolution. Metamorphosen von Leben und Tod. Das Argument-Z.Philosophie（Schwerpunkt：»Materialien zur neosexuellen Revolution«）260，189-205，2005c

Sigusch，V.：Praktische Sexualmedizin. Eine Einführung. Köln：Deutscher Ärzte-Verlag 2005d

Sigusch，V.：Anfänge der modernen Sexualwissenschaft. In：Lohmann und Pfeiffer 2006：39-48（Vorabdruck in：Psyche-Z.Psychoanal. 59，1061-1080，2005）（zit. als 2005/2006）

Sigusch，V.：Kann die neosexuelle Revolution ohne Neoliberalismus gedacht werden？Eine Antwort auf Daniela Klimke und Rüdiger Lautmann. Z.Sexualforsch. 19，234-240，2006

Sigusch，V.（Hg.）：Sexuelle Störungen und ihre Behandlung.4.，überarb. und erweit. Aufl. Stuttgart，New York：Thieme 2007a

Sigusch，V.：Das Frankfurter 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1973-2006）. Protokoll einer Abwicklung. Z.Sexualforsch. 20，216-246，2007b

Sigusch，V.：Geschichte der Sexualwissenschaft.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8a

Sigusch，V.：Metamorphosen von Leben und Tod. In：Angerer，M.-L.und Ch. König（Hg.），Gender goes life. Bielefeld：transcript 2008b：111-134

Sigusch，V.：Was heißt Neosexualitäten？In：Hill et al. 2008：59-78（zit. als 2008c）

Sigusch，V.：Sexualwissenschaftliche Thesen zur Missbrauchsdebatte. Z.Sexualforsch. 23，247-257，2010a（auch in：Quindeau und Brumlik 2012：209-221）

Sigusch，V.：Die Soziologie und der Strukturwandel der Sexualität. In：Benkel und Akalin 2010：135-151（zit. als 2010b）

Sigusch，V.：Auf der Suche nach der sexuellen Freiheit.Über Sexualforschung und Politik.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11a

Sigusch，V.：Von der sexuellen zur neosexuellen Revolution. In：

Amendt et al. 2011：88-103（zit. als 2011b）

Sigusch，V.：Sexueller Kindesmissbrauch. Zum Stand von Forschung und Therapie. Deutsches Ärzteblatt 108（37），A-1898-1902，2011c（auch in：PP DÄB，H.10，455-457，2011）

Sigusch，V.：»Shades of Grey und neosexuelle Revolution：Auf die Knie，Männer«. The European，7. August 2012-http：//theeuropean.de/volkmar-sigusch/11864-shades-of-grey-und-neosexuelle-revolution

Sigusch，V.und G.Grau（Hg.）：Personenlexikon der Sexualforschung.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9

Sigusch，V.und H.L.Gremliza（Hg.）：Operation AIDS. Hamburg：Gremliza Verlags-GmbH 1986

Sigusch，V.und R.Reiche：Die Untersuchung und Behandlung transsexueller Patienten. In：Sigusch 1980a：293-326

Sigusch，V.und G.Schmidt：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Wirkungen psychosexueller Stimuli. Nervenarzt 43，367-376，1972

Sigusch，V.und G.Schmidt：Jugendsexualität.（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 52）. Stuttgart：Enke 1973

Sigusch，V.，I.Klein und H.L.Gremliza（Hg.）：Sexualität konkret. Sammelband 2. Frankfurt/M.：Zweitausendeins 1984

Sigusch，V.，B.Meyenburg und R.Reiche：Transsexualität（Ⅰ-Ⅲ）. Sexualmed. 7，15-22，107-116，191-192，244-246，1978

Sigusch，V.，B.Meyenburg und R.Reiche：Transsexualität. In：Sigusch 1979a：249-311

Sigusch，V.，G.Schmidt，A.Reinfeld，and I.Wiedemann-Sutor：Psychosexual stimulation：Sex differences. J.Sex Res. 6，10-24，1970

Sigusch，V.，E.Schorsch，M.Dannecker，G.Amendt und K.Albrecht-Désirat：Aufruf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exualforschung zur Entkriminalisierung der Homosexualität vom Januar 1981. Abgedruckt u.a.in：Frankfurter Rundschau vom 19. Mai 1981，S.9；Das Argument 130，869-870，1981；Sigusch 2011a：68-71

Simmel，G.（1900）：Philosophie des Geldes. Gesamtausgabe，Bd. 6. Frankfurt/M.：Suhrkamp 1989

Soine，St.：Was hat »lesbische Identität« mit Frausein und Sexualität zu tun？In：Schmerl et al. 2000：194-225

Sontag，S.（1967）：Die pornographische Phantasie. In：Dies.：Kunst und Antikunst. 24 literarische Analysen. Frankfurt/M.：Fischer Taschenbuch Veriag 1982：48-87

Sontag，S.：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Saturday Review，24. September 1972（http：//www.uplift.com/mediawatch/？page_id=76）（auch in：Allman，L.R.und D.T.Jaffe [Hg.]：Readings in adult psychology. New York：Harper；Row 1977：258-294）Sousa，R.de：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Cambridge，Mass.：MIT Press 1987

Spengler，A.：Sadomasochisten und ihre Subkulturen.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1979

Spira，A.，N.Bajos und ACFS-Group：Les comportements sexuels en France. Paris：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3（engl.：Sexual behaviour and AIDS. Aldershot：Avebury 1994）

Starke，K.：Partner-und Sexualverhalten ostdeutscher Jugendliche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Umbruch. In：Sydow，H.（Hg.）：Entwicklung und Sozialisation von Jugendlichen vor und nach der 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Opladen：Leske+Budrich 1996：159-219

Starke，K.：Nichts als die reine Liebe. Beziehungsbiografien und Sexualität im sozialen und psychologischen Wandel：Ost-West-Unterschiede. Lengerich：Pabst Science Publ.2005

Starke，K.：Jenseits der Zonengrenze. Über die unvermeidlichen Schwierigkeiten der Altbundesdeutschen，die Ostdeutschen als zugehörig zu erkennen. Beispiel Partnerschaft und Sexualität. Vortrag，gehalten auf dem Hamburger Symposium»Das exkludierte Andere und wir«am 22. September 2006

Starke，K.：Pornografie und Jugend. Jugend und Pornografie. Lengerich：Pabst Science Publ.2010

Starke，K.und K.Weller：West-und ostdeutsche Jugendliche. Eine östliche Sicht. In：Schmidt 1993：80-101

Starke，K.und K.Weller：Deutsch-deutsche Unterschiede 1980-1996. In：Schmidt 2000：231-255

Stoller，R.J.：Sex and gender. Vol.1：The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New York：Science House 1968

Stoller，R.J.：Perversion. The erotic form of hatred.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5（dt.：Perversion. Die erotische Form von Haß. Reinbek：Rowohlt 1979；2.Aufl.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1）

Stoller，R.J.：Sexual excitement. Arch. Gen. Psychiat. 33，899-909，1976

Stoller，R.J.：Sexual excitement. Dynamics of erotic life. New York：Pantheon 1979

Stoller，R.J.：Pain；Passion. A psychoanalyst explores the world of S；M. New York，London：Plenum 1991

Strauß，B.：Kultureller Wandel der Sexualität und die möglichen Folgen für die Psychotherapie. Psychotherapeut 44，270-278，1999

Strauß，B.：Die sogenannte Sex-Sucht. Klinische Aspekte süchtigen sexellen Verhaltens. Sucht 47（2），82-87，2001

Strauß，B.（Hg.）：Psychotherapie der Sexualstörungen. Krankheitsmodelle und Therapiepraxis-störungsspezifisch und schulenübergreifend.2.，neubearb. Auf. Thieme：Stuttgart，New York 2004

Stulhofer，A，G.Schmidt und I.Landripet：Pornografiekonsum in Pubertät und Adoleszenz. Gibt es Auswirkungen auf sexuelle Skripte，sexuelle Zufriedenheit und Intimität im jungen Erwachsenenalter？Z.Sexualforsch.22，13-23，2009

Sydow，K.von：Sexuelle Probleme und Störungen im höheren Alter. Psychotherapie im Dialog 9（1），53-58，2008

Thadden，E.von：»Alles eine Frage des Gefühls. Ein Gespräch mit der Historikerin Ute Frevert und der Soziologin Eva Illouz«. *Die Zeit* vom 6. September 2012，S.55

Thonke，I.：Kosten erschweren Zugang zu Verhütung. Pro familia untersucht Verhütungskosten in Europa. Pro Familia Magazin 39，H.3，13-14，2011

Tiefer，L.：Die Kommerzialisierung der weiblichen Sexualstörungen. Z.Sexualforsch.13，66-68，2000

Tissot，S.A.D.：Tentamen de morbis ex manustupratione. Lausanne：Marci-Mic. Bousquet；Soc.1758 [Anhang zu：Dissertatio de febribus biliosis；seu Historia epidemiae biliosae Lausannensis，An.1755]（dt.：Versuch von denen Krankheiten，welche aus der Selbstbefleckung entstehen. Aus dem Lateinischen übersetzt. Frankfurt/M.，Leipzig：Fleischer 1760）

Tolmein，O.：Recht und Geschlecht-ein Plädoyer für die Anerkennung von Hermaphroditen. ASTA-Zeitung der J.W.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M.（Schwerpunkt：Sex；Gender），Ausgabe Dezember 2010：44-45

Torelli，M.：Psychoanalyse lesbischer Sexualität.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8

Trosse，[Emma]：Der Konträrsexualismus inbezug auf Ehe und Frauenfrage. Leipzig：Max Spohr 1895

Ulitzsch，E.（1920）：D.A.F.M.D.S. In：Janin，J.：Der Marquis von Sade und andere Anschuldigungen. Mit einem Text von Ernst Ulitzsch.

München：edition belleville 1986

Ulrichs，K.H.（1862）：Vier Briefe von Karl Heinrich Ulrichs（Numa Numantius）an seine Verwandten. 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1，36-70，1899

Ulrichs，K.H.（unter dem Pseud. Numa Numantius）：Vindex. Social-juristische Studien über mannmännliche Geschlechtsliebe. Erste Schrift über mannmännliche Liebe. Leipzig：Selbstverlag，in Comm，bei Matthes 1864a

Ulrichs，K.H.（u.d.Pseud. Numa Numantius）：Inclusa. Anthropologische Studien über mannmännliche Geschlechtsliebe. Zweite Schrift über mannmännliche Liebe. Leipzig：Selbstverlag，in Comm，bei Matthes 1864b

Ulrich，St.：»Mein Partner mit der kalten Schnauze«. 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10./11.September 2011，S.13

Ussel，J.van：Sexualunterdrückung. Geschichte der Sexualfeindschaft. Reinbek：Rowohlt 1970

Ussel，J.van：Intimiteit. Deventer：Van Loghum Slaterus 1975（dt.：Intimität. Gießen：Focus 1979）

Valverde，M.：Sex，Macht and Lust. Berlin：Orlanda Frauenverlag 1989

Vinken，B.：Die Verrückung der Geschlechter. Dekonstruktiver Feminismus gegen Frauenforschung in den USA. Frankfurter Rundschau vom 10. September 1991，S.26

Völling，Ch.：Ich war Mann und Frau. Mein Leben als Intersexuelle. Köln：Fackelträger-Verlag 2010

Voß，H.-J.：Making Sex Revisited. Dekonstruktion des Geschlechts aus biologisch-medi-zinischer Perspektive. Bielefeld：transcript 2010

Voß，H.-J.：Geschlecht. Wider die Natürlichkeit. Stuttgart：Schmetterling 2011

Walder，P.：Körperkult und Sexualität in den neuen Jugendkulturen. Sex mit Tic Tac Toe und Tamagotchis. In：Schmidt und Strauß 1998：103-117

Weeks，J.：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Meanings，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y. London：Routledge und Kegan Paul 1985

Weininger，O.：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Eine prinzipielle Untersuchung. Wien，Leipzig：Braumüller 1903

Welldon，E.V.：Mother，madonna，whore. The idealization and denigration of motherhood. 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8（dt.：Mutter，Madonna，Hure. Verherrlichung und Erniedrigung der Mutter und der Frau. Waiblingen：Bonz 1992；Neuausgabe u.d.T.：Perversionen der Frau.[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82].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3）

Weller，K.：Das Sexuelle in der deutsch-deutschen Vereinigung. Leipzig：Forum Verlag 1991

Weller，K.：Wie nutzen Jugendliche Pornografie und was bewirkt sie？Pro Familia Magazin 1，9-12，2009

Weller，K.：Kindheit，Sexualität und die Rolle der Medien. tv diskurs 1，54-57，2010

Weller，K.und K.Starke：Veränderungen 1970-1990（DDR）. In：Schmidt 1993：49-65

West，S.L.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Ann. Rev. Sex Res. 15，40-172，2004

Westheimer，R.K.und P.A.Lehu：Silver Sex. Wie Sie Ihre Liebe lustvoll genießen. Frankfurt/M.，New York：Campus 2008

Whitebook，J.：Gewichtige Objekte. Zu Adornos Interpretation von Kant und Freud. Psyche-Z.Psychoanal.57，681-707，2003

Williams，L.：Hard Core. Basel，Frankfurt/M.：Stroemfeld 1995

Wilson，E.O.：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New York：Liveright Publ.2012

Winnicott，D.W.（1951）：Übergangsobjekte und Übergangsphänomene. In：Ders.：Vom Spiel zur Kreativität. Stuttgart：Klett-Cotta 1993：10-36

[Working Group]：The Working Group for a new view of women's sexual problems. Eine neue Sicht der sexuellen Probleme von Frauen. Z.Sexualforsch.16，160-166，2003

Wouters，C.：Duerr und Elias. Scham und Gewalt in Zivilisationsprozessen. Z.Sexualforsch.7，203-216，1994

Zhou，J.N.et al.：A sex difference in the human brain and its relation to transsexuality. Nature 378，68-70，1995

Zillich，N.：Pornografiekonsum unter Jugendlichen und die Flexibilisierung der Geschlechterrollen. Z.Sexualforschung 24，312-325，2011

Žižek，S.：»Die Nacht der Welt«.Süddeutsche Zeitung vom 23. September 1999，Nr.220，S.15

zur Nieden，S.：Weibliche Ejakulation. Variationen zu einem uralten Streit der Geschlechter.（Beiträge zur Sexualforschung，Bd.70）. Stuttgart：Enke 1994（Neuausgabe Gießen：Psychosozial-Verlag 2004）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stinenz，sexuelle 98，221，227，302，350，379，425f，430，443，515，524

Abtreibung 91，169f，200，227，408f，435，517，521ff

Affektdispositiv 566

Agape 54，167

Agender 124，213，229，250，257，531，549，567，571

Aggression，sexuelle 10，28，40，105，163f，177，185，188，209ff，226，228，281ff，297，302，336，378，388，577 s.auch Gewalt，sexuelle

AIDS 99，201ff，227，282，319，325，364，412，420ff，443，445，486，494，510，517，551，554

Akronyme，sexuelle 317ff

Akrotomophilie 537

Alterssexualität 213，459ff，578

Ambra 274

Amelotatismus 536f

Analverkehr 317f，361，385，426，453

Annoncen 317ff

Anteros 38，216，430，556f，581

Antibabypille 224f，277

Antisexualität 38

Armut 406，436f，497

Ars erotica 101，213，324，329，343，418，464，467，504，520，546ff，579

Asexualität 206，229，312ff，485ff，568

Asexuelle 213，290，430f，537，566f，581

Assoziation 358，534，546，562

- von Geschlecht und Sexualität 237ff

Aufklärung，sexuelle 125f，133f，154，159，168，191，202，204，211，214，227，238，245，269，290，345，421，426，485，519f，524，526，528，554f

Autodestruktion 63，75，95f，125，232

Autopoiesis 63，71ff，75f，95f，125，232，236，502

Autosexualität 359，489，506

Baubo 116，212，555

BDSM 317，326，344，366ff，404，430，476，539

Befreiung，sexuelle s.Emanzipation（sbewegung）

Begehren，sexuelles 62，101，105，153，156，165，175，177f，180f，209，212，222，226，301ff，346，356，376，388，396，456，464，482，492，557，564，577

Begierde 59，155，166ff，177ff，390，482，492，504，535，551，562，566，571

Beziehungen 13，28f，53，57，61，75，111，149，154，156，159，164ff，181f，222，226ff，263，276，289，296，305ff，340ff，347ff，353f，358，361，369，396，401ff，411，417，442ff，462f，478，495，505ff，509，518，528，530，532，535ff，544，546ff，551，557ff，562，570，579 s.auch Diversifikation der Beziehungen；Liebe

Bigender 216，250，549，571

Bigenus 238，243ff，250f，255，261

Bionik 92

Bisexualität 122，146，158，162f，206，213，246，261，363ff，384f，404，457，485，511，531，538，548f

Bisexuelle 10，127，319，337，348，355，363ff，430，454，

486，488，512，571

Candaulismus 537

Cisgender 244，247，547 s.auch Zissexuelle

Compersion s.Mitfreude

Cougar 324，463

Cybersex 317，340f，430，451，553，572

Delinquenz，sexuelle 196，286，316，523，538，581 s.auch Forensik

Destrudo 164，176，226，281，407，576f

Devolution，neosexuelle 500

Differentia generis specifica 59，102，111ff，115

Differentia generosexualis specifica 17，50

Differentia generum 59，102，111ff，114f，117ff

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 55ff，98f，149，161，178，211，217，342，356，410，545，558，580f

Dildokratie 361

Diskursfiguren，sexuelle 430f

Dispersion，sexuelle 75，226，232，276，316ff，329，334，341，

347，546，557，573 s.auch Dispersität；Internetsexualität；Shopsex

Dispersität 317，319，348，369 s.auch Dispersion

Dispositiv 9，26，32f，62，77，125，144，193，246，258f，263，309，429，508，545，564，566 s.auch Sexualdispositiv

Dissoziation，sexuelle 75，155，176，226，276，316，341，347，482，486f，527，534，545f

- von aggressiver und zärtlicher Sphäre 281ff

- von Ehe und Familie 349

- von Erotik und Sexualität 306

- von Geschlecht und Sexualität 156，237ff

- von körperlicher Reaktion und Erleben 272f

- von Liebe und Sexualität 562

- von Mutter-und Vaterschaft 306

- von personaler Beziehung und sexuellem Erleben 305f

- von Reproduktion und Sexualität 206，235f

- von Sexualität und Angst 276，527

- von Weiblichkeit und Mütterlichkeit 239

- von zärtlicher und sinnlicher Strömung 416，482

Diversifikation 70，75，226，276，316，341，538，544，546

- der Lebens-und Beziehungsformen 347ff，434

Drang，sexueller 123，165，167ff，176ff，564f，567，579

Drangliebe，vernünftige 565

Egoismus 36，67，106，172，295，358，376，403f，410，412，483f，504f，508，558，560ff，569，574 s.auch Selfsex

Ehe 10，36，51，98，349ff，401，433，453，455，494，550，557，570

Ehescheidung 433

Emanzipation（sbewegung）35，56，63，74，82，100，113，193，204，216，221，236，252，357，360f，363，425，488，496 s.auch Feminismus；Frauenbewegung；Lesbenbewegung；Schwulenbewegung

Empfängnisverhütung 227，445，521 s.auch Kontrazeption，Zeugungsverhütung

Endlust 480f

Entstofflichung 19，63，92，95f，309，316

Entsublimierung，repressive 35，204

Entwicklung，sexuelle 151ff，443，471

Erektionsstörungen 198，272，275，279，433，467f，476 s.auch

Impotenz

Eros 38，54，100，147f，164，173，178，188，192，216，272，356，430，450，483，506，527，546，556f，563f，579，581f

- »heiliger«45ff，216，228，553

Erotik 43，45ff，216，306，310，319，324，341，358，384，456，464，483，488，532，552，556，568，582 s.auch Ars erotica

- kindliche 284ff，551

E-Sex 177，204，226，229，272，310，340ff，549，569，571f s.auch Internetsexualität；Online-Sex；Portalsex

Essenzialismus 22，25，127，562

Evolutionspsychologie 29ff，127，206

Exhibitionismus 161，230，298，342，371，390，457，514，549

Fake Sex 430，553，569

Faktion 571

Familie 27，36，43，68，91，134，203，222，230f，234，255，262，283，287，293f，296f，299，328，347，349ff，404，433f，439，442，444，449，452，455，496，499，505，514，518，525，530，535f，548，551，570f，577

Fantasien，sexuelle 28，38，79，122，124，126，133，140ff，151，153，157，163f，175，178，182，185，188，207，209f，

212ff，242，246f，251，286，296f，302，332ff，341，343，367f，374，377，381，387f，452f，456f，461，464，474，487，511，518，540，550，556f，561，580ff

Female Genitale Cosmetic Surgery 198f，555

Feminismus 22，102ff，106，108ff，111，115，222，237ff，281，352，360，363，384，428，499，533f，536，555f s.auch Frauenbewegung

Fernliebe 518

Fetischismus

- gesellschaftlicher 19，21ff，35，38，53f，63，66，73，75，80，83，86ff，105，114，145，167，208，214f，232，303，309，408，415，449f，494，498f，559ff，573ff

- sexueller 98，135，162，185，187，210ff，223，229f，252，254，272，291，298，305ff，310ff，314，325，368f，375ff，381，384ff，401，416，456ff，488，531f，537，549，556，559ff，568，581

Forensik 317，345，366f，513 s.auch Delinquenz，sexuelle

Fortpflanzung s.Reproduktion

Frauen 28ff，40，76，85，90，103ff，113ff，122，163，184，213，246，282f，305f，333，343，349ff，354，369，391，402f，417，432ff，442ff，447，449，452ff，461ff，469ff，476，479，496，517，532，541，546f，555，567，577

- Benachteiligungen 48ff，107ff，113ff，141，148f，224，227，281，335f，338，352，377，404，406，416f，436f，468，495f，517，528，533，551f，562

- Selbstbestimmungsrechte 10，521ff

Frauenbewegung 42，102ff，107ff，193，221，227，237ff，246，355，359f，554 s.auch Feminismus

Furor causalis 136f

Furor naturalis 131f，521ff

Furor sexualis 33，566

Geburtenrate 435，459

Gender 76，124，166，195，229，232，237ff，250，262，266，352，456，539，577

- Blending 250ff，430

- Sex-and-Gender-Diskurs 227，238，259，361，447

- Swapping 342，532 s.auch Agender；Bigender；Cisgender；Intergender；Liquid Gender；Selfgender；Transgender

Genitalien 59，117，123，132，139ff，161f，171，199，268，286，291，324，335，339，369，464，480f，520，540，554f s.auch Baubo；Intimchirurgie；Klitoris；Penis；Phallus；Vagina；Venuslippen

Gerontophilie 385，390

Geschlecht（er）11，13，17，22，24f，31，35，38，41f，46ff，59，75，100，102，104，106，108，110f，114，116ff，124，127f，156，162，183，205，212，214ff，227，237ff，244，246，250ff，256，338，486，489，492，500，528，531ff，543，545，547，558，564，571，577，581f s.auch Sexus potior；Sexus sequior

Geschlechterdifferenz 40，76，107，111ff，114ff，117ff，228，253，259，263，369，405，444，468，495，533f，545ff，551，562f s.auch Differentia generum

Geschlechterdimorphismus 30f，40，122，141

Geschlechterdistinktion 250ff

Geschlechterspannung 120，156，163，233，542

Geschlechtsdifferenz 59，76，111ff，251，262，411，531，582 s.auch Differentia generis

Geschlechtsdysphorie 246f

Geschlechtsform（en）9，33，37，40ff，50，77，115，122f，125，204，208，226，229，246f，251f，265，316，348，420，429，446，527，547，557，561，569，578，

Geschlechtsidentität（sstörung）59，120，122，134，184，195，237，239，244，246f，260，292，448，543，571

Geschlechtsmetaphysik 41f，43f，45f，48，261

Geschlechtsrest，irreduzibler 105，192，543

Geschlechtsrolle 160，184，257，354

Geschlechtstheorie 40ff

Geschlechtsumwandlung s.Geschlechtswechsel

Geschlechtsunterschiede s.Geschlechterdifferenz

Geschlechtsverkehr 126，229，390，435，442ff，453ff，463ff，469，485，507，514，550，554，556，570

Geschlechtswechsel 11，121f，241ff，252，254ff，260ff，292，384

Gewalt（formen）

- allgemeine 56，78，88，104，106，109f，126，225f，228，266，293ff，334，359f，385，393f，407，438，486，500f，512，519，524，529，538，549，573ff，580

- sexuelle 12，29，50f，106，157，204，209，281ff，302，333，367f，378，417，445，450f，513，532，551 s.auch Missbrauch，sexueller；Traumatisierung，sexuelle；Übergriffe，sexuelle

Hankies 328，369

Hermaphrodit（ismus）s.Intergeschlechtliche

Heteronormativität 405，495，538，547

Heterosexualität 10，108，156，159ff，213，224，230，236，245，353ff，356，361，363，372f，378，478，486，494，537，539，547f，552

HIV-Infektion s.AIDS

Homo sexualis 17，34f，97f

Homonormativität 495

Homosexualität 10f，26，28，56，80，108，127，129，132，134，137，155f，159f，176，203，213，216，221，224，227，230，245f，254f，262，292，301，319，348，363，366f，369，371f，374，385，389f，404f，421f，443，454，452，478，486，495，500，503，512ff，515f，518，537f，547ff，552f，558

- männliche 136，202，251，324f，328，344，353ff，422ff，426f，469，536，558，570f，577

- weibliche 100，148，319，349，359ff，404，558 s.auch Lesbenbewegung

Hormone s.Sexualhormone

Hylomatie 38，63，75，77，79，90f，93，95f，155，232，309f，316，396，429，497，519，543，548，553，573，578 s.auch Metamorphosen von Leben und Tod

Impotenz 30，274，276，278，412，457f，475，481f

s.auch Erektionsstörungen；Sexualstörungen

Instinkte 20，38，100，172，176ff，181f，206，478，498

Intergender 124，229，250，257，265，531，549，553，571

Intergeschlechtliche 250，265ff，348，553，578

Internet 71，232，267，351，364，400，434，449，485，493，519，524

Internetsexualität 10，177，226f，248ff，302，305ff，310，312，317，319，325，328，337，340f，343ff，366，373，386，389，401ff，511，529，532，536f，550，557，569

s.auch E-Sex；Online-Sex；Portalsex

Intersexuelle s.Intergeschlechtliche

Intimchirurgie 198f，241，272，274，473，516

Involution 41

- neosexuelle 232，435，501，521ff

Inzest 159，281，287，298，384，482，518，521，548，558

Jugendsexualität 213，222，285，292，442ff，462

Kannibalismus 10，325，342，571

Kapitalismus

- und Sexualtheorie 30，34ff，38，51，63ff，71，73，75ff，82ff，87，103ff，108，177，190，223，233f，346，348，407，418，429，484，495f，499，501，504f，507，528，542ff，557，559ff，566，578f

Karezza 556

Kern，sexogenerischer 30，112，128，183f，533，542ff

Kind（heit）9ff，28f，44，47，51f，59，64f，76，79f，91，111ff；117，143，151ff，181ff；233，236，281ff，284ff，290ff，293ff，296ff，301ff，349ff，406，409，411，429，433ff，444，447，452ff，494，496，505，512f，518，525ff，531f.548，551，567，570f，577，579f

s.auch Kinderpornografie；Kindesmissbrauch；Missbrauch，sexueller；Pädosexualität；Sexualität，kindliche

Kinderpornografie 282f，328，345，447，494，518，575

Kindesmissbrauch 11，152，157，282f，296ff，303，317，328，334，345，447，518，556，574f

s.auch Missbrauch，sexueller

Klitoridektomie 193，474

Klitoris 139，158，193，198，237，265，273，286，317，336，377，470ff，475，543，554f

Klonen 44，88，92f，123f，236，429

Koitus s.Geschlechtsverkehr

Konsensmoral，individuell-intime 233，410ff，449，494，511，523

s.auch Moral；Sexualmoral

Konstruktivismus 22，25，127，138，408，428

Kontrasexualität 361

Kontrazeption 203，222，224f，229，445，525f，528

s.auch Empfängnisverhütung；Zeugungsverhütung

Körper

- und Seele 138ff

Krankheitsobjektiv 193ff，564

- und nosomorpher Blick 244，254ff

Kritik

-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2，22，33，38，64ff，73，75，95，408，499，503

- Notwendigkeit und Kritik der Kritik 82ff

Laktaphilie 537

Lean Sexuality 75，189，229，276，450，504ff，527，546

Lebenspartnerschaften 392，404

- gleichgeschlechtliche 10，271，433，512，547

Lesben 319，349，353，363，404，509，512，523，549，571

s.auch Homosexualität，weibliche

Lesbenbewegung 359ff

Lethe 164，217

Libido（sexualis）146f，155f，161，164，176，180，184，226，235，238，277，281，372，407，468，487，489f，577

Liebe 9ff，12f，20，22，24，26，28f，32，34，36f，51ff，55，58，74f，87，97ff，101，104，123，126，128，134，144，146，154，156，163ff，167f，172f，176f，179f，185f，188，192，204，208ff，212，214，216f，221，224，231，248，263，278，280，284，287，295，303，305，307f，325，336，352，371ff，377f，381，396，406，410，412f，416，421f，442f，445f，450ff，457f，467，480ff，494ff，500，506，509，515，520，530f，542，544，547，557f，559ff，566，569，579

- Gemeines Lied 54

- Hohes Lied 52f，371

- Mystifikation 53f，75，83，308f，335，376，445，559ff

- Niederes Lied 52，371

Liebesform（en）9，37，41，51ff，54，127，165，309ff，350，354，358，369，393f，397，399，402ff，414，420，478，530，548，551，560ff，569ff

- affektive oder Triebliebe 560f

- emotional-rationale oder Vernunftliebe 560f

- romantische 53f，403，443，450，488，544，560，570

- vernünftige Drangliebe 565

s.auch Fernliebe；Lovemaps；Polyamorie；Selbstliebe；Verliebtheit

Ligurinus-Schock 463

Liquid Gender 102，124，229，250，257，531，547，549，567，571，582

Liquid Identity 250，571

Liquid Sex 365，567，582

Lovemaps 165

Ludus 54

Lustlosigkeit，sexuelle 63，100，126，430，464，468f，476，484，487f，492，494，547

Lustprinzip 164，173，480

Mania 54

Masochismus 230，254，292，298，344，366ff，371，390，434，476，481

s.auch BDSM；Sadomasochismus

Masturbation 164，196，233，272，285ff，288ff，443，447f，455，472f，488f，516，536

s.auch Onanie；Selbstbefriedigung

Menopause 90，460，463

Metamorphosen 63，185，538，540

- von Leben und Tod 90ff，96，195，235f，309，396

s.auch Hylomatie

Metamour 403

Metrosexuelle 250f，430，533，538f

Missbrauch，sexueller 10，126，159，204，227f，281ff，290f，296ff，303，430，439，445，491，498，517，521，550f

s.auch Gewalt，sexuelle

Mitfreude 403f

Monogamie 26，28ff，43，147，204，221，235，253，364，402，404，421，426，570f，581

- serielle 222，369，402，442，511

Moral 22，28，71，75，86，101，126，146，175，193，200ff，214，222，224，233f，281f，302，329，331，355，377，379，397，406ff，419，428，446，450，499，501f，517f，521，523，534，552，559，578

s.auch Konsensmoral；Sexualmoral

Mundverkehr 205，294，318，335，453，457，475

Nachrichten

- aus der neosexuellen Revolution 509ff

Nekrophilie 309，325，385，571

Neoallianz（en）11，29，155，226，229，347ff，392ff，401ff，439，499，537，540，549，557，568，570

s.auch Neozoophilie；Portalsex；Polyamorie

Neogeschlecht（er）11，29，124，155，226f，229f，236，248f，253，265，385，486，499，533，537，547，549，557，578

s.auch Agender；Bigender；Intergender；Liquid Gender；Transgender

Neoliberalismus 71，75，231，236，341f，500，523，527，544，567f，572

s.auch Revolution，neosexuelle

Neosexualität（en）11，29，33，155，226，229，232，234，249，265，272，306，314，317，319，334，340ff，367，385，402，476，486，499，506，516，527ff，543，549，552f，557，569

- emergente 340ff

- versus Paläosexualität 527ff

s.auch Involution，neosexuelle；Revolution，neosexuelle

Neozoophilie 310，325，392ff，434，510，515，549

Normopathie 354，374，495

Objektiv 12，17，22，26，32ff，37f，53，55，61ff，72，74ff，79f，89，93，95f，99，105，116，125，143，147，177，180，192ff，239，243ff，253，255，259，309，348，429，498f，537，545，563，582

s.auch Krankheitsobjektiv；Operationsobjektiv；Sexualobjektiv

Objektophilie 155，208，307ff，537，549，568，571f

Objektsexualität s.Objektophilie

Ödipuskomplex 27，111，123，146，159，208，233，371，407

Ökonomie s.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 sexuelle 28，223，228

Onanie 85，165，197，286，288，290f，324，339，343，371，385f，443，446，507，537

s.auch Masturbation；Selbstbefriedigung

Online-Sex 340f，344

s.auch E-Sex；Internetsexualität；Portalsex

Operationsobjektiv 189，193ff，242

Oralverkehr s.Mundverkehr

Orgasmus 28，85，100，135，140，166，171，177，188，193，208，211，222ff，229，280，287ff，292，324，329f，338，341，343，368，386ff，444，454f，458f，466ff，470ff，475f，479，486，528，533，541f，546，551，554ff

Orientierung，sexuelle 76，103，156，160，230，239，364，370，404，409，485，490f，548，577

Paarsexualität 452ff

s.auch Beziehungen

Paartherapie 458，579

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PACS）504

Pädophilie 10，284，291，296ff，301ff，317，390，513，518，551

s.auch Pädosexualität

Pädosexualität 37，284，297f，301ff，317，352，385，558

s.auch Pädophilie

Paläosexualität（en）10，228，323，342f，527ff，551f，573

- versus Neosexualität（en）527ff

Pansexuelle 207，370，404

Paraphilie 187，^89，368，385ff，395，457，469，477，537

s.auch Pervers（ion）

Partialtriebe 161，229，306，342，371，457，527，538

Partnerschaft s.Beziehungen

Patriarchalismus 38，40ff，43，48f，51，59，63，65，76，79，103ff，106ff，111f，114ff，121，123，148ff，175，179，186，193，224，245，247，253，276，282，353，362，382，429，451，476，482，499，532f，555，562，564，569

Penis 116，126，139f，149，158，162f，197ff，206f，237，252f，265，267，272ff，278ff，317ff，325，329，342，361，433，470ff，477，487，517，532，547，555，582

Personenstand 121，270f

Pervers（ion）10，13，30，36，143，145f，155f，158ff，173，176，186f，189，193，196，203，205，209，213，224，229f，234f，237，242，254，261，284，298，316f，319，334，354ff，363，366ff，371ff，381ff，385ff，395，400，415，417，421f，424，430，451，456f，469f，475，477，486，496，507，514，527f，537f，549，556，558，578

s.auch Paraphilie

Phallus 116，252，274，278ff，361，555

Phosphodiesterase-Hemmer s.Viagra

Polyamorie 54，135，167，216，229，401ff，539，549f，570

Polysexualität 213，298，413，457，527，538f，549，581

- polysexuelles Vermögen 158，230，457

Pornografie 58，134，187，196，204，213，221，281，325，329f，331ff，341，343，346，379，381，384，389f，416，434，447ff，451，510，520，536f，556，569，572

s.auch Kinderpornografie

Portalsex 229，401ff

s.auch E-Sex；Internetsexualität；Online-Sex

Postgender 123

Postsexualität 325，568f

Präferenzstörung 137，187，189，385

s.auch Paraphilie；Pervers（ion）

Pragma 54

Promiskuität 29f，164，204，369，387，389f，426，443，530

Prostitution 317，341，384，402，413ff，434，517f，521

Prothesen-Sex 272f，569

protogeschlechtlich 123

protopolysexuell 457

protosexuell 38，123

Psychoanalyse 10，12，25，29，37，64，93，103，109ff，120，122，132，152ff，155f，158ff，162ff，170f，176，178ff，182，184，206f，212，221，223，228ff，231ff，234，237，239，252，258ff，284，287，305，324，328，333，354f，367，373ff，379，381ff，387，408，417，465，478，492，563，566，579

- Kritik der Orgasmuslehre 470ff

- und Sexualwissenschaft 80，98，143ff，151ff，237，245，284，287，298，301，303，308，361f，368，422，468，475，578

Psychosexualität 38，111，140，149，151ff，298，471，478

Pubertät 60，111，166，185，229，262，267，287ff，291，303，369，375，386，432，443，447，460f，470f，480，482，489，528

Queerness 215，257，337，361，511，539，549，574，581f

Queer-Theorie 102，124，215，250，361，543，577

Religion 34，71，74，84，86，103，120，148，179，189，231，355，367，382，497，499，503，505，530，541，544，551

Religiosität 46f，109，184，302，414，433，439f，487，521f，525f，550

Reproduktion 163，221，224f，235ff，239，472，474，502，519，543，549

Reproduktionswissenschaft（en）159，242，350，408，484，534

Retrosexuelle 538f

Revolution（en）

- neosexuelle 9，13，29，50，71，73，75，121，124，130，199，215，226ff，238f，245f，255，257，263，272，276，284，309f，316f，319，324，338，340f，344，352f，354，366f，369，385，401f，429，447，459，485f，492，500f，505，509ff，527f，529f，534，536f，544，546f，550f，558，567，577，582

s.auch Involution，neosexuelle；Nachrichten；Neoallianz（en）；Neogeschlecht（er）；Neoliberalismus；Neosexualität（en）

- sexuelle 9f，35，41，56，107f，167，177，204，206，221ff，227，231，234，241，276，278，332，355，363，384，391，401，408，412，422，424，442f，445，449f，454，459，462，482，484f，496，506，528f，532，544，546，550f，557，560，567f，582

Sadismus 229f，298，309，344，366ff，371，378，383f，390，476，481

Sadomasochismus 10，98，100，161f，200，229f，272，296，318f，366ff，372，385，387，390，430，454，457，511，538，549，566

s.auch BDSM；Masochismus

Scham（losigkeit）12，36，51，53，70，148，177，203，211f，281，292，299，324，336，342，344，373，394，399，424，426，458，493，514，530，552，565，570，582

Schwangerschaft 90f，111，185，203，225，301，305，325，343，354，379，421，435，445，449，451，479，522ff，540，542f，554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s.Abtreibung

Schwulenbewegung s.Homosexualität，männliche

Selbstbefriedigung 111，164，285f，343，354，389，443，446，449，454，464，466，486ff，506f，527，530，548

s.auch Masturbation；Onanie

Selbstliebe 229，446，450，504f，507，548，551，553，562f，580

s.auch Selfsex

Selfgender 155，229，238，343，507，527，582

Selfsex 73，155，222，229，238，276，342f，504ff，527，530，548，580，582

Sexarbeit s.Prostitution

Sexindustrie 272，329f，334f，414

Sexismus 41，51，63f，75ff，79，101，103，114，116，227，281，429，468，550，562，567，569，574，577

- patriarchaler 106ff

Sexkino 338f，344，384，389，414

Sexmaps 59，165

Sexomation 58

Sexose 390

Sexshop 272f，329ff，336，555

Sexting 447，571

Sexualaufklärung s.Aufklärung，sexuelle

Sexualchirurgie s.Intimchirurgie

Sexualdelinquenz s.Delinquenz，sexuelle；Forensik

Sexualdispositiv 33，35，77，324

s.auch Dispositiv

Sexualethnologie 27f，214，289

Sexualfantasien s.Fantasien，sexuelle

Sexualforensik s.Delinquenz，sexuelle；Forensik

Sexualform（en）9，12，34ff，40f，75，77，88，97，105，125，156，160，185，206，208，211，213，215，226，229，231，235，237，246，252，276，286，298，301f，316，330，341，353ff，376，385f，388，405，414ff，429，443，446，454，486，496，504ff，528，531，546，548，557f，561，569，573，577，579

Sexualfragmente 228，316ff，569

Sexualhormone 30，38，60，91，100，111，132，136，139，141，171，182，212，254，269f，460f，463，490，503，545

Sexualindividualität 36，57

s.auch 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Sexualperson（alität）

Sexualisierung 10，41，153，163，204，222，232，296f，305，388f，401，456，492，554

Sexualität（en）

- allgemein 27ff，61ff，191f，205ff，371ff，480ff

- als gesellschaftlicher Begriff 24ff

- Alte s.Alterssexualität

- diskursive vs.nichtdiskursive 33，430f，442

- Gesundheitsgewinn 465f

- infantile s.Sexualität，kindliche

- Jugendliche s.Jugendsexualität

- kategoriale 38，133，205

- kindliche 151ff，154，157f，165，209，231，284ff，287，290ff，293ff，296ff，301ff，577

- Kommerzialisierung 12，71，77，221，228，309，316f，323，329，492，528，553，569

s.auch Shopsex

- körperliche Belastung 465f

- Paare s.Paarsexualität

- Wortgeschichte 38f，132

- und gegenwärtige Gesellschaft 492ff，509ff，521fF，527ff，546ff，566ff

Sexualmedizin 11，13，141，161，222，229，345，387，464，467ff，534，537

- Kritik der Fachsprache

s.auch Sexualphysiologie；Sexualtherapie

Sexualmoral 222f，227，230f，287，290，297，299，316，323，328，371，380，382，402f，413ff，422，447，525，529，537f，546，551f，562，569，575，s.auch Konsensmoral；Moral

Sexualobjektiv 32ff，37，77，105

s.auch Krankheitsobjektiv；Operationsobjektiv

Sexualökonomie s.Ökonomie，sexuelle

Sexualpause 463

Sexualperson（alität）13，55ff，161，410，494，551，569，580

s.auch 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Sexualindividualität

Sexualphysiologie 28，235，464，471f，480，541

Sexualrest，irreduzibler 191f，205，543

Sexualstörungen 196，228，464，467，479

s.auch Impotenz

Sexualsubjekt 55f，212，305，412，420，422，493

Sexualsucht s.Süchtigkeit，sexuelle

Sexualtheorie

- Aporien 12，15ff，55，125，260，534

- Begriffe 19ff，24ff，32ff

- paradoxale Verhältnisse 492ff

- Prämissen 12，57，98，125ff，171，568

- und Gesellschaft 24ff，27ff，32f，34ff，61ff

Sexualtherapie 215，477，537

s.auch Paartherapie

Sexualtrieb 13，20，22，25，32，34，36ff，40，44，57ff，99，101，105，111，127f，143ff，152ff，167ff，187ff，205，210f，215，228ff，237，246，308，373，426，443f，475，481ff，487ff，551，563，566，574

Sexualwissenschaft

- affirmative 125f，201，214，217，239

- allgemein 10ff，37，63f，80，97，99ff，121，124，127f，131f，139，141，143f，146，153f，156f，162，166，180，187，189f，191，193，201，203f，212，222，237，266，287f，308，329，347，386，534，573

- als gesellschaftliche Einrichtung 200ff

- als Wissenschaft 187ff

- empirische 57，442，450

- fortschrittliche 100，125f，137

- kxitische 10，19，35，38，57，59，84f，100，103ff，124，125ff，128，130，141，143ff，151，179ff，185f，187ff，191f，200f，204，214f，341，361，421，425，428，431，442，450，457，499，503，534，556，558，578，581

- paradoxaler Status 97ff

- Prämissen und Aporien 19ff，125ff

- und Feminismus 102ff

Sexualzwang 390

Sexus potior 48ff

- sequior 48ff

Sexwelle 35，222，229

Shopsex 329ff

s.auch Kommerzialisierung

Silver Sex s.Alterssexualität

Singles 10，348，350，352，401，434，452f，464

Skripte，sexuelle 59，165f，376，448

Sodomie 331，384f，390，476

Solosex 340，343，506，536f

s.auch Selbstbefriedigung

Somatologie 38，135f，140，171，185，196，239，241，256

Storge 54

Süchtigkeit，sexuelle 11，127，226，228，298，302，348，367，379，387ff，390，424，430，449，469，549，577

Systemtheorie 22，62，73，90，95，215，232，259，262

Thanatos 147，155，164，173，188

Transgender 76，124，141，213，229，247，250，257，292，337，361，385，495，511f，531，547，549，571，578

Transidente 142，247，512

Transsexualismus 136，155，242f，244f，247，252，254ff，258ff，265，495，534

Transsexuelle 10f，121f，124，127，142，161，239，241ff，244，246f，248f，250ff，254ff，258ff，292，318f，328，337，348，374，451，495，511，513，547

Transvestiten 292，318，383，549

Transvestitismus 261，298，390

Trauma（tisierung）153，204，209，212，262，264f，283f，295ff，302ff，305，314，333，368，383，439，479，487，511，529，543，564

s.auch Gewalt，sexuelle；Missbrauch，sexueller

Trieb s.Sexualtrieb

Triebschicksal 59，165，184，263，353

Trigamie 571

Trisexualität 200，213，216，430

Übergriffe，sexuelle 157，283，293，296ff，343，413，417，445，479，512，577

s.auch Gewalt，sexuelle；Missbrauch，sexueller；Trauma（tisierung）

Unigender 250

Unisex 106，183，538

Vagina 116，158，162，198f，206f，248，253，273，322f，329，435，453，463，471ff，491，554f，582

Venuslippen 197f，467，473，554f

Verliebtheit 52，78，213，224，308，310f，313，376，386，430，458，552，556，562，564

s.auch Liebe；Liebesform（en）

Verstofflichung 12，20，30，78，92，95，101，105，114f，126，179，185，188，195，198，232，283，294，336，382，426，500，505，572ff

Viagra 126，134，196，198，204，228，274ff，278，280，430，476

Virginität 221，233，471，571

Vorlust 105，480

Voyeurismus 161，185，230，298，334，342，371，390，549

Wissen

- als gesellschaftlicher Fetisch 86ff

Wohllust 189，229，284ff，442ff，482，527，529f，548

Wollust 39，189，229，284，286，406，434，444，450，482，529f

Zeitalter，sexuelles 153f，207，233，325，330，342f，485f，566ff

Zeugungsverhütung 402，445，554

s.auch Empfängnisverhütung；Kontrazeption

Zibet 274

Zissexualismus 213，244

Zissexuelle 122，241，243，244ff，252f，539，547

Zivilpakt s.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

Zonen，erogene 153，335，470

Zwitter 117，261，263，265

s.auch Hermaphrodit（ismus）；Intergender；Intergeschlechtlic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全2册/（德）福尔克马·西古希著；（德）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201-1770-8

Ⅰ.①性… Ⅱ.①福…②王… Ⅲ.①性学-研究②性行为-研究 Ⅳ.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0185号

性欲和性行为（上、下册）

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

著者/〔德〕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

译者/〔德〕王旭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责任编辑/沈艺 黄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8.5 字数：668千字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770-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2223号

定价/138.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書 / 2018

〔德〕福尔克马·西古希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 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

〔德〕克里斯托弗·诺恩 /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古希腊罗马的开端到 20 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世界大战的时代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英〕卡丽·古布森 / 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现在的加勒比海史

〔德〕雅恩·克诺普夫 / 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英〕亚当·查莫斯基 / 幻影恐惧：政治偏执狂与现代国家的创建

〔波兰〕安娜·比科特 / 犯罪与沉默：直击战时犹太大屠杀

〔日〕伊藤之雄 / 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的男人

〔美〕玛雅·贾萨诺夫 /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康拉德

〔英〕罗伯特·欧文 / 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

〔美〕尼古拉斯·雷诺兹 /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

〔英〕理查德·伯克 / 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

〔德〕沃尔弗拉姆·希曼 / 梅特涅：战略家、空想家

〔德〕约尔格·劳斯特 / 世界的神采：基督教文化史

〔德〕沃尔夫冈·莱因哈德 / 世界的征服：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

〔美〕马克·劳伦斯·希拉德 / 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美〕约翰·A. 法雷尔 / 理查德·尼克松：人生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redacted]

索·恩
THORN BIRD

SEXUALITÄTEN:
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 “男女间的交媾历来就在自然地进行着”这句话，是一种误导。

/ 如果把性作为意识形态，那么对于健康和快乐的性生活来说，意识形态恰恰就是它的障碍。

/ 我们的性时代只是开始于几百年前，因此也能够再次消失。

/ “尽管他并没有发明‘性’，但属于那些使‘性’高雅地登上科学讲坛的科学家之一。”——黑森州广播电台

/ “西古希向我们展现了陷在神秘和个体感觉夹缝之间的性科学，怎样才能打开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法兰克福汇报》

/ “他的研究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美。”——《时代周报》

译 歌德学院（中国）翻译资助计划

索·恩 THORN BIRD
忘 掉 地 平 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1770-8
9 787520 117708 >
定价：138.00 元（上、下册）

